“亲历中国”系列丛书

（套装书共9册）

全景再现晚清中国的政治风云

读懂了这套书，才能读懂晚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亲历中国”系列丛书

（套装书共9册）

全景再现晚清中国的政治风云

读懂了这套书，才能读懂晚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总目录

慈禧太后
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李鸿章回忆录
中国人的性格

慈禧太后

“亲历中国”第二辑

解读“无冕女皇”的传奇人生
全景再现晚清中国的政治风云

[英]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著 曹磊 译



Philip W. Sergeant

Empress Dowager Cix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LTD

版权信息

书名：慈禧太后

作者：（英）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55941680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叶赫那拉的身世
第二章 中国和西方
第三章 咸丰皇帝
第四章 慈禧涉足政坛
第五章 垂帘听政和李鸿章的崛起
第六章 慈禧的宗教信仰
第七章 同治皇帝亲政
第八章 操控皇帝的慈禧
第九章 慈禧独揽大权
第十章 慈禧再次隐退
第十一章 光绪亲政周年庆典
第十二章 光绪维新
第十三章 顽固派的反击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
第十五章 慈禧和义和团
第十六章 向世界宣战
第十七章 返回北京
第十八章 作为维新派的晚年慈禧
第十九章 慈禧的最后时光
第二十章 曲终人散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慈禧太后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前言

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就职《香港日报》期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达到顶峰。当时的情况使得所有在华西方记者和普通人理所当然地赋予慈禧太后诸如“嗜血的老泼妇”、“冷酷的巫婆”之类的蔑称。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某位美国传教士(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在这位老太后率领大清朝廷返回北京后，将她的名字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刚刚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认为她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3位女性君主。话虽如此，鉴于那段时间的极端情况，西方人还是更愿意把慈禧太后跟耶洗别[1]、麦瑟琳娜[2]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那位美国传教士对她的溢美之词其实很难获得普遍接受。西方人对慈禧太后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那些受邀带着子女访问紫禁城的驻华公使夫人和其他名媛贵妇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强烈谴责，特别是当这些妇孺从那个“双手沾满西方儿童鲜血的老巫婆”手里接受礼物的时候。

所幸，从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慈禧太后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乃至她去世后的两年内，西方人转而开始发自内心地称颂、赞美这位老太后。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人对慈禧太后的好感是最突出的。与此同时，欧洲旧大陆对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也可谓冰火两重天。近年来，某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向西方世界介绍慈禧太后的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她的偏见，某些人却在逐渐改变着对她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6年当中，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挽回了曾经因为支持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还成功将自己转化为颇具维新色彩的人物，从而赢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其实很难判断那些被西方中国历史爱好者描述出来的慈禧太后形象究竟有几分可信度。

正如本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其实也无法对慈禧太后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陈述那些事实。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主要是出自对那些慈禧太后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品行、能力的钦佩。仅仅通过本书当中那些蹩脚的中文地名、人名的英文拼法，专业读者就可以发现作者其实并非货真价实的汉学家，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软肋”。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将本书的潜在读者定位于那些最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我相信，这些普通读者起码儿不会吹毛求疵地计较“慈禧”两个字到底应该拼成tzuhsi还是tzehi。

这里，我要向派克教授、贾尔斯教授，以及威海卫总督史超活·骆克[3]等人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及时为作者解答了种种疑问。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此时身在威海卫的庄士敦[4]。庄士敦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慈禧太后书法作品的碑刻拓片，那是他在陕西游历时偶然获得的。不仅如此，庄士敦先生滞留香港期间还向我介绍了大量与中国风物有关的知识，最终激发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我还要感谢《香港日报》的股东沃伦·史密斯先生，他慷慨地允许我查阅保存在伦敦办公室中的大量相关资料。感谢坎宁安先生，《香港日报》的前任经理，他为我提供了李鸿章的自画像，以及康有为的若干照片。感谢雷恩斯夫人，她将自己收藏的两枚已故慈禧太后的印章贡献出来，供我欣赏、参考。

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伦敦

1910年9月

【注释】

[1] Jezebel，出自《旧约·列王记》，耶洗别是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亚哈王的妻子，亚哈王在位年间，她大建崇拜异教神的庙宇，杀害上帝的众先知，迫害著名先知以利亚，并欲置之于死地。西方文化中，耶洗别是淫荡、恶毒女人的代称。

[2] Messalina，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妻子，这个人在西方是女色情狂的代称。

[3] James Stewart Lockhart，中文名字叫骆仁廷，苏格兰人，汉学家，供职英国外交部，一生主要在中国活动，曾参与香港新界划界，1902年起任威海卫殖民总督。

[4]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他曾在威海卫英国殖民机构任职。

第一章 叶赫那拉的身世

慈禧太后可能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1835年下半年，慈禧生于北京，也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她的父亲名叫“惠征”[1]，是位八旗军官。慈禧的家庭属于著名的满洲那拉家族，这个家族已经前后延续了200多年。除了慈禧这位日后鼎鼎大名的女儿，惠征还有几个儿子，他们的家庭当年算不上富裕。满族人都有自己隶属的旗，八旗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也就是明代末期，由努尔哈赤创立的。作为旗人，惠征不需要工作，特别是不需要从事那些体力劳动，就可以从自己隶属的旗获得粮饷。在某些西方作者笔下，惠征被描述为隶属满洲正白旗相当于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个人物，西方人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本书作者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慈禧是惠征女儿。话虽如此，关于慈禧太后的出身，西方世界还流行着一种获得普遍接受而且还被作家们反复提及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当初的慈禧其实是个广州女孩，并非满族，而是汉人。只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慈禧被卖到了满族家庭，然后又以满族人的身份，通过皇帝的选秀女活动，最终来到北京定居。类似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按照大清帝国的选秀制度，能够进入皇宫的秀女必须是纯粹的满族人，而且满汉间严格禁止通婚。也有人辩解说慈禧虽然本身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被满族家庭收养，所以就变成了满族人。这样的说法也没什么根据。要知道，在重男轻女的大清帝国，收养女孩的事儿非常少见。即便某个满族家庭打算收养孩子，他们也只会在同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更何况，即便慈禧被满族家庭收养过，也无法改变她原本的汉族身份，因此不可能获得选秀女的资格。

如果说将慈禧描述为汉族人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么把她的祖父认定为欧洲人的说法则荒谬至极。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居然还有人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慈禧血统的古怪说法，无论是将她描述为汉族人后裔，还是欧洲人后裔，都有其特定原因，因为这位强势的女性的确跟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那些八旗子弟存在太多不同点。众所周知，虽然自1902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旗人给人造成的印象仍然是懒散、无知、骄奢淫逸，跟他们那些曾经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荒野上，靠渔猎为生的祖先们相比简直就是天渊之别，类似慈禧这样的人则属于其中的例外。在挽救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方面，慈禧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后者可能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也可能是最英明的皇帝，绝对担得起人们送给他的那些“明君”“圣主”之类的美誉。作为乾隆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实在乏善可陈。要知道，一个始终生活在温柔乡里的民族很难保持住自己的血性。除了秉性、做派，慈禧的外貌也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人认为她的面孔接近欧洲人，至少跟标准的满族人有所区别，然而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慈禧太后由内到外都是标准的满族妇女。



咸丰皇帝

对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本书一概不予采信，作者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认定慈禧就是惠征的女儿。慈禧娘家的姓叫“叶赫那拉”，光绪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慈禧的童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基本的常识。身在北京的满族妇女，即便本身地位不高，相比汉族妇女，也仍然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早在当今的妇女解放潮流爆发前，满族妇女就可以随意上街溜达，有时还可以自己步行去买东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禧的童年时代相当宽松自由。就像西方人经常在中国见到的那些孩子们一样，童年时代的慈禧可以自由自在地浪迹街头巷尾，背上往往还要背着个年

龄更小的弟弟或妹妹。遗憾的是，由于慈禧太后父亲的家境并不特别富裕，这位将要主宰紫禁城、高居万人之上的贵妇人的童年其实也很清贫，甚至还必须分担某些日常的家务劳动。自由却又清贫的童年锻炼了慈禧的体格，也增长了她的智慧。至于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断言， 15或16岁时以秀女身份走进紫禁城的慈禧基本是个文盲，她的那点儿学问是进了皇宫以后才学到的。在此之前，如果说慈禧读过什么书，那恐怕也只有《孝经》而已。《孝经》是孔子的著作，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却往往得不到西方学者重视，被认为是部失败或者平庸的作品。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孝经》可能都是众多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启蒙读物，无论他们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的生命周期几乎是跟东西方世界相互接触、交恶，直至爆发冲突的过程重合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关于慈禧早年经历的各种史料实在太过稀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的我们或许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命中注定要跟洋人斗智斗勇一辈子的老太后最初听说这些来自西方的“蛮夷”时，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感受。进行这样的内心窥探应该是件非常有意思事，只可惜，相关史料其实根本就找不到。由于史料局限，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直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跟着丈夫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前，慈禧是否知道洋人的存在。众所周知，当时的满清朝廷异常封闭、无知，即便地位高如慈禧太后，其实也没太多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晚年时代的慈禧虽然已经习惯了跟洋人迎来送往、虚与委蛇，却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过年轻时的自己究竟如何知道这些“蛮夷”的存在，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话虽如此，最初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大多对洋人抱有鄙视乃至敌意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大清朝廷内部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洋人就是茹毛饮血的牲口，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年轻时的慈禧大概也不能免俗。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免伤和气的考虑，暮年的她才不愿向洋人们提及这些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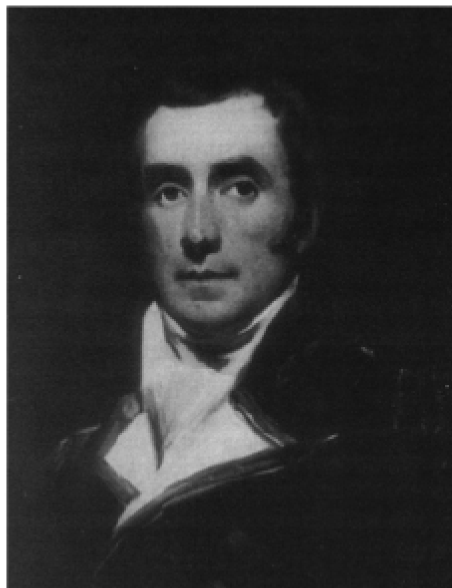
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慈禧太后生于1834年11月。此前不到1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历史，特别是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交往历史发生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件事儿发生在慈禧出生前，年幼的她当然无需为此负责，并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从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的慈禧却必须面对以这件事为开端的一系列麻烦。1834年统治中国的是大清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这位皇帝17世纪中期登上宝座，当时已经在位14年了。道光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儿子。这位皇帝死后虽然照例被赋予了各种荣誉称号，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肖子”。道光皇帝为人懒散、放荡、贪婪、暴虐，对他的臣民们而言，也算不上是个好皇帝。39岁那年，道光皇帝被确认为太子。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奖赏，主要是因为道光在1813年发生的刺杀皇帝阴谋中救了父亲嘉庆的命[2]，登上皇位的道光很快就表现出与此前几位皇帝明显的不同之处，

他曾下定决心整治自乾隆皇帝统治晚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遗憾的是，国家和个人生活方面连续发生的几次不幸事件极大挫伤了道光皇帝的锐气。道光皇帝的皇后很早就去世了，他的长子年仅20岁就染上了鸦片烟瘾。不仅如此，从他父亲统治时代晚期就开始逐渐积累的国内矛盾此时也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断爆发的反抗和起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这之后，就在慈禧太后出生的那年，洋人们又开始找麻烦了。

1834年4月，查理一世国王与东印度公司定立的合同已经维持了200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对华贸易规模水涨船高，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垄断性优势。200年后，英国政府感觉有必要修改当初的条文，由自己直接控制英国与广州间的贸易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广州是大清朝廷指定的唯一与西方商人进行合法贸易活动的对外口岸。1834年，律劳卑勋爵[3]由英国皇室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同年7月，他在前往广州途中来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暂时停留。按照从巴麦尊勋爵[4]那里获得的指令，律劳卑勋爵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点:①尝试将中英贸易由广州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②尝试直接跟身在北京的清廷建立外交联系。律劳卑勋爵还被告知说，这样的努力可能毫无效果，但起码儿可以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william iv)与大清帝国建立最友善外交关系的诚意，同时还要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愿意采取任何配合手段，保证和促进中英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政府的想法看似非常完美，却从根儿上就错了。这是中英交往过程中英国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以后的日子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会犯上无数次。英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做决定前没能对形势，特别是大清朝廷方面的意图作出准确评估。律劳卑勋爵抵达广州沿海水域时，大清朝廷并没有就此事得到事先通知，更不知道英国政府出于保护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地位的需要，已经任命他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比英国政府更早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在他还没动身离开英国前，就曾要求政府将相关消息提前知会远在北京，向来以保守、自大闻名于世的大清朝廷。对此，巴麦尊勋爵却只是授意律劳卑勋爵给两广总督写封信，简单介绍下情况。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授

予律劳卑勋爵的身份证明只是由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执照，两广总督后来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东西。



英国外交官律劳卑

在律劳卑勋爵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两广卢总督(统领广东、广西两省的地方官)[5]被形容为“放肆的野蛮人”。这位总督是个典型的大清官僚，他傲慢、顽固、极端保守，而且把别的其他国家都看成没开化的原始部落。由于律劳卑勋爵自行其是地来到广州，又没事先打招呼，卢总督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了洋人的“奸细”。于是，他命令广州商行[6]，也就是当地唯一获准跟洋人贸易的商人组织成立个代表团，前往澳门会见滞留在那儿的律劳卑勋爵，通知他必须继续留在那里，直到获得准许，才能动身前往广州。问题在于，这个代表团的动作太慢。他们抵达澳门时，律劳卑勋爵已经到了位于广州的英商会馆，同时又给卢总督写了封信。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位于广州附近沙面岛的英国领事馆、商会是那以后30年才出现的。

卢总督坚决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他给广州的中国商人们发了份告示，抱怨“洋人奸细”不懂礼数，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同时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律劳卑勋爵的信，还将命令广州的中国商人们降低针对英商

的贸易额度。由于英国政府的失误，律劳卑勋爵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慌乱中，他犯下了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再加上卢总督本身的强硬态度，最终让所有滞留广州的英国人，乃至所有滞留当地的西方人都陷入了异常危险的境地。针对卢总督的告示，律劳卑勋爵写了份“反告示”。这份“反告示”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通报整个广州城。在这份“反告示”中，律劳卑勋爵谴责了卢总督的无知和顽固，声称这位总督破坏中英贸易的妄想就跟阻断广州河[7]的水流一样不可能。卢总督对此的答复是立刻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贸易，同时驱逐当时困在英商会馆里跟坐牢一样的律劳卑勋爵。中英两国的冲突由此升级，两艘英国战舰奉命上溯广州河抵达黄埔岛周边。上溯过程中，英军战舰跟清军炮台发生交火。另外，还有一批英国水兵被挑选出来登陆上岸，承担英国商会的守卫工作。



清代广州街景

就在这时，被中英冲突搞得心力交瘁的律劳卑勋爵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834年9月底，他返回了澳门。同年10月11日，律劳卑勋爵这位中英两国因误会而导致冲突所造成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就当初巴

麦尊勋爵设定的目标而言，律劳卑勋爵基本一无所获。直到临终，他的信也没能送到卢总督手里。不仅如此，律劳卑勋爵的主动离开还被卢总督视为与“蛮夷”斗智斗勇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心花怒放的他最终开恩，恢复了广州当地的中英贸易。

从当年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律劳卑勋爵的来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根本微不足道。除了来自卢总督的简要通报，清廷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份简报中，卢总督将此次事件描述为某位试图挑战天朝权威的部落首领已经因自己的无礼遭到了教训，嚣张气焰大有收敛。当年的大清朝廷和卢总督根本没有料到，发生在1834年的这件事为随后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从那以后，大清帝国连续遭受苦难和屈辱，旧有的观念和意识逐渐变得一钱不值，整个国家也被排斥到了文明世界以外。

【注释】

[1] 叶赫那拉·惠征，1805—1853，原隶镶蓝旗，后被慈禧升至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监生出身，历任文选司主事、验封司员外郎、保源局监督、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广太道等职。咸丰三年被革职，病死江苏镇江。同治元年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端恪”。

[2] 指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白莲教攻打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当时其实不在宫中，未来的道光皇帝以皇子身份带人击退了白莲教的进攻，因而得到父亲嘉奖，作者此处说法不准确。

[3]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年10月13日-1834年10月11日，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皇家海军军官， 1834年奉命出任首任驻华商务总监。这位英国外交官1834年试图前往广州履职时，遭到满清地方官员严词拒绝，中英两国因此爆发了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史称“律劳卑事件”。作者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4] lord Palmerston，巴麦尊是个贵族封号，这里指第3代巴麦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这个人在1830至1834、1835至1841、1846至1851三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先后参与了2次鸦片战争的决策和实施。

[5] 即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卢坤， 1772—1835，字静之，号厚山，顺天府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广东惠潮嘉道、山东兖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6] 即十三行。

[7] 即珠江。

第二章 中国和西方

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对发生在慈禧出生前的“律劳卑事件”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那么几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此时的慈禧已经是个小姑娘。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仍然一无所知。就在此时，这个未来即将由慈禧主宰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爆发了第1场战争[1]，并因此签订条约，将香港割让给战争胜利者，除广州外进一步开放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同时还要在外交场合赋予英国官员与大清官员同等地位。不仅如此，大清帝国还被迫拿出2100万银元，作为支付给被自己惹恼了的西方列强的补偿。

1839年年底，这场战争肇始于广州，最终在1842年8月终结于南京，后来被世人称为“鸦片战争”。从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鸦片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原因，尽管为此签订的《南京条约》根本就没提鸦片的事儿;从英国的角度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则完全是由于大清帝国的自负。对于没能及时终止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的英国政府而言，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确是个错误。从1773年起，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这之后，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递增，最终达到近期的每年200万磅的规模[2]。虽然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和以后的大清朝廷从没放弃过针对这桩买卖的巨额税收，却拒绝为允许大量进口鸦片的事实承担责任。类似这样“当婊子，立牌坊”的事，对大清朝廷来说也不新鲜。事实上，就在清廷乃至大清各省地方官员口袋里装满了通过鸦片走私获得的黑钱同时，他们又在高声谴责外国人从事的肮脏勾当，声称鸦片已经毒害了大清帝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无数子民。有鉴于此，清廷针对鸦片发动的这场“圣战”的真诚性非常值得怀疑。

从英国的角度来说，1839至1842年的这场战争以鸦片为导火索是非常偶然的，即便没有鸦片问题存在，战争同样不可避免。中英双方冲突的的真正根源在于英国希望谋求对华贸易的合法性，纠正大清朝廷当年对于西方国家的不公正态度。只不过异常突出的鸦片贸易非常不幸地在战争爆发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来的中英《南京条约》还专门开列了针对广州禁烟活动的赔偿款项。《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华鸦片出口贸易，大清朝廷也始终没有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这种暧昧的状态维持了将近20年。这个过程中，鸦片走私活动持续增长，不但给广州当地造成了巨大麻烦，而且反复充当着中国人与西方人矛盾冲突的由头。



吸食鸦片的男人



吸食鸦片的汉族贵妇

自从跟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以来，古老的中国始终保持着某种敌意和戒备的态度。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那位著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以及真正让中国深入了解了西方世界的葡萄牙探险家。历史上的葡萄牙人贪婪、阴险，四处烧杀淫掠，足以让西方世界蒙羞。作为葡萄牙人的邻居，西班牙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西班牙人跟中国人发生冲突最早是在1603年，也就是前者占领马尼拉大概30年后。这年，西班牙人屠杀了菲律宾当地的20000中国移民[3]。当时统治中国的皇帝被国家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对西班牙人的行为采取抗议或报复行动。不过从那以后，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敌意维持了很长时间，因此还引发了不少小规模冲突。相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行为多少还算文明。17世纪早期，他们占领了澎湖列岛，对当地的土著居民来了个斩草除根。那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澎湖列岛，转而盘踞中国台湾。要不是后来遭到“国姓爷[4]”的驱逐，他们至今恐怕还会赖在那里不走。

英国与中国最初的接触同样伴随着暴力。想当年，威尔德船长奉命率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次造访广州。他的船队沿着广州河上溯，占领了虎门炮台[5]，从那里以后，这座炮台就经常沦为英国海军的囊中物。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尽管冲突不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商人最终还是在广州站住了脚。在随后的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

期，为了利益，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等西方商人在这块土地上不断跟当地人勾心斗角，更有甚者，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欧美水手们还会对他们拔刀相向。面对这一切问题，大清帝国的衙门几乎无能为力。本书前面曾经说过，大清朝廷对待外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让他们享受到与本国百姓相同的待遇。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外国人受到的优待要比本国百姓多得多。比较而言，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在中国人当中的声誉算是比较好的。归功于对待国内华人相对友善的态度，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总的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就是个悲剧。大清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它的浅薄、无知和盲目自信，话说回来，西方国家表现得其实也不怎么样，以至于无法赢得对方的信任。大清帝国视西方人为“蛮夷”，西方人反唇相讥称他们为“野蛮人”，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努力来消除误解。不仅如此，正如很多持中立立场的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西方还对中国做出了许多非常不讲理的事情，让早已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

早期来华西方人犯下的种种恶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隔阂。与此前的很多朝代不同，大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对外国人奉行更加保守的政策，将中外贸易的口岸仅仅局限于广州。随着时间流逝，大清皇帝的排外心理也变得越来越强。康熙皇帝尚还可以允许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员在位于北京的教堂接受西方传教士的洗礼。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捣毁了中国各地300多座基督教堂，驱逐了大批西方传教士，只留下少数几个听他话的人。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至于随后即位的嘉庆皇帝，他比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做得更加极端，以至于将北京城里所有信奉基督教的人[6]都赶了出去。道光皇帝时代，被驱逐的对象从西方教士扩展到所有在华外国人，西方商人也被“一视同仁”。受制于越来越偏激、狭隘的排外政策，大清帝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几乎都被切断了。如果说曾经的大清朝廷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偶尔还能向外伸伸触角，那么到了道光皇帝执政的时代，它就彻底缩回壳儿里不再动了。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把这个古老帝国重新从“壳儿”里拉出来，西方人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却适得其反。

【注释】

[1] 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2] 1磅约等于0. 453592千克。

[3] 1603年，西班牙人误以为大明帝国要攻占菲律宾，为了避免出现里应外合的情况，他们在几天时间里屠杀了当地超过25000名华人。事后，西班牙曾派使者向明朝皇帝谢罪。大明帝国当时已然风雨飘摇，无暇顾及海外，所以这件事就被轻易放过去了。

[4] Koshinga，郑成功曾被南明皇帝赐姓为“朱”，因此又称“国姓爷”。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年后病逝，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承袭封号，统称为“国姓爷”。本书作者这里指的是郑成功。

[5] 明朝末年，也就是崇祯帝统治时期，英国试图参与被葡萄牙垄断的对华贸易，葡萄牙也打算借助英国的力量制衡竞争对手荷兰，双方于是在1635年达成协议，葡萄牙允许英国利用澳门为基地，与中国进行接触。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尔德为指挥官，率领6艘舰船前往中国。1637年6月27日，英国船队抵达澳门，葡萄牙人却突然变卦，不愿意英国人在对华贸易方面分一杯羹。威尔德只得独自采取行动。8月8日，英国船队来到广州虎门海面寻衅，与驻守当地的明军爆发冲突，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同年11月12日，双方各有胜负。此时的英国人实力有限，感觉再打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请出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调停。11月22日，广州当地英国商人同意为此赔偿中国白银2800两。11月30日，威尔德向广州当地明朝官员提交了一份致歉书。中英两国的首次冲突至此结束。

[6] 作者的意思是说被驱逐的不仅有西方传教士，还包括中国教民。

第三章 咸丰皇帝

继承道光皇帝大统的是他的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伊始，他就解决了父亲留下的老臣，换上了能够秉承自己意志的亲信。这群亲信中的首领是咸丰的侄子怡亲王载垣[1]，他的手下包括乾隆皇帝留下的血脉郑亲王[2]以及满族大臣肃顺[3]。肃顺这个人冷酷又贪婪，对百姓异常苛刻。咸丰提携起来的新人依旧怀有强烈的排外心里，而且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无知、狭隘。这些人把持着朝廷，大清帝国变得愈发孤立，就连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少得可怜的些许对外交往活动也被完全禁止了。

按照中国传统，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书，谦虚地说些“自己无才无德，继承皇位不能造福百姓”之类的客套话。事实证明，他真的给自己的子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咸丰刚刚坐上宝座，就下令关闭了福州的通商口岸，这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与此同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四川还发生了地震，太平军也在两广地区揭竿而起。当然，所有这些不幸不能完全由咸丰负责，不过如果这位皇帝真是一位有道明君的话，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最起码儿，他可以对太平军进行更加坚决的镇压，消除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最大隐患。尽管咸丰本身可能并没有他在自谦诏书里承认的种种缺陷，然而他的统治真的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最终使得大清帝国内外都无法继续保持和平状态。平心而论，将这些错误全部算到咸丰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其实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小集团，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咸丰难辞其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咸丰在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其实无足轻

重，然而无足轻重的咸丰却做了件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把一位自乾隆皇帝以来最铁腕的统治者推上了历史舞台。将这个决策的做出全部归因于咸丰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个站在前台的执行者，年轻的慈禧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吸引了皇帝注意，博得了皇帝的欢心，进而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前面所说，满族女孩慈禧在北京自己父亲家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成人。咸丰登基时，慈禧大概刚满15岁。按照八旗制度，她被带到专门的负责人那里，登记了姓名、年龄、相貌、出身和才艺。需要说明的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居然是税务部门。经过这个部门的登记认可，满族女孩就具备了进宫被皇帝挑选的资格，成了未来皇后、嫔妃或宫女的候选人。慈禧当时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她的美貌，因此有幸进了皇宫，成了皇帝的妃子，也就是妾。正如许多关注中国题材的作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妾”这个字眼儿在中国并没有侮辱的含义，尤其是对相当于皇帝的妾的嫔妃而言更是如此。在类似大清帝国这样允许一夫多妻的国家，给人当妾可能也是个不错的出路。与此同时，正妻是可以享受多种特权的，例如她丈夫的孩子即便由妾所生，也要管这位正妻叫母亲。相比普通女性，身为嫔妃，或者说皇帝的妾，可能还要做出更多牺牲。女人一旦被选为嫔妃，便意味着终生无法离开皇宫，变相地成了囚徒。这些成了囚徒的女人如果运气不好或相貌不出众，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的面儿。即便她运气足够好，得到皇帝的青睐，也要终生担惊受怕，因为皇宫永远都是阴谋和邪恶的集散地，任何无法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最终都只能万劫不复。话虽如此，能够有幸侍奉皇帝，仍是许多女孩最大的梦想。



咸丰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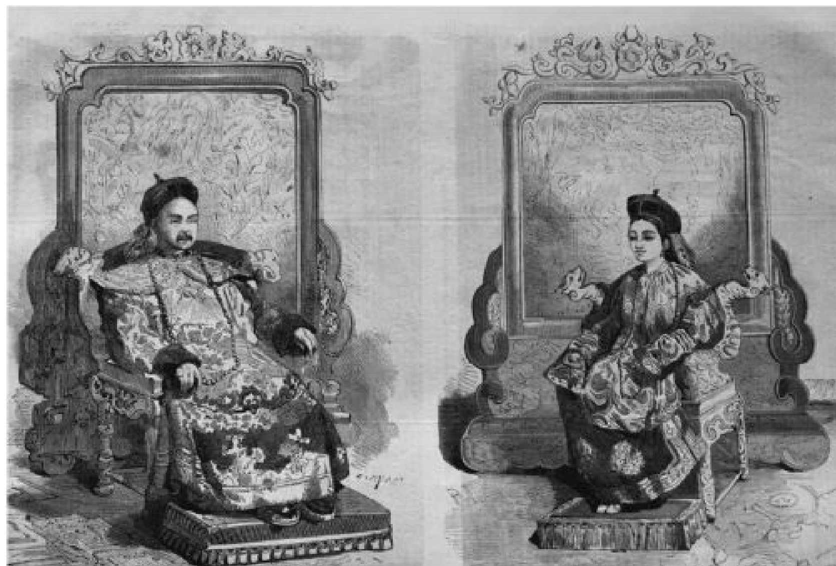
慈禧入宫的具体日期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入宫后的慈禧被封为“贵人”，这是嫔妃中的第5等级[4]。大清皇帝到底有多少妻子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和准确的数字，不过据说皇帝除皇后外，还应该拥有238位嫔妃。皇帝的妻子被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第1等级1人，第2等级4人，第3等级72人，第4等级84人，第5等级120人。咸丰登基时，最初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也没留下后代。他身为王爷时的侧室，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由此晋级成了皇后。日后跟慈安太后势均力敌、分享大权的慈禧，这时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所幸在1854年年初，慈禧就被从第5等级提升到了第4等级。1856年，她又很幸运地向上爬了一步。慈禧的好运气并

没有就此终结，这年春节过后，她就成了皇宫里仅次于慈安的2号女主人。

慈禧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晋级，主要应该归功于她的美貌。对性格软弱又多愁善感的咸丰皇帝而言，慈禧的美貌是无法抗拒的。正如本书前面所说，慈禧只接受过很少的教育，但她很聪明，也愿意学习。通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后宫女性命运的太监们，慈禧学会了读写汉字。要知道，类似这样的学习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汉语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人那里本身也相当于"外语"。经过艰苦的努力，慈禧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不仅如此，她还竭尽所能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据后来的很多西方人观察，慈禧太后的记忆力非常出众，甚至可以背诵不少中国的古代经典。话说回来，在咸丰皇帝眼中，慈禧的美貌显然要比她的智慧更具吸引力。这也是慈禧能够在后宫迅速晋级的最根本原因。1856年4月27日，慈禧在后宫的身份更上一层楼，她为皇帝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慈禧所生的孩子是咸丰的第一个孩子，最起码儿是第一个男孩。有证据表明，通常被认为没有孩子的慈安太后曾为丈夫生过一个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大概20岁左右就夭折了。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皇位只能传给儿子，所以此前一直没有儿子的咸丰皇帝感觉非常焦虑。慈禧贡献的这个儿子可谓雪中送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在这年成了后宫中地位仅次于慈安的二号女主人。儿子出生一年后，这位幸运的母亲从她的皇帝丈夫那里获得了皇家封号，"慈禧"这两个字至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咸丰去世后，慈安就成了东宫太后，原来低等级的嫔妃慈禧则被尊奉为西宫太后，她们分别居住在紫禁城后宫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区域。

慈禧一生比较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是她始终跟慈安太后保持着比较和睦的关系，直到后者1881年离开人世。与慈安太后维持这样的合作关系令慈禧获益匪浅。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后宫女性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以仇恨和嫉妒为基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是个非常失败的女性，因为她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慈禧后半生给人造成的印象大多是专横暴戾的，大家因此很难相信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慈安太后长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两个女人的同盟关系异

常紧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慈安跟慈禧的同盟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人想象的咸丰皇帝和皇后

西方作家中没人真正见过慈安太后，大家都只能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位东方女性。有些作家认为慈安太后是个懒散不羁的人，她对政治没什么野心，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也有作家认为慈安太后非常具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柔弱，因此容易迁就、屈从于别人。以上种种都只是西方人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慈安太后都应该是个很随和的人，因此也就能够包容原本属于她竞争对手的慈禧。与慈安不同，慈禧专横暴戾而且野心勃勃，具备政治家必需的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这些能力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过后，慈禧太后接见、款待欧美使节女眷的众多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早在距今50多年前，慈禧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能力，她跟慈安太后达成协议，分享丈夫咸丰皇帝去世后留下的皇宫和权力。

鉴于咸丰皇帝生性软弱，慈禧插手政务自然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之后，以慈禧为首，形成了一个把持朝政的小团体，主要成员大多是年迈且见识短浅的皇室成员。慈禧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并非起始

于北京。入宫八九年后，耳濡目染的慈禧多少懂得了些国家大事。按照大清制度，后宫不得干政，然而人嘴终究是堵不住的，各种各样的小道儿消息在后宫嫔妃间流传，最终又通过她们影响了皇帝，间接控制着这个国家。咸丰登基时，大清帝国已然风雨飘摇。就在慈禧入宫前后，肇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逐渐发展到中国中原地区，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是包括明朝在内的此前几个朝代的首都，这之后的11年当中，它又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同样也是在这11年当中，慈禧为咸丰皇帝生了儿子。还是在这11年当中，由于“亚罗”号事件，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再次爆发冲突[5]。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本书主题，这里可以略去不讲，然而本书的确有必要对“亚罗”号事件作个简单说明。因为这次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对慈禧的世界观、命运，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56年10月，大清帝国广州地方衙门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老闸船[6]“亚罗”号。表面上看，“亚罗”号的手续完全合法，不过有证据显示这条船上的水手的确夹带了某些“私货”。这样的行为再次激化了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酝酿已久的矛盾。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当地的排外情绪始终就没平息下去。新任两广总督叶铭琛[7]上任后，当地的排外情绪得到了默许和鼓励。这位总督因此在温格洛夫·库克(wingrove cooke)的文章中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叶总督”，成了英国尽人皆知的大反派。叶总督的确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反面典型，他狭隘、自大又心狠手辣，盲目仇视所有非中国的东西，最终跟英国派驻广州的驻华商务总监约翰·宝宁[8]爵士闹得水火不容。糟糕的是，约翰·宝宁爵士本身也是个强硬顽固的人。当时的广州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人利用临近广州的香港自由港向这个地方大量走私鸦片;广东境内遭到叶总督坚决镇压的太平军可以通过广州的口岸获得武器;葡萄牙人通过这个口岸拐骗中国人，从事“卖猪仔”的黑色贸易;以及西方人不断要求广州向他们彻底开放大门等。

从英国人的立场来说，由于合法贸易持续受阻，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总督大人不愿意跟英国代表进行平等对话，再加上官府默许百姓暗中杀掉这些“生番杂种”，他们理所当然要对大清帝国心怀怨恨。遗憾的是，好战的英国人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一切，

就像额尔金勋爵在他的书里写到的那样:

> “亚罗”号事件对我们而言是个耻辱。我有理由认为，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决，无法私了。

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或者也可以说“亚罗号战争”的主要根由在于清廷明显有失公平的处理办法激化了英国人的上述情绪。“亚罗”号被扣押后，面对来自英国的抗议和要求，清廷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冷淡的蔑视。这之后，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展开行动，虎门炮台再度被占领。英国人最终攻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州城，不过由于实力有限，他们最终没能保住这个战果。叶总督的反击措施是针对每个英国人的人头悬赏30银元[9]，烧掉西方人在广州的工厂、店铺，驱逐少量与英国无关的其他国籍西方人，同时拿着悬赏来的英国人头在广东省内到处示众。不仅如此，叶总督从广州发到北京的相关消息还误导了咸丰，让他对局势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鉴于此时英军兵力很少，战火被控制在广州为中心的有限区域，远在北京的清廷也就没对这场冲突给予过多的关注。

与大清朝廷不同，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大打出手。恰在此时，某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遭到虐杀，这件事得到了当地官府的暗中支持，清廷却拒绝对此作出解释，英法两国就此获得了组建联盟的契机[10]。就这样，英国委派额尔金勋爵[11]，法国委派拜伦·格罗(Baron Gros) ，率领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来到中国，奉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解决问题。额尔金勋爵奉命向大清朝廷提出要求，以便英国女王委派的公使可以常驻北京，或者至少可以经常性地到北京访问。对于这项任务，额尔金勋爵满口应承，同时却忽略了其他觊觎中国的国家从中作梗的可能性。

为了给自己的外交代表营造声势，英法两国决定分别派出强大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就在这个当口儿上，印度爆发的反英起义耽误了部分英军的行程[12]。尽管如此， 1857年的12月底，广州还是落入了英法联军手里。广州陷落前，叶总督一直向北京报告说，“额尔金勋爵根本就拿当前的局势没办法，只会躲在香港跺脚、叹气。”英法联军入城时，叶总督正率领残兵坚守广州的西南城墙，他最终成了俘虏，

被送到加尔各答看管起来， 2年以后死在了那里。目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叶总督手上沾了不少西方人的血。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同胞也异常残酷。就在1855年这1年当中，广东当地就有80000名太平天国起义者死于叶总督领导的镇压。

广州已经沦陷，远在北京的清廷却拒绝委派任何全权代表前来与英法代表协商解决问题。英法联军只得沿海路北上，一路来到白河口，占领大沽炮台，进而有史以来第1次攻克了天津。咸丰和他那些无知的大臣们原本以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遵守大清朝廷的命令，会老老实实待在广州。现在，英法联军却打到了距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这样的行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 3名代表奉命前来与欧洲人接洽，为首的代表名叫“桂良”[13]，他是位上了年纪的满族大臣，还是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14]的岳父。经过反复试探和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俄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曾试图劝说额尔金勋爵放弃向北京派驻公使的要求，用以交换所有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经商权力。额尔金对此表示拒绝，明确告诉大清代表说，如果清廷拒绝他的条件，英法联军就将进军北京。

1858年7月4日，条约内容基本确定，双方同时约定转移到上海继续商谈后续的其他问题，英法联军也立刻撤退到了中国南部沿海。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清廷没能及时吸取此前的教训。第2年夏天，眼看条约就要正式签订，清廷却再次尝试劝说英法代表放弃前往北京签约念头儿。英法联军就此失去了耐心，战舰奉命开到白河河口。霍普海军上将(admerial Hope)原打算沿着白河上溯，却遭到重创，损失了3条战舰和300名水兵。于是，他们要求大清朝廷除了允许英法代表进京签约外，还必须就此道歉和赔偿。此时的清廷却因洋人在大沽炮台的损失错误地产生了某种信心，进而拒绝了英法代表的要求。兵力不足的英法联军暂时忍耐了段时间，增援一到，便立刻向北京发起进攻。1860年夏天，大沽炮台被攻克，天津再次被占领。此时，桂良及时现身，代表清廷求和。有赖于他的巧舌如簧，英法联军又被拖在了天津，直到同年9月才正式进军北京。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怡亲王载垣站了出来，要求获得授权去跟洋

人谈判。英法两国表示愿意谈判，与此同时，联军在张家湾[15]遭到了僧格林沁[16]麾下部队的阻击。僧格林沁是位蒙古族将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立了大功。这位蒙古族将军在欧洲人当中非常有名气，甚至获得了专门的英文名字———san collinson。当时，双方谈判的氛围原本非常诚恳，奉命前去与清廷大臣会谈的3位代表以及若干随行人员却突然被抓了起来。他们随后受到虐待，其中的一个人最终丢掉了性命。虽然双方无法确定到底谁该对这个人的死亡负责，僧格林沁终归难辞其咎，因为他默许了手下的不人道行为。使团被扣留后，战争随即爆发，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之后，英法联军再次在八里桥[17]击溃了奉命阻击的清军。

八里桥位于通州，距离北京大概10英里左右。从这个地方开始直到北京，英法联军再没遭到像样儿的阻击。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北京城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出现在了眼前。打到北京城下的联军停住脚步，要求清廷释放被扣押的外交人员。清廷对此的答复是再次派出代表谈判，只不过奉命前来谈判的大臣换成了恭亲王。这位亲王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外交生涯，也确实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奉命跟英法联军谈判的恭亲王时年21岁，刚刚进入理番院工作。这个部门是当年大清帝国专门跟洋人，也就是“吃人生番”打交道的部门，所以才叫“理番院”。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跟桂良的女儿结了婚。他的这位岳父对洋人的态度相对开明，因此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女婿。恭亲王采取的初步行动是给英法联军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大清全权代表，同时要求停战。这封信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把入侵的洋人赶回海里，最终却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咸丰和大臣们因此陷入极度绝望，皇帝决定带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和太监们从北京出逃，逃到东北方向大概100英里以外的热河。这地方紧邻长城，虽然行政区划属于直隶省的范围，但风土人情方面却更多具有蒙古特色。对于自己的出逃，咸丰比较冠冕的说法是“秋围狩猎”。皇帝“打猎”期间，恭亲王奉命驻守距离北京城几英里远的圆明园，他得到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洋人议和。留下恭亲王跟洋人谈判，这可能是咸丰皇帝此生唯一的正确决定。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恭亲王接受的任务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英



恭亲王

法联军虽然在北京城下主动停住了脚步，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有限，一旦得到增援，战火就会重燃。滞留北京城外的他们来到圆明园，占领那里作为前哨据点，还抓住了正打算从后门逃跑的恭亲王。后来，恭亲王还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城，前提条件是他答应联军释放被僧格林沁扣留的外交代表。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被释放回来的外交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那具被害者的尸体更是在英法联军上上下下引发了极大不满，额尔金勋爵因此下令焚毁圆明园。

大清皇帝的圆明园是座庞大的传统中式园林，院子里有湖泊、亭台、殿宇，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树林和灌木丛。这座园林的主体建筑是由18世纪滞留北京的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建筑里还装满了价值至少100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包括欧洲国家送给大清皇帝的礼物、帝国各

省献给皇帝的贡品、成匹的丝绸、金银珠宝、玉器瓷器、稀有皮毛，以及各种贵重家具等。由法军和部分锡克族骑兵[18]组成的联军先头部队进驻圆明园首日，抢劫就开始了。这不是单纯的抢劫，因为大批财富根本就被毫无理由的就地破坏掉了。额尔金勋爵抵达圆明园后，也被这座皇家园林的美给震惊了，可他并没阻止抢劫的继续发生，虽然联军士兵们的行为此后多少有了些收敛。更有甚者，抢劫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无端的浪费被彻底杜绝。后来，联军士兵接到命令说必须要把圆明园烧掉。额尔金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

> 园子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清空后，士兵们有权来到这里进行光荣的复仇，发泄敌人罪行所引发的愤怒。这并不是单纯的报复。



圆明园景观正大光明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任何良知都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利奥波德二世国王[19]在刚果犯下的暴行不能通过烧掉他在奥斯特德的宫殿来偿还一样，英法使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应以烧毁圆明园作为报复，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从额尔金勋爵的角度来说，适当教训教训大清朝廷似乎理所当然，不过就在圆明园被大火吞噬的过程中，周围又有几座皇家园林也遭到波及，这无疑加重了局势的紧张程度。这之后，英法联军发出威胁，扬言将烧掉整个北京城。大清朝廷至此终于沉不住气了。就在联军进抵圆明园2天后，恭亲王敏锐地发现整个朝廷的立场正在日趋软化，任何就此作出的让步都可能被批准，哪怕是

为那些遭受虐待的西方使者支付巨额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的10月24日，恭亲王和额尔金勋爵在北京正式举行签字仪式，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得到确认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次日，法国代表也跟恭亲王举行了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仪式。

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将允许英法在北京派驻公使，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还将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若干新通商口岸。英国获得了紧邻香港岛的一块新土地[20]，法国则在自己的条约条款中加入了派遣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和传教的特权。尽管大清朝廷始终认为法国添加的条款是非法的，然而这项特权的涵盖范围最终却被扩展到了罗马教廷的所有在华教产和神职人员[21]。不仅如此，大清朝廷还就此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的问题在北京向法国代表支付了赔偿。

作为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的前提，英法要求大清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将条约公之于众。为了早点儿把这帮“瘟神”送走，咸丰不情愿地遵命照办。有意思的是，英法联军撤走后，他似乎又不急着回皇宫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咸丰和大臣们似乎已经被“食人生番”给吓坏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北京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沦落敌手，遭受战火蹂躏的惨痛经历，刚刚攻占这座城市的英法联军又成功迫使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的公使驻扎在紧邻紫禁城的地方[22]，与这个古老帝国进行平等外交活动。这对大清帝国的尊严和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大清皇帝的嫔妃们此时也已陷入巨大的恐惧震惊当中。这些女人曾经将皇帝视为金口玉言的“天子”，对他唯命是从，可是这位“天子”自己却从他的首都仓皇出逃。就这样，现实给慈禧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认识、了解了这些远隔重样的“生番”，进而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1900年，当慈禧再次离开北京，沿着与若干年前完全相反的方向向西出奔时，她肯定回想起了当年跟着吓破了胆的丈夫逃离战火的往事，进而感喟天道轮回、命运无常。或许正是因为热河承载的不愉快记忆，慈禧最终才选择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陕西。话说回来，1860年的她终归到底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1900年所发生的一切却是她一手造成的，最终也只能由她自己负责。

【注释】

[1] 1723年，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自己的13弟胤祥为和硕怡亲王，随后又准许这个家族世袭罔替。咸丰皇帝登基时，承继这个爵位的是爱新觉罗·载垣，他后来位列咸丰指定的顾命八大臣之首。

[2] 爱新觉罗·端华，1807—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三子。道光二十六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死后位列“顾命八大臣”，后在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被赐死。

[3] 爱新觉罗·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中期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咸丰帝执政时，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联手把持朝政，慈禧辛酉政变后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4] 清代后宫设皇后1名，皇贵妃1名，贵妃2名，妃4名，嫔6名，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不限，刚入宫的慈禧实际为第6等级。

[5]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

[6] lorcha，又称“鸭屁股”，正式的说法叫“西式中国三桅帆船”，是明代中国工匠借鉴葡萄牙技术设计出来的采用西式船体和中式三桅风帆的帆船。

[7]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累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以“海上苏武”自诩。

[8] Sir John Bowring，英国政治家、旅行家、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第4任香港总督。

[9] 原文为dollar，这个单词通常的意思是美元，同时也指曾经流通过的各种银元。自晚明时代以来，随着对外贸易日渐频繁，西方银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银两单位与银元间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兑换率，具体的兑换标准需要参考银元的重量和成色。

[10] 1853年，清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广西西林县传教。1856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指控，逮捕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依罪论处，史称“马神甫事件”，法国政府由此找到了出兵中国的借口。

[11] 英国布鲁斯家族古老的贵族封号，这里说的额尔金指的是这个家族的第8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他因劫掠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和火烧中国的圆明园恶名昭著。

[12] 1857年到1859年，印度北部和中部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管理印度的体制，将印度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被认为是印度争取独立的第一步。

[13] 瓜尔佳·桂良，满洲正红旗人，恭亲王奕□的岳父，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7月病死，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

[14] 即恭亲王奕□。

[15] 位于今北京通州区。

[16] 僧格林沁，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五年入嗣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授御前大臣，后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

[17] 位于今北京通州区。

[18] 指当时在英军服役的印度籍士兵。

[19] king Leopold，比利时国王， 1865至1909在位，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执政期间建立了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刚果自由邦”，即后来的比属刚果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共和国。

[20] 指九龙地区。

[21] 法国是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历史上跟罗马教廷渊源很深。

[22] 指曾经作为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

第四章 慈禧涉足政坛

1861年的北京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这年3月，弗雷德里克·布鲁斯[1]爵士以英国首任驻北京公使的身份来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当地人认为，“食人生番”使节进驻北京，是对大清帝国神圣首都的玷污。皇帝和朝廷甚至有可能长期留在热河，咸丰皇帝还可能退位。与此同时，众多旗人也陷入深深的惶恐中。这些人的生活平时完全依靠朝廷供给，皇帝的出逃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咸丰能赶紧回到北京主持朝政，以免自己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众多旗人的翘首以待也确实是敦促咸丰返回北京的最主要因素。

当年的北京还流传过一则影响非常广泛的谣言。据说，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急剧恶化。有人认为咸丰皇帝的身体不好是因为平时生活过于放荡，热河冬天近似蒙古的天气又让已经存在的危机雪上加霜。慈禧作为咸丰的宠妃，被认为应该对丈夫身体问题负责。咸丰死后，慈禧的政敌也的确给她冠以过这样的罪名。不管怎么说，曾经在热河发生过的林林总总、杂七杂八或许终究要化为千古之谜了。目前合情合理的推测是，慈禧和慈安太后的确事先预见到她们共同的丈夫即将不久于人世，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进而开始寻找某个代理人应对来自咸丰指定的那些顾命大臣们的可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京跟洋人周旋的恭亲王进入了她们的视野，被寄予厚望。不同于自己性格软弱的皇帝哥哥，恭亲王在旗人群体中非常具有影响力。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咸丰才把他留在北京，临危受命。按正常逻辑推测，恭亲王与两位太后结盟的过程中，应该是前者首先抛出了橄榄枝。因为当时恭亲王的绝对权力是由咸丰授予的，只要皇帝活着并且返回北京，他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现在，皇帝就要死了，为了避

免失势，恭亲王就必须从那些控制着太子的权贵中寻找盟友。

今天的我们无法详细得知二位太后跟自己的小叔子当年进行了怎样的讨价还价。1861年8月初，恭亲王秘密前往热河。当时，他发现皇帝已经时日无多，真正把持朝政的是那些老臣。同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驾崩。太子年龄还小，无法亲自执政，于是大权就落到了皇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手里。这些人奉命辅佐太子，直到后者成年亲政。怡亲王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主心骨儿，郑亲王和肃顺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三个人之下还有另外五名满族大臣。八位顾命大臣将新皇帝的年号定为“祺祥”，也就是“美好的预兆”的意思。这八个人并不急于返回北京，而是打算先把新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所以这年的9月和10月，他们仍然留在热河，同时任命恭亲王为刚刚成立的总理衙门大臣。这个新部门是根据恭亲王本人的提议组建的，专门负责处理跟洋人的关系。据此来看，当时的恭亲王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充分摆出了一副听命于八位顾命大臣的姿态。



恭亲王

八位顾命大臣当年到底有什么打算，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按照他们政敌后来的指控，这八个人图谋先搞掉慈禧和慈安，然后再收拾恭亲王跟他的弟弟，最终扫清一切障碍，彻底控制大清朝廷。这年10月底，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七位返回北京，肃顺则奉命留在热河随后出发，因为他必须护送皇帝的灵柩。如果这八位顾命大臣真的像后来指控的那样阴谋把持朝政，那么他们此时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把两位太后放在眼里。被忽视了的慈禧联合慈安及时向恭亲王传达了信息，同时决定立刻采取行动，避免朝廷大权落入政敌之手。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她们获得了皇帝的玉玺，然后又以刚刚去世的咸丰名义发布了两道遗诏。其中一道遗诏剥夺了全体顾命大臣的权力，另一道遗诏则指定慈禧和慈安取而代之。前一道遗诏被抢先送到了恭亲王手中，依据这道遗诏，他调集了北京城外受自己控制的军队，然后带着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解决了顾命大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八位顾命大臣

不管心里情不情愿，其实都别无选择，怡亲王和郑亲王被当场逮捕，恭亲王由此解决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敌。与此同时，他的弟弟醇亲王则奉命率军沿着热河通往北京的大路拦截护送灵柩的肃顺，这也是醇亲王首次在政坛上亮相。据说，肃顺当年在护送皇帝灵柩回京的途中日夜歌舞升平，丝毫没有悲痛的意思，也根本没注意到危险临近。醇亲王趁着夜色，很容易地就把他从床上拖了出来。肃顺被押解回北京后，由三位亲王组成的特别法庭立刻开始对顾命大臣们进行审判，受到“谋反”的最严厉指控。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三人将被处决，肃顺则将被处以凌迟酷刑，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千刀万剐”。这个判决结果报告给慈禧后，两位太后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慈”，适当降低了惩罚的级别。所以最后实际的结果是两位亲王奉命在密室中上吊自裁，肃顺则被押赴闹市刑场，当众砍头。肃顺这个人平时的声誉实在很差，所以他的死被百姓们当成件大喜事。

通过这次政变，大清帝国脱离了咸丰安排的既定轨道，两位太后和恭亲王成了实际的统治者。很多人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应当归功于恭亲王的足智多谋，然而后来1875年和1898年两次政治危机的化解过程却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慈禧在跟慈安太后结盟涉足政坛后的确也变得越来越老辣，而且她本身的政治天赋也不逊色于恭亲王。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慈禧升格为太后时其实年仅26岁，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相比之下，恭亲王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善于跟西方列强打交道。尽管如此，初涉政坛的慈禧很快就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她绝对不可能成为自己小叔子手中的傀儡。事实上，慈禧在1861年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比恭亲王少。

慈禧等人掌权后，大清朝廷的改变受到西方人的普遍欢迎，曾经甚嚣尘上的排外趋势受到了明显遏制。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乐观地认为，大清帝国将迎来门户开放的时代。如此乐观的希望注定是要破灭的。在对洋人的态度方面，新、旧朝廷其实没有太大分歧，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的某些大臣态度相对开明。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恭亲王，以及满族大臣文祥[2]。这位满族大臣由于及时支持了恭亲王等人的政变，被任命为军机处成员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和文祥这样的当权者并非不讨厌洋人，只不过他们相比怡亲王等人对洋人的态度稍

稍友善，而且也懂得如何跟这帮“食人生番”和平相处。恭亲王等人之所以能够相对开明，是因为他们更了解洋人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同文馆的设立应该归功于恭亲王。这家机构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的读书人逐渐了解西方，为大清帝国抗击西方国家的侵略做准备。至于慈禧和慈安太后，由于跟随丈夫仓皇逃往热河，失去了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她们当时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



慈禧太后

为了尽可能抹去怡亲王等八位顾命大臣留下的3个月短暂历史，新皇帝在政变成功后启用了新的年号———同治。这个年号的寓意大概就是“上下和睦、齐心治国”。鉴于新皇帝登基时只有5岁，实际主持朝政的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获得了相当长的执政时间。这让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大清帝国当年的国内形势也相对平稳。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新朝廷的执政

者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们最初需要应对的是两场国内起义。首先是刚刚爆发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民起义，其次则是在咸丰皇帝统治时期已经持续了1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爆发在中国云南的回民起义对大清帝国的命运，特别是慈禧的命运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这里略去不谈。相比之下，太平天国起义却改变了大清帝国，乃至许多牵涉其中的西方国家的历史轨迹，值得多费些笔墨。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信奉中国化的基督教，因此赢得了不少西方人的好感和帮助。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让很多对基督教心存芥蒂的中国人加剧了自己的排外倾向。

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原本是位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家位于距广州不到30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洪秀全的家庭就像当地的许多农民家庭一样，属于客家人群体。客家人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国北方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当下占据着广东全省1/3的人口份额。现在的客家人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南方人，然而他们又在血缘、风俗、服饰和语言方面跟广东原住民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和区别。洪秀全早年是个勤奋的学生，才华出众，很可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飞黄腾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洪秀全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考上。这位中国传统读书人与基督教间的因缘据说是因为偶然遇到了某位基督徒，后者当时正在给周围的人分发宣讲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洪秀全得到了1本这样的小册子，然后就随手把它带回了家。当时的洪秀全并没在意这个东西，而是全力准备前往广州参加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洪秀全这次的备考非常努力，却很遗憾地再次落了榜。无比沮丧的洪秀全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然后就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据说，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洪秀全得到神的启示说他有可能推翻清廷的统治，取而代之。清醒过来的洪秀全并没把这件事儿当真，而是准备继续走科举考试的老路。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不幸落了榜。失落中的洪秀全听从某位亲友的建议，第一次认真阅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让洪秀全联想到此前来自神的启示，进而为他展现了另一幅充满光明的远景图。这之后，洪秀全开始在亲友的协助下改造基督教义，以便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洪秀全创立的组织叫“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最初只是纯粹的宗教

社团，以至于当时一位正在广州传教的名叫“罗伯特”的美国传教士还曾打算把洪秀全连同他的组织收编到自己的教友圈子里。然而就在“拜上帝会”



洪秀全画像。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基督教背景，所以画像对人物进行了西化处理

成立2个月后，这个组织的色彩发生了转变，出现了明显的反清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向来鼓吹反清复明的“三合会[3]”的不少成员也成了洪秀全的支持者。按照洪秀全制定的教规，加入“拜上帝会”的人必须戒除烟酒和鸦片，也不能再去其他神灵的庙宇祭拜，还必须遵守主的安息日制度。时间到了1848年，尽管受到某些人的抵制，洪秀全在广东已经拥有2000到3000名信众，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正在这个时候，大清朝廷对洪秀全产生了警惕。为了避免麻烦，洪秀全举家迁往广西居住，同时开始酝酿发动起义。根据洪秀全的命令，此时的“拜上帝会”全部改穿中国明代服装，剪掉了辫子，重新开始蓄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也被称为“长毛”。

洪秀全迁居广西后，两广地区的大批百姓纷纷前来投奔，最终让他获得了武装反抗清廷的实力。起义后的洪秀全通过基督教聚拢人

心，自称“天父”“天兄”的化身。面对风头正盛的太平军，衰弱的大清军队屁滚尿流。几次胜利后，洪秀全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洪秀全的追随者热情地接受了他的主张，进而将起义推向高潮。在广西农村地区，太平天国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很多农民甚至把洪秀全当成神话里的人物，相信他可以剪纸为马、撒豆成兵。这跟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风生水起的太平天国从农村发展到城镇，可谓一帆风顺，大清官府和军队除了恐惧害怕，几乎无所作为。就这样，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的作战就好像是在进行一场胜利游行。直到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后，他们才遭到了勇猛的曾国藩的一记重拳。曾国藩是位来自中国湖南省的著名将领。当年的他只是个老学究式的读书人，栖身在成立于公元8世纪的翰林院。

太平军在长沙城下被曾国藩挫败后，转向渡过长江，随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占领了沿途所有战略要地。1853年春天，他们把南京，这座大清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收入囊中。攻占南京似乎应该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最高潮。兵临南京城下前不久，由于像多数中国人那样笃信佛教，三合会的成员逐渐被视为异己，进而与太平军发生了分裂。话虽如此，战场上的胜利仍然为太平军吸引来了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最终围困南京的太平军人数已经达到80000之巨，城内清军根本无力抗衡。太平军因此得以顺利攻入南京城内。

洪秀全从开始在广东老家宣传拜上帝教，到最终入主明朝的故都南京，总共只用了3年不到的时间。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就好像是枚楔子，将大清帝国割裂为南北两个部分。软弱无能的咸丰因此认为，大清王朝可能就要完了。然而就在此时，高高在上的洪秀全却变得昏庸腐朽，逐渐脱离了他的追随者，整日沉溺于后宫的荒淫与独裁生活。为了有效管理日常事务，洪秀全任命了5位王爷，他的权力因此被分散，就连代表上帝说话的特权也受到限制。最终， 5位王爷中的东王[4]站出来严厉指责天王的过度享乐。天王表面上接受了批评，随后却以“叛国”的罪名砍了东王的头。一场悲剧随即拉开序幕，太平天国进入了内乱时期。所幸洪秀全很快重新控制了局势，如果不是后来爆发了由“亚罗”号引发的战争[5]，大清帝国就算不完蛋，起码儿也还要被太平天国运动困扰更长时间。

就在英法联军在直隶省沿海登陆的同时，大清帝国的将领们仍然率领重兵在长江流域抵御着太平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来自北方的增援、补给被切断，他们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相反，太平天国的忠王[6]则趁机横扫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最终，还是那些原本打算被用于攻打北京的英法联军士兵及时登陆干预，这才让上海留在了大清朝廷手里。咸丰死后，继任的新皇帝发现整个帝国的中部地区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由于太平军和清军来回拉锯，这个地区已经陷入了彻底的荒芜，尸横遍野、血流如河，杀人、抢劫之类的行为随处可见。面对兵强马壮的太平军，清军士兵甚至不能按月领到军饷，就连起码儿的军需供给也没有，这些人不但无法作战，甚至本身也成了当地的祸害。蔓延的战火摧毁了农民的房屋，夺走了救命的口粮，将他们逼到了人吃人的状态。

对于所有这一切，政变后的新朝廷暂时无能为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清军的指挥和装备情况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大清朝廷决定与西方列强合作，从而获得了大量外来援助。这种势头自咸丰皇帝去世后就已初露端倪。早在1860年，经由当地富商出资、牵头，“常胜军”在上海正式成立。3年以后，根据大清朝廷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乔治·戈登成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一半儿是由于戈登的军事才能，一半儿也是由于类似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出力卖命，大清朝廷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再次迎来了转机，逐渐看到了成功地希望。1864年7月19日，南京被清军攻克。此前的6月30日，天王已经通过吞金的方式自杀[7]。忠王李秀成战斗到了最后，拼死带着洪秀全只有16岁的儿子以及几千名追随者逃离南京。不过这年年底前，他们就被清兵陆续剿灭或抓获了。1865年春天，太平天国运动被彻底镇压了下去。当时的大清帝国基本已经消除了内患，唯一需要应对的只有国内几个省份西方教士与中国百姓间爆发的小冲突。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些小冲突未来给大清朝廷带来了大麻烦。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画像，人物进行了西化处理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被成功镇压，然而这场漫长的起义已经对大清帝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4年内战过程中， 2000万中国人死于战火或饥荒， 9个省份被战争搞得一塌糊涂，其中湖南、浙江、江苏3省的损失尤其严重。天王洪秀全曾经许诺建立一个比大清帝国更美好的国家，最终却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对刚刚掌权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而言，当时的情况却比较乐观。太平天国覆灭前的3年时间里， 2位太后联手恭亲王陆续解决了朝中所有政敌，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爆发在云南省的回民起义还没被镇压下去。1863年，云南的起义还没被镇压，陕西回民又举起了反清义旗，起义很快波及了甘肃省。由于清廷的专制独裁所导致的回民起义跟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并没有推翻大清朝廷的强烈愿望，规模也比较有限。慈禧等人掌权伊始，虽然仍需面对这大大小小3场起义，以及被咸丰搞得翻了脸的洋人，最终却成功地保住了大清帝国，也保住了大清朝廷。事情总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的，两位太后和恭亲王尽管饱受非议，然而大清帝

国、大清朝廷，乃至新登基的小皇帝的确欠了他们一笔很大的人情。

【注释】

[1] sir Frederick Bruce，额尔金勋爵的弟弟，英国外交家，曾在港英殖民当局任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参与了中英条约的制定和签署工作，后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

[2] 瓜尔加·文祥，满洲正红旗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和领导者，辛酉政变后被慈禧太后委以重任，同治帝时期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3] 又称洪门三合会，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成立于清康熙、雍正年间。

[4] 即杨秀清。

[5]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

[6] 指李秀成，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参加太平军后逐渐获得晋升。天京变乱后，李秀成力撑危局，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因此封李秀成为忠王，号称“万古忠义”。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遇害。

[7] 原文如此，公认的说法是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病逝。

第五章 垂帘听政和李鸿章的崛起

正如前面所说，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联手应对种种危机，挽救了大清帝国和朝廷。然而就在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同盟内部却发生了分裂。目前我们仍然无法搞清两宫太后和恭亲王间到底爆发了怎样的冲突，唯一能够获得的可靠史料就是1865年4月2日，两宫太后联合发布的一道旨意。这道旨意指责恭亲王越权，目无太后和皇帝，并据此解除了他的职务。还有小道儿消息说，恭亲王的主要罪过在于这位王爷当时实际控制了大清朝廷的行政权力，同时还可以代表皇帝公开接见大臣，两宫太后则必须遵照皇室习俗躲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所有这一切让恭亲王极度膨胀，变得自高自大，最后惹恼了太后们。

两宫太后发布的旨意很快得到落实，原本高高在上的恭亲王乖乖地交出了权力，没有遭到任何反抗。然而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就职军机处的高级官员，却及时向太后和皇帝表达了不满。某位胆子特别大的大臣甚至放话说，如果大清皇室发生内讧，麻烦就会没完没了。随后几天时间里，又有勇敢的大臣站出来指责慈禧，以至太后也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慈禧的地位其实是不稳固的。虽然此时的慈安仍然跟她保持着合作关系，但这位盟友除了盲目的自信外，本身是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有鉴于此，慈禧决定跟恭亲王妥协。与此同时，恭亲王也向太后做出了深刻反省，请求宽恕。双方于是一拍即合。恭亲王被解职1个月后，几乎恢复了此前的所有权力和地位，却不再继续执掌军机处。为了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善意，太后们还把恭亲王的女儿收到了自己名下，赐予她公主名号。这位公主至今仍然在世[1]。

尽管如此，这次失和事件仍然可能对恭亲王的未来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有人认为，这次事件以后的恭亲王雄风依旧;也有人认为，

恭亲王从此就被架空了。种种迹象显示，两宫太后的确给恭亲王上了一课，使得后者从中吸取了教训。通过这次事件，太后们让恭亲王明确意识到她们才是真正的老板，要想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必须听她们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知之明其实恰恰是恭亲王始终立足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与嫂子们的这次失和给恭亲王当头泼了盆冷水，降低了这位满族王爷叱咤风云的热情。利用这个机会，两位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出身的汉族大臣得以脱颖而出，他们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国藩的家族将曾子奉为自己的祖先，向来崇尚诗礼传家。曾国藩本人却在承袭祖先文脉的同时，天生就是个精通军事的好手。如此特殊的才能让曾国藩在翰林院显得鹤立鸡群。凭借长沙城下跟太平军的决死一战，曾国藩在1864年很快获得提升，成了最终攻克南京的那支清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覆灭后，曾国藩凭借军功被封为侯爵，随后又成了自皇帝以下，整个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天津教案发生时[2]，曾国藩虽然时任直隶总督，并且遭到一定非议，不过这位总督本身对西方人的态度却比较开明。话说回来，曾国藩肯定也不是个完全崇洋媚外的人。对太清帝国而言，他无疑是个忠君爱国者，不过这个人很明智，因此能够在爱国的同时对外来的人和事表现出足够的宽容。

李鸿章当然也是个忠君爱国者，只不过他的私心明显比曾国藩要重。相比同时代的所有中国人，李鸿章无疑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这个人早年的经历跟曾国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李鸿章生于1823年。太平军打到他老家安徽省时，李鸿章正安稳居住在父亲留在合肥的祖居老宅里，已经将近30岁了。就像曾国藩一样，为了镇压太平军，原本身为读书人的李鸿章主动拉起一支队伍，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李鸿章与太平军最初的作战规模局限为小型游击战，不过这就已经足够引起朝廷对他的重视。此时的曾国藩由于出道较早，已经在大清官场上站稳了脚跟，因此也就成了李鸿章这位“曾国藩模仿者”可以依附的对象。从那以后，直到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都跟这位前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李鸿章和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具有很多相似性。同样是依靠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李鸿章获得了迅速提升，最终当上了执掌江西、江

苏、安徽三省的总督。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命运跟乔治·戈登发生了交集。太平天国覆灭后，李鸿章虽然仅被封为子爵，却获得了赏穿黄马褂儿的荣誉作为补偿。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外国人记得李总督在外交场合身穿通体明黄，只有两个袖口点缀一抹蓝色的黄马褂儿的光鲜形象。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李鸿章得以进入大清官场，开始报效大清皇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此时的李鸿章还没机会跟慈禧太后面对面地交流，后者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予他大展宏图的机会。按照当时的宫廷礼节，虽然李鸿章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获得了不少军功，却还不具备直接面见太后的资格。好在大清帝国又一次危机的爆发为李鸿章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这次危机爆发在山东、河南两省，起义者自称“捻军”[3]，大清朝廷则把他们叫作“捻匪”。捻军活动在中国北方，对清廷更具威胁性。



曾国藩

1870年，李鸿章奉诏来到北京，接受剿灭捻军的任务。多数西方人认为，此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已经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二人将齐心协力完成慈禧野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把大清帝国和朝廷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永远不可能形成平等的盟友关系，李鸿章只是她手里一件招之即来的工具。至于慈禧得以顺利把李鸿章招安到自己麾下，然后又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种种技巧和手段，那恐怕永远无法被局外人知晓。当时的同治皇帝尚还

年幼，身为母亲的慈禧则抓住所有机会从各个方面稳固自己的地位。出于这个目的，慈禧极力促成小叔子醇亲王跟她的妹妹结亲。这样一来，慈禧家族跟大清皇室间的关系就又密切了一重。话说回来，跟皇室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利益，同时也意味着风险。有鉴于此，慈禧还需要在这个关系以外，组建一个随时听命于自己的小圈子，李鸿章则逐渐成了这个小圈子里最得力的干将。后来的事实证明，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确具备先见之明。



李鸿章



李鸿章和家人

无论此时的慈禧如何暗中为私利打算，政变后的新朝廷终究要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相比已经去世的咸丰领导的朝廷更英明、更开放的姿态。这个时期，大清帝国对内、对外的政策的确因此和缓了许多，不过也有生活在通商口岸的西方商人坚称实际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商人们如此固执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虽然新朝廷渴望有所改变，大清帝国的各级地方衙门却依然保持着腐败、排外的原状，为西方商人来华经商设置了种种障碍。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朝廷却可以任命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4]充当自己出使欧美国家的全权大使。这表明当时大清帝国官场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蒲安臣此前的身份是美国驻华公使。1867年年底，蒲安臣卸任，随后又被大清朝廷任命为全权公使，协同两位大清官员率领1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组成的团队，出使多个欧美国家，为大清帝国主张权利。令蒲安臣失望的是，这支外交团队并没能取得他所预期的成果。作为大清使节，蒲安臣代表大清跟自己的祖国签订了1份条约，规定大清和美国这两个

国家的人士可以出于经商、探险等目的，在对方的国家自由活动。来到欧洲后，蒲安臣原打算为大清再接再厉，却突然在1870年春天病逝于圣彼得堡。当初给予蒲安臣全权大使身份的清廷明显对他此行的成果不是特别满意，随同他出访的两位本土官员回国后因此并没像预期的那样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也是从那时开始，大清帝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一股猛烈的排外风潮突然在多个省份同时出现，就连紧邻北京的京畿地区也没能幸免。某些西方批评家则趁机站出来，指责大清朝廷对外政策的摇摆和不确定性，顺便也抹杀了大清帝国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如果这些批评家愿意“三思而言”，就会发现这种摇摆和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即便是在笃信“天赋人权”的美国，近年来也针对华人公布了越来越苛刻的排斥法令。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澳大利亚，而且遭受损失的华人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蒲安臣使团

遗憾的是，除非在被迫情况下，西方列强在跟包括大清帝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相处的过程中从未采取过公允的态度，后者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唯一的区别在于，大清帝国经常要对自己的排

外行为作出赔偿和道歉，西方列强却从未这么做过。1870年的“天津教案”爆发后，遭受损失的法国态度异常温和，大清帝国为此做出的赔偿也低得空前绝后，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本身已经麻烦缠身[5]。此前2年当中，类似排外事件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和台湾等省都有发生，主要的受害者都是神职人员。类似这样的情况似乎应该归因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坚持要求在自己与大清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加入神职人员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本书下章还要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 ，英国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张他们的商人和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意定居。

总理衙门内部，包括哪些最开明的大清官员，始终都在坚决反对设立这样的条款，因为设立这样的条款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人散布到中国内陆各地，相应的矛盾冲突必然增多。只可惜，他们的反对并没获得重视。由于受到法国的外交欺骗，大清朝廷最终批准了这样的条款，从而也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很多居住在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相信，条约签订、批准后，发生在大清各省愈演愈烈的涉外冲突背后其实都有清廷操控的影子。1870年，冲突再次升级，参与发动“天津教案”的那些人其实是得到朝廷直接支持或者至少暗中默许的，后者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所处屈辱地位的不满。话说回来，清廷也许并没打算把情况闹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然而有些事儿一旦开了头儿，也就无法控制了。

有理由认为，“天津教案”的背后推手包括醇亲王、曾国藩在内的众多大清重臣。“天津教案”发生后20年，慈禧太后成了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人，不过1870年时，这位女士在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基本还默默无闻。当时，她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公开场合，则往往是跟恭亲王、文祥等开明派大臣们掺和在一起的。对这些开明派来说，“天津教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严重威胁到了他们对朝政和国家的控制。好在，这次突发事件并没闹到如此前咸丰皇帝执政时那么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慈禧太后已经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参与了危机处理。尽管无法说清整个危机处理过程的内幕，不过慈禧的表现应该还算值得称道。

“天津教案”爆发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是曾国藩，那时的他刚刚从江南调任直隶省。离开江南前，这位总督还在忙着跟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讨价还价，处理扬州发生的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暴力行为。整个处理过程中，曾国藩并没有向麦都思先生[6]做出任何让步，尽管后者声称可能进行武装报复。来到天津后，曾国藩又遭遇了比扬州更加严峻的局面。当时，愤怒的老百姓烧毁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1870年上半年，天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强烈的排外情绪，任何涉及外国人的小事儿都可能引发大的冲突。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今天恐怕已经说不清楚。据说，这次冲突爆发前10年，法国人把当地的一座寺庙改造成了他们的领事馆，搞得天津老百姓民怨沸腾。不仅如此，法国神职人员的行为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当年法国修女们曾在天津设立过一所针对中国儿童的孤儿院。为了吸引更多人行善，把自己发现的孤儿主动送到她们手上，修女们采取了有限的金钱刺激手段。某些不了解内情的中国百姓声称，修女们的善行反而刺激了拐卖儿童罪行的发生，就连很多西方人也觉得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中国老百姓总是倾向把外国人和他们的教堂跟儿童拐卖联系起来。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护理经验，进入法国孤儿院的中国儿童出现了比较高的死亡率，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人对他们的误解。当时的很多普通中国人就像朝廷里的权贵们一样，无法理解西方人的科学，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东西是巫术、魔法。于是，针对法国修女的谣言很快就被演绎成了:外国人利用中国孩子的眼睛，乃至他们的尸体做药。那些传统读书人可能相对更加了解西方，然而盲目的排外情绪却使得这些人不愿站出来向老百姓澄清事实，反而乐得隔岸观火，甚至推波助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因为误会陷入重重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老百姓的误会和法国传教士的不明智行为共同催生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这年5月底，法国修女的孤儿院爆发了流行性传染病，很多孤儿因此丧命，针对孤儿院的谣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极大扰乱了公众视听。忐忑不安的外国人报告当地大清衙门说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后者却不愿采取任何行动。直到老

百姓开始聚众包围教堂，大清官员们才提出派个调查团，澄清孤儿死亡的真相。就在这个当口儿上，脾气坏、不理智的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再次火上浇油。尽管大清官府和法国当局都已意识到形势严峻，也愿意合作，丰大业却突然来到孤儿院，不礼貌地赶走了负责澄清事实的调查团。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负责处理此事的知县[7]特地来到领事馆拜访这位领事，提醒他驱逐调查团的危险性，丰大业以对方级别过低为由，拒绝会面。化解矛盾的最后机会就这么被放过去了。

1870年6月21日，也就是知县造访法国领事馆前2天，老百姓再次聚集到法国教堂和孤儿院周围，准备动武。正如我们通过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8]写给恭亲王的信所了解到的那样。最先挑起事端的是来自法租界的“救火队[9]”和天津当地被称为“混混”的流氓，后者受1位前太平军军官指挥，这个人当时在清军中获得了相当于少将的级别。再后来，很多清军士兵和衙门公差也参加了攻击教堂的行动。就在天津当地的气氛日渐紧张的当口儿上，倒霉的丰大业突然带了个随从，闯进了满族官员崇厚[10]的衙门。

崇厚其人虽然生性软弱，“天津教案”若干年后还因为向俄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闹得声名狼藉，不过当年的他对整个教案的发生可以说是毫无责任的。就崇厚当时的官职来说，天津的治安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惜气昏了头的丰大业拒绝接受来自崇厚的任何好心建议，反而拿着手枪冲到街上寻衅滋事。后来，这个法国人稀里糊涂地被人给打死了，他的死成了接下来攻打教堂和孤儿院行动的导火索。法国修女连同其他许多外国人，总计20人左右，最终死于教案。此外，还有不少中国教民也受到波及。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无法准确区分他们具体来自哪个国家，然而1870年的“天津教案”证明，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教案过程中，愤怒的老百姓主要针对的都是法国人，另有3名俄国人被打死，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误认为法国人。不仅如此，教案中受到攻击的也都是法国教堂，其他国家和教派的宗教机构并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天津教案”是一次针对法国和天主教的、目标明确的行动，算得上冤有头、债有主，并没滥杀无辜。

就“天津教案”发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说，大清朝廷的运气真的挺不错，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麻烦缠身。教案发生大概3周后，也就是1870年7月14日，法国和普鲁士正式开战。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法国很可能再次对大清帝国动武，清廷也将因此付出惨重代价。教案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时，清廷上上下下似乎都有理由相信灭顶之灾是无法避免的。更糟糕的是，出于兔死狐悲的心态，其他西方列强纷纷站到了法国人一边儿，支持他们对大清开战。眼看大难临头，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只得采取“和稀泥”的拖延战略，尽可能缓和事端。为了让洋人满意，他们严令总督曾国藩和其他地方官整顿社会秩序，抓捕那些参与教案的老百姓。各国驻华公使却针锋相对地挑刺儿说，被抓起来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把戏，大清地方官对教案的真正态度是支持和默许的。为此，威妥玛爵士专门给恭亲王写了封信坦言说，教案存在明确的背后主使，这些人即便没直接策划、参与教案，起码儿也是发动教案的支持者，而且还为不少教案参与者提供了庇护。除此之外，威妥玛爵士还要求大清朝廷对死于教案的西方人一视同仁。



崇厚

西方列强根本不相信清廷能主动惩罚那些教案背后的真正主使者，于是就在天津海域集结舰队施压。与此同时，法国则通过外交文书和驻北京公使直接向清廷提出照会，坚持要求严惩涉事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位知县。此时，总理衙门已经得知法国跟普鲁士开战的消息，多少感觉有了些底气，拒绝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满足法国人的要求。作为替代条件，清廷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整个事件展开详细调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之后，鉴于西方列强普遍对曾国藩持不信任态度，大清皇帝最终只得下旨把这位总督从直隶省重新调回江南。曾国藩回到江南后，很快便遭到了一次暗杀。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从湖广总督的任上被调到天津接替曾国藩的职务。

李鸿章的出现，让西方人意识到整个事件可能很快得到解决。果

不其然，新官上任的李鸿章立刻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了2名地方官，随后又将他们发配到东北地区。除此之外， 20个老百姓作为教案首犯被判处死刑。教案结束后大概4个月， 1870年10月18日，这其中的16个人被带到众多西方人和中国老百姓面前当众问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随即就被砍了头。为了让法国人更加满意，清廷还答应支付40万两白银的赔偿金，同时安排荣禄以钦差身份前往法国当面道歉。平心而论，这样的代价在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历次冲突中，已经算比较轻的了。如果教案的主角儿不是刚好麻烦缠身的法国，清廷别想这么轻易了事。事实上，的确有某些传教士建议西方军队应该登陆，将半个天津城夷为平地，然后再给教案的死难者立个碑，好在最终只有16个中国老百姓因为这件事丢掉了性命，并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不过很多天津当地人始终坚信，这16个人根本就是无罪的替死鬼。“天津教案”圆满解决，清廷上下对李鸿章充满了好感，皇帝下旨提升他为二品大员，赏赐双眼花翎，同时安排他进入军机处。就这样，有赖于曾国藩过去3年当中跟洋人打交道时的两次失误，李鸿章成了大清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1872年，曾国藩因病去世后，大清朝廷里也就再没有能跟李鸿章匹敌的竞争对手了。



李鸿章

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以来，“天津教案”应该是她遇的第一次后果严重的涉外事件。正是通过这次事件，慈禧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厉害，同时也看清了大清帝国所面对的危险形势，进而决定再不能跟洋人作对。只可惜，30多年以后，她似乎忘记当年的经验教训，最终让大清帝国再次陷入危机。“天津教案”30多年后的那次危机处理，也是李鸿章的人生收关之笔。通过这次危机处理，李鸿章再次将慈禧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同时也再给她上了一课。



法国媒体对李鸿章的介绍

【注释】

[1] 指荣寿固伦公主，恭亲王奕□的长女，她死于1924年。

[2] 1870年4月至5月，天津连续发生儿童失踪、绑架案件。同年6月，由于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教会承办的育婴堂出现了儿童大量死亡现象，谣言传播，引发社会动荡。6月21日，天津当地因此发生了针对法国天主教人员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3] 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存在了前后15年时间。

[4]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

[5] 指普法战争。

[6]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年-1857年，自号墨海老人， 19世纪著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

[7] 原文为the district magistrate，对照史料，应指负责处理天津教案的知县刘杰相。

[8] Sir 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他发明的威妥玛字母表至今仍是西方人拼读中国地名、人名的主要参照。

[9] the fire-brigades，当时天津法租界豢养的一支半警察、半军事的殖民武装。

[10] 完颜崇厚，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外交家，道光年间中举人。咸丰十一年任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同治年间署直隶总督。1870年天津教案后出使法国谢罪， 1878年出使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遭弹劾入狱，后降职获释， 1893年病逝。

第六章 慈禧的宗教信仰

似乎从来没人提到过，慈禧太后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也曾接触过基督教。实际的情况是，她的确出现过接受基督教的倾向。那是慈禧16岁的时候，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妇女送给她一本《圣经》，虽然她可能从来也没读过这本书。慈禧明确接受基督教的经历起始于1902年。



樊国梁

同年2月，仓皇西逃的她终于平安返回北京，进而对西方宗教人士表现出更多善意。为了向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损失的教堂表达歉意，她当众接见了樊国梁主教[1]，同时表示将对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大

清子民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由于慈禧统治时期来华传教的西方神职人员越来越多，“慈禧”这个名字也才得以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当然，西方人眼中的慈禧太后并不如这位女士自认的那么光辉灿烂。

历史上，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路线相对比较固定。传教士应该是这条路上最早的旅行者，商人和炮舰则紧随其后。再后来，西方人在大清帝国获得了租借地和通商口岸。为了跟这些来华洋人打交道，清廷的确费了不少心思。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慈禧太后和她倚重的助手李鸿章认为，跟洋人硬碰硬是不可行的，比较实际的办法是表面上采取示弱的态度，同时利用不同国家洋人在经济、政治、宗教等问题上的矛盾，挑起他们的内部纷争[2]。就慈禧这个人而言，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她在针对西方宗教上的某些偏激政策不放，也就很容易忽略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所在。恰恰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大清与西方列强的冲突。

能跟那些来华传教士扯上关系的西方专著大多涉及这样一些题材:中国的读书人，外国人在中国的逸闻，大清官员，商人阶层，作家记者，旅行家，以及英国国教牧师、罗马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等各类宗教人士的在华经历。就人类学研究本身而言，这些专著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任何专著能够与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因此，本书的讨论只能满足于参考某些侧面材料。任何不持偏见的西方观察者都应该注意到，中国在宗教方面其实是当今世界最宽容的国家。中国的上流社会充斥着儒教的虔诚信徒，与此同时，底层老百姓的信仰更加广泛，也更迷信，各种各样的神都可以受到他们供奉，又互不妨碍。中国传统主流宗教大致分为三类，即儒教、道教和佛教。这三种宗教本身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很难分清彼此，而且它们也不反对其他宗教，比如伊斯兰教，跟自己和谐共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没理由排斥基督教。遗憾的是，基督教最初进入中国时虽然没对其他宗教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却也没能向它们展示出足够的善意。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不愿向这些朋友兼竞争者伸出橄榄枝，也没能尝试着跟它们互相了解。更有甚者，基督教还不断挑战这个国家的传统，鼓励教民背叛自己从属的文化。正如很多中

国传统读书人和西方批评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西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人为激化了这个国家老百姓间的矛盾。



清代教堂

孝，或者说对祖先的极端尊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无论儒教、道教，还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也都不可能无视这个基础。17世纪便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曾建议罗马教廷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却遭到后者拒绝。从那以后，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不约而同地将祖先崇拜视为冒犯上帝的异端邪说，同时要求他们的中国教徒必须摆脱这样的文化传统。如此不明智地行径让基督教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它的信徒因此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屠杀。更糟糕的是，西方传教士的不明智行为还惹怒了一贯温和的佛教和道教，宗教纷争此消彼长。那些因受到蛊惑而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中国教民激怒了其他宗教的信徒，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所幸，西方传教士直接参与的针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敌对行为目前为止还比较少见，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上，直到本世纪初期，类似这样的事也并没被完全杜绝。明恩溥博士[3]当属众多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的典范，这位神职人员同时还是个作家，以及向中国传统读书

人讲授西学的教师，向来行端履正，从未有过任何不妥的行为。可是西方人呢，无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个程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多数传教士来华前没受过相应的训练和告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冲突自然也就无可避免。



清代寺庙(北京白塔寺)

无法准确规范自己言行的来华传教士很容易就会成为多数中国人宗教乃至政治立场的对立面。基督教传教士往往自鸣得意地声称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多数发生在中国的教案都是天主教神父们的责任[4]，进而步众多批评家的后尘，加入谴责罗马教廷的行列。事实上，罗马教廷可能也只是个被利用的对象。过去若干年当中，在华天主教神父的种种遭遇无疑经常成为法国政府要挟、敲诈清廷的借口。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习惯自诩为罗马教廷的捍卫者，然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配不上这个光荣的身份。至于多数中国人，他们并不能像我们那样熟知天主教的种种历史和内幕，因此也就很容易把个别天主教神父的错误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头上。

当某些传教士打着上帝的名号频频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出于种种目的向大清地方官员施压时，基督教世界确实不能否认这一切跟自己完全无关。话说回来，传教士庇护皈依自己的教民，原本无可厚

非，然而某些教民信仰上帝的目的本身也不是特别纯洁。西方传教士在大清官员面前的优越感很容易给他身边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心怀不良的人造成某种错误印象，进而让他们将上帝作为自己欺压同胞甚至对抗朝廷的工具。由此带来的后果对清廷上上下下造成了明显的压力，以至总理衙门为处理中国教民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政策。

正如前面所说，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犯了了不少错误，甚至主动引发了很多矛盾，不过有些问题的发生确实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并非基督教的本意。无论对基督教怀有怎样的芥蒂，多数中国人都无法否认，那些在传教的同时为他们带来医学知识和服务的西方神职人员是这个国家所急需的。遗憾的是，这些西方人也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被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例如，"天津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就是那些本意善良的修女们救助中国孤儿时的无心失误。自从这次教案发生后，所有西方来华神职人员都被不分青红皂白贴上了"拐卖中国小孩"的标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一本名为《打击堕落洋教(a death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的小册子[5]。这本小册子声讨了同时期在华传教士的种种劣性，还回顾了早期罗马教廷派遣的天主教神父来到中国后的不光彩历史。这本书的作者被认为可能是大清长江水师的某位军官，名叫"彭玉林[6]"。他创作的材料基于一本1624年发行的小册子，当年发行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声讨那些来华西方传教士。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非常可笑地指责传教士杀害中国儿童，然后用他们的眼睛以及其他身体器官做药。做出来的药物据说可以被用来冲洗照片，或者点石成银。事实上，包括天津在内，中国其他地区流传的众多同类谣言的根源其实都是出自这本小册子。恰恰就是由于这些可笑的谣言，很多生命被毫无意义地牺牲掉了。当然，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也不能说完全没责任。这些同时具有医生身份的神职人员最大的错误在于不分场合地向并不了解现代医学的中国老百姓展示那些骨骼标本，以及泡在玻璃瓶里的各种人体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就是那些泡在瓶子里的婴儿标本为后来的"扬州教案"埋下了伏笔。就像"天津教案"里那些倒霉的法国修女一样，扬州当地好心的西方神职人员收养了大批中国孤儿，还让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只不过，这些神职人员同样好心办了坏事，孤儿们后来大量死亡，他们

则被指责为谋杀这些孩子的凶手。

中国人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极端重视世俗生活，因此即便本土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也经常处于被世俗社会排斥的地位，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西方传教士自然不可能指望获得更好的待遇。修女之所以特别不受中国人欢迎，是因为她们的言行违反了中国社会对男人和女人最基本的文化定位。修女们的行为本身可能是无私奉献、毫不利己的，她们这么做的动机也不容怀疑，然而，当这些修女跟着男性神职人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时，中国人的反感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法按照西方标准评价或质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却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这个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力无所不在。遗憾的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但自己不遵守这样的文化传统，反而还鼓动他们的中国教民背弃曾经尊奉的一切。于是这些传教士和教民在多数中国人眼中就成了背叛祖宗、目无尊长、亵渎神灵的坏人，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中国的风水，干扰衙门的判决，鼓励女人不守妇道。作为反击措施，被激怒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就会公开攻击传教士，烧毁教堂，然后大清朝廷很快又会站出来替这些洋人出气报仇，支付给他们巨额赔偿，砍掉自己老百姓的脑袋，甚至向他们开放通商口岸，允许这些洋人在中国自由游历、定居。如此一来，中国人反基督教的情绪自然水涨船高，就连那些本身没有受到洋人直接侵犯的人也开始随风而动。



笃信佛教的慈禧

中国传统读书人认为，西方传教士不尊敬孔孟，以及其他圣人先贤。长此以往，读书人得以立足的根本就被动摇了。大清官员相信，传教士打算跟他们平起平坐，这是对自身权力的极大威胁。至于普通中国老百姓，虽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某些信条可能是有利于他们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不过这些老百姓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跟其他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反对洋人的宗教。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虽然已经长达若干世纪，可是本土基督徒的规模至今只能维持在125万左右。这个数字可能是被夸大了的，据9年前帕克教授(professor Parker)估计，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应该只有50万左右。“天津教案”的爆发促使大清朝廷开始认真考虑能够避免此类事件重演的办法，提出的办法之一是将不断惹是生非的传教士彻底赶出中国。那些稍稍懂得洋务的清廷官员认为，这样的办法根本不可行，因为即便是在当年没有西方列强军队保护的情况下，要想把这些传教士驱逐出去也是不可能，今天如果再动这样的念头，倒霉的只能是大清帝国自己。为了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可行方案，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同仁们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采取的策略可能有慈禧太后背

后支招儿的因素，但更多无疑还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如果那些西方外交官能够投桃报李，对他们的善意给予得体、积极的回应，未来的很多冲突和悲剧就有可能避免。很遗憾，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私利，不愿意采取行动帮助大清朝廷走出困境。

“天津教案”发生后的次年2月，列强驻天津领事馆接到了一份来自总理衙门的公告，以及作为附件的针对西方在华传教士问题的备忘录。目前，这份备忘录已经被某位英国政治家公之于众。仅就它的内容来看，总理衙门提出的解决方案明智而恰当，是值得称道的。这体现了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同仁们经过对形势的仔细分析、判断后，试图跟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强烈渴望。与此同时，他们也立场鲜明地主张了中国的权利，谴责了列强的某些做法。这份备忘录的最大亮点应该是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这句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正处于不受控的状态。即便西方政治观察家，只要内心不存在偏见，也无法否认备忘录里的这句话的确戳中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总体上来说，这份备忘录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清廷对洋人的不满，不过态度和措辞要温和许多。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总理衙门向列强领事提出了8点建议，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①教会收养中国孤儿的行为必须受到监管，而且收养对象仅限于那些教民的孩子。

②为了维护基督教的得体性，不得允许女性进入男性存在的教堂，即便西洋女性也不得违反此项规定。

③传教士不得发生传教职责以外的越权行为，也不得干涉大清官府对教民的管理。

④在处理教民问题方面，传教士的权力低于大清地方官员。

⑤传教士不得转借自己的护照，也不得滥用护照赋予的权利。

⑥罪犯、恶徒不得被接受为教民，教民如果犯罪，也不能因身份问题受到特殊照顾。

⑦传教士不得以官方身份享受特权。

⑧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的即便在损害中国人合法利益前提下，也应优先照顾、保障罗马教会在华教堂和教产的条文应予以终止。

以西方人的立场来看，这8条建议，除了第2条，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西方各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却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无疑都看到了总理衙门的备忘录，却一如既往地把它当成了耳旁风。这样一来，整个事情就被拖了下来，总理衙门最终只得放弃了就此展开友好协商的呼吁，恭亲王等人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公允地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的态度要比欧洲列强国家友善得多。最起码，他们及时针对总理衙门的建议给予了明确的官方回应。只可惜，美国的友善除了让众多列强稍感难堪外，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一次可能彻底改善双方关系的重要机会就这么被白白放了过去，直到今天，西方列强与大清帝国仍然龃龉不断，相继爆发了若干小规模冲突和一次大规模战争[7]，清廷因此失去了所有重要港口的控制权，还被迫拿出大笔银子作为赔款。

正如传教士兼作家明恩溥博士所说，总理衙门当年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在大清帝国处理西方来华传教士问题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西方列强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态度，积极回应大清帝国在1871年伸出的“橄榄枝”，愿意以这份备忘录为基础展开更积极的对话和谈判，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甚至都有可能被改写。西方列强的顽固不化使得他们不愿意接受大清帝国为解决问题而做出的任何尝试，就像历史上跟迦太基人作战时的罗马帝国一样，大清朝廷也经常难免做点儿背信弃义的事情，不过恭亲王和他的同仁们的这份备忘录却是绝对真诚的，绝非某些偏心眼儿的人认为的那样不可靠。恭亲王和文祥这些人虽然只是暂时得势，能够代表皇帝说话，不过一旦总理衙门和列强间就来华传教士问题达成了某种协议，即便没有武力胁迫，即便恭亲王他们不再得势，大清朝廷也可能会继续遵守这样的协议。如果慈禧能够始终信任自己的小叔子[8]，这位太后也就不会被来华传教士这个老大难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她统治中国的那段历史也许就要完美许多。遗憾的是，来华传教士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尽管1903年清廷

和列强就这个问题在上海签订了相关条约，英国却拒绝参加这个条约，彻底解决来华传教士问题的努力因此也就留了个“尾巴”。



明恩溥

【注释】

[1]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法国人，庚子拳乱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

[2] 即晚清时代“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

[3] Arthur Henderson Smith，阿瑟·史密斯， 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1872年偕妻子来华传教，前后长达25年，出版过多部汉学专著，代表作《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4] 指晚清时期的重大教案大多具有天主教背景。

[5] 作者下面讲述的是1868年“扬州教案”。当时，法国传教士在扬州开办的育婴堂出现了中国儿童大量死亡的问题，英国传教士则利用特权来扬州建立教

堂。这2件事引发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进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本书前面提到曾国藩1868年从南方被调任直隶总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扬州教案”处理不当。

[6] peng yu lin音，具体身份不详。这本小册子现存版本实际署名为kuang hsien yang，具体身份不详。

[7] 指八国联军侵华。

[8] 指恭亲王。

第七章 同治皇帝亲政

两宫太后成了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两位女士一位是皇帝实际的母亲[1]，另一位则是皇帝法律上的母亲[2]。与此同时，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则被交到了皇帝的叔叔恭亲王手里。就在这个过程中，同治皇帝逐渐到了该亲政的年纪。同治皇帝生于1856年4月，截至1872年4月，按西方人的计算方式，这位皇帝也才只有16岁。不过按中国人的计算方法，同治在1872年年底就将年满17岁[3]。于是，太后们和恭亲王决定在1872年秋天为同治皇帝迎娶皇后。1873年春节过后，年轻的皇帝就将开始亲政。

为了给皇帝迎娶皇后， 600名或者人数还要多的满族少女按规定进入皇宫，供皇帝选择。同治皇帝最终选定了阿鲁特氏，阿鲁特氏是公爵崇绮[4]的女儿。这位公爵是位手握大权的满族大臣，同时还非常博学，拥有翰林头衔，这在满族人当中非常少见。据说，阿鲁特氏皇后是同治皇帝自己选出来的，两宫太后对这种做法和阿鲁特氏都不满意。从大清皇族的习俗以及维护太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皇帝选择皇后必须征求太后的意见。在利用皇后制约皇帝方面，慈禧无疑是个高手。因此后来当她的养子光绪皇帝选择皇后时，慈禧做决定的主要依据就是未来的皇后首先是能够对她百依百顺的亲侄女，其次才是皇帝的妻子。有证据表明，慈禧当年对阿鲁特氏的性格作出了误判，进而勉强默认了同治皇帝的选择，然而也恰恰是这个误判导致了未来的悲剧。皇后人选确定，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由钦天监为皇帝的婚礼选择黄道吉日。这个日子最终被选在1872年10月16日，而且精确到了当天的午夜时分。为了避免错过时辰，阿鲁特氏坐着轿子离家时，全程护送的父亲特地在手里拿了根点着的蜡烛，以便计算时间。就这样，阿鲁特氏被准时、准点地送到了丈夫手中。此时的阿鲁特氏经过

那些熟知传统的老年妇女的教育，也已经明白了身为妻子的责任。



同治皇帝与阿鲁特氏

皇帝迎娶了皇后，即将亲政，太后们自然也就应该交出盘踞若干年的宝座。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发布亲政诏书[5]: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履位以来十一载于兹矣。追维践祚之初，藐躬尚在冲幼，神器至重，具弗克胜。仰蒙两宫皇太后俯念时事多艰，允廷臣垂帘之请，俾朕专心典学，讲求立政本原。钦惟两宫皇太后宵旰勤劳，躬理庶政，鉴亲贤以佐治，命将帅以专征，纳谏求才，仁民爱物，十一年如一日用，能振肃纪纲，廓清疆圉，上副皇考未竟之志，下启后嗣蒙业之庥，功德盛隆，震耀今古，实薄海臣民所共见。 兹复特颁懿旨，以朕春秋方富，宜亲总万机，与中外臣工共求治理。朕自惟谅皇考文宗显皇帝付託之重，海内臣庶望治之殷，渫予仔肩，曷敢不力。谨遵慈命，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同治皇帝的亲政让过去12年当中始终运气不佳的大清帝国看到了

转机。代替皇帝执掌大权的太后和恭亲王虽然心里不情愿，却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毕竟，小男孩终归要长大成人，然后向他们讨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各国驻北京公使引荐给新皇帝。要知道，西方列强和大清帝国自从开始交往，就因为如何恰当、得体地觐见皇帝问题，发生过无数冲突。按照中国传统礼仪，觐见皇帝应该行三跪九叩大礼，也就是磕头。西方使节最初来华时，清廷就明确表示如果这些洋人打算觐见大清皇帝，就必须遵守大清帝国的礼仪。早在17世纪中叶，清廷就曾要求某位俄罗斯使者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俄国使节拒绝下跪，所以也就没能见到皇帝，最后只好空手离开了北京。同时期似乎还有1位荷兰使者也因为拒绝下跪，最终没能见到皇帝。

当年的西方列强并非都这么不好通融。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勋爵[6]作出了部分妥协[7]，最终得以在热河行宫的一座帐篷中受到乾隆皇帝接见。23年后，由于嘉庆皇帝要求使者必须磕头，英使阿美士德勋爵[8]只得无功而返。到了道光和咸丰皇帝统治时期，大清朝廷在礼节方面的要求依然没有半点松动。1859年，时任美国公使沃德(ward)先生就这个问题与清廷代表展开会谈，后者告诉他说:



马戛尔尼

如果我们不向皇帝下跪，就体现不出对他的尊重。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我们拜神的时候也要磕头。

会谈过程中，桂良，也就是恭亲王的岳父还特地告诉沃德先生说，他自己就不在乎焚香叩拜美国总统。毫无疑问，桂良这么说是因为想起了马戛尔尼勋爵当年提出的礼仪对等原则，即英国使者在乾隆皇帝面前鞠躬行礼时，作为对等回应，清廷大臣们也应朝着英国乔治国王的画像鞠躬。对咸丰而言，直接跟洋人使者打交道，然后通过他们向西方列强传递信息是必须的选择，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觐见礼仪问题。好在，他还可以通过逃往热河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回避过去。同治皇帝亲政后，这个问题就再无法回避了。皇帝发布亲政诏书当天，各国公使找到仍在负责清廷外交工作的恭亲王，要求参加皇帝的亲政大典，同时递交国书。总理衙门则先是以“负责人文祥生病”为借口，把这件事拖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通过反复谈判的方式，继续拖延了4个月。这一切其实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根据《天津条约》第3条“不得采取任何带有侮辱性礼节”的相关规定，公使们觐见皇帝就不需要磕头。最终，恭亲王只得作出让步。总理衙门之所以这么好通融，据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恭亲王的侄子，也就是同治皇帝非常想亲眼看看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为了保住大清帝国的体面，恭亲王没把这次觐见安排在紫禁城里的大殿，而是放在了一个叫“紫光阁”的地方。这座建筑位于紫禁城的西边，紧邻水面。各国公使起先纷纷对此表示不满，最终却又不约而同认可了恭亲王的方案。毕竟，紫光阁历史上就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恭亲王的做法算不上失礼。更何况允许大清帝国适当保住面子，从而换取未来更长远的合作，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要知道，很多大清官员的观点是，如果洋人不磕头，就坚决不许他们见皇帝。

就这样，在1873年6月底，同治皇帝接见了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美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当时的皇帝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面前摆着个小案子，众多亲王和大臣环侍周围。公使向皇帝鞠躬行礼，先用汉语、再用满语宣读国书，大致意思都是以各自国家的名义祝贺他亲政。这之后，恭亲王向自己的侄子行全套三跪

九叩大礼，然后从皇帝手里接过致各国公使的答谢书。手捧答谢书的他从宝座所在的高台走下来，同时严格遵守着孔子规定的礼节，也就是说，小步慢走，双臂向前平伸捧着答谢书。总而言之，恭亲王的举动要表现出对皇帝的极大尊重。走下高台的恭亲王代表皇帝向公使们宣读答谢书，公使们随后则把各自的国书呈递到龙书案上，然后再次向皇帝鞠躬，倒退着走出紫光阁。此时的他们认定自己在跟大清朝廷的斗智斗勇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铜版画，大清帝国贵族生活。作者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34年3月13日—1872年10月21日)，英国画家、作家兼皇家建筑师。

当年的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同治皇帝的亲政对大清帝国而言很可能将是个良好的开始，然而直到同治去世，这个国家都可谓内忧外患、麻烦不断。就在1873年年底，云南回民爆发大规模起义，很快波及全省。这之后，回民起义的浪潮又蔓延到陕、甘两省。完全是因为左宗棠的镇压措施得力，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9]才被镇压了下去，饱受战火摧残的大清帝国由此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好景不长，大清帝国的边境省份又相继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日本以船员在台湾被杀为借口，派兵登陆台湾，然后又趁机侵占了琉球群岛[10]。过去几个世纪当中，琉球始终受中国庇护，日本既然打算染指，战争也就很难

避免。所幸大清朝廷最终通过赔款的方式诱使日本人离开了台湾，琉球群岛则被彻底放弃了。台湾的问题刚解决，安南[11]又出了麻烦。几乎从公元3世纪早期开始，安南就成了中国的属国。18世纪末，法国人来到这个国家，随后又从1858年开始自己的殖民计划。1874年，安南国王被迫签订条约，实际等于向法国割让了紧邻东京湾[12]的东北部省份。除了直接破坏大清帝国对安南的宗主权，法国人在紧邻中国东南边境地区的频繁活动也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铜版画，大清帝国官员出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治皇帝其实是幸运的，他没能亲眼见证法国人将安南彻底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也没能切身体会到日本人在黄海上的耀武扬威。鉴于同治皇帝软弱的性格，如果是由他本人，而不是性格更加坚强、智谋更加高超的太后和大臣们处理随后发生的这一系列危机，大清帝国可能早就完了。对于同治帝的准确性格特征，我们掌握得并不特别充分。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认为，同治跟他的父亲咸丰各方面都差不多，既无能，又放荡。大家针对同治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跟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昏庸君王一样，不理朝政，使得大权旁落。有传言说，同治跟哈伦赖世德[13]爱好相同，喜欢夜里悄悄溜出皇

宫，到民间私访。至于同治从事这种活动的实际动机究竟是好是坏，作者这里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14]。

这位年轻皇帝亲政期间可能只做过一件比较有魄力的事。自从总理衙门设立以来，恭亲王始终实际担负着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然而这位王爷明显并不是特别让他的侄子满意。1874年9月10日，同治下旨剥夺了恭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澄[15]世袭罔替的爵位，原因据说是恭亲王对刚刚亲政的皇帝“言语不敬”。回想1865年4月两宫太后以同样的理由下旨责备恭亲王陈年往事，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恭亲王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清廷上下都因为皇帝的这次行动受到了极大震动。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个开始。

鉴于皇帝已经亲政，慈禧和慈安太后理所当然地应该结束垂帘听政，不再出头露面、干涉朝政，然而就在1874年的春天，太后们和皇帝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陪同，前往距离北京80英里的大清皇陵祭祖。按理说，太后既然不再干政，也就不应再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好在这次祭祀活动本身确实也没什么政治色彩，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治帝下旨剥夺恭亲王和他儿子爵位的第2天，躲在幕后的太后们就以自己的名义下旨，恢复了他们的爵位。太后们的做法无疑有背“大清祖制”，所以她们发出的这第二道旨意的合法性就存在疑问，可是同治帝却对这种做法采取了默认态度，也没有进行任何抗议，起码儿皇宫以外的人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任何消息。

同治如此任由大权旁落而无动于衷，或许是跟最后要了他命的疾病有关。1874年12月初，皇帝下旨对外宣布说自己得了天花[16]。中国人认为，得天花是件“喜事”[17]。同年12月18日，皇帝再次下旨，声称自己病情严重，只得恳请太后再次主持朝政直到他彻底康复。12月24日，皇帝第三次下旨，表示自己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太医院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关于皇帝的不利谣言甚嚣尘上。这之后不久，朝廷发布可靠消息说皇帝驾崩。

据推算，同治皇帝应该死于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尽管很多直接、间接的材料都可以证实同治皇帝的确死于天花，慈禧太后的政敌却仍然不失时机地散布出了“同治帝是被母亲亲手杀死”的险恶谣

言。某些西方作者未加辨别，就在自己的著作里采纳了这种说法。就像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8]，慈禧太后被安上了不少“谋杀”的罪名。相比叶卡捷琳娜二世，慈禧似乎更加残忍，因为针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谋杀传闻大多无据可查(除了谋杀她自己的丈夫)，慈禧在这方面则更容易被抓住把柄。关于同治皇帝死亡的其他各种神秘说法最早出现在他死后25年。1874年12月9日，也就是同治皇帝宣布自己罹患天花的当天，出现了金星凌日的天象[19]。当时的北京是个理想观测点，两位美国天文学家为此特意携带望远镜来到大清帝国的首都。由于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天象传统的迷信心理，他们的观测活动受到阻挠，被迫丢下望远镜落荒而逃。1900年5月，某些特别迷信的义和团成员就把皇帝驾崩这笔帐算在了那两个美国天文学家头上:

> 他们拿了个特别大的望远镜架在地上，突然，太阳上就出现了黑点，这之后两天皇帝就因天花驾崩了。太阳是皇帝的象征，洋人利用望远镜在上面制造了不吉祥的黑点，咒死了皇帝。只不过是由于公使馆的包庇，他们才得以免于凌迟的惩罚。

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的理论，同治皇帝选择的坟地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是不吉利的。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他应该避开咸丰的陵墓，长眠清西陵，可是同治帝最终却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埋在了东陵。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清帝国随后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饥荒。

如果说同治帝的亲政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那么他继任者的命运就还要更加悲惨。从1875年开始，慈禧便牢牢掌握着这位不幸继任者的命运。

【注释】

[1] 指慈禧太后。

[2] 指慈安太后。

[3] 作者这里说的是周岁和虚岁的区别。

[4] 崇绮，1829—1900，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晚清大臣，原隶蒙古正蓝旗，父凭女贵，后升隶满洲镶黄旗，郑亲王端华的女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之子，同治三年状元，同治年间任侍讲，封三等承恩公，光绪间历任吏部尚

书、礼部尚书，与徐倜同为大阿哥溥儁师傅。八国联军入京时随慈禧西逃至保定自缢死，谥号“文节”。

[5] 同治亲政诏书原件今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诏书内容直接引自该原件，诏书原文为繁体且无句读，本书译者为其断句、标点并改为简体。诏书原件此段文字后面还有同治帝提出的具体施政措施及勉励臣工的训词，作者未引用。

[6] Macartney， 1737年—1806，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 1793年率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

[7] 单膝半跪。

[8] Amherst，英国外交官， 1816年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后任驻印度总督。

[9] 1862至1873年，陕西、甘肃回民发动起义，史称“同治回变”。

[10] 即今日本冲绳。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归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 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1874年，日本利用清廷官员的糊涂大意，硬说琉球是日本属邦，试图吞并当时跟中国存在藩属关系的琉球国，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

[11] 今越南。

[12] 今北部湾。

[13] Harun al - rashid，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

[14] 此处暗指坊间关于同治帝溜出皇宫以私访为名逛妓院的传闻。

[15] 爱新觉罗·载澄， 1858—1885，人称“澄贝勒”，恭亲王奕□长子，曾任内大臣、正红旗蒙古都统，去世时年仅28岁。

[16] 坊间传闻同治帝私自外出嫖娼，最终染梅毒身亡，但正式史料明确记载他死于天花。

[17] 当时没有预防接种措施，得过天花的人如果不死，就可以自然获得免疫力，因此被认为是喜事。

[18] 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汉语通译“叶卡捷琳娜大帝”，英语地区称她称为“凯瑟琳大帝”。

[19] 按中国古代天象学的说法，金星凌日意味着大灾、大难，多战争。

第八章 操控皇帝的慈禧

同治帝没有儿子[1]，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大清帝国的龙位首次出现了空缺的尴尬状况。于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大清最高权力的人就需要寻找一位能够得到各方面接受的新皇帝。如果同治皇帝有兄弟，这位兄弟又已经有了儿子，寻找新皇帝的任务就不难完成，哪怕这个孩子年龄尚幼。问题在于，同治帝本身是咸丰皇帝的独子，所以他也就没有直系血缘的侄子。在这种情况下，皇位继承人就应该从比同治皇帝小一辈的皇室宗亲中产生。不过由于咸丰和同治两位皇帝去世时都比较年轻，两人的在世时间加起来只有45年，所以同治皇帝子侄辈中可供选择的继承人也不是特别多。有鉴于此，新皇帝的人选就只能在同治皇帝的同辈人，也就是“载”字辈的皇室成员当中产生[2]。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皇位世代相传的大清祖制。

如果打算从“载”字辈皇室成员当中选择新皇帝的话，恭亲王的儿子载澄无疑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不过按照大清皇室的规矩，一旦载澄成了皇帝，身为父亲的恭亲王就必须向儿子行国礼。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恭亲王就只能选择退休，可是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又离不开他，所以新皇帝就不可能是载澄。鉴于光绪皇帝登基后，醇亲王继续执掌大清朝廷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说法其实只是慈禧努力将恭亲王的血脉排除在皇室继承序列以外的借口。相比恭亲王，他的弟弟醇亲王此前并没有过多抛头露面的机会。醇亲王也有个儿子，而且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如此一来，让醇亲王的儿子当皇帝无疑是个更加有利的选择。

很多人将1875年拥立新皇帝的事件认定为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第二次政变，这次行动依旧得到了慈安太后的配合。具体的行动细节

是这样的。同治皇帝死后，太后们利用皇亲国戚们还没赶来奔丧的空当儿，以去世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指定他的堂弟载湉为皇位继承人。饱经风霜的慈禧当然预见到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麻烦，也提前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预防措施之一就是安排她的政治盟友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即将离世的准确消息后，立刻率军进驻北京。李鸿章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了慈禧阵营。得知同治皇帝死期将至，他立刻率领来自老家安徽的8000精兵，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从天津赶到北京，尽管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

同治皇帝去世的那天夜里，李鸿章率兵来到紫禁城外，赶走了毫无防备的皇宫护卫，控制了所有出入口。与此同时，两宫太后乘坐遮挡严密的小轿，带着最心腹的随从，避人耳目，冒着大雪赶到醇亲王府。这之后，慈禧亲自来到自己侄子的摇篮旁边，把他抱了起来，带进小轿，一行人又悄无声息地原路返回了皇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完全在李鸿章的控制之下了。第二天早上，光绪正式登基即位。众多皇亲国戚尽管心中不服，眼看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无话可说。据我所知，尽管不少人都对慈禧太后借助光绪皇帝的名义再次垂帘听政心怀不满，她的这种行为却也没受到太多的指责或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不过他对慈禧的行为同样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李鸿章

光绪皇帝登基时只有4岁，当然需要有人辅佐，太后们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及跟皇帝的血缘关系，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垂帘听政的生活。在这方面实际给慈禧造成障碍的，可能只有皇宫中的某些太监。按照中国传统经典的说法: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很多时候，太监就是紫禁城里的“小人”。尽管大清祖制严格禁止太监干政，不过这些人仍然时不时地就要跳出来生事。同治皇帝相对比较宽容，太监们相应地也就自由了不少。光绪皇帝即位后，太后们立刻着手收拾这些太监，以“干政”的名义逮捕了为首的7个人，又把这7人当中的3个充军发配到遥远的北方边境，另外4个人则被打了板子。从那以后，太监们消

停了好多年。

就这样，太后们，或者应该说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已经不需要继续护驾的李鸿章则带着军队离开了北京。对慈禧太后而言，未来的道路还不平坦，却也犯不上刀兵相见。眼下，慈禧需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光绪皇帝的继承人身份与大清祖制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光绪必须被过继给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成为他的儿子。同治是光绪的堂兄，自然不可能再来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如此一来，光绪的身份就只能是14年前去世的咸丰皇帝的儿子。按照大清祖制，如果咸丰皇帝还有1个儿子，在同治皇帝无子的前提下，这个儿子就将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按照大清祖制，慈禧等人没有权力再给已经去世的咸丰皇帝过继个儿子。据说，为了抗议这种“有违祖制”的行为，某位大臣选择自杀。坊间还有传言说，恰恰是由于光绪皇帝的即位不合祖制，所以他登基的头一年太庙就遭受了雷击。不管怎么样，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说，光绪都是继承同治帝皇位的最佳人选，最起码这位皇帝年龄很小，也就容易控制。



光绪皇帝

对两宫太后而言，光绪的即位肯定是件好事，尽管她们为此受到了无数质疑。通过过继光绪皇帝，两宫太后再次成了母亲，进而也再次控制了大清朝廷。只要她们足够长寿，就可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很多年。说到这里，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两宫太后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当中，同治留下的那位皇后究竟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她没能参与丈夫继承人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中国老百姓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势力更加强大的两宫太后。如果年轻的阿鲁特氏皇后真的能为同治帝生下儿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关于阿鲁特氏皇后，坊间流传着版本不一的各种谣言，大致意思是说同治皇帝死时的确为皇后留下了个遗腹子，不过皇后却在皇帝去世后大概两个半月后也死掉了。死因据说是丧夫后过度悲伤绝食而

死，不过也有传言说这位皇后使用更加惨烈的方式自杀身亡的。更多的中国人相信，阿鲁特氏皇后的死亡背后大有文章，很可能是慈禧太后把这位儿媳给毒死的。对于这样的传言，我们目前找不到可以支持它的证据，当然，也找不到可以反驳它的证据。比阿鲁特氏皇后的死亡更耐人寻味的是，皇后的家族对这位女性亲属的离奇死亡始终保持沉默，也不准备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皇后的父亲崇绮仍然在为慈禧卖命。后来，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到了保定，这位前国丈则选择自杀殉国。有鉴于此，似乎有理由相信最起码儿皇后的父亲认为自己女儿的死跟慈禧没有直接关系。众人指责慈禧太后涉嫌谋杀阿鲁特氏皇后最主要的依据在于，如果皇后当时真的怀了儿子，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慈禧的权力就将受到极大动摇。于是，她只能在同治皇帝死后把年龄尚幼的侄子推上宝座，从而保证自己和慈安太后的权力、地位。这反映了慈禧在政治方面的极大野心。

以上只是坊间流传的各种说法。清廷关于阿鲁特氏皇后死因发布的正式消息仍然声称皇后死于失去丈夫后的过度悲伤。与此同时，大清皇室也在不遗余力地把这位皇后打造为节烈妇女的典范。两宫太后为此专门以新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旨意，李鸿章等大清官员则纷纷给朝廷上奏折，要求赐予阿鲁特氏皇后荣誉称号[3]。大清皇室也乐得卖这个顺水人情，于是就命令礼部为过世的皇后颁发荣誉称号。礼部的官员们搞出了12个备选方案，最终，阿鲁特氏皇后的荣誉称号被确定为: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不管怎么说，这个称号也算是给了崇绮的女儿一个交代，她跟大清皇室的纠葛至此有了个了断。

光绪皇帝坐稳了宝座，恭亲王一如既往地负责这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东西两宫太后的地位丝毫也没受到影响。有迹象表明，此时的慈安太后已经主动放弃了权力，慈禧成了真正的“主心骨儿”。从各方面来说， 1875年后的慈禧都有理由更加高看醇亲王。要知道，醇亲王跟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本身就是兄弟，慈禧的妹妹又亲上加亲嫁给了醇亲王。现在，醇亲王和慈禧妹妹的儿子又经太后之手当上了皇帝，同时也成了太后们的养子。至于恭亲王，种种迹象显示， 1875年的这次政变后，他的影响力已经受到了极大削弱。作为制衡恭亲王

的手段，慈禧虽然没有直接剥夺恭亲王领导总理衙门的权力，却往这个要害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个亲信还跟恭亲王不对付。正如随后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慈禧的确是个搞平衡的高手，能够灵巧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纵横捭阖，保持对朝政的控制。在这方面，慈禧一生只搞砸过一次，由此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死对头[4]。

1875年，大清朝廷的形势可谓扑朔迷离，只有恭亲王的前途相对明朗。作为有能力的老牌外交家，恭亲王已经成了西方人眼中最值得信任的中国人。对大清朝廷而言，恭亲王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他的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较之哥哥，醇亲王此前留给西方人的印象似乎更加排外而且好战。按照大清祖制，儿子成了皇帝，醇亲王就应该主动退居幕后，不过此时的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反而开始逐渐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人都是不可能跟哥哥通力合作的。李鸿章则通过跟两宫太后结盟，已经成了权势、地位最高的汉族大臣，慈禧将他视为自己手中可以用来制约满族亲王势力的重要棋子。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以及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也是值得慈禧重视的。就在1875年，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再立新功。这年年初，英国年轻的外交官马嘉理[5]在位于云南的中缅边境地区遇害。李鸿章为此及时与英国代表威妥玛爵士展开外交接触，成功化解了危机。接下来，李鸿章还成功处置了1876年和1877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山西两省，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作为回报，李鸿章坐稳了直隶总督的位子，还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不过随着权力、地位的水涨船高，李鸿章的政敌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应对大饥荒的过程中，李鸿章对那些敢于贪污赈灾款项的大小官员毫不手软，这样的举动进一步为他的官场生涯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家对头。



恭亲王

光绪登基后的最初阶段，大清朝廷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汉族大臣恐怕非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莫属了。就像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早年也靠追随曾国藩起家。这之后，他又通过镇压陕甘地区回民起义不断积累军功。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强力镇压，1878年，某些回民起义者被迫离开了大清帝国的西北地区。作为军功的回报，左宗棠相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还在总理衙门任职，权势越来越大。左宗棠其人勇猛豪放又小心谨慎，是个受人爱戴的领导者，还精通外交事务。除此之外，这个人死后留下的回忆录显示他具有明显的拥护维新派倾向。多数西方人认为，左宗棠的得志跟醇亲王的暗中提拔、照顾密不可分。

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又发生了一件可能威胁大清朝廷统治，以及慈禧刚刚建立的政治权力平衡局面的重大危机。早在1871年，俄

国就利用大清帝国西部边疆战乱频发的计划，占领了伊犁[6]。7年以后，左宗棠成功镇压了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随即着手收复这块位列大清帝国中原18省以外，俄国人称为“伊犁”，中国人称为“新疆”的西部领土。为了解决问题，大清朝廷首先派人前往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展开谈判，最终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得派遣特使远赴圣彼得堡，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清帝国的特使名叫崇厚，是位满族大臣。这个人跟本书作者在天津打过交道。

“天津教案”发生后，崇厚曾经以特使的身份前往巴黎，代表清廷向法国政府道歉。由于这样的经历，崇厚虽然压根儿不懂外文，却被认为是个精通洋务的新派人物。1878年8月，慈禧专门召见了临行前的崇厚，此时的她似乎认定这位满族大臣必将不辱使命。这样的想法是个严重的错误。7个月以后，完成使命的崇厚乘船在上海登陆，还带回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7]。事实上，就在崇厚返回中国前，相关的消息早就传回了国内。按照崇厚与俄国人达成的协议，后者虽然同意退还部分新疆领土，却依然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作为代价，清廷则需要向俄国支付相当于50万英镑的赎金。得知这个消息的大清帝国立刻骂声一片。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8]等人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当年的张之洞还只能算是个政坛新人，批评起崇厚来却毫不留情，甚至用上了“糊涂”“昏聩”之类的字眼儿。汉族大臣对崇厚不满，满族大臣也痛打起了“落水狗”。恭亲王的妻子跟崇厚存在亲戚关系，所以这位亲王也就不太好意思抓破脸，醇亲王则没有这样的顾忌。正是在醇亲王的带领下，满族大臣们对崇厚口诛笔伐。事情闹到最后，朝廷只得下旨剥夺崇厚的所有官职，将他逮捕起来，判处了杀头的罪名。与此同时，崇厚跟俄国人签订的条约也没获得批准，清廷转而要求就新疆问题重新展开谈判。由于无知和冲动，当时的大清朝野可谓群情激愤，甚至扬言说“如果俄国不同意重新谈判，就要开战”，只有恭亲王相对清醒。种种迹象显示，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属于坚定的主战派，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大清敢于跟俄国开战，则必败无疑。

李鸿章能够亮出这样观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任直隶总督的若

干年当中，他耗费了巨额资金，用以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内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主和的他难免就要授人以柄。所幸，慈禧太后和恭亲王都是李鸿章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地位因此不可动摇。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清帝国最终没有向俄国宣战，主战派转而将怒火发泄到了崇厚身上，声称砍头的判决实在太便宜他了。崇厚这个人还算命大，在俄国、英国公使，以及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的共同干预下，崇厚的判决最终被减轻了。不仅如此，俄国还同意就新疆问题重新展开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新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规定，大清帝国得以收回更多的新疆领土，俄国在当地的控制区域则相应地缩小了。当然，作为代价，清廷支付给俄国的赔款也上涨到了90万英镑。就这样，在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协调下，一场重大危机暂时就被压制住了。对李鸿章而言，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相当危险的。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这位总督把大把的银子投入到了军事建设当中，现在却又突然改头换面成了主和派。他之所以坚持要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明确意识到大清帝国的军力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跟列强开战的程度。至于慈禧，她的功劳则是力排众议地支持了李鸿章。未来的很长时间里，慈禧和李鸿章之间类似这样的合作还要发生很多次。

收复新疆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采取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这件事还没有彻底了结， 1881年4月9日， 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去世。清廷公布的官方消息说慈安太后死于心脏病，不过根据她在遗诏中百般叮嘱光绪不要因自己的去世而过度悲伤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位太后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早就心中有数了。从慈禧太后政敌的角度来说，她对慈安太后的死亡难辞其咎[9]。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慈安太后已经成了唯一能够制约慈禧的“绊脚石”。从咸丰皇帝去世算起，这两个女人已经合作了将近30年，按理说也确实到了闹矛盾的时候，不过那时的皇宫内外确实没有两太后不和的任何传言，所以我们也就没理由确定慈禧谋杀了慈安。就当时的形式来说，慈禧也没必要谋杀慈安。慈禧其人阴险狡诈，却也非常有远见，从不做无用功，而慈安的死活对早已大权在握的她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注释】

[1] 坊间传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前已经怀孕甚至生产，而且还通过同治帝染上了梅毒，不过这种说法没有明确的史料支持，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说法是阿鲁特氏皇后在同治帝去世70多天后自杀或病死，至于是否怀孕或生产则无据可查。

[2] 实际的情况是慈禧为保住太后的地位，不升格为太皇太后，这才坚持要在“载”字辈当中寻找皇位继承人。

[3] 即谥号。

[4] 此处应指戊戌变法中慈禧彻底跟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决裂。

[5] Margary， 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险队，由近200名士兵武装护送，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马嘉理参加这支探险队。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然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他们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

[6] 1865年，受到英国暗中支持的中亚浩罕汗国首领阿古柏率军入侵中国新疆。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新疆至此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危险。左宗棠临危受命，在清光绪初年率军收复新疆，挫败了英、俄瓜分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作者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7] treaty of livadia， 1871年5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的时机，出兵侵占伊犁地区，还逐渐向周边地区渗透。清廷解决阿古柏问题后，于1878年派崇厚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崇厚在未请示清廷的情况下，擅自签订条约，向俄国出卖国家利益，引发公愤。

[8] 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9] 坊间流传的说法是慈安太后吃了慈禧送去的有毒点心，然后突然暴毙。

第九章 慈禧独揽大权

46岁那年，慈禧成了坐在年幼皇帝背后，大权独揽的人，实质上已经跟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没有区别。此时的慈禧其实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独裁者，因为就像此前的众多中国皇帝一样，她的独裁其实只能局限在紫禁城以内。大清帝国实行的制度本身为皇帝的权力设立了诸多限制。虽然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不过这也只是个自谦的说法而已。很多时候，皇帝的执政必须依赖大臣，这也就为后者提供了进入包括军机处在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分享皇帝大权的机会。

就慈禧太后来说，她在从政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其实是她自己的性别。中国传统文化为女性设置的重重禁锢妨碍了慈禧的行动，与此同时，作为地道的传统中国妇女，慈禧似乎也没勇气采取极端的手法挑战这个传统，她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慢慢来，逐渐让自己获得世人的认可和接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1898年变法[1]失败后，慈禧才打破禁忌，直接面对面地接见大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坐在帘子后面。这之后又过了4年，她才敢于力排众议，在紫禁城里召见西方使节的家眷。总而言之，为了冲破层层禁锢，慈禧花费了若干年的时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时刻也没有放弃显示并维护自己权力的机会，比如最终搞掉恭亲王。正式下旨解除恭亲王的权力以前，慈禧必定已经忍耐了很久。虽然时不时地要给慈禧制造些麻烦，恭亲王终究为这个国家和朝廷诚实服务了很多年。相比他的贡献，恭亲王造成的麻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前面曾经提到，同治皇帝统治时期，法国人已经在紧邻中国东南边境的安南东京湾[2]地区站住了脚。历史上，东京湾就是个不太平的

地方，这里聚集了众多因为各种原因必须逃离大清朝廷控制的流亡者。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很多残存的起义军就取道广西、云南2省，最终撤到了东京湾地区。这些起义者跟其他流亡者互相联系，最终演化成了被称为“黑旗军”的势力。为了对抗黑旗军，大清军队不但定期展开越境清剿行动，还在云南红河沿线布置了驻防部队。1874年，法国与安南签订条约后，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被继续保持了下来。这之后，法国的殖民野心进一步扩张，于是便决定在当地挑起事端。如此一来，法国跟大清帝国间的冲突再也无法避免。

作为挑起事端的第一步，法国人毫无理由地指责大清地方官员暗中勾结、资助原本势同水火的黑旗军跟自己作对。1883年夏天，法国人武力占领了东京湾地区，同时还控制了安南的首都。为了自保，安南国王被迫对大清帝国采取敌对态度，允许法国军队进驻到紧邻中国边境的地区。作为回应，大清朝廷警告法国政府说，如果驻扎北宁省等地的军队继续骚扰大清边境，他们将撤回驻法公使以示抗议。法国方面对此不理不睬，大清朝廷针锋相对，不过双方并没有因此宣战。



游历云南的法国人

法国人在安南找麻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作为惩罚措施，恭亲王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几位大臣因此被免职，还有几位直接负责此事的清军将领也丢了饭碗。慈禧惩罚恭亲王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这位王爷没能把法军进攻北宁省的消息通报给太后，这明显属于故意找茬儿。得知自己被免职以后，恭亲王像往常一样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悄无声息地从高位上退了下来。这之后，恭亲王又活了14年，虽然光绪皇帝后来在1898年时曾再次启用他主持过总理衙门，可是那时这位王爷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丧失殆尽了。对历史学家而言，恭亲王其人恐怕永远都将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只是在1865年和1874年这两个身处逆境的人生特殊阶段，恭亲王才愿意更多地袒露心

扉，向世人展现不一样的自己。正是由于恭亲王的努力，两宫太后才得以在咸丰皇帝死后稳定住了局势，进而成了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类似1865年这样的特殊阶段外，恭亲王跟两位嫂子的合作基本还是愉快的。特别是在这位王爷专心自己擅长的外交工作，不在其他方面节外生枝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他的侄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恭亲王曾经期待自己的儿子载澄能够继承皇位，最终的结果却是被自己弟弟的儿子摘了桃子，落得空欢喜一场。1884年，恭亲王黯然告别官场，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对这位王爷来说，他的儿子没能当上皇帝或许是件好事。如果他的儿子取代光绪成了皇帝，恭亲王可能就要因此生发出更多的野心，进而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或许，恭亲王同样憧憬过自己取代两宫太后坐在皇帝身后大权独揽的美好未来。为了这个目标，他跟慈禧合作了23年，也隐忍了23年，最终以辞职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恭亲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因为经过23年的漫长较量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嫂子的对手。



驻云南清军



驻云南清军

对局外人来说，想要搞清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是不可能的。恭亲王的确成就了慈禧，却也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所以我们的确没理由指责慈禧忘恩负义。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慈禧在对待朋友方面基本还是真诚的。恭亲王倒台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他弟弟醇亲王的野心。这位王爷娶了慈禧的妹妹为妻，当然也就更容易获得慈禧的信任。1889年3月，慈禧最后一次以“垂帘听政”的名义出席朝会[3]。这次朝会上，有大臣提出既然皇帝已经亲政，醇亲王就应避嫌，交出权力。对于这样的提议，慈禧不但加以拒绝，还大大夸奖了醇亲王一番，称赞他尽职、谦虚、没有野心。随后，慈禧又告诉大臣们说，光绪元年，也就是15年以前，醇亲王就上了一道非常说明问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醇亲王主动拒绝了朝廷奖赏给他的黄马褂。这样的行为足以证明醇亲王是个单纯、低调的人，始终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仆人，而不是皇帝的父亲。慈禧当然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醇亲王留给世人的印象仍旧是野心勃勃的。就在恭亲王告别官场的同时，醇亲王开始利用生命中的最后7年全面接管哥哥留下的权力。话虽如此，醇亲王并没能把总理衙门的大权抢到手，这个位置落到了庆亲王奕劻[4]手里。庆亲王是乾隆皇帝的曾孙，由于执掌总理衙门，这位王爷后来在外国人当中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尽管失

去了总理衙门的要职，醇亲王仍在抓住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很快便被授予了各种各样的头衔。例如，醇亲王首先把驻防北京的禁卫军抓到了手里，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天津、烟台、旅顺等地。外出视察明显开阔了醇亲王的眼界，回到北京后，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大清帝国应该引进铁路技术。与此同时，这位王爷还给紫禁城和他自己的宅邸装上了电灯。

较之恭亲王，身为弟弟的醇亲王起先对来自西方的知识、理念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年轻时的他看起来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醇亲王进一步表现出了明显的排外倾向，留给西方人的印象既守旧，又顽固。好在醇亲王本身不是个糊涂人，逐渐意识到了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性。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这位王爷已经成了支撑大清帝国的一股重要力量，实现了从保守派到维新派的转变。就大清亲王这个层次的人物来说，醇亲王已经相当开明，他不但为这个国家配备了铁路和电灯，还介绍了大批来自西方的知识，培养了众多中国自己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说回来，虽然慈禧评价醇亲王谦逊、低调，不过这位王爷投身官场终究还是难免追逐权力的俗气。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儿子成了皇位继承人，按照祖制，醇亲王就应该选择隐退。然而在年幼的光绪登基后的5年时间里，这位王爷就成了北京禁卫军的最高指挥官。这之后又过了4年，大清官场已经没有能够跟他匹敌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儿子成了慈禧太后的养子，进而登基成了皇帝，反倒有利于身为父亲的醇亲王获取政治权力。问题在于，祖制终究是祖制，随着光绪皇帝成年亲政，醇亲王应该隐退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某些极端保守的清廷大臣甚至认为，醇亲王是否能够急流勇退，直接关系到大清帝国的生死存亡。话说回来，光绪这个人运气实在不好，无论他的父亲怎么做，这个帝国其实都已经保不住了。

很多西方驻北京公使曾将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执掌大清内政外交视为强硬主战派的重大胜利。鉴于当时的形势，醇亲王掌权后首先要做的事，可能就是向正在安南频频挑衅的法国宣战。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醇亲王保持了足够的克制。为了搞清这位王爷复杂的心态，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法军攻占北宁省后，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也就不打算继续挑战大清帝国的耐心。为了表示友好，解决问题，他们派了特使前往天津找直隶总督李鸿章谈判。1884年5月，李鸿章和法国特使傅里叶上校(cap -tain Fournie)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大清将主动撤走驻扎东京湾地区的军队，同时承认法国跟安南签订的条约。大清和法国针对安南的争端本可以就此和平了结，遗憾的是，双方后来在解释和执行协议条款时发生了分歧。按大清朝廷的说法，傅里叶上校私自改变了约定好的撤军时间，所以1884年6月21日法军小股部队进驻谅山时，当地的清军并没有及时撤离。法军随即要求清军让出地盘，清军表示拒绝，双方发生交火，法国人吃了大亏。吃了亏的法国人要求清廷道歉、赔偿。大清帝国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两国军队就此在东京湾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不过此时的大清和法国并没有公开宣战。此时清廷的多数大臣都主张要跟法国人开战，反倒是一项被视为主战派的醇亲王头脑异常冷静。最让慈禧太后和她的亲信们感到意外和欣慰的是，法国人始终留在危机的爆发地，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沿海路北上“讨说法”的打算。清廷因此也就没下达准备跟法国开战的命令。于是，当法军远东司令孤拔[5]下令封锁台湾岛周边海域，并沿着闽江上溯到距离通商口岸福州以南10英里的马尾军港时，清军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战备措施，虽然大清海军的10艘木质军舰当时就停在那里。



醇亲王夫妇

来到马尾军港的孤拔总共带了9艘军舰。8月23日，他要求停泊在闽江里的大清军舰和沿江两岸炮台投降。大清军队对孤拔的要求置之不理，法军随后开火，打沉了大清的9艘军舰，沿江炮台也被炸成了废墟。总的来说，法国人的这场仗打得比杜威上将[6]当年在马尼拉湾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时候还容易。开战后第2天，法国人的舰队又击沉了闽江上的12艘船，炸毁了4座以上的炮台。大获全胜的孤拔下令舰队返回台湾海域，此时大概已有3000名左右的清军殒命沙场。法国人的暴行在西方人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愤慨。驻留福州的传教士，同时也是福州教会学校校长的施美志先生[7]这样说道:

> 死难者的尸体落潮时从闽江漂到了海上，涨潮时，他们又被冲了回来。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从马尾军港到闽江出海口的江面上漂满了尸体，甚至无法行船。这些尸体漂在那里，向世人控诉着法国人的残暴和野蛮。

很多西方人对法国的行为都感到如此愤慨，大清帝国上上下下的心情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大清帝国内部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

排外风潮，大清朝廷也保持了难以想象的克制，依然没向法国宣战。这之后，孤拔又在台湾采取了规模有限的行动，没占到什么便宜。法国陆军在东京湾周边地区跟人数相对占优的黑旗军和大清正规军打了几次仗，反倒还吃了亏。大清和法国的战争就这么不温不火地持续着。后来，其他西方国家的在华商人终于坐不住了，因为战争毕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人纷纷通过各自的渠道给战争双方施加压力，要求和谈。于是，东京湾周边的战火还在燃烧，大清和法国的代表却在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8]的斡旋下开始了谈判。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签订条约，大清承认法国在东京湾周边殖民的权利，支付赔偿160万英镑，安南则沦为受法国庇护的殖民地。

这场战争给法国政坛造成的影响不属于本书讲述的范围，这里略去不谈。就大清帝国方面来说，李鸿章签订的条约似乎可以算得上是个外交胜利，至少法国人没能通过谈判桌得到自己当初希望通过战争获得的一切。尽管如此，大清朝野仍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视为奇耻大辱，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慈禧太后则在这场危机中坚定地站在了李鸿章一边，所以后者非但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反而还取得了更多的信任和利益。不仅如此，就连在李鸿章手下，直接在福州负责指挥清军跟法军对阵的张佩纶[9]也没受到惩罚。法军出现在福州海域时，张佩纶不但放任对手沿着闽江上溯到马尾军港，开战后还向朝廷谎报消息说自己率军取得了“大胜”。张佩纶为所有这一切付出的代价仅仅是革职拿问，然后充军发配到长城以外。就连这点儿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由于李鸿章出手干预，张佩纶充军发配了没多久就被弄了回来，然后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升官发财，直到1894年才又因投机和贪污的罪名栽了跟头。从李鸿章的角度来说，他为这么个货色耗费的心血实在有些不值。好在此时的慈禧太后仍旧需要李鸿章，所以也就可以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

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时期



晚清清军

可谓麻烦不断，先是跟法国在安南开战，然后朝鲜又出了娄子。大清帝国跟朝鲜存在着明确的藩属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后，清廷才及时出手摆平了此事。作为交换条件，大清许诺将不允许其他列强染指朝鲜半岛。列强当中对朝鲜半岛觊觎最盛的当属俄国和日本。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大清帝国成功遏制了日本对朝鲜可能的侵略。这方面最主要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大清派驻朝鲜首都的代表袁世凯。袁世凯也可以算作李鸿章的门下，不过这个人明显比张佩纶强得多，能力很强，又非常懂得谋略。为了回应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种种行为，袁世凯干脆把朝鲜国王的父亲[10]抓回了中国，然后以礼相待地软禁了起来。朝鲜国王的父亲凭借身份优势，成了朝鲜的摄政王，向来以阴险和排外著称，因此也就制造了不少麻烦。这个

人被软禁起来以后，朝鲜局势安生了很多年，袁世凯因此飞黄腾达。

所有这一切都在光绪执政时期走到了尽头。光绪执政初期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迎来的最好发展阶段，当时的大清帝国内乱已经结束，也没有对外战争，朝廷里掌握实权的大臣也都比较有能力。这些大臣们明确意识到，要想让大清帝国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就必须首先加强国防建设。当时的种种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相比短命的3位前任，光绪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就光绪执政早期来说，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自1883年开始露头的反洋教运动，不过直到光绪被实际软禁以后，这种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排外行为才真正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本书后面将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

慈禧虽然利用光绪皇帝的年幼再次垂帘听政，不过这位太后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因此她就需要发现、扶植那些可以协助自己的亲信。此时，善于跟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已经被慈禧废掉了，于是就在1887年前后，慈禧又相继培养了醇亲王、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替补。这3个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却基本还算称职。除了这3个人以外，同时期只得关注的两位清廷重臣还有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11]。这两个人的生平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个性也很强，在19世纪临近结束的若干年当中跟西方人打了不少交道。

【注释】

[1] 指戊戌变法。

[2] 今北部湾。

[3] 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8岁正式亲政。

[4] 爱新觉罗·奕劻， 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皇帝曾孙。

[5] Courbet， 1827年6月26日—1885年6月11日，法国海军中将，时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

[6] George Dewey，美西战争中的海战明星，美国海军特级上将，他一生指挥的最著名战役就是美西战争中的马尼拉湾海战。

[7] George Blood Smyth，福州英华书院第二任校长。

[8] Robert Hart， 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 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 1863年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 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被清廷追授为太子太保。

[9] 张佩纶，直隶丰润县齐家坨人，同治十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婿，女作家张爱玲祖父。

[10] 指朝鲜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63年，高宗即位时年仅12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担任摄政。这个人是当时朝鲜内乱的重要根源，因此在1883年被袁世凯率领的清军抓回中国天津，软禁在保定， 3年后释放回国。

[11] 刘坤一， 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 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兼任两江总督。

第十章 慈禧再次隐退

1887年，光绪已经成年，按照大清祖制，他应该在次年春节以后亲政，然而光绪的亲政却被外人所不知晓的原因打了折扣。就在这年，慈禧太后首先对外界宣布光绪到了该亲政的年纪。紧随其后，光绪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地发布诏书说自己还不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1]：

> 朕寅绍大统，于今十有三年。践阼伊始，时事方殷，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念朕躬冲幼、时事多艰，允廷臣垂帘之请，俾朕从容念典、讲求政本，以仰副皇考文宗显皇帝皇妣孝贞显皇后穆宗毅皇帝眷顾之隆。十余年来。伏睹皇太后励精图治、惟日孜孜、慎简亲贤、严昭黜陟、载扬师武、并济刚柔，求才不弃迩言，赐帑必期实惠，用能目张纲举，物阜民康，佑启后人，允光先烈，丰功伟绩，照古腾今，为向来史册之所无，实薄海臣民所共见。 兹复特颁懿旨，以朕典学有成，宜亲大政。敬闻巽命，祗益战兢，若涉大川，罔知涯涘。我皇太后复以神器至重，朕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尚待提撕，允再训政数年。旰食宵衣，忧勤靡倦，自惟凉薄，曷敢怠荒，谨遵慈命，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行亲政礼。

光绪这么做的背后动机究竟是什么？皇帝亲政以后还要听从别人的指导，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2]。难道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敢于破坏大清的祖制？或者此时的光绪真的还不完全具备执政的能力？相比大清帝国历代皇帝乃至其他皇族成员，光绪在性格方面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如果说这位皇帝的伯父恭亲王可以被称为一个谜的话，光绪就是谜上加谜。儿童时代的光绪身体就很弱，所以他的性格相应也就比较软弱、温和。不同时期见过这位皇帝的西方人都曾注意到他苍白的面容，还有气若游丝般的呼吸。光绪的外貌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小很多， 36岁的时候看上去还跟16岁的人差不多。光绪的身材非常单薄，因此也显得很文雅。他的头比较大，前额异常饱

满。光绪的脸型基本是枣核形的，颧骨很低，下巴很尖。这位皇帝的眉弓比较高，眼睛大大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又很忧郁。光绪的嘴唇很薄，经常紧紧地抿在一起，稍稍向左歪。非正式场合的光绪衣着极端简朴，却无法掩盖他身上引人注目的帝王之气。也有谣言说，私下独处时的光绪脾气挺坏。儿童时期的他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躺在地上打滚、尖叫。生命的最后阶段，已经被软禁起来的光绪经常随手把可以够到的东西摔到地上，据说还踢过皇后一脚。光绪对女人似乎没太大兴趣，无论她们的容貌多么诱人。

光绪执政时期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发动了维新变法，这个人对来自西方的知识无疑非常感兴趣。与慈禧太后不同，光绪皇帝首先是个功底深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广泛涉猎了西方新学。从儿童时代开始，光绪就痴迷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玩具，这些玩具本身也蕴含了同时期西方最新的机械知识。亲政以后，光绪这方面的爱好得到了更大发展。他曾热衷收集西方钟表，还尝试着自己拆卸、组装它们。除此之外，光绪还鼓捣过八音盒、照相机和电话，弹过钢琴，骑过自行车，甚至在紫禁城里修了铁轨，绕着太液池跑火车头[3]。光绪非常渴望来自西方的知识，为此阅读过大量中文译本，后来干脆自己学起了英文。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光绪是个非常具有新派色彩的人物，甚至可能是最具新派色彩的中国人，对未来饱含热情而充满远见。

遗憾的是，光绪是在紫禁城只能看见女人和太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要时时受到慈禧太后的监视。据说，慈安太后起初承担了抚养光绪的责任。后来，慈安太后死了，光绪就彻底落到了慈禧和她的亲信手里。种种迹象显示，慈禧并不支持光绪的新派作风，不过鼓励这位皇帝沉迷于某种爱好终究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慈禧至少可以趁此包揽皇帝的权力。为了保证自己地位不受损害，慈禧曾经有意培养光绪对自己的尊敬。随后的种种事实证明，她在这方面的努力非常成功，最起码光绪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能够让慈禧满意，至于私下场合，那就不好说了。

按中国标准计算的17岁那年[4]，光绪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成

熟，可以如预期的那样独自管理大清帝国了，然而他的亲政和婚事都被太后耽搁了下来。就像当年同治皇帝面对的情况一样，慈禧显然不希望为这位侄子兼养子迎娶一位自己信不过的皇后。于是，她想出了个亲上加亲的基础上再加亲的办法。慈禧的兄弟名叫桂祥[5]，当时在八旗军队中获得了相当于中将的军衔。桂祥的几个女儿都很受慈禧宠爱，年龄最小的那个女儿也是最得宠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当然也姓叶赫那拉，性格温和、孤僻，容貌并不出众，比光绪还大3岁，却是慈禧心中皇后的第一人选。虽然光绪对这个女孩没有任何好感，1888年11月初，桂祥这个最小的女儿仍旧超越所有竞争对手，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后。为了让全体国民知道这个好消息，慈禧专门在北京出版的官方通报上刊发了如下旨意[6]:

> 随着皇帝逐渐长大，具备了可以承担列祖列宗留下的荣耀的能力，他也是时候给自己选个合适的皇后，协助处理后宫事务。皇后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能够母仪天下。桂祥的女儿温良贤惠，是皇后的不二人选。

光绪的皇后是慈禧强加给他的，作为补偿，他被允许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两个妃子[7]。皇宫中流传出来的小道消息说，皇帝对待皇后非常冷淡，这两位妃子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光绪跟皇后的紧张关系。还有消息说，光绪大婚那年的1月，皇宫的大门被火给烧了，这本身就是不祥之兆，说明上天并不满意这场慈禧看好的姻缘。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皇后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管闲事，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所以尽管光绪后来遭到幽禁，这位皇后却得以继续默默无闻地安享荣华富贵。

皇后人选确定后，负责皇帝大婚的官员们很快便拿出了相应的婚礼策划方案供慈禧审定、拍板。为皇帝策划婚礼其实有不少现成的先例可循，然而这些官员的婚礼计划却偏偏在其中的祭告天地环节出了纰漏，进而惹恼了慈禧，被全部解职。新的婚礼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很快纠正了前任们的失误，得到了慈禧的肯定。1888年12月4日，光绪的订婚仪式举行。需要说明的是，大清皇帝的结婚流程基本大同小异。首先要有皇帝本人乃至太后挑选合适的皇后人选，然后举行订婚仪式，皇帝给予皇后相应的信物和彩礼。所谓信物，通常就是装在纯金镶宝石匣子里的金册，它是皇后身份的证明。在大清帝国，无论皇

帝还是普通百姓，结婚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结婚前，新郎要送彩礼。结婚当天，还要要派出轿子去皇后的父亲家迎娶新娘。这之后，夫妻见面，拜天地，入洞房。结婚后的一两天，新郎还要带着妻子回门。身为皇帝和皇后，他们的结婚仪式无疑更加奢华。光绪当然用不着亲自去丈人家呈送彩礼，却也需要目送彩礼队伍离开皇宫。这支彩礼队伍由亲王率领，携带的礼物包括皇后的金册和大印，凤冠，镶有珍珠的盖头，绣着凤凰的丝绸礼服，还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队伍离开后，皇帝要跟大臣们一起聆听来自太后的旨意，他在这方面唯一的特权就是不用跪着。彩礼队伍离开皇宫后次日一大早儿，皇帝需要前往慈禧居住的宫殿拜见太后，三跪九叩。行礼完毕，慈禧退居幕后，皇帝接见皇亲国戚，再次聆听太后发布的关于自己结婚的旨意。



珍妃

根据钦天监计算，1888年12月25日是个黄道吉日。当天黄昏，皇后前往皇宫的预期路线实施戒严，以免闲杂人等窥视皇帝新娘的真容。此时的光绪虽然只是太后的傀儡，对普通百姓而言，却仍旧高高在上。皇后的喜轿总共有16名轿夫抬着，若干名亲王骑马护送，另有若干名负责开道的人跑在前面，高呼:“凤辇驾到!”与此同时，乐队演奏中国喜庆场合的传统音乐。喜轿进入皇宫后，护送队伍主动退去，

太监们从轿子里把皇后搀扶出来，引导她坐上属于自己的宝座。宣旨太监高声宣布:“吉时已到，喜结良缘!”皇帝由一队太监陪伴，进入随处可见龙凤呈祥图案的新房。直到这时，新人们才算真正见了面。这之后，皇帝和皇后从跪在旁边的侍从手里接过珠光宝气的杯子，共饮交杯酒，喜庆的音乐再次响起。

光绪结婚意味着他已彻底成年，慈禧失去了继续垂帘听政的理由。好在，这位新皇后的到来又让她在控制皇帝方面添了道保险。牢牢控制住形势的慈禧于是正式颁布旨意，从1889年3月4日开始将大权移交给皇帝。此时的慈禧其实也才只有54岁。按照光绪的安排，经历18年辛苦操劳的太后被安排在皇宫中颐养天年。为了让退休后的太后过得安逸，皇帝安排专门的负责人，提前作了各种各样的准备。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只有前面提到的那次皇宫火灾期间，才稍稍暂停。结束垂帘听政的慈禧除了去皇宫中的寺庙祈祷国家风调雨顺，自己健康长寿，很少再公开露面。作为对皇帝让自己颐养天年“好意”的回答，慈禧告诉光绪说:“皇帝的职责就是处处谨言慎行，不断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造福大清子民。”

退休后的慈禧干脆搬出了皇宫，转而住进了颐和园。这座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大概12英里左右，里面最著名的景观就是万寿山。为了方便太后前往颐和园，大清朝廷修建了专门的御路，路面由青石铺就，沿途做了景观绿化，播种季节还可以看到成片的麦子和玉米，走在上面的感觉远远好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道路。1860年，颐和园所在的旧址曾遭到英法联军破坏，后来又得到了修复。总的来说，慈禧太后安居的颐和园是个建筑林立、风景优美的好地方。置身这座皇家园林，慈禧满可以安安心心地养养花、画画画。据某些见过太后的西方公使女眷说，慈禧画画的水平的确不错。颐和园里还有个大湖，湖中心有个小岛，汉白玉的十七孔桥连接着小岛和湖岸。湖心岛被大理石的围栏围住，岛上有黄琉璃瓦的亭子，人工修建的假山，以及美丽的花园。大湖的西北部湖面相对比较窄，湖岸上有大理石的围栏。这片湖面风景挺不错，连接着直通北京城的运河，运河跟湖面的界限是一座被称为“骆驼背”结构的石拱桥，整体都是汉白玉建构而成的。慈禧如果走腻了陆路，就可以从北京城坐船沿着运河，直接进入颐和

园的水面。随着时光流逝，喜欢新鲜玩意儿的慈禧还为颐和园的水面增添了蒸汽小火轮。需要说明的是，颐和园的大湖是专属慈禧一个人的，能够陪同她乘舟泛水的只有特定的随从人员，以及大批提供各式服务的宫女、太监。

据说，慈禧在颐和园的主要活动就是园艺和乘船。作为交出权力的补偿，皇家建筑师奉命竭尽所能满足太后的要求。在建筑方面，慈禧的喜好跟拿破仑的妻子玛丽·约瑟芬差不多。尽管不少西方批评家认为慈禧在建筑方面的品位实在不怎么样，热衷奢华建筑的她仍然在万寿山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亭台楼阁。不仅如此，她还试图恢复那些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景观。只可惜，颐和园在1900年再次遭到战火破坏，不少建筑因此遭到损坏。除了园艺和乘船，慈禧的爱好还包括文学、画画和京剧。这位太后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喜欢看戏，当上太后的她得到了发展这方面爱好的极大空间，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剧团。慈禧就这么如光绪所愿在颐和园颐养天年，遗憾的是，几年以后，她的安逸生活就被打破了。本书后面章节将专门介绍这段历史。

慈禧的某些政敌声称，这位太后的生活极度奢华，就连她身边的太监也是假的[8]。前面曾经提到，为了确保自身地位，慈禧和慈安太后执政初期专门收拾过那些干预朝政的太监。作为代价，慈禧也在这个群体当中树立了不少敌人。在那些有幸目击真实清宫生活的西方人眼中，太监们都还算是些说得过去的人。例如，美国女艺术家凯瑟琳·卡尔小姐[9]就发现太监们当中其实不乏文化修养非常高的人。尽管如此，以总管李莲英为代表的太监群体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憎恶。李莲英留给西方人的总体印象是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精明干练，普通中国老百姓则觉得这个人无耻贪婪、滥用权力。耐人寻味的是，李莲英的女主人慈禧对这位手下采取了明显的纵容态度，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测他们中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这样的猜测纯属捕风捉影。



颐和园

退休后的慈禧尽管住进了颐和园，可她只要爬到万寿山山顶，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紫禁城的黄琉璃瓦。事实上，慈禧可以“看到”的不只黄琉璃瓦那么简单。通过事先布设好的各种渠道，她依旧执掌着紫禁城里的一切。

【注释】

[1]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 202—203，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为译者所加。

[2] 原文如此，只能说作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还不充分。

[3] 1886年，光绪十二年，清廷开始在皇城范围内修建皇家铁路，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 1888年竣工，一般称为“西苑铁路”。

[4] 指农历虚岁。

[5] 叶赫那拉·桂祥，慈禧的弟弟，三等承恩公，满洲镶黄旗副督统。

[6] 这份旨意的原件未查到，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7] 即珍妃和瑾妃。

[8] 坊间传言安德海是个假太监，跟慈禧有不正常关系。

[9] miss katharine Carl， 1858—1938，中文通译为“柯/克姑娘”，她是唯一在中国宫廷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外国人，也是唯一替尚还健在的中国后妃画像的

人，代表作《禁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

第十一章 光绪亲政周年庆典

1890年2月25日，亲政后的光绪正式全面接管了大清帝国的统治权。对西方人而言，这可是个期待已久的时刻，因为按照已经去世的同治帝留下的先例，他们将再次得到被大清皇帝亲自召见的机会。此前，实际掌握大清实权的慈禧试图通过“拖”的办法回避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再也拖不下去了。随着光绪正式接管大权，总理衙门也开始与各国驻华公使展开漫长的协商。最终，就在这年年底，光绪发布旨意说他将在次年农历春节后接见各国驻华公使。不仅如此，以后每年的第一个月都将照例举行这样的接见活动。对于光绪的示好姿态，各国公使备感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光绪的接见仪式流程仍然遵循了同治帝留下的先例，地点同样安排在紫禁城以外的紫光阁。1891年3月5日的第一次接见结束后，各国公使对此纷纷表示不满。这件事很快就闹到了总理衙门。最终，大清朝廷作出了让步。1894年11月，也就是马戛尔尼勋爵晋见乾隆皇帝101年后，各国公使终于在紫禁城受到大清皇帝的接见。

1891年1月1日，光绪还没来得及第一次接见各国公使，他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一来，醇亲王也就没来得及利用慈禧的退休拓展权力空间。自从光绪登基后，大清朝廷中始终就存在着敦促醇亲王及时隐退的声音。不过这位王爷似乎打定主意决不交出自己的权力，即便破坏祖制也在所不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醇亲王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问题在于，1889年光绪正式接管权力后，他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有谣言说，光绪跟自己的亲生父亲长期不和。这两个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醇亲王虽然没有多数西方人想象的那么保守，却也达不到光绪如此开放的程度。

醇亲王的死为恭亲王提供了复出的机会。只不过，光绪对这位伯

父虽然心存好感，内心却还是更倾向摆脱皇族亲属的控制，组建属于自己的力量。或许正是由于亲生父亲的去世，光绪才得以在1890年12月和1891年6月相继发布了两道广受西方人欢迎的旨意。光绪在这两道旨意中指出，目前大清帝国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已经保证了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广泛传播，朝廷也反复命令各省官员保护来华传教士。这之后，光绪继续说道:

> 基督教自有劝人从善的一套道理。大清帝国的老百姓即便皈依了基督教，也仍旧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必须服从大清各级官府的管理。我们没理由因为宗教的原因破坏和平的生活，然而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且发生的频率非常高。

光绪相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很多人才会仇视洋人的宗教，各种各样的麻烦随即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廷只得严令各地官府保护洋人，还将严惩那些办事不力的官员。光绪的旨意随后谴责了自1883年以来大清各地针对洋人的各种攻击行为，特别是1891年5月发生在芜湖和1891年6月发生在无锡的两起排外事件。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长江下游地区，后者的影响尤其坏，因为有若干名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丢了性命。就像前面提到的几起排外事件一样，这件事的起因仍然是民间有谣言说洋人拐骗中国小孩，用他们的尸体做药，再就是说洋人的宗教有意教唆破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如此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部分大清官员采取了行动，更多人却选择不作为。按照“天津教案”发生后签订条约，西方人可以在大清帝国境内自由生活、游历和传教，大清各级官员对这项规定尤其仇视。他们认为，洋人的行为正在破坏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光绪正式执政后，朝廷中皇帝阵营的大臣与太后阵营的大臣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些持排外立场的官员得以趁机拓展自己的影响力。众多西方学者认为，大清帝国发生的所有排外事件背后其实都有朝廷暗中支持的影子。这种所谓支持可能是明确的命令，也可能是默许和暗示。

有人认为，慈禧这位公认的顽固排外派在启用那些立场温和的大臣跟洋人周旋的同时，又在暗中默许和支持针对那些在广东、山东、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实际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慈禧是个善于在不同力量之间搞平衡的人，如

果她明确地站到了以端亲王、董福祥、毓贤为代表的排外派阵营一边，平衡就将被打破。有鉴于此，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极端时期，慈禧的立场始终是暧昧的，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排外倾向。只不过是由于治国理政的能力太过低下，这位太后才有意无意地妨碍了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复兴国家、抵抗侵略的努力，进而让本已麻烦缠身的大清帝国雪上加霜。

也有人认为，所有这些排外活动的幕后推手是一群身居高位而且有头脑、有目的的人，并非通常意义上愚昧无知的皇族、保守顽固的八旗子弟或者迂腐偏激的中国传统文人，这些人的意图就是要阻挠那些更加开明的同胞变法国家的努力。充分的证据表明，慈禧大权独揽时期和光绪执政初期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排外事件，背后都跟远在北京的朝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清各省地方官员仇恨洋人，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还阻挡了官员们的财路。在得到高层默许的前提下，这些大清地方官吏自然非常乐意收拾收拾这帮麻烦制造者。受到的损失的洋人们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众多大清官员为此丢官罢职，甚至被砍了脑袋。为了报仇，心存怨恨的官员们变本加厉。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事情最终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帝国内部一个极度仇恨洋人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

1891年，上述危机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了缓解危机，光绪不得不在这年6月专门发布旨意，以期挽回局面。光绪在这道旨意可谓诚恳又友善，然而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山高皇帝远”，好的旨意传达到地方未必就能起到好的作用。1895年，相对平静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和东南的福建相继发生了惨烈的排外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要攻击对象的。1894年秋天，大清帝国与日本开战，整个国家仇恨洋人的情绪因此水涨船高，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受到了波及。



西方人想象的光绪皇帝和皇后

1894年发生过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甲午战争的爆发，西方驻华公使终于解决了面见大清皇帝的程序问题，还有慈禧太后的60大寿。这其中又以甲午战争的影响最为深远，就连太后的大寿、公使们的朝觐都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其中。1894年11月12日，光绪正式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这应该算得上过去1个世纪当中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重大胜利。各国公使要求总理衙门安排觐见的理由是向皇帝当面祝贺太后的60大寿，并呈递书面贺信。对大清朝廷来说，拒绝这样的要求是不得体的，而且接受这种具有私人性质的贺信的地点也只能安排在皇宫以内。总理衙门对此感觉很为难，然而在各国公使的坚决要求下，大清朝廷居然破例没有讨价还价，最终爽快地将觐见日期安排在11月12日。觐见的具体地点确定为紫禁城的文华殿，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都是中国皇帝举行经筵的场所。文华殿在紫禁城的范围内算不上特别重要的场所，不过这毕竟是有史以来西方外交人员首次被邀请进入大清帝国的皇宫。

觐见当天，整个文华殿装饰着黄色的帷幔，家具方面却只摆放了皇帝专属的龙椅和书案。皇帝宝座的后面悬挂着刺绣装饰的丝绸帘子，慈禧太后隐身在帘子背后，公使们看不见她，她却可以听到外面的一举一动。皇帝宝座两旁侍立着清廷各部的尚书和侍郎，以及其他高级别官员。光绪皇帝双腿交叉坐在宝座上，身穿貂皮长袍，头戴皇

冠。大臣中地位最高的恭亲王和庆亲王分别站在皇帝左右两边最近的位置，他们负责充当整个觐见仪式的司仪。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各国公使依次觐见皇帝。资历最老的美国公使排在首位，他用英语向皇帝表示祝贺，然后呈递贺信。这之后，公使的贺词再被依次翻译为汉语和满语当众宣读。美国公使结束觐见后，其他各国公使再依样画葫芦。所有呈递上去的贺信均由两位亲王代为接受。亲王们拿到贺信后要大致浏览一下，将信中的意思用满语简要概述给皇帝，然后在把贺信恭敬地放在皇帝的书案上。皇帝则向公使点头示意，用满语表示感谢。皇帝说完话后，再由翻译把他的话首先翻译成汉语，然后翻译成相应国家的语言，当众宣读。觐见仪式结束时，公使们集体向皇帝鞠躬，退出大殿。

通过这次觐见，西方人第一次受邀走进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对慈禧而言，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虽然整个觐见过程中她都躲在帘子后面。1894年11月2日，也就是公使觐见前5天，慈禧迎来了自己的60大寿。这让她获得了从退休后的隐居生活中暂时摆脱出来，出入公开场合的机会。为了庆贺自己养母的60大寿，光绪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庆典的筹备工作。对这个委员会来说，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其实算不上什么难事，因为这方面是由先例可循的。1752年，也就是慈禧60大寿142年以前，乾隆皇帝为了祝贺自己母亲的60大寿，曾经举办过类似的庆典。庆典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乾隆皇帝特意穿上类似儿童款式的衣服，模仿“老莱子娱亲”的典故。当然，光绪也不一定需要做得这么过火。

不管慈禧本人乐不乐意，战争终究扰乱了她的60大寿，某些重大庆祝活动最终因为她的主动要求而被取消。坊间也有传闻说，慈禧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一半儿是出于自己愿意，一半儿也是受到了来自恭亲王等人的压力。北京以外的地区基本没有举行任何庆寿活动，北京城内的庆祝活动也被降到了最低标准。例如，为了祝贺太后60大寿，紫禁城的大清门像光绪大婚时一样张灯结彩，不过整个皇宫的庆祝活动也就仅此而已了。清廷宣布，通过压缩太后60大寿庆典节约下来的银子将被充作军费，慈禧由此也算是在国民心目当中树立了个良好形象。作为补偿，光绪在慈禧的60大寿当天为她授予了新的荣誉称号。

按照大清皇宫的惯例，后妃通常是在为皇帝产下龙子或者跟皇帝结婚10周年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才可能被授予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一般包含若干个字，当事人在获得称号的同时，荣誉称号每增加一个字就意味着他每年可以多收入10000两银子(相当于1500到2000英镑)。有鉴于此，被皇帝授予荣誉称号是件名利双收的大好事，特别是对慈禧这样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位太后临终时，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已经长16个字[1]，大大超过了她的前辈们。



慈禧

除了获得皇帝授予的荣誉称号，60岁的慈禧还感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官员们的孝心，各式各样的生日礼物纷纷涌入紫禁城。慈禧因此再次获得了展示自己高风亮节的机会，她主动把收到的礼物献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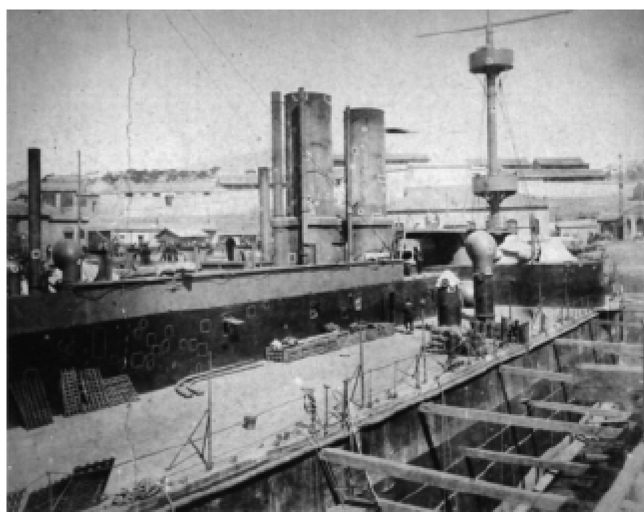
来，充当对日作战的军费。这笔钱据说达到了150万英镑的规模，不过对慈禧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话虽如此，鉴于这位太后10年后庆祝自己70大寿时再次表现出的高姿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慈禧基本还算是个有爱国心的人，当然也不能排除所有这些义举背后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由于上述事实的存在，近年来某些人针对慈禧经济方面的指责起码是不够公允的。甲午战争的爆发为慈禧的60大寿当头泼了盆冷水。通常来说，中国皇帝是不喜欢将类似战争这样的晦气事情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在这方面，咸丰皇帝如此，他的妻子慈禧同样如此。60岁生日赶上了战争，这样的事终究让异常迷信的慈禧觉得非常不高兴。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0年以后，即将迎来70大寿的慈禧特地将生日庆典提前1年举行，从而避免了再次被某些倒霉事煞风景的可能性。



日军缴获的清军重炮

1894年8月1日，大清和日本正式宣战，此前1周，战争其实已经打了起来。引发这场战争的根源是朝鲜半岛。早在16世纪，这两个国家就曾为此发生过冲突[2]。从那时开始，日本便不断试图染指朝鲜半

岛。与此同时，朝鲜内部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希望通过跟日本合作，获取相应的利益。朝鲜和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直到1880年代早期，大清帝国还跟朝鲜保持着藩属关系。1885年，觊觎朝鲜的日本与大清达成协议，共同撤出滞留半岛的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却背信弃义地继续在首尔驻军，随时准备侵占这个国家。面对日本在朝鲜的咄咄逼人，李鸿章一如既往地理智而冷静，此时的他明确意识到，如果大清和日本开战，自己在直隶省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新式陆军和海军就将灰飞烟灭。甲午战争爆发前，类似李鸿章这样的主和派属于少之又少的异类，就连他那个不成器的女婿张佩纶也曾义愤填膺地给光绪上书，要求好好教训教训日本人。李鸿章无疑比他的女婿老练很多。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就当时的形势来说，仗是肯定要打的，但绝对不能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危机最终只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好在此时的李鸿章虽然已经成了官场上的众矢之的，慈禧太后这个靠山却依旧牢固，可以为他提供有力的支持。



被俘的镇远舰

甲午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朝鲜国王在1894年请求大清派兵协助镇压本国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宗主国的大清为此向朝鲜派出了规模有限的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1885年签订的条约也向朝鲜派出了军队，而且人数远远多于大清。日本此举明显属于故意找茬，大清

也不打算示弱，战争自然不可避免。1894年7月25日，两国舰队在朝鲜附近海域发生激战。甲午战争跟本书主题并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无需赘述。简单地说，大清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擦屁股”的任务最终又落到了李鸿章身上。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新式军队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已经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总督背负了太多骂名，此时的他本不愿意再去背“卖国贼”这口黑锅。问题在于，当时的清廷除了李鸿章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谈判人选。最终，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李鸿章成了对日和谈的全权代表。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由儿子李经方[3]陪同来到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解除了大清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同时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开放了若干新通商口岸，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条约签订后，大清帝国上下群情激愤，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要求将“卖国贼”碎尸万段。然而就像1885年李鸿章跟法国人签订条约后的情况一样，慈禧太后及时出手，压制住了针对这位亲信的种种指责，因而也惹恼了不少狂热的爱国者。尽管如此，慈禧仍旧对李鸿章的工作表示了有限的满意。最起码儿，他的努力和付出将大清帝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凭借李鸿章的危机处理，大清帝国虽然输掉了战争，总算还没把老本儿赔光。《马关条约》签订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俄国、法国和德国联手向日本施压，大清帝国借此进一步挽回了某些损失。不过从长远的角度来说，3国的干涉也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作为3国联手施压的结果，羽翼未丰的日本表示屈服，将原本已经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大清帝国为此又额外拿出了一笔钱，增加了几个通商口岸。8年以后，遭受屈辱因而决心复仇的日本再次点燃战火[4]，大清帝国也受到了波及。

【注释】

[1] 宣统帝执政时慈禧谥号最终被确定为23个字，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2] 指明万历年间朝鲜的抗倭战争。

[3] 李鸿章长子。

[4] 指1904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

第十二章 光绪维新

1894年慈禧庆祝60岁生日的同时，还发生过一件小事。这件事情本身不大，影响却非常深远。为了庆贺慈禧60大寿，总计10000人左右的中国各地女性基督徒决定联手敬献太后一份礼物。在神父、牧师们的建议下，妇女们最终决定送给太后一本银子包边的中文版《圣经》。1894年11月11日，这本工艺精美的《圣经》通过英美驻华公使转交给了总理衙门，然后再由他们呈送给太后。作为答谢，慈禧写了封措辞委婉的便笺，还赐给几位牵头儿的女性基督徒一些礼物。这之后，那本《圣经》就被她忘到了脑后。反倒是听说此事的光绪特意请求北京当地的教会为紫禁城提供一批《圣经》，以便感兴趣的太监们闲暇时可以翻翻。

光绪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是要把自己或者太监们变成基督徒，而是希望更加彻底地了解西方。正如前面所说，光绪热衷收集来自西方的各类书籍，读了不少相关的中文翻译本，甚至还打算亲自学习英文，而且真的掌握了几个英文单词。光绪渴望来自西方的知识，不过这个人明显缺乏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的毅力和能力。更糟糕的是，皇宫里的太监大多都是文盲，最多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不足以成为光绪在学习方面的导师和伙伴，所以他就只能在皇宫以外寻找相应的替代。如果曾国藩当时还在世，那么光绪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命运就都有可能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此时光绪能够找到的志同道合者只有康有为。



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

在讲述光绪发动的变法维新，以及慈禧太后以此为借口重返紫禁城的故事前，有必要首先聊聊1896年俄、法、德3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那段历史。光绪的运气非常不好。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整个大清帝国的排外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度，恰在此时，光绪开始鼓励自己的国民学习西方，这在情感上其实非常不容易被人接受。当时的情况下，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活动可谓按倒葫芦起来瓢，大清各级地方官员对此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1897年11月1日，事情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2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省西部的农村地区被杀[1]。当时的人们无法判断作为受害者的德国究竟是完全无辜的，还是在暗中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2名传教士的死最终为早就渴望提升在华政治影响力的德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得知本国传教士遇害，德国海军舰队第一时间赶到了胶州湾，这个山东沿海地区条件最好的港口。胶州湾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公元414年，法显和尚[2]就是从这里坐船出发，前往印度取经的。德国人很快占领了青岛，然后就向清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

比如支付巨额赔款、惩办凶手和地方官、撤换山东巡抚、租借胶州湾90年，以及获得在山东省境内开矿和修建铁路的特权等。眼看德国人在山东耀武扬威，其他西方列强采取了静观甚至默许的态度，大清帝国自己无力抗衡德国又找不到合适的帮手，自然只能全盘接受对方的条件。德国人的麻烦刚刚解决，俄国人又跳了出来，要求比照德国在山东的先例，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同时还要将正在修建的横穿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地区延伸到这2个港口。中国有句成语叫趁火打劫。当时的日本首先点着了大清帝国的房子，德国和俄国则是利用这个机会占便宜的。这还不算完，英国和法国很快也加入到了趁火打劫的行列，分别强行租借了威海卫和广州湾。如此一来，仅仅是因为2名传教士的死，大清帝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相继丢掉了4个最好的港口。趁火打劫，这就是俄、法、德3国干涉还辽的最根本动机。至于英国人，他们连最起码儿的本钱都没出。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让西方列强认识到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无力，此时的这个国家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只有那些最弱小的西方国家暂时还不敢亮出刀子。不久的未来，他们也将得到分一杯羹的机会。就在列强争相宰割大清帝国的同时，光绪跟那些守旧派大臣们间的隔阂也在逐渐加深。甲午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光绪领衔的维新派跟守旧派实现了短期的合作。随着战争的结束，这样的合作再也无法维持。此时的光绪迫切希望在国内实行改革，希望自己的改革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又不希望为了这样的目的损害大清帝国的尊严。1896年，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圣彼得堡出席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道环游世界返回中国后，切实感受到了维新派和保守派间的矛盾张力。这位老总督回国后首先被叫到慈禧太后那里喝茶聊天以示慰劳，然后很快又被皇帝下旨严惩，剥夺了黄马褂和三眼花翎，还被罚了半年俸禄。如果不是太后及时出手干预，他遭受的惩罚可能还要更加严重。光绪恼火李鸿章也算情有可原，因为李总督在圣彼得堡跟俄国人达成的协议的确到了丧权辱国的程度。据说，李鸿章之所以愿意担这个骂名，是因为收了沙皇的钱。如果不是由于太后掣肘，光绪很可能直接就把这位老臣给收拾了。



李鸿章



慈禧的干预让光绪失去了借李鸿章这个由头儿解决守旧派的机会，德国人强占胶州湾的危机再次让他看到了借题发挥的可能性。此时的光绪以退位为威胁，要求太后完全交出权力，以便自己可以更加方便地化解危机，慈禧决定让步。她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以取代光绪的合适皇位继承人。更何况，新的皇位继承人也意味着新的不确定因素。话虽如此，慈禧在交出权力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光绪的监视和控制，只不过所有行动都改为暗中进行。此后很长时间里，名义上彻底交权的慈禧除了1898年5月15日偕同皇帝接见奉命率领舰队强占胶州湾的德国海军上将以外，再没回过紫禁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次会见也是慈禧太后首次直接面对面地接见洋人。

慈禧太后的暂时屈服让光绪看到了希望，进一步加快了自己主导的改革。当时，光绪的身边聚集着大量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接受西方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官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和来华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学校，也有少部分人直接去西方留过学。他们拥有知识和热情，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这些年轻人备感屈辱，同时也坚定了他们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寻求国家富强的决心。遗憾的是，这些青年人对日本的模仿过于死板，没考虑到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因此也就注定了未来失败的命运。例如，崇拜西方科学的他们过于盲目地成立了大量新式学堂，同时又过于盲目地关停了大量传统书院、私塾。这样一来，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式读书人自然而然就站到了维新变法的对立面上。话虽如此，改革初期，由于光绪的强烈支持，维新派还是占了上风。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只要光绪能够牢牢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改革就可以持续推进下去，然而这位皇帝真的可以把权力始终抓在手里吗？

1898年年初，光绪已经明确加入了维新派阵营，并结识了康有为，后者送给他1本自己撰写的有关日本明治维新的书。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898年1月，康有为专程面见总理衙门大臣。双方畅谈了大概3个小时，会谈过程中，康有为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改革大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任用更多具备新知识的年轻人。总理衙门比康有为想象得还要开明，爽快地表示愿意把后者引荐给皇帝，引荐的前提是康有

为先要给光绪写份奏折。康有为听从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呈递了奏折。光绪看了奏折，马上下旨邀请这位新派人物进宫会面。据北京发行的《京报》[3]说，康有为之所以得到皇帝垂青，主要归功于某些高层人物暗中施加影响。这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总理衙门的2位高级官员，光绪的堂兄弟和姐妹等。公开倡导维新变法前，为了更方便地获得外界信息，光绪下令总理衙门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替自己传递消息。这样的举动遭到了包括恭亲王在内的众多满族大臣反对，光绪却依旧我行我素。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康有为结识了光绪，进而成了后者的高参和密友，同时也成了众多守旧大臣的眼中钉。

对于康有为其人，西方批评家的评价呈现出明显两极分化的态势。维新变法失败后，这种两极分化又变成了一边倒的横加指责，康有为因此被戴上了“危险的煽动者”“野心家”“半吊子学者”之类的罪名。尽管如此，康有为还是在英国、日本等国的政府当中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进而得到了他们的庇护。较之西方人，康有为自己的同胞们对他的评价更加多样化。在康有为的故乡广东，他被尊称为“康圣人”“孔子再世”。正是凭借如此吓人的名头，康有为才得以在维新派当中获得较高的威望，最终进入清廷最高决策层。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读书人那里，康有为则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就连某些接受过西方教育读书人也对他存在着强烈的敌意。

获得光绪信任的康有为成了维新变法的“助推器”，也成了能够左右皇帝意志的高级幕僚。坊间传闻，康有为曾经给光绪皇帝打气说慈禧太后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自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她在老百姓当中已经失去了威信，要想铲除这个绊脚石易如反掌。光绪被康有为说动了心，却又无法真正下定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在1898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政令出现了明显的左右摇摆，官员们因此无所适从。同样是在1898年5月， 66岁的恭亲王告别人世，他的死很快引发了政坛地震。首先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被迫辞职，他在总理衙门的职务由前直隶总督继任。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侄子，光绪的表兄，英俊又精明的满族大臣荣禄[4]成了新的直隶总督。政坛的变化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恭亲王去世后仅仅几个月，坊间就有传闻说慈禧太后

可能再次出来公开执政。还有传闻说，翁同龢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推进变法不力，光绪早就打算收拾他，只是碍于恭亲王的面子。恭亲王死后，翁同龢的靠山也就倒了。至于荣禄，大家认为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新任直隶总督，进而控制北洋新式陆军和海军，完全都是慈禧太后为自己复出而布的局。就在4年前，荣禄还只是某省的低级军官，是慈禧一步步把他提到了今天的位置。荣禄的晋升说明慈禧仍旧牢牢控制着清廷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了她制衡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的最重要筹码。荣禄就任直隶总督的同时，袁世凯则被慈禧任命为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后者由此成了她手里能够平衡荣禄权力的一颗棋子。遗憾的是，就在这年9月，光绪却想当然地把袁世凯当成了自己人。

就在大清官场发生地震的过程中，光绪领导的维新变法终于开始了。从1898年6月11日到这年9月初，光绪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变法有关的旨意。篇幅所限，本书只能简要介绍光绪维新变法中最主要的27条措施。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旨意中，光绪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基本纲领，重点谈到了军事和教育方面改革的紧迫性，同时还指责了大清官员的昏聩无能。作为变法措施，光绪决定在北京设立一所现代大学，以便向国民普及新式教育。于是，京师大学堂[5]正式成立。8月9日，光绪再次下旨，聘任丁韪良博士[6]为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并给予他大清官员的待遇。京师大学堂在慈禧重新掌权后被保留了下来，成了光绪那场注定失败的变法硕果仅存的纪念。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大清帝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八股取士制度被下令废止，各省也都仿照京师大学堂的样式成立了名目各异的新型学校，原有的旧式书院和私塾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理所当然地损害了某些旧式读书人的利益，他们因此成了慈禧的坚定盟友。教育改革稳步推进的同时，大清帝国的军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专属于新式海陆军的外国顾问制度推广、扩散到了包括八旗在内的所有清军部队，现代军官的教育和选拔体制也被建立了起来。除了以上几项，光绪变法的其他内容还包括开矿、修建铁路、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鼓励发明创造、新闻出版自由等。维新变法实施过程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强学报》[7]在上海创刊，康有为成了这份报纸的主编。

领导变法的光绪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将引发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因此他也颁布了相应的旨意表示自己愿意倾听一切反对意见，然而在维新变法的实施过程中，这位皇帝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强力手段铲除那些对立面。相应的，那些支持和参与变法的人就很容易得到他的信任和提升。随着维新变法的逐步推进，光绪的热情也越来越高。1898年8月底，针对大清帝国官僚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作为改革措施之一，原有的六部遭到裁撤，它们的职能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大批官员因此丢掉了饭碗。9月1日，光绪再出重拳，2位尚书(满族、汉族各1人)、4位侍郎被解职，理由是他们私拆了1位维新派下属呈递给皇帝的密封奏折。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官场上的论资排辈、改穿西式服装、确立基督教为国教、设立议会、太后和皇帝亲自前往日本考察新政等。6位私拆奏折的官员看了自己下属的建议，感觉义愤填膺，随即也给皇帝上了份针锋相对的奏折，光绪的答复是将他们全体解职。



6位高级官员的被解职应该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丢了官帽的他们立刻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鉴于光绪皇帝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这些官员强烈呼吁太后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慈禧太后听了这些官员的话，只是平静地命令他们退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话虽如此，这时的她心里肯定已经有了准注意。拿定主意的慈禧就这样继续等待着，等待光绪“恶贯满盈”。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9月7日，光绪下旨撤了广东、湖北、云南3省巡抚的职，随后又免除了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还把一位高级官员踢出了户部。据说，李鸿章的被解职是由于英国驻华公使不满他明显偏袒俄国，同时还蔑视大英帝国的权威。李鸿章自然是不好欺负的，光绪由此又多了个强大的敌人。



京师大学堂匾额

李鸿章被从总理衙门解职后，光绪颁布了变法期间的最后3道旨意，为大清帝国引入了西方模式的财政预算制度。这之后，维新变法就被扼杀在了襁褓当中。某些对光绪持支持态度的西方批评家认为，光绪发动的维新变法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冒进，短时期内触及了太多群体的利益。单从字面看，光绪颁布的所有政策都是正确而合理的，却是不现实的。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很有几分道理。当时大清帝国的条件尚不允许完成如此激进的改革，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却给光绪造成了太多的错觉，让他忽略了来自保守派的可能反击。保守派原本是一个以慈禧为核心，相对松散的群体，当他们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便立刻结成了牢固的同盟，决心死战到底。共同的利益追求让这些人，相比维新派，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清代文人

此时的顽固派掌握着一件足可以致变法于死地的有力武器。那些被光绪树立为中国学习和模仿对象的西方国家，本身也是正在瓜分、肢解中国的侵略者，顽固派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把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转移到光绪的维新变法身上。要知道，就在光绪发出

变法命令的同时，英国正在要求总理衙门确认它对威海卫的实际控制权，并扩大香港殖民地的范围。备受洋人欺辱的大清帝国需要向洋人学习从而反抗他们的侵略，这就是很多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的维新变法内部存在的悖论。尽管如此，这些有识之士依然坚信向那些“西方强盗”虚心学习肯定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光绪义无反顾地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只不过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的强烈抵制。

【注释】

[1] 1897年11月1日深夜，德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教堂被当地大刀会杀死。11月14日，德国海军陆战队在军舰配合下登陆胶州湾沿岸，最终强占这个地区直到一战结束，史称“胶州湾事件”，作者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2] 法显， 334年—420年，东晋高僧，中国历史上第1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公元399年，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回国。

[3] 《京报》最初是清代在北京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中文期刊，也称“邸报”。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投递。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故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

[4] 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

[5] 今北京大学。

[6]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汉学家，1850至1860年在宁波传教，曾参与1858中美《天津条约》的签署。

[7] 原文为chinese progress，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报刊名称，推测作者指的可能是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发行的《强学报》。

第十三章 顽固派的反击

1898年9月初，身在紫禁城的皇帝与安居颐和园的太后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双方根本不存在和解的可能。领导维新变法的光绪发现，那些顽固派已经聚集到了慈禧太后周围，酝酿着针对他的反击。出于先发制人的考虑，维新派建议光绪立刻采取措施。坊间传闻，康有为等人当时的设想是把慈禧软禁起来，让她无法再对政局产生影响。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必须剪除太后身边的羽翼。李鸿章当时已经老迈昏庸，不足为患，维新派真正需要担心的对手是新任直隶总督荣禄。光绪最终全盘接受了维新派提出的计划。这时的慈禧尽管还没有站出来明确表态，心里却已拿定主意必须阻止皇帝的“瞎胡闹”。作为迟暮老人和传统中国妇女，慈禧发自内心地厌恶任何改革，顽固派非常巧妙地将慈禧的这种心态引导到了维新派和他们的变法身上。话说回来，慈禧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识时务，善于投机，一旦形势需要，她也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打扮成跟光绪一样的改革者[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出自对维新变法的厌恶，而是担心自己可能因此失去权力，身陷囹圄，甚至被人杀死。

鉴于当时的形势，慈禧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维新派的计划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手段，夺取太后手中的政治权力。慈禧在这方面也算是未雨绸缪，虽然身在颐和园，却始终关注着紫禁城内的风吹草动。就在维新派准备采取行动的同时，她也作好了反击的准备。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在这个关键时刻将直隶总督的位置以及北京周边军队的控制权交到了亲戚兼亲信荣禄手里。为了制衡荣禄，她又让袁世凯成了直隶省内新式清军的直接负责人。此时的光绪想当然地认为袁世凯必定跟荣禄不和，因此能够为自己和维新派所

用。于是，光绪就把袁世凯从天津叫到了紫禁城，要求他杀死荣禄，然后率军包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

就这样，维新变法的最终命运落到了袁世凯手上。经过反复权衡， 1898年9月，袁世凯决定背叛光绪，投向慈禧阵营。离开北京后，袁世凯直接找到荣禄，报告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情况。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袁世凯受到了维新派以及光绪的弟弟二代醇亲王[2]一致仇恨。二代醇亲王后来成了大清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大权在握的他很快利用自己的权力解除了袁世凯的职务。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1898年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救了慈禧太后的命。得到消息的荣禄立刻来到北京面见庆亲王，然后两人一起前往颐和园。慈禧接见了他们，了解了维新派的计划，然后立刻传令备轿，仅仅带着一帮太监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轻而易举地把光绪抓了起来，其间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光绪被抓后，血腥的屠杀随即开始。耐人寻味的是，慈禧接管朝政的过程非常顺利，原本听命于皇帝的大臣们中的多数人在太后面前照样俯首帖耳。光绪本人也没有丝毫反击的打算，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姑姑坐上属于他的宝座。此时的光绪似乎已经手足无措，他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给康有为下了道密旨[3]:



袁世凯

>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正是由于光绪提前通报了消息，康有为在慈禧返回紫禁城的当天夜里逃进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然后又在朋友的掩护下从天津乘船取道上海最终抵达香港。与此同时，包括他弟弟康广仁在内的多位

维新派领袖却没能及时逃离北京，被慈禧下令抓了起来。这之后，光绪就被自己的姑姑彻底控制住了。1898年9月21日，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公之于众[4]:

>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敦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

1898年9月23日，也就是光绪连续发布一系列维新变法诏书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慈禧再次全面接管了大清朝廷。当时北京有谣言说光绪病得很重，不久就会死去。尽管如此，光绪署名的诏书仍然接二连三地被发布出来，而且内容都是跟他此前的意志完全相反的。例如，光绪被囚禁3天后，清廷就弄出了一道让这位皇帝自打嘴巴的诏书[5]:

> 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忘为揣测，议论纷腾。 …… 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复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
>
> 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沦落到这个地步，变法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当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结束了每年的例行休假，从距离北京城15英里的西山返回城里时，各种关于变法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他们首先得到的消息就是包括康有为弟弟在内的6名维新派领袖[6]已经被处斩。具体的行刑时间是1898年9月28日。被斩首的6位年轻人表现得都非常勇敢，至死还在大骂慈禧太后，声称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他们的未完成的事业。6位年轻人被斩首后的第二天，另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被公布了出来。这份诏书以光绪的名义指责康有为的学说背叛了孔子，他的所作所为意在颠覆大清社稷，同时还发布了针对康有为的悬赏通缉令。诏书的结尾还以光绪的口吻表示，此前一天被处斩的6名维新派都是隐藏极深的叛国者，幸亏朝廷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光绪被囚禁后，他颁布的各项变法措施又被逐条“矫正”了过来。六部人员因此得到重新调整，3个省的地方官员也被来了个大换血，只有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几所新式学校得到保留，不过改革旧有私塾、书院的行动却被停了下来。光绪此前发布的要求全国上书为变法建言的旨意遭到撤销，变法期间创办的《强学报》也被停刊。以此为肇始，光绪变法时期制定的自由出版和言论政策彻底成了一纸空文。随着维新变法的半途而废，针对维新派人士的恐怖大清洗也拉开了序幕。当时，康有为已经逃出了北京，大清朝廷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作为惩罚措施，奉命率领军舰前往上海搜捕康有为的军舰管带被投入了监狱，理由是“办事不力”。此时的慈禧恨透了康有为，即便冒着挑战国际舆论的风险，也要把他抓回去砍头，因为光绪杀死荣禄、软禁太后的计划基本都是康有为设计的。如此一来，本质上可能并不绝对仇视维新变法的慈禧就加入了保守派和排外派的阵营。

1898年9月大清帝国的政局可谓风云突变。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流产，各种针对洋人的攻击行为也是按倒葫芦起来瓢。就在9月的最后一天，一位美国公使馆人员和一位英国公使馆人员前往位于北京城外的火车站迎接家眷，却在返程途中受到攻击。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各国公使馆随即给驻扎天津的舰队发电报，要求派兵前往北京，保证公使馆安全，接到电报的各国舰队随即成立了一支联合海军陆战队。这支部队虽然最终没能开赴北京，却一直维持到次年春天才宣布解散。西方列强的反应让清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开始采取某些措施控制局面，然而就在1898年10月23日，几位参与修造北京至汉口铁路线的英国人在距离北京8英里的位置遭到攻击，受雇于他们的1位中国工人被打死。各国公使馆事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实施这次攻击行为的不单纯是受到煽动的老百姓，还包括正规的清军士兵。

1898年9月，慈禧太后第3次发动政变后，驻扎甘肃省的董福祥将军[7]奉命率军进京勤王。董福祥此前也曾起兵反抗过大清帝国，后来又归顺了朝廷，不过这位将军和他麾下士兵们身上的那股草莽之气始终就没能消除干净。奉太后旨意进京的他信心满满，曾向慈禧夸口

说自己的部队足可以把所有洋人都赶到海里。慈禧对此只是微微一笑，告诉他说事情还没闹到这个地步。话虽如此，董福祥手下的士兵却无法领会太后的用心，于是就发生了1898年10月23日的惨剧。迫于各国公使的压力，牵涉此事的清军士兵在受害者的见证下遭到了大清官员的惩处，董福祥本人却毫发无损，继续在北京扩充着自己的影响力。

就在大清帝国上上下下被半途夭折的变法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同时，清廷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当时有消息说光绪皇帝已经被从皇宫转移到颐和园，囚禁在昆明湖中的小岛上。也有消息说，皇帝并没有离开紫禁城，而是被囚禁在太液池中的小岛上[8]。这个小岛只能通过一座吊桥跟湖岸相连，已经被太监严密把守住了。10月15日， 14名官员因“反叛朝廷”的罪名，被慈禧下令绞死。3天后，又有几位官员被砍头。接下来的日子里，数名官员再次遭受了同样的惩罚，理由居然是他们未经允许暗地里给饥寒交迫的皇帝送棉衣。再后来，光绪掌权时经常被召进皇宫表演的戏班子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坊间传闻说，这个戏班子的老板在某些太监的帮助下，穿了套西方人的衣服，试图混进紫禁城协助光绪出逃。慈禧太后察觉到了他们的行动，戏班子里的人及时逃离了北京，参与此事的太监们则被留下顶缸。

光绪被囚禁后，各种不利于他的消息被清廷不断释放出来，其中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反复向世人强调皇帝健康状况恶化，已经无法正常执政。各国公使馆通过官方途径得到的消息是，刚刚发生的政变仅仅属于大清皇室的家事，根本无关大局。尽管如此，窦纳乐爵士[9]仍警告清廷说，如果光绪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死了，必将引发严重的国际后果。为了安抚西方人，慈禧专门下旨，邀请外国医生进宫探视光绪。10月17日，来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见到了光绪，进而发现这位皇帝除了遭到囚禁后出现的正常生理反应外，身体并无大碍。

由于西方列强施压，囚禁中的光绪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尽管如此， 10月底时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仍然出现了“光绪试图出逃最终却没能成功”的传言。据说，当时光绪已经从位于昆明湖的岛上逃了出来，然后被一大群太监追着跑到了颐和园的大门口儿。光绪跑

到颐和园门口时被慈禧安排的侍卫堵在了那里，随后赶来的太监们则跪下哭着请求皇帝不要再跑，否则他们的命就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只得转身返回了小岛。变法失败后光绪首次公开露面是在1898年 11月8日，随同慈禧太后接见日本驻华公使。需要强调的是，这次接见被安排在慈禧办公的宫殿里，而不是光绪自1894年以来举行外事活动的固定地点。当时大清帝国老百姓普遍相信太后接下来的行动要么是暗中把皇帝弄死，要么就是强迫皇帝退位。坊间传闻认为，当时真正救了光绪的人可能是荣禄。如果这则传闻属实的话，荣禄其人真可谓心胸宽广。毕竟，皇帝曾经打算要他的命。从慈禧的角度来说，杀死光绪可能是避免自己大权旁落的最好办法，她的确有理由承担这个弑君的罪名。一直以来，所有反对慈禧的人始终坚称太后最终谋杀了皇帝，与此同时，所有支持慈禧的人则言之凿凿地说太后根本就没这么做[10]。



荣禄

对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光绪而言，生与死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即便可以活下去，也是纯粹的苟活。这位年轻而充满热情的改革者从此只能待在与监狱无异的宫殿里，眼睁睁看着姑姑把那些关乎大清帝国生死存亡的改革措施逐条推翻，“让中国立足于世界列强之林”这句维新变法初期由光绪提出的口号至此彻底成了白日梦。身处囹圄中的光绪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有违初衷的旨意，任由那些保守派搞垮大清帝国。那些曾经协助他维新变法的年轻人纷纷丢掉了性命，光绪则必须在处死他们的命令上盖章、签字。那位协助光绪成功坐上龙位的女人，那个被他称为“姑姑”的女人，如今又变成了个称职的“典狱长”。她把自己的侄子囚禁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任命那些冷漠麻木的太监充当看守。就连充当看守的太监人选也要每天更换，这样一来“囚犯”也就无法跟“看守”日久生情，光绪再也无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小岛以外的地方。

支撑光绪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寄托就是等待复仇的那天。在很少几次与外人接触的过程中，光绪反复表示自己终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尤其不能放过袁世凯。只要光绪可以等到慈禧归西的那天，所有背叛过他的人都将付出代价。光绪将自己的复仇时刻安排在慈禧死后究竟是出于对这位姑姑的恐惧，还是尊重呢？这两者或许皆而有之吧。要知道，果断行动从来都不是光绪的强项，除非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与此同时，孝道也成了他向慈禧动手的最大障碍。孝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无论皇帝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遵守。

【注释】

[1] 指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领导实施的清末新政，这场改革基本照搬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2] 指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译者为区别本书前面提到的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将其翻译为“二代醇亲王”。

[3] 指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随身携带的光绪“衣带诏”，不过史学界始终对这份诏书的真伪问题存疑，此处光绪“衣带诏”原文转引自中国社科院马勇教授《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4]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同时假托

光绪名义发布吁请慈禧训政的诏书，慈禧第3次垂帘听政，史称“戊戌政变”，自6月21日至9月21日总共103天的戊戌变法正式结束，下面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597—598，句读是译者加的。

[5]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602—603，句读是译者加的，这份诏书比较长，本书作者只引用了开头和结尾部分。

[6] 即被押赴菜市口斩首的戊戌六君子。

[7] 董福祥， 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甘肃环县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8] 即中南海瀛台，当时中南海、北海跟今天的故宫是连成一片的，被称为“西苑”，都属于皇城的范围。

[9] sir Claude Macdonald， 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 1888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 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10] 近年最新的考古发现，光绪尸体，特别是胃部的砒霜含量远高于常人，确系中毒死亡，不过史学界认为凶手不一定就是慈禧。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

就在光绪栖身小岛，看着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帝国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同时，重新走上前台的慈禧太后正在放手收拾那些维新派。类似康有为这样的流亡者终归是幸运的，因为各种原因留下的人则只能坦然承受自己的悲惨命运。那些协助慈禧搞垮光绪的人获得了及时的回报。荣禄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和兵部尚书，由此成了大清帝国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袁世凯接替荣禄出任直隶总督，还加挂了侍郎头衔。李鸿章虽然没能及时出手协助太后夺权，毕竟还是在光绪那里受了不少委屈，作为补偿，他被任命为应对这年8月黄河泛滥而成立的官方机构的最高负责人[1]，很快又获得了更多的荣誉。

正如前面所说，光绪亲政后的慈禧并没有放弃对清廷人事任免权的控制，这让她在重新走上前台后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朝政。光绪即便在权力的鼎盛时期，也只能将手下的维新派安排到那些不起眼儿的位置上去，类似军机大臣、总督、巡抚之类的重要职位全都被慈禧的心腹把持着，政变后的慈禧首先要做的事情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优先提拔那些自己更信任的人。荣禄理所当然成了太后眼里的大红人。紧随其后得到提拔的是前广东巡抚刚毅[2]，这个人跟大清皇室沾亲，被来华外国人视为顽固的守旧派。慈禧却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是个有能力的人，特别擅长搞经济，因此可以提拔起来收拾光绪留下的烂摊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慈禧似乎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提拔满族官员，用以压制维新变法时期出尽风头的汉族大臣。满汉互相制约，这也是历任大清皇帝控制朝政的要诀所在。

出于抗衡维新派的需要，向来善于搞平衡的慈禧被迫跟那些顽固的守旧派结盟，从此成了很多人眼中妨碍中国发展的绊脚石。英国伦

敦《泰晤士报》曾有文章这样写道:

> 某些人认为慈禧支持守旧派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光绪领导的变法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也是出于热爱国家的考虑。然而正如大家随后看到的那样，守旧派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话虽如此，善于搞平衡的慈禧在联合守旧派，控制朝廷大权的同时，对守旧派仇视的洋人也表现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虽然这些洋人把她的重新掌权视为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前兆。很多人认为，当年那些西方驻华公使夫人得以首次走进紫禁城，最初源自慈禧向西方示好的需要，这其实是错误的。早在1898年5月，普鲁士亲王亨利[3]曾应邀来到紫禁城面见皇帝和太后。临行前，他曾开玩笑地询问英国窦纳乐公使夫人自己此行有什么可以替她效劳的地方。公使夫人告诉他说，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请向她转达自己希望受邀访问紫禁城的请求。亨利亲王满口应允，第二天见到慈禧时还真的替公使夫人带了话儿，同时还向慈禧说明这么做其实也是有利于大清帝国的。慈禧对此表示赞同。

1898年12月初，慈禧得知公使夫人们打算以庆贺太后64岁生日的名义入宫觐见，便顺水推舟地把这个日期安排在12月15日。12月15日当天，以窦纳乐夫人为首的公使女眷们坐着轿子，在众多护卫的陪同下，走进了紫禁城。进入紫禁城的公使女眷们首先得到了总理衙门官员和几位亲王的招待，随后，她们换乘皇宫内部的肩舆，沿着皇城内部的铁路，经过汉白玉石桥，来到慈禧端坐的大殿。进入大殿的公使女眷们享用了茶水和点心的款待，陪同慈禧接见她们的还有众多格格和宫廷贵妇。最出乎意料的是，光绪本人也驾临现场。双方客套寒暄一番后，窦纳乐夫人代表众位女眷用英语向慈禧表达了生日祝福，庆亲王则用汉语替太后感谢了各位公使女眷。接下来，各位女眷分别拜见了皇帝和太后，具体的顺序是先见皇帝，再见太后。光绪依照西方礼节跟她们握了手，慈禧除了握手以外还送了她们每人1枚镶嵌大珍珠的金戒指，公使女眷们依次鞠躬致谢。



慈禧与驻华公使女眷合影

整个觐见过程至此还没完全结束。太后、皇帝退场后，专为公使女眷们准备的午宴端了上来，庆亲王和他的福晋，以及5位格格作陪。午宴结束后，女眷们被带到别的房间用茶，随后又返回到原先的大殿里。慈禧太后再次现身，她端坐在象征皇权的宝座上，亲切而随意地跟女眷们聊起了天儿。美国康格(conger)公使夫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 慈禧太后睿智又开朗，脸上饱含善意。她的言行随意又温和，处处表现出对我们来访的欢迎态度。后来，慈禧太后站了起来，同时也请求我们站起来。我们依次和她握手，她则满脸真诚地反复说着:“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

这次会见结束后，慈禧再次退席，公使女眷们则受邀观看宫廷戏班子的表演。观看过表演的公使女眷们第3次见到太后，慈禧非常谦逊地说自己希望她们今天过得愉快，招待方面如有不周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与此同时，茶水又被端了上来。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回忆，慈禧为了表示善意，特意把每杯茶都抿了一口，然后又亲自端着茶杯来到相应的公使女眷面前，让对方从杯子的另一边也抿一口，嘴里还不

断重复着说:“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这之后，公使女眷们再次得到了太后赐予的礼物，满心欢喜地离开了紫禁城。鉴于上面谈到的这次觐见活动，慈禧似乎不应该被单纯的定位为排外派或保守派。遗憾的是，1899年至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慈禧也被有意无意地裹挟其中，再没有向西方人展示这般善意的机会了。即便如此，在对慈禧这个人下任何结论时，也应该进行更加复杂的考量，不能以偏概全，任何凭空想象都是无法接受的。

慈禧对公使女眷们的招待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觉得太后在部分限制皇帝权力，抓捕康有为等人的同时，不一定完全阻止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甚至还有可能跟西方国家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很多居住在通商口岸的西方记者和商人都持这样的看法。相比光绪，多数在华西方人对慈禧明显好感不足。他们认为，即便这位太后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最终也只能是表面文章。更何况，太后宠信的那些守旧派官员的所作所为也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些令西方人难以接受的守旧派官员包括控制整个中国北方海陆军，已经登上大清帝国最高政治舞台的荣禄。相对来说，这个人在西方人中的口碑还不算特别差。李秉衡[4]，这位守旧派此前因在山东巡抚任上惹恼了德国人而被调离，现在反而高升成了大清帝国长江下游地区军队的最高统帅。刚毅，这个人现在被任命为大清帝国各地国防工程的总负责人。毓贤，是位满族大臣，态度傲慢，刚刚从南京被调到山东接替李秉衡的职务。毓禄[5]，也是位满族大臣，立场极度排外，1898年刚刚升任军机大臣。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在大量任用守旧派的同时，也把类似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乃至此前作为外交代表团成员访问过欧洲的满族大臣端方，这些明显具有维新色彩的官员提拔了上来。这些人的掌权无疑会给慈禧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慈禧是个善于搞平衡的人，懂得如何将不同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让所有西方人失望的是，慈禧第3次政变后，针对西方人的排外行动并没有明显减少。还是在光绪维新变法期间，1898年7月，清廷就曾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控制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活动。光绪失去权力后，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离谱儿，进而引发了普通老百姓针对西方人的敌意。1898年9月13日，重庆周边的多个教堂遭到

攻击。同年11月，传教士弗莱明(Fleming)在贵州遇害。次年1月，法国传教士维多利(Victorin)在湖北被杀后，尸体还被当街示众。同样是在这个月，四川省内也发生了不少针对西方人的袭击事件。从那以后，类似的袭击事件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并在同年10月蔓延到了北京。为了向清廷守旧派大臣们表示善意，各国驻华公使馆却在1898年10月主动减少了护卫兵力，这实在相当不明智。

1899年年初，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再次被他的女主人召唤到了京城。种种迹象显示，李鸿章在被太后召见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别礼遇，甚至被赐了座。我们无法肯定地说李鸿章从治理黄河的任上被叫到京城跟清廷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调整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不过清廷后来在外交政策的方面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光绪在实际掌握权力的最后一个年头儿里见证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慈禧再次走上前台后，这样的势头并没被刹住，反而愈演愈烈。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此前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却还不满足。此时的法国要求在上海和四川享有更多的权利，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派舰队来华。葡萄牙则要求进一步拓展澳门殖民地的范围，比利时希望在汉口设立租界，日本打算独享福建省的种种特权，就连西班牙也计划着宰大清帝国一刀，只是暂时还没想好到底应该要什么。对1899年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其实是意大利。1899年初，意大利照会清廷，要求比照旅顺港、胶州湾等地的先例，租借位于上海以南的浙江省三门湾。同年3月，意大利专为此事向北京派出了外交特使，特使的态度异常强硬，声称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意味着战争。大清朝廷的态度同样强硬，慈禧为此密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开战准备，严防洋人登陆。此时的总理衙门也得到慈禧授意，对意大利特使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实话实说，意大利人虽然连声喊打，其实还是不想打仗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谈判迫使清廷作出适当让步。可是直到这年11月，守旧派控制的大清朝廷已然寸步不让，双方就此陷入僵局。

慈禧太后这么有底气其实也有她的道理。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出于各种原因归还了通过战争获得的某些利益，这让慈禧觉得双方存在握手言和的可能。面对意大利人的战争威胁，慈禧最后的底牌就是

大清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联手对付西方人。事实上，慈禧为此也真的派了个外交代表团前往日本游说，只不过可能是由于奉命出使的官员办事不力，双方最终没能谈出个结果。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就只能独自面对来自意大利人的压力了。这样的尴尬情况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慈禧会在1900年一边倒儿地支持守旧派的开战主张，因为按照她的逻辑，贪婪的洋人已经全部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能够依靠的就只剩下那些立场强硬的守旧派。在这种情况下，天生具有亲西方立场的维新派就很难获得上上下下的理解和支持。同样具有维新派色彩的李鸿章能够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相对中立的俄国制衡英、法等西欧国家，问题在于，俄国人为此开出的价码儿也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能够相信谁呢？绝望中的她就像个溺水者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救命稻草，哪怕是虚无缥缈的神仙，以及自称神灵附体，可以把所有入侵洋人一举赶进大海的义和团。正如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慈禧非常迷信，这让她相信了义和团的那套说辞，最终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



清代骑兵



清代军官

1899年7月，反对光绪维新变法的慈禧自己却突然下旨，打着“新政”的旗号，重组大清帝国的户部，同时要求各省严惩官员贪污问题。正是在惩治地方官吏贪污问题的过程中，刚毅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两广总督[6]。刚毅其人在西方人当中向来就有“雁过拔毛”的名声，来到两广后，立刻就为大清国库开辟了滚滚财源。也正是由于看中了刚毅的这个长处，慈禧才委任他为大清户部的特别专员。未来的“庚子之变”中，慈禧之所以有底气向列强宣战，恰恰基于刚毅此前为她打下的财政基础。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慈禧把刚毅派到两广任上时，心里就已经有了开战的打算。

1899年夏天，围绕大清皇室的谣言此起彼伏。比较老套的谣言继续声称光绪病情严重，随时可能驾崩。比较有创意的谣言则说慈禧太后随时都有被人暗杀毒死的危险，为此，她特地委任亲信荣禄监管自己的厨房。与此同时，坊间还有传闻说荣禄跟庆亲王关系紧张，他之所以能够统帅北京城内的禁卫军，主要还是得益于慈禧的坚决支持。这年8月，又有传闻说受到众多皇亲国戚支持的庆亲王出于对荣禄权力和被太后宠信的嫉妒，已经跟后者公开闹翻。如果事实真的如传闻

所说的这样，大清帝国最有能力的两位官员关系的恶化对这个国家肯定是不利的。更何况，这两个人身后还有各自的大批支持者，他们关系的恶化必然造成党争的出现，这对大清帝国更加不利。1899年9月，通商口岸出版的中文报纸《中外日报》[7]曾这样报道当时的情况:

> 荣禄和庆亲王的支持者纷纷上折子互相攻击，以至于把太后都搞烦了，最后只得把统帅北京禁卫军的权力转给了荣禄。这之后，为了敲打自己的这个侄子，太后又当着众位军机大臣的面，盘问荣禄当年康有为参加会试时的阅卷官到底是谁。太后这么问自然有她的用意，因为康有为已被认定为乱党，他当初的阅卷官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位阅卷官恰好属于荣禄阵营。荣禄对此作出了解释，帮助自己的盟友开脱了罪名。慈禧太后全程笑而不答，却让荣禄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既然是他选择了太后这方，将康有为等人送上绝路，也就不该再抱有其他幻想。只要荣禄能够做到这点，就将始终得到太后的信任。 …… 通过敲打荣禄，慈禧显示了自己在荣禄和庆亲王间的中立态度，同时又让荣禄领会到了自己对他的偏爱。

同样是在1899年9月，一场由某些满族贵族策划的政变阴谋被揭发了出来。这些人计划将慈禧、荣禄、庆亲王等人全部搞掉，让后再推举自己认可的代言人掌权。据说，得知这个阴谋的慈禧异常紧张，无论走到哪都带着30名全副武装的侍卫。与此同时，光绪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得到了更多说话的机会。9月22日，他前往天坛祈雨，后来还在军机大臣的会议上发了言。然而这年10月底接见俄国驻华公使时，真正主导这次会面的仍然是慈禧本人，光绪则继续充当陪衬的角色。种种迹象显示，光绪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以前拥有的权力。



西方人与清军士兵

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慈禧在1899年秋天针对光绪种种压制的放松，其实是对于来年更加严酷的压制的某种补偿。在这个方面，光绪永远猜不透慈禧的心思，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事实上，慈禧对光绪的控制从未有过丝毫松懈，即便某些时候出现了表面上的松懈，那也只不过是慈禧把自己的手段搞得更加隐晦而已。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也是在事后才能发现慈禧的险恶用心。“变化无常”，这4个字用来形容慈禧的性格、心理恐怕再合适不过了。有些时候，光绪在慈禧眼中是亲妹妹的儿子，自己的侄子，是那个由她亲手拉扯长大，然后又扶上皇位的亲人;有些时候，光绪在慈禧眼中又是康有为的盟友，是那个无时无刻不想着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总而言之，亲情与权力的纠结造成了慈禧的人格分裂。

作为西方人，当我们对中国人作出分析和判断的时候，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中国的孔子有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人总觉得中国人难以捉摸，中国人对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是一样的。作为孔

子所说的“兄弟”，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性格、心理的复杂性方面难分伯仲，问题的关键是，任何一方都不该以己度人。

【注释】

[1] 这是个有“油水”的肥缺。

[2] 他他拉·刚毅，满州镶蓝旗人，曾任刑部郎中。1877年因审理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有功升江西按察使，累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率领义和团抗敌，病死在山西侯马镇。刚毅曾担任广东布政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番台，而非巡抚，作者此处说法有误。

[3] prince henry of prussia，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

[4] 李秉衡，字鉴堂，辽宁庄河鞍子山人，捐班出身，累官至四川总督、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侵华时率军进京勤王，兵败自杀。

[5] 毓禄，满洲正白旗人。

[6] 原文如此，刚毅实际从未担任过两广总督。

[7] the universal gazette， 1898年5月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时务日报》，同年8月17日改名《中外日报》。

第十五章 慈禧和义和团

义和团也被西方人称为“拳匪(boxer)”，这个侮辱性的名词是由某些传教士最先开始使用的，中文“义和团”里的“义和”这两个字包含了忠义、太平、爱国等意思。义和团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世纪早期，山东南部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组织的雏形，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义和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过某些以“义和”为名的组织，不过义和团的真正前身其实是著名的白莲教。白莲教是元朝灭亡后在明代逐渐成型的，就像义和团一样，这个组织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因素又跟真正的佛教有所区别。义和团的信仰体系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神灵，其中有些还是中国古代实际存在过的英雄人物，义和团声称这些古代英雄的灵魂可以附在他们身上，达到“拳神互助”的效果。义和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武术和迷信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相信神灵附体后的自己可以刀枪不入。为了戳穿义和团的神话，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曾有意邀请几位义和团首领赴宴，听他们畅谈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然后又突然把这几位首领拉到院子给毙了，理由是验证他们的神灵是否管用。义和团的另一大特点是特别看重妇女和儿童。在义和团的巡行活动中，妇女会被组织成专门的方阵，名为“红灯照”。儿童们则不分性别，完全像成人一样练拳、拜神，打仗的时候也完全被当作成人使用。

义和团的这套说法对无知的普通农民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的队伍因此很快壮大了起来，蔓延全国，无法控制，就连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也出现了义和团的身影。当时，位于北京的渣打银行分部恰好着了火，某位义和团首领立刻站出来说，洋人的银行之所以着火，只是因为被他用1个手指指了一下。义和团声势最盛的省份当属山东，闹出来的麻烦也最多。山东有个大刀会，这个组织历史上跟白莲教存在

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又跟义和团结成了同盟。根据袁世凯发布的文告，早在1896年年中，大刀会就已经在山东成立了。这个组织最初的宗旨不但反对洋人和本土教民，同时还有意推翻大清统治，不过坊间也有传闻说，这个组织是由慈禧亲自制定的代理人毓贤[1]暗中支持组建的。大刀会和义和团结成同盟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将自己的口号确定为“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出现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光绪维新变法的失败却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刺激因素。维新变法失败的同时，恰好赶上黄河决口泛滥，大批灾民无家可归。出于自保的目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自然而然的结成了团体组织并且武装了起来。后来，义和团的组织体系逐渐完善，局势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土教民受到攻击，越来越多充满排外色彩的标语口号出现在大街小巷，诸如“传教士杀小孩做药”、“铁路、电线破坏风水”之类的老生常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以下就是一份有代表性的义和团布告:

> 铁路和火车惊扰了龙脉，破坏了土地的风水。铁丝、铁轨上生出来的那些红锈其实是空气里蕴含的精气，精气被洋人吸走了，我们大家都要生病。

义和团当年闹得最厉害的3个省份当属山东、安徽和江苏。夹在洋人和义和团之间的当地官员往往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包赔受攻击洋人的任何损失，同时又包庇造成损失的义和团。1899年春天，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当时，山东省内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为了报复两名德国人在山东境内被杀，德国决定从胶州湾的驻军中派遣1支部队深入内陆讨说法[2]。迫于直隶总督和德国人的双重压力，毓贤决定向德国支付赔偿，并派遣军队收拾闹事的大刀会和义和团。大刀会和义和团因此损失了98个人，耐人寻味的是，毓贤为此把指挥清军部队的将领撤了职。由此可见，坊间传闻毓贤暗中支持大刀会和义和团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1899年12月初，局势进一步恶化。根据滞留山东的美国传教士发给本国公使馆的电报，当地至少有20个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传教士和教民事件。公使馆为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指责毓贤保护洋

人不力。接到抗议的毓贤继续无所作为，局势愈发变得不可收拾。为此，公使馆又给总理衙门提出了份措辞更加强硬的抗议，毓贤因此在12月26日被调离山东，返回北京述职。回到北京的毓贤立刻得到太后召见，慈禧不但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还赐给他1张自己亲笔写的福字。作为继任者，袁世凯来到了山东。新巡抚上任伊始，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Brooks)就在泰安被杀了。袁世凯随即下令缉拿凶手，严惩肇事的义和团，然而他的命令最终基本都没能得到落实，因为此时的义和团已经得到了清廷高层的支持。



义和团拳民

当年的慈禧认为，风生水起的义和团恰好是自己克制洋人的生力军。正如前面所说，眼看讨要口岸租借地不成的意大利态度越来越强硬，1899年11月21日慈禧密令各省总督、巡抚整军备战。在这道密令中，慈禧特别向各省官员强调说，洋人就像胡狼一样贪婪，觊觎大清的财富和土地，他们之所以敢做这样的非分之想，就是认定我们拿

不出钱财和军队跟他们抗衡。密令随后告诫各省官员，不要指望所有的涉外冲突最终都能和平解决，必须作好开战的准备。慈禧的密令向大清各省官员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让他们意识到战争几乎百分之百是要发生的。这份密令发出后不久，慈禧又通过总理衙门以她本人和皇帝的名义授权各省总督、巡抚不经请示朝廷，视情况就可跟洋人开战。

慈禧当时针对西方国家的很多指责都是合情合理的，她作出准备开战的决定也是顺理成章的。遗憾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那些原本被她寄予厚望的同盟者关键时刻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真正能给慈禧帮上忙的其实是那些维新派，可是慈禧在准备与列强开战的同时并没有停止搜捕康有为等人的行动，尽管同年7月她也接纳了维新派提出的某些主张。1899年即将结束时，为了加大通缉康有为、镇压维新派的力度，慈禧特意把李鸿章调任为两广总督。直到1900年3月，慈禧还专门颁布旨意，逮捕了北京城内的50名维新派。慈禧跟维新派闹得势同水火，当她面对外部压力时，全部赌注就只能放在相对温和且开明的中间派的身上，守旧派则是指望不上的。这样的政策绝对算不上明智。当时，大清朝野可以算是中间派的大概包括这么几个人，即荣禄、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和刘坤一。然而李鸿章能够想出的最好办法仍然是依靠俄国居中调停，其他3个人虽然表示愿意把手下的新式陆海军交给太后跟洋人开战，不过他们对战争的胜负实在没有把握。更何况，这些中间派大多具有亲近西方的倾向，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是不愿意跟洋人开战的。

维新派、守旧派、中间派全部指望不上，义和团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慈禧的暗中默许下，很多满族人，包括皇亲国戚在内，也加入了义和团。此时的慈禧似乎忘记了义和团的前身白莲教本身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严峻的形势迫使她必须饮鸩止渴。当时，扮演慈禧与义和团中间人角色的人是端亲王[3]。端亲王家族的血缘关系距离皇帝相对较远，因此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并没能获得太多的政治权力，也很少在西方人面前出现。后来，慈禧提拔第二代端亲王进入总理衙门当差，又在1900年6月让他成了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总理衙门由

此彻底变成了守旧派、排外派控制的据点。在西方人眼中，端亲王文化水平不高，脾气暴躁，还满怀政治野心。慈禧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将这个人纳入自己的视线，目前无从得知。1899年6月，端亲王受命统领名曰“虎神营”[4]的100000名八旗士兵，由此逐渐崭露头角。恰好为缺乏得力盟友和助手发愁的慈禧突然发现，明显具有守旧派色彩的端亲王似乎具备配合自己实现最终目标的能力。端亲王当时已经被义和团那套刀枪不入的迷信搞得昏了头，于是便邀请众多义和团进入自己的府邸展示“神力”。端亲王的做法对其他皇亲国戚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包括庄亲王、刚毅和毓贤在内的众多王公大臣争先恐后成了义和团的信徒，进而开始不断在慈禧耳边煽风点火。慈禧逐渐被他们说动了心，便下令在颐和园召见一位姓王的义和团大师兄， 1900年5月10日的《北华捷报》[5]报道了这则新闻:

义和团大师兄上前见礼，太后对他说:“既然你是直隶本地人，就应该了解省内义和团的情况。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准备，跟洋鬼子开战？” “老佛爷，我们现在就有把握!义和团誓死捍卫大清，誓死抗击洋人!作为您的子民，我相信义和团肯定愿意沙场立功，为驱逐洋鬼子出力。现在，大清男女老幼都加入了义和团，都愿意为朝廷报效，把洋鬼子赶进大海!如果朝廷给我相应的权力，我将组织并武装义和团，率领他们向洋鬼子讨还血债。” 太后点头赞许，沉吟半晌，然后突然又说:“义和团办得很好，不过我还是担心你们缺乏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鲁莽行事，反而给朝廷带来麻烦，所以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再动手。”

太后又沉吟了几分钟，继续说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直隶和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应该选出几个当家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 接见后的第二天上午，太后发布旨意，任命王姓大师兄为北京城内所有义和团的总负责人。



大刀会

正是由于各位王公大臣的不断游说，慈禧坚定了对义和团的信心，加强了对他们的支持。鉴于形势日趋紧张，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曾要求慈禧下达命令，限制包括义和团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1900年1月11日，慈禧真的为此发布了旨意，不过她又对不同民间组织作出了区别对待:

> 守法百姓和他们的家人出于强身、防身的目的习武，乃至在村庄范围内组织社团，符合中国民间风俗。一旦引发事端，各地官府应区别对待，切忌滥杀无辜。如果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只能说明地方官员办事不力，与百姓无关。

各国公使对慈禧的这道旨意当然不可能满意。为此，除俄国以外的各国公使决定联名向清廷施压，要求切实遏制义和团和大刀会的活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1月23日，北京的《京报》发布消息，要求几位手握实权的亲王、军机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次日集体前往紫禁城议事。通常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比如皇帝突然驾崩等。坊间为此议论纷纷，好在大家的好奇心很快即得到了满足。1月24日，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公之于众[6]:

> 朱谕: 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

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业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敦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馈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鉴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求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毫无疑问，光绪违心签署这份几乎相当于退位性质的圣旨，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当时坊间有传闻说，太后这么做表面上看是为大清江山着想，实际是在为最终搞掉光绪做铺垫。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慈禧的打算是利用端亲王和受他控制的义和团抗衡洋人。作为回报，端亲王时年9岁的儿子则将接替光绪坐上龙位。对慈禧持同情立场的赫德兰德教授(pr of essor Headland)认为，慈禧选择端亲王的儿子溥儁充当光绪的继任者其实也不情愿，只不过她当时的确有求于后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慈禧必须彻底跟守旧派站在一切。

光绪有了继任者的消息公布后，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抗议。相对而言，海外华侨、华人的呼声更高、抗议也最激烈，因为他们不用担心由此可能造成的危险。抗议活动中比较有名的是当时的邮政部负责人从上海以电报形式提交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抗议书，总计12000名大清官员和地方绅士在这份抗议书上署了名，这些人后来奇迹般地没有遭到任何惩罚。事实上，当时的慈禧根本不在乎任何抗议，她的全部赌注都已经押在了端亲王的“虎神营”，还有俄国人的外交调停上面。为了显示对光绪未来继承人的支持，她甚至邀请溥儁来到北海，享用慈禧专属的小火车和私人车厢。后来的种种事实表明，溥儁[7]这个人跟他的父亲一样，没什么文化，根本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大孩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慈禧才又异常坚决地抛弃了他。尽管遭受种种非议，确立溥儁为皇位继承人的事最终还是定了下来。事实上，早在1875年，清廷和皇室就已经制定了必要时为光绪制定继承人的相关原

则。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备光绪出现不能生育或没有儿子的情况。光绪后来真的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是上天对大清的惩罚。根据1875年制定的原则，光绪的继承人只能在比他本人和同治帝小一辈子的皇室成员中选择，从而纠正光绪当年以同治帝兄弟、咸丰帝养子身份继承皇位的不正常情况。1900年年初，坊间盛传光绪病入膏肓，随时可能死去，新皇位继承人的公布恰好印证了民间的种种猜测，很多中国人、外国人因此不约而同地认为，光绪恐怕真的不久于人世了。

1900年2月中旬，光绪公开露面接见外国公使，慈禧照例垂帘听政坐在他身后。很多人注意到，当时的光绪看起来的确病得很重。3月初，光绪病重的消息得到印证，太医院奉命派太医入宫为皇帝看病。随后，坊间又有传闻说光绪可能很快就要被转移到热河居住，理由是慈禧突然下令整修自从咸丰帝去世后就再未使用过的热和行宫。3月底，坊间再次有传闻说光绪已经病入膏肓，连寿衣都准备好了。坊间流传的这些消息基本属于无稽之谈，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中的一部分是慈禧有意散布出来的，目的是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出试探和铺垫。

前面已经提到，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慈禧下令逮捕了北京城内的50名维新派人士。如果此时的慈禧仍旧对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耿耿于怀，她似乎也就没理由放过自己的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那些连篇累牍的抗议信和电报救了光绪的命。这些东西让慈禧意识到，要想马上解决光绪，时机的确还不成熟。4月7日，暂时放过光绪的慈禧再次前往颐和园休养。与此同时，鉴于整个帝国已经乱成一锅粥，大臣们则纷纷上书要求她留在紫禁城。

1900年5月各种谣言又从宫里传了出来。此前坊间有传闻说似乎有人打算在光绪的茶水里投放慢性毒药，这年5月，传闻里被谋害的主人公从光绪变成了溥儁。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溥儁看书时，某位太监给他端来杯茶水，声称是太后赏赐的。按照宫廷礼仪，溥儁应该亲自到太后面前谢恩，所以也就没来得及喝这杯茶。得知此事的慈禧声称自己根本就没派人送茶，阴谋于是就被戳穿了。随后调查发现，这杯茶有毒，宫中随即开始大搜捕，两名太监最终被当成替罪羊砍了

头。实在无法想象，谋杀皇位继承人对两个太监能有什么好处。

皇宫里谣言四起，皇宫外面也不太平。作为对各国公使要求严格限制义和团和大刀会活动的要求的回应，3月1日，总理衙门密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适当对义和团采取限制手段。各国公使很快从中发现了问题。第二天，德国公使找到总理衙门指出，密令涵盖的范围并不包括大刀会。总理衙门答复说义和团和大刀会是一回事，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不仅如此，他们还拒绝按各国公使要求，命令各地地方官限制义和团活动。为了以防万一，驻华公使们各自游说本国政府，向大沽港调派军舰。4月13日，清廷再次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旨意。这份旨意只是说了些原则上的话，对义和团的实际问题只字未提。与此同时，清廷各地官府纷纷告诫治下的老百姓不要跟教民过多来往，以免招惹麻烦。总督和巡抚们也反复告诫百姓不要惹是生非。为了安抚洋人，直隶总督荣禄还专门在北京《京报》上发布消息，介绍自己手下军队镇压省内义和团的情况。从平息事端的考虑出发，荣禄确实有意镇压义和团，不过此时大清的多数省份和官员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支持态度。

大清朝廷的种种做法虽然存在敷衍了事的嫌疑，却让各国公使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甚至给国内写信介绍当时的情况说:

> 我认为经过我个人的努力，大清朝廷终于开始采取切实行动控制义和团以及制裁对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攻击行为了。

这样的看法真的是被表象蒙蔽了双眼。所幸，并非所有驻华公使都这么好糊弄。就在英国公使对现状表示满意的同时，美国公使仍然不断向清廷提出抗议，然而此时的总理衙门已经被义和团的支持者把持住了，他们对此作出的回答是更加的敷衍了事和误导信息。就这样敷衍来、敷衍去，小问题终于积累成了大麻烦，各国公使失去耐心，联名要求清廷必须对义和团采取最严厉的手段。

真正让各国公使下决心采取行动的是来自樊国梁主教的一封信。这位神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40年，算得上是当地消息最灵通的西方人。1900年5月19日，樊国梁写信给法国驻华公使，提醒他注意正在

严重恶化的局势，特别是刚刚发生在直隶保定针对本土基督徒的屠杀行为。樊国梁警告公使说，针对基督教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很快就要发生，普通在华西方人也将因此受到波及。一旦外省义和团进京跟本地义和团会合，北京城的局势就将失控，危机随时可能爆发。法国公使觉得樊国梁言之有理，就把他的信散发给了其他驻华公使，要求考虑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就在法国公使的报告传回国内的同时，距离北京40英里的地方，又有一位本土神职人员被杀了。各国公使为此专门开了个会，随后要求总理衙门采取行动，证明大清朝廷镇压义和团的诚意。作为答复，清廷决定再发布二道旨意。可是这二道旨意还没来得及下发，义和团就在北京丰台点燃了大片建筑，破坏了北京连接武汉和天津的铁路，居住当地的西方人因此仓皇逃窜。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00年5月25日，清廷发布一份冗长的旨意向各国公使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反复强调丰台的悲剧是由少数混进义和团的逃兵和流氓策划、煽动的，跟义和团本身没太大关系。话虽如此，义和团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清廷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 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大清军官，烧掉了不少电线杆，破坏了很多铁路，这样的行为跟造反已经没有太大差别。老百姓本意是好的，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确实给教会造成了不少麻烦。朝廷已经下令各地官府保护教堂和教民，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为了给洋人个交代，清廷命令以荣禄为首的众多地方官搜捕那些在丰台带头儿闹事的人。5月30日，清廷再次下旨，严令直隶省地方官员尽快逮捕那些带头儿闹事的人。然而直隶省地方官继续对义和团采取包庇态度，甚至清廷连续发布的几道旨意本身也压根儿没提义和团一个字。同样是在这天，清廷通过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暂时拒绝各国派兵进京加强公使馆保卫，理由是必须首先请示在颐和园静养的太后。鉴于丰台事件的严重程度，各国公使这次没再相信清廷的敷衍了事。5月31日，总计331名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奉命开赴北京。眼看各国军队兵临北京城下，清廷也只能哑巴吃黄连。3天以后，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海军陆战队员奉命来到北京。同一时间，各国公使馆远赴西山度假的人员也被紧急

召回，所有能联系上的北京城内的西方人也都被召回到各自国家的公使馆，受到军队保护。

此时的北京城可谓山雨欲来。很多人指望义和团的“神力”能够扭转乾坤，董福祥的军队则作好了跟义和团联手对付洋人的准备，就等慈禧一声令下。

【注释】

[1] 毓贤，字佐臣，清末著名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

[2] 1897年11月1日夜，德国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被杀。11月13日，德国以此为名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还勒索了大笔赔偿，史称“巨野教案”。

[3] 爱新觉罗·载漪(1856年8月26日-1922年11月24日)，道光帝旻宁之孙，惇亲王奕誴之子，后过继瑞敏郡王奕志为嗣， 38岁袭封端亲王。

[4] 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在北京编练的禁卫军。“虎神营”这个名称据说是端亲王亲自起的，意思是“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之也”。

[5]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是上海当地发行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50由英国人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这份报纸基本遵循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也被视为“英国官报”。

[6]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1025—1027，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为译者所加。

[7] 爱新觉罗·溥儁，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次子，他的母亲是慈禧弟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

第十六章 向世界宣战

谁也说不清慈禧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义和团能把大清帝国从洋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目前，她跟义和团有据可查的唯一一次接触就是在端亲王的百般怂恿下，观看了义和团的“神力”表演。可能就是通过这次表演，义和团让慈禧建立了坚定的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慈禧是相信神仙鬼怪的，义和团的“神力”让她打定主意跟洋人开战。心里有了底的慈禧从颐和园返回了北京城内，大批外省义和团也蜂拥而至。

离开颐和园以前，为了安抚各国公使，慈禧又发布了一道旨意，不疼不痒地谴责了义和团一通。单从字面上看，慈禧在这道旨意里的话说得都挺漂亮。旨意的开头几部分，她非常坦率地承认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从未主动惹是生非。可惜近年来滞留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多，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有些人的确利用教会的势力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义和团才开始四处闹事。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动机还是好的。朝廷针对义和团的错误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果义和团出现了反叛大清的苗头，必将遭到严厉的镇压。问题在于，目前朝廷还未发现这种迹象。直隶总督荣禄为此已奉命密切关注义和团的活动。事实证明，慈禧的措施对义和团没有任何作用。发布完这道旨意的慈禧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紫禁城办公，各国公使因此认定，北京城内的局势必将发生相应的好转。实际的情况跟他们希望的恰好相反。6月4日，北京与天津间的电报线被割断了，这在西方人当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不过很多人仍然相信返回紫禁城的慈禧肯定能够控制住局势。6月9日晚上，慈禧带着光绪和众位王公大臣浩浩荡荡回到了紫禁城。跟随慈禧回到北京的还有众多清军，城内局势的确出现了明显好转。然而就在同一

天，北京西面的1座教堂又被义和团给烧掉了，一位本土教民也被扔进了火里。也是在这天，一位本土教民赶到北京英国公使馆报信，声称他亲耳听见慈禧说要把所有洋人赶出北京城。

形势千钧一发，英国公使窦纳乐立刻给天津发电报，要求西摩尔[1]将军率军开赴北京。6月10日，天津传回消息说，经荣禄同意，西摩尔将军已经派了900人着手修复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这份电报发到北京后，北京连接天津的电报线再次被切断。不仅如此，北京与外界联络的邮路也大多被破坏掉了，只有跟张家口的联系还算畅通。6月17日，北京与张家口间的邮路也被破坏，这座城市彻底成了孤岛。为了保住性命，北京周边的西方人争相向城内转移，寻求公使馆和卫队的庇护。从这天开始，北京城内的使馆区[2]事实上已经被包围了。6月11日，日本公使馆外交官杉山彬[3]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被杀。6月12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使馆区抓到个义和团打扮、全副武装的人。当天夜里，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教堂、西方人和本土教民的住宅大多被烧掉了，还有很多本土教民被杀死。



东交民巷



驻守东交民巷的日军

危机爆发后，为了安抚洋人，清廷很快拿出了解决办法。庆亲王被从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的任上解职，端亲王非常不情愿地接替他执掌起了总理衙门，开始直接面对洋人的压力。另外，清廷还找了3个跟义和团没太大关系的地痞流氓，充当替罪羊。6月16日，西摩尔将军向大沽炮台清军守将发出最后通牒，慈禧太后为此召开御前会议。会议过程中，慈禧回顾了大清帝国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强调了向洋人开战的必要性。后来，满族大臣率先站出来主张宣战，慈禧顺水推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得知此事，前大清驻圣彼得堡公使许景澄[4]立刻表示反对，认为大清如果向全世界宣战就是彻底疯了。刚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此次向洋人宣战跟以往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大清可以依靠义和团的“神力”。正当某位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准备反驳刚毅的荒唐言论时，慈禧突然发话说向洋人开战的事情已经定了，不需要再讨论。眼看慈禧拿定主义开打，曾国藩的后人转而建议将战场转移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不要骚扰各国公使馆，也不要同时向所有列强宣战，尤其是不要向那些对太清态度友好的国家宣战。满族大臣那桐[5]随后也表态说最好不要打仗，如果必须要打，也应该把战场转移到沿海地区。那桐话音刚落，满族大臣们便接连叫嚣这位同僚是个卖国者，慈禧也只是盯着他不说话。刚毅随后提议说，既然那桐和许景澄主张和平，那就任命他们为特使，去跟西摩尔将军谈判吧。

眼看国家到了危急时刻，光绪不再像通常那样保持沉默，他警告自己的姑母说，如果向列强宣战，大清就可能亡国。遗憾的是，光绪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朝会开到这个程度，局势已经失控，满族大臣们开始毫无理由地指责任何反对开战的人为“卖国者”。大家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委派那桐和许景澄面见西摩尔将军，劝说他停止率军向北京开进。接到命令的那桐和许景澄立刻动身，却在丰台被义和团挡了下来，还受到了后者的死亡威胁。一个月以后，许景澄以“勾结洋人”的罪名被逐出北京。那桐虽然饱受打压，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直到1906年，这个人仍旧在清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赫德兰德教授的夫人在《中国宫廷生活(court life in china)》中记述，某位格格曾向她透露说，早在6月16日以前，清廷就曾针对开战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慈禧、光绪、端亲王以及众多王公大臣。端亲王当时以未来皇帝父亲的身份，获得了站在慈禧宝座旁边的殊荣。慈禧首先发言，痛斥了洋人对大清帝国的种种羞辱，然后又介绍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种种“神力”，声称这些忠勇的爱国者肯定可以把洋人赶出去。接下来，慈禧询问大臣们是否应该利用义和团这股力量对抗洋人。端亲王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说自己相信义和团的“神力”，其他王公大臣纷纷随声附和，只有肃亲王[6]怀疑义和团是否真的拥有所谓的“神力”对抗洋人。据赫德兰德教授夫人所说，这位亲王平时为人处世就非常有个性，不喜欢随大流，对西方的态度也相对开明。面对肃亲王的质疑，慈禧回答说自己已经观看过义和团的“神力”展示，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庆亲王随后发言说，开战肯定是有危险的，不过如果太后已经下了决心，他本人愿效犬马之劳。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王爷长期负责总理衙门方面的工作，在西方人中的口碑还算不错，反倒是光绪对他心怀芥蒂。根据赫德兰德教授夫人的记载，会议过程中，光绪一言不发，慈禧也没主动征求过他的意见。眼看木已成舟，他流着眼泪离开了大殿。

6月16日的会议结束后，清廷向各国驻华公使提交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发出的具体时间是6月19日下午16时，具体内容是说既然西摩尔将军已经向天津大沽炮台发出最后通牒，也就意味着列强与大清帝国自动终止了友好关系。有鉴于此，清廷也就不再承担保护各国公

使馆免受义和团侵扰的义务。大清朝廷将给予各国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24小时的时间从北京撤离到天津，并提供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地方衙门也已接到命令确保他们的安全。确凿的证据表明，清廷发出这份公告时其实已经获悉大沽炮台于6月17日被西摩尔将军拿下的消息，却由于种种原因佯装不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么做既可以保住大清朝廷的面子，又可以避免助长各国公使馆的气焰，更顺利地把他们送出北京城。

接到公告的后的各国公使马上表示愿意尽快离开北京，不过24小时的期限肯定不行。为此，他们要求第2天上午面见端亲王或庆亲王。清廷对此不予理睬。6月20日上午，脾气最暴躁的克林德[7]终于失去耐性，决定亲自前往总理衙门讲理，陪同他的只有一名翻译和几个轿夫及随从。走到哈德门大街[8]，也就是使馆区的东部边界时，一名清军军官领着几个人拦住了他的轿子，然后开枪。克林德当场被打死，翻译腿上中了一枪，挣扎着跑回了使馆，其他随行人员下落不明。通过这件事，其他西方人得出结论认为，不管大清朝廷要求他们撤到天津的本意如何，这条路上必定充满了危险。克林德被杀当天下午，总理衙门发布消息说是由于两名德国人首先向人群开火，清军和义和团才决定还击的。与此同时，清廷还要求公使馆确认二人的具体身份。然而就在当天下午16时，也就是清廷规定的24小时期限结束后，奥地利公使馆首先遭到枪击。随后，使馆区各处都可以听到枪声。就这样，著名的围攻公使馆时期就此开始， 7月中旬达到最高潮，直到8月14日上午才宣告结束。围攻公使馆时馆内西方人的种种遭遇不属于本书关注的范畴，这里主要介绍危机过程中清廷方面的应对措施。克林德被杀后次日，义和团围攻公使馆的同时，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旨意。这道旨意公布了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然后又以光绪的口吻这样说道[9]:

> 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

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馕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由于这道圣旨的颁布，义和团正式得到了大清朝廷的认可和接受，成了他们向世界宣战的最可靠盟友。与此同时，被义和团视为敌人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土教民也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受攻击对象。有意思的是，宣战后的大清朝廷并未召回驻西方各国的大使，南部某些省份的总督、巡抚甚至继续跟洋人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10]。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义和团活动最频繁的1900年6、7月间，大清朝廷在针对西方的态度和政策方面始终保留着回旋的余地，甚至出现了软化的迹象。某些西方人认为，这是荣禄暗中在发挥着作用，他对慈禧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7月9日，慈禧本人对守旧派和义和团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李鸿章因此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当时的朝廷大臣里面，李鸿章对义和团最没有好感。李鸿章再次就任直隶总督后，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了若干道向西方示好的旨意，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逐渐变得有一搭无一搭。7月18日，慈禧的示好行动达到高潮，清廷发布旨意对杉山彬和克林德等人的死表示遗憾，要求地方官员切实保护使馆安全，调查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却对义和团的问题避而不谈。不仅如此，这道旨意再次要求使馆区的外

国人撤到天津。荣禄甚至已经为此安排了负责的地方官和军队。



清廷为克林德举行的葬礼

毫无疑问，此时的慈禧已经下决心收手不干了，然而局势已经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义和团的很多高级首领以及董福祥将军根本不愿再听她的号令。于是，大清朝廷便开始做出越来越多互相矛盾的事情。7月25日，义和团再次猛攻使馆区。3天以后，总理衙门奉慈禧之命，给使馆送去了久违的水果。8月6日，义和团再攻使馆，总理衙门为此专门给使馆发来了致歉信，尽管杀红眼的洋人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大清军队开过火。就这么一来二去，对使馆区的围攻行动逐渐名存实亡。8月8日，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说李鸿章已经被任命为和谈的全权代表。4天以后，清廷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举行和谈。当天夜里，使馆区再次发生激战。8月14日，也就是使馆区遭到围攻后第56天，来自天津的援军终于赶到了北京城。

目前，我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史料可以用来分析慈禧在整个围攻使馆以及后来西逃期间的所思所想，能够依靠的材料只有那些清廷公开发布的旨意。尽管大清军队和义和团在阻击西摩尔将军率领的部队开赴北京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英勇，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决定开战后的慈禧对义和团的所谓“神力”似乎已经不那么相信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让老牌盟友李鸿章再次披挂上阵。这场仗打到最后，慈禧已经陷入了完全绝望的状态，甚至放弃了对朝政的把持，所以1900年7月末到8月初的北京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清廷官员进而开始自行其是。此时的总理衙门似乎忘记了原先的连声喊打，转而开始高呼和平，清军针对使馆区的军事行动也变成了象征性的。后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攻城行动中，只有日军正在北京的东偏北方向遭到了比较像样的抵抗，其他国家的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就进了城，负责守卫帝国首都的清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种种迹象表明，清廷当时似乎认定联军必然从北面攻城，所以才在这个方向布置了比较像样的防御。至于其他方向的设防，则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对大清帝国来说，首都沦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860年，咸丰皇帝就曾被英法联军赶出了北京城，只留下年轻的弟弟恭亲王收拾烂摊子。现在，咸丰皇帝的妻子慈禧又带着光绪和众多王公大臣再次逃离了首都。早在这年7月，北京城就有谣言说只要联军攻城，慈禧他们必定出逃，紫禁城里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逃跑时乘坐的车马。1900年8月14日夜里或8月15日清晨，也就是联军攻入北京前后，慈禧一行从北京的西北城门逃了出去，最初目的地是北京西南方向50英里的山区。庆亲王护送他们进了山，然后又转身返回北京城，承担起了40年前恭亲王承担过的责任。

据皮埃尔·罗蒂[11]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记载，慈禧出逃前的最后一夜基本是在太液池南部水面上的一个小岛[12]的宫殿里度过的。皮埃尔·罗蒂将这座宫殿称为“建筑的奇迹”。它的周围松柏掩映，环绕着汉白玉的栏杆，房顶上铺着绿色的琉璃瓦。联军进城后，这座宫殿遭到了洗劫，不过皮埃尔·罗蒂还是赶在他们前面搞到了一双红色丝绸女鞋。这双鞋装饰着蝴蝶和花朵的刺绣，后跟儿高达12英寸，应该是慈禧本人穿过的。1900年10月，皮

埃尔·罗蒂还曾参观过慈禧位于紫禁城内的寝宫，瞻仰了慈禧供奉的木质佛像。这座佛像通体用金箔装饰，脖子上挂着货真价实的珍珠项链，面前还摆放着鲜花。某位太监告诉皮埃尔·罗蒂说，这些鲜花是慈禧临行前亲自供奉的。

慈禧走得实在匆忙，丢弃了大批首饰、财宝和华丽的衣服。出逃的她惊恐异常，生怕被老百姓给认出来。为了掩饰身份，她剪掉了引以为傲的长指甲，轻车简从。任何领教过北京城里那种马拉轿车的人都能体会到慈禧此行的不适和不便。到了后来，他们还出现了食品短缺。为了让自己的姑姑兼养母吃饱，光绪甚至必须忍饥挨饿。以上种种细节都是返回北京后的慈禧亲口告诉某位拜访她的西方妇女的。回忆往事时的慈禧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乐观、幽默，然而当年出逃中的她却实在乐观、幽默不起来。慈禧等人走得虽然艰难，总算有惊无险，光绪留在紫禁城的妃子[13]却被她下令丢进了井里。作为补偿，慈禧后来给这位妃子授予了荣誉称号。走到保定府以后，慈禧一行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率领全家自杀。刚毅后来则病死在了太原到西安的路上。西安距离北京大概300英里，慈禧等人是在9月末到达那里的。就在慈禧抵达保定的同时，返回北京的庆亲王则在日本军队的护卫下，静静等待着李鸿章由俄国军队从天津护卫来京和谈。10月10日，和谈正式开始。早在从天津来北京的路上，李鸿章就已得到慈禧指示，要求他立即制止义和团攻打使馆区的行动。李鸿章为此专门发布了命令，惩处了义和团的几位首领。与此同时，他开始请求美国公使充当中间人，游说其他国家公使。



八国联军高级军官合影

众位公使对李鸿章的做法并不买账，和谈虽未因此终止，军事行动却仍在继续。直到1900年年末，联军始终在向北京周边地区派遣讨伐部队，理由是报复义和团此前针对西方人的种种行为。这样的暴行符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却令西方文明蒙羞。出于对暴行的厌恶，德国皇帝曾明令禁止自己国家的军队参与对义和团的报复行动，不过仍有很多德国士兵参与了烧杀掳掠罪行。关于这方面内容，本书无意过多描述，这里仅仅引用明恩溥博士提供的康格夫人写给他的信中的一段话：

> 如果我们说所有联军官兵都参与了烧杀掳掠的罪行，那肯定是不公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无视成千上万中国无辜百姓被残杀的事实。军队是由人组成的，人总是同时包含了善恶两个方面，战争则让恶的方面充分显露了出来。联军侵入中国北方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违背基督教的第6、第7和第8条戒律，他们制造的很多罪行是令人难以置信，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14]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听说了北京发生的种种惨剧，慈禧等人并没在太原久留，而是很快进入陕西境内，来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西安。近代以后，西安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仅限于当地保留着景教的石碑[15]。逃到西安的慈禧终于感觉自己彻底安全了。随后的整个10月，她都待在这个地方。

【注释】

[1] 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 Edward Hobart Seymour，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指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 即东交民巷。

[3] 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是庚子国变中第一个被杀的西方外交人员。

[4] 许景澄， 1845—1900，浙江嘉兴人，同治年进士。1880年开始外交生涯，曾任驻法、德、奥、荷4国公使， 1890年改任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

[5] 叶赫那拉·那桐， 1856—1925，满洲镶黄旗人，位列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绪、宣统年间先后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那桐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

[6] 爱新觉罗·善耆， 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朝12家铁帽子王之一，女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生父。

[7] 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德国男爵、驻华公使，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街头为清军枪杀。

[8] 今崇文门大街，崇文门旧称哈德门。

[9] 这道圣旨史称《对万国宣战诏书》，译者参考本书引自《义和团档案史料》p 162—163。

[10] 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南部某些省份曾采取“中立”的不介入姿态，试图避免引火烧身，史称“东南互保”。

[11] Pierre Loti，法国小说家，服役法国海军时曾驻扎中国，代表作《菊子夫人》《冰岛渔夫》。

[12] 应指中南海瀛台。

[13] 即珍妃。

[14] 即《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其中7至8诫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和不可偷盗。

[15] 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称东方亚述教会，西安保存着很多唐代景教十字寺遗迹。

第十七章 返回北京

联军在中国北方制造的暴行接二连三。1900年12月24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与西方列强代表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6天以后，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清廷正式接受了洋人提出的条件。1901年1月16日，条约[1]正式签字。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分别派遣二代醇亲王前往德国，户部侍郎那桐前往日本，就克林德和杉山彬被杀事件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清廷还需惩处义和团首领，为死去的德国人立碑，在90年内向西方列强支付赔款4. 5亿两白银，拆除大沽口炮台，允许列强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驻军，将总理衙门升级为位列六部之首的外务部，并在武器进口方面受到相应限制等。条约中最匪夷所思的条款是列强要求清廷禁止那些出现排外活动的地区5年内举行科举考试，这样的规定对当地读书人的打击异常严重，不过也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某个人或某个地区出了问题，那一定就是当地的文化教育存在缺失。例如1873年，广东省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家族武斗，两广总督就曾上奏皇帝，要求在当地散发《诗经》，以便教化百姓。同样是在1870年代，陕甘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反清起义，时任礼部尚书曾上奏皇帝，要求终止这两个省份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在西方人看来，终止科举考试资格的惩罚显然要比散发《诗经》有力得多。条约谈判过程中，很多西方人还希望加入要求慈禧向光绪归还权力的条款，不过负责谈判的外交官认为他们无权干涉大清皇室的内部事务。



总理衙门

1901年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有生之年为大清帝国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这位老总督死于1901年11月7日，享年79岁。临死前，他还在就满洲被侵占的问题跟俄国人举行谈判。由于俄国人通过这次谈判占了不少便宜，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鸿章重新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然而通过一封李鸿章在去世前38天写给荣禄的信可以发现，这位老总督当时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竭尽全力替大清挽回损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俄国人已经武装侵占了大片满洲土地，指望通过外交手段再让他们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是不可能的。李鸿章的设想是，与其让大清帝国跟俄国硬碰硬，还不如任由他们在满洲发展势力。这样一来，俄国必然会跟日本在满洲发生利益冲突，大清就可从中渔利。只可惜，李鸿章的众多同胞以及多数西方驻华公使，特别是英国公使，无法领会他的用意。李鸿章去世后没几年，俄国和日本真的在满洲发生了武装冲突[2]，只不过这两个国家最终没有如李总督所料，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而是最终达成了瓜分满洲的分赃协议。



李鸿章

能够让临终前的李鸿章善感欣慰的是，经过他的努力，慈禧等人终于可以平安返回北京了。1901年10月6日上午，慈禧等人从西安启程返京。据当地人描述，慈禧一行的仪仗蔚为壮观。他们启程的时间是经过钦天监反复确认的良成吉日，离开西安时走的城门也是具有吉祥寓意的北门。除了从北京跟随过来的太监侍卫、王公大臣，慈禧的道队中还增加了不少现代化的武装士兵。身份显赫的端亲王和他的儿子，以及刚刚晋升军机大臣的荣禄骑乘着特别挑选的高头大马，太监总管李莲英也骑马走在人群当中。慈禧身穿镶有狐皮的明黄色斗篷，坐在8人抬的黄色大轿里。光绪同样身穿狐皮斗篷，坐在跟慈禧相同的黄色大轿里。皇帝轿子的后面，跟随者以皇后为首的众多嫔妃的轿子。再往后，就是王公大臣的轿子和行李车。全副武装的骑兵走在队伍的最后，负责安全保卫。相比1900年逃难的时候，回程中的慈禧从容了不少。抵达河南省会开封时，他们甚至停下休息了很长时间。据说，慈禧之所以这么拖延回程时间，主要还是因为担心形势发生反复，虽然根据条约规定，清军已经在1901年9月17日重新接管了紫禁城的控制权。慈禧他们就这么停在开封观望形势，就连失去耐心的荣禄反复劝说也不起作用。后来，就在慈禧67岁生日那天，哥老会[3]的成员袭击了她在开封的临时行宫。受到惊吓的慈禧这才在1901年12月起身继续向北京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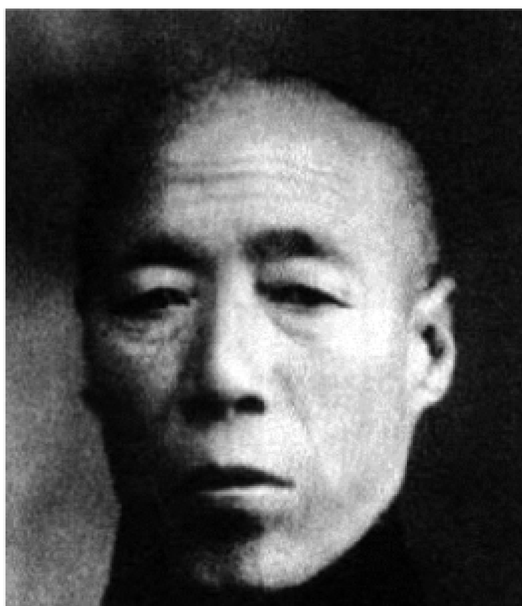


清代北京城楼和城墙

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太监总管李莲英抓住机会大捞特捞了一笔，他的女主人却对这位亲信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慈禧一行还没离开陕西境内，弹劾李莲英的奏折就已经堆成了山，其中很多奏折的内容都是指责慈禧随行人员过分铺张奢华、为难地方的。有意思的是，道队进入河南后，类似的弹劾居然销声匿迹了。据说，其中的原因是河南省的地方官提前给李莲英送了笔银子，他的手下因此不再惹是生非。陕西的地方官不愿意花这个钱，李莲英他们自然就要有意制造麻烦。离开开封前，慈禧采取了一项有利于光绪的举措。1901年11月30日，她下旨罢免了溥儁的皇位继承人身份。据说，慈禧这么做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条约中指名道姓地要求处决端亲王，父亲失了势，儿子自然也要跟着遭殃，虽然洋人并没打算株连这位皇位继承人。失去皇位继承权的溥儁重新被降为公爵，随后又被发配到了整个道队最后的位置。直到慈禧去世，溥儁的实际身份都是一位高级囚徒。

1901年12月底，慈禧一行终于进入了直隶省境内。进入直隶的他们改乘火车，取道保定，返回北京。途径保定时，袁世凯和庆亲王特意赶到当地向迎接太后。经过钦天监测算，慈禧返回紫禁城的最佳时辰应该在1902年1月7日下午14时，所以她就又在保定多待了3天。1月5日那天，为了确保赶在良辰吉日返回皇宫，慈禧执意要在当天夜里动身。不过由于当时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所以他们从保定启程的时间最后被确定为1月6日上午7时。尽管如此，担心误了时辰的慈

禧还是黎明前就出现在了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火车开动。对于那些义和团的幸存者而言，眼睁睁看着曾经支持自己的太后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



李莲英

返回北京的这段旅途无疑是慈禧和光绪一生当中首次乘坐火车。早在几个月以前，留守北京的清廷官员就为迎接太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人特意在站台上搭建了明黄色的帐篷，以便让太后下火车就找到回家的感觉。战争期间，北京的很多城门、牌坊都遭到严重毁坏。为了迎接太后，负责管理的清廷官员甚至下令搭建了不少临时建筑。按照以往的惯例，慈禧等人行经的街道实施了戒严，军警沿街执勤，所有现场人等都被轰进了沿街店铺或者待在警戒线以外，只有少数官员和绅士才被允许目睹太后和天子的威严。享有特权的洋人则被允许坐在指定的3家店铺门口目睹皇家风采，某些特别好奇的西方人，尤其是妇女们则急不可待地爬上城墙[4]眺望慈禧等人的身影。



正阳门火车站



清代铁路

1月7日中午，慈禧的道队从火车站向着紫禁城出发了，《北华捷报》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 庆亲王走在最前面开路，步兵跟在他身后。步兵后面是骑马的太监和侍卫，再往后是皇亲国戚的轿子，其中地位较高的人的轿子是红色的。光绪的轿子跟在这些轿子后面，他的身后依次是慈禧的轿子、皇后的轿子、光绪嫔妃的轿子，以及去世的同治帝和其他几位皇帝嫔妃的轿子。皇帝、慈禧等人的轿子全部是明黄缎子制作的，某些高级官员和贵族也身穿皇帝赏赐的黄马褂。道队里随处可见象征皇家威严的明黄色旗帜。 …… 慈禧一行所过之处，中国人纷纷跪下磕头，虽然各国驻华公使已经根据总理衙门的照会，要求各自国家的公民远离慈禧行经的街道两侧，不过街边还是随处可见脱帽致敬的西方人。

虽然各国公使由于公务缠身，无法目睹慈禧等人返回紫禁城时的胜景，有幸见证这个特殊时刻的西方人仍然不在少数。光绪当时坐在8人抬的轿子里，身穿红色、紫色相间，绣有“万寿无疆”字样的丝绸长袍，一言不发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慈禧则正好相反，她始终留意着身边的一切，每当遇到西方人，还要稍稍撩起轿帘，颔首致意。站在城墙上的那些西方妇女中有不少都是慈禧的熟人。看到这些老朋友，她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点头的频度也更大了，时不时还要招招手，打个招呼。总而言之，重返北京的慈禧感觉异常良好。

坦率的说，无论慈禧，还是西方人，要想忘记刚刚发生的不快都是不容易的，大家只不过都在努力装出非常快活的样子。40年前，当第一次从北京出逃的慈禧从热河返回这座城市时，她的内心便充满了挫败感; 40年后，这种挫败感只能愈发强烈。此时的大清都城已经成了洋人的天下，处处都要随着他们的性子来，就连紫禁城的威严也被这些“生番”给玷污了。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太庙丢失了9位太清皇帝的神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年送给康熙皇帝的天文仪器也被德国人抢走，被德国皇帝用来装饰位于波茨坦的宫殿。紫禁城本身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随处可见残砖碎瓦，各种器物的碎片满地都是。如此种种，时刻都在提醒着慈禧这个国家遭受异族入侵的事实。

慈禧等人返回北京后，清廷的办事作风发生了明显改变。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光绪便爽快地同意接见1900年8月刚刚到任的6个国家驻华公使。此时的清廷再也摆不起以前的架子，洋人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于是有史以来，西方人第一次从正门走进紫禁城，在皇宫

的正殿里面见大清皇帝和太后。1901年1月28日，皇帝和太后再次在紫禁城的大殿里接见了全体西方驻华公使。与以往相比，这次接见仪式的流程出现了很大调整。用满语宣读文书的环节不但被取消了，慈禧本人还首次直接坐在宝座上面对西方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躲在皇帝身后的帷幕里面。接见过程中，光绪身穿貂皮长袍，照例端坐在龙书案后面。庆亲王充当仪式的司仪，替皇帝酬唱应答，光绪本人则只是象征性地说几句客套话，慈禧反倒喧宾夺主，频频向来访者对刚刚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歉意。

对于这次接见中慈禧的表现，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是:慈禧简单而含糊地对此前的错误表达了歉意。事实上，慈禧当天的所作所为远不止道歉这么简单。为了表示友好，她非常诚恳地邀请公使馆的女眷和孩子们来紫禁城拜访她。这个改善关系的新创意在她的头脑里应该酝酿了有些日子了。早在1月2日，还未返回北京的慈禧就曾发布旨意，初步表达了这样的设想。得知这个消息的公使女眷们随后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特别想去紫禁城参观的人担心太后可能只是随便说说，对紫禁城没兴趣的人则声称不应该给这个曾经的敌人太多面子。最终，女眷们还是决定前往紫禁城，拜见这位在西方人眼中形象不佳的老太后。按照约定时间，这些来访者被带进了紫禁城，慈禧、光绪，还有众多格格和王公大臣在大殿里等待着她们。赫德兰德夫人在《中国宫廷生活》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一印象:



庆亲王奕劻

一进大殿，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位端坐在宝座上的老妇人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女皇气质。

康格夫人这群来访这种慈禧唯一已经认识的人，她们首先打了招呼。这之后，康格夫人便开始扮演引荐人的角色，为慈禧介绍其他来访者，同时还以女眷代表的身份祝贺慈禧重新返回北京，祝愿大清和西方国家能够继续友好往来。作为慈禧的发言人，庆亲王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宣读了以太后口吻撰写的讲话稿。寒暄过后，女眷和孩子们依次走上前去，跟慈禧握手，然后再拜见光绪。整个见面流程完毕，

慈禧又把康格夫人单独叫到另一件大殿里，双手握着她的手，声音颤抖，带着感情地说:

> 我很抱歉之前发生的误会，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大清以后再不会跟列强们为敌了。朝廷将保护所有来华洋人，希望友谊天长地久。

慈禧把这番话重复了好几遍，反复展示了自己的善意。随后，她开始给女眷和孩子们分发手镯、戒指之类的礼物。分发礼物后是照例的午宴款待。午宴过程中，慈禧跟几位女眷碰杯喝酒，替她们布了菜，还特意给康格夫人敬了茶。女眷和孩子们告辞时，慈禧还亲热地说:“咱们应该常来常往。”最有意思的是，据某位西方记者报道，慈禧当天还特意说了几句英文，比如“how do you do……happy new year……thank you”什么的。康格夫人这样评价慈禧当天的表现:

> 显而易见，她的言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是要取悦那些来访者。她的目光睿智而敏锐，时刻关注着周围的人。她的脸上永远挂着愉快的笑容，声音也很柔和、低沉而有磁性。总而言之，她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友好的意味。

缺乏类似康格夫人经历的西方女性可能很难理解慈禧态度的突然转弯。仅仅几个月以前，这位女士还叫嚣着要把所有洋人赶进大海，几个月以后，她又突然让洋人成了自己的座上宾。事实上，慈禧对洋人的友好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对西方世界武力的屈辱臣服。不管慈禧的初衷究竟如何，大清和西方的友好关系终究还是逐渐建立并发展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公使女眷前往紫禁城做客的旷古奇闻。为了讨这些西方妇女欢心，慈禧送给她们各式各样的礼物，其中包括皇家饲养的北京哈巴狗、她亲手制作的中国结、亲手画的扇面。自从那次拜访结束后，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慈禧还要命人给这些女眷送去水果、点心和鲜花。除了赠送礼物，为了进一步建立与西方的友好关系，慈禧还尝试着跟身边的西方女性谈心。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这么做是非常不容易的。通过谈心，早在返回紫禁城几周前，慈禧就已经向西方世界释放出了强烈的友好信号，甚至将自己装扮成了曾经最令她深恶痛绝的维新派形象。

对于慈禧晚年进行的改革，即便那些最讨厌她的西方批评家也表现出了程度有限的赞赏。只可惜，由于清廷官僚系统的涣散，她的改

革并没能得到真正落实。尽管如此，慈禧在西方人眼中仍然算是个非常识时务的人。正是由于非常识时务，慈禧才可以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当年允许西方公使驻留北京，到后来模仿光绪的改革思路，无不尽然。从1902年返回紫禁城开始，慈禧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 即《辛丑条约》。

[2] 指1904年日俄战争。

[3] 起源于湖南和湖北，近代活跃于长江流域的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被称为袍哥。译者并未查到哥老会在开封袭击慈禧行宫的确凿史料。

[4] 慈禧返回北京时火车停靠1897年完工的马家堡火车站，这个车站后改名为永定门火车站，1988年再次改名为北京南站。慈禧1902年在这里下车后向南沿前门大街返回皇宫，很多看热闹的人就站在沿途的城墙上。

第十八章 作为维新派的晚年慈禧

慈禧这个人非常识时务，某些情况下也非常有效率，为了展现带领大清帝国走出困境的决心，还在流亡途中的她便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那些在1900年前后指责慈禧缺乏执行力的批评家至此也不得不稍稍转变态度。

清廷返回北京办公前一个月，慈禧本人便亲自下令，在全国旗人的范围内选拔男性幼童去西方游历、学习。这些幼童肩负的使命是学习西方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以便将来为大清朝廷效力。除了选拔幼童出国深造，慈禧还恢复了一项光绪变法时的新政措施，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引进西方现代教育考试制度。1902年8月，这条新政便得到了落实，中国起始于汉代[1]，延续了大概20个世纪的传统考试形式立刻就被废除掉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1906年，清廷开始了每年例行的针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选拔录用考试，地点设在北京。考试第一年，只有14个人胜出，被清廷授予官职。第二年，这个人数就增加到了42个，其中留日学生23人，留美学生16人，留英学生2人，留德学生1人。42人当中成绩最优异的8个被直接授予了相当于西方博士学位的进士功名。清廷留学生选拔考试要求考生用各自掌握的外语答卷，试题形式大概是这样的:

①解释什么是哲学，阐述哲学与科学和伦理学的区别。解释下列哲学名词:二元论、有神论、理想主义、实证主义、泛神论、不可知论。按照西方标准，如何划分下列哲学体系:庄子、禅宗、苏轼、朱熹、王阳明？

②解释穆勒[2]的理论，介绍以此为基础的科学发现。

③以“中国是否应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为题，撰写论文1篇。

就慈禧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来说，能够设定这样的考题，实在非同寻常。1902年慈禧开启的教育体制改革更加不同寻常的地方还在于，中国的学校第一次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包括众多格格在内的贵族女性作为第一批女学生进入专门设立在紫禁城内的女子学校就读。时间到了1907年，北京当地接收女学生的学校已经增加到了17所，就连慈禧也自掏腰包捐献白银10万两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不过她的这所学校教授的科目只有书法和刺绣。慈禧在教育方面采取的更大举措是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同时成立了以拥有公爵爵位的载泽[3]和端方[4]为首的留洋考察团。载泽和端方属于比较开明的满族大臣，早在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时，就曾坚决支持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游历欧美，吸收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优秀元素供中国借鉴。



留美幼童

1906年6月，考察团返回中国后，向清廷提交了1份总计120卷的考察报告，认为日本的政治体制最值得中国模仿[5]。同年9月，清廷发布旨意，声称将尽快依照考察团提交的报告实施改革。对于慈禧倡导的改革，多数西方批评家持怀疑态度。实际的情况的确如他们所

料，慈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即将到来的改革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许愿，然而直到她离开人世，新登基的皇帝才发布旨意，从当年10月开始进入改革程序，并在1917年正式完成大清朝廷的转型。大清朝廷的全面改组遥遥无期，某些细枝末节方面的小修小补却还算雷厉风行，特别是在慈禧本人严重关注的情况下。载泽和端方考察团提交报告的那年，慈禧还组建了一个负责清廷中央机构改组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政府里面吃闲饭的八旗子弟实在太多。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6]还有其他几位皇室成员主张立刻着手对此进行彻底改革，二代醇亲王也主张进行改革，但同时提出改革的步子应该适当放缓。尽管如此，这项措施还是遭到了坚决抵制。时任户部尚书，后来的陆军部尚书[7]满族大臣铁良[8]是最顽固的反对派。慈禧后来听说了这个消息，便在1906年11月召集军机大臣开了个会，要求他们毛遂自荐出任领导此项改革的负责人。庆亲王和另一位大臣很快站了出来，与会的其他4个人却保持沉默。《北华捷报》报道了当时的情形:



曾经的大清留日学生鲁迅

> 太后目光炯炯地看着军机大臣们。后者心里很清楚，太后和皇帝都是支持改革，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的。尽管如此，持反对态度的军机大臣们还是声称，他们宁愿辞职，也不愿意因此成为大清帝国的千古罪人。太后对此的回答是:“随你们的便!由于办事不力，你们4个人已经被解职了，我和皇帝一定要推进改革!”

第二天，慈禧又连续发布了二道旨意。第一道旨意正式公布了4位军机大臣被解职的消息，第二道旨意确认了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措施。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慈禧在军事领域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不过作为皇族成员以外跟慈禧关系最近的袁世凯的确是当时中国非常具有领导力的将领。袁世凯在慈禧执政的最后阶段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提出了不少军事改革措施，虽然大多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大清帝国晚期推出的改革措施往往见不到实际成效，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

大多办事效率低下，而且态度保守，不愿意进行改革。更糟糕的是，大清帝国已经没有实施改革必备的经济基础。正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9]在1898至1899年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大清帝国而言，经济方面的改革其实远比军事改革紧迫得多。问题在于，此时的清廷已经腐败透顶、积重难返，就连慈禧本人其实也是官场腐败的受益者。在缺乏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即便希望进行军事改革，也不现实。事实上，慈禧晚年推出的军事改革措施到了实际执行层面大多显得荒唐可笑。例如，当清廷在1906年提出即将为清军装备现代枪炮的同时，驻守北京皇城的八旗士兵却还在练习使用传统的弓箭，理由据说是因为在紫禁城里面放枪有可能“惊驾”。

清廷实施的改革当中比较受到众多西方观察家，特别是来华传教士欢迎的项目当属严厉的鸦片禁绝措施。1906年9月，慈禧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扫除鸦片。1908年3月，清廷动了真格的，提出了禁绝鸦片的具体措施，最核心的行动是禁绝本土种植罂粟的行为。某些西方批评家认为，这么做将给大清帝国造成巨大的税收损失。1908年，清廷又公布了补充方案:

> 为了填补禁绝鸦片造成的税收损失，朝廷已命令户部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因此造成怎样的困难，大清朝廷必将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彻底禁绝鸦片。

这道旨意发布后1个月，有消息说慈禧又把负责此事的特别委员会叫到面前，询问工作进展情况。这些人汇报过工作情况以后，慈禧警告他们说，任何疏忽和延误都是不可饶恕的，必将受到严惩。为了率先垂范，慈禧已经命令宫里的人员全部戒烟，对以身试法者的惩罚是重责100大板，然后永远驱逐出宫。与此同时，清廷官员也被要求限期戒烟，违反者将遭受相应的处罚。

晚年慈禧以女人特有的方式热衷改革，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受改革措施影响的人或部门。1902年2月，她颁布旨意禁止女性缠足，同时也禁止了男性包括吸食鸦片在内的种种放纵行为。针对朝廷机构冗员过多问题，慈禧在面对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布旨意，裁减了大批京官和地方官员。1907年，大清朝廷又准备发起货币制度改

革，只可惜慈禧没能等到计划完全变成现实的那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的改革其实是光绪1898年改革的翻版，同时也有她自己的创新之处，例如禁绝鸦片的措施，以及针对旗人的改革等。由于慈禧的改革，满汉不得通婚的法令遭到废除，原先的民族壁垒被逐渐打破。除此之外，慈禧还取消了旗人在各大城市集中驻防的做法。1908年，旗人被允许经商自谋生路，不再依靠国家供养。有意思的是，针对八旗改革的各种措施都是1898年光绪维新变法时被慈禧要求绝对不许涉及的。也正是由于她的支持，光绪变法失败后，守旧派为主体的满族大臣逐渐垄断了清廷几乎所有重要官职，打破了大清帝国建立以来“满汉平衡”的惯例。现在，慈禧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话说回来，慈禧虽然愿意改革八旗，却又不会如载振等人设想的那样彻底废除八旗制度。庆亲王父子提出变革八旗的设想时，慈禧其实非常不理解，甚至指责他们是维新派，阴谋反对大清。年老的庆亲王因此恐惧万分，立刻上奏折要求辞去军机大臣职位。由于庆亲王提出辞呈，慈禧又大发了一通脾气，拒绝这位关系最近的亲信辞职，还在庆亲王过生日时赏赐有加，以示友好。载振也没有因为八旗改革的事受到任何损失，不过后来有御史因为别的问题参了他一本，载振主动辞去了商部尚书的职务，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的父亲庆亲王为了承担连带责任，再次提出辞职，然后又遭到了慈禧的拒绝。正如前面所说，慈禧是个善于搞平衡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改革者的她要比光绪明智得多。最起码儿，她不像光绪那么希望维新变法可以一蹴而就。正是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光绪自认为合情合理的改革遭受了巨大挫折，最后半途而废。

无论光绪本人，还是他所依靠的维新派，都低估了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过分机械照搬了西方的教条。相比光绪，慈禧无疑有耐心得多，她可以把改革的过程拉长到几年时间，同时善于在各种意见当中寻求各方相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愿意对自己的子民和洋人一视同仁。改革过程中，慈禧同样遭遇了不少阻力和困难，不过她都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缺少解决问题的铁腕手段。例如1906年6月，慈禧就曾下旨坦陈支付对外赔款必会给大清帝国带来沉重负担，但改革绝对不能因为缺少经济基础而停止，如果朝廷缺钱，尽可以从

老百姓头上征税。慈禧就是这么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做某件事，就一定要做成。

【注释】

[1] 原文如此，科举考试制度实际起始于隋代，八股考试制度则建立于明代。

[2] Mil ，约翰·穆勒， 19世纪英国哲学家，代表作《论自由》。

[3] 爱新觉罗·载泽，满洲正黄旗人，晚清宗室大臣，立宪派的重要人物。

[4] 托忒克·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光绪维新变法的重要参与者，后又得到慈禧信任，宣统三年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军杀死。

[5] 主要指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利于满清皇室。

[6] 爱新觉罗·载振， 1876年—1947年，满洲镶黄旗人，奕劻长子。

[7] 1906年，清廷在原有兵部的基础上改设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承担了今天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的部分功能，最高长官军衔为正都统，相当于上将。

[8] 铁良，满洲镶白旗人，清末大臣， 190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继任军机大臣。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

[9] lord Charles Beresford，英国政治家、海军将领。

第十九章 慈禧的最后时光

种种迹象显示，从1902年开始，光绪的权力逐渐得到了恢复。早在1901年11月溥儁的皇位继承人资格被剥夺后，很多西方人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这个过程并没有他们希望的那样在慈禧返回北京前后立刻开始。返回北京的慈禧从原先的幕后走上了前台，光绪则回到那个小岛上，继续囚徒般的生活，充当慈禧的傀儡。此时的光绪并没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不过影响力相当有限。返回北京后的光绪仍然是皇帝，可慈禧就是不愿意给予他皇帝应有的权力。或许，通过对皇帝乃至整个国家的控制可以满足作为女性的慈禧对男性的控制欲。光绪因此失去了所有自主权。每当举行朝会或接见外国使者时，光绪都要坐在慈禧身边，只是宝座的位置要相对放低些。接见外国使者时，光绪的自由度相对还大些，因为按照中国习俗，使者只能跟他握手，却不能握慈禧的手。包括赫德兰德夫人在内的很多西方人都提到了上述情况:

> 每次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都要在大殿里同时跟我们见面。他们坐得很近，不过光绪座椅的位置要稍稍偏下，不能跟慈禧并列。慈禧走进大殿后，光绪必须稍等片刻，让太后先坐下，然后等慈禧发话才能落座……大臣们看见光绪不会磕头，向来善于巴结逢迎太监们见到他也不用屈膝请安。我甚至不止一次看见光绪给慈禧身边的太监行礼……据说，每当慈禧让光绪跟自己共进晚餐时，他都必须跪在桌边，慈禧给他布什么菜，他才能吃什么。

慈禧绝对不愿放弃权力，所以当她的改革开始时，曾经的维新派光绪却成了局外人，只不过他的自由度相比1898年到1900年时还是大了不少。为了防止光绪东山再起，慈禧和她的同党们好像猫看老鼠似的看着他，太监则是慈禧监视光绪的最主要耳目。在这种情况下，光绪表现得驯服无比，甚至连袁世凯这样的仇人都不再记恨。这可能

只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手段，不过也有可靠的消息说，光绪曾出现过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暂时失忆伴随重度焦虑。据说，光绪因此在自己的寝宫里连续躺了几个星期，盖着被子，眼睛直呆呆望天儿，偶尔无缘无故地流眼泪。有一次，他突然就尖叫了起来。听到尖叫的太监飞跑进他的寝室，迎头被他扔过来的花瓶之类的东西砸了个满脸花。太监们后来好不容易才给歇斯底里的光绪换了个房间。慈禧太后紧急召来了御医，不过他们也提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多也就是建议光绪进进补，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医生拿光绪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位皇帝真正的病根在于当初维新变法的半途而废，以及被自己的姑姑平白夺走权力。

返回北京的慈禧成了改革者，进而也就开始同情起了1898年的那些维新派。1904年6月，为了庆祝自己70大寿，慈禧颁布了全国大赦令，宽恕了包括维新派在内的所有仇人，只有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除外。慈禧始终不愿宽恕康有为。早在1902年就有报道说，清廷曾以光绪的名义给流亡大吉岭[1]的康有为发电报，试图诱骗他回北京。康有为真的上了当，立刻动身来到香港，好在当地维新派成员及时劝说他返回了印度。这个故事真假与否还有待证实，二年后慈禧的所作所为却是有据可查的。当时，慈禧认为中国的报刊媒体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自由度，议论了太多的国事，便发动了针对报纸和媒体的第二次大清剿，某位记者甚至因此被用刑致死。



慈禧出行

尽管做了不少恶事，返回北京后的慈禧明显还是宽容、和善了许多，以至于很多政敌打算诋毁她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此时以改革者面目现身的慈禧尽管仍旧值得怀疑，却无法继续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守旧派。在善待西方传教士这个问题上，慈禧做得简直无可挑剔，各地总督和巡抚不断得到她的指示，必须跟那些传教士和平相处，对教民和非教民必须一视同仁，因为他们都是大清皇帝的子民。慈禧的转变实在太彻底，很多政敌无法继续在执政理念方面挑她的刺儿，于是针对这位太后的指责便转移到了道德品质方面，甚至完全变成了毫无理由的恶意诽谤，慈禧身边几乎所有男性亲信因此都曾被传言跟她保持过某种不正当关系，就算太监也不能幸免，比如总管李莲英。话说回来，针对已经70高龄的慈禧编造这样的谎言实在太过卑劣。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确曾在年纪很大时还拥有不少情人，不过当时的她也还远远不到70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编造慈禧跟李莲英间的种种绯闻也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满足低级趣味的目的。坊间有传闻说，某位驻华公使曾分别送给慈禧和光绪每人一套欧式风格的衣服。慈禧得到礼物便迫不及待地试穿了起来。就在她脱得一丝不挂时，李莲英突然

冲了进来，跪在她面前磕头行礼。慈禧赶忙询问个中情由。李莲英回答说，根据大清祖制，自己有责任制止太后和皇帝身穿任何不符合规矩的衣服，特别是洋人的衣服。慈禧听了他的话，和蔼地笑了，夸奖李莲英对大清帝国忠心耿耿，却并没停止继续试穿自己的新衣服。看到这种情况，李莲英继续跪着磕头，声称自己宁愿把头磕破，也不能让太后穿洋人的衣服。后来，慈禧实在觉得过意不去，这才命人把衣服收进衣柜，同时还宽慰李莲英说自己舍不得让他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就闹得肝脑涂地。

这则逸闻充分说明了李莲英和慈禧间的亲密关系。正是凭借这种亲密关系，李莲英赚了不少外快。可靠证据显示，通过贪污，李莲英一生聚敛了大概相当于500万银元的财富，北京当地很多当铺的幕后老板其实都是这位太监总管。坊间还有传闻说，李莲英曾和某位义和团的高级头领过从甚密，还凭借这个人的手捞了不少银子。对李莲英而言，政治是种回报非常高的游戏。1902年，几位俄国外交官曾在满洲见过这位大太监。这几位外交官原本打算通过李鸿章办事，却没能办成，因此转而走起了李莲英的门路。李莲英从俄国人那得到的许诺是，如果他可以促成慈禧同意在满洲利益方面对俄国让步，每年就可以得到100万两银子的“常例”。



慈禧

由于李莲英的鼎力相助，同年2月，慈禧真的答应了俄国人的要求。4个月以后，相关条约在北京正式签字。

返回北京后慈禧的权力其实在逐渐缩水，相应的，李莲英的权力也就随着主子每况愈下。1906年3月，这位大太监彻底失了势。那年年初，革命党取代维新派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谋反”事件不断发生，据说一天当中就有6座宫殿发现了炸弹。惊恐万分的慈禧把李莲英叫到面前狠狠训了一顿，指责他玩忽职守。鉴于这位大太监多年来的忠实服务，慈禧最终要求他戴罪立功，把隐藏着的革命党找出来，否则严惩不贷。受到责罚的李莲英告别慈禧，又把自己的4个直接手下叫了过来，然后把“革命党嫌疑”的罪名栽到了这4个人的头上，直

接下令把他们给打死了。找来4个替罪羊的大太监兴冲冲地找到太后复命。听了李莲英的汇报，慈禧一言不发，这是她表达愤怒的最常见方式。眼看太后真的动了气，李莲英惊恐万分，当时就崩溃了。此时的李莲英也上了几岁年纪，于是干脆就借此递交了辞呈。慈禧顺水推舟，批准了李莲英的要求。1个小时以后，她又亲自发布手令，调李莲英去颐和园当差，将他赶出了紫禁城，由已故慈安太后的亲信太监接管李莲英原先的职务。就这样，李莲英带着大批财宝离开了大清帝国的权力中心，然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慈禧去世后，这位太监才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正如前面所说，李莲英在促使慈禧向俄国人出让满洲利益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慈禧晚年大清帝国的外交活动并非本书关注的主题，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李莲英参与签订的条约实际承认了日本和俄国对满洲的合法瓜分，慈禧虽然表面上同意签署条约，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为了避免像1898年那样因为战争爆发破坏自己过生日的兴致，她决定把原本安排在1903年11月的70大寿庆典推迟一年，改在1904年举办。与此同时，为了表示自己体恤百姓、关心国家，她还主动要求降低庆典规模，谢绝授予她的荣誉称号。1903年8月3日，慈禧发布旨意说[2]:

>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徽号一折朕亲奉懿旨，自来每逢庆典，虽有加上徽号之文，惟现在时事艰难，疆国未尽绥谧。广西尚在用兵，各省筹款方殷，民生困苦，深宫宵旰忧勤，从无暇逸。倦怀民瘼，时切疚心，岂宜更进徽称，乖予夙志。 皇帝以恪遵，成宪再三跪请，亦难俯从。但愿君臣一德，同怀克艰之义，实心实政，使治理蒸蒸，黎民又安，即所以尽皇帝之孝。所有加上徽号、典礼，着毋庸议。

王公大臣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慈禧的要求，大寿庆典的规模没有丝毫减少。慈禧收到的生日礼物仅珍珠、宝石一项，价值就折合24000英镑。她的第二个大寿过得可算心满意足。同样是在1903年，慈禧最信任的亲信荣禄告别人世。1902年，慈禧刚刚安排光绪的兄弟，二代醇亲王跟荣禄的女儿结了婚[3]。6年后，这对夫妇的结合对大清皇位的继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晚年慈禧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人并非真的反对那些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只不过她对这些东西

的吸收、借鉴必须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

【注释】

[1] darjeeling，印度东北部避暑胜地。

[2] 旨意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8册p 844，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3] 他们的孩子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第二十章 曲终人散

慈禧晚年是否已经厌倦了权力，或者身体状况的江河日下逐渐迫使她对自己8年以来的政治生涯进行反思？1907年盛夏时节，北京有传闻说慈禧有意彻底退休，将大权还给光绪。慈禧把交权的日期确定在1908年2月2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光绪将在这天恢复被剥夺的权力，与此同时，新的皇位继承人也将被指定出来。自从1900年溥儁遭到废黜，皇位继承人已经空缺7年。据说，慈禧曾在1906年把若干皇亲召入紫禁城读书，以便从中选择未来的皇帝。这些人当中，二代醇亲王和荣禄女儿的儿子溥仪，恭亲王的孙子溥伟[1]，以及道光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的孙子溥伦[2]最终胜出。慈禧最满意溥仪和溥伦，多数皇室成员则看好溥伟。

相关方面的流言此起彼伏， 1908年2月2日这天却什么也没发生。1908年1月初，慈禧发布旨意取消了农历新年那天皇宫里的庆祝宴会。按照惯例，慈禧将在这个宴会上接受光绪和百官的朝贺。光绪对此当然不置可否。农历新年过后，又有传闻说光绪再次病重，慈禧为此紧急召唤御医进宫。此时的慈禧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同年3月，宫里传出消息说，由于大清和日本的外交出现危机，太后着急上火，也生了病。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由于清廷怀疑日本轮船“达丸”号替广东的革命党偷运武器，便扣留、搜查了这条船。日本为此提出严重抗议，清廷的态度也很强硬，随时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这个坏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慈禧耳朵里，把她吓得够呛。据《北华捷报》报道，慈禧为此特意召集二代醇亲王和另外二位皇族开会。这几个人足足说了1个小时，话题涉及大清面对的严峻局势，还有太后垂垂老矣的晚景。谈话过程中，慈禧突然失声痛哭，坦承自己虽然已经执政40年，却仍然没能把大清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现在已经

彻底没办法了。

3月底的时候，慈禧已经病情严重，无法出来公开露面。屋漏偏风连阴雨，就在这时，北京多处发生火灾。很多人怀疑纵火者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钦天监则声称这场火灾的原因是因为火神爷不愿意在庙宇里安分待着，后者的鬼话当然没几个人相信。为了安抚人心，清廷逮捕了14名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慈禧则命令陆军部加强对紫禁城和整个首都的护卫。北京的局势动荡异常，大清帝国其他地方也不太平，革命随时可能发生。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虽然遭到清廷通缉，却仍在自己祖国的周边不断为革命奔走、策划。很多追随他的革命者则留在国内，随时准备执行孙中山的指令。3月13日，同样出于安抚人心的目的，慈禧和光绪照例动身前往颐和园居住、办公。当时的人们发现，慈禧虽然患病但身体状况还算可以，光绪则已经病得走不动了。

移居颐和园的慈禧并未放松下来，因为她手下的两员大将袁世凯和张之洞又闹了起来。慈禧的本心偏向袁世凯，不太待见保守色彩更加浓重的张之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获得了她赏赐的三眼花翎，张之洞的花翎则只有一眼。为了撮合这两员大将，慈禧特意把他们叫到一起，让他们结成了儿女亲家。为了堵住这两个人的嘴，慈禧告诉张之洞和袁世凯说，自己已经让钦天监算过了，他们儿女的八字非常合适。联姻是慈禧调节大臣纠纷的常用办法，她已经用这招儿替袁世凯解决了他的另一位政敌，时任陆军部尚书铁良。太后发了话，袁世凯和张之洞自然不可能拒绝，也就只好握手言欢。

慈禧在颐和园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没太多值得记述的事情。1908年夏天，李莲英的继任者，太监总管崔玉贵遭到解职，随后被永久驱逐出宫。这个人的离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只是关注程度没有李莲英那么高。按照计划，慈禧和光绪应在9月入秋后返回紫禁城，来自拉萨的达赖喇嘛当时还在等候他们接见[3]。达赖喇嘛此行给慈禧从西藏带了不少礼物，意在庆贺太后即将到来的生日。由于未知的原因，达赖喇嘛的觐见仪式被推迟到了那年10月，仪式规模也大大缩了水，双方也没进行太多实质性的会谈就草草收场了。达赖喇嘛完成觐

见后，北京的形势相对平静了下来，直到慈禧74岁生日的这个月，一件事情的发生震动了大清帝国，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11月初，宫里传出消息说光绪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御医认为他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紊乱，随后请来的西医则确诊光绪罹患肾炎和神经官能症。光绪病入膏肓，慈禧的状况也不怎么样。坊间有传闻说，她当时即便没死，可能也离死不远了。比较可靠的消息是，慈禧已经下不了床、出不了屋，御医必须时刻守在身边。还有消息说，御医守在慈禧身边并非是为了给她本人看病，而是随时向她报告光绪的情况。临终前的慈禧时刻关注着大清朝廷的局势，特别是光绪的病情，以便这位皇帝一死就让自己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顺利接管权力。

11月11日，坊间传闻光绪此前一天受到惊吓，病情加重。11月12日，来自《京报》的消息又说光绪出现了明显好转，已经可以参加御前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皇位继承人问题。11月13日，清廷发布圣旨，任命二代醇亲王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未来的皇帝。同样是在这天，各国使馆接到了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成的外务部发来的照会:

慈禧太后任命二代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11月13日下午14时，光绪病危。据说，负责伺候他的人准备把这位皇帝转移到灵床上等死，却遭到光绪的严词拒绝。11月14日，经过漫长痛苦挣扎的光绪恢复了意识。恢复意识的他再次拒绝离开自己的卧室，后来就死在那里，连寿衣都没来得及穿。可悲的是，这位皇帝到死也没能摆脱慈禧的束缚。为了时刻掌握皇帝的动向，同样躺在床上等死的老太后把曾经的亲信李莲英派到了光绪身边，时刻监视着不久于人世的侄子。当天上午，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圣旨。这份圣旨的大概介绍了皇帝自8月以来健康逐渐恶化的情况，要求各地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举荐名医，替皇帝治病的事[4]:

谕内阁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都、抚保荐良医生。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来京诊视。惟所服方药，迄今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胯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

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后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将此通谕知之。

遗憾的是，这些名医根本就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领。11月15日庆亲王向各国公使发出了1份照会，这份照会是以皇位继承人溥仪的名义签署的，光绪本人则已在14日下午17时至18时间驾崩了。15日晚上，清廷发布消息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正式继承皇位，成为同治和光绪的继承人。溥仪在满清皇室里的辈分应该算是同治和光绪二位皇帝的儿子。前面已经提到， 1875年同治去世时，慈禧有违常规，选择身为他同辈的兄弟，而不是子侄辈的光绪继承皇位。现在，被打乱的皇位传承顺序被重新纠正了过来。10月12日的御前会议上，多数军机大臣其实更支持溥伦继承皇位，不过光绪本人还是倾向跟自己血缘关系比较近的溥仪。临近生命终点的慈禧任命二代醇亲王担任摄政，其实也具有强烈的暗示用意，等于已经明确宣布溥仪将成为大清帝国的新皇帝。溥仪当时只有5岁，这就意味着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不可能亲自执政，二代醇亲王因此可以在慈禧死后继续“垂帘听政”。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二代醇亲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人事任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慈禧的很多政策作出了适当调整。二代醇亲王执掌朝政的方式跟晚年慈禧大同小异，不过通过对克林德事件的处理，西方人普遍认为他是位年轻有为、开明和善的亲王。



溥仪



溥仪

倒霉的光绪终于死掉了，那个造成他终生不幸的女人只比他多活了不到24个小时。11月12日，慈禧突然中风瘫痪，面部肌肉失去控制。当御医奉命前来抢救她的时候，慈禧却很坦然的告诉他们自己恐怕已经不行了。光绪皇帝去世时，慈禧其实也已经离死不远。尽管如此， 11月14日夜里，慈禧仍旧挣扎着发布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道旨意。第二天早上，她也告别了人世[5]:

> 奉大行太皇太后遗诰曰。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追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雕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 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

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豫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豫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服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

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慈禧和光绪先后告别人世，又把当时还是小孩的新皇帝溥仪推上了宝座。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慈禧走在光绪前面，进而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慈禧死前还是向光绪表示了屈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关于慈禧和光绪人生最后时刻的误解和谣言可谓铺天盖地，其中多数都属于主观臆测。据说，某位负责给皇帝诊治的御医曾从袁世凯那里得到过33000块银元，光绪其实是在慈禧去世后被认为下毒毒死的，后来发布的二道遗旨不过是障眼法。如果这样的说法真正成立的话，那么参与者肯定不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袁世凯和二代醇亲王肯定脱不了关系，大批官员、太监和宫女也必定参与其中，只不过这些人后来出于各自的原因和利益都选择了沉默。在光绪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和二代醇亲王既是拥有共同利益的盟友，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掌握大权以后，二代醇亲王立刻就跟袁世凯翻了脸，迫使他以“腿疾”的理由主动辞职，暂时告别大清官场。袁世凯默默承受了自己的命运，返回河南老家隐居。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

袁世凯早在1898年就背叛过光绪， 10年后的他出手杀掉对自己恨之入骨的皇帝也是顺理成章的。袁世凯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即便对曾经的恩主李鸿章也毫不手软。尽管如此，在缺乏可靠证据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只能认为光绪和慈禧间隔不到24小时的相继离世只能是种巧合。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光绪和慈禧去世后仅仅几天，庆亲王也撒手人寰。从二代醇亲王的角度来说，妨碍他在光绪和慈禧死后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庆亲王。庆亲王跟二代醇亲王的家族3代以前曾是一家人。得到慈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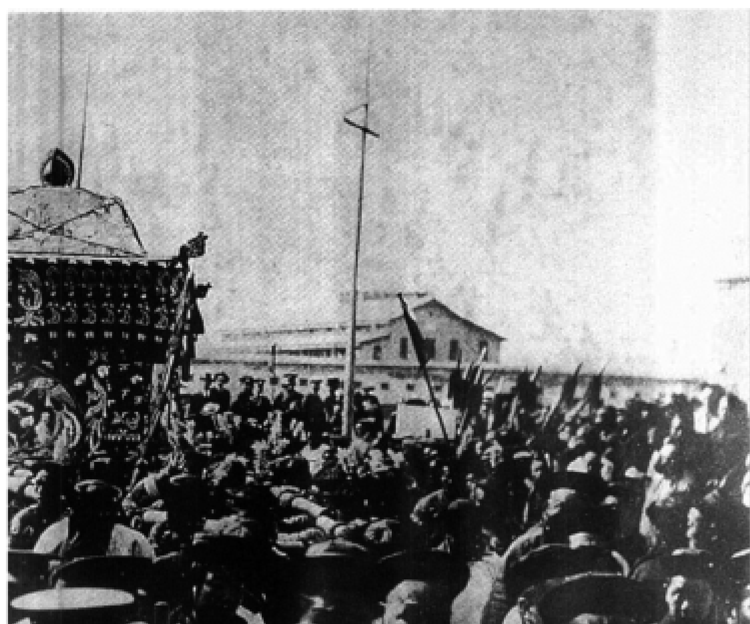
青睐后，手握重权的庆亲王获得了数不清的政治盟友。种种迹象显示，光绪和慈禧去世前后，庆亲王已经和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后者有意支持庆亲王的儿子载振继承皇位。



袁世凯(中)

上述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因为庆亲王家族跟皇帝的血缘关系比较远，而且这位亲王本身也不讨光绪喜欢，二代醇亲王自然也不可能待见他。相应的，如果二代醇亲王利用溥仪年幼的机会把持朝政，庆亲王也不可能让他称心如意。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庆亲王非常识趣地死了。清廷给出的官方说法是庆亲王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悲伤过度，最终患病死去。坊间则传闻这位亲王曾拒绝出席12月2日溥仪的登基大典。本书对庆亲王的死无法给出确定答案，鉴于庆亲王当时已经72岁高龄，将他的突然死亡解释为中风发作或许比较合理。庆亲王去世时，清廷正忙着给光绪和慈禧办丧事，还要筹备溥仪的登基典礼，上上下下乱成一团，这位亲王的死也就没能引起太多关注，反倒是平常跟他打交道比较多的驻华公使们对庆亲王的突然离世表示异常惋惜。多年以来，特别是自1901年的停战谈判以来，庆亲王就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按照中国传统，光绪的灵柩在紫禁城停了整整100天，然后被安葬到距离北京80英里的清东陵。自从登基以来，光绪始终拒绝为自己挑选“吉地”，所以他的陵墓是在死后匆忙修建的。慈禧跟光绪的做法正好相反，多年以来，她始终在精心修建自己的陵墓。这座陵墓最初由她最信任的荣禄负责修建，地点位于清东陵，跟咸丰皇帝的陵墓紧挨着，耗费银两折合100万英镑，慈禧在世时曾多次前往陵墓视察施工情况。1909年11月9日，慈禧的灵柩在紫禁城停放将近1年后，这才动身出发，足足走了4天，这才按照钦天监选择的良辰吉日准时被埋进了坟墓。



慈禧出殡



慈禧葬礼

慈禧的灵柩安葬前，北京照例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很多满心好奇的西方人也赶赴现场观礼。8月30日，皇宫里的人在紧邻慈禧灵柩的紫禁城墙根位置的空地上替她烧了1艘长达180英尺的纸船。烧纸船的这个日子也是钦天鉴算好的良辰吉时。这艘纸船装满了各种各样纸糊的家具，还有纸糊的男女仆人等扎纸活。装满物品的纸船用丝绸蒙住，周围还摆满了纸扎的莲花。全部这些扎纸活的花费超过7000英镑，它们的用途是让慈禧在阴间过得跟在颐和园时一样舒服。随同纸船被烧掉的还有另外3000个不同形式的扎纸活，包括全副武装的步兵和骑兵、乐工、官员、马和马车、男性随从、轿夫等。

11月9日清晨5点，慈禧覆盖着刺绣龙凤图案棺罩的棺椁由84名轿夫抬着，离开紫禁城，向北京城东北部的城门缓缓移动[6]。慈禧灵柩行经的路线早已黄土垫道，由军警站上了岗。出殡队伍由二代醇亲王引领，后面跟着众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每走一段距离，队伍就要停下，接受驻华公使路祭。跟在灵柩后面随同护送的是全副武装的西式清军部队，蒙古八旗人员则牵着骆驼，驮着最传统的蒙古包跟在清军后面。那些蒙古包是供他们未来4天沿途休息使用的。再往后，

众多随从排成整齐的行列，举着慈禧生前出行时的全套执事。高级僧侣和喇嘛烧着香，念着经，跟在执事队伍后面。僧侣、喇嘛队伍再往后，还有一大串人举着各种祭品、佛教象征物、刺绣装饰的祭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慈禧生前使用的两顶大轿。

灵柩出城门后，负责抬棺的人数增加到了120人。护送灵柩的二代醇亲王向前来观礼的各国公使表示感谢，邀请他们留在城门处特地搭建的帐篷里休息。二代醇亲王继续护送了灵柩一程，然后也返回了紫禁城。据说，慈禧葬礼的规模表面看起来远不如光绪那么隆重，不过光绪的葬礼实际花费还不到50万两白银，慈禧葬礼的花费则在100万到150万两白银之间。《泰晤士报》的记者评论说:

> 在中国，葬礼的规模是跟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紧密挂钩的，慈禧、光绪二人死后待遇方面的差异因此耐人寻味。

话说回来，按照上述原则，慈禧死后的待遇高于光绪倒也合情合理。

【注释】

[1] 爱新觉罗·溥伟， 1880年12月30日—1936年10月10日，道光帝曾孙，恭亲王奕□之孙，贝勒载滢之子。

[2] 爱新觉罗·溥伦，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皇帝五世孙，贝勒爱新觉罗·载治第4子，后过继给道光帝长子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为嗣孙，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

[3] 1908年9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来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4]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9册p 891—892，作者只引述了这道圣旨的开头和结尾，中间各省举荐医生名单的部分被略去了。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5]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9册p 893—894，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6] 按当时北京习俗，灵柩通常由齐化门，即今朝阳门出城。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慈禧太后

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像慈禧那样存在如此多的争议。无论功过是非，慈禧终究是中国的慈禧太后，是极大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慈禧太后。通常来说，那些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人，总能在各个领域引发无数的思考和讨论，然而他们当中像慈禧、耶洗别、麦瑟琳娜、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那样，能够统治一个国家的女性实属凤毛麟角。要想完整讲述1875至1908年间的中国历史，根本绕不开慈禧这个人。在很多人眼中，慈禧其实是个两面人，一方面坏事做尽，祸国殃民;另一方面，她又是个爱国者，平时吃斋念佛，有时还很开明。不同观察者对慈禧做出的评价可能天渊之别，本书所要做的则是对各种各样的看法进行分析判断，避免走向任何极端。最终，本书呈现出来的那个慈禧既不可能漆黑一团，当然也不可能洁白无瑕，她其实就是个复杂的人。话虽如此，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应对慈禧这个人作出是非功过的基本判断。

在慈禧的政敌眼中，这个人的毛病数也数不清，比如性格残忍、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杀人如麻、野心勃勃、道德败坏、贪婪成性、奢侈浪费、愚昧迷信、伪善做作等等。如果所有这些指控都符合事实的话，她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了。实话实说，慈禧其人的确存在冷酷、残忍的方面，例如在对待她的亲侄子光绪这个问题上。就算慈禧从没想过要把这个侄子真正置于死地，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光绪帝其实也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肯定是无法从慈禧的人生履历中完全删除的。话说回来，真实的光绪肯定也不会像他的中外盟友们描述的那么完美无缺，不过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他确实本应拥有比20年“准囚徒”生活更好的命运。亲政后的14年当中，光绪不断忍受着别人以他的名义发布与自己真实意图相反的旨

意，他喜欢和信任的朋友不断沦为阶下囚，甚至丢了性命。事实上，早在光绪被慈禧变成“准囚徒”以前，他的性格就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这样的结果可能也并非慈禧的本意，很多时候她对光绪的确冷酷无情，不过也有很多时候她还是位慈爱的养母和姨妈。

在1898年发动变法的那些维新派面前，慈禧展现了自己性格中最冷酷的一面。她的众多坚定支持者认为，这个人的脾气虽然不怎么好，却非常有自制力。话虽如此，慈禧偶尔也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例如1907年，某位军机大臣遭到二名政敌上书弹劾，慈禧相信了他们的说辞，直接就把这名大臣解了职，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与通常的看法正好相反，慈禧在维新变法这个问题上其实是表现了相当的克制，她曾足足隐忍了6年，直到康有为给光绪出主意准备搞掉她的时候，这才出了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维新派先打算要慈禧的命，她可能也不会被迫“自卫”。

不管怎么说， 1898年镇压维新派的慈禧仍然表现了自己性格中最邪恶的一面。因为变法吃了苦头的牺牲者不仅是维新派，还包括那些支持维新变法的记者，乃至清廷内部的变法同情者，其中的很多人因此都被砍了头。除此之外，慈禧当政期间紫禁城里的太监因为各种原因被打死的也不在少数。虽然作为受害者的太监未必绝对没有问题，然而其中很多人的确完全是慈禧坏脾气的受害者。慈禧一生曾4次遭到谋杀指控，受害者包括她的丈夫咸丰、儿子同治、儿媳阿鲁特氏，还有同盟者慈安太后。有人认为，慈禧的亲妹妹，光绪的生母可能也是被她杀死的。据说， 1896年的某天，慈禧把妹妹叫到宫里，就光绪的“缺少教养”问题好好训斥了她一通儿，指责光绪成天想念生母，不关心国家大事。慈禧的妹妹回家后第二天就死了，就像针对慈禧的4项谋杀指控一样，亲妹妹的死是否跟这位太后直接相关也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基本属于坊间传闻。慈禧的4项谋杀指控中，只有阿鲁特氏皇后那项相对靠谱，因为这位皇后的死确实对两宫太后有利。如果阿鲁特氏为同治生了孩子，她就会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后，顶替慈禧和慈安的位置临朝听政。话虽如此，阿鲁特氏皇后的死是否真的跟慈禧有关，同样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作为执掌大清帝国40余年的女强人，围绕慈禧的各种传闻恐怕永远不会有个尽头，而且恐怕永远也都

说不清楚。

慈禧的所有性格特质当中，强烈的政治野心可能是最主要的一项。慈禧具备成为统治者的潜质，热衷追逐权力，为此甚至不惜杀人，连亲人也不放过。话说回来，如果她不杀人，或许就保不住手里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年轻和软弱成全了慈禧的政治野心。光绪其实同样具备称为统治者的潜质，只不过慈禧已经把这个位置先抢到了手里，不但绝对不可能主动让给他，相反还要压制这位年轻皇帝的成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慈禧可以无所不为，她的人品因此被很多人描绘得异常不堪，甚至影响到了不少西方作者。例如，明恩溥博士在《动荡的中国(chinainconvulsion)》里曾如此评价1899至1900年间的慈禧:



慈禧

慢慢的，慈禧对义和团的超自然能力着了迷，进而让自己也变成了义和团的“大师兄”。

与此同时，也有西方作者这样评价慈禧:

> 坊间流传的关于慈禧生活放荡的传闻多数是不可信的，她的健康和长寿就是证明。对慈禧来说，政治权力游戏远比庸俗的个人娱乐重要得多。

事实上，慈禧很多时候都是在替自己的手下，比如太监总管李莲英，背黑锅。所谓的“慈禧罪行”其实大多是这些亲信打着她的旗号干的。李莲英其人名声实在不怎么样，平时民怨极大，那些对慈禧心怀不满的人总喜欢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说事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本人的言行也对这种做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年的她喜欢照相，而且经常拉着李莲英当陪衬，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李鸿章和李莲英都姓“李”，某些西方人往往将他们搞混，把李鸿章也算在慈禧的秘密情人范围以内。除了李鸿章和李莲英，法国作家罗兹(Rodes)和德弗朗斯(Defrance)在《中国中篇小说(la chine nouvelle)》里还认为一代醇亲王，即咸丰皇帝的弟弟，也跟慈禧存在暧昧关系。类似这样的话题永远也说不完，同时也永远都说不清楚。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本书作者仍然坚信，就当时大清帝国严峻的形势来说，慈禧恐怕没那么更多时间和闲心再去找那么多男朋友，尽管在很多人眼中慈禧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在识人、用人方面，慈禧其实并不高明，李莲英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很多跟慈禧打过交道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任何人只要得到她的信任，从此就可以为所欲为，慈禧当年对义和团就是这么做的。除了对人过度轻信，迷信可能也是慈禧接近义和团的重要原因。由于义和团展示的种种“神功”，慈禧对他们深信不疑。慈禧的确是个“女强人”，却是个迷信的“女强人”。她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钦天监的指导，一举一动都必须讲究良辰吉日。慈禧这个人本身就对金钱异常贪婪，她任用的亲信大多贪污成性，经常还要拿自己搜刮的民脂民膏“孝敬”太后，最终一个从头烂到脚的朝廷就这么被培养出来了。话说回来，大清帝国终究是慈禧的“家天下”，所以她有时又会表现得非常爱国，比如偶尔收拾收拾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即便那些远离祖国的华人、华侨，也经常可以沐浴到“老佛爷”的皇恩雨露。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慈禧从自己的私蓄中拿出15000英镑，打算用于救济当地灾民，不过由

于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外部捐款，所以慈禧后来又把这笔钱的数字改为6000英镑，专门救济当地华人、华侨。

慈禧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当然更加慷慨，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奢侈欲望，她必须不断获得大笔银两。前面已经提到，慈禧和法国的约瑟芬皇后一样热衷华丽建筑。除了建筑，她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对珠宝的痴迷。所有珠宝当中，慈禧最痴迷珍珠和玉石，晚年后又爱上了钻石，手上始终戴着不少钻石戒指。凯瑟琳·卡尔小姐认为相对慈禧的地位而言，她的衣柜算不上奢侈，不过这位女士还是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过慈禧在颐和园接见来宾时身穿的一件华丽明黄色长袍，上面装饰的图案是可以乱真的刺绣藤萝花，右侧开襟，扣子都是玉石制作的。慈禧右大襟的扣子上挂了个18颗珍珠串成的手串，珍珠和珍珠间还搭配了1颗绿玉的隔珠。同样是在这颗纽扣上还挂着一个装饰黄色流苏的红宝石吊坠，就连流苏的穗子上还串了2颗梨形的珍珠。慈禧的脖子上绕着一条2英寸宽的蓝白色领带[1]，上面满是刺绣，还缀了不少大珍珠。慈禧的发型是满族妇女标准的盘头，发髻周围装饰了一圈珍珠，其中正前方的那颗最大、最亮。除了珍珠，她的头上还插了不少鲜花和首饰，其中有根大簪子的流苏完全是用珍珠串成的，总共8条，一直垂到她右侧的肩头。穿着这件衣服的同时，慈禧还必须搭配很多戒指、手镯、胸针之类的东西，材质要么是玉石的，要么就是黄金镶嵌红宝石或珍珠的。这身打扮总体上给人造成一种异常奢华的印象，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要知道，这还不是慈禧上朝时的正装。

很多跟慈禧打过交道的西方人认为晚年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慈禧是异常虚伪的。对西方人来说，慈禧跟义和团联手对付他们的那段历史是很难忘怀的，这段历史也给慈禧在西方的形象造成了最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段历史，很多西方批评家认为慈禧在1898年年末，乃至1902年以后对西方人的频频示好绝对是装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抵消她在1900年前后的种种排外言行。持如此观点的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慈禧本身的爱国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同样具有慈悲之情，而且不吝于将自己的慈悲扩展到西方人身上，特别是对于西方的妇女。即便她的这种慈悲带有

几分表演的色彩，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虚伪的。

慈禧的人性当中包含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愚昧迷信、奢侈浪费、虚伪狡诈诸多不良因素，然而这又并非她人性的全部。即便慈禧的政敌也不能否认这位女性拥有极高的政治天赋，不能否认她经常也会饱含爱国热情，愿意真诚对待朋友等等。慈禧这个人具备发现人才(男性)的慧眼，善于跟形形色色的男人共事，让他们为自己所用，李鸿章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然，必要的时候，慈禧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会心慈手软，就像她在1901年前后对对端亲王、毓贤，以及很多义和团头领所做的那样。古代罗马有句名言:不要对共和国绝望(not despairing of the Republic) !同样，慈禧也从未对她所统治的那个帝国失过望。慈禧是个爱国者，虽然她意识里的那个“中国”跟革命者们所说的那个“中国”并不完全一样。慈禧有她自己的爱国方式。这位太后一生当中多次试图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它们本应属于的人，然而一次次尝试最终只能让她坚信，别人都是信不过的，大清帝国离不开她。对慈禧来说，政治是有意思的游戏，同时也是艰苦的工作，她在遗诏中所说的那句“夙夜忧劳”绝非夸张。中国皇帝的日子绝非如外人想象的那么舒服，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很早起床上朝，慈禧虽然不是皇帝，却承担了皇帝的所有职责。凯瑟琳·卡尔小姐是唯一一位跟慈禧共同生活过较长时间的西方女性，因此也见证了慈禧在颐和园日复一日的辛劳。为了处理政务，慈禧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即便到了晚年，也要每天批阅奏折，有时甚至必须边跟大臣谈话边看文件。北京的冬天黑得很早，天气也很冷，即便如此，慈禧也要在阴冷的大殿里坚持工作。相比之下，很多西方君主的日子无疑幸福许多。

慈禧是个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家并不容易对她达成意见方面的一致，然而即便对她最不友好的批评家也无法否认，慈禧的执政理念仍然有不少成功之处。总的来说，慈禧属于那种比较有手腕和能力的机会主义者，具有一定的全局观念，恰恰是她令大清帝国得以苟延残喘。相比慈禧，光绪无疑更加忠厚诚实，不过他的所有努力却不可能让大清帝国真正摆脱被列强宰割的命运，所以慈禧去世后，这个古老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慈禧其实很聪明，她善于利用列强基于贪婪所引发的矛盾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要想达到这样的效

果，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谁能替慈禧完成这个任务呢？答案是这个任务只能慈禧本人承担，虽然它也曾拥有过几位亲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亲信相互间的关系本身也非常微妙，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秉持迥然有别的政治立场，最终却都能被慈禧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



慈禧宫廷照

本书前面已经谈到过不少慈禧早年与光绪维新变法间的关系，这里没必要重复赘述。由于慈禧反对1898年的维新变法，很多西方人不愿意相信返回北京后的她所发起的改革是真心实意的。由于慈禧终其一生都在通缉康有为，压制报刊媒体的言论自由。很多人认为，晚年慈禧频频抱怨愚昧无知的老百姓拖了自己改革的步子可能只是故作姿态，她从来也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1898年

慈禧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真正分歧在于改革的时机不到，而非到底要不要改革。经历过1900到1901年改革的时机似乎终于到了，相比光绪，善于搞平衡的慈禧其实更懂得如何让改革获得方方面面的接受。如果当初康有为选择慈禧，而不是光绪作为变法的同盟者，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发生改变。作为变法领导者的慈禧肯定不会像光绪那么急功近利，3个月当中一道接一道地颁布政令。慈禧领导的改革必定是渐进性的，因此更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无论如何，晚年慈禧发动的改革终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慈禧完全是在演戏的确有失公允。

亚历山大·米基（Alexander Michie）先生在《英国人在中国（Englishman in china）》中对慈禧的评价还算中肯：

> 慈禧其人拥有让想法变成现实的技巧，意志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能够面对现实……慈禧设定目标时非常务实，也不乏将目说完了慈禧的缺点，再来说说优点。慈禧其人的言谈举止都非常优雅，或者说“得体”更加合适，不过也有某些心怀敌意的人认为她有做作的嫌疑。众多通过报纸认识慈禧的美国读者都曾借助文字，领略过这位太后接见西方人时的风采。例如，1882年年初，李鸿章的老母亲得了重病。自从1870年开始，李鸿章由于政务繁忙，已经很少有时间探望自己的母亲。眼看母亲病入膏肓，李鸿章只得要求暂时从直隶总督任上离职，回家侍奉母亲。慈禧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赏赐给他不少灵丹妙药带给母亲。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老母亲没等到他回来就去世了。李鸿章为此上奏折请假回家替母亲守孝3年半。慈禧的回复是准许他回家守孝100天，然后回京继续上班。这样的处理方式让李鸿章得以忠孝两全。1900年袁世凯母亲去世时，慈禧比照李鸿章的前例，准许他回家守孝27个月再回京复职。很多跟慈禧有过私下接触的人都认为她是个非常会做人的人，只不过光绪悲惨遭遇对她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
>
> 标变成现实的智慧。虽然这个人对大清帝国的统治处处有违常规，却仍然不失为一位成功女性。

在关心家人方面，慈禧也堪称表率。特别是她的侄女，如果没有慈禧的帮忙，她是不可能进宫当上皇后的。除此之外，她对各位公主、格格的态度也非常不错，例如庆亲王的几位格格都通过慈禧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恭亲王的女儿则被她纳为养女，从格格升级为公主。慈禧的居住的宫殿里还收容了不少守寡的满族和汉族贵妇人。按照中

国风俗，这些女人几乎已经没有再嫁的机会，却可以凭借太后的庇护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总而言之，通过阅读各种西方人撰写的相关专著，我们发现慈禧并非完全是坊间传闻中的那个形象。



慈禧赏雪



慈禧乘船

很多有幸跟慈禧做过面对面交流的西方人认为，慈禧其实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她的魅力是威严与吸引力的混合体。慈禧的威严属于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任何人第一眼就可以注意得到。与此同时，慈禧的温文尔雅也不容忽视。随着年龄、阅历的不断增长，慈禧文化气质方面的素养也在不断提高。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入宫后便开始自学中国传统典籍，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学者式的名字[2]。基于多年不断学习，慈禧的谈吐非常文雅，书法也有几分功力。慈禧在书法方面绝非徒有虚名，赫德兰德教授认为，如果慈禧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在这个方面，甚至有可能跻身大清帝国书法家的前几名。对慈禧来说，赠送中外朋友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幅她亲笔撰写的书法作品，比如“富”字、“寿”字、“喜”字、“和”字等;一张她亲手创作的绘画作品，主要内容是鲜花写生;除此之外，还要搭配适当数量的玉石、皮毛等贵重物品。

慈禧似乎特别喜欢鲜花，虽然鲜花在中国算不上什么稀罕东西。她的花园无论冬夏都鲜花不断。据说，紫禁城的西南角以前还有个从不对外开放的小花园，全部是日式风格的。痴迷鲜花的同时，慈禧还喜欢饲养小动物，唯独不喜欢猫。大清皇室拥有自己的宠物狗繁殖体系，平民百姓胆敢染指绝对严惩不贷，这种专属皇家的宠物狗直到1901年才有少量流散到了西方。据凯瑟琳·卡尔小姐记载，慈禧还挺爱养鸟。有一次，慈禧饲养的小鸟从笼子逃跑了，她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只小鸟招回笼子里。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有幸参观紫禁城的西方人往往震惊于皇家建筑豪华装修。相比紫禁城里的宫殿，颐和园只是“小儿科”。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皇家宫殿能跟紫禁城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紫禁城更近似于博物馆，而非单纯皇帝居住生活的场所，蕴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慈禧的寝宫名为“瀛台[3]”，这是紫禁城当中最好的建筑，装修风格完全依照慈禧的品味，里面摆放的东西也大多是中国传统器物，很好见到外来的洋玩意儿。中国人在皇家建筑的装潢方面可谓吹毛求疵，无论日常使用的红木家具，还是各种丝绸质地的帐子窗帘，古董级的官窑瓷器，乃至挂在墙上的中国历代传世名作，全都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美国胡博·华士所绘慈禧像

相比之下，慈禧的卧室堪称朴素，值钱家具只有一口座钟。慈禧的床上铺着明黄色床垫和床单，上面蒙着黄色的床罩。整个床铺被黄色的帐子包裹着，帐子的下摆一直垂到地上。除了睡觉用的床，慈禧寝室里还摆了张小桌子，墙上挂了些字画之类的东西充当装饰。慈禧日间在寝室中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一架砖炕，包括赫德兰德教授在内的很多西方来访者都曾受邀在炕上坐过。紧挨着砖炕的是慈禧平时念经拜佛用的佛龛，佛龛里摆放着皮埃尔·罗蒂在1900年时见过的木质佛像，还有贡品、香炉等佛教用品。

个人打扮方面，慈禧照样一点儿都不凑合。她平时使用的是皇家工匠专门为她一个人配制、生产的肥皂和香水。慈禧非常喜欢各种香料，却从不使用化妆品，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寡妇不能浓妆艳抹。年轻时的慈禧是个公认的大美人。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慈禧才能够得

到咸丰皇帝的垂青。遗憾的是，西方人从未得到机会目睹慈禧年轻时的风采，因为亚洲女性向来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由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对慈禧的描述往往存在很大分歧。凯瑟琳·卡尔小姐由于给慈禧画过像，她对这位太后外貌的描述相对也就比较靠谱儿:

> 慈禧的身材比例非常协调，头项端正，面容姣好。她的手很漂亮，手掌很小，外形具有明显的贵族特征。慈禧的头型也很周正，耳朵很大。她的头发又黑又亮，脑门儿特别宽，眉毛又弯又长。慈禧的瞳孔颜色漆黑，眼睛的位置长得很正，平时目不斜视。就中国人的标准而言，慈禧的鼻梁算得上很高，颇具欧式贵族气息，它的延长线向上正好穿过两只眼睛和脑门的正中。慈禧的嘴唇线条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内心坚强的印象，她的嘴比较大却不难看。她那对红唇偶尔翕动时，就会露出洁白、坚固的牙齿。这副好牙为她的微笑平添了不少魅力。慈禧的锁骨线条非常明显，却又不会给人造成生硬、顽固的印象。单从外表看，慈禧似乎也就是个保养水平不错的40岁女人，然而我明确知道她已经快69岁了。

康格夫人对慈禧外貌的描述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相对来说，英语国家女性大多认为慈禧的外貌其实并不出众。阿绮波德·立德夫人[4]几乎和凯瑟琳·卡尔小姐同时跟慈禧打过交道，她在《北京我家花园周围(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 从外表看，慈禧肯定足有68岁了，她的脸很大，下巴叠了好多层。她的眼睛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细长的，眼帘总是向下垂着。慈禧的脸即便挂着笑容也仍然难掩威严的气息，足以让站在她面前的人发冷、发抖，即便外国公使也不能幸免。慈禧站起来一言不发的时候，这种威严的气场就会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阿绮波德·立德夫人又耗费大量笔墨描述了慈禧脸上的每道皱纹。苏珊·汤丽(Susan Townley)女士也在这个时间段跟慈禧打过交道，还写了本名为《我的中国札记(my chinese notebook)》的书:

> 慈禧已经68岁，头发却仍然是亮黑色的，不过这些头发主要都是充数用的假头发。总而言之，她的外表看起来还是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些。

引述完了西方女性观察者眼中的慈禧，再来说说西方男性视角中

的慈禧。老资格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博士曾这样写道：

> 相对西方女性，慈禧的身高稍稍偏矮些，不过她的身材比例非常好，而且仪态优雅，就她的身份地位来说已经无可挑剔。慈禧的外貌谈不上美丽，却让人觉得鲜活，挺受看。她的肤色并非中国人常见的黄色，而是偏橄榄色的。她的面部被珍珠串成的面纱半遮半盖着，外人无法准确获悉她的喜怒哀乐。慈禧的外貌总体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也就刚过40岁的样子。

某位中国宫廷诗人曾经写诗描写过25岁时的慈禧，把这首诗跟上面3个人的叙述放在一起看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首诗已经被几位英国诗人翻译成了英文，这里可以引述其中的一部分[5]：

> 天子的光辉殿堂， 一颗新星正在升起! 她的体态如天鹅脖颈般婀娜， 容貌倾国倾城。 端正的双肩托举着鹅蛋形的脸， 双眉漆黑，弯如满月。
>
> 五官精致，线条分明。 身材修长、苗条， 一颦一蹙、一举一动，令人刻骨难忘。 她的眼神直达心灵， 单凭美丽便可征服一切。 啊，美丽的天后! 啊，闪耀的新星! 为天子的殿堂闪耀! 你是仁爱、勇敢、希望、智慧、决心、伟力的化身!

晚年慈禧似乎特别看重自己的手和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的手指甲非常长，还带了专为保护指甲设计的纯金镶宝石套子。慈禧没缠足，脚却天生很小，带有6寸高跟的满族花盆底高跟鞋恰好跟它们相匹配，还让慈禧原本只有5英尺左右的身高显得挺拔了不少。就像很多满族妇女一样，慈禧的头发非常浓密，不过也可能如苏珊·汤丽女士所说，那里面掺了不少充数用的假头发。慈禧的微笑非常具有亲和力，声音如同银铃，显得很年轻，将近70岁时听起来还仿佛17岁的少女。总的来说，慈禧是个保养状况非常不错的女人，虽然年老色衰，不过凭借残留的几分姿色仍然可以窥见她年轻时的风采。即便按照西方标准，慈禧也不是个难看的女人。慈禧晚年拍摄的有限几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衰老，凯瑟琳·卡尔小姐却对老年慈禧的衰老作出了有效的弥补。通过这张画像，我们看到的应该不只是位5英尺高， 70岁上下，被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集体诅咒，又在全世界引起巨大争议的老年妇女。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恐怕都不能对慈禧作出真正完美的描

述，大家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中立、客观地讲述自己眼中的那个慈禧。1861至1908年慈禧执掌中国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今天，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获得新生，对于慈禧的讲述因此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视域，人们也有可能对慈禧其人作出更加公正、多样的评价。

【注释】

[1] 即满族妇女搭配旗袍的围巾似的装饰物，学名“领子”。

[2] 指慈禧书法、字画的通常落款叶赫那拉·杏贞。

[3] 原文如此，慈禧在颐和园的住所实际是乐寿堂，在紫禁城内则先后居住过储秀宫、长春宫、慈宁宫、寿康宫等地，作者此处描写有误。

[4] Mrs Archibald Little，英国著名在华商人立德的妻子，曾大力倡导中国妇女戒除缠足陋习，还写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书。

[5] 这首诗原文未查到，作者身份不详，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the 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

abukhaye努尔哈赤

hweicheng叶赫那拉·惠征

Peking北京

hienfung咸丰

kienlung乾隆

kwanghsu光绪

yehonala叶赫那拉

taokwang道光

kiaking嘉庆

Nanking南京

Canton广州

Macao澳门

Lu viceroy of the liang kwang卢坤

Kwangtung广东

Kwangsi广西

Shameen沙面岛

the canton river广州河（珠江）

Whampoa黄埔岛

Amoy厦门

Foochow福州

Shang Hai上海

Ningpo宁波

Marco Polo马可波罗

pescadores澎湖列岛

Koshinga国姓爷

Formosa台湾

bogue forts虎门炮台

kanghi康熙

yungcheng雍正

prince I怡亲王（tsaiyuan爱新觉罗·载垣）

prince ching郑亲王/庆亲王（本书同时出现了两个prince ching，既指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也指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应该是作者把发音搞混了，译者翻译过程中根据上下文内容作了区分。）

sushun肃顺

Szechuan四川

tza an慈安太后

tungchih同治

yeh ming chin叶铭琛

John Bowring约翰·宝宁

Seymour西摩尔

Elgin额尔金

Peiho白河

Taku forts大沽炮台

kweiliang桂良

Tientsin天津

prince kung恭亲王

changkiawan张家湾

sankolinsin僧格林沁

palikao八里桥

tungchow通州

li fan yuen理番院

Jehol热河

Chihli直隶

Shensi陕西

tsaungli yamen总理衙门

prince chun醇亲王

wen hsiang瓜尔加·文祥

tungwen college同文馆

hung hsiu tsuan洪秀全

hakkas客家人

triad society三合会

tsengkwo fan曾国藩

Hunan湖南

Yangtze river长江

chung wang忠王(李秀成）

Chekeang 浙江

Kiangsu江苏

Kansu甘肃

Hofei合肥

Anhui安徽

Keangse江西

Shantung山东

Honan河南

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

Fuhkien福建

Yangchow扬州

medhurs麦都思

Henry Fontanier丰大业

chunghow崇厚

Thomas Francis Wad威妥玛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樊国梁

Arthur Henderson Smith明恩溥（阿瑟·史密斯）

ahluta阿鲁特氏

chungyi崇绮

William John Napier律劳卑勋爵

Macartney马戛尔尼

Amherst阿美士德

tzu kwang ko紫光阁

tso tsung tang左宗棠

loochoo islands琉球群岛

Tonking东京湾（越南）

tsaiching爱新觉罗·载澄

prince chun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爱新觉罗·载沣）

tsaitien爱新觉罗·载湉（光绪）

Paotingfu保定

Yunnan云南

Margary马嘉理

chang chih tung张之洞

Bacninh北宁省（越南）

yikwang爱新觉罗·亦劻

Chefoo烟台

Port arthur旅顺

Min river闽江

Pagoda anchorage马尾军港

George Blood Smyth施美志

Courbet孤拔

Robert Hart罗伯特·赫德爵士

zhang pei lung张佩纶

port hamilton巨文岛（朝鲜）

yuan si kai袁世凯

liu kun yi刘坤一

the lotus lake太液池

kweisiang叶赫那拉·桂祥

katharine carl凯瑟琳·卡尔

li lien ying李莲英

Wuhu芜湖

Wusueh无锡

li ching fong李经方

Kiaochau bay胶州湾

Talien wan大连湾

Tsingtao青岛

fa hien法显和尚

Wei hai wei威海卫

Kwangchou wan广州湾

weng tung ho翁同龢

Hupeh湖北

yong lu荣禄

kang kwang jen康广仁

tung fu hsiang董福祥

sir Claude Macdonald窦纳乐

Chungking重庆

Kweichow贵州

Ichang宜昌

Sanmmoon bay三门湾

the white lily白莲教

the red lantern红灯照

the chartered bank渣打银行

yu hien毓贤

li ping heng李秉衡

yu lu毓禄

kangyi他他拉·刚毅

Taianfu泰安

prince tuan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

Kalgan张家口

mr sugiyama杉山彬

Edward Hobart Seymour西摩尔

hsu ching cheng许景澄

natung叶赫那拉·那桐

prince su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

the heathen street哈德门大街（崇文门大街）

von ketteler克林德

Taiyuanfu太原

Sian西安

Kaifengfu开封

kolao hui哥老会

tsaitse爱新觉罗·载泽

tuan fang托忒克·端方

tsaichen爱新觉罗·载振

puyi爱新觉罗·溥仪

puchun爱新觉罗·溥儁

puwei爱新觉罗·溥伟

pulun爱新觉罗·溥伦

tieh liang铁良

eunuch tsui崔玉贵

prince chuang庄亲王（爱新觉罗·载功）

Archibald Little阿绮波德·立德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丁韪良

从北京到曼德勒

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亲历中国”第二辑

探秘百年前中国西南胜景
溥仪洋帝师的一次冒险之旅

[英]庄士敦 著 曹磊 译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LTD

版权信息

书名：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作者：（英）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55941677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简介
第二章 从北京到宜昌
第三章 从宜昌到万县，穿越长江三峡
第四章 从万县到成都
第五章 从成都到峨眉
第六章 峨眉山和中国佛教
第七章 峨眉山
第八章 从峨眉到打箭炉
第九章 打箭炉
第十章 从打箭炉到八窝龙，雅砻江
第十一章 从八窝龙到木里
第十二章 从木里到永宁府
第十三章 从永宁府到丽江
第十四章 从丽江到大理府
第十五章 中国西南的多样民族
第十六章 大理府到巴莫
第十七章 从巴莫到曼德勒
第十八章 结语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简介

永远在路上—独处的乐趣—周游中国—泰国和缅甸—小城思茅—登上泰山—孔子后裔

本书讲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源自地理学方面的纯学术目的，也不是获得官方资助的政府行为。很久以来，我便渴望游历这片中国土地上仍然很少为西方人所知的区域，加深对于中国西藏和云南北部地区的了解。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内地的18个省份已经陆续向欧洲旅行者敞开大门，相关专著在西方世界也不断获得出版。据我所知，我这次旅行所经历的从打箭炉到丽江的这条路线却是英国人此前从未涉足过的，西方世界也从未出版过相关专著。

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本书集中笔墨描述的中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通过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很多关于亚洲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仅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查拉[1]和木里可能是目前已知的海拔最高的大规模人类定居点。相比此前某些英国旅行者选择的进入拉萨的路线，我此行所选择的路线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海拔最高的。我个人的这次旅行对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不过，如果我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起更多读者对于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的兴趣，哪怕仅仅是对于那里壮丽山河风光的兴趣，那么我所有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



年轻时的庄士敦

对于那些有志研究人类早期起源，或者向那些古代印度朝圣者一样，渴望亲手触摸人类文明的洪荒时代的读者来说，中国西南地区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2]。这片土地上覆盖着大量人类足迹还未染指的原始森林，耸立着终年积雪的巍峨群山，还有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数量众多的峡谷和沟壑。来自世界屋脊的冰雪融水在这些幽暗的峡谷和沟壑中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波涛汹涌地汇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中国西南的群山环抱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媲美伊甸园的山谷和盆地。这些地方景色绝美，很长时间以来与世隔绝，因此得以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就像《圣经》里所

说的隐士们一样。

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偏重实际，缺少浪漫精神的民族，这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国西南胜境里的中国人，他们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感知能力并不输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中国民间流传着这么个故事:有位中国学者，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们一样，总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持不满意的挑剔态度。这位学者非常相信鬼神之事，某天晚上，他听见黑暗中有人这样对自己说道:“你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我是上天的使者，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我，它们都将得到上天的满足。”

可敬的学者回答，“我希望能够终生温饱，不过只要粗茶淡饭就可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上天能够允许我自由地游历那些山峰、瀑布和森林，免除尘世的纷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学者话音刚落，天空中就传来了连续不断的笑声。上天的使者疑惑地问:“你想要的就是这些吗?你为什么不让上天赐予你人世中最大的幸福呢?你为什么不要求上天赐予你终生的富贵生活呢?你不是跟上天开玩笑吧?”

如果上天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我的选择可能会跟那位中国学者差不多———随心所欲地到处游历，或者干脆找个远离尘嚣的地方隐居下来，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

The weariness，the fever，and the fret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忘记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令人对坐哀叹的世界。[3]

这可能是个悖论———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和独处的权利。通过无处不在的无线电，某个专横的声音不断提醒我们说:“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让电子通讯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触及地球上的每个人，不管是陆地还是海上。”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那种独自走在路上的安逸，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周围的人扰乱心境。我刚

刚引述的这两句诗让我们意识到，由于现代科学的胜利，电子通讯技术已经遍及世界，就算澳洲也不能幸免[4]。我们做梦也不可能再去拔掉那些电报线杆，剪断那些电报线了。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类似斯坦利[5]这样的热带丛林探险家，或者吉尔里[6]先生这样的极地冰原探险家居然可以每天在《泰晤士报》上同步发表自己的游记。如果时代继续发展下去，威廉·普利兹爵士[7]所幻想的与火星间的时时通讯恐怕早晚也要变成现实。

如果这样的幻想真的变成现实，未来的旅行者即便到了别的星球，恐怕也无法免除尘世的纷扰，享受完全独处的快乐了。如果人类凭借自己的科学发明不断侵扰自然，我们又怎么能设想自己可以跟这个世界保持文明初始阶段的和谐关系?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无线电并非所有旅行者的必需装备，世界上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们必须跟周围的人时刻保持联系。摆脱现代文明的纠缠，这样的命题在西方世界似乎存在返祖和野蛮的倾向，跟很多普通西方人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折中一点儿说吧，作为现代人，如果能够暂时摆脱这些现代束缚，那也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当然，具体能够欣慰到什么程度，也要取决于每个人对那些现代文明的依赖水平。

本书描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是我在远东地区的首次长途旅行。早在1902年年末，我就曾游历过受法国控制的东京湾[8]地区，并沿红河上溯，深入云南境内。我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横穿了这个省份，最终来到名叫思茅的小城，随后又从那里出发，前往掸帮、上寮等地旅行，旅行的主要方式是乘坐独木舟沿着美丽的河流漂泊。这次旅行让我深入了解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生活，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最好客的民族。抵达上寮的首府琅勃拉邦[9]后，我改乘木筏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参观了位于芽庄[10]的古代王国遗迹。那之后，我告别湄公河，开始在暹罗东部的干旱平原上向着呵叻[11]行进。平安抵达呵叻的我改坐火车，很快就来到了曼谷。曼谷是个东西杂糅，现代和古代交汇的奇妙城市。这个地方拥有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西方公使馆林立，同时也保留着最传统的乘坐大象出行的方式，到处可见金碧辉煌的庙宇和高耸的佛塔。

这次旅行的4个月期间，除了挑行李的脚夫，我始终都是一个人

在行走，没有任何朋友或仆人陪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我沉浸在一种诗意的孤独当中。抵达掸邦、上寮区域后，就连那4个负责挑行李的脚夫也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告而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丢弃了大量行李，留下能够随身携带的少量必需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现代文明强加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毫无必要的。



1922年，庄士敦穿着溥仪赏赐的官袍和顶戴留影

舍弃它们对我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虽然这些东西此前始终被认为是保持文明、舒适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在我所游历过的那些热带地区，当地居民的热情和淳朴极大弥补了旅行者因为装备和辅助人员缺失所造成的不便，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为远来的陌生人提供包括饮食在内的各种帮助。由于他们的帮助，旅行者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深入那些最偏远、荒凉的地区。对那些抱着科学研究目的的旅行者来说，适当的装备和辅助人员当然是必需的，可是对于类似我这样纯粹是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来说，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完全可以弥补自身准备的不足，虽然将自己的生死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可能并不理智。旅行途中，我曾跟各种各样的亚洲人打过交道，他们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起码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

旅居中国期间，我还因为政治、商业乃至纯粹个人兴趣的原因，在远东地区获得过很多次旅行的机会。仅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我就曾先后游历过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等多个省份。1904年，我游览了已经被德国占领的胶州和山东省的省会济南。旅行途中，正好顺路拜谒了孔子陵墓的所在地曲阜，这个地方现在居住着他的第76代直系子孙孔公爵[12]。告别孔子的家乡，我登上了泰山。据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古代伟大的舜帝就曾来到这里举行祭祀仪式。这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日本和俄国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我还沾服役于皇家海军中的某位朋友的光儿，造访了朝鲜的首都[13]。

相比上面这些经历，本书接下来所要描述的这多半年时间的旅行还要更加引人入胜。我当时的计划是要沿着长江上溯，取道四川，进入西藏东部地区。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一路向南，横穿藏区，抵达云南省境内。通过从前辈旅行者那里获得的经验，抵达云南以后，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缅甸地区[14]。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虽然旅行途中出现了种种意外和插曲，受惠于众多朋友和当地居民的帮助，我最终还是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注释】

[1] chala，位于今甘孜藏族自治州。

[2] 指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

[3] 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夜莺颂》。

[4] 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人口以土著人为主。

[5] 亨利·莫尔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英国人，后加入美国国籍，曾深入中非探险，以搜索戴维·利文斯通和发现刚果河闻名，1899年受封为英国爵士。

[6] Geary，具体身份不详。

[7] Sir William Preece， 19世纪90年代英国邮政局的首席工程师。

[8] Tong king，今北部湾，指当时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

[9] Luangpra bang，缅甸地名。

[10] Vien chan，今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庆和省省会，当地保留有古代城堡遗迹。

[11] Korat，泰国地名。

[12] Duke Kung，指孔子的第76代嫡孙孔令贻，1877年袭衍圣公爵位，1898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衍圣公有时居住在山东曲阜孔府，多数时间则居住在北京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

[13] 指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

[14] 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

第二章 从北京到宜昌

从威海卫出发—六国饭店—北京的风沙—卢汉铁路—黄河大桥—路权问题—张之洞—抵达武汉—沿着长江上溯—灾难性的开始—死了人

这次旅行的第一阶段比较顺利，时间也比较短，这里不需要太多笔墨描述。此次旅行的重头戏是中国西南，所以我也就没在华北地区耗费太多时间，而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到了宜昌，这个长江上的重要港口。由于连接北京和汉口间的铁路此时已经完工，所以我这次旅行就不需要像以前的旅行者那样乘坐马匹和车辆在尘土遮天的大平原上索然无味地跋涉数百英里，仅仅用了4天就顺利抵达了宜昌。

1906年1月6日，我乘坐“顺天(shuntien)”号轮船从威海卫出发，两天后来到秦皇岛，然后从陆路向北京进发。1月9日傍晚，我平安抵达大清帝国的首都，途中只在天津休息了一个晚上。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火车旅行后，六国饭店[1]提供的舒适房间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彻底放松。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我的日程安排主要是拜访英国公使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北京漫天的沙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风沙非常厉害，恐怕只有蒙古的戈壁沙漠或者新疆和田的情形才能与之相比。任何人如果有胆量在大风天气去北京的街头走走，肯定就会弄得嗓子疼得说不出话，眼睛也会发红、充血。为了防范风沙，当地居民必须采用双层窗户纸的窗户，门上还得悬挂门帘。多数公使馆周围有高墙环绕，情况稍微好些。

眼下，来北京游历是旅行者群体中的新时尚，我向大家介绍起这座城市来并不比那些导游手册的编辑困难多少。现而今，就连那些从没出过国的英国人对这座城市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自从7年前的战争[2]结束后，北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建设了新的火车站和其他若干新式建筑。话虽如此，这座城市的街巷、庙宇、店铺和皇家宫殿跟

1900年以前相比，似乎又没有太大变化。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一种壮丽、混乱、辉煌、凄婉相混合的感觉。这座城市的居民相比从前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日益加深，他们针对“洋鬼子”的态度变得更加淡定、从容了起来。越来越明确的证据显示，自从上次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生某种觉醒，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向西方学习成了他们的共识。这种趋势在北京表现得尤其明显。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地理学名词，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色彩的爱国主义。10年前，诺曼爵士[3]曾在《远东(the far east)》一书中说过，他在自己的书里使用“中国”这个名字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事实上，中国还算不上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4]。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前现代的中国在很多年前的那场战争[5]中，是无法跟已经进入现代门槛的日本抗衡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眼下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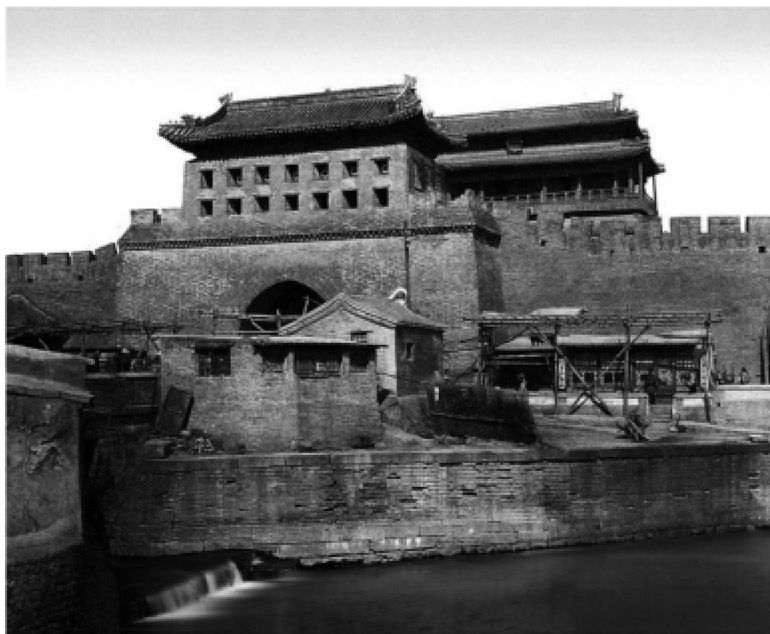


北京街头推独轮车的人



拉洋片

北京这座城市目前的地位非常奇特，已经成了各种力量角逐的舞台。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羸弱的皇帝[6]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在百姓面前扮演着父亲和上帝的角色。皇帝身后，某位女士[7]时刻注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嘴里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才是真正的“金口玉言”。皇帝的宫殿以外，朝廷各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满洲皇室贵族、不同政治党派的领袖各显其能。这些人当中不乏善于跟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高手。身处全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们也不闲着，他们每天都在向北京呈递大量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要么是支持维新的，要么就是反对维新的。很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年轻学子则奔走、游说于各派力量之间，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认可。西方列强当然也是这座城市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列强们表面上铁板一块，私底下却各有各的算计，躲在公使馆里互相钩心斗角。



清代北京永定门

1月16日，我乘坐火车沿着卢汉铁路[8]告别北京。1月18日傍晚，我来到了汉口。这段旅行的距离大概是1223公里，也就是759英里的样子，我乘坐的火车先后经过了直隶、河南和湖北3个省份。火车所过之处，一派富裕、祥和的乡村生活景象，树林、村庄、农田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色反倒容易使旅行者赶到厌倦。火车每天傍晚停车休息，每天清晨重新开动。第一次停靠站台是在顺德府[9]。旅行的第二天，火车进入河南境内，通过新修建的大桥跨过了黄河。为了修建这座大桥，工程师们曾发生过不小的争论。这座大桥总共大概有2英里长，桥墩、桥梁采用螺栓固定，对于负责建设的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来说，是项难度非常大、成本非常高的工程。工程的主要难点就在于黄河涨落不断的水位，还有地形随时变化的沙质泥浆河床。我们这些旅行者大多对工程技术问题一窍不通，真正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大桥的长度和它的坚固程度。据说，为了保持桥身的稳定性，打入河床的桥墩长度远远要比它们露在水面上的部分长得多，而且桥面也修得非常窄。这座大桥能否承受住黄河夏季泛滥的洪水，它的桥墩打入河床的深度是否已经足够保持坚固，那恐怕就要等待时间检验了。事实

上，大桥是在我来到这里前才刚刚完工通车的，这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封闭抢修过好几次。由于桥面过窄，大桥每次只能允许一列火车单向通过。为了减轻桥身压力，列车上桥前还要改挂特制的轻量火车头。



清代北京朝阳门，渔民正在护城河里捕鱼

第二天入夜后，火车在郑州停靠，这个地方距离黄河大堤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家名为“伯里克利酒店(hotel pericles)”的欧式旅店，是由已经退休的意大利籍铁路员工经营的。地道的意大利通心粉、基安蒂酒[10]，还有旅店主人马科特尔斯(mouchtour-is)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同胞的友好招待，让我的枯燥旅行得到了适当的调剂。第三天临近尾声的时候，火车抵达了驻马店。这个地方是个铁路枢纽，不过当地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接下来的一天，火车穿过了划分河南、湖北两省的山脉，同时又让我们领略了无与伦比的风光。几个小时以后，火车到了汉口，停在了长江江边，这个地方距离上海大概600英里。与汉口隔江相望的就是湖北省省会武昌，

也是总督大人的驻节地。距离汉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名为“汉阳”的城市，汉江是它们的分界线。武昌、汉口、汉阳，3个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足有200万左右。这个区域差不多位于中国的正中间，理所当然地成了特别重要的商贸中心。西方人无疑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价值，当地的西式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地价上涨很快。由于河道的限制，沿着长江上溯的海轮到了这个地方就必须停下，货物改由吨位更小的船只运送到上游390英里处的宜昌。汉口的地名可谓名副其实，它正好就位于汉江的出口位置，汉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这条大河本身也有超过1200英里的河段可供小型运货船只通行。连接北京的铁路修通后，汉口又成了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据说这条铁路不久后还要向南面的广州延伸。不夸张地说，汉口可能会是未来全世界最具商业和工业潜力的城市。

毫无疑问，将铁路从汉口延伸到广州乃至九龙必将耗费大量的资金，不过铁路一旦修成，中国从中获得的益处将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铁路修通后，中国内地的商人和农民将可以把他们的货物、产品贩运到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远方，很多地方的饥荒问题也将由此得到缓解。遗憾的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对于各种新生事物始终保持着疑惧的态度。想当年西方人修建上海至吴淞的铁路时，大清朝廷就曾出于某种特别可笑的原因，耗费巨资把这条铁路买了下来，然后将它彻底拆除、废弃。所幸，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廷对于修建铁路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最近完全由中国兴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就是很好的证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条铁路不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出资修建，而且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师和工人也全部都是中国人。

近期，清廷虽然针对修建连接广州至九龙、缅甸边境地区至腾越[11]的铁路项目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抗衡外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还有列强借此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非反对铁路本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矿山开采方面。中国人希望修建完全属于自己的铁路，独立自主地开采原本属于自己的矿藏，不再愿意列强对他们指手画脚，眼睁睁看着国家财富外流。很多西方人幸灾乐祸地指出，中国目前还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幻想变成现实。从这些人的利益角度来说，他们应该非常乐意这种情

况出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维护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暂时没有资金和技术，他们可以等待，哪怕因此耽误了追求财富的脚步，他们也可以等待。这样的做法在经济上可能是不明智的，在民族感情上却是理所当然的。

西方和远东地区[12]的很多人因此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让中国人屈服，彻底向世界打开大门，这其实是不明智的。任何事情都怕调个个儿来想，假如中国人向英属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我们这些英国人会作何感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不断侵犯别人的国家，同时又在不断指责他们高涨的排外情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



极力倡导修建铁路的张之洞

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13]属于大清高级官员群体中明确意识到修建铁路可以造福全国各个阶层的少数派，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14]中这样写道:

>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

这位英明果敢的大清总督认为，修建铁路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好处。除了可以促进商业发展和产品流通，还可以巩固国防。话说回来，中国现在的确非常缺乏大规模修建铁路的资金和技术。所幸，随着清廷与比利时政府签署的协议即将在1907年到期，他们将可以适时收回整个华北地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路权。这样的做法对中国和西方将是双赢的，中国人可以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西方人则可以获得在这个国家合法经商的权利。

抵达汉口后，我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为接下来继续深入中国内陆的旅行做准备。从汉口到上海，乘坐长江上的轮船的话，总共只需要4天时间，这个地方是我此行最后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价格采购某些西方商品的补给站。

从汉口到宜昌也需要乘坐轮船走长江水路，这样的轮船每周开行两到三次，分别由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公司经营，船上的住宿条件还都不错。1月18日，我乘坐隶属日本公司的轮船继续沿长江上溯。这次旅行的开头儿异常平静，平静得没什么东西值得浪费笔墨，直到21号我们突然搁浅在了沙洲上。23日，船员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最终通过名为“抛小锚移船(kedging)”的方式将轮船拉回了深水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断了根儿锚链，配套的锚也陷在泥浆里拔不出来了。我们的日本船长随后宣布，由于轮船进水严重，无法继续安全航行，也找不

到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原路返回汉口，把船上的货物卸掉一部分。船上的中国乘客联名反对，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返回家乡跟家人一起庆贺中国新年，这个时间是1月25日。我听说，有些比较极端的人甚至打算用武力胁迫船长。日本船长提出可以让这些人就近上岸，再去换乘其他船只。大概有20到30名乘客接受了船长的提议，一条小船靠了过来，准备把他们摆渡上岸。悲剧很快发生，可能是因为超载，那条小船没走多远就突然翻了，乘客全部落入水中。我不知道淹死乘客的确切人数，因为这些人离开轮船前并没有详细登记，好在总共应该不超过三个人。获救的乘客重新回到轮船上，那条底朝天的小船则被彻底遗弃了。为了早点儿回家，这些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时，他们的家人还在翘首企盼这些人回家欢度中国新年。最糟糕的是，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恐怕得等到棺材送到门口儿，他们才能知道亲人已经去世的噩耗。

这次悲剧事件还只是个开头儿。当天晚上，我们在事发地点下游几英里的地方抛锚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返回汉口。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船被卷进旋涡，撞进了停在岸边的一大堆小船里。所幸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船长当场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第二天出发后不久，船上的大副突然询问我是否随身携带了药品。据他说，某位中国乘客突然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我身上没有对症的药品，只能建议大副暂时把这位乘客适当看管起来，到了汉口以后再去看病。然而就在这天中午，那位可怜的病人却突然摆脱了看管人员的约束，跳进了江里。船长下令紧急停船，放救生艇，把那个病人救了上来。幸运的是，这个人当时穿了中国传统的棉衣和皮袍子，浮力比较大，所以跳到江里后就一直漂在水面上，没有沉下去。船员们把病人救上来以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意外，只得用绳子暂时把他捆了起来。据我看，冬季长江冰冷的江水对歇斯底里症的疗效应该比任何药物都明显，因为等我们抵达汉口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悲剧到这儿还不算完。轮船抵达汉口后，船上的某位中国船员又伤了腿。至于这条船上随后是否还发生过别的不幸事件，我不知道，因为我当天晚上就带着行李和狗登上了“泰远(taiyuan)”号轮船，次日就重新向宜昌进发了。我听说，那家日本公司由于这次损失总共支付

了10000银元的赔偿金，不过日本政府通过保险的形式替他们堵上了这个窟窿。

“泰远”号同样隶属这家日本公司，不过它的运气明显要比上条船好得多。这次旅程，我们在途中只被江上的大雾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再没有发生其他意外。1月30日上午，我们的船来到开放历史比较短的通商口岸沙市。这时，原先那条轮船的悲剧新闻已经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完全走了样儿。码头上的海关官员甚至认真地向我询问，船上是不是至少淹死了20人!那天夜里，轮船抵达宜昌，当地流传的谣言已经将那场灾难的死亡人数提高到了30人!

【注释】

[1] hoteldes wagonlits，1905年由英国人开办，位于东交民巷，1949年后称外交部招待所，现更名为华风宾馆。

[2] 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3] sir Henry Norman，当时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写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书。

[4] 作者这里说的是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学命题，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这种制度跟古代中国的家国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5] 指中日甲午战争。

[6] 指光绪皇帝。

[7] 指慈禧太后。

[8] lu han railway，即京汉铁路，1906年4月1日通车。

[9] Shun tefu，今河北邢台市，明、清两代称顺德府。

[10] chaianti，意大利产的著名葡萄酒。

[11] Teng yueh，今云南腾冲，元明清三代称腾越州。

[12] 指日本。

[13]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14] 即张之洞的《劝学篇》，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英译本名为《中国唯

一的希望》，此处引文翻译参考本书直接引自大连出版社《张之洞劝学篇评注》p151—152。

第三章 从宜昌到万县，穿越长江三峡

长江航线—征服三峡—红船—在三峡拉纤—三峡纤夫

轮船抵达宜昌前，长江江面就已经开始逐渐变窄，而且越来越窄。宜昌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正好扼守着著名的长江三峡的东大门。从长江入海口到宜昌的距离大概在1000英里左右，这个地方是大型轮船沿长江上溯能够抵达的最远端。宜昌城位于长江左岸，它对面的江岸主要是风景如画的巍峨群山，这些山峰的高度据说可以媲美埃及的大金字塔[1]。

宜昌城面积不大，人口最多40000，其中包括30到40名西方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传教士，其次是领事馆和海关的官员，以及极少量的商人。宜昌开放为通商口岸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个地方的商业至今仍然说不上繁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算是个货船停泊、周转的港口，不是真正的商业城市。通过宜昌周转的货物最大宗的当属来自长江上游河谷中的土产鸦片。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禁烟行动风生水起，鸦片贸易受到了极大遏制。由于航道限制，来自长江上游的小型货船需要把货物卸在宜昌，然后再用大型货船运到下游的富裕省份销售。那些完成任务的小船则需要依靠纤夫的人力牵引，沿原路返回。如果足够幸运，能够避开那些险滩或激流的话，它们可以用至少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完成从宜昌到重庆的400英里航程。要是老天保佑，赶上顺风的话，它们也可以舍弃纤夫，完全依靠风帆上溯，不过航速仍旧非常慢。



长江三峡泄滩

早在1894年，宜昌至重庆、叙州[2]和遂府[3]的轮船航运就已经开通了，可是激流和险滩仍然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困难，航行的风险非常大。这其中，从宜昌到万县的200英里距离又是最危险的江段。1898年，阿绮波德·立德先生[4]曾成功指挥“李泉(lee chuen)”号轮船穿越了长江三峡，然而由于成本和风险过于巨大，使用轮船在这个江段航行仍然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这也就限制了物产丰富的四川与中国其他省份建立贸易往来，将省内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地方。法国似乎从中看到了商机，趁势提出通过沟通云南、四川两省的铁路，将来自四川的货物运到东京湾和海防等地，然后再转口销售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一旦长江河道的种种问题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解决，长江在四川货物外运方面必将获得天然的优势。在这方面，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做出了初步的探索。目前，有两艘英国炮舰长期驻扎在万县至叙州间的平静江面。每年夏天，这两条船还要沿着岷江上溯，开辟新的航道。岷江在叙州汇入长江，目前英国军舰沿着它已经可以上溯到嘉定[5]，这个地方距离上海大概1680英里。

克服了激流和险滩的问题，长江连同它的支流无疑将成为整个中

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航道，不但军舰可以沿着岷江上溯到嘉定，民用的货船也可以在全年任何时间直接开到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在岷江上游距离嘉定133英里的地方，距离上海超过1800英里。目前，西方人对



四川某处以盐井为中心形成的工业小镇

岷江水道的了解，最远点主要局限于叙州上游40英里的屏山[6]，这个地方距离太平洋海岸线大概1600英里。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文资料，即便当地的中国人，经常也会把岷江认为是一条独立的大江，而不是作为长江支流的大河。距离嘉定不到一天的路程就是著名的峨眉山。站在这座大上山，可以远眺西藏高原东部的巍峨雪山。我有理由认为，未来应该能够找到沿长江上溯，直达中国西部边境的通航水道，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航运体系。

通过英国驻当地领事福克斯先生(Mr fox)以及大清地方官员的热情帮助，我顺利搭乘一艘“红船”，带着我的斗牛犬吉姆(Jim)进入三峡，向着万县进发。“红船(red boat)”是当地人对专业救生船的通俗叫法。这些“红船”由官府出资维护，平时分散驻扎在各个危险的江段，全部由最勇敢、最高明的船员驾驶。由于激流和险滩，每年会有大量

的船只在三峡江段沉没，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如果不是“红船”存在的话，这样的损失还可能更大。“红船”采取官府出资加民间自发资助的运作模式，驻扎当地的英国海军也对他们的工作赞誉有加。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具有官方背景的项目是最值得信赖的。

我在“红船”上的房间相比西方人习惯的轮船舱室缩水了很多，好在这条船的速度还不算慢。我的房间小得像个耗子洞，前后都有舱门。温度计即便在白天也升不到45华氏度以上，夜里则很快跌到36华氏度以下。为了让自己暖和起来，我甚至上岸加入纤夫队伍，跟他们一起拉了会儿纤。由于得到事先关照，这条“红船”已经暂时免除了其他工作，专供我一人使用，不过船上好像还捎带了一名海军军官，他是前往长江上游寻找自己所属的军舰报到的。到目前为止，西方人已经对长江三峡留下了太多的描述，有些人的描写声情并茂，有些人的描写让人倒胃口，还有些人的描写平淡无奇。感兴趣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找相关的材料来读，我就不打算献丑了。关于长江三峡方面的材料，我建议读者可以读读阿绮波德·立德先生新近的大作。阅读这样的作品起码儿可以为提升长江航道的公共救生事业作出贡献。如果大家打算发发善心的话，这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还是继续讲讲我个人的经历吧。就我个人来说，这段旅行的确让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不过相比三峡的奇绝风光，我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三峡的风光只能用奇绝来形容，然而远远达不到让我震惊的程度。我觉得，三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自然伟力与人类肌肉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千百年来，那些战天斗地的人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积累出了一套与自然抗争的经验。长江两岸那些亘古耸立的巨石好像就是这段历史的永恒象征。巨石上，那些绳子磨出来的勒痕，是一代又一代纤夫曾经在这里拼搏的明证。江边小道石板上那些深深的脚窝，是过去上千年间纤夫们留下的印迹。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代依然沿着前辈的足迹往来穿梭于这个江段。为了说明



三峡纤夫

在长江三峡拉纤的难度，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通常来说，要想拉着一条普通的货船上溯，至少需要动用200名纤夫。他们拼尽全力，每天最多可以把船往上拉200码，这样的工作需要周而复始地重复若干天，只有意志最坚定的人才能胜任。

很多前辈西方旅行者都曾经介绍过三峡纤夫的艰苦生活。我认为，他们的描述不管怎样夸张，都是基本符合实际的。艰苦的生活必然带来恶化的健康状况。作为补偿，纤夫们的日常伙食标准相比普通中国人要好得多了。这些人还可以在艰苦的工作中自得其乐，让日复一日的工作变得不那么单调。就我的角度来说，与纤夫们付出的劳动相比，他们得到的那点儿报酬实在少得可怜，不过这些人的确做到了知足常乐。跟那些在阴暗的欧洲现代工厂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们比较起来，三峡纤夫的境遇无疑更加值得同情，不过如果让我在去工厂做工和在长江三峡的激流中拉纤这两种生活中作出选择的话，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那些纤夫们为伍。

我的船从宜昌走到万县总共用了11天。这次旅行时从2月2日开始的，“红船”在2月6日到了湖北、四川两省的交界地[7]。8日，我们顺

利通过风箱峡，也就是长江三峡最危险的江段。12日上午，我们看见了万县的城墙。我在这个地方给船员们支付了报酬，上岸沿陆路向成都进发。

【注释】

[1] the great pyramid of egypt，即胡佛金字塔，它是现存金字塔中最高的，因此也被称为“大金字塔”。

[2] Hsu chou，今四川省宜宾市，清代称叙州府。

[3] Sui fu，今四川省遂宁市。

[4] Mr Archibald Little，英国著名在华商人。

[5] Chia ting，今四川省乐山地区，清代这个地区被称为嘉定府。

[6] Ping shan，今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

[7] 作者游历三峡时重庆还属于四川的一部分，重庆划为直辖市后，湖北和四川两省就不存在交界了。

第四章 从万县到成都

普拉特神甫—斗牛犬吉姆—伺候大人—曲水河—顺庆府—成都—山大王—天涯石

万县可能是长江沿线景色最美的城镇之一。这座城市坐落在长江边的山坡上，距离宜昌200英里，距离海岸线1200英里。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属于通商口岸，不过英国政府已经有了在当地设立领事馆的计划。目前，万县城内居住的西方人只有几名传教士和邮政人员。万县的商业非常发达，因为这个地方是几乎所有四川商人向下游销售货物的中转站，万县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在万县受到前来中国内地传教的普拉特(Clatt)神甫的热情招待，在他家待了一天一夜。这位神职人员还热情地在当地帮我雇用了接下来旅行必需的脚夫。脚夫中有3个人负责轮流抬我乘坐的滑竿，另外3名脚夫负责挑我的行李。滑竿也是在万县当地买的，我其实很少用。除了脚夫，我还在万县找了个临时仆人，他的任务主要是照料我在前往成都路上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旅程畅通，我特意拜访了万县知县。知县按惯例派遣两三名士兵沿途护送我们一行，这是西方旅行者通常都可以享受到的待遇，不管当事人被人是否乐意接受。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西方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旅行，最好直接从这个地方雇用各种辅助人员，他们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足可以确保旅行者的安全。不过一旦离开了这些人熟悉的区域，就应该适时遣散他们，重新雇用新人。至于食物，除了偶尔接受传教士们的热情招待，我可以完全适应地道的中国饭菜，我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免去了翻译、向导之类的麻烦，虽然中国的某些方言特别难懂。



重庆府的城墙与城门



万县桥

从万县到成都的旅行大概可以划分为14个阶段，全部里程将近400英里。这条线路贯穿了整个四川最富饶的地区，道路情况可能也是中国内陆地区数一数二的。由于这样原因，很多来自东部的清廷官员前往成都出差、公干时，都会选择跟我相同的道路。这条路上的旅店很多，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来说，也算舒适。旅店的主人大多还不

习惯跟西方人打交道，不过他们对西方人也没有太多的恶感。看见我走进旅店，他们也会像招呼中国主顾那样客气地说:“伺候大人。”当地人总的来说是热情友好的，某些西方旅行者只是由于好奇心太过强烈，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目前，这条路上还很少能见到西方旅行者的身影。他们选择的路线都是带着沉重的行李走更方便的长江水路抵达重庆，然后再沿着岷江上溯。尽管如此，从万县到成都的陆路上还是陆续出现了几个西方传教士建立的教堂，当地也因为这些传教士的缘故，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比较高的知名度。

我的旅行大多是在丘陵间穿行，这些丘陵很多都被开垦成了梯田，用以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玉米等作物，收成看起来非常不错。沿途的景色可以称得起风光如画，树林和竹林中到处点缀着村庄、农场和庙宇。山坡上的稻田连成一片，给人造成一种近似英国公园里的人工湖的错觉，特别是当梯田的围墙上也长满了植物的时候。我的狗在这里似乎比我更引人瞩目，因为中国是不出产斗牛犬的。每当我们路过村庄，当地居民便纷纷赶来看热闹，嘴里还喊着:“看洋狗喽!”

有些地方的人还大呼小叫地询问同伴:“这是狗吗?”

我甚至听见有人下结论说:“这肯定是头熊!”

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那条狗长得跟熊绝对一点儿不搭界。

四川的气候比较潮湿，上午通常略显阴冷，因此自己下来走走远远要比坐在滑竿上舒服。当地农民取暖的方式令我感到非常惊奇。他们通常会在一种很小的篮子里放上一种圆形的金属容器，容器里装着燃烧的煤。这种东西跟西方女性使用的暖手筒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当地农民会把这种取暖工具直接塞进衣服里，让自己显得鼓鼓囊囊。

离开万县的第二个夜晚，我来到了名叫“梁山[1]”的小城。当地人对旅行者很热情，还特别具有幽默感。第四天晚上，我到了大竹[2]，这个地方有家特别出色的旅店。经历过长途跋涉，舒适的房间让我感觉身心愉悦。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旅店再没有出现，第五天，我在

行进途中经过了很多露天采煤场。这个地方的煤炭储量应该很大，却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开发利用。当地人只是把地表浅层的煤炭挖走，用于取暖和烧窑。第六天，我们乘小船渡过了曲水河。这条河流淌在四川东北部的群山当中，目前只通航当地人的小船，它的部分河段也被称为“白水[3]”。曲水镇[4]和广安位于这条河的沿岸，两座城市规模都差不多。这条大河在合州[5]跟嘉陵江以及其他支流会合，然后在重庆汇入长江。曲水河的水质清澈，夏季丰水期的时候水位可以达到10英尺或者更高，甚至能够漫过河堤。



大竹西部梯田

离开万县后的第八天，我抵达了富庶的顺庆府[6]。这个地方原本拥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后来却逐渐衰落了。当地目前仍旧兴旺的工业项目主要是利用红花提取天然染料，不过随着来自奥地利的化学染料进入中国，天然染料的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了。养蚕缫丝可能是当地目前硕果仅存，仍然具有良好前景的行业。大概三四年以前，这座城市曾经受过洪水侵袭，部分城墙倒塌，大街小巷都被泡进了水里。

告别顺庆府，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四拱石桥，这座桥名叫“永安桥(jung an chiao)”。过了桥，我们就进了当地人所说的西山

(hsishan)。大山的石壁上开凿了不少类似神龛、石刻和匾额的东西，这样的景象在四川省内的主要道路两侧比较常见，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少数是当地节妇烈女的传奇故事，多数则是曾经主政当地的地方官的丰功伟绩，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有趣且奇妙，值得深入研究。继续往前走了一阵儿，我发现一块平整的大石板上刻着这么几个字———屈死不告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不要为了某件事惊动官府。中国人的传统将打官司视为成本高昂而且丢面子的行为，所以他们轻易不愿意跟法官打交道。

2月25日，我离开山地，来到了一片大平原的边缘地带，这片平原就是四川省会成都的所在地。26日快天黑的时候，也就是告别万县14天以后，我们终于走进了成都城。就像大清帝国其他很多富庶之地一样，成都的贫富分化现象令人震惊。这座城市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富有的，不过当地的乞丐也是最多的。进城后，我下了滑竿，打算自己走几步，某位乞丐立刻凑了过来，自告奋勇地提议把我驮在背上走。这是他们乞讨的一种手段。还有位乞丐邀请我乘坐他的独轮车，可是那辆车的木头轱辘差不多都要散架了。种种迹象显示，成都城内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并不是很好，因为我在路上不止一次得到好心人“要当心强盗”的提醒。我当然不愿意得到被“山大王”垂青的荣幸，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来到成都城外的那天还是发生了。“山大王”总共有两个人，都带了手枪，不过据我看他们的手枪很可能没装子弹，甚至早就到了报废期。

我们正在路上走着，这两个人突然就从路边藏身的竹林里蹿了出来。他们应该已经在这个地方躲了很久，等待合适的牺牲品。关键时刻，护送我们的士兵发挥了作用。其中一个强盗明显被吓坏了，拔腿就跑。眼看自己的同伙已经跑了，剩下的强盗很快回过神来，也拔腿就跑。负责护送的士兵们追了上去。我命令滑竿停下，准备看场好戏，只可惜，预想的激烈战斗并没有发生。两名强盗身上不但带了充样子的手枪，还挂了双刀。沉重的分量压得他们跑不快，很快就被士兵们给抓了回来，扔在我前面的空地上。他们趴在地上，装出可怜的样子求饶。强盗们解释说手枪和大刀都是偶然在田野里捡的，他们正在寻找失主，也不知道枪里边有子弹。这套鬼话我肯定不会相信，只

能把他们交给当地的地方官处理。至于那位地方官会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命运。

据成都城内的传闻说，四川总督正在规划修建从万县到成都的铁路，这条铁路同样要求全部由中国自己出资、设计、施工。由于资金不足，总督打算要求省内的地方官们各自认购一定份额，然后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筹募款项。认购份额的标准主要依据地方官的级别，以及他所治理地区的贫富程度确定。地方官当然不可能自己掏这笔钱，所以压力最终还是要转移到他治下的老百姓身上。从万县到成都的路上，我注意到沿途的城镇都张贴了告示，向百姓描绘铁路未来的施工进度，铁路修成后可以带来的各种好处，本地商业将通过铁路获利，整个四川省也将变得更加富庶等内容，不仅如此，四川总督还邀请有实力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这个项目。据我看，这条铁路如果修成，首要的好处是可以绕开长江最危险的江段。当地官员和商人为对修建铁路的热心态度则充分说明中国人正在尝试改变很多过时的传统观念。



清代四川客栈



成都平原上的手推车(鸡公车)

成都距离海岸线非常遥远，不过当地人，起码是一部分人仍然相当开明，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这种情况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成都城内拥有一所省级大学，大概300名年轻男性在这里同时接受现代的西方教育和传统的中式教育。这所大学除了一名负责教授化学和物理的英国老师，还雇用了几位日本教师，即便是中国老师，差不多也都掌握一门外语。我曾听到某位老师向同事炫耀说，自己学英文已经学到字母G了。不管怎么说，他最起码儿还有学习的愿望。相比宁静的校园，成都的工厂显得更加热火朝天，其中最热闹的当属丝绸纺织工厂，当地的工厂不但直接从西方进口机器，还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

巴伯尔[7]先生针对四川、云南两省富有魅力、无可替代的描述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读过他的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巴伯尔曾提到成都城内有座人工堆砌的土山，或者说坟头可能更合适。巴伯尔并没能搞清这座土山的历史，只是含混地说它属于某位皇帝的儿子。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半圆形的土山，连同它附近一个已经被土埋了半截，近似哑铃形状的石碑，肯定是用来纪念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位王子或者帝王的。那个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的“蛮族[8]”占据成都平原

的时代。

我曾亲自到这个地方考察过，看到了巴伯尔介绍过的已经躺倒在地上的那座石碑[9]。目前能够看到的露在地表以上的部分应该只是这座石碑的冰山一角，它的一个角儿已经破损非常严重。我试着测量了石碑圆形断面的直径，因为被半埋在土里，所以只能推测它的直径差不多在17英尺左右。石碑目前露在土外边的那部分总长仅为2英尺3英寸，我们很难想象，埋在土里的部分还有多长。如果以跟石碑配套的那个土山为参照估算的话，石碑的高度肯定是惊人的。巴伯尔在他的书中声称，任何挖掘石碑的行为都将导致天昏地暗、妖魔出现，我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小心为好。

除了文物，中国浩瀚的古籍，乃至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也可以为我们追溯成都的历史提供很多蛛丝马迹。据《书画史(shu huashih，明陈继儒撰)》记载，早在公元618至905年的唐代，成都就已经成了重要的艺术中心。这本书耗费大量笔墨介绍了当时成都各个寺庙中的宗教彩绘和壁画，还罗列了挂在当地藩王宫殿里的各种名画。《书画史》提到的很多寺庙至今仍然存在，也值得专门拿出时间认真参观。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地区最值得参观的寺庙其实并不在成都的范围以内，而是在距离它不远的灌县。这座寺庙是为了纪念李冰父子而设立的，他们是成都平原至今仍在使用的伟大灌溉工程[10]的设计者。为了纪念他们，当地的老百姓修建了据说在全中国都数一数二的华丽庙宇，然而正如某位英国旅行者所说，那座至今仍在为百姓造福的水利设施或许才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

【注释】

[1] Liang shan，今重庆市梁平县。

[2] Ta chu，今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

[3] the pai shui，作者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今天距成都70公里的白水河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

[4] Chu hsien，今属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5] Ho chou，今重庆市合川区。

[6] Shun ching fu，行政区划大致包括今四川省南充、西充、仪陇、蓬安、营山、渠县、岳池、邻水、大竹等地，作者这里指的实际是今南充市。

[7] Baber，英国外交官，1866年来到北京任职，1876年至1888年先后多次以采集楠木为名，前往中国西南地区游历。

[8] 指古蜀国人，存在于商周时代，跟后来刘备的蜀国没有关系。

[9] 结合上文推断，作者说的应该是成都的天涯石。

[10] 指都江堰。

第五章 从成都到峨眉

岷江漂流—锁江塔—乐山大佛—史前洞穴—月氏人—白蜡虫

离开成都后，我的下个目标是去攀登壮美的峨眉山，这座大山是中国最具悠久历史的名山之一。3月1日，我乘坐一艘船舱很小，到处漏风，待在里头非常不舒服的小船启程出发，沿着岷江支流向下漂流4天后抵达嘉定，总行程应该超过130英里。当时，位于灌县[1]的水利设施还没到春季开闸放水的时间，所以河里的水始终非常少，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第三天早上我们抵达江口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曾多次遇到船被泥浆陷住的情况。抵达江口后，无数条小河，其中也包括把我从成都东门带到这里的那条小河，终于汇聚成了四季不缺水，可以通航大型货船的大河，这就是岷江，它被很多四川人认为是长江的真正源头。西北方向，来自西藏群山当中，水量充沛，却不适合通航的那条大河则被称为金沙江，它跟岷江在叙州汇合，从这个交汇点开始，这条河就被统称为金沙江。岷江这个名字中国人自己似乎很少知道，巴伯尔因此认为这个名字最早可能是西方传教士起的，起这个名字的依据则是岷江来源于四川省西北部岷山的积雪融水。事实上，一条河具有多个名字在中国是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传统的中国人很少到远离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他们能看见的某条河往往就是流过家门口的那一段儿，既不会关心这条河从哪儿来，也不会关心它会流到哪儿去。至于河的名字，往往也是因地制宜地起上一个。这样的情况确实给西方旅行者造成了太多的困扰。



岷江上的帆船

岷江两岸可谓风景如画。河流所过之处，基本都是富庶的平原地区，偶尔才能看见那么一两座低矮的小山。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我在彭山县[2]江对岸的位置参观了一座漂亮的12层佛塔，这座佛塔被称为“锁江塔[3]”。这座塔的后期维护状况出人意料的好，好得我仍然可以沿着塔内的楼梯爬上去，饱览周围的风光。锁江塔的塔身是砖结构的，里面的楼梯用砂岩砌成。

来到嘉定附近，江上的景色变得更漂亮了。两岸都是绿色的山峰和悬崖，还有很多人工开凿的神秘洞穴，意在向神灵表达敬意。3月4日，我们进了嘉定城。这座城市位于岷江右岸，再往下游走一点儿，就是岷江、大渡河和雅江3条大河交汇的地方。来自3条大河的河水从这个交汇点开始，再经过130英里的路程，最终在叙州汇入长江。我从成都开始的水上旅行抵达嘉定后也就告一段落了。



嘉定府的西城门



嘉定大渡河边

可能是因为距离峨眉山比较近的原因，嘉定当地的佛教寺庙也非常多，附近的山里还有不少史前人类生活过的洞穴遗迹。嘉定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首先是养蚕缫丝，其次是白蜡制作。与嘉定隔江相望的山上有座著名的佛教寺庙，名叫“凌云寺[4]”。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已经有差不多1200年的历史了，1667年曾经由四川省内的名人出资修缮过。这座寺庙通常也被老百姓称为“大佛寺(the great buddha monas-tery)”，这个名字主要来源于寺庙附近那尊直接雕刻在岷江边上的巨型佛像[5]。这座佛像的建造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高僧海通[6]来到这里修行，为了遏制当地经常泛滥的3条大河，他决心用某种方式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于是，海通花了19年时间，在江边的悬崖上开凿出这尊巨型佛像。据我看，要想完成这样的工作必然耗费巨大的精力，承担很多的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岩石质地本身的缺陷，再加上多年来植物生长的侵蚀、破坏，佛像的很多部位现在已经

变得模糊不清了。现存的佛像总高386英尺。为了详细研究大佛以及它周围的佛教雕刻，我只得冒险攀登陡峭的悬崖。顺便说下，虽然海通当年修建佛像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水患，不过从那以后，当地洪水泛滥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嘉定当地的史前人类洞穴也是个值得一看的去处，巴伯尔在他的书里最早向西方介绍了这些洞穴。我去参观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洞穴已经被改建成了僧人修行的场所，里面设置了佛堂、祭坛和钟磬，还装饰了大量佛教壁画，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嘉定附近的这些洞穴，以及四川境内的其他类似遗迹已经被统称为“四川红层盆地[7]”现象，属于中国人类学领域的一个未解之谜。滞留嘉定的两天时间里，我造访了这些洞穴中的大部分，却无法为这些洞穴的起源等问题提出更多、更新的看法。

这些洞穴明显是在松散的砂岩上直接开凿出来的，当初的开凿者应该擅长使用某些手工工具。洞穴里的那些壁画跟有意识的艺术创造肯定不沾边儿，造型上也跟现今的中国艺术没有太大关系，反倒很有几分印度味道。洞穴的入口有方有圆，全部开在悬崖上，很多地方只能借助梯子和绳索才能到达，少数洞穴相对更容易进入。有些洞穴眼下已经成了蜜蜂的家，有些则明显已经成百上千年没人走进去过了。洞穴的内部结构大同小异。进洞之后首先是个长方形的房间，这个房间又连接着若干小的房间。通过留在墙上的洞和槽判断，洞穴里最早肯定还有木质的家具。洞穴的环境可以满足人类对舒适生活的要求，当年的设计者考虑到了饮水槽，直接在墙壁上挖出来的储物柜和架子，还有石头板凳等细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当年开凿洞穴的时候一起搞出来的，全部不可移动。

现在的人已经说不清楚，开凿这些洞穴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把它们当作活人的居所，还是死人的坟墓，抑或是供奉神灵的庙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洞穴大多处于很难直接到达的峭壁悬崖，这就说明它们当初是为活人准备的。生活在里面的人平时使用绳梯进出，遇到敌人来犯的时候，就可以把绳梯收起来。这里所说的敌人可能指同时期的其他人类，也可能指大型野兽。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狭小的洞穴连同那些不可移动的石头家具

充分说明了这些洞穴的坟墓性质，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洞穴里还有取暖用的壁炉(虽然没有烟囱)，以及供活人使用的凳子之类的东西。认为这些洞穴当初是庙宇的人的主要依据就是那些处在比较容易到达位置的洞穴已经被改造成了佛教修行场所，不过这些洞穴即便现在成了庙宇也不能说明它们当初就是庙宇。我个人更倾向认为，这些洞穴当初就是活人的家。当初住在这里的人靠渔猎为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具有完善的社会结构。他们当时可能频繁受到周边其他原始部落的威胁，这才选择了如此独特的生活方式。虽然可以凭借洞穴躲避侵害，但他们的文明还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了。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1904年7月和1906年1月，克劳谢·威廉姆斯先生[8]曾在皇家亚洲学会的刊物上撰文介绍他在波斯[9]发现的古代人类穴居遗迹。我觉得克劳谢·威廉姆斯先生提到的洞穴跟四川的这些洞穴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遗憾的是，无论波斯的那些洞穴，还是四川的这些洞穴，至今都没有文献材料出土。它们之间的众多相似性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就只有留给人类学家解答了。话虽如此，如果我有证据证明那些曾经分别生活在波斯和四川洞穴里的原始人类可能都是来自古代印度的移民的话(我后来真的找到了证据，请看本书第15章)，那么这些洞穴的主人很可能就跟印度半岛的李查维王朝[10]等远古文明存在亲缘关系。这个族群原本是生活在印度半岛东北端的一支强大力量，跟历史上的月氏(yueh chi)文明具有很多相似性。公元前2世纪左右，月氏人被匈奴打败，被迫整体迁徙到了西亚地区，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到过波斯。迁徙后的月氏人来到乌浒河[11]左岸定居，在原先粟特人[12]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国家，很快变得强盛起来，进而开始向南面而不是西面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家未来还将在波斯和中国发现更多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洞穴，进而向我们解释这些洞穴主人的更多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古伯察神父[13]发现的位于蒙古戈壁边缘的那些洞穴，通往拉萨的道路上靠近羊卓雍措湖边的那些洞穴，地处穆尔加布(m u r g h a b)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那些洞穴，以及巴米扬(bamian)附近的那些洞穴都跟四川的这些洞穴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只不过那些洞穴的主要功能都是宗教性质的。据帕克教授[14]教授的研究，早在公元7到10世纪的唐代文献中就曾提到过四川当地生活着一个穴居族群。公元1012年，还有文献介绍了四川当地另一些穴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部落首领。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两种穴居人间存在着血缘关系。

中国本土学者认为，这些洞穴最早是史前时代生活在四川的蛮族居住的，然而“蛮族”这个词在汉语中实在具有太多的意义指向，可以泛指当时生活在中国中原地区以外的很多少数民族，本身是非常模糊的。有鉴于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只能期待研究的继续深入，以及相关文献的陆续被发现。在此之前，对于这个问题最保险的结论恐怕只能如巴伯尔所说的那样:

> 我个人认为，这些洞穴开凿于未知的年代，后来又因为完全未知的原因被它们身份未知的主人给放弃了。

3月6日，我动身前往峨眉山。峨眉山的山脚下有座小城，从嘉定到这里的距离只有16英里，走一天就能到达。这次，我的队伍仍然包括三名轮流抬滑竿的脚夫，三名挑行李的脚夫，以及一个从成都雇来的，什么也不会干的临时仆人。我已经拿定主意，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手，就立马儿打发他回家。过了横跨雅江的大桥后，一块大平原展现在眼前。这块平原上到处种满了数不清的梣树，它们是生产白蜡用的原料。每年，农民们会从大渡河以南的金川[15]河谷捕捉成篮成篮的白蜡虫，然后把它们放在属于自己的梣树上。小虫子们工作一段时间，树的枝叶上就会覆盖一层厚厚的蜡质。农民们把这些枝叶砍下来，小心地收集上面的蜡质。谢立山爵士[16]在他的《中国西部的三年(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以及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几份报告中详细介绍过中国的传统制蜡工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乐山的船屋

峨眉山当地旅馆的条件出人意料的好。由于每年大批香客前来朝觐的旺季还没到，我可以任意挑选最好的旅馆、最好的房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即便最好的中国旅馆也不一定能够满足西方旅行者的需要，所以这方面只能尽可能入乡随俗。通常来说，中国旅馆的客房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墙壁大多是用砖头或石块砌起来的，有时候会在上面刷层灰浆，有时候灰浆也不刷。个别旅店的老板还会在客房的墙上挂点儿对联、年画之类的东西，这就算是比较艺术的装饰了。北方中国人睡觉讲究睡砖头砌的炕，生活在更温暖地区的南方中国人则习惯睡木板和架子支起来的床。为了保证自己的睡眠舒适，西方旅行者起码应该准备一张行军床。相对来说，大城镇的旅馆肯定要比乡村旅馆条件好些，不过也只是好些而已。旅行途中，我其实更愿意在乡村过夜，因为中国的乡村入夜后基本万籁俱寂，很少再有什么噪音干扰休息。

峨眉山的老百姓对外来者不是一般的热情、友好，若干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接待来自各地的香客，很多人甚至完全以此为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吸引客源。通常来说，中国人

是不会在每年1月到3月这个时间段来峨眉山进香的，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峨眉山上会出现大范围积雪，很多地方根本无法通行。据我观察，不受积雪影响的似乎只有来自西藏的香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积雪的山地环境。3月7日一大早儿，我把那个讨厌的仆人留下看守行李，开始由两名驻扎当地的清军士兵护送攀登峨眉山。峨眉山脚下的那个小城的海拔本身已经有1500英尺，峨眉山峰顶的海拔则在9500英尺左右。

【注释】

[1] 今四川省都江堰市。

[2] Peng shan hsien，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3] the so chiang ta，即回澜塔，位于邛崃市南郊1. 5公里，建于清代。

[4] 原文为 the monastery of the voice of the waters，参考上下文内容，应指凌云寺，始建于初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乐山当地俗称为大佛寺。

[5] 即乐山大佛。

[6] Haitung，原籍唐代黔中道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人。

[7] the red basin of ssuchuan，红层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领域主要指中生代以来即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新生代古近系的湖相、河流相、河湖交替相或是山麓洪积相等陆相碎屑岩，这样的沉积层颜色大多是红的，故名。

[8] Mr Crawshay Wiliams，具体身份不详。

[9] 今伊朗。

[10] licchavis，东南亚古代民族，曾在今天的尼泊尔建立了李维查王朝。

[11] oxus，今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的冰川，汉代称其为妫水，唐代称乌浒河。

[12] gracobactrian sogdiana，粟特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西域古国，大概位置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

[13] Abbe Huc，法国遣使会传教士， 1839年来华。1843年5月25日从西湾子出发，游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著有《鞑靼西藏旅行记》。

[14] professor Parker，具体身份不详。

[15] the chien chang，应指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县等地。

[16] sir Alexander Hosie，先后任英国驻中国温州、天津等地领事，游历过中国各地。

第六章 峨眉山和中国佛教

天真皇人—蒲公追鹿—会飞的大钟—千岁和尚—普贤菩萨—达摩祖师—两种佛教—孝的信仰

峨眉山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神秘色彩。这座大山的历史非常悠久，悠久得传说跟史实都纠缠到了一起，分不清彼此。世界上可能没有哪座大山像峨眉山这样饱含浪漫色彩，可能也没有哪座大山能像峨眉山成为众多故事的主角儿。多数被香客们口口相传的所谓峨眉山“神迹”，比如奇怪的景象或声音等，最终都可以获得科学的解释，而且往往跟常年笼罩着峨眉山的大雾有关。由于常年大雾，峨眉山主峰很少有能见到太阳的时候，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峨眉山的神秘色彩其实也正归功于常年不散的大雾。要是没有大雾，这座名山的神秘色彩恐怕就要打个很大的折扣，那些虔诚的香客也就没法告诉别人说，自己在雾境中攀爬神山时，曾经得到过来自神的召唤;要是没有大雾，山上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恐怕就要丧失很多灵性，变成单纯的人工建筑;要是没有大雾，那些原本出自无心的鸟鸣、兽啼也就不会被演绎为神奇的怪声;要是没有大雾，香客们也就没机会昏头昏脑地走到悬崖边上，然后又好像受到神启般的突然悬崖勒马。

种种迹象显示，最早将峨眉山奉为神山的并非佛教徒，而是当地的彝族人。彝族人为峨眉山制定了最初的祭祀制度，而且还要定期在峨眉山的山坡上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中国人与峨眉山有关的最早传说是以伏羲和女娲为主角儿的，这个传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世纪。同样根据传说，各种各样的神灵都在峨眉山拥有自己的洞府，只不过凡人的眼睛根本看不见他们。峨眉上上最著名的神仙被称为“天真皇人(tien chen huang jen)”，他定居峨眉山的历史非常久远，甚至还曾在这座山上接待过生活于公元前26世纪的中国古代著名君主黄帝。

世界各地的皇帝、国王当中很少有能活过百岁的长寿之人，然而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却是他们不变的梦想，黄帝当然也不能免俗。为了追求长生，皇帝特地来到峨眉山拜访天真皇人，双方因此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对话。对话过程中，天真皇人给了黄帝不少有益的建议，却对长生这个主要话题避而不谈。天真皇人无疑是知道长生不老的秘诀的，因为他自己当时至少就有1000岁甚至2000岁了，只不过他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秘密。天真皇人的年纪实在太大，为了避免搞错时间，人世间即使没经历一次改朝换代，他也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名字。

就像中国的其他许多神山一样，峨眉山蕴藏着丰富的草药资源，不过当地修行的僧人们却从没动过把它们收集起来卖钱的念头儿。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草药，天真皇人才活到了那么大的岁数，可是如果神仙们长生不老的秘密真的是这些草药的话，那么这个秘密也就算不上什么秘密了。以峨眉山为舞台的很多故事都涉及长生不老的内容，比如千岁宝掌和尚[1]的故事。这位僧人的故事是有史料可查的，据史料记载，宝掌和尚生于周威烈王(wei lieh wang of the chou dynasty)二十一年，死于唐高宗(kao tsung of the tang dynasty)八年，总共活了1021岁。这位和尚原本是印度人，却在公元265年至419年的晋代(the chin dy-nasty)来到中国峨眉山朝觐普贤菩萨的道场，并在这座山上度过了余生。也有史料记载，宝掌和尚来峨眉山的时间可能还要在秦代以前，因为目前已知的所有以峨眉山为背景的神话最终都能跟宝掌和尚扯上关系，包括汉明帝(ming ti of the han dynasty)的传说在内。

峨眉山跟佛教和普贤菩萨结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在位的汉明帝统治时期。当时，一位姓蒲的官员奉皇帝的命令来峨眉山寻找草药[2]。大雾中，他突然看到了神鹿留下的脚印。这些脚印看起来跟普通鹿的脚印不一样，就跟莲花差不多。受到神迹启示，蒲姓官员决定跟着神鹿上山。最后，他来到了峨眉山的顶峰，发现神鹿正站在那里，紧挨着悬崖峭壁的边缘。蒲姓官员凑过去眺望，看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奇异景象。萦绕在峨眉山主峰周围的云气突然幻化出各种色彩，变得光芒四射。蒲姓官员看得入了迷，徘徊着不愿离

开，然后就遇见了宝掌和尚。宝掌和尚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告诉他说:“你实在是有福气!这是普贤菩萨在向你显灵。你应该顺应菩萨的启示，努力促成这座神山成为菩萨的道场。菩萨把着这个重任交给你，这是你的幸运。”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蒲姓官员在他得到神启的地方修建了峨眉山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专门用于供奉普贤菩萨，今天峨眉山著名的祖殿(the hsien tsu tien)和金顶[3]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蒲姓官员修建普光殿(pu kuang tien)的地点。

上面这则传说将峨眉山与中国佛教的起源紧密联系了起来。很多西方读者应该知道，同样是在汉明帝执政时期，由于皇帝在睡梦中梦见了金色的神人，佛教这才从印度被引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汉明帝梦见的神人是金色发光的，蒲姓官员在峨眉山遇到的神启也是金色发光的。可能就是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发生的峨眉山顶峰的自然现象才被赋予了超级神圣的内涵。

峨眉山的神奇之处还有很多，篇幅所限，这里来不及详细列举，只能大致说说。峨眉山山脚下有个巨大石盆。据说，当年的香客上山前都要在这里净身沐浴。峨眉山上有一处池塘，池塘里荷花的神奇之处在于一年四季都可盛开。荷花在佛教文化中本身就被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如此奇特的习性让峨眉山荷花身上的神话色彩又加深了一层。峨眉山上据说还有一口会飞的大钟，人们在山上不同的地方都听到过这口钟的鸣响，可是这口钟本身却从没移动过位置。峨眉山拥有包括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内的众多帝王、名人留下的石刻、题记。距离峨眉山上历史第二悠久的万年寺(wan nien monastery)不远的地方有股名叫“黑水(the black water)”的小溪。唐代的时候，某位游方僧人来到峨眉山，打算留在当地建寺修行。他看中了小溪对岸的一块地方，打算涉水过去详细察看，可是小溪的流水实在太急，和尚怎么也过不去。突然，急流中出现了一只老虎。老虎看看僧人，认定他是个有修行的和尚，于是就驯顺地趴在地上，让僧人骑到背上，把他驮过了河。僧人和那只老虎如今当然都已经看不见了，不过后来的人却在故事发生的地方修了座桥以示纪念，这座桥就被称为“虎桥(the tiger bridge)”。峨眉山上还有块中间裂了道缝儿的巨石。据说，这块石头里原来困了条龙，困了很多很多年。有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石头

被闪电劈开，被困住的龙一飞冲天。现而今，龙当然已经看不见了，不过那块石头还留在那里，每个来峨眉山的人都得摸摸它。

峨眉山上数不清的山洞是无穷无尽的故事来源。有个山洞据说住着9个妖怪，几位有道行的僧人当算进去探险。他们小心翼翼地朝着洞里走了一段儿，什么也没发生，于是就又朝前走了一小段儿，洞里突然冲出一只喷火的老鼠。僧人们转身就跑，从此再没敢进过这个洞。峨眉山上另一个山洞被称为“雷穴”，这个洞里住了条恶龙，它平时就待在山洞深处的水潭里。这个山洞连同水潭的历史应该已经非常遥远了，因为山洞里的很多痕迹可以跟史前的人类动物崇拜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痕迹在峨眉山上并不少见。每年，人们都要定时为那条据说住在山洞里的恶龙举行祭祀仪式，向它敬献华丽的丝绸作为贡品。赶上天旱少雨的时候，还要举行额外的祭祀仪式。如果祭祀仪式举行后还不下雨，作为惩罚措施，人们就要向洞中投掷死猪之类的脏东西。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适当的侮辱可以刺激恶龙发怒，气得它从自己的藏身之地冲出来，不断发出嚎叫。龙的嚎叫随即化身为天空中的雷鸣，雨也就落下来了。



峨眉金顶

峨眉山拥有很多著名的古树[4]。公元1101年至1125年的宋徽宗时期，某棵树龄高达1112年的古树被猛烈的暴风雨摧毁。人们在裂开的树干里发现了个活着的僧人，他当时正处于打坐入定的状态。僧人肯定已经坐了很久，他的头发和胡子长得都连成了片，指甲长得打了卷儿。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下令把僧人送到京城。奉命迎接僧人的使臣好不容易才把他从藏身的树干里劝了出来。使臣询问僧人的来历，僧人回答说:“我是修行的和尚，来自东林寺[5]的远法师[6]座下，名字叫‘慧持(huichih)’。我当年来峨眉山拜佛，于是就在这棵树的树干里打坐入定。我的方丈远法师他现在还好吗?”使臣回答说:“你的方丈是晋朝(the chin dynasty)人，700多年前就死了。”僧人听了他的话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到树干里继续打坐。

峨眉山当地还流传过一个情节大同小异的故事。大概是在公元14世纪，某位僧人决定到一棵树干已经朽坏的古树里打坐修行。从那以后，僧人就一直坐在树干里，坐到将近80高龄。僧人的苦行必定感动

了上天，因为那棵树的外貌突然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已经接近干枯的枝干重新抽出了新枝，树叶再次变得郁郁葱葱，朽坏的树干上的伤口逐渐愈合，把僧人包在了里面。僧人和古树由此变成了一体，再没有什么能够干扰他的修行。

据民间传说，佛祖也曾来过峨眉山游历，他的脚印至今还留在距离山顶不远的石头上，虽然那些痕迹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时至今日，峨眉山的某座寺庙据说仍然保留着源自佛祖本人的佛牙舍利。这座大山在佛教徒心中的地位因此绝不低于楞伽山[7]和康提[8]。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目前很多东方国家都拥有佛祖的脚印遗迹或佛牙舍利，中国和锡兰[9]只是其中的两个国家。

前面已经提到，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按佛教的说法，普贤菩萨把佛祖所赐的佛经驮在大象背上带到了中国，分藏在峨眉山各处。这样的说法当然也只能当传说听听而已，因为普贤菩萨本身就是位被大乘佛教虚构出来的人物。这位菩萨的原型应该是印度原始佛教里的三曼多跋陀罗[10]，中国的佛教经典《华严经(hua yen ching)》在他的基础上通过本土化的处理，最终塑造出了普贤菩萨的形象。峨眉山上的僧人们通常喜欢供奉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形象，这是因为在大乘佛教经文最原始的叙述中，比如《妙法莲华经(saddharma pundarika)》的叙述中，三曼多跋陀罗的形象就是经常跟大象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妙法莲华经》的描写，普贤菩萨骑乘长着6对长牙的大象，负责保护那些真心皈依的僧人不受邪恶力量侵袭。峨眉山的僧人则声称，普贤菩萨当年就是乘坐大象来到峨眉山的。来到这里后，他在山上修建寺庙，向中国僧人传播佛法，吸引了大批信徒。

显而易见，无论印度僧人，还是峨眉山上的僧人，全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普贤菩萨的形象作了加工、改造。类似的情况在佛教文化中还有很多，比如文殊菩萨等，只不过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人们往往容易忘掉曾经的加工、改造过程，进而把加工、改造的结果当成了事实。更有意思的是，某些佛教经典甚至认为普贤菩萨是佛祖的大儿子:

> 佛祖端坐千瓣莲花之上。每个莲花花瓣包含有3000个宇宙，每个宇宙里都有一位佛祖在宣讲佛法，每位佛祖都有个名叫普贤菩萨的长子。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为了在佛祖和普贤菩萨间建立实际的血缘关系，而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精神传承。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三曼多跋陀罗，也就是普贤菩萨，是最有法力的五位佛祖之一毗卢遮那佛[11]精神上的儿子。至于大象，在印度佛教中，这种动物除了被人物跟佛祖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存在神圣的象征关系外，还被认为是遵守戒律、克制自我的象征。

峨眉山上最早的佛教建筑的出现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渴望与世隔绝的苦行者。宗教热情驱使他们退到森林和河谷深处，从而躲开尘世的喧哗。时间流逝，更加华丽的庙宇取代了苦行者的小屋，它们敞开大门，欢迎那些渴望精神上的解脱，追求长生不老，乃至因为种种挫折灰心厌世的人。中国佛教学说的普及可以追溯到达摩祖师(bodhidarma)传播佛法的时代，他是印度佛教的第二十八代祖师，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在公元6世纪早期来到中国。他主张放弃对佛教经典和戒律的刻板演习，认为真正的修行只能在静坐沉思中通过顿悟完成。通过静坐沉思，修行者最终可以意识到四大皆空的世界本质，走向对绝对真理的体认。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达摩祖师自己曾静坐面壁沉思了整整9年。他的主张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连那些喜欢静坐沉思的雅典学派，以及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12]身上似乎也可以找到跟达摩祖师的相通之处。

中国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者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中国佛教在自身的演化过程中摒弃了很多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过分虚幻的东西，同时又吸收了很多儒教、道教，乃至民间迷信的因素让自己显得更加具有中国特质。相比西方基督教，中国佛教的门槛比较低，松散、宽容得有些过分，很多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声称自己是佛教信徒，真正严格遵守戒律修行的僧人始终处于少数，这无疑带来了很多问题。佛教向世人传播灵魂转世的观念，因果报应学说声称人必将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即便这辈子不用负，下辈子也得负责。某个人的肉体可以死亡，精神却永不寂灭，而是要经历轮回，转移到新的肉体当中。每个人这辈子的运气取决于上辈子积累的因果，这辈子积累的因果又会在下辈子得到体现，周而复始，报应循环。这无疑对端正人们的言行起到了积极作用。普通人信仰佛教

是为了追求一个好的因果，真正的佛教僧侣皈依佛教则是为了彻底摆脱轮回转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前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极乐世界，修成正果。



清代伽蓝殿

佛教的终极信仰是空，然而如果真的四大皆空的话，那么推动因果轮回的最初原动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佛教无法对此作出解释，所以只好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或者干脆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说因果循环一旦开始，就永远不会停止，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制造因，同时又在不断地承受由此而来的果。摆脱因果轮回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涅槃的方式彻底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具体的方法被佛教僧侣称为“八圣道分”。涅槃是佛教中相当古老的概念，可一般的佛教信徒对它却视而不见。涅槃并非意味着处于完美的精神天堂，也不意味着占有绝对的真理，当然更不是死亡的同义词，涅槃的实际意思是说某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焦灼状态中摆脱出来，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安宁状态。进入涅槃即意味着生命免除了轮回的苦难，不再有痛苦和悲伤。

佛教僧侣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连同我们自己，全部都是虚幻的。柏拉图认为存在一个绝对完美的理性世界，现实世界则是这个理性世界不完美的镜像反射。佛教僧侣则相信人对于自我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都是一种虚幻的执着，只有破除这种执着，人才能够摆脱尘世的束缚，所以涅槃也可以被认为是破除执着后的顿悟状态，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就是佛。值得注意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从未宣称过自己是永生不死的神，他的信徒只是尊奉佛祖为觉悟的人和老师，普通人通过修行也可以成为佛。人不能指望佛来拯救自己，只能依靠自己拯救自己。佛祖释迦牟尼本人在临近涅槃时，也曾说过内容相似的话。

事实上，中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佛教，一种是普通人信仰的佛教，一种是寺庙里的僧侣们所信仰的佛教。对后者来说，精通教义、遵守戒律是必须的前提。尘世中的人相信灵魂转世，真正的佛教信徒却不会把追求成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所谓涅槃就是要破除所有的执着，包括对信仰本身的执着。在佛教文化中，佛是具有不同等级的，有些佛实际已经被演绎成了永生的神。菩萨是比佛次一等级的存在，他们还需要经受更多的修行才能成佛。所有菩萨当中最著名的当属观音菩萨，他(她)被视为大慈大悲的人类拯救者。

普通人信仰佛教不是为了成佛，当然也不是为了涅槃，而是为了投生西方极乐世界。投生这个世界便意味着长生不老和永久的幸福。他们不必像真正的僧侣那样研读佛经、遵守戒律，甚至连佛祖的身世也不清楚，只要知道观音菩萨，嘴里能念“阿弥陀佛”，能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可以了。如此种种使得中国汉地的佛教与原始的印度佛教和流传于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具有了明显的区别。普通人信仰的佛教实际是将佛教的修行和戒律要求降低到了最小的限度，信徒只需要学会念诵佛号，向佛和菩萨祈祷也就行了。某本宣传佛教的小册子这样告诫信众:

> 那些无缘降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只能通过后天的积累善行往生净土。信徒无论男女，均应在心中牢记佛祖的形象。弥留之际，佛祖就将率领众位菩萨、罗汉来到死者面前，带着他前往净土，永远生活在那里。为了往生净土，我建议所有信徒无论男女，均应抓住所有机会向佛祖祈

祷。

普通人信仰的佛教宣称神佛无处不在，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高呼观音菩萨的法号，无论身在何地，都能及时获得拯救。某些小册子甚至告诉信徒说，临刑时的犯人只要高呼观音菩萨法号，行刑的屠刀在碰到他脖子的瞬间也会变成碎片，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样的佛教跟寺庙中的佛教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在指责普通人信仰的佛教过分宽泛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宗教从释迦牟尼时代开始，就始终是不断变化的。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必要的牺牲和让步也是值得的。接下来的这章中，我将通过进一步介绍峨眉山的风土人情，帮助那些从没来过中国的西方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佛教在这个国家现状。类似我这样过分热心探讨某些宗教话题，似乎有悖于此类游记的传统，不过还是值得的。

平心而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东方民族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要比我们西方人宽容得多。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即便来自“洋鬼子”的基督教也可以跟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只有当那些传教士们过分热心地干涉当地居民的生活，试图动摇他们的文化根基时，才会引发强烈的反抗。只要不超越这个底线，任何传教士都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自在地生活、传教。

中国人在所有这些宗教以外，还拥有一种最基本的宗教，那就是孝。所谓“孝”，大致可以理解为对祖先的崇拜。孝是维系中国人生存的纽带，促使他们遵纪守法、珍爱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孝的信仰在中国扮演着与基督教在西方相似的角色，它是中国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石。任何与这块基石相违背的信仰都不可能获得中国人的真正接受。

【注释】

[1] Pao chang，印度人。史称宝掌千岁和尚，魏晋间东游中土，入蜀地参礼普贤菩萨，留在当地修行，寿活千岁。

[2] 作者这里讲的是蒲公追鹿的典故，但是庄士敦的叙述跟民间传说的通行版本有出入。

[3] the chin tien，也称华藏寺。

[4] 下面这个故事出自南宋释普济撰《五灯会元》。

[5] tunglin，在庐山。

[6] yuan fa shih，指东晋高僧慧远。

[7] adam's peak，位于斯里兰卡，佛教圣山。

[8] Kandy，斯里兰卡中部城市，佛教圣地。

[9] Ceylon，今斯里兰卡。

[10] samanta bhadra ofindian buddhism，普贤菩萨在梵文里的读音。

[11] clestialvairocana，释迦牟尼佛的别称。

[12] Thomas Aquinas，意大利人，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代表作《神学大全》，号称“神学之王”，死后入圣。

第七章 峨眉山

峨眉山的纸币—青铜大象—红眼睛的鸭子—莲花—六字真言—张良塑像—肉身不朽—佛光和佛灯

由于气候潮湿，再加上经常爆发山火，峨眉山那些脆弱的木质建筑其实很难保存得特别长久。比较而言，寺庙又是所有建筑中最为脆弱的，因为它们的结构大量使用了木材。不同于暹罗[1]、缅甸等地采用柚木材料，精雕细刻、金碧辉煌的庙宇，中国的佛教寺庙显得更加朴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寺庙大门的正上方，殿宇屋檐的下面通常会悬挂很多木质的牌匾，它们主要用于书写寺庙的名字以及各种佛教的格言警句。佛殿供桌上的供品大多来自虔诚的香客，佛像的定期修缮、装饰则需要僧人们外出募集相应的资金。相比外部建筑，峨眉山寺庙佛殿里数量众多的佛像更容易给人带来震惊的感觉。寺庙里的佛殿采取纵深排列的方式，每个佛殿之间还会有个庭院将它们互相隔开，寺庙的规模越大，佛殿的数量相应也就越多。除了供奉佛像的大殿，每个寺庙也有专门供僧人、香客居住的生活区。为了管理银钱等世俗事务，寺庙往往设有专门的负责机构。这个机构的办公室通常设在寺庙第一座大殿左边的小房间里，与这个小房间相对称，位于大殿右边的那个小房间则是这座大殿维护人员平时值班的地方。负责维护这座大殿的僧人们多数时间都待在这里，围着炭盆打坐，忍受着寒冷的天气，同时还要小心留意是不是有香客从大门进来了。一旦有香客光临，僧人们就要赶紧出去接待。

前来峨眉山朝觐的香客通常都要自备食物，汉族人带大米，藏族人带糌粑。只有那些地位特别高的香客才有资格得到寺庙的额外关照，被邀请到特定的房间里喝茶，吃点心，靠着炭盆烤火。中国佛教强调吃素不杀生，这样的戒律在峨眉山上得到了僧人和香客们的共同

遵守，只有西方人才显得满不在乎。中国人的习俗，进寺庙烧香拜佛肯定是要拿出相应的布施的。这笔钱数量通常不会很大，也就是几个铜板，香客可以把它们放在专门的托盘里，或者直接放在自己参拜过的佛像前面的桌子上。那些布施超过一两白银(大概相当于3先令)的人才有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功德簿上，作为自己曾经来过峨眉山的见证。

为了减少香客携带银钱上山的辛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银钱外露惹来麻烦，香客们抵达峨眉山脚下的小城的当天晚上，专业的经纪人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跟他们兑换专门的纸币。这些纸币的面额从白银10两到铜钱100文(大概相当于2便士)不等，采用雕版印刷工艺。有时，由于香客提供的金额无法跟现成的纸币面值相匹配，经纪人还需要用手写的方式修改纸币的面值。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安全，香客们通常都会尽可能地把身上的银钱换成这种纸币，它们在峨眉山的范围以内可以跟银钱一样自由流通，既可以用于购买东西，也可以用于给寺庙布施。寺庙手里的纸币积累到一定数额，就可以派人下山找到发行纸币的经纪人。经纪人确定纸币真伪无误后，可以直接把银钱兑换给僧人，也可以替僧人把这笔钱开户存在他开设的私人银行里。

峨眉山上的寺庙有大有小，大的寺庙可以拥有上百名僧人和辅助人员，小的寺庙也就三四名僧人。如果寺庙不幸遭遇火灾被烧毁，僧人们可以转移到邻近的寺庙借宿，同时向各地派出募化人员，为重修寺庙筹集资金。这些募化人员最远可以走到东部沿海地区。寺庙在原址得到重修后，有时连名字都会改成新的。最让西方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人对修建寺庙普遍保持着高度热情，即便平时不怎么信佛的人，也愿意为这种事慷慨解囊。



清代僧人

从山脚下的小城前往峨眉山的路上，我路过了保宁(pao ning)寺，随后又参观了白龙寺(pai lung ssu)和金龙寺(chin lung ssu)，当晚在万年寺(wan nien ssu)住宿。住宿前，我着重游览了附近供奉普贤菩萨的白水寺(the white water monastery)。这座寺庙里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被巴伯尔首次发现，起码儿是首次在专著里提到的跟实物一样大的青铜大象。用于保护这只青铜大象的螺旋顶砖石建筑，据巴伯尔说，最晚也应该是在公元6世纪由来自印度的僧人修建的。这座建筑的主要问题是太小，待在里面无法看见青铜大象的全貌，也找不到适合拍摄的角度。巴伯尔认为，这座建筑可能是除了长城以外，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古代建筑了。与此同时，他还断言说那尊青铜大象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它的历史至少在15个世纪左右。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有充足的理由提出质疑。

前面说过，传说中的普贤菩萨是乘坐大象来到峨眉山的，所以那尊青铜大象的身上还有个稍小些的普贤菩萨青铜像。在年代相对较近的万年寺，我还看到了刚刚从缅甸的曼德勒和仰光游历归来的僧人带回来的小型石膏佛像。这位前往缅甸游历的僧人还凭借记忆画了张以仰光的瑞德宫塔[2]为题的宗教画，这张画被万年寺的僧人视为无比珍贵的艺术品。就在这座寺庙名为“海会堂(hai hui tang)”的大殿里，还供奉着佛祖的牙齿舍利，不过据当地僧人说，那其实是大象的臼齿。

万年寺的海拔只有3500英尺，要想爬到11000英尺的峨眉山主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就在告别万年寺后的当天晚上，我平安爬上了山顶，冰雪造成的困难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是在温暖、干燥的季节，健康人爬上峨眉山最多也就需要1天时间，不过太快的速度可能反倒会影响他欣赏沿途的景色。峨眉山的树木非常茂密，只有当山路延伸到悬崖边缘或者陡坡上的时候，才有机会饱览开阔的山景。我在路上看到了雪松、橡树、红松、柏树、桂树、白桦树、栗子树、云杉、楠木、枫树、喜树，还有各种正在开花的小型植物。峨眉山的植物分布依照海拔高度变化，高高的山顶上只生长矮化的竹子、杜松、杜鹃，某些自然条件特别好的地方才能生长雪松、枫香树、紫衫、柳树以及小灌木丛。至于桤木、白蜡树、榕树之类的植物，则只能生长在平原或低海拔的山坡。榕树是峨眉山周围平原上一种非常雄伟壮观的树，树干周长有时可以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还没走到万年寺的时候，我就觉得春天走了，冬天又回来了。爬到海拔4000英尺以后，山路上开始积雪。再往上爬2000英尺，路根本就看不见了。树枝上满是冰挂，小和尚们穿着冬季的棉袍，清扫各自寺庙门口的积雪。我随身携带的温度计显示当时峨眉山山脚下的温度为64华氏度。到了万年寺，温度降到49华氏度。山顶上的温度即便白天日出后，最多也不超过13华氏度。



峨眉山万年寺

离开万年寺，我来到了观心顶(kuan hsin ting)。这是个很破的小庙，里面平时只有个9岁的孩子负责照料。观心顶的后面是息心所(hsihsin so)，这个名字字面的意思是让心得到宁静的场所，不过它的主要功能还是供来往的香客歇脚。峨眉山当地文献对息心所的解释是说，香客一旦走到这里，就再也听不到尘世的喧嚣，内心随之平静下来。息心所内部供奉着弥勒佛的佛像。弥勒佛是未来的佛，平时居住

在兜率天，等待着道成肉身的时刻。

过了长老坪寺就是开山初殿(the chu tien)，也即是所谓的祖殿(the tsu tien)。传说，这个所谓的“祖”的化身是一只红眼睛的鸭子，他在峨眉山上的象征则是距离开山初殿不远处的鸭子形巨石[3]。开山初殿拥有造型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塑像，这座寺庙还保存着年代非常悠久的佛教文献。山上各个寺庙最精通佛法的僧人通常都会被方丈派到这个地方来，完成最后的学习。正如上章所说，修成正果是很多佛教信徒的终身追求。修成正果，意味着人可以摆脱妄想、无知、悲伤的状态，获得终极的宁静。修成正果的人离成佛只差最后一步，却不愿迈出这一步，因为保持这样的状态可以让他继续生活在人群当中，拯救、帮助其他人，这样的人就被称为罗汉。中国佛教中认定的罗汉数目是变化的，比较常见的数字包括1200、500、18和16。1200罗汉的说法，据我所知，只存在于典籍当中，多数中国寺庙塑造罗汉像的数目最多不超过500，例如广州就有所谓的五百罗汉堂。某位爱开玩笑的西方人曾经声称其中的某尊罗汉像跟马可·波罗存在相似之处，所以那以后的很多年，广州当地的向导总是喜欢把西方人带到这个地方，开玩笑地告诉他们说马可·波罗已经成了中国的神。这个错误的可笑之处在于，那些罗汉们的传说大多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远远早于马可·波罗来中国的年代。就像中国其他地方的寺庙一样，峨眉山寺庙中的罗汉像只有18座，只不过不同寺庙的僧人对罗汉们身世和功能的解释会有所区别。与中国寺庙不同，日本和韩国的僧人们供奉的罗汉像永远只有16座。中国西藏地区的喇嘛庙则可能同时出现十六罗汉和十八罗汉并存的情况。由此可见，18位罗汉当中应该有两位是在较近的年代新加进去的。

离开开山初殿再往上走，就到了华严顶(hua yen ting)。前面已经说过，《华严经》是佛教的著名经典。这座寺庙里的罗汉塑像有18尊，另外还有佛祖释迦牟尼，以及普贤和文殊两位菩萨的塑像。这三个主要塑像的背后，还有座小型的观音菩萨像[4]。出了这座寺庙，山路朝着山下的方向延伸了一小段儿，然后又重新指向山顶。我们很快来到了著名的寺庙莲花石(lien hua shih)，这座寺庙因为拥有一块形似莲花的神圣巨石而得名。我注意到，有些来自西藏的香客往这块巨

石上投了铜钱，铜钱随后被僧人们收集起来，作为留给寺庙的布施。据僧人们说，这块巨石最早是凭借神力从深水里打捞上来的，它可以像真的莲花一样漂浮在水面上。

正如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那样，莲花在佛教中具有非常神圣的象征意义。狂热的佛学问题专家艾特尔[5]曾这样描述过莲花在佛教中的意义:

> 佛教与莲花的渊源非常具有诗意性，是人类充分调动想象力的结果。莲花平时躲在水下悄悄萌发、生长，直到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水面以上，展开叶子，绽放花朵，结出莲子。莲花色彩丰富，造型优美。佛教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最初是一片混沌。这片混沌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爆发，便演化成了今天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这个过程就跟莲花的萌发、出水一样。 这样的说法恐怕并非纯粹的凭空想象，值得达尔文认真思考。

进入某座寺庙后，人们总能轻易发现大量具有宗教意味的莲花造型，这种造型也很容易跟峨眉山的主人普贤菩萨联系起来，因为几乎所有佛和菩萨都是站或坐在莲台上的。只不过普贤菩萨是骑着大象站在莲台上面的。至于那块类似莲花的神圣巨石，我个人觉得，它跟莲花或者别的什么植物基本没有相似之处。这块石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表面被长年累月的香客摸得油亮、油亮的。除了所谓莲花形的巨石，这座寺庙还拥有另一块具有神圣色彩的大石头。这块石头是椭圆形的，大概有几吨沉，若干年前因为雪崩自己从山上滚落到寺庙大殿的后面。僧人们觉得这块石头肯定具有某种神力，再加上把它弄走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就让它一直留在了那里。我注意到石头上挂了面经幡，经幡上写着“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所谓六字真言是直接用汉语对藏文的音译，它的含义大致可以被翻译为:“啊!莲花，宝珠。”

六个字开头的这个“唵”就是个打招呼的虚词，宝珠指代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宝或者三宝，也可能指观音菩萨，这位菩萨在藏传佛教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话说回来，就连那些每天转着法轮念佛的藏族人自己其实也没把握说他们念诵的这六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字真言就跟汉地佛教的“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大家不需要

对它的含义刨根问底，只要记得时时念诵，就可以得到神佛的保佑。由于季节原因，我在山上遇见的汉族香客只有那些特别虔诚的僧人，这些僧人即便走在山路上也忘不了念佛，来自西藏的香客也是如此。向山上爬的过程中，大雾突降，周围看不到人影。置身浓雾中的我却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冥冥中听到来自神佛的声音。

经过一段陡峭的山路，洗象池(hsi hsiang chih)出现在眼前。这个池子修建在临近湖水的位置，据说是普贤菩萨当年经过漫长旅行来到峨眉山后，给他那头神圣的大象洗澡用的地方。位于洗象池的寺庙同样供奉了佛祖释迦牟尼、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塑像。同一座大殿里，这三座佛像的后面，还供奉着三尊比真人还大的华丽鎏金神像，分别是阿弥陀佛(amitabha)、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ta shih chih)，他们被认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管理者，所以塑像在寺庙里也都是一起出现的。与其他寺庙不同，这座寺庙还设有专门的观音殿，里面供奉了观音菩萨的塑像。

接下来游览的寺庙名为大乘寺(the great vehicle)。这座寺庙正殿同样供奉了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塑像，事实上，他们的塑像在各个寺庙中差不多也都是一起出现的。与前面的寺庙不同的是，这三尊神像背后供奉的是弥勒佛，也就是未来的佛。

爬上一段陡峭的台阶，顺着山势再往下走几步，便来到了白云古刹(paiyun ku cha)。我觉得，峨眉山上所有寺庙当中，这座庙的名字起的是最贴切的。白云古刹与众不同地供奉了张良的塑像。他死于公元2世纪，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长生不老的忠实追求者。死后的张良成了神仙，被授予“文成侯(wen cheng)”的称号。除了别具一格的张良塑像，这座寺庙也有专门供奉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大殿。

要想继续向山上爬，必须经过名为“雷洞坪”的地方。传说，这个地方居住着掌管风雨雷电的巨龙，也就是本书上章提到的那条恶龙。所有香客走到这个地方都小心翼翼，不敢随意喧哗。位于雷洞坪的寺庙特意挂了块牌匾，向香客介绍这条巨龙行云布雨的神力。同时特别强调说，任何轻微的声响，哪怕是调笑或者说话，也可能刺激巨龙发

怒，引来猛烈的狂风、雷暴。

雷洞坪再往上是接引殿(chieh yin tien)，专属于阿弥陀佛的庙宇。“接引”的意思是接纳和引导，这恰恰是属于阿弥陀佛的职责，因为他在佛教文化中就是负责引导信众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由于是阿弥陀佛的专属寺庙，所以寺庙的第一座大殿供奉的就是他的华丽塑像。位于阿弥陀佛后面的是韦陀(weito)塑像，他被认为是佛教的护法神，主要负责寺庙的安全，保证僧人们得到足够的供养。这座大殿后面的大殿里排列着十八罗汉的青铜塑像，大殿正中照旧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塑像。其中普贤菩萨的塑像通体鎏金，端坐在白象之上，白象又站在莲台上面。3座神像右手边的角落里供奉着常驻东方世界的药师佛(yo shih fo)，地藏菩萨(titsang)和观音菩萨的塑像陪伴在他的两侧。药师佛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地位丝毫不逊于阿弥陀佛，老百姓认为向他祈祷可以治愈各种疾病。地藏菩萨是与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等地位相当的菩萨，中国人认为地藏菩萨的家乡在安徽，所以那个地方对这位菩萨的崇拜也最狂热，不过也有证据显示这位菩萨最初的原型其实是暹罗的某位王子。地藏菩萨是主管地狱的菩萨，他曾发愿说只要三界中还有一个灵魂没得到拯救，自己便永不成佛。



峨眉山寺庙里供奉的佛像

山路越来越陡，带着我来到了古太子坪(ku taitzu ping)。这个地名的由来据说是因为明朝的某位皇子，不过当地僧人更倾向认为所谓太子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人，因为他出家前就是位王子。古太子坪寺庙里的释迦牟尼佛像穿着装饰了华丽刺绣的丝绸长袍，他的右手边是普贤菩萨的塑像。普贤菩萨端坐在白色的大象身上，那头大象的塑像真的依据佛经记载，被刻画出了6对长牙。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矗立着观音菩萨的塑像，他们的身后是地藏菩萨、文成侯(也就是张良)和文殊菩萨的塑像。

接下来是永庆寺(yung ching ssu)。这座寺庙正对山门的是一尊戎装打扮的观音塑像，他或她的身后端坐着阿弥陀佛的塑像。永庆寺与其他寺庙不同的地方在于，寺庙里多了尊达摩祖师的塑像。达摩在佛

教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圣托马斯，他盘腿坐在那里，右手手掌立在胸前。达摩塑像右手边还有尊小号的普贤菩萨塑像，只不过这尊塑像骑乘的大象只有4对长牙，另有2对长牙不知道是掉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有。这座寺庙里还保存着不少铁质和青铜质的建筑构件，它们来自一座已经彻底消失的寺庙。

离开永兴寺继续向山顶爬，就到了开山肉身祖师殿(kai shan joushen tsu shih tien)，就像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这座寺庙保存着一位已经去世很久的住持僧人的不朽干尸。这位住持僧人就穿着生前的那身僧袍，面部虽然经过修饰，样子却仍旧有些吓人。单从外表看，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只是尊黏土或青铜材质的塑像。据我所知，峨眉山上保存的干尸绝对不止这么一具。告别了死去多年的住持，山路变得愈发陡峭，引领着我来到沉香塔(the eagle wood pagoda)，位于当地的寺庙就因为这座9层宝塔而得名。

随后遇到的寺庙名字非常有气势，叫“锁钥天门(the august guardofthe gate of heaven)”。寺庙的名字不一般，寺里的内容却平淡无奇，供奉的照旧是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从这里继续往山上走，就到了七天桥(thechitien chiao)。当地有座很小的寺庙，里头供奉的神像也很有意思。身量比较大的释迦牟尼佛端坐在靠后的位置，佛像的前面则并排坐着普贤、观音、文殊三位菩萨。其中普贤菩萨居中，文殊在右，观音在左。

下一座寺庙名叫“普贤塔(the pu hsien pagoda)”。顾名思义，这座寺庙是以峨眉山的主人为核心建立的，普贤菩萨自然而然成了那里绝对的主角儿，端坐在正殿之中，面朝着山门。这间大殿后部正中的位置供奉着阿弥陀佛，他的左右两侧是释迦牟尼佛和观音。整个大殿的左侧还供奉着财神(tsaishen)的神像。财神是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和尊敬的道教神，却不属于佛教的范围。只不过这位神仙在中国的知名度实在太高，所以佛教也把他吸收了进来。类似这样被佛教吸收的道教神还包括关帝(kuan ti)、龙王(lung wang)和三官(the san kuan)。

这座寺庙再往山上走，山路被特意铺上了木板，以起到防滑的作用。香客顺着铺了木板的路，可以一直走到锡瓦殿(the hsi wa tien)。

据说，这座寺庙里原本有3间非常特殊的大殿，它们屋顶上的瓦分别是锡的、青铜的和铁的。现而今，金属的屋瓦早就不见了踪影，原先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从佛教角度来说，以“锡”为寺庙的名字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锡是佛教戒律允许僧人拥有的唯一一种金属。依照佛教戒律，僧人外出云游、化斋的时候应该手持一柄锡杖，僧人停留在某个寺庙则可以被代称为驻锡。中国南方有处著名的泉水被称为“锡泉”。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当年某位僧人走到这里突然感到口渴难忍，周围却没有任何河流、水井，于是僧人就用手中的锡杖在地上轻轻顿了几下，泉水便从地里冒了出来。

离开锡瓦殿，再往山上爬了没多远，就登上了峨眉山海拔11000英尺的顶峰。我在这里的正顶金殿受到了僧人们的热情接待。对于我的来访，僧人们感到非常突然。虽然我事先派了负责护送的两名士兵来这里打前站，不过这两个人后来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在僧人们很快就为不请自来的我安排了宽敞、清洁、舒适的房间。通过攀谈，负责接待的僧人发现我在佛学方面拥有比较深的造诣，这让他觉得意外而且高兴，于是又赶忙为我准备了一桌还算可口的素斋，各种招待可谓殷勤备至。

抵达这座寺院后大概一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我站在山门的门洞里欣赏落日的余晖。此时，我脚下2000英尺左右的地方积累了厚厚的云层，峨眉山的顶峰变成了漂浮在云海中的小岛。后来，白雪一样的浮云又被落日镀上了淡淡的金色。我觉得身上有点儿冷，就返回房间烤火。天就要全黑的时候，那两个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的士兵终于找到了这里。

第二天早上的景色令人惊喜。笼罩在峨眉山周围的云海已经彻底消散，山上、山下的风光一览无遗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由于气候原因，四川很少能出现这种大晴天的情况。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连当地的狗都觉得不习惯，会朝着太阳不停地汪汪叫，所以四川人有“日出则犬吠”的谚语。相比四川其他地区，峨眉山上晴天日出的景色更加少见。如此说来，我的运气应该相当不错。

除了寄宿的这座寺庙，峨眉山顶峰的范围内还有其他几座寺庙。

其中有座寺庙显得非常特别，它的大殿顶上有个镀金的大圆球，我曾在这座寺庙寄宿过两个晚上。香客们众口相传的峨眉山佛光的最佳观测点，就在这座寺庙后面的悬崖上。本书上章已经提到，笼罩峨眉山主峰的云海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金色的光环，科学暂时还无法对这种峨眉山专有的奇景做出合理的解释。据我看，类似峨眉山的佛光这样的奇观在世界其他地方其实也可以看到，不过很多中国香客声称，峨眉山的佛光能够呈现出近似彩虹的七彩光环，这是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的。虔诚的香客们相信，峨眉山的佛光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或者他精神上的儿子普贤菩萨伟力的显现。一个人来峨眉山朝觐如果没看到佛光，那么他此行的意义就要打个很大的折扣。



峨眉山金顶云海，摄于1906～1909年

据香客们说，佛光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山顶区域保持晴天状态，与此同时，山谷里要积累厚厚的云海。我来峨眉山游历的时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自然也就没能领略到佛光的神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万里无云的天气让我有机会饱览峨眉山地区的全景。站在10000多英尺高的山巅向四周眺望，北面和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富庶平原，南面的大

渡河形似白练，生活在峨眉山附近茂密山林中的彝族人至今仍然过着近似洪荒时代的生活。从峨眉山向西南方向眺望，可以看到巍峨的大瓦山[6]，看到它异常平坦的山顶，还有陡峭的山坡。站在峨眉山的顶峰向正西方向看，就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有些雪山的海拔足有2000英尺，甚至更高，它们构成了中国西部高原地区与东部平原地区的分界线。这些雪山也是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延伸的余脉，它们那么挺拔高耸，好像要把苍天刺破一样。即便与我所在的位置相隔将近100英里，它们依然显得那样高大，高大得让人觉得不真实。值得欣慰的是，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要前往这些雪山游历，探寻那些被它们隐藏的秘密了。

要想前往寺庙后面的悬崖欣赏佛光，香客必须特别小心，因为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肯定会没命的。巴伯尔认为，这座悬崖观景台可能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据峨眉山的僧人们说，每年都有很多为情所困的男女选择到这个地方跳崖殉情，还有某些特别狂热的佛教信徒也会从这个地方跳下去，以求早日往生自己向往的极乐世界。由于承载了太多的悲剧故事，所以这座悬崖也被称为“舍身崖(the rejection ofthebody)”。也有人将这座悬崖称为“银色界”，这个名字的由来可能是因为峨眉山被认为是通往大雪山的门户，也可能是因为站在峨眉山上可以远眺西边的大雪山。距离悬崖边缘不远的地方，至今保留着某座古老寺庙的残存遗迹。这座寺庙曾多次被闪电击中起火，又多次得到修缮，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彻底毁灭的命运。时至今日，遗留在悬崖上的寺庙残骸仍然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据某位僧人说，上天曾经显露神迹，表示要为因闪电而毁的寺庙做出补偿，不过这个诺言似乎至今也没兑现。

我后来借宿的这座寺庙里僧人连同辅助人员总共有20多人常驻，每天还要接待大量的香客和游方僧人。我注意到，有三名远路来的僧人随身携带了某种证明文件，他们每参拜峨眉山的一座寺庙，就会请当地的僧人在上面盖章留念。据这些僧人解释，他们此行并非完全的个人行为，同时也代表了各自所属的寺庙。这样一来，他们就需要有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来过峨眉山，而且确实严格完成了朝觐的程序。按照峨眉山历来的传统，众多寺庙也要向香客散发各种名目的佛

教小册子，或者寺庙风光图之类的东西，这些风光图的印刷水平相对都比较粗劣。我此行得到了一幅峨眉山僧人的印章图。当时，几名来自四川东北部保宁府[7]，身穿黄色僧袍的僧人，还有几位来自靠近藏区理塘的僧人都请身在峨眉山顶峰修行的印章主人在自己的证明文件上盖了章，我也就沾光跟着盖了一个。

登上峨眉山顶峰第二天剩下的时间里，我观看了两场宗教活动，还听一帮没正式出家的小和尚念了会儿经。那两场宗教活动主要就是僧人们吟诵各种经文，给人一种很古怪的感觉。僧人们日常的祈祷活动比较简单，就是反复念诵某些简短的经文。僧人的早课通常安排在大雄宝殿里举行。他们在佛像的左右两侧成排坐下，佛像面前摆着点燃的蜡烛，还烧着香。僧人们首先要念诵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句话是赞颂佛祖释迦牟尼的;南无本师当来弥勒尊佛，这句话是赞颂佛祖未来的接任者弥勒佛的。念完这两句佛号，铃声响起，意味着早课进入下个阶段，僧人们用恭敬且带有音乐感的语气连续念出一大串儿神佛的名号，我只能简单记录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包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护法诸天菩萨(hu fa chu tien pu sa)、三洲感应护法韦陀尊天菩萨(san chou kan ying hu fa weito tsun tien pu sa)、日光遍照菩萨(jihkwang pien chao)、月光遍照菩萨(yveh kuang pien chao)、药师佛、增福财神(tseng fu tsaishen)，以及什方菩萨(shih fang pu sa)。

早课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经文中的某个段落进行重点讲解，那个感觉跟西方基督教的布道非常像。讲解结束，僧人们还要再念诵一段表示赞颂的经文。这种赞颂属于礼仪性质的，选取的经文也都比较常见。类似这样的过程要重复若干次。旁观者如果站的位置比较远的话，通常听不清经文的具体内容，耳朵里塞满的只是各种有节奏的音节而已。晚课跟早课的流程大同小异。僧人们依次念诵了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这三位神佛都是早课的时候已经提到过的，跟在他们后面的名字很多都是新的，包括: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伽蓝圣众菩萨(这位菩萨其实就是道教里的关帝)、历代祖师菩萨(litaitsu shih pu sa)，以及清净大海诸菩萨(ching chingta haichupu sa)。

香客们登上峨眉山顶峰能够看到的胜景不仅有佛光，夜间峨眉山的景色同样令人惊叹。夜幕降临后，那些菊花形的小光团四处飘荡，就像长了翅膀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它们就是峨眉山著名的佛灯。对于这样的奇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评价，只能连连惊呼，眼睁睁看着它们在脚下的云海里时聚时散。某位僧人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这些佛灯就是由佛光转化来的。白天的时候，它们是整片的光，晚上就化成了星星点点的碎片。西方人从科学的角度认为这可能是某种自然的放电现象，不过我倒觉得僧人的解释更具诗情画意。

我借宿的这座寺庙可能是整个峨眉山顶峰上规模最大的，却没有它边上的那座寺庙著名。那座寺庙名为“先祖殿(the hsien tsu tien)”，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当初峨眉山上最早供奉普贤菩萨的庙宇所在地。汉朝的时候，前面提到的蒲姓大臣追随神鹿的足迹来到这里，最早见识了佛光的壮丽，然后就在当地修建了寺庙。先祖殿至今保留着这个人的坐姿塑像，塑像所在大殿的后面有段台阶，沿着台阶就可以走到这位先贤当年看到佛光的那段悬崖。距离先祖殿不远的两座寺庙分别是峰顶卧云庵(monastery of the sleeping clouds)和千佛(chien fo)寺，两座寺庙附近还有个池塘叫“白龙池(the white dragon)”。

3月10日，我带着无限留恋告别了峨眉山顶峰，沿着积雪冻冰的山路跌跌撞撞往下走，当天下午回到万年寺，晚上就第二次在那里借宿。次日清晨，我继续下山，途中遇到了已经参观过的白龙寺。山路在这里分了叉儿，都可以通向山下的峨眉县城，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来的时候没走过的那条路。随着海拔逐渐降低，冰雪不见了，天气变得温暖起来，周围又出现了绿色。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有某种神力在人为调整四季一样。雪莱[8]写过这么首诗:

I dreamed that as I wander'd by the way

Bare winter suddenly was changed to Spring

And gentle odours led my steps astray

Mix'd with a sound of waters murmuring

我梦见自己在路上徘徊，

寒冬突然变成了春天。

温暖的气息让我脚步蹒跚，

还有那潺潺的流水……

他的梦想在峨眉山变成了现实。

两条山路分叉儿夹角中间的区域里零星点缀很多寺庙，它们一直延伸到山脚下。这些寺庙远远看起来都挺漂亮，不过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其中比较显眼的寺庙包括广福寺(the kuang fu ssu)、龙升岗(thelung sheng kang)、观音寺(the kuan yin ssv)、中峰寺(the chungfeng ssu)、大峨寺(the ta o ssu，这座寺庙经常接待从嘉定来这里度假的西方传教士)。离开这片寺庙去，山路就蜿蜒来到河边，眼前出现了名为“正心桥(cheng hsin chiao)”的小石桥。过了这座石桥，就到了慧灯寺(huiteng ssv)。站在这座寺庙周围远眺峨眉山顶峰，景色异常优美。离开慧灯寺再往山下走，还可以看到很多寺庙。从山区进入平原以后，路变得好走了不少，我很快就到了峨眉县城。从这里回望峨眉山，什么也看不见，那座大山已经被浓雾从头到脚包了起来。只有远远飘来的钟声还在提醒我，曾经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的笔墨停留在峨眉山实在太久，读者可能已经被那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寺庙名字搞得心烦意乱。如果某些读者由此留下了“峨眉山就是一座属于佛教的大山”的印象，那也是片面的。即便没有佛教在这里安家落户，峨眉山也同样是座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神山。那些灵动的山水，足可以为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无尽的想象力。不管本身信奉什么宗教，当你站在峨眉山之巅，俯瞰那苍茫的云海时，都将为自然的伟力所折服。

【注释】

[1] 今泰国。

[2] shwe dagon pagoda，又称仰光大金塔。

[3] 原文如此，译者未查到相关记载。

[4] 中国寺庙的习惯通常是把观音像放在正殿佛祖像的背后。

[5] Eitle，具体身份不详。

[6] the wa mountain，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北岸，海拔3236米。

[7] Pao ningfu，位于今四川省东北部，下辖阆中、南部、苍溪、剑州、广元、昭化、巴州、通江、南江等地，民国后撤销。

[8] 珀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ey，英国诗人，浪漫主义作家，下面4句诗引自雪莱的the question。

第八章 从峨眉到打箭炉[1]

雅州府—周公山—飞龙岭—茶马古道—清溪县—内地第一险阻—泸定桥

告别峨眉县城，我太平无事地在路上走了4天，就到了雅州府[2]境内。路上第一天，满眼所见还是富庶的平原地区，这个地方的主要树木就是可以用来制蜡的桍树。金色的油菜花到处盛开，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去年秋天播种的小麦这时还是绿色的小苗。天快黑的时候，我渡过雅江，来到规模不大的夹江[3]县城过夜。第二天出发后没多久，我又乘船反向渡过了雅江，开始沿着江的右岸行进。行进过程中，我注意到距离刚才渡口不远的江左岸有不少小庙，悬崖上还有不少天然形成或人工开凿出来的洞窟，很多老百姓都在朝着洞窟里供奉的神像烧香。

沿着雅江右岸行进，沿途照旧风景如画，茂密的树林里零星点缀着几座寺庙，桃子和樱桃树已经开花，山间野生的报春花迎风怒放。当天下午，为了前往左岸的洪雅[4]县城，我们再次渡过了雅江，然后沿着县城的主要大街穿城而过，来到了比较贫穷的金口河镇[5]。这个地方的住宿条件相当差。据当地人说，从夹江县上溯的整个河谷都是野鸭的越冬地。我来的季节有些晚了，野鸭已经飞走了不少，不过还是很幸运地打到了几只鸭子。这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建筑当属篮桥。所谓篮桥，就是用大竹篮子装上石块，按10英尺的间隔投到河里充当桥墩，然后再在这些桥墩山铺木板架桥。篮桥最大的好处是便宜，缺点是不耐久。时间长了，泡在水里的竹篮就会烂掉，石块被水冲散，整座桥也就垮了。篮桥修了垮，垮了修，搞得这个河段的水里全是大石头，再加上原本就很厉害的激流，行船非常不方便。从雅州府到嘉定府的雅江江段平时还有运送木材的功能。除了每年雨季山洪暴发的

时候，整根的原木都可以被直接投入雅江，任凭它们自己顺流而下。

第三天，我们在河谷中艰难跋涉，穿过了无数溪流。由此渡过小河后，我还不得不爬上800到1000英尺高的悬崖，以便通过一处山口。这处山口附近居然还有家茶馆，历史非常悠久。通过山口后，高度迅速下降，我们重新回到了雅江河谷当中。这个江段的水流异常湍急，无法行船，只能从桥上通过。那座桥名叫“观音桥(kuan yin chiao)”，整座桥都是用石材搭建的。过了桥，很快就到了同名的小村子。从这个小村子再走4到5英里，我们来到草坝[6]镇，留在那里过夜。这座小城处在群山环抱的盆地当中，只有东和东北方向留有沟通外界的通道。小城紧邻雅江左岸，这个江段的江面变得非常开阔，水流也和缓了下来。

第四天，也就是3月14日的早上，我抵达了雅州府[7]。这个地方的最高长官是位道台，他管理的区域向西一直延伸到四川跟西藏交界的地方。雅州府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它恰好扼守在连接北京和拉萨的大路上，同时也是这个区域最富庶的城市。雅州府的主要作物是茶叶，他们生产的茶叶大多卖到了西藏，采摘下来的茶叶首先要靠人力背到打箭炉，然后做成茶砖或者茶饼，由藏族商人销往拉萨，甚至还可以卖到更远的印度。

我在雅州府受到了在当地传教的美国教会人员的盛情招待。通过他们走在路上跟大伙打招呼的情况判断，这些人跟当地人相处得应该挺不错。美国传教士们已经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小型诊所和一所学校。我来到这个地方时，他们正打算把小诊所扩建成大医院。

由于雅州府的热情好客，我决定在当地多待一天，四处游览游览。这个地方同样处于群山环抱的盆地当中，雅州府边上的周公山[8]还是四川境内仅次于峨眉山的佛教圣地。抵达雅州府后，我终于把那个从成都带过来的讨厌仆人给辞退了，然后又从当地雇了个新仆人，他将陪着我一直走到打箭炉去。来到雅州府后，我还打算把那几个负责抬滑竿的脚夫也辞掉算了，他们抬着的滑竿还是当初在万县买的。一路上，除了经过城镇的时候，我一般很少坐在上面。有鉴于此，我觉得索性不如就把它扔在雅州府，这样的话，脚夫的数量也可以减少

一半儿。只可惜离开雅州府时是直接从城外走的，没再进城去，所以那架没什么用的滑竿又被抬到了打箭炉，最后就扔在那里。

离开雅州府不久，我就又进入了山区，这个地方已经属于跟西藏交界的地带。充分的证据显示，马可·波罗曾经取道雅州府所在的平原，通过金川峡谷，从成都前往云南游历。他那个时代，雅州府很可能就是元朝控制的边界地区，再往西走就属于古代吐蕃的范围。据马可·波罗记载，这个地区曾频繁爆发战争，还有不少伤人的猛兽。

3月16日，我来到距离雅州府几英里远的飞龙岭(feilung ling)，这个地方的海拔又升至3600英尺。曾经来到飞龙岭游历的谢立山爵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three yearsin western china):

> 走过漫长而危险的道路，我们这才爬到山顶。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谢立山爵士当时应该是不幸赶上了特别恶劣的天气，因为我自己觉得同样的路并不是特别难走[9]。相反，这条路可能要比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道路好得多。离开雅州府后，我大概已经走了65华里，也就是20英里的距离，这才来到名叫“史家桥[10]”的村子过夜，当地的旅店非常不错。第二天，我渡过雅江的某条东北流向的支流水系，来到它的右岸，进入某座小城。这个地方的路非常难走，以至于我把在峨眉山买的佛头登山杖都给搞折了。当天下午，我来到名叫“皇仪堡[11]”的小村子，留在那里过夜。次日，我再次翻过一道山梁，这座大山被称为“大相岭[12]”，据说只比峨眉山顶峰的海拔低2000英尺。黄泥堡本身的海拔大概是3870英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翻过的那道山岭高度不会低于5000英尺。据当地的向导说，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叫“大象岭”，因为普贤菩萨当年就是乘坐大象通过这里，从印度来到峨眉山的。这样的说法无疑属于纯粹的民间传说，找不到任何史料支持。

准备翻越大相岭的那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总的来说，自从我进入四川境内，老天爷就挺照顾我的。我带着我的狗吉姆走在最前面，丝毫没有畏惧周围的冰雪，把负责护送的士兵都远远地丢在了后面。中午前后，我爬到了大相岭的最高处，留在那里稍事休息，喝茶、吃点心。就在这座大山的顶上，我还遇到了全凭人力背茶的脚夫队伍。

自从离开雅州府，路上就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平均每人要背300甚至4000磅的茶叶，根据身上茶叶分量的不同，每人每天可以得到20或30个铜板作为报酬。通常情况下，他们走完这段路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轻装的旅行者则只需要8天。脚夫们必须走得很慢、很小心，因为随便摔个跟头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人对我翻越大相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走得很慢，而且差不多把路都给堵上了。由于身上的茶叶非常沉，脚夫们即便停下休息的时候也不愿意费事把货物拿下来，只好就那么靠着路边的岩壁凑合休息。我在这段旅途中只遇到过一位运气不好的脚夫。当时，他正从一处小悬崖底下通过。为了避开头顶上的大冰柱，脚夫失去平衡，脸朝下摔倒，所有货物都砸在了他的背上。包括我在内，大家赶紧过去帮忙。脚夫的身边都是人，到处都是试图拉他的手，所以我直到帮这个人重新站起来，也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获救的脚夫对那些善意的朋友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根据我自己的测量，即便在大相岭上背阴的地方，温度也不低于43华氏度。当然，这是正午时分获得的数据。这个时候的阳光很强烈，山顶的积雪甚至出现了融化现象。站在大相岭上四处眺望，周围的景色只能用“壮丽”两个字来形容。这天正好没有雾，阳光充足，周围的雪山被映照得闪闪发光，直刺着湛蓝的天空。



茶马古道上背茶砖的脚夫

告别大相岭，告别那些终年积雪的山峰，就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了阔别几个星期之久的平原地区。眼前的小城名叫“清溪县[13]”，地方不大，平时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像沿海地区那样接触西方文明，却出人意料地拥有一所专为女孩设立的学校。这座小城主要的功能是驻扎部队和调运军用物资，所以成立就配套修了座关帝庙。前面已经说过，关帝是中国人崇拜的主管战争的神。我在小城的街道上看到了官府发布的告示，告示的大概内容是安慰老百姓不要对远来的军队惊慌

失措，军队在当地购买任何物品都将按市价付钱。

从雅州府到打箭炉的路上，我遇到过不少清军部队。这些士兵的身体都还不错，可他们肩上扛的却是正在被逐渐淘汰的老式火枪。与其他地方的清军部队不同，这些士兵似乎每月都能按时领到军饷，所以他们执行起任务来也相当痛快。据我看，要想把军需物资从成都运到这个靠近西藏的地方来，应该不是件容易事，大相岭只是他们需要翻越的众多大山之一。清军士兵们需要拖着大炮，连续翻过若干座大山，其中某些大山的海拔超过15000英尺。对英军士兵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清溪县这个地方不大，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早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就是中原汉族王朝跟西部游牧民族作战的前线地区。清溪县周围拥有大片天然沼泽地，易守难攻，根本没有路能打过来。任何人要想攻占这座小城，都只能走大相岭那条路，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驻扎四川的清军士兵

我们从西门出了清溪县城，立马儿就进入了位于城西和城南的大片沼泽地当中。没过多久，我们又渡过了一条小河。这条河发源于周围的大山，跟清溪县城同名。过河以后，道路再次随着山势逐渐升高，我们进入了宽阔的流沙河[14]谷。流沙河的左岸有个名叫“富庄[15]”的村子，这个村子也被称为“蛮庄(m a nc h u a n g)”。河谷越往深处走就变得越窄，只留下很少的土地供当地人耕种。话虽如此，由于流沙河水经常泛滥，带来丰富的肥料，河谷里的土地非常肥沃，适合种植水稻。这个地方除了农田以外基本看不见什么绿色，两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只有每户农舍的附近才种那么一两棵树。告别流沙河，接下来遇到的规模较大的村子名叫“泥头[16]”，当地的旅店还算不错。我们留在当地过夜，养精蓄锐，准备次日通过前面的山岭。

泥头的海拔在4900英尺左右，前面的飞越岭[17]海拔足有9000英尺，只比大相岭稍微低点儿。山路出了流沙河谷以后，便继续蜿蜒向东，沿着东边的山坡爬上了这座大山。就在距离泥头不远的山上，湍急的水流奔腾而下，形成了壮观的瀑布。攀爬飞越岭的最后1500英尺距离显得特别陡峭，不过那些提到这座大山的中国史料明显都对登山的难度做了太大的夸张，甚至称它为“内地第一险阻也”。我觉得这个称号用在大相岭身上可能更合适。近些年成名的中国诗人徐长[18]曾在他的诗中形容攀登飞越岭的感觉就好像天鹅一飞冲天，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就好像老鹰在俯冲。这样的描述非常具有诗意，却不如某位路过这里的向西方旅行者柔克义[19]所说的话那样实在。

我在飞越岭上遇见了一位僧人，这位僧人当时是要去拉萨的布达拉宫[20]朝觐的，当时已经在路上走了7年。这位僧人走得很慢，是因为他每走两步就要趴在地上磕个长头。据这位虔诚的僧人自己估计，再走个两三年，他应该就能走到拉萨了。据我个人的体会，翻越飞越岭跟天鹅和老鹰都没什么关系，即便不磕长头，你的速度也不可能比那位僧人快多少。

这天下午还很早的时候，我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只好留在位于山顶位置的华林坪[21]村休息。就在抵达这个村子不久前，我还在半路参观了一座寺庙。这座寺庙位于那道山间激流的右岸，坐落在一片树林当中。这座寺庙主要是供奉观音菩萨的，不过掌管飞越岭的山神

也在庙里占了个位置。供奉观音的正殿里还安放着十八罗汉的小型塑像，正殿后面的空地上放着一口已经废弃的道光二年(1822年)铸造的铁钟。寺庙里有座完全用原木建成的房子，那是僧人们平时居住的地方。整座寺庙地势最高的地方修了个小亭子，亭子里安放了红木制作的牌匾，那上面刻的都是历年来出资修缮这座寺庙的善男信女的名字。寺庙本身的建筑很漂亮，周围的风景也很漂亮，两者搭配起来让人赏心悦目。

华林坪是个只有两条街道的小村子，却显得异常干净整洁，村子里的多数居民也不再是单纯的汉族。村子的街道上张贴着布告，大概意思是说，由于军事方面的需要，官府需要从当地征用大量脚夫。脚夫们如果胆敢利用这个机会私吞负责运送的物资，或者把它们卖给别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那些收购赃物的居民也将承担连带责任。华林坪这个地方的煤炭储量非常丰富，埋藏位置也很浅，当地居民可以挖回去用于取暖和烧饭。通过送到我手里的一块样本判断，当地煤炭的质量非常好，燃烧时发热量大，还没什么烟。这个村子所处的海拔比较高，村民差不多一年四季都需要生火取暖，燃烧木炭释放出的毒气对健康不利，优质的煤炭则是相当理想的替代品。



清代四川某地煤矿

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离开华林坪的我始终在山间行进，周围的景色异常动人心魄，我从未欣赏过如此壮丽的山景。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积雪，湛蓝的天空，颜色暗淡的峡谷和沼泽，各种色彩组成了一幅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图画。这样的景象，即便诗人、画家也无法用艺术的手段再现。没来过这里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美景，然而这样的美景你只要见过一次，就必定终生难忘。由于气候原因，这个地方多雨雪、多大雾，所以多数旅行者很难像我这样有机会在晴天的时候跟它近距离接触。由此可见，自从登上了峨眉山，好运气就始终陪伴着我，不管走到哪里都艳阳高照。

离开华林坪后不久，山路突然向着另一侧的山脚俯冲下去，我们很快就进入了美丽的大渡河河谷深处。自从离开嘉定，也就是大渡河和岷江的交汇点以后，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条河了。我现在所处的大渡河河段跟嘉定附近河段间的落差至少有3750英尺。通往泸定的路位于大渡河左岸。这条路修在山地上，起伏非常厉害。泸定距离华林坪大概20英里左右，那个地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当地拥有一座非常重要的铁索桥。抵达泸定前的最后一段路相当危险，路边的山上经常有巨石落下来，一直滚到大渡河里。这样的石头如果砸到人的话，必死无疑，谢立山爵士就曾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过这样的险情。谢立山爵士非常幸运，滚落的巨石差不多是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的。这次遇险后没多久，他们就在路上看见了一个被砸死的人的尸体。谢立山爵士的妻子当场吓哭，不过他们还是冒着危险把这个人抬走，埋了起来。

泸定周边的景色据说一年四季都非常漂亮，不过我来这里的时候应该还是赶上了最美的季节，田野里到处都是野菊花，各种果树也都开花了。要是我再晚来几个月，也许就能吃到被柔克义在书中盛赞过的桃子。泸定城很小，不过这座城市所处的位置却让它具有了某些商业上的便利，几乎所有来往于西藏和中国内地的商队都必须从这个地方经过。泸定铁索桥是这个地区唯一能够安全通过大渡河的地方。这座铁索桥总长120码左右，拥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其间多次得到过修缮。我们可以认为这座铁索桥是沟通中国内地和西藏的咽喉要道。

从地理和气候特点上来说，大渡河其实已经属于西藏高原地区的东部边缘，不过这个地方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实在太过强烈，所以实在

很难让人把它跟西藏联系起来。话虽如此，住在大渡河西岸的居民仍然以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汉族反倒成了真正的少数，当地的语言和习俗也呈现出多民族混杂的状态。由于这样的情况存在，中国内地采取的县的行政区划只延伸到大渡河东岸，大渡河西岸实行的是更加因地制宜的行政体制。

过了泸定桥，我沿着大渡河的右岸向上游方向走了差不多20英里。这个区域内的人口和村庄都非常稀少。一直走到名叫“大鹏坝[22]”的小村子，我才找到家汉族人经营的旅店，这家旅店的老板居然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利用喝茶休息的时间，老板自我介绍说他原来就是北京的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他才逃出北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老板的自我介绍肯定还是有所保留的，却也没有深问。不管怎么说，这位前义和团对我这个“洋鬼子”还算非常友好。

告别大鹏坝，我又开始爬山。下山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座木桥横跨在山间的河流上。这样的情形配上周围的雪山，显得异常壮丽。我走的这条路也是藏族人前往峨眉山朝觐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两边的山崖上有不少佛教主题的石刻和石窟。藏族人多数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从拉萨到峨眉山的路上为自己的信仰留下了大量的痕迹。离开大鹏坝大概25华里，路线逐渐向左偏移，我们慢慢离开了大渡河河谷，来到了泸水河[23]边上。山路到了河边突然下降，把我带到了下个休息点瓦斯沟[24]。这个村子非常小，全村只有一条街道。村子外面有些小块玉米地和果园，村子跟泸水河中间的河岸区域里还种了不少核桃树。村子里有座小庙，“瓦斯沟”的名字很可能就是从这座小庙来的。村口外面，有座跟泸定桥模样差不多的铁索桥横跨在泸水河上。过了这座铁索桥，道路再次蜿蜒到了高高的山上，沿着泸水河边的群山向远方拓展。大渡河跟泸水河交汇点以上的这个河段又被称为“金川(chichuan)”，沿着大渡河边的那条路继续往西走，就可以进入藏族土司控制的区域。我在瓦斯沟停留了一个下午，搞了些调查。瓦斯沟对岸的山上有座观音寺，修建寺庙的目的据说就是为了保护那条蜿蜒的山路，以免它被汹涌的河水冲毁。

第二天，我走完了最后15英里山路，顺利来到打箭炉。整条路线

始终没离开泸水河右岸的范围，不过海拔却从瓦斯沟的5300英尺不知不觉就升到了打箭炉的8400英尺。事实上，从瓦斯沟到打箭炉的泸水河就是由一连串儿瀑布构成的。每年夏天，山上的积雪融化，瀑布的规模也就达到了最盛。我来的这个季节还是春天，瀑布的水量相对较小，不过带给人的感觉也是相当震撼了。我抵达打箭炉的时间是在那天下午，脚夫和仆人比我晚了5个多小时。驻留打箭炉的莫耶斯(Moyes)夫妇是所有西方传教士中首先来到中国藏族地区传播福音的先驱，他们热情接待了我这个访客。

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打箭炉这个城市的结构是长条儿形的。环绕打箭炉的雪山非常高，山上的积雪常年不化。根据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绘制的地图，打箭炉附近最高的雪山海拔足有25592英尺，第二高的雪山海拔也有24900英尺。除了泸水河河边，打箭炉城墙以外的地方很少有平地。泸水河穿城而过，把这座城市分为两个部分。打箭炉是中国内地和西藏间名副其实的过渡区域，汉族和藏族的商人们纷纷来到这里贸易，把来自对方家乡的商品贩运到自己的家乡。来自中国内地的商品主要是茶叶，还有少量烟草和棉布。来自西藏的商品大多是麝香、金沙、皮货，还有很多样子古怪的药材。打箭炉的居民以藏族为主，总共700户左右，汉族居民只有大概400户。藏族居民中有很多喇嘛，他们平时住在城内的寺庙里。打箭炉的居民以藏族为主，房屋差不多也都是藏式的，就连城里的两家旅店也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街道两边的墙上随处可见“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中国人买东西习惯讨价还价，打箭炉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人，显得很喧闹。前面已经说过，藏族人大多是虔诚的佛教徒。打箭炉的汉族居民们长期耳濡目染，很多人也成了藏传佛教的信徒。当地的喇嘛庙香火非常旺盛，喇嘛们时而低回、时而高亢的诵经声隔着寺庙的高墙也能听到。

【注释】

[1] Tachienlu，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

[2] Ya chou fu，下辖雅安、名山、芦山、荥经、清溪、天全、打箭炉等地，1913年撤销。

[3] Chia chiang，今属四川省乐山市。

[4] Hung ya，今属四川省眉山市。

[5] Chih kou chen，今属四川省乐山市。

[6] Tsao pa，今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

[7] 作者这里指的当时雅州府的行政中心，今四川省雅安市。

[8] Chou kung shan，古称蔡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东南周公河畔，诸葛武侯征讨西南蛮夷途径于这里梦见周公，故名。

[9] 作者接下来走得这段路叫相岭古道，属于茶马古道和南丝路的一部分。

[10] shih chia chiao音，具体情况不详，按作者路线推测应在今四川省荥经县境内。

[11] Huang nipu，位于今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境内。

[12] Ta hsiangling，位于今四川省雅安市南部。

[13] Ching chihsien，今四川省汉源县，这个地方从隋代开始一直叫汉源县，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称清溪县。1914年，因地名与贵州省的青溪县同名同音，所以又恢复了汉源县的旧称，作者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今汉源县清溪镇，也就是清代县衙的所在地。

[14] the stream liu sha，位于今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属于大渡河支流，古称汉水。

[15] Fu chuang，今汉源县富庄镇，位于流沙河中游西岸，距汉源县城富林镇西北36公里。

[16] Nitou，今四川省汉源县宜东镇，这个地方是扼守飞越岭山口，沟通川藏的交通要地。

[17] the fei yueh ling，位于今四川省汉源县境内。

[18] HsU chang音，具体身份不详。

[19] William W.Rockhill，美国外交官、汉学家， 1884年来华，曾游历中国西藏、四川等地。

[20] 原文为pu to，即普陀山，也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这个发音来自梵文，汉藏佛教的音译不同，藏传佛教翻译为“布达拉”。

[21] Hua lin ping，今四川省汉源县境内。

[22] Ta peng pa音，具体情况不详，按作者路线推测应在今四川省泸定县境

内。

[23] 原文为thelu river，直译应为泸水河，泸水是金沙江的古称，不过按庄士敦走的路线来说，他在泸定附近不可能看见金沙江， thelu river指的应该还是大渡河的某个河段。大渡河古称沫水，但是当年康熙帝就把沫水和泸水搞混了，因此大渡河上的铁索桥才被称为泸定桥，庄士敦可能犯了相同的错误。为了避免误会，译者将原文中所有出现thelu river的地方全部直译为泸水河。

[24] Wa ssu kou，今四川省泸定县境内。

第九章 打箭炉

土司大人—榆林宫—温泉—家族墓地—转经筒—玛尼堆—马可·波罗的足迹—强盗暗语—责任自负

我在打箭炉发现了一家不错的藏式旅馆，从3月28日至4月15日的3周左右时间就都住在那里，其间拜访了当地的汉族和藏族名流，特别是驻节打箭炉的藏族土司[1]，还抽空在打箭炉周围游览了一番。我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地方多停留些日子，主要是为了仔细研究下自己此前并不熟悉的藏语。后来，当地一位和蔼、友善的老先生成了我的老师。这位老先生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着，纠正发音。老先生平时主要的工作是为藏族土司占卜，通过跟他接触，我希望能像当年马可·波罗所做的那样，在藏族群体中发现那些全世界最优秀的星象学家和预言家。马可·波罗认为这些人具有伟大的神力，他们的巫术可以让任何亲眼看到或者仅仅听说过他们事迹的人目瞪口呆。马可·波罗显然比我幸运得多，因为我的那位老师似乎压根儿就没有向我展现神力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他可能本来也没什么神力。

就像所有海拔超过8000英尺的地方一样，打箭炉的气候非常多变。每天夜里，气温可以降到冰点以下，天上还经常落下雪花，可是只要太阳出来，冰雪马上就融化了。3月30日，当地发生了一场轻微地震。据当地人说，这样的事情在打箭炉是经常发生的，一般也造成不了太大的损失。打箭炉城内底层老百姓的房子普遍比较破旧，所幸居民们的体质都挺不错，再加上气候也还说得过去，生病的情况并不常见。这个地方最主要的传染病是斑疹伤寒。

前面已经说过，大渡河以西是藏族土司的管辖区域。这些土司既是当地藏族人的部落首领，也是大清朝廷委任的地方官。他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里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同时也需要按时向大清皇帝缴纳

税款和贡品。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大清朝廷特意在打箭炉安排了一位级别很高的官员长期驻扎。这位地方官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那些藏族土司落实来自朝廷的各种指令，却从不直接插手当地的地方事务。总的来说，这位官员扮演的是大清朝廷与藏族土司间的“传声筒”的角色。

打箭炉城内只有3座官方建筑，最大的那座是统治这个区域的土司驻地，较小的那两座分别属于清廷派来的那位官员以及土司手下管理打箭炉的地方官。我抵达打箭炉后一两天就去拜访了那位土司，受到热情招待。土司的年纪大概40岁左右，外表看起来养尊处优，实际却非常具有活力。他能说流利的汉语，虽然带有浓郁的四川口音，平时还喜欢穿汉族的服装。土司当时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官邸从打箭炉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几年前曾经有位游方喇嘛对他说，如果土司继续在这个地方居住3年以上，就可能厄运临头。藏族人对喇嘛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的，即便土司也不能免俗。为了躲避灾难，土司只得搬到附近山上的行宫住了两年。时间到了第三年，由于当地局势越来越混乱，他只能从山上搬回了打箭炉，处理地方事务，心里还念念不忘地要赶快回到山上去住。



土司官寨

土司笃信佛教，对偶然来到这里的西方传教士也非常友好，据说甚至跟两三位传教士朋友换过帖，拜过把子。按照中国习俗，这是朋友关系最亲密的表示。瓦德尔(Wadell)在新近出版的《拉萨和它的传说(lhasa andits mysteries)》中也曾提到过这位土司:

> 打箭炉的藏族土司对待来访的西方人非常友善，即便因此受到来自上级的指责，也初衷不改，甚至明目张胆地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跟洋人换了帖。

据瓦德尔描述，打箭炉土司的势力非常强大，手下最起码有10000人的兵力，还修建了大量城堡、要塞。然而据我观察，这位土司对所有人都非常和气，从来不喜欢打仗。

生活在打箭炉的这段时光让我意识到，西方世界很多相关的传闻都是靠不住的。西藏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封闭，这里的人同样渴望了解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来自远方的人始终保持着友善的态度。打箭炉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某位土司手下的藏族贵族向来以多情著称，拥有数不清的罗曼史。某天，这位贵族遇到了同僚的妻子，为她的魅力所折服。为了创造接近这位女士的机会，他把那位丈夫安排到军队里出征远方。很快，那位妻子半推半就地成了他的情人。这个故事跟《圣经》里乌利亚[2]的故事大同小异。那位倒霉的丈夫后来平安回到了家乡，发现了妻子的不忠行为，随即跟她解除了婚姻关系。与此同时，那位贵族也喜新厌旧，抛弃了情人。所幸，那位女士后来又嫁给了一位汉族商人。这对夫妻继续在当地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任何人因为以前的事情为难他们。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故事交给史蒂芬斯·菲利普斯先生[3]，肯定能创作出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不过我耗费笔墨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出自纯艺术的需要，而是想让西方读者意识到，在打箭炉，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共生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打箭炉的石桥

现任打箭炉土司是从去世的哥哥手里接过这个位置的，他未来的继任者则是年龄更小的一个弟弟。土司的这个弟弟性格非常温和，就像很多英国人一样喜欢户外运动。他平时不愿意住在打箭炉城内，多数时间都待在前面提到的，位于山上的行宫里，当地汉族人称这座行宫为榆林宫[4]。我曾经受土司的邀请去这座行宫做过客，受到了土司弟弟的热情款待。土司的行宫规模宏大，位于距离打箭炉大概8英里的山上，周围没有任何建筑。这个地方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滚烫的硫黄温泉，土司特意在温泉边上修建了浴池，经常在里面泡澡。行宫周围的森林被严格保护了起来，作为土司的专属猎场，平时主要用来打野鸡或开展其他体育活动。土司的兄弟平时喜欢背杆老式火枪，枪身上布满各种华丽却无用的装饰物。我个人对这位年轻人充满好感。

土司行宫后面的空地是专属他们家族的墓地，墓地周围的杆子上挂满了各种经幡之类的东西。墓地边上还安放了个巨大的转经筒，转经筒装在结实的架子上面，底下还设置了传动装置。传动装置始终是泡在溪水里的，水流就可以带动转经筒不停转动。按照藏族人的说法，转经筒每转动一圈，就等于念了遍“唵、嘛、呢、叭、咪、吽”的

六字真言。墓地里的经幡和转经筒象征了在世的亲人为逝者灵魂永不停息的祈祷。后来深入西藏腹地的旅行中，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相同的经幡和转经筒。这些东西似乎是藏族人墓地的标准配置，特别是在那些采取火葬习俗的地区。当然，转经筒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动力问题，不过只要附近有河流经过的墓地，就肯定能看到转经筒。相比汉族人，藏族人似乎更不介意直接饮用生水。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很多藏族人特意跑到转经筒附近，喝那个河段里的水。这可能是因为驱动过转经筒的水本身也被认为具有某种魔力。顺便再说一句，圣水崇拜并非西方基督教独有的现象，我注意到很多喇嘛在宗教仪式上都使用过圣水。正如读者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佛教和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

转经筒有水力驱动的，也有用手直接推动的，最小的转经筒通常被喇嘛或信佛的俗人直接拿在手里不停转动。上了年纪的老人差不多时刻把这种小转经筒拿在手里，他们既需要通过它祈祷消除此生的罪业，也需要通过它祈祷修个幸福的来世。长年累月的习惯积累下来，转经筒已经成了这些老人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即便突然把手里的这个转经筒抢走，他们心里的那个转经筒也会继续转动下去。从古董的角度来说，转经筒使用的时间越长，转动的次数越多，也就越值钱。话虽如此，藏族人很少会出售自己使用的转经筒，除非贫穷迫使他们必须这样做。

用手推动的转经筒尺寸各异，最大的转经筒外观跟水力驱动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必须用手推着它们转动。这样的转经筒通常成排安放在架子上，寺庙里比较常见，普通人家里一般看不到。寺庙里这种成排的转经筒经常放在进入大门后右手边的位置，香客走进寺庙，就可以一路用手推着它们转动，出寺庙的时候还可以再让它们转一次。香客出入寺庙时推动转经筒意味着对神佛和寺庙主人的崇敬，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祝福。这无疑是种非常和谐、友善的习俗。

除了经幡和转经筒，藏族人还热衷用石头堆成小山的形状，小山上还要摆放形状、大小不同的石板，上面全部镌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这种小山被称为“玛尼堆(mani drombo)”。打箭炉附近就有不少玛尼堆，从这里再往西走，越是深入西藏腹地，

玛尼堆越多。藏传佛教跟所有佛教流派一样以右为上，因此所有神圣的东西都应该放在右手边的位置。香客朝拜玛尼堆时，应该沿着顺时针方向绕行，也就是要让自己的右手始终靠近这件圣物。玛尼堆上那些镌刻着六字真言的石板都是香客们陆续带过来的贡品，代表了对神佛的敬意。每个喇嘛庙都会安排固定的喇嘛或者雇用职业石匠专门雕刻这种石板。

来到打箭炉附近的时候，我曾有意识地离开大路，试图探访那些不在安排范围以内的地方，但很快就被陪同、护送的人员追了上来。显而易见，大清地方官员不可能允许我完全脱离他们的视线，自由活动。我曾经打算走一条对西方人来说完全陌生的路线穿越西藏腹地，前往拉萨，不过这样的想法恐怕也是不可能的。我曾试探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位清廷派驻到打箭炉的汉族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劝我打消去拉萨游历的念头，所以我随后的路线仍然只能限定为最初设想地沿着西藏和内地交界的边缘地带穿越雅砻[5]江河谷，进入云南省的西北部。如果这条路线也走不通的话，我就原路返回大渡河畔，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通过金川峡谷，探访越嶲[6]、宁远府[7]等地。只可惜这条路线近年来已经被巴伯尔和谢立山爵士等人走过了。

据当地人说，马可·波罗当年的这条路线现在也不太平，强盗非常多，某些旅店也都是黑店，暗地里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要想平平安安地从这条路走过去，只能事先跟强盗们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配合，获得某种确保安全通过的暗语。在这种情况下，旅行者不但可以确保自身平安，沿途还可以从强盗们那里获得各种补给。透露给我这个消息的人在大清衙门里任职，本身就跟强盗们有勾结。这个人自告奋勇地替我跟强盗们搭上了关系，还真的得到了通过暗语。只可惜，我后来没走这条路，也就没机会检验他给我的消息是不是准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愿意把这个情况在这儿说说，也许以后的旅行者能用得上。

雅砻江河谷可能是整个中国最不为西方人所知的地方。1895年至1896年，法国殖民官员博宁(Bonin)先生从云南大理游历到了打箭炉，他走的路线跟我马上要走的路线基本是重合的。1899年，瑞典籍传教士阿蒙德森(Amundsen)先生差不多又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从打

箭炉走到了大理。我虽然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线的西方人，却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英国人。遗憾的是，旅行开始前，我始终没有机会阅读这两位先生撰写的游记，也就无从获得借鉴。话说回来，他们的游记虽然非常有意思，某些地方却写得过于简洁、模糊，无法为我提供太多的帮助。通过地图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基本都在打箭炉西南方向的群山里。过了雅砻江以后，需要首先前往木里，然后再从那里向北走上若干英里的距离，取道永宁府[8]进入云南境内。这个距离在地图上看不算长，不过由于实际的路线都是山路，走起来的距离就要长得多。为了避开设在金川峡谷的收税点，某些云南商人会选择这条路线进入四川做生意，可是沿途风雪弥漫的高山垭口，还有无法架桥的河流始终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

即便已经到了打箭炉，我也很难为随后的旅行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就连土司本人，似乎也对他统治的这个区域不是特别了解。得知了我的想法后，土司跟那位汉族官员一样，竭力劝阻我不要去冒这个险。目前积雪已经开始融化，那条路比平时还要难走，再加上随时出没的强盗和野兽，走这条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更何况现在沿途基本看不到人，也就是说我无法就地获得补给，只能出发的时候就把所有食物都背在身上。当时，我已经通过某些来自西藏和云南的商人获得了这条路可以通行的保证。据他们说，这条路上除了那些野外生活经常遇到的困难以外，并没有太多麻烦。我觉得如果普通的商人都可以走这条路，那么轻装又带着武器的我应该也可以走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接受土司和地方官的好意，坚决要求他们给我颁发前往这个地区游历的护照。这两个人互相交换了几次意见，我又分别游说了他们几次，双方还是僵持不下。相比藏族土司，那位汉族地方官的反对态度无疑更坚决一些，反复强调他无法为我此行的安全做出任何保证，我必须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心中有数。我有理由认为，这位大清官员的反对态度并非出自对我个人的关心，主要是害怕万一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会牵连到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阻挠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说服土司和地方官，我只得用英语和汉语写了份责任自负的声明。声明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人声明，我在做出决定前已得到明正土司(ming cheng ssu)对从打箭炉前往云南这条路线可能存在各种风险的警告。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本人一清二楚，却仍然执意前往。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都将由本人自行承担。土司大人对我在他控制区域内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无需承担责任。

这份声明后来递交给了英国驻当地领事莫耶斯先生(Mr Moyes)，作为土司的免责证明。同样的文件，我在启程前也给了那位汉族地方官一份。这么做对我来说可能不太明智，却别无选择。英国驻当地领事馆接到通知后没有任何表示，不过我知道，他们也是反对我的旅行计划的。

就实际情况来说，土司和地方官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我所要途径的那个区域基本算是天高皇帝远，形势混乱得很，西方人被杀也不是没有先例。不管怎么说，我的声明总算让土司和地方官放了心。这个问题解决后，他们也就不再对我横加阻拦了。土司热情地从自己的手下里给我挑了个向导。向导是藏族人，也能说点儿汉语，他的职责是把我护送到雅砻江畔，土司控制区域的边界地区。除了这名向导，地方官还给我派了3名士兵沿途护送，他们将一路把我送到永宁府，也就是云南省界的位置。在此之前，我已经从当地雇了个小伙子充当仆人。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是汉族人，母亲是来自拉萨的藏族人，精通汉语和藏语，他可以陪着我一直走到缅甸去。临出发前，土司还慷慨地给我颁发了特别通行证。拿着这个通行证，我可以在他控制的区域内畅行无阻，必要时还可就地征用任何牲畜。

【注释】

[1] 即明正土司，正式的称号是明正宣慰使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属于嘉绒十八土司之一，辖境包括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境内和雅江县、道孚县，凉山州冕宁县等地。这个官职最早出现是在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庄士敦见到的应该是1902年接替哥哥职位的第十二代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

[2] Uriah the Hittite，指所罗门王与手下军官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的故事。

[3] Mr Stephen Phillips，当时的英国作家，擅长写历史小说，并不是特别有

名。

[4] Yulin kung，距离打箭炉南门10余公里左右，当地土司的避暑行宫。

[5] Yalung valley，金沙江的最大支流。

[6] Yueh hsi，今四川省越西县。

[7] Ning yuan，清代四川行政区划，范围大致是现在的四川攀西地区。

[8] Yung ning fu，清代行政区划，范围包括今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北部及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北部等地。

第十章 从打箭炉到八窝龙[1]，雅砻江

进入藏区—折多山—糌粑—雪盲症—藏族人家—酥油茶—藏獒—丹巴碉楼—雪山垭口

4月15日，我告别了打箭炉。陪同我开始这次旅行的包括三头驮行李和银子的骡子，两匹专门供我和我的仆人骑乘的骡子，还有前面提到的那四名向导兼护卫。银子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硬通货，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来换取必需的物资。我那点儿行李其实用一头骡子驮着就够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了三头。

离开打箭炉大概半英里左右，我遇到了一座石桥。按当地人的说法，这里就是汉地与藏区的分界线。过了这座桥，就算真正进入了藏区。山路在行走中不断抬升，不知不觉已经比打箭炉的海拔高了2250英尺。等我们来到距离打箭炉40华里，名为“折多[2]”的小村子时，海拔已经升到了10650英尺。我们就在村子里找了间废弃的屋子过夜。到了折多村，我们也就等于来到了连接理塘和巴塘的大路边上，这条路是西藏重要的商道，我看到很多商队带着货物朝着打箭炉走去。从打箭炉来到折多村的这一路上，我至少在路边遇见了4具牦牛尸体，可见当地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我的路线在折多村逐渐偏离了大路，进入了更荒凉的地区[3]。随后的一天时间里，我只看到一间小屋，还看见个愁眉苦脸的女人，骑着一头色彩斑驳的牦牛。离开折多后的这一天时间漫长又无聊，海拔始终在上升，不过幅度并不明显。我们穿行在河谷当中，沿着一条大河的左岸行进。从那天中午开始，脚下出现了厚厚的积雪，当天下午我们登上了海拔17400英尺的折多山垭口。这个垭口带来的困难是双重的，因为我们必须连续翻越中间隔着一道河谷的两座大雪山。据我看，两座雪山中间的那道河谷应该是很久以前冰川留下的遗迹。登上

这个垭口，眺望东北方向，还有更高的群山连绵不绝，南面和西南方向的山反倒不是特别高，它们笼罩在浓浓的云雾当中，雾气掩盖了那些可以通行的峡谷。

由于积雪的原因，下山的路比上山时候更难走。雪深得可以没过骡子，有些地方人一旦掉进去，就再也上不来了。下山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富饶的河谷地带。我们沿着河流的右岸行进，河对岸的山坡上生长着茂密的丛林。海拔下降3000英尺，出现了大群的牦牛，这是有人居住的标志。我们继续往前走了5华里，看见了大片耕地，还有一栋两层楼的住宅。再往前走，是个零星分散着几间农舍的小村庄，这个地方叫阿德村[4]，我们就在当地过了夜。身在这道河谷里，四周的高山都被云雾遮盖得看不见了。据我估算，这些大山的海拔差不多应在13000英尺左右，它们的山坡上覆盖着茂盛植被。我在当地遇到了被称为“马鸡(machi)”的白色野鸡，这种动物在中国内地并不常见。

接下来几周的旅行都跟这天差不多，没什么值得过多耗费笔墨的。概括起来，就是不断地在覆盖着积雪或丛林的群山当中爬上爬下。这片壮丽大山无疑应该是整个中国海拔最高的地区，不过眼前的风景如果始终保持不变，无疑也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旅途漫长，负重能力有限，我们只能携带那些最简单、粗糙的食物。这几个星期每天的食谱就是糌粑(tsamba)，以及少量的酥油和干牦牛肉。藏族人吃糌粑一定要配酥油茶，具体的食用方法是把糌粑放在酥油茶里，再用手指头搅和成面糊状。运气好的时候，我能用手里的枪打只野鸡吃，或者花两三个银元买几只活羊。活羊的好处是可以始终保持新鲜，还能自己跟着我们走，直到被杀了吃肉。

这片大山的山谷里生活着不少白色的野生鸽子，有人居住的村庄很少见，有时候一天也就能碰上那么一两个，有时候一天什么也碰不上。那些村庄规模都比较小，房子也很破旧。所幸，我们总还能在这样的村庄里找到借宿的地方。为了轻装，我们并没有携带帐篷，所以也就不可能在这么冷的地方露营。为了御寒，我穿了从北京带来的皮大衣，脚上套了羊皮缝制的长靴。为了预防雪盲症，我不但自己戴了墨镜，还把多余的两副借给了我的随从，没有墨镜的人就带一种用牦

牛毛编织被藏族人称为“米格拉(mig ra)”的眼罩[5]。所过之处，村民们都非常友好热情，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就能找到借宿的地方。购买补给品也非常方便，村民们做买卖时都显得非常有绅士风度，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要的价钱却低得让人不好意思。顺便说一下，离开折多村直到云南丽江的这大概一个月时间里，我再没遇到过汉族人，我的那点儿汉语优势也就没什么用了。

藏族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石头砌成的，窗户很小，室内的光线也就不好。由于直接在室内用明火取暖、做饭，气味也不是很好。藏族人的住宅窗户小，主要是因为糊窗户的纸张在当地属于稀缺资源，所以他们不可能像中国内地的人家那样，安装面积很大的窗户。通常来说，藏族人住宅外部的规模跟内部的实际面积并不相称。很多住宅外面看起来足有两三层，里面的房间却很小，还塞满了各种家具。如果某栋住宅有两层的话，那么一层多数区域就不是用来住人，而是养牦牛的。住宅的二层跟一层通过木制楼梯连接，二层的房间主要用作粮仓和储物间。有些人家条件比较好，可以为我这样的借宿者提供单独的房间，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我必须跟这个家庭的男女老少，甚至某些动物，共同分享一个房间。这样一来也就睡不太踏实。传统的藏式住宅没有壁炉、烟筒之类的东西，就是直接在屋子中间挖个火塘，燃烧产生的烟气只能通过门窗或者墙上专门开的洞排出去。这样的排烟效果当然不会很好，所以在屋里待着就有点儿熏眼睛，屋里的墙壁、家具也都被熏成了黑色。

每天晚上找到借宿的地方后，我们就围着火塘坐着，吃自己带的糌粑。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则在边上卖力气地为我们打酥油茶。打好的酥油茶被倒在个大罐子里，每个人根据需要再往自己的小碗里倒。藏族人的茶叶要比汉族人的茶叶粗糙很多，几乎都是用已经长老的茶树叶子甚至嫩枝做成的。这种茶要加大量的酥油饮用，感觉跟菜汤差不多。藏族人用牦牛奶做酥油的同时，还能生产一种近似奶酪的副产品[6]，我觉得比较好吃。我的藏语半生不熟，即便在我那位拥有一半藏族血统的仆人帮助下，也很难跟当地人顺畅地攀谈。好在，我很快发现了几个能很快引起他们兴趣的话题，比如峨眉山的寺庙和僧人，四川的风土人情，还要我那条狗吉姆跟中国本地狗的区别等等。当这些

生活在雅砻江沿岸的居民看着吉姆遵照我的命令趴下或者用两条腿站起来，再或者用鼻子顶着团糌粑来回走的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我可能是位具有某种法力的巫师。



清代藏族贵族女性

生活在不同山谷里的藏族人似乎都拥有一种不同的方言，我那位精通藏语的仆人也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遇到我以前，当地的居民应该从没见过英国人，可能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英国这个地方。当我介绍说自己来自一个中国以外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有自己的国王时，他们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据我观察，当地居民能见到汉族人的机会恐怕也不是太多，因此他们对负责护送我的那三位汉族士兵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当地孩子觉得我很可能是来自某个地方的妖怪，动

不动就会被我的长相给吓哭了，这样我觉得挺过意不去。旅行途中，打箭炉土司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发挥了很大作用。凭借这张通行证，我们在途经的每个村子都换了骡子。如果没有骡子的话，就换牦牛。要是连牦牛也没有，村民们(经常是女性)就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当脚夫，替我们驮东西。女性的出现调剂了枯燥的旅程。负责护送我的那3名士兵虽然不懂藏语，却也乐得跟她们调笑两句。很多时候，我都为当地村民的天真纯朴赶到惊奇。除了他们，世界上恐怕没几个人能这么放心地把自家女人派出去，替几个陌生男人背行李。

生活在西藏东部的藏族人已经跟汉族人在外貌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男人普遍身材都比较高，体格强壮，高鼻深目，具有某些欧洲人的特征。相比拉萨等西藏腹地的藏族人，这个地区的居民体质明

显更好一些。他们是天生的登山者，面孔几乎从落地就带着健康的古铜色，这种肤色让他们跟缅甸人又有几分相似之处。藏族男人喜欢穿羊皮或牦牛皮的袍子，为了保暖，脚上的皮靴筒经常可以长到膝盖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族人的袍子跟苏格兰人的短裙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藏族女性平时也穿裙子，不像中国内地的汉族女性那样缠足，所以她们走起路来更加灵便。只可惜，当地的气候让她们的肤色变得很深，皮肤也显得有些粗糙。相比汉族女性，藏族女性更开朗活泼，也更好动。她们可以像男人那样翻山越岭，可以像男人那样长途负重，遇见丈夫以外的男性也可以大方自然地主动打招呼。

马可·波罗应该是到过西藏的边缘地带的。据他描述，这个地区的风土民情非常独特，对旅行者具有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吸引力。近些年来到这里游历的古柏先生[7]在《先驱者的旅行(travels of a pioneer ofcom mence)》中提到曾在游历途中偶然遇到过一场藏式婚礼，他稀里糊涂地就加入了进去，坐在核桃林里，吃了顿免费的野餐。这片山谷里的核桃树挺多，我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来这个地方以前，打箭炉的土司和汉族地方官曾反复告诉我说路上不太平，到处都是强盗。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从没丢过钱或行李，就连糌粑都没丢过，更没见过那些传说中的强盗。马可·波罗曾描述说藏族人家里都养着跟驴一样大的狗，这样的狗我倒是见到了，只不过没那么大。对藏族人来说，

狗是重要的家庭成员，每户人家都会养上那么一两条。它们之所以没长成驴那么大，要么是马可·波罗的描述言过其实，要么就是这些狗的血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了退化。我在这个地区遇到的狗没有那种体型庞大的西藏獒犬，不过有些狗看起来已经跟个成人差不多了。它们体格强健，对陌生人的警惕性非常高。藏族人白天通常把它们用链子拴在院子里或屋门口，晚上就再撒开。入夜以后，任何胆敢在村子里瞎溜达的陌生人都将承担极大的风险。藏族人养的狗叫声比较特别，低沉浑厚，好像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不像欧洲狗叫得那么尖利。

我们途径的村庄大多处于农田的包围当中。即便位于高山峡谷，这些田地还是得到了极好的照顾，产量不错。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耕地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很容易重新退化成森林。海拔升到10000英尺以后，仍然可以见到耕地，这种耕地主要用于种植青稞和玉米。海拔较低的山谷里，作物则变成了黑麦、燕麦、黄豆和豌豆。即便海拔13000英尺的地方，仍旧可以看到农耕的迹象，作物品种和产量也都不错。耕地以外的野地上生长着很多欧洲人没见过的野花，这些野花在幽深的山谷里生长得特别茂盛。山谷两侧海拔14000英尺以下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树种主要是松树和冷杉。相比松树，冷杉明显更适应高海拔气候。它们生长的山坡高度可以比松树再高2000到3000英尺，达到16000英尺左右。

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这个地区雪线的高度是不稳定的，不过平均海拔不会低于16500英尺。我自己经过的几处垭口海拔明显低于这个高度，不过据当地人说，那里的积雪全年只有夏季的两三个月才会融化。除了松树和冷杉，这个地区比较常见的树种也都是针叶树，比如云杉和杜松，还有常绿的紫杉和柏树。海拔8000到12000英尺之间，可以见到杨树、马栗和野樱桃树，以及常绿的柞木。高大的树木底下，通常生长着茂密的灌木和花草，比如黑莓、山茶、荚蒾、艾蒿、某种绣球科植物、铁线莲、鹅莓等。野花在海拔高的山地并不常见，不过在雅砻江及其他河流附近的河谷里，我发现了数不清的开花植物。只可惜，我不是植物学家，也就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能稀里糊涂地欣赏它们的美丽而已。据我猜测，这些野花应该包括野生的玫

瑰、雪绒花、龙胆属植物等，其中的很多品种应该是此前从未发现过的。

如果此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植物学调查，或者为了打猎，那么眼下也就该心满意足了。然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个猎人，也没带猎枪，偶尔开那么两枪只是为了调剂调剂伙食。更多的情况下，我可以跟那些野生动物互不相扰，也没有研究它们的兴趣。麝和鹿应该是这片大山里数量最多的动物，除此之外，还有狼、狐狸、羚羊、熊、豹子、野驴和野山羊。渡过雅砻江以后，我的随从们强烈要求每天夜里宿营的时候必须生火，还要求我时不时地开那么两枪，以便吓走野兽。据他们说，野兽即便没有吃人的打算，也可能被骡子吸引过来。那些骡子似乎也受了本能的驱使，每天入夜后总是待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倒方便了第二天早上找到它们。

我们这一路上走过的地方海拔应该在12000英尺到17500英尺之间，很多位置都处在雪线以上。翻山越岭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然而只要不下雪、不刮风，路也就算不上特别难走。越往高处走，温度越低，厚重的皮毛也无法令身体保暖。随着海拔上升，空气逐渐稀薄，行动变得不方便起来，就连骡子每走100码左右都得停下喘口气，所幸我本人还没出现任何高原反应的症状，只是觉得非常累。我们的速度越走越慢，从日出走到日落，每天通常也不超过10英里，最多到不了12英里。走在高高的山顶上时，经常能遇到没过整个人的积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在雪上挖出通道，供自己和骡子前进。尽管环境非常恶劣，每个高山垭口附近却都能看见此前无数代旅行者留下的玛尼堆。看见这些玛尼堆，我的随从们就会发出高兴的喊声，还要亲手为它添块石头或者挂面经幡。与通常的经验相反，这个地方下山并不比上山容易。道路实在太陡，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小型的雪崩，积雪裹挟着巨石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去。

总的来说，这条路上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没有超出我事先的预期，我也从未对自己拒绝了打箭炉土司和那位汉族地方官的好意而后悔过。每天的旅行虽然让我感觉筋疲力尽，然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果某些人能够因为我这次旅行对中国西南地区发生兴趣，步我的后尘，那我就更加不虚此行了。只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特别是

有个好胃口，同时拥有一颗始终年轻的心，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打起行囊，来到这里享受旅行的乐趣。我将很愉快地看到那些跟着我的脚印来到这里的人欣赏到与我眼前相同的壮丽景象，在群山和丛林当中对自己、对这个世界产生新的体认。对于那些热衷于旅行的人来说，本书描述的这条从中国西藏前往云南省的道路将拥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的经历也将对他们未来的旅行提供足够的借鉴。

我从打箭炉走到云南的这条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打箭炉到雅砻江畔的八窝龙，总共历时11天;第二个阶段是渡过雅砻江后从江的西岸走到木里的喇嘛寺，用了7天;第三个阶段是从木里到永宁府，也就是云南的西北部，这段路走了3天。

这次旅行的前两个阶段刚才已经有所描述。4月17日，也就是离开打箭炉的第三天，我们连续穿越了三条漫长的河谷。这三条河谷都有人居住，零星点缀着几个规模不大的村庄，我遇到的第一个村子名叫“士司德龙[8]”，距离阿德村大概三英里远。告别这个村子，我们很快进入了第二条河谷，先是朝着西南方向，后来逐渐改为朝着正西方向前进。没过多久，我们抵达了第二个村子扎日古[9]。从这个村子再往前走，翻过座小山，沿途经过几间孤立的农舍，就到了第3个村子陵夷德龙[10]。我们就在这里，这个村子的人查验了打箭炉土司开具给我的特别通行证。查验通行证后，我们向南行进，很快就来到了第三条河谷，沿着名叫“扎济曲[11]”的河流左岸行进。我发现这条河谷里的居民普遍患有“大脖子病[12]”，这种情况在云南和四川的高海拔地区也比较常见。



土司官寨的碉楼

同样是在这条河谷当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那种八角形的石头宝塔[13]，这座宝塔在当地非常引人注目，应该跟吉为哩[14]当年在藏区更北边看到的那种宝塔属于同样的类型。巴伯尔应该只是读过他的《金沙江(river of golden sang)》一书，却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留下了这样的描述:

> 这些建筑物的用途目前还说不清楚，不过有理由相信它们可能是某种水塔。它们普遍出现在雅砻江以东地区，过了雅砻江以西就看不见了。

我的经历可以算作对这段描述的补充。类似这样的宝塔，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但它们决不会出现在日瓦[15]以西的地方。按我行进的速度来说，日瓦距离雅砻江差不多还有5天左右的路程。至于这些八角形宝塔的用途，其实主要是充当瞭望塔使用的。由于这样的原因，它们总是被修建在视野开阔的制高点上。通过近距离观察，我觉得这些宝塔不但是瞭望哨，也是作战用的工事。遇到敌人来袭的时候，周围的村民可以把自己的牲口、家畜赶进宝塔的底层，自己躲在

上层。躲在宝塔里的人可以通过墙上的窗户兼射击孔向外投掷石块之类的东西，这种建筑物跟苏格兰的很多城堡原理是一样的。类似这样的宝塔我在路上遇到了不少，却从没有士兵从里面出来盘查过我。它们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废弃不用了，少数保存完好的宝塔也只是被大家当成粮仓和储藏室使用。有些村民则干脆把这种宝塔改造成了自己住宅的一部分。



河谷边的碉楼

进入第三条河谷后，我们轻松地走了两三英里，通过一座木桥过了扎济曲河。这条河是由河谷里的很多小河汇聚而成的，水量不小，这些水最后都流进了雅砻江。

过河后，沿着扎济曲河的河岸走了段距离，道路无法继续通行，我们转向暂时离开了这条大河。抵达仁棹[16]村后，第二次有人查验了土司颁发的通行证，随后又在名叫巴鲁[17]的地方查验了第三次，这个地方总共只有一间孤零零的农舍。

我们在4月17日这天总共走了大概16英里的距离，入夜后留宿旁布西[18]村。村子所在的河谷基本是北北东、南南西向的[19]，河谷里有条小河。我们的宿营地在河的左岸，河的右岸偏东南方向还有些房屋。离开这道河谷后，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沿着扎济曲的右岸行

进。就在这一天当中，同样的河至少出现了三个名字。后来我们经过了一座已经损毁的八角形宝塔，这座宝塔位于河右岸200英尺左右高的山上。此时，周围的高山已经笼罩在云雾里看不见了，路上遇到的山普遍都比较低矮，路的两侧散布着很多大片的牧场和森林，绵羊、山羊、牦牛、马，还有猪挤在一起吃草，大家相处得非常友好。

继续往前走了两华里，遇到了第二座宝塔，这座宝塔比刚才那座明显高了些。再往前走，扎济曲的河面逐渐变窄，名字也改成了“阿米奇扎[20]”。这是当地人根据他们的习惯起的名字。河两岸的山坡上覆盖着大片森林，不过采伐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个地区的树木非常多，所以居民们也就不太懂得珍惜它们，乱砍滥伐现象严重。我们又往前走了大概20华里，走出林区，来到一片开阔地，然后通过一座精致的木桥过了河，来到河的左岸，这条河当地人称为“里曲[21]”。那之后没多久，我们在另一道河谷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这座房子基本处于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的方向。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吃了糌粑当午餐，然后离开了里曲，进入河谷，朝着东南方向继续行走。这个河谷里也有条大河，名叫“扎曲[22]”。我们沿着路况非常差的山路走了5英里左右，两侧山坡上照旧是茂密的树林。这之后，又一道河谷出现在眼前。这道河谷是西南方向的，入口处恰好也有栋房子。房子的主人是这个地区老百姓的头人，他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舒适的房间过夜。过去的2天，我们走得还算顺利，不断地穿越河流和河谷。

告别那位好客的头人，艰苦的旅行又开始了。那天早上阳光明媚，但气温非常低。头天夜里下了霜，我们出发的时候河里还看得见冰碴儿。这次的路线是沿着山谷向南走，每走几英里，海拔都要升高一点儿。后来，我们来到了一片林中空地，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两侧的山坡上覆盖着成片的松树。海拔继续上升，我们登上了名为“丹噶[23]”的垭口。这处垭口所在的大山脚下有个村子叫“硕第巴泽[24]”，我们已经在那儿提前换过了骡子。进入垭口后，山路明显变窄，海拔急剧上升。当天中午，我们终于爬上了这个垭口的海拔15000英尺的最高点，这个地方依然可以看到树木。再往前走又是下山的路了，海拔又开始快速下降。我们下降了大概3000英尺，又进入了一道植被茂

盛的河谷，这个地方生活着野鸡和其他多种禽鸟。眼前很快又出现了条河，这条河位于我们刚刚通过的那道垭口偏右的位置，流向是东北东到西南西方向的。这条河的水量非常充沛，我们沿着它的右岸向东行进，走了不到半英里，遇到了名叫“杜里[25]”或者“泸里[26]”的小村子，就留在村子的某个仓房里过夜。跟之前遇到的那些村民不同，当地人似乎非常害怕我们，刚开始并不愿意跟我们有所接触，不过后来大家的关系就融洽多了。这条河的两岸非常宽阔，适合耕种，村民们种植的主要作物是青稞，也就是制作糌粑的原料。虽然距离我们早上离开的那个村子只有几英里远，这个地方的人的方言却有了很大变化。事实上，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缺少交往机会，处于不同山谷中的村庄似乎都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

第二天早上，我们天刚亮就出发，走了几百码的距离，便离开了有耕地的区域。接下来的路线照旧是沿着那条河的右岸行进，不过方向逐渐变成了南南东。就这样又走了一会儿，我们通过木桥过河来到左岸，然后继续顺着河谷走了3英里，进入了面积几平方英里的小平原地带。我们路线的方向随即调整为朝向正南，走了半英里，遇到了两个距离很近的村子，分别名叫“三卡子[27]”和“下城子[28]”，然后就在那里查验了通行证。行走过程中，我注意到山路右侧的山坡上有不少人工开凿的洞穴，它们跟岷江沿岸的那些山洞没有关系，据说是当地牧人用来临时休息的。距离这两个小村子不远的地方，飘扬的经幡显示着当地人墓地的位置，他们通常习惯火葬。

我们所在的位置相比此前到过的地方明显更贫瘠些，树木稀少，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离开那两个村子，继续向南南西方向走了两英里，就到了德拉舍[29]村，当地人查验了我的通行证。这个村子非常贫穷，几乎处于半废弃的状态。从下城子村到德拉舍村的路上，我见到了座规模非常大的玛尼堆。再往前走一英里多点儿的距离，是东谷[30]村，前面提到的八角形宝塔从这个地方再往西就没有了。

继续往前走不远的路就到雅砻江了，不过沿途已经很难再找到借宿的地方，我是第二天早上才意识到这种情况的。这天的旅行从攀爬孜足拉雪山[31]的垭口开始。我们沿着条河的右岸朝着南南西方向行进，沿途都是崎岖的山路，山顶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路两边只能

偶尔看见些树木或灌木，长势还不是特别好。我们从地势相对平缓的山坡爬上垭口后，沿途开始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沟壑。这些沟壑的底部生长着针叶树和杜鹃花。距离垭口制高点的最后几百英尺山路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个地方的海拔已经达到17500英尺左右，周围完全都是冰雪的世界。从郭日棹[32]到垭口的最高点，我们始终都在爬山，就这么走了差不多半天时间，再没看见房屋和耕地。站在垭口制高点四处眺望，前后都是连绵不断的大雪山。据那些赶牦牛的脚夫说，这个垭口里的雪从来也没化过。

屋漏偏逢连阴雨。登上垭口后，西风裹挟着冰雪迎面扑来。气温低得厉害，那种感觉就好像整个西藏东部大雪山上的凉气全跑到我们周围来了。开始下山后，天气变得更坏了，暴风雪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我们连身边的人都看不见。就这么艰苦跋涉了12个小时，我们兴奋地找到了规模还算比较大的黑佬[33]村。这个村子的头人当时恰好去打箭炉办事了，我们就在他的家里借宿。他的房子非常宽敞，通风条件比普通藏族人家好得多。据热情招待我们的头人妻子说，头人去打箭炉是为了打官司，这场官司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了。

村子所在的这条河谷被称为“孜足隆[34]”。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它应该也是原古冰川留下的遗迹。第二天早上告辞的时候，天还在下雪，我们走了3英里左右，回到昨天的那条路线上继续行进，跨过从雅拉雪山上流淌下来的这条大河，再次进入美丽的平原地区。这块平原四周青山环绕，面积不大，却可以为成群的牦牛提供充足的木材，我们还看见了3座用圆木建造的小屋。进入平原地区后，路线转向西南西方向，眼前很快出现了另一道高山垭口，名叫“五树拉[35]”。垭口所在的大山海拔15500英尺左右，几乎全部覆盖着森林。上山的路刚开始很陡峭，后来逐渐变得平缓，临近山顶的时候又变得陡峭起来。下山的路照旧是在森林中穿行，海拔较低的地方有个叫“五树[36]”的小村子。这个村子所在的平台区域面积不大，穿行过去的路程也就不到11英里的样子。五树村周围的景色美得让人惊叹，村子附近的池塘边有座废墟。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座八角形宝塔的遗迹，却拿不出充分的证据。

4月23日，我们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天还在下雪，路上也积满了

雪。这天的跋涉应该是我从北京以来，整个旅程中最艰苦的。离开村子不久，我们就开始冒雪爬山，登上位于南南西方向的森格拉这段路程足有5英里，海拔上升到了15000英尺。所幸，就在我们即将爬上山顶的时候，雪停了，天空中重新变得阳光灿烂。站在山顶，看着周围被绿色森林衬托着的白色雪山峰顶，感觉心旷神怡。过了垭口，海拔很快下降了2000英尺，我们进入到一条小峡谷当中，然后逐渐又上升了3000英尺，来到海拔16000英尺左右的乃玉拉[37]垭口。过了这道垭口，山坡变得相对平缓，我们下降到河谷里，直接从已经封冻的河面上走了过去，继续攀爬第三道垭口。这道垭口被称为“汗格拉[38]”，海拔据说在17200英尺左右。这是我们此次旅行最艰难的登山行动。[39]垭口。

登山过程中，我留心观察了将这三座大山分隔开的那些沟壑里生长的茂密森林。这个地区存在着明显的耕种痕迹，成片的树木都被人为放火烧掉，开辟成了耕地。从打箭炉到云南的一路上，类似这种放火烧荒的现象屡见不鲜，上千英亩的上等木材就这么被白白浪费掉了。据当地人说，很多地方的森林其实不是他们放火烧掉的，而是某些粗心的旅行者离开临时宿营地时忘了彻底熄灭火种。赶上刮风的日子，几个火星儿就能烧掉整片的森林。话虽这么说，据我观察，很多起火点根本就是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所有当地森林火灾除了人为因素，肯定还存在某些无法解释的自然原因。

除了火灾，这里的森林还需要面对更危险的敌人。但凡来到这个地方的旅行者，恐怕很少有人不会注意到那些缠绕在树木上的寄生植物。这些植物生长非常迅速，有时甚至可以把相邻的几棵树捆在一起。长此以往，它们就能慢慢把树勒死。我在路上就遇到过不少已经完全干枯了的大树，那些杀死它们的植物却依旧生长旺盛。更可怕的是，这些寄生植物可以借助风力快速传播，很容易就能从一棵树上窜到另一棵树上，逐渐杀死整片森林。对付这些寄生植物的方法只能是人为地在已经受到攻击的树木周围砍伐出一片“防火带”，以免它们继续传播。遗憾的是，这里的很多森林目前仍处于人迹罕至的状态，大清帝国的地方官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里还要顺便说句，我觉得，那些无法解释的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那些

被寄生植物杀死，已经完全干透的枯树的枝干在风力推动下相互摩擦发热造成的。

从汗格拉垭口下来后，我们进入了一条地形崎岖的漫长峡谷。海拔逐渐下降，我们来到了一块面积挺大的平原地区，再往下走，海拔下降的幅度明显增大。经过漫长跋涉，我们在名叫“银镯[40]”的小村子找到了过夜的小木屋。这个村子下方的平地上种着成片的大麦和燕麦。

第2天早上，我们离开村子，沿着原路往回走了2到3英里，回到了此前的路线上，接着爬山，翻越海拔16500英尺的日格拉[41]垭口。就像以往那样，我们首先穿过了茂密的丛林，然后就进入了终年积雪的地带。糟糕的是，这个地方的雪比别的垭口都厚。下山的路非常陡峭，我们损失了一头骡子。翻越垭口后，我们朝着南南西方向行进，再次进入丛林，沿着一条山谷快速下降了上千英尺。当天下午，雪就看不见了，我们来到了一片颇具热带风情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茂盛的植被里混杂着很多竹子，这些竹子非常脆弱，用两根手指就能折断。高大树木下面，各种灌木和花草竞相开放，就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天上忽然落下了雨点。这充分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海拔相当低的地方，而且非常靠近雅砻江了。当地有个村子名叫“白泰[42]”，海拔10000英尺左右，我们就留在那里过夜。来到这个村子前，我们还翻越了菩提拉[43]垭口，它的海拔只有11000英尺不到，爬起来还算容易。白泰村里有个拥有三座金色屋顶大殿的喇嘛寺，当地人以此为荣。招待我们的头人家就在这座寺庙的边上。

离开这座村子，我们开始了向雅砻江行进的最后一天。我们首先沿着村子里的路下山，下降到山谷当中，山谷里的风非常厉害，道路上还出现了多处塌方。好在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地方有不少野花，很多野生果树也都开了花，小草都是嫩绿的颜色，松鼠是这里最常见的动物，到处都能看见它们漂亮的长尾巴。绿色的大鹦鹉也很多，它们的长尾巴可以跟松鼠媲美。我们沿着山路进入了蓝衣坝[44]河谷，就在河边的独栋农舍里吃了午饭。农舍的女主人拿出3个鸡蛋送给我当作额外的加餐。告别女主人，我们沿着山路兜了几个圈子，著名的雅砻江赫然呈现在眼前。

我们继续沿着山路行走，路的拐角处突然出现了个类似检查站的地方。驻扎那里的士兵查看了我的通行证，还要求我用自己的枪朝着山下开一枪。士兵们说这是所有旅行者来到八窝龙都必须遵守的风俗，我也只能入乡随俗。后来听当地人说，八窝龙这个村子相对比较富裕，经常有强盗光顾。要求外来的人提前放一枪目的就是为了给村民们发个信号，表明自己没有恶意。放完枪后，继续沿着山路往下走，路很陡峭，好在不长，我们很快就进了八窝龙，每个见到我们的村民脸上都带着害羞的微笑。

八窝龙所在的位置是一块坡度较缓的山地，面积不大，可耕地非常多。当地人主要种植青稞、大麦等粮食，还有各种蔬菜。靠近雅砻江的地方比较陡峭，只有那里还保持着未开发的状态。八窝龙的海拔在7700英尺左右，雅砻江比它还要低200英尺。这个村子是由一个大村和两个散布在河谷里的小定居点组成的，人口差不多2000，应该是我们离开打箭炉以来遇到的最富庶的村庄。来到八窝龙，意味着我们从冰雪覆盖的高海拔地区来到了温暖宜人的平原地带。抬眼四望，覆盖着白雪和森林的群山依旧震撼人心。恐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也忘不了穿行其间的那段独特经历。阳光照射下，那些雪山显得挺拔而圣洁。事实上，从黎明到深夜，你都可以发现它们独特的美，那种美只要看过一眼，就终生难忘。西方的很多诗人都曾用自己的笔描绘过阳光照射下的阿尔卑斯山，并且认为那个时候的雪山是最美的，然而正如拉斯金[45]认识到的那样，夜幕中的雪山其实具有一种更独特的美。相比那些受到过多尘世熏染的风景区，人迹罕至的地方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那里的山谷、森林、河流美得可以直击你的灵魂深处，可能只有宗教带来的体验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正如约翰·丁达尔[46]所说:

> 这些拥有圣洁白色的山峰可以激发人对自然的崇拜之情。

我觉得，欣赏这样的美景时最好一个人独处，因为朋友间的交谈会破坏美景带来的那种感觉。那些身在群山、雪原、海上，甚至空中的旅行者其实只要带着自己的眼睛就足够了。对这些美景来说，任何导游词都是多余的，你只需要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沉浸于跟同伴的交谈当中，不停地议论着大山如何如何雄伟，日出如何如何绚丽的人

永远无法领会美景所蕴含的真谛，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的机会。有鉴于此，美景还是应该留给自己独享。很多时候，自然景观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无法完全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即便文学大师的手笔，也只能触及它们的皮毛而已。无论诗歌、散文或者口头文学，无论多么华丽的文笔、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取代你自己的感受，那是种触及灵魂的感受。那些热衷亲近自然的人都知道，只有当你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大自然才愿意真正对你敞开心扉，由此所得的乐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置身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每个人都将成为自己灵魂的绝对主宰。孤独可能是一种容易引发悲伤的处境，然而很多情况下，享受孤独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体验，特别是当你欣赏自然美景、艺术品，或者需要激发某种高尚情感的时候。享受孤独的机会其实非常难得，由此带来的体验往往稍纵即逝，即便如此，这样的机会仍然可以成为我们暂时摆脱、躲避尘世纷扰的精神家园。

【注释】

[1] Pa u rong，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八窝龙乡。

[2] Cheto，今四川省康定县炉城镇折多村，这个地方因折多山得名，过了折多山就进入了藏区。

[3] 作者接下来的路线基本是在康巴藏区的东部的横断山区朝着西南方向兜了个圈子，大致经过了今天的甘孜、木里两个藏族自治州，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省境。

[4] A te，今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下雄乡阿德村。

[5] 近似纱网，可以罩在眼睛上，遮光又能看见东西。

[6] 应指奶渣。

[7] Mr Cooper，考察康巴藏族的第一个英国人，1868年到理塘等地游历。

[8] du sz drung音，本书这两章出现了一些威妥玛拼音标注的藏语小地名，作者标注的本身就不是特别准确，译者将尽量依据各种史料准确翻译，实在无据可查的只能结合藏语地名特点直接按原文音译，同时标注原文，供读者指正。

[9] dza rigu音。

[10] ringidrung音。

[11] dja kichu音。

[12] 即缺碘引发的甲状腺肿。

[13] 作者说的是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古碉楼。

[14] Willian Gil ，英国人， 1877年经巴塘南下云南。

[15] ri wa，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城香格里拉镇。

[16] ringidrung音。

[17] balu音。

[18] pun bu shi音。

[19] 原文为NNE和SSW，属于地质学术语，比日常使用的方向名词更精确，NN E可以理解为北北东方向，也就是介于北和东北方向之间，更靠北一些;同样的道理， SSW就是南南西，类似这样的术语后面还有出现。

[20] a mi chi tsa音。

[21] li chu音。

[22] tsa chu音。

[23] tan gala音。

[24] sho tiba dze音。

[25] tuli音。

[26] luli音。

[27] San chiatzu，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东谷乡三卡子村。

[28] hsia cheng tzu音。

[29] dra she音。

[30] Chung ku，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东谷乡东谷村。

[31] djidjula音。

[32] ko ridrung音。

[33] heilao音。

[34] djidju rong音。

[35] wu shu/shih la音。

[36] wu shu音。

[37] sin gola音。

[38] naiyula音。

[39] hlan gola音。

[40] yin cho音。

[41] rigola音。

[42] peitai音。

[43] pu tila音。

[44] lan yipa音。

[45] John Ruskin，英国作家、哲学家。

[46] John Tyndall，具体身份不详。

第十一章 从八窝龙到木里

彝族人—邓明德神甫—雅砻江溜索—鼠疫地带—偷鸡—内讧—喇嘛灵塔—伊甸园

过了雅砻江，就意味着我们离开了打箭炉土司控制区域的西部边界。到了这个地方，土司派来护送我的那位强壮、忠实的随从就沿着原路返回了，那3名汉族士兵则将一直陪着我走到云南省境。告别前，土司派来的随从还特意先到江对岸游说了一番，向那边的人说明了我的身份，请求他们尽量为我们提供帮助。这样的游说非常有必要，因为土司的特别通行证出了这个界线就成了废纸一张。

还在打箭炉的时候，土司的兄弟就曾告诉我说，抵达雅砻江后，应该去寻访一下“白骨头”彝族人的居住地，跟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彝族人主要生活在四川省的南部和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少数民族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金川河谷和长江上游地区，他们跟老挝、缅甸的某些民族存在明显的亲缘关系。彝族人分为“黑骨头”和“白骨头”两个群体，“黑骨头”彝族人属于贵族阶层，“白骨头”彝族人则是奴隶阶层，只拥有很少的人身自由。通常来说，只要本身不怀恶意而且事先得到过熟人引荐，欧洲访客可以受到彝族人热情友好的接待。遗憾的是，这个少数民族目前在西方受到的关注度仍然很低，通晓彝族语言的西方学者人数用一只手上的手指头就数得过来。根据曾在云南省传教的天主教神甫邓明德[1]编写的小册子，彝族人的语言演化出了很多种方言，不同部落的语言都可以有所差别。神甫甚至因此怀疑生活在云南的彝族人是否能够跟大凉山[2]的彝族人顺畅交流。

我的队伍来到八窝龙后留在原地休息了两天，随从们都放了假，我则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彝族人。事实证明，土司兄弟提供的消息非常准确，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们的聚居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

我的戒心非常强，甚至找不着一个人能给我讲讲这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我只得花了几个小钱，雇了一个胆子比较大的人，专门跟我聊天。这个人耳朵有点儿聋，不懂汉语，但能说几句蹩脚的藏族话，我们勉强可以交流。据这个人说，八窝龙附近居住的彝族人可以分为21个家族。1850年，为了躲避老家各个部落间存在的血仇，他们从越巂迁徙到这里居住。控制这个区域的打箭炉土司友善地接纳了他们，还提供了耕地，当然前提是每年按时交租。1864年前后，他们主动提交申请，正式成了打箭炉土司治下的老百姓，两个民族的关系由此变得更加和谐。目前，这地区的彝族人已经出现了很多藏族特征，就连他们的语言都是用藏文字母拼写的，不过当地彝族人里面能读写、有文化的人并不多。

彝族人内部互相以兄弟相称，他们信奉的神分别叫“巴勒尼部[3]”和“三多[4]”，后者据说就住在八窝龙东北方向的大雪山上。彝族人不实行土葬或火葬，而是把死者用裹尸布包好，直接投入雅砻江。他们当中最穷的人平时买不起鞋穿，只能打赤脚。每个家族的头人采取长子继承制度，头人如果没有儿子，他留下的遗孀可以过继个儿子继承头人的位子。这种过继子嗣的习俗跟汉族人是一样的。如果某个彝族人没有后代，也无法过继后代，那么他死后留下的财产就归当地喇嘛庙所有。这是从藏族人那里学来的风俗。通过和这个人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彝族人的神是可以跟着他们一块儿迁徙的。到了新的定居地，他们就将周围的某座山奉为圣山，当成神的居住地，所以不同地域生活的彝族人认为的神的居住地也是不一样的。八窝龙的彝族人虽然跟当地藏族人关系极为融洽，却依然信奉自己的宗教，没有皈依藏传佛教。他们知道峨眉山，也尊奉这座山为神山，却认为那座山上住着别的神。彝族人的神是跟山分不开的，就四川省境内的彝族人来说，大凉山就相当于他们的奥林匹斯山[5]。漫长的历史让八窝龙地区的彝族人正在逐渐遗忘自己的文化传统，出现了很多被藏族同化的迹象。滞留八窝龙期间，当地的某位老人(不是彝族)特地来拜访我。他自称天主教徒，20多年前在打箭炉，某位法国传教士让他皈依了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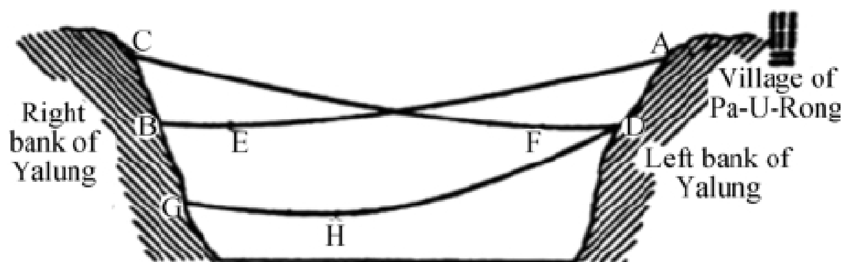
我在八窝龙照旧住在当地村子头人的家里。房东笃信佛教，更确

切地说，是藏传佛教。我借宿的房间是他家的佛堂，里头有个小型图书馆，收集了很多藏文书籍。从上面积累的尘土来看，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图书馆里还有不少扑克牌大小的卡片，卡片上有些潦草的文字和图画，那是驱邪用的符咒。

过江前往木里的头天晚上，我托打箭炉土司派来的向导给他的主人带封信，告诉他我已平安抵达八窝龙。土司把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形容得非常具有神话色彩，而我却没遇到什么太稀奇的事情，心里未免有了几分失落。话说回来，我没出什么事，打箭炉土司也就不会惹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对他的回报。

藏区的大路沿线，比如从打箭炉到拉萨的大路沿线，每道沟壑、河流都配备了相应的桥梁或渡船。相应的，那些走小路的人遇到沟壑、河流往往只能依靠索桥过河。我的那位彝族朋友曾去拉萨做过生意，他虽然没实际走过这种索桥，却多次见识过它们的样子。吉为哩先生在他的《金沙江》一书中这样写道:“使用索桥过河的人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根据吉为哩先生自己的描述，他应该没有为自己提供检验勇气的机会。现在，来到雅砻江左岸的我却必须要从索桥滑过去。

猛地看起来，这种原始的桥梁实在让人无法保持信心。雅砻江的索桥总共有两根，两根索桥互相间隔30码距离，其中一根是用来从左岸向右岸滑行的，另一根则是用来从右岸往左岸滑行的。左右两侧的江岸都非常陡峭，索桥就直接拴在江岸的石头上面，如下图显示的那样。



某个人如果打算从左岸到右岸去，就得从A点滑向B点，反之则要从C点滑向D点。A点和C点距离江面大概120英尺，B点和D点比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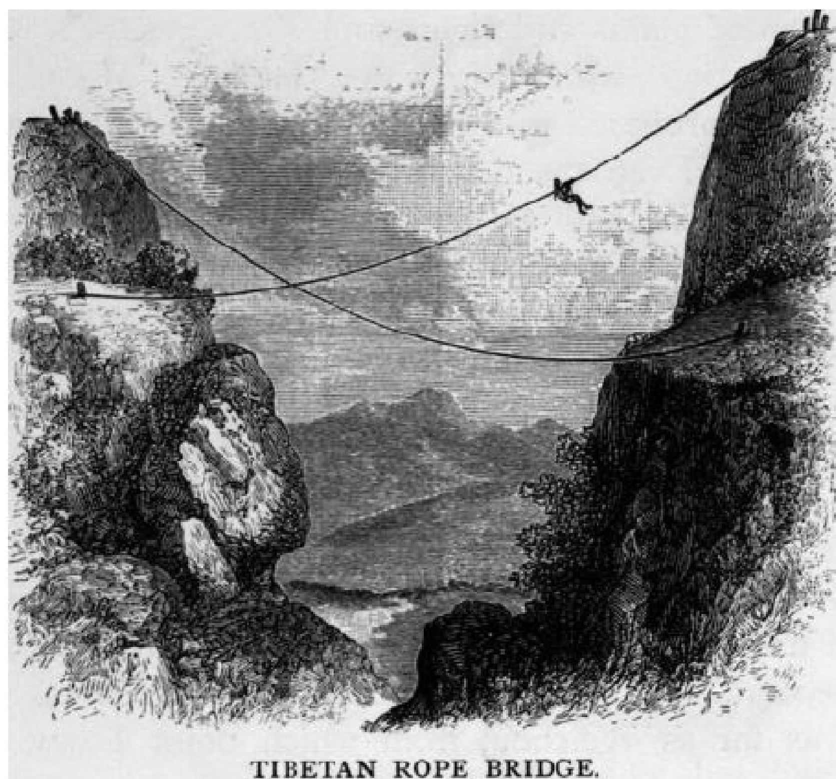
的位置低40英尺。当地人要想过江，需要准备半圆形的吊篮，还得戴上手套。吊篮和索桥通过竹子纤维拧成的绳子连接，过江的人坐在吊篮里，双手攥着那段绳子滑行前进。所谓吊篮，其实也就将将兜住屁股，过江的人两条腿都是完全悬在空中的，要想保命就不能乱动，更不能松开绳子。索桥不是紧绷在江两岸，而是松松垮垮地垂着。每条索桥都有它的最低点，也就是如图所示的E点和F点。抵达最低点前，过江者的滑行速度非常快，到了这个点以后就滑不动了，所以剩下的这点儿距离只能用双手交替拉着索桥，让自己慢慢前进。对精于此道的人来说，通过索桥过江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麻烦就大了。

更糟糕的是，原来用于从左岸滑向右岸的那根索桥已经旧了，不太安全，我们只能通过原先用于从右岸滑向左岸的那根索桥过河。为了便于滑行，索桥原先在右岸的固定点被从C点移到了如图所示的G点。即便如此，受这道索桥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依靠体重自然滑行过2/3的江面，抵达H点，剩下的1/3距离则只能完全凭借臂力一点点儿地向对岸挪动。这对体力实在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我和随从们对自己的体力都没这么大的信心，为了保险起见。上索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胳膊上拴了根皮绳子，把自己跟索桥连接起来。万一有人中途失手，这根皮绳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据说，某些类似的索桥会为过桥人提供能把整个下半身兜住的网兜，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减轻手臂承受的拉力。我们的运气不好，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只能全靠自己的体力和运气。

老天保佑，我们全部安全过江。我的狗吉姆也被破布包住，拴在吊篮里，慢慢地滑过了江。看得出来，像条咸鱼似的这么悬在雅砻江上让它非常不高兴。抵达H点后，问题来了，因为狗不可能伸手把自己拉过去。关键时刻，某位技巧高超的当地人使用额外的吊篮上了索桥，用绳子把狗乘坐的吊篮拴上。站在右岸的人再慢慢拉动绳子，把狗弄过去。接下来，我的行李也用相同的方式过了江。这样的场景应该非常有趣，江两岸村里的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必须承认，当我被挂上索桥的那刻，突然有了种死刑犯马上就要被吊死的感觉。如果稍有不慎掉进江里，那绝对必死无疑。下面的江水非常湍急，水面上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旋涡，水温也非常低，因为它们全部都是来自附近雪山的冰雪融水。

我从没听过当地的藏族人说过“雅砻江”三个字，他们称这条江为“尼雅河[6]”，汉族人直接音译过来，就变成了雅砻江。事实上，知道这三个字的汉族人也不多，他们更习惯称这条河为“金河(kin ho)”，“雅砻江”只是书本上的正式说法。当地很多河流名字里都带个“金”字，例如大渡河位于瓦斯沟[7]的上游河段被称为“金川”，长江的上游被称为“金沙江”等等，这可能是跟藏区东部和北部的河流普遍出产黄金有关。巴伯尔曾经提到，长江上游位于跟雅砻江交汇点以下，岷江河口附近的屏山以上的这个河段一般被当地人称为“金河”。珂罗蒂雅先生(Mr Cordier)在他编纂的那本《马可·波罗(yule's marco polo)》里指出，巴伯尔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犯了错误。因为中国人习惯把如此宽阔的河流称为“江”，而不是“河”。我在这里没兴趣过多地抠字眼儿。种种迹象显示，巴伯尔应该是对的，当地人不但把上面提到的长江江段称为“金河”，还认为雅砻江就是这条河的源头和上游，就像他们把岷江当作长江的上游一样。巴伯尔无疑不知道雅砻江也被称为“金河”，所以他也就无法讲清楚为什么长江跟雅砻江相汇的这个江段被叫作“金河”的原因。清廷发布的官方文献在地名使用方面相对规范得多。官方文献提及位于四川境内的长江江段时，通常只使用“扬子江”和“金沙江”两个名字。至于藏区内的各种地名，他们通常都会根据藏语发音提出对应的汉字音译。至于长江跟雅砻江汇合的那个江段为什么会被称为“金河”，我个人的理解是，雅砻江比这个江段的长江看起来开阔得多，因此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西藏的索桥

通过索桥“飞”过雅砻江，我们继续行进。过江后，首先沿着山坡向上爬了1500英尺，然后就在贫穷的小村子朱穆[8]过夜。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清晰地看见对岸的八窝龙，我目测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12华里。从雅砻江左岸来到右岸，当地藏族人的方言再次发生了变化，就连某些风俗习惯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那位精通汉语和藏语的仆人感觉非常头疼。相比雅砻江左岸，右岸的藏族男性身材好像要矮小些，女性则显得比较粗壮。这个地方男性的服装跟江对岸没太大区别，女性似乎更热衷佩戴各种饰品和珠宝，走起路来叮当乱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喜欢戴大得夸张的银质圆耳环，年轻姑娘还喜欢在耳环上拴很多彩色的穗子。雅砻江两岸的藏族女性还有种非常奇怪的习俗，就是在头发上戴一种银质圆盘或长条形状的饰品。这些饰品的直径从5英寸到1英尺不等，某些饰品采用了非常高超的加工技术，多数这类饰品则批量出自普通工匠之手，工艺相对粗糙。我买了几件这样

的东西留作纪念。

这些饰品的中心位置通常会镶嵌某种红色的装饰物，从远处看近似红珊瑚。除了装饰作用，它们据说还有辟邪的效果。据当地人说，雅砻江两岸每年秋季都会爆发鼠疫，不佩戴这种饰品的人很难幸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江、大河两岸似乎都有关于各种瘟疫流行的传说。例如，流经东京湾地区和中国云南省的红河两岸流行黄热病，而且往往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南北向横贯云南的怒江[9]两岸千奇百怪的传染病更是令那些试图去大理府或巴莫游历的旅行者望而生畏。为了避免鼠疫上身，雅砻江两岸无论男女都佩戴这种圆盘或条状的饰品。男人和男孩还要额外用丝线或链子在脖子上挂个小盒子，里面放上从喇嘛那里求来的各种护身符。当地人认为，这些护身符只有在自己的主人手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也就没机会实际检验它们是否具有效力。



藏族家庭

4月23日，过江后的第二天，我们只走了6英里不到。出发后先是在峡谷里穿行，然后朝着西南方向攀爬一片长满松树的山坡。当晚，我们在名叫“德本[10]”的小村子过夜，住的是当地头人提供的房子。这座房子远离其他村民的住宅，修建在悬崖边上，站在这里可以俯视

脚下奔腾的雅砻江。

4月24日，由于路况非常差，驮行李的牲口走不快，拖累得我们也无法快速行进。海拔逐渐上升了2000英尺，我们来到了巴松[11]村，这个村子牲口很少，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替换脚力，所以接下来为我们驮行李的只有一头牦牛和3位藏族女性。经过这个村子的时候，负责护送我的一位汉族士兵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从当地村民手里搞到了一只活鸡，然后就把这只鸡悄悄交给那些驮东西的藏族女性背着。直到当天晚上借宿的时候，我才发现了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作为惩罚，我训斥了那位士兵，掏钱把鸡买下来，自己吃掉了。士兵们找麻烦，牦牛也不安分。当天中午休息吃糌粑的时候，那头牛居然在森林迷路了，大家怎么找也找不到它。最后还是牦牛的主人，也就是负责赶牛的小男孩发现了这头牛。这次事件让我想起来某位英国诗人写的诗，这首诗盛赞牦牛是种非常有用的牲畜，而且能够时刻激发诗人的灵感。据我看，就像中国内地的小孩普遍跟水牛相处得不错一样，藏区的小孩大多都是驾驭牦牛的高手。这些牲口到了欧洲人手里压根儿就不听什么号令，弄不好还要发脾气伤人，中国的小孩却能把它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离开巴松村，海拔再次下降。我们来到河谷当中，这条河上有座生了锈的铁桥。河谷里植被茂盛，开放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粉的、红的、紫的、白的，五颜六色。我注意到这里生长着很多英国很常见，远东地区却非常稀有的常春藤。它们通常缠绕在树干上，依托大树生长。大树底下生长着很多蕨类植物，比如铁线蕨，这种植物在潮湿的河岸边最为茂盛，几乎挡住了我们的路。

我们横穿河谷，再次开始爬山，山路依旧崎岖难行。好容易走到腾八卡[12]村，我们照例在村子头人的家里借宿，我被安排住在头人家房子一层的佛堂里。这位头人长得非常英俊，头发又长又黑，弄成了个披肩发的造型，这让他在村民眼中具有了某种特别的威严。头人的房子紧挨着村里的喇嘛庙。这个村子的位置恰好在一条东北至东南走向的河谷的入口处，站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回望那些已经被甩在雅砻江对岸的大雪山。那条河谷的结构非常奇怪，它的内部横亘着很多小山脊。我觉得那应该是远古冰川的遗迹。

第二天出发后，我们爬上了距离村子最近的那道山脊。翻过山脊，一块植被茂盛的小平原展现在眼前，小平原的左侧就是悬崖峭壁。从山脊下到平原，海拔再次下降了1000英尺左右。平原上有个小村子，村子周围环绕着肥沃的耕地。我们径直穿过这个村子，然后才找了个地方休息，吃午饭。午饭过后，又开始爬山，沿途的林木越来越稀疏，最后只能看见几棵零散的白桦树。翻过这道垭口，眼前再次出现了平原地带，这个地方有条名叫“扎曲[13]”的大河，它发源于周围的雪山，将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一直陪着我们走到木里。我们选择的路线位于扎曲的左岸，位置比河面高几百英尺。当天晚上，我们在位于路边的房子里过夜，女主人端上了我吃过的那种类似奶酪的食物。我们借宿的那座房子周围还散落着几间农舍，它们组成了名叫“胡达拉[14]”的小村子。

5月1日早上，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这让我回忆起了英国美好的初夏时节。路边的树林里，布谷鸟不停地鸣叫。我们沿着河岸先向东南方向走了3英里左右，然后顺着河流的走向转向西南。这样走了大概一英里的距离，我注意到河对岸有个小村子。我们所在的左岸几乎跟那个小村子相对的位置有两间快要塌了的草房，大家就在那里吃了午饭。饭后休息的时候，护送我的两名士兵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打了起来。其中的一位士兵嗓门儿很尖，我把他称为“博拉金斯(Bloggins)”，另一位士兵则被称为“霍金斯(Hoggins)”。我还没来得及把事情问庆祝，霍金斯突然拔出刀来，做出要拼命的样子。那把刀并不具有太大的威慑力，因为平时根本不磨，几乎没什么刀刃儿。博拉金斯只是象征性地躲在了骡子后面。两个人隔着骡子互相咒骂，声音大得跟打雷一样。最有意思的是，闹了大概半个钟头，两人又和好如初，亲亲热热地坐在一块儿喝茶了。

午饭后，我们继续沿着河流的左岸行进。这条路的位置相对较高，视野开阔，却比较危险，走路时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河里。更糟糕的是，路面上还坑坑洼洼的。好在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缓解。从早上出发算起来，我们已经走了足足65华里。眼前出现了座喇嘛庙，它在这个地区非常有名，被称为“瓦金干姆巴[15]”。庙里的喇嘛表示无法容留我们住宿，大家只好继续往前走，来到达克阿[16]村。一直陪

伴我们的扎曲河到这个地方改了名字，变成了雅砻曲[17]。

某位西方诗人曾经说过，现代文明最大的悲哀就是让旅行者对沿途的那些野花野草失去了兴趣。我这个人非常走运地没太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样的兴趣。5月1日那个美好的清晨，我的心被路两边的野花不停地诱惑着。这些野花品种繁多，数量也非常大，五颜六色地盛开着，就连我的那些随从也忍不住摘上那么两朵，拿在手里。那些精心编织的花环跟我们风尘仆仆的衣服并不相配，替我们背行李的那三位女士也都相貌平平，似乎很难跟英国人印象里的夏季女神联系起来。我只记得她们当中长得比较好看的那位非常爱笑，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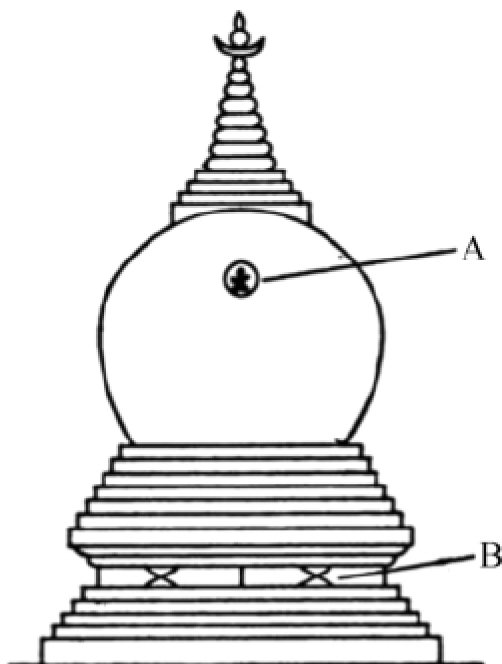
5月2日，道路两边的花草树木更多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英国花园爬满植物的篱笆墙。我们走了4英里，来到地势较低的地方，这里可以更清楚地欣赏扎曲。只见宽阔的河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汹涌的河水奔流不息。自从离开折鲁[18]村，我们头一次离这条河的河面这么近。扎曲到了这个地方又换了个名字，被称为“洞伊[19]”。河上架着一座大概50码长的木桥，我们从桥上过了河。前面已经说过，同一条河的不同河段在这个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从4月30日开始，扎曲至少已经改了7回名字了。我们至少还要沿着这条河再走3天，不知道它还要换多少次名字。据我观察，西藏地区河流改名的规律通常是以附近的村庄为准的，某个河段靠近某个村子，通常就会被以这个村子的名字命名。有些时候，河流改名则是以这条河流经的那道河谷为准的。

从地理学角度来说，某条河流始终保持用一个名字肯定是最方便的。问题在于，这个地区的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家乡，更不知道地图是个什么东西。在他们眼里，自己生活的村庄还有周围的山水就是整个世界，也就用不着费那个心思去琢磨自己家门前的河是从什么地方流过来的。事实上，我在雅砻江附近遇到的所有居民都不知道这条大河是从哪发源的，更不知道它要流到哪儿去。对他们而言，知道这些的确没什么意义。

过桥后走了大概一英里，扎曲变成了米曲[20]。再往前走，来自

东面河谷的巴赞曲[21]汇入了这条大河。继续往前走了几英里，河流走向逐渐向南偏移，最终指向了西南方向。我们沿着右岸行走，路越来越窄，河面也越来越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我觉得，这条河沿岸的景色虽然跟长江三峡和大渡河河谷有所不同，却拥有我们开始旅行以来最美的景致。我们又往前走了5英里左右，时间到了中午。路边恰好有两座小草房，大家就在那里吃午饭。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们还遇到了塌方。大量山石、泥土滚落到河里，河面变得更窄了。

吃过午饭再往前走，扎曲又变成了里曲[22]。这个河段的地形很复杂，河面有时可以宽达100码，有时却突然窄到不足30码。欣赏着沿途美景，我们不知不觉又走了几英里，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可以借宿的地方，大家只能在野外露营。我们露营的空地近处有座敖包[23]形的木顶方形石头建筑，这就是喇嘛灵塔[24]。这种形状的塔在西藏很常见，我画了幅草图。



A—Recess with miniature Buddha, on the S.E.side.
B—Conventional lions in relief, two on each of the four sides.

灵塔的造型非常简洁，没有太多装饰，正面朝向东南方向，按东南西北4个方向开了4个小窗口，窗口里有佛像。灵塔本身是石头砌起来，外面粉刷了白色的灰浆，大概20英尺高。柔克义在他的《喇嘛的故乡(land ofthelama)》里也提到过这种宝塔:

> 它们在西藏的数量非常多，通常建在喇嘛庙附近，主要的作用是标示通往寺庙大门的道路，与基督教“苦路十四处”上立的十字架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朝觐的人指路。

瓦德尔上校[25]对这种宝塔的描述更有意思。他认为宝塔代表了构成我们身体的5大元素。宝塔底部有棱角的部分象征土，往上的圆形部分象征水，三角形的部分象征火，顶部的新月形象征气，最上面的葫芦形结构象征以太[26]。据我个人观察，这些宝塔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充当死去喇嘛的坟墓，用来保存他们的骨灰。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跟中国内地以及缅甸等地的佛塔大同小异。



5月2日作者的宿营地

5月2日的晚上，大家就依靠着这么座宝塔露营。第二天，我们走进了条小山沟，这个地方四周都有高山遮挡，比别的地方又温暖了不少。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决定不再找地方借宿，直接露营，吃自己携带的糌粑等食物就成了。当天晚上找的那个地方非常理想，周围万籁俱寂，只能听见小溪潺潺的水声。月光映照着茂密的丛林，感觉真好像是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如果莎士比亚有机会来这个地方游历，那么《仲夏夜之梦(midsum mer night's dream)》[27]的背景恐怕就要变成中国西藏了。遗憾的是，除非飞机未来真的成了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像我们这样历尽艰难、辛苦跋涉，只为来到这里欣赏美景的人恐怕永远都是少数。话说回来，即便飞机真的成了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我也不希望它们飞到这里，破坏那片雪山环绕中的宁静。

the silence that is in the starry sky,

the sleep that is among the lonely hills。

寂静，满天的繁星;

沉睡，在寂寞的群山当中。[28]

人类文明无论怎么进步，也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几块不被我们打扰的地方。如果我的某位读者渴望远离尘世喧嚣，在自然美景的感

召下，追慕那份原始的质朴情感，我所走过的这些山峦沟壑肯定能够帮助你实现梦想。

5月4日，继续登程。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我们仍旧在这条美丽的河谷中穿行，只不过离开露营地不久后，前进的方向改为沿着扎曲向东。太阳照常升起，把阳光洒向群山和丛林。我们走了5到6英里，遇到一座人走上去就吱呀作响的木桥，大家通过这座桥去河的左岸走了3英里，然后又回了右岸。从这个地方开始，河面变宽了，我们来到了一片满是小山和岩石的地带，沿途看见了不少敖包形的宝塔、飞扬的经幡，还有转经筒。路线逐渐远离了河边，名叫“古泽[29]”的村子出现在眼前，我们就在那里借宿。

我的一名随从已经赶在我们前面过来做好了安排。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热情的头人已经替我们收拾好了住处。原本已经没了屋顶，摇摇欲坠的房子得到了修缮，房间的地面上铺了厚厚的地毯，墙壁上插了松枝，就连门口也弄了不少新鲜的竹子作为装饰。作为贵宾，吃饭时我还得到了额外的牛奶和鸡蛋。

从这个村子到木里只剩下最后14英里路程了，道路情况也非常好。只可惜，我们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滑坡，大路被堵住了，只好改走崎岖的小路。由于走了小路，我们没能在日落前赶到木里，周围一片漆黑，看不到有人居住的迹象。大家只好摸着黑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现出一道高高的白墙，那就是木里著名的喇嘛庙了。木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当地的房子大多被粉刷成了白色，看起来白乎乎的一片。这座城市里佛教的香火非常兴盛，到处都能看见寺庙和喇嘛。两三位身穿深红色长袍的喇嘛正站在那里迎候我，他们的态度客气而友好。喇嘛们把我带到距离寺庙不远的二层建筑里休息，还提供了食物和取暖用的炭盆。

【注释】

[1] Paul Vial，法国传教士，清末来华，主要在彝族地区传教。

[2] Taliang shan，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3] bale nim bu音。

[4] san to音。

[5] 古希腊神话众神的居住地。

[6] nya rong音。

[7] Wa ssu kou，指今康定瓦斯沟。

[8] dju mu音。

[9] the saiwen，怒江又称萨尔温江。

[10] te ben音。

[11] pa sung音。

[12] ten ba ka音。

[13] dja chu音。

[14] hua dra音。

[15] wa chin gompa音。

[16] ta koa音。

[17] ya rong chu音。

[18] dje ru音。

[19] tong yi音。

[20] michu音。

[21] batsam chu音。

[22] lichu音。

[23] obo，直译为鄂博，敖包的别称。

[24] chorten，藏传佛教用于供奉和收藏活佛、上师法体或骨灰的一种佛塔。

[25] colonel Wadel ，即前面提到的《拉萨和它的传说(lhasa andits mysteries)》的作者。

[26] 原文为ether，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一种物质，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元素除了水、火、气、土之外，还有一种居于天空上层的以太，这个词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佛教所说的“空”。

[27] 莎士比亚剧作。

[28] 这两句诗出自瑞士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施皮里的《海蒂》，名为

thelonely hills。

[29] ku dze音。

第十二章 从木里到永宁府

黄喇嘛辖地—木里大喇嘛—木里大庙—摩梭族—罐头盒子—摩梭土司—一妻多夫

木里对西方人来说是块非常陌生的土地，与这块土地相关的文献材料也相当有限，总计将近200册，卷帙浩繁的《四川通志(ssuchuantung chih)》留给木里的篇幅其实只有一页。巴伯尔在皇家地理学会刊物上对这个的地方的介绍也非常简略:

> 木里位于理塘以南，雅砻江以西。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当地藏族人的方言非常独特，汉族人称这里为“黄喇嘛辖地[1]”。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以喇嘛庙为核心的。

谢立山爵士在新近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木里的黄喇嘛非常具有社会地位，他们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gelupa)，头戴黄色的帽子作为所属教派的标志。遗憾的是，我来到木里时等级最高的大喇嘛恰好去别的地方办事了，接待我的只有4位等级稍低的喇嘛。我通过那位仆人用藏语跟他们交谈，互相只能大致明白对方的意思。据这些喇嘛说，他们之所以拥有很高的地位，是因为很久以前的先辈曾为大清皇帝立过功。作为回报，皇帝赐予了他们相应的封号。不过也有喇嘛告诉我说，木里原先其实也在打箭炉土司的控制范围内，很久以前的某位喇嘛治好了土司的病，因此就得到了相应的封赏。木里的大喇嘛被称为堪布[2]，地位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大主教，他的传承体制并不采取西藏地区常见的“转世灵童”体制。大喇嘛不能结婚生子，每代大喇嘛去世后，大家会直接从他的兄弟或侄子辈中选取继承人，对继承人的要求是必须年满1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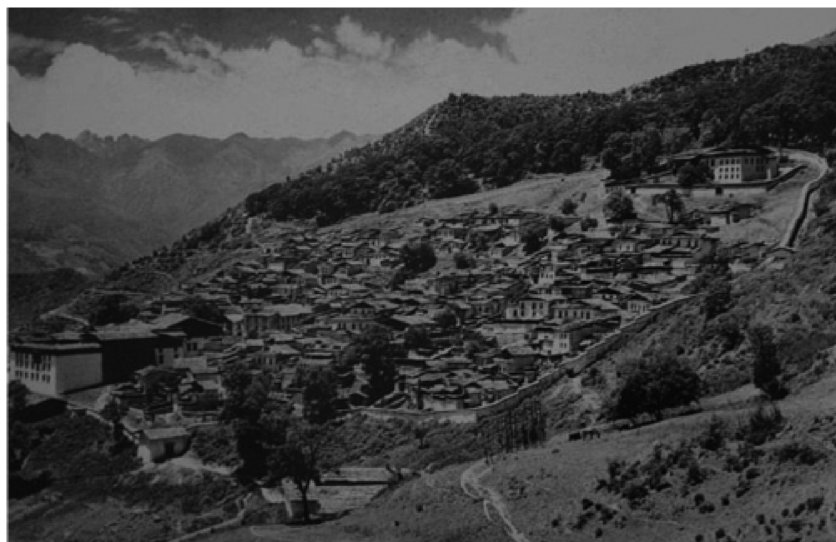
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代木里大喇嘛去世，必须首先向远在北京的大清皇帝通报消息，同时呈交继承人的名单，由皇帝最终确认。

相同的消息也会被送到拉萨，不过真正有权确认木里大喇嘛合法身份的只能是大清皇帝。大喇嘛是木里的宗教领袖，也是治理当地的地方官。他在这个区域设有3处管理机构，分别位于木里、拉康[3]和甘[4]，这些管理机构同时也是寺庙。木里的喇嘛庙总共生活着大概450名喇嘛，拉康和甘的寺庙规模比较小，只有一两百名喇嘛。大喇嘛平时轮流在这3座寺庙驻留、办公，每个地方待1年时间。喇嘛们告诉我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喇嘛充分了解木里当地的情况，更好地了解老百姓的要求。大喇嘛在这个地方是所有事务的最高仲裁人，不过很多工作实际都是有其他级别较低的喇嘛完成的。木里所有高级地方官的任用采取的也是类似大喇嘛的继承制度，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喇嘛，只有相当于村长的头人是由村民们推选出来的。比堪布地位稍低的喇嘛主要负责管理财政，地位再稍低一些的喇嘛的工作是保障食物供给。

就像打箭炉采用的模式一样，木里大喇嘛处理地方事务时也要跟宁远府下属的盐源[5]县令，以及身在雅州府的道台(t a ot a i)互相配合。通常情况下，木里大喇嘛每隔12年要去位于山西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然后再从那里转道北京，晋见大清皇帝，向皇帝献上包括黄金、皮货在内的各种贡品。不仅如此，大喇嘛每年还要按时向皇帝上缴税款，税款的额度是根据不同耕地的生产能力而定的。他治下的老百姓除了纳税，还要服大清朝廷规定的各种徭役。木里的金矿也是大清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个地方到处可以看到采挖金沙的人，生产出来的黄金通常会被送到理塘或打箭炉的市场销售。木里当地不产茶叶，当地人喝茶只能靠从别的地方贩运，运费加上税款让茶叶的价格高得吓人。现任木里大喇嘛时年37岁，已经在位17年，前任大喇嘛是他的哥哥。大喇嘛的正式称号为“哈巴德里杰布[6]”，他的身份、地位跟打箭炉的土司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木里的人口相对稀少些。

木里喇嘛庙[7]对戒律的掌控非常严格，女性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许进入庙门。庙里的建筑物都是藏式的，以二层楼为主，外墙用白灰粉刷，上面留的窗户非常小。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条件限制，特别是因为缺乏纸张，藏族人不习惯在墙上开很大的窗户。喇嘛庙的选址在半山坡上，庙里的建筑物因此体现出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从

远处看起来显得特别壮观，最佳视角位于东南方向。对那些来自西南方向的人来说，被群山遮挡住的寺庙只有等他走到非常近的距离是才能突然闯入眼帘，由此带来的冲击力超乎想象，仿佛寺庙从天而降一样。



木里大寺，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摄于1924年

喇嘛庙门前有条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流淌的小河，属于扎曲的支流。这条陪着我们从雅砻江一直走到木里来的大河眼下位于3英里以外的地方，肉眼还能看得见。喇嘛庙所在的山坡上开辟了不少耕地，主要作物包括青稞、大麦和黑麦，几块草地特意被保留下来，作为牦牛和山羊的牧场。喇嘛庙本身处于森林掩映当中，树木以橡树和针叶树为主。森林里生活着不少野鸡，不过按当地习俗，寺庙周围是不能打猎的。喇嘛庙所在的森林再往上走就是陡峭的悬崖，这个地方南面的山谷里还有不少树木苍翠的小山。喇嘛庙里有两座建筑物特别显眼。一座位于喇嘛们的居住区以上，一座在居住区以下。位置稍低，带有鎏金尖顶的建筑物相当于汉地佛教寺庙的大雄宝殿，喇嘛们每天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各种宗教活动。

经过反复交涉，喇嘛们同意我观摩一次这样的宗教活动，前提是必须由两名喇嘛陪同，而且只能站在大殿的门槛外边朝里边看。只见

大殿里跪着很多喇嘛和信众，他们的嘴里不停地念着经，感觉跟英国教堂里的唱诗班差不多。这些人明显接受了很长时间的相关训练，各种声部配合起来非常默契。大殿里边的光线很暗，什么也看不清。我向陪同的那两位喇嘛询问说，既然经已经念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能允许我进去看看。陪同的喇嘛告诉我说，刚才那段经文只是开个头儿，这场祭祀活动将持续整整11天，喇嘛们按时换班，但念经绝对不会停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也许他们只是不希望我这个“洋鬼子”进入如此神圣的大殿。

参观庙里的其他建筑时，我遵守了相同的规则，也就是说只能站在门槛外边朝里边看。幸运的是，我得到允许参观了大喇嘛平时的住处和专用的大殿。按照惯例，大喇嘛每年只在这里生活1个月左右的时间，通常从每年中国阴历的5月中旬住到7月。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寺庙里不允许宰杀任何动物，喇嘛们必须严格遵守素食戒律[8]。据我观察，这里的喇嘛当中没有吸烟的人，烟应该也是被他们的教规严格禁止的。

木里的喇嘛庙规模比较小，喇嘛的人数也很少。据我所知，西藏某些喇嘛庙规模非常大，整个西藏地区的喇嘛都要去那里学习，就跟英国人到牛津上大学一样。木里的喇嘛人数大概在450人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刚入门的见习喇嘛，严格地说，他们还不能被称为“喇嘛”。这里的很多喇嘛都去过拉萨，他们告诉我说，从木里到拉萨差不多要走3个月，不过道路情况比打箭炉到木里的这条路要好得多。木里的喇嘛当然也是说藏语的，只不过他们的方言跟标准藏语的差异更加明显，融合了来自当地多个民族的语言特征。由于这个原因，我的仆人很难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我也就没法真正跟他们顺畅交流。据喇嘛们介绍“hjong人[9]”是当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其他的民族还有汉族、彝族，以及苗族(miao tzu)等。苗族在木里的人口比较少，却广泛分布于广西、云南、贵州等多个省份。关于木里当地多样化的民族分类，《四川通志》中有详细的介绍，只可惜我看不太懂。木里的喇嘛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当地人中唯一能够读书识字的群体，这种情况跟缅甸和暹罗差不多。区别在于，缅甸和暹罗的僧人同时扮演着教师的角色，寺庙也是当地孩子的学校，西藏的喇

嘛通常不承担这种义务。木里的风俗习惯跟西藏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喇嘛去世后一般实行火葬，骨灰经过筛选被保存在精致的瓷瓮里，普通老百姓的骨灰则直接抛撒在山里。包括木里在内，西藏很多地方的人死后不习惯火葬，而是直接把尸体放在山坡上，或者扔进河里，任凭动物啃食。

我在木里一直从5月3日待到了6日，然后继续向永宁府进发。从木里到永宁府的距离非常近，路线大致分为3个阶段。直到我进入云南省境为止，这条路线始终都在木里大喇嘛的控制范围以内。喇嘛们非常友好，也像打箭炉土司那样给我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张通行证要求沿途居民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帮助。除此之外，他们还派了一个刚入门的年轻喇嘛把我护送到永宁府。

这条路线的第一阶段距离很短，出发后，我们沿着龙曲[10]河谷向南南西方向前进。走了大概4英里，我们过河到了它的右岸，然后开始爬山。走到距离木里7英里左右的地方，我们就停下住宿了。前面有座异常险峻的大山正等待着我们，随从们声称，如果不提前养精蓄锐，根本就不可能翻过去。更何况，这道垭口附近强盗闹得非常厉害，安全起见，也不应该太贪赶行程。我们本来打算在间废弃的农舍里过夜，可是那间农舍实在太脏、太破了，大家索性决定在它旁边露宿。入夜以后，暴风雨突至，我们只得又跑进那间农舍里躲雨。随从们在屋里生火取暖，烟实在太大，把我给熏了出去，所以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就是在农舍的房檐底下凑合过来的。

第二天，我们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跋涉，爬上了海拔15500英尺左右的施利拉[11]垭口。上山的路刚开始是偏向东南的，过了道山梁后就改成了西南。从这个点再往山顶上爬，赶上晴天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可我们爬的时候正在下雪，路面又湿又滑。下山的路非常陡，到处都是石头，不过我们的速度还是挺快，很快就进入了茂密的森林，这个地方长了不少特别高大的杉树，有些大树的树干周长可能足有15英尺。过了垭口，海拔下降了3000到4000英尺，眼前出现了一条河。顺着这条河的流向朝山下眺望，风景如画。就在山谷里的人间仙境当中，我们遇到了离开木里连续跋涉30英里后的第一个大村子里社子[12]。这个村子里居住的人属于摩梭族[13]。从这个地方再往前走，

直到宁远府，都属于摩梭族的生活范围。本书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个民族。

5月8日，我们离开了里社子。前面的路主要都是起伏的山路，周围长满了树木。走了5英里左右，我们来到里朗子[14]，就在这个地方换了骡子。据当地人说，这个村子已经位于木里大喇嘛管辖范围的边界，离四川省的省界也不远了。再往前走4英里的样子，翻过几座覆盖着森林的小山，就是云南省境内[15]。

果不其然，离开那个村子没走多远，我们就进了云南省。翻过那几座小山，眼前又是平原地区。下山的路非常陡，路况也很差。我们好不容易下了山，山下就是左兹[16]村，村里的头人接待了我。这个村子的村民全部是摩梭人，好在头人精通汉语。他穿了件汉族样式的羊皮长袍，上面的黄铜扣子闪闪发光，这种扣子应该是模仿了英军军服的样式。头人从金属质地的罐子里取了张名帖递给我，同时声称自己对西方人并不陌生。除了我以外，他之前已经见过两个洋人了。据头人说，这两个人都是法国人，也是刚不久才从这个村子经过的。我想，他们的目的应该跟我一样，也是为了游历。这两个法国人给头人留了一个沙丁鱼的空罐头盒子当纪念品，就是他现在用来装名帖的那个。当地人很少有机会见到现代工业产品，那个罐头盒子就成了“宝贝”。

左兹村所在的地方非常富庶，人口也很多，村子周围丘陵地区的那些平地都被种上了庄稼。从这个村子往永宁府的所在地走，沿途都是这样的摩梭村落，村子周围都是这样的耕地。摩梭人的房子都是单层的小木屋，建筑材料全是松木，就连屋顶也是木头的。为了防止木头屋顶被大风掀翻，上头还特意压了大石头。这个地区的女性更热衷于打扮。她们的头发通常梳成长辫子盘在头上，头上还要插上、挂上各种银子和丝线做的饰品，身上穿的裙子色彩也非常艳丽。我觉得，这些女儿或者妻子可能是把她们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穿在身上了。跟女性不同，男性的衣着显得非常朴素，也没有什么装饰品。这里的某些男性受汉族影响非常大，不但剃发留辫子，还穿了长袍马褂。

永宁府从行政区划上说属于府的级别，我却觉得这个地方充其量

也就是个规模比较大的村子。永宁府没有城墙，房屋也像此前的那些村子一样，都是木头的，唯一显得比较精致的建筑就是当地的喇嘛庙。这个地方的人口主要是藏族和摩梭族，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平时以务农为生。永宁府的管辖范围向东、向北直抵云南、四川两省的交界处，向南以金沙江畔的永北[17]府为界，向西最远包括中甸[18]。永宁府的土司[19]的采取世袭制，同时也需要得到大清皇帝的任命。他的地位略低于打箭炉土司和木里大喇嘛，不过影响力也非常大。永宁土司是这个地区级别最高的官员，不过他平时也需要跟驻节永北府的汉族地方官协同工作，虽然这位地方官名义上是他的下级。永北府在永宁府的南面，距离这里有6天路程。



永宁府基督堂

抵达永宁府后的第二天，土司召见了我。这位土司不会说汉语，我只能先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他的一位汉族手下，这位手下再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方言讲给土司。永宁土司非常年轻，大概28岁的样子，对人也很和气。他应该从没见过西方人，跟我说话的时候略显局促。为了表示隆重，土司当天特意依照礼节穿了大清皇帝按品级颁发给他的全套官服。

永宁府所在的平原地区海拔9500英尺左右，气候比较温暖，作物种类很多。由于河流众多，灌溉方便，当地的耕地很多都被用来种植水稻。自从离开四川中部地区以后，我应该是第一次看见了成片的稻

田，还有扶犁的农夫和拉犁的水牛。永宁府的这条河名叫“开济”[20]，河里的鱼很多，河上有座漂亮的石桥。据桥头石碑上的碑文显示，这座桥是在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5年刚刚得到重建的。

永宁府的居民除了藏族和摩梭族，还有傈僳族(liso)，这个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我利用待在这里的一天半时间大致了解了他们的语言，还把这种语言跟摩梭族的语言作了对比。由于长期共同生活，摩梭族的很多风俗习惯跟藏族都差不多，例如，这里的女性通常可以拥有三四位甚至更多的丈夫。据巴伯尔观察，一夫多妻制通常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比较富庶的河谷当中。这些地方女性的数量比较多，劳动强度较低。相反，一妻多夫的现象大多出现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地方自然环境恶劣，女性人数也比较少，而且她们也不可能胜任劳动强度比较大的野外放牧工作。巴伯尔在皇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这样评价这种很难为西方人所接受的婚姻制度:

> 不管这种情况跟我们的习惯相比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它都有自身产生的客观因素，我们因此不应该以轻浮、调笑的态度对待它。话虽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要去琢磨这些夫妻平时究竟是怎么一起生活的。

摩梭人的情况跟巴伯尔观察到的有所不同，这个地方的居民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差不多都是采取一妻多夫制生活的，即便距离永宁府不到2天距离，位于金沙江畔的那些富庶村庄也是如此。据我观察，那些一妻多夫的母亲生出来的孩子，不管实际的父亲到底是谁，都会得到这些男性的共同抚养，而且这些男性相互间的关系本身也非常和谐。由于采取一妻多夫制度，摩梭人就像很多藏族人一样，通常没有固定的姓氏，而且家中的权力往往是掌握在女性手里的。我听说在打箭炉西北藏区的某个地方，有个完全由女性统治的地方，这就是德格[21]东北的萨芒[22]。这种特异的习俗要么属于非常久远的原始社会遗留，要么就是长期实行一妻多夫制度产生的必然结果。

摩梭族处理死者的方式跟藏族人差不多，要么火葬，要么直接扔到野外任凭野兽吃掉。即便采取火葬，骨灰最后也还是要被抛撒到山谷或河流当中的。这种习俗应该也起源于原始社会，那个阶段的人类文明还没形成悼念死者的意识。这个地区的摩梭族大多居住在金沙江沿岸，占据了最富庶的土地，很多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这

些人火葬亲人的尸体后不再随意抛撒他们的骨灰，而是要在金沙江的江水里把骨灰仔细地清洗干净，然后再埋在位于江右岸的简易墓穴里。与汉族不同的是，他们不会给死者的坟墓立碑。



摩梭女子

【注释】

[1] theland of yellow lamas，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木里第六代大喇嘛洛桑吐都接受了雍正皇帝册封，同时兼任当地土司，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

府。

[2] kan po，相当于汉地寺庙的方丈。

[3] lha kang音。

[4] khon音，作者这里说的是木里三大寺，即木里寺、康坞寺与瓦尔寺，大喇嘛以一年为期，在这三个寺庙轮流主持，当地称为“转寺”。

[5] Yen yuan，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

[6] ha ba deligyalpo，前4个字为音译，具体未查到，杰布一般是当时藏族对高僧大德的尊称。按时间推算，庄士敦见到的应该是第十七世木里大喇嘛昂旺罗桑龙布。

[7] 指木里大寺。

[8] 喇嘛平时是可以吃肉的。

[9] 参考下文，这个词应指摩梭人。

[10] rong chu音。

[11] shilila音。

[12] lishetzu音。

[13] mo so，当时的摩梭人被认为是个单独的民族，不过现在不属于国家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范围以内。

[14] lirang tzu音。

[15] 当时四川、云南的省界划分跟今天不同，金沙江以东的部分地区也算云南省的范围。

[16] djo dji音。

[17] Yung pei，清代云南省区划，辖境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省永胜、华坪二县及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地。

[18] Chung tien，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 2001年12月17日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19] 元、明、清三代管理当地的摩梭人世袭土司。

[20] kaichi音。

[21] Te ge，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

[22] Sa mong，根据上下文应指今西藏林芝的萨芒村。

第十三章 从永宁府到丽江

横渡金沙江—沉船—罂粟花—丽江

我在永宁府跟一路从打箭炉护送我过来的那3位汉族士兵依依惜别。这3名士兵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我照顾备至。不管路多难走，他们总是那么乐乐呵呵的，弄到什么食物都先让我吃，每天住宿的时候也先得把我安顿好，才顾得上照顾自己。尽管我按照在打箭炉的约定支付了丰厚的报酬，心里还是觉得亏欠他们。抵达永宁府后，他们3个人，还有那位从木里护送我们过来的喇嘛原路返回。几个月以后，我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平安回到了家乡，这才略感欣慰。那位在打箭炉雇来的仆人还要再陪着我走几个星期，直到临近缅甸的腾越。

5月10日，我从永宁府启程了，队伍里的随从人员增加了很多，因为据说将永宁府跟金沙江隔开的那座大山里的路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危险的，平时有很多强盗出没。永宁土司非常热心地给我派了12名随从武装护送，他们将把我一直送到金沙江畔。这12个人当中有两个是穿制服的职业士兵，剩下的10个人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好像连枪都不会用。

上午的路大致是朝着西南西方向前进的。这条路起伏非常厉害，刚开始是随处可以看见耕地的平原地区，后来就蜿蜒爬上了满是树木的山峰。下午稍早的时候，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这个地方海拔13000英尺左右，被称为“格瓦垭口[1]”。站在这个制高点向南眺望，除了绵延不断的森林，什么也没有。转身往回眺望我们刚刚离开的平原地区，各种庄稼地在阳光下连接成了翠绿的海洋。

我们沿着垭口西边一条路况很差的山路慢慢向下爬，由于山石遮

挡，只能看见眼前的那点地方。就这么往下走了3000英尺，视野豁然开朗，巍峨的雪山出现在西南方向。路上出现了两座小木屋，还有几块种了蔬菜的耕地，再往前走，就是当晚借宿的小村子。村民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间条件非常差的小草房。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下山，朝着金沙江的方向走。海拔下降到距离河面2000到3000英尺的地方，那条从西北流向东南方向的大江蜿蜒曲折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条江的两岸差不多都是悬崖峭壁，却散布着好几个村子，还开辟了不少耕地。来到这里之前，有人却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在名叫兰格拉[2]的村子吃了午饭，然后继续朝山下走。沿途又遇到了个村子名叫“拉卡什[3]”，它附近有条被称为“丝河[4]”的小河。从这个地点开始，我们转向沿着金沙江的左岸行进，江边的那条山路距离水面大概两三百英尺的样子。走了半英里左右，山路左绕右绕，我们终于来到了江边。

过金沙江还算容易，因为有渡船可以使用。问题是，当地只有一条船。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先让船工把比较容易运输的行李还有我们自己送过江去，然后再慢慢地运骡子。骡子非常不配合，运起来就很慢，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运第二船骡子的时候(船里装了两匹骡子)，船大概走了1/3的航程，骡子受惊，把船都给踹漏了，船夫只能紧急返航修船。我觉得金沙江的水应该没有雅砻江那么急，因为我们的船向右岸行驶时只被向下游冲出了大概30码，不过船夫告诉我说，现在仍然属于枯水期，等夏天周围山上的雪化了，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我们过河的渡口江面宽度在100码左右，相对比较窄，水流就比较急，船夫驾船非常困难。金沙江这个江段的海拔大概5200英尺左右，当地汉族人习惯称它为“白水河(paishui ho)”。这个名字跟实际情况非常不符，由于水源主要来自周围山上融化的冰雪，河水基本上就是棕色的泥浆。据我所知，金沙江距离永宁府大概一天多路程的大拐弯江段是最近10年才开始为地理学家所熟悉的。这处大拐弯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丽江以北地区山脉的阻挡，正是这道山脉逼着金沙江走了弯路。博宁先生应该是最早来这里探险的西方人，他的很多发现后来得到了戴维斯少校(major Davies)和赖德少校(major Ryder)的证实。

顺利抵达金沙江右岸(南岸)，马上又开始爬山。我注意到距离江面不远的悬崖上有不少人工开掘的洞穴，那应该就是摩梭的墓地。距离这块墓地不远不近的地方还挖了很多一人高左右的大洞，有些洞口已经坍塌了。当地人告诉我说，这些洞是采挖金沙留下的矿洞。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技术，想来应该非常原始。从这些矿洞的位置再往上走，有不少坟墓，它们的样式跟汉族人的坟墓有明显区别。我的队伍里某位赶骡子的脚夫是个摩梭人，他告诉我说，这些坟墓属于某个原先居住在这里的古老民族，至于这个民族的具体来历，大家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云南省界的附近，从永宁府到丽江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摩梭和傈僳族，只不过金沙江这边的摩梭族已经不属于永宁府的土司管辖，他们的最高长官身在丽江。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摩梭人曾经建立过以丽江为首都的小王国，然而现在丽江的最高长官却不是那位古代国王的后裔。我们沿着山路爬到了距离江面2000英尺的位置，在富裕的奉科[5]村借宿，房东把楼上最好的房间让给了我。

第二天，我们穿过了奉科村所在的山谷，沿着半山腰的路向西南方向走，这条路跟脚下的河道基本是平行的，海拔在逐渐上升。离开奉科村大概3英里，我们转向正西，进入河谷。河谷的南面和西南方向都是怪石嶙峋的大山，常年积雪的顶峰起码海拔18000英尺。往前走上两三英里，遇到条清澈的小溪。顺流而上，又看见座小庙，小溪的源头就是小庙边上山石中的泉眼，水质非常好。这个地方条件不错，能够同时供很多人露营。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那些循着我的足迹而来的旅行者们也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备选营地。轻装的旅行者可以把这里当作离开永宁府后的第二站，重装的旅行者则可以把它当成第三站。

告别这个景色秀丽的地方继续爬山，又走了几英里，遇到几间农舍，我们就在那儿吃了鸡蛋当午餐，然后接着爬山。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了山脊，然后开始沿着山脉的走向前进。周围的云雾越来越浓，周围的山逐渐看不见了。傍晚时分，天降大雨。这个地方属于荒山野岭，我们只能在树林里露营。为了减轻负担，我们此行没有携带帐篷，大家只得砍了树枝搭建临时帐篷避雨。这一夜注定是够我们受的，好在半夜的时候雨停了，只有少量来自树梢的水

滴还在继续找麻烦。凡事都有利有弊，大雨制造了困难，也提供了干净的饮用水。要是不下雨，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找到干净的水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又下雨了，断断续续下了一个上午。午后天总算晴了，剩下的旅程我们再没遇到过这样的坏天气。海拔又在逐渐上升，我们爬上了摩梭人称为“格卡亚[6]”的垭口，海拔15000英尺左右。

下山的路很陡，到处都是石头，山坡上丛林密布。傍晚时分，终于又见到了有人烟的山谷。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个小型的盆地，盆地里的村子名为“托可索[7]”。我们进了村，找了间农舍暂时休息。休息时候看见村里有个男人背着弓箭去打野鸡了，我们来不及等他回来，所以也就无从得知这位猎手的水平如何。短暂休息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英里，来到紧邻草地的森林边缘露营。草地上有条小溪，为我们提供了清洁的水源。据当地人说，这个地方有豹子出没，所幸我们并没遇到，不过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搞得我整宿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上，随着道路向南延伸，我们再次进入了丛林地区，更远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海拔10000英尺的巍峨雪山，那些山峰标志着丽江平原的所在位置，丽江平原本身的海拔也超过8000英尺。丛林深处，我们遇见了名叫“鸣音汲[8]”的小村子，这个地方的居民差不多都是汉族人，以农耕为生。设在当地的征税点，还有贴在墙上的汉字告示明确标志着我们已经离开了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鸣音汲的多数房子都是木头的，只有少数铺了屋瓦。村子里的居民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穿的基本都是汉族服饰，只不过当地女性也像之前遇到的那些少数民族一样，喜欢佩戴大耳环之类的饰品，而且是不缠足的。税收点墙上贴的告示大概意思是说周围的道路最近很不安全，强盗非常多，官府因此发布了悬赏缉捕令。

离开村子，很快又进入了丛林，沿途有不少高大的松树，感觉跟到了公园一样。我们一直走到日落，也没遇到任何村庄，只得选择露营。夜晚的森林非常安静，一丝风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开始爬山，从昨晚露营的地方又向上走了10000英尺。下山的路坡度非常大，走

3英里左右，下降到一条河谷当中，河谷里的河被当地人称为“黑水(the heishui)”。这条河上非常罕见地架了座刚刚完工的桥，类似这样的桥整个旅行中我只见到过3次。这座桥其实还没完全完工，几位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按中国人的习俗，走这种还没完全竣工的新桥是不吉利的，我们只得选择这座桥下游几十码以外的旧木桥过河。过河后，我发现那座新桥的桥头已经按中国的传统立了块石碑，石碑的大致内容是介绍出资修桥者的事迹。通过上面的文字，我知道这座桥不是官府主持修建的，而是得益于当地的某位善人。离这块石碑不远的地方，还有个小庙，里面供着的神据说是可以保佑旅行者平安的。过河后，我们朝向正南方，沿着河的右岸行进。

脚下的路顺着水流的方向向远方延伸。我自己身上没背任何东西，走起来比后面的随从快了不少，结果就很不幸地走错了路，只得掉头再往回走。据随从们说，前往丽江的路需要连续翻越3座垭口，每道垭口之间还隔着山谷。这三道垭口海拔最高的地方足有11000英尺，站在那里，我觉得自己肯定可以看见远处的丽江城，可是映入眼帘的只有连绵的雪山和森林。翻过第三道垭口，我们进入了一条怪石林立的山谷，显而易见，这是远古冰川的遗迹。远古冰川遗迹的出现说明我们头上更高的地方，也就是雪线附近，应该还有冰川存在。

抵达这条山谷后，我们其实已经来到了丽江所在平原的北部。前面再没有大山阻挡，大家跌跌撞撞地在山谷里走了10到20英里，就到了丽江城。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条山谷起先看起来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它最宽的地方不超过2英里，满地都是石头，山谷右侧耸立着高高的雪山，雪线以下的山坡上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棵树。再往前走，景色逐渐发生了改变，植物越来越多，好像进了花园一样。丽江最主要的作物是罂粟，此时的它们已经到了怒放的季节，到处都是白色的罂粟花。白色的罂粟花当中点缀着少量红色的野玫瑰，非常漂亮。由于大量花朵的存在，温暖湿润的空气里浸饱了花香，类似这样的风景世界各地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可是看看周围终年积雪的大山，你就会发现眼前的一切弥足珍贵。

通往丽江城的大路非常宽阔，路两边满是肥沃的耕地，田地里种的仍然是大片的罂粟花。路况如此良好的道路甚至在英国也是非常少

见的，我觉得就算狗拉的小车应该也能在上面跑得风驰电掣。这条路沿线的村子非常多，却来不及逐个造访。日落时分，我们到了名叫“白沙(peisha)”的小村子，村民的房屋差不多就是修建在花丛和树林当中的，有种人间仙境的感觉。大家还是没有停留，因为这个地方离丽江城已经非常近了。天差不多全黑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丽江城的郊外，脚下的路由原先的土路变成了更整齐的石板路。看得出来，这些石板应该是很久以前铺的，很多已经被长年累月经过的车马给轧坏了。我们就这么顺着石板路，摸着黑进了丽江。



清代昆明北城门

丽江城很小，没有城墙。作为整个丽江府的行政中心，这座城市同时有两位地方官驻节，首先是管理整个丽江府的高级地方官，其次是管理丽江城和周边地区的县令。前面已经说过，丽江城是古代摩梭王国的首都。它修建在这片平原地区唯一一块山地上，易守难攻。与此同时，丽江距离金沙江的渡口又不算太远，交通方便。现在的丽江城已经成了多民族杂糅之地，汉族、摩梭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和睦相处。这个地方的商业非常发达，很多来自西藏以及湄公河沿岸的

商人都赶来做生意，生活在大理、云南府[9]、永北府和金川河谷等地的商人更是近水楼台。丽江城本身是以城中的市场为核心建成的，这个市场从早到晚都有做买卖的人。城市周围植被茂盛，几条小河穿城而过。虽然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跟北京等城市大有不同，商铺的样式却大同小异，就连牌匾的款式也都差不多。

来到丽江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找了一家条件非常差的旅店安顿下来。就在这家旅店里，我非常高兴地得到消息说丽江城眼下还有两个英国人。其中一位是领事馆派驻的代表，另一位是搞铁路调查的。据我所知，英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把缅甸的铁路延伸到中国云南境内的计划。那么这位铁路人士跑到丽江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解开心中疑团，我决定拜访这两位同胞。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住处，我非常遗憾地发现，领事馆的那位官员前些天已经离开了，剩下的那位居然是个法国人，也根本不是搞铁路调查的!通过跟法国人攀谈，我得知那位所谓的领事馆官员其实是生物学家福里斯特先生(Mr Forrest)，他在丽江住了段时间，主要是为了在周围的山里搞研究。法国人名叫加斯顿·佩罗纳(Gaston Perronne)，是个商人，主要业务是贩卖麝香。由于生意需要，他在丽江长期租了栋房子。法国人热情地邀请我搬过来住。我本打算明天就离开这里，可是受惠法国人的慷慨，滞留丽江的时间最终调整为从5月15日的晚上直到18日的上午。

【注释】

[1] Ge wa ya kou，位于今丽江市宁蒗县格瓦村。

[2] lan galo音。

[3] la ka shi音。

[4] the siriver，具体情况不详。

[5] fen ke音。

[6] ge ka ya音。

[7] tuo ke so音。

[8] ming yin chi，作者标注了汉语。

[9] Yunnan fu，指今云南省会昆明。

第十四章 从丽江到大理府

大理—白族姑娘—买了假货—捐款修桥—洱海

离开丽江，我的下个目的地是大理府。此前陪伴我的那些脚夫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得又在丽江雇了些人，他们将陪伴我走完接下来的5天。离开丽江，行进速度明显快了很多，有了走马观花的感觉，因为这个地区已经有很多西方人来过，留下的相关材料也不少。更何况，当地的雨季就要到了，我必须赶在道路变得泥泞难行前穿越大理府再往南的那些山脉、河流。目前为止，我还没拿定主意是走腾越到巴莫的陆路去缅甸，还是通过云州[1]和滚弄[2]的渡口去腊戌[3]，那里是英国在上寮修建的铁路的终点站。好心的法国人佩罗纳先生对这个地区已经非常了解，他告诫我说要想在瘟疫流行的春夏季节渡过怒江，基本属于找死。有鉴于此，我决定到了大理府以后再根据情况最终选定路线。

离开丽江后，路线的方向改为向西，路况也变得很好。沿途开满了野玫瑰、旋果蚊子草和报春花等英国人常见的野花，让我有了种回到英国的错觉。翻过一道低矮的山梁，丽江所在的平原被甩在了身后，新的平原又展现在眼前，这块平原被称为“拉是坝[4]”。山下有个湖，湖边有条路，沿着这条路走几英里就是金沙江边的阿市[5]渡口，以及更远的中甸和阿屯子[6]。由于最近刚刚发生的大规模滑坡，阿屯子这个地方据说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地震频发，滑坡在这个地区属于家常便饭，只不过阿屯子的那次滑坡实在太厉害，半座山都塌了下来，山下的房子、庄稼，还有很多活人就都被埋掉了。当地大清地方官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他们认为这次滑坡是由某种妖怪引发的，于是就拿着火枪和弓箭朝着滑坡的方向乱放了一通。瞎猫碰上死耗子，滑坡恰好就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地方官们因此认为

自己的驱邪行动真的发生了作用，他们的“救灾”也就到此为止。至于真正能够帮助那些老百姓活下来的实际救灾行动，那是没人管的。

我们沿着湖左岸的路朝着南面的金沙江前进，中午在上拉市[7]村吃午餐。这块平原上的村子也不少，可是土地明显没有丽江周围肥沃。当天下午，我们通过了一道海拔不算高的垭口，再次进入河谷，当晚在关下[8]村过夜，这个地方又叫坡脚(po chiao)，村子附近有个小湖。村子里的红土地让我想起了远在四川的红层盆地。第二天，我们全天都在河谷里穿行，遇到了不少大村子。很难想象，夹在两座大山中间的这么一小条沃土居然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口。河谷里的路非常好走，路两边经常可以遇见能直接饮用的水源，架在河上的桥梁也都结实、漂亮。

自从离开丽江，我们也就告别了摩梭族的生活区域。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被称为“民家[9]”，就像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他们的起源同样是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民家非常有意思，对待陌生人也很友善，不过按照习俗，他们从不跟陌生人直接对视。这里的女性跟藏区女性相比别有一番风韵，应该更符合西方人的审美。距离大理府以北还有两天路程时，我遇到个民家小姑娘，堪称绝色。这个小姑娘当时正站在罂粟田里，用他们民族自己的语言唱歌，我听不懂。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

For old,unhappy,far—off things,

And battles long ago.

没人告诉我她唱了什么吗?

或许只是那忧伤的往事在流动。

关于衰老、伤心之类的陈年旧事，

还有很久以前的战争。[10]

罂粟田里唱歌的小姑娘，这应该是我在中国生活多年以来见到的最美的一幅图画。

离开丽江的第二天，我们又遇到了很多村子，当天中午顺利抵达剑川州[11]。这座城市是被很多村庄簇拥在当中的，它的周围环绕着中国城市常见的那种城墙，不过据我观察，剑川州最初应该也是从几个村子逐渐发展起来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至今仍然靠在城市周围种田为生。告别剑川州再往前走，遇到个小湖，它的水源来自海尾河。过了河上的桥，就到了汉登村。我又往前赶了些路程，当晚在甸尾村留宿。这个地方的居住条件还算不错。

自从走出丽江北面的那些大山后，气候似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太阳的威力越来越足，即便树荫里的气温也可以达到80华氏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仍然属于高原地区，平均海拔7000英尺左右，气候却有了点儿热带的意思。这个地方马上就要进入雨季，正是全年最热的时候。刚刚在藏区还穿着厚重的皮衣服，突然来到这么热的地方，确实有些不习惯，只能盼着每天早晚享受些许清凉。随着我们逐渐接近缅甸，温度只会越来越高。

就在甸尾这个地方，每天日出前一小时的温度最低可以达到54华氏度，勉强还算凉爽，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抓紧赶路。走出河谷后，路线进入丘陵地带，起伏的小山上长了不少低矮的松树。再往前走，又是遍布村庄的河谷，海拔慢慢升高，我们爬上了一道山脊。站在山脊的制高点，我最后看了眼丽江的大雪山，随着路线向南延伸，它们脱离了我的视野。抬眼向前望去，大理府周围的雪山已经露出了些许轮廓，我们距离那里还有不到两天路程。翻过山脊，我们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庙吃午饭。利用吃午饭休息的机会，我在小庙里转了转。这座小庙建在河边，河上有座桥名叫“鹤寿(hao shou)桥”。鹤这种鸟在英语中被称为“crane”，中国人认为它可以活到很大岁数，“鹤寿”的意思就是像鹤那么长寿。

离开小庙，往前走了8英里，我们到了牛街[12]村。村子附近有座形状很奇怪的小山。这座山名叫“火焰山(huo yen shan)”，它就像被削去了尖顶的圆锥形，山顶的平台上正好修了个宝塔。火焰山的山脚下有温泉流淌，这说明它在很久以前可能真的是座火山。顺便说下，我们前些天走过的那道河谷据说曾发生过强烈地震，很多村子被毁，老百姓也死了不少。离开火焰山再往前走，我在名叫“三营[13]”的小

城找了一家不错的旅店。三营眼下是个热闹的商贸镇，不过这个地名说明它最初可能是个驻军的地方，历史应该可以追溯到蒙元时期。我在三营花了600大钱(折合1先令左右)给自己买了把伞。这把伞外表看是地道的英国货，我还以为是从缅甸仰光那边贩运过来的。再仔细看，上面的商标居然把位于印度的厂名给拼错了，说明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仿品。



驻守云南的清军军官

第二天，我们继续沿着三营所在的河谷前进，看见了不少村庄和耕地，这里的主要作物除了罂粟就是水稻。这个地方的气温比丽江

高，路两边的野玫瑰多数已经进入盛开的阶段，田里的罂粟花大多却已经谢了。尽管如此，河谷在阳光的照射下仍旧那么风景如画。过了名叫“长营[14]”的村子，我们就出了河谷。前面的路又是山路，好在山都不高，就是偶尔出现的高山沼泽比较烦人。我们经过一个小湖，路线改为西南方向，很快就到了映山堡[15]，这个大村子位于两道山梁夹着的河谷当中。我们没进村，而是从它的左面绕了过去，沿途参观了附属于这个村子的小庙，那个庙里也有座小宝塔。

过了映山堡，南面出现了道山谷。山谷的入口处有座漂亮的单孔石桥，桥下流淌的小河被称为“白沙(pai sha)河”。我们没过桥，而是沿着小河的左岸行进。远远望去，那道山谷里面的水草丰美，可河两岸的小山上差不多都光秃秃的，只长了些多刺的灌木。沿着白沙河走了3英里，眼前出现了平原地带，河水流速明显变缓，完全自然的河岸也变成了人工修建的堤岸。这个河段的白沙河明显是被当作运河使用的，水上的货船不少。沿着堤岸走了一英里多，前面是中所[16]村。走这段路跟在牛津的莫德林步道(magdalen walks)散步感觉肯定不一样，路两边的植物比牛津多得多。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条临河路倒是跟阿狄森步道(addison's walk)有几分相似之处。白沙河的样子则有点儿像彻韦尔[17]河，它们的水流都非常和缓，同时富于色彩变换。我们中午就在中所村一家挺不像样儿的旅店里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房间里的苍蝇特别多，闹得人没个清静时候。村子里的人当时正计划着要在白沙河上修座桥，我拿了几个钱出来作为捐款，还在账簿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如果这座桥未来真的修起来的话，桥头石碑上应该也能找到我的名字。

过了白沙河，连续经过几个村子，就到了邓川州[18]。我们没有停留，直接穿城而过。这座小城紧邻著名的洱海的最北端，站在高处已经可以看见那片著名水域的很大部分，还有城市和湖泊中间的空地上绵延不绝的红土丘陵。据说，洱海的面积正在逐渐缩小。种种迹象显示，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真的。邓川州与洱海间的那片丘陵地带里散布着不少小池塘，说明那个地方原来应该也是洱海的一部分。湖水退去以后，原先的湖底就被改造成了耕地。

5月21日晚上，我们就住在洱海附近的沙坪村里，旅店的条件还

算不错。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上关村。这个村子规模很大，现在里面的部分房屋已经成了废墟，它原先的主要作用是保卫大理府的前哨阵地。大理府的东边靠山，西边临近洱海，大理府就建在山水间3英里宽，20到30英里长的方形区域里。城区的南北两面分别修建了类似要塞的小城，北面的叫“上关”，南面的就叫“下关”。大理府依山而建，距离上关18英里，距离下关7英里。任何人如果打算进攻这个城市，首先面对的就是它的前哨阵地。大理府所在的那个区域原先应该也是洱海的湖底，土地非常肥沃，粮食产量让这座城市即便在遭到长期围困的情况下也能自给自足。只可惜大炮出现后，这样的防御工事就失去了意义。

大理府周围的沃土不光是用来种粮食的，这个地方最主要的作物仍然是罂粟。为了采割鸦片，上千名男女受雇成了专业工人，这其中主要是民家的年轻姑娘。看到我从路上走过，这些面孔晒成古铜色的姑娘纷纷抬起头来，嬉笑着看“洋鬼子”。某些在田里忙碌的女性头上包了蓝黑色的头巾，头巾打结的地方还插了把银梳子，远远看起来好像鸡冠子形的装饰。

从上关到大理府的路距离洱海只有3英里，道路和洱海间是成片的耕地。由于灌溉方便，这些地即便在旱季产量也非常可观，距离洱海比较远的耕地收成相对就没这么好。耕地当中也间杂着些没开垦的荒地，它们是被当成坟地使用的。眼看快到大理府城门的时候，路两侧出现了很多十三层的宝塔。我们从北门进了城，找了家还算不错的旅店，我住在清静的二楼。



大理府五华楼



从大理府大街看到的北城门

大理府的样子跟多数中国城市都差不多。我在这个地方待了2天3夜，不但游览了全城，连城墙附近几英里以内的地方也转到了。有天下午，我来到了洱海边上。湖面如镜，倒映着西面的高山，非常漂

亮。阳光照射下，淡蓝色的湖水幻化出了奇异的光泽。距离河岸很近的地方，大群野鸭子正在戏水。这些野鸭根本不怕人，淘气的小男孩们就在它们身边游泳，孩子和野鸭欢快的声音为这个宁静的夏日傍晚增添了些许生气。

【注释】

[1] Yun chou，今云南省临沧市云县，位于大理、普洱、临沧的交界处。

[2] Kunlon，缅甸掸邦下辖的一个镇。

[3] Lashio，缅甸地名。

[4] lashipa音。

[5] ashi音。

[6] atuntzu，今云南德钦。

[7] shanla shih音。

[8] kuan hsia，实际应该是下关。

[9] min chia，清代少数民族，即现在的白族。

[10] 这4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华兹华兹的The Solitary Reaper。

[11] Chien chuan chou，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

[12] Niu kai，应指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牛街乡牛街村。

[13] San ying，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三营镇。

[14] Chang ying，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东山乡长营村。

[15] ying shan pu音。

[16] Chung so，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镇中所村。

[17] the cherwel ，具体情况不详。

[18] Teng chuan chou，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邓川镇。

第十五章 中国西南的多样民族

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土家族—摩梭起源—忽必烈—中华文明的亚利安血脉—民家人—建文帝

本书前面几章已经对中国西南地区多有介绍，这两个地区的民族多样性应该是值得读者高度注意的。190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某次会议上乔治·斯科特爵士曾这样说过:

> 大理府地区居住着多种多样的民族，我们或许将在那里找到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多样性的直接原因，如果这个原因真的存在的话。

中国西南那些与世隔绝的峡谷和雪山是孕育众多民族的摇篮，他们出生在这里，最后又终老于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若干个民族兴起，同时又有若干个民族消亡，人类始终在这个地区生生不息。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特征。这个地区遍布幽深的峡谷、陡峭的山峰，气候、地貌和动植物分类千变万化。这些环境因素最终作用到人类身上，自然而然便催生出了语言、风俗存在明显差异的不同民族。

从打箭炉到大理府的这一路上，我已经见识过不少民族，然而他们只是中国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地区的很多民族至今仍然属于谜一般的存在。不同的民族往往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否认在起源问题上与其他民族存在关联，这其实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不同民族起源的线索实在太过零散，除非相关研究者愿意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到这些群体当中，研究他们在社会、语言和心理方面的特点，否则这个领域的研究可能就会永远是笔糊涂账。鉴于文献材料的缺乏和不可考性，图书馆对于这方面研究的帮助不会太大。至于那些能够身临其境的旅行者，又总是来去匆匆，不可能真正体现研究的深入性。



白塔下的通京大道是清代昆明城的主要干道

帕克教授(professor Parker)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其实只有两个起源，要么是藏族，要么就是掸族[1]。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藏族和掸族的话，这样的论断也算有其合理性。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西藏地区的研究至今仍然属于不完善的状态，只有类似柯曾勋爵[2]和斯文·赫定[3]那样的少数探险者才有机会稍稍揭开这个地区的神秘面纱。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其实还没意识到，今天的藏族并非起源于古老的单一民族。凡是亲身到过西藏，或者通过文献资料对这个地区做过深入了解的人都会意识到，今天的藏族虽然拥有相对统一的风俗习惯，却是由历史上的多种民族混合而来的。今天的藏族在头型、眼睛、发色等生理特征方面，与周边的民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从文化上来讲，这个民族可能仍然处在融合的过程当中，不断有新的群体被接纳进来。例如，藏区东部边远地区的很多非藏族人目前已经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文化的因素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在雅砻江两岸，藏语甚至已经成了通用语言，很多人同时掌握着两种语言。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纯藏族人(如果这个概念真的成立的话)”的界定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民族的融合与分化是个永远不会停

止的历史过程。

就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多样性的问题而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使用的略带侮辱性的“蛮族(man tzu)”可能是个更恰当的概念，因为“蛮”的范围相对宽泛而模糊，涵盖了今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多种民族，甚至包括发明这个概念的汉族。例如在马可·波罗生活的年代(13世纪下半叶)，宋朝的皇帝败退到了南方，以今天浙江省的杭州为首都重新建立政权，身在北方的马可·波罗便把他们统称为“蛮子”。

忽必烈大元帝国的建立加剧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分化。对于今天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彝族，西方世界没有人比天主教传教士邓明德更具发言权。邓明德神甫曾在云南的彝族人群体当中生活过很多年，他认为这个民族在13世纪前后可能是云南省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问题在于，邓明德神甫写的那本小册子完全忽略了掸族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同时还仅仅通过语言方面的某些相似性就认定彝族人跟缅甸人以及生活在云南的傣族存在共同起源，却没有意识到傣族跟掸族本身存在亲缘关系。邓明德神甫还曾断言彝族人的语言跟汉语不存在联系，然而却忽略了被他认定跟彝族存在亲缘关系的傣族在语言方面跟汉语存在很多渊源。神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彝族人、傣族人和缅甸人应该存在共同的起源，他们的祖先大致生活在湄公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4]上游地区。总的来说，神甫的研究脉络是比较混乱的。

邓明德神甫对贵州土家族[5]的论述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这个群体是800多年前从江西省迁过来的，他们随后又跟当地名为“仡佬(kalao)”的土著居民发生了融合。我觉得，马可·波罗所说的“kolo-man”指的可能就是仡佬族，珂罗蒂雅先生的那本《马可·波罗》则认为所谓“koloman”指的可能是彝族的一个分支。种种迹象显示，土家族跟生活在当地的彝族或苗族(miaotzu)其实都没有联系。拉克伯里[6]先生认为，从他们的语言特征判断，土家族的语言跟暹罗语非常接近，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来自那个地区。如果这样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土家族跟掸族肯定存在渊源，因为他们都属于宽泛意义的傣族范围以内。与邓明德神甫的观点截然相反，沃锐先生[7]认为土家族跟苗族存在亲缘关系。

相关领域的顶级权威伯恩先生[8]认为苗族应该被单独化为一个民族，进而认为彝族、掸族和苗族是中国西南地区除汉族外，最主要的3大民族。不管苗族的起源究竟如何，这个民族现在已经分布于中国西南甚至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向南最远分布在老挝，向东则生活在广东省内。我在雅砻江以西的木里曾见过他们。苗族人称呼自己为“mung”、“hmung”或“hmeng”，这样的说法似乎在暗示他们的祖先来自印度支那。邓明德神甫认为苗族的祖先最早是从东面迁徙过来的，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宽泛。不管怎么说，苗族都应该是中国境内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少数民族。

至于摩梭族和傈僳族，我在从丽江到永宁府的这一路上遇到的分别来自这两个民族的群体都在竭力否认他们互相存在亲缘关系，同时还认为他们在历史上跟彝族人也没有渊源。这样的说法恐怕是靠不住的。据永宁府的摩梭人说，他们的祖先应该是草原上的蒙古人。这样的错觉可能源自六七百年前忽必烈大汗的蒙古骑兵挥师南下，却没有什么实际依据。历史上的摩梭人曾经广泛分布于西藏的西南部地区，这是有据可查的。前面曾经提到，摩梭人在最鼎盛时期曾以丽江为中心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王国。时至今日，这个地区南部的湄公河附近仍然生活着这个民族的某位亲王级人物[9]。历史上的摩梭王国曾臣服于定都大理的南诏(nan chao)王国，不过真正让这个王国走向末路的却是蒙古铁骑的南下。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忽必烈决定首先攻打摩梭王国。大概在公元1235年前后，他顺利占领丽江，然后才继续攻打大理。元朝统治时期，云南省的最高地方官是忽必烈手下的大将忽哥赤[10]。

“摩梭”这个称呼究竟从何而来，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摩梭人通常自称为“拉(l)”或者“纳(n)”，藏族人则把他们叫作“戎(djiung)”，这可能是因为摩梭人跟中国历史上的西戎存在某种关系。中国的历史典籍中经常提到戎这个群体，不过所谓西戎其实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的祖先。现在的摩梭人大多精通汉语，他们的本民族语言跟彝族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我曾向居住在永宁府的摩梭人指出过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却坚决否认自己跟彝族存在渊源。另外，摩梭族的语言跟藏族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他们称丽江为“sa tam”，这个说法就源自藏

语。目前驻节永宁府的土司就是摩梭族人。摩梭族这个概念涵盖的群体非常广泛，前面已经说过，目前木里最主要的人口构成被称为“njong”，我怀疑这个词汇可能就是从藏语的“djiung”演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木里的摩梭人群体在文化方面比云南的摩梭人更接近于藏族。

当从语言上的相似性来说，傈僳族跟缅甸人的亲缘关系可能要比他们跟摩梭族的关系近得多。话虽如此，永宁府的摩梭族和傈僳族关系却非常友好，文化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就像摩梭人一样，傈僳族分布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中国的云南、四川两省，还生活在缅甸的掸帮和克钦等地。傈僳族跟生活在缅甸的拉祜[11]人应该存在亲缘关系。他们拒绝跟掸族人通婚，同时也不认为自己跟掸族存在渊源。亨利·奥尔良[12]对傈僳族的语言非常有研究，他认为这种语言跟拉祜族、摩梭族，乃至彝族的语言都存在联系。亨利·奥尔良收集记录下来的傈僳族传说声称他们的祖先是从长江下游的南京迁徙过来的，彝族人的传说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我在永宁府遇到的傈僳族一般称自己为“lu su”。



摩梭女子

金斯密先生[13]近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研究。这位学者列举了来自中国和希腊的大量文献证据，证明生活于公元4世纪的秦尼人[14]是南亚次大陆，特别是包括缅甸在内的印度支那半岛的重要居民。他们王国的首都名叫“锡奈(thinae)”，位于伊洛瓦底江沿岸的巴莫和曼德勒之间。金斯密认为秦尼人即便不属于掸族，最起码也在人种学方面跟这个群体存在渊源。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他们的共同祖先应该来自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孔雀王朝。历史上，印度文化曾对中国乃至印度支那半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秦尼人则利用这样的机遇向东拓展，与当地土著联姻、融合。

如果我们就此认定中国西南地区的多种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先源自印度东部，那可能有点儿过分牵强。最起码儿，这样的说法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傣族与汉族间存在的很多联系。更获得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掸族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后来又逐渐向南迁徙。

拉克伯里[15]先生认为，掸族起源于四川北部，陕西以南的九龙山地区，这个地方是汉族为主体的区域。有鉴于此，对金斯密先生提出的观点做出某种折中可能更加合适。也就是说，中国西南地区的多种少数民族可能真的源自印度，不过他们的祖先并非今天的印度人，而是更古老的印度人。这些更古老的印度人则是从印度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迁徙过来的。

今天的人对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的早期历史了解异常贫乏，不可能追溯到它的真正渊源。单就孔雀王朝在印度的历史来说，建立这个王朝的人因该属于李维查人的分支。李维查人曾经生活在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国[16]的东北部。就在佛祖释迦牟尼将生前不久，公元前7到6世纪，摩揭陀和居萨罗[17]间爆发了战争，正如戴维斯博士[18]所指出的那样:

> 这场战争最终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少年时代以摩揭陀的胜利而告终。

公元前320年前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19]推翻了达那·难陀[20]的统治，当上了摩揭陀的国王。从那以后，摩揭陀变得更加强盛，直到公元前190年左右灭亡为止。李维查人属于孔雀王朝部族的重要分支，也是孔雀王朝主要的力量来源。这个大部族的野心家旃陀罗笈多跟塞琉古一世[21]是同时代的人，也是竞争对手。旃陀罗笈多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宾头娑罗又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印度的著名佛教皇帝阿育王(asoka)。李维查人当年的首都在毗舍离[22]，具体位置可能在恒河以北25英里，摩揭陀原来的首都华氏城[23]，也就是现在的巴特那[24]的东北方向。佛经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毗舍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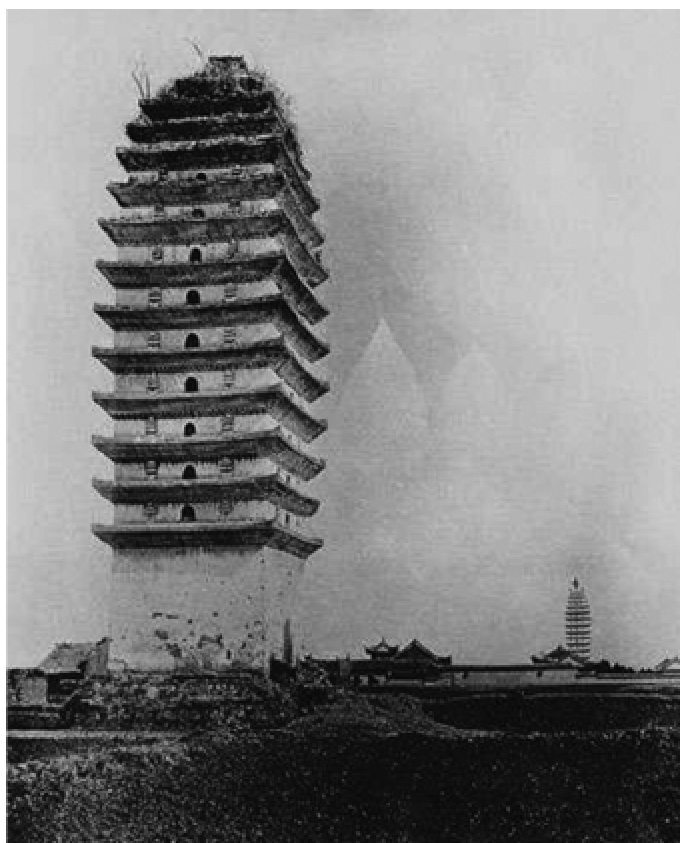
> 城市由三重城墙环绕，每道城墙之间都留有缓冲地带。城墙上开有3座城门，还修建了配套的城楼。这座城市里总计生活有7707位国王，还有同等数量的文臣武将和富商。

其他佛经的相关记载则声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处于于永无休止的纷争当中。事实上，即便是在传说中的伊甸园，也不可能有哪座城市同时生活着7707位国王，佛经里所说的“国王”可能是指当时不同家族的族长。阅读这段史料时，我们必须把东方人在历史文献中惯常使用的夸张手法考虑在内。话虽如此，毗舍离在当时印度的规模和地位仍然非常可观，这座城市不但是李维查人的首都，也是当年这个地区的中心，影响力远远超出印度的范围。有理由认为，很可能在孔雀王朝建立很久以前，李维查人曾经向东扩展，迁徙到今天的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生活，然后又去了印度，而且即便是在他们迁徙去了印度以后，可能也仍然跟留在东边的亲戚保持着某种联系。按照这样的思路，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在跟居萨罗的战争中能够始终获得来自印度支那半岛的援助。我在这里不想耗费更多笔墨去介绍金斯密先生的相关研究。概括地说，他是从语言、地名、姓氏、服饰、建筑等方面的相似性去论述孔雀王朝与中国西南地区及印度支那半岛多种民族的联系。

单从外貌来看，虽然生活在同一地区，民家人跟摩梭人肯定没有太多的亲缘关系，相反，前者可能跟掸族存在某种渊源。公元1400年，建文皇帝遭到废黜，来到云南隐居30年，大批汉族人跟随建文帝来到这个地方，跟本地土著交流融合，形成了今天民家人的基础。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很多民家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一个叫“高石桥(kao shih chiao)”的地方来的。遭到废黜的建文帝穿上僧袍隐居云南，同时还带来了大批追随者，这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只不过，我从这些记载中却找不到邓明德神甫将他们认定为今天民家人起源的确凿证据。即便从外貌来看，民家人跟汉族人也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精通汉语，不过这也不能作为民家人曾经就是汉族的证据，因为早年的几位大清皇帝都曾在云南等省份搞过官话的普及工作，所以当地的很多民族多少都能说点儿北京话。汉族跟云南少数民族融合的事肯定是实际发生过的，漫长的历史也能逐渐掩盖原有的民族特征，然而民家人的独特性实在太过突出，很难让我把他们跟几百年前从南京迁徙于此的汉族人联系起来。

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云南

少数民族还有很多。例如土家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苗族人也认为他们原先生活在更靠东边的位置。据亨利·奥尔良搜集的文献记载，拉祜族和彝族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迁徙过来的，傈僳族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说法中的大部分肯定是不靠谱的，不过其中难免又有某些靠谱的因素，我自己实在无法给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释。某些人愿意坚定地相信其中的某种说法，那恐怕只是因为有个答案总比没有答案的悬而未决让人觉得心里舒服。



清代昆明东西寺塔

【注释】

[1] Shan，缅甸官方对境内多种民族的统一称谓，不过他们更习惯自称为“泰族”，中国境内的傣族也包含在这个范围里。

[2] lord Qurzon，具体身份不详。

[3] Sven Hedin，瑞典探险家，曾在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游历。

[4] the bramaputra，发源于中国西藏，流经印度、孟加拉等国，在中国境内被称为“雅鲁藏布江”。

[5] chung chiatzu，参考这个词的发音和下文内容，应指土家族，因为相关史料对土家族起源的记载有唐末至五代初年，彭瑊率领百艺工匠从江西迁居湘西，他们的后裔演化为土家族的说法，但这只是关于土家族起源的一种说法。

[6] Terrien de Lacouperie，法裔英国人，19世纪著名汉学家，提出了中国人种西来说。

[7] Mr Warry，具体情况不详。

[8] Mr Bourne，具体情况不详。

[9] 应该指土司级别的人物。

[10] 原文为uriangkadai，参考相关史料，这个词应该指孛儿只斤·忽哥赤，也就是忽必烈的第五子，他被册封为云南王。

[11] lahu，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群体就被称为拉祜族。

[12] 原文为prince henry oforleans，这应该是种戏谑的说法，因为奥尔良对应的贵族封号只有公爵，没有亲王。亨利·奥尔良曾于1895年在中国澜沧江沿岸游历，著有《云南游记》。

[13] Thomas Wiliam Kingsmil，英国人，汉学家，旅居上海多年， 1887年受聘于山东巡抚，勘测过京杭大运河北段，曾在中国西南地区游历，提出了中国文明亚利安起源说。

[14] sinae，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指古代中国，作者这里介绍的就是中国文明亚利安起源说。

[15] Terrien De Lacouperie，法国汉学家，也提出了中国人种西来说，认为中国人是古埃及人的后裔。

[16] the kingdom of magadha，印度古代王国。

[17] kosala，印度古代王国。

[18] Drrhys Davids，指Thomas Rhys Davids，英国学者，以研究印度历史

文化见长。

[19] sandrakottos，又译“月护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任君主。

[20] dhana nanda，古印度难陀王朝末代皇帝。

[21] Seleukos Nikator，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军官，后来建立了塞琉古王朝。

[22] Vesali，古代印度大城市，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北部。

[23] Pataliputra，大致位置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

[24] Patna，印度比哈尔邦首府。

第十六章 大理府到巴莫

雨季—湄公河—金牙王国—怒江—瘴气—铁路计划—阴沟翻船—边境—巴莫

抵达大理府后，居然雇不到去滚弄渡口的骡子和脚夫。要是换在凉爽季节，走这段路其实没什么可操心的。据当地人说，从大理走到位于湄公河以南的云州最多也就7天时间。然后再花12天时间从南定河走到怒江位于滚弄的渡口。过了这个渡口，也就进入了英国控制的范围。从滚弄穿越丛林，再走四五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英军驻防的腊戍。腊戍是北掸帮行政长官驻节的地方，当地修建有直通曼德勒的铁路。问题在于，现在已经进入夏季，马上又要进入雨季，脚夫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南定河谷以及怒江沿岸的丛林是会要人命的。即便我愿意出比平时高3倍的价钱，也没人愿意接这个活儿。无奈之下，我只有选择另一条路线。虽然这里的人认为在夏季渡过怒江前往巴莫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过真正被认为有危险的路段只占全程的几个小时路程，脚夫们也就更容易接受。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只得放弃了去滚弄渡口的打算，不情愿地选择了途径永昌府[1]和腾越前往巴莫的老商道。

这条路近年来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走过了，这里没必要浪费太多笔墨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巴伯尔、柯乐洪[2]、吉为哩和莫理循博士[3]等人的相关专著。总的来说，中国西南地区在近30年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跟马可·波罗游历这里的年代相比，变化恐怕也不大，除了道路可能变得好走了些，所以这段旅程真的没什么太值得写的。



大理的三宝塔

5月25日，我离开大理府，抵达了位于这座城市南面的防御要塞下关(h s i ak u a n)。这个地方的贸易看起来比大理府还兴旺。从下关开始，路线逐渐偏离洱海，向西拐进了山谷。我们沿着山谷的走向前进了几英里，到达合江堡[4]村住宿。第二天，我们经过漾濞，走过一座正在维修的铁索桥，卖力气爬了半天山，随后在山顶隘口附近的村子过夜。27日，我们又翻过一道不太高的隘口，经过了太平铺[5]和其他一两个小村子，随后进入一条幽深的山谷当中，通过铁索桥过了青莲河[6]。据桥头的碑文记载，这座桥是大家集资在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修建的。过桥后又走了几英里，我们在黄连铺[7]村住宿。第二天，爬了半天山，我们到达小城永平[8]。这个地方附近的河流去年发了大水，城市受损严重，当地已经没有旅店，所以我们只能在学校里借宿。

27日，我们离开永平走上了条刚开通不久的路，陆续经过了被稻田包围着的小田坝[9]村，以及小花桥[10]、大花桥[11]两个村子。大花桥村所在位置的山上有座三圣宫(s a ns h e n gk u n g)，我们就在那休息、吃午饭。下午的时间主要用于攀爬一道很陡峭的垭口，下山的路也不好走。我们当晚就在山脚下的村子住宿。第二天，离开村子就翻了道不太高的山脊，然后进入到满是稻田的山谷当中。山谷里有

条河，河上有座三孔石拱桥名叫“凤鸣石桥[12]”，修建于1888年。桥头立着一排石碑，有块碑的内容是颂扬曾经治理这个地方的地方官的，其他石碑则镌刻着出资修桥人的名字。

接下来登上的那座隘口最高点已经可以眺望到湄公河。隘口上建有规模宏大的寺庙，是由往来这里的富商们出资修建和维护的。下山前往湄公河的路非常陡，就像巴伯尔所说的:

> 一连串短促而危险的之字形拐弯儿，通向一座跨度60码的铁索桥。河水从幽暗的峡谷里流淌出来，铁索桥恰好悬挂在峡谷出口的位置，看起来就挺悬。峡谷两侧的峭壁相距最多不到100码，受视角限制，我们无法测量它们的高度。

据说，就在我来到这里的前一天，有个人沿着河朝下游走的时候被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给砸死了。负责护送我的汉族士兵在我们刚好走过那个不幸地点时，非常恰当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天上午，我们就站在那个倒霉蛋的坟墓附近，推测他的致死原因。大家七嘴八舌，多数人认为那块要命的石头应该是被鹿或者山羊给踢下来的。

那条河上有座桥，桥的东南立着供奉神灵的石刻神龛，上面还刻了“太平桥(taiping chiao)”3个大字。这座大桥桥面上建有木质的拱顶，拱顶上挂了几块金字匾额，金字的内容大多比较俗套，比如“山高水长”之类的。这样的文字内容虽然缺乏想象力，却实在应景儿。河西岸桥头的山崖上也刻了些形式、内容差不多的文字，刻在最显眼位置的4个大字是“人力所通”。这4个字是用来夸奖大桥的修建者的，他们造出来的这座桥堪称建筑工程的精品，任何人都应该为它感到骄傲。

就我这次旅行赶上的天气来说，确实称得上天公作美。云南西部的雨季通常从5月初开始。幸运的是，我这一路上除了赶上过几次暴风雪，在丽江附近被淋了一天雨，离开大理府后又赶上了两三场阵雨外，基本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当中。话虽如此，一旦雨季真正开始，可能连续几周都不会再有晴天了，因此我必须尽快赶到巴莫。只要过了伊洛瓦底江，天气再怎么变化也就都奈何我不得了。

离开水寨村[13]后，我的下个目的地是永昌府[14]。抵达永昌后，

我需要给那些从大理雇的脚夫结账，然后再从当地重新雇人。为了节省一天时间，我把那位从打箭炉陪着我来到这里的仆人提前派过去打前站，我则跟在他屁股后头优哉游哉。出了水寨村，沿着盘山路走了大概6英里，就登上了一处垭口，这个地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永昌所在平原的部分区域。我脚下的这座大山就是湄公河流域和让人望而生畏的怒江流域的分界线。越过垭口不久，山路顺着一条小溪的左岸蜿蜒而下，溪水的目的地和我一样，都是英国控制的缅甸。



大理到漾濞的廊桥

位于垭口西侧的村子名叫，“牛角关[15]”。巴伯尔来这里游历的年代，所谓“村子”其实就是两间草房。现在，草房的数量增加了5倍，当地的人口还是没多到哪儿去。下山的路走了一英里，进了关坡[16]村，再往山下走，就是永昌平原区的边缘。下山后，我们从名叫“世科村[17]”的村子旁边走了过去。这个村子里有座宏伟的寺庙，被称为“光尊寺[18]”。值得注意的是，越向云南省的西部深入，寺庙的装饰风格就越显奢华，好在这样的风格并不惹人反感。种种迹象显示，这里的建筑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缅甸文化的影响。

接下来遇到的村庄名叫“板桥[19]”。村子里只有一条大街，可是挺热闹，街道两旁有不少店铺和新式建筑。这个村子的狗挺厉害，有

条狗打算找我的吉姆的麻烦，结果吃了亏。我这条狗的表现一贯不错，平时很少跟别的狗打架，实在迫不得已动手的话基本都是以一敌二。离开这个村子，永昌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了，它的背景是座造型奇特的金字塔形山丘。那天下午很早的时候，我们就从北门进了城。城里的感觉跟城外差不多，照旧有不少耕地和农舍。那些本该属于街道和店铺的位置，如今盛开着刺梨的繁花。好在永昌城并不是都这么荒凉，路线向右一拐，便是人口稠密的繁华地区，再往前走，向左一拐，巷子里有不少旅店。这说明永昌还是具有相当的商业潜力的。我希望能在这里买到货真价实的西方产品，可惜能够选择的范围非常窄。当地店铺里出售的贴了英国商标的新加坡产菠萝罐头跟真货的售价一样，9便士每听。来自仰光的所谓专供印度的特等蜡烛每包5根，售价大概1先令。

我刚刚走过的那片以大理府为中心的区域当年被马可·波罗称为“carajan”。这个区域的西部边界大致就是湄公河，过了湄公河再往西则是马可·波罗口中的“zardandan”，他把这个古老王国的首都称为“vochan”。所谓“vochan”，其实也就是今天的永昌。这个地方曾经被称为“金牙王国”，因为当地的土著习惯用金箔包裹牙齿作为装饰。现在，这样的习俗已经看不见了，我们也不能肯定生活在这里的人跟缅甸人是否存在历史上的渊源。时至今日，永昌依然保留着马可·波罗当年见识过的“挽娩”习俗。也就是说，妻子生孩子以后，把婴儿收拾干净，放在床上，然后就开始料理家务。她的丈夫则要代替妻子躺在孩子身边，连续卧床40天。亲戚朋友要在这段时间过来探望，还要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据当地人解释，“挽娩”的目的是因为女人在分娩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男人也应分担相应的痛苦，这才算是公平。这样的解释实在有些牵强，更何况，它也无法讲清楚为什么亲友还要大张旗鼓地赶来探望这个无聊的男人，并把这件事当成喜事庆祝。

永昌的民族构成就像云南其他地方一样复杂，不过这个地方的人多数都能说汉语，当地方言也没有超出云南方言的大范围。观察力异常敏锐的马可·波罗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人有文身的传统，这可能暗示他们跟今天的缅甸人存在某种联系。

我找到旅店住宿时，未来几天的行程已经全部安排好了。除了两

匹骡子，队伍里新增加了两头大象，我骑一头，仆人骑一头。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永昌出发，赶骡子的脚夫答应5天内把我们送到腾越，他们后来真的做到了。我们沿着永昌城内的道路向南行进，从南门出城。我注意到当地城墙的某些城砖上有“光绪二十六年”的字样，这说明永昌的城墙是近年才修缮过的。这可惜工匠们并没有找到根除那些生长在砖缝里的杂草和灌木的办法，随着时光流逝，它们的根系必定损害城墙的坚固性。出了城门，首先遇到了一座观音庙，然后又穿过了面积不大的郊区。路线在广阔的平原上向南延伸了4英里左右，便来到了卧狮窝[20]村。村子的名字源于附近山上几百码高地方的同名山洞。山洞里生活着许多蝙蝠，所幸它们的吵闹声并没有惊醒正在睡觉的狮子。由于大量蝙蝠住在里面，山洞的臭味阻挡住了所有试图进入探险的人。站在洞口向里面张望，可以看出这个洞具有比较长的纵深。具体有多长那也说不清楚，因为山洞从洞口向里面延伸了没多久就向左拐弯儿了，而且光线很暗。这个洞里的道路基本都是下坡儿，洞顶常年往下滴水，搞得路面非常滑。如果真的有胆量进去探险，满可以直接坐着滑下去，不过我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别的人吧。

离开这个山洞，又开始爬山，好在道路并不是太陡。翻过山脊，眼前的村子名叫“郝祖铺[21]”。我们没有停留，继续攀爬下一道垭口。翻过垭口，山脚下是冷水井[22]村。从这里再往前走，又进入了平原地区，我们在浦桥[23]村找了家条件挺差的旅店住宿。

第二天出发后走了大概7英里，就进入了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怒江河谷。任何人只有在精力充沛，而且提前吃了奎宁[24]预防的前提下，才敢涉足其中。进入河谷区域后，连续遇到的几个村子都叫“放马场[25]”。这几个村子在巴伯尔来云南游历的时候已经被战乱变成了废墟，现在又得到了重建。告别放马场，再往前走2英里，就是此行的终点，贫穷的大板井[26]村。这座村子后面不远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还有座石头小庙。庙里有4尊坐像和2尊立像，他们的面前是一堵围成半圆形的墙。如果这些神灵真的有知，他们能看到的世界也是非常有限而单调的。就在这座小庙上面的山坡上，还有座精致的小庙隐藏在丛林当中，这座小庙旁边还有块坟地。

第二天早上，我和随从们吃了大量奎宁，然后开始沿着盘旋的山

路下山，向着怒江进发。怒江在中国又被称为“泸江(lu chiang)”或“泸子江(lu tzu chiang)”[27]。我比随从们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大家约定在江边碰头儿。出发后不久，我遇到条河，河边有块石碑，碑文的大意是警告路人这条河里的水有毒，不能饮用。如此说来，怒江河谷里的河水可能真的如传说的那样含有植物或矿物毒素，它的恶名绝非虚事。大板井的海拔为4500英尺，怒江江面的海拔为2400英尺，也就是说我需要沿着山路下降2100英尺的海拔。好在山路不陡，我很容易就来到了怒江吊桥的边上。相比同纬度的湄公河，怒江无疑要宽阔得多。

目前，我的身体感觉良好，应该没得什么病。单从这点来说，怒江河谷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这个地方植被茂密，土地宽阔，本可以被开垦成上好的农耕区，然而因为莫须有的民间传说，这里的多数土地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居民数量也非常有限。受制于民间传说，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怒江边的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缩短自己的滞留时间。如果能够爬上河谷另一侧的山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福大命大。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巴伯尔留下的相关记载:

> 第二天的旅程将跨越怒江。当地人相信，这是一条充满神秘和诡异色彩的大河，云南西部的人提起它来总是带着一种敬畏之情。据说，每当太阳升起，河谷里就会弥漫着各种瘴气，红、黄、蓝什么颜色都有。就危险性来说，红色的最致命，蓝色次之。桑德将军以前也没来过怒江，他告诉我们说必须赶在天亮前渡江，太阳升起的时候务必要跟怒江拉开相当的距离。据将军说，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的怒江上已经有了大桥。要是以前，过江的人只能坐船。船划到江心的时候，隐藏在深水里类似毯子的怪物就会浮上来，连船带人裹下去，沉入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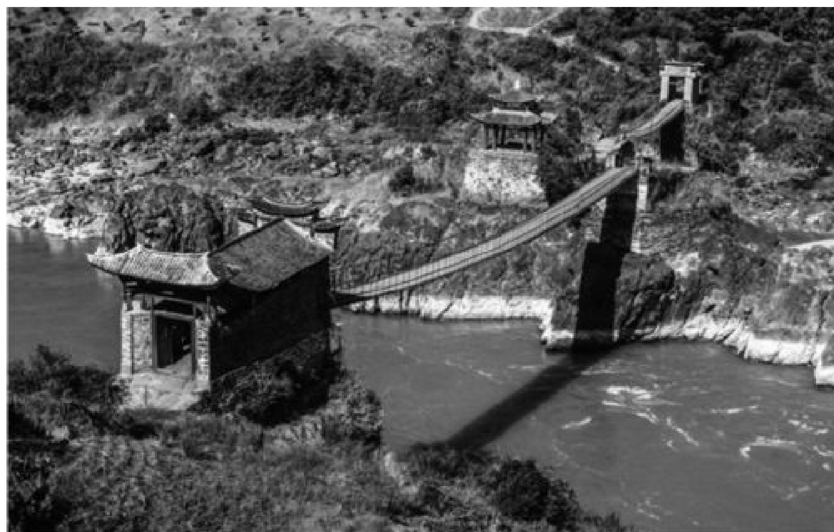
[28]

实在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传说在怒江两岸流传了多久，最起码13世纪的马可·波罗是知道这些事的。他虽然没来过怒江，却把这个地区描述为到处都是不可通过的大山和森林，夏季空气污浊，外国人去了那里就必死无疑。据我看，旅行者突然从云南的高原地区下降到海拔只有2400英尺，水汽弥漫的峡谷，身体发生某些不适是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怒江的那些传说基本属于无稽之谈，至少我的队伍里没有得病的人。关于怒江，我在北京的朋友，《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博士也认为各种与怒江有关的可怕传说都只是传说而已。鉴于这位朋友的博闻广记，我觉得他的看法还是靠谱的，更何况我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要知道，莫理循博士同时也是位科学家，就算巴伯尔提到的那个毯子怪真的存在，他也肯定能把这玩意儿找出来弄死。

怒江上的那座吊桥跟我前面遇到过的那些吊桥都差不多，区别在于这座桥有两个桥洞[29]。过了桥，就是名叫“巴彝[30]”的小村子，还有座小庙。我不急着赶路，同时也想见识见识怒江传说中的瘴气有多厉害，就在小庙里转悠了一个小时，顺便等等后面驮行李的骡子。当地人告诉我，现在怒江两岸的人口已经逐渐多了起来，很多荒地也被开垦成了耕地。这个地区的最高长官也是一位土司，他住在怒江右岸以南10英里的地方，江边有条小路可以一直通到那里。

虽然赶上了阵雨，翻越怒江西岸的大山对我来说还不算困难，驮行李的骡子也都顺利地过来了。站在山顶，看着一大块积雨云边下雨边向怒江以南的地方飘，也算是个奇观。此时怒江的海拔已经比我们所处的位置低了2000英尺，远远望去，银色的江水被阳光照耀得如同白练。突然，雾气笼罩了江面。逐渐的，一道色彩以橘红和蓝绿色为主的诡异彩虹在雾气中显现了出来。那道彩虹跟江面最窄的位置同宽，就好像又在怒江上架了座桥一样。5分钟后，雨过天晴，彩虹也就不见了。这幕奇景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它的美丽和神奇无法用语言形容。或许这就是巴伯尔所说的能致命的彩色瘴气?



怒江上的双虹桥

我们继续向上爬，直到距离江面海拔3100英尺的地方，来到破败的小村子黄木树[31]住宿。此时的我们已经浑身湿透，拖泥带水了。第二天早上出发后又下了雨，大家费了半天劲烤干的衣服不到半个小时就重新湿透。山路在树林中蜿蜒，树木的枝叶挡住了雨水，可是从上面落下来的水滴同样烦人。大家就这么走了大概3英里，来到象坡[32]村。从这个村子再往上爬1500英尺，就登上了海拔8700英尺的垭口最高点。这个地方立了道木头栅栏门。接下来的路起伏不定，先朝着下山的方向走了1英里左右，然后又开始爬山，就这么来回折腾，直到中午抵达太平村休息，吃午饭。这个地方的野鸡挺多，不过要想打到就得离开大路，深入丛林，那就有点儿不值得了。太平村接待我们的那户人家拥有几件西方工业产品，比如一盏煤油灯，两个空的法国红酒瓶子什么的，那应该是以前的旅行者留下的东西。离开太平村，前面的目的地是龙江[33]，基本都是下山的路，又陡又滑，我们跌跌撞撞地下降了3500英尺。龙江上也有座铁索吊桥。过了桥再走不到两英里，就到了橄榄站[34]村，我们找了家旅店过夜，那家旅店很脏。

第二天的旅行平淡无奇。当天下午，我们抵达了腾越所在的平原地区。这片平原上散布着大量富庶的村庄。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混杂其

中的大清海关衙门，那是栋半西式的建筑。距离海关不远的地方，就是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驻当地领事奥特韦尔先生(Mr Ottewell)热情接待了我，我就留在领事馆休息了两天。

腾越目前已经被拟定为以巴莫起点的那条英国铁路的终点，相关的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个计划如果变成现实，必将极大促进中国与缅甸间的贸易。然而据当地大清海关官员说，当地的贸易情况并不是太好，每年收的那点儿税款也就够维持海关自身的运转。铁路修好后，能否真的促进贸易，那也是个未知数，因为从巴莫到腾越的商路早就存在了，铁路的修建只不过是缩短了运输时间，同时也免除了翻山越岭的苦难。单就交通来说，铁路肯定是有用的，至于贸易，那真的不好说。我觉得，如果铁路能再从这里延伸到大理府，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很大改变，不过由此带来的工程量非常大，成本也非常可观。铁路延伸到大理府后，如果能从那里再延伸出几条支线，一条向南直达滚弄渡口(这条路线已在踏勘之中)，与目前已经完工的曼德勒至腊戍的铁路衔接;另一条可以向北连接丽江;当然，最主要的支线应该向东延伸至云南府，与即将动工的从云南府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的铁路连接起来。

根据我这一路走过来的经验，修建从大理到丽江的铁路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铁路沿线都将因此受益。最理想的情况是将这条支线延伸到更西边的维西[35]，这样就可以把西藏地区也拉进这个贸易网当中。铁路向东延伸的话，最好可以把会理州和宁远府纳入进来，建立跟金川地区的联系。这将极大增加四川省的贸易量。当然，这些铁路必将耗费大量的建设和维护成本，目前英国政府只对修建从巴莫到腾越的铁路感兴趣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可是如果认为修建这么条铁路就能跟法国人在这个地区搞贸易竞争，抢夺他们在东京湾[36]的商业利益，那纯粹是异想天开。

抵达腾越后，我跟那些在永昌府雇的脚夫结了账，也跟那位从打箭炉跟过来的仆人告了别，然后又在当地重新雇骡子和脚夫送我去巴莫。6月8日，我再次踏上旅程。路线很快离开了平原地区。经过一大片墓地，翻过几座小山，海拔逐渐上升。这天晚些时候，我们下降到河谷当中。这条河谷里的村子不少，还有很多稻田，只不过最近的雨

实在太多，多得稻田里的水都溢了出来，弄得走路很不方便。我们在名叫“热水塘[37]”的小村子里吃了午饭，村子的名字说明当地肯定有天然温泉。此时的我们已经把云南高原甩在了身后，逐渐下降到伊洛瓦底江所在的平原地区。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主要是掸族人和克钦人，他们跟汉族人不同，习惯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妇女头上的饰品大得夸张。类似这样的头饰，我在怒江沿岸已经见过。头饰的主体是黑色的头巾，裹在脑袋上就跟英国绅士的礼帽差不多。这个地方的人不分男女都喜欢嚼槟榔，所以牙齿都弄得很黑，看起来很别扭。按照通常的经验，水稻种植区河里的水肯定是不能随便喝的。我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真的看到了告示，警告路人溪水有毒，这样的惩罚对那些干渴的旅行者实在残忍。

离开腾越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名叫“南甸[38]”的村子里找了个寺庙过夜。第二天的旅行照旧平淡无奇，只是道路实在让人恼火。到处都是水，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面，哪儿是稻田，多数时间只能在泥水里蹚着走。那天晚上在高街[39]村过夜，这个村子是以一个大市场为中心的。次日晚上，我们留宿小新街[40]，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小巴莫”。当地的居民以掸族为主，房屋也都是掸族式样的。

6月11日，河流纷纷因降雨而涨水，路比此前更加难走，我真担心可能要被洪水耽搁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小新街和龙掌街[41]之间遇到条小溪。这条小溪在旱季的时候根本不起眼儿，现在却变得水流湍急。最糟糕的是，周围没有船，没有桥，也没有能直接蹚过去的地方。就算我们愿意冒险蹚水过去，骡子们出于本能却拼命拒绝下水。脚夫们跟骡子较了半天劲，最后只得把行李从骡子身上取下来，分成小份儿，由人顶在头上蹚水背过去。河水真的很深，脚夫们干脆脱光衣服下水。有位脚夫站立不稳，还是把头上的行李掉进了水里。落水行李后来找到了，可装在里面的胶卷大部分曝了光。这是我此次旅行遭遇的最大不幸。最可气的是，一路上艰难险阻都没出事，最后偏偏阴沟里翻船。屋漏偏逢连阴雨，冰冷的河水让我感了冒，连续几天都病病歪歪。热带河谷里的水汽令感冒和热病非常不容易痊愈，还不如西藏的高山气候让人觉得爽快。

过了小溪后的路出乎意料地顺畅了起来。我们的面前忽然出现了

一条状况良好的公路，路面虽然没经过浇筑，却也十分平整。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路是在缅甸政府的请求下，由云南省的地方政府出面聘请英国工程师修建的。由于资金不足，这条路目前还不能延伸到腾越，不过终究会有那天的。到了那时，旅行者就可以免除在泥水中艰难跋涉的痛苦了。走上这条路，距离巴莫就还剩下最后的70到80英里，距离中缅边界则只有20到30英里。距离边境还有15英里的时候，我们在曼闲[42]村停下过夜。这个地方是当地掸族首领的所在地，不过所谓村子也就是大概30间竹子搭建的草房，其中包括两三家店铺。

6月12日的旅行开始于中国领土，结束于英属缅甸。赶骡子的脚夫速度快不起来，我索性把他们甩在后头，独自一人走完了这15英里。那天早上下了雨，但很快又晴了天。炎热的阳光炽烤着我，路上买来的那把冒牌英国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好在脚下的路还算平坦，只不过由于路面没有浇筑，很多地方都被大雨给冲坏了。路两侧都能看到茂密的丛林，区别在于左侧是长满树木的高山，右侧是植被茂盛的深谷。洪水还在泛滥，可是我只能听到水流的声音，却看不到它到底在哪儿。脚下这条路确实不错，可惜只适用于旱季的好天气，同时也缺少桥梁和排水渠。雨季的洪水不但能冲毁路面，还能创造出很多临时的河流，让道路难以通行。更糟糕的是，道路边上的山坡没有经过加固，发生滑坡的风险非常大。不过话说回来，为这么个偏僻的地方耗费太高成本修建道路，可能也是不值得的。

提起缺少桥梁的问题，实在有必要说说位于曼闲村以西4英里处康萨[43]的那座令人惊叹的铁桥。这座铁桥架设在一连串的瀑布之上，站在上面可以看到瀑布的最高点，风景真是美极了。如果当地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肯定能吸引很多旅行者。我更应该感谢那座铁桥，要是没有它，脚下的湍急水流不管蹚水还是游泳都根本过不去。试图绕过去也是妄想，因为河道上游和下游的河水已经漫过了河岸，把附近的森林都给淹了。

距离曼闲村15英里的地方有条狭窄的山谷，谷底流淌着小溪，小溪上架了根圆木当桥。这个地方没有石碑，没有旗帜，也没有哨兵盘查，却是中国和英属缅甸的边界。中国一侧有个名叫“古里街[44]”的

小村子，村子里零星散布着几间草房。我们从这个地方过了小溪，开始攀爬西边的大山。爬上山谷西侧的大山后，我看到了两座木头建成的孟加拉式平房，周围还有仆人的宿舍和其他辅助性房屋，这意味着我真正进入了英国属地。这片房子应该是供英国的工程师或者勘测人员居住的，眼下，它们都是空的，只有几个掸族的商贩在露台上睡午觉。我也找了间空房子待在里面，等后面的脚夫赶上来。吃过午饭，我们再次上路，路两侧都是地道的热带风光。路线在丛林密布的河谷中穿行，视线总是受到遮挡。我只能隐隐约约得看到脚下几百英尺的地方，汹涌的太平河(thetaiping)正在跟狭窄的河道发生猛烈的撞击。这条河位于平原地区的河道很宽，适于通航，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咆哮的水声似乎是在不断抗议狭窄河床的禁锢。

越过边境线后走了大概8英里，驿站出现在眼前，它就是我们今天旅行的终点。类似这样的驿站普遍出现在缅甸的主要道路沿线，每过一定距离就设有一座，目的是供来往的官员和旅客居住。驿站的正式管理员不在，一个克钦族姑娘跑出来接待我，客气地打着招呼。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知道那肯定是表示欢迎的意思，所以也就跟着客气了起来。缅甸是个热带国家，现在又处于最炎热的季节，一天走23英里实在不是轻松的事。过去几个月当中，我远离西方文明，现在终于重新看见了那些熟悉的桌布、刀叉、玻璃杯、安乐椅、挂着蚊帐的床，更重要的是，还能洗澡!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算起来，从威海卫动身走到缅甸，总共用了5个月零6天。我的出发点是中国最东边的登州府[45]，终点则是中国最西边的永昌，等于是从中国的东北角走到了西南角。沿途历经7个省份，翻过了无数高山，渡过了包括黄河、长江、岷江、雅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湄公河、怒江和龙川江在内的多条大河。这一路上，除了在腾越以西的地方感冒过一次之外，我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吃的东西跟手下的脚夫们是一样的。



庄士敦(左一)与溥仪兄弟在紫禁城御花园

我居住的这个驿站距离巴莫还有段距离，脚夫和骡子却已筋疲力尽。鉴于他们的强烈要求，我决定用3天时间走完剩下的43英里。6月13日，我来到位于古朗加[46]的驿站住宿，这个地方距离巴莫30英里。

6月14日，我在距离巴莫18英里的里程碑处发现了修筑良好，路况不次于英国一级乡村公路的道路，然后就顺着这条路走到位于莫马克的驿站，当地居民主要是掸族和克钦族。6月15日清晨6点，我早早动身，希望尽快走完最后的9英里，抵达巴莫的驿站。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这身打扮引发生活在巴莫的欧洲人围观。我从威海卫启程时穿的那身体面衣服早就没有了，藏区买的皮衣、皮靴不适合热带气候，只得在大理府送给了脚夫们。至于行李里的换洗衣服，眼下也都变成了破布。我现在脚上穿的是中国式的草鞋，还光着脚。

身上穿了件卡其布上衣，衣服上打着不协调的蓝色补丁，扣子都丢了，只用用条草绳子捆着。头上戴着的则是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时用的那种大草帽。我的坐骑是从腾越骑过来的云南种小马，浑身的毛又脏又长。马鞍子还是在打箭炉买的藏族货，鞍子两头的尖儿很高，上面还包了金属，鞍子的主体就是个包牦牛皮的硬木座。配套的脚镫是两块平底盘子似的铁板，缰绳则是用麻和竹子的纤维拧的。

就冲这身打扮，弄不好进了巴莫就得让警察抓了。我打算趁着早上人少的时候悄悄溜进去，先找个鞋店、裁缝店打扮打扮，然后再出去见人。这个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了空。巴莫的房屋已经出现在视野当中，眼前突然尘烟弥漫，一大队荷枪实弹的印度士兵走了过来，那是驻防当地的英国山炮连。看到他们我本该欢呼，然而看看自己的这身打扮，觉得还是不惹麻烦为好。想到这里，我赶紧把小马赶进路边的沟里隐蔽起来，让士兵们先走过去。即便如此，我还是没能逃脱带队英国军官挑剔的眼神。告别士兵，又往前走了半英里，就算进了巴莫。迎面走来一个骑在马上的欧洲人，我不好意思地向他询问驿站的具体位置，他非常友善地为我指了路。半个小时以后，我在当地一家被英国侨民称为“柯恩商店(kohn's)”的店铺里买了些蹩脚的成衣，把自己打扮起来。

【注释】

[1] Yung chang fu，清代云南省区划，以今云南省保山市为府治，辖境大致包括保山市隆阳区、永平县以南，澜沧江以西，怒江、龙川江以东及缅甸联邦萨尔温江以东、南卡江以北地区。

[2] Colquhoun，英国探险家，清代末年曾在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游历。

[3] Dr Morrison，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也是著名的旅行家，拍摄了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老照片。

[4] Ho chiang pu，应指今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合江村。

[5] Taiping pu，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太平乡太平铺村。

[6] the chinglien river音。

[7] Huanglien pu，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北斗乡黄连铺村。

[8] Yung ping，即永平县城。

[9] hsiao tien pa音。

[10] Hsiao hua chiao，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小花桥村。

[11] Ta hua chiao，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大花桥村。

[12] feng ming shih chiao，作者标注了中文。

[13] Shuichai，今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力角镇水寨村。

[14] 作者这里指的是永昌府治所在地，今云南省保山市。

[15] Niu chio kuan，保山附近的古代关隘，位于怒山山脉。

[16] kuan po音。

[17] Shih kotsun，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世科村。

[18] Kuang tsun ssu，位于世科村后的五凤朝阳山，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南诏王皮逻阁下令修建。

[19] Kan chiao，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板桥村。

[20] Wo shih wo，今保山二十五街。

[21] hao tzu pu音。

[22] leng shuiching音。

[23] Pu piao，今保山市隆阳区老营乡浦桥村。

[24]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25] fang ma chang，作者进入了今云南省红河州境内。

[26] Ta pan ching，今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官厅镇板井行政村大板井自然村。

[27] 庄士敦这里的说法有问题，泸江是越南红河支流，发源于中国云南省石屏县，流经开远市时被称为泸江，属南盘江支流，跟怒江没关系。

[28] general Thunder，具体情况不详。

[29] 庄士敦走的是乾隆年间修建的怒江铁索桥，这是怒江上最古老的吊桥，因为跨度大，因此在江中间多个桥墩，形成了两个桥洞，远远看过去宛如两道彩虹，所以也被称为“双虹桥”。

[30] Pai，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八一村。

[31] Hu mushu，今红河州个旧市蔓耗镇黄木树村。

[32] hsiang po音。

[33] thelung river，发源于高黎贡山西侧腾冲的明光河一带，属伊洛瓦底江水系。

[34] kanlan chan音。

[35] Wei hsi，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36] Tongking，今北部湾。

[37] je shuitang，云南红河州境内有多个热水塘村，无法确定庄士敦去过的是哪个。

[38] nam tien音。

[39] kau ngai音。

[40] Hsiao hsin kai，今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小新街乡。

[41] rung chang kai音。

[42] man hsien音。

[43] kamsa音。

[44] Kulika，今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福乡古里村古里街自然村。

[45] Teng zhou fu，这里指晚清登州府府治所在地烟台。

[46] kulong ka音。

第十七章 从巴莫到曼德勒

巴莫历史—伊洛瓦底江三峡—曼德勒皇宫—佛的光芒

若干年以前，巴莫还被西方人视为普通旅行者鞭长莫及的地方，很多人甚至自以为是地将它排除在人类文明范围以外。1855年以后，巴莫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地方迅速成了重要的贸易中转站，逐渐在中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商人都来到这个地方做生意，英国也派遣军队长期驻扎。驻防这里的英军主要是印度士兵，当地还有规模很大的英国侨民聚居区，聚居区拥有军队、警察、军事和文职官员，后者掌握当地的最高行政权力，就像很多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一样，巴莫地方长官的职责事无巨细，他的手下还有一些部门负责具体的工作。莫理循博士这样评价巴莫:

> 巴莫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混合风格，世界上可能没有那座城市能够同时接纳如此多种族的人共同生活。这个地方生活着英国人、中国人、掸族人、克钦人、南部印度人[1]、旁遮普人[2]、阿拉伯人、德国的犹太人，以及法国的冒险家、美国的传教士、日本的传统妇女。大家生活在一起和谐共处。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我见到的巴莫跟1894年莫理循博士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法国冒险家和日本妇女如今已经跑到别的地方谋生去了。关于巴莫，博士还说过这么段话，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 即使在最鼎盛的时代，巴莫也只能算是个不起眼的中途歇脚点，任何来访者对这个地方留下的印象只能是深深的失望。

我并没有失望。如今的巴莫应该算是这个地区比较繁华的所在，曼德勒和仰光跟这里保持着方便的水路和陆路联系，让它不再是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巴莫的英国居住区非常漂亮，铺设了道路，配备了专门的网球场，还有很多空地可以供大家从事马球之类的运动。那些

西式住宅都配有花园，花园里长满了各种热带植物。唯一的遗憾在于，每年总有那么段时间，这个地方的天气让人无法忍受。巴莫位于伊洛瓦底江的边上，海拔不到400英尺。每年初夏的雨季到来前，这里的气温可以达到100华氏度。我逗留的那几天，即便背阴处的温度也足有90华氏度。相比曼德勒，这个地方的气温还是可以接受的。要知道，每年临近雨季的时候，曼德勒的气温总是高得吓人。巴莫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听说过去3周曼德勒的每天下午背阴处的温度高达115华氏度。话虽如此，曼德勒和巴莫干燥、凉爽的春天和初夏还是能让欧洲人觉得比较舒服。



庄士敦的好友莫理循

我在巴莫从6月15日一直待到18日，受到当地英国侨民的热情接

待。18日，我乘坐小轮船走水路前往曼德勒。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我只能在船上待着，经历过中国境内的艰苦跋涉以后，这倒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休息。相比中国的大江大河，伊洛瓦底江的这个江段并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不过宁静的流水与两岸的丛林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宁静之美。要知道，眼下类似这样还没被人类文明(哪怕是土著人的文明)染指的地方已经不多了。缅甸人的村庄非常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建造房屋的材料只有木头和竹子，全部取自村子周围的森林。这些房子立在那里，就好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跟周围的树木完全融为一体。古希腊人认为，石头之所以能被刻成雕像，其实是因为雕像的灵魂原本就隐藏在里面，雕刻家的工作不过是把这些灵魂释放出来。缅甸的村庄似乎也是这样，它们的灵魂原本就隐藏在周围的树林里，人类的手和斧子最终让它们的灵魂释放了出来。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很怪异，不过当我乘坐的那艘轮船有节奏地发出声响，在水汽的包裹中划破平静的江面时，我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我乘坐的轮船需要经常靠岸上下旅客和货物，这也为我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缅甸村庄，验证自己想法的机会。村中寺庙精美的柚木雕刻，佛塔闪光的金顶，还有村民朴素的服装、愉快的笑容，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遗憾的是，迷失于外来西方文明的缅甸正在逐渐丧失这种自然之美。防火的考虑，经济的因素，逐渐庸俗化的审美品位，都在促使这里的人们不断引进西式的建筑方法。最让人觉得别扭的就是传统的木头房子上搭着洋铁皮的屋顶，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材料可供选择了吗?缅甸人至今仍在坚守自己的传统服装，只可惜，他们还要煞风景地同时搭配来自西方的黑色雨伞。这种半土半洋的做法似乎还是得到英国殖民当局鼓励的。前些日子，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ales)莅临曼德勒。英国派驻缅甸的副总督特意举办水上表演以示欢迎，表演被安排在古老皇城曼德勒皇宫(the fort dufferin)周围的护城河里。这座前皇家园林的部分区域目前是向公众开放的，很多缅甸老百姓因此也赶来看热闹。他们身穿最漂亮的传统服装，手里却撑着来自英国的黑色阳伞，非常不协调。为了让亲王领略最地道的缅甸风情，当局只得临时派人请求这些人把伞收起来。如此地道的缅甸风情是亲王在仰光都没见识过的。

伊洛瓦底江位于巴莫下游的河段最让人惊叹的景致莫过于第二峡[3]。河道在这里突然变窄，两岸都是大概800英尺高的悬崖峭壁。几年以前，我曾专门拿出几天时间，乘坐独木舟，沿着美丽的蒙河[4]顺流而下，从孟洼[5]漂流到琅勃拉邦[6]，那次旅行非常愉快。这条河最终是汇入湄公河的，就在离它们交汇的河口不远的地方，河的右岸有座巨大的石灰岩峭壁拔地而起。我当时没算出它究竟有多高，不过从第一印象来说，这个地方肯定不次于第二峡。如果我的记忆可靠的话，这个地方甚至比第二峡更加雄伟、壮观。那次旅行过程中，我白天乘坐小小的独木舟在浪花中飞驰，晚上则在河边人迹罕至的树林里宿营，周围什么声音也没有。从那时开始，蒙河的美就深深印刻在了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当然，我的记忆难免会有夸张的地方，某些东西可能就被人为地给放大了，不过伊洛瓦底江无论如何都将成为我这一生难忘的梦幻之河。

6月18日离开巴莫，20日抵达曼德勒。我把曼德勒看作此次旅行的终点，正如本书的标题所标明的那样。近半年以来，从中国的首都经陆路抵达了缅甸的古都，我愉快地完成了从威海卫出发时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或许，我应该描述一下曼德勒这座奇异的城市，作为本书的结尾，然而这可能不是我这个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所能胜任的。曼德勒是亚洲最奇特的现代化城市之一，仅仅在这里居住一周时间是不足以把它给说清楚的。当然，某些环球旅行者也可能认为只要在某个地方停留两三天也就足够了。

我在曼德勒宫殿的庭院里看到了曼同王[7]的宏伟纪念碑，他是锡袍王(k i n gt h i b a w)的父亲。我听说最近某本以缅甸为主题的书把这座纪念碑的照片收录了进去，可能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核实，作者居然把说明文字写成了“国王爱犬之墓地”。这实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这里的众多宫殿中有间是金色的，设有宝座的大殿，由于寇松爵士[8]的努力，这里已经不再被充作当地西方侨民的俱乐部。除了宫廷建筑，曼德勒最吸引人的景致其实位于皇城城墙以外。但凡对佛教感兴趣的学者，恐怕没人不愿意去见识见识王恩佛塔(t h ek u t h od a w)这座不大的寺庙所拥有的丰富收藏。这座寺庙拥有全套的三藏经文，至少有基督教的《圣经》5倍那么长。佛经的内容被雕刻在上千

块[9]白色的大理石碑上，大理石碑又被竖立在专门的小型宝塔中，免除了风雨侵袭，又能方便大家阅读佛经内容。那些小型宝塔本身也成了寺庙里的景致。宝塔的总数在700左右，排着整齐的行列，组成了个大的四方形，寺庙则位于宝塔群的中间。这些宝塔作为一件功德善举，在1857年由曼同王下令修建完成。

曼德勒城内及周边地区的宝塔其实非常多，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最精美的当属马哈牟尼佛寺里的宝塔(the maha myatmuni)，俗称“阿拉干塔(the arakan pagoda)”。这座宝塔里有尊巨大的坐姿铜质佛像，大概有12英尺高。这尊佛像的特别之处在于，据说它是严格按照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的真实形象铸造的。中世纪的时候，为了争夺这尊佛像的归属权，古代的几位缅甸国王甚至不惜跟周围国家的国王发动战争。最有意思的是，宗教方面的虔诚似乎并没有妨碍这里的僧人接受现代文明，他们给寺庙引进了电灯，而且使用相当得当。几盏电灯被有意安放在佛像周围的壁龛里，为它提供照明，增加了佛像本身的威严感，佛像周围的地方光线则相对昏暗。我看到几位女性信徒正跪在那里向佛祖祈祷。

滞留缅甸期间，我以曼德勒为中心，陆续游历了周边地区，前后历时6个星期。除此之外，我还去腊戍转了转。这个地方如果从怒江的滚弄渡口过江，走陆路几天就能到达，也是目前以曼德勒为起点的那条铁路所能抵达的最远点。现在，我则以北掸邦长官客人的身份，从曼德勒去那里待了些日子。中途抵达风景如画的欧洲人山地居住区眉苗后，我受到了缅甸副总督郝伯特·怀特爵士[10]的盛情款待。回到曼德勒后，我又受到他的邀请，参观了政府所在的那栋建筑。眉苗距离曼德勒只有4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为了抵达那里，火车需要爬上海拔3000英尺的山坡。我的脚步在从眉苗到腊戍间的位置暂时停了下来，受惠于当地英国顾问罗伯森先生[11]，我有幸见到了掸邦昔卜省的现任首领。

如果时间充足，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怒江沿岸的迷人却又鲜为人知的省份逗留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便仔细研究当地众多部族的语言和风俗，同时将他们跟我所熟知的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部族，以及我刚刚在中国境内见识过的那些少数民族进行比较。遗憾的是，

这样的计划在雨季是无法实施的，我只好把它无限期拖延下去。我不愿意让这样的愿望成为空话，因此就利用留在缅甸的剩余时间学习了掸族语言，还专门找了掸族仆人。

离开腊戍，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伊洛瓦底江左岸，曼德勒以南的古都蒲甘。我在那座城市花了3天时间考察各种宝塔和寺庙留下的废墟。这座城市在缅甸历史上不止一次成为古代王国的首都，也是当时整个东南亚学术和宗教的中心，现在却几乎都是废墟了。古代世俗居民留下的居所已经彻底消失，与宗教有关的建筑留下的也只是断瓦残墙而已，不过它们仍然值得考古学者认真研究。我个人认为，这座已经死亡的城市在建筑和艺术方面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的军队曾经远征过这里。即便这样的远征真的发生过，应该也没留下太多的影响。

告别蒲甘，我沿着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在7月15日抵达了仰光。凡是来缅甸游历过的欧洲人，往往都要对这个神奇的国度，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民表示赞叹。缅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这是每个旅行者都有目共睹的。根据我的个人经历，以及那些英国侨民的叙述，缅甸也是个非常慷慨好客，具有无穷吸引力的国家。某些侨民则敏锐地指出，目前仰光城内的居民中真正的缅甸人最多就占一半儿，从印度南部来的放债者、厨子和劳工，还有来自中国的商人正在成为这座城市各种产业的主导力量。天性所致，缅甸人只是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却不愿意跟外来移民展开竞争。现在缅甸的很多欧洲侨民家里使用的都是来自印度的仆人，根本看不见缅甸人的身影，印度人在缅甸几乎垄断了厨师、脚夫、侍者、洗衣工等辛苦行业。

某些驻留缅甸的欧洲人基于绅士的良好教养，能够善待身边的东方人;某些欧洲人因为固执的偏见，却始终无法放下对东方人的歧视态度。这些人的错误做法反倒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当你愿意跟一个国家的人民友好相处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彻底，也就越喜欢他们。那些所谓的旅行家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顺便“逛逛缅甸”，然后根据自己从饭桌上听来的鸡毛蒜皮写点儿东西，那根本就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屡见不鲜，很多针对中国

人的偏见最初的根源其实就是那些西方旅行者从香港或者上海的俱乐部里听来的一鳞半爪。

有鉴于此，如果我仅凭自己的经历就对缅甸人的性格气质发表鸿篇大论，那肯定是要惹发争议的。当然，我也不会这么不谨慎。我只是建议那些对缅甸感兴趣，却又无法亲临此地的读者，去读读那些对这个国家做过深入了解又不存偏见的作者留下的专著，比如乔治·斯科特爵士、菲尔丁·霍尔先生[12]和斯科特·康纳先生[13]等人的大作。通过这些人的作品，我们可以认识到，缅甸人并非真的懒散到懒得去跟外来移民搞竞争，他们只是主动退出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爱的生活，自由自在地耕种家门口的那片稻田，这样的人生选择绝非出于懒惰。事实上，缅甸并没有走向消亡，恰恰相反，它正在逐步兴盛起来。正如菲尔丁·霍尔先生所说的那样:

> (缅甸人)现在极为兴旺，跟我所见到过的东西方各民族相比，他们当中的穷人、病人，以及各种遭遇不幸的人的数量是最少的。无端地认为某个民族天生悲观厌世是种荒唐的做法。

我觉得，如果缅甸真的存在某种衰退(也可能只是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艺术感觉。这并非当地人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周围东方邻居的影响，而是我们英国人的殖民占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关于西方世界流传的缅甸人天生不诚实的说法，菲尔丁·霍尔先生也给了我们完满的解答。他认为，缅甸人之所以常对欧洲人说谎，那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本来也没对他们以诚相待，让他们难以跟欧洲人倾心相较:

> 每个人看待事物都有多种尺度，一种用于自己，一种用于外人。没有人会没来由地像对待自己的同胞那样对外人坦诚相待……如果你打算客观的评价某个民族的性格气质，最好还是看看他们内部究竟是如何相处的。就我观察的结果来说，缅甸人跟缅甸人相处的时候，对诚实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欧洲人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待遇，那就应该首先考虑自己的态度。

顺便说一句，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我们跟中国人的关系。

类似“缅甸人懒散、缺少活力”之类偏见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

缅甸人其实只是不愿意从事厨子、仆人之类的枯燥工作，缅甸男人平时又习惯穿着不适合劳动的衣服，嘴里叼着大雪茄，把抛头露面的活儿都留给妻子，这难免让英国人看不惯。英国人的文化鼓励艰苦的工作，强调勤劳的意义。话虽如此，我却不愿意因此过多地去指责缅甸人，这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懒散倾向吧。缅甸人其实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散，正如菲尔丁·霍尔先生所说的那样:

> 不要把缅甸人想象为懒散的民族，他们的劳动方式只是与我们不同而已，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其实都需要工作。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轻松的，而是艰苦的事情，很多工作等待着他们。在缅甸，没有一个男人是懒散的，也没有一个女人是懒散的。

有了这样的评价，缅甸人怎么还会落下“懒散”的恶名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缅甸属于富庶的热带国家，各种生活物资的获取相对容易。这里的人也需要劳动，却没必要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劳动。再加上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本身不高，饭食不但简单还经常吃素，对他们来说，很多东西都可以自产自销，金钱没有太大的用处，除非打算买点儿英国人倾销过来的进口货。要想购买商品，就需要足够的金钱;要想获得足够的金钱，就得辛苦劳作，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对缅甸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有幸还没受西方影响的缅甸人并不会过多地追求金钱，也不会对有钱人俯首帖耳，财神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追求的只是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再有两件舒服、体面的衣服，就算田里多打了些粮食，他们也会把这些粮食卖掉，然后再把这些钱捐给寺庙，或者干脆拿出来跟亲友们乐呵乐呵。这样一来，除了每年的收获季节，他们必然就会有很多闲暇时间。这种不为挣钱而挣钱的生活方式就被我们称为“懒散”。

对于缅甸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很多英国人必然持断然拒绝的态度。他们觉得，如果所有人都是吃饱了饭就不再工作，那么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积极而勤奋，不断地克服困难，这是英国保持先进地位的诀窍所在。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自有英国人的道理，然而却不能以此为尺度去否定别人生活的意义。话说回来，我们真的已经懂得了什么才叫文明和进步了吗?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阴暗和丑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只有那些长期在东方生活过的西方

人才能意识到这样的事实。没有什么比居住在英国大城市贫民窟附近的人，比如伦敦东区的牧师，更能感受到日复一日的压抑和痛苦的了。类似这样的黑暗，在东方国家最发达的城市也非常少见。更糟糕的是，黑暗在西方世界已经超出了贫民窟的范围，正在向中产阶级蔓延，它的形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难免做作的嫌疑，我还是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英国人如此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地积累财富是否真的值得?现代生活的卑鄙和贪婪又是怎么败坏着英国人的生活，让我们变得粗俗而残酷的呢?

在缅甸，如果某个人足够幸运地成了百万富翁，他就会拿出钱来修桥盖庙，大方地款待亲友，搞些西方人听都没听说过的慈善事业。直到钱袋彻底倒空，他才会真正收手。如果我们强行把100个缅甸人送进英国的工厂做苦工，不出5年，他们可能就得全部死掉、疯掉，或者更早，他们所拥有的开朗、乐观的灵魂会被彻底碾碎。这样的后果不是因为工作辛苦，必要的话，缅甸人可以忍受任何辛苦，而是因为日复一日地机械性劳动，还有暗无天日的厂房。如果某个缅甸人有机会去英国生活1年，他可能会觉得多数英国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脖子上拴着铁链的奴隶强多少。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话虽如此，某些英国人还是意识到了我们所面临的窘境。虽然很多英国人眼里除了钱什么也看不见，然而自从托马斯·摩尔爵士(s i rt h o m a sm o r e)在《乌托邦(u t o p i a)》一书中发出对西方拜金主义的警告以来，拉斯金、卡莱尔[14]和弗鲁德[15]等人还是在接二连三地谴责金钱的罪恶。就连那些相对超脱的心理学家和玄学家也忍不住在滚滚红尘当中，揭示现代社会的虚伪性，以及文明面具掩盖下的丑恶。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late and soon,

Getting and spending,we lay waste our powers;

世事纷繁无停歇

患得患失虚耗了人生[16]

需要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行为本身是无害的，真正有害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以商业和工业为手段，对金钱的过度追求。正

如诗人华兹华斯所说，我们把金钱视为主人而不是奴仆，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个虚假的上帝，糟蹋了自己本该用于更高尚事业的精力和才华。

人们总是认为，生活中各种新需求的出现代表了社会的进步，这点在已经商业化的英国表现得更加突出。我们不但为自己创造新的需求，还强迫那些“落后”的民族接受这样的需求，逼着他们去追求财富，同时却忘记了金钱和财富可能并非唯一的真理，人类也不是只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拉斯金所说:

> 人们为自己设置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开发某种新的需求对人类的生活是有意的，同时却可能忘记了，适当地减少某些需求对生活可能也是有益的。

是我们迫使缅甸人穿上了英国兰开夏生产的棉布，逼着他们从早到晚从事着枯燥、机械的劳动。这个国家明净的蓝色天空被工厂的烟囱污染了，宝塔遭到废弃，不再金光闪闪。无休止的工业发展让美丽的国家变成了杂乱的蜂巢，而这仅仅是为了增长财富，让英国获取贸易利益。金钱和财富成了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然而谁又关心过那些缅甸人生活得到底怎么样呢?如果他们鄙视金钱，不愿意过多积累财富，不那么竭尽全力地购买来自西方的商品，这个国家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幸福与快乐，那么缅甸人其实早就站在世界的前列了。有人可能会反对说缅甸人的快乐只是源自无知，并非实实在在的富足生活。狭隘的基督教信徒则会指责信奉佛教的缅甸人为“异教徒”。西方的科学家会强调说，缅甸人虽然生活得很快乐，可他们不懂得现代医学，也不会发明、制造机器。为了体现公平原则，我觉得这最后一种观点还应该加上句话———缅甸人不会发明、制造机器，所以他们也就不懂得用这些机器互相杀戮。在我看来，缅甸人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可他们最起码知道如何使生活不那么自私自利，如何在工作的同时享受生活，不让工作成为生活的负担。斯科特·康纳先生在他的《丝绸东方(the silkers east)》里曾这样说过:

> 置身激流，他们喜欢逆流而上，显示超强的驾驭能力。同时也不介

意调转船头，顺流而下，懒散地躺在精美的小船上，晒一整天太阳，悠闲地享受极乐世界的幸福。这样的人并非懒人，却可能是哲学家或者艺术家。他的生活中有可以抬头仰望的蓝天，有波光粼粼的小河，挣钱永远没有享受生活重要，物质不过就是过眼云烟。

很多年以前，我曾在掸帮和湄公河在泰国的河段两岸游历。我当时没带证件，没有仆人和向导，也听不懂当地人的语言，所到之处却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从蒙河到湄公河，我经过了无数村庄，村民们都把我当成最尊贵的客人。面对我这个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连话都听不懂的陌生人，他们表现得友好又得体。金钱跟他们的态度没有关系，因为钱在这个地方真的没有用处，大家吃的、用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的。在那难忘的几周时间里，我仿佛置身仙境，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独木舟或者竹筏子。当地人如此幸福、快乐，我甚至担心自己的出现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本不缺少真正的文明，只不过我们对文明的认定标准需要重新修正。这次从中国境内来到缅甸以后，轮船和火车为我的旅行提供了很多便利，却也让我失去了近距离观察缅甸人生活的机会。所幸从我直接或间接得到的消息来看，缅甸人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个性。他们就像我曾经遇到的那些友好、殷勤的村民们一样，拥有自己的文明。

老挝乃至缅甸这个地区的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强调和平与安宁的精神，当然，也有人认为人生就应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论我们这些西方人是否真的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坟墓是我们前往完美天堂的中转站，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多多少少还都是抱着挑剔和不满的心态的。这样的情况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不存在，当地人似乎已经生活在和平、安宁的极乐世界。他们的生活是西方文明所不能理解的，具有独特的魅力。不过话说回来，西方的文明也是这些东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照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套用格林[17]的话来说，在相对单纯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太多的因素能够刺激人们脱离固有的常态，无论这种刺激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西方文明虽然有自己的阴暗面，经常被鲜血和阴谋玷污，却能够拥有东方人无法想象的活力。高耸的山脉，辽阔的海洋是一种美，高贵而娇弱的玫瑰其实也是一种美，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美而否定了另一种美，即便这种美属于陌生的国度。

就我的经历见闻来说，缅甸人就算在娱乐的时候也能体现出一种高雅的涵养。他们与粗俗无缘，即便在跟朋友狂欢的时候，也不粗鲁、吵闹，更不会喝醉了酒。缅甸人良好的涵养表现在言谈举止当中，正如他们的服装所显示的那样。无论男女，都那么大方、自然。缅甸妇女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属于什么阶层，从骨子里说都是位淑女。她的生活不缺少欢乐，却没有狂喜。我们能够以“狂野的英格兰”为标尺，去指责他们的文明有问题吗?

缅甸的生活当然也有阴暗面，只强调那些好的东西，再拿这些好的东西跟英国的阴暗面作对比，那肯定是不公平的。我想说的是，缅甸人的文明是我们的很多同胞所无法企及的。假如某位缅甸的学者去英国搞研究，研究研究我们大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为什么总是那么粗俗而吵闹，他恐怕会把原因归结为屈辱而刻板的劳动，永远见不到阳光的办公室，以及不断重复的枯燥生活。工作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所得的报酬却只够勉强糊口，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怎么可能保持优雅，怎么还能有闲心去体味生活中的美好?

缅甸人的生活如此奇特，足够写满一本书，这里只能简单说说。众所周知，缅甸最主流的宗教是佛教，不过也有人认为缅甸人真正信仰的其实是泛神论[18]，相信万物有灵。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缅甸人的泛神论色彩相比掸族人，还是淡化了不少。例如，我在老挝的河流上乘坐独木舟旅行的时候，每次遇到危险，负责驾驶独木舟的男孩都要向河神虔诚祷告。过分强调缅甸人的泛神论色彩其实是片面的。据我观察，多数缅甸人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他们从小也是在佛教教义的滋养中长大的。英国人来到这里以前，寺庙就是缅甸孩子的学校。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不过有机会进入世俗学校的缅甸人仍然属于少数，就像暹罗的男性一样，缅甸的多数男性都要在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阶段穿上袈裟。短暂的出家生活结束后，他们又会脱下袈裟，可佛教的精神却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扎根。事实上，很多缅甸人在自己一生中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阶段接触的都是佛教文化。这让他们终生都保持着对佛的敬畏。

顺便说下，目前缅甸的佛教徒人数跟英国和德国的基督徒人数是差不多的。与欧洲人不同的是，缅甸的佛教徒决不会轻易违背佛陀的

教诲，西方的基督徒却经常把西奈山上订立的契约[19]当成耳旁风。缅甸人接受了佛陀的教诲，而且会把它们实践到生活当中，西方人却总是觉得上帝说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又是一回事。我没跟那些在缅甸传播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有过接触，然而我遇到过的普通西方侨民却都很难从那些佛教徒和他们的信仰身上挑出什么毛病。无论本身具有怎样的宗教背景，多数西方侨民都认为佛教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促使人心向善的伟大力量。如果佛教未来真的在这个国家衰落了，那么缅甸也就将随之进入异常悲惨的时代。

有学者认为，缅甸人的佛教信仰就好像一层清漆、一层珐琅质或者一朵花，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很容易被擦去或拔除的。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佛教真的可以被完整抹杀，同时又不会对缅甸人产生任何影响吗?难道缅甸人的淡定、耐心、仁爱、文雅、宽容、慷慨，乃至对动物的爱心不应归因于佛教吗?哪怕佛教仅仅在塑造缅甸人性格过程中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毋庸置疑，泛神论在缅甸是存在的，它跟很多原始宗教一起，帮助人们走过了历史上的洪荒时代。今天缅甸人的宗教思想恰恰惦记于这个基础之上。事实上，世界上全部，起码是大部分宗教，最终都可以找到泛神论的根源。根据迈尔斯[20]的研究，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第11卷浸透了泛神论的韵味。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埃涅阿斯记[21]》的第8卷，就会发现即便在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的光荣年代，泛神论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婆罗门教、佛教、神话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信仰，乃至基督教，都是跟泛神论纠缠在一起的。佛教体现出特别强烈的泛神论色彩，那也不奇怪，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宽容性的宗教。佛教要求信徒不分高低贵贱，相比泛神论，深奥的哲学思辨是无法适应那些连字也不认识的普通的农民的。

据某位著名的缅甸问题作者介绍，1888年地震的时候，仰光宏伟的大金塔的尖顶被彻底震掉了。为了修复这座佛塔，缅甸人捐款600000卢比，还有很多人提供了无偿劳动。我不想过分强调6000000卢比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缅甸人的确视金钱如粪土。在他们眼中，某些西方慈善家不过就是几个很小气的守财奴而已。真正值得我

们思考的是，这个被贴上了“懒散”标签的民族居然愿意无偿劳动去修一座其实什么用也没有的佛塔。英国人向来自认是个勤劳的民族，试想一下，如果某天大主教号召我们去无偿修缮圣保罗大教堂[22]，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把宗教当“清漆”的民族可能还不只是缅甸人。



仰光的大金塔

但凡参观过缅甸的佛塔，见识过缅甸人拜佛的西方人，都不可能得出佛教已经在这个国家衰败了的结论。顺便说一句，缅甸人拜佛的意识要比西方人做弥撒有意思得多，虽然这与本章的主题无关。不仅如此，缅甸的佛教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试图跟上时代的脚步，这必将获得良好的效果，令各种悲观的预言不攻自破。仰光的高大金塔是佛教在这个国家依旧兴盛的标志，佛教则赋予这座宝塔以异常灿烂的光芒。只要佛教在缅甸仍旧保持生机，就永远会有无数热情的双手去装饰神坛，把金叶铺在壮丽的佛殿穹顶之上。佛陀对任何愿意皈依自己的人都不会冷眼相待，让那些在自己脚下供奉鲜花的孩子受到冷落。如果佛教真的在缅甸消亡了，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它最值得珍视的财富。如果仰光的宝塔某天真的被信仰者所抛弃，变成了一堆瓦砾，世界也将为之黯然失色。

【注释】

[1] 原文为madrasis，指印度土著人种中的一个地域人种，主要分布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也称达罗毗荼地域人种，他们属于印度的原始居民。

[2] punjabis，北部印度人，属于后来迁徙到印度的雅利安人种。

[3] the second defile，伊洛瓦底江也有三峡的说法。北起辛博、南至八莫，为第一峡;伊洛瓦底江流在距八莫19公里的地方进入冲积平川，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到八莫附近时又突然调头向西进入石灰岩地带，也就是第二峡;过了杰沙后，伊洛瓦底江又调头南下，流经冲积盆地，直达太公城，从太公城到德贝金是第三峡。

[4] nam u，对照地图，结合下文，这个词应该指泰国境内的蒙河，它是湄公河的两大支流之一。

[5] muang wa音。

[6] Luang prabang，老挝城市。

[7] king Mindon，缅甸贡榜王朝的国王， 1857年主持修建了曼德勒。

[8] lord Curzon，应指George Nathaniel Curzon，英国政治家，担任过驻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

[9] 实际为729块。

[10] sir Herbert White，指Herbert Thirkel White，这个人曾长期在缅甸工作，还写过以缅甸为题的书。

[11] Mr Roberson，具体情况不详。

[12] Mr Fielding Hall，应该是一位德国作家，写过不少佛教题材的书。

[13] Mr Scott o'connor，曾写过一本书叫《丝绸东方》，主要是介绍缅甸的，作者后面引述了部分内容。

[14] Carlyle，指英国作家Thomas Carlyle。

[15] Froude，具体情况不详。

[16] 这两句诗出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The worldistoo much with us。

[17] T·H·green，应指Thomas Hill Green，英国哲学家。

[18] 西方观点认为人类宗教是从泛神论到一神论的进化过程，因此泛神论是落后的。

[19] 指摩西十诫。

[20] F·W·H·myers，指Frederic W.H. Myers，英国诗人、哲学家、社会学家。

[21] aeneid，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

[22] st Paul cathedral，英国第一大教堂，位于伦敦。

第十八章 结语

从缅甸返回中国北方的旅行安排得比较宽松，断断续续走了两个半月，好在一切顺利。至于沿途经过的那些地区，西方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相关著作也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7月19日，我乘坐轮船离开仰光，24日抵达科伦坡，受到锡兰总督，圣乔治勋章获得者，卜力爵士[1]的热情招待，然后就在那个岛国乘坐火车和汽车转悠了6个星期。在阿努拉达普拉[2]我从历史名树———菩提树上取了颗种子，随后把它种到了香港的公园里。我种的那棵树眼下应该还活着。离开锡兰后，相继路过了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等地，然后又改道去日本，在九州岛待了大概两个星期，随后又去朝鲜短暂停留。10月5日，我回到了威海卫，这次旅行前后算起来总共持续了9个月。唯一的遗憾是，我那条斗牛犬吉姆陪我经历了风风雨雨始终没出什么问题，回到中国后不久却突然死了。

由于我的中国经历，很多西方人都会询问我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对待我的，我是不是在这个国家遇到过很多麻烦，中国人是不是特别恨“洋鬼子”?对于这些问题，持包容心态的读者通过这本书前面的描述，应该已经找到答案了。我已经在中国待了9年多的时间，从没遇到过特别严重的不快。大清的各级官员毫无例外地依据严格的礼节制度跟我相处，老百姓始终是友好、善意的。当然，任何地方的人总是形形色色，的确有某些中国人把我们当成吃人的妖怪。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跟山东东部的农民接触是最多的。他们的脾气非常好，懂道理，遵守秩序和法律，懂得对别人的善意投桃报李;男人们虽然难免存在赌博之类的恶习，多数还都是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这个地方的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有的时候，他们反倒觉得我这个“洋鬼子”挺傻，故意哄着我玩儿;除非迫不得已，他们并不比西方人更愿意说谎;很多人还

特别具有幽默感，能够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挫折。由于条件限制，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即便从小小的威海卫地区(面积约300平方英里，人口160000)得来的印象也可能是过于片面的。



清代某地村民

中国人遭到西方人的误解，那其实是有很多客观原因存在的，有限的接触往往导致印象方面的以偏概全，即便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对这样的问题也没能带来太大改变。身在通商口岸做买卖的那些中国商人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诚实赢得了西方人的尊重，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品质恶劣的中国人来到这些地方坑蒙拐骗，他们让全体同胞背了黑锅。

目前来自中国广东及东南沿海各地的侨民已经广泛分布于海峡殖民地[3]、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等地，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当然，人多了就难免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这些人就成了败坏中国人形象的害群之马。

西方人对中国人存在误解，中国人其实也并不能真正了解我们。只不过，中国人所拥有的东方式教养能够让他们把对我们的反感尽量克制在内心深处，不表现出来。只要能够相互理解，互相发现对方身

上的优点，中国人就能跟西方人成为真正的朋友，虽然这样的情况目前很少能够发生。话虽如此，这样的问题并非不可以克服，民族与民族间不存在永远的鸿沟，更何况很多最开明的中国人也愿意放弃僵化过时的传统，向“洋鬼子”敞开心扉。西方人认为自己无法跟中国人成为朋友，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按照马蒂诺博士[4]提出的观点，某个人来到异域，必然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引发种种不适，进而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国家的好。可是当他逐渐适应了新环境以后，就会产生如鱼得水的感觉，转而对异域的一切心悦诚服。遗憾的是，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你跟某个群体朝夕相处，随时都在发生各种摩擦和矛盾的时候。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那些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人却经常容易对异域产生某些自以为是的想法。这是一种源自无知的危险，可能造成很多无法弥补的损失，例如，现在的很多英国人仍然认为，那些生活在大英帝国殖民地里的东方人“有权”像英国人一样生活。这些人的想法肯定是出于好心，然而他们不明白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将西方的东西强加给他们，那只能是有害无益的，而且也会加剧东西方世界的矛盾。

我需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作为真正有见识，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应该对东方世界给予高度关注，对东方人的文化传统给予应有的尊重，对东方的艺术、哲学和宗教持钦佩、欣赏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不应该无来由地认为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别人就一定也觉得好，中国人、印度人只能按英国人觉得正确的那套逻辑活着。如果某个西方人一味地想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东方，那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理解东方，也没能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样的人只能在东方四处树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如此，远在英国的很多人还是沉迷于自己的幻想当中，试图像上帝那样将英国人已经享有的权利(即便在英国，我们是不是真的拥有了这些权利也还不好说)“赐予”东方，却忘记了美好的祝福换个环境就可能变成恶毒的诅咒。与这种做法相反的是，很多英国人沉浸于另一种幻想，认为东方人天生就应该成为西方的奴隶。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跟东方人打交道，就难免不发生矛

盾。

就我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来说，多数中国人对西方人没有好感，这是肯定的。与此同时，那些在东方扮演着上帝角色的西方人，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事实上，不同民族间的鄙视和诋毁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现在的很多英国小学生就认为1个英国人比3个法国人都强，中世纪的法国人则声称英国人都是长了尾巴的猴子。过去的中国皇帝把所有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都视为生番，古希腊人则认为除了他们，所有人都是野蛮人。就在不久以前，某位俄罗斯政治家声称俄国现在已经成了西方文明的灯塔，很多西欧政治家对此莞尔一笑，固执地坚信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才有权代表西方文明。

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是人类的痼疾。过去，大清帝国的官员带着强烈的优越感跟西方人打交道，把我们称为“蛮夷”或者“洋鬼子”，变着法儿地羞辱那些西方外交官。然而换个角度看问题，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又能比这强多少呢?当然，文化传统不同，具体的做法也可能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只能进一步加深误解和仇恨。心态公正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先生[5]说过这么段话:

> 中国人抱怨说，洋人总是以主子的态度自居，动不动就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和刁难，对那些敢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大清官员无端指责。这实际上是在蔑视中国人的主权。西方人在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有个不讲理的前提设定，那就是说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而且是永远正确的。

事实的确如此，很多西方人不但认为中国文明低于西方文明，还认为中国人在进化的等级上天生就比西方人低贱。某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曾非常得意地对我说，中国人天生就是低贱的民族，因此即便你在广州街头动手鞭打那些中国苦力，也不会引发任何反抗。这样的态度就是标准的侵略者心态，很多西方人不但在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抱有这样的心态，跟其他东方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已故的印度学者史瓦米·维卡南达[6]曾经转述过一段在伦敦街头听来的话，作为西方人心态的注解:

> 东方人缺少勇气，他们的拳头没有我们厉害，至今还没进化到我们所拥有的文明程度。

某位傲慢的英国女士对此的回答是:

> 你们印度人算个什么东西!你们征服过哪个民族吗?

这里姑且不说什么民族主义、种族偏见之类的事情，认为东方人在进化层次上天生就比西方人低贱的看法其实跟文化、经济、军事等因素无关，应该是个人类学、生物学领域的命题。按照进化论的逻辑，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缓慢的渐变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悖论就出现了。现在的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相比50多年前要“进化”多了，可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低等生物进化到高等生物的过程绝对不可能这么快。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觉得日本人“进化”了，跟人类学、生物学无关，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通过向世界打开大门，在知识和精神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做到了强国富民、抵御外辱。从人类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说，50年前跟50年后的日本人都只是人，跟西方人一样的人，不存在进化不进化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中国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落后也只是暂时的。

很多西方人被现代文明搞得昏头涨脑，匆匆忙忙就得出结论，认为白种人的成功就是种族优越的直接证明。至于日本目前取得的进步，则被当作对西方的拙劣模仿，自然就要差个档次。如果某位画家临摹了幅拉斐尔的名画《圣母玛利亚》，那么仿品的价值当然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原作。类似这样的逻辑不应被无限扩大和使用，更不应该以此为依据急于对东西方的发展做出定论。西方只是在最近的一两百年当中才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我们今天的进步恰恰有赖于此，然而就像在东方一样，科学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应用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目前都处于跌跌撞撞的摸索状态，谈不上谁在模仿谁的问题。

某位特别可爱的老太太曾告诉我说，她认为包括气球在内的任何飞行器都不可能成功，因为上帝已经判定人类必须终生在地上生活。尝试制造飞行器属于严重的渎神行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时至今日，飞机的出现已经迫在眉睫，类似这样的高论在西方才逐渐失去了市场。火车是现在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就在19世纪早期，很多

英国人却以各种名义反对在英国境内修建铁路。今天的我们忘记了这段历史，进而对中国人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在自己的国家修建铁路大加嘲笑和指责，认为他们愚昧无知，认识不到铁路能够带来的巨大好处。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直到今天还在反对让铁路过分靠近自己的校园，我们却不会因此把这个英国学术的最高殿堂视为顽固不化、对抗现代文明的绊脚石。无独有偶。18世纪的时候，英国兰开夏的工人曾以非常可笑的理由拒绝引进和使用纺织机械。既然英国人曾如此“愚昧”，那么中国人自然也有权“愚昧”一下。

中国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直到康熙帝统治时期，这个国家仍然可以跟西方势均力敌。西方超越东方不过就是最近200年的事情。相对漫长的历史，200年却恍如白驹过隙。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拥有了蒸汽机、无线电报、速射步枪[7]、铁甲巨舰之类的东西，就认为自己永远可以跑在东方前面。毋庸置疑，目前的中国处于一种非常糟糕、亟待变革的状态。造成这样的后果，既有西方的问题，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中国才能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眼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却也在为克服这些困难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这个国家在重新崛起之前，必然要承受凤凰涅槃般的痛苦，甚至还可能出现某些倒退和灾难，这都是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拥有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太大问题。总体不动，搞些小修小补，可能是最有利。如果坚持要搞那种颠覆性的全盘变革，这个国家未来的损失可能会跟它的收获一样大。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既有的社会组织基本是健全的。在没有饥荒、战乱等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可以平稳地发展下去。中国的老百姓深爱和平，明理守法。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这个讨人嫌的“洋鬼子”才可能平平安安地从这个国家的最东头儿走到最西头儿，还没携带什么像样儿的武器。除了北京、成都、开封等有限几个大城市外，中国各地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警察，可这个国家的犯罪率却可能比西方低得多。这归功于中国人自身的善良天性，以及村庄里的家族宗法制度。

我在威海卫负责管辖的区域[8]差不多有200平方英里，大概分为200多个村子，人口将近10万。这个区域总共只有8名警察，平时集中驻扎，有情况再随时出警。最近6个月(其中包括中国北方容易集中

出现犯罪的冬季)，警察们接到的抢劫案报案总共只有3起。同一时期，因为赌博等鸡毛蒜皮做出的拘留、罚款等处罚差不多有80起。我习惯骑着马在自己的辖区到处视察。印象里，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只见过一个喝醉酒的人。他当时刚在集市上卖了猪，然后就庆祝了一下。驻留威海卫的这二年当中，我处理过醉酒滋事的英国人和日本人，却从没以这种理由跟中国人打过交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威海卫租界的社会治安好绝不是因为引进了英国人的管理制度。事实上，租界区周围的村庄治安情况同样良好，甚至更好。唯一的遗憾是，威海卫租界法庭的工作量实在太大，每天都有大量民事纠纷需要处理。威海卫租界的法庭由英国法官主持，依据的是中国法律，审理过程完全使用汉语。诉讼人的全部支出就是花一两个先令请人写份状子，如果他自己有文化的话，这点儿钱也可以省下来。过于便宜、方便的诉讼过程反倒促使当地的老百姓不再愿意和平友好地私下解决问题，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要找法官裁判。现代文明的侵袭破坏了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稳定结构，这让我觉得非常遗憾。



1905年，庄士敦在威海卫

如果高水平的文学和艺术可以作为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那么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傲。现在，很多西方收藏家喜欢而且愿意花费巨款购买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有些甚至是从北京等地偷来的赃物)，可他们心里对中国的艺术水平到底是个什么程度恐怕也没有数。欧洲拥有的中国绘画精品不多，普通人也不容易看见，虽然大英博物馆保存着包括明代著名画家林良[9]作品在内的众多中国绘画。话虽如此，基本师从中国艺术的日本作品在西方的迅速走红充分说明，来自中国的艺术作品必将获得西方世界的普遍接受。英国批评家、诗人劳伦直到19世纪以前，欧洲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艺术。宋代的山水画摆脱了庸俗生活的束缚，体现着对大自然本身无私的热爱。 …… 就像华兹华斯一样，宋代的美术家和诗人对山有一种独特的偏爱， 15世纪的日本绘画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风格。

斯·宾扬先生[10]，这样评价中国宋代(公元10到13世纪)的山水画:

中国的艺术拥有辉煌的过去，现在中国艺术家的人数可能也要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些人不知疲倦地创作着，同时却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肯定可以将自己的辉煌延续下去。

至于音乐，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感觉还是比西方稍差一些。西方人普遍接受不了中国的音乐，无法理解其中所要表现的内容，然而口味的偏差不应成为妄下结论的理由。就拿瓦格纳来说，他的音乐曾被西方人当成笑话，理由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听不懂。现在的西方人又有几个能听得懂19世纪的高雅音乐?对他们来说，聆听高雅音乐就好像不懂希腊语的人去看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乏味。音乐是所有艺术门类当中最年轻的，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谁又能够随便下结论说这个领域只能保留西方音乐这一种形式?

谈到文学，中国的书面语无疑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西方迅速传播的最大障碍。目前，这个领域最好的译本往往出自懂外语的中国学者之手，西方人的译作则大多无法真正贴切地展现原作风采。毕业于苏格兰大学的辜鸿铭[11]先生翻译的很多中国经典著作是目前西方能够得到的最好译本，为我们了解东方提供了很大帮助。话虽如

此，即便那些长期旅居中国的西方侨民，多数对这个国家文学的博大精深仍然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不久前，我在跟朋友闲谈时提到了中国的某位诗人，他居然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不相信中国还有诗人。好在，才华横溢的贾尔斯教授[12]近期用流利的英文将若干首中国唐宋年间的诗歌翻译了过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问世，必将轰动西方世界。很多西方人可能还不知道，早在麦西亚人(the mercian)和西撒克逊人(west sax-on)为争夺英国的最高权力互相厮杀的年代[13]，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完美的诗歌作品。对中国诗歌这个领域来说，西方人目前进行的翻译工作实在只是沧海一粟，中国诗歌的广博是今天的西方人所无法想象的。



辜鸿铭

这方面最要命的问题在于诗歌本身的抗译性，中国的诗歌用西方的语言翻译过来，韵味就要大受损失。

对中国学者来说，作诗属于基本功的范畴，不会作诗是没有学问的表现。很多中国学者即便功成名就，离开了学堂，也不会轻易放弃这门技艺。不像很多英国学生，只要离开学校，就很少再去鼓弄韵

脚、格律之类的玩意儿了。就中国目前的水平来说，同时代作品的艺术水平往往赶不上古代作品，然而中国人对诗歌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少半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金文泰先生[14]新近选编、翻译的《岭南情歌(can-toneselove songs)》，就会发现中国诗歌的精神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消亡。中国的诗歌大致有感怀诗和田园诗两个门类。这个艺术门类最初是跟音乐紧密结合的，不过现在能够配乐演唱的中国诗歌已不多见。中国很少有类似雪莱和斯温伯恩[15]那样的浪漫抒情诗人，类似格雷[16]这样擅长叙事感怀的诗人却非常多，足可以跟英国同类的顶级诗人媲美。相比西方诗歌，中国人的诗可能不那么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不过借用小泉八云[17]评价日本诗歌的话来说:

> 这个作品只用几个经过推敲的词汇，就可以在你的头脑中创造出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唤醒你心灵中最美好的情感。

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让那些从没来过这个国家的西方人感觉无所适从。除了那些被报纸夸张了的负面消息，比如排外、焚烧教堂之类的，他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却很少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负面消息。一个巴掌怕不响，西方人的很多做法让中国人感觉到了屈辱，报复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目前的实力还无法跟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正面对抗，心中压抑的怒火难免就要寻找其他发泄渠道。这并非真的出于嗜血和野蛮，中国人也并非天生的懦夫。面对装备精良的对手，他们暂时无能为力，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也不该忘记，最近刚刚战胜了强大西方陆海军的日本[18]不久前同样在西方人面前不堪一击。有鉴于此，等那些中国士兵拥有了精良的武器，再加上训练有素的军官正确指挥，鹿死谁手还真是个未知数。

很多西方人总会为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找寻各种借口，就连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件事[19]，也不乏站出来替他们辩护的人。然而无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俄国人，只要是还残存着一点儿良知，又有谁能大言不惭地说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是合理合法的呢?近年来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恃强凌弱的暴行始终都在发生，被英国中学生鄙视的下流手段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信奉的“公理”。真正的英国绅士讲究扶危济困，如果我们真的能把这个处事原则用在中国人身上，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在东方获得一个诚实、强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英国的

温切斯特公学[20]有句古老的校训———礼仪使人成功(manners makyth man)。中国人信奉同样的准则，甚至比很多英国人更加真诚地信奉这个准则。如果我们希望来自英国的教师、工程师、铁路专家、商人、传教士和投资者能够在这个国家受到欢迎，首先就应该收起自己的贪婪和自私，对中国朋友坦诚相见。

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来说，根除鸦片流毒，阻止列强对这个国家的进一步瓜分，无疑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的这个看法，稍有见识的英国人都会表示赞同，不过仍然有那么些人害怕丧失某些不光彩的既得利益，使用各种手段促使英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频频犯错。他们对英国以外的列强瓜分中国表示强烈愤慨，同时却不能容忍“中国是中国人”的正义呼声，那些敢于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的正义人士则被污蔑为“中国人的走狗”。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香港、上海等地出版的英文报纸在对华立场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智，也敢于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时至今日，很多生活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仍然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抱有极度偏见，甚至认为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能造成自己的头脑弱化，研究越深入，弱化得就越厉害。类似这样的逻辑似乎跟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如出一辙。这些受到我们鄙视的庸俗商人认为，除了挣钱以外，干别的事儿(比如学学希腊语)都属于瞎扯淡。殊不知，这么做的后果只能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中国近期刚刚从漫长的昏睡状态中觉醒过来，开始竭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抵抗外国侵略。这个过程必然在东西方之间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和矛盾，然而从中国的利益角度考虑，同时也是从西方各国的利益角度考虑，各国政府应该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克制。对于这么一个正在经历浴火重生的伟大国家，我们不应采取敌视和自私的态度。未来的15年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帮助它闯过这个难关，未来的中国必将开启新的辉煌，同时也为世界和人类的持久和平作出贡献。

对西方来说，“世界”是个不断变化着的概念，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也是不久前才刚刚形成的，在这个过程背后发挥着推动作用的就是日新月异的科学。古罗马时代，古罗马人认为自己统治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就是整个世界。今天的我们却已经知道，地中海不过是

这个地球上的一小块，而且也不是唯一存在人类文明的地方。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央之国”，认为自己脚下踩着的土地就是整个世界，任何生活在中国范围以外的人，则都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大同小异。多少年以来，西方人认为我们拥有的就是整个世界，于是当我们跟东方遭遇时，便把那些自己陌生的东西视为病态的、怪异的，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讽刺和嘲笑。与此同时，我们却可能忘记了自己的很多东西在东方人眼中同样是病态的、怪异的，也是应该加以讽刺和嘲笑的。



1901年，慈禧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图为天津小站的新军。新军后来亦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1905年，广西桂林，清政府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集会。左边是穿着满清官服的官员，右边是穿着西式学生装的洋学堂学生。(摄影:乔治·莫理循)

当今这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应该随便轻视、鄙薄对方。西方人应该懂得，西方不是整个世界。即便我们拥有延续自古希腊时代的悠久文明，也没有权利说自己的文明可以垄断整个世界。同样的道理，东方也没有这样的权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值得互相珍视和借鉴的东西。只有在明白这个道理的前提下，东方和西方才可能友好相处，取长补短，东方和西方的交往也才能超出棉花、丝绸、机器、军火等商品贸易的简单范畴。

【注释】

[1] sir Henry Blake，这个人曾任第十二任香港总督，香港卜公码头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2] Anuradhapura，斯里兰卡北部城市，古锡兰王国首都。

[3] the strits settlements，指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等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

[4] Dr Martineau，作者同时代的英国心理学家，写过本书叫Dr.Martineau's Philosophy:A Survey

[5] Mr Chester Holcombe，美国传教士、外交官，1869年来华，1885年回国，1895年出版了《本色中国人》一书，在西方国家影响很大。

[6] Swami Vivekanada，印度僧人，因代表印度参加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和佛教获得了很高知名度。

[7] 配有弹仓，使用定装子弹的步枪，发射速度比老式前装火枪快，故名。

[8] 英国于1898年强行从清廷手中租借威海卫，成立殖民机构，庄士敦当时是这个机构里的官员。

[9] Linliang，林良，字以善，南海(今广州)人，明代著名画家。

[10] Mr Laurence Binyon，指Robert Laurence Binyon，最著名的作品是1914年9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For The Fallen。这首诗表现了对阵亡将士的缅怀之情，被西方人视为千古绝唱，现在很多欧美军人的追悼会上都要将集体朗诵这首诗作为固定环节。

[11] Ku hung ming，字汤生，号立诚，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

[12] professor Giles，指Herbert A. Giles，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中文教授。

[13] 作者这里说的是英国的早期立国史，时间大致在公元9世纪末，被奉为“英国国父”的阿尔弗雷德大帝通过几次内外战争，奠定了今天英国的疆域。

[14] Mr Clementi，指Sir Cecil Clementi，他在庄士敦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未获贵族封号，因此被称为“先生”。金文泰1899年进入港英殖民政府任职，后来成为第十七任香港总督，也是知名的汉学家。

[15] Swinburnes，指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16] Gray，指Thomas Gray，英国18世纪著名抒情诗人。

[17] Iafcadio Hearn，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他是西方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

[18] 指1904年日俄战争。

[19] 1897年11月1日夜，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被杀。11月13日，德国以此为名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还勒索了大笔赔偿，史称“巨野教案”。

[20] 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于1384年创建。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Mandalay曼德勒

Tibet西藏

Yunnan云南

Tachienlu打箭炉

Lichiang丽江

Muli木里

Lhasa拉萨

Ssuchuan四川

theredriver红河

Ssumao思茅

Shanstates掸邦(缅甸)

Upperlaos上寮(缅甸)

Mekong湄公河

Bangkok曼谷(泰国)

Kwangtung广东

Kwangsi广西

Kiangsi江西

Shantung山东

Kiaochou胶州

Chinan济南

Chufou曲阜

Peking北京

Ichang宜昌

Hankow汉口

Weihaiwei威海卫

Tientsin天津

Khotan和田

Chihli直隶

Honan河南

Hupei湖北

Chengchou郑州

Chumatien驻马店

Shanghai上海

Wuchang武昌

Hanyang汉阳

thehanriver汉江

Kowloon九龙

Wusung吴淞

Canton广州

Kalan张家口

Changchihtung张之洞

Shashih沙市

Wanhsien万县

Chungking重庆

Haiphong海防

theminriver岷江

Chengtu成都

mountomei峨眉山

thefenghsiang风箱峡

thechuriver曲水河

Kuangan广安

Chialing嘉陵江

Kuanhsien灌县

Liping李冰

Huitsung宋徽宗

Chiangkou江口

chinshachiang金沙江

minshanthe岷山

thetaturiver大渡河

theyariver雅江

theyamdoklake羊卓雍措湖

Fuhsi伏羲

Nuwo女娲

Huangti黄帝

puhsienbodhisattva普贤菩萨

Sutungpo苏东坡

Huitsung宋徽宗

manjusri文殊菩萨

Rangoon仰光(缅甸)

Changliang张良

Anhui安徽

Litang理塘

Luting泸定

Talifu大理

Batang巴塘

Linchiang丽江

Shansi山西

Wutaishan五台山

Kueichou贵州

Hanteng汉登村

thehaiweiriver海尾河

Tienwei甸尾

Erhhai洱海

Shaping沙坪村

Shangkuan上关村

Chekiang浙江省

Hangchow杭州

Kublai忽必烈

Kachin克钦(缅甸)

Nanking南京

theirrawaddy伊洛瓦底江(缅甸)

Kiulungmountains九龙山

theganges恒河

Chienwen建文皇帝

Namting南定河

Yangpi漾濞

Huilichou会理州

Momauk莫马克(缅甸)

Maymyo眉苗(缅甸)

Hsipaw昔卜(缅甸)

Pagan蒲甘(缅甸)

Lancashire兰开夏(英国)

Colombo科伦坡(斯里兰卡)

Kanghsi康熙帝

Kaifeng开封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庄士敦

“亲历中国”第二辑

记录晚清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
回忆与慈禧交往的那些日子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英]苏珊·汤丽 著 曹磊 译



Lady Susan Townley

Memoirs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Lad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LTD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作者：（英）苏珊·汤丽（Lady Susan Townley）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ISBN：97875594167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期中国历史
第二章 光绪帝亲政
第三章 中国人的崇拜和信仰
第四章 中国的语言
第五章 中国的文化经典
第六章 皇帝如何统治国家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初识中国
第二章 在上海
第三章 沿长江上溯
第四章 长江三峡
第五章 北京城
第六章 结交慈禧太后
第七章 宫廷贵妇
第八章 帝国皇陵
结语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谨以此书献给亲爱的沃尔特[1]

【注释】

[1] 沃尔特，1902至1903年任英国驻华公使，本书作者是他的妻子。

前言

本书并不奢望为相关领域提供更多新的启迪和借鉴。它的第一部分源自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近乎“失业”的我除了读书，实在没别的事情可做。读过很多书以后，我尝试着把从中获得的知识和体会串联起来，写成完整的文字，与此同时，我又不希望把它写成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的“流水账”。本书非常适合那些像我一样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朋友阅读，能够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作为亲眼目睹过紫禁城内林林总总的西方人，我在自己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了历次受到大清皇室接见的经历。经历过漫长而严苛的自我封闭，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太后终于愿意(部分也是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摘下戴了几个世纪的面纱，对全世界坦诚相见，这实在非常不容易。

时间进入20世纪，即便中国这样古老的东方国家也不再显得那么神秘莫测，这个国家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处处闪现着新世纪的曙光。最近，我们听说某位特别新潮的地方总督给大清皇帝进贡了一辆西方生产的最新款汽车。皇帝拒绝了这份好意。身为“天子”，他不可能坐在后面的座椅上，允许司机坐在前面开车;同样的原因，即便北京的道路状况允许汽车通行，皇帝也不可能自己手握方向盘开车。尽管如此，这件事本身却说明了时代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本书作者苏珊·汤丽

就在我离开中国前不久，大清驻某国公使的两位女儿[1]随结束长期侨居欧洲的生活返回祖国。经过反复讨价还价，这两位在欧洲宫廷中开了眼界的女士被破例允许身穿巴黎女性最时尚的服装觐见太后。不仅如此，她们觐见太后时还不用按中国传统礼节磕头，而是代之以西方宫廷礼节。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觐见，还亲眼看见慈禧太后饶有兴致地伸着脚，把自己那双清廷花盆底高跟鞋跟两位年轻女士的最新款路易十四式高跟鞋[2]比来比去。现在，我听说跳舞和打毛衣已经成了紫禁城里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引领这股风潮的正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贵族妇女。

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近期刚刚允许某位外国画师[3]为她画了幅像，这幅油画很快就要被送到国外展览。虽然按照慈禧的特别要求，这幅画像不能依照西方绘画习惯，在人物的脸上采用阴影技巧，不过包括这幅画像在内的种种迹象还是显示中国跟与她隔海相望的日本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变革趋势，逐步走向世界。



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为读者介绍起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来，其实并不存在太多隔膜。通过这本书，你将首次看到一个不管自愿还是被迫，虽然保持着种种天朝做派，却终归还是向我们这些西方外交人员女眷伸出了橄榄枝的慈禧太后。

苏珊·汤丽

【注释】

[1] 指裕德龄和她妹妹容龄，德龄和妹妹自1895年起先后随父亲出使日本和法国， 1903年回国，被慈禧任命为御前女官。1907年，德龄跟美国驻上海副领事结婚，后移居美国。1911年以“德龄公主”的笔名出版了英文著作《清宫二年记》。1944年在加拿大死于车祸。

[2] 今天的西式高跟鞋最早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明的，后来才逐渐演化成女性专用品。

[3] 指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miss katharine Carl，中文通译为“柯/克姑娘”，她是唯一在中国宫廷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外国人，也是唯一替尚还健在的中国后妃画像的人，代表作《禁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早期中国历史

周朝建立前，从公元前2953年至公元前1122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历史基本属于糊涂账[1]。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人的祖先[2]并非这片土地的土著居民，而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的。他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陆续建立了很多定居点，那些原先定居当地的部落则被他们逐渐瓦解、同化。还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属于游牧文明，而非农耕文明。这方面比较明显的证据就是中国房屋采用的大屋顶、翘屋檐和木头立柱的设计，它们跟游牧民族的帐篷具有很多相似性。据说，成吉思汗每攻下一座城镇，就下令把城里房子的围墙全部拆掉，只留下木头屋架。这样一来，原来的房屋就可以很方便地转化成供蒙古骑兵和战马居住的蒙古包。

中国最早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53年。这年，伏羲氏被拥立为王。“伏羲”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最早教中国人学会了打猎、捕鱼和饲养牲畜。伏羲被认为是中国历法的制定者，被认为是中国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姓氏制度的创立者，以及中国古琴和八卦的发明者。另外，伏羲还被认为是汉字书写的创建者，在此以前的很多世纪里，中国人只能结绳记事。

炎帝是继庖牺氏[3]之后，中国又一位伟大的古代领袖。他最早教中国人种植五谷，发明了耕田用的犁，还开设市场，方便人们交换各种商品。炎帝之后，黄帝崛起，他发明了中国最高统治者专用的那种带流苏的帽子，以及配套的衣服和裤子。黄帝指导手下伐木造出了船

和桨，他饲养牛，还驯化了马。除此之外，他还开创了中国祭祀天地、神灵的制度，发明了金属货币，协助医生们编纂了出了《黄帝内经》[4]。黄帝的妻子[5]则教中国人学会了养蚕、缫丝和纺织。

从公元前2357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伟大的尧、舜、禹3位帝王统治的时代。尧这个人生活极其简朴，从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和装饰物，他居住的房屋据说连墙壁都不用粉刷。尧的儿子[6]，唉……是个顶没出息的人。尧这个人公而忘私，没把王位传给儿子，而是选择了一位名叫“舜”的继承人。舜原先就是个种地的农民，他不但对父母特别孝顺，还兼具各种美德，野兽甚至因此受到感化主动替舜拉犁，飞鸟自己飞到他的田里帮助捕捉害虫。舜坐上王位后，希望老百姓能直接向他传达自己的想法，就在王宫门口挂了块木牌，允许大家在上面书写各种建议，还在王宫门口安放了一面大鼓，老百姓需要面见舜的时候，就可以敲响这面鼓。

舜的继承人叫“禹”。禹能够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治理黄河水患得力[7]。那个年代的黄河经常泛滥，造成巨大的损失。据说，为了治理黄河，禹足足花了9年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犒赏如此巨大的功绩，舜把王位传给了禹。禹继承王位后统治非常清明，为了处理公务，吃顿饭都可能停下10多次，洗一次头可能也要中途停下两三次，连头发都来不及擦干，就那么把湿头发攥在手里[8]。由于心地十分善良，禹每次审案的时候都会替犯罪的人落泪。遇见因为贫穷被迫卖儿卖女的老百姓，禹还要拿出自己的钱周济他们。



舜帝画像

尧、舜、禹执政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只可惜，这种近乎乌托邦的日子即便在神话传说中也无法维持长久。尧、舜、禹之后，中国开始了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堕落时代。公元前1818年，夏桀继承王位，这个人集人类的各种缺点之大成，比此前的所有统治者都坏。夏桀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叫“妹喜”。为了讨妹喜高兴，夏桀动用宝石、象牙和大理石修造宫殿，甚至还送给她一张用整块碧玉雕刻出来的床。妹喜喜欢听靡靡之音，夏桀就特意组建了专门的乐队。妹喜的花园里有用酒灌满的池塘，上面可以行船，池子里的酒足可以把3000人喝得烂醉。相比妹喜，夏桀的生活更加糜烂，每天完全放纵在感官享受当中，连续30天不上朝。统治者的种种劣迹激怒了老百姓，起义爆发，天怒人怨的夏桀因此丧命。

领导这场起义的人名叫“汤”，他在公元前1766年取代夏桀，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好景不长，一场干旱很快席卷大地。汤用发布“罪己诏”的方式向上天祈求降雨，他为自己罗列的罪名包括：

①怠慢朝政；

②不能督促子民勤劳生产；

③建造奢华的宫殿；

④听信妇人之言；

⑤对贡品过分贪婪；

⑥偏好谄媚之言。

这份“罪己诏”发布后，上天很快便降下甘霖。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似乎总是很难维持长久，美德总会被时间慢慢侵蚀。公元前1154年，殷纣王即位，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堕落时期。纣王有个宠爱的妃子名叫“妲己”，这个女人施展魅惑手段，牢牢控制了朝政。纣王其实是位非常有天分的君主，却在奢华的享受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据说，纣王即位没多久，就命人给自己制作了一副象牙筷子。他的臣子听说了这件事，忧心忡忡地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跟瓦器相配，要用犀牛角的碗、白玉的杯子。犀牛角的碗、白玉的杯子肯定不能配野菜、粗粮，只能吃山珍海味。吃着山珍海味，自然不肯再穿粗布衣服，住简朴的屋舍，步行出入，就要穿绫罗绸缎，住豪华的宫殿，乘坐华丽的车子。国内的财富无法满足需要，必然要去国外征讨。这非常值得忧虑[9]。沉迷享受的纣王逐渐变得昏庸，那些试图劝谏他的臣子在妲己的蛊惑下遭到残杀，很多新奇的刑罚被发明了出来，比如炮烙。九侯（the earl of chin）的女儿入宫后不愿陪伴纣王一起淫乐，纣王就把她的父亲剁成了肉酱。鄂侯（the earl of o）不断地劝阻纣王施暴，最后被杀死做成了肉干。西伯侯（the earl of the west）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囚禁了多年[10]。纣王的臣子比干劝谏纣王，反倒惹恼了他，被挖心而死。纣王声称这么做是为了看看这位大臣的心是否真的有玲珑七窍。

事情发展到后来，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武王趁势发动起义。纣王失败，聚集起金银财宝，放火自焚而死，他的宠妃妲己则被武王砍了头。武王建立的周朝从公元前1122年持续到了公元前250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武王是位杰出的君主，却在执政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国家划分为12个小的诸侯国，分给了亲戚和大臣，允许他们的后代世袭罔替。这无疑削弱了

天子对国家的控制权。后来，诸侯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互相征伐、吞并，国家因此陷入动荡之中。

武王的继任者是成王（cheng）。他即位时只有13岁，因此必须由周公辅佐。周公的儿子名叫“伯禽”，他跟成王从小一起长大。成王小时候非常顽皮，每次犯了错误都是伯禽替他受过。长大后，为了报答这个弟弟，成王就把他封为了鲁国的首任诸侯王[11]。据说，周公辅佐成王执政时，曾给周边国家的君主送了一个磁石做成的指南针当作礼物。这是目前已知的关于罗盘的最早记载，欧洲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罗盘直到今天仍然习惯以南为正方向，被称为“指南针”，欧洲的罗盘习惯以北为正方向，被称为指北针。同样是在周公辅佐成王执政的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金属货币，就是那种圆形中间有孔，方便用绳子串起来使用的货币。周代的中国的军队开始使用双轮战车和战马作战。奴隶制度在这个时期得到保留，很多奴隶少女甚至要为死去的主人殉葬。史书记载，某位大人物临死时曾给儿子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爱妾全部殉葬。幸运的是，这位儿子找到了恰当的替代方式，让这些女人免于一死。

周代建立后，随着时间流逝，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强大，这些名义上的臣子开始挑战天子的权威，经常拒绝向天子进贡。周朝内部的动乱让周围的小国家看到了机会，公元前936年，游牧民族的军队侵入中原地区，很快又被击退。这是有据可查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发动的第1次进攻，从那以后，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历代中原王朝。

今天中国人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是在周代确立起来的。例如家族群居性的生活习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平时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同时还要指定一位当家人。家族制度建立后，姓氏文化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至于椅子、桌子、床这些中国人今天必备的家具，也都是在周代逐渐发明出来的[12]。尽管周代的中国文明得到了极大发展，孔子、老子、孟子这些圣人却在反复指责社会道德的沦丧、国家秩序的动荡，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公元前255年，周朝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身在中国西部的诸侯王势力不断壮大，发动了针对其他诸侯王和周天子的战争，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王朝。这就是短命的秦朝（tsin/ch in），中

国正是从这时开始被西方人称为“China”。

始皇帝是秦朝的首位君主，执政时期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06年。始皇帝从父亲那里接过大权时只有13岁，却很快凭借强有力的手腕控制住了局势。秦朝建立后，始皇帝废除了诸侯国制度，强化

了中央集权，“始皇帝”这个名号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建立秦朝后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同时通过强迫手段发动百姓修造了一系列宫殿、公路、桥梁和运河。公元前214年，为了抵御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始皇帝下令建造长城。长城总长1400英里，一路越过了无数高峰、河流和山谷，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工建筑之一。领受命令的臣民们虽然全力以赴，始皇帝却非常遗憾地没能亲眼看到这项工程彻底完工。

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项重要罪名，那就是焚书坑儒。由于这个罪名，他落下了不好的名声，特别受到学者和读书人的仇视。除此之外，很多老百姓也都不喜欢他过于严苛的执政措施。始皇帝死后，民间不断爆发起义。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继承皇位，却始终没能挽回局面。最终，名叫“刘邦”的农民领袖脱颖而出，建立了汉朝。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1年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别辉煌的时期，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仍然以自称“汉人”为荣。刘邦登上皇位后被称为“汉高祖（kaoti）"，这是个中国史书中如雷贯耳的名号。汉朝前后延续了大概4个世纪，中间只经历过短暂的中断[13]，国富民强。汉朝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其中的很多东西被后来的朝代继承下来。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的墨汁、毛笔和宣纸都是在汉朝发明出来的，当时造纸的原料主要包括桑树皮、麻纤维之类的东西。汉朝还出现了从读书人群体中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汉朝虽然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个过程中却始终战乱不断，特别是来自西面和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问题。事实证明，秦代开始修建的长城并不具备太大的实际意义。

汉朝临近尾声时再次变得腐朽、没落。当时至少有两位皇帝完全是被身边的太监控制住的。很多心怀野心的人从中看到了希望，起义很快爆发。这些起义者头戴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

身为起义领袖的董卓[14]很快积累了足够的实力，达到了跟汉朝皇帝抗衡的地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名叫“王允”的大臣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挺身而出，准备除掉董卓。他的具体办法是给对手进献了一位美女。这位美女名叫“貂蝉”，她从小被王允收养，习学歌舞。危急时刻，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貂蝉主动站了出来，询问养父究竟为什么事情烦心，如果需要，她愿意替养父分忧，万死不辞。看到貂蝉，王允突然有了主意，他屏退下人，只留下貂蝉，详细告诉了她董卓的情况，以及自己打算铲除这个敌人的决心。王允发现，董卓的义子吕布虽然勇猛无敌，却跟他的义父一样，都属于好色之徒。如果同时把貂蝉献给董卓和吕布，从中挑拨，这父子二人就可能反目，大汉王朝就迎来了铲除董卓，国家中兴的机会。貂蝉认为王允说得挺有道理，决定依计而行。

第2天，王允派人给吕布送去一顶镶嵌有珍珠的金冠，还写信奉承他是天下第一的大英雄。吕布非常得意，来到王允家表示感谢。王允设宴招待吕布，吕布喝得大醉。宴会临近尾声，貂蝉婀娜现身，吕布立刻被她的美丽给吸引住了，直接告诉王允说，如果能得到这位美丽的女子，他愿效犬马之劳。王允很痛快地答应了吕布的要求，许诺选个黄道吉日，就把貂蝉送到吕布府上。

王允的计策很快获得了成功。由于争风吃醋，董卓和吕布变成了仇人，失去吕布辅佐的董卓被汉朝皇帝顺利铲除。遗憾的是，董卓的死并未给汉朝带来和平，而是进入了群雄逐鹿的时代。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位英雄最终胜出，将原先的汉朝割据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国家。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国”，从公元221年延续到618年的400年当中，除了很少的时间，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政权，战乱频发。公元590年，隋朝逐渐崛起，统一了全国。隋朝建立后仅仅维持了39年的稳定和富强，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两代皇帝先后主政中国。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日本开始了频繁的外交往来，基督教也首次传入中国。隋炀帝是通过弑父的方式登上皇位的。由于统治过分残暴，他很快就把隋王朝引向了末路。隋炀帝执政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修建了沟通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15]，后来忽必烈可汗的大运河就是以此为基础整修而成的。

公元618年，名叫李渊的将军夺取皇位，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唐王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开始，到公元907年结束。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弗雷德大帝[16]崛起，英国开始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唐朝是继汉朝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灿烂的阶段，后人对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评价是太平、富强和进步。唐朝最著名的皇帝当属高宗[17]。这位皇帝执政34年，起初励精图治，最后却以堕落的悲剧收场。玄宗统治的黄金时期，中国文学受到大力扶持，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军事方面，大唐成功挫败同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18]，控制了今天中亚的很多地区。经济方面，唐朝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纸币[19]。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妇女缠足的这个恶劣习俗也是在唐代发展起来的[20]。据说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著名昏君陈后主（chen hou tsu）的某位妃子为了讨君王欢心，故意用布把脚缠成了近似新月的形状。从那时开始，中国女性便以缠足为美，称这种小脚为“金莲”。



清代汉族少女

唐朝的繁荣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一个短暂的动乱时期过后，公元960年，新的王朝建立起来，这就是宋朝。宋朝从公元960年开始，到公元1260年结束。这个王朝控制了今天中国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却始终无法摆脱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公元1127年，宋朝将长江以北的区域放弃给打败、吞并了契丹（chitans）的金朝，龟缩到中国南方地区。这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又开始了由北向南的扩张过程。

草原上的蒙古人原本是臣服于金朝的。后来，他们的领袖成吉思

汗抓住时机，统一了草原上分散的部落，率领蒙古骑兵向西横扫了北至里海、南到印度河的中亚地区，向北远征朝鲜半岛，向南一直打到了长江边上。成吉思汗并不满足这样的战果，很快再次率军向西征伐俄罗斯南部省份，势不可当地占领了莫斯科、基辅等地。如果不是因为黑死病肆虐，他们可能还要打到更远的地方。

建立功勋的成吉思汗返回了蒙古草原，很快就在公元1221年去世了，甚至没来得及享受他的胜利果实。成吉思汗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窝阔台。听说成吉思汗去世，金朝立刻派出了求和使者，希望与蒙古媾和。窝阔台认为金朝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声称将继续开战，直到金朝彻底倒台。蒙古与金朝间的战争因此又持续了很多年。公元1230年，蒙古失去了伟大的将领拖雷[21]，战争却没有因此停止。拖雷的12个儿子中有两个特别出类拔萃，就是蒙哥和忽必烈，这两个儿子后来先后继承过汗位。

公元1232年，蒙古与宋朝达成合约。根据合约，宋朝将出兵协助蒙古打败金朝，作为回报，被金朝占据的北方领土将归还给宋朝。蒙古与宋朝的联手最终要了金朝的命，金朝的皇帝为了免受被俘的屈辱，在宫殿中自焚而死。他的儿子随后即位，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死于军队哗变。金朝自此彻底退出中国历史。400多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建立了今天的大清帝国。

金朝灭亡，蒙古与宋朝的蜜月期自动宣告终结。窝阔台率领军队很快占领了今天的湖广（hu kwang）、河南、江南[22]等地。遗憾的是，窝阔台像他的父亲一样短命。公元1241年，主政蒙古13年，时年56岁的窝阔台去世。公元1248年，前面提到的拖雷的儿子蒙哥继承汉位。他和兄弟们齐心协力率领蒙古骑兵延续着自己的胜利。公元1259年，蒙哥去世，他的弟弟忽必烈即位，元朝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元朝从公元1259年开始，至公元1360年结束，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像元朝那么国土辽阔、力量强大。忽必烈继承汗位后的头20年，退到南方的宋朝仍在全力抵抗蒙古骑兵的南下，公元1280年，忽必烈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北到北冰洋，南到马六甲的庞大帝国。除了横都斯坦[23]、阿拉伯半岛，以及西亚的部分地区，

蒙古骑兵所到之处，当地人纷纷向蒙古大汗称臣、纳贡。

不管蒙古大汗如何英明神武，不管他如何尊崇中国中原文化，也

不管他如何关爱、体恤穷人，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始终摆脱不掉被异族统治的压抑感。公元1294年，在位25年的忽必烈撒手人寰，他的很多臣民对这位大汗的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公元1323年，大元帝国气数将尽，元顺帝（shun ti）统治时期，国家陷入动荡，各地纷纷爆发起义，一位朱姓的农民儿子[24]成功推翻了元朝。

朱元璋原先当过和尚，后来还逃荒要过饭，各地起义的消息唤醒了他身上的血性，促使他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通过逐渐积累军功，朱元璋成了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击垮了大元帝国，将中国的18个省收入囊中，龙袍加身，成了大明王朝的皇帝。

经过两个宋朝[25]和元朝的持续发展，此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令马可·波罗，这位中世纪最著名旅行家为之惊叹的高度文明。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来到大元帝国的首都，此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现在意义上的椅子、桌子、床、筷子[26]、犁、货船和马车等器具，有些东西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样子跟当初也没太大变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甚至已经掌握了天花的秘密，知道了人工预防天花，具体的接种方法跟现在大同小异，主要是



朱元璋画像

通过鼻孔吸入少量天花病人的痂皮[27]。忽必烈统治时期，连接北京和中国南方的大运河正式通航，它的主要作用是从南方向帝国的首都调运粮食。正如前面所说，这项工程巧妙的利用了公元7世纪隋炀帝大运河的部分河段，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从公元1368年到公元1644年，明朝延续了大概300年的时间。朱元璋称帝后将自己的年号定为“洪武（hung wu）"。这位皇帝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都非常成功，中国重新开始了高速发展。朱元璋身后最伟大的继任者非永乐皇帝（yung lo）莫属，这位皇帝公元1403年即位，执政24年，将大明帝国带上了历史的巅峰，老百姓安居乐业。永

乐皇帝非常具有尚武精神，他当政期间将中国的首都从南京搬到了北京。直到今天，这个城市仍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朱元璋和永乐大帝统治时期，可能从来没人想过这个王朝也将重蹈灰飞烟灭的悲剧性覆辙。

自然环境因素[28]对大明王朝的倒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朝内部的起义直接推翻了这个王朝，逼得皇帝[29]自杀殉国。这之后没多久，来自满洲的清军在大明将军吴三桂的帮助下打败了这些起义者，建立了大清帝国。据说，吴三桂当年跟清军有过约定，后者协助镇压起义后，应该主动撤回关外。事后食言的大清皇帝为了换取吴将军的合作态度，接受了他提出的4个条件：

①汉族妇女不得被选为后宫嫔妃；

②满族人参加科举考试不能被点为状元；

③汉族男性活着的时候依据大清法律身穿满族服装，死后可穿明代汉族服装下葬；

④汉族妇女无论生前身后都可身穿汉族服饰，可继续保留缠足的习俗，也不必像满族女性那样婚前梳长辫。

清朝建立后，很多汉族男性，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汉族男性，不愿意接受剃头留发辫的习俗，就把他们的辫子盘在头上，用头巾包住。这种习俗延续至今。



在路边等活干的人



剃头匠

大清王朝公元1644年正式建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光绪皇帝

[30]。建立大清帝国的皇帝声称他们是当年金朝人的后代，为了神化自己的祖先，他们还杜撰了个非常具有浪漫色彩的故事。据中国历史学者所说，很久、很久以前，3位美丽的少女在长白山下的神湖洗澡。突然，一只喜鹊飞到那位最年轻少女放在湖岸边的衣服上面，留下了1颗深红色的果子。少女吃了这个果子，怀上了身孕，她生下的孩子就是爱新觉罗家族（aisin ghioro）的祖先[31]。公元1644年至1662年当政的清朝首位皇帝顺治便来自这个家族。顺治皇帝当年的即位诏书是这样写的：

>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弘基，神功圣武，遗厥子孙，迨我皇考，承元继体以来，十有七载，显谟遗略，深恩厚泽，用干戈而讨逆，本仁义而纳降，所以遐迩向化，丕业日隆，臣子方作万年之颂，宫车乃有一朝之虞，肆予冲人，正在弱龄，讵意宗盟及诸大臣，咸谓神器，不可以久虚，宗祧不可以乏主，于皇子之中，合辞推朕，勉循舆情，于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于笃恭殿。于戏，惟予小子，莅兹重任，所赖伯叔宗亲大小臣工，同心协力，辅朕不逮。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为顺治元年，宜发大赦，共图惟新，自八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一应罪犯，并常赦所不免者，尽行赦宥，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八月二十六日。[32]

光绪帝即位前，清朝的皇帝已经前后延续了8代。顺治后的第2位清朝皇帝年号“康熙”，公元1662至1732年在位，这个人是位皇帝，同时也是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统治的时期是整个大清王朝最强盛的时代。康熙帝对待顺治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33]非常友善，但也始终保持着戒心。这位皇帝不仅任命西方神甫充当自己的哲学老师，认真听他们授课，还向很多西方传教士讨教过最新的科学知识，对来自西方的天文学成果尤其感兴趣。康熙帝本人从未受洗皈依过基督教，不过他却默许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以及50多名宫廷贵妇入了教[34]。公元1773年，执政60年的康熙帝告别人世。



康熙画像

康熙帝去世前，已经指定他的第4个儿子雍正继承皇位[35]。这位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公元1735年就去世了。雍正帝去世后，他的儿子乾隆从公元1735至1796年执政。乾隆皇帝自视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皇帝，认为他的国家比其他国家面积都广阔，财富都殷实，粮仓都充盈。话虽如此，乾隆帝镇压对手的手腕其实一点儿不逊色于他的父亲，这在大清帝国内部引发了若干次反抗。

据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乾隆帝具有很多“特异功能”。例如，他的眼睛不需要转头就可以后视，他的大耳垂肩，双手可以够到膝盖。乾隆皇帝除身体上具有很多“特异功能”外，精神上也非常尚武、好战。正是在乾隆帝统治时期，清军彻底平定了伊犁[36]。乾隆帝执政时期发动的另一场大规模战争是征讨库尔喀（ghurkhans）之战[37]。这次战役中，他手下的将领率领70000军队攻入尼泊尔，还深入英国控制

区域60英里。随着库尔喀人的臣服，大清帝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得到了加强。

乾隆帝时代的大清帝国虽然频频使用武力，国家发展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财富仍在快速积累当中。这个时期的乾隆帝不但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也是周围很多小国家名义上的宗主。这些小国家慑服于大清帝国的强大，崇拜这个国家的文明，争先恐后成了大清的藩属。同样是在乾隆帝时代，欧洲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急剧增长。公元1684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了商站[38]。遗憾的是，由于当地官员从中作梗，这家商站的经营异常惨淡，英国无法取得预期的利益。最终，英国政府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39]代表乔治三世国王前往北京洽谈相关事宜。马戛尔尼受到大清皇帝的热情接待，也向大清皇帝转交了英国国王赠送的大量礼物。得到大清皇帝允许的马戛尔尼相继参观了热河和圆明园，不过他此行的成果仅仅是获得了英国人可以继续在广州与大清通商的权利，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马戛尔尼此行因此被认为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只有他本人因为受到大清皇帝的种种礼遇而沾沾自喜。

公元1795年，执政满60年的乾隆帝主动把皇位让给儿子，然后又当了3年太上皇。公元1795年至1820年，乾隆皇帝的第15个儿子嘉庆皇帝成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嘉庆皇帝这个人当皇子的时候就举止粗鲁、品行卑劣。他当皇帝的这25年，大清帝国逐渐风雨飘摇。嘉庆皇帝本人执政期间就曾遭到两次行刺。第1次是在北京的大街上，由于护卫玩忽职守，皇帝差点儿丢了性命[40]。第2次发生在紫禁城，要不是当时的皇子旻宁（miening），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及时出手，他可能就真的被杀了[41]。嘉庆皇帝自己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 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方期与吾赤子，永乐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匪七十余众，犯禁门，入大内，戕害兵役。进宫四贼，立即捆缚；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绵志，续击一贼，始行退下，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

> 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拿净尽矣。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惟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
>
> 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42]

总的来说，由于皇帝的无能，政权的腐败，嘉庆帝统治时期各地爆发起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公元1816年，鉴于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境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英国政府再次向北京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43]领衔的外交使团。访问期间，阿美士德勋爵被要求向大清皇帝磕头行礼。本着公平原则，勋爵要求大清官员同时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行礼。双方僵持不下，使团因此没能得到皇帝的接见。

嘉庆皇帝其人虽然并非一无是处，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君主。据说，他的某位大臣曾指责这位皇帝过于沉迷酒色，因此降低了他在臣民眼中的地位。皇帝龙颜大怒，把这位大臣叫到面前臭骂一顿，让他自己给自己挑个死法儿。这位大臣选择五马分尸。皇帝于心不忍，让他再挑些别的死法儿，大臣又先后选择了上吊自尽、砍头，以及被人用绳子勒死。皇帝没表态，让他回家等死。这位大臣回家等了一宿的死，结果第二天却得到了被任命为伊犁将军的消息。这位大臣后来因为敢于直言犯上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44]。



西方人在中国游历

公元1820年至1850年，道光皇帝接替父亲执掌大清帝国。这位皇帝精力充沛，也很有知识学养，可是一旦登上皇位，就把君主的职责抛到脑后，忘记了当年的许诺，沉迷到个人享乐当中。道光皇帝统治时期，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处境变得更糟。1834年，英国政府终结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开始直接操控这项业务。律劳卑勋爵[45]奉命出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来到中国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快就在澳门病死了。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不断增长的鸦片贸易加剧了中英两国的矛盾，大清朝廷尝试采取各种方式禁绝鸦片，最终却没能取得成功。事实上，鸦片之所以屡禁不绝，很可能跟大清商人和官员本身涉足鸦片贸易有很大的关系。矛盾发展到极端，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军队一败涂地，英国远征军首先占领了舟山，广州的沙角炮台随后也被攻破。清廷被迫默许了英国对香港岛的控制权，并支付了600万银元[46]。

鸦片战争开始后，广州的实际控制权落到了卧乌古爵士[47]的手

里，后来厦门、宁波、定海、乍浦、上海、靖江、南京等地也相继被攻克。1842年，亨利·璞鼎扎[48]爵士代表英国与大清朝廷签订和约，在广州以外，增加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4个地方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向英国赔偿2100万银元。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人进入中国的数量出现了明显增加。

公元1850年，大清帝国内部危机重重，道光帝去世，他的儿子咸丰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1862年。咸丰帝当政期间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蔓延了半个中国，要不是西方列强及时出手协助镇压，清廷很可能就撑不住了。这场起义的缘起是广西当地的百姓发现咸丰帝即位后，自己悲惨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些对清廷心怀不满的人成立了以"天地"为名号的宗教团体[49]。一位洪姓[50]年轻人抓住机会，联合多路力量，利用宗教和反清复明这两面大旗的号召力，发动了起义。

洪秀全的出身非常低贱，却饱含上进心。青少年时代，他曾多次前往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进入大清官场。很遗憾，尽管天赋异禀，洪秀全却始终名落孙山。就在多次落榜，灰心丧气之际，他从一位美国传教士[51]那儿接触到了基督教，只不过当时的他并没太把这门宗教当回事。4年后，洪秀全再次前往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再次名落孙山，又非常巧合地再次遇到了那位传教士。这时的洪秀全尽管没有接受洗礼，却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

回家后的洪秀全陷入了极度悲伤忧郁的状态，很快就病倒在了床上。病中的他据说听到了神的召唤，赋予他手持宝剑，推翻大清王朝的权力。受到神的鼓舞，洪秀全决定发动起义。他成立了拜上帝会，号召受压迫的贫苦百姓都来参加，原先信奉"天地"的人也纷纷改投到洪秀全麾下[52]。清廷发现了危险的苗头，派遣将领带兵镇压，然而镇压效果并不理想，洪秀全连续取得胜利。起义者的队伍因此声势大壮，洪秀全手下的兵马越来越多，最终让他有能力夺取了距离海岸线850英里的重要城市汉口。夺取汉口后，洪秀全挥师沿长江而下，直捣南京，打败了驻防当地的25000名清军，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由此自称"天王"。登上宝座的洪秀全很快忘记了当初的许诺，逐渐堕落起来。为了保持手下的忠诚，堕落了的洪秀全也对这些人的堕落视而

不见。

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快速取得成功，还要感谢一艘名为“亚罗（arrow）”号的老闸船[53]。这条船上的水手全部是中国人，但悬挂英国国旗。1857年，清军强行扣留、检查了这条船，英国因此再次向大清帝国宣战[54]。接到米切尔·西摩尔海军上将[55]十万火急的报告后，额尔金勋爵[56]受命率领5000人前往增援。同年10月，广州落入西摩尔手中。次年5月，战斗再次爆发，道格拉斯教授（professor Douglas）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洪秀全与随从在南京城。1864年刊载于法国画刊的铜版画，这是西方人描绘太平天国领袖及其随扈最为清晰完整的图画。

他成功击溃了清军征集广州周边地区的大小船只组成的临时舰队，凯珀尔准将（commodore Keppel）和哈里爵士（sir Har-ry）两位指挥官则相继率领英军连续击溃清军水师部队，清军来自佛山的部队损失尤其惨重。这之后，西摩尔率领舰队主力冲在前面，凯珀尔准将带着较小的战船负责殿后，准备扩大战果。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成功登陆，清军未做有效抵抗，便仓皇撤退。相比陆军，清军水师的抵抗明显更坚决一些。河面上的清军战船虽然不断遭到英军炮击，却始终没有停止还击。凯珀尔准将率领500人规模的小舰队，效仿纳尔逊[57]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使用的战术，突袭冲入清军水师阵线，将他们的队形割裂开来。凯珀尔准将本人亲自率领英军士兵采用跳帮战术，登上了对手最大的战船，那条船上的清军水兵很快就弃船逃跑了。清军虽然主动弃船，却也

算不上仓皇逃窜，相反，这或许还是某种战术。凯珀尔准将等人登船时，这条船的弹药库已经被清军士兵点燃，要不是他们跑得快，很可能就被炸得粉身碎骨。总的来说，英军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很多清军战船起火燃烧，还有的战船被直接抛弃，只有很少的几条船完好无损地撤到了佛山水域。此时的英军其实也损失惨重，可建功心切的凯珀尔准将却立刻率领部队向佛山发动了进攻。负责守卫佛山的是一支装备齐全的清军水师部队，他们严阵以待。凯珀尔准将的座舰被击沉，虽然他很快恢复了对部队的指挥，英军的攻势还是明显慢了下来。看到这种情况，西摩尔上将下令主动撤退。

清军的顽强抵抗并没能为大清帝国挽回败局。公元1857年的圣诞节，额尔金勋爵向清廷提出了主要涉及广州通商和战争赔款等内容的条约草案。这个要求遭到断然拒绝，英军随即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广州城的老百姓在48小时内撤到城外。12月28日，英军对广州城发动猛烈炮击，城市很快陷落，正在试图逃跑的叶姓总督[58]成了英军陆战队的俘虏。叶总督后来被转移到印度加尔各答看押，就死在那里。

英国随即在广州成立了临时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是3位欧洲人，即巴夏礼先生[59]（后来由哈里爵士接替）、海军陆战队的霍洛韦（Hollo-way）上校，还有1位法国海军军官。

占领广州的额尔金向北京派去了信使，通报了最新的局势，再次申明了恢复和平的前提条件。清廷对此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西摩尔上将奉命夺取大沽炮台。此时英国向清廷提出的条件主要包括同意女王政府向北京派驻长期公使，同时在原有通商口岸的基础上，向西方人开放5个新的口岸，分别是牛庄[60]、登州[61]、台湾、汕头，以及位于海南岛的琼州。1859年，额尔金勋爵打算乘坐炮舰沿河上溯，前往北京正式签订条约，清廷再次从中作梗，战火重燃。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随即向北京进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扣押了奉命前去接洽的巴夏礼爵士[62]和洛赫先生[63]（后受封为爵士），将他们扣留在距离北京大概10英里远的通州，双方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会谈。来自清廷的代表拒绝承认此前已经成型的条约草案，额尔金勋爵下令进攻北京，迫使大清皇帝接受英法提出的条件，解救遭到扣押的外交代表。

英法联军进攻过程中，圆明园遭到焚毁，咸丰皇帝出逃，奉命留

守的恭亲王[64]基本全盘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条件，同意对西方开放开放牛庄[65]、烟台、九江、靖江、汉口、台湾，以及北海[66]等地，允许英

国向北京派驻长期公使。



遭焚毁的圆明园

英法联军还没来得及从北京周边全部撤离，诡异的阴云再次笼罩这座城市。当时的恭亲王为了换取联军尽快撤离帝国首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而且已经跟联军将领就撤军时间达成了比较明确的共识。俄国感觉有机可趁。据说，时任的俄国驻北京公使私下找到恭亲王，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促使联军尽快撤军。作为回报，清廷应向俄国出让位于普里莫尔斯科[67]地区两个省份的利益。恭亲王有病乱投医，落入了圈套，俄国人假意出面“调停”，骗走了大把利益。

不管怎么说，英法联军终于还是从北京撤走了，清廷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太平天国。之前镇压行动的失败让他们对自己的将领失去了

信心，为了加大镇压力度，清廷找到英国驻北京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68]，希望由他推荐一位英国军官，负责领导针对太平天

国的镇压行动。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当时急于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外交关系，很快便推荐了时任少校的戈登[69]，也就是后来的戈登将军。他领导的那支部队被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名字大体上可算是名至实归。“常胜军”原先的领导者是个美国人，名叫“华尔[70]”，后来在战斗中阵亡了。戈登接手后，常胜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成功拿下了苏州，为后来攻克南京奠定了基础。苏州的战斗结束后，常胜军跟后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合兵一处。李鸿章的部队对待俘虏非常残忍，戈登听到后非常生气，就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讲理，指责对方在自己不知情的前提下拉着他合谋做坏事。李鸿章因此吓得仓皇而逃。

目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李鸿章和戈登的冲突很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沟通不畅造成的误会，尽管如此，双方的隔阂已经造成。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为此处处排挤戈登，剥夺了他的指挥权，迫于压力的戈登被迫辞职。那之后没过多久，另一位清军将领曾国藩率军攻克了被太平天国定为首都的南京。洪秀全不愿落入敌手，吞金自杀[71]。清军入城后，发现了他身穿黄色丝绸龙袍的尸体。洪秀全追随者中的很多人步了他的后尘，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从南京城逃了出去。延续前后10年，差点儿撼动大清帝国的起义就此偃旗息鼓。

咸丰皇帝没能活着看到这场胜利。公元1859年，他死在了热河，继承皇位的是年仅5岁的同治帝。早在太平天国起义还没被完全镇压

下去的时候，西方曾表示愿意为此向清廷提供贷款和资助，前提是中国的海关控制权必须交由外国人控制一段时间。西方国家通过这笔买卖狠狠地赚了一笔，中国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今天，这个国家的海关仍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从1861年开始，罗伯特·赫德[72]爵士就成了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清廷通过出卖海关控制权的确获得了急需的外部援助，不过这点儿利益跟由此造成的损失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同治帝1862年至1875年在位，他的生身母亲就是今天仍然健在的慈禧太后[73]。慈禧太后当年是咸丰皇帝后宫位列第二的嫔妃。为皇帝生了这个儿子以后，她被提升到几乎跟正宫皇后[74]平级的地位。这两位女士在咸丰皇帝死后奉命代替仍然年幼的新皇帝治理国

家，获得了东太后和西太后的称号，新皇帝的叔叔恭亲王成了她们最依仗的幕僚。

同治帝在位期间大清帝国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回民起义，主要的涉外事件则是所谓的“天津教案[75]”。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天津当地有谣言说天主教的神甫和修女拐骗、杀害中国儿童，用他们的眼睛做药。1870年6月21日，受到蛊惑的中国老百姓冲进法国驻天津领事馆，打死了托马辛（Thomasin）夫妇、皮埃尔·谢弗瑞（Pere Chevrien），以及查尔麦森（Chalmaison）夫妇，当地的法国天主教堂随后被烧成了白地，法国开设的教会医院和孤儿院也受到围攻，供职于这两个机构的修女遭到杀害，受她们庇护的30至40名中国孤儿也遭到波及。有对不幸的俄国夫妇在前往教堂举行婚礼的过程中被误认为是法国人，他们和参加婚礼的来宾也被打死。为了弥补这次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清廷撤职了一大批地方官，专门派遣特使前往巴黎道歉，还支付了大笔赔款。

公元1872年，同治帝结婚，10位最美丽的满族少女从大概7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了皇后的候选人。这10个人又经过慈禧等人亲自挑选，一位名叫“阿鲁特[76]”的少女最终胜出。同治帝和阿鲁特氏结婚的日期是经过钦天监反复测算选择的良辰吉日。那天的凌晨2点，紫禁城正门大开，阿鲁特氏来到新家，在专属皇后的宝座上接受众人朝贺，接过了象征皇后的印绶。陪同阿鲁特氏进宫的送亲队伍包括众多王公大臣，队伍里的旗帜和伞盖数都数不过来。总的来说，中国皇帝结婚的流程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区别，只是规模、排场更大而已。

同治帝结婚后，两宫太后按照规矩将手中的权力交还给他。各国驻北京公使认为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宫觐见新皇帝，祝贺他结婚并亲自执政。经过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觐见的日期最终被确定为1873年6月29日。以下关于觐见细节的记载来自当时发行的《帕尔玛尔报（pall mall gazette）》：

> 那天一大早儿，各国公使就乘坐轿子，来到位于皇宫西侧的西苑[77]门外下轿，然后由等在那里的清廷大臣引领着进入休息室，

> 皇帝的厨房为他们提供了茶水和点心。这之后，公使们又被带到了位于紫光阁西侧的椭圆形帐篷里[78]，见到了恭亲王和帝国的主要大臣，大家一起恭候皇帝驾临。皇帝进入帐篷后，日本公使首先上前觐见，各国公使随后依次向皇帝表达了敬意。觐见过程中，皇帝始终面朝正南坐着，身边侍立着恭亲王等重要大臣，大概四五个人的样子。觐见的公使来到场地中间站住，鞠躬致意，向前一小步，再鞠躬，然后再向前一小步，来到距离皇帝的龙书案非常近的位置，鞠第3次躬。完成这套流程，公使便站直身体，侍立到场地两侧。所有公使都鞠过躬以后，俄国公使首先用法语宣读了国书，向皇帝表示祝贺，中国的翻译同步将他的话翻译成汉语，讲给皇帝听。国书宣读完毕，公使把国书呈递到龙书案上，退到两侧。其他国家公使依照同样的程序，再宣读、呈递各自的国书。国书呈递结束后，皇帝向公使得体地点头致意。恭亲王站到位于皇帝宝座前面左侧的位置，依照中国礼节双膝下跪，代表皇帝用满语宣读了诏书，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已经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国书。这之后，恭亲王又双臂平伸，高举着诏书，沿左侧台阶走下安放宝座的高台，来到离公使们更近的地方，用汉语把诏书又宣读了一遍。这之后，他又双膝跪下，代表皇帝向公使们表达美好祝愿，希望他们能对这次觐见感觉满意。结束觐见的公使退出帐篷，按原路离开西苑。

同治帝是个短命的皇帝，结婚没多久就死于天花[79]。阿鲁特氏皇

后随后也死了，据说是因为皇帝死后过于伤心，所以就把衣服上的金纽扣摘了下来，吞金自杀[80]。死去的同治帝没有儿子，因此清廷就需要在众多皇亲国戚中替他物色一个继承人。慈禧最终选择了醇亲王[81]年仅4岁的儿子，同治帝年仅4岁的堂弟，他就是今天仍然在位的光绪帝。

公元1875年，柏郎上校（colonel Browne）组织了一支针对缅甸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探险队，意在寻找一条通过缅甸巴莫地区进入中国的商路。探险途中，英国外交官马嘉里（Margary）被杀，整个行动因此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果[82]。公元1876年，英国和清廷为解决马嘉里事件签订了《烟台条约》，后者同意为这次事件支付200000两白银的赔偿。除此之外，双方还就鸦片进口中的运输路线问题达成了相关协议，清廷不但新增了4个通商口岸，还在长江沿线为外国商船提供了6个合法的停泊点。

公元1881年，东太后去世，西太后，也就是现在的慈禧太后得以大权独揽。公元1882年，法国侵入东京湾[83]地区。这个地方并不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却跟这个国家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清廷在当地有军队长期驻防。公元1884年，法军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北宁省[84]。当时的清廷自顾不暇，只得默许法国对东京湾地区的侵占，撤回了驻防该地的军队。作为交换条件，法国许诺决不为此威胁中国



清末的北京前门大街

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事情并未按照双方的预期发展，清军和法军最终在谅山地区爆发冲突，法军的人员和物资都损失惨重。

战争的爆发由此无可避免。作为报复，法军歼灭了清军驻守福州的舰队[85]。清军陆军后来又在台湾淡水地区给予法军沉重打击[86]。这之后，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公元1885年，罗伯特·赫德爵士居中斡旋，促成双方坐下来展开和平谈判，他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据说，赫德爵士某天曾在总理衙门对诸位公使报告情况说："9个月前，你们委托我就和平谈判问题居中斡旋，现在……"

"现在，你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公使们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和平已经恢复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基本是按赫德爵士最初提出的设想构建的。1886年，英军进攻缅甸。大清帝国此时还是缅

甸的宗主国，不过那也只是名义上的了。英军很快攻占了曼德勒，驻防缅甸的清军主动撤回国内[87]。

第二章　光绪帝亲政

公元1889年，光绪帝正式开始执掌大权，慈禧太后从前台退到了幕后，她专门为此发布了一道旨意。1889年2月26日，光绪帝大婚。同年3月4日，慈禧归正随后从紫禁城移居颐和园，过起了名义上的“退休”生活：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88]

年轻的光绪帝随后也投桃报李地发布了一道旨意：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神器至重，惧弗克胜。仰赖皇太后垂帘听政，孜孜求治，朝昃不遑，惟一二日，慎敕几康，历十四年，无闲终始。用能内修外攘，久道化成，胥海禹而咸措乂安，俾藐躬以承庥蒙业。凡此大猷之丕焕，实皆圣善之宏敷。迺谦冲常切于慈怀，而期望弥殷于嗣服，前岁即颁谕归政，经朕率廷臣再三吁恳，始允训政数年。兹复钦奉徽纶，重申成命，以朕春秋方

富，典学有年，宜及时而亲总万几，与在廷而共熙庶绩。朕自维凉薄，益懔冰渊，顾念祖宗付托之重，艰钜统集于一身，敬体圣母宵旰之劳，尊养待伸夫寸报，敢不谨遵懿旨，力任仔肩。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亲裁大政。惟率循期于由旧，在恪守列圣之成规，凡损益贵乎因时，仍亲秉慈闱之彝训。……[89]



光绪



明信片上的光绪皇后

光绪帝亲政后的第2年，也就是1890年，英国开始尝试从印度向中国西藏境内渗透，开辟商路，双方为此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公元

1894年，大清帝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朝鲜国王请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国内的东学党（tonghak）起义，日本依据1885年签订的相关协议在没有知会清廷的前提下同时向朝鲜派兵。两军在朝鲜擦枪走火，日本随即向大清帝国宣战。1894年7月27日，日本海军首先击沉了运载清军部队的蒸汽轮船“高升（kowshing）”号。9月17日，两国海军在鸭绿江口发生大规模海战，清军舰队损失了5艘军舰。10月25日，日军从朝鲜越过边境，侵入中国满洲地区，随后再于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港。这座港口是当时清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拥有重金修建的船坞和大批战略物资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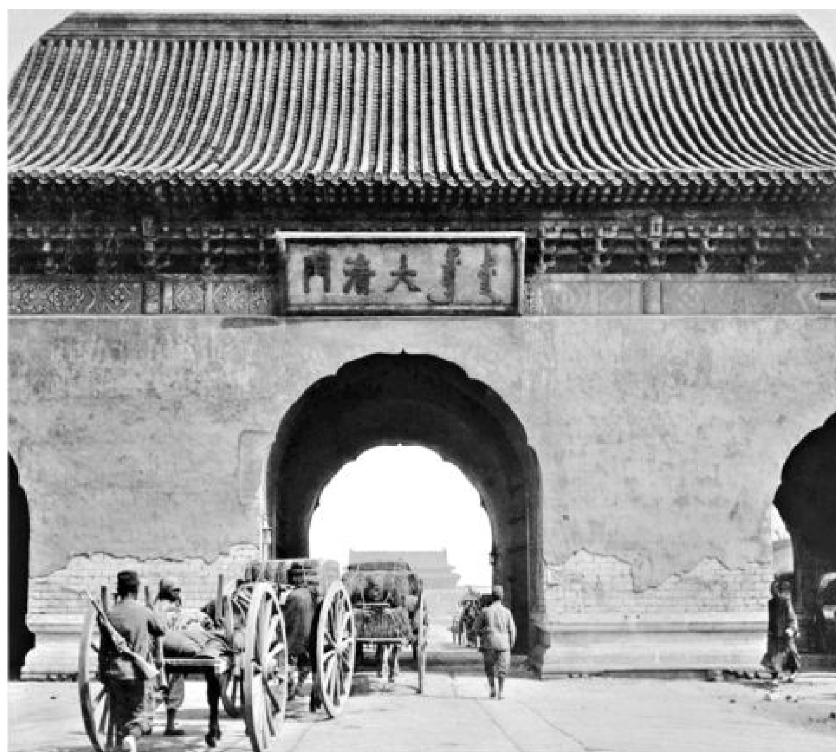
1894年11月9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1895年2月12日，他们的海、陆军联手进攻清军最后的堡垒威海卫。清军舰队的残余舰艇投降，丁上将[90]在舰队投降前3天自杀殉国。同年3月，清军陆军在牛庄[91]连续战败。仗打到这个地步，清廷无力支撑，只得任命大清帝国最具知名度的总督大人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求和。李鸿章在日本遭到暗杀[92]，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停战谈判。4月17日，清廷与日本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协议：①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实际是默许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②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最终由于德、法、俄等国干涉，没被割让给日本，而是换成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金[93];③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④增设5个新的通商口岸。

同样是在1895年，眼看日本觊觎满洲利益，俄国赶紧逼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确保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特权。俄国人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当时已临近完工，清廷依据协议，允许他们把这条铁路延伸到中国境内[94]。延伸到中国境内的铁路主要包括两条干线。其中一条从俄国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经珲春连接吉林，另一条直接从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中国，途经瑷珲、齐齐哈尔等地，最后抵达吉林。依据

协议，这条铁路由俄国出资修建并派人管理。铁路开通30年后，清廷可以“收回”铁路的控制权，不过具体怎么个“收回”法儿，俄国人也没明说。

大清帝国当时在关内地区已经修建了一条铁路，他们希望把这条

铁路从山海关延伸到关外，连接沈阳和吉林。清廷的想法很好，可没有钱。俄国人愿意出资修建连接吉林和山海关的铁路，不过前提是铁路修好后路权归他们所有，期限为10年。10年后，清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收回”路权。这条铁路途径牛庄[95]、盖平、锦州、旅顺等地，铁路范围以内要依照俄国人制定的法规实施管理。除此之外，俄国不但获得了与清廷“共同”开发黑龙江、吉林等地矿产资源的权利，还可以在满洲地区驻扎部队，旅顺、大连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港口的控制权也落到了俄国手中。



大清门

1894年战争爆发前，中国沿海地区被外国人占据的领土只有葡萄牙从1537年开始控制的澳门和英国从1842年开始控制的香港。通过1894年的战争，日本把中国台湾抓在了手里。如果不是德、法、俄3国坚决阻止，整个辽东半岛也可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公元1897年，

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清廷迫于压力，同意将这个港口“租借”给德国99年，允许德国在当地驻扎部队、修建工事和海军基地，开采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96]。胶州湾被强占后，德国又逐渐获得了在整个山东境内修建铁路和开矿的特权。按照当年某些报纸的说法，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港口控制整个中国北方海域的水上煤炭运输通道。

公元1898年，清廷接受窦纳乐爵士[97]的建议，准备通过吸收外国贷款的方式，支付拖欠日本的战争赔款。作为提供贷款的交换条件，英国要求将旅顺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无疑损害了俄国的利益，俄国人为此处处作梗，搅黄了这件事。作为报复措施，英国要求清廷不得将长江下游地区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利益作为担保，向其他西方国家寻求贷款。清廷接受了这个要求，还向英国商船开放了内河航道。

从1898年开始，如沙利斯伯利勋爵[98]所说的“一场列强间的利益争夺战”在北京拉开序幕。这场争夺战的焦点是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直到今天也没完全结束。俄国人在谋求在华利益方面向来非常积极。公元1898年，他们要求清廷正式租借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英国不反对向俄国租借大连，却对旅顺的未来异常担忧。1898年3月

22日，沙利斯伯利勋爵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写信说：

> 女王陛下政府并不介意俄国人在即将完工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获得某个永不封冻的商业港口，但军用港口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这个港口距离北京非常近。旅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适合作为军用港口使用。俄国人一旦占据这里将能够直接威胁北京，进而在瓜分中国利益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沙利斯伯利勋爵的反复呼吁没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俄国还是在1898年3月27日获得了旅顺港的租借权。作为反制措施，沙利斯伯利勋爵转而建议英国政府夺取威海卫的控制权。英国和俄国的行动让法国人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在这场利益竞争中落在后面。据阿诺托[99]先生发表的文章披露，法国的设想是这样的：①通过租借的方式在中国南方海岸线获得一个港口；②从东京湾[100]地区修建一条横跨红河，延伸至中国云南境内的铁路；③迫使清廷同意不向其他列强出卖临近

东京湾地区本国边境省份的利益；④迫使清廷同意不向其他列强出卖海南岛的利益；⑤获取在中国建设邮政系统的特权。法国人获得了这么多利益，按说应该心满意足，然而1名法国籍传教士和2名中国籍教徒的死很快又让他们找到了继续伸手的借口：①迫使清廷同意法国修建连接北海和南宁的铁路；②在传教士和教民被杀的地点修建一座教堂；③严惩相关地方官。他们的要求再次得到了满足。

1898年6月，以康有为为首的一群年轻改革者站了出来，鉴于国家的糟糕状况和大清官场的腐败，他们认为除了发动变法，重组政府和教育机构，自己的国家已经无路可走。他们的主张很快在紫禁城以内获得了认可，年轻的皇帝连发7道圣旨，发动了变法[101]。这次变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①言论自由；②引进西方的教育和考试制度；③在北京城里兴办一所新的大学[102];④适当减少寺庙数量，将它们改建为新式学校；⑤设立翻译机构和专利机构；⑥向国外派遣留学生；⑦裁撤官僚机构中的冗员。

参与变法的改革者饱含热情，他们的好运气一直维持到这年9月底[103]。短短3个月时间里，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某些拒绝执行皇帝变法命令的高级官员被撤职，执掌总理衙门的李鸿章也因为接受俄国人的贿赂[104]，贪污和滥用公款，遭到解职。为了预防官员利用职权犯罪，清廷还要求所有官员每隔3年进京述职，接受质询。变法期间，来自西方的技术被应用于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生产领域。老百姓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朝廷甚至还打算向全国公开财政预算和开销。地方官府实现了改组，议会的成立也在筹备之中，退居幕后的太后的权力遭到进一步限制。

1898年的变法可谓雷厉风行，然而换个角度来说，过于激进的行动往往很难维持长久。1898年9月17日，窦纳乐爵士给沙利斯伯利勋爵写信说：

> 皇帝一直想努力把这个国家拉到变革的路上去，然而他的措施大多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皇帝本人对此其实心知肚明。

9月21日，变法的末日到了，慈禧太后重新把大权收回手中，光绪皇帝发布了这样的诏书：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敦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05]

9月26日，一道光绪帝署名但很可能并非出自他本意的诏书终止了所有变法措施。9月28日，6名参与变法的改革者被处决，康有为侥幸从北京逃到了香港。清廷为这些人罗织了包括“谋杀太后”在内的各种罪名。太后则趁机再次越过皇帝，成了朝廷的实际控制者。事实上，过去的30年当中，她对朝政的把持从来就没放松过。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后来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布了他跟光绪帝交往、合作的种种内幕[106]:

我总是热衷学习西方知识。1885年，法军攻占福州后，中国面临的危机已然显露无遗。1889年，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悲惨局面。我认为，当时最主要的危险来自沙皇俄国势力的南下，以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野心，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变法实现国家富强。这个时候，军机处中占据高位的都是保守派，他们决不会允许我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皇帝。台湾被日本割占后，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这些人失望之极，转而对我亲热起来。我趁机建议他加入变法阵营，同时还联合1300名各省举人联名上书[107]，呼吁变法。这之后，倡导变法的组织[108]在北京成立，拥护变法的报刊《强学报》[109]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1895年），翁同龢开始强烈建议皇帝发动变法，然而由于慈禧太后的破坏，所有的变法活动和组织都遭到了严厉的压制。我只得返回广州组建变法社团，也在广西建立了性质相似的秘密组织。我的学生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湖南组织了强学社，林旭在福建，杨锐在四川，杨深秀在山西，宋伯鲁[110]

在陕西也成立了性质相同的组织，我的弟弟康广仁和他的朋友金岳绅[111]在上海创办了女子学校和不缠足会[112]。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各种倡导变法的报刊纷纷创办。胶州湾被德国强占后，我回到北京，再次向皇帝上书，要求仿效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实施变法。为此，我还向皇帝进呈了相关的书籍。这个时期，我最核心的主张是彻底开放海禁，与西方国家自由贸易。翁同龢赞同我的主张，为此在朝廷中四处奔走，可是由于保守大臣的坚决反对，他的奔走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当时，澳门出版的某些支持变法的报刊甚至建议大清帝国与英国结成同盟抗衡其他列强，朝廷对此游移不定。后来，当我听说英国主动要求将旅顺和大连设为自由港口，不能租借给俄国时，便赶忙找到翁同龢，对他说：“国家有救了，你应该赶快敦促皇帝，这是天赐良机。”很

遗憾，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两个港口租借给俄国。这之后，英国曾提议清廷向自己以3%的利率贷款，用以支付战争赔款，俄国则从中作梗，要求清廷以4%的利率从自己那里贷款。清廷夹在中间，谁都不敢得罪，起先决定同时向两国贷款，后来又改变主意，干脆谁的款也不贷。我对此事的观点是应该甩开俄国，向英国贷款，俄国虽然一贯气势汹汹，却很少有胆量真正向大清帝国宣战。由于慈禧太后惧怕俄国人，所以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是哪个国家的款也没贷。

俄国谋夺旅顺和大连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向皇帝上书，建议他严词拒绝俄国人的无理要求。皇帝为此斥责恭亲王和李鸿章说："为什么要跟俄国缔结秘密条约！俄国人向来不帮助我们，还经常趁火打劫。"

恭亲王和李鸿章回答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的事已经定了，无法反悔。"

皇帝为此大发雷霆。这两个地方被俄国强行占据后，翁同龢发现我曾经做出的预言差不多都变成了现实，对我更加言听计从。监察御史高旬曾[113]，湖南巡抚陈宝箴[114]，翰林院的苏济庆[115]，礼部尚书李瑞棻[116]也陆续加入到支持变法的阵营。当皇帝就变法事宜咨询各位大臣时，以翁同龢为首的变法派纷纷进言，他们说话的分量当然比我重得多。我则配合这些大臣向皇帝进呈了英国、法国、德国的相关质量，以及李提摩太[117]撰写的《19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时事杂感（essays for thetimes）》，以及其他西方书籍的中文翻译本。皇帝由此对世界和国家的形势有了个大概的认识，坚定了变法的决心。我则以变法顾问的身份，第一次得到了皇帝接见。



康有为

康有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清廷的形势正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皇帝孱弱，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慈禧太后。此时的慈禧太后名义上已经“退休”，不过就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

> 实际上所有实权仍然控制在太后手里，呈交给皇帝的任何奏折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朝廷里各个要害部门的正副手都是她的心腹。皇帝没什么发言权，做决定前必须首先请示太后，他实际就是个傀儡。
>
> 无论如何，皇帝还是非常希望有所作为。自从台湾被割让出去以后，他就对国家的前途异常忧虑。为此，皇帝可以信任的老师，博学的翁同龢，给他找了不少有关西方世界的书籍和地图。皇帝每天研读这些材料，发现国家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保守封闭，因此决心发动变法。可太后并不希望变法。

甲午战争开始时，皇帝和众多大臣希望血战到底，太后和李鸿章则盼望着求和。战斗刚刚打响，太后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割让台湾甚至满洲的心理准备。皇帝无法理解这样的做法，悲愤异常，进而希望跟英国发展同盟关系，推动变法。太后为此作出的让步是主张大清帝国跟俄国结盟，但不发动变法。从这时开始，太后与皇帝间的隔阂越来越大。1895年，当皇帝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变法时，太后已经跟他势同水火。皇帝的两个宠妃[118]因此遭到毒打，包括长麟[119]和汪鸣銮[120]两位侍郎，宠妃的兄弟志锐[123]，还有她们的老师文廷式[124]在内，皇帝的多位亲信都受到波及，丢官罢职。之所以发生这些悲剧，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皇帝打算要把权力从太后手里收回来。

太监寇连材[121]因为劝说太后归政皇帝被处死，皇帝本人为此也遭受了严厉的惩罚。长麟是恭亲王的近人，向来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对皇帝说："太后跟同治帝是亲母子关系，对陛下来说却无非只是前任皇帝留下的妃子而已[122]。"太后得知此事震怒异常，恭亲王也吓得够呛。最后还是光绪帝下旨降了长麟的职，恭亲王为此也进宫下跪痛哭道歉。

有人看到后询问恭亲王这么做，皇帝只是悄悄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话。再后来，皇帝干脆和恭亲王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哭得都没力气站起来，太监们只好把皇帝搀回了宫。文廷式曾建议皇帝真正把国家大事管起来，皇帝还是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话。皇帝心里其实很清楚，自从亲政以后，太后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变法还是彻底失败了。由于变法跟西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后，具有明显排外立场的人在清廷逐渐占了上风。1898年10月1日，窦纳乐爵士给沙利斯伯利勋爵拍了封电报：

昨天下午几名西方人在离开火车站[125]，回到北京城内的路上遭到攻击。目前，中国老百姓中的排外情绪已经相当强烈，做出了很多不理智的行为。我已经给西摩尔上将[126]

发电报，要求他派遣1艘军舰来大沽驻防，同时安排陆战队从天津登陆，前往北京加强公使馆保卫。除此之外，我也正在尝试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

这份电报发出后不久，各国公使鉴于形势紧迫，一致同意增加使馆区的守卫力量。各国滞留天津的军舰纷纷组织陆战队，向北京进发。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向北京城内调兵，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从这年的10月到11月，形势一天坏似一天，不过和平的局面尚还可以维持。这年12月，公使馆首次接到了慈禧太后发出的进宫做客邀请。窦

纳乐爵士这样描述这次做客的情形和感受：

> 觐见仪式举行的非常成功，太后凭借自己的优雅和友善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些对慈禧怀有恶感，认为自己此次在紫禁城将看到一位性格冷漠、反复无常的难缠老太太的人因此感觉脑子转不过弯儿来。慈禧展现给他们的是一种亲切得体的贵族妇女形象，她非常善于展现女性的魅力。

几乎是在公使们进宫做客的同时，驻留上海的法国人私自破坏、占用了当地中国百姓的墓地，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四川也爆发了多起针对传教士的排外活动。整个大清帝国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针对西方人的敌意和反感日渐增强，各国却还没有及时停止在这个国家瓜分利益的竞争。1899年4月，英国和俄国达成私下协议，英国承认了俄国在满洲地区以铁路为核心的种种利益，俄国则默许英国将长江下游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 俄国和英国不希望因在华利益问题发生冲突和争议，同时也考虑到大清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达成如下协议：①俄国将不在英国的在华利益范围内修建铁路或插手铁路事务；
>
> ②英国决不在长城沿线以北修建铁路，也不得在这个区域插手与俄国利益相关的铁路事务。

这个协议本质就是为了避免英国和俄国在远东地区因在华利益问题爆发直接冲突。双方还特别规定，协议达成前英国已经动手协助清廷修建的牛庄[127]至山海关的铁路不在协议规定的范围以内，不过英国在铁路完成后必须将路权完全移交给清廷，铁路平时的运行也必须由清廷派人管理。相应的，俄国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在满洲的铁路线向南、向西适度延伸。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美国政府照会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政府，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各国纷纷表示赞成，只有俄国在赞成的前提下对这项政策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他们给美国人的答复是这样的：

> 就俄国已经从大清帝国租借到的土地来说，沙皇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支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有意将大连建设成为自由的商

业港口。鉴于大连有可能成为自由商业港口这个前提，不在这个地区设立专门的海关似乎是不恰当的。当然，海关成立后，具体的关税政策将由各国平等协商决定，是否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口的最终决定权在大清朝廷手中，俄国作为租借这个港口的国家当然也有权参与意见。至于是否在当地设立专门的海关，这个问题也要由大清朝廷决定。沙皇政府无意在这个地区为了谋求私利，排斥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

1900年1月24日，光绪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诏书：

朱谕：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国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业月坐惟念。宗社至重，是以敦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鉴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多罗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



天津的义和团

钦求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128]

几乎是在这道诏书发布的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排外活动愈演愈烈，社会陷入了失控的状态。以下内容摘录自法布尔（Faber）的《中国编年史（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a）》：

4月25日，义和团攻打了保定以南的天主教堂，北京的很多上流社会人士也加入了义和团。5月12日，两位隶属于英国教会[129]的本土教民在北京附近受到攻击。5月26日，北京至保定铁路间的车站被烧毁。5月28日，义和团拆毁了天津至北京铁路间的一段，奉命养护、维修铁路的比利时工程师和他的家人于6月2日从保定逃到北京避难。5月31日，各国组织陆战队开赴北京加强公使馆保卫。6月1日，隶属于福音传播会[130]

的传教士罗宾逊（Robinson）和诺曼（Norman）外出传教时被打死。6月4日，窦纳乐爵士发出电报称北京对外联络的电报和铁路线已被切断，他们被困在了城内。鉴于形势异常紧张，他请求政府敦促西摩尔上将尽快从塘沽向北京派出陆战队。6月5日，天津至北京的铁路联系彻底中断。6月6日，窦纳乐爵士来电称，由于慈禧太后的暧昧态度，针对西方人的攻击活动已经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局势很可能失去控制。6月8日，保定燃起大火，通州当地的教堂被烧毁，北京城内的传教士已集中到使馆区和某些教堂内寻求庇护。窦纳乐爵士发来电报称，局势已经失控，使馆中挤满了避难的英国人，北京城内的英国教会财产已被彻底放弃。希望西摩尔上将尽快采取行动。6月10日，西摩尔上将给英国海军部发去电报转达了窦纳乐爵士的意思，向他们报告说，鉴于形势濒临失控，他已经组织陆战队登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同时，西摩尔上将率领2000人组成的联军队伍向北京进发。6月11日，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街上被义和团打死[131]。6月13日，北京城东边燃起大火，很多教民被打死，慈禧太后对此未作任何表态。6月16日，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最后通牒。6月17日，大沽炮台被攻占，天津城内不断发生爆炸。6月19日，清廷要求所有在北京的西方人于次日下午4点前离开北京。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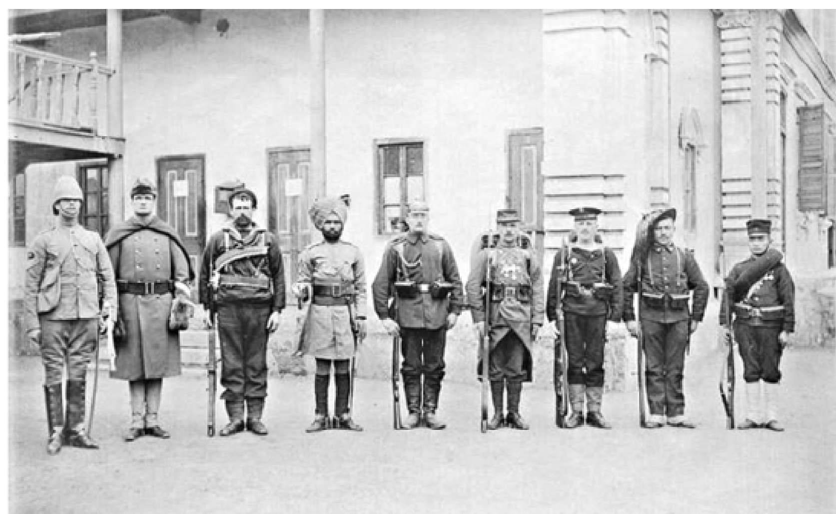
在前往总理衙门交涉途中被杀。当天下午4点后，义和团和清军对使馆区发起了攻击。6月23日，联军从大沽进抵天津，当地的爆炸声就此停止。6月26日，西摩尔率军前往北京途中受阻，退回天津[133]。6月30日，多名传教士在保定被杀。

7月1日，又有多名传教士被杀。7月9日，45名传教士在太原被杀，其中有12名为天主教传教士，其余为新教传教士。日军在这天攻占了位于天津的兵工厂[134]。7月14日，联军彻底占领天津城。7月22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抵达上海。8月5日，联军再次从天津向北京进军，清军在北塘和杨村的阻击失败。8月14日，联军来到北京城下。

在此之前，隶属各国公使馆的卫队已经联合起来守卫使馆区。他们至少分别来自8个国家，包括18名军官和389名士兵。75名男性志愿者拿起步枪临时加入了这支队伍，另有50名其他男性带着随手找到的从步枪到餐刀之类的武器，充当协防力量。时任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早年有过从军经历，指挥过部队，被公推为最高指挥官。与此同时，作为公使的他本身还要负责使馆内男女老幼的吃喝拉撒。英国公使馆是当时整个使馆区的防卫核心。除了英国人，这个地方还聚集了法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意大利

人，窦纳乐夫人具体负责关照他们的生活。从6月20日至8月14日，双方你攻我守，在使馆区展开了拉锯战，距离此地不远的大清贡院[135]也受到波及，燃起了大火。战斗开始后，地处英国使馆对面的的肃亲王[136]的府邸被卫队占领，作为前沿阵地。为了装沙包垒工事，各国使馆昂贵的丝绸和缎子都被贡献了出来。

当时北京正处盛夏时节，大家躲在使馆里面又热又闷。食物短



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士兵在北京合影

缺，卫队最后只好把马匹和其他宠物杀了给大家吃。所幸，使馆区内总共有5口水井，不过这5口井中只有2口是甜水井。使馆区仅存的葡萄酒和罐头食品，乃至公使酒窖里价格不菲的香槟全部被集中起来，留给伤病员。遍地的的尸体滋生了大量蚊蝇，有限的蚊帐也只能集中给伤病员使用。所有妇女组织起来，给大家洗衣服、做饭。大家就这么坚持着，直到增援部队赶到，莫理循博士[137]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 午饭来了，又是难吃的马肉！突然有人喊："英国的军队来啦！"人们涌向使馆区的出入口，来到运河街[138]正对城门水关的位置。英国军官正率领着第1锡克步兵团[139]和第7拉齐普特步兵团[140]沿着运河街向英国使馆走来。

这次事件结束后，兰斯多恩勋爵[141]专门在1901年2月10日给窦纳乐爵士写了封信：

> 通过报告，我了解到了您在危机期间的表现。这里，我谨代表女王政府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使馆内的所有人员在危机期间各自承担了自己的职责，令人敬佩。这其中特别要感谢您，从6月22日至8月14日，正是您率领大家渡过了难关。通过各种渠道，很多在这期间受惠于您的人至今仍然心怀感激。这里，我还要代表女王政府为窦纳乐夫人主动照顾老幼妇孺和伤病员的行为表示感谢。她和众多妇女的仁慈行为为她们在各国人士当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那些受惠于窦纳乐夫人的亲历者以及曾经为他们牵肠挂肚数个星期的亲友们，至今仍然为此念念不忘。

8月15日，使馆区的战斗彻底结束。就在这天早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带着众多王公大臣、后宫嫔妃逃出了北京城。肃亲王护送他们走了一段儿，然后又掉头返回了城内。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 那天，太后、皇帝等人离开北京，向西逃到北京以西20英里的灌石村[142]暂时落脚。护送他们的是由众多军官率领的3000名士兵，这帮人一路不断烧杀淫掠。太后、皇帝等人在灌石村把轿子换成了骡车，然后以每天20英里的速度向距离北京120英里的宣化府挺进，每隔3天停下休息一天。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支队伍，太后和皇帝的权威降到了最低点，士兵甚至偷吃为他们准备的饭食。为了杀一儆百，几名参与杀人、抢劫的士兵被下令处决，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某些随行大臣建议太后抵达宣化后就留在那里，这个地方离北京毕竟比较近，消息灵通，然而队伍中的多数人已经吓破了胆，害怕洋人的军队随时可能追过来，坚决要求向更远的地方走。队伍只得继续向太原府进发。离开宣化时，隶属于董福祥将军[143]的10000名士兵也加入了护驾的队伍，这些人唯一的贡献就是让军纪变得更加涣散。一路上，太后不停地掉眼泪，咒骂那些让国家陷入绝境的大臣。皇帝早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权力，再不会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了，更是一言不发。从宣化到太原走了26天，大家时刻担心着洋人从后面追上来。抵达太原后，太后和皇帝曾尝试在当地把临时的办事机构组织起来，恢复对朝廷的控制，但没能成功。这支队伍虽然不断以太后和皇帝的名义向外发布命令，可再也没人认真执行它们，情况变得乱糟糟的。

慈禧等人最终抵达了西安府，陕西省的省会，这才真正安顿下来。8月16日，义和团攻打北堂[144]的行动彻底结束。下面的内容来

自奥利佛（Olivieri）中尉的日记，他隶属意大利海军陆战队，曾率领1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和30名法国陆战队员守卫这座教堂：

> 8月9日，我们的食物即将告罄，躲在教堂里的教民只得宰杀毛驴充饥，为此还发生了争抢，树叶子也早就被吃光了，大家处在崩溃的边缘。两名7岁左右的儿童死于饥饿。几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因为没有奶水，孩子也陆续饿死了。情况极度绝望。8月12日，我查哨后返回住处，突然听到了爆炸的巨响，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我试图往屋外跑，可房子塌了，把我埋在了里面。后来的调查发现，这次爆炸是由于某中尉指挥部下在教堂外面排雷时操作不慎导致的。我手下的中士班长连同4名士兵都被埋在了废墟里，只有5名士兵幸免，他们很快跟法国陆战队员联手展开了救援行动。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大概45分钟以后，救援人员从废墟里先刨出了我的一只手，发现还是热的，就继续向下挖，把我救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头部和右脚受了伤，都不严重。这次爆炸中，除了5名意大利军人，还有100名教民也被埋在了废墟里。我们对此几乎束手无策。负责指挥法国陆战队的军官和他手下的中士班长都已经死了，我自己无法行动，我的中士还埋在废墟里，士兵们实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更糟糕的是，围墙被炸了个大洞，如果外边的义和团趁势冲进来，一切就结束了。上帝保佑，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炮手罗斯李（Roseli）终于被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他

断了一条胳膊，第2天还是伤重不治死去了。炮手被刨出来后大概11个小时，我们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哥伦布（Colombo），还找到了2具尸体。8月13日，又找到9具尸体。没有人再受伤，可躲在教堂里的人已经差不多要被绝望逼疯了，吓得草木皆兵，听见点儿响动就乱跑、乱喊。军人们竭尽全力安抚大家的情绪。此时的陆战队员手里总共只剩下50发子弹，食物已经被吃光。当天午夜时分，北京城的东面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和炮声，我们的增援部队来了。大家不顾横飞的流弹，纷纷跑到外面打探消息。14日和15日，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8月16日，教堂的东面一直有两门炮在响，士兵进来报告说日本的军队已经打到了这条街上。没过多久，围攻教堂的义和团就撤走了。8月28日，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了阅兵式。9月14日，李鸿章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9月21日，瓦德西元帅[145]抵达上海，次日继续北上前往北京。作为各国驻华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军官，他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联军司令。12月22日，各方宣布彻底停火。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李鸿章奉清廷之命与各国谈判

次年，也就是1901年9月7日，清廷与列强签订了和平条约[146]。条约内容大致包括：

1.任命二代醇亲王[147]为特使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的死道歉，北

京城内要为这位公使立碑，碑文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撰写。

2.惩处相关官员，排外活动特别突出的省份5年内停止科举考试。

3.遭到破坏的西方人墓地要重新立碑祭奠。

4.向日本派遣使团为外交人员被杀一事道歉。

5.两年内不得从西方国家进口武器，这个期限还可视情况继续延长。

6.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内结清，全部款项结清前，每年按4%的比例计算利息。

7.加强公使馆地区保卫。

8.拆毁大沽炮台。

9.天津至北京沿线要点由联军驻防。

10.皇帝下旨严禁国内排外活动，任何触犯此项条款的个人将受到严惩，地区将被停止科举考试。

11.整修白河[148]和黄埔[149]地区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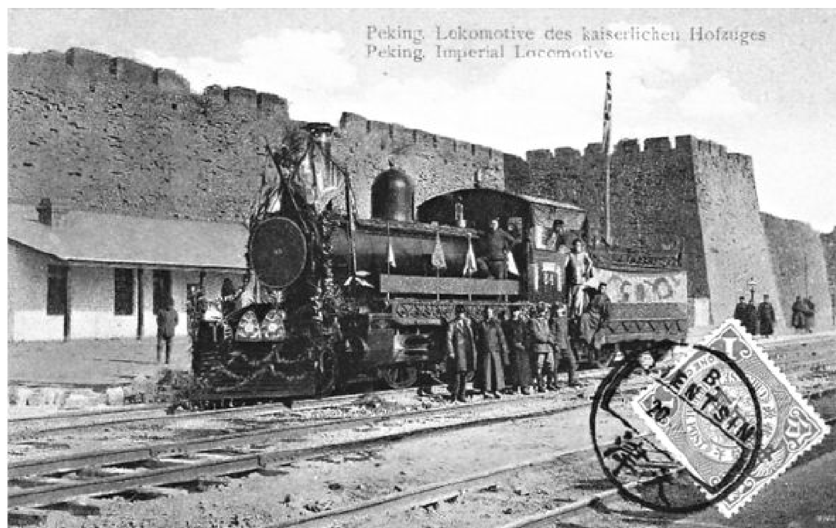
12.总理衙门升级为外务部，地位居六部之上。

11月7日，李鸿章去世。和平谈判耗尽了他最后一点儿心血，庆亲王[150]这年10月底的临时退出，更让他的身体雪上加霜。年老的总督身体异常衰弱，然而这却不妨碍他投身终生热衷的政治活动，谈判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越活越年轻的现象。要不是因为贪嘴吃了一大块最喜欢的中式点心，引发了严重的消化不良，他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猝然

离世。不管怎么说，李鸿章都是1860年以来，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11月30日，皇位的继承人溥儁[151]遭到废黜。

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正定[152]坐火车返回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生事物[153]。下了火车的太后和皇帝返回皇宫以前分别前往庙宇祭祀了他们崇敬的关帝和观音。很多西方人人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



明信片上的慈禧专列火车头

第三章　中国人的崇拜和信仰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对非人格化的神的崇拜。这种崇拜

的根源基于上天的伟力，它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不断赐予幸福或者灾难。我们西方人把这种崇拜具体化为对上帝的崇拜，中国的孔子则称之为“天”。中国人对上天的信仰延续至今，皇帝被尊称为“天子”。中国的皇帝很早以前就拥有了这个荣誉称号，这个荣誉称号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责任，就像公元前1776年的商汤所说的那样，上天对人间的任何不满，最终都要由天子一人承担，如果有人因此要以生命

为代价向上天献祭赎罪，那也只能是天子自己。为了把自己当成祭品向上天献祭，商汤剪下指甲和头发作为祭品，乘坐白马拉的普通车子，来到一片桑树林，请求上天降罪于自己，同时免除人间的苦难。这个故事的出现足足比耶稣降生早了16个世纪[154]。耶稣降生后19个世纪，1832年，中国遭遇了罕见的旱灾，道光皇帝模仿商汤向上天谢罪，希望把黎民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1903年，天下再次大旱，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阴历）北京的《京报》[155]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 辛亥，以京师雨泽稀少，上亲诣觉生寺祈祷行礼。遣恭亲王溥伟诣大高殿恭行拈香，遣醇亲王载沣诣时应宫，贝勒载瀛诣昭显庙，贝子溥伦诣宣仁庙，贝子毓櫄诣凝和庙拈香。[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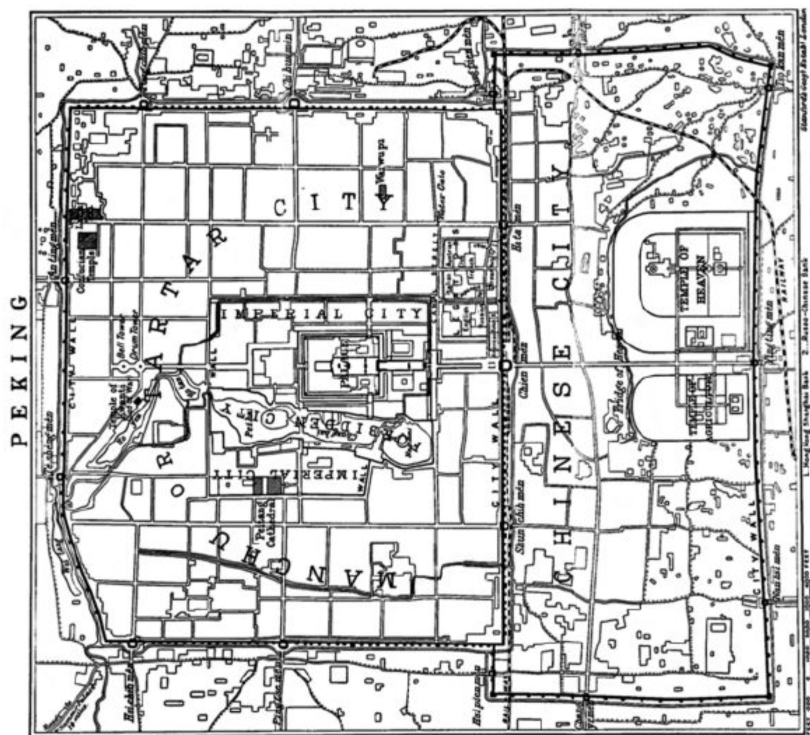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皇帝的这次谢罪并没有换来天降大雨，北京城内及周边的寺庙因此得到命令齐力祷告求雨，上天这才降下甘霖：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庚午，以京师雨泽愆期，上复诣觉生寺设坛祈祷，并诣大高殿设坛祈祷，行礼。遣贝勒载洵诣时应宫，贝勒载涛诣昭显庙，贝子溥伦诣宣仁庙，贝子毓櫄诣凝和庙，镇国将军载振诣黑龙潭，庄亲王载功诣白龙潭拈香。以铁牌迎请到京，在觉生寺供奉，发大藏香一枝，派醇亲王载沣前往拈香行礼。[157]

中国人信仰上天的最明显标志就是北京的天坛。这座建筑的历史非常古老，是明朝皇帝下令修建的。天坛距离紫禁城大概3英里左右的路程，是北京城内，甚至是整个中国，最漂亮、最有意思的建筑。之所以要把天坛的位置放在北京城的最南端，主要是为了方便皇帝在这里举行宰杀牲畜的祭天仪式。天坛核心建筑周围的围墙是圆形的，从里往外有几道围墙，围墙与围墙之间的区域遍植松柏，树下长满了野花野草。距离天坛最近的那道围墙被粉刷成了跟皇宫一样的红色，红色围墙圈起来的区域正中是二层的汉白玉基座，基座上面就是三重屋顶的天坛。这座建筑是木结构的，铺着蓝色的琉璃瓦，最高处还有个金色的尖顶。天坛的南面，安放着类似基督教圣餐台的祭坛。这个祭坛是三层汉白玉结构的，“三”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神秘的意味。祭坛被装饰以各种精美的雕刻，四面设有台阶，祭坛中心被中国人视为宇宙的中心！总的来说，这座祭坛看起来非常朴素，却拥

有一种肃穆的美。

每年两次，也就是每年临近冬至和夏至的时候，皇帝都要前往天坛祭天。从紫禁城出发的祭天队伍，就成了北京城里特别的风景。皇帝每次去天坛祭天的路线都是固定的，出了北京内城的南大门，也就是前门，然后沿着大街一直向南。这条大街可能是全世界路况最糟糕的道路，路面上到处都是长年累月留下的车辙，这些车辙里还经常填满了泥沙。皇帝前往天坛祭天时，普通老百姓是不得随意观看的。沿街的住户、商铺都要关闭门窗，道路两侧还要拉起蓝色的帷幕，阻挡那些胆大的外国人好奇的目光，按照中国文化，普通人是没资格瞻仰皇帝的“龙颜”的。1903年春天，我们在距离前门不远的一处商铺里有幸“偷窥”到了皇帝祭天的队伍。这座商铺是1900年经历过战火后重新修建起来的[158]，传统中国纸窗户的中间还镶嵌了块玻璃，正好可以方便我们向外窥视。窥视过程中，店铺的主人连连抗议，让我们千万不要出声，还拿手掌在自己脖子上来回比画，意思是说如果被发现，就要杀头。



本书英文版收录的清代北京地图

通过那几个小玻璃窗，我们看到前门正中专供皇帝出入的大门缓缓打开了，大门外面汉白玉的石桥和栏杆已经事先得到清洗。经过漫长的无聊等待，大街上突然传来了连续的呵斥声，看街的兵丁[159]正忙着用手里的皮鞭驱散行人，把他们赶到街道两侧的帷幕后面。赶骡子的人粗暴地抽打着温顺的牲口，躲进离自己最近的小巷。毕竟，冒犯皇帝的罪名是谁都承担不起的。

粗野的呵斥声在街上持续了好一阵子，然后突然就静了下来，这样的安静在北京的街道上非常少见。皇帝道队的先导仪仗进入视线，队伍越变越长，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色华丽服装组成的彩带。太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手里端着托盘，盘子里托着装满佳酿的酒瓶，以及各色贡品。随从们穿着暗红色的长袍，手里举着长长的杆子，杆子顶上是装饰着流苏的伞盖。皇帝的侍卫们挎着弓箭坐在马上，身上穿

着明黄色的、刺绣了龙纹的马褂。这支队伍过去后没多久，一个人举着黄色的权杖跑了出来，嘴里不停喊着："磕头！磕头！下跪！下跪！"这个人身后，一位官员打扮的人举着象征皇帝的黄色伞盖，他的身后还有两个人端着冒烟的香炉。皇帝乘坐装饰了各种明黄色饰物的肩舆跟在后面，身穿亮蓝色的丝绸龙袍，头上戴着貂皮帽子。为皇帝抬肩舆的轿夫总共有32名，16名在左，16名在右，身上穿的都是近似粉色的丝绸长袍，老式的帽子上镶嵌了一圈豹皮。皇帝的兄弟二代醇亲王，也就是1900年奉命前往柏林为克林德的死道歉的那位王爷，骑着高头大马跟在皇帝后面。道队殿后的是由6匹配备了明黄色鞍韂的战马组成的马队。皇帝由这支队伍护送着前往位于神圣的天坛范围内的斋宫，直到第二天早上都要待在那里斋戒、静坐，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充满对上天的敬畏之情。皇帝的队伍过去后没多久，躲在各处的人们就都冒了出来，重新活跃起来。5分钟时间不到，做买卖的摊子、棚子又都支了起来，一切恢复原状。

从来没有西方人亲眼见证过大清帝国皇帝祭祀上天的情形，不过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看到过已经准备就绪的祭天场所。当时，圜丘最上层正中心那块象征上天的蓝色玉石周围环绕着样式统一的绿色帐篷，帐篷里安放着大清历代皇帝的牌位，他们是受邀来到这里陪伴上天一起享用供品的[160]。圜丘的第二层安放着太阳神、金木水火土5大星，以及28星宿的神位，神位前摆放了成盘的肉类、水果和鲜花。圜丘的最底层才是真正供那些参加祭祀的活人使用的[161]。可以想象，当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开始祭天仪式，召唤神灵和祖先前来享用供品时，是个多么壮观的景象！还可以想象，皇帝身穿蓝色的龙袍，跪拜在他心中的万物主宰面前，用庄严的声音代表子民向上天传达他们的敬意，袅袅的香烟直达云霄。此情此景，苍天在上，内心的杂念将被荡涤而空，只留下最古老、朴素的情感。

除了上天，中国人还崇拜相当于宗教的三种哲学，这三种哲学在中国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人很难理解，三种原本不搭界的宗教居然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和谐共存、难分你我，然而中国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的确就这样和平相伴了上千年，互相之间不但没有任何纠纷和偏见，还同时受到皇帝的资助和保护。他不偏不倚地善待这

三种宗教，同时祭祀它们各自的庙宇。皇帝如此，他手下的大臣和子民们当然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人往往同时是这三种宗教的信徒，只不过不同的人身上三种宗教的配比也会有所不同，通常来说，儒教最受读书人青睐，妇女更多倾向佛教，道教则不分阶层和人群，拥有广泛的信众。儒释道三种宗教同时刺激着中国人的想象力，满足着他们不同的心理需求。对祖先的崇拜是孔子学说的基石，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普遍的一种“宗教”。佛教则为人们，特别是女人们，描绘了一个死后的世界。为了在这个死后的世界中获得幸福，就需要在人间心怀慈悲、多做善事。道教则为人们提供各种可以保证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满足人在世间的各种愿望。



北京天坛

儒释道三种宗教在中国经历了逐渐融合的过程，发展到最后，就连神邸也可以互相“借用”[162]，三种宗教的元素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座寺庙里，难分彼此。例如，北京的寺庙求雨时经常是和尚坐在一边，道士坐在另一边，官员们则在当中向着神像叩拜行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官员都是孔子的门生和信徒。中国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最

直接象征就是所谓的“三教堂”，这种寺庙同时供奉儒教的孔子、道教的太上老君和佛教的释迦牟尼。儒释道三种宗教的关系或许正如马丁博士[163]所说的那样：

>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小的冲突，然而经过上千年的不断调和，他们在融合中又坚守着各自的界限，和平共存。佛教掌管天堂，道教负责地狱，儒教则指导着现世。

接下来，我将耗费笔墨，简单介绍下儒释道三教各自的起源和流传。

①儒教

儒教的核心在于“仁义”这两个字，它的功能在于指导现世的社会关系，它的基础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先贤留下的典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教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宗教，虽然它的内部也存在着偶像崇拜等宗教特征。儒教崇拜的最重要偶像是在世者自己的祖先，而不是类似其他宗教的抽象神灵。我们虽然不能由此下结论说对祖先的崇拜让在世的人受到了某种束缚，不过逝去的祖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确占有重要的位置，进而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建立了最基本的爱和敬畏之情。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对祖先的异常崇敬，不敬祖宗的人是没办法在这个社会立足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不能生育孩子的妇女往往受到她们的丈夫，乃至其他妇女的鄙视，因为这些女人断绝了祖宗的香火。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生了女孩的妇女也要低人一等，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延续祖宗的香火。基督教的信仰不主张祖先崇拜，因此这种宗教进入中国后就很难获得大家的接受。

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每个中国家庭，哪怕是那些最贫困的家庭，也一定要在房屋的角落里为祖先的牌位留下容身之地。每年4月，中国人总要倾巢而出，祭扫祖先的陵墓，修整坟头、种植树木。同样是在这天，家族里的男人[164]还要给祖先的牌位献上丰盛的供品，以示他们对列祖列宗的尊敬。中国人相信，要是没有后代在人间为死后的自己按时献上供品，他们的灵魂在那个世界就会沦为乞丐。那些不幸死于战争、饥荒，或者死在海上、外国的人，

灵魂永远也回不了家，找不到归宿，只能成为孤魂怨鬼。中国人还相信，要是怠慢了祖先，就要遭到报应，所以他们祭祀祖先的仪式绝对不敢马虎。不但要为祖先献上丰盛的食物，还要为他们焚烧纸质的钱币和衣服。晚生后辈则要跟在家里最年长的人身后，恭恭敬敬地向祖先磕头行礼。

针对祖先的祭祀仪式不但要在坟地举行，每户人家还要在家里供奉祖先的牌位，时刻表达敬意。事实上，中国人所有的人生大事都要有已经去世的祖先“参与”，共同完成。如果某位男孩幸运地长到了



成年，父亲一定要带着他在祖宗的牌位前面表示感恩；某位女孩成年出嫁时，她的家人一定要向祖先报告；某位男孩成年迎娶新娘时，他的家人首先要给祖先献上美酒和食物，请求他们祝福新人。祖先即便已经不在人世，也要严格监督尘世间的一切，每个中国人临终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首先是自己的灵魂能不能在那个世界得到祖先的接受，其次则是自己的灵魂能不能享受到后代的无限崇敬。

除了祖先，儒教还敬奉上百位各色神灵[165]。比如创造汉字的神，传说这位神仙模仿鸟兽在地上留下的脚印，创造出了今天的汉字[166]。中国人对文字异常崇敬，滥用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亵渎行为。国家为此甚至拿出数额不菲的专款雇人收集那些散落在各处，写了文字的纸张，带到镌刻有“敬惜字纸“4个大字的焚烧炉集中焚烧。这种专用焚烧炉在中国的各处寺庙里都可以看到，有些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就连焚烧后的纸灰也不能随意丢弃，必须要把它们撒到干净的河流里。中国还有所谓的“狱神”，这种神专门在监狱里供奉，死囚离开监狱赴死前，要恭敬地向他磕头致敬。战神关帝在中国人心目中处于几乎跟孔子平行的地位[167]。中国的战神拥有众多信徒，在至少1600间庙宇中享受人们的供奉。不光战神本人，就连他使用过的大刀也被当做圣物[168]，陈列在庙宇里。官员每次去刑场监督死刑执行后，都要到战神的庙宇祭拜，祈求战神压制住死囚的灵魂，不要让他来找自己报仇。

孔子是儒教的创立者，公元前551年生于今天的山东省。公元1465年，宪宗皇帝[169]特意下旨在孔子的坟前竖立石碑，称赞他为“引领世人走出黑暗的明灯”。孔子生活的时间跟居鲁士二世[170]统治波斯的时间大体吻合。他的父亲是位低级地方官，孔子3岁那年就过世了，留下母亲把他养育成人。孔子的母亲是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在她的教导下，年仅20岁的孔子就成了公认的博学之士，因此还被授予了官职。很遗憾，孔子的生活刚刚小有起色，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中国传统，孔子主动辞职回家，整整为他的母亲守孝3年。利用这段时间，他充分研究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3年后，当孔子结束守孝时，他已经对这个国家的过去烂熟于心。这之后，他开始不定

期地四处周游，担任各种官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对父母的孝顺，对年长者的恭敬，以及对朋友的友善和诚实。孔子经常告诫世人说：“不要对别人做你不希望别人加之于你的事[171]。”说来也奇怪，孔子的学说虽然非常有道理，后来甚至演化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却非常潦倒落魄。

公元前479年，时年73岁的孔子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人世。死后的孔子逐渐演化成了中国人心中类似于耶稣那样的天地主宰。中国的每座城市都设有供奉孔子的庙宇，每个学校都要供奉孔子的牌位。他的第76代直系子孙今天生活在北京，名叫孔令贻[172]，被国家授予了公爵爵位。

②道教

道教的创始人被尊称为“老子”。这个尊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老子生于公元前604年，比孔子年纪稍大。老子幼年和青年时的历史比较模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神话创造者的解决方式是把老子塑造成一个生下来就是老头儿的传奇人物。老子在世时被当时的中国皇帝任命为编写历史的小官，过着一种半退休的悠闲生活，他这个人主张躲避尘世的纷乱，喜欢清静和无为。老子之所以被尊奉为道教的创始人，主要是凭借他撰写的《道德经（tao teh king）》，这本书是他清静、无为思想的总结。

今天中国人信奉的道教在老子去世500年以后已经雏形初具。这种宗教跟老子的学说虽然具有很多联系，同时又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道教的核心思想就是“道”，它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的基点。这门宗教信奉的神灵异常众多，各种祭祀仪式也非常有意思。就算老子今天复活过来，恐怕也不会相信这门宗教是以自己的学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包含了不少非科学的成分，比如点金术、炼银术，还有长生不老之类的。

道教信仰的神灵多得数不过来，可能是各种宗教里最多的。道士习惯身穿蓝色的棉布长袍，脚上套一双白色的直达膝盖的布袜子。信奉道教的人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有些人常年生活在寺庙里，有些人则拥有自己的家庭，只是在寺庙举行活动时，才穿上那身祭祀的衣

服，赶过去参加仪式。道教信仰的神灵非常多，实在介绍不过来。例如，道教有一种专管发烧的神，他的神像被塑造成没长胡子的年轻人形象，只有发烧的人才会找他祈祷。相应的，道教中还有专管头疼的神、打摆子的神、咳嗽的神、天花的神等等等等，就连身体的每个部位，哪怕是指甲和头发，在道教中也有对应的神。治病是道士的重要工作，他们治病的方式主要依靠法术，例如用黑色或红色画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神符，再把它烧成灰，放到水里喝下去。有时，他们也会用具有“法力”的水或油直接涂抹病人的患处。苏州有这样的习俗，某人如果罹患失眠症，就要去道教寺庙里专管睡眠的神像前烧炷香，这就可以了。如果还睡不着，病人还得向这位神仙敬献一床被子。

星星在道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主管幸福、官运和寿命的这3颗星[173]。除了皇帝在每年两次祭天仪式中供奉二十八星宿外，中国就只有星象学家和道士会经常性地祭拜这些星星了。中国人相信，星星主宰着人间的一切，星象的变化预示着各种灾难或幸福。例如，彗星的出现就被认为是灾难的先兆，慈禧太后本人的经历似乎就可以成为这种说法的佐证。

按照中国传统，人过40岁，每隔10年就要庆祝一次大寿，即便慈禧太后也不能免俗，虽然她的每次大寿都伴随着灾难的发生。1874年，慈禧年满40岁，他的儿子同治帝因病去世。1884年，慈禧50大寿，大清帝国跟法国开战。1894年，慈禧60大寿，全国为了庆贺太后60大寿作了充足的准备，结果日本又跳出来找麻烦。眼下[174]，太后的70大寿马上就要到了，大清帝国的星象学家们为此云集位于北京城墙上的天文台[175]。这座天文台曾经拥有很多古老的天文仪器，只可惜，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被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劫掠走了。星象学家们来到这座天文台的目的是要在1903年挑选出个黄道吉日，以便正式开始太后70大寿的庆祝阶段。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彗星从紫禁城的上空划过。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晦气！星象学家们认为，彗星现身就是为了警告他们不要举办太后的生日庆典，甚至随后的1年当中任何重大活动都不宜举办。

除了星星，中国人还非常崇拜太阳和月亮。道格拉斯教授（professor Douglas）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民俗认为日食、月食的发生是因为有妖怪正在吃它们，为了拯救太阳或月亮，人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国家就将遭受灾难。具体的做法是由朝廷出面，号召百姓拯救太阳或月亮。帝国的钦天监能够提前几个月推算出日食或月食的发生，然后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礼部，礼部则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各省的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则把这个消息层层传达给手下的地方官。到了预定的时间，地方官就要齐集在总督或巡抚的衙门里，衙门的院子当中要设立祭坛，还要焚香。大小官员要根据长官的号令，集体向着祭坛下跪、磕头。这之后，大小官员还要亲自擂鼓，希望通过鼓声把吃太阳或月亮的妖怪吓走，道士则要在这个过程中配合他们做法。为了增强威慑的效力，老百姓也被要求爬上自家的屋顶，根据衙门的号令，敲响各种能发出声响的器物。这样一来，威胁太阳或月亮的妖怪就会被吓走了。

有天，我们参观了位于北京城西南方向的道教寺庙白云观。那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寺庙，据说是为了纪念道教的创始人“丘祖[176]”而建立的。那天下午3点，我们裹挟在进香者组成的人流中，朝着白云观前进。这些香客形色各异。有些是来自满族王公大臣家的女眷，她们每年只有这一天时间[177]能够被允许坐在几乎全封闭的骡子车里出来散散心。这些贵妇人的车夫双腿拧着麻花，坐在车辕上赶着牲口。车夫的身后，一道布帘子把车厢的入口遮盖起来，挡住了人们窥视美人的视线。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只能在路两侧慢慢步行，忍受着车马激起来的灰尘。兜里有几个钱的人则乘坐租来的毛驴，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足足有好几百名乞丐，他们跪在路边，不停地磕头，请求路人施舍。卖水果和蔬菜的小摊贩也不顾冲天的灰尘，在路边摆起了摊子，连声叫卖，用尽招数吸引买主。走到白云观附近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噪音纠结在一起，甚至听不见旁边的人说话。

我乘坐的是4人抬的小轿，轿子前后都有人骑马护送。骑在马上的人反复呵斥，费了好大的劲，这才在人群里开出一条路，我的轿子趁机通过大门，进了白云观。此前一天，我们已经专门派人通知寺庙住持第二天来访的消息，当天早上还派了4名仆人来白云观打前站。住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小房间，可以稍微歇歇脚。这个小房间位于某座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里面，整个建筑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大理石基座上。房间的窗户还是中国传统的格子式样，好在糊窗户的纸已经被来自西方的玻璃代替，丝毫不妨碍我们欣赏外边的风景。



白云观

白云观可能是北京规模最大、最富有的庙宇之一。紫禁城中的太监是这座寺庙的最大施主，他们这么慷慨，主要是为了自己上了年纪，从皇宫中退休以后，能够有个落脚养老的地方。这座寺庙据说最早是在元代由丘祖本人亲自兴建起来的，大清立国后又多次得到修缮和扩大。丘祖的生日就在今天，按照传统，白云观晚上还要挂出很多灯笼以示对他的纪念。这些灯笼中的精品全部被悬挂在进入大门后的主要通道两侧。白云观的大门前有两根非常高的旗杆（中国道教寺庙的门前都有这样的旗杆），上面挂着两个巨型纸灯笼，每个灯笼的4个角又悬挂有色彩各异稍小些的灯笼。晚上灯笼点起来的时候，是处非常漂亮的景致。中国人非常善于制作灯笼。据我所知，他们使用灯笼的年代非常久远。直到现在，中国很多街道的街灯还是最传统的灯

笼，中国人不论贫富，夜里出门的时候也要手提着灯笼。

就像其他中国寺庙一样，白云观里也有不少精致的庭院。某位道士自告奋勇，充当向导，引领我们在各处参观。在某座庭院里，我们看到有人正在向中国人信仰的“喜神”祭拜行礼。那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先在神像前面磕头，然后又用颤抖的手从竹筒里拿出一根签子。这根签子上有字，而且是编了号的，道士要根据这根签子上的文字和编号，从一大堆小卡片里找到对应的解释，预测姑娘未来的命运。

我们在另一处庭院看到的景象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大殿三面的地上都端坐着道士，他们的双腿盘在身下，用蓝色的袍子盖得严严实实，手掌向上平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不动，就跟塑像一样。大殿的墙上写着“有求必应“4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周围还悬挂着一些旗帜、彩带之类的东西。后来才弄明白，这些道士是在等待一个伟大的时刻。到了那个时刻，他们的精神就可以摆脱肉体束缚，前往天堂拜见伟大的丘祖[178]。很多信徒都来朝拜这几位道士，大把、大把地施舍铜钱。每天晚上信徒离开后，这些道士也会结束神圣的等待，返回各自的房间吃些信徒们送来的糕饼充饥。

参观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处相当于养老院的庭院[179]。这座庭院里生活着3位年纪非常大的道士，其中的一位据说已经有107岁了。他们的年纪的确非常大，以至于无法对来访者作出得体的反应，甚至根本注意不到我们的存在。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信徒来到这里，向他们磕头祈福。尊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些具有某种神奇法力的老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别的尊重。

告别这些老人，向导带着我们进入了一处可能是整个白云观最奇特的地方。这座庭院中间有一口大理石井口的水井，这口井非常、非常深，井口周围围着汉白玉的石头栏杆。井里有个拱门形的结构，拱门下面一动不动，盘腿坐着位道士。他的前胸和后背都挂了一块护心镜似的东西，直径大概18英寸左右，护心镜的正中还挂了个小铃铛。众多信徒围着井口向道士投掷铜钱，谁能够把铃铛打响，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整年都有好运气[180]。我们来到这个院子的时候，道士的身

边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铜钱。大家入乡随俗，也往井里丢了不少铜钱。

我们在白云观各处游览时，始终有很多中国的男女老幼跟在旁边看“洋鬼子”。这些人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过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善意。就算我们返回那个小房间吃晚饭，他们也不愿意离去，而是挤在窗户那看“洋鬼子”如何吃饭。饭后，我们把多余的面包、水果和干果送给他们，这些人显得非常高兴。用过晚饭，我们继续在白云观各处参观，这些看热闹的人照旧跟着我们。直到那天午夜，我们才动身离开。头上圆圆大大的月亮将路上的小石子照得发出钻石般的光泽，北京城高大的城墙在夜幕中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屹立在满是星辰的天空之下。

③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被尊称为“佛祖”，具有王族血统，公元前624年出生在印度某地，“佛”的意思是“觉悟了的人”。佛祖还被人们尊称为“释迦牟尼”，这个词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关于佛祖的各种传说本身就可以写一本书。据说，他出生在某座花园的无忧树下。他的降生伴随着众多神奇的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出现彩虹、天降玫瑰花雨，以及9条龙喷出热水和冷水为刚出生的佛祖洗澡等。佛祖刚出生就能走路，他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走了7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高呼“天大地大，唯我独尊”。佛祖出生7天后，他的母亲就去世了，身为王子的他是由姑姑和32名保姆共同抚养长大的。这些保姆分别负责给他洗澡、喂饭、陪他玩耍等等。佛祖就这样在王宫中幸福地生活了8年，每天骑着配备金鞍的山羊各处游走。最神奇的是，佛祖从降生那天起就没哭过。

8岁以后，佛祖的父亲为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这些人发现他们的学生具有惊人的天赋。15岁那年，佛祖正式被确定为王位的继承人，此时的他已经是位非常英俊、善良，具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他的父亲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最最出色的国王。后来，佛祖的父亲决定为他娶亲，佛祖最终从众多候选人中选出了一位美丽的黑眼睛姑娘。结婚那天，仅仅陪同新娘出嫁的女仆就有500名。国王为佛

祖修建了世上最好的宫殿，希望儿子和儿媳能够在里面幸福地生活，光是取乐用的舞女就一次为他们配备了3000多名。正是这些不幸的女人让佛祖对人类的命运作出了反思，他最终决定舍弃自己拥有的一切，离家探索世界的真谛。得到父亲的准许后，他乘坐纯金的马车，离开了自己的乐园。离开了乐园的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衰老、死亡，还有苦难。佛祖疑惑不解地向为他驾车的车夫询问其中缘由，车夫告诉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走上这条路，即便王子也没有特权。觉悟了的佛祖决定舍弃他所拥有的一切，离家修行。

从那天开始，佛祖离群索居，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让自己的精神进入冥想状态，持续了整整6年，经受了各种诱惑的考验，最终觉悟成佛。从此以后，财富、权力等等尘世快乐就对他失去了意义。找到世界真谛的佛祖开始在印度各地游历，传播自己的思想。80岁那年，他在波伐城[181]一处有18棵娑罗树环绕的空地上圆寂。佛祖虽然离开了人世，他的思想却流传到中亚、锡兰[182]、缅甸、暹罗[183]、安南[184]、日本和中国等地。

佛教进入中国是在公元61年的汉朝时期[185]。当时的汉朝皇帝夜里做梦，梦见一位全身发着金光的神人。这位神人在梦里让汉朝皇帝派人去西边的国家寻找自己，还要让这些人把他撰写的书籍以及他本人的画像带回中国[186]。汉朝皇帝遵命派遣两名使者前往西方寻找这位神人，而且要求他们找不到神人就不要回来。这个时间大概也是圣托马斯[187]在印度游历、布道的年代。如果这两位使者遵守皇帝的命令一直向西走，那么他们带回中国的很可能就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教。很可惜，两位使者畏惧前途艰险，刚刚进入印度就不再继续往西走，所以佛教就得到了向中国传播的机会。发现了佛教的两位使者又耗费数年时间才返回中国，随同他们来到中国的还有佛祖的画像、大量的佛经，以及两位印度僧人。这些人返回中国后，便开始着手将佛经翻译为中文。

汉朝灭亡后的几个短暂朝代中，佛教获得了皇帝的有力支持。名叫“法显[188]”的高僧再次横穿中亚地区，来到印度求学佛法。14年后，他取道锡兰和马六甲海峡，走海路将大量佛经带回了中国。记录

这位高僧传奇经历的自传性作品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多个高潮阶段。公元681至907年的大唐时代，由于一位皇帝的提倡，这种外来宗教在中国达到了全盛。这位皇帝被称为宪宗[189]，他当政的时代曾多次举行盛大仪式，供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佛骨舍利。这段历史因为一位读书人韩愈针对皇帝撰写的大胆文章而家喻户晓[190]。公元1368至1644年的明朝建立者洪武帝原先就当过和尚，成为皇帝后，自然对佛教照顾有加。他的继承者永乐帝异常讨厌佛教，曾颁布法令严格限制佛教发展，不过从他以后的历代明朝皇帝始终保持着对佛教的宽容态度。公元1644年，大清帝国的首位皇帝顺治帝退位后出家当了和尚。上个世纪，乾隆帝则把位于杭州的某处属于他父亲的宫殿捐献出来，变成了佛教寺庙[191]。

中国人对待和尚的态度非常矛盾，僧人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家争相供养他们，然而出家为僧却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不幸的人生遭遇，某人如果打算出家，一定会受到反复的规劝和阻拦，因为出家即意味着抛弃世俗生活，包括父母亲人。对世俗人而言，和尚的主要功能是替他们死去的亲人超度灵魂。佛教让中国人相信，一个人做了多少好事，就会遭到多少好报，做了多少坏事，就会遭受多少恶报。这种哲学被称为“善恶因果”。苏州的很多中国人手里都有一种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不但对人的各种行为作出了善和恶的区分，而且还给不同的善行和恶行开出了相应的分数，做了某种善行就可以增加若干分，相应的，做了某种恶行，就要减去若干分。最后剩下的分数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福报越大。杜博斯（Du Bose）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这种小册子中的部分内容：



北京后门桥镇水神兽

善行

替父亲还债，加10分

在父亲的葬礼上表现得体，加50分

富贵以后不抛弃贫贱时的妻子，加100分

借给陌生人一把雨伞，加1分

为修桥、补路、挖水井、修运河等工程提供捐款，大概每4先令加10分

为穷人提供棺材，加30分

替没有子女的人办理后事，加50分

劝阻某位母亲杀婴，加30分[192]

营救某位即将被杀死的婴儿，加50分

拯救昆虫的性命，每100只加1分

埋葬死去的野鸟，每只加1分

为购买动物放生提供捐款，每5便士加1分

捡起掉在地上的一粒米，加1分

归还街上捡到的东西，按东西的总价，每5便士加1分给乞丐施舍，每5便士加1分

1年不吃牛肉或狗肉，加5分

出资印刷1部佛经，加100分

主动放弃追讨某笔债务，加100分

销毁诲淫诲盗的书籍，加300分

终生保持贞洁，加1000分

恶行

爱恋妻子甚于父母，减100分

听信妻子挑唆，致使兄弟失和，减10分

无视继室虐待前妻留下的孩子，每天减1分

长舌头，传闲话，减30分

不诚实，减30分

怀有恶念，减10分

冬天把冬眠的虫子从土里挖出来，每只减1分嘲笑相貌丑陋的人，减3分

弄脏书籍，减5分

把酒肉带进寺庙，减5分

酗酒，每喝醉一次，减5分

谋夺别人的财产，减100分

制造假币，减100分

乱丢写有或印有文字的纸张，减50分

吃牛肉或狗肉，减100分

把别人的棺材挖出来，减100分

官员不主动禁止杀婴，减10分

协助杀婴，减50分

亲自动手杀婴，减100分

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罪大恶极无法计分

佛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将进入六道轮回，至于具体进入哪个道，则取决这个人在类似上面这种表格中的得分情况。分数不同，他有可能转世投胎为昆虫、鸟、牲畜、穷人或者富人。此生行恶的人必定转世为低等生物，只有那些行善的人来生才能投胎到富贵人家。中国人差不多都是灵魂转世说的信徒，他们认为，自己此生的命运取决于前生的所作所为。

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于色空，世间一切皆为虚妄，佛教的信徒应该处于认清这个问题以后“不生不死”的状态，通过涅槃达到无忧无虑的极乐境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如此玄奥的哲学，因此佛教在中国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因果报应，寺庙、僧侣努力向人们宣传的也是这样的思想。通常来说，佛教寺庙大多位于名山大川之类山清水秀的地方，不过很多中国的小城镇和村庄也会设有相对简陋的寺庙。佛教的神灵与其他成千上万的神灵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分布在中国的大街上、店铺里，老百姓的家中，乃至桥梁上、门洞里，数也数不过来。

第四章　中国的语言

中国人的语言肯定是全世界最难掌握的一种。他们的口语和书面语简直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193]，而且1个汉字往往具有很多种意思。中国人口语的音节总共大概有500多个，为了准确搞清楚某个人发出某个音节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你就必须注意他发音时的声调、

语气，他说话时的上下文语境，修饰这个音节的虚词，乃至这个音节在句子中的具体位置。

一个音节按不同声调发音时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这无疑让中国话变得更加难以掌握，然而这又是所有学习者必须过的一关。例如”c h u[194]”这个音节，它对应的汉字就可以是“珠、猪、竹、诛、铸”等等。北京方言一般只有4种声调，中国其他地区方言的声调最多可以达到8种！

威妥玛爵士用下面的例子为我们说明了北京人说话中的四种声调问题：

> 我们分别用A、B、C、D代表4个北京人，他们在谈论某位共同熟人的近况。A告诉大家说这个人已经死了；B认为他有可能是被人杀死的，但又不确定；C坚决否定了B的疑问；D最终强调确定了A和C带来的消息：A用一声调……死了。B用二声调……让人杀啦？C用三声调……不是[195]!D用四声调……是。

詹姆斯先生（M r J a m e s）在他的书里也介绍了中国话口语中因为声调的不同造成的误会。例如，中国人管给马装上鞍子叫“备马”。如果你搞错了声调，就可能把“备马”说成“备妈”，有些调皮的中国人就可能问你是不是还要“备爸”。



懂英语的清军军官在跟外国军人交流

这还不算完，中国话口语的最大问题是不同省份的口语又存在无穷尽的变化。不同省份间口语的差异性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如果不经过事先学习，根本无法理解对方正在说些什么。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位北京籍的仆人用“广东英语[196]”跟一位广州人交流，这是他们唯一能够相互理解的口头沟通方式。好在不管口语怎么变化，书面语只有一种，所以各省中国人互相通信可以畅通无阻。为了沟通方便，中国人后来发明了全国通用的“官话[197]”。顾名思义，这种口语最早是在官场中使用的，后来又在商人圈子里普及开来，按大清帝国的制度，官员上朝一定要使用官话，参加科举考试也一定要使用官话。

所有东方语言当中，中国话是最讲究使用各种表示恭敬和自谦的修饰词的。例如，两个原本不认识的中国人见面时，通常要采取下面的流程互相介绍：

> 老先生贵姓？贱姓吴。久仰、久仰，敢问吴老先生高寿？不敢，不敢，已虚度50春秋。老先生膝下几位公子？家门不幸，只有犬子一人承欢。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提到自己的妻子一定要把她称为“贱内”，提到别人的妻子则一定要尊称为“贵宝眷”。所有的中国话口语当中，官话是最讲究礼节和规矩的。中国人如果打算跟某人搭讪，可以从问候他家人的健康情况入手。问完了健康情况，可以再问问对方有几个儿子，不过随便提及对方的妻妾却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同样是出于礼貌的考虑，中国人提到自己还在世的父亲时一定要尊称他为“家君”，如果这位父亲已经去世，则要尊称他为“先严”。相应的，已经去世的母亲则被尊称为“先慈”。如果某位中国人有幸当了官，别人就要尊称他为“大人”。如果某位中国人身份比较富贵显赫，却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别人可以尊称他为“老爷”。我们西方人现在也可以享有这样的尊称。皇帝通常被尊称为“天子”，也可以称呼他为“万岁”。慈禧太后则被尊称为“国母”或者“老佛爷”。总的来说，中国人交流时最基本的礼貌原则就是尽可能抬高别人，同时贬低自己，在自己身上使用一些表示轻贱意味的修饰词。违反了这样的原则，你将寸步难行。



乡村绅士

本书介绍的中国话口语仅仅属于冰山一角，却已经让人头痛万分。相比口语，中国话的书面语更加难以掌握，就连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掌握。中国的文字书写据说是由生活在公元前2697年至公元前2597年的黄帝手下的臣子仓颉发明的。中国人的文字不是由字母组成的，而是众多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198]。汉字使用的符号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表示意义的，一种是表示声音的，前者差不多有214个，后者的数量超过1000个。这两种符号相互组合，就构成了汉字的主体[199]。中国的读书人普遍认为，某个人认识的汉字越多，他的学

问也就越大。

汉字的字形是跟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紧密相连的，这里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汉字“人”的字形象征人是两脚站立的动物。中国人认为肚子是储藏学问的地方，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这或许就是“人”字没有代表头部的结构的原因。按照中国传说，混沌初分，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天地形成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才被创造了出来。人是万物的老大，因此把“人”字向上延伸，伸出象征地平线的一横之上，就代表“大”的意思。人是万物的老大，可人再怎么大也大不过天去，所以“大”的头上再加一横，就是天的意思。相对来说，“口”和“山”这样的字比较简单，它们就是从所代表的事物的图画衍生而来的，本身并没有更深的含义。这些比较简单的汉字还可以相互组合，表达新的意思。例如“囚”字，它的意思就是四堵墙里面围着一个人，象征囚犯的意思。“言”字是由“口”和三横、一点组成的，那三横、一点就象征从嘴里说出来的话。“家”的上半部分象征屋顶，下半部分则代表猪，屋顶下养着猪，就是中国人心中最原始的家。

汉语难于掌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语言使用的文字没有类似英语那样明确象征词性、时态、性别之类的标志，而且还没有标点符号。

第五章　中国的文化经典

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标准去评价中国的文学、文化，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西方人要想掌握中国的语言已经异常困难，打算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学和文化，更是难上加难。总体而言，中国的文学、文化偏向于历史、道德等严肃内容，缺少类似西方那样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因素。在科举考试面向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前提下，中国人的读书热情普遍高涨，甚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历史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遭到过数次灾难性的破坏，例如公元前212年著名的焚书事件[200]。基于这样的原因，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对中国文学的起源时间作出确切的判断。中国最早的文学、文化经

典之一当属《易经（book of channges）》，这本书是在公元前1150年由一位名叫“文王（wan wang）”的哲学家在囚禁生活中创作完成的[201]。《易经》可以被视为整个中国哲学的基石，正如理雅各博士（DrLegge）所说：

> 《易经》提出的八卦虽然只是8种简单的线条，但是这些线条又可以衍生出无穷的变化。

贾尔思博士（D rG i l e s）对《易经》的理解相对更加深入，他向世界这样介绍八卦：

> 8种卦象时合时分，衍生出64种变化，它们象征着世间万物。

《易经》的内涵极其深奥，不但西方人很难理解，即便很多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无法真正领会其中深意。

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1122年的商代，具有传奇色彩的《周礼（b o o ko f r i t e s）》已经雏形初具，这本书的作者名叫周公[202]。若干个世纪以来，《周礼》始终是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指南。《周礼》对中国人的影响如此深远，直到现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仍然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影子。问世3000多年以后，《周礼》不但深刻影响着中国，也把这种影响扩散到了周边国家。现而今大清帝国的中央政府大致可以划分为7个办事机构[203]，这其中的礼部的设立就是以《周礼》基础的。中国人共同的老师孔子也对《周礼》推崇备至。

《尚书（b o o ko fh i s t o r y）》记载了公元前2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721年的中国历史，位列中国最重要“四书”“五经”之一。这本书记载的内容可能并不完全可靠，却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反映那段历史的唯一文献。

《诗经》是一部古老的中国诗歌总集。据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说，这本书最终经由孔子删改编辑完成。就西方人的口味而言，《诗经》保存的诗歌跟古希腊时代的同类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春秋（s p r i n ga n da u t u m n）》是孔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据孔子去世后118年出现的另一位重要哲学家孟子所说，孔子创作《春秋》的目的是有感于现实的沦丧，希望通过追忆历史的方式，匡正现

实，遗憾的是，正如理雅各博士所说，孔子创作《春秋》后的242年间，这本书并没有发挥他预期的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的“四书”“五经”。所谓“四书”，指《孟子（mangtsze）》、《大学（greatlearing）》、《中庸（doctrineofthemean）》和《论语（confucian）》。至于“五经”，其实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几本[204]。“四书”中的3本书的作者都是孔子，只有《孟子》是由他的后辈孟子创作的。由此可见，孔子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老师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与此同时，由此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让后来的人们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不是后世的盲目崇拜，孔子和他的作品可能无法取得今天的显赫地位，甚至可能早早就被大家遗忘了。无论如何，今天的人们都不应该仅仅看到孔子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带来的那些好处，却忽视了他的负面作用。



贡院

孔子学说的核心大致可以归纳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对父母的孝

敬，以及宽恕精神等等。孔子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四处兜售自己的学说，然而多数人都把他当成怪物看待。今天，所有中国学生都要每月两次向孔子的神位焚香叩拜，所有中国学生都把孔子的书当成金科玉律。这方面的学习成果越出色，便意味着将来更好的前程。只要这样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天，孔子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也就将持续一天。即便是在20世纪的今天，他也仍将是很多中国人，甚至很多亚洲人的共同的老师。

《道德经（tao teh king）》的作者老子跟孔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老子的著作比较简短，也比较抽象，跟同时期的中国其他思想、哲学流派具有明显区别，体现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就连《道德经》的这个“道”字本身其实也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因为中国人自己对“道”的理解本身就千奇百怪。有人认为，“道”就是“路”的意思；也有人认为，“道”指代的是自然法则，这个概念的产生跟远古中国人对天的崇拜紧密相关；不过还有人认为，老子可能是个无神论者，所以“道”跟天其实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中国人自己对“道”的理解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西方人在翻译这个概念的时候，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汇，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直接音译的办法。正如道格拉斯教授（professorDouglas）所说：

> 如果要给老子的“道”找个对应词的话，恐怕只有孔子的“术”能够勉强胜任。总的来说，“道”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场，对它作出不同的理解。“道”这个概念包罗万象，它可以被理解为玄妙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被理解为道士们具体的炼金术，乃至追求长生不老等等。老子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科学诞生前，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炼金术师之一。

老子和孔子去世大概100年后，孟子降临人间，他一般被中国人尊称为“亚圣”，也就是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孟子的著作也是今天很多中国学生的必修课。公元前212年，始皇帝发动了著名的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经典遭到大规模破坏，只有少量被人们保护、收藏了起来。后世凭借这些经典安身立命的中国学者和读书人普遍认为始皇帝的行为是异常愚蠢的，然而从维护自己帝国稳定性的角度考虑，他

的行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教训那帮对自己政权指手画脚的读书人，始皇帝下令烧掉帝国境内的所有书籍，只留下那些讲授医学、农学和占卜的技术类书籍，以及符合他自身意图的历史类书籍。始皇帝的命令得到了严格执行，那些拒不从命的人甚至因此被判处死刑。

始皇帝之后的高帝[205]当政后的首要工作就是着手恢复被摧毁的文化经典，他安排学者搜集那些流散民间，因而得以逃脱始皇帝毒手的书籍，还让那些年老的读书人通过口述的方式把已经失传的经典重新整理成文字，某位小女孩也为这项工作出了力[206]。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公元前162年，中国的文化经典逐渐得到恢复。大概是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后，中国人已经拥有了3123部经典性著作，2705部普通哲学著作，以及1383部诗集[207]。

这个时期出现的司马迁被称为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留下的历史著作《史记》讲述的范围从中国历史的早期一直延续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这本历史著作的文学性，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些史料的神话性，我们无法对司马迁的客观立场抱有太大信心，然而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巨著。



北京东四牌坊附近的街市

公元220年至公元618年，也就是汉代到唐代之间，中国基本处于混乱、分裂的状态。唐代建立以后，中国的文化得以重现辉煌。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诗歌，然而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却是公元681至公元907年的唐代。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位最著名的中国诗人，也就是李白和杜甫。据说，李白从7岁开始就能创作诗歌，并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资助。遗憾的是，皇帝妃子[208]认为李白在某首诗中对她冷嘲热讽，便开始在皇帝面前说诗人的坏话。无法立足的诗人只得告别宫廷，最终在困苦潦倒中告别了人世。相比李白，杜甫的运气更加不好。他的人生几乎完全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直到死后才获得世人的认可。

公元960年至1368年是中国的宋元时期，这个时间段大概跟乔叟[209]生活的时代相吻合，此时的中国在文化方面远远领先于西方世界。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平面和立体的三角函数[210]，数学水平超乎想象。今天科举考试的雏形也在那个时代逐渐进入人们的生

活，这种考试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它起码儿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同样是在这个时代，《洗冤录》[211]出版发行。这本书虽然存在很多反科学的地方，然而它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容忽视的。直到今天，《洗冤录》仍然是相关领域的官方指定参考书。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司马光在1084年出版发行的《资治通鉴（m i r r o ro fh i s t o r y）》。《资治通鉴》总共有294卷，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部书被稍晚些的朱熹推崇为中国历史著作的样本。盛赞司马光著作的朱熹自己也在公元1184年出版了一部60多卷的专著[212]。这部书主要是用来解释孔子学说的，后来也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参考书。

同样是在这个时代，今天很多中国读书人必读的《文献通考（a n t i q u a r i a nr e s e a r c h e s）》，由马端临创作完成，总计318卷[213]。这部书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认真精神令西方学者钦佩不已。正如卫三畏博士[214]所说：

> 这样的著作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国家文化的敬佩之情。这部书凭借耐心的调查、客观的立场、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巨大的史料容量，以及独到的见解，获得了相关领域的一致好评。

宋元时代，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中的3本都已经出现了雏形[215]。例如，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多以“三国”为题的艺术形式。时至今日，不知道《三国演义》的中国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本小说的演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

今天主要负责为国家编纂史书，替皇帝拟定旨意，为王公大臣颁发荣誉称号等工作的翰林院是在公元8世纪早期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建立之初其实并不是特别显赫，直到明朝洪武年间，翰林院才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能够有幸进入翰林院的读书人，则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有学问的人。翰林院的具体位置距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不远，只可惜这个地方在刚刚结束的战乱[216]中被烧毁了，现在已经成了白地。

公元1661年至公元1721年在位的康熙帝对文学、文化具有独特的兴趣，甚至为此专门召集学者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217]，这部书足足有1000册，直到康熙皇帝的继任者在位期间才最终完成。只可惜，

这部百科全书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不是特别完美的版本。康熙帝在位期间还下令编纂了一部总共收录了大概44000个汉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字典[218]，以及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的辞书[219]，总计110册。除了主持编纂这些规模宏大的作品，康熙帝还亲自操刀写了本名为《圣谕十六条（sixteenmaxims）》的小册子，这本书今天仍然是中国学生的必读物。大清帝国的乾隆帝比康熙帝更热衷文学、文化，不过这位皇帝在位期间只有两部大型丛书问世，首先是著名的《四库全书》，这部丛书是对大清帝国现存各种书籍的归纳和整理；其次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山河地理和风土人情的大型丛书[220]，总共有500多册。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和乾隆帝还非常具有文学才华，他们各自写了很多诗歌。



清代的书摊

中国的文学、文化拥有值得骄傲的历史，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果这个国家只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传统，不愿意接受来自西方的新知识，她的未来就是值得忧虑的。中国人在接受外来的新生事物以前，恐怕还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变革他们的语言，以便更加适应这个时代。仅就医学领域而言，那些千奇百怪的符号、公式、名称其实已经是古老的中国话所无法胜任的。为了理解新时代的思想，他们必须拥有一种新的语言。这就好像那些希望深入了解法国文学、文化的人，必须首先精通法语一样。所幸，很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儿，而且正在为此付出努力。他们希望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理解这个全新的世界。

第六章　皇帝如何统治国家

中国皇帝统治国家的体系异常复杂和严密。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将皇帝视为所有子民的“父亲”，他是这个国家唯一有权发号施令的人。通常来说，皇帝的权力是无边的，不过他的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要受到军事、经济，乃至官僚体制等条件的限制。按照大清帝国的法律，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所有老百姓在内，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帝有权决定任何人的生死，有权向任何人征税，或者干脆直接没收他的财产。帝国境内所有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男性都有义务为皇帝从事各种劳役。

皇帝在理论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不过仅凭一个人要想统治这个大的国家，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皇帝就需要任命一定数量的总督和巡抚，这些总督和巡抚直接受皇帝和他手下几位辅助大臣的领导。皇帝手下直接对他负责，协助处理日常事务的辅助大臣一般有5位，他们构成了大清帝国的军机处。军机处每天早上4点到6点间跟皇帝集中开会，讨论各项事宜。这5位大臣手下还有60名级别较低的官员[221]，他们主要负责听命处理各种具体工作。地位稍低于军机处的是朝廷的内阁，内阁大学士总共有4名，通常满族、汉族各2人。内阁大

学士一般同时兼任朝廷各部门的最高长官，理论上具有很高的级别，不过内阁这个机构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掌握朝廷实权的是军机处和下面的部，内阁大学士实际的权力也取决于他在朝廷具体部门中担任的职务。

目前大清朝廷的办事部门总共有8个部，他们负责领导各省的具体事务，同时向皇帝和军机处汇报工作情况。这8个部包括：①外务部②商部③民政部④户部⑤陆军部⑥法部⑦工部⑧礼部[222]。各个部的正副长官分别被称为“尚书”和“侍郎”。尚书和侍郎之下还有若干名低级别官员，某些低级别官员名义上隶属某个部，不过他实际从事的工作可能又跟这个部没太大关系。除了目前的8个部，大清朝廷还有名为“理番院”的机构。理番院的编制设有正职1名、副职2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这个机构主要负责蒙古和西藏事务。如果把理番院算上，那么大清朝廷目前总共就有9个部。这些部不但要受到来自督察院的御史们的监督，而且每个部的内部还要设置低级别的监察官员正副职各两名[223]。

大清帝国内陆领土目前总共分为18个行省，分别由总督和巡抚们治理。总督、巡抚以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官，他们负责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司法断案、组织科举考试等各项工作。这些地方官只对总督、巡抚负责，通常不能直接跟皇帝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清帝国的行省基本就是个独立的小王国，总督、巡抚相当于土皇帝，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无边的权力，前提是他始终服从皇帝的权威。总督有权在自己管辖的境内征收各种名目的税款，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税款豢养听命于自己的海军和陆军。就总督管辖的范围来说，他所作出的司法裁决就是这个区域内的终审判决，而且他也有权对治下的老百姓作出死刑判决。相应的，总督也要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承担责任，因此他必须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防备老百姓有可能发动的暴动，以及手下官员们的各种营私舞弊行为。作为管辖区域内的最高长官，总督有权任免手下的官员，根据工作情况提升或降低他们的级别。



大清官员

总督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然而这真的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为了防备总督权力过度膨胀，朝廷也为这些人制定了各种条条框框。例如，总督的确有权任免手下的官员，不过他在采取相应的行动前，必须首先得到朝廷的认可。如果朝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总督作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那么他们也有权拒绝总督的要求，甚至作出相应的处罚。设置这样的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总督出于私人恩怨，对下属公报私仇。按照惯例，总督或巡抚不能在自己故乡所在的区域担任职务。理论上说，他也不能任命自己的亲戚担任手下的官员，或者跟管辖区域内的人家结成姻亲。朝廷为此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目前在位的两广总督，也就是管理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地方官，他的故乡就在广西[224]。朝廷限制地方官权力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御史制度。大清帝国的御史编制总共有56人，这些人几人一组，分别对应特定的省份，负责向皇帝报告自己管辖身份内地方官的失当行为。



大清总督府辕门

除了军机处、内阁和9个部，为了管辖类似北京、西藏、蒙古、新疆这些特定区域，大清帝国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门。例如，负责管理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225]，他实际管辖的区域非常有限，可级别却相当高，甚至高于很多总督、巡抚，通常由某个部的尚书或侍郎兼任，满汉不限。这位最高长官手下，还有很多低级别的辅助官员。负责北京城治安的警察部队也掌握在这位最高长官手里[226]，这支警察部队目前的规模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全部是由原先的八旗士兵充任的。他们分成小队，在北京城内分散驻扎，主要负责维持街面上的治安。

据说，除了这些明面上的官员和警察，清廷还有一个秘密的特别机构。这个机构由正副两位长官统帅，主要负责搜集北京城内及北京城周边10到30英里范围内的各种风吹草动，随时向皇帝直接报告[227]。北京城内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机构，这个机构正副长官的级别相当于户部侍郎，他们主要负责管理位于通州的粮食仓库[228]。这些粮食都是从南方调运过来，供北京城内的居民食用的。对任何国家来说，造币都属于大事中的大事，清廷的造币机构隶属于户部[229]，被称为“铸钱局”。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通常由户部两位侍郎中的1位兼任。

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拥有如此精密、复杂的政府机构，大清朝廷的办事效率仍然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这主要归因于官场的腐败。大清官员领到的那点儿合法薪水根本不够他们维持正常生活，更不可能支撑他们应酬交际、声色犬马的需要。所以每个省份以内，上至级别最高的总督，下至最低级别的衙役，几乎没有人不贪污受贿。老百姓有句俗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理论上说，御史有责任向皇帝揭发官员的贪污行为，不过这些人通常也是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自己也要从中渔利。



清代警察

对于罪犯，大清官员可以合法地使用各种严酷的惩罚手段，而且还要当众执行。这么做既是对当事人的惩戒，也可以对其他人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我的一位朋友曾有机会参观北京当地的某所监狱，而且还亲眼看到了一位被判了10年徒刑，正在狱中服刑的老人。这位老人向我的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

这位老人原先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有自己的田地，顺利地娶妻生子。某天夜里，他拿着枪去驱散那些溜到他地里偷吃庄稼的牲口和

野兽，开了那么两三枪。第2天才发现，居然有个人不幸死在了他的地里。严格的说，这个人不一定就是他的枪给打死的，可老人还是很快被抓了起来，没经过什么像样儿的辩护，就被指控为杀人凶手。老人不服，于是就被反复用刑，用刑后还是不服，于是就被直接关进了监狱。他这样对我的朋友说：

> 我知道，自己肯定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监狱了，他们肯定要把我一直关到死，让我慢慢活受罪，可我是无辜的，就是不能承认。关在这儿死了还能落个全尸，要是承认了，就要被拉出去砍头。

据我所知，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大清帝国的监狱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大清帝国法律的内在逻辑是将所有人都视为罪犯，当事人则必须向审判官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否则就只能受罚[230]。我的朋友还在这所监狱里看到不少只有8英尺高、8英尺宽的笼子[231]，这些笼子里分别站了26个成年人，其中的6个正在发高烧，已经奄奄一息。他请求看守允许自己替这些垂死的人做医学检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他们从笼子里放出来。看守打开笼子，揪着辫子或者身体的随便什么部位，把这6个人拽了出来，直接扔在了地上。毫无疑问，这些人里也有不少肯定都还没有经过审判证明有罪，给他们动用这种酷刑，只是为了迫使他们招认。

事实上，很多英国人也曾见识过大清帝国的监狱。1860年，奉命和谈的巴夏礼爵士遭到扣押，他这样描述随后的情形：

> 总的来说，监狱对我们的关押措施并不是特别严厉，主要的问题是饥饿，还有肩上扛着的那具大枷以及配套的绳子和锁链给身体带来的痛苦。犯人们时不时地就要被拉出去受刑，回来的时候全身血迹斑斑，站都站不住。监狱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虫子，有一种体形很小的蛆，它们聚集在地面的低洼处。这些蛆就是犯人们的噩梦。但凡进了监狱的人，很少有身上不带伤的，蛆凭借本能，专挑人身上有伤口的地方钻。有些犯人受刑以后已经没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蛆钻进自己的身体，呻吟着慢慢死去。

大清帝国为不同种类的犯罪制定了相应的刑罚。谋杀父亲、母亲或其他特定亲属的罪犯是不能被允许痛痛快快死去的，他们要被当众绑在柱子上，用刀子一点儿、一点儿割成小片儿[232]。割下来的肉片还要被行刑的刽子手扔到围观的人群里，对类似的犯罪起到威慑作

用。仅在1903年，北京的刑场上就不止一次执行过这样的死刑。据说，某些有钱人家为了亲人少受罪，便会重金贿赂刽子手。刽子手得了钱，行刑时就悄悄给罪犯喂点儿鸦片或者干脆一刀先扎死他，以便减轻随后的痛苦。

相比这样的刑罚，普通的砍头就显得仁慈多了。执行这种刑罚要求刽子手不能拖泥带水，必须一刀就把罪犯的头给砍下来[233]。通常来说，中国的罪犯如果已经必死无疑，往往希望自己能被判处绞刑，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人死后要留全尸。这种文化对西方人来说，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我听说当年有4位参加变法的人[234]，他们受刑时，亲友就在刑场外拿着针线等着。人头落地的第一时间，这些人就冲进刑场，用针线重新把受刑者的脑袋给他缝在身体上。负责监督死刑执行的官员和士兵并不阻止他们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做法在中国文化中是无可厚非的。



作者手绘清代刑罚图

为了惩罚犯罪，大清法律规定的刑罚可谓花样百出。本书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道来。结束本章之前，这里还有必要讲讲我从某位北京土著居民那里听来的故事。这个故事证明，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人性总有很多共通之处。

有位名叫“向洛[235]”的富裕农民，他耕种自己的土地，妻子也非常漂亮。有天，灾难突然降临，某位满洲贵族看上了他的妻子，想把

这个女人搞到手。贵族罗织了一套罪名，把向洛送进官府，官府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将他发配给披甲人为奴。这个判决的意思是说，向洛必须披枷带锁，从北京步行出发，前往这个国家的北部边疆，供某位士兵随意驱使。不仅如此，向洛这一路上每走18英里就要遇到一座驿站，每来到一座驿站，就要挨一顿板子。通常来说，类似这样的刑罚就等于死刑，因为几乎没人能忍受着饥寒和虐待，最终活着走到目的地。向洛是个例外，因为他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对仇人的愤恨，希望有一天还能活着回到北京，报仇雪恨。

抵达边疆的向洛被安排在矿山中工作，一干就是3年。就在这时，康熙皇帝登基，天下大赦。向洛因此恢复了自由，立刻动身返回北京，他不但要杀掉仇人，还要杀掉已经背叛他，委身于仇人的妻子。然而就在向洛重新看到妻子的时候，他心中的旧情复燃，虽然这个女人拒绝跟他再续前缘。按照大清帝国的法律，向洛如果同时杀了仇人和这个女人，就不用承担任何罪责。相反，如果他饶恕这个女人，只杀了那个仇人，就要遭受谋杀的指控[236]。向洛犹豫再三，还是放过了那个女人，只准备杀了那个满洲贵族。

接连几天，向洛都在寻找下手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仇人从前门门洞经过，向洛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要求跟他决斗。对方胆小，不敢应战，向洛就直接拔出刀来，插到了他的心窝儿里。看着仇人倒在血泊里，向洛知道自己肯定也活不成了。他平静地把刀从仇人身上拔出来，在袖子上擦干净，找到最近的衙门投案自首，几天以后，这位农民被砍了头。

【注释】

[1] 作者写作本书时甲骨文才刚被发现，当时对夏、商和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还没达到今天的水平，比较可信的历史被认为是从东周时代开始的。

[2] 这里指中原地区汉族人。

[3] 伏羲和庖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作者同时使用了这两个名称。

[4]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这本书虽然托名黄帝，但一般认为是成书于西汉时代。

[5] 指黄帝的妻子嫘祖。

[6] 即丹朱太子。

[7] 原文如此。传说中的禹实际上是负责治理全天下的水患，并非针对黄河。

[8] 原文如此。作者这里应该是把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跟大禹弄混了。

[9] 这段话是纣王的臣子箕子说的，后来被称为“象牙筷子定律”，出自《史记》，原文为“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10] 作者这里说的是《史记》记载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文王于羑里”的典故。

[11] 原文如此。实际的情况是周公的封地在鲁国，不过他当时必须留在镐京辅佐成王，所以就派儿子去封地就职。

[12] 原文如此。中国人开始使用现在意义上的椅子、桌子、床这些家具其实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13] 指王莽篡位建立新朝。

[14] 原文如此。董卓其实是靠镇压黄巾军起家的。

[15] 即京杭大运河。

[16] Alfred the great，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朝国王，公元871年至899年在位，被奉为英国国父。

[17] kaotsung，原文如此。参考下文，作者实际想说的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译者将后面所有涉及kao tsung的地方直接翻译为玄宗。

[18] 指唐与大食之战。

[19] 现在历史教科书一般告诉学生说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宋代的交子，不过唐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飞钱”的纸质或丝绸质货币。

[20] 有种说法认为唐代舞女为了跳舞方便会用裹脚布把脚缠得很小，还要穿一种被称为“利屣”的小号舞鞋，普通女性竞相模仿，这就是中国妇女缠足的起源。

[21] 孛儿只斤·拖雷，成吉思汗第4子，忽必烈的父亲。成吉思汗去世时虽指定窝阔台继位，但是由于蒙古的部落议会制度，窝阔台在此后的两年间实际没能继位，大权落在了监国拖雷手中。

[22] kiang nan，清代有江南省的行政区划，范围就是明代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地区。

[23] hindustan，印度古称。

[24] chu，即明太祖朱元璋，以下为行文方便直接翻译为“朱元璋”。

[25] 指北宋和南宋。

[26] 中国古人吃饭最早同时使用餐刀和小勺子，跟现在西方人的习惯近似，史称“左刀右匙”，筷子的出现相对要晚些。

[27]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接种预防天花的技术，具体方法是用鼻孔吸入少量天花病人的痂皮粉末，被称为“种人痘”，这种方法比后来的牛痘接种风险大得多。

[28] 指晚明天下大旱引发了西北农民起义。

[29] 指在景山上吊的崇祯皇帝。

[30] 本书完稿于1903年。

[31] 据《清史稿》记载，仙女佛库伦吃了喜鹊留下的朱果，生了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因此满族习俗把喜鹊当神敬奉。

[32]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朝鲜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承政院日记》，《承政院日记》是古代朝鲜王朝定期编修的官方档案文献，通常每月出一本，因为历史上的渊源，其中也保存了很多中国史料。

[33] 这里指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更早时期传入中国的景教一般被西方人视为异端邪说，不算在基督教的范围以内。

[34] 多位西方人的相关专著都曾提到康熙帝时期有皇族加入基督教，不过译者从未查到过相关的中文史料。

[35] 坊间主流的说法是雍正篡改诏书继位，但也有观点认为康熙帝鉴于自己执政时期过于心慈面软，就是有意要把皇位传给比较铁腕的四子。

[36] 指乾隆在1757年最终平定了准葛尔。

[37] 1788-1792年，乾隆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反击库尔喀，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侵占中国西藏领土的战争。

[38] 1684年，平定台湾的康熙帝开放海禁，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以来华在广州设立商站从事贸易。

[39] Macartney，1737-1806，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1793年率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

[40] 1803年，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时，在神武门遇刺，刺客是47岁的北京当地人陈德。由于事发突然，侍卫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嘉庆帝差点丢了性命。

[41] 指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白莲教攻打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当时其实不在宫中，未来的道光皇帝以皇子身份带人击退了白莲教的进攻，因而得到父亲嘉奖。作者此处说法不准确。

[42] 这道诏书史称“嘉庆遇变罪己诏”。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31册p722-723，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43] Amherst，英国外交官，1816年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后任驻印度总督。

[44] 原文如此，嘉庆帝执政时期总计有6个人担任过伊犁将军，但未发现与作者描述相匹配的人。

[45] William John Napier，1786年10月13日-1834年10月11日，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皇家海军军官，1834年奉命出任首任驻华商务总监。这位英国外交官1834年试图前往广州履职时，遭到满清地方官员严词拒绝，中英两国因此爆发了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史称“律劳卑事件”。作者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46] 中国自晚明时代起，由于西方银元大量涌入，开始出现“两”和“元”两种白银货币单位共存的情况，其中又以西班牙银元使用最为普遍，这种银元被称为“本洋”，鸦片战争的赔款全部是以本洋支付的。作者这里说的是清廷为从英军手中赎回广州城支付的600万银元“赎城费”，不在后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范围以内。

[47] sir Hugh Gough，中文史料也有译为“郭富”的，英国陆军少将，鸦片战争时是英军来华地面部队的总司令。

[48] sir Henry Pottinger，早年在英国海军服役，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被晋封为男爵，1841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侵华全权代表，鸦片战争后出任首任香港总督。

[49] 指洪大全领导的反清组织天地会。

[50] hung，即后来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以下为行文方便，直接翻译为洪秀全。

[51] 指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他在1847年跟洪秀全结识，两人有过很深的交往。

[52] 指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天地会与拜上帝会联合。

[53] orcha，又称“鸭屁股”，正式的说法叫“西式中国三桅帆船”，是明代中国工匠借鉴葡萄牙技术设计出来的采用西式船体和中式三桅风帆的帆船。

[54] 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55] admiral Michael Seymour，清代史料一般把他的名字翻译为“西马糜各厘爵士”。

[56] lord Elgin英国布鲁斯家族古老的贵族封号，这里说的额尔金指的是这个家族的第8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他因劫掠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和火烧中国的圆明园而恶名昭著。

[57] Nelson，号称英国皇家海军之魂，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溃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破坏了拿破仑登陆英伦的计划，他本人也在这场战役中阵亡。

[58] yeh，即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累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以“海上苏武”自诩。

[59] 原文为M rP a r k e s，参考史料，应指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巴夏礼，S i rH a r r yS m i t h P a r k e s，也就是后来被僧格林沁扣押的外交代表团成员，跟前面提到的指挥英军作战的哈里爵士不是一个人。

[60] 这个地方距离营口非常近，后来通商过程中西方人发现牛庄条件比较差，就选择营口作为替代，不过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内情，所以他们字面上说的牛庄往往实际指的却是营口。

[61] 今烟台。

[62] 巴夏礼在1859年12月6日获得贵族封号，因此作者对他的称呼由M r变成了s i r.

[63] Henry Brougham Loch，额尔金的助手。

[64] prince Kung，即恭亲王奕□。

[65] 如前所说，实际指营口。

[66] 广西境内。

[67] 原文为primorsk，指俄罗斯在里海的港口城市普里莫尔斯科。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沙皇俄国在1860年趁火打劫，强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承认此前的中俄《瑷珲条约》，夺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43万平方公里土地，跟里海没有关系。

[68] sir Frederick Bruce，额尔金的弟弟，1860-1865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

[69] 即 Charles George Gordon，查理·乔治·戈登，受雇于清廷负责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常胜军”的指挥官。

[70] Ward，即最早率领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的美国人华尔。

[71] 洪秀全在清军破城前吞金自杀的说法在西方流传非常广泛，不过中国史料比较普遍的说法还是认为他在破城前已经病逝，清军入城后又把他从坟墓中挖出来，挫骨扬灰。

[72] sir Robert Hart，1861至1911年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廷追授为太子太保。

[73] 本书成书于1903年，慈禧死于1909年。

[74] 指东太后慈安。

[75] 1870年4月至5月，天津连续发生儿童失踪、绑架案件。同年6月，由于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教会承办的育婴堂出现了儿童大量死亡现象，谣言传播，引发社会动荡。6月21日，天津当地因此发生了针对法国天主教人员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76] 即孝哲毅皇后，1854年7月25日-1875年3月27日，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的孙女，顾命八大臣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三等承恩公户部尚书崇绮的女儿，东太后慈安的外甥女。

[77] 即今天的中南海、北海，清廷当时认为洋人没资格进入皇宫觐见皇帝，但各国公使又坚持必须觐见，所以最终的妥协结果是把觐见仪式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这个地方历史上主要被清朝皇帝用来接见外邦使臣，理论上也算皇城的范围以内，双方都可以接受。

[78] 乾隆帝当年在热河就是在帐篷里接见马嘎尔尼的，意在通过这种姿态表达“不是正式会见，不重视洋人”的意思，同治帝因此借鉴了祖上的做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79] 坊间传闻同治帝私自外出嫖娼，最终染上梅毒身亡，但正式史料明确记载他死于天花。

[80] 坊间传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前已经怀孕甚至生产，而且还通过同治帝染上了梅毒，不过这种说法没有明确的史料支持。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说法是阿鲁特氏皇后在同治帝去世70多天后自杀或病死，至于是否怀孕或生产则无据可查。

[81] prince chun，即光绪帝的生父，第1代醇亲王奕譞。

[82] 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险队，由近200名士兵武装护

送，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马嘉理参加这支探险队。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巴莫与柏郎会合，然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他们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

[83] Tong king，今北部湾。

[84] Bacninh，今越南境内。

[85] 指马尾海战。

[86] 指后来被任命为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指挥台湾民众抗击法军登陆的战斗。

[87] 1886年，英国看到中法战争后法国成功侵占了越南，就开始打缅甸的注意，发动了第3次英缅战争，通过与清廷签订条约，将缅甸吞并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个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

[88] 这道懿旨实际发布于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446，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89]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564-565.这道诏书比较长，作者只引述了前半部分。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90] admiral Ting，即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91] 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92] 1895年3月24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前往马关与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在街上遭到枪击。

[93] 甲午战争后，德、法、俄出于自身利益，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94] 即中东铁路。

[95] 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96] 1897年11月1日夜，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被杀。11月13日，德国以此为名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还勒索了大笔赔偿，史称“巨野教案”。

[97] sir Claude Macdonald，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1888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98] lord Salisbury，时任英国首相兼内政大臣。

[99] Mr Hanotaux，1853-1944，法国历史学家及外交家，1894-1898年间曾两次出任法国外交部长。

[100] 今北部湾，具体指当时已经成了法国殖民地的越南。

[101] 即戊戌变法。

[102] 即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103] 指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废止变法。

[104] 1896年5月18日，李鸿章以特使身份出使俄罗斯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接受了沙皇的300万卢布，出卖中国利益。

[105]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597-598，句读是译者加的。

[106] 这篇文章并未收入《康有为全集》，原中文名、内容和出处均不可考，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107] 即公车上书。

[108] 应指强学会。

[109] 原文为chinese progress，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报刊名称，推测可能是指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发行的《强学报》。

[110] 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累官至督察员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撤职。

[111] king yuen shen音，具体身份不详。

[112] 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发起成立，总会设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等省设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停止活动。

[113] ka hsueh tseng音，具体身份不详。

[114] 江西义宁客家人，1851年投入曾国藩麾下以举人身份进入官场，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撤职，不久去世。

[115] su hin ching音，具体身份不详。

[116]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同治二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累官至礼部尚书。

[117] Timothy Richard，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跟晚清维新派有非常深的交往和联系。

[118] 指珍妃和瑾妃，实际只有珍妃遭到了廷杖的处罚。

[119] 时任户部右侍郎。

[120] 时任吏部右侍郎。

[121] ④ 他他拉·志锐，满洲正红旗人，累官至伊犁将军，珍妃和瑾妃的堂兄。

[122] ⑤ 江西萍乡人，1890年科举考试的榜眼，近代著名爱国文学家、学者，维新变法的坚定支持者。

[123] ⑥ 北京昌平人，幼年家贫净身进宫，1896年，这位太监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哭谏慈禧太后，要求把实权还给皇帝，随后在菜市口被斩首，留下了“烈宦”的美名。

[124] ①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太后系穆宗皇帝之母，实际上不过是文宗皇帝之妾。皇上现今作为文宗之嗣入承大统，没有以父妾为母之礼，皇上真正的嫡母是慈安皇太后。现今皇太后就穆宗朝而言，可称太后，就皇上而言，不过先帝一遗妾耳。”

[125] 应指永定门火车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站，当时西方人的习惯是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然后沿北京中轴线向北经前门大街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126] 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 d w a r dH o b a r tS e y m o u r，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指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个人跟本书前面提到的米切尔·西摩尔不是同一个人。

[127] 如前所述，实际指营口。

[128] 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1025-1027，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129] 基督教新教。

[130]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美国基督教新教社团。

[131] 6月11日，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被打死，他是庚子国变中第1个被杀的西方外交人员。

[132] 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德国男爵、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街头为清军枪杀。

[133] 指他们在廊坊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顽强阻击。

[134] 指崇厚创立的北洋机器局。

[135] 具体位置在今北京崇文门内，距离东交民巷不远，是当年各省举人进京会试的地方。

[136] prince Su，爱新觉罗·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朝12家铁帽子王之一，女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生父。

[137] G e o r g eE r n e s tM o r r i s o n，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也是著名的旅行家，拍摄了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老照片。

[138] 原文为t h ec a n a l s t r e e t，对照上下文内容，应指前门大街。明代北京大运河漕运码头就在前门以南地区，今天的北京正义路当时就是河道。

[139] 由来自印度殖民地的锡克族士兵组成。

[140] r a j p u t，印度北部少数民族，自称古代印度社会第2等级刹帝利的后裔，跟日本武士阶层类似，男人成年后大多成为职业军人。

[141] lord Lansdowne，指第5代兰斯多恩侯爵Henry Petty-Fitzmaurice，这个人是当时英国著名政治家，曾在政府多个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142] kuan shi，这个地方今天名为“西贯市村”，行政区划属北京昌平区阳坊镇，是著名的回民聚居区。

[143] 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甘肃环县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144] the peitang cathedral，即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天主教堂，当时北京有4座规模比较大的天主教堂，西直门教堂位置偏北，俗称“北堂”。

[145] count Waldersee，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中国史料习惯通译为“瓦德西”，德国历史上第2任总参谋长，晚年担任八国联军最高指挥官。

[146] 即辛丑条约。

[147] 原文为prince Chun，此时老醇亲王奕譞已经去世，继承醇亲王爵位的是他的儿子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为区分起见，这里翻译为“二代醇亲王”。

[148] 指天津至北京的航道。

[149] W hampoo，广州黄埔，这个地方是西方人来华贸易的传统港口。

[150] prince Ching，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皇帝曾孙。他当时奉命跟李鸿章共同参加谈判，后中途退出。

[151] 爱新觉罗·溥儁，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次子，他的母亲是慈禧弟弟叶赫

那拉·桂祥的女儿。

[152] 这个地名字面上写为“正定”，但民间约定俗成的读音为“真定”。

[153] 原文如此。实际早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清廷已经在皇城范围内修建了皇家铁路，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1888年竣工，一般称为“西苑铁路”。

[154] 商汤求雨的故事出自《搜神记》，大概意思是说，商汤推翻夏朝后，天下连续大旱7年。商汤剪下头发和指甲，自己充当祭品，在桑林，也就是今天河南偃师附近，向上天祈求降雨。

[155] 清代北京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中文期刊，也称“邸报”。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投递。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故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

[156] 这则消息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8册p796，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157] 这则消息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8册p806，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158] 八国联军侵华时，前门商业区的很多店铺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战争结束后，这个地区得到了重建。

[159] 清代北京街头有类似今天治安岗亭的设置，里面长期驻扎有负责维持治安的兵丁，这些人官称“看街的”，皮鞭是他们的常用装备。

[160] 这种仪式被称为“陪祀”，相当于家里来了客人，请出亲友帮忙招待，陪吃、陪喝。

[161] 现代人很自然地认为皇帝祭天必定站在圆丘的最高点，北京天坛公园现在举行的祭天表演也是把皇帝演员安放在圆丘的最高点，这其实是错误的。据史料记载，明清皇帝祭天确实是站在圆丘的最底层，上面2层平台都是安放神位用的，祭天仪式开始后不能有人。

[162] 例如佛教的观音菩萨在道教中被尊奉为慈行道人，道教的关帝则是佛教重要的护法伽蓝。

[163] D rM a r t i n，应指W i l i a m A l e x a n d e rP a r s o n sM a r t i n，中文名“丁韪良”，字冠西，号惪三。美国传教士、汉学家，1850年来华，1858年参与起草《天津条约》。1865年出任北京同文官教习，后升任总教习兼清政府国际法问题顾问。1898年以二品官的身份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戊戌变法后在北京创办崇实中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21中。1916年12月17日在北京去世，安葬在西直门外的外国人公墓。

[164] 中国传统文化只允许男人进入祠堂参与祭祖仪式。

[165] 作者把很多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都算在了儒教的范围内。

[166] 指仓颉造字。

[167] 中国传统文化将孔子和关公都尊称为“夫子”。

[168] 关帝庙都要陈列青龙偃月刀的复制品。

[169] 指明宪宗朱见深。

[170] c y r u s，又称居鲁士大帝，古代波斯帝国皇帝，被今天的伊朗尊称为国父。

[17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72] 孔子的第76代嫡孙，1877年袭衍圣公爵位，1898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衍圣公有时居住在山东曲阜孔府，多数时间则居住在北京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

[173] 即福禄寿三星。

[174] 指作者写作本书的1903年。

[175] 即今天北京东便门城墙上的古观象台。

[176] chin tzu，即长春真人丘处机。

[177] 据上下文内容推测，作者指的应该是燕九节，即每年正月初九，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生日，过去北京白云观要在这天举办庙会，游人如织。

[178] 这里说的是道教的羽化飞升，类似于和尚的圆寂。

[179] 指白云观老律堂。

[180] 这种祈福形式是白云观的传统，今天仍然存在，只不过把道士换成了一枚巨大的铜钱，能够用手里的硬币击中铜钱就意味着好运。

[181] 汉语佛经也有译为“婆瓦村”的。

[182] 今斯里兰卡。

[183] 今泰国。

[184] 今越南。

[185] 即东汉。

[186]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第2天早上，汉明帝让众位大臣替他解梦，博士傅毅告诉皇

帝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信以为真，于是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这些人在西域大月氏国遇到了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就带着这两位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回到洛阳。第2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西修建寺庙，供天竺高僧居住，这就是洛阳白马寺。

[187] s tT h o m a s，即托马斯·阿奎纳T h o m a sA q u i n a s，意大利人，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代表作《神学大全》，号称“神学之王”，死后入圣。阿奎那其实并没到过印度，不过他曾在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游历、讲学，这个地方距离印度不远。

[188] 334年——420年，东晋高僧，中国历史上第1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公元399年，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回国。

[189] hsien tsung，即唐宪宗李纯，他在位期间大唐国力得到恢复，史称“元和中兴”。

[190]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打算把佛骨请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说这个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一文，差点因此丢掉性命。

[191] 原文如此。史料并未发现相关记载，作者指的可能是北京雍和宫。

[192]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很多地方都有杀死女婴的陋习。

[193] 指晚清时代口语已经是跟今天差不多的白话，书面语则还是古奥的文言。

[194] 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是威妥玛字母表，这种字母表跟今天的汉语拼音大同小异，是由英国外交官、汉学家，T h o m a sF r a n c i sW a d e发明的，威妥玛字母表至今仍是西方人拼读中国地名、人名的主要参照。"c h u"相当于汉语拼音的“z h u”。

[195] 作者这里说的是北京土话，北京人用这两个字表示否定意思时要把“不”的发音拉得很长，还要拐个弯，“是”的发声短而轻。

[196] p i g e o n-E n g l i s h，清代以后大量英国人来到广州从事对华贸易，“广东英语”应运而生。今天的中国人学英语大多经历过用汉语给英语注音的阶段，“广东英语”就是用汉语给英语单词注音，分门别类地编辑成名为《鬼话》的小册子。实际使用时不管语法，直接把单词连成句子说出来，只要能表达意思就行。鸦片战争后，“广东英语”流传到上海外国商馆集中的洋泾浜，就演化成了“洋泾浜英语”。

[197] 相当于古代中国官方规定的普通话，历史上，随着国家情况的变化，

官话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清代官话基本等同于北京方言。

[198] 类似英语这样的西方语言属于表音文字，它通过字母组合来记录声音，传达意义；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属于表意文字，字形本身就可以传达意义。

[199] 汉字字形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6类，其中形声字数量最多，这种汉字是由形符和声符组成。例如“铜”字的“金字旁”表示这个字跟金属有关，是形符；“同”表示它的发音，是声符。作者这部分关于汉字的介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出发的，不是特别专业。

[200] 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201] 即文王囚羑里而演《易》。

[202] 《周礼》一般被认为是周公旦编纂完成的，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伪托之作。

[203] 即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再加上八国联军侵华后由总理衙门升级而成的外务部。

[204] 作者只提到4本书，漏掉了《乐经》。

[205] k a o t i，原文如此。作者的意思可能指汉高祖刘邦，不过秦代遭到禁绝的很多文化经典重新面世基本是在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

[206] 指西汉武帝时期，90多岁高龄的伏生是当时少有的能通过口述方式教授《尚书》的人，汉武帝因此特意把他征召到长安，打算把《尚书》重新整理成文字流传，不过伏生由于年龄较大、口齿不清，再加上有口音等原因，还需要他的女儿羲娥充当翻译。作者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207] 这3个数字应该是作者根据《汉书·艺文志》统计出来的。

[208] 即杨贵妃。

[209] C h a u c e r，英国古代诗人、小说家，生活时间在1343至1400年。

[210] 主要指祖冲之发现勾股定理。

[211] f o r e n s i cm e d i c i n e，南宋时代宋慈编纂的法医学专著，这本书很早就被翻译引进到了欧洲，因此在西方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212] 指《四书章句》。

[213] 马端临，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通考》主要是总结、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不过这部书总计应为348卷。

[214] D rS a m u e lW e l l sW i l l i a m s，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

16日，著名汉学家，美国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卫三畏”是他的中文名字。

[215] 指宋元时代一些话本小说和说唱艺术已经涉及到三国、水浒和西游的相关题材。

[216] 指1900年庚子国变。

[217] 指《古今文献图书集成》，性质跟《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相似，前后编纂28年，直到雍正年间才最终完成。

[218] 即《康熙字典》。

[219] 可能指《佩文韵府》，清代官修辞书，“佩文”是康熙的书斋名，这部书主要是供文人作诗时查询各种辞藻和典故使用的；也可能指《子史精华》，这部书主要是对各类图书的摘录和分类汇编，不过这两部书都不是110册。

[220] 应指乾隆《大清一统志》。

[221] 即军机章京。

[222]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在原有六部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机构改革，到1906年最终确定为11个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还只有8个。

[223] 即都给事中和给事中。

[224] 应指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籍贯为广西西林，1885年以举人入仕途，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来因支持变法受到光绪皇帝赏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岑春煊率军进京勤王并护送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立了大功，逐渐被提升为两广总督，跟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

[225] 指九门提督，一般为正二品或从一品的高级官员。

[226] 1902年，清廷仿效西方警察制度，成立工巡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

[227] 作者指的可能是粘杆处，也就是民间传说的血滴子，这个机构成立于雍正还没即位的时候，对外宣称的功能是用粘杆捕蝉，以免叫声打扰雍正休息。雍正即位后，利用这个机构的人员可以到处游走的优势，把它引入紫禁城，发展成了类似明代锦衣卫的特务组织，这个机构后来在嘉庆诛杀和珅的行动中受到牵连，逐渐销声匿迹了，不过关于它的传说始终没有停止。

[228] 清代在通州设有仓场总督衙门，最高长官为仓场侍郎，主要负责管理当地粮仓和漕运事宜。

[229] 清代各省其实也有独立的造币机构。

[230] 中国古代司法传统是对犯罪嫌疑人做有罪推定，西方则习惯做无罪推

定。

[231] 即站笼，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

[232] 即凌迟。

[233] 其实即便砍头也有快刀和钝刀的区别，罪行越严重，刀子越钝，当年清廷杀谭嗣同等人用的就是钝刀，要连砍几下，人头才能落地。

[234] 指在菜市口被处决的戊戌六君子。

[235] chiang lo音，具体身份不详。

[236] 中国古代法律，本夫捉奸成双，当场杀死奸夫淫妇，地方官勘验无误，不但不能治罪，还要给本夫披红挂彩，让他像英雄一样游街。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初识中国

我第一次遇到中国人是在来中国的船上，对方是包括主人和仆人在内的一大家子人。这个家庭的家长是刚刚从柏林卸任的大清公使，姓“吕[1]”。吕当时正带着他的一大家子人返回祖国，这些人里边儿有的能说几句德语，我们因此攀谈了起来。一番攀谈过后，我跟公使11岁的小女儿成了好朋友。这个小姑娘既聪明又漂亮，名叫“官娣[2]”。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这个女儿之后，能再得个男孩，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永远在儿子以下。官娣很幸运，因为她的父亲旅居柏林4年，耳濡目染了西方人的很多习气，不那么重男轻女。更何况，这个小姑娘还通过家庭教师，学到了一口流利的德语，父亲从事交际活动的时候，反倒还需要她帮忙当当翻译。有意思的是，除了类似这样的场合，我从没见吕公使跟自己的女儿说过话，也从没见他向对待年龄更小的儿子那样，哄着女儿玩过。

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姑娘生活得很快乐，打扮得也非常漂亮。我记得她当时下身穿了条苹果绿色的阔脚裤，上身穿了件装饰了淡紫色褶皱下摆，满是刺绣花纹的褂子。那件褂子从一侧系扣子[3]，长度直到膝盖。她的头型很圆，没什么棱角，所有的头发归纳在一起，梳了条大辫子，辫子的根部扎着粉色的绸带，辫梢儿上挂了个彩色的流苏穗子，那个穗子看上去挺沉。小姑娘的头上戴着中国女性常见的那种老式头带，镶嵌了各色珠宝的黑色丝质头带在头上围成一个圈儿，遮

住了部分后脑勺和脖子。我从没见过像官娣那样精致的小手儿，手指又细又长，皮肤是深橄榄色的，这可能勉强算是一点儿缺陷。小姑娘的金莲紧紧包裹在一双黑色的亮缎子小鞋里，鞋面上装饰了各种好看的刺绣。官娣告诉我说，她从3岁就开始缠足，这才达到了如今完美的尺寸。缠足刚开始的确很疼，她为此流了不少眼泪，可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官娣的脚实在太小了，小到重心不稳，她的弟弟甚至抓着辫子就可以轻易把她拽倒。更加熟识了以后，我为此专门问过她的母亲，为什么要对孩子如此狠心。那位女士的回答是缠足属于中国人的习俗，就像你们西方女人穿紧身衣勒细腰一样，没什么可奇怪的。

官娣有3个弟弟，分别为7岁、5岁和3岁。在父母那里，女儿的地位明显低于儿子。就我来看，这3个小男孩可能是世界上最淘气的孩子。他们都有各自的奶妈。可怜的奶妈们为了照顾淘气的孩子，每天都得颠着小脚儿东奔西跑。有天，奶妈终于抓住了小坏蛋，惩罚立刻降临。我看见他趴在奶妈的膝盖上，褪下裤子、撩起上衣，被一下、一下地打屁股。为了避免小坏蛋的哭闹声惊动雇主，奶妈还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小坏蛋后来被打得连哭闹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才被放了下来。光着屁股的他还没忘了趁机踢奶妈的小腿一脚，作为报复。

除了这4个孩子，吕公使还有个很小的女儿带在船上。那个孩子还在摇篮里吃奶，是公使和他的妾离开德国前刚刚生下的。公使的妾平时很少走出自己的舱房，我只去拜访过她一次。据这位妾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她亲生的，公使的正妻自己没有孩子。



作者拍摄的吕海寰及家人

吕公使正妻的年纪看起来挺大，气质很威严。她在船上曾按礼节举办过一次舞会招待大家，不过由于身体虚弱，再加上那双金莲，这位女士只能拄着拐棍走来走去。我是通过官娣结识吕公使的正妻的。当时，我指着公使正妻问官娣这个人是谁，她痛快地告诉我说:“哦，那是我母亲。”

那时的我对中国人的多妻习俗还不了解，奇怪地追问，“你妈妈不是待在甲板下面的舱房里看孩子吗?”

“是的，那也是我的母亲，我有两个母亲。”

后来我才闹明白，敢情公使正妻生的孩子早就不幸夭折了，我见过的那位妾生的5个孩子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和这位正妻都当成妈妈看待。除了这两个女人，船上还有个从不主动到甲板上露面的女人，她是公使的第3个妻子!这位女士时年24岁，已经嫁给公使4年了。很不幸，4年当中她没能生下一男半女，因此就被丢在了角落里，忍受着被人遗忘和羞辱的痛苦。我偶尔看见过她偷偷哭泣，泪水在擦了厚厚粉底和胭脂的脸上冲出两道小沟。真可怜……



清代江南妇女

所有这些老幼妇孺的当家人当然是吕公使本人。吕公使已经上了年纪，肤色暗黄，脸上那副大大的角质眼镜给他增添了几分威严的气派。虽然担任着大清帝国的驻外使节，但公使本人其实不懂任何外语，一切只能仰仗翻译。吕公使属于那种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精通各种儒家经典，这么大年纪，每天早上还要早早地起床读书、做笔记，他的家人为此感觉非常自豪。官娣曾经把父亲的几卷手稿，还有他使

用的毛笔和墨盒悄悄拿出来，供我研究。我对中国文人的器物真的一窍不通，只能凭感觉认为那支毛笔的笔头肯定是用特别珍贵的毛发(我觉得是骆驼毛)制成的，所以不用的时候，还要用专门的笔帽儿把它保护起来。墨盒是银的，上面錾了些中国字。官娣指着其中的几个字说那就是她父亲的名字。我跟官娣的这番谈话发生在公使居住舱房的外面。整个过程中，若干位名分各异的女眷先后从我们身边走过，进入舱房。由此可见，吕公使是个非常有“艳福”的男人。沾这几位女士的光，我还得以通过门缝儿偷窥了吕公使。他当时正在喝茶、抽烟，使用的烟袋无疑是用非常珍贵的木料制成的，上面还有个玉石的烟嘴。

有天，我非常鲁莽地跟公使夫人谈论起了官娣回到北京后的婚事。那次谈话是以拉家常作为开头儿的，后来我不知怎么的就提起了官娣，然后顺理成章地谈到了她的婚事。据公使夫人说，官娣5年后就要出嫁了。我的这位小朋友当时只有11岁，也就是说她在16岁的时候就会成为别人的妻子。我的这个问题虽然有些过分，却还在中国礼节允许的范围以内[4]。随后的问题更加得寸进尺，我直接询问公使夫人官娣是否知道她将成为谁的妻子。毕竟，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这位丈夫有可能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这个问题引起了非常大的尴尬，公使夫人半天没说话，然后结结巴巴说了通儿蹩脚的德语，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女孩结婚前根本不应该知道丈夫是谁，长的什么样子。时机一到，父母就将代替她选择合适的丈夫。女孩对此只有服从和心怀感激而已。

轮船来到新加坡海域后，我的中国朋友们明显高兴了起来——他们已经到了家门口儿了，而且新加坡当地的大清公使馆好像也为他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停靠新加坡港口的时间恰好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们认真梳洗打扮了一番，吕公使则换上了大清官员的全套行头。公使的级别本来不低，此次回国又将被授予更高的官职，因此有不少下级官员在码头迎候，等着给大人请安。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有意思。下级官员们排着队依次走进公使的舱房，下跪磕头行礼。磕头的人要一直保持五体投地的姿势，直到公使请他站起来，找座位坐下，下一位官员再走进舱房，如法炮制。请

安完毕，下级官员们簇拥着公使和他的家人下船，分乘7辆马车，前往大清驻新加坡公使馆做客，他们将在那里过夜。我站在船上向我的中国小朋友挥动手绢告别，官娣以为这一去就见不到我了，伤心地落下了眼泪。第2天，她向我详细讲述了上岸做客的细节，以及他们看到的那些美丽的树和花朵。

我跟这些中国朋友真正分手是在中国上海。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以后是不是还能见到。上岸前，公使的女眷们全部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头上还戴了花。告别的时候，我忍不住亲了亲那几个小坏蛋，他们也按西方礼节回吻了我。小坏蛋们虽然是中国人，实际却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回到祖国以后，他们可能再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跟女性发生如此亲密的行为了。公使私人享用的大型汽艇靠了过来，他们一家人转移到汽艇上，向港口驶去。轮船上的三副和1名水手奉命登上汽艇，护送公使安全上岸。

第二章 在上海

当我们从吴淞口沿着大江上溯到上海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西式烟筒。上海的一切都笼罩在淡淡的薄雾里，看不太清楚。轮船停靠在专供西方船只和人员停留的区域，这个地方跟周围是相对隔离的。

轮船入港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参观起了上海。这座城市拥有非常完美的6英尺宽街道，大街上塞满了人，行人头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金字匾额，整条街都显得非常繁华。当地的小庙非常有意思，里面安放着各种各样的神像。貌似地位最高的神被放在小庙正中最高的地方，站在街上就能看见，其他的神像只有走进庙里才能看清楚。我们的向导操着一口蹩脚的“广东英语”，向我们详细讲解每个神都是管什么的。我们也入乡随俗地给神们烧了些银色的纸片，祈求好运。向导后来又带着我们去了一片位于上海城中的死水塘，这个水塘具有景观作用，上面横跨着西方人非常熟悉的那种中国式的拱桥。拱桥的另一

头儿连接着水塘中间的小岛，小岛上有个茶馆。有人认为，英国国内建造的某些中国式园林都是以这里为模板的。

感谢威尔金森先生(Mr Wilkinson)，也就是时任上海会审公堂[5]特别顾问的盛情，我们得以在某天上午来到领事公堂，观摩审案。这个法庭由一名大清官员和一名西方外交官联合组成，主要负责处理上海租界内的各种法律纠纷。审案过程中，不断有犯人被揪着辫子带进来，还有一次是5个人被绑在一起，同时押进来的。某些犯人特别讨厌衙役揪自己的辫子，就会在头发里悄悄插上几根鱼刺，扎他们几下。我们当天遇到的最有意思的案子是某位中国大夫由于治疗不当，治死了一个中国孩子，孩子的父母因此对这个大夫连打带骂，把他告上了法庭。负责断案的大清官员看了看大夫开具的药方，声称药方中的某味药是有毒的，那个用量毒死10个人都有富裕。法庭因此判处这位大夫以后不得在租界范围内行医。后来，我听说大夫开的药方里有味药是猴子的指甲，这种东西对中医来说属于非常名贵的药材，120块银元只能买到一点儿。那个不幸的孩子当时得的是麻疹[6]!观摩过审案，我们又参观了阴暗潮湿的牢房，以及各种各样的刑具，比如打屁股用的竹板子、当街示众用的大枷，还有皮子做的类似鞋底的东西，那是专门用来打女性罪犯耳光的。那位刚才负责审案、戴着红顶子的大清官员亲自向我们详细讲解了这些刑具的用法，还邀请我们当天下午3点再来参观对罪犯的行刑现场!

有天，我们正在静安寺路[7]上闲逛，偶然遇到了一群中国搬运工人，他们好像把一户人家的全部家具都扛在了肩膀上。那些家具大多漆成红色，我们叫不出名字。好奇心驱使着我们尾随这些工人来到某处庭院，那个庭院的风格属于中西混合。庭院四处悬挂着彩旗和灯笼，角落里还有一群中国乐手演奏着我们听不懂的音乐。我们走进庭院，里面有很多仆人。搬运工人们的到来似乎预示着某个重要时刻的开始，因为乐手们演奏的音量突然变大了，灯笼里的蜡烛点起来了，鞭炮也放起来了。看热闹的人群尖叫着拥成一团，工人们只能用力挤出一条路来。

我们当时正好站在庭院的大门道里，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站在台阶上趾高气昂的庭院主人，也可以看见他那些躲在露台上看热闹的女

眷。几乎毫无预兆的，某位看来比较有身份的仆人招呼我们进去做客。我们跟着他走进主人的住宅，受到一位身穿漂亮刺绣衣裤的中国贵妇的热烈欢迎。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困难地跟我们交流。据这位贵妇自己介绍，她本人跟刚刚去世的李鸿章是近亲，丈夫是英国人。今天之所以这么热闹，是因为她的侄子明天要在这所房子里结婚。我们看到的那些工人就是给新郎送嫁妆来的[8]。我们坐在屋里跟贵妇谈话的过程中，各种家具还在往屋子里搬，新朋友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家具当中有两张完全一样的四角方桌，上面还盖着漂亮的刺绣桌布，据说这就是新郎和新娘的餐桌。桌子上面摆着玻璃瓶子，瓶子里插着3双筷子，有双应该是珊瑚的，有双可能是象牙的，还有双肯定是银的。筷子以外，新郎和新娘的餐具也都是银的，比如银的勺子、杯子、碟子之类。



清代上海静安路

聊天的时候，我们惬意地品尝了装在精致瓷杯里的上好绿茶。用过茶以后，我们又由新朋友领着，穿过一道大门，进入金碧辉煌的住宅内部参观，后来又由她领着经过一道走廊，来到了住宅的二层。走廊里靠墙堆放着大量刚刚运来的家具和器物，几位看似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讨论某样东西应该放在某处，同时还要根据一张单子核对它们的数目。这些人工作得非常投入，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们得以从容仔细地欣赏他们身上的华丽官服，跟着我们的新朋友打开一个又一个红漆木盒，观看里面珍贵的珠宝和丝织品。

据这位新朋友介绍，新郎的父母非常有钱，眼前的这些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她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后天再来，虽然我们不能出席次日正式的婚礼，不过婚礼结束后却可以跟新娘见见，再欣赏其他器物。当天告辞前，新朋友带着我们又参观了几间屋子，还把我们介绍给了新郎的亲戚。我们首先来到新人的卧房。这件屋子是西式风格的，有两扇窗户，还要个小壁炉。屋子的正中摆放着一张传统的中国大床，这张床上面有顶，四周三面有栏杆。这张床暂时还是光秃秃的，没有卧具，那些东西还在外边的走廊里没有开箱。新房最主要的装饰就是墙上挂着的几个中国画卷轴。紧挨着卧房的那件房子明显是作为起居室使用的。屋子里靠墙放着两排木质高背扶手椅，椅子跟椅子中间摆了张乌木的小茶几。新人房间最隐秘的部位，我们看到了吸鸦片用的烟榻，烟榻正中放着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吸鸦片用的各种东西。

这所住宅里的多数房间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也不想多说，因为它们留给我的印象大多都不太好。有件屋子里，我看见很多仆人正在伺候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士躺在铺着蓝色垫子的烟榻上休息。看见我们，她赶紧从烟榻上站起来，招呼大家来到屋子中间的方桌周围坐下。这位女士属于那种典型的中国美女，我想，她应该是南方人。永远挂着温和微笑的脸上，挺拔的鼻梁和漆黑的双眸为她增添了不少神采。这位女士的脸蛋儿红彤彤的，明显涂了胭脂，眉毛也描得很重。她头上戴的头带装饰了贵重的皮毛、珍珠和其他珠宝，扣子扣到下巴的丝绸长袍同样镶嵌了各种宝石。

新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位美女是她的近亲，她的丈夫目前在香港

经商，非常有钱。这位美女热情地招呼仆人给我们端来了“茶点”，比如鸡蛋大小的猪肉丸子，还有各种甜口味的肉食。我实在不习惯就着茶水吃肉，可又不愿意直截了当扫了主人的兴，只好假装不会用筷子，夹不起来那些圆圆的丸子。没想到热情的女主人居然走到我身边，熟练地用象牙筷子夹起丸子，送进了我的嘴里。通过这位美女的手，我第一次吃到了最纯正的中国菜。

两天以后，我们按照约定见到了那对新婚夫妇。新朋友显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早早就安排仆人在门口迎候我们。这位仆人带着我们上了楼，然后任由我们自己走进两天前参观过的新房。新郎站在门口欢迎我们，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郎非常矮，可是非常胖，那身厚到夸张的冬装让他看起来愈发肚大腰圆。他的一只眼睛长了白内障，脖子后头还有道又深又长的伤疤，那意思好像是有人想砍他的头又没砍下来似的。更糟糕的是，新郎还有条腿是瘸的，走起来一拐一拐。看着新郎，我实在有点儿同情那位还没见面的新娘，虽然她嫁入的这个人家拥有如此令人艳羡的财富。

出乎我们意料，新郎居然能说英语，而且挺流利，举止也非常得体，这让他在大家眼里的形象提升了不少。新郎身穿大清官员标志性的官服，官服是丝绸质地的，上面绣满了各种图案，比如金龙之类的。他头上的官帽不但有红顶子，后面玉质的翎管儿里还插了孔雀的羽毛[9]。新郎的肩上披了红色的饰带，一直垂到他胸部的位置。据我们看，这可能是新婚期间必须的装饰，因为新郎身边的仆人也都挂了这样的饰带。对于这套穿戴，新郎明显非常得意。

寒暄过后，他招呼大家围着桌子坐下。几位同样肩头挂着红色饰带的女性仆人走过来，替他摘掉沉重的帽子，脱下厚厚的外衣。“茶点”很快又端了上来，还是各种装在瓷碟子里叫不出名字的甜肉搭配绿茶。大家喝着茶，吃着味道古怪的肉，听新郎讲述他的身世和婚姻。一番讲述过后，新郎许诺我们将很快见到新娘，而且兴奋地回忆起了昨天他乘坐绿呢大轿，前去迎亲的情形。特意强调说，他当时为新娘预备的轿子是全天鹅绒的，上面绣满了金线。

就在这时，新娘的仆人走了进来，趴在新郎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新郎立刻站起来邀请我们去见新娘。他带着我们走进前天参观过的那间卧室，穿过连续几道丝绸质地的帘幕，绕过那张大床，这才在阴暗的角落里看见了坐在凳子上的新娘。新娘的身边站着位同样挂了红饰带的仆人，她的主要工作是搀扶新娘。由于小得吓人的金莲，新娘的站立和行走都非常困难。

我们看见新娘的时候，她已经在椅子上稳稳当当坐好了。身上穿了件长到脚面的丝绸长袍，上面满是刺绣和各种宝石。那件衣服的袖子非常肥大，我们因此看不见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新娘头上戴了个鸡冠子似的帽子，上面满是小绒球之类的装饰，帽子左右两侧各有条红色丝质流苏，一直垂到她的腰部。帽子的正面是由众多珍珠串组成的面罩，珍珠串同样长及腰部，几乎遮住了她的全部面庞。虽然显得非常失礼，我还是忍不住伸手稍稍撩动面罩，看了看她的脸。新娘非常年轻，长相甜美。她的眼影画得非常重，脸上用的粉底和胭脂也很重，多少弥补了略显苍白的肤色。新娘就那么坐在床和墙形成的角落里，双手放在膝盖上，长袍遮住了整个身体，看起来就跟庙里的神像差不多。

看到我们盯着新娘目不转睛，新郎显得挺得意。我转过脸问他新娘叫什么名字，新郎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她叫“王氏”。

“可她没有个好听的名字吗?就像中国女孩常见的名字那样，比如‘荷花’、‘珍珠’之类的，供你们这些亲人在家里称呼她?”

新郎涨红了脸回答说:“我还没来得及问她……”

这就是中国风俗，很多东西都是跟西方正好相反的。丈夫只能在结婚之后才知道妻子究竟长个什么样子，姓甚名谁。男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是握别人的手，而是握自己的手[10]。读书的时候要从右往左读，作者署名在整本书的最后一页。女人可以抽烟、穿裤子[11]，男人却可以穿着裙子[12]，手里拿着扇子。官员们帽子上装饰的羽毛是下垂的，不像我们那样指向天空。罗盘叫“指南针”，而不是“指北针”。

好了，还是再说说那位新娘吧。她应该是位非常沉默寡言的人，

见面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据新郎说，中国的习俗要求新娘结婚后3天不能说话，而且这3天当中亲友还可以随便闹洞房，新娘则不能表现出任何反感。对我来说，这样的婚礼实在不值得羡慕。聊天过程中，陪同我们拜访新人的新朋友，也就是就是前天结识的那位中国贵妇，我按她丈夫的姓氏称呼她为坎宁夫人[13]，趁机向新娘献上了见面礼。那是个小金盒子，盒子里有个小镜子。新娘显得非常高兴，她把脚向下伸了伸，头部微微前倾，表示感谢。

新郎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结婚庆典将持续整整3天，新娘每天都要换身衣服，绝对不能重复，而且后一身衣服肯定要比前一身更华丽。新郎的那身礼服则可以保留下来，如果他将来续弦或者纳妾，还能再穿!结婚第一天，新郎要把新娘从娘家迎娶过来，两人磕头拜天地，正式结为夫妇。这之后，新娘还要以妻子兼儿媳的身份给丈夫和公婆行礼。第二天，新郎要把新娘引荐给他这边的亲朋好友，新娘全程不用说话，只要坐在那里就行。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到新娘的父母家，新郎按照类似的礼节拜见岳父、岳母和其他亲友。这就是中国婚礼大致的流程。

滞留上海期间，我们还在夜间拜访了公共租界里的中国居民区。那天夜里，我们由巡警和侦探陪同，沿着福州路[14]游览。这条街同样灯火辉煌，到处挂着形态各异的中国灯笼，里面点着蜡烛，不同买卖铺户的金字牌匾一块紧挨着一块。比灯笼和牌匾更高的地方，很多茶馆在房顶上开辟了露台，供茶客们坐在上面，欣赏繁华的夜景。这条街道基本等同于步行街，几乎看不见什么车马。我们只看到一位很有气派的年轻姑娘乘坐双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成群的男女仆人。后来听说，那人是个唱戏的名角儿，当时正要去位于这条街的某个戏园子表演。这姑娘还带了个小姑娘，看年龄有可能是她的妹妹。小姑娘的打扮相对朴素，没那么大气派。她当时正穿着丝绸质地的衣衫，骑在男仆的肩膀上，我们因此得以看到了那双平时被宽大裤脚遮盖起来的金莲。

整条街看起来都挺热闹，到处都是欢闹的人群。我们参观的第一站是家鸦片烟馆。大家顺着破旧的楼梯，爬进一家同样破旧的房子里，这栋房子里充满了鸦片的味道。鸦片烟馆里面分成了很多独立的

小隔间，每两个人共用一个隔间。他们头靠着靠垫躺在烟榻上，中间隔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各种抽鸦片用的东西，比如烟灯、鸦片，烟签子。抽鸦片时，先要用烟签子挑出些鸦片在烟灯上烤，直到把鸦片烤成一团儿的样子，然后再装到烟枪上。烟枪大概有2英尺长，一头儿是放鸦片用的，一头儿是玉质的烟嘴，跟普通的烟斗大同小异。除了这些，烟馆还提供免费的茶水，这也是抽大烟时必须的。这间屋子的气氛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它的地板非常破旧，走起来吱吱呀呀的，不过抽大烟的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的打扰，也不在意我们看看他们抽大烟用的各种器具，闻闻装在罐子里的鸦片。有些特别好客的人甚至还邀请我们喝茶，或者抽上一口。



清代上海福州路

烟馆里除了盏小汽灯和烟客们的烟灯，再没有别的照明措施。据陪同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样的烟馆已经算是档次非常高的，烟客来这儿付出的价钱也要比别的烟馆高。来这儿消遣的人只是刚开个头儿，

等烟劲儿上来，他们还会去某些更下流的地方“消遣”。我们就不方便跟着去看了。这个烟馆里的人多少还算处于清醒状态，因此比较安全。

我们参观的第二个场所是一处表演音乐、歌剧的地方。进入幽暗的院子以后，我们首先看到刚才抬着那位气派姑娘的肩舆就放在角落里，类似这样的肩舆还不止一个。大家顺着楼梯上楼，室内的声音让人感觉头晕目眩，半天才缓过劲来。我们被带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侍者立刻献上了绿茶。我的注意力很快被舞台附近11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士给吸引住了。这些姑娘都是女演员，她们围桌而坐，桌子上摆了11杯茶，由于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看不出具体年龄，只能说大概在11岁到20岁之间。姑娘们穿的衣服款式都差不多，丝绸质地，只是颜色和刺绣有所差别。她们的裤子非常肥大，色彩属于暖色系，比较淡雅，裤脚装饰着花边。配套的褂子两侧开衩儿，长度直到膝盖。头上戴的头带是黑色丝绸的，宽度差不多可以盖住耳朵，上面镶嵌了很多珍珠。除了头带，她们头上还插了不少簪环首饰和假花。这些姑娘的脚都被肥大的裤子给遮住了，看不出大小。她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专属的男仆，这些男人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演唱的间隙给姑娘们的茶碗添开水，或者递上已经点燃的烟斗。舞台靠后的位置坐着3位演奏者组成的乐队，其中一个拿着类似长笛的乐器[15]，一个拿着跟某位姑娘被选出来登台演唱了，她的男仆递过来类似吉他的东西[16]。这件乐器其实根本没有琴弦，姑娘演唱的时候只是装着在弹奏而已。我觉得，这件道具的主要作用可能是帮她在演唱时把半边脸给遮住。姑娘开了口，乐队的演奏立刻开始。他们的演奏声实在太大，以至于我们听不清姑娘嘴里唱的是个什么，屋子里的其他观众对此好像并不介意，反倒听得津津有味。台上的姑娘演出完成，男仆赶紧把她手里的吉他接过来，再递给另一位姑娘。循环往复，我们始终就没听明白她们唱了什么，整场演出就这么结束了。



清代上海南京路

小提琴差不多的东西[17]，还有一个正在用两根小棍敲着圆形的金属器物[18]。我们听不懂他们演奏的是个什么调子。

总的来说，这些姑娘跟日本的艺伎差不多。她们的收入非常可观，有时随便唱个曲子就能得1块银元。这个地方的表演结束后，她们还要坐着肩舆再去其他地方表演，一晚上差不多转遍整条大街，挣回大把的银元。据说，这些女孩很小的时候都是被现在的老板直接拐带或者花钱买来的，老板会为她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等到这些姑娘长大后，她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男仆、肩舆和漂亮衣服，每天在静安寺四处卖艺。卖艺得来的钱全部归老板所有，以此作为向这些女孩提供优越生活条件的回报。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易是公平的!

告别了这些姑娘，我们去了另一家类似剧场的地方，获得的体验又是全新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完全是西式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男女在这里被完全分开。男人全部在一层活动，女士们则占据二层的露台和包厢。房子的入口处放着桌椅，坐着位男士。进去的人首先要经

过他来验票。所谓“票”就是一张写着进门者姓名和地址的小纸条，这里的侍者第2天会根据上面的内容去他家收取相应的费用。看得出来，来这里玩儿的人都非常开心，就连二层的女士们也兴高采烈。侍者拿着滚烫的湿毛巾，像飞镖一样扔出去，供大家擦脸[19]。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由于人太多，不通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很好。



清代歌妓

大家照旧围着桌子坐下，得体地拒绝了侍者提供的茶水、香烟和热毛巾。为了避免被人踩到裙摆，我还特意把裙子往上提了提。我们当然也坐在二楼，视线比较高，屋子里挂的灯笼之类的东西全被踩在脚下。眼前的情景是一块挂在立柱上的大幕，身穿各色服饰的男孩们正在大幕下的舞台上表演。乐队坐在舞台一侧，手里拿着乐器，吹拉

弹唱。舞台另一侧有个小门儿，通向后台休息室，我们随后也参观了那里。舞台上的节目是使用北京方言表演的[20]，我们听不懂，可其他观众都觉得很有意思。我想，对于那些上海本地人来说，眼前的节目同样也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吧?不管怎么说，这个节目还是顺利完成了。



歌妓演奏

接下来的节目表现的内容是一个戴着火红色假发的人命令手下给一位孱弱的老人动刑，那个老人当然也是假扮的，就是演员在下巴上面挂了个长及胸口的假白胡子。假扮的老人被按在那里动刑时，台下的观众纷纷叫好儿，我们却没看出个所以然。后来，台上的人又开始拿大竹棍子抽那个假扮的老人，台下的叫好儿声随即达到了高潮。那

天晚上舞台上表演的几个故事好像都是互相独立的，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有华丽的服装，鲜艳的舞台布景。表演中的有个桥段类似杂技加舞蹈。众多演员拿着装饰了花鸟图画，里面还点了蜡烛的纸灯笼列队踏着舞步从舞台后面向前走，走到舞台前面再分成两队，向左、向右转身朝后走。回到舞台后部，演员们再次列队，伸着胳膊，高低不同地把灯笼举起来，组成类似神像似的图案。

那些演员服装的色彩和图案都很漂亮，我们当即要求去后台参观，近距离欣赏。这是一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经历。演员们的服装道具远远看起来确实非常好看，可到了近处仔细一看，其实也不过如此。后台所有演员都是男士，就连女性角色也是由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扮演的。按照中国习俗，专业演员跟理发师一样，全部只能由男性担任，这些男性终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21]。我们离开这家剧场时，还有很多人正在往里面挤，挤得我们几乎出不了门儿。从剧场中的演奏声和观众们的嬉笑声判断，当晚的演出应该还要持续很久。

离开剧场后，我们又去了家中国餐馆。照旧由向导领着，我们穿过幽暗的庭院，走上台阶，经过厨房和洗碗间，小心翼翼地走过摆放着大量酒坛子的狭窄走廊。酒坛子里装的酒被中国人称为“烧酒(samshu)”。普通的白酒只经过1次蒸馏，烧酒则被反复蒸馏过3次，稍微喝上一点儿，就能让人头晕眼花。

餐馆的店堂分为若干小隔间，小隔间里没太多家具和装饰，隔间门口挂着照明用的灯笼。大伙进了隔间后还是围着一张方桌坐下。桌子上已经预先摆放了些瓷碟子、盘子之类的东西。据向导说，我们来的这家餐馆是当地最上等的，在这个地方吃顿饭，每人大概需要花费20块银元，差不多2英镑左右的样子。贾尔斯博士在他的《中国速写(chinese sketches)》中向读者介绍过一份典型的中国宴席菜单，这里所有美味分别装在大概一指深的盘子里，这样的盘子总共有40到50个，把整张桌子挤得密不透风。客人们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菜[22]，先用筷子或勺子把食物转移到自己面前的小碟子里，然后再慢慢享用。宴席上没有类似西方那么严格的程序，每个人都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菜肴。大家吃菜，偶尔互相敬酒或者共同举杯，还要碰杯，这点跟西方倒是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中国人使用的酒杯比较小。宴席中

也可以喝茶，中国人不习惯喝冷水，喝茶只能喝热的。至于牛奶，他们似乎压根儿不感兴趣。大盆米饭上桌意味着宴席临近终点。中国人吃饭习惯用左手端着饭碗，同时右手拿着筷子迅速把米饭扒拉进嘴里。宴会过程中，中国人还喜欢划拳行令，失败者要喝酒作为惩罚。据我所知，古罗马人也有相似的习俗。

引述过来作为参考:

正菜

蟹汁鲨鱼翅

蘑菇烩鸽子蛋

野鸭烩白菜

炸鱼

米粉蒸猪肉

清炖百合

火腿鸡肉丸

淡菜羹

爆炒山鸡片

蘑菇浓汤

小吃

油炸点心，咸、甜各1盘

甜味鸭子

油炸鸡架子

酱汁腌鱼

猪油中炸到半熟的羊肉丸子

离开餐馆，返回住处途中，我们走过一家关着门的店铺。里面的声音非常大，引起了人的好奇心，大家不顾向导的劝阻，推门走了进去。这家店面非常狭窄，里面的伙计好像没什么事可干，所以就开始唱歌取乐。看到我们，他们先是停止了娱乐，脸上挂着非常扫兴的神

色，看明白情况后，马上又投入了进去。我们发现，刚才在门外听到的声音是由4位乐师演奏出来的。他们4个人围坐在中间，其中一名乐师用小棍敲击金属乐器，另一个人拿的是金属打击乐器，还有一个人用的是类似骨头的东西。他们表演的节目我们看不懂，不过屋里的人明显非常快乐，快乐得我们都有点儿羡慕了。出于不想再次打扰他们的好意，我们没有道别，只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有天，我在另一条街上闲逛，迎面碰见个贵妇打扮的人。这个人看上去有点儿眼熟，我猛一下叫不出名字，却还是本能地伸手拦住了她。拦住对方以后，我才突然想起这个人就是我那天在金沙路[23]那户正要举办婚礼的人家认识的新朋友，坎宁夫人。只不过我们上回见到她时，坎宁夫人穿的是传统的中国贵妇人服装，现在的她则是全套西方妇女居丧的打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怜的坎宁夫人很快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惑。原来就在那场婚礼结束后3天，那位令她无比自豪的英国丈夫就得了白喉，拖了不到1个礼拜就去世了。



传统乐队

“这真是个坏消息，我感觉非常遗憾。”

坎宁夫人没注意到我在说什么，只是继续用她那略带中国口音的英语倾泻着胸中的积郁。据她说，丈夫去世后，她的心情非常不好，所以希望到英国去生活一段时间，改变改变生活。我后来再没遇见过这位朋友，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提起坎宁夫人的不幸，就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传统葬礼。毫无恶意地说，对于那些局外人，观看中国传统葬礼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儿。我就曾亲眼看到过最传统的中国葬礼。当时，我正在街上闲逛，突然发现很多人聚集在一家大开着门窗的店铺前面。我凑过去，透过人缝儿往里面窥视。眼前的景象西方人实在无法理解，只能说非常的中国。当时，店铺里已经为死者安放了类似祭坛的东西。葬礼正在进行中，很多人围着一尊佛像烧香和各种纸做的东西。祭坛前面，一位年轻的和尚正在给死者念经。他手里的经书封面和封底是两块木板，中间夹着纸质的书页。这本经书足有两英尺长，宽却只有两英寸。屋子正中，有个年轻人跪在那儿，不停地朝着祭坛磕头。店铺后面有张桌子上放着3排用糊灯笼的那种纸做的马，纸马全部涂了装饰的颜色，大概两英尺高，至少有12个。这些纸马的脖子和尾巴上设有机关，有风吹进来的时候，能像真马那样摆动。死者最终下葬的时候，这些纸马将被同时焚化。中国人相信，焚化纸马时冒出的青烟可以把死者的灵魂带上天堂。

送葬队伍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仆人，有个打红色伞盖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打红伞的人后面有很多人抬着某种乐器，有节奏地用槌子在上面敲打。这些人后面就是死者的棺材。棺材下面绑了两根长竹棍，总共有4个人抬着，两人在前、两人在后。棺材上覆盖着天鹅绒绣金线的罩子，棺材顶上还放了个仙鹤，也是纸糊的，装饰了各种色彩和花纹。这只纸糊的仙鹤应该也设置了机关，伴随着4个抬棺人的节奏，它可以不停地点头，看起来非常怪异。跟在棺材后头的是一群明显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走在这群人最前面的那个人在日常的衣服外面套了件纯白的大褂儿，辫子上也系了白色的布条。其他那些人头上全罩了白布，不停地哭号。

第三章 沿长江上溯

3月29日[24]

这天晚饭后，我们乘坐太古轮船公司[25]的轮船，准备从上海沿着长江上溯。轮船直到第2天凌晨2点才正式开船，那天正好是复活节。

3月30日

我们整天都在沿着长江航行。江水是难看的土黄色，江面非常宽，几乎看不见两边的江岸。我们的船舱非常舒适，就是空气略显干燥。猛烈的江风通过舱门和舷窗吹进来，简直可以把人劈成两半儿。

3月31日

我们在早上8点30分抵达南京，见到了正在码头迎候的英国驻南京领事圣迪尔先生(Mr Sundio)。圣迪尔先生引领我们下了船，还热心地带着我们把码头附近该看的地方都看了看。我们乘车沿着两侧种满柳树的大路从码头前往领事馆。刚刚下过雨，柳树的叶子被洗得非常干净，在我们头上织成了一片绿荫。这条路大概有几英里长，是由张之洞[26]总督下令修建的。途中，我们停车爬上小山，参观了一处名为“北极阁[27]”的庙宇。利用爬山的机会，我们欣赏了附近的景色，还眺望了远处南京的城墙。北极阁保留着全中国最漂亮的瓷塔，这座塔在当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曾遭到战火破坏。遭受战火蹂躏前的南京也远比现在繁华。现在的南京城更像个掩映在绿色植被里的村子，漫天尘烟中可以看到城内点缀着几个湖泊和鱼塘，附近的大江好像一条白练流向远方的地平线。

经过那场战争以后，南京的城墙已经千疮百孔，基本丧失了防御功能。午饭前，我们参观了城内的孔庙[28]，还有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29]。这个考场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它的院子里有很多排列整齐，石头建成的小房子。每次参加科举考试的10000名考生要独自待在各自的小房子里，用9天时间完成自己的答卷。我的到来引起了当地老百姓的围观，聚集了足足上百人，负责看守考场的官员百般恐吓，也无法将他们驱散。官员们后来只得在我们进入某处后，趁机将我们身后的门关上，这才隔开了看热闹的人群。



晚清时期的南京江南贡院

用过午饭，我们又去参观了明陵[30]。这座陵墓距离码头大概8英里，距离英国领事馆大概4英里，正好就在南京城墙外面。为了抵达那里，我们必须穿过整个南京城，不过一旦出了城，眼前的景色就立刻变得开阔、明丽起来。陵墓的主人是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死于公元1399年。陵墓的主体是个小山一样的大坟头儿，陵园入口的牌楼已经残破不堪。从牌楼到坟头儿的道路两侧摆放着各种神像，其中有4对神像看起来像人，其他都是怪物的模样。这些神像成对面对面摆放在道路两侧，每对神像间大概间隔1000码。那些怪物神像据说是以狮子、老虎、骆驼、大象、犀牛和马等动物为原型想象出来的，全部由整块的石头雕刻而成，不过有的神像的腿明显看得出来是单独做好后再装上去的。



晚清时期，南京明孝陵神道

南京附近没有任何采石场，这就让人非常疑惑，当年那些修建陵墓的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把这些石头运过来的?靠近坟头儿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尊巨大的石碑，石碑的底座是个同样材质的大海龟[31]。石碑碑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介绍死者的名姓，他的生平和种种美德。据说，大明帝国的建立者原先是个放羊的，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皇位，死后就被埋在了这里。他的继任者后来把首都从南京搬到了北京，可是陵墓不能随便搬迁，所以就留在了这里。

4月1日

我们在九江停留了1个小时，仓促拜访了当地的英国领事馆。当地已经显露出了春天的迹象，树上都是嫩绿的叶子，山上开满了花朵。据说去年江水足足上涨到40英尺高，洪水淹没了整座城市。今年春天刚到，江水又不祥地上涨了起来。

4月2日

早上7点30分，我们抵达汉口，受到了英国驻当地总领事弗雷泽先生(Mr Fraser)和他夫人的欢迎。这对夫妇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们临

江的住宅做客，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3天。汉口租界里的建筑式样比较统一，都是灰砖带露台的小楼。我们参观了租界内的赛马场。这处场地明显是刚修建完成的，连场地周围的树都是新种的。尽管如此，场地中间画的各种线条仍然非常严整，供观众使用的看台也非常漂亮。有些马匹已经开始在这块场地里训练，它们明显都是从欧洲运过来的，看着就比中国本地的马高了不少。

4月3日

我们给宜昌打电报，通知当地的英国领事馆，询问他们是否已经做好接待我们的准备。

4月4日

我的丈夫和弗雷泽先生一起去拜访了张之洞总督。这次会见被安排在上午10点，所以他们早上9点就坐船去了江对岸的总督衙门[32]等候。他们乘坐渡轮过江，在码头换上等候已久的轿子，穿过城区，前往总督府邸。

总督本人在府邸二门迎候。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留着下垂到锁骨以下的白胡子，眼神明亮、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牙齿非常干净、整齐。总督不会说英语，不过他的助手英文非常流利。会谈过程中，这个人和弗雷泽先生轮流充当了翻译。会谈是围坐在圆桌边举行的，桌子上摆放了水果、糕点和糖果。大家落座后，每个人还得到了一杯类似甜酒的东西。总督举杯祝客人们身体健康，客人们则表示感谢。举行会谈的场所属于典型的中式房间，没有太多家具。除了这张圆桌，就是靠墙角设置的炕。炕上铺着垫子、毯子，正中间还放了个非常矮的小桌子，那主要是为了吸烟时使用的。会谈持续了大概两个小时。客人们认为总督非常睿智，对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了解。会谈临近尾声，仆人送上茶水，客人们按照中国礼节告辞[33]，沿着原路退出总督府邸。



张之洞总督府卫队



西方媒体关于张之洞的介绍

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了由苏格兰人希勒先生(Mr Shearer)开设在当地，生产俄式茶砖和茶饼的工厂，饶有兴致地看着工人们用压力机把松散的茶叶压成固体形状。通常来说，用于制作茶砖的茶叶质量都是相对比较差的，不过这种茶砖在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都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制作茶砖的首道工序是把茶叶研磨成粉，研磨好的茶叶粉要经过烘干，烘干后再通过筛子去掉各种杂质，最后就可以用于压制茶砖了。茶砖都有标准的重量，所以茶粉在压制前要提前分成若干等量的小份儿。分成小份儿的茶叶被送进蒸汽室，重新获得少量水分。重新获得水分的茶叶被依次装入大概6到10英寸高的木头盒子里，然后送进水压机压制。压制好的茶砖要放置3小时，冷却、干燥，以便定型，然后送到专门的机器里去掉充当模子的木头盒子，再由专人负

责检查茶砖的形状和重量是否符合要求。没有问题的茶砖被送到楼上的包装车间，工人们首先在茶砖外面包一层锡纸，然后再包一层棕色的糙纸。包装好的茶砖几块为一组，放进竹筐，再把筐用麻绳或者铁丝捆好，就可以向外发货、运输了。如果茶砖的质量没能通过最后的检查，它们会被重新研磨成茶粉，二次压制。制作茶饼使用的原料比茶砖要高级很多。它的制作流程跟茶砖大同小异，只不过整个过程中工人的手都不能直接触碰茶叶。压制出来的茶饼直径大概3英寸左右，市价在40到60两白银每担[34]。我们参观的那家工厂规模非常大，拥有很多厂房，同时雇佣了600名左右中国工人。因为不断使用蒸汽的原故，厂房里烟雾弥漫，温度非常高，工人们都在脑袋上缠了白色的头巾。

4月5日

我们登上“桂礼[35]”号轮船，继续旅行。这条船将在次日早上启航。

4月6日

隶属大清轮船招商局[36]的 “桂礼”号非常舒适，船长沃德(Wade)先生、大副伦纳德(Lennard)先生等人招待我们也非常周到。

今天江上弥漫着雾气，只能看见近处的小船和筏子，还有几个光着屁股的中国孩子在江边放牧水牛。江边的田野没什么树木，可看起来绿油油的，应该是种了小麦、油菜之类的东西。由于当地江段有很多暗礁和湍流，轮船一直等到早上8点，天亮了以后才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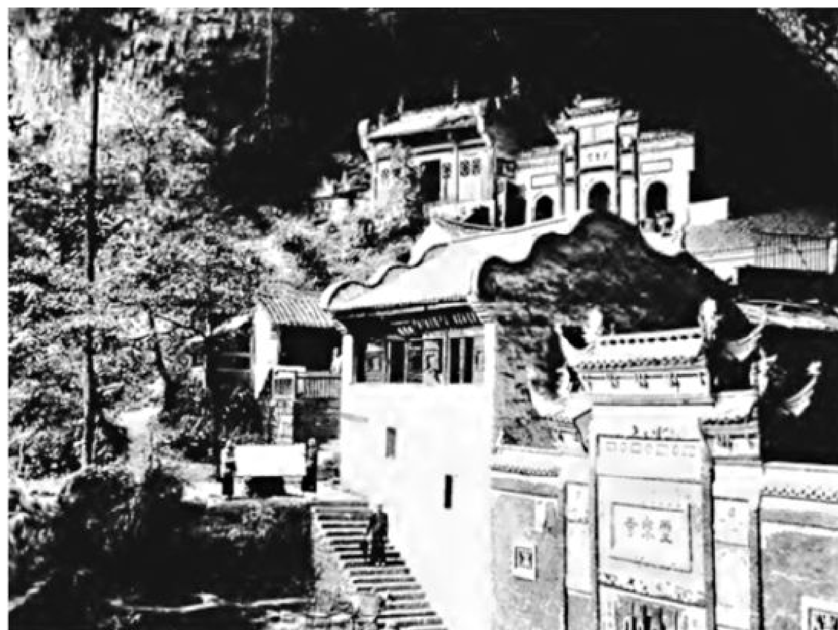
4月7日

我看到江岸的旗杆上挂了个笼子，笼子里装着颗人头，可能是被处决的罪犯。

4月8日

我们下午1点抵达了宜昌。天气还是雾蒙蒙的，好在我们进城的时候雾气小了很多。跟我们同时下船的中国商人们大多在当地经营食盐或鸦片生意，其中的不少人还花钱捐了官做。轮船入港后，不少由

士兵护卫的小船就赶了过来。船上的人大声呼叫，还有人吹起了喇叭，他们就是来迎接这些有钱有势的商人的。那些商人的行李首先被转移到小船上，他们自己随后也上了小船。我则有幸瞻仰到了他们的全套仪仗。这些大人物下船后，云雾消散，太阳出来了。



作者拍摄的宜昌龙王庙

英国驻当地领事威利斯(Willis)先生不但热情地上船迎接我们，还早早地替我们雇好了随后旅行使用的小船[37]。轮船上的水手帮我们把行李转移到小船上。我们的小船大概有50英尺长，40英尺宽。船舱集中在中部，包括卧室、客厅和一间小厨房，整条船漆成白色，里面的布置让人感觉非常舒适。负责驾驶这条小船的船员总计有20人，我们还额外雇佣了1个厨子、1个男仆和1名搬运工。当地的衙门还派了艘总共装了5个人的小救生艇护送我们，随时提供各种帮助。长江三峡里类似这样的小救生艇随处可见，他们每处理一次险情，获得帮助的船只要根据船上的人数，按每人8块银元的标准支付酬金。

第四章 长江三峡

4月9日

我们在新的舱房里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夜晚。上床前，我们特意看了看那些船员们，打算看看他们在哪儿休息。对他们来说，甲板既是做饭、吃饭、工作的地方，也是睡觉的地方，同时兼具了多种功能。当时他们正在吃晚饭，晚饭的内容是大米饭和蔬菜。晚饭后，他们打开脚下甲板上的活门儿，从底舱拿出很多席子和棍棒，然后很快利用这些材料给自己在甲板上搭了个棚子。棚子搭好后，他们就坐在里面聊天，直到就寝时间。从晚上10点到第2天早上5点，就寝的船员们都在沉睡当中，除了呼噜声，再没有发出其他任何声音。即便我们的舱室跟他们的棚子间仅仅隔着层薄木板，双方也可以互不打扰。第2天早上，我们被雨水落在船舱顶上的声音惊醒。大家从窗户往外看，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大雨和大雾。鉴于天气如此恶劣，我们的船长(中国船员习惯叫他“老板”)下令留在原地，停止航行。被迫停在异常潮湿的江面上，天上还不停地下着雨，我们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老天保佑，上午9点左右，云层逐渐消散，船长终于下令开船。开船的前兆是船员们开始七手八脚地拆除睡觉用的棚子，把它重新变成零件，送回底舱。这之后，船员们唱着调子古怪的歌，摇着船桨，向前行驶。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观察这些船员，逐渐分清了他们的面容和地位。船长以下还有两名船员，他们3个人是这一群人当中的头头儿。剩下的人当中有8个人是水手，他们4人一组，分别在船两侧划桨，另有15个人是纤夫。为了给这些人做饭，船长专门雇了个厨子。船上还有个半大孩子，应该是船长的弟弟。他没什么具体工作，却喜欢在船上跑来跑去，吆五喝六，一大早儿就被哥哥臭骂了一顿。专门为我们服务的人员包括1个厨子，他可以在一个6英尺高、14英尺宽的小厨房里给我们做出非常出色的菜肴。除了厨子，我们还有1名英语说得挺不错的男仆，以及1个搬运工。我无端地认为，船长应该还有个老婆，她就被藏在船上的某个狭窄角落里，只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看见她。至于前面提到的那条救生艇，它上面的5个人都是受过某些专业训练的，专门负责在危急时刻提供某些帮助，同时也负责打捞失事船只留下的尸体和财物。

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天气越变越好。三峡的景色非常美丽，挺拔

的山峦就在我们左右两侧直直地指向天空。大山的底色接近灰色的天鹅绒，又点缀着些翠绿。航行的第一天平安无事，只有那些纤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纤夫们都光着脚，丝毫不畏惧悬崖上锋利的巨石。他们的纤绳最后汇总成一根，拴在我们这条船的桅杆上。为了保证船只逆流而上，他们必须不停地在山间爬上爬下。船上的船员通过鼓声跟纤夫们联络。如果船员发现前面存在某种危险，必须停船，就要用力敲鼓。得到通知的纤夫们马上会停止前进，等待船上发出继续航行的命令。当岸边的悬崖无法为他们提供立脚点时，纤夫们就会坐上那艘救生艇，暂时返回大船。回到船上的他们也不可能休息，而是要立刻帮助船员摇桨，等到了合适的地方再上岸接着拉纤。这些纤夫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工作过程中还要连续发出有节奏的古怪声音，船长则站在甲板上发出类似的声音，指挥他们行动。纤夫们采取轮流休息的制度。所谓休息，其实就是暂时放下纤绳，蹲在路边抽两口烟，他们的烟斗好像是公用的。为他们服务的厨子整天忙着烹制数量可观的饭食，饭食的内容则是雷打不动的米饭、蔬菜和豆子。



作者拍摄的长江三峡

夜幕降临，我们的船在岸边悬崖下找了个类似小港湾的地方抛锚

休息。船员们照旧吃饭，搭帐篷，抽烟，睡觉。我们根据他们的作息制度调整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4月10日

早上5点半，我们起了床，船员们也正在准备新一天的工作。5点45分，我们继续航行。这天过得不错，两岸的美景不断映入眼帘。那些中国船员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不过他们总是满不在乎地把自己承受的一切都称之为“玩儿”。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7点半，这些人足足工作了14个小时。中间只是偶尔停下休息个10来分钟，抽口烟，再就是急急忙忙地吃了顿米饭配豆子和鱼的午饭。我们这一整天就是待在舱房里，或者去前甲板观赏景色，感叹那些纤夫怎么会有使不完的力气，能拉着这条船一直朝前走，从日出拉到日落。这些人肩膀上的纤绳通过某种金属机关连接着主纤绳。拉纤时，他们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前拽，脸恨不得都贴在了地面上，从远处看就跟四脚着地爬着走差不多。偶尔必须站直身子的时候，他们也要用两条胳膊拼命地拉。不管用什么姿势拉纤，纤夫们都必须不断发出尖叫，以便给自己和同伴鼓劲儿。这些纤夫们的工作就是根据船长发出的信号拉着船向前走，其他什么也不用管。纤夫们身后还有两个船员远远地跟着，他们的工作是要保证连接桅杆的纤绳不被岸上的礁石卡住或者割断，同时还要避免这条船的纤绳给别的船的纤绳缠在一起。

这天下午1点，我们遭遇了首个最危险的江段[38]。通过这个水域前，我们的船靠岸停了会儿，从岸边的一排棚屋里购买了些新纤绳，还雇佣了几个临时纤夫。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我们的船驶入了激流当中。纤夫们走在距离这条船前面1/4英里左右的位置，远远地还可以听到他们的吼叫。救生艇就在我们附近航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船长站在甲板上拼命敲鼓，不停地给纤夫们发信号。我们的船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向前挪动，周围的水像开锅了似的，翻着泡沫和浪花，船身左右摇摆得非常厉害。尽管如此，船长和船员们还是表现得非常冷静，平安地将船带出了险境。

那天下午再没发生什么事情。晚上，我们照例停泊在岸边的悬崖下休息。周围没有一丝亮光，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4月11日

还是早上5点30分起床，船员们正在升起风帆。他们的嘴里发出各种怪异的响声，那是在召唤风神。慢慢的，风帆被风吹鼓了起来，我们的船开始移动。刚开始的情况显得非常惊险，突然，远处的天际起了条白线。白线越来越近，变成了巨大的，翻滚着白色泡沫的水墙壁。这个地方叫“泄滩[39]”，是从宜昌到夔州这个江段最危险的一处险滩。水流非常急，船员们拼命划桨，想尽办法让船向前移动。船长突然下了道命令，某个船员嘴里叼着条绳子，徒手跳进水里，游到船前面200码左右的岸边，找了个地方把绳子拴上。船员们利用这个机会快速划桨，向前挺近。岸边终于出现了可以下脚的小路，救生艇赶紧把纤夫们送到岸边，这些人再加上从当地临时招募的200名纤夫一起用力把船一点点儿地拉了上去。眼前的景象非常壮观，岸边的悬崖足有3000英尺高，江面异常狭窄，两岸的山峰就好像随时都会合拢，把我们夹在里面一样。

我们抬眼向前望去，看不到险滩的尽头，不过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只要过了这个江段，就将进入一个风景优美而且不那么危险的区域。船员们显得非常紧张，只有他们的厨子镇定自若，继续在甲板上做饭，就好像周围的一切根本不存在。这个人显然对船长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很多次，船被激流冲得连续后退，让人感觉头晕眼花;很多次，船员们再次奋力划桨，慢慢地把船往上挪。船长镇定地站在巨大的舵杆旁边，眼睛直视前方，随时准备发布命令。据说，船只在这个江段失事遇险的可能性是20%!

船慢慢向前移动，我们距离水流最急的位置只有200码左右了。这是段非常恐怖的记忆。此时，一侧江岸的峭壁已经无法继续为纤夫提供下脚的地方，救生艇迅速把他们转移到另一侧。我们的船在巨浪中随波逐流，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险情突至，前方的巨浪中显出一块直立的礁石，我们的船紧急转向。救生艇上跳下个人，朝着我们游了过来。船上的水手朝他扔了根绳子，这个人叼着绳子游向岸边，把绳子拴在巨石上，帮助我们保持航向。我们的船脱险了!船员们没那个工夫庆祝，再说周围的浪涛声非常大，就算高声尖叫，别人其实也听不见。船长找了架短梯子，爬上船舱的最高处，站在那里继续

指挥。

不管怎们说，险情终究还是过去了，船员们的表情都轻松了起来，开始清洗甲板。那位淡定的厨子刚才不知跑到什么地方躲避了会儿风浪，现在又回到甲板上继续做饭。已经11点30分了，船在激流中只移动了很短的距离。平心而论，在流速9节[40]的河道中行船，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的纤夫拉纤时必须时刻注意让纤绳避开河道里的巨石。居高临下的水流不但冲得我们无法前进，有时还能把船头整个埋进水里。为了让船避开礁石，船员有时候只能跳到水里，用自己把船和礁石隔开。我们的船发了疯似的上下左右摇晃，弄得我都有点儿晕船了。

前面的激流里露出了块更大的礁石。我坐在船舱里兀自琢磨着我们怎么才能避开它。船在距离这块礁石不远的地方靠岸停下，稍事休息，做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船长拿了根蜡烛检查船舱，保证没有漏水的地方。准备工作完成，我们冲着礁石开了过去。感谢上帝!我们的船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任何问题。我看着那块礁石离我们越来越近，船长在鼓上有节奏地敲了一通儿，鞭炮声同时响起。我询问仆人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说是为了祈求平安，保佑船不翻。我们终于来到了礁石面前，当时的感觉真好像是在玩儿命，让人感觉头发都要立起来了。所幸，总共300名纤夫一点点儿地把我们拉过了这个危险的江段，进入了安全的水域。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们的船来到了美丽且安全的江段，两岸的悬崖峭壁回落到目视可及的高度，视野非常开阔，水流变得平缓起来。周围的山上可以看到有中国农民正在耕种梯田，种植的大概是水稻、小麦、黄豆、油菜、大麻[41]、罂粟之类的东西。那些人力无法触及的地方，就长满了各种野生的树木和花草。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早，多数野花还没开放。据水手们说，等到花儿开了的时候，景色更美。

河面上吹着微风，我们的船缓缓行进。经历过刚才的险滩后，这样的感觉弥足珍贵。纤夫们不再拉纤，而是返回船上帮助船员摇桨，每摇一次桨，他们照例还是要发出有节奏的喊声。夜幕降临，我们来到了距离夔门50英里左右的江段停留休息。这个地方停了很多跟我们

差不多的船，有的已经停了3天，他们都是等着通过前面的险滩的。

4月12日

这天的情况可谓千回百转、柳暗花明。早上刚过6点，船员已经做好了进入险滩的准备，不过当地的规矩要求所有船只只能排队依次通过，所以我们只能等在其他船的后面。这样的等待持续了3个小时，实在烦人。大概9点左右，我们终于出发了。我们的船没装什么重东西，不过由于当地的条件只能从岸边一侧拉纤，所以船走得还是很慢，远远地落在了那些满载货物的船的后面。这样的速度让人心烦。后来，船长发信号让救生艇靠过来，把我们转移到岸边，接下来的路，我们只能跟在纤夫后面，在峭壁上步行前进。走累了，我们就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看着纤夫们一点点儿地往上拉船，看着我们的船在水里吃力地移动。

这天，我们经历了两处危险的江段，这两个地方的流速都达到了10到12节。对我们来说，上岸步行，看看风景倒是一种不错的生活调剂。近处、远处的山峦在视野中呈现出棕色、翠绿或浅灰的颜色，江水翻腾着从它们脚下流过。当天晚上，我们抵达了宜昌上游大概70英里的巴东。



驻扎四川的清军士兵

4月13日

早上5点30分左右出发，温和的江风推动着船帆，我们很快来到了巫山峡[42]。这是长江上最长，也是景色最美的一段峡谷，美得无法用语言描述。巫山峡总长20英里左右，两岸的山峰多得数不过来，山脚下就是漫长的航道。周围非常安静，我们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水流声和划桨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沉船出现在视野当中。我们这天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被石头围起来的湖里航行一样，前后左右都看不见地平线，只能看见头上的一线蓝天。只有脚下不断向后流淌的水流才能让我们意识到这条船还在向前行驶。

晚上5点30分，我们经过了湖北与四川的分界线。这个地方有个小村子。按照传统，不管上行还是下行的船只都要停在这里，享用一顿猪头宴，我们当然也不能例外。船还没靠岸，船员们的厨子就已经手脚麻利地收拾起了猪头，手里没有工作的船员也都跟着动手帮忙。

猪头煮熟后，他们没像往常那样急着开吃，而是举行了某种宗教仪式。厨子庄重地脱帽，点上香，插在香炉里慢慢燃烧。然后，他双手举着些祈福用的纸，放在脑门儿的位置，反复跪下磕头，然后就点燃了这些纸，投入水中。那个煮熟的猪头被恭敬地摆放在甲板上的神位前面，向神献祭。整个过程都伴随着鞭炮的声音。仪式结束，猪头当然很快就被船员们吃得干干净净了。

4月14日

今天跟昨天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连续经过了4处险滩，有些江段由于无法拉纤，只能全靠划桨通过。来到最后一处险滩时，我们的船头被撞坏了一块。危急时刻，全体船员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每个人都在大声喊叫着鼓劲儿。好在船头被撞坏时，我们今天的行程已经基本结束，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天下午，船上还多了个人，船长的老婆给他生了个孩子!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那么船上势必要举行比较盛大的庆祝活动。只可惜，那个孩子是个小姑娘，所以一切就都从简了。我已经弄清楚，原来船长的老婆就躲在一间小舱房里，他全家都住在那里面。不光是船长夫妇和那个新生儿，还有船长的母亲。据我观察，那个老太太为人非常和善，船长的老婆虽然只生了个女孩，她却还是非常得意。

几天相处下来，我们跟船员们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这些人都挺不错。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我们的话，不过大家都可以明白对方的意思。今天，那个镇定的厨子找到我，向我展示他小腿上一处糟糕的伤口，请求帮助。我随身恰好携带了些纱布和绷带，就替他简单处理了一下。其他船员都善意地在周围看热闹。那之后连续几天，厨子都来找我处理伤口，显然对我的医疗技术非常满意!有了这个先例摆在那儿，其他船员有了伤口也都找我处理。这些人身上的伤口让人看着非常难受，尤其是他们的腿和脚，几乎每天就那么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可谓伤痕累累。因为拉纤的缘故，纤夫们的肩膀也被绳子磨得血肉模糊。

顺便说下，纤夫们的绳子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种绳子只比成

人的手指[43]稍微粗一点儿，一头儿拴在桅杆上，一头儿却可以同时承受300个人的拉力!除此之外，这跟绳子还必须承受得住岸边礁石的摩擦力，江中水流的冲击力。不知道中国的匠人采用了什么工艺，我们逆流而上的过程中，这种绳子好像只断过1次。

由于险滩太多，再加上船头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走得很慢。入夜后，我们停在距离夔州府至少还有55英里的地方休息，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巴不得马上睡觉。

4月15日

我们早上动身还挺及时，可一路上险滩太多，再加上还需要避让其他船只，所以耽误了时间。这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看到了进入夔州府前的最后一处险滩，这个地方被称为“风箱峡[44]”，距离我们旅行的终点已经非常近了。当时正好有5艘大型货船正在排队等候通过险滩，为了避免无聊的等待，我们决定转移到救生艇上完成最后的旅程。救生艇灵活轻便，航速是大船的2倍。通过短暂交流，救生艇的船长同意把我们带到夔州府去，换乘等在那里的英国炮舰。我们于是转移到这艘小船上，开始了最后的旅程。

风箱峡大概有4英里长，景色还是非常优美。这段河道非常窄，也就300码左右，水位最高的时候有40英尺。河道窄、水流急，很容易发生危险，当地的官府因此在峡谷的入口处横着拦了道铁链，禁止船只在枯水期通过。这道铁链丰水期时被淹没在江水里，不影响船只通行，枯水期时就会露出来，拦住过往船只。我们来的这个时候当然是丰水期，铁链是看不见的。据船员说，判断这道铁链的位置的标志是岸边一块名为“雁尾岩(goose tail rock)”的巨石。这块石头枯水期时距离江面40英尺左右，丰水期时就差不多被整个淹没。



四川某地渡口

我们的运气不错，沿着风箱峡上行期间，风向多数时间都恰好合适。风向偶尔变了的时候，小艇上的船员就划桨航行，嘴里还要大声呼喊，祈求风向改变。航行期间，除了船员的划桨声，耳边就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两岸悬崖上的岩石大多是白色的，上面还被流淌千万年的江水雕刻出各种坑坑洼洼。小艇航行了2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峡谷中间，感觉周围的气氛陡然变得和缓了起来。目力所及，到处都是农民的梯田，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就这样又航行了2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迎候我们的皇家海军“金沙(kinsha)”号炮舰。当天下午6点，我们登上了“金沙”号，受到了舰长鲍威尔(commander Powel)指挥官和他手下船员的热烈欢迎，大家一起吃了顿地道的英国饭。



在风箱峡航行

我们在“金沙”号上待了整整2天，这条炮舰的主要作用是驻留当地，维护英国的利益。这个地方的西方传教士只有隶属罗马天主教会的皮埃尔·罗杰神甫(P e r eR o g e r)[45]，他已经在中国传教30年了。当地大清地方官特意派了8名士兵，护送我们进城拜访这位神甫。为了抵达皮埃尔·罗杰神甫的住宅，我们需要穿过整个夔州城。据神甫说，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出现在这座小城里的第1位西方女性。基于这样的原因，当地居民理所当然地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我们当然也好奇地打量着当地居民。

总的来说，夔州跟同级别的其他中国城镇大同小异。城里有几条热闹的商业街，还有几座残破的寺庙。皮埃尔·罗杰神甫的教堂混杂其中，显得非常简陋。据神甫说，他目前已经在当地发展了300户教民家庭，当地某些家庭信奉基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由于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久了，神甫本人的穿着打扮也已经非常像中国人，就连口味也变得中国化了。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而且自称可以用汉语直接思考问题。神甫多数时间都是夔州城里唯一的西方人，偶尔才能有西方传教士或者我们这样的旅行者登门造访。

4月17日

我们之前雇的那条小船终于从风箱峡开上来了，大家得以返回之前的船舱休息。由于第2天还要赶路，船上的人睡得都很早。“金沙”号上的经历令我感觉非常奇妙，我此前从未想过能在距离中国海岸线1130英里的内地邂逅自己的同胞。

4月18日

早上5点，我们开始乘船沿着原路向下游行驶。航向变了，水流不再成为阻力，可是那些曾经阻挡我们逆流而上的礁石、险滩却变得更加危险了。更让人遗憾的是，由于船只航速加快，我们已经无法从容欣赏两岸的风光。长江三峡的美是独一无二的，让人经历过一次就永生难忘。顺流而下的过程当然也是时刻伴随着风险的，不过总算有惊无险。再说，我们那条船当时的航速已经达到12节，很多险处你可能还来不及害怕，就已经被甩到后面去了。例如，我们上行通过泄滩总共用了6个小时，可下行才用了大概十来分钟。4月19日晚上9点30分，我们返回了宜昌。4月23日，我们告别小船，重新登上隶属招商局的“桂礼”号。4月25日下午2点，我们回到了汉口，然后看很快又转移到太古公司的轮船上，于4月30日回到了上海。如此奇妙的1个月至此画上了句号。

第五章 北京城

北京可能是全世界风沙最厉害的城市。这座城市是被城墙从四面围起来的，城墙里面是土，城墙外面也是土。春天，狂风裹挟着风沙横扫一切;夏天，只要下了雨，城里就变成烂泥塘，道路几乎无法通行。多数外来者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此都不是很好，然而他们很快又会被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所吸引。所有东方城市当中，北京是独一无二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浸润到了它的一砖一瓦当中，渗透到了城市中的每个居民身上。更何况，这座城市当中还生活着神秘的大清皇帝，他主宰着4亿人的命运。

北京的历史古老得几乎无法追溯。这座城市的雏形出现在公元前1121年，当时被称为“蓟[46]”。公元前221年，蓟城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新城市被称为“燕(yen)”。公元7到10世纪，原来的燕城又变成了幽州(yeoutcheou)。幽州城在辽代遭到焚毁，重建起来的城市改称“燕京(yen king)”。公元1135年，金国灭亡了辽国，他们在原有燕京的基础上修建了新的城市，新城和老城被统称为“中都(tchoung tow)”。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灭亡金国，他的孙子忽必烈随后在1264年又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元大都。西方人最早是通过马可波罗知道了“汗八里[47]”这个城市的。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推翻了大元，元大都改称为“北平府(peping fou)”。1409年，永乐皇帝把首都迁到这里，“北京”的名字由此确定下来，延续到了今天。

现在的北京城存在着满族和汉族两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区[48]。隔开这两个居住区的那道城墙总共有3个城门，分别为哈德门[49]、前门和顺治门[50]。这3个城门每天要按时开闭。北京城的满内城不是标准的正方或长方形城池，它南面和北面的城墙明显要长很多，不过这座城市最初建立的时候就严格依据了中国人强调的正南正北传统。内城总共有9个比较大的城门，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还有齐化门[51]、东直门(tung chih men)、安定门(anting men)、德胜门(tesheng men)、西直门(hsi chih men)和平则门[52]。1860年，额尔金勋爵就曾在安定门外驻扎过。

北京城墙上的城门洞是砖拱结构的，门扇都是厚重的木质大门，上面还钉了很多大钉子[53]。内城的城墙周长在21英里左右，超过40英尺高，规模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城市。北京的城墙从1437年便已雏形初具，永乐皇帝时期又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包了一层砖，弄成了现在的样子。北京的城墙上建有非常平坦的道路，宽度大概50英尺左右，现在这条路上已经野草、树木丛生。站在如此古老的城墙上，看看城外西坠的斜阳，再看看城内灰色调为主的房屋、街道，苍茫的感觉油然而生。通常来说，北京的城墙是不允许平民，特别是女人随意攀爬的。理由是他们的出现可能打扰战神关帝的安宁，给城市带来灾难。

北京内城的9座城门中的一座已经在1900年的战争中遭到损毁[54]，保留完整的城楼都是标准的方形建筑，大概80到90英尺高，



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前门

上面还架设着古老的大炮。每座城门在主城墙以外，还添加了一圈环形防御工事[55]，环形工事的城墙比主城墙还高、还厚。北京所有城门当中在西方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哈德门、前门和顺治门。哈德门的位置最靠西，紧邻使馆区[56]，前门正对着紫禁城的大门，顺治门在最西边。西方人普遍知道的北京“水门(water gate)”并不在正式的城门之列，而是联军在1900年时用炸药开辟出来的。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铺设了铁轨，火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城内[57]。北京前门的城楼以及附近的城墙已经在1900年受到战火损毁，不过相应的维修工作现已开始。前门总共有4道大门，城楼中间的主通道仅供皇帝使用。皇帝出这个城门的目的一般是沿着前门大街前往天坛祭天，或者再向南走，出城打猎[58]。这座城楼附近还有座小关帝庙，1900年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时，特意进去参拜过。很多西方人也曾站在这附近的城墙上，目睹过当时的盛况。北京的城门每天是要按时开闭的。城门关闭后，前门的城门洞子就成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乞丐遮风挡雨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当气温降到华氏8度[59]，就可能有乞丐冻死在这里。每天早上会有专门的马车把他们的尸体收集起来，拉到城外埋葬。马车和埋葬的费用全部是通过捐款获得的，在这方面慷慨解囊被中国人认为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北京外城的城墙相对要矮，也要薄一些，是在1544年才修建起来的。1644年大清帝国建立后，八旗入住内城，外城则成了汉族居民的居住区。时间到了今天，北京城内的满汉民族虽然仍旧分开居住，然而他们在风俗文化方面其实已经水乳交融了。按照大清法律，北京内城不得开设烟馆、戏园子等娱乐场所，这些设施就全部转移到了外城。

我个人认为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欣赏风景是件无比美妙的事情，特别是当天气不错，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景色只要看过一次，就终生难忘。头上是蓝天和白云，远处紫罗兰底色的西山点缀着点点深红或金黄的颜色。城内的苍松翠柏间掩映着皇宫屋顶的金色琉璃，还有众多普通的灰色民居。眼前的北京就像是个梦!若即若离，让你无法确定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梦幻的。

北京内城当中还专门有个被红色高墙圈起来的部分，那就是皇城

的所在。红色的城墙上日夜有士兵把守，城墙内除了紫禁城，还集中了大清帝国的很多最高机构。皇城在4个方向总共有4座大门[60]，它的核心就是神秘的紫禁城。士兵们在皇城的4座大门日夜站岗，城墙上有士兵巡逻。皇城城墙上的转角儿处，以及4座大门的上方都修建有岗楼，士兵们时刻保卫着皇帝的安全。皇城内的紫禁城周围还额外挖了一圈护城河[61]。

皇城西部的西苑[62]可能是这个区域中景色最好的地方。很多西方人都曾利用1900年皇帝和太后出逃的机会，参观过西苑。不过我觉得可能很少有西方人能像我这样，被太后和皇帝正式邀请到这个地方做了一天的客。太后那天没有亲自露面，而是由很多公主代替她接待我们。陪同这些公主的还有众多官员、太监和宫女，他们的出现为那次做客增添了不少乐趣。

作为贵宾，我们得到了在皇家专属的太液池(the lotus lake)上泛舟的荣耀。我们登上那条覆盖着明黄色棚顶的游船，航行经过了白塔和五龙亭，然后又穿过了一座汉白玉石桥的桥洞，这才重新回到满是垂柳的湖岸。我们上岸闲逛，享受着与红墙外边那个背景迥然有别的气氛。我们参观的这个区域平时似乎很少有人来，因为路面上都长了很高的草。太液池畔还修建有专供皇帝娱乐使用的2英里铁路[63]，不过配套的火车已经没了踪影。很可能是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跟那些金银财宝一样，被各国联军给抢走了[64]。参观过铁路，我们又去了蚕坛[65]，据说太后本人每年都要到这里祭祀。离开蚕坛，大家来到紫光阁。1874年时，各国公使在这里首次得到了同治帝的接见。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一处圆形的寺庙，里面供奉的玉佛跟真人一样大，价值连城[66]。这个地方还保留着1900年遭到联军洗劫的痕迹，地上尽是屋瓦和瓷器的碎片。我们此次做客也参观了澄观堂[67]。想当初，光绪帝结束漫长的等待，亲掌大权后，慈禧太后就从紫禁城的宫殿里主动退了出来，将这个地方作为她冬季的住所。我们登上石头台阶，进入了长满各种爬藤植物的庭院。这间宫殿在1900年曾被瓦德西元帅和他的参谋们作为司令部使用。后来澄观堂遭到联军士兵洗劫，还被点着了火，差点儿完全烧毁。瓦德西元帅和参谋们当时还待在宫殿里，元帅本人比较幸运，及时逃了出去，一名参谋却不幸葬身火海。现在

这个地方能搬动的财物基本都被抢干净了，有些则被大火烧毁了。



北京城内街景

我们此行还参观了光绪帝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短暂扣押的那处宫殿[68]。这座宫殿位于湖心的一处小岛上，只能通过石桥与湖岸连接。那处宫殿非常漂亮，按中国人习惯的标准来说也算舒适，到处都是黑色的木雕和明黄色的帐子。待在这个地方，我禁不住要去想象当年光绪帝和他的随从们是怎样在这里忍受枯燥的生活，通过屋顶的平台眺望远处的景色解闷的。

煤山[69]也在皇城的范围以内，是人工堆起来的，大概150英尺高，周围也有城墙和护城河环绕。煤山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因为当年有很多专供紫禁城使用的煤堆放在那里，以备万一哪天出现被围困的情况，还可以坚持抵抗。传说归传说，今天的煤山已经一块煤都看不见了。按照中国人的风水学理论，煤山的另一项功能是为紫禁城挡住来



紫禁城大门



煤山

自北面的邪气。煤山自从落成以来就始终没对西方人开放过，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地方游玩。站在城墙上遥望，我觉得煤山的景色应该非常优美。煤山上从山下到山顶连续修建了若干个小亭

子，双檐的亭子顶上全铺着黄色的琉璃瓦，亭子与亭子之间有道路相连。煤山的院子里还可以看到很多红色的宫殿和庙宇。当年清军攻破北京时[70]，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就是在这里上吊自杀的。

相比土著居民，北京的街道对西方游客可能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前者对自己身边的风景可能早就熟视无睹了。北京的街道中间往往要垫高2英尺左右，这个垫高的路面两侧都是路沟[71]，街道两侧紧挨着路沟的就是各种商铺和房屋。道路中间垫高了的那个部分平时主要是供车辆通行的。北京的车夫驭使的牲口主要有中国原产的很矮小的马、驴或者骡子。这些牲口通过一系列绳子和铁环跟后面的车辆连接，车夫经常光着膀子坐在车上，想尽各种办法驱赶牲口前进。万一某个车轮不幸陷进泥坑，车夫也得跳下车，用后背和肩膀把车推出来。中国原产的驴脾气挺倔，经常在路上扬着尾巴。那种非常矮小的中国马经常在夏天的时候跟骆驼一起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它们的工作是从远处的山里给这座城市运来煤炭。

北京的轿车主要是老百姓和西方游客的专属车辆[72]，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官衔，因此没资格乘坐轿子的人都可以乘坐轿车。我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这种轿车的经历。轿车停在门前时，我觉得这辆车还挺漂亮的，拉车的骡子也很健壮。赶车的轿夫穿着灰色的棉袍，头上戴着红缨圆帽，就跟画里的形象一样。开头儿都很顺利。我先把一条腿跪在车辕上，小心翼翼地往里爬，车夫反复提醒我小心碰头。爬进车厢后，一个转身，我已经稳稳当当地坐在了里面。坐下以后，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只能那么半弯曲地朝前伸着，蜷不起来，也放不平，这个感觉非常不舒服。话虽如此，想想当初慈禧太后逃出北京时坐的也是这种车子，我心里感觉还是舒服了点儿。整理好裙子，我命令车夫出发。车夫抖手给了骡子一鞭子，骡子开始以某种介于走和跑之间的方式拉着车子前进。北京的轿车不像西方马车那样给车夫设有座位，所以赶车的人只能跨坐在车辕上。这不但阻挡了我的视线，也挡住了新鲜的空气。



北京的轿车

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糟糕。我们当时走的路是由2到3英尺见方的石板铺成的，石板跟石板间存在缝隙，石板上头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洞，车子在上头跑，能把车厢里的人骨头都颠散架了。就这样，我坐在车厢里被颠得滚来滚去。突然，车轮遇见到特别深的车辙，我的帽子直接被颠飞了!我尝试着调整自己的身体，可无济于事，这样的感觉真让人抓狂。屋漏偏风连阴雨，一阵风沙灌进车厢，我吃了个满嘴，不但衣服上、头发上落了沙子，就连眼睛也进了沙子，搞得眼泪汪汪的。我想做点儿什么把自己拯救出来，又什么都做不了，就连嚷嚷也没用，因为轿车颠簸的声音完全把我的声音给压了下去。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坐北京的轿车!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亲眼目击的另一次重大事件是李鸿章的葬礼。中国人的习俗，人死了以后不能马上下葬，而是要根据星象学家的推算，等待一个比较吉利的时刻。李鸿章是在1901年11月7日去世的，他的葬礼则被安排在1902年5月31日。葬礼当天，我们被邀请到李鸿章棺椁停放的寺庙，向这位政治家表达最后的敬意。葬礼的主角是李鸿章的儿子，他表现得非常悲伤。按照中国习俗，父亲去世，儿子不

能剃头、刮脸，还要穿很破、很脏的衣服。我后来听说，这位儿子在他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不久就去世了，有大臣因此向皇帝建议把李鸿章的爵位全部交给这个儿子继承，因为他的死是基于对父亲去世的过度悲伤，是“孝”的表现。在我看来，这可能纯属巧合[73]。

李鸿章的棺材当时覆盖着帷幕，外人看不到具体的情形。棺材前面摆放着漂亮的蓝色香炉和烛台，香不停地烧，整个屋子里都烟云缭绕。李鸿章棺材的右边站着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儿子，在他的左侧站着的应该也是李家的亲属。这个人从头到脚都穿着孝，模样显得非常干练、精明，不过他的关系应该跟李鸿章比较远，所以可以剃头、刮脸。棺材右侧站着的人跟他们的穿戴差不多，明显也是李家的人。棺材前头摆着3个拜垫，左右两个都没有外罩，中间那个外面还有层丝绸质地的罩子。这个垫子是专供身份比较高的王公大臣使用的。吊客进入这间灵堂后，首先要走到棺材前头稍稍停留，然后再跟站在棺材两侧的李家人寒暄几句。寒暄过后，他们就跪在拜垫上磕头行礼。磕头时，需要手背朝下平放在地面上，脑门要碰到手心。行礼结束，他们被带到灵堂的外间。这件房间到处装饰着白色，窗户也被白色的帘子遮住，显得很昏暗。客人们坐在这里，享用仆人端上来的茶水和点心。李家特意在灵堂最外边的大门处安排了两名仆人，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搀扶某些客人迈过门槛。虽然中国传统乐队始终在灵堂里演奏着悲伤的音乐，不过大家的情绪明显没受太大影响，反而显得乐呵呵的，就像参加一次普通聚会。这或许是因为举行葬礼的时间距离死者实际去世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的缘故吧?

灵堂外面的庭院里摆放着各种纸糊的神兽，全都跟真的一般大小，它们的身体主要都是用纸和柳条之类的东西弄出来的。我注意到，它们中间有只纸糊的京巴儿，它的身体比其他的神兽都大[74]。神兽当中还有很多真马大小的纸马，每匹纸马都配了对应的纸糊马夫，马夫身上穿着纸糊的全套官服。从远处看，你可能会觉得这支骑兵小队就是真的，可是走进一看，就难免莞尔，因为纸糊的东西毕竟没有真人、真马那么生动。更何况，那些纸人脸上的表情也非常滑稽。所有这些纸糊的神兽当天晚上都按某种固定的程式给烧掉了。这么做，据说就可以让它们在那个世界侍奉死者的灵魂。出于同样的目

的，李家的人还为李鸿章准备了大量纸糊的仆人、房屋、轿车、箱柜、家具，当然还有姬妾。灵堂外面，还有很多人手里举着大概10英尺长的杆子，杆子上挂着用金字写成的条幅，条幅的内容主要是对死者生前品行的赞扬，以及皇帝授予他的荣誉称号。



李鸿章和家人

第2天早上，我们目睹李鸿章的灵柩从北京踏上了返回安徽老家的旅程。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要有条件，人去世后肯定要把灵柩送回老家，而且还要埋在祖坟里。为了护送李鸿章的灵柩出城，士兵们已经提前在大街上站好了岗。走在灵柩队伍最前面的是由仆人们抬着的各种纸糊的东西。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些纸人、纸马之类的东西已经在夜里被烧掉了，这些是重新制作出来的。跟在各种纸糊东西后面的，是由仆人们举着的各种伞盖和红色的官衔牌子。这些人过去后没多久，李家的亲属们出现了，他们照旧穿着白色的丧服。走在亲属队伍最前面的是李鸿章的那个儿子，有8个仆人专门替他撑着白色的伞

盖。其他关系相对疏远的男性亲属则跟在这个儿子后面。女性亲属由于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只能乘坐白色的轿子，跟在男人身后。李鸿章的灵柩装在马车上，跟在亲属队伍后面。紧跟着棺材马车的还有若干辆马车，他们负责运载死者留在北京的财物。众多身穿苹果绿色服装的仆人跟在马车后面，他们头上都包着白布。各式各样的轿车和轿子，全部都是白色的，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队伍当中还点缀着乐队和被李家雇来的职业哭丧者。乐队的乐器主要是吹奏乐器、打击乐器，还有一种特大号的喇叭。队伍行进途中，不断向空中抛撒各种纸质的钱币和银元宝、金元宝。大风偶尔吹开了天上的云朵，阳光就直直地落在了送葬队伍的头上。这样的情形即便在北京也不常见。

说完了李鸿章的葬礼，还是让话题再回到北京的街道上来吧。前面说过，北京道路中间高出来的部分是专供车马通行的，行人都要在两侧的沟里行走，行走过程中还得小心各种泥坑和水坑。道路两侧只要有空地的地方，肯定就有做生意的小贩。这些小贩跟大的店铺不同，他们做生意不挂幌子。他们出售的商品主要有旧的衣服(大多是蓝灰色棉布的)、宠物鸟、各种铁器、鼻烟壶和水烟袋等等。小贩们的东西卖得很便宜，可买主总还是要还个价。有时候，讨价还价的声音可以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行人通行的沟里偶尔也可以看见近乎赤裸的乞丐。乞丐跟普通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剃头，因此也就无从谈及编条像样儿的辫子。待在路边沟里等着做生意的还有盲人算命先生，这个职业在中国非常古老，而且的确有利可图。尊重老人和弱者是中国人的美德，北京城的老百姓都非常尊敬这些人，称呼他们为“先生[75]”。沟里的泥坑和水坑虽然妨碍通行，却是小孩们游乐场。北京城向来多风沙，雨季一到，风沙就变成了稀泥。

有群人正围在那看热闹，你也忍不住凑了过去，越过他们的肩膀，向人群里张望。这种情况下，人群中间要么是个耍杂技的，要么就是个拉洋片的。所谓“拉洋片”，就是表演者站在一个大盒子旁边，通过机关不断变换盒子里的图画。观众透过盒子上的小窗户朝里面看，表演者根据图画的内容讲故事。北京街头做生意的小贩真的五花八门，谁要是想剃头(全程不用肥皂)，花1个小钱就可以找到剃头匠;要是身体闹点小毛病，也可以随便在街上买点儿药吃;如果肚子饿了，

那更容易，到处都是卖小吃的。可以这样说，北京街道的每个拐角儿差不多都有卖小吃的棚子，就算最挑剔的食客，也可以找到心仪的选择。要是想吃鱼，街上就可以找到装着活鱼的大盆，现杀现做。在街上杀鱼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还有小贩直接在街上宰羊，很短时间就能把它们变成美味的食品。当然，这样的场景对那些心地过于善良的人来说是不太适合的。如果你属于这样的人，不妨欣赏欣赏那些装在笼子里的小鸟，看看它们漂亮的羽毛，听听它们婉转的歌喉。



街头的小吃摊



街头的流动商贩

北京搭棚子沿街做生意的小贩往往都要背靠正规的大商铺作为依托，拥有这种商铺的商人非常富有，也非常有教养。走进店铺，这些商人会微笑着请你喝茶，从丝绸质地的包裹里拿出珍贵的货物向你展示。他们的店铺门口永远打扫得一尘不染，大门上方通常悬挂着金字的匾额。一般来说，店铺开张时间越短，金字就越鲜亮。年深日久，金字就会变得暗淡下来。店铺门口还会挂着幌子和各种旗帜，向路人宣传自己的经营内容和信誉承诺。顾客不用进店，就可以知道这家买卖是做什么的。

北京街头的路人同样形形色色，汉族人、满族人、蒙古族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能看得见。非富即贵的上流人物把肥胖的身躯塞在轿子里，在街上鸣锣开道。和气的买卖人站在柜台后面，始终保持着微笑。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大多穿着蓝棉布的衣裤，头上永远缠着毛巾。和尚们的头总是剃得光光的，在太阳底下闪光。没目的乱逛的闲人手里举着架杆儿，架杆儿上落着他们的宠物鸟，还有的闲人三五成群地围在那儿斗蛐蛐。士兵们扛着枪，为了防止风沙灌进枪管，枪上都包了红绸子。北京的街头什么人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上流社会的女性。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她们不能随便走出自己的家门，反倒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在街上闲逛。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北京街头的声响有时的确令人心烦。唯一能让人觉得内心平静的声音来自天上的鸽群。这些鸽子的尾巴上拴着特制的哨子，盘旋飞翔时就能发出悠扬的声音。据说，北京人使用的鸽哨光形制就有11种，每种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音色堪比竖琴。

这就是北京的街道，永远灰蒙蒙的，喧闹、嘈杂、繁华，可能还有点儿不太卫生，然而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北京比较有意思的名胜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天坛，还有钟楼（the bell tower)、鼓楼(the drum tower)、黄寺[76]、雍和宫(the great lama temple)、孔庙[77]，当然也包括跟西方人颇有渊源的北堂[78]。

钟楼非常值得一去，因为这个地方悬挂着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钟。这口钟最宽的底边周长足有34英尺，重120000磅。1406年，永乐大帝总共下令铸造了5口这样的钟。据说，铸钟期间，曾把8个人投入熔化的铜水充当祭品[79]。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献身，大钟才能够发出无与伦比的声音。每逢节日或其他重要日子，悬挂在钟楼上的这口大钟还要被敲响。这口大钟挂在那，外形近似倒置的百合花。悬挂大钟的屋顶还特意开了个洞，那是为了防止声波反射，把钟给震坏了。永乐大钟的内外密密麻麻铸满了文字，每个半英寸左右大小，足有84000个[80]。鼓楼距离钟楼非常近，是元大都的遗迹。这座建筑上有面大鼓，负责整个北京城的报时工作。鼓楼在乾隆帝当政时期得到了修缮，这座建筑和它的周边是北京景色最好的地区[81]。



大钟寺

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远远就可以看见黄寺漂亮的金色屋顶。这座寺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帝时代[82]。1780年，六世班禅喇嘛从拉萨来到北京朝觐大清皇帝，就住在这座寺庙里，后来也是在这座寺庙不幸罹患天花去世。六世班禅喇嘛死后，他的遗体被装在黄金的棺材里运回了拉萨，衣服则被装入镶满珍宝的盒子，埋进了黄寺的衣冠冢[83]。这座衣冠冢上镶嵌了7块金版，写满了记述六世班禅生平的文字，金版周围装饰了各种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图案。黄寺应该算是北京城范围内最精美的佛教寺院，只可惜，这座寺院在1900年遭到了日本军队的洗劫。



黄寺

雍和宫就在距离黄寺不远的地方。这座寺庙原先是雍正帝还没当皇帝时居住的官邸，他登上皇位后，就把这里改成了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鼎盛时期可以容纳3000名喇嘛在里面修行，不过现在喇嘛的人数已经降低到了500人。统率这些喇嘛的最高等级喇嘛通常被尊称为“活佛”。相比黄寺，进入雍和宫参观、游览的机会还是比较容易得到的。这座寺庙可能是全北京最宏伟、最有意思的寺庙，它基本都是木结构的，大殿一间连着一间。整个寺庙靠右的区域主要是供喇嘛和香客居住的区域。雍和宫里供奉着一尊鎏金木佛[84]，是用整棵大树雕刻出来的，足有70英尺高，木佛的脑袋刚好碰到大殿的屋顶。雍和宫大殿正面供奉着3尊坐姿佛像，佛像们的两侧还有两尊站姿雕像[85]，大殿的两侧还矗立一些可能是十八罗汉之类的雕像。佛像前面的供桌上摆放着众多精美的铜器和瓷器，有些据说还是皇帝赏赐的。雍和宫的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寺庙里的很多漂亮家具、建筑都显得乌突突的，上面的彩绘也非常斑驳，还被香火给熏黑了。

我们游览的当天，喇嘛们正聚集在正殿后面的大殿里从事某种活动。我们站在那儿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只记得这座大殿非常昏暗，只在门框的位置点了很少的灯。连续穿过三道这样巨大的门框，

可以看到庄严的坐姿佛像。等级最高的喇嘛，也就是活佛，背对佛像坐在那里，众多喇嘛则面朝着他站在那里。某位年轻的喇嘛身穿漂亮的红色僧袍，同样背对着活佛和佛像，正在摆放供品。

站在大殿外面，通过三重门道，可以直接看见大殿的最深处，中间只有少量高大立柱遮挡视线。佛像前面成排摆放着类似垫子或凳子似的东西[86]。只见喇嘛们纷纷在各自的垫子上跪下，把神圣的经书摊开放在面前。这些喇嘛的穿着都差不多，都是跟那位负责上供的年轻喇嘛一样的红色长袍，可以把从肩膀到脚踝的身体整个包住。他们的年龄跨度在10岁到60岁之间，可能还有更年轻的。不管老少，都剃了光头。他们用一种平缓而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语气诵读着内容相同的经文，偶尔停下来敲下木鱼或者铃铛。

诵读了一阵子经文后，喇嘛们走出大殿，来到院子里。很多人老早就等在这里，观看喇嘛们的神秘舞蹈，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两次[87]。我们由于跟其中的某位喇嘛关系不错，因此得到照顾，被带到附近的露台上观看，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喇嘛们来到院子里后稍稍站了会儿，没有任何动作。突然，两个装扮成妖怪的人冲入人群。他们身上穿着白色的紧身衣服，脑袋上带着象征死神的面具，全身还用红色颜料画了很多奇怪的符号。这两个人手里挥动着让人看着就害怕的长皮鞭，嘴里发出怪叫。鞭梢儿所到之处，大家纷纷退避，一块空地很快就被清理了出来。



喇嘛

喇嘛们排成行列，来到这块空地，慢慢舞蹈起来。我实在数不清眼前究竟有多少喇嘛在跳舞，只记得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服饰，脑袋上还戴着象征鸟兽的面具，一个比一个吓人。伴随着节奏古怪的乐曲，他们2人或4人一对翩翩起舞，跳舞过程中还要不断鞠躬、摆头、晃肩。舞蹈持续了几个小时，围观的人越看越高兴，不顾皮鞭的威胁，向着跳舞的喇嘛围了过去，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则利用这个机会，仔细打量那些看热闹的人。他们当中有穿着棉袍的男人，有衣着颜色相对鲜艳的妇女，还有不少穿着灰色僧袍的和尚[88]。这些人五颜六色的衣服映衬着古老的寺庙、黄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石头栏杆，我觉得，可能只有西方画家的笔才能把如此丰富的色彩在画布上呈现出来。



戴面具跳宗教舞蹈的喇嘛

出了雍和宫，不用走多远，就到了孔庙。这个地方是喧嚣的北京城中少有的宁静所在。孔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平添了几分苍凉的感觉。我们在参天的松柏下漫步，欣赏着那些雕刻着历代进士名字的石碑。石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上面雕刻的名字都是每次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幸运儿。看着这些名字，就好像直接触摸到了中国漫长的历史。无论历史如何风雨飘摇，孔子始终是这个民族共同的老师。不管皇帝，著名学者，还是达官贵人，无论年少，还是年老，都要在孔子面前匍匐下拜，向这位老师表达敬意。

孔庙的大殿建在一个汉白玉基座上。基座上的三层台阶，跟孔庙的三重大门是正对着的。大殿正面宽84英尺，使用的红色木头立柱足有40英尺高，屋檐上画满了精致的彩绘。大殿里除了孔子的牌位外，还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供奉了10个他最著名的学生的牌位。大殿里没什么家具，光线有些昏暗，日积月累的尘土和蛛网给人一种古老、神秘的感觉。紧邻大殿的庭院里摆放着10个石头雕刻成的鼓[89]，那上面刻了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文字，这些文字的内容据说是记载了公元前8世纪某位中国皇帝的打猎活动。乾隆帝曾下令给这些石鼓搞了套复制品，现在，这些复制品就摆在原品旁边。孔庙大殿旁边还有一处名为“明伦堂[90]”的建筑。据说，皇帝每年都要在这里接见那些学习成绩最出众的学生。明伦堂的外面立了300块石碑，上面雕刻着众多阐述孔子思想的著名作品的名字。

樊国梁[91]主教传播福音的北堂旧址几乎在1900年被夷为平地，现在的北堂是重新修建起来的。据说，老北堂的某些残骸现在被保存在紫禁城内，这样的做法好像跟风水问题有关。

第六章 结交慈禧太后

你可以想象，我来到北京后几乎立刻就被邀请，随同诸位公使女眷进入紫禁城，觐见慈禧太后，那是多美奇妙的经历。这次觐见被安排在慈禧太后位于紫禁城内的冬季住所。当时，我坐在轿子里，穿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大门和庭院，满眼看到的都是精美的龙形图案，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漂亮器物。经过的每处庭院都种植了高大的松树，油漆成红色，屋顶铺着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就掩映在松荫里，庭院与庭院间还有小桥流水相互联系。我觉得，那些建筑可能就是皇室成员的住所。来到慈禧太后住所附近时，轿子被命令停止前进，我们必须换乘由皇宫内的轿夫抬着的肩舆。太后居住的宫殿矗立在汉白玉的基座上，某位皇室成员正站在基座的台阶上等候欢迎我们，他身后还站着成群的王宫大臣、宫廷贵妇和仆人。

告别耀眼的阳光，进入大殿，立刻感觉神清气爽了起来。原来大殿当中放着个巨大的瓷盆，里面盛满了冰块，那是降温用的。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端坐着慈禧太后。她的面前摆了张铺着黄色绸子的桌子，桌子上放了两个花瓶，花瓶里插着新鲜的菊花。这两个花瓶中间还放了个玻璃的小瓶子，瓶子里插着价值连城的珊瑚树。为了看清楚我们，隔着桌子跟我们握手，慈禧太后稍稍把插着珊瑚的瓶子往旁边挪了挪。这样一来，我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名声早就如雷贯耳的女士。

她坐在一个没有靠背和扶手，类似沙发的座位上，这个座位外面包着接近鸡蛋黄颜色的绸子。由于座位比较低，她的脚放在地上整个被衣服和桌子遮住了，我们只能看见她露在桌子以上的肩膀和脑袋。需要说明的是，满族女性跟汉族女性不一样，她们通常是不缠足的。

慈禧穿了件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袍子，袍子很宽松，丝绸质地，上面绣满了精美的刺绣，应该是挂着果实的葡萄藤。慈禧的脖子上围了条蓝缎子饰带，大概1. 5英寸宽，缀满了珍珠[92]。她的头上戴着满族的传统头饰，头发非常浓密，可以盖住耳朵。所有头发归拢到脑后，再向上梳，盘成个发髻，发髻里插了个绿色玉石质地的裁纸刀似的东西[93]，玉石裁纸刀露在头发外边的末端还装饰了红色丝绸做的假花和蝴蝶，像流苏一样垂在那里。由于居孀的身份，按照中国习俗，慈禧的脸上没有抹太多脂粉。她的目光异常敏锐，特别是当她定气凝神，不向周围乱看的时候，据慈禧自己介绍，她今年已经68岁了，不过她的头发还完全都是黑的，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慈禧的手指纤细修长，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每个指甲都做了繁复的装饰。跟普通中国妇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慈禧的指甲留得非常长，长得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保护过长的指甲，她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戴了两个金质的指甲套。通过这两个指甲套的长度判断，她的指甲至少有3到4英寸长。



北京国子监孔庙正殿

向太后表达过敬意后，我们转向她左侧稍稍矮些的座位，光绪帝



慈禧

就坐在那里。光绪帝的名字叫“载湉(tsai tien)”，不过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直呼别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所以也就很少有人知道光绪帝的名字是什么。身为皇帝，光绪帝受到了臣民们的无限恭敬。他每次离开紫禁城上街的时候，老百姓要全部回避，临街的门窗也要关起来，因为就连偷偷看皇帝一眼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臣民们见到光绪帝时要磕头行礼，标准的程式被称为“三跪九叩”，而且整个行礼过程中，他们的眼睛绝对不能偷瞄皇帝。专属皇帝的东西都有特别的颜色或标志。例如，他吃饭用的瓷盘子、瓷碗都是明黄色的，仅供他一人使用。他的衣服和器具上经常可以看到龙

的图案，而且是5个爪的龙，其他王公大臣身上的龙形图案则只能有4个爪[94]。皇帝的座位别人绝对不能坐，哪怕它刚好空着也不行。大清帝国的每个城镇都设有类似皇帝居所的房间，里面的装饰全部采用明黄颜色，还象征性地设有皇帝的宝座。每年皇帝生日的前3天和后3天，当地的文武官员都要来到这个房间，对着那张空椅子行三跪九叩礼，就好像皇帝真的坐在那里一样。



光绪画像

皇帝无比威严，然而光绪帝在慈禧太后面前却永远矮上一截子。事实上，我们刚进大殿的时候，要不是有人特意指引，大家几乎就没注意到这位皇帝的存在。光绪帝今年据说已经36岁了，不过在我看来，他那样子似乎连26岁也不到。光绪帝的眼睛非常漂亮，又黑又大，只是眼神始终透着忧郁。光绪帝的脸基本属于四方形的，额头突

出，颧骨很低，脸上的表情非常和蔼。光绪帝身上穿了件深蓝色的丝绸袍子，袍子下摆直达脚面，袖子宽得盖住了双手。这件袍子跟大清官员们常穿的那套官服款式基本一样，只不过衣服上象征官阶的方形图案在皇帝身上变成了圆形的[95]。他头上的帽子带有上卷的帽檐，帽顶上装饰了红色的流苏，帽子后面的玉石翎管里插着花翎，这种帽子同样是只有皇帝才能戴的。光绪帝的脖子上挂了串漂亮的项链[96]，是用绿色的玉石和红色的珊瑚串成的。今天这次会面其实压根儿就没皇帝什么事情，他的任务就是陪着太后坐在那里。如果太后打算去别的宫殿走走，他就也跟在后面走，等太后坐下了，再跟着坐下，座位永远都要摆在低于太后的位置。觐见过程中，光绪帝一言未发。

慈禧太后的身边站了一圈儿宫廷贵妇，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年轻的叶赫那拉皇后[97]。这位皇后不像她的婆婆那么果决而有威严，见了外人，她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红。出现在觐见场合的，还有受慈禧宠爱的庆亲王[98]的女儿。这些宫廷贵妇身穿颜色、图案各异的袍子，还带着众多仆人，形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

觐见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每位公使女眷依次走过去跟慈禧太后握手。我实在想不出慈禧是从什么地方学会这套西方礼节的?依次握手完毕，慈禧站了起来，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说，待会儿大家将被带到别的宫殿，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招待宴席。中国传统住宅里每栋房子间都会隔着个院子，距离相对较远。慈禧从宝座上走下来，坐上12个太监抬着的黄色肩舆走在最前面，肩舆后头还跟着个太监给她撑着黄色的伞盖。这些太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皇宫从事各种服务，人数据说有3000人左右。话虽如此，我觉得紫禁城里的太监可能真没那么多。他们都穿着一样的深颜色丝绸长袍，长袍外面还罩着同样也是丝绸材质的红色或蓝色短褂。太监们依据工作性质分属不同的部门。最高等级的太监负责皇宫的饮食和服装供应，二等太监负责皇帝的保卫工作，三等太监负责照料具体的皇室成员或宫殿，四等太监负责替皇帝选秀女以及在属于皇家的田地上征税，五等太监负责紫禁城的维修工作，六等太监负责在皇室成员外出时替他们净街，七等太监负责依照主人的命令监督、惩罚紫禁城内包括其他太监在内的各色人等。为了节约

开支，皇室作出了很多努力，不过紫禁城每天的开销还是大得吓人，太监们在这方面当然难辞其咎。紫禁城里等级最高的太监姓李[99]，他对大清朝政的影响超过了很多王公大臣。

公使女眷们跟在太后的肩舆后头，前去赴宴。紫禁城临时为我们每人配备了两名宫女，她们负责全程搀扶、陪伴我们。紫禁城每3年就要举行一次宫女选拔活动，她们主要来自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旗人家庭，进入紫禁城后当然也很难获得更高的地位。这些宫女长到25岁，就要离开紫禁城，回到原来的家里。按照大清帝国的法律，汉族妇女不可能进入紫禁城，所以这个区域里就看不到缠足的女性。这些充当宫女的小姑娘看起来都生活得很愉快，我悄悄问其中一个她们不在皇帝面前服务的时候都做点儿什么，她的回答是“玩儿”。

前往设宴大殿途中，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房间。这个区域是完全属于女性的，就连慈禧的翻译也是女性，只有光绪帝一个男人可以来到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专属皇帝的房间，这个房间很大，但光线昏暗，照旧设有配了桌案的宝座，宝座对面还有被称为“炕”的床榻。中国人的床是跟火炉连接在一起的，主体是个砖砌的台子，台子上铺着垫子和被褥。冬天烧火的时候，砖台子就可以被烧热，人睡在上面很暖和。皇帝房间左右两侧的尽头都摆放了安装在黑色木头框子里的大镜子，可整个房间还是显得挺黑，因为这里的窗户全部是那种老式的中国纸窗户。慈禧太后的房间相对更加赏心悦目，这个房间有床，还有那种类似沙发，没有靠背和扶手的座位。房间正中摆放着配有木头底座的玉石屏风，靠墙的桌子上有很多西式的小摆设，那应该都是西方皇室赠送的礼物。我们参观的另一处房间应该是皇家的图书馆。这个房间的屋顶上挂了很多装饰着黄色流苏的灯笼，屋子里除了放书的架子，没有别的东西。那些书也都是用黄色饰带捆扎着的。



慈禧与驻华公使女眷合影

终于，我们来到了设宴的大殿。眼前的景象令人称奇。在这间按中国审美设计的雕梁画栋的大殿里，居然摆放了西式风格的餐桌和椅子。这显然是出于照顾我们的考虑，尽管这些家具跟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餐桌上铺着普通的桌布，为了防止菜汤弄脏桌布，上面又铺了美国产的油布。那张油布是黑色的，印有彩色的花朵图案。桌上摆着若干盘地道的中国菜，但是给客人提供的却是西式的刀叉和勺子，同时也为那些打算尝试下异国风情的客人准备了乌木包银的筷子。每个人的面前还放了条餐巾，餐巾是深色的，中间绣了朵白色的大花。我们吃的菜是中国口味的，酒却是西式的。只可惜，啤酒被错装在了高脚葡萄酒杯里，香槟则被倒在了喝烈酒用的小酒杯里。

虽然慈禧太后本人亲自劝菜，大家还是没吃多少东西，她自己反倒因为陪客的原故，吃了几碗米饭和不少菜，还喝了些奶。宴席过程中，无论公使女眷，还是那些宫廷贵妇，大家都只坐在自己的桌子面前吃喝，唯独慈禧需要在不同的桌子前周旋。慈禧的身后还跟着个仆人，这个人是负责替她端着专用的碟子和筷子的，我们那天用的碟

子、盘子也是黄色的，不过上面还有绿色或黑色的龙形图案。那天告辞的时候，慈禧按照中国习俗把我们用过的碗筷、餐巾，还有记载着当天宴席上各种美食名称的菜单送给大家留作纪念。那次宴会，光绪帝照旧坐在低于慈禧太后的位置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吃，就是抽了几支西式的香烟，他的皇后也抽了几支，两个人都是一脸享受的表情。

宴会过后，我们排着队被肩舆抬到某处剧场，漫长无聊的大戏就此开始，紫禁城的主人则觉得这样的表演非常有意思。此前被隔绝在女性区域外边的各国公使们此时也加入到看戏的人群中来。我想，他们应该在其他某个地方也受到过跟我们相似的款待了。演出结束，我们被肩舆抬到外面，换乘原来的轿子，各自回家。

我第2次见到慈禧是在保定，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坐火车需要走7个小时。我们来到保定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参观袁世凯在当地开设的一所现代化学校[100]，其次是观看为欢迎慈禧太后、光绪帝、光绪皇后，以及众多王公大臣来到保定而举行的仪式。慈禧等人是在离开西陵(h s i l i n g)返回北京的途中来到保定的，他们前往西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祭奠几位埋葬在那里已经去世的皇帝，同时还要为光绪帝本人选择合适的墓地。返回北京前，慈禧等人将在保定逗留1个星期左右。

据我所知，这是保定首次获得如此巨大的荣耀[101]。能够亲眼目睹太后真容，老百姓们激动万分。为了方便大家瞻仰皇家威仪，沿街的店铺特地被恩准可以在太后、皇帝等人经过时开着门窗，不过店铺的主人必须跪在门口。按照中国人敬老的美德，所有上了年纪的百姓都被安排在人群最前面的位置，小孩则利用灵便的优势拼命往前钻。

那天天气很热，尘土飞扬，保定的地方官特地为我们这些洋人在路边搭了顶红色的帐篷，还提供了茶水。我看到好几位熟识的地方官都穿了比平时的官服更华丽的衣服。“太后驾临”的谣言传了好几次，他们乘坐的那列火车终于缓缓驶入了车站，军乐队开始奏乐，扛着枪的士兵沿着铁轨站岗警戒。那列火车非常长，机车头上装饰着象征大清帝国的龙旗。紧邻车头的第1节车厢由负责驾驶这列火车的法国铁

路公司人员占用，他们后面挂着4到5节特制车厢，这些车厢比普通车厢大，安装了巨大的玻璃窗，外壁全部漆成蓝色。我看到慈禧正坐在第1节特制车厢里，扭着脸朝外看，冲着人群微笑致意。火车很快进入车站，看不见了。大家没等多久，慈禧等人就从车站走了出来，准备前往临时安排的行宫，袁世凯手下的士兵穿着深蓝嵌红色的军服为他们提供护卫。道路两旁立了很多旗帜，还有百姓向太后和皇帝表达敬意的“万民伞”。类似这样的“万民伞”每逢重大活动都要出现，它们是圆形的，撑开后挂在那里。伞的上面写满了众多表示美好寓意的语言，伞面本身也有龙形和花朵的刺绣装饰。“万民伞”通常都是丝绸质地的，颜色各不相同，可根据具体环境选择，不过黄色的“万民伞”只能用于太后或皇帝出席的场合。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光绪帝，他的轿子非常快，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皇帝身后跟着一队挎着刀剑的士兵，太后坐着跟皇帝相似的黄色轿子，走在士兵的后面。眼看太后的轿子走了过来，路边站岗的士兵也全部跪下，磕头行礼。这样就为站在士兵身后的我们提供了更好的视线。慈禧显然也看到了我们，赶紧命令停轿子，不过她的命令被周围人群的欢呼声给盖住了，仆人们没听见，所以那顶轿子也就很快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里。光绪皇后跟在婆婆后面，她乘坐的是一辆漂亮的轿车。这辆轿车的车篷是黄色丝绸的，拉车骡子身上的挽具也都是黄色的，车轮也做了各种装饰，用于彰显乘客的身份。皇后轿车后面还有一连串普通骡车，里面坐的都是身份相对较低的达官显贵。运行李的车走在最后面，车上的东西都用黄色的苫布遮盖得严严的。队伍走过去以后，我们从路边回了帐篷，却在那里意外遇见了肃亲王，他非常不幸地被马踢了一脚。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以至于仆人们找不到可以运载受伤亲王的轿子，最后还是我主动把轿子贡献了出来。第2天，肃亲王为这点儿事特意派人向我表达谢意。中国人在礼节方面确实要比很多民族认真、繁琐得多。

当天下午，慈禧从行宫传出消息说打算让我过去见见面。陪同我从北京过来的罗素小姐(Miss Russell)，也就是已故的阿瑟·罗素勋爵[102]的女儿，也可以参加觐见。罗素小姐当时正和她的母亲还有妹妹在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做客，听说保定有热闹看，就跟我一起过来了。

按照约定时间，袁世凯派了两顶绿色的轿子，还有一队士兵过来接我们。慈禧的行宫非常漂亮，是在太后驾临前1周才刚刚修缮和布置过的。等在行宫的某个小房间里迎候我们的包括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首任外务部尚书王文韶[103]，以及第二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104]，这3个人都穿了黄马褂。我们在这个小房间等候了片刻，太后传见。

我们看到她坐在黑色木头雕刻的宝座上，宝座上还放了黄色的坐垫，面前的桌子上照例铺了黄色的绸子。慈禧的背后放了个三扇的木刻屏风，大概有7英尺高。光绪帝按老规矩坐在她左侧稍低的位置上，包括皇后在内的一大群宫廷贵妇环绕在他们身边。慈禧首先说了些客套话，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走下宝座，把我们带到另一处小房间里，招待大家喝茶。她自己喝茶时往杯子里加了粉色和白色的杏花[105]，还从绿玉质地的糖罐里加了糖。边喝茶，她边跟我们拉家常，同时对我们特意来到保定瞻仰她的风采表示感谢。慈禧的逻辑挺奇怪，她似乎认定我们来保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她表达敬意。听说我们当天晚上就打算返回北京，她热情地提出坐她的专列回去，同时还命令一名外务部的官员不但要全程护送我们回到北京，第2天还要再坐这趟火车回来，向她报告我们已经安全抵达的消息。

喝完了茶，她又起身把我们带到边上的房间，那里准备好了丰盛的宴席，作陪的只有皇帝和皇后。袁世凯为我们派来的翻译那天工作得非常辛苦，因为每次太后向他说什么话，他都得跪着听完，然后再站起来翻译成英文说给我们听。就这么反复折腾了1个多小时，我注意到这位可怜的翻译头上已经见了汗，自己都替他觉得累!用餐完毕，慈禧把我们带到花园游览。走在路上，她亲热地挎住了我的胳膊，还为我们身高间的差异大笑不已。我的身高是5英尺8英寸，慈禧穿着鞋跟至少3英寸高的满族高跟鞋，头顶也才将将到我的肩膀。那个花园的景色美得令人惊叹，中国人非常善于利用自然和人造的东西制造美丽的景观，花园小径的两旁不失时机地点缀了山石、宠物鸟、松鼠和猴子，那些宠物鸟的品种都非常稀有。花园里有个小小的湖，湖上架着小桥，湖里还漂着小船。

慈禧明显对这个花园非常满意，我们被带着到处乱转。所到之处都要用黄色的丝绸帷幕围上，周围还要有太监站岗。她坐着8个太监

抬的黄色肩舆走在最前面，还有个太监跟在后面举着黄色的伞盖遮阳。光绪帝和他的仆人们则走在比我们还靠后的位置!游览途中，我们在一座亭子里稍事休息。那个亭子紧邻着一个小鱼塘，里面养了不少漂亮的金鱼。慈禧坐在亭子里，可以隔着水观赏鱼塘对面戏台上的表演。所幸，那天并没有演戏，大家只是坐在亭子里喝茶、聊天。休息过后，我们又欣赏了各种各样的山石、苍劲的松柏、摇曳的柳林、茂密的爬藤植物，走过曲曲折折的小径，又爬上一座小桥，这才回到原来觐见的房间。

告辞前，慈禧又把我们叫到某个房间里，见识她刚刚安上的电灯!我们只得又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会儿。太监们侍立左右，那个倒霉的翻译只能始终跪在地上。闲谈中，我无意中发现光绪帝的身体实在非常瘦弱，跟他屁股底下那张大椅子很不般配。他就那么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双脚收得很靠后，一言不发。慈禧这次的谈话更加漫无边际，话题涉及政府、历史和教育等等，总之就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她提出的很多问题在西方可能根本不是问题，然而换个地方偏偏就成了问题。最后，我们起身告辞，慈禧从自己手上取下两个玉石戒指，送给我和罗素小姐一人一个留作纪念。

那次觐见过后，我又在次年的中国新年[106]随同各国公使女眷受邀进入紫禁城，见到了慈禧太后。这次的见面过程被我记到了日记里:

> 觐见过程简单又不失尊严。我们依次走到宝座前面，首先向太后致敬，然后向皇帝致敬，皇帝照旧坐在太后左侧稍低的位置上。他们都跟我们握了手。 正式的见面结束后，慈禧走下宝座，来到我们中间。她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这里显然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我注意到这间屋子的墙上居然挂着已故维多利亚女王[107]的照片。大家在这间屋子里聊了会儿，她又带着我们去了准备好宴席的大厅，太后要求我们“不必拘礼，随意用餐”。我们注意到桌子上铺的还是以前那种美国黑色印花油布，菜肴从鲨鱼翅到网球大小的肉丸子，不一而足。众多太监、宫女负责伺候我们，还有两位公主在座陪吃。用餐临近尾声，太后带着皇帝走了进来，分别到我们的桌子上象征性地用专用的黄色瓷碗吃了些米饭。慈禧吃的那点儿饭更是象征性的，碗里剩下的饭菜会被很随意地递给皇帝，后者则要一声不吭地吃完。后来，慈禧又吃了个桔子，也是吃了几瓣，就把剩下的给了皇帝。我随身带的翻译惊奇地看到某位太监取走慈禧留在桌子上的专用碗时，对着这个空碗毕恭毕敬。我向她解释说，这

是对碗的主人表示敬意的常见方式。 宴会结束，慈禧把我们带到了她的休息室。太后专用的炕上铺着羊毛垫子，羊毛垫子上铺了层席子，炕的两头儿分别摆放了带有黄色外罩的靠垫。我当时站的位置恰好离这个炕很近，慈禧便邀请我也上炕。我学着慈禧的样子，盘腿坐在炕上的坐垫上。光绪帝后来也坐了上来，这样，我等于就被太后和皇帝夹在了中间。这种情形让人觉得有点儿滑稽。座位有限，其他公使女眷只能站在炕的周围参加谈话，这也意味着我们此次的谈话肯定是非正式的。 慈禧对我的暖手筒非常感兴趣，也把两只手都伸了进来。她还把自己袍子的下摆有意朝我身上盖了盖，意在显示亲密。这张炕靠墙的位置放了个小条案，上面摆了好几个西方国家生产的座钟。慈禧告诉我们说，这些钟走得都不太准，所以才把它们放在一起，互相矫正。她还告诉我们说，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名负责侍侯她的贴身宫女就在这间屋子的地上搭铺睡觉，另外还有若干名宫女待在外间值班。前些日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她特意派人给我们送了礼物。慈禧解释说，礼物中的鲜花是象征幸福和长寿的，茶叶可以保证身体健康，那些饽饽[108]都是她本人喜欢的口味。 谈话结束，我们依次从炕上爬了下来。对我来说，从事这样的活动的确有些困难，慈禧友好地伸出双手帮了我一把。太监们再次端上茶来，慈禧喝茶用的是她专属的玉石杯子，还配了纯金的船形托盘。此前我们见过的那些宫廷贵妇照例出席了觐见仪式，也照例穿戴了自己最漂亮的满族服饰。

我在华期间最有意思的经历是在颐和园里跟慈禧非正式地、亲密地待了一整天。颐和园是座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大概14英里的地方。1860年，当地原有的园林遭到战争破坏。现在的颐和园是在原有基础上重修和扩建的，专属慈禧一人使用。这个地方在1900年也曾被联军短期占据，好在并没遭到太严重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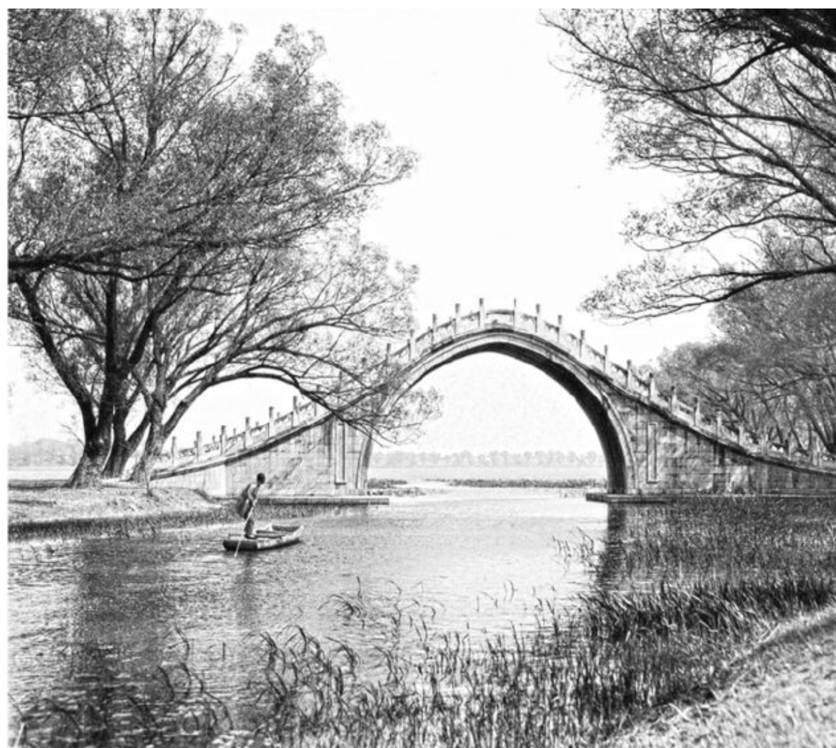
颐和园的景色非常优美。园子的核心是个湖水碧绿、澄清的大湖，湖里还架设着汉白玉的石桥。这座园林的风格基本属于中国式的，所有建筑物都被建在高于地面的基座上，所有建筑物都是单层的，内部通过黑色木头雕刻的屏风划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建筑物的基座都是汉白玉的，上面还修建了宽阔的台阶。它们的屋顶都覆盖着黄色或绿色的琉璃瓦，屋顶的翘脚上还装饰了同样材质的龙、凤等小雕像，每个大概有6到8英寸高[109]。这些雕像据说也跟中国的风水学有关，主要功能是保卫建筑物的安全。支撑屋顶的梁柱全部采用手工彩绘装饰，五颜六色，彩绘内容主要是中国的各种神话传说，龙

的图案则反复出现。建筑物的入口处还要适当摆放神怪或鸟兽的雕像，它们的作用是守卫所在的入口。



颐和园万寿山

颐和园的湖边有条绿树成荫的环湖路，可以直通远处山上[110]的佛殿群。1900年，意大利士兵曾驻扎在这些佛殿里。照理说意大利人是整个欧洲最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可是这些具有艺术气质的人对颐和园造成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某座佛殿外部完全覆盖着黄色的琉璃，每块琉璃砖上都雕刻有精致的小佛像[111]。那些意大利士兵居然拿着锤子，把所有手臂可以够到位置的佛像的鼻子甚至脑袋都给敲掉了。他们这么做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敢妄加揣测，不过由此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也是损人不利己的。



颐和园玉带桥

我和慈禧互相挽着胳膊，在颐和园里足足转悠了一个下午，她不时停下来指引我看那些漂亮的花朵或者湖上的美景。她这么做的时候就跟那些得意洋洋地向客人展示自家花园的西方主妇没什么区别。沿着湖边小路，我们登上了一条完全用石头做成的船[112]。慈禧习惯跟她的那些女伴们在这里喝茶，度过炎热的夏日午后。告别石头船，我们又去了其他地方。我对颐和园的感觉是它非常漂亮，却缺乏条理。比如，颐和园里的牡丹非常多，却种得非常分散，这样就失去了那种令人震惊的气势。相比之下，颐和园的树木更值得称道，它们不但提供了大片绿荫，还阻挡了北京恼人的风沙。顺便说下，这个下午慈禧带着我四处转悠，始终处于喋喋不休的状态。光绪帝则带着众多公主、大臣、太监、宫女跟在后头，始终一言不发。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可以俯视全湖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棵巨大的松树可以提供阴凉，松树下面已经提前铺了毯子，安放了宝座。慈禧

太后走到宝座前坐下，众多贵妇自觉聚拢到她的身边。我则坐在宝座旁边的普通椅子上听着她们闲聊，虽然什么也没听懂。坐在那里，遥想中国悠久的历史，在看看身边好客的女主人，我感觉非常惬意。

第七章 宫廷贵妇

有天，我们在英国公使馆举办大型午餐会，专门招待大清皇室的几位公主。这次午餐会没有邀请任何男性参加，属于纯粹的“女性时间”。午餐会被安排在公使馆的餐厅，我作为女主人坐在餐厅正面墙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巨幅画像下面，跟对方的主宾，慈禧太后的养女，已故恭亲王的女儿[113]颇有感慨地谈论着若干年来世事的变迁。

公主的父亲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弟弟，多年来主持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公主很小的时候就被咸丰帝过继，同时被授予“固伦公主[114]”的头衔，位列大清皇室等级最高的公主行列。公主小的时候就被许配给了咸丰帝手下军机大臣景寿[115]的儿子，只可惜，那位新郎还没来得及长大，就早早地去世了[116]。公主因此成了寡妇，按照中国习俗，她的脸从此不再涂抹胭脂。来宾中地位仅次于固伦公主的是顺承王妃[117]，她的丈夫位列大清帝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来宾中的第3位公主是载振王妃(princess tsai chen)，她嫁给了庆亲王的儿子载振[118]。庆亲王继恭亲王之后主持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载振则在1902年前往英国参加了新任英王[119]的加冕仪式。除了这3位公主，来宾还包括庆亲王的3个女儿。其中最年长的女儿是个寡妇，被称为“多罗格格(ta ehr ko ko)”，属于大清皇室第2等级的公主[120]，还有个女儿应该是慈禧侄子的妻子[121]。

午餐会的时间定在中午12点30分，固伦公主准时到达。我按照礼节站在公使馆大门的台阶下面，看着她下轿子，然后立刻过去握手。固伦公主坐的是专属皇帝、太后等人的黄色轿子。据我所知，公主在皇室内部非常得宠，任何王公大臣在街上遇到她的车轿，不但要立刻让路，本人还得马上跪在路边表示敬意。固伦公主抵达不久，顺承王

妃也到了，我们3个人携手走进公使馆喝茶等候其他客人。来宾陆续到齐，午餐会随即开始。

那应该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午餐会。公主们头上插满了花朵和首饰，身上穿了华丽的长袍，令公使馆的餐厅蓬荜生辉，就连她们仆人身上的蓝色短褂和红色丝绸长袍似乎也为这间屋子增添了光彩。那天吃的是西餐，来宾对使用刀叉和勺子吃饭显得兴致勃勃。有些女士不善于使用这些餐具，最后还是换成了她们熟悉的筷子。公使馆餐厅使用的餐具是纯银的，擦得非常亮，当这些女士看见自己的影像出现在亮晶晶的勺子上时，居然孩子气地嬉笑了起来。最让我惊奇的是，她们当中居然有人可以用西方科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还能讲给她的同伴们听。



满族宫女

用餐过后，我们吸烟、喝咖啡，聆听院子里罗伯特·赫德爵士组建的乐队演奏音乐。这些演奏西洋乐器的乐手全部是中国人。看见自己的同胞能够灵巧地摆弄西方乐器，公主们明显来了兴致。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离开公使馆后肯定向慈禧报告了这件新鲜事。没过多久，这支乐队就被邀请进入紫禁城演奏，而且足足在里面待了4天。需要说明的是，教会中国人演奏西方乐器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传统来宾们开心得跟小孩子一样。她们的年龄其实真的也不大，除了固伦公主，其他人都不超过25岁。这些女士在公使馆里来回溜达，查看各种新鲜东西。钢琴受到了特别关注，她们亲手敲响琴键，观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我们的服装和发型也遭到了女士们的仔细品评。后来，女士们意识到自己应该适当补补妆、换换衣服了。我指引女仆把她们带到了我的房间，这些女士带着探险的表情上了楼。楼上的新鲜东西显然进一步激发了她们的性质，补妆、换衣服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嬉闹声。下午茶时间到了，这些女士再次走进餐厅。我注意到有人喝茶时悄悄把茶点藏进了宽大的袖子里，而且也猜到她们是打算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太后尝尝，于是赶紧命令厨房多拿些点心打包给客人带走。慈禧最终吃没吃这些点心我不知道，反正它们肯定是没有被浪费掉的。



清代满族贵妇

音乐只有5个音[122]，而西方音乐有7个音。

客人们告辞时的情形可谓壮观，光伺候她们的仆人就有161名，这些人手忙脚乱。最先离开的是固伦公主的轿子，其他客人则根据自己的身份高低依次乘坐骡子拉的轿车离开。轿车外观的装饰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就连骡子身上的挽具也根据主人等级的不同，分为金黄、紫色和红色3种颜色。每名客人都贴身带了2个太监，除了老妈子，太监是唯一有资格搀扶她们的人。固伦公主的黄色轿子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长串轿车，还有大量的仆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公使馆的大门。

不管按中国的礼节，还是西方的礼节，这次午餐会后，我都应该去那些女士家里回拜，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相关信息，公使馆只好正式照会外务部询问情况。外务部的答复是庆亲王的妻子将出面邀请我

到家里做客，又经过反复协商，做客的时间最终确定。受到邀请的只有我本人，还有我的私人翻译。我的翻译是标准的英国女性，不过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中国话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地道。

做客那天，我们乘坐4人抬的轿子离开公使馆，跟随我们的有4名男性听差，以及2位女性仆人，也就是“老妈子”。前往庆亲王府邸的路程总共耗费了45分钟，亲王的儿子载振在门口迎候我们。前面说过，他的妻子曾去公使馆做过客。载振的身后站着庆亲王的4位妻子，这些女士为亲王生了很多孩子。我们被带到一间大厅里，这间大厅的地面上铺着石板，整个大厅被黑色木头的隔扇分为3个独立的空间，互相通过隔扇上的拱门相连。大殿的窗户是中国传统的纸窗户，温度宜人，却看不见炉子之类的东西。我猜肯定在别的地方有炉子为这个房间供暖。大厅中间摆了张方桌，桌子上已经放了茶水、点心和水果，桌子周围摆放着沉重的黑色的木头椅子，我的座位被安排在庆亲王两位等级比较高的妻子中间。载振非常得意地向我们介绍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男孩一个6岁、一个7岁。我们聊天、喝茶的过程中，他们就在旁边的地板上玩耍，一大群太监、保姆负责照顾他们。这些人趁机打量我们这两个洋鬼子，时不时地发出窃笑声。顺便说下，中国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往往比西方人宽厚得多，他们被视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经常可以陪伴主人出席某些场合。



载振

我跟庆亲王妻子们的交谈自然离不开家长里短，大家都对对方的穿着打扮特别感兴趣。她们试着戴了我的手套，我也审视了她们身上的每件珠宝;她们羡慕我的白皮肤，我艳羡她们纤细的手指。相比西方女性，中国女性的手确实要好看不少，手指又细又长，指甲还是杏仁形状的。

喝了会儿茶，聊了会儿天，庆亲王的妻子们提议带我在府邸里四处转转，我和翻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庆亲王的某位妻子拉着我的手，带着大伙穿过一座又一座庭院，进入另一座建筑当中。庆亲王本人正在那里迎候我们，他接替妻子们继续跟我闲聊，亲王的众多姬妾、子女，还有孙子、孙女也都出来见了面。这次会面以前，我虽然在觐见慈禧的场合多次见过庆亲王，不过这种面对面的谈话还是第1次。庆亲王是个风趣、睿智的人，只不过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没那么高。这位亲王的胡子非常浓密，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嘴唇上还留着八

字胡。他的眼睛黑亮亮的，目光犀利。他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据说，由于觐见慈禧时需要长时间跪在冰冷的石头地上，这位亲王患有严重的肌肉劳损。他用于接待我们的这件房间摆放了不少中国的古董，瓷器、玉器、珐琅器什么的。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可亲王的妻子们却一个劲儿地招呼我看她们认为很有意思的西洋玩意儿。

告辞时，亲王送了两张他女儿的相片给我，还亲手用毛笔把她们的名字写在了空白处。他的家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门的门道里。我回身向他们告别，只见他们身上华丽的服饰在古朴的大门映衬下显得更加斑斓绚丽。

第八章 帝国皇陵

北京周边几天路程的范围里至少有3处皇家陵寝。这些陵墓本身的建筑异常奢华，所在的位置也山清水秀。这3处陵寝分别是明陵[123]，也就是明朝皇帝的陵寝，还有清西陵和东陵。我们依次都参观过。

首先去的是明陵。这次游览的内容除了明朝皇帝的陵墓，还包括位于西山的3座庙宇，以及南口的长城。9月14日[124]，我们雇佣了两匹马连同两个马夫，一个厨子，一个仆人，还有负责挑行李的挑夫，这些人每天晚上都在我们那3辆轿车里睡觉。旅行的第一天夜里，我们在碧云寺[125]过夜。这个白天，我们始终在田野里行进，满眼看到的都是绿色的庄稼。有时候，我们需要沿着小路，从比人头还高的谷子地里穿行过去。中国北方不适合种植水稻，除了谷子，我们还看见了芝麻、荞麦、白薯、花生、烟草和玉米。这年的冬小麦和黑麦收成非常不好，农民只能寄希望于从这些庄稼身上得到弥补。我们在碧云寺居住的那个房间就是中国寺庙里常见的普通僧房。我那个屋子的地是泥地，没有地板，窗户是纸的，还破了，除了桌椅外，再没有任何家具。最有意思的是屋子里那张砖炕。这个炕非常大，占据了半个屋子，三面都顶到墙。我小心翼翼地爬上炕，找了条床单把破损的窗户

遮上，这才感觉安心了些。旅行中不可能有那么多讲究，通常来说，带张行军床，带上橡胶浴盆和脸盆，带面镜子，再带点儿换洗衣服什么的也就够了。厨子肯定是要带着的，因为中国的很多地方除了新鲜水果，几乎买不到现成的食物。中国人做饭习惯使用“灶”这种东西。灶就是在地上用砖石和泥浆砌的中空台子，台子上有两个大洞，洞口用铁圈箍住，可以放锅。凭着这样的灶，中国的厨师可以做出最美味的菜肴。

就寝前，我们在寺庙里转了转，参观了各种各样的佛像。在某处小佛殿的墙上，我们看到了用整块木板雕刻，还涂了油彩的宗教画。这样的木板有两块，分别挂在两面墙上，大概有18英寸高，盖住了整面墙，一块表现了地狱，一块表现了天堂，看上去极具震撼力。我在中国其他寺庙里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碧云寺最明显的地标就是这附近山头儿上一连串的塔，这些塔的模样都差不多，可是一座比一座修建的位置高。碧云寺还有一处温泉，温泉所处的庭院满是龙和其他各种神兽的雕像。这个庭院的门洞是圆形的，大门由一位自然界的“怪胎”守卫着。那是棵巨大的银杏树，老得看不出年龄。它可能是被闪电劈成了两半，然后就长出了两棵看似独立的树。更令人叫绝的是，在这两个半棵树中间又长了棵雪松和小的银杏树，而且枝繁叶茂。这处庭院的地上长满了蕨类植物，还有长春花，空气显得有些湿冷。院子里有两个水色发暗的小湖，湖上架着汉白玉的石桥。

碧云寺的后面是个皇家猎场，周围都有高高的石墙，想要进去非常困难，不过却可以站在附近的山顶上朝里面眺望。据我所知，光绪帝从未来过这片猎场，它目前基本处于闲置的状态。这位皇帝不像他的祖先那样热衷四处闲逛，每年除了去皇陵祭祀，几乎从不踏出紫禁城的大门。



碧云寺

第2天早上，我们给碧云寺的和尚留了5块银元的香火钱，又开始了旅行。下个目的地是大觉寺[126]。这天中午，我们首先在一个名叫“黑龙潭[127]”的地方吃饭休息。这个地方的得名是因为山上有个湖。这个湖周围被群山环绕，阳光直射不到，因此水色发黑。周围的大树把枝叶垂到湖面上，整个树身也倒映在湖水中。山间有小路可以直通水边。据当地人说，这个湖里住了条龙，偶尔就要上岸吃人，还专吃洋人!当地人还说，这个湖里生长着不少甲鱼，有的甲鱼有毒，有的甲鱼则无毒，可以食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些甲鱼是从水蛇变过来的，那些蛇本身就有毒。鉴别有毒甲鱼和无毒甲鱼的方法是看脖子，脖子特别长的甲鱼就是水蛇变的，吃了就能毒死人。脖子短的甲鱼不但吃不死人，还大补!

大觉寺位于某处山顶，规模很大，但缺少很多小庙具有的灵性和神秘感。我们穿过广阔的庄稼地和野地，走过成片的柿子树和白杨树，沿着石头阶梯爬山进入寺庙参观。当天夜里，我们就在寺庙所在的山脚下找了户农家，住了下来。夜里的月亮很圆，不过后来月光就被山顶上的寺庙给挡住了，寺庙的影子从山上直接投射到我们所在的院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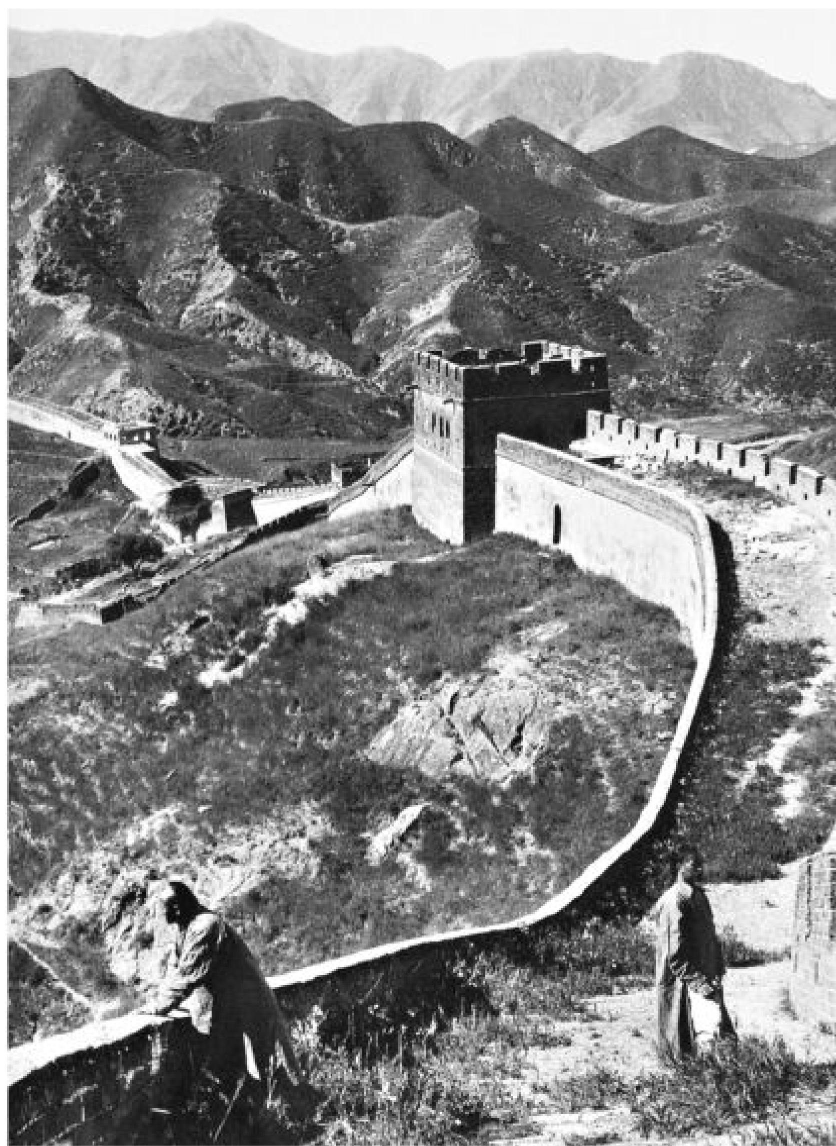
离开大觉寺，我们去了南口。这个地方是北京周围山脉的一个缺口，附近山上的长城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在当地的旅店居住了两个晚上，这家旅店跟多数中国旅店大同小异，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为房客提供了某些西式家具，比如可以折叠的躺椅。旅店所在地住满了各种卖苦力的人，还有成群的牛羊，白天显得比较吵闹，入夜后才逐渐安静下来，除了骡子的叫声，什么也听不见。旅馆的院子里停满了轿车。这些轿车都没套牲口，凭借支架保持平衡停在那里。轿车和轿车间的空隙还停了些小贩的手推车，主要是卖馒头和甜肉的。旅店老板的个子很高，习惯光着膀子，下身穿的那条裤子也要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



北京城外的骡马店

中国的长城最早是由始皇帝下令修建的。这位皇帝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为了防备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他提出了这项人

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长城的总长在1400英里左右，平均宽度20英尺，宽度22英尺。长城蜿蜒曲折，时而爬上5000英尺的山顶，时而深入幽深的峡谷，时而绕过沟壑，时而又从激流上直接跨了过去。每隔100码左右的距离，长城上就要修起一座邸楼，以供士兵驻扎。长城的城墙采用夹层结构，外表是砖，中间填充石头和泥土。现在的长城多数成了废墟，已经面目全非。我们游览的地点是两条长城的交叉点。前往这个交叉点的路不太好走，但骑马还是可以勉强通过。越往前走，地势越高，好像一直能走到天上去。路的两侧盛开着各种野花，悬崖、巨石上还长满了苔藓。行进途中，我们还看到了骑马或步行放牧猪、牛、马等牲畜的蒙古族牧人。



长城

游览过长城后，我们又在南口的旅店睡了一夜，然后就去了明陵，这个地方位于距离南口10英里远的巍峨群山当中。明陵埋葬了从1368年到1644年在位的13位明朝皇帝，明朝的开国皇帝则埋葬在南京。这些皇帝陵墓的模式大同小异，最著名的永乐大帝的陵墓是其中

最宏伟的。通往陵墓的道路两侧成对摆放着各种人物和怪兽的雕像，每对雕像间隔100码。最先看到的是两只蹲着的狮子，然后又是两只站着的狮子，再往后是两只跪着的狮子，狮子后面还有骆驼和大象，这些雕像大概都在13英尺高左右。其中的有些雕像比较粗糙，有些则栩栩如生，甚至吓坏了我的马。当初用于雕刻这些雕像的石头重量起码得有三四吨的样子，它们应该是在采石场被就地刻好，然后再运到这个地方的。

永乐大帝的安息之地长满了树木，树木掩映中的是一处铺了石头地面的墓园，整个墓园被顶部铺了黄琉璃瓦的红色高墙围了起来，地面上杂草丛生。陵园入口的台阶是汉白玉的，台阶的栏杆上装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龙凤等雕刻图案。进入墓园，首先看到昭示皇帝姓名和功绩的巨大石碑。石碑后面的大殿大得超乎想象，恐怕可以容纳足足一个团的人。大殿的屋顶由24根巨大的立柱支撑，这些立柱当初都是整棵的大树。大殿后面立着巨大的土山，土山下面埋葬着去世的皇帝。据当地人说，陵墓建好时会预留通道等待它的主人。皇帝的灵柩通过这条通道运进陵墓后，通道就会被泥土和砖石彻底封死，通道入口的具体位置将成为永久的谜，以防盗墓现象的发生。

永乐大帝宏伟的陵墓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现在，陵墓几乎处于废弃的状态，墓园里的很多建筑都成了废墟，屋顶上的黄色琉璃瓦扔得到处都是，红色的高墙倒塌、开裂，大殿内不但落满灰尘，还遍地野草。只有当年种下的那些树木依然长青，伸展着枝叶守护着皇帝的安宁。

清西陵是个很少能被洋人造访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北京比较远，也不在知名度非常高的长城附近。为了前往西陵，我们在西山的环抱中足足跋涉了一天，饱览了各种美景。下午5点，大家又累又饿，于是就停下住宿。我们在当地住宿的地点是所现代学校，学校里有几位中国老师能说英语，还懂得一点儿西方科学。遗憾的是，由于昨天下了大雨，山洪泛滥，我们的辎重没能及时跟上，所以当晚的休息就只能勉强凑合。在没有枕头、被子和褥子的情况下睡在砖砌的炕上，那是非常痛苦的。所幸，第2天早上7点，辎重总算追了上来，我们起床时不但得到了换洗衣服，还吃了顿像样的早饭。



十三陵



十三陵雕像

这天，我们没走多远就到了西陵。西陵与其说是个陵墓，还不如说是个面积非常大的公园。西陵的纵深大概有好几英里，这么大的面积完全被高墙围住，里面古木参天。负责守护这个陵园的有8支部队，全部是满族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住在这里，世世代代充当守墓人。接待我们住宿的主人是这些部队里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他家的条件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西陵总共有6座陵墓，这些陵墓的模式跟明陵简直如出一辙。区别在于，西陵是有人看守而且不断得到维护的，所以没有明陵那么破败。

通往陵墓的道路照旧由石头雕像守护着。我们连续穿过五道拱门，来到记载皇帝生平的石碑面前，这块石碑的作用就相当于西方人的墓碑。绕过石碑，我们登上三孔的汉白玉石桥跨过环绕墓园的护城河，来到墓园大门的外面。墓园大门总共有3个门洞，左右两侧的小门洞里放着供桌，一张供桌上摆了茶水、牛奶之类的东西，另一张供桌上是水果和点心什么的。我们进入中间的门洞，连续穿过三道大门，来到了被红色高墙围住的墓园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院子有左右两栋建筑，其中一栋建筑用于给墓主人上供，供品随即就可以在建筑内部装饰黄色琉璃的炉子里烧掉，另一栋是在上供的同时容留和尚念经用的。院子正中正对大门的建筑几乎是空的，里面只有两个空着的巨大红色宝座，宝座前面放了桌子，后面挂了从屋顶垂下来的黄色幛子。这两个宝座是供死去的皇帝和皇后的灵魂使用的。距离这两个宝座不远，稍稍靠下的位置，还有个规模相对小些的宝座，那是供有幸被埋在这个墓园里的皇帝妃子的灵魂使用的。与皇帝、皇后不同，妃子的坟墓只能使用绿色的琉璃瓦装饰。每次祭祀活动时，墓主人的灵位就要被摆到相应的宝座上，前来祭祀的皇帝或皇帝代表就要冲着这些宝座下跪、磕头，大殿正中象征死去皇帝的宝座周围摆放了些动物形状的青铜香炉，当时正焚着香，大殿里烟气缭绕。

第一个院子后面那个院子的地势比第一个院子要高，周围有独立的高墙环绕，这个地方才是皇帝真正的坟墓所在。坟墓的主体是个大土山，土山外面覆盖了砖石，土山前面立着巨大的石碑，石碑顶上有黄色琉璃瓦的重檐。从院子大门到石碑有道路相通，不过钉有铜锭的巨大木质院门是被紧紧锁住的，我们不被允许进入这个院子。跟这个

墓园不同的是，有些墓园不但可以随意进入，甚至还允许我们爬到坟墓的顶上，眺望整个西陵。据我所知，西陵埋葬的是雍正、嘉庆、道光三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目前正在执政的光绪帝将来也要埋在这里。他的陵墓已经竣工，就连石碑都立好了，只是还没刻字。

大清帝国还有几位皇帝和皇后，以及众多妃子被埋在一个叫“东陵(tung ling)”的地方。我个人认为，东陵各方面的条件是三处皇陵中最好的，虽然很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

秋天是中国北方最美好的季节，这个季节晚上有点儿冷，可白天不热，又不像春天那么多风沙，或者夏天那么多雨。我们就是在秋天游览的东陵。东陵位于距北京80英里的群山当中，我们坐火车来到通州，与提前几天出发，走陆路来到这里的仆人和辎重会合。驻守通州的将军马玉昆[128]得知我们即将去东陵游览的消息，特意派了4名骑兵沿途护送。这些骑兵身穿亮蓝色带镶边的制服，枪斜挎在肩膀上，胯下骑的全是白马，为我们的旅行提供了一抹亮色。旅行途中，我们的队伍连续引起骚动，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洋鬼子”。当天晚上，我们在某处省一级的学校里住宿。这个学校主要是举办地方的科举考试用的，每月好像只办公一天。学校的宿舍条件不太好，可是很干净，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厨房。所幸，我们出色的厨子没用多长时间就在地上用砖头砌了个灶，仆人则从周围的村子搞到了煤炭、木头和清水。天刚擦黑，我们就在学校的某个小房间里吃上了热饭。月光从树梢上照下来，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

外面的街上非常热闹，因为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大概是说很久以前的某位皇帝得到了某种仙药，吃下去就能长生不老。这位皇帝非常不小心，随手就把仙药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就出去了。他的侍女溜进来看见仙药，偷偷吃了下去。皇帝回来发现仙药被偷吃了，生气地下令处死侍女。侍女听到风声，抱着她的宠物兔子逃跑了。仙药当时已经发生了作用，所以逃跑途中她很容易地就飞到了月亮上，从此就住在了那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认为月亮上的那块阴影就是兔子脸的形状，我们西方人则认为这块阴影是个人脸的形状。为了纪念侍女和她的兔子，中国人开始过中秋节。[129]

第2天，当我们沿着庞庄[130]的大路向蓟州[131]前进时，发现路两边都是售卖各种货品的商贩，其中最常见的是水果和蔬菜。商贩们的摊位都搭着棚子，以防阳光把货品晒坏，这些棚子连成了片，以至于我们骑马都无法通行。负责护送的骑兵只得强行开出一条路来。我们在这个村子里还遇到了一个个子非常矮的人，他那身穿戴非常有特点，只可惜当时没能停下给他照相。当天晚上，我们在蓟州过夜。这座小城拥有年代非常久远的厚实城墙，城门洞被水果商贩和他们的顾客堵得严严实实。当地的旅店还算不错。来到旅店的院子里，我们看见空地上一边晾着高粱，一边晾着玉米，就跟金色的地毯一样。院子的尽头还有菜地，种着各种美味的蔬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的老树下面吃了晚饭。

马兰峪[132]是我们此行抵达的最远点。途中，我们还遇到个游方的僧人。所谓“游方”，就是没目的地到处走，这也是佛教的一种修行。僧人一手托着紫色的陶钵，一手拿着禅杖，禅杖的主要作用是随时掩埋路上无主的尸骨。僧人非常消瘦，脚上蹬着白色的长袜子，身上穿着灰色的袍子，脖子上挂着黑色的念珠。类似这样的游方僧人在中国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有明确目的到处旅行的，另一类则像我们的新朋友这样，由等级更高的僧人指定，每年定期前往某些寺庙学习。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修行，或者说苦行。僧人需要经历的苦行有多种形式，比如把手伸进热油锅或者在头顶烧香(由此带来的神圣印记几乎在所有僧人头上都可以看到)等等。能够顺利承受住这些痛苦的僧人就将被授予红色的法衣[133]、用于乞讨的紫色陶钵，还有僧人的身份证明[134]。凭借身份证明，僧人可以在任何寺院里每天吃两顿饭[135]，免费住宿，与此同时僧人也需要向所在寺院履行相应的义务。

那天中午，我们在当地村子的某户富裕人家吃午饭。这个人对我们的来访显然很高兴，他详细地研究了我们的行李，观看了我们吃午饭的过程，还通过翻译跟我们聊了聊。后来，他的儿子走了进来。这位年轻人能说英语，他自我介绍说是英国驻天津领事馆的书记官。那位父亲站在旁边看着，脸上满是得意的表情。说实话，这位年轻人的英语实在不怎么样，因为他当初的英语老师居然是个日本人，而且他

还把很多英语单词的发音作了中国化的改造!好在我们还可以结合他的表情，猜着跟他对话。

午饭后，我提出拜见拜见这户人家的女主人，男主人爽快地答应了。我被带着穿过很多道院子，来到住宅的最深处，看到了那个人的妻子和女儿，他们对我的来访也很高兴。这户人家是满族人，所以家里的女眷都没有缠足。她们身上穿的是满族妇女代表性的服装，蓝色棉布的裤子非常宽大，大袖口袍子的下摆直到膝盖。我们从天气入手开始聊天，谈到了各自的年龄(这在中国是合乎礼貌的)，品评了对方的衣服。我告诉她们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谈话过程中，女主人热情地请我喝茶，我则按照中国的礼节向她们致谢。

当天下午，我们看到一幕非常悲惨的景象。某位年轻女士正趴在田野里的土堆前放声痛哭，那个声音大得我们离得老远就能听见。当我们走近时，发现她正在用双手不停地捶打胸部。两个男孩正站在她身后，试图安慰这位女士，同时又把眼睛死死地盯在土堆前面摆着的水果、点心和酒上面。我原以为这位女士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后来才闹明白她是在祭奠某个死去的人。那些食物名义上是为死者准备的，最后其实还要被活着的人吃掉。

来到马兰峪以后，我们在一座寺庙里安营扎寨。这座寺庙位于村子外面的山顶上。住下没多久，分别姓贵[136]和蔡[137]的两名高级军官风风火火地赶了来。军官们是负责守卫东陵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清廷已经发来了不允许我们进入陵区参观的指示，只不过由于中秋节的缘故，这个消息才刚刚送到。为了缓和气氛，军官们邀请我们去当地官方的驿站休息，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军官们随后又说，按照中国礼节，为了欢迎贵客，他们将在这天晚上6点送来一桌酒席，他们自己还有另外4名下级军官将陪同我们进餐。

军官们没有食言。下午4点，就有6名厨子来到庙里，动手准备总共有54道菜的宴席。54这个数字代表了当地人款待贵客的最高规格。那顿饭足足吃了两个钟头，这可能是我来到这个国家以后吃过的最地道的中国宴席。两位军官告诉我说，我的确也是他们见到的第1个洋人。通过他们不停打量我的眼神判断，这两位军官没说假话。姓贵的

那个军官好像不怎么会笑，也不太爱说话，就是盯着我看。后来，我随口提出要求说打算去拜会他家的女眷。姓贵的军官着实吓了一大跳，赶紧说了很多推脱的话。姓蔡的军官明显对我丈夫更感兴趣，盯着他看了半天，还通过翻译对我们说他觉得我丈夫的脸长得非常有意思。按中国人的标准来说，我们吃的这顿饭水平不低，菜谱包括鸟巢[138]汤、鲨鱼翅，还有百年陈的蛋[139]等稀有美味。

宴会结束，军官的仆人们也都找各种借口挤到屋子里来看热闹。我们给军官们展示了些牌技。负责做饭的厨子似乎最先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儿，不停地趴在主人耳边小声嘀咕。后来，我们抽出扑克牌里的国王和王后，送给两位军官留作纪念。军官们告辞时，我的丈夫按中国礼节把他们送到寺庙的大门外。他们临走前约定第2天上午9点带着我们在附近转转。

我们第2天上午转得非常开心，因为东陵的景色异常优美。这片墓地的样子跟明陵和西陵都差不多，这里没必要浪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也把自己未来的墓地选在了这里!过去30年当中，慈禧的墓地始终都在建设当中，规模只比她的丈夫咸丰帝稍小一些。1902年，慈禧来到自己的墓地视察，下令将某些设施推到重建。这样一来，墓地的规模又被大大提升了起来。这个墓地现在才刚刚竣工，相关费用已经高达600万两白银，也就是大概80万英镑的水平。慈禧太后现在也是位高龄的老人了，说不定哪天就要被埋进这座坟墓。她离开人世后，谁又将主宰大清帝国的命运呢?这个人是那位孱弱的光绪皇帝吗?

【注释】

[1] 原文只写了个L。作者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随丈夫由英国来到北京担任驻华公使的，按这个时间推测，L应指同时期卸任的大清驻德国公使吕海寰。吕海寰，山东掖县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洋务派，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累官至尚书。庚子国变后，二代醇亲王载沣作为特使前往德国柏林为克林德事件道歉，吕海寰从中斡旋，让他避免了很多屈辱。载沣心怀感激，回国后投桃报李，向慈禧太后极力推荐吕海寰。吕海寰因此得到提升，在1902年回国述职。参考这个时间点，以及本书作者拍摄的照片，可以认定所谓L指的就是吕海寰。

[2] gun di音。

[3] 中国传统女性服装采用右大襟，一般在身体右侧腋窝的部位系扣子。

[4] 西方人认为婚恋情况属于隐私，外人不能随便询问，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更开放些，因此作者有这样的说法。

[5] the mixed courts，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利用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领事裁判权，先后在上海各自的租界中设立了由本国领事主持的法庭。1864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大清上海道牵头成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这个衙门主要负责处理租界内的各种华人犯罪，以及上海范围内没有领事负责的西方人司法事务。具体位置设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院内，主要由1名上海道衙门的下级官员和1名西方外交官联合协商审案，各国驻上海领事馆还要派出若干外交官充当陪审团成员。

[6] 中医没有猴子指甲这味药，但是有猴骨入药的记载，猴骨入药可祛风除湿，治疗小儿疳积。理论上说，这个大夫开的药方还算对症。

[7] the bubbling wellroad，今上海南京西路，当时是由东向西横贯上海公共租界的主干道。

[8] 中国传统习俗，女方应在结婚前一天把陪嫁送到男方家。

[9] 即象征军功的花翎，清代的花翎只颁发给立有军功的官员，并不是像今天清宫戏演的那样，人手一个。

[10] 指中国传统的拱手礼。

[11] 直到20世纪初西方人仍然认为女性穿裤子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

[12] 指长袍。

[13] Mrs Canning，具体身份不详。

[14] the foochow road，今上海黄浦区，现在还叫福州路，这条街自上海开埠后逐渐演化为著名的商业和文化街，类似北京前门大栅栏。

[15] 应指箫。

[16] 应指胡琴。

[17] 应指小锣。

[18] 应指琵琶。

[19] 过去戏园子的行话叫“飞手巾把儿”。

[20] 应指京剧。

[21] 中国古代规定专业戏子本人终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他的后代如果改行，至少也要3代以后才能参加考试，但非专业性的票友不在此列。

[22] 指中国传统宴席实行共餐制，西方人则习惯分餐制。

[23] the zinsa road，今上海嘉定区，原地名还在。

[24] 参考本书内容，应指1902年3月29日。

[25] ngankin of butterfield & swire’s company，1861年成立，总部在伦敦，中国分部设在营口，当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内河和沿海航运。

[26]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27岁中进士第3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27] peichiko，北极阁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鼓楼东面，明洪武年间设观象台，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发源地。

[28] 即南京夫子庙。

[29] 即贡院。

[30] 即朱元璋的南京明孝陵。

[31] 正确的说法是赑屃，龙生九子中的一种，中国古代传说认为赑屃擅长负重，因此用它的雕像充当石碑底座。

[32] 指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

[33] 按中国传统端茶送客的礼节，主人请客人喝茶就是打算送客的含蓄表示，客人一般应主动告辞。

[34] 1担相当于50公斤。

[35] kweilee音。

[36] the china merchantservice，1872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提议，1873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属于洋务运动中代表性的军民融合性企业。

[37] 宜昌是湖北和四川的分界线，当时大型轮船还不适于在长江三峡江段航行，因此需要在宜昌换乘小船。

[38] 过去的长江三峡江段有72处险滩。1949年后，由于不断整修航道，特别是三峡大坝完工后，这些险滩基本都不存在了。

[39] hsin tan，长江三峡曾经的三大险滩之一。

[40] 1节等于1. 852千米每小时。

[41] 大麻属于毒品，不过过去人们种植大麻主要还是为了获取纤维。

[42] 原文为wushan gorge，结合地图判断，作者指的是巫峡。

[43] 原文用的是finger，这个词虽然可以用来统称手指，但通常指大拇指以外的4根手指，大拇指则被称为t h u m b。

[44] windbox gorge，白帝城以东大概2公里的位置，这个地方的地形酷似风箱，民间传说原先就是鲁班的风箱，故名。

[45] 译者此处翻译依据中国教民习惯，即天主教神职人员称为“神甫/神父”，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则被称为 “牧师”。

[46] chi，即周代燕国的都城。

[47] cambaluc，即元大都的蒙古语发音。

[48] 指清代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制度，满族居住内城，汉族居住外城。

[49] ha ta men，即崇文门。

[50] shun chih men，即宣武门。

[51] chi hwa men，即朝阳门。

[52] ping tse meng，即阜成门。

[53] 指门钉。

[54] 指正阳门箭楼，今天的建筑是清末民初重新修复的。

[55] 指箭楼和城楼间的瓮城。

[56] 指东交民巷。

[57] 北京内城城墙前门以东的位置当时开了个圆洞供火车出入，还修建了配套的的正阳门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原址还在，今天已改建为中国铁路博物馆。

[58] 指去南海子围场。

[59] 约等于零下13.3摄氏度。

[60] 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除了天安门，其他3座城门已在1950年代陆续拆除，但地名仍存。

[61] 即今故宫筒子河。

[62] 即今北海、中南海。

[63] 1886年，光绪十二年，清廷开始在皇城范围内修建皇家铁路，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1888年竣工，一般称为“西苑铁路”。

[64] 美国著名旅行家伯顿·福尔摩斯Burton Holmes在《从阿穆尔到北京Down

the Amur，Peking，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中提到，这列火车当时很可能被扔在了前门的瓮城里，后来慢慢损毁消失了。

[65] the silk temple，这个地方原址仍存，在今天北海公园东北角的位置，是祭祀嫘祖的场所。嫘祖是黄帝的妻子，据说她教会了中国先民养蚕、制作丝绸。

[66] 指北海团城承光殿玉佛，这尊佛像在1900年曾被八国联军砍了一刀。

[67] 原文为the palace of earth’s repose，参考下文内容，作者指的应是北海北岸的澄观堂，这个地方1900年被八国联军占据，成了联军司令部。

[68] 即中南海瀛台。

[69] meishan，即今景山公园里的煤山。

[70] 原文如此。实际应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时。

[71] 当时北京的道路采取甬路的形式，中间高的部分供车马通行，两侧设有路沟，供行人行走。

[72] 直到民国早期，骡马拉的轿车始终是北京城最主要的载人工具。这种车中国南方并不使用，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北京使用最普遍，因此也被称为“京车”。京车最明显的特点是它使用的轴承，这种轴承运转时能发出特殊的声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骡车过来了。今天传统相声、评书里所说的大鞍儿车、小鞍儿车指的就是这种骡车，它们的区别只是车厢大小不同而已。

[73] 作者此处描述错误比较多。李鸿章得过6个儿子，最后长大成人的总共有3个，其中死于1902年的只有次子李经述。这个儿子是李鸿章的继室所生，属于嫡子，死于1902年4月6日，不可能在5月31日被作者看见。李经述原本患有慢性肝病，李鸿章死后，他感觉既自责又悲伤，病情加重，所以很快也去世了，死前还留下遗书，倾诉内心的苦闷。李氏宗族和清廷的很多大臣认为这是纯孝的表现，要求光绪皇帝授予相应的荣誉，他的长子李国杰因此得以隔辈承袭了李鸿章的爵位。至于李鸿章3个儿子中知名度最高的李经方，其实是从李的六弟家过继来的，当时正在北京任候补官，作者看到的很可能是他。所谓“葬礼”，其实也只是李鸿章灵柩从北京启程返回合肥老家的仪式，1903年3月16日，他最终被安葬在今合肥大兴集。

[74] 原文如此。作者可能指的是狮子，明清时代的狮子雕塑外形和神态都接近哈巴狗。

[75] 中国人过去的习惯除了尊称有身份的人为“先生”外，还把“先生”作为老师的代称。盲人当时大多从事算命的职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因此也被称为“先生”

[76] the yellow temple，北京标准发音应读为 “黄寺儿”，位置在今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这条大街原有东西两座黄寺，都属于藏传佛教寺庙，“黄寺”名字的来历据说是因为这两座寺庙都使用皇家专属的黄色琉璃瓦。东黄寺又名普净禅林，是1651年顺治帝为招待前来朝觐的治佛脑木汗所建。西黄寺建于1652年，相继作为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来京朝觐时的驻地。东黄寺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毁于战火，残余部分后来被逐渐拆除。西黄寺目前仍然存在，已改为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

[77] the temple of confucius，指国子监孔庙。

[78] 即西直门天主教堂。

[79] 北京民间流传有铸钟娘娘的故事，大概意思说铸造大钟期间，工匠的女儿主动跳进铜水充当祭品，死后成神。

[80] 这段描述错误比较严重。永乐大钟最初的确悬挂在钟楼，不过这口钟在1607年明万历年间被转移到了紫竹院西面的万寿寺，1733年清雍正年间又被转移到觉生寺再没移动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觉生寺才被民间俗称为“大钟寺”。作者1902年来华，不可能在钟楼上看见永乐大钟。

[81] 这段描述也不准确，元大都时代修建的鼓楼在清乾隆年间毁于大火，乾隆帝下令在元大都鼓楼以东不远的位置重新修建了今天依然屹立在那里的鼓楼。

[82] 原文如此。实际应为顺治帝时代。

[83] 即乾隆帝在1782年为缅怀六世班禅，花费7000两黄金在黄寺修建的清静化成塔，俗称“班禅塔”。

[84] 即雍和宫著名的檀香木佛。

[85] 一般佛教寺庙大殿都是这样的布置，3尊佛像象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两侧的站姿雕像是阿南和迦叶尊者。

[86] 应指蒲团。

[87] 通过上下文内容判断，作者看到的应该是雍和宫喇嘛著名的打鬼仪式。

[88] 指汉地僧人。

[89] 即石鼓文，秦代石刻文字，采用小篆字体，记载了周宣王打猎的场景。发现于唐代，因刻石形似鼓而得名，共10个。清代时保存在北京国子监，现原件已转移到故宫博物院，复制品仍留原地。

[90] the hall of classics，国子监太学正殿，平时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场所。

[91]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法国人，庚子拳乱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

[92] 指满族妇女搭配旗袍穿着的近似围巾的东西，学名“领子”。

[93] 学名 “扁方儿”。

[94] 4个爪的龙形图案一般被称为蟒。

[95] 指团龙图案，清代制度规定，只有皇族的正式服装上才能使用团龙图案，普通官员则依照官阶使用图案不同的方形补子。

[96] 指朝珠。

[97] the young empress yehonala，指光绪皇后，她是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儿。

[98] prince Chin，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皇帝曾孙。

[99] 即李莲英。

[100] 应指1902年成立的保定军校，中国第1所近代陆军学校。

[101] 原文如此。实际慈禧在西逃和随后返回北京的途中都曾路过保定，只不过没有长时间正式停留。

[102] lord Arthur Russell，应指第二代罗素伯爵，他的父亲第一代罗素伯爵是19世纪英国首相。

[103] 咸丰二年进士，晚清重臣，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在1901年出任过外务部会办大臣。

[104] 同治年进士，累官至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105] 原文如此。实际可能是菊花。

[106] 即春节。

[107] 即在位期间多次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她死于1901年1月22日，因此作者说是“已故的”。

[108] bon-bon，北京土语对点心的称呼，也泛指各种面食。

[109] 即吻兽，主要起镇宅、辟邪的作用。

[110] 指万寿山。

[111] 应指万寿山佛香阁。

[112] 指颐和园石舫。

[113] 恭亲王奕 的长女，荣寿固伦公主，她从小颇得慈禧宠爱，在紫禁城内

长大，因此作者有“慈禧养女”的说法。

[114] kulun kungchu，这个称号一般只授予皇后本人所生的女儿。

[115] ching shou，富察·景寿，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帝的女婿，他的儿子志锐是荣寿固伦公主的丈夫。

[116] 此处说法不准确，其实是两人结婚5年后去世的。

[117] princess shun cheng，多罗顺承质郡王爱新觉罗·讷勒赫，即第15代顺承郡王的福晋。

[118] 即爱新觉罗·载振，他的福晋是叶赫那拉·那桐的女儿。

[119] 维多利亚女王之子，1901-1910年在位。

[120] 清代皇室女儿分8个等级，多罗格格其实为第4或第5等。

[121] 庆亲王有个女儿嫁给了慈禧弟弟桂祥的儿子。

[122] 即宫商角徵羽五音。

[123] 即十三陵。

[124] 参照上下文内容，应指1902年9月14日。

[125] bi yun ssu，北京香山附近。

[126] ta chih ssu，又称西山大觉寺，始建于辽，位于今北京市海淀区阳台山。

[127] hei lung tan，北京有3个黑龙潭，目前知名度最高的是密云黑龙潭，房山也有黑龙潭，作者去的是位于海淀寿安山的黑龙潭，距离北京市区30公里。海淀黑龙潭附近修有龙王庙，还有康熙和乾隆的御制碑，清代时的知名度远高于另外两个黑龙潭。

[128] 安徽亳州人，靠镇压捻军起家，这个人和他手下的部队在清军当中战斗力是比较强的，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时都有不错的表现，慈禧西行时曾率军护送。

[129] 作者讲的是后羿和嫦娥的故事。

[130] pang chun，按作者路线推测应指庞各庄。

[131] chichow，今天津蓟县。

[132] 位于河北省遵化市，也就是清东陵西北23公里的蓟县、遵化、兴隆、三县交界处。

[133] 指袈裟。

[134] 指度牒。

[135] 严格遵守戒律的僧人讲究过午不食，每天只吃早饭和午饭，这就是所谓的“持斋”。

[136] kwei音，具体身份不详。

[137] tsai音，具体身份不详。

[138] 指燕窝。

[139] 原文为hundred-year eggs，可能指皮蛋。

结语

眼下，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即将告别这个国家。这段经历带来的感受称得上五味杂陈，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来到中国。随着驻留这个国家时间的日益增长，我对它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谁也说不好它将会走向何方。我们这代人目击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墨西哥、秘鲁、印度以及很多中亚和非洲国家纷纷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中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被碰得头破血流，却避免了这样的命运。现在的中国处于列强包围当中，列强各有各的利益诉求。清廷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然而大清军队的衰弱却让这样的行动一次次沦为泡影。

大清帝国的衰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皇帝中央政权的无力，其次是各级地方官员的腐败。正如前面所说，总督和巡抚们的权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几乎是不受制约的，很多人因此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成了被默许的行为。正如罗伯特·赫德爵士所说，腐败已经成了大清帝国的痼疾，由此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例如，法官断案时可以根据所收贿赂的多少颠倒黑白，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任意增加税款额度，军官们明目张胆地吃空饷，很多人通过食盐和鸦片生意大发其财。

内部腐败再加上外有强敌，大清帝国急需一场剧烈的变革走出困境。重病还需猛药治，这场变革必须来得迅速和彻底。中国人是个优秀的民族，只要条件合适，他们就将创造出与西方世界比肩的现代文明。这个国家眼下正处在命运的三岔路口上，如果错失良机，就可能仍需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没有人能拯救这个国家，除了他们自己!

北京，1903年11月25日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Jenghizkhan成吉思汗

Fuhsi伏羲

Yenti炎帝

Paohsi庖牺氏

Huangti黄帝

Yu禹

Confucius孔子

Chiehkuei夏桀

Meihsi妹喜

Tang汤

Chouhsin殷纣王

Tachi妲己

Pikan比干

Wuwang武王

thedukeofchou周公

Pochin伯禽

Laotze老子

Mencius孟子

Shihhwangti始皇帝

Liupang刘邦

Tungcho董卓

Wangyun王允

Lvpu吕布

Tsao曹操

Liupei刘备

Sunchvan孙权

Suiwenti隋文帝

Suiyangti隋炀帝

Kublaikhan忽必烈可汗

Liyuan李渊

Oghotai窝阔台

Tooli拖雷

Kangu蒙哥

Honan河南

Manchu满洲

Wusankui吴三桂

Nanking南京

Kwanghsu光绪

thelongwhitemountain长白山

Peking北京

Shunchih顺治

Kanghsi康熙

Yungcheng雍正

Chienlung乾隆

Ili伊犁

Canton广州

Macartney马戛尔尼

Jehol热河

Chiaching嘉庆

Amherst阿美士德

Napier律劳卑

Chusan舟山

thebogueforts沙角炮台

Amoy厦门

Ningpo宁波

Tenghai定海

Chefoo乍浦

Shanghai上海

Chinkiang靖江

Hsienfeng咸丰

Fatshan佛山

Takuforts大沽炮台

Kwangsi广西

Hankow汉口

Newchwang牛庄

Tengchow登州(烟台)

Formosa/Taiwan台湾

Swatow汕头

Hainan海南

Kiungchow琼州

Tungchow通州

Chefoo烟台

Jiukiang九江

Pakhoi北海

Soochow苏州

Chihli直隶

Lihungchang李鸿章

Tsengkwofan曾国藩

Tungchin同治

Tientsin天津

Ahlute阿鲁特

Tszekwangpavilion紫光阁

Langson谅山

Foochow福州

Tamsui淡水

Tsungliyamen总理衙门

Mandalay曼德勒

Yaluriver鸭绿江

Portarthur旅顺港

Shantung山东

Weihaiwei威海卫

Pescadores澎湖列岛

Liaotung辽东半岛

Hunchun珲春

Kirin吉林

Aigun瑷珲

Taitsihar齐齐哈尔

Shanhaikwan山海关

Mukden沈阳

Kaiping盖平

Chinchow锦州

Amur黑龙江

Dalny大连

Hongkong香港

Macao澳门

Kiaochow胶州

theredriver红河

Yunnan云南

Nanning南宁

Kangyuwei康有为

Wengtungho翁同龢

Liangchichao梁启超

Tantzetung谭嗣同

Liushio林旭

Fukien福建

Yangtui杨锐

Yangshinsheu杨深秀

Sungpehlun宋伯鲁

Kangkwangin康广仁

Chenpaochen陈宝箴

Litwanfen李瑞棻

Changlin长麟

Wangmingluan汪鸣銮

Tsztui志锐

Wentingshih文廷式

Kowlangtsai寇连材

Szchuen四川

Paoting保定

Taiyuan太原

Peitang北塘

Yangtsun杨村

Hsuanhuafu宣化府

Tungfuhsiang董福祥

Singanfu西安府

Puchun溥儁

Chengting正定

Chienmen前门

Kwanti关帝

Kunglingi孔令贻

Boyunssu白云观

Fahsien法显

thestraitsofmalacca马六甲海峡

Hanwinkung韩愈

Hangchow杭州

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

Tsanghieh仓颉

Szematsien司马迁

Lipo李白

Tufu杜甫

Ssumakuang司马光

Chuhsi朱熹

Matuanlin马端临

Woosang吴淞口

Changchihtung张之洞

Kiukiang九江

Ichang宜昌

Kweichoufu夔州府

Patung巴东

Hupeh湖北

Anhui安徽

Lassa拉萨

Yuanshihkai袁世凯

Wangwenshao王文韶

Chvhungchi瞿鸿禨

Tsaichen载振

Nankow南口

Mayukun马玉昆

Malanyu马兰峪

一位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美]凯瑟琳·卡尔 著
陈述 陶林 译

親歷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

著者：（美）卡尔

译者：陈述　陶林

责任编辑：郝鹏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一九〇三年的清宫画像
原前言 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第一章 初入宫廷
第二章 泛舟昆明湖
第三章 醇亲王府
第四章 太后的寝宫
第五章 皇后和宫中的贵妇
第六章 慈禧太后的爱犬
第七章 光绪帝的万寿大典
第八章 我眼中的光绪皇帝
第九章 光绪皇帝的万寿大典
第十章 畅游三海
第十一章 极具个性的慈禧太后
第十二章 重返颐和园
第十三章 丁祭大典
第十四章 宫中的太监们
第十五章 慈禧太后的才情
第十六章 太后临朝
第十七章 颐和园
第十八章 中秋之夜
第十九章 颐和园中的游园会
第二十章 颐和园中的闲适生活
第二十一章 欧洲来的马戏团
第二十二章 与众不同的习惯
第二十三章 太后的烦恼
第二十四章 冬天到来
第二十五章 北京杂忆

第二十六章 满族风俗之我见
第二十七章 中国人的送礼之风
第二十八章 紫禁城的冬天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宗教
第三十章 太后往事
第三十一章 慈禧太后面面观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新年
第三十三章 清宫趣闻
第三十四章 送展圣路易斯
第三十五章 别了，颐和园
译后记 慈禧这“老祖宗”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一九〇三年的清宫画像

陶林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记载了一段很有趣的清宫往事。

这本书的故事要从一百年前，也就是1903年说起。这一年是农历癸卯年（兔年）。同时，也是中华帝国大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无论对大清朝，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还算太平的年头。

这一年的年头，大清朝的河南省安阳府出土了一批“龙骨”，经在京官员王懿荣研究，乃是商代的甲骨文；清政府成立了北洋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英国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入侵中国西藏，而俄国则在一步步地蚕食中国东北；4月，全国上下声讨俄国对东北的侵略，唯满清政府岿然不动；5月，上海滩爆发了赫赫有名的“《苏报》案”，革命党人章太炎、《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相继在上海的《苏报》上发表了赞同革命的文字，引发了满清政府不快，遂封杀报馆，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引得全国哗然；6月，维新党人梁启超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请教革新之道；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学校，训练未来革命的军事人员；9月，满清政府成立了商部，力图振兴全国工商业；11月，《大清奖励公司章程》二十条颁布，鼓励全国兴办工商业；12月，知识分子林白水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白话报》，力争用白话文做新闻和出版，可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驱……



慈禧太后画像

这一年，韶山冲里一个叫毛泽东的湘伢子才十岁，上着学、放着牛，绕在池塘前跟自己的父亲作斗争；这一年，宁波慈溪口一个叫蒋介石的少年刚刚十六岁，可是他已经成婚两年。他是奉母亲之命，娶了一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小脚女人，并为之苦闷不已，终日寻思着要

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天地……

总之，在这一年里，大清朝这艘大船航行得还算平稳，新与旧犬牙交错，列强们侵略的步伐还算小心谨慎，英雄豪杰们各忙各的事业，局势还没糟到一决雌雄之日。

放眼世界，也是如此。这一年，日后死亡上千万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丝毫不见踪迹；无论欧洲还是美洲，日子宁静得如风和日丽一般；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太平洋电缆投入使用，通向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连接成功，标志着第一座亚欧大陆桥架成，未来全球一体化初见端倪；日本和俄国相互承认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即将爆发的日俄战争也未露出端倪；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成立了自己的汽车公司；几乎与此同时，在法国，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发现了具有放射性的镭元素；而在瑞士的伯尔尼，一个名叫爱因斯坦的默默无闻的专利局小职员，在抚养自己的小婴孩之余，推演着没人能看得懂的方程式，两年后，它们将以“相对论”之名震惊全世界；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着人类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飞机飞向了蓝天，完成了人类的首次飞行之梦……

这一年，一个叫希特勒的十四岁奥地利少年刚刚丧父，然而，他却庆幸自己不再做脾气暴躁的父亲的“出气筒”。这位少年的全部梦想，在于成为一个绘画艺术家，而他身为海关职员的父亲，则希望他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像他一样考取国家公务员，捧上金饭碗。父亲之死，重燃了希特勒的艺术之梦。三年后，他将义无反顾地去大城市维也纳追逐自己的梦想。在那里，他将为梦想付出流浪街头的代价。然而，老天给他的回报是异常丰厚的，因为多年以后，他将获得德语世界里最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职务。与他的职级相比，他那自负的父亲老希特勒简直不值一提。

然而，1903年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年的8月，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满清宫廷，宫门洞开，迎来了一位可能令当时的他崇拜不已的同行，一个来自美国的女画家——卡尔·凯瑟琳。这位美国女画家，在满清的紫禁城里，获得了一份为世界美术界所称羡

的好工作——为中国实质上最高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去画像。

对于接受现代美术教育、在现代美国成长起来的凯瑟琳小姐而言，她的这一旅程有如走进了“天方夜谭”的古老传说当中。或者，用时下一个时髦的话语来说，她“穿越”了。

不错，对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来说，她的确是穿越了。本来，她能打交道的各色人等，无论是政府官员、教师、艺术家还是学生，都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公民没什么两样。然而，只是因为美国公使康格尔夫人的介绍，她这一年的工作、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是实实在在“穿越”到满清宫廷里去当画师了。

除了认识太后，她还要认识皇帝、皇后、妃子、贝勒、格格、王爷们，还有一些叫做太监、宫女、嬷嬷的奇特人等。这些形形色色身份复杂的人，对于一个女画家而言，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

然而，幸好这位画师是一位外国女士。她既不会跟格格、妃子们勾心斗角，也不会跟王爷、阿哥们打情骂俏。她一心想着及早完成自己的画作，像达·芬奇或者伦勃朗那样，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并希冀能画出一幅绝世之作。

在她短暂的清宫画师生涯里，她可以体会到守寡多年的太后总是很慈祥，且很会享受宫廷代价高昂奢侈无度的生活，慷国家之慨毫不吝啬。她喜欢热闹，把乐享天下看成她的最自然之事，至于宫墙之外，天下的满目疮痍并不在她的考虑之列。

时值1903年，距离慈禧从八国联军的入侵中逃脱出来仅仅三年，距离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只有两年，距离她在1908年病终也只有五年的光阴。那时候，台湾、澎湖已经割让给了日本，中国周边割让给沙俄的土地无可计数，包括香港、澳门在内，无数个租界正交由列强管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有驻军；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争夺得更加厉害，战争一触即发……

总而言之，稍稍明眼的人都知道，这貌似太平无事的1903年，其

实是一个“风暴眼”。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是没有任何理由去“享福”的。然而，于慈禧而言，她只顾在世乐趣无边，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她只是一个女人，且是一个有聪明无见地的小女人。在历史中扮演着一个类似“贾母”、“王夫人”与“王熙凤”混合一体的角色，不仅严重错位，而且绝对是力不胜任。然而，倒霉的中华民族，偏偏在历史转型的当口上，摊上了这么一位执掌权枢的主儿，不能不说是冥冥中历史运数的局限。

而心念单纯的美国女画师，置身1903年的清宫之中，是不会说出那么多的。她能体会到的，只是慈禧的热情与好客，宫廷生活貌似的宁静与平和。她笔下记录的1903年纪事，与她的画作一样，是对那时那景的忠实描绘，平实地读过去，让人饶有兴致，但如果读者带着我所讲述的整个1903年的历史大背景去读，我相信，大家跟随凯瑟琳的清宫穿越之旅，一定会有别样丰富的感触。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在1903年，现代艺术画派的代表人物，与梵高及塞尚齐名的法国艺术大师高更先生，在巴黎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就造诣而言，高更显然要比墨守成规的画师卡尔·凯瑟琳高出许多。他抛下银行高管的白领职位，“穿越”到澳洲的塔希提岛上，混迹于原始部落当中，苦苦追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我非常好奇地联想，如果换成高更到清宫之中，不知他会追问什么样的问题，画出怎样的画卷来。

最后，提请读者注意一点，本书的译者陈述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工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他久经古典阅读熏陶，练就了一副非常典雅的文笔。这一点，在本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原作者凯瑟琳是一位职业画家，但并不是一位专业作家，她的英文文笔相当浅显。可陈述匠心独运，把原作翻译成了颇为典雅的文字。在修改译稿的过程中，我斟酌再三，最终只作出了极为有限的修改。一位美国女士呈现出非常典雅的汉语文字，很令人惊奇，也让人回味良多。本书是否因此读来妙趣横生，且交由尊敬的读者去判断吧。

原前言　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卡尔·凯瑟琳

在世人眼中，慈禧太后是一个性情暴戾、阴险恶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这种观点在最初也影响着我，然而当我见到她后，这些印象立刻被颠覆了。她待我殷勤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使我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她专门为我安排一座宫殿，以使我可以安心自在地生活工作，至于画画所需，更是事无巨细地安排到位。是以我在清宫的这段日子，可以安心地从事绘画，一共成就了四幅作品，其中一幅便是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参展的。

我在东方宫廷中的这段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经历，非但外国人没有，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少经历。但我离开宫廷不到数月，本不打算将所见所闻公之于众。因为，慈禧太后待我如此周到，其他人也待我如同家人，亲切备至。我觉得我有义务报答他们的善意，而不是将这些宫闱秘闻公之于众。这既是对他人的回报，也是对中国风俗礼制的尊重。



美国女画家卡尔

但是，当我回到美国后，报纸上经常出现许多关于我的报道。这

些报道真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有的说慈禧太后本来是又老又丑，曾对我进行威胁，逼迫我将其画得年轻漂亮，而且落笔之后，不许我有任何修改。至于伦敦的《泰晤士报》更是耸人听闻，在他们笔下，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虎狼之心、残暴成性的老女人，卡尔小姐数月来伴驾随行，颇有感触。

当我看到这些文章时，真是愕然不已。天地良心，我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绝伦的想法，更遑论将其公之于众。有道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诸家报纸转载抄袭，添油加醋，谓之绝非空穴来风，查有实证。有道是“三人成虎”，民众也跟着人云亦云，说得越来越玄乎，大有蔓延之势。

本来，面对这些谣言，我大可置之一笑，不予理睬。然而，事关他人清誉，容不得我再缄默下去。是以我要挺身而出，与谣言斗争到底，还公众一个真相。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我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写作成文，公之于世。

毫无疑问，一旦本书问世，必然会引起我的中国朋友的关注，也许会冒犯她们，她们可能根本不想理会书中的内容，仅仅因为我将她们的宫闱之事公布出来，而埋怨于我。倘使慈禧太后以及宫中的贵妇们听说此事，想来会盛怒不已，怨我“恩将仇报”。在古老的中国，人们极为看重礼法制度，不得对皇亲贵胄妄加议论，违者则以“大不敬”论罪，轻者受刑，重者则有诛族之罪。是以历代中国帝王的生活起居，常人都不敢妄议，更是被律例所禁止的。

因此，本人的拙作，即使对慈禧太后滥加饰美之词，也无法弥补我的“大不敬”之罪；而读者则会误解我的本意，以为我是在向慈禧太后献媚。值此两难之地，我真是不知所措。然而，本人心意已决，决意将此书付梓出版，不求流芳百世，但求无愧于心。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慈禧太后，一个真实的大清内廷，展示在世人面前。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对于义和团运动，大内之间经常有人作为谈资而提及。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也毫无避讳。我耳闻目睹，也颇知道一些掌故，觉得若

是能奉献出来，也能为史学家提供一些资料。

一位哲人曾说过，“倘若你想了解一个人，莫过于先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因如此，我想，数月以来，我身处大内之中，所见所闻，对了解慈禧太后应该很有帮助。

我想，拙作对于了解清宫内廷，应该有点帮助。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走近慈禧太后生活的西方人，我曾处在她的角度，去观察周边的事物，我也亲身体验到了许多风俗礼节。当然，在当今的世界上，天资聪颖的汉学家比比皆是，本人在中国待的时间毕竟有限，再加上天资愚钝，泽笔芜陋，实在是贻笑大方。

由于我在中国仅仅待了九个月，无暇对这个古老的国度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了使拙作能够有些深度，我曾翻阅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希望对我的写作能有些帮助。很多事物，千百年来已经沿袭为传统，在中国人看来是合乎情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些传统的根源所在。我更不可能寻根追源，进行学术般的考究。以我的粗浅，只能将我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尽管这可能会引起清廷的不满与反对，但我依然希望能借助拙作来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慈禧太后。以下便是一个谨慎的画家质朴无华的描述，如果有描述不够全面的地方，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谅解，报以宽容的微笑。

第一章　初入宫廷

1903年8月5日，是太后首次召见我们的日子。那天一大早，我们便恭候在美国大使馆，以便及时出发，因为从北京城到颐和园路途遥远，坐车需要花上三个小时。和西方一样，严守时间也是东方的重要礼仪。因为画像的时间被定在十一点，这个时辰，是钦天监根据历法进行斟酌，并经过慎重的考虑、磋商，最终定下来的良辰吉日，丝毫不得耽搁，所以我在十点半便要赶到。



俯瞰北京城

早晨七点钟，在使馆卫队的护卫下，我带着绘画用具，与康格尔夫人以及翻译，乘着一辆豪华马车离开大使馆。出了北京城，一路上但见良田肥沃，景色宜人。由于昨晚一直在下雨，空气清新，湿润的青石路面像一条蜿蜒的小河闪着光芒，向远方延展。种着玉米和小麦的农田郁郁葱葱，为阴郁的清晨增添一分生气，时而看到一棵松柏，从一座古刹中伸展出来。远远地可以看到，颐和园坐落在一座山峦之下，与淡蓝色的天空相互映衬，至为恬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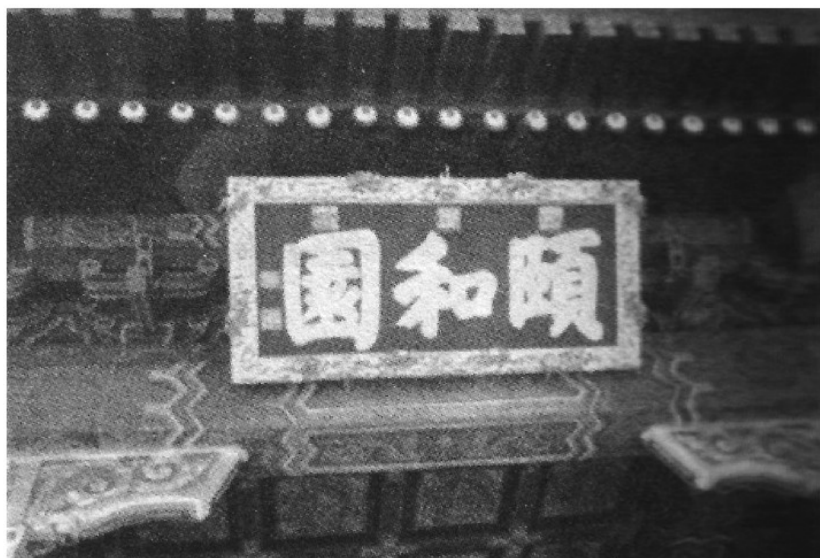
离开北京城后不久，便有外务部的卫队迎上前来，随后护行。马车又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匆匆驶过一处村庄，农人们早已在田间开始劳碌，又经过一座宏伟的喇嘛庙遗址和几座皇族贵胄的私家园林。

渐渐地，颐和园近了，只见殿阁巍峨，气象万千，红墙绿瓦，相映生辉，树木成林，百鸟啾鸣，清雅至极，仿若人间仙境，令人为之

神往。

到了近前，我不禁皱起眉头，只见宫墙外坐着许多乞丐，或盲或跛，残状不一，见了我们，纷纷拥上前来，伸手讨要，却早被护卫尽数驱赶。如此景象，在东方专制国度屡见不鲜，也非颐和园前所独有。

每当太后、圣上移驾颐和园，外务部为方便起见，在颐和园大门左侧设立一个临时办公场所，已然沿袭成俗。当我们走下马车时，立刻便有一众官员，带着翻译上前恭迎。



我们在接待室稍待片刻后，一名太监便出来与我们会面，他引领我们坐进覆着红缎的豪华轿子，早有六名轿夫恭候在这里。他们抬着我们由左门进入（正门仅供太后、皇帝使用，以显示其威严），我们便进入了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颐和园里。

沿途景物，殊为罕见，一路上我目不暇接，尚未适应过来，便来到了一座宫殿之前，殿前许多奇花异草，争芳夺艳，美不胜收。落轿后，我们便由众多太监引领着，走进一座大殿，其间虽然人数众多，却是个个噤口不言，只觉鸦雀无声，尽显庄严肃穆。

正入眼帘的是一座朱漆屏障，上面嵌着一方大玻璃，上书朱红“寿”字。这里空间甚小，东西南北不过十余步，而穿过此殿，就是一座大殿。这便是慈禧太后召见我们的地方了。

早有一群格格和宫女恭迎过来，其中便有前裕庚爵爷[1]的夫人与两位女儿——德龄[2]与容龄两位公主。她们曾随爵爷出使法国，那时我在法国学画，偶然与之相识，相处甚睦，如今阔别多日，乍一相逢，不禁喜出望外。两位格格的英文水平炉火纯青，自然而然地充当我与中国人之间的翻译。

此时大概是十点一刻，我们便先在这座大殿中恭候太后圣驾。大家正在谈笑风生，忽然间，大殿中悄然无声，我环顾四周，只见一身材娇小，容貌清丽的女子，正满面春风地问候康格尔太太。

德龄对我小声说道：“这就是太后。”我不由吃了一惊，西方传闻，慈禧太后乃是凶残成性，歹毒刻薄的老妖婆子，怎会是眼前这样一个标致美丽的贵妇人呢？

然而，事实便是如此，眼前这位年轻、优雅、和蔼而又高贵的妇人，分明就是慈禧太后。

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清矍少年，端庄俊雅，却未脱稚气，这便是大清朝的天子光绪皇帝。

在与康格尔夫人互致问候之后，慈禧太后向我看过来，我顿时感到她周身透露出庄严与肃穆。她信步走到我身前，伸出右手，并报以亲切的微笑。我立刻被她的雍容华贵征服，忘记了事前被告知的宫廷礼仪，情不自禁地握了握她那纤纤玉手，放在嘴边轻轻一吻。

事后想起来，这真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行为，一直到礼毕之后，我都在惊诧于她那难以名说的魅力。

只见太后优雅地转过身去，向那年轻人打着手势，轻声说道“皇上”，同时亲切地看着我。我随即向光绪皇帝行礼问安。他微微一躬，微笑着向我回礼，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但我感觉到，在那一瞥

之下，他的眼神中透出一丝机警，迅速地对我打量一番。

寒暄片刻之后，容龄告诉我，太后传下懿旨，让我开始绘像。此时，慈禧太后则暂退殿后更衣。

我环顾四周，尝试着在这座大厅中寻找适合作画的地方。这里高大宽敞，但四面窗户都糊花纸，导致光线很不理想。唯有玻璃屏风前，光线差强人意，但此处过于逼仄，如果在此处作画，势必要靠近太后，而这很不适合画大型画像。

早晨从外务部那里得知，慈禧太后对西洋画法一无所知，在她心中，最重要的是有一幅成稿。她不会明白我在一张小画布上所打的初稿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立刻开始，她将不会给我太多的时间。而且我事前被告知，太后仅仅会出座一两次，若不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抓紧完事，便不会再有机会，如此一来，事情便会糟掉。

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由沉了下来。我不可能有绘制底稿的工夫，只能简略地绘制几张草图，仅仅用片刻工夫来设定姿势。事已如此，我只得见机行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慈禧

不一会，太后更衣回来，只见她一袭满族盛装，乌黑的头发梳成“大拉翅”，这是慈禧太后发明的一种发型。“大拉翅”发髻实际是一个高约一尺有余、内以铁丝为骨架、外包青缎青绒布做成的两把头冠套。摘戴自如，又可美饰头发，用檀香木、金丝和小珠子镶成。头花是“大拉翅”发髻的主要首饰，大多以珠宝镶嵌而成，发髻正中有大朵珠宝头花。头饰上簪插了许多珠翠首饰：翠簪、凤钗、金扁方、宝石头花、珍珠头箍及下垂的一串串流苏，显得雍容富贵。

太后身穿黄底绣紫藤萝团寿字氅衣，上面缀着无数光灿灿的大明珠，外套如意云头领，上绘“寿”字花纹。对襟排穗下摆坎肩，前挂念珠，念珠乃是由十八颗翠珠，两颗碧玺珠穿成，与碧玺佛头相连，下穿钻石、红宝石、珍珠、结牌等装饰物。这念珠既可以挂在衣襟上，也可以戴在手腕上。手戴玉护指，绚丽夺目，光艳照人。身子两侧，佩戴着手巾、荷包等物，都是极显华贵。

太后来到殿中，问我应该坐在哪里。太监依着我的指点，将宝座安置妥当，太后遂移驾坐下。刚一坐定，顿显威严神态。慈禧太后身高不及五尺，此时她穿的鞋，却有六英寸厚。所以她登上宝座，身体也似乎高了许多，望去更加庄重，仪态举止，极为雅丽。

太后不时地叮嘱德龄，让她告诉我如果姿势不佳，大可以直言改正，我连连点头。此时已近午时十一点，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大凡画家开始一幅作品，都需要仔仔细细地对人物加以揣摩，今日我面对的，正是中国至尊无上的慈禧太后。她庄严地坐在我眼前，任凭我以三寸之笔，画出全部的庄严圣容。此时此刻，我倍感责任重大，简直无以言表。我的手指微微颤抖，今天，我将全力以赴，画得好与不好，关系着我在宫廷里名誉的毁辱，这倒也还罢了，我所顾虑的，是到时康格尔夫人如何向太后交代。

此时，慈禧太后居高临下，用一双高深莫测的眼睛，一览无遗地望着我，让我感到惶恐不安，双手不听使唤，只好强作镇定，心中不断祈祷，万万不要慌张，也不能彰显张皇之色。

“当！”猛然间，八十五座自鸣钟一起齐鸣，真是蔚为奇观。时辰已到，容不得我再踌躇犹豫，我举起炭笔，在画布上落下第一笔，开始描绘这位举世闻名的中国太后，一个颇有争议的女人。格格、侍女和太监们伫立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看我作画，屏息凝气，不敢发出一丝响动。此时此刻，我看到一种肃穆庄严的氛围，只有走针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更显大殿中的寂静。

随着炭笔在画布上来回游走，我渐入佳境，心无旁骛，天地之间只有我眼前的太后与手中的画笔。时间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久，我眼前的画已经初具成像。

慈禧太后忽然开口言道：“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不禁一愣，只听她继续说道：“柯姑娘远道而来，车马劳顿。不如暂停画像，稍事歇息，明日再说。”说着，她从宝座上站起身

来，走到我的画架前，凝神查看我的作品。此时我已经画出了轮廓，其面部也有所点缀，已看得出些许神态来。太后仔细地审视一番，面带喜悦之情，赞不绝口。可我本能地感觉到，这并非由衷之言，想来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我的紧张情绪。

看完之后，她又叫康格尔夫人和格格们一起前来观赏，发表意见。一时间议论纷纷，大伙全都是交口称赞，多为溢美之词。

太后又转向我说道："柯姑娘的画像，极合哀家的心意。不知姑娘可否愿意在皇宫多逗留几日，为我画成此像？这样我也可以在闲暇之时，前来绘画，不必因拘泥时刻受苦。"听闻此言，我不由大为欣喜，之前，听到关于这位太后对外国人极度仇恨的传闻而形成的成见，立刻烟消云散。我想，我应该能够与这位风华绝代的太后融洽地相处，并完成一幅伟大的作品。当即欣然应道："太后既然下令，我当然努力去做好。"

见我应允此事，太后也显得颇为高兴，她开口道："柯姑娘既然同意，我也绝不会亏待于你，定会让你感到宾至如归。"然后，她告辞走出大殿，我们也暂往别处，饮用茶点。

太后独自用膳，早已成为惯例。大概这样方能显出其尊贵无比的身份地位。倘若有来宾，则由格格与贵妇们负责招待。宾客依照身份，依次坐在主席的左侧，即是裕庚爵爷的妻女、康格尔夫人和我。

只见桌面上置放着精美绝伦的餐具，上面布着鲜花与水果，中西式菜肴一应俱全。中国的菜肴真是色香味俱全，尽管我知道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但我在瞬间就被精美的菜肴征服。桌上准备着西式酒水和中国的饮品，尽管刀叉就摆在我面前，但我还是尝试着拿起筷子，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种食物，样样都品尝了一下。

用过餐后，光绪皇帝引着他那年轻的皇后走了进来。和早晨一样，太后将皇后介绍给我，这位皇后举手投足之间，体现了无比的优雅，无愧于"皇后"这一尊称。随后，太后告诉康格尔夫人，她已经安排好一出戏剧，并邀请我们到时一起前去欣赏。

主人既然盛情邀请，我等岂有不从之理，当即欣然道谢。于是，慈禧太后与康格尔夫人走在前面，我、格格与皇后紧随其后，只见处处鲜花盛开，芬芳扑鼻。须臾，我们来到一座大厅之前，走了进去，只见这间戏院四四方方，大概有六十到八十英尺见方，周边乃是用汉白玉砌成的长廊，端的是无比华美。那戏台便在正中，三面临空，台后则有两门，乃供演员之出入。戏台前满布鲜花，又多以紫铜古器为饰。



隆裕皇后

再往前，一座亭阁跃入眼帘，慈禧太后的御座便置于其间。周围是用厚玻璃做成的窗格，闪烁生光，别有情趣。亭阁占据形胜之美，坐在其中，可一览无遗地看到舞台，视听效果非常好。亭阁后面则是散座的厢房，是给朝廷大员或是皇亲国戚预备的，其间却没有椅凳，观众须得像土耳其人那样席坐在地，乃因在太后面前，没有人可以与她平起平坐。

今天除了我们，并没有其他来宾，想来是慈禧太后专门为我们召集戏班。演员们先是上前叩拜请安，慈禧太后端坐在一张裹着黄缎的红木太师椅上，光绪皇帝则坐在她左侧的一张黄色条凳上，这体现着中国式的尊卑关系。康格尔夫人和我则坐在慈禧太后的右侧，皇后、格格、贵妇以及宫女们，则环立在周边。

观赏了两三出折子戏后，我依旧看得一头雾水，但能感到其中的些许趣味，而且好奇所在，并未感到困倦。当演出结束后，康格尔太太起身向太后等人辞行，我陪她走到外面，与之告别。

自此以后，我便独自一人留在皇宫之中，这是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长期生活在宫廷中的外国人，并与这些宫廷女子朝夕相伴，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一阵孤寂袭上心头，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倘若有何变异，影响到我的画画，那真是非同小可。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德龄出来告诉我，太后已经回到寝宫，我也不必再前往戏院。太后反复叮嘱，要我先回卧室歇息，养精蓄锐，来日再画。她希望我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不要有任何拘束，倘有什么不便，只管开口便是。

听了这番宽慰的言辞，我深表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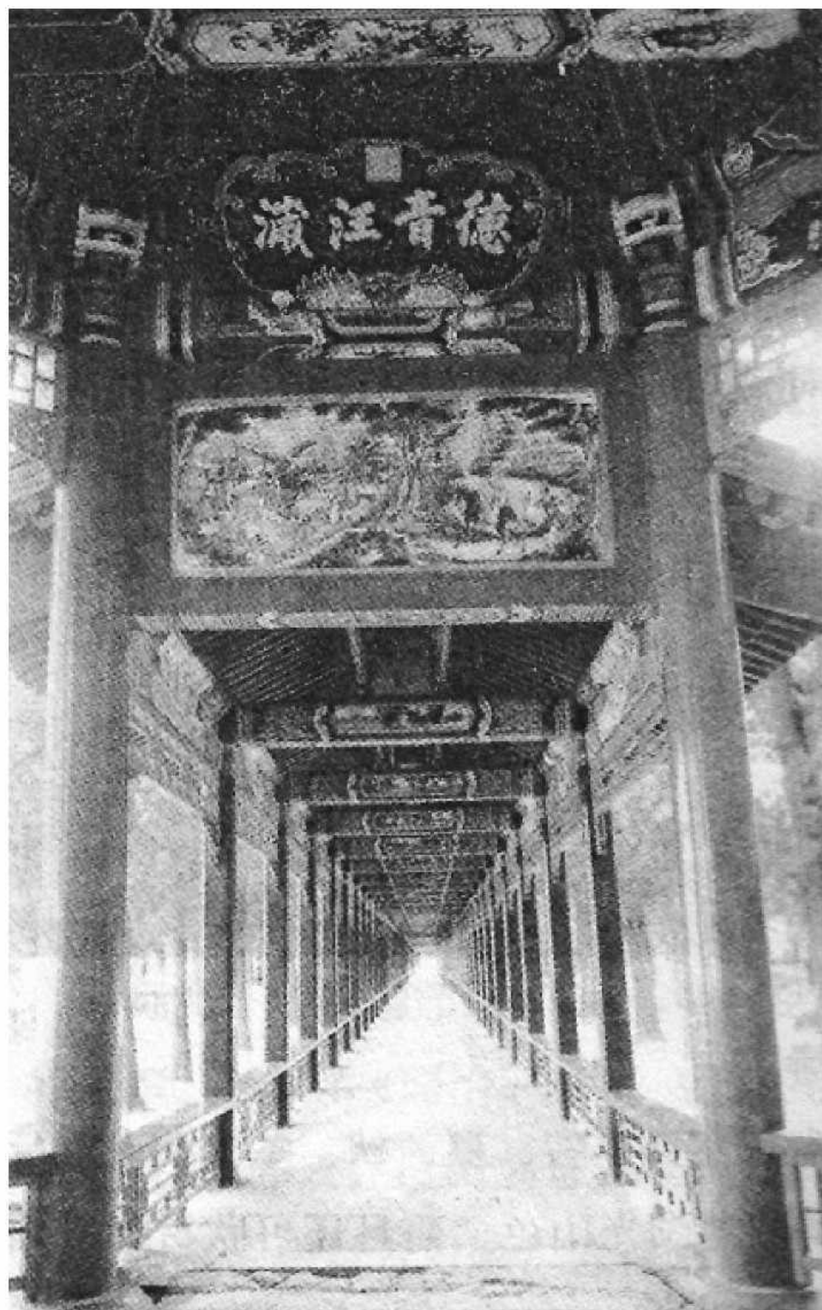
颐和园里的建筑，和中国的宫殿、庙宇一样，四面围以连廊，建造在石头地基上，高于地面，整体上都是四方结构，尽显庄严。太后为我安排的寝宫，在太后的寝殿的左侧，二者离得很近。这样方便我每日前往绘画。我的住宅乃一座小楼，青玉为砖，白璧作柱。室内的屏风有许多精美雕刻，巧夺天工。四面墙壁上张挂着许多名人字画。

由于房间的隔板能够自由移动，因此完全可以根据主人的喜好，随时调整室内的布局。板壁之间裱衬着蓝光闪闪的缎子，室内一面挂着古人的书画，是孔雀开屏水彩图，另一面则挂着一面大镜子。窗帘用黄色的绸缎缝制而成，缕缕清风把庭外的花香吹进室内，沁人心脾。室内陈设着各色精美的古董，花瓶、陶罐等等。床上尽是绫罗绸缎，一方绸幔像窗帘一样挡在窗前，虽是好看，却使床内光线昏暗不明，不大符合我的要求。我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但这里只适合睡觉，因为绸幔一拉就如同黑夜来临，闭上眼就能酣然入睡。

中国的床铺要比我在美国时硬得多，而且有十几个太监分拨到我身边为我效命，他们在门外窃窃私语。虽说有诸多不适，但我因为极度疲倦，还是很快便进入梦乡。

大约在五点左右，容龄小姐敲响我的房门，告诉我太后早已醒了，让我收拾停当，便去觐见。

我匆匆赶了过去，太后早已坐在大殿之中等候，她把我叫到身边，说道：“昨晚睡得可好？”



颐和园长廊

我回道：“有劳太后挂怀，一切安好。”她点点头，再次关切说道：“若有什么不妥，尽管说出来，不要客气。今儿个我精神头不是很好，咱们不画画了，明日再说。用过早膳，你且随她们一道逛逛吧。”

随后，太后便独自一人坐下，开始她的早膳。直到她离开餐桌后，皇后和格格这才招呼我，围坐于太后适才坐过的地方，开始用膳。太后坐过的位置此时作为虚席，皇后在那张宝座的左侧坐了下来，并邀我坐在她的右边，和容龄一起对我进行极为周到的款待。

我们用过早膳，便向太后辞行，离开正殿，去醇亲王的花园游览一下，这位醇亲王，乃是当今圣上的生父，他的宅子早已空了下来，正好留给我以作临时的住所。

第二章　泛舟昆明湖

我们玩了一天后，便接到通知，明日早朝散了，便去为太后画像。次日早晨，我已有了经验，不待德龄敲门，便已收拾停当，随时可以出发。果然，这次我们先行抵达，过了片刻，一群宫人簇拥着太后，缓步走了过来，还有必不可少的翻译容龄小姐。太后唤我来到身前，轻轻握住我的手，说道：“柯姑娘，昨儿个歇得可好？”

“回太后，一切都好。”我恭敬地回道。

“如此便好，趁着大伙儿精神不错，今儿就抓紧画画吧。”

我不禁对她的体察入微佩服不已，昨日她见我并未适应宫中的生活，只是强打着精神，显然是不太妥当的，是以把画画的日子推到了今天。见我此时精神不错，便拉住我的手走到前天那座大殿，太后先坐下小啜一口清茶，然后退到殿后，卸去朝服，穿上前日那身黄袍，头上胸前依然佩戴着那些金银珠宝，重新端坐下来，示意我举笔作画。

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地端详慈禧太后，我感到前一天，我对她的观察太草率，印象不太清晰，此时此刻，我感到她也放松了许多，比起上次来，少了一些威严，多了几分和蔼，期间还随和地与我说笑，浑身散发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东方文明真是神秘，我即使潜心探究，也难窥全貌。

我拿起笔来，凝神望去，她就在那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开始，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其全身上下都极为匀称，面容红润富态，一头漆黑柔软的头发，苗条丰满的身段，纤细优雅的双手，她的面容生就得非常好，前额微隆，双耳浑圆，下巴光洁，眼睛明亮，睫毛纤长，鼻子笔直（中国人称其为富贵之相），弯弯的眉毛浑然天成，不带半分修饰，唇丹赤白，粲然一笑时，风情尽显，却又透露着坚毅与

果断。

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太后已经年近七旬，我真以为她只有三十余岁。她没有使用任何化妆品，自然生成的光彩，可见平时她是如何精心地进行保养，再加上披金戴银，浑身上下雍容华贵，堪称风华正茂的绝世艳后。



慈禧

正当我出神地望着慈禧太后时，她老人家开口言道："今儿要画哪个部位？"

"回太后，今天画面部。"我想到别人告诉我太后对她的面容颇有自信，当即回答道。

果不其然，太后点点头，露出赞许之色。

其实，若在往常，画画往往先从整体着手，一般不以面部为始，此举实在是打破常例。我接着前天的画稿，细加点缀，再以阴阳明暗润色。

在场的贵妇、宫女和太监们往来不绝，尽心伺候。慈禧太后一边饮茶，一边闲谈，神色怡然。这位太后和许多东方妇女一样，喜欢抽烟，身边的宫女太监时而上来装烟点火，太后所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烟袋，这是一个白铜制成的扁壶，一根细长弯曲的铜管从壶里伸出来，伸进她的嘴里，烟壶上还有另一个圆孔，里面塞了一根欧洲雪茄。在欧洲，人们是直接把雪茄含在嘴里，太后却把它插在烟壶上，想来这样味道也许会更好，或者说，看起来会更加优雅一些。

大约画了一个钟头，太后忽然开言道："咱们先歇息一会，活动活动身子。"说着，便离开宝座，来到我的画架前，仔细观看起来。她的脸上很快露出一片欣喜之色，显而易见，太后对我的画非常满意。我想，这是因为画布上已经呈现出太后的容貌神态。她站在我身后，对一些细节进行评价，她感叹道："真是奇怪，又没有把纸放到脸上，竟能画得如此传神。我真想看看这幅画能画成什么样子。"

然后她又对我说道："今个儿上午，画的时间也不短了，想来你也是倦了，不如先停下笔，用过午膳后，下午哀家若是还有兴致，再让你接着画。"

我点头道："非常感谢太后。"

随后，几个宫人便上前把我的画布和画架收拾起来，容龄小姐送我回到住宅。此时已到了午饭的时间，太后又派另一位少女前来陪我，顺便交个朋友。

这位少女名叫叶赫那拉·红英，他的父亲是一位朝廷勋贵，曾做过中国驻德国柏林使馆的参赞，精通英、德两国语言。红英随父亲学过不少英语，是以能和我交流自如。我们一见如故，当下便坐到一起，共进午餐。

由于红英的到来，午膳显得更加丰盛奢华，一上来，桌子上摆满了二三十个盘子，里面装盛着各式珍馐美味。

中国的厨师堪称艺术大师，他们做出来的珍馐佳肴堪称色香味俱全，鱼翅、鹿羹、海参、燕窝、鱼脑、虾子，不一而足，还有许多其他各种美味，没有谁能像中国人这样，将各种飞禽走兽做成如此多的美味佳肴，他们做出的汤，其鲜美程度无与伦比，他们的糕点乍看起来和西式糕点相差无几，一品之下，却有着独特的风味。中式糕饼不是烤的而是蒸的，看起来并不怎么诱人，但你若放下偏见，细致入微地去观察时，会发现上面点缀着五个红点，甚是可爱，放在嘴中，则是满口溢香。中式糕点多呈灰色，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西式的美白面粉。他们做出美味的奶油，和香甜的糖果一样受到外国人的喜爱。

在宫中，除了米饭、面条一类的食物外，汤、烤制食物、甜食这些需要趁热吃的，一旦做好，便被装在精美的瓷盘中，然后放进保温的食盒中，需要时，便立刻端上桌面。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一条柔软的方帕当做餐巾。仔细看看，竟没有在西方常常见到的盐。

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只小酱碟，如果需要添加盐，就可以派作用场。中国人认为食物一旦由厨师烹制好，便不应该再往里面随意添加他物。在宫中吃饭，很少喝酒，偶尔小饮，也只是浅斟一杯果酒。酒水盛放在银质的酒壶中，因为酒壶被放置在热水中烫着，所以酒始终是温热的。他们的果酒好似我们的葡萄酒，通常用鲜花和药草蒸馏得出，其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有些酒有着富有诗意的名字，比如“玫瑰露”、“佛手露”等等。

吃饭的时候，中国人从不喝冷饮料，也不喝茶。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总会为我预备香槟或葡萄酒。用过膳后，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喝咖啡，而是喝不加牛奶和糖的茶水。

中国人习惯午睡。在炎热的夏季，每个人都会在午饭后回到房间休息两个钟头。我并无午睡的习惯，而且躺在中国的床垫上实在难以入睡，于是自制了一个羽绒靠垫。几天之后，我忽然在房间里发现两

个可爱的蓝色丝绸做的新坐垫。触摸上去，丝滑柔顺，上面还散发着淡淡清香——里面是由茶叶末填充的。很显然，它们是慈禧太后送给我的礼物。我发现这种靠垫要比羽绒的舒服，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清凉宜人。尽管我不习惯午后睡觉，但我依然入乡随俗，饭后独自待在屋里，无所事事地闲坐着。

当太后醒来后，立刻会有太监通报给宫中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立刻各就其位，皇后与格格们赶来恭迎圣驾。慈禧太后睡醒后，通常先施点淡妆，然后与众人共用一些茶点果汁。

这日午后，太后让我把上午没有处理好的地方补描一下，并没有说接着再画，而是从宝座上走了过来，提议到湖上转转。立刻便有一群宫女太监，簇拥着她走出大殿。

皇后、格格引着我紧随其后，走出门来，经过一座亭阁，来到一座湖泊之前。在蔚蓝的天空掩映下，湖水是那样湛蓝，那样晶莹透澈。如同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一切美不胜收，让人仿佛走进画卷之中。

湖的南边有一座白石砌成的平台，我们就在这里登船。太后专用的大船系在平台前正中央，那里有几级同样用汉白玉砌成的阶梯。太后拾级而下，登上宝船。宫人们则乘坐小船，紧密环绕在她的身边。如此景象，真如一支小型的舰队。



慈禧游湖

皇后、格格和贵妇们按照传统的尊卑次序，依次落座。太后坐在大船中央一个黄色的宝座上，比其他的位置都要高出一些，以显示她的权力地位。还有几个宫女，蜷坐在毡毯上面，以示她们是毫无地位的下人。我踏上甲板，太后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来到她身边，并让我坐在她的右侧，皇后则坐在她的左侧。几个太监分立在她的背后，手里捧着烟管、雪茄、茶杯、甜品等物，供其随时享用。

有两个太监作为向导，拿着长篙站在船头，船的两侧各有十二个太监站着划桨，因为即便是在船上，太监们也不能逾越礼制，坐在太后的周边。每条船桨都用黄色的绳带系在船上，以防船桨滑落到水中。

许多小舟紧随在巨大的御船之后，在湖面上鱼贯而行，这些船上都坐着宫女和太监，其中一艘船专门装载着茶具以及点心，随时准备为慈禧太后等人奉上。

船队行驶到湖心岛，我回头一瞥，只见背后巍峨的宫殿、宏伟的拱门、山中若隐若现的佛寺、弯曲的桥梁以及汉白玉台阶，与这湖光

山色相映成趣，美不胜收。我们的游船荡漾在碧水蓝天之间，真是奇妙无穷。

淡淡的芬芳随风而来，原来前面便是一丛荷花，慈禧太后兴致盎然，令人把船划进荷花丛中。这些荷花亭亭玉立，千姿百态，含笑伫立，娇羞欲语；嫩蕊凝珠，盈盈欲滴，清香阵阵，沁人心脾！

慈禧太后对这些荷花似乎情有独钟，命令手下摘一些荷花，分赐众人。她见我对荷花也是爱不释手，不禁喜笑颜开，自己也要了一朵，捧在手中，细细把玩。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太后虽说方兴未艾，却也只好下令原路返还。船停岸边，宫女与格格们先行下船，在岸边排成两列，恭迎太后。太后则由两个太监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

我紧随其后，走上岸来。

太后让我和皇后一道到她的宫里共用晚膳。依然和上次一样，太后独自先吃，吃完离开才轮到我们。等到宴终人散，已是夜幕低垂。

第三章　醇亲王府

慈禧太后为我安排的住宅就在醇亲王府中，因为这里离她的寝宫很近，便于往返画像。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七弟，当今天子的父亲。亲王府本是极为雄伟，清雅不俗。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这里便荒废了。是以其间有不少断壁残垣，都未曾加以修复。虽然为了我的到来稍加修缮，但也只限于我所居住的这一部分，其他的楼台阁榭，大多倾毁，因此置身其间，多能感受到破败与荒凉。



醇亲王

我下榻在醇亲王府中的一座小楼，楼前有一面荷花池，背后有一道清水渠。渠水从园外流进来，上面一座小桥，桥影倒映在水中，煞是好看。进楼的一间大厅极其豪华，左边通往我的卧室、更衣室、膳食室，右边通向书房，正中是巨幅高大的屏风。屏风开处是一条长长的围廊，一直通往别的宫殿，围廊中间栽种着无数的奇花异草，人到这里，仿佛置身众香之国。整座楼都是青玉铺成的地面，白玉柱子，木板镶成的隔壁，上面镂刻着精细的图案，非常漂亮。正对我房门的

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榆树，树影倒映在湖面上，别有情趣。这是一个迷人的花园。后来我了解到，醇亲王的儿子，当今的光绪皇帝，在继位之前，曾一直生活在这里。

为太后画像的时间渐渐规范起来。每天早朝结束后，她都会来到画殿，画上一两个钟头（一般是早上8点到11点）。除此之外，便没什么事情可做。因此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有大量的工夫去探寻名胜古迹，每一天我都能有新的收获。

因为中国人比较忌讳自己的隐私被别人窥视，所以中国园林的四周多以高墙环绕。这座花园，地势高低起伏，如同山峦一般，其地势略高的地方往往筑有亭台楼榭。登高远望，若是凭栏远眺，远近景观便可一览无遗，凉亭周边繁花似锦，花香扑鼻。我最喜欢在黎明之时，独自来到凉亭中，沉浸在浓郁的花香之中，让自己的身心完全松弛下来。

在花园大门的左侧，有一块硕大的石头，上面刻有铭文。虽然我不识汉字，但看其字行排列，想必是文人所赋的诗词。中国的诗歌追求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讲究含蓄，以淡为美，似乎更具有诗意。后来从别人那里知道，这文字的主人正是醇亲王。

醇亲王题照诗

醇亲王生前最喜欢在这里休憩。一天，他诗兴大发，当即题诗石上，以作寄托。中国人写字，是用毛笔蘸着墨汁，因此可以在任何地方书写；中国的文字是方块字，不像英语的拼音文字那样，需要固定的格式组合，因此可以任意发挥。中国的士人，都会随身携带笔墨纸砚，意兴所至，纵情挥毫，将自己的心情随时抒发出来。

后来请人为我解读这首诗作，其大意是说这些美丽的莲花，今天还是争奇斗艳，明天说不定便零落成泥。作者有感而发，只道俗世的荣华富贵有如过眼烟云，今日也许还是高高在上，明日却一落千丈。

一天，我偶然在马厩附近发现一片坟茔，这些坟茔处在一个幽静的角落里，全部用石头堆成。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安葬的是醇亲王的爱马与爱犬。每一个坟茔前都竖立了石碑，并由名士作文，将其一生功绩刻于碑上，以示自己的喜爱之情。醇亲王生前极爱犬马，他有着帝国最好的马厩与犬舍。

每天早晨散步，我都会欣赏园中的书法石刻，其间名人诗词，佳句偶成，山石险峻之处，多有篆刻，大可从中体会到那龙飞凤舞的妙趣。中国的文字本就灵动优雅，倘若再配以丹青，更有意境。文士们借助字画，抒咏性情，其意味悠然甚远。尽管我不识其字，亦不通其意，但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它们的魅力。每天早晨散步到此，我总会驻足片刻，用心欣赏，以此怡然自乐。当然，如果要真正地理解这些诗句，必须要对中国文化精通，这是我所不能做到的。

倚着凉亭的柱子向山下观望，可以看到一条宽阔的青石路面从颐和园一直通向北京城，大道上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当我在园中静坐久了，便会走到这里，观察世态民情。有时我可以看到乘着车子、坐着轿子的官员，带着他们的护卫前来朝觐；有时会看到使者带着紧要文书疾驰而来；还有许多流动的商贩，沿途叫卖他们的货物；如果你看到插着小黄旗的车辆，那一定是向皇家进贡的队伍；还有鲜衣怒马的纨绔子弟，呼朋唤友，绝尘而去，令人为之侧目。远望着这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一时感慨不已，也涌

出畅人胸襟的感觉。

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地位尊卑也体现在日常用度上。仅从其所乘轿子便能一目了然。太后、皇上和皇后才能使用明黄色的轿子，皇妃乘坐的轿子则是橙色的，格格乘坐红色的轿子出行。一二品的朝廷大员乘坐的轿子是绿色的，三四品的官员乘坐蓝色的轿子，其余等级的官员也各有规定，不得逾越。平民百姓一般难以坐轿。京中的官员如果要入宫觐见，一般会乘坐一种两轮大车。这种车车身沉重，车轮用铁圈圈住，车身遮着蓝布，装饰讲究则随车上的官员身份而有所不同，而拉车的牲口多是骡子。骡子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牲口，身材高大，吃得劳苦，与马很相像，只是略小一些。

醇亲王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的丈夫）的弟弟，他的妻子——当朝天子的母亲，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他与两朝帝王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尤其是与当今圣上。在他生前，一直都是最值得信赖的顾问，堪称摄政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公认他为一位品行优良的开明贵族，以及称职的父亲。正因为他享誉甚高，在同治皇帝驾崩之后，因为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慈禧太后便选中他的次子继承皇位。依照大清律例，皇帝和朝中重臣们都会选择一位继承人。如果皇帝只有一个儿子，他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但如果皇帝有许多子女，便在诸子中选择最优秀、最贤德的那一位做皇储。如果皇帝没有子嗣，便从他的侄子，即皇帝的兄弟的儿子中选择一个，至于其是否成人则不予计较。当今圣上的父亲，醇亲王便是咸丰皇帝的七弟，是以中国人称其为“七王爷”。

第四章　太后的寝宫

有天清晨，我们准时来到画殿。此时慈禧太后刚刚下朝，她面带微笑向我们致意，寒暄过后，我们走进大殿，开始绘画。

这座宫殿的布局和我的房间很相似，只是要宏伟得多。大殿的正中挂着一块黑底金字横匾。容龄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乐寿堂”三字，乃光绪帝手书。此时我方知晓，这间寝宫原来叫做“乐寿堂”。乐寿堂高大宽敞，庄严华丽，一面的窗户全都镶嵌着精美的蔚蓝色玻璃，好似一扇屏风，从地面直到房顶，下半截全用高丽名纸遮掩。正中间是一面高大的穿衣镜，与屋顶相齐。其他三面都是纱窗，上面贴着绢面书画，多出自名人之笔，其中还有皇帝、皇后的墨宝。各道房门都挂着用蓝色绸缎精制的门帘，其间窗帘也多为蓝色。想来这是慈禧太后最为喜爱的颜色。所以宫中的物品，除了象征皇权的黄色以外，最多见的便是蓝色了。



慈禧太后的卧室

大殿的右面是一间带着祭坛的佛堂，一尊观音端坐在莲花上，闭目凝思。像前的供桌上摆放着鲜花水果，和一尊香烟袅袅的香炉。大殿的左面是乐寿堂，殿内设宝座、御案、掌扇及玻璃屏风。座旁有两只盛水果用的青龙花大瓷盘，四只烧檀香用的九桃大铜炉。西套间为卧室，东套间为更衣室。院内花卉植有玉兰、海棠、牡丹等，名花满院，寓“玉堂富贵”之意。这里的玉兰花很有名，殿后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那是宫女太监的值班室。大殿的后方是一扇华丽的五叶柚木屏风，上面镶嵌着青金石、羊脂白玉和许多其他的宝石。屏风前面是一个高台，上面摆放着一张宝座，下面放着一只脚凳，这个宝座像沙发一样，可以倚卧在上面，舒适随意。但慈禧太后从来都是正襟危坐，始终保持着庄严的神态。

在这座宏伟的大殿中，除了传统的座椅，慈禧太后还喜欢一些现代的东西。太后很喜欢一张雕刻精美的柚木座椅，上面的圆形椅背可以将人围起来，垫着黄色的垫子。但太后一般不坐在上面，此次入座

完全是为了画像。宝座的左右各插着一把孔雀毛的扇子，扇把是紫檀木的，插在景泰蓝花架上。旁边还有几只景泰蓝花瓶以及古瓷大碟，碟里摆放着苹果、木瓜和佛手等水果，还有许许多多的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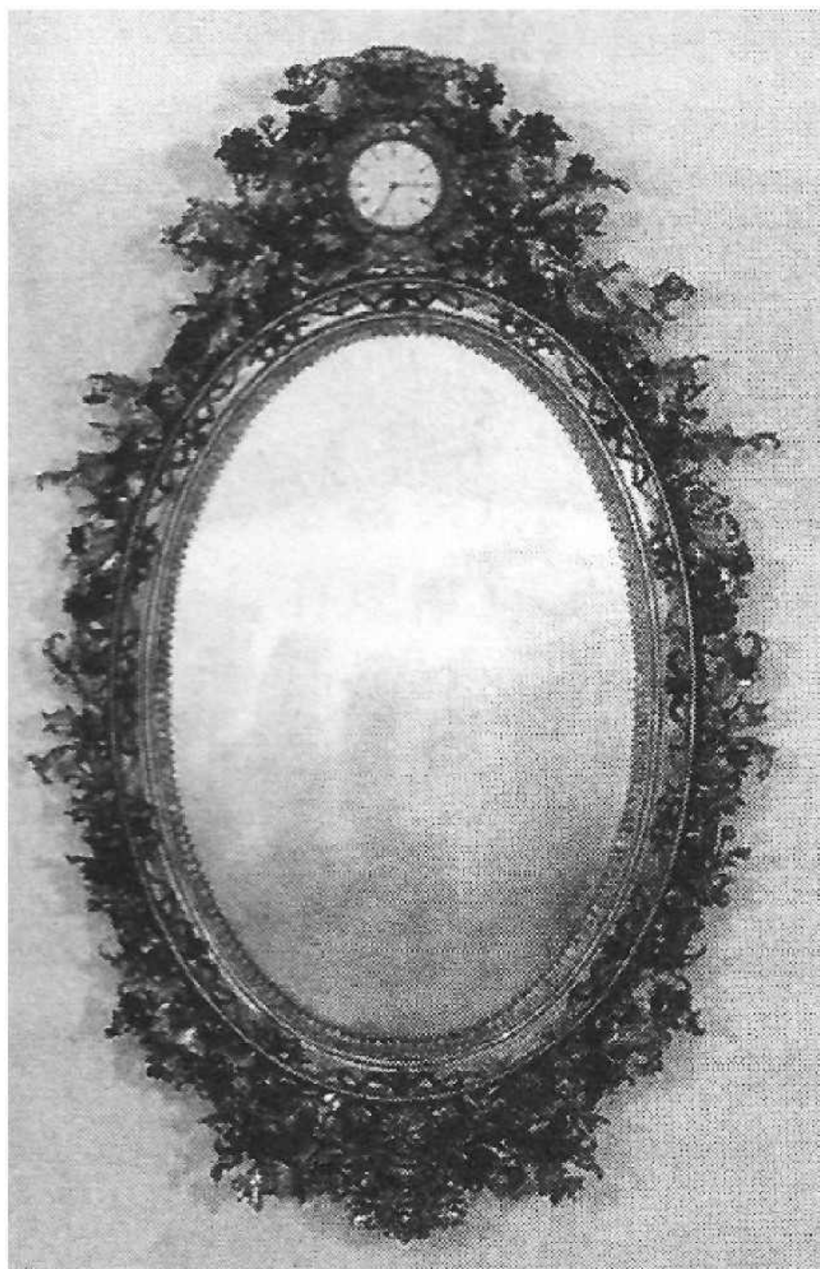
此时正值兰花盛开的时节，处处弥漫着芬芳。慈禧太后对这种兰花格外偏爱，养花的花盆都是古瓷或景泰蓝，在大殿中摆放了许多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荷花、百合。各种奇珍异草争奇斗艳，沁人心脾，又让人觉得香雅淡远。

慈禧太后喜欢新鲜空气，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会保持一扇窗户敞开着。



景泰蓝珍品

除了鲜花水果，殿中还有一处奇景，便是产自西方的自鸣钟。不仅在这座宫殿，每一座宫殿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自鸣钟，可以说是数以千计。之前我已说过，仅仅在这座大殿中，便有八十五座之多。钟座大多为金银所制，并饰以色彩斑斓的宝石。钟的造型各式各样，有的是雄鸡高唱，有的是小鸟低鸣，有的是清水自流，有的是音乐浅唱，还有的一到正点，便有一排小人走出来，沿着轨道走上一圈。当然这些钟表良莠不齐，有些是罕见的艺术品，有些则甚为普通。



带钟表的容镜

大殿中还有许多外国的工艺品，但在我看来，大都是平凡无奇的

东西，与陈列在旁的中国瓷器和古董相比，真是相形见绌。而且这些东西在欧美都很廉价，出访国外的中国官员把它们买回来，献给太后，着实有“大不敬”之嫌。

每天早朝之后，太后便退去朝服，换上常服。若要画像，她便穿上专门的服饰。当我将画布安置在画架上后，她必会走过来，仔细观看一番。如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则嘱我修改。

这天，太后注视画像良久，感到戴着护指（她的护指是以纯金打造，上面镶嵌着无数珍宝）入画不太美观，让我以她的手指原形入画。

此事极合我的心意。如果戴上护指，不仅遮掩住了她那修长柔美的手指，我画起来也很别扭。尽管如此，我对太后的服饰从未提过建议，一任她自己决定。

说来也怪，中国的贵妇人喜欢留长指甲，有的甚至长达一尺，竟然以此为美。

摘取护指之后，慈禧太后走到一个大花瓶前，从中摘下一朵莲花，捧在手中。如此一来，真是锦上添花，甚是优雅迷人。她开口问道：“倘若捧着莲花入画，是否合适？”

我暗道：此花的色彩与整幅画甚不协调，若要入画，颇为不妥。只是这般说辞，恐不能打动太后。忽然间灵机一动，开口言道：“我听说手捧莲花显得毕恭毕敬，空手下垂则显得轻松自在，不知太后喜欢哪一种形态？”

慈禧太后听了容龄的翻译，略一思忖，开口道：“你觉得我是虔诚恭敬好，还是轻松自在好？”

我说道：“太后乃是一国之尊，应该是别人对您恭敬，太后若是这样，只怕不太合适。况且此画要送到博览会，以供万国观瞻，我想，还是轻松些好。”

慈禧太后莞尔一笑："既然如此，那还是轻松些好。罢了，这莲花也就不要了。"

这天大约画了一个小时，太后忽然开口言道："今儿先到这里，你且退下休息吧。"

我回道："若是太后圣体不适，可以先移驾。我可以在此继续作画，稍事加工。"

太后摇摇头道："来日方长，何必急于一时，以使自己劳顿不堪。"

既然圣口已开，我自当从命。

这天下午，太后让我画了一会，又起了游湖兴致。当下吩咐左右，移驾昆明湖。我们跟随圣驾，来到湖边。太后仍坐在御舟的明黄宝座之上，皇后、格格照旧环绕着太后，席地而坐。御舟前面，有两只护卫舰用黄绳拖拽前行。水色清澄，御舟仿佛一只美丽的天鹅，在明镜般的湖面上缓缓滑行。

游了片刻，太后心血来潮，忽地颁下懿旨，令两个太监唱起小曲。二人当即领命，引吭高歌，但闻声音清脆，宛转悠扬，与这湖光山色融作一体，颇有诗意。远望西山，只见云屯雾集，波谲云诡，与蔚蓝色的天空相互映衬，无边风月引人入胜。其间神妙之处，难以尽说。

颐和园中，处处红墙绿瓦，巍峨宏伟，湖畔有许多栩栩如生的雕塑，静静地恭迎着我们的游船。在柔美的歌声中，我们不由得沉醉了，仿佛置身于奇妙的世界中。

随波逐流，不觉间来到一处果园前。这里栽种着上千株苹果树，郁郁苍苍，别有一番美景。我们离船上岸，信步走进园中。

由于色香味俱全，中国人对苹果非常青睐，甚至把它视作和平与繁荣的象征，因而具有神圣的意义。正因如此，人们常把苹果供奉在

佛陀面前。但是，以我之见，中国产的苹果色和香倒还不错，味道却是不尽如人意。

太后在果园中闲庭信步，命太监采下一些果子，赐予我们，并请我随意采摘。太监则在一边拎着篮子侍候着，后来把摘下的果子送回我的寓所。

太后又从果园徜徉到一座花园，数不胜数的花儿争奇斗艳，各领风骚，真是让人美不胜收！太后随手摘下几朵小花，放在自己的耳后，又亲自为我戴上几朵。我知道，这是太后特意在人前优待于我，以使我感戴她的圣恩慈爱，并使宫女、太监不敢对我有所怠慢。

太后酷爱鲜花，足见其情趣高雅，与外界所传大为迥异。大凡寝宫、朝堂、戏苑及大殿各处，无不有名花点缀其间。除了处理朝政或是接见大臣时，无论春夏秋冬，她都会在头上插戴鲜花。每当她闲暇之时，往往会拈花微笑，每每以鼻轻嗅其容，好似手中的花朵能够体贴人意。她常常在万花丛中，往来婆娑，悠然自得。

说起养花来，中国人很少将花养在水中，而是直接种在盆里，或是插在花瓶中，使花香尽吐。然而太后侍弄花草，却有独到之处。她常将莲花或者茉莉的花冠置于浅盆之中，星罗棋布，甚是好看，又不失其芬芳。太后爱花的癖好，人所皆知。是以皇室贵胄、朝中大员，无不煞费苦心，寻觅到罕见的名花异种进献太后，以博其欢心。

宫里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比如生长在各处的鲜花、水果，宫人们大可以自由采摘，但是在太后之前，谁也不许擅自碰触。只有得到太后恩准，才可以动手。凡太后所赐之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要视作极大的恩德，虔诚地供奉起来。每当宫里开出第一朵花或是结下第一枚果，都会被视作神圣，须由太后亲自来摘，其余人等，不得妄动。

这些东西，看似琐屑，毫无任何记录的价值，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皇权至高无上，唯我独尊。

第五章　皇后和宫中的贵妇

皇后，作为皇帝的第一夫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她名叫叶赫那拉·清芬，隶属满洲镶黄旗，是大将军桂祥的长女。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如此说来，清芬便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与光绪皇帝是表亲，比皇帝大三岁。她的母亲出身显赫，谨守礼制。是以皇后自幼便恪守礼教，端庄高贵。其幼年时，常在宫中陪伴慈禧太后，是以对宫廷礼仪颇为熟悉，大有母仪天下的风范。慈禧对这位侄女也非常喜爱，在她的操持下，幼年时便与光绪皇帝订下婚约。等到他们大婚之时，已是几年之后，当时是1889年2月，慈禧太后归政皇帝还不到一个星期。



隆裕皇后

隆裕皇后身长不到五英尺，显得极为娇小，却是精致秀丽，惹人爱怜。皇后面容秀雅，鼻准高隆，眼睛颇与汉人相似。在我看来，比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她的下颌长而不垂，显得坚毅刚强，口微大而不多言。她的眉眼甚是好看，面上常常浮现可亲之情，却又有无比尊严的威仪。只是在太后面前，她流露出的唯有顺从，也实在令人叹

息。

至于皇后的从政能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当慈禧太后休息时，宫中大小事务，皆由其操持，也做得井然有序，不输于旁人。

另一位我要介绍的，是地位仅次于太后与皇后的瑾妃，也是由慈禧太后钦定的。瑾妃姓他他拉氏，为礼部侍郎长叙之女。听说她当年被选为皇妃时，倒也有几分姿色，如今她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已经很胖了，丝毫瞧不出有多好看。她的眼睛明亮有神，呈棕色，但形似球体，鼻子扁平，口大唇薄。其前额宽阔，威仪平平。说起她的胸怀也是了无城府，毫无机智可言。而且性情率直，不善言语。是以在宫里不怎么受待见，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只是她似乎也甘心如此，一直以来都是那么默默无闻。但尽管如此，皇后依然诚心相待，处处以礼相敬。

我曾听人说过，中国的皇帝如何“后宫三千”，如何“粉黛如云”，但这并不适用于光绪皇帝，因为他只有这两个妻子。

太后身边的女官，多以其同宗的少女或是贵族中的寡妇充任。例如她的首席女官，是庆亲王的四格格，叫做薛吉葛氏，十六岁时嫁给了直隶总督的儿子。可是婚后数月，她丈夫便因病而逝，后来便进了大内充任女官，陪伴太后。这位格格年纪尚轻，生得明眸皓齿，肤若凝脂，无论以任何标准，都堪称美人。可惜她没有孩子，不过中国的习惯是，寡居的女子若无子女，便可领养一个。一般是从同族中选一个过继，许多时候，过继的孩子还会同自己的亲生父母保持来往，甚至于有时候亲生父母会违拗孩子的意志，强行将其过继过去。

第二女官也是一位孀居的贵妇。中国的寡妇，命运极为凄凉，她们不能再婚，否则不但自己会受到唾弃，还会辱没家族的门风。虽然她们在守寡之后，不像印度的妇女那样，要遵循火殉的习俗，但若是一个寡妇能够自杀殉夫，也会受到推崇。那种守着丈夫的灵牌终其一生的，被称为节烈之妇，受到全社会的抬举与表彰。在她死后，人们会为她举行盛大葬礼，并竖立贞节牌坊，以彰显其操守德行。

如果其家庭没有足够的财富建立牌坊，则往往向乡亲邻里乞求募捐。而人们也多乐意慷慨解囊，以示对烈女的崇敬。这些牌坊大多是用石头砌成的，也有些是木制的，上面的雕刻极为精美，或饰以鱼虫鸟兽，或雕作奇花异草。牌坊正中则会刻下该贞节妇女的姓名，或是镀金，或是朱漆，风光十足，在另一面则竖立一方石碑，上面尽述其贞节操行。

中国的女孩，大概六到八岁，便会被定下婚约。如果她的夫君在成婚前便去世（中国的男子一般也早在十六岁左右完婚），则女方便被视作寡妇，应当终身守节，不可再嫁。只是可以认领义子，义子也称其为母亲。至于夫妻之情、伉俪之欢则与之终身无缘。其夫死后，妻子要为其守孝三年，再也不可身着艳丽的服饰。

中国的妇女，喜欢在面部施以粉黛，以作修饰。但一个寡妇绝不可如此，否则会遭到别人责难。可我看她们娇柔多姿，并未因此而有所减色。中国女子的肌肤，本就柔滑细腻，若是再加以粉饰，反倒会弄巧成拙，损毁其天然的玉容。

太后身边的女官，平时仅有八人，若是举行盛大典礼，则有许多贵妇前来宫中帮衬，人数则会增加四倍不等。

宫中还有一位皇郡主，是恭亲王奕□的女儿，慈禧太后的义女。在格格之中，皇郡主身份最高，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和瑾妃。

一天晚膳，薛吉葛氏曾告诉我各位格格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有各人与皇后之间的关系，只有太后与皇帝只字不提因为依照大清律例，对太后和皇帝不得妄加议论，否则便是大不敬之罪。从薛吉葛氏那里得知，宫中的女官，大多与她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宫中除了女官，还有许多宫女在大内侍奉太后、皇后及各位贵妇。她们从事粗繁的工作，在外人眼中，她们无异于没有自由的奴隶。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或者说，这些宫女只有一段时间自由受到限制。一般来说，她们在宫中服务十年左右。每年春季，一些地位较低的满人家庭，会将年幼的女儿送到宫中待选。一旦成为宫女，则

是其父母的荣耀。



清代宫女图片

一天，我走出宫门，看见有许多车辆停在门前，车上载着许多幼女，打听过后，方知这天是挑选宫女的日子。这些女孩都是十来岁的年龄，她们被带到太监总管面前，先由他选出比较优秀的，然后再被送到太后面前，决定去留。一旦被选中，她们将要在宫中服务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她们是可以回家看望父母的。十年后，她们就会被遣出皇宫，寻个合适的人家出嫁。如果谁干得好，得到太后、皇后的宠幸，更会得到一笔令人艳羡的嫁妆。而且她们一旦入宫，必定锦衣玉食，比外面要好上很多，变得风姿卓越，楚楚动人。

侍奉太后的宫女，都身着蓝色长袍，乌黑的头发编作发辫，以红丝缠系，下垂于背。至于皇后、贵妃以及各位格格，也都有许多侍女随时听候差遣。

除了这些使唤丫头，还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宫女，很多都已经结婚生子。她们留在宫中，主要工作便是监管这些小丫头和低等太监的工作，其性质有点像我们西方的女管家。

这些老嬷嬷中，有一个上了年岁的汉族女人，特别受到优待，盖

因二十五年前，慈禧太后患上重病，靠饮用这个女仆的奶水方得复原。太后对其感念不已，一直将她留在身边。作为一个汉人，她曾裹过脚，慈禧太后便令她放为天足，现在已能行走自如。这个老宫人膝下有一子，太后便为其聘了教师，培养成才，现在已在一个衙门里当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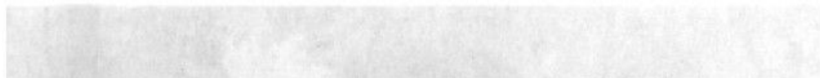
在中国，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一般不会自己梳洗打扮，往往会有三四个丫鬟侍候在左右。这些丫鬟都是从穷苦人家买来的，与奴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主人一般会善待她们，因为这些小姐太太也多是足不出户，寂寞得紧。当这个丫鬟被买来时，女主人也多在幼年，二人一起长大，自然是亲密无间。尽管如此，这些丫鬟也不会忘记主仆的身份，对主人依旧是恭敬有礼。比欧洲的主仆之间，这种关系更多了些人情味。

中国的贵妇，大多会将一名侍女视作心腹之人，行走坐卧，总由其相伴。如果侍女到了出嫁的年龄，主人会馈以厚礼，作为其嫁妆。其所生子女，则为自由身份，并无人身隶属关系。但主仆之间，往往连续三四代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第六章　慈禧太后的爱犬

每天早晨，我都会为慈禧太后画上一个小时，下午便只画半个小时。虽说这里布满奇花异草还有各式水果，但一旦我动笔作画，便总会有许多宫女、太监好奇地上前围观，而且来回走动，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慈禧太后也多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尽管坐在那里，却也是想怎么动便怎么动，还常常开口向我询问，这使我难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虽说苦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利用其他的时间再对画作进行润色。

慈禧太后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我对她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当她卸去朝服，随意谈笑的时候，其神情和蔼，顾盼生辉，和在朝堂上接见大臣，或者朝拜佛祖时，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的声音如银铃般清脆，清晰响亮，全然不似一位老人的口齿。虽然我听不懂她说些什么，但仅仅是倾听她的声音，便使我如痴如醉。





慈禧太后

太后对我似乎颇为关照，她不许我多做工作，认为那样会影响健康，并常常引我前往颐和园游览。凡是宫中举行聚会、欢宴，她必然不会忘记我。可是在我来说，却是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圣意难测。有道是“伴君如伴虎”，今日礼遇有加，谁知明日又会怎样。是以我一心想着早日将画作完成。

慈禧太后对我恩宠有加，着实令我感激不已，然以外人的身份出入宫廷，实在与清廷的祖制大相违背。若是耽搁太久，只怕会夜长梦多，到时我的画像也无法完成，遗憾终生。

也许这是我在宫中唯一的烦心事，当然，这可以说是杞人忧天。这点小小的烦恼，也会随着工作带来的欣悦，而时时被抛到脑后。

我时常随太后游览颐和园，太后与皇后的坐轿，乃是六人大轿，全为明黄色。其后是格格与侍女的红色轿子，总是按照严格的等级，不得有丝毫逾越。最后则是一群太监和轿夫。

每天的游玩路线都不是固定的，太后随心所欲，信步而行，旁人只有唯其马首是瞻。每当太后觉得某处风景宜人，便会下令落轿，随行立刻搭起黄色的幔帐。当太后的轿辇一旦停下，其余人也一律停下。众人纷纷下轿，走进太后的幔帐中，这时太后会坐着随身带着的黄马扎，指点江山，喜不自禁。

有时出去散步，太监们还会带着太后豢养的爱犬。中国人多爱养犬，尤其是慈禧太后，她养着许多纯种的京巴和斯凯狗。这些狗被精心照料着，毛皮光洁，机敏灵动，甚是惹人怜爱。据说，西班牙的查尔斯国王对京巴也颇为喜爱，专门命人选一些优良品种运到欧洲。

在宫里，慈禧太后养着数十只小狗，有两只最得她的宠爱。一只是斯凯狗，它特别伶俐，对太后唯命是从，还能做出许多高难度的技巧。比如太后一声令下，它便立刻躺下，一动不动，除非太后唤它，否则任谁叫也不会起来。另外一只则是京巴，金丝皮毛，眼睛闪闪发亮，非常讨人喜爱。太后对它也很钟爱，但说起伶俐活泼来，却远远不如那只斯凯狗，所以太后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海龙”。大凡太后的爱

犬，都有一个符合其特点的名字，只要太后一声招呼，便立刻欣然而应。慈禧太后非常讨厌西方人培养出来的袖珍小狗，一想到这些小狗仅仅用糖果和葡萄酒喂养，她就会流露出极度厌恶。她曾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何人类会凭借自己的喜好，去改变动物的天性。

那天，我第一次在御花园中见到太后豢养的爱犬，其品种如此之多，实在是大开眼界。这些小狗丝毫未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径直冲到太后面前，摇头摆尾，以讨其欢心。太后则一一抚摸宽慰，温言细语，似乎在与儿女交谈。直到过了许久，它们才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在场，当即向我扑跃咆哮，显然对我这个从未见过的人怀有敌意。还有一些看起来有些害怕，畏葸不前，尽往太后身后躲去。

只需那么一小会，这些小东西便意识到我是太后的宾客，对我的态度立刻好转。我也弯下腰抚摸着这些小生灵。

本来我觉得我的举动并无什么不妥，但是忽然间，我看到太后的脸上流露出了不悦，心中立刻警醒起来，连忙站起身来。想必在她看来，这些小狗都是她的心肝宝贝，怎能由别人戏弄；当然，她也不喜欢自己的爱物对我这位生客“一见钟情”，其嫉妒之心暗暗滋生。

虽然太后的不悦之情只是一闪而过，然而我当即注意到这一点，不再唐突，这些小狗觉得无趣，不久便一一散去，自寻乐子去了。哎，看来我还是涉世不深，对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太过浅薄。

几天后，我们又在一起散步，忽然太监们把一些小狗带到我们面前。太后温柔地爱抚着它们，一一品评，然后招呼我上前，问我最喜欢哪一只。鉴于上次的鲁莽，我只有含糊其辞。可是太后坚持让我仔细观察，对其一一给出评价。大概她对自己上次的失态也有所察觉，想借这个机会来进行弥补。

慈禧太后的爱犬，地位仅次于太后的“随驾大臣”。有的小狗身穿马甲衣服，面子是红色贡缎，里子是最柔软的皮革。给它吃的饭食是切碎的肝脏和着肉汁，与新煮的白饭拌和。每餐狗食由御膳房的厨师做好，交给专职狗太监。狗太监岂敢做主，就捧到大太监小德张处请

示。谁知小德张也不敢做主，恭恭敬敬地捧着狗食，来到太后处请示。最后由太后亲自检查认可后才让它吃。

养狗的犬舍是仿宫殿的式样建造的，雕梁画栋，碧瓦朱甍，白玉为砖，锦缎为衽，极尽人间之奢华，只是规模小了十几倍而已。御犬厩的材料用的不是木石，全部用竹片，设太监专门管理，一位主管，三位帮办。四位太监的职责就是和御犬们做伴。他们虽然是奉了太后的旨意管理这些御犬，实际上不是在“管”，而是在“侍奉”。

说到这里，倒真要为“御犬厩”的太监们担忧：就是遛狗，也是狗牵着人，而非人牵着狗。往东往西由狗决定，老佛爷的宠物要自由行动，奴才们岂敢说个“不”字？奴才只有小心翼翼“侍奉”的天职。狗狗倘若有个闪失，绝不是太监这条“狗命”担当得起的。在此种情况下，还要把小狗们驯养得懂得简单指令，会“打圈”、会“站住”、会“直立”、会“拜拜”，会认识“老佛爷”、取悦“老佛爷”，实在是不易！由不得要赞叹太监们的聪明才智了。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太后如此爱犬，皇后、格格、侍女甚至太监们都自然不甘落后，人人豢养，终日玩弄，以此作为消遣，或是希望能博得太后的欢愉。有的太监甚至因此成为养狗的专家。如此一来，宫中的犬不下数百只，然各归其所，从不混杂在一处。然而，太后对别人所养的犬并无甚兴趣，从不去赏玩，是以大伙这种养狗的热情也渐渐地消退，宫中的狗也在逐渐地减少。

太后虽然爱犬，却并不喜欢猫。但宫中仍有许多太监私下里养了一些猫。只是此事须做得绝密，万一被太后知晓，必然会大发雷霆。

太后的犬舍与她的寝宫离得极近，离我下榻的地方也不远。每当中午时分，人们熟睡之后，我往往会走到犬舍近旁，抚弄一番，从中倒也得到了许多乐趣。这个时候，除了饲养犬的太监以外，不会有旁人在场，我也能落得个自由自在。

我时常到太后的花园中去抚弄这些无忧无虑的小动物。自从在花园里见到太后豢养的那群小狗后，我便对一只黄白相间的哈巴狗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每天都会来犬舍看望它。这只小狗似乎与我心有灵犀，每当我穿过花园，来到犬舍前，它都会欢蹦乱跳，欢迎我的到来。



瑾妃与小太监及爱犬

一天晚上，我在太后的宫中吃完晚饭，一个太监忽然抱着这只小狗来到我面前，说道："老佛爷有旨，将这只狗赠给柯姑娘！"

我真是受宠若惊，欣喜异常。想必太后得知我时常前去犬舍看望这只小狗，便遂了我的心意，将它送给我。正当我兴奋不已的时候，太后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走上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以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太后见我如此高兴，也充满了欣喜，说道："我听下面人说，你特别喜欢这只狗，因此将它送给你。"

我连忙谢恩，并道："请太后恩准我为这只小狗起个名字。"

太后笑道："既然送给了你，一切由你做主是了。"

我说道："这只狗黄白相间，不如叫做金琥珀好了。"

太后粲然一笑，道：“好名字。”旁边诸人或是交口称赞，或是夸我会起名字，一时间，大伙欢笑一堂。

从那以后，这只小狗便成为我的亲密伙伴和忠实朋友，无论别人如何引诱，它都不为所动，无论我走到那里，它都不曾离开我须臾。

第七章　光绪帝的万寿大典

我在宫中滞留的日子里，有幸赶上了光绪皇帝的万寿大典。有意思的是，为皇上祝寿之日，并不是在他出生的当天，而是要提前两天进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依照惯例，皇帝万寿后的第三天，须得举行祭祖的仪式。皇帝要提前三天斋戒沐浴，以示对神灵与祖先的尊崇。正因如此，皇帝若是不将生日庆典提前举行，那三日斋戒便做不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祖之礼，从商朝起便被视作最重要的事情，决计不可更改日期，即便是皇帝的生日庆典，也要提前举行，如此方能显出对列祖列宗的敬重。

在准备万寿庆典的时候，宫中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我想这个时候太后也没有闲暇让我画画。我打算暂时回到美国大使馆去。因为依照惯例，皇帝的万寿大典，从未邀请过外国人参加，我想我也不会例外。

大概在庆典的前一周，我随太后游园时，太后突然把我叫到身边，说皇上的万寿庆典将在下周举行，并邀请我留下来一同庆贺。我欣喜异常，既因为太后对我恩宠有加，无以言表，更因我竟然能有机会一睹这东方古国的盛典，想来是辉煌典雅、华丽壮观的。我真是太幸运了。

宫中各人无不忙忙碌碌，四处都在张灯结彩，但见华灯火树，绚丽灿烂。戏剧演员们早已开始抓紧彩排。而太监们则不断来回奔走，向太后汇报请示各项准备工作。而彩排的人，也时常拿着底稿，进呈太后，以请圣裁。说真的，宫中事无巨细，都要经太后过手，方能成行。然而太后处理各种繁琐的事务，竟是有条不紊，干净利索，不仅丝毫看不出厌倦疲劳的样子，反而越是繁忙，太后越显得精神矍铄。

今年的庆典宴会提前到皇帝生日的前四天。这时宫中的筹备工作

大已完成，每天早上起来，人们定能够看到楼阁花园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其华美景象，真是一天胜过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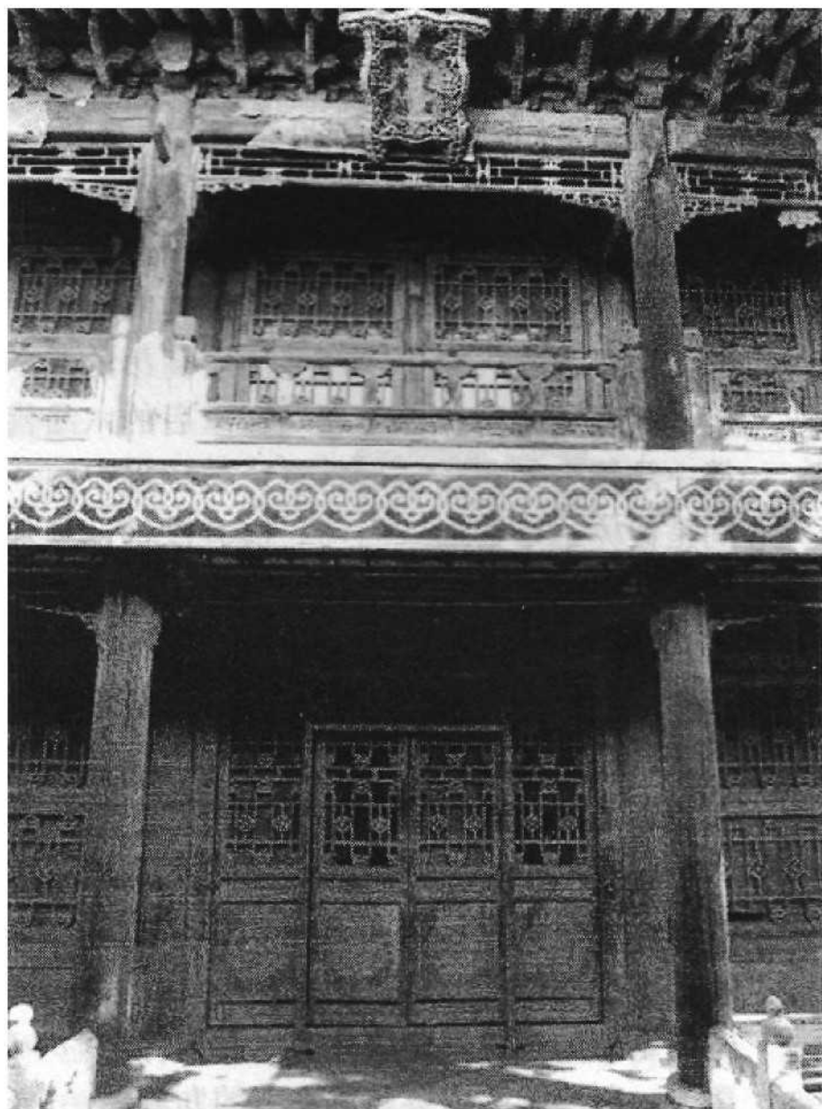
大殿之上，陈列着各种宏伟的青铜乐器。这些都是用来演奏上古时期的音乐的，仅仅在盛大庆典时，才从仓库中搬出来使用，其演奏的音乐也只用于朝廷庆典或是宗教仪式。这些新奇的乐器中，有的依照大小排列，并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名为青铜编钟。有发音清脆悦耳，穿透力极强的三角铁，有体型硕大，雕刻精美的铜锣，巨大的鼓，精致的铃，还有很多古老的乐器，都将在天子的万寿大典中奏鸣雅乐。

宫殿的窗户窗棂之间也都扎起了五颜六色的丝绸彩球，多用红黄两色，乃因黄色代表尊贵，红色代表喜庆。其他颜色的彩球则掺杂其间，充作点缀，着实是绚丽多彩。

直通御殿的官道上，则竖起了数百顶黄缎绣花大伞，排列成行，绚丽之至。这些黄伞被称作华盖，是一种仪仗用具。上顶有一直径三尺的伞盖，铁丝竹篦扎制，上蒙绸缎，黄顶，周围下垂两层伞沿，下层长约尺半，上绣彩色龙凤，黄缎或黄绸底；上层为半尺的荷叶沿，用红绸或绿绸，打荷叶边。持黄罗伞的人，跟在日月扇的身后，伞盖前倾，罩在帝王或后妃的头上。它的象征意义是“荫庇百姓”，实际功用是为了遮阳、挡风、避雨。

届时，各省大员进贡的礼物，一日之内必有数百之多，若无细致的管理，必会堆积如山。

一场精彩的演出将在皇帝的万寿大典上开演。在此之前，太后坐在戏楼上，一边观看排演，一边仔细推敲，不放过每一个细微之处。一旦她觉得某个地方需要改动，当即令太监通知后台。如此一来，节目居然增色不少。想来太后若是投身梨园，必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晚会当天，太后会遍请宫中各位贵妇一同入宴，而她自己则独自在戏楼上用餐。



宁寿宫内的梵华楼

颐和园中宫殿的露台上，都会架起竹制的凉棚，以遮挡阳光，因此人走在下面，会感到非常阴凉。这些凉棚也尽显奢华，其顶部以鲜花为饰，使得人在其中纳凉的同时，还能闻到扑鼻的芳香。支撑的竹竿约有二三十英尺高，上面尽刻花草人物。竹竿上铺着席子，还设有滑轮一类的机械装置，像窗帘一般可以舒卷自如。整个凉棚，包括一

些小零件在内，都是浑然一体，没有使用一颗钉子。一般来说，凉棚会在六月挂起，九月撤去。此时正逢万寿大典，凉棚也是张灯结彩，非常漂亮。

在临近万寿盛典的一周内，贵族妇女和格格们会从各地赶来，纷纷入宫向皇帝朝贺。一路上，来往车辆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

隆裕皇后将这些宾客一一引荐给我。说起来，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中国的宫廷中，比一个中国人出现在西方的宫廷中要更加奇怪，而且这些贵妇以前从未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然而尽管如此，她们见到我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对我甚是亲切，而且对我的习惯、服饰和容貌都丝毫没有露出奇异之心。她们高雅端庄的言行举止，真是令我倾倒。而且一些出身贵族的儿童，对待我这样一位“来自外国的柯姑娘”都非常有礼貌，显得极其有教养。

我在想，如果一个中国人来到欧洲的宫廷，或是我们美国的白宫，他会受到如此礼遇吗？哪怕他面对的是一个服侍人的杂役。

待到曲终人散，演员们一一告退，我们的酒宴也宣告结束，宾客们纷纷散去。我走到戏台旁，饶有兴趣地开始观察戏台的结构和设备。戏台高出地面约有十二英尺，与慈禧太后的御座几乎持平。整个建筑分为三层，还有一个地下的部分。后者专门作布景用，由一个简单的设备来回移动，像希腊戏剧一样。舞台的三面是开放的，演员们则由台子的左侧上场，从右侧退场。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观察这个舞台时，坐在楼阁里的慈禧太后看到了我，她便走了下来，来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否愿意到台子上看看其内部构造。她补充说道：“这个戏台在中国独一无二，你若是不看看，只怕会后悔不已。”说着，她便引我一步步登上戏台。只见台上的面积大约二十五平方英尺，上面被屋顶遮盖，三面临空，突出于整个大厅之中。其背面以画屏为界，设有两门，即演员的出入口。

中国的戏班演员全都是男人，戏中的女性角色也都是由男子装

扮。而这个男子的音容笑貌，几乎和女子无异。一开始，我以为那真是由女子扮演的，当我得知真相后，不禁大吃一惊。台后坐着许多乐手，专为演出者伴奏。

慈禧太后带着我走进幕后，只见各种道具五花八门，难以名状。这些道具都是为了庆贺皇帝的生日大典，由慈禧太后专门设计的。

慈禧太后又建议我去看看舞台的地面，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里竟然有三层舞台。原来中国的寻常戏院，只有一层舞台，而大内的戏院则有三座，第一座高于第二座，第二座则高于第三座。平常演出只在第一座舞台上，若是演出大型戏剧，则揭去内幕，三个舞台并用，以此来突出舞台的层次感与立体感。

太后领着我一一参观，拾级而上，轻松自如，实在不像七十岁的老人。更何况她穿着一双鞋底厚达六英寸的鞋子，却是行动自如，不见丝毫困难。和我这个穿着舒适的服装的年轻人比起来，实在不遑多让，由此亦可看出太后的精力不同凡响。

满族的女子都不裹脚，但是裹脚这种恶习在满族入关之前，便已在汉人中盛行了。满族人对汉人的习俗虽然沿袭不少，但在裹脚这方面却是嗤之以鼻。虽然他们作为统治者，已经长达两百五十多年，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和汉人截然不同。所以我在宫中所见到的，皆是秀美绝伦的满族服饰。而且和西方人一样，她们对汉人的裹脚习俗深恶痛绝。比起许多东方国家的妇女，她们少了许多礼教约束，更加自由一些。实际上，满族妇女似乎和东方国度的妇女大相迥异，这一点，很像我们美国的现代妇女与她们的受着传统影响的欧洲姐妹之间的差别。

第八章　我眼中的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到了十八岁，可以独立执政时，慈禧太后便归政于他，不再做帝国的摄政女王。在她的懿旨中，她曾经对皇帝提出期望，希望他“克己奉公，为政以德，体恤黎民，以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才是一个圣明的君主应该做到的。而在另外一道懿旨中，则提出希望“皇帝对待国事不得有丝毫惰怠之心”，这样才“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列祖列宗”。于是，在光绪十三年的阴历正月十五，光绪皇帝正式亲政，遂昭告天下，晓谕万民。

光绪这个称呼，意为光明永续，而帝王的年号，不仅是一个属于他的称号，还寄予着对这个国家的美好希望，有着许多象征性意义。

光绪皇帝是清朝的第十二个皇帝，按照满清政府的观点，他是一个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皇帝。这位皇帝五岁登基，一开始由两宫皇太后摄政。而东宫太后慈安于1881年离世，从那时起，朝中一应事务，便只由慈禧太后一人处置。光绪皇帝在位时间之长，在清朝的皇帝中名列第三（前面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我见到光绪皇帝时，他只有三十二岁，还很年轻。

我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光绪皇帝虽然也有些个人魅力，但若要同慈禧太后比起来，却是望尘莫及了。太后的魅力令人心醉，但光绪则缺乏这种品质。若是细论起来，太后的待人接物的风范，那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光绪皇帝则完全是典型的东方人的风格。

光绪皇帝体态优雅从容，身形不高，约在一米六上下，只见其骨骼清奇，龙睛凤目，河鼻海口，雄姿杰貌，颇有一番帝王之相。然其肤色微暗，略显苍白，这一点和慈禧太后家族的人不太一样。一般说来，满族人的皮肤比汉族人要白一些，但这似乎更像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结果。他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光泽可鉴，若不是剃成辫

子，只怕是更加显得风流倜傥。可惜依照满清的传统，男子必须剃发结辫。他也没有蓄须，因为按照中国的习俗，男子不到四十，是不能蓄须的。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遵从这一习俗。和许多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中国人一样，他的脚和手都不大，而且那两双手比较细长，似乎富有表现力。



光绪皇帝画像

若无重大的场合，例如朝廷大典或是会见外宾，光绪皇帝平日里所穿的服饰都比较简朴，上面鲜有珠宝玉石作为装饰。他面容慈祥，

性格沉毅，那双眼睛透露着精明与智慧，但时时被忧郁所掩盖。他的行为举止也无不透露着小心谨慎，但他之所以给人这种印象，并非是由于缺乏自信的原因。在我的心中，他就是一位理想的东方国家的君主，一位圣明天子。在他笑容下面，似乎隐藏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神秘，他的眼神沉着冷静，显示着他丝毫不向命运低头，面对困境，他总会在轻蔑地一笑，然后从容地去应对。

这种抽象的看法真是微妙，只能说，这是东方的神秘，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一开始很难说出这种印象是来自对皇权的敬畏，还是因为缺乏对东方的了解。但是光绪皇帝那消瘦的下巴、苍白的面容，以及锐利的目光，显示出在他的灵魂深处，积蓄了巨大的力量，一旦得以释放，必然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光绪皇帝身上透露出极度的压抑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否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梦想重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否是因为他的变法失败，在默默等待着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时代的到来？这些都是谜团，让人难以猜度，但是，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又是顺理成章。

他似乎完全意识到，他当年在时机和人事上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最终导致变法失败。但他的那双大眼睛似乎表明他的心灵深处，依然存在着坚毅的耐性，他一直在等待着，一旦时机到来，他仍然会设法完成中国的变革。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光绪皇帝对太后存在敌意。然而严格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分清高下尊卑的，但是更多的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有人认为，自从1898年的“戊戌政变”之后，他们之间出现了隔阂，但是在我看来，光绪对慈禧太后丝毫没有任何怨恨之情，他认为，阻挠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的，并不是慈禧太后，而是中国的保守主义，尽管他想通过变法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保守派官员组成的强大联盟却在他的改革之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慈禧太后是在保守派大臣的恳请之下才重新执政的。根据太后的意思，政治变革不可操之过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积弊深远，传统势力强大的国家中，更应该循序渐进，谨而慎之。如若不然，国家只怕

会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皇帝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深不可测的眼睛隐藏了无限的力量，可能足以改变整个世界。他是否在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然后紧紧地抓住机会，一蹴而就，将中国引向成功？他的微笑也透露着坚忍和一丝神秘，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

他知道，在朝中的官员中，真正支持他的人还是很少的。他虽然没有被废黜，但朝廷大事悉听令于太后。凡遇重大事件，与军机大臣共商机宜，则必请太后垂拱。大臣们进献奏章，则先奉于太后，太后阅毕才轮到皇帝，而光绪只是粗略地看一看，便呈还太后，往往不置一词。这显然不是因为光绪的无能，而是屈从于太后的巨大压力。

尽管光绪皇帝知道供他大展身手的时机尚未到来，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对感兴趣的时政要闻颇为上心，对各国的国计民生、政治学识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如果慈禧太后和他同处一室，我想他绝不会在太后面前显露出他的任何想法。他也知道，太后也很希望中国能够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但是她的方法更保守，相对于自己的办法，也许比较慢，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皇帝似乎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并唯命是从，一任军国大事，悉听令于她。他知道，世人也会很快看到，太后也要使中国走向进步，她并非要毁灭中国，也不反对改革，而且就在此时，太后已经意识到，改革的时机到来了。

光是从近年来慈禧太后颁布的法令来看，她改革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中国能否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实行变法，重振往日的雄风；抑或是光绪皇帝在有生之年，通过改革来使中国走向强国之路，成为令后世颂扬的一代明君。这类问题太过复杂，不是我等小民所能预料。

皇帝的寝宫面临昆明湖，壮丽雄伟，丝毫不亚于太后的宫殿。他的身边也有许多太监、宫女，因此他的生活是完全独立的。每天早晨，光绪必须先到乐寿堂问安，然后一同上朝，接见百官，处理政事。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宫殿，去发愤图强。

每当盛大的节日，皇帝都会随太后一起参加筵席，观赏戏剧，或是随其一道游园，只是皇帝对戏剧并无多少兴趣，不很在意，他往往

会中途退场，到后面的休息室里读书、抽烟。当然，在太后面前，他是从来不会做这些事的。

皇帝每天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英文，他是一个很专心的学生。宫里还专门有一个官员，为他购买书籍，这绝非一个闲置，因为皇帝经常一天数次发布旨意，令其外出购书。皇帝不仅阅览中国的古书，也特别喜欢近人翻译的西方著作。人们总说，皇帝只要有一本书，便可打发一天的时光，由此可见其专心好学，勤勉努力。

除了看书，皇帝还比较喜欢音乐，他非但精通中国的各种乐器，还曾经尝试着弹奏钢琴。他对音乐的鉴赏能力很高，只要听过，他便能试着演奏出来，甚至无甚差别。他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只有他能拆卸钟表的各种零件，对其一一研究，再将其恢复原状。通过这种方式，他懂得了许多复杂的机械原理。慈禧太后虽然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却仍然不放心，总担心他把她那些心爱的钟表拆开后，不能重新组装起来。但皇帝一旦动手研究钟表，也不允许别人打搅他的雅兴。

皇帝是一个很有生活规律的人，他通常凌晨两点起床，如果赶上祭祖或是其他的庆典活动，那他必于凌晨两点动身，而在八点之前返回宫中，参加早朝。在这期间，许多随行人员需要步行两个半小时往返颐和园与北京之间，走上十六英里路程。

虽然皇帝很喜欢孩子，在宫中，无论男女，都没有特别受皇帝宠幸的人。他对身边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无多大兴趣，也无什么特别的嗜好，实在是一位难得的贤君。

皇帝对太后非常尊重，上朝时，太后登临御座，他只坐在左边一只小方凳上。太后游览御花园，如果皇帝随驾而行，必立在轿旁侍候，若是与太后一同用膳，必坐在末端。

每当太后独自用餐的时候，她老人家所使用的筷子、勺子以及碗碟之类，都是银质的；而当皇帝、太后坐在一起，却会换上金制的餐具。



慈禧太后的银碗筷

我不知道皇帝独自用膳时使用什么样的餐具，因为他总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而我也从未去过那里。使用金制餐具，似乎并不能使味道变得更好，好像也不是出于什么礼节上的考虑，如果不是需要，皇帝很少和贵妇们打交道。但是在节日里，皇帝有时会陪着慈禧太后和贵妇们出席公共场合，或是一同游园散步，他一如既往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他似乎并不喜欢与众人处在一起，当活动结束之后，他便立刻返回自己的寝宫。

当太后接待外国使节时，皇帝会在一边坐陪，但是，任谁都能看出来，他对这种接待事宜比较厌烦。他会寻找机会离开，这倒不是因为他反对外国人，而是这种乏味的见面实在不合他的胃口。

而太后倒挺希望皇帝能够陪她一同在半官方的朝见典礼中出席。尽管在这些场合，皇帝从未表现出不悦的情绪，也从未将气氛弄得尴尬，但他似乎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腼腆，还是不喜欢如此。

第九章　光绪皇帝的万寿大典

这日一早，我们便赶往太后的宫中朝贺，此时才六点，太后早已穿戴整齐，正襟危坐，等着前来朝贺的来宾。此时，早已有许多贵族妇女，乘坐或红或黄的轿子、车辆，从北京以及临近的地方赶来，在宫外候着，随时预备觐见。

许多太监首领都穿着绣着双龙图案的锦缎绣袍，而小太监的衣服则比较简单。可能因等级所限，双龙绣袍只能由首领太监穿戴。我们的轿夫穿着大红锦衣，上面绣着“寿”字。

我们穿过几座金碧辉煌的大殿，抵达太后的御座前，此时皇帝已经驾到，正在接受来宾的朝贺。一时间，大殿中人头攒动，自是热闹无比。

皇帝之所以不在自己的寝宫中接受朝贺，乃是因为按照宫中的礼制，贵妇们不得进入天子的寝殿中，即使是如此重大的万寿大典，也不得破例，是以朝贺大礼便在太后的宫中举行。

当我们进入正殿时，皇帝是坐着的，或者说，是以一种悠闲的姿势斜倚在一个卧榻之上。这并非对来宾的一种慢待，依照满族风俗，横卧见客，并非失礼。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见面，因为中国有句俗语：“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卧着。”所以这种姿势，并非失礼。只是慈禧太后在接见宾客时，从来不会如此，总是正襟危坐，保持端庄的体态。

当我们走进来时，他略微正了一下身子，格格们上前叩头请安，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友好地点头致谢。我则依照欧洲的礼节，向他表示祝贺。



皇帝御用马鞍

皇帝今日的着装，比往常要华丽庄严，显然是精心打扮了一番。他外套明黄绣袍，上面绣着许多龙，还有日月星辰等多种图案，腰束扣玉腰带，足蹬方头朝靴，颜色与服色相同，并饰黑色边饰，上面绣有草龙花纹，却没有戴朝冠，依照大礼，实为不该有之事。大凡在中国，上自天子，下自黎民，但凡重大场合，皆需正衣冠，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如今皇帝不戴朝冠，大概是因为这是非正式的朝贺。他的朝

冠放在身边的卧榻上，只见其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丝编织，另在冠檐上前缀金佛，嵌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七。顶子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龙上各饰珍珠一枚，层间各贯珍珠一枚。顶上端为一颗大珍珠。这颗大珍珠，平时并不戴着，只在重大典礼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还有七个穿着不同服色的官员立在一旁，从他们的顶戴可以看出，这些人皆是朝中的阿哥。这些顶戴是清朝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帽饰。以红宝石为最高，依次为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砗磲、素金、镂花阴文金顶、镂花阳文金顶。

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简朴的男子，便是光绪皇帝，他平时仅仅戴一个普通的红色丝绸做成的顶戴，当然只有他，才能在朝冠上镶饰珍珠。

我们向皇帝道贺之后，便走到偏殿，恭候太后的御驾。过了片刻，太后从寝宫里缓缓走出来，贵妇们立即跪倒在地，恭请圣安，只听她们齐声说道：“老祖宗吉祥！”

“平身！”太后面带祥和之色，悠然说道。

在与众人寒暄过后，太后便径向我走来，伸出右手，我连忙移步上前，依照西方的礼节，轻轻握住指尖，吻了一下。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外国使节对太后和皇上行过这种礼。太后亲切地说道：“以外国人的身份，参加皇帝的万寿大典，你实乃第一人。千万不要拘束，尽情欢愉是了。”然后她又看了看我的穿着打扮，包括佩戴的首饰，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转向众人，对她们的穿着也审视了一番，看看是否有失检点。慈禧太后正是这样的人，哪怕是细枝末节，也绝对不肯放过，总是郑重其事，精益求精。

来宾所着衣饰，皆华丽无比。时值盛夏，她们所着的服饰多由透光锦缎制成，与太后画像时所穿衣物大抵相似。

依照传统，已婚妇女的服色是深红色，寡妇们则身着蓝色礼服，

至于未婚的女子，则身着淡红色礼服，无论何等身份，衣服上都绣着五彩金龙。已婚之人在宫中朝贺，头上须插戴首饰，而未婚女子则不需如此，只需插戴普通的簪子即可。

今天皇后的穿戴极为华丽，头饰乃黄金丝绦做成，上嵌各式珠宝，旁边还有九条栩栩如生的黄金凤凰，灿烂夺目，其尾部悬挂着几串珍珠，遮住了她的前额，并一直垂到她的肩上。四周点缀着几朵珠花，真是巧夺天工，绚丽无比。她的礼服是明黄色的，上有绣金双龙纹，颈挂镶金玛瑙朝珠，领后垂明黄绦，饰有珠宝无数。在宫中，只有皇帝和太后不以双龙为饰，并不用挂戴朝珠，其余官员及贵妇则必须穿戴。（朝珠是由佛教的念珠演化而来，盖因清代皇帝信奉佛教，形成了这种礼制。）

今天，皇后看起来非常高兴，整日里笑语盈盈，神采飞扬，不时来到皇帝身边，亲切交谈。我在宫中待了许久，今日难得见到帝后之间的关系如此融洽和美。皇后身后跟随着瑾妃，她的服饰规制，大抵与皇后相似，只是作装饰的珠宝，要稍逊于皇后，而且服饰的颜色是橙黄色，盖因宫中唯有太后、皇帝和皇后三人，可用明黄色。

皇帝和皇后在太后的宫中接受朝贺后，太后和皇帝便走出寝宫，登上朝堂，接收文武百官的朝贺。刹那间，金鼓齐鸣，震耳欲聋——原来是乐者奏起了音乐。听其声，但觉金声玉振，引人入胜。正所谓钧天广乐，响遏行云，想来便是如此。当时，文武百官齐聚于朝堂之上，肃静无声，恭然而立。一些地位略低的官员，则长跪于大殿之外，一同恭贺皇太后、皇帝万岁。



隆裕皇后

皇后和妃嫔并没有随着来到朝堂，而是驻留后宫，等到百官朝贺结束，然后才能现身庆贺。这是朝廷礼制，是万万不可妄加逾越的。皇后极善应酬，当我们在宫中小坐时，她便吩咐太监宫女奉上茶水和各色点心。又将其所豢养的狗带出来，与我们嬉戏。此处的陈设极其雅洁，外面阳光明媚，照射在园中的花草树木之间，树影斑驳，别有情趣。我们在此闲坐半个小时，直到太和殿上的朝贺大礼结束。

皇帝在接受朝贺时，便坐在皇座上，君临天下，俨然一副皇者风范，再也不是先前那腼腆、害羞的样子。他的身旁，站着一名衣着华丽的礼官，专司礼赞之职。国中勋贵忠臣，纷纷依照大礼，匍匐在地，恭贺“万岁”。之后，每人都向皇帝进献一支玉如意，以作贺礼。很多外国人认为“如意”是一种类似权杖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中国，“如意”其实是一种吉祥美好的象征，臣子们常进献如意祝贺皇室寿辰，皇族也拿如意赏赐王公大臣，以取兆吉祥。光绪皇帝亲手接过大臣献上的玉如意，然后递给在一旁侍奉的太监，令其将礼物置放在右侧的桌案上。

当勋贵们退下之后，皇后、皇妃、格格以及各位贵妇则走上朝堂，向皇帝恭贺。适才在太后寝宫的庆贺，并非正式的朝贺。只见皇后带头跪拜在地，和先前的勋贵一样，向皇帝进献如意，只是她的如意，造型巧夺天工，显得更加华美富贵。



清代后妃元宝底鞋

贺礼结束后，太后、皇帝和皇后一同退出朝堂，贵妇、宫人们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万乐齐奏，恭送太后与皇帝，恰如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一般。

慈禧太后平日的装扮总是华丽富贵，实为宫中之首。今日皇帝万寿之日，反倒穿得朴素了，她身上并没有佩戴什么珠宝首饰。想来这种安排，也是出于她的深思熟虑——今天是皇帝的万寿之日，朝贺大典的主角自然应该是皇帝和皇后，她不希望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上，甚至是她的衣服上面。如此方可避免喧宾夺主，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这日进宫朝贺的宾客，大多蒙赐入戏院观戏。他们听戏的地方，与太后的御座形成直角，相互之间可以望到，勋贵们可以起身向太后、皇后敬拜。但包厢之间以十二尺高的丝绸屏障相隔，之间不能相通，至于其他情形，之前我已有所描写，在此不做赘述。

太后、皇帝、皇后三人落座，台上的演员纷纷上前叩头请安，然后演出方得开始。首先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接着几位演员走上前来，高声唱诵，都是恭祝太后、皇帝万寿无疆一类的话。至于他们所穿的戏服，则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样式。这些颂词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说什么“仙福永享，普世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还有什么“文成武德、泽被苍生。万瑞百祥，罔不丰登”。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套话。

颂歌唱完之后，震天动地的锣鼓便响彻大堂，如此喧哗了片刻，第二幕便开始了。中国的戏剧，大多短小，每出戏大概只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长度，称之为折子戏。但这天却上演了一出大戏，戏文的内容大概说的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戏装，并设置了逼真的舞台背景，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戏剧从早晨演到黄昏，在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太监们献上各色点心和茶水，进呈于前来的宾客面前。这些点心上都印着“万寿”、“喜庆”、“吉祥”、“如意”一类的贺词。其间有中国常见的水果蜜饯，有各种水果、坚果、杏仁乳酪以及时令瓜果，一起端上来的还有许多香甜

可口的饮料，各人用了少许，以作充饥。

用过点心后，大家便共进午餐。筵席便摆在戏院正中。我们所坐的餐桌特别宽大，是以同席之人，比平日要多了三倍。来宾们依照等级身份，纷纷依次而坐，她们深知礼数，进退之间，颇为周到，既谦恭有礼，又不显淡漠，虽然我对她们的言语并不理解，但她们的好客之情感染了我。她们对我这个“陌生人”极尽地主之谊，关怀备至，纷纷邀请我品尝美味佳肴。还有几位贵妇举起香槟，邀我同饮。当长辈们吃完之后，小辈们方才坐下。这些孩子随同父母一同入宫道贺，然而依照宫中的规矩，未满十六岁之人，是不得与长辈同席的。

没过多久，我们便吃完午饭，返回各自的包厢里。这时男宾包厢的帘子已被太监们撤去。只见这些皇亲国戚们纷纷席地而坐，如同土耳其人一般。离太后和皇帝越近，其爵位也就越高，如此依次排列，各就其位。容龄和德龄指着包厢里的这些勋贵，向我一一介绍。这些人无不是她们的兄弟叔伯，多少沾亲带故。但是因为我们躲在帘子后面，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们。

过了片刻，太监们又呈上许多点心，又有内侍手持银质酒壶紧随在后，给每位宾客都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色饮料，但是我们女宾却没有。显然，这些饮料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都是盛在小杯子里，而他们用的都是大碗。我很是好奇，很想知道白色饮料是什么东西。经过了解，我才惊奇地发现，这种饮料不过是热牛奶罢了，里面加入了杏仁粉和一点糖，这样口味会略带一点苦味和甜味。这种饮料是满族人非常喜欢的东西，但是只有在盛大典礼的时候，才会颁赐给大臣，以示皇恩浩荡。

王公们手捧茶碗，轻轻啜饮，显得极为庄重，似乎这碗乳酪承载着皇帝的健康与幸福。喝完之后，太监们将茶具移走，又有一队太监鱼贯而入，他们两两成列，同捧一只黄色托盘，上面印刻着大红的“寿”字。这些托盘里放着皇帝赐予来宾的回礼。盘中的礼物都是一样的：一对御制青花瓷瓶，一只青铜香炉，抄有孔子名言警句的卷轴一幅，卷轴乃以黄色绸缎装裱而成，除此之外，上面还有一支玉如意

和一枚玉扳指。

宾客受礼完毕，太监们捧着空盘子走出来，垂帘也随之落下。德龄姐妹又拉我回到原位坐下。这期间台上的演出始终在继续。只因我们的应酬太多，便顾不得去看了。

到了下午四点，最精彩的压轴戏开始了，三层舞台，同时解开序幕，所有的演员身着盛装站在舞台上，一人在前面带领着，齐声向皇帝唱颂祷祝之乐。其内容无外乎称颂他为圣明天子，德被万世，并祝愿他万寿无疆云云。颂歌结束之后，演出当即开始。只见舞台之上流光溢彩，声势极其宏伟，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便登场，他们饰演的有大罗金仙，凌霄众神，在琼楼玉宇中顾盼飞扬，直让人应接不暇。娉娉袅袅的瑶池仙女手提竹篮，其间摆放着各式水果，象征着幸福美满，吉祥安康，又有仙翁手捧寿桃，进献于前。紧随众仙之后的是一条巨龙，作戏珠之状，蜿蜒舞动，惟妙惟肖，旁有天兵天将伴随左右，手擎祝寿的条幅。那巨龙在舞台上盘旋几圈之后，在中间停住，仰头长啸，口吐一道清泉，水花四溅，遍及四周，殊为壮观。

这些程序都是太后所裁定的，皇后和德龄姐妹都已经看过彩排，但在这之前，当我向她们询问演出内容时，她们总是莞尔一笑，故作神秘，概因想留点神秘感给我。我被舞台上的表演吸引住了，来到包厢前面想看个仔细，不料竟被水雾喷了一身，也算是有惊无险，颇有几分乐趣。


清代后妃用的香水瓶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一一谢幕，包厢的帘子随即敞开，太后和皇帝现身于众人之前，王贵大臣们按照爵位高低，依次上前叩拜。这一次，他们行的是三叩九拜的大礼，并高声叩谢皇恩浩荡，极为郑重。面对这些大臣的叩拜，太后与皇帝正襟危坐，轻轻点头应对，俨然一副至尊无上的模样。

当王公大臣叩拜之后，演员们也来叩头谢恩，这时他们已经卸去了戏服，身着平时的衣服，来到御驾之前，依旧行三叩九拜之礼，只

是这次，太后与皇帝连点头回应的程序也省去了。

待到宾客散尽，太后领着皇帝、皇后以及妃嫔格格们一同来到祭堂，叩拜列祖列宗。先由宫人在祖宗灵位前的香炉中焚起檀香，紧接着笛声悠扬，钟鼓齐鸣，祷祝之人高唱雅颂之乐，显得宏伟肃穆，太后等人便在这庄严的音乐声中一一下拜。

第十章　畅游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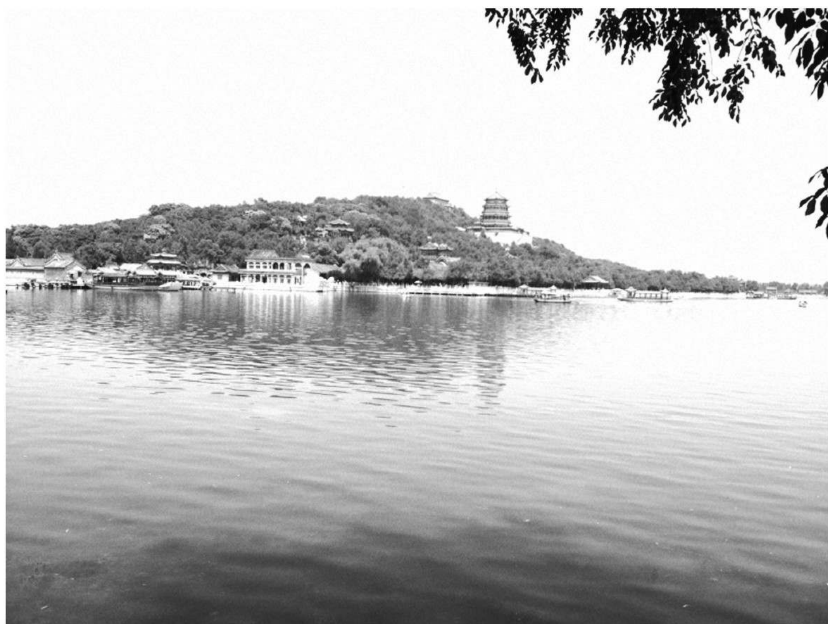
皇帝举行万寿大典之后，照例斋戒三天，然后举行祭祖大典。所以万寿之日的第二天，宫中便变得极为肃静。太后也是身心俱疲，在寝宫中静养。除了朝见大臣，这天所有的事情都暂且停下。前来觐见贺寿的贵妇们则收拾行装，预备离开；太监和宫女们东奔西走，因为太后与皇帝即将御驾回京，返回紫禁城居住。总之，这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太后不愿被众人打搅清修，也不想那些贵妇们前来告退，大家都不方便，遂下令将午膳安置在离宫一英里处的一座避暑山庄中。

这座山庄位于一座小山丘上，俯瞰昆明湖，景致优雅，这是太后最喜爱的山庄，她常常在此小坐一番，调节身心。在之后的一两天内，慈禧太后索性就搬到这里，一日三餐，游乐休息，都在这里进行，只有当夜色降临，她才起驾回銮。太后每次来这里，都会和格格们一同登高远眺，舒畅襟怀。

此处的陈设极其豪华。一座藏书楼，藏有成千上万部书籍，有些是举世罕见的珍本，有些是太后爱不释手的古籍。太后常在这里博览群书，以消磨时光。走过长长的走廊，便来到一处汉白玉砌成的台阶旁，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我们在此消闲度假，一边享用茶点，一边观赏美景，实在是惬意极了。

美丽的颐和园就在脚下，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那是宏丽的喇嘛寺庙和五彩琉璃宝塔。正前面，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湖中一道长堤自西北逶迤向南，把湖面划分为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域，每个水域各有一个湖心岛。这三个岛在湖面上成鼎足而峙的布列，象征着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由于岛堤分隔，湖面出现层次。西堤一带碧波垂柳，自然景色开阔，湖岸和湖堤绿树荫浓，掩映潋滟水光。向东远眺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里的白塔。湖山

相连，构成一个极其开阔的环境。这里的湖、山、岛、堤及其上的建筑，配合着园外的借景，形成一幅幅连续展开、如锦似绣的风景画卷。难怪太后对此地如此喜爱。



颐和园昆明湖

这天太后用过茶点，小憩片刻之后，便招我到跟前，道："明日我便要起驾回京，祭祀祖宗，如此需要三天的光景，你可愿与我同往？"我心中还在思量，她又说道："这些日子，哀家必然事务缠身，势必无暇出座画像。即便有闲暇之时，也只能小坐片刻。"我当下回道："既然如此，那听太后安排吧。因为若是画像，得需要寻找一个光线合适的地方，和此处一模一样，是非常难找到的，不如不去了。"

太后思忖片刻，道："如此也好，不如这段时间，你往美国使馆走上一遭，与康格尔夫人会晤，一诉离别之情，不知柯姑娘意下如何？"

听闻此言，我不由大喜，我与康格尔夫人一别两周，双方互无音

讯，心中颇为挂怀。既然太后开口，我何乐而不为呢。

太后又道：“北京的三海，你也未曾去过，若是失之交臂，势必遗憾。不如趁此机会，前往一游，岂不快哉。”她顿了顿，又道：“予虽然事务繁忙，却也愿忙中抽闲，陪柯姑娘一同游览三海宫殿。”

听了此话，我不由大为感激，我早对三海向往已久，却一直没有机会一睹其景。此时太后早已知晓，特意作此安排。她心思如此缜密，对我又如此关怀，实在令我感念不已。又听太后说道：“等诸事了毕，回到颐和园后，画像的事便可照常进行了。”

我在太后的寝宫用过餐后，便回到画室，将种种画具归置妥当，免得被不知情的人乱动，以致有所遗失。此间，太后也伴在我身边，竟然动手帮我一同整理。之后又令宫人将画像悬于墙上，以黄绳相系，并用透亮的黄色丝帘遮盖，以防灰尘。这幅画自从我着手时起，便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成了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甚至连我所用的画笔、颜料、画布，也一同被视作极为神圣的东西，每日画完后，太监会恭恭敬敬地走上前来，将其小心翼翼地安放在一间精致的小房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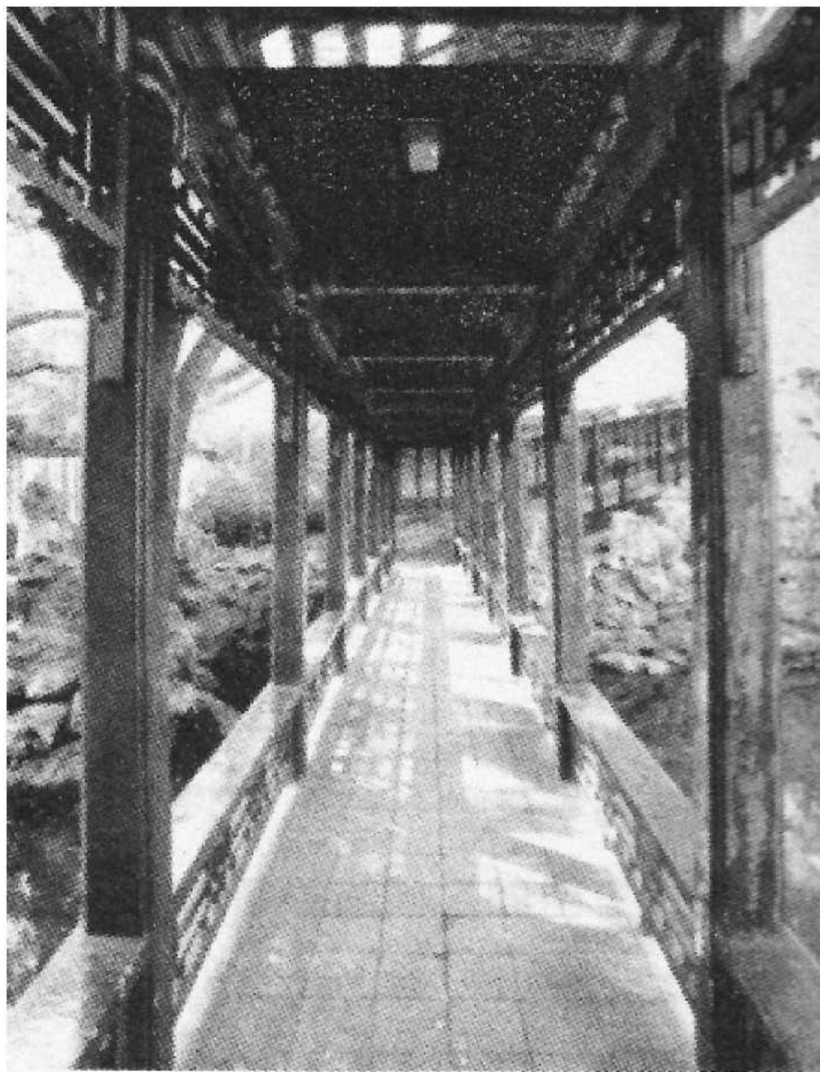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起身前往北京城里的美国大使馆。康格尔夫妇和许多其他的朋友早已等候在使馆门前，并对我报以热烈的欢迎。当时，美国大使馆在北京的水西门内，是由一座宏伟的寺庙改建而成。庚子之乱后，各国的使馆都设在东交民巷中，但是美国使馆还在修建之中，中国政府只好先将此处赠给美国政府，权作临时大使馆。这座大殿高大宽敞，富丽堂皇，其外表是中国式的古典建筑，庭院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非常迷人，其中许多花还是慈禧太后送给康格尔夫人的。虽然美国式的布置会使人觉得非常方便、舒服，但康格尔夫妇对东方文明一贯非常感兴趣，尽量保持这里的中国风格，包括家具、墙上的字画，都是中式的。康格尔夫妇与客人会晤，全在这里，足见其对东方文明的倾心。

康格尔夫人喜欢交际，也极擅应酬。来到北京后，便开始与京中各国的贵妇们建立联系，因其和蔼可亲，处事周详，旁人也乐于与她

交往。在此之前，清宫的贵妇们，从未与外国使馆里的夫人建立过私人感情。她甚至已经成为中国贵妇与各国的夫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其他各国的使馆也效仿美国使馆，外交官的夫人们开始频频接触清廷贵妇，“夫人外交”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得以改善，然而溯本追源，这一切都是起于康格尔夫人。

康格尔夫妇长袖善舞，不仅与上流社会来往密切，对待本国人也是一视同仁，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从他们这里感受到真挚的情谊。能够与康格尔夫妇相识，真让我开心不已。这日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简单而又隆重，当晚我下榻在使馆的客房中，依然回味无穷，一时间，让我产生了一种回到美国故土的感觉。

次日清晨七点，便有一顶墨绿色的官轿停在使馆门前，原来这是太后安排带我到三海游玩的。我立即坐上轿子，先到贤良寺等候片刻。这里曾经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现在是裕庚爵爷一家暂住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房子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毁掉了，所以他们从巴黎回国后，只能暂时栖居此地。我到了贤良寺后，德龄与容龄两位小姐立刻迎了出来，与我一同乘轿前往三海。在我们前后，都有御前侍卫随行护佑。



北海静心斋长廊

所谓三海，指的是北海、中海和南海，它们位于紫禁城的西侧，是中国现存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置精美的宫苑之一。这里的建筑，多是近五十年兴建起来的，相对皇宫来说，显得更新一些。我们在宫殿的北门停下，一些在颐和园便熟识的太监迎上前来，引领我们登上一艘渡船。原来太后驻留的地方，在湖的对岸，所以必须乘船穿湖而过。这条船也是一条游船，其船舱位于正中，桨手则站立在船舷

上，摇着船桨轻轻划入湖中。

这条船尽管只是一条渡船，却也装饰得极为豪华，船舱之内，毡毯、茶几、椅子一应俱全。我们一一入座，随行太监则坐在船首。

船中环境极为安适，我们欢笑一堂，不知不觉，船行了二十分钟，终于到了对岸。我们依次上岸，穿过几座宫殿，便来到太后所在的祭堂。

此时太后刚刚祭祀完毕，乐声尚未结束，空气中还弥漫着焚香的味道，太后缓缓地从礼堂内走出，甫一见到我们，便唤我来到近前，问道："这几日到了京城，过得可好，身子可也安康？康格尔夫人近况如何？"我一一做了回答。然后她令太监前面领路，引我们游览参观。

我们首先来到一座华美的殿堂，稍事休息，只见这座大殿飞檐翘角，宏丽轩昂，共分作五间大堂，分别以帷幕遮掩。在这里歇息片刻之后，我们回到御舟，太后告诉我今日专门为我安排一艘游船，尽览三海景色，让我不虚此行。这时，一个太监手拿数十方丝绣方巾，来到我身旁。见我看得稀奇，太后说道："这些小方巾是拜佛时遮盖在佛像头上用的。"说罢，便与我们告别，让我们自己前去游湖。

我们来到湖畔，只见数十艘豪华的游船停泊在岸边，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里面的陈设也有所不同。我们遂登上一条大船，其船舱是以蓝色绸布遮覆，华美艳丽。在游船的后面，则有一众太监驾着小舟，捧着茶点，随时准备上前侍奉。

在船头为我们引导的太监叫做张德兰，在宫中被唤作"小德张"，是一个太监首领，乃宫中的六大首领太监之一。在颐和园画像时，便被太后派来侍奉我。这个人天资聪颖，颇有学识，对中国的古典艺术造诣颇深，平日里最爱收藏书画古玩。据说他先前在宫中的戏班里谋事，唱得一嗓子好曲，表演功夫也极为精湛，记忆力也是极好，许多历史典故、诗词歌赋，他无不熟记在胸，可以出口成章。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慈禧太后非常喜欢听他诵读诗词，或是讲说故事。

当我们泛舟湖上时，为了解闷，便令小德张纵声歌唱，只听他喉清韵雅，如吐玉喷珠，若鸾吟凤唱，与这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真是虎斑霞绮，林籁泉韵。虽然我听不懂其间的语言含义，但那悦耳动人的歌声，使我深深的陶醉。我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幻境之中，又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一座小岛旁，一座寺庙映入眼帘。我们兴致勃勃地走上前去，只见庙门之外，立着一方黑色石碑，上面篆刻着几行铭文，龙飞凤舞，我不由驻足观看。德龄小姐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学造诣颇深，她看了碑文后，告诉我这是一首诗，是对皇天后土的歌颂。这个岛上无甚可看，走马观花一番，便离岛上船。

船行不远，又见一处宏伟的庙宇，隐隐约约看见许多工匠正在对其修缮，我不由极目眺望。小德张见状，遂命舟子划桨前往。到了岸边，却不由叹息起来，只见满目疮痍，四处都是断瓦残垣。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造成的破坏。昔日的壮观景象，皆沦为一片废墟，实在令人唏嘘不止。

庙里的四周，曾经是僧人开辟的菜园，然而战乱过后，这里一片荒芜的景象，蓬蒿遍地，偶有数朵野花长于其间。由此向前，步入密林之中。只见这里树木参天，交错成行，颇有一番古意。再往前走，便到了庙宇之前，拾阶而入，来到大殿之中，只见其间已是空无一物，一片萧瑟没落的景象，然而从其布局来看，依稀可以看到那富丽堂皇的影子，先前香火必然是极旺盛的。只有一些工匠在其间忙碌着，有些地方已被施以颜色，略微显现出旧时的面貌。

大殿两旁，皆为僧侣们的禅修之地，现在也是残破不全，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些佛陀、菩萨、罗汉的雕塑，七七八八地散落在大殿的四处，全都是蒙着灰尘，尽显凋敝的景象。大殿的内部多饰以重彩，其木制的房顶，与我在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所见到的样式差不多，但是相比较摩尔人[3]那种以白色为主调的设计，中国人喜欢色彩斑斓的风格，使殿堂充斥一种暖色调，显得更加和谐一些。

大殿的后面是一间间独立成室的小佛堂，处处雕廊画栋，其间垂

挂着亮绿色（据说是代表佛陀的颜色）的丝绦，尽显匠者的精细。

正如欧洲的天主教中有专门的房间供奉圣器一样，这些佛堂有的用来供奉佛典，有的为长老们诵经的地方，也有的是得道高僧清修之地。佛堂后面是一个半圆形的高台，大约有三十英尺高，沿着大理石台阶逐级登上去，只见高台四周的围栏上都是以青石砌成，上面雕琢着莲花的图案，因为莲花在佛教中乃是圣物，所以在佛寺中四处可见。

凭栏远眺，可以望见远处一座小山，这便是景山了，它修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因为有五座山峰，所以称“万岁山”。又因明初朝廷在景山堆煤，以防元朝残部围困北京引起燃料短缺。因此该山又称“煤山”。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便是在那里上吊自缢的。露台的两端是两间八角凉亭，过去僧侣们常在这里休息、冥思，当他们祷诵佛经时，也可以顺便欣赏这迷人的景色。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一会，便继续向前，穿过僧侣们的禅房，这里是他们休息的地方，看起来宽敞而又舒适，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洒到庭院之中，形成斑驳的树影，静谧清幽。我们走得累了，索性在一棵茂密的大榆树下坐了下来，太监们立刻奉上茶点，供我们享用。

歇息片刻，我们便回到船上，水波荡漾，不觉间已将我们送到一堵高墙之下，仰面望去，只见城墙高耸，千仞壁立，上面郁郁葱葱，种满了高大的树木。细究之下，我不由吃了一惊，原来这里竟然也是一座寺庙。不过说它是座寺庙，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堡更好，不知与世无争的佛陀看到后世将庙宇修建成这样，会如何作想。我一时兴起，便要去游览一番。

游船在一座白玉铺就的桥边停下，太监们早已预备了几顶轿子，抬着我们走上城墙，其间道路蜿蜒盘旋，实在是大费周折，好不容易方到了顶部，然而这绝对是不虚此行。一座庙宇现于眼前，其壮丽恢弘，实在是我闻所未闻。庙宇周边遍植松柏，郁郁葱葱，苍劲有力，这些树木一般都会种植在庄重肃穆的地方，例如陵园、庙堂，因为它们象征着永垂不朽。我在中国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些四季常青的乔木

或者灌木。希腊人将长青之木视作生命之源和不朽的象征，这种思维是不是来自于中国呢，我不得而知。

一进山门，便看到一尊白玉雕琢的菩萨，其衣袖之上多用宝石点缀。菩萨的面容慈祥和蔼，是典型的中国人的面容。当佛教刚从印度传入中国时，佛像的造型多是印度式的，直到佛教在中国得到普及，佛像便开始中国化，开始体现出中国的风格。我们眼前的这尊菩萨，身上披覆着黄色的绸缎，戴着一顶满族风格的头巾，因为在颐和园时，我亲眼见慈禧太后戴过，所以到如今竟还可以认出来。神像前燃着两根高烛，鼎中香气冉冉升起。供奉的花果等物也颇为新鲜，显然早上太后和皇帝刚刚来此祭祀过。毕竟，这里如此恢弘壮观，应该是比较尊贵的皇家寺院了。

在寺庙的正中有一潭池水，周边以栏杆围起，上面雕刻着许多行龙。绕过潭水，便看到一尊大鼎，鼎最早是一种食器，如今寺庙里经常用它来盛放食物，向穷人进行施舍，因此它的体积是非常之大的。有时候，无家可归的人或是过路的行人会来到寺中寻求庇护，行脚僧人也会来此借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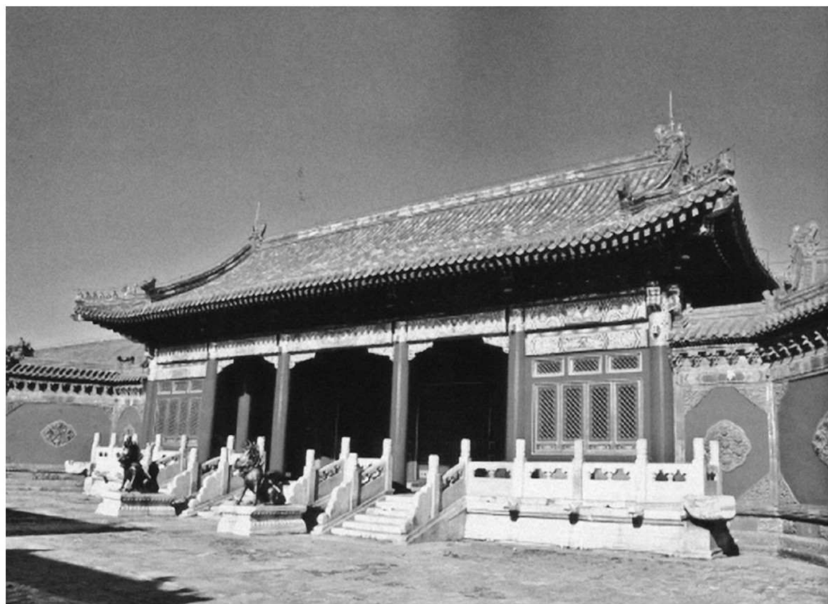
正当我们玩得兴致勃勃时，忽然间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眼看便有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敢久留，立即乘着轿子原路返回。途中，我看到一个塔尖，一问之下，方知那是天主教建筑，当初法国传教士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天主教堂，清政府特拨地给他们。但是当教堂落成之后，人们发现站在教堂顶上，可以尽看三海之地，于皇家殊为不便。遂出资将其购下，另外拨地给传教士，另行再造。所以皇墙之内便有了这座天主教堂。盖因中国皇帝笃信佛教，清宫周边多佛教建筑，而如今在皇宫边上兀然冒出一座西方的教堂，实在是稀奇得紧。

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轿夫抬着轿子，奔走如飞，很快来到慈禧太后的寝宫前。我们在此用过午餐，便去参观三海中的两座戏院。这两座戏院形状相仿，只是一座在冬天使用，一座在夏天使用。后者建在湖的中心，据说，这种构建模式可以使声音产生共振，让声音更加轻柔悦耳。

伴着潺潺的水声，我们在这座美丽的宫殿用过晚饭，便向太后辞行，乘坐游船返回了。此时已是雨后天晴，在夕阳的映照下，湖面上像撒下了万道银针，波光粼粼。石桥、宝塔、树丛、宫殿、教堂，都好像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细纱。微风拂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它们的倒影微微晃动，蔚成紫霞千道，撩人眼目。几只水鸟掠过水面，箭也似的向远处射去，逐渐融化在了那梦幻般的夕阳美景之中。

第十一章　极具个性的慈禧太后

漫游三海，使我筋疲力尽，第二天便不想再出去游逛，索性留在大使馆，悠闲自在地度过一天，真是惬意极了。不过，想到不久我便要回到宫里，继续为慈禧太后画像，心中还是充满了兴奋。因为对我来说，研究慈禧太后如同在撰写一部惊险刺激的小说一样，而且仿佛成了我每日的必修功课。一天不做，我都有些不自在，简直像患了“强迫症”一样，真是迫不及待想再次见到太后她老人家。



慈宁宫

在我进宫之前，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她的传闻，但是当我见到她后，发现这些传闻真的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和真正的慈禧太后大相径庭。她是如此神秘而有趣，如此的与众不同，这种印象，并非是初见之时的一种陌生感造成的，而是每一次见到她，都会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太后处事周全，机警多智，和她在一起，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

觉。我入宫已有一个多月了，每天都会和太后进行接触，然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坐在那里充当模特的太后，而且是一个鲜活的人物，一个完完整整，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并且随着我与她交往的深入，我对她的敬重之情也与日俱增，而且愈发的强烈。甚至，一天见不到她，便觉得恍然若失，大有意兴阑珊的感觉。

太后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人物，每次见到她，我都会有新的感受，她真是一位可以被称为代表着永恒的女性。她与诸贵妇一道欢颜嬉戏，顾盼生姿，趣味盎然，甚至如孩童一般，天真烂漫。可是一旦临朝听政，便立刻变得威严庄重，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群臣无不为之凛然，不寒而栗。处理起政事来，哪怕历时三个小时也毫无倦容；当大事了毕，群臣告退，她便又恢复原来的亲和了。

一个法国贵族曾经如此评价慈禧太后：“在中国，她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从卓尔不群的能力和超凡脱俗的智力来看，她不愧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巨人”。但是，我要研究的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慈禧太后，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慈禧。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能有机会来到皇宫大内，来到慈禧太后身边，和她朝夕相处，这个机会实在难得，怎能轻易放过。

就我看来，慈禧太后驾驭群臣极有方略，就拿宫中诸位贵妇和侍女来说，可谓是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受到她的平等对待，她有宠爱的人，但决不允许其恃宠而骄，也不会偏信其一家之言。尽管太后还算比较开明，容得下别人的意见，但宫中诸人在她面前一律唯唯诺诺，绝无违背之举。虽然如此，太后依然能够洞察到每个人的真实想法，想来这是她能够驾驭众人，牢牢把持朝政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慈禧太后对权力极度痴迷，众所周知，人们对她常冠以“老佛爷”的称呼，其意指她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1900年，庚子拳乱，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她被迫逃亡西安，一路历尽艰辛，自不待说。从那以后，她觉得“老佛爷”似乎不是很妥帖了，便接受了大臣赠给她的另一个尊称——“老祖宗”，这样显得更加亲密，有人情味。

宫里无论何人，包括皇帝和皇后都这么称呼她，她也叫我这么称呼她。

次日，我重往三海拜见慈禧太后，向她老人家请安，然后再坐着轿子四处游览。先是到了一个接见蒙古王爷的宫殿里，这座宏伟的大殿在公园的西北角，距离太后的宫殿还是有些距离的。这座宫殿颇有些来历，其造型和寻常宫殿一样，足足有四十英尺高，形势嵯峨。内部也很气派，只是陈设的家具却不多，除了皇帝的宝座和几张雕刻着盘龙的椅子外，便再无他物，连一些简单的装饰也省去了。殿堂的后部是一个凸起的台子，踏上大理石台阶可以登上高台，只见上面摆放着一张风格古雅的宝座，宝座上方是一块黑色的匾额，上面写着满汉两种文字。这间大殿每年仅大开一次，专门用来接见前来北京朝觐的蒙古亲王。殿旁有几十间小屋，乃因每次亲王入京，随行者多达数百人，他们便在此处下榻。

离开大殿，我们坐上轿子，沿着湖堤缓缓地前行，只见堤岸垂柳，海棠相间，湖水荡漾，碧波照人。楼、堂、亭、廊错落有致，掩映在山石松竹、花木绿荫之中，一派宜人景色。再往前走，便是著名的“九龙壁”了。大多数的中国院宅都有一座影壁，正对着大门，一来为了挡住外人视线，防止别人窥其隐私；二来寄予吉祥如意的希望。

每座影壁多少都有些雕塑、壁画，这座皇家的影壁自然更加壮观。九龙壁由三部分组成，下层为基座，也称须弥座，为束腰形，雕有浮雕两层琉璃兽，一层是麒麟、狮子、鹿、马、羊、狗、兔等动物，另一层是小型行龙。兽、龙形象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中部为九龙壁的壁身主体，用琉璃构件分六层拼砌而成九条飞龙。上部为斗拱装饰，琉璃瓦兽顶歇山式。北海九龙壁东西两端分别是“旭日东升”、“明月当空”的图案。九龙壁中央正对着代王府，姿态端正，龙头向上，龙身向上弯曲，九龙壁的主龙为正黄色，正视大门。主龙左右的两条龙为浅黄色，龙头朝东，龙尾回甩向中心龙，呈对称状。依次对称的两条龙龙头向西，呈淡黄色。再其后是对称状的两条宝蓝色巨龙，东西两边的两条龙呈黄绿色。九龙壁上九条龙张牙舞爪，气势磅礴，好似从天而降，腾云驾雾，翻江倒海。九龙之间的背景是水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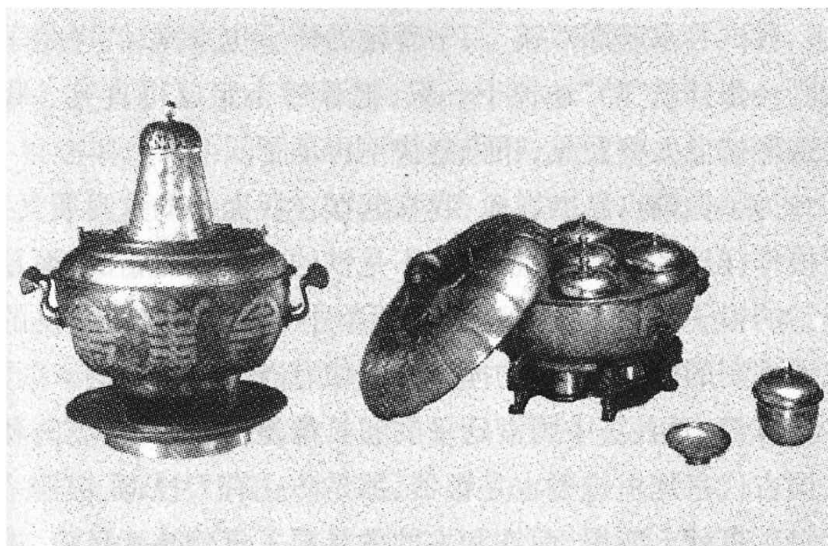
山石图案，映衬烘托九龙成为一个主体亦是个体，灵活多变，姿态优美动人。

不过说来有趣，虽然影壁有驱灾辟邪的作用，但我在皇宫大内从来不曾见过，也许是因为天子乃真龙之身，妖魔鬼怪避之不及，哪敢前来加害呢。这里之所以设有影壁，乃因此处本来并非皇宫大内，只是一处寻常的园林，后来咸丰皇帝一声令下，将其纳入皇室禁苑之中。是以后来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都无缘一见这座美丽的园林，殊为遗憾。

我们在此处流连多时，方恋恋不舍地离开，直接往太后寝宫去了，此时太后刚刚下朝回来，正从容不迫地处理宫里头的事务，毫无倦怠的神色。不一会，太监进上一篮新鲜水果。其间有一串葡萄，晶莹剔透，鲜艳无比，太后拈起一串，对着阳光把玩了一阵，然后放进嘴里，细细一品，不由赞道：“果然不错，真是色香味俱全。”

不一会，太后开始用膳，我们其他人则先恭候在回廊中，等到太后起身离座，我们方坐进膳室，坐下用餐。

我和皇后、格格们一道在太后宫中吃饭，已成为习惯，反倒不习惯自己独自待在住所。为了入乡随俗，我早已摈弃刀叉之物，学习使用筷子。我觉得美丽的中国女子使用起筷子来，显得更加优雅，当即下定决心要向她们学习使用筷子的技巧。时隔多日，我还没有熟练起来，但我切身体会到，筷子就是为中国美食量身打造的，品味中国美食必须使用筷子。一双竹筷，在纤美的玉手中上下飞舞，要比拿着刀叉优雅得多。虽然我已做了努力，但是手指依然木呆不灵，总是弄得满盘狼藉，引得旁人捧腹大笑。不过这些人都是非常善意的，她们见我如此狼狈，便纷纷为我夹菜，并热情地告诉我这道菜的名字和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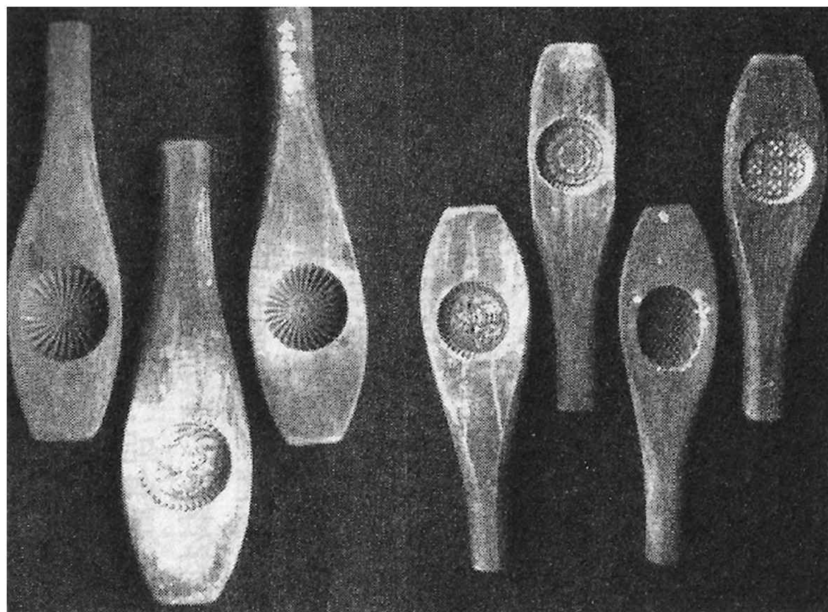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的银制火锅

我努力学习这些菜的中文名称，当我张冠李戴后，她们必然会再次笑倒。太后有时听到笑声，便会询问，当贵妇们告诉她我们大笑的原因后，她也会好奇地问道：“柯姑娘真这么说？”继之莞尔一笑。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太后已命令准备轿子，等候在宫外，准备和我们一同游玩。可是突然间风雨交加，带来阵阵寒意。但太后既然打定主意，什么事都无法改变，必然会照计划实行。想来她从政的风格也是如此，手腕强硬，百折不挠。

太监们见太后要动身，当即撑起一柄巨大的黄色华盖，紧随其后，为其遮风挡雨。我之前已说过，太后、皇帝和皇后所用之物，皆为明黄色，皇妃则为橙黄色，以下各人和我，都用的红色。太监们张开红色华盖，为我挡着风雨，走出大殿。

皇亲贵妇们都穿着平日的鲜艳的袍袖，太监和轿夫们所穿的衣服，也都是绸缎制成。一行人便这般漫步在雨中。太后的兴致最为浓厚，似乎无论何种天气，她都能从中寻求到乐趣。但在我看来，她似乎最喜欢下雨，她曾经颇有诗意地对我说道：“烟雨朦胧，柔润如酥，沐浴其间，心神为之涤荡。”想来，是由于北京气候干燥，烟雨

朦胧的景象可是稀罕得紧。每逢此时，太后必然心情舒畅，沉浸此中，其乐无穷。然而其他人却没有这样的好兴致了，看他们的样子，都是勉为其难地跟在后面，只是碍于太后的威严，不得不勉强跟随，太后乘轿时，喜欢急速前行，几个轿夫身手也是了得，重担在肩，依然能够奔走如飞，却又非常沉稳，丝毫没有颠簸之感。大约行了一刻钟，轿子突然停住了。我放眼望去，只见大雨依然淅淅沥沥，而四周一片空旷，没有避雨的地方，不知道太后意欲何为。正当我兀自诧异，太后已信步走了出来，径直朝一个葫芦架走去。



清代做饽饽的木模具

葫芦这种东西，在中国很受欢迎，它象征着丰收与繁荣，慈禧太后对其也颇为偏爱，所以大内各处多有种植。虽然中国处处可以见到葫芦，但寻常人家种植的葫芦，远远比不上大内的那样饱满风韵。概因大内之中，有人专门栽培照料，施肥修剪，极为讲究，绝非寻常人家所能相比。这个葫芦架上结的葫芦，形状相仿，上下部口径相近，无一例外。这些葫芦只有大小之分，小的大约一英寸，大的约十二英寸。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些小葫芦的形状和大葫芦毫无二致。它们都挂在七英尺高的葫芦架上，四周缠绕着葛藤，显然得到精

心的修剪，每个葫芦都有很好的生长空间，并且可以沐浴到阳光。

太后径直向葫芦架走去，六英寸高的白色鞋子陷入泥泞之中，早已被雨水浸透。太监首领想方设法地为太后遮挡风雨，却没什么作用。但太后对此毫不在意，很快便来到葫芦架下面。她抬起头，兴致勃勃地审视着那一颗颗葫芦，看它们被照料的好不好，是否快要成熟，好及时地采摘下来，以免时机不对，导致葫芦枯萎。

兴致勃勃地审视之后，太后摘下几只成熟的葫芦，返回轿中。在此期间，我们当然也要出轿相随，好在太后没有叫我们一同去摘葫芦，不必受泥泞之苦，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站在路边恭候，身上早被雨水打湿。当她在轿中落座后，我们纷纷长舒一口气，坐定之后，我方能体会到“站着不如坐着”这种东方谚语是多么有道理。

又走了片刻，轿子竟然又停了下来，因为我们又来到另一个葫芦架旁边。太后仍同先前一样，举步出轿，又在葫芦架下流连忘返。此时大雨滂沱，来势愈来愈猛，然而太后兴致不但不减，反而更加浓厚了。

无奈之下，我们也跟着走出轿子，站在路边恭候太后，因为只有如此方能显出对太后的尊敬，也只有如此，方不为失礼。虽然有太监为我们撑伞，但我们的衣衫早已被打得精湿，狼狈不堪。贵妇的鞋子底部很高，在雨水中还不会被打湿，可怜我那双皮凉鞋早已被浸透了。唉，一个个真是苦不堪言。

更可怜的是我们身边的太监，他们侍奉我们的同时，不可能为自己撑伞，他们的衣服里里外外都已浸湿，紧贴在身上，帽子上的翎毛早已被打得破烂不堪。而且太后一声令下，便要抬起轿子，飞奔起来，无一刻的停顿。相比之下，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

太后回到轿子上，继续行进，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大雨没有停止的迹象。太后遂下令去接见蒙古王公的大殿中休息，如此一来，我们才寻到一所避雨的地方。

大门开启，太后趋步走进，坐在高台上的那张黄色宝座上，太监们则捧着采摘的葫芦，侍奉在两侧。太后先选了一个留给自己，然后再分给首席侍女薛吉葛氏和太监李莲英首领各一枚。因为他们俩都能在葫芦上雕刻字画，惟妙惟肖。而太后自己也擅长此道，并不比二人逊色。

过了一会，有太监将一根削尖的竹片进呈给太后。她立刻动起手来，先是刮掉葫芦的外皮。做这个活极为困难，需要心灵手巧，她让我站在她近旁，仔细观看。只见一双玉手上下翻转，疾徐进退，无不随其意念，恰似行云流水一般，足见其功夫精湛。太后雕刻时，面色从容，与我谈笑风生，竟能做到一心二用。

言谈之中，我们提到宝座后面的一块石碑，太后说道："上面有满汉两种文字，你可能看出它们的区别来？"我端详一番，摇了摇头，太后遂为我讲解两种文字的不同，以及语言上的差异。

太后说道，对一个西方人来说，满文要比汉文容易学习，因为满文是字母文字，与西方的文字颇有共通之处。依我所见，所言甚是。

接着，太后转过身去，又与其他人言语，我便知趣地先行退下。与皇后、格格们在一起休息。她们早已先我而退，在外廊中等我，接着便一同往后殿去，享用茶点和香烟。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雨渐渐地停住了，风也屏住了呼吸，园中变得非常幽静。远处，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开始啼啭起来，仿佛在倾吐着浴后的欢悦。近处，凝聚在树叶上的雨珠还往下滴，滴落在路旁的小水洼中，发出异常清脆的音响。不一会儿，一条彩虹挂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见此情形，我们不由来了兴致，一道走出大殿，漫步在雨后的园林中。此时此刻，置身于美景之中，轻嗅着雨后的清香，不觉陶醉于其间。

我们在园中用过晚餐，然后登上游船，渡河出宫。远处，一队武士正在练习射箭。尽管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但是射箭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时尚的运动，有一手好箭法在军队中也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因

此，射箭是满族贵族必修的一门功课，以此来训练眼力、臂力以及胸部力量。

只见这些勇士身形挺直，昂首挺胸，“嗖”的一声，利箭离弦而发，呼啸而过，正中目标。我坐在轿中，出神地看着他们操练，直到洪亮的钟声响彻云霄，回声在皇宫的院墙内阵阵不息，我知道，这是告诉人们天色已暮，我也该加快步伐，不然今天晚上就出不了宫了。

第十二章　重返颐和园

三天的祭祀转眼间便结束了，自太后以降，所有的人又要返回颐和园，我便也随驾重返故地。我本以为，从此以后，我便可专心画像，不再有其他的事情耽搁。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太后仍不肯按时出座，即使出座，也极为短促，使得我无法从容落笔，肖像成形的日子一拖再拖，我不由得焦急起来。

然而，太后待我优厚无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内心深处，真的非常感激。可惜在她眼中，处理政务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绘制肖像，不过是闲来无事的消遣而已，有时可以忽略不计，致使我的工作一拖再拖。不过我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能够在皇宫大内观览全景，而且能与中国最尊贵的人朝夕相处，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全面透彻地去了解中国的礼仪、风俗，去了解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物。我想慈禧太后之所以将画画的事情一拖再拖，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太后处理政务可谓是废寝忘食，然而她竟能百密而无一疏，实在是体贴入微，真使我感动不已。假使我能够掌握流利的汉语，我想我会有更多的收获，使我在颐和园中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十分喜欢和太后一起游园散步，喜欢每一天的短暂绘画时间。每当我拿起画笔，为太后画像时，我的心中都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仿佛与太后建立起了心灵上的共鸣，我们无需言语，便可知道对方心中所想。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我知道，对于一个肖像画家来说，这种画家与模特之间的感觉实在是经常碰到。大凡画家为人画像，对方无论是相识已久的，还是乍一相逢的，甚至那人相貌蠢陋，令人厌弃，但一旦拿起画笔，都会发现其闪光的一面，并将其尽可能地放大。如果双方相处和谐，彼此之间心有灵犀，笔下的作品将会更加完美。然而，虽然我每日里和太后都几乎形影不离，但除了她坐在画架前，我很少有机会详细地从正面端详她的容貌，很难把握到

真实的太后。

返回颐和园的次日早晨，画架已被安置在正殿中，太后那幅尚未完成的肖像也被从墙上请了下来，安置在画架上面。这天太后出座的时间极长，让我的画作有了质的飞跃。其实，如果给我一个画室让我独立工作，我可以在那里进行思考研究，这样即使太后不坐在我面前，我也能凭借我的功底进行修改，这幅画也可早日完成。然而现在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每天画上一小时左右，太后便会感到疲倦，起身离座，这时太监们则一拥而上，转瞬间便为我将所有的画具收拾好，使我不再有机会可以补笔，只能等到下次太后高兴，再继续下去。

我带进宫的画架比较小，不太适合绘制大型肖像，然而在北京，我又买不到更合适的画架了，只能将就着用。太后洞察秋毫，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当即令我画出图样，标明尺寸，令宫中的木匠照着图纸赶制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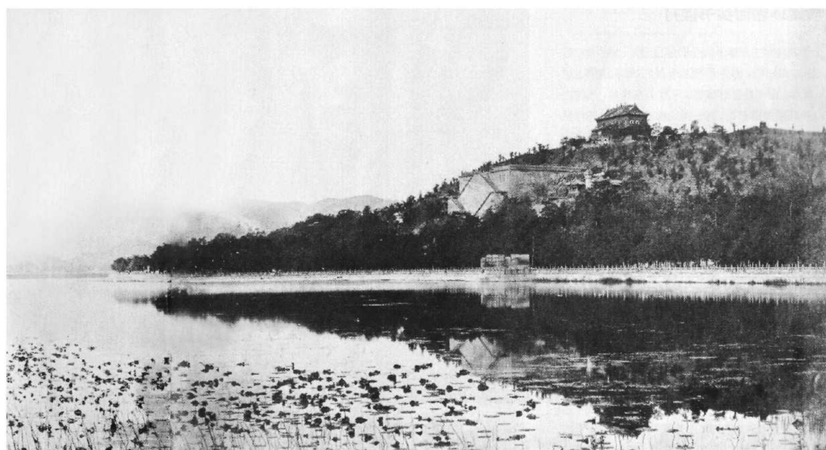
不久，画架做成，甚合我的心意。太监们见我赞不绝口，当即又以同样的样式做了五具画架，其形制一模一样，只是大小有所差别。我不由惊讶，询问原因，太监回道：“凡为太后所造的物事，倘若合其心意，则至少共制六件，惯例如此。”如此一来，我便有了六个画架为太后画画了。

慈禧太后还令人做了几只扁平的大箱子，配以钥匙和锁，专门放置我的绘画工具。这些箱子清一色明黄色，乃因此箱专为盛放太后圣像，必须漆成明黄色，以示恭敬。

我忘了告诉大家，那六个画架也被漆成明黄色，在我作画的日子里，这些箱子和画架自始至终都被放置在大殿的显著位置上。每天绘画结束，李莲英都会带着太监们上前将画具、圣像，有条不紊地放置在新制成的箱子里，然后锁上锁，再交给侍奉我的小德张手里。

这天下午画完后，我们又到园林中游览一番。蔚蓝色的天空，在深秋时节，一尘不染，晶莹透明。朵朵霞云照映在清澈的昆明湖上；

鱼鳞的微波，碧绿的湖水，增添了浮云的彩色，分外绚丽。秋末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岚风带着浓重的凉意，向我们吹来。这时候的日落很悠闲，从容不迫，总给人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也会让人联想到生活中本应该多一些坦然和从容。我们徜徉在颐和园中，时而闲庭信步，时而驻足观赏，虽说在此生活已久，但小别重逢，似乎又有一番衷肠需要倾诉。太后是那么喜爱颐和园，她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她爱这里的风霜雨雪，当她回到这里时，仿佛是流浪的游子，重新寻回了灵魂的归宿。



昆明湖

游玩累了，我们便走进一座茶亭，依次坐了下来。这时，太监奉上一碗莲藕粉。原来太后散步的时候，太监们捧着红炉、茶具，以及各式美食，只要太后落座，当即便上前侍奉。只见细瓷碗中，盛放着质地细腻，晶莹透明的凝状藕粉，轻轻一嗅，淡淡香气扑鼻而来。太后娓娓言道："此物益胃健脾、养血补气，服之颇有益处。"我点点头，轻轻一啜，只觉淡雅清香，味甘爽滑，着实人间美味。

至于其他的中国美食，也着实令我大开眼界，有些菜品精致无比，真是匪夷所思。我们吃过藕粉，立刻有茶水奉上。中国各地所产的最好的茶叶，自然要进贡到皇宫中来。太后对美食颇有造诣，她时常将茉莉花、金银花投入茶盏之中，使茶叶吸收花香，冲泡之时，茶汤回荡，花香飘溢，真是人间极品。如若调和一点蜂蜜，则另有一番

风味。

太后所用的茶杯，乃以碧玉制成，质地温润、色泽晶莹，制作亦非常精细。其茶碟则以银制成。中国人饮茶喜用沸水冲沏，所以茶具多用瓷器，而玉器却不能承受高温，至于慈禧太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太后饮茶时，并不像西方人那般使用茶匙，而是按照中国的方式，两手轻捧，微微啜饮。

用过茶后，我们又起身前行，曲径一转，豁然开朗，眼前一处花园，满园鲜花，争相怒放迎风摇曳，婀娜妩媚。

太后忽然心血来潮，令随行太监采来几根形状特别的花草。当即用纤手结成一只兔子，形状惟妙惟肖，又是极为迅捷，信手而成，然后她问我可认得是何物事，我当即照实回答，太后闻言，大为喜悦。

接着，我们又来到一座高冈之下，这里是颐和园中最高的地方。我们拾阶而上，登临山巅，俯视湖面，平田远村，绵亘无际。夕阳斜照，满山红叶，遍地黄花，金风送爽，一层层如同薄纱般的云在天空浮动。慈禧太后不由得豪情万丈地说道："这样的良辰美景之乐，真是难以尽言。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她看来，此间一切景色，无论湖光山色，还是花香鸟语，都乃天地灵气所集，非灵心巧智不能体会。而宫中诸人，见识修为，皆不足与道。太后常叹息世人或是附庸风雅，或是曲意逢迎，真正能与其相知的却是寥寥无几。这正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不知不觉，天色已暮，秋风袭过，苍然之感浑然而起，我不由一颤，顿感阵阵凉意。太后见状，便从李莲英手中接过一件秋衣，披在我的肩上，关切地说道："天气渐凉，还应多多保重。"

刹那间，我的心头涌起一丝暖意，我的眼睛不觉间竟然湿润了。

第十三章　丁祭大典

这一天，太后邀请我们坐上汽船同往昆明湖游览，现如今，太后也与时俱进，接纳了最新的西洋汽船。不过汽船快是快了些，但是比起那漂亮的画舫，却是少了不少感觉。太后的性格比较保守，就好像陈旧的驳船一般，但她思维敏捷，好奇心也不小，对待新鲜事物也颇有一些兴趣。倘若新鲜事物着实有用，那便毫不犹豫地拿来使用。

如果是在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日子，昆明湖上荷花盛开，碧波荡漾，太后则喜欢乘着画舫，随波荡漾。若是寒气袭人，天色阴晦，荷花凋零，无花可赏时，她倒更愿意乘坐汽船，感受一下工业时代的速度。

太后的宝座便被安放在舱外的船头上，而贵妇和格格们则坐在舱中，里面陈设华丽。然而太后喜欢那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从来都没有坐进去。

当我们第一次坐上汽船时，船上的技师似乎对船的性能还不太熟悉，操作起来颇为生疏。结果我们很快便在一座遍植柳树的小岛旁搁浅了。纵使绞尽脑汁，开足马力，也无济于事。一时间，技师一筹莫展，而太监们更是惊慌失措，唯恐出了什么差池。

然而太后却神色自如，毫无慌张之相，反倒提出建议，令技师向后倒转，虽然这个办法早已试过，但这次竟然成功了。汽船缓缓地动了起来，终于再度全速行驶起来。格格和太监们欢呼起来，太后却不动声色，只是笑她们刚才太过失态：“倘若船真得搁浅不走，咱们大不了走上岛去，不过弄湿鞋子而已。”

此时，李莲英上前劝太后起驾回宫，以免汽船再出障碍，惊扰圣驾。太后却摆摆手，下令继续前行。不久，汽船竟然又搁浅了。技师这回是黔驴技穷了，无论是用什么法子，都不能使汽船再次行进。太

后毫无愠色，只是平静地令人划来一艘游舫，领着众人登了上去，直至目的地。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百折不回之毅力，一旦定下目标，无论以何种手段，都势必要达到，否则绝不肯罢休。

中国的皇帝，通常集皇权、族权、神权于一身。他既是一国之最高首领，又是皇族的宗族长，同时，也是宗教的最高首领，他不仅统领一种宗教，而且统领所有的宗教。比如，他是天子，是受命于天而统治百姓的，这就自然成为祭祀上天的唯一人选，其余人绝无此资格。同时，他也统御着佛教、道教和儒教，当然儒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但尽管儒学是哲学，儒学却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和典礼，以致很多人会把儒学当做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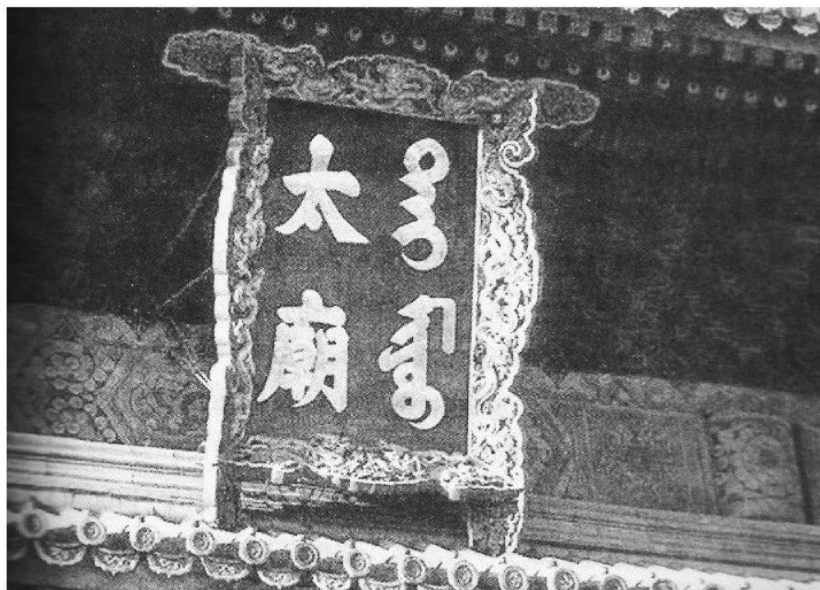
无论皇帝对三大宗教有何种喜恶，每逢各派宗教的盛大典礼，他必然一律参加，也不管各派教义是否有冲突。当然，他的官方身份乃是代天统御万民，所以祭拜天地便只能由皇帝举行，这种仪式，每年都会在北京的天坛举行一次。

这天下午，我们游湖结束，乘着画舫回到岸边。恰好山下的大殿中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祭典，祭奠的是中国的先圣孔子。两千五百年来，他的学说影响着中国的各个方面。他的哲学思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颇为相似，然而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人影响相当深远，在这一点上，绝非二人所能媲美。

孔子十分重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秩序，与其说他是一位宗教领袖，倒不如说他是一位道德上的先贤。尽管很多宗庙都供奉孔子，以作尊崇，但这些宗庙并不像神学殿堂，倒像一个科学纪念堂。这些庙堂中既没有孔子自身的塑像，也没有他的门人的塑像。各种陈列摆设，也不带一丝一毫的宗教色彩。只是四面的墙上都悬挂着儒家先贤们的经典语录，其中大多出自《论语》，中国有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中的很多言论，都可以单独列出来，作为中国学者的座右铭。

在孔庙大殿正中的一座龛壁里，则供奉着孔子的神位，神位是用木头制成的，高约五英尺，漆成朱红色，上面有一行描金大字：“大

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孔子神龛的两旁，供奉着另外四位圣贤的神位，其中，我只认识孟子这位先贤。



太庙匾额

现在进行的叫做丁祭，按照惯例，中国人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所以称作丁祭。祭孔前日，宰杀猪、牛、羊，整只烹好摆放于孔子灵位前，即所谓“太牢三牲”，另有清洗调制好的瓜、果、菜、蔬、鱼、肉、稻、谷等食物分装在礼器中，按顺序整齐地摆放在孔子灵位前。是日，午夜过后，参祭人员便忙碌起来，烛火荧荧，人头攒动，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参祭人员主要由祭祀人员包括皇帝、祀官、分献官和司礼人员组成。

祭典在钟鼓齐鸣中开始，参祭人员列队缓缓步入孔庙大成殿前，在司仪的引导下行祭孔之礼，整个过程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大步骤，寓意迎接孔子的神灵、祀飨孔子的神灵和恭送孔子的神灵。



大成殿匾额

这时，皇帝、皇后以及贵妇们一律穿戴朝服来到大殿上。当下里，钟鼓齐鸣，肃穆至极。殿上放置着三只黄色蒲团，专供太后、皇帝和皇后叩拜时使用。其余人等，则都是红色。行礼时，三叩九拜，这些我早已司空见惯。而且按规制，只有皇帝才能步入大成殿内祭拜孔子，亲王只能立于大成殿的月台上，而大臣就只有在台阶下遥拜了。向孔子跪拜后，太后便坐在黄色的宝座上观礼，皇帝与皇后则站在一旁，这样一直等到典礼结束。我本来在殿外参观，太后瞧见我，当即向我招手，邀我走到她身边。于是我走上前去，屏气凝神，仔细地观看这场隆重的典礼。

很快便是典礼的高潮“三献礼”了，主祭官在大成殿前向孔子灵位献爵、奉帛、行跪拜礼，乐舞生跳“六佾舞”。

祭典结束后，供品分发给参祭人员，以求得到孔子神灵的庇护，据说还能增长智慧。因为孔子生前最讲礼制，而乐舞是礼制的象形符号，孔子也精通乐理，所以乐舞伴随着整个祭孔过程。

虽说典礼中祀官所读的祝文、所奏的音乐，表演的舞蹈，我都似懂非懂，完全不能明白其中的内涵，但是这些都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

事务，我依然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同时面色愈加庄严肃穆，以示对这场大典的虔诚恭敬，太后瞧在眼里，不由面带欣喜之色。

当祭典结束后，太后让我上前仔细地看一看祭坛、供物以及庙中的装饰。有人告诉我，祷祝之词在颂读之后，便完成了它的使命，放在火中焚烧，孔子的在天之灵便能感受到人们对他的尊崇。

当我观看完毕后，便又坐上船，回到了昆明湖上。

第十四章　宫中的太监们

清代太监有两大类：一类专门侍候帝、后、妃、嫔，另一类则专门负责处理宫中各种事务。虽说这些太监都是些奴才，然而奴才中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工亦有所不同。有些太监读过几天书，甚至可以吟诗作对，舞文弄墨；有些太监长袖善舞，处事圆滑，结交了不少外臣；有的巧舌如簧，颇受主子重用；然而有的胸无点墨，不会阿谀奉承，眼力界也不怎么样，便只能做些粗笨的杂活，处在最低的位置。

这些太监在宫中充任各种角色，粗笨的太监多为戏子、厨师、花匠一类，粗通文墨的则会被安排到皇子身边侍读，更得宠的甚至于可以帮主子抄写公文。从御林军监军到看大门的门卫，处处都能看到太监们的身影。在这个群体中，总管太监处于最高的地位，在他之下，又有六个首领太监，之后便是御前太监、殿上太监和一般太监。侍候帝、后、太后的是总管、首领，妃、嫔身边只是首领。太监官职最高的为三品，但个别的太监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办事颇得主子的欢心，便会受到提拔，例如太后的宠信李莲英，便被破格赏戴二品顶戴。低层太监没有官职，只做些杂役，一年到头吃苦受累。在宫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傅、师傅、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大内宫室数以百计，每一处必有一群太监，由一名首领太监管理，从事守护、洒扫、侍候等差事。有一名首领太监专门负责管辖宫中的花匠，另一名则专管御膳房的厨子。这些首领太监充斥着各个部门，其地位虽然比普通太监要高，但都归总管太监节制。虽说总管太监也有几个，但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才是真正的大总管，他不仅年纪比较大，办事很有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子是至高无上的慈禧太后。

这些个总管太监因为其主子的缘故，地位自然非比寻常，甚至可以说，他们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在禁苑之中，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众太监，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众人无不唯唯诺诺，不敢稍加辩驳。而在宫禁之外，皇亲贵族，朝中大员，无不要卖他几分面子，因为他们可以随时上达天听，赞说某人如何之好，或是贬斥某人如何可恶。有道是圣意难测，然而这些太监因为随侍在太后身边，可以及时将宫里的消息透露给他们，使这些勋贵可以为自己的前途多做打算。所以，大总管每年接受的礼物多达数百万，堆积如山，其家中之富有，足可富比王侯。而其权势，则炙手可热，大有凌驾于王公贵族之上的趋势。这让我想起被称作“儿皇帝”的路易十三，那时他年纪尚幼，其母玛丽·美第奇及其宠臣们飞扬跋扈，操弄权柄，与今日的中国何其相似。

然而，总管太监无论如何风光，也毕竟只是一个奴才，他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的主子，无论是太后还是皇上，他都要小心翼翼地服侍，不敢有丝毫马虎。否则一个小过失，便有可能万劫不复。他的命运和他的主子紧密相连。

由于中国皇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天子，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皇宫大内之中，宛如一尊佛像供奉在大雄宝殿之上，供人崇敬。然而天子再怎么神圣，也有一些私人事务需要处理，有些事务不便动用官方的力量，也不便公开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要由太监处理，这样皇帝对太监的依赖则更甚。现如今天朝的统治者是个女人，受礼法的约束更深，与外界的隔阂亦更大，仿佛生活在一个镀金的监狱中，一个秘闭的神社中，所受限制，更甚于皇帝。

除了朝见的时候，太后不能私下接见任何官员，甚至连宗室成员也不可以。如此一来，总管太监便有更大的权势。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便是这样一种人。他长得又高又瘦，他的脑袋有点像佛罗伦萨的宗教改革家萨沃纳罗拉。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下巴削尖，下唇突出，眼睛炯炯有神，显然心智不俗，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李莲英脸上皱纹不少，皮肤像一张老旧的羊皮纸，虽说他只有六十岁，但看起来却像七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是宫中年纪最大的太监。

李莲英极善言辞，操着一口流利的官话，铿锵顿挫，颇能悦人耳目。他是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十岁入宫，便很快适应了宫中尔虞我诈的环境，明白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关系，他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千方百计地讨主子欢喜，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地应付同僚，多少年来不敢松懈。假如以貌取人的话，李莲英绝对有着超出常人的才能，只可惜少年家贫，走上了做太监这条道路。



李莲英

太后与李莲英几十年形成的感情非同一般。太后在政治上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手腕强硬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脆弱、害怕孤独的老人。几十年来，慈禧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善解人意的，除了安德海就只有李莲英了。她与李莲英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

能化解慈禧烦恼并最会服侍她的只有李莲英。太后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太后还经常找李莲英一起散步，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直至深夜。由此可见，李莲英实际上成为太后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伴”。

太后与皇帝政见不一，深受慈禧宠爱的李莲英则采取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策略。不但太后喜欢他，就连光绪也因为从小受到他的看护而喜爱他，并夸他“忠心事主”。我听人说过一个故事：拳乱之后，太后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返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华美，李莲英住的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小太监无一人在殿内值班。一问才知皇帝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当即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奴才们罪该万死！”并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老伙伴或师傅之意），我活不到今天。”

至于光绪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其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因为我仅仅在听戏和万寿大典时见过几面，印象很模糊。

太后身边还有一个二总管太监，叫做崔玉贵，其品级与李莲英相当。然而二人性格迥异。崔玉贵为人坦荡，处世光明磊落，不似李莲英那般圆滑谨慎。崔玉贵四十多岁，身材魁伟，长着一张圆圆胖胖的脸，见不到一丝皱纹。他的神情完全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和善可亲，平易近人，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一股子“雅”，完全是读书人的气度风范。

太后不喜欢粗野之人侍奉在左右，而崔玉贵不仅有学问，而且身手也颇为了得，可谓是能文能武。接见文人学士的时候，太后可以不带李莲英，但必带崔玉贵，一旦遇到她不懂的东西，便向其垂询。

我听说，太后的用人之道，乃是选择两个立场相对的人物或团体。每逢议政，她便令双方各抒己见，然后再在其基础上折中采纳，这样既可以听取不同的声音，又可以使这些臣子互相牵制，实在是高

明之至。如今这两个总管太监性格差别也是如此巨大，想来是和她的用人之道有关系。

宫里头有一个太监，专门负责赏善罚恶，此人为两宫所任命，职位极其尊崇。即便是品级较高的太监，若有过失，也难逃其咎。地位较高的太监，通常是罚其俸禄，或摘取顶戴花翎。俸禄减少，固然痛苦，然这些大太监多有外快收入，倒也无妨。若是被摘去顶戴，便意味着降黜，自身的耻辱便不消说了，更难堪的便是从此失去了广进财源的机会。我曾经见过两个太监，因为职务上的懈怠，使慈禧太后龙颜大怒，罚了他们两个月的俸禄，以儆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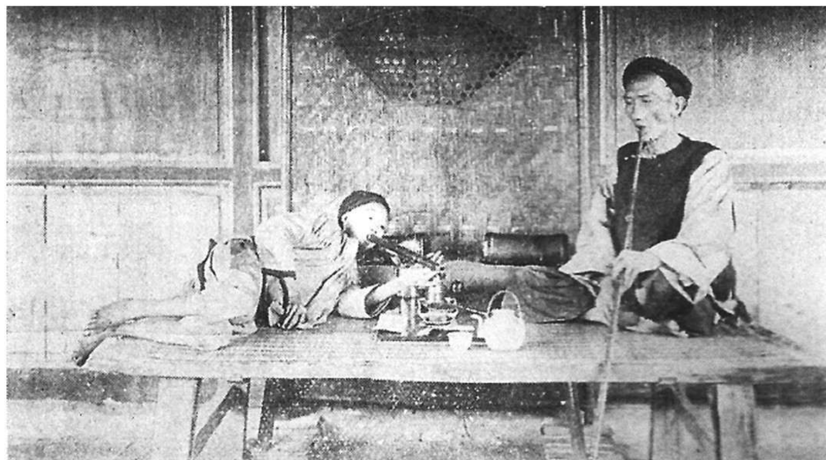
各处宫殿的首领太监，对其下属皆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手下若是犯错，便由其惩罚，而其手段多为刑罚，这些刑罚摧残肉体，可谓是惨不忍睹。但大多数首领太监性格温和，能够善待下属，能饶人处且饶人，很少有滥施淫威的情况，想来太监们出身悲苦，正所谓同病相怜，需要相互关爱吧。

每一个高等级的太监都会收一些小太监做弟子，这些弟子则称其为“师傅”，平日里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绝不敢有任何违背。这些“师傅”则教给他们许多事情，比如如何在宫中立足，如何侍奉主子，如何与同僚相处等等。弟子的命运与师傅的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师傅会对弟子尽心关照，一有提拔升迁的机会便首先考虑自己的弟子。而弟子若能出人头地，师傅也倍感荣耀，晚年便可安享富贵了。

太后对吸食鸦片这种行为可谓是深恶痛绝，如果一个太监胆敢偷吸鸦片，一旦被太后得知，必然严惩不贷。这种情况下，不仅仅只是罚其俸禄，或是摘取顶戴，往往还会逐出宫去，令其反思悔过，若能改掉恶习方可重返大内。若是运气不好，还会遭到鞭笞的刑罚。太后治理禁苑，其手段不可谓不严。然而，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烟禁纵使如此严厉，也免不了一些太监偷偷吸食。这些人也是极端地小心谨慎，为了不被发现，想出了各种法子瞒天过海。

太后的嗅觉极为敏锐，特别是对鸦片这种东西，因为鸦片本身味道就比较重，一旦吸食，衣服上必然会带有一种略似玫瑰的味道，而

且经久不散，很容易识别出来。然而太监自有妙招，他们在吸食的时候穿着一身亚麻衣服，吸完后再换上常服，这样烟味便不至于如此浓烈，除非是个大烟鬼，一般人很难察觉到。饶是如此，也有一些人会被发现，到时，严厉的惩罚便少不了了。



吸食鸦片的人

宫里的太监们喜欢饲养各种各样的宠物，狗、猫、禽鸟数不胜数，有意排遣在皇宫内院中的孤独。其中养犬的居多，大概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太后如此爱犬，太监们自然也效仿起来了。

那些小太监们对师傅非常依赖，他们能否得到主子的青睐，能否得到提拔，很大程度上都要靠师傅的提携，如果师傅在主子面前多美言几句，便可能会平步青云，因此小太监对师傅是毕恭毕敬，如同侍奉父母一般。

我所居住的寝宫中，有许多太监随行服侍，其中有一个太监命运波折，他进宫已有十五年了。而他的师傅早已过世，这样一来，他便失去了依靠，没人替他说话，因此他即使做事尽心尽力，也始终默默无闻。照此下去，他可能就此终老一生，被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一天，他陪我出游时偶然被皇帝看到，见其举手投足都比较妥帖，应对起来也是从容不迫，深得皇帝的欢心，当下便留在皇帝身边。虽然身为太监，不能封官进爵，但赏赐顶戴，提高品级，增加俸禄是少不了

的。这对于大内的太监来说，可谓是非常幸运。

中国的宫殿，如同一座城镇一般，宽大宏伟，其间有无数区域需要人打点料理，这些事情全部由太监来做。而宫廷中处处井然有序，毫无杂乱之感，全赖这些太监，由此可见，即使是小太监，办事能力也是差强人意的，其间向来有不少人颇有一些才能。而这些人，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必然会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在我进宫之前，有人告诉我，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这些人，都是权势滔天，进宫后，要尽量与他们交好，赠送给他们值钱的礼物，或者施以贿赂，方不会为难于你。如此忠告，我自然谨记在心。但是我进宫后，并没有机会与他们走近，而他们对我却是极好的，对我毕恭毕敬，令我感到极为熨帖。总之是非常快乐，完全不像事先听到的那般。或许是因为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但是据我仔细观察，这些人平素便恭敬有礼，和蔼可亲，相处极为融洽。与外界所传，大为不同。

当然，也许我不能对中国人的礼貌持以太高的赞扬。我还是比较赞成一个法国学者的评价：中国人的礼貌，是有着局限性的，是因人而异的。

第十五章　慈禧太后的才情

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东西二宫同时垂帘听政。当时东宫是慈安太后，西宫则是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生前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人对其的德行赞不绝口。慈安生性淡泊，不爱名利，所以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她平日的大多数时间则用来看书，经常夙兴夜寐，手不释卷，其文采可谓是出类拔萃，她的一些散文随笔，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赞誉，由此而获得了“文学太后”的美称。

咸丰皇帝死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长期垂帘听政，慈安太后于1881年过世，朝中大权便由慈禧一人独掌。一般人提起慈禧，只知道她的政治手腕如何强硬，驾驭群臣如何有方，甚至皇帝也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却忽视了她的文学才能。

其实，慈禧太后的文学功夫并不亚于慈安太后，她能够吟诗作对，填词写赋，其风格具有女性独有的细腻，有着清高的意趣、淡远的情怀，同时在作品中亦能体现出政治抱负，其用笔清新优雅而无矫揉造作之嫌，通俗易懂却又不显得粗俗鄙陋。要知道，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差别很大，若不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很难写出优美的文章，而中国的妇女所受教育本就有限，太后在文学上能有如此高的造诣，实在是难能可贵。

太后尤其擅长满文，平时喜爱阅读名家诗作，特别是豪放壮丽，慷慨悲歌的诗篇，她简直是百读不厌。有些名家之作，她可以出口成诵。她最喜欢的作品是关于一位英雄人物的诗，这位英雄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少女，名叫“花木兰”。此人堪称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替父从军，远征沙场，在金戈铁马之中度过了十二年，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凯旋而还，受到皇帝的封赏，从此光耀门庭，流芳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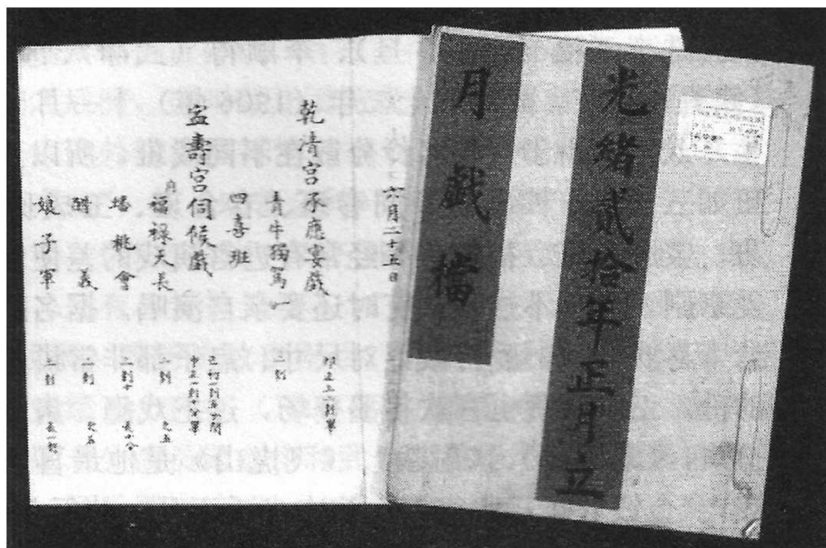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博闻强记，有着过目不忘的才能。与我们西方人相比，很多中国人都善于记忆，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慈禧太后更是此中的杰出代表。许多名家的诗词歌赋都熟记于心，出口成诵，这一点，确实胜过我们西方人。

已逝的同治皇帝有一个妃子，叫做富察氏，每个星期都会来向太后请安，这也是一个异常聪慧的女子，慈禧太后非常喜欢她。婆媳俩的共同特点是记忆力惊人，两人每次见面，都是坐在一起畅谈名家诗文，轮流吟诵。而一般的背诵不能尽兴，她们经常唱诵，中国的诗词本就是用来唱的，听起来抑扬顿挫，高低起伏，喉清韵雅，吐玉喷珠。有时连续唱上半个小时，丝毫不见疲倦。每当绝妙之处，则击节而歌。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情景，太后坐在宝座上，身边置放着许多鲜花，或是点着幽暗的灯光，她的儿媳富察氏侍立在身边，二人共同沉浸在诗歌之中，她们神情都是无比快乐。我虽然听不懂她们的诗歌，但是我深深为此间的氛围所感染，不觉痴醉于其中。

当太后回到寝宫休憩时，身边必会有长于诵读的太监相伴，为她朗读名家大作，有时我从门外便能听到他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声音，不由为之陶醉。有时太后对一本书痴迷到了极致，甚至在散步、游湖时都要带在身边，利用乘坐轿子或者泛舟湖上的空闲工夫，读上那么几段。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部奇妙的书籍，相比较书中优美奇幻的文字，别有韵味，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胜一筹，是以太后有时会沉醉于山水之色，暂且将手中的美文放在一旁。

太后对戏剧的喜爱可谓是如痴如醉，相对而言，她更喜欢以历史为题材的古典戏剧，更甚于演绎当下的戏文。同时，她还喜欢参与到戏文的编撰中来，如前所述，皇帝万寿大典时，太后便对将要上演的新戏做过反复的推敲，并且对整个排演过程也极为关注，一遇到需要修改的地方，便令太监前去后台传旨矫正，而且一经修改，立刻增色不少，由此可见，太后在戏剧方面的造诣也是颇高的。



晚清宫廷唱戏的戏单

中国的戏剧，在一开始时往往会有一个丑角上来表演一小出喜剧。太后平日里虽然威严，但看了这出喜剧，往往也会拊掌而笑，尽展欢颜。这些喜剧往往会带有讽喻世事的意味，让人们在欢笑之余，也会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本来我印象中的中国人，是沉默、固执、呆板的，但是见到这些人，我方知中国人是那么的诙谐幽默，生活中充满了情趣。慈禧太后本身就富有幽默感，她不仅能从戏剧中体会到笑点，还能把这种笑点运用到生活中来。

慈禧太后对语言的表达方式非常看重，她自己总是谈吐高雅，言简意赅，从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要知道，中国的语言非常复杂，各地方言也不相同，尽管文人和官员们会说官话，这是一种所谓的普通话，全国通用，互相交流起来，并无太多困难。但仍有许多文人学者甚至官员，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有时候说起来真让别人不知所云。太后是个很挑剔的人，她对言语中带有方言口音的人很不喜欢，有时会生出厌恶之感。于是乎，只有官话说得好，才有机会得到太后的赏识，或是声若洪钟，铿锵有力，受太后青睐那是不消提的了；相反，若是口齿不清，口音太重，便很难入她老人家的法眼。老实说，这一点她老人家可不太公平。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即便官话说得不好，但其才比天高，堪称栋梁，老佛爷也依然会对其重用。比如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他说话便带有非常浓重的安徽口音，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太后对他的眷顾。现下李鸿章早已过世多年，可太后依然时常提起他，思念之情可见一斑。

至于太后自己，她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官话，而且声如莺啼，笑似银铃，有如黄莺出谷，恰似沉鱼出听，不仅如此，在她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时，其神情姿态无不显得袅袅婷婷，正可谓是风姿绰约，使我疑心这是否真是一个年已七旬的老人。我虽然听不懂她的言语，但这足以使我如痴如醉了。

有一天，我随太后外出散步，花园的管事有事上前奏报，讲的无非是一些花床的更新设置一类。只是这位管事口齿太不清晰，太后听了几句，便皱起了眉头，面上露出不悦之色，显得颇不耐烦。管事更是诚惶诚恐，畏畏缩缩，言语之间更是含糊不清，不知其意。太后立即对身边的总管太监李莲英说道："叫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说给我，我可不爱听这种怪里怪气的话。"于是便皱着眉头离开了。

第二天，富察氏又来向她请安，太后便将这个管事太监的窘态当做笑料说给她听。之前我已说过，富察氏也是一个饱读诗书、谈吐高雅的人物，与太后处得极为融洽，二人对这件事评论一番，自然少不得对那位管事太监的讥讽。

中国的汉语真是变幻莫测，比如说许多字词发音完全一样，但其意义完全不同，若是在音调或语调上稍许变化，表述的意思更是截然不同。因此若要充分体会汉语的奥妙，必须是极度聪慧的人。有一次，太后交给一个太监差事，可是这个蠢材误解了太后的意思，所作所为和太后本来的期望大相违背。出人意料的是，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动怒，原来她发现自己的言语被误解了，实在是啼笑皆非，对那名太监只是责备几句便了事了。还有一次，太后纠正一个格格的发音问题，事后她还对别人说，这位格格读错语音，实在合情合理，因为格格的父亲口音便糟糕得可以，由此可见，中国的官话实在不好学，即便是王公大臣也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慈禧太后在书画上的造诣非同寻常。太后丈夫、儿子都死得很早，长年孑然一身，她虽地位至上、颐指气使，王公大臣拜倒一地，“万岁”声满殿轰响，却仍然几十年生活孤独、精神困厄。她活得并不容易，加上闲来无事，于是拾起从小就开始的书画爱好，勤书习画，以求得内心的安慰、精神的满足。

虽然慈禧太后的书画基础并不是太好，但她天资聪颖，每日间勤勉于此，水平明显提高；尤其在她亲自下诏将许多著名画家请进宫来给予指导之后，在书画上可以说已颇有造诣。有时候太后兴致所起，挥毫弄墨。然后将墨宝赐给臣下，受赐之人无不将其视作稀世珍宝，谨慎收藏。



慈禧太后1889年作：梅花双鹊图

有一天，我到宫中画画，正好碰到太后挥舞着一支形如巨椽的大毛笔，在一方大砚台中频濡笔端，待到墨色浓淡相宜，当即龙蛇竞走、手不停挥，在纸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寿”字，观其风采，铁画银

钩，力透纸背，端的是遒劲有力，毫无美女簪花之感。有道是字如其人，太后的书法，如她的处事一般，果敢决绝。

中国文字的基本形态是方形的，但是通过点画的伸缩、轴线的扭动，也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动人形态，从而组合成优美的书法作品。整体形态、点画结构、墨色组合都是完成一幅书法作品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总而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它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就在太后挥毫舞墨的同时，皇后、格格、太监们伫立一旁，屏气凝神，脸上露出艳羡之色。我悄悄地对裕庚夫人说："太后的手小巧纤美，拿小毛笔更合适一些吧。"夫人笑着说："太后书法造诣很深，无论什么样的毛笔，到了她手里，都可以龙蛇飞动，只是太后更喜欢用大毛笔，如此才见豪迈之气。"有人说，太后的书法，足可以与一些一流的书法家相媲美，以我之见，这并非阿谀奉承之词。

太后天资聪颖，又颇具艺术天分，在绘画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其书法成就，尤其是她所画的着色花草，堪称神品。考其原因，原来太后自幼便工于刺绣，只是中年以后，眼力不济，而太后又不喜欢戴眼镜，嫌那样不美观，便只好搁置了。然而少时打下的基础，到今日也依旧受用。

满族妇女头上多佩戴假花，而这些假花，多是自己亲手制作。太后也颇善于此道，一些贵妇做好假花，呈进给太后，太后稍加改良，便能增色不少。而且太后还能设计出许多新的花色，教给众人，或是用小的鲜花扎成各种禽鸟的样子，或是各种大花。有时还会用香气逼人的白色茉莉花来代替珠宝，装饰她的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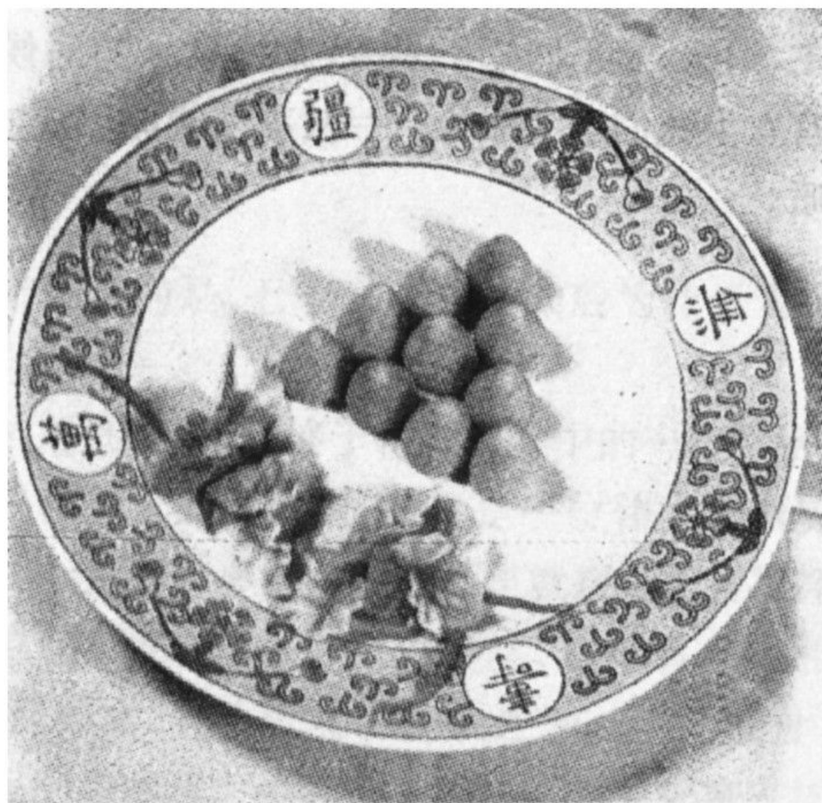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的服饰很多，衣服大概有两千件，既拥有如此之多的衣服，当然可以随时更换。但因为实在太多，就是每天换两三次，仍有许多衣服永远穿不到。而她平常穿的四季衣服不是很多、很新，只是她平常常穿的几件，观其真实之价值，亦不见十分高贵。比如在冬天，她常穿的就是一件茶青色缎子皮袄，见客时就另换一件丝的或织

锦的新旗袍。慈禧与多数女人一样喜欢检阅和欣赏自己的衣物。有些衣服虽是从不再穿，却因有纪念意义，如数十年前她为贵妃时穿过的衣服等，时常要叫太监取来把玩，追念往日的绮年玉貌、美景良辰。有时候，太后会自己设计装饰，珠宝、鲜花、色彩配合得相得益彰。当然，在公开场合，太后必须身着皇家必用的明黄色，此为祖制，不得妄加更改，然而太后会别出匠心，在黄色礼服的边带上另寻花样，却件件不同，色色翻新。一个人的审美情趣，以及对美的追求，太后可谓是达到了极致，我生平只怕再也不会碰到第二个这样的人物。

太后的鞋子不能算多，也有三四十双。好在太后走路的时候很少，平均一双新鞋可以穿五六天。太后身高中等偏低，喜欢穿高跟的鞋，有的高达六英寸。她有一款大典时才穿的绣花鞋，鞋底很高，四周缀有小珍珠串，如同穗子一样。

太后还是一位出色的美食家，宫中许多新颖的美味佳肴都是出自她的设计。御膳房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厨工，又从各地采办各种食材，做成全国最好的名菜名点，供帝后享用。太后每日两顿正餐，照规定需上一百碗不同的菜肴。另有两次“小吃”，至少也有二十碗菜，平常总在四十至五十碗左右。这么多的菜，除了靠近的几种，其他的菜慈禧很少动。慈禧若爱上了较远的某一种，就吩咐侍膳的太监端近前来。

慈禧每餐尝过的菜至多不过三四种，剩下的待她用餐完毕，便一齐撤下。这些菜或当即扔掉，或由女官、宫女、高级太监等依次取食，其中十之八九还是完完整整的，像供祖先撤下来的祭菜一样。太后的饮食很好的体现了饮食多样化的思想，每种食物她都会吃，而且每种食物都不会多吃，即便是山珍海味，她也绝不敢多吃。相反，她听说玉米粥、茯苓饼有益于身体健康，便对它们产生了好感，并常食不厌。由于她在避乱期间急不择食地吃了民间的窝窝头，从此对窝窝头也颇感兴趣，只不过她后来吃的是栗子面的，与最初吃的大不一样。



慈禧爱吃的小窝窝头

太后每日所用的肥皂与香水，全都是宫中特制而成，全都是人世间的极品。尽管宫里头有不少产自法国和德国的上等香水、香皂，但是太后还是喜欢宫中的制品，其中，她最喜欢的是一种用杏仁制作而成的护肤品。

制作这些香水、肥皂，当然由下人来做就成了，然而最后的关键时刻，太后依然不放心，总会亲自指点一下。有时太后来了兴致，亲自上阵，动手料理这些护肤化妆品。太后所使用的各种香水、精油，是从各种植物的花、叶、茎、根或果实中提炼萃取的，在色香味各方面都堪称极品，对美化皮肤、改善睡眠、缓解疲劳、舒缓情绪有着极好的作用。太后年已七旬而容貌不减当年，想来就是得益于此。

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有序循环。这一点，在他们与飞禽走兽之间的关系上便可以看出。中国人亲近自然，而鸟兽亦愿意与之为亲，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人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鸟类。关于中国人玩鸟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清初年。当时八旗入关，除了军队外还带来了满族人的生活习惯，其中便有玩鸟的习惯。有些人玩鸟的水准可谓是炉火纯青，只要走到鸟笼子前，说了一声“嗨”，小鸟立刻唱出清脆悦耳的歌声，很是好听，丝毫没有对人的畏惧。

如果是在早春时节，或是冬天里赶上一个好天气，您就瞧吧，许多北京大爷提笼架鸟，出来溜达。小花坛边上，小树林里头，都有许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彼此都很熟悉，有些个交情还不错，常年聚在一起玩鸟。这些人把鸟笼子放在一起，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放在地上，这些小鸟仿佛见了久违的伙伴，当即啁啾婉转，争相啼鸣。尽管被关在笼子里，却丝毫影响不了它们的兴致，而且服从主人的命令，对它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成就。有的时候，主人还会把小鸟放出笼子，让它们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而当主人需要回家时，只需一声呼哨，小鸟便立刻回到主人身边。待到游兴已尽，则各归其笼，毫无丝毫放纵。要知道，这些鸟并非一出生便如此驯服，都是从林子里捕获的，再加以适当的训练，才能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中国，有那么两条宗教上的箴言：“众生平等”，“不可妄杀”。中国人对此推崇备至，进而身体力行，是以极少有虐待动物的事情。这本是一种极为善良的风俗，应该得到赞扬和推广。

由于他们对生灵怀着一份善念，万物有灵，飞禽走兽自然也能明白他们的心肠，知道人类不会去攻击它们，与人类相处毫无危险，自然而然地与人亲近起来。这种思维，实在是玄而又玄。

这种玄妙的事情，在太后身上也有所表现。她似乎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无论她发出如何轻微的声音，她豢养的宠物犬便立刻会注意到，只要她稍微做一下动作，小狗们便立刻遵照指示，丝毫不敢放纵。虽然太后喜爱这些小狗，但她很少用手去抚弄它们，因为她对

自己双手的呵护极为重视。有时偶尔抚弄一下，便要立刻用热水洗洗干净。我从来没见过她把小狗抱在怀里。除了一次太后正好到犬舍来看狗，见到一只洁白如雪的小狗，便把它抱起来，带到寝宫玩乐。

又有一次，我们在颐和园里闲逛。太后做了一件事情，使我再次感受到她那不可思议的魔力。当时，一只小鸟从鸟笼中逃脱，落在一棵树上，不肯下来，太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抓不住。恰好这时太后领着随从驾到，太监们见势不妙，慌张不已。太后询问原因，总管太监只好如实禀报。

太后听了以后，缓缓说道：“此事无妨，且看我如何唤它回来。”我心中一凛，暗自想到：“此话未免夸大其词了吧。想来太后君临万民，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以至于她认为一只鸟都要对她俯首听命，实在是可笑之至。”想到这里，我不由产生一丝同情，倘若太后唤不回鸟，又如何收场，如何下台呢。

正值我胡思乱想之际，太后拿着一根嫩木制成的手杖——那是刚从林中砍下，并削制而成的，手杖通身细长，顶部还带一个弯曲的握柄，太后见其嫩绿可爱，非常喜欢，时刻不离其身。出去遛弯时，还能用它来指点风物，倘若看到中意的花草，便用其指出，令太监们采来，或者坐下小憩时，用它在沙地上勾画图案。

只见太后手擎木杖，口中发出“啾啾”的声音，目不转睛地盯着树上的小鸟。那只小鸟似乎与她心心相印，当下也发出宛转悠扬的啼鸣，相和相应。

过了一会，那只小鸟振动翅膀，从树顶落到一条树枝上，太后又模仿鸟鸣叫了几声，那只小鸟再一振翅，落到了手杖的握柄上。跳了两跳，最终落到她的手上。

我不由大为惊诧，感到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观其随行人员，却是波澜不惊，显然是司空见惯了。过了一会，太后将小鸟递于一个太监，继续领着我们遛弯。这件事实在是匪夷所思，或许真如中国人所说，人与自然万物皆有心灵感应。

还有一次，我们散步时，在一个灌木丛旁发现一只纺织娘，一位格格试图上前抓住它，却是无功而返。此时太后伸出手来，指着那只美丽的小虫子，学着它的音调，婉转几声，那只昆虫便立刻飞到她的手中了。太后把玩了片刻，方才松开手，那只纺织娘仿佛是恋恋不舍，在她手中逗留了许久，方才振翅高飞。

第十六章　太后临朝

光绪皇帝亲政的时候，上朝的时间很早，大约在凌晨三点左右，就如同他为人比较腼腆一样，早起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不过由于时间太早，他得在宝座前燃上两根巨大的蜡烛，朝堂之中悬挂着许多灯笼，闪耀着暗淡的光辉，整个早朝都是在昏暗的大殿内进行的，官员们即使抬起头来，努力辨认，也很难看清坐在高处的皇帝的面容。这件事，听起来似乎颇为怪异。

光绪皇帝早朝的地方在乾清宫，后来太后秉政，则搬到了颐和园中的仁寿殿。这是一栋独立的殿堂，周边一片空旷，而且建筑规制也与其他的宫殿相去甚远。

仁寿殿位于仁寿门内，仁寿殿取《论语》中“仁者寿”之意。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丹墀上摆着古铜宝鼎。鼎式香炉是皇家建筑的特征之一，体现皇权，象征威严。每遇大朝，炉内点燃檀香和藏香，青烟缭绕，香气袭人。铜龙铜凤，排列于仁寿殿前，是帝后举办朝会时点燃檀香之用。当腹内燃起檀香时，香烟即从龙凤口中袅袅冒出。中国古代历来以龙象征皇帝，凤象征皇后，习惯的设置是龙居中间，凤靠边侧。但慈禧掌权后，便将龙凤位置颠倒，“凤在上，龙在下”，以显示她的权威。大门两侧则有一副对联，上面挂着乾隆皇帝写的对子：“星朗紫宸，明辉腾北斗；日临黄道，暖景侧南荣。”

大殿里边就更气派了，紫檀雕的高台子上摆着龙案、屏风、宝座、孔雀翎掌扇、仙鹤景泰兰香炉。殿里还有两面一模一样的大镜子，在宝座的左右对着脸儿摆着，足有门扇那么大。殿内高悬金字大匾“寿协仁符”，殿中放着慈禧、光绪朝会大臣的宝座，宝座由极名贵的紫檀木精雕而成，椅背上雕有九条金龙，宝座四周设有掌扇、鼎炉、鹤灯等。仁寿殿内最吸引人的是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制怪

兽，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鳞甲，即为传说中象征富贵吉祥的麒麟。

仁寿殿在室内装饰上突出一个“寿”字，在南北暖阁山墙上，分别挂有一个巨大的条幅，幅上是百只蝙蝠捧着一个“寿”字，寓意“百福捧寿”。在殿中宝座后边的屏风上，一共雕有二百多个“寿”字，用不同写法精雕而成，把一个“寿”字书写得穷工尽趣。仁寿殿四周房檐的滴水瓦上也刻上了寿字图案，两侧各七十八个，前后各一百二十八个，共计四百十二个“寿”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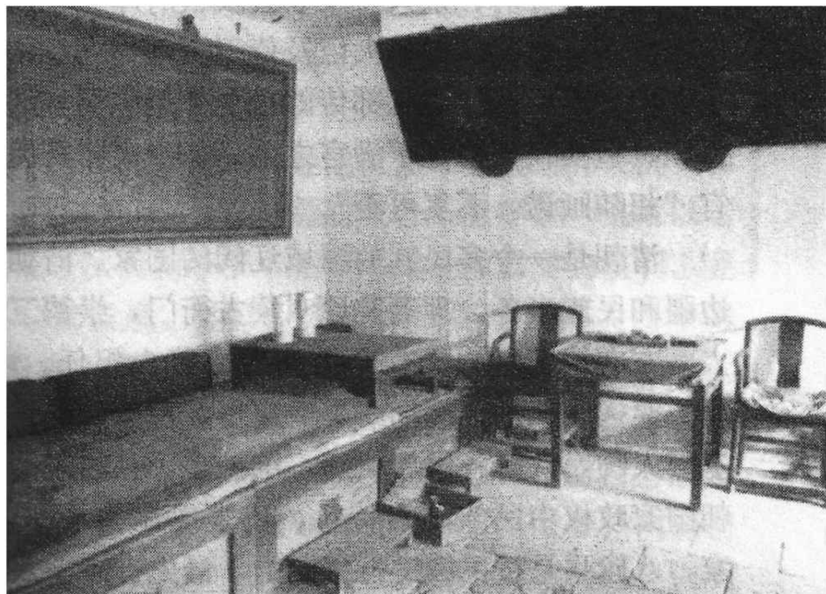
大殿中间便是御座，安置在高高的台子上，御座后面是一扇七叶屏风，四周围着黄色的帷幕，气象森严。原来的台子比现在低一些，御座也比较大，与其称为座，不如叫做床。皇帝可以在上面随意坐卧，可见先前的早朝，比现在要宽松一些。

各部尚书、侍郎以及皇室成员的朝见，每月都有规定的日期，不可错乱。他们在朝见时，或是上递奏折，禀报近来的各种事宜，以及施政方针，若是没有担任官职的皇室成员，则要来向皇帝、太后请安。至于军机要员和总理大臣，则必须每天前来上朝，商讨军机大事。御前会议也根据需要随时进行，以便及时有效地制定出大政方针。每天朝会之后，军机领班庆亲王总要留下来，继续与太后讨论各种军国大事，直到确立最终的政策方针，才会向慈禧太后与皇帝辞别。至于各地发来的电报，或者是呈进的奏折，若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通常先送到军机处，由军机处批阅之后，再由军机大臣在朝会上向太后奏明。

通常情况下，早朝在上午十一点结束。退朝后，朝中官员便可逍遥自在，不必再为朝中事务烦心了。只有当军事吃紧，或是遇到重大的外交事务，这些朝臣才会略显紧张。如我在宫中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广西民变、中俄交涉以及日俄战争爆发这三件严重的事情，那时各地发往京中的电报、奏折，即使不在朝见时，也必须立刻呈进给太后，片刻不得耽误。

有时太后正在游园，电报、奏折便直接由太监带进来呈递御前。

这些文件多由外务部呈进，当然，这是经过太后准许的，遇有紧急军情，可立即呈进，不必再走军机处，否则，无人敢违反朝廷律例，越级呈报，惊扰圣安。这些文件都是由黄缎包着，由太监跪着呈递，太后也立刻批阅文件，并无丝毫的怠慢。



军机处内景

每当朝会时，太后御座之前，往往会放置五个垫子，作为军机大臣跪奏时用。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大臣们觐见皇上、太后，必须下跪，往往要长达数个小时，圣上恩赐跪垫，也是对朝中重臣的恩恤，其余官员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只能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非常难受。距离御座最近的是军机处领班大臣的专用垫子，其余人等依次向后排开，越来越远，很难听清楚前面的谈话。尤其是光绪皇帝，他的声音很小，非常难听清楚。大臣们很怕听不到圣谕，办事出了差池。

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向太监贿赂。太监得了银子，便会偷偷地将垫子向前移上一段，使跪拜的官员可以更靠近御座，以便恭聆圣音。放在前面的两个军机首领的垫子不得移动，而另外三个垫子可以随意移动。所以太监们可以借机大收贿赂，甚至公然标价，

垫子怎么移动，都有相对应的价钱摆在那里。

凡朝廷要员被太后召见，先是由太监引领进大殿前。这时，太监要跪在大殿之外，高声唱出叩见官员的姓名职位，及其何时来到宫外候驾。得到太后恩准后，这名太监便将官员引入大殿。

这位官员跪在什么位置，全看他事前塞给太监多少银子。当官员跪下叩拜时，太监则必须立刻退出殿外，不得有丝毫耽搁。若是胆敢滞留不走，听到了军机政事并泄露出去，这名太监便会被处以极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当然也要防止太监结交外臣，干涉朝政。

直到太监离开，觐见的官员才开始禀奏朝中要事。太后和皇帝坐在御座上静心聆听，时而开口垂询，听取臣下更深入的解释。当奏对完毕后，官员便站起身来，先行告退。和欧洲的习惯不一样，以背部示人，并不意味着失礼，所以他们背对太后，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些官员经常上朝，却没有资格跪在垫子上，他们便自作聪明，找到一个很可笑的法子，那就是在腿上套上厚厚的护膝，这样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膝盖就不会那么难受。中国的官服本就十分宽大，即便是裹上厚厚的护膝，也丝毫不会被外人看出，这真是一个好法子。

光绪帝亲政时，年纪尚轻，有时候做起事来充满天真稚气。朝中许多重臣都上了年纪，他们说起话来，往往絮絮叨叨，啰里啰嗦，有时候在细节问题上含糊不清，有时候甚至不知所云。年轻的皇帝和这种年老昏迈的老头子共商国是，实在感到无趣得紧。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慢慢吞吞，有气无力的说话方式。后来竟心血来潮，颁布一条法令，朝臣上朝禀奏时，一律不得抬头，只能伏在地上说话，否则便是大不敬。于是乎，就在这些老头子东拉西扯，喋喋不休的当儿，年轻的皇帝会悄悄离开龙椅，走下高台，独个去玩，假使这时那可怜的官员抬起头来，他会看到龙椅上空无一人，而这时皇帝已躲到屏风后面抽着香烟，自娱自乐去了。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固然是至高无上，受万民崇敬的，具有无比的神圣性。然而，这种神圣性似乎并不属于他

们个人，而是属于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或者说，人们崇拜太后和皇帝，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而是把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加以崇拜，这种象征，便是他们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着整个帝国。比如，在朝堂议政时，大臣们毕恭毕敬，伏在地上，与太后进行对话。即使在禁苑之中，一旦谈及军国大事，无论是皇亲国戚、军机要员，都必须严肃恭谨地跪在地上。如果皇帝和太后不在身边，谈及国事时，则不必如此。

然而，如果是涉及私事，那么大臣们即便是接受命令，也无须下跪，甚至可以和太后亲密地交谈，显得极为融洽。但此时若是突然谈及国家要事，那么臣子必当立刻跪倒在地。由此可见，太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高神圣，而大臣们所礼敬的，实际上是帝国的尊严。

宫中的叩拜磕头之礼，通常是在感谢圣恩时才用，平素并不常见。比如我们在看戏时，戏院的演员们上前叩拜，便是为了感谢太后恩赐他们在宫中演出的机会，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接受赏赐时，也要叩头感谢圣恩。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对浩荡皇恩的感激涕零，臣子们便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即双膝跪地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一共要磕九个头，次次都要碰触地面。在一个西方人看来，如此卑躬屈膝，实在与奴隶无异，对人格是莫大的侮辱。但中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人看来，这并非是有损人格的行为，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感恩方式。也许这种礼节一开始是一种对奴隶的羞辱，但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了，叩拜之时也并未感到如何的委屈。

第十七章　颐和园

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园林，说实在的，这里真的可以被称作人间天堂。它位于北京城的十六英里的地方，坐落在风景如画的西山脚下、昆明湖畔，本来就极具天然形胜，再加上许多人为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和众多雄伟壮丽的宫殿建筑，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堪称人间胜景。

颐和园规模宏大，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其中昆明湖占地极广，犹如一方明镜，映出无数异彩。楼、堂、厅、榭、楼、亭、廊、阁掩映在山石松竹、花木绿荫之中，堤岸垂柳，百花相间，湖水荡漾，碧波照人。

颐和园地势高低起伏，园中有宫殿一百余座，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恢弘富丽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艺术地融为一体。

园中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太后和皇帝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太后、皇帝及贵妇们居住的地方；以万寿山和昆明湖等组成的游览区，是供帝后们澄怀散志、休闲娱乐的场所。

太后等人的生活区位于昆明湖的东南，这里简直就是一处繁华的城邑，宫室、戏院、庙宇、凉亭不一而足，临湖而立，但见水面碧波荡漾，烟波淼淼，湖中有一道西堤，堤上桃柳成行；十七孔桥横卧湖上，湖中三岛成鼎足而峙的布列，象征着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由于岛堤分隔，湖面出现层次，避免了单调空疏。西堤一带碧波垂柳，自然景色开阔，湖岸和湖堤绿树荫浓，

掩映潋滟水光，呈现一派近湖远山的自然美景。

若是到了夏天，荷花盛开，芳香四溢，更使人流连忘返。园中有几座小山，很是可爱。其中一座山上矗立着万佛寺，走过汉白玉铺就的石桥，再拾阶而上，走过数百步，便来到万佛寺外了。周围除了宏伟的寺庙，还有许多楼台亭阁点缀其间，与自然形胜相映成趣，仿佛一切都是天成，丝毫不觉得有人工斧凿的突兀。

独立峰头，极目望去，只见昆明湖碧波荡漾，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湖中有一座南湖岛，十七孔桥和岸上相连。蜿蜒曲折的西堤犹如一条翠绿的飘带，萦带南北，横绝天汉，堤上六桥，婀娜多姿，形态互异。

再看远处，一条御河自北京城蜿蜒而来，注入昆明湖中，其间无数曲折，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缓缓自流。每一个转弯处，便有一座拱形石桥。中国的建筑师真是巧夺天工，他们将自然与艺术糅合在一起，是那么和谐，很难分辨出哪里是自然天成，哪里是人工雕琢。有时候，仅仅用简单的线条和色调，便可勾勒出一幅美景，创造出一个神奇的世界。

如果深入研究中国的建筑，会发现中国人真是非常高明，有许多宏伟的建筑，用的都是穹顶式风格，这种建筑在颐和园里比比皆是。这种风格也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大帐便是穹顶式的，看上去总会让人联想到蓝天覆盖下的草原，中国古代有一首诗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便是这么一种感觉。穹顶建筑在中国很早便出现了，大多是用砖砌成斗拱结构。穹顶建筑和其他形式的建筑相比，其包围同样体积的空间所用外表面积最小，对外围护结构也达到最小，在极端气候下最为适合，同时穹顶建筑特有的外形在排水和防风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外观上丝毫不逊色。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朱红色的门，显出古色古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庄重之感。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千门万户，金碧相辉，耀人耳目。壁砌生光，琐窗曜日，工巧之极，举世罕见。



圆明园清漪园文昌阁

这里宛若一幅精美的田园风景画，与自然形胜相得益彰，毫无突兀之感。匠师们别出心裁，使得周围绿水环绕，花木繁茂，苍松数株，翠竹千竿。亭台楼阁，池馆水榭，映在青松翠柏之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藤萝翠竹，点缀其间。更有意思的是，山下竟然辟出一座农庄，里面栽种着小麦、稻谷、各种菜蔬，太后兴致来时，便到田地中操锄扶犁，感受一下田园之乐。这些作物种植在肥沃的土地上，可谓是地尽其利，而且这非但无损颐和园的优美风光，反倒平添了几分田园景色，使人一眼望去，增添了许多亲近之感。想来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人的心中都有着几分田园情结，哪怕是贵为太后，也不能免俗。

半山腰上，有一处大花园，宫人们称其为“花山”，这里种植了许多牡丹。只是现下并不是牡丹的花期，无缘一睹“中国花王”的风采。听人说，每到春天，百花怒放，姹紫嫣红，犹若灿灿赤霞，煌煌夺

目，千姿万态，高低相昂，浓姿贵彩，争相斗艳，馥郁芳香，久久不散，翩翩舞动，沁人心脾。

虽说没赶上繁花盛开的时节，但我却感到不虚此行。金风送爽，此刻正是金菊怒放的时候。当帘卷西风，百花凋零之时，唯独菊花不畏寒霜，绽蕊怒放。中国人赏菊，不仅仅关注其花瓣的大小，而是更看重菊花的形态。这一点，慈禧太后尤甚，宫中的花匠为了博得太后欢心，千方百计地培养出姿态万千的菊花来。这一年，花匠们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通体碧绿，瓣若丝发，随风摇曳，煞是好看。太后慈颜大悦，当即重赏了这群花匠。

我面前的这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因为里面供奉了一万多尊佛像，故名万佛寺。万佛寺有三座大殿，中间的大雄宝殿供奉着一尊大佛，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面相极为庄严。据说，这里先前还供奉着一尊大佛，还有许多佛教圣物。但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尽数毁去。每当提及此事，太后都不禁捶胸愤恨，她总是认为，西方人对毁坏寺庙具有非常大的兴趣。

中国的宗教政策是非常宽容的，他们无法理解西方人在宗教上的极端的排他性。我们西方人除了自己信仰的宗教，对其他宗教都比较歧视。过去，西方人总是说中国人如何仇恨西方人。可是扪心自问，中国人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喜欢西方人，也不会欣赏被过分吹嘘的西方文明。欧洲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烧杀掳掠，焚毁宫室，捣毁佛像，残忍暴虐不亚于野蛮人。

在万佛殿后的山脚下，便是一片废墟，这里就是曾经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五十年前，英法联军洗劫并将其付之一炬。在这之前，圆明园风物之盛，更甚于今日的颐和园。当年圆明园遭受浩劫，也波及到了颐和园，致使颐和园后来迁到昆明湖以南。而1900年，颐和园再度遭遇劫难，也许当年的营造者决计是预料不到的吧。

现如今，圆明园的废墟依然还在，然而，这已不是一处景观，而是一个污点，一个西方人的污点，一个人类文明的污点。雨果曾经说过：“在我们欧洲人眼里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是野蛮人。这就是文

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这一惨淡的回忆，人们只能无奈地一笑，不再在心中挂怀。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离废墟不远，有一座小湖，旁边依稀可以看到一些楼阁，那是一座寺庙。湖畔泊着几条小船，配以不远处的大水法，真使人恍若来到了威尼斯古城。我们从未到过那里，而且，这显然是太后有意回避。因为在那里，她会产生一些痛苦的回忆。想当初她刚入宫时，曾陪伴丈夫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到如今，斯人长逝，宫苑倾颓，难免使人潸然泪下。



圆明园清漪园昙花阁

站在颐和园的最高处，可以看到通往北京城的道路。太后和贵妇们时常站在凉亭中举目远眺，但见来往之人，熙熙攘攘，从中也能窥见些许民情。其实这些贵妇久居禁苑，又何尝不想体验一下市井民情，只是她们大多数时间都被皇宫的高墙圈起来，没有机会看到外面

的世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一睹宫外的风光。

有时候，我们在山上看到皇帝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从北京城返回颐和园。当看到那浩浩荡荡的车队时，太后会告诉大家："皇上来了。"然后贵妇们立刻簇拥上前，举目眺望。从远处观望圣驾，并未违背礼法。但若是在大道之旁遇到皇帝的銮驾，必须回避，甚至沿街店铺，也必须大门紧闭，以示对皇帝的尊敬。而皇帝出行的大道宽阔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出行时，这条道上还会被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第十八章　中秋之夜

在我看来，中国人生性保守，处事拘谨，平素里很少参与娱乐活动。但是，中国人却又极度重视传统节日，除了日本，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节日了。在中国，每逢节日盛典，自天子而至黎民，无不欢天喜地，张灯结彩，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这些节日中的庆典仪式，民间与宫廷也并无太大的差异。

中秋节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节日之一，这是在月圆之夜，庆祝一年收获的活动，其日期固定在农历八月十五。此时桂树飘香，月明如昼，正是花好月圆的好时节。每逢此日，宫中必然上演戏剧。而所演戏剧往往都和月亮的传说有关。我在宫中，便看到这么一出戏，说的是一位皇帝日夜祈祷上天，终于感动了九天神女，赐给他一株仙草，告诉他如果服下仙草，便可长生不老。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在庭院中摆下各式贡品，燃起高烛，感念上苍。打算焚香沐浴，斋戒之后，服用仙草。不料，这时一名宫女走了进来，见到仙草后，颇为好奇，不由自主地将仙草服下。等皇帝准备停当，回到大殿，方才发现仙草早已被宫女服下。



颐和园内的戏台

皇帝自然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宫女处死，剖腹取草，希望能够重获仙草。只是为时已晚，但见那名宫女生出两翼，缓缓升起，直飞到重霄之上，一直来到月亮上。从此以后，那女子便一直孤零零地生活在月亮上，陪伴她的只有一只和她同时飞升的白兔[4]。

这幕戏结束以后，便点起彩灯。无数彩灯，连绵不绝，照得颐和园光辉如昼。彩灯上悬挂着珠玉、金银穗坠，风吹金玉，相击互撞，锵然成韵，响若乐声。昆明湖中漂着浮灯，水面霞光回旋，空中成为了飞霞的河，河水成为了映霞的天，真是水天一色，光射彩掩。浮灯趁波逐浪，变成闪光星带，灯火点点，闪烁荡漾，非常迷人。两岸万盏灯彩照耀着水陆，形成一幅艳丽壮观的水上灯景。湖的正中是一只硕大的莲花，上面端坐着一尊巨大的金佛，栩栩如生，这奇妙的景象，使人恍恍惚惚，仿佛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天晚上，宫中大摆宴席，太后与贵妇相会一堂，共庆佳节。戏还没有结束，太后便走出戏院，我们见状，便不得不随着走出来，这天大家都身着盛装，一个个雍容华贵，光彩照人。上百名太监手持灯

笼，紧随其后，鱼贯而行，禁苑之中浩浩荡荡，甚是壮观。

我们一直来到万佛寺前，只见大殿之前，摆下一张桌案，案前高挂月神像，案上放置月饼、祭酒、西瓜等各式水果，以作为祭祀供品，外加红烛两支、香炉一座、酒爵三只。在中国，有“男不祭月”的习俗，故主祭一般是家中女性长者。此时自然由太后挑头。在祷祝的唱词声中，她款款走上前来，举起高香，深深一拜。



清宫宴席

是时，一轮明月从天际升起，玉盘似的满月在云中穿行，淡淡的月光洒向大地，把大地照得一片雪青，树木、宫殿都像镀上了一层银似的。众人纷纷随太后跪倒在地，向着夜空遥拜。只见月亮渐渐升高，仿佛披着一层白色的纱衣，娴静而安详，温柔而大方，透过柳梢，将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整个世界都被浸成了梦幻般的银灰色。

此时，祷祝唱起祝词，声调宛转悠扬，抑扬顿挫，充满韵味。在我听来，这种中国式的颂歌非常悦耳，远胜先前我听过的戏剧与清唱。这首赞颂月亮的颂诗分为两个声部，配合得非常和谐。当朗诵结

束后，便将祝词以及各种用纸做成的祭品一并投入青铜鼎炉中焚烧，一瞬间，熊熊火焰达到数丈之高，将夜空映得一片通红。宫中诸人簇拥着太后与皇帝，围着鼎炉站成一圈，欣赏着这壮观的景象。她们华美的衣饰与炉中的火焰交相辉映，熠熠生辉。太监们提着灯笼，站在外围，仿佛是皎洁的明月，周边环绕着点点繁星，构成一幅奇美的图景，使人沉浸在梦幻之中。

炉中的火焰渐渐熄灭，只剩下袅袅的白烟飘摇直上，消逝在夜空之中。人们转身离开祭台，此时太监们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来到昆明湖畔。湖中的游船全部张灯结彩，列队恭候太后一行的到来。此时，引路的太监立刻排成两排，跪在地上，高擎着灯笼，照亮岸边。太后等人依次登上游船，身后的太监也随即登船，并用灯笼拼出“太平”、“吉祥”等字样，以示庆贺。

当此时节，颐和园内，朱红翠绿，星罗棋布，玉带缭绕，灿灿生辉。轻舟纵横穿行。白舟过处，浪纹摇曳！宛如剪刀将一幅幅图画款款裁剪开。通明的灯火照耀下，湖水如蓝晶翠玉，红墙绿栏水光摇曳，琉璃金瓦灿灿生辉，别有一番清雅寥阔的韵味。

虽然我在宫中度过的每一天都非常愉快，但我始终记得，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画画，相对于日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我倒真希望快点将画完成。我需要充分的时间来画画，即便是太后不在眼前也没问题。但是，太后若是不出座，我便没有机会画画，而太后每日出座的时间又极其短暂，然后便叫上我一道出去遛弯。数月下来，我的工作进展极为缓慢，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对此，我深表忧虑。

终于，我向太后提议，在她出去散步时，可以把我单独留下，继续画作。太后虽然答应了，但显得极不情愿。在她看来，把我一人撇在宫里，是一种极为失礼的行为，这是好客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她显然很喜欢大伙欢聚一堂，一同欣赏我作画。至于时间，那是有的是，何必急于一时呢。来日方长，自然可以逍遥度日。既然太后如此盛情，我就不好再勉为其难，只有在太后出座时尽力而为，希望早日将工作完成。

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绘画之中，但是却总是事与愿违，然而，这并不是我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中国人重视礼节，固守己见，实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随着我绘画的推进，这些古老的陈规在不断地束缚我的工作，其如此繁多，难以尽述。比如，东方的绘画中，是没有明暗对比的，人物的面部更是如此。人们总是按照这种思维去评论我的绘画，认为我画的太后脸上带有阴暗面，实属大不敬。其实太后是个颇为开明的人，对西洋画的技巧也能够认同，对我的绘画给予极大的自由，并未进行干涉。然而，积习难改，总有人在她耳边非议西洋画法，使她也不由改变主意，令我多多遵循东方的绘画技巧。

就这样，虽然我有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这位权势熏天、举世闻名的太后绘画肖像，却被中国的传统所限制，这种传统如同铁铸的枷锁一般，将我牢牢束缚住。我被迫服从这些古老的习俗，遵守他们要求的每一个细节。在用笔时，我既不能随意着色，也不能画出褶皱，更要尽力减少画面上的阴影部分，失去了许多真实感，使太后的容颜大为减色。

面对这些顽固的言语，迂腐的思想，我实在是无可奈何，我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我的热情不再如当初进宫时那般，我对我的画像工作逐渐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每当我拿起画笔，开始画画时，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无从落笔。当然，这种颓丧的感觉从未表现在我的脸上，所以太后一直不曾晓得我的心思。反观太后，见我逐渐适应了中国式的画法，符合众人的审美清韵，心情也逐渐欢悦起来。

一天，太后问我，是否希望邀请康格尔夫人进宫，来看看我的画像。我当即欣然点头，于是太后令外务部发出邀请，请康格尔夫人入宫，一睹我绘制的圣像。太后在乐寿堂中接见了康格尔夫人，我想我总算有机会将绘画的进度推进了，因为乐寿堂光线充足，太后坐在那里，对我的画画非常有利。

然而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太后接见康格尔夫人时，并没有坐在宝座上，而是引着康格尔夫人来到安置画像的小房间参观，真是天算不如人算，我本想抓紧时间作画的念头就这样破灭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跟着她们走进小房间里，总管太监李莲英小心翼翼地将覆盖在圣像上的黄色丝缎揭了下来。可恶，这里的光线非常暗淡，还有一些反射的光，对观赏画像极为不利。而且狭小的空间内站满了人，更使人觉得逼仄促狭，让人无法静下心来观看画像。然而康格尔夫人依然仔仔细细地对画像进行观摩，她认为画像神情逼真，尤其是一双眼睛，奕奕有神，实乃一幅上乘佳作。其实当时完全要感谢几缕阳光透过窗格照到画像的上部分，方能看出个究竟，至于其他部分，那真是如同雾里看花一般了。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依然非常开心。



第一幅画像描绘的是太后端坐在宝座上，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张座椅，上面雕绘着许多神仙，形象栩栩如生。太后一只手拈着鲜花，另

一只手平放在黄色的椅垫上，脚上套着一双小巧的绣花鞋，头部略尖，四面绣着金丝花边，鞋面上镶嵌着璀璨的珠宝。脚下踏着一张蟠龙脚凳，白色的袜子被衣服的下摆遮盖住，只能略微看到一点。头部在画像的四分之三的部分，双目炯炯有神，凝视着前方。太后的右侧置放着一只花瓶，插着她最为钟爱的兰花。由于光线运用得恰到好处，显得栩栩如生。

整幅画大约四英尺宽，六英尺高。太后身着明黄色的朝服，这正是她日常生活的写照，我曾经为太后设计过这样一尊造型：她端坐宝座，拈花微笑，一只手高擎在上，宛若佛陀入定一般。

在她的左边放置着一只巨大的火盆，蓝色的火焰在空中跳跃着，与她身上的珠光宝气相映生辉。一只古朴的青铜炉鼎中燃着梵香，紫烟袅袅升起，将一切都笼罩在朦朦胧胧的烟雾之中。在她的脚边是两条俯卧在地，张牙舞爪的巨龙，而她的眸子中闪烁着令人捉摸不定的光芒，面部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来，不再有所掩饰。周围昏暗的灯线，将这一切都映照的神秘莫测。这显然也能体现出太后常人难测的性格来。

只可惜，我的构想虽好，然而却不被太后所接受，在她看来，这种构想太过匪夷所思，实在无法接受这种虚幻的意境，我只好遵从她老人家的意思，遵照中国的传统，按照写实的风格绘画。

但在我绘画时，我一直在用心把握太后的性格，用来宽慰我沮丧的心情。随着对她的研究不断深入，太后的个性、人格也不断展现在我面前。在这个国家里，她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最值得人们去关注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人物，她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整个宫廷，而且，太后本身就极富魅力，无论她处在何种地位，都能让人为之敬仰。

第十九章　颐和园中的游园会

中秋过后，太后又发起了一次游园会，特意邀请各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参赞以及夫人们，以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谊。因为中国的风俗，男女不便同时共聚一堂。是以游园会安排两天，第一天招待男宾，第二天则专门招待女宾。而一切款待程序，则不分男女，一律相同。

第一天，男宾们被迎进宫中，依照常例先在朝堂上向太后与皇帝致以敬辞，然后来到左右的偏殿中享用茶点。当来宾到齐之后，则同皇帝等人一同游览颐和园，荡舟昆明湖。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方得结束。在这一天中，除了慈禧太后，宫中所有的女子全部回避。

第二日，便是招待女宾的日子，此时我不由尴尬起来——我该以什么身份出现呢？按理来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应该和各使馆的夫人处在一起；但是我又在宫中过了许久，太后并不把我当外人，让我随她一同接待外宾，以尽地主之谊。我站在中国人的队伍中接待外国人，那感觉真是非常怪异。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提出来，然而太后圣明无比，很快便察觉了我的心思，而且极其巧妙地对我说道："在这种场合，你适合以官方的身份，而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参加游园。"

她建议我先去外务部，和康格尔太太先行接洽，然后再以外宾的身份来到宫中。这时，太监上来禀奏，各国的公使夫人已经来到外务部，太后当即让我乘坐一顶红色的轿子前往外务部去和康格尔太太会合。外务部位于皇宫左侧，仅有几百米远的距离，是以我很快便到了，第一眼便看到康格尔夫人，她是第一个来到的，我们一阵寒暄，真是有吐不尽的言语，然而，其他各国公使的夫人陆续到来，容不得我们耽搁太久。当众人到齐以后，我们便一同起身，来到宫前的一座大厅中，稍事等待，然后按照各人的顺序依次觐见。

但见楼台廊榭，处处皆以绸缎幔帘遮覆，给人一种神秘而又威严的感觉。地上铺着红色地毯，以示对来宾的尊重。慈禧太后的宫中虽说有许多美丽的地毯，但除了冬天或是一些盛大典礼时，平素很少拿出来使用。我从未在乐寿堂中见到地毯的使用。

当我们走进朝堂时，格格们分列两排，从台阶上款款走了下来，向我们表达敬意。我们在汉白玉铺就的石桥上互道问候，然后便由格格们引领着，进入大殿，格格们当即分列两班，侍奉在太后与皇帝的左右。

只因四面都被帷帐遮覆，大殿中光线幽暗，森然寂静。只见太后端坐在龙椅之上，光绪帝坐在她的左侧，其相貌看得不甚清晰，使人陡生凛然之感。他们身前放着一张御案，明黄色的案围几乎垂到地上，案上摆放着水果与鲜花，堆成塔状。刹那间，我想起在太后的佛堂中供奉菩萨的经历，此情此景，不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么？

各位公使夫人依次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并向太后致以敬辞。德龄小姐站在太后的右后方，为之一一翻译解释。每当一位夫人上前觐见，她便为太后道出此人的姓名、履历，以及其丈夫现下身居何职。太后记忆力极强，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但凡与人有一面之缘，再见之时，便如同旧识，当下便能道出其姓名，无需再作介绍。女宾之中有许多人与太后早已熟稔，也有的是初次见面，然而太后对待众人，无论亲疏，一视同仁，都报以礼貌的回敬。其中有数人，与太后相交甚欢，然而此时此刻，大家齐聚一堂，太后丝毫不曾显露任何偏爱之意，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看来，太后也是外交场上的老手，处事极为圆滑，其阅历之广，心计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

觐见之礼结束以后，太监们当即将太后座前的御案移开。太后从御座上款款走下，与诸位女宾相互寒暄，极为热忱，并将宫中诸人一一介绍给来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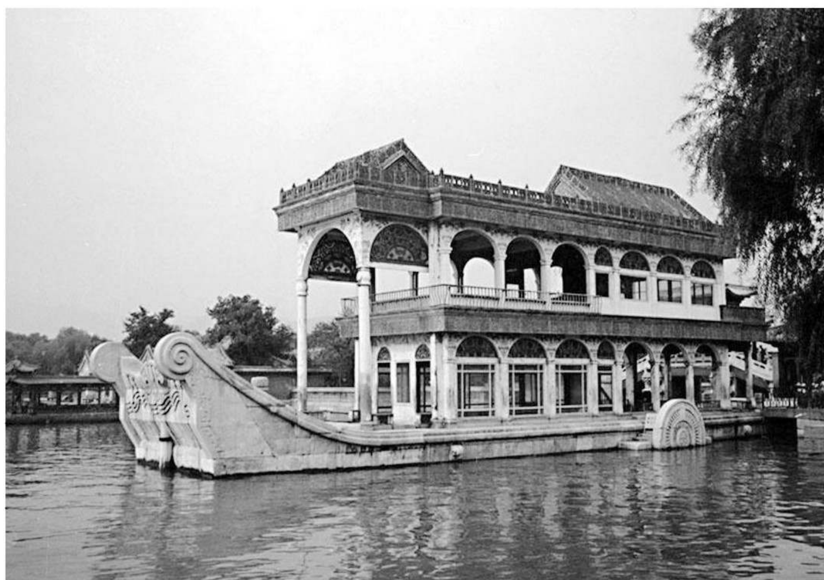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

不一会，太监端来一把裹着黄色绸缎的宝座，放在大殿的右侧，太后遂坐了下来，女宾们则环绕着太后，围在一起。太后点点头，说道：“看茶。”立刻，便有各色茶点奉献上来，太后请来宾享用茶点，并不时地与来宾交谈，不曾有丝毫怠慢。

喝完茶后，格格和太监们引着来宾，穿过宫廷剧院和一间间殿阁，最后来到乐寿堂。此时，皇后与太后已端坐在宝座上，乐寿堂中的桌案上早已准备好盛宴，以飨来宾。只见满桌之上，中西俱备，有欧美进口的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以及各种纯饮用水，其中自然少不了甜香槟，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吃饭若无香槟，那就简直不叫吃饭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各色名酒，总之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贵妇与格格们在席间招待来宾，酬酢往还，备极周到。

宴会结束后，格格们遂引领各位来宾前往园中游览，大家伫立在昆明湖畔，秋风送爽，徐徐地拂送来一阵阵花木夹杂的幽香，使人心旷神怡。不一会，隆裕皇后和瑾妃前来与我们会面。适才在宴会上，她二人都提前离开，直到此时方再现身影。

皇后见大家兴致正浓，索性提议一道泛舟湖上，众来宾无不欣然应允。皇后遂下令手下准备游船。不一会，万事俱备，我们分乘三艘游船，齐头并进。虽说这回我们无缘搭乘太后的龙舟，但所乘的三艘游船，都是极大的，每条船上都有一间豪华的船舱，每一间船舱中都安放着一张裹着明黄绸缎的龙椅，不用说，这自然是太后的御座了。太后虽未出席，但她的御座也是至为神圣之物，任何人都不得擅动。



石舫

我们在湖面上荡舟而行，不一会，便来到一座小岛近旁，我们登上小岛，上面只有一座小庙和一间宫室，倒也没什么值得一看的，很快便回到船上，继续游湖。我们又来到一座石舫之前，舫是中国传统园林中最独特的一种水上建筑，它的建筑外形和内部结构都与舟船极为相似，故称之为“舫”。这种舫式建筑不仅可以丰富园林中的景致，还可以供人们在舫内游玩宴饮，观赏周围的湖光山色。

颐和园中的这座“石舫”船体用巨石雕成，船上二层白色木结构楼房，都用油漆装饰成大理石纹样，顶部镌刻有砖雕装饰，整座石舫既精巧华丽，又不失典雅恢宏的气势。这座石舫是当年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为的是避暑纳凉，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时，石舫

也被全部焚毁。后来石舫重建，按慈禧太后的意图，原为古建筑形式的舫上舱楼改建成了西式舱楼，取名清晏舫，取海清河晏、江山太平之意。慈禧太后平素里却很少到此处游玩，想来也是怕触景伤情的缘故吧。然而，清晏舫在各国外交官员的口中却声誉极高，概因每次造访太后，必然会在此处设宴。

我们坐在石舫之上，欣赏着湖光山色，享用着精美的茶点，直到游兴已倦，方起身告辞，格格们将女宾送到宫门外，一一惜别。然后诸位宾客返还外务部，或乘轿子，或坐马车，回到北京城中的大使馆。

这次游园盛会，太后极尽地主之谊，格格们热情款待，照料周详，在我看来，实在没有丝毫的不足。然而，游园会中却依旧出现了不和谐的状况，令人感到不快。这种不和谐的声音，便是来自各国的女宾。也许是女人的天性吧，这些宾客眼中都流露出嫉妒之色，或者是攀比的神态，总想在风头上盖过别人，即便是在餐桌上，当着主人的面，也不肯稍稍收敛一点。

以我之见，这些来宾大概以为中国人既不懂她们的语言文字，则必然也不晓得她们的心思。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中国人虽说不苟于言笑，但却并不等于他们缺乏判断力。而事实上，中国是礼仪之邦，举手投足之间，最为看重规矩。所以对于外国来宾的言谈举止，也是颇为留意的。这些来自于欧美文明国度的夫人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和最高的礼仪接待，然而她们放纵的表现却让人为之羞愧，格格们嘴里不说，难道心里没有数么？只怕言谈欢笑之间，内心升起了鄙夷之心吧。

宫中诸人对来宾所着的西式礼服品头论足，听起来也颇为有趣。太后对西洋礼服似乎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其色彩绚烂缤纷，夺人眼球，太后更是为之倾心。她说西洋礼服非常适合体型匀称、气质不凡的人穿戴，最能体现出人的美态来。若是臃肿肥胖的人穿上洋服，那真是丑得无以复加。反观中国的服装，自衣领部位开始自然下垂，不夸张肩部，常用下垂的线条、过手的长袖、筒形的袍裙、纵向的装饰

等手法，使着装人身体显得修长，特别是使四肢有拔长感。即便是矮胖的人穿上，身体上的缺陷也会被衣服遮掩住。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宫中的贵妇们认为我们总是比中国人显老，问我们的年纪，总会觉得我们的容貌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这种看法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贵妇自小便养尊处优，从未体验过生活的不易。纵使是普通人家，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生活方式极其简单，所以脸上不会过早地爬满皱纹，不会显老，倘若她们身处发达的工业社会，也许情况便不会如此。

中国女子，尤其忌讳头发变黄，虽然我生就满头金发，但她们从未和我谈及此事。但我几次观戏，戏台上穷凶极恶之人，大都是戴着黄色发饰的。而且头发越黄，则那人便就越为凶恶。有一天，一位贵妇告诉我，她有一种秘方，是用天然的植物汁液炼制而成，用了之后可以将头发变黑，但不会对人造成任何伤害，如果我愿意，她愿意奉献出来，供我使用。至少，不会让我的头发看起来如此发黄。我笑着点头，深感对方的热忱和天真，同时也能看出，在中国，即便是身为贵妇，对外国人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

第二十章　颐和园中的闲适生活

游园会结束之后，太后闲暇的时间多了一些，出座的时间也比较长，我手头的活进展自然也就快了起来。这时太后打算将她的徽号写在肖像画上。所谓徽号，即尊号的别名，也就是在皇帝和后妃生前所加的表示崇敬褒美的称号，比如慈禧太后徽号全称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一共十六个字，若是写在画上，还需要加盖官私印章，颇占空间。因此，文字的布局处理是需要好好考虑一番的，太后先令官员呈进各种字体，以待选择。

太后所用的印，大约三英寸大小，要印在徽号的两端。至于印章改什么颜色，则需要反复推敲。最后决定，一颗用白底红文，一颗用红底白文。对于这件事，一开始我毫不知情，所以画画时并没有为字、印留下空间，现在再加上，只能加在头部上方的位置，如此一来，画面的效果便大打折扣，这使我大为不悦。

因此，我便暂时搁下画笔，将画像交给他们去处置，等到他们将字和印添上以后，再重操画笔，这期间他们如何讨论归置，我都一概不问，任由他们安排。

很快，第一幅画便要完成了，太后又告诉我，她希望我为她再多画几幅画像，以使我的才能尽情发挥。当时我便欣然应允，我想第一幅画像中存在的种种遗憾，大可以在后面的画像中进行弥补，而且这些画并非用来公开展出，少了许多约束，我大可以尽情发挥，其效果想来会更好。

太后这次画像，不再穿朝服，而是换上常服，那些繁杂的满族头饰也悉数去掉。概因第一幅朝服画像，纷繁芜杂，穿在身上很不自在，不耐久坐。画第二幅画时，太后身着绣花蓝色袍服，一头乌发盘在头顶，插着几枝茉莉花，旁边以一只玉蝴蝶作为点缀，极为优雅。

我感到，她的发饰如果做成满族式样，倒有些显得头重脚轻，而若像现在一般，则恰到好处。同时，她的衣着上少了许多珠宝饰品，倒更显得清新自然，将她那自然的美态展现出来，不会被外在的东西喧宾夺主。



慈禧画像

同时，太后坐在宝座上，神态自如，也不似先前那般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样子，给人以亲切感。如此等等，少了诸多约束，我有了更多的空间得以发挥。这张画像，太后打算只用作私人收藏，平时只示于身边的亲密之人。既然如此，我便大胆提出建议，把太后的两只爱犬也画在画中，太后听了，欣然应允。

这两只小狗，一只是纯种的北京哈巴狗，毛色金黄，唤作“碧眼狻猊”，另一只毛色微暗，唤作“海龙儿”。“海龙儿”偎依在太后的脚边，耳朵上插着两朵菊花，可爱极了，“碧眼狻猊”则不愿让人进行修饰，就那么趴在地上。当我为两只小狗画像时，太后便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观看，见我寥寥几笔，便勾画出轮廓来，其神态惟妙惟肖，不由大呼神奇。在宫中，不只有我一个画家。太后身边还有不少宫廷画师，这些画师被授予权力，可以在宫中行走，有时太后参加庆典，或是日常的游园，这些画师便为之作画。宫中的屏风、灯笼、窗心上面的画像，多出自他们之手。戏班所用的背景之类，也多由他们绘制。他们的功底极为深厚，所画各物极为传神，绝非常人所能媲美。有些出色的画师，也会为宫中的贵人们画像，但没有一人为太后画过，概因其品级太低，不得靠近御前，所以太后的圣容是何等模样，都是一无所知。

这些画师的官阶多是三品，如果碰上太后的銮驾，必然有一太监在前面清道，这些画师听闻太后驾到，当即回避，以免冲撞了銮驾，罪不可恕。这些画师所画的图画，全部由太监代为呈递，太后如有什么旨意，也由太监代为传达。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画家，是在一个秋风送爽，金菊怒放的日子里。那时，有人进献几株极为罕见的菊花，品色皆为上乘。太后龙颜大悦，当即令画师将这些菊花画下来。那天，当我走进宫时，见到几名身着顶戴花翎的官员围着花圃，仔细观摩。一见我们到来，便鞠躬行礼，我向德龄格格询问，方知这些人的身份乃是宫中的画师。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画的风格与西洋画迥然不同，若以艺术价值而论，双方难分高低。我虽从未与他们攀谈过，但可以利用我在宫中

自由行走的机会，在他们作画时，躲在屏风后面，仔细观摩，去感受中国画的独特的风格。他们绘画的地点，恰恰与我下榻的寓所邻近，所以我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领略东方画派的魅力。

比如说，当这些画家要绘制花卉时，必先对花卉进行仔细的观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然后再由画师的头领动笔勾勒，作为头领，必然是极为谨慎的，当他细致入微地将花卉画好后，其他画师便依照样画进行临摹，这时，他们尽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不受外在的约束。最后各人都将所成的作品进献于首领，再由首领选择其中的上品，进行保存。

渐渐地，园中的菊花全部绽放了。有一天，太后和贵妇们外出遛弯，让我独自留在乐寿堂中绘制画像。当她回来时，手里捧着一束菊花，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新的品种。太后将菊花递给我，说道：“我刚为这种菊花起了名字，你可能猜得出来？若能猜中，我重重有赏。”

我仔细地观察这束花，只见其花瓣细如发丝，通体雪白，晶莹闪亮。宛若老人的苍颜白发一般。

于是我说道：“在下心中所想，若是有违太后圣意，还望恕罪。此菊如同长满白发的老者，却不知唤作什么名字。”太后闻言大悦，笑道：“你所言甚是，予适才为其起名叫做‘山中老人’。”

这段日子，太后的游兴大增，每日都要邀我们一同游园，一路上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每天都有一些小事情为我们助兴，现在想来，我仍禁不住要莞尔一笑。

话说这日，我们在园中走得累了，太后便坐在牡丹山下小憩一会，我、皇后和格格们则跑到树林深处，谈笑甚欢。皇后从地上捡起一根看起来颇像孔雀翎毛的树枝，对我说道：“今日，我便将这孔雀翎赐予你。”她让我屈下身子，将树枝插在我的发髻中，树枝从头顶垂到颈部，看起来怪模怪样。然而我知道，孔雀花翎只有皇室勋贵或立下大功的臣子才有资格佩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人人羡慕。皇后将“孔雀翎”插在我头上时，正色说道：“卡尔大人，本宫封你为正

一品内阁大学士，在宫中任意行走。”众人听了，无不粲然大笑。

我与众人尽情嬉戏，很快便把头上的“孔雀翎”忘掉了，竟戴着它回到太后身边。本来这天太后似乎有点抑郁，但一见我的打扮，不禁展颜笑道：“谁赐给你的顶戴花翎？”

我方想起我的头上还插着一支“孔雀翎”，当下如实禀报事情缘由。太后笑道：“封赏臣子，乃是皇后的权责所在。可惜了，倘若你身为男子，莫说顶戴花翎，便是黄马褂，也受用得。”我心中不由一奇，正在疑惑，只听太后又道：“你可知其间缘故么，只因你那无所畏惧的气魄，便使众多男子自愧不如。”我更是奇惑，真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太后缓缓道来：“自庚子拳乱以来，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极度仇外，而我这皇宫大内，更是龙潭虎穴，进来必然九死一生，许多人是避而不及。反观你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来到禁宫，又陪着哀家过了如此长的日子，这份胆识，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一天下午，太后带我走进仁寿殿，这里是太后临朝听政的地方，我之前从未涉足于此，现在总算有机会一睹其真面目。只见大殿中陈列着古老的青铜器和精美的景泰蓝，太后的宝座由极名贵的紫檀木精雕而成，椅背上雕有九条金龙，宝座四周设有掌扇、鼎炉、鹤灯用端等。

仁寿殿的后轩，竟然摆放着三架钢琴，其中两架是直立式小钢琴，另一架是平台式大钢琴。大钢琴是崭新的，最近才从外国运来，太后颇有兴趣，希望我们演奏一曲。容龄小姐当仁不让，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曼妙的乐曲。容龄小姐在巴黎学过音乐，演奏水平非同一般。太后直听得如痴如醉，又叫我们表演西洋舞蹈给她看。于是，我坐下弹奏钢琴，德龄和容龄则手挽着手，跳起了轻快的华尔兹。太后啧啧称赞，不由说道：“到底是洋人风气开放，男女搂在一起跳舞，中国人可没那么闲情逸致。而且，中国人往往只喜欢看别人跳舞，自己很少跳。有钱的人家，则买来舞女歌姬，以供消遣，大户人家的小姐，可是绝不会给人唱歌跳舞的。”

族，真不知会如何作想。



慈禧和德龄、容龄姐妹

我想，东西方文化果然大为迥异，倘若太后看到欧洲的宫廷舞会，数以百计的舞伴同时翩翩起舞，而这些人又都是身份显赫的贵族，真不知会如何作想。

第二十一章　欧洲来的马戏团

我在颐和园的这段日子，不仅参加了几次盛典，更有趣的是，我还碰到了一支从欧洲来的马戏团，感谢上帝，我在颐和园真是享尽了人间的快乐。

游园会结束不久，便听说有来自国外的娱乐节目将要在颐和园中上演。好奇之下，我四处打探，方知所谓的“娱乐节目”竟然就是马戏团表演，而且还是来自欧洲的高水准马戏团。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由欣喜异常，因为我在中国待了两年了，这期间没有碰到欧美的娱乐生活，而我自小便喜欢观看马戏表演，小丑耍宝、小狗跳舞、山羊拉车、狮子钻火圈以及马术表演，常常浮现在我的梦中。而如今，我竟然能在中国的皇宫中观看到马戏表演，这怎能不令我兴奋。

这支马戏团当时在天津演出，有人禀奏太后，说马戏表演非常有意思，太后听了也是怦然心动，当下令一名八旗子弟前去天津作一番考察。那名亲贵回来后，对马戏表演是赞不绝口，并呈献许多张他在天津拍摄的照片。太后仔仔细细地审视一番，当她看到那些身着艳装的摩登女郎时，眼中不由露出一丝鄙夷和嗤笑，然而，当她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以及马术表演时，不由精神一振，当下拍板决定，邀请马戏团来宫中表演。

收到电报后，马戏团全体成员异常兴奋，当下便收拾停当，奔赴京城。所有的人员与动物都安扎在颐和园外，以防万一。而其演出的场所，则设在宫内，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马戏团的大帐篷就安置在昆明湖的西端，这里是一处开阔的田野，地里种着红萝卜，这些红萝卜都已经成熟，正是收获的季节，既然决定在这里安置马戏团，那么就需要先把这些红萝卜处理掉。于是，太后领着我们前往菜地，她亲手拔出第一个萝卜，随后格格、贵妇们纷纷上前采摘。若发现形状奇异的萝卜，便会献给太后。此时，黄色的龙椅已被安置在田野之旁，太

后悠然自得地坐在上面，欣赏着田园景色，神情怡然，她的脚下则是采摘下来的萝卜。而身着华服的皇后与格格们在田中忙碌着，享受着这田园之乐，丝毫不见疲倦之色。太监们则侍立在太后身边，将众人采下的萝卜分成堆，而他们自己显然自认为身份卑贱，丝毫不敢上前采摘萝卜。

最后，萝卜差不多都被摘完了，太后起驾回宫，立刻便有一队工人前来将田地整平，为马戏团的到来做好准备。

马戏团进宫演出的日子，定在下个月的初一，因为每逢月初，宫中必有戏剧上演，此乃惯例。话说这日一早，太后依照往常的习惯，一大早便前往戏苑看上几出戏剧，用过午膳后，便离开戏苑，来到昆明湖的东岸。因为从这里坐船，穿过湖面，是最便捷的一条道路。此时，许多游舫停泊在岸边，船上、岸边站着许许多多的太监，恭候太后驾到。这些游船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条幅，装饰得绚烂多彩。其中有一艘船，乃两宫所乘坐的御舟，装饰得极为豪华，船舱周边布以色彩绚烂的彩缎，桅杆上悬挂着明黄色的龙旗，太后与皇帝沿着大理石的台阶拾阶而下，登上御舟，只听汽笛高鸣，数十艘游舫一同向对岸行去。但见彩旗招展，随风舞动，蔚为壮观。

皇后和格格们都伴随在太后的身边，其他来访的女宾则分乘各个游舫，我也蒙太后眷顾，得以与之同行，这艘船的船舱，大小如同一座亭子，地面上铺着金黄色的地毯，舱中家具也是罩以金黄的绸缎，显得极为华贵。连廊直通船首，连廊两侧以丝绸屏风遮饰，秀美绝伦。还有一些贵妇站在船头，指指点点，兴奋不已。而太后则坐在一张软榻之上，身边围着几个贵妇，她们坐在垫子上，与太后一起尽情欢笑，毫无约束之感。显然，太后自然懂得，何时该表现得平易近人，何时该表现得威严可畏，这是最基本的为君之道。

这时，太后叫我到船舱中来，指着一些马戏团的照片，向我询问相关事宜。想来她早已知道我对马戏情有独钟。

她指了指软榻，叫我坐在她的身边。我当即推辞道：“在下怎敢与老佛爷平起平坐。”

太后笑道："但坐无妨，我晓得你们外国人不习惯坐在垫子上，你也不必像她们这般拘礼。"

我谢过圣恩，在太后身旁坐下，想起宫中诸人绝无我这般待遇，不由感慨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太后对我见爱，更因为她老人家想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事事都考虑到我在美国的习俗，其用心良苦，实在让人感慨。

船行如矢，水面泛起阵阵波澜。不一会，便到了湖西。皇后和贵妇们先行上岸，分立在两旁，恭迎太后。

当太后现身的那一刻，马戏团中军乐齐奏，以示欢迎。早有皇亲阿哥、朝中权贵恭候在岸边，一同向太后叩头请安，之后，便由几名勋贵在前面引领，数十名太监举着黄色的华盖、掌扇，簇拥着太后与皇帝，贵妇格格们紧随在后，身边也有许多随从，数百人浩浩荡荡，向马戏大篷走去。

当日，阳光明媚，天气晴好，使人感到更加愉快，马戏大篷门户大开，里面的设备华丽无比，彩旗飘扬，色彩明艳。看台上方覆盖着黄缎天幔，用以遮挡阳光。看台两侧，先来的贵宾分立两侧，恭迎太后。看台的最高处陈设着一张黄绸包裹的龙椅，旁边还有一张略小的椅子，不用问，那便是太后与皇帝的座位了。

这天到场的大约有两百多位官员，与往常不同，官员们的座位与太后的座位并未用帷幕隔开，以我所见，实乃首例。看台的右侧有两支军乐队，这些乐手都是中国人，而他们演奏的全部都是外国乐器，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细问之下，方知其中一支乐队乃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乐队，另一支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乐队。赫德先生的乐队早在十八年前就成立了，因为他喜爱音乐，便尝试着从欧洲买来一批乐器，然后请欧洲的音乐家前来教习，经过一年的训练，终于培养出一批技艺精湛的乐手。这支乐队约有二十人，所用乐器以管弦乐为主，演奏水平高超，一时间惊动京城，被许多朝廷大员艳羡，当下便有不少人效仿，也成立了私人乐队。其中便有袁世凯，他筹建的乐队规模更大，人数有五十多，以管乐为主，主要用作军事操练。两

支乐队交替演奏，声势浩大。



龙椅

虽然我在宫中待的时间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朝中勋贵大员，虽然在戏院听戏时他们也曾经到场，但是都以帷幕隔开，看不清面容。演出之后，他们叩头跪安后，也是匆匆离去，一瞥之下，无甚印象。现如今，我有机会仔仔细细地打量这些帝国的首脑人物。在座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人物，个个都是权势熏天。

按照中国的风俗，女子盯着男人看，是极为不妥的，尤其是在规矩繁多的上层社会。但是我是外国人，不用去理会这些规矩，而且我坐在前排，后面的人看不到我的神情，那些王公们也自顾自，很少注意到我。我便利用这个机会，仔细端详他们。这些人或老或少，或丑或俊，有的器宇轩昂，有的神情萎靡，不一而足。

正看着，几名王爷走上前来，向太后请安，之后便是几名贵妇、格格，这些都是皇亲国戚，地位显赫无比。在这些人中，有一位翩翩少年，乃恭亲王的儿子。此人肤色白皙，宛如珠玉，容貌昳丽，标俊清澈，一双美目，顾盼飞扬，一身锦服，更显其体态颀长，帽子上镶嵌着一颗明珠，灿然生光，腰间围着白玉镶嵌的革带，虽说只有十六

岁，然而进退揖让，谈吐之间，优雅无比，着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恭亲王权势煊赫，想来假以时日，这位阿哥必然会出人头地。容龄还告诉我，这位阿哥不仅生得俊俏，而且并无贵族子弟的骄奢淫逸之气，诗词书画、弓马骑射样样在行，太后对他格外器重，年纪轻轻，便被授予轻车都尉的爵位，在御前听候差遣。

马戏表演，在欧美本来很常见，但在中国却很少，是以宫中诸人从未看过，而且马戏大篷的布置极为新奇，所以兴致非常浓厚，即便是我，也是无比的兴奋。太后和皇帝都带着一副望远镜，上面镶嵌着珠宝，制作精巧而又奢华。当太后举起望远镜时，两个太监在一旁托着镜筒，尽心伺候。而皇帝则不需人服侍，始终自己举着望远镜观看表演。在我看来，皇帝与太后只对其中一些演出有兴趣。比如当动物们致敬行礼时，他们便显得非常高兴。当两个侏儒上来表演时，他们也觉得很有趣。其他的无甚出彩之处，二人便不太感兴趣。太后最为欣赏的是小狗们的表演，皇帝则喜欢马术表演。

皇帝在看马术表演时，正好我就在左近，他打量了我几眼，看看我是否也对马术有兴趣。后来他令一名太监用不流利的英语问我："卡尔小姐，你认为今天的马戏怎么样？"我自然极尽溢美之词。

太后一直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表演，一位表演空中飞人的女子在半空中向她致敬，更使她感到开心。不过，当一只老虎被抬上场时，却发生了意外的插曲。

原来，马戏团中豢养一只母虎，受过严格训练，能够表演各种绝活，马戏团老板打算让老虎上来表演，却被太后阻止了。一开始，老虎笼子被抬上场，太后怕老虎伤人，不许放虎出笼。她厌恶地看了一眼，便摆摆手，侍从们当即喝令老板将老虎笼子抬走。太后对于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比较厌恶，不唯独是老虎。

有传闻说，太后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10月，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农历羊年，故慈禧属羊。因有羊入虎口之说，所以慈禧不但怕虎，甚至忌讳"虎"字，再后来连所有的猫科动物都一并恼了。但她却喜欢养狗，狗的品种还特别多，退朝后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御狗

监”赏玩爱犬。据说是因为狗能看家护院，使虎无法叼到羊。

最后，演出顺利结束，所有的演员都走到前台，鞠躬致敬。之后，观众们依次退场，此时，两支军乐队同时奏响音乐，慈禧太后在众人的簇拥下，乘上御舟，御风而行。

紫禁城中的各位妇人，平日里规矩甚多，被森严的礼教所束缚，行走坐卧都没有一丝自由，日复一日过着相同的日子，平淡无奇。即便碰到了什么节日庆典，也无甚稀奇之处，早已看厌了吧。今日有缘观看有着异国风情的马戏表演，自然是开心不已。在我看来，上自太后、下到宫女太监，无不呈现出欣然之色。

第二十二章　与众不同的习惯

慈禧太后是一个习惯早睡早起的人，当然了，说到早起上朝，谁也无法和光绪皇帝相比。除了碰到重大的事件，各部官员有要事禀报，才会早早上朝议政，其他时间，大多都安排在七点钟开始，到中午十一点结束。

太后就寝时，一名宫女会在一旁侍候着，两名太监守候在寝室之外的次间[5]，四名太监立在门外，通宵站岗，以备不时之需。另有许多大内侍卫，轮番守备。太监和宫女每两天值一次夜班，只有深得太后信赖的高等太监才有资格进入太后的寝宫乐寿堂中侍奉。



乐寿堂

我只在颐和园中见过太后的寝室，占地并不大，不过十五平方左右，太后的寝床和中国北方大多数的床形式一样，设置得如同一座壁龛，三面围着橱架，安置着许许多多的书籍和古玩玉器。床上悬挂着

黄绸幔，幔上装饰着万寿吉祥文字和各种蝙蝠形状的吉祥图案，床前垂挂着的寿字帘特别新颖，让渴望长寿的太后百看不厌，时常爱抚，并在上床之后听讲故事时，经常摸着垂挂的帐带酣然入睡。

有趣的是，太后的卧床边安放了十五只钟表，一起走动，滴滴答答，聒噪声不绝于耳，足以使任何一个欧洲人为之疯狂，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太后竟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依然能够酣然入睡。

太后虽然喜爱花草，但是她的寝室中并没有摆放，倒是明间、次间摆放了不少鲜花果品，奇香无比，龙床前垂挂着流苏，并有精美花饰的帷幔，将卧床和外面的空间隔开，太后上了年纪，睡眠不是很有规律，她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便索性穿衣起床，到外面闲逛。尽管在我看来，大半夜起来溜达实在没什么意思，但是太后却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都呈现着独特的魅力，不同的时辰便有着不同的情趣，关键在于欣赏之人有无心境去享受。所以人们说，太后每年必有一次，十二个时辰不间断地巡游颐和园。

当太后夜游的时候，值日的太监便提着灯笼，跟在她的左右，但是太后并不需要灯笼，因为有的时候皓月当空，太后沿着幽曲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温柔恬静月光，将大地照得雪亮，世界完全笼罩在圣洁的气氛里，人的心灵也在这圣洁中升华。

无论太后夜晚睡得怎么样，第二天的早朝是决计不会漏过的，每到六点钟，她必然准时起床，准备上朝。这时候，宫女会呈上一碗热牛奶或是藕粉，用过之后，梳理整齐，换上朝服，朝服穿戴极为复杂繁琐，所以平时太后绝不会穿它，只穿简便的常服。

梳理整齐后，太后便来到明间，此时皇帝、皇后以及贵人们早已恭候多时，特来向太后请安。之后，太后和皇帝便一同来到仁寿殿，上朝听政。各位贵妇，也止步于殿外，直到散朝之后，太后换去朝服，再与众人一同游乐。



仁寿殿

我为太后画像，都是安排在她退朝回来之后，有时朝议把她搞得精疲力竭，便先去园中散散步，然后返回乐寿堂，处理一些后宫的琐事。有时太监会把当天采来的鲜花水果呈进上来，太后细细查看之后，便从中选出一部分，作为礼物，赐给臣下，剩下的则留给自己，并命人将其送往御膳房，由御厨调理。有时候，下面会进献新制的服装，或是化妆品之类，太后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一验看。

有时太后会玩一种游戏，看得出来，太后非常喜欢玩这种游戏，而且水平很高，罕逢敌手。这种游戏玩法很有趣，在一块方方正正的木板上，铺着白色的绸子，上面画着各种图案，分别代表仙界与人间。

游戏者使用象牙棋子，代表“人类”，力争进入仙界。游戏开始后，游戏者分别将骰子拿在手中，扔到一只玉碗中，根据点数的大小决定棋子的走法。在宫中，有时太后与格格、贵妇们玩，有时由太监来凑数，有两个首领太监，也非常善于此道。大家玩游戏是有彩头的，不过如果太后赢了，别人不需要掏钱赔注，而若是太后输了，其他人则会拿到彩头。而太后无论输赢，都会非常开心。不过太后手段

颇为高明，寻常人若想赢她，只怕不那么容易。我只见到三次，太后下棋下输了。每当太后要下棋，格格们都会特别开心，因为她们有赢钱的机会，却绝对不会赔钱。

可是有一次，太后与一群贵妇玩游戏时却动了怒气。原来一名贵妇心态不好，一旦下输，恼恨便面形于色，太后不由怒道："游戏而已，何以如此在乎胜负成败？看你喜怒哀乐，皆不加掩饰，平素肚量必然极小，这等鼠肚鸡肠之人，莫要再在我面前出现。"那位贵妇受了训斥，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出宫去。

慈禧太后垂帘以后，手握政权数十年，一切饮食服饰，奢侈绝伦。就拿其用膳来说，她每日里只吃两餐，即午膳和晚膳，其菜品大致保持不变，但是每顿大约有精馔一百五十种，列成长式，大碗小碟，相间排列。席间还有糖、莲子、瓜子、核桃等干鲜果品，为餐后掇食之用。至于质量更是没得挑，御厨都是全国数得着的名厨，手艺精湛，各有特长。所用原料是从各地采办的上品，米饭以玉田稻米为之，长及五寸，有胭脂、碧粳之名。每膳必备粥，乃至五十余种，稻粱菽麦，无所不有。这些菜肴，除了离她本人最近的区区几道菜，其他的基本都是凑数，装点老佛爷脸面的。这些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待她用餐完毕，或者倒进泔水桶喂猪，或者分给女官、宫女、高级太监们打牙祭。

中国皇帝之尊严，仅次于天。臣下以犬马声色迎逢着，自然穷奢极侈，唯恐不得主上之欢心。而皇帝则自以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区区数千百万金之供奉，自亦无所用其顾惜也。所以皇宫奢靡之习历来如此，并不仅仅是慈禧太后。

太后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只要她有需要，立刻便要菜肴端上来。至于其他的事情，也都是没有规律的，唯独两样，是雷打不动，那就是起床和上朝的时间。一般来说，太后午膳的时间大概在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这要视其退朝的时间而定，晚膳则也无固定的时辰。

太后特别喜欢吃点心，水果、糕点等各种零食都是她的最爱，有

时候她会在吃点心的同时，喝一杯热茶，或是牛奶、果汁。慈禧太后嗜茶成癖，特别讲究。泡茶用的水是当天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所饮的花茶不是经过火焙的茉莉、玫瑰，而是刚采摘的鲜花，掺入干茶里再泡入茶盅，饮起来既有茶香又有花香。慈禧饮茶用白玉茶杯。金茶托上放三盏白玉杯，中间是茶，两边是花。两名太监双手将茶托共捧至慈禧面前，口呼：“老佛爷品茗了！”慈禧方才饮用。



乾清宫

皇后与贵妇们用餐，并不与太后在一起，而是在自己的住所内。所以用膳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不必受太后作息规律的拘束。有时贵妇们吃完饭后，太后才开始设席。太后用过餐后，往往请皇后等人过来。大家虽然已经吃饱，但太后的面子怎好驳斥，只得再坐下来吃上一顿。皇后等人若在太后席上用膳，必然站立一旁，不得入座。按太后的说法，这是祖宗的规矩，不得随意更改。然而，若是我在场时，却能够得赐一座，想来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可以不遵中国祖宗的规矩，特加优待吧。

虽说祖宗的规矩不容更改，但太后也很体恤众人，当她吃好之后，便起身离开，或坐在内堂，让众人得以坐下用膳，不受约束。她若有事返回正殿，则放慢脚步，不发出声音，也不许太监在前面作引导，以免惊动在座的诸人，影响大家吃饭。

太后用膳时，坐在一方长桌的一端，坐北面南。桌上陈放着精美的碗碟，里面盛放着各式美肴，乳猪、蒸鹅、全鸡不一而足。开席之前，太监们须将当日的菜单呈献给太后，以示尊重，这一点倒和欧洲的习俗颇为相似。席上的餐具，多是明黄色的彩瓷，上面用精美的银制罩子覆盖着。当太后入座以后，一个太监会高声唱道："撤盖——"随即众太监一同应和，片刻间，珍馐佳肴便呈现在眼前。

太后的面前，放置着两只勺子、一只小碟、一只小碗、一双筷子，还有一方丝帕，用作餐巾。入座后，太后先用一根金制的别针将丝帕固定在胸前，以防油渍溅到衣服上。太后对美食的欣赏能力非常高，能够品味出每一道佳肴的特点来。而且，正如所有的美食家一样，她总是慢条斯理地进食，尽情地享受美食给她带来的快乐，风度极为优雅。太后从不在吃饭的时候饮用酒水。我只在两个场合见过她饮用葡萄酒，一次是一批新的葡萄酒被进献到宫中，她略微尝了尝，以作品评鉴赏。当太后吃完饭后，宫女立即捧来银盆、手巾、肥皂、香水，进行洗漱。

午膳之后，便是午休的时间了。太后回到寝室，侍读太监会为其诵读一段诗赋，以作消遣。午休大概要有一个半小时，无论太后入睡，还是只听太监侍读，她都会准时起床。起床后先整妆梳理，再与贵妇们一道前往园中游玩，游兴尽了，便是晚膳。每日皆是如此。

每逢初一、十五，宫中必会上演戏剧，这天退朝后，皇帝便不再直接回到寝宫玉澜堂，而是陪着太后与众贵妇们一道来到戏院观戏。演员们先是集合在一起，跪在地上叩头请安，恭祝大清朝千秋万代，太后、皇上万寿无疆，然后便开始演出。

初一、十五两天，太后与皇帝进用午膳和茶点，都在戏院中进行。太后坐北面南，皇帝坐在她的右侧，二人形成直角。

皇上吃饭的速度比较快，对于桌上的美食，只图果腹，不辨滋味。当他吃完之后，便侍立在太后身旁，或是在大殿内走上一圈，等候太后。

太后笃信佛教，每逢初一、十五，或是佛教节日，都会斋戒。在这些日子里，席上全无荤腥，完全是素菜。然而，即便是素食，也是精美无比，令人咂舌。满桌的鸡、鸭、鱼、肉，色香形俱佳，令人馋涎欲滴。可举箸品尝却叫人大吃一惊，继而拍手称绝，鲜活的荤菜原来全是素食，只是形似而已。斋戒的日子里，宫中诸人也随着太后一起斋戒，不过，如果我也在席上吃饭的话，太后会吩咐下人，为我准备一份荤菜，直到我对素斋也产生兴趣后，才不再单独为我备饭。

若是赶上盛大的节日或是听戏的日子，皇亲贵族和朝廷大员的家眷会被邀请进宫，一同欢庆，有时这些来宾会带着子女一同进宫，这些孩子大都只有十一二岁，我从未见过超过十七岁的男孩进入宫中。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十六岁的少男，一问之下，方知他是庆亲王的幼子。这些少年进入宫中，一切言谈都极为规矩，颇有成人的风范，彬彬有礼，由此可见其家教极严。太后虽然很喜欢孩子，但她对晚辈的管教极为严格，对孩子们的礼仪规范极为看重。每当孩童行礼姿态不佳，太后便令皇后示范教导，嘱咐孩童用心学习。孩童的父母也遵照太后旨意，回去严加教导，当其再次入宫觐见时，礼仪规矩，必大为改观。

一名出身显赫的女子嫁给了太后的本家，一次，这位贵妇进宫觐见，同时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当母女三人给太后请安时，那个五岁的小女儿不愿意受礼节约束，使起性子，竟然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太后并未开口，只是静静地观察孩子的母亲。太后喜欢小孩，可以容忍小孩子的无理取闹。然而，这个孩子太过娇惯，无论其母亲如何抚慰，都不肯停止哭闹。太后不由恼怒起来，对那名贵妇严厉地斥责道："咱们满人，最看重礼节规矩，即便是孩童，也要从小严格教导，懂得待人接物的礼数，你这孩子如此不济，早早带出宫去吧。"

那位贵妇大为窘迫，不由声泪俱下，恳请太后宽恕。太后正色道："孩童的桀骜不驯，完全是因为家教不严而致，今日之事，并非你女儿的过错，而是你平日太过放纵。一个人若要出类拔萃，必须从小加以训导，幼不知礼，将来如何能成大器？今日我便给你一个教训，你回去好好悔过吧！"

那名贵妇连忙磕头告退，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能进入宫廷。

第二十三章　太后的烦恼

近来一段时间，太后上朝议政的时间总是很久，退朝之后，显得忧心忡忡。每日都有许多奏折呈递上来，太后批阅之后，也是无比忧烦。有时她会将手中的事情放在一边，独自一人到花园中散心，这时，太监随从，一律不许接近。有时候，皇后和贵妇们虽然也跟在后面，但太后并不与她们交谈，只是心烦意乱地四处游逛，湖光山色，也只是走马观花，匆匆一瞥，便行离去。有时她长吁短叹，一言不发，还有的时候，太监会上来将加急的折子递给太后，她勉强一阅，再将懿旨传达下去。

如此焦虑地度过了许多天。一日我们照例外出游园，太后又是心神不宁，独自坐在牡丹山下，神色疲惫，长吁短叹，频频挥洒伤心之泪，贵妇们站在远处，不敢上前打搅，这幅景象，看起来着实让人心酸。我有心上前宽慰，但我久居大内，如同井底之蛙，对外界的事情所知甚少，竟不知如何开口，如何相劝。

后来看了天津过来的报纸，我才知道，太后烦心是因为和俄国交涉的事情。原来1900年庚子拳乱时期。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与此同时，俄国大举入侵东北地区，妄图独吞东北。后来经过交涉，俄国虽答应撤兵，但是1903年8月以来，俄国又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接着又重占奉天，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的架势。而日本也把东北视作嘴边的肥肉，怎容俄国独占。两国不断向东北增兵，日俄之间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战场，必然摆在中国的东北。太后平时所思所想，都是和此事有关。



日俄战争时期漫画

有一次，太后收到俄国照会，让她表明态度，到底支持哪一方，太后大受刺激。同时，广西传来大规模民变的消息，内忧外患，使太后心力交悴。然而，在皇帝和群臣面前，太后极力掩饰自己的感情，表现得冷静镇定，只有回到宫中，身边只有妇人时，才会显出疲惫忧虑之色。倒是皇帝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非常淡定，也许他内心深处焦虑无比，但仅从他的外表上绝看不出来，他永远是那么波澜不惊，有时候，他的嘴角边还会挂着浅浅的微笑，显得自信从容。然而，我从他黯淡的眼神中看到，皇帝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还是无比忧伤的。

转眼间到了岁末，11月16日是太后的诞辰，依照惯例，宫廷内外，都要大肆铺张，各级官员都会进献奇珍异宝，为太后祝寿。然而这次，太后决定一切从简，她还发布懿旨，禁止朝廷官员进献奢侈的寿礼。

在太后看来，此时正值多事之秋，国家飘摇动荡，《辛丑条约》议定大笔的赔款还没有着落，国库空虚，若是在此刻大肆铺张，显然不合时宜，而且政府财政困难，也无力大肆操办。在中国，老年人庆

贺寿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甚至像宗教仪式一样，神圣无比。即便是穷苦人家，也要想尽办法，为父母操办寿筵。这是一种传统，也是晚辈要尽的义务。尽管太后下旨不再为寿诞大肆操办，但是皇帝却不同意，坚持要将寿筵办得有声有色。皇帝甚至毕恭毕敬地恳请太后，让他来负责寿礼的置办，一切如以往一般，不做删减，并在以往的尊号上再加上两个字，以示尊崇与庆贺。要知道，按照清宫的惯例，每增加一个尊号，便要增加一万两千美元的年俸。

尽管如此，太后依旧坚持不再操办寿筵，只是和亲近之人一起吃个饭便成了。看得出来，相比为皇帝操办寿典时，太后的确是意兴阑珊了。然而，到了太后寿诞之日，宫中依然大肆铺张，太后虽然郁郁寡欢，这时也强颜欢笑，她在向人们暗示，东北那边的事宜磋商得比较顺利，中国很快便要收回在东北的全部主权，国家的前景是一片光明。总之，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万寿大典之日，虽说一切铺陈都已有所缩减，然而在我看来，其奢华程度，依旧令人瞠目结舌，太后被授予新的尊号，以彰显太后的圣绩。宫中装饰得富丽堂皇，各地进献的贺礼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甚至比皇帝的寿诞还要奢靡。

万寿之日，太后凌晨两点便来到万佛寺，接受群臣朝贺。之所以如此之早，是因为太后出生的时辰便是凌晨两点；之所以选择在万佛寺，而不是平时朝议的仁寿殿，是因为只有皇帝才能在朝堂上举行寿诞大典。太后虽然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然而也不能破例，只能在其他的殿堂中接受朝贺。众人纷纷来到山下、寺前，首先是皇帝和皇后率领皇室宗亲，向太后朝贺。接着，群臣纷纷向高高在上的太后顶礼膜拜。

时值隆冬，朔风凛冽，然而宫中一片喜庆之色，丝毫不因天气恶劣而扫人兴致。一条大红色的地毯，自昆明湖的岸边，一直铺到万佛寺的门前，宛若一条火红的巨龙自水中腾空跃起。御座之前，摆放着三对巨大的银质烛台，每一只烛台上都插着一根硕大无比的蜡烛，这些蜡烛高约五英尺，重约五十磅，烛身是明黄色的，上面雕刻着张牙

舞爪的金龙，灼灼燃烧的火焰，将大殿映得通明。周围的檐廊下，悬挂着数以千计的红绸宫灯，下面悬垂着金黄色的穗子，每一盏灯笼上都书写着“万寿无疆”四个字，数千盏灯一同点起，远远看去，灿若星河，夺人心魄。至于其他的铺陈，都和皇帝万寿大典时相仿，只是在规模上，要远远胜过昔日了。

朝堂之上，座无虚席，前来朝贺的宾客，有许多竟是不远千里，从东北赶来，那里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这些人的身份，自然也非比寻常。宾客们身着冬季礼服，上面绣着金色双龙，边上镶着各种毛皮，颈中戴着黑貂绒围巾。妇女们的发饰，冬日和夏日倒没太大区别，只是这时节已然看不到了，她们头裹皮帽，帽子上镶嵌着各种珠宝，极尽富贵之能事。

在中国，庆贺生日的同时，也会伴随着祭祖大典，所以每逢万寿大典，太后必然要回京祭祖。这个传统，实在是令人疲惫，但却必不可少。我听人说，现在是多事之秋，日俄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太后的六十九岁生日虽然操办得热热闹闹，但是她始终挂念着国事，心中焦虑无比，难以提起兴致。

有趣的是，许多外国人众口相传，太后举办生日庆典曾遭到许多人，尤其是皇帝和皇后的反对。因此，太后在生日当天，迫使二人跪在她的面前，以示羞辱，同时为了展现她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实，在中国，儿女跪在父母面前以示尊敬，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免俗，如果皇帝不这么做，那么他就会被视作不孝，传将出去，普天之下，都要视其为无道昏君。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的哥哥，因此，太后不仅是光绪皇帝的伯母，而且是他的养母，也是由慈禧一手扶上皇位的。光绪皇帝四岁时，便被接进宫中，当了皇帝，从那以后，太后将其视为己出，尽心尽力地抚养、调教，其养育之恩举世皆知。两人的感情也非比寻常，皇帝管太后叫“亲阿玛”。而在中国，即便是养子，也应该把养父母当做亲人来赡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经作了一首诗，特意赞颂光绪皇帝的孝道。

第二十四章　冬天到来

颐和园是太后最为喜爱的宫殿，说起来，当年庚子拳乱，引来八国联军侵华，紫禁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这成为太后挥之不去的痛楚，每忆及此，便不由潸然泪下。为了不触景伤情，太后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颐和园中度过的。只有到了冬季，天气极冷时，才会返回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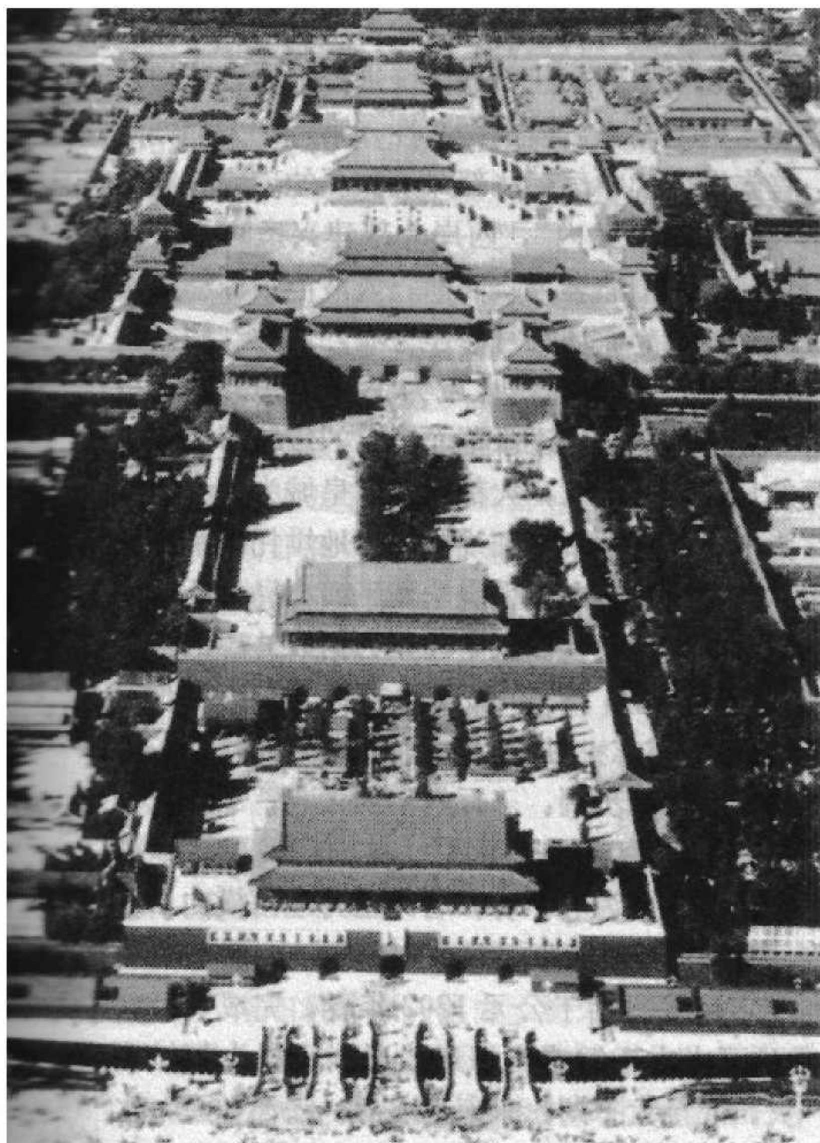
颐和园的宫殿中本有取暖的设施，宫室的地面之下挖砌火道烟洞，使之串通遍地而顺于室外，生火后烟火串满炕洞，遍热地面，暖气腾腾而上，室内受热均匀，且不烟不呛。然而太后并不喜欢使用这种地暖，只用小火炉便足够了。小小炉具，不能够向宽广的大殿供暖，整个宫殿，还是寒冷彻骨的。太后对此并不介怀，她似乎并不怕冷，仅凭自身体质便能耐得住朔寒。而且她身披重裘，安居深宫，不会被寒气侵袭。

然而，到了冬天，朝中的官员可就苦了，北京的冬天特别寒冷，官员们觐见太后或是上朝议政，都要一大早起身，冒着凛冽的寒风，大老远地从北京城赶到颐和园。虽说有些权贵在颐和园附近置下房产，可以住在里面，但是更多的官员并没有这种条件。为了体恤臣子，太后便在严冬到来之时，回到紫禁城，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才会移驾颐和园。

太后寿辰过后，天气渐渐变冷，众人也开始着手准备搬回紫禁城。这时皇后建议我先到美国使馆去住上一日，等宫中安顿好了，再搬过来。于是，我便向上次一样，提前离开颐和园，临时下榻于美国使馆。临行时，皇后又嘱咐我，次日一定要早早赶来，恭候太后驾到。依照惯例，太后移驾别处，皇后、格格、贵妇们都要提前出发，先行到地，换上盛大的礼服，列队恭候。

太后銮驾回京的日子，定在1903年12月的一天，这天的天气是极为典型的北京天气，空气清新，万里无云，恰如香槟一样使人陶醉，直让人产生一种幻觉：生活在这样的气候中，简直可以长生不老。据说，每次太后出行，天气都非常好，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女王天气”一样，太后出行每每如此，福气实在不浅。

北京城城池由三重围墙组成，最外面的叫做“外城”，其次为“内城”，最里面是“皇城”。而紫禁城则在皇城之中，周长六里，城墙高七点九米，内外砖砌，外围护城河，四隅角楼，巍然高耸。城四边都有高大的城门楼，城内宫殿建筑布局沿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红墙黄瓦，画栋雕梁，金碧辉煌。殿宇楼台，高低错落，壮观雄伟。朝暾夕曛中，仿若人间仙境。



紫禁城

紫禁城并非是“紫色”的，其名称系借喻紫微星坛而来。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根据对太空天体的长期观察，认为紫微星恒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那里，是天帝所居。因而，把天帝所居的天宫谓之紫宫，有“紫微正中”之说。而“禁”，则更容易

为人理解，意指皇宫乃是皇家重地，闲杂人等不得来此。由于时间的流逝，原本朱红色的宫墙渐渐褪旧，呈现出一片紫灰的颜色，这倒也符合“紫禁城”的名称。我们走过石桥，进入宫中，绕过煤山，经旗军营，一直前进，穿过许多道守卫森严的宫门，这些大门上布满铁钉，数一数，都是八十一枚。中国人把一、三、五、七、九这五个奇数叫做天数，剩下的偶数就是地数了。皇帝常常说自己是天子，所使用的就应该是天数，天数里面最大的数字就是九，所以大多数的城门和宫门都是选择了九九八十一颗门钉，象征最高的等级，用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路上，还能看到许多小房间，这些是大内侍卫轮班休息的场所。每间房子的窗格子上都用白纸糊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陈设极为简单，只是一张大炕，这是典型的北方的床，多是用砖砌成，中间空心，上面以泥抹平，泥干后上铺炕席，或者铺一层厚羊毛毡，毡上再铺一张专用油布。寒冷的冬天在炕下面生火，会提升整个房间的温度。人睡在炕上，又暖和又舒服。

我们的轿子停在一道大门前，我们纷纷下轿，换乘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红色轿子，继续前进。又经过许多道大门。沿途景象极为华美，地上铺着白色的大理石，周围高墙环绕，仿佛与外界隔绝一般。最终，我们停在一座华美的大殿前，殿前松柏苍劲，郁郁葱葱，虽是严寒，却依然显得轩昂挺拔，傲然矗立。皇后和格格早已等在殿前，她们身着朝服，翠珰明羽，在阳光的照射下，灿然生辉，光彩照人。我穿着一身素朴的礼服站在她们中间，真有些别扭。

忽听一阵铜锣，紧接着擂鼓放钟，宫门全部打开，不问便知，这是太后与皇帝驾到了。我极目眺望，只见一百多名太监列成两队，簇拥着两宫的驾辇，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太后坐在一顶开放式的轿子中，因为她素来不喜欢那种全封闭的轿子，嫌其密不透风，视野也不够开阔。此时，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偌大的宫城内鸦雀无声，默默地站定身子，直到太后的銮驾来到近前，众人纷纷俯身叩拜：“老祖宗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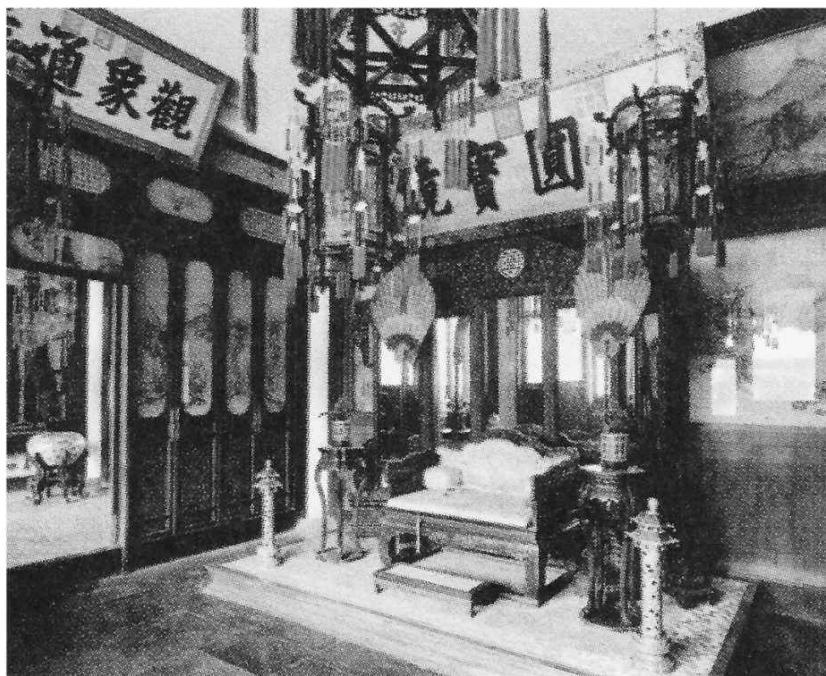
我随其他人一起附和着。太后的轿子落定后，她缓缓走了下来，我向她鞠躬致敬，她伸出手来，和我打了招呼，笑道："希望你在这里也能感到舒心，只是这里的景色，可要远逊于颐和园了。这里有这么多围墙、大门，好似囚笼一般，让人很不舒服。"

寒暄过后，太后迈入正殿，众人紧随其后。这座宫殿在一处花园之中，地势平坦开阔，莳花种树，叠石垒池，不费跋涉之劳而得山林之趣。周边还有十余间精致的小馆，都覆盖着绿琉璃瓦，布局规整严谨却略显单调，主要依靠内部精巧的装修和院落中的水池、山石以及品种繁多的花木来烘托浓厚的园林气氛。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储秀宫的外檐装饰采用色泽淡雅的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储秀宫外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廊壁上刻有大臣们工笔楷书的歌功颂德的颂词，把整个庭院装饰得庄严古朴。

我随着太后走进屋子。由于太后的到来，这里早已摆放了许多鲜花和各式水果，阳光透过窗子，铺洒在地面上，太阳的气息充斥在空气之中，伴随着浓郁的花香，使人陶醉。与此同时，我还嗅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循着走过去，发现一间小佛堂，一尊佛像前，三根细香已被点燃，青烟袅袅升起，燃尽的香灰掉落在塑像面前。

显然，太后早已安排人在这里祭祀神佛。此时，太后双掌合十，虔诚地拜了拜。然后转过身来，由侍女将外套脱去。我知道，太后很乐意我四处参观，我也不再客气，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这座殿堂装修精巧华丽。正间后面是楠木雕纹玻璃罩背。罩前设地平台一座，平台上摆置紫檀木雕嵌寿字镜心屏风，屏风前设宝座、香几、宫扇、香筒等。宫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福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内檐装修精巧华丽。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五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东次间南部设木炕，北部落地罩内为翘头案、桌椅；东梢间南部设木炕，北

部为八角罩；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次间南北部均设木炕，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南部设木炕，北部为寝床。当然，必不可少的，许许多多的钟表便安置在这座宫殿内。



慈禧曾居住的储秀宫

令我惊奇的是，在一面墙上竟然悬挂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画像中，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亲王站在一起，他们的子孙环绕而立，显得极为和睦。其实，早在颐和园时，我便听说过，太后对维多利亚女王极为推崇，认为自己与她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同样身为寡妇，同样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维多利亚女王活了八十二岁，在位时间也极其长，太后显然希望自己与她一样。

有一次，太后和我聊天时，我无意间提起我曾经见过许多英国皇室成员，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曾见过，太后不由吃了一惊。当然，其实那只是一个巧合，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经常坐着敞篷马车在白

金汉宫外面巡游，所有的臣民都可以一睹她的风采，并非为我一人安排的会面。太后听了以后，不由哑然失笑。

太后告诉我，她有一间佛堂，每逢特别的日子，便会有一些喇嘛在佛堂里为她诵经祈福。她还专门引我到这间佛堂参观，佛堂设置在一座阁楼中，里面灯光幽暗，安宁静谧，颇有一种神秘的氛围，非常适合在此冥思、参禅。

在东、西、北三面墙壁之内，随墙砌有须弥座台子，三面转角相连，每层做出隔架以供佛像，与墙壁上的佛像挂龛连为一体，挂龛上设金漆毗卢罩，三面通连，与佛像、挂龛共同组成了一处妙高庄严的佛法世界。佛堂正中安放着一座高坛，上面供奉着一尊工艺精美的黄金佛像，佛像正前方是座高高的烛台，也是由黄金铸成，上面还镶嵌着珍珠、宝石，华贵无比。另有一尊掐丝珐琅花瓶，釉色艳丽、洁净，上面的花纹图案是以金丝制成，还有一座嵌金鎏金香炉，袅袅的梵香正从炉中缓缓升起，散发着阵阵幽香，地上铺就明黄色的地毯，周边悬挂着幡幢，墙壁空隙处设有唐卡，整个佛堂的布置颇具藏传佛教特色。窗格的遮光性能比较好，纵使在白天，这里也极为幽暗，黄金珠宝却闪烁着灿灿的光芒，将整间佛堂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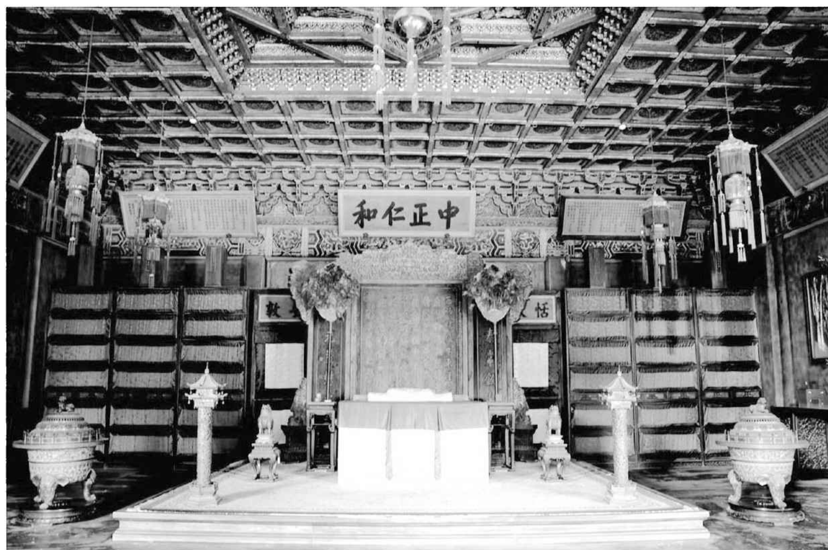
太后是如此笃信佛教，将这间佛堂打造得富丽堂皇，这也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有意向我展示这一切，我当然也是啧啧称赞。不过我想，这座佛堂不是正如她驾驭的清国一般么，昏暗、幽冥，看不到将来该走向何方。

太后还带我参观了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二百年来，中国的皇帝多在这里进行日常活动，包括处理政务。养心殿的前殿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大臣、学习与休息的场所。正门设有宝座和御案，还有书橱，内藏历代皇帝治国经验教训等记载与书籍等。皇帝们经常在这里召见大臣，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臣。

养心殿为工字形殿，前殿面阔三间，为了改善采光，养心殿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皇帝的宝座设在明间正中，上悬雍正御笔“中正仁和”匾。明间东侧的“东暖阁”内设宝座，向西，这里曾

经是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处。当时小皇帝坐于前座，太后坐于后座，两座之间由一道黄色纱帘隔开。所有的决策就由黄色纱帘后的太后们作出。

明间西侧的西暖阁则分隔为数室，有皇帝看阅奏折、与大臣密谈的小室，曰“勤政亲贤”，还有小佛堂、梅坞，是专为皇帝供佛、休息的地方。



养心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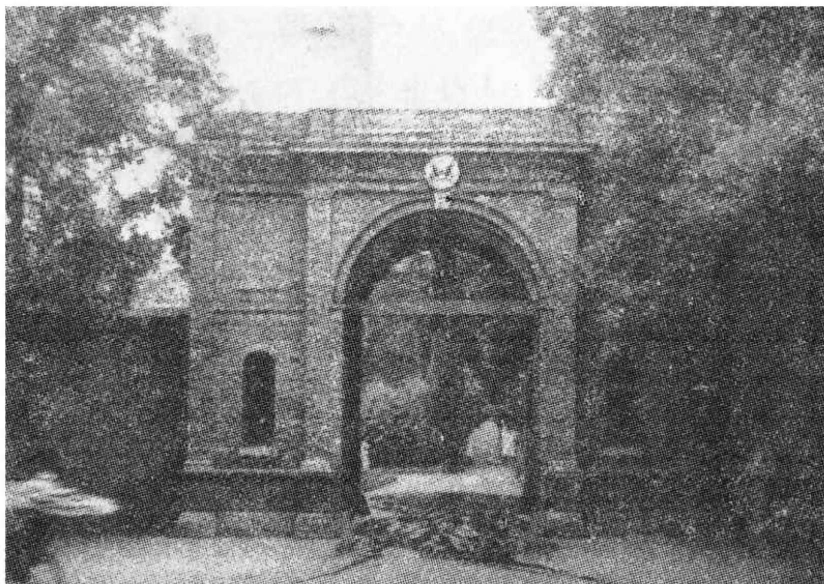
此外，我还参观了许许多多的建筑，如果要和颐和园作比较的话，紫禁城坐北朝南，以大殿为主体，取左右对称的方式排列诸殿堂、楼阁、台榭、廊庑、亭轩、门阙等建筑。屋顶多用金黄色，立柱门窗墙垣等处多用赤红色装饰，檐枋多施青蓝碧绿等色，衬以石雕栏板及石阶之白玉色，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体现了皇室的尊严。而颐和园的建造，则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形成一幅优美的风景画，更适合人休闲怡情。两相比较，确实难分出高下，不过我更愿意住在颐和园中。

当我还在颐和园时，便有人告诉我，太后已经为我准备了一间书

房，这里光线充足，极其适合画画。我听说后自然极其高兴，可是当我走进书房时，不由大失所望，这里虽然十分宽敞，然而采光却非常不理想，依然显得很昏暗。我颇觉怏怏不快，不过事已如此，只能去适应了。

第二十五章　北京杂忆

各国的驻北京大使馆，大都设置在北京城的内城中，1903年，美国使馆尚未落成，因而先驻于一座庙宇之中，庙宇在北京水西门内，毗邻运河。说起来，1900年庚子拳乱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自那场动荡以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庚子拳乱后新落成的美国使馆

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清晨，我从美国大使馆出发，前往颐和园，一路沿着运河而行，途中还经过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看上去要恢弘气派得多。再往前，古老的石桥，蜿蜒狭长的街道，青石铺就的地面，高大雄伟的城楼，还有朱红色的皇城，都令我倍感新鲜，目不暇接。

中国人对城墙似乎颇为重视，在修葺城池上花了不少工夫，别的

不说，但就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便可以称作世界奇观。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造就如此恢宏的建筑来。而中国的每个城镇，几乎都有城墙，还有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构造极为复杂，每一座都堪称建筑艺术的奇葩。而皇帝居住的宫城也被修建成堡垒的样式，更有甚者，民间许多富裕的人家，也会修建坞堡，这样住进去才会有安全感。

这些坞堡外观颇似城堡。四周常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可以眺望远处。之所以中国到处可见城池堡垒，我想，和旧时战乱频繁有极大的关系。为了防范盗贼和游牧民族的劫掠，人们必须聚族而居，大兴土木来保卫家园。一般来说，中国的城市中必有一条宽阔的主干道贯穿整个城市，在城市中心，会有一座高大的台子，用以公众聚会时使用。每逢节日盛典，道路上便会铺上涓涓细沙，穷人、富人，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纷纷赶往中心广场，参与盛典。这种场景，曾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位深受忽必烈大汗信赖的外国人曾经游历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描述极为详细。

然而，中国的城市也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公共卫生实在糟糕。来自各地的商人将衣服、家什、蔬菜摆在路边，高声叫卖，聒噪嘈杂；摆着摊子的小贩在锅里烹炸着各式各样的吃食，发出怪异的气味；理发师便在路边为客人理发、修面，一阵风吹过，须发四处飞扬；有的甚至把摊子摆到大路中间。你还能看到流浪的猫、狗、家禽，甚至猪也会赶来凑热闹，在人群中拱来拱去，地面上到处都是脏水、垃圾，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总之，这种景象实在令人抓狂。

不过，中国的城市还是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比如街边挂着金字招牌的老店，掌柜的和伙计气定神闲地招呼着客人，有的店铺还悬挂着夺人眼目的幌子，随风招展，有的小贩撑起巨大的伞，发出悠长的吆喝声，倒也独具特色。至于北京城，更多的是华丽的轿子和马车，毕竟天子脚下，有所不同。

大使馆主要和外务部打交道，当然，有时候也要和其他衙门的人员来往，我在这里便有机会见到一些高官。我曾见过一个坐在绿色的轿子里大胡子的官员，长得有点像犹太人。有人告诉我，这便是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此人是慈禧太后的本家，深受太后器重，如今刚刚接手外务部，可谓前途无量。

有时候，透过大门，我还能看到簇拥着大红花轿的迎亲队伍，披红挂彩，欢天喜地地通过门前；有时是抬着灵柩的送葬队伍，死者的家属披麻戴孝，哭哭啼啼；有时能看到身披黄色袈裟的喇嘛，从皇宫的方向走来，那是他们刚做完法事；有时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骆驼，驮着煤炭等货物从远处缓缓走来。我们还看到每年一度的蒙古王公的入京觐见，整队人马都穿着蒙古皮袍，或骑骏马，或骑骆驼，其坐骑都打扮得华丽无比。这些蒙古王公进京之后，都会被安置在皇城中，这些我已在前文说过，不再赘述。

在皇宫门外，竟然还能看到乞丐行乞，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实在有碍观瞻，在森严的紫禁城前，显得太不和谐。然而太后并没有派人将他们驱逐开，反而下令，每天都将宫中的残羹剩饭分给他们。宫中运出的垃圾，也允许穷人先去搜寻，然后再尽数拉走。我经常能在皇宫门前看到这些破衣烂衫的乞丐，守卫宫门的士兵也没有对他们恶语相加。在我看来，他们至少生活得比较平静，不会担心飞来横祸。

我在美国使馆过了一夜，便赶往宫中叩见太后。然而，我发现这里的画室光线更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暗无天日。我不由大为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先画上几日。后来，我实在画不下去了，只好把情况告诉李莲英，因为太后对我关怀备至，我早已感激不已，加上近来东北那边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太后整日为之愁眉不展，我怎能以这些琐碎的事情麻烦她老人家呢。但我又不愿意在宫里耽搁太多时间，为了早日将画作完成，我私下里自作主张，请太监将我画桌前的窗纸换成玻璃，这样光线自然充足了。但李莲英连连摇头，说若是如此，费用先不说，以前宫中全是窗纸，若是换成玻璃，实属开创先例，这种事情不是他们能够做主的，若不先禀报老佛爷，他们是决计不敢擅

自作为的。

他这番言语，也在情理之中，我便没有与其纠缠。第二日，太后走进书房时，我便将我的苦衷全盘托出。太后四处打量了一下，也感到屋里的光线实在不是很好，当即应允了我的要求。两天后，画室中的窗纸全部换成玻璃。如此一来，屋里焕然一新，非常适宜我作画。我的画室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家具，我请太监们将这些家具堆在墙边。如此一来，又出了问题。其中有一座巨大的自鸣钟，一百五十年前被安放在这里，始终没有移动过，太监犹豫是否该移动它。不过在我的坚持下，终于将画室清理整齐了。

虽说经过清理，但这间画室并不是很大，不过却是个很理想的画室，首先这里的光线非常充足，其次这里很安静，因为这里离太后的寝宫比较远，距离格格、贵妇们的卧室也有一段距离，平素很少有人来打搅，非常安静。

在我的卧房中，有一套欧式家具，这是太后特意送给我的，虽然并不是很精致，更谈不上艺术感，而且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但使用起来非常舒服，坐卧上去，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我对太后的感激之情也更深了。

我在新的环境中安顿好之后，太后开始和我讨论新的事宜，她希望我能够为她画一幅大型的肖像画，把人像周围所有的布置都画进去，包括一台风扇，一扇绘有九凤呈祥图的三叶屏风，还有许多奇花异草、新鲜花果。我当然没有异议，但提出在落笔之前要仔细揣摩一下，并确定到底要画哪些东西，好确定画的尺寸、布局，以免动笔之后，再增添麻烦。太后欣然同意，当即告诉我她的心意。我于是在小书房中仔细地筹划一番，基本上构成了一个草图。

不日我便开始画大型肖像画了，我一直想把太后坐的一张龙床画进去，因为那张龙床精雕细琢，造型精美，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然而太后并不以为意，在她看来，这张龙床颜色暗淡，线条也不称心，最重要的是它“不合适”。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所有的礼节都具有宗教性，一件事是否“合适”，要看其是否遵循传统，是否违背礼仪。至于

这张龙床为何“不合适”，我一直都没闹明白。不过既然太后坚持，那我便遵照她的意思办好了。

我终于开始动笔了，太后头上佩戴着各式珠宝，光彩照人。身穿一套冬季朝服，里面是一件毛皮长袍，上面用彩色绒线，及金、银线绣出金龙、海水及行云等图案，极为华丽。外穿黑色长袍背心，衣襟缀着一串珍珠，个个圆润光滑。一双精致的纤手在袍袖中若隐若现，指甲上的指钉闪闪发亮，一只手平放在腿上，一只手拿着一条蓝丝手帕。现在想来，其实这些首饰再美，不过是外在的东西，而太后的那双手堪称世间尤物。



慈禧画像

我非常希望将太后的双手展现出来，便请德龄格格转述我的心愿，不料太后却认为把手画得太细致，有失体统，当即拒绝了。我只好顺其意旨，动笔作画。现在想来，若能将太后的双手呈于画上，那该多好。不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我的草图很快便打好了，太后看后，啧啧称赞，甚为满意。接着我们便讨论成像的尺寸。我提议将画像画成五英尺宽八英尺高，太后想了想，道："还是大点好，依哀家看，还是六英尺宽，十英尺高为好。"

我接受了太后的意思，当即请宫中的木匠为我打造一张画架。中国人真是心灵手巧，我仅仅把画架的样式略微一说，他便心领神会，没过多久，便打造出一副令我非常满意的画架来。但是如何将画布安置在画架上，中国工匠便不知道了，太监们笨手笨脚，无论怎样，都不合我的心意。看来这需要我亲力亲为。

由于画布太大，我必须站在一张六英尺高的凳子上（宫里没有画画专用的梯子）来安置画布。这时节，一群太监站在我的身边，或拿着锤子，或捧着钉子，为我打下手。我每一发出命令，领头的太监便高喝一声，让其他太监遵照执行。若有怠慢，当即便会受到鞭笞。最后终于将画布安置好了，而太后听说如此粗重的差事竟由我亲自料理，便责成李莲英将办事的太监聚在一处，狠狠训斥了一番。又告诉我，这种差事让太监们做好了，若是不会，学上个四五次也便成了。此话虽有道理，只是我此番东来，所带的画布不多，实在不够让这些人去练习如何安置。

第二十六章　满族风俗之我见

我在宫中逗留的这些日子中，因为赶上几场盛典，例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万寿日，中秋节以及其他的日子，总有许多王公大臣家眷们进宫觐见太后，我便有了许多机会和她们接触，甚至可以把盏欢笑，倾诉心扉。比如常常进宫的庆亲王的格格、几位亲王贝勒的夫人，老醇亲王的遗孀及女儿们。

已故的总理大臣荣禄有一位遗孀，叫做瓜尔佳氏，也经常进宫，这位可怜的女士一年内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悲伤憔悴，几近于疯癫。



从左往右依次为瑾妃、德龄、慈禧、容龄、裕庚夫人、隆裕皇后

总的感觉，这位瓜尔佳氏并没有什么魅力，太后对她也不见有多少宠爱，只是太后念其情景悲凉，特别关照她。荣禄夫人膝下有一名

养女，业已长大成人，嫁给了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为妻。因为光绪并无子嗣，如果他们能生下儿子，倒很有希望将来入承大统[6]。

按照宫里的规矩，凡王公之家娶亲后，其姑母或是最近的女亲，应带其进宫，朝见太后与皇后。这与英国的贵族新娘也要朝见女王、王后大抵相似。进宫之日，新妇总要盛装打扮，坐上红色的轿子，来到宫中。这种场合，新人必会打扮得珠光宝气，相比较下，满族的礼俗规矩不比汉族那样有许多繁文缛节。就拿首饰来说，有的汉族贵妇要在胳臂上戴上十五对镯子，发髻上插满各式各样的珠宝，简直再无立锥之地。

进了宫后，新妇先来到太后面前，行礼参拜，叩谢太后赠赐的礼物。有时太后会将妇女应遵守的礼数一一告诫于她。参拜完太后后，新娘便到皇后御前朝拜。之后再由皇后和格格们领着，在宫中参观游览，共进午餐，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结束朝觐。

这些女孩，大都青春年少，有时我会很奇怪，为何她们年纪轻轻，便迈入婚姻的殿堂，之后相夫教子，失去自由的乐趣。不过据我观察，东方的女性，大都结婚极早，这也许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缘故吧。

这些新妇进宫时，总会受到皇后热情地接待，大家欢庆一堂，其乐融融。我借机对这些新妇进行观察，觉得以光绪幼弟的妻子最为艳丽，容貌秀美，举止大方，在各方面都胜过她的婆婆，醇亲王的福晋。

由于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满人重男轻女的观念颇重，他们把没有男丁视作家庭的不幸。即使女儿长大成人，也享受不到与男子一样的权利，甚至不能参加对祖先的祭祀。当然，满人的风俗与汉人还是有所不同的，起码未婚的女子在自己家里是极为自由的，而且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独立人格。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伍廷芳曾经告诉我：“美国未婚女子在家中的地位如此之高，我纵观世界，鲜有能及者，唯有满人家的姑娘，可与之媲美。”

此话绝非妄言，满人的女孩只要未婚，在家中便享有一定的权力，甚至不亚于她的兄弟，比起她的嫂子，地位更高。纵使她的嫂子年纪比她大一倍，或者长嫂进门时她还没有出生。

有时，少女的权力地位甚至高于其母亲。究其原因，想来其具有父系这边的血统，而其母亲、嫂子则没有家族血统。她不仅有一定的家庭地位，甚至在财产分配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长女的同意，其父亲便不能随心所欲地将家庭财产分配给儿孙。其在娘家，可以管理家政，教育晚辈，其嫂不得干涉，因为她与她的兄弟有一种天生的血缘关系，在这个家庭中自然有说话的分量。而她的嫂子却只能算个“外人”。即便是其出嫁之后，回到娘家时，也不减当年，在处理家事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想来，这是因为满人对血缘关系更为看重。

未婚的满族女孩不仅在家庭中享有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也比其他的东方民族较为自由。她们可以和外界自由交往，不怎么受到礼法的约束。虽说满族妇女的文化水准比不上汉族妇女，但是她们的社会交往和处事能力却极高，她们的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言谈举止不失礼仪，待人接物非常大方得体，大有欧美女子之风。我与她们交往，颇为开心。



清代贵族妇女照片

一个满族少女的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性，她们不会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如果不愿意出嫁，尽可以留在家中，依然受到别人的尊重。不会因为无所归依而变得凄凄惨惨。相反，到了晚年，人们还会为她立一座牌坊，以表彰她一生的贞洁操守。

如果某位女子步入中年，忽然想结婚了，别人也不会有所非议，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在大内便碰见一例，一般说来，进宫朝觐的新妇多是年轻女子，但有一次我见到一名四十二岁的新娘。这位姑娘的本家侄子都已长大成人了，许多还是她抚养长大的。她在四十岁之后，忽然产生嫁人的想法。于是，她便嫁给了一名官员，这位官员

两年前妻子过世，留下许多孩子，这位官员也想娶一个贤内助操持家庭，抚育子女，所以一经别人说和，两人便成了夫妻，过得倒也美满。不过如果这位妇人曾经立誓要终身不嫁，家中早已为她备下了贞节牌坊，倒也说不定呢。

进宫朝见太后的贵族子弟一般不会超过十七岁，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便是成人，奏请之后得到恩准方能进宫。以往王公大臣进宫听戏时，虽与太后同坐一堂之中，但皆有垂帘阻隔，彼此之间互不能视。只有那次欧洲的马戏团进宫表演时曾经破过例，因为那天在草地上举行，垂帘隔阂多有不便，我也因此能够对那些王公大臣们作一番仔细的观察。

一般说来，满人的体格要比汉人健硕一些，体力也较强一些。想来他们是靠征战起家，比较看重武艺，许多人自小练习弓马骑射，不像汉人那般重文轻武。据专家考证，马球这种运动，是英国人从印度学来的，而印度的马球运动又是来源于东北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现在，马球运动依然在满族人中盛行，但我从没见过。不过我曾经见过一些满族贵族纵马扬鞭，绝尘而去，尽显其马上英姿，想来打起马球来也不会太差。一个满族贵族继承爵位以后，便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弓马骑射。尚武的精神，使得满族人的先祖从亚洲东北一隅崛起，迅速地征服了中国广大地区，建立清朝。然而，正如同匈奴人当年占领欧洲以后便失去了尚武征戎的精神，变得孱弱起来。现在的满族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朝廷上下早已是文恬武嬉，一片萎靡之象，不复当年入关时的景象了。

满族人身着长袍马褂，薙发垂辫，这都是当年征战生涯留下来的印记，他们入关后，也强迫汉人做此种打扮，所以单凭衣着上是分不出彼此的。清一色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筒靴。夏天戴着草、藤编成的凉帽，冬天则戴着皮帽。从皇帝以下，每一级都在帽子上镶嵌不同的宝石，以显示其身份。比如皇帝的朝冠上镶嵌着东珠，一品大员是红宝石，二品是镂花珊瑚。同时能彰显身份的，还有顶戴后的花翎，这些花翎使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

满族贵族，在冬天都会穿上皮毛大衣，贵重者如黑貂、紫貂。但是中国人的习惯，是将有毛的那一面穿在里面，做衬里用。颐和园上演马戏的时候，天气还比较暖和，很多人还穿着夏服。绫罗绸缎突显无比富贵，许多人衣服上都绣着双龙纹饰，衣服的前摆垂到膝盖以下，玉带束腰，因为很多人操习弓马，年纪虽高，身材却不容易走形，显得极为匀称。至于一些纨绔子弟，总喜欢弄些奇装异服穿在身上，显得颇为轻浮。这种人，素来不为太后所喜爱。



皇帝御用马鞍

男子的腰带非常华贵，即便是平常穿着，都很有讲究，腰带佩系用红香牛皮所制，饰金花银环，缀有银质花纹佩囊。挂环上系挂刀、荷包、罗盘、牙签筒、火镰袋之类的东西。这些可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必不可少的物件。中国人又是如此喜爱玉，只要有条件，几乎无处不用玉来作装饰，帽子上、腰带上、衣服上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看到有些人腰间戴着一枚玉佩，晶莹剔透，圆润光滑，实在是一件珍宝，而玉的主人，也将其视作自己的性命一般。

至于满族妇女的服饰，和汉人大不一样，她们身穿长袍大褂，如同男装，只是腰间并无束带，从肩到腰，无什么变化。看来汉人细腰的风俗，并未被满族女子接受。



清代妇女服饰

纳妾的风俗，通行于汉人和满人之间。纳妾，在基督教社会，是非法同居，然而在中国，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是中国的文化。当然，一个男子只有一个妻子，其余的只能称为妾。妾在家庭中的地位远远不如正妻，绝不能与正妻平起平坐。

以我之见，中国男子如果有足够的财富，自然可以纳妾，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一个男子一旦成人，便会在父母的安排下成婚，所娶的女子，大都是来自门当户对的家庭，一旦娶进门，便是结发妻子，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社会上都被认可，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其后男子所纳的女子，都以妾视之，无论主人宠幸与否，都不能凌驾于正妻之上。而妾，一般是男子自己选择的，也许这样更富有感情吧。

妾的出身，多是穷苦人家，但也有来自大户人家的，只因家道中落，度日维艰，不得已做了人家的妾室。当她进入夫家后，事事都要听婆母（如果尚在的话）和主母（正妻）的支使。在她们面前，不得随意就座，不得大声言笑。如果妾生了孩子，其子女则称正妻为母亲。主母对家中事务拥有决断的权力，妾决不能稍加干涉，只能唯命是从。不过，主母很少滥用职权。

在欧美人看来，中国的女性如此凄惨，实在可怜又可悲，并会引出无数的麻烦纠葛。然而，据我观察，妻妾制度在中国大行其道，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因为中国的房屋格局，很适合妻妾制度。妻妾各自生活在自己的院落中，见面的时间亦比较少。能够和睦的相处在一起，情同姐妹。所以尽管正妻在家庭生活中处于绝对的领导优势，但并未引起其他妾的嫉妒。

如果一个平民的女儿嫁到地位显赫的家庭中，即便是做妾，也是一件高兴的事。若是能入宫为妃，那更是天大的喜事，甚至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因为她极有可能生下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以后也极有可能成为皇帝，这样一来，这个家族便成为皇亲国戚了。而且母以子贵，皇帝的生母在宫中的地位前后也有了天壤之别，只比先皇的皇后地位略低一点，却在其他任何嫔妃之上。

另外，如果皇后去世，皇妃也可被册封为皇后。后妃在大内的称呼，皆为“娘娘”，一切用度，大抵与皇后相仿，只是唯皇后方能穿正黄色的朝服，皇妃只能穿橙黄色的服饰，这种礼制极为森严，不得逾越。

清宫有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选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考察时，皇帝和太后（如果还活着）会一同选阅，其程序和选后一样严格。公开的两条标准，一是品德，一是门第。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入宫之后，各自有居住的场馆，一切行为都要服从皇后的安排，相得益彰。

光绪皇帝便只有两个妻子，一个是隆裕皇后，一个是瑾妃，她们居住在不同的宫殿中，相处倒也融洽。至于慈禧太后，她本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只因为咸丰生下了唯一一个儿子，地位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致有今日之境遇。

第二十七章　中国人的送礼之风

馈赠礼物的风气，在中国极为盛行，无论是在大内还是在民间，无人可以逃脱这种风气，在中国的这些日子，也使我大开眼界。下面，我便说一说我的所见所闻。

紫禁城，又名大内，顾名思义，乃全国的中心，中国的心脏。各种风俗习惯如同血液一般，从这个心脏向全身输送，达到每一个毛细血管中。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我想，中国的送礼风气，多半也是从大内传播到全国各处的吧。

中国人几乎在每个场合都会送礼，出生、结婚、丧葬，来宾们都要向主家赠送礼物，这些礼物多是约定俗成，具有特定的意义，而到了过年的时候，送礼之风简直要泛滥成灾了。

至于礼物的轻重，和馈赠的对象有极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地位越高的人收受的礼物便越重，想来不仅因为其地位尊崇，更重要的是位高权重，一言便可以决定许多人的命运，讨好这种人，自己的前途当然是一片光明了。光绪皇帝的万寿大典，外面进献的礼物琳琅满目，都是极其贵重的东西，许多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直看得我瞠目结舌。后来太后万寿之日，贡品更是堆积如山，无论是礼物的数量，还是其珍稀程度，都远远胜过先前。这自然因为太后的权力地位高于皇帝，年龄也比皇帝要大。任何一个西方人，看到有如此多的礼物送进宫来，都会惊呆，他绝不会料到，世间竟有如此穷奢极欲的事情。

在朝廷中，每逢节日或是什么盛典，都要互相馈赠礼物，以表示庆贺。其中尤以宫中的规矩最为繁琐，据我观察，没有哪一天进献的礼物中断过。当然，太后和皇帝接受的献礼要占绝大部分，而他们也要回赠给臣下，这些礼物也是不计其数，是以每年赏赐一项的开销，便要占宫中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

慈禧太后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后来我又发现，不但她自己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还把这种奢侈带给其他人。每当换季的时候，或是碰上节日，她总是大批大批地赏赐皇后、格格、贵妇们，绫罗绸缎，金银首饰，无所不有。这些赏赐极为昂贵，每件都在三百到六百美元之间。若是遇上婚嫁大事，太后也必然赠送新人极其昂贵的礼物。若是谁家添了新丁，则赠送小儿的衣服首饰。如有病故，也必赠送相应的礼物。若是亡故的是一名常年守节的寡妇，还会立碑彰显她的事迹。

当年，各国的公使、参赞的夫人们进宫朝觐太后，太后也是依照中国的习俗，送给每一位夫人礼物。此例一开，变成了规矩，这些夫人们也乐得接受。庚子拳乱之后，太后曾再次会见诸位夫人，并赠送了贵重的礼物。当时各国都认为，这是慈禧太后在刻意讨好西方各国，希望列强不追究她支持义和团的责任，继续支持她在中国的统治。然而，以我之见，太后如此做，只是展现中国式的慷慨好客罢了，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并不是在刻意讨好列强。她与各国夫人的交流，从未涉及过政治。

上次开游园会时，太后也大笔派送了许多礼物，希望能增进各国的友谊。后来驻华大使照会中国外务部，请太后不必有此举，这才作罢。但每逢节日，她依然以私人的名义将水果鲜花送给各使馆的夫人们。如果外交官员有所调动，离华之前，太后也必有礼物赠送。

尽管馈赠给外国使馆的行为已经停止，但是这种送礼之风在宫廷中以及官场中依旧盛行。每当太后与皇帝寿诞之日，都会在之前明下谕旨，禁止臣下百官有所馈赠，但这只是表面文章，众人如何看不透？只怕若是真的不送，头顶的乌纱帽便要保不住了，不但要送，还要大送特送。届时，礼物自宫外呈递，络绎不绝，堆积如山。如此习俗，只怕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吧。就如同太后多次下谕废除裹脚的习俗，甚至要立法，阻止汉族女子裹脚，但这种恶习积习成俗，始终难以改变。中国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什么样的政令，到了下面，都会被执行人虚与委蛇，只做一做表面文章罢了。

送礼的风气，在官场中更是盛行，下属对上司，必然要巴结好，逢年过节，要绞尽脑汁送礼行贿，如此才能换来一片大好前途。只是官员们哪肯做亏本买卖，送礼的开销，还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而来。由此可知，中国的百姓过的是如何苦不堪言了。

我在大内居住的时间也不短了，自然也得到了许多太后赠送的礼物。每逢佳节，太后赏赐格格、贵妇，我必然也能得到一份，而馈赠外国使节的夫人们礼物时，我又是外宾，也能得到一份。如此说来，真是幸运，而更令我开心的是，太后每次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我非常需要或是喜爱的，似乎太后早已探知我的喜好，然后仔细筹划，再赠送给我。其用心良苦，实在让我感激不尽。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转寒，人们都换上了冬装，太后派侍女到我的住处取一件欧式的衣服，令宫里的裁缝，依照样式为我做上几件。不但轻巧暖和，而且还在细节上有所改进，穿起来更加舒适。后来宫人们改穿皮衣，太后又送给我几件皮袍，其样式中西合璧，是由太后亲手设计的，既暖和又宽松，一点都不影响我画画。

后来太后又送给我一顶貂皮帽子，这是中国贵妇经常戴的一种帽子。我的这顶帽子周边围了一圈淡紫色的紫色绸缎，上面绣着花饰，金黄色的丝绦垂下，随风飘扬，帽子正中还缀着一颗硕大的明珠，周围绕着三圈小珍珠，极为美观。后来我听说，太后之前曾考察过三种颜色，后来考虑到我满头金发，特意选了这种颜色。要知道，珍珠是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佩戴的饰品，太后将其赏赐给我，足见其对我的厚爱。

除此之后，太后还赠送给我无数宝贵礼物，我将永远保存它们，以纪念太后对我的一番深情。我甚至想把太后送给我的名贵花卉也保存下来。可惜，它们都已经香消玉殒，早已不在世间了。

第二十八章　紫禁城的冬天

这年冬天，我是在紫禁城度过的，我的画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时着手的是一幅大型肖像画，我准备把这幅画送往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去参展。因此，慈禧太后对这张画非常重视，我的需求大多也能得到满足。在这里，画室光线充足，环境清幽，很少有人前来打搅，因此我便能专心致志地去完成这幅画像。

太后每天都会出座，只是时间上并不固定，有时我没有想到她会出现。对画像的布局、点缀等细节方面，她也往往会提出一些建议，想来是因为这幅画是要送到国外参展，供全世界来观瞻，是以马虎不得，凡事必须小心从事。有时太后看了草图，觉得她佩戴的首饰不那么好看，便当即换掉，这样我就需要重新构图。

但是我在画太后所坐的御座时遇到一点麻烦。太后最喜欢的一张宝座，是当年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在世时送给她的，她一直视作珍贵之物。然而，这张御座在庚子拳乱的时候失踪了。太后曾命令宫廷画师依照记忆将御座的样子画出来，供我参考，让我把御座添加上去。虽然这样做很别扭，但我还是遵从太后的意思，将一张不存在的却是精雕细琢的柚木宝座画了出来。太后看了以后，龙颜大悦，只可惜她不明白，这样一来，整幅画的结构又要发生变化，唉，只要太后喜欢，随她去吧。

还有，我发现在太后的身后有一幅蓝色的景泰蓝屏风，上面绘着九只真人大小的凤凰，色彩绚丽，夺人眼球。然而，这些东西如果入画，看上去就好像太后的身后有许多虚幻缥缈的东西，视觉效果不是很理想。花瓶和其他一些装饰品被安放在御座的周围，对构图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若是太多的东西入画，难免会淡化主角的形象，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还有，太后的衣服总会有些褶皱，但我必须要顺应中国的传统习俗，将这些尽数去掉，以突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形

象。

北京的冬天，极为寒冷，紫禁城中，也没有太多的游乐场所供人散步。而且天气不好，人也不愿意出来。只有天天圈在高墙之中，围炉取暖。每天上午，太后都要照例上朝议政。散朝后，她也无所事事，有时会挨个到别的宫中转一转，或是在寝宫中来回踱步。

每天上午，我在绘画前，必先与格格们一起到太后的御驾前请安。若是碰上初一、十五这两天，便直接前往戏院，我对看戏没有多大兴趣，之后便会离开，着手工作。一直到夕阳西下，我才回到戏院。这时，我不会打搅太后，而是走进皇后或贵妇们的包厢中，和她们一道观戏，紫禁城里的戏院不亚于颐和园中的，灯光等舞台效果都称得上一流。

太后和皇后都明白我急于完工，以便届时将画像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参展，所以她们很少打搅我，不再邀我与她们一同游乐，以免妨碍我的工作。不过若是碰到盛大的节日，或是宫中举行什么仪式，太后还是会邀我前往，不过至于我去不去，倒也随便。

吃午饭的时候，我经常和皇后、贵妇们在一起。皇后待人既亲切，又善于应酬，和她在一起，如沐春风。晚饭则常常在太后的宫中进行，因为天气寒冷，宫中便安了两只巨大的铜火盆，虽说炉中熊熊燃烧，但是屋中依然觉得寒冷。因为中国式的建筑，通风透气的地方很多，所以总会有寒气透进来。房间大门虽然遮着厚厚的幔布，但是由于太监们不停地进出，外面的寒气不断地侵入，屋里好不容易聚起的暖气便冲散得一干二净。一开始我特别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

在寒冷的冬天，贵妇们在室内也穿上皮袭，若室内温度过高，也不太能适应。餐桌下面，会放置一张巨大的毡毯，以阻隔寒冷的地气。其实这么做，也是专为了我。太后和贵妇们都穿着两英寸厚的软木底鞋，鞋子还都是皮质的，非常暖和。而我则穿着欧式的鞋子，太后怕我被冻坏，特意命人铺了张毡毯。

冬天吃饭，桌子上总会摆着几只银质的火锅，中间装着红彤彤的炭火，锅中的汤水时刻保持着沸腾，无论是蔬菜、还是鲜肉，都可以放在锅中，不会冷掉。一天晚上，我请一名太监拿来一瓶红葡萄酒，建议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饮用，这样可以驱除寒气。不一会，太监端来一只大茶壶，滚滚的开水里面，放着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原来中国人冬天喝酒，总喜欢烫过以后再喝，他听我说要“驱除寒气”，想当然地把葡萄酒也给烫了，还天真地说：“在这样冷的天，喝一壶烫酒，真是再好不过了。”我不由哑然失笑。

冬天的天黑得特别早，若是没有戏看，我便会在日落之后来到皇后的寝宫闲谈。许多贵妇、格格也都会在场，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皇后还常常教我说汉语，她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总是孜孜不倦地纠正我的发音，我也用心学习。不过汉语实在是太难学了，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如同天书一般，因为同音异意的字特别多，即便听力特别好，也难免会混淆，张冠李戴、南辕北辙的事情特别多。

有时候，格格们会反复用不同的声调说同一个词，然后让我复述，再告诉我每个音调所表示的不同的意思。她们有时候还会教给我双关的字词，或是一段绕口令，来不断矫正我的发音。这正如法国人说的那样“三个老鼠三只洞”。我总是发不准音调，引来她们哄堂大笑。我也会教给她们英语中难发的单词，或是“PeterPiperpickeda peckofpickledpeppers”这样的绕口令，看她们出窘，以示报复。看其支支吾吾的样子，正如我学说汉语一般。不过这纯属游戏，看着彼此的窘态，大家嘻嘻哈哈，非常开心，为无聊的冬夜增添了许多乐趣。

有时候，皇后会带着大家打牌。和太后喜欢玩仙女游戏不一样，皇后等人常玩的是一种叫做马吊牌的游戏，马吊牌由四人打，每人先取八张牌，剩余八张放在桌子中间。四人轮流出牌、取牌，出牌以大击小。打马吊牌有庄家、闲家之分。庄无定主，可轮流坐。因而三个闲家合力攻击庄家，使之下庄。我和她们玩，每局必输，却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候格格们会用五色丝带做女红，她们可以用丝线编织成各种

各样的图案，我在一旁观察，觉得她们心灵手巧，令人叹为观止。有时候，格格们还会在一起刺绣，为自己的衣饰增添花色。但是刺绣这种活，极为精细，只能在光线充足的时候才能做，晚上便绣不起来了。因为此时只有颐和园通了电，紫禁城中的照明，依然要靠蜡烛、灯笼。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皇后请我第二天早些起床，说是有一场典礼，可以一同去看。次日早晨九点，我如约来到皇后寝宫外，只见几名太监已经守候在门口，他们引我走进寝宫，我方知原来今日是皇后的生日。我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加快步伐，只见格格和贵妇们早已等候于此，就等我一个人了。见我来了，便一起与我通报，说是皇后有旨，等我来到之后再一同入宫道贺。我连连致歉，未能及时赶到，害得诸位等候多时。之后，我们便一起走进殿内，此时皇后已经穿戴整齐，身着朝服，头戴凤冠，冠上垂下几道珠帘，颇合她的狭窄的脸型，看起来庄严神圣。

我走上前去，皇后早已将手伸了出来，我轻轻握住，俯身吻了一下，发自内心地祝福她万寿无疆，幸福美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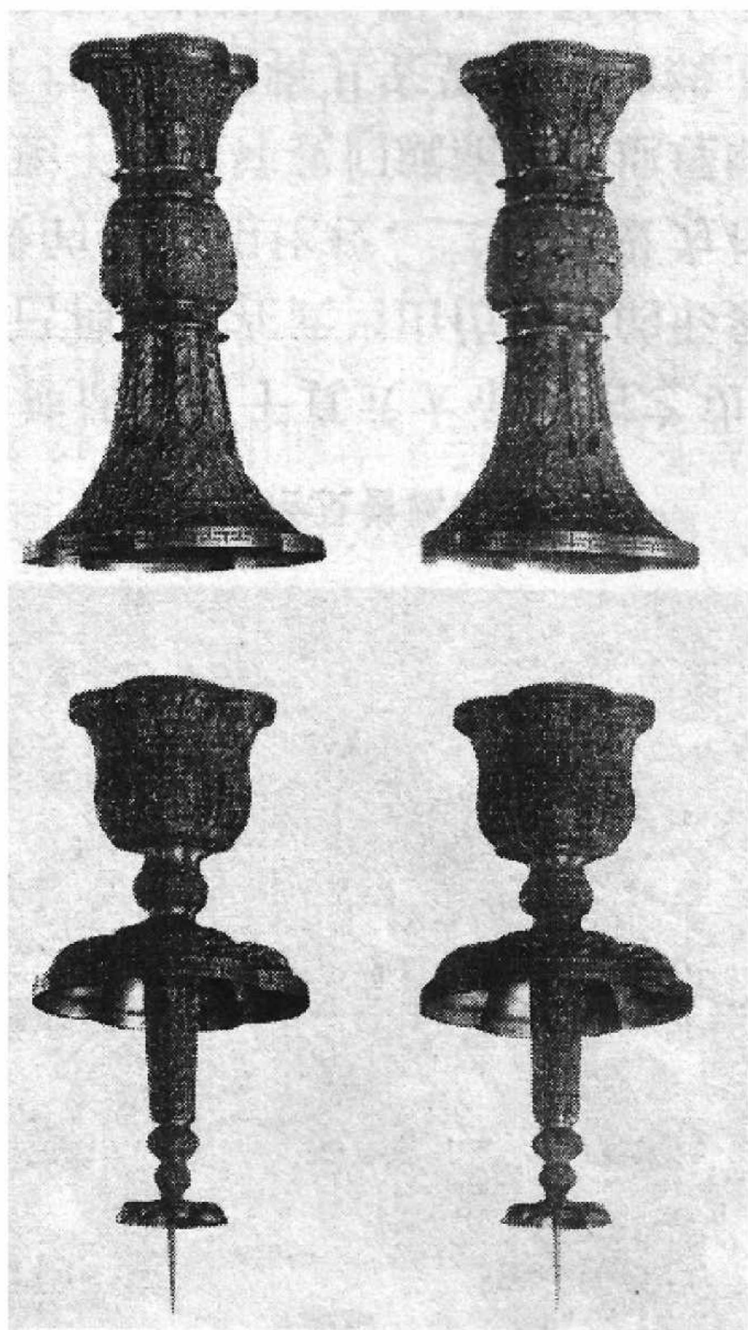
说罢，我正要退出大殿，却被皇后叫住，她请我留在殿内，瞧一瞧其他人是怎么来朝贺的，我心中也很好奇，自然乐于从命。只见众人鱼贯而入，纷纷向皇后呈献玉如意，这种仪式，我在皇帝和太后的万寿大典上也看到过，只是规模要小一些。

这年冬天，我不仅度过了喜庆的节日，还碰到一些忌日。每逢先皇忌辰，必然也举行悼念仪式，而且礼节特别隆重，当日宫中所有的人必要身着素服，一大早便来到太庙进行哀悼，当日除了斋戒，还要禁绝一切娱乐，以示哀恸之心。

一天晚上，皇后悄悄告诉我，次日是同治皇帝的忌日，宫中要举行哀悼仪式，希望我身着素装。我点头会意，次日便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头上插着青色的花簪，以表达我的哀悼。当我走进太后的寝宫时，她正在佛堂中对着佛像顶礼膜拜。只见她身穿镶着紫边的黑色衣服，头上除了点缀几颗珍珠，再也没有其他饰物。她看上去非常伤

心，神情也极为肃穆。礼拜完佛祖后，太后起身和我们打招呼，寒暄之后，我们便告辞了。

这一日，我一直都在画室中忙碌，直到晚膳之后，才再次见到太后。由于之前德龄格格曾告诉我，在中国，只有办丧事的时候，人们才会穿黑白等素色的衣服，平日里穿，是一种极大的忌讳，太后也是如此。是以我入宫之后，很少穿黑色的衣服，太后见我做如此打扮，不觉一奇，当即让德龄问我缘故，我便如实回答，说是哀悼同治皇帝。太后听了，显然深受感动，拉起我的手，哽咽着说道："难得你一片苦心，竟能和哀家同甘共苦，哀家深以为念。"说罢，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清宫铜嵌石五供祭器

太后在这段日子里，不仅要回忆起丧夫、丧子的痛苦，更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日俄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东北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使太后忧心忡忡，焦虑不安，难以像以往那样展颜欢笑了。

我想，一旦日俄交恶，战火烧起，东北便要成为战场，到时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实在是国家之不幸。另外，东北本是满人发祥之地，祖宗陵墓近在咫尺，若是被外人侵扰，又是一件奇耻大辱。然而清廷孱弱，国运废颓，夹在两强之间，实在束手无策。将心比心，太后此时的困境，我也能理解了。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宗教

中国的宗教可分为三大派别，一是佛教，二是道教，三是自然崇拜。而自然崇拜，在中国最为常见，也是中国地位最高的一种宗教。其供奉的主神，便是天帝，而皇帝便是天的儿子，代表天帝统御万民，是以称作“天子”，由此可知，这种自然崇拜在各派宗教中的地位了。

祭祀上天的地方，称作天坛，位于紫禁城东南方，比紫禁城还要大上许多倍。皇帝在这里祭祀皇天上帝、行祈谷礼。天坛建筑布局呈“回”字形，由两道垣墙分成内坛、外坛两大部分。最南的围墙呈方形，象征地，最北的围墙呈半圆形，象征天，北高南低，这既表示天高地低，又表示“天圆地方”。天坛的主要建筑物集中在内坛中轴线的南北两端，其间由一条宽阔的丹陛桥相连结，由南至北分别为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和皇乾殿等；另有神厨、宰牲亭和斋宫等建筑和古迹。设计巧妙，色彩调和，建筑高超。



天坛远景

圜丘坛是皇帝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坛平面呈圆形，共分三层，皆设汉白玉栏板。每层的栏杆头上都刻有云龙纹，在每一栏杆下又向外伸出一石螭头，用于坛面排水。圜丘坛有外方内圆两重矮墙，象征着天圆地方。圜丘坛的附属建筑有皇穹宇及其配庑、神库、宰牲亭、三库（祭器库、乐器库、棕荐库）等。站在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因此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神谕一般，加上祭礼时那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这是因为坛面光滑，声波得以快速地向四面八方传播，碰到周围的石栏，反射回来，与原声汇合，则音量加倍。

圜丘坛以北是皇穹宇，是供奉圜丘坛祭祀神位、存放祭祀神牌的处所。皇穹宇为重檐圆攒尖顶建筑，有东西配庑各五间。其正殿及东西庑共围于一平整光滑的圆墙之内，人们在墙的不同位置面墙说话，站在远处墙边的人，都能十分清晰地听到，此为回音壁。

皇穹宇台阶下，有三块石板，即回音石：在靠台阶的第一块石板上站立，击掌，可以听到一声回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击一掌，可以

听到两声回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一掌，可以听到三声回声。这是因为皇穹宇的围墙是用磨砖对缝砌成的，墙头覆着蓝色琉璃瓦。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极其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是十分规则的。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也可以使对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所以称之为“回音壁”。

祈年殿在天坛的北部，也称为祈谷坛，共有三层，气势巍峨，是一座有鎏金宝顶的三重檐的圆形大殿，殿檐颜色深蓝，是用蓝色琉璃瓦铺砌的，因为天是蓝色的，以此来象征天。坛周有矮墙一重，东南角设燔柴炉、瘗坎、燎炉和具服台。坛边还有祈年门、神库、神厨、宰牲亭、走牲路和长廊等附属建筑。

在中国，帝王们都极为重视祭祀上天，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夏季的首月），帝王们都要来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的仪式。如果遇上少雨的年份，还会在圜丘坛进行祈雨。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祭祀时，除了献上供品，皇帝也要率领文武百官朝拜祷告，以祈求上苍的垂怜施恩。皇上祭天所献上的贡品，在经过隆重繁复的仪式后，通过“燔柴炉”、“燎炉”焚化敬天。

在中国，只有皇帝有资格祭祀上天，因为只有他才是“天子”，皇帝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宗教祭祀的大祭司，他执掌着皇权、族权与神权。中国学者认为，天子若是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因此，若是出现自然灾害，皇帝则要到天坛检讨过错，希望灾害早早终结。其祷祝之词，现列举一二：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

“……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

“……朕以不德，遭家多难，云雷作屯，夷羿窃命，失位京邑，

遂播蛮荆，艰难卑约……”

在皇帝祭祀上天的时候，京中官员一律陪同前往，他们同皇帝一样，都要斋戒沐浴，以最虔诚的心态向上天祈祷。

中国皇帝，虽说身为天子，充当着祭祀上天的大祭司，但是他对于佛道两教，也一视同仁，并不排斥。而且，皇帝也是佛道两教的领袖，每逢盛典，也加以祭祀，只是仅仅在宫中举行，其规模远不如祭天那般隆重。

中国人比较重视道德说教，对宗教信仰却不怎么放在心上。虽然许多人崇信佛教、道教，但大多数人只是流于仪式上的盲从，对于其艰深的教义，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儒家思想。儒学所构建的其实是一种伦理体系，一种处世哲学。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道教信徒，只是名义上的教徒而已。因为无论是佛陀还是老子，只告诉人们如何解脱现实世界的烦恼，获得长生或是跳出轮回，而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其意义真的不大，佛道二教并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如何处理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博得功名，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因此说，这些教徒从根本上说，实际上都是儒家的信奉者，都遵照孔子等一些圣贤的教诲去生活。当然，真正的佛学大师，或是道学大师，那是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只是这种人在中国少之又少。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所有节日都是起源于自然崇拜，或是和农业有极大的关系，例如夏至、冬至、中秋、春节。这些节日，都是和农产品的收获有极大的联系，很多时候，农业又和太阳、月亮的运转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创造了许多祭祀天、地、日、月的仪式，并将这些仪式神圣化。在观看他们这些祭祀仪式的时候，我并不能解读出仪式表达的含义，但我依稀看得出来，仪式所蕴含的对自然崇拜的本质。中国人和自然万物如此接近，甚至做到天人合一，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多么地神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曾强大一时的民族，例如古埃及人、

古印度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在历史的涤荡下灰飞烟灭了，只有中国人和他们的文明传承下来。历史上，也有许多民族征服了华夏大地，匈奴、蒙古、契丹、女真、鲜卑都曾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然而他们或是销声匿迹，成为汉人的一分子，或是被汉人同化，政教、风俗、人情、礼仪与汉人并无差异。究其原因，乃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它吸收一切外来的文明，并加以改造，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落后的游牧民族一开始凭借着弓马骑射，也许很容易占领中原，但若想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则必须接受先进的文明，否则，便注定要像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那样，他们虽然盛极一时，却拒不接受中华文化，最终被逐回草原深处。而满族人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定都北京。之后便如其他民族一样，逐渐接纳、吸收汉族文化，其中包括学习汉人的文字、礼法、官制，渐渐从一个野蛮好战的民族，变得知书达理，其中几任帝王，如康熙、乾隆，他们的文化水平毫不逊色于汉族的儒学大师。

现如今，满人和汉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如以往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一样，渐渐地被汉人同化了，当今的光绪皇帝，完全是一个汉人的模样。虽说汉人当年被强令薙发留辫，改易胡服，在衣冠上效仿满人，但如今满人却在骨子里变成了汉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昔日彪勇善战的满族人，如今变得极为文弱，酷好和平，畏惧征战，整日研究诗词歌赋，满口的子曰诗云，同汉人并无二致。究其原因，并非是满汉通婚所致，其实清朝入关后，曾有禁令，严禁满汉通婚，直到近年来，太后发布谕旨，允许满汉之间互通婚姻。

汉人似乎很容易被征服，并进行治理，但是汉族人所创立的文化却极有生命力，几千年来，有许多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汉人作为一个民族，始终延续下来，中华文明也从未有过中断。

中国的中秋节，我之前曾有过描述，它寓意着农业上收获，人们在近一年的辛劳之后，终于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好好休息一下。中秋节的来历，有着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以致人们早已分不清，它究

竟因何产生。然而探其根源，当是人们为感念上苍，为感谢大自然的赠予而自发的庆祝。

还有其他节日，也能体现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比如立春，它意味着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之后蛰居的虫类慢慢苏醒，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鸟语花香的开始，这是耕耘播种的信号。不久之后，新鲜的蔬果便被采摘下来，其第一波必被装在银盘之中，由太监跪呈太后。太后收到献礼，总会把蔬果分赐给皇后、格格和贵妇们，一同品味春天的味道。而受赏赐的众人则拜倒在太后座下，恭祝物阜民安，国运昌隆。之后，众太监一同高唱祝词，其声音回荡在紫禁城中，久久不能平息。

太后为了祈祷五谷丰登，总会在立春之日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其实从很早开始便有了迎春庆贺礼仪，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去郊外迎春，祈求丰收，回宫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立春之后，皇帝还会进行亲耕，有时太后也会参加，不过作为妇女，她并未执犁耕作，而是在田里种下一棵桑树，以之晓谕百姓，劝课农桑。丝织业是中国一项极为古老的手工业，中国的丝织品也曾闻名于世。传说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的妻子嫘祖，便是养蚕缫丝的发明者，也是桑蚕的守护神。妇女们总会在立春之时来到桑林中，向这位先贤进行祷告。

中国人和自然走得如此之近，他们乐天知命，历经几千年，男耕女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有极其稳定的几千年文明。

第三十章　太后往事

坊间流传，慈禧太后出身极为低贱，她本是汉人，在某大户人家做丫鬟，后来这家夫人很喜欢她，便收她为干女儿，后来被选为秀女，经过千百次的斗争，最终独揽大权。其实，这是民间谣传，绝不可信。

慈禧太后的父亲是军中的一名将领，而且地位还很高。而按照大清律例，非满人不得身居此位，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确是满人，而且出身高贵。她的家族是叶赫那拉氏，属于满洲正白旗，在满洲八旗中，其地位仅次于两黄旗。因为两黄旗的统领是皇帝。在满人入关之时，黄白两旗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两黄旗赢得胜利[7]。

慈禧太后从小家教极其严格，曾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文化水平很高。成年之后，行为举止、待人接物都表现得落落大方，由此可见，她的父亲也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

清代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秀女，挑选秀女的范围，各朝都有一些不同的规定，但基本都是籍在八旗之中的人家的十三至十七岁的女儿。挑选秀女由户部主办。每到挑选秀女之期，秀女们都得乘坐骡车至神武门外下车，然后按次序由太监们从旁门引入，到顺贞门前集齐，再按事先排好的名单顺序，进顺贞门备帝后们选看。审看时，备选女子要按圣旨六人一排，只有容貌秀丽，举止端庄的女子方能入选。入选的秀女还要定期复看，直到复看合格后才能留在宫中。

咸丰二年（1852年），还是少女的叶赫那拉氏被选秀入宫。后宫的妃子分为八个等级，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当时叶赫那拉氏被封为兰贵人，因为她美貌与智慧并存，家世又非常显赫，所以便有很多人认为她很有可能被封为贵妃。



慈禧太后入画前对镜化妆

果不其然，叶赫那拉氏进宫之后，深受皇帝宠爱，不久便生下一子，取名载淳。因为载淳是咸丰帝唯一的皇子，如此一来，母以子贵，那拉氏便被封为懿妃。五年后，咸丰帝驾崩，载淳登基为帝，是

为同治。于是那拉氏便被封为皇太后，与原先的慈安太后并立，称为东、西二宫。

因为同治年幼，无法处理国事，所以两宫皇太后垂帘秉政。慈安太后与世无争，只对诗词文学有兴趣，对于国家大事并无高见，也无意费神于此。而慈禧太后对政治权力有天生的喜爱，早在咸丰皇帝时，她便经常代皇帝批阅奏章。如今真是如鱼得水，朝中大权全揽在手中。不过我亦听宫里的老人说，东西二宫当年相处得极为和睦，未尝有过龃龉。同治皇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二人又共同从宗室中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登基，便是当今的光绪皇帝了。数十年来，二人和睦相处，一直到1881年慈安太后过世，当时慈禧太后无比哀痛，所置办的丧礼，极为隆重。

同治皇帝登基的时候，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困扰着帝国的统治者。先是太平天国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又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并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并死在那里。同治皇帝六岁登基，一个孩童，又如何能治理国家。眼看着大厦将倾，幸亏有东西二宫齐心合作，同舟共济，又有一干能臣鼎力辅佐，不但与英法等国议和，还从两国借来大军，剿灭了太平军，终于将清朝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咸丰皇帝临终前将八名重臣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她们相互牵制。咸丰帝死后，同治即位。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粉碎了八大臣势力。最初，慈禧太后在议政王奕□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起义、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和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列强的贪欲业已满足，外交上

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慈禧功在清室，诚不可没。

同治皇帝亲政两年便逝世了，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为伤心的事情。太后哀恸之后，便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君，年号光绪，太后遂重新垂帘听政，收揽大权。其实按照清朝的规矩，一般是父死子继，光绪本无资格继位。太后之所以拥立光绪，无非出于自己的私心，一来光绪是自己妹妹的儿子，二来光绪当时年仅四岁，若要亲政，还需等上十余年，这期间慈禧太后便可独揽大权了。

然而，此举招来朝野一片议论，其间许多大臣颇有微词。然而，太后凭借强硬的手腕，又得到一干重臣的支持，最终将朝中的局势平定下来。慈禧太后摄政的这段日子，虽说表面还算一片呈祥，然而波涛暗涌，内忧外患并未消除，若要引领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向前行驶，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和长远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避开暗礁与漩涡。在朝中，有保守与激进两派官员，他们或主张闭关自守，或主张全盘西化，慈禧太后周旋于两派之间，尽量使帝国按她的思路发展，即通过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处在闭关锁国的形势之下，在不知不觉中远远落后于西方，以致到了近代，屡屡遭受侵略，被迫割地赔款。老实说，慈禧太后在外交上是一败涂地，其本人也承受巨大的批评。然而，若把这些责任一股脑全推到慈禧太后头上，未免有失公允。毕竟，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个责任，需要许多人来承担。其实，慈禧太后又何尝愿意出卖主权，她也尽力周旋于列强之间，甚至采用欺骗的手段，想愚弄列强。可惜弱国无外交，慈禧太后的种种心思，在列强面前昭然若揭，反落下许多笑柄。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二十八年，直到1889年，才还政于光绪皇帝。这时，中国呈现出复兴的气象，随着许多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渐渐融入到世界潮流中来；海关的创设，每年都为政府带来巨大的税收，解决了财政亏空的问题；与欧美列强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相处得极为和谐。可谓是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太后遂将政权移交给光绪皇

帝，并告诉各部官员，今后有什么事，和皇上商量便可以了，不需要再去劳烦她。她只想从此颐养天年，整日以游山玩水为趣。而光绪皇帝亲政时日亦短，自己一时也还没有什么建树，一切都沿袭慈禧太后主政时的政策，朝廷上下自然相安无事[8]。

正当中国稳健地向前发展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894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冲突，由此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最终，日本大获全胜，中国再次割地赔款，而且数额巨大。这一结局，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因为日本的许多方面，包括其文字、文学、建筑、艺术等等都是学自中国，近千年来，日本都是中华文明的追随者，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以及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不过是一蕞尔小国，孤居海外，礼俗粗鄙，怎能与中华上国相提并论。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怀，一直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近代虽然屡被欧洲列强欺凌，但在东亚，却始终是第一大国。

甲午一战，形势逆转，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将中国践踏在脚下，这是何等的耻辱。年轻的光绪皇帝痛心疾首，经过反思，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效法西方，维新改革，中国若要自强保种，必须也要实行全面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

于是乎，年轻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在各个方面推行改革，恨不得一夜之间使中国面貌一新，从此走向强盛的道路。

很明显，光绪皇帝太过急功近利，朝中许多大臣，只因对改革略有微词，便立刻罢黜，以维新派取而代之。将太后的许多政策也一并推翻，毫不顾忌。其改革内容非常之多，废科举、兴新学、练新军、提倡工商立国，鼓励新闻自由……一时间，大有翻天覆地之势。

然而，中国人素来保守，改革变法又损害了许许多多人的利益。这些人携起手来，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这些保守派与维新派水火不容，纷纷绞尽脑汁，力求将对方尽数打倒。维新派认为保守派思维陈旧，无法救国；而保守派认为维新派急功近利，要将中国拖入万劫不

复的境地。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站在维新派背后的，是光绪皇帝，他希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便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转而依靠慈禧太后，他们纷纷向慈禧太后展开游说，说皇帝妄变祖宗成法，太过激进，若听之任之，只怕大厦倾塌，清室崩颓，为了国家大计，还请太后重新秉政，挽救危局。慈禧太后出于大局的考虑，决定出来收拾局面。

到了这个地步，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已到了一决生死的地步，维新派决定发动政变，将慈禧软禁起来，太后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三度出山，垂帘秉政。之前维新派无论如何得势，到如今也只是穷途末路了。

慈禧太后出山之后，先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中，接着发布命令，将维新派官员全部罢黜，保守派中不合太后心意的，也一律免职。例如帝师翁同龢本是一守旧之人，但他属于“帝党”，自然也要被“后党”排斥。不过，太后罢黜他的理由是年纪老迈，不足以辅佐皇帝。而其他许多维新人士，都被逮捕下狱，后来有六人被斩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而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借助外人的帮助，逃往海外。

关于这场政变，太后曾经向我解释道，光绪皇帝并未因此而被废黜，他依然是皇帝，执掌着国家大权。但由于皇帝执政太缺少经验，所以太后必须时刻提醒他，为他把握好方向。

在中国人看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阻挠改革，迟滞国家的发展，是民族的罪人；在外国人看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是排斥西方文明，换言之，是闭关自守的表现，着实是颟顸昏聩之举，可笑之至。

然而在我看来，太后三度秉政，废除变法发布的一切政令，确实

对中国的发展有些阻碍。然而，纵观维新派发布的法令，实在过于激进，他们希望毕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于一役，使中国一蹴而就，成为世界强国，这种想法显然不合实际，然而他们竟准备热火朝天地大干一场，并未看到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将会带来的危害。

而且，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逃出海外之后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心只想着为自己牟取利益，甚至有许多无耻下作的举动。可想而知，若是这种人掌握朝中大权，会将中国带入何种境地。慈禧太后并非不愿改革，而是她深知中国国情，一旦乱了方寸，必然会引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中国人素来保守，若要改革，需得循序渐进才行。

变法失败，给光绪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极度的沉沦。他的失望，不仅在于变法本身的失败，更是由于他的美好理想的幻灭。曾几何时，他立志做一个有道明君，要使中国重新崛起，战胜日本，以雪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更立志让中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这些念头，时时刻刻萦绕在光绪帝的脑海之中，竟使他沉迷于此，不能自拔。然而，面对现实，他却又无可奈何，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太远太远。他知道，若要重振国威，仅靠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于是他倚重维新派人士，希望凭借变法而自强。在遭遇挫折之后，他深受打击，竟至一蹶不振。其实，这何尝不是年轻人的天性，初时踌躇满志，一旦受挫便心灰意冷。

然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在保守的中国，激进式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后来慈禧太后将其软禁在瀛台之中，他更是感到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变得心如死灰，不愿再理政事。

光绪皇帝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遭逢这样的打击后，身体每况愈下。需得终日服食汤药。而那些反对太后的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就此大做文章，说太后将不利于皇帝，而且说得煞有介事，有说太后把皇帝关在中南海的瀛台中，打算饿死他；有说太后派人在皇帝的饮食中下毒，打算毒死他；还有人说太后打算废掉皇帝，另立新君。这些说法一时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令天下大哗，直到近年来，才

渐渐息止。

这些谣言实在荒谬，要知道，太后与皇帝之间情同母子，怎会随意将其废掉，更遑论痛下毒手了。而太后心腹遍及朝野，对太后忠心耿耿，只要太后点头，便会立刻取了皇帝的性命，又怎会费劲毒死或饿死皇帝，可见坊间谣传，实在不足为信。现如今，太后只是在训政，其意乃是帮助光绪皇帝处理政务。光绪皇帝依然每日上朝，与百官共议朝政。

许多外国人见到太后与皇帝同时在场的时候，太后会端坐龙床，而皇帝只能坐在一旁的凳子上，便想当然地认为太后欺辱皇帝，将一切大权揽在手中。其实，此言谬矣，中国历朝历代都提倡孝道，无论贵为天子，还是寻常百姓，儿女在父母面前，都要坐在偏侧，甚至要垂手而立。而皇帝更是要以身作则，为天下之垂范。对于如同母亲一般的慈禧太后，皇帝的这种行为不过是出于孝道而已。这正如我在前文所讲的，皇帝皇后时常向太后跪拜，其实是一个道理。

其实，在我看来，晚年的太后对于权力并无太多的热情，她的愿望是早日将光绪皇帝培养成熟，自己乐得隐居深宫，整日里游山玩水，乐得逍遥自在，只是现如今，她对皇帝还不是很放心，不敢将国家完全托付给他。



政变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相反，它还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因为粉碎维新派，囚禁光绪皇帝，使得许多外国人认为，这是慈禧太后极度排外的表现。两年后，即1900年，庚子拳乱爆发，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团民血腥地袭击外国人，火烧教堂。而太后被西方人视作幕后的策划者、教唆者、支持者，应当负起全部责任。

然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中国高层并无联系。义和团，最初是底层农民的秘密结社，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几个省份，与首都北京相离甚远。义和团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涌入中国牟取利益，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又有许多传教士深入中国民间，招揽信徒，这些人无视中国的法律与传统文化，欺凌百姓，为非作歹。而中国的教民则依仗外国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为。中国的官府畏惧外国势力，不敢出面干涉。许多外国人在本国奉公守法，到了中国，无所制约，竟然丧尽天良，坏事做尽。中国百姓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试图将在中国的外国人尽数驱逐。

甚至一些满清权贵也加入了义和团，比如光绪皇帝的堂兄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这些权贵为了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断在太后耳边煽风点火，说什么西方列强打算推翻太后，重新迎接光绪皇帝继位，挑起太后的不满情绪。又说义和团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而且民心可用，大可以对付洋人。如此一来，慈禧太后被他们的胡言乱语所蒙蔽，不待查出事情的真相，便勃然大怒，开始支持义和团，对付外国势力。这样，北京城的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情况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庚子拳乱”。

不久，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残杀，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由于形势危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讨应对事宜，途中与义和团团民发生冲突，被义和团杀害。紧接着，义和团攻击使馆、火烧教堂，民众的暴动一发不可收拾。从义和团到王公大臣无不为之陶醉，以为洋人的末日即将到来，

中国的希望已经能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太后竟也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即便他们想用强硬的手段剿灭义和团，也是力不从心了。纵观世界历史，一旦民众运动爆发，必然会打起极其正当的口号作为宗旨，也没有哪一国的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平定下去。必当酿起燎原之势，天下大乱之后，才能着手收拾旧河山，由大乱而转为大治。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慈禧太后这样一个富有心机，有着几十年从政经验的人，会真的被几个亲王大臣所欺骗，相信义和团“神功护体”的鬼话，也不会认为她不知道攻击大使馆，杀害公使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必然会遭致外国的干涉。然而，慈禧太后当时已无力控制事态了，几十万义和团团民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他们甚至拉拢了中国的军队，一起来对付外国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太后被迫向列强宣战，派军队和义和团一起去攻打使馆区。

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思量起来，实在不可理解。后来我又到使馆区参观，见其除了一面靠着城墙外，三面都比较开放，并无险要隘口可以防御。若是以精兵攻打，一个星期便足以攻克。然而义和团久攻不下，除了自身使用的是大刀长矛，比不上欧洲的火器外，来自朝廷中的阻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慈禧太后一开始便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后来谈起此事，她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以示抚慰。

义和团发生暴动，是在1900年的夏天，当时慈禧和皇帝都在颐和园避暑，见情况不妙，当即决定移驾京城，但被官员们劝阻，他们认为形势太不明朗，回京之举，太过冒险。若是外国军队攻入京城，则

难以逃脱。但是太后力排众议，她认为自己一旦回到北京，必然可以凭借威势，将事态平息。遂于联军攻破北京城的前一个星期，返回紫禁城，并下令禁止杀害洋人，停止围攻使馆。

然而，慈禧太后对事态的估计太过乐观，形势已经超出了她的控制，许多温顺、和平的中国百姓，此时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大肆屠戮，慈禧太后的诏令，丝毫不能发挥作用。

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极是沮丧，又听说洋兵攻陷天津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想来自己若是落入外国人手中，真不知会有何种下场。越思量心中便越感惊恐，再不复当日向列强宣战的豪迈气概，当下决定改装出走，保全性命，以图将来。因为害怕被洋人认出来，太后扮作普通的妇人，她那代表崇高地位的长指甲尽数剪掉，带着皇帝、皇后以及一些亲信、侍卫，驾着马车，微服逃出京城。

本来，慈禧太后并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根本没有准备出逃。临到头来，便显得极为慌乱，她的珠宝细软、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上。时值深秋，天气极为寒冷，一路上西风瑟瑟，令人战栗。太后在苍茫的夜色掩映之下，仓皇向西逃去。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仅仅在太后逃离京城的几个小时后，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便攻入水西门，进入城中。虽说京城内外有许多守军，但是他们士气低迷，而且义和团团民并不服从军事长官的调度，彼此之间还互相倾轧，况且武器极为落后，这种军队，如何能对付荷枪实弹的联军？很快，抵抗便被联军消灭。接下来的便是清算义和团，联军在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屠戮，终于靠着血腥手段，将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

再说太后等人逃出京城后，一直向西安逃去。虽说有许多护卫，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义和团团民，他们见两宫对义和团并不真心支持，心中早怀有怨恨。此时虽也参与护驾，但并不忠心，护卫长官也无可奈何。车驾所经之处，都是义和团起事的地方，沿途居民不愿向太后

等人提供食物给养。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心向洋人，又何必效忠于她。所以太后等人在逃难途中，实在苦不堪言。我曾听肃亲王善耆说，太后西逃时，历尽种种艰辛，即使正常的饮食，也难以维系。有时寻觅来的食物，还会被护驾的士兵偷吃。太后常常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更不用说别人了。太后也曾经告诉我，皇帝的食物，不时被护军偷去，甚至还被溃兵们哄抢一空，致使皇帝终日不得进食。

众人连日奔走，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却没有取水的工具，只能望而兴叹。不得已，只好采下秫秸秆，在嘴里反复咀嚼，嚼出浆汁，聊以解渴。有时太后与皇帝仅得一板凳，二人贴着背，互相靠坐着，仰望夜空，述说悲情。夜间寒风凛冽，二人冻得浑身颤抖，太后只好自我解嘲，幽默地说道："你看看，我这样子，完全就是一乡下老太太。"

西逃之路，自上而下，都历尽了艰辛，苦不堪言，然而无论何人，都对自己承受的痛苦避而不提，想来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

后来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对西逃之路上护驾有功的人大行封赏。而且，庚子事变似乎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她对外国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友好起来，并对效仿西方进行政治革新的事情开始上心。宫里的太监宫女常常以庚子年的悲惨境遇作为谈资，并没有太多避讳。

令我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回到京城之后，宫人送给她一个尊号，称之为"老祖宗"，不再称她为"老佛爷"，这是什么用意，我一直不得而知，我也不曾问过别人。

痛定思痛，庚子拳乱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其间有许多事值得人深思。中国百姓素来温和谦顺，何以能做出如此暴行。西方人无不视义和团野蛮残忍，然而究其原因，其实是外国人先对中国进行掠夺压迫，民众忍无可忍，终于起来反抗。但愿后来之人以此为戒，莫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第三十一章　慈禧太后面面观

慈禧太后是一个复杂的人，她的性格具有善良、正义的一面，但又崇尚奢华，当然，这些并不矛盾。倘若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她会下令广设义庄，用来赈济灾民，倘若她的同情心被唤起，会显得无比慷慨，甚至会将内帑拿出来，以作救济之用。北京城内有几处养济院，专门用来安置鳏、寡、孤、独、残，人数高达一万多人，每年支出的款项，都是太后赏赐的。每到冬天，太后必会从皇家内库中调拨一万五千石大米，在北京周边搭棚施粥，以此赈济无家可归的贫民。这些善举，都显示出太后善良慈爱的一面。

太后处事公正，每每见于司法审讯之中。民间若有冤狱或是不平之事，便会竭力主持公道。1903年11月19日的《字林西报》曾刊登一篇文章，讲述的便是太后审案的事情。

在庚子拳乱之前，有一个姓王的地痞流氓，欠了一个回民的钱，拖欠已久，不肯归还。后来这个回民告于官府，要求王姓无赖偿还，这个无赖便怀恨在心。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这个无赖投机取巧，竟成了义和团的一名首脑人物，遂于某夜率领暴徒多人，闯入回民的家中，将其全家十余口赶尽杀绝，仅有一个年轻的儿媳躲在阁楼中，幸免于难。她清楚地看到暴徒们将一家人悉数杀死，将老人和四个儿子的首级挂在长矛之上，大呼小叫，引以为乐，又将其家中财物搜刮一空。其媳历历见之，自然伤心无比。然而当时京城大乱，毫无说理的地方。只得暂时逃出北京躲避。直至1903年回到北京，暗暗探查出凶手，然后写下状纸，沿街申冤。时值太后出行，见一年轻寡妇（年仅十九岁），跪于道旁，似有冤情申诉，遂令身边侍卫上前询问，少妇遂将状纸呈递于太后。太后不看则已，看罢之后，勃然大怒，当即责令会审此案，并限定破案日期。不日，凶手便被捉拿归案，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其子一人，其侄二人，主犯一并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关于慈禧太后生活奢侈无度这件事情，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在此笔者也无意为其避讳，仅仅从颐和园的营造，便能看出慈禧太后的奢华程度。太后的奢侈，一来与其本性有关，二来也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关联。可以说，整个官场，自上而下，无人不贪墨，无人不奢侈。无论什么人，只要手中有一点点权力，便要想尽办法，为自己捞取好处。太后如此，官员如此，甚至连宫中的太监也是如此。整个国家，都在渐渐地糜烂下去。

自清朝建立以来，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其间也有几个皇帝曾经厉行节俭，希望一改官场上的奢靡之风，然而最终却无济于事。我听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道光皇帝，他本是一个极为节俭的人，有一回他裤子上穿破了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拿去补上。结果，这条裤子补好了，几乎是和原来的一样，道光皇帝在高兴之余，问补的费用是多少？回答自然是使他大吃一惊的，也是大怒的，因为补的费用是三千两银子，也就是说，即便做这样一条新裤子，也就是三十两银子，补一条裤子的费用，足可以买新裤子一百条。但内务府的官员却不慌不忙地回答皇上：“皇上所穿裤腿，系属有花湖绉，剪过几百匹，鲜有花头恰合者，所以如是其贵。”道光皇帝听了，也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在路边吃到一种极好吃的点心，一枚只要几个铜板，回宫后问御膳房的主管，宫里要做这种点心，需花费多少。那总管算计之后，回禀一枚需要四两银子。乾隆帝大吃一惊，细问之下，方知宫中无论采办何物，都需要经过数十名官员之手，层层揩油，其价格自然要水涨船高。只有皇帝自己出去买，才能买到几个铜板一枚的点心。乾隆帝听了之后，不由大为感慨，直叹奢靡之风积习难返，虽是贵为天子，也无可奈何。我在宫中亦曾听说，一枚鸡蛋竟要三两银子，是民间的一千多倍，中间层层盘剥克扣，可想而知。皇帝纵然有心力行改革，提倡节俭，也是非常困难，而以慈禧太后的奢侈本性，更是如痴人说梦了。

关于慈禧太后的奢华生活，我倒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我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太后花费的款项中，最大的支出便是馈赠礼物，其他的

开支并无太多。我曾经研究过太后的服饰。而太后的衣服虽多，其面料、花色、品种之类倒是平平无奇，甚至连美国大富豪妻子的衣服也比不上。中国人的衣服，即便是丝绣、皮草，其款式也是代代相传，经久不变，即便是大富之家，也没有什么时髦可言，太后的穿着亦是如此。

太后虽然也喜爱珠宝首饰，但其所拥有的也只不过是翡翠、珍珠之类的东西，像欧美的权贵、富豪经常佩戴的绿宝石、钻石，我从来没有见过。太后拥有的首饰是很多，而且价格据说非常昂贵，但是这些首饰在民间的价格要低得多，只因为已经过内务部的采办，中间必有许多人层层揩油，到了宫中，价格会翻上许多倍。

我在宫中倒是见过许多次太后厉行节俭的事情，比如在我为太后画像的时候，她曾打算改变一下朝服上的饰物。当时，宫人呈递上几条绣着花纹的缎带，她挑选了一根，令宫女将其缝制在衣领周边。当时，我建议把这些缎带剪断，用来遮挡衣服上的褶皱部分。但是太后却摇头拒绝，她说这些缎带非常漂亮，都是织匠辛辛苦苦织出来的，若是裁断，以后便没有用处了，实在可惜。

还有一天，太后喝果汁时，不小心将果汁洒了出来，落在了她的外套上。太后想用手帕将衣服擦干净，却没有成功，只得再换上一件。当时她比较烦闷，说道："予听闻西洋有一种事物，可以将衣服清理得干干净净，抽空得好好打听一下。一件好衣服若是不慎弄脏了，便可以清洗干净，还能继续再穿。若是就这么丢掉，未免太过可惜。"

说起来，慈禧太后对国事极为热心，她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就我在中国结识的人来看，还没有谁像她那样，对民众的休戚，国势的强弱如此关心。而且，她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并对自己的子民关怀备至。每当列强叩关，或是内乱迭起时，她必然会忧心忡忡，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慈禧太后也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能全部怪到她的头上，因为太后身居禁宫，对外界的了解，全靠大臣们的汇报，

而制定方针政策，也是参考了大臣们的建议。有时候，大臣还会刻意隐瞒真相，谎言虚报，使得太后做出错误的裁决。若是论起来，太后的心智、脑力，绝对在常人之上，她只是被蒙蔽了。因此，中国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要整个朝廷一起来承担责任的。

去年冬天，有司呈递奏折，说是因庚子赔款，致使财政拮据，国库空虚，希望增加捐税，以解朝廷困厄，特请太后审度。慈禧太后审阅之后，颇为踌躇，虽说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赔款一事又是雪上加霜，然而若轻易增加捐税，不但有伤国家元气，更会激起民变，本已摇摇欲坠的清廷，实在经受不起这种折腾了。因此增加捐税一事，还需从长计议，规划周详。

其实太后深知，中国的官员贪污成性，整个官场污浊不堪，即便增加捐税，大多数银两还是要落到贪官手中，进入国库的只有很可怜的一点。而老百姓因此负担加重，对朝廷的怨恨之心，日益加深。然而太后虽心知肚明，但面对整个官场，她也显得力不从心。说到底，中国的种种弊端，都是政治体制造成的，即便最高统治者再英明，也是回天乏术，除非将整个体制改变，然而这又是难于登天。至于中国将来何去何从，还是拭目以待吧。

太后的性格比较温和，对待身边的人都是和颜悦色。然而一个人总不会时时刻刻保持好心情，倘若有人触犯了太后，则必然龙颜大怒。只是太后并不会情绪失控，只在言语之间多见厉色。然而纵使如此，也足以使手下之人心惊肉跳，战栗不已。宫廷之中，总少不了流言蜚语，也有许多宵小进献谗言，然而无论听到何种言论，太后总是不动声色，不置可否。有道是圣意难测，别人也难以揣摩出太后的心思，因此在太后面前，无不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也许这便是所谓的帝王之术吧。

太后的交际应酬能力极为出众，在足不出户的中国女子中，实属凤毛麟角，纵使比起男子，也不遑多让。当她第一次接见外宾时，便展现出这种非凡的才能。英国爵士克劳德·麦克唐纳曾如此评价她：“慈禧太后待人殷勤周到，一切女子所应有的才干与美德，都在

她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苏珊·汤利亦曾对她给予极高的评价：“慈禧太后招待欧洲宾客，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举手投足间都露出高贵的气质。”这些赞美都是发自肺腑。居住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使节，只要见过她，都一致认为她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人。而太后并未接受过外交礼仪的训练，也许，这种才能是与生俱来的吧。

曾经有一次，年轻的普鲁士皇子阿达尔贝特出访北京，太后和皇帝专门举行一场招待会，以示欢迎。当日随皇子一同到场的，除了使馆人员外，还有许多军官、侍从，人数极多，若要招待的面面俱到，倒是一件难事。而我曾有过耳闻，慈禧太后一般只接待女宾，因为中国的礼法森严，妇女很少抛头露面，更遑论接待外宾了。然而，慈禧太后接待来宾异常周到，落落大方，有理有节。与阿达尔贝特皇子谈笑风生，相处甚欢。一位在场的嘉宾对太后大为赞赏，说太后不但风华绝代，而且仪态端庄，与她交谈，如沐春风，以致产生一种幻觉，自己面对的并非凡人，而是圣母玛利亚。也许这不过是外交辞令，溢美之词，但是我久居大内，得蒙太后悉心照料，有宾至如归之感，每当忆及此事，感戴之念油然而生。而纵观诸位贵妇、格格，无人能与太后媲美。美丽、善良、智慧、极富人格魅力，这就是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新年

中国的节日甚多，然而，最为万众瞩目的，是春节。每逢新春佳节，无论贫富，都会张灯结彩，欢天喜地，恭祝之声，不绝于耳。我在紫禁城中，能够一睹中国最隆重的节日，实在幸运。

刚刚进入农历腊月，宫里头便忙活起来了，宫殿、亭阁、轩廊，到处张灯结彩，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宫人们披红戴绿，以增添喜庆。大门上贴上了春联，窗格上粘上了窗花，墙壁上挂上了年画，这都是在表达除旧迎新，寄予美好未来的一种心愿。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称作“扮鬼脸”的傩戏表演，是满族十分流行的一种兼具舞蹈和游艺性质的游戏。表演者戴面具扮成野兽或鬼怪，再由扮作猎人者与其周旋打斗，最后战而胜之，很有狩猎民族的特色。

到了岁末，太后也不再处理国事。国印封置，直到来年再拿出来用。这时她也会如普通家庭主妇那般，要亲自动一动手。做糕饼就是一项，糕饼是准备新年祭祀用的，太后显得很虔诚，第一块糕饼要由太后亲自来做。当太后说要开始做饼时，大家都跟她走进一间专为做饼而设的房里。饼是将面粉、糖和酵母混合起来，揉成面团，然后再上锅蒸，它就跟面包一样发起来。谁做的饼发得最厚，谁就被认为是神最喜欢的，运气一定最好。太后做的饼发得最高，大家都向她祝贺，她自己也很高兴。后来她又命宫人们每人都做一个，结果做的都不如太后的好。想来是宫妃、侍女有意做不好，讨太后高兴的吧。

过了腊月二十三祭灶，内务府便传知各宫总管封印准备过年事宜，由内务府奏明太后，得旨按宫中旧例后，便传告各府第福晋、命妇、格格，及一二品大员的女儿于腊月二十五进宫过年。

这天上午八时，太后升堂入座后，第一拨由格格朝见。众格格鱼

贯而入，向太后行礼毕，分别侍立太后左右。太后对她们说些吉祥话后，便一一询问年龄、学识，然后退去。第二拨由各府第福晋、命妇朝见，皇后、妃子及宫内当差的格格负责招待。太后说：“过新年，大家应当快快乐乐庆祝一番，可不要闲着。我朝家法严谨，女子应该懂得理家之道，首要会做针线活，历来凡是皇上御用的衣履，都是由皇后、贵妃亲自做。我看各府格格，性喜浮华，不要说娴熟裁剪，就连做针线也好像不是自己的事。总是坐享其成，将来出阁怎么是好？今天就叫皇后、妃子、福晋、命妇各裁一件衣服，然后叫格格们每人缝一件，限两天交活。”



傩戏面具

有的福晋一听太后懿旨，吓得汗流浃背，因为她们知道自己闺女针线的本领。有的福晋则希望自己的闺女大显才能。太后叫李莲英传知准备好的衣料，随同针线笸箩，摆在案子上。太后说：“裁完针线活，可以到台前看戏去，格格们今天只管看戏，二十六、二十七两天限你们做好。可不要慌神。”

那些不会做针线活的格格们，趁太后同福晋们去斗纸牌为乐时，偷偷把衣料交给会裁剪缝纫的姊妹。也有不愿弄虚作假的，做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最后，太后在案前走马观花似的巡视一番。由皇后、妃子评定，按等级发给赏赐。

大年三十这天，太后起得比平时要早，皇后等也在黎明时分来到殿上。格格们天不亮就已梳洗打扮完毕。太后由寝室出来，升座后，由隆裕皇后率众人向太后请安。礼毕，太后命皇后率领福晋们制作佛前的供花；大格格率领格格等布置佛前供品，直到午膳时才忙完。太后亲自写了二十张一尺见方的福字、寿字。她说："谁爱写字，照着我的字样书写吧，不要怕难看，越练越好，没有胆子不行。"说完，有的格格提起大笔，歪歪扭扭写起来。太后笑着说："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众格格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提笔大胆写字的格格脸儿通红。下午五点钟，光绪皇帝率领近支宗室、满蒙各王公及满汉二品大员，至宁寿宫给太后行辞岁礼。

除夕之夜十二点的钟声刚过，太后命众人齐至殿上，排好长案后，由御膳房将事先预备好的各种素菜端上桌，太后命众人一齐动手做素馅饺子，于是切的切，剁的剁，切剁好后，都交到太后面前，由皇后、妃子、大格格等人拌馅儿，口味咸淡，由太后决定。天刚蒙蒙亮时，饺子已包齐。太后命众人退回更衣，重新梳头打扮。不大工夫，众人回到殿上。太后坐在案端，皇后等人都站在案旁。太后命宫女把煮好的饺子端上来，太后说："此刻是新年、新月、新时开始，我们不能忘记去岁的今日今时。今天我们能吃一碗太平饭，这都是神佛的保佑，列祖列宗的庇护。"说完，命大家用膳。大家向太后叩头谢恩。吃罢煮饺子，天才大亮。太后吩咐各府福晋、命妇回府。

太后在宫中过年，并未忘记外面的穷苦百姓，特意命人送一些吃食和礼物给守在宫外的乞丐们。说到礼物，此时太后确实收到不少，但都比不上万寿节时的高贵了，慈禧对送她的年礼很在乎，会一件件看，喜欢的就留下来用，不用的就锁进库内，也许再不去看上一眼了。这些礼物包括细小的用品、珠宝、绸缎，甚至还有衣服，应有尽有，但多半是盆景花卉之类。这时虽是寒冬腊月，名花佳卉，争奇斗

艳。太后的心情也特别好，种种不快也暂时搁置一边。

就在宫中欢庆佳节的时候，日俄冲突愈演愈烈，东北形势危急。将来走向如何，无人可以预料，太后的这个新年，过得也颇为闹心。

新春佳节，我也暂时将手头的工作放在一旁，和宫中诸人一起欢度。过了春节，状态也调整得极好，画像渐渐成形。我一直希望太后的双手能够从衣袖中露出，好展示她的美态。然而，太后始终坚持己见。然而随着画像的成形，太后却突然改变主意，接受我的建议，决定尝试一下新的构图。至于为什么，我倒不太清楚，不过我有把握让画出的肖像甚合太后的心意。



慈禧太后71岁画像

我先在小的画布上进行构图，太后看了，啧啧称赞，我无比振奋，当即在大的画布上进行改动。

春节过后，太后便决定移驾三海宫居住。那里虽然比不上颐和园，但比起囚笼一般的紫禁城，要好多了。至少，三海水面开阔，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叠石岩洞，绚丽多姿，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

既然太后移驾三海，我自然也要随之前往。我希望再给我安置一间光线明亮的房间，作为画室。不过我知道这种想法又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因为若要光线充足，则必须把房间的窗格全部换成玻璃，实在繁琐。然而圣路易斯博览会开幕的日子逐渐临近，容不得我再做耽搁。

这时有人告诉我，在三海之滨，有一座楼阁，地方宽敞，光线明朗，非常适合作画。我听了之后，暗道，若是说地方宽敞，倒没什么疑问。然而要说光线明朗，凭着我先前的经验，倒不那么可信了。不过究竟如何，还需亲临其境看一看才知道。

一天早晨，我们坐着轿子，搬到了三海宫。我绘画所用的工具，如画笔、画布、画架之类，都由太后安排人带了过去。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连一张纸，一支笔都没有遗失，而且全部都按照原来的样子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次为我安排的画室，果然就在湖畔。雕工精细，萧墙粉壁不说，光线也是极好。可以说，这是我为太后画像以来，最为满意的一间画室。同时白天变得更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画像，想来完工之日，不会太远。

几天后，各国的驻华使节纷纷来到三海宫，向太后、皇帝恭贺新年。次日，则是各位使节的夫人前来道贺，宾主之间，相见甚欢，我也能和故人得以相见，甚是喜悦。由于春节刚过，朝堂上还能感受到新春佳节的氛围，每个窗格上都贴上了“寿”字，周边还有五只蝙蝠围绕着，这是取“五福（蝠）托寿”之意。地面上还铺着红艳的地毯，看上去喜气洋洋。

因为这一日是正式的朝贺典礼，是以礼节极为隆重。外务部派出

几名翻译，与来宾一同登上朝堂，充作翻译。而来宾方面，则由奥匈帝国的公使齐根爵士进行一一介绍，他本是一名陆军军官，担任驻华使节多年了。他首先做了一个优雅的法国式的行礼，向太后等人恭祝新春愉快，并祝中国繁荣昌盛，外务部的人员在旁一一翻译给太后，太后听了，微微颔首，以汉语进行答谢，这时则由善讲法语的联芳[9]进行翻译。接着齐根爵士引领诸位女宾一一上前拜见。朝贺结束之后，男爵便与其随从先行退下，由外务部的官员引到偏房享用茶点。而女宾们则由格格们陪伴，在另一间厅房中座谈。

春节之后半个月，便是元宵节了，宫中张灯结彩，又是大行庆祝。不过，这跟我倒没有多大关系，整整一天，我都在画室中进行绘画。直到晚上，才走到戏院中，与太后寒暄一会。晚饭后，再与太后来到园中，观赏灯会。这时，华灯初上，四处灯烛光辉，将黑夜照耀得宛如白昼。三海之畔，高挂彩灯千盏，湖中漂着浮灯，水面霞光回旋，空中成为了飞霞的河，湖水成为了映霞的天，水天一色，光射彩掩。浮灯趁波逐浪，变成闪光星带，灯火点点，闪烁荡漾，如同一颗颗光芒四射的珍珠。湖畔万万盏灯彩照耀川陆，形成一幅艳丽美丽壮观的水上灯景。

众多太监，都穿着大红色的袍子，手提一盏红灯，每盏灯形状不一，或是人物，或是花草，或是走兽，都做得惟妙惟肖。他们来到太后殿前，排成一幅“吉祥如意”的字，以此博取太后的欢心。

太监们的步伐，极为整齐，人数虽多，确实有条不紊。掌灯的太监之后，又有一群太监，齐举两条彩缎扎成的长龙，龙头硕大而威严，龙须飘动，目光如炬，烟花爆竹四起，焰火四射，两条龙在万点火花之中，金灿灿的，犹如遨游在霞光云海之中，翻江倒海，活灵活现。忽有一人高举着一颗明珠，那二龙见状，争相上前，欲将明珠吞下，只是那明珠上下翻舞，苦不得就，容龄告诉我，这便是“二龙戏珠”了。至于“二龙戏珠”出于何处，她却不知道了。

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是不一样的，在基督教看来，龙是邪恶的象征，然而在中国的神话中，龙的地位是极为崇高的。龙可以呼风唤

雨，无所不能。龙的形象也与皇权联系起来，成为皇家的徽记。皇帝自称“真龙天子”，他的后代称为龙子龙孙，他的服饰被称作龙袍，他的一切用品都刻画上龙的形象。

在我看来，二龙戏珠也许蕴涵着这样一种意思：双龙不断地追逐明珠，因为它们一旦吸取明珠的力量，便能修成正果，然而它们永远达不到目的。这就预示着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纵是皇帝，也要不断地克己省身，奋发图强，以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元宵节当晚，除了要张灯结彩，还要燃放焰火。我们在正殿一边享用晚宴，一边等待焰火的时刻。不久，太后与皇帝的轿辇纷纷来到殿前，贵妇们则紧随其后。当太后坐定之后，只听一声脆响，三海上空都被焰火照亮了。一团团盛大的烟花在夜空开放；像一簇簇耀眼的灯盏在夜空中亮着。焰火时而像金菊怒放、牡丹盛开；时而像彩蝶翩跹、巨龙腾飞；时而像火树烂漫、虹彩狂舞。巨大的烟花在空中绽放，花瓣如雨，纷纷坠落，人们似乎触手可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景色。有些造型别致的美丽的纸花随风飘舞，落到太后身边的，便由太监拾来，呈递太后，太后看了，展颜而笑。更有许多，随风飘到远处，太后怡然道：“若是宫外小民拾到，也可博得一笑了。”

此时，三海早已冰封，太后便想在冰面上拖冰床为戏，便口谕每三个人坐一张拖冰床，由两名太监拖拉。太后说：“格格们可以跑在我的冰床前面，其余的冰床都在我的冰床后面。”于是冰床开始慢慢行走，逐渐加快，像在冰上飞跃一样。从岸上观看，如游龙在飞舞。约莫一小时后，太后传旨停止拖拉，命李莲英取大清元五千块，李莲英应声命令两名小太监搬取。大家不知要取这些银元做何用。正在议论，忽听得太监嚷道：“老祖宗有旨，所有人员都来太后冰床前听旨。”只见随同游玩的后妃、宫女、太监及各府福晋、仆妇等，连摔带爬地把太后围拢起来。

太后笑道：“你们分成三排。第一排是皇后、妃子、格格、宫女，第二排是太监，第三排是各府女人们。”这时李莲英派太监把银

元抬来了。太后吩咐四位蒙古福晋说：“你们有力气，每人拿五百元钱，向中心抛掷。”这时大家才知道太后要看摔人啦。太后对蒙古福晋说：“我一说抛，你们就用力抛。”

年轻的人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年龄大的福晋，却愁起来。太后说：“听口令，抛——”大家得钱心急，那抛出的银元，借着冰的光滑，滚得很远。你追我赶，一百人中，被滑倒七八十人，把太后看得乐不可支。

早些年，大内燃放焰火，曾准许百姓近前观看，以示与民同乐。到了同治年间，两宫太后因身为女性，多有不便，遂将此举免去。抑或是欧美各国在京中设立使馆，若是中外混杂，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罢去旧例。

第三十三章　清宫趣闻

在三海宫，我一直紧锣密鼓地推进画像的完成，以便参加圣路易斯的博览会。这时，宫中有些人在斟酌什么时候完稿比较合适。我本以为完稿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只需在画上添上最后一笔便可以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非常讲究良辰吉日，到了慈禧太后这里，更是事事都要参考黄道吉日。最后钦天监根据历书不断地推算，终于敲定，完稿的最佳时辰，当在1904年4月19日下午四点。

太后将选定的日期告诉我，并问我能否按时将画作完成。因为无论是画作开始的时间，还是完成的时间，都是经过精心甄选的，太后对此事似乎极为看重，竟表现出一丝忧虑，迫切希望我能够快些给予答复。因为我从未想过画画还要按时日来完成，所以告诉太后，容我仔细想想。我盘算一阵，点头道：“在下一定可以在4月19日四点之前准时完成。”太后听了，如释重负，连连称“好”，并请我务必准时完成，勿要拖延。

肖像画不断接近完稿，太后也频频来到我的画室，仔细端详画作，看看那些修饰、着色的工序。有几日，太后在早朝后，竟来我的画室看上两三次，看来她心存顾虑，生怕我不能按时完成，以致误了良辰吉时。

太后头上的珠宝首饰，都是事前由很多官员提供建议，经过反复斟酌后定下来的。然而在画像时，太后有时心血来潮，会觉得某一件首饰不太合适，便立刻换上其他的首饰，而且态度坚决，丝毫不容别人插嘴。她不知道，换件首饰对她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若要我在画作上修改，可是要费很大的工夫了。不过既然主人提出要求，我从命便是，绝不会出口抱怨。对此，太后显得极为感激，不时地对我说：“如此麻烦柯姑娘，实在过意不去，柯姑娘能体谅哀家的心意，真是慧心之人。”

其实，我倒不怕有麻烦，但是如此改动，使画像的效果大打折扣，使我不能够画出一幅自认为完美的作品来。

就在画像即将完成时，太后又别出心裁，令人做出一副画架，在上面雕绘两条飞龙，作二龙戏珠的造型。画架中间镶嵌着一个“寿”字，其余的雕刻也极为精细。太后又令人用樟脑木做一副架座，其形状与中国的镜架颇为相似。说起来，中国的工匠慧心巧思，做出的东西真是巧夺天工，无论放在哪个国家，都堪称大师级的水平。

新春之后，白天渐长，万木逢春，吐出嫩芽，芳草也渐渐染绿，其间夹杂着一些小花，昭示着春天的到来。三海之上，冰封的湖面也已解冻，春风吹起阵阵涟漪，可爱极了。我们出行，不再乘坐轿子，行走在三海之畔，沐浴在阳光之下，春风拂面，惬意极了。

精致的游船，停泊在岸边，轻轻荡漾，等着我们再次泛舟湖上，饱览春天的美景。太后的心情也颇为愉悦，经常出来走走。有时我们前往太后驾前请安，却被告知太后一大早便已出门遛弯，我们遂赶往湖边，与太后相会。

一天清晨，太后与皇帝正在视察三海宫新建的建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联军统帅瓦德西曾将指挥部设于三海宫，其手下的士兵曾大肆劫掠，又将许多宫殿付之一炬，现在只能重新起建。在这些建筑群中，自然也有太后与皇帝的行辕，两宫兴致勃勃地参观着，所到之处，工匠杂役一律回避。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栋建筑，完全按照欧洲风格建造的，以供接待外宾时使用。不过，我倒希望这栋建筑能保持中国的风格。我相信，当外国宾客下榻于此时，他们更希望能感受到中国的风情，毕竟，只有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才能对外人产生吸引，现代工业社会将许多民族、国家同化，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从文化的角度，这个世界已然黯淡很多。

有时候太后会坐着来自日本的人力车出游。太后的车子自然精美

绝伦，两边扶手各雕着一条金龙，神采奕然，作昂首长吟状，真是惟妙惟肖。车轴被刷得金灿灿，显得极为豪华，车轮则是用橡胶做成，这样更轻便快捷。走的时候，一名太监在前面拖拽，一名在后面推着。太后坐在里面，显得极为享受，但她说，人力车毕竟是东洋舶来的，远不如中国的轿子舒适，她宁愿自己步行，抑或是乘坐轿子。

在三海宫中，有两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一种是小火车，铁路的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当年一些洋务派官员曾上书建议在三海宫建造铁路，其用意是使太后明白铁路的便利以及利益，以便引发太后的兴趣，支持洋务派官员兴建铁路。后来三海宫的铁路虽然建成了，但是太后并不喜欢乘坐火车。

因为火车运行时会发出巨大的噪音，车厢也太过狭窄，游园时需要恬淡、自然的氛围，坐上这样一种东西，太过无趣。

另外一种交通工具是汽车，无论是在三海宫，还是在颐和园，都有太后的御用汽车，这些都是中国的官员从国外重金购买献给太后，以此博取太后的欢心。其实，太后对欧洲文明也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对许多舶来的新事物，颇感兴趣。



慈禧的汽车

在这些汽车中，有一辆被漆成黄色，上面绘着双龙，车厢内设有

太后的宝座。一开始，太后乘坐汽车竟然引起争议，原来依照惯例，旁人不得坐在太后的前面，也不可与她平起平坐。然而非如此司机才能正常驾驶。虽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太后决定打破陈规，破例让司机坐在她前面。然而如此一来，官员们纷纷上书表示反对，认为祖宗成法不能随便更改，而且太后万金之躯，不能有所冒险，倘若汽车出了事故，真是不堪设想。如此种种，使得太后只得作罢，放弃了乘坐汽车的想法。我在大内时，太后始终没有尝试过坐汽车的感觉。但我想，以太后那坚毅、富有冒险精神的性格，终有一天，她会如愿以偿，感受一下汽车这个工业文明的产物。

阳春四月，暖风熏人，人们纷纷走出户外，放起风筝。在中国，风筝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无论老幼，都乐于此道。皇宫之内，各位贵人早就期盼着这个时节的到来，大家一同放飞纸鸢，其乐无穷。太后说，在风和日丽的自然中放风筝是最好不过。跑跑走走，可以缓心舒神，增强体质。筝友相聚，妙语连珠，破闷解难，精神愉快，颇有延年益寿之效。

风筝的种类，亦有许多，常见的如鹰、蝴蝶、燕子、喜鹊，还有能工巧匠造出长龙风筝，长达数十米，又有宫灯、花瓶之类，造型奇特，手艺精湛。风筝上天有两个条件，一是要在有风的天气下，风筝才能放飞；二是风筝都需要有提线的牵引，“断线的风筝”在短暂的飘远之后必定会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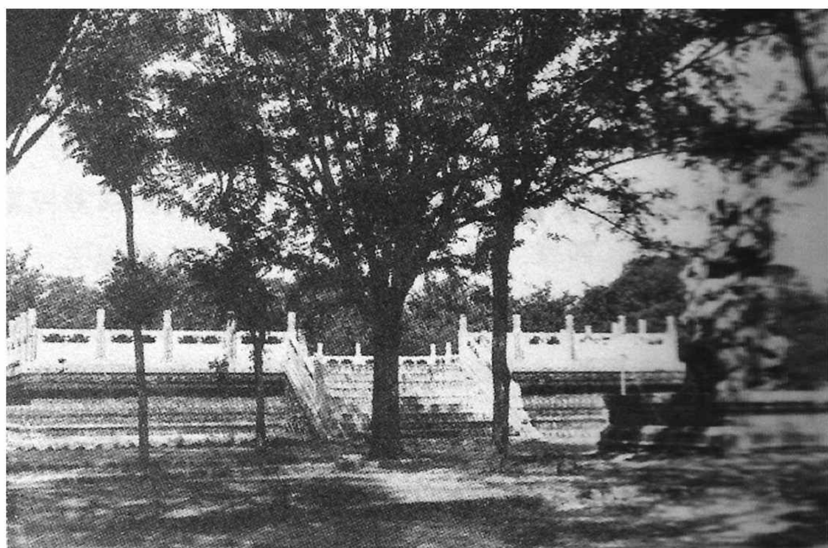
太后放风筝的技巧也是不俗，她将风筝放到天上，遂让我来试一试，然而我并不善于此道，只好婉言谢绝。不过看到皇后、格格们沉浸于此，其乐无穷。不由得怦然心动。

一天早晨，我们荡舟湖面，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迎着宜人的春风，顿觉心旷神怡。放眼四望，条条柳枝随着和暖的春风翩翩起舞，苍松翠柏被忽紧忽慢的春风吹动，粉色、白色的野桃花开满枝头，娇黄的迎春花开得正旺，洁白的玉兰含苞欲放；一阵阵花香沁人心脾，一树树鲜花为三海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忽地，我看到许多戴着顶戴花翎的官员簇拥着一位身着明黄衣袍

的人在湖畔忙碌着什么。我当即意识到，那是皇帝。不过，皇帝带着百官来此做什么呢？再仔细看，只见皇帝身边有一头小牛，一张耕犁。我不由问起容龄，才知道今日乃春耕之日。

原来立春之后，皇帝会进行亲耕，以表示天子劭农劝稼、祈求年丰之意。亲耕之日，一清早，皇帝就着礼服，乘舆前往城南的先农坛。在行过祭享先农等礼仪后，来到观耕台前的籍田里，面南站立，户部尚书跪进耒，顺天府尹跪进鞭，皇帝右手秉耒，左手执鞭，前面耄耋二人牵牛，旁有农夫二人扶犁，户部侍郎负责播种，在礼部、太常寺、銮仪卫等六位堂官导引护驾下，在一片鼓乐赞歌声中，往返三个来回，便完成了“三推三返”的亲耕礼。



先农坛观耕台

皇帝亲耕，不过是个礼仪，但也有皇帝当真耕田的事。据说康熙皇帝在京南博野视察春耕情况，曾亲持犁器，一气儿耕了一亩地。当时共有万人观看此景。这个场景我虽然不能一见，然而今日看了光绪皇帝亲耕，方知中国所谓天子亲耕、皇后亲桑，绝非虚言。

第三十四章　送展圣路易斯

4月19日，这个良辰吉日快要到了，画像的进展也比较迅速。太后的兴趣似乎在不断地增长，她不时来到我的画室，观看我绘画的进展，并对我的画像表示出极大满意。这时我恳请太后，是否能允许在画像的完工之日，准许康格尔夫人前来参观。太后当即应允，并责令外务部写下许多份请柬，不仅送给康格尔夫人一人，还邀请了驻京的许多使节夫人，一同到宫中参观。

各位夫人接到请柬，都非常高兴，4月19日那天一早，纷纷来到宫中。太后在大殿接见她们，然后派皇后和格格们领着她们来到我的画室，参观画像。太监们早已将太后的肖像安放在专门打制的画架上。我并没有参与到接待的人群中，或是和故友们相叙情谊，而是留在画室中不停地忙碌着，因为最后的点睛之笔，需得等到下午四时，如此才能宣告完成。在此之前，我还有些细节要去完成。

这些宾客来到我的画室，参观太后的肖像后，不由啧啧称赞，直道我笔下的太后，神形兼备，惟妙惟肖。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是慈禧太后生平第一幅画像，又是出自外籍女画家之手，颇有一种纪念意义，所以引起她们的极大兴趣。来宾仔细端详画像后，不惜以华美的辞藻，纷纷给予最高的评价，其溢美之辞，实在令人惭愧。宫里的太监们说得更是神乎其神：这幅画像如此逼真，以至于一眼望去，仿佛太后亲临，心中立时便生出敬畏之感，实在是神来之笔。

来宾们参观了太后的画像后，来到一间偏殿享用茶点，负责招待的则是皇后。这是我在宫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皇后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外宾，其他时间都是太后作为主人，皇后只是陪在身旁，并没有多少言语。如今皇后出面，风度翩翩，谈吐优雅，丝毫不亚于太后，深受来宾的赞许。



慈禧太后

送走各位女宾后，太后告诉我，完工后，贝勒们也将于次日入宫参观画像。然而按照规矩，男子不得进入后妃的居室中，即使是外国的柯姑娘的住所，也不能破例。所以当皇亲们来到宫中参观时，须得将画像移到朝堂上。

次日一早，太监们依照命令，先将精美的画架搬到朝堂上，再小心翼翼地将画像安置在上面。一切准备就绪后，皇亲们便纷纷来到大殿中，仔仔细细地端详，可惜他们的评价我都听不到，因为我必须按

照宫里的规矩，躲到一张厚厚的帘子后面，相隔甚远，是以听不清楚。不过我可以透过帘子，看到他们的神情，只是这些皇亲们受到礼法的约束，自幼便被教导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所以他们对我的画像究竟有何看法，单从表情是看不出的。

来宾之中有一位少年弟子，曾在国外游历多时，颇通摄影技术。太后遂令其将画像拍摄下来，以作留念，因为这幅画不久后便要被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参展了。

当参观结束之后，王公们纷纷退出宫外，肖像再次被收回我的画室。太后对人们的评论非常满意（这些人当然不会给予差评），同时答应了几名高官的请求，准许文武百官们都来朝觐太后的圣像。于是，几天之后，这幅画便被送到外务部，以便那些无缘进入大内的官员可以一睹太后的风采。不光是中国官员，许多外国使节也收到邀请，一道来瞻仰太后的圣容，各国使节前来参观时，全都身着盛装，以示尊敬。看过之后，自然也是一片称赞。

待众人参观过后，外务部便打造了一只紫檀木箱，周边用绣着双龙的黄缎裹起来，准备用来安放画像。

画架也被安放在同样的一只箱子里。两只箱子都镶嵌着青铜手柄，并用巨大的圆形锁扣住。箱子外面又用另一只木箱套住，再用黄缎裹住，以防在路上遭到损坏。与此同时，清廷考虑到若是由普通的轿夫搬运画像，显得有失尊重，竟特意修建一条从外务部到前门车站的铁轨，以便运送圣像。

动身运送画像的那天，外务部以及其他衙门的许多高级官员，身着朝服，恭恭敬敬地前来护送画像。运送画像的特别专列尚未抵达天津，直隶总督便率领全城的官员，恭候在火车站。等到火车驶入车站，他们纷纷跪倒在地，叩头请安。到了天津之后，画像便被装在汽轮之上，先送到上海，然后再送到美国。其间一切礼仪，并无二致。沿途所有的负责官员，都是太后亲自指派的。

当画像抵达上海之时，江苏省的官员们也纷纷前来恭迎圣像。之

后画像便被装到远洋轮船上，跨越太平洋，直抵旧金山。美国政府已备下专车，将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城。其间，宗室弟子溥伦[10]一直担任钦差大臣，专程负责护送工作。画像一运到世博会的会场，溥伦便照会美方，要求将揭幕仪式定在6月19日下午四点。

画像陈列的场馆，是博览会的美术馆。揭幕当天，美术馆的馆长、副馆长以及一些董事会的成员，全部赶来观看，大厅之中，熙熙攘攘，人们都期待一睹慈禧太后的风采。

揭幕仪式一直从下午四点持续到九点，放置画像的箱子被抬到美术馆后，溥伦进行一番祝辞，大家一同举起香槟，表示庆贺。随后揭开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太后的画像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之后便纷纷上前观瞻，此时，太后的画像不再如以前那样神圣不可侵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参观。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听到人们对画像的真实看法。人们面对这位传说中的东方太后，显得极为好奇，也有许多人指指点点，显露出轻视与嘲弄的神情，这自然是因为听说过许多关于太后的不利传闻，脑海中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一个恶毒的老妖婆子。几天之后，博览会闭幕，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派出一名专员，恭恭敬敬地将画像收起，送到华盛顿大使馆中。

依照太后的本意，倘若这幅画在博览会上取得了成功，那么便于会后将此画赠给美国政府。本来，为太后画像，并将画像送往美国参展，是康格尔夫人发起的，而这幅画又是由美国画家所画，送给美国，再合适不过。这也是美国收到的第一幅中国统治者的画像，也颇有意义。

画像抵达华盛顿后，中国大使梁诚[11]亲自将其送到白宫，总统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画像，并致以感谢。

第三十五章　别了，颐和园

圣路易斯博览会虽然胜利召开，慈禧太后的画像也已赠送给美国政府，但是我并未就此离开中国，因为尚有一些善后的事情需要料理。

四月下旬，天气已完全回暖，太后遂下令返回颐和园。几天之后，我故地重游，再次回到了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此时风和日丽、春暖花开，树木舒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在微微的春风中轻柔地拂动，花儿们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红得如火，粉得如霞，白得如玉。它们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苞初绽，有的昂首怒放。

先前我曾说过，在颐和园中有一处牡丹园，此时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在中国牡丹被誉为“花中之王”，因为它们形大鲜美、仪态万方、色香俱全、冠绝群芳、国色天香，五彩缤纷的色泽，有红、黄、蓝、白、粉墨、绿、紫，超越百花。即使花色同为红花，有的如丹，有的像火，有的却似红玛瑙那样晶莹；同为白花，有的似冰，有的若银，有的宛如白玉。花香沁人肺腑，令人陶醉。在如此美妙的地方，太后流连于此，也不足为奇了。

我最爱带着我的“金琥珀”，漫步在百花丛中，金琥珀尽情地奔跑，感受着春的气息，有时它会顽皮地扑向小鸟，或是追逐兔子，真是惬意极了。有时候我会独自徜徉在醇亲王的园子中，欣赏他留下来的墨迹，与园子的主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与此同时，太监们又重新为我布置好一间画室，坐在室中，透过窗子便可望见风景宜人的颐和园，而画室内也极为宽敞，颇合我的心意。后来得知，这间画室是太后亲自安排的，我不由感慨她总是那么和蔼、体贴。知道我性情沉静，喜好幽静的地方，以便能专心作画，遂专门为我挑选一间画室。

此时，我主要的工作，便是按照送去参展的那幅画像，再临摹一幅小的，以供太后自己留念。并将先前所画的两幅画像，仔细修饰润泽，这些都要花费一些时间。我在画室中作画，样样称心，唯有一点使我烦恼，那就是画室毗邻戏院，每当上演戏剧的时候，都能听到锣鼓丝竹的声音，还有太监、宫女们来回奔走，颇为烦乱。于是我决定每当上演戏剧的时候，我便借故前往美国大使馆中，与康格尔夫人小叙。



卡尔所画的慈禧

这天，适逢上演戏剧的日子，我遂告请太后，希望能前往北京一日，去见康格尔夫人，太后当即允许。次日返回，见到我的桌子上放

着一张戏单，上面有朱红色的笔迹，想来是皇帝的笔迹，因为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朱砂红笔批写文章。想来昨日我不在时，皇帝曾在此处小作盘桓。

我仔细看了看戏单，只见上面所画的竟是一张地图，细细一看，乃日俄在东北交战的形势图，还有长城和东北的分界线。我不由大为感慨，平日皇帝寡言少语，似乎事事都不放在心上，一切只按照太后的意思行事，然而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皇帝对国事的关心程度，丝毫不亚于太后，对于中国的前途，他甚至比太后还要忧虑。不过，长期以来，他似乎将自己的感情深深地隐藏起来，不会轻易流露。

数日之后，太后又安排了一次游园会，邀请各国驻北京的使节夫人，并且请我承担招待工作。那天，我一大早便来到朝堂上，宾客们还没有到来，太后打量了一下我的穿着，说道："柯姑娘今日所穿，太过素雅了。"当即从花瓶中折下一只粉红色的牡丹，别在我的裙子上，笑道："如此一来，岂非增色不少？"

她顿了顿，又道："柯姑娘所作画像，甚合哀家心意，我今日请各位来宾一起参观姑娘的大作，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我对我的作品颇有自信，当即点头赞成。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事前毫无准备，以致画室中杂乱不堪，画像也没有安置好。我说道："既然要供人参观，还请容我前去规整一番，以免失了礼数。"太后点头道："如此也好，待宾客到齐，用过茶点之后，你便去准备吧。"

不一会儿，宾客们纷纷到来，我在大殿中充当东道主，一一接待，用过茶点之后，我正要离座，却见太后起身说道："今日请各位来，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一睹柯姑娘的大作。现在各位且随我来吧。"说罢，便领着众人前往我的画室。我不由一怔，只道太后早已将先前的安排忘在脑后，不待我去整理，便领着宾客前来参观了。事已至此，我也不好多言，只好随着众人一并前往，心中却是惴惴不安。

然而，当我走进画室时，不由一震，只见一切井然有序，所有的东西都归置得整整齐齐，太后的画像早已被安置在画架之上，窗棂打开，阳光铺洒在屋中，显得极为明亮。此时我方知，太后早已授意太监，为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打量了一下，除了画架安置的地方稍嫌不佳，其余几近完美，不过，这一点缺陷也是无伤大雅，而且在太后面前，我也不好再去移动位置了。

来宾们看过画像之后，纷纷称赞，在我听来，无非是恭维罢了。当大家在参观之时，太后忽然瞥见画像上袍袖的一边，画的不甚清晰。她立即指给我看，说道："请柯姑娘在此做一些润泽，不知行否？"其实这是西洋画法常见的手法，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和印象，而不是将事物清晰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太后自然不知道，但我也只能按照她的意思，进行改动。改过之后，再请太后观赏，果然获得极高的评价，直道这幅画比送去参展的那一幅画得更好，又对我的画技赞扬了一番，并夸我我灵心巧慧，善解人意。只是在我看来，这种改动，实在不如以前了。

总而言之，为慈禧太后画像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在此之前并没有先例，在我之后，不知会不会有人再度为太后画像，再次将太后的风采展现给世人。说起来，让太后打破固有的偏见，允许一个外国人进入宫中常住，并且同意将画像送到世博会上，供全世界人民参观，这种勇气着实不易。而且，一旦她见识过摄像拍照，立刻领会到其快捷方便，当即任命了一位宫廷摄影师。种种迹象表明，慈禧太后并非冥顽不灵，墨守成规，敌视西方文明的顽固分子。相反，她非常乐意接受新鲜事务，毕竟，作为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这一点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作为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未停止开拓进取，她一直在做巨大的努力，推动这个老大的帝国缓缓地前进。

自从我进入大内，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九个月了，我在这里享受到了难得的奢华，真如生活在天堂一般。我与太后、皇后和德龄、容龄等人相处甚欢，甚至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太后甚至建议我索性留在大内，陪伴她度过余生。

太后的好意，我心领了，然而颐和园虽是人间天堂，却终非我的故土。在大洋彼岸，有我的亲人、朋友，在中国的日子里，我始终牵挂着他们。有道是世间无不散的筵席，毕竟，我在中国完成了四幅画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巅峰，接下来，我该去尝试新的挑战了。

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向太后等人辞别，至今已过了许久。然而，太后等人的音容笑貌时刻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能自已，遂提起笔来，将这段难得的经历述于纸上，以作永久的怀念。

（全书完）

译后记　慈禧这“老祖宗”

陈述

解读中国近代史，慈禧太后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曾几何时，我们通过书籍以及影视作品，对慈禧太后形成一个深刻的固定的印象，她是一个骄奢淫逸的人，她一顿饭要吃一百多道菜，她的衣服不计其数，她的用度惊人得奢华——仅仅从慈禧太后死后的陪葬品便可窥出，这位太后生前过着如何奢侈的生活。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曾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在李莲英和他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慈禧棺内，底部铺的是金丝织宝珠锦褥，厚7寸，镶有大小珍珠12000余粒、宝石85块、白玉200余块。锦褥之上铺着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丝褥上铺珍珠2400粒。慈禧尸身上盖有一条织金陀罗尼经被，被子用明黄缎捻金织成，织有陀罗尼经文25000字，经被上还缀有800余粒大大小小的珍珠。入殓时，慈禧头戴镶嵌珍珠宝石的凤冠，凤冠上一颗重达4两的珍珠，大小如同鸡蛋差不多；慈禧口内还含一粒夜明珠。据传，此夜明珠在夜间能在百步之内照见人的头发；慈禧脖颈上有朝珠3挂，两挂是珍珠所制，一挂是红宝石所制；慈禧全身穿金丝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足蹬朝靴，手执玉莲花一枝。慈禧身旁还陪葬着金、玉佛像，以及各种宝玉石、珊瑚等。据说，当宝物殓葬完毕后，送葬的人发现棺内还有孔隙，就又倒进了4升珍珠和2200块红、蓝、祖母绿宝石。慈禧棺内最珍贵的陪葬品是什么呢？据传闻，是用白玉雕成、号称可以“烟云流动”的九玲珑宝塔。慈禧棺内还有4个翡翠西瓜，两个绿皮白籽黄瓤，两个白皮黄籽粉瓤，仅这几个翡翠西瓜，价值就达600万两白银。

同时，她还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在她的统治期间内，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割地赔款不计其数。面对日本人的虎视眈眈，她挪用北

洋海军的经费，为自己筹办六十大寿，导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留下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骂名，也是从那时起，日本开始不断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面对维新派的救国图强，她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手段，囚禁了光绪皇帝，逼走了康有为、梁启超，杀害了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再度使中国陷入泥潭之中。不久，因为她的颟顸昏聩，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侵华，签下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她那不知廉耻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言论，更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慈禧还是一位善于操弄权术的女人，辛酉政变，她联手慈安、奕□击败了顾命八大臣；之后，慈安神秘死亡，奕□被她架空，其余的王公大臣在她面前无不战战兢兢；她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她的高压之下不堪重负，郁郁而终——当然，他的死亡至今还是一个谜团，她的亲外甥光绪也在她的淫威下一生抑郁寡欢，而这位皇帝的死亡，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极大的谜团。

然而，若从另一面看，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应付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也有人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即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动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端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笔者认为，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也绝不能脸谱化，作为一个人，她是生动的、丰满的、复杂的，我们在认识慈禧太后这个近代史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时候，也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认识。而本书，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本书作者，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1858-1938年），中文译作柯姑娘。20世纪初曾创了两项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纪录：她是唯一在中国宫廷之内一连待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又是唯一替尚健在的中国后妃画过肖像的人。

“柯姑娘”——当时宫廷内外对卡尔的一致称呼——一个美国人给西太后画像，这在当时听起来似乎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所以能得以实现，不能不归功于康格尔夫人。

卡尔1903年来华，是当时中国海关税务司柯尔乐（FrancisAugus-taCarl）的姐姐。在上海逗留期间，卡尔收到美国驻北京公使夫人康格尔的来信，信中谈到中国的慈禧皇太后正欲请人为其画像，问其是否愿意前往北京，进宫承担此任。并说如果这件事能办成，她还希望慈禧太后能够同意把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去参展。夫人认为此画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兴趣且令世人瞩目。对这样的事，康格尔夫妇自然会努力促成。康格尔夫人曾有机会多次见到太后本人，因此她认为外面的人如能亲眼目睹慈禧太后的真实肖像，或许会改变对太后抱有的偏见。

卡尔很快给康格尔夫人写了回信，表明自己非常愿意进京为太后画像，将在上海恭候她的安排。后康格尔夫人又告诉她说，画像之事已定，太后准备召见画师，并择吉日动笔。然而，中国官场风气一向

拖沓，直到7月，康格尔夫人才收到外务部的正式文书：请康格尔夫人携美国画师卡尔小姐，于8月5日一同进宫觐见，并于即日开始为太后画像。接到康格尔夫人的通知，卡尔于7月29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美国公使馆受到了康格尔夫妇的热情款待。8月5日那天，在康格尔夫人的引领下去颐和园参见了慈禧太后。

以外国人的身份进宫为太后陛下画像，在中国悠悠历史长河中，实属破天荒之举，概无先例可循，处处无所适从。卡尔到颐和园参见太后时，不知道可以请她出面画上几次，也没有人能明确告诉她一点儿有关画像的事。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均取决于太后的意愿，接下来其将受到怎样的待遇，又将如何开展工作，都要受这位显贵的太后各种古怪念头的支配。

原定画两次的，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一直画了九个月。这期间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宫里。九个月的宫廷生活不仅使卡尔完成了四幅西太后的肖像，以及从未公开的七幅格格肖像，更重要的是她与慈禧太后的亲密接触，促使她完成了这部稀有之作——为世人真实地展示了没落前的大清帝国谜一般的宫廷暮霭和谜一般的慈禧皇太后的私密生活。

卡尔以观察统治者的眼光去解析慈禧，却在政务之外，看到了一个女人对容貌的关注和对服饰的考究；她曾以揣度一位七旬老人的心态去接近慈禧，却在年龄之外，感受到一种旺盛的、孜孜不倦的好胜之心……在卡尔眼中，她严厉、专横，同时又通达、聪颖。书中展示给大家的，是一个鲜活而客观的，曾经统治中国四十八年之久的女人的另一个侧面，是集君主的铁面与强权、女人的魅力与多情于一身的多面人格。同时书中对深宫御苑中许多秘而不宣，一向不为世人所知的奇闻轶事，也做了相当生动的描述。

这位女画家对慈禧推崇备至，认为她待人和蔼可亲，举止高贵得体，谁见了都喜欢。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她是外国人，又是慈禧的座上宾，对宫闱秘事知之不多，就算知道，也不会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不过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不是什

么坏事。

[1]裕庚，汉军正白旗人，字朗西，人称八旗才子。光绪优贡生，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出使日本、法国大臣。裕庚有二子二女，长子馨龄、次子勋龄、大女儿德龄、二女儿容龄。他们兄妹均随其父母在欧洲生活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法文。

[2]裕德龄（1886-1944年），满清贵族，正白旗人，被封郡主。因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并用英文写作了这段经历而闻名。其著作有《清宫二年记》、《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

[3]译者注：摩尔人，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及北非部分地区的阿拉伯人。

[4]作者显然没有看懂这出嫦娥奔月的戏，做出了似是而非的认识。

[5]建筑正中一间称明间，其左、右侧的称次间，再外的称梢间，最外的称尽间。

[6]译者注：1906年，载沣的长子溥仪出世，1908年光绪死后，继位为帝，是为末代皇帝宣统。

[7]译者注：作者的说法并不准确。满洲八旗，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清军入关前，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由皇太极亲自统领，是皇帝的亲兵，身份高贵，条件待遇优厚，称为“上三旗”。其余五旗，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白旗、镶蓝旗，称为“下五旗”，由亲王、贝勒、贝子掌管，驻守京师各地。入关后，多尔衮将自己所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就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此后清代就成了定制。一般认为慈禧属于满洲镶蓝旗人，后抬旗入镶黄旗。

[8]译者注：作者了解到的只是一种表象，或者是道听途说而已，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9]联芳（1835-1927），清朝大臣。字春卿，汉军镶白旗人。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饬令前署俄国参赞候选知府联芳留天津差委。随后，联芳供职于北洋，由李鸿章差遣；数年后回京在外务部任职，官外务部左侍郎。宣统二年（1910年）授荆州将军。

[10]溥伦（1869-1927），字顺斋，满族镶红旗人。同治帝驾崩时，曾有望继承大统，为慈禧太后所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筹备资政院，与孙家鼐共同担任总裁。宣统三年（1911年）任庆亲王内阁农工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赞同清帝逊位。民国后，转而依附袁世凯，赞同洪宪帝制，任参政院长，许亲王双俸。1904年3月4日，溥伦率清帝国代表团离京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主持“一切赴会事宜”。事实上溥伦除了参加世博会活动外，还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进行了许多考察和会见。

[11]梁诚（1864-1917年），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人。在1903年至1908

年间，曾担任晚清驻美利坚合众国公使。

一个拥有至高皇权的女人，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面孔？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著

房新侠 杨丹 译

親歷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著者：（英）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艾特豪德·拜克豪斯

译者：房新侠　杨丹

责任编辑：郝鹏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慈禧王朝面面观
第一章 慈禧身世
第二章 逃往热河
第三章 辛酉政变
第四章 首度垂帘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1864）
第六章 太监惹祸
第七章 礼仪问题
第八章 同治皇帝
第九章 御史以死明志
第十章 二度垂帘
第十一章 慈禧还政
第十二章 维新变革
第十三章 百日变法
第十四章 戊戌政变
第十五章 三度垂帘
第十六章 义和团的兴起
第十七章 大臣景善日记
第十八章 缅怀两位勇士
第十九章 施政纲领
第二十章 离京西巡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领袖之死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第二十三章 两宫回京
第二十四章 慈禧新政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第二十六章 慈禧弥留

第二十七章 慈禧宾天
第二十八章 评价慈禧
译后记 慈禧和她的时代
返回总目录

此书为作者根据晚清的官方文献及私人日记写成，记述了慈禧的历史和她统治的那个时代。

作者在此特向以下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凯瑟琳·A.卡尔小姐，承蒙能在此书中征得她同意，采用她为太后画像；东京艺术出版商K.奥格瓦先生，为本书提供北京皇宫慈禧太后的独家照片；《远东评论》的乔·布朗森·李尔先生，授权在本书使用他们刊物的原创插图；北京的倍亭思公司，授权出版他们对首都的评论；还要感谢泰晤士报的编辑，承蒙授权在本书中收纳该报文章。

1910年9月10日于伦敦

序言　慈禧王朝面面观

陶林

公元1908年11月14日，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三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即将死去。这一天之前，她预估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颁布一道密旨，下令毒杀了被她一直软禁在瀛台的侄子光绪皇帝。以后来研究者从光绪尸骨、毛发中提炼出的砒霜浓度来看，她要置光绪于死地的决心是很坚决的。

一直在韬光养晦的光绪皇帝一命呜呼之后，慈禧全部的求生意志松弛了。11月15日，她就进入了弥留状态。清宫的御医们手忙脚乱，开出一剂益气生津之方，力图妙手回春：老米一两，人参五分，麦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稍通西医西药之理的人一看便知，对于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人来说，这是一剂没有任何意义的药方。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强心针，没有输氧和体外循环，在几位宫女的强灌喂服之下，慈禧太后服下了最后一剂药方。

药方勉强能保她回光返照。临终前，慈禧太后又郑重地下达了另外一道密旨：“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说完这道遗嘱仅仅一个时辰之后，慈禧太后便死去了。

她的这道临终遗言很是奇怪，经由这部《慈禧统治下的中国》一书独家向全世界公诸后，引来无数人持久的争议。按照她遗嘱字面的意思，慈禧似乎否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执政的一生，恐深感大清王朝行之不长；或许，其另一层意思在于，慈禧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向自称老佛爷、老祖宗的，让皇帝用“皇阿玛”（父亲）称呼自己的她，更多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超人。

无论是谁，一旦撒手人寰，在世的是是非非全然而去，终还交由后人评述。在临终前，慈禧已经选定了五岁的小孩子溥仪作为皇帝的接班者，并托孤给诸位满族大臣、亲王。她自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已有效地操控了满清王朝这艘破败不堪的大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几乎要倾覆的难关。尽管这些导致难关的绝大部分因素，得由她本人来负全部责任。

作为美人与贵妃，她在陪伴咸丰皇帝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权力非同寻常的欲望——当然，对于终身在权力羁绊下的中国人来说，贪权是人之常态，况且还是执掌天下的超级大权。咸丰皇帝去世前，曾感受过自己这位“兰贵人”弄权的机灵劲，曾下密旨，一旦慈禧权欲过大，则击杀之。然而，该属于慈禧的，谁也夺不走。整个大清王朝的末代时期，从咸丰皇帝去世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几乎都可以看成是慈禧的王朝。

然而，与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孙中山这样心怀天下的政治家不同，慈禧对权力的迷恋，从本质上来说，是纯感官性的，而非理智性的。这感官性就像吃喝拉撒一样，遵从于一种低劣的人性。她本能地要权、揽权，而从骨子里来说，并没有任何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其中。这种本能驱动着她排除任何异己，搬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自始至终没能有一副清晰的眼力，能看清历史的潮流与轨迹。正因为如此，慈禧王朝是一个视野相当模糊、目光非常短浅而头脑非常糊涂的时代。

我把慈禧王朝，称之为中华民族的“鼹鼠时代”。整个民族被一位“鼹鼠”太后领导着，在地洞里稀里糊涂地挖掘，提心吊胆于每一粒土坷垃的掉落。既谈不上有什么“开天辟地”之功，也谈不上是光宗耀祖，更谈不上走进什么“历史的三峡”那么悲壮。慈禧的权臣李鸿章，对之概括得很好，仅仅是裱糊一栋四处漏风的破房子而已。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慈禧王朝在近代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跟满清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逐步走入传统的“治平”不一样的是，慈禧王朝面临的是一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与世界

大时代的巨大变化相比，康雍乾盛世的所谓辉煌灿烂，更像是王朝传统的回光返照。特别到了乾隆统治时代，专制术加文字狱，使得所谓的“盛世”只是徒有虚名的。经济和文化水准一落千丈，用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评价来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成为野蛮人。”

“盛世”假象一闪而过，鸦片战争中，满清的朝廷文化因为太多的注目于单纯的权力操作，世道人心一落千丈，根本无力抵御新兴西方国家最微弱的一次攻击。等到了慈禧王朝时代，国门洞开，现代文明浩浩荡荡，所有既往传统统治的经验全部作废。一个多变善变、心气无定的女权威者，要跟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较量。

慈禧一直很自负，喜欢拿自己与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然而，与维多利亚女王安于相夫教子的日常化生活不一样的是，她从没有一天过过正常化的生活，夫亡守寡后，便把压抑的生活全部投入无休止的权术斗争，以及穷奢极欲的“享福”生活中。而非常有趣的事，除了力主与中国进行鸦片战争之外，维多利亚女王一生几乎一无所为，典型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种无为，使得英国的现代宪政制度极少受到最高权威的干扰，得以在粗糙的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顺利地完善与发展，也让大英帝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唯一日不落的超级大国。所以幽默的英国人赞誉维多利亚，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孵育了现代英国。

而在整个慈禧王朝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从辛酉政变上台起，到太平天国、剿捻、兴办洋务、中俄、中法、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剧变等等，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插手，但没有一件事能以善终，没有一件事能有好结果。这是典型的无不为而无所为，反复证明这位执政者的无能和命硬之外，别的一无是处。慈禧却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慈禧王朝时代，名臣辈出，前有曾国藩的湘军系，后有袁世凯的小站派系。无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还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执掌天下的能耐，但至少慈禧活着时，每一个人都谨遵传统、恪守臣道。即使慈禧再无能，作出再昏聩的决定，他们也不至于一朝变脸，踢翻她的

龙椅。

然而，对历史最没有感觉的中国人也都能感觉到，慈禧就像一只吸血鬼一样，吸尽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气数。满族作家老舍先生，在总结历史时诚恳地说：“从慈禧开始，我们满人对中国只有拖累、没有贡献。从上到下都讲究，富的富讲究，穷的穷讲究。讲究不尽，讲究到死。”他说的这种“讲究”，毫无疑问，是慈禧总带头的。她讲究了颐和园，便输掉了甲午战争。这一历史，即使现在学者再翻案，也是绕不过去的。

被赶尽杀绝、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康有为等，非常憎恨慈禧，一直花重金求刺客要去行刺慈禧。但康有为的这一行为，却被日渐倾向于革命的梁启超劝阻了。我猜想，显然是在梁启超看来，慈禧对于满清来说破坏力，比一万个革命者还要大。

事实也是如此，在慈禧死日（1908年）到满清覆亡（1911年）的这3年时间内，满清政府虽然乱象纷纭，但中国日子却好过得不得了。统治者的奢侈浪费锐减，现代技术和制度的红利爆发，等到了辛亥年，满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达到了2.4亿两白银。这样良好的财政状况，远超过历朝历代任何一个“盛世”。即便如此，满清还是抱着一块大金砖迎来了革命的爆发和王朝的灭亡。这一事实，若慈禧在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本书《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就是一本纵览慈禧王朝的专著。原书的两位作者之一——艾特豪德·拜克豪斯是一个奇人。这位英国册封的爵爷，自称是慈禧的西方秘密情人，亲眼见证了清朝宫廷若干的不堪与淫秽，并写成了一本萨德式的小说作品《太后与我》。显然，这些都是这位西方浪子的无稽之谈。不过，与他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部书严谨、周详，严格忠于史实，是一部非常好的慈禧王朝的面面观，却一点不影响它的可读性，好读，有趣。要感谢房新侠和杨丹两位译者，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匡婷、卫梦琳等提供的帮助。她们让译文流畅、明白。能邀请到她们完成这部译著，是一种荣幸。

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书，能获得对慈禧及其王朝的全面认识，

以及对当下、未来的无限启示与遐想。或许，对于慈禧太后，我们适宜抱着放松的心态待之。一直以来，我们都太专注于她历史中的是非，甚至鲜有人注意到她的本名——叶赫那拉·杏贞。确实，那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第一章　慈禧身世

叶赫那拉部落是满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祖辈能一直追溯到贝勒杨吉努。1835年，这个家族诞生了一名女婴，她注定要影响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一生中三次垂帘听政，对中国的专制统治长达半个世纪，她就是叶赫那拉。

叶赫那拉的父亲叫惠征，世袭八旗将军头衔，与贵族出身相比，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混得不够成功，到死也就是个道台。惠征在安徽任内去世，女儿仅仅三岁，孤儿寡母只好投奔亲戚穆扬阿。之后与叶赫那拉一同垂帘听政的慈安，正是他的女儿，孩子们在穆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慈禧太后

最近几年，针对皇太后的低微出身，不少可耻的毫无根据的谣言四起。其中不少是一些小报消息，不过想通过满足读者对偶像的猎奇心理造成轰动效应而已。但是，毫无疑问，还有些谣言是关于嫉妒、仇恨以及宫廷斗争，一些铁帽子王和皇室官员乐于造谣生事，就是想让叶赫那拉家的人“丢脸”。因为这些人的搅和，京城里人人皆知，南方的老百姓也深信不疑，康有为等人还写书为证。

在说其他事之前，很有必要先强调一下，从努尔哈赤开始，叶赫

那拉家族就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自从叶赫那拉镇压了载垣谋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后，皇族与这个强势家族之间的摩擦与斗争从未停止过，戊戌变法后关系更加紧张，紫禁城里危机四伏，只是碍于慈禧的威严没有爆发。最近京城发生了不少事，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在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被罢免，更是加深了满族阵营的分化，没了慈禧的清政府现在真是四面楚歌。

我们外国人根本搞不懂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党派之争的真实情况，比如家谱、婚配、过继、世仇等等。不过，有件事我们还是清楚的，皇室（他们都姓爱新觉罗）被分为红带子和黄带子，他们都是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直系后裔，因为祖先的关系他们自认为在满族皇族中拥有最尊贵的地位（中国人都认可）。叶赫那拉家族虽不是皇室后裔（家族中的女性嫁给皇帝最多获得个贵族头衔），但是因为家族人数众多，而且前后出了三个皇太后，特别是有了慈禧这样个拥有无上地位和声望的皇太后使他们拥有了巨大的权利。近期发生的事以及慈禧临终安排都预示着，叶赫那拉家族的领袖要求当今的皇太后，也就是光绪的遗孀，要相仿她的姑姑慈禧在摄政期间把持朝政。而且多亏慈禧卓有远见，安排荣禄的外孙继承皇位，这样老佛爷定下的规矩肯定会延续下去。

老佛爷算得上是个强硬的保守派，她生前对直系亲戚打着保护伞，包庇他们僭越礼制的行为，暗中加深了他们与红带子和黄带子之间矛盾，这些事成了京城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慈禧最喜欢怠慢爱新觉罗家的人，她曾下旨禁止爱新觉罗家的人住在商业区附近，因为她听说他们做了些违法的交易。铁帽子王和努尔哈赤的后裔肯定不喜欢她，但是又担心慈禧削了他们的特权，只好私下抱怨抱怨。

有件事能证明慈禧的英明，一个胆大包天的世袭贵族竟然在紫禁城禁区附近造了一所宏伟的大宅子，可以远眺看见紫禁城部分建筑。没过多久，房子刚竣工老佛爷就没收，并且问罪房主，胆敢觊觎皇宫，随后把新房子赏给了她的弟弟——承恩公。

还有件事也能证明慈禧的宗派观念很重，包庇纵容亲戚。1902年流亡返京后的第三年，新设巡警部，由慈禧的亲信徐世昌任尚书。不久，他就发现经常要和皇亲国戚打交道，这可不是个美差。慈禧的弟弟桂祥就是个刺头，从来不遵守什么规矩，驾车逆向行驶，还觉得是有“面子”的事。一次，一个有正义感的衙役抓了桂王爷的奴才，徐世昌听了此事命令立即放人，但是桂王爷认为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一定要徐世昌本人登门请罪。徐大人三次登门谢罪，桂王爷都没让他进门，直到徐大人跪在王府大门外磕头才算了事。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京城里上至权贵下至小民人人皆知。后来徐世昌又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1910年8月又升任军机大臣。但是当慈禧听说她兄弟的事后，立刻把徐大人调离军机处，安排去了奉天。

慈禧的母亲钮祜禄氏，守寡多年，住在锡拉胡同，就靠着外国公使馆区。慈禧当上皇太后后册封自己的母亲为一品夫人。钮祜禄氏聪明伶俐，在家族里也是人品出众。死后和丈夫葬在城西的家族墓地，就在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表孝心，又在墓地造了牌楼和大理石石碑。1902年正月，慈禧结束流亡，从正定府乘火车回京，原本决定沿汉口铁路线回京，但是这条线会经过父母的墓地，如果不下车祭奠就是不孝，所以慈禧决定做给那些支持她的人看，改为绕路从城南进城。



北京西直门车站

关于叶赫那拉童年的记载很少，只是提到亲戚中有个名叫荣禄的，是她儿时伙伴，后来此人在叶赫那拉一生中多次危难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人说其实两人指腹为婚，不过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了。无论怎样，荣禄在慈禧青年时代起到了任何旁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康有为等一些反对满族统治的人说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热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咸丰帝还没死。

叶赫那拉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她机敏灵活，再加上野心勃勃、对权利的欲望使她在男权世界出类拔萃。她精通诗画，水平丝毫不逊于英国最著名公立学校的学生，十六岁就熟读四书五经，通晓满文，熟读二十四史，知识赋予她智慧和力量，史书记载，她对自己伟大的一生也早有预感。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皇子中年纪最大的皇四子继位，年仅十九岁，改年号咸丰。守丧（二十四个月）结束后，新皇帝才能下旨，要求容貌端庄符合年龄的满族少女到内务府报名，等待皇帝的挑选进

入后宫。咸丰早先娶了穆扬阿的长女，没等咸丰称帝就死了，这次参加选秀的女孩中就有穆扬阿的次女萨克达以及叶赫那拉。最后萨克达被封为嫔，叶赫那拉被封为贵人，这些妃子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还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很少有例外的。按规矩，后宫最多有七十位妃子，但通常很少能达到。除此之外，后宫还有二千名满族女性，都是仆人，归太监管理。后宫的事太后说了算，连选秀女皇帝也只能看看，没权定她们的等级。

后来，叶赫那拉离家来到了戒卫森严的宫里，断了和家里的一切联系。一位自叶赫那拉入宫就侍奉她的老宫女，在我们的要求下描述了叶赫那拉唯一一次省亲的经过。那是1857年1月，诞下皇子九个月后，叶赫那拉承蒙皇恩，恩准离开皇宫。当天一大早，太监宣旨，告诉叶赫那拉的母亲，她的女儿中午要回来省亲。家族亲朋好友皆欣喜若狂，这真是天大的荣耀。整个胡同的人都出来，争着看贵人乘坐的凤辇和宫里的太监。贵人的母亲和族人（包括一些年纪大的长辈）分列大门两侧，恭迎贵人圣驾。凤辇一直驶入院子里，太监才请贵人下来，贵人直入正屋坐了主座。除了她的母亲和几个年长的族人站着外，其他人都跪着迎接圣驾。然后就是宴会，经过特殊安排，她的母亲坐在她的下首，这等于是认可了她作为皇权继承人的生母的身份。在场的人都觉得贵人亲切随和，宫里的规矩好像对她改变不大，她和姐妹们聊家常，对家里的事也很上心，尤其关心妹妹们的功课。

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叶赫那拉问这问那聊了好多，冬日天黑得早，太监来请她准备回宫。贵人与家人告别，依依不舍，进宫后又要与家人失去联系，总想着皇上能再次恩准她省亲，不管怎样也得让她的母亲能进宫看看她。最后，她分发了带来的礼物，然后坐轿离去。之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过，她的母亲后来能经常进宫瞧瞧她。

叶赫那拉自打一进宫就处处讨好太后，凭着她的聪明伶俐又很快讨得皇上的宠爱，1856年4月她生了个儿子，遂了皇上的心愿，她在宫里的地位日益巩固。

叶赫那拉进宫那年，太平军正闹得凶，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

一个南方省会城市。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参政，并向皇上力荐曾国藩，任命为总司令，提供军需训练湘军，在戈顿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

慈禧年轻时就有出冲破世俗的勇气，临危不惧的政治魄力和决断力。当时按规定曾国藩要回乡为母守丧三年，但是叶赫那拉却认为规矩也不能临驾朝廷之上，命令他领兵打仗，显示出她天生就是个统治者。

1855年8月，太后驾崩，叶赫那拉因其“勤勉服侍”有功被册封为“嫔”，而她的同伴萨克达已经是皇后了。

当时人们都认为咸丰应该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了，因为清朝的气数已尽。各地都有叛乱，皇帝昏庸无能，老百姓对他谈不上什么忠诚。与前面的五位皇帝比起来，这位皇帝一无是处，连效仿他们编个经典文献或者字典都办不成。不但如此，他二十五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些先皇十五岁就有儿子了，也被视为不祥。因此，当1856年4月叶赫那拉生了儿子，同时湖南、江西各地叛乱也都被平定局势好转时，大家都认为上天再一次眷顾了皇权。

但是不久，皇上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叶赫那拉母凭子贵，手腕高超，皇后又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于是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叶赫那拉已经升为“妃”，俗称“懿贵妃”，意思是具有女性美德的妃子。

当时叶赫那拉年轻气盛，她处理国际事务时，根本不考虑外国情况，态度都很强硬，十分傲慢，优越感很强。英军攻打大沽口，慈禧派琦英劝说额尔金勋爵撤离大沽口，被勋爵拒绝后。慈禧大怒，竟然赐琦英一条白绫，让他悬梁自尽，还说这是“皇上的宽容仁慈”。她还劝说皇上拒绝钦差去广州与英国商谈贸易，直接导致了一年后英国人的野蛮侵略。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或者私人日记里，我们能发现没人关心皇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凡事都是叶赫那拉说了算，而她那时不过是个妃子，年仅二十二岁。

为了防止混淆，有必要解释一下，叶赫那拉是她娘家的姓，进宫

前用的。直到当了皇太后（西太后），虽然也用这个名字，但通常被称为“懿贵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她的尊号是“慈禧”，前面还有很多的敬语。老百姓一般都喊她“皇太后”或者“老佛爷”，特别在她晚年，北方人一般尊称她“老佛爷”。

第二章　逃往热河

大家应该都知道英法联军为什么要攻占华北，对那段历史也都了如指掌了吧，所以这里不必再多说什么。不过，欧洲读者也许并不清楚，在那个大混乱时期，叶赫那拉氏在清朝皇帝逃往热河的前前后后，她起到的重要作用，你可千万不能低估。

当时，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中的细枝末节。这本日记在事发几年后由私人印刷出版，以下片段就是从这本日记中摘抄出来的。日记原名为《悲恸录》，它主要记录的是这位大学士对自己母亲的一片孝心，日记中也难免夹杂了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慈禧在此期间的表现。尽管文章没有突出的艺术技巧，但其中的真情实感，我们读后不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不定广泛传播后，叫人们对这部书欲罢而不能：

庚申年七月（1860年8月），母亲那病得了已经有五六天了，风声传来了可靠消息，说敌人已经抵达大沽海口了。大家也都听说了，各省官员当时纷纷上奏朝廷，但这些奏折根本没人过问，搞得人心惶恐、谣言不断。不过，当时风声还没紧到有人逃离京城的地步。皇上病重，据说他要到北方避避风头，但懿贵妃和僧王却极力相劝，安慰说服他，说敌人绝对不可能进京城的。

当时，我母亲得的是痢疾，但她却叫仆人们向我隐瞒病情。一天，我无意中在桌上看到了一张药方，才知道了其中的实情。同过去一样，为母亲把脉看病的全是刘郎中，不过我一直对他本人连同他的治疗方法很不放心，我总是担心他用药过猛。但是，刘郎中给我母亲看病已经足足有七年多了，母亲以及家人都非常信任他的，胳膊哪里拗得过大腿呢？唉，古语说得好，想当孝顺的儿子，就需要对药理方面多一点知识才好。而母亲最终离开我们，我一当儿子的，真是责任难逃，罪过不浅。我想，即便我死一万次，大概也难换回我母亲一命

呀！

之后几天，陆续看到有人逃离京城，因为有信报说我军在大沽口损失惨重，总兵也已经阵亡了；北塘的守兵已经溃退，炮台应该已经稳稳落到敌人手中了。皇上发下诏书，命令僧王不准与敌人正面交锋，有皇帝这份诏书下来，我军哪还敢动？只好都乖乖地拱手观望了。老百姓不知道其中到底什么情况，一个个都诚惶诚恐的。

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我母亲病情有点严重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立即请了十天假。尽管我一直向母亲隐瞒政治时局，并且一直佯装镇定，劝她老人家放下心来，安心静养，但战局真是越来越差了，老百姓纷纷地迁离京城避难去了，这个时候，有哪个不要命啊？

第二天，县令李敏斋到我家来，跟我说了些道别的话，他说自己要离开北京，出发前往安徽大营任职去了。当他得知我母亲的病情时，对刘郎中开的药方相当不满，于是他索性亲自给我母亲看病开药方。但是，我母亲是个难缠的人，哪里愿意服他开的药啊？我极力劝说母亲喝下，母亲才勉为其难，痛苦地把药喝下去了，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当天晚上，她却忽然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我立即叫人请来敏斋，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开的药的问题。他说这并不能怪他开的药，但我母亲还是觉得不对头，她说以后坚决不服这个药了，坚持要继续服用刘郎中为她开的药。没办法，我只好又请刘郎中配些药力较轻、适合老年人服用的药给母亲服用。

母亲自己感觉日子不多了，叫我为她准备一副棺材。巧的是，八年前我已经在奉天购买了寿木，现在就存放在京城的一家棺材铺中。我派人把寿木取回来，让木匠们在院中当场制作棺材，到那个月二十日，棺材就已经完工了。寿木材料非常厚实，作出来的寿材当然也漂亮、结实。如今时局动荡不稳，我从没料想在这样的境况下竟还能匆匆忙忙赶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寿材，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木匠说，这样的棺木如今在京城至少能值白银一千两以上，听了这话，我稍微感到一丝宽慰。

第二天清晨，油漆铺派人来给寿材刷底漆，底漆至少用去了二

斤。随后，我派人去购置衣料，请来六七位裁缝为母亲缝寿衣。裁缝们先做好了貂皮长袍，但第二天母亲病情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起色，我便叫人暂停缝制莽袄霞被。当时，京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敌人已经到了通州地区，二十七日就要炮轰北京城了。因此，离开京城逃命的人越来越多。到二十七日为止，寿材刷完了第二道漆。

一天，我军俘虏了敌人的首领巴夏礼，连同其他俘虏一共八人，把他们囚禁在刑部大牢中。京城这时就像锅烧开了，新消息不断传来，说皇上打算离开京城，要逃到北方去了，但懿贵妃说服一些老臣来上奏，劝皇帝留在京城，不能到北方。所有这些奏折都被皇帝留下，一封都没发出去。在京城的满汉官员们此时大都已经把家眷连同值钱一点的财物先运出京城，但布巷前门一带的大店铺仍然继续在营业，好像他们一点没受到什么不良影响。我母亲病情照旧，我又续了十天假。

八月初一，母亲的寿材上了第三道漆。那天，刘郎中来更换药方，但母亲的腹泻没有丝毫好转迹象，真让人着急。

八月初四，母亲把我叫到她病床前，说："恐怕我的病也难好转了，儿啊，你准备料理我的后事吧。我今天没有食欲，什么也不想吃。"听了这话，我的心哪，就像一把刀在割，又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让裁缝赶制寿衣。当天，好朋友潘玉石来我家探望我母亲，他给我母亲推荐了一剂通泻药，说效果很好的，不妨可以试试呢。我立即告诉母亲这副好药，但她却非常生气，坚决不肯服用这药。

当天晚上，母亲不停呕吐，呕吐完了以后，她看上去倒好像神清气爽，我只好又对裁缝讲，缝寿衣的事情暂时可以放一放。第二天清晨，莽袄霞被做成功了，但母亲觉得缝的被子盖在身上稍微有些重，一听这话，我连忙叫人做了一床丝绸被。母亲又觉得自己担当不起，说太贵重奢华了，她说我祖父祖母安葬时也没用过这么贵重的。当时，北京局势越来越混乱了，百姓纷纷大包小包、成群结队地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不能久呆啊。为了防止敌人进入京城，除城南的彰义门等几个城门开放外，其余的都关得紧紧的。

初七那天，我军在齐化门外与敌军交战。我军先锋都是由一些未经专门训练的蒙古骑兵组成的，这些人从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什么仗。一听敌军炮响，蒙古骑兵们纷纷掉头往回跑，将步兵冲散，相互践踏，踩死的人数太多，哪数得过来啊？我军已经全线崩溃，士兵散开，到处奔逃，敌军乘势逼近了京城的城墙。

一些亲王大臣恳求懿贵妃劝皇上赶紧离开京城，逃命要紧，这正中皇上下怀。但懿贵妃却敦促两位资深老臣上奏，劝皇上不要出巡，并下一道圣旨，说皇上是绝不离开京城半步的。然后，她又亲自下了一道谕旨，重奖那些杀敌立功的人。因此，京城老百姓都以为皇上必定不会出巡。

第二天一早，听说我军在齐化门外再次与敌军交战，皇上吓得屁滚尿流，当即仓皇北上出逃，随行人员包括后宫妃嫔、诸王公大臣及内务府大小官员。一行人逃离京城，那个境况才真叫狼狈不堪，就好像敌军正尾随在后追赶他们一样。实际上，此时敌军距离京城还有一段距离，圆明园内也还没出现任何警报。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劝说皇上离开京城的，反正懿贵妃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恳求皇上留在京城，不要出逃。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只要有皇上坐镇，一定能威慑敌军、保卫整个京城连同百姓的安全，这是心理战术。懿贵妃说，如果连皇上都离开京城，不顾宗庙，那么还有谁能庇护京城呢？她反复提醒皇上古代有周朝东迁的先例，当时天子“蒙尘”弃都，与同宗王子逃亡，后代国人只要一提及这件事，就把它看作是抬不了头的事。而如今，如果皇室官员弃京城出逃北方，这必定是史上少有的奇耻大辱。

而此时此刻，我母亲病情危急，我已经顾及不到混乱的政局了。当时，京城稍有点小权的官员有些已经收拾包裹带着妻儿离京了，有些正在打点行装，而那些有钱的商人也正送自己的家眷外出避难逃命。对于多数人而言，运送物品的代价确实让人难以承受：雇一辆骡车到涿州需要白银二十两，到六十里外的保定府则需要白银三十两。对我来说，带母亲离京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们只有耐心静观局势的不断变化。

眼看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得到了刘郎中许可，我让母亲试着服用杨郎中开的药。可是，效果很不理想，看来我母亲的病是谁都救不了了。十二日清晨，我母亲吞咽食物也不行了，我立即叫人找来李裁缝缝完母亲的寿衣的最后几针，并准备了一些鸡鸣枕、被褥等东西。就在那晚亥时左右，我母亲闭眼了。唉，都怨我这个不孝子啊，自己不懂医术，被人耽误，以致母亲离我而去。我用头撞地，恳请老天爷原谅我，但我仍万死不能原谅我自己。

无奈之下，我们强忍悲恸，为母亲穿上寿衣。让女仆为她穿上中衣，套上白绸大衫，外穿一件灰绸夹袄和蓝缎霞披，补服上系上玉带，挂上琥珀珍珠。金簪卡在头上，戴上凤冠。大红被褥铺在床上，我们将母亲安置妥当，她头枕着鸡鸣大红缎子的枕头。那天家家大门紧闭，并没有亲朋好友来我家吊唁。第二天大清早，我用红绸缎铺在棺材底部，周围上下垫上干草，以免棺材晃动厉害。下午三点的样子，我把母亲放入棺材，愿她老人家安息长眠。

这时京城已经乱作一团了，我的一位好友登门拜访，劝我把母亲暂时安置到城外一座庙内，说那里安全。他说，就是把母亲安葬在我家府院中也不是太安全的，因为敌军本性天生多疑，一旦他们攻入京城便会挨家逐户搜查。如果他们发现母亲的灵柩，一定会大肆糟蹋，那后果我就是想想也汗毛直竖。以前敌军占领广东省城时，也是这么干的，这点必须考虑到。

八月十四日那天一大早，彰义门刚一开，我便来到城外那所庙宇，挑选了一间位置还行的正房，运气不错，主持也愿意把它租给我用。回到家中，我立即叫家人前往霸州一个门生那里安身，我自己嘛，就守在母亲的灵柩旁。当时，只有京城两个西门仍然还开放着，其他的所有大门都关得紧紧的。因为前三个门已经关了整整四天了，所以顺治门那边，简直拥挤不堪。那会儿，所有小商小贩全部已经离开京城，而大商铺仍然还在营业，他们也真能挺的，战局对他们似乎没有影响。



北京南门

八月十九日，我护送母亲的灵柩去寺庙，却发现城门口几乎人流如织，迈不了步子。我们费尽了周折才来到小庙，但发现这地方格外寂静。二十三日那天，街上行人格外稀少，仅有寥寥几个人这儿一群，那儿一伙的，但都在窃窃私语。刚过正午不久，西北方突然大火冲天，听可靠消息讲敌人已经占领了海淀颐和园地区了。据说，我军人数虽有五十万，竟然一个都不敢抵抗敌人的进攻，敌军就像进入了一块无人之地，感觉就叫一个字：爽！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僧王及胜将军已经率军撤退到了德胜门，速度还真快。

八月二十四日，京城内所有店铺全都已经关闭了，车马价钱虽然是越来越贵，但相比之下，想雇车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家里没有什么家底的干脆收拾收拾包裹，携带家眷逃难他乡去了。

恭亲王派信使前往敌营送信，说是希望敌我双方能够停战议和。但是，信使还没有走到敌营，眼见敌军举枪瞄准自己，便掉头撤腿逃回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西北方上空狼烟四起，根据消息证明，说是敌军的的确确已经攻占了圆明园。他们在园内的三个主厅进行大肆掠夺，将其中的值钱物品抢劫一空，然后把宫殿付之一炬，烧个精光。对此卑鄙的强盗行径，敌军借口说军队失控，属于乱兵干的纵火行为，与军队无关。此后，敌军四处张贴告示，宣称如果二十九号中午前双方还未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将开炮攻城。告示还特别警告所有不愿与城同归于尽的居民，叫他们趁早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合着自己趁早去找个安全的地儿躲躲。

当天，皇上顺利到了热河，安全是安全了，但他却有点吓得不轻。还发了一道圣旨，里面说敌军已经攻陷了北京城，虽然眼睁睁瞧着敌军侵犯我国，自己没能尽力，心中是又悔又恨。紧接着听说皇上病了，亲王载垣和端华挖空心思想朝军机处里钻。他们都清楚，万岁爷一旦归了天，懿贵妃就会被定为皇太后，但她从来就跟这两位亲王合不来。所以，载垣和端华在皇帝面前讲了许多诋毁懿贵妃的话。

安放我母亲灵柩的那个寺庙情况还算好，一切安然无事。白天有敌军部队经过，但没人进庙骚扰。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有个叫荣儿的小仆人来跟我说，敌军所雇的天津士兵正驻扎在庙中。我吓呆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忙赶往寺庙，却发现原来驻扎的是胜保将军的人啊。僧王率部队也驻扎在庙宇附近呢。假使敌军炮轰寺庙的话，我母亲的遗骨咋办呢？想到这里，我立即前往杠房，以每车白银六两的价格雇佣推车，好把我母亲的棺材迁往保定府，我让杠房雇佣抬棺材的人手。

当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敌军从安定门进入京城，占领了安定城楼，升起五色彩旗，并且在城楼上安放了一门大炮和四门小炮。除掉负责和谈的官员不算，其他所有官员全部都已经离开了京城。两天前，我军所囚禁的巴夏礼连同其他八名敌军将士已经被礼送回去了。这些人刚返回他们的营地，热河就有急件到达北京城，圣旨要恭亲王把敌军将士就地解决掉，目的是警戒那帮胆敢擅闯皇宫的强盗们。过去懿贵妃一直主张要求对敌军将士，一律斩杀勿论。因此估计这份诏书肯定又是她的意思。

九月初一，彰义门已经关闭了，我只好从西便门离开京城。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了。好不容易我才挤了出来，来到寺庙中，我把锦官套在棺材上，不大不小，正好合适。我无意中发现户部尚书梁海楼和他一家人也都在庙中藏身呢，唉，他们都是蓬头垢面的丑样，个个都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可见高官此时也有狼狈不堪的丑态啊！来不及多问什么，我随后匆匆忙忙返回我自己家中，整理整理物品，准备第二天让母亲动身。

初二大清早，我来到了寺庙里，就看见杠房的车辆以及抬棺材的人都已经到了。我因为先前有点慌乱所以也没大留意，竟然把母亲棺材中安放的杠子搞得比预定尺寸要小，并且我没用十六人抬棺材，只用了八人。不过，现在跟他们计较没啥用了，干脆叫他们赶快动身再说。个个都搞得狼狈不堪、惨不忍睹。但我当时又能咋办呢？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要保护好我母亲的棺材。刚开始是决定让荣儿步行护送棺材的，但后来又转念一想，开始担心他难以忍受长途劳累之苦。我料想如果我母亲还在人世，看见他小小年纪受这个苦也会不忍心的。于是，我又叫人雇一辆车，火速追赶他们。

一返回家中，左思右想，心中一直不定当，担心母亲的棺材安放在又窄又小的架子上，一定会摇动。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到杠房那边跟他们好好说说。大闹之后，他们才勉强同意更换杠子，但却要我再多付二两银子。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了，后来却听说他们并没有按约定更换杠子，这群卑鄙的强盗！我无话可说了。但事情已经这样，告他们又有什么用呢？还好，荣儿写信回来，说他们已经安全抵达保定府，棺材也安然无恙，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时，敌军已经完全占领了京城，满北京城已经是流言满天飞了。所有留在北京的人（仍然有许多人没决定好去处）整天摆出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城内满族人把自己的家眷送往南城，以免女性家眷遭受敌军凌辱。人们的惨状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了。一位御史上奏远在热河的皇上，指责他就是因为听了一派谗言，才离开北京出逃北上，他责问皇上把百姓和家族宗庙都放在哪里了？同时，他还恳请皇上赶快回京城。可能是因为恭亲王不愿意满足敌军的条件，也许是因

为对方条件太苛刻了，所以朝廷跟敌军并没有达成什么和约。听了这个消息，百姓个个更加不安了，都预感大事不妙。

初六那天，英军送来一份急件，谴责中国将他们的同胞折磨到死，说我们简直太残忍了！所以，他们要求中国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与此同时，俄军也发来一份急件，说他们已经听说了英方的赔偿要求，并准备利用俄国自己的影响来劝说英国降低赔款额度。恭亲王的意思是，即使俄国能说服英国，我们也只能顶多省十万两银子，而且为此还要还俄国人的人情。因此，他回信拒绝了俄国人，借口是中国已经答应了英国所提的条件，没法更改了。而俄国人立即回信，称中国如果已经答应了英国的条件，他们也无话可说，但同时他们提醒恭亲王，起初英军是打算让我们赔二百万两的，是俄国说服他们算上烧圆明园所造成的损失，折合起来共计一百万两，还剩一百万两，所以我们还得感谢他们，欠他们人情呢。初九，恭亲王派人给英军送上了五十万两白银算作赔偿。

另外，敌军提出的其他十六条要求，中国没有作任何更改，全部一一满足了他们。我们议和者唯一的条件是要求联军立即撤出北京城。于是，敌军大笑，称堂堂大清国，竟没有一人站出来反抗！我又悲又愤，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懿贵妃听说恭亲王对敌军条件全部一一满足，她埋怨皇上全权让恭亲王去议和，又劝皇上赶紧向敌军挑起战事。但是，当时皇上已经病危，不愿离开热河，因此我军复仇的事只能暂时不提。



青年时代的慈禧太后

在日记中，这位翰林院大学士多次暗示，英法联军入侵北京那会儿，咸丰帝一直是犹豫不决，丝毫不果断，没有任何决策力。因此，在咸丰十年八月初三（1860年9月6日）颁发了这份措辞非常强硬的诏书，如果不是叶赫那拉氏亲自提笔写成，至少也是她极力促成的：

我们大清皇朝将会一视同仁，不分中外。我们从没有禁止过英法两国与中国通商，并且近些年来一直同他们关系很好，通商进行得挺顺利。然而，三年前，英国无缘无故闯进我国广东省，俘获了一批大清官员，把他们押到牢房中。当时，我方并没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因为感觉叶总督当时态度过于固执，对双方冲突负有一定责任，他一定是有过失的。事情过去一年了，敌军统帅艾尔金竟敢率兵在北边侵犯我国疆土，朝廷命令直隶总督谭廷相筹备议和的事情。然而，就在议和期间，敌军竟然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期间，炮轰大沽口，直逼天津，气势咄咄逼人。但是，为了使百姓免受战争之苦，大清朝廷纯粹是一片好心，朝廷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击行为，立即派桂良去与敌人议和。尽管敌人的要求非常苛刻，但我军依然还是命令桂良出发去上海，协商能不能进行通商的条款，甚至答应了他们，说我们可以早日批准开放。

尽管我朝采取了一再退让的策略，敌军将领布鲁斯竟不识好歹，反而又得寸进尺，在八月率领舰队再次袭击大沽炮台，遭到僧格林沁带领部队的顽强抵抗，敌军大败，逃回去了。以上事实明确表明，我朝并没有背信弃义，相反应该是敌军反复无信。如今，敌人的首领艾尔金和格罗斯再次侵犯我大清朝的海疆。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然而，朝廷万不得已还是不愿采取武力措施，所以我大清王朝决定同意他们登岸，来京城商谈解决方案。

可是谁又能想到呢，这时的帝国心里打的究竟是什么鬼算盘，竟然带了大批士兵和枪炮上岸了，而且还竟然从背后偷袭大沽炮台，逼退我军，率领部队直接逼近了天津！我们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大清朝再次派桂良到天津跟敌人理论理论，希望对方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只要他们的条件不太过分，我方都会尽量满足他们的。但是让皇帝万分震惊的是，艾尔金等人竟胆敢向大清提出索赔的狂妄要求，要求我们大清朝开通更多通商口岸，他们甚至要在京师驻兵。他们的狼子野心可真狠啊！但是，我朝仍然用仁义之心对待他们，不和他们计较，命令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去谈判，希望能够用感情打动他们，让他们讲点道理，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然而，这些奸诈的家伙们竟然率兵进犯通州地区，他们甚至要求带兵进京觐见皇帝。

如果朝廷再次对敌人采取姑息政策的话，估计国家与百姓的安全就难保了。所以，我大清朝已经命令大军作全力抗敌，并且让乡绅组建团练，来抵抗敌军，保卫自己的国家。在此，我大清朝廷特别颁布奖励诏书：凡是杀死一名黑人敌军，将得到赏银五十两，凡是杀死一名白人敌军，将得到赏银一百两，如果能俘虏敌军将领，不管死活，将得到赏银五百两；如果能夺取敌人的军舰一艘，将得到赏银五千两。天津是全国闻名的勇士之乡，所有的好儿女们，现在就是你们杀敌卫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我们并不是好战之人，这场战争完全是敌人强加于我们的。

广东、福建两省的一些地区已被敌军占据了，当地人民都是我们大清王朝的子女，只要这些地区的人民百姓抓获了敌军首领，朝廷也会给予重赏。

这些外国人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商。但是如今，他们之所以作出这些令人不齿的行为，肯定有我大清朝的奸细从中煽风点火。在此，朝廷下令，所有通商口岸一律对英法两国关闭，与他们的所有贸易立即停止，与其他各国的贸易不受任何影响。我们郑重承诺，只要英国和法国能悔过自新、态度诚恳，我大清王朝一贯对人对事宽宏大量，仍然乐意同以前一样跟他们正常交往。然而，如果他们两国依然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我大清朝的军民一定会众志成城，发誓将敌军消灭得干干净净！希望英法两国三思而后行。

这份诏书下达三天之后，咸丰帝在早朝上说（当时叶赫那拉氏也在场）：

我知道，现在敌军仍然在向京城逼近。尽管我们大清朝已经满足了他们所有要求，敌军依然坚持亲自来到我大清朝廷，还要求僧王从张家湾撤兵。他们真是无理取闹，我大清王朝实在难以容忍。在上次与敌人的交战中，僧王全胜而归，现在他们正守护着八里桥，准备牵制敌军的兵力。



咸丰皇帝

朝廷下发旨意，凡锦州附近敌舰上有胆子敢登陆的，我们一律歼灭他们再说。

那个月初七，皇上到孔庙去做祭祀活动。但到第二天，虽然他心里也希望祭祀其他各路神仙，能保佑他出巡一路顺风，但皇上不敢朝颐和园外迈出半步。第二天清晨，恭亲王取代了怡亲王载垣，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尽管诏书中措辞相当强硬，但皇帝还是在安佑宫匆忙敬拜之后，慌里慌张地逃出了京城。在动身之前的旨意中，他称这次出行为“秋巡”。

皇帝出发时，情形一片混乱，只向北走了十八里，就在一座小庙里停下过夜。在小庙中，皇上颁布了一道诏书，命令所有满族部队立即出发，火速去热河保护皇帝。第二天夜里，皇上接到恭亲王的奏折，回报了敌军的最新动向。圣驾作出批复，同意恭亲王见机行事，凡事自己看着办，皇上远离京城在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这分明就是天子在推卸责任嘛。

八月十一日那天，皇帝在密云县北部的行宫里驻扎下来。按照中国人的记载，皇帝龙体欠安，无法接见军机大臣，允许叶赫那拉氏代为行事。慈禧便下诏这样说：

听说敌人离京城越来越近了，各位王公大臣要求从各省派兵上来增援。兵法的最高境界是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军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先进的武器，如果我军能引诱敌人上前搏击，他们就没办法使用武器，我军一定就会稳操胜券的。对于这种战术，蒙古兵和满族骑兵无能为力，但湖北四川的士兵动作却像猿猴一样敏捷，他们很擅长埋伏。只要他们能成功偷袭敌军，对方一定会落荒而逃。因此，特别命令湖广总督曾国藩火速挑选三千精兵，四川迅速派尽可能多的精兵，前去京城解围。僧王的部队已经被打败过多次，京城情况现在很危急，容不得半点迟缓。朝廷让各省的救援火速到京城，击退敌人。我们大清朝廷一定会重赏杀敌勇士。

皇帝一到达长城附近的巴克军营一带，就收到了僧格林沁亲王的一份奏折，称北京近郊已经发现了敌军的侦察兵，但到目前为止，敌军还没攻进京城。皇帝下达诏书说：

如果遇到抵抗，这些敌军会更加凶悍，所以，我大清王朝应该尽快与敌人商量和好。至于法国将领格罗斯要求在北京跟恭亲王面谈，我们自然答应。否则的话，如果敌人率军队进京，僧王应从后面打击敌人，断掉他们的后路。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京城不幸落到敌人手中，要火速派蒙古骑兵来长城保护皇帝。

八月十八日，皇帝终于到了热河地区。八月二十日，皇帝身边的各位大臣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开战。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

旨，他指出既然敌军竟敢驻扎在颐和园周围，恭亲王就应将俘获的敌军将领就地解决。恭亲王回复奏折说，敌军将领都已经释放了，安定门现在已被占领了。事实上，恭亲王这位明智的政治家现在才意识到，中国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投降，因此他才不顾皇帝的旨意，自作主张了。很快，皇帝就被说服要重新进行和谈，并且在九月十五承认了双方在北京签订的协议。诏书是这样的：

我大清王朝全权议和大臣恭亲王在本月十一、十二两天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合约。从此以后，我大清王朝与两国将会世代友好下去，各方将严格遵守条约中的规定。

第三章　辛酉政变

1861年春天，咸丰皇帝打算从热河回北京，但是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出行不便，于是打消了回京的念头。

在热河，咸丰的兄弟不在身边，自己又饱受病痛折磨，权利逐渐落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肃顺之手。他们三个觉得皇上大限将至，政权更迭，时间紧迫，必须抓住机会夺权。表面上看怡亲王是主谋，其实肃顺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端华世袭郑亲王爵位，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他的祖先是努尔哈赤的兄弟。肃顺是郑亲王的弟弟，年轻时在京城就无人不知，这个人长得有点像莫西干人，脾气暴躁，喜欢玩鹰，整天不务正事。肃顺正是由这两位王爷引荐给皇上的，他很快讨得皇上欢心，赢得了他的信任。起初不过是个御前侍卫，但是爬得很快，最后竟然当上了内务府大臣。不过，他的贪婪和残忍也是出了名的。他曾力谏咸丰将文渊阁大学士柏葰斩立决，罪名是他科考收贿，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前面那两位王爷。不过，叶赫那拉却和肃顺对着干，因为不想皇上受制于他，强烈反对处死柏葰。但是叶赫那拉失败了，这是叶赫那拉和肃顺的头一次交锋。所有反对肃顺的人要么受罚要么降职，再加上叶赫那拉失宠，朝廷里人心惶惶。一次，肃顺认为户部官员违法铸币谋利把他们全部革职了。这件事可能真有其事，城里的官员不少人都这么做，但是后来的事证明肃顺这么做纯粹是出于一己私欲，他抓了百十来号名流富商，虐待他们，直到收了大笔赎金才放人。肃顺一下子发了，有了钱，他就可以巴结怡亲王和郑亲王以谋取更多的权力，不过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肃顺死后，他苦心搜刮的财产被慈禧没收充公，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慈禧仓皇西逃途中还不忘命人把这批财物藏到宫里去。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那会，皇上不顾叶赫那拉和大臣们的劝阻，听了肃顺的主意，跑到热河。肃顺还不许其他大臣跟着去，是想让皇上孤立无援，欲意篡权。在这危机时刻，完全凭着叶赫那拉一人勇气和

智慧化解了这场阴谋。皇上刚刚驾崩，趁着谋逆者犹豫不决时，慈禧派荣禄送信给恭亲王，命他火速赶来热河，最终取得胜利，她自己也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事后，叶赫那拉把谋逆者送宗人府审判，肃顺愤愤不已，抱怨同伙，“早听了我的，杀了那个女人，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慈禧太后

回过头来，咱们再详细说说辛酉政变的来龙去脉。首先，怡亲王第一步要离间皇上和宠妃叶赫那拉的关系，因为皇后不是问题，她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是必须除掉叶赫那拉，至少事成之前把她打入“冷

宫”，于是他向皇上告密说叶赫那拉和年轻英俊的侍卫荣禄有暧昧关系。在热河，他们的初步计划取得成功，但是他们自己也明白一旦回到北京城，接触皇上的人也多了，叶赫那拉靠着太监的帮助早晚又会得宠，他们的处境还是危险的。所以，他们继续向皇帝进谗言，数落叶赫那拉的种种不是，还举例当年有一个妃子对太后不敬，乾隆爷就下旨将她终身监禁了。他们又打起了叶赫那拉儿子那位皇位继承人的主意，病魔缠身的皇上迫于压力最终同意，宣旨怡亲王的福晋到热河行宫来照顾小王子。同时，他们还不忘在皇上面前数落他的弟弟恭亲王，说恭亲王滥用职权，勾结洋人，唆使洋人与皇上作对。怡亲王与恭亲王也是多年的对头。

接着，肃顺在京城挑起事端，抓捕杀害了大批洋人，他们准备等皇上驾崩后再颁布诏书解释缘由。事与愿违，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叶赫那拉不知怎么弄到了皇上的玉玺。没有皇上的玉玺加盖，任何诏书都是无效的。但是怡亲王也不敢贸然要求她交出玉玺。

爱妃与荣禄的流言蜚语使皇上十分气愤，病情日益加重，整个夏天都滞留在热河，京里太庙祭祀的事也都交给恭亲王去办理。六月初四，皇上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下了一道圣旨，称钦天监观测到星象，有祥兆：

上个月在西北发现彗星，一定是老天爷发怒了，但现在又发现吉祥星象，这肯定是个好兆头，因为老天爷没有必要来讨好咱们。我朝历代先祖都不信这个，但是最近南方叛乱四起，百姓流离失所，我倒宁愿信其有，但愿老天保佑，南方叛乱早日平定。以虔诚之心记录下此次观测记录。

第二天是皇上的三十岁寿辰，他临朝接受百官祝寿，叶赫那拉没有参加，这是皇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七月初七，叶赫那拉派人给北京的恭亲王送去一封密函，告诉他皇上病危，命他速派一支叶赫那拉家族的骑兵前来热河。局势瞬息万变。十六日这天，所有载垣派系的内阁大臣进入皇上的寝宫，皇后及妃嫔们离开寝宫后，他们逼迫皇上颁布了一道诏书，命载垣、端华和

肃顺为顾命大臣，在他死后全权代理国家事务。并且明确禁止叶赫那拉以任何形式参政。但是玉玺被她拿走了，又找不到藏在哪里，所以这道诏书实际是无效的。次日黎明皇上驾崩，谋逆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诏书，封载垣为首辅大臣，对恭亲王和妃子们是只字未提。

他们以五岁小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继位，但是没有加封小皇帝的生母，明显不符合规矩。他们也担心制造矛盾，紧接着立即弥补了诏书中的疏漏，封皇后和叶赫那拉为皇太后。史书记载，叶赫那拉被封为皇太后，不是因为她是小皇帝的生母，而是因为她受热河军队的拥戴，顾命大臣迫于军队压力封她为皇太后。他们打算回到北京站稳脚跟再除掉她。但是没多久，他们就等不及下手了。因为她的野心和影响力始终是个障碍，动手前，他们还必须先扩大自己在京城和各省的势力。

接着，载垣以顾命八大臣的联合名义，颁发了一道诏书，下旨顾命八大臣辅佐小皇帝，并任命首辅大臣为“监国”（其实相当于独裁者），通常只有皇帝的兄弟或叔父才有资格当这个差。所以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炸开了锅，纷纷恳求小皇帝下旨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和先帝的其他兄弟也和叶赫那拉暗中来往，他们都认定皇太后才是紫禁城的主人。他们敦促她尽早扶柩回京，此事必须谨慎行事，先帝的其他几个妃子已经被肃顺他们买通，她们手中也掌握着各自家族的满族军队。肃顺虽然有钱，不过也有他办不成的事，京城的老百姓就不买他的账。他滥用权力，随意印钞，传说他的金库里金银财宝都装不下了，用钱收买了不少人。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员都这么做，只不过肃顺下场很惨罢了。

当时，政局动荡，皇族地位受到威胁，京城还驻扎着外国军队，各省都有叛乱，载垣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时确实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是叶赫那拉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在荣禄及以前亲信的帮助下，使局势有了转机，她一手提拔的曾国藩从叛军手里收回安庆（在安徽省），这个胜利对她来说真是个好兆头，凭着她的勇敢和外交手腕赢得了时间和朋友。

但是，她的野心和抱负遇到个麻烦。大清朝有祖训，后宫不得干政，顺治和康熙年幼时都是由顾命大臣辅佐皇帝，皇太后都没有干政。可是康熙朝的顾命大臣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不是受罚就是赐死。恭亲王不顾祖训帮助太后，有可能是低估了叶赫那拉的能力，认为太后辅政的结果是大权都落入自己的手中。



慈禧太后

一个当年随行热河的满族人，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叶赫那拉刚毅的个人魅力使她在军中威望及高，这才是她胜利的关键原因。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她不得处处小心，为了不与载垣他们正面冲突，

不让他们起疑心，她都是通过太监安德海（后文会提到）暗中与荣禄联络。正是通过安德海，北京的恭亲王每天都能安全的收到密函。同时，对政局她装得漠不关心，对怡亲王载垣也非常尊重，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八月十一日，顾命大臣在会后发了一道诏书，严厉谴责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皇太后参政，必须听从先帝遗照，由顾命大臣辅佐当今的小皇帝。同时又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下月初二扶灵回京。这一天叶赫那拉等了很久了。由热河到京城有一百五十英里，顾命大臣全程陪同，而灵柩沉重，需要一百二十个人肩扛才能走过崎岖山路，进度会非常缓慢。沿途每隔十五里就必须搭建休息场所以备先帝灵柩停放和大臣们休息，这样一来，路上起码要十天才能到北京，如果天气恶劣，时间还要更长。这么长的时间对皇太后来说真是大好时机，她们不需扶灵，乘轿子可以提前五天到北京。依照礼制，新皇帝和后妃只要在送葬队伍出发前祭奠一下，然后回京后再用同样的礼数迎接就行了。叶赫那拉发现提前回到北京真是个难得的优势，她立刻把计划通知恭亲王，让他做好准备在北京“热情”迎接载垣他们。

载垣他们也知道，晚到几天肯定不利，说不定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安排自己的贴身护卫护送皇太后她们回京，以便在路上把她们都除掉。还好荣禄提前听到风声，如果不是荣禄，她们根本到不了北京。一得到消息，荣禄就带着一队人马当夜离开送葬队伍，在她们之前赶到古北口救人，载垣准备在这里动手。

送葬队伍刚刚离开热河就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行走困难。沿途没有任何住宿的地方，皇太后也不得不找山谷避避，大队人马落后她们十英里。叶赫那拉不忘礼数，她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派人去询问先帝的灵柩是否安好，顾命大臣们回信平安到达第一个休息点，叶赫那拉以私人名义拿出银两犒赏抬棺人每人一千两。怡亲王深知只要皇太后活着一个小时，自己的危险都要增加一分，但又不得不按照规矩恭敬的处理事情。他恭敬的回消息，说先帝灵柩一切都好，请两宫皇太后放心。叶赫那拉又派人送去消息，称赞怡亲王办事尽心尽责。紧要关头，他们双方还不忘礼数，这些内容在清宫档案里都有记载，这真

是证明中国人即使在危急时刻仍不忘形式和礼数的最好的事例了。义和拳闹事的时候也是如此。

不久雨停了，皇太后继续赶路，在荣禄的护送下，她们安全穿过山谷，没有遭到暗杀。九月二十九日，她们到达北京，比送葬队伍提前整整三天。一到北京他们就秘密召开会议，先帝的兄弟们，站在她们一边的大臣和皇亲国戚都出席了。会议开得时间很长，讨论得也很激烈。尽管皇太后手里握着玉玺，但是也不能公然捉拿扶柩的大臣，大清朝哪有这种先例。这么做就是对先帝的大不敬，对刚上台的小皇帝也不利。最后他们商定，要谨慎行事，一切必须符合祖制，等先帝的灵柩一到北京，先革了载垣他们的职，然后再见机行事。

十月初二一大早，灵柩如期抵京，从西北门进城。头天晚上，恭亲王在此已经安排了大批军力，防止载垣的势力在这里动武。在两宫皇太后的陪伴下，小皇帝到城门口迎接灵柩，随同的还有先帝的兄弟们以及一些大臣。灵柩由城门而入，众人下跪迎接，以表敬意。先帝灵柩以及仪仗队打头阵，接着是八旗军，怡亲王以及顾命大臣已经将先帝灵柩安全送抵京城，接下来，按规矩，他还必须亲自向小皇帝当庭奏报。为了举行这个仪式，在城门内搭了个大帐篷，两宫皇太后，先帝兄弟们，还有军机大臣桂良和周祖培都在帐内。

叶赫那拉一如既往的威严，彰显着她的权威，她首先称赞怡亲王扶柩回京有功，接着说，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削去他们顾命大臣之职。怡亲王断然拒绝，称自己是先帝任命的顾命大臣，在小皇帝成人之前，没有他的同意，无论是叶赫那拉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干政。

“好啊，那咱们就瞧瞧。”叶赫那拉随即命令守卫拿下三位顾命大臣。然后迅速带着小皇帝到紫禁城城门迎接先帝灵柩，在中国，无论事多急，死者为大。那些被罢免的顾命大臣们也跟着，根本就没机会逃跑或者抵抗，因为道路两旁都是效忠叶赫那拉的军队。此时，叶赫那拉牢牢掌握局势，这是她第一次品尝胜利和最高权力的滋味。

随后两宫皇太后发了一道懿旨，上面盖着玉玺，以示其合法性和权威性：

去年，我国海疆受扰，京城陷入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信任的亲王和大臣的失职所致。怡亲王他们和谈失败，为了逃避罪责，竟然抓了英国的使臣，让大清朝失信在先。结果，英法联军损毁颐和园，先帝也被迫避于热河。

后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处事得当，京城恢复平静。先帝曾经多次命令大臣安排回京，但是载垣、肃顺、端华勾结串谋，让先帝相信英法没有诚意，不愿恢复和平，镇压民众。

热河天气严寒严重损害了先帝健康，再加上他过于辛劳焦虑，竟于七月十七日驾崩。我等万念俱灰，载垣及其同党胆敢犯下欺君之罪，理应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新帝继位，本来要惩罚他们，但是念在他们是先帝受命的顾命大臣，所以暂且宽饶，以观后效。当初谁能料到他们会这么胡作非为呢？

八月十一日，因御史董元醇上了道奏折，我等召见了顾命八大臣，新帝自称年纪小暂时由皇太后代理朝政，成年后再归政于他。要择选一两个亲王辅佐皇太后，再在大臣中为自己挑个师傅。这些都是新帝自己的意思。虽然大清朝还没有皇太后执政的先例，但是一切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能死守成规，审时度势才是明智之举。我等特命载垣拟旨，谁知他竟然对新帝出言不逊，真是忘了君臣之间的礼数。他假意迎合我等意思，拟旨时竟敢以我等名义篡改内容。他们居心何在！他们口口声声说没有篡权之意，可是这种行为不就是篡权吗！他们就想欺负我等年轻没有经验，想蒙蔽我等。可是他们能蒙蔽普天之下所有人吗？他们真是忘恩负义，辜负了先帝的信任。如果对他们一味宽容，怎么对得起苍天，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载垣、肃顺、端华立即革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酌情予以责罚，关于两宫皇太后参政程序也一并商议。

两宫皇太后在紫禁城东华门恭迎先帝灵柩，并暂时停放在中殿大厅内。



紫禁城护城河

身在北京很安全，又仗着手握兵权，叶赫那拉处事越来越大胆。她以个人名义，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妃子，下了第二道懿旨，三个主谋移交宗人府严惩不贷。恭亲王负责查办，免去三人一切封号和职位。在这道懿旨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复仇者的声音：

今天他们早晨竟然质疑我们是否有权召见恭亲王，用心险恶，昭然若揭，和他们罪行相比，这点惩罚算不得什么。

叶赫那拉尤其憎恨肃顺，他的妻子在热河胆敢侮辱她。她一直耿耿于怀，第二天早晨，针对他的罪行，叶赫那拉又下了一道懿旨：

肃顺篡权谋逆，广受贿赂，罪行罄竹难书，已革去一切职位，命宗人府将其捉拿。肃顺接旨后竟然出言不逊，完全不顾君臣纲常，以下犯上，恶行令人发指。此外，扶柩返京的途中，他竟敢携带家眷，无耻之极。在热河和北京的家产全部抄没，无需怜悯。

肃顺的家产保守估计最少也有数百万英镑，太后一举获得大量军资和财产，其实她一生当中非常贪财，后来运用权利搜刮了不少财

宝。清朝只有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和珅的家财超过肃顺，他的家产都被乾隆的儿子嘉庆没收充公了。

叶赫那拉的怒火还没有平息，第二天又发了一道懿旨，从中我们能看到她极为贪心，毕生都在积累财富：

肃顺在热河给自己造了一处府邸，还没有竣工，在那里肯定藏了很多财产，以备阴谋败露之需，一定藏了不少黄金白银，务必将府邸内的财物清点仔细，一旦发现立即上缴，藏匿不报的人与肃顺同罪并罚。

十月初六，恭亲王审理载垣等人谋逆事件，草草结案，判决如下：

宗人府会同三部九卿判定，载垣、肃顺、端华图谋叛逆，依据大清朝律法理当处死。他们篡权夺位的卑劣行径已经下诏公之于天下了。

他们口口声声宣传先帝驾崩前任命他三人为顾命大臣，其实先帝已经对我们说了皇位继承人，根本没有予以他们任何任命。

他们越权自封，还胆敢随意颁发无效诏书，篡改皇太后旨意。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参政，他们不仅篡改皇太后的批复，还宣称他们才是监国，根本就不听皇太后的。他们还狂妄的说，太后批奏折根本就是多余的。逆贼的暴行随处可见。表面说让我们可以接见亲戚，其实暗中阻挠我们接见亲戚和大臣。这些罪行他们三人全都参与的。

肃顺更是胆大包天，胆敢坐龙椅，随意出入宫殿，还把宫里的东西占为己有，拒不归还。他还单独觐见两宫皇太后，挑拨离间。这些罪行为他一人所为。

圣母皇太后和母后皇太后已将此事交与宗人府处理，今天召见了所有亲王大臣，询问能否宽恕这三人，众人都认为他们罪大恶极，依照大清律法不能赦免。得知宗亲三人将被公然处死，我也不禁眼眶湿润。但是，他们篡权夺位，罪大恶极，感谢天佑我朝，渡过危机，他

们不仅仅是对我的不敬，更是对列祖列宗的不敬。他们以为有先帝的庇佑就能获得赦免，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大清律法。如果原谅他们，将置大清律法于何地，原谅他们就是辜负了先帝重托。依法他们三人理当凌迟处死，但我朝律法对皇族适当开恩，所以免其公开受刑。即派肃亲王和刑部尚书绵森速往宗人府传旨，命载垣、端华自尽。这不是徇私情，而是为了维护皇家的体面。

至于肃顺，罪责远甚载垣、端华，理应凌迟。只有凌迟才能以正国法，大快人心。但是我实在不忍心，所以判肃顺斩立决，特派睿亲王和载龄执行监斩，如此以儆效尤。

原注：1861年，因怡亲王和郑亲王在咸丰驾崩后谋逆篡权，削去世袭爵位。1864年，清政府平定太平军的叛乱，收复南京，大赦天下，慈禧下诏恢复两位世袭封号。诏书里称，怡亲王的爵位最初是赏赐康熙皇帝的儿子十三王爷的，1723年雍正皇帝下诏，称其家族永世世袭封号，除非“泰山缩减成磨刀石，黄河干涸成小溪流”。慈禧先是提了一下载垣谋逆的大致经过和所犯罪行，然后说，命他们自尽，是不想让他们忍辱偷生，是不想让他们的祖先蒙羞。九天之上先祖若知他们的罪行，灵魂也不得安息。当时下旨夺取封号为了平民愤，安天下。事后我们也常常回忆起他们先祖当年的赫赫功绩，现在我朝攻克南京，正是恢复他们封号，恢复他们祖先荣誉的最佳时机。所以特命恢复世袭封号，返回田产，入族谱，但是直系两代以内不享有特赦。载敦、承志分别袭怡亲王和郑亲王爵位。你们两家人一定要行事谨慎，不要忘记你们先辈的荣耀，一定要维护他们的名誉。

朝廷是一片好意，但是怡亲王和郑亲王没有受到老天的保佑。倒数第二个怡亲王在1900年被赐自尽，说他勾结义和团，但是外国人提供的黑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所以很可能是他得罪了老佛爷，她心情不好，稀里糊涂的就下了旨。至于郑亲王，八国联军入京那天，就绝望自杀了，倒成了满族贵族的榜样。

肃顺死后三年，慈禧还要发泄对他的仇恨，下旨禁止肃顺后代入朝为官，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咸丰帝时期他就这么对付

自己的政敌的。

第四章　首度垂帘

载垣造反的事已经被平定了，其中的主要头目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严惩，叶赫那拉氏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稳固，她几乎成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东宫太后对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不过，垂帘听政的最初几年中，慈禧办事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她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把持朝政事务，而是把自己的勃勃野心藏得一丝不露。同时，她也抓住每一个表现机会，尽力想取得各位高官大臣们的支持。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诏书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慈禧当时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她没有垂帘时的情形。她首度垂帘（1861—1873年）可以看作是慈禧太后掌握实权的初始阶段，这让她头一次尝到了权力的魅力，感到很甜蜜，但同时也尽力避免自己不能做得太过分，以致锋芒毕露。而在她二度掌权期（1875—1889年），尽管慈禧太后的名字只是偶尔在诏书中出现，但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所有官员的任免权，对待下属她可以说是恩威并施，目的是想赢得官员的爱戴和尊敬。光绪小的时候，慈禧并没有垂帘只是训政，因为他就是慈禧太后本人亲自挑选出来的，而同治皇帝则是由他父亲咸丰帝在遗诏里就指明的。直到1898年到1908年第三次垂帘听政期间（严格地说，慈禧已经不是简单的垂帘听政了，她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真正的皇帝），慈禧这时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她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对权力的疯狂执着的迷恋，由于自己对政权已经耳濡目染了许多年，她便毫不客气地独揽了所有皇权。每天她在皇宫大殿中召见各位大臣百官，慈禧在龙椅上正经端坐，而光绪皇帝就坐她一侧，就是个活脱脱的傀儡，任由慈禧摆布，慈禧俨然已经是当时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了。



龙椅上的慈禧

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慈禧当然有所察觉中国人自古就不认同女性当皇帝。连历史上最有功绩的著名女皇武则天都难逃篡位的说法，而为汉朝辉煌盛世打下坚实基础的吕后，尽管德才兼备，却为世人不齿。另一方面，慈禧通晓古今，知道过去的太后独揽大权后往往会走上专权道路，但她权力欲望过盛，仍然决意走这条女性专权的道路。除了三名造反的领头者外，各位大臣还都劝说慈禧用同样的手腕处置他们的同党。恭亲王虽然不是出于报复之心，他至少也一直在挖空心思地想严厉惩办那些进谗言给咸丰皇帝的官员们。但此时慈禧却显示了作为政治家宽容的肚量。她很早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点，不能滥杀，只需要惩治领头者。她深知，饶人一命往往就意味着拉拢一个支持你的人，何乐不为呢？所以，慈禧仅仅是处置了怡亲王同党的一个军机大臣，对其他有罪的她则既往不咎。比如，有人要弹劾礼部尚书陈浮恩，因为最初就是他不顾慈禧反对，第一个竭力上奏要先帝离开京城，逃往热河的。而在咸丰皇帝驾崩后，在京城的所有大臣中也只有他一个被传唤到热河去。而最后，尽管陈浮恩这些罪都已经有真凭实据了，但慈禧还是网开一面，仅仅撤了他的官职了事，并没有给他定罪。1861年春天，还有一位内务府大臣则帮坏人行凶，胡说什

么京城要爆发叛乱了，阻止咸丰皇帝返回京城。这个人最后也只是官职被免去了事。尽管当时北京有人想借当权之人搞搞报复，但慈禧都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在一份诏书中，慈禧说，她只想惩治奸党中的出头者，其他人就不过分追究了。慈禧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便是，一旦自己的目的达到，她会采取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怀柔政策：对人宽宏大量。对于载垣造反的这件事，慈禧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载垣和他的同党人士如果没有得到许多大臣官僚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也不可能有胆量密谋造反夺权的。不过，只要现在没有人公开挑衅她的威严，她不愿意树太多敌人，那样做也是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干脆得过且过算了吧。既不偏袒谁也不报复打击谁，保持中立就行。在处理另外一些大事件中，正是由于慈禧的这种宽容政策才使得她在京城百姓和官员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仁慈宽容的形象，这一点是她复杂个性中的真实的一面。这样，她成功地揭穿和处理了造反者后，没有对这件事纠缠过多，相反，她劝告在朝的各位大臣，“从此以后，你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正直，千万不要再犯陈浮恩等人的错了。”在另外一份诏书中，慈禧强调道，知情不报的人和犯罪是没有两样的，她委婉地批评了有些亲王和大臣在事情处理中缩手缩脚，不能及时地揭发造反者，指出这些大臣所缺乏的是胆识和魄力。另外，各位皇亲国戚们要以载垣为首的三个人为前车之鉴，如果再有这类事件发生，处罚一定会比对他们三人更加严厉。

太后垂帘听政，头等大事便是确定新皇帝的年号。当初载垣他们定的年号是“祺祥”，但是太后自己读书比较多，她感觉“祺祥”这两个字不好，而且笔画也比较多。另外，她也希望能把载垣他们“造反”的所有痕迹全部抹得一干二净，她便把年号改成了“同治”，大概也是希望早点能平定南方的叛乱，大清朝能太平地实行同治。其实，对皇帝本人来说，这两个年号没啥区别，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一点。

发诏书改年号的当天，东西皇太后共同下发旨意，对自己代替皇帝主持政事的事实假心假意地推脱了一下：

垂帘听政根本不是我们的本意，而是根据各位王公大臣的再三请求，不得已才这样的，因为大臣哪能一天不把国家大事向皇帝禀报

呢？这是万万不可的。等皇帝长大成年，完成了他的学业，我们一定会退位，不再替他主持政事，一切大权将全部交给皇帝本人行使。希望大臣和百姓能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无奈，各位大臣将会勤勤恳恳、一心为国，帮助我们一起来治理国家。

随后，皇帝本人亲自下发诏书，对太后说了一些替他主持政事感激不尽之类的话，还说自己等成年后，一定会勤勉治理国家，来报答太后对他的一片苦心。

两宫从垂帘的那天起就被授予了尊号，以表示对她们的尊敬，尊号中的每一个字都会相应地得到由国家拨给她们的十万两白银。太后尊号为慈安，是东宫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尊号为慈禧，是西宫太后。后来在不同的阶段，这两位太后被增加了其他的尊号，每次都是两个字。因此，在慈禧七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十六个字的尊号。当时，光绪皇帝（并不是出于真心）又给西太后四个字的尊号，还被慈禧委婉拒绝。慈安太后尊号共计十个字。两位太后在各自三十岁生日时被授予了两个字，在同治皇帝继位时加了两个字，同治得了天花夭折死亡前加了两个字，目的是嘉奖太后“治理国家”有功，两宫太后四十大寿时加了两个字，慈禧五十大寿时加了两个字，光绪结婚时加了两个字，慈禧六十大寿时加了两个字。所以，西太后的最后完整的尊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大清光绪年特别为慈禧六十大寿发行的纪念币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贺礼——大雅斋

垂帘开始阶段，叶赫那拉氏尽力提拔恭亲王。她和东宫太后共同任命恭亲王做议政王，还特别给他一个称号叫世袭亲王。恭亲王坚决推辞不接受，不愿意作议政王，太后却极力不同意（后来的事实表明了，西太后并不需要什么议政王，只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罢了）。经过再三推脱，两宫皇太后才同意暂时先不授予亲王这个称号，等时机再成熟一点再说吧，但是恭亲王一定要当议政王。叶赫那拉氏对恭亲王心里一直就非常感激，她从没忘记他在热河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自己的大恩情，所以封了恭亲王的女儿做公主，允许她出门使用黄色的轿子。这位公主对慈禧的影响挺深，尤其是在慈禧晚年时期影响更深。

慈禧垂帘听政的最初时期，对许多政事都不太了解，京城中党派

林立，外交上事情也纷繁复杂。她经验不多，年纪又小，所以自然非常看重恭亲王，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慈禧事事都听恭亲王安排，他说什么便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慈禧耳闻目睹了许多国家大事，她本性专断，开始小露锋芒，不愿意每件事都听恭亲王的了。她通晓史书，加上本人聪明悟性高，渐渐对怎样用人方面有了自己的一套，于是她改了从前事事依赖恭亲王的习惯，开始有些厌恶他了。慈禧性格上格外喜欢独揽大权，一旦她决定下来的事情，就容不得任何人在旁边指手画脚，而恭亲王这个人也难搞定，他的骄傲和独断专行和慈禧有一拼。因此，当年轻气盛的叶赫那拉氏开始有意不采纳他的意见时，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生气，于是两人的关系很快开始恶化。由于慈禧对恭亲王态度有所疏远，恭亲王便开始向东宫太后求助，使得两宫太后产生了小摩擦。另外，在官员任免事情上，恭亲王根本不同慈禧商量便自作主张，擅自提拔袒护自己的门生和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根据当时的记载，两宫太后垂帘的开始阶段，恭亲王对两宫太后的态度简直达到了野蛮专制的阶段，这个人简直是有了大权在手，就无法无天了。由此在上朝期间，他还很肆无忌惮地对太后说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太后不可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这样大不敬的话慈禧不可能忘记，她也不会轻易就原谅和放过恭亲王的。

召见各位大臣时，两宫太后端正地坐在大殿宝座上，她们的前面挂着一道黄色帘子。每次召见各位大臣，先由议政王领着这些大臣，各位大臣按照官职高低依次进去，他们是看不到太后尊容的。太后宝座的两边都有贴身太监服侍，他们会从帘内向外面窥望，观察是否有大臣失礼。严格来讲，除非有当班的太监传达旨意，否则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准擅自看到太后尊容。但是恭亲王自我感觉位份高于各位大臣，所以他往往会自作主张地走到黄色帘子后见太后。慈禧上朝越久就越感觉到恭亲王失礼之处过多。比如说吧，念读太后下达的旨意时（这往往由慈禧宣布），恭亲王经常故意把音量提高，甚至有一次当慈禧说完，他还故意假装说没有听清，请太后重复。总而言之，恭亲王态度比较傲慢，没有作为大臣的应有的谦和与恭敬，这一点恰恰是骄傲的慈禧无法容忍的地方。恭亲王住在紫禁城外面，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与内外各方保持联系。如果他蓄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密谋推翻

慈禧政权。另一方面，慈禧在宫内得到的所有消息几乎都是来自于各位太监们，有时难免是道听途说，这使得慈禧的猜疑心日益加重了。因此，慈禧决心要采取某些措施来向恭亲王证明，他目前的地位与权力完全都是太后所赐的，必须识点好歹才行。

慈禧并不是那种一有眼中钉就夜里觉都睡不着的人，她耐心地等待机会。终于在她垂帘的第四年，也就是1865年4月，机会来了。在一次召见禀报奏折期间，搞不清是有意还是无意，恭亲王本来跪着的，陡然擅自起立，这一举动严重违反了基本的宫廷礼仪。按照清宫规定，臣子觐见决不允许起立，以免发生任何危及皇帝的举动。当时，太监立即把所看到的禀报了太后，太后当场大声求救，称恭亲王有不轨企图。侍卫们听到声音赶紧入内，把恭亲王拖出大殿，这才了事。然后，太后颁布了旨意，是说恭亲王竟敢大胆到要篡夺朝中大权，自恃有功，过分骄傲，罢免了他议政王的职务，撤掉了他军机处、内务府的所有职务和总理衙门的差事。旨意内容是，“恭亲王辜负了朝廷对他的一片信任，结党营私，应该及时阻止他的这种错误逆反行为。”

然而，一个月后，慈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不是那么稳固，而且她对恭亲王的处置在朝中和在各省的官员中都引起了多多少少的不满情绪。于是，两宫太后很快又颁布一道旨意，来对这件事加以解释说明，目的很明了，就是要挽回自己的脸面嘛。在这份谕旨中，慈禧解释自己之所以要严惩恭亲王，都是为国家百姓着想。同时她指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一点，如果哪位皇亲国戚谋取私利，但朝廷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其结果是给国家百姓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恭亲王对太后态度不敬，朝廷严惩他，都是为了避免他犯大错误，作出后悔不及的事情。现在，既然一些大臣上奏恳请希望对他的罪过进行宽大处理，朝廷当然也不想责怪他。现在决定恢复他内臣这项职务，仍然继续统领总理衙门。谕旨中还交代，恭亲王既然已经懂得了清宫的礼仪，朝廷暂时不去追究他的过错，但希望他能知恩图报，从今以后，恪守职责，忠心尽好自己作仆人的本份。

慈禧决定好人做到底，一周后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下发旨意。

今天早上，我们允许恭亲王来见我们，承认自己的不是。他趴在地上痛哭不已，我们见了都过意不去，再三劝他，而恭亲王也对自己的罪行忏悔不已，样子让人竟然不免心生些许同情。

我们真是勉为其难地垂帘听政都有四年多了，时间过得真快，真是一眨眼功夫啊。这四年来恭亲王当议政王，他责任很重，整天到晚满脑子考虑的都是朝廷国家，其他大臣哪里比得上他呢？因此，朝廷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一旦他犯错误了，我们也必须对他严厉惩处。现在，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只要他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朝廷对他没有任何成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公心，没有半点私心。对于他这样一位能力超强的大臣，我们也不希望看他被处罚，朝廷也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位得力的大臣啊。所以呢，现在恢复他在军机处的差事。但是他议政王的职务暂时免去，目的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希望恭亲王今后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忠心为国家效力，报答恩德，消除不应有的疑虑，千万别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啊。

同一年，也就是在1865年秋天，持续了四年的陵墓修建工程终于正式完工了，现在开始进行咸丰皇帝的大葬礼。和咸丰皇帝合葬的是孝德皇后萨克达。1850年咸丰皇帝继位一个月前，萨克达去世了。十五年来，她的遗骨一直存在京城郊外七英里外的一处乡村的寺庙中。修建陵墓是要耗费巨额资金的，但清政府掏不出腰包，款子筹不齐。通常朝廷国库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南方各省，但现在这些地方还被太平天国这伙叛贼占着。根据统计，修建咸丰皇帝陵墓共花掉几千万两银子，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内务府大臣私吞了。

咸丰皇帝大葬的那天，年幼的同治皇帝跟着两宫太后一起去东陵，参加庄严的安葬仪式。一起去的还有恭亲王，他负责修建陵墓和筹集款子的事情，他在做这些事情方面非常尽心，太后对他的满意劲头别提了。咸丰皇帝的棺材都是由梓木做成的，外面涂着厚厚的油漆，刻着佛字。在皇帝和两宫太后的无限悲痛中，咸丰皇帝的棺材被慢慢抬到宽敞的圆顶陵墓中，轻轻安放在镶满了珍贵珠宝的宝座之上。中国过去的皇帝下葬，身边往往都有许多妃子和太监陪葬。而现在都有真人大小的木人或者纸人代替，跪在棺材前面服侍着。随后，

点起巨大的蜡烛，僧侣们口念经文，棺材外面放上黄金珠宝之类的东西，陵墓中放满了珍宝摆设。一切安排稳妥后，陵墓的大门缓缓关闭。

第二天，两宫下达谕旨一份，大力夸奖恭亲王做事稳妥、让人放心，对他筹办咸丰皇帝葬礼的功劳表示感谢。

根据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自从办文宗显皇帝的大事以来，已经有五年过去了，这期间他忠心耿耿，做事有条不紊，一切让人放心。今天，文宗显皇帝和孝德皇后安定陵，仪式结束，大家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恭亲王最近做事无论大小，非常细心，实在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一片希望。今年三月初七在读谕旨时，因为小的理解疏忽，对他的责备严厉了些，还不是因为对他寄寓很大希望嘛？在三月十六和四月十四两天，把处理的结果都宣布了。因为后人不知道其中的因果，所以千万不能乱定他的是非。所以三月初七的谕旨千万不要编入起居注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一心勤勉为国，对大清王朝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直到后期的这些谕旨反复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人性情善变。四年后，恭亲王和东太后联合除掉了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再一次触犯了她敏感的神经。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1864）

两宫垂帘听政的头几年，慈禧处理政治颇有艺术和手腕，使性情温和的东宫太后逐渐退居幕后，同时又成功镇压了太平军，一度非常得意。太平军这支叛军在1850年揭竿起义，使千疮百孔的清政府受到摧枯拉朽的打击。中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通常相互借鉴）都认为镇压太平军全靠了曾国藩，他是儒学大家，忠勇之士，家喻户晓。当然他的幕僚左宗棠也功不可没。儒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虽有弊端，但中国人从中受益匪浅。



曾国藩

作为统治者，慈禧知人善用，尤其是善于发现军事人才，除非有

时候相信迷信才会犯错。慈禧一开始只是听说一些关于曾国藩的传奇故事，说他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后来与曾国藩熟悉后，慈禧非常钦佩曾国藩的人品和才华。除了荣禄，没有其他人能获得慈禧如此厚爱，而荣禄是满族贵族，曾国藩不过是来自湖南的一个乡绅。一个中国人告诉我们有关太平军的事，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曾国藩忠君报国，而年轻的慈禧已经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皇权。咱们先说说太平军的最后失败，我一个英国人，作为目击者，已经对此事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是看了官方的诏书和文件，倒引起了我的怀疑，而且事实证明这些怀疑非常有历史价值。

1861年事比较多，先是咸丰八月驾崩于热河，然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接着北京恢复和平，再有就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1860年10月恭亲王签订和平条约后，首要任务就是借用外国入侵势力打击叛军，这支军队在长江流域逐渐壮大，引起朝廷的焦虑。有件事很值得深思，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有意义，当时英法联军在上海集中兵力准备入侵中国北方，长江流域的各省官员竟然请求他们援助镇压叛军，请求遭拒后他们指责英国政府不明智，忽视他们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的本国利益。英军是常胜之师，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1862年，他们把叛军围困在江苏省内，1863年英政府同意戈登将军参与指挥作战，战争形势立刻有利于清政府，为曾国藩扫清了障碍。1863年10月清军收复苏州，1864年7月收复叛军首都南京，叛军首领之子自杀身亡，这标志着叛军最终被成功镇压。一开始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要严格保持中立，甚至还有人认为应该推翻中国腐朽的统治阶层，为了帮助清政府，英法联军牺牲了不少人，包括一位法国海军上将，然而，曾国藩在上报朝廷的捷报里，不仅没有提到戈登将军的功劳，竟然指责他残忍的对待手无寸铁的犯人。曾国藩认为战争胜利完全归功于咸丰皇帝的英明神武，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对皇权怀着无上的敬畏（日本人也有这种观念，在一个日本将军的捷报里几乎可以看见一字不差的表述），真实情况一般不会写入奏折里，更别谈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那一点点帮助了。对于曾国藩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来说，事实并不重要，他知道这个戈登，帮助指挥围剿叛军一年多的人，正是那个刚刚洗劫了颐和园的戈登！

收复南京，慈禧非常高兴，以小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里，以她特有的文字风格描述了整个事件以及嘉奖令。以下内容是这份诏书的部分内容，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慈禧性格的认识：

收复南京诏书

刚刚收到曾国藩二百里加急捷报，胜利收复南京。叛匪头目之子自焚，彻底摧毁太平军主力，活捉叛匪首领两个。细读奏折，我们真是欣喜若狂，应该普天同庆。自道光十三年起，叛匪头目洪秀全带着这帮剪辫子的逆贼开始作乱，从广西迅速流窜至湖南、湖北、长江流域各省，一直到达直隶及山东，足迹遍布南北，真是无孔不入。咸丰三年（1853年），南京沦陷，叛匪就地另立伪朝廷，涂炭生灵，不计其数，恶贯满盈，人神共愤。

先帝龙颜大怒，命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负责督战。官文清剿湖北境内叛军后，继而东进，准备肃清江苏省内叛军。后来曾国藩收复南京，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负责剿匪，他不负重托，功勋卓著。1861年，虽已收复江苏、浙江两省半数城镇，但是先帝仍悲痛不已，竟于当年驾崩，未能亲眼目睹彻底镇压叛军。我登基之后，遵照先皇及两宫皇太后旨意，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江南四省军务，统一指挥作战。

曾国藩有勇有谋，他命彭玉麟和曾国荃联手，水陆同时剿匪，收复城镇百余座，剿灭十余万去南京增援的匪军，并割下他们的左耳。使南京陷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况。本月初，南京城外军事防御被摧毁，剿匪三万余人，叛匪称他们会在城内负隅顽抗到底。

据曾国藩奏报，自我军攻陷南京外城后，叛军在城内加强防御，我军成功登上龙脖子山，修筑炮台，对城内日夜轰炸，双方发生激烈对攻。16日黎明，我军集中兵力冲锋，在城墙上炸开一个六十尺宽的大口子，我军跨过裂口，一下涌进城内，叛匪引爆炸药库，我军伤亡惨重。我军将领杀一儆百，遏制住逃跑势头。

（此处略去战争详情）

凌晨一点左右，叛匪头目及首领住所火光四起，其中一人带着千余随从从主殿逃出，在南门附近的民房里避难，随从七百余人被杀，此人被俘，在他身上搜到玉玺两枚，金印一枚。凌晨三点多，大约一千多人的叛军身穿清兵服装，企图从天和门的地道出逃，被我军骑兵追捕，在湖熟村活捉干王李万材。据李万材交代，太平军有七个王爷准备趁黑逃出城，被我军诛杀。经其他叛军证实，叛匪头目洪秀全一个月前已经服毒自杀身亡，埋在伪皇宫的院子里。他的儿子幼天王继位，南京城被攻陷的时候，他自焚身亡。还有一个头目李秀成身负重伤，在他藏匿地方的附近，同时又抓获了洪秀全的兄长。三天之内，剿匪近十万余人，其中包括三千多的所谓的王、将军还有大小官员。战争胜利全凭老天保佑，祖宗庇护，靠的是两宫皇太后慧眼识珠，积极选拔人才，加上内外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才最终获胜。以此慰藉先帝在天之灵，举国同庆。先帝在世未能目睹胜利，我们深感不安，胜利之荣耀愧不敢当。叛乱持续十五年，南京已沦陷十二年，摧毁南方数省，占领城镇百余座，悲惨之状难以想象，我军将领栉风沐雨，克服艰难困苦才最终取得胜利，劳苦功高必须予以嘉奖。首先要给曾国藩记头功，他带领训练有素的湘勇，转战省内，挽救湖南多座城市免遭彻底摧毁。接着，收复武昌，肃清江西省内叛乱分子，继而东进，接连收复多座城镇。曾国藩智勇双全，才干卓越，领导有方，不辱使命，赐封太子太保衔，世袭一等毅勇侯，赏戴双眼花翎。

（曾国藩的弟弟也被封侯，下面还有长长的赏赐名单）

一旦发现匪首洪秀全尸体，立即砍下首级，在南方各省巡游，以平民愤。派两名官员去南京，把俘虏的叛匪头目押往北京，凌迟处死。

诏书还宣传，小皇帝将亲自前往太庙祭祀，纪念牺牲的勇士，感谢神灵的庇佑。

一个中国人记录了洪秀全自杀的过程：

自清兵攻克沐阳后，南京城里的叛军就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绝望没有出路。四月初，南京城就被团团包围，毫无出逃的希望。口粮

在减少，一天吃一顿，少得可怜，“天王”命人把树根和叶碾碎然后揉搓成丸子，还说“这是来自天堂的甘露，宫里也吃这个好久了”，他还命令每家每户都要收集十担这种食物，都储存到宫里去。有些愚昧的人还听他的，不过不少人根本不理会。

“忠王”李秀成从沭阳逃回南京，一进城，他就击鼓鸣锣，通知洪秀全和其他头目上朝议事，局势危急。洪秀全傲慢登上皇位，说“上帝神谕，圣父圣兄（基督）命我下凡，统治世界，我有何畏惧？去留你们选择，我的江山固若金汤，你们不保卫自会有人来保卫。我会指挥十万天兵天将，清兵怎么可能入城呢？”李秀成听到这番疯言疯语，泪如雨下，离开大殿。

但是还没到五月中旬，洪秀全就意识到南京城注定在劫难逃，彻底绝望，他把毒药混在酒里，举起酒杯，大叫“非天亡我，是我抗天命”！大叫几遍后一饮而尽。当夜毒发身亡。临终之言虽有愧意但无悔改之意。根据他们的宗教，不用棺材，而是用绣龙黄缎把他裹起来，埋在宫苑一角。他的部下封锁死讯，推举他的儿子继位，人称“幼天王”。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官兵士气重挫。

在奏折里，曾国藩提到挖出洪秀全尸体的经过：

尸体从头到脚都是用绣龙黄缎包裹着，光头，胡子灰白，验尸后砍下首级，焚烧尸体。据当时参与掩埋尸体的，一个黄姓妃子说，洪秀全已经很少上朝，所以死讯瞒了十六天。洪的伪印已经差人送往京城，以备存档。

第六章　太监惹祸

中国现代史学家、评论者以及皇帝的老师和侍卫曾经反复强调过，明朝之所以会腐朽衰亡，主要原因是宦官对宫廷以及对各位官员的恶劣影响。所以，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用它来劝谏皇帝废除掉宦官制度，尽管这些人里面，大部分能混个官职都是靠那些皇帝宠爱的宦官的帮忙，而且他们还想通过他们这些宦官继续高升自己的职位呢。中国官僚系统中这样无比虚伪的陈词滥调，简直数都数不过来。这些奏折都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事中国有，其他国家全都有。虽然在慈禧统治下，宦官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而且越来越严重，但慈禧本人表面上好像很诚恳地表示，她很欣赏这些官员的提议，她自己也憎恨手下宦官们作恶多端。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对宦官制度的弊病恨到骨子里的人。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十年当中，任何一个当之无愧的改革家都会这样说，中国如果要跻身于文明大国的行列，首要的措施便是废除宦官制度。1898年戊戌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太监李莲英本人对光绪皇帝不满意，也就因为以前光绪皇帝曾经处罚过他。另外，李莲英也担心，皇帝如果有一天真的实行了改革，肯定会掌管大权，废除宦官制度。同样，事实表明，义和拳闹革命的那一阵子，也是这位臭名昭著、大权在握的宦官利用自己对慈禧太后的巨大影响，替那些反对外国的义和拳的贼匪们讲话的。事情过后，如果不是俄国公使的庇护，李莲英肯定会在和平协定的“黑名单”中排名头一个。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李莲英在这两件事中的表现，主要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宦官制度早就深恶痛绝了，而且中国各省对它也是有苦难言。所以，这些年来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比如袁世凯和唐绍仪等人）已经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泯灭人性的宦官制度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骤降，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况且一些报纸杂志，都纷纷催促朝廷尽快废除掉宦官制度。表面上，太后也持有同样的态度，而实际上却并

不是这样。早在1906年，《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就一直在讨论，清政府正在酝酿的变法一定会把这个弊端十足的制度废除掉。不过，中国当时仍然占主导的保守派们普遍认为，宦官制度历史已久，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存在是非常符合中国根深蒂固的一夫多妻制度的，并且中国人又十分重视继承先辈留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有些人指出，周朝初年明君统治下的黄金时期，当时宦官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他们借古说今，认为贤明的统治者就应该废除过时的宦官制度。

1644年大清王朝在北京开始建都开始，满族统治者就接管了过去明朝留下的所有行政旧制度，也包括宦官制度，但同时也对宦官的活动和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年轻的顺治皇帝即位后第一次召见宦官时，满汉官员就联合上奏，批评了近来皇宫宦官的专横跋扈的行为，说这些奴仆“只能洒水扫地，不能接近高贵的主人”。顺治皇帝立即定下多条法令，这些法令到今天还被看作是金科玉律（至少在书面上的确如此）。法令禁止宦官担任官职，衔位不允许超过四级。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吸取明朝宦官魏忠贤引祸乱国的沉痛教训，下令禁止任何太监以任何理由离开京城。在此后两百年间，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的英明统治，宫里的太监一直安分守己，从没惹过什么事。然而，在叶赫那拉氏进宫前，清政府在咸丰皇帝的统治下已经显出了种种衰落的迹象，这时太监的权势在紫禁城内又死灰复燃。慈禧掌权后，明朝末期太监的种种行贿受贿、横行霸道的丑恶行径全部露出水面，最终搞得整个皇宫乌烟瘴气。

慈禧统治期间，在她的庇护下，太监们权力很大，无人敢比，专横骄纵，胡作非为，甚至明目张胆。1898年，深受慈禧青睐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只要他想让哪个官员升职，没有办不到的，想让谁降职，就必降无疑，更过分的是，他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但是有许多传言是胡乱捏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比如说宫内荒淫无度啦，太监们为慈禧安排酒会搞狂欢啦等等，纯属谣言。有一些书中所涉及的这些方面许多完全属于偶然事件，尤其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写的东西更是纯粹出于怨恨报复心理。跟常理不符，他们甚至编造出太后与荣禄关系暧昧，完全是无中生有，各位千万别相信哦。但

是另一方面，无风不起浪，任何谣言一定都有它的来源。虽然京城里的老百姓都很爱戴慈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皇宫里的生活奢侈放荡，还公认太监们在宫里胡作非为。因为皇帝软弱无能，一些太监就目中无人、欺上瞒下，生出了好多是非，这些都加速了皇帝的死亡，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同样，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过早死亡虽然不能说由身边的这帮小人直接促成的，但是他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近七十年来，清朝的皇宫内外，凡是大小事情，一切都和太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慈禧当政五十年期间，皇权实际上是由太监一手把持着。慈禧中老年期间最为器重的一位太监是李莲英，他的外号是“皮硝李”。这个人呢，真是名声臭到极点了，他一手导演了数不尽的宫廷悲剧的发生。李莲英对皇太后有很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式上朝以外，其他的场合下慈禧对李莲英态度极其和蔼可亲。李莲英毫不拘束，或许可以说除了荣禄之外，有这样的待遇是任何大臣以及慈禧的家人都盼望不来的。



李莲英

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期间，年轻的叶赫那拉氏在随身服侍的太监当中偶然发现了聪明伶俐而且又得力能干的安德海，于是慈

禧加以重用。后来，载垣造反的危急时刻，安德海成了慈禧忠心的心腹人员，成了叶赫那拉氏与荣禄之间联系的信使。两宫垂帘听政之后，安德海更是成了慈禧的贴身密使和随从，甚至后来成了她的智囊和左膀右臂了。所有的计划和决定，慈禧都必须和他商议后作出决定，当然安德海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另外，慈禧喜欢看戏，安德海投其所好，想方设法在宫里建了相当豪华的戏院，这深得女主人的欢心。安德海自己长相俊美，加上他的戏也唱得挺好听。

两宫刚开始垂帘期间，政权不稳定，载垣造反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就有官员上奏，指责说宫里过于豪华奢侈，说得有鼻子有眼。年轻的叶赫那拉氏非常自负，她已经开始听不进批评的声音了，同时她深信自己的贴身随从对自己是忠心不二的，他们绝不会犯任何错误，于是她根本毫无改正的意思。不过，这位固执的人还是蛮注重礼节的，她很看重自己的面子，所以她对身边的道德家们的指责深表赞同。太后当政的最初几年中，大家经常会看到这一类的语言相当得体的诏书，但是其中的诚信度确实让人怀疑，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人真正把这类诏书太当回事。下面的这份诏书是慈禧垂帘第三年颁布的，也就是1864年，很具有典型性。有趣的地方是，当中提到了宫里太监偷窃的事情，但是直到今天，情况依然这样，没有改善。这份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的诏书说：

奉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的懿旨，根据御史贾铎的上奏，我听说内务府有太监演戏，把库存进贡的缎匹裁剪做成戏服，每上演一天，就有赏银几千两，请各位赶紧停止这种行为，这样的坏事必须防微杜渐。

尽管先帝去世的第二十七个月的祭祀活动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还是颁布了一道诏书禁止所有活动，因为先帝的遗体还没移到最终的墓地；同时，我们颁布诏书，要求各省作季节性的进贡，目的是为了皇宫戏剧演出的服装费用。同时，我们准备颁布另一道诏书作为葬礼仪式的结束。我们适时地抓住时机，要求永远废除把戏子带到宫内作太监的习俗，我们这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生活在深宫中，不可避免地，对外面的有些报道都一无所知。一些太监如果真作出了出格的事

情，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取缔。我们坚决要采取大力措施立即铲除一切冒犯者。

这些事情既然传出来了，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宫里偶尔有素质不高的太监，这也是难免的，他们借着自己的名声招摇过市，一定要当心啊。希望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能严密观察，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必须从严查办，以免后患。

皇帝在自己学习研究之余，也要适当和大家多接触。如果只顾自己研究学习，只听好话，不管周围的琐碎的事情，是不行的。各位大臣应该随时侦察情况，让各位总管太监们认真做好分内的事情，如果太监再有这样类似的狂妄之举，比如在外招摇过市的事情发生，我们会让步军统领衙门一起查办。总管太监如果不能检举揭发，必须让这位总管太监革职，定重罪。这道旨意希望内务府认真记载，妥善保存。

京城内人人都知道慈禧非常喜爱看戏剧，所以这份谕旨颁发下来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以后，一直到慈禧宠爱的总管太监安德海临死，宫里一直有人上奏太后，说什么宫里过分奢侈，导致户部的财政紧缺，又不停地让各省送物资到宫中救急。

1866年，两位敢于直言的官员上奏太后，痛骂安德海的胡作非为。奏折里说：

皇帝的贴身太监的选择应该更加慎重才对。明朝之所以灭亡，其中的直接原因就是宦官之乱。这等小人口舌比弹簧还灵，精通拍马奉承的噱头，往往使用自己的忠心来向主子邀功，让主子对他们信任和喜爱。凭借皇帝的信任和保护，他们勾结私党，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使之坚固无比。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我们恳请皇上要求身边的人尽量品行兼优。主子应该去除掉外貌好看的年轻太监，防止这些小人蛊惑主子，有任何不轨企图。

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对这份奏折的批复是这样的：

奏折中说的话相当有道理。宦官影响朝廷的事情在历史上很多，我朝一定要以此为戒。自从我们大清开始建朝以来，先祖们相当圣明，不仅有明文禁止太监干预国家朝政大事，而且不允许他们偷听皇上谈论国事，更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他。因此，近二百年来，这些跳梁小丑们根本没有机会扰乱朝政，太监乱了国家朝政的事情早就成了历史遗留了。我们垂帘听政到今天，两宫太后也严格遵守我朝的朝廷禁令，坚决杜绝出现这样的宦官之乱。通过发布这道诏书，我们必须清醒，这些危险依然在威胁我们国家，因为我们还处在宦官的影响之下。我们现在必须颁布诏书，如果有任何小人妄想凌驾于皇权之上，必须及时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知道处理结果。我们希望我们的随从人员都能品格兼优，这样宦官之乱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这样，慈禧以最好的举止仪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但是，在深宫中，生活还同过去一样在继续，他们过得逍遥自在，宦官对太后的影响在日益增加。在茶余饭后，人们都谈论着宦官在紫禁城中掌握实权，以及叶赫那拉氏和安德海在颐和园，经常穿着历史剧中的漂亮的服装，二人一起漫步游乐，而且他经常穿着龙袍。而且还有人说太后向他公开展示玉玺——皇权的象征。这些情况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无端的流言当然是对现实的夸大，甚至让人感觉安德海根本不是一个太监，因为竟然还有一次，有人竟然将安德海说成是慈禧太后一个儿子的父亲。毫无疑问，这些流言的很大一部分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慢慢地得到验证。

在这些事情中，有一件事情的影响很深。是说慈禧太后违反了宫廷一条禁令，竟然让太监离开京城。1869年，因为资金短缺的缘故，她派自己的亲信安德海去山东以她的名义搜集贡品。

到此时，安德海已经惹怒了宫中几个太子皇族了，特别是得罪了恭亲王，而且他在宫中的影响日益提高。一次，太后传话给恭亲王，说她正忙于与太监谈话，他是不能听的。这次羞辱是恭亲王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于恭亲王来说真是太丢人了。

这次安德海非法的山东之行，以及他在该省无法无天的行为使得

恭亲王找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珍贵机会，但是他不仅毁了安德海的名声，而且与慈禧树了敌。山东巡抚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名叫丁宝桢的勇敢官员，他曾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不俗。恭亲王到达皇宫时，慈禧正在看戏呢，没有一刻迟疑，他要求觐见慈安太后——另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而慈安太后仅仅会玩弄自己的虚荣却没有任何决策权，丁请慈安签一份诏书，是当面签署的。但是慈安是个很难说服的人，她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对慈禧的妒忌。她迫不得已在懿旨上盖上了东宫太后的印玺，她想，如果慈禧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大怒，她说："西太后一定会杀了我。"得到这份谕旨，恭亲王立刻派特使火速送到山东巡抚丁宝桢那边。

下面是这份谕旨的详细内容：

丁宝桢上奏太监在宫外招摇煽动是非的折子。根据德州知州赵新禀报，七月有个姓安的太监乘坐两艘大平船，声势非常浩大，自称是奉谕旨出差，为皇帝置办龙衣。船上有一面太阳图案的三足乌旗帜，船旁边有龙凤旗帜，船头坐着男男女女许多人，还有女乐人，用各种乐器在演奏，沿河两岸的围观者多得围成了墙。还说本月二十一号那天，该巡抚已经到东昌、济宁各知府去追捕了等等。

看到了这个折子，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自从这位太监出行后，就传出种种非法的事情，如果再不从严查办，那怎么能安定内宫呢？所以我们委派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和丁宝桢迅速统办侦缉，到下面去把六品蓝翎那个姓安的太监严密查办。让随从人员做好明确的指证，不需审讯，当即就地正法，不允许有任何狡辩行为。如果这位太监见风头不对撤回京城的话，则立即让曾国藩严惩不贷。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疏忽，拿这些巡抚是问。如果他随从的人员中有类似的匪徒行为的，也一并惩处。不需再另行颁布诏书。这是六百里内的秘密谕旨，各位知道就行了。

这时，慈禧太后对自己宠爱的太监身处危难之中的事情，还蒙在鼓里呢。对他的死也一无所知。恭亲王和慈安太后之所以能如此秘密地把事情办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安德海平日里骄横跋扈。十天

后，慈安太后在恭亲王的压力下，不得已下了一道谕旨，这才公布了出事总管太监的事情。

这里根据丁宝桢上奏的折子说，已经在泰安县城把犯人安德海捉拿归案，遵旨就地处决。他的随从人员，也在当天遵旨让丁宝桢分别从严查办了。我们大清朝家法代代相承，执法必严，只要有在外面惹是生非的，统统要立状定罪。这位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大胆妄为，作出了种种违法乱纪的事，实在是罪有应得。经过这次严厉惩办，各位太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好自为之。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及总管太监等各人回去以后要对自己府内所管的太监严加管教，严厉约束，让各位太监谨慎当差。如果有不安分守己的，在外面胡乱生事的，除了要给太监治罪，连同管太监的人一并惩处。一定要通知到各省督查巡抚，遇到有太监冒充说是奉谕旨行事，无论他们有没犯法，立刻捉拿归案，上奏惩办，从严惩处。

这份谕旨行文非常委婉，但是因为担心惹恼了叶赫那拉氏，所以与平时慈禧给别人定死罪时所发的谕旨的方式差距有十万八千里。慈禧向来遣词用语都是直言不讳，有啥必说的，而这种“话里藏刀”的方式是她能掌控大权的一个秘密武器。

安德海在山东被就地处决后，他的几个随从的太监也都被一并处死，但还有六个人得以逃脱，后来他们中有五个被捕捉住处死了。安德海的家人被发配到大西北的边关，当了军奴。安德海被处死后的几天，还有一位逃脱的太监回到京城，经过李莲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慈禧太后。起初，慈禧太后不相信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东宫太后一向都是胆小怕事，从来不爱抛头露面的，怎么这次竟敢一声不吭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擅自颁布了两道谕旨，根本不顾其中的严重后果。等她后来慢慢缓过神来，慈禧怒不可抑了，立即奔向仁寿宫，怒气冲冲地问慈安太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慈安心惊胆战，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恭亲王的头上，但这仍然丝毫不能平息慈禧的怒气。慈禧与慈安争执了半天，慈禧愤愤离去，她发誓要报仇。这件事成了叶赫那拉氏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过去对于性格温顺的慈安太后，慈禧表面上非常友好，礼节很周全。但从这件事发生后，她在国家大事方面花了更

多的时间和心思，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巩固好自己的权位，绝对不能让大权落到旁人手中。从此以后，慈禧太后完全不顾东宫太后的存在，当起了清朝政府的独一无二、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大发雷霆之后的第二天清晨的早朝上，慈禧太后严厉训斥了恭亲王，威胁说要把他的职务罢免，并收回他的爵位。不过，慈禧暂时并没有处罚恭亲王，但是她心里一直在暗暗等待时机，采取报复行动。不可否认，慈禧后来又提拔了恭亲王，但是其中的原因在于她的权力离不开恭亲王的极力辅佐相助。另外，慈禧对恭亲王的女儿非常喜爱，还认她做了干女儿。

安德海死后，接替他总管太监职务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李莲英，这个人同样也成了西太后的最为贴心的奴才。接下来的四十年中，这个李莲英太监注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手上掌握着千万人的生杀大权，操纵着各位高官的职位升降，各省的纳税所得全都中饱私囊。李莲英十六岁进宫，外貌美丽俊俏，举止大方得体，深得慈禧的欢心。据可靠资料记载，李莲英很早就深得太后的宠爱，经常得到太后的赐座，甚至还有传言说他与太后同坐龙椅之上。私下的非正式场合，他甚至可以自由畅谈。后来，李莲英与慈禧太后关系日益亲密，他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大事方面全部参与，说话极有分量。晚年他每当与人谈到太后，动不动就称“咱们”，这个称呼只有关系亲密的朋友或者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之间才会用的。手下人都很恭敬地称李莲英为“九千岁”。只有非常严肃的国家重要典礼上，这位仅次于“万岁”的奴才才会遵守太监的应有礼节，态度比较收敛。

尽管李莲英这个人极其贪婪腐败，属于那种小仇必报之人，对异己态度凶残，但是他对慈禧太后始终忠心耿耿，每当女主子遇什么危险时，他始终竭尽全力地加以保护她。另外，李莲英性格外向、开朗而且随和，喜欢说笑，擅长装扮自己，喜爱讲故事取乐，为人极其慷慨大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富得流油。不仅慈禧太后对他宠爱有加，就连许多满族高官也不惜放下自己高贵的架子，对他奉承不迭。1909年11月，慈禧太后出殡时，李莲英步行给她送葬，那情那景不

免让人心中充满怜悯，暂时忘记了他在七十年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年迈体弱而且多病的他，走路几乎是步履蹒跚、一瘸一拐了，在所有送葬的人中，只有他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悲痛。看到这位创造了秘史的人，大家不禁心生疑惑：陪同最高贵的女主人的同时，也是她亲密无间的伙伴，李莲英那诡秘的脑袋里面究竟在想什么呢？慈禧太后当政的近五十年来，李莲英对她一直忠心不二，在这样一个时局动乱、人心不古的时代，能忠心耿耿守着主子的奴才还有几个？年轻时，每次太后出行，李莲英必在轿子前服侍着。这么多年来，两人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辉煌与落魄。而如今他却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被留下了，置身于纷繁的变故中。虽然他年纪大了，影响力在日益消退，但是他的精神和昨天一样抖擞。

因为前面有安德海的例子，所以在言行举止方面，李莲英极为谨慎，从不侵扰外省，也不追求高位，最多是法令所规定的太监的最高等级，也就是四品顶戴。但是，有了慈禧太后的庇护和纵容，李莲英要求朝中的官员贿赂他，然后他把赃款与老佛爷平分。1900年西巡时，太后与这位总管太监就是用这种方法谋得了不义之财。当时，李莲英的运气不算好，因为离京太匆忙，他把财宝藏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地点只有几个少数的贴身随从知道。哪里想到其中有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法国人，于是这些奇珍异宝被洗劫，从西安返回京城后，李莲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慈禧太后把这个人斩首。北京有银行家估计，这位总管太监的家产约有二百万英镑，主要投资在北京城的各家当铺银行。这些巨额财产主要是李莲英在将近八年中通过各省的进贡物品和各位官员给他的贿赂得来的。当时向李莲英买官的价格竟然有三十二万两黄金，相当于四万英镑呢。

李莲英之所以能搜刮到如此多的巨额财富，主要的秘密是他不因财少而不贪。从下面的一封信中，我们就能看出苗头。这封信是李莲英写给一个给皇宫提供物品供给的商人的，估计他们之间类似的交易很多。纸质非常普通，随信附帖子是他个人的一贯做法，落款是个普通商人。这封信的内容很简明扼要：

王七老爷：

不好意思，小弟最近囊中有点羞涩，请七老爷暂时先借银票一千五百两，让我派去的人速速带回来。

改天再叙。

弟　李莲英

至于他所要的具体金额，李莲英心中很有数，知道在各种情况下供货商们能提供的回扣是多少，所以他每次“借款”都能够如愿到手。

李莲英花钱奢侈不需多说，他除了花费慈禧的私人钱财外，还多次动用国家的财政拨款，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中国之所以败给了日本，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李莲英挪用了大量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而他连同手下从中侵吞了许多。1885年，朝廷派醇亲王管理海军处，庆王、李鸿章和曾国藩辅佐他。曾国藩（实际是海军处的核心灵魂人物）死了以后，海军事务便落入了一帮丝毫没有经验的年轻的王爷们手里了。1889年光绪皇帝理政，他过问的第一件事便是重修颐和园，因为自从1861年起，这里被八国联军烧光，便成了一片废墟。但是，重修的耗资巨大，国家没有经费，于是，李莲英建议挪用海军拨款。皇帝太后竟然批准了，海军处于是变成了内务府的一个下属机构，所有的拨款均必须由内务府支配。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下令撤掉海军处，遭到全国上上下下的一片批评的声音。在慈禧的眼里，海军处和颐和园重修的款项就是一码事，既然重修即将完成，拨款也将用完，所以海军处便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有人建议把颐和园用去的款子还给海军处，但估计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1889年，总管太监李莲英第一次跟着醇亲王视察被淹军港旅顺、威海卫等地。当时人人都说官员对待李莲英的态度远比对待醇亲王的态度更为殷勤百倍。北洋海军中，总督丁汝昌手下的大小官员都竭尽全力地讨好这位朝野有名，大权在握的太监，争相成为他的门生弟子，因此李莲英受到的贿赂不计其数。中外许多人纷纷指责李鸿章，认为他应该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这些人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李鸿章自己都不敢公开提及这件事）：本该用在海军日常开

销方面的钱和沿海公事修建的拨款十分之九都被总管太监用到颐和园的修建事宜上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总管自己的腰包），海军官兵对这个都怨声连连，交战期间不肯奋勇直前，而枪炮器械也是残缺不全。了解英国历史的读者可能都记得，英国同样在危难关头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庆幸的是，海军官兵的士气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戊戌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莲英非常憎恨光绪皇帝，后来慈禧与这位名不副实的统治者之间的疏远与敌对大都因为李莲英而产生，甚至有人说他跟光绪皇帝的驾崩也有关系。光绪皇帝立志变革维新，李莲英对此又是恨又是怕，担心改革把自己改掉。那些一心想建立新制度的广东新党在1898年纷纷到北京去，李莲英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反对改革的第一个，他极力鼓动太后恢复原来的政体，义和团闹事期间，慈禧对团员们的法术大为惊叹，如果当时不是李莲英在旁边推波助澜地蛊惑，使她对这种骗人的把戏坚信不疑，估计慈禧不会支持拳变。当时反对外国人的浪潮也不会蔓延到山东省内，而中国人也不必承担巨额的赔款金额，看看中国政治和皇宫风云变化，这位皮匠出身的太监竟然能掀起中国境内的滔天巨浪，真是太有趣了！李莲英为自己的女主人送葬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忧伤。他侵吞了大笔财富，如今自己离坟墓也不远啦！



晚清水兵像

义和团鼎盛时期也恰好是李莲英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刻，端王向太后或军机处汇报时一定会再三强调，他们的所有行动全得到了总管太监的同意或许可，还说这份或者那份谕旨是得到他的许可才下发的。端王之所以器重李莲英，主要是为了牵制住反对者的嘴巴，因为他很清楚，很少有人敢于反对总管太监本人同意的事情。慈禧奖励义和团成员，而且奖励那些杀死外国人的士兵，所有的奖金都是李莲英劝太后自己掏腰包拿出来的。

八国联军的援军渐渐接近了北京，甚至连顽固派们也能一眼看出，义和团已经是支撑不下去的强弩之末了。此时，李莲英忧虑得很，他痛苦到了极点，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语言失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每当太后盛怒时总要找个发泄对象，李莲英肯定一次又一次成为她的替罪羊。慈禧又怕又怒，肯定会把一切责任都归到李莲英头上，因为当初是他极力主张要重用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八国联军的援军抵达北京的当天，澜公匆匆忙忙跑进皇宫，大喊鬼子已经打进京城啦。太后恶声恶气地质问他：“我以为洋鬼子已经跑了呢，前两天你不是对哀家说我军在天津打了胜仗了嘛？其实咱们心里非常清楚，直隶总

督和李秉衡已经死去。”一听到这话，站在一旁的李莲英出去对早已吓坏了的太监们说：“老佛爷现在气得不可收拾了，但是也没有啥好办法，我们只有跑到陕西那边，在那里等等救兵来，再把这里的鬼子们打跑。”两宫太后出巡后，李莲英的恐惧和害怕远远比老佛爷多得多了，直到他们安全抵达西安，他才恢复了平日的镇定。

当时有一位随行的内务府官员给在北京的一位老乡写了一封信，信里的一些内容谈到了那段动乱时期的宫廷生活以及李莲英和慈禧的其他贴身太监们在国家大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陕西巡抚岑春煊在陕西边境迎接老佛爷的大驾光临，老佛爷掀起了轿帘子看看他，问：“你可知道我们在北京城都受了些什么苦？”“微臣不知道啊。”太后用手指了指李莲英怒声说：“都是他干的好事，我可是被他害惨了。”这位总管太监脑袋一耷拉，一声不敢发。后来，岑巡抚了解到李莲英的手下在乡里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他便立即报告给太后，太后勉强同意他对其中的三人就地处理，但是岑巡抚本来还想把总管太监也算进去一起办，但是又顾虑到太后对他的器重，所以哪里敢把她触怒啊？李莲英这才捡回一条小命。朝廷恢复了旧制度后，李莲英找了机会公报私仇，依靠荣禄的帮忙，他请求朝廷把岑春煊调到山西去当巡抚。因为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山西局势危急，联军很快逼近了，二是由于让岑春煊主管内务府的开销，管理有方，所以他逐渐取得了皇太后的信任。这个人相当秉公廉洁，全国上上下下无人不知他的名声。所以，他管理皇宫的理财用度后，花销很快便急剧下降。岑春煊的第一项措施是禁止太监向官员的勒索，给他们规定了金额适当的津贴。眼看岑春煊逐渐获得了老佛爷的信任，李莲英满肚子愤愤不平，想尽办法破坏他的名声。最后，在荣禄一伙的帮忙下，李莲英这才说服老佛爷把岑巡抚调走。几个月以来，慈禧太后每天跟这位刚正的巡抚探讨国家和宫中的各种事情，如果她能把岑春煊这样的人才留到自己身边，来削减满族的达官贵人和太监的腐败行为，肯定能有不少益处。自从岑春煊调到山西当巡抚后，李莲英便肆无忌惮了，他竟敢私自扣押甚至把岑春煊写给老佛爷的许多奏折销毁了。渐渐地，李莲英重新得到了女主人的宠爱和信任，他又和往日一样骄横跋扈了，甚至比过去在京城内做得更过分。有时召见大臣，他竟敢不

传达太后的谕旨，说自己太累，当天的公事实在处理得太多了！

这段时间，南方各省进贡上来的大量贡品必须先得到总管太监的过目，李莲英家里的绸缎、珍珠玛瑙堆积得比山高。凡事有贡银，太后拿一半，余下的太监们拿五分之一，剩下的交给荣禄准备军务。太监们在西安和开封发了横财，于是李莲英苦口婆心地劝太后不要回京城，说外国人必定要报复她。不过，他之所以这样吓唬太后，贪财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害怕使馆列出的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当时看来的话，这种事极有可能发生。于是，李莲英让手下一个姓蔡的太监每天向他汇报京城的动静。后来，对于慈禧太后的改革政策李莲英尽管不太满意，但还是听从了荣禄的劝告，保留自己的意见，表面上表示赞同。

当时各省运送到西安的贡银达到每月五百万两之多，由李莲英以及另外一个老佛爷宠爱的孙太监来打理。这位孙太监格外贪财霸道，他的勒索之道比起李莲英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回，湖北的贡银元宝到达了西安，运到内务府由孙太监负责验收。称完重量后，孙太监说数目不够。负责运送元宝的湖北官员说："不可能的啊，湖北的银元都是足色，每个五十两，不会有错的。"孙太监傲慢无礼地瞅了那人一眼，说："你送过几回贡银，知道宫里的规矩吗？"哪位官员尽管自己吓得屁滚尿流了，但还坚持说贡银数目不可能有任何差错的。孙太监顿时就大怒，骂道："难道你认为老佛爷的秤是假的不成？"说着就要上前动手殴打了，恰好慈禧听到了他们的争论（她当时居住的院子不算大），出来指挥太监把贡银搬到自己的住处亲自验收。她说："我想呢，最近确确实实有贡银数量不足的情况发生，我的太监是要自己检查验收的，免得我受欺侮。"那位湖北官员于是耷拉着脑袋告退，出门时刚好碰到了内务府大臣荣禄。他好言相劝："我知道你肯定受了委屈，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最近老佛爷管这些太监比较严厉，他们赚钱很少的，并且北京的好多财产都遗失了，你要体谅他们啊。"

广东进贡的贡品有二十四种，但是在检查验收的太监们为了勒索退掉了九种。押送贡品的官员非常惊恐，生怕老佛爷指责他们私吞贡

品，所以他们没办法，只好贿赂太监，这是太监最常用的勒索贿赂的手段了。另外他们还以太后的名义购买了大量的物品，但是绝不付账。太监们的卑劣行为使整个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的百姓大受其害。而且当时陕西已经由于常年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岑巡抚的报告中记载：面粉九十文一磅，鸡蛋三十四文一只，猪肉四百文一磅，而鱼根本是无处可买。这些价格都比南方贵起码五六倍。

许多太监都以羞辱皇帝来取乐，把他弄生气，惹他发怒，他们就达到目的了。当时西安宫内有传言说，皇帝性情变化无常，他经常和小太监们玩捉迷藏游戏，一见到太后过来，就立即躲到角落里，不发一声。生气时，皇帝会发脾气，拿瓷器扔到太监和宫女身上。当然这些传言不靠谱，大多数这类传言都是由总管太监和那些反对新政的人信口捏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毁掉光绪皇帝在外界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上文已经提到了，两宫西巡回到北京城（1902年）之后，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影响比过去更大了，宫里的大小事务全由他管理。另外，他也随着太后开始公开表示支持改革措施。对于预备颁布的宪法修正案，他也附和同意。他常常跟慈禧太后开玩笑，说她一定会皈依基督教。他说：“老佛爷，我们现在也是假洋鬼子啦。”

然而，年纪渐渐大了，身体虚弱了，但是他同过去一样执着地捍卫自己的职业特权，想尽办法百般阻挠废除宦官制度。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上奏了一份折子，说因为后宫妃嫔数量在减少，所以应该用宫女来代替太监。李莲英看到这份折子，先是藏了起来不上报给慈禧太后，直到劝说太后不同意了才拿出奏折。陶模的这道非常有名的折子内容是这样的：

国家的昌盛得依靠明君才行。君王如果多与君子亲近，对国家大业有好处；君王如果亲近小人，国家必定会混乱。如果一个人除了处理宫廷的事情，还要负责国家的各种大事，尽管他的地位很显赫，但是因为责任重大，所以绝不是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即使君王身旁有

正直的君子相辅佐，也会时不时有犹豫不决的时刻出现，难免会出现疏漏的地方。如果君王百姓之间有卑劣的小人阻挡着，国家怎么可能不危险？这些小人不一定就是些大奸臣或者无恶不作之人，但是这帮人从不读书，什么道理都不懂得，只知道如何拍马奉承。这样的人整天陪伴在君王的四周，国家在无形中就被毁了。大臣中即使有些能力不行，但也不会如此地亲近君主。每天接近太监，君主的美德也会逐渐失掉。亲信了小人，君主一定会离百姓越来越疏远。

如果要断绝宦官流毒，必须斩草除根才行。如果留着根芽，难免还会复活，所以需要连根一起铲除。皇上碰到大好机会，可以全心全力地实施新政，但是他身边整天都是这些小人陪伴，哪能不烦恼呢？前朝开始启用太监，因为当时宫里的妃嫔太多。我们朝代后宫人数减少了，所以可以让宫女来服侍，宫内的各种差事可以用士人来做，不一定再用太监了。

现在，西安行宫的太监数目众多，是削减他们的良机，只需要留下二三十个忠心的服侍就可以了。等两宫太后回到京城，如果数量不足还可以再招，总之宫内的旧制度需要作彻底的改变了。现在，宦官制度已经存在了千年了，是个陋习，可以废除，如果这样做的话，太后皇上的美名一定会千古流传的。

如今，改革是大势所趋，太后和皇上都收到了来自大臣官员的很多这方面的建议。但是，我作为一名大臣，私下认为，虽然宦官制度的改革表面上看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关系重大，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就看宦官制度能否废除掉。其他国家都已经废除宦官制度，只有中国到目前还保留着这项旧制度，这也使得我们大清朝遭受了许多批评。作为宫外一名大臣，我本不应该过问宫内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也提点建议，以报答圣明的皇帝的大恩大德。

从那以后，陆陆续续有许多大臣上奏痛骂太监旧制度的害处，时不时听说宦官制度就将废除了，但是太监的权力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像陶模这样正直并且刚正不阿的官员在当时毕竟还是少数。表面上朝廷已经出台了许多新政，但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利造福的措施却少

之又少。旧制度根深蒂固，而且反对势力相当强大，内地的报刊起初还锋芒毕露，但渐渐地开始被地方官吏压制，开始那些痛骂太监旧制度害处的话慢慢地也都无影无踪了。

第七章　礼仪问题

以下密折由御史吴可读于1873年上奏，虽然没有对慈禧的生活和性格作直接描述，但它却十分珍贵，因为它使我们了解到慈禧当政时期中国官员阶层的傲慢自大以及朝廷的愚昧无知。这样的文件数量众多，阅读它们可以深刻了解到，国民对夷人的蔑视根深蒂固、由来已久，西方政策在中国毫无价值；中国人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故步自封，外国列强和公使蒙受耻辱，至今仍不甘心。一般来说，假如要详细研究这位支配中国人民以及外交关系长达五十年的伟大女人，类似文件所披露的形势使得人们对她产生无限钦佩之情，人们情不自禁地赞赏她控制全局的非凡能力。此外，密折确实值得一读，它在叙述过程中潜藏着有意无意的幽默：

密奏朝廷制止官员争辩，免去外国大臣的下跪之礼，以证明我朝的宽宏大量，以增强我朝威望。此外，外国大臣在此事上的要求必然不会依从我朝规矩，而大臣的讨论现已陷入僵局，进退两难。

大约六个月前，自从外国大臣要求我朝允许他们可以给朝廷直接递交国书以来，我朝官员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却得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开始，他们争论是否应该接见外国大臣，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后，继续讨论是否应该要求他们行跪拜之礼。

在与几位次要大臣讨论此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有那么庄严，值得如此费心讨论？孟子说过："君子应该参加鸟兽的争执吗？"我听说，外国统治者像棋盘上的棋子，当不当由臣民说了算。

我曾亲眼看到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出门散步，家中女眷步行或坐轿走在前面，男人们谦卑地紧随其后，就像仆人，但面无羞愧之色。他们已与中国签订十几条条约，至少一万字。这么多字中，有一个字提到对父母的尊重，美德的培养和正直行为的九条教规？没有！这么多

字中，有一个字关于遵守礼仪、关乎责任、廉政、适当的羞耻感、我们国家的基本礼节？还是没有！他们提及的都是实质性的利益。“这样那样的条款隐含着给予中国的福利和收益。”他们只想到利益，怀着追求利益的俗气希望，他们欺骗了中国人民。这些人甚至不知道责任和礼仪、智慧和诚实的含义，但我们的确表示，期望他们能表现得好像被赋予了五大基本道德！他们不知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打算要求他们遵照执行的五大准则！在我看来，这等于人们把狗和马，羊和猪一起放在大会堂，迫使这些生物表演舞蹈的演变过程！

如果我们坚持要求外国大臣恭敬地下跪，用何种方式才能为朝廷的威望增添光彩？如果我们免了外国大臣的跪拜之礼，又会对皇权的威严产生什么影响呢？

但我朝大臣经过长久严密的商议之后，同意免除外国人的跪拜之礼。外国大臣说道：“从中国得到这么点小让步就需要这么大压力，那么今后处理重大事务时我们成功的几率很小啊。”这样，我们必须使他们停止没完没了地向中国提要求，他们失去威望时，我们要获得威望。依我个人浅见，我朝的声望不在于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也不在于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耻辱。一旦他们认识到我们非常在意他们的跪拜之礼，极不愿免除这仪式，与此同时他们又很清楚中国不敢与他们开战，他们就会坚定地坚持他们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同意免除他们的跪拜之礼，他们就会以战争相威胁。我们的缺点一旦暴露，他们就会不择手段。

我曾听说，在派遣过程和条约中，这些不值一提的怪物胆敢把他们的君主放在与我朝天子同等的地位！如果我朝官员能忍受这样的侮辱而不感到羞愧，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委屈自己，却要拒绝作为外交使节下跪的礼节呢？两年前，俄国夷人从西北面进入中国，占领我国大片领土，实行侵略政策，规模之浩大是我们在与夷人对抗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狡猾巧妙的计划使我朝受到严重威胁，而我们的政治家未显示出羞耻之色。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外国大臣拒绝跪拜是对中国的侮辱！我朝官员认为，如果外国大臣拒绝遵守我朝仪式的礼节，

大清就会受到侮辱。但依我拙见，顺从他们的意愿将会危害我国。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两大主要因素引导政府的政策，即当前的紧急状态和可用于采取行动的军队。现在，中国的地位不足以在这件事上抗衡，另外，我国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允许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国。因此，中国在追求效率提高的同时要选择让步。

孔子的一位弟子曾经问他什么是执政的艺术。大师回答道，首先需要三样必需品——充足的食物，足量的军队和自信的民众。弟子又问他，如果必要，三样中哪一个可以放弃。孔子回答，首先放弃军队，其次是食物供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旨在完善执政艺术，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不会轻率地采取不妥当的行动。明确行动过程前，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不应该出现草率、不成熟的决策，那样只会使国家陷入困境。起初，我朝政治家应该调查全方位民众的意愿，仔细权衡议题。他们本应当考虑，鉴于中国和外国实力的差距，反抗是否是明智的。倘若大清不了解自身的弱点，她可能会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会考虑在不同情况下的侧重点；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不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到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外国大臣被告知，朝廷免除他们的跪拜之礼，同时皇上也免除他们在大清朝堂上应该遵守的各项礼节。这么做我们可以避免显示大清外在显而易见的弱点，外国人会觉得我们把他们看得多么微不足道。这难道不是足以让中国人和夷人都印象深刻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才能吗？

但是，不，我们偏要反对接见外交使节，使得他们被迫让步，仍然要求让他们行跪拜之礼。坚持这么做，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我们最终会屈服于他们的反抗；我们必然不情愿地默许完成每一项行动。我们在签订天津条约时恰恰犯了大错。我深信，如果采纳了政治家的建议解决困境，皇位将无足轻重。皇上应该自己做决定，告知大臣们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深谈的必要。外国使节本来就不是大清臣民，那他们为什么要遵照中国的礼节呢？如果他们照做了，懒散应付或者笨拙行礼，难道不会变成可笑的滑稽表演吗？再说，如果外国大臣看上去荒谬可笑，难道中国不会违反制定的“礼貌体贴地对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的原则吗？同样，观众们看到如此荒诞的场景，怎么能不捧腹大笑，外国人肯定会觉得受尽屈辱，随之愤怒，导致他们对我朝宣

战？因此，朝廷应该颁布法令，免除外国使节遵守我朝礼节，如果他们无知地违犯任何一条礼仪规定，我们也应该宽容他们，这才是明智之举。大臣们应该停止激烈的争吵；他们应该记住，与外国人争论毫无意义。他们应该把宽宏大量表现得尽善尽美。同时应详细解释，该命令是皇上力却群臣之见的仁慈之举，万万不能作为外国继续向大清要求让步，或用其他方法逼迫大清的先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保存了自己的颜面，同时也断了我国人民企图报复外国的可能。至于其他，让我们继续壮大自己，等候时机。

我还要提醒一句。胆大奸诈的外国人可能会进言皇上。大臣们应当提前准备应对策略，以免临时乱了阵脚。

我，这份奏折的上奏者，是个住在荒凉偏远地区的无知居民，对国家事务一窍不通，斗胆上奏，言辞轻率，自知罪该万死。

慈禧回复奏章：

我已仔细阅读奏章，一语中的。允许外国大臣觐见，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礼仪行事。朝廷给远道而来的陌生人以仁慈和宽容，显示本国人民和外来夷人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上奏此奏折的人是刚正不阿、大胆无畏的御史吴可读。作为对慈禧规定的非法继承的反抗，他在同治帝墓前自杀后，名字家喻户晓。如果中国最勇敢最优秀的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有致使无知民众反抗外国人的谬论呢？吴可读对列强条约中的重商主义极其轻蔑，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态度。

第八章　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11月），两宫太后共同颁发一道谕旨，解释了当初接受委托、垂帘听政的事宜，宣布现在皇帝已经完成学业，并长大成人，所以她们也准备把政权移交给皇帝。太后命令钦天监选择一个好日子好时辰，筹备皇帝亲政的大典。钦天监上奏说，正月二十六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但是如果从同治皇帝的命运来看，这一天显然不是个吉利日子）。当天，两宫太后共同颁布了首次垂帘听政的最后一道谕旨，现摘录部分如下：

今天是皇上亲政的大喜日子，我们感到非常欣慰、高兴。我们大清朝代代相承，都是一直以敬畏祖先、热爱人民作为大业之本。几年来，东南部各省虽然暴乱已经平定，但是民生还没有十分稳定，加上云南边境以及西北地区因为军费开支庞大，国库最近比较吃紧，日子比较艰难。皇帝日理万机地处理国家大事，列祖列宗把重任托付给他一人，让他一人行政，我们两宫太后不能有丝毫怠慢。等皇帝有闲暇，我们仍然应该和他一起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研究古今治国之道，帮助他勤勤勉勉地把国家治理好。这都是我们垂帘听政的最初的心意，希望皇帝能实现我们的愿望，把国家治理好，也不枉费了我们的一片心意啊。

谕旨的最后，照老规矩，仍然是老一套地劝告京城内外的官员要尽职尽力地辅佐皇帝。但是，这番勉励的话对于皇帝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大作用。同治从小就不顺从母亲，更不用说什么尊重了。其实不怪他，他从小就喜欢东太后慈安，而且他很了解宫内的勾心斗角，特别是两宫太后向来不和。同治皇帝十七岁亲政，他独断专行，个性刚强，这一点很像咸丰和慈禧。

慈安亲自给他挑选的皇后阿鲁特贞德贤淑、大方、出身高贵，父亲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皇后非常支持丈夫的自立。执政刚开始，这对

年轻夫妇哪里懂得他们的地位危险呢？他们心比天高。两人上任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惊醒了——慈禧违抗不得，要想跟她和平相处，唯一的办法就是事事都顺着她。母子之间的第一个矛盾便是同治皇帝不让慈禧看奏折。后来他们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但是所有的分歧现在都归结到了同一个问题：如果皇后为同治生了龙子，等同治帝一归天，那么阿鲁特就顺其自然地成了皇太后。那么慈禧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实权了。这种可能性对今后事态的发展相当重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竟然不惜豁出一切，违背家法，立光绪为皇帝。慈禧是个无法忍受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果有什么人挡住了她勃勃的野心，她一定会不择一切手段地除掉异己。而且问题是同治皇帝驾崩时没有任何孩子，皇后阿鲁特也随丈夫殉节。这一切对于慈禧很有好处。民间的私人著作一致认为，慈禧有意放纵同治放荡的生活，后来同治患了重病，慈禧也没有派人认真地关心，所以病没能及时医治，身体本来就虚，还遭受疾病的折磨。内务府有个名叫桂庆的官员曾经反对皇帝放荡淫乱的生活方式，担心他会英年早逝，请求把那些谗言蛊惑皇帝的太监都赶出宫，统统砍头。他建议皇帝应该以自己的龙体安康为重。但是，桂庆的好言相劝使得慈禧太后很不愉快，同治帝更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他讨厌别人对他的事情指手画脚、不停对他的过错横加指责。所以这个可怜的桂庆最后没了招数，只好拾掇包裹、辞官走人。其他的内务府官员，比如文喜、贵宝等人的做法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是太后党的人。他们不但不阻止同治帝，反而怂恿同治帝去放荡。当时京城无人不知，皇帝跟这帮人整天在南城的龌龊地方进进出出。宫里也是流言不断，早朝时间已经过去了，皇帝还在外面喝酒找乐子没回宫呢。他不但如此，还经常打架斗殴，结交狐朋狗友，所以后来很快得病，英年驾崩也不奇怪。1873年，人人都清楚皇帝不行了。1874年10月，同治皇帝得了天花，在这段时间，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那个月月底，皇帝降谕旨说：

朕本月患了天花，两宫太后对朕的病情格外关心，已经同意替朕批阅上奏的国书与奏章，处理各种政事，朕感到非常欣慰。所以在这里朕特别赐给两宫太后徽号，略微表达朕对她们的感谢之情。

同治皇帝的虚弱身体哪里经得起两种疾病的折磨呢？所以他的病

情日益加重。1875年1月13日晚上八点，同治皇帝驾崩，当时身旁有两位太后，二十多位王爷以及内务府官员陪着，其中包括恭亲王、醇亲王和慈禧的心腹荣禄在内。皇帝归天后，一个胆大的御史竟然弹劾了两位怂恿皇帝放荡生活的官员。这两位作恶多端，最后恶有恶报，因为慈禧顺水推舟，立即免去了两位官员的职务。为了表达自己的奖惩分明，她还重新启用桂庆。但这时的桂庆已经读懂了太后的心意，他对仕途完全灰心，婉言谢绝了太后的一片好意。

同治皇帝归天了，他身后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按常理，这对慈禧有利，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掌控国家大权了。事情发展得可没那么顺利，皇后阿鲁特此时已有了身孕，可能会生一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阿鲁特和慈安的地位将会随之有提升，会超越慈禧。因为同治驾崩了，慈禧失去了皇太后的称谓，她原来也仅仅是一名贵妃罢了。作为同治皇帝的生母，皇帝在未成年期间她可以身居要职，但现在情形已经变了。叶赫那拉氏当时之所以能登上权力宝座是因为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通过合法渠道维持点既得的权力。皇帝儿子已经不在了，眼看着皇后阿鲁特就要生产了，慈禧如果还想继续掌握大权，她必须果断采取措施才行。

当时在皇族各支里，很多人都很嫉妒叶赫那拉氏这一族的势力，所以现在同治皇帝驾崩了，他们有人想立道光皇帝长子的长孙溥伦当皇帝。这项提议很有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溥伦比同治皇帝小一辈，但这中间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溥伦的父亲是由旁支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这一支的。主张推选溥伦的那些贵族王公们认为，按照继位的先后顺序，溥伦是唯一合格的人选，并且只有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祭拜同治帝。



太后的中式画像

但是，慈禧是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力的，在立帝的问题上她不会考虑情感、宗教或者其他任何因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违背了家规她也做得出。慈禧机智灵活，身边的追随者们又忠心耿耿，所以按自己的意图办事并不是特别难。当时，慈禧与东宫皇太后一直就不和，经对方同意，安德海被杀的事情，慈禧一直耿耿于怀；

慈禧对恭亲王也不够信任；而对皇后阿鲁特，她更是想除掉她才痛快。唯一跟慈禧关系较好的算得上是醇亲王了。他是道光帝的第七个儿子，同时是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尽管一直行为不够检点，但是他才华出众，娶了慈禧的妹妹当了福晋。所以慈禧想立醇亲王的小儿子为帝完全可以理解。在小皇帝成年以前，太后仍然可以掌握大权。等皇帝成年亲政后，他也会顺从姨母的意思。慈禧之所以不立恭亲王的儿子为帝，一是因为她恨恭亲王杀了安德海以及他目中无人的大不敬行为，二是因为他儿子现在已经十七岁了，如果登基不久就要亲政了。慈禧心里很清楚，按照紫禁城的惯例，有些人力量虽然强大，但还没大到能把她排挤出局。所以，她不可能立恭亲王的儿子当皇帝。慈禧一贯行动敏捷，考虑事情极为周密。她派了自己的心腹太监从中周旋，组织溥伦和恭亲王两排联合起来。同时，除了荣禄的部队，慈禧又调李鸿章的淮军进驻北京城。目的是为确保计划能够万无一失。等一切布置稳妥后，西太后传各位王公大臣们召开会议，讨论选新帝的事情。

这次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在紫禁城西侧的养心殿召开，这里距离同治帝驾崩的大殿也只有二三百米远。除了两宫太后外，参加会议的共有二十五人，包括王公贵族、军机大臣和京城的要员，其中汉人仅有五名，溥伦的父亲载淇和恭亲王这两位皇位的争夺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宫里的各条道路上全站满了太监，布置非常严密。慈禧有命令，紫禁城内的所有紧要之处必须要由忠于自己的士兵把守，大部分是荣禄的八旗兵，还有叶赫那拉氏的士兵。同时，慈禧明确禁止阿鲁特参加会议。所以，养心殿商讨选新帝的时候，皇后只能无助地守着同治帝牌位痛哭不已。

在养心殿内，慈禧和慈安面对面坐着，其他大臣都跪在地上。跟以往一样，慈禧首先发言，说选帝的事宜，这个事情很急，拖不得。尽管皇后已经有了身孕，但是皇位不能就这样拖着不解决。恭亲王上奏说，因为皇后就要生产，所以同治帝那边可以先保密不发丧。如果生的是皇子，就可以登基为皇帝，如果生的是公主，到那时再选立新皇帝也不迟。其他大臣王公也认为这个办法妥当。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她说南方目前叛乱还没平定，如果他们知道一国无主，形势一定

危急，恐怕大清的江山就难保了，她主意非常坚决，军机大臣和其他几位要员，包括南方的三位汉族官员同意她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朝廷不稳，最近异常活跃的太平天国叛乱可能会对国家造成大灾难。

东宫太后说恭亲王的儿子可以继承帝位，恭亲王听了连忙磕头谢恩，说自己哪里受得起这个大富大贵啊，就是按照位子排序，也该立溥伦亲王当帝才对啊。这时，溥伦的父亲载淇听了忙磕头说不敢不敢，压根他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出于礼节嘛，他必须这么做以表示谦逊。慈禧对载淇说："这不相干的，但是嘛，你倒是奕纬（他是道光的长子）过继的儿子，可能略有不妥啊。"然后她转过来对恭亲王说道："你说，历史上各朝代还有这样的先例吗？"恭亲王想了片刻，说历史上英宗就是这么做的。"这个例子我认为不妥。"慈禧向来是个喜读史书之人，所以反应极快，她听了立刻反驳说："英宗他并不是真正的龙子，是妃嫔们欺骗了先主。而且，英宗在位时国家混乱不宁，他曾经沦落为蒙古人的囚犯，后来等他回国皇位已经被他弟弟占了，八年后才又被他夺回。"然后，慈禧转向慈安说道："我的意思嘛，就是可以立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帝，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应该快刀斩乱麻。"听了这话，恭亲王转向弟弟怒声呵斥道："难道可以完全不顾立长的规矩了嘛？"慈禧不愧是一国之主，说："那么我们投票决定吧。"结果醇亲王等七位王爷没有投票选溥伦，另外有三个人投了恭亲王的儿子，其他所有人都一致选了慈禧中意的载湉。因为是公开记名投票，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当慈禧为一国之主，所以什么事还不是她马首是瞻呢？而东宫慈安太后因为一向为人和善，不愿与人争执，就由着西太后去安排决定，乐得清静。

投票结束时已经是九点多了，外面狂风大作，天寒地冻。在这紧要关头，慈禧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了一队亲兵去城西的醇亲王府上，用八人大轿把小皇帝接到宫内。同时，为了避免恭亲王再起什么事端，她命令恭亲王守着先帝遗体，又让荣禄率大部队护卫着皇宫内外。慈禧做事极为缜密谨慎，而她的对手做事拖拉、唯唯诺诺、犹豫不决，所以自然输给她了。大家一致认为，慈禧这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她运气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慈禧是个做事果断、实属强硬派，真是个东方拿破仑啊。

没到深夜，小皇帝就已经平安到达皇宫，但是他哪里见过这场面，一直哭闹不停，仿佛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在皇宫里的不幸命运。随载湉一起入宫还有他的母亲（慈禧的胞妹）还有几位奶妈。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登基后的小皇帝需要完成的头等大事便是到先帝遗体前磕头。因为新帝年龄太小，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她们联合降旨，内容是先帝没有留下龙子，所以没办法只好立载湉为帝，并将他过继给了叔父咸丰皇帝。等载湉以后如果生了龙子，就过继给同治皇帝，来继承帝业。这样的话，皇后阿鲁特的希望全部丧失，她的遗腹子也早没人问了。诏书一下来，大家都知道了皇后和同治皇帝没出生的孩子以后不可能有任何命运的转机了。

为了形式需要，各位王公按照过去的先例，联名上奏，恳请两位皇太后继续摄政，而太后下诏表示批准，理由光明正大，说皇帝成人前，国家应该有位首脑，大臣才能上奏讨论国事。谕旨中提到："看了各大臣上奏的折子，我们深感国家目前时世艰难，已经焦头烂额了，摄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等皇帝学有所成，立刻让他亲政，毫不迟疑。"然后，还没懂事的小皇帝对太后的关怀表示感激不尽。这样，这场闹剧暂时收场。慈禧下诏，已经开工的西苑和颐和园修缮的工程暂时停工，因为先帝大丧在即，太后没有时间和心思来游园看戏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国丧期间太后不能离开皇宫。

慈禧之所以能排除不同意见、破坏家法，迫使王公大臣们选她妹妹的儿子继承帝位，主要在于她才华出众、权势压敌、魅力超群、雷厉风行，这比其他任何方面都重要。新帝刚一登基，军机处的大臣就看出端倪，小皇帝身体虚弱，恐怕他长大后无法立子嗣，所以大臣们纷纷劝谏太后。那些反对她的人如果有胆有量，此刻可以借机批评她专权独断，估计会非常有用。

从这时起直到1908年10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过世，大家常常会议论纷纷，都说皇帝登基时有不祥兆头，估计他寿数比不过老佛爷，甚至有人预言，恐怕他活不到自己亲政的年龄。所有人都相信，慈禧一定会高寿，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再次选新帝，不断把持朝政。不过这些预言后来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光绪确实亲政

了。但是我们也心知肚明，戊戌政变后，如果不是害怕南方造反，慈禧早就会把光绪废了，再立一位小皇帝，自己可以继续摄政了。

新皇帝的年号定为“光绪”，为什么要起这个年号呢？主要是要强调新皇帝是道光皇帝的嫡亲孙子，而且希望能早日摆脱咸丰、同治两朝代的国家忧患阴影。随后紧接着，两宫太后降旨给同治皇后加徽号，但是即使这样，同治皇后还是在3月27日吞金自尽了。此举动一是为先帝殉节，二是为自己的遗腹子鸣不平。关于这件事，众人众说纷纭，有人说皇后是自尽，但还有人说是慈禧谋害的。忠于太后的人辩解说，既然光绪已经登上帝位了，已成事实，还有必要再除掉皇后吗？但是也有少数人说，即便是形势所逼，慈禧也不能这么做，何况过后怎么办呢？无论怎样，皇后阿鲁特的自尽引起了大家的深切关注。御史和外省官员纷纷上奏强烈反对立醇亲王的年幼的儿子做皇帝，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家规国法。这些官员的言辞一律都在指责慈禧，因为东宫慈安太后向来不参政。一时间，慈禧以及叶赫那拉氏家族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瞬间骤然降低。四年后，御史吴可读在同治皇帝陵墓旁自尽，他这样做是警醒国民，痛斥立新帝是个错误。慈禧没办法二度下诏，再次明确，将来皇帝生了皇子，一定让他的子嗣继承帝位。我们大家都擦亮双眼，拭目以待，看看她后来有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光绪像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上奏，请求辞掉自己的各项官职，因为如果

作为官员，他必须向皇帝磕头，但是作为父亲，他没有给儿子磕头的道理。醇亲王在折子里面说，一听说自己的儿子被选为新皇帝，他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回到家中，还全身瑟瑟发抖、心跳不停，脚如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感觉自己是在梦中，不久便肝病复发，病情严重，恐怕自己不久将离世。

太后命令各位大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原则，商量对策，最后同意了醇亲王辞官的要求，免了他参加所有朝廷大典，但是有要紧事情，还必须应两宫太后的要求去商量。太后大寿的日子，醇亲王可以在偏殿行大礼，不需要随官员一起朝贺。醇亲王的爵位可以世袭传承。他过去管理的满族军队交给惇亲王，并且把经验传授给他。想来他肯定是按太后的旨意去做的，因为在惇亲王的带领下，这支队伍的作风比起过去更加无赖恶霸、军队无能、腐败之极、臭名昭著。

同治初年，两宫第一次垂帘听政，这一次，垂帘的历史又在上演了。

第九章　御史以死明志

同治皇后用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事情一出，朝廷内部的保守派和正义人士们开始密切关注皇位的合法继承性问题，他们认为慈禧太后破坏各朝家法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第一个上奏表示自己不满的是个满人，他是位内阁侍读学士，虽然他承认光绪可以继位，但是他指出，朝廷应该用文件形式明确保证，新皇帝以后如果生子应该过继给大行皇帝同治帝，让他继承帝位。他的奏折全文是这样的：

尽管选帝是宫内主子们的事情，旁人不应该插话多言。但是事情办得不够妥当，需要作进一步的变通，做大臣的必须站出来说点什么。朝廷上上下下，谁都希望大行皇帝万寿无疆、国泰民安，没想到大行皇帝英年早逝，可惜了，他走时身后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子嗣。两宫太后亲自选新皇帝，说以后一定会为大行皇帝立嗣，以继承国家大统，真是英明的举动啊！这次立下的新皇帝，日后如果生了皇子，就把他过继给大行皇帝，继承国家大统，这样皇脉可以代代延续下去了。

太后的策略本应该是万无一失的计策。但是我作为一大臣，也曾经读过宋代历史，内心不免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深为忧虑。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遵从太后的意思，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而不是儿子，并且规定他弟弟的子嗣应该把帝位归还给他侄子（原注：折子中所提到的皇位合法继承人后来自杀身亡了。慈禧一定能理解，这是一种影射，她一厢情愿、不按照排序选帝，违背了各朝家规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导致了阿鲁特之死。从中国士大夫的角度看，这种影射实际是直接的抗议）。但是，当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上台后，却听信谗言乱语，违反了宋太祖当初的约定，立自己的儿子当了新皇帝。仔细想想，都是因为当初赵匡胤听从了母亲的意思才导致了后来的结局，这样做真是后患无穷啊。如果当时皇太后能够遵守约定，将昭示刻成铁

券的话，便如同泰山九鼎，就是想改也改不了了。太宗必定会按照铁券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大统依次传递下去，皇位一定不会落到旁人手中，不可能再起什么事端。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继位是一时的事情，却是关系万代的大业，当年大清朝开国时，全凭着祖先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一心报国，才有了国家代代相传的基业，多亏有一代代的英明君主，才使国家一直兴旺发达。现在，如果新皇帝有了子嗣，应该过继给大行皇帝同治帝，这样我们大清朝才能一直兴旺下去。太后的心意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前车之鉴我们又怎么能不考虑呢？我们唯恐多年后这件事被大家忘记，辜负了太后的英明意见。所以，我建议太后应该让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来共同商议此事，铸成铁券，新皇帝一有了子嗣，就过继给大行皇帝，继承国家的大统。

有许多爱国志士，对国家一直忠心耿耿，为了皇位的继承问题，纷纷上奏劝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为这事真是心力交瘁。她对于这位满族官员的奏折作了简短但是言辞非常锋利的批复，字里行间有不满的情绪。“朝廷已经对于立帝的事情下了很明确的诏书，是朝廷内外共知的事实。你竟然如此胆大，竟对主子的做法横加指责，太让人又气又恨了。”

许多官员都在上奏朝廷，他们所谈及的内容不仅仅涉及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还包括皇位继承对祭祀大典会有哪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因为都是私下里议论，没有人来组织，很快这些反对意见就慢慢自生自灭了，反对者慢慢认同了大局。朝廷这种违反家法的做法的确后果严重，但是这一罪行的后果却让这些一向容忍的下层“愚民”代替受过。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向来做事从不商量，单独行动是他们这一阶层的特点，总是相互猜疑，所以很多事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有一位官员的忠心和勇敢的精神的确可敬，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动摇，用惊人的举动使国民全来关注这件事，他的影响是任何言语都表达不了的。在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只要爱国志

士义愤填膺，当自己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就会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的做法在他们的国家会受到世代人的敬佩和仰慕，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行为，即使是独裁专制的君王也不得不对他们作出让步和妥协。这样的自杀行为如果能挽救当时的局势，他们简直功在千秋。同时，用死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文化底蕴。中国人从来都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尊重传统。只有他们才能达到视死如归的超高境界，我们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吧？

他的名字将会名垂青史，因为他敢于提出让幼帝光绪不合法地继承皇位有悖朝代家规的做法，他就是清朝的忠勇志士、士大夫——吴可读。因为他在遗诏中所提到的理由，他在同治帝宾天后四年中都耐心等待着，他一直期望慈禧太后能够明确降下谕旨，将来光绪帝子嗣能够用同治帝之子的名义，来传承国家大统，好让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最后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失望之极，他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1879年）上，在同治帝的墓地旁边自尽。他在死前写下了一篇士大夫阶层中永远传诵的经典之作。吴可读之死对慈禧太后有直接的影响，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她认识到士大夫的抗议有广泛的民意支持，立刻决定安抚他的在天之灵，满足吴可读在遗诏中的请求，立刻颁布谕旨，确定光绪帝的儿子过继给同治帝。吴可读之死不仅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当时的行为，而且也让慈禧迷信的思维有所清醒。后来，尤其是在西巡过程中，她也更加认识到吴可读的影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动酿成了灾难，王朝即将被颠覆，一想到此事，慈禧后悔不迭。

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吴可读从容就义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士大夫为人做事的准则、爱国志士以死明志的典型。这里，我们将把他的殉节全程和他的遗诏内容详细记载如下：吴可读在同治皇帝的陵墓旁，也就是蓟州马神桥旁边的一座小庙中悬梁自尽。他在临死之前详细交代了自己的遗体处置的具体细节，从中我们清晰看出他不想给家人和朋友添加任何麻烦。以下是他给寺庙主持的信：

周老道，你不要害怕。我根本不想加害于你。我是实在没了办法，万不得已借用了你的风水宝地，作为我一个诚实之人的合适死亡

之所，以成全我的清白。请立刻禀报州官，并让他们向上呈递我携带的盒子中的遗书，不能有片刻贻误。请给我买一副便宜的棺材，并把它漆成黑色。我的衣服都已安置妥当，在你把我放入棺材前，请把我靴子底部的皮掌割去。我已经轻轻割破了我的手指，你可能会发现血迹。棺材钱我估计二十两银子足够了。请在棺材外面涂上油漆，把链接的接缝处也要涂好，用钉子钉好，然后等待太后的谕旨，听从发落。请在大行皇帝墓地旁边帮我买一块地，迅速将我下葬。对于一个清白之人，哪里不可安葬啊？为啥一定要回到故里呢？

你会在我携带的盒子中发现四十五两银子，付完棺材和安葬费用，剩下的你就留着吧。至于我的表和我个人的其他物件，我家里交待得很清楚。你务必要看好我的尸体，不能让人凌辱，我儿子一定会因为你代替他办了我的后事，对你感激不尽的。请不要担心官差那边会给你带来什么茬子，但切记不要动放我写给太后的遗书的盒子啊。

明早你把悬挂我的绳子割下来，然后把我放在阴凉之处。恐怕你根本不会想到，进屋会看到我悬在空中，不过请放心，我事先已经服用了鸦片烟，可以确定我已必死无疑了。如果你参与了我的私事，过去的几天你也试图参与的，结果只会越搅和越乱，最后你会痛苦不堪的。

我所要你做的一切就是请你立刻禀报州官那边，并且禁止让妇女和儿童进来看我遗容。这里没有什么奇怪或不正常的，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责任。那些理解我的人会同情一下，洒几滴怜悯之泪，我就很满足了。吴可读最后的一点殷切希望。

然后，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其中包含了许多儒家珍贵思想和信念，用情颇深。

“之桓，我儿，当你听说父亲已死的消息，不要震惊，千万不要伤心过度，以免伤及家人。你妈妈已经上了年纪，你的妻子还年轻，我的孙儿们还年幼。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在了，但是一定让他们不要为我的死伤心过度。我们这个家族延续下来也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两个世纪中我们这个家族也有了皇室成员了。三百年来，我们家族中出

了不少士大夫。十八代以来，我们家一直有着很好的名声和荣誉。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一直是个正派之人，没有人能指责我未履行君子的职责，因此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儒家思想的虔诚尊师。最近，我谢绝了让我做大学士左宗棠儿子的家庭教师，因为大行皇帝下葬的大日子就近在眼前，我执意等着今天的到来。

自从我二十四岁参加乡试为官至今，我一直言行谨慎、恪守职责。我被爱国主义忠君思想深深打动，为古人的事迹感动流泪，读了他们的故事，我时而泪流满面，时而为他们的事迹欢欣雀跃。

大行皇帝一过世，我就决定要提醒慈禧太后，而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接受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是当我把草稿给一个老朋友看时，他请求我不要向慈禧太后提出书面请求，不仅仅因为我已经有了类似的鲁莽行为被惩罚过的教训，而且因为我对时事的影射绝对不恰当。因此，我一直等到了今天，但现在我再也不能等了。死是我的愿望，因为我的生命要与我一生中所恪守的忠心爱国思想相吻合。我的死绝不是因为流言蜚语在我的周围漫布，使我不能苟活。

当你收到这封信，立刻来马神桥旁的三义庙，位于蓟州东边十二里的地方，离帝王陵墓很近。到了那里，你找周老道，他知道我的下葬地在哪里，我已经请他帮我买了一副棺材，把里面刷成了黑色。我的葬衣也都安排妥当，但是我请他把我靴子上的皮后掌割掉（原注：下葬时死人穿上全新的衣裳，鞋的皮掌割掉，这样鞋子不会显得破旧）。他会给我买一小块地，靠近帝陵旁，那里是我选的墓地。这要比把我的遗体安葬在乡里的墓地要好得多，当然也确实没有必要把我安葬在乡里，因为我的弟弟是能够安葬在你爷爷奶奶墓地旁的。你知道的，他是二十年前在他北京的家中自杀的，当然他的死是因为个人的麻烦，今天我走了他的老路，但我和他不同，我是因为国家的麻烦。人们会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家族墓地已经成了邪恶之地，请别管别人是怎么流言蜚语的吧。当然你是一定想把我的遗体带回老家的，但是不要这样做。就把我的照片带回去吧，这是我在离京之前拍的，把照片放大一下然后挂在我家堂屋内就可以了。你们可以按照旧习俗把我的衣物留着。就不需要花钱把我的棺材不远千里地运回去

了。

即使慈禧太后可能因为我说了什么冒犯性的话，而会对我的尸体加以责罚，比如掘坟鞭尸什么的，但是应该可以保证在这个圣明的年代，他们应该不会对我的老妻和其他家人作出什么冒犯之事吧。你所要做的就是从我的朋友处借足够的钱带出北京城，即便一路乞讨，也要回到老家。你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北京，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而进一步增加为父的危险。为父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嘴巴快，在这一方面你一定要多加改正，说话要三思而行。如果别人说为父忠孝，不要和他们抵触；假如别人说为父是个诚实之人，你也要点头。要仔细阅读《马援诫侄》和《王侯诫子》这两本书，里面的很多建议都值得你好好学习。

你的母亲当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嫁给我时，极守妇道，服侍公婆，名声远扬。我很后悔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荣华富贵。她现在年事已高，就你在她身边。你要尽好职责，好好待她，让她颐养天年。

我父亲给我留下了几亩薄地，我也不指望你学习古人，把这些地都让给你的弟弟们，但是至少我要你和他们和睦相处。你的妻子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你要告诉她，每个家庭的幸福都依靠家里的妇女。我听说有个妇女假装死亡来劝诫自己的老公善待自己的兄弟，但这是英雄之举，当然不是以你妻子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至于我随身携带的四十两银子，请你全部赠送给周老道，除了他帮我买棺材和下葬的费用之外，余下的全部如数交给他。你一到蓟州后，立刻去拜访那里的州官，我已经写信叮嘱过他，然后再返回三义庙，给老道一些钱作为酬劳，因为麻烦了他这么多事。然后你到北京，在那里等待慈禧太后对我发落的诏书。

等我的小债务都已还清，我就可以有尊严地在地下安息了。在这样的时刻，我当然非常焦虑。很难预测慈禧太后将会对于我这种情况下发什么谕旨，但至少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还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你自己的安危，我认为你不必有任何害怕。

你一定要代我向张之洞先生问好，过去我总能和他畅谈，但是今后却不能了。你也要去左宗棠府上问好。近来他待我不如从前，主要是流言蜚语伤害了我们的关系。他过去对我的恩情，我永生难忘，如果你去拜访他，他必定会好好待你的。

你的妻子为我家生下三个孙子，对我家功劳很大，你千万不能有求她的父母为你再提供什么。事情办成，立刻返回老家。至于周老道，尽管他不是特别忠厚老实，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对咱们的恩德不小啊。告诉他我在他庙内自尽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决定，给他四十两银子，他顶多花十两在我的棺材和墓地上就足够了。我活在世上没有任何价值，就值这么多了。

为什么我要等到今天？都是因为我不希望在国家危难时刻，用我的死讯来打扰了慈禧太后的思绪。自从光绪皇帝当政以来，所颁布的所有诏书都深深打动了我，我自责自己无能，不能为国家效力。在古代，当君主宾天后，前朝的老臣为表达自己的忠心，都会自尽。过去，在侵略者来临时，唐明皇弃城出逃，宋理宗愚蠢无能，导致蒙古人来袭，江山被夺，这些都不能和我朝太后的英明相比。但是，我之所以自尽，原因与古代的忠臣殉节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儿，你赶紧回家吧，好好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切记不要打开我写给慈禧太后的折子。已经用蜡封好，请州官呈递给朝廷。”

吴可读给朝廷的奏折，事实上，正如同他给儿子的心中所暗示的一样，影射了朝廷统治者的不妥行为；同时我们也看出中国人对于皇位继承一事的传统观点。它开门见山，明确请求慈禧太后作出决定，把将来的皇位继承人过继给同治皇帝，这才符合各朝家法。这份奏折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文人，听说国家统一但并不一定不会分裂，国家安定也不一定不会发生动乱，如果主子不把分裂和动乱当回事，认为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做大臣的即使提出建议也是徒劳无用。在国家安宁时提出国家的危险所在则是不祥的兆头。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一个罪臣，会招致囚禁乃至斩首的后果，因为在义愤中，我竟

然对朝廷胡言乱语，会激怒主上。当时，王公们传讯我、质问我的罪过，但是大行皇帝却饶恕了我，所以我既没有遭死罪，也没有遭囚禁，也没有在传讯我的时候因为激怒了圣上而获什么刑罚。我已经有三次应受死罪但没有受罚，我生命无望的情况下还能被宽恕，所以我生命能苟延残喘，仿佛是皇帝对我的恩赐啊。但是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五号这一天，天摇地转，传来噩耗，就在那一天两宫太后颁布诏书："大行皇帝宾天，没给皇室留下子嗣，我们不得已任命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为新皇帝，继承国家大统。等他以后有了子嗣，再把他过继给同治皇帝。"

微臣跪着痛哭流涕，诵读诏令。我经过仔细考虑，觉得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但没有给大行皇帝立嗣，实在不够妥当。现在的新帝是咸丰皇帝的子嗣，让他继承国家大统，不是大行皇帝的遗愿，而是遵从了太后的谕示，这样的话，如果不明确说出来，将来的皇位肯定是由光绪的后人担任。但是，在诏书中，太后曾经提到，国家大统应该由大行皇帝的子嗣继承。作为微臣，我明白，当圣上还在世时，如果提到圣上的身后事绝对不妥。二百多年来，我朝的家法一直是皇位应该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样的家法应该能稳当地传承千世万代。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非常重视血统出身。而且，醇亲王是忠心志士、优秀的王公，他写下的奏折让西方人读了都热血沸腾。他的话就是他心灵的明镜，找不出半点瑕疵。

当我读了他的奏章，不禁喜极而泣。如果醇亲王知道了我的这一奏章，他可能会对我胆大妄为而恼怒，也可能会同情我的愚蠢行为。但是不管怎样，请他万万不要责备我在他们当中挑起事端，引起不和。

新皇帝性格温和善良，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太后授予的宝座，他在为大行皇帝立嗣的事情上一定会听从太后的安排。但是在皇宫中，有小人也有忠良之士，大家的观点意见非常不一致。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宋代之初，有个叫做赵普的宰相非常能干，即使这样也必须事事顺从杜太后的意思。同样，明朝的大学士王直虽然是朝中旧臣，竟然敢于上奏，请求把广西少数民族的黄纮立为景帝的太子，当

时没有中国人敢这么做，这让朝里所有人感到羞耻。朝中的优秀人士都这样，更何况那些不忠心的人呢？朝中的旧臣还这样，我们又怎能斥责新人呢？如果我们无视既存法度当然不对，而我们现在却没有什么法度，不是更严重的错误吗？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改变这种一错再错的局面，这样我们或许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因此我请求太后再下一道谕旨，明确指出将来的皇位必须由大行皇帝同治帝的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这样，皇位继承一事才能名正言顺，将来才不会引起什么事端。我朝的王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得以流传下去。目前大行皇帝没有子嗣，但是新帝的儿子可以过继给他，而太后变无孙为有孙了。这样可以遵守按序继承皇位的规定，太后的功劳将千古流芳。这就是微臣我所提到的用来弥补一错再错，回到正轨的办法。

当大行皇帝宾天时，微臣已经拟好了一份奏折，到时可以通过督察院呈递奏折给朝廷。但是我再一想，既然我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职位，我就不能越位向皇上禀报。再说了，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如果这个建议出自王公大臣之口，会被看作是为国家深思远虑。但是来自微臣之口，会被看作是胡说八道。微臣认为，在朝廷中有许多智慧的忠臣，不可能所有人都把此事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看成不足挂齿的事情。所以，微臣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但是时光飞逝，朝廷对于这件事却没有任何举措。后来，微臣重新获得了恩待，按照谕旨，可以复出，在吏部做事。这是四年前的事了，但这么长时间里，朝里却没有一个大臣给予此事片刻的考虑。如今，大行皇帝将永远埋葬在山陵中，微臣恐怕这件事会在人们大脑中渐渐淡漠。时间有限，微臣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抬头仰望先帝乘龙宾天，感慨万分；近看身后的山山水水，我不禁又开始追忆先帝了。现在微臣把先帝恩赐予我的剩下的岁月献出来，我要用死来代表大行皇帝，请求朝廷能降旨关于立嗣的事情，希望能平息太后的怒气。

但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感觉我的神智有些混乱。在我的奏折中言辞不够清晰，里面的遗漏内容较多。我过去的习惯是在我呈递奏折前总要再三修改稿子的，但是这一次我却做不到如此周密地修

改。微臣没有古人的才学，又怎么学得会他们的稳若泰山呢？从前曾经有个人在临死前腿迈不了，一个路人看到了便问：“你害怕吗，先生？”他回答：“是的。”“既然你害怕，为什么不往回转呢？”那人又问。他回答：“害怕是我个人的软弱，但是就义却是为了国家，履行我的责任啊。”我发现我今天就是处于这种情形之下。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微臣又怎敢自比作圣贤曾参呢？我将死去，但是我的话未必好听，我恳请皇上太后能可怜我最后的请求，不要把它看做是邪恶的兆头或者认为微臣在无病呻吟呢。这样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宋朝有位大臣曾经说过：“在事情发生前就讨论它是鲁莽；但是如果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说出来就迟了。尽管事情没有发生就说出来显得鲁莽，但是朝廷应该对一切事情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大臣后悔因为说得太迟了。微臣真心希望，我的话将被证明是不对的，这样后代会笑我的愚钝。我不希望我的话被应验，让后代称赞我的明智。罪臣希望当一回杜牧，即使我乱说了也不后悔。罪臣希望模仿一次史鳅，按照他所希望的，用死证明了自己对朝廷的忠贞。那样我的愚钝但却忠心的话最后证明是合理的。

我请求太后皇上永远铭记顺治康熙圣明的先祖，以仁治国，国家太平昌盛，愿朝廷不去竞争获取外国所器重的东西，如果那样，中国会陷于国难之中、会创下祖宗不齿的先例、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这些就是罪臣临终要说的话，是我临终的心愿。

罪臣我曾经当过御史，所以才敢上奏太后。但我目前的职务是个吏部小官，不允许我直接呈递奏折，我只能恳请吏部尚书代我呈递。我的名字也没有被列入筹备大行皇帝安葬仪式的名单之中，我请求大学士宝云能把我的名字加进去。宝云哪里能预知我的自尽呢？所以他是我的恩人，千万不能责难于他啊。我们当代是开明盛世，古代官员为君殉节的事情怎么能重演呢？但是我太过悲伤不能自制，今天大行皇帝入土为安，全国万民和我一同痛哭之际，罪臣上奏，向朝廷提出我对大行皇帝立嗣一事的请求。

第十章　二度垂帘

同治皇帝的丧事过后，选择了良辰吉日把他安葬到了皇陵。由于吴可读的上奏，太后下令作出承诺，等光绪皇帝生下龙子，一定立为同治子嗣，让他继承大统。从那以后，紫禁城在两宫太后的联合执政下恢复了正常节奏。

但是时隔不久，尽管是慈禧自己把光绪帝扶上了皇位，但是小皇帝虽胆小懦弱，竟然也成了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光绪渐渐长大成人，宫中人，凡是有点识别能力的，都能一眼看出，两位皇太后中，皇帝更喜欢的是慈安，因为慈安性格忠厚老实、善良秉直。皇帝只要一有闲暇，经常去慈安宫中探望。而慈禧极有个性，即使是个孩子，也决不能丝毫挑战她的权威。她嫉妒心极强，密切关注皇帝的举动，眼红他的思想被另外一个女人控制。另外，慈禧身边喜欢嚼舌头的小人从来没缺过，他们非说慈安宫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常常怂恿小皇帝违背西太后的旨意。自然，年幼的小皇帝成了两宫太后的争斗中心。



慈安太后

慈禧内心很矛盾，她不喜欢皇帝老是亲近慈安，同时又恨慈安能得皇帝的心。处在皇宫之中，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能成为慈禧的潜在敌人，所以小皇帝对慈安的态度让慈禧一度心中忧虑不堪。她清楚，慈安就一个人是不会成为强有力的劲敌，但是如果有了皇帝撑腰，唆

使皇帝和自己较劲（实际上光绪后来的确与她对峙过），那样的话对自己的形势极为有害。考虑到皇帝就要成年，慈禧必须加紧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预防，她不愿意像乾隆皇帝的一位妃子那样的下场，被加上了一个难听的罪名“生活糜烂、贪图享乐，对皇太后大不敬”，还被打到冷宫中，封号被全夺，忧郁而死。

1880年，在小皇帝才九岁的那一年，两宫太后在去往东陵做祭拜大典的路上发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当时，慈安听从了恭亲王的话，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她坚持在祭拜时什么事情都要位居慈禧之上。在咸丰皇帝的陵墓前，两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作为咸丰帝的皇后，慈安要求站在中间，而让慈禧按礼数站在她右边，她左边的尊贵位置则空着。她不仅这样，还提醒慈禧，在咸丰生前她不过是个贵妃，后来由于同治登基当了皇帝，她才母以子为贵，成了皇太后。作为贵妃，在祭奠先帝时只能站在慈安身旁靠右的位置，而慈安的左手边空着的尊贵位置属于已经去世的中宫。尽管在咸丰皇帝登基前中宫已经去世，但是她死后仍然被封为了皇后。慈禧清楚，所有这些话都是恭亲王和其他王公们唆使她这么说的，但是慈禧是不可能认输的，她绝不后退半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持续了仅仅片刻，最后慈禧占了上风。但是，她感觉在众目睽睽下两宫太后争吵简直太有失体统了，而且在陵墓前争吵完全是亵渎了祖宗。她认为这事一定早就预谋了的，目的是要自己当众丢脸，这件事的发生，使慈禧对东宫的不满日益加深。

这次去皇帝陵墓祭奠大典前，荣禄是步兵的统领，他负责保护太后。但是，祭奠回宫后不久，他做了一件让慈禧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他深深触怒了慈禧。自从热河载垣逆反后，特别是在同治皇帝驾崩后的这段重要时期，荣禄是慈禧的心腹，深得慈禧的信任与重用。他是内务府的总管，可以在紫禁城中自由进出。1880年，可能由于宫内生活太平淡无奇，他竟然与同治皇帝的一个妃子私通，把这件事报告给慈禧的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他一直与荣禄有隔阂。宫中还有传言，说知道这件事后，喜欢追根究底的慈禧在这个妃子房中抓了个正着，她愤怒之极，立刻辞去了荣禄的所有官职。在随后的七年中，被贬的荣禄在家赋闲，无事可干。慈禧性格刚烈，即使是她宠信

的人犯了法也绝不能饶恕。但是很快，慈禧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但事已至此，不能反悔，防止大臣不服。荣禄的事情加剧了两宫太后之间的矛盾。因为慈禧一直认为，是慈安在设计陷害荣禄。

1881年的3月，两宫太后因为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事情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慈安不停抱怨，说受慈禧宠幸的李莲英太监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其他太监也效仿，不把东宫太后当回事。另外，慈安还说李莲英太监的势力太大，人们称他是“九千岁”，就是说，全国他的位置仅仅次于万岁爷，相当于王爷的位置。

这次两宫太后的争吵已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许多人说，当时慈禧怒火中烧，为了除掉后患，她自己在心里做好了盘算，她决定下毒灭掉东宫。中国的宫廷中，对慈禧所指责的人们，大家无法分辨是非，因为无法查证，并且非常不幸。那些遭慈禧猜疑或者阻碍她权势的人，没有一个长寿的。类似的事情很多，简直数不胜数，应该不可能都是巧合。于是人们自然心生疑惑，认为一定是慈禧做了什么手脚。慈安去世的事情本身疑点很多，本来她身体非常健康，突患重病，根据朝廷的降旨，说东宫“二月十日归天”。按照惯例，慈安临死前有遗诏，但是对当时的政事没有丝毫提及，就是在临死前，她也和从前一样，把国家大事要留给做事果断利落的西宫。遗诏中首先就提及了自己作为咸丰皇帝皇后的身份，然后说，她对光绪学习勤奋感到非常欣慰，她还说：

回想起来，当时虽然时势艰难，皇帝每天忙于政事，幸好身体强健才能挺住，只能在闲暇时，才能放松身心。本月初九那天，我偶然感染病症，幸好有皇帝不停关爱问安，上天保佑，恢复很快。没料想在初十那天病情加重，到了凌晨，神思渐渐混乱，直到弥留还是这样，我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在这二十年中，垂帘听政了二十年，身为太后，辈份尊贵，每逢大典，都有徽号，我活了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呢？

按照慈安太后的要求，她大丧的时间由二十七个月减少到二十七天。遗诏的结尾充满了人情味，让人不免抹泪。我们可以推测这份遗

诏应该没有慈禧太后的干预。慈安在遗诏中说自己一向注重勤俭节约，反对由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她要求自己去世后丧事也要从简。而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是个鲜明对比，多年来无论是哪位御史官员还是王公大臣，都不断上奏批评慈禧做事讲究场面，过分奢华，没有节制。同是太后，两人差别很大。

慈安终于去世了。她是慈禧年少时的玩伴，是慈禧在神秘皇宫的朋友，因为没有生下龙子而把慈禧推上了皇太后的宝座。她多年来清心寡欲，她去世了，慈禧称心了，她现在可以独揽大权，没有谁可以阻挡她的道了，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她成了中国公认的统治者了，没有人可以和她比。不过，目前慈禧还有一个障碍，他就是恭亲王奕□。这么多年来，自从恭亲王和慈安联合杀掉了慈禧的宠信太监安德海以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关系一直比较僵。慈禧一直怀疑恭亲王的影响力和他在政治方面的能力，前面我们说了慈禧曾经把奕□的议政王职务辞掉，尽管恭亲王内心不满，但是慈禧看重他的老练稳当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他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所以二人出于现实的需要，维持着令人尴尬的关系。但是在1884年时，慈禧认为自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再也不需要别人的扶持了。而这时正逢上中法战争期间（由于中国要求成为安南宗主国，引起了争议，导致了战争），这给慈禧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和借口，她要借这个机会把恭亲王和他的追随者们一起除掉。



慈禧太后

除掉他们最直接原因是清军在马江大败给法军。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慈禧非常担心和怀疑恭亲王和皇帝正在联合要把自己除掉。另外，最近有几位御史联名上奏，指责太后奢华无度，所以慈禧也怀疑是恭亲王在背后挑拨。她罢免恭亲王等人的下诏用词非常巧妙，显示了这位中国女强人的过人手腕，慈禧的谕旨中提到了一些事实和此后历史的紧密联系，现特抄录部分如下：

奉慈禧皇太后的谕旨：现在正逢国家元气不足、时势艰难、内务繁杂、国家有待安定，国家的内外大事需要有人打理。而军机处是内外用人的枢纽，恭亲王奕□在军机处开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但是近几年错误不断、做事敷衍了事。

本朝家法严厉，如有任何扰乱政权的居心不良行为，法律绝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以上的这些问题，恭亲王绝不是第一次犯，总是屡

教不改。如果不思悔改，一味姑息下去，一定会耽误了国家大事。将来皇帝亲政，有这样的人在，怎么能安心理政呢？

恭亲王和大学士宝鋆，在宫内时间较长，对他们的责备应该严厉。考虑到他们毛病太多，年纪也有点大了，我们应该顾及他们过去的功劳，为他们的今后安排一个好出路。恭亲王仍然可以得到亲王的全额薪俸，免去他的一切差使，撤去他的双倍俸禄，还乡养病。宝鋆保持原品级还乡。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在宫内当差有了历史了，因为此人学识不高，办事有时有欠妥之处。除去兵部尚书景廉的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没有什么建树，现在对他停职留原任，还在毓庆宫当差，以显示区别。

朝廷对于他们的办事能力，一直在细心观察，担心他们的错误越来越影响国家政权稳固，为了委曲求全，现对他们从轻处理。在宫内办事，如果假公济私、相互倾轧，甚至有品行卑劣的行为，必定要除去一切隐患，按法律惩治，绝不姑息。特此发诏以作通知。

于是恭亲王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家赋闲。直到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这时的慈禧办事更加老练成熟了，她重新启用恭亲王，不过她对恭亲王已经没有刚垂帘听政时那么倚重了。从1894年到1898年去世的这四年间，恭亲王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提高。尽管内心慈禧不喜欢他，但不得不佩服他个人的出色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杰出才能。

恭亲王被贬回家后，他的职位由礼亲王代替执行。他位居八大亲王头一个，是努尔哈赤小儿子的后代。与礼亲王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和孙毓汝，而孙毓汝与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向来不和。慈禧之所以把孙毓汝调入军机处，就是使用了惯用的政治伎俩，这也造成了军机大臣之间的不和睦，让他们互相牵制，自己可以从中斡旋他们的复杂关系，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慈禧接下来的举措引起了各位亲王大臣的不满，招来批评声一片。她下诏说，凡是遇到什么紧急事件，军机处应该先与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商议再作决定，然后再禀报皇太后和皇上。昭示中还说，等

皇帝长大成人亲政后，太后就把这件事下诏说明情况，按照这份诏书，醇亲王相当于是一个凌驾各王公大臣之上的首领，这不仅破坏了现有的规矩，还有可能违反1875年太后许诺要给同治皇帝立子嗣的诏示。大家都担心醇亲王可能会劝儿子无视给同治帝立子嗣的意思，破坏正统，以醇亲王这边另外立皇权。如果这样，醇亲王与福晋（慈禧的胞妹）在有生之年就会当上太上皇和皇太后，百年后也将位于王族之列。一旦这样，同治帝的统治将彻底结束，大清祖先中的长支一派会慢慢削弱，叶赫那拉氏的势力会慢慢增长。从此，皇宫将没有太平之日，种种内外阴谋诡计不停上演，那时的情况与英国历史上玫瑰战争时期的皇权之争会有一拼。

慈禧发下诏示后，一个名叫盛昱的皇亲贵族和其他十个人共同上奏，言词恳切，请求太后收回成命，建议如果朝廷需要醇亲王参与政事，可以请他同太后直接商议，不需与军机处商议。上奏者还罗列了许多反对的理由，目的是保全醇亲王的面子，但也可以防止他权力过大。他们觉得，军机处是权力事务的中枢机构，是个劳碌伤命的苦活，醇亲王身体不佳，不知能不能胜任这一重任。上奏的人还明确地指出一点：如果醇亲王权力太大，肯定会引起全国上上下下的反对，这种结果，太后一定不愿意看到。另外，1799年，嘉庆皇帝曾经有过规定，除非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否则皇帝不允许参与军机处的事务。

折子里面说："事实上，皇帝地位至高无上，即使皇帝犯了错误，也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处罚，所以他不方便在朝廷中担任职务。恭亲王确实在军机处担任过职务，但只是一时的情况。再说，当时他的权力比现今醇亲王的权力小多了，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所以，我们作为大臣的，请太后遵守我们大清朝的王法，收回让醇亲王参与军机处参政的成命。"

最后，上奏的大臣认为，醇亲王不应该参加每天的早朝，也不能凭借皇帝给予的特权，就召集军机处的大臣到他的府上商议国家大事；亲王参与军机处大事，即便他犯了什么错误，也要按照规矩，就是御史也不能上奏弹劾他啊。

御史赵尔巽（他做官清廉、为人正直，曾经担任过直隶和四川总督），曾经上奏过类似的折子。他认为，如果军机处的事情要醇亲王一一过问，那他与其他大臣又有什么两样呢？身为太上皇，醇亲王没有权过问军机处事务。他说：“如果太后需要醇亲王商量国家大事，可以直接召他进宫商议，当面商量不就稳妥了吗？天下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的。”

对于这些指责太后的折子，太后批阅后下发谕旨：

对于先帝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朝廷当然应该遵守。但是，自从我垂帘听政以来，国家大事繁多，我忙得顾及不了其他，没有空多次去请亲王辅佐政事。各位大臣应该清楚，我之所以这么做都不是从我自身出发，而是一心为国家时局着想。几天前，我曾经下诏让醇亲王同军机处商量政事，是因为国家有紧急情况，不是平常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打算要给醇亲王任命正式的职务，即便要给他任职，他也是一再推辞。由于醇亲王本人请求，我才同意等皇帝长大亲政了，再重新商量此事，所以目前的这个安排也只是暂时的解决方案。国家事务相当繁忙，我日日夜夜理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个人能力有限，不能独当一面，其中的苦楚你们做大臣的又怎么能体会呢？军机处的各位大臣处理政事，不准因为醇亲王的缘故，就推卸你们分内的职责。总之，希望各位大臣能体谅我做主子的心意，不准无故刁难。盛昱等人的奏折不能同意。

看到这份诏书，让人不禁想起伊丽莎白女皇连同她处理大臣类似请求的方法和态度，那真是如出一辙啊。

第十一章　慈禧还政

1887年，光绪皇帝17岁了，慈禧理应把政权交给他了。这个变化使得那些太监和皇族感到忧心忡忡，在过去十年中，他们依靠慈禧无上权威的庇护，为所欲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会随着新主子的上任而面临极大威胁。但迫于责任，慈禧表达了自己要从公共视线中隐退。这并不奇怪，但是要求她继续当政的请求像潮水般涌来，他们都请求她继续执政，管理国家事务，慈禧虽然心里也这么想，但口头依然表示要退下来。直到1889年，光绪帝与慈禧兄弟桂良女儿大婚时，她才确定把政权交给了皇上。

当时慈禧已经55岁。她作为大清帝国的无冕之主接近三十年了。她已经尝到了权力的甜蜜，满足了当统治者的欲望。当时国内外政局动荡不安，理政方面，她也整日忧心忡忡，外国列强对中国加紧掠夺和逼近，在内忧外患中，她也情愿舍弃紫禁城繁忙的政治生活，隐退到颐和园（当时颐和园还在重建中），过着悠闲放松的生活。再说，她也不能再赖在王位上不走了，更重要的是，光绪帝已经成年，她再迟迟不下来会引起大家的猜疑。当时中外著书立说者们的普遍看法是她明着不问政事了，但是她的心还在紫禁城，从没离开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推断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慈禧归隐到颐和园大体持续了十年，在这当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慈禧毫无疑问极少直接关心国家政事，当然充实她个人钱包的经济事务她还是很关心的。但是虽然交出了外在的统治权，慈禧当然不愿变成被人忽视的人，她时刻关心时事政治。她豪华的居所就在环绕北京城的山脚下，这样她完全可以密切观察皇帝的一言一行，保护她追随者的利益。她拥有任免官员的权力，其中很多建议都是大总管李莲英提出的。

慈禧让皇帝娶了她最宠爱的侄女，其实是想避免重蹈她儿子同治皇帝的覆辙，同治与优秀勇敢的阿鲁特结婚，结果导致了阿鲁特至死还与自己作对。有这个前车之鉴，她在为皇帝择偶这个问题上，关心

的主要不是皇帝个人的喜好，而主要是按她的意见上来选择妻子，这样在皇帝身旁安插一个她的亲信，就可以随时监察皇上并向她报告情况。在这方面，慈禧的侄女表现得相当完美。她虽然姿色平平，给人感觉没有太大亲和力，但是她遗传了很大一部分叶赫那拉氏家族所具有的智力和意志力。从一开始，她与皇上的关系就不和，他们俩在宫中经常争吵，这已经是宫里人人皆知的秘密了，在他俩的争吵中，年轻的皇后往往是获胜的一方。很自然，结果便是，光绪帝对后宫的珍妃和瑾妃极为珍爱，而对皇后态度不冷不热。

光绪帝亲政后，叶赫那拉氏家族中权位高的成员非常想抓住机会增强他们的地位与权力，他们提议给皇帝的父亲加封更高的官衔，希望能让他最终拥有皇帝的权力。建议虽然被提出来了，但是慈禧拒绝执行，她充分顾及了醇亲王的面子。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对中国皇位问题上所涌动的暗流略窥一二，对于这一点，欧洲人有点难以理解。关于醇亲王追随者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在河督吴大澂的上书中看出来，他曾经担任过监察院左督御史的职务。在他的上书中，他首先提到了醇亲王担任海军头目时的功勋，然后他赞扬了醇亲王的爱国思想和谦恭热情。他接着提到醇亲王毕竟是皇帝的亲生父亲，在这样一个以忠孝美德赢得天下的朝代里，醇亲王有资格获得更高级别的待遇。吴大澂还引用了孟子“圣人人伦之至”的名言，他认为上天授予天子以权力，尊重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前人一样，吴用古人的观点强化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他所引用的事情发生在宋朝，当时朝廷两派为是否给当朝皇帝宋英宗的父亲尊号的问题争执不下。后来在编写史册时，乾隆皇帝作为编写人，他反对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给皇帝的父亲尊号，以显示孝心。乾隆借用了明朝的一个例子，尽管皇帝（1525年）的父亲只有王爷的号，但当朝皇帝希望尊其父亲为皇帝；换句话说，乾隆皇帝认为父子的血缘关系远远高于所有的君臣关系。最后，吴在自己的奏折中得出结论，醇亲王应该被给予“帝父”的尊号，而且慈禧太后应该在归政前宣告此事，以表示皇帝的拳拳孝心。



裕隆皇后

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以上的这份奏折是受到朝内高官的授意写成的，目的是让慈禧太后有机会表明自己在此事上的观点，同时可以进一步加恩于醇亲王一族。慈禧太后赞扬了吴大澂的奏折，认为他对醇亲王极度忠诚，然后她继续说：

每当我想给醇亲王特别的待遇，他总是眼含热泪地推脱。一次，我让他和我同坐杏黄轿，他至今都不敢接受这一殊荣。醇亲王一直对我朝忠心耿耿，无比谦逊、忠诚。这一点，不光是宫中，连天下子民都了解。自从光绪元年的正月初八，醇亲王呈上一份秘密奏折，他列举了许多前人的例子，提到许多前朝的君主都推崇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他也提到了如今的吴大澂奏折中所提到的例子，他说自己很担心有些小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位份向皇上进谗言。因为这个原因，他提前秘密上奏了这个折子，提出要求，就是当皇帝当政后，在自己的尊号方面不要作任何变更。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忠诚的大臣啊！既然我就要归政了，醇亲王所担心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决定借这一机会，把他的奏折宣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大清朝的隆恩。这样就没有人再提出类似建议，也可以向天下明示醇亲王的心意，成为后来人学习的榜样。

醇亲王的折子在1875年上奏，本身意义不大，但是它却揭示了醇亲王在光绪登位之日就早早料到了皇位继承问题上可能会引发的问题，表达了他对未来形势的忧虑之情。醇亲王明确表示拒绝接受更高的封号，主要是希望避免小人的谗言会阻碍自己或者在宫内结党营私。他担心等皇帝开始亲政，“奸臣可能会通过谗言曲意奉承，从而欺骗皇帝，获得高位，飞黄腾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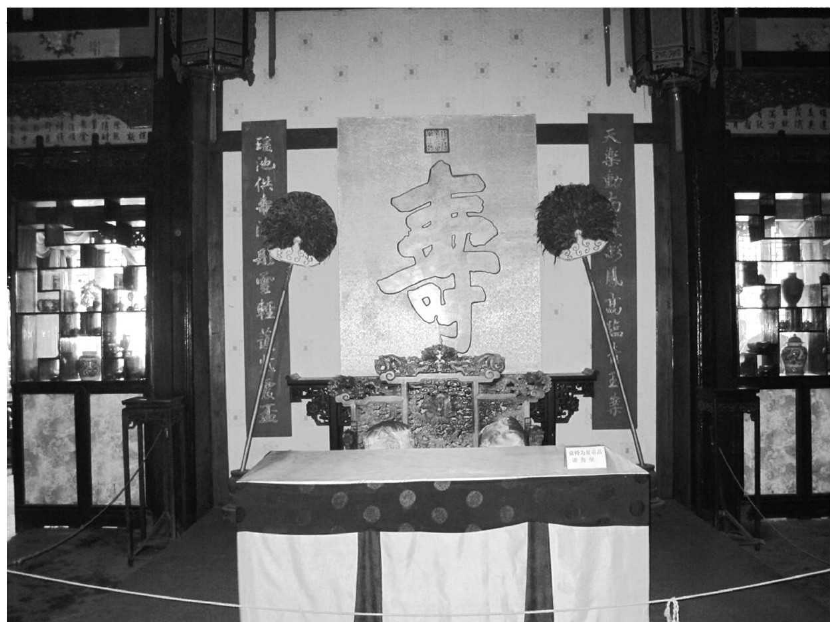
因此，皇帝的父亲的位份一直是世袭亲王，但是类似的事情还经常被提起，等监国摄政王载沣归政于皇帝时这件事又被提起，具体事实不清楚。

慈禧太后归政隐退后不久，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就得了重病，直到1891年1月1日去世。在1890年，格外重视仁孝的御史们联合上奏朝廷，希望太后和皇帝能去探望病重的醇亲王，但是慈禧却对这一提议

大加斥责，叫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别狗拿耗子。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伊丽莎白女王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方法。然而，尽管她对此事好像不以为然，实际上她还是接受了暗示，在1890年整个夏天，频繁去醇亲王病榻前探视病情。

跟醇亲王的其余几个弟兄相比，慈禧对醇亲王格外器重；她对醇亲王的死格外伤心难过，感觉自己失去了智力上的左膀右臂，她认为醇亲王是个足智多谋而且无畏的好参谋，对她政策的制定起过很大的作用。醇亲王是个十足的排汉主义满人，对权势地位和满人所持有的特权特别看重。他曾经在军机处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一句名言："宁可把政权交给外国鬼子，也不能落到汉族叛匪手中。"这句话会永远铭刻在中国史册上，他的这话加剧了广东人对满族人以及他们统治的日益不满。

醇亲王去世后，慈禧太后竭力赞扬了他担任内务府大臣、治理海军、统领满族陆军期间的杰出贡献，然后她又详细布置了丧礼仪式的细节安排，赏赐了一条陀罗经被，并且赐予醇亲王级别相当高的"帝父"封号。她下令，葬礼必须隆重举行，目的是彰显皇帝的孝心，同时还要谨慎对待，不能太过奢侈，违背了逝者生前的节俭谦逊的美德。无论如何，谕旨中的所有要求都体现了慈禧的"折中主义"原则，她想把所有关于醇亲王的"有意逾越"的疑虑全部打消，表明醇亲王家族从来都没有非分野心。最后，与乾隆朝代的前例相符合，她把醇亲王府分为两部分，一半用来作为祭祀醇亲王的先祖的纪念堂，还有一半作为光绪帝的发祥之地。



慈禧太后祝寿的地方

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应该大做一番。慈禧的大业已经稳固，而且她越来越受到万民爱戴，在国内很具有影响力。老佛爷早早来到了颐和园做大寿的准备工作，她希望这次庆祝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庞大，当时颐和园已经重建完工。其实自从1889年开始，光绪帝就下令动用海军部门的军费开支和其他部门的经费着手重建颐和园了，而此时，颐和园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为了给太后庆祝大寿，各省高官都奉诏令来京贺寿（给祝寿的各项费用买单）。在这些人中，当然包括对慈禧忠心不二的荣禄，他也火速赶回主子身边，他继续被太后重用，统领北京步兵部队（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一直在西安担任大将军的闲散职务）。每位受邀请的高级官员都需要贡献出自己四分之一的薪水作为生日礼物给慈禧太后作贺礼，这些数额加起来可以达到几百万两白银了。一切和祝寿有关的场面都相当奢华，从皇宫到颐和园之间的整整五英里都已经接到命令，建起了大牌楼来纪念祝寿活动。然而就在此刻，中日甲午战争这场对中国来说的灾难性的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样的局面迫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局势，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六十大寿的庆典仪

式。她用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份诏书，其内容如下：

在今年十月，恰逢我六十大寿，本来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举国上下都同心协力、共同庆祝，表示对我的忠心。已经决定，到时候皇帝会协同整个朝廷到颐和园给我行庆贺大礼。我的子民和官员都已经捐款，一心要报效于我，从京城内到颐和园一段都建造好牌楼以示纪念，高高的经坛也已经建好。我也不能过分矫情，所以就勉为其难地允许皇帝和朝廷官员们在颐和园行贺礼。因为在这段时间，我国人民生活安定繁荣，而且在历史上都有庆祝先例，比如康熙乾隆年间他们也都有六十大寿的庆典仪式。因此我也就更不好有任何推脱之意了。

皇帝极力要表示孝心，决定在颐和园庆祝我的六十大寿。谁能料到日本倭寇与我国为敌，自从夏天就开始挑衅我国，入侵我国边疆及朝鲜地区，捣毁我军的战舰。我军万不得已，兴师讨伐，剑拔弩张，把军队推向前线。中朝两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无比难过。因为考虑到前线士兵的苦楚，我特别下诏拨了三百万两白银支助前线各种费用支出。

虽然我的生日就在眼前，但是哪里还有什么心情愉悦啊？如果战事胜利，我们才真的有心情庆祝。因此我下诏，所有庆祝活动仅仅局限于宫中，在颐和园的所有准备活动暂时停办。

在这份诏书的末尾，光绪帝加了几句表示孝心的话：“太后这样做符合她的杰出优秀品质，尽管我心里很想替太后大办一下，但是对于太后的旨意又不敢违抗。”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完全战败于日本，这对满洲王朝的统治绝对是个不小的打击。这次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南部省份强烈要求改革维新，而这就导致了后来的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假如清政府不向日本开战，或许要承受甚至更大的损失和奇耻大辱，没人知晓。对于战败，慈禧太后明哲保身，她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也不愿意为光绪帝的决策负任何责任。而且，她心知肚明，由于总管李莲英的操纵和建议，多年来用于海军部的费用大部分都挪用到重建颐和园的

工程上了，一直都无法维持正常开支，而中国当时的大多数官员对这一点毫不知晓。

于是，大家的矛头普遍对准了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他遭到了国人的普遍指责，大家谴责他建议朝廷向朝鲜派兵以维持主权。不过这个事情就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当时李鸿章与其他许多官员一样，直到最后都没有拿好主张，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冒险一搏。他深知：这场战争打不打对中国来说都是很危险的。非常不幸的是，1900年中国战败，天津的总督衙门和北京海关总署被毁，所有能证明史实的历史资料也全部被毁了，所以这次灾难性战争的直接原因可能永远不能准确地重见天日了。李鸿章很清楚，日本已经两次对中国进行侵略，已经尝到了胜利的甜头。在1874年，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第二次（1885年）则允许日本侵略朝鲜，清政府一连串的退让才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危机。李鸿章心知肚明，中国即使把对朝鲜的宗主权让给日本（这项权力对中国其实没有实质的好处），一连串的退让买来了暂时的安宁，好日子不会长久，日本不久一定会进犯满洲各省。恰恰在1905年，中国签署了朴次茅斯协定那天，满洲三省的命运已经裁定。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在外交上是不合理的，而且挑衅我国的方法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李鸿章非常了解日本这些年来所作的精心准备，同样了解自己的水军资源状况，两者的对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但是，他身边的官员与1900年时的满人一样，自恃清高、目空一切，觉得自己四海无敌；而且当时驻高丽的特使袁世凯也拍拍胸脯对李鸿章保证，日本人如果有胆侵犯中国，英国人一定不会不闻不问。毫无疑问，当时英国政府对清政府持同情态度，这可以清晰地从汉城英国总领事的态度和行为中看出来。

中国历史学家们纷纷公开谴责李鸿章唆使朝廷和皇帝卷入战争中，并且外国人也普遍持有这种看法。而事实是，李鸿章最初全力支持中国派兵平定朝鲜叛乱，而当他一旦意识到卷入平定朝鲜叛乱正是日本人的计划时，他就开始反对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以防卷入对日战争中去。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德国籍军事顾问十分好战，尽管他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还是被说服，下定了战争的决心。在他与北京当局商议过后，才派出了“高升”号船舰以及水师前往朝鲜，

实际上他知道这一举措就意味着对日宣战。“高升”号被日军击沉后，海军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国，李鸿章自然竭力把自己的责任最小化。



李鸿章像

外国人责备李鸿章不顾实际情况对日宣战，而他的同胞则责备他

当了汉奸，背叛国家去帮日本人的忙，他们随后攻击他把满洲里卖给了俄国。尽管慈禧钦佩李鸿章的杰出智商和足智多谋，但是她对此人没有任何好感。中日战争后，看到许多御史攻击弹劾他，而且她自己的名字也连带其中，不免对李鸿章心生同情，又竭力为他辩护。1895年，一个名叫安维峻的御史上奏，公开指责太后和李鸿章对中国战败的这场灾难应承担责任。他在奏折中说：

李鸿章与洋人关系尤其密切，所以经常会自以为了不起。日本倭寇侵犯高丽，他好像很担心自己存在日本的大笔钱财会有去无回，因此他反对对日开战。当接到对日开战的谕旨时，他相当失望，开始充当汉奸和卖国贼，为日本倭寇提供粮草弹药物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倭寇能战胜，他的预言就能成立。另外，他还克扣我军的粮饷放入自己腰包。对于那些敦促参战的人，他动不动就训斥他们，我军失利他就高兴，我军有战果他反而伤心不已。他所指挥的军队将领们看风行事，一看见敌军来了，吓得逃之夭夭。对于李鸿章的叛国行为，许多御史都曾经上奏弹劾他，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需要补充的是，叶志超和卫汝贵两人都已经被罢免，朝廷也已经下令把他们捉拿归案，但是他们至今为止还一直窝藏在天津，躲在总督衙门。大家似乎都这么说，估计八成是千真万确的。另外还有丁汝昌的案子，朝廷也在下令要拘捕他，但是他请李鸿章替他说情开脱，说他对大清国作用非同小可，因为有一项美国新发明，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他能使周围环抱着的物体看不清。这种荒唐的法术，李鸿章也还真敢在皇帝面前上奏，微臣认为，李鸿章简直是无视朝廷的存在，视朝廷为儿戏。然而，当时在场的所有军机大臣竟然都不敢反驳他，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年龄太大，思想昏聩，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还可能因为他们过于惧怕这项发明，所以不敢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军机处所制订的政策难怪这么含糊不清，因为他们对李鸿章的乱说一通的内容是一无所知。

邵友濂和张荫桓两人已经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来讨论议和的事情，谕旨还没有下发公布。因为军机处事实上害怕公开提及“和平”二字，尽管他们知道这是唯一选择，但是口上却不敢提及，简直是掩耳

盗铃。这些大臣感觉好像忘记了其实全国人人都知道朝廷要议和。

日本与邵在某些个人问题上曾经有过隔阂，军机处竟然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替他。这简直荒诞至极，因为李经方是日本人的女婿，他称自己是日本卖国贼，我之前对他就已经弹劾了。如果允许这种卖国贼去日本，这不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吗？他们正求之不得呢，这种协商的结果是我们大清朝的主权不可避免地会被强盗们抢走。日本的实力也就是表面强大，是烂透的桃子，但是我们不能和他们一决死战，假如我们接受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条件，我们就是把自己变成日本国的属国。换句话说，我们泱泱大国不仅仅会毁在一帮糊涂蛋手中，而且会被卖国贼们出卖。全国人民应该都会愤怒到咬牙切齿，剥了李鸿章的皮才痛快。

也有人说令人羞辱的议和之策是由太后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提出来的。我个人不大敢太把这些茶余饭后的闲谈当回事。但是，如今太后已经把政权交给皇帝，但是请问皇上，您还事事允许她过问插足，您又怎样面对列祖列宗和天下百姓呢？李莲英是何许人，他竟敢干预政事？假如这些流言中有些许真实性存在，请皇帝一定要严惩不贷，因为我们大清朝法律严明，禁止任何宦官干涉政事。

实际上，李鸿章一直在恐吓朝廷，朝廷对他说的话都很当事儿；而且军机大臣们基本都是李鸿章的忠实追随者，凡事都护着他，从中姑息，充当和事佬，他们害怕李鸿章有任何反叛行为。他们尽力在皇上面前为他说情，却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内心早有反叛之心。他只是不想反，不是不能。他所带领的淮军都是些昏庸之人，没有任何军事知识或能力，他的士兵们屡次被克扣军饷，人心不齐。最近天津招募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对付李鸿章的部队仍然兵力很足，所以李鸿章反不了；不然他可能早就反了。他没了办法，转过来违抗朝廷的谕旨，他心眼里就不把皇上和太后放在眼里，所以才敢用什么周围物体全都看不见了的新发明戏弄圣上和大臣们。

微臣对此事感到羞耻不平。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圣上能把愤怒表达出来，把李鸿章的反叛展示给天下人看，将这个卖国贼处以死刑。只

有用这个办法我们的军队才能雄起，才能平定东洋倭寇。同时，如果微臣说得有什么错，请砍下微臣的头颅来谢罪。列祖列宗们都在这里看着呢，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对此事，我很有把握，我把我赤诚的心献给圣上，请皇上作最后决定。

对于这份直白的奏折，皇上颁布了如下谕旨，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仅仅对她最宠爱的李莲英的攻击一条，太后就肯定会站出来，再说她当时正密切观察着皇上的一言一行，定期批阅奏折，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奏折：

鉴于最近形势比较艰难，对于任何御史的奏章，我们总能包容接纳，不去追究任何一人，即使他们有时候会言辞偏颇，表达不当。这都是因为平时受了太后的谆谆教诲，而且作为皇上，我们需要的是安定的国家，我想天下的百姓一定也能体会到我们要治理好国家的这片苦心吧。今天收到安维峻的奏章，他所说的基本都是流言蜚语，还说“太后仍然事事牵制皇上，圣上怎样面对列祖列宗”这样的话，简直是满口胡话，作为一名御史，讲话没有任何分寸，不知天高地厚，如果不严厉惩办，估计他早晚会离心叛国。现在对安维峻立即停职查办，发往西部军台边疆，以警醒他人。他的奏折退还给他，以表示蔑视。

慈禧对中国战败一事深感羞辱，中国历史学家们多次提到，日本的文明和文化最初都起源于中国，所以太后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日本对中国的二次入侵，占领满洲三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保证，俄国和欧洲联盟绝不允许日本对满洲三省有染指，于是太后这才同意签署了和平协议。按照前文所述，对于满洲亲贵们或者那些言辞猛烈的南方批评人士，慈禧太后都站出来替李鸿章鸣不平。因为她知道李鸿章此事的处境不利，而且他对中国的战败也不应负直接责任。本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太后可以好好庆祝自己的大寿，使她名垂青史，现在因为有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她被迫取消了寿典，她总要找个人问罪，她把怨气都发泄在了光绪帝身上。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光绪帝就向日本宣战了。正是从那时开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隔阂愈来愈深，最终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政变，两人之间的不和把皇宫分裂为两大敌对阵

营，这种敌对状况一直持续到两人的相继离世才停止。

根据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知情人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随着光绪帝的改革之意日益明显，裕隆皇后与他的关系越发紧张起来。1894—1896年两年间，光绪帝对他的姨母慈禧太后的态度没有显著的变化，他在表面上对她仍然恭敬至极，到1896年光绪帝的生母（慈禧的妹妹）去世，他与太后之间的亲情的最后联结者和关系的协调者离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第十二章　维新变革

1898年年初，军机处的构成人员如下：恭亲王、礼亲王（他儿子娶了荣禄女儿）、刚毅、廖寿丰、翁同龢（大学士，曾经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当时慈禧太后还在颐和园调养身体，身边有荣禄妻子和继嗣的大公主作陪。据说，太后当时的生活怡然自得，有时还有雅兴在昆明湖划船，时而听听戏曲，时而到周边的寺庙中祭拜，时而吟诗作画。但是，她每时每刻都会关注紫禁城内的情况，宫内的凡事都由刚毅和礼亲王一一如实禀报，虽然她现在已经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了光绪皇帝，慈禧偶尔也会到宫内居住一两天，皇帝每个月都会去颐和园几次给太后请安。这期间两人关系表面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在发布什么重要的诏书之前，光绪都会请示太后，而慈禧对皇帝的态度和蔼有加。不过，有时她责备皇帝脾气暴躁，对下人不够友好。这一切都是因为李莲英偏袒自己人，挑拨太监夸大说法，太后只听到一面之词，才对光绪有了这个坏印象。光绪皇帝深知，太后虽然外表温和谦恭，但手段强硬。每次太后回宫中，他都会严格按照宫中的礼仪，在宫门口毕恭毕敬地等候太后传旨召见。去颐和园请安，皇帝也决不能径直进入太后寝室，必须跪在寝室门前，等太后传旨才能进去。而负责传旨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对光绪帝又怒又恨，往往等他跪了半个小时才去禀报太后。每次进颐和园，皇帝都跟其他官员一样，给太后身边的小太监银子作贿赂。实际上，这些太监虽是奴仆，也轻视皇帝，对他的态度还没有对待其他的满族达官贵族的态度尊敬。宫外人认为皇帝地位尊贵无比，但是在宫中，人们不把他当天子看。所以在1898年夏天维新变革期间，光绪皇帝表现格外主动与坚决，让外人出乎意料。众人经过这事才知道，皇帝不是个无为等闲之辈，他身上也流着母亲叶赫那拉氏的血液。

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的影响最大。1894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中日战争爆发，由于开头打得不顺，当时军机大

臣中许多人都被罢免，翁同龢被补进军机处参与政事。不过，在光绪皇帝五岁开始，他作为皇帝的师傅就常在皇宫出入。翁同龢是京城南方党派的领袖人物，他是江苏人（这个地方近代文学最为昌盛，人才辈出，一代胜似一代），他痛恨满族守旧势力，他们思想保守，北方的汉人也是一样，因为这些人思想极为迂腐，跟满族人一样。光绪年初，北京就已经有了南北两派，他们互相攻击。北方派有两位领袖人物，徐桐和李鸿藻，徐桐学识渊博，知识面丰富，是同治皇帝的老师，虽然是个汉人，但是思想和满族人相同，很守旧。另一个人李鸿藻，他与翁同龢同时进入军机处。南方派的领袖人物是翁同龢，江苏苏州人，学识渊博。这两派势力相互抑制，而且这两派势力对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后来慈禧再次摄政和义和拳运动都有重要影响。



翁同龢

二十多年来，南北两派的四位领袖人物一直在北京城内担任重要职务，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会经常碰头。他们之间经常打口水仗，精明的南方人常常全胜。四个人都是正直、有威望的人士，新进仕途的后辈都想投奔他们门下，总体而言，南方派的门生相对比较多，这让李鸿藻和徐桐非常眼红嫉妒。在1899年的殿试中，北方派出了口气，当时殿试中，李鸿藻是大总管，而潘祖荫是副总管。潘祖荫负责挑选回答优秀的试卷，他建议把一位江苏考生录取为第一名，但是李鸿藻不同意，他想让一位直隶人成为第一名。所以潘祖荫公开地责怪李鸿藻做事带私心，这对南方人不公正，还挖苦对方，说他们学问差劲。

1880年，俄国占领了伊犁，徐桐和翁同龢分别是礼部和工部尚书。召开御前会议时，翁同龢主张跟俄国开战，徐桐原先答应要支持开战的，但是最后他反悔了，这让翁同龢处境孤立，场面尴尬。从那以后，这两人的矛盾加剧，后来两人各自成了南北派的带头人物，他俩如同劲敌，互不相让。同时，翁同龢与荣禄之间关系也不和，因为1880年翁同龢向慈禧太后揭发了荣禄与妃子私通的事情，使得荣禄官职被罢免，荣禄为这事一直愤愤不平。而且作为一名北方人，荣禄自然倾向支持北方派。

1890年以后，这两派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在1894年，李鸿藻和翁同龢同时进入了军机处，于是宫廷也被卷进了这场纷争之中。慈禧太后对北派鼎力支持，而光绪皇帝偏袒南方派。之前，人们常把两派称为李党与翁党，后来又改称为后党与帝党，两党都有诨名，分别是“老母班”和“小孩班”。潘祖荫和李鸿藻都在1897年病故，之后徐桐开始诋毁诽谤皇帝，说他是汉奸。徐桐曾经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自然受到太后的无比信赖，但是光绪帝拒绝让他进入军机处。皇帝对徐桐极为反感。1887年到1898年这十多年间，他仅仅召见过他一次。但是，徐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关系非常要好。刚毅憎恨所有的汉人，不管是南方派还是北方派，都是他眼中钉。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势力，在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挑拨离间。1897年，刚毅请皇帝降谕旨，他正在训练装备满洲兵，光绪皇帝对他说：“你好像还觉得满洲兵可以打仗嘛，我来告诉你，他们简直都是废物啊。”刚毅碰了钉子之后非常恼火，他对老佛爷和铁帽子王说，皇帝把满洲人看作敌人，想让

汉人在朝里出任高官和显要职务呢。听了这话，满人当然对皇帝怨恨满怀啦。

京城内的南北两派之间的不和甚至影响到朝廷的外交政策了。太后、满人和北方的汉人都主张联合俄国，而光绪皇帝、翁同龢以及南方派都主张与日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想效法日本的成功变法。因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了日本，所以大家都把责任一致推到了李鸿章身上，大家都不把他的观点放在眼里，不过他本人的倾向是联合俄国。恭亲王是王公贵族中的贵人，老谋深算，即使是慈禧太后有时还要听从他的意见。在满洲贵族眼里，只有他一个人与南方汉人派能够和睦相处。恭亲王本人的学问很棒，他非常仰慕翁同龢的文学才华。中日战争本来跟他没关系，因为他也在家闲了十四年了，后又被重召进了军机处，一同进入军机处的还有翁同龢等人。

当时有一件事情外人不太清楚，就是翁同龢迫切想让朝廷委派他做朝廷的特使，去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因为他慢慢开始感觉到太后对他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了，并且他也隐约感觉到中国马上经历一场大变故，他很想出去躲躲，避避风头。1895年，朝廷发下谕旨，不许翁同龢再在毓庆宫教皇帝功课。这样，他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时时对光绪帝产生什么影响了，而他的仇敌也会随时冷不丁中伤于他。

1898年初，军机大臣的头目恭亲王得了严重的心肺疾病，请假在家休养。光绪皇帝陪同太后三次去他府上探望，还让御医去府上诊治。但是他寿数以至，没有回天之力了。4月10日那天，恭亲王去世。慈禧太后降谕，其文如下：

慈禧太后谕旨：恭亲王奕□是我朝的重臣。从同治初年至今，辅助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国内东南部不安定，国事艰难，恭亲王亲自上阵，平定混乱，功劳匪浅。三十多年了，他尽心尽职，呕心沥血，一心为了国家。从二月至今，旧病复发，我和皇帝几次来看望，让他悉心调理，满以为不久就可以痊愈。没料到这个月初十，撒手归天了。我们失去了一个良臣，遗憾和心碎，无以言表！考虑到他勤勉的一生，特赐予他“忠”字的谥号。

这份谕旨非常明了地反映了党派纷争对慈禧太后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尽管太后名义上已经把国家大权交给了光绪皇帝，但是实际上只要她自己愿意，她仍然是大清王朝真正的统治者，并且她也随时准备显示自己无上的威严。光绪皇帝也发了谕旨来悼念恭亲王，但是这也只是太后谕旨的附属品罢了。随后慈禧又发了一道谕旨，命令各位大臣一定要学习效法恭亲王的忠诚之心，谕旨最后有句话极为重要，说恭亲王在遗嘱中劝皇帝凡事一定要多听听太后的，并且还要操练军队，治理好国家。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御筆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融和

賜

經筵講官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臣瞿鴻禨

慈禧太后御笔——融和

恭亲王的死非常重要。一方面，满洲达贵中失去了一位地位极高的老前辈，一位老练稳重的指导者。就国事来说，这些满人都是些观念极其狭隘，排斥汉人的心理相当严重，只有恭亲王能用自己的威望给他们施压。另外，恭亲王当时是道光皇帝唯一的还在世的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与慈禧太后相抗衡，他的地位是其他亲王根本不能比的。假如他还在世的话，义和拳的混乱也许能避免。另外一点，光绪皇帝有事常常与他商量。他去世后，光绪才轻信了康有为等人的话，着手搞变法维新。尽管恭亲王并不是顽固的保守派，但是如果他在地下有灵，他必定会反对许多的维新之举。对于翁同龢来说，失去了恭亲王就等于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和庇护者。

恭亲王去世后不久，翁同龢就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说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他希望康有为能够取得皇帝的信赖，这样就可以支持南方派来对付满人了。尤其是他的宿敌刚毅和徐桐，一想到他们，他夜不能寐。但是，翁同龢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康有为怂恿了皇帝来对抗太后，甚至设计谋害太后的办法。他原来只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党派的势力罢了。光绪皇帝听从了翁同龢的意见，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康有为。

当时与翁同龢关系非常好的同僚廖寿丰说，他要等这次召见的结果出来，再确定自己以后的行动方向。如果康有为取得了皇帝的信任，他就继续留任原职，否则他就辞职不干了。翁同龢还说，如果端午节皇帝仍给他赏赐的话，就说明自己并没有这个担忧。他唯一担心的是慈禧太后是否会放过自己，他担心自己会遭遇到侍郎张荫堂的命运。张荫堂是广东人，因为他得罪了太后，最后落了个罢官免职回家的下场。不过庆幸得很，康有为等人最终说服了光绪皇帝保留了张荫堂的职务，百日维新时，他成了皇帝的得力助手。而慈禧太后对他则是恨到骨子里了，一直在找机会要除掉他才好。

四月二十，翁同龢请了七天病假，说明他知道在这几天内，朝廷一定有大变故。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第一道变法谕旨，之前他已经到颐和园把此事禀报给了慈禧太后，还召见了荣禄。太后向皇帝保证说，只要变法不触及满洲人的特权，她绝不会阻

挠改革进行。同时，太后还劝皇帝一定要尽快地除掉翁同龢，因为他最近一直在煽动排满浪潮，如果不及时制止他的话，恐怕迟早会危及朝廷。荣禄极力向皇帝推荐一个有名的激进派人物，就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这一点让人感觉有点意思，因为欧洲人大体上都觉得荣禄是个反对变法的老顽固，实际上好像不是如此。对于陈宝箴的儿子，后来荣禄反过来又开始反对这个自己当初推荐的人，倒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突然有了转变，而是因为维新派的做法实在太让人出乎意料，非常危险。光绪皇帝第一道圣旨如下：

多年来，中外的大臣都讲究办事的效率，很多都是要变法而自强。现发布诏书一道，裁掉部队中冗余的士兵，改革教育制度，设立大小学堂，都经过了一再审定，已经筹备成熟，可以稳妥实施了。只是现在改革风气还不够浓厚，大家的态度还有争议之处。有人老于事故，担忧国家命运，认为应当坚守陈规，去除新法，认为新法都是噱头，都是哗众取宠，没有实际意义。试问一下，时局已经摆在眼前，国难当头，如果我们不练兵法，不搞好教育，我们与强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们到时候怎么能抵挡得了别人枪兵利炮呢？所以现在为了国家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改革，特作宣示：

朝内各位大臣，都要努力向上、发愤图强。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能不懂装懂，要务实求精、变无用为有用，成为懂经济的人才。在各省的提倡下，要首先兴办京师大学堂。凡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的各位大臣、各部门的官员、侍卫、州县以下的各级官员的子弟、八旗子弟、武职的后裔，凡事愿意入学的，都可以入学学习，这样可以人才辈出，渡过目前的艰难形势。凡是入学，就必须好好学习，不能敷衍了事。

此道折子发布的第二天，殿试的成绩揭晓，光绪皇帝希望这次考试将是清朝的最后一次旧制度的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定的是一位江苏人，但是慈禧太后却故意改变次序，把一名贵州人选为状元，我们可以看出她憎恨翁同龢，进而憎恨他的同乡。同时朝廷还下了懿旨，奉劝达官贵人的子弟出国留学，甚至鼓励亲王贝勒出国留学，考察国外的政治。这些圣旨在满人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觉得，这些举

动是在挑战朝廷的老根基，这威胁到了满人的统治地位。

第二道圣旨发布后第二天，翁同龢的七天病假期满，他照例在清早四点与军机处的同事们一起去颐和园接受太后的召见，却接到了一道谕旨，免去他的职务。这是慈禧太后代表满人采取的第一步公开举措，是为了保全皇帝，谕旨内容如下：

现发诏书一份，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经协商，以致大家不服，屡次有人上奏提到此事。而且每次召见时，总是喜怒无常，实在太任性，难以胜任现在的重要职位了。本应该查明追究，再严加惩罚，现考虑到他在毓庆宫行走已经有了年头，就不严惩了。翁同龢立即返回原籍，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才这样做的。

另外一道圣旨中，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光绪皇帝已经完全处在太后的权力控制下了。谕旨命令所有新二品以上的官员都需要亲自向太后谢恩。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因为自从中日战争以来，慈禧已经不再每天都参加早朝了，仅仅在她大寿庆典和有特别重要的国事时才会召见各位大臣，当天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将荣禄调到了天津，任命为直隶总督。第二天，光绪皇帝召见荣禄和康有为，他让荣禄训练天津的陆军。荣禄退下后，皇帝与康有为商量了好几个小时（之后这样长时间的召见还有很多次，但是朝廷只记载了这一次）。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是又恨又怕，所以从一开始就在皇帝面前诽谤她，说太后并不是真心要支持这次变法，而且康有为还说，太后的生活太奢侈浪费了，康有为说，南方的汉人之所以反对满人统治国家，主要是因为太后。他还说太后很阴险，比得上唐朝的武则天，奉劝皇帝要把太后打入冷宫。因为她是维新变法的最大障碍。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说的很对，便对他的话全盘接受，后来颁布的所有诏书都是康有为写的。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对变法维新如此热衷，并不是想要富国强民，而是私心很重，他想博得皇帝的信任，掌控大权。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诋毁诽谤太后和荣禄并不是出于他的爱国心，而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只要太后还有权，他就不可能获得什么，地位也不会稳固。

第十三章　百日变法

自从康有为受到了光绪帝的第一次召见，维新变法的诏令就一个接一个地陆续下发。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制度从宋朝延续至今，（除了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有暂停）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历史，而如今被完全取消。皇帝下令，今后凡是要进入仕途的人，除了学习古典经史之外，还必须学习实际科目。考生需要对其他各国的历史和当代政治有所了解。

这时，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上奏，他们弹劾吏部上书许应骙（他是广东人，但却是个正宗的守旧派人士），因为他阻碍变法进行。他们请求皇帝“大发龙威，立刻把许应骙的官职降低到四品，以警示他人”。他们的奏折是这样说的：

微臣已经发觉，圣上发愤图强，热心改革事业，尤其关注教育事业以及外交关系。吏部管理全国上下所有学校，不论大小；总理衙门负责我国对外政策；但是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能力不佳，傲慢无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皇上深知彻底改革的迫切性，急于培养人才，还特别开设了政治经济特别考试。但是，许应骙却胆敢无视皇上诏令，公开声称这种考试是无用的创新。他的目的是越来越少的考生能通过考试，以后这种考试会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也就越来越得意。另外，许应骙还诋毁皇上的维新诏书，在与晚辈门生谈话中，他对西学大为贬斥，对所有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视为仇敌。皇上一直担心进步士大夫人数太少，而许应骙还在竭力压制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进步人士。

在总理衙门有时一个词语表达错误就可能引起战争，这个部门的职务非常重要，掌管者要熟知外交事务，了解敌人妄想伤害我们的企图，否则就不能胜任该部门的工作。许应骙远非一个杰出的士大夫，他不通国学，还鄙视洋务，如此自负的人又怎能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利

益，维护我国的尊严呢？微臣以为，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大臣，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妨碍变革维新，对皇上的懿旨竟然违抗，应该把他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职务以及礼部尚书的职务立即免去，好给那些守旧的保守派大臣一个警示。如果皇上把他的官位降到四品，洋人就不敢讥讽我们大清朝廷，我们才能顺顺当当地进行维新变革大业。

看了以上的这份奏折后，光绪帝下令许应骙回奏，解释他的行为。下面就是他回奏的内容，明眼人可以看出他对康有为很不满：

微臣觉得，由于自己为人正直，所以树立了不少敌人，感谢圣上能赐予臣这样一个大好机会来表述臣的本心。宋伯鲁和杨深秀等说臣诽谤皇上的维新诏书，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怎么知道臣脑子里在想什么？臣与李鸿章都大力赞成设立政治经济科目的考试，不过我认为，做这件事必须格外小心，如果录进的条件过于宽泛，使得考生们进来过于容易，太多的通过者中不免会混进一些滥竽充数者，这样的话一定会危及改革的大目标。所以我和礼部的其他同事们商量后认为，要折中一点为好，条件既不能太苛刻，也不能过于宽松。如今，我们还没有呈上奏折，宋、杨两位御史又怎么知道我们就反对变法了呢？看来他们的结论仅仅是处于个人主观捏造、无中生有罢了。而且，皇上下诏的许多改革方针，比如要废除科举考试、裁掉冗余军队，这些都和我们礼部没有关系。再说了，二位御史指责微臣接见后辈门生时贬低西学，与进步学者为敌。臣出生于广东，对洋务熟知，凡是对西方的技艺与科学擅长的人，我都会推荐他们，比如精通洋枪设计的华庭春、精通制造枪炮的方耀等人。臣接见后辈门生时，常常劝诫他们要取各家之长处，通晓当今政务，讲求实际，不可有浮华风气。

御史们指责我视开明士大夫为仇敌，他们显然是指康有为。康有为与我是同乡，我早年就知道他年轻时人品不行。他参加完乡试回家乡后，多次遭到乡里人的投诉，早已经臭名在外。到了北京后，康有为与御史们为友，结交某些高官，他充分利用自己所谓的西学知识，一心希望谋求一个肥缺。康有为曾经三次到臣府上求见，因为臣太了解他的为人了，所以臣一直拒绝接见他。后来，康有为在广东会馆私

自成立了一个协会，召集了二百多号人。臣担心他们会找茬犯事，所以臣命令他把协会解散。因此，康有为对我一直不满，后来，皇上召见了他，他就对同乡们夸耀自己一定会谋得高位；但是，他最终仅仅当了个总理衙门办事员，他很失望，满肚牢骚。因为臣掌管总理衙门，康有为便散布谣言攻击臣，而且他怂恿御史弹劾我，企图代替臣的位置，这就是他的一贯品行，是他的卑鄙伎俩。大学士李鸿藻过去曾经这样说过，当今许多人借用西学来夸耀自己，实际他们往往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碌碌无为之辈，他们就是哗众取宠，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康有为有许多怪异的点子，他企图剽窃一些西方报刊上的文章，说是自己的观点，轻视我们的古典文献。他提出的建议都完全是不实用的，他的动机经不起任何论证。假如还让他继续待在北京总理衙门，他和他的同党勾结起来，一定会密谋肇事，惹出什么乱子的。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挑起党派纷争，天下乱了，他们就开心了。康有为是个祸水，威胁国家政权，这绝不是小事一桩，臣对康有为这股邪恶祸水简直恨到骨子里了，的确如同御史们所讲，臣视康有为为仇敌。宋、杨两位御史还指责臣鄙视西学。圣上召见臣时，臣也多次强调了开矿、建船以及提供战争用的火药的重要性，圣上一定知道臣真正在想什么，他们绝对是在无中生有的指控臣。但是，现在总理衙门和外国协商的事情日益增多，各种事情的处理也很困难，光做口舌方面的争辩对臣的地位不会有丝毫提高。因此，微臣请求圣上免掉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因为臣学识浅陋，实在不能胜任，这样流言蜚语估计才会平息。

许应骙竟然毫无顾忌地谴责康有为的不是，皇上看了奏折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许应骙是太后所看好的人，如果真免了他的职务，就得罪了太后，他不敢鼓起勇气跟太后过不去。两位御史以及许应骙的奏折都经太后批阅过了，许提到的康有为的革命激进思想给太后提了醒。从那以后，尽管太后没有公然反对变法，但是她已经开始悄悄警惕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唯恐他的影响会误导皇上的决策。她一直在看时机要把康除掉，只要她说一句话，皇帝一定会除掉他的，对这一点她很自信。当直隶总督荣禄到达天津上任时，原来的总督王文韶完成交接任务后回到京城，太后特别召见了他。王文韶赞同许应骙的观

点，他认为对皇上新颁布的措施应该持谨慎态度。光绪帝颁布一道诏书，允许许应骥保留原职，但同时提醒他，担任礼部和总理衙门的最高位，应该把更多精力放上去。而许应骥把这看成是太后对自己的保护，所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他比过去更加反对变法，因为有满人尚书怀塔布（慈禧的表亲）的支持，他更加坚定地站在极端保守派这边了。

光绪帝再下一道谕旨，重新组织整顿京城的满族军队，下令开设京师大学堂和各省的中小学堂，研究学习西学。

有一位名叫文悌的御史上奏，指责同僚宋伯鲁和杨深秀嫉妒心太重，看不惯许应骥的高位权大，所以他们找了借口上奏欺君，离间皇帝与太后的关系。光绪帝看了龙颜大怒，说他胡说八道，挑动党派纷争，立刻免去了文悌的御史职务。文悌便请求怀塔布到颐和园去博得太后的同情。



京师大学堂

但是太后却不为所动，因为当时她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谴责皇帝，同时她也打算先随新党胡作非为，然后等时机一到就除掉他们。然而，慈禧也不是完全不闻不问，她把自己的宠信荣禄安排到了军机处，让他向自己汇报京城内发生的大事。荣禄属于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他连同刚毅一起，极力反对维新变法。后来，1900年，裕禄担任直隶总督，他协同刚毅在京城对外国人大肆屠杀，同时他也是义和拳重要头目。当时在军机处办事的有刚毅、王文韶和裕禄三名保守派，不论皇帝颁布什么维新变法诏令，他们三个都从中阻挠维新，使得变革几乎成了空文一张，但是他们要是真想与光绪帝抗衡，首先必须有慈禧太后撑腰，而且要联合荣禄才行。

就在那时，光绪帝因为书写中的一个错字谴责一位御史。然而一周过后，皇帝再下一道诏书，应该是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诏书下令以后殿试招考中书法写字不再考核。在朝廷的某些部门中，书法整齐是必备的要求，但是以后只在某些誊抄员等特别考试参照此科目，其他部门不作要求。

六月初八，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官报局，任命康有为为上海总局的总负责人。这些官报是官办报纸，目的是宣传知识，开启民智。经费由朝廷下拨，每期报纸都要给皇帝预览。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并且康有为要为官报草拟一份规章。

六月二十三，朝廷又发布一道诏书，命令官员们专心办理维新变法事务，不能虎头蛇尾。谕旨中提到："朝廷现有的问题是陈旧陋习过多，所有问题都由于大臣麻木不仁，才导致了如今局面，比如说陈宝箴自从就任湖南巡抚到今天，他一直致力于改革维新，却成了大家攻击的靶子，受到官员、乡绅的谴责。希望各位大臣能体会到朕的良苦用心、同心同德，为了大清朝美好的明天共同奋斗。"

不久，又下发一道谕旨，命令设立水师学堂，作为重建中国海军舰队的预备。并且在北京设立铁路局、矿务局，命令广东的改革维新派梁启超负责译书局，每月提供开支一千两白银，出版外国的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

但是真正让守旧派深感震惊的改革项目还在后面。提倡对陆军进行整顿的直隶总督荣禄上奏朝廷，请求皇上陪同太后乘火车去天津视察军队。光绪帝竟然欣然赞同，决定在九月初五乘坐火车去天津。保守派震惊至极，他们认为太后皇帝坐火车纯属冒险，违背了帝王尊贵的身份。但是慈禧太后本来就喜欢乘坐西苑的小火车游玩，她觉得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掉呢？假如满族亲贵们对此举感到震惊，下一道谕旨的下发才叫真正的打击呢，感觉如同晴天霹雳。朝廷下令取消掉所有冗余的官职，把那些只拿钱不做事的通通清退回去。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满族亲贵们就是这么闲闲散散地、过着逍遥日子，的确是国家的一个沉重包袱。

这道谕旨下发了，它与满清朝代制度出入太大，让保守派们无法接受，谕旨受到了严厉谴责，数不清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到老佛爷身旁，个个都请求老佛爷保护满人特权阶层的利益，取消这道谕旨。但是两天后，更令人受不了的消息传来了，礼部的所有高官，包括尚书许应骥以及太后的亲属怀塔布都被免去官职，因为他们扣押了礼部翰林王照的奏折。王照在他的奏折中建议皇上陪同太后出国游历，先去日本，然后去欧洲。京城中守旧派们意识到，随着维新变法的陆续展开，满清王朝可能就在危险之中。于是保守的高官大臣们一起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说要拯救国家，唯一的途径是老佛爷能听政。太后规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机，虽然事情很紧迫，但是她感觉没到时候呢。

康有为意识到自己前途未卜，但是他看慈禧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误以为她还在犹豫不决中，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劝光绪帝违抗太后。有一次，他对皇帝说，太后说自己同情改革变法，纯属掩人耳目，实际上太后才是真正的阻碍变法的最大阻力，朝廷腐败昏庸，主要就是因为太后的存在。为什么她能每年耗费数百万的国家巨资在颐和园大肆挥霍呢？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发动政变，突然包围太后的住所，控制住她，把她软禁在西苑的一个小岛上，让她在那里了却余生。然后，皇上可以颁布一道谕旨，详细列举她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以后再也不允许她干预政事。这番话是在宫内的一个秘密房间对光绪帝说的，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恰好被李莲英安插在宫内的太监听到了，而且很快就传到了太后耳朵里。听了康有为的慷慨陈词，光绪帝耳根子软，竟然信了他，决定等去天津阅兵回来行动。他心中清楚，这个计划要想成功，自己必须能控制一支可信的军队。同时光绪帝清楚，只要荣禄控制着直隶的新军，他就不容许别人动太后一根指头。所以光绪帝认为他真正的障碍是荣禄，但是他没有看到真正的危险，因为他好像低估了太后的手腕和决策能力。

光绪帝还一直在发布维新变法的新谕旨，其中有一份命令在北京修建新马路，有一份命令招募民兵，还有一份允许八旗子弟可以自由离开北京到地方谋生。七月二十七颁布的谕旨是维新变法的最后一道（后来发生的变故，使人不禁无比感慨），诏书是这样说的：

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实施，我们采用了一些西法，因为中国和欧洲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优秀的政府，为人民造福，西方在这方面已经走了较长的路，我们国家可以借鉴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长处来弥补我们的短处。但是我们的许多士大夫仅仅局限于旧的成见，不知道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他们不知道用西学来开化智力，增加自己的财富。只有这样，健康幸福长寿才能最终真正实现。

朕每晚都在锐意改革大业，力求变法图新，难道我这也算是崇尚新奇的东西吗？我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我所做的要对得起上天和祖宗。我感觉自己还没能尽职，国家还没有完全和平昌盛。而且，如今，外国列强正包围着我们国家，屡次对我们进行侵略威胁。除非我们能够学到他们强盛起来的本领，否则我们就走不出这场灾难。朕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我们的天下子民还没有完全了解，因为反对的因素还在蓄意阻碍我们目标的实现，在全国散布流言，惊扰大家。对我们致力的改革，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说过，我真是又叹又恨啊。现在我将变革实行新法，向天下宣告，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可以上下团结一心，实行新法，中国一定会有更强大的明天！这是朕的心愿。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与新政有关的谕旨，各省的督抚都要迅速抄录下来，切实开导大家。各省州县教官要详细宣讲，做到家喻户晓。各省的道府上书禀报事务，不得有顾忌，要把人民的需要表达出来，不得有丝毫隐瞒不报。这份谕旨要悬挂在全国各省督抚衙门的大堂上，让大家观看学习。

但是，光绪帝的光辉如同昙花一现，他当政的日子就要转瞬即逝，慈禧太后就要再次从颐和园复出了。

第十四章　戊戌政变

1898年8月，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末，慈禧太后和守旧党沆瀣一气，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内幕，慈禧和光绪帝打算9月去天津视察新军，她决定从天津回来后再开始行动。再次出面亲政前，慈禧想与荣禄秘密商量一下。当时南方各省对太后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太后想竭力安抚他们，免得他们在自己亲政时发生暴动。

8月1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同他秘密长谈，商议国事。由于李鸿章的推荐，当时年仅四十的袁世凯官运亨通，连连升迁。但是，他有许多政敌，他们普遍认为：1894年，袁世凯当时担任清政府驻朝鲜特使，由于他一意孤行，才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向朝廷报告了当时汉城的局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尽管这些奏折没有直接导致战争，却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导致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正中了日本人下怀，他们一直打算挑衅开战，从此清政府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这件事没有影响到袁世凯本人在朝廷的地位和威望。这次光绪帝召见他时，他极力赞扬和推崇新政，光绪对他格外信任，认为他是自己的得力支持者。光绪帝已经清醒，自己现在进退两难，必须要面对老佛爷的势不可挡的权威。

不久前，康有为建议皇帝，任何事情都要自己作决定，慈禧知道后严厉训斥光绪帝，不能轻信康有为的胡言乱语，光绪帝知道，荣禄是老佛爷的忠实走狗，自己不能信任他。如果哪天太后宣布亲政，京城内是没有任何满洲大员敢站起来说不的，而敢于说话的汉族大员也少之又少。如今在京城中他可以信赖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广东人张荫桓，另一个是贵州人李端棻。为了新政，如果要想除去反对势力，他必须控制北洋新军，要控制新军，首先要除去新军的负责人直隶总督荣禄，做所有这一切时，万万不能让太后知道半点风声。于是，光绪

帝接受了康有为、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的建议，决定在天津的总督衙门就地处决，然后带领一万新军连夜赶回京城，将慈禧太后包围在颐和园内。同时，派人捉拿京城新政的主要反对派刚毅、裕禄、怀塔布和许应骥，把他们都押送到刑部大牢中。皇帝召见袁世凯时，向他公开表示，朝廷会一往直前地实行新政。光绪帝问袁世凯，如果让他统帅军队，他愿不愿意效忠于皇帝。袁世凯立马保证："臣一定会报答皇上对我的知遇之恩，只要臣还有一口气，就会为陛下效劳到底。"

光绪帝见袁世凯言辞如此恳切，热忱支持维新变法，立即颁布谕旨：

现在是练兵的紧要关头，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认真稳妥，命他做侍郎候补。责成他专门负责练兵事宜，所有应办的事情，随时可以上奏禀报。现在时局艰难，练兵强国是第一要务。袁世凯应当更为勤勉，切实抓好训练兵士，达成朝廷整顿强化军队的心意。



光绪画像

这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没有提到要除去荣禄的事。袁世凯刚刚从仁寿殿退出，慈禧太后立即要召见他，详细问了光绪帝和他的具体谈话内容，并对袁世凯说：“整顿陆军是重要事务，应当办理，这道谕旨相当通达，但是皇帝办事有些过于匆忙，我怀疑他别有用意。你等皇帝二次召见后，再听从我的指示。”

然后，慈禧命人请来皇帝，让他迅速逮捕康有为，因为他乱加指责太后的生活品德，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大不敬。此时太后已经略微

听说皇上要夺走自己的权力，但没有向他挑明，她并不清楚皇上要囚禁自己以及要杀害荣禄的计划。太后同以往一样，责备皇上对自己越来越不关心了，认为他违背了孝道。光绪帝只得仍然对太后百依百顺，立即捕捉康有为，但是就在那天晚上，太后还在昆明湖上游玩、用膳，皇帝亲笔写了一份密诏，派心腹太监带到了城中。诏书的内容如下：

工部主事康有为，过去命他督办官报局，现在听说他还没出京城，很是诧异。朕深深感觉时局艰难，想找些通达时务人士，与他们商谈变法革新事宜。康有为讲求变法，因此召见过他一次（实际上曾经召见过他多次），让他督办官报，朕认为开办报馆是开通民智的根本所在，必须重视。现筹备一些款子，请他迅速前往上海，不需前来朝廷看望朕了。

接到皇帝的秘密诏书，康有为知道事情非常紧急，在第二天清晨乘坐头班火车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安全抵达塘沽，然后乘坐轮船到达上海。太后听说康有为已经逃离京城，她大发脾气，立即发电报，让荣禄立即去抓获他。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太后的电报比康有为先到达天津），荣禄竟然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这时他还不知道康有为已经谋划要杀害自己了，否则他一定不会让康有为逃脱，但是康有为也不值得荣禄施恩，他一直对荣禄没有任何好感，他痛骂荣禄是次于太后的第二大奸恶之人，是维新派的宿敌。实际上，最初向皇帝推举康有为的大臣中，荣禄便是其中之一，直到他去世，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属于康党。老佛爷听了感到很有趣，也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有那个奸党康有为的消息。当月初二的上午，光绪帝召见了维新派林旭和袁世凯，后者再次向皇帝表明自己要效忠于皇帝。然后，皇帝回到紫禁城中，打算在城内实施自己初定的计划，因为颐和园内的所有太监都是太后的眼线。

此时，光绪帝并没有丧失信心，他满怀希望地认为自己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第二天清晨他颁发的谕旨可以作证，一道谕旨要求新式学堂要教外语，一道命令地方官员要严厉整顿吏治。

初五早晨，袁世凯动身向天津出发前，光绪帝在大内乾清宫最后一次召见了他，这次安排非常机密，免得走漏了风声。大殿幽暗，早晨光线微弱，皇帝最后一次坐在金龙宝殿上（这个位置不久后就由慈禧太后再次占据），他详细布置了袁世凯这次行动的任务：到天津后，立即在东都衙门内把荣禄正法，然后率领亲信部队迅速赶回京城，包围太后的颐和园。皇帝交给袁世凯一支小箭，作为执行皇帝密令的证据，然后督促他赶紧到天津实施计划。另外，光绪帝给了袁世凯一道诏书，钦差任务一办完，立即让他代当直隶总督，返回京城见皇帝。

袁世凯满口答应，表现出一副忠心不二的样子，唯唯诺诺地退出了大殿后，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就坐上头班火车离开了京城。当天早上八点，太后从颐和园移居西苑，她要在这里祭祀蚕神。光绪帝跪在蕴秀门迎接她。

袁世凯中午抵达天津，直接前往总督衙门，见到荣禄，问他是否仍然是自己的结拜弟兄（几年前他们两人曾经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荣禄听了好惊讶，问道：“自然是的。”“这样当然最好不过了，皇上这次派我来天津杀害你，但我不愿意加害于兄长，做对不起太后的事情。”听了这话，荣禄表面上很镇定，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老佛爷竟然还丝毫不知道。然后他说自己要立即回京城，连夜求见太后。袁世凯把皇帝给的诏书交给了荣禄，荣禄立即坐上专车，下午五点多到达北京。

朝廷有规定，地方官员如果没有接到旨意，不可以随意进入京城，更不可以入宫。但是，荣禄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径直来到西苑，不需要太监指引直接来到太后宫中，一边叩头一边大喊太后救命。太后说：“在紫禁城内，你有什么事要我来救你啊？这里没有危险，你不应该来。”荣禄把皇帝密谋的计划全滔滔不绝禀报给了太后。慈禧听了，十分冷静，拿出克服困难险阻的决心与勇气，发挥她身上特有的果敢、刚毅的特长，命令荣禄迅速秘密召集旧党首领，马上全部到西苑觐见太后（此刻皇帝还在紫禁城内）。两小时不到，所有军机大臣、数位满族亲贵（庆亲王请病假，他在有危急情况时通常

这么做）以及六部尚书，包括两位已经免职的尚书许应骥和怀塔布都一一来到西苑。这些王公大臣全部跪在慈禧面前，恳请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挽救大清江山，以免遭到夷人的伤害。经过协商，最后决定把紫禁城中所有侍卫都换掉，让荣禄从天津带来的新兵代替，荣禄立刻返回天津整兵待命，会议直到半夜才结束。第二天凌晨五点半，皇帝到中和殿阅览礼部草拟祭文，准备在秋季社稷坛祭祀大典上宣读。可是，皇帝刚刚踏出殿门一步，就被侍卫太监挟持住，动弹不得，被逮到了西苑湖中一座小岛（瀛台），他们说太后马上会来见他。随后慈禧用皇帝名义颁发了一道诏书：

现在属于时局艰难时期，国家事务繁多，朕每天通宵达旦，日理万机。同治年间到如今，两宫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协助打理朝政，共渡难关，事事办得尽善尽美。目前，以国家社稷为重，朕再三恳请太后训政，如果太后能接受，是天下万民的福分。从今天开始，在便殿办事。从本月初八，朕率各位王公大臣在勤政殿行大礼，一切该行的礼节先让个衙门预备起来。

随后太后又下发一道谕旨，免去了御史宋伯鲁的官职，因为他早已身败名裂、臭名昭著，就是他推荐了匪党梁启超。太后非常痛恨宋御史，他最近还上奏朝廷，弹劾太后的品行不良，太后只要想到这里，就咬牙切齿。但是，宋御史毕竟没有参与密谋太后一案，所以太后也就赦免了他的死罪。

太后前往瀛台，随身只有李莲英一人陪同。光绪帝身边原来的太监现在都全换成了李莲英的手下，原来的那些太监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发往军台卖命效力。有个满人曾经从慈禧弟弟桂祥那边听说了太后和皇帝会面的情景，下面是他的说法：太后面色相当严肃，一本正经地告诉皇帝，她决定饶恕他一命，暂时让他保留皇位，但从今以后，他会被严密看守，他的所有言谈举止都会有专人禀报给太后。原来所推行的维新政策，太后原来是没有意见的，没想到皇帝愚蠢到荒唐的地步，胆大包天，导致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新政从今起立刻废除。慈禧又面向皇上，责问他怎么竟敢忘了太后对他的大恩，从他五岁开始就把他接进宫，立为皇上，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到成年，又

把国家大任托付给他。其实，他没有资格做皇帝，他就是个傀儡罢了，她只需一句话就能废黜他。太后说，满族大员都想废黜皇帝，恳请太后训政。汉族大臣中确实有人支持皇帝，但都是奸臣，日后都会被依法处置。当时，珍妃（在所有皇妃中得到皇帝宠爱的好像只有她一人）跪在太后面前，请求太后不要再训斥皇帝了，并且说皇上是名正言顺的一国之主，作为太后，也不可以想废黜就废黜皇帝的。慈禧听完这话，勃然大怒，命人把她立刻带走，囚禁到宫中另外的地方。1900年，太后找了借口把这位胆大口快的珍妃处死了，这才平复了她的报复之心。



珍妃

慈禧命令皇后留在皇帝身旁，尽管皇帝不愿同裕隆皇后讲话，但是皇后作为太后的侄女，依然很尽职，向太后禀报皇帝的一言一行。除了皇后和太监，只要太后不在场，皇帝不愿见任何人。

直到临死前，皇帝只恨袁世凯一个人，正是因为他背叛自己，皇

帝秘密计划的治国方案才成了水中花；正是由于他的背叛，他才有了今天被囚禁于瀛台的日子，孤苦地煎熬了二十三个月，简直是度日如年。光绪的临终遗言就是让弟弟们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苦难的一生，找到袁世凯报仇雪恨。对于荣禄，光绪帝没有怨恨，认为他忠于太后是他应尽的责任。而且他本来就打算除掉人家，更不能责怪人家对自己不忠了。而太后迁怒于皇上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也设计谋划要软禁她的。但是，袁世凯不同，他当时可是对皇上保证得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效力于他的，哪知最后却翻脸不认人，出卖了他。后来，袁世凯当上了直隶总督，皇帝被迫召见他，但不愿同他讲一句话。

如今，袁世凯已经被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免职，整天生活在郁郁寡欢和诚惶诚恐中。皇宫中的复杂关系永远主宰着人们的命运，每天都有人欢喜有人悲伤。

第十五章　三度垂帘

光绪的统治时期画上了句号，他剩下的只有皇帝的空名。他曾经有过机会，他年轻气盛，满怀热情和理想，一心致力于改革变法，决意与黑暗的朝廷高层进行顽强搏斗，结果却输尽了血本。同治帝归天后，慈禧满足了自己一心想统治全国的野心。她曾把国家大权交给自己的外甥，自己撤帘归隐颐和园，放心大胆地让光绪帝管理国家大政。现在他又把国家引到麻烦的危险之地，如果太后同意各位大臣的意见，再次垂帘听政，该指责的绝不是她，而是老天的刻意安排。二十三年前，儿子同治帝行为放纵，导致早逝，慈禧二度垂帘。现在，二十三年后，光绪帝愚昧昏庸，慈禧三度垂帘。所有这一切都是皇帝自食其果，和太后没有关系。大家都说，同治和光绪天生注定没有当皇帝的命，所有大权最终都要回归太后之手中，太后在这当中所起到的小小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不必考虑太多。

光绪帝的统治时期结束了，给他留下了羸弱的身体和忧虑的心灵。但是，慈禧对自己的不完全统治很不过瘾，她的需要更多。自从可怜的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的那天开始，慈禧就开始按自己的老办法，着手让他“宾天”，然后自己在皇室亲属中落实一名小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了。但是，由于南方各省份革命情绪高涨，欧洲各国可能会出于同情，进行干涉，慈禧在这当口必须谨慎。十月初，京城流言遍布，都说皇帝活不过春节了。

光绪帝被囚禁于自己的宫中，他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但是他还是必须扮演傀儡天子，主持每个季节都会照例举行的祭祀大典。八月初八，光绪帝由侍从带领，率领皇宫群臣向慈禧行三跪九叩大礼，请太后训政。当天下午，在荣禄亲兵卫队的护卫下，皇帝来到月坛主持祭祀大典。他如同木偶，举行了繁杂的礼仪，完成了最高祭司的使命。昨日尊贵不再，居于寂寞的瀛台，光绪帝该是什么心绪？

然后，慈禧开始理政，尽管在颐和园隐居多年了，重新执政，她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当年。要想重新当政，她首先必须除掉皇帝的旧人，提拔忠于自己的大臣。



颐和园

中秋节一过，慈禧下谕旨警告皇族，如果有不忠心的，不管他是谁，都要削去爵位，统一严惩。一想到当年载垣叛逆的事情，她心里就异常不安，生怕满族亲贵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份诏书中，贝勒载储被判永久监禁，原因是他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国法难容。更糟糕的是，他娶了慈禧太后的侄女，两人的关系很差。因此，在百日维新开始，载储劝皇帝果断地制止太后干政，此事传到福晋那边，报告给了太后，于是造成了现在的后果。

在戊戌政变后，京城的舆论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皇帝的改革，另一派认为太后及时压制改革是明智之举。但是，官吏中大多都有见利忘义的政治本能，他们对于政治最关心的是权力。所以，大部分显然都是太后一派。另外，慈禧太后精通权术，知道如何转移舆论。通

过太监和茶馆造成舆论，然后传给士大夫，新的舆论逐渐深入人心。于是，大家都知道了，皇帝是个不肖之徒，竟设计陷害太后（在中国这种推崇儒教的国家，这种做法令人羞耻）；另一方面，皇帝还得到了外国人的同情，他们设法支持皇帝（这一点连最开明的中国人都无法替他辩护）。因此，全国上上下下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皇帝缺乏正确的决断和自控力，没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太后理所应当重新掌朝，没有什么可议论的，那些本来还从光绪的维新变法中已经看到中国出现了新时代曙光的外国使节，这时也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

很多年来，外国人就一直在敦促中国的开明人士对政府进行改革，但是光绪帝变法失败后，外国（包括英国在内）的使节很快改变观点，他们都责怪他变法时机过早，行事太轻率。但是，自从1900年后，慈禧太后也逐渐接受了变法思想，认为这是新政的重要手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外交界的态度变化真是太快了。1898年6月，英国使节看到了光绪帝变法的诏书，他们认为“中国清政府终于觉醒了，终于有了觉悟，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到十月，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出逃，来到上海，英国领事派兵船把康有为护送到英国殖民地（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英国即便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也要出面干预清政府的变法）。现在我们发现英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他们觉得，“慈禧和满族亲贵们觉得，维新变法已经伤害了满族在朝廷的利益，他们发动政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是迫于无奈。”

两个月后，英国人好像受到了清政府和平亲善外交政策的影响。克劳德·麦克当纳男爵告诉萨利斯伯格侯爵，说慈禧在她六十四岁生日那一天，召见了七位外交使节的夫人，“太后待客极为周到热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另外，按照外交礼节，光绪帝也出来与各位使节夫人们象征性地一一握手，就这样，大幕布慢慢落下，维新变法，如果算一场戏，终于以大团圆告终。除了极个别人极度失望，皆大欢喜。

但是，英国等国使臣听到了京城内风言风语，说太后对皇帝采用了非常手腕，这让人格外担心，他们示意清政府不能采取偏激行为，

防止引起欧洲各国的负面舆论。如果他们得知光绪皇帝突然宾天，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听说有外国人插足这件事，中国人义愤填膺；皇帝是废还是立属于中国内政，何况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不用外国人指手画脚。光绪帝喜欢欧洲人的新政，满族亲贵大多持反对意见，他违背了祖宗的规矩，得到外国人的支持，满族和汉族都不能容忍他。

但是，所有的事情很快平息，中国重新走回到了过去的轨道。太后重新掌权，绝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欢欣鼓舞。为了制造舆论，以后能废掉光绪帝，京城中一种说法非常流行：皇帝曾经要密谋杀害太后，所以仅仅废掉他不足以抵罪。士大夫们纷纷口诛笔伐，把光绪帝比成是唐朝一位曾经设计谋害太后的皇帝（762年）。于是，流言遍布，说皇帝不久要归天，好像人们对皇帝的命运都能接受，没有悲痛，因为似乎这是他应有的结局。无论中国南方各省份如何看待皇帝被废的事情，北方人好像对此事没有任何意见，都坦然接受，热火朝天的舆论已经形成，太后用皇帝的名义下了一份诏书，平淡地说皇帝得了不治之症，然后摆摆样子，做了点表面文章，命令各省选派最优秀的医生进京给皇帝诊治。诏书中说："自从四月（维新变法开始时），朕就已经感觉身体不适，到今天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这份诏书可以说是为光绪帝未来的命运作了铺垫，国人没有表示出任何诧异。

当时被派到京城为皇上看病的有一个医生名叫陈莲舫，他医术高明，在全国都有名气，下面是他在京城的见闻以及他为皇帝诊治的情形，他讲述给记者听，发表在《泰晤士报》。

朝廷下发一份谕旨，要求各省派本省最权威的名医奔京城为皇帝诊治病情，苏州知府命令陈莲舫迅速北上。给皇帝看病一向被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况且陈郎中已经七十多岁，身体有些虚弱了，但是皇帝的差使哪里能推得掉呢？知府送来六千辆白银作为来回盘缠和酬谢费用。所以，陈郎中留下自己的两名学徒看店，自己动身去了北京出差。到了北京，他先到军机处报到，当时已经有三位名医已经报到了，法国使馆的德赛夫医生已经到宫里给光绪帝诊治过，这

些日子，他对天子的诊治情况一直是各国使节们的谈资。而对这位法国医生的诊断方法，年迈的陈郎中根本没放在眼里。他给皇帝写的病历和药方很像小说中所提到的欧洲中世纪医生的普遍做法：先毕恭毕敬地把皇上的病症列出来，然后一一指出皇上发热眩晕的原因，最后给出治疗药方。不管怎样，从他的描述中，明眼人可以清楚地看出，皇帝的主要问题是呼吸道方面的（他说已经有十二年了），还说发热是因为身体虚、心力不交导致的。十一月中旬左右，陈郎中离开京城回乡前，皇帝发热有所缓解，病情有减轻的好兆头。可是，老郎中认为，皇帝病因比较复杂，所以他要早早离京（这当然需要贿赂高官）。有人问他皇帝的病到底看得怎样时，他就含含糊糊地说，如果皇上能拖到春节，第二年春天会慢慢好转的，复原还是有希望的。

陈郎中到北京几天后，就有军机处的人带他进宫觐见皇帝。皇帝和老佛爷在大殿南侧的偏殿接见了他。在整个看病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能些许了解到清朝宫廷内部的陈规与陋习。陈郎中按照礼节在偏殿门口跪拜叩头，然后跪着来到皇上面前。皇帝和老佛爷对面而坐，中间放着一张矮矮的小桌子。皇帝面色苍白、面容枯槁、憔悴不堪、喉咙里面明显有痰、头好像还在发热。他是长圆形的脸盘，面庞极其清瘦，鹰钩鼻。陈郎中感觉他像外国人，而太后保养得极好，一眼看上去就属于聪慧、有涵养的人，她对皇帝的病情表现出极其关心的样子，医生一般是不能直接询问皇帝病情的，于是太后代他讲述了各种症状，皇帝坐在一旁只是偶尔点点头表示同意，或者偶尔说一两个字，意思是同意。整个殿中，只听见太后说话的声音。按照皇宫礼节，陈郎中只能一直跪在地上，头一直低着看地，不敢仰视。后来，太后命令他为皇帝把脉。于是他一直是跪着，举手把脉，其实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摸到皇帝的脉象，他只是象征性虚按了一下皇帝的手腕。然后，太后继续述说皇帝的病情，说皇帝的舌苔怎样怎样，又说皇帝口中的咽喉部位都已经溃烂了。但是，由于医生不能亲自作进一步检查，他只能凭借太后不太专业的说法含糊意会。太后说完，陈郎中退了出来，把他给皇帝诊病的病历和治疗的药方全都交给了军机处，让他们转奏皇帝和太后。陈郎中所开的药都是中国的传统中药，专门用于进补虚寒体质的，他还叮嘱病人必须

多加休息，调养身心。

这位老医生的含糊预言果然应验了。光绪帝活过了春节，然后他开始慢慢康复，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太后害怕外国干涉，但主要原因在于，她害怕南方各省的激烈反应，她不敢小视他们的影响。当时两广地区的人民看到同乡的维新派被杀，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排满情绪。他们进京讨伐慈禧，反对满族人统治，他们义愤填膺，只要稍微煽风点火，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南方人也听说了皇帝生命垂危，还听说太后在年底一定会把他废黜，于是各种抗议废黜的奏折接二连三上发到北京，有些发到了各部，但有些直接发给了皇上。其中有份奏章是上海的一位名叫经元善的官员发来的。他上奏的名义是“上海的所有缙绅、士大夫、商人和民众”，他上奏清政府，恳请太后和王公们允许皇帝继续掌政，不要顾虑什么身体欠佳的说法，也不必考虑废黜皇帝的事情。经元善还说道，如今江苏一带人民情绪高昂、异常激动，如果皇帝有什么三长两短，恐怕外国人也一定会出面干涉。慈禧看到这份奏折，怒不可抑，不是因为经元善指责她要设计加害于皇帝，而是因为他竟敢用后果严重来威吓朝廷。于是，太后下旨命令立刻罢免他的职务。经元善害怕慈禧会给他定重罪，火速逃到了澳门，但是他大胆无畏的话语对皇帝而言，显然很有益处。

在所有的省级官员中，称得上勇敢仗义、能为光绪帝说上话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时局动荡不定，朝廷不能对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公开谴责，即使慈禧本人也对他的无畏气节大为赞赏。但是刘坤一的举动让太后很生气。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此人的风格显然不同。张之洞出身名门贵族、才多学广，但是他是个骑墙派，变化多端。变法初年，他极力支持变法，仅仅六个月前，他还向光绪帝推荐了几位维新变法人士（其中包括他的门生杨锐）；而且政变发生前皇帝还把他召进军机处，让他主持新政。但是，慈禧太后刚刚宣布支持守旧派，准备再听政，张之洞立即致电老佛爷，声明自己鼎力支持老佛爷，还恳请老佛爷重罚维新派。当然，他的建议对于太后而言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慈禧如果决意要做成什么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头，她绝对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类。

八月十一那天，慈禧太后下旨召荣禄回京，镇压维新变法。刑部上奏太后，恳请派钦差大臣审判维新党。太后命令刑部和军机处共同严审维新派。同时，她下谕旨，立即捉拿张荫桓，把他囚禁到刑部大牢中。张荫桓是光绪帝得力的高级参谋，太后说他“又臭又烂”。在这份谕旨中，慈禧抓住时机，指出“朝中有不少大臣都和维新派有牵连”，但是皇上、太后以慈悲为怀，只是追究了首级要犯的罪过，其余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然后，荣禄又建议太后用皇帝的名义再下发一道诏令，说要废除一切新政。太后训政已经名正言顺了，她还可以借机会宽慰守旧派的势力。从这道诏书中，明眼人可以看出慈禧成熟、老练的政治手腕，既然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维新变法运动所造成的忧患都是因为大臣们没能体谅圣上的意思，这样一来就保全了所有人的面子。下面这一道取消新政的谕示看来很有意思，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被人沿用着，而且清政府即将面临君主立宪的问题，到时一定也很有启示作用。

朝廷下令要振兴全国商务，筹办新政，是为当下的时局考虑，一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着想的。现在要废除新政是朕不得已的苦衷，天下子民一定会体谅朕这么做的。体察今日的民情，感到有所惶恐，感觉各部门做得很不够，大臣似乎并没有体会到朕的苦心，导致某些无识之士胡乱揣度、议论纷纷。举例说吧，本来打算裁减冗余官员，外人不知实情，以为要大改制度了，此类的例子枚不胜举，以讹传讹，影响很坏，如果不下谕示宣告天下，估计民风会变差，与国家变强的本意相差得会越来越远了。所以新政中裁减的各部门分别归并，以达到去除繁冗部门的目的，詹士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都照旧设立，不必裁并。各省份应该裁并冗余人员，朝廷仍然应该敦促各督抚认真淘汰冗余人员。开办事务官报，准许天下子民上书，朝廷可以广开言路，宫廷内外的大臣子民凡是提出的建议都要采纳实施。允许上奏国事的官员可以上奏，表达民意，但是这些奏折有些观点雷同，甚至语言荒诞，参差不齐。其余不应上奏的人员，不允许擅自上奏，这才符合我们大清体制。时务官报对于体制没有好处，只会蛊惑人心，应该立即撤并。大学堂是培养

人才的地方，除了京师和各省已经陆续兴办，其他各省州县计划设立小学堂，应该看各地方的具体情形，根据具体需要设立。各省的寺庙，不作祀典用途的，一切照旧，不必改为学堂。

目前国家形势艰难，一切革新事务必须斟酌，不能流于形式。朕不存在任何成见，大小臣民需要体谅朕的心意，实事求是地帮助朝廷励精图治。



荣禄

荣禄现在已经进入军机处，担任兵部尚书的职务，管制北洋军队，成了全国上下权力最大的官员，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自从在热河避难到现在，荣禄再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太后的忠心，

并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奖励。他在政变中大力镇压新派，无疑会受到大家、特别是外国人的指责。但是，如果站在中国官员的视角，荣禄支持太后对抗皇帝，尽了为人臣的责任。而且，他也很有大臣风度，为人通情达理、谦虚随和、小心谨慎，可以委以重任。后来闹义和拳那段时期，中外舆论普遍谴责荣禄，一部分由于康有为及同僚造谣惑众、诬陷政府，另外由于外国使节存在偏见、以讹传讹。后面我们会看到，虽然荣禄当时尽了全力阻止义和拳叛乱，尽一切努力劝阻太后，防止造成大错，无法挽回。在一帮缩手缩脚、胆小怕事的满族亲贵中，只有荣禄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慈禧统治中国政府达五十年之久，治国能力强、又忠心耿耿的大臣只有荣禄，曾国藩也得靠他支持。从这一时期直到1903年荣禄去世，他一直陪着太后，忠于职守，是慈禧最得力的参谋大臣。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1900年义和拳时期，看到荣禄虚张声势，慈禧太后一时眼花缭乱，因为极度迷信，在一群满族亲贵的煽动下，她接受了端王等人的建议，暂时削弱了荣禄的权势。但是，如同《景善日记》中所描述的，太后酿成了大错，唯一能与她商量对策，她唯一能信赖的人仍然是荣禄，荣禄更是事事依照太后、说一不二、从没起过二心。

慈禧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有时不会采纳荣禄的建议，但是后来的事实总能证明他的话有先见之明。中国历史起起伏伏，没有规律，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中外，荣禄得到的评价应该比现有的更高。两宫西巡时期，大家造谣中伤了他，荣禄竟然丝毫不知道。所以銮驾回到京城后，他对外国使节态度不冷不热，感觉自己为他们做了许多事，但是对方丝毫不领情，荣禄感到很不平。从此，直到他去世，荣禄常常对自己要好的朋友说，他用强硬手腕反对义和拳，他从不后悔这么做，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要对他忘恩负义，对他持有敌对态度。曾经看过一段记录有关荣禄的话：“当时荣禄之所以那么做，并不是因为他爱外国人，而是出于对太后和朝廷的忠心，但是他的做法恰好符合了外国人的利益，他理应得到他们的赞赏才对。”

关于如何惩办维新派，慈禧太后与荣禄商量对策，讨论了很久。荣禄认为对他们应该严厉惩办，不然不能维护满族统治阶层的威望，

于是，谭嗣同等六人被交到了刑部大堂审讯，荣禄也参与其中，共同审讯，主要是查办康党是如何设计，准备谋害太后这件事。在康有为的居所查到了许多文件资料，其中记载了设计谋害太后的全部计划，于是军机处根据这一点，决定判处六个人死刑。这些维新党人谋害太后的证据确凿无误，处置他们不容任何拖延。当时汉人与满人的党派纷争不断，如果迟迟不作决断，恐怕两派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加深。老佛爷也想赶快了结这件事，答应了军机处的请求。于是，当月十三那天，六人被斩首示众。这些人个个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场的许多人被深深感动。据说，在杨锐的处所，查抄了很多皇帝写给他的信，信中大多写的是攻击、贬低和指责太后的话。文件中还有一份奏折，是杨锐写的，揭发太后道德败坏无耻，与朝廷几位大臣的关系过于暧昧，其中提到了荣禄，这份奏折后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批示。杨锐在奏折中引用了在广东地区广为流行的歌谣，内容都是关于太后的放荡行为。而且他提醒皇帝，如果满族统治结束，罪魁祸首应该是慈禧自己以及她的倒行逆施。这有点像殷纣王的爱妃妲己，最后导致王国灭亡，是一个道理。杨锐把慈禧在颐和园糜烂的生活比作是妲己的酒池肉林。慈禧的追随者严厉镇压维新派时，还为自己辩护，说太后亲眼看到皇帝给杨锐的奏折所作的批示，知道皇帝一定参与了新党的密谋，所以她才决定切断皇帝与这些新党人士的一切联系，她当时毫不手软。

处决谭嗣同等六人的诏令是由慈禧太后在荣禄的帮助下起草的，但是让人感到有趣的是，诏书是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的。诏书是用红笔书写的，为了显示重要性，往往由皇帝用御笔亲自书写。诏书先强调了改革变法的重要，因为朝廷一直为如何治理好国家而焦虑头疼，然后诏书指出，康有为借变法为名，心藏祸水，有不轨企图，想推翻大清朝的统治，幸亏朝廷及早发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诏书中说道：

听说维新乱党私自成立了保国会，说要保中国，但不保大清朝，这种悖逆情形，令人发指。朕恭敬太后，推崇孝道，主张共和。康有为学术怪异，根据他平时的著书立说，都是些离经叛道、无法无天的说法。名义上说要讲求时务，让他担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章京一

职，让他赶紧到上海办官报局，他竟然逗留在京城煽动是非，设计阴谋，如果没有祖宗保佑，这事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康有为是叛逆的头目，目前是在逃的嫌疑犯，各省的督抚，一定要严密查办，一旦抓获，必须极刑惩办。

然后，诏书下令立即处死几名康党要犯：首先是梁启超，他学识广博，后来逃到日本，在那里创办了一份威望很高的报纸，其次是三名军机章京，他们被关押在刑部大牢中准备随时发落；接着，诏书说，军机处认为，如果不加紧处决他们这等人，恐怕日久生事，所以处决六名新党手续全部免除，立即斩首示众。

处理完毕这六名康有为的同党以及帮凶后，诏书再一次强调了他们的滔滔罪行：

众所周知，我朝是礼仪之邦，像康有为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天理难容，群民共愤。有些人被他们迷惑，心甘情愿跟随其后，朝廷也都有所洞察。朕心胸宽广，现降下谕旨，一概不予追究株连，以显示我朝宽宏大量。以后凡是大小官员，必须以此事为戒，共同渡过艰难时局。

尽管圣上“心胸宽广”，慈禧宣布除了处决六位重要维新党派的重犯，不再株连其余人，但是一想到他们竟然预谋设计加害于自己，慈禧不禁怒火中烧。上面提到的那份诏书一下发，慈禧就降下谕旨，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地区，理由含糊不清。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张荫桓曾经禀奏说太后用度过于奢侈，而且更让太后生气的是，英国公使还插手这件事，为张说情。

另外有一份谕旨下令取消皇上和太后去天津阅兵，因为荣禄竭尽全力阻止太后前往，生怕有人要加害于她。尽管慈禧受好奇心驱使，很想离京透气散心，游览天津这个港口城市，但是她最终仍然接受了荣禄的建议。当时，直隶正在加紧整顿陆军，他们的训练非常艰苦，太后命令给北洋军队发奖赏。

荣禄从天津返回北京后，直隶总督的职务由裕禄接管。他是个满

人，思想极为顽固，深得慈禧的信任，是个昏庸无能、不懂事理之辈，后来天津以及周围地区义和拳运动不断发展，他罪责实在太大，不过在敏感的节骨眼上，朝廷对汉人戒心很重。老佛爷觉得，直隶的地位非常重要，只有派一名满人总督坐镇，也许可以防范激进派发动骚乱。

与新党有牵连但一直还没有受到追究的京城大员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礼部尚书李端棻。等了一段时间，眼瞧着朝廷并没有追究自己的责任，李端棻干脆自己上奏，陈述自己犯下的罪行（比如推荐康有为等人入朝），觉得自己应当受罚。这份奏折让人感觉有趣，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内部的几个显著特点。李端棻首先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受责罚，他感谢圣恩；同时他说自己内心非常不安，请太后降罪于他，“以规诫今后大臣合理推荐人才”，慈禧太后的批示同样有趣，批谕使用皇帝的名义下发的：

李端棻上奏提到保举康匪，自己要求接受严惩，该尚书确实受龙恩不浅，但是他不识好歹，胡乱保举匪人，属于投机取巧，应该立即革职查办，发往新疆地区，交给地方官吏严厉惩治，以警戒他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有发生。

太后党对镇压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南方人怒不可抑，他们设立了保皇会，支持光绪皇帝。上海租界的报纸每天都有新评论，肆无忌惮地批评太后，荣禄更是众矢之的，被抨击得体无完肤。这些文章的作者显然受到了在逃新党领袖的怂恿和唆使，称朝廷的行为是在有意排汉，结果必定是全国上下所有重要的职位都由满人担当。另外，其余各省份都出现了排挤外国人的倾向，这些人煽动是非，见太后不满新政、憎恨外国人，他们以为排外会得到太后欢喜。这种情况如果继续维持发展，后果一定会相当严重。当时，一位名叫会章的满族御史上奏朝廷，用朴实的语言向太后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会章在他的奏折中首先为朝廷歌功颂德，说朝廷办事雷厉风行，查出康有为的叛逆罪行方面相当有功，太后会千古流芳。然后，他提到了南方各省的情况：

近来有传言，因为朝廷斩首的几位新党人士都是汉人，流言称皇上和太后想牺牲汉人的利益，借机提高满人在国内的地位。我大清朝一向对待满汉一视同仁，从无二心，这一点人人皆知，然而康党残余分子偏说朝廷偏袒满人，说出话来危及朝廷。

然后，会章建议朝廷在用人时必须小心谨慎，一定要采用忠心耿直的汉人，并对他们的功德予以嘉奖，这样才得人心，谣言会不扑自灭。他还目光敏锐地指出，如果有罪的人遭到了惩罚，那些忠诚人士也应当受到奖励。他建议在过去几个月中凡是上奏朝廷、谴责新政、痛斥新党的人都应该得到升官。最后，会章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汉人忠于朝廷比起满人忠于朝廷更为难得。这种看法一针见血，连精通当政之道的慈禧看了，都连连点头称是。

对于会章的奏折，慈禧太后的批复虽然带有一丝不满，但是却不带痕迹地回避了奏折中谈到的问题。她仅仅强调了朝廷行事的君子作风：坦坦荡荡，不论满汉，统统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奖惩分明。尽管太后表面上对会章提出的问题不以为然，但是，很快会章升职了。同一天，为了表示公平，慈禧所罢免的六个大臣中有一个是满人。另外，由于荣禄曾经推荐过一个新党，太后把他交给了吏部处理，让他们定罪，但是这样做不过是为保全自己的面子罢了。

跟往常一样，如果受到了别人的指责，慈禧就会接连下发几道谕旨，这一次同样不例外。其中有一道谕旨下令要保护内地的外国人和京城中的使馆工作人员；还有一道谕旨警告各省的要员在选择下属时必须小心谨慎；还有一道命令各省督抚，在上奏政事时，禁止谈论党派，因为“朝廷知道他背后暗藏的动机”。

紧随其后，慈禧太后下诏谈论国事，乘机维护自己作为满人代表的政策。现摘录部分如下：

我们大清朝对国家的治理一直都是井井有条、国泰民安、奖惩分明、尽善尽美。在水旱灾年，政府每次都尽力赈灾，帮助人民渡过难关。政府一直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遇到军务，从没有从民间抽丁服役，宫中的侍女也从不多选。圣上圣明，上下同德，朝野相

安无事，共享太平生活。现在竟然出现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人，密谋聚众、胡言乱语、企图乱了国家政务，而且在士大夫中也有一些不明大义的人，接济贼匪，心怀不轨，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愤愤不平，朝廷为了表示宽大，暂时免了他们的株连之罪。

谕旨在最后依然告诫百官要尽职尽业、注重仁孝。

慈禧太后下一步动作是对皇帝刚刚罢黜的太后党的大臣一个个恢复官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许应骙，他之所以被皇帝罢免，是因为他参奏维新派王照。皇帝所重用的大臣都被罢黜，在京城已经找不到一个他可以信赖的大臣和朋友。只有甘肃的藩司增厚上奏，说要为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说情。太后得知后，怒火中烧，罢免了他的官位，从此再没有一人敢为新党说情了。

接着，慈禧把注意力转到了地方各省。恰巧两江总督刘坤一正告病在家休养，他请求辞职回乡。太后严厉训斥他，说朝廷待他并不薄，他怎能凭一点小事就推脱？他仍然应当尽心尽力，慎重选择自己的属下，报效朝廷和国家。

翁同龢胆大妄为，和太后对着干，慈禧每每想到这，心里就愤慨不已。没有给他任何降级处分，便允许他告老还乡，这样做太让他讨便宜了。而且荣禄向来跟翁同龢就合不来，他不愿意在太后面前替翁同龢讲一句好话，于是太后仍然用皇帝的名义下诏严厉训斥他：

翁同龢自从当了朕的老师，辅导无方，从来不讲读经史，而是不时用一些书画古玩使人玩物丧志，况且经常巧借事端，刺探皇帝。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主战主和，甚至信口开河，说出一些奇怪论调，搞得不可收拾。今年春天他又力主要求变法，秘密推举康有为，说他才华出众。朕认为当时时局艰难，一心想奋发图强，说要变法也就同意了。哪里料到康有为乘着变法时机，搞阴谋诡计，企图颠覆国家政府。因为翁同龢推举贼匪，他的罪过不可逃脱。其他方面他凡是上奏一些重要事件，只要朕稍有几句反驳，他就袖子甩甩，表示不悦，甚至还恫吓要挟朕，什么花招都使用。飞扬跋扈的态度，让人不免痛恨不已。现令他回江苏原籍，也不能平息朕心中的怒火。让他立

即停职，永远不会再用，交给地方政府严厉管教，不准在地方滋生任何是非。

翁同龢返回老家江苏常熟，直到他1904年病逝前，凡是知道他的人，都对他敬爱有加。在中国，凡是当过高官的人，一旦告老回乡，都不问国事，尽享天伦之乐。但是翁同龢与他们不同，回乡后，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在老佛爷去世后自己还能进京官复原职，自己还能继续帮助皇帝实施新政。当他回原籍后，就成了地方官吏严厉管束之人，但是他给当地知县带来了不少烦恼。因为他每个月都要拜见知县三次，叩头便说："县官老爷奉皇上谕旨秘密看管我的一言一行，我特来县衙门听候处分，请大老爷奉召行事。"当时县官都很尴尬窘迫，因为世事难料，谁知道这位曾经权重天下的大学士以后会不会官复原职呢？而且翁家在常熟也是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很有势力，除了拜见县官，翁同龢每天的娱乐就是文字，他往来的信件也在那一阵出版问世了。

这些书信充分反映了翁同龢在行文作诗方面的才华相当出众，他写的文章浅显易懂，而且蕴含哲理，深受当时士大夫的欣赏和喜爱。尽管他被罢官，但是朝廷对他的家产丝毫未动，他能够在家安享晚年，比在京城忙于国事时过得舒适惬意得多了。直到他去世，翁同龢的才学和爱国情结一直为远近各地的人民所称颂。

慈禧太后知道，皇帝变法维新，取消了科举制度，全国上下怨声载道。于是，慈禧下谕旨恢复科举制，守旧派高兴得争先恐后为太后歌功颂德，这足以显示她笼络人心的本领。原来在科举考试时，所有的试卷是密封信息批阅的，考官看不到考生的信息，但是新式考试不是这样，这样做让很多人不满意，他们非常反对，太后下发如下谕旨：

奉慈禧太后谕旨：国家用四书文章方面的考试选拔人才，二百年来，选拔了许多人才。近年来，文风日下，各省的考生往往抄袭，试卷雷同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新出现的，而是应试者搞不清文体，不揣摩根本，学非所用，是制度不完善的表现。科举制度从

唐宋沿用至今，吟诗作赋，当然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但是现在有一些考生心术不正，考风日下。现在特别宣示：今后的乡试、会试以及岁考、科考都沿用旧的制度，仍然采用四书经文方面的考试，经济科的考试容易产生舞弊行为，暂时停考。今后的应试考生必须去除浮华，推崇认真的学问，不能辜负朝廷培养人才的用意。国家需要富强，地方必须力求发展，不能徒有虚名。所有农工商各业，都必须大力整顿，总局设在京城。仍然应该责成各省的督抚在各省设立分局，分门别类，认真详细地加以考核，才会有实效。命直隶总督选派恰当官员，督促办理进度。

慈禧太后的心思相当细致缜密，她考虑问题周全。她希望全国上上下下，不管满汉，所有官民都能对自己爱戴有加，同时也为了调整她一直引以为豪的党派平衡术，她又下了一道谕旨。朝廷处死了维新派的首领，慈禧一直担心会遭到人民的非议，在这道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忧虑：

奉慈禧太后谕旨：治理国家，从古至今，必须遵守纲常。有些道理偏于陈旧，需要根据当时情况作必要的变通，没有定法可循。历史上中外积留下来的弊端过多过深，必须因时制宜，大力整顿。有些匪贼，口上说要变法，改革国家，但是一心想煽动是非，有逆反之心，所以我们不得已必须对他们加以严惩，遏制逆流。一切跟政治有关的国计民生的事情，不管新旧，需要一样一样推行，不能因噎废食。现降下谕旨宣示，大小官员，应该都能体谅朕的心意。胡言乱语的大臣，往往胸中没有定识，在国内有叛乱的紧急时期，能够有真知灼见、防微杜渐的大臣并不多见。所以，朝中用人必须不偏不倚。以后，大小官员务必要做人做事清清白白，只做对时局有益的事，不得妄自揣测。是对是错，自有洞察之人。特下发谕旨一份。

慈禧太后又念及百姓疾苦，下令有关部门大力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免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再受任何损失。同时，她深知，黄河工程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弊端，治理官员侵吞公款已成了惯例，仅仅凭借朝廷诏书，根本改变不了这种诟病。谕旨中提到，朝廷每年都拨款巨资修缮黄河，为何没有成效呢？太后亲自与军机处的各部门大臣以及

都察院商量，但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后来又派李鸿章到实地考察，估算修建水库的成本，结果他无功而返。

重掌大权的慈禧太后与1861年挫败载垣的阴谋后一样，一旦垂帘听政，便考虑周密、措施灵活。从各种谕旨中，明眼人可以看出，处理过黄河工程后，慈禧太后又密切关注另外一个困扰百姓的政府弊端：百姓到官府告状，案件却常常无故拖延，不仅诉讼费用昂贵，而且让百姓身心受苦，伤口很难愈合。

这样的诉讼案存在很多弊端，中国人都很清楚，但是官方很少有文献档案记载。而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尖锐地斥责官员们的行为，她的坦率性格在其他统治者的身上很难看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都感觉老佛爷是个心地善良、体恤民间疾苦的统治者吧。但是，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的农民和商人却认为，老佛爷心地善良虽然是好事，但她有时过于仁慈，在很多情况下会带来危害，北京人认为，1900年八国联军没有来京城以前，城内的外国人和中国的基督徒们之所以没有被杀尽，都是因为老佛爷太过于仁慈了。在这道有关诉讼的谕旨中，太后指出，她最近听说有一些诉讼案件长期不解决，有些拖延滞留长达几个月，使得无辜老百姓长期被关押，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在案件滞留期间体现出的种种弊端枚不胜举。试想，一个人受了牢狱之灾，全家人跟着不安，如果百姓不是含冤负屈，他们也不会轻易涉及诉讼，委身于官府。但是，许多官员全不为百姓考虑，着实让人痛恨不已。现命令刑部都察院以及各省的督抚详细制定一份诉讼章程，严格审核官吏的功过。如果再出现不尽心职守的官吏，立即严厉惩办，绝不纵容。

还有一道圣旨也能看出圣母的慈爱之心以及她要安抚民心的愿望：

奉慈禧懿旨：近来各省上奏的、就地正法案件中，盗窃案最多。盗贼的情节恶劣，但是其愚昧也让人怜悯。凡是当盗贼的，都是由于饥寒所迫，沦落为匪徒，本来心中没想要犯法却犯了法。

这些人都不是懦弱无能之辈，假如埋头务农，应该能有营生之路；认真干某一行，也能有晋升的机会，现在沦落为囚犯，是得还是失呢？而且一旦事发，还连累了父母妻儿，捶捶心口自己问问自己，安心吗？虽然朕处于深宫中，没有一刻不念及民生，现特别训诫人民：凡我大清子民，请体恤朝廷的一片苦心，做良民，不要触碰到法网中。现命令各省督抚，必须明确告知百姓，即使身处偏僻地方也要做到这一点，请明白圣上的良苦用心。

当时驻京的英国公使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以及国外舆论，对光绪帝的处境都深表同情，慈禧太后感到很不平。但是，慈禧忍气吞声，她借鉴了从古代经书中学习的办法：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予以报复。于是，在初冬时节，慈禧邀请外国公使的夫人入宫，对他们以礼相待，当场就赢得了这些公使夫人们的赞扬声，缓解了太后与外国人之间的隔阂。从那以后，慈禧太后逐渐信任保守的满人刚毅，他趁荣禄离开北京期间，说服了太后：如果要整顿全国军队，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训练各乡勇士。外国传教士在山东等省密切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训练乡勇的目的主要是对付外国人，出主意的人是刚毅，而太后听信了他。



慈禧和公使夫人们

下面的这道谕旨在年底发布，内容很显然受到了刚毅等人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义和拳运动的开始和宣言书：

从来都说君民是一家，上下同心，凡属于地方应该办的事情，虽然圣上心里着急，但是办成还在地方。比如积谷、保甲团练等事都属于平常事情，只要出实力认真办好，一定有利无弊。只要储存了足够粮食，即使歉收也能应付荒年，只要保甲就能对付盗匪，团练了就能做到全民懂兵的道理。

从直隶、奉天、山东、山西开始，以及各省的将军督抚，务必通知到乡民，把以上的各项，认真兴办。原来有章程的，需要加以重新修订。没有章程的，协商后拟定。先从各省省会办起，推行到全省各邑，迅速按照章程进行，慢慢逐渐扩充。

谕旨中的其他内容大多是些寻常的告诫语言，不太重要。仅仅从这道谕旨中，我们无法判断慈禧太后是否意识到肆意发展乡党团练的

后果。直到后来义和拳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国兴起，她仍然犹豫不决，即使我们没有十足的证据，至少能从某种程度上判断，当初她之所以允许团练，主要是听信了刚毅的话，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随着性子做的。不管怎么说，乡勇团练发展的势头相当迅猛。仅仅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又发布一道圣旨，说明她开始意识到乡勇团练对国防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她内心一直就有的想要报复外国人的想法，谕旨中说：

近来因为时事艰难，虽然我整日忙碌，但却没有一刻不想着教化士兵为民服务的事情。这次所发的谕旨，比如训练士兵、发展水利桑蚕、兴办保甲团练、积谷等事宜，都是为了富强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啊。

重复了前一道谕旨的基本点之后，太后牢骚满腹地说：“听说从前各省奉旨应该办的事情，并没有认真办理，不过由院发给有司，由司交府，由府发县，一层推给一层了事，以致事情得不到解决。”她坦率承认了这种对谕旨敷衍了事的态度是相当常见的，历史已久，但她同时指出，现在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了，她命令以后朝廷只要颁布谕旨，一律必须写在黄纸上，广为通告，使得全国上上下下，人尽皆知。

随后，谕旨再次劝诫百官一定要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尽力办好事。太后还命令地方官员应该与乡绅及年老的百姓搞好关系，负责军队操练的官员要加紧训练，大力宣传朝廷设立乡勇的用意。

谕旨在结尾处写道：

平时不要怀有畏难求苟安的心思，遇到紧急事件才能够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保护国家，不辜负这片谆谆告诫的用意。特此下发谕旨。

这道谕旨下面紧接着又下发了一道谕旨，劝勉军队士兵要一心忠于国家，没有太多实际内容，与其他下发给各省大员的谕旨大体相同，勉励他们要尽心尽职，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有些历史学家指

出，慈禧在这一时期频繁下发谕旨，可见她希望改革整顿国家是诚心诚意的。但是，这些谕旨能有多少真正意义，有多少不是空洞的说辞，即使中国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慈禧太后自己没有以身作则，让人们对她心服口服，没有整顿后宫以及整个皇宫奢侈浮华的陋习。

这道谕旨集文学性与政治性于一体，在结尾处老佛爷再次谈到自己的遗憾，曾经要密谋害她的新党康有为现在还逍遥法外，她一直还耿耿于怀，慈禧恐怕大家还不知道康有为的罪孽深重，她再下了如下一道圣旨：

昨天，根据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奏折，得知康有为与逆党有许许多多的来往信件，他还石印出来便于日后阅览。全篇都是逆反言论，甚至还推举谭嗣同做伯里玺（相当于中华共和国总统之职务），说我大清朝不值得他们效力辅佐，每一封信函都没有采用我大清光绪年号，而是孔子后多少多少年。看他种种狂妄逆反的姿态，实在是个乱贼。他的信件往来牵涉许多人，现在朝廷本着宽大原则，不深究株连处理，已经把他的信函全部焚毁。

前段时期因为康有为创立了歪门邪说，煽动惑众，我大清朝不得已揭发了他的乱国罪。一些无知人士对此事议论纷纷。现在抄录他的部分信函，以了解康有为的大逆不道，证据确实可靠。凡是我大清子民，稍微有点知识，读了信就该知道什么是大义所在，不能被他的歪道邪说蒙蔽。

就这样，慈禧太后逐步稳固了自己再次垂帘听政的地位，当然她同时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不久这颗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将极大震撼大清朝的统治。

第十六章　义和团的兴起

许多史学文献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包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原因。这个事件的再进一步的叙述，只会显得很多余。然而，这份摘录——摘自荣禄写给他的好朋友——福建总督许应骙的一封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在直隶（今河北省）义和团运动不断发展的原因，而且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个老佛爷身边最信任的人——荣禄，对他的性格、个人政见和手腕有所了解。这封信是在1900年6月初写的：

义和拳是在山东某县的十八个村庄里兴起的，最初是叫“梅花拳”。在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1895年），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相反，他却把这些拳民收编，组成民兵组织。去年夏天义和团拳民和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山东巡抚以行为不端为由而把带头的将领开除出军队，并且把抓起来的拳民全都释放。义和团的领导者自称是明朝的后裔，义和团有一个女性分支组织以她的名字命名，名叫“红灯照”。去年秋天，由于受到许多人的追捧和支持，义和团运动一直扩展到直隶。景州知县张贴告示劝诫人们不要相信义和团所谓的法术。他说：“义和团不过是白莲教的别称”。这位知县是一个法国传教士的好朋友，山东巡抚听说这件事情，立刻开始调查，然后迅速把这位知县开除了。我对此感到很遗憾，因为王文韶在直隶担任总督期间，我们十分了解他的为人，并且也很尊重他。

去年九月初，义和团拳民公开展示横幅，上面写着：“上天派遣我们剿灭洋鬼子，欢迎你们加入爱国主义民兵组织”。某地，有一个和尚是义和团的领头人物，他带领乱民把当地的教堂焚毁了。后来，当这些人烧毁留坝教民的房屋的时候，当地知县派兵镇压这些拳民，官兵一开火，义和团拳民就撤退了，但是他们的领头被抓获了，并且有三四十个拳民当场被击毙。这向广大百姓证明了这些江湖骗子所谓刀枪不入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尽管这些拳民身上带有咒符，但是我们

的士兵捉拿他们就像捉小鸡一样容易。当地知府经过调查后，立刻处决了他们。

直隶藩司廷雍对于这起祸端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听说十天前他召集自己的下属到衙门集合，共同练习义和拳。正好当时宣化知府路过那里，为表示敬意，他特地登门拜访。他说道：“嘉庆年间，也出现过类似的邪教组织，圣上下令剿灭了这些邪教。”廷雍回答道：“如今时代不同了，您为什么要牵扯以前的事情呢？”宣化知府回答说：“确实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应当遵守圣祖颁布的规定，并且永远把它作为人生的导向。”廷雍对此当然无话可说，只能瞪着眼睛气愤地看着他，沉默一阵过后，他立刻转移了话题。

当时是我第一次看到太后在6月21日颁布的诏书，她派我们把勇猛的义和团拳民全部收编，组成民兵，他们人数众多，太后宣称这些人是爱国人士，在每个省份，应该都把这些勇士全都收编。我一夜未睡，整夜都在思考这件事情，由于睡不着，我总是从床上跳起来，我过于兴奋，脑袋里充斥着一丝欣慰和不安。招募这些具有爱国情怀的志愿兵去抵御外敌本来是件好事，如果能够好好处理，严加管理指挥，毫无疑问，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这些人不可避免会失控，到时候惟一的结果就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且可能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你作为我的老朋友和同僚，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义和团的兴起只是出于激愤的爱国情怀。现在，大多数老百姓和教民互相敌视，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朝廷先前招来洋人，现在在北京城外，朝廷的军队与洋人开战了。毫无疑问，即使我们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我们对于保卫祖国的事业，充满激情。

义和团兴起之初，拳民害怕朝廷官兵剿灭他们，因此不敢当众聚集太多人。仅仅凭借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他们其实骨子里也跟普通人一样，具有恐惧之心。仅仅通过他们自己的说法，我觉得并不可信，对我来说，我认为（您可能认为我的想法有些荒唐）我们可以好好利用他们的狂热，激发士气。作为一个作战军队，他们无论如何对付不了敌人，但是他们所谓的超自然的法术倒是可以用来吓唬敌人。对我们来说，相信他们那些荒谬的说法，或者认为他们能

克敌制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拳民的法术真的灵验，那也只能被归类为邪术。您应该了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信奉迷信思想的邪教，他们最终都落得谋权叛国的下场。

您最近发电报安慰我不要太过焦虑，因为您认为义和团在6月20日天津大沽打的那一仗十分漂亮。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是很确信。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铭记这一点，中国南方和北方士兵的作战能力和脾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南方到处都是地下革命组织、盐贩和其他亡命之徒。这些人就像“易燃物”一样，在任何时刻只要一点燃，便会导致灾难性的熊熊大火。这些南方人大都是赌徒，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但是他们的血液里却丝毫没有一点爱国情怀。如果你把他们绝大多数人收编，组成一个作战部队，就相当于召集了豺狼与猛虎相斗。结果就是老虎没有剿灭，相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就好像无助的小绵羊，痛苦地遭受这一切。另一方面，北方的义和团拳民并不是出于掠夺的欲望，而是出于狂热的宗教热情。如今，正如你所了解的，北方拳民呆板、顽固，南方人虽然个性机敏，却不值得信任。一般情况下，如果使用同一政策管理他们，几乎行不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我军看到倭寇就像看到猛虎一样，吓得纷纷丢盔弃甲，四处奔逃，军机大臣们听说此事后气愤地咬牙切齿。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南方人的性格？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面对敌人？

这些拳民没有经过系统的操练，但是他们时刻准备着作战，有视死如归的精神。看到这些勇士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勇气，见证他们抵御外敌时使出浑身解数的那种激情，着实让人钦佩不已。但是我们仅仅看到了猛夫之勇，想象一下，到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效仿他们，认为我们必定能够把可恶的洋人赶出国门，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此举注定会失败。我建议足下毫不犹豫遵守朝廷颁布的诏书，提高民兵的素质。我向足下提出这样的建议，确保足下能够万无一失地处理接下来的事情。足下可以朝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大步向前进，但是有一件事情千万要记住，就是不要让朝廷的旨意变成乱民谋反的借口。我给足下写这封信时，忧心忡忡、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希望足下能原谅我，这么仓促地给足下写这封信，内容中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希望足下能谅解。我相信足下会回复我、支持我。

第十七章　大臣景善日记

景善是满族人、正白旗，生于1823年。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编修的宋明朝的理学，闻名遐迩。第二年，他担任内务府副大臣，1869年担任内务府大臣，1879年当内务府大总管。景善的父亲桂顺在道光年间担任过大总管，得到皇帝器重。景善家族与太后叶赫那拉氏家族有亲戚关系，并且与满洲各亲贵都有丝丝缕缕的联系。所以，对于朝廷的大小事务以及太后皇上身边的满汉大员的想法和行动，景善都看在眼里。在内务府工作了多年后，1894年辞职回家。他曾经当过端王、载澜以及惇亲王（道光帝的五儿子）其余几个儿子的师傅，所以他跟义和拳运动的头头也很有关系。

1900年8月，北京发起了义和拳运动，轰轰烈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北京城狼藉一片，场面惨不忍睹。在这种局面下，景善的命运让人心酸。当时国家的时局艰难、连年战乱、义和拳拳民滋事、洋人进攻，雪上加霜的是，景善家庭不和：妇女吵嘴、儿女不孝。8月15日，联军进入北京城，两宫逃离北京城，景善的妻妾和儿媳全都自尽身亡。他自己也很命苦，被大儿子恩珠推进了院内的井里。后来，恩珠本人因为包庇暗藏携带武器的拳民，不幸被英国人杀了，作者8月18日在景善的书房中发现了这本日记，幸亏发现及时，不然就毁在大火中了。日记记录了1900年1月到8月期间的事情，大部分记录的都是不重要的家庭琐事，下面所选内容主要写的是慈禧在那年夏天的疯狂惨剧中的系列活动，她强硬的手腕和阴险的策略都跃然纸上，日记中还写了努尔哈赤后裔们的愚昧无知。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景善不是1904年左右离世的敬信。敬信也是一位满族人，深得太后器重，凡是在京城内的外国人都熟悉他，他也曾经担任过各种高官要员，最后当到了军机大臣。1900年两宫离京西巡后，他依然留在北京紫禁城内处理皇宫各种事务。当年9月，他陪同外国使团参观紫禁城，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敬爱有加。

景善也曾经担任过高官，外国人却不是很了解他。但是，英国公使团的文秘定期编辑的“京城和各省份的要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今天，澜公（载澜）来我府上，看望我这个过去的师傅，他和我谈了许多有关义和团的事情。义和团在山东发起，巡抚毓贤大力支持义和拳运动。然后，他和我谈了昨天被召见的事，除了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太后召见的人还有恭亲王、载瀛、载濂、端王等。老佛爷说她准备另选新帝，说道：“当今皇上的上任，国民普遍不满，都说不符合祖宗立下的传位规矩，况且，当年是我极力把皇上扶上来，自打他小时候把他抚养成人，如今皇上却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反而对我不孝，甚至联合南方叛党来陷害我。所以，我提议废了光绪帝，另外选一位新皇帝，暂时定在明年正月初一举行大典。今天召集你们过来，就是想请你们商量一下，皇帝退下来该用什么封号为妥，前面朝代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事情，明朝景泰帝的兄长在蒙古被囚禁了八年，回国后当了皇帝，将他的弟弟降为王爷。”太后话一说完，大殿中寂静无声。过了片刻，军机大臣徐桐建议把退下来的皇帝取封号为昏德公，过去在元朝曾经有宋朝退下的皇帝用过这个号，老佛爷认为这个封号可以接受，挺好的。

她立即表示自己已经有了意向，准备立端王的长子为新皇帝。端王为人老实，人尽皆知，今后他可以经常进宫教新皇帝读书。当时，军机大臣孙家鼐据理力争，请求太后千万不要废了当今的皇帝，一旦皇帝被废黜，恐怕南方会不稳定，可能会有叛乱发生。选新帝的事情应当太后说了算，但只能在皇上百年归天后才能举行。太后听了他的话大怒，对孙家鼐说，这是他们的家庭会议，召见各位王公大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轮不到他说什么话。而且，她已经把这件事告诉皇帝了，皇帝本人没有任何意见。然后，太后命令各位王公大臣去勤政殿恭候他们，等待她和皇上的驾到，一同阅览选新帝的谕旨，决定正式宣布的日子是正月初一。事已敲定，不会再更改了。

于是，各位王公大臣遵照圣旨来到了勤政殿外等候。一会儿，太后乘着轿子到了，身边有几位太监陪同，众人见了连忙跪地叩头。太

后让其余太监在外面等，派李莲英前去恭迎皇上驾到。一会儿，皇帝也乘着轿子到了，他在外门下来，跪地叩见太后。太后现在已经在大殿内的宝座上正襟危坐，她见到皇帝，召皇帝进去，其余大臣仍然跪在外面。皇帝进入殿内，叩头谢恩，太后叫他起身，坐到旁边，又吩咐各位大臣进殿，总共有三十来人进殿了。老佛爷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皇帝只说了一句："太后说得极对，我也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荣禄把军机处早拟好的谕旨呈递给太后。她看了一遍，立刻下发给众人看，众人开始商议新帝的事宜，没有人向皇帝提起他要被废黜的事情。商量完毕，各位王公大臣退殿回去，军机处的留下来听候谕旨。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澜公不清楚，他只说了一句，皇帝神情恍恍惚惚，感觉如同在做梦一般。

除夕夜（1900年1月30日）。今天刘顺帮我剃了头，今晚他要回到保定老家过年了。大儿子恩珠求我给他五十两白银，他想买件貂皮大衣。这个儿子品行不端，是个不孝之子。今天齐秀成来我府上拜访，说他的岳父毓贤很快会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前段时间因为山东境内有一位法国传教士被杀害，所以毓贤的山东巡抚的职务被罢免了。回到京城，受到了太后召见，太后称赞他任期内为人正派诚实，政绩突出，大刀会提出了"把洋人杀尽"的口号，太后说她不赞同，因为她不相信他们真能把洋人杀绝。毓贤常常去端王府上秘密商议事情，端王大言不惭，说如果自己担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他和洋人的交涉必定会易如反掌。从他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他耀武扬威、盛气凌人，实际上，他是个脾气暴躁、举止粗俗、缺乏涵养的人。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今年过了年我已经七十八了，儿子们都在笑我耳背。这些孩子没有一个积极上进，指望他们光宗耀祖是不可能的了。当我二三十岁时，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些许名气，曾经得到过道光皇帝的称赞，他还赏赐给我一轴御书，上面写有朱子的语录。

今年闰八月，大家都认为不吉利。新帝原定是今天即位的，年号定为"恒兴"，但是儿子恩林却对我说，确实是新帝主持了大高殿的新

年祭祀大典，但是他只是名义上代替圣上光绪帝。大阿哥今年十四岁，聪明可爱、伶牙俐齿，但是脾气急躁、粗暴，在祭祀大典时，他从煤山步行到了宫中。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或称龙舟节（1900年6月1日）。今天我早上六点钟起身，在小书房洗漱时，看门的何贵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军机大臣刚毅的名片，还拿来十公斤猪肉，说是给我作过节的节礼。刚毅和赵舒翘去了涿州查看义和拳运动的情形，我不知道刚毅已经回来了，他派人传话过来说今天上午就来拜会我。

儿子恩珠与恩顺今天要到齐秀成府上看戏了，小儿子恩林在颐和园里做事。从今天开始，老佛爷叫戏班子在颐和园唱四天戏。我奇怪为什么刚毅没去呢，可能因为他昨天才回京城，所以明天上午才能正式到班当差吧。

申时（下午三点光景）。刚毅上午来过了，我留他一起吃饭。刚毅是我小舅子，为人善良忠厚，比我小二十岁，和其余军机大臣一样，聪明灵活、办事谨慎。他对我说，昨晚又有几百位洋鬼子打进城里来了。他和赵舒翘是昨天下午四点半钟到北京的，一回来就忙着写奏折，打算明天早朝呈递给太后，说老天派来了义和团，要把洋人打尽。端王已经告假五天了，刚毅昨晚上去拜见了他。两人正谈论着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局，庆亲王派了侍卫统领给端王送来一封信，说有三百名洋鬼子昨天下午从天津出发，正前来北京保卫使馆。庆亲王说，区区几百名洋鬼子，没什么好怕的。端王命令他的部下对这帮洋人不要反攻，放他们进城得了，况且老佛爷也是这个意思。端王向统领询问具体情况，他说庆亲王已经收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发过来的电报，里面说这帮洋人没有携带洋枪洋炮。听了这话，端王眼睛一斜，轻蔑地放声大笑：“就几百个洋鬼子，我们怕他们什么？我们人多力量大，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刚毅却奉劝端王下令步兵统帅崇礼，让他不能放鬼子进城，但是荣禄已经发出命令，允许他们进城。刚毅对这个决定很不满意，非常恼火，他不明白荣禄这样做，到底安的什么心。大概是去年年底，端王和荣禄已经商议过，如果太后废了皇帝，就一齐拥护端王的长子做大阿哥。端王坦率地说，如果荣禄不是太后最器重

的心腹之人，她一定不会同意立端王的儿子做大阿哥的。但是现在，荣禄坚决抵制义和团，奉劝太后不能相信这帮人。只要荣禄反对，端王和刚毅就别指望太后能鼎力支持义和团。有件事情足以证明太后对义和团的真实态度，端王告诉刚毅，最近有一天大阿哥身上穿了一套义和团拳民的服饰，在颐和园空地上与太监们一起切磋拳艺，正在他们谈得投机时，被老佛爷撞见了，老佛爷立即命他回书房学习，她一面催促，一面还指责徐桐是怎么教育的学生，没把学生看管好，竟然随着大阿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让外人知道了，不是丢脸吗？

从端王府起身告辞出来，刚毅从前门出了城，恰好迎面碰到洋人进城。旁观的百姓只敢动口辱骂，但都不敢动手打人。不过，有什么好怕的？他们进来了，就别指望出去，他们迟早要命丧北京城。刚毅这次前往涿州，他相信直隶人民必定会同心协力，扶植大清、剿灭鬼子，连小孩都在学习拳术呢。大家信心满满，这回一定能把鬼子赶出中国，一个也不剩！涿州的知县是个姓康的人，他曾经捕获了几名义和拳首领，但是刚毅和赵舒翘下令把他们全都释放出狱，还命令他们表演拳术。其中几个人被枪射中几发，竟然还能从地面跳起来，没有任何损伤，不禁让人称奇，太神了！这回的表演设在县衙大院子里进行，围观表演的群众把大院包围得水泄不通。赵舒翘说，很多年前他在陕西老家，也曾经见到过这样的表演。东汉末年，张角率领数十万黄巾军造反政府，攻进都城，无论打到哪里，都是所向披靡。他们自己说有玉皇大帝在保佑他们，刀枪不入。明天，刚毅和赵舒翘将会入朝觐见太后，他们会对太后讲述自己的奇遇，请求太后改变对义和拳的态度，把义和团收下，整编为军队，让端王和刚毅直接指挥，因为北洋陆军统帅荣禄不相信义和团能够抵御洋人的进攻。

虽然大总管太监李莲英热捧义和团，他常常和太后讲述自己看到的拳民的神奇事迹。但是，前面说了，只要荣禄有一丝反对，太后就绝不会相信李莲英的半句。另外，太后年龄上升了，她喜爱和平。我知道太后是个怎样的人，她一向性情温和，喜欢吟诗作画，爱听听戏曲。但是她有时发怒，人见人怕。我父亲曾经当过内务府总管大臣，有一次他亲眼看到太后勃然大怒。那是在同治六年（1868年），太后听说山东巡抚奉东宫太后的旨意，杀死了总管太监——小安子，她简

直是怒发冲冠，训斥内务府所有大臣，说他们联合起来欺骗她，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只有她一个人蒙在鼓里。太后还说，恭亲王曾经要谋害她，她身边的大臣侍卫都跟此事有关系。内务府严刑拷打，逼问安德海随行的小太监，以查出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太后着人把查出的人乱棍打死，可见她发起怒来，威力很大。如今，太后到了晚年，心肠也软了，即便对洋人也是一样心软，不允许国人随便伤害他们。其实只要太后说一句话，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就会被斩尽杀绝，洋人的居所也会被烧成灰烬。刚毅坐了大约两个时辰，就起身要走，准备前往端王府，今天下午大总管李莲英要进城办事。

工部侍郎康秀也来拜访我。他说，庆亲王私底下谈话时常常取笑义和拳，说他们没什么本事，不值得聪明人一笑。

但是，他在公共场合还是相当谨小慎微的。上周老佛爷问他关于义和拳的意见，他模棱两可地说练习拳术可以保卫国家。

晚上九点钟，恩珠在齐秀成府上看完大戏回来，说大家对荣禄风言风语，说他昨天不应该把洋人放进京城里来。齐秀成的岳父毓贤从山西写来信件，说山西的百姓很少有人报名练习拳术，但他说他一定要尽力提倡，使得山西能赶上北方其他省份的氛围，共同击灭洋人。有人传言，说袁世凯已经皈依基督教派，如果让他压制山东的义和拳拳民，必定得不偿失。

恩珠的老婆非常不孝，今天晚上跟我的小妾发生了口水战，甚至大打出手。孔子曾经说过：女人与小人最难养，距离远了，他们怨恨你，距离近了，他们对你不好。我今年已经七十八了，却常常因为家务事烦心头疼，我无法忍受家人不讲道理。

五月十二（1900年6月8日）。恩铭中午回家，他在当侍卫，刚刚陪同太后从颐和园进城了。荣禄昨天早晨去了颐和园和太后详谈了很久。听荣禄详细地描述了拳民们如何烧毁铁路，太后大惊失色，决定立刻返回南海的西苑。听说拳民刀枪不入，太后将信将疑。荣禄又告假几天。只要荣禄不在军机处，刚毅和启秀一定会受器重。恩铭说，进城前，太后心里火急火燎的，一直催轿夫快跑，手里拿着手绢

扇风祛热。到了西苑瀛秀门，皇上和大阿哥已经跪在门口迎接，一入宫，太后就传见端王，两人商量了很久。可惜老佛爷不是当机立断的人，而皇帝受召见时基本不说话。董福祥已经到了京城，他胆子很大，今天在殿里弹劾荣禄，说他率领部队五天内就可以烧尽京城所有使馆，但是荣禄从中捣乱，是背叛朝廷的奸臣。董福祥还说，如果不趁早把洋人除掉，国家难免会有祸患。董福祥是个粗人，对满族人态度比较粗暴，刚毅厌恶他的为人，但是感觉眼下可以利用他。

五月十四（6月10日），军机大臣启秀来看我。他给我看了一份已经拟好的上谕，内容就是要断绝与外国人的一切关系往来。上谕只要等太后盖了国玺就行，但是太后还是犹豫不定，还没有决定要与洋人开火决战。午后，我去了澜公府上，今天是他夫人的生日，我去登门庆贺。澜府外面的院里住了一百多名拳民，大部分是农村来的乡民，首领名叫文顺。当中还有五六个孩子，大概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他们练功就像痴迷了一般，口中直吐白沫，用力一跃而起，从前面抓起一个东西，就乱舞乱跳起来，口中发出怪叫声。澜公很信神，相信这些人有法术，他们的法术可以帮他找到二毛子（是个信教的中国人）的住所。澜公的妻子常常入宫，常给太后讲讲义和拳民的神奇事情。大公主（太后过继的女儿）在皇宫后门口集中了二百五十多名拳民，但她不敢跟太后说实话，而她的兄弟瀛贝勒自己也练习拳术。甘肃的拳术高强者已经进了京城，城里几千人已经打算离开北京逃难了。

五月十六（6月12日）。荣禄今天销假回到军机处当差。昨天甘肃有一名勇敢的拳民在永定门外杀死了一名洋人，军机处统领礼亲王不敢把这事上奏给太后。礼亲王退出大殿，太后召见荣禄。刚毅觉得，荣禄一定会劝太后命令董福祥带兵离开京城，并给被害的洋人赏赐荣誉。上奏时其他的大臣都不在场，荣禄上奏完直接回到家，没和同僚们讲一句话。又有传言说越来越多的洋兵来京城，但是太后不准他们进入京城，荣禄表示赞同。他劝说太后，尽量允许京城的洋人离开北京城，外国使馆是不能攻击的，如果攻击外国使馆会违反世界公约。

五月十八（6月14日）。昨天傍晚，恩珠从外面回来，说几百名拳民已经进了海岱门。我腿有问题，不能亲自去看场面到底什么样，很遗憾，只能叫仆人郝庆定替我去看看了。能够活着看到今天的场面，真是幸福啊。除了使馆，京城里所有花园洋房都被烧成了平地，整个北京城在一夜之间，火光此起彼伏，场面真是巍然壮观！刚毅派人来送信，说昨夜三更，他和澜公去了顺治门指挥义和拳民烧毁了法国教堂。其中教民有几百名，不管男女老少一律被烧死了，臭味直冲鼻孔，两人最后不得不掩着鼻子撤退了。清晨，刚毅上早朝，大总管太监李莲英对他说，老佛爷在南海西苑的小山上看到了火光，看得很清楚，顺治门外的义和团正在焚毁法国教堂。李莲英告诉太后，因为洋人先对海岱门内的百姓挑衅开枪射击，惹怒了义和拳民，所以义和拳的拳民才屠杀教民报仇雪恨。还说洋鬼子阻挡着街道，徐相（徐桐）被鬼子堵在家中无法出门。老佛爷听了很挂念，命令庆亲王与使馆谈判解决方案，放徐相出来。老佛爷见义和团如此勇敢神奇，惊讶不已。刚毅认为她很快会下令拳民全面攻击使馆。但是，李莲英奉劝刚毅，过度称赞义和团会让太后怀疑，还说除了荣禄外，其他军机大臣都不敢在太后面前提及反对义和团。太后现在已经搬到宁寿宫住了，因为外面的嘈杂声音已经传到了西苑太后耳朵里，使她不得安宁。

五月二十一（6月17日）。南城火光冲天，烧了一天。这些鲁莽冲动的拳民放火烧了大栅栏的外国药店，火势愈烧愈烈，慢慢周围的银号都被连带烧成了一片焦土。正应了书上说的那句话：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义和团拳民本来都是好人，有一片爱国心，但是他们当中也夹杂了一些图谋不轨之人，企图趁火打劫。坏人身穿义和团的衣服，玷污了义和团勇士的名声。前门外塔也着火了，太后命令荣禄派士兵把守城门，防止不法分子从大清门混进城里。

下午，我侄女回娘家省亲。她自己家在外城，因为战乱不断，她惶恐不安，所以搬到了北城的公婆家住了。

听说端王恳请太后任命他担任总理衙门的大臣，太后命令他赶紧通知所有洋人火速离开京城，朝廷将派兵一路护送他们，避免遇到拳

民的袭击。我的好友启秀和内阁协助大臣那桐都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那桐最近曾经有过上奏，恳请朝廷立刻向各国宣战，如果等对方的后方援军到了，再向他们宣战会比较危险。老佛爷派他进入总理衙门，协助端王和启秀的工作，安排护送洋人离开京城的事宜。庆亲王对义和拳的态度比较含糊。荣禄主动提出，要求护送洋人到天津，他提议免掉直隶总督裕禄的官职，防止发生变故。今天晚上，我夫人病重，口中一直在说胡话，辗转不能入眠，身体疼痛如刀绞。我派人把杨大夫请来给她做针灸理疗。

五月二十四（6月20日）。裕禄的奏折昨天中午抵朝廷，他说洋鬼子向他索要大沽炮台，他恳请太后立即对洋人宣战，惩罚对方的蛮横无理。太后听了勃然大怒，立刻召见军机处大臣，决定今天召见所有王公、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八旗统帅，最后作决定。端王、启秀和那桐向太后呈递了一份外国公使的照会，其中的口吻相当强硬，竟要求太后立刻归政，把政权交还给皇上，废了大阿哥，允许一万洋兵进城。刚毅对我说，太后看完照会，满腔怒火，先前得知康有为逆反行为时，也没有见她这么生气，此时，她真是怒火中烧，厉声说道："他们竟敢干涉我的内政！简直是乱了！外国人竟然无礼至极，我发誓不把他们斩尽杀绝不罢休！"

盛怒之下，无论是谁都劝不了她，甚至荣禄也拿她没办法。她对荣禄说，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护送外国公使前去天津，但是既然对方一定要她归政，她便不能确保他们途中的安危了。太后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前面还允许使馆的护卫队进入北京城，尽力打压义和团，但是她万万没有料到洋人对她恩将仇报。她说："与其受他们胁迫，还不如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算了。"太后尽管是个妇女，但是她的勇气与智商却不是平常男子所能比得上的。

五月二十四（6月20日）。酉时，就是下午五点多，我刚刚去拜访了军机大臣刚毅，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今天被召见的事情。寅时（凌晨三点多），太后在西苑的銮仪殿召见了军机大臣，六个大臣都在：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只有皇帝一人没有入朝。这是一次极为特别的召见，先让军机大臣对目前的形势作自己的

分析，然后再召见各位王公大臣。

荣禄满泪盈眶，跪着向太后上奏，说中国向外国宣战实在不是他的错，实在是对方自找的，但是围攻使馆万万不可以，如果真按照端王的主张，那么保护国家社稷江山一定有危险。况且，杀死了几名外国使节，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这样做，不能显示国家威风，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老佛爷对荣禄说，如果他确实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好奉劝洋人赶紧离开京城，免得日后遭遇任何不测。即使她愿意，她也压制不了义和团运动。如果荣禄没有别的更好的意见，他可以退朝了。

荣禄听完，叩头离开大殿。启秀从靴子中取出已经草拟的宣战谕旨，呈递给太后御览。太后看完，连连点头赞赏道："很好！我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她问各位军机大臣有什么意见，大家都点头主张要与洋人彻底决裂。现在已经到了平时的早朝时间了，李莲英进殿搀扶太后入宫休息一下，然后起驾前往勤政殿。

勤政殿外面，所有的皇族亲贵全部到场：恭亲王、醇亲王、端王、贝勒载濂、载滢、澜公和他弟弟瀛贝子，另外，在大殿门口恭迎皇上太后的还有庆亲王在内的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九卿、二十四旗都统以及内务府大臣。皇上与太后乘坐四人抬的小轿同时到达，皇上先下轿，跪下迎接太后，随后进殿。皇帝面色苍白，没有血色，入座到太后身旁的龙椅上，他竟然浑身战栗。

老佛爷命各位王公大臣们入殿，然后她严厉说道："洋人真是欺人太甚，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一直都主张压制义和拳运动。但是，昨天看到外国公使团发了一份照会给总理衙门，竟然恬不知耻地要我归政，我才知道我们与洋人之间的事情不可能和平解决。而且，过去的各种事实已经充分说明，皇帝没有执政能力。天津的法国领事馆索要大沽炮台，无理到了极点，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干涉我国内政。"太后一旦拿定了主意，就是平时她最为信任的荣禄也改变不了她。然后，慈禧对在场的所有汉族官员说，二百多年来，大清朝深仁厚泽，大清子民，不论满汉，都一视同仁，从不

厚此薄彼，深受人民爱戴。自从她执政开始，学习前辈先贤，恪守治国安邦的道理，降低赋税，一旦百姓遇到灾荒，国库总会及时出资赈灾。南方有过叛乱，朝廷克服困难，让天下百姓享受太平。如今，外国洋人欺凌我国，举国上下应该同甘共苦、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只有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才能打败敌人，要让他们懂得，大清朝对他们一再忍耐，不是无能懦弱，而是心肠仁厚，一向本着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邦交政策，康熙帝时就允许洋人在中国传教，但是我朝的宽仁却被洋人误解，认为我朝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忧患局面。太后说，大的方面，洋人无视我朝威严，小的方面，洋人败坏了中国民俗，仗着兵力威猛，在我朝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如今，中国人已经义愤填膺，千千万万勇敢爱国志士们都站起来了，即使孩子都拿起刀剑，保卫国家。太后一直感觉，咸丰十年（1860年）让英法联军轻轻松松就打了胜仗。如果中国军力雄厚，一定会转败为胜。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日子了。

太后说完这番话，转过身来，询问皇帝是什么意见。皇帝思索了很久，没有主张，他恳请太后听听荣禄的意见，不要攻打使馆，应该派兵把公使们平安护送到天津。然后，他补充说，这样的大事，他不能断然决定，一切还是听太后的意见。

军机大臣赵舒翘上奏，恳请杀尽城内所有洋人，一个不剩，防止外国奸细出卖义和拳拳民，他请求太后发下谕旨。太后命令军机处反复掂量，及时向朝廷上奏考虑结果。

接着，满人立山、汉人许景澄、袁昶按次序进言，恳请大家千万不能对世界各国宣战。一旦开战，中国只会战败，然后中国可能会被列强瓜分，国内也会发生大规模动乱，非常危险。袁昶说，他在总理衙门做事已经有两年，感觉外国人爱好和平，凡事讲道理，不相信他们会干涉中国内政，照会竟会要求太后归政。听了这话，端王愤怒起身，询问太后，是否相信这个大汉奸的话。太后责备端王，说他态度过于暴躁，她命令袁昶退下，于是没人再敢进言。

随后，太后命令军机处宣布开战，下发谕旨，传到各省，说开战

前先要去太庙祭拜。端王和澜公被任命为义和团团练大臣，但太后指出，如果外国公使愿意，今天下午可以离开京城，荣禄会护送他们安全抵达天津。最后，太后命军机大臣不可散去，因为中午还要听候命令。除了端王和澜公，其余人都可以退下，他们两人和太后商议了很久。已经到了早朝时间，徐桐也参加了今天早朝，太后向他庆贺，因为他从公使馆地区安然离开，真是万幸。

澜公向太后禀奏，说自己前天夜间见到了玉皇大帝。当时他正观看拳民们练习拳术，忽然看到玉帝降临人间，赞扬拳民们武艺高强，忠义勇敢。老佛爷听了，说在唐朝武后当政初年，玉帝也降临过。这足以说明玉皇大帝支持正义、反对洋人侵略我国，中国必胜。

未时，下午一点多，刚毅进宫时，发现庆亲王也在军机处，神色激动不已。原来是一个名叫恩海的满族士兵刚刚到庆亲王府上报告，说自己早上见到两个洋鬼子坐着轿子从东单牌楼旁边经过时，便一气之下把他们杀了。因为他根据端王、启秀过去的命令，无论官兵，只要遇到洋人，都可以把他们就地解决。

这次他杀死的两个人中，一个是位德国公使，恩海是来庆王府邀功请赏的，指望能得到提拔呢。端王已经知道了这事，他由衷高兴。庆亲王与刚毅商议着，打算立即禀奏太后，刚毅认为不需要，说杀了一两个洋鬼子又不是什么事，尤其现在是非常时刻，太后已经决定要把外国公使斩尽杀绝了。但是，庆亲王不这么认为，他说杀死外国公使是大事，以前杀死不过是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教民，今天杀的是公使，各国必定愤怒。咸丰十年（1860年），官军扣押了英国的议和使臣不就是后果非常严重吗？

太后召见各位军机大臣，礼亲王向老佛爷禀奏了此事，说这事不怪我们，完全是洋人自找的，是他们先开枪，我方处于自卫才杀了他们。太后命荣禄迅速进宫觐见，刚毅因为忙于拳民方面的事，没等荣禄到达就先退出了。

就在我写日记的当下，家人说有子弹从头顶上疾驰而过，但是我因为年事已高、耳背，竟然没有听到。恩珠说，义和拳勇士已经开始

围攻外国使馆区了，荣禄没有能安全地把外国使节送到天津。仆人刘顺刚刚进来，向我请假七天，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京城出逃了。

五月二十四（6月20日），戌时，晚上七八点。恩铭回家，说董福祥手下有个士兵捉住了一个洋鬼子。这名受伤的洋人被带到了庄王府，他一路上叽里呱啦，不知在说些什么。庄王拿出许多银两嘉奖了那位俘获洋人的士兵，决定把洋人处死，杀鸡儆猴，作为其他洋人的前车之鉴。官兵们已经在皇宫外集中，随时等候命令下来（准备去进攻外国使馆，那边离皇宫很近）。荣禄带着两千满族士兵，准备护送外国使节前往天津。荣禄是一番好意，但是太后责备了他，说他不会阻止围攻使馆区。如果洋人愿意随荣禄离开京城，荣禄会护送他们安全离开。如果他们不愿意离开，是他们咎由自取，到时不能埋怨没有事先提醒他们这么做的后果。

澜公派人请我明天去他府上吃早饭。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他和他的兄弟却对师傅非常尊敬、礼数周全。澜公脾气暴躁，有时好斗，有时温和。齐秀成派人来问我们愿不愿意搬到他家去住，因为他家在城北，那边的枪炮声几乎不太听到，我们景善府在城内的东安门一带，但是我耳背，什么都听不到，所以也无所谓。

齐秀成给他岳父毓贤写了封信，告知他在宫内受召见的事情。

澜公给我写了一封信，刚才有人通知端王和启秀，说汉奸袁昶已经下令把被杀的德国公使入棺装殓。这个人想请端王同意把公使的尸体割成八块，割下首级悬挂到东安门示众。袁昶说自己在总理衙门办事，认识这位德国公使，不忍心看到他暴尸在外，还引用孟子的话为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真是个汉奸，连我国的仇敌都同情，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五月二十五（6月21日），申时，下午三四点，轿夫们都逃离北京城了，我只能乘了辆车前往澜公府上。端王、刚毅、载濂都在座，新上任的步兵统领崇礼也在。太后今天早上召见了端王，她和皇帝都已经从西苑搬到了紫禁城内。太后从西苑门到西华门，一路上有拳民列队护卫，太后赏给他们两千两银子，称赞他们是忠勇爱国人士。她

对庄王说："现在，洋人犹如瓮中之鳖，死路一条了。四十年了，我如同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一直在等待时机，能够报仇雪恨。我对待洋人一直是仁爱有加，不是还请了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赏景的嘛？现在，如果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我心想，目前端王一定是心急如焚，盼着太后能立他儿子大阿哥当皇帝呢，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事极力反对，他是太后极为器重的人。今年二月，刘坤一回到北京，曾经极力劝太后千万不要相信义和拳，甚至反对立大阿哥当继承人。如果没有刘坤一极力反对，恐怕现在大阿哥早就坐上龙椅当皇帝了，所以端王对这个人恨极了。第二次召见时，刘坤一对太后说，皇帝不能被废黜，不然两江百姓一定会起来反抗。但皇帝由谁来当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皇帝在位，国家遇难，退位也是理所当然地。端王为什么不直接入宫，恳请太后宣布他的儿子当皇帝呢？董福祥的甘勇以及端王统帅的八旗士兵一定会拥戴新皇帝。但是，只要荣禄说一声不，太后就绝不会同意。太后最喜欢的人是荣禄妻子，她经常陪在老佛爷身边。慈禧真正喜欢的人是荣禄的二老婆，1900年9月，荣禄的正房夫人去世，二老婆才被扶为正房，她活得比她丈夫长久，荣禄去世之后，她仍然是太后最为信赖的人。

五月二十六（6月22日）。今天上午，我去礼亲王府上拜访，他的府邸位于西城，我要乘轿，轿夫们不是回乡下避难就是已经加入了义和团，没办法我只能乘车。恩珠和恩铭打算召集一百来名拳民来家里练习拳术，我们还要供应他们伙食。如今全国百姓都已经加入到义和团，大练拳术、驱赶洋人，如今物价飙升，我们不得不节俭算计着过，不能有一丝一毫浪费。我年事已高，很像梁太祖的弟弟萧宏，此人极为节俭吝啬，喜好节约。每存满一百万，就用黄签作标记，只要存满一千万，就用紫签作标记，他的家人和亲属都埋怨他过于吝啬小气。我的儿子也很想得到我的积蓄，但是一直没能如愿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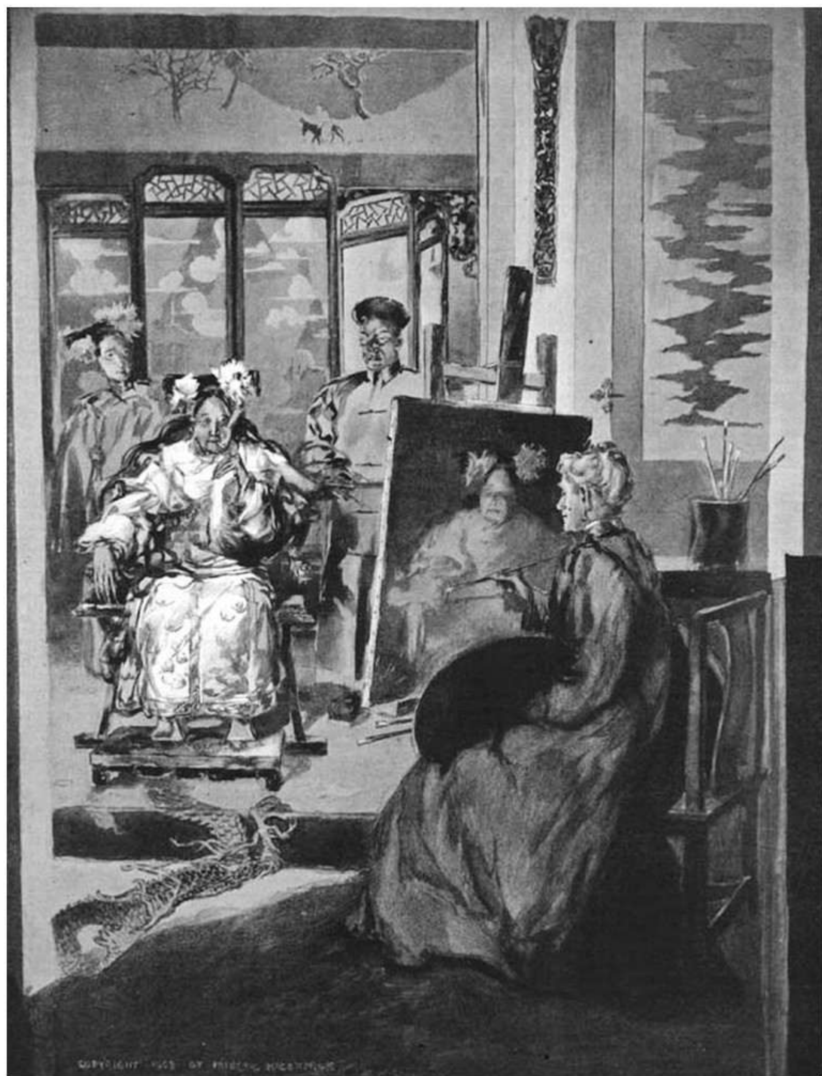
我来到礼亲王府上，发现礼亲王正生着闷气，心事很重的样子。他家里存款很多，怕遭遇不测。作为军机大臣，他责任重大。礼亲王才疏学浅，至于太后为什么要选他当军机处领袖，顶恭亲王的空缺，

让人想不通。礼亲王跟我说，今天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他心中难以平静。刘坤一给朝廷发来一份电报，大肆攻击拳民，太后大为生气，刘坤一给荣禄发了一份私人电报，请他一定要想办法阻止拳民滋事，但是荣禄有没有回复，就没有人知道了。

刘坤一的电报奏折是由保定府加急送来的，电报中说，如果要抵御外敌侵略，他会勇往直前地率领军队北上。如果让他杀戮使馆孤立的洋人，他坚决不同意，堂堂中国人，坚决不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太后红笔批示，她引用《左传》的话：唇亡齿寒，意思是国家危难中，南北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刘坤一当年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叛乱，他应该明白太后讲的这个道理。

老佛爷命令步军统帅庄王贴出一张悬赏的告示：杀死一名男性洋人，得赏银五十两；杀死一名女性洋人，得赏银四十两；杀死一名洋人孩子，得赏银二十两。

我正与礼亲王说话期间，荣禄坐轿子来拜访。他面容憔悴，步履艰难。坐定后，他大声怒骂拳民，说他们必定没好报。原来他刚才经过后门时，拳民们一个个用手对他指指戳戳，说他是个大汉奸。我口上没说什么，但是暗自觉得这个称谓对于他正合适。荣禄家大业大，对太后的影响力非同小可，我怕他最终会破坏义和拳的爱国行为。



西方世界描绘的慈禧太后像

一回家，就听说端王和庄王他们正派兵包围法国教堂，这个教堂把守不严密，只有几名外国兵守在门口，一攻就破。礼亲王府邸距离教堂就一箭远，礼亲王进宫必须从教堂南墙经过，进西华门。虽然教堂这边的战役不可避免，但是礼亲王死活不愿举家搬到安全的处所，因为整个家一齐离开，府中值钱的财物就难保了，一定会被匪兵洗劫。不必说，法国教堂几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

我自己的庭院里现在住的都是拳民和甘勇，这哪里算是个家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可恶的洋人造成的，让人又气又恼。

当天晚上戌时，七八点的样子，听说荣禄给袁世凯发来一份电报，经过他转发给两广、两江以及湖广总督，礼亲王派人给我抄录了一份，叮嘱我千万不能对外人提及。电文是这样的：

来电已经获悉。一个弱国对付十个强国只有一个后果：弱国失败，然后被灭。从古到今，两国交战，对于来访使者是万万不能斩杀的。祖宗不辞劳苦，创下的家业和江山，现在传到我们手上，难道我们仅仅听信一些歪门邪教，就不顾自己的江山社稷了吗？义和拳一直吹嘘要歼灭敌人，明眼人一听就能判断他们是痴人说梦话，怎么可能呢？

不用说，上至太后皇上，下到平民百姓，一直深受列强凌辱侵略。所以，义和拳打着上天派来的兵力的旗号，保卫国家、报复洋人。现在，国家危难迫在眉睫，尽管我尽了一切办法陈述危险所在，但全是枉费心机。最近，我身体欠佳，行动不太方便，请假在家休息，这期间我曾经七次上奏痛骂义和拳民，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没了办法，只能带病上朝，估计各位也大体知道了实际情况。我在这里不敢引用太后的言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宫里所有人，其中满汉士兵有三分之二已经加入了义和拳。这些拳民现在已经塞满了京城的条条街道，比蝗虫还多，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即使太后皇上圣明，也难改天意，天意如此，人怎么能违背呢？几天来，我日夜苦苦思索，希望能找到万无一失的方案扭转局势。昨天上午（6月20日），我在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们见面，希望能护送他们离开京城，前往天津。我认为，这个计策应该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了。没想到端王手下的人竟然杀死了一名德国公使，从那以后，我方形势节节败退，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朝廷上下，王公大臣中支持我的人也只有庆亲王和王文韶两个。庆亲王同以往一样，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请病假回家，所以帮不上我任何忙。我死也没什么，只是害怕自己成了历史罪人，上天

知道我心中充满了伤心和遗憾。大清朝对我恩重如山，我仅仅希望各位先帝的在天之灵能保护大清的江山社稷。目前京城的形势不利，但是希望各位能够严密部署，尽心尽职，保卫南方沿江各省。这是机密，希望各位严守秘密。荣禄含泪回电。

我还听军机大臣说，张之洞也发来电报，向太后表白自己的忠心，问是否需要他率兵北上，御敌卫国是他的责任。他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当初废掉皇帝，另选继承人，他举双手赞成，还旁征博引，为太后辩护说，重选继承人是天经地义。他见风使舵，立场很不坚定，远远比不上刘坤一。虽然我不喜欢刘坤一反对义和拳，但是他有原则，忠贞不二，这一点没有人不敬佩他。

（后面的日记记录的是义和拳运动是如何兴起、发展的过程，详细交代了拳民的神勇事迹、咒语以及入会的仪式。这些事过去都有不少记载，大部分内容已经省略了，从下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受过很多教育的满人，包括慈禧本人，对义和拳的迷信程度很深。下面仅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凡是义和团拳民，身上都有秘密的护身符，只要发生交战，必定携带。说到底，就是一个小小的黄色纸片，上面用朱砂画着一个半人半鬼、半神半妖的模样、有头无足、尖尖脸盘、眉毛眼睛一应俱全、头上顶着四道光环。心脏下方有一道密语：“我是来自冷云的佛，前方有火神，后方有太上老君。”另外旁边有菩萨、龙、虎等字样。护身符的左上方写着“请天兵天将”，右上方写着“请瘟疫之神”。连太后都知道这个护身符，她每天默念多遍，她每次说一遍，李莲英就在旁边大喊一声：“又消灭一个洋鬼子。”

义和团用一种奇异方式判决罪人是生还是死，通过焚烧一捆黄纸，看纸灰的飘升方向来决定人的生死命运。如果纸灰升天，说明此人可以免死罪，如果纸灰落地，说明必须立刻处死。他们相信神灵在一旁左右人的生死。其实，黄纸的材质不同，有些比较轻，烧过的纸灰就容易升天，如果采用的是厚纸，纸灰很难升天，只能落地。而且纸灰飘升方向与纸捆扎的松紧程度也有关系，松捆的比紧捆的容易升

天。同样道理，拳民说放火也有神灵暗中指挥，神灵想把哪里烧毁便命令拳民剑的方向指向哪里，所指之处立刻火光冲天。这是骗人的杂耍，拳民打算在哪里纵火抢劫，便会事先在那里洒好煤油，或者在周围堆木柴，举剑的同时扔一支划好的火柴过去就行了。

五月二十七（6月23日）。我前面写到的那个洋人今天早晨六点被砍头，头颅现在放在一个笼子中，悬挂在东安门的正梁上，之所以放在笼子里，是因为他们没有辫子可以系在梁上。这个洋人面目可憎，但是把敌人的头颅悬挂在宫门上，真是大快人心的盛事啊！我不禁想起了咸丰十年（1860年）刑部大牢外也挂着洋人的头颅，但那是一个黑鬼子的头颅，这次是个白人的。

荣禄这个汉奸，竟然还想方设法要营救这个洋人，甚至准备动用武力，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但是端王和庄王处死洋人的决心已下，于是不声不响地动了手，没让荣禄知道，等荣禄赶到场时，事情已经办妥。昨天，两位王爷让这个洋鬼子跪在铁链条上，时间有足足几个小时，求饶的声音听了让人发寒。老佛爷知道后，命令赏赐给捉拿洋人的士兵五百两银子，这个数目很大，抵得上朝廷悬赏数额的十倍之多。

住在我家中的拳民一心想拿走我的雪茄，因为我年老，才允许我抽。如今所有的洋货，即使火柴都禁止平民使用。义和团首领张德诚和韩以礼都是些斗大的字不识的粗野之人，今天他们都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待遇，真是不可思议！

今天下午澜公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上午太后的嗣子大阿哥说皇帝是“鬼子徒弟”，刚好被皇上听到了。皇帝非常生气，并报给太后，太后听了怒火中烧，命令太监惩罚大阿哥，抽他二十鞭子。端王见自己儿子被抽，心疼不已，又不敢同太后理论。太后同他讲话，他感觉背上有万根芒刺，汗流浃背。

董福祥昨天禀奏太后，称外国使馆是强弩之末，时日不多了。太后站在宫里高处的石山上朝使馆方向看，看到使馆区熊熊大火，认为使馆已经完全被毁。下午，许景澄求见，将他与袁昶所写的奏折呈递

给太后御览，谴责义和团，说着火的不是使馆，而是翰林院起火，甘勇放火烧了翰林院，想让火势蔓延，最终烧到使馆区，他们好趁着火势攻进使馆抢劫。太后听了勃然大怒，失望至极，严厉训斥了董福祥一顿。然后紧急召见荣禄，两人在宫中商议了很久。

今天裕禄从天津发来一份奏折，说我军在大沽炮台全胜，击毙的敌人数不胜数，击沉多艘敌舰，天津的洋人几乎被我军剿灭殆尽，真是大快人心！

今天有几百名中国教民在庄王府前被处死，审讯人是庄王、贻谷、芬折和桂春，场面异常残忍，许多无辜的平民被判有罪，含冤而死。太后为人宽厚仁慈，听说这次杀戮事情，顿生恻隐之心，说如果教民们诚心悔过，就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

五月二十九（6月25日）。今天是内务府大臣文连当班。他对我说，早上六点，端王、庄王、载濂贝勒、载瀛贝勒带着大约六十个拳民入宫，搜查教民，一行人来到寿宁宫门外，皇上还在床上没起身，他们大呼小叫，要皇上立刻出来，说皇上是洋人的徒弟，带头的是端王，文连说端王估计早晨喝多酒了，才出来闹事，老佛爷正在宫中喝早茶，听到外面叽叽喳喳的喧闹声，一群人大呼杀死洋鬼子徒弟之类的话，她急忙出来看是怎么回事，站到台阶上往外一看，看到外面站着各位王公大臣和一大群拳民，便怒喝道：“你以为你是皇帝吗？如果不是，这样胡闹，成何体统？你必须知道，我一人，只有我一人有权力决定皇帝废还是立。现在尽管把你的长子立了大阿哥，但马上就可以废了他。你以为自己趁着国家混乱就能浑水摸鱼，你打错算盘了。赶快把人全带出去，没有召见的谕旨，不允许随便进来！”太后命令他们向皇上请罪，停发端王薪水一年，作为惩罚。义和团的首领胆大妄为，竟敢在宫中嚣张，立刻斩首，命守卫在门外的荣禄的士兵立刻执行。因为闯宫一事，太后对义和拳隔阂加深，大家都认为荣禄必定会恳请太后停止围攻外国使馆。这件事情让皇帝担惊受怕，受了很大精神刺激，多亏太后及时出面，事后，他及时叩谢太后。

晚上九点，因为对端王和义和团的怒气未消，太后忽然下谕示，

命令停止围攻使馆、杀害洋人，同意让荣禄前去使馆协商和谈事宜。今天晚上六点，京城内的枪炮声基本停止。荣禄带兵来到了使馆边界以北的桥上，外国人也从使馆里出来，双方准备商谈。荣禄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奉太后的谕旨，保护使馆"。荣禄原本希望和洋人商谈停火事宜，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仅仅三个小时没有枪炮声。恩铭刚刚到家，就对我说，老佛爷一听说洋人的后面增援部队在来京的途中遭遇义和团，损失惨重，她立即改变了保护使馆的决定，对义和团重新信任起来，相信他们一定能消灭洋鬼子。

六月初四（6月30日），戌时（晚上七点多）。今天刚毅来我家，在我家中吃了晚饭。他说，董福祥今天上午登门拜访荣禄，希望借他的大炮用用。听说荣禄的军队军备精良，他的军械大炮能在几小时就毁掉敌人使馆。

董福祥在外面等了整整一个多小时，荣禄才出来见他。一见面，董福祥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要借大炮，荣禄则假装瞌睡不搭理他。董福祥怒气冲天，大声呵斥荣禄，说他太无礼了，荣禄不愠不火，笑呵呵地说，如果想要借大炮，除非让老佛爷杀了自己，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董福祥就别指望借大炮。然后荣禄开始逐客，说道："你赶快去求见老佛爷吧。你是条汉子，再说太后对你信任有加，只要你吱一声，太后一定会答应你的。"

董福祥满腔怒火，离开了荣府，径直前往宫中，此时早就过了召见时辰，他哪里管那么多，直接来到黄极殿门口，大声吩咐太监禀奏太后，说甘军首领求见。当时老佛爷正在一门心思作画，有人打扰，心里不痛快，但还是强忍怒火召见了董福祥。董福祥进来便跪下叩头，太后说："我猜你进来是禀奏已经攻下了洋人使馆吧，自从上个月底你就开始禀奏，已经奏了十次了吧。"董福祥回答："臣要弹劾大学士荣禄，他真是个大汉奸，帮助洋人残害同胞，他带的武卫军有大炮，设备精良，如果用他的大炮轰炸使馆，效果很好，臣向他借用，他不肯借，还说即便有太后的谕示也是白费口舌。"老佛爷勃然大怒，喝道："住嘴！你起家时是个强盗，朝廷之所以启用你，本来是想让你重新做人，改过自新，将功赎罪。但是你现在还是一副目中无

人、狂妄自大的样子，你的强盗面目没改啊！你是不想活了吗？退下吧，以后没有召见你的谕旨，不允许随便进宫！”

刚毅说，只要荣禄势力一天还在，就一天不能攻破使馆。立山也深得太后器重，如今他也袒护洋人，还因为这个原因遭到那桐弹劾。

下面的告示是庄王的意思，太后草拟的谕示，在京城的各处张贴，听说赏银由太后亲自掏出。

悬赏

现如今，京城各处的外国教堂大都夷为平地，洋人想藏身也找不到地方了，必定会四处逃散。现在特颁发谕旨，提醒军民，如果一旦有胆敢窝藏洋人的，立刻斩首。如果活捉一位男性洋人，得赏银五十两，如果活捉一位女性洋人，得赏银四十两，活捉一洋人孩子，得赏银三十两。必须活捉，不得冒充。一经查实，立刻发放赏银，绝不延误。

我记得咸丰十年（1860年）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悬赏通告，但我记得当时的赏银比现在多，因为当时京城的洋人没有现在多，现在的洋人满大街都是，真是多如牛毛。

今天有九百多教民在庄王府门外被斩首，审讯者是贻谷、芬折、桂春，其中提到有些人通敌叛国，但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就匆匆斩首，连孩子都没有放过，简直是滥杀屠戮，手段残忍无比。老佛爷斥责庄王没有严加管教好拳民，随他们肆意胡为。

六月初八（7月4日），上午十一点，毓贤的女婿齐秀成来我家拜访，我们谈了很久，期间城内的枪炮声接连不断。我家背面就是皇城，李秉衡的部队把大炮就架在城墙上，因为荣禄不肯给他们借用大炮，他们到现在还耿耿于怀，而荣禄的手下个个都忠于主子，贿赂他们没用。荣禄的勇气确实非凡，他借用孟子的话，说纣王当政（指的是端王），他住在北海海滨，等待天下至清。听说端王最近得到了一枚玉玺，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可以直接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但是这

件事要是被太后知道了，一定会严惩端王。齐秀成对我说，他的岳父毓贤最近上奏太后，是关于山西传教的事宜。十天前，太后曾经发了一份密旨给毓贤，命令凡是遇到洋人，立刻斩杀，即使这些人准备出省离开山西也不能让他们漏网。老佛爷好像还把这份谕旨下发到各省督抚处，但是陕西督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以及蒙古各地得到的谕旨内容却有很大出入：其中的“杀”全都改成了“保护”，恐怕有奸细从中捣鬼，擅自改了谕旨，但没有人胆敢禀报太后，太后对毓贤的奏折用红笔作了批复，让人火速送到太原府，批复如下：“凡是洋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斩杀，去除罪恶根源，让民间太平。”齐秀成告诉我，毓贤惧内严重，他之所以斩杀洋人，都是他夫人出的主意。毓贤到山西任职不久，由于他办案公正无私，不断赢得百姓的赞誉声。齐秀成还说，庄王听说了太后的批复非常高兴。荣禄对这个批复很有意见，他说杀戮妇女儿童，国威扫地，只会成为世界人民嘲笑的把柄，也有辱太平时期积攒下的一向与人为善的美名。太后说：“你说得很对，但是你的外国朋友要我归政，我这么做，就是以牙还牙罢了。从光绪帝到现在，洋人一直就反客为主，在我国欺侮我国百姓，现在要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看，到底谁是真正的主人。”

昨天下午，太后在西苑湖心游玩，身旁有几名宫女妃嫔陪同。攻打法国教堂的枪炮声接连不断，太后嫌太喧闹，命太监告知驻守西华门的军队暂时停火，等她们回宫再攻打。



慈禧游湖

六月十一（7月7日）。裕禄最近上奏朝廷，内容很可笑，奏折是在天津抓捕了四头骆驼，杀死了许多名洋人。荣禄曾经劝阻裕禄不要攻打租界。我听荣禄说，董福祥最近派了一名满族兵暗杀他，但是这个人却把阴谋告诉了荣禄。这个士兵的哥哥就是杀死德国公使的恩海，董福祥认为他必定对洋人也是深恶痛绝，只要能消灭洋人，什么都干。没想到，这个满族兵却是荣禄手下的人，不愿杀死自己的主子。荣禄上奏太后，引用《春秋》《左传》中的话，说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今天中国围攻外国使馆，是违背世界公理的，而且也荒诞到家了，各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仇恨。太后说，非洲的一个小国家还能战胜大英，中国这么大，更能勇敢抵抗列强。荣禄说，这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如果这时与列强议和，形势可能还有转机，一旦使馆完全被毁，恐怕大清江山社稷不保。荣禄极力劝说太后，太后也开始慢慢觉得荣禄说得有道理，义和团只有蛊惑人心的本事，极少取得实效。

天津战败，噩耗传到了京城，太后寝食不安，但始终不相信洋鬼子会攻进北京城。

六月十五（7月11日）。我的邻居文连是内务府大臣，他对我说，昨天太后在宫中大发雷霆，训斥大阿哥无礼。大阿哥曾经恳请太后，让他护送太后去热河避难，留皇帝在京城与敌人讲和。有个小太监为了讨好太后，只要听到一声枪炮声，就说又杀了一个洋鬼子。太后说：“前些日子，听了那么多枪炮声，足以杀死很多洋人了，可眼下情形不是那么回事。”

六月十七（7月13日）。荣禄昨天进宫觐见太后，说如果义和拳失败，洋人打进北京城，太后怎么办？太后引用汉朝的辩士贾谊的话作为回答：

如果一国之君主想要联合各国力量，他必须向这些国家的国君证明他有三表，并能承受得住五种诱惑，三表指的是诚信、爱心和善良。五种诱惑是指：各种华丽服装诱惑他的眼睛，各种美味食物诱惑他的胃口，美妙的音乐诱惑他的耳朵，豪宅和美女诱惑他的奢侈本能，隆重的礼节诱惑他的心灵。

老佛爷还说，两年前，她曾经热忱邀请各国的公使夫人进宫游玩赏景，待之以礼，她们玩得不亦乐乎。太后觉得，尽管外国人一心要她归政，同情皇帝的境遇，但是她一定有办法让他们改变主意（原注：在著作《清宫画像记》一书中，卡尔·凯瑟琳小姐详述了慈禧善待外国人的手腕，慈禧参加了圣路易斯画展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征服了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参见本丛书中的陈述、陶林所译的《清宫画像记》一书）。

六月二十（7月16日），传来噩耗，天津完全被洋人占领了。军机处没有人敢向太后禀报此事。端王壮壮胆子，上奏太后，说因为义和团没有认真遵守规则，洋人已经占了天津。但是，洋人不可能来北京，京城是个安全宝地。今天凌晨，荣禄禀报太后，他已经验明，前面说外国人要求太后归政的照会是赝品，是端王让军机处章京伪造的。所以老佛爷对端王大为不满，警告他，如果洋人攻进北京城，先要他的首级问罪。太后知道，端王一直心怀不轨，想趁着国家混乱获取国家摄政的机会，太后呵斥他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做不

了监国。以后你再不安分守己，就把你赶出皇宫，家产充公。你的行为和你的狗名（原注：端王的名叫载漪，带反犬旁，这个名字是咸丰皇帝赐予的，因为载漪为父亲道光帝守孝间行为不端正，才得了这个名字。）真是相配！”于是，端王狼狈退出宫殿，嘴里嘟囔着，说太后龙颜大怒，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除了董福祥的军队，荣禄得到各个军队统领的支持，他们都倾向认为必须停止围攻外国使馆。荣禄为自己辩护，说之所以没有把大炮借给董福祥，是因为怕他们会破坏到社稷宗庙。

老佛爷最近派人给使馆送去了西瓜、酒水、蔬菜、冰水等，说马上派庆亲王前去慰问各国公使。

听说许景澄与各国公使之间的联系紧密。

今天一名使馆信使被活捉，他被带到了庄王府，从他身上搜出了十二份电报，其中三封全是密码，无法译出。从其他电报中可以看出，洋人已有一百多人死伤，粮食供应严重跟不上。

齐秀成前往太原府看望老岳父毓贤。毓贤最近上奏朝廷，说自己有个小伎俩，把洋人全都捕获，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在衙内处死。只有一名女性洋人被割了乳房后逃跑，躲到了城墙下面，发现她时已经死了。

今天外面下了瓢泼大雨。刘大桥从御膳房送来八公斤猪肉，我派人给妹妹送去一碗。傍晚时分，一队车马荷枪实弹从我家门口经过，他们是李秉衡军队的人，准备把大炮架到紫金城的城墙上，在敌人突袭时用。夜间枪炮声不绝于耳，非常激烈，有人说在海岱门一带已经看到洋人身影了。

六月二十一（7月17日）。今天天气晴朗，我步行去看望了礼亲王和澜公。最近听说裕禄的军队由于粮饷几个月停发，士兵们纷纷逃跑，到处打砸抢，通州和张家湾一带都被士兵洗劫。京城的另一个东城门都已经关闭，北门（安定门）偶尔开放。

看门人杨顺从老家宝坻县回到京城，说那边没什么动静。

听说李秉衡军队打了一次胜仗，把洋人赶到海边去了。但是下午东南方向又传来枪炮声，异常激烈的样子。

听说有教民躲藏在口坛，澜公率大队义和拳拳民去搜查。

六月二十七（7月23日）。袁昶和许景澄今天早晨第三次上奏太后，恳请太后杀死那些支持义和团的军机。昨天太后召见了李秉衡，她对义和团重新信任起来。但是袁昶和许景澄在这时上奏，虽然他们的见识有误，但是他们的胆识不免让人心生钦佩啊。李秉衡已经被任命为北洋军督师大臣，辅助荣禄办事。这次他从汉口回到京城，在太后面前保证的信誓旦旦，说他必定能攻破外国使馆，还说绝不会伤害到朝廷的社稷宗庙，太后不必离京西巡了。

我今天早晨前往澜公府上，端王和李秉衡也在，他们正商量再次攻打使馆的事宜。李秉衡建议可以在翰林院埋下地雷轰炸使馆，他曾经向太后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在攻打法国教堂时就是使用的这个方法，埋下地雷轰炸了法国教堂，非常成功。李秉衡说，地雷一爆炸，洋人一定会四处奔跑逃散，他们就可以乘机攻下使馆。

太后御览了袁昶和许景澄的奏折，说："他们两人都是有胆有识之人，况且不谈他们在戊戌年间曾经向我禀奏康有为等人的阴谋诡计，这两人的人品很好。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应该过于固执，用这些烦人的事情不断来打扰我。朝廷自然会作出决策，他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对朝廷横加指责。但是现在朝廷不会给他们二人加罪，仍然传旨申斥他们二人，今后不允许再犯同样错误，扰乱圣听。"

七月初三（7月28日）。老佛爷对李秉衡非常器重。昨天，他刚刚和刚毅一起查明，把太后发往各省谕旨中的"杀"改为"保护"的人是袁昶和许景澄。我刚才见到了刚毅，他说，太后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怒不可遏，呵斥道："他们胆大妄为，竟敢篡改谕旨，与赵高没两样，即使处以车裂之刑也不过分。"随后，传旨立刻将袁昶和许景澄拖出去斩首，但是在下发的谕旨中并没有提到两人擅自改了谕旨的

事，因为这关系到朝廷的威严。谕旨中只是说袁昶和许景澄当庭抗争狡辩，包庇洋人，所以今天早晨处决。恩铭当时在场。袁昶是个品德很好的人，眼看这种结局，我不禁心酸；至于许景澄曾经同我在内阁共过事，知道他的为人，向来不是很看重他。这个人名声不太好，在刑场，袁昶说："我只希望不久能看到天日，消灭这帮奸佞。"他指的是端王专横跋扈，蒙蔽太后耳目。澜公在一旁监刑，听了这话，呵斥他才是奸臣，不要多嘴。但是袁昶丝毫没有畏惧之心，继续说："我可以死，但我没罪，你们才是祸国殃民，罪该万死，我的名字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后人会敬仰我的。"又转过头来对许景澄说："我们两人马上就会在黄泉路上相遇了，死了就回家了。"澜公冲上前好像要打袁昶，但是这时刽子手已经斩落了两人的头颅。

七月初八（8月3日）。今天与大儿子发生争执。他最近总偷拿我的许多银子，一旦被我发现，我就会对他严厉斥责。他竟然还胆大妄为，驳斥我，说我受朝廷器重，现在应该自尽，才能报效国家。

李秉衡已经带兵奔赴前线，阻挡敌人北上。他曾经上奏弹劾荣禄，老佛爷押下没发。皇帝盛赞荣禄尽心尽力，忠于职守，荣禄回答道，因为两年前的变故（指的是1898年的戊戌政变），许多大臣没敢奢望能得到皇帝的恩典。

七月十一（8月5日）。老佛爷命令荣禄谋划护送洋人前往天津，希望借此能阻止洋人北上。几天前，我听说有人奉劝启秀致电外国大使，请他们不带卫队来总理衙门商议事情。其实商议事情是假，真正的想法是劝他们离开使馆，然后在途中对他们进行突袭，乘机斩杀他们。启秀以为自己的计策高明，但是连续发了几天邀请函，公使们不敢离开使馆半步。就在前几天还有围攻使馆的事件发生呢。

昨天，崇文门大街上有一个赤裸上身的洋人，见了人便叩头，见到挑夫也连连叩头，恳求饶命，讨些小钱。他说："我们很快会被杀，但是我从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荣禄的手下把这个洋人带回来，但是荣禄并没有杀他，而是释放了他。这个洋人的情形足足可见洋人在中国的窘迫境遇。

七月十五（8月9日）。南方传来了噩耗，裕禄的部队受到重创，洋人节节逼近。老佛爷一心想离京前往热河，荣禄却极力阻拦，他说即便洋人攻进城，太后也不能离开，澜公却不相信洋人会来。不过有一件事情还算好，即使联军进了城，他们不会洗劫财物、屠杀老百姓。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的洋兵很守军纪，当时我在家里动都没动，没有一个洋人来家中骚扰，唯一的困难是粮食等日常用品不好买到。洋人驻扎在城外，几乎没有进城，我们都没有受什么伤害。

七月十六（8月10日）。立山是我的工作上的老搭档，他家紧紧挨着法国教堂。有人告他，说他家在家里私自挖了个地道，接济洋人各种食品。端王把立山捕捉归案，交给刑部处理。太后对此事丝毫不知情，一同被送到刑部大牢的除了立山，还有徐用仪和联元，徐用仪是因为反对端王儿子被立为大阿哥，所以端王耿耿于怀，联元是由于有人举报，说他和袁昶交往甚密。这两个人都在今早被处决，徐用仪年纪比我大，今年七十九岁了，遭到这一劫难，真是可怜。他也知道这件事不是端王一个人干的，太后不了解情况，他却没有半句怨言，走得很从容，临刑前他说："奸佞之人好日子绝不会长久的，能死在联军攻进城之前，是我的愿望。"假如太后知道这两人死去的情景，一定会大动肝火吧。照理说，立山一直就是荣禄的好朋友。

山西有一位姓刘的将领来到京城，今天早晨上奏太后，自我保证说在三天内一定要摧毁整个使馆，这样做的目的是警告洋人，让联军害怕，从而不敢进城半步。现在他们正在猛烈轰击使馆呢。

义和团真是无用透顶，我早就说过他们必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七月十八（8月12日）。洋人军队离北京越来越近了。裕禄的军队在北仓、杨树和蔡村受到三次重创，裕禄本人藏在蔡村一家棺材店，开枪自尽了。李秉衡14日到了河西务，虽然他认真整编军队，但是手下两个大将张春发和陈泽霖消极迎战，李秉衡遭受了打击，服毒自尽身亡。

荣禄今天早晨入宫时把这件事禀报给太后，君臣面对面，泪千行。朝廷之所以遭到这一劫难，都是些腐败的王公和义和团拳匪导致的。荣禄智商不是寻常人可比的，这时他没有过早表明自己的先见之明。老佛爷说宁可跟皇帝一起以身殉国，也不愿意离开京城西巡。荣禄恳请太后接受他的建议，留在京城，发布谕示，斩首端王等人，对他人以示警戒，表明朝廷的真正用心。但是，太后好像依然对义和团抱有一丝幻想，所以下令猛烈攻击使馆。

太后今天召见了荣禄共计八次、端王四次，其他军机大臣都一言不发。

七月二十（8月14日），下午五点，通州沦陷，洋人已经开始突破京城。太后今天在宁寿宫召见军机大臣五次，据说她准备逃到张家口避难。申时（下午四点左右），澜公悄悄进宫，来不及等通报，就闯进去大喊："老佛爷，不好了，洋鬼子已经来了！"接着，刚毅后脚就跟进来，向太后禀报在天坛附近有一大队缠头士兵，太后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也许是我们的回勇，他们从甘肃赶过来焚毁使馆的？"刚毅果断答道："不，是洋鬼子。请太后立即决定，马上出走，不然他们要来杀了你。"

半夜时分，太后再次召见了军机大臣，刚刚结束，现在只有刚毅、赵舒翘和王文韶三个人在面前。老佛爷说："那些大臣都到哪里去了？估计都跑到自己家了吧，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不闻不问了，不管怎么说，你们三个要跟着我们走。"她转过头面朝向王文韶，说："你年纪太大，不想叫你太辛苦，你回去稍微准备下，马上过来吧。"然后她又对另外两个说："你们两个人都会骑马，马上跟我们走，好一路照顾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王文韶说："臣一定竭力赶上。"皇帝当时刚刚从睡梦中受惊吓醒来，大声说道："你尽量赶快点啊。"三位军机大臣从大殿退出，但他们不清楚太后究竟打算什么时间离京，这时荣禄正忙着整顿军队，没时间进宫。

七月二十（8月15日）。文连对我说道，老佛爷夜里只睡了一个小时，寅时（早上三点左右）就起身了，匆匆忙忙梳洗穿戴，她穿了

一件早已准备好的蓝布褂，有生以来第一次梳了汉人发髻，感慨万分，说道：“谁会料到我竟然也会落到今天的田地？”三辆骡车，外表极为普通，被人带进了宫里，车夫外貌朴实，都没有戴官帽。

三点半，所有妃嫔集中，为太后送行，太后事先早已下谕示，任何妃嫔不允许随行。珍妃向来跟老佛爷唱反调，但是今天也随同大家一起前来为老佛爷送行，还斗胆说了一句，提出让皇上留在京城之类的话。老佛爷懒得同她费口舌，干脆直接命令当班太监道：“把这个不要命的贱人扔到井里吧。”皇帝悲痛万分，跪下苦苦求饶，但是太后更加来火，对他说：“起来吧，现在不是你分辩的时候，必须把她丢进井里，才能惩罚那些没孝心的孩子，让他们看看鸟儿长大、羽毛丰满后，怎样啄它们母亲的眼睛。”于是，李莲英等太监只得把珍妃推进了宁寿宫门口的一口大井里。



太后画像

皇帝心中又悲又怒，浑身发冷汗，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太后对他说道："上你自己那台轿子吧，记住把帘子放下，不能让人认出来。"皇帝穿着黑纱长袍和黑布褂，老佛爷对溥伦发令："你坐到皇帝旁边吧，一路上好照应他。我坐到另外一辆车上，溥俊（接班人大阿哥）坐我旁边吧，李莲英，你虽然骑马不行，但你要抓紧赶上才行

啊。”在这个危急关头，好像只有老佛爷一个人头脑清醒、异常镇静、井井有条，她对车夫说：“你们什么也别管，只管抓紧赶路，如果有洋鬼子拦下车子，不要多说什么，由我来应付他们，就说我们是乡下人，正回家呢，现在先去颐和园吧。”于是，车马出发了，从皇宫北门（神武门）启程，内务府所有人和各位妃嫔全都跪着送行，默念恭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两宫随行人员只有三位军机大臣，其他大臣奉旨前往颐和园集合。文连是内务府大臣，负责恭送太后一行从德胜门出城，当时在城门要往外逃的人流拥堵不堪，场面史无前例。

下午四点。圣上在上午八点抵达了颐和园，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早晨六点，出发前往颐和园之前，庆亲王派人去城东齐化门一带，向正在攻城的日本鬼子高举停战旗，然后打开城门，鬼子乘机一拥而入。

太后皇上一路人马来到颐和园，正巧我儿子恩铭当班。两宫满脸蒙尘，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竟然没人敢认出是她，这难道就是老佛爷吗？听到太后大声怒喝一声，守门兵士才把门打开，把车赶进园里，准备早茶点心。太后命令，立刻把园里值钱的古玩珠宝全部运到热河，又派一名太监回到京城，告诉皇后，赶紧把宫里值钱的珍宝埋藏到宁寿宫院子里。

端王、庆亲王、那王、肃王都到了颐和园随行，另外还有几名贝勒，大臣吴汝梅和溥兴，各部堂倌大概十二个左右，军机章京三名，由提督马玉昆带领一千名士兵护送他们，向张家口方向出发，还有几百名虎神营旗兵由端王带领，他们攻打使馆，但受到重创，只好返回。荣禄此刻还在竭力整顿军队。

才听说老朋友徐桐自缢身亡，全家十八名妇女全部自尽。徐桐是位曾经当过帝师的军机大臣，绝对是朝廷的忠臣，德才兼具，真是可惜可悲啊！这时耳朵里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情，都是满洲骄子，却都落得这等可悲结局，让人扼腕叹息。醇亲王（是指载沣，后来由慈禧做媒，娶了荣禄的女儿为妻）本打算下月结婚，没想到对方全家自尽身亡。真是可怜！

在老佛爷的一生中，这是第二次为了逃避敌人、离开京城，如同周朝天子一样，蒙尘在外。这次失败，应该归咎于南方各省，不肯同朝廷齐心协力。端王一心排斥汉人，他同样有责任，正如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的预料准确，拳民的法术简直是孩子胡闹，没有任何用处。昔日的大清太平盛世难以再现了！

我家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在内，全都愚昧无知，坚决要吞鸦片自尽，我阻止不了她们，但我自己确实做不了这等愚昧的事情。外国列强在京城到处抢劫肆虐，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藏金子的地方。我年纪一大把了，不想动身到哪里去了。自从昨天开始，恩珠就没了人影，奴仆们也不知都逃散到哪里，连为我做饭的人都没有一个。

《景善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天夜里，景善被大儿子所杀，在这之前家中所有妇女都吞鸦片自尽了。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光绪帝用朱笔发下谕旨，宣布立端王为嗣子大阿哥：

朕年幼便开始管理国家，多亏太后垂帘听政，事情无论巨细，殷殷教诲，孜孜不倦。我开始亲政，正逢上国家境遇艰难，我想发愤图强，报效太后。

自从去年开始，身体不佳，国事繁忙。考虑国家社稷，朕恳请太后训政，到现在有一年多了，但朕身体总没好转迹象。

现在时事艰难，太后每天忧劳过度、废寝忘食，朕曾经奉太后懿旨，一旦等朕生了皇子，就立为嗣子。想到这里，朕无地自容，病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啊？

再次恳请太后，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为将来国家大统着想。经过再三恳请，终于应允，立穆宗毅皇帝位嗣子，特此通谕知之。

世上让人如此伤心欲绝的诏书实在罕见，在这封诏书中，光绪皇帝承认自己当皇帝不合法度，要求退位，还为自己发布了死刑执行的令状。而且这个可怜的皇帝还感谢把自己推上刑台执行的人，感谢她

的圣恩，实际上，这个女人，对权力有无止境的爱，从一开始就把他毁了。

下面的这份奏折是京城中的都察院上奏给西安的两宫，禀报关于捉拿恩海的事宜，恩海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

这份奏折留下没发，慈禧也没有加批示。西安的一名两宫随从人员曾经送到上海报馆准备刊载，于是见报了。

从这份奏折中，明眼人可以看出，京城中的高官对于义和团的排外行为非常同情，而且，即使战败，他们也会一直尊重并忠诚于太后，同时可以对中国官员的勇敢精神有些许了解。

日本人所雇用的侦探，在日军领地的当铺中，查得一块手表，上面有克林德的图标。当铺的老板说，这块表是满族人恩海当的，他住在内城的车店里。侦探的名字叫做得洛，是本旗营第八支队的书记，查明这件事情，他立刻上报了日本人，日本立刻派人前往车店巡查，开始两三人进去，站在院内，问道："有叫做恩海的人住这里吗？"

有人答道："我就是恩海。"这个人立刻被抓捕。审问他时，恩海神情安然自若，毫不畏惧，审讯官问："是你杀害了德国公使吗？"恩海回答："我是奉长官命令，遇到外国人就杀。我是一个士兵，只知道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有一天，我带领了二三十个人，在街上遇到一个外国人坐在轿子里，我站在旁边，对准那个外国人放了一枪，轿夫当时逃跑了，我把外国人拖出来时，他已经死了。他的胸前有一枚表，我立刻取出来，同事当中有的得了手枪，有的得了金戒指，我没想到会因为这块表而犯案，但是我是杀了国家的仇敌而死，我没有遗憾，心中很满足，你们就杀了我偿命吧。"

翻译又问他："你那天是喝醉了吗？"恩海笑着回答："酒是好东西，我平常每次都能喝四五斤左右，但是那天一杯都没有喝，你怕我要借酒企图减轻罪行吗？"恩海是个真正的忠勇人士，毫不畏惧，围观的人都感动了，感觉中国还是有真英雄在的。第二天，恩海就被移交给了德国人，在克林德被杀害的地方杀了他。我们感觉这样的事

情，理所应当禀报，恩海是为国家而死的，应当得到太后皇上的怜悯，给他记功嘉奖。

第十八章　缅怀两位勇士

上一章提到的那份奏折中记录了满洲士兵被捕以及行刑的整个过程，因为这个士兵在德国公使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他枪杀了。这份奏折是向太后恭贺这个喜讯，并建议国家应该表彰奖励这样的勇士。这个士兵最后为了国家的安危英勇就义。然而，中国那些有着远见卓识的学者是真正值得称赞的。他们骨子里就流淌着英雄气概和高尚品德的血液。例如袁昶和许景澄这两位大臣，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甘愿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只要清政府多培养出一些这样的人才，孔子教义能够多培养一些坚忍克己之士，那么清政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不会衰败灭亡。这两位勇士实在让人钦佩不已，他们把一生中最后的三份奏折抄写下来，他们在奏折中抨击义和团把局面搅得混乱不堪，严厉指责奸佞小人混淆视听，力劝老佛爷今后不要犯糊涂，一错再错。国人已经为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过人的胆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着实让人钦佩，当朝的摄政王特下令把他们安置在先贤祠中，追封他们为圣贤。

袁昶和许景澄被处决后不久，袁昶的儿子就给他的亲朋好友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袁昶的死讯。1900年9月，袁昶家人向亲戚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关于袁昶的死讯。在信中，他首先表达悲痛和自责的心情，然后在信里说：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父亲从容就义，都是因为他直言不讳，有过人的胆识，且不随波逐流，坚决抵抗当时的邪恶势力。我的父亲“走”的不是时候。现在我们把这份通函的内容全部都告知我的亲朋好友。

今年五月份，义和团运动爆发，形势十分严峻，我的父亲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对此感到十分焦虑，他的同僚许景澄也十分担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我父亲曾先后三次上奏，称义和团完全不可信。他说

道：

“我曾经路过公使馆附近亲眼看到义和团拳民暴尸街头，很显然他们是被枪炮当场轰炸而死，而他们自称的那些法术根本没有用。应该把他们赶出军营，全部消灭。”听完我父亲的话，皇上转向许景澄，询问他中国现在是否有实力抵御洋人的军队，还问他外国列强的兵力怎么样？许景澄立刻回答道：“中国兵力太弱，根本没有实力抵御外国列强。”皇上听完之后，十分震惊，拽着许景澄的袖子，看上去悲痛万分。许景澄悲痛地退下了，之后，立刻与我的父亲一起联合上奏弹劾义和团。

后来义和团全面展开了围攻使馆的行动，我的父亲对许景澄说：“屠杀公使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如果使馆被毁，列强必定会派兵出征，伺机报复，那么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你和我一定要坚决阻止这种愚蠢的行为发生，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第二次上奏，禀明皇上，事实上他们的奏折没有出现在皇上批阅的公文里，但是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感到又震惊又恐惧，对洋人的袭击有所减少。如今，使馆得以保存主要是出于这份奏折的功劳。从那以后，我父亲和许景澄的敌人对他们愈发地憎恨。

六月下旬（7月15日到25日），外国人率大军逼近北京城，父亲对许景澄说：“我们现在只能等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延迟死亡的时间呢？”于是他们第三次上奏，在这份奏折中，他们宣称时局极其紧迫，但是王族亲贵和军机大臣们都支持义和团拳民，他们共同协作，把皇上蒙在鼓里。如果要避开临头大祸、抵御洋人大军，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铲除义和团。为了成功消灭义和团，我们必须首先处决王公大臣中的领头人物。这份奏折已经上报，我的父亲对母亲说道：“如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我是公开发表声明，还是保持缄默，都将必死无疑。与其死在这些卑鄙的小人手中，我还不如死在刽子手的手里。只要我死了就能让朝廷上下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险境，那么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们都围在父亲周围哭泣，他却镇定地对我们说：“我把我的一

生都奉献给了国家，现在我还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吗？无论是继续留在北京还是返回南方老家，你们都自己做决定吧。”他教导我们要忠诚于国家，要有爱国情怀。

七月的第二天（7月27日），父亲被捕，被押到刑部，第二天下午被处决了。斩首的场地周围挤满了许多义和团的乱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气愤地问他为什么对义和团不满，说他们是邪教，而不是维护和平、保家卫国的爱国民兵呢？父亲嘲笑道：“作为一个大臣，谋议国事是职责所在，你们这些人又怎么会懂呢？”

狱卒告诉我说，父亲和许景澄在狱中很从容地攀谈。他们还要了笔墨纸砚，写了二十多张纸，但是这份文件后来被义和团的拳民发现，就被他们焚毁了。我们在想，这是一份写给朝廷的告别奏折呢，还是写给我们家人的委托书呢？我们无法确认，也不得而知。我们这些不孝子本该去承受这巨大的悲痛。无论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我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的母亲健在，我父亲的丧事有待于办理，我们这些不孝子仍然要强忍悲痛继续守孝，哀悼逝去的父亲。本月初八，我们打算把父亲的灵柩安排在杭州的一个园林内，陪同母亲回家乡。我们在父亲的坟墓上刻了碑文，我们围着坟墓又悲痛地哭了起来。

如果说临危不惧、胆识过人是一种英雄气概，那么袁昶和许景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英雄。在阅读他们写的奏章时，尤其是最后一份奏章，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罗马的勇士。在他们品德高尚的哲学观里，他们骨子里那种高贵的品格以及面对死亡时从容镇定的态度散发着苏格拉底、塞内加、普林尼等欧洲人身上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就是欧洲文明中那种崇高坚韧品质的传统典范，这种精神是一种粉碎个人主义的高贵品质，也是日本得以强盛的根基。袁昶和许景澄的最后一道奏折绝对是惊世绝唱，彰显了他们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恳切之情。第一道奏折尽管是以袁昶个人的名义上奏的，但是其实是他和许景澄共同草拟的。许景澄曾经是驻俄国和德国的外交大臣，论清正廉洁、精忠报国，他都比不上袁昶。但是，无论他之前是多么不成功，他以死报效国家的那种大无畏爱国主义精神已经弥补了他之前的

不足。

1900年6月20日，许景澄第一份反对义和团的奏折，内容如下：

6月16日以来，义和团闯入北京城，皇上召集所有王公大臣。国家现在所处的险境困扰着皇上，皇上焦虑万分，向我们征求建议，想出一个能够让列祖列宗和全国百姓得以安宁的法子。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可以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也没有办法可以安慰皇上。真正的惨痛是给我们深感羞耻和悲痛。

我想起在嘉庆十三年间七月颁布的一道谕旨，当时山东河南一带有匪徒，名叫“八卦组织”，这些匪徒图谋不轨。事实上义和团就是“白莲教”的余党，嘉庆帝当时已经下令查办这些匪徒。只是去年在山东，吴桥县知县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上面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这个邪教的一些信息。两个月前，山东巡抚袁世凯向皇上禀明，称义和团绝对承受不起皇家的厚爱，他们也不可能被收编，成为朝廷的军队。没有什么话能比这更加直白了。而且前任巡抚毓贤上报说，他曾与这个邪教的头目有过接触，名叫朱红灯，这个江湖骗子自称是明朝后裔。他在当地妖言惑众，整个地区都陷入了骚乱之中。谋反的行径越来越猖狂，一直蔓延开来，直到朝廷军队擒获乱党头目，并把头目斩首之后，谋反的行径才有所收敛。处决这些义和团拳民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他们把自己完全神化了，那些自称义和团无懈可击的说法，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

去年当我在为这个案子查找资料时，程文炳将军告诉我说：“五年前（1895年）他驻守在河北省前线，遭到匪徒侵扰，这些匪徒的组织名叫‘金钟罩’，是‘红灯照’的兄弟党会。曾经有段时间，金钟罩大概有五十个人想要加入程将军的部队里。于是程将军想试探一下他们的实力。程将军派人用军火攻击他们、用刀剑刺伤他们，最后他们却躺在血泊之中，这些自称有法术的乱民当场死亡。”我想指明一点，那就是迷信是多么地荒唐。当他们声称自己是明朝后裔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些邪教组织的头目是很危险的，他们是有谋反之心的恶棍，他们建立这些邪教是想对抗朝廷。他们召集了很多追随者跟着他们，毫

无疑问，他们都应该被当作是反叛分子处置。

去年11月13日，皇上召见我。我上奏了以上事实，还说道，散布义和团反基督教的谣言仅仅是一个借口，而想叛国篡位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后来，新上任的巡抚袁世凯履行职责，镇压了这场运动，消灭了许多义和团组织，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安宁。山东省许多上层读书人曾经一度十分信任义和团，并且控诉巡抚的手段残忍，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被欺骗了，多亏了巡抚当机立断，立刻制服了这些乱民。谁会想到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势头会一直蔓延到河北省。河北省总督毫无疑问对此应该负有责任。他没有仔细审查就让溃疡继续滋长，充当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角色。后来当义和团拳民谋杀了涞水知县后，河北省总督才开始意识到，当前，他们自称的反基督教运动只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谋反行动。大臣裕禄见义和团以仇视教派为旗号，臭名远扬，立即电奏朝廷，请求立刻剿办义和团。朝廷的大臣们持有不同意见，一时无法作出决定。其他地区很快受到了这个邪教组织的影响，不知道什么原因，涞水的叛乱分子没有遭受任何惩罚就逃之夭夭了。他们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直到最后，他们毁坏了铁路线，摧毁了通往整个河北省的电报机，尽管这些都是政府的财产，大部分公款都已经被花费了。这一切确实令人发指，一个早上的工夫，国家经过数十年经营的数百万巨资就这样被完全摧毁，他们还摧毁了许多教堂，国家损失惨重。

我恭顺地上奏朝廷，称这次义和团反基督教的运动对于朝廷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根据我国法令，地方官吏在处理公务时要做到绝对的公正，不能有所忌惮或者出于私心，偏袒某人。其实，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应该不允许这些邪教乱民以宗教信仰为借口来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现在，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叛乱分子居然胆敢入侵京城，这些武装起来的乱民竟敢亵渎朝廷的军力。他们焚烧了教堂，围攻使馆，犯了纵火罪和谋杀罪。皇上的宫殿也因此受震动，从此根基不稳。遇到这样的行径，应该直接判处死刑。在这种时刻宽恕仁慈绝对是愚蠢的行为。

本月20日，他们向正阳门外的一千多个商店开火，京城里最繁华

的中心地带此刻变成了一片废墟。九成居民纷纷逃离北京城，大街上几乎没有店铺开张。其他省没有现成的钱可以用来支持我们的军队。语言已经无法描述我们所处的破败不堪的局面，在各个方面我们都不占优势。我们竟然允许这些暴徒大摇大摆地走在皇城脚下，大肆屠杀、抢劫，是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整个文明古国中的笑柄。各国外交大臣受到义和团的威胁，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们已经屈服了。外交大臣调用了使馆守卫士兵，士兵人数加起来才410个。很明显，他们只能起到防御性的作用，而不能起到攻击作用。

本月16日（6月12日），慈禧太后派启秀和军机处其他大臣向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妻子表示慰问和同情。公使感谢太后的仁慈与好意。太后仁慈，为保护使馆，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保护措施。外交使臣称，使馆已经调兵，做好了防卫工作，他们不想干扰我们国家的内政。他们对天起誓，让苍天为证，只要暴乱镇压，他们的军队会立即撤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们的虚伪和不怀好意的目的。当务之急是清除掉城内的乱民，不仅仅是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要消除洋人的疑虑。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需要进一步和外国列强交涉，让他们再调用更多兵力。如果我们自己镇压了这些反叛者，那么最后就不需要洋人的协助了。显然，这是明智之举。（下面提出了一些清剿的措施）

义和团拳民人数众多，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消灭可能不太实际，我敢说目前的局面主要是由少数的头目操控的，大多数拳民都是淳朴无知的农民。另一方面，这些叛乱者自称拥有法术秘籍，赐予了他们超能力。我胆敢提醒圣上汉朝末年的“张角”“黄巾”、元朝“红巾”，这些人都有超能力，然而最后都性命不保。这些匪徒自称无懈可击，是因为他们在白天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到了晚上就开始布阵，召唤他们的神灵来救助他们。他们自称的这种法术是借助咒语、护身符和咒符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仅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巫术而已。让他们遭受致命的武器攻击，让他们尝尝被大炮轰炸，被枪弹袭击的滋味，最后他们必定当场击毙。如果说这些臭名昭著的匪徒能够避开枪炮，那为什么在本月17日（6月13日）在攻击使馆时，遭受洋人军队炮轰，便当场死亡了呢？仅仅昨天一天，四十多个拳民在帅府胡同被击毙，他们

的圣坛也都毁灭了。

除了那些无耻可恶的暴民和义和团匪徒，北京城有一百万老百姓们都对国家忠心耿耿、遵纪守法。擒获这些匪徒，把他们就地正法，彰显了大清律法的公正无私，可以安抚民心。反叛者士气衰败，因为我军士气大增。只要清除掉京城内的义和团匪徒，使馆将会感恩圣上，认为这都归功于圣上英明，他们会觉得圣上是再生救世主。洋人调兵增援的行动可以中止了，或者说可以让他们早日撤军，很显然，现在没有什么必要让洋人军队滞留在这里。

总之，《周礼》中称，治理混乱的国家，必须实行死刑。《康诰》中称，对罪犯施加刑罚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所以，很明显，那些义和团匪徒应当立刻被处决，一而再地拖延或者采取一些含糊不清的措施，例如把他们收编、加入朝廷军队，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徒劳。洋人的势力很强大，他们早已愤愤不平，已经忍到了极限。

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打击报复我们，接下来等待着我们的可能是无法言语的灾难。不要让洋人来镇压义和团，否则北京城内和周围都充满着斗争和杀戮，这样会殃及到普通老百姓。让我们自己来镇压这场运动，这样才可以让那些诽谤我们和恶意批评我们的人闭嘴。只有这样，列祖列宗的祠堂才能免遭亵渎，真正造福人民。

大学士荣禄对国家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如果圣上能够授予他更多权利，那么胜利就指日可待。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决那些棘手的外交事务。我想告诉圣上最基本的事实：只有权力集中了，才能战胜敌人。我现在虔诚地乞求这份奏折能够呈交到圣上手里，这份奏折叙述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圣上英明，恳请圣上三思过后再作决定。

7月8日，袁昶和许景澄呈递第二份奏折，内容如下：

从那以后，上个月24日，德国使臣克林德被义和团拳民杀害，义和团围攻了使馆，甘肃省提督董福祥所统领的军队与这些匪徒狼狈为奸、作恶多端。在使馆附近居住着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死在了这些叛乱者的手里。事实上，在北京城的东区每幢住宅，无论是公有财

产还是私有财产都被残忍地掠夺了。

义和团拳民起初声明，他们的使命是成功完成反基督教的任务。他们的行动中包括对使馆的攻击。从使馆开始他们就拓展了行动范围，直接把打击朝廷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作为行动目标。叛军和反叛暴民在北京城胡作非为，对老百姓坏事做尽，这种情况真的是史无前例啊。

当匪徒刚开始围攻使馆时，他们自吹自擂说，不出二十四个小时，没有一座公使馆会继续矗立在北京城。不只如此，董福祥还上奏说，这些使馆早已化成一堆灰烬。然而事实上，大约一个月过去了，被杀害的外国士兵寥寥无几，整个使馆区域却躺满了义和团拳民的尸体。他们欺骗淳朴的老百姓，声称他们的法术可以帮助他们免受子弹之伤，可是如今，他们口口声声夸耀的那些法术到底有什么用呢？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五万义和团匪徒居然没有攻破使馆不足四百人的守备部队，我们可以从中准确地掂量出这些义和团拳民到底有几斤几两。谁想借用这所谓的勇士去和洋人作战呢？

如果说真正的义和团可以为国家效力，那么这些犯有谋杀罪和纵火罪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义和团，而是一些不合法的邪教徒、专门妖言惑众的江湖骗子，他们是一些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团伙组织被真正的成员和冒牌的成员搞得四分五裂，并且如果后者还是经过了前者的允许和同意，犯下各种罪行，那么很明显义和团已经声名狼藉了。

而且，很明显，朝廷已经禁止他们用炮火和刀剑继续他们的破坏行为。朝廷下令让他们解散义和团，立刻离开北京城。然而，他们却无视朝廷的命令，继续为非作歹。无论是真正的成员还是冒牌的成员，这些拳民争先恐后公然蔑视大清律法。对于他们无可救药的邪恶行径朝廷只能处决他们。对他们一再仁慈，只会助长他们嚣张的气焰。由于对这些匪徒一再忍让，义和团匪徒人数越来越多。

在上一份奏折中，我们力荐大学士荣禄应当被赋予更多权力，奉命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可能对于镇压义和团运动很有必要，但是皇上

拒绝采纳我们的建议。如今危险加剧，在皇上的英明之下，我们的观点是粗鄙的，我们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定会因为我们的鲁莽招来杀身之祸。《春秋》中记载：在战争中，使臣是不可侵犯的。根据欧洲国家的国际法规，外国大使被视作神圣的人士，任何人蔑视公使，对公使不敬，就是蔑视公使所代表的国家。如果说让义和团匪徒摧毁公使馆，杀害外国使节，那么毫无疑问，列强会愤慨不已，他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联合起来，伺机报复我们。

目前，洋人军队还驻守在北京城，尽管人数不多，但是之后会有大批军队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中国接下来要和世界列强战斗，依微臣之见，列强不仅仅是要击败我们，而是要把我们大清帝国瓜分。过去60年间，中国已经和外国列强商讨，允许欧洲的传教士来我国传播他们的宗教。事实上，这些传教士利用他们的身份不能公正对待我们的同胞，还侮辱他们。他们经常利用自己传教士的特殊保护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但是当地官员对此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不能公正处理这些事情。结果，由于当地政府官员的不闻不问，导致非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愤恨与日俱增。现在，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领悟了不少道理。圣上在谕示中，不要流露出基督教民对老百姓的行为的任何不满的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各国的眼里，中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尊严，然而我们的清政府对于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之间的长期争端却视而不见、漠不关心。最不可容忍的是，当地官员竟然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说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秩序。例如，一个村子里有两家邻居长期不和，各自家族的家庭成员和仆人常常争斗。结果在争斗过程中财产损失惨重，甚至还伤及他人性命，那么受害者就可以向施暴者索要赔偿。但是如果来自其他家族的头目的话，就需要接受法律法规的制裁。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治国之道。

欧洲的宗教分成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以“神父”著称，而新教称作“牧师”。这些义和团匪徒不知道他们各自传的是什么教，便统称他们为洋教。但是俄国人信仰希腊教会，日本人信仰佛教。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把传教士送到中国内陆来，事实上，义和团不知道哪些国家有传教士，哪些国家没有传教士。对于他们来说，只要看到身穿异国服饰的人，或者听到外国话，就立即把他

们当作是“长毛鬼”，是必须消灭的人。很明显，根据这种原则而作出判断的行径是不公正的。然而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不明智之举是万万不可的。我敬请圣上铭记中国也有使臣驻在世界各国。如果听闻外国使臣被大肆屠杀，必定会触怒列强，他们必定会伺机报复，屠杀我们的使臣，这不就是说中国自己把他们的使臣杀害了吗？圣上，太后已经把水果、蔬菜、面粉和大米作为礼物送到了使馆，为的是展示圣上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的仁慈。然而这些义和团匪徒却只信任他们狂妄的董福祥将军，把他当成义和团的中流砥柱，继续攻击使馆。如今各国列强对朝廷的作为表示怀疑，表面上虚伪地表示友好，暗地里又派人大肆屠杀，虽然圣上事先已经向表示怀疑的列强声明，然而今后谁还会相信圣上是无辜清白的，说您不支持这场大屠杀呢？

如果，另一方面，使馆成功抵御敌人的攻击，直到又恢复往日的安宁与平静，等外国使臣收了皇上的赏金，必定会心怀感激，这样就会报告他们的政府说是义和团单独攻击使馆的，使馆没有事先防备，大清皇帝与这场运动毫无关系。在这个要紧的关头，我们采取一系列明智的举措，这样才会消除列强的疑虑，对我们来说是事半功倍啊。这有利于我们大清国与各国恢复和谐的关系。但是如果使馆被彻底毁灭，而且各国使臣都被杀害，那么世界各国列强有谁会了解皇上的怀柔之心呢？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只是希望通过劝服列强，说明朝廷是清白无辜的，那只会是徒劳。列强现在恳请中国政府，派兵来镇压这场叛乱。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妄想永远驻守在中国领土上。只有大多数轻信的人才会真的相信洋人的谎话。我们作为圣上的臣子，没有足够的智慧，所以也揣摩不出洋人的真正目的，但是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必须亲自铲除这些图谋不轨的义和团匪徒。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洋人来剿灭呢？为什么要等到这些洋人来处理我们手头上正处理的事情呢？

我们恳请圣上保护使馆，让列强彻底相信中国只是希望保存领土完整。我们现在请求圣上颁布一道谕旨，严厉谴责董福祥，命令他立刻从北京城撤军。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踏进使馆区域半步。下令任何义和团拳民和他们的追随者，只要继续攻打使馆，就把他们就地正法。义和团失去了朝廷军队的支持，铲除义和团匪徒就更加容易

了。同时我们恳请圣上赋予荣禄权力，让他及时把每个义和团拳民赶出北京城，以解燃眉之急，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杜绝后患。

我们都知道飞蝗蔽天，祸从口出的道理。但是，谦逊点说，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就像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奄奄一息。作为臣子，我们有职责履行劝谏的义务。因此我们冒死上奏，微臣恳请皇上圣鉴。

1900年7月23日，摘自袁昶和许景澄呈上的最后一份奏折：

微臣斗胆向皇上禀明，作为神圣的首都——北京城已经一个多月都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中，全国各地对国家事务的反响很强烈。如今，我们面临着要与世界各国列强宣战的险境，结果必定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咸丰年间，太平匪徒在十多个省份发起暴动，一直到十年后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天下才又恢复往日的安宁。嘉庆年间，白莲教发动反叛，三四个省份沦陷。历史中明确记载了，在这些斗争中，只有勇敢地冲锋陷阵、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朝廷军队才能成功让天下恢复秩序。这些反叛运动与现在的义和团起义相比，根本无足轻重，不值一提。这致命的伤害如今一直威胁着国家的安危。在之前的情况中，上至朝廷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很清楚太平天国是叛乱分子，但是如今一些上层阶级的人居然把义和团当成爱国英雄，以至于一些知道他们是叛乱者的人都不敢说出事实。我们的愚蠢让各国耻笑，让各国仇视。起义之初，这些人都是一些无知的农民，不谙军事计谋。他们只知道追随义和团的头目，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是这句口号到底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对于仁慈和善良要心存感激。目前大清已经传承了两个多世纪，我们内心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作为子民，保家卫国、报答朝廷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说自己的国家处在极大的危难之中，正是这些乱民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并且恢复往日的安宁，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认识到：这些能够“扶清”的人也是能够在今后推翻清王朝的人呢？“扶清灭洋”的口号只不过是些逆谋的话语，说出这种观点的人简直是大逆不道。

微臣深刻地意识到，这些洋人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筑巢，对于我们国家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是解决这种境况的首要方法就是改革，同时要小心谨慎处理外交事务。我们必须等待时机，挑选一个实力较弱的对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实力可能会适时显现，一雪前耻。

如果说外寇毫无理由就侵略我大清，那么我们就鼓励各种忠诚爱国人士拿起武器，加入战斗，尽管说他们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但是如今，朝廷与洋人关系很友好，这种突如其来的“杀死洋人”的口号只不过是针对朝廷、带有敌意的故意的挑衅而已。这种愚蠢的行为像弄坏孩子的玩具一样，轻易就能推翻清王朝。另外，他们说要杀死洋人，是指杀死在中国的洋人呢？还是要消灭整个五大洲的洋人呢？但是如果说他们的口号的意思是他们计划扫除全世界的每一个洋人，那么傻子都知道他们的计划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毓贤、裕禄和其他总督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尤其是裕禄还召集义和团的头目，把他们当成座上贵宾。许多无赖恶棍聚集在衙门口，只要持有“义和拳”三个字的字帖便可以进入衙门。这些人与总督分庭抗礼，这完全是蔑视朝廷、侮辱读书人的智商。像义和团头目这些令人发指的无赖恶棍，张德成、韩以礼等人之前在他们的省份里根本没什么名气，现在在北京城却臭名昭著。之前有个总督向朝廷上奏推荐他们。该总督没有征得皇上同意就公然奏报，录用这种人渣，实在是欺君罔上。

关于裕禄的奏折，他上报说在天津打了胜仗，我们仔细询问了许多来自天津的难民，他们都否认了这个奏折中上报的事实。相反，他们一致同意，说成千上万的人马被洋人杀害，他们甚至还说大沽炮台沦陷，是因为裕禄首次允许义和团攻击洋人军营，先行挑衅才导致的。他们对于裕禄愤愤不平，可能他们的话语中有些夸张，但是我认为，总督上奏的内容确实言过其实，他与董福祥联手谎称说他已经焚毁使馆、剿灭敌人。董福祥只不过是甘肃的一个强盗而已，向朝廷军队投降后，投奔军营，在他所在的军营里获得了威信，加之得到朝廷格外的厚爱，才有了他如今的地位。他应该报答圣上的赏赐而不是串通逆谋者，表现得像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他目前的行为很明确地显露

出他的狼子野心。

裕禄作为大清国的高官，和董福祥这等人是完全不同的。只能说他的愚蠢蒙蔽了他的双眼。毫无疑问，是朝廷里一些奸佞小人欺诈了裕禄，导致他误入歧途。这些小人使得朝廷背离了原来要走的道路。正是这些奸佞之臣应该对此全权负责。

大学士徐桐，一向比较糊涂，对于我们的需求和此时此刻所处的困境一无所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是一个顽固偏执的人，跟随叛乱者，对叛乱者卑躬屈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生性傲慢顽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本性狡猾、善于奉承。

当义和团拳民第一次进入北京城，圣上召见所有人，当时王公大臣都在场，圣上问我们有没有可以采取的安抚政策或者说镇压政策？

有大臣回答说义和团绝不是爱国人士，对付洋人毫无用处。同时微臣乞求皇上三思，不要轻易就和世界各列强宣战。徐桐、刚毅等人胆敢在皇太后以及皇上面前斥责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没有足够的人马去击败敌人，我们作为圣上的臣子绝不会没有忠于朝廷的爱国精神，我们盼望着这些洋人被彻底击溃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结果绝对不可能发生。把国家带到灾难边缘的人不是那些反叛者，而是那些犯迷糊的大臣们，正是他们的错误使得国家离灾难越来越近。

五月，刚毅和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义和团，义和团却逼迫这些大臣们跪在他们的祭坛前上香，这些匪徒手里拿着那些荒谬的咒符，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一些咒语。赵舒翘很清楚，这个愚蠢的举动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于是他当众恸哭起来。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反驳刚毅，因为刚毅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后来，他们回来之后，联合刚毅向圣上禀明说义和团已经解散了。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已经解散，怎么可能义和团匪徒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呢？对于这些随意上奏的大臣，朝廷应该怎样处置呢？

天津已经沦陷，眼看着洋人的军队一天天逼近北京城。目前，义

和团的法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帮助，我们估计，不出一个月敌军就会攻破城门口。微臣乞求圣上考虑到当前的局势所带来严重的后果，以及亵渎列祖列宗的圣祠的可能性。一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但是同时徐桐、刚毅等人却一起有说有笑。大船开始下沉了，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担心，就好像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避难所一样。国家与其靠傻瓜和酒鬼，也比靠这些军机大臣强。甚至有些上层阶级的人士，包括圣上的一些亲随大臣，以及军机处的其他大臣都在义和团面前磕头。一些皇亲国戚的府邸也都变成了义和团的祭坛。这些拳民都是傻瓜，但是他们却又如此聪明，居然能够欺骗徐桐和刚毅等人。徐桐、刚毅等人都是傻瓜，但是他们又轮流设计去欺骗这些王族贵亲。徐桐、刚毅等大臣是这些灾祸的始作俑者，除非圣上下令立刻把他们斩首，证明他们的罪行，从而彰显大清律法的公正无私。朝廷上下各个官员必须接受义和团是邪教的事实，否则，其他追随裕禄和毓贤的官员会继续支持义和团。

圣上不仅应该治徐桐、刚毅等人的罪，而且还要对那些身处高位王亲贵族定罪，是他们思想糊涂，一直保护并且支持义和团。他们和圣上的关系亲密或者说他们是皇族成员，身份尊贵，圣上不能偏袒他们，免除他们该遭受的刑罚。因此只有通过这样，洋人才会认识到是义和团过于疯狂，对各国列强宣战只是部分被误导的官员挑起的，这并不代表圣上的意思。战争向和平作出让步，那么列祖列宗的祭坛就能免遭洗劫了。等事情过去之后，下令赐死各佞臣。这样才能安抚徐桐、刚毅和他们的同党。臣等含笑入土，绝无怨言。我们怀着愤愤不平以及焦虑不安的心情，含泪上交这份奏折，恳请皇太后和皇上圣鉴。

第十九章　施政纲领

当初太后对义和拳执迷不悟时，敢于上奏劝谏她的大臣除了袁昶和许景澄之外，还有很多人。义和拳运动刚刚发起时，两江总督刘坤一见到太后的举动，感觉她在引火烧身，焦虑不安。他给太后发去电报，竭力奉劝太后阻止义和拳运动，还从八百里之外发去急电，恳请太后下发谕示，停止攻击各国使馆。太后对刘坤一的这份奏折置若罔闻，批阅模棱两可，充分说明她当时的进退两难心态：她既想打击报复洋鬼子，又怕惹来一身祸。从《景善日记》中，我们可以察觉太后的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收到了刘坤一的奏折，对使馆又持续猛攻了大约一个月，当中断断续续，时而下诏猛攻，时而发谕示要与各国交好言和，给使馆送粮食蔬果。刘坤一对朝廷忠心不二，丝毫不亚于荣禄，加上他办事老练沉稳，太后对他极为器重。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太后丝毫不为所动，没有放弃打击报复之心。直到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太后才恍如大梦初醒，后悔不迭，她费尽心机，谋划补救方案。战局已定，慈禧暂时采取权宜之计，向各国修书一封，请求言和，连连给围困在使馆中的公使们送上水果蔬菜，表示清政府的诚意。但是，心底下，慈禧心里依然有杀敌之心，希望端王能带领义和团奋勇前进，打败敌人，保卫大清的江山社稷。

读一读刘坤一的奏折，中国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一览无余，满族统治国家的强大基石是君主一言九鼎。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孔孟之道宣扬忠君孝亲敬祖，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一切听从君主的。所以，刘坤一在奏折中，只字不提朝廷腐败无能，还大力颂扬太后皇上仁德智慧兼具，把一切责任推到了大臣身上，说他们不能体谅圣上的一片苦心。奏折中说：

细细分析本次战事，因为义和拳匪徒们借口仇视宗教，大肆烧杀抢掠，酿成了大祸。各国以保护自己的商人教士为幌子，大肆增兵调

舰，合着算计我们大清王朝。各省都在大力筹备战事，我们已经对防务工作作了严密筹备。如果敌人前来侵犯我朝，我们一定会奋力抵抗，不敢有丝毫疏忽怠慢。因为考虑到太后圣上宽大为怀、仁至义尽，我们做大臣的理当效力。

目前，朝廷必须把万不得已的苦衷，发下谕示，这样盗匪们就不敢找茬危害一方了。

在战事开始时，各位大臣连同微臣已经向大家发下通告，请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相信无端的流言，我已经收到来自中国海外华人的恳请，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在华外国人士，防止他们产生报复之心，对海外的中国人不利，他们请愿的言辞真是情真意切。在华的外国领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他们各国的教士和商人，我们乘此机会，会见了江海关道的余联沅，同他们订立一份章程，以共同遵守。在长江一带以及苏杭地区，只要各国不侵犯，我们会照常保护他们在该地区的商业和各国教派。各国领事已经致电他们各自政府，我们大臣已经致电各位在国外的使臣，向各国作好了切实声明。因为一名德国使臣被杀害，德国可能会反对章程，各国可以牵制德国，督促它遵守章程。

我在这里引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下发的一份谕旨：在外国的使臣目前情形危急，我们仍然在尽力保护他们，并且敦促各位大臣恪尽职守、审时度势、竭尽全力。六月初三（6月29日）的一份诏示下发到各国使臣，说朝廷仍然派了官兵保护各国使臣，我们力量如此，只能尽力而为了。各位使臣在各国，遇到任何交涉的事件，仍然按常规办理就行。换句话说，朝廷在天津对那些开火攻打我方的洋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对我方没有发动攻击的外国商人和教士，则尽力保护。朝廷的威严与仁德并施，如同日月生辉。

我们一再恳请朝廷采取措施，保护外国使臣，太后皇上忧虑当前时局，保护外国使臣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不能有丝毫延误。

出使大臣杨儒和他的同僚们来电，他们认为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

护在华的所有外国使臣和平民。因此我们恳请太后皇上派遣精英部队保护京城使馆，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在国外的我国使节的安全。我们恳请朝廷给各省下发谕示，保护好各省的洋人，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在国外的公民的安全。形势危急，我们不胜焦虑。

对于这份奏折，太后批阅后，致电刘坤一，并且派人送到了两江总督府。批奏电文如下：

已经收到了你的奏折，朝廷本来并不想与洋人为敌，我们曾经告知各国政府，并且下谕示，通知到了各省当局。屡次降下谕旨，要求保护境内的外国使臣和公民。督抚的意见正与我们朝廷的相同。幸运的是，各国使臣中除了克林德之外，其余的所有人都安然无恙。目前我们已经给各国使馆送去了蔬菜水果等食品，表达我们朝廷对他们的体恤。如果各国依仗自身兵力雄厚，进犯我国各省，我们会出于保护疆土的原则，英勇抵抗到底，毫不手软。即使目前，洋人与我们相安无事，我们也要严密筹备，防止发生任何意外变故。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会先发制人，绝不首先侵略别国。我们会向在华外国使节和平民表明我们的和平友好的诚意，向各国政府表明我们的态度，共同商量切实的补救方案，维持和平大局，以符合各国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你们不能轻信任何流言蜚语，破坏我们内部的团结统一。这份谕示是从六百里外紧急送出的。

这份谕示在下发前，7月1日，慈禧亲自草拟了一份诏书，清楚详实地向各国政府解释为什么会导致今天这样的局势。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十天以前，太后还下发一条悬赏令，凡是京城中捕捉到洋人就有奖励，而且她还向山西巡抚毓贤下令，要求杀山西境内的洋人，而毓贤奉旨，在山西对洋人大开杀戒。慈禧通读史书，经验丰富，她只要略微施点小伎俩，就能让洋人产生内讧。这道谕示是下发给各国使节的，内容如下：

这次中外产生敌意，完全是由于大量不利情形导致的，让双方产生了误会，绝不是我们有意所为。我们在国外的大臣与我们远隔重洋，对国外的情形洞悉不深，不能把中国政府的真情实意如实传达给

各国外交部。我们现在特别向你们澄清事实。

先是在直隶和山东两省，产生了乱民阶层，他们在各自村落，练习拳术，并玩弄杂耍。因为地方官员一时疏忽，没能及时察觉，没有把拳术发展遏制在萌芽阶段，导致势力壮大，几个月工夫，全国范围都蔓延开来，甚至京城地区都有波及，个个都把拳术看作神奇的玩意，附和成风，结果被一帮桀骜之徒利用。五月中旬，义和团突然开始对外国教民发动进攻，开始焚毁教堂、虐杀教民，气势汹汹，不可阻挡。

一听说有焚毁教堂、虐杀教民的风声，各国都调遣自己的精锐部队来京城，保护自己的使馆。形势如此严峻，朝廷破格同意这种做法，各国派到京城的洋人士兵不少于五百人，这些都是中国重视邦交的明确证据。各国驻京城的使馆，过去与我国地方官员几乎没有联系，怨德更是谈不上，但是自从洋人军队进驻京城后，他们没有一心保护自己的使馆，有时会在京城内四处巡街，放枪伤害百姓的事情时有听说。有时士兵在街道游行，差点进入东华门，后来被拦截下来。我国的军民对此事愤愤不平，正在这时，义和团匪徒乘机而入，肆意横行，大肆烧杀教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增加兵力，有不少被义和拳乱党所杀。这时直隶、山东两省的乱党已经联合起来、沆瀣一气了。朝廷此时没有对乱党彻底剿除，害怕操之过急会造成不良后果，又担心对各国使馆保护不力也会酿成大祸，真是进退两难啊。朝廷忧虑，直隶、山东两省乱民同时造反滋事，两省的教士教民就会全部被害，所以朝廷踌躇不已、审时度势，不得已作出决定，让各国使臣暂时到天津避难。

正在与各国商量期间，突然又听说德国使臣克林德在早晨前往总署途中，被义和拳乱民伤害。总署事先与德国使馆有会晤约定，但是因为中途出了这件事，导致会晤没能成功进行。自从出了这件事，义和拳乱民态度不明，即便是护送外国使臣前往天津的事也不能轻率进行。必须保护好使馆，护送使臣前往天津的事仓促不得。没想到在五月二十日，大沽海口的外国大员与守台提督罗荣光会面，提出借用炮台的事，没有得到肯定答复，便在第二天两点强行占据了炮台。保护

炮台是罗荣光的职责，他哪里肯同意？于是罗荣光一方先开炮轰击，双方相持多日，最后罗荣光没有保住炮台，炮台失守。这样，双方摩擦生事，但绝不是我方先挑衅，而且中国也不可能自不量力，同时挑衅多国，完全是乱民先行挑衅各国，请各国务必谅解。

以上种种委屈情形，都是中国万不得已才采取的相应行为，各位使臣应该向各国外交部详细切实说明情况，体谅中国政府本意。现在我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带领官兵保护使馆，如果再有乱民焚毁烧杀事件，我方一定自行剿灭他们。各位使臣在各国，遇到任何交涉的事件，仍然按常规办理就行。不得观望，特此下发电谕。

随后，可能有军机智囊团的建议，慈禧太后分别致电俄国沙皇、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以及各国首脑，想用这个办法离间外国列强，导致他们之间不和与矛盾。这个政治手腕是中国官场采用的，并且屡试不爽。但是，中国官员简直不知道如何恰当处理外交事务，按惯例，这些官员应该由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照会外国使馆（他们目前仍然处于围困中）。但是，中国政府却把照会发到驻各国的大臣，由这些大臣转给各国政府。从这些电函中，明眼人可以看出，在遭遇了大沽炮台失守、天津沦陷、联军进攻京城一系列事件后，慈禧太后忧心忡忡。充分了解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外交事务中的弱项，慈禧太后抓住一切时机向各国表示友好，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时局面前命运不济的无辜牺牲品，一心想博得外国列强的谅解和同情，为自己找后路。但是，处在深宫中的她，对义和团的拳民仍然抱有希望，希望义和拳民能扫荡各国使馆，报仇雪恨。



西方画报所描绘的慈禧太后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凡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都是希望统治者能以历史为明镜，把握现在与未来。他们应当看到朝廷的态度，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所有官员，无论满汉，无论勇敢懦弱与否，无论正直腐败与否，朝廷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对他们简直恨之入骨。只不过与拳匪的态度上有明暗区别，

拳匪们把这种恨表现得明目张胆，而朝廷表现得比较温和，即使是朝廷要员，比如袁世凯、荣禄和刘坤一也是如此，他们表面与洋人态度友好，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打击报复。所以，中国的外交文书写得冠冕堂皇、态度友好，我们对这些文书必须三思，不能轻信；同时，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会恨之入骨，原因何在？

究竟是我们外国人的错，还是他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去五十年期间中国高官要员的奏折，我们也会碰到极个别的例外情况，比如袁昶就是一个例外，他对外国人非常尊重。但是，他的尊重也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与外国人结为至交。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屑一顾，认为我们外国人智商不行，认为我们不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感觉我们外国人容易轻信别人，所以中国人总是能利用我们的这一弱势达到他们的目的。毫无疑问，如果未来再产生拳乱，他们政府的态度一定依然与1900年相同，表面上不鼓励，暗地里推波助澜，外人当然是看不出的。

现在回到正题，下面的电谕是慈禧太后下发给俄国沙皇、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的，时间是7月3日，这些谕示也同时下发给了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但是奇怪，时间竟然是6月19日。7月3日的电谕命令驻俄国的出使大臣杨儒递交给俄国沙皇：

大清政府皇帝向大俄国皇帝问好。中国与贵国是友好邻邦，二百多年来，和睦相处，友谊笃深。近来，因为教派问题，义和拳民乘机扰乱。各国都怀疑是我们大清朝廷怂恿。贵国使臣格尔思曾经向总理衙门建议，请求剿除乱民，解除各国忧患。但那时在京城内外，乱民已经遍及各地，风声四起，官兵军民到王公大臣，都一致与洋教为敌，达成了势不两立的势头。对此事朝廷不能操之过急，既担心对各国使馆保护不力，酿成大祸，又担心全民乘机滋事，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一直踌躇不前、举棋不定。各国水师不能体谅我国，攻占了天津大沽炮台，于是军队之间结下仇恨，时局更加纷乱。实际上，贵国与中国的关系绝对不是寻常的邻邦可比，我们两国友谊深厚。前年就曾经派李鸿章当全权专使，立了一份密约，至今还保存着。

现在中国迫于时局，百姓群愤，政府几次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为百姓排乱解忧，只好把责任推给了贵国。为此，开诚布公地给贵国修书一封，希望俄国大皇帝能设法帷幄，竭力挽回时局。中国政府静候贵国佳音。

同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英国女王发了一封电谕，由出使英国的大臣罗丰禄递交：

大清朝皇帝向大英帝国兼印度皇帝问好，自从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与贵国的商务份额最重，关系最硬。近来，因为教派问题，义和拳乱民乘机扰乱贵国与我国的关系，各国一致认为是我们朝廷在包庇纵容乱民，于是产生了攻占大沽炮台的事件，从此军队之间嫌隙加深，时局日益纷乱。因为考虑到中英商务，贵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对贵国的关税比其余各国都轻，条件也宽于其余国家，几十年来，通商各口岸有贵国的商民，和我国居民相处融洽，亲如一家人。

现在因为相互猜疑，时事日益艰难，恐怕大清政府万一挺不过去，恐怕各国会觊觎中国地大物博，争相来抢夺，我们认为贵国如果也做这样的事是很不妥当的。现在中国开始招兵买马，筹集物资，准备迎战，我们不得不把责任推给贵国。为此开诚布公给贵国发书一封，希望女王陛下能自持贤明，设法帷幄，竭力挽回时局。中国政府静候贵国佳音。

发给日本天皇的电谕，则由出使日本的使臣李盛铎递交：

大清国皇帝向大日本国皇帝问好。中国与日本是友好邻邦，齿唇相依。一个月前忽然听说使馆秘书被杀，我们感到痛惜，正在惩办凶犯，而各国因为教派信仰问题正互为仇敌，各国都认为我们大清朝廷对百姓偏袒包庇，结果攻占我们大沽炮台，军队之间互相挑衅，局势日益严峻。考虑到中外局势，在世界东方大国就是中日两国。西方列强觊觎的难道仅仅是中国吗？

万一中国支持不住，恐怕贵国也难独立，彼此之间休戚相关，我们两国一定要抛弃前嫌，顾全大局。现在中国方面正在招兵买马，筹

集资金，排除万难，准备迎战，责任可能都在贵国方面。为此开诚布公，向贵国修书一封，希望贵国天皇能运筹帷幄，尽力挽回时局。中国政府静候贵国佳音。

第二十章　离京西巡

《景善日记》中详细描述了8月15日黎明，皇太后和皇上逃离北京城的事情。军机大臣王文韶把两宫西巡的经历都记录下来，寄给他浙江的朋友，后来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中发表了。王文韶所叙述的内容与《景善日记》不谋而合，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故事。

8月18日，王文韶快马加鞭赶超两宫一行。在过去的三天里，两宫曾经遭受到无数的艰难险阻。19日晚上，他们在离北京城七十里远的贯市停下歇脚，两宫就在清真寺庙里就寝了。在那里，有个叫“同光裕”的商行，专门把牲口出租给来往运输的商人。给他们提供最好的食物，却也只不过是些粗粮、蔬菜和粟米粥。另外还准备了几头骡车给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乘坐。随行的护卫军在后面远远跟随，万一敌人军队追上，两宫行踪不至于泄露，同时微服出行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两宫和随行的人一路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却被一大批逃难的难民和周围的村民追问北京城的情况，当时，有一个目击者称，他看到皇上紧张地向四周张望，还说道：“我们今天沦落至此，全拜义和团所赐。”之后，老佛爷大喊让皇上住口，虽然她也身处险境，却表现得毫无畏惧。

第二天，两宫和随驾的仆人乘坐骡车行走了九十里路，他们在岔道过夜，那个地方已经离长城很远了，那里非常荒凉，没有人来招待他们。没有足够的铺盖，两宫只能睡在简陋的砖头炕上，两宫确实受了不少苦。幸亏白天有个知县为太后找了一个蓝色的轿子，让太后就寝的时候稍微舒适些。中午，两宫一行在居庸关休息的时候，总管太监李莲英向当地村民寻来了一些茶水给太后享用。

第二天，一行人从岔道前往怀来，这五十里路程让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一些官员和宫中大臣已经赶来随驾。整队人马除了老佛爷的轿子和皇上的骡车，还有十七辆马车。两宫出行的消息走漏了，有谣言

称，有一行人开始冒充天子和老佛爷。事实上，老佛爷梳着汉人的发式，身上还穿着逃出宫时的汉族平民的衣服。尽管谣言四起，但是怀来知县吴永却没有接到两宫亲信的通报，当两宫一行在一大帮人的簇拥下踏进他的衙门，他还没来得及穿他的官袍，就匆匆忙忙地跑出来迎接圣驾。知县行过礼之后，他想把围观的百姓驱赶开，但是老佛爷却制止了他，说道："不必了，就让他们看看吧。看到这些淳朴的村民，我感到很欣慰。"经过了三天粗茶淡饭的煎熬，太后品尝了怀来知县准备的燕窝鱼翅，感到十分高兴。知县还为太后、皇上和大阿哥准备了换洗的衣服。怀来知县安排周到，得到了太后的赞赏。

两宫一行在怀来县歇息了一天，随后王文韶便赶来与他们会合。老佛爷看到他非常高兴，甚至还热情地对他表示慰问，说他一路上风尘仆仆，辛苦他了。老佛爷还坚持要把燕窝赏给王文韶享用，说道："你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肯定很想尝尝燕窝的味道。"她指责皇帝，王文韶作为朝廷老臣，长途跋涉与他们会合，可谓忠心可嘉，可是皇帝也不热情地慰问他一下。

太后命令庆亲王赶回京城与外国联军和平谈判。明知这件事情非常艰难，但是他不得不奉旨回京办差。在出发之前，太后召见他，并和他商议很久。太后称大家都相信庆亲王的能力。1860年恭亲王与外国人议和十分成功，建议庆亲王也可以参照恭亲王议和的方式去和外国人交涉。

以下是王文韶记录两宫西行的路途中的一些趣事：

七月二十一日黎明时分，两宫乘坐普通马车，仓促地逃离皇宫，到达贯市时，没有一个人来招待两宫。皇上和溥伦贝勒爷乘坐一辆马车一直到达怀来县。怀来县的知县为两宫提供了一个大轿子，后来在宣化县，宣化知县为两宫一行准备了四顶轿子。

由于局势紧张，逃离皇宫时过于仓促，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足够多的衣服。太后衣衫褴褛，梳着汉人的发式，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样一身行头外观上看起来确实改变了不少。离开京城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像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一样，睡在砖头砌的炕上，晚上甚至连米饭都

不够吃，只能喝点小米粥。在历史上记录的所有灾难中，没有什么可以与这样可怜悲壮的场面相比较了。

到达怀来之后，他们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贴身随从和太监人数很少，也没有一个妃子在老佛爷身边伺候着。两宫西行的前些日子，礼亲王、荣禄、启秀这些军机大臣都没有陪伴在老佛爷身边，老佛爷只命令端王陪伴在身边。起初，她经常很严厉地谩骂端王，斥责他图谋不轨、谋权篡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后与端王在旅途中共患难，日子久了，太后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亲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老佛爷受到端王福晋的影响，才逐渐改变了对端王的态度。

当我到达怀来的时候，主要有端王、庆亲王、那王、肃王、溥伦贝勒爷和大臣刚毅带领的一些随从以及大约二十位大臣。马玉昆将军的军队以及端王带领的禁卫军保驾护航。在前行的路途中，他们几乎洗劫了一路上所有的村庄和小镇。由于所有店铺停止营业，所到之处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到生活必备品。

回顾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情。裕禄（直隶总督）兵败，在蔡村开枪自杀了。李秉衡带领的大军全军覆没之后，便在通州服毒自尽。当外国联军首次攻陷通州直达北京城，人们开始对两宫的落跑行为议论纷纷。但是由于车辆不够，一直迟迟没有开始出行。七月十九日深夜，城外大炮隆隆不绝。七月二十日早上，我居住在喜鹊胡同那一带，听见炮声离城中心越来越近了。最后枪弹的声音像口哨声一样，从耳边一阵阵地划过。七月二十日中午，炮弹轰炸得更加厉害，传来消息，说紫禁城内长安门和西天安门失守。我无法去证实这个消息。现在轮到我去皇宫值班，但是太后最后一次召集我们过后，就无法进入紫禁城了，因为所有的城门都禁止出行。只有在七月二十一日早上七点，我才能获准进入紫禁城内，我了解到两宫早已仓皇而逃。之前一天（七月二十日），我和其他军机大臣先后被紧急召见了五次，最后在场的人有刚毅、赵舒翘和我。老佛爷看到我们，悲伤地说道：“现在只有你们三个人留在这里，其他人都逃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管，任凭命运的捉弄。你们几个人都跟随我一起避避风头吧。”她转向我，然后对我说道：“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希望你跟着我们吃苦。

你尽可能地赶上我们吧。”皇上也说，让我务必要赶上来。

深夜，他们仍然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京城。谁知道，天还没亮，两宫已经仓促逃走，整个京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情形十分狼狈凄惨。那天，我不能回到家中，因为紫禁城所有城门都关闭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十点，我从后门（紫禁城的北门）溜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荣禄，他坐在椅子上，浑身虚弱乏力，被那些怯懦的轿夫抛弃在路上。他说：“是时候结束了，你和我都不应该相信这些义和团匪徒，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带给老佛爷的后果。如果你看到太后，告诉她，我已经重新集合了军队，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尽快赶来护驾的。”

离开荣禄之后，我一个人走到了一座小庙，那座庙位于城门的北边和西北边的中间，我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掌管这间寺庙的住持说，外国人将要烧毁京城内所有的寺庙，因为这些寺庙曾经被用作义和团练习巫术的场所。在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对他来说，热情招待一些客人真的很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外国联军已经抵达城门外面，位子极其靠近我们的两扇城门之间，洋人在大街上大肆开火扫射。京城已经奄奄一息，但是洋人没有干扰老百姓，尽管他们有时会开枪扫射一些“勇士”和穿着制服的人。因为住持拒绝收留我，我就暂且在隔壁姓韩的人家中避难，这个人是旗人。我所有的车夫、轿夫和仆人全都逃命了。正午过后不久，我听说西直门大开，可以通行。于是我把马车、椅子和一些家畜都送给了韩姓家。傍晚，我带上足够的盘缠和随身衣服只身一人徒步前行。前面的路被一大帮逃难的难民堵住了。我沿着鼓楼上路了，顺着湖的边缘向紫禁城的北边出发。一直到傍晚，可怕的雷暴雨降临了，于是我就在景宅借住一宿。这时，洋人停止开火，但是整个紫禁城的北边地区硝烟弥漫，整个晚上，其他一些地方全都爆发了抗争运动。凌晨三点，我们听说西直门打开了，守卫城门的士兵全都逃走了，但是洋人军队还没有抵达京城的西边地区。

我原本打算乘马车上路，但是那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官兵利用这个机会，把能够用上的家畜全都掳走了。我的二儿子请刘将军从京城

捎来一辆马车，为了拿到这辆马车，他真是历经了九死一生。我是徒步离开北京城的，但是在离西北城门口很近的桥上，我发现了那辆马车正在等着我呢。我乘着马车，我的二儿子骑着一个骡子，后面跟着五个徒步行走的仆人。当我们抵达海淀（一个离颐和园很近的镇）时，每家餐馆都歇业了，但是我们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些食物，饭后我们匆忙上路，在贯市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得知两宫曾在怀来歇脚，我们终于在七月二十四日那天赶上了他们。我们期望可以在下星期抵达太原府。

此次西行，危险重重，无法用言语形容。沿路每个店铺都被随从的溃兵抢劫，他们还自称是陪同两宫出行的皇家士兵。这些强盗是走在我们路程的前边，他们在乡下洗劫一空，以至于当两宫抵达任何地方时，护卫队只能尽量去征用老百姓的口粮，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糟糕透顶。确切地说，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都被摧残得很严重。

两宫从怀来动身出发，向前行进了三天，到达宣化。在宣化休息了四天，然后准备向山西出发。沙河镇的都统给两宫提供了几顶绿呢轿子。由此往后，皇家的仪仗才逐步完备。太后神采奕奕，对周围一切事物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走到鸡鸣驿，毗邻的山上有一座寺庙，那座庙里有康熙皇帝作的一首诗，刻在了石碑上，以此作为留念。太后听说后，非要上山去看一看那块石碑，大家纷纷劝阻，才就此作罢。

宣化那个地方混乱不堪，但是地方官员倒是对两宫招待得十分周到，这都是当地知县陈本为人热忱，对两宫尽心尽力。在这里，老佛爷接到庆亲王返回京城后的第一份公文，上面说京师动荡不安，形势十分凄惨。

在此期间，皇后带领一些贴身宫女太监一同赶上来，随驾的人数越来越多。8月25日，两宫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了宣化，当晚在军事要塞住了一宿。这个地方非常荒凉，条件十分简陋。守卫的士兵早已逃走了，一些官邸早被洗劫一空，房屋都被焚毁，只剩下阴暗潮湿、

臭烘烘的两间屋子。除了用湿漉漉的面粉做包子，没有其他食物可以吃。老佛爷住一间屋子，皇上和皇后住另一间屋子。其他官员仆从，不论地位高低，只能在不通气的庭院里休息。此时此刻，一直受人尊敬的老佛爷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遭遇，于是向侍从抱怨道："我实在受够了！这个地方有好多蚊虫，我一夜几乎没合眼。现在，我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丢尽脸面。昔日，唐玄宗经历安史之乱，被迫逃离都城，眼看着自己的宠妃被杀，却不能救她。如今我的境况比他凄惨多了。"另外，小道消息传来说，外国联军已经把皇宫里的珍宝都劫掠一空，太后听说后，大发雷霆，屋子里的人吓得胆战心惊，惴惴不安。

8月27日，两宫銮驾越过山西边境，当晚在天镇县过夜。当地知县是个满洲人，听说沈阳和满洲其他城市都已经沦陷，便自尽了。整个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两宫仓促地吃了点当地狱卒准备的晚饭，心里感到十分凄凉。不过，岑春煊（是当时陕西巡抚，带兵北上勤王）赶来护驾，这让太后心里稍微有点安慰。令太后更高兴的是，这位智勇双全的大臣给她呈送了鸡蛋以及装钱和装烟草的荷包。

8月30日，两宫一行人抵达大同府，住在当地都统的衙门里。一行人在当地休息了四天。都统招待十分周全，太后对都统的盛情款待感到十分满意。

9月4日，銮驾向前行走了三十五里路，到达了一个集镇。尽管这里房屋潮湿简陋、食物粗糙，但是太后的情绪逐渐稳定。9月6日，经过雁门关时，太后命令停轿欣赏风景。太后感慨地说道："这里的风景让我想起了热河。"然后转向皇帝说："别的不说，离开北京城后，能看到这样美妙的景色还是很令人愉悦的。"皇上回答说："如果下次能选个好日子出行，必定也会有愉悦之情。"此时，岑春煊拿出一大束黄色的花儿献给太后，这样一份礼物让太后感动不已，作为回报，太后赏赐给他一杯奶茶。

9月7日，圣驾到达原平，当地官员为两宫提供的一所住房只是平民住的泥屋，一眼望过去，屋子里有几口空的棺材。岑春煊在前面开

道，得知此事后，立刻快马加鞭，禀奏太后，等候太后下令。然而太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说道：“如果棺材能够移走就把它们移开吧，只要别把棺材放在主卧就行了，这并无大碍。”于是那些棺材都被移开了，以免老佛爷受到那些凶兆影响。

9月8日，忻州地方官员为两宫提供了三顶皇家御用的明黄轿子。9月10日，圣驾抵达太原，场面颇为壮观。两宫决定在巡抚衙门暂住，就在一个多月前，毓贤下令屠杀外国传教士，众多外国传教士血溅巡抚衙门。毓贤是太原巡抚，率人在城墙外跪接圣驾，直到老佛爷的轿子出现。她命令轿夫停轿，然后将毓贤召唤至轿前。太后对毓贤说道：“去年12月我最后一次召见你，你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说义和团是战无不胜的。可是，你错了。现在北京城已经沦陷了。不过你还能谨遵谕旨行事，可谓精神可嘉，现在山西省境内已经没有洋鬼子了。这儿的老百姓人人都夸你干得漂亮，我知道你的声誉和政绩，也知道你为朝廷尽心尽力。然而，因为洋鬼子到处宣扬说要报复你，我现在不得不革除你的官职，李秉衡也是如此。但是你心里千万不要觉得伤心难过，这只是为了国家大局着想，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你们就静候佳音，等待国家强盛之日的到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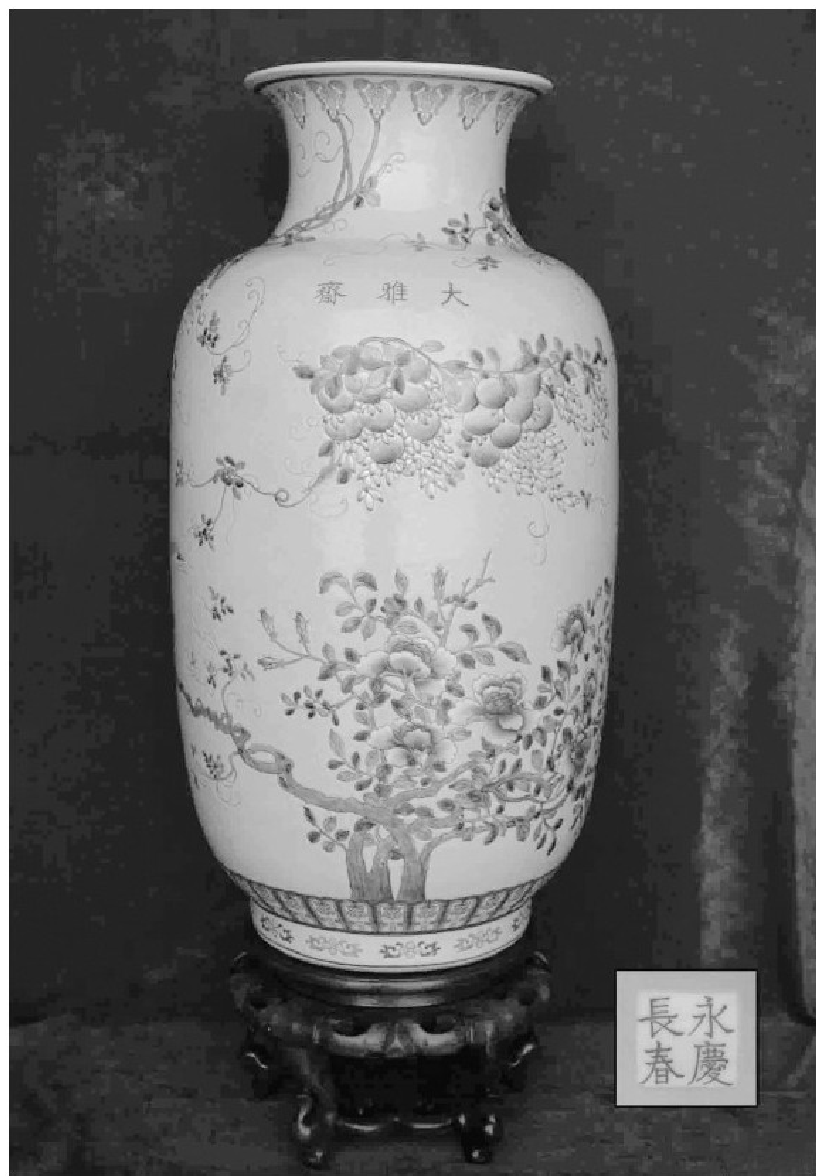
毓贤遵守往常的礼节，跪拜太后之后，说道：“奴才捉洋鬼子如同网中取鱼，无论是小鸡还是小狗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但是，臣愿意接受革职，预备受罚。关于义和团，他们已经全部溃败，他们没有遵守大清律法，到处杀害、抢劫一些非基督教徒的无辜老百姓。”

这段对话被一些看热闹的人听到了，其中有一个人把对话内容记下来，写信寄给上海。当毓贤说完之后，老佛爷叹了口气，让轿夫继续向前行进。几天后，慈禧太后颁布第一道赔罪的谕旨，革除毓贤和其他义和团领袖的官职。降谕之前，太后曾经到屠杀那些倒霉的外国传教士的地方观看过，向毓贤详细询问了整个事情发展的始末。据说，当时慈禧太后聚精会神地听着毓贤讲着那些难以启齿的有关怯懦和残忍行径的故事，嗣子大阿哥就在院子里得意扬扬地挥舞着大刀，上蹿下跳，这把大刀是毓贤给他的，就是曾经用来屠杀外国传教士的那把大刀。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的本性，她内心深处

有着极大的报复心理。

两宫在太原暂住期间，老佛爷再次召见了毓贤。在这次召见过程中，老佛爷意识到洋人是铁了心要报复毓贤，要致他于死地。但又知道毓贤深受太原老百姓的拥戴。无奈她只好对毓贤说，现在棺材的价格也上涨了。明显慈禧太后是委婉地向毓贤暗示让他自尽，省得以后落入洋人手中，要遭不少罪。

太后对于她在太原所受到的盛情款待颇为满意，尤其很喜爱那里的金银器皿，这些器皿是1775年制造的，当时乾隆皇帝为前往五台山上香准备的。这次太后驾到，特地把这些器皿拿出来重新磨光擦亮，十分有排场，因为当地知县希望能博得太后欢心。太后高兴地说：“我在北京城也没有这么好的物件啊！”



慈禧太后大雅斋地灯瓶

慈禧太后和皇上抵达太原的第二天，荣禄便赶来随驾，老佛爷热情欢迎荣禄的到来。荣禄向老佛爷详细奏述经过直隶时，沿途所发生的事情，义和团沿路烧杀抢掠，老百姓深受其害，民不聊生。他先前

呈上的那份奏折足以表明他深受老佛爷器重，与那些只知道奉承谄媚的小人和迂腐保守的官员比起来，荣禄可称得上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为朝廷鞠躬尽瘁。他的奏折内容如下：

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黎明时分，奴才进宫才知道太后和皇上都已经出巡。当时我遇到了户部尚书崇绮（此人是大阿哥的师傅，也是同治帝皇后阿鲁特的父亲），我们建议一同追随圣驾，然后了解到东北城门和北城门都已关闭。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城门找出路。后来我仔细一想，发现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重振旗鼓。但是和宋庆及董福祥将军商量了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军多次深受重创，如果没有大军来增援，军心涣散，早已没有战斗的斗志，恐怕无法克敌制胜。我和崇绮来到了保定，居住在“莲花书院”。他和我整晚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希望能商榷出一些挽救国家的对策。崇绮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伤，第二天早上，他在外面的一块空旷的土地上悬梁自尽了，给我留了一封遗书，身边还放着一封告别的奏折以及他生前写的一些绝命诗。现在我把这些奏折和遗书呈给太后，真诚地期望太后能够仔细阅读，我认为崇绮以身殉国，太后和皇上对他的牺牲也会感到很可惜。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是真正值得太后赞赏的人才。崇绮为人正直廉洁、意志坚定，只恨自己无力挽回国家的命运。当朝廷上下都偏信义和团匪徒的妖术时，他却十分不屑，认为这些匪徒不值得智者对他们微笑。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失去了值得信任的同僚，对我来说真得是一个沉重地打击，但是我强迫自己认清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自己很不称职。奴才身统北洋军队，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在，我定会肩负起重任，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我正料理崇绮的后事，我已经命人快马加鞭，把这份奏折呈送给太后，期望通过这份奏折告知崇绮的死讯，因为我不期望把他的死讯公之于众。我想皇太后、皇上必定会赐予崇绮厚葬，以慰忠魂。

现在奴才立刻快马加鞭奔往太原，向皇太后、皇上请罪。我没有能够阻止这场灾祸的发生，奴才甘愿受罚。

慈禧批阅了奏折，赞赏崇绮忠于职守、精忠报国，特给予他极厚

的抚葬。

荣禄继续向前赶路，但是走到直隶的边境时，在保定府刚与荣禄会合的福晋却在途中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老佛爷在太原很热情地欢迎荣禄的到来，对荣禄嘘寒问暖，并且把荣禄的小妾刘氏提升为福晋。这位新福晋深得慈禧太后欢心，在两宫颠沛流离之际，迅速上位，回到京城后，她在宫中的地位日益加强。太后询问荣禄，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挽救国家命运呢？荣禄一如既往，仍然直言不讳，他回答说："老佛爷，如今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你必须把端王和其余所有欺君罔上，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全部斩首，然后立刻返回京城。"

随驾西巡的满洲高官描述了一件小插曲，足以描述当时皇上、皇太后以及荣禄的关系。当荣禄抵达太原府时，光绪皇帝派亲信召见他。皇上说："我很高兴你最终能够赶过来随驾，我希望你立刻除掉端王。"

荣禄回答说："没有太后的懿旨，我怎敢妄自行动，皇上独断下谕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荣禄此言是指1898年9月，光绪帝下谕杀荣禄一事）

要不是荣禄有老佛爷给他撑腰，恐怕荣禄的位子也岌岌可危。由于他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因此树敌颇多。他深受维新党的憎恨，在保守党中也不得人心。而且，荣禄也没有像崇绮那样具有清正廉洁的好名声。在太原府，御史公开向老佛爷弹劾荣禄，陈泽霖侵吞巨额军饷，但是荣禄却一再包庇纵容他。荣禄一开始说要追查这笔公款，但是后来他却向朝廷禀告说，军饷被外国联军劫掠了。荣禄的立场之所以转变地这么快，是因为陈泽霖派了一位姓姚的将军给荣禄送去四百万两银子、二十磅上等燕窝、四箱丝绸。老佛爷一如既往地把这份弹劾荣禄的奏折搁置一边，不过她肯定利用了这些信息，从中充实自己的银库。荣禄在大寿那天，收到了大量钱财以及一些稀世珍宝。荣禄妻子下葬时，很多人也送来金银珠宝表示慰问。这使得太监总管李莲英垂涎三尺，李莲英在京城的财产都被外国联军洗劫一空，现在正打

算捞上一笔，以挽回损失。

此时在太原府，越来越多的官员赶来随驾，官员之间的钩心斗角也愈演愈烈。那些官员从逃离北京城开始，一直跟随两宫西行，一路危险重重、颠沛流离，他们认为自己护驾有功，想要向老佛爷邀功。比起那些半路才赶来护驾，或者那些现在仍然还在路上赶来的人来说，这些官员认为自己和两宫历经重重困难，理应受到褒奖，应该得到朝廷的优待。

在太原，无论是太后召集大臣，还是军机大臣开会商议，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两宫是否要返回北京城，什么时候返回，是否要迁都，迁到中国南边还是西边某个主要的城市。张之洞上奏，极力建议把都城迁到湖北当阳，这个地方位于大清疆土的中心地带，地势极好。而且当阳，按字面意思就是“面朝南边”，这个地名预示着重新兴旺，绝对是吉兆。也预示着好日子即将来临，还有，因为皇上总是面朝南边坐着。朝中有和张之洞不和的官员说，此举是想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掌朝政。

荣禄是老佛爷身边的人，自然和老佛爷很亲近，老佛爷也很器重荣禄。荣禄一直劝谏老佛爷即刻回京，军机大臣鹿传霖和王文韶也赞同荣禄的观点。随后，慈禧太后决定起驾回京，比起自朝中大臣呈送上来的奏折，慈禧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慈禧信任荣禄是个胆识过人的忠臣。两宫在太原府逗留期间，关于回京之事仍然争论不断。9月底，有谣言传到太后的耳中，据说外国联军要立刻派兵前往山西，为那些被杀害的传教士报仇雪恨。于是太后决定立刻前往西安府，认为那里安全一些，可以避开联军，于是两宫在9月30日离开了太原。在中国无论是丫鬟还是老佛爷，都比较爱面子，慈禧太后为了保住颜面，就简单地下了一份诏书，解释此次西行的目的，诏书中说：

因为山西省遭遇饥荒，给我们这一大队人马供应食宿，可能比较困难，再加上这里缺乏电报交流，消息滞后，造成诸多事宜不便。我们实在是不得已，选择继续西行，前往西安。

9月30日，两宫从山西太原向陕西西安出发，一路上食宿供应周

全，不像之前要忍受仓皇逃生之苦。但是太后在途中听说刚毅的死讯，非常悲痛。刚毅生前是义和团的主要支持者，在守旧派中，他为人十分偏执残暴。他在一个叫侯马的地方患病，结果一病不起，尽管都察院副都御史何乃莹留下来照顾他，但是三天之后不治身亡。老佛爷很不情愿撇下伤残人员，对于刚毅的死流露出了非同寻常的同情。刚毅死后，刚毅的儿子也赶到西安随驾，太后对他十分关照，经常在他面前赞赏他父亲对朝廷忠心不二、为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西安，圣驾暂时先住在临时总督衙门府中，这里是专门为陕甘的总督巡视陕西所准备的府邸，后来重新修正之后，就把巡抚衙门搬到了这里。现在这两个衙门都成了两宫临时使用的行宫。衙门周围刷了朱红色的漆，外面围上一圈栅栏，栅栏外面有守卫士兵的军营，以及六部九卿的临时办公场所。尽管行宫面积不大，但是一应俱全，和京城皇宫里的摆设基本一致。行宫的前殿是空着的，侧殿是官员等候召见的地方。正殿后面有一个房间，大门有六扇门板，其中仅仅开两扇门，从门外可以看到正中央的宝座。宝座周围用黄色绸缎装饰。这间屋子在朝廷举行典礼时会派上用场。左面的屋子是每天召见臣子的地方。行宫的后面又有三间屋子，分别是太后的卧室和起居会客的地方。皇上和皇后住的小屋子可以通向太后的卧室。行宫的西面还有三间小屋，这些是为大阿哥溥伦准备的。总管太监李莲英住在太后东面的偏房中。两宫的日常饮食起居不大正式，这里的规模显然和紫禁城没法比，一切开支都十分节俭。太后开始担心各省进贡的银两和贡品能否安全抵达目的地。只要让财政大臣岑春煊掌握财政大权，在他的监管下，其他人都不敢铺张浪费。例如，按照老佛爷的意思，两宫每天用膳的费用是两百两银子，仅为在京城时的十分之一。老佛爷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节俭啊。”岑春煊回答到：“太后，其实这个数字还可以再缩减。”

当差的太监每天开出的菜单有一百多道佳肴，晚上呈送给太后，让太后选择次日的膳食。自从逃离北京城后，两宫每天缺衣少食。当时，南方进贡了许多燕窝等珍奇佳肴，而太后对于鸡鸭鱼肉早已厌倦，享用到这些佳肴感到很欣慰。但是皇帝还是一如既往，只吃些斋饭。

她下令每顿饭只准备六个菜，太后非常喜爱喝牛奶，她每天都要喝很多牛奶。太后每个月花费二百两银子命人在行宫周围圈养了六头奶牛。总体上来说，太后身体不错，只是有些消化不良，太后说主要是天气变幻无常，再加上她一路上颠沛流离，身体难免有些吃不消。有时候太后忍受失眠之苦，她就吩咐一些推拿手艺高超的太监给她按摩。两宫在西安府稳定后，太后想看看戏曲，就命人搭戏台子，看来太后仍然像在京城一样乐得自在。不过，她心里一直惦念着京城与外国列强议和的进展，她命人一收到电报就给她过目。太后收到颐和园被亵渎的消息之后，便大发雷霆，内心悲愤不已，守在皇宫里的孙公公来信说，太后的宝座被扔到湖里去了，还有一些洋兵在太后的卧室里乱画淫秽下流之图，太后听说后更是火冒三丈。当太后听说和平条款双方已经达成之后，便稍感欣慰，和平条款是9月7日在京城签订的。当这些条款最终确定签订之后，慈禧太后就下谕（1901年6月），九月回京城。这份谕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口吻拟定的，内容如下：

我们尊敬的太后年事已高，理应颐养天年，才能万寿无疆，然而我们一路长途跋涉、受尽煎熬，太后的身体经不起折腾，因此特择日于7月19日在河南一带启程，护送太后回京，各衙门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庄王的弟弟纲公是支持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此次也随两宫一行来到西安。老佛爷意识到，这个人的出现必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决定把他流放。纲公一家就此落魄，但是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最终历经长途跋涉之后，太后把纲公贬到一个衙门里当差，勉强糊口。他的妻子年轻貌美，便把她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很明显，老佛爷已经认识到自己深信义和团是愚蠢之举，而曾经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下场也十分凄惨，不是被斩首，就是被赐自尽。事后，太后说道：“这些王公大臣仰仗自己是皇亲国戚，夸下海口，拍着胸脯保证说洋鬼子肯定不会战胜中国的，我居然愚蠢到相信了他们的鬼话，实在是大错特错。他们愚昧无知、妄自菲薄，导致了今天国家的衰败。如今我所可惜的只有赵舒翘一人。”

堂堂朝廷大公，地位显赫，却没有人愿意怜悯资助，庄王弟弟的命运足以说明了一切：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意识到老佛爷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无论是前往西安的路上还是返回京城的途中，太后深切关心农民的贫困疾苦、百姓的流离。太后为此慷慨解囊，拨给山西省巨额赈灾银两，给深受饥荒之苦的百姓送去慰问。她还对皇帝说，以前深居宫中，不知道百姓疾苦。

两宫在西安府逗留期间，光绪皇帝对于朝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国事中来，这是自戊戌变法以来，皇上享受到的最大的自由。尽管老佛爷给予了他参与国事的自由，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但是，事实上，光绪皇帝在一些重大国事上是没有发言权的。皇上仍然喜怒无常、脾气捉摸不定，因此许多朝廷的忠臣更愿意向慈禧太后禀奏公务。在这段时期，老佛爷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满足了皇上的要求，就是任命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为军机大臣。1900年选立大阿哥时，孙家鼐认为这无异于废黜光绪皇帝，便毅然辞官。闹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一直躲在京城家中，要不是荣禄及时救了他，他早就自尽了。同时，军机处的人还有鹿传霖。当使馆开始被围攻的时候，他还是江苏巡抚，他带领三千骑兵北上救援京城，抵制外敌。在他抵达北京城之前，北京城就已经沦陷，于是就解散了自己的部队。他又继续向前行走了几个星期，然后在老家直隶待了一段时间。从那时起，鹿传霖西行赶到太原府护驾，老佛爷见到他很高兴，热情地招待他，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出军机处，像其他许多京城的高官一样，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一直到运动之后，对于清政府的国策以及中国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意见始终如一，没有任何改变。有趣的是鹿传霖身为江苏巡抚，却自己带兵北上勤王。这件事说明中国各省封疆大臣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他们手腕强硬，便可以成立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南京和武昌总督竟敢违抗太后的旨意，不愿意和洋人开战。他们手下的人各执己见，采取自己认为正确的措施，甚至是带兵北上。

苏州有一个官员作为省代表，负责前往西安向两宫进贡，自从他

返回苏州之后，便给他北京城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的内容主要详细描写了太后与皇上逃离在外的生活，这个选段就是摘自他的那份信函。当时，这份信函是很机密的，没有打算公布于众，其中某些内容是官方文件中罕见的：

太后仍然执掌朝政、独揽大权，朝廷上下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她最信任的人莫过于荣禄和鹿传霖。巡抚岑春煊后来失势，得不到太后器重。朝中大臣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太后何时回京。她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但是看上去不过四十岁的样子。皇上一直郁郁寡欢，但是最近看上去精神不错。大阿哥今年十五岁，肥胖粗鄙，行为粗鲁，爱穿武装，经常外出看戏。我当时看到他在外面玩耍，戴着一个镶金边的毡帽，里面穿着一个皮衣，外面穿着一件红色军服，看上去像一个夺标者。大阿哥认识所有的戏子，经常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擅长马术和音乐。如果有人在台上弹奏错了，他便会从他的位子上站起来对乐师破口大骂。有时他甚至会跳到台上去，把乐器夺过来，自己一个人弹奏起来。这一切都把这个男孩惯坏了，他在许多有威望的人眼中没有什么好名声，他的一些恶作剧传到了老佛爷的耳朵里，会被体罚，比如鞭笞。最近与侍奉太后的宫女有了私情，太后知道后，勃然大怒，大阿哥因此受了不少罪。他经常在总管太监李莲英的陪伴下到处晃荡。我的一个朋友高某曾经在提及他时，说道：“他有候补皇帝的资格，但是不久之后，恐怕也只不过是一个被废黜的皇帝而已。”这句话倒是挺有道理的，因为他从来不读书，就喜欢做一些无耻下流的事情，再加上他行为粗鲁，为人嚣张跋扈。举个例子，10月18日，大阿哥溥伦在他弟弟以及义和团首领澜公的陪伴下，带领一群太监去城隍庙的戏场看戏，因为太监们要抢占最好的位子，和甘肃的一些猛汉打斗起来。甘肃猛汉蛮横凶悍，太监和其他一些小官员都被揍了，戏场变得一团糟。太监吃了亏，不敢找这些甘肃大汉直接报复，他们当着巡抚岑春煊的面诋毁戏院的主人，还叫人把西安每个戏院都封了。把戏院的主人用木枷套在脖子上，当街游行示众。巡抚贴出告示说，太后因为陕西省饥荒灾害，国家多事，深感焦虑，布告西安百姓，在这期间不宜演戏娱乐，要关闭所有戏园子。太后还下令说供公众娱乐的餐馆和其他场所也要停止营

业。西安百姓人人都知道这是那些太监干的，并不是太后的旨意。最后，内务府大臣求总管太监李莲英，请太后降谕，重新下令让各大戏园子开演。然后又贴告示称，事情终于沉冤昭雪，这是大丰年之兆，预示着国家繁荣昌盛，现在各大戏院可以重新开始营业，但是不允许发生任何动乱。

在西安期间，总管太监李莲英没有像往常一样嚣张跋扈、滥用私权，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验收和保管贡银贡品上了。如果进贡的贡品分量不足，质量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就拒收，这给各省进贡的官员带来了很多麻烦。

10月份，在太后六十五岁大寿的前些日子，巡抚岑春煊提议说要举行庆典，按照惯例，要呈上贡物。但是溥倜却强烈反对，说：“中国如今身处险境，宗庙陵寝都还在洋人的手上，老佛爷怎么还能有兴致来庆祝自己的寿辰呢？这件事我完全不赞同。”这件事情就此搁置。岑春煊是急着想为自己博得一些名声，尽管他个性独立，大言不惧，但是有人传言说他和总管太监李莲英走得很近。有些人说他还和奏事处的太监结为兄弟。由于这些事情，他最近被提拔为尚书一职，朝廷还赏赐他在紫禁城之内坐轿子，显然他认为坐轿子比乘马车更显尊贵。

董福祥回到甘肃老家，但是他部下的兵都已经归谭将军统帅了，谭将军镇压了回族匪徒的叛乱，战功赫赫。

似乎在老佛爷心里，她仍抱有战胜洋人的奢望，最近夏震武上奏向太后推荐了一个蛮子，说此人深谋远虑，有非凡的战略能力，希望太后能够重用他，太后甚是欣慰。夏震武用自己的脑袋和全家人的性命担保说，天降神将，在此人的带领下，最终一定能够击败洋人军队，并且央求皇上重用此人，让他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领袖之死

中国的官员可能被归为个人主义一类，通常来说，缺乏集体英雄主义或任何有组织的爱国精神。哲学系统值得注意的特点和结论之一——官员们，甚至那些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胆小怯懦的官员都会以完美的淡定，绝对的顺从接受圣上的赐死，北京和平协议的协商过程中义和团领导者的权利被剥夺，义和团领袖之死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趣的说明；它也投射出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推崇儒家思想——绝对顺从的准则和对国家元首的忠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政体稳固和持久的原因。

尽管外国势力一直坚定要求对义和团的主要领袖和支持者处以死刑，但慈禧不愿意让步，因为她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在与主要议政者进行多次持久的会议后，慈禧终于了解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是她获得满意的和平条款的唯一希望，最终她勉强地答应了。1901年二月慈禧颁布圣谕（由荣禄起草），将他们定罪，他们曾有她的了解与支持，曾领导起义将所有的外国人逐出中国。在反外运动中，作为慈禧太后的共谋，我们得到了她的理解，而有的情况下是她主动。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女人的无情和她除了对自身安全和权力以外其他一切的忽视，是很难读懂这圣谕的。但即使这样，慈禧一开始仍不愿意答应列强的所有要求，她希望通过妥协和进一步的协商拯救她三个心爱的大臣——端王、澜公和赵舒翘的性命。圣谕以皇上的名义颁布，全文如下：

去年夏天，义和团反叛兴起，致使与友好邻邦展开一连串的战争。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已经谈成了和平协议的初步条件。回想这次灾难的结果，我们不能逃避这个结论：灾难是由我们某些亲王和大臣的无知和傲慢引起的，他们愚蠢地相信义和团所谓的神力，从而违背皇权，忽视明确的命令，反叛者终将被消灭。他们不仅没这样做，反而鼓励和协助反叛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场运动获得了许多追随者。

后者发动了未受挑衅的战争，事件达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这是由于这些愚蠢的人，顽固的吹嘘者，胆敢轰击公使馆，使朝廷处于危险的边缘，使国家处于混乱的状态，使人民处于极端的痛苦中。慈禧太后招致的危险，以及我自己，都是难以形容的，我们的心是疼痛的，回想起苦难的经历就伴随着未加抚慰的愤怒。让那些带来灾难的人们问问自己：什么样的惩罚才够抵偿这些灾难？

我们之前颁布的命令都太过仁慈，我们必须给犯人严厉的惩罚。庄亲王已被革职，是他指使义和团袭击法国大教堂和公使馆，除了这些，他还发布了一则公告，违反了所有的条约（这是指给提供外国头颅的奖赏）。也是他，成为野蛮的义和团的领袖，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人。虽然他犯了许多罪，我们不应对他仁慈，但我们还是允许他自尽，特派葛宝华前去监督执行。

已革职端亲王，是宗室的领导者和发言人，他坚称对外宣战；他固执地相信义和团的魔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战争。载澜，协助庄亲王起草公告，定价每个外国人的头颅，他应当被剥夺所有的尊严和头衔。但念及这两位亲王都是我们的近亲，我们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发配新疆，终身监禁。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在他管辖山东时，信任义和团；后来到京城，在朝廷上赞扬义和团，因为他的话，许多亲王和大臣误入歧途。任陕西巡抚时，他曾杀害众多传教士和皈依者，完全被义和团误导，残忍至极。毫无疑问，他是我们所有麻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已经发布命令将他流放至新疆，至此他应该已到达甘肃。将他斩首的命令已到，当地按察司负责监督。

已故大学士刚毅，信任义和团，定价外国人的性命。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要被处以死刑。但考虑到他已病逝，我们下令于他身后除去头衔，立刻革职。

我们已革职董福祥，虽保留其军事官员头衔，即使是亲王和大臣发的命令，他仍不能逃脱围攻公使馆的责任。因为他对外交事务的无知，松弛的纪律以及愚钝的资质，他应当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忽视他对甘肃反叛作出的贡献，他在汉人中拥有好名声，因此，

出于善行和仁慈之心，我们只是革去了他的职位（董福祥在甘肃深受人民爱戴，因此慈禧担心另一场反叛的发生，推迟了处决他的命令）。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反对发布公告为提供外国人的头颅奖赏，因为这点他应得到宽大处理，但他没有强烈地反对，我们只好惩罚他。他已被革职监禁直至斩首（这处罚等同于终身监禁）。

据我们了解，刑部尚书赵舒翘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表现出任何敌意，我们以特别使团派遣他与义和团协商，他返回时所上交的报告并没有表现出对他们行动的任何赞同。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粗心的，我们因此宽大处理，判决他革职，囚禁直至斩首（慈禧太后非常器重赵舒翘，从一开始就急于庇护他。根据后来的证据以及公众舆论，他大部分的行为即使不是听从刚毅的命令，也是他教唆的。外国列强坚持将他处死，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有罪）。

大学士徐桐，总督李秉衡，均已自杀身亡，但他们的行为为世人严厉批评。特下令革去职务，身后的所有荣誉也一并取消。

友好邻邦的官员终于认识到义和团的反叛是这些罪臣的煽动，而绝非朝廷的意愿或行为。惩罚罪犯我们绝不心慈手软，天下子民都意识到近来的危机很严重。

外国列强仍然对谕旨的条款不满意，特别是对端亲王和澜公的处罚。一个星期后，另一道谕旨下达，判决满族领导者监后斩，后来减轻为永久发配边疆。刚毅接受进一步的惩罚——开棺斩首，这在中国官员眼里是莫大的耻辱。赵舒翘和英年被赐自尽。最后，军机大臣启秀和大学士徐桐的一个儿子（紧随其父亲脚步，暴力反对外国侵略）都按时在北京斩首。

按照外国列强的最终要求，太后颁布最后一道谕旨恢复五位官员的职位和名誉，显然是很不情愿的，这五位曾因义和团向慈禧进谏而被降罪。为了保住颜面，朝廷将责任推诿给他人，谕旨如下：

我们迫使官员在所有大臣面前明确表明他们的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公平判断议题。他们支支吾吾地表达，罪恶的亲王和建议者们利用了他们的优柔寡断。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他们被所有人怀疑，最终被斩首。我们会想起这五位官员在外交事务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为表赞赏，我们将他们官复原职。

赵舒翘之死。大学士赵舒翘，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臣子之一，到最后一刻都想保全的人。最初，他只是被判终身监禁。他被关在西安的监狱，家人可前去探望。在他被监禁的命令下达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在军机处会议上说："我不相信赵舒翘会与义和团勾结，他的错误在于低估了这场暴动的严重性。"赵舒翘听了这话自然很高兴，以为自己可以被饶恕。但是，几天以后，谣言称外国列强坚决要将他斩首，消息在城里引起巨大反响，赵舒翘是西安本地人。城中三百名绅士起草请愿书，上报军机处，以整个团体的名义乞求宽恕赵舒翘。军机处不敢将请愿书带给太后。但是，作为回应，刑部尚书（与赵舒翘交好）声称对赵舒翘的处罚很不公平。

元旦，谣言四起。那天慈禧太后接见军机处大臣，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十一点；但没有得出对赵舒翘判决的最终结论。鼓楼周围挤满了人，威胁道，只要赵舒翘被带出来执法，他们就会营救。喧闹声四起，军机处恐怕再有暴乱，于是他们决定请求太后允许赵舒翘自尽。慈禧太后勉强同意，第二天凌晨一点下达谕旨，下午五点向太后复命。命巡抚岑春煊按应有的形式，前去监狱宣读谕旨。静静地听完谕旨，赵舒翘问道："没有别的谕旨了吗？"岑春煊说："没有了。""一定有的"。赵舒翘说。这时候，他妻子说："没有希望了，我们一起死吧。"她把毒药给了他，他喝了一点，但到了下午三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似乎更精力充沛了，和家人详细地讨论葬礼的安排。他担心他的死对年迈的母亲身体的影响。一整天，他的牢房都挤满了朋友和同僚；巡抚一开始还阻止他们探访，最终放弃了，因此来访人的数量相当庞大。赵舒翘对他们说："我就是因为刚毅才落入如此田地。"巡抚注意到他的嗓音清晰而有力，到这个时候他都没有死亡的迹象，于是他命令侍从给他吞咽鸦片。下午五点，鸦片也没有起任何反应，又命令侍从给他一剂砒霜，服完砒霜，他翻滚着躺到地上，呻吟着捶打

着胸口。后来，因为剧烈疼痛，他摩擦着胸口才舒服点，他的身体如此强壮，意志力如此坚定，即使到了11点他也没有一点死亡的征兆。巡抚很苦恼，很清楚太后需要执行命令晚点的充足理由。他说："我应该在五点复命。可这个人还不死，怎么办？"侍从建议他揉搓一些厚纸，在烈酒里蘸湿后插入呼吸道，这样他就会迅速窒息了。巡抚采纳了他的建议，插入五卷纸后，他终于死亡了。他妻子悲痛地哭泣，随即自杀了。至死赵舒翘都不愿相信太后会赐他死，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有意只服下不足量的鸦片，为了获得缓刑的时间。

庄亲王之死。庄亲王，带着他的小妾和儿子，来到山西南部的薄州，等待慈禧对他命运的最终裁决。他住在一所接待官员的房子里。有一天一大清早，钦差大臣葛宝华带来了赐死的谕旨，然而，他一到，当地就按照礼节放鞭炮迎接。噪音着实惹怒了庄亲王，生气地问侍从究竟为何在这个时间放鞭炮。"钦差大臣来了。"他们回答道。"他们是来找我的吗？"亲王问。"不是，只是经过这里办事。"侍从回答。钦差大臣一被领进住处，亲王就与他谈论朝廷之事，而钦差简要作答。谈了一会儿后，葛宝华离开去检查房屋，他发现房屋后面有一座庙宇，他选择了一间空房作为庄亲王的行刑之地。从房顶横梁上悬挂一根丝绳。安全扣紧后，他又派地方兵维持秩序。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又回到庄亲王那里，告诉他有圣旨宣读，命令他跪下听旨。亲王挺直身子说："是想要我的脑袋吗？"钦差没有做直接回答，只是继续为亲王宣读圣旨，亲王已恭敬地跪下（与之前习惯类似）。钦差宣读完毕，亲王说道："赐我自尽，我一直认为，他们只有要了我的命才会满意。我很担心我们的太后不能在位很久啊。"后来他请求钦差大臣允许他和亲人道别，钦差答应了。这个时候，他的小妾和儿子已经了解到了钦差大人的意思。进屋之后，亲王对儿子说："记住，为国家鞠躬尽瘁是你的职责；不惜一切代价，都不能允许外国列强占有我们祖先打下的光辉事业（庄亲王是明朝的征服者——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嫡系后裔）。"他儿子已泣不成声，不能回答。他的小妾早已昏死过去。亲王不为所动，问道："在哪行刑？"钦差大臣回答道："王爷请移驾到房子后面的空房。"王爷跟在他后面，看到了悬挂在横梁上的丝绳，他转身说道："阁下已做了极好、极完备的安排。"说完话他把绳

子绕过脖子，几分钟之后就断气了。

英年之死。英年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在宣布第一道圣谕，命令将他监禁在西安的那天，他的家人离开了他，他彻夜难眠，掩面而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英年向侍从抱怨庆王没有保护他。第二天是元旦，所有人都忙于准备庆祝节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一整天他都在哭，到半夜他的哭声突然停止了。第二天早上侍从发现他躺在地上，脸上都是泥，死了。他吞食泥而使自己窒息而死，但是赐死的圣旨还没有下达，他死亡的消息被压了48个小时。西安巡抚知道后立即向太后禀告。

毓贤之死。当毓贤接到斩首的圣旨时，他已被押送至流放之地。不过他身体很虚弱，只能蹒跚地前行。一听到这消息，他头晕目眩，与之前山西巡抚凶狠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他曾开展残忍的行动。在他死的前一天，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行刑时间到时，他虚弱得需要人协助才能到法场。前一天兰州府的许多百姓表达了为他举办个告别盛宴的想法，但他感恩地拒绝了，希望平静地度过最后一天。城里的老人决定用红布装饰法场，以表尊敬。到了晚上，主要街道贴满了告示，号召人们争取毓贤的缓期执行，但毓贤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他以官方告示的形式表明心志，坚决认为他的死是光辉的爱国主义的终结，要求人们绝不能干预他的行刑。最后他亲手写下了一幅卷轴，在他死后，卷轴的内容在全中国流传，第一部分的内容如下：

大臣为君主而死，妻妾为夫君而死。谁会说这是不得体的？我年迈的母亲已九十高龄，小女儿才七岁。谁会在她们年老和年幼时保护她们？怎样才能完成亏欠父母的孝道？君主下命令，大臣遵守。我杀过人，现在反过来，我被杀了。我为什么要懊悔？我唯一惭愧的是我服侍皇上多年，已有三省的高职位，但我的功绩还比不上沙漠里的一粒沙，大海里的一滴水。唉，我真配不上朝廷待我的好啊。

大臣犯罪招致斩首之刑。此刻我脑海里没有其他想法，除了希望我死之光彩，就如我生之正直（这里没有自夸。毓贤，冷血的盲信者，绝对正直、轻视财富。他在贫困中死去，如此悲惨，以至于在衣

服中找不到一套新的作为寿衣。他依然为陕西人民所爱戴，人们歌颂他的领导，他们声称是他的精神使陕西省免于外敌的入侵。为了纪念毓贤，人们建立了圣祠，但为了平息列强的怒气把它拆了）。与其在痛苦的监狱里过完余生，我宁愿死。我辜负了太后的好意。谁来抚慰她的悲伤？我真切地希望辅政的政治家们可以找到恢复衰落命运的方法，光荣地履行应尽的义务，缓解君主的悲伤。

第二天下午一点，毓贤当众被斩首，百姓恸哭之声回响。

启秀之死。1901年2月的一大早，启秀和徐承煜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许多欧洲人前来观看。被通知将被斩首，启秀只有一个问题："谁的命令？"得知是西安行宫的谕旨，说："这是太后的旨意；只要不是外国列强的命令，我死而无憾。"这位大学士已被日本人逮捕了数月，因他母亲病重，庆王特许释放他。等他母亲一死，庆王就建议他自尽以表对母亲的孝顺和忠诚。庆王的建议很好理解，但启秀没有听，最终引得旁人非议。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随着义和团领导处死的被处死、充军的被充军，外国列强的愤怒才逐渐平息。慈禧太后意识到她未来的政策需注重调解和改革，因此首先她颁布以下谕旨（1901年2月13日），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修改原来的诏书：

去年夏天，自发动战争后，义和团占领京城，夺取政权。那时叛乱的亲王和大臣颁布诏书，利用当时的混乱条件，毫不犹豫地用玉玺发布文件，实非朝廷所愿。我们之前不止一次地间接暗示，在这危难的时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照做。相信官员们能领悟言外之意，理解我们的意思。

我们已惩戒所有罪犯，并命令内阁呈递五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日的诏书（7月20日到8月14日），撤回甚至销毁一切伪造和非法的文件。这样就能达到历史准确度，皇室也能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

重获子孙的尊重后，慈禧为她所犯的错误做了体面的正式道歉（关乎皇室颜面）。另一份诏书中，以皇上的名义虚夸地描述了太后皇上在1900年义和团危机时的命运，又悲惨地描述了太后皇上在逃亡时所经历的痛苦。她郑重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承诺改革。在中国历史上，这份谕旨具有长久的价值：

悔过谕旨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3日）

去年夏天，义和团撒下了反叛的种子，致使我们卷入与友好列强的战争。此后，京城陷入无序状态，我们护送太后前往西部省份视察。全权委托庆亲王和大学士李鸿章，就停战及和平条约与外国大臣协商。不久前大使发来电报，列出了拟订协议的十二项主要条款，我

们已全部同意，同时我们也让他们根据中国履行条款的能力，仔细核对多方面内容。

我们应该承认错误，更有义务颁布悔过谕旨，让每个人知道朝廷被包围的混乱有多震撼人心。

许多无知的人认为，近来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支持义和团；他们肯定没有看到我们在五月和六月重申的诏书。诏书声明，义和团必须被歼灭，基督徒应当得到保护。不幸的是，反叛者及其同党将我们置于无法逃脱的境地；我们拼尽全力，誓死反抗，害怕王朝即将到来的毁灭。事情发展迅速，七月二十一日，京城沦陷；就在那一天，太后和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在王朝守护神和大地之神面前自尽，以赎罪来抚慰祖先的亡灵。就在极端悲叹和混乱的关键时刻，亲王大臣们紧紧抓住了我们，强行地带领我们远离敌人的枪林弹雨。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匆忙地西行。这些灾难难道不是由义和团导致的吗？太后处于危险之中，祖先留下的遗产遭到巨大破坏，繁荣的京城成为荒僻的原野，沟壑被伟人的尸体填满，又怎么能说朝廷保护带来这些灾难的叛贼呢？

但是，有理由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以及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谕旨把责任归结为当地官员没有公平地管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导致双方不满，出现动荡的局面，给义和团可乘之机。派去镇压首次起义的皇家军队低效无能，进一步提升了义和团的士气。最后，还归结于很多人的谗言和无知，更有朝廷重臣在支持义和团。事实上，这份谕旨中的观点和袁昶、许景澄上奏的三份奏折中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两位爱国官员早已为此丢掉了性命。谕旨描述了义和团进入北京的情形，悲哀地把朝廷的处境比作“甩不掉大尾巴的蛇”。谕旨继续说道：

——然而，大使馆被包围时，我们不断指挥总理衙门官员停止战争，与此同时，和外国大臣沟通交流，使他们相信我方的友好态度。但是，后一条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因为包围者和被包围者之间不断发生炮击和枪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坚持友好路线。假如伤

亡无数，大使馆真的沦陷，中国还怎么能奢望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呢？朝廷艰苦努力，就是为了避免可怕的大灾难，给大使馆送去葡萄酒、西瓜等水果表明老佛爷宅心仁厚。在这样危急时刻，他们承认我们大清朝是个主权国，这事实足以证明列强不再把责任推给朝廷。但是，攻击方的无知和暴力只会增加我们的愤怒；回首过去时，我们充满了羞愧和愤慨。我们相信，在和平协议中，外国列强不会企图从我们身上榨取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东西。我们已命令庆王和李鸿章考虑任何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围绕至关重要的问题继续讨论签订协议。列强爱好正义，如果他们希望谈判圆满成功，就一定会考虑中国有能力做的事。最后我们期待着大使们竭尽全力，展现出强烈的爱国心。

京城混乱之时，朝廷命令各省保护各自的疆域，不得加入挑衅战争。清朝南部和东部得到保护，唯一的原因是谕旨坚持要求维持当地和平。列强贸易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总督和省长也能维持当地正常秩序。南部省份正高声宣布加强地方防御，但也不可否认，动乱爆发后，他们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不关心困扰朝廷数不清的灾难，他们通过散布神谕似的观点和言论来使自己定心，他们甚至责备君主。我们可能还记得，当我们一行人匆忙离开紫禁城的时候，风声鹤唳，苍鹭在头顶哀嚎，那时我们战战兢兢，听起来就像敌人前进时的脚步声。我们从昌平逃至宣化，一路上照顾太后的起居。我们穿着劣质的衣服，只能吃点豆子，喝点粥来缓解饥饿。我们中很少有人经历过比这次还令人痛心的饥寒交迫。我们奇怪，那些自称忠臣的大臣和仆人就没有想过，他们的君主受尽折磨，义愤填膺，难道不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用一句话总结，不是臣民有罪，是皇室成员有罪。想到这里，我们都不想旧事重提，但是我们有责任提醒大家，以免历史重演。过去二十年来，在与外国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有责任庄严警告，严厉指责。但是过去常用的言论："卧薪尝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毫无意义。谈到整顿秩序，改革金融，这些话毫无意义。危急时刻一过，公共事业徇私疏忽现象一如既往；一如既往地，货币买卖分等级，朝廷又将被误导。让官员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义和团反叛，中国就会成为强国吗？在这些灾难降临之前，保持我们国家的完

整性就有难度，而现在，可怕的访问之后，很明显我们国家变得更加软弱更加贫穷。我们想说，在这个时候，从朝廷享受到高级待遇的国家大臣必须展现正直爱国的一面。重调税收体制以便能担负外国赔偿，同时也要记住下层人民的贫苦。选择官员方面，品行纯良是第一位，才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国家官员的职责可以归为两点：遏制腐败趋势，制止暴行。正义和能量需成为提高经济军事效率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国家及其未来必将重新焕发生机。

近三十年来，太后劳心劳苦，从未间断地正确指导我们，训练我们。但现在的打击之下，她所有努力的结果都毁于一旦。我们还记得推翻圣祠和庙宇时的憎恨和所受的侮辱。向北看，想到被毁坏和亵渎的京城，想到数以千计失去家庭的高官，想到在这场大灾变中数百万失去生命和财产的民众。我们不停地问自己：我们怎么能责备他人？我们作此警告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或毁灭在于统治者和人民的精力或冷漠，而政府腐败是一个王朝衰弱的直接原因。我们重申命令：加强与列强友好关系，同时提高抵御能力，鼓励言论自由，任命可靠官员。我们期待大家遵守命令，热心爱国。太后和朕，诚挚地祈祷这份奏折能带回大臣手中，走出阴霾才是智慧的表现，责任感促使我们不断努力。愿整个大清朝都能知晓这份谕旨。

谕旨在二月颁布，恰巧是太后接受列强和平谈判条款的时候。从那天到六月，朝廷全权委托大臣签订协议条款，太后忧心忡忡，此时西安行宫不适，加上荣禄和地方总督一直进谏，太后期望早日回京，甚至有点不耐烦。

朝廷还有一个难题，端亲王之子，皇位继承人。慈禧清楚地知道，只要义和团领袖之子在位一天，她就不能同列强在北京的代表搞好关系，就不能获得国外的同情。如果端亲王之子登上皇位，他就不可能同意流放自己的父亲，列强也同样不可能同意端亲王官复原职。他已正式被任命为皇位继承人，此事不容轻易更改。这再次表明神圣的继承法远远比不上一个女强人的意志力。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大家都清楚，端亲王之子傲慢无礼，举止粗鲁，太后也曾后悔选他为皇位继承人。太后不止一次为他的野蛮、可耻的行为而羞愧。甚至在太后面前，这家伙也极少注意朝堂上的礼节，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尊严和将来的处境，因此对于找理由废除他，太后一点也不感到歉意。在废除他为皇位继承人的谕旨中，太后提到，端亲王将王朝置于毁灭的边缘，他对祖先犯下的罪无论如何不能赦免。为了挽回端亲王之子和太后自己的颜面，谕旨宣称，端亲王之子知晓在这样的困境下，他完全不可能继承皇位，因此他自己恳求太后取消之前的决定。太后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废除继承人之位，授予他最低等级的爵位，同时免除他任何职务。这决定意味着慈禧竭尽羞辱他，因为授予他的等级是很低的，没有任何职务和俸禄，从此他生活贫困，身份卑微。这位没落的皇位继承人常常出现在北京城最污秽的地方：他是醉汉、赌棍、流氓，肮脏不堪、臭名昭著，却一直吹嘘着自己辉煌的过去。如果不是命运弄人，被列强欺凌，他已是清朝的皇帝了。

废除端亲王之子后，太后通知大家，选择同治继承人一事暂时搁置，直到找到合适的候选人，暗示直到中国的外政内务都有安全保障后，才会以合法正确的形式选择继承人。奇怪的是，慈禧和官员好像心照不宣地认为光绪帝无法担当重任。

因此，逃亡之时，老佛爷贤明地穿上忏悔者的白袍，点上赎罪之蜡烛，为重返京城做准备，她知道，外国人会忘掉之前的记忆，有长久的耐性。1901年6月，和平条款签订；9月7日，各国列强代表庄严地签下和平条约，是“集体无能的纪念碑”也是多年后麻烦的根源。在西安行宫深处，慈禧一边忏悔着，一边害怕着；返京途中（1901年10月20日至1902年1月6日），太后思考如何迷惑洋人，却又陷入疑惑恐惧中。与此同时，和平协商者及条款再次安抚了整个京城，大家都已消除恐惧，却再一次处于不可一世的傲慢状态。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这种迹象，在后来修改通商口岸条约时更是明显，早前，一位驻中国的英国代表发现这些事实，他说道：“这个民族不讲道理，在恐惧时倒会事事谦卑。”

要证明中国官员傲慢自大、优越感强，有一个例子最为合适。这与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现在的摄政王）前往柏林有关，这段插曲曾一度导致德中关系的破裂。在和平协议第一项条款中，代表团指定醇亲王亲自向德皇传达中国政府对杀害公使克德林的歉意。1901年7月12日离开北京，朝廷已教他如何表达中国政府的歉意。醇亲王认为，德皇对他们道歉的要求与朝廷教他的不相符，他拒绝道歉，德国政府犹豫片刻，最终中国的消极反抗取得了胜利。醇亲王载沣在9月26日向和平大使庆亲王和李鸿章发送电报，相当有趣，全文如下：



1901年，慈禧太后66岁

我已如期收到军机处的通知，注意到我应该按照形势需要行动，这条路被认为是权宜之计。我非常欣赏你们的政策，充满智慧、小心谨慎，我已按照指示分步行动。这月14日德皇下令停止为仪式做准备，但我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撤退皇家火车，侍从武官也没有离开我的随从，我推测德皇有可能在争议中放弃自己的观点。因此，在长时间与荫昌讨论现状后，我让他用德文写信给景音泰（德国名字的中文翻译），要求他友好介入外交部，明确解释中国不可能同意向代表团下跪，如果德方坚持如此，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惨败的唯一结果就是

两国变得荒唐可笑。因此我恳求德皇同意我的请求，放弃坚持。同时我要求担任巴伐利亚州的中国领事的德国人，以大致相同的意思与外交部交谈，以便我们能直切要点。四天后我命令吕使回到他在德国的岗位，做些可能的安排。第二天我发电报给他，了解军机处在此事上的观点。二十日下午，我接见了巴伐利亚州的领事，他告诉我他刚收到外交部的电报，询问我什么时候动身去柏林，希望我动作迅速点，因为德皇已经同意不要我们下跪，但我在阅读道歉信时，只准荫昌一人陪我，其他随从待在另一个地方。

当天晚上我收到吕的回电，他说德皇确定要接见我，因为其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德皇希望我们几天后就能到达柏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过分苛求礼节的次要细节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时间紧迫，我请求德皇的宫廷大臣为我准备专车。我们二十一日（中国日期，当地为九月四日）下午三点抵达波茨坦，德皇派将军乘坐宫廷豪车来接我。我和随从住在宫殿里，我们受到各方极大关注，在已故皇后坟前献花后，我认为必须完成我的使命。二十二日早上我前往墓地，中午时专车接我到新皇宫，被领到德皇面前后，我就大声朗读问候信。随行人员在邻近的房间等候。仪式过后，我被护送至住处，下午两点德皇到我这来。他态度诚恳，和我聊了好久。他下令为我安排一艘汽艇。我乘坐汽艇游览了孔雀岛；二十三日看军队出操，仍去拜见皇后。德皇留我在柏林多待些日子，他说我应该参观一下军械库，视察亨利王子在什切青的舰队。我不能拒绝德皇的盛情邀请，拜见皇后之后，我住在柏林的宾馆。因为大清朝威望在外，事情已妥善解决，我已圆满完成任务。我希望这份电报能给予焦虑的太后皇上宽慰，请您代为上奏，载沣。

慈禧对于此行的结果很是满意，在中国政府眼里，这无疑是外交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以往只能依靠割地赔款求和，因此政府吹嘘着这种方式赢得的胜利。醇亲王此次前往德国，目的是代表友好邻邦，即中国政府及朝廷对杀害德国公使一事道歉，而在上述电报中，我们看不到醇亲王丝毫的歉意。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一致认为，自从摄政王从柏林回来以后，学会了好多东西。今年，摄政王的两个弟弟游历各国，表面上着手学习重组陆军海军的知识，并受到了文明国的厚待。

但是密切关注北京变化的观察者认为，他们只不过又在上演之前的闹剧，他们试图赢得摄政王家族和朝廷在人民中的威望，而不是真的想要改革政府体制。

第二十三章　两宫回京

自从离开京城逃难至西安，慈禧太后一直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正如她在处理义和团暴乱和围攻北京时的状态。一部分原因是她年事已高，另一部分是由于占星家和卜算者的矛盾影响，出现危机时慈禧很重视他们的建议。我们在前文提到过，慈禧对各种征兆和迷信很敏感，这个时期它的影响最明显，在回京的小事上尤其突出。

荣禄利用他在西安的影响，李鸿章运用他在北京的影响，有条不紊地诱导慈禧太后回京；但是，直到明确谈成和平协议的条款，直到说服慈禧对义和团的领袖施以适当的惩罚，慈禧太后的主要感觉只是怀疑和恐惧，就像她紧急下令从太原逃离到西安时表现出来的一样。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国政府批准攻击大使馆是很愚蠢的。李鸿章运用他的影响让慈禧了解这个决策有多荒唐。危机白热化的时候（1900年7月21日），慈禧意识到压在中国身上的外国势力正渐渐打败义和团和皇家军队，她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令李鸿章立刻从广州赶到京城，因为那里急需精通外交事务的官员。太后建议他借俄罗斯船乘到天津。李鸿章电报回复慈禧，由袁世凯通传，李鸿章虽然表面上很尊敬慈禧，但暗地里认为慈禧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在电报中写道：“我真的很感激太后对我的信任，但我仍不停想起之前的荒唐事毁掉了大清改良后的政治结构，这可是我任直隶总督二十年内成功建立起来的。我很担心，在这样危急时刻，我不能坚守这艰难的岗位，因为我缺乏合适的物质资源。”他甚至在电报中批评慈禧太后对他行程的建议，他说：“俄罗斯在上海没有船，即使有，就现在的战争形势，他们也不会借的。”最后，他找借口推迟启程日，因为英国大臣要求，直到安全护送外国大臣从北京到达天津，他才能离开。他说：“我不知道是否为安全护送大臣做了充分安排。”因此他结尾时让袁世凯告诉慈禧，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将陆路北上。面对直隶总督直截了当的话语，慈禧的回复也同样直接：战事紧急，李鸿章

需听从上一条命令，赶忙北上，不许再有任何借口推迟启程日。

尽管慈禧太后的态度很强硬，但李鸿章依然留在了上海，他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困境。他表面上留在上海协商，其实在等待围困大使馆的结果。7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分社记者采访了李鸿章。他声称除非有明证使他相信慈禧已经认识到自己处理问题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北上就职。他准备对愤怒的外国列强采用和解政策。七月底，当李鸿章得知朝廷决定逃离北京，他立即差特使呈上一份奏折，这份奏折非常有名，他请求慈禧太后明确旨意，恳求立刻调整奏折。慈禧太后离开北京前就收到了这份奏折；里面有些内容值得重新阅读，最大限度地显示出李鸿章的胆识和智慧，使他成为二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官员，名声遍及世界：

我们都牢记着，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和外敌多次交战，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知己知彼，以定政策。道光中期，外敌不断向我们边境施压，到今天我们已处在绝望的边缘。1860年，列强入侵北京，烧毁颐和园；咸丰帝被迫逃亡，最后死于热河。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于心，不忘报仇，珍惜任何报仇的机会。自从那以后，法国占领了安南及其附属地，我们已彻底失去这些地方，不可挽回；日本从朝鲜侵略我们。紧接着，灾难不断发生，领土不断丢失：德国占领了胶州；紧接着俄罗斯吞并了旅顺和大连；英国强占了威海和九龙。上海殖民地不断扩大，又开了新的内陆通商口岸；法国更妄想广州湾。面对这样野蛮无度的侵略行为，我们怎么还能够保持沉默呢？谁不想防御，谁就是懦夫，谁不想有结束之日，谁就是无耻之徒。

我自己承蒙朝廷不少恩惠，国家对我的期望也很大。我不必强调，如果中国能光荣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将会多么高兴；如果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侵略国最终被征服，效忠朝廷，尊重太后，我也死而无憾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悲哀的事实，中国完全没有进取心，我们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望。谈到这个影响我们王朝统一的问题，我们举些例子。谁会愚蠢到在价值连城的瓷器的附近对老鼠投下导弹？鸡蛋比石头容易击破，这是不用预测的事实。近年

来，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土匪和皇家军队攻击天津的外国殖民地，只有两三百外国士兵抵御他们；然而，经过十天的战斗，只有一百名外国士兵战死，不少于两万名中国士兵死亡，受伤者更多。北京大使馆不是防御阵地，外国大臣和大使馆人员也不是作战之人；但董福祥军攻击大使馆已经有一个月了，为了夺得阵地已经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

八国联军正加快他们侵华的步伐；大炮正对准我们。中国有能力抵御他们吗？中国有一位有能力抵挡侵略的领导者吗？只要列强派十万士兵，就可轻易攻克北京，皇太后皇上将无处可逃。他们将再一次逃亡热河，但这次没有像胜保那样的指挥官阻止敌人的追赶；或者，他们会开另一场和平会议，就如1895年的下关？今天的情况和当时完全不同，我作为大臣代表将接受伊藤的接见。被义和团背叛，被众人所抛弃，太后您还能找到一位亲王，大臣，政治家来帮您吗？一想到宗庙社稷危在旦夕，我就十分心寒。如果皇上圣明，宣扬他们可笑神力的义和团早就被消灭了。历史早有记载，汉朝因为相信巫蛊之术，最终灭亡；宋朝因为相信关于身穿甲胄的战士的神力而最终毁灭。

我已八十高龄，行将就木；我承蒙四代皇帝恩惠。现在我心里想，将来到了阴曹地府，我如何面对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因此我诚心恳求太后立刻抛弃邪恶的巫蛊之术，将邪恶之人立刻斩首。

太后应立刻采取措施委派高官惩治暴民，确保外国大臣安全回到八国联军总部。尽管天气炎热，我仍要急忙北上从广州出发至上海，我在上海收到太后命令我火速回京的圣谕。虽然身体越来越差，但我仍不能违抗命令，细读太后圣谕，发现在这动荡的时候，太后仍不愿议和，始终坚信义和团叛徒是忠义之士。我现在在上海，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如果现在冒险北上，会遇到重重险境，被暴民横尸。所以我还是留在上海，寻找办法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也可以有机会查明敌军动态，作出有用的建议。只要计划完备，我将全力北上。

李鸿章这番话真挚感人，对慈禧太后也不是没有作用。8月19日和20日慈禧在怀来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首次向外界宣告，为了日后返京，她将明确采取和解政策。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八国联军存

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猜忌，这点对回京是有帮助的。

在8月19日的诏书中，慈禧太后解释道，义和团叛乱和攻击大使馆是由于中国教民和非教民的差异，她也愤怒地抱怨，无疑，虽然外国势力奋力消灭乱党，但他们的行为表明对中国暗藏祸心，是对亲善友好的不尊重。她更天真地认为，尽管困难重重，中国政府正竭尽全力保护外国人员在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她本人善良仁慈，得到这样的恶报，实在是件很令人震惊的事。要不是外交官能力超群，经验丰富，知道中国人治理国家离不开轻信二字，很难知道这些话出自一位资质不凡的统治者。但慈禧一如既往地被证明理由充分，诏书发布之时，俄国也有类似的理由，为中国政府辩护，推行慈禧在京的政策。

在上述诏书的结尾，慈禧命令荣禄、徐桐和崇绮留京担任谈判代表，但她承认，洋人有军队撑腰，打了胜仗沾沾自喜，一开始就有满意的议事程序是很困难的。她把问题交给这些全权代表，让他们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发电报给各国外交部还是与上海总领事协商，请求他们友好介入。我们不能忘记，慈禧是多么精明的人，她肯定知道这个节骨眼上，北京的气氛不会对她有利。比起刚刚从围攻中脱身的洋人，各国外交部和上海总领事更好蒙蔽。

第二天发布的诏书，依然以皇上的名义，但却以完全不同的口吻——承认皇上的过失，请求百姓的同情，劝诫列强重拾智慧：“净化心灵，消灭猜忌，帮朕改正错误。朕虽无能，但已认识到错误，并深深自责。”全文读起来充满着难得的真诚，以皇上的名义，对国家发生的灾难全权负责。提醒官员们，灾难发生的首要祸根，就是因为他们养成了懒惰和奢侈的习惯。深深忏悔，诏书完全承认朝廷的责任：“朕贵为天子，却不能为百姓抵挡风雨，朕应当自尽来抚慰神灵与大地。但朕不能忘记赡养年事已高的皇太后的孝道。”

已清晰阐明改革政策，概述未来政府的基本情况。命令各省和主要城市的官员立刻回京，迅速开展改革计划；长江一带督抚根据条款，维持秩序，值得嘉奖。皈依为基督教的中国人更确信朝廷对他们的保护和亲善。

皇上的这番话，都通过庆王和他的同僚一字不漏地传递给了各方列强，很快他们就有了预期的效果，再次向朝廷大臣保证，他们没有人身危险。9月初，总督和各省高官联名上书，督促两宫回京。但凡联军对慈禧太后的生命安全有一点威胁，他们都不会提这样的建议。此时，朝廷上官员讨论未来中国首都的定居地，意见不一。袁世凯起草总督的奏折，送至南京刘坤一处，由刘坤一传递各省。奏章明确强调义和团及其领袖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一想到“过去让慈禧太后尴尬的困惑现已明朗起来”就兴奋。现在朝廷大有可能离开太原，继续向西安前行，大臣们谴责这个想法，认为这既不明智，又不方便。从这份奏折中提取的大清官员如何处理政事的例子，也是很有趣的：

过去事实证明，因为国难，我国已不止一次迁移首都，但敌人并没有无限期地在国内驻军，战后都被迫撤军。但今天的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也不能从过去的例子中得出经验。谈到山西省，它曾经是战争和叛乱的中心；人民生活贫苦，没有贸易往来。七百年前，西安曾是皇城，但现在穷苦不堪。它与甘肃、新疆邻接，新疆出现大量反叛，又与俄国邻接，是最不适合定都的地方。如果联军因为胜利沾沾自喜，提前西行，什么才能够阻止他们？如果一万英里的海洋都没能阻止他们，何况更短的陆地之行呢？

清朝发源地，先祖陵墓都在北京附近，从地理上来说北京最适合成为政治中心，进谏者提醒皇帝，列强已承诺离京，只要朝廷回京，他们不会再要求割让领土。如果朝廷执意西行，就不会有这些结果，因为中国统治者回到京城也是外国大臣的想法。万一联军永久占领北京，满洲国必然不保。进谏者预计国家就此四分五裂，灾难相继发生，包括财政危机，不可能为两宫或大清国任何一个偏远的角落提供花销。如果朝廷执意西行，至少发布一项命令，声明此行只是短暂逗留，只要恢复和平，朝廷就会回京。“国家存亡，就在于此。”奏折最后恳求太后授权庆亲王通知外国大臣，联军一撤退，朝廷就会明确宣告回京。

督抚和地方官员又呈上了一份奏折，声称俄国外交大臣暗示中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大臣，西安太穷，实在不是定都的理想之地，毫无疑

问，两宫将继续西行，定都甘肃兰州。谈及这有趣的事实，进谏者们说道：

——那些赞成定都西安的人公开表示，黄河潼关是抵御侵略的天然屏障。但是他们忘记了，洋人拥有远程大炮。潼关到黄河不足两英里，洋人的枪轻易就能达到两倍的射程。我朝只有自制的火炮，比起洋人的枪差远了，是不可能占据优势的。毫无疑问，洋人将深入我国内部，控制水路，隔断交通和物资运输。一个国家行动可能有些困难，多国联合就容易多了。

按照国际惯例，列强有权派遣外交大使到我国。一旦和约成立，外国同意我国迁都陕西，他们就能派使节前往陕西。经历了许多事之后，他们肯定会要求驻兵保护大使馆，而且离海越远，士兵的数量越多。河南、山西、直隶为要塞，需重兵把守，维持洋人的通信路线。最终整个中国将被外国军队包围，毫无疑问，朝廷不可能迁都陕西。和平状况下这还有可能，可在发生这样毁灭性的战争之后就不可能了。各国行动一致，中国却毫无组织。他们有充足的物资和增援部队；中国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想与任何一个国家对抗，都必须首先与其他国家联盟；可是在积累到足够的军火和军需品之前，这一切都是空谈。已经没有考虑这些可能性的时间了。我们冒死向太后、皇上进谏，两位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提醒太后、皇上，诚挚地恳求二位作出明智的决定。

在下决定之前，慈禧要求确认列强不会逼她退位，作为和平谈判的一项条款。确信了这点，她之前回京的犹豫立刻消失，就像脱了一层衣服。保守官员和文人预测，我们的老佛爷不会再愿意看到受辱的皇城，也不愿祭扫受辱的先祖皇陵。虽然慈禧很迷信，但她头脑冷静、高瞻远瞩，绝对不会在权力问题上感情用事；一旦统治权遭到威胁，她总有办法权衡。她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以及对张之洞希望她在中国中部建都建议的重视，都关乎“面子”问题。只要尊严和权力得到保证，她就会立刻回京。和平协议继续进行，慈禧很清楚可以利用列强互相猜忌的老办法，她回到北京不仅不会受罚，反而会受到欢迎，她早早为回京做准备。庆亲王每天都会上报慈禧全权大臣的议和进

程，直到《辛丑条约》完成，慈禧对条款很满意。夏天大雨过后路面不能通行，慈禧只等道路情况改善，再顺利上路。慈禧和朝廷待在西安期间，收到了大量贡品，需要花大把时间整理和包装这些东西。慈禧得到一个好消息，她在北京的宝库没有被列强的军队抢夺，因此她急着尽快回京亲自监督宝藏的转移，以免被宦官盗走。

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20日），大部队离开慈禧暂住的行宫，随行人员很多。离开之前她先到城门外的小庙祭天，“天”是大清朝的守护神（顺便说一句，“天”也是义和团的守护神）。朝廷向北前行，从容不迫，日行二十五英里，先在河南停留，继而前往开封，停留数礼拜庆祝慈禧66岁大寿。现在为慈禧的舒适和方便提供的各项安排，与之前朝廷从京城逃离时的悲惨与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慈禧停留在开封期间，《辛丑条约》签订。九月底，慈禧还没离开开封，李鸿章去世。他精通外交事务，具有非凡的谈判能力，为慈禧立下汗马功劳。毫无疑问，列强对条约的条款如此宽容，大部分原因都是他的努力。虽然慈禧很欣赏他的能力，却以听不懂他的方言为借口，拒绝任命他为军机大臣。李鸿章死后，慈禧为他在北京，以及他任职过的各省建立圣祠，以示纪念，这是之前清朝任何官员都未享有过的荣誉。

虽然最初慈禧认为李鸿章应为甲午中日战争和它带来的灾难性结果负责，但她从来没有赞同光绪帝罢免李鸿章直隶总督一职这个草率的决定，这在慈禧的统治时期意义重大，是她公正、智慧的表现。《辛丑条约》一签订，慈禧太后就授予他身后殊荣，与此同时，发布圣旨感谢庆亲王、袁世凯及其他官员协助条约的签订。她特别赞扬了荣禄的忠诚，“他曾恳切地劝诫消灭义和团，在军机处留下功绩，为保卫大使馆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鸿章像

看了祝寿戏后，朝廷离开了开封府，继续向京城出发。在她离开的前夜，满洲官员文悌（1898年担任御史，后因反动被革职，政变后慈禧将他官复原职）建议太后不要回京，洋人阴险狡诈，必定会扣押太后圣体以哗众取宠，太后公然坚决地训斥了他。

渡黄河的那天，天气晴朗，慈禧怀着忏悔和感激的心情祭拜了河神。当地官员建造了一艘华丽的龙舟，以便慈禧和众嫔妃安全过河。值得注意的是，皇家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外国人观看。到达北京前慈禧就颁布懿旨，准许欧洲人观看她到达时的队伍，尽管事实如此，按照传统，大使馆发布告示禁止本国人出现在皇家队伍行进的大街上。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慈禧太后正想方设法安抚欧洲列强。这是她深思熟虑的政策，迎合列强，以便推行将来的政策。从幽默的角度来看，慈禧的做法还是挺有趣的。

跨越直隶省的边界后，慈禧发布了一道懿旨，流露着友好的态度，宣称皇帝一到京城就接见外国大臣，招待会将在庄严的大殿隆重举行。不知道《辛丑条约》为列强做了多大让步的中国人在读这道懿旨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皇家的仁慈和亲善。这道懿旨也宣称慈禧将亲自接见使臣夫人，并暗示她很珍惜之前与她们交往时的愉快回忆。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预谋的实现，按照最经典的方式精心构思布局，“为了与强悍的野蛮人打交道。”

1902年1月6日的中午，太后一行乘坐专车到达临时车站，该站建在北京南墙附近，与原来位于马丁堡的终点站相隔不远。车站附近建立了许多大帐篷，都有漂亮的装饰，老佛爷和皇上可以在帐篷内休息；帐篷内设有金漆的宝座，景泰蓝制的祭祀器皿和许多贵重的瓷器。成百上千的高官出席，专设一处供洋人参观。超过三十节车厢的火车驶进了车站，老佛爷透过车窗窥探四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随行的有年轻的皇帝与皇后，太监总管李莲英在旁服侍。百官向太后叩拜行礼，内务府总管继禄大呼外国人脱帽（他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一个从车内出来的是太监总管，他立刻检查各省贡品和财产的清单，以及山一般的行李。这些东西从一开始就跟着朝廷，由慈禧亲自监管。接着出来的是皇上，很明显他很紧张，看了太后一眼匆忙回到自己的轿子，匆匆离开了，没有和在场的官员说一句话，也没有示意他已经看到了他们。皇上离开后，慈禧太后出来了，站在车厢尾的站台上说：“我看见许多外国人。”她按照中国妇女的传统礼节向众人行礼，一边低头示意，一边抬起交叉的双手。之后，庆亲王上前请安，王文韶同行（继任李鸿章成为谈判全权代表）。他们邀请太后上

轿："不急。"太后回答。她足足站了有五分钟，将整个人群尽收眼底，饶有兴致地与旁观者讨论，看起来很健康很年轻，李莲英回来后，交给她行李和财产的清单，她仔细浏览，满意地把清单交给了他。

之后，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铁道部门的总管及工程师上前拜见慈禧，接受慈禧对行程中精心安排的感谢。接着慈禧上轿，轿子比皇上的更大更好，太后被抬进了皇宫；慈禧最喜爱的宦官在旁随行，不停地给慈禧讲有趣的事。一看见洋人他就报告慈禧，有人听见他说："看！老佛爷快看洋鬼子！"慈禧微笑着，温柔地点了点头。过了正阳门，轿夫抬着慈禧直接走向了天安门旁边的太庙。一大群外国人在城墙上等待着，他们看见慈禧从轿子上下来，跪在神像前烧香，几位道士在一旁吟诵经文。慈禧抬头看着洋人，微笑着点头示意，接着她被抬进了紫禁城。下午两点，她一到达内宫（宁寿宫），就命令宦官将她在逃亡之时埋藏的宝藏挖出来，发现它们完好无损，慈禧的欣慰之情难以表达。

此后，慈禧不仅看重同洋人的关系，更关心国家的公众舆论，她下圣谕授予珍妃身后荣誉。在朝廷逃离京城的那天早上，慈禧下令将她推入井中。但在这份圣谕中，慈禧赞扬她的贞操与勇气，"因为不能赶上朝廷离开的队伍而自杀"，因为她不想见证先祖陵墓被破坏，被玷污。她的行为应该受到嘉奖，因此授予封号，位升一级。通常人们都认为这个圣谕对死者作出了合理的补偿，在中国，死者只是移居到阴间，依然真实地存在。活着的时候，在老佛爷的政策面前，一个珍妃无足轻重；而死后，她的灵魂必须得到安慰和补偿。

许多欧洲人观看了慈禧的迎接大典后，仍留在车站观看慈禧行李的卸载过程。这是有趣而富有意义的场景。首先卸下皇后和公主的黄轿子，以及主要嫔妃的带有黄边的四顶绿轿子；其他嫔妃在官车里，两人一辆。总共有九十位嫔妃，路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几位年长的嫔妃话很多，相当惹眼。她们离开之后，宦官和下等官员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慈禧太后成堆的个人行李，包括烹调用的厨具，日常家庭用品。这项操作，连带大数量纯金的搬迁（每个箱子上都标明了进贡省

份的名字），都由军机处暂时监管。虽然这项工作需要持续数小时，但在荣禄的带领下，不久后他们就乘坐轿子回京了。大家注意到荣禄看起来很虚弱，走路时需要两名高大强壮的侍从搀扶。

从正定府到保定府，再到北京，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乘火车前行。下面对行程的描述1902年3月首先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现经《泰晤士报》编辑的允许得以引用。它反映了慈禧太后性格中风趣的一面，爱护自己的私有财物，她精力旺盛，不仅注重朝廷礼仪的细节或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历史先例，更关心交通运输以及国内经济发展。这些都反映出老佛爷的性格与“小军曹”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

12月31日一大早，朝廷就到达正定府，大队骑兵护送，许多官员，太监和侍从随行。足足一列汽车搬运行李，有人看到大约有三百辆。太监的人数在三百到四百之间，同行的厨师和其他厨房杂役也不少。为这么多人提供住宿是不可能的，尤其这个时候，城内最好的住处已被高官和他们的随从占用，他们特意从北方赶来迎接太后的归来。朝廷在正定府待了三天，这几天场面相当混乱，行李被随意堆放，挤满了每一个可以利用的角落，宦官和仆人围着行李扎营，麻木地忍受着亚洲特有的寒冷天气带来的身体不适。天气非常寒冷，1月1日晚上温度降到了华氏零下两度（约为摄氏零下19度），许多旅客唱起了哀歌，流下热泪。中下层的官员因为找不到住处，被迫在火车站附近的临时避难所待了几天，避难所里挤满了毫无纪律的暴民。第二晚，行宫附近的马厩突然着火，虽然最终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但却带来巨大的混乱，缺乏组织，难以控制。朝廷打算1月3日出发到保定府的明确消息对这些饥饿、混杂、而又代表亚洲最强国的骄傲的人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从黄河到火车终点站正定府，大约250英里。皇家队伍不断壮大，众人一路不是坐轿，就是乘车，要不就是骑马，一路欣赏美景。许多场景让人回想起斯科特所描写的欧洲中世纪的盛况。每个满族亲王都有骑兵随行，人数从30到100不等；一路是冻着又不平坦的小道，这就是中国北方的公路，就像小溪奔腾不息，永无止境，运货车

发出咯吱咯吱声，划破冬季短暂的天空。士兵点燃火把引路，嘎吱声响彻寒冷的冬夜，直到到达指定的停靠点才结束。但慈禧太后和皇上，在太监总管和众嫔妃的陪伴下，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一场旅行，众人已为他们铺平道路。一路上，皇家轿子经过的道路已被铺平，甚至表面覆盖了一层发亮的泥，踩上去既柔软又安静；不仅石头被移除了，皇家队伍快到的时候，雇用了一群壮汉用羽毛做成的扫帚打扫地面。每隔十英里就有一处休息场所，里面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当然，专为皇上建造的交通干线对国家的日常交通来说，是毫无用途的，一位当地承包商称，粗略计算，每八码就相当于50墨西哥元，1000英里的泥土还是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这片土地上，贫穷蔓延，朝廷官员却奢侈浪费，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慈禧将离开正定府的时间定在1月3日上午九点半。尽管已经67岁，但这个非凡女人的性格有个特点，在细节问题上，她依旧做得四平八稳，亲力亲为；她的权力毋庸置疑，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宫女的生活起居，她都了如指掌。她带有鲜明的女性形象，但又不让人觉得枯燥，她用她的智慧带领大清朝度过了最后的四十年，她绝不轻视家庭琐事，从粮食供给，到交通运输。如果慈禧的生命中发生一些变故，或给她带来些影响，她就会看到在她统治下的腐败、欺诈、冷血和残忍，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女人会变成什么样，又会为她的百姓做些什么。



慈禧踏雪照片

按照慈禧太后的命令，上午九点半，朝廷将乘坐专车离开。比利时铁路当局和盛宣怀早已做好了迎接准备；但是，太后七点出现在车站，随行的有皇后，众嫔妃及女官。皇上走在太后前面，太后一到，皇帝就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下跪行礼，以示尊重。接下来两小时，慈禧毫无疲惫的迹象，精力充沛地亲自安排她那成堆行李的安放，在站台上与文武高官进行非正式会议。她接见了杰多先生，花许多时间与

他友好交谈，表达对她路途舒适安排的满意，并称很开心他把轿子换成豪华装饰的休息车。她耐心地让总工程师了解，细心看管朝廷的行李和财物是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情表明，太后虽然和蔼善良，但一直坚定。

派遣了四辆货运车之后，太后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大家很清楚地知道，一到保定府，太后一定要亲自检查，决不允许财物提前回京。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女人的天性，不管是慈禧，还是别国与她有着同样身份的女人，这也反映出宫廷内侍的忠诚度意义非凡。

站台上的场景非常有趣。朝廷不再隐瞒它的生活状态、迁移情况，这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想法。这一次，整个行程过程中朝廷没有试图，也没有想要使他们的太后、皇上免受监视和骚扰。虽然群众很好奇，但却没有表现出集会的倾向，来去自如；回京路上保护太后的袁世凯的勇士，多达1000人，挤满了车厢。太后会见高官，随行侍从都退下，正如所预料的，待在远处以示尊重。去过督抚州县衙门的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缺乏民主，看到这个场景非常惊讶；但这个例子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经历。

在本国观众眼里，侍女、太监和外国铁路官员一样有趣；瑾贵妃，年轻好动，容貌讨喜，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个女人，穿衣华丽，浓妆艳抹，只要是与火车有关的事，都能引起她的兴趣，从这节车厢跑到那节车厢，喋喋不休地与侍女交谈。后宫嫔妃都穿戴大量珍珠首饰，其中皇后佩戴的首饰尤其名贵，她们都不抽古老的水烟，而改抽香烟了。这是进步的征兆，很值得庆幸。太后召见群臣，大概花了一刻钟，皇帝就站在太后旁边，总是闷不吭声，无精打采。虽然外界形容皇上充满活力、聪明睿智。在欧洲人眼里，皇后的姿色被过度化妆给毁了。她看起来很忧郁，对周围没有兴趣，三人穿着颜色淡雅的丝绸。

专车九点半准时到达，护送太后等人回京。火车有一个机车和二十一节车厢，依次为：九节运货车厢、运载仆人、轿子、车等物品；一节警卫车厢，供铁路工作人员使用；两节上等车厢（众位亲王乘

坐）；皇上的专用车厢；为随行高官准备的上等车厢（荣禄、袁世凯、宋庆将军、鹿传霖、山西巡抚岑春煊、内务府大臣及其他官员）；太后的专用车厢；皇后和众嫔妃的车厢；两节二等车厢，随行宦官乘坐；一节上等车厢，太监总管李莲英；最后是杰多的服务车厢。

铁道部总干事盛大人说，为了准备这些专用车厢，耗资巨大。太后、皇上、皇后及众嫔妃的车厢，摆满了昂贵的古董，帝国黄绸装饰，豪华奢侈。每节车厢都设有宝座、长沙发和接待室。车厢内为了方便妇女，贴心地提供了深色的窗帘。但是，在路途中她们都不介意隐私暴露，所以这些窗帘都用不着。路途中，慈禧太后的车厢总是各宫嫔妃聚集的场所，太监在旁服侍，太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皇上和太监总管李莲英交谈，李莲英是个声名狼藉的人物。

慈禧太后本性专横，现在人们发现她的性格有个很显著的特点：迷信至极。北京城内的算命者和占星家也没得闲；另一方面，比起一般进谏者的建议，太后更注重他们的看法，巫师的地位不容小觑。他们把太后回京的吉时定在1月7日下午两点；因此杰多先生必须为大部队的准时到达作最细致的安排。太后反复跟他强调，她如何注重准时到达永定门。铁路总工程师指出，为了准时到达，大部队必须早上七点就从保定门出发，太后如此坚决，不会被任何事情耽误。早上六点，这位伟大的女人到达车站；天气严寒，沙尘暴猛烈地怒吼；东方还没泛白，士兵拿着灯笼和火把为轿夫引路。真实细节与想象的非常符合。行李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太后的全部注意；最后一节货运车，载满了南方省份进贡的财物，先于皇家车队二十分钟出发。大家都知道，这位威严的太后要求亲自监管财物，加大了铁道工作人员的责任，使他们行事更加小心谨慎。

在保定府发生了一件小事，充分体现了慈禧性格的另一面。上文中我们提到的高官的上等车厢，在太后和皇上专用车厢的中间。他们觉得车厢很挤，就与铁路负责人商量，加进了另一节上等车厢。慈禧立即注意到这件事，询问原因，最后没有得到她的批准。加进的车厢立刻就被移走了，袁世凯和他的同僚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待在拥挤的

车厢里；下车之前，慈禧还视察每节车厢，询问他们是否舒适，表示她对路途中的安排非常满意。

一分不差地，上午十一点半，火车到达丰台，京汉线和京津线在此交会，由英国官方管理。太后再次表示，行程安排非常出色，时间把握得很好；然而越靠近北京，她就越焦虑。杰多在丰台与太后、皇上告别，太后再次表达她对首次乘坐火车的满意，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再次有这样的机会，承诺自己将出席京汉铁路通行开车仪式。她分发五千美元，赏赐给中外铁路工作人员，并赐给杰多先生二等双龙宝星勋章一枚。

英国人控制的铁路从丰台直达紫禁城正门——南门。上述的算命者和占星家说它是吉兆，才铺设了这条铁路。遵照传统，太后一行必须在马家堡下车，经永定门，一路直行，达到内城。正午，朝廷一行乘轿离开铁路，前往京城。只要官员肯花大钱，游行就会很壮观。欧洲作家将这场景形容为威风，而一位日本记者认为这和他们国家的乡村表演差不多。一如往常，皇上在太后前面，恭敬地迎接她进入内城，18个月之前，慈禧太后匆忙逃离北京，此刻进城，与算命者预计的吉时吻合。太后口谕中的自责口吻，以及现身北京，都表明太后明智，做了正确的选择。

最后还有一点。按照盛宣怀的安排，慈禧的车厢内放了一张欧式床，以适应时代潮流。另外车厢内还有鸦片工具，做工奢侈而精细。

遵照《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朝廷回京一周之后，将接见列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太后一如既往地坐在最高的位置，皇上坐在低些、次要的位置。随后，太后在千秋亭接见了公使夫人，外交使团领袖之妻敬辞，“欢迎太后回到美丽的京城。”内容诚挚感人、热情洋溢，显示出慈禧为安抚列强，运用奉承和诱惑，采取狡猾、细致安排的手段，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此时此刻，大家都忘记了围攻时的恐慌，1900年时受到的侮辱，自己的盲目自大；列强代表为了赢得中国偏爱，互相竞争、彼此诋毁。

收到外交使臣之妻的致辞时，慈禧对外国人，尤其是来宾深情注

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着诚挚的情感，慈禧说道，“宫廷政变”使她被迫逃离北京；她对外国公使馆的好友们遭受的不便和困苦表示深深的遗憾，希望双方能恢复友好关系。慈禧的谦逊和宽宏大量让在座的公使夫人很是满意。这只是慈禧第一次接见公使夫人，后来还有很多次，这对于以后太后和列强的交往是个参考。她跟荣禄强调古人对付夷狄办法的价值，只要谦恭有礼，他们就会既往不咎，事实证明老佛爷没有说错。

生活进入了既定的轨道，京城一如往常，街上列强的驻军已司空见惯，幸存的百姓回来了，贸易开始了。外国和所谓天朝大国的闹剧再次开启，国际间的阴谋和猜忌再次出现，使得清朝统治者在冲突的压力中维持平衡。这个时候，荣禄掌握着朝堂上的权力，直至他死亡。仍对围攻念念不忘的外国列强，对于他们了解的关于义和团起义原因不符的一切信息，都表示怀疑。他们不了解荣禄的功劳，认为他应当与同谋者一样接受惩罚。围攻事件的真相，以及荣禄的个人行为，都记录在景善大人的日记中，这些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但各国大臣无法得到这些资料。荣禄首次正式官方拜访外国大臣就受到了冷遇，很是不悦。在外交使团的成员中，荣禄与其中一位交情甚好，并向他保证，上天证明，1900年除了尽全力保护大使馆，他什么也没做；完全没人相信他的说辞，他很痛恨人们加在他身上的不公平待遇。他严肃地请求太后允许他辞去军机大臣一职。慈禧完全了解真实情况，她很信任荣禄，于是颁布一道嘉奖令，拒绝他的请求：

慈禧写道，“军机大臣荣禄，潜心爱国，对朝廷忠心耿耿，长久以来作出巨大贡献。义和团反叛期间，他独自一人，冷静大胆，坚定前行，虽然围绕他的却是猜疑和非议，但毫无疑问，他拯救了我们大清朝。最荣耀的是他的功绩。虽然现在事态已得到改善，但我们始终不能从悲伤的国难中走出来。这就急需废除旧的陋习，引进改良方案。所有人都应共同努力，从一而终。我们都在宫中努力，奋发图强，我们器重的大学士又怎么能在面对压力时退缩呢？怎么能把这烦琐的工作交给我们呢？回想起每一位忠诚的政治家为国家肩负着忘我的职责，他的良心难道不会不安吗？我拒绝他的请求。”

在慈禧太后宾天之前，有两次是乘火车回京的。北京民众和外国团体都有机会观看慈禧回京的队伍。大家对她普遍的评论是：和蔼可亲。第一次是第二年春天慈禧祭扫东陵回来，和往常一样，又去东陵祭拜。慈禧与几位在朝堂上接见过的夫人聊得很欢。从太庙出来后，慈禧叫太监把她的望远镜拿来，用望远镜在城楼上俯视下面的人群，看到熟悉的面孔，她就挥挥手帕致意。她曾经大声询问一位外国大臣的女儿的身体状况。满洲亲王和朝中大臣一直视洋人为蛮夷，现在也是如此，看到太后如此屈尊，就很难抑制自己的愤怒之情。他们甚至督促继禄恳求太后不要这样，赶紧回轿。慈禧不为所动，对自己违反礼节很满意。但是，大家注意到皇上根本就不注意外国人，好像很忧郁、无精打采。

第二次是1903年4月，慈禧忠实的朋友和进谏者荣禄去世四天后，她祭扫西陵，慈禧缓慢地下车，看上去情绪低落，没有往日的活泼。慈禧的弟弟桂祥，跪下迎接慈禧，慈禧只说了句简短的话："你举荐的那个庸医害了荣禄。"没有再说其他话，坐上轿子走了。在保定府行宫接见外国夫人时，老佛爷直接表明，外国传教士的大屠杀与她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慈禧用重复的力量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不管怎么样，慈禧凭借自身的魅力，以及表面真诚的态度，赢得了许多洋人的支持。

慈禧越来越喜欢下诏书发表个人观点，还没安定下来专心过既定的生活，她就下了一道诏书，赢得了所有等级官员的同情。在诏书中，她劝诫大臣们，通力合作、潜心改革、废除陋习、积极做善事。她形象地描述了她和皇上在被迫"西行"时的困难。想到路途中难以忘怀的震惊和悲伤，慈禧写道：

我再一次回到了皇宫，祖庙庄严肃穆。在列祖列宗面前，我克服了深深的恐惧，灵魂增加了悲痛和懊悔的重量。我只希望能得到上苍持续的眷顾，有时间完成许多大事。





慈禧太后书法

后来，她又提到了陕西和山西的干旱以及所导致的饥荒：“大清朝正遭遇可怕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拮据，他们如此忠诚，再不能增加税收了。朝廷应削减日常开销，未来制定严厉的经济政策。除了祖庙的必要修补，特此下令不得花任何钱修补装饰皇宫，除非有绝对的需要。”

第二十四章　慈禧新政

1900年庚子巨变，京城内满目荒凉、破败不堪，慈禧太后流离在外的苦难经历使得她意识到国家内部存在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改革。上一章内容中提到，就是在颁布忏悔的谕旨之前，她果断地作出决定，向全世界宣布，她准备推行新政，摒弃种种陈规陋习，她已经认识到国家腐败的原因正是这些陈规陋习。太后随后推行的新政，事实上就是光绪皇帝1898年戊戌变法时所提倡的那些政策，但是太后讳莫如深，并不承认这一点。慈禧的新政和光绪皇帝有所不同的是，她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此来调解朝廷上下各方势力的利益冲突，消除地方守旧势力的反对意见。

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皇帝的名义向世界发布了一道谕旨，首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治理国家的执政理念有所转变。这份文献是在荣禄的协助下起草的，中国历来的谕旨都是冗长啰嗦，这份谕旨也同样有此弊病，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的刚毅、智慧和治国才能。颁布的这份诏书实在是振奋人心，即使在慈禧太后不受欢迎的广东和中国南方各省地区，也有许多维新派人士纷纷响应，拍手称快。中国报纸称这份谕旨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份谕旨言辞雄辩，一方面呼吁百姓接受改革政策，另一方面犀利地指出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社会的现状。另外，这份谕旨用词巧妙，既安抚了国内各派，调和各方势力，同时也提高了老佛爷的威望。“少壮派”党人尤其热情高涨，这份诏书中，太后明确宣布要摒除独裁专断的体制，而绝对专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应该认识到，要不是1900年遭受到惨痛的教训，慈禧就不会如此彻底地和清朝传统、皇室宗亲以及之前的信仰决裂。慈禧在垂暮之年，能够重回衰败不堪的都城，能够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勇气实在是令人钦佩不已。作为一个统治者，慈禧太后身负国家屈辱，勇于承认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并且对未来承诺实施更好的新政，这一切都表现出慈

禧太后治理国家极强的统治欲望和内心隐藏的忧患意识。

当然，鉴于以往所有的经验，许多大臣和大多数洋人都怀疑慈禧的诚意，认为这份诏书和平时的诏书一样，不过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目的只是为了安抚大众。但是，两宫重返京城之后，慈禧身边的侍从和高官渐渐地发现，这个自信的女人是铁了心要推行新政。她坚定地让那些很不情愿的皇族贵亲接受新政，渐渐地，慈禧太后又再次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戴，尤其是南方各省（1898年慈禧镇压了广东省的革命派，许多革命人士惨遭迫害）的拥护，慈禧在南方各省中重拾威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慈禧归西，无论慈禧的内心是真诚的还是虚情假意、敷衍了事的，她之后的每一步举措都表现出她对改革事业极大的虔诚，关于这一点，她的言行足以证明。

慈禧在拳匪祸乱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从中也吸取了教训，现在她把这些教训投入实践。但是慈禧太后一直到最后仍然很钟爱义和团的那些领袖，她赞赏这些人对她忠心耿耿，为了国家赴汤蹈火、冲锋陷阵，表现出他们尽一切力量驱逐洋人的赤子之心。不过，残酷的现实经历使她认识到，义和团所做的努力只是徒劳、毫无希望。她从中得出结论：未来，一直到中国足够强大以前，排外的行径都必须要镇压。

因此，慈禧太后知难而上，态度坚定地昭告天下，正式宣布要改革，综观中国上下几千年，这一举措绝对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除了慈禧一人，就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在进行如此剧烈的改革下，没有引起强烈的纷争，也没有引发内战（1898年光绪皇帝进行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例子）。但是，慈禧处理事务手法高超，下谕旨呼吁人们改革维新的态度强硬、理据充分，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和支持。慈禧说，如果把国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摆在孔夫子面前，他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即使是大多数顽固的尊孔人士，也都被慈禧巧妙的暗示说服。

这份谕旨记录了慈禧态度的转变，内容十分有趣：

整个宇宙中，存在着特定的固定不变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支配

着人类的行为。但是我们发现无论在哪里，政府制定的法令都是一成不变的。这句话出自《易经》，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状态都要遵循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个事物必定会被另一事物状态替代。很难说这个状态到底能持续多久。就像《论语》中写到，经常进行变化和改革并不难，每个朝代都应该从前朝的灭亡中吸取经验教训。有一些特定的规定从来没有改变，即三纲五常。这些规定从不变化，就像日月交替、照映大地，亘古不变。但是，在一些其他事情上，是可以有些改变的，不应该还持有那些迂腐刻板的想法。一个乐师想要通过琵琶来创作音乐，那就必须触摸每根琴弦。反过来说，每个朝代起初的时候，已经适应了这些变化，也废除了前朝的一些陈规陋习。我们的列祖列宗擅长改变自身的行为来应对紧急事件，这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自从满族人进京的那一天起，新的体制就开始盛行，与之前在沈阳都城所盛行的体制完全不同。

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看待某个问题，我们所遵守的某个体制，由于持续的时间过长，面临着变成陈腔滥调的危险，一些老式的事物应该要有所改进。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大清帝国的地位，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自从我们西行回来，老佛爷为了治理国家，日夜操劳，负担过重。

朕对此深感自责，一想到过去二十年来的弊病和陋习与日俱增，然而废除这些陈规陋习的打算一再延迟，最后国家就陷入危难之中。现在我们正在和洋人议和，一切政务需要重新整顿，并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改革体制。只有这样，大清才能重新恢复到昔日的地位，逐渐变成一个富强的超级大国。老佛爷决定我们应该采取西方国家盛行的方法和体制来改正我们的缺点，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以此作为借鉴，未来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

光绪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间（1897—1898年），改革维新缺乏计划，加上一些高官的鼓动，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茫然、不知所措以及愚蠢的想法。这场危机比1898年叛贼康贼引发的后果更严重，比义和团匪徒所制造的麻烦要更危险。一直到现在，康有为和他的同谋还不间断地从海外寄信过来，向人民大众宣传逆谋叛国的思想和干扰公

众的想法。他们写这些书信的目的很简单，他们毫不避讳地使用了一些标语，很显然，想鼓动一些爱国人士逆谋，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制造纷争，挑拨保皇派和保种派别的关系。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保卫大清”和“保护中国同胞”，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革，这只是革命党派对抗朝廷的一种方式，他们希望挑拨太后和朕的关系，这些奸诈狡猾的反叛者想利用朕虚弱的身体。当朕极力恳求老佛爷重新摄政时，朕感到十分欣慰。太后立刻上手，操纵大局，把朕从濒临险境的边缘救了回来，随后她又迅速惩处了那些反叛者。但是，阻止改革维新从来都不是太后的意愿，朕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废除列祖列宗遗留下来的规矩和习俗。我们忠心的臣民必须要认识到老佛爷不变的希望，我们母子一条心，臣民共睹，在一些政策上产生冲突时，我们会中和对方的想法，择善从之，采取中庸之道。

我们今天接到太后的谕旨，从中了解到，她是下定决心要彻底进行改革。然而，我们深信，清政府目前有必要把中国和欧洲国家最精华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体制，让底下的人对此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想革命。清政府体制的主要弊病就是习气太重，一些陈规陋习过于深入人心，一些文法冗长啰嗦，平庸低效的官员过多，而真正能为国家人民谋福利的人才却少得可怜。基本上每个平庸的官员都十分重视官文的书写，每个官僚都把这些官文视作法宝，以此用作充实自己荷包的工具。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乐意用这样的官文进行沟通，但是这些官文却毫无价值，根本不能为国家谋福利。

另一方面，大量无用的限制条件阻挡了真正有才能的人的去路，他们不愿同流合污，这些人才最终对仕途丧失信心，毅然辞官。清政府整个官僚体制已经腐败到了骨子里，但是目前改革的第一步就被致命的“先例”所羁绊。

到目前为止，学习欧洲国家的治国之道就不仅仅只局限于学习一些肤浅的语言知识、文学作品和西方国家的制造技术，很明显，这些东西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精华。我们所要寻找的西方文明的精华，事实

上就是统治者要对百姓富有同情心，百姓要对统治者给予理解。要求政府官员言辞真诚，能够履行诺言。伟大神圣的祖先们所传授给我们的这些教义和一些欧洲富强国家的立国之本不谋而合，但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学会了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技术之后，就开始沾沾自喜，感到很满足。一些陈规陋习却还没有废除，官吏之间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我们舍弃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只有一些没有学精的皮毛，那么国家怎么才能做到繁荣昌盛呢？任何改革想要最终起到积极的效果，并且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就要求改革的效率和公正。

根据谕旨和下达的命令，相关的大臣们根据中国现有的一些特殊文献，参酌了中西政治制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只有国家的法令和中央政府，还有一些关于为百姓谋福利的内容，比如说考试和教育制度、军队制度和财政规章。要求他们禀报，哪些内容的变化是合理的、哪些制度需要废除、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什么先进的理念、哪些中国传统的制度需要保留。我们目前需要的是足够的人才、充实的财政基础以及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军队。我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向太后禀报相关事宜，在采取确切的行动之前，应该先问问太后的决定。

当朝廷在太原逗留期间，迫切地号召臣民协助我们。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请愿书，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很愚蠢，要么就是从报纸文刊上剽窃的观点，要么就是迂腐的读书人的一些浅薄之见。这些建议听上去挺合理的，但事实上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他们这些人的性格骄傲自负，事实上他们目光短浅、见识狭隘。只有少数人的一些建议是可行的，推荐了一些具体行动的步骤，但是他们只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足。许多新进派大谈改革，还谈及了一些富强的西方国家，但是当谈到所有这些知识的由来时，他们往往就自欺欺人。中国还有一些尊孔人士，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的需求，只是一味地推崇孔子教义，儒家的经典思想。现在正是大臣们施展拳脚的时候，针对这些建议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尽量避免这些弊端。朕希望你们要考虑周全，能够详尽地阐述改革的详细步骤。

重新整顿政治体制，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官吏的能力。没有人才，

再好的政治体制也只是以失败告终。如果说我们的官员不能本着提高效率的精神、不能阐明新的改革方案，那么我们的改革成功的希望就会消失殆尽。现在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主要是因为一些老一辈的人还很守旧，目前想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要摒弃这些陈规陋习，首先就是不应该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要为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采取一些新颖明确的方法来保证工作效率，这样的人能够胜任对国家的事务的管理。但是如果你们，作为国家的官员，继续墨守成规，还是和原来一样，行事拖沓、懒惰松散、逃避责任、说一些假大空的话来敷衍国家，那么你们将自食其果。法令都已经立好了，专门来惩治这些官员，国家绝对不会同情你们这些人的。

我们注意到，这份谕旨是以皇上的名义写的，深刻地谴责了1898年戊戌变法时的那些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行径，并且在谕旨中可以看出太后急于撇清皇上和这些革命党人的关系。这份诏书证实了太后实施改革措施是势在必行。这个专横的女人从来不会低头认错，她也不会把美名留给身边的侍从。她现在采用的一些改革政策正是当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党所提倡的，但是慈禧太后为了保全面子，她必须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她的监管下，如今的改革和以前那些反叛者的改革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她所提倡的改革更加优越。愚民必须清楚地明白太后目前的改革政策与康有为等党羽的改革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不具有革命性质。然而，慈禧太后改革的主张与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慈禧太后的改革之路走得更远一些，惟一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改革中，慈禧太后是倡导者，而上次改革她是反对者。

回顾慈禧太后回銮后的六年时间，在经历了这么多风波之后，尽管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感情有所改变，但是她决心改革的诚意却是不容置疑的。义和团运动的大起大落，北京城沦陷以及列强毁灭性的力量使慈禧太后从中吸取了教训：国家软弱就意味着国家灭亡，而西方许多政治家都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慈禧太后意识到墨守成规、刻板守旧不会使中国赶超西方，如果中国想继续以独立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就必须要效法日本，对国家内部重新进行整顿，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国家实力。慈禧太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立即采取措施实施。这也使得她有别于那些只沉浸在消极

宿命论和无助的满洲亲贵，从而看出慈禧太后绝非常人。

改革之初，她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太后要小心处理皇室宗亲素来享有的特权，尽管这些人傲慢自大、嚣张跋扈，但是他们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她还要谨慎处理地方各省的贵族名流和维新人士，因为这些人都是中国文人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考虑到列强，慈禧太后必须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颜面，一方面，要保留自己威望，另一方面要表现“唯我独尊”的姿态。慈禧在臣民心中的威望一直都在，但是自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慈禧“唯我独尊”的姿态受到强烈动摇。在列强眼里，她不能表现地像一个受惩罚的悔罪者，而是表现成一个在动荡时局中无辜的受害者。事实上，慈禧太后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好演。

1901年在西安颁布了一道谕旨，这份谕旨堪称一流的文学作品，受到全国上下许多文人学士的热烈赞颂。但是大多数地方官吏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份经典的“参考意见”而已，就按照以前的那套路子敷衍塞责。他们心里认为老佛爷只不过是消遣解闷而已，按照她以前的习惯，老佛爷的这份诏书不过是掩人耳目，混淆洋人视听。他们认为各级官员随便敷衍、草草了事，老佛爷也不会动怒。一直到最后，即使面对太后懿旨中言辞恳切的劝诫，这些地方官吏出于自己的偏见和私利，坚称老佛爷不过是在演戏，但是我们在这六年的官方或私人的记录中，没有找到相关可以支撑这一点的证据。太后回京之前就颁布了一道谕旨，其中太后清晰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念：

一年前，我仓促地离开了北京城，我无时无刻不在反思国家遭此不幸的原因，感到十分懊恼。现在，幸亏有神明的保护，我决定要返回京城。每当我想起国家的衰亡和造成我们存在的这些弊病的原因时，我就会懊悔之前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调用各方力量，采取所有可行的手段推行新政。我们应该摒弃那些陈旧的偏见，必须继续向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理念。我坚定地下定决心，从今以后要注重实际事务，挽救国家于腐败堕落之中、振兴中华。起草这些必要的措施可能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

间，但是我回京后希望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能够逐一引进。

鉴于改革迫在眉睫，荣禄和他的同僚都劝谏我向天下表明我坚决的立意，向天下宣告朝廷的立场坚定，不容置疑。各地方官员应该真心诚意与朝廷合作，不得怠慢。出于这个原因，我所颁布的谕旨中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对于目前的形势，大清国不应该继续逃避，推迟改革的相关事宜。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和皇上两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如今的险境，然后稳步推进新政的实施。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要争取什么东西，然后选用合适的人才协助我们争取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母子同心，力图振兴大清国。我的子民们要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为振兴中华奋斗到底。

慈禧太后不仅意识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远远超于中国，而且她还认识到教育和逐渐便利的交通工具在她的臣民心中，逐渐形成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她察觉到，这些力量迟早有一天会引起那些衰败无知的满族人的重视。从这份有关微妙问题的谕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慈禧太后已经意识到了威胁满洲统治的危险。慈禧认识到满族的特权，所受的供奉以及统治阶级所得到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并不是开国先祖殊死奋战、抓住机遇得来的，但是，事到如今，早已不合时宜。在不久的将来，满人必定会卷入严峻的危险和困难之中，除非利用民族融合的方法来避免纷争。清朝开国元祖为了保证满人纯正血统，特立下规矩，禁止满汉通婚。尽管南方的八旗子弟经常违反这个规矩，但是在北方的许多大城市中，这个规矩依然很有权威，被用来维护统治阶级，保存等级差异。但是慈禧太后逐渐明白，如果中国要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借助汉人的力量，融合满人的力量，而不是只靠满人的一己之力。1902年1月，慈禧太后返京之后，她立即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之后她颁布了一道谕旨，她建议今后满汉可以通婚。她说：“入关之初，满汉文化和语言不通，这也是禁止满汉通婚的原因。但是，现在，满汉文化相通，语言也不存在障碍。时至今日，为了大清国的利益，同时也为了顺应民意，我认为应该解除此禁令。”在这份谕旨中，太后抨击了汉人缠足的文化，这一陋习，满人沿袭，慈禧太后鼓励缙绅联合起来反对这一损害身体健康又不人道的陋习。不过，这个倡议不需要严格执行。只有一点，

慈禧太后坚持满人的排外传统，后宫挑选秀女，都要选自八旗。她不愿意后宫招致祸端和一些纠纷，更不想重蹈前朝的覆辙。如果随便挑选挑选汉人作妃子，那么这会直接影响到皇权的合法继任。如果让汉人女子进宫，必定会有阴谋反叛的事情发生，慈禧不愿意让族人承担这样的风险。“没有满族太监，没有汉族嫔妃”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我们应当永远要遵守，这个规矩对历代皇帝都有约束力。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降谕旨，在谕旨中深刻坦诚地谴责了她那些愚昧无知的皇族，然后批准皇室亲贵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留学，希望他们可以受国外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愚笨无能可以得到改造。挑选十五到二十五岁的体格健硕的年轻人，他们出国留学的经费由国家承担。

以上措施都是针对满人的。但是在教育问题上，慈禧称教育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和困境的根本，在同袁世凯和张之洞磋商了许久之后，她深感八股文在人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只要八股文制度一天不废除，势必会对改革之路造成阻碍。慈禧太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只有废除整个八股文制度，向西方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才能切合实际。守旧的八股文制度二百多年来备受争议，被一些不切实际的官员奉为理想文章的经典标志，许多官员对八股文十分着迷。只要考取功名保留八股文一科，那么八股文制度势必会取代其他教育制度。在谕旨中，太后指出在五千多年前周文王统治时期，中国学堂就已经出现，这和今日那些外国大学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事实上八股文制度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之举，早在公元1390年明朝时期首次被提出。最终，1904年，慈禧太后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建议下，下旨废除科举考试，规定以后要做官必须从新式课堂毕业。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意识到派遣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形成了一个由知识分子成立的革命团体，这是清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的。她下令今后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到欧洲和美国去。

这个划时代的谕旨颁布之后，随即又颁布了另外几道重要的谕旨，慈禧太后下令十年之内，禁止鸦片买卖。这道谕旨体现出真诚的强大的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展现出中华民

族强大的正义感以及重新崛起的惊人的力量。这道谕旨影响广泛，之前改革朝廷机关的谕旨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两者一比较，很明显差距很大。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些满清官吏阳奉阴违，结果就是把以前的弊端改头换面，另立新名目，但仍然照旧行事。当时清政府新设立了一个部门——邮传局，外国人称赞说这是中国真正的进步，但是随着邮传局的建立，部门内部腐败不堪、效率低下、铺张浪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在处理完教育问题过后，老佛爷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问题上，即废除刑部判案时所使用的刑罚。这一点在先前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大臣的奏折中已经提到过。慈禧太后意识到，如果中国想让西方列强同意废除外国领事裁判权，那么就必须要建立并执行一套与西方文明相类似的刑事法案。这份谕旨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事实上缺少了这个时期她应该展现出来的诚意，例如它和要求禁烟的谕旨，以及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谕旨完全不同。这道谕旨的原则完全和她之前的想法和做法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只能说，尽管要花很大的功夫起草法案，但是纵观各省衙门野蛮的行事方法，就知道这道谕旨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慈禧太后下谕，在引进新的刑法之前，斩首就是最高的刑罚。五马分尸等野蛮残暴的刑罚要废除，烙印、鞭笞和连坐等刑罚也要停用。她说，这些残酷的刑罚最初是由明朝的统治阶级提出使用的，满洲人沿袭了这些酷刑和汉人的一些文化，这其实是违背了满人的仁慈之心的。

最后，考虑到南方的舆论日益激烈，慈禧为了顺应民意，采取了立宪的第一步，她派遣以载泽为首的清朝考察团游历欧洲、美、日各国，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考察团回国以后，1905年秋天，慈禧太后立即颁发了一道赫赫有名的谕旨，明确宣布她要立宪的决心，宪法什么时候能生效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员和百姓们面对变革时，所推动或阻碍力量的大小。这份谕旨中富含许多微妙的主张，从而呼唤中国民众的心声，这篇文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绝对是绝唱之作。谕旨上说：

自从大清朝建国以来，历代贤君谨记祖宗教诲，一直把列祖列宗

的教诲作为他们治国的宗旨，政府处理事务的方法应该随时进行改进，这样才能应对紧急时刻和变化无常的状况。如今，中国的危险与日俱增，这主要是因为一味地遵守那些守旧的治国方法。如果我们再不修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不仅违背了大清列祖列宗的精神，也会让广大百姓的希望破灭。清朝考察团向我们禀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繁荣富强，主要是因为政府办事都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这确保了民族的团结一致，君主和臣民能够达成共识。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借助这样的一部被赋予权利的宪法。在朝廷的监控下，君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在一些关于民生的问题上，人民的意愿可以真正实现了。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准备好立宪，我们的人民们大都没有接受过教育，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想要过快地解决中国目前的状况，往往不能达到我们预想的结果。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改革政府机关，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教育、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先进理念，设立警察制度。让臣民全都了解国政，从而为立宪做准备。

对于一些人来说，既定的旧制度意味着锦衣玉食、大鱼大肉。即使慈禧知道进行如此激进、广泛的变革，势必会招来一些满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推行新政。在北京城由于缺乏一些直言不讳的报刊，反对意见只敢在暗中发表，这是官场中人惯用的伎俩，因循守旧，坚守旧习，但是改革终究还是需要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如果说当今的统治者不是慈禧，换成另一个人，没有慈禧那么当机立断，也没有慈禧那样深受百姓爱戴，那么，满人肯定会联合起来，采取一些强硬措施抵抗当权者。但是他们很了解老佛爷，害怕触怒老佛爷。全凭借老佛爷位高权重，权倾朝野，她才能够建立一个部门专事确立立宪政府，中国的立宪制政府仿效的日本，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许多守旧的满洲保守党还没有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尽管朝廷已经承诺要建立立宪制政府，但是南方民众舆论不断，香港和上海两地报界的自由撰稿人从来没有节制自己的言论，他们直言不讳，抨击太后的新政，还指责她实施新政是为了讨好西方人，对洋人卑躬屈膝，一点都没有君主该有的威严，也有损国家形象。这些人缺乏太后那样刚毅的智慧，正视困难的勇气，只知道对她横加批

评，指责她的不是，但是却没有体谅一下太后当时所面临困境时的心情，那时，太后为了推行新政遭到同族人的排挤和痛恨。然而当时的通商口岸的外国报刊自然也对太后的动机有所怀疑，他们对昔日太后参与的排外运动念念不忘，即使他们对慈禧太后没有敌意，也不会有太大的好感。中外报界对于太后刚毅的性格和旺盛的精力都不太了解。很多批评太后的人没有意识到，太后跟许多普通人一样，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冷酷的一面，她固然天性聪慧，可是作为普通人，她也会犯错，她也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会受到周围人的干扰。本质上来说她也是个女人，性情不定，难以捉摸。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天生的统治者，一等一的政治家。

下面的一段文字是摘自那时上海报刊出版的一些文章，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少年党人的情绪，展现出他们排满的倾向以及盲目的爱国热情。有一位批评家以太后款待外国使团为题，写道：

举办宴会招待客人，客人应该心存感激，对于主人家的热情款待应该有所表示，但是对于那些对你心存怀疑的人，你应该怎样招待他们呢？当一些无知愚昧的中国人对外国人卑尊屈膝的时候，便会遭到周围人的鄙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作为一个身份尊贵的人却自降身份与外国使臣的夫人们结交，关系十分亲昵，连一些身份低下的商人也一并款待。如今宫殿的大厅内装饰成欧式风格，上的菜也是西餐。宾客们对太后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之后，便离去了。但是次日，外国公使在外交部对待中方态度嚣张跋扈、再三威胁。慈禧太后本来是想通过举办宴会缓和与洋人紧张的关系，如今她的那些美酒佳肴全部浪费了。事实上，这些洋人对于慈禧太后举办的款待毫不领情，这场宴席就像公使馆被义和团包围期间，朝廷派人给公使馆送水果蔬菜一样，似乎是太后为了讨好洋人。这件事情从此便传开了。曾经俄国为了感激太后的盛情款待，作为回馈，送了不少钱财。太后就是依靠前驻俄国大臣李鸿章，扩充了自己的银库。如今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太后还有什么期待可言吗？

论员不相信太后是真的喜欢洋人的那一套方式，怀疑她只是暂时假装修复和洋人的关系，事实上，只是为了图谋今后报复洋人，他这

样写道："太后年事已高，想要让她改变习性，确立违背她本性的事情，这几乎难以置信。外国人试着扪心自问一下，昔日他们洗劫皇宫，追杀太后信任的臣子，太后怎么可能真心对待他们呢？"

该笔者又不相信太后会图谋另一场义和团运动，坦白说他自己对此也困惑不已："太后如今之举似乎不惜一切代价为聚敛钱财，而不是重整朝纲。太后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以保证她安享晚年。"

慈禧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批评，坚信自己的想法和明智的见解，为了国家未来的安定，她坚定不移地推行了自己的改革新政，这其实是振兴中华的必经之路。然而慈禧太后性格刚毅，国内民众的偏见以及宫廷内外守旧势力根深蒂固，要想一日之内克服这些障碍根本不可能。慈禧太后归西之后，旧制度中有许多顽固的势力仍然没有得到惩戒和触及。例如，太监的势力和官场的腐败。但是她去世的时候，基本上粗略地画好了一条航线，现在只要忠实地朝着画好的方向行驶，那么中国这艘大船一定会安全地驶过礁石浅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荣禄之死给慈禧带来巨大的悲痛。在慈禧长期的执政生涯中，几乎每场危机或重大事件，都有这位忠心追随者的鼎力相助。听闻荣禄的死讯，慈禧太后在保定府的行宫发布圣谕，赞扬荣禄的爱国情怀和非凡智慧。不管是芝麻小官，还是后来的内务府总管、将军、总督乃至军机大臣，荣禄都是鞠躬尽瘁，并且成绩显著。荣禄死后，被授予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职位，这对官员来说是最高的荣誉。

慈禧特别强调了荣禄为促进与外国列强友好关系作出的突出贡献。为表厚爱，太后赏赐其陀罗经被，盖在灵柩上。她还派遣恭亲王率领十名皇家士兵，前往荣禄墓地，代表她祭拜这位已故政治家，并赐予谥号“文忠”。慈禧还授予他儿子最高世袭等级，如果不是立过战功，或是皇室后裔，是不可能得到如此殊荣的。他祖先的陵墓迁入了他的陵园。下令赏银三千两作为荣禄葬礼开销。

中国历史上，荣禄的遗折从未公开。但慈禧身边的侍从表示，这份奏折对慈禧的影响很深。在她阅读奏折的第二天，发布了以下的圣谕：

已故大学士荣禄，国家危难之时担任军机大臣，他那明智的建议和对朝廷作出的杰出贡献，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应得到充分的褒奖。他对我们来说绝对不可缺少，我们完全依赖他的建议。两个月前，由于身体不适，我们只好批准他的假期，但所有的治疗都是徒劳的，最终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已精读他的遗折，满是对朝廷未来，对炎黄子孙的诚挚。回想起他杰出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只能用眼泪表达我们的悲伤之情。授予他身后荣誉，我们下达圣谕，在他遗体安葬的前一天，将第二次祭拜他。甚至，对他平生的记载，移交修饰官，加入我们朝代的编年史。所有对他过错的记录都会被删去，我们对这位忠诚大臣的真挚情感溢于言表。

荣禄于1903年4月11日去世，享年67岁。若不是在义和团暴乱期间经历严峻的艰辛和精神紧张，他可能会活得久些，继续为太后服务。他死后，庆亲王及其党羽权力大增（庆亲王成为最适合接替荣禄担任军机大臣首脑的满人），经过长期的秘密布局之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荣禄本质上是个中间派，一直孜孜不倦、认真追求慈禧想要的“折中”。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不会同意慈禧匆忙裁决朝廷尚未成熟的计划。只要荣禄不同意，慈禧决不会一意孤行。在回京之前，荣禄就不断督促慈禧，在命令中讲清楚，改革政策对朝廷的发展很有必要，但是，就像已故的伊藤博文一样，他同意缓慢谨慎的过程，今天与政府规划有关的观察者都不会怀疑他决策的明智。

下文就是迄今为止未公布的遗折，这份文件对研究政变，以及慈禧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很有价值。但在其他方面，荣禄缺乏足够的证据。

奴才荣禄，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现呼吸衰竭，恐怕不能回报太后的偏爱，故恭敬地呈上奏折，乞求太后看一眼。

我，一无是处，却得到太后不小的恩惠，希望上天能给我多些时日，好让我继续为太后效力。我想起我担任皇家卫兵的时候，咸丰十年，逃至热河。那时国家岌岌可危，内有反叛、外有英法联军占领我们的首都。我们见证了皇家圣地的暴乱，看着太后乘着战车离开北京。根据孟子的主张，一旦蛮夷入侵，统治者应当远离首都。

朝廷到达热河后，我有幸成为管家照顾太后，咸丰帝临终之时，我有幸提醒太后郑亲王和怡亲王密谋造反。皇上驾崩后，亲王们夺取摄政权，太后在许多天内处于危险之中，作为臣子不应再次提及。令人开心的是，太后坚定地采取主动，外加上天庇佑，瞬间就抓住叛徒，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执掌大权，镇压反叛，四海之内皆和平。

我承蒙圣恩，升职为内务府大臣，得以继续照顾太后。同治帝驾

鹤西去后，太后委托我将光绪皇帝带入宫殿。我得到的恩惠像宇宙一样无尽，但我却无力回报。

担任步军统领时，触怒龙颜。七年之间我一直等待对我冒犯的合适处罚。皇上成年后，太后高兴地将政府权力移交，您任命我为西安都统。由此我回想起之前在京城的职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太后决心引进西方改革之法。皇上命我为天津直隶总督，我要在欧式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择和介绍改革，以弥补中国管理的弊端。但谁会相信康有为的不忠最终阻碍了太后的计划？皇上轻信小人的谗言，有亏孝道。他亲笔书写诏书，声明改革计划遭到太后阻碍，因为太后反对进步精神，您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对国家来说很危险。太后多次对我动怒，不止一次遭受“斧戟”之刑。我暗地拜见太后，陈述密谋的细节。太后立刻答应我们的请求，再度垂帘听政，迅速消灭叛逆乱党。

光绪二十六年，某些缺乏美德的亲王大臣、政治家在您耳边吹风，使得您被误导，直到祖先圣祠成为灾变的中心，大清朝的命运悬而未决，才相信义和团的罪恶和巫术。那时我多次招致您的责难，我在家闭门思过四十天，等待判决。即使这样太后仍会聆听我的建议，虽然您不会每次都听从我的建议，但外交大臣全体遇难，而我得以幸免。太后多次屈尊表达感谢。

太后皇上离开京城视察西安时，太后决定处罚可恶的亲王大臣，并在每个行政机构的分支平缓有效地改革。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您重回京城的那天，天空将重现日光，东西方的蛮夷也会欢呼太后的仁慈，对大家同等的关怀。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如此。

去年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两个月前我被迫申请病假，请求允许辞去职务，但太后派宦官前来探望，带来人参（中国药典中对身体虚弱的特效药，长成人形或部分人形时具有神奇的魔力，最好的一种已进贡给皇上，为满洲和朝鲜野生种植）和口讯，希望我尽快康复，继续肩负职责。

即使有太后的保护，我也不能逃脱病魔的折磨。哮喘不断复发，

呼吸越来越困难，我已非常虚弱、行将就木。凭借最后一口气支撑，我恳求太后继续改革，渐渐地我们的王朝就会变得和欧洲、日本一样繁荣。我在军机处任职期间，看到许多人被授予他们并不合适的官职，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地方法官的选择、征税收税的方法，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如果太后举的经济改革的例子都能实现，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身居后宫，太后不可能了解到官员的真实情况。如果不是对运输大量的随行人员有开销限制，我会建议太后对不同地区进行定期的视察。乾隆帝曾多次出巡，在古代贤明的君主中，基本都遵照这个传统。现在我脑中一片混乱，就不再多说了。奴才祈祷太后的名望不断提高，所有代表太后所许的美好愿望都能实现。即使我死了，我也会像活着一样为太后祈祷。

我口述遗折，由我的养子桂良，代为转交给暂住在保定府的太后。虽然意识到有很多不足，为此我请求太后原谅，希望您仔细阅读，凭着最后一口气，奴才荣禄跪上。

（1903年4月10日）

第二十六章　慈禧弥留

1908年的夏天，慈禧一向强健的身体显示出衰弱的迹象，正如慈禧遗诏提到的，同一时间皇帝也病重，这也是慈禧身体抱恙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皇帝之死的原因和方式，历史并没有明确记载，这成了紫禁城中众多秘密之一，只有李莲英及其亲信知晓，即使满汉官员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现在对慈禧和皇帝接连去世的解释有许多冲突的理论。对那些研究人员来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长期受到威胁的皇帝是被李莲英主导的反动派迫害的，因为李莲英当时在朝堂上的权力相当大。与此同时，慈禧很有可能对当年颐和园内的阴谋行动毫不知情，那些预见慈禧会比皇帝早死的人，按照中国传统，有目的地把慈禧置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暗中采取行动。

事实上，根据目击证人的可靠说辞，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找出实在的证据来解释这个巧合是很困难的。下面对慈禧最后日子的描述，来自一满一汉两位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朝廷任职。他们的证词和结论与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可靠的报纸一致，这些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从官方获取的。我们有保留地接受了他们，他们的好评对太后有益，当然我们也有些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但大多数评论家都注意到，根据慈禧忠心的仆人的描述，皇帝死后，慈禧表现出来的绝对不是悲伤，而是轻松。

去年皇上就开始生病，渐渐地严重到一整年都不能参加祭祀，因为长时间的跪拜需要消耗他很大体力。皇上命不久矣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慈禧太后已经下令抚养醇亲王的儿子，他于1906年2月出生。大家心知肚明，慈禧有意醇亲王之子接替光绪之位。虽然大臣们都请求慈禧亲自处理国事，但慈禧拒绝了，因为她认为她先前不幸的经历和选择会产生许多误解。清朝祖制规定，只有国家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才能另立新帝，而慈禧1900年任命醇亲王儿子为皇帝，完全是对祖制的漠视（乾隆制定此祖制，以防朝廷官员与皇

位继承人私通）。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慈禧极其迷信，回想起吴可读抗议自杀时的遗言，毫无疑问她后悔违背祖制让光绪继承皇位。近年来，她不止一次安抚吴可读的灵魂，通过授予身后荣誉安慰公众。慈禧统治后期，法国、日本及八国联军，接连不断发动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此她深感内疚，她认为是她的错误使上天动怒。1888年，天坛被闪电击中，接着，紫禁城大门起火，她把这看作是上天不同意她做法的惩罚。1898年，光绪帝与康有为等人密谋变法，她也认为是上天的判决和视察。因此我们合理地推断，义和团劝说慈禧相信妖术效力和他们能将列强赶出中国的能力时，她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因为她相信这能帮助她重新获得上天的宠爱，为过去的错误赎罪。

虽然选择了端亲王的儿子作为同治皇帝的接班人，慈禧又一次触犯了大清朝的祖制，但她依然坚持如此，因为小皇帝的父亲，权力在她之下的人，被中国人民尊称为天赐的拯救者，可恶蛮夷的征服者，国家的救世主。换句话说，慈禧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让自己在国民面前颜面尽失，她决定孤注一掷，竭力挽回。后来，慈禧从西安回京后，她意识到自己英勇的冒险最初就被误导，就像她之前所有的过错一样。她鼓起勇气，巧用智谋，彻底改变看法，接受原来不同意推行的改革，取消任命端亲王之子为皇位继承人。她彻底果断地斩断与义和团领导人的关系，收回了她曾经颁布支持义和团的所有谕旨。现在的情形迫使慈禧改变政策，改立醇亲王之子，这样使皇家幼枝的地位的到巩固。在朝廷上，第一亲王醇亲王，光绪帝的父亲，当今圣上的祖父，最终会被封为帝或太上皇，几乎成为一个新的王朝分支的奠基者，大家都相信这一点，但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它。在中国人的眼里，继承皇位不是件简单的事。大家推断慈禧将会立溥伦为新帝，以恢复嫡长子继承制（1908年10月《泰晤士报》北京分社记者举例）。这么做符合传统，朝廷官员都表示赞同，同时也可以安抚吴可读的亡灵，这比慈禧采取的政策有效多了。莫里森博士在谈论皇位继承问题时，曾发表言论，另立幼主继承皇位对清朝来说是一大危害。毫无疑问，现在的情形缺乏五十年来支撑中国混乱局面的强力后盾，未来几

年，最高权威必须掌握在摄政王手里，摄政王属于皇族长支，而朝堂权力将会被皇族长支削弱。慈禧深知立醇亲王之子后的情形，因为这个原因，无疑光绪继任者的选择一直拖到了慈禧临终的那天。临终前，情况紧急，她不得不采取决定。她一直在权衡两件事，第一，对荣禄的承诺；第二，对庆亲王的公开不满，因为他曾为溥伦进言。慈禧很自然地想要留给她最喜爱的侄女（光绪皇后）太后的头衔和权力，以奖赏她多年来对自己的忠诚。换句话说，慈禧的个人偏见和爱好最终战胜了传统观念和良心谴责。

1907年冬天和1908年春天，慈禧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4月份她和往常一样前往颐和园，在那里度过整个酷暑。因为天热，她的痢疾又犯了，8月份她有轻微的中风，因此她那原本对一个70岁的人来说尤为年轻的脸，显得憔悴而疲倦。从别的方面来说，慈禧的身体很健康；她讲话的气势一点也没有变弱，仍然坚持不懈地处理国事。她一直宣称自己会健康长寿，活得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长久，维多利亚是慈禧最钦佩的统治者。她以前经常召见一位道士，这位道士对慈禧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曾预言慈禧会比清朝先前任何一位太后都活得长久；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因为慈禧有三位前任比她长寿。



慈禧太后71岁画像

1908年夏天，老佛爷对达赖喇嘛秋天要访问北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太监总管李莲英请求太后取消这次访问，因为众所周知，活佛和

天子同时在一座城市是不吉利的，两人必有一死（事实上李莲英反对达赖喇嘛来访有自己的理由，他怕更多的人相信喇嘛的迷信，对自己不利）。对此，慈禧反应不同，她早就认为皇上的病是不治之症，因此没有理由阻止达赖喇嘛进京。然而，7月份，慈禧传召外国的医生和学者为皇帝看病，此时皇上已经非常虚弱无力了。他们诊断出皇上患有肾炎。他们对皇上的检查和病情的诊断都只是例行公事，因为按照礼节，他们不能运用正确的检测方法，但是他们肯定了一点，皇上的心跳很弱。另一方面，南方报刊的记者毫不犹豫地断言，整个治疗过程只是一场闹剧，朝廷各方势力对外宣称，皇太后命不久矣，皇上的命自然也保不住。

北京城公众舆论一致认为，这期间老佛爷和皇帝的关系不太友好。据说皇帝病情加重前不久，太后曾鼓励皇帝积极处理国事、选择高官候选人，她恢复惯例，圣旨的颁布必须要经过皇上的同意。改革派王照逃亡归来自首，如果在1898年，慈禧肯定将他赐死，但现在她请皇上决定他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长时间的沉思后，皇上建议饶恕王照。慈禧说："我本来就打算饶恕他，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知道你很憎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担心你会坚持要求立刻斩首。"她终于肯定皇帝心里已经没有反对她的想法了。

皇上病情日益恶化，慈禧命令太监，皇上来向太后请安，不要让他等候，在召开军机处会议时，也不用跪下迎送太后。一位担任朝廷高位的满族官员，亲眼目睹了以下事件。一天早上，皇上批完一位官员的奏折，奏折中包含许多错误之处，皇上对大臣们说："谣言太不可信了。比如，我知道自己真的病得很重，但奏折中却说我身体无恙。"太后打断说："谁敢说出如此谎话，如果抓到，必将身首异处。"光绪继续说道："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恐怕不能为太后即将到来的寿辰磕头祝寿了。"慈禧悲伤地说道："对我来说，你恢复健康比磕头祝寿更重要。"皇上跪下感谢慈禧说出如此亲切的话语，一会就晕过去了。庆亲王建议召见大夫屈永秋入宫为皇上诊断，这个人曾在欧洲受过训练，但直到后来庆亲王的建议才被采纳。第二天皇上询问当值的名叫吕用宾的御医，自己的病是不是致命的，这位大夫的医术和唐朝传下来的相当。他说："皇上的心智被打乱了，您现在的状

况不足以致命。请皇上放心，奴才们定当全力医治。”

慈禧中风以后，关于她身体状况的流言四起，地方舆论激烈，人们尤其关心宪法的问题，慈禧决定即刻履行她1906年时作出的承诺，不得推迟。八月初一，慈禧下达诏书，效仿日本，在未来九年内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展现了和日本统治者一样的政治家才能。同时下令政府各个分支积极变革，以促进新政的发展。在诏书中，慈禧希望自己能活到首次中国会议召开的那天，声称如果端亲王之子贤能，到时仍为皇储，那么在光绪帝驾崩后，他就到了处理国事的年纪。她年事已高，她很开心能在垂暮之年隐退颐和园。根据当时的情形，很多事情必须征得她的建议，但慈禧却特别希望她的执政之期可以早日结束。

九月份是前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五十大寿，而朝廷仍然住在颐和园。老佛爷给她信任的大臣送去了昂贵的礼物，几乎每个大臣都前往寿宴，送去祝福和礼物。而皇帝的兄弟，醇亲王（当今摄政王）不仅没有出席，也没有送任何礼物。

袁世凯的寿辰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朋友们送了许多条幅，它们都被挂在了墙上，有一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上面写着以下题词：“戊申年八月初五”。那天袁世凯告诉荣禄密谋造反，导致政变，光绪帝被废。另一条幅上写着：“吾皇万岁，阁下万岁。”



袁世凯像

“万岁”的意思是“一万年”，不能用于尊称朝廷官员，这些字被看做是对袁世凯密谋篡位的指控。大家都清楚，袁世凯的敌人把这条幅送来，提醒大家袁世凯十年前就有反叛之心。而条幅能被挂起来，只能证明袁世凯身边的人太粗心大意了。四个月以后，袁世凯没落，人们又想起了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把它与醇亲王缺席袁世凯寿辰联系起来。

九月，达赖喇嘛抵达京城，但因为忙于争论接待的细节，召见活佛的日子一拖再拖。最后安排活佛向皇帝磕头，皇帝起身，邀请喇嘛坐在他旁边的榻椅上。喇嘛勉强地接受，他认为向皇帝磕头是对他尊严的践踏。活佛带来了许多贡品，但老佛爷没有给他想象中的尊重，对这点他很失望。十月初接见喇嘛，慈禧要求他定期为自己的长寿祈福，为大清的繁荣昌盛祈福。

十月，慈禧在颐和园接见外国大臣，10月20日，慈禧一行从颐和园回到西苑准备过冬。这是慈禧最后一次出行，她像往常一样乘船回到京城，经过的运河将颐和园内湖和皇宫的水域连接在一起，前行中看到了万寿山上的庙宇，万寿山坐落在运河的岸上。人们注意到，慈禧离开颐和园时，凝视着从河堤筑起的高墙，并远眺远处的小山。慈禧转身看着瑾妃，说出了她的担心，皇帝病情不容乐观，恐怕很久都不能来这了。

慈禧华丽的船上刻有龙凤图案，她就坐在升高甲板的榻椅上，她最喜欢的太监及五六个主要宫眷陪在她周围。慈禧从船上下来，两个太监搀扶着，坐进轿子，把她载入了寺中，有评论说她精神充沛。她在万寿山例常祭拜，这是她赠予的圣地；慈禧死后，有一个不祥的征兆，最后一根香不能点燃。离开庙宇前，她要求道士每天都吟诵经文，为她祈祷，因为她的生辰即将到来。

离开万寿山，慈禧在宫眷的陪伴下来到万牲园，就在紫禁城的西直门之外。一来到西直门，慈禧坚持要求下轿，步行游览整座万牲园。看到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时，慈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很兴奋，她打算以后会经常参观这里。她问了饲养员很多问题，特别对狮

子很有兴趣，问院内负责人这些动物从哪里来，给随从带来极大的乐趣。负责人是内务府的一位满人，他显然并不了解动物的情况。“你好像对动物不太了解啊。”慈禧说着，从这位垂头丧气的负责人身边离开，以最轻松的口气问了另一位饲养员。太监总管李莲英因为慈禧不同寻常的行为很累，恳求太后不要累着自己，但慈禧很快活，有意让他匆忙地在后面跟着。这样的场合非常罕见，慈禧不拘礼节，这幅画面让英国人想起另一个意志坚强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游览公园。那天的目击者认为慈禧活力十足，精神百倍，预计她能健康长寿。

慈禧记忆力惊人，犹记得当年端方从欧洲回来时送给她一只大象，当时皇宫里没有合适的地方饲养动物，因此才建造了万牲园。大象原本由两位德国饲养员负责，他们从一开始就照顾这只大象；大象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经常向负责的官员反映，但始终没有结果。后来大象就这样活活饿死了，合同未满，两名德国人拿着俸禄回国了，这件事让慈禧很不高兴。现在提及此事，对大部分动物都被照顾得很好表示满意，除了老虎的管理员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慈禧回宫后，整个皇宫上下都在为10月3日，她73岁寿辰做准备。京城的主要街道都装饰一新，宫内安排了持续五天的特殊戏剧表演。为达赖喇嘛安排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生日庆贺的特别仪式，达赖喇嘛要率领众属员向太后行礼。皇上病重，已经不能按照规定的礼数，在仪鸾殿前向太后叩首，皇上派亲王一行代表他向太后行礼，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场合意义重大，皇上都不能到场，他的病情一定非常严重了。后来皇上也没有出席在大殿为达赖喇嘛举行的宴会，大家更确信了这一点。活佛跪在宴会厅外恭候皇上大驾，而皇上迟迟没有出现，让他很恼火。

太后寿辰那天早上八点，皇上离开瀛台，来到大殿。他面容憔悴，老佛爷实在不忍心，让太监扶他进轿子，原谅他不能到场。后来慈禧颁布诏书，褒奖达赖喇嘛的忠诚，命令他即刻回西藏，“大清朝慷慨无比，忠心听从君主的命令。”慈禧一下午都沉浸在化妆舞会的乐趣中，她扮成观音菩萨，众妃子、公主、太监们都穿着舞会服装。他们在湖面上野餐，慈禧兴致很高。但是到晚上，她着凉了，后来吃

了太多的奶油和山楂，她的痢疾又犯了，这是折磨她整个夏天的病。第二天她照常处理国事、批阅奏折、记录决策。11月5日，太后和皇帝都没有接见军机处大臣，导致国事被搁置了两天。听到太后身体抱恙的消息，达赖喇嘛赶忙给她送去一尊佛像，他说务必尽快送去陵墓，慈禧的陵墓在庆亲王（庆亲王接任荣禄监管陵墓的建造）的监督下刚刚完成。活佛让手下急忙把佛像送到慈禧陵墓；如果这件事即刻完成了，慈禧的寿命就能延长，因为天空星星连接是不祥的预兆，会使佛像的魔力消失。达赖喇嘛的预言大大安慰了老佛爷，第二天照常上朝。慈禧命令庆亲王继续修建陵墓，不得延误，把佛像放进祭坛（陵寝位于北京东部九十英里处，占地面积广，包含中国建筑的最好风格。陵墓内有四座宫殿，前后排列，第四座后面有座大丘陵，称作“宝城”，下面就是大坟墓）。慈禧命令庆亲王留心陵墓的工作，强调必须如实遵照她的细节要求。庆亲王对这些命令有些异议，询问太后是否真的想让他在太后皇上都生病的时候离开北京。但老佛爷不想争辩，果断地要求庆亲王听命。她说：“未来几天我还不可能会死，我觉得好多了。无论如何你只需听命就行。”11月9日星期一，太后皇上召开军机处会议，特别接见了直隶提学使，最近学生的革命思想趋势越来越明显，慈禧说时饱含苦味，她命令提学使竭尽全力，牵制政治活动。



慈禧扮观音

朝廷又召见来自地方省的四位大夫为皇上看病。当天下午皇上旧病复发，相当严重，从那天开始，他就没离开过宫殿。第二天早上皇上派人向太后请安，太后待在宫里，没有接见任何人。御医报告太后皇上的病情都很不乐观，后果严重，他们请求内务府监管另请高明。军机处给庆亲王送信，让他尽快回京，因为他是朝廷一位非常重要的

人物。庆亲王日夜兼程，终于在13日早上八点到达京城，火速进宫。他看到慈禧身体康复了，神采奕奕，信心满满，但皇上却一直病着，处于昏迷的状态，只有片刻清醒。保留最后一点意识，皇上让皇后告诉太后，他很遗憾不能继续服侍太后，希望太后尽快立新储君。究竟这些话是皇上自愿说的还是被逼的，或者传话的人究竟是不是皇上派的，都是值得怀疑的。

庆亲王回来后，慈禧就在仪鸾殿接见大臣。虽然很虚弱，但慈禧还是登上了宝座，她势不可挡的勇气最终战胜了身体疾病，她依然言辞激烈、声音清晰。军机处大臣消息灵通，慈禧表现出的意志力表明慈禧已经完全领导并控制了军机处。在场的大臣有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处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

慈禧太后宣布，现在时候已到，按照光绪皇帝登基时的诏书，必须从同治帝的子孙中选择一人继承皇位。她说，她已经做了决定，但她仍想要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庆亲王和袁世凯建议选溥伦或恭亲王为新帝。他们想，溥伦是道光帝的长曾孙，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这点醇亲王也同意。其他的官员建议选择醇亲王之子。

听完大臣们的建议，老佛爷说，很久以前，她赐婚给荣禄之女和醇亲王，并决定将他们的长子立为储君，以作为荣禄终生对自己的忠诚、在义和团叛乱间对朝廷作出主要贡献的承认和奖赏。她还记得那时候，荣禄反对炮轰大使馆，救了大清朝。今年3月，她又在荣禄遗孀临死前给了她承诺，她曾是慈禧的老朋友。因此她将授予醇亲王摄政王之位，这比1861年赏赐给恭亲王的头衔要高得多，当时恭亲王被东西两宫太后封为议政王。

听完慈禧的话，醇亲王从座位上站起，一直给太后磕头，觉得自己不能担当此重任。袁世凯再次力荐溥伦，他提醒太后应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他自己很清楚现在醇亲王是他最大的敌人。老佛爷看着他，生气地斥责道：“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你应该知道，我一旦决定，就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现在国家关键时刻，年轻的君主对国家来说很危险，但是不要忘了还有我引导帮助醇亲王呢。”然后转向其他军

机大臣，继续说道：“立刻传我谕旨，第一，封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第二，醇亲王之子溥仪即刻进宫，在宫内抚养。”她还命令庆亲王将这两条谕旨告知皇上。

光绪帝还有意识，也能听懂庆亲王的话。“为什么不选个成年人当皇帝呢？但太后想的，始终不会错。”他还是很满意慈禧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下午三点，即两个小时以后小王爷就被带进了皇宫，醇亲王抱着他见了太后和皇上。第二天早上七点，当值太医向太后禀报，皇上的鼻子抽搐，胃在胀大，表明皇上命不久矣。晚上光绪帝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写下了最后的遗诏，字迹模糊，前言是以下重要话语：“我是醇亲王次子，被太后选中立为储君。太后一直憎恨我，过去十年来，我生活悲惨，袁世凯和某某某（第二个名字看不清）难逃责任。时机一到，我希望袁世凯立刻被处死。”

这份遗诏在皇后手中，但被很多人看过。遗诏的措辞表明皇上去年的任何妥协态度都是因为害怕，而非感情用事。

下午三点太后来到瀛台看望皇上，但皇上没有意识，根本不认识太后。后来，意识短暂恢复，侍从就为他穿上长寿礼服，这是君王死时应有的礼节。历来的传统是，病人需在最后一刻穿上长袍，若在死后才穿会被视为不祥。但皇上固执地拒绝了，五点钟，光绪帝驾崩，当时慈禧、隆裕皇后、两位妃子及太监在场。慈禧没有留下来看着他们为皇上穿上龙袍，立刻回自己寝宫，下令发布皇上遗诏，宣布新帝登基。

皇上遗诏中最有趣的部分如下：“我们国家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被引导着把中国体制与外国的创新体制结合起来。我们致力于教徒和非教徒的和谐相处。我们重组军队、建立学校、发展贸易工业、建立新的公平体制、为共和政体铺平道路，这样我们的大臣都能享受和平。谈到任命摄政王和皇位继承人，他总结时又提到了宪法（或者说是太后为他总结的），呼吁大臣们净化心灵，作好充分准备，这样年后，就能完成使命，成功完成任务。”

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佛爷精神尤其好，大家都被她的热情和热心

震惊了。她下令以新帝的名义颁布诏书，内容包括对已逝君主的一贯赞美，感谢太后让自己登上皇位的仁慈之心。

任何熟悉中国朝廷礼仪和继承法纷繁复杂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权宜之计在先前类似的情况中绝对无人采用，因为要求活着的君主以双重身份面对逝世的皇帝，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慈禧手段蛮横，意志坚定，人们会禁不住怀疑传统的士大夫会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

慈禧发布另一道谕旨，把一切日常事务的控制权交到摄政王手里，只保留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这样的安排使得醇亲王担任摄政王的虚名就和光绪帝一样，直到年轻皇帝亲政，或者慈禧宾天。换句话说，慈禧再一次掌握执政大权，自她丈夫咸丰帝驾崩后，她就一直享有最高权力。毫无疑问，此时此刻她仍想长命百岁，权力不减。像往常一样，在这道谕旨中，谈及国家危急时刻时，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有力，摄政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一切听从太后指示”。如果慈禧活得更久，那么摄政王将和不幸的光绪帝一样，没有独立的自主权。

第二十七章　慈禧宾天

11月14日，繁忙兴奋的一天结束后，慈禧准备就寝，虽然处理了一天政务很累，但是从表面上看身体好了很多。第二天早上，她和往常一样6点起床，召见军机处大臣、皇后、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和他们谈了很久。慈禧以新皇帝的名义颁布圣旨，尊称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称皇后为太后，为册封大典计划了盛大的仪式，并宣布摄政王的就职。中午慈禧太后正在吃饭，突然长时间严重的昏厥。虽然最终她恢复了意识，但很明显前几天所有的压力和兴奋瞬间迸发，长时间的痢疾已使她筋疲力尽。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慈禧急忙召见隆裕皇后、摄政王和军机处大臣进宫。他们到的时候，慈禧发布以下圣谕，口吻中有她处理日常政务时一贯的冷静：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下令，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一切国家事务都由醇亲王处理，听从我的指挥。但现在我已身患重病，没有康复的希望，在此下令，从今以后大清朝完全由摄政王管理。然而，如果出现重大问题，需请示太后的意见，摄政王需亲自询问太后意见，再做定夺。

任何熟悉清朝朝廷处事以及熟悉慈禧平生的人都看得出，这圣谕结尾处的意义。富有独创性的话语，清楚地为隆裕皇后和叶赫那拉氏在特殊危机时提供处理政务的权力，得以维持家族的最终权力，如果摄政王或其追随者大不敬，他们还能守护自己的地位。端方在慈禧的葬礼上对新太后不尊重，被革去了直隶总督一职，表明慈禧预防的结果早已显现，这个小插曲更表明摄政王不好当啊。新太后隆裕竭尽全力想保住叶赫那拉氏的地位，极力效仿她那威严的前任，终生执掌权力。

上述圣谕发布以后，慈禧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仍下令起草圣谕，并交给她批准。这件事很快就完成了。仔细阅读文件后，慈禧多处修

改，尤其加了这句话，“我承担摄政权是不得已，但这是职责所在。”慈禧自己解释，她想加入这句话，是因为在不止一次的情况下，她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错误地被归为个人野心，但是事实上，国家福利事业对她很重要，就像她自己的爱好也很重要，当时垂帘听政完全是形势所逼。遗诏结尾处也有些感人的话语，话是这么开始的：“回想过去的五十年”等等。在写诏书时，她强调她一生中没什么遗憾的，只希望自己还能活得更久些。然后她深情地向众多侍从，身边服侍的女仆告别，他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到最后，慈禧的头脑依然很清楚，临死之前，她说话都很镇定，就好像打算启程去颐和园一样。一次又一次，当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已经宾天的时候，她又恢复了意识，直到最后她床边的看守人禁不住希望（或许是因为害怕）她能战胜死亡。最终，依照中国传统，他们让她最后说临终遗言。这位执掌中国人的命运长达五十年的了不起的女人竟语出惊人：“再也不准许女人执掌国家大权，这违背了我朝法规，应当严格禁止。不许宦官干预政府事务，明朝就毁在宦官手里，明朝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个警示。”慈禧宾天了，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凌驾在法律之上，嫉妒别人操控法律。几个小时之前她才将权力移交到自己家族的女人手上，而现在，临死之前，不愿延续这将中国置于混乱的制度。她死了，就像她活着一样，个性冲动、情绪多变，真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女人。

下午三点，慈禧宾天，死时面朝南方，按照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君主死时正确的位置。那些看着她死的人说，她的嘴巴张得很大，中国人把这迹象理解为，死者的灵魂不愿离开身体，也不愿离开九泉。

慈禧就这样去世了，侍女为她穿上刺有龙的图案的长袍，她和皇帝的遗体从西苑移到了紫禁城，一路上有大臣跪着，遗体被分别安放在不同的宫殿里。

慈禧的遗诏中，最后的话实在比宝剑还锋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模型的如实复制，这是人民的统治者最后的绝唱。遗诏内容如下：

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太皇太后懿旨：

我，美德微末，却得到咸丰帝的宠爱，成为妃子。咸丰帝年纪轻轻就登上皇位，当时叛乱四起，但都被镇压。不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回苗的土著居民连发骚乱。沿海省份处在危难之中，人民处在毁灭的边缘，我们所有人危在旦夕。

我和咸丰皇后即东宫太后合作，处理繁重的国事，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听从我已故丈夫，咸丰帝的命令，召见省、府官员，军事指挥官，指引政策，为重塑和平而奋斗。我任用廉洁的官员，听从他们的忠告。在洪水和饥荒之时，我减轻人民的痛苦。因为上天眷顾，我们镇压叛乱，脱离危险，恢复和平。后来，同治帝驾崩，光绪帝继位时（现已去世），危机爆发，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灾难不断，我们又面临着国外再三的侵略行为。

再次垂帘听政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得已的。两年前我颁布了圣谕，宣布朝廷打算颁布宪法，今年我已公布了宪法开始实施之日。我手里数不清的国事需要方向，我鞠躬尽瘁，日复一日。幸运的是，宪法如此牢固，我的精力毫无退减。但今年夏秋之时，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紧迫的国事压得我没有时间休息。我失眠、食欲不振，渐渐筋疲力尽。我没有休息，一天也没有。昨天光绪帝驾崩，我受到沉重打击。我不能再承受别的了，我的身体也不可能康复了。

回想起过去的五十年，国内的灾难和国外的侵略无尽地围绕着我们，我从来没有一刻从焦虑中解放出来。所幸今天改革取得显著的成就。皇帝只是个孩子，正是需要指导的年纪。摄政亲王和官员们必须忠心护主，稳固我们王朝的根基。皇帝必须潜心为人民的利益努力，而不能沉浸在个人悲痛中，勤奋学习，为祖先辉煌的成就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是我最诚挚的愿望。

丧服只限二十七日。

特此布告天下。

十一月十五日

慈禧太后的徽号多达二十二个字，她死的那天就有16个字，其余六个，是慈禧死后，为表扬她的丰功伟绩而追加的。第一个字是“孝”，即对丈夫忠诚，任何死去的太后都有这个称谓。第二个字是“钦”，寓意一丝不苟遵循祖制。第三个和第四个字意为同于天地，将她放在与孔夫子同等的位置，第五和第六个字把她放在比圣人还高的位置，因为它的意思是“神圣至极”，孔子只不过被尊称为圣人，而根据中国敬语律法，慈禧被尊称为“孝钦显”，这是有史以来女统治者享有的最高称号。

慈禧宾天后，她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有增无减。她的棺材首先放在宁寿殿，后移至紫禁城北面，煤山脚下的礼堂，等待出殡的吉时。这超乎寻常的遗憾和尊敬是其他中国统治者都不曾享有的。老百姓以及官员都一致认为，慈禧太后宾天，他们就失去了强有力的向导，因为她不仅是个人，更是整个国家的支柱。从她死的那天，到她的墓碑浩浩荡荡地从陵墓迁至紫禁城的这一年里，祭拜从未间断，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老佛爷深厚的感情。

当年七月，正是她死后的第九个月，是佛教中众神的节日。人们用纸做成了一条大船，一百五十英尺，放在紫禁城外，邻近煤山的大片空地上。船上挤满了侍候的太监和宫女、家具、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使用。船头放着一把椅子，周围都是穿着官服的随行官员跪着的雕像，就好像慈禧正在召见他们一样。

当天早上，摄政王以皇帝的名义在纸船前祭拜，将纸船点燃，以便老佛爷能在黄泉之下享用。在葬礼前的一两天，焚烧了数以百计纸做的侍从、骑兵、骆驼以及其他动物，慈禧的灵魂得以安慰，因为她生前是如此喜欢这些。

1909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详细记载了慈禧葬礼的情形：

11月9日早上五点是占星家为慈禧遗体离开紫禁城，前往东陵而选的吉时。但为了方便外国代表，时间改成了早上七点。

整个队伍的安排和外交使团的部分都和光绪皇帝的葬礼差不多，

只是骑兵的队伍更长，穿戴更好，兵队明显更精神，穿着讲究，总体上队伍让人印象深刻。但对那些五月份见过光绪葬礼的人来说，这次缺乏独特生动的场面，因为上次阳光闪耀，与宫墙的灰暗形成鲜明对比。而今天天气寒冷，乌云密布，灵车迟迟没有出现在外交使节等待的地方，一路观看的老百姓很失望。

84个人抬着灵车，这是负重时能通过城门的最多人数；经过城墙后，灵柩被转移到120个人抬着的更大的棺材。摄政王、亲王的卫队以及军机处大臣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一队骑兵。骑兵后面是一列军队，再后面是大量的骆驼，他们的蒙古侍从带了帐篷和其他生活用品，去陵墓的路途要走四天，在不同的时间点要停下来休息，建造临时宫殿就是为了安置棺材准备的。再后面是华丽的伞队，这些伞是1901年老佛爷从西安回来时赠送到的：遗体埋葬后，伞被焚烧；后面跟着喇嘛，再是皇家装备部门携带满族供具、佛教旗帜的队伍。队伍中带有装饰物和黄缎窗帘的三辆战车尤其醒目，装饰上印有龙和凤凰，两顶轿子与之前慈禧乘坐的相似。队伍中六个主要太监的身影尤其醒目，包括臭名昭著的李莲英和经常陪在太后轿子旁边的个子不高但英俊帅气的侍从。总体上，场面是很壮观的；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武则天的葬礼可以与之比较，年鉴记载，当年有成百上千的侍从在武则天的陵墓被活埋，而今天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官兵们的高效率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叹，老百姓们把这归因于当今太后害怕暗杀事件。士兵严密地看守一路上紧闭的门，为防爆炸做了许多特殊的预防措施。街道上的护卫人数多，警惕性很强、纪律严明、恪守礼仪。送葬行列少有混乱，没有人不合时宜地高声呼喊。

送葬行列踏着沙路，历时四天到达东陵。东陵在城外九十英里处，四周青松围绕，后面是座山。陵墓原先是荣禄负责建造的，总共花了八百万两。它和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所在的定陵很近。西面是东太后慈安的陵墓，东面是咸丰第一任皇后的陵墓，她在咸丰登基前就去世了，后来才被封为皇后。慈禧的一生中，尤其是后半生，对自己的陵墓十分关心，对它的建筑和装饰特别上心，时不时就去看看。1897年的时候，陵墓已基本建造完成，但慈禧嫌柱子不够大，就下令重造。荣禄死后，庆亲王负责监管陵墓的建造，里面有珍贵的物品——玉雕刻制成的供具、花瓶和金银制成的香炉，用来装饰太平间。棺材放在嵌有诸多宝石的长椅上，旁边有雕刻而成的太监和宫女服侍。在陵墓最后的仪式结束之后，亲王们、内侍和官员们向伟大的慈禧太后作最后的告别，新太后、咸丰帝和光绪帝的遗孀们也做最后的祷告，巨大的石门关上了，慈禧的休息地永远地封闭了。

官方公布光绪皇帝葬礼的费用，按中国货币精确为459940两2钱3分6厘。在中国，葬礼的开销反映死者的尊严和他们的颜面，当与慈禧太后葬礼的花销比较时，这些就算不上什么了，慈禧的葬礼花费在125万两到150万两之间。谣言曾让摄政王努力削减开销，但在最后的时刻，面对强大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他选择了放弃。国民都很重视慈禧壮观的葬礼，因为在慈禧五十年的执政生涯里，深受群众爱戴，是位伟大的统治者。

慈禧的牌位从东陵送入紫禁城内的太庙，是个规模浩大的仪式，表明对中国人来说，祭拜祖先是很重要的事。牌位上贴着雕刻涂漆的木条，满汉文字书写，已在葬礼上正式与大家见面。陵墓大门紧闭，死者的灵魂依附在牌位上，牌位的地位和死者生前的地位一致。牌位

放在黄缎轿内，由骑兵护卫队照料，整个队伍进程缓慢而庄严，从东陵到北京走了三天。晚上就停在专门建造的亭子里休息，专门有人跪下，庄严地请求牌位离开车子休息。这条通往慈禧灵魂所居之处的道路叫神路，早已提前准备，官兵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常人不能随意行走。随行队伍快到紫禁城大门的时候，摄政王和众多朝廷官员跪下恭敬地迎接慈禧牌位的到来。道路已封，街上一片寂静，老百姓都跪下以表示对老佛爷的敬意。经过紫禁城正门后，灵位缓慢庄严地进入太庙，太庙是清朝最神圣的地方，牌位被放在九祖三十五后之列。在灵位入庙之前，必须将同治皇帝及皇后的灵位暂时撤出太庙，因为即将进入的灵位要给祖先行礼，而父母是不能给儿子儿媳妇行礼的。这项礼仪由别人代替，摄政王代替宣统皇帝行礼，每个牌位前都有九叩，总共400叩首。慈禧的牌位放好后，根据死者的辈分顺序，恭迎同治皇帝及其皇后的灵位重回太庙，并向慈禧的牌位行礼。慈禧的牌位放在她之前共同的执政者，慈安太后的旁边。这样这位了不起的女人一生中最后的仪式就结束了；但她的灵魂始终守护着紫禁城和她的子民，老百姓们始终相信，有一天，她的灵魂会带领国家脱离苦难，拥有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忘却了她性格中的弱点和她生前所犯的错误，人们只记住了她的伟大。她的遗诏是最好的悼文，记录了她统治时期所有的细节。引用《观察周刊》一位记者的话（1909年1月2日）："希腊人想象着人类统治的理想状态，国王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国王。"

第二十八章　评价慈禧

葛里瑞菊曾经说过："只要是一时之兴说出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法国的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说过："生性聪明的人是不会苛求别人都成为大富大贵之人的。"我们来看慈禧的一生，要想给她一个很恰当的评价，一定要先去除我们已有的偏见，深入了解她周围的形势变化，以及她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她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引用《观察周刊》里一篇很有道理的文章的句子来说，"慈禧太后的身世经历、她的治国策略以及她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西方人的思想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评价太后的历史，就应当用太后自己的规则来评论，而不能用我们的规则来对她进行判断。"

放眼世界的主流评论以及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慈禧太后一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非常有名，影响力极强的君主。"她的聪明才智、她的敏锐果敢、她的沉着冷静远远超出一般的男子。"

今天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所以如果想通过中国著书，来阐明慈禧太后的治世真相，这是不太可能的。在京都当官的那些人，虽然也有很多人通过笔记等形式记载了太后大量的真实材料，可以作为研究慈禧的参考资料，而且其中也的确有一些人，他们非常了解太后的脾气性格，可是那些记得太后大量信息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去著书立说的。因此在中国很少有关于太后的这一类话题的著作问世。中国那些在朝为官的人都认为，讲述太后的真相，那是对太后极大的不尊敬。在受到欧洲人保护的各通商口岸以及香港、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报纸，有广东人写的与太后相关的一些短篇文章，但是因为文中大都充满了对满族人的仇恨、排斥和偏见，把太后说的一无是处、十恶不赦。这些言语大都是不能够相信的，这些文章枯燥乏味，陈词滥调跟官家的文书差不了多少。其中有一份材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那是曾经在新加坡报纸上登过的一篇文章，后来

还被多次的转载，书名是《中国内部危机》，署名是文庆，这文庆肯定是笔名，其实很可能就是康有为的一个很忠实的信仰者。文章中大都是一些言辞过激的抨击慈禧太后的话，并且行文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很明显他是想要在中国人心目中制造一种仇恨满族人的氛围，最终目的是要让汉人从中得到利益，并且他还希望外国列强不要让慈禧回到京都，这个人用西方人的学问，就好像是印度的书商，简直有点胡编滥造，把太后比作是国外的那些残暴的女王。他为了让自己的话有说服力，还引用了但丁的一些名言。他将太后生性中善良的一面全部抹杀掉，而且对太后当时所处的特殊的艰难的时势，以及太后自身知识和阅历的浅薄，都没有能够进行换位思考，而是求全责备。在这种情况下随意给出的结论，当然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因此，换句话说，他的所谓的著作是毫无研究价值的。

同样，很多的欧洲人对于慈禧太后的描述，比如说大使馆的夫人以及她的朋友的一些话语也是不能轻易相信的。她们虽然的确亲眼看到过太后，而且与太后也有过接触，但是她们见到的，也只是中国朝廷接见外国客人时的表面现象。她们看到的太后，是一位仪态端庄、容貌艳丽、待人热情和蔼的美丽妇人。于是，她们就被这表面给迷惑住了，其实太后远不止于这样的简单庸俗，只是慈禧太后很擅长在这方面逢场作戏罢了。假如中国当时的制度允许欧洲的男性政客、外交家以及一些名人去会见太后，相信太后同样也会用这种方式，这样的态度去接见他们，而他们也同样会像那些女人们一样被征服，甚至会更加的惊叹。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和影响力，使人一见到，在无形中就被感化了。因此，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把太后与德国的威廉大帝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联想到一起，因为他们都擅长用这样的方法来影响别人，来俘获别人的心。尽管由于制度的制约，当时太后只能和同性的外国人建立关系，但她同样以自己高贵的气质、优雅的举止，给对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自从太后回到了京城以后，只要是曾经与太后会见过的人，都这样去称赞她，即使那些曾经被围困在大使馆里的人也是如此，都毫不讳饰地赞美她。因为她拥有上天赐予的人间罕见的美貌，以及那自然迷人的仪态举止，使得每一个见过她的外国女人都心生羡意，而无法忘怀，并感觉到她们所见的太后的形象，

与平时所听说的真是相差甚远，不可比拟。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辛丑条约》的签订，肯定也会受到这一层原因的影响。

从《景善日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太后的性情。此书的作者曾经有机会长期观察太后的行事作风与手段，从各方面都作了印证，因此书中的记载是基本属实的。尽管太后的情绪变化无常，反反复复，让人无法琢磨，再加上她的学问见识也是相对浅陋的，而且她还贪恋权力，脾气有时也显得很暴躁，遇到事情更是睚眦必报，但是她也并不是就像文庆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毫无理智、野蛮粗暴、让人难以接近的怪物。平心而论，太后是一位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活力，而且魅力无限的女人，她的志气很高、理想远大、而且好大喜功、不拘小节。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她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她的民族的传统、她当时特殊的社会地位及身份。

《景善日记》中记载说："太后年纪已经大了，心中更向往和平。我特别了解太后的性情，她平常待人非常和蔼可亲，喜欢书画、戏曲。她心情好的时候，非常和蔼，平易近人，但是生气发怒的时候也是非常怕人的。"我们站在一个同情者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太后是一个一生都受到国人爱戴与追捧的非凡女性。她一心想做大事立大功，年纪虽然大了，但并不显得衰弱，意志很坚定，绝不会因为外界的境遇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就连义和团的首领在她面前也显出一副唯命是从，恭顺谦和的样子。她从二十四岁起就开始独揽大权，做事情总是率性而为、不计后果。一生都执掌君权，治理国政。她从少女时代进入宫廷，在耳濡目染当中，在经受了诸多磨难之后，学会了保护自己，学会了嫁祸他人，学会了玩弄权术。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她的周围的情形，她刚刚得到皇帝的宠爱，长期居住在深宫之中，她的所见所闻，都是虚伪的，充满阴谋的，处处都有陷阱和罪恶。在西方列强来犯之前，还没有过与欧洲列强交涉的先例。当时，京城的情形大致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差不多，后来虽然失败了很多次，外敌也渐渐入侵，但是朝廷的秩序，旧时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最近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世纪的历史时，他认为，当时北京城的生活，跟欧洲十四世纪是大致相同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宫廷里的生活情形，让人感觉很曲折、很深邃；有些时候，又让人感觉做事情的人很幼稚，也很愚蠢。有时本是一个令人感觉很快乐、很轻松的场合，忽然间就会有一个悲剧发生了，其间变数之快速，让人无法揣度。虽然其中有很多罪恶的影子，但清白纯洁的味道同样是可以体验到的。大抵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会有赤诚的心与险恶的阴谋相互较量，最终才会形成。尽管慈禧太后一生有许多很残忍、暴戾的行为，但是她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果断，却是令人不得不钦佩的。

东方的君主，如果没有强硬的手段，就很难有所作为。在中国，那些想做官、谋求功名利禄的人，就是要把自己置身在恩怨是非之地，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测。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慈禧的手段或许毒辣了些，但也并没有事实证明，她天生暴虐、喜欢杀人。我想，那些被定为死罪的，肯定都是阻挡了太后执政之路的人，当然，这些悲剧的形成，都是由于她过分热衷权势才导致的。当她愤恨别人的蛮横干预，而大发雷霆时，她会毫不心慈手软，立即将这些干预者送给相关部门去处理，即使是当朝皇帝的爱妃冲犯了她，也同样难于幸免，当场赐死，绝没有缓和的余地。慈禧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手段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在东方人看来，这样做并不是很残酷，相反，恰恰显示了她遇事的果敢、意志的坚定。这些是可以从她办大事时所下的谕旨中看出来的，虽然独断专行，却并没有暴虐残酷的刑罚。因此，我们评价太后的行事手段，与其说是弗罗然塔模式，倒不如说是伊丽莎白模式更加恰当。

慈禧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孤芳自赏、自恃清高，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委求于别人。看一看朝廷的上上下下，能够帮助她，助她一臂之力的人少之又少。整个皇宫的里里外外，不是年老体弱、思想僵化腐朽的老人；就是一些整天沉浸在吸食鸦片、醉生梦死、相信天命的愚蠢书生。至于她自己的皇亲国戚，要么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要么是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大多都是些不能够独当一面、立大志、办大事的人。似乎只有慈禧一个人，命中注定就是这个垂将没落

的王朝的统治者。只要是她说出的话，便立刻成为当时的法律，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她之外，便没有能够料理国事、处理政务的人了。

即便如此，慈禧同样也具备一般女人的天性。她喜欢快乐，爱热闹，不喜欢孤单，对金钱的诱惑也是无法阻挡。她一生都喜欢享乐，并且只要一有机会，她便会让自己融入到享乐的氛围之中。但是，她也不会太过分，她懂得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的道理。她天生就很聪明，而且见识广博，常常能够自我约束，而不会无限度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她也绝不会因为自己喜欢享乐，就误了大事，足可见她在处理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时的大智慧。

和其他的封建君主一样，慈禧也非常相信鬼怪神灵，相信宿命，相信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她非常注重礼节，逢时过节，或者遇到大事，都要去祭拜神明，祈求上天保佑，并且还请国内的僧人道士来主持法式。她虽然很迷信，但她也能够像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始终以国家大事为重，太后的贤明和智慧是其他大臣远远比不上的。她绝对不会容许有侵犯她大权的行为存在，哪怕是一丁点都不行，她更不可能容许所谓的神权凌驾于她的君权之上。这些都是太后一直大权在握的原因，也是她能够坐稳江山的关键。

慈禧能够最终执掌国家大权，受到国家民众的爱戴，绝不是偶然的，这期间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其一、她性格刚强勇敢，而且意志坚定；其二、她拥有真实的才能，能够镇定自若地指挥中国当时的局势。这两个超出常人的特性，能够让她在众多满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太后做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毋庸置疑、无可非议的，即使是义和团在犯上作乱的时候，太后仍然是不动声色，不改常态。景善就曾经亲眼目睹过她的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临危不惧的意志力。当时整个皇宫都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即使是那些勇猛的男士，可能也不能表现出镇定自若，可是太后却能够很安静的坐在那儿画竹子，而且还下令停止攻打外国使馆。她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是为躲避尘世的喧嚣，自由自在的在湖中游玩一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太后在宫中义正辞严的斥退义和团首领的时候，是怎样的一幅惊心动魄的场景啊！后来，当她又被迫逃离皇宫的那天早

晨，太后说话时表现得冷静而又安详，好像是早已准备好了，要出去旅游一般，没有任何的惶恐不安的神情。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够觉察到的便是太后那难以掩饰的高贵的气质和让人肃然起敬的博大胸襟，至于其他的，早已经抛之脑后了。

慈禧太后的意志力极为坚强，一旦认准的事情，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点，丝毫不比德国的君主逊色。她很有自知之明，而且自尊心极强。她居于中国最高统治者之位，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帝国的成败兴衰，关乎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一件事情，让她的极强的自尊心和非常迷信的思想都暴露无遗。那时候，美国一个大使推荐了一位很有名气的画师，名字叫密斯卡尔，她为太后画了一幅油画像，并且要把这张画像送去圣路易斯参加展览比赛。画完之后，就打算由外务部将这张画像送到美国。太后对这件事情相当重视，当时恭送油画的礼节，就好像太后亲自要去美国一样。她还亲自下令，要选一条轻便的铁路，专门用于运送这张画像。当时，油画像是用黄色的绸缎裹着的，被专人一直很恭敬的捧着往前走。太后还特别下令，不允许用轿子抬，因为她觉得用轿子抬不吉利。这幅油画像在送出皇宫之前，皇帝都是跪着恭送的；当油画通过京都的街道到达铁路轨道时，所有的人都下跪了，好像慈禧太后亲自到场了一样。这件事情在我们欧洲人看来，肯定感觉是不可思议的，假如要想真正的理解它，还需要去考察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老的历史，以及中国流传数千年的风俗礼仪习俗。

太后说话做事都很谨小慎微，一旦有人要阿谀奉承，她马上便能察觉了，只要是太后依赖信任的人，他们大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意志坚定、刚正不阿、不屈不挠，像荣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他们便都是拥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他们虽然说话时显得有点愚钝，但是他们敢于直言相谏，从来不怕得罪人。而那些想得到太后的恩宠和抬爱，阿谀奉承的小人，却受到了太后的鄙视。虽然有时，有一些大臣在言语上有冒犯的地方，但太后考虑到这些人才华横溢，而且有勇有谋，太后也就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了，像谭嗣同就是如此。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可以证明太后的这种行事风格的。有一次，翰林院选拔人才，试卷做完后，都要送给太后去批阅。太后认真批阅之后，

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现有严辰的一张试卷，卷子被判成甲等第一名，看这篇文章韵律以及遣词造句上还是很流畅的；再看文章的内容，虽然也涉及一些当今真实的事情，但是刻意的夸张铺排，词句很华丽，却不能很好的表达主题。甚至言过其实的进行颂扬，比如文中认为我是女人中的尧舜等等这样的句子。现在我们国家在这里八股取士，跟前面的王朝是差不多的，应当崇尚朴实，罢黜虚华，重视文章的品位和实效。翰林院的各个书馆，选拔的人才都是国家的要员，他们在做文章时更应当讲究务实。如果都像严辰这样写文章，不切实际的写，专门搞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这应该也于他本人的人品和学术见识有很大的关系。但这种风气决不能任其滋长，因而，将严辰的卷子改判为甲等最后一名。以后的各项考试，派出的考官以及阅卷的大臣们，一定要注意，文章必须要切合实际，讲究实效，绝不容许虚华浮夸，希望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太后任用人才，不存在满族与汉族的偏见。太后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很稳固，能够长治久安，并且多年来一直受到国人的尊敬与拥护，这与她用人的公平性是分不开的。只要是国家的官员，不管是满朝还是汉朝，太后都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从不偏信或者偏用满族人。因为太后自己也知道，汉族人的聪明才智要远远超过满族人，如果要想保住满族人已取得的权势，必须先要俘获汉族人民的心。凡是满族人犯法的，包括庚子年义和团的同党，虽然他是皇亲国戚，是宗室的亲属，但是都同样受到了公平的刑罚，没有一丁点的顾虑和私人感情。当满人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共道德，激起民愤时，太后绝不会姑息纵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里讲一件真实的事情作为例子。当时，有一个人名字叫胜保，是太后非常信赖、非常得宠的一位大将。在1860年与英法联军的战役中，曾经因为阻挡联军侵犯热河而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便很是受到太后的器重，赐给他高官厚禄。然而，在1863年，胜保在陕西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的时候，上书朝廷，请求亲自去说降一名叛军的首领，并且进一步要求给这个投降的匪头一个重要的官职（这种事情在当时是极为常见的）。太后深深知道，这件事情应允了以后是非常危险的，就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并且还指出了不

能答应的种种理由。但是胜保并没有理会，而是自作主张的隐匿了太后的旨意，还封给了那个匪头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后来，这个降匪真的像太后预料的那样，他瞅准机会再一次反叛，屠杀了很多的官员，并且还攻陷了很多重要的城池，最终酿成了大祸。太后便下令将胜保捉拿到京都，交由刑部进行审讯。

在所列出的罪状当中，胜保只承认，在行军打仗时随营携带了几名女子（这一条在汉人的法律当中罪状也是很大的），其他的，胜保都没有承认，而且态度强硬、蛮横无理，还要求与证人当面对质。后来，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宣布胜保的罪过，按照律法应当立刻问斩，可是顾念他曾经功勋显赫，就从宽处理，赐给他自行了断。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太后做事为人是多么公平公正啊！

正如前文所讲的，太后是非常迷信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中世纪的巫术时代，那么太后这样的表现也就不算奇怪了。太后这样的迷信，从她很小的时候就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根深蒂固了。她一直很信奉儒家的教诲，而且能兼收并蓄包容各种宗教。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宗教形式，她也保持一颗宽容之心，从不会排除异教。她常常按照占星家的话语去做事。同治帝登上皇位的第一年，她就曾经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人们看了以后，禁不住联想到巴比伦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魔术师和预言家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谕旨的内容如下：

七月十五日的夜晚，天上众多的星星都在向西南方向移动，过了十天，彗星又在西北方向出现过两次。北京城中，上个月瘟疫大流行，令人很是恐惧担忧。现在接到皇太后的懿旨，上天之所以出现这些异常，都是因为我们处理国家大事时有过失和疏漏，还有便是民间的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申诉。

在下完谕旨之后，太后又警告众大臣：“不管是内臣还是外臣，都必须要直言劝谏，陈述治国的得与失，并努力改正过来，这样才能让老天爷开恩，不再责罚我们。”

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讲述了太后从西安回到京城时，特别命令

钦天监慎重选择最吉祥的日子回京都。太后这样的迷信，就好像法国的拿破仑一样，他总是相信，在无形之中，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势力，它的智慧远远超出人类，我们只有顺势而为，才能取得成功。在情况危急的时刻，太后常常向神灵求助，并不断地向自己的祖宗亡灵祷告，希望祖宗显灵，让自己顺利摆脱困境。尽管太后如此迷信，但是一旦涉及有关自己权势的事情，太后就不再怕得罪神灵了，她会公开的反其道而行之，事情过后，她又会举行祭祀仪式，表明自己悔过之心，希望能够得到祖宗神明的原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慈禧太后在自己的儿子同治帝死后，她没有依照祖宗的遗训，而是选立了光绪，让其继承咸丰的帝位，虽然她知道，这样做普天下的人都会指责，都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她还是这样做了。

在选择自己陵墓时，慈禧太后也是相当迷信。在工程进展的过程当中，她常常有迷信的见解。公元1873年，同治登上帝位，首先要做的，便是恭送两位太后前往东陵，选两处最为吉祥的地方作为墓地。东陵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不仅山水环绕，而且地势也是最棒的。选定好墓地之后，又用了很多的烦琐的仪式来驱除邪恶，永保太平，最后才选定一个良辰吉日来动土开工。工程的整体进程以及陵墓内外的装饰，太后都非常的重视，而且一直都关注着，直到自己死的那一天为止。陵墓的建筑风格、地理位置等必须要与太后的生辰八字相符合，由于事情的重大，太后特地派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荣禄负责这项工程。荣禄接到了这样一份美差，当时被满朝的文武百官妒忌羡慕着，因为主持建造陵墓，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发大财的，这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谁都想去做。陵墓的地形比较复杂，很难详细描述清楚。慈安太后的陵墓向北移动了十五尺二寸，向西移到了四尺七寸半。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陵墓向北移动了七尺四寸，向东移到了八寸。

慈禧太后从来不畏惧任何人。从她开始掌握大权的那一刻，她便确保了自己权力至高无上，并且坚信自己是天上的星宿。她品味自己的权力就像品味一杯美酒一样，深深的陶醉其间。对待大臣们，她常常是激励与劝诫并用，这些可以从她的谕旨中看出来。公元1862年，

慈禧只不过才二十七岁，可是她却下达谕旨来训诫军机大臣，要求他们彻底铲除旧制度中的弊端，并勉励他们要改过自新。在谕旨中提到："作为一国的大臣，应当为朝廷多多招揽人才，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结党营私。"后来有一次，监察官参了一本，要弹劾恭亲王的时候，太后下谕旨并且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为官就要勤政爱民，以仁德的规定要求自己，以礼义的原则治理国家和百姓，通过教化的方式消除民间的诉讼纠纷，执行君主之令要切实努力，这样才能做一个好官，使得地方得以安定。"太后的谕旨，文辞非常精妙，并且经常以训诫的话语来引导大臣们。人们常常怀疑，太后引用典故或者古人的一些辞令，是想来讽刺或者挖苦他们的，由此看出，太后的说话艺术也是少有人能敌的。为了联络与外国大使夫人们的感情，太后常常委屈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竭力的去讨她们的欢心，最终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表明，太后受到全国老百姓的尊敬和拥护，而且声名远扬，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尤其是在京城一带，只要听到有人谈论到太后，一定都是对她大加赞美，这就像英国的臣民对待他们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太后是赞同的，后来当老百姓因此而受到灾难的时候，人们只是痛恨义和团，对于默许这件事发生的老佛爷，百姓们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怨言。太后的这一举措虽然显得有些大智若愚，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有勇有谋的一面。她不惜以整个朝廷为赌注而奋力一搏，下面百姓们都议论纷纷，认为太后这一个驱逐洋人的办法非常好。对于老百姓们来说，这一举措正证明了太后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君主，她能够顺应民意，保卫国土。假如这件事情不能成功，这便是天意如此，无力挽回；假如这件事成功了，这必将显示出太后的英明果断，才智超群。老百姓对太后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便是在她回到金銮殿之后，在面对洋人时，她却自降身价，甘愿屈居人下。尽管如此，百姓对于太后的爱戴还是一成不变的。

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亲眼见过太后的面，但是人们总是觉得，这位老佛爷应该是一位仁慈而又勇敢的君主。即使人们看到太后突然之间大怒，也会觉得这很正常，甚至可能会解释说，一个人要是有怒气

而不把它发泄出来，这是很伤身体的事情。北方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觉察过太后的脾气很暴躁，一直以来都认为太后很仁慈，很博爱，即使是发了脾气，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都是因为女人的脾气本就多变才会这样的。这种观念，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责备他们。老百姓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平时早就受够了地方官吏的残酷的刑罚，而太后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残暴的官员比较起来真是出入很大了。

当太后坐着轿子去往东陵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在路途中遇到太后，感觉自己很庆幸。那个时候，太后正在齐化门外面的东岳庙里面吃早饭，吃好早饭之后就打算坐轿子前往登州。路两边早已跪满了百姓，轿帘子被风吹着有些掀起，正好可以看见太后睡着的样子。朴实的村民们看到后非常高兴，并且说："快看，老佛爷睡着了，老佛爷真是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啊，真不愧是真命天子啊。我们有福气看到老佛爷啦，真是太好了，太高兴了。"

中国的老百姓都认为，太后的权力应该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法律只是太后用来管理臣民的工具。比如说，太后曾经下旨禁止监狱里面滥用酷刑，可是，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03年7月的时候，太后却亲自下令将维新派人士沈荩施以杖毙的刑罚，也就是用棍棒殴打，直至死亡的刑罚。然而，公众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非议，觉得太后这样做很正常。几天以后，宫中又忙碌着为太后的七十大寿筹备庆祝仪式，太后这个时候却下了一道谕旨，谢绝了皇上封赏给她的徽号和寿礼，并且宣布说，现在这个时刻没有心思来庆贺生辰。谕旨是这样写的：

"当前这个时候，正是时势最为复杂，最为艰难的时刻，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对我们发动的战争还没有平定，我国东北三省的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我们国家的官员能够同心同德、一致对外、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让我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才是我七十大寿最想要的庆祝。"

沈荩的这件事，对太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一点不需要有任何的疑惑，否则这么一个爱热闹的太后，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么好的可以热闹的机会呢？

慈禧太后的报复手段同样也是非常残忍的。根据《景善日记》的记载，哪怕是太后最忠实的仆人，见到太后发怒，她们都尽量避免在太后身边出现。假如实在无法避开的话，就一个个都战战兢兢的，生怕触怒了太后。因为一旦把太后惹恼了，不管是谁，都难逃重责，甚至处死。当然他们心里也都知道，只要是真心忠诚于太后的人，太后也会心中有数的。这就像俄国的凯瑟琳女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一样。

然而在中国的中部以及南部，太后好像并不是很受欢迎。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种现象稍微有点改善，但是在戊戌变法之后，这种现象就变的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当时的广东人，他们对太后的诽谤满大街都是，把太后看成是一只野蛮、专横而又霸道的怪物。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自己的心浮气躁，用心险恶，便在街头巷尾，到处高谈阔论，毫无顾忌。我们也都能够理解，普通老百姓都喜欢把这样的话扣在当朝统治者的头上，因此我们对这样的议论也不必太在意。当然，也不只是广东人这样说，其他南方的各个地方的人也都有类似的言论，甚至还有说法相当极端的，大致就是说，现在维新变法已经渐渐成熟了，满洲政权用不了多久便会被颠覆了。

1898年，广东街头流行一首关于满清政府的打油诗，大意是这样的："对于我们伟大的满洲王朝，我们想追问一下我们难以理解的三个问题：一、你们的皇上让他的子孙去跪拜谁的祖坟？二、你们的太后过年过节时又祭拜的哪里的神仙圣人？三、你们的公主所嫁的夫君都是些什么人？"

当然，这些街头巷议只不过是地方性的言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之后，这些言论也就随之消失了。在上海当地的报纸中，言辞更是激烈，对清政府持敌视态度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血气方刚，出言更是嚣张跋扈，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大多数老百姓

对太后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成绩还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谈论到广州一带的土匪骚乱时，人们都会称赞太后，正是因为她信任曾国藩，才能够使叛乱迅速平息下来。再说到戊戌变法的事情时，人们大都会称赞，多亏太后能够及时出手，扭转乾坤，否则激进派的改革一旦形成气候，还不知道要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又有人称赞太后在同治初年（1860—1861年），如果不是太后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载垣等人的密谋造反，那么中国的政治局势将是不堪设想了。再想想如今的国内外形势，如果不是太后的镇定自若，胸有成竹，那么中国将要面临怎样的困难与危险真是让人无法想象的。

慈禧太后在宫廷中的日常生活，被卡尔小姐很详细的记录下来了。书中不仅描写了宫廷中的礼节，而且也记录了太后在宫中游乐的情景。书中描述的极为生动有趣，被誉为“描写中国宫廷的第一本书”。太后除了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很相似的，事实上，维多利亚女王也非常受到太后的尊重和敬仰），还对文学、艺术都非常感兴趣，同时她还很喜欢游乐，更是喜欢戏剧，尤其是一些历史剧，并且她还给每天呈上的将要表演的剧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根据知情人士的记录，太后即使在被迫离开京城去西安居住期间，也不忘戏剧，还特地下令，让随从多带些戏剧演员，这样就能随时给她唱戏解闷了。

太后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重新修建颐和园之前，我们对太后了解的很少。中年以后，太后受到哲学中“怡乐”观念的影响，太后更加崇尚简单，生活起居包括吃饭、穿衣、出行等都井井有条，很有规律。太后对颐和园的感情更是非同一般，她喜欢园子里的小花小草，喜欢环绕着小山的湖泊，就是在年纪大了，除非不得已的情况，否则她是不会进宫里去的。她喜欢在颐和园里生活，因为在这里，她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没有宫里的繁文缛节，没有宫廷的钩心斗角。她经常乘着一叶小舟在湖泊中游玩，并且和她喜欢的福晋宫妃们谈谈笑笑，以此作乐，消磨时间。她特别喜欢和荣禄的妻子以及皇室的福晋们在一起，闲聊些过去的往事，表达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和打算。



慈禧太后御笔楷书

太后非常喜欢文学，而且她还有着很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让她受到朝廷中的士大夫们的肯定和尊敬。她读书的时候，只需了解文章的大意，而不会去咬文嚼字。每天，她总会抽出一些时间，让宫里一些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而且经过专门训练的太监朗诵一些古今的书籍给自己听。太后非常重视教育，可有一点让我不理解的是，她却固守成规、遵循祖训，不肯接纳新兴的学说和知识。人们对太后竭力反对光绪帝的改革变法可能还都记忆犹新，这也一度使得光绪皇帝的面子丧失殆尽。公元1900年，太后转而信任义和团，协助驱逐洋人，这也完全是出于气愤，而并不是她的本意。公元1876年，京城开设了同文馆，馆中教授的都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个朝廷官员甚至宣传说，数学只是适合朝廷中那些研究天文学的人学的，其他人即使学会了，也没有什么大用场。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下了一道懿旨大加训斥。谕旨是这样写的：

朝廷开设了同文馆，是为了让官嗣子弟能够学到一些天文算术的知识，并不是把它作为投机取巧，捞取功名的手段。如果能够好好学习，用处还是很大的。但不管怎样，仍然要以我们国家的经典书籍为学习之本。所以，我们要借助西方的知识来拓宽自己的学识见解，让我们的子孙计算的更加精准无误，并不是学了这个，就不需要学习老祖宗留下的经典文史资料了。如果按照我的旨意去执行，又怎会出现那位御史担忧的问题呢？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一开始，因为朝廷生活奢华糜烂（这个现象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曾经提及过），大臣们上书参奏的特别多。他们大多指责太监们的滔天罪恶以及太监们一手遮天，势力不断扩大等。尤其是公元1862—1869年之间，上书的人最多。都是参奏当时的太监过于大胆放肆，目无王法，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更有甚者，有些太监还把手伸向地方，对各省进行大肆的搜刮。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太后都没有听取大臣们的谏言，针对为非作歹的太监们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同时，太后却下了谕旨，褒奖这些上书言事参奏的官员，并且宣称朝廷也正有惩办这些太监的想法，只是时机还不够成熟，想用这种方法来压制住外面对这件事的议论。太后整日享受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但她还是不会忘记给这些上书言事的官员台阶下，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太后考虑事情还是很全面的，而不是外界所传言的昏庸无道。公元1869年，同治皇帝大婚的时候，军机处以各省在太平军叛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为借口，请求宫中不要增加支出的费用。太后知道这件事后便下了一道谕旨，谕旨是这样写的：

每次想起我国老百姓们生活的艰难和痛苦，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恨我以前太过奢侈，穿着不够简单、饭食不够节俭，这些我以后都要注意啊！

但事实上，太后在此后的衣食住行上仍是一如既往的铺张浪费，没有一丁点节约开支的迹象。要知道，宫廷里的日常开支以及修理陵墓的费用，大多数都进了太监的腰包。不管军机处把这件事的情形陈述得如何严重，也不管上书的官员如何地情真意切，这种习惯已经是铁板钉钉、毫无挽回的余地了。百姓、大臣们这个时候都顺势的认为，这样的事情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也就不必深究了。太后对这件事肯定不是毫不知情，只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的听之任之，当然，太后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丰厚利益，那也是免不了的。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的询问一些日常用品的市场价格，正向太后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她就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警告当时的太监总管李莲英，表明自己非常清楚日常用品的市场物价，不要想在她面前浑水摸鱼。

太后虽然喜欢繁华热闹，但是她的本性却是十分节俭的。年纪大了以后，甚至近于吝啬的表现。宫廷中的支出费用每年都没有一个特定的数目，主要是根据年成的好坏，以及时局的安定与否，通过征收各省官员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部分银两来支付宫廷中的各种开销。太后喜欢藏点私房钱，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擅长积蓄的本性，使得太后在宫中私藏了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而其他的，像各种珍贵的丝绸、药材、钟表等，也被太后大量珍藏。太后死了之后，听说她的私人财产，包括许多的金佛以及各种珍贵的祭祀用品在内，共计大约一千六百万便士。这还只是一个大概的数目，大家都知道，1900年，两宫被迫离开京城去西安的时候，宁寿宫储藏的白银（这个银两是1861年查抄肃顺家产时得到的）大约有六千万两（大约合计八百万便士），可是在太原西安的时候，受到的各省朝贡的财物，也不低于这个数目，甚至还要多得多。

一直以来，慈禧对自己的容貌非常自信和自豪。直到死的时候，她的面容仍不见衰老，而且几乎没有皱纹，跟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一位画家在她临终前为她画像时，她还希望不要把自己的皱纹画在上面）。和普通的妇女一样，慈禧太后每天花在梳洗打扮上的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对头发的装饰，那是相当的重视。在被迫离开京城去往西安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换上汉人的服饰，据说太后为这件事抱怨了很长时间。

太后体质很好，一直都很健康，而且生活情趣很浓、很乐观，这些都是很难得的。她把这些都归功于每天都能早起，生活很有规律，而且还经常喝牛奶。她所喝的牛奶，实际上是牛奶凝结而成的奶酪。太后在饮食上很有节制，每次在处理好国事之后，都会给自己放松一下，消遣片刻。太后每天白天都会小睡一个小时，再吸食一会儿大烟。在这期间，绝不容许有任何人打扰。慈禧太后也深深地知道，鸦片对人体的伤害，也很想戒除，更是非常同意朝廷所颁布的禁烟令。但同时，她又认为，对于那些已经超过六十岁，而且吸烟也懂得节制的老人，应该给予适当的宽恕。因为她觉得，鸦片有一种麻醉作用，可以让老人忘记苦痛，而沉浸在吸食鸦片后的欢乐之中，而且它还可以给老人提神。对于那些一般的吸烟的人，太后是明令禁止的；而对

于自己以及和自己类似的吸烟的人，太后则认为，这是这类人寻找快乐的一种方式。

综合以上所讲述的，我们足以了解太后的为人以及她这一生的事业。如此伟大的太后，也足可以与其他贤明的君主相提并论了，就是在全世界，也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了。她一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她始终享有着众多朝廷大臣们的尊重爱戴，也是很难用普通的分析比较的方式来阐明的。慈禧太后能够掌管大权，统治天下，关键是她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神奇的而又让人无法捉摸的吸引力，使普通人一见就为之倾倒。当然，她的这种魅力是独立于她的道德文明以及她所受的良好的教育以外的。而且这种魅力极其巨大，使得大多数人，在她面前都失去了免疫能力，最终被她的魅力感化，直至最后的臣服。太后以自己的天生丽质，再加上温柔活泼的个性特征，博得了群臣的拥护和爱戴，即使是那些主张以德服人的人，也在不经意间为她的魅力所征服。太后的这种魅力，就好像吸铁石一般，对每一个人都有着无穷的吸引力，这应该也就是，她能够始终总揽大权的秘密。太后以自己这般特有的秘密武器，统治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五十年的时间。她在治理国家方面，有值得肯定的成绩；也有令人费解的愚蠢行为；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功劳；也有阻碍社会继续前进的谬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位以美丽闻名于世的老佛爷，正是她才能够让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得到重用。在她辞世之后，百姓们都很怀念她，哀悼她。一直到今天，太后也是这个世界上能力非凡，智慧超群的了不起的伟大人物。

欧洲人用西方的伦理道德来评价太后，认为太后这一生，意识形态上有着畸形的变化，而她的所谓的治国伟绩也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并且还谴责她是一个冷血的、暴力的、毫无教养的人。对于这样的评价，笔者在这里不作任何的反驳，我也不想去减轻她所犯下的过错。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普通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价慈禧太后，确确实实是不公平的。和太后以前以及同时代的人物相比，从中国老百姓对太后的公共舆论来看，慈禧太后绝对不是一个残暴的君主。比如伊丽莎白女王以及玛丽斯图尔特女王，她们为保持皇室的尊严，拥护基督教，她们不惜砍断别人的肢体。这两位女王，难道不也是欧洲

人所谓的温柔善良的女子吗？！

太后生病的时候，性情和平时一样，由于自己病了，难以再去处理朝中大事了，太后便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但即使这样，她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怀有幻想，一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心中想的仍然是整个国家，和刚刚施行的新政，她希望新政实施之后，中国能够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庶、安居乐业。临死的时候，她毫无惧色，表现得很坦然，跟她生前一样，用她的广阔的心胸去寻找极乐世界的辉煌与威严，感觉就像是要出远门游玩一般。在生与死的最后时刻，她无可挽回的离开了人世，以及她这一生都很挚爱的事业。但是，她的死却与英国曲德女王的死完全不一样。她的离开是那样的从容，始终保持着帝王所特有的尊严，自信地迎接着自己高贵命运的到来。

译后记　慈禧和她的时代

房新侠

晚清社会风起云涌，各路势力纠结交错，可是谁也不能无视一个女人，那就是大清朝至高无上威风凛凛的慈禧太后。

百余年来关于慈禧的说法真是纷纭得很，有学富五车一本正经的学者说她是红颜祸水；有革命先锋说她是封建余孽；有爱国志士说她是割地赔银子的卖国贼；有道德卫士大骂，说她是乱了朝纲的荡妇；也有皇亲国戚对其顶礼膜拜，说是亏了老佛爷维持着大清朝的体统；还有不少洋人对这位享有无尚荣威的女人竟也兴趣浓浓，撰写了一些在当时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的书。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叫做约翰·奥特维·布兰德。他是英国作家和记者，先后在海关、上海租界议会担任要职，后又转型为《泰晤士报》记者、中英铁路谈判代表。这位洋先生活了八十多岁，竟有一半的时间待在了中国，真算得上是个“中国通”。他在中国近四十年时间里，正逢晚清时期，亲眼目睹了大清朝没落的过程，回国后专职写作关于中国的记忆和思考的著作，主要著作有《李鸿章传》、《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埃特蒙德·拜克浩斯合著）和《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等。

这位洋先生，不仅仅只是一介书生，对政治也是很感兴趣，还兼任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秘书，曾经受英国领事委托，帮助康有为出逃。他对清朝社会各类掌故都很熟悉，甚至于当时社会上一些流言蜚语他都记录在书内，什么据说荣禄和慈禧曾经订过娃娃亲啦，咸丰皇帝听说关于两人的风流韵事气得不行啊，光绪皇帝是被慈禧毒死的啦，等等此类市井小民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这倒是和现在的八卦期刊差不多，满足了咱们的猎奇心理，估计这些传言也不完全是空穴来

风，最近科研人员利用现代仪器证明光绪帝体内砒霜含量极高，证明他是被毒死的，除了慈禧老佛爷谁也没这么大的胆！

当然，这位洋先生可不是单纯靠这点本事混饭吃的，他的书总归有着自己的历史观，他在书里客气的讽刺中国的史官“他们通常相互借鉴”，说白了就是相互抄袭，没新意。看看他的书名，《慈禧统治下的中国》，野心够大吧。他就是力图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特定时期的真实的中国。为此，收集了很多的史料，上至皇室的诏书，下至宫女、太监、老百姓的访谈，还夹杂着普通人的书信、日记，中国当时主要阶层都涉及了。他自己当导演，把这些人物推到历史的前台粉墨登场，让他们自个演，并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由历史人物展示历史。这样的书自然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也绝没有什么困难，处处读得明白。

此书既以“慈禧”命名，自然她是主角，以她贯穿全书，间或加入旁人的信息。各位从小饱读诗书，咱们书里的慈禧必定是残暴、冷酷、狡诈、自私、耍弄权势、卖国的，但在这本书里，咱们还能看见她敏锐果敢、沉着冷静、机智敏锐的一面。洋先生劝导咱“一定要先去除我们已有的偏见，深入了解她周围的形势变化，以及她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她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能听反清人士的一面之词，也不能被她在公开场合的端庄与美丽所蒙蔽。这位老太太确实是情绪变化无常，让人无法琢磨，学问见识相对浅陋，而且还贪恋权力，遇到事情更是睚眦必报，但是她也不完全就是一个毫无理智、野蛮粗暴、让人难以接近的怪物。平心而论，慈禧是一位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活力，而且魅力无限的女人，她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她的民族的传统和她当时特殊的社会地位及身份。这才是个真实的、有个性的慈禧！

此书的翻译工作是我朋友杨丹和我共同完成的，她是一位很优秀的英语专家，能有幸跟她合作翻译这部书，我获益匪浅。最后，还要感谢几位提供历史资料的朋友，以及统稿的陶林先生，感谢他们无私的、专业的帮助！

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王朝公主，如何看待末代清廷的深宫内帏？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德龄公主 著
许海峰 陶林 译

親歷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著者：（美）德龄

译者：许海峰 陶林

责任编辑：郝鹏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人在红楼未尽处
原序
第一章 返国
第二章 入宫
第三章 宫戏
第四章 后宫午膳
第五章 会见大使夫人
第六章 太后梳妆
第七章 后宫琐事
第八章 宫廷女官
第九章 皇帝
第十章 皇后
第十一章 换装
第十二章 太后和康格夫人
第十三章 太后的肖像
第十四章 皇上的生日
第十五章 中秋
第十六章 颐和园
第十七章 大殿
第十八章 过年
第十九章 西苑
第二十章 尾声
后记 天朝末世的侧影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人在红楼未尽处

陶林

我曾一度非常醉心于《红楼梦》的研究——那是在我自己的长篇小说《红结忆》前后十年写作的光阴里，一段人生之春的好韶华。以我经验看，青春读红楼，最易让一个内心粗糙的青年，变成一个地道有情的中国人。

《红楼梦》的百转千回、博大精深毋庸讳言，但所有知晓“红楼”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它并没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真正结尾。高鹗的续笔让曹雪芹公的旷世杰作有了个勉强能说得过去的“后来怎么了”的结尾。即便如此，众多的读书人眼明心明，终还是不满于高鹗强画的大团圆，难以释怀佳作的有头无尾。

我还记得，罗素先生面对传统哲学关于宇宙论的诘难时，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反驳：“谁说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始，要有一个结束？”受之启发，在研读《红楼梦》以及红学相关著作的过程中，我头脑里一直盘旋着这样的一个困惑：《红楼梦》真的那么需要一个结局么？

如果说大荒山里无才补天的顽石到人世繁华的一遭行走是一个开始，那么无论说是延续恩泽，还是家道败尽，都无足以作为一个终了——人间的灯红酒绿、恩怨繁衰，与石头又何干。只缘有了情，石头没有补天之功，却能录天之美。曹雪芹公自石头上抄录了《红楼梦》，要记下的，是一个全息的历史，要对整个中华文明“摄魂”——实际上，他看来的，是当时代的全部人类生活。



本书作者裕德龄

在接手组织翻译这部晚清德龄公主的回忆录之前，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碰到心中困惑的答案。在粗粗地读完这部德龄公主的回忆录后，我惊奇地发现，它与《红楼梦》居然有着如此强烈的互文

性，真让人不得不信冥冥中的文化气数流转，更让人叹服曹雪芹先生的伟大。

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以最为平实的笔调，记述了一位在海外长大的满族贵族少女裕德龄，进入晚清宫廷中，陪伴“老祖宗”——慈禧太后度过的两年光阴。与时下林林总总的清宫小说相比，这部德龄的回忆录是货真价实的后宫实录：太后、皇帝、妃子、王爷、格格、贝勒、太监、女官、外国大使夫人、画师……帝国的战争与动乱，贵族的享乐与困境，权枢的斗争与较量……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与真事，却并不一定让人觉得距离多么遥远。所以，斟酌再三，把它定题为《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在这部第一手的后宫实录里，我们可以读到贵有满清天下的慈禧是如何养尊处优，如何享尽天下之福，如何度过乏味漫长的后宫生活，如何起居、吃饭、游玩、游戏、听政、养犬看戏、养花弄草、处理宫内纷争、结交列强之欢心……那后宫的世界，时时看来平淡无奇、时时看来又步步惊心，既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中国式人情味，又到处充满着浓浓的杀机。一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切又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是一部历史的正剧，每一章节读起来，都令人兴致盎然。

而说到这部书与《红楼梦》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就是说紫禁城里的世界，与曹雪芹公所描写的那个大观园世界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裕德龄的自述，她在宫廷里只呆了短短两载的光阴，担任慈禧的女官，服侍慈禧的起居。这两载的光阴像极了红楼所着力描写的“三春”。随着春夏秋冬的流逝，这位女官忘我地将青春好光阴与这位“贾母”般好享福、也会享受的老佛爷、老祖宗相伴。她们无非就是说说闲话，玩玩棋牌，养花种草，敬神拜佛，游园听戏，度了新年过元宵，度过端午过中秋，全然一派中国人的那么点气息。偶尔，涉及一些外交和国事，但也只是些情绪，仿佛只是享用不尽的好日子的点缀。所谓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那是一点不假；所谓人情练达皆是文章，宫中一切围绕着一位老佛爷的喜怒哀乐运转，也是一点不假；那些后宫里的太监、宫女、帝王、妃子之间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更

是一点不假。

德龄在紫禁城中的角色，太容易让我联想起红楼中那位游历天下、闯入大观园的薛宝琴。她在西方成长、受教育，回到了本土的宫廷，就像一扇窗子一样，给紫禁城里幽闭的男男女女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无限惊奇。与慈禧长年相处，也积累了深厚的情感。慈禧一度考虑她的婚配问题，要把她嫁给一个王爷。然而，已经见识了世界的小女子德龄，早已看破浮华，并且心中充满了抗争。最终，她像贾探春那样远嫁海外，甚至嫁给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这也证明了爱情与自由，远比身为王妃的荣华更为珍贵。

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在德龄的叙事中，真实得分毫毕现，活脱脱是红楼的宫廷版。而叙事背后，那种空虚、寂寥与刻骨的虚无，也是一点不差，读书入了境，多让人有“浮华一梦”的感触。

细细想来，我也似乎太少见多怪了。由于《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最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那么，它所描绘的大观园与真实的紫禁城，又怎么可能会相去太远；而德龄笔下的紫禁城世界，又如何不和行将一朝倾覆的满清王朝相映成趣？这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何我说《红楼梦》或许并不需要一个结局。其实，它是自然有结局的，这个结局在不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之中并不重要。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点，在“繁华盛世”中所诞生的《红楼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伟大作品，充满了预言的气质，恰如一颗顽石，硬生生地镶嵌在历史的轨道上，指示着方向。而德龄公主所著的这部回忆录，就是遵照红楼的气息而运的实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红楼梦》的结局之一。它所记录的人与事，都真实且忠实地生活在红楼未尽之处——虽然文采风流不及曹公的万分之一，但作者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还是鲜明可感的，令人由衷信赖。

一直以来，很多人努力要为《红楼梦》画上属于自己的句号。读完这部回忆录，我想，此举大可不必了。没有其他原因，历史自身已经给出了优美的终了。曹公自负自己的满腹才华是天运之子，而老

天，也就在冥冥之中完成了这位骄子的亡佚之笔。我想，能充当整个《红楼梦》大结局的，没有比1911年前后一整个满清王朝的命运更好的东西了。而这部《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就是历史的明证与天运的作品之一。

非常有幸能够邀请我的友人、青年作家许海峰先生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和编整。他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我仅负责译文的有限润色与修正。我们的英文修为不高，幸好原作者德龄公主也是如此。而许海峰先生对翻译工作的认真，尤其对于准确、晓畅明白的现代汉语译文的刻苦追求，同样值得读者信赖。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读者可以放心地通过我们的译笔，探求自己心目中这段历史趣录的答案。是为序。

原序

毫无疑问，德龄公主有着充分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本书。裕德龄，中国清王朝满族八旗中正白旗贵族裕庚侯爷之女，曾深居清宫两年，担任慈禧太后御前女官，深得太后宠爱，后被慈禧封为郡主衔位，或为其“公主”之谓的来源。

裕庚本姓徐，字朗西，汉军正白旗人。祖先本为汉人，后入汉军正白旗。光绪优贡生，初参两广总督英翰幕事，官太仆寺少卿，曾为清王朝授命，出使日本、法国，担任外交使臣。裕庚妻子为法国人，育有二子二女，长子馨龄、次子勋龄、大女儿德龄、二女儿容龄。这些子女均随父母在欧洲生活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法等语言。

裕庚侯爷在清王朝同时期的众多官员中，属于较为进步和开明、具有现代思维的人士之一。他年轻时加入军队，从军期间恰逢太平军之乱、清朝与法国之间的台湾战争，也曾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兵部侍郎，如此等等，度过了其从军生涯。后来，他被清王朝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1898年任期满了之后，任职于总理衙门（亦即清王朝的外交部）。1899年，裕庚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在法国度过了整整四年光阴。

在中国那段历史时期，满清朝廷冒历史之大不韪，一味地闭塞和拒绝，茫然地看着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在极端自负又是极度不安中，走向了穷途末路。裕庚凭借一己之力大声疾呼，力挺维新改革，并在德龄进宫伊始，就明确要求其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维新，进而促进中国的自强与发展。

裕庚在促进中国邮政走向现代模式的改革中，也付出过很多努力。同时，他在促进国家财政体系和海陆军现代化建设方面，也显示

了过人的才智和眼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裕庚卒于1905年。

裕庚的进步精神和前卫思想，还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上。当时，他做出了极为大胆的选择，让子女接受外国教育，这种情况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也因此曾广遭非议，甚至被视为崇洋媚外。他却并未因此改变初衷，去迎合他人的想法，依然将子女带到国外读书，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他的孩子们在教会学校接受了早期教育，女儿们随后进入法国的修道院接受教育。本书作者正是在那所修道院完成了学业，实现了从学校到社会的顺利过渡。

裕德龄刚刚回到中国，就被选入皇宫，担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她是个极为有心的女子，担任女官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处处留心观察与思考，不断收集本书的素材。

她也因此有充分的时间，近距离观察与评判慈禧太后——那位长期统治中国的独特女性——并以自己的讲述，为公众认识慈禧太后，认识清宫生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她为此倍受称道。

后来，她为去世的父亲守孝百日，从此离开了皇宫。1907年5月21日，她与美国人赛德厄斯C·怀特（ThaddeusC.White）喜结连理。裕德龄跟随丈夫到了美国之后，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最终将这段奇特的经历付诸文字，也才有了我们即将欣赏到的视角独特的清代后宫史。在本书中，她以慈禧身边人的特殊身份，凭借深切生动的笔触，入木三分地描绘了那位中国最有名女性的生活点滴、宫廷生活的习俗氛围等等。

是为序。

托马斯F·米勒德（ThomasF.Millaed）

1911年7月24日，上海

第一章　返国

1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亲结束了四年的法国大使生活，带着全家人，一等、二等参赞，海军随从及其家眷、仆人等等五十多人，从法国巴黎出发，乘坐“安南”号船只，前往上海。

我们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而欢迎我们到来的，却是一场瓢泼大雨，实在是很糟糕的体验。大雨如注，对我们的行程造成了很大的阻碍，我们一方面要安顿一大群人的住所，一方面又要照看繁杂的随身之物，真是糟糕透顶。

在此种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那些随从和仆人们当然是指望不上的，这并非我虚言，故意贬低他们的能力，而是早有以往的旅途经验充分证明。唯一可以依靠的，能让我们的心有着落的，只有我的母亲，她似乎有与生俱来的解决麻烦事的能力。

船只抵达法租界的上海黄浦码头，我们会见了衣装严整神情肃穆的上海道台（上海这个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地方官和其他府衙的众多官员，欢迎场面非常隆重。

上海道台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天后宫”，供我们这些人暂居上海之用。我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船只途经香港的时候，他就已经着人通过电报与此地法租界的侨民饭店联络，衣食住行皆有安排，诸事妥当不劳再费心了。

1895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我们曾在此“天后宫”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暂住经历，往事不堪回首，实在不想第二次踏进这同一条河流。虽然嘴上不说，父亲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却无一例外地非常赞同。

“天后宫”风烛残年久已失修，即便金玉其外，亦难免败絮其中。当时有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应尽地主之谊，为途经本地的高级官员提供住所，照顾好生活起居。路过本地的高级官员也大可不必拒绝好意，只管安然受用便是。我父亲却总是婉言谢绝地方官的安排，情愿自行解决生活起居问题，以求身心安适不受拘束。

经过了一番奔波和忙乱，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此时正有两封来自紫禁城的电报等着父亲，要求父亲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城。看似简单的命令其实难如登天，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通往天津的水路正逢冰冻，着实令人寸步难行。何况，我父亲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若没有医生悉心照料，实在难以撑得住舟车劳顿。若改道秦皇岛，那么一番乏味枯燥的长途旅行，更会让他体力难支，疲惫不堪。

鉴于这种种主客观困难因素，父亲不得不回电说，困难重重，实在难以即刻成行，恳请等到冰河溶解，便马上乘船北上，赶赴天津。

我们2月22日离开上海，26日顺利抵达天津。同当初抵达上海时一样，受到了当地道台和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表达尊崇的规矩很奇特，从外国归来的当朝高官，船只在中国海岸停靠，上岸后必须照例执行“恭请圣安”的礼仪（即参拜天朝皇帝）。

以当地道台的资历，尚不具备主持“恭请圣安”这等礼仪的资格。好在我们抵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身在天津。他安排了一名精明强干的随从与我父亲联络，并筹备好了“恭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诸事齐备毋庸赘言。

我父亲与袁世凯恭恭敬敬地穿戴好朝服、朝珠、顶戴花翎，立即赶往专为此类仪式斥资兴建的参拜之地万寿宫。众多职位卑微的官员早已恭候于此。

我们到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一些官员已经先到了。在这座半是宫殿半是庙宇的宏伟建筑殿堂中间，摆放着一只很长的窄几，

安放了皇帝和太后的牌位，上书几个大字：“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请圣安”仪式开始了，袁世凯立于窖几左侧，其他官员分立殿堂两侧。父亲进入大殿，径自朝前跪拜下去，高声说：“微臣裕庚恭请圣安！”随后询问圣体可好。袁世凯站在旁边代为回答说：“皇帝与太后圣体安康。”“恭请圣安”仪式到此结束。

我们一众人等在天津停留了三天，2月29日抵达了北京。我父亲当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无奈只得告假四个月，在家悉心诊治调养。他的恳求得到了慈禧皇太后的恩准。

2

当初前往巴黎之前，我们本来已经修建好了一处住宅，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很可惜，这处住所于1900年不幸毁于义和拳之乱。为此，我们无端端损失了至少十万两白银。此次入京，我们只得租下了一处住所临时居住，作为权宜之计。

我们从前的那处住宅也并非全新，是购置原本属于某位王爷的一处房产。那处房产虽陈而不旧，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古典建筑艺术魅力，令我们至今难忘。我们经过精心巧妙的装修和布置，饰以雕镂的硬木纹饰，使它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一座漂亮的西式风格住宅。我之所以称它为西式风格住宅，仅仅指其拥有西方建筑的外表，比如其中的门窗、曲径、家具等等，而房屋的总体格局和庭院气象，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扣的中国古典风格。正像北京城的其他中国建筑一般，拥有足足十英亩大小的花园，凸显出可供徜徉其间的闲适田园风格。

如此美妙的安居之所完工之后，我们仅仅居住了四天，就离开北京去了巴黎。这处房产最终毁于无情的战火。失去了这样华丽的居所，失去了耗费巨资和宝贵时间完成的安乐窝，这样残酷的事实，成为所有家庭成员的心头之痛，那种遗憾在心头挥之不去，历久而弥新。话说回来，作为中国高级官员所经受的考验和苦楚，又何止这些呢？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当真是一言难尽啊。

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种闲适清幽的风格魅力，占地面积亦较为宽广，我们当初的房子也不例外。那套宅院包括十六套平房，大约一百七十五个大小不一的房间，分布在四合院的各个方位。在四合院内，所有房间与房间之间以回廊相连接，足不出宅院，就可以穿梭往来于所有房间。

我的读者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众多的房间，哪里能用得完呢？其实也不难理解，试想宅院里除了我们众多家人之外，尚有很多的随从、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这些房间当然都各有去处物尽其用了。

那些房子周围的花园极具中国式风格，设置了小小的池塘，所到之处，莫不是小桥流水，鱼戏莲叶间，莲叶何田田；树上蝉鸣鸟声，清新悦耳；两岸垂柳依依，曲径通幽；两侧繁花似锦，一片胜景，引人入胜。1899年6月，我们准备远赴巴黎之时，宅院里正值满园繁花绿叶，交相映衬，见者无不凝神欣赏交口称赞。当时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而今，我们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天津的时候，父亲曾致电他的一位好友，请求为我们寻觅一处住所，好让我们回京后有个安身之处。

那位友人经历了一番周折，为我们找到了一处住所。有意思的是，这个住所很不一般，在京城乃至全国都颇有几分知名度。它是义和拳之乱后，清朝大臣李鸿章和外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最后驾鹤西归之所，他的灵魂最后归属地。

中国人的内心充满了迷信意识，他们认为若是有人住进了那所阴气过重的宅院，难免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横祸。正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谁敢住在那里，房子闲置了很长时间。我们成为了李鸿章死后第一批住进来的人。尽管有很多好友得知我们的打算后，极力劝阻，我们还是坚持了决定，最终十分舒适地住了进去，一切都相安无事。

当然了，世事难预料，要是考虑到我们家房产遭遇的大火和损

失，或许，他们那些关于遇到不幸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大火对于我们全家所造成的损失，永远也无法恢复和弥补了，真是令人遗憾和伤感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是朝廷命官，当然绝不可以监守自盗假公济私来弥补自家的损失，若那样做的话，当真是名节不保了。身为朝廷命官，理应一心为公为民请命，绝不该考虑一己私利，不能抱怨命运与生活。

3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带着儿子来看望我们，他说慈禧太后想尽快召见我们母女三人。我们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早晨六点，赶到颐和园的万寿山觐见太后。

我母亲向庆亲王解释说，我们这么多年身在国外，一直都穿戴外国服装，此次仓促而行，竟找不到合适的满族服饰可供穿戴。

庆亲王说自己已经将这些情况禀告了太后，太后认为我们初来乍到不必拘礼，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习惯穿外国服装，她恰好也想了解一下外国的着装方式。



颐和园的万寿山

为了这次难得的入宫机会，我和妹妹[1]在选择服装方面，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妹妹打算穿她那件淡蓝色的天鹅绒礼服，认为那种颜色最适合自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让我们穿同样的服装。这一次，我说自己还是更倾向于穿那件红色的天鹅绒礼服，我觉得慈禧太后应该会更喜欢这种颜色。经过了长时间的家庭讨论，大家最终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们戴上了插着美丽鸟羽的红色帽子，穿上了相同颜色的鞋袜，整体效果与预想的全无二至，非常亮眼。母亲则穿上了浅绿色的天鹅

绒礼服，礼服上镶着淡紫色的花边，头戴装饰着白色鸟羽的黑天鹅绒帽。

我们的住所位于北京城中心，距离目的地颐和园万寿山约有三十六华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轿子。为此，我们计算了一下时间和路程，最后的结论是：必须凌晨三点出发，才能在六点之前到达。

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入宫觐见。庆亲王带来的消息确实很让我们惊喜，当然也正因为此行的重大意义，使得我们也在是否穿着得体、能否准时抵达等问题上，很是费了一番心思。

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机会走入皇宫，亲眼目睹它神秘的威仪与风景。这愿望曾经遥若星辰，可望而不可即，毕竟，我们这些年一直在京城之外，甚至，身居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促成我们至今才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至关重要，那就是我和妹妹出生之后，父亲没有将我们的名字记入满洲政府儿童出生登记册。因为这个原因，在从巴黎回到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才知道，原来裕庚还有两个女儿，这才为最终的召见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父亲曾说过没有登记我们名字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让慈禧太后知道我们二人的存在，从而失去接受国外优良教育的好机会。按照当时满族风俗，凡是朝廷二品以上官员，其女儿到了十四岁的时候，都必须入宫服侍，有的可能会被选作皇帝的妃子，慈禧太后当年就是这样入宫，之后被咸丰皇帝选中做妃子的。父亲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有更好的安排，所以做出了完全与众不同的选择。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们出发了，乘坐着轿子匆匆穿行于漆黑的街道。我们乘坐的是四人抬的轿子，轿子的四边各有一名轿夫。徒步行走这样长的距离，很耗费体力，必须有两班轿夫轮流换班才能撑得住。所以，我们的三乘轿子，足足配备了二十四名轿夫。每乘轿子前还有领班轿夫，各有三名骑军护卫，后面还有两名仆人。轿子的后面跟随着三辆大车，供换下的轿夫轮流休息。这样算来，整个队伍共有四十五人、九匹马、三辆大车。

夜色四沉，周围寂静无声，人与车马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犹如空谷回响。黑夜沉寂无声，更显出轿夫喝道声的粗粝与马蹄声脚步声的幽远，这种经历真是令人倍感压抑。我的读者大概没有过此类经历，那真是让人很不舒服，有种沉入水底的气闷感觉。

道路上时有石块与坑洼，天又黑，轿夫走在其间必须小心翼翼。轿子颠簸，坐在里面的人必须始终保持笔直坐姿，才能让轿子保持平衡和稳定，时间长了非常难受。这段路如此的漫长无际，好不容易捱到了颐和园，我感觉浑身肌肉僵硬，疲惫不堪。

第二章　入宫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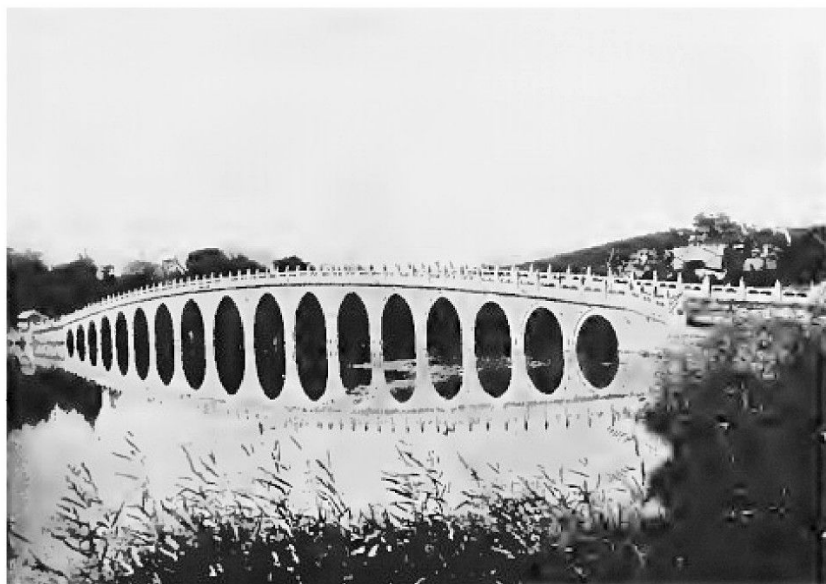
大概走了全程的一半，我们抵达了城门。此时城门已然大开，我们可以畅行无阻。这种情况令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按照惯例，平时城门都是在晚上七点关闭，除非特殊情况，绝不会在第二天清晨之前打开。我们询问城门守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守卫告诉我们，上头早有命令，让他们早早打开城门，保证我们一行的顺利通过。

经过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官员穿着整齐的朝服，站立道路两侧，向我们众人施礼，态度恭敬。

入了城门之后，天地之间依然为无边的夜色所笼罩。我回想自己短暂的人生经历，感觉如今天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前所未有，今天的经历实在是太独特了，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暗暗琢磨，现实中的慈禧太后该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见面之后，她是否会喜欢我呢？我们已经从庆亲王口中得知，太后有意要将我们留在宫中。我琢磨要是真的能这样，我将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影响太后的思想观念，进而促成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我为自己设想的光明图景感到由衷的欣喜，若是设想能够付诸实践，我定然会竭尽全力。

正当我还沉醉在美好的想象中时，地平线上展露了一缕淡淡的红色晨曦，预示着美好的一天即将在芸芸众生眼前徐徐露出容颜。随着刚刚初露的晨曦越来越明亮，美好的风景在我眼前慢慢清晰起来。颐和园越来越近，我能看到宏伟壮观的红色围墙，在起伏的小山之间蜿蜒向前，环绕在颐和园周围方圆之地。在清晨明亮阳光的照耀下，宫墙与宫殿顶上黄色或者绿色的琉璃瓦光芒绽放，宛如一幅幅亮丽的风景图画。



颐和园中的桥

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些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宝塔，到达了海淀村，距离颐和园只有四华里的路程了。我们被告知再前行一小段，就可以抵达目的地。这消息真是及时雨啊！让人心情大畅。我刚才甚至以为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呢。

海淀村风光无限，看上去非常美丽，其中遍布砖头砌成的平房，都十分的整洁、素净，无论外形还是环境，都和中国北方的房屋类型一样。孩子们跑出来簇拥着观望这一大队人与车马。我听见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这些女子是被选进皇宫里做皇后的。”我听了真是忍不住笑到肚子痛。

走过海淀村不久，我们来到了一处牌楼前（形状像那种拱门）。牌楼是中国古老的建筑形式，它们精雕细琢巧夺天工。从牌楼处看过去，颐和园的宫门已经近在咫尺，大约在我们前面的一百码即到。有几处大门分布在围墙的周围，一个大门在中间，两个小门分居两侧。居中的大门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此时左边的那个小门开着，我们的轿子在那门前停了下来。

在这些门的外面大概五百米的地方，有两处房子。晚上，里面驻扎着镇守颐和园的禁卫军。

刚到颐和园门口，我就看到一些官员在比比画画，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有几位此时跑进去大喊：“来了！到了！”等我们下了轿子，马上有两位太监迎上来，他们是四品宦官（从他们的顶戴花翎可以看出品级）。他们帽子上的花翎是一种叫做“马鸡”的羽毛，这种禽类产自中国的四川省，它们的羽毛灰黑皆有，比孔雀翎要宽上许多。

在我们下轿之后，那两位太监带着十名小太监，把几匹黄丝帘披挂在轿子上。他们是在太后的授意下这么做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荣耀。我留意看了看，那些黄丝帘大约十英尺长二十英尺高，两位太监共持一匹。

两名品衔较高的太监站在大门两侧，恭恭敬敬地迎接我们进入。走进大门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足足有三百平方英尺的大庭院，地面以青砖铺就。院内有很多小花坛，还有很多古老的松树柏树，上面挂着形态颜色各异的鸟笼子，里面各色鸟雀鸣声啾啾。

对面是一排红色宫墙，上面也有三个大门，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长排低矮的建筑，各有十二个房间，是作为接待客人之用。我们走在这所大院子里，看到很多身着不同品级朝服的官员来来往往，看上去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仔细观察，他们似乎仅仅是佯装忙碌而已。他们看到了进门的陌生面孔，都停下来默默地望着我们。

2

两位太监引领着我们进入了其中一间会客室。房间大概有二十平方英尺大小，里面摆设着普通的黑色木质桌凳，上面铺着红色的布垫子，三个窗户上悬挂着丝质窗帘。

我们在这个房间等了不到五分钟，便有一位穿着华美服饰的太监走进来，对我们说：“太后有旨，请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到东宫等候觐见！”华服太监宣完懿旨，陪我们进来的两位太监马上虔诚跪拜，

道："喳！"按照规矩，无论是谁接到太后的圣旨，都要像见到太后亲临一样，诚惶诚恐，跪拜接旨，以示尊重。

然后，他们又领着我们穿过一个左侧边门，进入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和前面的那个大致相同。只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背面坐落着仁寿宫，而且这院子里的建筑规模比前面的大一些。

两位太监领着我们步入东面的房间，这里的陈设布置十分华美，红木家具上的雕饰玲珑有致，考究精美，桌椅上都铺设着蓝色的绸缎，墙上悬挂着相同材质的装饰品。房间的不同位置悬挂着相同尺寸和形状的挂钟，我数了一下，竟然多达十四个。

等了不大一会儿，有两位宫中侍女走过来，告诉我们太后正在梳妆打扮，请我们略微等一等。这所谓的"略微等一等"，足足耗费了我们差不多两个半小时。此类"漫长的等待"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乃是司空见惯，我们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为此感到焦急不安。

在这段时间里，有太监往来，为我们送来了牛奶和二十几种不同花样的点心，这些都是太后特别赏赐给我们的。另外，太后还赏赐了我们每人一枚精美的金戒指，中间镶着大个儿的珍珠。

又过了一会儿，宫中太监总管李莲英身着朝服而来。李莲英应该是二品的官衔，头上戴着装饰有孔雀翎的红顶戴。他是宫中唯一有资格使用孔雀翎红顶戴的太监。他是个很丑的老人，脸上满是核桃皮一样的皱纹。但是他颇有风度，很注重礼仪，且注重细节。他说太后马上就会召见我们，让我们等一等。他还为我们带来了太后赏赐的玉戒。

太后在见到我们之前，就这样慷慨地赏赐精美礼物，我们真是又惊又喜，心想她真是位极令人尊重的人，让人倍感亲切，心里暖洋洋的。

李莲英离开之后不久，庆亲王的两个女儿进来了，询问陪同我们的太监，我们会不会说中国话。这真是好玩的想法，她们真是太有意

思了，我听了忍不住发笑。

我干脆主动开口，告诉她们，我们虽然会说几种外国语言，但是依然不会忘记中国话。她们大惊小怪地嚷道："啊，多有意思啊，她们的中国话说得和我们一样好啊。"

这下子轮到我们惊讶不已了。真让人难以想象，皇宫中竟然有这样缺乏见识的人。毫无疑问，在皇宫的环境中，她们这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获得知识的渠道是极其有限的。

她们来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太后已经准备好召见我们了。我们毫不迟疑，谢过她们之后，马上起身前往。

这次同前面的过程很相似，我们又穿过了三道门，经过了三重院子，来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里面雕梁画栋，浓墨重彩，宛如琼楼玉宇。很多牛角灯笼挂在大殿的屋檐之下，红色的流苏直垂下来，每个穗子底端各吊着一块美玉。有两间小殿位于正殿两侧，也同样的精雕细琢，挂满了装饰着红流苏白美玉的牛角灯笼。

我们在大殿的门口遇到了一位宫女，她所穿着的服饰和庆亲王的女儿相差无几，相对特殊的一点是，她的头饰正中多出了一只展翅凤凰，衬托出她的高贵典雅与鹤立鸡群。

这位女子面带微笑，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使用的竟然是标准时髦的外国礼仪。后来我们得知，这位女子乃是皇后，当今光绪皇帝的妻子。她对我们说："太后命我来迎接你们。"她的语声亲切，举止彬彬有礼，容貌倒不是很出众。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自大殿传来："请裕太太和两位姑娘立即上殿。"我们马上听命走了进去，看到一位老年女性端坐殿堂中央，身上穿着绣满大朵红色牡丹花的黄色锦缎袍，发冠周围缀满珍珠、玉石和翡翠等物，发冠左侧垂下一条珍珠流苏，中间缀着一只用纯而又纯的翡翠雕刻而成的凤凰。

她的黄锦袍外面罩着一件披肩，我从未见过如此华贵和精美绝伦

的东西，这件披肩起码用了三千五百颗左右鸽子蛋那么大的珍珠连缀而成，每颗珍珠都是相同的大小与色泽，真正的珠圆玉润。披肩呈现渔网形状，两边缀着玉制装饰，以两块纯玉扣连结。



慈禧太后

除此之外，太后的手上还戴着两只珍珠手镯、一只玉手镯、几只宝石戒指。她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上，各戴着一只纯金护指，足有三英寸长，左手的两根手指上，戴着同样长短的玉护指。她的鞋子上也装饰着珍珠小流苏，镶嵌着各种造型五颜六色的小块宝石。

看到了我们，太后站起身向我们招手，脸上洋溢着迷人亲切的笑容。她很惊讶我们竟然如此熟稔宫廷礼仪。与我们寒暄之后，她对我母亲说：“裕太太，在教育女儿方面，您可真是很有一套啊，尽管在外国这么多年，她们的中国话说起来竟然和我一样的好啊，您是怎样教育她们如此温润贤淑、彬彬有礼的呢？”

“她们的父亲管教很严，”我母亲回答说，“他首先让她们学习本国的语言，而且她们自己也的确不忘祖训，专心好学。”

“我很高兴，听到她们的父亲能这样照顾好她们，”慈禧太后说，“还能给予她们这么好的教育。”

太后拉着我的手，仔细地端详着我，她亲了亲我的面颊，微笑着对我母亲说：“您的女儿们真是招人喜欢，何不留在宫中陪着我呢。”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马上对她的恩典表达由衷的谢意。

太后接下来问了我们与巴黎服装有关的很多问题，她希望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穿着习惯，因为她常年深居皇宫，极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装束。她对我们所穿的“路易十五”款式的高跟鞋，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我们谈得热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一直静静地站在不远处。过了一会儿，太后说：“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当今皇上吧，不过，你们应该称呼他为万岁爷，称呼我为老佛爷。”

皇上腼腆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他是一个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的年轻人，非常瘦弱，高高的额头，眼睛大而明亮，挺直的鼻梁，大大的嘴巴，唇红齿白，形象优雅，气质突出。我们在场的时候，他一直微笑着。但我能够感觉的到，他文雅有礼的微笑背后，总有种掩饰不住的忧郁。

3

这个时候，李莲英过来了，跪在大理石地板上禀告说，太后的轿子已经准备好了，请太后起驾。太后让我们和她一起上早朝。后来得知，在相隔大约两分钟路程的地方，还有一所大殿，太后每天早上都在那里接见各部大臣，这便是早朝。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太后的轿子已经等在了外面，这顶轿子精美绝伦，八个身着朝服的太监抬着。李莲英跟在轿子左侧，另一名二品太监跟在右侧。他们与轿子保持着相同的前进速度，分别以手扶持着轿子以保持平稳前行。四名五品太监轿前开道，十二名六品太监跟在轿子后面。

轿子旁边的每位太监手里都拿着东西，比如太后的衣服、鞋子、手帕、梳子、刷子、粉盒、大小不一的镜子、香水、别针、黑色和红色墨水、黄色的纸、香烟、水烟，最后一位太监手持太后的那只包裹了黄缎的凳子。另外，还有两位嬷嬷（皇宫内部老年女性仆人）和四名宫女也拿着东西。皇帝走在左边，年轻的皇后和宫女们则跟在右边。这个前进的队伍看上去应该非常有趣，日常用品一应俱全，会让人感觉好像是哪个贵族女子的梳妆室自己长了腿脚，跑到外面来了。

朝堂大概有两百英尺长，一百五十英尺宽，堂内左侧摆放着一张铺着黄绸缎的长桌子。慈禧太后下了轿子步入朝堂，登上这张宝座面见各部大臣。皇帝坐在左边一张小一些的椅子上。各部大臣隔着宝座，齐刷刷跪在太后对面的地上，个个屏息凝神，庄严肃穆。



慈禧太后身穿百蝶服，衣摆之下可见鞋子，鞋子上镶满珠宝

在朝堂的尽头，有一座大约二十英尺长、八十英尺宽的大大的“坛”，环绕着大约二英尺高的护栏，护栏精雕细琢非常华美。护栏的前面有两条通道，与六级台阶相连接，同时设置了两扇门，很窄小，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坛的最里侧还布置了一个小小屏风。太后的宝座正是在坛的正中间位置，紧挨着御座的后面，安设了一个

很壮观的木质大屏风，二十英尺长、十英尺高的样子，上面雕刻着各类图文，精美绝伦夺人耳目，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精美的木刻。

坛上的各类物品陈设和整个朝堂大殿一样，大部分为紫檀木质，无一不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凤凰和高贵典雅的牡丹图案。太后的宝座左右两侧，各竖起一柄孔雀翎做扇叶、以乌檀木为柄的大型銮扇。朝堂大殿内的所有陈设物品，都铺着明黄色的天鹅绒垫子。

太后准备登上宝座的时候，曾吩咐我们几个人和皇后、宫女们一起，躲到屏风后面。站在那个地方，太后和各部大臣们之间的谈话声清晰可闻。我的读者朋友们不久之后便会了解到，我是多么好地利用了这个“有利地形”，了解早朝上君臣们共同商讨的各类信息。

第三章　宫戏

1

这一天的皇宫生活很丰富，给我留下了鲜明独特的印象。

对于那些信息封闭、见闻狭窄的宫中女子来说，我们简直是太奇特的存在了。她们一连串的问题雪片一样飞向我们，等待我们的回答，问题无非是关于外国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等。

我很快就发现，这些宫中女子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女人们一样，对自身认知经验之外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感，也特别喜欢闲聊。

庆亲王那个相貌出众的四女儿（宫中称“四格格”）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她问我：“你是在法国出生和接受教育的么？我听别人说，凡是有人到了外国，喝了那里的水，就会很快完全忘记自己的国家。你是通过学习通晓了那里的语言，还是喝了那里的水才最终学会的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干脆不做回答，而是向四格格提起自己曾经在巴黎见过她的哥哥，也就是载振贝勒。那个时候，载振贝勒途经巴黎前往伦敦，去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当时我的父亲也收到了一份加冕典礼的特别邀请，我们本可以顺道和载振贝勒一同前往的，但是因为父亲要处理云南问题——那个问题当然更加紧迫——无奈只好放弃行程。

四格格追问我：“啊，英国也是有国王的么？我原以为我们的皇太后是全世界唯一的女皇呢。”她的姐姐，也就是皇后的弟媳妇，是一位非常聪慧、娴淑温柔的女子，一直站在一边微笑着，凝神倾听妹妹那些大惊小怪又很可笑的问题。

听到了四格格这些幼稚的问题，年轻的皇后说道：“你多么无知啊。据我所知，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执政者，有的国家是共和政体，比如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对我们比较友好的共和政体国家之一。很遗憾，我们那么多平民百姓到了他们的国家，让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都是这等平常之辈呢。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些满族正宗的皇族贵胄过去，让他们也见识见识我们的高贵风度。”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自己正在阅读介绍外国历史的书籍，当然，都是翻译成中文的。她看上去满腹诗书，颇有见识，非常与众不同。

2

待到退朝了，百官散去，太后令我们从屏风后面出来，陪着她一起去看戏。她说，这样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真该出来走一走。我们于是开始步行，保持在太后身后不远的距离，这是宫廷内部严格的日常规矩，任何人都无可逾越。

一路上，太后兴致很高，时不时指指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东西给我们看，那些都是她特别喜欢的。因为步行位置的原因，她必须不断回头和我们说话，最后她干脆让我们和她并行。我后来得知，能与太后并行，这在宫中是很大的恩典了，太后平时极少这样对待别人。

太后和很多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宠物和个人爱好，比如养些花草树木、狗儿或者马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一条狗儿特别得到太后的喜爱，算是她最得意的宠物了。这条小狗一直跟在太后左右，几乎形影不离，是我见过的最温顺乖巧的动物。因为实在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来称呼这条狗，太后觉得它毛色油亮顺滑，特别漂亮，就干脆叫它“水獭”。

在距离朝堂不远的地方，我们进入了一处大院子。院子内部的四边，各有两只大花篮，高约十五英尺，以茂密的紫藤经过精心修剪后自然长成，精巧而美丽，令人叹为观止。很显然，太后非常喜欢这些简约却不简单的花篮，总是在繁花似锦的时候，自得地展示给大家欣赏。



慈禧太后早朝之后前往戏院；她的左边是隆裕皇后。她的爱犬“水獭”卧在脚下。左一为太监二总管崔玉贵，右一为太监大总管李莲英

通过了这个大院子，我们又穿过一条环绕着假山的曲径，花了很短的时间，一直走到宫廷戏院。

那戏院真是超乎常人想象，它沿着露天庭院的四边因势而建，每边都彼此分开并各有不同。戏院共有五层，一二两层的舞台完全敞开，一个在另一个之上，上面三层用作储藏室和张幕之用。其中第一层比较普通，第二层建的像一座庙宇，主要用于演出太后最喜爱的神仙题材戏剧。

戏台的两侧各有一排低矮建筑，由同样狭长的走廊连着，是王公大臣们获得恩典，陪同太后看戏的所在。戏台的正对面是一排宽敞的建筑物，包括三个大屋子，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这大型观戏台的地基高于地面约十英寸，和戏台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观戏台前面设置了很大的玻璃窗子，夏天的时候可以撤去玻璃，换上蓝色的纱帘。三间房子的其中两间作为起居室，剩下的最右边那间，作为太后的卧室，前面摆放了一张很大的床榻，太后可根据自己的心情，坐卧舒展两相宜。这一天，她带着我们正是进入了这间屋

子。

我后来得知太后经常来这间屋子，看一会儿戏剧，然后开始午睡。她可以睡得很踏实，戏剧现场的吵闹声一点儿都打扰不到她。如果我的某些读者有机会来到中国宫廷戏院，亲身体验一下，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在那种喧闹的锣鼓声演唱声中，若还能一如既往沉稳入梦，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3

我们走进房间坐定，戏曲便开场了。那出戏名为《蟠桃会》，所谓仙界的蟠桃盛宴，传说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举行。

第一幕拉开，只见一位身着黄色僧袍、左边肩膀披着红色袈裟的僧人，驾着祥云从天而降，邀请各路神仙同赴蟠桃盛会。看到那名演员轻巧敏捷地在棉花做成的祥云上腾挪翻滚，我真是惊奇万分。

舞台上的布景在不断地移动变换，加上其他的一些奇怪好玩的东西，真是多姿多彩，非常有意思，让人感到兴致盎然。我想这戏院的管理者应该在训练演员方面下了很多苦功夫，演员才能不借助任何器械，徒手做出这些令人咋舌的高难度动作。

在僧人降临的同时，一座宝塔自舞台中间徐徐升起，宝塔中有一位菩萨手持香炉，高声吟诵佛经。随后有四座小型宝塔从舞台的四个角落升起，每一座中间都同样有一位诵经的菩萨。第一位神僧降临地面，和其他几位菩萨走出宝塔，共同环绕舞台中央，吟诵不止。那五座宝塔转瞬间便消失无踪了。戏台上的佛僧不断增加，最后比肩围成一个圆圈，绕场走动，齐声吟诵佛经，场面蔚为壮观。

过了些时候，戏台上升起一座大莲花，以粉红色的丝绸制成，带着两片绿色的大荷叶。绿叶和荷花花瓣渐次张开，我看见一位美丽的女菩萨（观世音菩萨），身着白色的丝绸衣装，戴着白色的头巾，立于莲花中间。莲叶打开之后，又出现一对金童玉女，分侍观世音菩萨两边。待到莲花完全打开，观世音菩萨渐渐升起，莲花渐渐合拢，最

后观世音菩萨站在了合起的莲花尖顶。童女站立于右侧的荷叶，手捧玉净瓶与柳条。据传说，只要观世音菩萨以柳条蘸起玉净瓶中的甘露洒到死去的人身上，可保起死回生。这对金童玉女是观世音菩萨的侍者。

最后，观世音菩萨与侍者从花叶上走下来，加入了那些佛僧中间。这时，天宫的王母娘娘降临了，那是一位面目慈祥、体态端庄的老年女性，满头银发，从头至脚的黄色衣装，身后跟随着很多侍从。王母娘娘登上位于戏台中央的宝座，说道：“现在，宴会开始吧。”戏剧第一幕到此结束了。

第二幕紧接着开始了，戏台中央是王母娘娘的盛宴桌子，上面摆放着蟠桃和各种美酒。四名侍者在桌边打点。忽然，一只蜜蜂飞过来，在侍者的鼻孔边撒下了一些粉末，侍者马上沉沉睡去了。蜜蜂变成了一只大猴子，一阵风卷残云，几乎吃掉了所有的蟠桃，喝尽了全部的美酒，临了，还裹走了剩下的东西。如此大快朵颐之后，猴子偷偷溜走了。

宫廷仙乐响起，王母娘娘带着那些佛僧、菩萨、侍从走进来。王母娘娘看到桌上的蟠桃与美酒都已不翼而飞了，赶紧叫醒那四名侍者，询问为什么他们睡着了，那些蟠桃与美酒都到哪里去了。侍者均禀告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等待王母娘娘和宾客的时候，莫名其妙就睡着了。

其中一名宾客建议，不如先查查到底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于是，王母娘娘派了两名侍从到守门的卫兵那里了解情况，询问这段时间究竟有谁出入过这个地方。

没等前去打听的侍从回来，先有守门的卫兵来禀告王母娘娘，刚刚有一只醉醺醺的猴子，扛着一个大包裹出门去了。王母娘娘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派出天兵天将和几名菩萨，一同去寻找那只胆大妄为的猴子。

那只猴子本是由一块大石头所生，住在一座大山洞里。它有腾云

驾雾的神奇本领，王母娘娘想召它进入天庭看守御果园。待到天兵天将等一众到了那座山上，看见猴子正与其他同类大摆盛宴，分享从天上偷来的珍味。

天兵天将马上向猴王宣战。猴王前去迎战，天兵天将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它拔下一撮毫毛，变成了很多小猴子，各个手持铁棒抵抗前来侵扰的天兵天将。猴王的那只铁棒更是非同寻常，乃是东海龙王送给它的，可根据意念随意变形，小到像绣花针，大到如擎天柱。

与天兵天将一众同来的有一位神仙，名叫二郎神。他长着三只眼睛，法力最为高强。二郎神有一条凶猛异常的神犬，他放出神犬，扑倒了猴王，将猴王擒到天庭。

王母娘娘命令将猴王交给道家之神太上老君处置，太上老君把猴王放进自己的炼丹炉中大火焚烧。炼丹炉中烈火熊熊燃烧，太上老君把猴王扔进去，严加看管防止猴子逃出。炼了很长时间，太上老君觉得应该烧化了，便心下懈怠，放松了看管。

然而，猴子并没有被烧死，它趁着太上老君离开的短暂时间，动用法力逃出了炼丹炉，顺便偷拿了太上老君装在葫芦里的丹药，逃回山洞去了。猴子深知太上老君的金丹法力无边，任何人吃了都可以长生不老。猴王吃了一颗，觉得味道很好，就把余下的赏给了小猴子们。太上老君回到宫中，发现猴子逃走丹药被偷，立即禀告王母娘娘。第二幕到此结束了。

第三幕开场，天兵天将和菩萨再次来到凡间，聚集在猴王的洞口，向猴王宣战。猴王大喊：“好哇，还敢再来？”它大声嘲笑那些天兵天将的无能。他们开始打了起来，天兵天将还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连二郎神的哮天犬都奈何猴王不得。天兵天将一众最终败北，无奈丢盔弃甲返回天庭，向王母娘娘禀报战况，说那猴子委实法力无边，兵将无法将其捉住。

这次王母娘娘下令召来了一位小神，大概十五岁的样子，名字叫做哪吒。哪吒年纪虽小，却法力无边。他是莲花化成，莲花为骨，莲

叶为血肉，所以能够随心所欲，百般变化，十分神勇。王母娘娘命令哪吒赶往花果山，将那猴子擒上天庭严加处置。

哪吒来到花果山，猴王见了他，大喊：“什么？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来挑战？若是你真觉得可以打赢我，尽管放马过来！”哪吒马上变作了一位三头六臂的巨人，猴王见此，立即也跟着变作三头六臂。哪吒见状，又变作更大的巨人，追赶着去捉那猴子。猴子化作一支宝剑，将巨人拦腰斩为两截。哪吒又变成熊熊烈火去焚烧猴王。猴王变成大水，冲熄了烈火。哪吒见不敌猴王，马上变作一只凶猛异常的狮子，谁知猴王变成了一只大网，罩住了狮子。哪吒见实在没有办法取胜，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天庭，向王母娘娘禀告，说那猴子当真是法力无穷无尽，自己亦是难以取胜。

王母娘娘万般无奈，只得请来众神之神如来佛祖，还有普济苍生的观世音菩萨，下界擒那妖猴。

如来佛祖与观世音菩萨来到花果山，那猴王出来一见，乃是众神之神、法力无边的如来驾到，顿时诚惶诚恐，不敢再说半个不字。如来佛祖伸手指指猴子，猴子马上跪拜地上。如来对猴子说：“跟我走吧。”然后以法力把猴子压在了一座山下，告诉它说，除非它一心向善，否则不会放它出来。

如来对猴子说道：“有朝一日，我会放你出山，要你保卫一位圣僧前往西天求取真经。西行路上一路艰难险阻，你将遇到无数考验，历经无数磨难。如果你能保卫圣僧取到真经，你将脱去愚顽之性，洗去从前罪孽，修成真身正果，从此永驻天庭，过上极乐永生的生活。”

这场戏剧到此结束了，非常的有意思，我从头到尾保持了很高的兴致观看。整出戏剧排演得十分巧妙和逼真。我真是奇怪，宫廷的太监怎么能演得这样精彩。太后告诉我们，整个场景的布置与绘制都是太监们亲力亲为，她自己也尽量地为太监们指导排演，才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4

这里的剧院与一般常见的中国剧院有明显不同，安装了可供升降的幕布。慈禧太后并没有看见过外国的剧院，我真想不通她怎么会有这样先进的设计思维。

太后还经常阅读宗教类书籍和神话故事，然后亲自写进戏剧并排演，并对完满的演出效果深感自豪。



左起：瑾妃，德龄，慈禧，容龄，容龄之母，隆裕皇后

慈禧太后安坐谈笑，我们站在一边凝神倾听。太后问我们能不能看懂戏剧的故事情节，我们回答说看得懂，她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儿，她热情地说：“哎呀，我光顾着和你们说话了，把午膳的事情都忘记了。你们肚子饿了吧？你们身在外国的时候，有机会吃到中国饭菜么？想不想家？要是我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么久，肯定会想家的。当然了，在异国他乡居住那么久，也并非是你们的问题，是我派裕庚到法国巴黎去的。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遗憾。现在你们可以让我面上有光了，我为你们感到自豪，我也可以把你们展示给外国人，对他们说

咱们满族的女子也能说外国话了。”

在太后说话的当口，我看见一些太监摆上了三张大桌子，每张桌子上都铺着漂亮洁白的桌布。还有一些太监捧着食盒在庭院里站立等候。那些食盒和盘子均为木质，涂着黄色的漆，比较大，足以容纳四只小碗两只大碗的饭食菜肴。

等到桌子摆放齐全，庭院里的太监们在院子的小通道处站作两排，将手中的托盘一个接着一个地传递过来，一直传递到房间里，再由四个衣装华美的太监一件一件摆上桌子。

很明显，太后并不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用膳，而是到了哪个喜欢的地方，就在哪里用膳。我还注意到，那些碗无一例外的是凸显尊贵的金黄色，上面盖着银质盖子。有的上面描绘着绿色的龙，有的则雕刻着“寿”字。

菜肴摆放完毕，我暗暗数了数，差不多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菜肴，列成了长排，一排是大的碗，一排是小的碟子，然后又是一排大碗，又是一排小的碟子，就这样一排又一排。

在菜肴的行列不断延伸的时候，两位宫女走进了这间卧室，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只大食盒。我感到非常惊讶，想不到宫女竟然要做这类事情，若是我们进了宫，是不是也要做这些事情呢？尽管餐盒显得很是沉重，但是并不妨碍她们以优雅的姿势捧着。

太后面前摆放了两张小桌子，宫女打开食盒，拿出了一个又一个精致的碟子，分别装着各式甜点，糖莲子，西瓜子，各色口味的核桃，切片的时令水果等等。这些碟子很快摆放停当。

太后告诉我们，相对于肉食类菜肴而言，她更喜欢这些甜点。她赏赐了我们一些甜点，让我们随便吃，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不要拘束也不要客气。我们谢过她的恩赐，开始认真品味起来，吃得津津有味。

我发现慈禧太后食欲很好，她从不同的盘子里吃了不少东西，真

难以相信她待会儿还要吃午餐。吃完了之后，两位宫女走进来收拾了碗筷。慈禧太后告诉我们，每次她吃完了，都把剩下的菜肴赏赐给这些宫女。

一位太监端进来一杯茶，茶杯由洁白无瑕的美玉制成，茶托和杯盖都是黄金制就，极尽华美。接下来，又有一位太监走进来，手里托着一只银质托盘，上面放着两只白玉杯盏，和前面装茶的那只完全一样，我看到其中一只装着金银花，另一只装着玫瑰花瓣。另外，这位太监还备着一双金筷子。两位太监跪在太后面前，举起托盘，保证手中物品太后伸手可及。

太后拿开杯盖，夹了几朵金银花放进杯子里。她一边饮茶，一边对我们讲着，她本人非常喜欢这种金银花，放到茶里一起慢慢品尝，可以品味到淡淡的甜香味儿。

转眼间，太后又说道："你们也尝尝我的这种茶吧，看看是不是也会喜欢。"她命一位太监拿来相同的一杯茶，并亲自泡进了金银花，看着我们慢慢品尝。这是我品尝过的最为可口的茶，加入了金银花之后，散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细腻的甜香味道。

第四章　后宫午膳

1

喝完茶之后，太后让我们跟着她到了另外的一个房间，那里面午膳的桌子都已经准备完妥。我暗想，太后刚刚就已经吃了不少，不知道午膳还能不能吃得下。

不过，答案很快就摆在面前了。太后一走进屋子，就命令女官和太监们将所有餐具的盖子统统拿去。她坐在了上位，让我们站立于桌子下首位置。太后告诉我们："本来呢，按照以往的习惯，在看完戏之后，皇上是要与我一起共进午膳的，不过他的性格是比较害羞的类型，和你们又只是初相识，就不来参加午膳了。我真希望他以后能够克服羞涩。今天，你们三位就陪我共进午餐吧。"

如前所述，我们当然知道这是非常大的恩典了，就一起跪下来磕头谢恩。所谓的磕头谢恩，就是弯腰曲背将自己的脑袋碰到地面上，这个动作一开始让我们非常的疲倦和眩晕，后来才慢慢适应下来。

我们开始共进午膳，太后命太监为我们分发了碟子，并且为我们准备了银质的筷子、勺子等等。她说："我很抱歉，要让你们站着吃饭，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坏了祖宗立下的规矩。哪怕是皇后在我面前吃饭，也必须是站立的。其实我也知道，若是外国人知道我让宫廷女子们站着吃饭，一定会笑话我们是野蛮人。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把我们所有的宫廷礼仪都看在眼里。以后你们会慢慢看到我在外国人面前表演得多么辛苦，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就是万万不能让他们全部了解宫廷规矩。"



慈禧冬景照

太后和我母亲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她。她刚才在卧室里吃了那么多的甜食、干果之类，现在竟然又吃了很多食物菜肴，食量之大，食欲之强，食速之快，令人咋舌，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惊讶。

说到菜肴，牛肉在宫中被列为禁食之列，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认为，屠宰或者食用这类为人们的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动物，那可是罪孽深重的，死后都要下地狱。宫中的菜肴主要包括猪肉、羊肉和野味、鸡鸭鹅等家禽和蔬菜等等。

这顿午膳我们吃到了以十种不同方式烹制的猪肉，包括肉丸、切肉——切肉分为红白两个种类，其中红的那种切肉是用特殊的豆酱烧制而成，色泽红润，香气扑鼻，吃上去味道好极了。另外，还有竹笋炒肉丝、樱桃烧肉块和洋葱炒肉片。洋葱炒肉片这道菜很为太后所喜爱，不得不承认，吃过之后，我感觉这道菜确实非常的美味。另外，还有以猪肉、鸡蛋和蘑菇做馅料，经过煎炸而成的饼；还有猪肉卷心菜、萝卜烩菜等等。那些鸡和羊肉类的菜肴也都以不同方式烹制而

成。

比较显眼的还有桌子中间摆放的一个大碗，和其他的碗一样也是金黄色，口径足有二英尺大小。这只大碗里面装着清新的鱼翅煲，卧着一只鸡和一只鸭。鱼翅在中国属于备受好评的贵重食品，寻常百姓家是见也没有机会见到的。

除此之外，桌子上还有烤鸡、拆骨鸡和烤鸭。鸡和鸭体内都填充了松枝，放在烤炉上烘烤完成之后，散发出松油的清香之气，色香味俱佳，令人食欲大开。

还有一道菜是慈禧太后非常喜欢吃的，做法就是将猪肉皮切成小小的方块儿加以烘烤，猪皮焦黄脆嫩，微微卷曲，像卤好的腊肉那种色泽和形式，吃上去香味扑鼻，外脆里嫩，口味极其富有层次感。

值得一提的是，满族人的生活习惯也很独特，平时很少吃米饭，酷爱吃种类繁多的面食。我们在宫中一天，吃到了各种各样不同做法的面食，比如烤制的、蒸制的、油煎的等等，一些加了糖，一些则加入了盐和胡椒，还有一种加入了甜美的馅料。这些面食还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是用不同的模具做成不同的充满想象力的形状，比如龙、蝴蝶、花儿等等，美观又有趣。我们还吃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泡菜，这些也是慈禧太后非常喜爱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嵌在蛋糕中和浸在糖汁中的红豆糕、绿豆糕，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让人看都看不过来，吃更是吃不过来了，每样饭菜尝一口，片刻之间，人就很饱了。

吃饭的时候，尽管太后反复邀请我们多吃一点，我吃得依然不多，因为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太后的一举一动和倾听她的言语上了。除了我上面一一提到的食品之外，我们还吃到了各种各样的粥，有些是用甜玉米熬制的，有些是黄色的小米粥（看上去像鸟食）。太后告诉我们说，在吃了肉类菜肴之后，应该把这些粥都吃完，那样更加利于养胃养生，我们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我们享用完午膳之后，太后站起身对我们说：“你们一同到我的休息室去吧，让皇后和宫女们进来吃饭，她们总是在我吃完之后才吃的。”大家便跟随太后向外走去，我有意识地站在了两扇门之间，看到了皇后和宫女们走了进来，团团围在桌子周围，异常安静地吃了起来。按照宫廷礼仪，她们是不允许坐下来用餐的。

这个时段戏剧依然在上演，演的还是一个神仙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远不如第一个戏剧那样的吸引人。太后慵懒地斜躺在那种大床上，太监为她献上了茶。太后命太监也给我们呈上茶。

我的读者们可以想象，受到慈禧太后这样特殊的关照，我是多么的欣喜和自豪啊。在中国，人们把君主看作是至高无上权威，她的话语便是不可更改和怀疑的法律，是金口玉言。人们在和君主对话的时候，必须恭恭敬敬，甚至不允许抬头望上一眼，以显示对权威的无上尊崇。我想我们受到的礼遇真是非同寻常。

以前有人告诉我说，太后是个脾气暴烈的人。但是当我近距离耳闻目睹，却发现她是如此的和蔼可亲、高贵优雅，对待我们几乎如慈母般的温柔亲切。亲身经历了这些，如此大的反差，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所听到的一切，那些认识应该都是道听途说，都是错误和偏颇的，根本不足为凭不足为信。通过这一天下来的感受，我甚至认为太后是世界上最为温柔可亲的女性。



慈禧和德龄容龄母女三人，冬日走下牡丹山

太后躺在床上休息了半晌，然后对我们说，我们是时候返回家中了，别走得太晚。她赏赐了我们八大盒水果和糕点，让我们不必客气，尽管带回家享用。

她对我母亲说：“你回去告诉裕庚，希望他服用了从我这里带过去的药物，能够早点好起来。还有，把这几盒水果和糕点带给他品

尝，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暗想，从法国巴黎回国之后，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怕是享用不了这些糕点和水果了。即便这些糕点和水果对父亲的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好处，他也一定会感谢太后的恩典的。

我的读者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在接受太后恩赐的时候，为表达感激之情，我们都应该磕头谢恩。当太后下令赏赐我们水果和糕点的时候，我们马上磕头谢恩。

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太后和我母亲说，她非常喜欢我们这两个小姑娘，希望我们能担任宫廷女官，留在宫中陪伴她。这依然是太后的恩典，我们再次磕头谢恩。

太后询问我们的意见，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宫。她还说，我们进宫的时候，只要稍微带几件随身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就可以了，她会着人为我们准备好一切所需。太后希望我们能够两天之内进宫。

3

在我们离开之前，太后还着人带我们看了一下为我们专门预备的房子。那处房子位于太后寝宫的右侧，共有三大间屋子。太后的这处私人寝宫名为“乐寿宫”，建立在湖岸边，其中有很多很多的房间，每一间都各有用场，安排妥当，无一闲置。这里是太后最喜欢的所在之一。在乐寿宫，她安享了人生中很多阅读、休息的愉悦时光。兴之所至，太后还会在湖中泛舟，体验自由自在的放松感觉。

看完房子之后，我们告别了太后、皇后和宫女们，经过了一段漫长乏味的路途，回到了家中。经过了这纷繁多彩的一天，我们都感觉非常疲惫，但是十分开心。

刚进入家门，我们就惊奇地看到，几位宫中太监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带来了太后赏赐我们的东西：每人四匹黄色宫廷锦缎。我们再一次对太后的赏赐表示谢恩。我们把这些锦缎放置在屋子中间的桌子上，对着它们磕头谢恩，如见老佛爷真容般虔诚无比。礼毕，我们

请太监们带给太后我们十二分的感激之情。

按照常规，我们应该赏给上门的太监一些礼物或者是赏金，我们给了他们每人十两白银，聊表谢意。

后来我们才发现，太监们每次奉旨外出办事，无论到了哪里，得到了什么赏赐，受到了什么礼遇，都要向太后详细禀告。太后也时常会问这些太监们一些问题，比如，主人的房子有多大，主人对待太监们是否友善等等。这些太监们也都特别健谈，等到我后来入宫，他们纷纷向我描述起太后对我们初次进宫的种种评价。

说起来，我们在父亲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的时候，放弃对他的照料，进宫去做女官服侍太后，这其实并不合时宜。我们的母亲对此也很是忧虑，但是既然是太后懿旨，那么无法可想，唯有奉旨前往。于是，在三天之后，我们早早便进了宫。

我们进宫的第一天异常的忙碌，先到太后面前谢恩，感谢她赏赐我们的礼物。太后说她今天会很忙，要会见俄国驻中国大使的夫人勃兰康女士。

勃兰康女士带来了俄国沙皇送给太后的一张全家福。太后问起我懂不懂俄语，我说自己不懂，不过据我所知，大部分俄国人都说法语，她看上去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她说：“其实你可以说自己懂得俄语的，反正我也听不懂。”说这话的时候，她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旁边的宫女。我推测可能是有人曾经欺骗过她，她或许也因此对我刚才的诚实回答表示赞赏。不久之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以前一位御前女官骗太后说自己懂得外国话，到了时候却连一个字都不会说，结果被太后驱逐出宫了。

除了会见俄国大使夫人之外，这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太后侄女德裕的订婚典礼将隆重举行。依照满族风俗习惯，订婚仪式的规矩是由两位皇室的女眷亲自到准新娘的家中，按照传统规矩完成一整套礼仪。未来新娘则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闭着眼睛，静静等候两位女眷的到来。

女眷们进入新娘的卧房，把一只大约一英尺半长的玉如意放到新娘的膝上（如意，在中国代表“祝君万事顺心”之意），然后把两只绣花锦囊挂到她衣服的纽扣上，每只锦囊里装着一枚金币。另外，还把两只刻有“大喜”二字的金戒指戴在新娘的手指上。

整个仪式绝对的庄严静穆，明晰而简洁。礼仪结束之后，两位宫廷女眷回到宫中，将仪式过程及完成情况向太后如实禀告。整件事情到此圆满结束。

第五章　会见大使夫人

1

事先没有人告诉我们那一天太后要会见俄国大使夫人。我们向太后禀告说要先回房间换了衣服再来，以适应这样的场合。我们当时穿的衣服很朴素，又是那种很短的款式，不适宜接见外宾的正式场合。



慈禧太后和公使夫人们合影

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宫中没有铺着地毯，地面上又是青砖裸露，我们长长的天鹅绒礼服裙摆总是很容易弄脏。另外，那些笨手笨脚的太监亦步亦趋的时候，也总是会不小心踩到我们的裙摆。我们就根据实际情况，自作主张地固定了穿着习惯，平时非重大活动场合只穿短装。

听到我们的换装请求，太后却不以为然，她说："为什么一定要换衣服呢？我就感觉不到你们那礼服在地板上拖着长长的尾巴有什么好看，那天你们第一次进宫，我看到那长尾巴就觉得好笑得很，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我正要解释换装的原因所在，太后又说："不必说了，我知道的，你们要换装是因为觉得礼服更适合这样庄重的场合，对么？"我们马上点头称是。太后这才点头恩准："那速去速回，马上换上你们美丽的长尾巴礼服吧。"我们马上去换衣服。

我和妹妹换上了粉红色的绉纱礼服裙，镶着布鲁塞尔式样的花边，系着相同颜色的透明薄纱腰束。我的母亲穿上了灰色的绉纱礼服裙，镶着黑牡丹花边，淡蓝色的暗花绸腰束。我们忙不迭地做着这一切，太后很快派太监来问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太后看到换装之后的我们，大声笑着说道："哎呀，看看这三位长了长尾巴的仙女吧！"接着，她饶有兴致地问我们："你们走路的时候还要一直提着半边长裙，难道不觉得累么？这身衣服倒也很漂亮，我就是看不习惯这条长尾巴，觉得这个大可不必保留。我弄不清楚外国人看见我让你们这样穿着会作何感想，不过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不会喜欢这样的安排。我这样安排是有我的想法的，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于外国的服饰也是有些研究的。我以前确实未曾看到哪个外国女子有你们穿着这样好看的。我觉得外国人真的没有咱们富裕，看他们佩戴的珠宝首饰都很少。我听人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有我这么多珠宝首饰的，更何况，我的珠宝首饰还在越聚越多。"

我们匆匆忙忙地准备着，迎接勃兰康夫人的到来。大约在十一点钟左右，她到来了。接见的程序如下，先由我妹妹在前面院子的会客室里接待她，然后再引导她到仁寿殿觐见太后。慈禧太后登上了她宏伟的宝座，皇后坐在太后左手边，我站在太后的右侧，等待着为她做翻译。

太后身着透明缎面的黄色绣袍，金丝滚边，镶着金黄色的穗带，绣着大朵的蜀葵和一个汉字"寿"，衣服和纽扣上缀着很多雀蛋大小的

珍珠，手上戴了不少的手镯、戒指和金护指，发型梳成的款式和平时一般无二。

很快，勃兰康夫人进入了大殿。我妹妹领着她登上殿下台阶，勃兰康夫人站定了，恭恭敬敬地向太后行了礼。我迎上前去，把勃兰康夫人引至太后面前。太后与勃兰康夫人握了握手，勃兰康夫人呈上了沙皇赠给太后的全家福照片。

太后随即说了一段话，表达了对沙皇及其皇后赠送礼物的谢意。勃兰康夫人不会说英语，我便用法语把太后的这段话翻译给她听。



慈禧太后站像

会见仪式结束之后，太后命我将勃兰康夫人带到皇上那里。皇上站起身，与勃兰康夫人握了握手，亲切问候沙皇陛下和王后的身体状况是否安好。

这些官方仪式结束之后，慈禧太后走下她的宝座，领着勃兰康夫人去了她的寝宫，那是她众多寝宫中的一个。来到寝宫之后，众人按照宫中规矩分别或立或坐，自成体统丝毫不乱。太后命人为勃兰康夫人赐坐，并和对方亲切地交谈了大概十分钟，这期间一直是我在充当翻译。后来，太后又命我带着勃兰康夫人去见皇后。

这里要再次提及满族的严密礼仪，在满人的规矩里，婆婆与媳妇之间的礼节尤其严格，在整个儿接待过程中，皇后一直站在大殿屏风的后面，寸步不离，大气不喘，直到结束之后，我到那儿去找她出来。从大殿出来之后，我们就去了宴会厅，在那儿，一桌丰盛的满族特色浓郁的宫廷午餐已经准备妥当。

讲述到这里，我有必要和读者们解释一下满人用餐方式和汉人的不同。汉人用餐时，一次性将所有的菜盘放在餐桌的中央，每位用餐者使用筷子从餐盘中夹取自己想吃的食物菜肴。满族人的用餐习惯则大为不同，他们分别使用各自的碗碟和其他餐具，和一些西方国家的用餐习惯差不多。对这样的用餐习惯和方式，慈禧太后很感自豪，她认为这样的习惯更利于节省时间，也更加的清洁卫生。

宫里的食物总是非常精美和洁净，招待外国客人的时候当然更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场合，我们还会用上各种各样精美的餐具，宛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效果，以衬托席上鱼翅、燕窝及其他众多菜肴色香味的精妙之处。

那个早上，太后吩咐下人们一定要将餐桌布置妥当，精心收拾安置，尽可能漂亮得体，万不可让外国人挑出毛病来。有了这样的要求，仆从们当然尽心尽力。我们入席的时候，餐桌确实布置得得当漂亮，让人倍感舒服。除了平时常用的餐具之外，每个座位面前另外摆放着一式描绘着金龙图案的菜肴清单，小寿桃形状的银质碟子中装满了杏仁和瓜子，在筷子之外还准备了刀叉。

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太后和皇上向来不与客人同席就餐。这次陪勃兰康夫人用餐的，也依然是宫内格格与几位女官。

所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用餐过半的时候，一位太监匆匆而来，告知说太后要我立即去见她。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只是太监传错了话，这样子张冠李戴的情况在宫中并不鲜见。来不及多想，我便已经到了太后面前，见到她满面笑容，我心里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才落了地。

太后高兴地对我说，以往来到宫中的女子，大多性情普通，举止不当甚至言行粗俗，从没有一位如勃兰康夫人这样既体面又谦和懂礼的女士。太后说："别人认为咱们国人见识浅薄，所以瞧不起我们。其实，我早就发现，他们自以为教育优良，举止文明，其实在我看来，咱们这些被他们认作的野蛮人，倒是比他们文明礼貌得多呢。"

以往，大凡有外国女子来到宫里，太后都能以温和有礼的态度对待之，不管那些女子举止多么不得当。而等到她们离开之后，太后则会与我们评论一番哪个人举止优哪个人言行劣。

太后说完这些之后，给了我一块温润晶莹的翡翠，让我代为送给勃兰康夫人。勃兰康夫人收到了礼物，显得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向慈禧太后谢恩，我就带着她再次来到宫里。

我们午餐过后，勃兰康夫人告诉我们，今天皇宫能够给予她如此规模的午餐，如此盛情的招待和太后的热情关照，凡此种种，令她深感荣幸与喜悦。我送她到大殿前的院子里，她的轿子已经安置妥当，等在那里了。她乘坐轿子离开了皇宫。

3

太后有一个规矩或者说是习惯，每当皇宫的客人全部被送走之后，我们必须回到她面前，向她报告与之有关的一切信息，尤其是那些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我猜想，慈禧太后应该也和其他女性差不多，喜欢茶余饭后的闲聊，这在太后很多生活细节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太后问起大使夫人说了些什么内容，是否喜欢自己赐予的翡翠，当时说了什么什

么表情，怎样评价今天的午餐饭菜等等细节问题。

太后非常赞赏我的翻译能力，能够把她的意思翻译得那样好，她说："在你之前，我还没有发现谁能像你翻译得这样好，虽然我不懂外国话，我还是能够看出来，你说得非常流畅。你是怎么学得这样好的呢？我以后要让你常伴我左右了。有时候，一些外国女士带着自己的翻译过来，翻译所说的中国话，我都很难听得明白，只能靠暗自猜测来完成交流过程。特别是像那个康博夫人带来的翻译那样，翻译的错误百出不知所云，我就更加听不懂了。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你能够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我将来会为你安排一门婚事，当然了，现在还不能够具体告诉你。"

听了太后的一席话，我内心很是高兴，没想到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赢得了中国这位至高无上之人的喜爱。不过，太后所提到的婚姻之事又让我有些郁结，我尚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她劝解我不用担心，到时候，我可以婉拒太后的好意，就完全没问题了。我的心里才安定下来。

我们将勃兰康夫人的情况叙述完毕，太后恩准我们可以休息了。今天我们起床很早，又忙忙碌碌了一整天，难免都比较疲劳。太后表示今天不再需要我们为她做些什么了。我们按照宫廷礼数道了晚安，纷纷退去。

第六章　太后梳妆

1

如前所述，我们所居住的房子格局，包含四个大的房间和一个门厅。母亲、妹妹和我三个人各住一个房间，剩下的一间给陪侍的丫鬟住。

太后派了一位太监服侍我们，这位太监告诉我们说，太后还派了四个小太监为我们服务，要是他们不听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他马上严加处置。这位大太监告诉我们他姓李，但是这里姓李的太监太多了，包括那位太监总管李莲英，所以我们根本分不清楚谁和谁，只做耳旁之风，吹过就算。

那天辞别了太后，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往回走，才到达我们住的地方。陪侍的李公公指着右边的一栋建筑物告诉我们，那是太后自己的宫殿，也正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我很感到费解的是，望山跑死马，看上去很近的宫殿，怎么走起来这么远。

我忍不住向李公公问起这种情况的缘由。李公公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那所小建筑位于皇帝宫殿的左手边，从这处建筑到慈禧太后宫殿的道路，已经被太后下令隔断，禁止通行，究其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李公公不愿意明说。

李公公还说：“请看这所房子，本该面朝东的，实际上却是面朝湖水。”我观察了一番，感觉湖上风景俊秀，令人心旷神怡，便告诉公公说，其实我更喜欢房子朝向湖。李公公微微一笑，说道：“等到您慢慢融入这个地方，便会慢慢了解到它神秘莫测的一面了。”他的欲言又止让我好奇又惊讶，我却也懒得细细询问。



慈禧太后寝宫卧室

李公公又介绍说，皇上的宫殿即在我们住所的后面，是和太后宫殿几乎一样的大规模建筑群。他指点给我们看那边的风景，我们看到了庭院内伸出屋檐的树枝。

接下来，李公公又指着皇帝宫殿后面的一座大而矮的、同样拥有一个大庭院的建筑告诉我们，那里是皇后的宫殿。皇后宫殿两侧各有一处建筑，李公公介绍说，左边的那一处，是瑾妃的寝宫。皇帝与皇后的两座宫殿之间，原本有道路可以互相往来，后来太后老佛爷下令封去那条道路，从此皇帝与皇后若要互相来往交流，就必须要通过太后的宫殿不可了。

我心里暗暗揣度，这大概是太后掌握他们生活状态和私下里动向的一种简便实用的方式。这些情况对于我来说，除了新奇感觉之外，不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作何评论。

我听够了这些稀奇古怪让人心神不宁的故事，便主动说道，我已经累了，想要回去休息，对他进行礼貌的暗示。李公公当然理解我的弦外之音，马上拜别离去。

我进入了自己的房间，经过细心观察，发现屋子里的乌檀木家具装饰品都铺盖着红色绸缎，窗子上也悬挂着红色的丝绸窗帘，窗帘上面装饰着长长的板条隔栅。房间各种陈设大气而美观，让人心情为之畅快。每个卧室的陈设均如此类，正面的窗子下面，以青砖沿着墙壁内侧砌成炕（床），炕上铺着相同材质的光滑木板。炕是这里一种很独特实用的居室设置，以砖砌成，正面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冬天的时候，在这个洞口投入木柴生火，将整个炕的砖烤热，暖烘烘又能保持热量，防寒保暖，很是舒适。白天的时候，炕上放着一张小桌子以供使用，摆放文房四宝或者其他物品，晚上睡觉的时候方才移去。

我们到了这里不久，几位太监送来了我们的晚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厅堂中央的大桌子上面。太监说这些食物是太后吩咐了送来的，太后让我们不要拘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累了一天，浑身酸痛，四肢无力，没有什么食欲，随便吃了一点而已。在准备休息的时候，李公公过来了，告诉我们说，明天凌晨五点钟便要起床，不可以再晚。我让李公公明天凌晨五点钟的时候，过来敲敲窗户，提醒我们起床。

2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上了床，一时间思绪纷纷，无法马上入睡。我们谈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感到驳杂而有趣。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夜晚短暂，好像才刚刚入眠，便听到了有人敲打窗户。我迷迷糊糊地问是谁，李公公的声音传进来，告诉我们该起床了。

我一个激灵清醒过来，立即准备起身。起床之后，我打开窗子向外看去，天刚刚破晓，遥远的天际，深红色的晨曦微光映照在坦荡如砥、静如处子的湖面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幽美，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一段距离之外，是慈禧太后的所谓牡丹山的所在。唯有牡丹真国色，此花开尽更无花。牡丹盛开，让清晨的景色更加楚楚动

人。

顾不上再细细欣赏美景，我急匆匆穿戴洗漱完毕，立即和别人一起，乘着轿子赶往太后寝宫。

皇后正坐在走廊里，我向她施礼请安。皇帝的瑾妃也在走廊里，但是我们本已知晓，不必向她请安，她在宫中并没有那么高的身份。还有几位我们不认识的年轻宫女待在那里候命，皇后把我介绍给了她们。



端康皇太后（光绪皇帝的瑾妃）与众太监

这几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女儿。我留意看了看，其中有几位尤显出众，看上去美丽聪慧，伶俐动人。皇后告诉我说，这十位女官还没有被准许见到太后呢，目前正在做的是认真学习宫廷礼仪，等候太后懿旨。这些女官都穿着一式得体的满族服饰，式样与花色与皇后的大致相同。

渐渐熟识，我和这些女官们聊了一会儿，便跟着皇后进入内宫，迎面碰见了四格格（即庆亲王的四女儿）和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被

称作“元大奶奶”的寡妇，她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儿。她们两位也正为服侍慈禧太后做着准备。

皇后令我们马上到太后的寝宫，伺候老佛爷穿衣梳妆打扮。我们马上过去，见到了太后，齐刷刷跪拜请安道：“老佛爷吉祥。”太后还慵懒地在床上待着，她微笑着问我们昨天晚上睡得可好。我们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聊到房间很舒适等闲话。

这些不过是表面的客套，其实我心里在想，昨晚睡的好倒是好，就是太短了，还没睡个半觉呢。毕竟我们是头一天进宫忙碌，对新见的人、事、物和规矩都不太适应，又是前后往来地跑了一整天，累得脚疼腰酸。

太后接着询问我们是否吃过早饭了，我们回答说还没有。她便责备李公公不应该忘记及时把早餐送到我们的房间。她转而叮嘱我们：“你们在这里初来乍到，但是不要总像外人一般拘谨，若是需要什么，只管大着胆子理所当然地向太监们要便是了，他们不听话，就过来告诉我，我自会命人重重责罚他们。”

随后，太后开始起身穿衣。她原本是穿着睡衣睡眠的，起身之后先是穿起自己的白丝绸袜子，在脚踝的那个地方，以漂亮的丝带系住裤腿与袜脚。

需要和读者朋友说明的一个细节是，慈禧太后每天都和衣而卧，但都是在上床之前换上干净的衣服，天天如此。然后，太后穿上了她粉红色的衬衣，套上一件竹叶刺绣的丝绸短袍，她早上习惯穿着低跟的鞋子，若是穿长袍会不方便行走。

穿戴之后该是梳妆打扮了。太后走到窗子下面的两张长桌子前，那上面摆满了洗漱用具和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五彩缤纷花样繁多，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



清代宫廷饰品：翡翠手串

太后边洗脸梳头边对我母亲说，她不愿意让丫鬟、太监和嬷嬷们碰到自己的床，她觉得那些人都不干净，所以这些事情都由女官来完成。她说着这些，又转身看看小心翼翼站在一边的我和妹妹，说道："你们可不能认为，作为御前女官还要做这些事情是跌份儿的啊，反过来想想看，我这把年纪足可以做你们的祖母了。你们这些小姑娘为我做这些琐事，也不能算是有失身份了吧。而且，轮到你们做的时候，你们可以安排和看着别人去做就行了，不需要亲自动手的。"

太后对我们说道："德龄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很是喜欢，现在我封你为宫廷一等女官。你平时不用做太多事情，一般在外国人到来的时候做好安排，并且为我做做翻译就行了。其他的时候呢，不需要你做什么杂活粗活儿，为我照看那些珠宝首饰就行。容龄则可以选择有兴趣的事情做做即可，也不要太多动手。我把你们俩和四格格、元大奶奶四个人放在一处，一起在宫中服侍我吧。你们也不必对她们俩过于生疏客气，她们若是不待见你们，就对我说。"

这么短时间内能受到如此待遇，我心里非常高兴。当然，我不能过于表露欣喜之情，并且按照情理，我应该谦让客套一番。我先对太后的恩典表达了十二分的谢意，然后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又涉世无多，若是不能胜任，恐怕辜负了老佛爷的一片慈爱之情、关怀之意，心里实在不能承受这样的结果。恳请老佛爷容我做一个普通的御前女官，我已然倍感荣幸，今后将更加勤修苦练不断学习尽心尽力，诚心一片只为服侍好老佛爷。

太后没等我说完，就赶紧笑着制止："好啦好啦，别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倒是很谦逊谨慎，由此看来，你当真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一点也不妄自尊大，我没有看错你。看到你这样，我很高兴，你虽然在国外这么多年，还是保留了满族女子知书达理的良好品性，这样很好。"

太后很喜欢揶揄逗笑，她和我开玩笑说，要是发现我做得不够好，就会责罚我，还会另外找人取代我。她既然都已经这样说了，我就不再拒绝，坦然接受了她的恩典。

3

随后，我走到太后房间的窗前，认真观察该如何收拾整理。作为我今后的职责之一，我发现这项工作其实很简单。首先，每天早上等太后起床之后，太监会把她的被褥拿到庭院里晾晒。然后，用小刷子把精美的雕花木床清理干净，垫上一层毛毡，铺上三层厚厚的黄色绸缎垫子，再铺上几条熟丝制作的、不同颜色的床单，上面都绣着精美的金龙和蓝色的云彩图案。

太后还有很多的枕头，都以精美绝伦的刺绣作装饰，日间夜间都摆放在床上。有一只很特别的枕头，里面装满了茶叶。这只特殊的枕头是太后平日里常用的，据说枕着茶叶枕头睡觉，有明目醒脑的效用。

除了这些之外，太后还有一只形状很独特的枕头，里面填满了各类干花，大约有十二英寸长，中间有一个三英寸见方的小洞。枕着这

个枕头睡觉，耳朵贴在小洞处，能够敏感地听到任何细小的声音。我估计有了这只枕头，无论是谁如何悄无声息地走近太后，依然会为她所察觉。

最后，在绣花床单上面，叠放着六条颜色各异的被子，有淡紫色、淡蓝色、粉红色、绿色和紫罗兰色。在太后床的顶部，设置着雕刻了精美花纹的木制框架，悬挂着精美的绣花白绉罗帐，还悬挂着很多小小的香囊，均以薄丝制就，填满了名贵的香料，浓烈的香气在床上和周围缭绕回环，异常强烈，一般人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被熏得头晕目眩。太后不但很适应，而且尤其喜欢浓烈奇异的麝香，在很多地方都用到它。

我们花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收拾好了太后的床。我回转身，看到一位太监正在全神贯注地为太后梳头，于是马上垂首缄口，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观看。

太后年纪大了，却有着与年龄反差很大的头发，乌黑柔软，如黑色的天鹅绒一般质感分明。太后的头发被从额头正中间分开，低低地拢在耳后，再绕上头顶盘出一个紧紧的发髻，最后梳成一种名为“大滚簪”的纯正满族发式，以很长的两枚簪子别住定型。

太后的习惯是先梳头后洗脸，在梳妆方面，她像个年轻女孩一样挑剔和不容易满足，若是太监不能让她满意，她会毫不犹豫地换掉他。她备了很多很多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瓶子和香皂。洗完脸之后，她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擦干面部，再轻轻喷上一点儿蜂蜜和花瓣混合制作而成的花露水，又扑上粉红色的浓香粉饼。

结束了复杂漫长的梳妆过程，太后转身对我说道：“我知道，你看到我这样一把年纪的人，还有心思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来梳妆打扮，一定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我也承认，我实在是很喜欢打扮自己，我也很喜欢看到姑娘们把自己打扮得大方得体花枝招展的。每次看见小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心中总是欢喜不尽，感觉好像是自己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一样。”

我奉承太后说，老佛爷看上去依然年轻美丽气质端方雍容华贵，就算是我们这些姑娘，也仅仅有幸一窥凤颜，却难以望其项背，更不敢存有攀比之心。太后听了之后很是高兴，可苦了我这个第一女官，我不得不大费心思地观察太后的爱憎好恶，每时每刻留心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接下来，太后带我到了另一个房间，给我看她收藏和喜爱的那些珠宝首饰。房间的三面墙上都是从地面直到屋顶的木架子，放置着成堆的乌檀木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着珠宝首饰。盒子上都贴上了小小的黄色纸条，注明了里面珠宝首饰的名称。

太后指着右边木架子上的首饰盒，对我说道："这里是我最为心爱的首饰，是每天都要佩戴的，你要记得时常检查核对，万万不可丢失或者损坏。其余的那些是我在特殊场合佩戴的首饰。这个屋子里面，大约有三千盒首饰。还有一些珠宝首饰，我妥善保存在别的房间，等我空闲的时间带你去看看。"她想了想又说："挺可惜的，你不会读写汉字，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着人给你开一张清单，你可以按照清单来一一检查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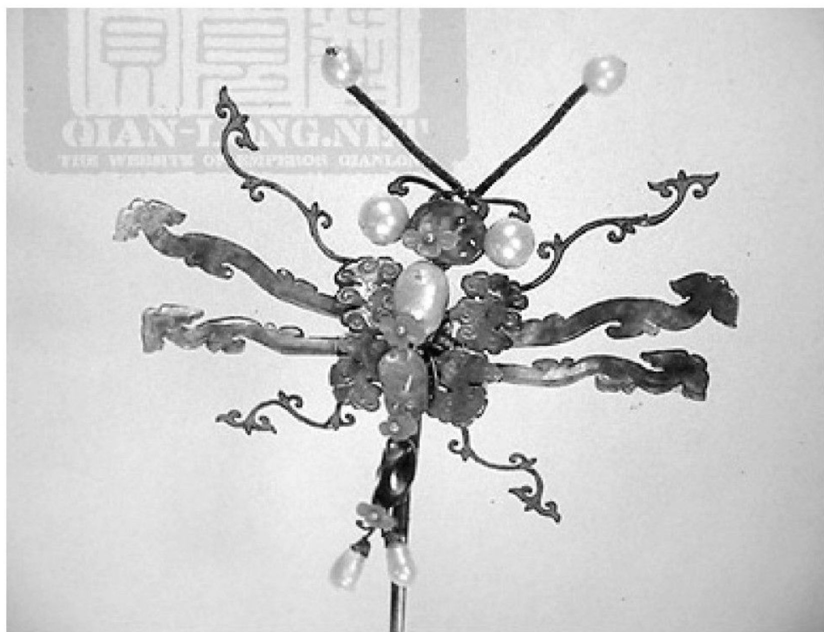
听了她的这些话我大为讶异，实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告诉她我不会汉文的。我很想弄清楚这一点，但是又不能直接问太后，就变通了一下，告诉太后说，虽然我没有多少学问，不过也学习过一段时间汉字，若是太后能让人给我开个清单，我可以尝试着读读看。

太后说道："那真是太有趣了，我想不起来是哪个人了，在你第一天进宫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你完全不能读写汉字。"太后边说边环顾房间。

通过她这样细微的动作，我判断太后是能够记得起谁这样说过的，只是不愿意告诉我而已。太后说："要是下午有空儿，我和你一道核对清单。现在，你把第一排架子上的那五只首饰盒拿给我吧。"

我把指定的五只首饰盒拿到她房中，放在了桌子上。太后打开第一只盒子，里面装着一朵用珊瑚和翡翠制成的牡丹，样式生动独特，

品相完美，花瓣微微抖动，宛若真的花瓣在风中舞动。牡丹那珊瑚的花瓣由极其纤细的铜丝连缀而成，片片叶子晶莹剔透，均以无瑕美玉制成。



清代宫廷饰品：银镀金嵌珠簪子

太后把这朵牡丹花插在右侧的头发里，顺手又打开另一只首饰盒，取出一支以相同工艺手法制作而成的玉蝴蝶。我后来得知，这种巧妙的制作方法是太后自己的创意发明，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根据造型需要，将翡翠玉石雕刻成花瓣的形状，尾端钻出细细的小孔，以细铜丝连缀成完整的花朵，当真是神思妙想，巧夺天工，难得太后能够琢磨得出来，足见其心思细密。

另外两只盒子里，装着不同造型和花纹的手镯与戒指：一对镶着珍珠的金手镯；另一对手镯以美玉作为装点，末端垂吊着金手链串住的玉石。其余的盒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珍珠项链，华贵珍奇，美轮美奂，我一眼看上去就再也舍不得移开目光，真是喜爱得不得了。

太后拿出其中梅花状的一条链子，造型也是相当别致，分别是每

五颗小珍珠围着一颗大珍珠串绕成一朵梅花，如此等等，很多条这样的珍珠梅花汇集，集中起来串成一条长长的项链。太后把这串梅花链挂在外衣的纽扣上。

这当儿，一位御前女官拿来几件宫袍请太后挑选。太后看了一看说道，这几件都不合适，再去多拿些来。在我看来，那些宫袍都非常漂亮，颜色鲜亮脱俗，刺绣精巧别致，太后却完全没有看在眼里。

转眼之间，那位女官又送来几件宫袍，太后选择了海绿色底子、绣着白鹳的那件。

太后穿上了那件宫袍，对着镜子前后左右照了一番，取下了头上的翡翠蝴蝶，对我说："你注意到了吧？我特别在意这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翡翠蝴蝶的绿色太深，又和袍子的底子顺色，会盖过袍子的颜色，影响整个儿的效果。你把这翡翠蝴蝶放回去，帮我把三十五号首饰盒的那只珍珠白鹳拿过来。"

我到了珠宝库房，很快地找到了三十五号盒子，拿过去呈给太后。太后打开盒子，取出一只镶满了珍珠的银质鹳，鹳的喙是以珊瑚雕刻而成。鹳身的珍珠镶嵌极密且错落有致，十分精巧，若不是离得很近仔细地查看，根本看不到它里面的纯银底子。这只首饰工艺精湛，生动华美，珍珠均颗粒圆整、光泽透明，完美无瑕。

太后戴上了这只珍珠银鹳，更衬托得她气质雍容高贵。她又在宫袍外面套上了一件中意的紫红色绣着鹳的短马甲。她拿的手帕和穿的鞋子上也同样都绣着鹳鸟。等到她穿戴整齐，从头到脚，看上去整个儿一个"鹳夫人"。

4

太后穿戴完毕之后，光绪皇帝也来到此间。他穿戴着宫廷正装，其朝服与大臣们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没有顶戴花翎。皇上走到太后面前跪下，毕恭毕敬地说道："皇阿玛（父亲）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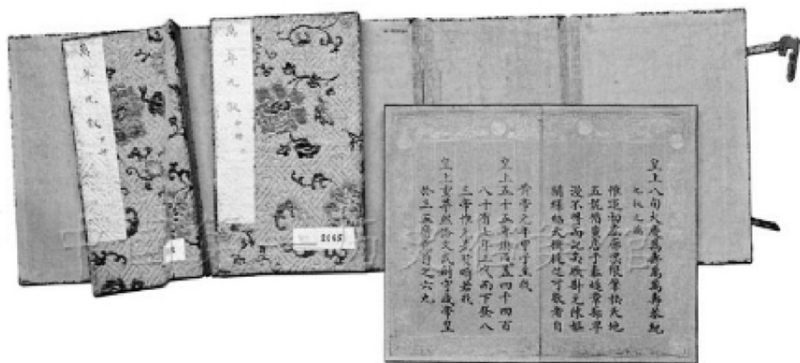
皇上称太后为父亲，甚至错乱了性别，读者也许觉得想不通。事

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慈禧太后一直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她为此严格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制定了称呼标准，把她作为男性来称呼，大概是要在生活中给自己形成“身为威仪男性”的假象。亲爱的读者们会慢慢知道，这不过是慈禧太后很多怪异癖好中的一项而已。

我搞不清楚应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向皇帝行礼，也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去做。不过我想，多礼总比失礼好，尊重总胜于无礼。宫廷礼仪的讲究里，在太后面前，我们是不可以向别人行礼的，我只有默默等待着皇上或太后两人中有一人离开。

过了一会儿，光绪皇上走出去了，我看准时机，赶忙跟着他来到庭院，向他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正在我行礼的时候，太后走了出来，她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包含着不确定的意思，似乎对我的举动很不以为然，却出于某种考虑，欲言又止。这种隐而不表的意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都说礼多人不怪，看来即使在最讲究礼数的清朝宫廷，多礼也未必见得就是好事。

等我自庭院返回屋子，只见一个小太监把几只黄色的匣子放在了左边的桌子上。慈禧太后端坐在那把被称为宝座的大椅子上面，等待着小太监的准备工作。小太监将匣子依次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份一份的黄色封袋递送到太后手中。太后用象牙制成的裁纸刀裁开封袋，一份份取出里面的奏折，慢慢浏览内容。这些奏折都是各部各省上报言事的奏章。



光绪皇帝也再次回到屋子，站在桌子一边，依旧沉默不语。太后一一读完了那些奏章，再一一转手递给皇上。自始至终，我一言不发，屏气凝神站在太后的身后。没用多大工夫，皇上就把那些奏章读完了，读完之后，他把奏折又一一放回那些匣子。在整个览阅奏章的过程中，屋子里面除了各人的呼吸之外，安静得绣花针掉到地上都听得清。

这个时候，太监总管李莲英走了进来，跪在地上禀报说太后的轿子已经预备好了，请太后起身。太后马上站起身向外走去，我立即紧跟上前，扶着她的手一步一步走下台阶，登上了轿子。

皇上、皇后和御前女官一众人等，一个接着一个，按照各自的地位次序鱼贯而出。那些太监、嬷嬷和丫鬟们，也像我第一天进宫所见到的那样，各司其职，拿着种种东西碎足快步紧随其后。进入了皇宫大殿之后，我们这些女官们全都快速躲到了大屏风的背面，一连串的行动之后，早朝开始了。

我对早朝究竟是怎么回事充满了好奇，想趁此机会仔细观察一番，听听他们都在谈论些什么。可是围在一处的宫女们总在窃窃私语，不容我清静半刻。最后，我总算找到个机会，趁着她们七嘴八舌地和我妹妹说话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溜到一个角落，单独坐下来，凝神倾听太后与众位大臣谈论的内容。

早朝刚刚开始的时候，大臣们也在互相耳语，各类声音语调混合在一起，我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些什么。不过还好，我顺着屏风的缝隙看过去，看到了太后正在与一位将军模样的人谈着什么。我还注意到几位军机大臣在军机处首领庆亲王的带领下鱼贯而入。

太后与将军谈论完毕，转而和庆亲王商议官员任免事宜。庆亲王准备了一份名单，呈送给太后。太后从头至尾查看了一遍名字，从中挑选出了几个名字。庆亲王又推荐了其他的几个人，并建议太后："虽然被推上来的这些人受到了太后的恩典，我觉得尚有其他一

些人更适合这些职位。”太后答道：“好吧好吧，这些事情就交给你办理吧。”太后又问皇帝：“皇上觉得这样可以么？”皇上回答：“好。”

经过了这些内容，早朝就结束了。各部大臣和军机大臣们依次退下，我们这才都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来到了太后面前。太后说今儿很想外面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马上就有几个训练有素的小丫鬟取来了太后的镜子，放到桌子上。太后取下了她沉重的头饰，只留下简单普通的发髻。

太后想换几样珠花装饰，我打开一位太监随身带着的首饰匣，从里面拿出几朵高雅别致的珠花递给太后。太后从中选择了一支，插在发髻的一边，又挑了一支玉蜻蜓，插在发髻的另一边。她说自己很喜欢这几支独特的小小珠花，每次卸下沉重的头饰就会换上它们，轻便又美观。

此刻的我离太后如此之近，捧着太后卸下来的头饰，却有些不知所措了，不知该把它们放在哪儿，我并没有准备装首饰的盒子。谁又能够事先想到，太后还有早朝之后换头饰的习惯呢？我一时不免有些内心惶恐，也不清楚太后见到我这样手足无措，会怎样教训我。

幸运的是，此时一个小太监捧着太后的首饰匣子走了过来。我顿时长舒一口气，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赶紧把手里的宝贝头饰放到匣子里面。

第七章　后宫琐事

1

第一天服侍太后，我不熟悉太后到底喜欢什么，喜欢我怎么样去做，有什么讲究，有多少忌讳，所以觉得费心费力。也没有谁主动告诉我这些经验，我只有依靠自己的细心，去贴近地观察，好歹搞清楚了一些状况。

我把那些换下的头饰放进珠宝匣子之后，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道是应该送回珠宝库房，还是等着太后的具体旨意。我看了看太后，她正在和我的母亲说着话儿，我等了一会儿，委实没有机会插话。于是，我干脆冒了一次险，自作主张地把匣子送回了珠宝房。

我往回走的时候，在庭院里遇见已经换了装的太后。此时的她换上了低跟儿的鞋子，人一下子显得矮了很多。太后刚换上的袍子以深蓝色绉丝制成，没有刺绣，只是装饰着桃红色的镶边，看上去依然很出众。

太后看到了我，问道："你刚刚去了哪里？"我回答说去把老佛爷的首饰放回库房了。她说道："我换下来的东西，就应该马上送回原处，不过我今天早上忘了告诉你这些了。是不是有谁告诉过你这些？"

我回答说，没有谁告诉过我这些事儿。我只是觉得，既然这些贵重的首饰太后用完了，太监们还要拿着四处走动，磕磕碰碰怕不太合适，还是小心地保存在珠宝房更为放心妥当。

她盯着我的脸看了片刻，说道："我能够看得出，那些姑娘们什么都没有叮嘱你。很高兴，你能很好地处理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像有人专门教过你一样。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大胆过来问我好了，

不要去和那些低劣的家伙们计较什么。”

我再次捕捉到了太后的细微反应，就在心里暗暗猜测，应该是有什么人猜忌我了。我暗下决心，以后凡事都要靠自己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我知道太后喜欢我，遇到异常事情，她肯定会帮助我摆脱困境的。

太后走了一小段路，笑着对我说道：“看看我，现在舒服很多了吧？我打算走上长长的一段路，到那个小山的顶上去。山顶上有一处好地方，我保证你肯定会喜欢的。来，我们一起走过去吧。”

皇上已经回到自己的宫中去了，太监总管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一道走着，太后说说笑笑兴致很高，仿佛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烦恼，更不存在什么国家大事日常琐事需要去处理。

通过这些小细节来看，我分析太后应该是豁达开朗的性格。太后回头看了一看，说道：“你看看吧，多少人跟着来了。”我回头望去，伺候太后早朝的那一大批人都跟了上来。

我们通过了西面的大庭院，走到了湖前面的一条大而长的游廊，蜿蜒曲折，精美华丽，长到一眼望不到头。这游廊首尾衔接，处处可见雕刻图案，设计理念独具匠心。



颐和园长廊

游廊顶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电灯从上面悬挂下来。若是这些电灯在夜晚悉数亮起，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那肯定是美不胜收的景观了。

慈禧太后走得很快，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得上她的速度。太监和宫女们一顺溜儿地跟在右侧，仅有一位太监被准许紧跟我们身后。这位太监一直端着一把黄色绸缎包裹的凳子。这只凳子和太后的

狗儿“水獭”一样，总是跟随太后左右。太后外出散步走累了的时候，会坐在凳子上休息一会儿。

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已经感觉疲劳了，看看太后，她那么大的年纪了，竟完全没有显出疲劳之态，还是保持着快速前行的步伐。她边走边问起我，喜欢不喜欢居住在皇宫，和她待在一起开心不开心等问题。我回答她，能进入宫中服侍太后，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现在得到老佛爷的恩宠得以实现，我着实是欣喜若狂，实在是太满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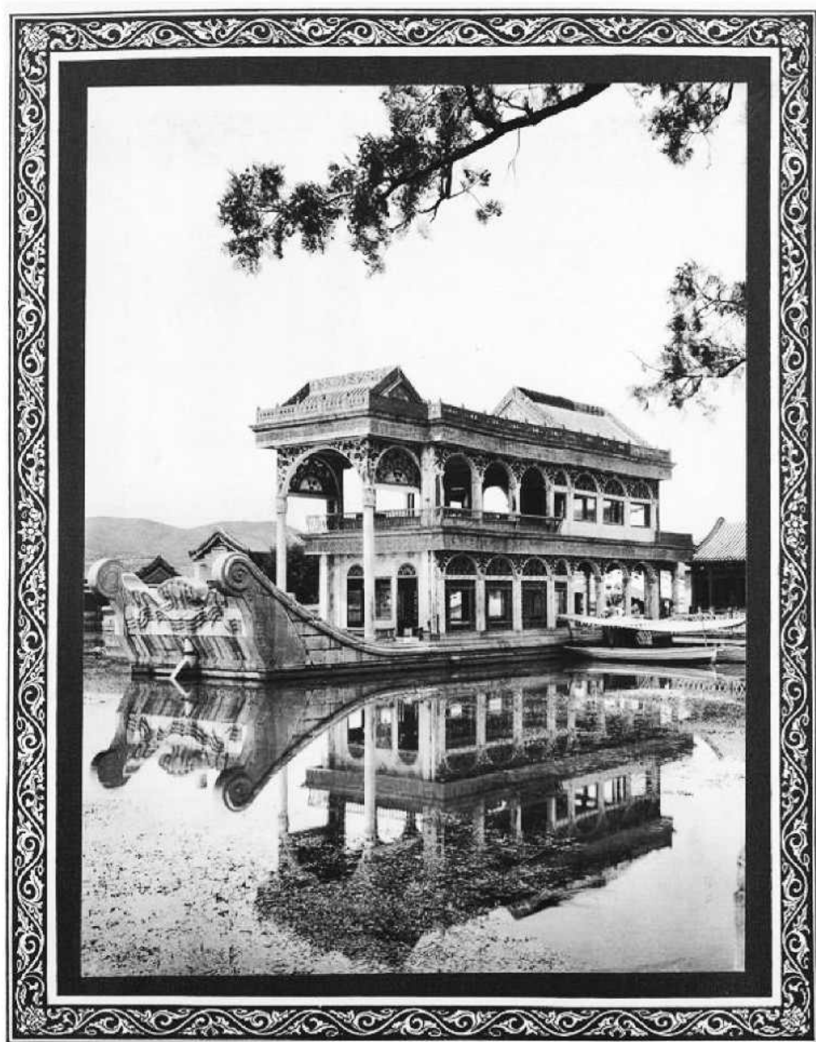
又过了一阵子，总算走到了石舫所在的那个地方，我真是累坏了，又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真是我见过的最有活力的老年人了。换个角度想想也就不奇怪了，她能成功统治一个东方大国这么多年，足见其非凡能耐。

2

这座石舫华丽宏伟，精雕细琢，气势不凡。里面却大都损毁，与外面景象反差强烈。太后指了指石舫各处，对我们说道：“看看这些窗户上的彩色玻璃，还有那些好看的彩绘，在庚子年间，被那些强闯进来的洋鬼子强盗们毁坏殆尽。我早已决定不再修整这个地方，由它去吧，放在这里可以一直提醒咱们，万不可忘记洋人们给咱们上的耻辱的一课。”

我们在石舫前站了几分钟，太监端着那把“举世瞩目”的凳子到了跟前，伺候太后坐在上面休息。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两艘雕梁画栋的大船慢慢靠近了，后面还跟着几艘小船。船越来越近，我看到这些尾随的小船也无不精美耐看，仿佛天然木材雕刻的浮塔。这些轻盈的“浮塔”上悬挂着红色的、镶着丝边的薄纱窗帘。

太后说道：“那些船来了，我们坐船到湖西面去用午膳吧。”说完站起身来，向湖边走去，两位太监一左一右，搀扶着她。太后登上了船，我们大家也跟随进入。



颐和园清宴舫

大船里面空间合理地安置了一些雕花的黑檀木家具，放着蓝色缎面靠垫。窗子两侧各摆放着一只花瓶，插满了美丽芬芳的鲜花。在这件起居室的后面，还有两个小客舱。

太后看出了我的好奇，就准许我到客舱里面参观一下。两个小舱其中一间做更衣室，洗漱梳妆用具一应俱全；另外一间放置了两张卧榻和几把小椅子，太后累了的时候可以用来休息。

太后坐在她的御座上，吩咐我们众人坐在船板上。已有太监在船板上铺好了红缎垫子。直接坐在地板上，对于身着中国服装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对我们几个穿着法式服装的人来说则不容易了。我坐在那里觉得特别不舒服，却又不敢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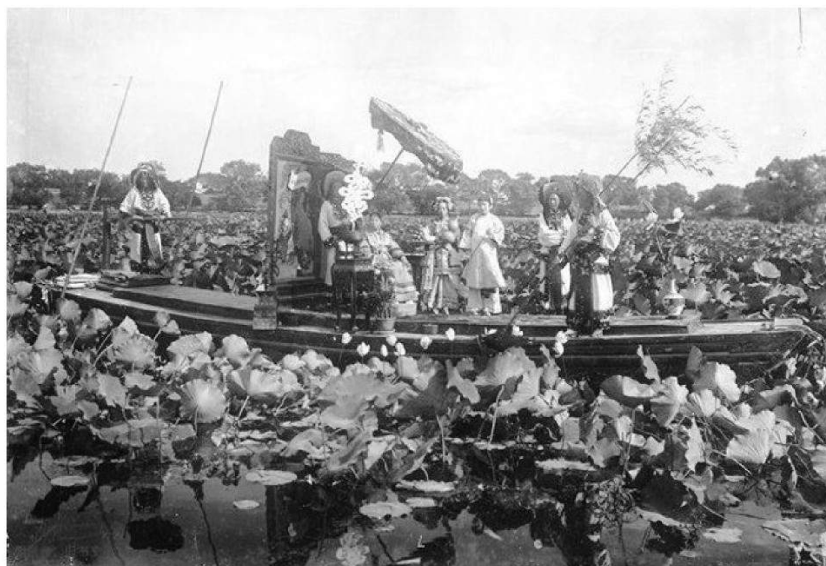
我很想换上轻便的满族服装，那样会舒服多了。可没有太后的恩准，我可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还是忍一忍为妙。太后注意到了我们难受的样子，便委婉地说道：“要是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站起来，欣赏一下后面的这些小船。”

我把脑袋伸出窗外，看见皇后和一些女官在后面的小船上。她们向我打招呼，我也向她们挥手致意。太后看见了，笑着对我说：“我给你一只苹果，你扔给她们吧。”她说着，便从桌子中间的果盘里拿了一只苹果递给我。我拼尽全力抛出去，却没有落到那小船上，直接掉入了湖水中。太后笑着让我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扔到地方。

太后拿起一只苹果抛了过去，苹果不偏不倚朝着另一只小船飞过去了，正好打中一位姑娘的脑袋。我们都畅快地笑了起来，我此刻感到非常开心。

除这几只船外，还有几只敞篷小船，一只载满了太监，一只载满了丫鬟、嬷嬷，其余的小船载着待用的午餐。

湖上景色很美，湖水在阳光下碧波荡漾水光粼粼。我忍不住对太后说，这湖水在阳光下的颜色，让我想起了大海。



1903年，慈禧太后在紫禁城西苑旁荷花湖的一条游船上，容龄和庆亲王的四格格陪侍

太后说道："你游历过那么多的地方，还在想着大海。你以后不要再到国外去了，就呆在这里陪着我吧。我满心希望你能喜欢在这里的湖光山色中行舟，不要再去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了。"

我赶紧表示自己很喜欢服侍太后的生活方式。这些话是真心的，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美丽的风景，晴朗的天气，明媚的阳光，还有太后的慈爱、温馨慈祥如母亲般的温婉话语。我真是越来越爱戴这位太后了，这种感情在与日俱增。我太喜欢这里的生活了，甚至已将巴黎的繁华胜景，都远远地抛在脑后了。

最后，我们驶到了湖的另一处地方，这里宛如溪流，非常狭窄，宽度仅容一条船通过。此处两岸遍植垂柳，风吹柔枝，光影斑驳，让我想起了自己读过的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奇幻场景。

这时候，我看见丫鬟、嬷嬷和太监们捧着食盒在两岸走着。此刻只有两只船在继续行进，皇后的那只和我们所乘的这只。太后说道："再过片刻，我们就能到那边的山脚下了。"

我们靠近了湖岸，上面已经备好了一顶黄色轿子和几顶红色轿子。我们上了岸，走近那些轿子。太后坐进了她的轿子，我发现并不是早上使用的那一顶。这是一顶小一些的黄色轿子，两位太监抬着黄色的轿杠，挎着黄色的轿绳，轿子的四个角各有一位太监扶着以防摇晃。

太监抬起轿子的时候，慈禧太后说道："裕太太啊，今天呢，我特准你和你的女儿们乘上红轿。换做一般人，我可是不会这样对待的啊。"

皇后对我们示意了一下，我们立刻明白了，她是在暗示我们磕头谢恩，我们马上叩头感谢隆恩，并跪在那里直到太后登上轿子。

我们找到自己乘坐的轿子时，发现站立轿旁等候的太监，竟然是专门伺候我们的那几个。我还注意到，一顶轿子的杆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很惊讶，问起是怎么回事。太监告诉我说，太后昨天晚上就已经这么安排好了。

这样子登山真是很有趣，我看到太后的轿子走在最前面，皇后的轿子在后面紧跟着。从后面朝上望去，我觉得这种攀登方式很是危险，后面的轿夫必须将轿杆高高举过头顶，才能保持轿子的平衡，真是太让人紧张了。我觉得很害怕，心惊肉跳地想，要是他们一脚踏空，滚下山去，我们可就彻底完了。

我小声对走在轿子旁边的一位太监说，我们的生命可都掌握在轿夫手上，真害怕万一轿夫们摔倒，那可就麻烦了。这位太监让我朝后面看看，我看了一下，大吃一惊，原来抬着我们的轿夫竟然也正将轿杆高高举过头顶，而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这真让人惊奇。

那太监让我放宽心，说轿夫们都是经过了专门训练，这样抬轿上山早已驾轻就熟，完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才稍稍平定了一些。其他女官们的轿子依次跟在后面缓缓上山。很多太监、丫鬟们步行紧随其后，也都小心在意，步步谨防我们滑下山去。

感觉真是经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抵达了山顶。我们搀扶着太后稳稳当当下了轿子，跟着她一起步入了一处亭子。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漂亮华美的建筑物。这座名为清富阁的亭子，在我看来，也算得上是整座颐和园内最“一览众山小”的顶峰之作。

清富阁只有两间房子，四面墙上各设窗户，像是一处观光台，到了此处的人可以毫无遮挡地俯瞰各处风景。那仅有的两间屋子里，大的一间是太后享用午膳的地方，小的一间是化妆室。我发现皇宫内，无论是哪里，只要是太后会到的地方，总会设有化妆室。

太后领着我们四处走动，饶有兴趣地指着那些散布各处的花花草草给大家看，还介绍着那些花草的名称和讲究。

一个小太监过来禀告，说太后的点心已经准备停当。这是我当班的第一天，按照规矩，我连忙走出去准备，看到在两只黄色的大盒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水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一般无二。我每次端两盘摆放在太后面前的方桌上面，一共端了九趟。

太后还在和我母亲谈论着和花花草草有关的闲话儿。我注意到，太后一边聊天儿，一边在留意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小心翼翼地把盘子放在桌子上面，根据对上次用餐过程的细心观察，我暗暗记住了太后喜欢吃的几种点心水果，这一次便有意识地将那几种放在靠近太后的地方。

看了半晌，太后笑了起来，对我说道：“你做的很好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是我爱吃的，知道放在离我近的地方？是谁指点过你的呢？”我回答太后说，从没有谁告诉过我这些，是我昨天服侍老祖宗用膳的时候留意到的。（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对着太后称呼老祖宗，是因为根据满族风俗习惯，对话的时候，为表尊重，应将上级、长辈或者父母的名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说出来，而非直称“你”、“我”。）

太后说道：“看得出来，你是处处都很用心。（在中国，人们在描述“思考”的时候，以“心”来代替西方人话语中的“脑”。）不像我身

边这些人，一个个像无头鸟一样。”

说毕，太后就快速地吃起了点心，还给了我一些蜜饯，并允许我在她的面前吃，不用回避。我当然没忘记马上谢恩，在我看来，礼多人不怪。太后告诉我：“我再赏赐你小小东西的时候，你不必磕头了，只须说一句‘谢老祖宗赏赐’，便可以了。”

过了一会儿，太后吃完了点心，吩咐我将盘子撤走。她说：“今天轮到你当班，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了。你拿去到走廊里慢慢吃吧。我吃不完这些，剩下了这么多。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呢，可以让服侍你的太监为你送到住处去。”

我把小碟子放进了食盒，拿到走廊里，在桌子上摆放齐整，请皇后一起吃。我不清楚这样做是不是得当，但是我想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就试着邀请一下吧。皇后说好啊好啊，也吃了一些。

我刚刚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就听到太后在叫着我的名字。我赶紧走了进去。太后正坐在餐桌边准备用午膳，她对我说道：“昨天，那位勃兰康夫人还说了些别的什么话没有？她真的还满意么？在你看来，你觉得那些外国人真的是尊重我的么？其实我不那么想啊，我觉得可能正相反，他们根本忘不了光绪二十年的时候那场义和拳之乱。我不介意承认，当时我很好地遵守了祖上传承的规矩，做过的那些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想不出有什么必要采用那些洋人的方式，也想不出那样做会有什么益处。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外国女人评论我是个凶神恶煞的老太婆？”

她在吃饭的时候端端地把我叫过来，竟然是问这些不相干的问题，我实在是很惊讶。太后看上去却是神情凝重，很显然，她正为这些突如其来的想法深深困扰着、纠结着。

我十分肯定地告诉太后，只听到过有人说她好，没有人说过她坏。外国人在我面前所说到的，都是太后多么的和蔼可亲，气质优雅等等。我的话让太后高兴了一些，她笑了一下说道：“当然了，他们在你面前，也只好这样说了。让你听到自己的主子是完美无缺的，你

心里自然也会高兴。其实到底怎样，我心里何尝不通通透透。我本可以不用过多忧虑，可我实在不能容忍中国老是陷入如此贫弱的境地。虽然啊，身边的人都准备了一套好的说辞在宽慰我，说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非常友善，我知道事实上未必如此。我希望我们能有一天强盛起来，不再受洋人那些窝囊气。”

说这些话的时候，太后神色严峻。我对这个话题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有尽量去宽慰她说，国家强盛的那一天即将到来，我们都在热切期盼着呢。我想为她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看见她正忿忿不平的样子，只得欲言又止。我思忖，还是不要在这种场合提什么建议，还是另寻良机吧。

看到太后这个样子，我为她感到遗憾。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拿出世界上所有东西来支持她、帮助她，我可以告诉她普通民众对她的看法，让她了解真实情况，这些真实情况是没有任何人敢告诉她的。然而，某些不确定的情况昭示着我，现在必须保持沉默。太后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建议的事情，最后终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现在还远远不是进谏的成熟时机，若强行建议，肯定会适得其反。

有了这样的交谈过程，我对太后的尊敬之心更加炽烈。我将会更加地谨小慎微，绝不冒犯太后，有朝一日实现我诚心进谏的愿望。我打算首先彻底地了解太后，进而尝试影响她推进中国的改革。

太后用膳的时候，我一直站着伺候。此时，太后站立起来，将她的餐巾递给了我（餐巾以一码见方的丝绸制成，编制得色彩缤纷）。餐巾的一个角儿略微小一些，镶嵌着一只金色蝴蝶，蝴蝶背后设置了一只挂钩，以便挂在太后的衣领上。太后说：“你们一定都饿了。把皇后和其他人叫来用餐吧，这桌子上的东西你们随便吃，尽量多吃一些吧。”

我真的已经饿坏了。读者可以想象，我从早上五点直到现在，只吃过些许早餐，还走了这么多的路，忙碌了这么半天。太后在桌子旁坐下来用膳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了。她独自享受了好一顿饕餮大

餐，还吃得那样慢腾腾的，我站在那里和她谈话的时候，简直感觉她永远也吃不完这顿饭了。



慈禧太后游湖照

皇后站在桌子一头，其他人本应分别站立桌子两侧，但是我们都不想靠前站，便纷纷站立在桌子的另外一端。食物和我们昨天的大致相同。

太后在化妆室里洗好了手和脸，走了出来。她更换了一件袍子，朴素无华，却也别有一种韵味。这件袍子以粉红色和灰色的生丝编织而成，每当太后移动脚步，袍子上的色彩便不断变幻着。

太后走出来说道："我看看你们吃饭吧。为什么你们都站在桌子那一头呢？好菜都在这边的啊。都过来吧，挨在皇后旁边吃吧。"

我们都顺从地从桌子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太后站在我的旁边，让我尝尝一碟熏鱼味道怎么样，那也正是她爱吃的一道菜。太后对我说："好好吃，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要明白，在这一群

人里面，你要做最好的，要出类拔萃。当然了，谁对你不公或者不好，你可以过来告诉我。”

太后说完便出去了，说是要出去走一走。我注意到有几位女官面露不悦之色，显然是对太后如此关照我而感到不平。我知道她们对我有些嫉妒，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们很快用完了午餐。因为对宫中规矩和环境依然生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种时候要不要陪着太后同行，就只好跟着皇后。自从看出有些女官对我存有嫉妒之心，我便愈加事事小心，时时在意，防止自己做事出错，惹得她们笑话。我可不能给她们取笑我的机会。

我听到太后正在训斥照看花园的太监，责骂他们太过懒惰，没能及时剪去那些花木的冗枝。我们走近太后身边。她对我们说道：“你们看看，无论什么事情我都要亲自过问不可，如若不然，我的这些花木都要被毁掉了。这些奴才真是靠不住，真想不出他们能做好什么事情。他们本应见天四处走动细心观察，剪掉枯萎的枝条，收拾好落叶。我看他们真是几天不受罚，心里不舒服，等不迭地要挨板子了。”她笑着又说，“他们想着挨板子，我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我思忖着，这些人难道是傻瓜不成，巴巴地无事生非，想着挨板子？只是不知道谁来执行处罚呢？太后对我说道：“你见过那种处罚场面没有？”我回答说亲眼看过的，那是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沙市看见过犯人在衙门里挨板子。太后说：“那可不算什么，那些囚犯还没有我们这儿的太监一半坏呢。这些太监们犯了错，理所当然应受到更重的惩罚。”

4

太后觉得我应该学学掷骰子，她总是凑不到足够的人来玩这个游戏。我们回到了她前面用午膳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只大方桌子，还有一把太后的御座，都朝着南面。南是太后最为得意的方位。太后坐在御座上，对我说道：“让我来教你怎么玩这个游戏。以你的汉语

水平，能够看懂这张地图么？”

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与桌面等大的地图，绘制得色彩缤纷。地图中央写着游戏的玩法说明。说明是这样讲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八仙过海”。所谓的“八仙”，指的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几位神仙，分别是吕洞宾、张果老、铁拐李、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和汉钟离七位男仙，还有何仙姑，唯一的一位女仙。

这张地图正是中华帝国全图，标明了不同省份的名称。这里有八片圆形象牙牌，长约一英寸半，厚约四分之一英寸。每片象牙牌上面都刻着一位神仙的名字。这种游戏可以八个人玩，也可以四个人玩——八个人玩的时候，每人一片象牙牌，四个人玩就每人两片。

地图的中间摆放着一只瓷碗，每个游戏参与者往碗里掷六颗骰子，然后比较点数多少。举个例子来说，有四个人参与游戏的话，其中一个人往瓷碗里掷出六颗骰子，然后计算骰子总的点数。他可能得到的最大点数之和是三十六点，若能掷出这个最大点数，牌子上所注明的神仙便可以去杭州城欣赏美丽的风光。若是代表吕洞宾的人掷出了三十六点，便把吕洞宾的象牙牌放在地图上的杭州那里。同样的道理，若是四个人玩，这个人就再为自己手中的另一位神仙掷一次骰子，同样的道理，若是八个人玩，则只为一位神仙掷点数即可。

不同的骰子点数代表地图上不同的省份，点数的等级依次如下：六颗骰子点数全相同，六颗中有一对至三对点数相同，最小的是双数的一二三点。若是哪位神仙不走运，碰到了双数的一二三点，就不得不出局了。总而言之，第一个游遍全国回到皇宫的“神仙”，便是最后的赢家。

我把地图上的说明文字一句一句读给太后听，太后似乎非常高兴，她说：“真想不到你竟然能读得这样流畅。这个游戏是我自己的发明。我很费神地教过三位女官学过这个游戏，从教会她们认识这些汉字开始。她们学了太长时间，没等她们学会，我就完全失去了耐心。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玩了吧。”听太后说出女官们竟然这般无知，我真是万分惊讶。我本以为她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以至于我

不敢在她们面前班门弄斧，随便显示我的中国文化知识。

随后，我们开始玩这个游戏。太后的运气相当不错，她手中的两位神仙总是遥居我们之前。一位女官对我说道："你将会惊奇地看到，老祖宗总是赢家。"

太后听了，忍不住笑着对我说："你追不上我的神仙的。你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只要你的任何一个神仙赢过我的任何一个，我就赏赐你一个好礼物，速速朝前赶吧。"

我想我是赢不了她了，她的神仙把我的远远撇在身后。她告诉我说，可以把想要的点数喊出来，我喊了，可是每每事与愿违，掷出来的点数总是相差很远。太后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不清楚这游戏玩了多长时间。我们计算了一下，排在第二的是我的一个神仙。太后对我说："我早知道你赢不了我，也没有谁能赢得了我。看在你仅次于我的份儿上，我还是要赏赐礼物给你。"

这么说着，她命一位丫鬟去拿几条她的绣花手帕来。丫鬟拿来了几条彩色的手帕，太后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她递给我一条粉红色的和一条浅蓝色的手帕，上面都绣着紫色藤萝。太后说道："这两条最好，你拿着吧。"我想跪下谢恩，却发现自己的膝盖动弹不得了。我费了半天劲，才勉强跪下去。

太后笑了起来，对我说："你看你还不习惯站立这么久，腿都僵硬得不能打弯儿了。"尽管我的腿很疼，我想还是不要表露出来为好，于是我告诉太后说，我的膝盖没什么，只是有些僵硬。太后说道："你到走廊去坐下歇一歇吧。"

我实在太高兴了，赶忙到了走廊里，见到皇后和几位女官正坐在那里。皇后说道："你站了这么长时间，一定很累了，坐到我这里来歇一歇吧。"我腿疼腰酸，背部发紧。太后坐在自己舒适的御座里，哪里体会得到我们久站之人的痛苦。

在皇宫之内还要身着洋服，真是个大问题，总有诸多不便。我盼着太后能让我们换上自己的满族服装。太后每天都要问我不少和洋装有关的问题，她说："洋装真的不如咱们自己的服装好，要我说的话，那样子紧紧地束住腰身，肯定很不好受。"她虽然那样说，却总也不让我们换去洋装，实在没有办法可想，又不敢言声，我们也只好耐心地等待她的指令了。

皇后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看，说道："游戏玩了两个多钟头了。"我和她说，我觉得好像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正说着，有四位太监用扁担挑来了四只薄木板做成的大圆盒子，放在我们的座位旁边。

一位太监递了一杯茶给我。等我的母亲和妹妹来了，这位太监也分别给她们上了一杯茶。那几位和我们交谈的女官却没有这样的待遇。我看到走廊的那一头也摆放了两只同样的大圆盒子。一个高个子的太监在那里泡茶，泡好后以银质茶托杯盖的黄色瓷杯斟了，端给皇后。同样的，其他女官都没有。

我感到有些不理解，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官问我："你介不介意让王公公（我们的太监头儿）把你们的茶分给我一杯呢？这样我就不用巴巴地跑到长廊那头的小屋子里去拿了。"我惊讶地看了她一眼，我根本还不知道那些都是我们的茶呢。我转而想到，不如就让王公公给她一杯，至于里面的道道儿嘛，留待以后慢慢了解。我宁可把自己的所有都让给别人，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显示自己的无知。

我们正说着话儿，太后出来了。我坐的地方正好面对着她的房门，因此第一个看到她。没等太后走近长廊，我便站起身，告诉皇后说，太后出来了。太后对大家说道："这阵儿差不多三点钟了，我想去歇一歇了，咱们离开这儿吧。"我们马上站成一列，伺候着太后坐上了自己的轿子。随后，我们各自也坐进了自己的轿子。

这一次，轿子的速度要快得多了。在进入太后的院子之前，我们就纷纷下轿，走近太后的轿子，站成一列，伺候太后下轿。太后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们也都跟了进去。

一位太监端着一杯开水，另一位太监端着一碗糖，一起走进来。太后用她的金匙，舀了两匙糖放到开水里面，慢慢搅动，优雅地喝下去，她说：“你们知道么，睡前吃一杯糖茶，可以安神定心，有助安眠。我经常这样做，发现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太后取下了头上的珠花，我马上接过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匣子，送回了珠宝房。我从珠宝房回来，看见太后已经上了床。她对我们说：“你们都歇着去吧，这里不用你们了。”

第八章　宫廷女官

1

我们得令，都退出了太后的房间。我注意到有两位女官没有一同出来。一位女官对我说：“真是太高兴了，我今天终于能歇一阵子了。我已经在这里连续坐了三个下午了。”我起初没有明白她说的究竟什么意思。只听她又说道：“哦，你轮值的日子还没有到，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到指令呢。你该知道，每当太后午休的时候，咱们中要有两个人留下来陪着她，并监督那些太监和丫鬟们。”我想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了，真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陪侍在太后的房间里。

皇后说道：“我们还是赶紧抓住机会歇一阵子吧，太后若是醒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确实如此，我还真说不清楚太后会睡多长时间。

我们便各回房间休息。等在房间里坐定了，我才真正体会到自己强烈的疲惫感。我真的很累，筋疲力尽困乏难耐。我以前真的极少像现在这个样子，早上五点钟便起身，忙忙碌碌一天没有停歇。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我坐在那里，开始神思心绪游荡巴黎了。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啊，在巴黎的时候，我经常是尽情享受夜晚舞会时光，玩到早上五点钟才上床休息。在这里，我却是在这个时间起床。这里的环境对我来说，满是新奇与陌生。

我看着太监们来来回回地忙碌着服侍我们，像一群女仆一般。我对他们说，这里不需要他们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暂时退下去，让我躺下来休息片刻。可他们还是在送茶或是送来各式点心，并殷勤地问我还有没有其他需要。

我正准备换一件舒适的衣服，一位太监走进来禀告说：“有客来

访。”两位女官和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一起走了进来。我初进宫的那个早上见过这个姑娘一面，当时正在忙碌，也没有人向我介绍她的身份。

两位女官说道：“我们来看看你，过的是不是安适。”我想她们这么做很有体贴之意，但是她们的相貌实在让我不敢恭维。她们将那位相貌丑陋的姑娘介绍给我，说她的名字叫做长寿。女孩儿长得瘦小单薄，容颜倦怠，面色黯沉，真看不出有多么长寿的迹象和潜质。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女孩儿对我行了礼，我还了半礼（对着太后、皇上和皇后行礼，我们需要跪在地上；而面对比我们等级低的人，我们只需要在其行礼的时候，笔直站立，等待她们行礼完毕，再微弯膝盖还礼，这就是我对长寿的还礼方式。）。

两位女官接着说道：“长寿的父亲是宫中的小官儿，所以长寿在宫中也没有什么身份，既算不得御前女官，也算不得丫鬟。”听到她们这么有趣的介绍，我几乎要笑出声来，那么，这位长寿究竟属于什么身份呢。那天早晨，我见到这姑娘和几位女官坐在一处，于是，我也就请她坐下了。

这两位女官询问我觉不觉得很累，喜欢不喜欢太后。我回答她们说，太后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和善不过的了，虽然我进入宫中的时候很短，但是我已经在内心里深深地尊崇太后了。

她们看了一眼长寿，相视而笑，笑得意味深长。看她们笑得那样怪怪的，我心中很是恼火。她们问我：“你喜欢住在宫里么？准备留在这里多长时间呢？”我对她们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太后已然对我这样关照，我准备在宫里久住，竭尽所能服侍好太后，尽绵薄之力，以期为太后有些助益。此外，为君王和国家尽忠尽职，也是我辈的本分。

她们笑着说道：“我们真是同情你啊，为你感到遗憾。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怎样的辛勤劳苦，也得不到任何承认和赏识的。要是你按照方才所说去做的话，你将受到众人菲薄。”

我都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或者是有意隐晦地暗示些什么意思。我觉得她们说得怪里怪气，就想赶紧结束这个话题。这样想着，我立即转变话题内容，化被动为主动，问起她们的头发谁梳的，鞋子谁做的等等。她们回答说这些事情都是丫鬟们做的。

长寿开口对两位女官说道：“把宫里的那些事儿都告诉她吧，相信她听了之后，会彻底改变想法的。”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长寿姑娘，尤其对她的长相没有丝毫好印象：个子矮小，身体单薄，头小如拳，牙尖唇薄。她笑的时候，当真是皮笑肉不笑，只闻难听的声音，看不到脸上有任何表情。

我只想和她们扯一些闲篇儿，让她们没有机会传播流言蜚语，搬弄是非。她们却都很是狡猾，发现我在想尽办法牵引她们的话头儿，就干脆说道：“让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吧，不过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万不可泄露出去为好。我们都很喜欢你，才想给你一些忠告，帮助你在陷入麻烦的时候，能够自我保护。”我告诉她们，我做事一向时时小心处处谨慎，不会惹上什么麻烦的。

她们再次笑了起来，说道：“那也没什么两样的，太后吹毛求疵，总是能从鸡蛋里面挑出骨头的。”我并不相信她们所说的这些闲话，想要拒绝她们所谓的忠告。不过我转念一想，姑且听听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我不想和别人有什么过节，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开罪她们，使得大家都尴尬。

这么想着，我对她们说道，像老佛爷这样和蔼可亲、善良宽厚的人，怎么可能去计较我们这些势单力孤的无助姑娘的错儿呢。何况，我们本就是她的人，她要怎样对待我们都是天经地义的啊。

她们说：“你不知道啊，你不清楚这里是多么邪恶的地方，这里的痛苦与折磨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现在肯定觉得在太后身边服侍是很幸福的事情，身为御前女官是无比荣耀的。你现在初来乍到，太后对你还不熟悉，对你还有些新奇感，不会怎样难为你，其实，你的苦日子还远没有到来呢。不能否认，太后现在对你很仁慈和善，但是等她对你厌烦了，看她将怎么对待你。”

“我们深谙宫廷生活，早已受够了这里的一切。你肯定也有耳闻，太监总管李莲英狐假虎威，借着太后的威权统治这个宫廷，我们无不畏之如狼似虎。他平日里佯作一副无法左右老祖宗的样子，可谁又不知道呢？怎么样处置一个人，都是李总管和太后一起斟酌的结果啊。所以，倘若我们中有谁犯下了过错，便常常去恳求他解救。李总管总是说自己没有办法说服太后，不敢多说，唯恐言多必失，反受太后责罚。”

“我们都恨透了这帮可恶的太监。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现在对你恭恭敬敬，尊重之情溢于言表，唯恐你看不出来。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你现在很受宠。我们却时常要受到他们蛮横无理的对待，实在是无法忍受啊。”

“老祖宗总是喜怒无常情绪不定，她今天宠着谁，明天可能就弃之如敝履，厌之如荼毒。她心绪不定，恩怨不明。说到李莲英，连我们的皇后主子，都得让他三分，对他恭恭敬敬，礼貌有加。我们更是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了。”

她们叽叽咕咕滔滔不绝讲个没完没了。这个时候，王公公走进来给我们斟了茶。忽然，我听见远处人声纷乱，便问王公公发生了什么事情。女官和长寿也暂停絮叨，留神倾听。一位太监飞奔而来，对我们说道：“老佛爷醒啦！”面前的几位女子马上起身，说着要去伺候太后，快速地离去了。

她们的到来让我感到不快活，真希望她们从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更没有说过那些可怕的话为好。她们说了那么多太后的坏话，让我很是烦闷不悦。我第一天到宫中，便爱上了太后，哪里听得下这些话？我要忘记刚才听到的纷乱话语。

我来不及换衣服，便马上赶到太后房里。太后正在炕上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个小桌子。见我进门，太后笑着问道：“歇息得还好吧？睡着了么？”我回答说自己不困，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太后说：“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就想睡便能睡着了。现在

么，你还年轻，贪玩爱闹的。看你一副疲倦的样子，好像到山顶采花，或者长途跋涉过的样子。”我只好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是的。”

那两位刚刚还在我面前信口雌黄、说了很多太后坏话的宫女走了进来，忙前忙后地为太后递上洗漱梳妆用品。我看了她们一眼，想到刚才说了那么多太后的不堪之语，现在又如此这般来当面献殷勤，真能做得出来，我都为她们感到羞愧。

2

太后洗了脸，梳了头，一位宫女送来鲜花，有茉莉花和玫瑰花等。太后选了几枝戴在了头上，对我说道：“相比较那些翡翠珍珠，我还是更喜欢鲜花。我很爱看那些自己精心浇灌的花儿慢慢成长。自你来了之后，我总是忙碌，也没有时间去看看我的那些花草。你去告诉他们速速准备晚膳，等会我要去散步。”

我快步走出房间，把太后的命令传达给太监们。一般来讲，正式用膳之前，我们应该先准备一些精美可口的小点心给太后。

此时太后已经穿着停当，坐在大厅里面玩纸牌。太监们照例摆好了桌子，备好了饭菜。太后放下纸牌，开始用膳。她问我：“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么？”我回答说，我太喜欢陪着太后了。太后又说：“我经常听人说起巴黎，那里究竟是怎样美丽的地方？你们很享受那里的生活么？现在还有回去的想法么？你们离开家乡三四年，身居异国他乡，一定过得很艰辛。在你们父亲任期届满的时候，接到了宫中的回国旨意，心里应该很高兴吧。”我除了回答“是的”，还能说些什么呢？总不能把真实的感受——那种离开巴黎时的难过落寞——通通告诉她吧。

太后又说：“咱们中国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不过是生活方式上与外国存在些差别罢了。那种‘跳舞’是怎么样的呢？我听人说过，两个人手拉着手满屋子转来转去跳来跳去。若真是如此，我觉得可没有什么意思啊。你们曾经和男人一起跳过舞么？他们和我说过，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也会跳舞，真的是那样么？”

我就向她介绍了什么是总统舞会、私人舞会、假面舞会等等。“我可不喜欢那种什么假面舞会”，太后说道，“都戴着面具，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舞伴是谁啊。”我向她解释说，主办方在发送请帖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那些表现不佳举止粗俗的人是无法进入上层社会圈的。太后说：“我倒是想见识一下舞蹈是怎么个跳法，你能为我表演一小段么？”

我就去找妹妹，她正在和皇后聊得热火朝天。我对她说太后想看看跳舞，我们去表演一下吧。皇后和女官们听到这话，也都表示想欣赏一下。

妹妹说曾在太后的卧室里看到一个大留声机，说不定能找到合适的音乐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妙，马上禀告太后。太后说：“哦？你们一定要跟着音乐跳么？”我们差点笑了出来，就告诉她说，有音乐伴奏的话，我们能更好地找到节奏，也能跳出更好的效果。太后命太监将留声机搬到了大厅里，并说：“我用晚膳的时候，你们就跳给我看吧。”

我们翻找出了很多唱片，发现几乎都是中国传统音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支华尔兹唱片。播放起音乐，我们开始跳了起来。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跳舞，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我们发疯了，在屋子里无休无止地转来转去。

我们跳完了舞，看到太后正对着我们笑。她说道：“我是不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这样子一圈儿一圈儿地旋转着，会不会头晕目眩？我猜你们的腿一定很累吧。跳得倒是挺不错的，正像中国几百年前的姑娘们跳的那样。我知道跳这种舞蹈确实是很难的，要保持优雅美观的姿态。我总还是觉得女子和男人一起跳舞，到底是不合适的。我看不得男人揽着女孩儿的腰，我还是喜欢女孩儿在一起跳。在中国，可是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洋人可能在这个上面毫不在意，这足以说明他们比咱们开放。我听说外国人都不尊重自己的生身父母，可以打父母，还可以将他们赶出家门，这些都是真的么？”我解释说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传达这个信息的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有失偏颇。

太后说道："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可能是外国的普通人里面，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些人看到了听说了，就形成了错误的观念，以偏概全，认为外国人都是那个样子对待父母。依我看来，中国的普通百姓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听了太后说的这些，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她面前编造出了这么荒谬无稽的谎言，还能让她信以为真。

3

我们吃罢了晚饭，已经五点半了。太后说想在长廊走走。我们便跟着她一道散步。太后把那些花花草草指给我们看，说是她亲自栽培的。太后无论走到何处，必有随从陪侍前呼后拥，与上早朝的时候一样的规模。

经过了大约一刻钟的样子，我们走完了长廊。太后令太监将凳子搬进其中的一间凉亭。凉亭是竹子搭成的，里面的家具陈设也都是以各种形式的竹子制成。





裕德龄扶着慈禧太后走下牡丹山回宫

太后在凉亭内坐了下来，有太监奉上了茶水和金银花。太后吩咐也给我们奉上茶来。她说道：“这样子，便是我简单满足的消闲方式了。我偏爱乡下的风景。这里还有很多好的风景，我会慢慢地让你们领略到的。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看过了这里的风景，会对外国的风景有所改变，不会再迷恋那里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景色能和中国相比。很多王宫大臣们从国外归来，和我说起外国的风景，无非是粗鄙难看的山和树之类。真的是这个样子么？”我迅速推断出，一定是有人为了取悦太后，故意抑人而扬己。我告诉太后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也

欣赏过很多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美丽风景。

我们谈着谈着，太后觉得有些凉意，便问我：“你们冷不冷？看看你们都有自己的太监，却都在旁边傻站着，不知所谓。以后再出来的时候，要吩咐他们带上你们的衣裳备用。你们穿的洋装肯定不会舒服，不是太暖便是太冷吧。还有，把腰部束缚得那样紧绷绷，真不晓得你们怎么吃得下饭。”

太后起身向自己的宫中踱去，我们都紧紧跟随。到了地方，太后坐在大厅的御座里，玩起了单人纸牌。我们见状纷纷退出来，悄声走到走廊里歇息。

皇后对我说道：“你们觉得很累吧？我猜你们肯定不习惯这个样子，一整天来回忙碌不停，没有片刻休息。你们最好还是早点换上满族服饰，还会舒服一些，举手投足也轻便宽松。你看看你们的长裙子，走起路来，还要时刻用手提起，真是太过麻烦。”

我对她说，我当然很想换了衣服，但是没有太后的旨意，我也不敢擅自更换。皇后说道：“不用费心啊，你不要总在意这个事情。应该过不了多长时间，太后就会吩咐你们换装的。她现在让你们身着巴黎服装，不过是想了解外国女子在不同的场合如何着装而已。她原来只看过一些前来参加游园会的外国女子身上穿的羊毛衫。我们也都以为外国女子远不及我们国家的女子这般奢华，直到前不久会见了勃兰康夫人，这样的想法才有所改变。”

“你还记得太后是怎么和你说的么？她当时说，勃兰康夫人和她见过的女人很不一样，连穿着的衣服都完全不同。当时勃兰康夫人穿着的是一件雪纺连衣裙，装饰着精美的手绘花纹，太后特别的喜欢。”

我们正说着，电灯一下子都亮起来了。我们进了屋子，看看太后有没有什么需要。太后说：“睡觉之前，我们再玩一会儿骰子吧。”我们又玩起了昨天下午玩过的“八仙过海”周游全国的游戏。

我们玩了一个钟头左右，最终还是太后赢了。太后和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赢一次呢？”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而已，便说自己的运气不好。她便笑着说道：“明天再来比比看，你把袜子反着穿，博个好彩头。”我为了让她高兴，便答应一定试试看。

我进宫这短短的几天时间，一直在暗暗留心揣摩太后的喜好。我慢慢发现，最能令太后高兴的，莫过于对她事事顺从了。

太后说自己觉得累了，令我们去拿牛奶来。她对我说道：“我想你每晚在我上床之前，到隔壁房间去，在菩萨面前烧香叩头。我希望你不是基督徒，不然的话，你在我心里，就不是完全属于我的人了。现在告诉我，你不是基督徒吧？”

这个问题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得不本能地自我保护，告诉太后说我和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子哄骗太后，我心里有些愧疚，但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还明白，在这种情境下，我必须马上回答她，不能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否则会被她怀疑。

我极力掩饰慌张情绪，表面若无其事，内心却是波澜起伏。对于欺骗太后这种做法，我深感羞愧。我最早接受的教育便是，不能撒谎，要诚实待人，无愧于心。可这一次呢？当真是没有办法啊。

太后听到我不是基督徒，笑着说：“你值得我称赞，尽管和外国人交往了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恰恰相反，你保持了咱们自己的信仰。继续好好保持吧。我现在很高兴，我曾以为你肯定信仰了外国的神呢。我原以为尽管你不想信仰，洋人还是会想方设法让你信的。嗯，好了，我要睡了。”

我们伺候太后脱了衣服。我像往常一样，收好她摘下的珠宝首饰。她睡觉的时候，还戴着一对玉手镯。太后换好了睡衣，躺进了丝绸被子，吩咐我们：“没事了，你们去吧。”我们向她施了礼，退出了卧室。

大厅外面有六位守夜的太监，站立在冰冷的石头地面，他们将整夜无眠。太后的卧室里面，还有两位太监、两个丫鬟、两个嬷嬷，有的时候，还有两位女官。这些人也同样是整夜不能睡觉。两个丫鬟专司为太后捶腿，嬷嬷看管着丫鬟，太监看管着嬷嬷，女官看管着所有的人，防止他们懈怠或是行为不当。

所有夜值的人都是轮流换班，有时候轮到不可靠的太监，就必须安排两位女官整夜坐在那里监视着。太后最信任的人便是女官。

我向一位守夜的太监打听那些留守的人究竟都做些什么，他告诉了我这些内容，我真是深感惊讶，我从未见识过这样奇怪的安排。

稍后，一位女官告诉我说，按照宫廷的惯例，她们要轮流在太后的卧室里伺候着，早上的时候叫醒太后。明天是我值班，后天则轮到了我妹妹。她边说这些边意味深长地笑着。当时，我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到后来我才明白。

我问她，我该采取什么方式叫醒太后呢。她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要靠你自己的判断了。不过千万要小心，不要惹恼了太后。今天早上是我轮值，我知道太后昨天累了，睡得比较沉。我便比平时大声了些。太后醒来的时候勃然大怒，把我大骂了一通，嫌我叫醒得太晚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太后一旦起床晚了，便会责怪我们没有大声喊醒她。话说回来，现在她还不会对你这个样子，因为你是新来的人，等到过了几个月，你就知道其中滋味了。”

这位女官所说的一番话，让我颇有几分担忧。不过，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对太后的观察，还是不相信她是那种会对尽心做事者大动干戈的人。

第九章　皇帝

1

第二天早上，我担心会迟到，就比平时起床更早。我匆匆忙忙穿好了衣服，梳洗打扮完毕，赶往太后的寝宫。到了寝宫，只见几位御前女官正坐在走廊里。她们笑着让我一起坐着，说时间还早呢，才刚刚五点钟。她们告诉我，要在五点半钟的时候，叫醒太后。

过了几分钟，皇后也来了。我们向她行礼并道了早安。皇后和我们聊了几分钟，问起若是太后醒了，谁当班在里面伺候着。我告诉皇后是我当班。她命我立即进去伺候。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看见几个丫鬟在旁边站着，一位女官坐在地上。这位女官已经值了整整一晚上的班，困倦不堪。她看到了我，就站起来，对我低声耳语：“你来得正好，我先去换件衣服，洗漱一下。太后醒来之前，你千万不可离开。”

那女官说毕，离开了。我走到太后床前，说道：“老祖宗，五点半了。”太后面朝墙睡着，并不知道是谁在叫她，嘴里兀自说着：“走开，离我远点，让我再歇一会儿。我没让你们五点半叫我，我说的是六点。”说完，又睡去了。

到了六点钟，我再次叫醒太后。太后醒来之后，说道：“太烦人了，真是令人讨厌的东西，怎么叫来叫去的没个完！”她发完脾气，眼睛看了一下周围，说道：“呀，怎么是你呢，谁让你来叫醒我的？”我回话说是一位女官告诉我，说我今天轮到在太后卧室当值的。

“真是有意思，我还没下旨让你当值，谁这么胆大包天，竟敢自作主张乱说？”太后说道，“她们都知道当值不是轻松的事情，欺负你

是初来乍到，拿你开心呢。”我默不作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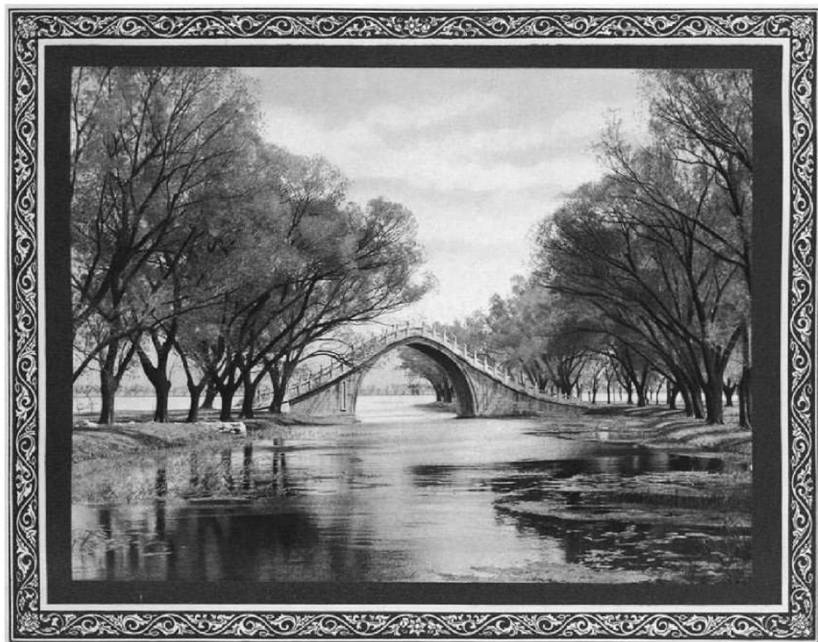
一整天，我都尽心尽力伺候太后，却也发现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太后特别在意小节，在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费尽心思去找些新奇好玩的事情来转移她的注意力，避免她因一些事情动怒。

我的读者朋友们一定想象不到，到了晚上十点钟，我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高兴。我又累又困，一到房间便脱了衣服上床睡觉。脑袋碰到枕头便马上沉沉入睡。

我在宫中接下来的生活，如此循环往复。从清晨上朝一直忙到晚上，手脚不停。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过去了十五天。我开始对宫廷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喜爱的感觉与日俱增。

太后始终对我们和蔼可亲，带着我们游览了颐和园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景观。我们还一起走过一座很高的拱桥（名叫玉带桥），去观赏太后位于湖西面的农庄。太后时常带着我们在玉带桥下划船行舟，或是在桥上往来徜徉。玉带桥的桥顶是太后很喜爱的地方，她经常在桥顶长时间停留，坐在她的黄绸缎凳子上，品味香茗，欣赏风景。

太后一般四到五天的样子，会到农庄走上一走。若是能在农园里收获一些蔬菜、稻谷或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她会非常高兴。她会在某间庭院里，饶有兴趣地亲自烹饪自己收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便也饶有兴趣地挽起袖子，帮着太后烹饪。



颐和园玉带桥

我们曾经从农庄里取回来一些新鲜的鸡蛋，太后教我们用红茶茶叶制作茶叶蛋。

她煮食所用的炉子非常特别，以黄铜制就，内部镶上灶砖。铜炉没有固定住的烟囱，因此可以方便地搬到任何地方。

太后告诉我们，制作茶叶蛋的时候，首先将鸡蛋煮熟，然后敲碎蛋壳，但不剥去，再加入半杯红茶、盐和香料。她对我说：“我喜欢乡村生活，那里比宫里的生活自然得多。我很乐意看到青年人玩得开心，我也会一起开心。我不喜欢贵妇人，尽管我们也位居其列。我年纪大了，但依旧贪玩。”

在农庄里忙完了，太后会首先尝一尝我们烹制的东西，然后给我们每个人都尝一尝。她问道：“你们不觉得自己烹制的东西，要比御厨烹制得好些么？”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要好得多了。”

我们便是以这类消闲方式，度过漫无边际的宫廷时光。

2

我每天早上都能见到光绪皇帝。在我有空的时候，他总会来问我一些英文单词。我惊奇地发现，皇上懂得的英文单词，竟然还真不少。我感觉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有一双会说话的、情绪丰富的眼睛。

皇帝单独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很开心，会开玩笑。然而，一旦他面对太后，立即判若两人，显得忧心忡忡又死气沉沉，笨拙而乏味。很多参加过早朝的人，都曾经和我说过，皇上显得有些愚钝，并且过分沉默寡言。

我每天都见到皇上，当然知道事实上他并非如那些人所说。我在宫中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观察皇上，发现他其实是中国少有的聪明男人。他有足够的通达权变能力和超乎常人的智慧，只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而已。

很多人问起我，光绪皇帝有没有胆识和智慧呢？当然了，话说回来，局外人并不清楚宫中的规矩，尤其是孝悌之道是多么的严苛。受到严苛的礼教所限制，光绪皇帝被迫放弃了很多事情。



光绪皇帝画像

我曾经和皇帝有过几次长谈，发现他是个有智慧，有耐性的年轻

人。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内心并不幸福，从童年时代起，他的健康状况就不太好。他告诉我，自己研究的学问不多，却天生热爱此道。他还是个天生的音乐家，能够无师自通地演奏任何乐器。他喜欢钢琴，经常让我教他弹奏。大殿中便有几架漂亮的平台式钢琴。他还极擅欣赏西洋音乐。我曾教过他几支简单的华尔兹舞曲，他很快便能完美地演绎出来。我认为他是个志趣相投的人，一位很好的朋友。他也很信赖我，经常和我谈起自己的烦恼和痛苦。

我们多次谈论西方文化，我很惊奇地发现，他对每样事物都如此精通。他一再和我谈到期待国家富强的雄心壮志。他爱他的子民，在饥荒时代或是洪涝灾害的时候，他愿意做出任何事情来护佑百姓。他非常在意自己的百姓。

我清楚，有些太监歪曲了皇上的形象——说他如何狠毒等等。进宫之前，我就对这些情况有所耳闻。皇上对太监们还算和蔼，当然也少不得划清主仆之间的等级界线。他向来不允许太监主动对自己说话。他从不听信任何流言蜚语。

我在宫中待了很长时间，深知那些太监们是多么刻薄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主子没有丝毫的尊重之心。他们无一例外地来自农村的最底层群体，没有接受过教育，内心没有道德观念，品行不端，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尊重之情。外界听闻过很多关于太后、光绪皇帝形象的彼此矛盾的信息。我可以向读者们肯定一点，这些都是太监们向其家人传达的闲言碎语，他们毫无顾忌地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为的不过是让谈话显得新鲜有趣而已。北京城的人们所知晓的与宫廷有关的信息，大多是通过这种歪曲的途径获得的。我在宫中的时间里，也屡屡遇到这样的事情。

3

有一天，在太后午休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阵恼人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燃放鞭炮的声音。这种声音出现在宫中就太不寻常了，因为宫中是禁止带进烟花爆竹之类东西的。

太后被吵醒了。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像见到房子着火一般，浑身战栗着四处乱跑。太后令太监们少安勿躁。但是根本没有人听她的，大家仍然像热锅上的蚂蚁，疯了似的团团乱转，一时间众人大呼小叫，声震屋瓦，乱作一团。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吩咐我们把黄色包裹递给她。（在此，我有必要解释一下那只特殊的“黄色包裹”，它以普通的黄布制成，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竹棍，分别用来惩罚太监、丫鬟和嬷嬷。）慈禧太后每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黄包裹，以备不时之需。我们都知道包裹在哪里，就纷纷过去将里面的竹棍全部拿出来。太后令我们去责罚那些不听话的太监们。

那种场景真是有趣得很，所有的女官和丫鬟人手一根竹棍，努力去分开那些嘈杂混乱的人群。这真是太滑稽的情况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别人也都在笑个不停。太后虽然站在走廊里看着我们，不过距离很远，未必看得真切。场面过于喧闹，她肯定也听不见我们在笑。我们费力地去分开人群，不过实在笑到筋酥骨软，根本没有力气动手打人。

突然间，仿佛得到了什么号令，所有的太监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原来是太监总管李莲英带着他所有的随从，走了进来。刚才还喧闹异常的太监们都吓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愣在原地，呆若木鸡。我们也都止住了笑，拿着竹棍转身走向太后。喧闹声开始的时候，李莲英也在打着盹儿，听见了声音便赶过来了解情况，并准备向太后禀奏。

当时的具体情况好像是这样的：一位小太监捉着了一只乌鸦。乌鸦在中国被视作不祥之鸟。人们因为厌恶太监，就将其比作乌鸦。由此太监们便对乌鸦有了莫名的痛恨。他们经常设置陷阱捕捉乌鸦，然后在乌鸦的脚上缚上大鞭炮，点燃引线之后，放飞那只倒霉的鸟儿。剩下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了，那只可怜的乌鸦正自由地飞向无边广阔的天地，鞭炮炸响，鸟儿在高空被炸得粉身碎骨，血肉飞扬。

看起来，太监们玩这套可不是头一回了。我听说他们特别热衷于欣赏这种血淋淋和充满了痛苦的场景。他们经常会在相邀开怀畅饮的

时候，进行类似的把戏，并以此为乐。这种残酷的消遣一般都是在宫外进行的，这一天，那只不幸的乌鸦正飞过宫廷院子的上空，爆竹爆炸的瞬间，它刚好飞近了太后休息的宫殿。

听完了李莲英的禀报，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吩咐下去，立即将肇事的小太监拿下，当着自己面儿接受惩罚。李莲英随从中的一位太监掌事，听到命令，即刻将肇事的小太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李莲英令人将小太监按在地上，两位太监站在他的身体两边，各执一根沉重的竹棍，轮番在他大腿上击打。那个小太监挨了痛打，从头到尾都没有敢呻吟一声。李莲英在旁边数着，等打到了一百下，才喊停手。

随后，李莲英跪在太后面前，脑袋在石阶上磕得砰砰作响，他称自己失职，管教无方，让太监犯下过错，惊扰了太后，实在是难辞其咎，恳请太后责罚。

太后说并不是李总管的过错，令他带犯错的小太监离开。整个过程中，犯错的小太监一直趴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有两位太监走过来，每个人抓住小太监一只脚，把他拖出了院子。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唯恐太后说我们矫情，看到她惩罚别人，故意做出一副多么恐惧的样子，等会又会到外面四处传播流言蜚语，说她是多么残酷无情，专横无礼的人。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事件，竟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诧。我后来在宫中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事情，也便司空见惯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同情这些受到惩罚的人，但是，很快我便改变了这样的观念。

我在宫中亲眼所见第一个受到惩罚的人，是一名丫鬟。她拿慈禧太后的袜子时，因为粗心，错拿了不是一双的两只。太后见到了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便命另一名丫鬟对她掌嘴，左右两侧脸颊各打十巴掌。那名执刑的丫鬟打得不够重，太后认为她们是好朋友，故而违抗命令，不舍得重罚。于是又让那个受罚的丫鬟反过头来惩罚执刑的这位。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委实滑稽无比，差点儿就笑出声来。当然，在那种庄严肃穆的场合，慈禧太后又在生气，是绝不可以笑的，只好拼命忍住。

当天晚上，我问起这两名丫鬟，如此这般互相掌嘴，有什么感觉。我之所以忍不住问这样的问题，并非出于刻薄的心理，而是因为我看到她们在掌嘴完毕，离开太后卧室的时候，马上便轻松地闲谈说笑，如同没事人儿一般。她们回答说这些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早就习以为常了。后来，我也和她们一样，见怪不怪，对此类事情习以为常了。

4

现在提一提这里的丫鬟们，若是论及出身，她们比那些太监们要好一些。她们都是满族八旗子弟的女儿，选进宫中后，要服侍太后满十年，才被准许出宫嫁人。我进宫的第一个月里，见到了这样一位出嫁的丫鬟。太后赏赐了她一小笔钱，大概五百两银子。这是一位特别精明能干的姑娘，在宫中的时候，很是中太后的意，故而很难被恩准出宫。这位姑娘名字叫做秋云，太后赐给了她这个名字，因为她看上去轻灵纤弱，柔美可人。

我和秋云在宫中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我很喜欢这位姑娘。她曾经嘱咐我说，不要听信宫中任何流言蜚语，太后曾经对她说过很喜欢我。三月二十日的时候，她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宫廷。

秋云的离开让我们很伤心，很不舍。直到她离去之后，太后也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离不开她。那段日子里，我们真是麻烦重重，感觉做什么都做不好。太后更是觉得没了秋云，凡事都不合心意，她的情绪为此大受影响，经常无故发脾气。

剩下的丫鬟们为此惶惶不安，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取悦太后，可都是白费力气，她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没办法，我们只得帮助丫鬟们做一些事情，以免太后更加心绪不安。

然而，事与愿违，太后制止了我们的行动。她说：“你们自己的事情都够忙的了，我不想你们再去帮助丫鬟们，这样做让我不高兴。”她看出了我对她严厉语气的不适应，转而笑着说道：“我心里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出于善意，为的是让我不要生气。但是这些奴才们太过狡猾，她们并非做不好事情，只是她们清楚，我会挑选聪明伶俐、手脚勤快的人到卧室来服侍自己，她们不愿意做这样的差事，就故意装笨扮傻，惹得我生气，便会安排她们去做寻常的差事了。太监们更是坏得很，他们也都害怕顶替秋云的位置。我看出他们的花花肠子了，偏偏不让他们称心如意，以后我专找蠢笨的人来伺候我得了，看他们能躲到哪里去。”

听闻太后这一席话，身边的几个丫鬟马上愁云满面。我看到这种情景，又差点儿笑出声来。我当时觉得这些丫鬟们是真的笨拙，而不是懒惰。但是随着和她们打交道的日子越来越长，我才发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太监们则是完全没有脑子的人，他们缺乏同情心，如行尸走肉一般。他们从早到晚都保持着同一个脾气，同一种状态，那种残忍的脾气和呆笨的状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太后有吩咐，他们马上跪地答道：“喳。”可一走出房门，他们便茫然四顾，互相打听：“刚才，太后吩咐咱们做什么事儿？我可全忘记了。”

有的时候，我们中的谁刚好在场，太监们过后便会来问：“能不能告诉我刚才太后吩咐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听到啊。”我们便常常笑着对他们揶揄一番。他们肯定是不敢再回去询问太后的，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为难他们，因此笑过之后，我们还是会告诉他们。

根据太后的旨意，一位太监的记录员负责将一年内太后发布的指令一一记录在册，因此，宫中每一天的事情都有案可稽。有二十位训练有素的太监专职负责这件事情，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都可算得上是优秀的学者。他们必须回答太后冷不丁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

当然了，在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太后本人也有很高的造诣。

若是哪个人回答不出她的询问，或者是学识不及她本人深厚，她总是为此感到骄傲，并为此不加掩饰地喜形于色。大家也因此而抓住时机奉承太后一番。

太后也喜欢逗乐，她乐得和他们开些玩笑。她也知道御前女官们学问不多，便也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来考考我们。我们不管知道不知道，都得随便搪塞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往往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惹得太后大笑不止。

我曾经听人说过，太后不喜欢太聪明的人，却也不能忍受别人太过笨拙。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刚进宫的三个礼拜，我心里暗自焦虑不已，不知道该去扮演怎样的角色才算适度。不过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便掌握了太后的好恶。太后当然是喜欢聪明伶俐的女孩儿的，却不喜欢别人锋芒毕露。我能得到太后的欢心，大抵便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何时和太后在一起，我总是留神观察她的表情，进而揣摩她的心理（当然，并非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很讨厌下人这个样子），然后恰如其分地去完成她吩咐的事情，不让她操心任何事情。

我还特别留意到一类细节，不管什么时候，太后想要一样东西，比如烟袋、手帕等物品，她都不会做出明确指令，只是看一眼想要的那件东西，然后再看一眼身边伺候着的人。（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太后每天需要的东西，都搁在上面。）

很短的时间里，我便熟悉了太后这种特殊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着她的眼睛，我便能清楚地知道她想要的东西，因此我很少出错。这让她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太后为人意志坚定，精明强干且雷厉风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偶尔我也会看到她心情糟糕的一面。她感情强烈，性格敏感，但是能以坚强的意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她也希望别人能和自己保持一致：做一个沉默的执行者，只付诸行动，不付诸语言。她不希望别人掌握自己的心思。

我敢肯定，亲爱的读者们一定会这样想：担任这位中国至高无上

统治者的御前女官，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事实上恰恰相反，我对自己的状况很满意。太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只要处处用心，让她高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5

四月初，太后因为久旱无雨而心存忧虑。她连续十天早朝后都进行祈祷，祈求天降甘霖，却没有任何结果。那一天，太后一言不发，不与我们任何人交流，我们也保持沉默。我观察到，太监们无一例外地非常恐慌，仿佛有祸事即将降临。我们异常勤劳地工作，早饭午饭都没有吃，所有的女官都饥肠辘辘。

我为太后感到忧心。最后，太后对我们说，大家可以离开了，她想歇一歇。我们这才长舒一口气，赶紧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我好奇地询问身边的王公公，为什么太后要为天不降雨而忧心忡忡呢？每天都是这样艳阳高照的天气，做什么事情都方便，不是很舒适么？

王公公答道，老佛爷是为天下贫苦百姓担忧呢，这么长时间滴雨不见，地里的庄稼都要旱死了，百姓可不都要饿死了么？那天下会成为什么样子啊。

王公公还提醒我说，自从我进宫直到现在，还没有下过一场雨呢。我掐指一算，我进宫已经两个月零七天，真没想到已经这么长时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又觉得仿佛已经进宫很久，宫里的生活舒适安逸，太后又对我如此慈爱有加，好像早已与她相识多年一样。

那天晚膳太后吃得极少，四周静寂无声，每个人都沉默。皇后让我们尽快吃完，我不知道为什么。回到休息室之后，皇后告诉我，慈禧太后为贫苦可怜的百姓担忧，准备亲自祭祀祈雨，将会下旨在宫中禁食肉类两三天。

那天晚上，太后在休息之前发布了一道懿旨：北京城内，禁止屠杀生猪。这么做是希望以人们禁食肉，不杀生，以一片至诚之心感动

上天神灵，广赐甘霖，惠及天下，拯救苍生。

太后又令我们每个人沐浴漱口，保持身体洁净，准备好祈祷上苍。皇上也要亲自前往紫禁城的庙宇，主持祭祀仪式（名为“祭天”）。皇上亦须禁食肉类，不与他人对谈。一心一意祈祷上天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拯救万民于苦难。

光绪皇上佩戴着一块三英寸见方的玉牌，上面雕刻着满汉两种文字的“斋戒”二字，含义相当于前面所说的“祭天”，不吃肉，一心祭祀，每天祷告三次。

所有和皇帝同行的太监也都佩戴相同的玉牌，用意是时刻自我提醒，须认真履行自己祭天的承诺。

第二天，太后很早起床，嘱咐我不用为她准备珠宝首饰，她只需朴素穿戴即可。她自己匆匆穿戴完毕。她的早餐也极其简单，只有牛奶和馒头。我们的早餐则是白菜煮饭，加上一点点盐调味，读者朋友可以想象出来，这样的早餐实在是索然寡味。

太后除了发布命令之外，不和我们任何人交谈。我们也都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她身着一件浅灰色的袍子，没有装饰任何刺绣或是花纹镶边，洁净素雅；穿着灰色的鞋子，使用的当然也是普通的灰色手帕。

我们跟随太后步入大殿，看见一位太监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一大捆柳条。太后拿了一根细小柳条，插在了头上。皇后也如法炮制，并吩咐我们也都照着做。光绪皇帝拿了一支，插在了自己的帽子上。太后吩咐太监和丫鬟们也一样做了。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一枝古怪的柳条，这场景真是有趣。

李莲英走进来跪在太后面前，禀告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妥当，按照吩咐都布置在太后宫殿前面的小亭内。太后说道，大家是去祭祀，理所当然要步行前往。

我们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穿过了庭院，到了祷告的地方。亭子

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上面放着几大张黄表纸、一块玉板、一些朱砂粉代替墨水，两把小刷子，是做写字之用。

桌子的两侧，有一对大大的瓷质花瓶，插着两大枝柳条。我们任何人都不允许说话。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每个人的头上都要插上柳条呢？我很想搞清楚。太后的黄缎垫子铺在桌子前面。太后取过一片檀香，放入盛满炭火的香炉。

皇后悄声与我说话，让我去帮助太后燃香。我便走上前去，拿了几片檀香，放在香炉里点燃，如此反复做着，直到太后说够了。

太后在垫子上跪了下来，皇后跪在太后身后，我们也都在皇后身后跪成一排，祈祷起来。早上的时候，皇后就已经教过我如何祷告了，祷告辞是这样的："我等臣民敬仰上天如是，祈求诸位神灵体恤天下臣民，救万民于饥馑。我等臣民甘愿以己之身，代受万民之苦，祈求上天垂怜，普降甘霖，以济天下苍生。"我们诵读祷辞三遍，叩头三遍[2]。

祈祷仪式结束之后，太后一如既往地去上早朝。早朝的时间比往常早了很多。因为要在正午之前赶回紫禁城，光绪皇帝要在那里祈雨。平时皇上无论到哪里做什么，太后总是要跟着的。

早朝结束的时候，大约九点钟。太后吩咐我不必为她拿什么珠宝，她今天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便到了珠宝房，把东西都锁好，钥匙放在一个袋子里，封好了，和别的东西一起，交给了一位专事看管的太监妥善保管。

我们把太后喜爱的物品都装起来，其中最重要的还数那些衣服。太后的衣服相当多，根本无法全部装起来带走。因此，众多御前女官之中，那位管理衣服的女官最为忙碌。她要负责挑选好足够太后四五天内更换的衣服。她告诉我说，已经挑选了大概有五十件不同的衣服了。我对她说，太后不过在紫禁城待上个四五天，不必带那么多衣服去吧。她说，多带上一些有备无患，谁也搞不清楚太后每天的想法。皇上的行李则简单多了。

太监们抬来了几只黄色的木箱子，大约长四英尺宽五英尺深一英尺。我们先在箱子里铺上一条很大的黄色绸巾，放进衣服，再盖上一层厚厚的黄布。每个箱子都如法炮制。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装完了五十六只箱子。太监们将这些箱子提前运过去了。

皇帝、皇后与一众女官在太后轿子出宫门的时候，齐刷刷跪在地上送行。等轿子从面前过去之后，再各自找到自己的轿子，坐进去一路随行。行进的队伍一如往常那般壮观，太后轿子前面有御林军开道，四位年轻的亲王骑着马走在轿子两侧，四五十名装束齐整的太监骑着马紧跟轿子之后，一路浩荡前行。

皇上和皇后的轿子与太后的轿子一样颜色。嫔妃的轿子是暗黄色，御前女官的轿子则是红色的，都是四人抬的那种。太后她们的则是八人抬轿子。我们的太监也都骑着马，跟在我们的轿子后面。皇上的轿子从青石路上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轿子都跟着下来了，我感觉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抬头望去，太后的轿子依旧循着原路行进。我们抄了近路，提前赶到万寿寺准备接驾。

我们刚在万寿寺下了轿子，就忙不迭地为太后准备茶水点心。太后的轿子很快到达，我上前扶着她下了轿子，又搀扶着她的右臂缓步登上石阶。太后在御座上坐了下来，我们将一张桌子摆到她的面前，我妹妹为她端来了茶（当时的规矩便是如此，每当太后出行，或者每逢节日，原本太监们做的事情，便由我们来做了）。

我们将所有的美味茶点都摆放妥当之后，就出去歇息了。平日里，太后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总是习惯在万寿寺停下来歇息。

第十章　皇后

1

一个人坐在轿子里，我心中浮想联翩。在这美好的一天，我却免不了要为整天沉默无语的太后感到担忧。一般的时候，她总是开开心心，兴致高扬地与大家同乐。我还忍不住揣摩那些插在头上的柳条的含义，实在是有些费解。

太后和皇上用膳的时候，我悄声走出大殿。皇后和几位宫女坐在院子左边的一间小屋子里面，边喝茶边聊天。她们看见了我，做手势让我过去。

皇后对我说道："现在肯定又累又饿吧？快坐到我这里来喝杯茶吧。"我谢过皇后，并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我们你一句我一句随意地聊起了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没涉及什么实质性内容。皇后说："咱们还得有一个小时，才到紫禁城。"谈到早上祈雨的事情时，她说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地、虔诚地去祈祷。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开口问皇后那些柳条究竟代表什么含义。皇后笑着告诉我："佛教弟子认为，柳枝能带来雨水。所以，根据宫里传承的规矩，举行祈雨仪式的时候都要戴上柳条。"她还告诉我说，从今天起直到雨水到来为止，每天都要举行这种祈祷仪式。

正谈着，我们听见太后在院子里说话，知道她已用完午膳，便跟着皇后一起进入院子，和往常一样吃那些剩下的饭菜。虽然吃的饭菜里没有肉食，因为制作精致，却也异常鲜美可口。

午餐结束之后，我们来到院子里，看到太后在来回走动。见到我们来了，她说道："一直坐着轿子，我的腿都僵硬了。在离开这里之前，我要走动一阵子。你们觉得累么？"我们都说不感觉累，太后便

让我们陪着她散步。

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太后在前，我们在后。这许多人跟在太后身后，在院子里一圈一圈走着。太后回头看看，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像是马儿在绕着马厩转圈了。”这话让我瞬间想起了在国外看过的马戏团里的场景。

李莲英走了进来，跪在地上禀告说，起驾的时候到了。根据路程和队伍行进的速度计算，我们这个时候走，才能保证在太后选定的吉时抵达紫禁城。于是，我们离开了万寿寺。所有的轿子都走的飞快，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望见宫门了。

我们跟上了皇上的轿子，抄近路赶过去。离得近了，我看到宫门已经大开。皇上和皇后的轿子径直进入大门，我们则必须下轿步行进入。有几顶小轿子已经等在那里了（如前所述，这些小轿子由太监们负责抬着）。

我们到了大殿的院子，皇上和皇后正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如往常，皇上跪在最前面，后面是皇后，再往后是我们跪成一排，如此这般恭迎太后进入皇宫。太后进入自己的房间，在那里，太监们已经早早地将一切物事准备就绪，等待她的到来。

我们又分别在下午和黄昏时分，举行了两场祈雨仪式。太后回去休息之后，我们也纷纷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太监们早已将居所收拾得井然有序，床铺也都安置铺设妥当。有了这些太监们服侍真是很好，我自己几乎无法完成这些事情。我很是疲倦，感觉四肢僵硬，躺在床上便坠入梦乡，完全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后来，有人敲窗，我起身拉开窗帘，远远望去发现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密布的样子。

我心里一阵窃喜，心想肯定是要下雨了。太后可以宽心了。我起了床，很快穿戴洗漱完毕，兴冲冲地走了出去。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此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的窗户上清晰地反射着阳光，明晃晃直刺眼睛。

紫禁城里的宫殿年代久远，建筑方式奇特，庭院小而窄，游廊却宽而长。所有的房间光线都很暗，没有电灯，平日里只有点起蜡烛照明。人身处房间内部是无法看到天空的，必须走到院子里仰望，才得见分明。

我起床向窗外遥望的时候，太阳犹未升起，天空仅有微薄的晨曦而已，所以我朦朦胧胧地看了，误以为阴云密布，白白欢喜了一场。

我到了太后的寝宫，发现皇后已经到了那里。她总是第一个到地方，且永远装扮整齐大方，真想象不到她究竟是几点钟起身的。皇后对我说，此刻也并不迟，太后虽然已经醒来，不过尚没有起身。

我走进太后的寝室，与平常一样恭敬地向她道了早安。太后的第一句话便是问我天气情况，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如实相告——天上并没有任何要下雨的迹象。

太后听了，神色凝重，半晌不语，随后默默起身，和平常一般穿着洗漱用早餐。她告诉我们，皇上到天坛祈雨去了，今天早上不用上早朝，也没有别的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唯有盼望天降甘霖而已。



隆裕皇后（光绪皇后）

我们在这里连续祈祷了三天，依然是滴雨未见，真是令人大为失望。太后更是沮丧透顶。她吩咐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祈祷二十次。每次祈祷，我们都用朱砂和着少许水，在大张的黄表纸上点上一个红点儿，作为本次祈祷的记号。

2

四月初六的早晨，天空阴云密布。我立即跑到太后寝宫，向她报告这天大的好消息，发现原来已有人来报告过了。太后笑着对我说道："你已不是第一个来禀告这个好消息的人了，我知道，你们都争着想第一个来告诉我，令我心中欢喜，真亏得你们有心了。今儿，我觉得很累，想多躺一会儿，你先去吧，等我准备起床的时候，再让人带信儿给你。"

我退了出来，找到皇后，发现所有的宫女也都在那里了。她们问我有没有注意到下雨了。我们不约而同走出了侍应室，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院子的地面上已经湿漉漉的了。不一会儿，雨点越来越密集了。

太后起身了，我们再次进行了祈祷。每个人都掩饰不住的欣喜之情。天遂人愿啊，大雨倾盆而下，片刻不停，整整下了一天。太后心情大悦，独自玩起了骨牌，我站在椅子后面看着她。我看到皇后和宫女们都站在走廊里，太后也注意到了，对我说道："叫她们都到侍应室里面候着吧，没看见走廊里湿漉漉的么？此处淋湿了身子，可是没有衣裳更换哪。"我走了过去，还没有来得及张口，皇后便告诉我，侍应室里面漏雨进水了。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座建筑年代久远，建筑方式古老，也没有设置排水沟。太后的寝宫地势较高，有十二级台阶。我们的侍应室位置在太后寝宫的左侧，直接建立在地面上，地基没有丝毫的垫高。下了大雨，总是会流入室内，搞得一团糟糕。太后也无意安排整修，就这么长久地凑合着。

在走廊里闲聊了一阵子，我全身都湿了。太后敲敲寝室的玻璃窗，让我们都进去。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包括皇后在内）没有太后的命令，绝对不可以进入太后寝宫。

那天太后兴致很高，笑着打趣我们说："看你们的样子，简直就是刚刚从湖里面捞上来的嘛。"皇后当时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头

饰上的红色流苏接连不断地滴下红色水珠，都滴到了旗袍上。太后笑着说道："看那些姑娘们啊，衣服都淋坏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太后吩咐我们去更换衣服。

她们下去了之后，我回到太后身边。太后看着我说："你的衣服也湿了，不过不太看得出来。"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制作普通的开士米羊毛连衣裙。太后摸摸我的胳膊说："你的衣服怎么湿成了这个样子？速速去更换吧。换一件厚一些的。我感觉这些外国衣服还是不够舒适，腰身太过细瘦。这种设计看上去和人身体的比例失调。我觉得你穿上满族服饰会更加漂亮。换下你的巴黎服装，收起来作个纪念吧。我只是想看看外国人的穿着习惯，现在也看够了。下个月这里举行龙舟会，我会命人为你做几件漂亮的旗袍。"

我马上叩头谢过太后的恩典，并告诉她，自己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身着外国服装，确实没有缝制过一件旗袍呢，现在能换上旗袍，心里觉得特别高兴。我们在进宫之前，原本是准备穿上旗袍的，但是得知老佛爷有令，要看看穿洋装的样子。

太后允许我们换上旗袍，我很高兴，这种感觉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一直身着洋装，会被那些宫女们视为外人，无端端的让别人在心里拉远了距离。其次，我知道太后其实并不喜欢洋装，只是图个新鲜。另外，在北京的宫殿里面穿着洋装，总归是感觉不舒服，也多有不便。所以，我们一直感觉还是入乡随俗地穿上满族服装为好。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要站立很长时间，要做很多的事情，自然更需要穿着宽松的衣服。

太后令一位太监取来她的一件衣服给我试穿。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脱下潮湿的衣服，换上了太后的那件。穿上之后发现太后的衣服有些肥大，整体的长度和袖子尺寸倒是非常合体。

太后吩咐一位负责记录的太监记下我的尺寸，以方便为我缝制新衣服。太后说，这样子做出来的衣服肯定合身。她也请太监为我母亲和妹妹量了尺寸，吩咐太监立即为我们制作衣服。

我知道太后现在心情愉悦，乐意赏赐我们这些。她还饶有兴致地告诉我，哪些颜色最适合我，为什么适合我等等。她说我应该穿粉红色和淡蓝色，这样子与人最相配。这两种颜色也正是她最喜欢的。太后还谈到我们的头饰，令太监们一并为我们制作和其他女官相同的头饰。

太后对我说：“我知道你可以穿得上我的鞋子。你进宫那天，我曾经试过你的鞋子，还记得么？我准备选择个良辰吉日，让你重新做回满洲人，”她笑着又说道，“从此告别那些洋装吧。”

太后拿起那本专门记载良辰吉日的皇历，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个月的十八日便是个好日子。”李莲英最擅长取悦太后，马上接茬说道，自己这就下令着人安排好所需要的一切。很显然，太后很高兴地安排我们做回满族人。她还给我们讲了该怎么梳头，戴上什么花儿等等事项。这么聊了一阵子，我们便奉命退下了。

雨接连下了三天，中间没有片刻停歇。最后的一天，皇上回去了，所有祭祀仪式随之停止。

太后完全不愿意住在紫禁城，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我也很讨厌这个地方。可以想象，早上起床穿衣，我们必须点着蜡烛照明。哪怕是在外面阳光明媚的正午，房间里也是相当的黑暗。人住在里面，宛如蛰伏山洞之中的蝙蝠，模糊了白昼与黑夜。

雨还是下个不停。终于，太后决定了，不管明天是否下雨，我们都返回颐和园。大家听了，个个都喜形于色。

在紫禁城住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终于返回了颐和园。那天天色灰暗，不过没有下雨。我们和来的时候一样，把所有东西集中起来打包。

经过万寿寺的时候，我们短暂停留用午餐。那天我们终于开斋吃肉了。太后吃得很是开心。太后问我喜欢不喜欢吃不见荤腥的饭菜。我回答说每样菜都做得很精致，尽管都是素食，我还是很喜欢吃的。

太后说自己完全不喜欢素食，要不是祈雨必须这样做，她可不高兴光是吃素。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车照，右一为太监总管李莲英

3

四月份，按照太后懿旨，宫中举行了旨在招待各国使节团公使夫人的游园会，也是今年的第一场游园会。太后希望将今年的游园会办得与往年有些变化。她发布命令，在院内设置各类货摊，像集市上或者杂货店中的那些一样。货摊上陈列着古董、刺绣、玉石珠花、花卉等物品。这些东西都是为来宾们准备的礼物。

参加游园会的来宾有：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国使馆中文秘书威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卡瑟夫人和女儿卡瑟小姐，日本公使内田的夫人，日本使馆的几位女士，葡萄牙公使阿美达的夫人，法国公使馆秘书加纳的夫人和其他几位法国官员的夫人，英国公使馆第一秘书的夫人苏珊·汤利，德国公使馆官员及税关官员的夫人们等等。

为了搭配这种场合，太后精心挑选并穿上了一件最漂亮的孔雀蓝

长袍，上面绣满了凤凰。那些凤凰刺绣如浮雕般微微凸起。每只凤凰的嘴里含着一条两英寸长的珍珠穗儿。每当太后走动，那些细小的珍珠穗儿随着身体趋势前后晃动，产生了五彩缤纷的美妙效果。太后的头上佩戴着美玉凤冠，鞋子和手帕上也绣着相同的图案，这些和平时并无二致。

我的母亲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镶着银色花边儿的丝绸长袍，帽子上插着羽翎，色调与形状均与袍子搭配协调。我和妹妹都穿着浅蓝色的丝绸长袍，镶着爱尔兰式花边，缝制着精美的天鹅绒细带子。我们戴着蓝色的帽子，装饰有大朵的粉红色玫瑰花。所有的女官们也都换上了最别致美丽的服装。这样花枝招展的女子队伍走在大殿里，真是美不胜收光彩夺目。整个宫廷一时间成为缤纷夺目的魅力海洋。

这天早晨，太后心情出奇地好，她对我们说道：“我想知道自己穿上洋装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的腰还是蛮细的，不过穿这样宽松的衣服显现不出来。我可不想把自己的腰束得那么紧，也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服装比咱们满族的更好看。”

慈禧太后在大殿里接见众多来宾。身为首席公使的奥匈帝国齐干男爵率来宾和各使馆的翻译们，一起步入大殿，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觐见中国皇室成员。



裕德龄（右）和妹妹裕容龄（左）洋装照

齐干男爵发表了简短的致辞。翻译官将致辞翻译给庆亲王，庆亲王再传达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以汉语发表了礼貌得体的答辞，由齐干男爵的翻译官翻译过去。随后齐干男爵登上台阶与皇上握了握手，其余的来宾依次施行相同的礼仪。

我站立在太后的右手边，每当有来宾走近，我便大声报出他们的姓名和所代表的公使馆。太后礼节性地与每位来宾讲上几句话，每当看到新面孔，便会问对方来中国多长时间了，是否喜欢中国等等问题。这个过程诸如此类的所有对话，均是由我来为双方翻译。来宾参拜完毕，便主动站到一边，直到仪式全部结束。

按照惯例，各国的翻译官是不参加这种仪式的，不过按照既往的规矩，他们也要等候在大殿里，直到仪式结束，才由庆亲王领着，到别的地方歇息，那儿早已为他们准备好茶点。等他们都离开了大殿，太后从御座上下来，进入了来宾们中间。

正式的仪式到此结束了。太监们搬来了椅子，奉上了茶，客人们可以舒服地坐下了。大家交谈了一小会儿，便换到了餐厅去。太后、皇上、皇后和瑾妃没有一起过去。

太后不在场的情况下，格格（太后的干女儿）就充当了主人的角色，卡瑟夫人、康格夫人分别坐在她的左右两侧。菜肴全是中式的，却也为来宾们预备了刀叉。席间，格格站起来，作了简短的欢迎辞，我负责把欢迎辞翻译成英语和法语。

我们用完了午餐，一起来到了园子里，太后等人正等在那里。一支管乐队演奏着风格独特的西洋乐曲。太后在前头带路，众人在院子里四处闲逛。每当经过不同的货摊，那些太太小姐们常常会停下来，交口称赞上面摆放的琳琅满目的物件儿，随后，那些东西就会以游园纪念品的名义，赠送给她们。

大家来到了园中的一座茶室，坐下来品茶聊天，歇息片刻。随后，太后过来送别来宾。客人们坐上了各自的轿子，相继离开皇宫，踏上了归程。按照惯例，我们禀告太后来宾们的相关情况，包括她们是否过得开心满意、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等等。

太后说道：“那些外国女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脚呢？她们的鞋子像船一样大，走起路来别别扭扭，让我实在难有好的印象。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外国人长着好看的双手。她们的皮肤很白，脸上却也长

着一层白毛，你觉得她们漂亮么？”

我回答说，自己在国外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些漂亮的美国人。

太后说道：“不管她们有多漂亮，那眼睛却着实难看。我实在不喜欢那种蓝颜色的眼珠儿，一见到就想起了猫儿。”又评头品足了一番之后，太后说：“你们一定累了，都退下吧。”我们着实筋疲力尽了，巴不得有个歇息的机会，赶紧行了礼，纷纷退了出来。

4

我们进宫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重病在身的父亲，心里着实关切得很。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告假回去看望父亲。我每天都能收到父亲的来信，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我，要对新生活充满信心，要有勇气应对各种困难，要竭尽所能，尽忠职守，服侍好太后与皇上。

我的母亲问皇后，我们能否恳求老佛爷恩准我们回家一两天。皇后说，请假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最好选择在本月初八之后，因为那一天有个节会，会特别的忙，那个节骨眼儿上，若我们不在这里尽责帮忙，就不太好了。

每年的四月初八这一天，都照例有个“吃青豆[3]”的仪式。根据佛教的说法，四月初八这一天将是一个分水岭，决定了谁是好人，死后进入天堂，谁算是坏人，死后堕入阿鼻地狱。在那一天，太后会赏赐自己喜欢的人一盘豆子，一共有八粒，拿到的人将其吃下。

皇后告诉我说，要是在那一天我送一盘豆子给太后，她会非常高兴的，那样子做的寓意是：“我们来生还能再相会。”那一天，我真的这样做了，太后非常高兴。

我们在湖的西面用午餐。太后说起我们第一天入宫的情形，问起我的母亲道：“我想知道裕庚有没有好一些，他什么时候能来宫里呢？他从法国回来之后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呢。”（当时，父亲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告假三个月）

我母亲回答说，他已经好一些了，只是腿脚依然非常虚弱，不能长时间走路。

太后说道："哦，我忘记告诉你们了，如果你们打算回去看一看，可以向我告假。我近来太过忙碌，竟忘记了提醒你们。"

我们谢恩之后，趁机回禀太后说，我们很想回家去看望父亲。太后于是吩咐说，我们第二天便可以出宫回家去。她接着问我们打算在家里过多长时间。我们当然知道宫里的规矩，就回答说敬候太后恩准。太后便说："两三天的样子可以么？"我们赶紧回答说，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我很奇怪太后为什么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诉了她我们的想法，还是她会什么读心术之类。

那天下午太后离开之后，我去找皇后。皇后一向待人和善，彬彬有礼，对待我们最和气不过。她拉着我坐在身边。太监为我端上了一杯茶。整个房间的陈设和太后的寝宫几乎一样。我仔细观察过了，房间里面的每件物品都相当讲究，显示出主人高雅的审美品位和不俗的眼光。

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话题都是关于宫内生活的种种。皇后说她很喜欢我们，太后也是如此。我告诉皇后说，太后准许我们回家两三天，真想不到她这样体恤下人。皇后说，其实是有人在太后面前提醒的，因为我们进宫已有两个多月。后来我才得知，是李莲英总管听说我们的想法，在太后面前提议的。

皇后说："我可以教你们一些小技巧。你们虽然得到了太后的恩准，明天可以离开皇宫回家去。但是，太后并没有提到回家的具体时间。你们不要对别人提及此事，也不可显示出即将回家的兴奋和急迫。不要穿成好像要回家的样子，还是照常做平日里的事情，作出对这件事平常看待的样子。若是太后明天太忙，忘记了让你们回去，也万万不可提醒她。回去之后，为了显示你们在意太后，应该比约定时间早回来一天，这也是宫里的规矩。"

能得到皇后这样的提醒，我非常高兴。我同时又向她请教，我们能否在回来的时候，带一些礼物给老佛爷。皇后说道，那样做当然很好了。

第二天，我们一如既往地伺候着，陪着太后到大殿参加早朝。退朝之后，太后吩咐将当天中午的午膳安排在那处乡村茶室。她所提到的乡村茶室就建在牡丹山上，建筑方式完全是乡村风格的，以稻草和竹子搭建而成，并用竹子做成了所有的家具和室内摆设，材质普通却做工精细，非常新颖，让人耳目一新。窗子上都挂着粉红色的丝绸窗帘，窗棂上刻着一排排的“寿”字和蝴蝶图案。

在这处精致美观的小建筑后面，有一座竹子搭建的凉亭，围着护栏，挂着红灯笼。座椅挨着栏杆，人可以很舒适地坐在上面欣赏风景。此处便算作是女官们的侍应室了。

午餐之后，我们和太后玩骰子，玩了很长时间。这一次总是我赢得多。太后笑着对我说：“你今天运气很好哇。我想你马上要回家去了，心里头高兴，你的神仙们都在保佑你了。”之所以说我的神仙，正如前面介绍过的，这个游戏叫做“八仙过海”，每个人手中都有几位神仙。

“依我看，你现在可以动身回家了。”太后说着，回转身问一位太监现在什么时辰了。太监回答说两点半。我们叩头谢恩之后，站在那里静候吩咐。太后说道：“虽然知道你们过上两三天便会回来，但是看到你们要走，我还是觉得有些舍不得，我会很挂念你们的。”

太后又对我母亲说：“你回去告诉裕庚，让他好好休养身体，早点好起来。我让四位太监陪你们一同回去，带一些我的米给裕庚，希望他吃了之后，能够更快地好起来。”听了这些，我们再次叩头谢恩。

太后最后说道：“你们走吧。”我们退出来，看到皇后站在走廊里。我们向她行礼，又和别的宫女们道别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里准备动身回家。我们的太监很不错，已经提前把需要用的东西都收拾好

了。

我们赏赐了太监十两银子，这是宫中规矩，又赏赐了每名轿夫四两银子。我们到了宫门口，看到轿子已经等在那里了。我们和太监们道了别。奇怪的是，他们竟一反常态地流露出一些关切之情，叮嘱我们早点回到宫里来。太后派来的几位太监见到我们进入轿子，便也都上了马，跟在轿子旁边一路随行。

此时想象在宫中的两个月生活，恍然如梦幻一般。我坐在轿子里，一边是对太后的依依不舍，一边是对父亲的深深思念之情。

经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到了家。父亲看上去好了很多，他见到我们也是欣喜异常。四位太监走入客厅，把一只黄袋子放在桌子上，里面是太后赏赐的米。父亲对着黄袋子磕头谢恩。我们赏赐了太监一些小礼物，完成了任务，他们便离开了。

我向父亲描述了我们的宫廷生活，太后如何慈祥友好地对待我们等等情况。父亲问起我能否在有朝一日抓住机会，对太后进行一些积极的影响，促动太后推行改良维新。他还说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表示将竭尽所能做好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上，太后又派了两位太监过来，送来一些食品和水果。他们转达说太后很惦念我们，并让他们问我们是否挂念太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实在是非常惦念太后，迫不及待要回到宫中了，我们准备明天就返回。

我们在家里待了不过两天，却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让我们一直忙个不停。父亲建议我们第三天凌晨三点钟动身，以便在太后起床之前赶到颐和园。他还交代我们在宫中要一心一意服侍好太后和皇上，不必过多惦念他。

我们按照父亲的建议，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动身，当时天地间一片漆黑，与两个月之前我们离开的时候全无二致。可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了多么大的改变啊！有了这段经历，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子。很多的人，尤其是皇后，都告诉过我，太后非常喜欢我。尽管我也听说，太后平日里并不怎样理会年轻人。

尽管我为此而高兴，但是也注意到一些女官并不喜欢我，她们时常故意不向我透露太后的需求和好恶，让我在很多场合因不知深浅而茫然无措，她们躲在旁边暗暗观察看我笑话。无论什么时候，太后当着我母亲的面夸奖我做事小心谨慎，令她很喜欢，那些宫女总是会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

我知道，我很快又将见到这些人了。无论如何，我都将独自一人面对那些人的挑战，并且要取得胜利。我想对太后有所用处，心念集于一处，才不会在意旁边的这些人。

凌晨五点多，我们抵达了颐和园。专职伺候我们的那些太监见到我们返回宫中，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告诉我，太后还没有醒来，我们还有时间回到自己的房里歇息片刻，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我们首先去问候皇后，她正准备去太后那里。皇后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衣裳已经做好了，她看过了，都做得美观大方，我们穿上一定很好看。

我们都饿坏了，好好地享受了一顿早餐。吃完早餐，我们去见太后。太后此时已经醒来，我们进入她的卧室，照例向她请安，并跪下叩头，感谢老佛爷在我们回家时间里的记挂，赏赐给我们的那么多物品。太后坐在床上，笑着对我们说：“回到宫里，回到了我的身边，你们高兴么？我知道无论哪个在我这里待过的人，总是不愿意离开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回来。”她又问我母亲：“裕庚现在情况怎样？”

母亲回答说，裕庚的身体好多了。太后问及我们在家的这段时间做了些什么，我们是否还记得她为我们选择的换装日子。我们回答说不但记得，而且一直热切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

此时，有太监搬来了三只大黄箱子，装满了漂亮衣服、鞋子、白色丝绸袜子、手帕、坚果袋，还有头饰等等一整套东西。我们磕头谢恩，表示太后赏赐的每样东西，我们都非常喜欢。

太后命太监把每样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一一看过，并对我们说道："看看吧，我赏给了你们一整套满族正式装束，一串琥珀朝珠，两件绣袍，四件平时替换穿着的普通袍子，两件每逢忌辰（历代皇上或皇后的周年忌）的时候穿着的袍子，一件天蓝色，另一件淡紫色，带着细碎的边饰。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内衣。"

我看了这些非常兴奋，对太后说恨不得立刻就能穿上这些衣服。太后忍不住笑道："你们一定要等到我选择的吉日到了，才可以穿上这些。你们要先学会梳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让皇后先教教你们吧。"虽然她让我等一等，但是我知道，看到我们如此兴奋，她是很高兴的。

第一天进宫的时候，太后曾问过我，为什么我的头发是卷卷的。我用纸筒将头发卷起来给她看，告诉她头发就是这样烫出来的。她后来经常用此事开我的玩笑。她告诉我说，要是我们不及时地把头发拉直，等到穿上了满族服饰，所有人都会取笑我们的丑样子。

那天晚上，我坐在走廊里歇息，一位女官走过来对我说道："不知道你穿上满族衣服会不会好看？"我对她说，我只希望看上去自然顺意就好。她说："你在外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个外国人。"我对她说："只要太后将我视作自己的人，我便心满意足了，其他的事情就不劳您过问了。"

我知道她们嫉妒我，就干脆离开走廊，径直去找皇后，把她一个人晾在那里。我在侍应室里和皇后聊天的时候，那名女子走了进来，坐在我的旁边，默不作声，自顾自微笑着。

一名丫鬟在附近为太后修剪鲜花，问那位女官为什么一直在笑个不停。皇后看到了也同样发问。她默不作声，还是一直在笑个不停。这个时候，一位太监进来传话，说太后要见我。

后来，我一直想搞清楚那位女官后来和皇后说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虽然无关紧要，但是那件事儿依然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永远也没有机会揭开谜底了。

几天过去了，一切都相安无事。太后一直心情愉快，我也一样。有一天，皇后提醒我们说，是时候为十八号那天的换装仪式做些准备了，保证那天一切顺利，因为时间已经很近，只剩下了两天。

那天晚上伺候太后休息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戴好新头饰，然后去找皇后。她看了之后评价说非常好看，太后肯定会更喜欢我的满服造型。我告诉皇后，在我小时候去法国之前，一直是穿满服的，理所当然地知道该怎样穿着。为什么那些女孩子都轻视我，把我当做外国人来看待呢？

皇后对我说："那样子对待你，只会显得她们自己的无知，她们就是在嫉妒你，你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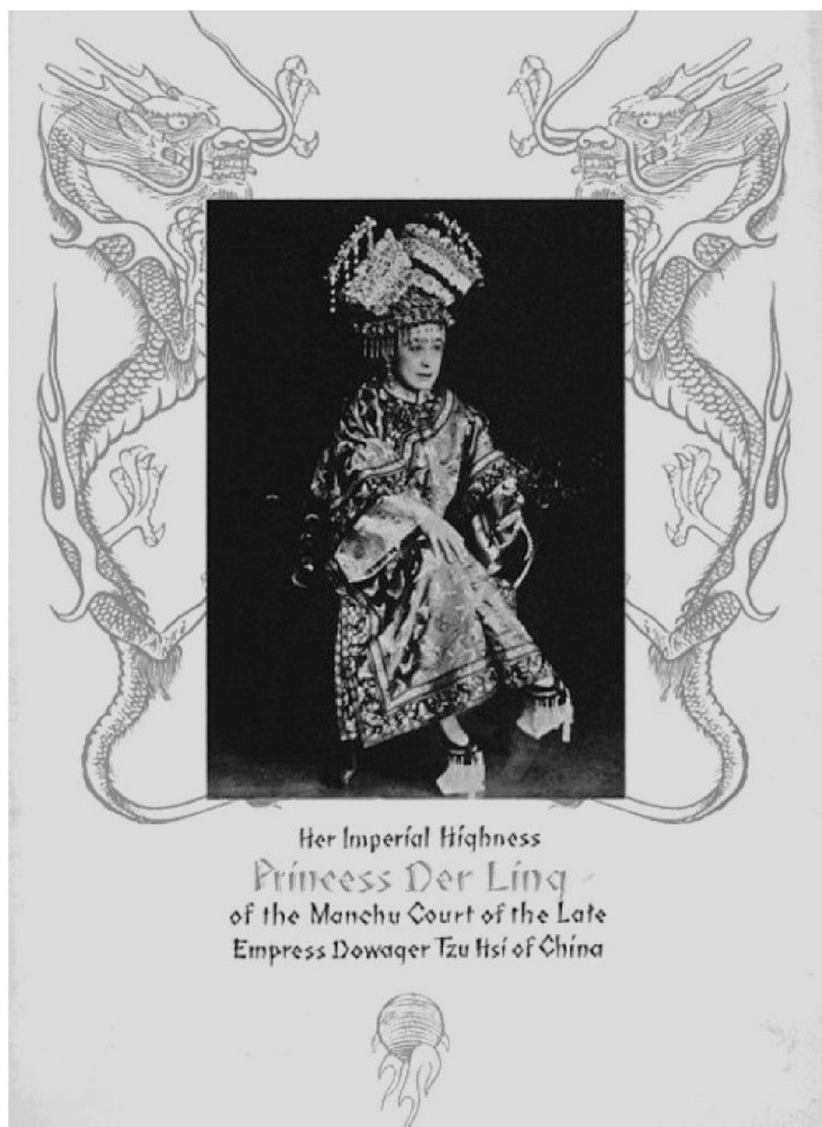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换装

1

第二天，我们比平时起床更早一些，很细心地穿好新衣服。反反复复照着镜子，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心里问了无数遍，这到底是不是我啊。

尽管我已经很久没穿过这种服装了，看上去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在此之前，大家或许认为我们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的太监们看到我们这样穿着，个个都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皇后到太后宫里去，路过我们的住所时，走了进来，等着和我们一道过去。



裕德龄清代宫廷装束照

等我们到了侍应室，许多人都进来看我们，叽叽喳喳评头论足个不停不休，让我们很是不好意思。几乎每个人都说我们这样穿着比穿洋装好看多了。只有光绪皇帝是个例外，他说道："在我看来，你们穿巴黎服装要比这样子好看得多。"

我笑着，不置可否。皇帝看着我们，摇了摇头，走进了太后的卧室。

李莲英走了进来，看到我的样子也表现得很是兴奋。他让我们马上去见太后。我告诉他说，那么多的人都围着我们看，好像我们是怪人一样。李莲英说道：“你不知道你们现在看起来有多么漂亮。以后可再也别穿那些洋装了。”

太后见到我们，先是笑得前仰后合，这让我心里有些没有着落，觉得她会不会认为我们这样穿不自然。太后随后说道：“真不敢相信你们和原来的女子是同一个人，你们自己快来照照镜子吧。”她指了指房间里的一面大镜子，“看看你们的变化多么明显，我现在感觉你们都是我的人了。我还要为你们做更多的衣服。”

此时，李莲英提醒了一句，二十号就是立夏了。按照风俗，到了那一天，每个人都要取下金簪，换上玉簪。

慈禧太后说道：“嗯，李总管，很高兴你提醒我这件事情。我都已经让她们换穿满服了，自然也应该每人赏赐一支玉簪。”李莲英得令出去，转眼拿着一盒子玉簪回来了，每支玉簪都是纯色绿玉制成。

太后拿出一支递给我的母亲，说这支簪子曾经被三位皇后佩戴过。她又拣出了漂亮的两支，一支给我，一支给了我妹妹。太后告诉我们，这两支玉簪是一对儿，一支是东太后时常佩戴的，另一支是她自己年轻时候佩戴的。

我深感惭愧，太后赏赐了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我们由衷地向太后谢恩，表达不尽感激之情。

太后说道：“我将你们视作我的人，给你们做最好的服装。我还准备要你们像格格王妃们一样，穿完整的宫廷服饰。你们都是我的宫廷女官，理所当然要享受公平待遇。”

李莲英站在太后身后向我们使眼色，我们心下明了，赶紧叩头谢恩。我都记不清这一天磕了多少回头。新戴上的头饰很重，我还不很

习惯戴这个，叩头的时候，总担心它会掉下来。

太后还说，要在自己七十岁寿辰的时候为我们封衔。所谓“封衔”，在这里我有必要向读者作个解释。每逢太后整十寿数的时候，她常常会对自己喜欢的人、为自己做过贡献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格外施恩。虽然太后平时也会提拔一些人，但在寿辰时的施恩格外不同，会更显重视。

皇后向我道贺，还说太后在为我物色年轻的王爷结为夫妻。她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我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写信给父亲，告诉他太后给我们的恩典。他回信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些恩赐，并要竭尽所能忠诚地服侍太后，直到其终老。

我感觉很幸福，宫中的生活真是无限美好。太后一以贯之地和蔼可亲、慈眉善目。自从我们改穿了满族服装，正如太后所提到的那样，她看待我们更有不同了。

有一天，我们在月色之下泛舟湖上，兴致正浓时，太后问我是否还会想到法国。那真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夜晚，几只小船跟在我们后面。其中的一只小船上，太监们演奏着动听的音乐，清越之声穿越夜色，悠悠扬扬响彻宫廷。太监们用的是长笛，还有一种很像曼陀林的乐器，名字叫做“月琴”，一种很小的竖琴，因形如满月而得名。太后和着节拍轻吟浅唱着。

我回答太后说，能够服侍太后，我们很满足，哪里都不想去。太后认为我应该学会吟诗，她可以每天教我。我回答说，父亲曾经教我学过各种各样的诗，我也曾胡乱写过几首。

太后很惊讶地说道：“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儿呢？我喜欢诗。你以后要经常读给我听听。我这里有不少书籍，收录了不同朝代的诗歌，数量浩如星辰，多得数也数不清。”

我对太后说自己的汉语知识很有限，只学过八年的中国文化，唯恐在太后面前露怯。太后告诉我，宫里只有她和皇后熟悉中国文化，

她曾经尝试教女官们读书写字，但是发现她们太过懒惰，只好放弃了。

我的父亲曾经告诫我，平日里要小心一些。除非有人问起，千万不要显得锋芒毕露。所以我一直保持低调，学诗写诗的事情从不为外人道也。这次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有些宫女对我更加不友善了，这种负面的状况日复一日地持续着。

这些小插曲之外，整个四月份在愉快的心境中轻松度过了。

2

五月初一这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因为，从初一到初五，是“五毒节”，又叫做“龙舟节”——这个我稍后会作详细解释。

在这段时间里，按照宫中习俗，所有的高官、皇亲国戚、御前女官和太监们，都要向太后进贡礼物。我从未在宫中节日庆典上见到过这么多的礼物。

每个送礼的人都要同时附上一张黄纸，右下角写上“某某某跪进”字样，并附礼品清单。这些礼物用黄色箱子装着，由太监们一只只抬着呈上来。这五天之内，所有人都非常的忙碌，尤其是那些太监们。

我实在统计不出到底有多少人进贡礼品。那些礼品琳琅满目各色各样，包括日用品、丝绸、珠宝等等。很大一部分礼品是些普通的洋货。我还看到了精美的雕刻和刺绣。

太后吩咐把其余的都储存起来，只留下那些洋货，对于她来讲，只有这些玩意儿还能有点新意。

五月初三是进贡礼品的日子，当时的场面蔚为壮观。我们忙碌着准备了一整天，还要兼顾着去帮助皇后做些事儿。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礼物装进黄色木盒子，放在大院子里。

皇后的盒子放在第一排，礼物都是她亲手制作的，包括十双鞋子，绣花丝绸手帕，小小的槟榔袋、烟草袋，无不做工精致，令人印象深刻。瑾妃细心准备的礼物和皇后的差不多。

女官们的礼物则是各式各样种类繁多，因为在节日之前大家可以请假出宫随意购买。宫里时刻要有人，所以我们不能一起外出。谁谁买了什么礼物回来之后，大家凑在一处交流讨论，总是兴奋异常。

我们母女三人都没有请假出宫，我们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礼物。宫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讨论着关于礼物的话题，想知道太后是否喜欢自己的东西。我们此前已经写信到巴黎去，购买了一些精美的法国锦缎和一套法兰西风格的家具。

虽然在宫里待的时间不算长，我们却已经掌握了太后的喜好。所以，我们赠送的礼物中，还包括扇子、香水、肥皂及其他法国新奇的东西。

太后一样一样查看那些礼物，每当看到层次低质量差的，就要搞清楚是谁送的。

太监和宫女们也都准备了美观实用的礼物。太后会挑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礼物，其余的吩咐人存起来，从此再也不理会。

不得不说，太后非常喜欢那些外国货，多有称赞之词，特别是那些花哨的法国锦缎。因为太后每天都要着人为自己制作新衣服。那些肥皂和搽粉能让她的皮肤变得细腻美观，她也很是喜欢。

太后为此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她称赞我准备了这么好的礼物，真是有心了。对于那些太监和宫女们的礼物，太后也都表示感谢，一碗水端平，基本礼节都要做到，令每个人都很高兴。

五月初四是太后反过来赏赐高官、皇亲国戚、御前女官和太监们礼物的日子。在这方面太后有着令人震惊的记忆力。她记得前几天里收到的礼物有什么，进贡礼物的是哪些人。

那又是忙碌的一天。太后根据对方赠送自己礼物的优劣决定自己回赠的礼物的层次。我们备好了黄纸，在上面记下太后赏赐什么礼物给哪个人。

那一天，因为一位王妃赠送的礼物太过菲薄，让太后很是不开心。太后命我们将王妃的礼品盒子留在自己的房间，并说要亲自细心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从太后的神色上，我判断出她内心的不快。她命我们将那些东西留在大厅，再量一下礼品盒中的绸缎和丝带。丈量的结果是：那些丝带长短不一，总体看来都太短，尺寸根本不够装饰一件长袍；衣料的材质也都普普通通。

太后对我们说道："你们看看吧，这些能算上是好礼物么？我心里清楚得很，这些东西是别人送给她们的，她们留下了最好的，把剩下的东西进贡给了我。因为她们也知道，不进贡一些礼物是说不过去的，而进贡好的礼物给我自己又舍不得。我真想不通她们怎么敢如此粗心大意地敷衍，可能是她们认为我收到的礼物太多，根本不会在意。她们那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我首先会注意到那些菲薄粗鄙的礼物，所以我总能记得是谁进贡的。哪些人是认真对待，真心实意要让我高兴，哪些人只是没有办法被迫的敷衍，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我不会客气，会按照她们的送法赏赐她们的。"

太后赏赐了每位女官绣袍一件，几百两银子。她赏赐给皇后和瑾妃的也是这些。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则略有不同，每个人是两件绣袍，几件寻常衣装，此外尚有短装、夹袄、鞋子和头花。太后说我们的衣服不多，就不赏赐银子了，以衣服取而代之。

此外，太后还赏赐了我一对精美的耳环，却没有同样赏赐给妹妹。太后留意到我只戴了一对普通的金耳环，我妹妹却戴着一对珍珠翡翠的。太后对我们母亲说道："裕太太，我看你有些偏心啊。容龄有这么精美的耳环，德龄却没有，这小姑娘，可怜见儿的。"

没等母亲回答，太后便转身对我说道："我有一对好的耳环赏赐

给你。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我母亲告诉太后，我不爱戴那种分量沉重的耳环。太后笑着说：“别担心，她现在是我的人了，我会给她想要的东西，这个不劳你费心了。”

太后赏赐我的耳环很重。她说只要每天都坚持戴，很快习惯了就没问题。她的话很快便得到了验证，我习以为常之后，的确很快便感觉不到耳环的存在了。

3

再谈论一番这个节日吧，它又称为龙舟节。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五月初五的中午乃是一年之中最毒的时辰，蟾蜍、蜥蜴、毒蛇之类的毒物，都在这个时辰藏身泥土之下，此时它们全身麻痹，动弹不得。造药的人通常会在这个时辰挖出那些毒物，放在罐子里，风干了做药饵。

这些情况是太后告诉我的。五月初五那天，我四处游荡，深挖浅掘，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照通常的习俗，在那天中午，太后要拿着一只盛满酒的小杯子，里面加上一些雄黄（类似于硫磺的东西）。她拿一只小刷子在酒杯里蘸一下，在我们的鼻孔下和耳垂上画上黄色小点儿。这样的用意是保证在接下来整个夏天，防止任何毒虫爬近我们。

之所以这一天被称为龙舟节，是因为在中国周朝的时候，连年征战，国家四分五裂，每一处领地都有一位统治者。当时的楚国有一位大臣叫做屈原，他力谏楚王与其他六国结成联盟，共御外侵，却遭到昏庸楚王的拒绝。屈原知道，楚国将在不久的将来遭到吞并。他心系楚国却痛感自己无力回天，最终捆了石头投江，自杀殉国。

屈原在中国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投入汨罗江自尽。从此以后，每到这一天，楚王都要登上龙舟，祭奠屈原的灵魂。同时，向江水中投入一种名为“粽子”的米团。从那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进

行这样的纪念活动。

宫里的剧院首先上演了一幕屈原投江的历史剧，非常生动形象。接着又演出了五月初五中午时辰到来之前，各种毒物竭力躲进泥土的场景。

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虎头鞋，鞋子的前端做成虎头的样子。我们的头饰上面也戴上了一只小老虎，是用黄色丝绸做成的。这种装束平时只有小孩子才穿戴，寓意是希望他们像老虎那样子强壮，可太后命我们也都这样穿戴。那些满族官员的夫人们来到宫里，看到了我们的样子，都在取笑我们。我告诉她们说，这是奉太后之命穿戴的。

宫中有一个特别的记录册子，记录的是每位御前女官的生日，由太监总管李公公保存。我的生日是五月初十。早在几天前，李总管就提醒我说，按照规矩，我生日的时候，应该送水果、糕点一类的礼物给太后。我就订好了八盒各色点心。

那天一大早，我穿戴好全套宫装，竭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花枝招展，去向太后请安。等到太后穿戴完毕，太监们把礼物送进来。我把礼物呈送给太后，虔诚地行了三叩九拜之礼。

太后表示了谢意，并祝我生日快乐。随后，太后赏赐了我一对檀香木手镯，雕刻极其精美，还赏给我了几匹真丝织锦。她告诉我，已经着人为我准备了长寿面，庆祝我的生日。这也是一种习俗。我再次跪谢她的仁慈和体贴周到。

我又去向皇后请安，得到了她赏赐的两双鞋子和几条刺绣丝巾。回到居所之后，我看到了女官们送来的礼物。总而言之，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



裕德龄清代宫廷装束照

4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五月十五日，因为对于所有宫中的人来说，那真是不幸的一天。

那天早晨，我们一如往常地很早便到了太后的卧室。太后抱怨说自己的后背太痛了，根本无法起床。我们轮流为她按摩背部，终于让

她起了身，不过略微迟了一点。她仍是烦躁不安，对什么都不满意。

皇帝进来了，跪下向太后请安。太后瞧也不瞧他一眼。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当皇上看到太后心情不悦的时候，就较平日更为沉默寡言。

每天为太后梳头发的那位太监生病了，只好安排了另外一位太监代替他。太后命我们紧盯着这位太监，不容许梳掉了头发。平日里哪怕只被梳掉了一两根头发，太后都无法容忍。

这位替代的太监老实而笨拙，远不如原来的那一位灵活机巧，发现太后掉了头发也会偷偷藏起来。这一次，看到有头发掉落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太监一时间吓得手足无措。

太后从镜子里看到了他惊恐无措的样子，便问是不是他梳掉了头发。太监惊恐万状地回答是的。太后雷霆大怒，叫嚷着命太监让头发再长上去。我听了几乎要笑出声来。太监却是万分惊恐，开始哭了起来。太后让太监滚出去，并叫着待会儿再惩罚他。

我们帮着太后盘上了头发。为她梳头发真是不容易，她的头发很长，梳起来很困难。

太后照常参加了早朝，结束之后，她告知李莲英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位李总管是个彻头彻尾的残忍的坏家伙，他说："老佛爷太仁慈了，为什么不打死他呢。"

太后马上命李莲英将那太监带到他的住处，接受惩罚。过了一阵子，太后又说饭菜做得很糟糕，命令惩罚厨子。

女官们都告诉我说，太后一旦心情不好，就会吹毛求疵，看什么都觉得不好。所以，那天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后来，太后又挑刺说我们脑后的"燕尾[4]"梳得过低，一个个看上去傻乎乎的蠢笨异常。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子梳头发，太后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留意看过一眼说过一句。这一次她却盯住了这个不放。她看着我们说道：“现在我要去上朝了，不需要你们在这里。你们都回房去将头发重新梳理一番。要是我看到你们还是梳成那个样子，我非把你们的头发剪了不可。”

见到太后这样声色俱厉地呵斥我们，我从未有过地大惊失色。我不知道太后这些话是不是说给我听的，但是我想自己还是聪明点为妙，便回答说马上去重梳。

我们都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太后站在那里望着我们。我们走出了大约五六步的样子，我听到太后大声呵斥长寿道：“你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还待在这里做什么？还不速速给我滚开！”

我们向自己房间走的时候，一些人开始嘲笑长寿。这令她非常生气。

太后对某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常会连带着说我们都有意和她作对，惹她生气。其实不得不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诚惶诚恐，平日里在太后身边大气都不敢喘，哪里有谁敢那样做呢？相反的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竭尽所能去取悦太后。

太后狂风暴雨了一整天，我尽量离暴风雨中心远一些。有些太监到太后那里去请示一些重要的事情。太后完全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是看她的书。

说句实在话，这一天我觉得非常痛苦。一开始，我认为太监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奴才。后来，每天都见到他们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底细。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太后时不时让这些人吃些苦头，对于整肃宫廷规矩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皇后让我一如往常，到宫里去服侍太后。她说若是我能提议太后玩一阵子骰子，或许太后能忘记心中烦恼也未可知。起初我本不愿意去尝试，担心会被太后骂，可是看到皇后可怜兮兮的样子，听到这温

柔得体的话语，又不忍心拒绝，便答应试一试。

我进入太后的起居室，看到她正在读书。她见我进来，说道："过来吧，到我这里来，我对你说些事情。你要清楚，宫里的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善茬儿，我一丁点儿都不喜欢他们。我可不想让他们对着你嚼舌根，说我如何如何的邪恶刻薄。你别理他们。以后别把发髻梳得这样低，今儿早上我不是对你发脾气。你和他们是不同的，别受他们的影响。我希望你站在我这一边，按照我说的去做事。"

太后很和蔼可亲地和我说这些话，脸色也缓和了，与早上的严厉模样判若两人。

我理所当然地赞同太后的话，并说只要能让她高兴，我做什么都可以。太后和我说话时的神态就像慈母对爱女，使我马上改变了早上的看法。我心里想着，也许太后是对的。我也常听大臣们说，不能对太监们太好了，因为他们会毫无理由地伤害他人。

那一天，太监们做事无不小心翼翼，比平时尤甚。有人告诉我说，太后要是发火了，会没完没了的。然而，她对我说话的时候，却总是语气舒缓，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好像她压根儿没有烦恼。只要摸透了太后的脾气，她并不难服侍。

我心想着，太后很有个人魅力，让我都几乎忘记她早上曾经暴风骤雨地发过脾气。太后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说道："我能让别人恨我胜过毒药，也能让他们爱我强似母亲，我有这样的力量。"我知道，她形容得一点儿也不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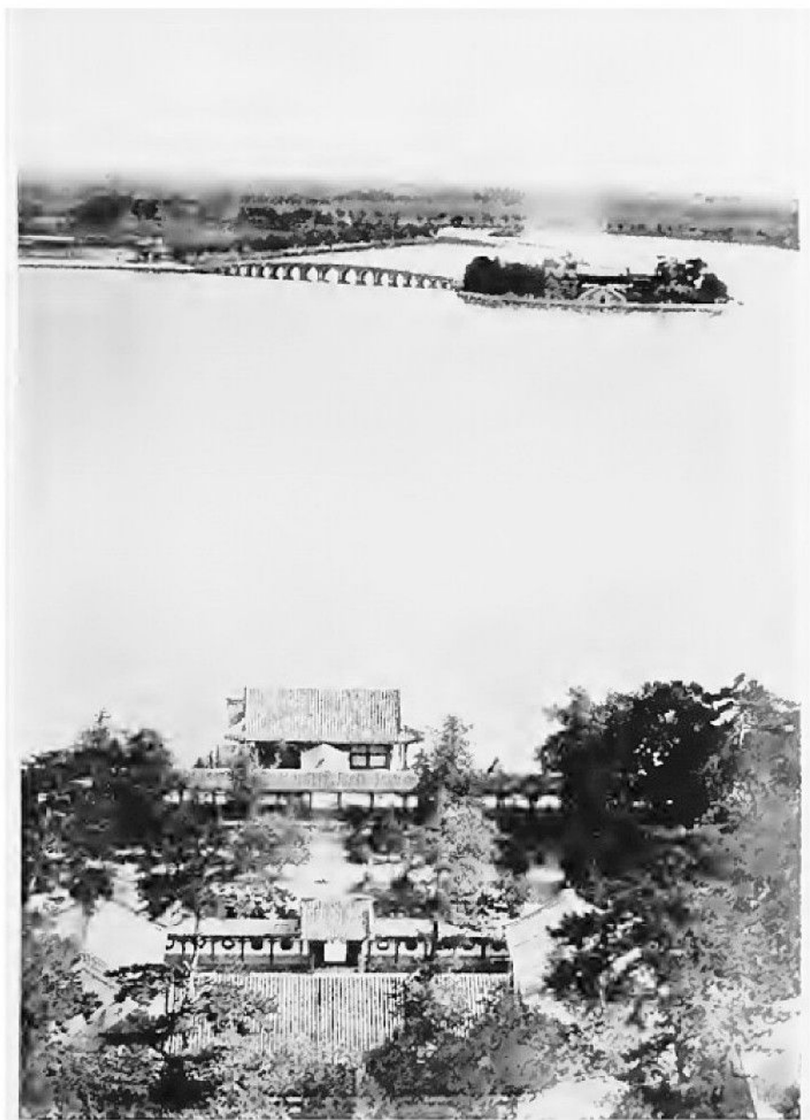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太后和康格夫人

1

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朝之上，庆亲王禀报太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请求以非官方形式前来觐见太后，至于具体时间，请太后酌情决定。太后请庆亲王明天再回复对方，以便她考虑一下。

我坐在大屏风的后面，听着前面的对话。可是，那些宫女们一直叽里呱啦吵个不停。好在太后命她们在早朝的时候保持沉默。这令我很是高兴，这样我就有机会听到太后和大臣们有趣的对话了。

退朝之后，太后吩咐将午膳安排在山顶的排云殿。太后说想走一走，我们便跟随着她慢慢走上山去。要走到排云殿，我们需要登上二百七十二级台阶，还要走十分钟崎岖不平的山路。



颐和园排云殿远眺

太后完全不在乎这样的路程，走得并不费力。倒是那两名小太监一左一右搀扶着太后的臂膀，费劲地和她的脚步保持协调的样子，很是惹人发笑。太后爬山的时候全神贯注，一言不发。

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们都感到筋疲力尽。健步如飞的太后看到我

们这副样子，就取笑我们。太后无论在游戏中还是在体力耐力的表现上超过了别人，总是会很高兴。她说道：“看看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是比你们年轻人走得快啊。你们真是没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些说得上话的人此时就开始恭维太后，说她身强体健远胜过年轻人等等。太后更加高兴了。她特别喜欢别人恭维自己。我在宫中待得时间久了，也学会了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让她高兴。不过恭维也需要恰当的时机，若是时机不对，她也会不悦的。

这个叫做排云殿的地方精美气派。殿前有一处开放的空地，像个大院子，长满了粉红色和白色的夹竹桃。空地上摆放着一只瓷桌、几只瓷凳。

太后安坐于她的黄缎椅子上，静静地品茶。碧空万里，阳光和煦，风却较大。太后坐了片刻，觉得风太大，便要众人移进大殿。我特别高兴能够进入大殿，我偷偷和皇后说道，真怕大风把发髻吹坏了呢。

太监们把午膳饭菜一一摆放在桌子上面。皇后朝我们示意，让我们跟着她走。我们跟着皇后走到了后面的游廊，在窗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要描述一下这种窗边的座位。宫中的建筑窗子都设置得较低，在走廊的内侧沿着窗子，安设有一排长凳，大约有一英尺宽。除了太后的座椅外，那个地方见不到第二把椅子。

皇后问起我有没有看出来太后若有所思。我说大概是太后在考虑早上庆亲王提到的那个私人会面的事情吧。皇后说道：“你猜对了，不过你知道具体的情况么？太后与康格夫人什么时候会面呢？”我回答说太后尚未决定呢。

这个时候，太后用完了午膳，在大殿里来回踱着，看着我们用餐。她走到我母亲身边说道：“我弄不清楚康格夫人请求私人会面的用意。大概她要对我说些什么。我倒是很想知己知彼，便可以作好应答的准备了。”我母亲猜测道，或许是康格夫人想向太后引荐什么人吧。

“不，不会是这种情况的，”太后说道，“想进宫的人，无一例外地会事先呈送一份名单给我。正式的会见我倒是不在乎，但是想不到会有人请求什么私人会面。你们都了解，我是最不喜欢接受别人询问的。那些外国人倒也算是友好和善，有自己的行事作风，但是在礼仪规矩上面，毕竟比不得我们。我这么下结论可能有些保守，但是我一贯尊崇祖宗传下来的礼仪规矩，在有生之年是不会更改的啦。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礼义廉耻的教诲。若是把老的教训和新的想法比较起来，似乎人们更见偏爱后一种。我的意思是，所谓的新想法，大概就是基督教之类的吧。这些教义主张毁掉祖宗的东西，想着一把火烧干净才好。我知道，一些人家被传教士搞得四分五裂不成样子，因为传教士吸引那些人家的年轻人信仰他们的宗教。”

太后又说道：“现在告诉你们我为何对这次会面感觉不自在，因为我总是对人家彬彬有礼，不忍心拒绝人家的任何请求，尤其是在当面的情况下。外国人却似乎并不懂得这些。告诉你们我会怎么做，无论外国人要求些什么，我都会简单直接地告诉他们，我一个人可说了不算，我还要和众位大臣们商量呢。尽管我是中国的皇太后，我还是必须遵从律例。说真的，我本人非常喜欢内田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她为人行事总是保持着平和优雅的风度，从不问那些愚蠢乏味的问题，不提那些不合时宜的要求。毕竟还是日本人和咱们更相像一些，不会那样不懂规矩。去年，在你们还没有进宫的时候，有一位女传教士跟着康格夫人一起过来，建议我在皇宫中建立一所什么女子学校。我不想令她们不快活，就姑且说会考虑考虑。现在，试想一下，在宫中建一所什么学校，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想法啊。换个角度说，我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女子来这学校读书呢？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可不想那些皇室家庭的孩子都跑到宫里来上什么学读什么劳什子书。”

说着，太后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你们要发笑了”，太后接着说道，“康格夫人么，看得出是个最和善不过的人。而美利坚对待中国也是一向友好的，这个大家

都看得出来。我特别想重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们在宫中的友善行为让我尤为赞赏。但是，我却不能因此而喜欢那些传教士。李莲英曾经和我讲过，那些传教士会给人一种药物，中国人吃了之后，会自愿成为基督徒。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传教士便会宣称，这可不是他们强迫谁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信仰他们的宗教的，请中国人自己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据说，这些传教士还会抓走中国贫苦家庭的孩子，挖出他们的眼睛去做药。”

我对太后说，那些传闻是不真实的。我曾经见到很多外国传教士，他们都有一副善良仁慈的心肠，愿意为中国贫苦的人们做任何事情。我还和太后讲起外国传教士为那些中国可怜的孤儿们做了些什么——提供住所、食物和衣服。他们还常常到国内来，领养那些遭到父母遗弃的盲童。我知道几个这样的例子。那些乡村的人们把自己的残障子女送给传教士，他们因为贫苦无助，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我还告诉太后传教士所开办学校的一些情况，以及他们帮助穷苦百姓的其他事儿。

太后笑了，说道：“当然了，我愿意相信你所说的这些，但是那些传教士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国家，帮助他们本国的百姓呢？”

我想着，言多必失，在弄不清楚太后实际想法的情况下，说得太多对自己可没什么益处。可是，与此同时我又想让太后知道，对于一些传教士来说，在中国的日子无疑是令人沮丧甚至恐惧的。前一段时间，也就是1892年6月份，两名传教士在汉口附近的武穴被杀害，所在的教堂也被那些暴徒们烧毁了。我父亲当时被总督张之洞派去调查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经过了重重困难，最终抓到了三名凶手。依照大清律法，这三名杀人犯应该被处以站笼之刑[5]。当地官府还给了受害传教士家属一笔损害赔偿金。

1893年，在扬子江畔靠近湖北宜昌的麻城，一座天主教教堂也被焚毁。那些暴徒们说，他们看到了很多盲童被关在教堂里，都被洋人传教士残忍地挖去了双眼，被迫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知府也证实说确实如此。我父亲便提议将天主教堂里的那些盲童带到衙门里询问调

查。

那宜昌知府是个阴险邪恶之人，又极其仇视和排斥外国人。他偷偷做了安排，提前发给了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很多食物，引诱并教会他们一套说辞，即自己真的是被传教士挖去眼睛的。

第二天，那些孩子们在衙门里接受问讯的时候，还是不约而同地说起传教士们对自己有多么善良和蔼，给自己提供了房子、食物和衣服。他们还说，自己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很久，就已经是盲人了，根本不是传教士害的。他们还说出了知府如何如何教自己谎称那些传教士是如何如何残忍等等。那些盲童请求重回学校——他们在那里曾经非常的幸福快乐。

太后说道："这些传教士能够帮助可怜的百姓，减轻他们所受的苦难，这是好的。正如我佛如来以血肉之躯饲饥饿之雀鸟。要是他们能让咱们的百姓单独选择信仰自己的宗教，我会更觉得他们做得好。你知道义和拳之乱是怎么闹起来的么？就是因为那些拳民受到了传教士们的恶劣对待，才一道儿起身报复的。不过这些草民们把娄子捅大了，最终像捅了马蜂窝，害人亦害己。他们闹得太过，又想趁火打劫发些财，就在北京大闹，不管是谁的房子，一股脑儿地烧掉。那些中国的洋教徒乃是坏得不得了的人，他们夺取贫困百姓的土地和财产，洋人传教士还保护着他们，只为也能在这抢夺的过程中得到好处。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的基督教徒被送进了衙门，他们总是不愿意像别人那样下跪，也根本不遵守中国的法律，面对官府官员的时候，也总是粗俗无礼。不论是否有罪，不论对错，那些传教士都竭尽所能地去保护教徒，而且相信教徒的每一句话，一直要让官府放了人才善罢甘休。你还记得在光绪二十四年，你父亲所定下的对待传教士的规矩么？我知道有些平民百姓，也就是那些生活境况不如意的人，变成了教徒。但是，我不相信有哪位上层人会信了那些洋教。"



康有为（1858-1927），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

太后说着，向四周看了看，低声说道：“康有为曾经试图劝皇上信那些洋教。不过，只要我活着一天，谁也别想信那些无稽的教派。不得不说的是，我在某些方面还是很赞赏那些外国人，比如他们的海军、陆军和他们的工程师。可要说到文明教化，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咱们大清朝都是天下第一的。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当时朝廷和义和

拳民是有所串通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刚刚发现暴乱，便马上发布了诏令，并派兵平定他们，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得凶猛难抑了。我那时下定了决心不离开宫中半步，我这么一个老太太，还在乎什么是死是活呢？但是端王和澜公力谏我快点儿离开。他们还建议说我们要乔装而行，这让我大发雷霆。我拒绝了这样的建议。等我们回到了北京，有人告诉我说一些人认为我是乔装出行，还添油加醋地说我是穿了宫中一位嬷嬷的衣服，坐着一辆破旧的骡车，而那位嬷嬷则穿成我的模样，坐在我的轿子里。我想知道是谁编了这样无稽的故事？大家都相信这个故事，而且很快地在京城的外国人耳朵里风传，真是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还是回到义和拳之乱这个话题上来吧。当时，我受到了奴才们多么恶劣残忍的对待啊。没人愿意跟着我走，在我们还没有打算离开京城的时候，很多人都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剩下的奴才们，也什么事儿都不做，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着看会发生些什么事儿，准备做那两边倒的墙头草。我下定决心要问清楚到底多少人愿意跟着我走。于是我对大家说：‘愿意跟着我的，就跟着走，不愿意跟着的，就离开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站在那里听我说话，我数了数，仅有十七位太监，两名嬷嬷，还有一名叫做寿珠的丫鬟。他们对我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会跟着我。我当时一共有三千名太监，在我准备清点之前，几乎跑了个干净。有些坏东西甚至敢在我的面前撒野，把我贵重的花瓶扔到石板地上，摔个稀巴烂。他们心里清楚，在那个要动身离开皇宫的当口儿，我没法儿惩治他们。我哭得厉害，每天都虔诚祈祷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平安无事，身边的每个人都陪着我一起下跪祈祷。全家陪我一起走的只有一位年轻的皇后。我有一个亲戚，平日里很得我的宠爱，对她是有求必应，那个时候竟然也不愿意跟着我。我知道她为什么拒绝跟我走，她觉得外国士兵会将逃出宫的人都抓住杀掉，一个也不留。

“我们离开皇宫七天之后，我派了一位太监回到北京，打探一下还有什么人留在宫里。这位亲戚便问那位太监，有没有外国兵在追赶我们，我是不是已经被杀掉了。不久之后，日本兵占了她的房子，把她赶了出来。她想自己这下子是只有流落街头死路一条了，又想既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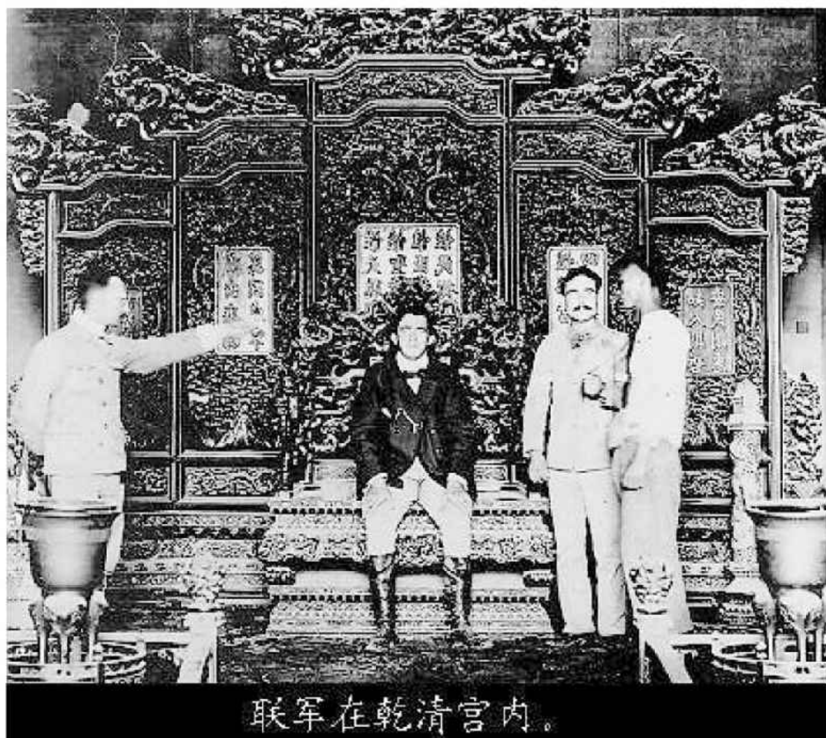
我没有死掉，她还是有可能赶上我们，并从我这里得些好处。我真想不到她们能跑得那样快。一天晚上，我们停留在一处小乡村的农家。她和她的丈夫，一位还算不错的男人，一起走了进来。她表白说自己是如何的想念我，无时无刻不心系我的安危，说得痛哭流涕。我拒绝再听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并且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从此再也不会相信她说的任何一个字了。从那个时候起，她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那真是一段艰难困窘的日子，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坐上轿子出发，直到三更半夜才胡乱找个村子歇脚。相信你也会同情我的，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从未受过这样的罪。

“皇上和皇后从始至终都是坐的骡车。我一路孤零零地前行，不停地向祖先祈祷，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皇上则是一直不说话，就是那样金口难开。有一天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轿夫偷偷逃走了，骡子又突然死了几头。天气很热，大雨从头顶直浇下来。另有五个小太监也偷偷溜走了。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因为我们的食物供给不够而去找当地的县令吵架，而那位县令已经竭尽所能地让我们过得舒服一些了。见到了这几位太监，那县令只好跪在地上恳求他们心平气和，并答应了他们所要的一切。我听了这些非常生气，在这种处境之下，人家能供给我们，理应万分满意了，还去嚷嚷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不当言行，我责罚了他们，他们便偷偷逃走了。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才到达了西安。一路舟车劳顿，我实在是疲惫不堪，那感觉非言语所能尽述。再加上过度忧虑，我病了差不多三个月。这样的经历真是让我永生难忘。

“在光绪二十八年年初，我们回到了北京。再次看到我们的皇宫，那真是可怕的感觉。哎呀，变化太大了。无数的贵重物品被损坏和盗走。西苑所有贵重的物品都被抢个一干二净。那些人损坏了我白玉佛像的手指，那佛像可是我每天都要烧香敬拜的啊。几个洋人还曾坐在我的御座上面照相。在西安的那段日子里，我简直就是个被流放充军的犯人。尽管巡抚衙门为我们准备了住所，但是那栋房子又老又潮湿，对人的身体健康很不好。皇帝为此也生病了。唉，那些事儿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本以为受的罪已经够了，谁知道那最后一件才是最

最糟糕的一件。我会再给你多讲述一些的，我想要你了解所有的真实情况。



八国联军乾清宫坐龙椅拍照

“现在，把话题回到康格夫人请求的私人会见上来吧。我揣度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如若不然，她何必要请求什么会见呢？我希望她不要提出什么要求为好，我可不擅长当面拒绝别人的请求。你能猜出她会提什么要求么？”

我对太后说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那康格夫人是个深谙中国礼节的人物，她应该不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太后说：“唯一让我心下反对的是，康格夫人每次总要带上一名传教士作为自己的翻译，而我呢，有了你母亲和你们姐妹做翻译，便足够了。我觉得她那样子不好，何况，那翻译的中国话我也听不太明

白。我对偶尔接见外国使节团夫人们还是有些兴趣的，但是，我没有心情召见那些传教士。我总会找到时机拒绝他们觐见。”

2

第二天早上，庆亲王禀告太后说，美国海军上将埃文斯夫妇及随从们要来觐见。此前美国使节团曾有过两次请求觐见。昨天所禀告的康格夫人私人会见，其实请求者应该是埃文斯夫妇，是庆亲王自己搞混了。

早朝之后，太后终于轻松下来，她笑着对我们说道：“我昨天说过的吧？请求觐见总要有个理由的。我倒是宁愿见见美国海军上将和他的夫人。”她转向我们说，“务必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把我的房间里里外外收拾一下，免得让他们看到我日常生活的情况。”

我们齐声回答：“喳。”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若想把里里外外都换个样子，那可是相当困难的事。

在会见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把每扇窗子上的粉红色窗帘取下来，换上太后讨厌的那种天蓝色窗帘。然后把椅子的垫子也换成了天蓝色的。

我们在监督太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又看见几位太监搬来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钟。这个时候，太后也走了进来，命我们移走所有的白色、绿色玉佛和另外几件玉质装饰品。这些玉制品都是神圣的东西，不能随便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移走了这些，换上了那些各种各样的时钟。

我们还将三幅绣花门帘换成了普通的蓝锻帘子。那三幅绣花门帘也是神圣的东西，在古旧的金缎子上面，绣着五百罗汉图像，是道光皇帝曾经用过的东西。太后相信，把这幅帘子挂在自己的门上，可以阻止任何邪魔恶鬼进屋。

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负责记住所有物品的原来位置，目的是等到会见结束，再将东西一一恢复。我们妥善安置了太后房间里所有物品。

她的梳妆台是她最重要的东西，她不允许任何外人看见它，哪怕是那些进入房间的大臣们的夫人。我们当然要把梳妆台移至一个安全的地方，锁起来妥善保管。

我们就这样如法炮制，又把太后床上的粉红色被褥换成了蓝色的。太后房间里的家具和床上雕刻的图案，均为檀香木制作而成。这些檀香木在制作之前，都要放置在不同的庙宇中净化，理所当然地也不能让那些外国人看见，以免亵渎了中国的神灵。我们却也无法取下床上的那些雕饰，只能用绣帘遮盖起来。

我们正忙得不亦乐乎，太后再次走进来告诉我们，不必急着收拾她的卧室。第二天会见的只有海军上将罗布利·埃文斯和他的随员们，按照规矩他们不会前来拜访内宫。而埃文斯夫人和其他的几位女士，则要到后天才会到来。

太后说，现在重要的事情是看看大殿是否收拾妥当了。她说：“把咱们这儿唯一的一块地毯铺到大殿里去吧。虽说我无论如何也喜欢不上什么地毯，却也没有办法，只好权且这么办了。”

我们完成了所有事情之后，太后开始教我们会见女宾时该穿着什么衣服。她对我说道：“你明天不必到大殿去，到时候那里都是些男人。我会命外务部安排一名翻译过来。我不想让你在那种情况下和那些陌生男人说话，咱们满族的规矩可不许这样。那些都是外人，若是你去了，说不定他们回到美国之后，逢人就品评你的相貌如何如何呢。”

与此同时，太后又下令将自己御黄色的袍子准备好，明天会见的时候要穿着。她认为在那种场合理应正式着装。那件御黄色袍子以黄色绸缎制成，绣着金龙。她穿着那件袍子的时候，还会搭配一串一百零八颗珍珠穿成的朝珠。

太后说：“我不喜欢穿这样的官服，不好看。不过又不能不穿。”又对我们说：“明天，你们不用什么特别的穿着，日常的那些就好。”

第二天早上，太后起得很早，比平时都要忙碌。每次太后有会见活动，我们总是要面临很多麻烦事儿，也总会有一些事情出错，惹得太后生气。太后说道：“我想让人看到的自己是和蔼可亲的，可这些下人做事总免不了惹我生气。美国海军上将回去之后，肯定会和别人说到我，我可不想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太后梳头用了两个小时，早过了平日早朝的时辰了。她便提议等外国人走了之后再上早朝。

太后穿上了御黄袍，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自己，对我说自己是多么的不喜欢这件衣服，还问我外国人知不知道这是正式的宫廷服饰。“我穿黄色服装的样子太难看，衬着我的脸色和衣服的颜色一样了。”太后说道。

我说道，“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见，若是太后不喜欢这样穿着，穿别的衣服也无伤大雅的。”太后看上去很高兴，我却心下暗自担忧，唯恐自己的建议不恰当。当时我实在忙得很，这种担忧并没有持续多久。

太后命女官拿来了别的服装，她看了几遍反复选择，最后选出一件绣满“寿”字的浅绿色的缎袍。那袍子镶满了宝石珍珠，华贵异常。太后试穿了一下，觉得很合适，便吩咐我到珠宝房去取搭配得当的头花来。

太后收拾停当，她的头饰一边是一个带“寿”字的头花，另一边的纹饰是一只蝙蝠（“蝠”与“福”字同音，蝙蝠在中国象征着福气的意思。）她的鞋子上、手帕上和其他所有的服饰上，也都绣着相似的纹饰。

穿戴完毕，太后笑着对大家说：“我觉得现在好看多了，我们都到大殿里面去等着来客吧。他们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玩一阵子骰子。”她又交待我们：“朝见的时候，你们都待在屏风后面不要露面，你们在那里也能看到一切，我却不希望他们看到你们。”

有太监在桌子上铺好了游戏的地图，我们各居其位，准备玩骰子。此时，一位高级别的太监走了进来，跪下禀告说，美国海军少将已经到了，同行的还有美国公使和其他随从，一共十到十二人。

太后笑道："我以为来的就是美国公使和海军少将呢，最多带上一两名随从。那么其他的是些什么人物？不过无所谓，是谁都没事儿，我照例召见他们吧。"

我们搀扶着太后坐上御座，为她整理好服饰，并且递送一张纸到她手里，上面写着她即将要讲的话。随后我们同皇后一起到了屏风后面。众人都屏气凝神，大殿里瞬间四寂无声，只听得见来宾们靴子底儿磕在院子石板路上的声音。

我们从屏风后面朝外窥视，看见几位王爷正引领着来客，缓步登上台阶走进大殿。美国将军和公使步入大殿，站成一排，向慈禧太后三鞠躬。皇上也坐在太后左侧的御座之上。他的御座很小，与一张普通的椅子相差无几。

太后简单地致辞，欢迎少将来到中国。致辞毕，他们从大殿的一侧登上台阶，与皇上握手示意，随后从另一侧下去了。庆亲王引领着他们到了另一处宫殿，为他们设宴款待。这样，会见结束了，简单又不失庄重。

会见结束之后，太后说道，她会见的时候听见我们在屏风后面说话，她很不喜欢这个样子，那些外国人怕是要议论我们这样不妥的行为。我对太后说，我没有在后面说笑。太后说："下次我再会见男宾的时候，你们都不要再到大殿来了。若早朝的是我们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

那天下午，太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宫去。她说要等着那些宾客离开，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两个小时之后，庆亲王回来了，禀告说那些人已经用完了午餐，都表示很高兴觐见太后，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

此处我必要解释一下，美国海军少将一众人等来的时候走的是宫殿的左边门。离开的时候，也是走的左边门。宫殿正中的门只被用来供太后和皇上出入。唯一的例外是：在某些人来递交国书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被允许走中门。

太后问庆亲王，有没有带领那些来客在宫中各处游览一番（这里她指的是颐和园），那些人看过之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说些什么，是否高兴。谈完这些话题之后，太后对庆亲王说道："你下去吧，记得为明日的会见做好充分准备。"

晚上，太后吩咐我们："明天，你们都要穿上一样的衣服，把你们最好的最漂亮的衣服都穿上。那些外国女士以后再也不会来见我们了，若是我们这一次不能展示最好的一面，就没有在她们眼前再次展示的机会了。"太后命我们每个人都穿上淡蓝色的衣服，包括皇后和瑾妃在内。

太后交待我："若是那些女士们问起你瑾妃是什么人，你方可告诉她们。若是她们没有问起，你不必向她们介绍了。我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宫里这些人没有多少机会见到这么多的外来者，不懂得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保持适度的礼节，可不能惹那些外国人笑话咱们。"



瑾妃

她接着对我们说道：“女士们进宫来，我一般总要赏赐一些礼物。不过，这一次是不是照例赏赐，我还没有决定，因为上一次接见就没有赏赐什么。”又转向我道：“你先准备一些玉器，以备随时用到。都装在漂亮的盒子里准备好，我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最后她说：“我就交待这些，你们都回去歇息吧。”

大家都向太后道了晚安，一一离去。总算能回到自己的房间歇息

了，我很是高兴。

3

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没有出现丝毫的纰漏。我们也都遵照太后的吩咐，穿戴齐备，还都进行了精心的修饰。太后看了之后很是满意。她对我说道："你脸上的脂粉搽得少了些，来客说不定会以为你是个寡妇呢。你还要在嘴唇上也搽些脂粉，这是规矩。我这会儿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速速回去补妆吧。"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认真补妆，把自己打扮得与其他人一样。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回到了太后房里，她看着我说："现在你看上去很好了。不要舍不得涂抹脂粉，若是你觉得脂粉太昂贵，我会买了送给你的。"她说着笑了起来，她总爱这样开我的玩笑。

那个时候太后已经梳洗完毕。一位女官拿来了很多衣服供她选择。太后说今天要穿淡蓝色的衣服。然后她挑了二三十件，还是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于是。她命女官再去多拿一些来。最后，她终于挑出一件绣了一百只蝴蝶的蓝袍子，袍子下摆缀满了珍珠穗子。又在外面罩上紫色的马甲，马甲上也同样绣着蝴蝶。

太后戴上了珍珠，其中的一颗足有鸡蛋大，这是她最喜爱的一颗，只有在非常特别的场合才会佩戴。太后的头饰两边各缀着一只玉蝴蝶。她的手镯和戒指也都设计成了蝴蝶的形状，每样东西都是与身上穿着的服饰完美搭配。

如前所述，在太后佩戴的珠玉首饰之间，她还时常佩戴不同种类的鲜花。白色茉莉是她最为喜爱的花儿。皇后和女官们在没有太后特别恩准的情况下，是不可以佩戴鲜花的。我们可以佩戴珍珠玉石等饰品，但是鲜花却只是太后独享。她认为我们都太年轻，若佩戴鲜花的话，很容易糟蹋了。

待太后穿戴完毕，我们跟随她一道儿进入了大殿。太后命人带上

纸牌，她想在宾客到来之前，玩一会儿牌。玩纸牌的时候，太后一直和我们说着话，她告诉我们应该保持良好的礼仪，友善和蔼地对待那些美国太太们，带着她们到处去看一看。

“现在没什么不妥之处了，处处都已然换了模样。”太后说，“我自己都想笑，每样东西都换掉了，又有多大价值呢？说不定她们看了，认为我们这里原本便是这个样子。会见的时候，若是那些女士们问起，你们就告诉她们，这儿本不是这个模样，为了能够给她们一点儿惊喜和新奇，每次会见之前，咱们总是把所有东西都换个遍儿。一定要找个机会告诉她们这个，否则她们总也不知道，咱们岂不是白麻烦了一场，吃力不讨巧，那可不划算啊。”

因为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私人会见，太后无需登上她的大御座，只是坐在了大殿左侧一个小些的御座上——她每天早上都是坐在那里接见大臣们的。皇上则站立一旁。

昨天的同一位太监进来禀告说，女士们已到了宫门口，一共有九位。太后命几位女官到院子里迎接，引导她们进入大殿。我站立于太后御座右手边，看到来客们拾级而上。

太后低声问我：“哪一位是埃文斯夫人？”我也没有见过埃文斯夫人，回答说我也不清楚。那些人走近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位夫人和美国海军少将夫人并排同行，心里揣测那必是埃文斯夫人无疑了。我告诉了太后我的推测。

那些人走近了，太后说：“那位传教士的夫人每次都和康格夫人同来，必是很喜欢见到我。我会向她表示很高兴见到她，看她能否明白我的言下之意。”

康格夫人和太后握了握手，向太后介绍了埃文斯夫人和其他几位美国官员的夫人。

我注视着太后，仔细观察她。我看到此时的她的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笑容满面，与平日里的神态相比较，实在是判若两人。太后说

见到这些夫人们很是高兴。她吩咐赐坐上茶，太监们极快地搬来了椅子，送来了茶。

太后问起埃文斯夫人，喜欢不喜欢中国，感觉北京城怎么样，来中国多久了，准备待在中国多长时间，现在住在何处。对于太后所问的问题，我早已句句了然于心，她还未张口，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

康格夫人让翻译告诉太后说，自己很久没有见到太后了，不知太后是否身体康健。太后对我说道："你告诉康格夫人，就说我身体很好，有劳挂念。见到她我很是高兴。只可惜不能经常安排这样的会见，难得时常相见相叙。"

最后，太后说道："格格（太后的干女儿，恭王的女儿）会陪同你们去用午膳。"这样子会见便结束了。

午餐安排在正殿后面的养云轩。这处养云轩专门为修身养性而建。除了皇上、皇后和瑾妃之外，所有的御前女官都一起用了午膳。但是为准备好那些餐桌，便花去了我两个小时时间。太后吩咐用白色的外国桌布，她认为那样子显得更洁净。

那些太监园丁们用鲜花装饰了餐桌。

太后指点大家，餐桌旁的那些座位该如何设置。她说道："埃文斯夫人算是主宾。尽管康格夫人的身份是美国公使夫人，但她在北京住的时间更多一些，与咱们的关系更近几分。因此，相较而言，埃文斯夫人应该坐首席。"太后告诉我，其他人按照品次等级安排座位即可。

格格和洵贵人（太后的侄女，皇后的妹妹）作为主人，她们在餐桌上对面而坐。我们在桌上摆放了金质菜单和小型碟子，碟子里盛着杏仁和西瓜子；其余的餐具包括筷子在内，都是银质的。太后吩咐了，无论是否用得上，外国的刀叉也都要准备好。午膳的餐桌上准备的都是满族菜肴，不包括那些甜点——水果和蜜饯，有二十四种之多。太后命我们准备最好的香槟酒招待来宾。"我知道那些外国女士

都喜爱喝酒。”太后说。

我想，在接待外国女士这件事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究其原因，每逢有这样的接待工作，太后教训起大家来，更要严厉得多。太后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大家这样那样注意言谈举止等等。因此，她们越来越厌恶这种接待外国人的场合。

我们用餐的时候，一位太监走进来，对我说道，太后正在自己的寝宫等着我们，吩咐我们用过午餐之后，带领外国夫人们到她那里去。

午餐之后，我们到了太后的寝宫，她正在等着我们。她见我们进来，便起身了，让我问埃文斯夫人，是否喜欢吃这里的饭菜，还说这里粗茶淡饭、口味欠佳，还请贵客海涵等等（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会在款待客人的时候，谦虚说自己准备的饭菜不好）。

太后说很愿意让埃文斯夫人看看自己的私人空间，以便对我们宫廷的生活方式有个大概的印象。太后领着来访的夫人们到了自己的卧室。待埃文斯夫人和康格夫人坐定之后，太监们像往常一样送来了茶。

太后邀请埃文斯夫人在北京住些日子，顺便到不同的庙宇殿堂去看看。她说：“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没有美国那么多现代华美的建筑物。我猜你们保准儿会对这里的每样东西、每样事儿都觉得新奇。我现在年纪大了，要不然我一定会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我读到过不少书上记录的外国情况，但是读万卷书也不过是纸上的东西，远不如自己亲身去看看有意思。不过也不好说，说不定以后会到各国走走呢。我还是怕离开自己的国家，怕只怕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陌生了。这儿的什么事情都要依靠我来决定。皇上么，毕竟还太过年轻。”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太后转过身来，吩咐我们大家带着夫人们各处参观一番，尤其是看看那所举世闻名的龙王庙。龙王庙建在颐和园内湖中心的小岛上。此时，康格夫人说自己还有些事情要拜请太后，

却中断了这个话题，转而与传教士夫人交谈起来。

在康格夫人与传教士夫人交谈的时候，太后显得非常不耐烦，她按捺不住迫切地想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太后于是问起我。同时听懂两名外国夫人和太后三个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含义，对我来说，真是再困难不过的事情。话语交汇中，我仅仅听到了一个词语："画像。"其他的意思我要靠猜测揣度来完成。

我正想找机会把连猜带译的意思告诉太后，传教士夫人对太后说道："康格夫人此次前来觐见，还有一项特殊的目的，即恳请太后恩准，允许同来的一位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为太后画一幅肖像。肖像完成之后，将被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去，让美国民众能有机会瞻仰到太后的容颜，从而知道中国的太后是一位多么美丽雍容的女性。"

她提到的美国女画家卡尔小姐，是F·卡尔先生的妹妹。那位卡尔先生已经担任烟台海关行政专员多年。

太后在听着那位女士说话的时候，表情看起来有些出乎意料。她当然不愿意表示自己没有怎样听明白，便转头看着我。她这个动作是我们事先的约定，暗示我解释对方的话给她听。我尚未开口解释，康格夫人已经适时地让传教士夫人重复一遍刚才的话，以便让太后听清楚。

此时太后对我说道："这位女士的话我听不太懂，我觉得你应该能解释得更加清楚。"我便把对方的话详细地解释给太后听，当然了，我也能够猜到，太后其实不明白所谓"肖像画"的意思，在此之前，她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拍过。

此处，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在中国，肖像画是人死去之后才画的。死后画肖像，既作为人去世的一个纪念，也为了后代能够借此瞻仰和祭拜死者容貌。

我注意到，太后在弄清楚了对方的意思之后，显得有些震惊。我不想太后在外国女士们面前显得无知，便偷偷拉拉她的衣袖，告诉她

我晚一些时候会详细解释给她听。

太后说道：“现在就多少解释一点给我听。”她是用满洲话说的，与通用的汉语有些不同，来宾不会听得明白。待我简略解释之后，太后对“肖像画”有了一个大略的概念。她随即向康格夫人的细心和善意表示感谢，并说等等再答复她们的请求。

太后对我说道：“你翻译给康格夫人，大概她也有所耳闻，这里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每当遇到重要的事情需要决定，我都会先与大臣们商量一番。告诉她，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黎民百姓指责我们的行为。我也必须恪守祖宗的习俗和规矩。”我注意到，这个时候，太后看上去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时候，太监李总管走了进来，跪下叩头，禀告太后说，渡湖参观龙王庙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发了。

李总管有这样适时的举动，是因为一位女官及时地给了他暗示，告诉他太后此刻对所谈的内容已经有所厌倦，希望他想办法换一个话题。

每当太后接见外国人的场合，宫中都会专门安排一位细心的女官站在旁边，全神贯注地观察太后的细微反应。无论何时她发现了太后对所谈的话题感到不快或是厌倦，便立即向李总管示意。李总管就会走进来，以适当的方式打断这样的对话，避免谈话双方可能出现的尴尬处境。

太后与来宾们道别了。若是等到她们观光返回再道别，就太晚了。分开之后，外国夫人们也能更加心无挂碍地四处欣赏胜景。

外国夫人们都坐上了前面提到过的、太后最喜欢的那艘龙舟，渡过湖水，到小岛上参观龙王庙。龙王庙建在一块山岩顶上，岩的中间有一个天然洞穴，大家都认为，那里从未有人攀援进入过。太后相信民间传说所讲的，那个洞乃是龙王的宫殿，这也正是“龙王庙”名称的

由来。

第十三章　太后的肖像

1

在龙王庙短暂停留之后，我们返回了皇宫。夫人们与我们道别，乘坐宫中的轿子到宫廷门口，她们自己的轿子正等候在那里。

我如往常一样回去面见太后，向她禀报那些来宾说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她们对所得到的款待感觉怎样等等。

太后说道：“我喜欢埃文斯夫人，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女士。她言谈举止有礼有节，与我所见的其他美国女士大为不同。我喜欢接见这样文雅有礼的人。”

随后，我们谈到了画像的问题，太后说道：“我很纳闷，想知道康格夫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主意呢？现在请你详细解释一下，所谓的画像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我向太后解释说，画像的时候，被画的人每天要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太后听了很是惊讶，她担心自己没有那样的耐心。她问我坐在那里的时候，自己还要做些什么。我解释说，只要坐在那里摆上一个简单的姿势，并且保持始终即可。

太后说道：“要是这样子，等到画好了，我怕是要变成老太婆了。”我告诉太后，我在巴黎期间，也曾绘制过肖像，并且，也正是康格夫人介绍的这位卡尔小姐画的。

太后马上命我把那张画像拿给她看看，以便让她仔细观察一下，画像究竟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做打算。我马上吩咐站在身边的一位太监到我的住处去，把画像取来。

太后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坐在那里，等着被画

像。别的人可以代替我坐么？”我解释说，这是为太后本人画像，不是为别的人画，所以还是必须太后亲自坐在那里才行。

太后又问我，是不是每次坐在那里画像，都要穿着同样的衣服，带着相同的珠宝首饰。我回答说是的。太后则说，中国人画像的时候，画师只需要看一次被画者即可，然后便动手绘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她说，这种画法，恐怕外国的一流画师也难以做到吧。

我又向太后解释，中国画像和外国画像有诸多不同之处。我告诉太后，只要她看到了最后的画像成果，便能理解有多么大的区别，也便会理解为什么需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么长时间了。

太后说：“我想知道那位女画家是怎样的一个人，她会说中国话么？”我对她说我比较熟悉卡尔小姐，她是一位非常美丽优雅的女士，不过不会说中国话。

太后问道：“她的哥哥在中国海关服务了这么多年，她为什么不会说中国话呢？”我告诉她，卡尔小姐已经离开中国很久了。尽管她的哥哥在中国，她却仅仅在中国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和美国度过的。

太后说道：“我倒是更喜欢她不懂中国话。只是有一个问题，若真是让她来为我画像，我将不得不允许一位外国人在宫中居住很长时间，我怕宫里的一些人把流言蜚语告诉她，我可不希望外国人知道咱们的事儿。”

我对太后说，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卡尔小姐不懂中国话，宫中的人除了我们几位（我母亲、妹妹和我自己）也没有人懂得英语，别人不会有与她交流的机会。

太后回答：“你也不能那么肯定，在宫里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彼此熟悉有所交流的。”她接着又问：“画一幅肖像，要多长时间能完成呢？”我说这些都取决于太后能否经常坐下来，每次能坐多长时间。

潜意识里，我不想告诉她画像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怕她会觉得太烦而拒绝画像。我只告诉她，等卡尔小姐来了之后，我会督促她尽快完成画像。

太后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得体地拒绝康格夫人的请求。你们也知道，我只能和她说要去和大臣们商量决定。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为的是有些时间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今，你既然如此了解这位女画家，能保证她进宫画像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么，就准许她来吧。我会安排庆亲王去回复康格夫人我的决定。当前最紧要的是，我们要商量一下该预先做些什么准备。让一位外国女士待在宫内毕竟没有先例。一般来说，我都会在颐和园度过炎夏，那里离紫禁城很远，外国女画家每天这么大老远的来回跑，毕竟也不是个好法子。那么问题就来了，把她安置在哪里呢？还得有人自始至终关注着她的动向。这真是个难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才好。你愿意去照看她么？你能否保证白天的时候，宫中没人有机会和她交流？又有谁晚上的时候去看着她呢？"

太后在屋子里面来回踱步，思索了好长时间。最后，她笑着说道："我想到了，我们可以不易察觉地巧妙地把她软禁起来。这件事要靠你的母亲、你妹妹和你共同来完成。你们每个人各司其职，小心谨慎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么，当然也会非常小心。我马上着人去收拾好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的花园，让卡尔小姐住在那里吧。"

那座花园是颐和园外边一个独立的地方，离太后的宫殿很近，乘轿子大约十分钟便能到达。

太后接着说道："就这样，以后你每日早上与她一起来，晚上陪她同去。我想这法子该是最妥当的吧，又能够保证简便易行。你须格外留神她与别人互相传递信息，这会额外耗费你一些精力。不过，你也须明白，为了这件事情，我是多么的放心不下，想尽法子只为今后少是非，彼此相安无事。还有一件事你要千万小心，不要让卡尔小姐与皇上有交流的机会。你也知道，我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因为皇上

太过害羞腼腆，万一不小心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冒犯了卡尔小姐，那可不好。我还准备在画像的时候，额外安排四位太监陪侍左右，若中间有何需要，可随时准备呈上。”

她又说：“我留意到了，你拉我衣袖的时候，康格夫人注意到了你的举动。我想知道她会怎么想。不过呢，你倒是完全不必在意。她喜欢怎么想便怎样想好了。我能够明白你那举动的意思就足够了，康格夫人明白与否都没有关系。”

我对太后说，说不定康格夫人以为我会建议太后拒绝她的请求呢。太后说：“那又怎样呢？如若不是你熟悉这位外国画家，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准许画像这件事儿。画不画像我倒是完全不在乎，我只在乎不要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出现才好。”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康格夫人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恳请我无论如何不要劝阻太后画像。我把信件的内容翻译给太后，她听了勃然大怒道：“谁也没有权利给你写这样的信，还用这种不敬的措辞。她怎么敢这么猜测你的意思，认为你会劝我不要画像呢？我昨天不是说她注意到你拉我衣袖了么？正是被我说中了啊。你回信的时候怎么写都可以，就用她那样不恭的语气回敬她。最好啊，你告诉她，在咱们的国家，宫中任何女官都没有资格影响皇太后。另外，告诉她，你还不至于在我面前说些对别人不利的话。要是你不想这样说，就直说卡尔小姐是你的朋友，你还不至于说那些对她不利的话。”

我并没有听从太后的话，还是按照通常的信件形式回复了康格夫人，没有说那么尖锐的话，并且尽可能地遵照正式的外交习惯来措辞。

整个下午，慈禧太后除了谈论画像的事情之外，没有说到其他任何事情。最后她还强调：“希望康格夫人不要安排传教士夫人陪伴卡尔小姐到宫中来。她要真是那样安排，我将直接拒绝画像。”

第二天早晨，太监拿来了我的肖像画。在送给太后之前，宫里的其他女官太监们都抢先看了。大家褒贬不一，有些人觉得画得很逼

真，栩栩如生，有的人则认为画得很是糟糕，稀奇古怪。

我禀告太后说，画像已经拿过来了。她命我立即拿到她的寝宫去。太后对着画像仔细看了一会儿，还忍不住好奇地用手摸了摸。最后她冷不丁大笑起来，说道：“多有趣的画儿啊，看上去就是用油彩画的嘛。”我心说，这本来就是一幅油画啊。

太后又说：“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粗糙的画法，不过画得倒真是太像你了。咱们中国的画家怕是没有一位能够画得这样惟妙惟肖。你画里的穿着多么奇怪啊。怎么手臂和脖子都露在外面呢？我也曾听说外国女人穿的衣服没有衣袖和领子，却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这样粗俗难看，就像你在画上所穿的这个样子。我真不敢相信，你怎么可以穿成如此模样。我想你穿得这样暴露，一定会很难为情吧。以后可别再穿这样的衣服了，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西洋文明么？多么可笑啊。要在什么场合才适合穿着这样的衣服呢？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穿？男人也可以这样穿么？”

我向太后解释，这类衣服是外国女士平常参加宴会、舞会、招待会等活动的晚礼服。太后忍不住大笑大嚷道：“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看起来，外国的每样事情都在倒退啊。咱们这儿，女人在男人面前，连手腕儿都是不可以露出来的。外国人在这些事情上面，与咱们有如此大的差别。皇上总是讲到要做什么改革维新，若是他所谓的改革维新就是这个样子，我看还是维持现状为好。告诉我，你现在对待外国风俗习惯的看法是否也有所改变？是不是也觉得咱们的更好？”

面对太后这样明显的偏见，我也不得不说“是”。

太后又仔细端详了我的画像，末了说道：“怎么在这上面你的脸是一边白色，一边黑色？这多不自然啊，也不准确，跟实际情况完全不一致，你的脸根本不是黑色的嘛。还有，你的脖子也有一边被画成了黑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太后解释说，那是这种画法常见的阴影表现方式，画家如实地反映了从她的角度所观察到的人物形象。

太后又问："画家是不是也要把我画成这个样子？我可不希望自己的画像也是这个样子送到美国去，让美国人认为我的脸是一边白一边黑的。"

我不敢和她说，其实她的画像将会和我的一样。我只是对她说，我会关照卡尔小姐，严格地按照太后的要求去画。

太后问我，是否知道卡尔小姐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画像。我说卡尔小姐现在人在上海，康格夫人已经写信过去，让她尽快赶到北京来，早些为画像做准备。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卡尔小姐的一封信，告诉我她打算马上来北京城。信中还说，对于太后能恩准自己画像，她深感荣幸。

我把信件的内容翻译给太后，她说："你和这位卡尔小姐比较熟识，这个我很高兴，会让我处理事情更加妥当些。在画像期间，说不定我会有些话想和卡尔小姐说，却不想让康格夫人知道的。因为若是康格夫人知道了某些内容，可能会留下不好的印象，认为我是个要求过多、不容易服侍的人。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卡尔小姐是你的朋友，有些话由你来转达，不会产生不便。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若不是因为卡尔小姐是你的朋友，我绝不会准许她来宫里久住，这样做可不符合咱们的老规矩。"

2

这年闰五月的初三，庆亲王来禀报太后，卡尔小姐已经到了北京，正与康格夫人在一处。她想知道太后什么时候方便，可以恩准开始画像。

在这里，我先得解释中国年度历法中的学问。举例来说，如果今年有十二个月，那么明年将可能有十三个月，也有可能是连续两年有十二个月，第三年有十三个月等等。女画家要进宫的这一年，就是所谓"闰年"，有两个五月份。

听了庆亲王的禀告，太后答道："容我明儿再答复她吧。我须得

先翻翻皇历，选择良辰吉日，我可不能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开始画像。”

第二天早朝之后，太后拿着她的皇历翻看良久，最后说道：“按照皇历上所说的，下一个黄道吉日要等到十天之后。”她把皇历递给我，让我也看一看。

终于，太后选定了闰五月的二十日开始画像，她认为那是近期最吉利不过的日子。随后太后又开始翻看皇历，查找一个吉利的时辰。最后选择在当晚七点开始。

我觉得这种安排很是不妥，晚上七点的时候，天已经太黑了，让卡尔小姐摸黑作画，那怎么成呢？我不得不尽可能有理有据地向太后说明这种情况，告诉她卡尔小姐在那个时辰很难着手画像。

太后说道：“哦，我们这里有电灯啊，电灯的光线总该足够亮了吧。”

我只得又向她解释说，相比电灯这种人造光源而言，还是自然光线下画出来的效果更好些，希望太后能够换个时辰，我想卡尔小姐也不会愿意在这样的光线下画像。

太后说道：“真是麻烦啊。我都可以在任何光线下面作画，她是画家，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讨论，最后选定了闰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卡尔小姐开始为太后画像。等着一切终于安排妥当，我才觉得浑身轻松下来。

那天太监奉命到我住处取肖像画的时候，顺便拿来了我在巴黎时所拍摄的几张照片。我决定不给太后看照片，怕她一旦看到了这些，觉得拍照更快更省心，还可以免去久坐的烦闷，要用拍照来取代画像，那我之前的所有努力可就付之东流了。

第二天的早上，太后经过我屋子前面的走廊，突然停了下来，走

进了我的房间。她在我房间里四处看着，按照她的说法，是看看我有没有把房间布置妥当，收拾得有条不紊。

这是太后第一次到我房间里来，她平时极少进入女官们的房间，我为此感到非常紧张。我不能让太后总是站着，又不好让她坐我房间的椅子。按照中国的规矩，太后、皇帝和皇后只能坐自己专门的椅子，那些椅子总是由其随从随时带着。

我正准备让人取来太后的椅子，她制止了我，说坐我房间里的椅子就行，还能给我带来些福气。

太后在我房间的一把安乐椅上坐下来。一位太监送来了茶，我接过来亲手奉上。这自然也是宫里的规矩，表达的依然是崇敬之意。

太后用完了茶，站起身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查看每一样东西。她一一打开桌子抽屉和首饰盒，查看是否摆放整齐。

在朝房间的一个角落瞥了一眼之后，她叫了起来："那边桌子上放着的画儿是什么？"她径直走过去，准备仔细看那些画儿。刚一拿起来，她便惊奇地叫着："哎呀，这些都是你的相片，可比你那张画像好得多了，更像你啊。前面为什么不拿给我看呢？"

我无言以对，一时语塞。太后见我被她问得很是局促窘迫，便马上转换话题。她经常在我们无法回答问题的时候，主动转移话题以避免场面上的尴尬。但是她总不会忘记那些问题，一般过段时间她会再次问起相同的问题，并且希望我们能够明明白白地回答。

太后看了一会儿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的都是欧洲服装）。她说道："这些照片真是好，比你的画像强很多。话虽如此，我既然应允了让卡尔小姐来画像，自认是不会反悔的。不过呢，若是我再拍几张照片，应该对画像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妨碍吧。只有一个问题，我不能让一位普通的照相师傅进入宫中。看来照相的事儿，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了。"

我母亲对太后说道，若是她想要照相的话，她的儿子，即我们的

一个哥哥，倒是学过一段时间摄影技术，他可以为太后做这些事情[6]。

我有两个哥哥在宫里做事。一个管理颐和园的电力设施，另一个负责管理太后的私人小汽船。宫廷的规矩，所有满族官员的子弟，都要在宫中服务两到三年。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宫中往来，每天都能见到慈禧太后和皇上。

太后对待这些年轻子弟都很慈爱，总是以母亲般的态度和他们聊天。这些年轻人每天一大早便进宫，完成全天的工作之后返回家中，不得在宫中停留过夜。

太后听了我母亲的话，显得非常惊讶。她问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在自己面前提起我这位哥哥会照相。我母亲答道，因为以前没有听说太后要照相，自己也不敢贸然提起这不相干的事。

太后笑道："任何你们喜欢和了解的事都可以提出来，我喜欢尝试那些新奇有趣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不为外人所知晓的独特玩意儿。"



裕勋龄，裕庚次子，裕德龄的哥哥，慈禧太后的御用摄影师，现存的慈禧照片全部由他拍摄

太后立即着人宣我哥哥觐见，对他说道：“我听说你是个摄影

师，我准备安排一些事儿给你做。”

我哥哥连忙跪下领旨。这是皇宫里的规矩，除去女官们之外，任何人在太后面前领旨的时候，都必须如此，甚至皇上也不例外。之所以女官们可以不用这样，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太后左右服侍，片刻不离身，太后又会不断地对她们说话，总是跪下站起，那可要浪费太多时间。

太后问我哥哥什么时候能给自己照相，需要什么样子的天气。我哥哥回答，他当天晚上就回北京城去取照相机，只要太后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拍照，天气状况对拍照没有什么影响。

太后于是决定第二天早上便开始拍照。她说道：“我想拍一张坐在轿子里去早朝的照片。然后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拍一些别的。”她还问起我哥哥，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多长时间，才能够拍好。听说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便足够，她倍感惊讶。

太后又问我哥哥，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看到照片。我哥哥回答说，“若是早上拍的，当天下午便能看到了。”她听了很兴奋，并说很想看看照片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她告诉我哥哥，可以选择任何一间房子来工作，并安排了一位太监做好必要的准备。

3

第二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大好天气。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我哥哥带了几架相机在院子里等候。

太后走进院子，仔细查看每一部照相机。她说道：“真是有意思，这些东西怎么就能给人照下相来呢？”在听到了照相原理的详细解释之后，太后强烈的好奇心显现来了，她命一位太监站到照相机前面去，自己则通过照相机的聚焦屏去观察对面，看看人在镜头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看了之后，太后大声叫起来：“你、你怎么是脑袋朝下？你到底在用脚还是用脑袋站在那里的？”

我们向太后解释说，等到照片完成，显示出来的就是正常的样子了。

太后对看到的东西深感有趣，她觉得照相机真是绝妙非凡的东西。

最后，太后让我站到照相机前面去，从聚焦屏中看我的样子。她又和我对调了位置，想试试我能不能在聚焦屏中看到她在做些什么。她在镜头前挥挥手，我告诉她我能够看见，她听了很高兴。

后来，太后坐上了轿子，八名轿夫抬起来朝外走。在轿子经过照相机的时候，我哥哥为太后拍了一张。轿子过去之后，太后在里面转身问我哥哥："刚刚你拍照片了么？"

我哥哥回答说已经拍了。太后说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刚刚我的表情太过严肃了。下次再要照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一声儿，我会做些准备，表情显得高兴一些。"

我看出拍照这事儿令太后非常高兴。早朝的时候，我在屏风后面，看出太后为了能够留下时间多拍些照片，急于要早点儿结束早朝。于是出现了很少见的情况，这次特殊的早朝仅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等早朝的人走了之后，我们从屏风背后走了出来。太后对我们说："这么好的天气，让我们再去拍些照片吧。"说着，她走到了院子里，我哥哥已经在那里摆好了照相机，很快便拍好了一张。

太后说想拍几张坐在御座上的照片，像正在参加早朝的样子。我们大家只用了几分钟的工夫，就把院子布置妥当。我们摆好了御座和脚凳，屏风放在御座后面。太后命一位女官去取来几件衣服，供自己挑选。与此同时，我也去拿来了一些太后特别喜欢的珠宝首饰。

太后吩咐女官把自己前两次召见埃文思夫人时，所穿着的那两件衣服和所佩戴的珠宝都拿来。她穿戴好这两身衣装，各拍了两张照片。接下来，太后又穿着没有刺绣的平常衣服，拍摄了一张。

最后，太后命我哥哥去洗出拍好的照片，她很好奇，急于知道会是什么效果。转而她想了一下，又对我哥哥说道："请等一下，我要亲自去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我原来并没有考虑到太后会有这样的兴致，所以也就没有向她介绍照相的专业技术，如冲洗照片、暗房等等此类。现在她要了解这些，我便尽量详细地向她介绍这些操作过程。

太后说道："没有关系，我就是去看看那个什么暗房，不管是怎样的房间都无伤大雅。"

我们便来到了院子里的暗房，观看我哥哥冲洗底片的过程。我们为太后搬来了椅子，她坐在那里，对我哥哥交待："你就像平常那样工作吧，不用紧张也不要有所顾忌，权当我不在这个地方就好。"

太后观察了一会儿，看到底片上的图像很快显示出来，显得很是高兴。我哥哥把底片举到红色灯光之下照着，以便让太后看得更清楚。

她问道："这个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不过倒是也能看出来是我的样子。可是，为什么我的脸和手都是黑色？"我们向她解释说，等底片的图像印到纸上，原来黑色的地方会变成白色，白色的地方会变成黑色。

她说："啊，真的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样样都是学问哪。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玩意儿，对拍照这事儿我很满意，只是不知道我的画像能不能也有这样的效果。"她又交待我哥哥："我去午休的时候，你可先不要做完这些，我等等还要来看。"

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太后醒来，与平日里不同的是，她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穿戴完毕，然后她立即去了我哥哥那里。哥哥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太后驾临。

夏季的午后四点，太阳还高高挂在天空，阳光明媚，天地间一片敞亮。太后在暗房里观看冲洗照片，足足看了两个小时之久。她兴奋

地看到一张张照片慢慢显示出来。

太后一张张仔细查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手里一直捏着第一张。等她想起来，再次审视那张照片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她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声惊呼道：“它怎么变成黑色了？会不会是什么不祥之兆？”

我们向太后解释说，照片在印出来之后，尚需再次冲洗，才能最终完成。若是暴露在强光之下，就会慢慢褪色，最后变成黑色，就像那一张照片一样。

她如释重负，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说道：“这真是很有意思，要费这么繁复的工夫。”

过了一会儿，照片印好之后，我哥哥将它们浸在一种化学试剂中，再取出来用清水漂洗。经过了这一道道流程，最后呈现在太后面前的图像已经非常清晰了。太后更为惊讶地喊着：“多神奇的事儿啊！什么都和真的一样！”

等到所有工作都做完之后。太后拿上所有照片，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小御座上面，一张一张长时间地仔细查看。看着看着，她还拿起了镜子，比较镜子里的自己和照片上的自己有何区别。

这段时间里，我的哥哥一直在院子里站着，等候着太后的进一步旨意。太后突然之间想起了这件事情，忙对我说道：“对了，我光顾着看照片，竟把你哥哥忘了个一干二净。这个可怜的人儿一定还在原地不动，等着我的吩咐呢。你去告诉他——哦，不，不，还是我亲自去吧，他一整天勤勉辛苦地工作，我要去说点儿让他高兴的话。”

太后命我哥哥将每张照片各洗十张，洗好后都先留在宫中。另外，所有的照相设备也都留下来，准备明天继续拍照。

可惜天公不作美，接下来的十天一直阴雨连绵。天气转晴之前，没有办法拍摄照片了，为此太后很是着急。

太后本想在大殿里拍摄几张，可是里面光线太暗，高处的窗子都被厚厚的纸张糊起来了，只有低一些的窗户才能透进来光。我哥哥尝试着拍摄了几次，效果都不理想，实在无法拍出好的照片。

4

这段下雨的日子，因为皇上要去地坛祭天，我们都搬到了皇宫西苑。皇帝祭天，这是一年一度的重大仪式，每年的安排都几乎完全一样。这一年因为下雨的缘故，路程诸多不便。太后吩咐沿着昆明湖的西岸坐船前往西苑。

在众人的陪同之下，太后登上了船。船只向西直门的方向笔直进发，抵达了最后一座桥，船只停靠，我们纷纷登上了岸。几顶轿子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乘着轿子抵达了西苑门口。在那个地方，我们又一次登上船只，在湖面推开涟漪一路前行，走了大概一英里路程。

船在湖面上悠然前行，荡起大大的波纹，一圈一圈儿朝岸边涌去。太后欣赏着湖面景致，看着盛开的荷花，说道："我们最少要在这里待上三天。等到天气好起来的时候，我要坐在敞篷船里，在湖面之上拍照片。我另外还有一个好主意，我想自己扮成观世音菩萨，让两位太监头儿扮成侍者。至于那些行头么，以前就着人做好了的，备在宫中。我只是偶尔穿穿。有的时候我因为什么生气了，或者遇到了烦心的事儿，我就会扮成观世音菩萨，帮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这样做对我有很大的益处，让我能够时常保持慈悲的性情。若能拍出这样的照片，放在身边，我经常看看，自己便能够时刻记得应该做出什么样子。"



慈禧太后扮观音照

我们抵达行宫的时候，雨已经停止了。路面尚有些泥泞，我们却还要走着去太后的住处。太后有个特殊的癖好，喜欢在雨天出行，还尤其喜欢步行。倘若不是大雨，她甚至不主张撑伞。太监们当然一直带着伞，但是如果没有太后的命令，伞是不必用的。太后不用，我们当然也不可以用——所有的事儿都是这样子的讲究，太后要选择步

行，我们就要跟着步行；太后下令乘坐轿子，我们也别无选择地要乘坐轿子。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在太后面前，我们是不允许坐下的，太后步行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坐上她的黄缎椅子，我们则要一直侍立身边。

和紫禁城的宫殿相比，太后更加喜爱西苑的行宫。这个地方林木葱郁，花香袭人，环境幽美妙不可言。在这样的地方，太后整日里绷紧的情绪能够得到很好的调整。

这一天走了太久的路，我们都很疲惫，太后就让我们早些退下了。她说倘若明天天气晴好，就准备到外面拍一些照片。

然而，翌日天公依然未能展露笑颜，阴沉沉的天气让满心希望的太后失望了。接下来又不断地下了三天雨。我们又在这里多住了一些日子。终于有一天，天放晴了，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我们按照太后的吩咐，到外面拍了几张照片，返回了颐和园。

返回颐和园之后的第二天，太后吩咐大家为卡尔小姐的到来做好准备。她吩咐李莲英告知所有的太监，在卡尔小姐进宫之后，除保持必要的礼节之外，任何人不得私自与其交流。我们这群御前女官也得到了同样的谕令。另外，太后还加了一条：卡尔小姐在场的时候，我们不得与太后说话。光绪皇帝也接到了相同的谕令。

太后命人将醇亲王的花园准备妥当。她又对我们说道：“我相信你们三个可以照顾好卡尔小姐。我已命外务部安排好卡尔小姐的膳食。这些已经妥当，只有一点我有些忧虑，宫里没有西餐提供给卡尔小姐。”

为此，太后特地吩咐我们把家里的小火炉带到醇亲王的府邸，若是卡尔小姐有自己烹饪的需要，可方便使用。太后总是如此细心，考虑问题滴水不漏。

太后对我们说：“这一回，你们要多受些累了，每天早上的时候，要带着卡尔小姐进宫，晚上又要陪着她返回。还要集中精神每天

都看顾着她。相信你们不会在意这些麻烦，这些可都是为了我啊。”

过了一会儿，太后想起了什么，又笑着说：“我多么的自私啊，竟让你们把自家的东西都拿到醇亲王府去。你们的父亲在家里，可怎么办才好呢？最好让你们的父亲也到这边来，和你们一道儿住着吧，乡下的空气也许对他的身体更有好处也未可知。”

这真是极特别的恩典，我们欢喜不尽，赶紧磕头谢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被恩准住进醇亲王府。我们终于可以每天都见到父亲了。之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每个月告假去探望他一次而已。

第二天，太后安排我们到醇亲王府去，为卡尔小姐的入住做些准备。

醇亲王府颇为宏伟华美，一处处小的寓所各自分开，自成一体，不像其他常见的建筑那般连成一片。王府中巧妙地设置了一处小小湖泊，更有小径蜿蜒向前，颇有幽雅风韵，秀丽宜人，与慈禧太后的颐和园风格很相像。当然了，若论规模，比颐和园小了很多。

我们选择了一处寓所，作为卡尔小姐的居所。我们竭尽所能去安排和布置一切事物，以保证卡尔小姐住得舒适。我们则住进了旁边的一处寓所，相隔不远，当然是为了听从太后的命令，更好地照应和留意卡尔小姐。

晚上，我们回到了颐和园，向太后详细地报告一切。太后嘱咐我们：“希望你们务必多加小心，千万不可让卡尔小姐看出你们在监视着她。若是那个样子，可真是太糟糕的结果了。”她对此很是忧心忡忡，在卡尔小姐到来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嘱托我们，务必小心、小心、再小心。

卡尔小姐到来之前的一天，一切事情均准备妥当。太后看了之后很是满意，我们也终于得以放松心情，长舒一口气。

那天晚上，太后命我们早早退下，她准备早些休息，以便第二天早上看上去精神百倍，神清气爽。

5

卡尔小姐到来的那天早上，我们匆匆忙忙地完成了所有的常规事情，包括早朝在内，有意识腾出大部分精力，迎接女画家的到来。

我如往常那样站在大殿屏风后面的时候，一位太监走过来告诉我，康格夫人和女画家，还有另外一位夫人已经到了，正在侍应室里候着。

此时早朝已经接近尾声。李莲英走进来向太后禀告，外国夫人们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的屋子候着呢。

太后对我们说道："我要到院子里去接见她们。"有一点毋庸置疑，太后总是在大殿里接见来客。卡尔小姐与寻常来客不同，太后也便采用了不同于一般的接见方式，更显亲和，也更随意。

我们拾级而下，看到了外国来宾们走进了大门。我悄悄把卡尔小姐指给太后看。太后敏锐又极快地打量了卡尔小姐。我们走到了院子里，康格夫人走上前来，恭敬地向太后致意，然后介绍了卡尔小姐。

可以看得出来，太后对卡尔小姐的第一印象很不错。卡尔小姐始终面带友善的微笑，这一点吸引了太后。太后最喜欢看到对方这样礼貌的笑容。她低声对我说道："她看起来是个很和气的人哪。"

太后能有这样的印象，我心里很高兴。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些惴惴不安，揪心卡尔小姐会给太后怎样的想法。

太后看着我与卡尔小姐互相问候着，嘘寒问暖，表示出了很满意的样子。后来，太后告诉我说，她当时注意到了卡尔小姐那次和我重逢，显得非常高兴。从这一点分析，太后认为："我觉得么，这个人很容易应付。"

我们跟随着太后向她的寝宫走去。卡尔小姐告诉我说，她带来了自己的画布。那块画布大约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稍稍早些时候，我曾经告诉过卡尔小姐，太后不喜欢那种很小的画像，要画肖像么，就

画一幅真人那般尺寸的。

太后看到了卡尔小姐的画布之后，非常的失望。她还是觉得画布与期望中的大小相差太远。

我们一起动手，帮助卡尔小姐把桌子摆放停当。太后请卡尔小姐为自己设计一个想要画出的姿势来。

我很清楚，受宫中的环境所限制，卡尔小姐并不那么容易为太后选择出合适的姿势。寝宫的窗户都比较低，光线微弱，从靠近地面的地方蛇一样蜿蜒而入。最终，卡尔小姐把画布摆放在了靠门的地方。

太后请康格夫人和其他几位客人稍坐片刻，她要去换件衣服。我跟着太后进入了她的卧室。进入卧室之后，太后问我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位卡尔小姐多大年纪了？她可是实在猜不出来。看上去卡尔小姐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我告诉太后说，卡尔小姐的头发天生便是这种颜色。太后便说自己倒是常常看见金色头发的外国女人，白色头发的却从未见过，除了老太婆之外。

太后最后说道："依我看哪，卡尔小姐算是个优雅有品位的女人，希望她能把我的肖像画好。"

尽管太后并不喜欢黄色，她还是转过头，命一位女官取一件黄袍来。她觉得若是针对画像而言，黄色应该最相宜。

那女官取来了好几件黄袍，太后从中选来选去，选出了一件上面绣着紫藤的袍子。当然的，也选择了颜色花纹与此相配的鞋子和手帕。她还系上了一条蓝色的丝巾，上面绣着"寿"字，每个字的中间都点缀着一颗美丽的珍珠。她还戴上了玉手镯和玉护指。另外，太后还在头饰的一边戴上了一只缀着流苏的玉蝴蝶，还有和往常一样的鲜花。这一次，太后打扮得美丽极了。

太后从卧室出来时，卡尔小姐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她一看到太后

的打扮，便忍不住叫起来：“太后的这身穿戴真是太漂亮了！”我把她的话翻译给太后听，太后听了非常高兴。

太后在御座上坐下来，摆好了一个姿势。她像往常那样随意而坐，雍容自然，一只手放在御座的垫子上面。

卡尔小姐看了之后，说道：“这个姿势极好，自然而随意，请太后保持这个样子不要动了。”我把她的话翻译给太后听。太后问我，这个姿势是不是真的很好，要是不够好的话，她可以再换个别的姿势。

我回答太后说，她的这个姿势庄严高贵，已经是极好的了。太后又问了皇后和别的女官们，她们也都回答说好极了，实在不能再好了。其实我注意到了，她们根本没有在意太后的姿势，她们都把兴趣集中在了卡尔小姐即将做的工作上面。

卡尔小姐开始勾勒轮廓，在场观看的每个人都惊呆了，她们没有哪个人曾经见过这样轻松自然的绘画方式。

皇后对我悄声道：“尽管我不懂得绘画的学问，我还是能够看出，这位女士是个很优秀的画家。她能够把没有见过的服装和头饰，画得这样精准。要是倒个个儿，找一位中国画家画外国女士，恐怕要搞得一团糟糕吧。”

轮廓画好了之后，太后非常激动，对于卡尔小姐能够画得如此生动精准，又是惊讶又是赞赏。我向大家解释说，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素描轮廓，等用油彩修饰，效果会更加不同。



1903年，裕勋龄翻拍的慈禧太后画像

太后让我问卡尔小姐累了没有，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并且她让我告诉对方，自己每天都会非常忙碌，只能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坐在那里画像。

随后，我们陪着卡尔小姐和康格夫人去用午餐。午餐之后，我们陪着太后去戏园子听戏。

康格夫人离开之后，我邀请卡尔小姐到我的房间休息。刚刚到了房里，太后就派了位太监前来传话，叫我到她的卧室去一趟。

太后对我说："不要安排卡尔小姐在我午睡的时候画像，她也可以在那个时候休息一阵子。等我起床之后，你带她过来。眼下画像的效果比预想好得多，这让我很高兴。"

我把太后的话转述给卡尔小姐，还告诉她，若是愿意的话，可以等到太后午休之后再画一会儿。

卡尔小姐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她说想立即接着工作。她第一天进宫，我不打算说得太多，以免扰乱她的心神，便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是太后的旨意，任何人都不可以违抗。我只是委婉地让她暂时停止工作，休息一阵子。

说话间，有太监来为太后晚膳布置餐桌，大家忙碌起来。我带着卡尔小姐走出来到了走廊里。皇后在那里和卡尔小姐聊天，谈得非常投机，我在中间担当翻译。聊了一阵子，一位太监过来报告说，太后已经用毕晚膳，我们可以进去用餐了。

一进入屋子，我就大吃一惊。屋子里竟然摆好了很多张椅子，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从来都是站着用餐。

皇后也是大为惊讶，问我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因为卡尔小姐在这里的缘故吧。皇后让我去问问太后，毕竟，没有她的吩咐，即便有凳子，依旧谁也不敢坐下来。

太后轻声告诉我："我可不想让卡尔小姐觉得咱们是野蛮人，让皇后和女官站着吃饭。她自然不会知道其实这是咱们多少年来的规矩。说不定会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你们都坐下来用餐吧，也不要过来谢恩，都表现得自然一些，像你们从来都是如此用餐的样子。"

太后洗漱完毕之后，走到了我们的餐桌旁边。我们都站了起来。太后让我问卡尔小姐，喜欢不喜欢我们的饭菜。卡尔小姐回答说非常喜欢，比自己国家的食物菜肴更加美味可口。太后这才放下心来。

等到用完晚餐，我让卡尔小姐向太后道别。我们向太后和皇后道了晚安，又对女官们说了再见。之后，我们带着卡尔小姐前往醇亲王府。我们乘马车过去，路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到了那里，我们带卡尔小姐看了她的卧室，随后就回到自己房里，倍感身心松弛。

6

第二天早晨，我又带着卡尔小姐进了宫。我们抵达的时候，早朝正在进行。因为卡尔小姐的外国人身份，不能进入大殿。我带着她到后院的走廊，在那里等候早朝结束。

没能如往常一样参加早朝，无法知晓今天的具体内容。我心里觉得有些失望，觉得空落落的。

我在宫里的这段时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便是尽可能地让太后对西方的风俗和文明产生兴趣。我相信一点，若是太后对这些风俗文明产生了兴趣，便能拓展她的眼界，将我们谈论过的这些主题摊出来与大臣们交流讨论，也许便会最终支持中国的改革维新。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曾经把法国海军检阅的照片拿给太后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甚至表示，有朝一日在中国也要做一个这样的军队展示。她也曾针对此事与众位大臣商讨。那些大臣们依旧是那一贯的推脱腔调，说什么“此事并非小事，还是要从长计议”之类。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太后想要实现革新主张，不是她一个人便能完全作主，需要和那些大臣们商量。大臣们表面多无异议，却一直拖延搪塞。

我在宫中的经历，让我得出如下经验：在这个环境里，每个人都对新的事物新的观念讳莫如深，唯恐自己提出来，反而会因此陷入麻烦。

太后早朝结束走出大殿的时候，卡尔小姐上前吻了她的手。太后为此大为惊讶，不过当时却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后来，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太后问起卡尔小姐的举动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可不是中国的

礼节，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好在当时，太后想到了那应该是外国礼节，故而什么都没有说。

太后步行返回自己的宫殿，换上了画像的服饰。这个早晨无限美好。太后摆出画像的姿势，坐了大概十分钟光景，就对我说累得不得了，实在坐不下去了。她让我问一问卡尔小姐，这次到此为止，以后接着画是否可以。

我对她说，卡尔小姐在宫中住着，要住上一段时间，耽搁一天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心下清楚，卡尔小姐一定会有些失望，但是我不得不更多地从太后的感受考虑问题，若不迁就着她的感受，我担心前面的努力会化作泡影。

卡尔小姐表示，若是太后要休息，她可以先画屏风和御座，等太后歇息好了，再摆姿势画也可以。太后听了很高兴，表示午休之后，会再来坐上一阵子。

太后吩咐说，每天中午十二点钟，让太监们将卡尔小姐的午餐安排在我的房里。我们母女三人共同陪着卡尔小姐用餐。

宫里的晚餐通常在六点钟准时开始。太后吃完之后，在那个时间安排卡尔小姐与皇后、女官们一起进餐。太后额外命人安排了香槟酒和卡尔小姐可能会喜欢的其他酒类。她认为，所有的外国女人都习惯在用餐的时候饮酒。

她到底从哪里得到的这种说法，没有人知晓。我相信太后肯定是听到了别人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不过，我不会选择当面去纠正她的误解，那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太后相当反感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看来只有另找合适的机会，再有意无意间谈及这个话题，改变太后那些错误的观念。

这天下午卡尔小姐去休息的时候。太后着人把我传过去，问起我那套老问题，诸如“卡尔小姐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之类。她看上去非常在意卡尔小姐对自己的看法。

我告诉太后说，卡尔小姐说太后很漂亮，看上去很年轻。太后说道：“哦，是么？卡尔小姐当着你的面，也只得这样说罢。”

我确凿地对太后表示，卡尔小姐这样的评论不是在我问及的情况下才说出的。她主动这样说起，肯定很真诚的、公允的评论，绝对没有任何恭维的意思在其中。

太后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道：“我在想啊，既然卡尔小姐能够画出屏风和御座，当然也就能单独地画出我的服装和首饰，我可就不用老坐在那里摆出固定的姿势了吧。”

我告诉太后，那样子是不可能的，没有谁能凭空画出服饰穿戴在人身上的样子。让我惊奇的是，她竟然说：“哦，那很好办啊，你穿戴我的服饰代替我坐在那里就行了。”

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思忖了一下，告诉太后说，大概卡尔小姐不会赞成这样的安排吧。我想找个借口避免这样的安排。

太后却认为，卡尔小姐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的安排。到了绘画面容的时候，她还是会亲自坐下来的。

没办法，我只得努力让卡尔小姐接受这样的安排。最后确定了新的方案，即太后觉得累或者厌烦的时候，我穿戴着她的服饰代替她。

在这种安排之下，太后的肖像画得以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太后只为数不多地摆了几次姿势，让卡尔小姐画她的面容。我则是每天上午下午各坐在那里两个小时，直到肖像画完成。

第十四章　皇上的生日

1

我父亲四个月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六月初一这一天，他到宫中接受了太后的召见。此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却依然没有摆脱风湿病的困扰。在他登上大殿台阶的时候，那种风湿病带来的沉重感与不便更为明显。太后见了，就命两位太监过去搀扶着他。

首先，我的父亲当然要感谢太后对我们姐妹的隆恩。按照宫廷规矩，他摘下顶戴，跪下叩头，极尽虔诚。这种仪式，一般在官员受到圣上隆恩时展现出来。

这套仪式结束之后，我父亲戴好顶戴，依然跪在御座之前，等待太后的询问。太后问了他在法国巴黎期间的生活状况，时不时表扬一番父亲的尽忠职守。太后看见我父亲跪在那里很是不舒服，就吩咐太监取来一只垫子，为父亲垫在膝盖之下。这又是太后极大的恩典了。这样的垫子，平时只有军机大臣在的时候，才有资格使用。

太后对我父亲表示，她不会再指派他到外国去了。一则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不适合再度远行至异国他乡；二来父亲若是出行，势必带上女儿同行。太后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留在宫里，常伴她左右。

太后对我们身居异国他乡多年，却依然恪守满族传统礼仪，表示很欣慰。我父亲回答说，他一直坚持以中国的传统礼教来教育女儿。

太后问皇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皇上问我父亲是否会讲法语。我父亲回答说自己不懂法语。皇上为此很惊讶。我父亲解释说，他既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也因为年事已高，学起来太难了。

皇上又问，法国人对中国的感觉怎样。父亲回答说，法国对中国

一直比较友好，遗憾的是庚子年拳民之乱后，自己的使臣身份便多了几分尴尬。

太后接口道，那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好在所有的一切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她最后嘱咐我的父亲多多调养，尽可能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朝廷效力。君臣召见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来，太后对我说，她见我的父亲自法国回来之后，明显见老了。她觉得我父亲应当多注重调养，保持身心的放松，早日恢复强健的体魄。她对我父亲因为女儿们受到的恩惠而周到虔诚地感谢自己的圣恩，感到非常满意。

2

这段时间，宫里在准备着光绪皇帝的生日庆典，具体时间是六月二十八日。其实，皇帝真正的生日是六月二十六日。因为六月二十六日恰恰又是先帝咸丰的忌日，所以不能为光绪皇帝生辰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就把庆典改在了二十八日。

按照规矩，官方的正式庆典将举行七天时间。在庆典期间，早朝暂停举行，所有官员一律身着朝服，民间则百业休息，共同庆祝。只有太后是个例外，不必在此期间穿戴特别的服饰，也不必在庆典上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

这一年是光绪皇帝的三十二岁生日，因为不是整寿（如二十岁、三十岁的整数生日），所以不是特别的隆重，但依然有十足的气派。

皇帝的生辰没有特别隆重的操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太后依然健在。按照满族的传统，她位居皇帝之前，是事实上的国家统治者，皇帝尚居第二。

皇上自己当然也很在意这种传统习俗，因此当太后拟订懿旨准备筹办他的生辰庆典时，他总是说这又不是什么整寿，完全不必大操大办，最后才在众人的强烈建议之下，很不情愿地认可了庆典事宜。

皇上出于恪守满族传统礼仪角度的考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无论他个人如何反对，这个生辰庆典毕竟是整个国家都认可的，一切都无可厚非。

在庆典的这段时间里，太后肖像的绘制工作也暂时停止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上，皇上穿戴好了宫廷正装。他身着黄色的龙袍，上面绣着九条金龙，外面罩上一件枣红色的外套。当然，他贵为九五之尊，顶戴上不是普通的扣子，而是一颗大珍珠。我注意到了，在宫里，也唯有皇上才有这般特殊的穿戴。

皇上和平日里一样，先去太后的宫里请了圣安。随后，他又到了庙里，祭拜祖先的牌位。中国人都习惯于以这种跪拜叩头的形式，表达对先人的深刻的、难以尽言的敬畏与尊崇。祭拜仪式结束之后，皇上再次来到太后的宫里，向太后叩头请安。

然后，皇上来到大殿，面见早已聚齐的文武百官，并接受他们的叩拜贺仪。这种仪式此时变成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文武百官在地上拜倒一片，此起彼伏，错落交替，当真是趣味横生的奇妙景象。甚至连正襟端坐的皇帝本人，面对这样的场景，有的时候也忍不住笑起来。

生辰庆典上使用的乐器，这里也值得略微提一提。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鼓，以坚硬的木头制成，平底、圆顶、中空，直径大约三英尺，高约三英尺。另有一根相同木质做成的长长的木棒，作为用来击打上述乐器的鼓槌。演奏的时候，有专门的鼓手，以鼓槌大力击打鼓面，那种声音强劲有力，非言辞所能尽述其妙。

平日里每当皇帝升座的时候，鼓手便擂动此鼓，鼓声隆隆，壮声威、正视听，极尽威严。

除了大鼓之外，还有一只硬木制成的老虎，与真老虎一般大小，放置在院子里。木虎的背上刻有二十四块鳞片。演奏“木虎”的人持续刮擦那些鳞片，发出奇特的乐声，类似数不胜数的爆竹同时爆炸的声音[7]。

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这大鼓与“木虎”两种乐器演奏之音贯穿始终，在宫廷之中缭绕不止，声震屋瓦。在此期间，一位礼仪官负责高呼口令，比如跪拜、鞠躬、起立、叩头等等，但是现场声音繁杂吵闹，根本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文武百官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动着。



宫廷打击乐器敔[yǔ]，即裕德龄提到的所谓“木虎”

还有一种乐器，以木条编成框架，大约八英尺高，三英尺宽。有三根木条横穿木架，上面悬挂了十二只纯金铃铛。以木棒敲击铃铛，声音清越，与洋琴乐声相似，当然声调要明显高出很多。这个乐器被放置在大殿的右侧。大殿左侧也摆放着一架类似的乐器，不同的是，悬挂的铃铛是白玉材质，发出的乐声与纯金铃铛的音色又有明显不

同，清新悠扬，宛如隔窗望月，又好似清风拂柳。

文武百官参拜完毕，皇上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在这里接受皇后、嫔妃和众多女官的拜寿。这一次拜寿仪式上，从头至尾伴随着弦乐器演奏的音乐，清晰明朗，悦耳动听。

拜寿礼毕，皇后带着所有的女官，跪在皇帝面前进献一柄如意。这如意是一种“朝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柄端多为小灵芝形、云朵形等多种形状，头尾两相呼应，主体呈流线形，柄微弯曲，造型美观华丽。这种如意有的是纯玉制就，有的则是木制，中间嵌玉，手工精巧。所谓如意，乃是中国一种吉祥之物，赠之与人，寓意是给人带来幸福吉祥和万事随愿。

再接着，便是太监们向皇帝磕头拜寿了，不过这次不再奏乐。太监们行过礼之后，是宫女们拜寿，直到此时，拜寿仪式才算圆满完成。

所有程序完毕，皇上再次来到太后的宫殿，向太后磕头谢恩，感谢太后对自己生辰庆典的隆重安排。最后，太后在众人的簇拥下，到戏园子去看戏。

到了戏园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太后赏赐的蜜饯，当然这也是老规矩。

戏曲看了没多久，太后返回宫殿午休，庆典工作便全部结束了。

3

皇帝生辰庆典结束两天之后，这一年的七月份到来了。七月七日，又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下面我向读者朋友们详细讲一讲。

相传天上有两颗星星，牛郎星和织女星。牛郎和织女是分别掌管农业与纺织业的两位神灵。这牛郎和织女二人原本是一对夫妻，在一场争执之后，长相厮守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们被王母娘娘划出的

银河彻底隔开。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他们才被允许见面一次。那个日子里，数以千万计的喜鹊在银河上搭成桥梁，让他们完成一年一度的相会。

这个节日的纪念仪式很特别。院子里放置了几只盆子，均盛满清水。太后拿着一些绣花针，分别投入每只盆子。阳光普照，漂浮在水面的细针会在盆底映上投影。根据绣花针投影的不同，一些影子的形状被认为会带来好运气，也说明了投针人心灵手巧，另一些影子的形状则被认为是投针人愚钝手拙，运气不佳。此外，太后还要焚香祭拜牛郎和织女两位神仙[8]。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七月份是令她满心伤痛的月份。这个月的十七日，是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的忌日。每年的七月十五日，又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死者的节日（民间俗称“鬼节”）。

七月十五日一大早，宫中众人便前往西苑，精心准备祭祀事宜。中国的传统观念对一种说法深信不疑，那就是在人死去之后，他们的灵魂仍然存在于世上。出于这种理念，人们就选择在死者的忌日祭祀和焚烧纸钱。活着的人们相信，那些死者的灵魂可以花费这些冥币，购买和享用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一天，太后命人安排了数百名僧人，念经超度那些可怜的、无人祭奠的孤魂野鬼。到了夜里，太后带领众位女官乘着船，漂流湖上，齐放荷花灯。那些荷花灯的花瓣中间插着蜡烛，随波而去，浮动一片光影，合着粼粼波光，悠悠桨声，在幽暗的湖面上荡漾，为这一年死去的亡灵们祈祷往生，享受生者由衷的祝福。

太后嘱咐我们也要点着蜡烛，放走荷花灯，为亡灵祈祷，并藉此得到亡灵的感激之情，今生来世均可得到好报。

有太监告诉太后说，他们曾亲眼目睹亡灵的身影。对于他们言之凿凿的描述，很多人深信不疑。

太后自己并未见过什么灵魂，但是她认为是自己的大富大贵气

象，让那些亡灵恐惧，不敢现身。她交待我们所有人都把眼睛放亮些，多多留意那些可能出现的亡灵身影，并且及时告诉她所见到的一切。

当然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许多宫女则被吓得紧闭双眼，唯恐看见什么可怕的亡灵鬼怪。

这段日子里，太后全身心沉浸在对已故咸丰皇帝的缅怀上，忧愁烦绪终日缠绕着她，片刻不离身，让她久久难以自拔。她变得更加挑剔易怒情绪郁结，整日里沉默不语，时常独自饮泣，情难自已，谁也劝解不开。我们当然都分外小心谨慎，步步惊心，唯恐因点滴小事不慎惹恼了太后。

为什么咸丰皇帝已经驾崩多年，太后依然在痛苦和怀念中无法自拔？个中原因，我实在感到费解。

整个七月份，宫中严禁女官穿着亮色的服装。我们都不得不一直穿着深蓝或者浅蓝的服装。太后则一直穿着黑色的衣服，没有一日例外，甚至连手帕都是黑色的。

往常在每个月初一和十五演出的戏园子，也在七月份关门大吉。宫廷没有一丝一毫乐声，一切大小事务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整个皇宫所有人，无不沉浸在一种时刻萦绕身边的、深沉的悲痛之中。

为了表示对先帝的尊崇，宫中规定斋戒三日。这是我进宫第一年面对的境况，目前的悲戚气氛让我颇为不适，尤其是在刚刚经历过喜庆和喧嚣的气氛之后，反差更为强烈。

七月十七日的早晨，太后来到咸丰皇帝的灵位前，跪在地上痛哭良久，悲恸之状令人动容。我为太后感到伤心，我看到她的悲恸完全是真情流露，毫无做作之态。那个时候，我是最受太后宠爱的人，在悲痛的日子里，她时常让我待在身边。

有一天，皇后对我说道：“太后对你颇为依恋，这段日子她内心

悲痛，你最好多多陪伴着她，缓解她的哀伤。”我便常常去陪伴太后，看到她哀伤地痛哭，我也忍不住哭泣。太后看见我哭了，马上止住我，让我不要这样。她对我说，我还太年轻，尚未尝过这样深切悲痛的滋味，不可以轻易这样哭泣。

那段日子里，她和我多次述说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她对我讲：“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家庭生活异常艰难困窘。从父亲母亲那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丁点儿快乐，他们都不喜欢我。我的妹妹很受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却总是被忽视，什么都没有。我初进宫时，因为我容貌出众，很多人嫉妒我。我心里明白，其实，我比她们都要聪明。我鼓足勇气去和她们对抗，最终我赢了。我进宫之后，先帝对我无比宠爱，对别的人提都不提，看也不看，完全不放在心上。幸运的是，我为先帝生了一个儿子，这更让我独宠的地位无可撼动。然而，不幸的事儿渐渐降临了。咸丰十一年的时候，先帝患了急症。当时，洋兵攻打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我们躲到了热河。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当然都很清楚，你也应该很清楚，不用我来多说了罢。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年轻的女人，跟着奄奄一息的丈夫，带着年幼的儿子。东宫的侄子是个大逆不道之人，垂涎皇位已久。当然他没有任何争夺皇位的资格，他没有皇族血统。我真的不希望还有谁再重复我的苦难经历。

她接着说：“先帝到了弥留之际，神思已经很模糊。我带着太子来到龙床之前，向他询问由谁来继承皇位。他神思游离，半晌无语。先帝去留已成定局，时间紧迫，无奈之中，我有了主意，对先帝说道：‘您的儿子正在此处。’听了这样的话，他才有片刻神归龙体，马上张开眼睛，开了金口，他说：‘自然是太子继承帝位。’这件事情确定下来，我才终于定下心来。那句定下继承人的话就算是先帝的遗言了，过了不久他就驾崩了。到了现在，那些发生过的事儿早已年深日久，但想到当时的种种情景，依然宛如昨日，近在眼前。那个时候，我心里琢磨着，先帝虽然归了天，好在还有我的孩儿同治足以依靠，安安稳稳度过余生，生活会越来越舒心。谁知道不幸的是，他竟然不到二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自从同治我儿死去、我广受关注的时候起，我原来所有的幸福欢

乐就一去不复返了。东太后给我制造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根本没有办法和她好好相处。最终，她在我孩儿归天的五年后，也死去了。”

她又提到当朝皇帝：“光绪刚刚被带到我身边的时候，仅仅三岁，身体孱弱不堪，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他的父母也不敢给他吃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吧，光绪的父亲就是醇亲王，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妹妹，所以他几乎相当于我的亲生儿子。事实上，我也一直将他视为己出，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尽管我为他做了一切，却依然不能让他有个好的体魄。除去方才说到的这些，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事儿，现在说了也没有什么益处。总而言之，没有哪一件事能遂了我的心意，到处都令我失望。”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再次哭泣起来。过了一阵子，她接着说道：“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贵为当朝皇太后，必然是一呼百应无比欢乐。可我对你讲的这些都完全不是如此，我的痛苦经历和麻烦还远远不止讲过的这些，更糟的事都比比皆是。我真是什么糟糕的事情都经历过。无论什么事情出了岔子，无一例外总是我的错。有些时候，甚至御史都敢当面指责我。好在我总还算是个能想得开的人，些许小事也总是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然，我怕是不知道气死烦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看，那些人多么的心胸狭窄事事计较。在酷暑天气，我暂时搬到颐和园住着，他们也要提出反对，我这样做根本就与人无涉啊，还总是被这些家伙说三道四。你进宫的时间不长，想必也能看得出来，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儿我能单独作主，很多事情都是由大臣们商量好了，才上奏于我，只要不是重大的决定，我也都是准许他们商量的结果。”

祭祀结束之后，我们返回了颐和园。卡尔小姐继续绘画工作。很显然，太后已经对画肖像厌倦了，热情都已随着时间消散。有一天，她问我这件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她担心天气寒冷之前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返回紫禁城了，她怕在紫禁城画像会多有不便。

我请太后宽心，告诉她这些都很容易安排好，不劳她为此费神。

太后让我代替她摆了几次姿势之后，问起我卡尔小姐会不会对此有意见。她交待我，若是卡尔小姐觉得有意见的话，我可以告诉她这是太后的旨意。

我当然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多说什么，一直都与卡尔小姐和睦相处。

但是，太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他们完全无视太后吩咐的要善待卡尔小姐的命令，多有怠慢之举。当然了，专心作画心无旁骛的卡尔小姐并没有觉察到这些。为了能让太监们善意一些，我吓唬说要把他们的行为报告太后，为此他们平稳了几日。很短的时间之后，他们又恢复了那副倨傲不恭的样子。

4

八月到来的时候，太后要亲自组织菊花的移栽。菊花是太后喜欢的花卉，她对这项移栽工作充满了热情。

太后每天都要带着我们到湖的西岸去，与我们一道儿剪下鲜嫩的枝条儿，插入花盆的泥土之中。我对这种栽植方法很感不解，这些枝条没有根，只有茎和花骨朵。太后却告诉我说，这些枝条插进泥土，没几天就能长出美丽娇艳的花朵。

在生出新的根须之前，我们每天都去为那些菊花浇水。有的时候，若是下起了大雨，太后就会命太监们拿草席遮盖好菊花，防止为雨打风吹所折损。

养花是太后的嗜好，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能让她如此投入。为了亲自照料那些花儿，她甚至连长久形成的午休习惯都可以暂停。她尽可能地亲力亲为，花费了很多时间去侍弄她的果园，果园里种植了苹果树、梨树等等。

我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春夏两季过去之后，太后的情绪便会变得烦躁易怒。她最无法忍受冬天，最害怕寒冷的天气。

八月份的一天，太后得了小病，感觉有些头痛。她为此牢骚满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后生病。太后依然如往常一般早起上朝，却没有用午膳，很快便回到卧室，躺到床上歇息。

宫中的几位太医被召来，轮流为太后把脉诊治。整个诊治过程类似一项仪式：太医们跪在床前，太后伸出她的手臂，搁在一个专用的小枕头上面。太医把脉确诊之后，都会写下一张方子，当然各人有各人治疗之法，彼此并不相同。

我们把这些方子呈送给太后，她仔细看了半晌，从中选出一张认为是最好的方子，命人即刻取药生火煎煮。煎毕，先有两位嬷嬷和太医本人当面尝过，确定平安无事之后，太后才放心地服下。随后，她再次躺在床上休息。当值的女官留下来服侍，其他人则静静退出。



脉案，清宫御医为帝后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员治病时辨脉、用药的记录，实为御医们在从事医疗活动中为其建立的详细的病历。其中记录了清朝帝后的日常医疗、保健、生老病死等丰富内容。清宫脉案有折单和簿册之分。折单为每次看病、用药的记录，大小不等；簿册一般为几个月的治病记录汇总

那些日子里，大雨不断，天气潮湿炎热。这样的天气，导致蚊蝇

大肆繁衍，处处嘤嘤嗡嗡，成群结队，不胜其烦。

若要说起太后最厌恶的东西，那必是苍蝇无疑了。每到炎热潮湿的夏季，苍蝇总是随处可见，这一年尤其多得令人难以容忍。在宫里，为了消灭苍蝇，我们把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手段想遍了用尽了，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宫廷的每个门口，总有一位太监守着，各自手持一柄拂尘，屏气凝神严阵以待，防备苍蝇侵入滋扰。

宫廷之中，蚊子倒是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夏天的时候几乎没有蚊子。事实上，我在宫中期间，甚至连一顶蚊帐都没有看到过。而苍蝇却是讨厌至极的东西，我们想尽办法防范、驱赶和消灭它们，却还是躲不过它们的纠缠。

一旦有苍蝇落到了太后身上，她就会难以遏制地尖声尖叫。假如有一只苍蝇落到了太后的食物上，她马上会命人把所有饭菜扔掉，一道都不留。这种情况总是会把太后一整天的食欲破坏殆尽。她也因此而烦躁不安，常常对着众人大动肝火。这种时候，人人都噤若寒蝉。

太后若是看到了有苍蝇在附近，就会马上吩咐身边的人，抓住那可恶之极的侵入者。我便经常接到这样的指令。我也和太后一样讨厌这种肮脏的东西，倘若抓住了它们，手都会被搞得很脏。

太后生病了很长时间，这段日子里她一直郁郁寡欢，提不起精神来。那些太医们从早到晚地在旁边观察和诊治。太后服用了很多药方，却总是没有明显效果，病情反而更见严重。后来，太后发起烧来。

太后最担心的便是发烧。我们终日陪护着她，白天黑夜寸步不离。哪怕是吃饭，也只能看准了时机，轮流离开，且必须很快回来。

她还有一个怪癖，在她生病的时候，她拒绝任何香气接近自己。对于各种鲜花的香气，她也是一概抗拒。尽管在健康的时候她那么的沉迷这些。

这段日子里，太后神经衰弱，白天无法入眠，往日欢愉易逝的时

间如今对她而言，显得冗长而乏味。为了消磨这些无聊的时光，她命一些读过书的太监，白天的时候为自己读书，自己半躺在床上若有若无地听着。太监们所读的书包括中国历史、诗歌或者其他的一些品类，不一而足。

在太监读书的时候，我们站在床边为太后按摩双腿，这样能够舒缓她的情绪，让她平静一些。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大概十天之后，太后完全恢复健康为止。

有一天，太后问我："在人生病发烧的时候，外国的医生一般给他们吃什么药呢？我听说吃的是各种各样的药丸。那样一定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些药丸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在咱们中国，所有的药都是用植物的根茎之类做成，总归能够知道什么药治疗什么病症。我这儿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解释什么药治疗什么病的。我还听说咱们用药治疗的一些病，外国人却是动用刀子。李莲英告诉过我，有一个小太监手腕上生了个疖子，别人建议他到医院去。当然了，他们也没人清楚医院究竟是怎么治疗的。小太监去了医院，外国大夫拿刀子割开了疖子，把个小太监吓得要死。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我听说过了几天，那个小太监的手竟然好了。"

她接着说道："一年前，几位外国人来到宫里，见我咳嗽得很厉害，就给了我一些黑色的药丸，让我吞下去。我不好当面拒绝，就接过药丸说待会儿再吃。我终于还是没有敢吃下那些黑东西，偷偷扔掉了。"

我回答说，自己对西方医学知之甚浅。太后则说，她曾经见过我服用过西药。她说："我当然是知道的，在咱们京城，还是有很多人信任那些外国药的，甚至在我的亲戚里面，也有一些人信任和支持外国医生。他们都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哪里会不晓得呢？我清楚得很啊。无论如何，他们愿意那样找死，我也管不着。所以说，他们生病的时候，我都不会派我的太医去为他们诊治。"

太后恢复了健康之后，心情开朗起来，带着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游湖，有的时候坐着敞篷船，有的时候乘坐小汽船。她兴致很高，

经常流连忘返。

出于种种原因，太后总是喜欢到湖的西边游览。那边的湖水比较浅，小汽船经常在那里搁浅，动弹不得。这些麻烦事儿反而让太后更为开心。她喜欢汽船陷入泥淖的那种感觉。

这种时候，敞篷船就会靠过来，我们离开汽船，登上敞篷船，曲曲折折转到最近的山顶上。在那山顶上，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太监们费力地把汽船拖出泥淖。

这也是太后的特点之一，她喜欢将别人的困难和麻烦视作一桩乐事。太监们深谙太后的这一心理，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故意做出种种滑稽有趣的样子来，取悦太后。

每逢这个时候，只要不出什么大乱子，太后总是饶有兴致地观看。但若是出了乱子，或者因为疏忽产生了严重后果，太后就会毫不手软地责罚。说起来，想要取悦太后，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

太后还有一个癖好，就是爱打探别人的私事儿。有这样一个例子，如前所述，太后习惯于在用膳之前吃些甜点，然后把剩下的分别赏赐给女官们。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忙不过来，也就顾不上吃掉那些。结果，太后很快就发觉了这种情况。

有一天，太后用膳完毕，走了出来，本想透过窗户看看我们在做些什么，却看到了几位小太监正在享用她赏赐给我们的甜点。

太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吩咐我们把那些甜点再拿回来。大家都以为她还想再吃一些。我却本能地感觉，肯定是哪方面出了岔子，因为太后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吩咐过。

太后看了看送回来的甜点，发现剩下的很少，就故意问道：“什么人吃了这么多？”没有谁敢接茬，那可是触霉头的事儿。我极快地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得出结论，还是如实禀告情况为好。因为她既然

突兀地这样做，必然是什么都知道了。

于是，我大着胆子禀告太后，说我们今天实在是太忙碌，把太后赏赐的这些甜点都忘记了，恰好这个空儿，有几位太监走过来，自作主张地吃掉了。

我还说道，太监们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了。我们都很感激太后能给我们反映这些情况的机会。

太后说道，若是想让太监们吃那些甜点，她自然会另外赏赐。她好心好意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想不到我们并没有领情，反倒让太监们占了便宜。她转身对我说道："很高兴你能够对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太后随后下旨，扣除每位太监三个月俸银，以示惩戒。我心里清楚得很，那些太监们才不在乎这些俸银呢，他们自有别的方法挣到更多的钱。

我们回到起居室的时候，一位女官告诉我："你真不应该说出太监们的这些事情，他们一定会想着法子报复你的。"我对她说，太监们不过是些奴才，能把我怎么样呢？她告诉我说，可不能轻视了这些奴才，他们会想出最阴险的法子来报复别人。

我自然早知道太监们的恶劣，却也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来报复我。我认为他们不敢在太后面前说我的坏话，很快就将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

后来，我慢慢发现，太监们报复女官惯用的手段，就是潜移默化地引导太后对这个人产生偏见。比如，太后告诉太监有什么事情要做，希望让我去做，太监却会去告诉另一位女官，而不告诉我。这样一来，太后会认为我很懒惰，总要等着她亲自指令。与此同时，那另一位女官会得到太后更多的信任。

太后和皇后都对我很是照顾，太监们要对我不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还是不要轻易开罪他们为好。这些太监自恃专

门服侍太后，暗地里颇为倨傲，拒绝听从其他人的指令。他们常常对女官们粗俗无礼，甚至对皇后也是如此。

6

时间很快到了八月份，到了皇帝去日坛祭祀的日子了。在这种祭祀的场合，他穿着一件红色长袍。

这段时间里，康格夫人请求与太后私人会见，顺便看看肖像画的进展情况。太后恩准了她的请求。这次非正式会见，康格夫人并非一个人进宫，她还带着自己的两位亲戚同来，还有坎贝尔小姐和一位传教士夫人。

这次会见是非官方性质的，所以并没有举行多么正规的仪式，来宾被带进了太后的宫里。太后就在平日里充当画室的小殿进行了会见。尽管太后对于画像这件事已经没有什么热情，也曾多次向我们表明这一点。可是见到康格夫人，出于礼貌和尊重考虑，太后仍然保持有礼有节，对着康格夫人大为赞赏卡尔小姐的工作，说卡尔小姐绘画才华惊人，这幅肖像必然会是一幅难得杰作。

这一天，太后的心情格外欢快，她让我吩咐太监们打开各处的门，带着客人们四处参观。太后带着大家一间一间屋子地走动，兴致很高地向宾客介绍自己的各类珍奇古玩。

后来走到了一间寝室，太后坐下来歇息，并让太监为宾客搬来椅子。这个房间中存着不少椅子，看上去并不特别，其实都是太后的御座。按照宫里的规矩，不管是什么椅子，只要是太后坐过了，就马上成为太后的御座。以后若是没有太后的恩准，任何人都再没有资格坐。

太监们搬来了椅子给宾客坐，一位宾客不小心坐到了太后的御座上面。我马上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想上前劝止，此刻太后也对我使了眼色。我立即走上前去，对那位不明就里的宾客说道，我要请她去看样东西。她自然而然地站起身，跟着我走开了。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太后希望我以适当的方式让这位客人起身，我却不能明确告诉对方是为了什么。正在我想方设法向对方翻译的时候，太后低声对我说道：“看看吧，她又坐到我的床上去了，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我们就带着宾客们到了膳厅，邀请她们用午膳。午膳之后，大家向太后道了别，与卡尔小姐一道儿离开了。按照一直以来的惯例，我们报告太后说，客人已经离去。

太后对我说道：“那位女士多么奇怪啊，太没有眼力见儿，先是坐在了我的御座上，又坐到了我的床上。或许她根本不知道御座为何物，意味着什么，没准儿还在心里暗暗笑话咱们呢。从这件事儿上看来，咱们的礼仪可比他们外国人的讲究得多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有没有注意到康格夫人进宫的时候，在院子里交给了卡尔小姐一个小包？”

我回答说，我注意到了她带着那个小包样的物件，不过说不清楚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太后便让我和卡尔小姐打听一下，里面究竟装着什么。

那个时候，我经常会从太后那里接到诸如此类稀奇古怪的指令，慢慢地我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我自然也会聪明地判断，巧妙地执行。所以，我当然不会去直接询问卡尔小姐，而是想方设法地旁敲侧击，尽快了解情况。

我开始四处寻找那个小包，却发现它已经不翼而飞。这让我颇为忧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办。太后总是希望自己的指令能够得到最快速的执行。

正当我努力而不露痕迹地寻找的时候，一位太监过来告诉我说，太后让我速速过去。我知道太后要问什么，却也只得硬着头皮过去，没等太后发问，我就主动先说明，卡尔小姐已经睡下了，没有来得及问她小包的事儿。等到明早她一起床，我就去问。

太后叮嘱道：“我不想让卡尔小姐知道，是我让你去了解这些事情的。要不然的话，她肯定会认为我是个疑心很重的人。那可就不好了。你要做得不知不觉，巧妙得体。你很聪慧机灵，肯定能处理好。”

不久之后，有一次我陪着卡尔小姐到宫中画像，竟然看见她就带着那只小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到了宫里的画室，卡尔小姐对我说道：“这个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你不用再摆姿势了。今天我可以先画御座，你没事的话就翻翻这本杂志，消磨一下时间吧。”

她说着，把小包递给我。我赶紧打开这神秘的小包，发现里面竟然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美国月刊，除此之外并无他物。我简单地翻阅了一下杂志，就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我要第一时间去向太后禀报这件事情。

此时，太后已经出去游湖了。我赶紧乘坐轿子追上去。到了湖边的时候，太后远远地看到了我，就命人摇着小船接我，把我送到了汽船上面。

还没有等我有机会开口，太后笑着说道：“我都已经知道啦，小包里装着一本书，卡尔小姐还拿给你看了。”真是徒劳无功的一场忙活，我心里真是失望透顶。我当然知道太监们一遇到机会，就会抢先向太后报告，可也没有想到他们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此时，太后对于自己的“先知”显得很是自得，随意问了问我，卡尔小姐有没有怀疑她在关心这个事情。这件事便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准备回到卡尔小姐那里去，太后叫住了我，对我说道：“我还要跟你交待一件事情，今后，凡是有外人进宫，你要片刻不离地跟着皇上。这样，外国人跟皇上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及时地做翻译。”

我答道：“以往无论什么时候有外国人觐见，我总是陪在身边不离左右。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和皇上有过交流

呢。”太后解释说，她之所以提起此事，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提醒我要像尊敬她那样尊重皇上。凡有来访者到来，要全身心地为皇上服务好。

我心里清楚得很，这根本不是太后真正的理由所在。其实，她主要的目标还是防范皇上与外部交流的可能，严防外国人在无形中影响皇上，与皇上讨论改良维新之类的事情。

第十五章　中秋

1

八月十五，中秋节到了。这个节日又被中国人称为“月节”。

中秋节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种久远的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花满则谢。”月亮并不总是满月，只有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是圆的。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满月刚刚从天际出现，大家就开始祭拜。中秋祭月的仪式一般是由女官领衔。其他的内容则是和端午节一个样子，太后和文武大臣太监宫女等等互相赠送礼物。

中秋节庆祝以戏园子一幕讲述月宫爱情故事的戏剧作为结尾。那幕剧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一位美丽无比的女子嫦娥住在月宫，只有一只白兔与她作伴。人们称呼那只白兔为玉兔。

那只玉兔不甘月宫寂寞，偷偷溜到凡间，化身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有一位住在太阳上的金鸡得知此事，他非常仰慕这名女子，便也偷偷降临人间，化身一位潇洒俊朗的王子。女子与王子相遇，他们相爱了。

凡间还住着一只红兔子，他知道了这一切。红兔子也同样爱慕那位女子，便也化身一位王子，追求那位女子。事与愿违，这只红兔子道行尚浅，在变成王子之后，脸上依然是红色的。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他爱情的失败。

这个时候，月宫的仙女嫦娥发现了因为自己的疏忽，玉兔溜到了凡间。她派出天兵天将前去捉拿玉兔，并把她带回了月宫。

金鸡王子失去了爱侣，没有办法，只得孤零零返回了太阳上的

家。

在戏剧上演的过程中，李莲英带着一位年轻男子走进院子，径直走到太后面前叩头。这种情况在宫中可是很罕见的，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位男子是个生面孔，我不认识他。我想着，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走廊的另一端几位女官交头接耳地叽叽咕咕，一边说一边偷笑着。过了一会儿，她们走到我面前，问我认不认识那位男子。我对她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们在宫中的时间比我长，应该比我认识的人多。”我还说道，“这个男子真的很丑。”

这天晚上，太后问起我有没有注意到那位年轻人。没等我回答，她就告诉我说，那人是一位满族重臣的儿子，父亲驾鹤西去，他继承了父亲的地位和大笔的财产。

我很想不通，为什么太后要如此详细地对我介绍一位陌生人。而且，在介绍的时候，表情一反常态地严肃，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对太后说，我觉得这个人长得不好看。

几天之后，一次我摆好姿势给卡尔小姐绘画的时候，听见太后和我母亲在房间的另一头小声嘀咕着什么。我看见太后拿着一张照片给我母亲看，问我母亲那人长得怎样。我母亲回答：“不太好看。”太后则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样东西都要好看的。”

我揣测这些事情和我有关，应该是太后要撮合我和那位男子结婚。我考虑该如何躲过这种指令式的婚姻。若是太后执意让我嫁给那个男子，我也无法违抗。经过思索，我暗下决心，若是非要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甚至是不认识的人，我宁可离开这个地方。

这天太后到寝宫午休的时候，说是要和我聊聊天。说了些闲话之后，她问起我愿意一直陪伴着她，还是愿意再度到国外生活。

我马上回答道，若蒙太后不弃，我愿意永远在身边服侍着她。若是哪天太后厌倦了我的存在，可以马上把我打发了，我一定速速离

去，并且毫无怨言。

听了这些话，太后对我说，她有意把我嫁给那位年轻人，不知道我意下如何。我对太后说，我现在完全没有嫁人的想法，父亲又生病，若是我因出嫁而离开家人，必定更让父亲伤心难舍，加重他的病情。

太后表示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不去国外，随时可以去探望父亲。

我对太后说，我现在一心只想服侍老佛爷，完全无意结婚，无论是嫁给谁。

太后说道："我可不想再听你的这些托辞了，我已经和你母亲商量过此事。她让我先问你的想法。毕竟你所受过的教育和别的女官大为不同。若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已和你母亲安排好了所有事情。"

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对太后表白，我可和别的女官不同，她们嘴上说着如何如何不愿意嫁人，心里却巴不得早点离开，甚至将嫁人视作离开这种单调日子的唯一方式。我却是真心实意的愿意永远留下来服侍太后，也从此不再做出国之想。若不是父亲被派往巴黎，我也根本不会有机会出国。

太后说道："哦，不错，我很高兴你能够出国，才能对我更加有帮助。若是你一辈子待在中国，反而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闲话。太后最后说道："好啦，我给你时间认真考虑这个事儿，你若是不中意这位年轻人，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嘛。"

这些安慰性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感觉到太后是下定了决心让我嫁人。无论如何，这一次算是躲过去了，若是下一次她再提起，那是后话了，再想办法躲过吧。

幸运的是，太后再也没有提起这桩婚事。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听

说那位男子和一位亲王的女儿定亲了，我总算放下心来，经过了一番周折，结果总算是遂了我的心意。

2

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又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满洲王朝建立的时候，顺治皇帝为顺利登基，经历了极其艰辛的战斗，才终于成功。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他带领的军队粮草断绝，人困马乏。皇帝与士兵们万般无奈，只好以树叶果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食用。

从那个时候起，八月二十六日成为一个纪念日，纪念先人的重重磨难和伟大功绩。节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每年的这个时候，满洲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拒绝奢华享受，老老实实过一天简朴节制的生活。

宫中尤其重视这个规矩，这一天里，我们不可以食用肉类，只能吃菜叶包饭。任何人都不许使用筷子，都是用手抓了送进嘴里。太后也不例外。这些规矩的目的就是永远警示后人，牢记祖先历经苦难建立王朝的丰功伟绩。

八月底，太后带人在早春的时候种植的葫芦渐渐熟了。太后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去看葫芦，看着它们一天熟似一天。太后会先挑选出那些形状最好的，也就是那些腰最细的，着人系上带子作为标志，方便最后择优采摘收藏。

有一天，太后指着其中的一只葫芦对我说道：“这只葫芦让我想起你穿洋装时候的样子。不消说，你还是穿现在的衣服更加宽松舒适。”

过了一段时间，葫芦完全长成了，被我们一一摘下。太后拿一把竹刀将葫芦一只一只刮去表皮，然后用一块湿布小心擦拭，再让这些处理过的葫芦自然风干。风干之后的葫芦外表会逐渐变成褐色。这个时候，它们便会被悬挂起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装饰品。宫里有一间独

立的房子，里面存着一万多只这样的葫芦装饰品，它们形态各异引人注目。

女官们有一项专门的职责，就是定期用软布擦拭这些葫芦，保证它们一直干净光洁。另外，我们还要像太后那样处理好新摘的葫芦，以留作宫中之用。不过，在做这些事情上，没有谁比太后更加细致用心。

有一天，我在擦拭这些葫芦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一只老葫芦的蒂碰断了。我知道，这是太后最喜欢的一只葫芦。我吓得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太后。

一位女官偷偷地劝我，干脆把这个葫芦悄悄丢掉，不要说出去。数不胜数的葫芦在这里，太后是不可能发现的。

我思来想去，彻夜难眠，最后还是决定如实告诉太后，自愿接受惩罚。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太后竟然完全没有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好啦，这只葫芦太老了，所谓的瓜熟蒂落，按照规律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的。恰好是你去擦拭它，就掉下来了，怪不得谁啊。”

我连连表示自己太过粗心，碰坏了老佛爷最喜欢的葫芦，心里总是自责难过。这件事情竟也就这么不声不响安安稳稳地过去了。

其他的女官都在侍应室里等着，急着想知道我怎样脱身。我出来之后，告诉她们事情经过。她们都说，这事儿若是发生在她们身上，少不得要挨一顿惩罚，到底是受宠的人儿，总有太后特别的照顾。

她们的话让我很不舒服。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后，她表示，我能够跟太后实话实说，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很好。她还叮嘱我事事小心时时在意，说身边嫉妒我的人可是为数不少，不要被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九月之初，菊花含苞待放。女官们每天都去修剪花枝，剪去枝条上多余的花苞，只留下一个。这样的修剪方法是为了去粗取精，独留一朵是为了让它充分开放，结出特别大的花朵。

太后也来一起做这些事情，她照顾花卉颇为讲究，倘若我们的手不够凉，她是不允许我们碰花卉的。她认为温热的手接触了花卉，会导致叶子枯萎。

菊花通常是在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相继盛开。太后有一项令人称奇的本领，她能在花朵含苞待放的时候，就知道开出来的花是什么样子。她会预测这一盆开红花。我们就在花盆里插上一根竹签，写上花儿的名称、颜色等等。她又会预测另一盆开出白花，我们同样插进竹签，同样写上说明，如此等等。

太后对我说："你头一年进宫，未免对这个事情有些想不通。但是，我却真的从未弄错过。若是不信，等到花开你就知道了。"

事实竟然真的如她所料。我们实在不明白她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她的预测从不落空。有一次，我问及太后这种预测的秘诀，她回答说，这是个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段时间，画像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有一天，太后忍不住问我，大概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按照外国的惯例，绘制这样一幅肖像，应该付给画家多少报酬。

我回答她，一般情况下要支付很多报酬给画家。太后却说，这根本不合乎中国的规矩。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乃是一种荣耀，若是给钱的话，会被对方认为是一种侮辱。

太后提出给卡尔小姐授勋，以代替赏金，这样更能让卡尔小姐感到荣幸。我不便再说什么，心里想着，等有了合适的机会我再重提此事。

3

九月份，一个俄国的马戏团来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太后听说了，就问我马戏团是怎么回事。

我详细地解释了一下，太后很有兴趣，说是想看看马戏团的表

演。我母亲提议，若是让马戏团进入颐和园，更方便观看。太后采纳了她的建议，并很快做好安排。

这一切很快准备就绪，马戏团进入了宫里，停驻在我们居住的房子旁边。我们要自己掏钱去喂饱那些动物，让它们攒足了力气表演。为了能够让太后顺利看到马戏团为何物，我们花些许钱当然在所不辞。

那些外国人花了两天时间搭建帐篷，做各种演出准备。这段时间里，太后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次报告，内容都是关于马戏团准备的进展情况。

在马戏团表演的前一天，太后早朝之后回到寝宫，面带怒容。大家都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后开始的时候忍住没说，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告诉我和母亲，今儿早朝有几位御史进谏，声称从未有马戏团进入宫中的先例，恳请太后下令取消此次安排。

太后怒不可遏，她喊道："你们看到了吧，我在这宫中总归就是这么丁点儿权力，想看一场马戏都要被人说三道四。我看啊，按照他们的说法，还是赶紧给那些马戏团的人一点钱，早早打发走了为好。"

我们当然不敢对她的想法表示任何异议，只能连连点头称是而已。

过了半晌，太后突然立起身，大声说："反正马戏团帐篷都搭好了，何不先看一场，左右不过是被他们说三道四，无论如何先看它一场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马戏表演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了。大家都看得兴高采烈。

有一个节目很特别，马戏团的一位小姑娘在大大的气球上走动跳舞。太后对这个节目特别满意，下令让她反复表演了几次。

另外，还有一个“高空秋千”也很有趣。宫中除了我们母女三人，没有谁看过马戏，太后担心表演者会从高得吓人的秋千上掉下来。

还有一个节目是“无鞍骑术表演”，太后也觉得非常精彩。

尽管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太后依然没有准许马戏团上演驯狮驯虎之类的表演。她认为那些野性十足的猛兽带进皇宫是很不安全的事情。马戏团老板只得退而求其次，带来一头温顺的幼象，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幼象表演的节目，让太后看得异乎寻常的高兴。马戏团老板自然投其所好，将这头聪明的幼象作为礼物送给太后。太后高兴地接受了。

等到马戏团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想再让幼象表演，一帮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却纹丝不动。我们无计可施，只好把幼象放到宫里，与其他的象一起养起来。

马戏团在宫中一共表演了三场。最后一场表演进行的时候，马戏团老板对我说，他非常想安排一场驯狮驯虎表演，那的确是很值得一看的节目。他表示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

我去和太后商量了一番，她总算是恩准了。不过，她也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绝对不能让那些猛兽出笼。

那些狮子老虎被带进场的时候，太监们围到了太后周围。过了一会儿，太后命太监们离开自己，她说道：“我自己并不害怕，就是担心放出它们会伤及别人。”

马戏团的表演全部结束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太后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戏团的有趣表演一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仅仅过了几天，太后再次谈到这次表演，表现出的却是明显的失望情绪。她对我们说道，本以为马戏团表演是多么的精彩绝伦，却也

不过如此而已。

这是太后的又一个性格特点，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多么持久的兴趣。

太后对我说道：“依我看来，外国人的技术未必都如何神奇。你看卡尔小姐画的这幅肖像，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画看上去凹凸不平，颇为粗糙。还有，干嘛一定要对着实物才能画呢，咱们自己的画家可不是这样，他们看一看就能画好。这样看来，卡尔小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画家。自然，我对你说的这些，你万不可对卡尔小姐说啊。”

她想了想又说：“我还要问你一句，你代替我坐在那里被画的时候，都和卡尔小姐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她说什么，不过我看得出来，她有很多话要说。你须小心在意，不要与她谈到宫里的事情，也不要教会卡尔小姐说中国话。我时常听到她问一些东西用中国话怎么说，不要教会她说那些。她知道的事儿越少越好。我注意到，卡尔小姐至今对宫里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是好事。不过，她若亲眼目睹了太监受到惩罚之类的事情，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我猜测，她会觉得我们野蛮。那一天我发怒的时候，看到你找借口让她回避了。你这样做很聪明。我脾气不好的时候，最好就是这样办，不要让她看见了。要不然，她以后出去了会议论我的不好。”

太后说：“我想那画像能够早一点画完。天气已经慢慢凉下来，我们该开箱整理冬天的衣服了，你们也都需要准备冬装了。我知道，你除了几件洋装之外，再没有别的衣服了。我的生日即在下个月，照老规矩又要举行庆典。生辰庆典之后，我们就要返回西苑。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安排卡尔小姐的生活呢？我估摸着，她大概会回到美国领事馆居住，每天画像的时候再到西苑，这样往来折腾直到画像完成。那样的话可是太麻烦了，现在往来是十分钟路程，那个时候可要半个时辰了。哪怕这个安排能够坚持下来，那么冬天的时候，她在紫禁城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啊。你速速搞清楚，她到底要多久才能完成这画像。”

我趁着这个机会，对太后说，卡尔小姐也十分迫切地想完成这项工作。然而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后只有极少的时间能够坐在那里摆姿势，而且，每天太后午休的时候，因为卡尔小姐的画室就在隔壁，所以她也要停下来。这些情况，都影响到了卡尔小姐画画的速度。

太后回答：“好啦好啦，若是她一定坚持让我整天坐在那里，我干脆放弃这件事儿得了。我看你代替我也坐得烦了，我更是早就坐得够了。”

我赶忙解释说，自己能够有幸代替太后坐在那里，我觉得是极大的荣耀，完全不会有任何厌倦之意。只是，卡尔小姐从绘画的专业角度考虑，为了最佳效果，她不希望我一直代替太后摆姿势。

太后觉得厌烦了，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消多说，你依照我吩咐的做就好。”

4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我们都在忙着挑选衣料，准备赶制冬装。同时，我们还需要赶制我和妹妹的礼服，那是即将来临的万寿庆典上必须穿的。

我们需要准备的衣服是全套的宫廷冬装，那些衣服非常华美，镶着金边的红缎子，灰鼠皮的衬里，黑貂皮的袖口及翻领，外面绣着金龙和蓝云。

太后吩咐着太监们应该如何如何去制作的时候，皇后在旁边向我招手。我快步走了过去。皇后对我耳语：“宫里的规矩，太后赏赐谁貂领衣服，那可是极大的恩典，通常只有格格才有资格穿，还不快去叩头谢恩。”

我听了，赶紧走过去，看准了机会跪下叩头，感谢太后的恩典。

太后说道：“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我委实没有理由不把你当做格格看待。在宫里，很多格格都不是皇室成员。我们可以给那些为国为

民贡献特殊的人才封衔。你比我任何御前女官都更有用，并且一直恪守规矩尽心尽责。你可能认为我不会注意到这些事儿，其实，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了。你配得上格格的身份，我也一直把你当做格格一般看待，有些地方还比格格更高些。”

她说着，转身命一位太监取来她的皮帽子。这顶帽子以黑貂皮制成，镶嵌着珍珠玉石。太后指着帽子对我说，她要赏赐给我的帽子，就大致同这顶一样，只是顶端颜色不同，太后的是黄色的，我的则为红色。太后赏赐了我这么好的东西，我感到高兴极了。

太后还赏赐了我另外几件衣服，各种长短花色均有：两件日常穿着的衣服，一件羊皮的，一件灰鼠皮的；四件质地精良、制作精巧的黑白狐皮衣，都饰以金色花边，锦缎丝带；还有一件淡粉色，绣着百蝶，另一件是浅红色，绣着绿竹叶。此外，还有几件皮制短外套和几件马甲。

我出来之后，一位女官评论说我真是很幸运，太后一下子赏赐了这么多的衣服，她进宫十年所得的赏赐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我清楚，她这是在嫉妒我了。

皇后听到了那位女官这样说，就走过来对她说道，人家进宫的时候，洋装之外就没有别的衣服，若是没有太后的赏赐，可怎么办呢？

这件小事成了我和一些女官们新一轮紧张关系的开端。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一位女官公开说出了一段不友好的话来，她说在我进宫之前，她才是太后最为宠爱的人。

我针锋相对地告诉她，她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

在场的皇后见了，对她们的不恭态度表示了不快，并说若是她们总是这样欺生，她会把来龙去脉都禀报太后。

皇后的态度非常有作用，以后那些女官们再也没有来烦过我。

第十六章　颐和园

1

时间到了九月底，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让太后颇有些百无聊赖。终于，她实在厌烦了这种日子，对大家说道："干什么偏要等到每月初一才能看戏呢？这么无趣的日子，我们索性明天便看一场。"

这么决定了，太后马上下旨让太监们做好演出准备。皇宫中的演出是不需要到外面请班子的，这里的太监们都受过专门的戏剧训练，下过苦功，并且都坚持勤练不辍，他们比宫外的戏子更加聪明。

太后交给李莲英一份戏单，上面写着她想看的戏。那些戏大都是神话故事题材。第二天，我们就安排看了其中的一出。

这一天的午后时分，太后回寝宫午休，台上的戏连着上演。我走出去的时候，在院子里遇到了皇上，他此时带着一位太监，返回自己的宫殿。我见过那位太监，他是皇上的亲信。

皇上问我准备去哪里，我回答说准备回房歇息。皇上说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见过我了。我听了心里暗笑，其实每天早朝的时候，我都会见到他，他自然也看得到我，根本没有"很久没见"这一说。

他说道："自从卡尔小姐进宫画像以来，你的时间基本被占用，我现在很少有机会和你聊天交流。没有你的帮助，我的英语怕是没有什么长进了。看起来，你很喜欢和卡尔小姐在一起，我却总是感觉那其实是件没有多大意思的事儿。这么长时间以来，卡尔小姐有没有察觉出你在留意提防着她？"

我回答说卡尔小姐应该不会有所察觉，我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

她。

皇上说道："听见一些传说，说的是卡尔小姐为太后画完像之后，还会为我画像。我很想知道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说法。"

我说道，这种传闻我还是头一次听到，真不知道是谁会这样说。我问他若真是有这样的机会，他愿意不愿意接受画像。

皇上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话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说道："愿意不愿意的，不好说啊。不过，我看到太后拍了很多的照片，连太监都拍上去了。"

我马上明白了皇上的弦外之音，就问他愿不愿意准许我用自己的柯达照相机，为他拍摄几张照片。



光绪皇帝与珍妃

皇上很惊讶，不相信似的问我："你也会照相么？若是没有不便的话，我们可以找个机会试一试，你把这事儿记在心里吧。不过，做

这样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他想了想，又说道：“嗯，我们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聊一阵子，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我，不必隐瞒和掩饰。外国人对我的普遍看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觉得我是个有骨气的人么？还有，他们认为我是个聪明的人么？”

我正准备开口，他又接着说道：“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会认为我只不过是个小孩子。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要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皇上，确有很多外国人向我问起皇帝是个怎样的人，却从未有什么人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他们知道的信息大都只是一个内容，就是皇帝龙体康健。

“若是那些外国人对我，以及对我在宫中的位置，有什么错误的印象的话，”皇上接着说道，“这也都是因为中国宫廷多少年不变的、极端保守的缘故。我已不再寄希望于自己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外面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解我，无非是视我为宫廷傀儡，有名无实的摆设罢了。我敢肯定必是如此。将来，若是有什么人在你面前问起我，希望你能如实相告，告诉他们，我在宫廷之中，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我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你应该知道，我根本无从实现，我身不由己，根本做不得主啊。太后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中国的现状，话说回来，就算有这样的力量，她也不愿意这样去做。我担心，中国离理想中的改革维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他接着说道，若是自己能够也像欧洲的君王那样，可以自由地到处去旅行、去学习，该是多好的事情啊，只可惜对他来说，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对他说，有几位格格想去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可以让她们亲眼目睹外国与中国的大不同之处，开拓视野。

这样的事情在宫廷是史无前例的。皇上听了，也对这件事情能否得到准许深表怀疑。

皇上与我聊了很长时间，话题主要是关于国外的风俗习惯。皇上表示很想去欧洲访问一番，看看那边的人如何生活。

正聊着，一位太监走过来，对我说太后醒了。我赶紧告别皇上，匆匆赶到太后的卧室去。

2

时光飞逝，很快到了十月份。开始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李莲英来问太后，她的万寿庆典是不是还如往常一样，选择在颐和园举行。

我前面曾提到过，颐和园是太后最喜欢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太后没经过什么思考，就定下了这个地方。庆典诸事准备工作即刻展开。

李莲英呈上了一份名单，列着宫中所有格格的名字和封衔，还有满洲官员妻子、女儿们的名单，请太后御览，并挑选出参加庆典的人员。

太后看过之后，从中选出了四十五个人。按照惯例，庆典举行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些人就会收到进宫出席庆典的邀请。

我一直站在太后的御座后面，她选好之后，回头对我说道："通常呢，我是不会准许这么多的人来参加万寿庆典的，这次破了例，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这些人的穿着打扮方式，还有她们对于宫廷礼仪无知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十月初六，万寿庆典开始了。卡尔小姐暂时去了北京的美国使馆小住。短时间内不用看顾她了，我们母女三人都回到了宫中。

初六这天，太监们一大早就在院子里、游廊上和树林间张灯结彩，把宫廷装点得美不胜收。七点钟左右，受邀的来宾们开始陆陆续

续进宫。见到这些人的样子和礼节表现，我对太后的评价深有同感。

主事的太监把这些来宾逐一介绍给女官们。她们都沉默寡言，腼腆羞怯。之后，那些来宾被带到了侍应室。宾客太多，侍应室内已无立足之地。我们这些女官们只得站在走廊里。

那些宾客穿戴各式各样，有的穿着考究昂贵，式样却很老套。我们认真观察了一阵子，就去向太后禀报情况。

万寿庆典这类场合，太后总是神采奕奕，非比寻常。她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太后还问我们有没有留意一位中年女士，打扮的像个新娘似的。她告诉我们，在所有来宾中，只有这位女人嫁给了汉族大臣。此次之所以邀请她来参加庆典，是因为她之前和宫里有联系。

太后还说，自己在此之前也没有见过这位女士，不过有所耳闻，知道那是一位聪慧的女人。我们却并未见到她提起的那位女士，应该是暂时没有到来。

太后很快穿戴完毕，她前呼后拥地进了大殿，在宝座坐定，所有的女官在御座后面站成一排。

李莲英领着来宾进来，一一引见给太后。那些人进殿之后，有的磕头，有的请安，还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做，但是都无一例外的诚惶诚恐。

太后对她们说了几句客套话，感谢她们所送的礼物。我想特别说一下的是，与普通人想象的相反，无论大小轻重，太后总是会对别人的赠与或者服侍，明确表示感谢，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

太后发现每位来宾在自己面前都显得局促不安，场面有些不舒畅，就适时命李总管带这些人到各自的房间去，还说宾至如归，希望大家不要拘束，随顺心意，安享这段日子。

那些人都在迟疑着，拿不定主意该走还是该留。太后就干脆对我们说道：“你们带各位宾客去见皇后吧。”我们把她们带到皇后宫里，

并一一引见。她们此时才轻松下来，不像刚才那般拘谨不安。

皇后对她们说，若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或是想知道宫廷礼节的种种讲究，可以随时询问女官们，大家会很乐意告诉她们。她又提议道，最好是一位女官照顾几位来宾，这样安排最清楚不过。十月初十晚上是正式庆典，万不可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就按照皇后的说法，每个人分配了几位宾客，负责照看与服侍她们，向她们详细讲解什么场合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去做。这样安排果然合理，而且便于操作，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很明确，与宾客联系交流起来也并行不悖。

趁着太后午休的空儿，我去拜访了自己负责照顾的那些宾客。我发现太后提到的那位“新娘”就在其中。我和她很快熟悉了，她比较容易接近，对我也颇有好感。这位女士与平常的满族女性不同，她的汉字阅读书写都很突出，明显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为宾客们讲解庆典上，什么时候要做些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这些必要的礼仪一概不能疏忽。

忘记了我是否在前文提到过，她们一直称呼太后为“老祖宗”，自称为“奴才”，而不是日常习惯的“我”。所有的满族家庭都是这样的讲究，晚辈直接以“父亲”、“母亲”等称谓称呼长辈，长辈则对晚辈直呼其名，诸如“你”、“我”这样的人称代词在人际交往中被省略了。太后尤其注重这些规矩，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一直到典礼举行的那一天，所有宾客都在悉心学习宫廷礼仪，还有就是陪着太后看戏。

我们每天早上都照常去服侍太后，并向她报告前一天的种种趣闻乐事，然后就是提前赶到戏院，齐刷刷站在院子里等待太后驾临。太后的轿子刚一出现，皇上就会告诉大家，我们循着他的号令，毕恭毕敬地跪在地上迎接。跪地的顺序是皇上在最前，皇后紧随其后，后面是嫔妃、格格和女官等等，最后是全体前来拜寿的宾客。

等到太后走过了戏台，进入对面的房子，我们才可以站立起来。

这样的仪式本来都是平淡无奇的，却出现了一个人为的有趣的小插曲。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正在院子里等候太后到来，皇上突然转过身，对大家说道："太后驾到。"我们一众人等赶紧跪在地上。

皇上却依然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笑个不停。原来太后根本没有来，他开了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开过玩笑，也从未这样高兴过。这一次，他像个孩子一样，与众人一起笑了半天。

3

十月初九晚上，女官们都一夜未合眼。第二天，我们都要早早起身。

这天早上，已经有宾客乘坐轿子到了山顶上，等候在了太后的专用大殿，等着我们大队人马的到达。宾客们凌晨三点就到了那里，我们紧随其后，到达山顶的时候，天空才刚刚微露晨曦。

过了一会儿，太后到了，万寿庆典正式开始。这次庆典与皇上的万寿庆典几乎相同，无需赘述。唯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初十这天早上，我们都要带上特别的礼物给太后：每个人一百只各种各样的鸟儿。每年太后的生辰这一天，太后都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即自己也掏钱买上一万只鸟儿，加上我们进贡的这些，全部放飞自然。

那个时候，大殿的院子里挂满了大鸟笼子，百鸟争鸣，震耳欲聋，那种奇景真是难得一见，煞是壮观。

太后选好了良辰吉时，这一次是在下午四点钟。她命太监们带上鸟笼子，所有人一路跟着自己，来到山顶。

太后先到山顶的庙里，焚香跪拜，虔诚祷告。太监们一人拿着一

只鸟笼，跪在太后身后。太后祷告完毕，一只一只鸟笼打开，放出鸟儿，静静地注视着它们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直到消失在视野尽头。

她还要祈祷上苍，保佑这些鸟儿平安，不要再被人捉住。太后此时颇为庄严肃穆，一反常态地虔诚。我们呆在后面，一边看着，一边相互嘀嘀咕咕，评论哪只鸟儿最好看，希望能留给自己云云。

几只鹦鹉被锁在架子上面，有粉色的、红色的，还有绿色的等等。太监们奉命解开锁链，鹦鹉却纹丝不动。

太后忍不住说道："真是奇怪，每年放生总有几只鹦鹉不愿意飞走，最后只好留下来养着，直到它们老死。你们都看看啊，它们总也不愿意离开呢。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李莲英过来的时候，太后告诉了他这种情况。李总管何等精明，立即跪下叩头，口中直呼："太后老佛爷洪福齐天，纵然是鸟儿，也被太后的慈悲所感化，发愿留在宫中，终生陪伴太后。"

这个仪式名为"放生"，传统观念里，认为是功德善举，放生者必能为上天记取功德，修得今生和来世的好运气。

一位女官悄悄问我，知不知道鹦鹉不肯飞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不过那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她对我说道："其实这事儿一点也不奇怪，讲出来就非常简单。太监们听从李总管的安排，很早之前买下鹦鹉，开始训练它们的习惯。每天太后午睡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鹦鹉带到山上去，让它们熟悉这里的环境。他们这么操心，不过是想取悦太后罢了。说到底也不过是在愚弄太后，让太后相信是自己的仁慈厚德感动和留住了那些鸟儿。"

这位女官接着说："最为好笑的是，每年太后放生的当儿，也早有几位太监悄悄等在山后，再次捉住那些鸟儿，拿出去卖钱。所以么，不管太后怎样虔诚祷告，鸟儿还是躲不过被捉住的命运。"

万寿庆典持续到十月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各类戏目轮番上演，宫中人人欢欣个个享乐，别的事儿一概不用操心。

十月十三日这天，庆典活动接近尾声。宾客们都做好安排，明天早上就离宫回府。这天晚上她们纷纷向太后告别，又热闹了一阵子。

随后的几天，我们依然忙得手脚不停，为太后迁至西苑做种种准备。太后自然又是翻翻那本皇历，选定了黄道吉日，定下二十二日动身。

4

二十二日的早上六点钟，宫中人马一如既往浩浩荡荡地离开颐和园，前往西苑。

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积雪很厚，道路上举步维艰。我们都坐着轿子，不抬轿的太监们则是骑马跟着轿子。

一些马匹滑倒了，为太后抬轿的一个轿夫竟也不慎失足倒地，可真是不得了，太后的轿子滑倒在地。我听到很多人吵吵嚷嚷，就急匆匆地往前赶，我当时感到心惊肉跳，一个想法在脑海里电光石火：坏了，肯定出大事了！

后面的人勒住马匹，太监们在高声喊着：“停下！停下！快停下！”我的耳朵捕捉到一句话：“快去看看，她是不是还活着！”

当时人马走的是西直门前的石板路，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情况，浩荡的队伍都停了下来，道路堵塞得严严实实。

我们一路朝前面挤过去，总算看到太后的轿子，正搁在了地上。我们赶紧下了轿子，跑上前去。很多人围在轿子远近，或惊讶，或惊恐，或手忙脚乱，或不明就里，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这种感觉不是没有原因，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私下里听到一种传说，说的是有一些革命党人意图谋

反，想方设法要除掉朝廷的人。当然，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没有谁敢告诉太后。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太后的轿子前面，顿时长舒一口气，太后安然地坐在轿子里，还在对李总管说，不要惩罚那名轿夫，他也并非有心摔倒，委实是路面太滑。

李总管说怎可如此就放过这个大胆的奴才，竟然这样不小心，几乎让老佛爷摔下轿子。他很生气地说着，转身对司刑的太监下令："赏他八十大棍。"这些太监们通常都带着竹棍子，随时准备依照吩咐惩罚犯错的人。眼下的局面，他们就派上了用场。

那个可怜的轿夫跪在脚印凌乱、泥水混合的石板路上，胆战心惊地听候发落。

司刑太监把这人架起，拖到离我们一百码远左右的地方，掀翻过去，竹棍子一五一十地抡下去，打得有数有序又节奏感分明。

很快地，八十棍子打完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个挨打的家伙竟然安然无恙地站立起来，走回原地，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太监端来了一杯茶，我接过呈给太后，关切地问她有没有受伤。太后笑着对我说："没事儿，一切安好。"

为什么半路上还会有热茶？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每次离宫外出的时候，太监们都备着小火炉和热水，可以随时奉上香茶。不过是一般不用而已。太后喝完了茶，命人马继续前行。

一如往常，女官们都抄近路，赶在前面到了颐和园，以迎接太后的到来。我们在院子里等了很久，几乎要冻僵了。太后终于到了，我们跪下等她的轿子过去，才站起身陪着她进宫。

太后也抱怨说，这个天气真是太冷，速速把火炉拿进来用着。她说的这种火炉是黄铜材质，内壁贴上厚厚的黏土，非常轻便可以随身

携带。一般使用的时候，通常是先在屋子外面燃起，等到烟味散尽，再送到屋子里。

这次太监们拿来了四只火炉，摆放完毕。我们关上了所有门窗，为的是祛寒保暖。

然而，我很快就感觉强烈的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我不敢说出来，只能克制着这种感觉，尽力保持清醒，还要忙着整理太后东西。最后，我晕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这是一张陌生的床。我一个激灵翻身坐起，连声问身边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片刻之后，我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太后那熟悉的声音，才终于放下心来。

一位女官送来一杯萝卜汁，说是太后吩咐送来的，让我喝下。我喝下了萝卜汁，觉得好了很多。女官看着我喝下去，告诉我说，太后已经歇下了。我安下心来，重又沉沉睡去。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看到太后正站在床边看着我。我很是惶恐，忙着要起身请安，却是动弹不得。我此刻实在太虚弱了，胸闷气短，浑身无力。

太后嘱咐我安心躺着，好好休息，很快会恢复精神。她还说，最好我能够到她旁边的房间去休息，说着就吩咐太监速速准备好房间，把我挪过去。

我搬过去之后，片刻不得休息，每隔几分钟，太后就会派人来询问我感觉如何，想吃些什么东西。若是按照宫里的规矩，每逢有人带来太后的口谕，接受的人都必须肃立。这样子，我每隔几分钟，就要竭力站起，以接受太后的关怀。可我真是太虚弱了，这样子反反复复站立、躺下、躺下、站立，周而复始，我不但没能休息好，反倒加重了病情。

天快黑的时候，李总管过来看我，还带来了几碟子蜜饯。他很是和善，对我说道，你真是幸运，太后很少对哪位女官如此上心，足见

她非常宠爱你。

李总管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劝我多少吃一些蜜饯。我现在对什么东西都没有食欲，就让他把东西留在这里，等我感觉好点儿会吃一些的。他临走的时候，让我好好休息，并说若是我需要什么，尽管着人告诉他。

我很是惊讶，李总管竟能亲自来看望我，他平日里可是对我们极少在意。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李总管破天荒地对一位女官这样关切，不过是因为太后宠爱我的缘故。

第二天早晨，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起身并且正常做我的事情了。我去向太后叩头谢恩，感谢她在我生病时赐予的关照。

太后说道，前一天晚上，李总管对她禀告了我的身体状况，她已知道我好多了。她很高兴地看到我恢复得这么快，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已能起身行动自如。她说我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只是不习惯那铜炉中的煤气而已。

大雪总算停下来了。太后决定第二天的时候，在宫里选出一个房间，为卡尔小姐继续画像工作之用。我建议太后说，倒不如等到卡尔小姐到来之后，自己去选择一处地方，毕竟她对画像需要的环境最为了解。

太后则说，绝对不可以任着卡尔小姐选地方，说不准她会选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我们又不好拒绝，那可就为难了。

我事后想想，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宫里有许多地方较为秘密，是不能为外人涉足的。当然更不能为卡尔小姐这位外国人所知。

第二天，我陪着太后去寻找合适的房子。我们看过不少地方，都觉得不合适，总是光线太暗，不适合绘画。

终于，我们选定了湖畔的一处房子。太后觉得很满意：“这里位置很好，很方便，你们来来去去既可以乘轿子，也可以乘船，不会在

路上耽误时间。”

我后来注意到，从这个新画室到宫门口，若是乘轿子，起码要四十五分钟，比坐船要快。我本希望可以像往常一样，能够回宫去服侍太后，却发现不可以了。卡尔小姐住在美国使馆，太后又不能允许她每天独自来去。

出于这样的原因，太后最后做了个折中的决定，她让我住到我父亲那里去，每天早晨带着卡尔小姐进宫，晚上陪着她出宫。这种安排让我心里不情愿，却又不能违抗太后的旨意，也只得这样执行。

第二天，卡尔小姐进了宫。她并不满意我们选定的画室，她说这里太暗。太后就命太监们把纸窗户换成玻璃窗，结果屋子里又显得太亮了，明晃晃的刺眼。卡尔小姐要求挂上窗帘，以便调整光线角度集中到画布上来。

我把卡尔小姐的要求转告了太后。太后说道：“嗯，这还是我头一次为了别人改动宫里的陈设呢，先是改窗子，改好了，她不满意，又要挂窗帘。我看干脆一下子把屋顶掀掉，她总该心满意足了吧？”

最后，我们还是挂上了窗帘。卡尔小姐总算满意了。

有一天，太后去看画像的进度，她认真看了那幅半成品，对我说道：“为了画这个劳什子，我们受了不少麻烦，我实在还是看不出它哪里特别。我披肩上的珍珠都被画成了不同的颜色，有白色，有粉红的，还有绿色的。你代我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对太后解释说，卡尔小姐画像的时候，是按照她自己的视角和视觉印象，画出这些东西的。太后完全不懂这些，她反问我，难道你看到的珍珠是绿色或者是粉红的？

我再次认真解释，力图简单明了可以理解，这些色彩效果都是因为光线照在珠子上面，映照之后的效果。太后则回答说，她只看到了白色，别的一概没有看到。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太后就忘记了计较这些事儿。

5

西苑里面挨着太后的寝宫有一个屋子，内部安放着一尊宝塔。这座宝塔以檀香木雕刻而成，大约十英尺高，里面供奉着各种各样的小佛像。

太后每天早上都会定时过来祭拜这尊宝塔。祭拜的仪式很讲究，太后对着佛像焚香叩头，再命十位女官也对着叩头。

太后告诉我，这座宝塔年代久远，已经在宫中供奉了一百多年。宝塔内群佛中，有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像，大约五英寸高，纯金制就，中间是空的，以珍珠翡翠制成她的五脏六腑。

观世音菩萨被认为是法力无边的神灵。太后每当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总要到观音像前焚香膜拜，恳求化解。据说，观世音菩萨大部分时候都能够有求必应。

太后对我说道："我每次祭拜祈祷，总是无比虔诚，哪里会像你们这帮子小姑娘，随随便便磕个头，敷衍了事，结束了马上就跑开。"

太后又接着说道，其实她心里明明白白的，现在不少的中国人，把祖宗的宗教丢在了一边，不再放在心上，而去走些歪门邪道，去信仰什么基督教，真是令人痛心不已啊。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太后对于那些和西苑有关的古老的中国式迷信，也是无一例外地深信不疑。一次聊天时，太后举例子对我说，若是一个人在你身边走着，然后突然间不见了踪影，这完全不必惊讶。这种现象只是狐狸在作怪而已，它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化作人形，混迹于人群去做些什么事情。

太后说，狐狸们已在西苑居住了几千年，修炼得道，法力无穷，这样如意变幻实在是司空见惯，大家看到了完全不必惊奇和恐慌。太

监们会认为这些动物是妖魔鬼怪，其实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它们是狐仙，绝对不会伤害普通人。

好像是为了证明我刚刚听到的这些迷信说法，在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我的火炉熄灭了，我吩咐一位太监去看看，还有没有哪位女官没有睡下，去找些热水给我。

太监提着灯笼走了出去，片刻工夫就跑了回来，脸色苍白如戏子敷粉。

我问他何事如此惊慌，他回答道："我看到一个鬼，女鬼！她走到我的面前，噗地吹灭了灯笼，就立即消失了。"

我说没准儿是宫里的丫鬟呢，可是太监说："不是。"他说宫里的丫鬟他都是认识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个，他惊慌失措，坚持说遇到的是鬼。

我对他说，太后说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鬼，也许是狐仙化成了人形而已。他回答说："不是狐狸，太后之所以称呼她们是狐狸，是因为她不敢称呼为鬼。"

紧接着，看我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这位太监环顾了一下左右之后，给我讲了一件事情：

几年前，李莲英总管在太后宫殿后面的院子里散步，蓦地看到一个小丫鬟坐在井沿上。这原本算不上什么，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很可怕了。他上前去，想问她为何一个人坐在这里。靠近之后，李总管发现竟然还有几个丫鬟也坐在那里。李总管正想上前仔细询问，那些丫鬟却都慢悠悠地、一个接着一个跳到井里去了。

这时候李总管吓得大叫起来，一个随从壮了胆子，提着灯笼走过去，却只看到了井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压根儿不可能有什么人跳下去，更没有什么人。

我的这位太监解释说，很多年之前，有几位丫鬟寻了短见，正是

在这里投井而死。李莲英所见到的女孩子们，正是这些自杀者的鬼魂。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若一个人寻了短见，魂魄会徘徊在附近，直到引诱另一个人也在这里寻死，自己方可投胎转世。

我对他说，我才不相信这些事儿，除非亲眼看到。他说道：“亲眼见到？还是不要见到为好，你若是见了一次，可就足够了。”

时间如流水，日月寻常过，十一月初一这一天，太后下旨说，本月忌辰集中，平日里的戏剧一律停止，宫中每个人的衣装打扮都要依照场合所需，随时更改。

十一月初九，皇上按例去天坛祭祀。在初九的前三天，他就必须待在寝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贴身的太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见到他，连皇后也不例外，这是宫廷祭祀的规矩。

这次祭祀和以往的仪式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就是多屠宰了几头猪，摆放在祭坛上一段时间。等到祭祀完毕，这些猪肉会被分给朝廷大小官员食用。大家都认为，得到这些赏赐，是享受到了太后圣恩，吃了这些猪肉，就是受了莫大的祝福，将会得到好运。

还有一个与其他祭祀活动不同的地方，就是整个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皇上亲自主持，他人不得代替。这个讲究的原因是这样的，按照祖宗的律法规定，任何一个被判处了死刑的人，最后都是由皇上亲笔签署判决书，等到行刑结束，状纸都会一律交给刑部保管。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会被抄写在黄表纸上，呈送给皇帝。皇上祭天的时候焚烧这些黄表纸，让纸灰上达天庭。皇室的列祖列宗看了这份名册，就会知道，皇上依然保持着恪尽职守、治国威严的本分，从不曾懈怠。

这一次祭祀活动在紫禁城举行。慈禧太后非常讨厌那里，可还是不得不下令让全宫人马悉数前往紫禁城。太后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安

排，是因为自己实在很依恋皇上，不肯离开皇上哪怕是短短的一个小时。

天坛祭祀活动结束了，人马依然待在紫禁城，因为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的忌辰，仍要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

康熙皇帝统治中国长达六十一年，是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太后告诉我们，康熙皇帝是中国最圣明的皇帝。她嘱咐我们务必虔敬地对待他的祭日，以示对先帝的敬意。

第十七章　大殿

1

十一月十四日早朝之后，太后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们，俄国和日本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虽然日俄是否发生战争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看得出来，太后依然为此深感忧虑。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太后的忧虑倒也不无道理，若是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地盘上开战，那么中国也难免要跟着遭殃。

太后刚说到这事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平静的日子。然而，突如其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早上，李总管来向太后禀报说，有五十位太监不见了。

这样子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发生，事先也完全没有任何预兆，所以就显得大为蹊跷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通常太监们只要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出城办事，只要在宫门关闭前返回即可。那么此次太监们不告而别，毫无疑问是偷偷溜掉了。

翌日早上，李总管再次来报告说，又有一百多位太监跑掉了。太后听了，马上说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消说，那些太监听说了我对日俄战争的猜测，担心又像拳乱那样凶险，就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依照往常的习惯，若是有太监私自逃出宫去，宫里必定要派出专门人马追赶，将其抓回来重重责罚。这一次，太后却破天荒地下了谕旨，明令不必捉拿那些太监。

有一天早上，太后随身的一位太监也跑掉了，这让太后暴跳如雷。她对我们说自己平日里对这位太监不薄，真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报答自己，战争还全无迹象，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个无影无踪。

我知道确实如太后自己所说，她平日里对那位太监很好。不过，我对那人的逃走却无动于衷，因为我知道那位太监也不是良善之辈，总会利用一切机会对一些女官不利。

那段时间里，太监逃走的事情时有发生。终于有一天，太后下旨，为确保安全，所有人都留在紫禁城，等到明年春天再返回。

我向随身太监打听太监们相继失踪的原因，他告诉我说，其实事实正像太后所猜测的那样，这些太监害怕又会发生拳乱那样的灾难，趁着脑袋还在肩上，赶紧提前逃命去也。

他又说起，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逃走了，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甚至连李莲英大总管这种身份的人物，也并非完全靠得住。在拳乱那年，太后离京西狩，精明的李总管就曾经装病，没有跟着一起出发，而是选择了先观察形势，再随后跟上。他这招很狡猾，给自己留好了后路，若是事情不妙，随时可以溜之大吉。

说到了李莲英，这位太监更加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总管可是欠下了不少的人命债，很多无辜的人尤其是太监，都死在了他的手里。在皇宫之内，李总管的权力大得惊人，若是什么人冒犯了他，或者让他厌恶的话，李总管可以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

这位太监还告诉我说，众所周知，宫里严格禁止吸食鸦片，李莲英却是吸食鸦片成瘾的人之一，且沉溺其中很久了。一直以来，没有什么人活得不耐烦了，敢去告发他，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秘密，太后更是完全不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有关于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传进宫里，大家当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后来有一天，太后把宫中人都召集到一个很特别的小殿里，说道：“大家不必惶惶不可终日，哪怕是俄日战争真的爆发，也和咱们没什么关系，大家可放下心来，定下神免受外界干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大清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都在看着咱们哪，我不希望再听到

这类闲话或是流言，扰乱了大家的心。”

在大场面上，太后这样底气十足地宣称，而在后面的时间里，她把宫中女官都召集到自己的寝宫去，命大家与她一道，向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虔诚祷告，祈求庇佑。她这样做很清楚地表明，她其实和大家一个样子，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深深忧虑、惶恐不安。

太后不希望别人提起这些事情，自己却忍不住时常提起。有一次她对我们说，希望能够每天都得到关于战事的确切消息。

我对太后说，这个不难做到，我们可以从国外的报纸或者是路透社的电讯中得到这些消息。

太后听我这样说，仿佛在阴暗的屋子里打开了一扇天窗，倍感兴奋。她让我马上以父亲的名义订阅这些报纸，每天及时送到我的家里，由我带到宫中来。我对她说，我所提到的这些报纸，我父亲都已经订阅了，只要安排人送到宫里即可。

就这样，每天上早朝的时候，我把报纸上所有关于战事的信息，都翻译成中文报告给太后。可是，我面临的情况是，信息一日多变，如雪片般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若是都及时翻译出来写在纸上，再呈送给太后，实在是来不及，我为此手忙脚乱。

我向太后建议说，最好让我一边读一边翻译给她听。太后允诺了，这样效率提高了很多。

太后越听越觉得有趣，越听越有兴趣听。她让我不要单单翻译那些战事消息，要把其他奇闻异事外国风俗花边新闻等，凡是有趣的消息，都逐一翻译给她听。

在众多类型的新闻中，太后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欧洲皇室成员的活动新闻，或者是相关的信息等等。太后通过我的阅读，知道了在欧洲国家，皇室成员的活动竟然可以成为面向公众的新闻，她对此异常惊讶：“这些皇族的事儿，在咱们大清，可始终都是机密呀。别说是那些宫外的人，就算是咱们宫里的人，也未必尽知啊。不过呢，真

要是让黎民百姓知道得多一些，或许也是好事，大概可以让一些有关宫廷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我们驻留紫禁城的那段时间里，卡尔小姐每天早起晚睡地继续画像工作。我们为她另外选择了一处房间，比原来的更好，更加适合她居住。

太后吩咐我们尽可能地为卡尔小姐的工作提供方便。她对画像一事却感到厌烦，盼望着越早结束越好。太后很少亲自到画像的地方去，无论是去看看还是去摆造型，可是只要到了那里，她就会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让人觉得来画像，简直可算是她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了。

2

十一月份的时间过得缓慢而悠长，几乎整整一个月宫中都是在悼念亡灵。有一天，太后也忍不住要改变一下惯常的生活方式，她提议在紫禁城里四处逛逛。

我们先到了大殿，这里的大殿和颐和园的略有不同。若要进入大殿，须先登上二十来级石阶，石阶为白色大理石材质，两侧各设白色大理石护栏。在长长石阶的尽头，有一条宽敞的走廊，以巨大的圆木柱子作为支撑，柱子无一例外地砌成大红色，环绕大殿周围尽显威严。走廊的窗户上，都精巧地雕刻着“寿”字等各种图案。

我们进入了大殿，看到地面以砖块铺就。太后告诉我，这些砖块都是黄金做成的，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认真看了看，大概如太后所说，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这些砖块都显示出一种很特别的黑颜色，肯定是专门漆过的。此外，我还感觉到砖块都滑腻腻的很不好走。

大殿里的陈设和颐和园、西苑里的大殿差不多，有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御座，均以黑色橡木制作而成，镶嵌着各色玉石，看上去也很惹眼。

据说，这座大殿一般不用，只在极少的重大场合可用，比如，太后万寿庆典或者是元旦庆典之类。这里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平时若召见外国人，都是在紫禁城里一个较小的宫殿进行。

出了大殿，我们又去参观了皇帝的寝宫。皇上的寝宫与太后的寝宫相比要小很多，却也布置精良极尽奢华。这里共有三十二间屋子，每一间都很华美，很多房间从来没有使用过。

这处寝宫后面是皇后的寝宫，规模更小一些，一共包含二十四间屋子。这里面有三间屋子，专门供瑾妃使用。

皇上与皇后的寝宫地理距离很近，但是走起来路程却是很远——没有任何通道相连，进出都必须得经过太后寝宫的走廊，绕上一个大弯子。

大院子里还有几间屋子做宾客接待室之用。还有一间屋子从来没有使用过，它经年累月大门紧锁，没人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或者，究竟有没有东西，也是个谜。

太后本人在宫中多年，也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闲置的屋子。这些屋子几乎为众人所遗忘，和其他的建筑物区别明显，如老人一般满面尘灰烟火色，甚至连通往这些地方的入口也早被封掉，冰冷凄清，人迹罕至。

有人偷偷叮嘱我们，万万不可提起或者谈论关于这些房子的任何事情。否则，可能会惹来麻烦。

女官们的住所与太后的寝宫连接于一处，狭窄逼仄，仅可容身，冬冷夏热，条件艰苦。仆人们的房间在女官房间的后面，没有专门的出入通道，他们进出都要经过我们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则有唯一的出入口，出入必经太后的走廊。

在房屋的设置上，太后着实用心良苦，如此这般房房相连户户相通，每个人进出都尽收眼底，谁都逃不过太后的眼睛。

走着走着，到了太后的寝宫。太后说道：“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保准儿你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跟着太后走入她卧室隔壁的那间屋子，卧室与那屋子之间有条狭长的过道相通。过道大约十五英尺长，墙面精饰彩漆，有很漂亮的各类镂空格局和装饰图案。

太后对一位随身太监低声说了两句，太监得令，弯下身，轻车熟路地从过道的两头，各移走了两块木塞子，露出了墙角的洞。他开始滑动起来，墙面竟然缓缓地移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墙体，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是两扇滑动的厚木板。太监把木板移开，一个隐秘的洞穴出现了。我们走进去，看见洞穴没有设置平常的窗子，只在屋顶有个天窗。室内的一头有一块大石头，铺着黄缎垫子，充当座位之用。石头座位的旁边放着一只香炉，其余再没有任何物品。

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显得很陈旧。穴室的尽头连着另一个过道，也设置了滑动镶板，有一个地穴，又连到另一个穴室，如此等等。

那么，这里的奇特布置就很明朗了，所有的宫墙都被这些秘密过道分割开来，每个过道中，都隐藏着这样一个密室。我深感惊讶。

太后告诉我们，明朝的时候，这些秘密所在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最主要的功能，则是皇帝静坐独处所用。

现在，这里的一间被太后用作珍藏宝贝之用。庚子年拳乱爆发的时候，太后在西狩之前，就曾将所有贵重物品藏于此处。等到一切平静下来，她们返回宫廷，打开此处的密室，发现所有东西都完好无缺。太后说道，那些在宫里肆意掳掠的蛮子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

我们看完了这个地方，回到走廊去，再回头看看刚才的密室所在，俨然唯有黑色石墙而已，当真是神妙的隐藏设计。

太后之所以不喜欢紫禁城，主要的原因便是这里包含了太多的隐秘，她自己都不完全清楚。她对我们说："我从来不和别人谈起这些所在，要不然人们就会议论纷纷，猜测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在紫禁城的宫里，我还遇见了同治皇帝的三个妃子。同治皇帝为太后的亲生儿子，他驾崩之后，三个妃子就一直在紫禁城深居简出，几乎寸步不离住所，靠做针线活之类的闲事儿打发日子。

刚刚见到这些妃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其中有一个叫作瑜妃的，最为聪慧过人，会作诗，会演奏很多种乐器。这种个人素质，可以被归入中国女性群体中最出色的那一类。

我们交流的时候，瑜妃对于西方各国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也让我颇感惊讶，每样事情她好像都略知一二。

我曾询问为何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她们，她们告诉我说，除非有太后的口谕叫她们过去，她们是不会主动去拜见太后的。当然了，若是太后住进了紫禁城，她们自然也得按照规矩，每天定时向太后请安。

某一天，我有幸受邀参观她们的寝宫。她们的寝宫是独立的，与紫禁城内的其他建筑完全隔绝开来。那是一幢较小的建筑，装饰朴素，陈设简单，没有排场，仅有几位太监和丫鬟伺候她们。

妃子们对我说，她们宁可安安稳稳地过这种简单的生活。她们从未接待过任何来客，也没有别的人会闲着无事到这儿来。

瑜妃的房里装满了各种书籍。她给我看了自己写的几首诗，透过那些意蕴悠长的诗作，能够看出她内心的所思所想和幽怨烦闷之情。

她还有个特殊的想法，就是能够建立专门的学校，让年轻的女子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她注意到，大多数女子甚至连基本的汉字读写能力都不具备。

瑜妃建议我有机会也向太后提及此事。不过有一点，尽管她希望看到西方的改良思想能够介绍到中国，却不赞成雇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师。在她的观念中，外国传教士总会假公济私，拿别的课题的经费来做他们传教的事。她担心倘若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反而会适得其反，令中国人更加反对革新运动和改良思想。

3

十一月底的时候，慈禧太后恩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觐见的请求。那天，恰好是个假日，卡尔小姐也休息了，没有到宫里来画像。因此，我有机会参加了这次会见。

太后询问袁世凯对于日俄争端的看法。袁世凯回答，虽然日本和俄国之间产生了争端，不过太后毋需多虑，按照目前的局势来分析，中国应该不会卷入其中。然而遗憾的是，战事一旦到来，满洲因地域情况，则未必能躲过灾难。

太后表示，她当然也清楚这一点，若是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地界上打起来，中国最好还是保持绝对的中立，事不关己方为上策。还有，最好现在就颁布诏书，表明中国决不干涉这等纷争，也省了让别人抓住什么把柄，白白让中国陷入无谓的战争中去。想当年那甲午年的中日之战，早已让自己身心疲惫，往事不堪回首，万不可重蹈覆辙。

太后接着问袁世凯对于战事胜负有何看法。袁世凯说，两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个胜负的结果倒是很难预料。不过，自己心里倒也觉得，日本的胜算更大一些。



袁世凯

太后觉得，若是日本果真胜了俄国，那可简单了很多，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需要去操心劳神了。但是，太后也知道，俄国地大物博，兵力充沛，战事结果到底如何，掀起战争的两国都没有根底，局外人着实也无法预料。

他们继续聊着，太后又提起中国面临的形势太过严峻。万一中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别国的战争，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咱们没有任何的准备，没有海军，没有训练有素的陆军，匆促上阵的话，连明哲保身都是大难题。

袁世凯向太后保证，眼下的局势刚才已经分析过了，中国尚无牵连其中的可能，太后大可放宽了心。至于以后何去何从，自可酌情对待。

太后说道，反正无论如何，现在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咱们大清朝是时候警醒过来，想方设法来自立自强，在世界上重树自己大国强国的形象了。她做如是想，然而对于究竟该如何去做，又完全没有概念。太后倒也是常常收到这样那样改良革新的建议，却依然没有见到任何改变强盛的迹象。

袁世凯的朝觐结束之后，太后很快就安排召见了军机大臣。她向众位大臣介绍了和袁世凯的会谈内容，大臣们当然不甘默默无闻，纷纷表示大清朝必须振奋精神，攘外安内，力展宏图，做出一番光耀乾坤的大事业，不再忍受外国的欺凌。

随即，根据太后的意思，一个和对外防范有关的议题被放上桌面，大家七嘴八舌展开讨论。一位亲王表示，他本人很赞同维新变革，却坚决反对学习外国的装束风格、外国的生活方式和剪辫子的做法，祖宗的制度还是必须严格遵守。

太后深表赞同，她说若要把中国的文明规矩都盲目改变成外国不文明的那一套，那可是得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荒谬做法。

一如往常，一番热火朝天的讨论之后，会议结束了，众人纷纷散

去，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因为太后开始定下了基调，大家每天的讨论的话题，除了日俄战事之外，干脆就没有别的了。

太后召见了军队的一些将领，同样探讨这些话题。这样的会见场合很少见，也很有意思。那些人身居行伍，对宫里的繁冗规矩很是不习惯，在太后面前行礼请安，都显得笨手笨脚。

另外，这些将领也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建议。一次召见的时候，太后说现在海军无能，缺少训练有素、有勇有谋的海军将领。一位将领答道，这似乎无须多虑，中国的人数超过任何别的国家，另外，我们拥有渔船商船无数，真要爆发战争，都派出去迎战，力量也不容小觑。

太后颇不耐烦，斥令他速速退下，并说："一点儿没错，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只可惜，这很多的人中，大多都是你这样扶不起的阿斗，对国家没有半分价值。"

那人手足无措地退了下去，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太后喝止了我们，并说她觉得这完全不好笑。这样的庸才竟然能在军队中取得这样的高位，她简直是怒不可遏。大家的笑声戛然而止。

一位女官悄悄问我，为何太后听那人说起渔船抗敌的建议，会那般生气。我告诉她说，若论对抗军舰，那些渔船不但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反而会带来诸多害处。她听了感到非常惊讶。

大概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太后召见了他，对他说道："如今，你身为朝廷老臣，我希望你能针对日俄战事的情况、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类话题，说一说你的想法，不要有什么偏见，更不要有什么顾忌，尽管把任何可能存在的结果都说出来，我们正要为那些结果做出充分的准备。"

张之洞回答太后，在他看来，无论这日俄战争的结果谁胜谁负，中国都可能要在外国武力的胁迫之下，做出无奈的让步，被迫开放满

洲通商，与外国贸易往来。

太后又向他谈起前几次召见和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情况，张之洞认为，若要施行改革维新，达到预期的效果，道路很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若是因为今日之形势仓促维新，必然不得要领导致失败。



张之洞

张之洞建议太后，虽有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古训，然纵观今日之中国，维新变法尚需从长计议最为妥当，待到中国之前景明晰，中国之形势稳定，再做决定为好。他认为，维新变革若是趋于极端，必非明智之举，定有贻笑天下之危险。

他接着说道，大概在十年或是十五年之前，他自己也曾经极力反对维新变革之法。然而现在时局纷乱，天下形势已大为不同，时过境迁，思想也需有所改变为好。依照当下局面，革故鼎新，富国强兵，确已为必然之趋势。

张之洞又说：“即使要变革维新，对于祖宗之成法规矩，则是万万不可以废除或者更改，依老臣之意，我们可以选用外国那些比我们先进，又有利于我们运用的进步文化。”

太后对这次会见非常满意，张之洞的主张与她的不谋而合，她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感觉。

每次召见的场合，皇上都无一例外会出席，一直坐在那里听着，却也无一例外地缄口不言。一般情况下，大家谈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太后就会询问皇帝的看法，他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完全赞同太后所说的和所做的决定。

时间依然过得飞快，转眼到了“腊八节”。说起来，在中国所有和佛教有关的宗教庆典里面，“腊八节”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顾名思义，“腊八节”时间在每年的腊月初八日。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在很多个世纪之前，腊月初八这一天，佛祖如来外出化缘，到了一处地方，有人施舍了他一些很好的米和豆子。如来回到寺庙，把这些东西均匀分给了自己的师兄弟们，尽显他天下皆知的大慈悲、大悲悯。

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腊月初八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节日。腊八节的含义是：一个坚持恪守真心，躬于反省，积累无量功德的人，会在这一天里，得到如来佛祖的恩赐。

腊八节这一天，大家都会吃一样食物，就是把稻米、谷子、豆子之类的粮食混在一起熬成粥，不放盐和其他的调味品。那种味道当然可以想象了，索然寡味。

第十八章　过年

1

时光依旧匆匆如白驹过隙，到了彻彻底底地打扫宫殿、准备过大年的时候了。宫中无论大小简繁，每样东西都必须取出来，一件一件地彻底检查。所有的照片、图画、家具和其他这一类的物事，都必须擦个一干二净。

太后又拿出了她的皇历，认认真真地翻了一番，就是为了选择黄道吉日，开始做这项重大的清洁打扫工作。她最终选定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日子，即十二日这一天。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命令，被要求十二日这天早上开始打扫。几位女官被安排去擦拭那些佛像，并为佛像换上新的帷幔。别的粗重些的打扫由太监们去完成。

我问太后，要不要去将她的玉石珠宝都整理擦拭一番。太后回答说不需要，那些珠宝只有她自己戴过，都很干净。大家一番忙碌之后，太后对打扫的结果表示满意，这事儿才算完成了。

太后准备了一份单子，上面列着一些人的名单。那是她准备邀请一起参加除岁庆典的人。这个庆典在每年的最后一天举行，与欧洲一些国家每年最后一天夜半时分的仪式差不多，都是表达辞旧迎新的意思。那些宾客们提前两周就收到了宫廷的邀请，这样他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好准备。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太后吩咐为女官们定制冬装。这批冬装与我们正穿着的略有不同，我们现在穿着的是灰鼠皮的，这次做的则是银狐皮的。

还有一项讲究，除岁庆典举行的时候，要在众位菩萨和列祖列宗的神位前，摆上供奉用的年糕。于是，紧接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作这些年糕。

按照惯例，第一块年糕应该由太后亲自制作。为此宫里专门准备了一个大房间，宫中的人大都进入此间，屏气凝神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太监们准备好了米粉、糖、发酵粉等材料，把这些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拿到锅里蒸熟，结果就会膨胀开来，很像西方制作的面包。人们都有这样的观念：谁蒸出的年糕膨胀得越高，谁就会最得菩萨的青睐，得到最好的运气。

太后制作的第一块年糕效果很好，我们纷纷向她道贺。太后自己也甚是满意甚是自得。

女官们也每人制作了一块，做出来的糕点样子却很糟糕，没有哪一个能够达到太后的那个水准。我第一次制作糕点，还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女官也没有一位做的好的呢？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我从一位女官那里知道了原因所在。她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可是故意这样做的啊，无非是为了让太后开心罢了。其实，哪怕不能比她好，我起码也能够做的一样好。不过，若是我真那样做，可就是自讨没趣了。"我们都做完了，剩下的太监们去做。他们不需要参与比较，个个都做得很好。

然后就是准备小碟的椰枣和各式各样的水果，以常青花木枝条精心装饰，供奉于佛像与列祖列宗神位之前。

我们又准备好盛放了糖果的玻璃碗碟，做祭祀灶王爷之用。根据民间传说，在腊月二十三日的时候，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即前往天庭，向玉皇大帝完完整整地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我们这些凡人做过的所有事情。到了除夕的时候，灶王爷重返人间。我们向灶王爷供奉这些糖果，为的就是粘住灶王爷的嘴巴，防止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

得太多。

这些糖果准备完毕，我们都来到御膳房，把碗碟都摆放在专门设置的祭台之上。太后转过身来，对在身后垂手而立的御膳房总管说道：“这阵儿，你们最好都留点神哪，灶王爷待会可就要上天报告去了。你们一年之中，偷了多少东西，可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灶王爷报告之后，你们等着受罚吧。”

第二天，还有一项仪式要举行：太后为宫中之人和宾客们书写新年祝词。一大早，我们就陪着太后到了大殿。太监们早铺设好了大张大张的黄色、红色、浅绿色的纸张。太后开始泼墨挥毫，写了无非都是些“福”字、“寿”字。



慈禧太后题写的“寿”字



慈禧太后题写的草书“寿”字

写了一阵子，太后感到有些疲倦，就吩咐女官或者秉笔太监代为书写。写完之后分发给宾客与宫中大小官员。无论是谁，能够得到太后御笔亲题的字，都视为莫大的荣耀，莫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上述这些事情，都要在过年之前的几天完成。

太后收到了各地官员进贡的无数新年礼物。她一件件看过去，入得了眼睛的就留在身边用用，看不上的就放到库房去，很快抛在脑后，可能从此之后再不会看上一眼。

各地进贡的礼物琳琅满目、种类繁多，难以尽述，包括小件家具、古玩、珠宝、丝绸等等，甚至还有衣服。直隶总督袁世凯就进贡了一件黄缎袍，以颜色各异的珍珠玉石，制成很多牡丹花的图案，以翡翠做成花叶。

这真是一件极为华贵的礼物，价值连城。但是这件衣服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分量沉重，穿在身上沉坠坠的会很不舒服。

太后见了这件衣服之后，非常高兴，很快就穿在了身上。然而，她很快又换掉了这件衣服，一直束之高阁，再无动静。

那么漂亮华贵的衣服就这样摆放起来，我觉得可惜，时常会建议太后穿起来。有一次，太后准备接见外国使节，我再次建议她穿上，她没有采纳也并不说明为什么。那件衣服我们再没有见到过，宫外的人则是更加没有瞻仰的机会了。

还有一件礼物引人注目，就是两广总督进贡的四袋子珍珠，每袋子起码有几千颗。每一颗珍珠都是精挑细选，形状与色泽均无可挑剔。这些珍珠若是拿到了欧美的市场上销售，价格一定会令人咋舌。可太后的宝贝尤其是珍珠之类堆积如山，哪里会在意这些呢，她只是随便看了看，礼节性地说了一句：“很好。”也就作罢了。

过年的时候，皇后和女官们也都向太后进贡礼物。大部分的礼物都是她们手工精心制作的，例如，鞋子、手帕、围脖、手袋等等。我的母亲、妹妹和我进贡的是镜子、香水、肥皂和化妆品，这些都是我们从巴黎带回来的。我们赠送的礼物太后看上去很是喜欢，她很在意这些满足虚荣心的新奇玩意儿。太监和丫头们进贡的礼物，则是一些精美的糕饼点心之类。那些进贡给太后的礼物多得惊人，然而没有她

的吩咐，谁也不敢动上一动。

女官们也在这个时候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赠送得太多太繁复，经常会闹出一些阴差阳错的笑话来。我收到了十几种礼物，我又把它们当做礼物，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别人。

有趣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发生了。第二天的时候，我收到一位女官赠送的绣花手帕，一眼就认出了那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礼物。

后来，我们闲聊说到此事，她笑道：“真的吗？太有趣了。我也在纳闷呢，你怎么把我送你的鞋子又送回来了。”说到这里豁然开朗，大家哄堂大笑。

更有趣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最后清点各自收到的礼物时，发现竟然有一半左右都是自己送出去的东西。最后，大家干脆折中了一下，把所有的礼物都聚集起来，每个人平均分得一份，终于皆大欢喜再无话说。

新年到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宫中停止了早朝与召见活动，印玺也被封存起来，年后才会再度取出使用。

这段日子里太后也不再理政事。一切事物都清静平和下来。看得出来，从日理万机到平静安妥，太后也很是喜悦满足。我们也都悠闲自在，浑身轻松，直到除夕来临。

2

大年三十的早上，太后到菩萨和列祖列宗的神位前焚香祭拜，一如既往地虔诚。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宾客们陆续入宫，一直持续到中午，到了五十人左右。

到来的宾客主要的有这些人：大格格（太后的干女儿），醇王福晋（光绪皇帝兄弟的妻子），洵、涛二贝勒之福晋（皇帝弟弟的妻子），恭王福晋（大格格之侄媳）和庆亲王的家眷。这些女士们都是宫里的常客，为我们所熟悉。

第二天，又来了很多的格格，她们并非皇族身份，都是先代得到了封号，故而亦是格格身份。另外，还有满族官员的女儿们，亦有很多生面孔。

中午的时候宾客们都到齐了。她们在女官的带领下向太后请了安，随后去各自的房间休息。

这天下午两点钟，宫中人员与宾客们都到大殿集中。在皇后的带领之下，来宾们按照身份的高低排成行，依次向太后叩头行礼。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除岁典礼，表达的是辞旧迎新之意。

除岁典礼结束之后，太后赏给每个人一个红缎做成的小钱袋，外面绣着金线，里面装着一些钱。这个被称为“压岁钱”，也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风俗，多少年来代代相继一直流传至今。

大年夜的娱乐活动，大都是欣赏丝竹、看戏、游戏、观光、谈笑等等，人们整晚不睡直至天明。

太后提议我们玩赌骰子游戏。她赏赐给我们不少钱，累计下来有白银二百两之多。太后让我们用心掷骰子，好好赢钱。我们自然都小心翼翼地生怕赢了太后。

玩了一阵子，太后没了兴致，就推开不玩了。她对我们说：“嗯，我把钱扔到地上，你们这些丫头们来抢吧。”说着，她撒出了钱。我们知道她是想得个乐子，就加倍热闹地争抢了一番。太后乐得哈哈大笑。

当日午夜时分，有太监搬进来一只很大的火盆，以黄铜制成，里面燃着旺盛的炭火。太后摘下了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常青树叶子，投入火盆之中。我们也照着样子做了。太监们又往火盆中投入了大块大块的松香。一阵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缭绕于整个大殿。这个仪式意味着能在新的一年里得到好的运气。

这之后的节目是包饺子。辞旧迎新的这一天，我们都是不准吃米饭的，只是吃饺子。饺子是面皮制成，里面包着肉馅。女官们做了分

工，一些人包饺子，其他的人剥莲子，以备太后早餐之用。

已经快到大年初一早上了，太后觉得疲倦，对我们说要回房间去歇息一会儿。她并没有去睡觉的意思，我们便也没有任何顾忌，继续高声笑闹，异常兴奋。

我们玩闹了一阵子，就到太后房中去，发现太后已经在床上睡得很沉。我们都赶忙收了声，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梳洗打扮，迎接新年的第一天。

太后醒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到她的卧室，手里捧着几盘苹果（寓意为平平安安），常青果（寓意为健康长寿），莲心（寓意为万象更新），呈送到太后面前。这也是宫廷的老规矩。

太后对我们表示感谢，也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她问我们睡觉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整夜没有合眼。她连连点头说应该如此。她原本也只是想歇息一下，不想却睡着了，当真是年岁不饶人啊，不服老不行。

我们伺候太后梳洗完毕，才正式给她磕头拜年。然后，我们又去给皇上和皇后拜年。所有的礼节和仪式就基本完成了。

我们接着陪太后看戏。戏台子搭建在大院子里，太后坐在靠近走廊的地方。

戏一出接着一出上演，渐渐地我困意袭来，实在忍不住，竟然靠着柱子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进了自己的嘴巴，我感觉了一下，原来是一块糖。我太困了，就没管那么多，直接把糖吃了下去。

这时，太后走过来问我，糖好不好吃，还是不要睡了，开怀玩乐一番吧。我从未见到太后的心情这样好过，如小女孩一般和我们开玩笑，与原本威严的太后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宾客们也和我们一样玩得很快乐。

傍晚的时候，演戏告一段落。太后命太监们奏乐，自己唱了几曲。我们不时与她高声相和。

太后又令太监们唱曲儿。太监们有的训练有素，唱的跌宕起伏颇有气韵，有的却是完全不懂，为了取悦太后而尽力高唱，惹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这段时间里，只有皇上一个人木然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后来在外面遇见了他，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何总是这样闷闷不乐，他对我说了一句“HappyNew Year”，微微一笑，走开了。

第二天，太后很早起身，到大殿上去祭拜财神爷，我们都陪着参与了仪式。

后来的几天，我们每天还是玩乐，赌骰子和抢夺太后赢的钱，没有别的事儿。

有一天，大家在抢钱的时候，一位女官突然哭起来，说是我踩痛了她的脚。太后被扰了兴致，很是生气，命人把那个扫兴的家伙拖出去关上三天。太后愤愤地说，她连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受不了，根本不配在这里享乐。

正月初十是皇后的生日，我问太后可不可以送礼物给皇后。太后说可以，送什么都可以，不必拘泥。

虽然得到了太后的准许，我们还是小心谨慎，选好礼物之后，都要请太后过目，不敢送她觉得太厚重的东西。于是，选择礼物成了一件难事，太后很可能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并要求留给她，让我们再选其他的送去。

皇后的生辰庆典和皇上万寿庆典形式相同，不过略微简朴而已。

我们向皇后献上了如意，叩头庆寿。她原本可以端坐宝座接受我们的拜贺。不过，她还是彬彬有礼地站立起来。毕竟，我们是太后的御前女官，她便格外尊重一些。

皇后生辰这一天，与皇上万寿时一样，皇上、皇后和瑾妃一起用膳。平时他们吃饭都是各在一处，唯有这种庆典之中才破例。

太后派了我和另外一位女官去伺候他们。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很想看看皇上和皇后一起用膳是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皇后的房里，向她禀明是太后命我们来的。她言简意赅地回答：“很好。”

随后，我们到膳厅布置餐桌和椅凳。这顿共餐与我的想象大为不同。他们用膳的时候，气氛很轻松自然，完全没有在太后面前的那种拘谨。我们也加入了交流，分享了饭菜。

在他们开席的时候，有一份很文雅的小小仪式，在皇帝、皇后坐下之后，瑾妃为大家斟满美酒，依次向皇上和皇后敬酒。

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了太后的寝宫，向她禀报一切安好，未发生特殊之事。我们当然心知肚明，太后派我们过去，不是为了什么伺候用膳，而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而已。太后问我们，皇上是不是很严肃，我们回答她：“是的。”

新年庆典到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就结束了。

“元宵节”又称“灯节”。宫中摆设出各种各样的花灯，有动物、鲜花、水果等等，都是用白色的薄纱糊制，外面涂上不同的颜色，绘上精美的图案。

有一只花灯，形状是一条龙，大约十五英尺长，身体固定在十根木棒上。十位太监每人手执一根木棒，在音乐的伴奏下舞动。龙的前面，有位太监手持一只巨大珍珠样的灯笼，让龙来追着吞下去，称之为“蛟龙戏珠”。

舞完了蛟龙戏珠，到了放焰火时间。烟花腾空而起，璀璨夺目，象征了历代中国的场景，还形成了葡萄藤、紫藤花以及许多别的花样，精巧而壮观。

靠近烟火表演的区域设置了一些活动木屋，太后和大家可以坐在

里面观看烟花，不必在寒冷的空气里挨冻。

烟花燃放了几个小时，大概放掉了数千挂鞭炮，太后似乎很喜欢听这种声响。最后，这项活动圆满结束了，每个人都欣赏得兴高采烈。

第二天早晨，来宾们陆续离开了皇宫，生活再度回归日常。太后还是和往常一个样儿，在宾客们走了之后，对她们的服饰打扮、对宫廷规矩的无知等等，评头论足一番，多有鄙薄轻视之意。最后，她又换了个角度补充道，正是这些人粗俗的表现，反而让自己很是开心。她恰好不希望这些人太了解宫廷情况。

3

春天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身边，这是百姓播种的季节。宫廷又有一项仪式要举行。

皇上先到农神庙去祭祀，祈祷五谷丰登，国安民乐。然后，他在农神庙旁边的地里亲手耕种，扶犁、翻耕、播下第一粒种子。他的这些举动是做给百姓们看的，表示从未有人会轻视他们的劳作，哪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会拒绝这些劳动。

这类祭祀和耕种活动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当时，就有很多平民百姓在现场观看。

与此同时，皇后也去侍弄蚕桑，等待蚕卵的孵化。幼蚕孵化出来之后，皇后便去采集鲜嫩的桑叶，精心喂养它们，一天要喂上四五次，直到蚕儿成熟吐丝作茧为止。

夜晚的时候，几位女官被安排喂养这些幼蚕，并留神不让它们跑掉。

这些幼蚕长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样儿，不久就长大了。长大了的蚕吃得更多更频繁，我们采摘桑叶喂养它们，忙得手脚不停，陀螺一样旋转。

皇后把蚕儿在亮处照一照，就能看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吐丝结茧。那些肚子透明的，就说明要吐丝了。此时把蚕儿放在纸上，它们就开始吐丝。吐丝的时候，蚕儿不吃东西，我们就只需要看住它们别跑掉。

大概过了四五天，蚕吐丝完毕，此时它们一只只都蜷缩起来，如同僵死一般。皇后把这些蚕放进一只盒子，等待它们慢慢变成飞蛾。再把那些飞蛾放在厚厚的纸上产卵。

就这样，养蚕的循环过程完成了。

在吐丝结茧的过程中，若是由着蚕儿自由行动，它们就会用吐出的丝把身体裹起来，慢慢地形成厚厚的茧。

通常，确定蚕儿吐丝结束与否，有一种好方法。大家习惯于拿着蚕茧在耳边摇动，听其声音以作分辨。若是那只蚕体内的丝已经吐尽，就能清晰地听到蚕蛹碰撞茧壁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丝尽茧成，就要把它们放在沸水之中，慢慢软化下来，里面的蚕蛹死去。然后，以针头挑出丝头，一圈一圈地绕在线轴上，分丝完成，可用作纺线织布之用了。

这个程序之中，一小部分的蚕茧被保存下来，让里面的蚕蛹自然变成飞蛾，咬破蚕茧钻出来，在厚纸上产卵。产下的卵被小心放置于凉爽干燥之处，待到下一个春季到来，卵孵化成幼虫，如此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

待到缫丝工序完成，我们把成果送去给太后看，期待得到她的赞许。

这个时候，太后命太监取来几束旧年的蚕丝，那是她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纺成的。存放多年的旧丝与新丝对比之下，竟然没有明显差别，呈现了相同优良的质地和色泽。

皇上耕种、皇后养蚕、太后的缫丝手艺展示，这些行动无非都是

在为百姓树立典范形象，鼓励百姓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

第十九章　西苑

1

这一年的春天特别热，太后很想返回西苑居住。此时，俄日两国已经宣战，时机并不恰当，太后转念一想，还是留在紫禁城为好，先认真地观察时局走向，再做打算。

太后对于这场不期而遇的日俄战争始终忧心忡忡，为了缓解心中的焦虑，她花费了每天大部分时间焚香祷告，祈求各路神仙护佑大清王朝顺利渡过难关。我们也被要求与她一起祭拜祈祷。

这段日子平淡寡味，很是无聊，让人无端生出一种怅惘之情。二月初的时候，太后也终于对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忍无可忍了，她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西苑去，着实是等不了了。在西苑正好可以完成画像，这工作拖延了快一年。

二月初六，我们回到了西苑。久别今至，放眼望去，一切都如新生。在明媚春光之中，鸟雀高飞，芳草吐绿，绿水盈盈，树上的花儿已经渐次盛开，芳香扑鼻。

太后带着我们，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大家都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太后戏说，看我们的样子，如同出笼的小兽一般。她的兴致也很不错，不过还是有些遗憾，因为她也说道，若是能回颐和园，会更加畅快。

阔别许久，卡尔小姐再次应召入宫。太后接见了卡尔小姐，表示想看看她所画的像。

太后再一次问我，画像要多久才能完成。我告诉她说，最好她能每天多一些时间摆姿势，要不然可能还要拖延很久。

她想了半天，总算同意每天早朝之后，在画家面前坐上五分钟。不过她也明确表示，除了画面部之外，她绝不会坐在那里。

好不容易坐了两个早晨，第三天的时候，太后就借口身子不舒适，不愿意再过来。

我告诉她，若是老佛爷不能坚持坐下来，画像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的。太后对此颇为不悦，却也无法可想，只得又勉强坐了几天，让卡尔小姐完成了面部的绘制。

到了这个时候，太后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坐下来了，她声称这画像完成与否，自己都绝对不会再做什么。无奈之下，只好再次由我代劳，让卡尔小姐画服装、珠宝首饰等。

经过了如此不易的一番努力，画像总算一天天接近完成。太后如释重负，很是高兴。我观察太后的情绪，觉得这是个重新讨论卡尔小姐报酬的好机会。太后正好也问起我："赏钱给卡尔小姐合适么？赏多少才合适呢？"

我回答太后说，卡尔小姐一直以绘画为业，若不是为太后画像，外面也有很多绘画工作给她做，能赚到不少的钱。故而，太后若真要赏钱，当更为丰厚，以显示太后的浩荡圣恩。

太后又问我能不能确定如此赏钱，卡尔小姐会不会生气，康格夫人会不会不高兴。

我向她解释说，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们多有以绘画、教育或其他事情为业者，并以这些职业安身立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她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以此为荣。

太后很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卡尔小姐不能仰仗哥哥生活呢？"我说卡尔小姐不会愿意这样做的，况且，她的哥哥也有一家子人需要供养呢。

她议论了一番，说这真是奇怪的文明传统。若在中国，父母亲辞

世了，必然是儿子供养自己的姐妹，直到她们各有归宿为止。况且，中国的女子若是自己谋生，定要遭人非议的。

说了半天，太后决定要和大臣们商量一下。我稍稍放下心来，心想起码有了一些希望。

2

二月十二日又是一个有趣的节日——“花朝节”，意为百花生日。

早朝过后，我们都跟随太后到了御花园。太监们早已等在那里，捧着大匹的红色丝绸。女官们将红丝绸剪成二英寸宽、三英寸长的小丝带。

丝带准备得差不多了，太后取出红黄两条绸带，系到了一棵牡丹的茎上（在中国人观念中，牡丹花被认为是百花之王）。女官、太监和丫鬟们也都照着样子，个个拿起红绸带，装饰御花园内的花草树木。

大家整个早晨忙活得不亦乐乎，终于完成。此时，御花园内彩绸飞舞，花香袭人，树影摇曳，加上女子们衣裙飘飞，炫彩多姿，相映成趣，当真宛如画中风景。

我们又去看戏，这出戏是演的树神花神贺寿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花花木木都各有所属神灵，树神为男性，花神为女性。演员的衣装与戏台的布置都很应景，以百花为主题，美轮美奂。

荷花仙子的上装以粉红丝绸缝制而成，正是一朵莲花的样子；裙子以绿色丝绸制成，形似荷叶。那仙子款款而行，花瓣与荷叶如随风摆动，与真花无异。其他各种仙人仙女装扮大致亦如此。

戏台背景为美丽绝伦的茂密森林和幽幽谷底，嶙峋的山石环绕，岩石洞穴瑰丽奇特。渐渐地，岩穴内走出了许多小仙女，个个手持酒器。她们是一些花草、雏菊、石榴小仙。这些小仙缓步走出，真是有神秘奇诡的效果，妙不可言。

这些神仙聚集起来，伴随着曼妙清越的丝竹之声，喝酒唱歌，载歌载舞，尤显神仙乐事。

这出戏的结局是个大团圆。一弯七色彩虹从天而降，如华美的桥梁搭在巨岩之上，众位神仙歌舞升平之后，坐上彩虹飞天而去，直上九霄重返天庭。

“花朝节”的庆祝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返回了自己的房间歇息。

3

二月十四日（1904年3月2日）这一天，是我进宫的一周年。我竟完全忘记了此事，反而是太后提醒了我。

太后问起我有没有完全适应宫廷的生活，在这里过得是不是快活，还有去巴黎的想法没有。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她，虽然在法国生活也让我觉得快活，相比下来，我还是更喜欢宫里的生活。宫廷的生活更为有趣，还能和自己的亲友生活在一处，不必远走他乡，实在是再好不过。

太后笑着说道，怕是我迟早会厌倦这种生活的，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会到那异国他乡去，看来唯一的办法还是让我嫁人。

她随即又问起我，为什么那么拒绝嫁人，是不是因为对将来的婆婆有畏惧之心，或是有什么别的难言之隐。若真的是有这些顾忌，那么，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她在世一天，就不会有什么让我为难的事儿发生。而且，哪怕是我嫁了人，也不必总待在家里，一样可以随时到宫中来玩耍。

太后又说：“去年的时候，我曾给你时间认真考虑婚事。我也知道，毕竟你接受的教育和其他女官们完全不同。不过我可没有忘记这件事儿，我总在留心，要为你配上个如意郎君。”

我依然坚称自己不愿意嫁人，若蒙太后不弃，愿意一直待在宫中伺候她。太后说，你现在这样固执己见，不过很快就会改变主意的。

二月下旬，卡尔小姐更为辛苦地工作，太后的肖像终于要完工了。

太后翻了皇历，选定了1904年4月19日这个黄道吉日，作画像最后的润色。

卡尔小姐提前接到了通知，她却告诉我说，太后指定的这个时间，画像是绝对无法完成的。我赶忙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太后，解释说画像还有很多细节尚待完善，稍等些时日为好。

太后却一口拒绝延长时限，她要求必须在四月十九日下午四点钟之前，全部完工，我也不敢再说什么。

画像完成前的一个星期，太后最后一次来到画室看画像。她看来还算满意，只有一点，她不喜欢卡尔小姐把自己的脸画成一半暗一半亮的样子。

我对她解释说，那暗的区域是阴影效果而已。然而，这种解释依然无济于事。太后坚持让我告诉卡尔小姐，务必将两边的脸色改成同样的颜色。

真没有办法，我只能照办。我和卡尔小姐激烈地争论了很久，让她知道太后乃是金口玉言，不依照她的指令做事是绝对不可能的。卡尔小姐只得答应稍作修改。

这时候，太后又注意到了画像下方的几个外国字，就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那是卡尔小姐的签名。

太后说道：“哦，我也知道洋人常会做些有趣的事儿，想不到竟到了这个地步，把自己的名字写到我的画像上。别人若是看到了，必然会认为那是卡尔小姐的肖像。”

我对她说，这是外国画家们的职业习惯，自己的所有作品都要签名。

太后只得说，那也只能如此了，随她去吧。我观察她的神色，知道她心里并不满意。

4

卡尔小姐没白天没黑夜地赶制了多日，终于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画像。

太后专门邀请了康格夫人和其他外交使节的夫人来宫里欣赏画作。这次依然以非正式会见的形式举行，太后选择在一个小殿接见宾客。

经过了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按照太后的吩咐，带着夫人们去画室。太后与她们礼貌地道别，随后回了自己的寝宫。皇后则以主人的身份作陪。在场的每个人都对栩栩如生的肖像赞叹不及。

欣赏之后，大家都去了膳厅。皇后坐了首席，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大家也都依序落了座。

一位太监走进来，说皇上有旨，请皇后转告客人，他龙体欠安，不能出来接见宾客。我翻译给来客听，大家似乎都并不在意。事实上，皇上的身体好得很。我们大家却几乎都把他忘掉了。

宾客们离开之后，我还是去向太后报告有关情况。太后问我，宾客们欣赏了肖像画感觉怎么样。我回答她，客人们一个个都赞不绝口。

太后说道：“她们自然要说好，这画像正是她们外国人画的嘛。”听上去，太后对画像并不满意。卡尔小姐费尽心思才完成这部作品，却是这样的结果，对此我深感失望。

太后又埋怨说，卡尔小姐画这幅肖像的时间太长，宾客到来之

前，也没有谁提醒自己让皇上也参加。她为此很生李莲英的气。她说自己一想起这个疏忽，就马上派出太监去说明，否则的话，还不知道宾客们会怎么猜测皇上的情况，要出去说些什么呢。

我告诉太后，在向客人解释皇上龙体欠安不能到场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谁多想。

第二天，宫里的木匠做好了画框，装好了肖像画。太后命我哥哥照一张相留念。照片的效果非常好。太后说，照片反而比画像好得多。

画像工作就这样彻底完成了。几天之后，卡尔小姐离开了皇宫。太后赏赐了她很丰厚的酬金，还额外赏赐了勋章和一些礼物。

卡尔小姐离开之后，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缓不过神来。我觉得很是寂寞难耐。我和卡尔小姐相处这很长的时间里，觉得她是个很谈得来的好伙伴，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太后很敏锐，她注意到了我的闷闷不乐，就问道：“我猜，你是想念你的画家朋友了吧？”

她看穿了我的心事，我只有承认确实如此。我担心她会认为我忘恩负义胳膊肘儿朝外拐，赶紧向她解释说，每当有熟悉的人离去，我总是会有一段时间不适应，不过很快那种感觉就会烟消云散。

她对我的解释很满意，表示自己并没有觉得怎样。她还说，等我到了她的这个年纪，看待事情就会豁达得多。

5

有一天，太后问我：“卡尔小姐有没有向你问起过1900年拳乱的事儿？”我告诉她，卡尔小姐从来没有提及这个事情，何况，拳乱的时候我还在巴黎，也不知道个所以然。

太后说：“我非常忌讳提起拳乱之事，更不喜欢外国人问起。你

应该知道，我自认为是前无古人的聪慧之人，无人能够比较。我曾听过很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儿，也读过她的一些传记——当然，是汉文版的，却依旧认为，她一辈子经历的大事趣事，还不及我的一半多哪。我的一辈子还没有到头儿，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些不同寻常的事，或是和过去的做法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惊讶一番。”



义和团民

她接着说：“公允地说，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强盛国家，这并不能

都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的才能。她所依赖的，还都是身后那些国会的人们。国会的人讨论所有的大事，等到有了最好的结论，再请女王签字同意即可。国家大事么，女王也不消多说什么，多管什么。你再回头看看我，我有四万万的黎民百姓。每件事情都是靠我一个人的分析和决断。确实，我们也拥有军机大臣可供商量，而这些人最关心的不过是仕途进退，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还都是要我亲自定夺。而咱们的皇上，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她越说越激动起来：“一直以来我都做得很好。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年的拳乱能把中国搞成那么混乱的样子。这算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过失，很多事情令我追悔莫及。我本可以及时下旨禁止拳匪们妖言惑众，搅得人心不宁天下大乱。可是，端王、澜公二人却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拳民都是上帝的使者，能够让我们摆脱那些可恶的洋人。他们所说的洋人，指的就是那些传教士。你也早就应该看得出来，我是无比虔诚的佛教徒，多么地痛恨那些传教士。这样考虑之下，我就想自己暂时不做明确的态度，干脆作壁上观，看看到底事态会往哪里发展。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太过严重。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的头领进入了颐和园，召集所有的太监在大殿的院子里聚齐。他们一个一个地检查，看大家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形。那个头领告诉大家，那些十字形普通人看不出来，他却能够看出来，由此判断对方是不是基督教徒。随后，端王才来到我的宫中禀报这件事，还说那个头领已经查出了两位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准备如何处置。听到他竟然说出这等话来，我当即勃然大怒，呵斥他说，没有我的准许，他没有丝毫权利把拳民带到宫中来。端王却说这位头领着实法力无穷，超出常人的想象，有足够的力量杀光该死的洋人。而且，这头领有天神护佑，可刀枪不入。

“端王还对我说道，拳民那些神妙之处他都曾亲眼目睹。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拳民射击，对方被子弹击中了却毫发未损。端王建议我还是少些麻烦，将那两位太监交给拳民处置。我想了想，只得应允了。我后来得知，那两位太监被他们拉到附近的村子里杀掉

了。”“这还不算，第二天，端王、澜公又领着那个拳民头领到了宫里，下令所有的太监都沐浴焚香，叩头祭拜，以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后来更加厉害，端王建议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修习各种各样的法术。整个儿京城差不多都在学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实在是令我惊讶不已。那装束很奇怪，都是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所有的奴才们也都作如是装扮，又是滑稽又是令人难过。澜公甚至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那个时候的军机大臣是荣禄，因病告假，我给了他一个月时间休息。每一天，我都会派一位太监去探望他。有一天，太监回来禀告说荣禄的病已痊愈，准备明天进宫。当时，离他一个月的休息时间还有十五天，我有些想不通，他为何放弃了休养提前回宫。我当然也很急于召见他，拳民的风潮让我忧心如焚，急于与他商量对策。荣禄进了宫，听说了拳民的所作所为，显得颇为忧虑。在他看来，那些拳民除了混迹其中的革命党和煽动者之外，别的都一无所用，不知所谓。拳民鼓动百姓同去杀灭洋人，恐怕迟早会招来祸患。我觉得他的考虑不无道理，问他可有应对之策。荣禄表示，自己马上去找端王交涉此事。

“第二天，端王禀报我说，昨日曾因拳民的事情，与荣禄大吵了一通。他说明眼人都看得出，现在整个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宣教范围，若要驱散他们，他们势必报复，杀光北京百姓，甚至连宫中人也难以幸免。他们已定好日子，集结起来杀光外国代表。那个思想保守的将领董福祥，已经与一位义和团分子商量妥当，答应到时候带领骑兵冲锋陷阵，帮助拳民攻打外国使馆。

“这番话让我大惊，感到大事不好了。我当机立断，留住端王，又立即差人叫来荣禄。荣禄过来了，看上去同样地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我告诉他拳民准备攻打外国使馆，他听了更显忧心忡忡，建议我即刻下旨，声明义和团乃是地下帮会，令百姓不可听信煽动，作为缓兵之计，或可限制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同时，命令九门提督立即派兵马驱散京内拳匪。”



右手持枪的义和团民

太后一刻不停：“端王听了荣禄的建议，大为震怒。他恐吓荣禄说，若老佛爷真是下了这样的旨意，拳民无立锥之地，必然会杀进宫来，恐怕到时候，无人能得幸免。我听端王这么一说，心里也着实没有根底，就想不如干脆把所有的事交由端王处理。我这样安排了。等到端王离宫，荣禄对我说，此人已经走火入魔，如此盲目不知深浅地对待拳民，必然惹下无可挽回之大祸。荣禄还分析说，以眼下之形势，端王肯定会帮助拳民攻打使馆。拳民不是贫困草民便是乌合之众，没有读过书，鼠目寸光。他们以为世界上的洋人极少，只有中国人眼前的这么区区几个，杀光了，就算得上是斩草除根了。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的外国是多么强大，同胞被中国人杀了，他们势必前来报仇雪恨。一个洋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掉一百个拳民。

“荣禄请求我马上下旨，令聂将军领兵保护外国使馆——后来，聂将军被拳民们杀掉了。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马上下了旨。与此同时，我命人去传来端王和澜公，与他们分析事态的严重性，吩咐他们千万不可以草率行事，当依照荣禄的建议行事为好，以免耽误大事。尽管如此安排，事态却依然越来越糟，唯有荣禄极力反对拳民，如倾盆之雨陷马之泥，哪有回天之力呢？后来的情势更是难以遏制地急转直下。”

她一口气地说下去，好像要说完心中所有的话来：“有一天，端王和澜公前来让我下令，让拳民们先去杀光使馆里的洋人，再一鼓作气，消灭其余的。我怒不可遏，拒绝下诏。我们商讨了好久依然拿不定主意。端王最后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拳民也都准备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是必然要动手的了。对于他这样的态度，我怒不可遏，让几位太监速速把他赶了出去。他走的时候嘴里兀自说着，若是太后依然固执己见，拒绝下诏的话，我会代老佛爷做这件事情。他后来竟真的这样做了，着实胆大妄为啊。后来的事情发展，你大概也知道了。他背着我发布了诏书，白白葬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后来，端王的计划落了空，又听说洋人已准备来围困京城，战火即将燃起，他此时才大惊失色，无计可施。我们不得不离开京城，远走避祸。”

太后说到伤心处，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是心情沉重，对她深表

同情。

她说道：“你倒也不必为我的这些经历感到难过。可话说回来，我的一世声名，的确就这样晚节不保了，着实痛心不已啊。这算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错误抉择。当初的我，好比是一块无瑕的美玉，我一心忧国忧民，诸事处理妥当，人所共瞻，百姓莫不称颂。可是，等到那拳乱之后，美玉也难免染瑕，或许穷尽一生，都无法洗得清白。我经常为此懊恼不已，我也是个很有主心骨儿的人，那一次却无端信了端王的谗言，这该死的东西真是害人不浅，整个无法收拾的场面，都是因他而起。”

三月底，太后厌倦了西苑的生活，又带着所有人搬到了颐和园。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众人分清主次，井然有序地乘船而返。得闲时间匆匆过，转眼到了大殿的水门，放眼望去，桃花盛开，风景如花，一切都那么地赏心悦目。

太后的心情好了起来，忘却了战争之类的烦心事，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宁。

第二十章　尾声

1

时光飞逝，我在宫中已是第二个年头，与第一年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各类庆典、庆祝活动和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早朝，依然是太后主持。早朝之后，正式开始一天的享乐生活。

别的事儿里，太后对她的菜园灌注了最大的热情。她亲自吩咐大家种这种那，在收获的季节，吩咐女官们拿着小剪刀，收割那些作物。

太后很喜欢并欣赏我们劳作的场景，若是哪一天兴致来了，也会亲自加入劳作的队伍，干上一阵子。她为了鼓舞我们劳作的干劲儿，常会赏赐卖力者一些小礼物。大家果然更为卖力了，既为了取悦太后，也为了获得奖赏。

太后还爱好养鸡，她吩咐下去，给每位女官相同数量的小鸡，大家亲自照管，等到生蛋了，我们须每天早上都拿去给太后过目。

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奇怪的事儿，我的鸡蛋总是比别人的少些。有一天，我的太监向我报告说，他亲眼看到，另一位太监从我的鸡舍里面偷鸡蛋，想要帮自己主子拿到嘉奖。

太后最不喜欢女官们懒散或者粗心大意。有一次，她命我打开一个包裹。我准备随手剪开，她叫住了我，让我把它慢慢解开。那绳子捆得很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开。这样解开了还不算，太后又让我把包裹纸小心地叠好，和绳子一起存放在抽屉里。她对我说，这样放好了，等到再用的时候，她就随手可得了。

有些时候，太后赏赐我们一些零花钱，供我们向丫鬟们买些头

花、手帕、鞋子、丝带之类的东西。丫鬟们经常制作这些东西卖给大家。

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被要求记录下来，用的是太后专门发放的本子。每个月到了月底的时候，太后会检查我们的记录，若是认为谁花费过多，她就会责骂；另一方面，若是觉得哪个人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就会夸奖一番。

如此这般，在太后的教导和考察之下，我们慢慢养成了处世谨慎、注重细节、操持有度的优点。这些优点渗透到生活之中，可能对一些人的一辈子都会产生影响。

大概也就在那个时候吧，我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他叩请开缺。太后没有恩准，只是又给了他六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家休养。

其实，父亲当时的真正想法，是要乘此机会到上海去，请他的私人医生好好诊治。太后听了却是很不以为然，她还是原来的观念，觉得宫廷的太医远比洋医生高明得多。

于是，那段日子里，父亲的病都是由太医们诊治。他们每天都开出不同的药方。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父亲看上去好了一些，只是因为慢性风湿病的原因，仍然寸步难行。

无奈，我们只得再次恳求太后，准许我父亲到上海看医生，毕竟，那医生跟踪诊治，对父亲的病症更加心中有数，可以更好地对症下药。

太后却还是没有恩准，她认为我们当下最需要的，就是一点点耐心，太医们或许慢一些，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会治愈父亲的病症。

说到底，太后不过是担心，若是我父亲去上海诊治，必定要带着我们同去，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决定，只要父亲的疾病没有恶化的迹象，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2

春季游园会又到来了，前一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按照惯例，第一天接待的是外国公使、参赞和使馆随员，第二天接待的是上述人员的夫人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人。

这一年的游园会宾客很少，有几位是第一次参加。六位日本使馆的夫人，陪着内田夫人一起参加活动。太后一直对内田夫人颇有好感，对她的注重礼节很是赞赏。

经过了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们带着夫人们去用餐，用餐之后是参观、告别、启程、离去。我们再去向太后报告情况，她依然要问很多细节问题，如此等等。

众位来宾中，有一位女士（我觉得应该是位英国人），身着笨重的斜纹软呢旅行服装，上面有很多大口袋，头戴一顶相同材料的帽子。她双手抄在口袋里，一副怕冷的样子。

太后问起我，有没有注意到那位女士，身着“米袋子”制成的衣服。她说，穿成那样子出现在宫廷正式场合，未免太过特立独行了罢。

她很想知道那是何许人也，从何处而来。我对太后说，此人肯定不是使馆里的人，因为那些人我都是认识的。

太后说道，不管她是何许人也，以这副尊容出现在这种高贵的场合终归不合礼仪，就算是在欧洲宫廷，也未必能够受得了这种形象。

她补充说道：“我一看便知，这些宾客里面，哪些人是真的在对我表示尊崇，哪些人认为我不值得尊重。外国人好像都有这种想法，认为中国人无知得很。他们因此觉得不必像在欧洲社交场合那样，需要特别注重形象和礼节。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告知大家，应该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子的穿戴。以后在邀请宾客的时候，也要考虑一番，以便把那些教会人员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通通排除出去。我愿意召见高雅的人士，而非粗俗的家伙。”

我建议说，在这件事儿上，日本人的礼节就很值得借鉴，即：在发出的请柬上面，注明属于什么场合，该穿什么服装。太后觉得这方法很好，并决定在中国也用上这样的方法。

天气好的时候，太后就会到外面去，看太监们在园子里面挥汗如雨地劳动，与我们漫步闲聊，以此打发无聊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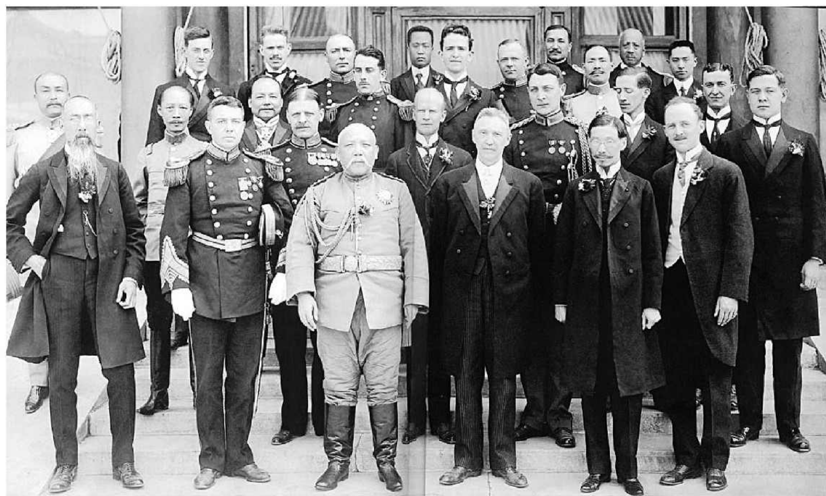
3

早春是移栽荷花的大好时节。太后很喜欢这项劳动。荷花的老根必须去掉，再把新的球茎栽进新鲜的淤泥。虽然荷花都长在湖西边的浅水里，太监们却也要时不时地趟到齐腰深的水中，清理老根，栽植新茎。

这个时候，太后就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玉带桥上，指挥太监们劳动，还会对栽植新茎提上点儿建议，她乐此不疲。

栽植荷花大概需要三四天时间，太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桥上观看。女官们在身边服侍着，有的时候也会编织造型各异的穗子流苏，或是做别的什么事儿，手里不闲着，以打发流速缓慢的春日时光。

袁世凯再次觐见，重点与太后谈论俄日战争的话题。他对太后说，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从长远来看，中国难免要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会见外宾的袁世凯（中）

这个糟糕的信息让太后担忧不已，她提到有一位御史曾建议为日本提供大量的米，可她已经决定暂时不会轻举妄动。袁世凯对太后的决定深表赞同。

我一如往常，每天为太后翻译和战事有关的各类报道和电报。一个早上，我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康有为（1898年中国维新运动领袖）从巴达维亚抵达了新加坡。我猜想太后可能对这个信息有点兴趣，就和其他的消息一同译了出来，转告了太后。

太后听了这条消息，突然间作出了强烈的情绪反应，那种反应前所未有。我很惊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她定下神来告诉我说，康有为此人给中国惹了无数的麻烦。见到康有为之前，皇上始终奉行祖宗的规矩，向来心无旁骛。可自从召见了康有为之后，皇上极快地对所谓的维新变法热衷起来，甚至开始宣扬起基督教义来。

“有一次，”太后接着对我说，“康有为竟然怂恿皇上下诏，派出人马围困颐和园，把我羁押起来，一直到实行新政为止。好在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忠诚无二，帮助我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得知了信息，立即赶到紫禁城兴师问罪。皇上正待在那里，我们进行了正面交锋，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开始恳求我继续代为执掌朝

政。”（那件事的最后结果是，1898年，皇上发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

当时，太后即刻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同党。康有为等人却逃走了，太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了。一直到我翻译了这篇报道，太后才终于知晓康有为现在何处，稍稍放下了心，并想进一步了解康有为还在做些什么。旋即，太后又一次发作了，她问我：“外国政府为何要给这些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保护？为何不愿意把中国的臣民交给本国处理，为何不能只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儿呢？多么荒诞无稽的事情啊。”

太后让我时刻留心，一旦再看到康有为的任何信息，即刻向她报告。



康有为在芝加哥

我却暗自打算，不管怎么样，再也不提起这个人了。渐渐地，太后也忽略了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在一次游览西苑的时候，太后指着一大块空地对我说，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座大殿，拳乱的那年毁于大火。她解释说，大殿的毁掉是因为一场意外，而非洋兵有意为之。

她始终不喜欢那座大殿，觉得它很难看。她决定在原址重修一座大殿，眼下的大殿太小，新年的时候接待外来宾客都很困难。太后下诏，令工部依照自己的设想，准备新建筑的模型，然后送给她批准建设。

一直以来，宫里的建筑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式传统建筑模式，在新殿的建设方面，太后有意多少参照一些外国的设计理念，在方方面面都做到最新。

大殿的模型很快完成了，工部呈送太后御览。那虽然只是小小的木质模型，却是细微纹理面面俱到，精确无比，甚至连窗子上的图案、屋顶上镶嵌的细致雕刻都毫发毕现，清晰可见。

然而，我也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完全达到太后的要求，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她觉得模型做得简直一无是处，不是这间屋子要大十寸，就是那间屋子要小三分，或者是这个窗子要挪到那个地方去，等等等等。

模型被工部拿回去重新制作，再次呈送过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明显改变了，太后也终于很满意。

紧接着，就是要为新建筑取名字，这名字必须大气精当，令人耳目一新、心头一震才好。经过了一番极其严肃和充分的讨论，这建筑取名为“海晏堂”。

新建筑很快破土动工，太后对进度相当关注。按照规划，大殿之内的陈设全部采用西式风格，唯有御座例外，依然是保持满族特色风格。

太后参考了我们从法国带来的那些陈设图录，她一一看去，反复对照比较，最终决定选用路易十五式样。有些变动的是，家具都漆成

明黄色，窗帘地毯之类陈设也都选用明黄色，无一例外。

选好了合适的家具之后，我母亲提出，让她来买下这些家具，献给太后做礼物。太后恩准了母亲的请求。

我们向巴黎一家著名公司下了订单，我们从前曾经从那里定过货。大殿竣工的时候，家具也送到了宫中，很快就安放完毕。

太后巡视了整座大殿，一如既往地挑出了很多毛病。她似乎不是很满意，她表示，中国的建筑么，毕竟还是应该如从前的那样，更加庄严肃穆、宏伟壮观的才好啊。不过事已至此，板上钉钉，生米煮成了熟饭，多说也无益。

5

夏天的几个月里，生活比较空闲。我就每天用一个小时帮助皇上学习英文。皇上聪明过人，记忆力很好，学得很快。不过，他的发音不是很准确。

学了没多久，皇上就能够阅读一些普通英文教科书中的短故事了。他的英文听写能力很好，英文书写更是出众，在英文古体和艺术体书写上，更是堪称专家。

太后很高兴看到皇上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并表示自己也有兴趣学习这些，相信很快便能学会。我就开始教太后英文，结果仅仅学了两次，她就完全没了耐心，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

英文教学的过程，为我提供了与皇上交流的机会。有一次，皇上冒着被监视的风险和我谈起变法维新的话题。他说我在推动太后维新上，似乎没有什么进展。

我对皇上说，自我进宫之后，宫中也着实完成了不少事情，那新近竣工的大殿就是个例子。皇上显然对大殿之类的完全没有兴趣，并让我不要再为此费神了。

皇上说道，或许到了某一天，会充分发挥我的价值。当然了，前提是真的有那么一天到来。他对那一天会不会到来，没有什么把握。

他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我告诉他，若是父亲的病总也不见好转，我们将不得不离开宫里一段时间。皇上说他虽然会对此觉得遗憾，但也认为未必不是好事。

他又说道，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在国外度过了这么多年，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完全融入宫廷生活。若是我有离开宫廷的打算，在他这里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的。

太后准许我每个月出宫探望父亲两次。有一天，太后身边的一位小丫鬟过来告诉我，老佛爷又在为我安排婚事了。这事儿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没过多久，太后告诉我说，婚事事宜均已安排妥当。

她亲自为我挑选了一位王爷，让我嫁给他。太后说完这些，盯着我的脸看着，仿佛在等待着我说些什么。我就说道，在父亲病重的这个时候，我着实心神不定，恳求太后将此事搁置一段时间。

太后听了很是生气，她认为自己为我考虑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我却毫无感激之意。我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沉默。太后也便不再说什么。

我努力想忘掉这件事儿，却发现根本是徒劳。我回家探视的时候，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和从前的态度一样，坚决反对这种形式的婚姻安排。

父亲交待我，返回宫中之后，把我当下的境况等都告诉李莲英，寻求他的帮助。当下在宫中，唯有李莲英能够让太后改变主意。我得了主意，返回宫中之后，马上前去拜访李总管，说明了来意。

开始的时候，李莲英面露难色，认为我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太后的美意。我依然坚称自己尚无意婚配，心甘情愿地长久留在宫中，尽心尽力服侍太后老佛爷。

见我这样坚持，李莲英才答应想想办法。

后来，太后和李莲英都再没提起我的婚事，李莲英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我没有多问，只在心里揣测，应该是李莲英暗中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6

这个夏天，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发生了。转眼进了八月份，到了砍伐竹子的季节了。我们这些女官们再次上手，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砍伐下来的竹子上雕刻文字和图案。太后也参与了这项雕刻活动。

这之后，竹子就被制作成桌椅板凳和其他日常用品，摆放在太后的茶室之中。

秋叶永昼，天高月朗，无限漫长。在那些无聊的夜晚，太后教我们中国历史知识和诗词歌赋之类。她每隔十天对我们进行一次考试，以检验我们的学习效果。考试成绩优秀的，她会给予奖励。

那些年轻的太监们，也参加这项学习和考试活动。他们回答太后的提问时，总是千奇百怪，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

太后心情好的时候，我们都跟着笑上一阵，若是太后不高兴了，则会下令责罚这些不用功的人，让大家都引以为戒。然而，对于这样不痛不痒的责罚，太监们早已习以为常，根本不放在心上，当面佯装悔恨不已，转眼又喜笑颜开了。

时光飞逝，太后的七十岁大寿快到了。皇上提议说，这普天同庆的日子，一定要举办盛大的庆祝典礼。

太后思考良久，终于还是没有恩准。她认为，当下国家如风中巨树，欲静而实不止。如此大操大办恐百姓议论。

这一次万寿庆典与往年唯一不同之处，除了以往的礼物往来之

外，太后还广施隆恩，为一些功勋卓著、表现卓越的人晋级增俸。

此次太后封衔，我和妹妹也受封郡主衔位。按照惯例，以往郡主衔位唯有宫人方有机会获封。此次我们能够有幸得到这样的待遇，真是太后的特别眷顾。外臣们的晋官授爵，则都是皇上亲自封赏。

本来，万寿庆典准备在紫禁城举行，那里的环境更适合举办如此盛大的活动。太后却不愿意这样，她下旨言明，等到十月初十万寿的前三天，再搬到紫禁城去。

这个决定让我们需要额外做很多事情，颐和园和紫禁城两个地方都需要布置妥当。那段日子，宫中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景象。



慈禧太后赏雪照

此外，还有些事儿更增添了忙碌。在初十的前几天，天上下起了雪。太后本就最喜欢在雪天外出观光赏景，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她想在山坡上面照相。我哥哥接到旨意，马上带着相机进宫，按照要求为太后照了几张相，效果非常理想。

7

十月初七，我们都移至紫禁城。庆典活动随着拉开帷幕。宫中五彩缤纷张灯结彩，一派辉煌亮丽风景。院子以特制的玻璃屋顶罩住，美观独特又便于遮风挡雨，一切人等均能行动无碍。戏院里面每天都是好戏连台，掌声不断。

初十的时候，万寿大殿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所有事儿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概不赘述。万寿庆典结束之后，我们所有人又回到了西苑。

返回西苑之后，我接到了信息，父亲病重，他为此再一次恳请开缺。太后先没有表态，而是派了太监到我家以探望为名打探虚实。

太监看到我父亲确如所说，当即禀告了太后。太后终于恩准父亲开缺养病，并且同意他到上海去看外国医生。

太后认为，我母亲陪同父亲前往上海医治即可，我们姐妹没有必要一并跟随。我再三向太后解释，陪侍父亲乃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万一父亲病况转危回天无力，我们岂不是要抱憾终生。

在我们的再三恳求之下，太后先是想出种种理由拒绝，到了最后，她见我们着实去意已决，只得说道："好啦，我知道，他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理所当然去陪侍左右。不过你们要牢记，事情办好之后，须是即刻回宫为要。"

她并没有恩准我们立即出宫，而是坚持为我们安排制作新衣等事宜，打算到了十一月中旬，才让我们出宫。我们心急如焚，但是除了耐着性子等待太后心情好的时候放行，别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终于，所有事情都准备完毕。太后翻起了她的皇历，为我们选定了十一月十三日这一黄道吉日出宫。

我们在十二日离开皇宫。离开之前，我们向太后叩头辞行，对她两年来的恩宠表示由衷的谢意。大家都哭了，太后也忍不住落泪。

我们又去向皇上辞别，他表情如旧，只是摆了摆手，对我们说：“Goodluck.”

马上就要离开，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久久不忍离去。太后见状说道，你们又不是从此不再回来，再等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还是早些动身吧。

在宫廷门口，李总管也来向我们道别。我们坐进了马车，一路马不停蹄回到家中，我们的太监们从始至终陪着我们，为我们忙前忙后。

家里的一切所需物品均已经准备停当，第二天，我们一大早乘着火车到了天津，恰好赶上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

刚到了上海，父亲马上去看自己的私人医生，检查诊治取药，很快就完成了。事实证明，这次到上海来，对父亲的身体有明显的好处。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怀念宫廷的生活了。上海的朋友们经常邀请我参加一些宴会舞会，我却总是有些心不在焉，闷闷不乐。上海的一切都和北京大不相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尽快回到太后的身边。

我们刚到上海两个星期，太后就曾经派出特使到上海来看望我们，询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需求等等。特使带来了很多漂亮的礼物，还为父亲带来了药物。我们全家人着实感激不尽。

我们见到宫里的特使，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不已。特使告诉我们，宫里的人都很惦念我们，希望我们能早日完成上海的事情，返回宫中。

这个时候，父亲在医生的诊治和我们的悉心照料之下，病情大有好转。他认为我没有必要再在上海待下去了，让我返回京城去，尽心尽责服侍好老佛爷。

我在新年这天的早晨动身去京城。此时正是河流冰冻时期，我先

乘船到了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这趟旅程着实艰苦，到了北京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心情好得不得了。

太后早已派了太监在车站接我。我下了火车立即赶往宫中。与太后相见，我们都忍不住高兴得流泪。我告诉太后，父亲的病已见好转，当下的我真希望能永远留在宫中服侍老佛爷。

一切都恢复到了从前的模样，我再次过上往日的生活。然而，这一次我是孤身入宫，没有妹妹和母亲的作伴，一切却又和原来完全不同了。太后依然对我如母亲般慈爱，关照有加，我却老是高兴不起来，又开始想念上海的生活。

8

我就这样待在宫中，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事情，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这年的卯月（1905年3月），我接到了一封电报，告诉我父亲病危，想要见我，让我立即赶往上海。

我把电报内容给太后看过，等待她的决定。她思忖了一下，对我说道：“你的父亲年事已高，实在是比不得青年人那般容易恢复了。”

太后恩准我再次去上海，我又一次向每个人道别。他们都希望我能早日返回宫廷。然而，这一次天不遂人愿，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宫中。

此时的父亲已是弥留之际，捱到了1905年的12月18日，终于医治无效驾鹤西归。我们为父亲守孝百日，从此，再也未能回到宫中。



老年裕德龄和丈夫怀特

在上海生活期间，我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熟识了很多人。渐渐地，我经过反思，也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宫廷生活的吸引力，依然还是不能消除欧洲生活对我的深刻影响。我的潜意识里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外国人，更倾向于接受外国的教育。而且，我也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毫无疑问，我注定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了。

我总是回想起我在太后身边的日子，那在宫廷深处度过的两年时

光，我那少女时代最宝贵的、也是最幸福的时光。

尽管在维新变革思维方面，我没有能够给太后更多积极的影响，我却依然抱有热忱的希望，那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中国的觉醒和自强，在世界强国之林里，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后记　天朝末世的侧影

许海峰

本书的作者德龄，笔名德龄公主，满洲汉军正白旗人，旅美作家。1886年生于武昌，在荆州、沙市度过童年及青少年时代。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起，随父亲裕庚先后出使日本和法国，且在法国巴黎留学。

当年民间曾有夸张的传闻，说德龄精通八国语言。从她的书中可以看出，这些传说未必真实，然其确实受西方思想影响至深。她回国入宫后，迫切希望能影响慈禧太后，支持中国的改革维新，让中国以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的想法顺应历史趋势，极具进步意义，与其父裕庚、光绪皇帝等人的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

1903年春，17岁的德龄随父回到北京，与妹妹容龄一起，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留作御前女官，同时担任慈禧太后的专职翻译，深得慈禧太后宠爱，后被慈禧封为郡主衔位。

1905年3月，德龄因父病重离宫到上海照顾。同年12月，裕庚卒于上海，德龄从此再未返回宫中。

1907年5月，德龄与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迪厄斯C·怀特结婚，德龄开始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清宫题材的文学作品。后随夫远赴美国定居。

1911年，德龄的第一部英文著作《TWO YEARSIN THEFOK-BIDDENCITY》出版，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阅读与品评的浪潮。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先生也读过此书，亦曾专门撰写英文书评，大为赞赏，广为推介。

Princess Der Ling



Princess Der Ling Assisting the Empress-Dowager of China Going Down Peony Hill to Her Palace. Photo Made in 1903 By Princess Der Ling's Brother.

First Lady-in-Waiting at the Manchu Court of Her Imperial Majesty, Tzu Hsi, the late Empress-Dowager of China.

Daughter of Lord Yu Ke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Japan, Germany, Italy, Spain, and Fran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Her Imperial Majesty's Cabinet, and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Chinese Statesmen of his time. Fulfilled two special 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accompanied by his daughter.

Educated in Japan, France, England, and America.

Studied dancing and dramatic art with Isadora Duncan and Sarah Bernhardt in Paris.

Author: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Old Buddha", and "Kow-Tow", (all published by Dodd, Mead), as well as numerous magazine articles.

Playwright and Actress.

A Princess Who Knows

By Thomas F. Millard

(The following is the considered estimate of an American who has lived many years in China and who, as editor of the China Press and as founder and editor of Millard's Review, knows China, her people, her politics, her strength, and her weaknesses as Mark Sullivan knows the United States. Thomas F. Millard has been a newspaper man and special writer since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in 1887. He reported the Boxer Uprising for the New York Herald, the Graeco-Turkish War for the London Daily Mail,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for the New York World. He was adviser to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to sess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1920-21-22, and to the Conference on Pacific Ocean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s at Washington in 1921).

PRINCESS DER LING has peculiar qualifications for her task. She is a daughter of Lord Yu Keng, a member of the Manchu White Banner Corps, and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officials of his generation. Lord Yu Keng entered the army when very young, and served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Formosan War with France, and as Vice Minister of War during the China-Japan War in 1896. Later he was Minister to Japan, which post he quitted in 1898 to becom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hinese Foreign Office). In 1899 he was appointed Minister to France, where he remained four years. At a period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reactionary, Lord Yu Keng labored indefatigably for reform. He was instrumental in reorganizing China's postal service on modern lines, but failed in his efforts to revise the revenue system and modernize the army and navy, from being ahead of his times. He died in 1905.

The progressive spirit of Lord Yu Keng was shown in the education of his children. When it became known that his daughters were receiving a foreign education—then an almost unheard-of proceeding among high Manchu officials—attempts were made to impeach him as pro-foreign and revolutionary, but he was not deterred. His children got their early education in missionary schools, and the daughters later attended a convent in France, where Princess Der Ling finished her schooling and entered society. On returning to China, she became First Lady-in-Waiting to the Empress-Dowager, and while serving at the Court in that capacity she received the impressions which provide the subject-matter of one of her lectures, as well as her book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Her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estim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markable woman who ruled China for so long was unique, and her narrative throws a new light on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ies of modern times.

The Princess speaks with authority and understanding and is, furthermore, a most interesting and unusual woman.



The Big Character is "Shou", Meaning "Long Life to You". It Was Written to Princess Der Ling by the Empress-Dowager. The Princess' Name and the Date Appear on the Sides.



We are honored to be her managers

THE AFFILIATED BUREAUS

Music :: Lectures :: Entertainment

Boston . Cleveland . Pittsburgh . Toronto . Chicago
Dallas . Atlanta . Portland, Ore. . Los Angeles . Calgary

美国报纸上刊登的裕德龄情况，以及托马斯·F·米勒德撰写的介绍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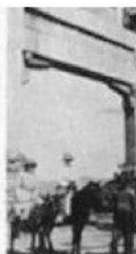
Vacationing at Tsing tao



At the Ming Tombs Princess Der Ling on Right



Showing Chinese How to Make Wool Socks During War



Entrance to Ming Tombs

Princess Der Ling in Pictures

Made in China from 1904 to 1918



On Sacred Turtle

Princess Der Ling's Lectures

"THE MODERN WOMAN OF CHINA"

This lecture will cover the period since 1911, when the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Manchus, and many of the old Chinese customs went into the discard. It will take up the great strides Chinese women have made since foot-binding went out, and since so many Chinese young ladies procured their educations outside of China, in England and America, taking back to China with them western ideas of "feminine emancipation", of which they had secured some inkling during a visit to China of Mrs. Catherine Chapman Catt.

"AT THE MANCHU COURT"

This will deal with intimate details of the Manchu Court, as far as possible using material which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her three books, and which is absolutely unknown to people who did not visit the court.

"CHINESE POLITICS OF TODAY"

Though a Manchu, Princess Der Ling is in sympathy with New China. This lecture will deal with the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since the Revolution: intimate word pictures of the various important moving figures now taking part in the government of New China; will deal with such activities as she believes to be mistakes and what she conceives to be the folly of trying too rapidly to change the soul of a country which has stood stil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t Tomb First of the Ming Emperors



On Camel in Great Wall



At the Summer Palace



At Peking Headquarters Red Cross, 1917



Princess Der Ling Atop the Leading Camel



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t Incense Burner Ming Tombs

美国报纸专版刊登的裕德龄照片集

后来，德龄的《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多部回忆录和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总字数达到七八十万字，使她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著名作家之一。这些著作

后来被顾秋心、秦瘦鸥等译为中文，在《申报》等媒体刊载，在中国人群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不幸死于车祸，终年63岁。

本书正是德龄的处女作与代表作。全书以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的视角，记述了作者在清代宫廷两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读下来，波澜不惊，客观真实，如一本少年笔记，非以故事或情节取胜，而如高手工笔画，深入细致地描摹了人物形象、皇族性格、宫廷礼仪、节日庆典、人情世故等等，从风云变幻暗流涌动，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涉及。有如她笔下所写的慈禧太后，有“母亲一般的慈祥”，又虚荣、多疑、爱窥伺、不自信、心思细密、对新玩意儿兴趣极高，在对作者袒露心声的时候，尽显其对不公平命运的偏执观念，对悲催经历的怨愤难平；她所描写的光绪皇帝，既郁郁寡欢又有少年之心，无力自主又心存不甘。这些人物都被作者刻画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德龄的描述力图真实朴素，避免了以猎奇性吸引人的低俗套路。德龄以当时自由平等的西方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人观念的落后保守；以客观的描述，很有主见的评论，令人信服。她给我们陈述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具象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不遮不掩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人们所认知的往往是教科书的历史，抽象的历史，平面的历史，闪烁其词的历史，可能仅仅简单化地将晚清宫廷定型为“没落”、“腐朽”、“阴森”、“险恶”、“自大”、“闭塞”、“勾心斗角”，将慈禧太后定型为昏庸暴虐，将光绪皇帝定型为屈辱哀怨等。

真正的历史，哪怕是早已尘埃落定盖棺定论的历史，都应该是这样一部“活”的历史，从而为后人留下更丰富的信息含量，更大的思考空间，更全面的思辨视角，更多的教益。可喜的是，德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她为摇摇欲坠的晚清宫廷注入了生活气息，注入了人情味儿，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末代王朝后宫的生活细节，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世界与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件。让读者对那个早已归为尘土的封建王朝有了直观的认知和深刻的体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末代王朝终被雨打风吹去，

而这本展示王朝历史侧面的书，得以留存下来。在全书十五万字空间里，读者可以读出的，是一个晚清宫廷的生活全景，足够了。

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力图最贴近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生活，保证翻译与原著的气息相连，气脉相通。例如，这本书里不同的场合下，什么人用“午膳”、何人用“午餐”；一句话上，什么人谦卑，什么人倨傲，什么人表面谦卑内心倨傲；女官之间相互嫉妒，说出来的种种怪话，什么人用什么语气，什么人持有什么姿态；慈禧太后怎样口是心非，李莲英怎样谦卑之下暗藏凶狠，袁世凯如何顾左右而言他，如此等等，均必须如自己写小说那样费心思揣摩，才能保证落在纸上的每一句话，更加精准到位。

我翻译这一本书，面对着另一种语言形态，耐下心来，字字揣摩，句句斟酌，有烦恼，有焦虑，更多是有趣。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取得最佳效果，我根据实际需要，广泛收集和研读清代的正史，野史，不间断地补充当时的历史知识。大到清王朝所处的世界格局，国家之间的争斗，小到女官的梳妆打扮，太监的抬轿姿势，丫鬟们的闲言碎语，都尽量搞清楚弄明白。与负责组稿的陶林先生，共同探讨、研究，互通有无，也各有增益。在书中，我对于一些不太为今人所知的风俗习惯等内容，适当加了一些译者注，对于原文行文不畅通的地方，亦略作一点过渡，便于读者参考和理解。

翻译的过程就是和作者对谈的过程，我也跟随作者到清代后宫走了一遭，再展示给国内读者，让读者朋友们在铺天盖地清宫戏那些人为的浓妆艳抹和刻意的机关算尽之中，窥见末代皇宫点点滴滴的真实存在，体味一番完全不同的味道。这多雨凉爽的天气里，我完成了本书的全部翻译工作，心情为之舒畅，雨打窗棂半沉醉，身居斗室乐逍遥。这个日子本身就值得纪念。

[1]裕容龄（1882-1973年），裕德龄的妹妹，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第一个学习欧美和日本舞蹈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曾亲自向现代舞蹈家鼻祖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学习过舞蹈的中国人。1902年，20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奥菲利亚》《水仙女》《西班牙舞》等舞剧，博得了观众的好评，引起了广泛关注。1903年回国后，裕容龄随母亲及姐姐裕德龄进入清朝宫廷，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曾获得慈禧亲赐封号“山寿郡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裕容龄被聘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著有《清宫琐记》等书。——译者注

[2]即三叩九拜之礼。三叩九拜：指封建社会进见帝王、祭拜祖先、祭祀时候所行的大礼。“三叩”、“九拜”各有其修真含义，“拜”就是自祭其身，把自己这一百多斤的身体祭献出来；“叩”就是顶礼恭敬。《周礼·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译者注

[3]农历四月初八是古代的浴佛节，亦称洗佛节、佛诞节和龙华会。这一天，老北京盛行舍豆结缘的习俗。佛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前世结下的缘分，即“有缘千里来相会”之意。因为黄豆是圆的，“圆”与“缘”谐音，以“圆”结“缘”，其非凡意义人所共知。浴佛节便由此有了吃豆的习俗，此习俗起于元代，最盛于清代。上至宫廷下至寻常百姓家，都有此风俗。清宫内每年四月初八，都要给大臣、太监以及宫女们发放煮熟的五香黄豆。——译者注

[4]满族的发式讲究是在脑后的正中间，梳出两个尖角燕尾形扁发髻，垂于脑后，被称作“燕尾”。——译者注

[5]站笼，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盛行于清代。犯人站在特制的木笼里面，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犯人受到痛苦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犯人是先站而后斩，有的则是活活站死其中。站笼之刑在惩罚犯人的同时，将其示众，以起到警示、威慑的作用。——译者注

[6]此处所提到之人为裕勋龄，裕庚的次子，裕德龄的哥哥，算得上慈禧的御用摄影师，慈禧太后的很多传世照片都是出自他手。——译者注

[7]作者此处所说之乐器“木虎”，实名为敔[yǔ]，又称楬，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常在乐队中使用。敔为木制，形如伏虎，背有锯齿形薄木板，以一支一端劈成数根细茎的竹筒，逆刮虎背的锯齿演奏，它一般代表一段乐曲的终结，用于宫廷雅乐。——译者注

[8]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等。乞巧节传统庆祝活动很多，有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喜蛛应巧、为牛庆生、拜织女、拜魁星、吃巧果等等。其中，投针验巧风俗是明清两代盛行的七夕节俗，古代书籍多有记载，如：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

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译者注

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一个英国传教士的晚清轨迹。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英]李提摩太 著
陈义海 译

亲历中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著者：（英）李提摩太

译者：陈义海

责任编辑：郝鹏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东行使徒的一生

原序

第一章 早年生活

1.我的童年

2.求学

3.教学

4.在西哈维津神学院的经历

5.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教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1.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2.抵达中国

3.芝罘的传道同工

4.首位皈依者

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6.效果不佳的街头布道

7.回龙山庙会

8.尝试在宁海定居

9.拜访一位虔诚寻求真理者

10.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惊人之文

11.济南府武官的洗礼

12.济南府的首位新教传教士

13.克罗赛特的“悲剧”

14.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

15.和布朗医生经历的奇特行医之旅

16.附魔

17.黑羊和白羊

18.二访济南府
19.中国北方的路及出行方式
第三章 定居青州府
1.初识李鸿章
2.在青州府的医疗工作
3.入乡随俗
4.租住房子
5.一个仇视外国人的退休官员
6.研究本土宗教书籍
7.拜访一个教派领袖
8.善良的村民们
9.道观里的午夜妇女集会
10.拜访一位隐士
11.最初的皈依者
第四章 山东赈灾
1.粮食绝收
2.劝老百姓向上帝求告的海报
3.饥荒引起的骚乱
4.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5.发放救济钱的方法
6.第二次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7.就避免未来的饥荒向巡抚建言
8.来自烟台的捐赠
9.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
10.我的传教策略被倪文思博士采用
11.赈灾期间的一件事
12.来自港口城市的捐款
13.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14.与官员交涉
15.追求与拯救
16.虚伪的官员败在女人手下
17.残酷的冬天

18.与官员和文人一起发放救济款
19.同事A.G.琼斯先生的到来
20.就避免饥荒向当地官员提出建议
21.教会工作
22.给浸礼会协会的一封信
第五章 山西赈灾
1.决定赴山西赈灾
2.太原府之旅
3.会见山西总督
4.给天主教神职人员发放问卷调查
5.1878年考察山西灾区日记选
6.交通困难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斯和特纳
8.在赈灾中与中国官员的合作
9.给总督的建议
10.给浸礼会的建议
11.给新教差会写建议信
12.希尔、特纳和怀廷的到来，以及怀廷的去世
13.发放伦敦市长官邸赈灾款（1878）
14.内地会女士们的到来
15.与马丁小姐结婚
16.冬天里的赈灾工作
17.中国人对外国人救灾的感激
18.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
19.新教的传教工作缺乏组织性
20.传教小册子疏远了非基督徒
21.消失的基督徒
22.吕洞宾
23.在108个县发放福音书和传单
24.乡试年的有奖征文
25.郗牧师
26.与李鸿章会面

27.斯科菲尔德博士以及其他内地会人员的到来
28.令人遗憾的分裂
29.基督徒传记
30.帮助山西人民的一些非常规措施
第六章 在官员和学者间的事工（1881—1884）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3.给官员们做演讲
4.拜访王知府
5.与儒生同居一室
6.会见左宗棠
7.友好往来
8.中国音乐
9.与佛教徒交往
10.参观五台山
11.张之洞
12.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3.山东之行
14.在青州患疟疾
15.为收获的感恩祷告
16.山东的新教会
17.J.S.怀特莱特的事工
18.与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纷
19.在回山西路上遭遇劫匪
20.斯格菲尔德医生的去世
21.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22.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所受的逼迫
23.与詹姆斯先生一起去北京（1884）
24.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25.著名的朝鲜反基督教宣言
26.罗伯特·哈特的改革计划
27.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28.对山西传教事工的建议（1884）
第七章 第一次休假（1885—1886）
1.沿海之旅，会见A.G.琼斯
2.跟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1884）
3.发现《大乘起信论》
4.归国途中遭遇风暴
5.浸礼会年会
6.请求更多的同工
7.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1885）
8.方案被否决，极度失望
9.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部长
第八章 艰难忧患的一些年月（1886—1891）
1.与耶稣教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2.理查德夫人患病
3.来自同工们的反对之声
4.离开山西
5.拜访在天津的李鸿章
6.理查德夫人的学生
7.曾纪泽爵爷
8.拜访大喇嘛
9.拜访寺院大方丈
10.应邀赴山东事工
11.在山东染上热病和麻痹
12.委员会拒绝了兴办学校的方案
13.开办中文报纸
14.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会
15.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第九章 在上海广学会的事工（1891—1894）
1.威廉姆森成立同文书会
2.广学会的其他同工
3.第一个工作计划
4.扩大影响的计划

5.中国政府对我们事工的肯定
6.慈禧太后寿诞的寿礼
7.中国公学与反缠足会
8.蓝姆波特·瑞兹先生的事工
第十章 中日战争期间的见闻
1.中日战争
2.我们的出版物在战争期间的影响
3.中国书商态度的转变
4.南京的冬天
5.第一次会见张之洞
6.第二次会见张之洞
7.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8.第三次面见张之洞
第十一章 代表教会进京上书
1.上书委员会
2.第一次会见李鸿章
3.后来与李鸿章的会见
4.拜访总理大臣
5.拜访恭亲王
6.11月14日，惠里博士和我呈递传教士请愿书
7.请愿的障碍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运动（1895—1898）
1.康有为
2.强学会
3.我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
4.帝师孙家鼐
5.会见张荫桓
6.军机大臣刚毅
7.告别翁同龢与李鸿章
8.维新变法始末
9.中国女学
10.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书

11.改革派经受的首次打击
12.担任皇帝的顾问
13.保守派政变，康有为出逃
14.遇害的改革派
15.其他改革人士的命运
16.皇帝的逊位诏令
第十三章 天台山纪行
1.规模宏大的宗教中心
2.渴望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3.奇特的迷信风俗
4.杭州的寺庙
5.出产师爷和美酒的绍兴
6.避免了一场无谓的骚乱
7.中国最大的佛像
8.深山访隐士
9.华庭寺
10.庆国寺与国清寺
11.关帝生辰、楚王庙
12.一个伟大的处方
第十四章 二度休假（1896—1897）
1.与李鸿章结伴旅行
2.访问马德里
3.印度之旅
4.德里
5.巴黎
6.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7.向宗教书刊学会的其他呼吁
8.其余工作形式
9.参观加拿大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
1.访问北京
2.排外情绪的蔓延

3.刚毅组建的团练组织
4.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5.在华盛顿和纽约呼吁
6.回到中国
7.周馥采取的行动
8.与庆亲王及李鸿章会面
第十六章 创立山西大学
1.建校的缘由
2.我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章程的反对
3.巡抚的友好态度
4.1907年重访太原府
5.辞去名誉校长的职务
6.巡抚岑春煊
第十七章 变革中的中国
1.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诏令
2.访问朝中官员
3.被清政府委任为新教的代表
4.樊国梁主教
5.在中国建立公学
6.访问日本
7.丧妻之痛
8.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9.在山东召开掌门人大会
第十八章 宗教复兴运动
1.威尔士宗教复兴大会
2.浸礼会的世界大会
3.在兰贝斯宫招待中国使节
4.J.B.帕顿博士
5.上海的纪念大会
6.浸礼会代表在中国
7.穆德博士在中国
8.爱丁堡大会上的永久委员会

第十九章 大乘佛学
1.佛教的研究
2.洛宜德教授
3.日本引进佛教
4.戈登夫人的研究
5.访问高野山
6.基督教与佛教在仪式上的相似之处
7.参观朝鲜佛教寺庙
8.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9.出使天国
10.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11.大隈重信伯爵
12.北京的日本银行里的一次晚宴
第二十章 晚年时光
1.访问朝鲜
2.孙逸仙（孙中山）的早期生涯
3.爆发革命
4.袁世凯的举措
5.与毛拉会面
6.上海的宗教会议
7.在山东召开的英国浸信会大会
8.泰清宫
9.乘坐木筏返回青岛
10.湖南省会长沙
11.1914年的出行
12.与佛教徒和教育工作者的交往
13.我的第二段婚姻
第二十一章 我与和平运动
1.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2.“人类的议会”
3.给河野公爵的建议
4.庆亲王

5.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卢塞恩的和平大会
7.万德尔勋爵
8.拜访罗斯福总统
9.中国的态度变卦了
10.与伊藤公爵的会面
11.卡耐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2.仲裁协定
13.欧洲大战
译后记
沟通中外文化的宗教使者
返回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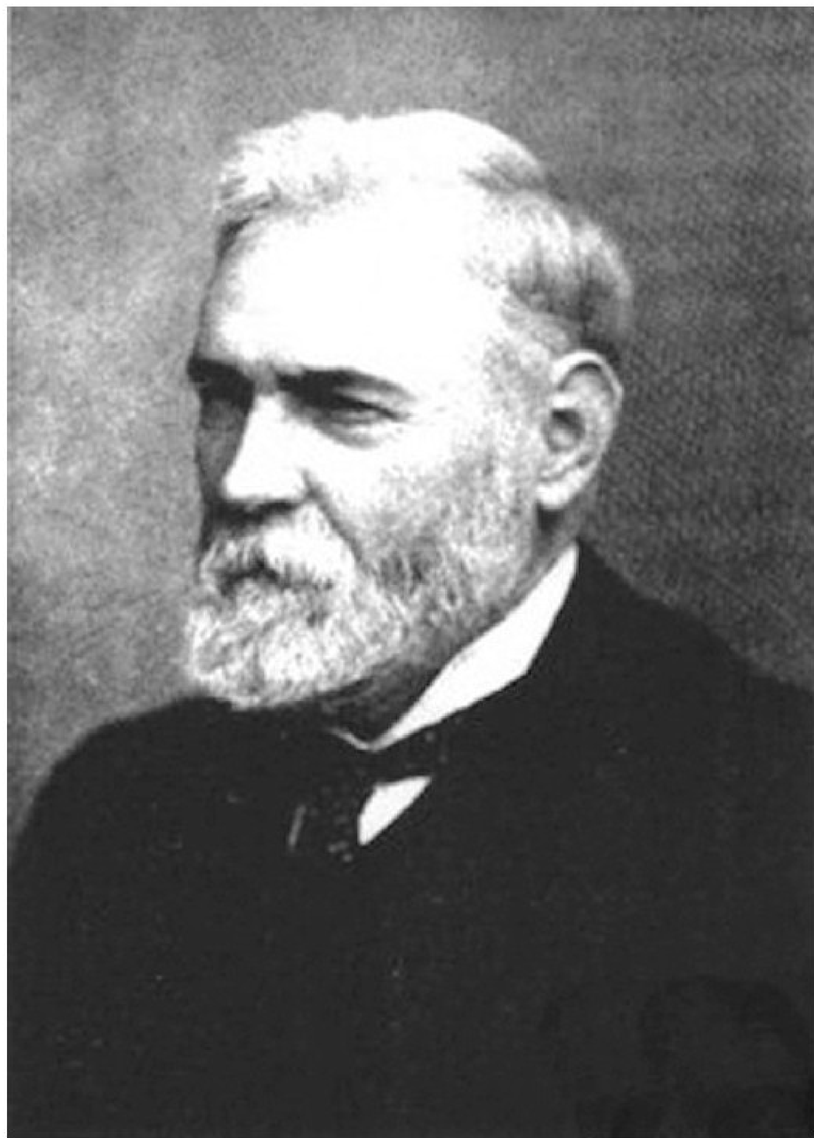
序言

东行使徒的一生

陶林

1871年夏天，大清国东北的某处旷野，有两个响马（土匪）劫下了一辆马车。他们甩着马刀吆喝着，让车里的人滚出来。很快，有一个高大的欧洲青年从马车里走出来。两个土匪从未见过西方人，他们被吓傻了，以为大白天遇上了鬼。他们立刻骑马走人。但不久，他们又带着一股人马杀来了——他们太好奇了，想回来看个究竟。

那个欧洲青年驾着马车并未走远。土匪们很快包围住他。好在土匪头子见多识广，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洋人”存在。他大胆上前，挥刀问那个欧洲青年，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生意的呢？”那个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来回答：“我从英国来，是来卖书的。”那个头目便又问：“卖的什么书？”那个欧洲青年便说：“是劝人行善的书。”他边说边搬出了一摞《圣经》，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们诚信向善。我分文不取也可以，送给你们。”他微笑着把书送给土匪头目，但是土匪头目连忙摇头，说自己不认字。出于对知识人原始的敬畏，土匪们放过了这个要送自己书的洋人。



李提摩太侧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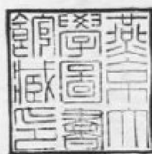
这个力图把《圣经》推销给土匪的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怀对古老中国的向往，年轻神学士李提摩太来到了中国。在来中国的轮船上，他学了中国二百一十四个汉字部首，开始了用大半生来成就的中国之旅。

燕京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學士畢業論文

系主任 齊思和
院長 周學章
導師 洪業 評閱

黎秀偉 學號三五一六三
民國三十年五月

李提摩太先生傳



民国时代所著的李提摩太传

在李提摩太到中国不多久的1876年到1878年间，中国北方滴雨未下，干旱带来了严重的饥荒。这就是晚清历史上凄惨无比的“丁戊奇荒”。饥荒蔓延，很多人开始吃树叶，也有人开始吃死人，而积贫积弱的满清政府却无计可施。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开始在上海的

英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口岸及本土的外国慈善团体赈灾捐款。很快，李提摩太就筹集到大量的救灾款。

在蜂拥的救荒潮中，李提摩太记下一段非常引人深思的故事：“为了避免人员踩踏伤亡，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成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一个不易除掉的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1877年，山西的灾情严重超过了山东，受上海教会赈灾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在途中，他见到了最惨绝人寰的景象，到处是死尸，倒在路边任野狗撕扯。这令他大为哀恸，开始在英国筹集善款赈灾。他共筹得六万英镑，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李鸿章派兵押往山西。途中，他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间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傻洋鬼子的，便深感到，拯救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拯救他们的肉体一样重要。

人到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李提摩太吸取了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更专注于跟当时中国的高层统治者打交道。通过影响诸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岑春煊、周馥这些高官，乃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来实现对中国的改变。

李提摩太开始融入中国，穿着中装，吃着中国菜，并尽量缩减个人的开支，购买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投影仪、手动发电机……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人的灵魂。他开始在各地的官绅中进行讲演，努力让中国有知识的人对西方的科学感兴趣，以便启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同胞谋利，免受贫困的压迫。同时，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全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中国维新变法的幕后总策划。我们后来所知维新变法的若干纲领性建议，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些建议在1905年及以后的光阴中，逐一变成了中国的现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支持义和团的山西巡抚毓贤，蛮横地烧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其中甚至有妇女和孩子。历史风暴过后，晚清史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产生。而山西的这桩惨案，各国全权委托李提摩太出面与李鸿章商议处理这件事。李鸿章主张赔款了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生中最亮丽的建议："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而罪行又必须得到惩罚，那我们就来建一个学校，用教育来惩罚迷信和无知。"

他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这便是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正是凭借这所大学带来先进文明，山西得以在民国时建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模范省。而李提摩太处理这一事件的胸怀，又给各国树立了榜样。不久，美国政府在传教士明恩溥的主持下退还了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四年了。正值李提摩太七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给他写了一封信，盛赞他的一生："你的许多朋友今天都在感谢主，感谢他把你的心带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将各种潜在的、未知的力量释放出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改变，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改变。这种努力如海上行舟，如雄鹰翱翔，你的努力为后人打下了基础。"

1916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回英国养病。在他的家乡，忙于战争的人们，没人知晓这位老教士一生的故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平息了下来。深感于欧洲已陷入堕落的李提摩太，买好了船票，准备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并决心就此终老于中国。可惜未能成行，他便因为老病在故乡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影响中国至深，却一直为西方和中国都忽略了的传教士自述平常的一生。当我们跟随着李提摩太的叙述进入那段历史，进入晚清风云流转的四十五年光阴，我们会收获无尽的启迪、感动、沉思与反省。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乃至完全颠覆

我们对历史的成见。但这其中，首先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信仰、怜悯、热爱、宽容与无畏，与一个古老帝国共度夕阳之垂。感谢博学的陈义海教授辛勤的工作，他为这部回忆录所做出的严谨工作和所有付出，让我们充分体味到这位东行使徒的真诚而热爱的一生，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一生。

原序

正如我在四十五年前在中国所发现的那样，摆在来华传教士面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灵魂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挽救他们的肉体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以每年四百万的速度在消亡。同时，还必须解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女人的裹脚还要扭曲；还必须将他们从一种哲学和习俗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们已经影响了许多个世纪，并使这个民族可能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可怕的习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接受教育——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的光芒的照耀，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幸哉，传教士们给这个民族的政治界、宗教界的领袖所带来的正是这种福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经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最终相信了我主的福音，可是，大多数人由于太无知、偏见太深，终无行动。这样，文明古国中的一个，或者说，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民族当中的一员，便陷入革命与无政府状态的泥潭，而它要摆脱这种状态需要很长时间。

本回忆录是一系列值得赞许的努力的告白，这些努力是要引领中国的精神领袖们走向上帝的国度，引领他们通向一种应许：现世福祉百倍，来世生命永享。这些努力意味着不拘一格地提升和欧洲一样大小的整个中国，其途径是：推行更好的宗教、更好的科学、更好的交通、更好的国际贸易，建立现代学校和学院制度，创办现代出版业，创建新型的工业与制造业。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有一臂之力，这从我的这些回忆中可以见到。

对于那些为拙著提供过帮助的各界人士，我深表谢忱——

感谢我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感谢她记录我的口授，并将

文稿整理成出版格式；感谢希尔达·C.波塞尔小姐，感谢她不辞辛苦地收集本书照片，并为整个文稿打字；最后，要感谢浸理会总部的秘书W.Y.弗勒顿牧师，是在他的要求下我才写出这部回忆录，还要感谢他帮我修订整个书稿。

李提摩太

1916年1月于上海

第一章　早年生活

1.我的童年

1845年，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福尔迪布莱宁的小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威尔士的凯尔马尔森郡，它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的山谷”。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起初是位铁匠——与我祖父一样，不过后来开始掌管农场。

我的父亲被誉为整个地区最风趣的人之一。他是伯特利与撒冷两地浸礼会的执事及秘书，经常充当敌对政党间的和平使者。我的外公是一名雷特尔克村的农民，也是拉尼比特尔附近亚伯度阿尔村的浸礼会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莉诺雷特尔克（Eleanor Llethercoch），著名的威尔士牧师吉尔斯比琼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称道的人’中，他再未见过谁像她那般为人诚实性格温和，而且她的煎薄饼手艺也是无人匹敌的。常回想起当有人冤枉她或说她坏话时，她只说：‘好吧，这么做对他们的坏处比对我的更大。’”



李提摩太头像

1858到1860年间，复兴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席卷了美国、北爱尔兰、苏格兰、挪威和瑞典。在这次运动中，即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缴械投降，皈依了基督教。一些人宣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河里受洗，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久之后，在一次并非特别涉及传教的讲道中，我第一次有了献身传教工作的念头。那次讲道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服从胜过祭献。"[1]从撒冷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约书亚，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似乎有个声音命令我去外国传教。他听了有点惊讶，因为他心中从未有过这种念头。

2.求学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公理会办的，就建在属于我父亲农场坦耶斯盖尔的一块地里。我在这里一直读书到十四岁。我十五岁时，父亲希望我能来农场帮助哥哥约书亚，但母亲和几个哥哥却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只要再支持我读一年书，以后就不用帮助了。于是他把我送到约二十英里开外，一个叫做十字客栈（Cross Inn）的地方，在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就读。除去日常课程，我还要和小学教师一起参与额外的课程，并且学习首调唱名法等音乐知识。年末，校长收到来自潘尼格罗斯（Penygroes）的学校需要教师的申请，他便派遣我去了。

这所学校在矿地上，我不仅白天要教小孩子，晚上还要给矿工们开夜校，有些矿工的年纪足以当我父亲了。有了上课挣的钱，我能够为自己支付一所在拉尼比特尔的语法学校的学费。语法学校的校长一有事外出，就会让我来管理学生。学校附近的人们常说他们总能知道是谁在上课，因为孩子们在我上课时要守规矩得多，也安静得多。一想起这点，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取得一些谅解。

往南几英里有个叫新客栈（New Inn）的地方，那里的校长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学校，去他处谋职。于是我被派遣立马前往新客栈担任临时校长。当天下午，那里的孩子们也被告知学校第二天早上会照常开放，只不过换了一位新老师。离开新客栈时，我已有经济能力支持自己进入一所天鹅海（Swansea）的师范学校。

我没在师范学校待太久，因为家中农场的哥哥约书亚打算冬天去

学校上学，便要我到农场代替他干农活。我熟悉各种农活，无论是耕地、割草、挖渠道，还是修剪篱笆、盖稻草堆。看到我返回农场，邻居们都说我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只得回来干农活，真可惜呀！

3.教学

然而有一天，我最年长的哥哥大卫给我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则康维尔艾乐维特（Conwil Elvet）资助学校招聘校长的广告。而哥哥约书亚愿意回农场干活，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的话。递交应聘申请后，我得到一封回信说有六十个人在我之前申请了。又过了一星期，我收到第二封信，通知说六十个人中只有两名合格的申请者，即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和我。几天后我收到应聘成功的通知。我并不认识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非常惊喜。可是我到那儿时才知道当地一名堂会理事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而他的儿子和我在天鹅海是同班同学。牧师的儿子没能获得职位在当地引起极大反感，许多父母接走了自己的小孩。因此我开始教书时，只有二十一个小学生。不过十八个月后，三所乡村小学因招收不到学生被迫关闭，而我却有一百二十个学生了。



李提摩太青年时期像

我给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开办了《圣经》研读班，每星期花一个晚上为他们讲解保罗的生平。他们非常喜欢以至于请求每晚都上这门

课。我没有答应，不过研读班还是经常上课的。我离开那里不到一年时，每个听课的人都加入了教会。

4.在西哈维津神学院的经历

接下来我成为潘布洛克郡西哈维津（Haverfordwest）神学院的学生。有个亲爱的同学叫西维斯（Chivers），考试成绩公布时，他的名字和我的总是靠在一起。神学院一毕业我们便彼此分别，后来的近三十年里各自忙着发展自己的工作直到1897年才偶然相见。当时我正在返回中国的路上，途径伦敦时听闻一个浸礼会的互助会在一所教堂举行会议。作为一名完全的陌生人，我去了那里听取工作报告。

会议开幕后，主持人说道："很高兴看见西维斯博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都乐意知道他在芝加哥的工作进展。"主持人话毕，一位正好坐在我前方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向我们说了他正通过办一份期刊来努力使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联合为一个浸礼会肢体，以改变一个国家里两个独立的浸礼会的局面。

等他回到座位，我的手放到他肩上并问道："你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经过打量，他认出了我，便马上起立对主席说现场有一位他在威尔士时的亲密同学，已在中国传教近三十年，他相信大会成员会乐意听我说一番话。于是我走到讲台，向听众简短叙述两个来自威尔士偏僻小地方的同学受到上帝大能的召唤从而领导传教工作——西维斯博士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浸礼会的年轻人，而我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众学生中做工。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领悟到不要轻视渺小的事物，因为如果上帝愿意，从中也能生出伟大的结果。

5.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教

1866年兴起了一场向中国传教的运动，这注定在传教工作上起着深远影响。这是传教运动向中国内地的首次起航。那时戴德生

（Hudson　Taylor）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被称作《不定期报》，他在其中阐释了他的传教原则——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相信上帝会用特殊带领来回应我们的祈祷，而非通过出发传教前的特殊学习；乐意到内地传教；着当地服装；住当地房屋；吃当地食物；并做好一生奉献自我的准备，而非一生在口岸享乐，尽管一些别的传教士会沉溺于此。

这一传教运动在浸礼会传教会中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1868年，我听到金尼斯夫人（Mrs.Grattan　Guinness）为中国内地传教事业的声援时，被这一极具英雄气概和自我奉献精神的计划吸引了。

那时正值我将从西哈维津神学院毕业之际，我决定加入他们。不过因为我属于浸礼会，他们便推荐我向浸礼会传教会提出申请。我提出了申请，并渴望被派至中国北方。当浸礼会传教会委员会询问我为什么想去中国北方时，我回答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中国人皈依后可以将福音传到较为落后的国家。欧洲人在北方地区传教，也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并且中国北方人成为基督徒后，能使整个帝国的国人皈依。

起航前的最后一刻，他们又问我能否保证十年内不结婚。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还没考虑过太多结婚的问题，只是觉得带着妻子进入内地是危险的，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就像非洲野外一样鲜有人知悉。于是我答道我是在十天内还是十年内结婚都由是否利于传教工作而定。结果我是九年后结的婚。



来华传教的教士一家三口

1869年春，浸礼会传教会接受了我去中国传教的申请。潘布洛克郡一个我常去讲道的教堂里有个人名叫瑞斯（Rees），他总是载着我回到离教堂十五英里远的西哈维津。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好友，听到我要去中国传教很受感动。我们的友谊如此真挚，他们只要有钱就会和我分用。我们在无声的泪水中告别。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1.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将乘坐“霍尔兹蓝烟筒”航运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启程。就在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了。不过由于它深度不足以让大吨位的船只通过，我们只得绕过好望角航行。行至毛里求斯时，船长惊讶地发现由于一场地震，上次经过还是港口深水区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人们曾一度认为毛里求斯是世界上最有碍欧洲军队健康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死亡率极其的高。然而我们到了那里却听说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死亡率也很低了。调查变化的起因时，我们发现以前的兵营建在低地上，而重建的选址在一座山顶。在这里士兵们就可以远离导致他们伤亡的疟疾——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潮湿地方的蚊子滋生的。

2.抵达中国

在香港时，后来成为主教的慕稼谷牧师（Rev.George Moule）登上船，他从英格兰度过首次休假刚回来，便和我们一起去上海。他为欢迎我来中国而表示出无与伦比的友善。我对他说有人建议我路上不要尝试学习中文，因为不同地方的发音差别太大，并询问他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他对此完全赞同，不过补充说我可以学习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二百一十二个部首，它们是解开组成书面中文的象形谜团之关键。到达上海前，慕先生给我进行了部首测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Mr.Thomas）从前属于伦敦传教会，后成为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牧师。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我，并坚持让我搬到他家。我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4日前往芝罘（今烟台）。2月27日我到达芝罘，受到同事劳顿先生

（Mr.Laughton）的热烈欢迎。

1860年，各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之际，芝罘、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首批开埠港口。数个在上海和宁波的传教会移往北方，部分原因是对那里的气候更适应，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这之前，一个中国传教会曾以上海为中心在华中地区传教，但因其资金困难，好几位成员申请加入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他们中间的霍尔博士（Dr.Hall）、荷兰籍传教士古路吉先生（Mr.Kloekers）——他是在刚果传教的霍尔曼·本特雷夫人（Mrs.Holman Bentleyofthe Congo）的父亲，在首次申请获批的人之列。1860年，浸礼会传教会决定在芝罘开办一个传教站，并派霍尔博士和古路吉先生前往。

曾经是传道会成员的戴德生先生也申请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我记得是在有五名同工的条件下。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戴德生先生便决定建立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当我到达中国时，浸礼会传教会已遭受数次打击。抵达芝罘不到一年，霍尔博士就在照顾霍乱病人时受感染而去世，而古路吉先生很快离开去了英格兰，另外两位麦克梅辰先生（Mr.Mc Mechan）和金顿先生（Mr.Kingdon）一两年后也受遣回国。接受我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时（1869年），在华七年的拉夫登先生（Mr.Laughton）是该会仅存的代表。他拥有天生的才能与罕见的奉献精神。不幸的是，我很快就失去了听取他有益建议和宝贵经验的机会，因为他患上斑疹伤寒于那年六月去世了。

3.芝罘的传道同工

当我到达芝罘时，已有数位能力卓越的人在那里传教。法学博士韦廉臣牧师（The Rev.Alexander Williamson, LL.D.）在伦敦传道会开始了其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一道乘船来到中国，首站停留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效率惊人，不到十二个月便用中文写了一本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也为过度劳累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累垮了身体不得不返乡。之后他又回到中国，不过是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

表，当芝罘开埠后停留在此。他周游了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部游记，为此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体力、智力及灵性的力量都非常充沛。之后他出版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及《基督生平》两部精彩著作。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他在中国人中建立了同文书会。1891年我在他之后接任该会督办。

美国长老会差会[2]的倪维思牧师（the Rev.John L.Nevius）是一位尤为杰出的同伴。当我前往新开埠的芝罘时，他已在宁波和杭州生活数年。1890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宣教大会，他当选为美国组主席，而李修善牧师（the Rev.David Hill）出任不列颠组主席。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郭显德牧师（the Rev.Hunter Corbett）在上海登上了韦廉臣牧师乘坐的那艘船，结果在山东成山角遭遇船只失事。船上一人描述此事时笑称他们是“在海中着陆”。郭牧师是名不知疲倦的传道人，跑遍了山东东部的每个地方。

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牧师（the Rev.Calvin Mateer）是在中国传教工作中进行科学教育的伟大先驱。他造访了芝罘，并用携带的一大组仪器作了一次关于化学的有趣演讲，而我作为他的助手协助示范。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伟思、郭显德和狄考文——说他们工作的收获比他们的花费要高十倍也是很公道的。

美国南浸信会的海雅西牧师（the Rev.J.B.Hartwell）极具礼仪之魅力，很早便获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及信赖。当他生活在滕州府时，太平军来袭，关闭城门将一些城民留在了城外。只有海雅西牧师顺利说服此城官员打开城门放那些城民进来。



与满清官员打交道的传教士们

罗伯特·利雷先生（Mr.Robert Lilley）是韦廉臣牧师在苏格兰圣经会的助理，在明恩溥牧师（the Rev.Arthur Smith）到来前，他是中国最诙谐机智的外国人。几年后他去了纽约协助《世纪词典》的出版。经过纽约时，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他一面。一位活泼的银发女士说他去苹果城（Appleton）协助完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他在这儿时，我们努力想把他变成共和党，”她说道，“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立宪要好得多。”他于1914年逝世。

4.首位皈依者

在拉夫登先生的葬礼那天，葬礼在墓地尚未结束，刚到的一艘汽船上开出的鸣炮声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马上赶到驻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船长带来了天津屠杀的噩耗，法国领事及其夫人，还有二十一名慈光会修女遇难。据说各个港口将会掀起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动乱。为了抵抗动乱，一支志愿防卫队迅速组织成立，我也参与其中。我们连续几日看守驻地，以防当地的中国人袭击。

自从同事去世，英国浸信会传教会的责任全部落在其在华唯一代表——我的肩上，为此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语言以便尽快将其掌握。只身一人，形形色色的经历就是我的唯一向导，我从中摸索今后走怎样的道路，以及避免错误发生。

在接受第一位皈依者加入教会前，我给他上教理课时问道："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吗？"

他忧伤地答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我知道我是个大罪人。"

这个诚实的答案连同我那愚蠢的问题给了我一击，同时我也发觉这个人在精神上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此后我再没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经历颇有意思。数年过后，满洲长老会传教会的罗伯斯顿先生（Mr.Roberston）在属于他传教范围的阿穆尔河（黑龙江）附近开设一个新的传教点。一天，从附近地区来了一个男人到教堂，并且告诉牧师他是基督徒。

"你属于哪个教会？"

"浸礼会。"

"谁带你加入教会的？"

"芝罘的李提摩太。"他给出了我的中文名。

"你在这个乡村多少年了？"

“十九年。”

“你们村上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有了，只有我和我家里人是。”

罗伯斯顿先生比较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在非基督徒中生活，没有牧师或传教人的拜访和帮助，要保持信仰是不可能的。本地牧师提议应该让这个人做一次祷告，从他的祷告中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辨别出他是否是基督徒。这个人投入到祷告中，而他们的所有怀疑就都消失了。他热忱的祈求是他每天都和主交流的明证。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出色的当地人做助手。他姓程（Ch’ing），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文职，在拉夫登先生那里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在芝罘的早些年里，他的工作由曼切斯特的格罗斯温浸礼会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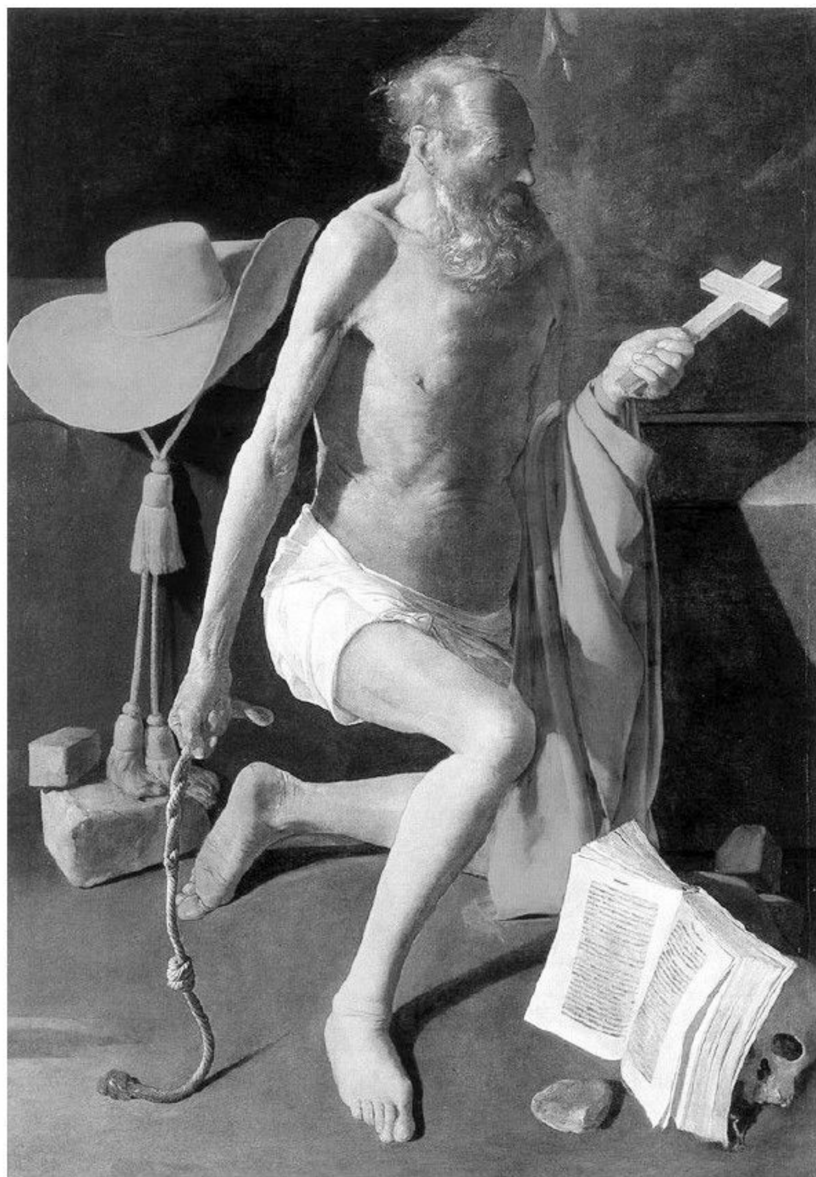
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1871年我作了五次旅行，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就在芝罘附近，而第五次却是六百英里以外，从满洲到朝鲜。这次的同伴也是罗伯特·利雷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了解很少，每次游人想进入朝鲜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惊险，在朝鲜差点就没逃出追捕。

（1）恐怖的船只失事

第一次惊险与一次恐怖的船只失事有关。在猛烈的南风刮来前，我们乘一艘德国帆船，从芝罘到牛庄，这是那时唯一开放的满洲港口。次日早晨的黎明，我们突然跌下了铺位，原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身处浅水里，每一个巨浪打来，船底就剧烈地颠簸。大厅里的大镜子摔倒在地板上，成了成千上百的碎片。船长把航海图铺在桌上，颤抖的手里拿着指南针，说道：“去年我损失了这艘船的两条桅杆，这回整艘船都要不在了。我们在这儿。”他指向图上河口南部的一个地

方。我们出主意说因为那场狂风，船可能比他预想中行驶得快，而且我们一定是在河口上方的浅水里，那么如果我们向西南方抢风行驶，很快就会到深水里了。他这样做了，于是我们安全到达牛庄，只不过船的铜复合板有点受损。



（2）中暑

我的下一次惊险是出于我们对气候的忽视。七八月正值雨季，洪水和泥污致使道路无法通行。虽然我们走的是与满洲首府相连的主要干道，还是被迫等了两个星期，才租到马车开始前往奉天的冒险之旅。我们终于有了三辆马车，各配两头骡子，除了我们和两名中国仆人的座位，车里载满了福音书和小册子。行将出发的那天，我得了严重的头疼。华生医生（Dr.Watson）因担心我轻度中暑，极力劝阻我休息一天再动身。但是由于等待马车已经耽误了两星期，我决定马上出发。我的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不能乘坐颠簸的马车，也不能睁眼，光线照在眼睛上像被柳叶刀刺着似的疼。我的朋友利雷让我靠着他的胳膊，那天我们跋涉了三十里（一里差不多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晚上到了牛庄城，白天的旅途让我的头更难受了，于是他们决定给我服一剂鸦片酊助我入睡。我们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不幸的是药品用量说明书没带。应该滴多少药，我们记得不一样。利雷建议我多服一些，他是目前的医生，于是照他说的做了。我很快入睡，醒后不觉一丝头疼了。多年后，我在《柳叶刀》杂志上读到中暑的最佳疗法便是服用一大剂鸦片酊。所以我们那时真是碰上了最佳治疗法。

为防止再度中暑，我在头上系了一个枕头，因为这是良好的绝热体，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依照欧洲观念，我这样的装扮是好笑的。然而中国人并不在意我的头饰，恰恰相反，他们倒是特别注意利雷的头盔。“看呀，那人头上戴着个痰盂！”他们喊道。

（3）强盗

在满洲的第三次惊险是乡间治安太差引起的。离开奉天向东前行时，人们告诉我们乡间有成群的强盗。一个午夜，我们居住的小旅馆响起很大的敲门声，是一些车夫叫旅馆老板开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本住在前面那家旅馆，一伙强盗闯入，惊恐中他们带着骡子逃出，车子和货物都留给了强盗。

次日我们的中国仆人听闻了这则消息，他们很害怕，想回芝罘去，不过发现我们已决心前进，便因着荣誉感没有离开我们，尽管我们给他们提供回去的路费。这以后我们把钱分成几份，如果我们中有人遭抢，其他人还能剩下一些钱。分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中国流通的银钱按“锭”计算，每锭约莫拳头大小，重五十两或者说六十六盎司。这样一个银块得送到铁匠铺，烧得通红，然后切成一二盎司重的方块。我们把这些方块缝进衣服的各个角落。作好防止被抢的准备后，我们那天出发得比较晚。

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备着长矛或肩扛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侧的路在一个山谷前行，警惕地留心四周。突然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在这儿！”我们看到前面河的左岸有一些帐篷，十一个骑马的人走向我们打算留宿的小旅馆。发觉到达旅馆前会被他们截住，我们便转道走向刚刚经过的一个农庄。我们在大门前看到一位大概六十岁的老妇人，便问她我们能否驾驶马车到农庄里，直到强盗离开。她是一个高尚的人，邀请我们立刻进来。“我有些人在田里收割，我让女儿叫他们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经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了。”我们驾着三辆车进去后，农庄的门关了起来。

村里满是即将丰收的高粱，田间道路若隐若现。因为高粱太茂盛，我们看不到骑马的强盗正在接近，但他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能听到马蹄嘚嘚作响。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门内，骑马的强盗转了弯离我们不到十码远才看到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在眼前，他们吃惊地叫道：“哎呀！了不得！”他们立刻调转马头飞奔而去，并开枪给同伙发信号。我们这时发现又有十一个人从帐篷处骑马来协助同伙。

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使用我们的左轮手枪，因为芝罘的朋友们坚持途经危险的村庄一定要携带左轮手枪自卫。我们是来救中国人的，谁都不想射击其中任何一个。我们最后决定万不得已的话，就把枪给保护我们的农夫用。于是我们把枪塞进仓库的稻草堆里，然后两手空空来到门前。

强盗第二次来时，小心翼翼地转过弯，带着来福枪和抬枪，骑马来到门前。他们停住后死一般沉寂了片刻，然后有人向看似领头人的那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听得懂一些。他们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做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卖书的。

他们问：“什么书？”比较诙谐的利雷答道：“劝人行善的书。”

“你不会是说你们车里全是书吧？”

“正是。”我们答道。“我们拿些给你们看。”我们于是走到车前，每人抱出满满一捧书，打开门出去给骑马的强盗看我们的书。

我们看到他们扣着扳机，手却怕得发抖。他们没有要书，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劝他们带给朋友们，但他们的朋友也都是文盲。他们还说并不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只是听说有外国人经过村庄，他们从没见过，就想来看看，还请求我们不要告诉政府他们所在何处，然后调转马头离我们而去，开了三枪对同党发信号。于是危险解除，无一人受伤。

（4）萨尔浒

刚躲过一劫，我们又身陷更大的危险中。经过一天，我们靠近了萨尔浒——我们路线里的重要城镇。利雷随车前行，到旅馆落脚，而我留在后面的村庄卖书。令我吃惊的是，这地方像座死城一般。这里有房子，却不见一个活人。我到了几个十字路口，也都空无一人。我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所有门窗都用砖块封起来了。不过透过砖块的间隙，我还是能看到屋里有人，还能听到他们低声交谈。没有预想任何危险，我开始喊着卖书。过了一会儿，小巷里走来一个男人，非常谨慎。我给他看书，他查看着。由于我生硬的中文，他很快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只身一人，他无需害怕。他叫其他人出来，不一会儿聚成了人群，我卖出不少书。但我仍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把门窗封起来。

走到市集，我发现路上每隔几码就有手持武器的哨兵。一到市集，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我朋友留宿的小旅馆前。整个城镇因为全副武装的人又显得有生气了。我们平静地吃过晚饭，休息前去看我们的车。我们刚出门，就有一发子弹飞过，也不知道从哪里射出的。车夫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很想快点前行。

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轮流站岗。我从未发现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对我于此有用，我靠记忆复习第一册书，一个定理接一个定理，这样来保持清醒。

凌晨时分，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房间和我们房间的门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过，显然是从后院穿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过后，又过去一头骡子走过，接着一头、又一头。我向利雷喊道："快起来，他们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吃谷料。每当它走到我们房间旁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就像要走到前边一样，所以是同一头骡子在来回走动。由于我的关系，我们开怀大笑。

不过我们起床后，问旅馆老板，为什么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听说有强盗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所以当你们出现时，人们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

（5）凌开

遇到了强盗，也遇到了防御强盗的人，我们带着轻快多了的心情继续赶路，心想我们知道了人们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原因。然而谣言比真相传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落脚点凌开时，我们没能在一家旅馆找到房间，老板都害怕外国强盗。最后，在城镇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我们外国人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名中国仆人去订房间。这里有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打开了，三辆马车驶进了院子。可是，老板一看到我们就喊说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以致跑到旅馆大厅，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以防我们做出任何袭击。他们看起来都很惊恐，老板断言一个房间都没剩了。我解释说我们找过城里所有的旅馆，都没有房间。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房间，我们就只得睡

在马车里了。

说完，我们走到外面，打算在马车里过夜，虽然我们很快发现非常寒冷。幸运的是不久之后，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道：“你们不能留在车里，这样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和别人合住。”我们高兴地跟他去了他的房间，炕（这种砖砌的床，每间睡房都有）里烧着火，房间温暖舒适。然后我们开始准备晚饭。我们还没吃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老爷驾到。来的是一名下级军官，穿戴整齐，脚穿长靴，帽上一颗白色顶子。他应旅馆老板请求而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在别处找了休息的地方。我们谢过他的好意，说一位先生已经客气地把房间让给我们，我们不想换地方了。我们就在那里平静地过了一夜。

（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一座在满族老家祖传下来的城堡。它建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三面垂直耸立在河床上，只剩一面可以通行。所以它是一座坚固的天然堡垒。我们晚上住的那个旅馆显然曾是一所监狱，因为在炕沿上方，和每位客人的床对面都有坚固的铁环，一定是用来捆紧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次天早上，我们外出售书，一个人到城东，另一个人到城西。两边都围着一群人，极其好奇地想看看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看他的书。当我正在解释书中意思时，一个恶棍般的男人出现了，他衣服油腻，目露凶光，手握一根结实的马鞭。他冲人群挥着鞭子，要他们不准围得太近，于是人群和我周围隔出了一个大圈。由于他态度凶残，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

看到这些，我告诫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是谁？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有皇上颁布的允许卖书的圣旨，你怎敢阻止想买书的人前来呢？”这时，那人的眼光明显投向了我的身后，人群也都如此。我转过身来，发现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名政府官员，身着威严的官服，帽上镶着一块蓝色顶子。一听我有允许卖书的圣旨，他变得非常有礼貌，我也得以卖给人们一些书。白天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也

经历了类似的事，他见到的是一位帽子上镶红顶子的高级官员。

那天晚上，两位高级官员肯定一起商量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官位较高的给我们递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在他乡的陌生人，可能会陷入无知民众的为难，因此他派六名骑兵来一路护送我们。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些骑兵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当我们停在某处时，都会帮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的管辖边境时，他们表示很希望陪我们回到山东——他们的老家。

（7）特殊的通货

一到位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货币流通非常混乱。我们必须重建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会使我们破产。在那片区域，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而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这样计算的原因是，这儿以前的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他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只能支付十六文，从此以后这种算法延续了下来。这种算法已经很糟了，更糟的事发生在我们使用钞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盎司换面值一万四千文的单子，可是当我们把单子兑换成现金时，却不能按面值兑现，只能得到一万文。在这偏远的满洲山区，穷人们就这样受地方小官和当地财主的剥削。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了非同凡响的地质构造，好像所有的路书页般交错相叠，此等景象会使任何一个地质学家乐开怀。我们穿过一片片丰收的肥沃土地，之后到了鸭绿江岸边。这里脚下柔软的草儿让我们想起了家乡的牧场。在另一处地方，我们经过了两边都是高树的林间大道，头上的树枝间挂着一串串茂盛的野葡萄。梨子在地上烂掉，甚至都没有猪来吃。而我们得知就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朝鲜境内，正在闹饥荒，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食物维生。整场危难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交通和通讯的价值而引发的。

（8）朝鲜边境的冒险

凤凰城是满洲边境上最后一座城，城外就是朝鲜的国门，它瞩目

地建在边境的平原上，但是两边都没有墙。国门旁边是一片中间地带，宽度从十到五十英里不等。既无中国人也无朝鲜人在此居住，以避免两个民族间的争端。他们的观念多么原始！到凤凰城时，我们发现大概一千名士兵正向中间地带进发。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就藏在这片中间地带里。他是个叛贼，曾僭夺政权，装得像名官员一样，还有约莫六百个人跟随他。

因为军队不着急离开凤凰城，而我们等不及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所以我们决定自行进入朝鲜国门。我们走了些距离，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谷里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两岸是绿草铺成的地毯。我们在这里停下车来，吃了点东西，喝了清澈的溪水。

我们正在休整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他指向一座山峰，我们看见山上有两个穿着奇特制服的人。他说："那两个是刘金开的探子，他们对你们可没什么好意。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在下一个山谷里。"听到这个，我们爬上车，让车夫赶着骡子原路返回，越快越好。一回到凤凰城，我们就听到更多关于刘金开的功绩。在满洲的这片地区，地方官远在五百里之外，结果这里任何一个村庄只要有问题，人们就得长途跋涉，才能到地方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这位刘金开经常担任仲裁者。他的仲裁令人满意，所以人们总是去找他。这样一来，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很快传开了。当地人并没把他看作一个叛贼，而是看作一位恩人。

（9）糟糕的政府

在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硬。数百辆农夫的马车在通往牛庄的公路上来来回回。但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大多数村庄实际上并没有公路。因此，马车在干涸的河床上通行，尽管雨季会有洪水，但洪水流向海里后河床就会干了。他们驾着马车走在硬石铺成的河床上，经常有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车夫们会好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大石头，驾车的骡子力气不够时，五到十头其他车上的骡子也会套上这辆车，使得车子得以前行。由于城市——地方官在那里为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

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通常在五百里之外，百姓生活的重担难以承担。

发现政府毫不留意百姓的安危，农民们难免为了自身利益，每个冬天付给强盗一笔保护费，使他们赶路时不用担心被抢。交了保护费的马车会插上强盗认识的旗子，有时他们还会护送农夫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里有火令人欢喜，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一个地方，我们和三十七个别的旅行者睡在一张大炕上，其中还有个女人。看到百姓由于缺乏政府妥当管理而遭受苦难，而改善状况的那个人却被政府视作叛贼，我们感到那些地球上的阴暗之处，的确很是残忍。当我们动身返回牛庄时，我们猜想着要到哪一天，这片从许多方面都可称作“流奶与蜜”的土地[3]，会由政府妥当管理，百姓会过上幸福繁荣的生活。

6.效果不佳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芝罘后，我每天都去小教堂布道，正如那时所有传教士习以为常的那样。我发现布道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很是灰心。我得知很多当地商人共同发誓，绝不进入小教堂支持外国人布道。所以参与礼拜的大多是乡间来的，路过教堂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想看看外国人和他们的蛮夷服饰。

在芝罘的最初两年的福传工作里，我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收获。之后我开始遵循“寻找值得的”这一计划，正如我们的主要求的那样。因为我发现他们是适合于播种福音种子的“好土地”[4]。

听闻一名虔诚的人住在离芝罘约八英里的地方，我便托人询问是否可以去拜访他。他回复说他将很高兴见到我。他是一名晒盐工人，通过在浅池里蒸发掉水分，来从海水里提取盐。他可能有六十岁。我给他带了一些福音书、一些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

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谈论了宗教。过了一段时间，他带我到里面的一间屋子，那里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就是我每天朝拜神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拿给他看时，他马上挑出一首描述世事无常的赞美诗，并对我说："这首赞美诗是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他们的宗教派别朝拜神时一直用这首赞美诗。他告诉了我一些其他关于他宗教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这一类人，我哑口无言，觉得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时间上比我的要早许多，而且其深度令我吃惊。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快乐的一天，他坚持陪我翻过山岭，返回芝罘。虽然在路上我好几次请他回去，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送到我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经常想尽管他不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管怎样，他离上帝的天国并不遥远。那时我对中文和中国宗教史的了解还太少，以致没能充分利用那次难得的机会。

7.回龙山庙会

我决定和一名当地传教士去乡间，看看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布道的效果如何。我得知春季许多地方都有盛大的庙会，周边地区的大批群众都会参加。这样的庙会每年在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来自数十个村庄的人们挥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钹，去寺庙朝拜。中午各种朝拜活动要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去，这里出售马、骡子、驴子、牛，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回龙山举行，山上有座著名的庙，靠近宋村的集市。

我骑在马背上到宋村那里去，后面跟着两头骡子，一头由我的助手骑着，另一头驮着两箱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他书籍。马比两头骡子走得快，我先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在当地仅有的另一家旅馆里，得到的了同样的答复，我马上猜测到可能旅店老板不想

收留外国人。我对此并不沮丧，心里相信既然我蒙召来这里做工，上帝一定会为我开道路的。我骑着马儿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下了马坐在石头上，手握缰绳。很快就聚了一群人。

“你想喂喂你的马吗？”一个人问道。

“当然，”我回答，“但是去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我来照料它。”他牵过马走进了第一家旅馆，而我仍然坐在石头上。

不到十分钟，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和我的意图。

没过多久，一个系着油腻围裙的厨师走上前来，说道：“我的主人听说两家旅馆不敢让你进去。他有一座空房，如果你愿意去那里的话，他很欢迎你。”

我同他去了，发现这座空房比那两家旅馆要舒服得多。款待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首要人物。他的曾祖父是某个省的最高官员。因为庙会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他便给我提供这座房子直到那时。他有两个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正在准备考秀才（通常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他们很有学识，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他们从书本里可学不到。周围村庄的校长都来和我见面。我们关于外国的文明和宗教进行长谈。而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明。没有访问者围绕时，我就学习中国文学。

庙会开始的前一两天，我提议去参观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这是座别致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询问在庙会期间能否向群众发表演讲。无人反对。那位年轻人问我想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很好，便选择这里作为我将向人们宣讲的地方。那年轻人让和尚放一架梯子，这样我就能轻松地爬上塔。



外国记者镜头下的中国的塔

庙会当天，我来到山顶，看到不可胜数的人们蜂拥而至，叫卖各色各样的农具。人们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围着我，要看一眼外国人，因为从未见到过。我真是寸步难行，但还是一路往寺庙挤去，并且按时到了那里。我看到梯子已准备好了，便爬上塔去。在这个有利据点，我对发生的一切都一览无遗。一系列的朝拜进行了一个上午，伴着音

乐、彩旗和锣鼓，周围数十个村庄的人们轮流进入庙里烧香，在偶像前鞠躬。鼓、锣、钹奏响的音乐冗长嘈杂。到了中午，最后一个村庄拜完了众神，噪音平息了。

我趁机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人们发表了长长的演讲。一个外国人用不好的中文对他们演说，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当看到他们听得那么专注，我差点脱口说出另一位传教士曾说过的："数千人对我洗耳恭听。"然而，除去许多人的兴趣是出于好奇，我也想到有些人是渴望听到更多关于西方国家和宗教的事，因为演讲结束时，好几个人走上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庄。

这是我向一大群人布道的经历中最难以忘怀的尝试。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并非最有效的传道方式。宋村那位主人及其儿子同我的友谊持续了许多年，每当我在芝罘时，他们都会来看望我。

8.尝试在宁海定居

自从在芝罘传教起初，我就认为既然内地未被占据，一大群传教士不必都在港口城市生活。因此我数次到内地旅行，考察乡村并寻找适于传教工作的环境。

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距芝罘仅二十英里的宁海城。我认为可以在那儿租间房子，安定下来以便传教。但我注定只能失望。我托人成功租到了房，但是一个外国人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接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捕，接受拷问，投进了监狱。在这个困境里，他写信给我讲述了他的麻烦，请我救他。

我去找芝罘的英国领事，他说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然后给我一封写给宁海官员的信。但是，无论领事还是我都不知道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带着领事的信作敲门砖，我来到宁海城，拜会当地官员。他立马穿上官服，排场盛大的接待我，表现得极其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官员。我回到旅馆，希望事情能很快妥善处理掉。

半小时不到，那位官员来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他正和我一起时，十二位当地长者走进房间，在官员面前跪下，请求不要把任何房子租给外国人。官员回答租不租房的权力不在他那儿，而在于我。于是他们又转向我，跪着求我不要坚持租房。由于我对处理中国的事情尚无经验，只得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无权改变他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超过中英合约相关规定的范围，我便要求释放房东，免除对他的惩罚。但是这次会见没有什么成果。

我认为对这间房有使用权，便住进去了。一些在芝罘有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中国人，用一首这样的打油诗来宣泄他们的愤懑：

“你若想遭殃，就给洋鬼子干活。”

这首诗在宁海四处反复传唱，煽动起一股排外的怒火，而我的行动招致了极大的愤慨。当我散步时，成群的孩子和成年恶棍跟着我，高喊：“洋鬼子！”对我进行各种恶意辱骂，还向我扔石头和土块，到了晚上则趁着夜色，在我的大门上涂抹各种秽物。我的当地助手强烈要求我向官员申诉我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不过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给浸礼会传教会的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找官员帮忙。

我正是在这些事中去探寻我主的旨意是什么。我的脑中涌现出两个想法。首先，如果上帝真的召叫我当传教士，那他一定同时也会预备一些中国人来听我宣扬的福音。宁海似乎没有上帝预备来接受福音的人。况且我们的主说了，“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5]于是我决定离开，说服自己上帝在其他地方预备了愿意听我传福音的人。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向官员和长者说一句话。

9.拜访一位虔诚寻求真理者

接下来我访问的城市之一是距芝罘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我在这里停留了两星期。一次街头布道后，我同两位学识渊博的和尚交谈起来。他们自由讨论着基督教和佛教的益处。一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来

到旅馆，对我提了两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被上帝接纳？”以及“为什么基督要为人类而死？”

另一名姓刘的男人素有真理寻求者的美誉。他的拜访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对每个打算传教又还未出发的人大有益处。我引自那时写的一封信：

我们走进一个长而狭窄的房间，或者说一个仓库，因为两边都有稻草堆，只剩得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有张桌子，刘和我们在此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这间房仅有的一扇窗。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儒家的，一本道家的（《易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当我问到三本书中哪一本揭示的是真理时，他答说它们都在揭示真理，这三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来自于上天。这并不是他的随兴言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他面前的《新约》，提出几个问题以确定他的理解有多深。在场的其他几个人中，有两人非常感兴趣；有一人躺在稻草上，不时发表几句言论；还有一人整个谈话过程中，都站在狭窄的过道间，好像一尊雕像。在门口别的人聊着天，说着笑话，并不在意一名外国人的造访。在我离开这座城市前，刘找到我，进行了又一次交谈。

虽然我再未见到这些人，但我和他们的会面并非不了了之，接下来的事将表明这点。

在莱阳对刘先生的拜访，使我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些方法来将中国哲学家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迷信使他们困于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他们用此来解释天地间的奇事。驱散他们无知的方法之一便是开办一些有物理、化学实验的讲座。返回芝罘后，我给我的中国助手们进行了肉眼可见的实验，让他们对自然哲学的法则有清晰的概念。

10.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惊人之文

1872年春，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开始实行，此后，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因为它为站在他人角度思考提供了绝佳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很可能是林乐知先生出版的）提供一笔奖金，给回答问题“你们说我是谁？”[6]的最佳中文文章。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文学学士）带他儿子来芝罘，请布朗医生为他看眼睛。在医院时，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其中有《约翰福音》和一些我们的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一则上面提到的竞赛通知，并写了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我翻译了这篇文章，然后寄给浸礼会传教会。一些出自此文的摘录如下：

“我如海中的盐味，你找，找不到；我如花朵的香味，你抓，却抓不着。人们以为我在有形之物中停留，却不到无形之中找我。如果他们恰巧遇到我，他们也不会知道，反会认不出我。认出我的，一定是真正信赖我的人。”

“能够被分裂、赋形和杀死的是有形之物，而我是完整的，渗透一切的，无形的。你抬起头往上面找我，却忘了我也在下面。你往前面寻求我，快速追逐我，却忘了我同时也会在你的后面。”

“日光之下，一切神秘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奥秘是永存的实在。”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过，物与我曾为二。我是道[7]，道是我。我存在过，道与我曾为二。我是父，父在我里面。我存在过，父与我曾不在相互之中。”

“我既不静止也不行动。真正相信我的人将得到生命的真谛。热爱生活的上帝的人，将成为生活的灵魂。不相信我的人乃行尸走肉。”

虽然这名中国神秘主义者凭着普斯佛德般的精神在写作，但传教会委员会认为其叙述的观点尚不足以陶冶英国基督徒，这样考虑很可能是对的。而这篇翻译，虽然本身很有趣，也因此没能发表。

11.济南府武官的洗礼

1873年秋，在朋友利雷先生和芝罘的联合长老会（the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麦金泰尔先生（Mr.Mclntyre）的陪伴下，我访问了济南府。这是山东省的省会，距离芝罘三百多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观看或许是地球上最为非凡的教育系统的运作。那时中国学者每年在帝国的一千四百个县参加由政府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帝国各地举行。之后秀才们作为候选人来到各自的省会考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

我们发现汇集了大约一万两千名学者，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立即会举办一场武科考试，约有一千名候选者参加。我们只看了很少的文科考生，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发起过反对外国人的动乱，所以和他们见面时我们都小心翼翼，但我们能自由混杂于武科考生之中。

考试举行后不久，麦金泰尔先生和利雷先生回到了芝罘，而我停留了五个月。

有天，我遇到一位来自河南省的极其风趣的副职军官，他经常来我住的旅馆看我，并且很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我在这座城市漂亮的湖里为他施行浸水礼，这是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洗礼。两个男人走进清澈的湖水，这一景象在西南城郊迅速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仪式一结束，副职军官立即上岸，用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向人群解释这一礼仪的意义，而他的衣服还在滴水。

12.济南府的首位新教传教士

直到那时，中国的传教士还没有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不过在济南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的牧师——文璧先生（the Rev.Mr.Mcllvaine），他是在我来访的一年前从北京搬来的。他是年轻传教士中颇具希望的一位，曾和他的传教会中的长者一起出版中文的长老会会规。他那时研究伊斯兰教，目的在于写一本供其追随者使

用的小册子。从他准备小册子至今已经四十年了，我得遗憾地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济南府，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克罗赛特先生（Mr.Crossett），他深受中国人喜爱，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投入。然而，这两位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况，主要困难在于观点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

就文壁先生而言，上述第二点即使在其着装上都能展现出来。例如，由于中国人的房子和旅馆里没有壁炉，我们的外国服饰完全不足以保暖。所以文壁先生穿了一件自己做的皮衣，没有依照中国的式样——一件长袍，外罩一件短外套——而像是一件外国大衣，用带毛的羊皮做衬里，披肩盖过肩膀和胸部，却在后背缝死了。

他穿着这件新衣服上街的第一天，人们都捧腹大笑。“这个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呀！”他们叫道，“她不会做外套。你在前面和边上看，他穿着马褂；但等他走过去，你从后面看，就看不到马褂了。你还见过像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吗？”

当我告诉文壁，说我受不了这每天持续不断的嘲笑和辱骂时，他的回答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动听。“我们应该忘记这事。”他说。但事实很快证明即使是他的本性也不能忍受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他十分沮丧地说：“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

“非常乐意。什么事？”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以为上帝召叫我当传教士，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上帝召叫了我，他一定会让我拥有一些皈依者，但直到现在我一个皈依者也没有。因此我决定离开传教会，好让董事会把钱用来资助真正蒙上帝召叫的人。我将到一个通商口岸，尽我所能编写一些中文教材，以此谋生。我有一座母亲送给我的钟。我不能失去它。我想请你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定下来。”

“我当然会保存你的钟，”我答道，“但你不觉得，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吗？”

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长谈。分别时，我对他说：“再为这件事祈祷一次吧，在你做最终决定前我们再谈一次。”

几天后，他又一次来见我，并且马上说：

“我已经得出结论，不论我们对生命、宗教和传教会的看法什么样，有一条路在我看来十分正确，它的价值永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身来，握着他的手，说道：“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烦恼很快就会过去。”

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快乐，工作效率也非常高。由于心理问题已经损害了健康，他于1878年去世。

13.克罗赛特的“悲剧”

克罗赛特先生是另一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职责的事，同样全心投入。过了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的工作的微小效果感到伤心，并得出是他祈祷不够的结论。于是他会在痛苦中每次祈祷数小时，不久就导致精神彻底崩溃，先送至北京，之后送回美国。

在美国期间，为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美国所能找到的每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不过他来华工作的渴望也是前所未有的强烈。由于董事会不准备再派他出国，他去到海岸，在一艘驶往圣地的轮船上，作为一名普通水手开始旅行。在雅法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竟碰上了罗马天主教在济南的主教。克罗赛特简直要靠在他脖子上喜极而泣了，而这次会面愈发增强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圣地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之后去了埃及，又乘船到了孟买。在这个港口，他拜访了印度人近乎于膜拜的智者波文（Bowen）。吸取智者的特别训导

后，他又一次站在朝向中国的桅杆下。

在离开中国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奇怪作者关于基督教的著作，从早期教父、中世纪的作者，一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他相信了许多奇怪的教义，比如皮肤上的毛孔是无数邪灵进出身体的大门。

一到芝罘，他就拜访了以前传教会的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他们都很吃惊，便给他钱让他去买新衣服，但他分文不取。他们暗中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但他发现银子后，就给了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为人看病，走到了济南府。当济南为数不多的当地基督徒看到他时，他们对他的外表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开心，表示他们愿意与他分享哪怕是最后一点食物。

一段时间后，他又被派往北京。在这里他投入到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亚西西的方济各，还是任何苦行僧，都没像他那般献身于穷人。一次我去北京，我们都住在伦敦传教会达吉恩医生（Dr.Dudgeon's）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我睡在一张外国样式的床上，而克罗赛特和医院里的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都会来我房间，躺在地板上，我们便一起讨论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对此了解很深。后来在1889年，当我们在北京生活时，我们经常请他来和我们吃饭；不过他来时常用袖子带着一个中式面饼，比起吃我们做的饭菜，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简单的食物。当我们让他留下过夜时，他有时接受这一邀请，但从不愿意睡在床上；他总是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过夜。

他小心保存着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首次离开济南府后的所有感想和经历。其中的摘录偶尔会在米奇先生（Mr.Michie）办的北京的报纸上发表。米奇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奉献精神。一次，克罗赛特给我这本日记，请我编辑出版。发现他的奇思异想正逐渐好转，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

一年或两年后，他去了上海，一路从北京走到汉口，然后才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Dr.Fryer）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里的仆人对他极其忠诚。傅兰雅夫人告诉我，一个早晨，他来吃早饭时，满脸

洋溢着喜悦。

“我现在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

“那是什么？”她问到。

“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把它烧掉了。”

真是一出悲剧！

同年夏天，他的体力开始衰减。他想如果去到蒙古，就能恢复健康。于是他乘“爱德拉都”号客轮开始前往天津。船长佩恩（Payne）非常善良，把他的隔间让给了这个病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外地，不过我的妻子听到这件事后，径直赶到轮船上，筹备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埋葬的地方立了一块普通石头作为标志。

文壁和克罗斯特，以及一些我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错误的神学理念，对基督教的不适当应用，还有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的缺乏。

14.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

1874年从济南回芝罘的途中，我和朋友——苏格兰长老会差会的马安仁先生在潍县住了一天。在那里，我得知了两点与中国传教工作有关的重要因素，一点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另一点是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即使在中国的非基督徒中也能发现最虔诚的人。

潍县是山东大型商贸中心之一，且有许多殷实人家，家庭成员在帝国各地出任不同官阶。因此这个城市不但是商贸中心，也是政治中心。

马安仁先生租了间小房子，作为传教工作的伊始，整个城市都反对，就像捅了马蜂窝一般。这件小事引发了极大的骚乱，如同是叛贼

头子或残暴的强盗闯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立刻从他们中离开。那时，当地一位绅士突然拜访了马安仁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哥尼流[8]，一个虔诚的人，常行善事。他告诉马安仁先生对民众的威胁不必惊慌，因为他们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将亲自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大错。

几年前，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个外国人（伦敦传教会的乐克医生）知道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天花之灾如此严重，致使许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失去了半数人口。他很高兴听到有预防天花的办法，于是奔波十天来到北京看望乐克医生。乐克医生向他传授了如何接种牛痘。他还派两名妇女带着她们接种过的孩子，同他一起赶到潍县。一到那里，他就给朋友和邻居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并且许多年来，一直到马安仁先生到潍县，这位中国绅士切实地每天义务为人们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上挂了一块精致的牌匾以示感激。

现在发现他去拜访外国人，人们变得非常气愤，说把牌匾送给他可不是为了让他和危险又可恶的外国人交朋友的。他们应该把牌匾拉下来。他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预防天花上，我能做的所有善事都是从善良的传教士乐克医生那里学来的，而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别无他图。因此我将尽我所能款待他。”

在我住旅馆的一两天里，马安仁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否带我前去拜访。他说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位马安仁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得知他已经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时，我问他：“当你读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回答前考虑了几秒，然后说：“也许这是最美妙的想法——一个人应该成为圣灵的殿。”[9]

15.和布朗医生经历的奇特行医之旅

威廉·布朗博士（Dr.William Brown）是来自爱丁堡的医生传教士，他12月参与到我的工作中。得到一位如此能干又肯付出的人当同事，我非常欣喜。我们一起经历的一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府近五个月后，我回到了芝罘。我发现布朗医生（Dr.Brown）语言方面正取得飞速进步，并在秦牧师的帮助下，正在翻译一本重要的医学书，还在训练四名当地人当医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后不久，领事馆的马嘉理先生（Mr.Margary）来同布朗医生吃晚餐。那晚，苏格兰圣经会的利雷先生也在，他一本正经地讲着滑稽故事，我们笑得肋骨都痛了。那年九月，马嘉理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的缅甸考察。1875年2月，他在曼允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布朗医生和我计划在山东省东部的半岛周围各村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集市停留，他来行医，我在候诊室布道，让病人一次一个去布朗医生的房间。由于那时外国人还是很新奇的，为了保障安静和秩序，我们一到县城就给首要地方官送去我们的名片，告之我们的目的，请他指派两名衙役来帮助维持秩序。地方官总是很客气，很快答应我们的请求，还不时有衙门里的人来看病。

清晨起，布朗医生就开始辛勤工作，不停地诊治病人。由于担心他重压之下，身体会垮下来，我努力劝他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听。病人的叫喊在他听来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力负荷不起这样的重担，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拉回卧室。

他的有些治疗立竿见影，在病人看来如同奇迹一般。比如，一天进来一个男人，肚子剧痛，痛得连腰都弯了。布朗医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十分钟后这个男人站直起身子，睁开了眼睛，对自己突然病愈甚是惊讶，大喊："我好了！我好了！不痛了！"他戏剧性的宣告让其他

病人先是大笑，然后意识到他真的好了，都非常急切地想拿到药，让自己也药到病除。

旅途中我们碰巧住在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宋村就是前一年我参加盛大的回龙山庙会前，住了两星期的那个集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叫“什子”，是一张吊床，吊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名布朗医生的助手和我们同行，帮布朗医生分配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实际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找店老板结账时，他却不收我们的钱，说：“你们到这里来，免费向我们发药；我如果还收你们的住宿费，就太不对了。再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一年他到宋村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和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他对此很是感激。我再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不收钱可能是用一种客套表达再见到我很高兴，但他坚持拒收我们任何费用，说他愿意为行善尽一份力。

唉！那时我们的传教工作正打开一条新的成功之路，由于缺乏欣赏和远见，传教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合作中断了。1874年4月，布朗医生去了新西兰的但尼丁，我们芝罘英美各教派的所有传教会都非常伤心。在那里，他既是大学教授也是营业医生，非常出名。许多年后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镇，授予他一张华丽的证书，对他在此居住三十年来做出的众多服务表示认可。

因此我再次成了英国浸礼会在华传教工作的唯一责任人。

16.附魔

七十年代早期，冬天没有轮船从上海驶往芝罘，因为芝罘港结冰无法通行。由于暂时没生意做，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便成立了俱乐部和协会，来愉快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在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指定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附魔》。这个题目很吸引人，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那是我们最大型的一起聚会。开始时，我举了几个由我们的主治好的附魔事件，然后我谈论起中国的类似案例。人受制于邪灵，以致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一天，一个受害者说他姓李，来自很远的地方，并叙述那个人的历史，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清醒时，他会用自然的语调，明确无误地说自己的家，张家的情况。但附魔时，他会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姓李的事情。也有时候，一些房子闹鬼，住的人因为害怕只得离开他们的家。据悉，有的房子二十年甚至更久租不出去，因为人们认为那里被邪灵占据着。

我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韦廉臣博士描述了在中国，特别是在鲁村庙里，用占卜给病人开药的情形。占卜用具包括一根系在梁上的绳子，尾端系一支笔，悬在一盘沙子上。

郭培德博士讲的是一座房子据说闹鬼很多年，因此没人敢租住。最后一名当地传道人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跑到了另一家，使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祈祷赶鬼。他随身带着《新约》，请邻居们同他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脱离一切伤害，让房子也归于安宁。郭培德博士之后是一个犹太人，他说附魔的想法是从波斯传到巴勒斯坦的。一个行医的人接着站起来，批驳附魔说，认为受害者是得了癔病，应从身体方面来解释。之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他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头儿，起初是名耶稣会神父，是在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之一。虽然他已结婚，但他款待了所有来内陆的罗马天主教主教。而且他一如既往地虔诚。他说他相信附魔说，且他的证据同那位行医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一样多。他举了许多惊人的案例，这些例子经不同主教证实过，即使是普通基督徒，也有能力让那些受折磨的人恢复正常。

我那晚宣读的论文在《天国》上发表，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先生（Mr.Christopher Gardner）摘录了大部分转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文章是写给国内一家报纸的“中国的妖怪”栏目。在这个值得

回忆的晚上之后，倪维思博士（Dr.Nevius）开始在中国各地搜集附魔和驱魔的证据，汇集在一本详尽无遗的著作《附魔》当中。此书于他去世后出版。

17.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奇妙的事情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结果却大不相同。

芝罘附近的登州，有一位荷尔姆斯夫人（Mrs.Holmes），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她的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杀害。她有一个小儿子，自己教育他。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同龄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给予他们一样的教育，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懂英语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能挣二十美元，而一个外国助手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两个中国男孩中年龄较小的那个，快十六岁了，没告诉荷尔姆斯夫人，就在一家芝罘的俄国商店工作了，每月薪水二十美元。这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是一大笔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美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催促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

荷尔姆斯夫人对此非常伤心。为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送他到美国的学校，她儿子即将快毕业。在美国几年后，山子回到了中国，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掌管的海关谋得一份好工作。每次他路过芝罘时，荷尔姆斯夫人都请求我把他当做我的客人。我发现他出奇地聪明。但是，唉！进海关不出三个月，他就以为领导一场叛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当上皇帝。他利用在海关的职位，暗中把一大批外国武器和军火运进镇江。但是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他的人头。荷尔姆斯夫人的一位传教士朋友帮他逃往美国。到美国后，忘记了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命，他在美国进行关

于中国的巡回演说，极力证明儒家学说比基督教更优越。

而杰在天津的贾丹—马西森公司找了个职位，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苦力。在困难面前，他很有办法，其他公司也经常找他咨询。

大约二十年过去了，荷尔姆斯夫人时运不济。她的儿子行医，情况也很糟糕。荷尔姆斯夫人穷了，身体也不好。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去一所学校教书，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告知自己的困难。他立刻去见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和他说了荷尔姆斯夫人伤心的信。“你在我账户里，存的一千美元，”他补充道，“请替我提出来，我要寄给荷尔姆斯夫人。”代理人答应了。大约一星期后，杰没有收到这笔钱，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意识到，这笔钱是花了许多年才攒起来的，他推迟时间以便让杰仔细考虑一下。杰答说他早已拿定主意了，“荷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亲生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会跟我手下的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把钱提给我吧，不要耽误了，一想到荷尔姆斯夫人在受贫困之苦，而我挣得够多还有节余，我心里就难受。”听到这个故事，一位银行职员说道：“听到这么美好的结局真好。我将尽可能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当我离开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送到船上。一队苦力来到前门，清理了整座房子，每人背着些东西出来，“连一根草都没留下。”我们登上船，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对此，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

18.二访济南府

我迫切想尽早有机会再访省会济南府。现在，山东进入了七八月间的雨季。雨势很大，乡间许多地方又不太平坦，路上全是泥，导致交通无法进行。大雨结束前，所有生意都暂停了。

因此，不到9月我就启程了。我雇了辆两头骡子拉的寻常马车。

车上，我放了一箱书和一些中式衣物在车后面，在车里面，则铺了一层厚被褥。在中国每个旅行者不论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因为旅馆不提供。十或十二辆车同我们一起出发，因为路还没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里推出来。有时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车夫们会禁不住离开主道，从田里绕行，那里地势较高，因此比较干燥。当地里正长庄稼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反对这种入侵。

一次，我们遇到了极大的麻烦。庄稼主人坚持让车返回原路，而车夫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冒犯，但那路实在走不通。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人们从村里跑来帮助农夫们，带着竹竿等武器，以便必要时对付入侵者。车夫看到村民反对他们，非常生气，脱下大衣，准备战斗。双方打了一阵。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前，指出如果不约束他们的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你们看，我们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有辆车的轮子已经断了，你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车轮都坏掉吗？这让别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不好。让马车从干地上过去吧，而我会把那辆已坏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觉得有道理，便叫村民们停下来，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车夫们都很感激，想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使他们摆脱了麻烦。

在济南府，我发现文壁先生非常沮丧，已近乎于绝望了。我到那里不久，芝罘长老会联合传教会的韦廉臣博士及其夫人也来了，带着一个当地人李先生，他曾给芝罘的行医传教士明恩溥医生（Dr.Henderson）当了几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书外，李先生还给有需要的患者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利眠宁等。一到济南府，李先生就发了高烧。过了约十天，韦廉臣夫妇要去泰安，留下他给我照顾，希望休息几天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恶性斑疹伤寒引起的。城里没有一个别的外国人，所以李先生和我在同一间旅馆。他的高烧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喂他鸡汤，认为这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十五天后，他的体温高得吓人。我决定不论日夜每隔一个小时

喂他几匙鸡汤。最后，我习惯了夜里每小时醒来一次，就像脑袋里装了一个闹钟一样准。

大概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大量出血，我开始担心他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敢相信有人能失去这么多血还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欣喜的是，他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贪婪地喝光了小米粥，还要更多。此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脾气却没有变好。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想家了，坚持要回芝罘，尽管身体还没完全康复。我雇了一顶轿子载着他，让我的仆人一路照顾，我步行送了他三英里。回到旅馆后，我头痛得厉害，后来发现自己感染了和病人一样的热病。由于我独自一人，便捎信给文壁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立即赶回城里照顾我恢复健康。这次的突然发作让我对后来的病毒袭击有了免疫能力，当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伤寒的饥民中时。

19.中国北方的路及出行方式

中国的路是很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的平原由黄河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在陕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地形构造，村民们在那里挖窑洞居住，冬暖夏凉。由于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六个月不下一滴雨，车子在尘土路上行驶自如，近百英里远的路上不见一块石头。但是，当六、七、八月雨季来临时，道路都被水淹没，水和尘土混成无法通行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这三个月里，贸易全部停止，期间所有资金都锁在柜子里没有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引发类似贸易停止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不够宽，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这总是引得车夫们大吵，争着谁应该把车退回街头。有时第一辆车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于是十余辆或更多车子挤在一起，堵上好几个小时。这样浪费的时间给商人造成很大损失，有时会使得他们花钱买下部分街区来拓宽道路。冷静的官员和商人没尝试的方法，义和团一天就做到了。他们烧了整座城。重建

时，当局加宽了道路，马车和电车都能通过，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在中国北方，官员出门一般用轿子，根据官阶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方式是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铺着草席的座椅，用两头骡子一前一后拉着。商人通常乘坐一种有盖的马车，速度每天约三十英里。他们在黎明前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大概十点，停车喂骡子，吃中午饭。中午左右再次上路，到快天黑了才停下来，住进旅店以防被强盗打劫。那时，主干道上隔一定的路就有一家旅店，现在也如此。

在最好的旅店里，能买到各样食物，和多种方法精心烹制的鸡、鱼、猪肉和鸡蛋。烤猪肉和大白菜就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旅店里的规矩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不过在不同的桌子上。午饭通常花两百文，晚饭约三百文，包括夜间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是小费。总的算起来，午饭花大约六便士，晚饭约九便士。

除了上述快捷的方式外，中国北方出行还有一种慢许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独有的，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约三英尺高，同马车轮子一样坚固。上面固定着一个架子，轮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的人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载他的行李，使得车平衡。一个苦力在后面推，而前面有另一个苦力或一头骡子或驴拉着。手推车的载重量极大，有时达半吨重，这取决于推车人的力量。聚集的车轴设计合理，使得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手推车的速度每天约二十英里。

坐手推车的人住的旅馆食宿比接待赶马车和赶骡子的旅馆要差很多。他们睡的炕通常离地只有一英尺，因此很潮湿，而食物非常粗糙，是小米和玉米面做的，就着咸菜，没有肉。夏天，车用蓝色的凉篷盖起来，当骡子拉着车匀速行驶时，人可以在车上读书或者躺下睡觉。在山东，风力适中时，给手推车加上一张帆是很寻常的景象。当十多辆载着重物的手推车扬帆沿着一条深陷的大路疾行时，好似一队帆船高速前进，趁着风还没降到乡间某条看不见的小湾。

一次，我坐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的地方旅行，那里的地面白茫茫的，因为到处都是碳酸钠渗透出来的沉淀。人们提醒我弄到淡水很困难，因为所有的井都浸满了碳酸钠。我们试着泡茶，但水里的碳酸钠把茶叶变得又浓又苦。好在我发现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给自己准备了一袋子黄瓜，当我喝了苦茶以后口渴难耐时，黄瓜的味道就像苹果一样甘甜。

第三章　定居青州府

1.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李鸿章在担任苏州总督时，英国政府派去的戈登将军，就是去协助李鸿章的。

我第一次接触李鸿章是在1875年，当时，他正在烟台签署《烟台条约》。而我当时正和一个当地助手一起，负责我们教会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许多士兵因为患有疟疾和痢疾而纷纷涌进我们的医院，我便把奎宁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从和警卫人员。为此，他还给我送来一封感谢信。



几乎与李提摩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鸿章

回到烟台后，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在内地的什么地方定居。经过打听，我在青州府附近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离烟台有两百英里，大约八天的行程；那里有几个本地的教派，并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所追求的真理，要比中国三大宗教中的真理更高。于是，我便断定，这是一个天赐的、传播福音的好地方，就这样，1875年1月，我决定到青州府去。当时，在烟台有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少年，他是一个船长的儿子；当时那里没有学校，所以他无法完成他的学业。于是，我们决定，他跟我一起上路，我每天晚上负责督促他学习。

由于天气恶劣，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其时正是冬天，路

上的积雪很厚。一起前往的一共才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行了十英里。第二天艰难跋涉了一整天，到半夜时分才抵达了我们要去的客栈，这一天我们只走了五英里。那一带是山区，风把高处的雪吹刮下来，这样，路上就被飘下来的雪覆盖，根本无法弄清那积雪究竟有多深。山坡上的田是梯田，并被两三英尺或四英尺高的篱笆围住。由于积雪太深，我们只好离开道路在田里行走；有时，为了通行，我们不得不拆掉一些篱笆。这就使得我们的行程耽搁了不少。

在离青州府还有两天的路程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地上的积雪虽然不厚，但是风力很大，狂风把细碎的雪末吹起，漫天飞舞，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被刮尽了。我们既看不见路上的车辙，也看不见太阳，我们便找不到方向了，因为在中国的大平原上行走，就跟在海上航行一样，太阳就是指南针。有的地方路上积雪太深，我们虽然看见前面的路，但就是过不去。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不得不先离开大路，从田里走；可是，在田里走着走着，再找大路时，我们却又失去了方向感。尽管如此，经过五个钟头的跋涉，我们在穿过了漫天的暴风雪和严寒后，终于走到了一处客栈，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客栈老板担心别的人可能会迷路。事实证明，他们真的迷了路。第二天早上发现，有两辆马车的确迷了路，有些人最后冻死了。

青州是一个州府，它下辖十一个县。在过去的某个朝代，它一度是某个亲王的都城。当初，它管辖的面积甚广。就是在今天，它的面积也是一般的城市的两倍，而它的城墙，则是全山东最好的之一。

抵达青州府之后，我们并没有花心思去租住房子，而是在一个客栈里住了下来。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宗教，而那个小男孩则跟着我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我们让当地人感到非常好奇。由于我们穿的是欧洲服装，每当我们从街上走过时，全城的人都会回头打量我们，一些好奇心强、胆子又大的人则会跑到客栈去看我们。我尽量和和气气地接待他们，不过，我也经常因此被打扰，这让我反感。

2.在青州府的医疗工作

1875年秋，雨季之后，很多人都得了疟疾。我当时带着不少奎宁，我便免费把它送给他们。周围的人无不称奇，因为通常一剂药八到十粒，足以一下子解除疟疾带来的痛苦。后来，他们又来向我求药医治他们的其他疾病，不过，我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医生。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种特效药的。

我发现利眠宁是一种很有效的药。这年夏天，霍乱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夺取人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成功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一天，警察局长拜访我，说他的妻子患上了霍乱，正奄奄一息，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她。我跟着他去了，发现她被摆放在露天院子里的一张草席上，很显然，她的家人以为她很快就要断气。我把樟脑油滴到糖水里给她服，每五分钟一次；不到一刻钟，她神志清楚了，并开口说她觉得舒服些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是，消息便传开了，都说虽然跟我讨药很难，但是，只要我肯给药，我看病就是个神医。

3.入乡随俗

在思考服装问题时，我在想，假如我穿中国传统服装，我会不会拥有更多的上流社会的客人呢？于是，有一天我穿上了当地人的服装，剃了头，还在脑后披挂了一条假辫子。我像往常那样走出客栈去散步时，碰到了卖饼的男孩，他习惯每天来客栈里兜售一番。只见他头上顶着一托盘的饼子走了过来。见我穿着中国服装，他吓了一大跳，一托盘的饼子哗啦一下散了一地，把过路的人逗乐了。我顺着街道走下去时，消息像电流似的，传遍了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纷纷跑出来，瞪大了眼睛看这一奇观。我听见有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哈！现在他看起来像个人了。”



李提摩太穿着马褂像

就在那天下午，我被邀请到一个房子里去喝茶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以前不被邀请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穿着外国人的衣裳，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怪异的，当我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围观者会趴在纸糊的窗户上。他们一个个会不声不响地用口水沾湿手指，在窗户纸上戳一个小洞，然后把眼睛凑在上面。每次到一个人家去拜访，都害得主人修补一回窗户纸。服装一换就不一样了，当这个外国人穿上了中国人的衣裳，他看上去就跟中国人一样，也就不值得去盯

着看了。

这之后不久，大清帝国经历了巨大的不幸——同治皇帝去世。根据这个国家的习俗，为了表示沉重哀悼，任何人不得理发。全体人民一律不理发，那景象一定非常奇怪。既然已经穿上了中国人的服装，在这一点上我也就入乡随俗了，跟别人一样不理发。

4.租住房子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期间，司库每天都跟我在旅馆里聊天，有一天，他忽然说：“你是一个很忙的人，不应该总让那些闲得无事的人到客栈里来打搅你。你为什么不自己租住一个房子呢？”

我回答道：“我很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是，如果没有人为我做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温和的人，我便没法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人们觉得外国人都很坏。”

他回答道，“喔，这就是你没有租房的唯一原因吗？”关于这件事，他再也没有说什么。

然而，第二天他来告诉我，说有一处房子我可以租住，而他愿意为我做担保。于是我便跟他一起去看那座房子。房子紧挨着官府的衙门，每个月的租金是九块钱（约三十先令的样子）。三天后，我不声不响地搬了进去。

我的房子坐北朝南，前面是一个小院子，约二十码长，十码宽。我的房东喜欢养花种草，在院子里养了许多盆景，长了许多花丛，这些他每天都要打理。院子的北侧是房子的正屋，也就是我住的地方。正屋共有三间，中间是最大的一间，起先是用作客厅的。西侧的房间地上铺了石砖，下面埋着烟道，有一个可以从外面生火的火炉。我发觉，冬天住在这里很舒适。我把这一间用作卧室兼书房，而且无需另加火炉。另外那个房间的地面是泥地。在这正屋的后面是一个半英亩大小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桑树，它的叶子可以用来喂蚕。这房子包括

这地皮以及少量家具的年租金，花去我大约四个半墨西哥元，也就是每年六英镑的样子（中国还是按照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时间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月份）。至于房东料理园子的费用，我不用付分文。那是他的爱好。

我吃的很简单。早饭主要是小米粥，这种很像燕麦粥的东西，是由我的仆人从街上买来的。小米粥上总是盖着厚厚的一层红糖，冬天的时候它可以使下面的粥一个小时内都不会冷。一大碗这种粥才五文钱。通常我还要吃一块小米饼，它跟纸差不多薄，按周长算，它跟一块威尔士奶酪差不多大小。这饼要花三文钱。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挺奢侈的：我总要在那薄饼上抹上外国的黄油。总之，我的早饭，包括茶，从来不超过十文钱；按照当时的汇率算，这差不多是半个便士。我的午饭也是让我的仆人从街上买的。午饭是四只粽子，街上的小贩子叫卖的这种粽子，包在很宽的叶子里；四只粽子加起来用不了一个便士。

我的晚饭非常丰盛。晚饭我通常下馆子，而不是在家吃。在饭馆里，晚饭我会点上一道烩鸡片（一道汤煮的、味道很好的鸡肉），晚上还要点一道煮鱼片（一道用风味独特浓汤煮的鱼片）。在点了肉和鱼之后，我还会点四只小笼包，其形状和大小相当于一只小玻璃杯。除了这些就是当地的茶，茶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一顿晚饭的花销算是可观的，但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二十文钱，也就是十六便士的样子。

冬天的时候，开始吃晚饭之前我经常喝两小盅温过的糯米黄酒，这大概要花六文钱。这点酒下肚，冰冷的双脚不一会儿便暖和和的，舒服得很。

为了换换口味，我经常去清真馆子，大家都认为清真馆子比中国馆子要干净些。在清真馆子可以吃到烤牛排、烤羊排，味道好极了。

山西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人们的饮食简单到了极点。任何肉类、任何蔬菜都断了货源。不过，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替代食品，当地人叫它“果皮”（即橘子皮）。客人在中午或晚上到了一家客栈，他们能

点的就是这个东西。点上之后，店老板便取出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再把它在一口平底锅里压扁。接着，他便把那薄面饼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点一点地掐出来，再把掐出来的疙瘩倒进锅中滚开的水里。不大一会儿，这些小面片便都煮熟了，可以和着一些汤料，装进大碗里。最后，再往大碗里加点醋和一点点盐。这样，“橘皮”面便做好、上桌了。这东西非常健康，做起来也很快。

5.一个仇视外国人的退休官员

青州城里住着一位已经退休的前任知县，他对外国人怀着强烈的偏见。于是他去拜访警察局长，也就是我现在的房东，并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通，说他居然敢把房子租给一个洋鬼子。而这位警察局长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这件事处理得也非常公道。他回答说，道台（就是管理着包括青州府在内共三个州的官员）最近有令，警告老百姓不要欺负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麻烦。他又能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把房子租给这个外国人，道台就会找他的麻烦。而且，这件事还得考虑到司库的面子，因为他已经为这个外国人做了担保。

这个前任知县碰了一鼻子的灰。在警察局长——以前曾是他的下属——那里游说失败后，他非常生气，便跑到现任知县那里，大发牢骚，说外国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麻烦，并要求他把我从城里赶走。知县给他的答复是，鉴于他的上司知府大人——管理着十个县的官员——现在就住在城里，他最好去拜见他，如果他下令，那么，他作为知县便可以采取行动。

于是，这个前任知县接下来便去拜访了知府大人，一个满族人。不过，他得到的答复却是：“北京城里住了那么多的外国人，但那里并没有什么麻烦。我听人说，这个外国人把药送给别人，为穷人做了很多好事。如此说来，无缘无故地找人家的麻烦没有道理。当然啦，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要让我知道，我会过问的。”

在中国，不管做什么事，都没有秘密可言。这个前任知县所碰的

钉子，全城的人不久便全知道了；他的无理取闹被现任官员制止住了，却没有人同情他。这起风波之后，普通民众也就不敢刁难我了，我也就获准平平安安地住在城里。

后来，这个前任知县又要找我的麻烦，说我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拐卖儿童。我的文书忍无可忍，反驳道："谁敢说我这是拐卖儿童？"就这样，他直截了当地反驳了这个退休官员，而且就在街当中，所有的旁观者无不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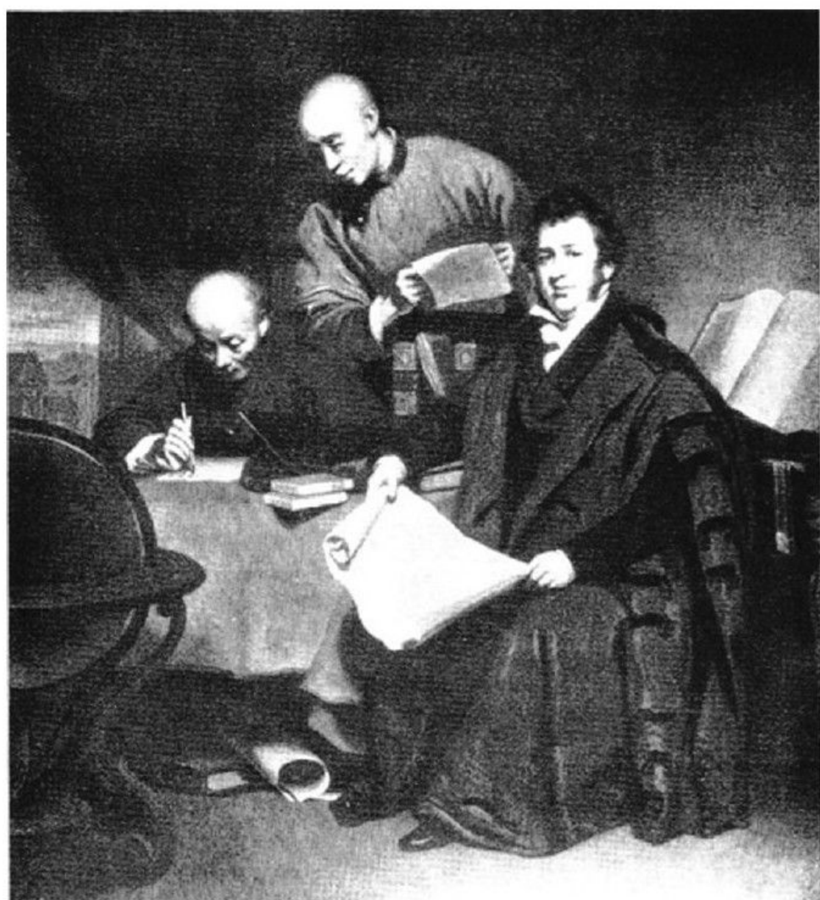
这个退休官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了侮辱，暴跳如雷，当即就跑到知府那里去打小报告，说我们在拐卖儿童。我的做警察局长的房东从一开始对我就非常好，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为了把事端扼杀在萌芽状态，我给知府写了封信，声明有人在挑拨离间，企图挑拨民众来与我对抗，并请求他对于这些为恶者给予制止。

第二天上午，知府签署的一份告示便在城墙上张贴出来了，上面写得分明，凡是收容在饥荒中死去父母的孤儿的人，都是社会的慈善人士，对这样的人，全社会应该抱感激之情；任何居心叵测、散布谣言的人，必将受到严惩。就这样，那个退休官员对我进行迫害的最后企图终未得逞，社会舆论都反对他，并支持办孤儿院。

6.研究本土宗教书籍

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后，我便可以不受打搅地继续我的研习。在这之前，我已经研究过一些由理雅各博士（Dr.Legge）翻译的儒家经典。现在我则开始研究一些虔诚教派常用的宗教书籍。这些书籍中最重要的当数《近思录》（"虔诚信仰汇录"），该书是汉语中最常见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汇编。当我问到什么是佛教最核心的书籍时，有人告诉我是《金刚经》（Diamond Classic）；一个中国朋友送给我一本很漂亮的书，书分为两卷，是手抄本。书本身装订得非常整齐美观，其书法美不胜收，我爱不释手，决定用它做我的习字字帖。于是，我每天花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去研究并抄写这部经典。每抄一

段，后面还要附上对一些术语的简要的解释。



早期传教士在和中国人合作翻译圣经

这种训练，以及我对《近思录》的研究，使我掌握了一套中国人能理解的宗教术语，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翻译《圣经》时所采用的方法。在吸收了这些书籍中的宗教思想以及宗教词汇后，我用中文写出了一本“教理问答”；在这当中，我尽量避免使用外国的术语，因为中国人讨厌外国的东西；但我采用了我主从人的良知入手的方法，而不是动不动就搬出一位中国人不熟悉的某个权威来。同时，我这期间还翻译了《拯救之道》，属灵小册子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一本书，还有耶利米·泰勒（Jeremy Taylor）[10]的《圣洁

生活》的第一部分，以及弗朗西斯·德·索尔斯（Francisde Sales's）[11]的《虔诚人生》。

7.拜访一个教派领袖

我的下一个行动是要与本地很有影响的教派的领袖人物接触，他住在二十英里外的山中。我派了两个信使去拜访他，请他在进城时来与我相见。他给我的答复是，他很少来青州府，不过，如果我到他那里去，他很乐意在他那里见我。于是我专程去见了他。

我决心通过这次旅行把《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我主对使徒们的教导付诸行动[12]。其时正是7月，我是步行去的。

到达目的地时，我得到的却是最为敌意的接待，以前我从未受到过；这敌意不是来自我的拜访对象，而是来自他的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狂热的家伙，那天碰巧他也在那屋子里过夜。吃晚饭的时候，甚至一直到夜里，他都喋喋不休地诋毁基督宗教，说它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他指责基督教是不人道的，其主要证据是一个行医的传教士所做的工作，把他所做的人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看作不人道的证据。他攻击基督教的言辞如此之恶毒，甚至拒绝听我解释，哪怕是一句。我知道，指望跟他好好谈谈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拜访对象叫到一边，告诉他，上帝把我从地球的另一边派来，给他以及世界上跟他一样的好人带来特别的讯息；可是，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他尚未准备好去接受它，所以，我决定立刻离开。他一听这话，便立刻为他的那个传道人的行为道歉，并告诉我那个人马上就走。他请求我再留一天，好让我解释我所带来的讯息。我留了下来，并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那时，我们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于次日告辞，接着去访问其他那些正在追寻最高真理的人；主人派他的一个仆人带我翻到山的那一边，并给我指了路，把我送上了通向下一个目的地的大路。与这个人道别时，我对他说，他这样给我

带路，帮助我去把那些追求最高真理的人团结到一起，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与上帝联合。

8.善良的村民们

我独自一人在路上走着，一直走到晌午时分。日头很大，天气很热。尽管我的头上戴着顶帽檐像阳伞的中国草帽，我还是觉得热；忽然发现路边有棵大树，枝繁叶茂，树叶在微风中簌簌作响，我走在树荫下坐了下来，感到很是凉快。不一会儿，一群肩上扛着锄头的村民从旁边走过，他们正从田里上来，回家吃午饭，我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这时，我听见两个刚从我面前走过的人在议论："你瞧瞧。他从人家面前走过，连一声招呼也不打！"他们的话音刚落，就见走在最前面那个人突然转过身来，走到我的面前。他问我这是要到哪里去，他听我回答之后，便说道："你大概不能到那边去。那条河里正在发大水。跟我们回去吧，等洪水退了再走吧。"

我乐呵呵地跟着他进了村，到了村子里，他把我带到了一所学校；一般说来，校舍往往是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之一。在小学校里，我跟校长一起吃了午饭，并留在那里一直聊到差不多五点钟；这时，那人来告诉我，说河里的水已经退去一些，我可以过河了。

有六个村民跟我一起到了河边，那条河大约有一百码宽，水流湍急。河上没有桥，我们不得不脱掉衣服，蹚水过河。其中一个人把我的衣服卷成一个卷儿顶在头上，他和另外一个人并排走在前面带路。我的两侧各有一个人保护，另外还有两个人跟在我的后面。越往前走，河水越来越深，到后来，水已经齐到我们的胸脯。水流非常湍急，我可以感到大块的石子儿在我的脚下滚动。每当我摇晃时，我周围的人便立刻上来把我扶住；就这样，我们平安地渡到了河的对岸。我终于发现，这条河实在是非常危险，要是我一个人冒险渡河，我一定会被淹死的；而所有这些人对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那么善良，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我对他们说，对他们的好心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是。

“哦，”他们叫道，“可别那样说。你一定不记得我们了吧？我们认识你呢。过年的时候，我们到青州府附近的一个有名的寺庙去，在那里进香。听说城里有个外国人，我们就到你住的那家旅店去看你。你很有礼貌，接待了我们，还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又请我们喝茶。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回报你的好心。”随后他们便把我去下一个目的地的路指点给我，于是我们便互致祝福，分了手。

在太阳下山之前，我到了我的目的地：另一个山村。我特地来拜访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他曾经常到青州府去拜访我，并与我长谈。就像在前面的那个村子里一样，他也给了我非常真诚的欢迎，把我带到学校去，并介绍给学校的老师，一位年届六旬的和善的老者。这不是一所小学，而是一所有着二十多名学生的中学，学生的年龄在十七到二十五岁之间。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些学生。

由于天很热，他们决定在露天的院子里吃晚饭。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就中西方的很多问题进行比较，展开讨论。晚饭后，学生们围拢上来，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把扇子，并请我在上面题字。在中国，这是很常见一种风尚；人们会把名人写在扇子上的书法很得意地示人。我跟学生们约定，如果我在他们的扇子的一面写上英文，他们得在扇子的另一面用中文翻译出来。于是，我在每一把扇子的一面都写了一首赞美诗。就这样，我们彼此都成了好朋友，他们约我下次再去拜访他们，并把赞美诗中所包含的教义更详细地讲给他们听。分别的时候，我被告知，在我路上要经过的一个市镇上，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道教法会。

9.道观里的午夜妇女集会

到了镇上后，我去了客栈老板那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在青州府拜访过我。他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并把那个宗教集会的事跟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原来，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宗教集会，参加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这些妇女大多数都在四十岁，或四十多岁。她们主要是来祈求丰收，但也有的是来求子的。

白天的时候，妇女们成群结队纷纷来到镇上，她们有的是三三两两地来，有的是五六个一群，有的则是十几个一伙；听说镇上来了个外国人，她们都很好奇，要来见我。小客栈里一整天都被来来往往的妇女们挤满了；她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关于我国耕作的，有关于我国收成的，有关于父母与孩子的，也有关于宗教的，这就让我有机会对她们讲解基督教。

仪式在道观的大殿举行，由一个道士主持，在得到了这个道士的许可后，我去观看了仪式。仪式是在半夜举行的。每个妇女都送给他捐赠，大多数妇女捐的是一袋小米之类的东西。他则把捐赠者的名字及数量写在两张狭长的黄纸上。其中一张纸张贴在道观外面的墙上，这样，行人便可以看到捐赠的名单。另一张纸则先放在一边，到半夜的时候，放到道观的主神像前焚烧，好让那些名字升到天上。仪式举行的过程中，道士焚着香，唱着经文，但没有一句教导或讲道，所以，我便觉得那些人就像是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羔羊。仪式结束后，一些妇女回到她们在镇上的住处，其他妇女则睡在道观的院子里，还有一些最为虔诚的妇女则继续祷告，直到困得不行才睡去。

第二天，她们成群结队地回到她们各自的家中，而我则回到了青州府。我终于发现，那些虔诚的人总是乐于迎接我，听我讲道，对我殷勤备至，这充分说明，我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的宣讲的训条是千真万确的。

10.拜访一位隐士

大约就是在这期间，我去寻访了山间的一个山洞，那里住着一位寻求真正宗教的道教隐士。一天晚上，我到达离山洞最近的一个村子，在客栈里，我对那位隐士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得知去山洞的路该怎么走。第二天清早，我找到了那个地方，于是，我开始跟他聊起了宗教。他接着告诉我，在我拜访过这山区的本地宗教领袖之后，那人便把散布在各个村庄里的他的门生们召集到了一起，把我的拜访向他们描述了一遍。这位隐士与他的那些门生一起去了，他还得

到了我留在那位宗教领袖那里的一些书籍，这些书，这位隐士正悉心研究着呢。当他明白我是何许人时，他对我很尊敬，执意请我跟他一起吃早饭。早饭主要是吃小米粥，是一种跟燕麦粥差不多的东西。然后，他便跟我讲了他正在钻研的道教中最高深的真理，而我则努力向他指出，他的那些问题在基督教里解释得更全面、更清楚。

两三年后，那些村子里出现了很多小型的基督教教堂，这是村民们向我们青州府传教点请求派遣基督教教师的结果。



西方传教士所建中式风格的教堂

11.最初的皈依者

为了满足当地教派的需求，我把手边所能找到的教理问答，不管是英语的还是威尔士语的，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并从中选出最好的，再加上能够对中国人的良知感发生作用的问答。我还对流传最广泛的当地宗教的小册子加以利用，删除掉那些偶像崇拜的内容，加进唯一真神崇拜的条文。

就在我准备新的教理问答的时候，一个以纺丝为营生的虔诚的人，经常来拜访我，跟我谈宗教。他请求我给他一册教理问答，好让他回去研读、记诵；记诵神圣的经文，在虔信宗教的中国人当中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他满心欢喜地把它带回了家，每天诵读，一页一页地研习。一天，正当他埋头于研习时，他的妻子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他问她是什么事情让她难过。

“你马上就要去天堂了，可我却要被抛在后面。”她这样回答，并哭得更伤心了。

“可你也可以学这个教，然后到天堂去呀，”他说。

“不行啊，我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学这本书呢？”她哭道。

“我来教你。”

“可是我很笨。我学不会这些字。”

“假如你每天学一个字，那又不是难事。这样，十天你就可以学十个字，一百天就是一百个字。只要你肯坚持，用不了多久，这本书的字你就全认识了。”

“我会坚持的，”她回答道，“只要你肯教我。”

就这样，他们便一起研习教理问答了。

除了编写教理问答，我还挑选了约三十首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对

于非基督教徒来说，即使不解释，也有感染力。在学完教理问答后，织工和他的妻子又把这些赞美诗记住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一个五岁的女孩，学习这些赞美诗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快。等他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住了，织工和他的妻子便请求给他们洗礼。浸入水中进行洗礼的仪式在当时还非常罕见，我没有把握，不知非基督教徒们会怎么看，于是，我把他们两个带到了青州府的西门外，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河水很清澈，周围除了一座佛教寺庙没有别的房子。我先去拜访了那个和尚，把这个仪式的涵义对他作了解释，并问他是否愿意暂借一两间屋子给我们用一下。他欣然同意，于是，我把这对夫妻带到了河里，给他们洗了礼；仪式结束后，我们在庙里换了衣服。

1875年底，我有一个机会因事去烟台。我在内地已经住了有十个月，这期间只见到过外国人两次。到这时，成为基督教徒的男人只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织工，第二个是我的老师。然而，到第二年年初，我为十五个人行了洗礼[13]。到了这一步，我在我的院子里主持过一次洗礼仪式。为了防止有人对这个不同寻常仪式在非基督教徒中散布谣言，我问我的老朋友，也就是青州府的司库，是否愿意到场。他同意了。他在场便足以让外面的公众相信，这里面所做的事是正当的。

第四章　山东赈灾

1.粮食绝收

中国南方多雨，所以中国南方常受到涝灾的侵袭，北方多遭旱灾困扰。1876至1878年间，中国北方干旱，几乎无雨。据说，大约有十个省份这期间遭受旱灾，灾害的中心是在山西省的南部，半径约有一千英里的地方。北方省份的灾情非常之严重，不仅是北方史上罕见的，甚至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恐惧感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

1876年春天，农民们播种之后却不见降雨，官员和老百姓都非常焦虑，便到各种各样的寺庙去求雨。青州府的行政长官发布了一份公告，号召民众吃斋，不吃任何肉食，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把铁链子戴在自己的脖子、手腕和脚上，从城里的街道上走过，到大庙去求雨。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官员出门总是坐轿子的。乡下的老百姓头戴着用柳条编的花冠，成群结队地跟在他的后面。当行政长官在庙中的神像前匍匐在地上的时候，老百姓们则在外面的院子里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祈求降雨。

2.劝老百姓向上帝求告的海报

就在他们这样四处向偶像祈求的时候，我制作了一些黄色的海报，上面只有很少的字，告诉他们，如果大家想有雨，最好的办法就是丢开那些死的偶像，转向活的真神，向他祷告，服从他对生命的诫命与要求。我骑着马到青州府下属的十一个县城，把这些海报贴在城门口。其效果相当惊人。每到一个县城，我会到这个城里的大客栈去吃点东西。在我吃完之前，老人们打发来的人就已找到客栈里来了，他们双膝跪地，请求我告诉他们该怎样崇拜并向那位活着的真神祷

告。再过些时候，一些小脚妇女又翻山越岭二十多英里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请教同样的问题。几年之后，这些村民便成为那些山区基督教堂的中坚分子。

3.饥荒引起的骚乱

在农历五月初九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据传，发生的抢劫案不少于十九起。一个被抢劫的人反抗时，居然被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捅了刀。”

到五月底时仍然没有下雨，民众很紧张，很无序。

一伙妇女开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占领了房子，在里面烧了一顿饭吃，接着又开到下一家，准备做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方法可以尝到甜头，便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团伙，从一个村子劫掠到另一个村子。闻知这些骚乱的消息后，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府知县及地方长官的顶戴，并传话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他们的位子就要被更有能力的人士替代。这样，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要么将违法者斩首，要么把他们关在木头笼子里，在那里面，犯人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最终活活饿死。行刑的地点就挨着我的后院。这样的酷刑每天都有，经过惩治，秩序得到了恢复，官员们也重新获得了他们的顶戴。

穷人们就算不被邻居打劫，还是难免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农历五月初十，在访问一个村子时，我发现一些男孩子提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从田里采来的野菜和从树上摘下来的叶子。他们在客栈附近的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我在吃着饼当午饭时，他们则开始吃他们的叶子。我问他们是否乐意拿他们的食物来换我的。他们能吃上面饼，简直乐坏了。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个孩子的脸很红，眼睛肿得都快睁不开了。当我问他的脸为什么那么肿时，我才得知他是吃了槐树的叶子，这种树叶对有些人有毒，但对别的人却无害。

就在同一天，一名小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而被斩首处决。农历五月十一这天，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笼子里。官府发现谷子的价

格太高，于是巡抚便发布了一个通告，命令灾区的官员对运进的谷物免征税收；官府还从江苏和满洲大量购进粮食，并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卖给老百姓，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求见了青州府的知府，建议他向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提出请求，与朝鲜和日本进行自由贸易，进口谷物，并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谷物的价格。

4.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六月三十日，两个都是秀才（相当于文学硕士）、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文人来找我。他们一个是寿光地方人士，一个是益都地方人士。可是，由于我当时很忙，根据约定，他们于第二天来拜访了我。他们一进门就拜倒在地上，求我收他们做弟子。谈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伙人派来的代表，那些人希望我挑头造反，因为官府不给濒临死亡的老百姓提供粮食。他们已经租好了一处房子，一大群人已准备好时刻听从我的指挥。我告诉这两个人，这样的举动，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一旦混乱开了头，谁也不知道这骚乱何时是个了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只会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我建议他们，为了改进民生应该多出主意而不是制造混乱。

七月初二（星期天）——“民众谣传有个测字先生复活了，预言今年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掉。假如有一个人把这个谣言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把他传给另外十个人，这些人分别再传给十个人，用不了多久，全国人都会感到自己岌岌可危。于是我利用谣言传播的机会，像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人讲话那样，我也对民众进行讲道，敦促他们为自己的罪忏悔，并心向上帝，只有这样上帝才有可能怜悯他们。官员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无知的罪导致了民众的死亡。一个站在我门前的妇女，她的手上抱着她的婴儿，累得不行，一下子坐到地上；她看到我的房东，就请求他从旁边的树上摘几片叶子。他摘了，而她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并说：‘现在我感觉好

多了。’看着饥饿的人们苍白的脸上平静的忍耐，的确令人揪心。见到这么多苦难的景象，我所能做的就是每过几天发放一点救济。”

5.发放救济钱的方法

很难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既把钱给所有的人发放出去，但又要确保不让领过钱的人回过头来重新领取。我忽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城里最贫穷的街区，叫发放人站在一条长巷子的出口处，让认领人排成长队一一从我面前经过。给每人一份救济钱后，我就在他脏兮兮的手上用印泥做一个标记，因为我知道这轻易擦不掉。过了一会儿之后，有些领过钱的人会绕到巷子的另一头，重新排队；当他们把干净的手伸出来时，自然让人怀疑，我们便断定这些人一定先前已经领过钱但用力把手上的印泥擦掉了。于是我们便不管他们，继续给其余那些手还是脏兮兮的人发放。

有人曾尝试从城墙上往外丢钱给穷人的方式发放救济款，结果造成了混乱。

我发现我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两件事：“共管辖十一个县的知府向皇上请愿，向他报告七个县遭受饥荒的情况。”“青州府学监王先生，在城隍庙求雨两天。”

7月初的时候，有消息说，在与临朐相邻的沂源县，有个人有五百亩田，但为了得到食物要把他的田产卖掉。可是，每亩他只能卖到两块半钱，怎么也高不上去，而每亩地的实价是五十到一百块。这个低价让他感到绝望，于是他在饭里面放了砒霜，这样，全家人便死在一起，一了百了。

我感到，我不能丢开这个地方而自保，也不能在穷人们挨饿的时候独自把钱留着，因为是上帝把它们送到了我的面前。可是，在进行个人救助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粮店老板，他打算把库存的粮食统统发放出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处，为了活命他们一拥而上，结果一个小女孩给踩死了；大家你踩我

踏，很多人虽然得以逃生但都骨折了。这件事发生之后，知府便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施舍，而饥饿的人们只能在街上徘徊。

七月初三——“在做晨祷的时候，我读到我主喂饱数千人的那一段，这一段中有一个细节是，他吩咐众人坐下。我的头脑中像有一道闪电划过，我从经文中的‘坐下’得到了启示——坐着的人群不会拥挤。于是我叫来十来个人，让他们把饥饿的人群带到我房子对面的一个空旷的打谷场上，并叫他们一排排地坐下。男人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都坐下了。这是，我才出现，我告诉他们，我的钱很少，不过，如果他们肯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乐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第一轮我只分发了很少的一点，然后我又发了第二轮、第三轮。我手下的人开始发放后，没有一个民众离开他们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像是在参加一场圣餐礼。官府的衙门就在街的对面，不一会儿，衙门里的几个衙役以及一两个当差的非常惊奇地看着这平静的场面。把最后一点钱发放出去后，我告诉他们我再也没有了，并对他们说，就是官府也救不了他们，除非天降大雨。要下雨，我们必须向上帝祷告。于是我叫他们都跪了下来，我则向上帝祷告请他怜悯他们。数千穷苦人怀着感恩的心情，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了微薄的救助，并尽量参与到了祈祷当中。”

6.第二次有人叫我做造反的头领

青州府东面约八英里处有个地方叫凤凰亭，七月初三的晚上，有个人从那里来拜访我。他说，那里的民众已经准备起来造反，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并做头领。我回答说，我不可能考虑这种行动。可他还是要勉强我，而我对这个很危险的谈话感到非常不安；就在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原来，我先前向这个马车夫订了一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府；我告诉我的客人，到了济南后，我会去拜访巡抚大人，并请求他为老百姓多提供些帮助。在这个人离开之前，跟着我的那个男孩子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已经聚集在外面，正等着这个人把我带走。但这个人终于走了，临走时说，等我从济南府回来

他会再来拜访我。我给了他一张稍大一点的海报。我下午在城里各处张贴的就是这种海报，上面印的是“主祷文”及其一些解释和劝人向善的文字。

由于我经常给穷人们一点接济，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一些妇女把我的态度与官员们的态度作比较，说官员们对穷人不闻不问。我意识到，如果人们继续这样议论下去，一旦有人传言我在谋划造反，官员们必定信以为真，于是我决定立即离开这座城。在出发之前，我给我的房东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每个月的租金还不到五个墨西哥元呢。

离开青州府大约五十里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府的一个裁缝；这个人有个弟弟，在济南府，也是个裁缝，小男孩想去看的就是他。担心有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拐骗了一个男孩，我便找了个人把这小男孩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7.就避免未来的饥荒向巡抚建言

济南府的巡抚叫丁宝桢，祖籍贵州。我七月初七抵达济南城，并去拜访了他。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官员之一，并因此而出名。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占领全国十八个省份中的十三个，是丁宝桢的部队阻止了太平军向京城进发。我建议他作出部署，从朝鲜、日本以及满洲进口粮食，并建设铁路、开发矿产，给穷人以就业的机会。他听得津津有味，并说他很赞成实施这样的改革。可是，山东还是没有福气，因为他不久就要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再也没有机会为山东人造福。他的儿子叫丁体常，我后来在山西见到他时他正任那里的道台；由于我先前跟他父亲相识，我在太原府期间他对我一直很友好。回来，他被提拔，成为广东省的大员之一。

回到青州府后我才发现，心怀叵测的人已经散布谣言，说我把一个小男孩拐到了济南府。我立即去见了那个裁缝，也就是小男孩的父亲，并带他跟我一起去了衙门。在衙门里，当着官府门上（秘书）、

其他衙门职员，以及十来个走卒的面，小男孩的父亲证实，他的儿子的确从家里跑走，上了我的马车，但我后来派人把他送回来了，他的父母对我的举动非常感激，现在孩子就在他们家中。

8.来自烟台的捐赠

我在烟台的朋友卡迈克尔博士为遭受饥荒的灾民募集到了一笔款子，农历六月十一，我把这一小笔捐款送交给知县发放，对他说，我希望他不会看不上这点赠予。他看上去很高兴，并说他要让得到捐助的人知道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就不必说明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要让一些穷人不被饿死。那段时间我在日记里写道：“田产的价格已经跌到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买家。老百姓以三分之一的价钱卖掉他们的铜的和锌的器皿。春天的时候，衣物在当铺里可以当到五百块钱，后来价格降到了四百块，再后来则是三百，而现在，同样的东西只能当到一百块。事实上，当铺现在已经拒绝接受这些东西了，只是官员们不许他们这样做。总之，东西几乎当不出钱来了。”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斩首处决，还有一个被关进了笼子。”

9.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

与此同时，除了张贴小海报，教人们向上帝祈祷以求得下雨，我们还广泛散布宣传基督教的散页传单，这把虔诚的人不断吸引到青州府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宗教上的事。

我向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捐赠的事实，对于民众来说，足以证明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对于所有来询问的人，我都给他们赠送教理问答和赞美诗，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把里面的内容记住。他们回到家中后，就跟他们的邻居们谈论他们获得的书，这样一来，在好几个中心便有了很多的询问者。每一个中心最后便成为一个教堂

的核心部分。这些带头的人把教理问答和赞美诗背完之后，他们又来找我，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

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时我已经翻译了耶利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一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讲如何面对上帝以及如何修行，这便引导读者直接面对上帝以得到他的启示和指引，而不是单纯依赖外国传教士来教导和规劝。我还从《诗篇》和《新约全书》中选出一些章节，让那些带头人背记，好让他们比他们的追随者先学一步。为了让他们学习祷告，我请人发来了英国教会的祈祷书作为临时的材料，并教这些带头人在祷告时如何使用这些。

这些来青州府与我住上几天的带头人的数目一度达到六十人。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他们则自带铺盖和吃的。除了聚集这些男人，我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妇女的集会，我给她们指导，指定部分内容让她们背诵。在每个中心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礼拜日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基督徒们给追随者们提供辅导，听他们背诵教理问答和赞美诗，他们还聚在一起祷告；这样，不到一年便有两千多追随者正常集会祷告，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出现了十几个崇拜的中心。



晚清的基督教教民

10.我的传教策略被倪文思博士采用

人在烟台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文思博士每年都要在山东境内进行两次长途传教旅行，一次是在春天，一次是在秋天。青州府离烟台有八百里路，是他旅行的最远点，他通常会在我这里住上一两天，我们在一起谈论各种传教手段。

我注意到，在教育方面和宗教教义的传播方面，中国人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的团体是自足并且是自我管理的。于是我忽然想到，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好办法应该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播方法。传教中最大的问题是，把基督教捧得很高，要中国人相信，基督教比他们固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好。在向倪文思博士介绍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是，几个本地人自愿出来承担传教的工作。倪文思博士跟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考察我的传教方法的效果。他大为吃惊，并决定采用这种方法，作为他新的且是核心的传教策略。

他在我的屋子里写出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规定以便发展这一方法，并用我的胶板印刷机进行复制。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便是按照这种方法传教，非常成功；然后，他又以此为主题撰写了系列文章，先是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随后又出版了小册子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美国和英格兰的差会领导层当中传阅，并被命名为“倪文思博士传教法”；在这个方法中，本国人是作为传教的主体，而不是外国传教士。我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所在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把它寄给了我，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法事实上是我先发现的。直到后来支撑它的基本原则被忽略了，这种方法才不再流行。

11.赈灾期间的一件事

在向当地官员说明情况，说我有足够的基金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发放救济之后，我通常会派几个人在开始发放之前先到一些村子里去，把最需要救济的那些人家的名字先登记下来，然后再给他们发放领取救济的券。然后便确定好发放救济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持券的人便到一个中心地点去领取救济。有一次，地点是定在一个很小的市镇上。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发现那儿聚集的人数相当于持券人的两倍到三倍，他们都恳求救济，他们的驴子、骡子和牛都被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钱平均分发，各人所得到的就会很少。可是，怎样才能把赈灾的钱只发到那些持券人的手中呢？人群把大门挤得水泄不通，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也只是白费口舌。饥饿感已经把他们逼到什么也不顾的地步。

在两个钟头里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最后我对我的助手们说：“我从镇上跑出去，过了河之后，我就往对面的山上走。那些手上没有券的人很有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再给那些名字已经录在簿子上的人发放。”

不出我所料，那些没有券的人都跟着我请求救济。于是，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好让那些小脚妇女也能跟上我。到了河对面那座山的山顶时，我停了下来，那些人在我周围纷纷下跪，向我苦苦哀求，希

望我给他们钱。这时，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夏日的一天，有个赶路的人又热又渴，就到一个房子里要点凉水。主妇把屋子里的一点都给了他，他把它全喝了。在他喝完之前，又有一个人，跟刚才那人一样又热又渴；他也走了进来，吵闹着要喝水。主妇回答道：‘我屋子已经没有水了，不过，如果你稍等一下，我就可以到井边给你打些水来。’今天，我手上的救济钱只是很小的一笔，只够发给那些已经拿到券的人。你们窘迫到这种程度，我心里很难过。不过，如果你们耐心等待，我会给住在海边的那些外国人写信，把你们的苦难告诉他们，等更多的钱来了，我会很乐意发给你们。

跪在我脚边的一个妇女听得非常认真，她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便站起身来，把我讲的话说给那群人听，并把故事中寓意也解释了。我的话她不但复述得很清楚，解释得也很清晰。那群人并没有生气，而是开始散去，对我所作的解释以及我请求的合理性表示满意。我并没有立即回到镇上，因为我要给负责发放救济钱的助手们足够的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等我最终回去时，我才得知，那些持券的人是从一个大门放进去，再从另一个大门离开，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12.来自港口城市的捐款



传教士和他们的小教民在一起

1876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给上海联合教会（Union Church）的詹姆斯·托马斯主教写信，把山东的灾情作了描述，并建议把我的记述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上。我已经把孤儿们聚拢在一起，所以我请求获得基金帮助他们，并指出，四元钱可以维持一个孤儿三个月的生活，四百元钱便可以维持一百个孤儿这么长时间的生活。捐款不久便纷纷汇来。N.P.安德森夫人（即赖松小姐）募集了两百元，并通过托马斯先生转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募集了五百元，那里的中国人也汇来两百元。赈灾委员会在不同的港埠成立，捐赠基金集中到青州府我这里。靠这些钱，我便可以在五个中心点建立起孤儿院，每处各容纳一百个孤儿，并能正常给灾民发放救济。

以下是我当时在青州府时为自己制定的一个时间表，它或许能引起读者们的某种兴趣：

7:30—8:00(上午)	早餐
8:00—8:30	祷告
8:30—10:00	英译中
10:00—12:30	指导求教者,或者布道
12:30—2:00(下午)	督促孤儿,教音乐简谱,其他
2:00—5:00	外译中
5:00—7:00	处理各项琐事,散步,晚餐
7:00—8:00	读英文的教会史
8:00—8:20	中文祷告
8:20—9:00	读培根的论说文以及巴特勒的作品
9:00—10:00	与教师们交谈

13.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与益都相连、在益都东面的昌乐县据说灾情非常严重。在昌乐县城发放救济时，我最终是死里逃生的。由于我们的救济金十分有限，只能就手上现有的一点钱作出安排，所以我决定先救济昌乐县的秀才。

这些相当于硕士的秀才们往往多出于寒门。一个家庭为了让其中一个儿子赢得功名、出人头地，往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这期间，基督教最大的反对者是来自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通过理论来向他们证明基督教的价值，我决定向昌乐县所有的秀才每人发放一元钱的救济。

后来，有更多的救济款到手后，我决定对一些灾情最严重的村子给予救济，并派人到那些村子把穷人们的名字登录上来。名字登录好了，我给村民们发放救济的日子也确定了，我便到潍县城里把银子兑换成现钱。为了运这些钱，我用了三辆大马车，每辆车用三头骡子

拉。要去受灾的那些村子，我们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可是，昌乐的知县开始怀疑我的动机，而我事先也不曾有时间对他说明情况。他认为，我给秀才发放救济就是贿赂这个县的地方官员，而现在我给予最穷人救济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于是，当他听说我正要运着三大车的现钱穿过县城时，他大叫道："这个外国佬到我们这里来、干涉我们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用心？假如他的钱被人抢了，不关我的事。"民众一听，知道这是暗示，便准备行动。

中午时分我抵达县城的南郊，并在那里的一处客栈吃饭。吃完饭后，我叫车夫们发车，前往那些村子。我们离开客栈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杀气腾腾的人就围了上来，并动手拿车上的钱。我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便叫车夫们调转车头，回到客栈里去。在客栈里，我与我的当地助手商量了一下，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到村子里去发放救济钱了，因为那些村子还有几英里远。于是我把三辆马车留在客栈里，让我的助手看管，我自己则骑着马去最中心的那个村子解释情况。

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在那个处于中心的村子里，从周围地区积聚到那里的几千人等着救济，已经耐心地等了一整天，很多人手上还抱着孩子。我不知道，民众除了对我发怒并揍我一顿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如果我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告诉他们是昌乐知县阻止我，不许我把救济款运来，民众一怒之下很可能冲到城里，局面对我一定会很危险。于是我与当地的助手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门上张贴一个告示，告诉他们，由于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我很遗憾未能如约于当天把救济款带来，不过，我劝村民们尽快回到各自的村子去，免得站在那里受冻；同时，我叫每个村子留下两三个年长的，我好安排他们尽早把救济的钱送到他们的村子里。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不到十分钟所有的人都安安静静地散掉了，然后，我跟那些年长者商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到青州府去，到时我把救济款给他们，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子里发放。

第二天，我回到了昌乐。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回到了那家客栈。

我刚到城郊，就有人冲出家门，一边束着裤带（他们打架前总是这样）一边大声喊着：“Lai-le！Lai-le！”（意思是“他来啦！他来啦”！）

回到客栈后，我问我的助手们那一夜是怎么过的。他们告诉我，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那么危险的夜晚。那些人先是想强行打开客栈的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又一阵阵地往墙里扔石头和砖头，我的助手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躲来躲去。

我回到客栈不久，一名军官送来他的名片，说希望见见我。他给我出了些主意后就离开了，而我怀疑那是些别有用心的主意。客栈外面的人群在急剧增加，气势越来越凶。十分钟后，我决定该如何对付这蓄谋的不幸。我叫我的助手在客栈里再坚守二十分钟，照管好马车；然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他带着五吊钱离开客栈和马车，到通往青州府的大路上约六里的地方去，并在那里等我。

14.与官员交涉

说完这些我便推开客栈的大门，快步走向城门。整个人群“哗”地跟了上来。进城之后，我直奔衙门，那些人叫了起来：“他到衙门去啦！他到衙门去啦！”在衙门的门前，我碰上知县的一个跟班的，我问他县老爷是否在里面。他想跟我周旋，问我有什么事。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他啰嗦，把他推到一边，径直走了进去，一直走到衙门里。进了一间内室，发现刚才拜访过我的那个军官正在和一个人交谈，我猜想，那人就是知县。我的突然出现把他们两个吓了一跳，他们似乎还担心我对他们动粗。

这时，我对知县说：“你一定知道城南郊外发生的事情，装现钱的马车正陷在客栈里。我叫我的助手在那里照管二十分钟。”然后，我掏出我的怀表。“二十分钟后，他就要离开那里，不跟任何人交代一句。现在，几百人已经把客栈围住，而且威胁要动武，我告诉你，我的人离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全算在你的头上。在他离开客栈

之前，你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去那里维持秩序，保住马车。”

“哦，你的钱跟我无关！”那知县吼道。

“但是，这个地方的治安跟你有关。”我回答道，“我不过是来告知你，好让你平息骚乱。”说完这话我便从他那里走开了，像刚才一样飞快地走过庭院。

知县很是紧张，立刻派人到客栈去，于是，我手下的人便把马车交由他们负责。

外面的人群见我从衙门里出来，叫了起来：“他回客栈啦！”他们叫着便转身冲到了我的前面，拼命地跑着。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全都转身向南城门跑去；可我却穿过一段比较空旷的地方，径直朝西城门走去。

这时，天已经黑了。在西门外我看到两个推手推车的车夫在休息，吃着硬邦邦的麦饼当晚饭。我问他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告诉我是要到姚沟去。我正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我请他们带着我一起走。能揽到活他们自然喜出望外，于是我爬上了手推车，他们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他们走得很快，我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帮暴徒而庆幸。

可是，没走多远便听到身后传来兴奋的喊叫声。喊声越来越近，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时，有六个人赶上了我们，把我抓住，一定要我回到昌乐的客栈去，把钱现场分给他们。

我跟他们纠缠了很长时间，劝他们回去。村子里的人也立刻聚拢了上来。按照中国人惯常的做法，我向第三方寻求帮助，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村子里的老人们听，并问他们我该怎么办才是。

15.追求与拯救

面前这六个凶狠的家伙，他们的恐惧感胜过他们的正义感。他们

劝我跟那些人一起回去。

事情就这样胶着时，我把他们叫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针对他们贪小便宜的心理，我对他们说："假如我跟你们一起回去，我回到城里消息一传开，就会有几千人聚到那里去要钱，一定会发生踩踏事件。很多人会受伤，会断胳膊断腿，有的人甚至会送命。你们敢担保，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你们自己，不会在受害的人当中吗？我已经跟我的助手说过，叫他在前面几里处的一家客栈等我。他会随身带五千文现钱去。假如你们跟我一起去，我会把这些钱分给你们，这样，你们既可以得到你们的钱，又不会有受伤的危险。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要比跟我一起去城里更好呢？"

这六个人当中的一个叫道："行，那我们就跟你去！"于是，他们叫我上了手推车，一起出发，上坡，下坡，越过潺潺溪流，一路上快速前行。就在抵达客栈之前（客栈里正亮着灯），我叫他们停下，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到客栈里去，把钱拿来给你们。"

于是我把钱取来了，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我们一共就得到这点钱吗？"

我回答道："我的钱全在这里了。我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我吃晚饭还要赊账呢。"这时，我把外套脱了下来，又说道："假如你们觉得钱不够分，就把我的外套拿去当掉吧。"

另外一个人听到这话便对刚才那个人吼道："他把钱全给我们了，你还要跟人家要，不害臊吗？"于是，他们向我道了谢便回去了，我则回到最近的客栈吃晚饭。

我还没有吃完的时候，一个完全不同的场面，一个不可思议的、感恩的场面，出现在我的面前。事情是这样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在离昌乐约五英里的窑口发放过救济。现在，窑口村的村民听说我在昌乐这边遇上了麻烦，他们便过来搭救我。他们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扛着草耙，有的带着更加危险的武器，还有的人则骑着骡子，打着灯笼。发现我安然无恙，他们便让我骑上骡子，一队人马便原路返回。

往前走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些来迎接我们的人，于是，他们也转过头护送我。等我们到达窑口的时候，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庞大队伍正聚在那里，一派欢天喜地。村子里的长者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当铺（那里最主要的建筑）里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欢迎宴会。午夜时分，我们坐了下来，为我的脱险而庆祝。

第二天，我回到了青州府，并拜见了知府。我把昌乐知县的失职行为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并向他解释，马车上的那些钱并不是我本人的，是设在港埠的赈灾委员会募集来的。我必须对这笔钱负责。我问他，是不是肯帮我向昌乐的知县索要这笔款子的收据。至于这笔钱，他得发放给县城里贫穷的老人和妇女们。青州府的知县对我很客气，两天之后，我便拿到了昌乐县知县的收据。

不过，那个倒霉的家伙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结束。他的刚愎乖张使得他与城里的百姓冲突不断。

16.虚伪的官员败在女人手下

昌乐城里的百姓听说那些钱将要发放给他们，便到知县那里去要钱。可是，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他们支开，说他过些时候会发放。于是，他们又去了第二次，但第二次他们又被拒绝了。后来，极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这一幕表明中国的专制政治是怎样在民主面前崩溃的，也表明它在女性权利面前又是多么无力。

一天，一百名妇女拿起厨房里切肉的刀子和砧板来到了衙门，在衙门的院子里坐了下来。跟班的问她们有何公干。她们说有话要跟知县说。知县心里有数，他必须出来，听听她们究竟有什么话要讲。他刚一露面，一个被选出来作为代表的妇女便叫道：“穷人们都快饿死了，可是知县却把本该给我们的钱偷去了，他就该像这样被剁成肉酱！”然后，一百名妇女用刀子在砧板上有节奏地剁着，并一齐有节奏地喊道：“谁要是偷了钱，就被剁成肉酱，像这样，像这样！”那官员现在终于明白，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好答应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

款。这回他真的做到了。

事发之后，我立即写了封信给一个在华的美国人，把近期所看到的、所做的一切林林总总地讲了一遍，至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的是，它被寄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出来了。很多报纸又对它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甚至传过了大西洋到了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14]或者《蓓尔美公报》（Pall Mall Budget）[15]——究竟是哪一家我记不得了，其标题是“传教士的奇遇”。可是，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教工作该如何更好的开展，编辑却予以忽略，没有提及。

17.残酷的冬天

1876年秋天，我们所募得的救灾款更多，但发放情况却不如人意。倪文思博士跟我在传教上是分区的，发现在他负责的区域灾情非常严重后，他也开始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了。在赈灾工作进行的同时，宗教活动每个星期日在很多中心也在正常进行，这样，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藉便协同起来了。

随着冬天的临近，灾情变得越发严重。有报告传来说，有的村子本来有四十个居民，最后只剩下十名幸存者。粮食的价格飞升到平时的三四倍。很多人听说满洲的粮价便宜，他们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满洲去。那些承受不起旅途开销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把房子上的所有木头，不管是门还是窗户，不管是门框还是椽子，统统当做柴火卖掉，希望卖点钱去买小米。等这点资源也耗尽了，他们便把原来用来盖房顶的但已腐烂的高粱秸秆和着草籽、麸糠煮了吃，聊以充饥。

深冬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为了取暖，他们在地下挖了很深的坑，二十、三十，甚至是五十个人在坑里挤在一起。由于空气污浊，加之没有吃的，这种地洞导致了大量人的死亡。一开始，活着的人没有办法给每一个死者都挖一个墓穴，于是他们就挖了两个大坑，一个

用来埋男人，一个用来埋女人，那些死者不过是被扔进去而已。后来，死者是在哪里倒下的也就给留在原来的地方了，有时是在他们的家里，有时是在村子里，有时是在路上，任野狗、饿狼、老鹰吞噬。

得知灾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去探访了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发现有人把自己的田按每英亩一两块钱的价格卖掉。丈夫和妻子为了活命，竟同意彼此分开。我在青州府东南方山区的一个乡下客栈过了一夜，那里出现了一个出卖妇女的市场，买主是从东面海边来的男人。由于思绪纷乱，内心痛苦，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着。那个没有被买走的妇女苦苦哀求有人把她带走，哪怕分文不取，因为这总比卖不出去、活活饿死要好些。

所幸的是，中国的官府还不时地采取一些未必文明的治乱措施。第二年，山东的灾情结束时，山东巡抚发出一项通告，上一年所发生的土地买卖和妇女买卖被宣布一律无效。这样一来，不公平的交易便得到了偿还，这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

18.与官员和文人一起发放救济款

我给烟台方面写了一封信，把可怕的灾情作了描述。我的一些朋友，荷兰公使弗格森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贾米森先生、海关的豪威尔先生、教区医生卡迈克尔博士，他们在读了我的信之后集中到一起，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由豪威尔先生把它翻译成汉语，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这之后不久，从北京到广东，全国各处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一百英镑的赈灾款。本地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他在其家乡省份开辟了一个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文人前来帮助发放救济款。

为了避免本地官府的救济金、江苏来的救济金、外国的救济金重复发放，同时，也避免老百姓对捐赠数目的多少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比较可能会在受助人中造成混乱），我跟管辖十一个县的

青州府的知府以及益都县（灾情最严重）的知县商量了一下，为的是找到了一个方法救济金的最佳办法。最终是这样安排的，把益都划成几个片区，让江苏来的文人发放一些村子，我到别的地方去发放；为了避免受助人的不满情绪，各处发放的数额全都一样。

江苏的捐助者们过来，他们也在城里开了孤儿院。可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极其不顺。流行性天花使他们的孤儿死掉了很多，所以，人们便不再把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并说他们那个地方“风水”不好。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孤儿院里，没有一个孩子染病，于是更多的孩子便送到了我们这里，超出了我们的容纳能力。

山东巡抚把七个受灾最严重的县的情况向皇上作了禀报。饥荒最严重的中心就是在益都县，也就是青州府城所在地。该城的知县是江苏人，他为民众已经尽其所能。除了接受官府的救济款外，他还号召主流的文人起来捐款；这样，在城里，五万灾民每天便可以吃到一顿像样的粥。他还在别的一些中心设立了类似的、提供汤食的厨房。

南京的一个小官员从我的报告中读到山东的情况后，给我寄来了一百两银子（约等于三十英镑），而我与他根本没有交往。

在我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不得不对我与之发生业务关系的山东本地的银行献上我的赞美之辞。我们兑银子的银行其实是青州府规模特别大的一家当铺，它与几个县有着业务关系。每当我们想到镇上或村子里发放救济现款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这家当铺，他们则把现款安全地交付给我们，往往要用十几辆手推车装着送到发放地点。他们每次的交付既迅捷又安全，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因为我们给他们的人民提供帮助，他们对我们很是感激，在银子的兑现上总是很优惠。

19.同事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在浸礼会的新同事来到了烟台。来烟台之前，他在爱尔兰的纽洛斯本来有自己的

产业，但是，他来自内心的召唤使得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从事别的，而应该投身传教事业。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了他的经理，而他本人却来到了中国。

我专程到烟台去见他。他是在一个星期六抵达的，但从星期一他就开始了汉语学习。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正跟他谈起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著名的布道文。他吸收着那段演讲词的精髓就像干涸的土地吸收着雨水。可是，他突然在沙滩上停了下来，并大叫道："停一停！我快站不住了！"一种献身于主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已经将他充满，以至于这种激情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20.就避免饥荒向当地官员提出建议

苦冬过后，春苗发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知县提出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以避免今后的饥荒。我请他们来考察我的孤儿院，并建议他们，如果官府肯辟出土地和房舍，并承担运行经费的一半，我可以负责培养他们，建立起像北京、上海、福州那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可以致力于培养孤儿当中最聪慧的那些孩子，授以西学和英文，对于那些不很聪慧的孩子，则教之以新式技艺，从而避免让那么多的人在老行当当中彼此竞争。当这些孩子都得到了完备的培训，他们便可以在事业上有一席之地，从而为国人提供有力的服务。我敦促这些官员要铭记在心，中国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得到敬重，是基于一个事实：为了苍生的福祉，他们发明了新的技艺：神农发明了农艺，仓颉创造了文字。因此，在当下这种交往国际化的时代，为了万民的福祉，官员们应该采取新的方法。

我的这些"听众"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接受不了我的理念。不过，大概是二十年后，本城知县的一个儿子徐先生，成了京城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可是，到慈禧太后掌权并抵制改革时，他无可奈何，被迫流亡。差不多是到了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学，势在必行，并号召全帝国接受西学。

21.教会工作

1877年2月，我以“按才受托的比喻”[16]做了一次布道，告诉听众们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用行动赢得主的奖赏，我们必须靠我们的作为换来报偿。

所以，我提醒我的听众们，除了正常的崇拜之外，那些加入教会的必须发誓，履行侍奉主的一些特别的方面：

（1）为印刷、传播基督教书刊募集资金。

（2）献出专门的时间传播福音。

（3）看望并治疗病人。

（4）抚慰心灵受伤的人。

（5）冬天给需要帮助的穷人们接济，给他们捐献保暖的衣物。

（6）为埋葬死去的穷人提供帮助。

（7）免费发放药品。

（8）关爱老人、寡妇和孤儿。

当时，《旧约全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已经翻译过来的《律中律》被用作它的替代品。所以，参加教会的那些骨干们便接受培训，使用《律中律》；这样，他们便渐渐熟悉《旧约全书》中的英雄和先知。以前大字不识一个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现在也能把我们的书背诵。星期天的时候，她们虽然都是小脚，但还要步行十英里路来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有一位问道者还带着三十多名村民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名妇女也带着她的邻居们求雨。尽管有人表示怀疑，报以嘲笑，但我还是要欣然记下实情：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天真的下了雨。

1877年7月，我起草了一些教会的纪律条例，主要参考了史密斯

的《古代基督教史》中的内容：

（1）中国的基督教徒应该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资助寡妇和孤儿，受挫折的人和生病的人。

（2）不管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还是在非基督教群体中，宽容隐忍都是基督之爱的显示。

（3）侍奉上帝既需要用智力，也需要用金钱。

（4）基督徒既要致力于使他人得到救赎，也致力于使自己得到救赎。

（5）教会中的任何人，在先向本地牧师询问之前，都不得直接诉诸法律。

当前来求教于基督宗教的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我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个小组。男人和女人分别选举出他们的带头人。那些被选出的人必须是口碑好、维持安宁的人，必须乐于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同胞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并引领他们心向上帝。对于表现好的，发给基督教小册子和赞美诗作为奖品。我们还在他们当中教授音乐。我们要求习教者必须对花费时间教他们的人友善、慷慨。

涉及到众多的宗教难题时，我不得不对付的就是风水迷信。在中国，在向风水先生请教之前，没有人敢砌房子、筑篱笆、挖井。我忽然想到，要破除这样的迷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他们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我认为，对科学的崇敬和对宗教的崇敬是同等重要的，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上帝律法。于是，我拟定一个计划，打算为中国人编写一批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22.给浸礼会协会的一封信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给浸礼会协会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们关注山东所经受的巨大痛苦，并指出，上帝正给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

机会，可以趁这次机会向中国人显示基督教的真谛；这对整个民族包括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帮助中国：

（1）立即启动赈灾工作。

（2）教给中国人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包括传授医学、化学、矿物学、历史学。

（3）引进新式工业。

（4）传授精神上的真理，以及讲授崇拜真正上帝的过程。

我以琼斯先生和我本人的名义，请求协会捐助一千英镑，用于赈灾，使中国人按照正确的原则摆脱灾荒，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并获得永久的繁荣。

我大胆地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把用在现在这项工作上的支出跟用在过去的其他方面上的支出进行比较，并跟别的协会的支出进行比较——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协会——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投入是最有效益的，可以用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此，我欣然为该协会的慷慨精神记下一笔：他们很快就给我们批准了五百英镑。

第五章　山西赈灾

1.决定赴山西赈灾

1877年秋天，山西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到了海边。山西饥荒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山东所亲身经历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慕威廉博士（Dr.Muirhead）受山西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写信来，说他们对山东的赈灾方式很满意，并问我是否愿意远赴山西，到那里开展赈灾工作。

这时，阿尔弗莱德·琼斯已经从烟台搬到青州府。他大约是一年前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的，这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目前他正帮助我管理账目，在这方面他可是个专家。收到上海方面的来信后，琼斯先生和我在祷告中感悟到此行的含义后，深信这是来自上帝的直接引导，要我们去内地开辟天地。中国人或许不能从文字上接受基督教的真切性，但是，帮助他们摆脱苦难则可以显示宗教无可争辩的善良动机。

琼斯先生非常乐意在我们的牧师程先生的帮助下料理我们在青州府的年轻的教堂。该教堂已经拥有七百个会员，外加一两名问道者。这位程牧师是全中国最好的牧师之一，他作为我的同事，他一个人抵得上两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当初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担任过秘书。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从未衰退过，在他一生中，经他洗礼的皈依者有两千多人。把我们的教堂交给这两位照管，加之我有七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实践，以及我近期在山东开展赈灾工作的实际经验，我感到我可以放心去山西，并开展那里的基督教工作。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又交谈了一番，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占据了我，因为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对数以千万的人施加影响。我感到浑身剧烈震颤，我几乎不能走过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要去山西的消息传开后，属于本地教堂的许多男人和妇女纷纷要求跟我同去。可是，我觉得最好把他们留在山东帮助传播福音。我上路时只有一个基督徒农民和基督徒仆人陪伴。走了还不到二十里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我的马车后面有一个铺盖卷。我问那是谁的。我的仆人笑了笑，一开始，他还不肯告诉我。后来我终于发现，它是我们本地一个传道人员的。他执意要跟我一起去。最终他很不情愿地听从了我的劝说，回到青州府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太原府之旅

我们行到山区时，道路十分难走，因为路面上尽是乱石，我只好骑骡子。当时正是十一月份。天气严寒，在过一个山口的时候，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山区的客栈都开在从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夏天的时候，这些窑洞里非常凉爽，因为阳光不能穿透土层；但冬天的时候，这些窑洞做的客栈却很暖和，而当炕的下面生了火的时候，在严寒里骑行了一天之后，住进这样的客栈是再舒适不过了。

太原府是山西的省会所在地，它位于一片高原的北端，这高原从北到南约有一百英里，东西宽约三十英里，海拔约在三千英尺。我刚刚离开的青州府，其海拔不过两百英尺的样子。所以，山西的冬天更寒冷。所幸的是，这个省份煤炭丰富，烟煤和无烟煤都有。

我抵达太原府时身边只带了一小笔资金，大约两千两银子。来之前我从当时是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里弄到了一个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旅行时会遇到阻挠。旅途上，我们不时看到可怕的场景，路边的死尸被野狗和饿狼撕咬着。这些恐怖的景象，加之可怕的寒冷，令我的两个同伴丧胆，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这些。见他们有回乡之意，我便同意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他们回去后，家乡的人对他们离我而去非常生气，“你们想想看，你们都是中国人，都习惯了本国的天气，却把一个不适应气候的外国人丢下，让他一个去面对寒冷、死亡、困顿。你们真可耻！好丢人啊！”他们这样叫着。这两个人受到这样的羞辱，决心回到山西到我身边来；他们离开我好些星期之后，在太原

府与我会合了。

那些时候，在这个省份并没有新教的传教士，不过，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以及十来个牧师分散在山西各地，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耶稣会传教工作的继续；大约在两百年前，耶稣会曾独揽北京的传教事业。

3.会见山西总督

山西总督曾国荃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弟弟，是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曾侯爵的叔叔。我一到太原就去拜访他，希望把我来山西的意图讲清楚。他的一名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总督对我的出现非常不快。在中国，造反常常出现在发生饥荒的时候，这时老百姓往往对官府不满，于是，总督便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从官府那里争夺民心。我终于见到总督本人，尽管我说明情况，准备把两千两银子发放给饥民，并出示了我的通行证，他还是不开心，处处限制我的行动，想方设法置我于困境。



曾国藩的弟弟、山西巡抚曾国荃像

他的哥哥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闻名遐迩的中国政治家——早就在政府面前表明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看法；他认为这两派如此势不两立，以至于他们的影响力在彼此的对立中被抵消掉了；这样一来，这倒省得中国政府采取任何干涉行为去对付它们任何一方。当我向山西总督求教我该怎么处理这笔即将到来的赈灾款时，

他眯缝着眼睛答道："本城有个天主教传教士，前几天他提出要一批粮食，给他开设的孤儿院。你最好把你的其中二百两银子交给他。"

我对他的建议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我会去拜访那位主教，跟他讨论这件事。我真的去了，把我拜访总督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补充说，我很乐意把这笔钱交给他，用在对孤儿院的维持上，但有一个前提，他应该让我的一个助手跟他一起发放这笔救灾款，因为这钱不是我的，而是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一些慷慨的朋友募集来的。

然而，这位主教一时间还不肯接受我的建议。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事儿禀报给总督，他说他乐得我这么做。于是，我把与总督的会晤写成了报告，并送了一份给这个主教，问他是否认为这是一份会晤的真实记录。他把报告还给了我，说报告真实无误。后来，我又把该报告给总督送去，同时就给灾民发放救济的事向他请教新的方案。由于他一拖再拖，不肯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便利用这段时间去考察该省南部的灾情，亲自去看看灾情究竟有多严重。

4.给天主教神职人员发放问卷调查

在出发之前，我设计了十几个问题，送给了那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问他是否乐意把这些所提出来的问题发送到省内他的同行们那里，然后请他们连同答案尽快发回。这些问题主要是：往年粮食的正常价格是多少，饥荒期间的粮价又是多少，已经死于饥饿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怎样，已经移民到别处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还有多少牲畜没有被吃掉，还剩下多少妇女。

主教爽快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把问卷发往分布在全省各地的他手下的神父们。到我从南部回来时，他们所提供的详细信息已经在等着我。我给他们的报告加上一个总结后，附在我旅途上详细记录所见所闻的日记的后面，一并寄给了我在上海的朋友们。

我是和一个仆人一起上路的，因为很多人因为饥饿都成了食人者，单独出行不安全。

5.1878年考察山西灾区日记选

1878年1月28日

穿过山西省的中部向南跋涉，才发现灾情之严重。我骑着骡子，跟着我的仆人也骑骡子。

离开城里之前，我们没法直接走到南城门，因为躺着个快要饿死的人，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路上碰到四具死尸，还有一个用四肢在地上爬的人，他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到一场丧葬，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母亲，抱着一个约十岁的死去的男孩。她既是送葬者，也是牧师，也是哀悼者；她把他丢进了城墙外面的雪中。

1月30日，太原以南270里

从两个显然是刚死去的人旁边经过。其中一个穿着整齐的衣服，但显然是饿死的。几里路之后，看到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在我们前面走着，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似的。一阵风吹来，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在路边看到十四具死尸。其中一个死者只穿了一只袜子，他的尸体正被一只狗拖拽着，可见他的身体有多轻。死者当中有两个是妇女。人们似乎为她们举行过葬礼，所谓葬礼不过是把她们的脸翻转过来朝着地面而已。路人对其中一具女尸还算善待，因为他们没有把她的衣服扒走。第三具尸体却成了一群尖叫着的乌鸦、喜鹊的盛宴。野鸡、野兔、狐狸和狼都长的肥肥的，男人和妇女们却无法生存。一个老人和我一起翻过一座山时，伤心欲绝地对我说：“我们的骡子、驴子全被宰杀吃光了。我们的劳动力也饿死了。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上帝要这样惩罚我们呀？”

虽然苦难无处不在，令人称奇的是，没有出现打劫富人的现象。不过，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村子里张贴着告示，内容是，官府有令，凡企图抢劫、实施暴力，镇上或村子里的官长有权将抢劫者立即处死。所以，犯罪的情况异常的少。人们默默地忍受着，连眼泪也没有，除了那些埋葬自己孩子的母亲们。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当中看到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妇女的尸体：一具是在没有顶的棚子里，裸露着，只有腰间一根带子；一具是在河沟里；一具是在水中，身体的一半露在冰面上，任凭野狗撕咬；一具躺在路边的一处洞口，上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另一半已经被猛禽野兽撕咬殆尽。遇到两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们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着，看上去像九十岁的老人。遇上一个背着母亲的年轻人，她母亲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见我盯着他们看，那年轻人求我帮帮他。离开太原府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求助。

看到有人把松软的石头——有点像做铅笔的那种石头——磨成粉末，每斤（相当于1.125镑）卖两到三文钱；人们用这种粉末与谷子，或草籽，或草根混合，做成饼吃。我尝过这种饼，那味道跟它的主要成分的味道——泥土——是一样的。很多人因为吃了这种饼而死于便秘。

都是矿工的三弟兄一个接一个地饿死了，第一个是在二十一天前去世的。至于安葬，不过是用两口缸来装盛尸体，一口罩住上半身，一口兜住下半身。七天之后，第二个兄弟死了，家里再没什么缸了，尸体便停在地上。第三个兄弟则极度虚弱，我给他钱帮助他埋葬死者，可他已经不能从炕上下来了。不久，很多人听说我给钱救济便跑到我跟前来，说他们每家都有尚未下葬的死者。

往前走，我又看到一个妇女试图自己站起来。她只有力气站起一条腿，但已经没有力气将整个身体站起来了。再往前走，我看到一只

笼子里装着两个人头，那是对那些妄想动武的人的一种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下一座城市的景象是我所见到的最恐怖的。我来到城门口的时候正是大清早。城门的一边堆着一堆一丝不挂的男尸，这一具叠加在另一具的上面，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似的。城门的另一侧则是情形相似的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光了，被拿到当铺去换钱买食物了。大车正停在那里，准备把这些尸体运到两个巨大的坑里去，一个大坑用来扔男尸，一坑用来丢女尸。

在洪洞城北门的外面，并排躺着三具尸体，一个男孩，另外两具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夜里下过雪，雪地上可以看出两个男人搏斗过的痕迹，血污渗在雪中——这景象说明，一个人出行是不安全的，尽管在前面的两棵树上分别挂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一颗人头，以警告妄图作恶的人。在这个地区，连续很多里地的树其树干都是白的，树干上十到二十英尺高的树皮全被剥得干干净净，用作食物。我们经过了许多没有门窗的房舍，那些门窗被当做柴火卖掉了。房子里面，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还都一应俱全，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卖不出钱。房子的主人早已离开或饿死。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但当中没有妇女。答案是，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见到装满妇女的马车，妇女们被卖掉了。还见到一些步行的人，但都携带着自卫的武器，哪怕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有的带着长矛，有的带着亮锃锃、明晃晃的剑，还有的带着生了锈的刀，可见他们的境况是多么可怕。走在他们中间，我们并不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留。遇到从蒲州府发来、到北方去买粮食的四十辆马车。在城里，街道的一边竖着稻草人。街道的另一边写着两个大大的汉字“穷人”，它们默默地向所有路过的人求告。在客栈里听人说，那

天夜里有父母交换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又听说人们不敢去煤坑挖煤，因为骡子、驴子，还有它们的主人，会被人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程，目睹了如此恐怖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府，因为对于这场灾荒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铁石心肠的人感动。

就连狼也变得肆无忌惮。有一天，看到路边的一匹狼，我便对它吼叫，以为它会害怕、逃走。没想到，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死死地盯着我，对我如此大胆地看着它好像觉得很奇怪。

原路返回时，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恐怖景象，到后来，以至于我不时地问自己，这些景象是不是一个精神错乱之人的幻觉。

我所遇到的从最南面的蒲州府逃出来的很多难民所讲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当问及死亡与逃难者的比例时，根据他们所讲，每个地方死亡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很多地方只有两成或三成的人能幸存。从另外一些目击者那里我还听说，他们三天当中就看到二百七十具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城镇都有马车进进出出，每天都装着三十到四十具尸体送到坑里去埋。

可以想象，身处如此恐怖的景象之中，我倒有点怀疑自己的感觉与理智了：我是在活人当中，还是在受煎熬的死人之间？灾情实在太严重，我们不敢发放任何救济，除非偷偷地发一点；因为，一旦我们发放救济的消息传开，我们必定会被人群围住，我们的行程就会被耽搁，我们的性命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丧命，结果对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如果我们平安返回，并最终为他们呼吁，很多人的生命便可以得到拯救。

十四天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太原府。谢天谢地，那些日复一日我们所见到的惨状，现在可以暂时看不到了。

6.交通困难

天津到山西南部的蒲州府的距离是八百里。由官府承担的粮食的运输就是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说，更近的地方已经没有粮食，饥荒的核心区域，其半径至少有八十里。个人已经无法用骡子来运输粮食，因为牲口已经全部被吃光。山区的路异常糟糕，一支由六七头骡子组成的运输队，一次仅运半吨粮食也很困难。

还有，山间隘口的路非常之窄，马车和骆驼相会时，总要耽搁很长时间。为了避免这种拥堵，人们便作了这样的安排，骆驼（总共有一百多头）一律在夜间通行，白天只让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海边运粮所遇到的这种困难，我便带上了一只袖珍气压计，沿途测量地势的起伏情况，等到了太原府的时候，我便绘制了一幅记录地势起伏的地图。

那一年的冬天也是几年当中少有的寒冬。黄河上的冰冻得很厚，马车都能从冰上走，这是三十年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1876到1879年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这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份中的一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这场饥荒结束时，可以肯定的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这相当于整个欧洲总人口。这数百万人的生命本来是可以得救的，假如中国的官员们不那么傲慢，说什么只有他们才是文明的，并认为从西方的野蛮人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一个官员事实上就发布过一个告示，禁止民众迁往粮食便宜很多的满洲，而在灾区土地的售价只剩下平时的十分之一。另一个事实是，周边一些省份的官员禁止向山西输送粮食，这使得灾情更加严重。

回到太原府后，我把我所写的日记，连同天主教会牧师们给我的回复，派专人经天津送到了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斯和特纳

与此同时，上帝激励更多的助手到中国来，以解燃眉之急。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和詹姆斯先生于1877年年初到了山西；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们给受灾的民众传播福音并分发经文与宣传的小册子。可是，他们两个都染上了斑疹伤寒，而詹姆斯先生的身体更是衰弱得不行，只得离开；于是，特纳先生也只好护送病人到海边去。他们是在十一月份离开太原的，就在我抵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对可怕灾情的报告，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此外，人在汉口的伦敦会牧师阿诺德·福斯特（the Rev.Arnold Foster）则前往天津，调查山西的灾情状况。穿过直隶后，他又在山西境内旅行了一两天，亲眼目睹到的景象，使得他做出决定：尽快回到英国，筹集赈灾款。他也是在我进入山西前两天离开那里的。他抵达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正好在伦敦，于是，福斯特先生便把这件事在他面前做了陈述，并提出请求，呼吁在英国成立一个赈灾基金会。可是，公众希望了解有关灾情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就在这时，正是需要了解山西恐怖灾情的时候，我的日记以及罗马天主教牧师们的报告经由上海送到了伦敦。

8.在赈灾中与中国官员的合作

我把情况反映出去之后，随着救灾款陆续进来，我现在便可以在需要救济的地方发放救济金了。然而，那个巡抚还是再三敷衍，不给我答复。一方面我的手上有那么多的钱，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的人不断饿死，我觉得这不合情理；在等待了很久但从他那里又得不到一个确切的方案之后，我派人给他捎信，告诉他，我打算在五天之内在最需要救助的村子发放救济金。我单方面做出的行动逼得他作出了反应。他立马派地方官以及他的助手们来和我商谈。原来，所有的村子他们都登记在册，并按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他们建议，把一些村子划出来，由我去发放救济金，并派官员和士绅们协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我回复他们说，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就这样，赈灾工作在得到中国官员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开始了，并顺利进行到最后。

官府在城里和中心集镇设立了施粥点。在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都有两万多人去那里，获得一碗小米粥。在偏远的村庄里，登记在册需要救济的人，则被集中起来，他们每人每月可以获得一百个铜子或每天三个铜子的救济。当时二十个铜子相当于一个英国便士。

9.给总督的建议

所幸的是，曾经当过军队指挥官的曾国荃此时正是山西的巡抚，因为这时的局面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正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他发布了很严格的命令，要是有人胆敢行凶或抢劫，各城镇的地方官和村子里的头领们就可以处决他们，无需向他禀报。发现有一个官员挪用了赈灾款后，他立刻下令把他处决了，这一果断的行动令其他官员胆寒。与此同时，他也因此拯救了那些官员，使他们免于腐败，各村的秩序也因此得以维持。

回到太原府不久之后，我向巡抚提出了三点建议：

1.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便宜的地方大规模移民。

2.开始修建公共设施，比如铁路，这除了可以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对于将来避免饥荒也有着永久的价值。

3.向未受饥荒侵扰的省份征收饥荒税。

几个候补道台应巡抚之命讨论了我的计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鉴于铁路会有利于人员流动，所以，自然会导致外国人数量的增多，相应地，必然会导致麻烦不断。因此，从最有利于全省的方面考量，最好不要建铁路。

10.给浸礼会的建议

大概是1878年1月26日，我给我的秘书A.H.贝尼斯（Baynes）写

信时指出，当第一批中国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只是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好玩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被带到教堂去，或是让他们听听布道。于是，我请求他想想办法，让英国最好的基督教绅士对新任的中国公使郭（嵩焘）先生给予特别关注；他是被派往英国担任公使的中国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我提议要让他看到我们西方文明最好的方面，这样他便能理解基督教传教士给人类文明从最早时期到目前所带来的妙处。这种由国内的朋友所承担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精神性，它会被中国的公使报告给北京的中央政府，并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大有益处。我向贝尼斯先生表示，如果我的看法他认为是正确的，那就请他把我的建议也向别的传教差会提出来。

我不仅竭力说服我们国家的绅士们对中国驻伦敦的中国公使发挥影响，我还为中国主流的士绅们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总是把帝国发生的公共灾害归咎到皇帝的身上，可是，如今所有的官员们总是认为，灾害之不可避免，乃是因为天意，他们这样做不过是要表明，他们在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然而，饥荒本可以避免的，只要这些官员们振奋起来，尽心尽责，并向别的国家学习避免饥荒的方法。儒家的傲慢自大，佛家的碌碌无为，道家和风水先生们的信神弄鬼，事实上都是罪过，正是这些罪过使这个国家生灵涂炭。关于如何赈灾，人们讨论过许多方案，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东西方联合起来。因此，我曾呼吁，为了中国的福祉，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们应该走到一起并通力合作。

11.给新教差会写建议信

1878年2月7日，我在写给在中国的新教各差会的一封信中指出，由于缺乏恰当的组织与合作，我们在传教方面的努力效果欠佳。各差会在工作上互不相干，所办的学校、医院彼此之间互相冲突。一方面，在同一个街区，使用着相同的传教方法，另一方面，宣传手册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传教士们像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只只船，没有船长，没有大副。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响应。整个传教团还不具备合作的意识。直到三十年后，在1907年召开的基督教来华百年宣教大会（the Centenary Conference）[17]上，我的提议才被得到重视。

12.希尔、特纳和怀廷的到来，以及怀廷的去世

1878年3月，天津开辟新河后乘坐第一艘轮船来参加赈灾工作的三位传教士到达山西，他们是卫斯理会的大卫·希尔（David Hill），美国长老会的艾尔伯特·怀廷（Albert Whiting）和中国内地会的约书亚·特纳（Joshua Turner）。他们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带着一大笔银两，大约有三万两。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已经夺取在天津的一些优秀传教士的生命，考虑到这一现状，他们的一些朋友很是为他们担心。然而，这三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赈灾款在他们手上，他们不可能不亲自前来，并把它发放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兄弟们的手上，哪怕冒着生命危险。抵达太原后，怀廷先生就染上了伤寒，于4月25日去世。

13.发放伦敦市长官邸赈灾款（1878）

到这时，我在山西的旅行日记已经传到伦敦。这使得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呼吁显得更加有力，于是，威妥玛公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合市长阁下，在市长官邸[18]开辟一个赈灾基金会。基金募集起来后，本是通过电汇，汇到上海。可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电报业务，于是这些银子便用船运送，五十两为一银锭，每箱装一千或两千两。这些装满银子的箱子到中国后，再由李鸿章负责转运给我，他派了一些军官和一些卫兵保卫这批银子的安全。其中一名军官对外国人的认识真是可笑得很，他在交割这些银子给我的时候，口口声声地尊称我“鬼子大人”（Kwei-tze Ta Ren）即“魔鬼阁下”（His Excellency the Devil）。我并没有纠正他，怕他在我面前觉得难堪。

当更多的赈灾款到来后，我们发现平阳府的灾情比太原府这一带更为严重，于是我们便和巡抚所委派的官员一起到那一带去，在那里发放救灾款到数个月之久。

在平阳府以及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处，我们在一百四十五个村子发放了救济金，那些村子的人口少则有六十三人，最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是三点一人。

官府的一个赈灾助手告诉我，洪洞县本来有人口二十五万，但其中十五万人已经死亡。灾情不仅表现在人口的减少上，也表现在牲畜包括骡子、驴子的消失上。比如，在一个有三百二十人的村子，他们有大片的土地可以耕种，但是那里只剩下了三头牲口，其余的都被吃光了。

官民纷纷向所谓灵验的各位神祷告，但结果都是徒劳。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中有一块铁碑，具有神奇的魔力。于是，巡抚曾国荃便派人到直隶去把这块碑借来，用于求雨。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人和新教的人也都在他们各自的教堂里继续祷告，求天降雨；终于，全省普降喜雨，民众喜不自禁；各方面跟以前一样，都相信自己所诉求的神灵是灵验的。

14.内地会女士们的到来

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受到敌视，相反，我们得到了官员们友好的接待，受到了穷苦灾民们的欢迎；于是我们感到，开辟道路、提供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多。于是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把情况给他们做了描述，并邀请他们派来更多的人手。听说戴德生夫人要从英国启程来山西开始孤儿救助工作，我们欣喜万分。1878年10月，她由宝乐先生（Baller）从天津护送来太原府，她还带来了洪恩（Horne）小姐和科利克尼（Crickney）小姐。她们是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外国妇女。我秋天在外赈灾期间，这些人就住在我的房子里。在她们之后不久，詹姆斯夫妇也跟着到来，他们也是内地会的成员。

15.与马丁小姐结婚

我曾经这样断言，如果我结了婚，在这个新开辟的省份，我可以在传教方面做出更有效的工作。在烟台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士——联合长老会的马丁小姐，她是1878年出来参与赈灾工作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她就被邀请在各个方面担任主要工作。除了在爱丁堡的商业学院接受过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她还在皮迪博士（Dr.Peddie）那里接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所以，在与蒙古的吉尔玛（Gilmour）那样的神学家讨论时，她能做到游刃有余。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分，在宗教活动中的音乐环节，她总是担任主要的工作。我们于1878年10月在烟台结婚，并于当年11月回到太原府。戴德生夫人，还有那两位单身的小姐，以及宝乐先生，在租到房子之前，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我太太开办一家接受男童的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则救助女童。



李提摩太和妻子的清装像

16.冬天里的赈灾工作

可是，随着冬天的到来，很多人的生活又在苦难中挣扎，于是，

我听从神圣的召唤，在结婚一个月后，离开了我的妻子，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在平阳府开展赈灾工作，为时四个月。在平阳府，教士（现在已经是主教）司各特（Canon Scott）和英国圣公会差会的卡佩尔（Capel），也在那里发放救济金；在烟台时，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起初，我们是为各自的基金会工作，但后来他们便与我们合作，一起为伦敦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发放救济金。

各商埠和英国国内募集到的赈灾款总数大约是白银二十万两，约合六万英镑。其中十二万两是由希尔、特纳和我本人发放；其余的则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天津的一个姓盛的道台（现在人们叫他盛空炮）发放，海关职员布德（Budd）先生协助，另一部分则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以及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帮手从外地购买粮食并发放下去。在那个小地方，也没有足够的钱庄来把我们的银子兑成现金。于是，我们决定给每户一定量的银子，或两盎司，或三盎司，随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把它兑成现钱，再去购买粮食，与草籽、麸皮和在一起充饥。整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首先把所有的村民登记在册，然后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发放中心去。在发放之前几天，我们让一些铁匠在一个院子里化银子，我们则仔细地监督他们工作。每锭五十两的银子（约六十六盎司）被放到火中熔化，等烧得火红时，则被锻打成薄薄的银板，接着，再截成一英寸见方、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银块。

中国的货币问题似乎可以摧毁人们对数学的基本认识。在一个地方八十二文被当做一百文用。在另一个地方，五十文被看做一百文；再换一个地方，十六文却又相当于一百文。在北京，十文相当于一百文。至于用银子兑换现金也是让人匪夷所思。有时，一两银子可以兑到一千五百文现钱，有时却只能兑到一千文。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银子的重量在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在平阳府一斤银子有十六两，而在外面的村子里，一斤则有二十两。

当我问起这些莫名其妙的换算是怎么得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八十二文等于一百文的缘由。一个聪明的官员突发奇想，认为他找到

了一个铸币上的一个窍门，通过这个办法，帝国的财富可以大大增加。他下令，每一百文当中，有十八文用铁来铸造。然而，时间一久，这十八文钱就会锈迹斑斑，不能再使用，于是，人们便说，“给我们八十二文吧，我们就当它们是一百文。”这样一来，人们渐渐地便把八十二文铜钱等同于一百文了。

教士司各特跟我一起在汾西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与我分别了，因为他要回国，并被提升为主教，而我则留下来继续做完赈灾工作。由于劳累过度，加之暴晒在阳光下，我终于病倒了，染上了痢疾，不得不用担架抬着送到了平阳府。康复之后，我回到了太原府，开始了更规律、更稳定安逸的传教工作，这方面，我妻子总是承担主要的工作。

17.中国人对外国人救灾的感激

山东赈灾工作结束后，那里的人民送给曾在那里开展过赈灾工作的倪维思博士（Dr.Nevius）一件礼物：一顶上面写着一万个感激者的名字的“万人伞”。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出行时，前面通常都要撑这种伞；在中国以及东方的其他地方，它也是显示尊贵的一种方式。有人告诉我，我曾经赈灾过的那些地方的人民也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不过，我让人捎话给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这么做，因为这需要动用到一些救灾款。

但山西人还是用各种不同以及相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为了纪念我们在赈灾中所作的贡献，人们立了一块石碑，但是，从碑文结尾处的文字可以看出，平阳府的文人们，显然是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府对外国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吾皇万岁，恩庇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与此同时，一些心怀感激的民众的代表则找到希尔、特纳和我本人，索要我们的照片，这样他们好把它们安放在他们的庙里供奉，永志感念。

1878年我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送来一封充满溢美之词

的信，信中他不仅代表他个人对我表示感谢，同时，他还代表山西的子民对我表示感激，因为是我将他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不过，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我担心自己在日后会禁不住诱惑、不恰当地对它加以利用。另外，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的前山东巡抚（赈灾期间的两位特派专员之一）向朝廷上报了奏章，请求为那些参与救灾的人员给予奖赏，授以匾额和顶戴，然而，提供了最多救灾款、两年中冒着生命危险和染上斑疹伤寒风险的外国人，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18.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

考虑到赈灾之后的传教工作，我请人从上海方面弄到一套完整的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基地就各有一套了。我又从北京方面获得一套希腊教会完整的中文书籍。两个多世纪之前，那些较早来中国的耶稣会士们曾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书籍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上层人士中赢得了皈依者，并在民众当中赢得了很多信众。查看这些书籍，我发现，如果把书中的天主教的痕迹去除掉，它们便是再好不过的基督教的教义，它们便可以在传教中发挥极其有利的作用。

此前，我曾订购了比特侯爵（the Marquisof Bute）翻译成英文的《每日祈祷书》和《圣徒的生活》，以及罗马天主教的一些正统书籍，这样，天主教和新教两者之间的争议之处、冲突的观点我便都能了解。那个时候，可供散发的新教书籍真是少之又少。主要书籍有花之安博士（Dr.Faber）[19]的《西方文明》和《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Dr.Williamson）的《自然神学》，林乐之（Allen）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Dr.Martin）的《基督教证》和《寓言》，以及一位中国皈依者所写的《良知之镜》的小册子。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推荐了。

19.新教的传教工作缺乏组织性

我的朋友们和我经常谈到新教传教缺乏组织性的问题，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计划时，我们认为，应该优先学习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他们把方济各会（Franciscans）、耶稣会（Jesuits）、拉撒路会（Lazarists）的传教士安排在中国各个不同地方进行传教，给各个差会划定一定的传教范围。所以，新教的不同教派也应该占据帝国不同的区域，而不是零零碎碎地挤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计划是，让现有的新教派别放弃他们的教派名称，进而在不同的省份组成一个联合的中国教会（aunited Chinese Church）。可是，要对新教各教派就传教范围进行重新分配，经费问题却成了一个拦路虎；而且，当时教派之间还缺乏宽容，要把它们都联合起来，也就没有可能性了。直到三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联合起来建立大学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正在进中国餐时，希尔告诉我们说，在中国传教几年却没有取得他所期待的成绩，于是他重新研读《新约全书》，并发现，他不再像上帝所做的那样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而是开始宣讲另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开始更注重经文义理，更少拘泥神学问题。他在《新约全书》中发现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可以让中国人包括欧洲人都感到快乐：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国，在这个国中，住着正义、人间的和平、人和人之间的善良。我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来摧毁，而是要充实；不是要人悲伤，而是让人快乐。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从饭桌边站了起来，走进我的卧室，拿来那本记着我的传教经验的笔记本。我把结论部分读了出来，其精神与希尔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

20.传教小册子疏远了非基督徒

当时流传着的传教手册有两种，一种攻击偶像崇拜，另一种则攻击祖先崇拜。

这些小册子往往对中国的很多习俗横加指责，说它们是有罪的，而不承认这些崇拜其实是值得称赞的。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宣传小册子传到哪里，反教的骚乱就爆发到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这些作者无知，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研究中国的观念，对中国人没有罪的地方指责其有罪。这样，一大批中国人便疏远并敌视基督教，相应地，那些作者们希望倡导的一切却被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抵消掉了。

我到中国的第一年，一个传教士朋友得意洋洋地跑到那里，手里拿着当地他的一个基督徒家里的祖先牌。他告诉我，那个人已经成为基督徒，所以他打算把那块祖先牌烧掉。我说："当他把他的祖先牌烧掉，我想，你是不是同时也会把你父母的照片烧掉呢？"他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块祖先牌再也没有被烧掉。

21.消失的基督徒

在山西的时候我得知，大约是在一千多年前，有过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带领一支中国的军队，在西北成功击溃了匈奴人和突厥人。他是个基督徒，他的老家便是在平阳府。当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多基督徒。在那之后，山西的南部出现了许多宗教教派，影响一直达到陕西省的西安，往西南、往东一直影响到河南省原来的省会、一度是中华帝国国都的洛阳。

据称，当时洛阳有外国传教士不下三千人（这还不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来自印度、波斯、喀布尔和叙利亚。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便派了一个由最博学的、最虔诚的学者组成的师团分乘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他们当中为首的两位空海大师（Kobo Daishi）和最澄大师（Dengyo Daishi）把一种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带回了日本；在日本，它以"高等佛教"（大乘教）的名称大概一直流传到今天。

22.吕洞宾

大约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公元755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吕洞宾的人。他本来是个儒生，又在道教掌门的故乡江西做过地方长官。由于对道教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受到景教和其他宗教精神真理的教诲，他抛弃了道教的方术，而转向宗教伦理和精神层面的研究，并写出一本评论道教的著作；该著作至今仍然是一部权威性的作品。这样，外国的宗教被引进到了中国的古都，其结果是，该教派在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迅速传播，其教义甚至在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信仰者程度不同地追随。

关于吕洞宾，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一位西方宗教的教师，他的脸是白种人的脸，而非黄种人的脸。他有一大批信徒，他们生病的时候会到庙里去，对一个白脸的神明敬香，并祈求医治疾病的药方。他们的做法是：在那神明前的屋梁上悬挂一支铅笔；一阵祷告过后，那支笔就在用于占卜的沙子或谷子上移动，然后看移动的轨迹而获得治病的药方。

去这样的神庙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它似乎在华北的省份尤为多见。另一种求得药方的方法是：在跪拜、焚香之后，从一个装有一束签的筒子里抽一根签。签上会有一个数字。庙堂的四周悬挂了很多长八英寸、宽二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纸条的上端是数字，下端则印着药方。签上的数字和黄纸上的数字相吻合后，来求拜的人就把那种纸条拿回家。

当这些宗教的教派纷纷出现时，残酷的迫害便接踵而至。政府有时会偏爱佛教而迫害其他形式的所有宗教，有时则偏爱道教或儒教。据说，基督徒在中国曾被剥夺公权，其追随者们则被贬为剃头匠，被勒令穿不同的服装。直到今天，无论是戏子还是剃头匠都不得参加官府的科举考试。很多理发师都把吕洞宾认作他们的宗教的始祖，而满清王朝不久前则禁止制作白面孔的神像。

1879年赈灾任务完成之后，我们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给中

国人提供“生命的粮”（Breadof Life）。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提供基督教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且必须对以下各派均有吸引力，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生，国中布满了其最美的庙宇的佛教徒，从吕洞宾的迷信、符咒、法术等装神弄鬼的说教中开始清醒的道教徒，穆斯林，以及仅在山西就有两万多追随者的所有的神秘宗派的信徒们。大卫·希尔自己会写中国字（这在传教士中是一种罕见的技艺），正是由他开始撰写相关书籍和宣传手册。我感觉到有必要在汉字方面多下些工夫，并开始用中文写日记。希尔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尝试着用汉语跟他通信。不过，我在撰写小册子的时候，我还是用口授的方式，然后由我的中文老师用有文采的文字写成。

1879年初夏的时候，希尔先生搬到了太原府，我们便在一起工作，我们的所思所想经常不谋而合。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在街上相遇，他正要到我的住处去，我正要到他的住处去，打算讨论各自同时想到的工作上的新想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最亲密的、最愉快的、最美好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23.在108个县发放福音书和传单

我们决定在各县发放福音书、小册子和精心准备的宣传传单，但是，我们要小心避免在其他省份出现过的、引发骚乱的危险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人手毕竟有限。绘着全省各县的一幅大地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尽可能多的县征集承担发放工作的志愿者。在大多数县都征集到了志愿者之后，我自己则到其余的县去发放。这项工作在一年内宣告完成。

24.乡试年的有奖征文

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年。大约有七千名秀才（相当于学士）投考举人（相当于硕士）。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他们当中

发放。一个是由1877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小册子是由一位上海本地的基督徒自己写的，书名叫《良知之镜》。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对拔尖之作给予奖金。

奖金由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20]提供，旨在激励中国的文人研究宗教与文明方面的书籍。最终，应征的文章有一百多篇。

25.郗牧师

最成功的获奖者是一位姓郗的先生，他原先是平阳府所谓金坛教（追求不朽的派别，跟景教很相似）的首领。正是在平阳府，他第一次受到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他与希尔的友谊不断加深，郗先生被基督教信仰所吸引。他最终由特纳先生洗礼，并成为当地教堂的一位牧师。该教堂属于内地会，而内地会早就希望在救济款发放得最多的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

26.与李鸿章会面

1880年，俄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争端，双方互为敌视。巡抚曾国藩被派往海边，训练军队，以迎战俄国人，可是，他的部队在中途就开始弃营逃跑。我深信，中国人试图跟外国人打仗是愚蠢的，于是，我写了一本小册子，讨论和平问题，书名叫《和议论》。1880年8月，我启程赴北京，就此事向高层官员禀报，并把我的小册子送到京城所有的衙门。这在反战派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战情绪，以至于上面发布了命令：任何人胆敢主和则被视为叛徒，并将严惩不贷。

1880年9月我经过天津。听说我在城里，李鸿章派人通知英国领事佛利斯特，说他希望见到曾经在直隶赈灾过的伦敦会的江奈生·里斯，以及我本人。我感谢这位巡抚大人仁德，把赈灾的银子押送到山

西，让我不为它的安全而担惊受怕；而他则感谢我们两个为解除民众的苦难所做的一切。接着，里斯和巡抚就基督教传教会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而后者所说的一番话让我后来一直深思。他说：“你们的信众之所以聚集在你们的周围，那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替你们做事，并因此生计有着落。收回你们发给这些本地代表的酬劳，你们在这里就不会再有基督徒了。”他还指出，在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基督徒。这让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影响领导层的重要性。所以，回到山西后，我决定给官员和文人们开设讲座。

27.斯科菲尔德博士以及其他内地会人员的到来

1880年11月，代表内地会的哈罗德·斯科菲尔德博士（Harold Schofield）抵达太原府；他是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中最睿智、医学水平最高的一个。他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总是鼓舞他人，欣赏他人。他来了之后不久，兰戴尔（Landale）先生，一位从爱丁堡来的律师，也来到了太原府；再后来，德瑞克（Drake）先生则从平阳府转来，皮格特（Piggott）先生也到太原府加入到内地会的工作中来。他们在发放福音书和传单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山东时，我与各差会的关系都是非常愉快的，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我本人认识全省的每一位传教士。与他们会面并交流我们在工作中的体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对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地域上的划分，是一个最让人感到高兴的决定，它避免了影响到我们关系的一些麻烦。

在山西时，我先是邀请内地会加入到那里的工作中去。后来，1883年，奥柏林会派美国传教士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建议：与其三家在不同的地点礼拜，每家各占一个地方，我们倒不如在省城里拥有一个联合的新教教堂。我还建议：我们不应一窝蜂到同一个县去开展工作，而是应该在我们当中划分地域，就像我在山东时那样，从而避免重复劳动。这个想法得到了三个差会成员的赞许，并一起融洽地共事了一段时间。

28.令人遗憾的分裂

我们与内地会成员的相处本来是最为友好的。戴德生夫人经常带着科利克尼小姐、兰开斯特小姐去拜访中国太太们。在斯科菲尔德博士会讲中文之前，我每周一次到他的诊所去为他做翻译。每到星期三的晚上，集体祷告会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然后所有的人都留下来参加社交性的聚会；星期天的时候，用英语做的礼拜仪式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进行，所有的朋友同样留下来喝茶；接着晚上便是用中文做礼拜，随后则是唱赞美诗。戴德生夫人在星期三的晚上给一个班上课，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并读谱的朋友们教授视唱。兰戴尔夫妇很有音乐方面的才能，在音乐方面对这个小小的团体的帮助可谓锦上添花。兰戴尔夫人在工作上鞠躬尽瘁，只可惜她去世得太早，但死得其所。

然而，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和谐；1881年，他命令他的成员们与我们分开来礼拜，理由是，我的做法不符合正统。这道命令让斯科菲尔德博士和兰戴尔先生十分震惊，他们立刻拿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见我。他们叫我放心，认为我出面说服一定很有效；可是，有违他们大多数人所愿，太原府的内地会成员最终还是和我们分开来祈祷，并另外开办了一所学校。

我决定于11月份去一趟烟台（往返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直接去见见戴德生先生本人，希望把这件事处理得更令人满意些。虽然我在太原府工作了几年时间，通过赈灾工作建立了在传教上的优势地位，但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撤出太原府，迁往河南省的省会，条件是，把那里划为浸礼会的传教范围，他不得派遣任何传教士到那里去。其实，他的差会早先的时候已经被从那里逐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建议他拒绝接受。

遭遇如此强硬的态度后，我只好心情沮丧地回到了山西。然而，我觉得，在同一个城市里开办互相对立的学校，对我们来说是件丢人的事。得知内地会计划开办永久性的学校，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那里的男孩子都归并到他们那里去，这样他们学校的人数便可以得到保障，而我们则有时间致力于其他慈善工作。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资源

的最好办法，可是，大家还是很伤心，毕竟送出去的那六十个孩子理查德夫人已经教了三年时间，对他们的感情很深，而且，最早进来的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经成为基督徒。

说到为自己辩护，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整个这件事如今已经过去。回想当时我的态度，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虽然时至今日那件事对我还有影响。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太原府城里已经不再存在分裂，浸礼会的势力现在已经控制全城。

29.基督徒传记

在1880年到1881年期间，我忽然想到，著名的基督徒的生平或许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与此同时，让中国人看到，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伟大的灵魂的目标追求。于是，我找来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后的各种教会史、圣人们的传记，并把我认为最合适的段落挑选出来，翻译成中文。城里的学校移交给了内地会之后，我妻子觉得，把时间花在翻译这些著名的基督徒的传记上是再好不过的。我离开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的翻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最终中文译文的总量多达十卷。这些译文于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版。

那位协助她翻译的中国文人很是能干；令人欣喜的是，他后来成了一名基督徒。在如今山西的基督教会界，我们忠实的朋友高大岭（Kao Ta Ling，音译）是最为出众，可谓光彩夺目。

30.帮助山西人民的一些非常规措施

饥荒期间，狼群肆虐，经常从村子里把孩子叼走，活活吞食掉。我忽然想起撒克逊的一位国王为英格兰人消灭狼群的做法，于是，我开出赏金，只要捕到狼，不管是死是活，皆予奖励；后来还真的有人送来几只。

我前面提到过，华北的一个特点是，地面由数百到数千呎厚的黄

土覆盖。暴雨在黄土中冲出一道道沟壑，并最终形成了难以逾越的浅沟深谷，这样，要想穿越乡野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思考什么交通方式更为合适时，我发现，因为有这些纵横交错的沟壑，建造铁路在工程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又想到，如果能发明出飞机的话，那么飞机一定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会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

于是，我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方面，记录它们身体的重量与它们飞翼的面积之间的比例，并根据一些昆虫飞行时所发出的音调，来计算飞翼每分钟的振动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人类具有发明飞行机器的能力。因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放风筝，所以我认为，发明出飞行机器的天才在他们当中产生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对飞行器产生兴趣的缘起，直到现在，这种兴趣依然没有减弱；不过，这一新兴科学的发展，已经比我梦想的还要快。

一天，一个书院的院长跑到我这里对我说："我们的古书中提到一种方法，认为身体组织的破坏可以用人工控制，并最终使生命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一种跟动物冬眠相似的状态。请问，你可知道，西方是否也有这种方法呢？如果你们有，那你便可以把秘密传授给那些正在饿死的人，这样，很多人或许可以不被饿死。"

我的答复是，我只读到过一个关于控制心跳的实验，那是在赫胥黎（Huxley）的《生理学初阶》[21]（Elementary Lessonsin Physiology）里提到过，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我不敢冒险做任何试验。

在干旱和饥荒的一两年中，全省普降大雨。在山西省北部的归化城附近的时候，我问当地的农民，当年的收成究竟怎样。他们的回答是："情况很糟糕，因为收成太好。每家的收获都很好，但是粮食卖不出去。用车把粮食运到缺粮地区的费用实在太高，劳动力奇缺，人工工资太高，我们农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谷子留在田里烂掉。"这可悲的局面正好有力地验证了我当初的观点；当初，我经常敦促官府修建铁路，以确保饥荒时便宜的粮食能运进来，丰收时低价的粮食能运出去。

第六章　在官员和学者间的事工[22]（1881—1884）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在时间上相当于基督教初期的汉朝和从七世纪延续至十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是欢迎外国人来华甚至在华定居的，不论他们是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穆罕默德信徒。然而，清王朝建立不久，这一政策就发生了彻底改变。

下面这个发生在1875年山东青州府的事例能很好地证明上述情况。一天黎明，我骑马从一个村子里出来，街上空荡荡的，只看见一个人，他还没穿戴整齐，边走边往身上披着褂子。当我经过他身边时，他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我，问我从哪里来。

“从青州府来。”我回答。

“但是，”他说道，“你不是中国人，你是个洋人。”

“是，”我回答，“我来自英格兰。”

“英格兰！”他喊了起来，“就是那个背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英国与中国在1837年的第一次战争[23]。）

“英国没有背叛，”我说，“因为她根本不属于中国。”

“她曾经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马戛尼大公及其他使节曾向中国进献礼物，这被中国史学家们记载下来，当做英国向中国进贡的记载。）“英格兰一旦背叛，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背叛。”

他义愤填膺地说的这些话，正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当那些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el）、南怀仁（Verbiest）等人，来到中国后，他们受到了明朝的万历皇帝和清朝的康熙大帝最高级别的接待。但是，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对耶稣会士不满，双方起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M.de Tournon）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对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皇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父读一下挂在觐见大厅的一些中国文字，那位神父不认识，于是康熙皇帝告诉特使，他最好把这些无知的神父们带离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他比那些神父们更懂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他管好自己的教民就可以了，而中国的事务皇帝自会料理。



晚明时代来华传教的利玛窦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还有之前教皇将东方给了葡萄牙、美洲给了西班牙，进而把自己看做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使得清政府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相反地，他们认为天子才是世界的唯一统治者，当东印度公司延伸至广州时，清政府下了一道敕令给纳皮尔（Napier）爵士，就像对中国百姓一样，希望他恭

恭敬敬、战战兢兢地服从管理。这两种相似的想象导致了冲突，这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正是这导致了中国与英国的第一次战争。

再后来，太平天国起义使得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之心，将其看做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即使在宗教宽容条约签署之后，中国政府还是晓谕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要尽最大努力阻止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内地居住，以防他们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出租房屋的屋主，只是因为身上被搜出一封外国人的信件，就被判了死刑。出租房屋给“洋鬼子”的屋主都被逮捕、判了重刑。这些政策也可以解释如下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教基地的开设总是伴随着暴乱，这些暴乱其实就是官员和乡绅发起的。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的饥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饥荒以及民众为何如此贫苦的原因，我感到自己必须要思考那些导致中国民众苦难以及整个世界苦难的根源。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意识到它优于中国社会的原因在于，它一直努力探寻上帝在自然界的作为，并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遵循上帝对亚当的命令——去管理世界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服务于人的过程中，西方民族做出了一些近似于奇迹的发明创造。我确信，如果有机会给那些官员和学者讲解明白这些，使他们对这些科学奇迹感兴趣的话，我会向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一条如何利用上帝蕴含在自然之中的力量为他们的同胞造福的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影响他们去修铁路、开矿山、避免饥荒再次发生、将民众从赤贫之中解救出来。除了各省的政府官员和学堂里的学生，还有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不久这些候补官员就会被皇帝派往各个地方，通过他们，这些好处还可以渗透到其他省份。

然而，在我能够与他们谈话、进行让人满意的讲论之前，我必须先将自己用新近出版的书籍、先进的仪器武装起来。我缩减了一切个人花销，住在一所中式的房子里，穿起中式的衣裳，吃起中式的食物，这样我才能把所有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书籍和仪器上。

我买了一所三进院落、十间房屋的大房子，既作为我的住所，又作为教堂和学校。房子装修得很有山西特色，四壁装饰着关于日常起居生活情境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间里铺着砖石，其他房间都是泥土地面。因为这所宅院被认为不是一所吉宅，已经空了好久，所以租金很低，只有每个月十二两银子。因为“洋鬼子”不会再害怕其他的“鬼”，后来屋主又减了价钱，如果我保证长期租住，我每年只需支付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可以了。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张大炕，这些大炕用砖石垒成，靠近房子中央的纸窗户，房间有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炕呢，高约两英尺半，六英尺宽，炕里面是散热的管道，火在旁边一个大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生着，小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得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炕上和房间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炕上铺着席子，感觉像地毯，使它不再那么坚硬，女人们整天坐在炕上靠近窗户的地方做着针线，缝制衣衫。



李提摩太在山西乡村传教的一个教堂

在1880—1884年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购买书籍和仪器，这一千英镑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里维斯的亲戚那里继承的一笔遗产。

3.给官员们做演讲

在这些书籍和仪器的帮助下，我得以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做了关于以下题目的演讲：

（1）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2）化学的奇迹

（3）机械的奇迹，例如车床和其他工具，还有缝纫机和自行车灯

（4）蒸汽的奇迹，蒸汽给每一个使用它的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益处，例如在铁路、轮船、工厂中的作用。

（5）电的奇迹，可以从应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里看到。

（6）光的奇迹，可以从幻灯片和照相机中看到。

（7）医药和手术的奇迹。

当1881年彗星出现的时候，我为此做了一次演讲，向听众展示它的轨道变化是有规律的，就像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是一样的，不是什么凶兆。有三年的时间，应官员和学者的要求，我坚持每个月做一次演讲。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们对这些演讲的赞赏态度：有一次，对一所刚刚建成的戏院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满人和汉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位知府大人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做演讲之用。

在做这些科学演讲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埃里斯通（Elliston）先生的大力帮助，他来自内地会（Inland Mission），后来成为芝罘（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来太原府跟我一起度过了一段假期时光。政府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力超过了其他任何的魔法。

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块重六十磅的铁砧板，在我书

房的另一侧，当这个铁砧板被称重的时候，我站在另一侧的桌子旁，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要看客们仔细检查下磁铁，确保上面没有钩子或胶水，然后按了一下配电盘上的铜按钮，就在这个时候，在房子的另一边，磁铁竖起来，粘在铁砧上，牢牢地分不开了。

“现在注意听。”磁铁与铁砧发出了撞击声，“现在，”我喊道，“将磁铁竖起来！”但是就在无数双诧异的眼睛的注视下，重重的铁砧也同时被举了起来，因为它跟磁铁粘在一起。“现在，我将松开这个铜按钮，铁砧就会从磁铁上滑落，注意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就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了。

还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能帮助燃烧达到这个程度：在氧气的帮助下，铁丝会像稻草一样地燃烧。这景象使他们感到惊奇，也是他们感到诧异。但是接下来氢气的实验一开始并不成功，还引起了惊慌。我曾经告诉他们氢气会像油一样地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是当我把火柴接触到玻璃管时，我以为会出现一个氢气火苗，然而却出现了像手枪一样的爆炸声，烧瓶的软木塞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不见了。马上，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感到惶恐不已，声称要立刻离开，因为第二天一早有要紧的公务要处理。但是我坚持请他们在离开之前听一听我的解释，他们不太情愿地留下了，我向他们解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点火之前，我没有足够的耐心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而氢气和空气一旦混合，很容易产生爆炸，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为了证明我所说的道理，我决定这一次等空气完全排出，再点火，这一次氢气就像蜡烛一样地燃烧了，众人都很吃惊。后来，我就让他们离开了，毫发未损，心绪宁静。

一般来说，在这些演讲之后，一些最有学问的人总是留下来，就我刚才讲的内容问一些更深的问题。然而，我不得不细心地选择我的听众，以免把不同官阶的人混在一起。有一次，我无意中邀请了几位道台（管辖大约三十个州县）、几位知府（他们是管理十个州县的行政长官）和几位只管理一个州县的知县。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位官员，平时总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是这次却一个晚上都没说一句

话。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沉默寡言，他回答说，在那么多上司面前他怎么敢说话呢？从那以后，我很注意地只请同一级别官员一起来，这样他们或许会感到轻松、和谐。

在所有的讲座中，我都指出了上帝是如何赋予人类无尽的能力从而在大自然中获得力量，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人类就会活得像劳工和奴隶。比如，很多邮差每天需要骑马赶两百里路，把急件送达，因此经常因为疲劳过度死去，然而，电报却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消息传遍全世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学习上帝在自然界的所有律法，这样才能获取上帝对世人的恩赐，他储备了所有的能量为人类所用，而我们就可以通过遵守他的神圣律法来表达对他慈爱的感激。

当我在太原府开始演讲之后，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生到来，以至于我不得不又租了临街的宅子，在那里，我才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的研究、翻译工作，不被那些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的访客打扰。

4.拜访王知府

有一位河南人，姓王，他曾做过山西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很感兴趣，当他在太原府做候补官员的时候常常来拜访我。当上知府后几个月，他因为公事来请示巡抚，在这期间他曾来看望我。当问及他在辖区内的改革措施时，他滔滔不绝地描述了将建一所教授现代科学的学校的计划，他已经举行了考试，并奖励了其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两个人跑去告诉他他们看见有两条实实在在的龙在宁武府的高山上游弋，他向那两人解释道，那不过是云里面的闪电，以蛇或者龙的样子发出的，是由电流而不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来的，而外国人已经把电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成了雨。这就是被推崇了几千年的所谓龙王降雨的科学解释。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他自己并非儒生，而是信奉

道教，又说，对我这样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竟然信奉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他感到很吃惊。

我回答："你应该知道，要是你要去上海，你必须坐车到天津，在那里才能乘船走海路吧？"

"是，这我很清楚。"

于是我把一张约翰·斯通（Johnstone）出版社印刷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我书房的墙上，指着各个行星问他是否知道每一颗行星因为形状、大小不同，所受的重力和球体表面的压力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别的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星球去另外一个，我们必须改变身体的形状，才能适应新的家园。"

"是的，我想应当如此。"

"那么，为什么你要奖励自己开办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

"那你把所有的监牢都关了吗？"

"没有。"

"为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

"是这样的。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些不法之徒关进监牢，让他们不能再危害于人。因此，作为官员，你知道赏罚这两个原则都是不可偏废的，或许宇宙的统治者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吧。"

听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了你说的一切。应当把这席谈话影印出来，这样，读了这些，就不会再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与儒生同居一室

当时一个全省最有学问的人，曾被选出来编纂一个新的版本的《山西省治》，他希望能与我住在一起，然后就付了一部分房租，跟我一起住了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的评价很高，尤其推崇他的那本《天主实义》，认为其可以与中国圣贤的经典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在广东传教的伦敦教会的霍博森（Hobson）博士的著作，这些著作几经他人之手传到了他的手里，其中丰富的科学知识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天，我请求他为我收集几首儒家的赞美诗，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他告诉我，他没有找到一首这样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表达的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怨声。后来，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其他地方担任政府职务，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就信仰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当中，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故意把它扔到了地上。



利玛窦的油画像

“在整个山西，恐怕没有人敢这么做了吧！”他大声说，“他们那么看重一切汉字和印出来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中的是它们承载的意义，我对那些蕴含其中的真理怀有敬意。所以，如果你请我接受洗礼并做一名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形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河

里洗一洗，不能让上帝更加看重我。如果我是真心相信，洗礼和外在的仪式不会使我变得更好。”

“你说得对，”我回答，“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地上扩展神的国，是否愿意帮助你的同胞。”

“哦！”他大声说，“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6.会见左宗棠

除了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们施加诸如此类的影响外，在一个难得的机会下，我还见到了总督左宗棠，同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犁，担任从沙俄帝国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在这之前，伊犁已经被沙俄政府侵吞多年，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问题，他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在收获季节补给军粮。尽管用了一些时间，但是他还是成功地完成了收复失地的任务。

收复伊犁后，他返回了北京，在回程中他要经过一个离太原府大约三十里的地方，因为曾经做过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收复伊犁的功臣，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拜见他。由于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邀请我一道去见见这位大人物。

我曾经做过一个世界历史图集，透过它，一个中国人只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对世界比较史的了解，就会比那些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人员更加彻透。因此，我把这个作为给总督的礼物。当我们到达他下榻的住地后，他安排了所有的中国官员一起接见，之后他遣散了他们，留下我单独谈话，直到深夜。他先谈论了一下我送他的世界历史图集，显然他很喜欢这件礼物，然后他谈起了自己在甘肃进行的机械改革，他将机械应用到了羊毛制品的生产中。他还让我看了一下机械制出的样品，他由衷地自豪起来，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当我讲了我们在救济饥荒中所做的事时，他谈到了信仰的问题，他说，既然传教士引人归善，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二者都是致力于同样的目标，他坚信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并没有真的

矛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他成为南京总督[24]后，尽管中国政府与传教士之间积怨已深，当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哈特（Hart）先生请求买一块土地，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政府官员找了一个合适的宅地，为南京基督教会的成立提供了便利条件。

7.友好往来

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太太[25]经常收到住在城里的高级官员的太太以及乡下乡绅夫人的邀请，在这些人中甚至有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做学生时，我就会问："你就不怕我会影响他们不仅学习西方的知识，还有信仰吗？"他们回答说，这些是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另一些官员，在离京任职之前，总会登门与我告别，感谢我对他们的指导，告诉我如果我的任何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只要有我的一封介绍信函，他们一定全力照顾。这些绝不是空口承诺。我在山西事工八年，最后整个山西有五十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建立了很多教会，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一起骚乱事件。

这的确是中国人与国外传教士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许多有名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县城市，都与当地的总督或其他官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中国音乐

儒学家告诉我，中国的信仰很大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一千多年前宋朝一本叫作《礼乐》（Liyo，或者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的著作得到解释。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到了中国的

首调唱法系统，这种体系与欧洲最晚在十九世纪的大胆创新相似。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这种体系，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读者可以查阅理查德夫人所著的《中国音乐》，这本小册子已于1898年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我和妻子着手编纂了一套十卷本的有关世界音乐的书籍，现在，其中九卷还是手稿，只有一卷数年前在山西出版发行，并被广泛推广。这套书籍包含了各个不同国家的民族音乐的曲调和歌词，展示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感情。其中，为了表达黑人的情感理念，还插入了Judilee歌者的一些旋律。

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总督的那个人，在山西致力于儒学复兴，为了纪念孔子新建了一所寺庙，庙里配备了一整套乐器，与孔子的老家山东孔庙里的一模一样。在庙里，有专人负责一定数量的学生掌握这种音乐的艺术。一天，我去拜访这位负责人，在谈话中，他发现我对音乐有一些了解，当我询问我能否参加他们下一次的演出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演给你看。"很快，他召集了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但是表演的成果却让人惋惜，尽管乐器种类繁多、崭新漂亮，但是使用者们却不知道如何矫音，以至于制造出一片恐怖的噪音，而非优美的音乐。

我问负责人为什么不把音调校准。但音乐对他是一门新的技艺，他也希望怎么能搞懂它，但对他很难。因此，我邀请他去我家里，告诉他我的妻子精通音律，她可以为他讲解一下。就这样，我们帮助山西的儒家音乐开了一个好头。

9.与佛教徒交往

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大寺院住了一个月。那里的住持方丈来自外地，手下有一百多名僧侣。每天，我与这位方丈一起进餐，他是一个六十多岁、和善的人。每次饭前，他都以基督徒难以匹敌的热情祈祷。他的祈祷词包含四个字——"三、宝、法、僧。"（"我

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一体的恩典中。”)

然而，僧侣们的教育却非常基础，除了每日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最主要的修行是各种宗教仪式的演练，只要经过五十天左右，他们就会收到由方丈亲自署名的通过文书。

10.参观五台山

佛教的四大圣山之一就在山西附近，那就是五台山，从太原府东部出发，几天就可到达。1880年我就去五台山参观了一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数千名和尚分属于两个佛教派别——一个是中国普通的、穿灰色服饰的教派，另一派是穿着黄色与红色交汇的法衣、来自西藏与蒙古的一派，被称作喇嘛。每年仲夏，五台山都有一次重要的宗教聚集，类似于犹太教的赎罪日。这也是一个大规模交易的机会，蒙古人会带着马驹和骡驹前来交易。

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中央喇嘛庙的住持，为了能见他一面，我精心准备了一张大的、彩色的世界地图，在上面用中国汉字标注。我把地图和名帖一起送过去，请求见他一面。他定了一个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地图的各种含义，指给他看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说明这张地图是按一比多少里的比例尺制成的，透过这个比例尺，他大概可以了解这些地区、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世界各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立刻请人上点心招待我。于是，我解释说，我此行的目的是更多地了解佛教信仰，请求可以亲眼看看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到达仪式现场时，我发现寺庙里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我很难挤过去。当我好不容易挤到通往大殿的一百零八级台阶前，发现一群手拿鞭子的侍从在等我，看到我之后，他们立刻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我被带到一座大庭院里，穿过又一人群，到达看台，看台上坐着一位中国官员，一位蒙古官员，还有他那穿着红黄相

间的袍子的夫人。我就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

一面大鼓敲响了，还夹杂着其他乐器的声音，于是法会开始了。接着，僧侣们开始用一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罗斯韵味）。接下来是一场无法想象的、令人吃惊的舞蹈，一群男人冒了出来，头上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面具，有一些像老虎，有一些像飞禽，整个场面看上去就像埃及神话中各种动物的大荟萃。看完这场宗教舞蹈，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里，我见证了一场截然不同的宗教崇拜。这一切都让我肃然起敬、印象深刻。

崇拜音乐使我想起格里高利的圣咏叹调和那些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古代教会颂歌。僧侣们被分成了两队，一队在通道右边，一队在通道左边，其中一队双手合十抱于胸前，音调一致地唱着一首四行的宗教圣歌。另一队则拜倒在地，悄无声息。跪拜结束后，第二队站起来，唱另一首颂歌，而先前的那一队则屈膝跪下，匍匐在地。他们唱的颂歌旋律十分优美，我忍不住把它记录下来，留待以后写作基督教圣歌时使用。

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培养道教徒、并授予他们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访问过一所由政府资助的道教学院。我还给江西省的道教首领写过信，讨要一些他们现阶段培养信徒的一些教科书，但是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功用就像那些被罗马大主教祝福过的、有免罪功能的十字架一样。

除了学习中国宗教信仰、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外，我还进行了其他多样化的事工，包括给官员和乡绅们开讲座、到农村传福音，此外，我还在城市里建立了一所养育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负责管理，她还参观了当地农村的七所小学堂。

11.张之洞

自从1860年大不列颠与法兰西占领北京后，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是恭亲王，他知道跟外国人作对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但是大约

1880年出现了三个年轻聪明、主张对外强硬的人物，他们饱读诗书，又对中国昔日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只要中国勇敢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

对于中国来讲，恭亲王的政策太过于温和了。一场宫廷政变蓄势而发，恭亲王被他主战派的弟弟醇亲王所取代。



李提摩太提及的张之洞像

这几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就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派往山西，任命为山西巡抚，他的任命打破了京官不外调的惯例。另一个年轻人是张佩纶，他被任命为福州海军司令，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向朝廷汇报沿海四周海域固若金汤，但是他的这一预言很快被法国人打破，他们仅用了三天就攻下了沿海的所有海障。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不记得第三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但是所有这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对世界知识的掌握还是非常基本、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抚之初，张之洞就大力推行各种富民政策、采取各种措施防备饥荒。在太原府衙门的旧档案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的一些建言，我在建言中建议政府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兴实业、建立现代化学堂。张之洞下令召集下属的主要官员一起审阅我的陈词表，后来又派了一个由三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接见我，请求我放弃传教工作，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政务中来，这样就能将我的建言付诸实施。我回答他们说，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改革措施的价值，但是我却不是什么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获得满意的结果，大量引进各个领域的专家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官员们说，巡抚很清楚我说的这些情况，但是既然我内心知道怎样对中国最有利，他很希望由我招募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监督下实施各种改革措施。在这一点上，我回答说，尽管物质上的进步很重要，但是传教工作却是更为重要的，我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崇高的事业而去做那些世俗的工作。因此，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和报酬。

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要求我对太原府周围地形进行探测，为预防将来洪水泛滥未雨绸缪。我请斯格菲尔德（Schofield）博士做我的助手，帮助测量地平高度并拍照，之后我们向巡抚汇报了我们的勘测情况。他还请我帮助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然而，就在巡抚下定决心实施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去处理清政府与法国人的争端，那时法国正在安南边境上制造事端。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驻扎在武昌，他并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那些建议，他建立了一座炼钢厂，开始修建铁路，开办实业，建设现代化的学校，一切就如我在山西所提的建言那样实现了。他又一次邀请我加入他的幕僚，我再一次拒绝了。同时，我也感觉到，在这一次的邀请下，仍然遗留着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清政府，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而且愿意认真兴办实业的官员了，其他的官员大都浑浑噩噩、盲目自信、对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

12.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一开始，尽管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但是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他们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我对中国的非基督徒那样的态度一样。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我到山西之后，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负责人商议合作解救饥荒的事情。那个时候在太原府有两位主教，一位年事已高，身体羸弱，已经快七十岁了；另一位是个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众，比我大几岁，精力充沛，中文名字叫恩格（Ngai）。一开始，他极力说服我回归母教会。我问他，他怎样才会知道哪个才是所谓的母教会呢？我们为这个问题持续争执了三天。他固执己见，我认为他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没有权利站在审判官的立场上说话。他用同样的理由回击了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读过所有天主教的经典著作，但他却是不被允许阅读清教的有关书籍的。

第一天，他们当地的教会领袖在，所以我们用汉语交谈，第二天他就没有被要求到场了，所以我们就纽曼（Mewman）枢机教会的经验以及两个教会之间的种种不同，直到彼此彻底了解了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地分手了。

当大卫·希尔（David Hill）和约书亚·特纳（Joshua Turner）来太原时，我曾带他们去天主教堂见过主教，感谢主教曾召集遍布全省的

神父们为我的饥荒调查搜集资料。当我们三人动身去赈灾时，曾听说主教为我们在教堂举行了一场全体会众祷告会。

当我再次回到太原府，一种谣传渐渐散播开来，说是天主教堂房顶上的天使会带来灾难。这个吹着喇叭的天使雕塑好像一个风向标，正好朝向能带来降雨的那个风向。紧接着，就有人相信当带着雨的风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时候，吹号的天使就会把云和雨都吹散。他们因此威胁说要把教堂拆掉。巡抚有意要激化天主教会与我们的矛盾，他觉得，如果我不同意在教堂屋顶上放一个天使雕像，那么现在机会来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他甚至派了幕僚来见我。对此我回应道，“告诉巡抚，民众这次彻底错了。教堂屋顶上的天使仅仅是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体现，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神奇的魔力。”幕僚问我能不能给他看看那段经文。于是，我拿出一本《新约全书》，把设计天使的那段经文折起来，请他拿给巡抚过目。他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天主教堂也因此得以保全。

在此之后，当我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互相走访几次。其中的一次会面中，他告诉我他已经通知他的所有神父，如果我到了他们教堂附近的任何地方，他们都要接待我在那里食宿，我会发现那里比小旅店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也遵命照办了。

在利奥十三世（Leo XIII）成为教皇之后，他将中华帝国分为五个教区，每个区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商讨在传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正好被选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中心，在这里还开过一次大会，来自山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主教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曾邀请我共进晚餐，因为都说汉语，所以我们彼此都能听懂。他们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因为会议不用汉语，所以我谢过他们的好意，婉言拒绝了。他们依旧对我很友好，还时不时地给我送来番茄和自酿的山西葡萄酒作为礼物。每次主教来访，都会有一位意大利神父陪伴，这位神父名叫维（Wei），是教堂的司琴。我家有架管风琴，我妻子有时会演奏罗西尼的一些曲子，每到这个时候，维就很高兴。我妻子曾询问主教，在省内有没有修女。当时，山东和直隶是有

的，而在中国腹地是没有的。那个时候，他们不敢把修女们送到那么偏远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中国民众一定会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的。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记录下来，神父们曾还收养了一些孤女，教她们一些最基本的书本知识和缝纫技术，以便让她们掌握谋生的技能。理查德夫人建议教给那些女孩们如何使用缝纫机。我们还订购了一台，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妻子还去了那所学校，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那台机器。

13.山东之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编年体的时间顺序来继续讲述。1882年，我的同事，曾主管山东青州府教会的阿弗雷德·琼斯（Alfred Jones），奉命回国。为了刚成立的教会的缘故，他请求我在他不在的这段日子取代他的工作。我不太想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认为如果让当地的基督徒自己去做，是能够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的。然而，在琼斯先生和刚到中国的两位年轻同事一再的要求下，我还是答应去了。从太原府到济南府的距离是二十一天的路程，当时是在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天气热得不得了，有一天，马车夫嚷道："哎呀，天热得像下火啊！"

在旅途中，我继续修改我的一些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立刻出版。修订工作是在早上、晚上和午间喂马匹的时候做的。在到达济南府的前两天，也就是离到达青州府还有三天路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修订工作中间会睡着。我认为自己可能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放在工作上，这个时候就会走一会儿让自己清醒一下，而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被彻底累垮了。

14.在青州患疟疾

一到济南府，我就把我的一部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然而，还没

到晚上，我就病倒了，患的是疟疾，而且一天天严重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大限当尽。我给在太原府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也给琼斯和我的年轻同事——“把我埋在青州府。”

收到消息后，我们的医生肯茨（Kitts）先生骑马从青州府出发。从青州府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三十六个小时就赶到了。他一赶到也立刻患上了疟疾。第二天，我的另一个同事怀特莱德（Whitewright）也在烈日下用了三十六个小时赶到了济南府，不过他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肯茨太太得到她的丈夫患病倒下的消息后，从青州府乘车到了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感染。多亏了她的悉心照料，我们三人才得以痊愈。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提及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病倒的消息后，他差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店照顾我的需要，直到我恢复健康。当我们康复后，我去他的府上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回答说，照顾好外来人，是他的责任，他还派了四名骑兵护送我们，直到我们安全到达青州府。

15.为收获的感恩祷告

在从济南府到青州府的这段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过了一个礼拜日。我问旅店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如何。

“收成很好。”他回答。

“你们有没有为此感谢上帝呢？”

“没有。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谢他。”

“你觉得镇上的人会不会感谢上帝的恩赐？”

“我想会吧，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啊。”

“那好，你把镇上德高望重的人请来，告诉他们中午之前来这

里，我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感谢上帝。记住我只要那些年长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中午的时候大约四五十人来了。他告诉他们所有的这些好事都是来自上帝的，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某种崇拜方式感谢他。在一些泛泛之谈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会也跪下来为他们向上帝祷告。就这样我做了祷告，而他们也同样虔诚，就好像他们已经养成了崇拜上帝的习惯了。当我的感恩祷告结束后，他们请求我教给他们更多有关我的信仰的事情。我许诺会派一位传道者带着《圣经》到他们这里来。就这样，我们互相承诺在敬拜上帝中保持永远的友谊，然后就分开了。

我如期到了青州。在持续几天的会晤之后，A.G.琼斯踏上了回国的路程，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16.山东的新教会

整个秋天，我走访了散布在乡间的各个教会，向他们讲道，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不太熟悉的人对这些仪式不产生误解是很难的。于是一个谣言散布开来，说我给了每一个会众很多两银子。一个基督徒就这个谣言做过些调查，其中一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的一个聚会，听到我提到分配银子的事情。接下来，这个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啊，那是牧师在用银子的比喻解释属灵的恩赐。”在那次布道中，我没有使用那些外国的名词来类比人的恩赐，而是用了一大堆银子来比喻。

对我来说，这次旅行最有趣的事情是，在一个五年前只见过三四次的一个人的身上，我见证了讲道的效果。之前，他来见我，希望学习我们的教义。我就从《马太福音》中找到了一些段落让他记诵，四五天后，又让他记诵《启示录》中开头的段落。

最后一天，我看到他脸上泛着不平常的光晕，他喊着：“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耶稣基督我的救主。”

“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了《启示录》中我们主的形象。

“他说什么了？”

“他让我去讲道，‘悔改吧，天国近了！’”

“你会像他说的那样做吗？”

“我怎么敢违背主的旨意？”

“那就去吧，你将会在心里感受到你从未感受过的喜乐。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这是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就在我离开青州府去山西之前。现在，在河的东岸有了五座新教堂，都是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建的。我访问这些教会的时候，问他们这些教会是谁建立的。他们回答说：“是一个姓顾的人。他从青州府见了你之后回来就在大街上布道，说‘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我们都很吃惊，想着他是不是在鼓动叛乱。我们就跑回各自的家，关上大门，以免被误认为是他的同谋。但是他还是照说不误。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和登山宝训。我们就躲在门内，听他宣讲。”

这就是他们对基督信仰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在河的东岸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立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根源不在于人的知识，而在于跟神的沟通中。

17.J.S.怀特莱特的事工

这段时间，在青州府只有三位传教士：肯茨先生、肯茨太太和怀特莱特先生。我跟后者同居一室。他对传教事工有着不同寻常的激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一些跟传教的任何一个方面有关的问题。我们经常谈论到天快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病了，我们很奇怪为什么

会生病。肯茨先生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你们生病的原因应该很清楚了：你们白天已经很辛苦地工作了一天，晚上还整晚谈论问题，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从那之后，我们不睡在一个房里了，而是有了各自的房间。作息正常后，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就在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对事工充满热情的朋友怀特莱特在青州府开了一间博物馆，那是在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的省会济南府，在那里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传教博物馆”。这是一间非常大的博物馆，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或许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在里面有两间报告厅，每天都会有几场演讲和报告。每天有四百到一千人来参观，在最后的两年里，参观人数差不多有两千五百万。

这些讲座的价值使四川内地会的威尔逊（Wilson）博士大受启发，在八九十年代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1910到1915年间，罗宾逊（Roberston）教授接受基督教青年会委托，组织了一系列的这种大型讲座，采用了最新的科学仪器。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的许多省份。

18.与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纷

在这段时间里，我非常不幸地遇见了一位极度排外、极度阴险的官员，这个人丝毫没有是非之心。我在这所城市一条地段很好的街道上租了一间房舍，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民众的抵制。但就在这个时候，青州府来了一位新上任的官员，是这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县的县官。就在我拿到房屋的钥匙之前，他找到了我。这个人大约四十岁，来自直隶，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考上过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我们谈了一些不相关的话，大约半个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一所宅院，但是住在那条街上的乡绅和我的一些邻居请求他让我离开。他说作为新官上任，他不太喜欢拒绝他们的第一个请求，因此，他请求我帮他一个忙，将房舍的租赁合同退掉。

我告诉他我对于乡绅的这种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在我谈合同的那一个月里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反对。听了这句话，他变得非常不安，还是请求我为他这样做。接着我问：“如果我退了这所宅院，你会为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一所吗？”

“可是，”他回答，“你在这个城市非常有名，不费吹灰之力你就会找到适合你的另一处房舍，而我却刚到这里。”

“如果有人继续反对我租住另外一处宅院呢？”我问。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确保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老百姓的心愿的。”

有了他的这个保证，我回到房间，拿出那份合同，递给他。这时候，他表示出对我的感激。

几天后，他被巡抚招到省会去了，在他不在的那两周里，我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租了一所宅院，那条街上只有三所宅院，我的是中间的那所。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我左右的邻居做我租赁合同的中间人。按照中国的风俗，在得到邻居们友好的同意后，我得以平静地住在那里。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对知县在这件事情里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劝我在他赶回来之前搬进新租的房舍，但我拒绝了，“我当着他的面放弃了一所房舍，我也应该当着他的面搬进这所房舍。”

过了两周，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了。这次他告诉我，我租的这所房舍的主人，一位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不安，请求他让我放弃租赁合同。我回答说我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一直很急切地想把房子租给我。

“但这是事实，”他回答，“她威胁说，如果你搬进这所房舍，她就会自杀。你是个好人，一定不会希望造成别人的死亡。另外，你的邻居也反对你住进去。”

“这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合同上签了他们的名字了。”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接着，他又摆出了另一个理由：“如果你住进这所房子，会有不怀好意的人将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很吃惊，问：“你不是向我保证说，我要是找到另一所房舍，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承认自己这样说过，“但是对控制着这所城市的暴徒，我又能怎么样呢？”

“谁控制着这所城市？暴徒还是你？”我问。

他还是坚持说，如果我住进这所房舍，他不会对后果负责，又一次劝说我放弃租赁合同。

我拒绝了。“这次我不会放弃了。我同意你第一次的说法，但是这次没有理由让我放弃合同。”接着我又说，“我已经推迟搬进去了，等到你回来。除非我能够在你的保护下，安全地住进去，否则我就会向领事汇报。我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考虑。如果你还不同意，后天我就动身去芝罘，亲自汇报这件事情。”

两天过去了。我租了一辆马车，正要启程的时候，知县来了，显得非常不安，好像整个城市马上有一场暴乱似的，他又一次劝说我退回合同。

“我知道民众都很平静，”我回答，“我不能再等了。”

接着，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向领事汇报了这件事情，领事去见了道台，这位道台统治着三十个县，他写了一道文书，责备知县制造事端，声明我完全有权利选择一所房舍租下来、住进去，不许任何官员和民众骚扰我。

当我回去后，我很吃惊在第二天一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道台的

文书在几天前就到了他的手里。这次，他的态度很好，在各个方面看上去，我就好像是他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一样。

他说他听说我有一台幻灯机，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我告诉他晚上可以展示给他看。所以他晚上又来了，带着一些幕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片，他自然很高兴。在就寝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他来拜访我了。

第二天，一些乡绅来见我，问我是否也能为他们演示一下幻灯片，我当然很乐意这么做，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些乡绅的为难。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我的朋友。于是，知县挑起的对我的敌意，就这样消失在了民众对我极大的同情中，也消失在对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中。

秋收之后，冬天来了，农民们无事可做，所以我邀请不同教会的领袖，有男有女，来青州府接受培训。这项事工，再加上对教会的督管和福音事工，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直到1883年春，詹姆斯·哈勃提（Huberty）先生，他曾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格兰家乡加入了浸礼会，前来接管山东的教会，我才得以脱身，回到太原府。

19.在回山西路上遭遇劫匪

在我回去的路上，在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伙强盗袭击了我们所住的旅馆。我有两辆车，一起住宿的其他旅客还有五六辆。强盗们打开所有马车的箱子，把衣服和纸张扔得到处都是。我起床后，发现一位同行的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三千两的银票，急得不行，那是他要向他在北京的老板交差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后，他彻底地搜查了他的所有随身物品，最后发现银票就躺在院子的角落里，这可让他高兴坏了。

而我呢，我的马车上的一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追踪强盗的脚印，来到了他们越墙而逃的一堵高墙下。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了两行深深的脚印，一定是扛着我的箱子的那个盗贼留下的。

在院子里微弱的灯光下，盗贼看到箱子里闪闪发光，他一定以为是一箱银子，他把它扛走了，以为自己收获最大。背着那么重的箱子，越墙而逃，而且走过那么远的路之后，当他打开箱子发现那只是一些听装的浓缩牛奶，那个盗贼该是多么的失望！

一路上没有遇到别的意外。在离开九个月之后，回到太原府，发现家里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在等着我。

20.斯格菲尔德医生的去世

1883年的8月，我们在太原府的小团契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斯格菲尔德（Schofield）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去世了，是被他的病人传染的。因为以前也得过这种伤寒，我就帮着斯格菲尔德夫人照顾他，但是我们的所有关爱和照料都于事无补。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颗最美的基督徒的心肠，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爱他。

1884年，恭亲王（Prince Kung）被他的弟弟醇亲王（Prince Chun）取代，好战、排外的一派占了上风。许多政府官员认为恭亲王性格懦弱，不适合领导中国这样大的国家。

21.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尽管在我来中国的六年前，太平天国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对基督教的传播的不良影响依然很大，因此不得不提及。洪秀全没有分清绘画中的艺术与偶像崇拜中的雕塑的区别，为了遵守摩西的诫命，他把对艺术的一切崇拜归结为拜偶像。他的信徒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对态度发展成了一种宗教狂热，随着会众的迅速增加，政府警觉起来，逮捕了洪秀全，把他关进监狱。他手下的信徒相信他是无辜的，将他解救了出来，政府宣布他们是叛乱。从那时起，这场运动有了反抗朝廷的性质，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占领了武昌，然后沿着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上

攻城掠地。最后他定都南京，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表亲，干王，是个基督徒，真诚地试着使洪秀全摆脱自命不凡和极端堕落的行为。太平天国有一个将军是忠王，非常有能力。在他的人那里，他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我认识的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过太平军，他告诉我，忠王对战士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会立刻得到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Burgovine）和沃德（Ward），还有英国人戈登（Gordon）曾帮助中国政府镇压这次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投降，这场叛乱得以结束。据不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场运动持续的十三年间，死亡人数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之间。无疑，它留下的是人们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消解。

22.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所受的逼迫

长期以来，遍布中华帝国的教会一直遭受着各种干扰、漠视和逼迫，这一方面来自民众，一方面来自官员和乡绅。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搅扰。应已回国的阿尔弗雷德·琼斯的要求，浸礼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让我们去北京面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巴克斯[26]先生，商议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

以下的几点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宽容条款的实行是多么迫切的事情。

（1）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交部[27]所做的那份著名的、不友好的备忘录是多么直接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威廉姆斯[28]的《中央王国》第二章，707页。）

（2）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为一本书作序，明显地排斥基督教。

（3）陕西和甘肃总督不允许一位传教士的居住。

（4）山西总督张之洞，在听到一份为基督徒受迫害的陈情表时，回应说这种请求使他觉得刺耳。

（5）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曾给他所有的部下下达命令，对于传教士的所有案子要推迟处理，结果，造成了广东十八座小教堂很快就遭到了攻击。

（6）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问题。

（7）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师提督基本上遵循了外交部在备忘录中的对外态度。

（8）陕西学政告诫教习和学生，如果他们加入了基督教，他们的学位将被取消。

（9）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一次将近一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试出了这样两个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称《伟大的学问》）和"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些题目造成的结果是，一位传教士的家被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被打伤。

（10）一个秀才状告一些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后来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是无辜的，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那位秀才为他的错误付出过代价。

（11）山东登州的一位知县强迫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他们要一致抵制。

（12）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在处理传教纠纷上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

（13）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传教案例的书，把所有麻烦都归结到传教士身上，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14）在山东，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知县对他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受中国皇帝保护，为什么你要学那

些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告诉他，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例》。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这之前的中国律法。

以上各点，除了备忘录，都涉及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布全国的教会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羞辱、抢劫，传教士被殴打。

23.与詹姆斯先生一起去北京（1884）

因此，现在到了有必要让我们的英国公使对事态加以关注的时候了，特别是福建巡抚向北京政府报告，教案的主要起因不在外国人，而是由政府对待基督徒不公平造成的。

一到北京，我和詹姆斯先生就得知巴克斯先生去了朝鲜，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订一份合约。在我们留在北京等他回来的这段日子，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里，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消除。我们召集了所有在京的传教士集会，我被推举为秘书。

24.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这样一个联盟，但是失败了，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到一致。在北京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开了九次会。跟我住在一起的伦敦差会的艾德肯斯（Edkins）先生收藏着好多期的《福音联盟杂志》，在其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成员，尽管总体观念一致，但却持有不同的教条。我从中选出最简明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期尽可能地减少分歧。在这些条文的帮助下，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成立了中国福音联盟。

稍后，我写信给《中国导报》（Chinese Recorder），敦促活动在各个省份的联盟成员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便各地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为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对当地官员贯彻《宽容条款》的力度予以监督。

在每年年初的时候，联盟会组织一次为期一周的祷告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盟获得了存在感。然而联盟成立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基督徒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结果却收效甚微。

在北京事工期间，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传教士身份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这也是导致中国民众对我们产生误解的一部分原因。处于谦卑，我们将自己称为“行僧”。中国民众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是各自为战的个体，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力图在全世界推行新教福音的一个庞大机构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有他们自己的级别定位，可以直接跟中国同等级别的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们都意识到了这种状况，他们把自己称为“牧师”，这一称呼已经广泛传播开来。但是他们的身份定位更多地意指“牧羊人”，而非“传教士”。在官方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达成一致的。

九十年代，在罗马天主教廷的要求下，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与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级别相符合。同样的待遇也赋予了新教传教士，但是大多数人拒绝接受这些身份。

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整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会众与非基督徒之间常有的冲突。为了消除这种争端，马礼逊（Morrison）博士近期建议中国政府撤回曾给予天主教会的职别待遇。

25.著名的朝鲜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豪克姆（Holcombe）先生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印件。该宣言是建立在清政府对基

督教态度的基础上的，清政府一直是朝鲜乐于效仿的对象。这份宣言是1864年发表的，是美国人在占领朝鲜某个港口时发现的。宣言内容如下：

（1）人们通过美德和好行为服务上帝，而不是通过祈求他的恩典与承认自己的罪。

（2）神是个灵，但是耶稣基督确是人群中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成为上帝呢？

（3）神父们说，灵魂比身体重要的多。既然他们是灵魂的指引者，那么，按着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服从的是他们，而不是给予自己身体发肤的父母和教育他们知书达理的老师。

（4）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先人的感激之情，使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朽，但外国神父们却禁止这一行为。

（5）教皇宣布民众应该对他绝对服从，并在任何律例之上。这就使他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搅乱了整个国家的平静。

（6）上帝创造了男女，但神父却宣布独身，这是对君王和父辈的不敬，也破坏了夫妇之道。关于童贞女、圣父、洗礼、坚信礼和拯救都是对民众的欺骗。

（7）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称他们不怕死亡，那他们不是醉酒，就是疯了。

这份宣言显示，朝鲜政府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罗马天主教的宣教体系。

26.罗伯特·哈特的改革计划

在北京的时候，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爵士慷慨地给我看了他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制定的改革草案，这包括以下七个要点：

（1）聘任有能力的人。

（2）开采矿山。

（3）改造河道。

（4）修建铁路。

（5）建立邮政服务系统。

（6）建立政府银行。

（7）建立海军。

在他的请求下，我给他看了我的一些改革措施的概要。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呈给政府官员的：

（1）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业、兴办棉纺织厂。

（2）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3）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和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机制，以使中国免于与外国的战争以及被勒索的命运。

（4）对大臣张之洞。我详细解释了：

a.由贝西默在钢铁制造工业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由此建议他在山西引进钢铁冶炼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b.呼吁他开采矿产。

（5）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阎敬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6）对哈特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a.组织一个代表团，有一位亲王带领，由当时的一些中坚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参与，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以便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b.组织一个由帝国优秀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出国考察，了解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

c.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优秀的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国外的宗教状况。

d.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

e.派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f.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全国介绍、推广考察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7.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当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他对詹姆斯先生和我呈上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的申诉十分关注，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公开发布的公告，这样他就能在下一次比较严重的教案发生时，照会中国外交部，使之发出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与对日本的态度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态度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提到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跟中国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只是同外务部的官员们就具体的事情做出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相互斗争。我提到了我在太原府的事工没有什么困难，在那里我跟当地官员建立了朋友关系，也大胆建议在北京的传教士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过了一周，我在街上遇见他，看到他容光焕发、心满意足的样子。在女皇生日那天，他邀请了

重要的政府官员共进晚餐，所有受邀的人都悉数参加。

在此期间，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之后，我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宗教自由的小册子。这本册子意在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都因为对宗教问题的彻底无知。

我们把拟定的公告草稿呈交给巴夏礼爵士之后，詹姆斯和我返回了我们各自的传教省份，他回了山东，我回了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到达太原府。我随身带了一个气压表，测量沿途各地的海拔高度，希望我所收集的这些记录能促使山西官员修建铁路，并为他们的早期工作提供便利。再次回到太原府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五个月了。

28.对山西传教事工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同工的全体会议，以便拓展事工的范围。传教的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广为散发，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主要中心开展系统工作了。

（1）成立福音同盟以及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2）出版更好的传教手册，以适应全省的需要。

（3）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的传教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的转变者都是由当地的基督徒传教的，而不是外国传教士。）

（4）在十个主要省份建立学校，每个学校招收一百个学生，可以教授三年的外国知识课程。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计划着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协会：

（1）提供基督教文学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

助自己的同胞。

（2）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善之情与相互理解。

（3）在所有对中国有益的方面启示中国。

第七章　第一次休假（1885—1886）

1.沿海之旅，会见A.G.琼斯

1884年的秋天，我感觉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而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展新的事工计划而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当面陈述我的意见。

同妻子与四个孩子一起，我们从沿海出发了。乘坐一只本地小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在小船里面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待在里面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馆要便宜很多。然而，我在芝罘认识的一位老朋友，怡和银行的代理爱德华·卡森（Edward Cousins）先生坚持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



在华传教士的孩子们

在上海，我们遇见了琼斯先生，他是随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派出的新传教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日，谈论了一些他与浸礼会协会以及国内教会的经验，还有关于未来在中国的事工。

2.跟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1884）

琼斯离开后，我的好朋友大卫·希尔（David Hill）从汉口赶来，希望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两人都对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认为现在是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时机了。曾国荃曾在饥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与他打过多次交道。我们在南京见到了他，然而，尽管他一如既往的态度友好，但是却根本没有情绪去提及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这使我们感到极度失望，不仅因为很多传教士在各个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更因为很多传教士在赈灾过程中因为感染瘟疫而献出了生命。

3.发现《大乘起信论》

就在访问南京期间，我们结识了佛教经书的售卖者杨先生，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早先是个儒者，后来改信佛教。他曾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跟随曾侯爵[29]出访欧洲各国。与马克斯·缪塞（Max Muller）、日本的南条雄文（Bunyo Nanjo）和巴黎的朱利恩（Julien）这个级别的人有过交往。

我问他："作为一个儒家的秀才，看遍了世界之后，你怎么能够来这里卖佛经呢？"

"我很惊讶，"他回答，"作为一个传教士，你竟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不觉得儒家对于人生的很多重要问题选择了避而不谈吗？"

"这倒是。那么佛教回答这些问题了？"

"当然了，"他回答，"我给你看一本让我从儒者转变为佛教徒的书。"

那本书就是《起信论》（《信仰的觉醒》）。我买了它，又买了几本他为我推荐的其他佛教书籍。

我彻夜读了那本将儒者转变为佛教徒的书。最后，我叫醒了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希尔："听着，这是一本有关基督的书。尽管用了佛教的概念，但是基本理念是基督教的。"

4.归国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Holt）公司的"阿贾克斯"（Ajax）号返回英国。在波斯肯（Biscay）海湾，我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滚滚。连续三天，我们都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况中。我们躲在船舱下面，听着巨浪裹挟着成吨的海浪拍在甲板上的声音，头顶上持续不断的呼啸声让我们觉得像是葬身海底了。

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进船舱。船长命令船员把舱门重新按上，但是没有人敢动，因为害怕咆哮着扫过船头的巨浪。于是船长命令关闭发动机，减缓了一点船的运动速度。他再一次命令船员："现在，孩子们，试试吧！"船员们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舱门加固在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当我走进餐厅准备吃早饭时，我发现船长正坐在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船长脾气很不好，除非斥责乘客和船员，其他时候从来没见他高兴过。看到我，他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那天早上没有早餐供应，厨师根本没有办法做饭，但我们尽量用饼干、黄油和奶酪解决了问题。一整天，海浪仍然汹涌澎湃，可怜的船只在波浪之中绝望地前进。傍晚的时候，突然一名水手大喊起来，指着眼前一小片蓝天，告诉我们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晚上，我们驶进了英吉利海峡，奇迹般的获救了。

5.浸礼会年会

到达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艾克赛特（Exeter）大礼堂召开了。来自于诺威奇（Norwish）的J.H.莎士比亚（Shakespeare）先

生、托马斯J.库伯（Thomas　J.Comber）先生，还有我，成了大会的发言人。库伯先生讲了他在非洲的神奇历程，以一种优雅的语调吸引了所有的人。莎士比亚先生在他的发言中以一种十分感激的语调提到了我在中国的事工。

接着我站了起来，这个时候我不敢扔掉手稿发言。因为已经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一直说汉语，我感觉我的英语已经极度退化了。因为是在两个口才很好的发言者之后讲话，而且天色已晚，听众们很快不耐烦，陆续离场了。发言结束后，我感觉自己毁了这场年会，于是向秘书贝内斯（Baynes）先生道歉。他用他一贯的友好态度回答："没关系，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

年度大会的报道刊印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会众注意库伯先生和我的报告中的事实，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基督差传工作的中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解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的重心则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那些正在遭受地狱之苦的灵魂解救出来。

6.请求更多的同工

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一些家族生意上的问题，琼斯先生也回国了。他向浸礼会委员会描述了那个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信徒和慕道友的数量，宣称这个数量比任何其他在中国宣教的基督教分支所传的人数都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协会对中国事工的极大兴趣，使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非基督教国家。他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府附近的十到十二个乡村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对此做出的答复是，增派十个人去山东，六个人去山西。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汇报，我们已经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乡村开展了事工。如果山东增派十个人，那么山西作为同样面积的省份，不能少于这个数量。

7.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1885）

我有一个大的理想，就是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和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联合起来，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都建立一所高等教会学校，先从沿海各省份开始，希望以此来影响中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题为《在中国从事传教事工十五年》的小册子，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在小册子里我请求他们制定方案，以实现中华民族传教情况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发现我使用的“民族转变”这个术语，使得一些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在中国已经建立的传教体系，转变为类似英国教会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对那些不信国教者是无能为力的。

稍后我准备了另一份报告，建议使用在中国推行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民族”这个词汇。

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第一次协商的结果是，他们不建议推荐这个计划，因为他们的基金不能承担这样一个昂贵的项目。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慷慨地向我保证，我的方案可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决定。

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忙于乡间的事工，直到委员会批准我的计划之前，我觉得不便在教会里倡议这件事情，但我私下里跟一些朋友谈过这个想法。我发现许多人都对此事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利（Carey）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8.方案被否决，极度失望

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我的方案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但委员会认为我的计划太过庞大，他们的基金无法支持。方案的否决使我感到无比失望。

然后，我又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急需：好撒玛利亚人》[30]小册子，像在其他文章中的观点一样，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除了学习语言外，对每一个新到一处的传教士来说，基本的要求是要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由此确立传教手段，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果效。

第二，我坚持认为大量发展当地同工是很必要的，试图证明，与单独使用外国同工相比，使用中国人从事传教事工的效果要高出八倍，也更经济。在七十年代，教会布道委员会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最近，最成功的传教工作是由爱尔兰长老会（Irish Presbyterian）在满洲里展开的，在他们的事工模式里，平均下来，外国传教士与本地传教士的比例是一比七。而在联合卫理会（United Methodist Mission）里，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平均有十名中国人协助，他们的事工效果仅次于长老会。近几年里，十分惹人瞩目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传教工作无一例外地是由从其他布道会中挑选的中国人承担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强调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建立一所大学、以便完成培训中国本土传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学课程，这些大学还应该教授在西方大学所教授的各门知识分支学科。

从这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上帝打算让我独立承担十字架的重量，那我就必须充实自己，以便更好地影响中国的领导阶层。因此，我打算学习科学知识，在南坎信敦（South Kensington）师从埃尔顿（Ayrton）和希尔维纳斯·汤姆逊（Sylvanus Thomson）学习电机工程学的专门课程。

9.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部长

基于对中国教育的兴趣，我急于想了解欧洲最先进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部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告诉部长，我

是一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很希望了解欧洲先进的教育制度，并想把这种制度介绍到中国。部长是个高个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向他当面陈明时，他把椅子推开，站了起来，大声说：“要是你把中国人教育好了，那我们该置于何地？”

看来，他是不会为我提供任何帮助的。

幸运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一名基督徒，主持一所主日学学校，他很高兴地为我提供了我所急于知道的任何信息。

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为了见见那里的教育部长。但是部长出差了。我被告知他恨不得把所有存在于官方教科书里的上帝字眼去掉。

在回中国之前，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我向浸礼会委员会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最需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协会，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

第八章　艰难忧患的一些年月（1886—1891）

1.与耶稣教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886年，我乘坐法国的欧克萨斯号（Oxus）邮轮回到中国。与我同去的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还有七名新教传教士。在神父中，有一位跟我年纪相仿，他非常热心地将天主教的书籍摆在桌椅上供我们阅读。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对他说，我想跟他谈谈。他回答说，他会很高兴在晚饭后跟我谈话。谈话一开始，我表达了对他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努力的钦佩之情。接下来，我说，“我们都要去中国，引导他们找到真理。因此，作为基督徒弟兄，我是不是可以直言不讳？”

“当然。”他回答。



晚清来中国传教的修女们

于是我说道：“开展事工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各自为战。但是，隶属于罗马天主教，还是信奉新教，对我来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现在，我在你的这些书里，发现了不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摧毁天主教会的垫脚石，因为上帝是绝对不会祝福愚昧的。”

尽管我努力使语气友善，但这样一个大胆的攻击还是使得他的脸色瞬间变白，他绞着双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说明他受了很大的伤害。他问我是否知道他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

“我是巴黎巴克区（Ruede Bac）耶稣会大学的校长。我很吃惊，你竟然说我展览的是充满谬误的观念。”

我回答：“你摆出来的其中一本书的名字是《对付新教徒的捷径》，我读过了。作为一个新教徒，你必须承认，我比任何天主教徒更了解新教。那本书充满了对新教的谬论。如果看到你捍卫真理，而不仅仅是某个宗派，我才会感到高兴。”

“哦！”他大声说，“我当然知道我在谈论什么，在我的那所大学里，每周一次有关于天主教与新教的谈论，这是我的规定。”

“但是你有没有请教过新教徒，谈谈新教的立场？”我问道。

“没有。”

“那么，你就不自觉地误导了你的学生，你竖立了一个稻草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新教徒，将他摆在学生面前，让他们在辩论中轻松打败对手。”

十一年之后，我刚刚结束休假回到上海，在我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卡尔·西蒙（Pere Simon）的名帖，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但还是见了他。当他被引进来时，我认出了这就是我在欧克萨斯号上的老朋友。我那一次坦率的谈话并没有阻碍我们的交情。后来，他被任命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任仪式。三个月后，他死于心脏病。

大约又过了五年，休·普林斯·休斯（Hugh Price Hughes）的姐姐，前剑桥培训学院的院长休斯小姐拜访了我们。她刚刚结束了在日本为期十五个月的学术讲座，表示想去参观下徐家汇的耶稣会教育学院，我和妻子带她去了那里。学院的负责人皮尔·卜谢尔（Pere Boucher）非常热情友好，他亲自领着我们参观，详细为我们介绍每一件事。当两位女士去另一所院子看望修女的时候，我跟他留在走廊里等着她们返回。透过窗子，我看到了一间屋子的墙上挂着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对皮尔·卜谢尔说："那张照片是西蒙主教，他是个很好的人。"

"是的，"对方回答，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你们将近二十年前在欧克萨斯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之后，我们一直都很关注你。"

2.理查德夫人患病

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31]就患了口炎性腹泻（sprue），这是一种英国人不太清楚的一种病，也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巧的是，在英国老家的一位朋友也患上了这种病，后来我们得知她的病宣告不治，因为医生们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病症。在上海，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请当地最好的一位医生为我的妻子治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但是，他从没有解释过这种疾病的性质是什么，也没说过他的治疗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好的效果。

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希望在那里休养一段时间，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就会好转。然而，她的健康状况不但没有好转，而是每况愈下，直到第二年——1887年的夏天。在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们都要去山区待一个月，我和妻子单独留在了城里。我的朋友，中华内地会的爱德华医生，在进山区之前来看我，告诉我，为了给我的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法，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任何方法奏效。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回国，请他们寄来了关于这种病症的最好的医学书，今天早上，这本书邮寄到

了，我把它留给你，好好研究吧。”

我将那本书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症实际上是全身的黏膜发炎，治愈的关键是采取措施治愈黏膜，那样健康就会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给所有的消化器官彻底的休息，这样黏膜就会自行痊愈。然而，这种方案的难处在于彻底拒绝进食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即使黏膜恢复了，但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的严重缺失。第二种方案是采取大自然养育婴儿的方法，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肠的负担。采取这种方法后，腹泻在第一天就止住了。于是我们继续采取这种禁食性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杯，每天称一下病人的体重。十天之后，她的体重开始每天增加，一个月后她就完全恢复了。这让那些所有从山区回来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坦白地说，当他们来向我们告别时，根本没想过她能活下来。

从那之后，在中国很多病人也用这种方法治愈了。对于那些得不到牛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yellow santonine），甚至还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痊愈了。这种病症再也不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了。我不厌其烦地讲解这个病症，是因为我知道，对于那些饱受病痛的人来说，知道这个疗法比什么都重要。

3.来自同工们的反对之声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名新派来的传教士来到了山西，他听说了我在事工中所采取的传教方式。还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听我的看法，他就给国内的委员会写了几封信，按照他所误解的那样，反对我的观点。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的一封信在《传教使者》（Missionary Heraid）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位来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件也广为流传，在信中对我的传教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这封说好话的信件抵消了另一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

当我回到太原府之后，我还是采取原来的事工方式开展传教工

作，还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道教的某些真理，也表明基督教是如何超越了它。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可取之处，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极不可取的。他们期待我改变我的神学观念，顺服他们的指导。但这两条我都无法接受，因为，首先，我相信我的观念与英国国内最富远见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其次，我有多年传教事工的经验，而他们没有。为此，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质疑。

4.离开山西

既然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因此，我很清楚我们在事工方面是不可能和谐一致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不断的冲突，而这对福音事工是致命的。因此，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同工们，并在十天之内，收拾好了行装。那些科学仪器并没有打包带走，我把它们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当地的乡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幻灯片，我就留给了我的同工们。

由于太忙，我没有时间跟那位远在三公里之外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写信道别，而是写了一封道别信。收到这封信几个小时，他就赶来看我，看到我正在收拾那些扔得满地都是的书籍。我请他看看，挑出任何他喜欢的书，作为我们过去友好交往的见证。他选了一本装帧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出版社出版的、名叫《在那神圣之地》的书。我在书上为他题词，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在那个时候，他建议神父们逃离太原府，而自己坚持留下来跟他的教民在一起。当臭名昭著的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孩童时，主教与新教徒们一起被处死。这也昭示着基督徒道义的力量，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那里，是一样的。

10月18日，我带着家人来到了天津。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年薪六百美金。但我是不能彻底终止

传教事工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住在美国圣公教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主教施若瑟（Shereshewsky）原来住过的房子里。

5.拜访在天津的李鸿章

伦敦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们回山东事工，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济南府建立一所教会学校。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着手写了一本关于“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七个国家的教育进展。在这本书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总体的、个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必须要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的需要，一个人必须要掌握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知识的需要——这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我在北京的官员中散发这本小册子，还把其中一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李鸿章。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建议中国政府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会带来一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看到成效。“二十年，”我说，“你才能看到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哦！”他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在会面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决定我后来写作《基督教所带来的好处的历史见证》（Historical Evidenceof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一书的最重要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他是一所省属学校的校长，读过我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小册子。他告诉我，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努力贯

彻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教育方法。

6.理查德夫人的学生

除了帮助我写作外，理查德夫人还应三位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她采用了一种新的教授语言的方法，说到底，是一种最古老的，也是最准确的方法，是孩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使用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而是最简单、最简短的短语。学生们就这样练习记忆，每日每日地练习。结果，六个月后，一个以前连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的人，竟然比另外两个糊里糊涂地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的英语要好得多，因为那两个人不正确的一些用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按着自己的意愿阅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很多宗教术语，弄不明白。我妻子推荐他们去读《新约圣经》，这样他们就能够熟悉那些宗教词汇了。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效果很明显。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内容的影响，以至于都渴望受洗归主。

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询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另外两人是他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日本天皇派到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的结论是，在他遇到的所有欧洲人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此，如果他的儿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不会反对的，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就这样，三人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天野（Amano）先生，先后被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刚从欧洲考察归来的曾纪泽爵爷，听说了理查德夫人教授这几个日本人学习英语的事情后，也曾表示希望让他的一个儿子跟随她继续学习英语。

7.曾纪泽爵爷

曾纪泽爵爷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早年，他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带着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语。他曾在伦敦和巴黎做了八年的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外务府的一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呼吁在北京与天津之间修建一条铁路。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持续不断地反对修建铁路的呼声而不胜其烦，就问曾爵爷能否提供一些伦敦的马车夫在铁路修建后生计受影响的一些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那些信息，就向他的医生达吉恩（Dudgeon）求助。达吉恩医生也不知道，转而求助于艾德肯（Edkins）医生，艾德肯医生也无法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于是找到了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收集了这方面的数据和事实，可以帮助曾爵爷，这使他很高兴。

曾爵爷的好几个儿女都会说英语，他们很高兴有外国人来拜访。理查德夫人很快跟他们熟悉起来。后来，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理查德夫人就受邀为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李提摩太曾担任过晚清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家的家庭教师

当我把为现代中国教育所做的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他热情洋溢地赞许了这个方案，并敦促我将这个提案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仅仅是外务府的下级官员，他觉得如果是他自己提出采纳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那些

高级官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提出这种倡议。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经验付诸实践。

8.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时不时地有关于远东的文章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Shioda）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曾被邀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of Buddhismon China）。在准备过程中，我从中国典籍中翻译了一些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约翰·沃什姆（John Walsham）。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为了得到急需的藏传佛教的信息，我特地拜访了在北京的大喇嘛。他住在雍和宫。这里曾是一个亲王的家庙，现在那里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人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参观过那个地方。

为了准备我的第二次拜访，我先是给大喇嘛送去了一张我的名帖，请求登门拜访，同时，根据中国的风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个小礼物起了大作用，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大喇嘛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能够仿制。他回送了自己的名帖，请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Shorrock）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达雍和宫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的是，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列队，等候我们的到来，随后将我们径直带到了大喇嘛的住处。在那里，我们看到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点心用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神奇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谈资。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将它固定在大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仆人的房间里。我吩咐仆人一直等到钟响了再

过去，我自己回到了大喇嘛的房间，按下按钮。仆人这时立刻穿过院子，兴奋地喊道："钟响了！钟响了！"这让大喇嘛十分高兴。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大喇嘛，喇嘛教是日渐昌盛呢，还是逐渐衰落？他回答说，喇嘛教无疑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就像海潮，有时潮涨，有时潮落，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汐。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但高潮一定会来临的。"

在谈到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在行。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尽管在这座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对大喇嘛来说，他在北京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政治代表，而不是宗教法师。

9.拜访寺院大方丈

在每个省会城市，中国政府都会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大方丈，在北京也不例外。然而，政府并没有让这个方丈控制各省的大方丈，以免他的权利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这位在北京的大方丈。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我："谁派你来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我回答，"如果不是感到了上帝的呼召，我是不会来到中国的。"

他立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一个最重的宗教问题："那你是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言谈使我明白，如果仅仅根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那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一种吸引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皈依的宗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只有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而是从基督教时代生成的佛教）的最高发展阶段的教义实则包含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只是现今这个阶段，大多数中国的佛教徒将佛教的旧教条与新教义混淆了，以至于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教义上的矛盾之处。

10.应邀赴山东事工

1888年春天，我去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改革在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回中国的路上，我从浸礼会委员会那里得到消息，尽管他们对我在文人和官员间开展的事工表示赞许，但并不支持我建立任何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各地教会不会允许将传道基金用在这个方面。计划遭到否决后，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一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琼斯先生立刻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来北京，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去山东跟他一起事工。在他的恳切邀请下，9月份，我跟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程。

在山东，我同所有的教友见了面，很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的想法：如果我回山东事工，我希望在济南府建立一所教会学校，需要有十个传道人在我一个人的管理之下。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我的同工们声明，我不希望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在国内，两个人合作牧养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传教的土地上，十二个人合作也是不现实的。必须进行分工合作，每一个传教士都是自由的，必须为自己的牧养事工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关于《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的写作。

11.在山东染上热病和麻痹

1889年5月，我们回到天津，6月我去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一次发生了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赈灾基金。因为我有长时间赈灾的经验，我被任命在济南府附近的州县协助赈灾。像往常一样，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了，死亡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病得不轻。美国长老会在济南府从事医药事工的柯特曼（Coltman）医生，担心我如果继续待在济南，会挺不住，就安排人把我抬到邹平，吩咐说晚上用担架抬着我走，白天睡觉，以避开炎热。就这样，我恢复了很多，就去了青州府。

就在我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召开了一次大会，我也被要求参加。在那次会议上，我的教育事工的方案得到了其他同工的赞同，大家给国内的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的十二个人都签了名。会上，大家建议我十月份到济南府来。然而，就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之前，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饥荒引起的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很疼。这使我不得不在青州府待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病得很重，稍微恢复后，她遵从指令去了芝罘，以求在海边恢复健康。夏天，我前去跟她会合，为了恢复健康，在那里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的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为山东的事工开展做准备，因为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工的一致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收拾好放在走廊里，随时准备出发。但是这时，医生来了，告诉我：“你别想着走了，你现在状态不适合做陆上旅行。”他还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府，我们也不能在那里度夏，要是那样我的疟疾性热病一定会复发，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由妻子代笔，通过口授，我的《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一书的写作也得以继续。与此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2.委员会拒绝了兴办学校的方案

浸礼会没有采纳山东的全体同工的一致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建立一所教会学校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提出了抗议，他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二十年里，还没有碰到过来自一个传教区的全体同工的一致意见被驳回的例子。随后，贝尼斯（Baynes）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同意山东的传教士们的请求，并敦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事工方式。这封驳回申请的信件在10月份到达。

1890年5月，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于1877年举行），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传教事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论文。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我正在参加赈灾工作，因此没能参加，因此我热切地盼望能够参加第二次大会。在我的论文里，我呼吁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可称为中国蓝皮书的书籍里，中国政府正在印刷和传播着对基督教最无耻的诽谤，并且这些二十年前就出版发行的书籍，现在正以更新、更便宜的版本重新印刷发行。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也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迫害即将爆发。因此，我指出，应当立即推选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教的真实目的，请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我对传教现状的认识太过于忧虑，但经过讨论，仍然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实现了。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面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这些迫害。但他对这些事件置之不理。

13.开办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将这个问题向直隶总督李鸿章阐明，请求他终止对基督徒的各种恶毒的宣扬，但他也没有要采取行动的任何表示。此后不久，就在1890年的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

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的中文报纸的编辑。我马上接受了这个任命，这真是一个因缘凑巧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方面，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阐明世界各国不同地区的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方面的信息。事实证明，这些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讲述日本是如何快速地展开改革的，为此一些日本的朋友还特意来感谢我。中国不同地区的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汉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了希望访问北京的愿望。中国官员们对此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在《时报》上接连几个星期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皇室成员之间的互访，指出这种互访能够促成和平与善意的达成，也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应该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

14.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会

1890年，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同工，珍维尔（Jewell）小姐请我的妻子在这个冬天担任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专为中国妇女组织的读经班里帮忙，干得很成功。这些妇女来自全国的不同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一起摘录了《基督教益处的历史见证》一书的大纲，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她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并最终传遍全世界的。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经文，每天以切合实际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她们的智力水平和性格各有不同，但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最轻微的冲突。



在教会中读书识字的晚清妇女

春天到来时，这些妇女们回到了各自的家乡，那些距离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地方。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嘱咐她们将自己学习的这些知识分享给村子里的其他家庭，上帝拣选她们做他的使者，将这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给他们带来快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村做了一次传福音之旅，当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发展了五十名慕道友，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一百个时，我的妻子感到无比高兴。这又一次证明了那个无数次被证明的真理：在发展教徒方面，本地教徒对其同胞有着最大的影响。

15.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0年10月，浸礼会委员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鲁沃（Richard　Glover）博士和来自阿普斯维奇的摩尔（W.Morris）牧师组成。这是浸礼会委员会代表团第一次来中国勘察。

抵达天津后，他们开展了全面的工作，考察了山东和山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离开传教事工的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接下来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同工之间达成谅解。但是，他们发现，我跟在山东的任何一位同工都没有分歧。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立者威廉姆森（Williamson）博士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有了切身体会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事工的价值深信不疑。因此，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够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姆森先生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前来考察的委员会的帮助，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于是，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编之后，我于1891年10月来到了上海。

第九章　在上海广学会的事工（1891—1894）

1.威廉姆森成立同文书会

1887年，“中文宗教书籍会”（Chinese Bookand Tract Society）宣告解散。该会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随后成立了“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of Christianand General Knowledge，简称S.D.K.），继承了印刷厂和其他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赠的资产[32]。

同文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亚历山大·威廉姆森牧师，早年在芝罘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将学会的宗旨定义为：在中国以及她的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文学，在熟悉当地人思维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著书立说，使之适应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那些知识阶层和领导阶级。

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月刊出版发行了，这份报纸又被称为《时代评论》（Reviewofthe Times）。同时，中文报纸《人童话报》（Boy’s Own Paper）也出版发行。前者的主编是爱伦（Young J.Allen）博士，后者的主编是莫瑞（D.S.Murray）先生。

1890年，因为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印刷厂，将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of Scotland）。

1890年8月，威廉姆森先生不幸在芝罘逝世。“威廉姆森先生那伟岸的身躯正是他多方面杰出才能的隐喻。从他那如塔般的高度，他看到了令他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这个协会的成功成为他漫长生命中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的财产管理员之一、怡和洋行的约翰·麦克格雷杰（John Mecgregor）先生的评论。

2.广学会的其他同工

在1891年10月，我接手广学会之前，汇丰银行的阿迪斯（C.S.Addis，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先生是广学会的代理秘书。他担任协会副会长一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那明智的建议和富有实干精神的热心极大地促进了广学会的发展。罗伯特·哈特爵士自1888年一直担任会长，到他1911年去世。

在进入广学会的时候，协会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职从事文字事工的。艾伦博士，《万国公报》的主编，是美国的美以美会所开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院长，因此，他只能将自己的空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就是在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在有关中国进步的任何一件事情上，艾伦先生都是一个友好的建议者。无论这份报纸传播到哪里，都会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谢。艾伦先生于1907年5月逝世。

1911年，美以美会与广学会继续合作，准许派克（A.P.Parker）博士拿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广学会的文学事工。

当威廉姆森先生刚刚开始在上海开展同文书会的事工时，他就得到了一位德国传教士法博（Faber）[33]先生的帮助。法博先生是中国文学最出色的学生，可以用德语、英语、中文写作。他身材壮硕，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阐释》一文。多年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希望读到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阐释》，那篇文章在哪里呢？"他用一贯缓慢、低沉又严肃的语调说："在墨水瓶里。"又一次，他被问到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法博先生离开广学会，开展独立事工。1899年，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成就是一部讨论"文明"的大型著作《自西

徂东》，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展开比较。这部书最早出版于香港，后经他授权，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保罗·柯勒兹（Paul Kranz）来到中国，参与了法博先生的事工。后来，他被邀请成为广学会委员会的一员。1895—1896年秋冬之际，我在北京之时，以及1896年—1897年，我休假之际，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秘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股永远不会被挫败的激情，满脑子都是如何改进事工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因此不得不过早地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的威廉姆斯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的事工，在文字事工上的得到了威廉姆斯夫人的极大帮助。

3.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我把在1891年广学会工作报告中的战略计划方案做一些摘录，想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对赈灾呼吁的回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团体一次次表现了他们的慷慨。然而，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原因，因为被无视，依然存在。因此，帮助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进由广学会所倡导的、类似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了解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行动。我们也不能接触所有中国的高官，更是远远不能接触那些在中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中国政府最重要的行政官员，还有各省学政、各县督学、书院院长、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等，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的。”

设想方案：

（1）创办一份针对上等阶层发行的期刊。同柯塞尔公司出版的

《大众教育家》一样，系统地提及并讨论相关课题。幸运的是，艾伦先生可以胜任主编工作。

（2）有望发行系列丛书和宣传小册，以揭示教育与宗教的发展对工商业以及国家所有领域的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致力于一些奖励措施的设立，将其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建立博物馆、阅览室等，为民众提供相关方面的有益知识。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销售点，售卖我们的出版物。

（6）不遗余力地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帮助他们建立组织，促进知识传播。

（7）在每场考试中，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标，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会参加科举考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中华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被学会所影响。

4.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领袖写信，请求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组织翻译。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扩大广学会的影响。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拟定了一份包括七十个题目的提纲，有超过二十位友人，大都是从事教育事工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写些文章。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梅森（George　Jamieson）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的写作。我在上海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同时，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筹备与推广。

1892年春，北京举行了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在考场附近，我们

免费发放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Four Great Problems）。我还把自己的书《历史见证》（Historical Evidences）作为礼物送给了十八个行省中的大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到1893年间，艾伦博士不得不回美国一次，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活跃分子艾德肯博士远在欧洲，所以，学会的全部重任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那是一份以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还要编辑《中西教会报》。同时，我着手翻译麦肯兹（Mackenzie's）的《十九世纪历史》[34]（Historyof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3年，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秋试，比正常时间提前了一年。柯兰兹（Kanzs）慷慨捐助一千二百美元，用于印刷法博博士的《文明化》（Civilization）一书，在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之间发放。同时，在另外一些友人的帮助下，我们在不同的考场周围共散发了六万册各类出版物。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芝罘等地创建了自己的书报发售点。

来自台湾和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5.中国政府对我们事工的肯定

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我们事工的肯定。中原地区的总督张之洞，捐赠了一千两白银；一位姓聂的山东道台也寄来了一些捐款；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帮助，后来他买了一百本我翻译的《十九世纪历史》，将他们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荐，当地的官员和乡绅向广学会订购了大量书籍，价值达六百两白银。这个时候，广学会作为基督教文学刊物出版机构逐渐被大众认识。聂道台的夫人

就是著名的曾国藩的女儿、我在北京的朋友曾纪泽爵爷的妹妹。她的文学造诣极佳，在读了当时东京贵族学校用作教科书的、史慕达（Shimoda）夫人的一本关于女性责任的书籍之后，她把它同样也作为中国女子学校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另一个儿子在长沙也成为了一名活跃的基督徒。她本人于1914年加入教会。



教会女子学校里的女生

1894年，托马斯·韩博瑞（Thomas Hanbury）先生捐赠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那些写出了最优秀文章的举人们。这些文章包含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1）中国应该修建铁路、铸造银币、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

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正如日本近期所采取的强国措施一样。

（2）中国应该引进机器加工茶叶、丝绸，用以增加产量，以便获得与外国竞争的能力。

（3）中国海关近三十年所获得的收益。

（4）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政府是否真的希望杜绝鸦片贸易，并切实禁止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5）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与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的、友好的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事评论》（Essaysforthe Times）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曾纪泽爵爷以《西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of Western Learning）为题，为本书作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慈禧太后寿诞的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事工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还是有必要将下面的事情记载下来：那时，中国的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作为寿礼，献给了慈禧太后。我们在其中也参与了很多事工。1894年春，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斯沃伦（Robert Swallow）女士写信给我的妻子和美国长老会的费彻（Fitch）女士，建议中国的女基督们集资制作一部《圣经》，作为寿礼祝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此，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蒂文森（Stevenson）先生担任主席，理查德夫人担任会计，费彻女士担任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为寿礼，会更合适一些。在各省也建立了分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最后一共募得了一千二百两白银。

在这部《新约圣经》中，伦敦差会的穆海德（Muirhead）博士负

责撰写序言，穆德哈斯特（Medhurst）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手写出来。《新约圣经》按照国外报纸最好的样式印刷，连同序言一起，装在一个优美的银质封面中。这个封面是由广东制作，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写就。圣经被装在一个银质的盒子中，盒子同样以竹子和小鸟装饰，以古老的金色长绒为衬垫。献词是由理查德夫人准备的，在优秀的中国作家蔡先生的帮助下，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现抄录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根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中华帝国。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与出众的智慧，整个帝国恢复了和平，并与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天涯海角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指定的诸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条十分重要，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民众那样，保护信仰基督教的、您的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名女基督徒，尽管大多十分贫穷，但恰逢您六十寿诞之庆，不能不尽力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之情。在此，谨奉上《新约圣经》一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致力于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为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平安与灵魂的纯净，以及对永生幸福的盼望。同时，它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义的律法和稳定的政府，而这正是这些国家持续的繁荣、强盛的基础。

在女皇、皇后、公主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献上一部《圣经》作为礼物，是我们西方国家的风俗。我们这些在您的国家里的基督徒一直不断地、热切祈祷，祈祷陛下您和所有的皇室成员的每一个人，同样也能得到这个真正幸福的秘密，同样也祈祷中国整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不落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我们同样祈祷，在您睿智的政府大臣们的辅助下，陛下能永享尊贵；在您歇了地上的工之后，愿所有

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能为您准备好一条能够进入荣耀之地的路径。

此致

永远对您心怀崇敬与感激的臣民

中国基督教妇女会

箱子在几名传教士的护送下，被送往北京。在11月11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欧·康纳（O’Connor）先生、美国驻华公使克罗尼尔·登拜（Coloel Denby）先生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当天就把这件礼物送到了慈禧太后的手上。尽管晚了几天，但它恰好同维多利亚女皇的寿礼一起到达太后的宫殿。不久，光绪皇帝派了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报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以供自己阅读。11月27日，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接到慈禧太后懿旨，分别赏赐理查德夫人和费彻女士绸缎两匹、丝帕两块，以及绣品两件，其他参与集资的另外两百名妇女每人黑绸一匹、丝帕一块。

7.中国公学与反缠足会

到上海后不久，我就发现由九个外国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顾问，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修建铁路、桥梁和维持治安上，却对国民的教育漠不关心，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早在1890年，汇丰银行的艾迪斯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的建议以“为上海开办公学的责任”为题。

于是，我就此事与身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詹森（Jansen）先生展开了讨论。他对此十分热心，并为我提供了上海现存的本地学校的一些数据，还要求我帮助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本土教育做点实事。然后，他向委员会提出了议案，但是在当时这个议案没有通过，后来因为詹森先生的去世，这一提案搁置了很多年。

1895年，阿尔奇博德·里特尔（Archibald Little）夫妇拜访了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对缠足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想法。

除了出版发行广学会自己的刊物外，我还被要求协助写作、发表有关缠足的文章，为了引起公众对缠足这一恶习的警醒。“天足会”的名称是由伦敦差会的麦高文（Macgowan）女士在厦门首次提出的，但这种新做法却与阿尔奇博德·里特尔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率先在上海建立了反缠足会的组织机构，协会大多数成员都是卓越的社团活动家。我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准备将这些文字翻译成中文。我的中文写作助手告诉我，当他把第一个传单上的内容读给他的妻子听之后，他的妻子宣布再也不为女儿们缠足了。我把这件事情转告了里特尔夫人，她认为，这是这场天足运动成功的明证。此后不久，一些中国妇女写诗反对缠足，这些诗歌由艾德肯出版发表，并随后翻译成了英语。

此后几年，里特尔夫人往返于中国的各个省份，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了反对缠足会的分支机构。她还亲自拜访巡抚大员们，劝说他们发表声明，反对缠足。最后，她还上书慈禧太后，使太后下令敦促臣民放弃这一陋俗。

1903年，出身于上海最富有家庭的、十六岁少女金小姐，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缠足，无论是文采还是论述都十分精彩，还用两幅引人注目的图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后来由反缠足会的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

在经过了十一年最艰苦、也是最成功的努力后，里特尔夫人将这个协会的事工转交给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位姓萨的海军司令、一位叫沈敦河的道台，还有另外两人。他们承担起了继续推动运动的责任。里特尔夫人不得不随丈夫回到英国，因为她丈夫的健康急转直下。自始至终，反缠足会的所有出版物都是由广学会负责出版发行，直到1906年，里特尔夫人离开。

8.蓝姆波特·瑞兹先生的事工

1895年，去北京之前，我曾请求伦敦差会的蓝姆波特·瑞兹（J.Lambert Ree）牧师，将莱辛著名的论文《人类的教育》翻译成中文。当时，瑞兹牧师的中文水平日益精进，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非常好。我还把我的中文写作助手蔡先生留下来，以便协助瑞兹，蔡先生是当时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当我因公回北京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把那篇论文翻译出来了，我就把它发表在广学会的某一期刊物上，并送了一份给张之洞。张之洞看了之后很满意，还为广学会捐赠了一千两白银，并表示我们应该出版一部世界通史。瑞兹牧师那个时候已经加入了美国新教圣公会，在圣公会的主教格雷夫（Graves）的慷慨批准下，应我们之邀，他花了很多年写作了一本具有原创意义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史》（Ancientand Medieval Historyofthe World），并翻译成中文。

1900年，这部著作分为三大卷由广进会出版发行，每一卷的开本大小都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这是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涉及内容最广的世界通史。张之洞为此非常满意，1911年又送来了三千美元的捐款（大约相当于三百英镑）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显然，他对基督教那根深蒂固的偏见烟消云散了。主持乡试的政府官员也开始从世界通史中出题了，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所有的题目都来自中国文学。秀才们不读瑞兹先生的世界通史，对这些为数不少的试题就无法作答。由于家人健康原因，他不得不早早回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最为杰出的汉学家。

第十章　中日战争期间的见闻

1.中日战争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日之间曾有协议，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向朝鲜出兵必须事先知会对方。但是，满洲政府，就像他们惯常处理外国事务一样，并不守约。一艘被中国政府租赁的轮船“高升号”，满载士兵，向朝鲜海岸驶去，以平定当地内乱。一艘在朝鲜海域监视的日本军舰，朝船头方向开了一枪，警告船长停船。就在船长下达命令之际，中国士兵之中发生了骚动。

眼看灾难就要来临，船上一个叫凡·汉衲肯（Van　Hanneken）的德国人跳进河里，向岸边游去。汉衲肯从天津出发，是被中国政府请来协助军队的。中国士兵残忍地向他开枪，但是他幸运地躲过了。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宣战的合理缘由。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开战了。在日本人路过朝鲜首都时，他们已经残忍地杀死了皇后，因为在反抗日本人的过程中，皇后表现得很活跃，也很有智慧。随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就这样，日本军队开进满洲里，意在向北京派兵。慈禧太后非常震惊，她害怕他们会像杀死朝鲜皇后那样，杀死她。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精明的俄国公使卡西尼（Cassini）伯爵看到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外交突破机会。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如果她答应给俄国一定的优惠政策，俄国将对中国提供保护。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俄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下子进入了高潮。旅顺港被割让给俄国，中国甚至同意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满洲。当日本军队进逼北京、对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造成了威胁的时候，俄国、德国、法国曾建立了一个同盟，共同抵制日本。他们的舰队集结在直隶海港，准备好了对抗日本舰队。日本发现自己无法独自对抗中国军队与这三国的合力，因此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算

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和谈。但是，他们还是彻底战胜了中国，中国人感受到了一股刻骨铭心的屈辱，因为征服中国的是一个素来被称为“倭寇之国”，领土和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

2.我们的出版物在战争期间的影响

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倍，读者对它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月要印刷两版。艾伦博士关于战事的文章大受欢迎，被认为是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人员将他们的订阅数量增加了一倍，并把其中一些分送给首都的官员们。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定期把大约三十份《万国公报》邮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的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历史的最新进程，说明如果他们采取西方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国家就会有希望。在这个翻译版本的序言中，犹豫再三，我还是冒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一再遭到外敌入侵，割地赔款，屈辱受尽，原因到底何在？”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民族间的阻隔，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满洲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抵制这种和谐，持续不断地起着阻碍作用。他们一再受到的羞辱是上帝的惩罚。因此，如果说，与世界的敌对态度是中国水深火热的原因所在，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么，她就不难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我把这本书和序言寄给了一些巡抚大员，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对我大胆言论的回应。但我没有等太久。李鸿章很快发来电报，请我去天津见他。但是之前，我已经答应了张之洞去南京见他，讨论战争事宜。战争尚未结束，李鸿章就被免去了官职，闲居在北京，这使得我得以与他会面。

3.中国书商态度的转变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中国公众的观点是反对基督教文学的。基督教的福音单张被用来纳中国式鞋子，其他宣传读物的最终命运则是被集中起来，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在寺庙里烧掉。无论如何，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售基督教的任何图书，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是对一个有身份的人的贬低。

然而，1895年，就在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以及广学会的其他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历史》就出现了不少于六个版本的盗版。其中一个针对富裕的买主，其他的则针对经济情况稍微差一点的买主。所有的盗版书的总价值加起来肯定达到一百万。《时事评论》也被盗版。在北京，1895年到1896年初，戊戌变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改革俱乐部[35]办了一份报纸，不仅重印了艾伦先生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而且连名字都一样。

因此，到了这个时候，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被拆除了。书商们不再觉得广学会的出版物一文不值，而是为能销售我们的出版物而高兴万分。一套《十九世纪历史》在上海价值两个美元，但是到了西安却值六个美元，这一点也不用奇怪。我们不知道盗版书商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我们从各个销售点所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捐助，这使得我们可以更经常地在任何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开展免费赠阅。

4.南京的冬天

这是从那个时期的一封信件中摘录的内容，可能会使读者感兴趣：

天气很潮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还伴着大风。路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浆，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溅。每个路人都蜷缩着身子，

好像得了心绞痛。路上什么车都没有。只有一顶轿子，还是从河对岸的下口来的，因为没有被送往应该去的渡口才留了下来。如果能现场看看中国人如何准备一顶轿子，那种因循守旧的态度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轿子必须被放置在祖先留下的地方，必须是祖先用过的那一顶，即使破裂的轿板和烂了的蒙布也不能更换，就连风也必须从使祖先烦恼过的同一个缝隙吹过。为了寻找轿夫，我们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当轮船靠近时，他们很抢手。这样，我们才得以前进。

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到处是倒塌的房屋。但是，让陌生人吃惊的，还是马路两旁的草棚。那些棚子大约四英尺高，四英尺宽，七英尺长。里面没有桌子、椅子，更别提床了，只有冰冷的地面，地上铺着一点稻草和一个草垫，它们被当做床来使用。唯一的家当是一口下面烧着火的铁锅，还有曾经是被子的一堆烂棉絮。

老人和妇女无法抵挡这样的严寒，年轻人因为食物的贫乏饱受饥饿之苦，体弱多病。许多人以赌博维持生计，因为除了这个他们无计可施。他们的皮肤冻得发紫，结了一层白色的痂。他们的姐妹们幸运一点，很久以前，为了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她们就被卖了。有人管这叫羞耻，其实是为了让她们的家人少受几个月饥饿的煎熬。尽管饱受贫穷之苦，但是人的自然本能还是存在的，还是有人会像做梦飞到天上一样，做梦能娶上老婆。有时，他们会把食物分给一个饥饿的寡妇，这个寡妇的孩子就躺在邻近的棚子里，她或许会得到一晚上的款待，直到另一个婴儿出生。婴儿是没人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到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这些轿夫们，他们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仍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和膝盖都是光光的，脚上穿着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走着，但是心里却还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好歹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的代价，他们终于挣了一口饭吃。

我们到达了总督府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就住在那里。旅馆不是

通常的三层楼，而是由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大院，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个门有八英尺宽，前门晚上才关，后门则白天晚上都开着。这所房子后面是两所跟它一模一样的房子，由一个二十英尺长的、敞亮的房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前面的那扇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后面的那所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冷风没日没夜地往门里面灌着。

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户中间的缝隙很大。房间由薄木板隔开，中间的缝隙也很大。风从高处刮下来，从我们的卧室刮过，就像水流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的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挡风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管这叫床。其实只是一些光秃秃的木板，上面根本没有铺盖。房间里还有两把椅子，只有一把能坐，还有一张桌子，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桌上有一盏老掉牙的油灯，大约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样式。如果向老板要铺盖，他们就会拿过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垫子，被子多年没有洗了，黑乎乎、油腻腻的。更糟糕的是，老板娘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指挥她的丈夫发铺盖，那个小孩患了麻疹。他们显然不知道，把铺盖从一个有麻疹病人的房间里拿出来有什么不妥。所以，对住客来说，这里既不暖和，也不健康，甚至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内的温度远在冰点以下。

这就是中华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理下的社会现状。谁会把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称为文明的国家，而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的文明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的民众所深陷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刚硬，而打算为拯救他们去做点什么。

5.第一次会见张之洞

我第一次会见张之洞是在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留美归来的梁敦彦先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主管，他是除我之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天是正月十一，不仅仅是中国的新年之中，也是衙门的假日，一些没戴帽子的仆人进进出出，衙门院子很安静，就像是英国在礼拜天的情景。

在督署的会客厅等了半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穿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这会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为了避免别人转达所带来的不便，我想跟总督当面交谈。于是，我们就战争问题聊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我离开之后才传到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形成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数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回到了中国方式的老路上。只是拿中国的优越性相比，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失落。就像辜鸿铭，他是个非常挑剔的人，但是经验又不成熟。他告诉我中国人觉得欧洲只是在嘲笑他们的弱小，而不会真正帮助他们。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官帽出来，引我去见总督。这会儿，已经差不多是一点半了。我一进内院，总督便出来迎接，他穿着长袍，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向他鞠躬，在我进屋后，又一次鞠躬，感谢他先前为广学会捐赠的白银。

在谈话中，我讲了如下几个要点：除非即刻达成和谈，否则任何的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就这一点上，总督完全同意，打断我的话，来发表他的看法）；上帝命令中国维新变法，倘若中国对此置之不理，上帝会让其他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印度、埃及等国的先例那样。

在回答我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一直思考日本为何如此没有原因地打破先前的和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他们屈服，而日本会像拿破仑治下的法国那样消耗殆尽的。他一直重复我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棋局，不掌握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博弈的。这个比喻影响了他的观点。

最后，他以一种无计可施的表情问我，和平将如何实现，要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而西方各国又坐视不理。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他事情上那样竭尽全力，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意见统一，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中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影响取得其他各省的支持。听这里，他笑了，显然这种恭维起了作用。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来打算要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帝使他身居要职，就一定赋予了他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扫清道路。

他为我在中国所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通过我的书，使四十个最高级的官员看清眼前的现实，剩下的官员们就会效仿他们。他承认，任何国家的繁荣昌盛都必须经过改革的艰难之路，但是又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最根本的东西，无法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何如此着急地赶回上海，问我什么时候再来见他。接着他要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帽子。看到这里，我赶紧请求他不要出去，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因为寒冷我睡得很少，实际上，我相当于睡在露天里。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思想被震动之后，我也没睡好。一方面是因为寒冷，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反复思考能够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分，我将思考的方案拟成了一个提纲：

（1）在一定年限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赋予某一国处理在中国的绝对权利，以此来处理中国的所有对外关系。

（2）这个外国政府必须被赋予在中国实行各种改革的权利。

（3）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部门。

（4）中国皇帝应该像以前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

（5）限期结束之后，外国政府应把属于中国的一切官职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6.第二次会见张之洞

回到上海不到一周，我正在苦心孤诣地细化我的方案，我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即刻动身前往南京，再会一次面，来回费用由他支付。于是在2月16日，我回到了南京。梁先生来拜访我，传达总督要第二天八点半钟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延请某个外国政府接管中国的方案大纲送给了梁先生，这样他可以先传达给总督，以便总督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为明天的会面做个准备。

在2月17日早上，我按时到了衙门，不得不与其他官员一起等候总督。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戴蓝宝石官帽的官员，他姓余，他告诉我说他从荣城来，曾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多年了。随后，一个戴着红顶官帽的人进来了，他是前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澜尔（Fryer）博士。稍后，又进来一位戴着水晶顶子官帽的官员，他说他认识在天津的麦肯兹博士，问我是否认识。然后又进来了一位戴着红宝石官帽的人，他一进来所有人都起立、鞠躬，我也跟着照做了。接着他在一把很高的椅子上坐定，也请其他官员坐下。他姓屈，是总督府的财务总管，负责总管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十一点钟，梁先生进来了，看了下我的手表。我问他，我是不是正好在八点半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是这会儿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扰。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又同他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理方案，好让他明白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先生告诉我，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皇室年轻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他，总督是不是打算送一些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去国外，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更年轻的一些人去国外接受教育。我回答说，那将会耽误太久的时间，第一批派往国外的人应该是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就在这个当口，有人传话进来，引我去见总督。这一次，总督不

像前一次那么友好，脸上似乎阴云密布。寒暄之后，他问我提供的“妙方”是什么。我马上讲了我的三点方案。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中国变成某一个国家的托管国，但是他赞成在十年之内的某个时期里，与某个国家成立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可以给予对方商业上的一些优惠条件。如增加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等。但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嫉妒，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7.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在我回到上海不久，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正在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赴日公使去缔结与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见个面，于是，给他送去了一本我翻译的、麦肯兹的《十九世纪历史》，还有我写的序言，希望他能读一下，并请问他有没有时间允许我登门拜访。在答复中，他与我约定2月28日会面。

在那次谈话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困境：

（1）来自法国、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来自外国威胁的危险。

（2）来自中国官员和民众愚昧无知的危险，正是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穷。

（3）来自于人口负增长的危险。这会导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像他们在美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扭转中国衰落之势的方案：

（1）派出两位亲王担任日本和谈的全权代表，考虑有限的金钱赔偿，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赔偿。

（2）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措施。

（3）大清皇帝应该每日召见总税务司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爵士，每一位巡抚都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式聘请外国专家和顾问。

（4）中国应该联络世界各国，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除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中国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具体事宜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回答："俄国是一个让其他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说英国是最值得信赖的。我提出，与所有列强都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在回答中，公使提到了以下几点：

（1）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2）任何解决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是毫无用处的。

（3）他曾提出过派遣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将意见递交给朝廷，因为那样只会削弱他的影响力。

（4）官员之间以各种名义互相攻击，但上面从没有人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5）铁路会使中国受益匪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士兵送到任何地方。

（6）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况。

（7）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则并非如此。

（8）中国派往国外的考察团，极少有合格的观察者。

（9）如果我有什么建议，他很高兴见识一下。

（10）我提到的这些方案，十有八九他很赞同。他感谢我热心地

提出了这些好的建议，但是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为时已晚。

当我提到，还有十几天时间的转圜余地时，他回答：

（11）中国已经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

（12）在国外，他本人曾得到了各国政府的热情接待，但想到各国公使在北京的待遇，他感到羞愧。

当我提到应该大力诱导改革方案付诸实践时，他回答：

（13）不经过各个方面巨大的、根本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情也无法做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之情，深深地影响着他。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以下两点：

（1）我把日本的进步归结为对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的接受。

（2）我提出了如何使中国由穷困潦倒转为繁荣昌盛的具体途径。

然而，他对于我提到的那些改革措施的立即执行，不抱任何希望。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所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广泛。

8.第三次面见张之洞

五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见了张之洞，为的是将进一步的改革方案呈给他。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十九世纪历史》写一篇序言。回去的途中，在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读了我的翻译后，他很愿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询问他的父亲能不能也为我写一篇序。在谈话中，他提到了民众的贫穷，以及越来越多他们无法负担的赋税和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

认为张之洞并没有把税款留在自己手里，但他也强调，张之洞非常专制，将当铺、盐商和其他人的积蓄搜刮得一分不剩。

第十一章　代表教会进京上书

1.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传教士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诽谤。我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为了起草一份请愿书，来说明基督教传教士的真正的目的和请求保障宗教自由，我们成立了七人委员会，包括艾伦博士，艾什莫博士，布罗杰特博士，约翰博士，摩尔主教，惠里博士，以及我。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准备出来一篇很长的建议书。但是，因为种种复杂的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将它呈上去。然而，到了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要求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

在1890年的讨论会上，我预言我们正处于随时都濒临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1892年，反传教士的暴动在芜湖及长江流域一带爆发了，在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传教士表示敌意。在我每天和每周的报纸中，以及印刷的声明书中，我都表示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和赞同，强调传教士在饥荒救济和医疗工作中所做的善行。我尽我所能的去影响中国民众，但是，遗憾的是，迫害活动依然在长江流域继续。

1893年，两位瑞典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惨遭猛烈攻击。他们爬上房顶，试图通过其他房子的房顶逃脱，但是他们像捉老鼠一样被人群追赶。被抓获后，他们被残忍地杀害了。当这个罪行被报告到总督府时，总督大人对此事一点都没有表示震惊，但是他说了以下令人难忘的话：

我们不想要这些传教士。我们反对他们，发动暴乱抵抗他们，破坏他们的教堂，杀害他们的皈依者，杀死这些外国传教士们。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杀的越多，他们来的越急切。

1893年9月，我特别走访了汉口，想要与格里菲斯·约翰博士和希尔先生商讨上书事宜。同时，在四川省爆发了更严重的暴动。反传教士运动不止局限于长江流域，也很快扩散到福建省。

1895年4月，恐怖的屠杀发生在十一位圣公会传教士身上，受害者中大部分是女性。此事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

我立即写信号召委员会的成员们去北京，试图接触最高的权威。尽管大部分的委员不能离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一致同意应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所以他们授予我全权，赴京与委员会成员布罗杰特博士和惠里博士一起商议之后采取行动。离开上海前，我起草了一份更短小可行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得到艾伦博士的完全肯定和支持。晚些时候，我的建议书获得了传教士团体的二十位主要代表签名，其中包括好几位主教。

9月到达北京后，我发现布罗杰特博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基督教的声明书打算呈给皇帝。但完成之后，他就回国休假了，把手稿留给惠里博士了。经过一致同意，我的短小的那篇建议书应该呈给总理衙门。布罗杰特博士所写的请愿书，指向的是同样的话题，非常详尽，应该和我的建议书一起以书籍呈递。两份文件经过中国人十分仔细的修订，誊写出来，所以花了些时间之后，才完全把它们准备好。

2.第一次会见李鸿章

为了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我们实施了一些预备工作。在那个时候，总理衙门有八位成员，恭亲王是首席总理大臣。因此，我拜访了李鸿章。因为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利，他当时比较失宠。我请他帮我写一封见恭亲王的介绍信。我的拜访时间是9月17日，我从那天我的笔记中摘要如下：

总督大人非常的和蔼可亲，坚持让我和他共进晚餐。吃饭的过程中，他说了一些对我的赞美之词。在公共事务上，他提到了以下八方面的内容：

（1）皇帝没有主见，只是依赖于少数几个顾问。

（2）掌权的重要官吏对国外事务知之甚少。鲜有官吏读过外交方面的书籍，比如说我翻译的麦肯奇先生的《十九世纪史》，他个人已经重复读过几遍，也推荐给他的幕僚们去读。

（3）所有人已经反对他和日本的议和主张，就连张之洞都鼓吹要斗争到底。

（4）北京的高级大臣提及西方教育的时候，称之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所以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只用来学习中国传统学问上。

（5）这些充斥候考生大脑的八股文，其实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

（6）政府将不会给西学合格的人提供职位或工作。

（7）《新闻报》（上海出版的报纸，被认为是张之洞部分出资的）对他的攻击是可耻的。

（8）能读高级中国经典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毕德格先生是一位美国人，他是李鸿章的外国秘书之一，在和他沟通之后，我得到以下信息：

（1）翁同龢（总理大臣）事实上是中国的皇帝。

（2）中国政府需要明白，条约和法律具有一样的约束力。无论何时，只要条约被忽视或者违背，战争就接踵而来。

（3）中国政府方面的态度稍有一点改变，这点在北京公报办公室重印我们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的文章一事体现出来了。

（4）总理衙门的新任大臣们一直都怀恨西方政府，各国公使就近期的暴动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对于我将要呈递的传教士建议书，他提议，我应该想办法通过总理大臣翁同龢引见，拜访恭亲王。与翁同龢见面之后，可以让他了解一些我之前和督抚们打交道的经历。

3.后来与李鸿章的会见

9月23日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李鸿章。因为之前毕德格告诉过我这样比较好。总督说：

（1）首席内阁大臣徐桐，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交公使回来，竟向皇帝上奏弹劾他，说他和外国人勾结谋反。

（2）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不许翰林学习国外书籍，同时一直咒骂西学和宗教。

（3）翰林和所有维新之士都无计可施，因为所有的权力都在排外的老臣手里。

（4）满族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5）我应该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6）我建议毕德格先生应该成为恭亲王的僚属之一，这样李鸿章的目的和方法可能就能得到理解，而不是任由一群无知的反对者摆布。他只说："你应该写信给翁同龢先生来得到会见的机会。你可以提到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参与过饥荒救济，教化过民众，因而你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你有对中国重大和紧急的事件要向他当面报告。你会非常荣幸如果他能抽出闲暇时间来跟你会面。"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小时的谈话内容，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送一百位翰林、十位皇族宗室到国外考察学习。

（2）所有的秀才都实施西方教育。

（3）在北京定期举行关于世界话题的讲座。

（4）由于反战派的过错，中国要赔给日本人两亿银两，我已经计算出一个方案，帮助总理大臣每年获得四亿银两。

这次谈话中，李鸿章表示非常希望我能在北京待下来，给翰林们开讲座。同时，他也提及说翁同龢非常多疑，他没有天赋，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我收到毕德格先生的邀请，到塔利饭店共进晚餐。我在那儿见到十位翰林。第二天，我带着写给翁同龢的信稿，请李鸿章修改。李鸿章也建议我，在同总理大臣的会见之初，我应该先洋溢些赞美之辞，接下来就可以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作答。结束的时候，无论好坏，都要强调国家的成败得失的重大责任落在他一人身上。他花了半个小时向我表示，我一定要畅所欲言，用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让翁同龢充分理解情况的紧迫性。对比恭亲王和翁同龢，他说他们两位大相径庭。

4.拜访总理大臣

在10月26日，翁同龢指定我们在总理衙门会见。聊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应该换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他就带我进入同一个院落的京师同文馆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只有汪鸣銮先生在场。汪鸣銮先生是翁同龢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之一。

我希望能说服他，为了证明谁是主要干扰基督教和征服和平的人，我随身带了两套书籍作为证据，其中包括十卷中文的《海国图志》，其余的是十卷另外的著作。这些书籍包含了大量对基督教荒谬至极的诬蔑。第一本书是魏源写的，陈述说基督教徒挖出中国人的眼睛，和铅混合起来生产白银，外国的传教士都是这么富起来的。另外一本书说传教士制作迷魂药让女人精神错乱，拍出来的照片，将这些拍照者的灵魂都吸走了。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是有人恶意造谣诬蔑，造成反基督教的暴动。他问我是哪些不法之徒制造出来的。我回

答说，是中国的官员。他说这不太可能。

作为答复，我从书里拿出来一本，打开翻到一些无中生有的控告。接下来又给他看第一卷的左宗棠写的序言。左宗棠先生是非常伟大的总督，从俄国人手上收复伊梨。然后我说，你应该承认，这个人明显是中国官员吧。我又从另外一套里面抽出一本，翻到诬告的内容，同时也翻到第一卷，题写着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我接着说，你也不否认这个人也是中国的高级官员吧。你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些书都是最近才出版出来的，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采用简装形式，已在全国广泛流行和发布。当大众读了这些诬蔑，看到本地高官的名字，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们被煽动后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已经彻底证明了我的要点，他放弃质疑我的内容，大笑说："你在中国待的太久啦！"

之后，我指出，一千年以来，中国就有宗教问题困扰。首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下来道教徒残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从来没有安宁过。但是一旦宗教自由了之后，中国大地就会和平起来。我最后说："其实，基督教徒希望中国政府能不要干涉宗教。"总理大臣对如此简单的请求有点吃惊，嚷道："如果你的要求仅仅是这些，我很容易答应你的。"结束的时候，他让我准备一份声明，写出我认为中国此刻急需的变革。

5.拜访恭亲王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见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也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信请求拜见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前总督大人非常爽快地将我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哥哥，在1860—1861年间，担任过清政府全权代表，挽回了当时的状况。他是我见过最专横的人，处处显得高人一等，行为作风表现得跟神明一样。据说他是帝国里唯一能让皇太后

害怕的人。他们争端不断，很多时候，权宜之计，皇太后都屈从于他。

10月30日，我在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会面，同时参与的还有其他七位成员。恭亲王安排了一个门边的座位给我，来表示他的轻视。他在会见开始，提到中国拒绝基督教徒。他说话的口吻很轻蔑，在提及1870年的天津教案时，只有说到判处基督徒死刑的时候才肯多说两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徒所遇到的困境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不忠诚和愚蠢行为一手造成的。当他表达完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及他的观点后，我问他，我能否说说基督教徒的看法。他回答说他愿意听闻。

我指出，他刚刚关于基督教徒引用的控告并不是真实的。基于这些控告之上，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更无公正所言。我在中国待过很多年，走过各个不同的省市，我目睹基督教徒做出的大量善事。我是了解真相的人，而他生活在北京，只能听信传闻，事实已经被严重误传了。我深信，只要恭亲王了解关于基督教徒的所有事实，他的正义感生起，一定会马上结束他们的痛苦遭遇。在那天，我不是以我个人的身份，不是作为一位代表国家的大使，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徒，请求他任命调查委员会，来澄清对基督教徒的指控。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不希望躲避正义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坚信恭亲王会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给基督教和中国其他宗教一样的自由。

恭亲王离开之后，李鸿藻走过来，感谢我对恭亲王如此坦白。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之一，同时也是总理衙门的大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反驳恭亲王。既然你有自己的请愿，用这样尊重的方式呈现给他，他可能不会感觉到被冒犯。你此行还是非常有成果的。”他也感谢我之前呈给他的麦肯奇先生的《十九世纪史》译本。

6.11月14日，惠里博士和我呈递传教士请愿书

除了获得李鸿章的帮助，向总理衙门引见我，惠里博士与我也和

英、美、德三国的部长取得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呈递传教士请愿书的目的。德国的部长并没有明晰他合作的理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部长（尼古拉斯·奥康纳先生和丹比上校）给总理衙门派遣了公文，提到了我们之间的贸易。在11月14日，我第一次得到会见，丹比上校陪我们去，同时将我们介绍给总理衙门。

听完我们的建议书后，大部分的总理衙门成员都支持我们的请愿。

建议书主要的内容如下：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给予儒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一千多年的宗教自由了，但是自从雍正帝（1723—1836年）开始，基督教徒不断遭遇迫害，即便是1842年承诺保护基督教徒的条约过后，迫害依旧继续。中国政府重印官方报告，控告基督教徒各种各样的可怕行径。官员和学者发现，这些书籍都是经过一些最高位的总督批准后印刷的。所以人们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被鼓动着发起迫害和暴动行为。人们烧毁教堂，杀害国外的基督教徒，甚至残害外国的传教士。中国人并不知道，坏人是不允许进教堂的。基督教已经让全世界受益。不仅西方的文明是受益于基督教堂，各大洋的洲和岛上的居民也因基督教变得更文明道德。日本推崇西学，也归功于传教士影响。

在中国，传教士也是为人民做善事。他们翻译西方圣书，同时也翻译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书籍，也把中国的圣书和历史翻译引进到西方。他们在山东、山西、江苏、满洲的饥荒救济中协助做了很多贡献。即便有传教士死于斑疹伤寒，其他人仍前赴后继地传播善行。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让中国如何免于贫困，软弱，饥荒和战争，如何变成世界上的强国之一。传教士要求的只不过是中国政府能学习上帝，对人类充满仁慈之心。如果中国政府不保护来帮助中国的好人，可能这些外国人自己的国家就会进入中国保护他们。除非基督教徒能不被迫害，继续其善行，不然会引起严重的国际问题。我们请求皇帝能颁布圣旨，同意这三项请求。

7.请愿的障碍

几天之后，皇帝谕示外务部协商传教士事件，直到事情解决。在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的成员向我们保证，短期内，政府一定会颁布政令来满足请愿书里的请求。但是有两件事情发生，改变了事情的顺利进行。汪鸣銮本来是我们总理衙门里最重要的支持者，忽然退缩，大大减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阵营。李鸿章还告诉我们，意外的是，法国部长反对皇帝满足传教士请求。这个又引发大家质疑传教士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问题。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利授予传教士的成命。

这个时候，惠里博士离开北京，回美国休假，他的职位被劳莱博士接手。因此，他建议我应该和美国的公使馆报告我们和总理衙门的会见，同时汇报我们从法国部长那边听闻的内容。我们希望各位部长能联合起来，获得中国政府批准请愿书。我们最后又提出一个请求，我们希望罗马天主教得到的权利，能推及给新教。

虽然我们没能通过请求，获得法令的认可，但是在和总理衙门的九次会面之中，我们启发了总理衙门的成员们，澄清了他们的误解，让他们了解外国传教士的宗旨和价值。

1896年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会见了我，口头保证那些文字诽谤会被镇压下去，各地的政府也会接到命令善待传教士。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运动（1895—1898）

1.康有为

这个时候，许多翰林经受了中日战争的刺激，不堪其辱，痛感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除了改革变法，着实没有别的办法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他们组织起来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推动中国走向独立与强盛之路。这些翰林们思想上很受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广东学者，进士出身。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像，他受李提摩太思想的影响极大

在此之前，南宋理学家朱熹一直被视为千年以来的权威，他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代经典。康有为却勇于质疑权威，他对朱熹的解读方法并不满意，雄心勃勃地想引用西方上帝的精神本质来重新注解古代经典。此举在中国学者群体中激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被很多人视作现代的圣人。

当然，不买账的也大有人在。北京城那些保守的检察官们大为震怒，强烈要求官府公开宣布，康有为这种行为乃是离经叛道的大不敬

之举，予以严惩，并销毁他的书籍。

康有为得知此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亲笔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邀请一万名学生（包括一千三百名举人）签字明志，要求光绪皇帝立即下诏，开始实施维新变法。在请愿书中，他们所提倡维新变法的方式、步骤等，与光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种种理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中国与日本签订条约之后不久，一些有志青年受到了康有为思想的影响，在上海成立了“少年维新会”，并很快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大城市成立了分会。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协会的章程资料带给我看，向我请教并与我一起探讨，该如何去启蒙自己业已危机四伏的国家。他们中还有一个人前去拜访了李鸿章，建议中国官府将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评论》）发展为官方报纸，按期发行，根据实际需要，每期至少发行一万份为好。

我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10月17日。当时，我正在伦敦教会驻北京办事处的一间屋子里，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正写到情深意切处，康有为的名帖被人送到了面前。紧接着，我在会客厅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学者，他身着黄色丝绸马褂，雍容地坐在那里。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交流。

第二天，康有为在离开京城去往南方之前，专程为我送来了自己的一本书。他对我说，他对我们的出版物中写到的那些天父之爱、那些不同民族人们兄弟般的情感都深信不疑。他希望在中国复兴的奋斗过程中，能够一直和我们保持合作。

2.强学会

康有为与其友人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亦称作“强学会”（高等学会）。强学会的成员除了北京城最有学问的翰林之外，还包括一些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军机处普通文官。

千百年以来，《京报》作为官方报纸，一直是京城唯一的报纸。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万国公报》。这份报纸身份很特殊，它具有相对独立的身份，不属于官府掌管，却在暗中受到官府的支持。

这份《万国公报》的发行者正是强学会。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当时的维新改良派依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行动上颇为小心翼翼。他们创办报纸，就用了和广学会月刊完全相同的名字。他们的考虑也不无道理，广学会的刊物多年来在高官手中广为流传，却从未因为任何原因遭受过反对，借用此名起码先可以自保。

创办伊始，他们的报纸上的内容，大部分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只有一点不同，我们的刊物是在上海以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的却依然采取《京报》的那种木雕印刷方法。如此一来，他们的报纸看上去便和官方报纸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报纸的宣传内容却都是广学会宣传的那些盛行于西方的种种思想观念。



在倡导变革维新的群体之中，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梁启超，是康有为最有才华和眼光的弟子。梁启超听闻我需要一位秘书，就前来毛遂自荐。后来，在我定居北京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多有帮助。

还有几个人需要介绍一下：一位名叫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在

宫中担任女学教师的翰林；一位叫做谭嗣同，湖南人，当时的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此君后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抓住处斩了；还有一位是江西人陈炽，他帮助我写出了献给翁同龢的改良思路；还有袁世凯和其他的一些人。当时，改革维新派的人们得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和帝师孙家鼐的同情，同时也获得了英国驻华公使尼古拉斯·奥康纳的极大鼓励。

维新派干将梁启超像，其曾担任李提摩太秘书

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时结识的老友、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开始在京城的上层官员中极力活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他们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基督教。

我和佩西克先生经常应邀参加强学会的群体活动，礼尚往来，我们也时常邀请他们参加这边的聚会。每一次聚会演讲和讨论焦点，没有例外，总是关于中国改革维新的话题。强学会的会员诚挚邀请我在北京多住些时日，以便为他们推行改革维新提出适当的建议。

后来在1月22日，强学会的活动被人告发，活动地点被封了门，贴上了封条。告发者为一名新来人员，李鸿章儿子的岳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李鸿章却拒不承认自己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任何关系。强学会的成员们组织起来，集体上书向皇帝请愿。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处理的结果是总理衙门承诺，每年为强学会拨款白银一万二千两，这样才算了了事。

3.我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

我代表教会处理请愿事宜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翁同龢。这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向我提出请求，让我针对中国亟待改革的问题，写一份简要的材料。我便草拟了一份东西。

我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上帝是公平公允的，他不会偏袒任何的民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均一视同仁。遵循天意可保国家繁荣昌

盛，违反天意则必然导致衰亡。从顺应规律的观点出发，我为他们提出了关乎中国兴旺荣辱的四项必要条件：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国内和平稳定，精神境界的提升。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这些理念，我紧接着提出了具体建议：

（1）皇帝聘请两名外籍顾问。

（2）成立由八位成员组成的内阁。其中，满族人、汉族人各一半人数，熟知世界发展形势的外国人占一半人数。

（3）立即改革货币政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4）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厂。

（5）仿效西方国家，成立教育委员会，广泛建立现代及专科院校。

（6）成立通讯社，聘请外国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对中国的编辑和记者进行培训教育，处理各类信息，进而启蒙社会群众。

（7）集中精神训练足够数量的新式海军、陆军，以保卫国家安全。



光绪皇帝与老师翁同稣及谭嗣同合影

我将这个改革方案递交给了翁同龢，他看过之后又呈送到了光绪皇帝手上。光绪皇帝看过之后，表示赞同。不久之后，这个改革方案

发表在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面。

4.帝师孙家鼐

10月12日那天，我和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谈了一个小时。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我对待孙家鼐如对待皇帝本人。孙家鼐是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经过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发现，他算得上是中国官员中最有涵养和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曾告诉过我，曾经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每天为皇帝朗读我所翻译麦肯齐的著作《泰西新史揽要》。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曾经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京师大学堂的前任校长离开了中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自知不可能接受这个职位，就谢绝了他的美意。

等我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孙家鼐再次致信邀请我，我再度谢绝了，并推荐了傅瑞雅博士。我认为傅瑞雅博士堪当此任，他曾经在官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里长期担任翻译一职。后来，我在返回英国休假的路上，收到了孙家鼐的第三次邀请。

当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孙家鼐曾赠送我一对精美绝伦的花瓶，一只紫色的，一只金色的。

5.会见张荫桓

12月3日，我应邀到张荫桓家中与其会面。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广东的官兵在广州双门底的教堂中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文件中提到了一个姓孙的人。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件事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传教事业，可能造成很大的打击。

我对他说，革命党的叛乱和历史上儒生的叛乱相比，并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革命党人对基督教造成的危害，也没有哥老会对儒教的危害那样严重。张荫桓听我说罢，笑了起来。

张荫桓还对我说起，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衰弱无能，都是因为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龢对外国事物的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拥有很大的权利，是朝廷的有力工具，专门对付那些不受待见的官员，翁同龢也不得不敬而远之，让他们三分。

按照张荫桓的说法，整个中国懂得外交工作的，唯有曾担任驻美公使的他自己和李鸿章二人而已。外务部的事务都是他一人鼎力维持，别的人不过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已。

6.军机大臣刚毅

2月2日，我到议政大臣刚毅的府上拜访。刚毅是满族人，时年六十二岁。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身为陕西巡抚，是最为顽固的维新变革反对派之一。凡是与钱有关的改革措施，在他手里一定会被否决。他的观念里，花钱去改革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

在山西任职时，刚毅总是和那些占卜星象的江湖术士混在一起。无数的夜晚，他总是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那些术士讲解老掉牙的世界观，不外乎是星象决定人的命运等无稽之谈。更为奇怪的是，每当接到为士兵购买训练弹药的申请，他总是千篇一律的回复，铅制子弹太过昂贵，用土块训练即可达到效果。

这一次会面他表现倒是很好，一举一动和总理大臣翁同龢那样，让人觉得轻松愉快。刚毅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任职期间的各项政策颇为自得，自认为做到了一贯的清正廉明。然而，在与他交谈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一项与改革有关的作为。

刚毅急于向我灌输一个理念：是那些排外的汉族官员们阻碍了中国和外国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我也在努力地告诫他，中国的顽固

锁国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我再三强调与外国人交流学习的必要性，建议中国应该聘请两位外国的女政治家作为慈禧太后的顾问。同样的，也为光绪皇帝配备两名外国顾问。

第二天，我派出秘书去刚毅府上，请求他为我牵线搭桥，让我入宫觐见皇帝，当面提些建议。秘书与刚毅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刚毅告诉他，自己没有能力对皇上施加什么影响，翁同龢垄断了所有信息。朝中的汉族官员们都不守规矩，形如一团散沙，连那恭亲王与礼亲王都已成为空架子。他认为，翁同龢一手遮天，事事把皇上蒙在鼓里，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他这样认为。

刚毅虽然在内心感情上排外，起码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这一点，和别的满族官员对比鲜明。恭亲王狂妄自大，景善是个粗鲁无礼之辈。我和刚毅的那次会面，从他所谈及的内容里，很容易判断出来，满族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相互嫉妒和攻击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刚毅成为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最大反对者，全力为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鼓与呼。他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排斥外国人运动。

7.告别翁同龢与李鸿章

2月24日，我离开北京城的前一天，翁同龢的人送来了他的名帖，当时我正在伦敦会的住所。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这样的问候属于非正式的。我对此表示感谢，并回赠了我的名帖。

没有想到的是，他就在外面等着我，说是有要事相商。这可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拜访过传教士的住所。我邀请他进来，和他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的问题，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翁同龢先是向我表达了歉意，他对上级没有支持批准传教士们的请愿书一事表示遗憾。我要求他不要区别对待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倘

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所有的麻烦事都会烟消云散。

他和我谈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官府准备恢复强学会的合法地位，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帮助强学会做些什么。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若是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我也不想为它做任何事情。

他离开之后不久，就派人送给我四匹丝绸和八盒点心，那些点心是为我路上准备的。这些东西和孙家鼐赠送的那对花瓶，我视如珍宝，因为那象征了珍贵的友情。

那天晚上我最后去见了李鸿章，他已经接到命令，准备前去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他也曾经对广学会的出版物表示过肯定态度，却从没有资助过一丁点儿资金。在他任总督的二十年里，尽管我一直为了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他却从未承认过基督教会为中国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情。

他对我们如此的不以为然，正如毕格德先生所形容的："谁又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呢？"

8.维新变法始末

我回国休假期间，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始了，犹如一颗火种迅速弥漫到全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广为流传）被邀请担任上海即将开班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他最终拒绝了这一职位，只同意起草一份章程，内容为如何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同时，他还借鉴了英国政府在印度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准备了一份构思缜密、操作性强的具体方案。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时务报》，作为改革维新派的发声器和传声筒。这份报纸一经创办，就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让维新思潮从南到北波及全国各地。《时务报》得到了武昌总督张之洞以及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

这份报纸上文章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文言和白话之间——前者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读懂，后者则是普通大众都能够理解。文章内容纯粹，言简意赅，颇得学者推崇。另外，又做到了文风朴实，语意明确，让各种学识层次的读者都能读得明白。

当时，甚至连保守的湖南省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担任长沙一所改革派人士开办的学校校长。很多湖南人转而成为改革维新运动的倡导者，还热情地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前去举办讲座，他婉言谢绝了。在蔡先生看来，他所掌握的所有新式的思想观念，都是属于外国人的，而非自己的原创。

我虽然远在万里之遥，却依然感受得到改革运动大有希望，因为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一点，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仇视，对于无辜的外国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中国应该与外国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中国长久流传下来的教育制度已经落伍，远远不能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起重视，引进西方教育思想方为上策。

这个时期，有一位进步的学者更加大胆地提出，中国传统的儒教已经显得过于陈腐世俗和不合时宜，中国应该应时而动，大胆采用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为国教。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激动人心，显示了改革维新的希望，那就是中国的报纸数量大量增长，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原来的十九家增加到了七十家。

9.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再次来到了中国，此时维新变法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风生水起，搞得声势浩大。中国电报局的局长联合其他一些改革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女子学校。学校位于通往江南制造局的路上，离圣凯瑟林桥比较近。

女子学校的负责人请求我的妻子推荐两个人，中国女子与外国女士各一名，要求中国女子有过在美国新教圣公会受培训的经历。聘请外国女士是到女子学校教授英文课程的。我妻子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我妻子也受邀每月至少前往学校巡视一次，检查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



教会女子学校里的女生

1898年2月份，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一书。书中有四十四篇文章为梁启超撰写，三十八篇为康有为撰写，我也有三十一篇作品被选入。另外，还有陈炽的一些文章。

10.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书

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章京），对皇帝有了直接的影响力。拥有内阁成员和总理衙门大臣双重身份的张荫桓，在以特使身份参加完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之后，也加入了维新变法者的行列。内阁中低职位的秘书们也纷纷对改革维新活动燃起了热情。

年轻的光绪皇帝信任改革派提出的种种思想，接受了他们的建

议，并试图把建议付诸实践。他经过酝酿，很快颁布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变法诏令，要旨如下：

（1）废除五百年来的八股考试制度。

（2）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3）改变全部庙宇为实行西式教育的学校。

（4）成立翻译委员会（译书局），专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

（5）设立专利局，鼓励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发明创造。

（6）保护基督徒不受任何侵扰。

（7）确立《时务报》为政府机关报。

（8）废除中央与各省繁冗无用的大机构。

（9）鼓励年轻满族人学习外语，到国外参观学习。

11.改革派经受的首次打击

在改革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慈禧太后与保守派也都在暗中忙个不停。对于在全国迅速蔓延的改革浪潮，他们持有怀疑和警觉的态度。为了防止改革派发动危及他们政权的攻击，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暗中策划了一场阴谋。

原陆海军大臣恭亲王6月份死去之后，本应论资排辈由恭亲王副手翁同龢继任，慈禧太后却反而免了他的职，转而任命亲信荣禄担任陆海军大臣。慈禧太后的这一反常决定，虽然是发生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前的三个月，却依然对刚刚摆脱她控制的光绪皇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慈禧太后把翁同龢免职之后，又下了懿旨，命令高级官员们有事

直接向自己报告。

在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那段时间，保守派莫不捶胸顿足，抱怨这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政策必将导致中国的毁灭。他们极力要求慈禧太后赶快抓住所有权力。

慈禧太后于是下了懿旨，定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有了担忧，担心皇太后趁着检阅的机会，撇开自己，独掌大权。维新派有同样的考虑，就劝说皇帝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于颐和园，中断保守派干涉维新变法的企图。

光绪皇帝召来荣禄的部下袁世凯，命他秘密带兵进入京城，包围太后的宫殿，软禁太后。袁世凯当年在荣禄手上发迹，此时当然不会放弃机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白保证了一番，得到了皇上的肯定，让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皇上让他负责军队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变革维新计划。

12.担任皇帝的顾问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再次到了北京。

当年夏天，康有为曾经就改革的方法问题同我展开探讨。他的意思是，伊藤博文能够使日本成为强盛的国家，若能请到他担任皇帝的顾问，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这话说过没多久，康有为便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外国顾问。我乘船前往，遇到了两名有趣的人，一位是袁昶，后在1900年抗议利用义和团杀害外国人，冒险将朝廷电报中“驱逐洋人”的措辞改为“保护洋人”，直接叫板慈禧太后的权威，被奉为一代英雄。另一位是美籍中国人容闳，曾经送出一百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



佩戴双龙宝星勋章的李提摩太

9月中旬，我到达北京与康有为会面。他告诉我目前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危机四伏。他准备马上动身去上海。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将由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人向我一一说明。

我当时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我找机会和伊藤博文的

秘书主任津田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担任《日本时报》的主编，在伊藤博文担任朝鲜统监时，他依然任其秘书。

当时，梁启超经张之洞引荐，在官府谋了个职位，当然也在北京。

13.保守派政变，康有为出逃

皇帝命袁世凯改革军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耳朵里，她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她担心皇帝会在袁世凯的帮助之下，夺取自己经营多年的权力和地位。

在这种考虑之下，慈禧太后向荣禄下了旨意，让他命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护自己。太后还极力让皇上认识到，是康有为迷惑了他的心灵，挑拨皇帝与太后的关系，让皇上下旨逮捕康有为。

就在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令他立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等候任命。康有为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马不停蹄赶往天津。

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大为震怒，立即密电烟台与上海的官员，命他们尽全力逮捕康有为，无需上奏就地正法。

康有为在烟台登岸的时候，慈禧太后的电报已经到了当地道台手中。然而，无巧不成书，道台正好到高桥去处理事情，带走了密电码，导致他的秘书无法翻译密电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在租界逛街，在海滩捡贝壳，依然平安无事。

上海的官员接到了密电，严加布控，等待康有为来到上海，正好来个瓮中捉鳖。结果，他们的愿望依然落了空。在上海的吴淞口，康有为被驻上海总领事安排，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

皇帝依然坚持颁布改革维新的诏令。孙家鼐通知我，皇上准备在9月23日召见我。我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召见的这一天还没有等到，保守派就发动了政变。

后来得知，袁世凯在最后一次被皇帝秘密召见之后，马上向荣禄告了密。

当时对这一事件流行的民间传闻，以及所有报纸报道，都说的是皇帝最后一次召见袁世凯，命令他带兵进入北京城之前，先除掉荣禄。然而，拜克豪斯和布兰德二位先生在他们《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曾经明确地指出：“（那次召见）采用了所有可以采用的防范措施，防止泄露谈话内容。”

从这些信息来看，会谈具有极端的隐秘性。那么就可以得出论断了，后来所泄露出去的内容，只能是来自于最终得胜的保守派。

当时改良维新派众人的想法是一致的，若想在中国扫除变法维新运动的障碍，唯有彻底夺下慈禧太后执掌的大权。他们却未必有意除掉荣禄。荣禄也曾经参与推荐过康有为，还向皇帝推荐过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时任湖北巡抚的陈宝箴。

荣禄接到了袁世凯的告密之后，大惊失色，立即去报告了太后。太后更为震惊，急命保守派采取行动。

伊藤博文得知了这个消息，说道：“一切都太晚了，没有能够控制军队，皇帝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他很快离开了北京。

孙家鼐这个时候来找我，告诉我一个信息，皇帝已经被慈禧太后下令监禁在中南海的小岛上。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国家大权，谈到时间，恰恰是皇帝和我约定会见的那一天、那一刻。

9月21日，清王朝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在诏书中，光绪帝称深感执掌国家大权责任过于重大，自己年纪尚小，恳请慈禧皇太后协理朝政。9月23日，再次发布诏书，奏请太后执掌朝政，昭命文武百官唯太后之命是从。

也就在23日这天，梁启超和谭嗣同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与我会了面。我得知朝廷正四处追捕他们。按照当时的情况看，皇上或将有性命之危。我们三人心急如焚地讨论着，该如何去保护皇上。

最后，我们决定分别采取行动，让容闳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则去见英国公使，去寻找力量保护皇帝。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到山区去了，英国公使则去了北戴河。

在抓捕变法维新人士的时候，城门关闭了。梁启超想方设法逃到天津去了，想在天津乘坐日本船外逃。他遭到了官府船只的追捕，最终侥幸逃脱，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船只。

我到天津去找英国公使，他正从北戴河返回的途中。我请求公使帮助拯救皇帝和维新人士。他与前任欧格纳爵士完全不同，对维新变法运动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在回来之前，从未听说过康有为这个人。

14.遇害的改革派

还有的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等地，却也有人完全无意潜逃。9月28日，有六位维新人士在没有经过审讯的情况下，即被处以极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湖南人氏，当时大概三十三岁，其父曾任湖北省巡抚。他出身官宦之家，可谓家世渊博，前途无量。他曾被多位官员举荐，最终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谭嗣同曾被光绪帝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当年康有为代光绪帝起草变法诏令，谭嗣同也多有帮助。

六个人之中，除了谭嗣同，还有刘光第、杨锐，都是四川人氏，四十岁左右；杨深秀，一位翰林，也担任御史职位；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三十五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是林旭，年仅二十六岁，为林则徐的后代。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初，曾受命在广州销毁外国商人的鸦片。

这六个人中，有四个人曾经担任内阁下级秘书。在赴刑的路上，林旭要说几句话，却被押解者无情拒绝。谭嗣同却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为了挽救国家于水火，我死不足惜。今日每个大义赴死者身

后，都会有一千个后起之人，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为国为民，尽忠职守。”

六名维新人士慷慨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了他的死讯，当即自刎身亡。

15.其他改革人士的命运

几位维新人士被抓捕和处死，牵连了一些人。其中，有四个人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陈宝箴因此事被革职查办，终身不再启用为官。六十多岁的翰林徐致清，因为推荐过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年。徐致清的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因为上奏皇上祈求代父服刑，也被革职查办，终身不复启用为官。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则稍稍幸运一些，或许是因为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缘故吧，最终免去牢狱之灾，被发配新疆喀什。1900年，他被义和团民所杀。陈炽忧郁而死。皇宫女学教师文廷式逃到了国外。

还有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王韬，逃到了日本。一两年之后，我到上海广学会的一处仓库，路上遇到一位和尚。他向我打招呼，问我认不认识他。我没有认得出来。他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王韬。

16.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下令严密软禁光绪皇帝。皇帝寸步难行，苦闷难当，终于病倒，很久之后才痊愈。1889年1月4日，朝中发布诏令，说是皇帝因龙体欠佳，决定退位。

这份诏令让皇帝的忠实追随者无限惶恐，全国各地都因此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份电报，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

名义发出，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恐引发西方诸国干涉。

起草这份电报的人是经元善，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校长。

过了三天，经元善的妻子在电报局一名职员的陪同之下，前来拜访我，恳请我帮助她的丈夫。

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建议经元善到日本或者澳门暂时躲避，并给我的香港朋友写了一封信。那女学很快即被官府查封。校长听从了我的话，准备逃往澳门。他离开之前，留给了我一份中文文件，内容是以我的名义注册了女校的资产。他这样做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防止校产被官府没收。

第十三章　天台山纪行

1.规模宏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于中国的浙江省，是千年传承的宗教中心，规模宏大。此处几乎可以和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孔子故乡山东曲阜、道教正一派祖庭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喇嘛所在地相提并论。

佛教是中国最盛行的宗教，天台山正是佛教中心，奉《莲华经》为其核心教典。也正是在天台山，源于埃及的净土宗传入了远东境内，并迅速在中国及日本传播开来。天台山上的众多庙宇中，绝大部分都属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此地在佛教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早已有意前去一睹神采。

终于有了机会，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米斯特·保克斯牧师的陪同下，我有幸参观了这座佛教圣山。

2.渴望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参观天台山的时候，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北京籍的姓童的人，他是满族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此人的经历非常富有传奇色彩，曾由罗马教皇亲自洗礼，由希腊正教举行了坚振礼。他曾经在长老会传教士那里学过医学，在斯哥特主教的指导下，经过自身努力，研修成为了一名口授教义的人。

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曾经居住在一处房子里。这个人学识高深，修养深厚，能有足够的毅力恪守教义。他心中有一股顽强和乐观的力量，坚持义无反顾地证明和持守真理性的东西。

他一直有一个想法，自己可以去欧洲，请求教皇将中国的所有教

派合为一体。他因此离京赴沪，经历了一些困难最终找到了我。那个时候他没有谋生的工作，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这才找到了我，让我为他指点迷津。

我知道他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干脆建议他同我们一起前往天台山。与此同时，我写信给斯哥特主教，告诉他，我发现了他丢失的羔羊，会代为妥善照管，直到他回信，告诉我应对之法。

3.奇特的迷信风俗

下文摘自我当时的日记：

在天台山贾里镇，我见到了令人惊讶的迷信风俗。很多店面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有纸做的，也有丝绸材质的。当地人不惜重金，把这些孩子玩具大小的东西，制作得和活人用的一模一样。那些店面还同时出售成捆的纸钱和金元宝。

从街道走过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两个祈祷祭祀的场面。第一处是在主街的一个店面里，摆着四幅色彩斑斓的佛像，大概高十八英寸，宽十二英寸，都装在镀金的木质框架中，望过去十分引人注目。

四幅佛像都面朝街道，底下各跪着四名居士，无一例外地身着特制的宗教服装。居士之中，有一位敲打着一件东西，状如小球。其他几位正在虔诚诵经，敲打乐器，好像是在为诵经者提醒时间节奏。

第二处让我的印象更加深刻，那些参与做法事的人大多为女性，显得比前面一组更为虔诚。他们都是在私人的家中举行这样的活动，不住声地念诵佛经，声音跌宕起伏，入耳清越。我们几人停下脚步，循声望去，只见一处空房子中，一个男人和二十多个中年女性围成马蹄形的队列，齐声吟诵阿弥陀佛经。

当地的一名传教者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当地佛教团体“无为派”的成员，他们现在是在为病人祈祷平安。经过了解我们得知，在当地的

风俗习惯中，人生了病不是选择请医生诊治，而是举行这样的祈祷仪式，祈求生病的人平安无事。

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迷信场景，同样令人吃惊不已。当地正在重建一座牌坊，牌坊已经很古老，为了纪念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而建立。牌坊一直竖立在那个地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飘摇。

如今重修这个牌坊，为了辟邪除妖，街上距离牌坊二百码以内的房屋顶上，无一例外地都竖立着稻草人，小的仅有一英寸左右，大的五英寸多。这些稻草人神态各异，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住弓箭，有的端着来复枪，摆出严阵以待的防御姿势。稻草人的周围还有一些诸如猴子、狮虎等长着尾巴的野兽雕像。

我们还留意到，很多人家的房门上贴着道家的符咒，内容无非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之类，上面都盖着大红官印，十分惹眼。

从上述特色来看，在这里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里，抓不着看不见的神魔鬼怪每时每刻都在身边游走。这些特征对我们的传教工作其实大有裨益，因为他们内心的恐惧，便是信仰的基础，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这个地区因盛产丝绸而闻名遐迩，养蚕缫丝的人家比比皆是。于是，这里的人们也慢慢形成了与养蚕有关的禁忌。例如，“死”字是万万不可直言的，须得以“静”字取而代之；“茶”字以“汤”代替；“油”更是极端忌讳的字眼，它让人们联想到水中漂浮的无根感，似乎带来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毒物品，大为不吉，在生活中就以“木”字代替。

此外，在养蚕的季节里，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人人深居简出，唯恐开了门放进来祸患，导致蚕儿生病或者死掉。

4.杭州的寺庙

我们随后乘船旅行，经过了五天时间，抵达了浙江杭州。杭州位于上海西南一百一十英里处，公元1130年的时候，此处是濒于灭亡的宋王朝的首都，当时大约有二百万人口，是个特大的都市。

杭州佛教盛行，城里面有无数的寺庙。布道团协会的梅因博士告诉我们，很多庙宇曾经被太平军毁掉，地方官员和士绅们正在组织筹资重建，足见重视程度之深。

我们到达了杭州北郊，选择去进山朝香者停留之处参观。每年四月底，此处总是香火盛行，此时却冷冷清清，万籁俱寂，一派萧条景象。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叫做“弥陀寺”，即“阿弥陀佛庙宇”之意。阿弥陀佛与Amitabha是同一个词语，为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里供奉着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观世音是掌管仁慈与幸运的女神；“大势至”即“伟大的救世主”，也相当于“世界的拯救者”之意。释迦牟尼佛像则被作为背景安放，看上去他在此处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城里见到了一个书店，是佛教书籍协会开办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兴冲冲地买了好几本书。我在旅行休息的间隙看了看，其中有一本寺庙指南中记载了这里佛教徒的数量，在大一些的寺庙里，僧众得到数百之众。

这里有一座寺庙叫做灵隐寺，距离著名的杭州西湖约有三四英里。沿途风光无限，一条林荫道两边大树林立，右边有一块巨石，雕刻着佛陀与其众位追随者法相。再往前走，有四个守卫天门的大力士。除了这些之外，别的都被太平军毁掉了。

灵隐寺中一位僧人带着我们到了西侧的一所院落。那里供奉着镀金的五百罗汉相，每一尊佛像的尺寸都比真人大，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众罗汉中间，供奉着乾隆皇帝的造像，头罩杏黄伞盖，另一个殿中供奉着嘉庆皇帝像。

这里气氛静穆，令人印象深刻。两个和尚往来忙碌着，为神灵上香供奉，整个大殿中烟雾缭绕，香气扑鼻。

我们参观的第二座寺庙是城东的海潮寺，这里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之一。游方僧人可以在这里挂单。我们了解到，仅杭州一个地方，就有这样的寺院二十多座。海潮寺内一百多名僧人，还容纳着一二百名游方僧人。

这寺庙刚刚修缮过，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寺庙主殿里供奉着另一些神灵，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是阿弥陀佛，左边是药师佛。三尊佛像坐在二十英尺的高台上，大约三十英尺高。准备离开的时候，董先生招呼我看一块悬挂在寺庙前面的巨匾，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慈父伟大"。

5.出产师爷和美酒的绍兴

过了几天时间，我们动身前往一百六十英里外的天台山。动身之前，我们找到一张旅游路线图，按照上面的指示慢慢行进。第一个重要的停留之处是绍兴，距离杭州大约三十八英里。

绍兴以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律师（师爷），二是酒。中国一千五百个县的知县都配备了一名师爷，他们无一例外都来自绍兴。在绍兴本地，有一所长期培训师爷的专门学院。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绍兴人真正控制着中国。

绍兴酿造的酒也是远近闻名，都没有经过蒸馏程序。因为直到蒙古王朝（1260—1368年），中国人才掌握了蒸馏技术。绍兴酒以大米酿造，装在规格大小不一的陶坛子里，行销全国。中国人很看重这种酒，在举办宴会的时候若是缺少了酒，会被认为是不圆满的。这种酒总是用小杯子温热了饮用。

绍兴城里竖立着一座牌坊，为纪念抵抗太平军、保卫绍兴城而阵亡的法国军官而建立。绍兴郊区非常富庶，这里耕地充裕，田丰水

美，农民终日在水稻田里汗流浃背劳作不止。村庄与农场密布四周。房子均用大块整齐的石头修建而成，坚固耐用。

绍兴城里有一个为旅客提供服务的代理机构，条件很好。这个机构使旅客能够花费固定的资金，顺顺当当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乘船还是坐轿子都很方便。游客因此避免了在找船、轿子和脚夫方面浪费时间，也免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事儿。游客所需要的只是购买一张全程旅游票，在停留点交给有关人员，不用一句话的争论，也不会浪费一分钟时间。每个提供服务的脚夫每天可赚到四百文钱，相当于十个先令。

6.避免了一场无谓的骚乱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张家堡，离开船只登上岸去办些事情，返回的路上，一些年轻人和孩子一路尾随着我们，甚至登上船向我们索要药品等东西。我们劝说他们赶紧上岸，他们完全不为所动。这么闹了大约十分钟，船工不耐烦了，大声喊着：“我们开船了！”

那些人这才跳上岸，却又折身大喊：“洋鬼子！洋鬼子！”我大为愤怒，命船工停下船只，我跳上岸去。那些人见状，以为我要追赶他们，赶紧四散跑开。



我却并没有去抓他们，而是直接走进了镇子，进入寺庙隔壁的一家店铺，告诉他们刚刚发生的事情，并说准备去见治安官。

李提摩太坐像

过了几分钟，当地的警察头子问讯赶来，向我解释说那些恶作剧的人都只是些孩子，希望我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事情闹大了，围观

的人越来越多，闹哄哄议论纷纷，店铺里更是挤满了人。

我大声说道，孩子们做出如此不敬的事情，必然是大人教唆的，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今天非得针对这个事情要个结果。

这个时候，一位自称姓杨的人分开人群，走了过来。他说若是派人到庙里或我们的船上燃放爆竹致歉，并公开告诫大家不要再冒犯外国人，这样子处理我是否满意。

我当然也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更不想得理不饶人，于是便同意了。他们就在寺庙前面燃放了很大的一挂爆竹。店主也告诫大家以后不可以再做这样冒犯外国人的事情。

我向那位杨先生表示了感谢，邀请他上船一叙。这事情闹得很有轰动效应，街上有数百名围观的群众，身后就跟了五六十人。我不得不止住脚步，向这些关注的人们鞠躬致谢。同时也没有忘记向他们强调，今后万万不可再做出这样不尊重外国人的事情来，免伤和气。

事情就怎么结束了，免去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骚乱。我对处理结果比较满意。

耽误了这么久，我们再次踏上船就不敢耽搁，马上吩咐开船。

这条水路浪头汹涌，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船只，让我们的船只几乎寸步难行。而事实上这里的水却很浅。实在无从前行的时候，船工们就下了船，上岸拉着纤绳前行。

船只时不时陷入无法移动的状态，四名船工汗流浃背地拉着走，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九个小时也仅仅行进了十五英里而已。

第二天的时候，船行更加艰难，船工完全没有上船的机会，一直在泥水中拉纤前行，甚至是在岸上的石头丛里跋涉或绕行。

7.中国最大的佛像

我们经过了两个地方，嵊县和新昌县，新昌县里有中国最大的佛像。天台山寺庙里的导游告诉我们，大佛寺里的佛像足有一百三十英尺高，尚且不如新昌县的佛像大，此处佛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那是一尊坐佛，直接在巨岩上凿刻而成。佛像之上有一座寺庙，开凿于同一处悬崖，覆盖着多如星辰的佛像和菩萨像。不用怀疑，最夺人眼球的是大佛本身，仅仅是双腿到膝盖的部分，就有三十英尺长。日本镰仓时代的大佛像在这尊面前，只算得上一个侏儒。

庙里的方丈告诉我，人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摆脱自己的欲望。若是不能实现自我欲望的摆脱，整个世界就会一直毫无希望可言。方丈还告诉我们，这庙里最重要的典籍是《莲华经》。

一路奔波之后，我们到达了天台山。此处真不愧为佛教中心，山顶上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座庙宇或寺院。

寺院里钟声敲响，悠扬地传向四方。这是寺院的早班香仪式提示。我们也随着钟声走下楼去，想参观一番这里的仪式。僧众三人一排站成了四排面朝东，又三人一排站成三排面朝西，之间的距离都在一码上下。整个仪式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僧众们全部站立；第二个阶段僧众们都跪在地上；第三个阶段又是站着，一位僧人前去上香，并开始主持仪式；第四个阶段，他们站成一列，围绕着大殿转圈子，口中念念有词，这个仪式被称为跑香。第五个阶段，大家又再次跪下来。

一共有二十四名僧人参加了仪式，有一半的僧人年龄不到十五岁，其中最小的一个是刚进入寺庙只有两个月的孤儿，看上去却最为聪慧灵动。

仪式上使用的乐器有大钟、鼓、木鱼、三角铁、小手鼓五种。中间的过程，僧人们各自吟诵佛经，节奏分明，最后统一成一个调子。我们仔细欣赏了吟诵佛经的过程，吟诵开始的时候节奏缓慢，一个音节大概持续一秒钟左右；慢慢地节奏越来越快，最快的时候差不多一秒钟四个音节。

我的观察结论是，这套仪式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套路而已，没有一句是针对佛教经典的解读和发展。也有些僧人曾经告诉过我，他们可以熟练地背诵那些普通的佛教经典，却很难能够理解其中的精髓。我为此深感悲哀。

万年寺中有一处专门的讲法大厅，专供宣讲讨论佛教经典之用。

去年的时候，山上曾经举行过一次法会。按照传统，每年的四月到八月总会有法会举行。今年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大多数师傅都被邀请到宁波、绍兴、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地宣讲佛法，直到冬天才能返回。所以只能取消山中例行的法会。

我们在寺院里住了一个晚上，早晨起身接着朝目的地行进。大概走了五英里，我们走到了光明寺。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山上共有二十座寺庙，一百八十处隐士深居修行的茅棚，现在很多都已经毁弃。另外，他们还告诉我们，这山上最老的方丈有七十岁，最小的有六十岁。

8.深山访隐士

我们走到了一处地方，离道路不远处有一所隐士的茅棚，建立在寺庙的旁边。

我们去拜访了那里的隐士。隐士将自己反锁在茅棚，只在墙上留下一个直径约十五英寸的圆洞，通过这个接受外面的人递进来的食物。这位隐士来自上海，曾发愿在这里居住四年，参禅悟法。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年。

寺里的僧人对着茅棚喊着，有客人来拜访。隐士便打开了门。我问及他为何发如是愿。他回答我，是为了祛除心中的罪恶念头。

我们在茅棚做了短暂的停留，临走的时候，我问隐士能否为他照几张相。他同意了，于是我为他拍摄了一张脑袋从圆洞中伸出来的照

片。这位隐士满脸的真诚之相，因长久的深居简出，不修边幅，他的头发足有十英寸长。

9.华庭寺

华庭寺是天台山上最高的寺庙，海拔三千四百英尺。它庄严雄伟气势非常，也同其他的寺庙一般，建立于孤寂的所在。华庭寺方圆两英里的范围内，有一百多处隐士修行的蓬茅。

华庭寺的方丈大约五十五岁上下，端方明朗，睿智非常，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僧人。然而看上去，此人却显得颇有些玩世不恭，想来还是因为太过理解世间真实与佛教真谛，故而深知修行之路漫漫无有尽头，表现出来的就是洞察之后的随性了。

方丈告诉我们，寺里的僧人们除了每天固定的早课晚课，大部分时间都优哉游哉，研究佛学教义亦是如此放松。

他认为佛教寺院是本着一些深刻的目的建立的，一是省（沉思），二是教（传授），三是礼（仪式）。天台宗的佛教侧重于“教”，而如国清寺者，则是以其“省”名闻天下。

离开了华庭寺，我们登上了天台山峰顶，抵达了拜经台。此处海拔四千英尺，雾气萦绕，白云悠悠，一片朦胧，美不胜收，我们也因其朦胧而无法拍照。

我们流连了一阵，举步下山。一路上我们又拜访了几处隐士的茅棚。第一处无人应答，显然主人外出。第二处有一位光头的人正在打坐，我听得出来，他口中念诵的是《金刚经》。

我问起这位隐士，可知《金刚经》中一些经文的深意。我请教的是第六章的一段预言：“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

隐士从入定的状态中醒来，为我们奉上了茶，先问及我们对此句

经文的理解。我确实对之有自己的理解，即认为预言所暗示的是基督的出现，正是在如来涅槃之后的五百年。

隐士则说，虽然自己已将《金刚经》反反复复诵读了三十五年，却从未尝试去解读这段话的意思。

距离这座茅棚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有另一座茅棚。茅棚的主人是一对年逾花甲的夫妻。那女士面容平和、举止得体，一边做着事情，一边不停歇地低声念诵着经文。

这对夫妻以采茶卖茶维持日常生活。采到的茶叶以每斤八文钱的价格卖出，每三斤（约合四磅）能收入大约两个先令。

离此不远的地方又是一处茅棚，屋门紧闭，仅留一个圆洞，直径一英尺左右。我问那对夫妻，这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位隐士。他们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告诫我说此刻不可以同屋内的隐士交流，那人正在入定之中。

山上寺庙的方丈向我介绍，这附近有一百多人住在这样的茅棚中修行。隐士一般都是深居简出，不与外界交流，只在接受人们捐助或是在华庭寺举行法会的时候才外出。

10.庆国寺与国清寺

我们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继续前行，走了大约十英里，到了庆国寺。我曾经在上海和这寺里的一位和尚有过交往，他回来的时候介绍过我，因此这寺里的僧人知道我的名字。

庆国寺的方丈敏海是位得道高僧，曾不辞劳苦，募集了一万三千块银元，重修了寺庙，当真功德无量。

这座寺庙有个奇特的地方，主殿里供奉的不是菩萨而是一座小小的宝塔。我感到不可思议，赶紧拍照留念。

翌日，我们一路前行，到了海拔八百一十英尺的国清寺。这座寺庙与杭州的海潮寺相似，庄严古雅。寺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下面是五百罗汉像，楼上是一间管理良好的藏经室。

西面的大殿供奉的是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它们均为站像，每尊大约二十英尺高，头顶都打着伞盖，显示了在众神之中的身份和级别。

我们一路走着，在厨房里看到一口废弃的大锅，有七英尺五英寸大小。这是一口历史悠久的锅，据说，关于它有许多有意思的传说故事。那里另外有几口直径约五六英尺的锅，目前为寺里一百六十名僧人煮饭之用。

院子里有一座禅堂，位于神坛的西面有一个蒙着白布的座椅。靠着墙有一条长凳，约两英尺宽，上面放着几十个蒲团，供僧人们每天坐禅三次，成为该寺庙的与众不同之处。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的讲经堂内没有讲台，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把椅子，供方丈讲法时坐着。

寺庙里接待我们的颂清和尚，是我遇见过得最睿智的僧人之一，他时年三十四岁，曾游历全国弘扬佛法，并希望能到印度和其他国家交流佛法，力求精进。

国清寺内还建有创立者的庙宇，里面挂满了林林总总还愿的匾额。这也是其独特的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11.关帝生辰、楚王庙

这一天正逢关帝的生辰。我们来得正巧，有机会亲眼看到难得一遇的妇女宗教活动。前一天的中午，这些妇人就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赶来，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各处住所都已经被这些人住满。这天下午的时候，在我们来时的路上，就遇到了许多同行的妇人。

这些妇人大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有的甚至更大一些。寺里的僧人

告诉我们，这些女施主都是来求梦的。向导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说，这里的妇人们有进入寺庙求梦的风俗。若是在寺庙中得到了梦，就去找朋友求解。若得到的是好兆头，就会到庙里面烧香还愿，或是赠送歌颂菩萨功德无量的匾额。

晚饭之后求梦活动开始了。一时间人声鼎沸，妇人们的声音宛如一张巨网从头到脚直罩下来。我们向领班僧人申请现场观看活动，他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八点钟左右，僧人打着灯笼带着我们前往楚王庙。事实上，这一天是农历的十二日，皓月当空。

到了楚王庙，我们看到大殿中央摆放了一个很大的架子，上面燃着十二根红色蜡烛，每根都有指头粗细。地上、走廊甚至是院子里，到处都黑压压躺满了妇人。这些妇人都躺在自己的衣服上。有很少几名僧人来来往往在维持着秩序。

房间的东面有六七个男人，围着一张桌子念诵经文。领头的大概六十岁。

我们看了半晌，就返回了自己的住所。寺庙里的音乐传来，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到了十点钟左右，音乐停止，人声渐微，偶有低声言笑。最后，终于安静下来，深山的寺庙里此刻万籁俱寂，唯有虫声啾啾而已。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僧人们起床开始早课。钟声响起，震彻群山。四五点钟的时候，妇人们纷纷起身，在两位城里教师的带领之下，开始吟诵祈祷的经文。

我在这个时候，找到一张黄纸，以中文写下一段话，大意是介绍基督教的教义。我尽量把字写得大大的，让大家能看得清楚明白。写完之后，我将黄纸放在了走廊的桌子上，希望来往的人们都能够看到，让他们都对上面的教义有个初步的印象，并能够将之带回家乡，传播四方。我觉得这是个宣传上帝教义的大好时机。

那些人果然开始注意这些文字，有些学识的教师走过去，一边读着，一边用本地的方言解释给身边的妇人们听。我相信这些人能够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将基督教的思想带回并传播开去。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开始背诵《心经》，他背诵得滚瓜烂熟，嘴唇如蜻蜓点水一般迅捷，时不时张开嘴换一口长气。他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动作，甚至已经做到了一心几用的程度，可以一边背诵，一边看着我们做事，一边数着自己的念珠。

我做完了手上的事情，从院子里面穿过，看到了一个角落里的遗迹，关于生殖崇拜的主题，一个两英尺高的生殖器样的雕塑。

离开了国清寺，我们的天台山之旅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下一站是上海。寺里的僧人都与我们友好地告别。

12.一个伟大的处方

从大塔头到天台山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挑夫。两地相隔八十英里，他们就这么每天挑着两百多斤的重物，用六天时间走完一个来回。按照规矩，他们所挑的一斤物品可得到六文钱，算起来，相当于每英里每吨得到十一便士报酬。

这里的山上没有合适的运输工具，牛马等驼畜极少，我们在离开上海之后的三个礼拜时间里，只看见过三头驴，没有看到骡子。马匹更是稀少，只有一些黄牛和水牛，只做耕地之用。山上运送物品，就只能这样靠人力肩挑背扛，让人看了很是不忍。

我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一个晚上。旅馆的墙上，写着一个伟大的处方，细细读来，认真品味，在我看来，足以作为天台山各寺院教义的集大成：

大补清心丸

阴阳——全体

好感——足量

慎言——足味

正直——三钱

责任——酌量

正义——多多益善

诚实——一片

好心肠——一个

小心——一点

投机——清洗干净

信仰——精心调配

安宁——一块

快乐——大量

宽容——完整

耐心——万分

敬畏天地——随需定量

清心——随需定量

日时——随需定量

以上共十八味，抟制成丸，名为智慧之方，可以清热解毒。一次一百零八丸，温汤服下，利已益人。

禁忌：讽刺挖苦，中伤诬陷，流言蜚语。

附言：本处方来自净灵山革心殿，专治世间所有男女一切疾病，如不孝顺，没有正义感，没有爱心等，服用此药者无不药到病除。

上面写到的这些，就是我们这次旅途的见闻。我们离开了一个月，于6月11日返回了上海。

第十四章　二度休假（1896—1897）

1.与李鸿章结伴旅行

在返回欧洲途中，我打算去一趟印度，首先想去那边看一看印度基督教学会的秘书默多克博士。他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很有价值；其次，我也想亲眼看看印度的传教工作进展如何。我此次旅行的旅伴是浸礼会驻扎陕西省的A.G.夏洛克牧师。作为一名牧师，他能力非凡，而且为人诚实可靠。我俩乘坐的是一艘法国游轮的二等舱，与另外四位基督牧师共用一个隔间。因为他们对英语很不精通，而我们也说不了他们的方言，所以我们用汉语交流。

船上最重要的旅客是李鸿章，他此行去欧洲主要是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他说自己感觉很惊讶，像我这种在教会工作，而且在中国改革中地位如此重要的人竟然会乘坐二等舱，他说自己的秘书们旅行坐的都是头等舱呢。



中年李提摩太像

2.访问马德里

离开锡兰，我们前去马德里，默多克先生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自从印度发生大叛乱（19世纪50年代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以来，他一直在那里开展工作，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教会事业。他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简直像父亲照顾自己的儿子一般。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有的工作方法和思路，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工作记录和他的私人书籍，他认为，正是那些书籍开启了他行动的内在力量源泉。

我们参观了印度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比中国的同类学校的建设早五十年，我们还发现它们在规模上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十倍。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平均在校生六十名，而马德拉斯学校当时却有六百名学生。

看到米勒博士开办的基督教学院，我们大开眼界、感到振奋人心。教学楼的一楼是小学部，二楼是从事的教育，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中学教育，三楼住的是大学预备科学生，四楼培养的是学士和硕士，最顶层是研究工作机构。整个建筑物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类“蜂箱”。

米勒博士经受着严厉的品格考验，有人不断对他进行意志攻击，说作为传教士，他从事教育工作就是不务正业。这不免让我想起自己在1893年担任《教会通讯》主编期间，中国的传教士们也一直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别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米勒博士能成功地从别人的攻击中摆脱出来，还被苏格兰自由教会任命为宗教会议的议长，这证明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3.印度之旅

我们计划离开马德拉斯后前往加尔各答，然后横跨印度，经过贝

纳拉斯和德里前往孟买，三周后在孟买还乘坐同一艘法国游轮。正值5月，我们在马德拉斯的朋友们坚决反对我们这次旅行，因为当时加尔各答霍乱肆虐，即使长期在此居住的传教士也没人想要在这样酷热的季节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看，说：“这一次如果放弃，就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我们现在能有机会在印度看看，我们必须抓住。”于是，我们坐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汽轮。在加尔各答，夏洛克感染了严重的霍乱，他差点就送了命。

一天傍晚六点，我们坐火车离开加尔各答，第二天下午三点到达那贝拉斯，我们投奔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来自南威尔士的卡马逊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妻子是著名传教士凯里的养女。

因为粗心大意，我们下错了火车站点，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乘上一辆马车，穿过整个城市。空气酷热，我们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巨大的火炉中，仿佛自己正在吸入火苗。等我们到了拉扎洛斯家，女主人老太太开口对我们说：“你们疯了吗？在一天中这个时候穿过城市！快点上床，等天凉爽下来才能外出，到时候我会叫你们的。布扇！仆人，赶快去拉布扇！”天气凉爽下来，她请我们喝下午茶，还用她的车带着我们到处游玩。第二天，她女儿带着我们去恒河看印度人洗澡，还去看河岸边火葬死人以及寺庙做礼拜的场景。

4.德里

我们在亚格拉参观了世界奇迹泰姬陵，但是对我来说，最神奇壮观的景观当属德里附近著名库特巴塔楼。

在回德里的路上，托马斯先生对我们讲了一个与圣墓有关的传说，听来相当奇异。那个坟墓埋葬的是以神奇幻术与奇迹闻名的圣人，他的权力跟帝王有一拼。一次，皇帝外出，皇子设计阴谋陷害父亲，请求圣人给予帮助。皇帝听说这个阴谋，发誓回来报复，但是圣人宣称自己永远不会返回德里了。皇帝取得了战役胜利，传出话来，说他回来后，会对叛乱者施加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那位圣人从外

地捎回消息，说："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每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点，随时叫报信人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城里，他每天都只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最后，皇帝在首都郊外驻军，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接着所有皇子与各位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凯旋归来。在欢迎仪式结束时，众人离开他，帐篷突然崩塌，皇帝被压死在下面：回德里的路依然漫漫无期。

在孟买，晚上10点左右，我外出时，发现自己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几乎没法行走，因为上面都躺满人，都在乘凉睡觉呢。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只好在露天睡觉。第二天，我们登上了法国游轮，我觉得当时的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像自己差一点就晕过去了。在通过红海时，天气变得很冷，我们实际上都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5.巴黎

经过马赛前往巴黎，妻子和四个女儿来迎接了我，女儿一直在巴黎念书，其中两个已经十年没见到我了。我们在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着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我去了伦敦。正当我们就要离开巴黎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灾难。一场大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大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像卷起羽毛一般，掀翻到地上，向路边的店铺摔了过去。这场灾难导致多人死亡，众多人在灾难中受了伤。虽然灾难发生时，我恰巧在坐车去火车站的路上，由于风暴涉及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对当时恐怖的情景一无所知。一直等我到了伦敦，我才了解到当时的发生的一切，伦敦当地报纸上充斥着相关消息。

6.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需要在欢迎仪式结束前对委员会作一些说明。除了夏洛克先生与我，还包括其他从传教区回来的四五个传

教士。我并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我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了许多中文书籍，一部分是我自己出版的，一些是自从我上次回国休假到现在为止经常翻看学习的书籍，这些书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银裱封面的《新约圣经》，我自己翻译、麦肯锡先生写的八卷本《泰西新史揽要》，我自己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评论》（《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连同《时报》（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的年度合订本，还有《时代评论》的一些样报。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次在这儿见到他们以来，这些就足以证明我这期间足够勤奋。

浸礼会的秘书被内斯先生对我相当关心，特别安排我在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产生的改革运动，我呼吁他们能够派出更多人员从事这样的传教工作。他们的反应强烈，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他们保证，如果我能够向其他教会提出类似申请，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最终，其他教会作出了类似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在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纳比牧师；伦敦教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人选，但是他们保证每年可以向广学会提供一笔基金作为资助。

7.向宗教书刊学会的其他呼吁

英美两国成立的圣经会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的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只有这样，传教的效果才能明显提高。结果，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我的呼吁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学会的答复是，他们各自的学会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同宗教书刊学会联系时，我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刚开始成立时的宗旨是在基督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宣传教义时，他们发现，以基督教原

理为基础的普及读物对传教事业很有帮助。所以，印度大叛乱发生以后，印度基督教学会开始着手向印度国内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广学会，目的是启蒙领导阶层。虽然这种宣传效果相当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事业，但是宗教书刊却无动于衷，拒绝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是他们的章程限制了他们的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批量的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的特殊性，我们希望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帮助，尤其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宗教作品的普及方面。

8.其余工作形式

不仅我要当代表，也就是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我夫人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我也为中国的觉醒所导致的危机这个不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士通了信，比如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蒂德先生。关于国家建立联邦的体制问题，我精心准备了一本小册子，送给了和平会以及几位地位显赫的政治家们。在1897年夏季，我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小册子，给他们需要时使用。

初秋，经过美国返回中国的途中，我遇到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后，平民运动的多位领袖来到中国访问，其中一位是银行家，来自华盛顿，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曾经送给我一本小书，我还一直带着，就是这一本。”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已经很破旧的书，正是我为年轻政治家们准备的那本册子。

9.参观加拿大

曾经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经过上海时，我曾经跟他谈到加入广学会及其扩大影响力的可能性问题。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他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个人曾就

这件事进行了讨论，还一起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做这项工作，他将很乐意加入我们。

现在，1897年，在从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多伦多，拜见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基督教文学的光辉前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余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一下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六个人全来了，我讲了大概一个小时，呼吁他们能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相关工作。麦凯博士同意季理斐先生来到中国开展工作，因为他认识到这方面的工作被严重忽视了。我离开时，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了。我们刚刚征收的“志愿兵”从一开始的表现，就如同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

1.访问北京

1899年夏天，广学会的委员会让我去北京，劝说中国政府能够赞同并批准一项教育计划，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极其悲观消极，他说任何改革建议一定会遭到政府否决。他劝我不要就这件事与中国政府最高官员作任何交涉，简直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见了几位政府高级官员，还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我还见到了李鸿章，当时他正在天津。他有一位助手名叫周馥，后来周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36]期间，我和他有过多次会谈。他的个性尤其讨人喜欢，是清政府第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的高级官员。

1899年冬天，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短暂停留，让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前往吴淞见面，我们曾经在天津相识。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总督比他劲头足，他像一个厌学的孩子回家过节一样开心。后来，我猜他一定是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某些消息，他为自己及时逃得远远的搞到庆幸不已吧。

李提摩太好友周馥像，曾任两广总督



李提摩太好友周馥像，曾任两广总督

2.排外情绪的蔓延



义和团运动中的义和团战士

随着提倡与外国人实行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对派越来越奉行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他们随即侵占胶州湾。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他们的排外倾向。因为中国政府忽视保护外国人，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加剧了保守派的排外倾向。有几个亲王和朝廷的高级官员筹集款额在不同省份搞起了地方武装组织。在山东境内，出现了由一群无知的狂热分子成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自己能通过念咒语、施法术，做到刀枪不入。长枪会与其他一些类似团体的目的一样：就是要把外国人斩尽杀绝。

3.刚毅组建的团练组织

与义和团有关系的影响力最大的官员当属刚毅。我在山西和1896年在北京期间，就已经认识他了。此刻，慈禧太后授权他筹集款项、组建地方团练组织，这为他赢得了“大敲诈犯”的名声。1899年，他途经上海，派了一位我们两人的共同朋友（此人曾经担任过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还指定了个时间，说我可以去看他。在同刚毅见面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他们信誓旦旦地认为，去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认为，康有为急于使中国变法图强，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是要掩盖他篡取权力的蓬勃野心，所以他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对于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绝佳机会。听到我说这句，那位布政使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因为他知道，像刚毅这样的老顽固，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他。

4.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们清楚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具有威胁性，形势很危险。明恩溥博士专门写出一篇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严重警告，但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只当没听到。

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在会上，我提出在中国展开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而且这样做很有价值。我坚信，确实有危险存在，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的外国人，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博士的报告，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者、对本土的基督徒和外国的传教士（他们也提倡改革）持极端仇视的敌对态度，可能会使传教事业在中国中止的排外运动达到极致，而且还会危及所有外国人的性命。我请求各教会的董事会能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避免恐怖事件的发生。但是，执行委员会决定，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目前的危险属于政治方面的危险，所以根据传统，他们不能“干预政治”。

在波士顿，我受到了迥然不同的接待，我有一位朋友邀请我向俱乐部介绍中国的情况。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他们认识到情况的严峻，看到在即将来临的动乱中，不仅基督教传教事业会被毁于一旦，而且连带被毁的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与世界和平，所以他们立即决定让我立刻把情况报告给华盛顿政府。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

5.在华盛顿和纽约呼吁

第二天，我出发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口头交流会产生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与要求用纸打印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上署名了，但是不能和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递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他对于我的观点深表赞同。但是，他说，如果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员支持，政府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

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听完我的情况，他同样非常感兴趣。当我把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则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无能为力，而纽约是所有城市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然后，我到纽约拜见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里待了一晚。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一方意见采取行动，不管意见多么强势有力。如果没有杀戮事件发生，没有任何事情能为即刻行动提供站得住脚的理由。

对于我请求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防止义和团灾难的所有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因为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两周后，我就收到了电报，说义和团已经开始展开屠杀行动了。

6.回到中国

我启程返回中国。登陆横滨十分钟后，我从报纸上了解到山东传

教士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听说从直隶开始的动乱正在逐步向其他省蔓延，我震惊不已。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已经中断。就在此时，上帝给了我一个点子。我从神户给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沙士比雷爵士，转告中国各省总督和巡抚，英国政府需要巡抚们作出承诺，说他们将对所在所辖区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电报是匿名发送的，它可以完全凭自身的价值获得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电讯，意思是沙士比雷已经能够告知伦敦的中国驻英国的使节，向他们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巡抚和总督个人会对辖区内的英国公民的安全负责。

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起见，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报都必须先给各省的巡抚过目一遍。对于太原来说，电报到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大开杀戒几小时后，电报才到达。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如同五雷轰顶。谁会料想，这样的悲剧竟然会发生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同许多官员和士绅都有友好的关系。

在陕西省没有生命损失，因为我的电报到得正及时。陕西省巡抚端方，是位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总督（译者注：两江总督）和四川总督，在革命初期被人暗杀。他派出军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方向。

7.周馥采取的行动

四川省采取了行动保护外国人，听来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年在天津，当时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很感兴趣。当其他省份有外国人遭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很多官员都奉劝巡抚（一个叫奎俊的满洲人），让他把外国人都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把他们杀了。其中只有周馥坚决谴责这个计划。他说：“当你们使得全世界都反对你的时

候，杀了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的影响力很强，劝说巡抚采取行动保护外国人。要求杀死传教士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从北京发来，巡抚全部一一塞入自己的高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就这样，因为周馥的努力，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8.与庆亲王及李鸿章会面

1901年，虽然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起过领导带头作用，正是这场运动使得清政府逃亡到陕西，我还是受到了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他们曾被任命为和平大使，他们让我协助处理陕西省传教士被杀后的理赔问题。

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山西大学建立了，整个筹建过程将会在下一章详细介绍。我同这位伟大总督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个周日。见面时，他周围有四五位助手和秘书陪伴在一旁，其中一个名叫周馥，此人后来当了两江总督，再后来当了两广总督。通常，李鸿章刻意避免同我谈到宗教问题，但是那一天，他别的什么都没谈，而且我后来再看这个事情，感觉他的所有问题都像是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对于我给出的有关基督教会的目的与方法的回答都已经有所了解。

可以肯定的是，他理所当然是我所见到的许多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位。从外表看，他的身材比绝大多数人高大；智力方面，他也在众人之上，他能够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

第十六章　创立山西大学

1.建校的缘由

1900年，义和团在山西省对传教士以及几千名本地基督教徒展开大屠杀。1901年，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我一起来协助处理义和团在山西的事件。

中国人担心事态发展会像保定府发生的一样，联军也会进军山西，并处死一些官员以及义和团的首领们。我已经在山西生活多年，又因分发过赈灾物资，为这里的大多数官员所熟悉。因此，他们选定我来跟全权大臣协商相关事宜。我表示，我们传教士协会是不会为了谋取钱财而枉害他们性命的。但是，如此恶劣的罪行已经犯下，对此，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就此，我提议，省政府需强制性拿出五十万两白银，以每年分期支付五万两的方式，致力于在太原建立一所与西方同一水平的大学，旨在教育人们消除可怕的无知和迷信，而这就是导致此次外国人被屠杀的主要原因。

这个建议提交给全权大臣和相关负责人以后，他们就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安排以及大学基金的管理等事务都交到我手里，为期十年。十年之后，对这所大学的所有管理权力将归还给山西省政府。

不久，建立太原大学的相关提议就被批准了。全国范围内发布了建立这所省属大学的诏令。1902年春，我和另外两位学者一同来到太原府。他们分别是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和理学士尼斯托姆先生。尼斯托姆先生是位年轻有为的瑞典人，他是化学系的教授，直至后来，他始终和太原大学保持着联络。我们到来后，发现在一个非常排外的官员掌控下，正在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筹建一所和太原大学同类型的学校，并且此人正不遗余力地抵制西方大学在太原的诞生。他曾经去过欧洲，还写过一本相关的书，对他一路行程中所看到的一切美好

的事物都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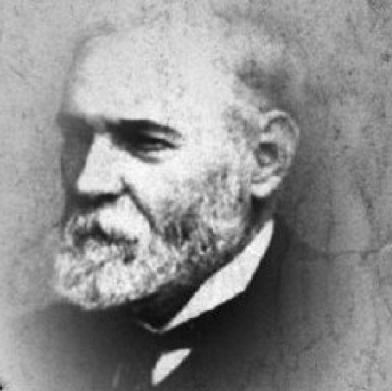
我意识到在同一座城市开办两所竞争性的学院是不切实际的，更无法实施。于是我就和巡抚大人岑春煊协商，把这两所大学合二为一，融合成一所帝国大学。在经过一些可行性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同意了。起草的章程中表明，这所大学包括两个部分——中学部和西学部。中学部完全由中国人负责，纯粹进行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西学部由我来管理十年，并开展纯粹的西方各科的教授和学习。

2.我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章程的反对

在对建校事宜商谈期间，巡抚大人派了一位道台来，想要得到我明确的承诺——章程上需添加一条，永不在此所大学传授基督教。我当即便回绝了这个要求。倘若我真答应了，就等于承认了对那些传教士和本地基督教徒的残杀是正义的，也等于承认了传教士们的信仰和他们教授的内容都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

然而，这位道台绝对是一个聪明过人的说客，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试图说服我，在长达八个多小时劝说中毫无倦意。而我早已被他软磨硬泡得身心俱累了，我甚至开始担忧自己是否会冲动地说一些日后会后悔的言辞。因此，我便退回到侧房去，向上帝做了祈祷并求得指示。两分钟后，我思路清晰地回去继续谈。我指出："对于宗教自由问题，中方已经在好几个条约中与外国几个国家达成一致在先，如果巡抚大人现今得到了一个特权可以废弃之前的条约，我们便可以来讨论禁止教授基督教这一章程。如果并无此特权，那就没有必要在此浪费口舌和时间了。"我再次表明自己强烈反对的态度。就这样，这项条款被废止了，也将永远不再被提及。







山西大学和李提摩太

尽管基督神学从没有在这所大学被正式教授过，敦崇礼先生对已经拥有的一些机会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在他关于文明的讲座里，向大

家展示了基督教所带来的有益结果，并在每周日，校长和教职员工在学校里提供服务，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当中做宣传和传授工作。

3.巡抚的友好态度

于此同时，在合适的新校舍建好之前，巡抚大人岑春煊把整座城中最好的楼宇借与我作为临时校舍。就在他把这些楼宇交与我为临时校舍那一天，他收到消息说，那个曾经极力反对建立西方大学的官员，也就是负责中方部门的那个人，之前一直忙于写奏折到朝廷逐渐削弱巡抚岑春煊的影响力，并指责他什么都屈服于我，不顾及任何中国的利益和权力。巡抚得之此事大发雷霆，立刻命令那名官员上交所有对太原大学中方部门的管理权，并当天离开太原府。如若多待上一天，后果自负。巡抚如此愤怒以至于没有哪个官员再敢干涉此事。

那天中午，巡抚邀请了一些达官显贵设宴为我送行。在宴会中，我起身感谢了巡抚大人的美意，并祝贺那些官府人员他们拥有一个好巡抚，他开创了太原府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业：一是建立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从此以后可以在教育上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一是着手实施了山西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将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益处。说到此处，巡抚起身打断我的话，他大声说道："不不，这两项伟业都归功于你，如果没有你在此，它们怎么都不可能真正实施的！"



李提摩太和山西大学的学生们

当关于新大学的章程条款签署完毕，被送到朝廷且加盖印章之后，当时属于官方报刊的《京报》，就立即致力于这件事的报道，并发到了全国的官员手中。

1902年，所有计划都达成了最终的一致。一份关于教学、行政用房的建筑合同也得以最终签署。建筑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用房以及供工程学、绘画、化学、物理、实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学科的教室。学校安排设置了为期三年的预备课程的学习。在此期间，所有教授的课程都与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相一致。接下来三年设置了毕业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选择法律、科学、医学、工程学、语言学或文学中的任何学科进行研习。在毕业考核中获得毕业资格的学生将被授予政府认可的学位证书。获得毕业学位的学生享受和中文部毕业生（不管他是秀才还是举人）同等的待遇，并由学校行政部门或本省的巡抚选拔任用。每位学生每月都将会得到二至八两不等的生活经费补助。这些资金补助并非来自西学部本身，而是来自省财政。我规定所有的教学用语为中文，这样才能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最大的成效。

为了解决教科书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翻译部。这个部门由十名中方翻译人员、作者以及一名日本籍翻译人员组成，由一名叫约翰窦乐安的外国人监督管理。这个部门给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如下：

《中国历史年表》（从周朝开始）

《神奇的世纪》罗素·华莱士并附有图表

《通史》梅耶并附有大量的图表和地图

《欧洲商业史》文学博士吉本

东京师范学校系列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及教学法。并附有大量的图例。

《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和二十二张美观的大幅钢板印刷的插图。

《物理学地图》附有二十四张彩色大幅地图。

从剑桥的《名人传记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传记。

《世界的故事》辛之

这个翻译部一直持续工作了六年，后因资金的缺乏而被迫关闭，但它却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山西大学成立之后，我东下拜访时任保定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因为我面临关于大学的最主要困难就是中文教科书问题，我打算每年从山西大学的基金中拨出一万两来致力于教科书的贮备。袁世凯赞许这不失为一个绝好的主意，并且表态他愿意捐赠出一万两并动员朝廷教育大臣张百熙也捐出同等数目来。他还信誓旦旦地承诺山东省和湖南省的巡抚也将各出一万两来。这样一来，学生很快就能有足够的教科书上课了。只是这个十分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我关于建立一所现代教育的大学，以永久真正意义上解决东西方

之间存在的隔阂与纠纷的观点，得到全权大臣的大大赞许。三个月后，朝廷诏书下令在全国的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更令人惊奇的是，拨给各省建校资金总数竟然和我建立山西大学所要求的数目等同。

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西学热潮遍布全国，很多寺庙也被改建成了各种学校和学院。但是，要想使世界上一个最封闭落后的国家一下子改变她拥有几千年渊源根深蒂固的古老的教育体系，形成一套现代的国外教育体系，那是毫无可能性的。尽管也曾有几百名官员匆匆对日本进行过考察；尽管也曾派出过三万留学生去海外接受过教育和政府管理学问方面的短期课程培训，然而还没有过一位中国领导者去国外深入研究先进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

然而，对于朝廷来说，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人，既要有丰富的知识来掌控新形势，又能有效的来驾驭它。

中国政府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当属张之洞了。在他被任命的一年时间里，拟定出一部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他的计划，体现在一个长篇报告中。这个巨幅报告也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权威基础。他的体系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他没有把原先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候选生源来利用，因此实际上放弃了中国最好的资源；第二，他探寻的从原有课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教育体制，学生们若按此完全被训练有素，至少要花费十六年的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一次和张之洞会谈是在1909年，几个月之后，他便去世了。他为中国拟定的教育体系完全仿照了日本的体制。我向张之洞提出自己的意见说，如果能提供出各省要用的课本，那这个教育计划就圆满了。他说这个相当难。我便提议说，既然已经有很多已完成学业归来的留学生，不如挑选出各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来编写教材，这样能保证教材的一致性，也是相当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此，他摇头道："这些留学生是可能已经非常精通外语了，但却对中文了解甚少，不会写出适合的课本来的。"再后来，他让我来负责教材编写工作，并承诺将承担一切相关经费。在我起身告辞时，

看到他虚弱的身体，我一再恳请推辞他不要送我了，他还是坚持陪我穿过几个庭院。最后他说："我非常想看到教材的编写工作能实施起来，你就多操操心，费用方面我来。"我无奈地指着一头灰白头发说："此项工作应该交给年轻一代来承担了。"然后，我们便作了别。

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任校长是敦崇礼牧师。他来自格拉斯哥，是一位文学硕士。山西大学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归功于他满腔的工作热情，永不枯竭的工作精力，他对中国人和汉字的丰富知识和他对管理的无限智慧与实际指导才能。所有人都尊崇他为无畏、诚信、能干的管理者。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次年八月，敦崇礼博士因病辞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来悼念他。朝廷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赐赏红宝石顶戴。在有合适人选继任西学部校长之前，由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毕万暂代校长。在他任职期间，也就是1906—1907年之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三百三十九人。那一年，山西大学还派出二十五名学生去英国学习铁路建设和采矿工程。这当中有二十三人的留学经费全部是由省政府承担的。对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山西人民未来的福祉将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完善。

4.1907年重访太原府

1907年秋，之前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校长。当地有一名官员同时也是翰林的人态度非常谦和，也对大学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的支持和赞赏。1908年，我重访山西之际，他时任山西省议会议事长。有一天，他召集所有学校在市博物馆广场上集会。每所学校的学生们穿着他们各自学校的校服，在大鼓和横笛合奏的乐声伴奏下整齐一致的迈步到广场。他和另一位官员邀请我到博物馆二楼观礼。从那里，我能够一览广场上列队的各个学校。那么多的学生穿着各色服饰，整齐的排列着，那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啊！

议长之后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今天到这里来的两千多名学生中，有些是来自军事专业，有些是来自农学专业，有些是来自于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他们中所有的骨干教师都是山西大学毕业出去的或者曾经在山大进修过。山西大学的带头作用激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类似的一座座学校正在太原或山西其他城市被建立。

同年，我又欣喜地看到1902年我所倡导修建的铁路已经竣工了，太原通往北京的定期列车也正式开通了。



山西大学的农学系

5.辞去名誉校长的职务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山西省巡抚和议会长的邀请函，诚邀我在取道上海返回欧洲之前务必去一趟山西大学。甫抵山西，议会长和政府要员们便在公共会议室热情接待了我。期间，他们高度赞扬了山西大学对全省做出的巨大贡献。鉴于我深信现代教育已深深地扎根于此，不会轻易被消除了，我想对官府和学生们表态，不打算把对这个

学校的管理权持续到最后一刻的1911年春了。因此我决定当即就把山西大学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910年11月13日，我实行了山西大学管理权的转交。中国政府允诺之前与教授们的合约继续有效，并且将持续扩大学校的规模。当时的教学工作，总共是在八名外籍教授、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员共同协作下开展起来的。

6.巡抚岑春煊

我掌管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一任巡抚是岑春煊，他是江苏人。他曾经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逃离流亡西安时，陪同在他们身边。后因为他的忠心耿耿，被任命为山西省巡抚，成为了整个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治理才能，他的廉洁公正，他的勇气和胆识闻名遐迩。据说对于清政府对他的各种任命，他官场上的对手们没有一个反对的。但同僚都暗想他有朝一日身陷僵局从而削弱他的权势。在任职期间，他成功地平定了太原的屡次反叛。不久之后，四川省局势动荡，一次大反叛的镇压迫在眉睫。岑春煊即被调派去做总督。就任仅三个月，整个四川省就恢复了正常秩序。



曾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像

之后，他又被调至广州。当时两广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动乱，很多之前的官员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平息并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就是在岑春煊调来之后也没能轻易平息。后来，岑上奏朝廷说，如果朝廷任命的广西巡抚只对政府负责，他就无法施展在此的治理。之后他立即被朝廷授予了全权治理的权力，两省之间经过他的治理很快恢复了良好

的秩序。

岑春煊的方法和那些著名的军事家的方法大同小异。哪里只要稍有动乱，便下令立刻捉拿首领并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此再也没有人敢谋反，否则会引来同样的杀身之祸。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今最有魄力的仲裁者。后来他进京那次也充分体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魄力。一些官府要员贪污腐败，他毫不犹豫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力。他是整个官僚统治下的中国中唯一敢于弹劾朝廷最高权威的人。他曾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下跪认错。当时很多官僚联手搁置他的弹劾，他便辞去职务，隐居上海，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去了。

1913年，孙中山、黄兴联合起义推翻袁世凯的共和政府。岑春煊在被唆使下支持起义军。起义失败后，他就和义军们一起消失了。

继岑春煊之后，由赵尔巽接任山西省巡抚一职，他是汉军正蓝旗人。敦崇礼校长发现此人对与山西大学有关的一切事务都极其感兴趣。后来，我在他要去做总督的前一个晚上去拜访了他。当时他还是武昌总督。在我们交谈中，我遗憾地说，中国目前其实没有任何真正的总督和巡抚，整个中国因此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对于我的说法，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要我作进一步的阐述。然后我解释道，因为总督和巡抚在中国调动变换得太频繁了，通常就是小几个月就调离，尽管他再有能力，也无法对当地的情形得以透彻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改革措施，所以收到的效果就如同没有政府管理一样。

山西另一位巡抚名叫寿恩，满洲人。他对山大非常好，曾说服山西财政拨出一万两来为山大增设器材。在我担任山大名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位山西巡抚是丁宝铨，这一位是最友善的。除了对大学的关注，他还在整个山西省全力加强师范学校的建立来培训越来越多的教师。

如果要我对这些与我有些关系的官员进行总结的话，我要说，他们对我管理大学的事务从未有过任何干涉，每年政府五万两支付给学校的日子一到，政府就会准时支付给学校，从未有过拖欠。当我把对大学的管理权交还给政府后，他们表现出出乎意料的欣喜和感激。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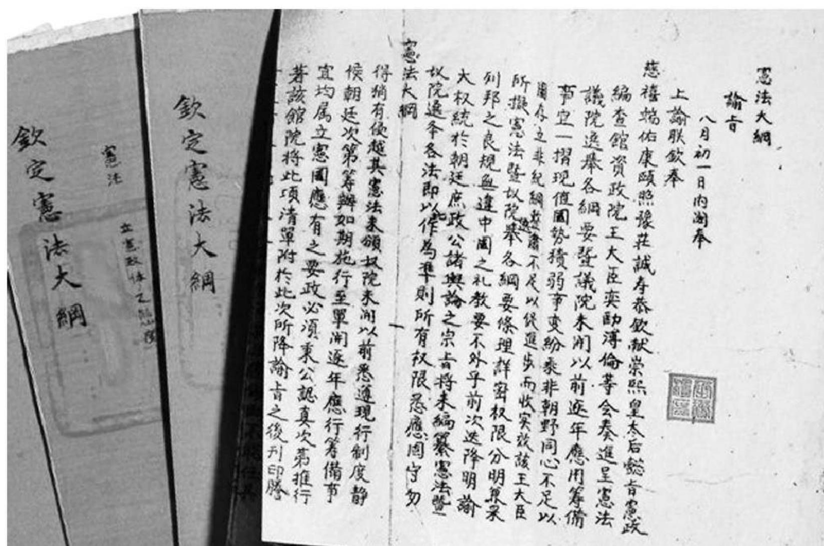
后，为了表达他们对敦崇礼校长对学校所做贡献的肯定和感激之情，他们还在大学校园里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雕刻有赞美他的诗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巡抚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大片城市遭破坏沦陷。但革命者们并没有触碰山大，也没有破坏校园。学校财务部门一位姓高的负责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以前是理查德夫人的写作助手，在各个教室和教学楼的门上贴上了外籍教师的名片。暴徒们不敢轻易摧毁外国人的任何财产。革命处于一片混乱中，因为没有额外基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所有的教授和学生都没有得到安置，零落四方。

第十七章　变革中的中国

1.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诏令

1895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被朝野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同理，1900年的庚子之变，使清廷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改革的呼声再度响起，上海的学生首先成立了进步团体，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各种学会，新的活力出现在上海的学界——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宣传西方思想。总之，改革的呼声在教育界是愈演愈烈。



欽定憲法大綱

憲法大綱

諭旨

八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会奏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暨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用籌備事宜一摺現值國勢積弱事変紛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圖存立非紀綱整肅不足以保進步而收實效該王大臣所擬憲法暨議院選舉各綱要條理詳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权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將來編纂憲法暨議院選舉各法即以作為準則所有权限悉應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憲法未頒議院未開以前悉遵現行制度靜候朝廷次第籌辦如期施行至單開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均属立憲國應有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真次第推行著該館院將此項清單附於此次所降諭旨之後刊印騰

钦定宪法大纲

甚至于清政府也开始倾向于改革，1901年8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条法令，下令改革考试制度，重点考察各种西式学科，比如政治经济学、宪法法律等，而旧的考试内容，例如弓马骑射，搬举石锁等武举考试必考的内容，则被一一废除。到了9月份，太后又发布了

第二条政令，命令所有的学堂都必须教授西方的现代科学，每个省会都要建立一所大学。几天后，第三条法令再次颁布，令天下的总督、巡抚们都要以张之洞和刘坤一为榜样，派遣聪慧的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西学。实际上，这本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发的诏令。

光绪帝曾发布过另一条法令，便是要求满族的亲贵大臣到西洋各国去考察，这条法令曾一度带来了恐慌，但依旧强行进行实施，满族贵族们迫于形势，也只得如此了。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光绪、慈禧死后，他便做了摄政王）便被派往德国，处理庚子拳乱中德国外交官被杀的善后事宜。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的亲王从未被允许离开京城四十里外，或是在城外过夜。这被视为一种破天荒的事件，尽管其任务是向德国赔礼道歉。次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随后又有众多的亲王贝勒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公务，甚至还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下令废止缠足，这项约束妇女的陋习虽然没有被彻底根除，但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看出太后革新政治的决心。

2.访问朝中官员

（1）周馥

1902年的春夏之际，我在北方驻留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我要帮助山西的官员筹办新式大学。在回上海的途中，我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能得到他的支持，为翻译教材提供资金。他手下的布政使叫周馥，庚子拳乱后，他在处理与外国的善后事宜中，表现出了高明的手段，所以被上级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

他不仅积极地为山东引进电报、铁路，而且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兴趣的人。我去拜访他时，他正准备到山东去上任，他告诉我，他对传教士们翻译出版的书籍一直不满意，因为他们

没有把握住官方的立场、心态。他告诉我，他搜集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整理出一大箱。前不久，他的一个下属因为丁忧守制，有了一些空闲。周馥便把这箱书交给他去研究，让他从中国官方视角，重新审读编纂。

后来，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周馥，那位官员的新作已经完成，周馥请我通读一遍，看看能否公开发表，我发现，由于受到中国官方思潮的影响，这篇大作记载了很多关于地方教案的内容，显然对基督教没有多少赞誉。我便向周馥指出，这是一篇探讨基督教原理的作品，但作者却引入许多教案来抨击基督教，就好像中国人在撰写儒学经典时，却引用儒生们作奸犯科的事例一样。自然，这本书后来没有出版。

（2）拜会荣禄

我在北京时，曾经专门拜会荣禄。我们谈了约有一个小时，期间他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处理政务的能力来说，我认为他和李鸿章更加接近，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官员。会谈结束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鹿传霖谈一谈。我想，他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在清朝的诸多官员中，鹿传霖以排外而闻名，我回答道：“如果鹿传霖愿意见我，我愿登门拜访。”荣禄遂点点头道：“明日下午五点，鹿大人将在家中相候。”

（3）拜访鹿传霖

鹿传霖是土生土长的直隶人，在荣禄的安排下，我与他得以会面。我曾经问他：“你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否比六十年前更好？”

“不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他摇摇头，拒绝回答，“比以前坏多了，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布置的一个陷阱，引他入彀，于是我继续问他：“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困境中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鹿传霖立刻意识到我在给他设套，当即老到地摆脱我的追问，反问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他这样讲，恰恰给了我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我将自己的关于改革的想法一一说出。在分手的时候，他就货币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道：“这个问题，你应该向银行家咨询，他们比我要更加专业。”但是他坚持要听取我的意见，我想了想，对他说道：“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用金本位体制，而中国继续使用银本位的体制，从汇率上讲，中国便会受到影响，如果中国也能采用金本位体制，将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数年之后，我再次见到鹿传霖，那是1910年，他告诉我，他在户部任职时，便开始着手向金本位过渡，但是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他的职务便被另一个人取代了，货币改革便被搁置，这个延迟，使中国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鹿传霖代表着中国的守旧派官员，顽固的坚持自己的见解，然而爱国之情毫不逊色。正如别人所说的那样，他对西方事物带有很大的偏见，使他无法对外来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

（4）肃亲王

在这段时间内，我遇到了一位政治家——肃亲王，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故事——他是如何利用他的府邸来庇护那些基督教难民的。



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攻击的教堂

义和团祸乱北京的时候，在华的各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置在英国大使馆的周边。正对英国使馆，隔着一条河流和一条街道，便是肃亲王的官邸。当时基督教教堂和外国人的房子都被烧毁了，詹姆斯先生以前是浸礼会的传教士，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他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他愿意搬到别处去，把王府腾出来给外国人避难，那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于肃亲王惧怕义和团，便商量道，希望外国难民从前门进来，他则带着家人从后门逃出去，做出一副被赶出家门，落荒而逃的样子，这样义和团便不会怪罪于他。詹姆斯先生便按照他的意思，将教民安置在王府里，然而，就在返回的路上，他落到了义和团手里，最后被残忍地杀害。

肃亲王现在负责京城的治安与防卫，已经开始着手清理街头巷尾，在政治上，他力赞改革，而且把三女儿和五女儿送到女子中学去

读书。

3.被清政府委任为新教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在和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Favier）先生商讨，以期制定一套规则，使中国政府与罗马教会之间能够更好地沟通。

早在1898年3月，清政府便颁布政令，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作出承认和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个《条例》告诉我后，我指出，新教的传教士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并且再一次提出1896年由六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请愿书的事情。

外务部问我，能否代表新教教会，就有关教会规定的问题进行磋商，我回答道，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代表新教，但是我很乐于促成二者的合作，并一同制定教规。

然而，7月3日，朝廷发布政令：谕内阁、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会事务李提摩太因事来京。请旨办理一摺。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外务部即将既拟民教相安规条。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后来，外务部官员通知我，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开前召见我。我回答道，如果太后允诺她承诺过的改革措施付诸实践，那么我将第一个向她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告诉他，明天我便要回到上海。我希望这种回答比一次无谓的见面更能刺激慈禧太后，使她加快改革的步伐。

4.樊国梁主教

7月4日，在周馥的陪同下，我造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草拟了一条章程，上呈给罗马教皇，请求批准。我建

议，首先是罗马的天主教会和我们的新教教会达成共识，然后再起草一个通用的规章制度。樊国梁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当时，他的助理、驻昌图府的主教、奉天的主教以及新上任的山西教区的主教都在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

不幸的是，事情刚刚有了起色，樊国梁主教便病逝了。后来，我起草了七条处理教会与民众关系的条例，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认可。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的时候，便把这个条陈呈递给罗马天主教在威斯敏斯特的枢机主教。

其条例如下：

（1）任何传教士不得散发轻渎中国文化宗教的文字，违者予以撤职。

（2）任何中国官员不得怂恿诋毁基督教文字的传播，违者予以撤职。

（3）任何传教士不得干涉中国的司法审讯，违者予以撤职。

（4）任何中国官员必须对基督教教徒与非基督教教徒一视同仁，违者一律撤职。

（5）各教会的负责人每年需向中国的巡抚提交报告，明晰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医院的数量，以及其辖下的教会从事文化和慈善工作的情况。

（6）巡抚每年都应邀请其治下的三名教会首领进行会谈，商讨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7）巡抚或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报告其辖区内教会的发展情况，以便使朝廷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以免被无知或居心不良的人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误导。

听完我所拟定的七条规则，枢机主教叹道：“倘若这些政策早些

提出并付诸实施，便不会有传教士遇害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呈递给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施行。”

5.在中国建立公学

我回到上海后，除了忙于广学会的日常工作外，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帮助中国在租界内建立一所公学。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向我表示，如果我能够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的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给租界市政委员会，相信是能够得到批准的。但这件事情刚刚着手，便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有关排外的传言甚喧尘上，于是，这项计划只好被迫终止。

当义和团被各地政府镇压平息之后，办学的事宜再度被提上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又起草了一份计划，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人分别是卜方济（Hawkspott）博士、弗格森（Ferguson）博士，还有我。后来我们收到答复，委员会对这项计划很支持，如果中国人能自己筹集三万两银子作启动资金，他们将拨给我们办学用地，以及每年一千两白银的赞助。

1901年，我邀请了上海的三名华商领袖——楚先生、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贾丹马西森公司的买办童克勋先生，来与两位合作人见面，我们把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三名华商领袖答应负责筹集兴建学校的资金。

后来，在购买土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到1902年年底，市政委员会拨款及土地都已经到位了。次年，足够容纳四百多人的漂亮学校便建立起来了，外籍教师的宿舍也相应到位了。除此之外，还成立了由三个外国人和两个中国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在学校步入正轨之前，我暂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学校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现如今，这所学校已名闻上海滩。

6.访问日本

（1）河野公爵

1903年的5月，为了给山西的大学筹备教科书，我曾短暂地出访日本，想聘请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同翻译。这期间，我拜会了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的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其他一些人物，他们待我非常热情。

我印象最深的是河野公爵，他是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被称作日本的俾斯麦。河野曾就读于伯恩大学，当时还是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的将来做过预言，这些材料都依照传统，被学校精心保存着。河野的政治理念是：让日本成为黄种人的领袖，领导整个亚洲，与西方进行抗衡。当他代表日本政府出使中国的时候，他曾提出建议，让中日两国建立联盟，以联合亚洲的力量，对抗西方。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认可，并建议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谈一谈。听完河野的意见后，张之洞兴奋异常，因为多少年来，张之洞都渴望振兴图强，一洗历次战败而遭受的屈辱。河野出访中国的一个结果，是促进了东亚同盟的初步建立，这件事情被刊登在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影响中国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滥觞。

在和河野会面的时候，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盟，其目的仅仅是维护世界秩序。河野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想法，而且纵观整个世界，各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要建立国际联盟，还需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这些话，明确表明了他的态度。

（2）庆亲王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位于东京的贵族女子学校。恰巧，我在那里碰到了前来参观访问的庆亲王载振。随他一同来日本访问的，还有大臣那桐等十余名大臣。早在北京时，我便与载振、那桐相熟了，如今相见，他们热情地向我招呼。

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育课，她们在跳一种田园舞，又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观看她们学习绘画和刺绣，还旁听了一节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则在《约翰布朗》的音乐声中，为我们表演了幼儿体操。

学校的校长下田女士，是一位美丽温柔、举止优雅，极富魅力的人，她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临别之时，她引我们来到一座花园中，摘下一朵白色的玫瑰和一朵粉红的玫瑰，送给载振。载振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女士的鲜花是否合乎礼制，但下田女士坚持把花递到载振面前，最后他尴尬地接受了。载振的拘谨约束与下田的落落大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日本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我遇见了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是应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去的。我和其中一个化学教授攀谈，问到他们去中国的目的，他说他们是应邀前去教中国人知道欧洲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肆意地大笑着。

后来到了晚上，他亲自来向我道歉，说白日酒喝多了，一直在说胡话。但我看得出，那是他和日本人的真实情感，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饱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去上海的医院动手术。我们希望通过手术可以延长她的寿命。但她已然是病入膏肓，7月10日那天，她告别了这个世界，接受上帝的安抚。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传教士的妻子比她更忠诚于上帝，更富有奉献精神。在太原时，她筹建了六十所孤儿学校，并在几所乡村学校里教学。在《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在日

本教授的日本学生中，有三人成了基督徒。她还曾到曾纪泽府上担任过家庭教师，负责教授其家人，影响很大。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一个冬天尽心尽责的授课，两名学员各自带来了一百名心向上帝的女性学员。在我们回家休假的时候，作为外派的传教士代表，她依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写作能力对于广学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艾德金斯博士休假的时候，是她承担起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并担任《教会通讯》的编辑工作。还与芬驰（Finch）女士一道，编纂了《远东妇女工作》一书，在她逝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版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中学里，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1898年，维新派开办了上海女子高级中学，她被推举为校长，而且担任了学校里唯一的一位外籍董事；即使在重病缠身之际，她还为一些中国官员的家眷开设英文课。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一般妇女的十倍”。

当她去世之后，许多人无论亲疏，都表达了无比的惋惜，有人这样评价她：“她是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一种女性，她的才能、虔诚和奉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学作品，将作为她对中国的爱的见证，永远流传于世。而比文字更加重要的，是她在千千万万的人心中留下了不朽的风范，以及永久的怀念。”

8.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在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虽然这场战争爆发于日俄两国之间，然而战场却是在中国的东北，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清政府对此束手无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强在自己的土地上肆意蹂躏。见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叫做沈敦和（在山西筹建大学时，他曾见为我提供过巨大的帮助）的道台前来拜会我，希望我能够与他一起筹办救助工作，来帮助东北的难民。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于是，一个由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各国人一起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了。沈先生担任中方秘书，我则作为外方秘书，各省官员以各

种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但是，当我们首次提出向难民提供救助的时候，日俄两国都明确表示出拒绝，尽管清政府也提出外交交涉，但他们依然拒绝，并说自己治下的红十字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庇护难民。这使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的款项，却无法派上用场。于是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苏格兰长老会满洲分会的传教士韦伯斯特（Webster）先生。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告诉他因为日俄两国的阻挠，我们无法前往东北救助难民，如果他能够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便在私下里拜会了俄国的将军，他们有点私交，恳请道，如果不能向中国难民提供援助，那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结果，俄方允许我们在俄国占领区向中国难民提供救助。韦伯斯特又致信给日本军方，说俄国已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在俄占区展开救济工作，想来日本一定不会在人道方面落后于俄国。日方立刻表示同意。这样，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韦伯斯特先生短短几天便顺利解决了。他立即发出电报通知我们，几天之后，捐款汇到了他在牛庄的账户里。后来他又发出电报，希望在两个礼拜内筹集到一万套棉衣，我回电说：“棉衣一定准时送达。”

战争期间，中国人筹集了四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三两白银（约五万六千英镑）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慈禧太后自己贡献出十万两白银（约一万二千五百英镑）。

9.在山东召开掌门人大会

在这里，我要说一说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可以说，这次大会召开得非常圆满，琼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教派的掌门，并在一起商讨各教派共同发展的事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一名学政——此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大会上，有三十

多位官员应邀前来，其中包括一名满族将军，除基督教教士外，到场的还有一百多位其他教派的掌门人。大会召开了四天，晚上则是宴会以及社交聚会，许多非基督教的上流社会人士也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道，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纂一些宗教读物，以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大会结束后的几天，我便去了济南，拜访一下巡抚周馥。他极尽地主之谊，派一名官员带我游览了济南的名胜，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游览了大明湖。在大明湖，他为我们准备了华丽的游船和精美的茶点。之后，他又举行了宴会，邀请了省里的高官前来参加，以欢迎我们的到来。当然，宴会期间的主要话题便是宗教。

周馥一开始便聊起了当年他在天津时，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提到那时发送电报必须铺设线路，而如今已经有了无线电报，时代进步，令人叹为观止。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本阐述上帝以及上帝和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书，如果谁能写出这样一本书，那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是为了庆贺慈禧太后的生日，我参加了在戏院里举办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同座的还有巡抚周馥，罗马天主教主教和他的助理；我西边的包厢里坐着山东的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东面包厢里坐着新建大学的官员和教授，以及一些外国人。

宴会期间，人声鼎沸，喧闹无比，周馥便把我带到后院，这里非常安静，我们展开一番长谈，他向我提出了两条极有价值的建议：

我以巡抚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推选出三名代表，与官方一同商讨山东的教务问题。

由我购买一些《圣经·新约》，周馥下发给治下的所有官员，以此来引起他们的重视，让他们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会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两百套精

装本《圣经·新约》，我将这些书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属下的官员，以便加深对基督教的理解。

不久之后，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很快又专任两广总督，在我所结识的中国官员中，他是最可亲的一位。

第十八章　宗教复兴运动

1.威尔士宗教复兴大会



目光炯炯的李提摩太

1905年，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决定不再让我担任传教士代表的日常工作，而去中部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堂中作报告。

在威尔士的宗教复兴运动期间，我被邀请在一个叫做Cymanfa的地方，在露天宗教大会上作报告。主办方在半山腰搭建了一个露天平台，讲台上设置了扬声器，正前方是一个缓坡，就像一个露天环形剧场。这样许多观众坐在台前，可以清晰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

上台演讲的是三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琼斯和我自己。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雄辩的演讲口才，赢得了大家的喝彩。但大会上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矿工的演说，他那朴实无华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然后他又深情地唱起了圣歌，使人们深受感动。

2.浸礼会的世界大会

这些时日，基督教的内部发生了几件大事，旨在促进几大教会的精诚合作，结果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宣告成立。1905年7月，来自世界各地的浸礼会代表在伦敦汇聚一堂，召开大会。我被推选为委员会的委员，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中国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只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更深地影响中国的官方人士。

我讲话结束后，一位女士当即表示，愿意承担翻译工作的资金，以便使我将更多的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中国去。从那天开始，十年中她一直慷慨地支持我们，现在，她已蒙主恩召唤，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还投入大量的精力参加“和平运动”，此事将在后文详述。

3.在兰贝斯宫招待中国使节

我回英国休假的这段日子里，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支由五名大臣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欧美列国考察学习，期间，他们造访了英国。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泽爵爷，当他们抵达英国时，我给坎特伯雷大主

教去了一封信，向他建议道，作为圣公会的主要人物，如果他能够出面邀请中国考察团前往兰贝斯参观，同时也邀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一道前往，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能显示出东道主的风范。在我看来，如果考察团旅英期间，能够与这些四处派遣传教士的宗教团体的首脑人物进行会晤，并受到友好的款待，待到他们回国后，中国政府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会更加友好，我们传教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开展。

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批准，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兰贝斯宫的邀请函，请我一道布置接待工作，我想，这是因为我会说汉语，可以充当翻译的缘故吧。

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我们在图书馆接待了中国考察团，我则充当翻译。随后，大主教引着客人参观了兰贝斯宫，并着重介绍了宫殿中颇具历史意义的地方。当考察团在签名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时，我正坐在伯明翰大主教的身边。我和他聊起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到世界各地考察先进文明这一开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在英国有许多教士对到中国传教颇有兴趣，他是否认为应该也派出一支五人考察团，前往中国访问。我还建议道，代表团应该有两名英格兰教会的代表，两名非国教的代表，和一名苏格兰教会的代表，以便一同研讨传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噢，不。”他摇头道，“我认为目前来说，这个建议行不通，我们各大教派还需要沟通，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因此，访问中国这件事，需要长期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认为，一个连分支教派——即便是在一个国家这样小的范围内，都无法联合成一个整体的宗教，并不适合中国。”

但有些人并不认同这位主教，他们认为，现在是将各大教派整合在一起，求同存异，团结与共，以求精诚合作的时候了。

4.J.B.帕顿博士

我在英国期间，碰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我需要提一下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他对庚子拳乱之后中国的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关注，以及独到的见解。

帕顿博士是由帕西·邦廷爵士和他的夫人一起介绍给我的，这二位也对中国的觉醒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家中，我认识了帕顿博士，并有过多次会晤。

一个人的灵魂最终要皈依上帝，这是大多数人的认识，然而除此之外，帕顿博士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致死不渝地奉行着一个信念，那便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个上帝的天国，并将其作为毕生的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所有的种族、民族以及国家的高度发展。为此，他创立了一个名曰“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教会去关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灵性的发展。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在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组织机构中，他被视作精神支柱、灵感的源泉。

同时我还了解到，他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当年他还积极地投身于印度的发展，为建立一个旨在改善印度农民生活的储蓄银行而四处奔波。

我与帕顿博士讨论了一下中国的发展形势，他对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业表示肯定，并提出一个计划，该计划倘若实施，将会大力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于是，帕顿先生、邦廷爵士以及我一道发起了设在中国地区紧急事务委员会。其中十四位成员来自各个教派，另外十四名来自独立教会，我们将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展开合作，这样要比以前的各自为战要好得多。

1907年，该委员会派出了一支由五个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中国作调研，这五人分别是：威廉姆勋爵、劳伦斯·塞西尔夫人，医疗行业的代表亚历山大·辛普森先生，剑桥大学的亚历山大·麦克利斯特教授

以及教友派代表弗兰西斯·福克斯先生。1907年5月，他们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百年纪念大会”，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了在中国的考察。

5.上海的纪念大会

本次大会旨在纪念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伦敦宣道会的罗伯特·莫里森。这是在华传教士第三次大规模的集会，第一次是在1887年，第二次在1890年，这一次，众多在华的教派代表云集一堂，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做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彼此和谐相处，似乎完全摈弃了教派之间的分歧。

紧急事务委员会也派出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我是大会的副主席之一，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全程参加，只进行了几场讨论。

会议代表来自中国各地，其间有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大家一道交流了福音学习、教育、文学和慈善工作等方面的心得，并取得了共识：现阶段，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统筹机构，以避免重复劳动产生的巨大浪费。会后，我便回到英国，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会议讨论的一个结果，是向基督教教会提交十万英镑的拨款申请，申请书是由来自里彭教堂的博伊德博士起草的，并获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阿盖尔公爵、罗伯特·哈特爵士、伦敦城市长的支持。

其中四万英镑将用于师范学校和学院建设，四万英镑用于医学院建设，两万英镑用于文献和教科书的翻译。除了这项专用基金的申请，将基督教引入在大学课堂的计划也得到了认可。我和帕顿博士给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写了信，希望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派出十名颇具经验的教育家，来援助中国的新式教育。不久之后，威廉·塞西尔勋爵也开始呼吁，希望能够在中国中部建立牛津和剑桥式的大学。

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唤起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事务。

这成了美国平民信徒运动兴起的动力之一。该运动的组织机构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上海召开的纪念大会，这些代表在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浸礼会代表在中国

1907年秋，浸礼会派出代表来到中国。其成员主要有C.E.威尔逊牧师、W.Y.富勒顿牧师。他们考察了我们在山东、陕西以及上海等地的工作。12月初，我在北京与他们进行了会晤，并把他们介绍给了外务部的官员，以及各省的传教工作的展开情况。然后，代表团参观了我们在山东的传教中心。

第二年，圣教书会派出了A.R.伯克兰德牧师和查尔斯·塔瑞英爵士来到中国，其目的是扩大他们的服务规模。这说明国内的基督教教会开始着重关注中国的实际需求。

7.穆德博士在中国

1907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新星，他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集会，邀请了中国各教派的负责人——他们分别来自东部、西部和中部许多地方，大家齐聚南京，共商大业。

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早在和他一起乘船航行的时候，他便告诉我，他摸索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已经得到各省官员和学者的认可。我督促他派出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和广学会合作，但没有得到他的认同。在南京的会议上，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上面记载了他在传教过程中思考的种种问题。他依次向每一位传教士咨询，以求获得满意的解决方案。我愈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专断的人，是不可能和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却别出心裁地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要求其他教派帮助他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穆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他的这份才智，无论用到哪一个行业，都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基督教青年会所主张的传道理念，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机制一脉相通。穆德也取得了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控制权。通过这一途径，他可以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学院的学生，并从中挑选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其工作。凭着强有力、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极具魅力的人格，他神奇地获得了英美学子的强烈拥护。

我在太原时，曾采取过讲座的形式，宣扬基督教。怀特·莱特先生先后在青州、济南开设了博物馆和研究院，宣扬基督，这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办法。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曾将我们的经验介绍给穆德。

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伯逊教授的管理经营，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得该教会得以迅速地成长壮大。而穆德博士的最大成就，则是在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和1912成立的永久委员会上取得的。

8.爱丁堡大会上的永久委员会

当我还在英国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们便产生了联合行动的想法。但在英美两国，这种想法曾经有过尝试，例如当年在利物浦与纽约两地分别召开的全球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基督教的各大教派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愿望。在这些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筹办得最为精心、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

由于出席的代表很多，所以不可能让所有的与会代表都发表长篇大论，因此，无论是主教还是普通教士，都被要求将发言限制在七分钟以内。我的发言围绕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文化书籍的需求，我特别指出，我们在传教过程中暴露出了薄弱的环节，那就是严重缺乏关于基督教的文学艺术作品，来适应中国的社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传教士在全球的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因此，经大会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并由穆德先生担任机构的负责人。

在担任负责人其间，穆德博士出访了印度，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后来他又到了中国，召开了五次地方性的会议和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在其中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说道，他在若干年前就曾经申请二十个工作人员进行基督教文字工作。他为我感到惋惜，因为教会并没有回应我的建议，在本职工作中出现了疏忽。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曾做过发言，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我希望改变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用在福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资金却非常少。其次，我希望传教士协会能够坚持原来的传统，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进行统计，并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一种书籍效果最好。

近些时日，我很高兴的发现，永久委员会在文字工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十九章　大乘佛学

1.佛教的研究

在上海，我被任命为广学会的秘书这一职位之后不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怎样彻底改变中国几亿人口的宗教信仰。

那时候，民间有一些传教士们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经常聚在一起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理所在。他们想让我写一篇论文来阐述一下佛教何以在中国能吸引这么多的民众并修建如此多的别具风格的庙宇。为了收集写作素材，我深入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入佛指南》。这本书写得妙趣横生，但我却没有从中得到我想要的。而我在18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的一本非常杰出的佛教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里面阐述了佛教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的秘诀所在。

那是一篇专题论文，名为《大乘起信论》。一位曾由孔子儒家思想皈依佛门的虔诚教徒，后成为佛教哲学的权威级人物，曾答应有空帮我把这本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到1891年，在他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但直到一本由铃木大拙（Suzuki）翻译的另一本译本面世后，才得以上市发行。

这本书的作者是马鸣（Ashvagosha），他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在印度北部产生的一个新佛教派别。它是作为反对小乘佛教及原始佛教而兴起并成长起来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是：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度世信持真如佛性得以功德圆满修成正果，慈悲为怀，舍己救人等等。

2.洛宜德教授

我被这本书里所蕴藏着的基督教性质的教义所深深打动了，并且发现了它们相似之处的并非我一个人。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籍，书中把佛主描述为像基督教中上帝一样的神灵。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亚瑟·洛宜德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当时在东京一所有名的大学任教，也曾是传教协会的一员。我俩对佛教的兴趣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一直跟他保持着通信联系。第二年，即1908年，我专程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数位名流一起共进午餐。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教主因故没能出席，其他出席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Nicolai），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Awdry），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Mckin），美以美会的主教哈里斯（Harris），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Carey Hall），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Sprague），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就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对我说："80年代你来拜访我时，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已经有两份了。"我便问他通常是在什么层次的阶级中开展工作。他很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对象和反对我的同事们不一样。他们在政界人士、领袖和学生们中间开展工作，而我则是在无知的穷人中间开展。"然而，就我所知，由他转化过来的信徒却是其他所有人转化信徒的总和。



李提摩太和友人在一起

午餐后，在洛宜德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研究室。在那儿，他说我可以向他提问我感兴趣的所有关于日本的问题。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非常震惊的发现基督教在远东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太过缓慢，我很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的个人看法又是什么。

总领事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谈论到，作为一个一般信徒，他饶有兴趣地发现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为不同。前者是支持，而后者是反对。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的工作少一些神学色彩，而多注重实际，多关注社会问题，他们才能扩大影响力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斯布雷格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施教传道就是个错误。他们的工作应该有传递性，从一处到另一处，通过不断地离开和到来，才能在日本民众中传播循环基督教真理，这样，基督教的发展进程才能真正得以改善。"

洛宜德教授说，那些传道士们的对当地宗教和各个教派的忽略无知造成了基督教在日本缓慢发展的现状。其他人并没有打算承认基督教发展缓慢这个事实，他们的评论中或多或少有些自我解嘲的成分，内容也并不见得能彰显什么独到之处的。在快要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今天一席讨论，受益匪浅，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啊。"

几天之后，我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孔子思想儒学的讲座。演讲尾声，洛宜德教授特地示意我呼吁听众们，认真地比较研究各种宗教的特点。他觉得这样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热衷于两本有趣的佛教书籍的研读：一本是《莠草中的麦子》，一本是《半个日本的信条》。

3.日本引进佛教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对于大乘佛教其他方面研究的重要性，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大乘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并对日本随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天皇得知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朝鲜的，就派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作为求佛使者来到中国，对佛教做进一步的研究。弘法大师可谓是日本的路德了。使团分乘三只帆船，并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一只船途中遭遇台风，另两只船也不幸走散，他们都唯恐其他船只已经遇难了。一路坎坷，艰苦跋涉，最后，三只船竟然都抵达了中国海岸，并顺利前往中国首都。在首都，他们发现居住在那儿的基督教徒、佛

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们多达三万人以上。

随同弘法大师一起出使中国的等一大师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专程去那里寻找这部非同寻常之作——《莲花经》。这部经典功德之作被认为超过所有其他经书。并且，和其他经书不同的是，它不是从陆路而是通过海运被带回到中国来的，可能还是从埃及传进来的。所经的这条海路也是有史可依的。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Adams）的著作《新帝国》中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的三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到公元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航路已经十分频繁了。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入日本之后，它便成为日本佛教中最重要的经典。时至今日，仍然是流行最广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的宗教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宗教或教派的发展，而是一种求得在整个远东地区——若不是整个亚洲的话——不断发展壮大的宗教发展。

4.戈登夫人的研究

这个时期，戈登夫人（E.A.Gordon）居住在东京。她曾经帮助过阿奇博尔德·利特尔（Archibald Little）夫人和博西。邦廷爵士从图书馆中搜集最好的英语文学类图书，提供给我们的豪侠联盟使用。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官方。统治者非常高兴，并特地修建了一座建筑来收藏这些书籍。戈登夫人很想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到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了一本日文译本的《莲花经》给我，这个版本里还附有一个关于教义的中文摘要。读了之后，我感叹于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同时，也震惊于它与《圣约翰福音》是如此的相似。

第二年夏天，我去了宫崎，在那我又一次遇见了戈登夫人。我便在此开始了《莲花经》的翻译工作。戈登夫人早先在上面已经做了一些注释。我讲述了一次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派对给戈登夫人听，并建议她如果能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并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

慢的原因的话，那将非常有收获。戈登夫人就照我说的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左右。出席者都鲜明地指出，传教士们不了解日本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因此他们没有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的认可，而那些人本来应该非常欢迎基督教的到来的。听到此，我前所未有的强烈感觉到，要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赢得远东的民众，并扎根于此，研究当地的宗教显得尤为重要。

戈登夫人就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教派的研究中去了，并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花经注》等书。在第一本书里她提到了西安的基督教派纪念碑，也涉及了日本的宗教传统跟基督教是多么的相似。她认为，基督教纪念碑是由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在公元九世纪出使中国时带入日本的。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郎（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了一份佛教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之前，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一直恶意攻击，还造成过激烈的冲突，但自从戈登夫人在书中有史可依的描述出现在他们面前后，日本佛教徒们很感动，于是从中国山西府弄来基督教派碑的复制品，把它立在高野山——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空海大师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非常简朴，通往坟墓的通道两边矗立着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通道两边还埋葬着千千万万有名望的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希望有朝一日，传教大师复活了，可以将他们一起复活。

5.访问高野山

在访问高野山时，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翻译了两本标准佛教经典著作《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来拜访了我，希望我能在计划停留的四天里每天能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

我演讲的题目分别如下：

（1）世界各国的宗教；

（2）世界的文明；

（3）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

（4）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责任。

讲座做完之后，全校师生一致向我表示感谢。在离开高野山之前，我去拜访了至高无上的大方丈，并且问他在真正的宗教复兴中，他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肯定的给了我真诚的答复，并阐述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佛教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超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所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精神的超度，更追求普度众生。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送了我好长一程路，途中他提到希望我能寄送一部《圣经》给他，他将放置于图书馆内供学生们参阅使用。一回到上海，我便给他寄了一部去。

这种新出现的对于佛教态度有所好转并非单方面的。高野山那所佛学院里的一名学生之前曾翻译并出版过托尔斯泰写的语言故事。几年之后呢，一个名为岩下的佛教徒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共同性，并就此给东京的佛教徒们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其他僧侣们最初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排斥，但渐渐的，随着了解的加深，他们态度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前来听他讲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后来这位僧侣为了能进一步习得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专门到上海来拜访我，并在我这里研习了两个月。

6.基督教与佛教在仪式上的相似之处

日本第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建立在古都奈良附近的法隆寺。走进其中一座庙宇，人们一定会惊叹于那栩栩如生的恰似《启示录》中描绘的“四兽围绕宝座”的画像。走进另一座庙宇的殿堂，佛陀被描绘为医治百病的神医，正在为苦难的众生治病超度。还有一座庙宇里，释迦牟尼周围站着十二位全身装备精良的护卫将军，据说这十二位是他的门徒，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释迦牟尼站在耀眼的琉璃中，日月为他普洒光辉，在举行仪式时，庙里的僧侣们也是在空中画十字符号。

地处下关和神户正中的宫崎，是日本最神圣的一个岛屿。岛上有

一座闻名遐迩的庙宇，据说是著名的宗教改革推动者弘法大师所建。

刚从中国回国，弘法大师就致力于开展各个教派团结统一的工作了，并致力于引进了他在中国寻找到的他个人认为最好的宗教。在坐落在宫崎的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弘法大师亲手点燃了圣火，圣火一直燃烧着，直至今日。在这座山的脚下，就是洗礼的地方。在得到允许后，我才得以进入内部参观。我在那里看到一件举行洗礼仪式时才穿的华丽的丝质袈裟。日本佛教直到现在还留存着洗礼的仪式。当我向一个僧侣讲述我在西方看到的洗礼仪式时，他极为感兴趣。我看到在另一座大庙里，僧侣们正在诵经。看到这些场面，我不禁想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在一个大堂里，我看到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儿女们正双膝跪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一个僧侣端上一盘子糕点和一些酒来到他们面前，一家人便吃掉糕点喝掉了酒，僧侣退回到祭台旁边的座位上。在过节时，这种看似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神道教的弥撒或圣餐的仪式将会持续一整天。看到了这一切的场面后，我就不可避免地联想起基督教教堂里举行的仪式。因为尽管这些仪式外在形式上有所区别，然而蕴藏在其中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7.参观朝鲜佛教寺庙

大乘佛教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鉴于此，1913年，我专程去了一趟南朝鲜，是为了研究那里的几座佛家寺庙。朝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佛寺坐落在南朝鲜的通道寺，距离釜山不太远。寺庙里的墙壁上绘有一幅“灵魂之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观音和释迦牟尼在显眼的位置，而由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则被绘在了一个花瓶上。

在参观了一些寺院之后，有一座庙不得不被提及一下，那就是坐落在新罗王国的故都东行半日方可到达的一处依偎着山洞修建而成的寺庙。据传，这座庙宇是在一位漂洋过海来到朝鲜的黑人僧侣的倡导

下修建而成的。在他的指导下，朝鲜人学会了捧香礼佛的礼仪。传说中朝鲜国王有一个女儿，得了一种怪病，全国上下没有能人能够治好她的病。黑和尚闻讯而来给公主治病了，国王郑重承诺，如果能治好，他将修建一座寺庙，并塑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在庙里，以此来感谢黑和尚并表示对其所信奉的佛教的敬意。结果和尚真的把公主的病治好了。于是国王派人从中国专门请来了建筑庙宇的专家来兴建这座佛家寺庙。中国的这些建筑师们以精湛的技术，全身心的投入到建造中，几经数载，终于把庙给修成了。

至今人们仍然能欣赏到这座佛寺，这简直可以称之为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因为庙里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中央大佛像，这座庙成为远东地区别具特色的仅有的几座佛寺之一，闻名遐迩。一位芝加哥的建筑设计师认为，著名的卡玛库拉的杰作就是由此模仿照搬而来的。

8.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不仅佛教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神道教与基督教之间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假设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导致日本天王统治的灭绝，在日本民众心目中还有分支和天王同样神圣并沿袭于天王的统治。这个支系的领导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他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日本人认为，属于天皇的神社是最神圣的，除此之外，就是伊斯摩的神社，它在帝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于1908年夏参观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庙。作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能受到如此神圣崇高的大祭主的接见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还派了个宫司带着我的几个外国朋友和我参观了一周并做了讲解。在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复制木钻，据说是古人用来钻木取火用的。还是那间房，里面还有一件宝贝，是一幅佩戴长剑的古代天神像，据说他就是神道教大祭主的祖系。参观完神社之后不久，我拜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Lafcadio Hearn）对伊斯摩神教的描述。就在几年前，此人作为首位拜访首席大祭主的外国人曾去做过专访。

我很好奇地注意到神道教举行的膜拜仪式中到处都能看到古老的犹太人拍手的习俗。一年中某个特定的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到这里膜拜神社，参加过这样巨大规模的人说，那浩大的场面，如雷的拍手声就像瀑布的轰鸣声。在举行拍手礼仪式时，大祭主身穿纯白色的法衣，场面非常庄严。神社一般都是建立成三排，有两进院落的建筑里，其门都是用草帘或布帘隔着的。在各个院落里，或是石制或青铜的水槽或是漂亮的黄铜盆（朝拜之前用来洗手的）。《旧约·诗篇·第24章》里说：“只有那些双眼和心灵都洁净无埃的人，才能站在他的圣所。”

9.出使天国

我在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深深感觉到了里面所蕴含着基督教哲学基础。翻译工作一直进行到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这部书。这本书里的取经使者——师傅，是一个有浓重基督教色彩的人物，他一路救苦救难，在这个使团的途中，他起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每个徒弟成员转变的关键所在。经过他的点化，那只高傲自负浑身本领的猴子转变成一位虔诚的忏悔者，他的聪明才智才得以充分发挥；那个品位低俗而有贪图享乐的猪后来变得乐于奉献自我；那个自大的水怪变得谦逊；就连一条愚昧的小白龙也转变成有用之才了。

每个徒弟都用自己的生命来普度众生，最后都修得德行被佛国接纳，并得到佛祖的恩赐。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追求的与基督教徒在中国所做的事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把这个思想为所有民众所感，还须假以时日。

10.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我的读者们对于听说日本的一些著名政治家们对宗教的态度这个方面可能会大感兴趣。

1908年1月，对于我所拟定的建立十强国联盟的方案，我同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专门会谈。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亲切会谈，在我起身告辞时，他一边打开一扇门一边对我说："你也许会对这间房间感兴趣。"我们便进了这个很大的房间，但里面除了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

公爵告诉我，这里是起草日本宪法的地方。天皇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内阁，他们每隔半个月在此碰一次面，来商讨制定宪法的纲要。每次天皇实际上都是参加的，只是他本人坐在另一间相通的房间，旁听他们讨论的每句话。

"这可真是件大事啊！"我感慨道，并问他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说，或许他们在讨论到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进行的讨论是最激烈的。进而他又告诉我一些官员原本是反对这一提案的，他是怎样一步步让他们赞同的。在成功处理这个大难题的过程中，他的策略和技巧可见一斑。他描述道，在他第一次提出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议案时，其中一个内阁成员黑着脸决绝地表态，他将永不会同意这项议案，而有一位内阁却选择支持他。

看到这两个人坚决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随即表示当天不再继续讨论此议案。并表示，在下次开会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给大家作进一步的思考，他也会再补充提供一些理由。公爵说宗教自由问题已困扰他多年了。在与会维也纳会议时，他曾与一位博士就此话题进行了探讨。一席谈后他有了顿悟：如果一个民族反对宗教自由，会导致不同宗教间时有冲突。时间长了，便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不和甚至导致内战，而窝里斗势必削弱一个民族的综合国力，到时，强国必将乘虚而入，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沦陷。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了保证，不同教派的宗教徒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就会忠于当政者的统治，国泰民安，各行各业各教派之间只会在有益的事务上相互竞争，这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发展和加强，最终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伊藤公爵指出，现如今，内阁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贯彻一种政

策来保障国家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还是选择一条会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导致国家走上毁灭的道路。当再次相聚在内阁，他询问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进一步思量上次他所提出的宗教自由的议案。之前带头反对的那个人说："从上次内阁会议到现在，这段时间我除了日日夜夜反复的斟酌此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去做，最终我的结论是：我们还是最好先试试再说。"另一个反对者也随之附议。这项条款就这样一致通过了。

内阁成员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商榷，最终拟定出了令人满意的日本宪法。天皇把这间内阁开会的屋子赠予了伊藤公爵成为他的私人住所。

11.大隈重信伯爵

大隈重信伯爵是新日本另一位杰出的开创者。他见多识广，思维宽泛，心胸开阔，整整要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先进了一代人。其人卓越之处体现在：他不仅希望日本能繁荣富强（这是所有热爱祖国的人的最高目标），他同时也期望所有的民族都能够繁荣富强。

改革初期，一起共事的人一致公认他的才能就推荐他为外事部长。任职期间，他大力倡导并推动对外贸易，从原来的只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发展到了开放整个国家。保守派们几乎难以相信眼前的改革，更加难以忍受这样大刀阔斧的力度，于是他们决定秘密干掉这个人。有一天早上，他在去外事部上班的途中，有人向他的马车里投掷了一枚炸弹，炸飞了他的一条腿，但他却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了，至此，他只能靠假肢行走了。

后来，由于内阁成员频频阻挠，导致他的改革无法及时得到实施，这样渐渐挫败了他的信心。最后，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从此之后，潜心致力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立大学。他怀想着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育这所学校的学生，这样，等他们完成学业后便能够真正把他一直主张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筹建的这所大学的学生数量超过了公

立大学招收的学生数量，高达七万多人。

1908年1月，我又一次访问日本。这一次来到大隈重信筹建的大学，我发现有七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我应邀为学生们做了一个讲座。我感到大家对我讲的内容表现出真挚的热忱，从阵阵喝彩声中，我觉得大家都深深认同我的观点。我告诫他们，现在一心完成学业，不要想着回国去参加政治活动，否者于国于己都将毫无益处。

讲座结束后，公爵约了几位教授和我一起到不远处他的住所进一步交谈。谈话期间，我了解到他已经把宗教研究的比较引进他的大学课堂，就问他日本政府会不会也有可能性把类似的课程引进到公立中学中去呢。在教育这个领域，无论日本有什么动作，中国都会跟着模仿。如果宗教比教研究的课程被引进到中国大学课堂，中国政府和基督教会将会达成更好的理解。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只对日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做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从中国来到日本，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因此各地的大名们都开始信奉儒教了。后来，当佛教被引进到日本时，大名们追随天皇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大兴土木，修建宗教庙宇。

最后，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宜上，我们这个国家主要还是追随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的。”他还是想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2.北京的日本银行里的一次晚宴

1910年，我去参加爱丁堡大会，沿途经过北京。横滨金正银行的经理邀请了老兵马丁教授和我一起参加在他家举行的晚宴。他还邀请了当时日本公使馆成员，两三名记者，和一名北京一所日本教堂里的牧师。用完膳，我们来到一间画室，一起进来的还有几名日本女士。在一位女士手风琴的伴奏下，牧师先是唱了一首神曲，唱完后就开始祈祷。

马丁教授跟我们交流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所见所闻。我后来也和大家就基督教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佛教后来发展出来的一

个新派别，在日本占宗教的主导地位）的关系作了交流。记者对于我们的发言作了很高评价。晚会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宣告结束。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更受益匪浅，这是北京的任何一家其他银行都举行不了的。

第二十章　晚年时光

1.访问朝鲜

1908年的冬天，我对朝鲜进行了访问。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译者：今已译为首尔）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楼，日韩双方的主要政治家和公务人员都答应出席该大楼的正式剪彩启用仪式。我也受到了日韩两方的邀请出席此次活动，并帮忙处理一些火上浇油的棘手事情。庆典一共举办了三天，第一天的出席对象主要是基督徒，第二天出席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们，而第三天的出席则主要是政府高官。我每天都要在庆典上发言。第三天，当我在伊藤公爵讲完话之后，准备坐下来开讲时，椅子却被机灵的朝鲜基督徒郧素和给抽走了。

在演讲中，我第一次对朝鲜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遭受的压迫表示了同情。我告诉他们，这令我想起了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大片土地，那里除了盐碱之外万物不生。种地的人们因为无法承担附着在土地上的税负，不得不抛荒。但是有一天，黄河决堤泛滥，淹没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无数的人们也被淹死。但当洪水退去的时候，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极其肥沃的土壤，那曾经一文不值的荒芜之地，现在却变成了无价之宝。

“而这意味着，”我说，“此刻，当你们似乎明显地感觉到遭受苦难和失去国家的时候，其实你们也遇到了巨大的机遇。当你们长时间地被日本保护时，任何外国势力将不敢再来侵犯。伊藤公爵是连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请他当顾问的人，如今已是你们的顾问了。如果你们能好好利用接下来的二十年，你们将成为新的人民，新的民族，发展潜力无限。到那时候，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将你们的不幸转变为伟大的祝福！”

在我离开汉城的头一天晚上，伊藤公爵邀请了日韩双方的政要和一些外国人参加晚宴。在宴会接近尾声时，他作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传教士式的讲话，这是我此生闻所未闻的。他在讲话中说道，天皇派遣他环游世界，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国家，并努力学习对日本有用的东西。

漂流海外期间，他认为学到了三个伟大的经验：第一条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它的人民持续改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算是繁荣昌盛的国度；第二条是，如果没有一种伦理道德作为支柱，人民的财富和社会的繁荣便不会长久；第三条是，在有伦理道德作为支柱的国家中，其背后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此，他希望传教士们可以把他看作宗教的支持者和同志。

这是我听到这位亚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最后话语。之后不久，他便死在了一个刺客的手里。

2.孙逸仙（孙中山）的早期生涯



青年孙中山像，李提摩太曾经力劝其勿轻易革命

孙逸仙博士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负责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的皈依者，隶属于伦敦传道会。他毕业于香港西医学校，开始是在澳门行医，后来又在广州成为一位活跃的革命家。但是由于反清密谋东窗事发，他流亡于日本和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期间，被诱捕并囚禁在位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内好些日子。后来，他在康特利博士的营救下

被释放。

不久之后，他来到我下榻在伦敦的旅馆拜访我，并对我为中国的赈灾和文化事业所作的事情表示感谢。他夸张地痛斥满族人的暴政和贪腐，宣称他们都是很恶劣的。他的主张是，汉族人急需取代满族人的政权以自立，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指出他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应该会发现，在满族人的官员之中，既有杰出的，也有卑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若只是简单地从满族人手中转换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对政府的权力中枢进行某些根本性地变革，那么这种权力的转换将是徒劳的。这就好比一枚已经锈蚀的钱币，你把它反过来放，它照旧是一枚锈蚀的钱币一样。我的观点是：中国所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但是孙已经不能被劝阻，从革命的道路上回头了，他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用来传播革命的理论了。

回到中国后不久，我访问了南方的一些港口，并给其他传教士们作了些演讲，告诉他们文化工作的必要性。在香港，我遇到了改良派霍凯。他十个非常有趣的人，和康有为很熟悉。他看过康有为著作的手稿，并给康提出过很多自己的观点。后来这些观点出现在康有为变法时，呈报给皇帝的奏折中。霍凯曾经忠告孙逸仙不要倡导反叛，而是“宣扬自由的福音”。

1900年，当我取道日本回美国的途中，得知孙博士就住在横滨。我去拜访他时，发现他正专注于制定推翻满清统治的计划。他宣称，满清统治者绝不会改变他们的暴政，除了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他已经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提倡革命了——纯粹而简单。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已经产生了分歧，因为我所坚信的是，可以用文化的力量来启蒙政府。我看得出，他对伦敦的满清政府公使馆关押他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从那以后，孙博士拜访了住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岛的华人，向他们募集资金用来支持革命。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汉族人王国，但是法国并没有把他的提

议听进去。

他于是将指挥部放在了日本，那儿大约有一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探索日本超越中国的秘密。当掌握了一些粗浅的知识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返回了各自的省份，号召本省人起来反抗清廷的统治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1908年11月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光绪皇帝的哥哥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而他（醇亲王）的小儿子则被立为新皇帝。除了在日本努力筹备之外，孙博士还与远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这些后来者们，在对政府的管理艺术的学习上，与孙博士对于汉族人和满族人统治的相对性的认识上，都存在认知方面的缺陷，但他们都认为“共和”可以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成功，就像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政体一样。因此他们的呼声高涨：“让我们走向共和！”在所有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和他们国内的朋友们都做好了行动准备之际，一面共和国的旗帜在芝加哥被制作了出来。对于那些甘愿攻击任何中国政府官员或者被劝导后愿意皈依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诺他们以高官厚爵。

3.爆发革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随即蔓延至其他无数政治中心。清廷官员端方刚履新四川总督，就被残忍地谋杀了。10月22日，可怕的流血杀戮降临陕西省治所西安府，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无论男女老幼均被屠杀。太原府——这座满族人居住的城市城门大开，为想要逃离的避难者们提供帮助。在福州、杭州、南京以及其他城市，很多满族人遭到了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便由满清帝国变成了共和国。



袁世凯像，李提摩太盛赞其才干

12月初，摄政王代表他的作为皇帝的小儿子，向隆裕皇太后呈递

了退位诏书。她接受了诏书，并将所有政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革命的第一声枪响时，孙博士尚在英国，但他很快就回到了祖国。在12月于南京召开的共和议会上，来自十四个省的代表共同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袁世凯为总理。但三个月之后，孙博士便辞去职务，并支持袁世凯接任。孙被任命为铁路交通总长，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计划开始酝酿。

但从孙博士那里得到有利可图职位的民国新官员们，大多数人不仅被证明是无能之辈，甚至贪污腐化得比满清官员还要严重。这将整个国家带入了混乱的局面。各省都有匪帮流窜，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面对如此混乱，一些省份企图建立独立的政府。袁世凯对此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他任命了一个在德国受过训的满族人荫昌为讨逆大臣，并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军队改革需要大量的政府资金，于是袁世凯决定大举外债，但孙逸仙以总统违反宪法之名提出抗议，原因是袁世凯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会见孙博士，并规劝他不要将他的抗议书宣扬到海外。因为袁现在作为民国政府首脑，民众应该给予他信任，而不是干扰他执行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国家强大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的时候，他正在阅读他的抗议书的样稿。他将样稿递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请求他不要公开发布抗议书，但是他听不进我的劝告。

一些革命党人在他们短暂而又声名狼藉的官位上，攫取了数百万两的白银。1913年，他们在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反叛之后便流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隐匿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正在密谋着另一场革命。

4.袁世凯的举措

袁世凯坚定地利用强大的武力来抑制各省的混乱局面，并邀请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维新派领袖们回国。康有为一开始并未接受邀请，但最后还是回国了，不过他拒绝接受任何职务。梁启超回国后则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我再一次见到袁世凯，是在1913年冬季的北

京。那时他正在为志在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延请英文女教师一事而烦恼。我向他推荐了波顿·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舰队司令的女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同一次会面中，康有为谈及了他关于上帝的父亲身份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仰，并认为终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组成同一个政府）。尽管民国政府另有教育总长，但实际情况却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北京大学以外，各省都缺乏足够的大学来训练中国的学生进行诸多最高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教育是民国最薄弱的一环，因为它已经被从尊奉了很多个时代的神坛高位上给拽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没有落实任何明智的政策。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是前清的一个翰林，这个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有害思想，并信奉军国主义的霸权理念。1914年，这个政府官员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认为除了他自己信奉的那一套以外，宗教已经不再为人民所需要。在我的这本书付梓印刷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结束了他动荡不安的一生，故而再作进一步的评论已经没有必要了。

5.与毛拉会面

1910年，我会见了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在交谈中我问他，出身伊斯兰教的政府官员，例如七十年代在南京遇刺的总督马新贻，是否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或者他们在仕途中更加遵循儒家的实践原则？他回答说，恐怕马总督作为一个儒教徒的成分要远远多于一名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采取的是类似于耶稣会的策略，即认为儒教是一种民间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当我问他伊斯兰学校是否还在教阿拉伯语，就像我在1875年发现时的那样。他回答道，教授阿拉伯语主要是针对神学专业的学生。有趣的是，在普通的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则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接受现代教育。

6.上海的宗教会议

1911年的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强烈的公共意见，那就是政府不仅在管理国家方面失败了，而且中国的本土宗教也失败了。维新派的领袖们在上海最大会议大厅里，召集了一次公众大会。李佳白博士和我以及中国的一些演说家被邀请在会上演讲。大厅的地板上坐满了男人，而走廊里则挤满了女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人们连大厅的门都没有挤进来。当我们呼吁中国改革宗教和其他社会事务时，获得了听众们最诚挚的反响。

在这之后，佛教徒和道教徒们就在他们的庙宇中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相同的话题。李佳白博士、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经常受到他们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晚宴和餐后的会议。那时候，有一位从老家江西来到上海的道教长经常与我碰面。还有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也常常来我家与我谈论宗教问题，直至深夜还意犹未尽。因此，在中国各地重建宗教的公共意见愈发变得有普遍性。

但是，当欧洲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我们觉得最好中止在李佳白的国际性协会中继续举办会议。

7.在山东召开的英国浸信会大会

1912年秋天，在中国的英国浸信会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大会，十三名代表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地点选在了山东的青州府，这里是我在近四十年前开始浸信会工作的地方。这次大会对于我们每个传教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励与鼓舞。此次宗教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收到了青州城里非基督徒们的一项请求，他们想申请一笔借款来举办一次公共集会，用以表达对基督教会所带来的每一项改革的感恩之情。有超过一千人聚集在大会上，他们中有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有社区各阶层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族人。有一队士兵维持秩序，以免会场因热烈共鸣的气氛而失控。形形色色的官员们都讲了话，其中一位还朗诵了一首专门为这次盛大集会而创作的

诗歌。这是一次最令人愉快的场合了！

1913年8月，在我翻译《西游记》这部著名的寓言和史诗般的作品时，我非常渴望探访一下此书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各种各样的道观里居住过。要去这些道观，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途径青岛。1913年的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文明中心，当时正处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承载着很多道观的崂山非常有名气，它在道教徒心目中的地位，和浙江的天台山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显赫。据说一代伟大帝王秦始皇曾到崂山寻找长生不老药。为了纪念皇帝的这次来访，在崂山道观之首的泰清宫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人们勒石以记。

很多道观分散于崂山之上，但是它们与天台山的佛教寺院相比，无论在建筑外观的美感上，还是在本教杰出人物的雕塑表现力方面都远远不如。这些道观看起来更像是间间农舍，相距十几里分散而立。除了华严寺属于佛教寺院外，其他的都是道观。

在靠近青岛的崂山之巅，有一个名叫“梅克伦堡”的疗养院，德国人经常去那里。其他国家的人去那里住的开销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里逗留了几晚。白天我参观附近的道观并阅读里面的宗教典籍，但这些道观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去参观崂山的首席道观——泰清宫，而泰清宫的道长则掌管着山上所有的道观。泰清宫距我有点遥远，道阻且长、酷暑难当，一天之内根本无法到达，于是我选择乘坐一顶轿子前往。去那里时是8月的最后一天，尽管有轿子的保护，但很高的气温仍然把我手背上的皮给热塌掉了。

黄昏时分，我首先抵达了佛教的华严寺。从它的建筑规模来判断，它曾经一度香火鼎盛，但如今它风光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在这里住了一宿，而枕头是一截木头。我没有见到华严寺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们都被地方官吏捉拿去了，原因是有人告发他们吸食鸦片。寺里的佛教经典因无人照料，多为老鼠所啃并落满灰尘，但《莲华经》因受人关注而保存较好。

8.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起伏不平铺满碎石的道路开始了通向泰清宫的行程。道长正好在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西游记》，并且渴望在作品出版发行之前，来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领着我来到一个安静的庭院里，并向我展示了一个小的封闭的研究室。那儿存满了道教书籍，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宗教和教育，我们长谈许久，在这些话题上他所阐述的观点，对我启迪颇深。他认为佛教徒和道教徒被要求的独身生活不应该继续下去，教徒们还应该被授予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知识。

泰清宫有十二个院子组成，每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居住的屋子。这里共有一百多个道士和一些劳工，后者在道观拥有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大约五六里外的山地间有一个小村落。那里的村民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土地可供耕种，无法想象他们是依靠什么生活的。每天退潮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妇女和小孩路过泰清宫的大门去海滩，捡拾牡蛎、玉黍螺和其他贝类。还有一些人会到泰清宫讨要一碗小米稀粥，来填补他们的辘辘饥肠。

当我赞扬道长的慈善义举时，他说道："与你近四十年前，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作出的赈灾贡献相比，我现在所做的不值一提。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当时正好在重灾区青州府，他把对你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相比，我们道观要富裕一些，如果我对于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们袖手旁观，那我简直就是铁石心肠了！"

9.乘坐木筏返回青岛

在我获得了所需要的所有资料以后，我便开始打听返回青岛的最佳捷径，因为我可不想把来时的炎热苦楚再经历一遍。道长告诉我可以选择木筏，这儿经常有装载着山草和木头的木筏，穿越海湾到青岛。一天早晨，我和道长一起下山来到港口探听情况，正巧遇到当天下午2点将有一个木筏顺着海流去青岛。道长作了安排，让他们把我

当做旅客给捎上。午饭过后，厨师又为我准备了一些刚出笼的馒头带着路上吃，随后我们就来到了港口。共有六位年老的道士为我送行，并在港口与我依依惜别。

木筏上装满了山草和木头，有二十几英尺那么高。我借助梯子向上爬了一段，然后又借助绳子爬到了顶上。在“柔软的床上”，大海和天空的美景一览无遗。晚上10点，木筏工们开始吃饭休息。我整晚都躺在以前从未躺过的如此之厚的草木垛床垫上，仰望满天繁星。在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风平浪静的旅程抵达了终点，第二天黎明，青岛出现在眼前。对于这个轻松舒适的返程之旅我感到非常开心，于是多付了木筏工们所期望得到的旅费，他们非常满意。

在青岛，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尔默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税务专员。他对于我们广学会倾力提供合适的文化书籍，以帮助中国进步的事业充满了兴趣。他在参观了我的同事怀特莱特先生在济南府建立的精美的博物馆之后，正仿效其在青岛建立一个类似的博物馆，欲收集和展览山东省的重要文物。奥尔默先生嘱托我帮助他为其图书馆搜集最好的中文书。

10.湖南省会长沙

很多年以来，湖南是清帝国最排外的省份。对于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就出自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汉的官员写的一部作品，其中的造谣中伤之词遍布于官方文献《经世文编》里面。在他的书里，他威胁道，如果有哪个外国人胆敢进入湖南省，将被碎尸万段并被众人分而食之。十九世纪早起，长江流域发生了多起排外暴乱，与周汉书籍的谬种流传有很大关系。不管怎样，随着后来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先前的敌意逐渐消解了。

1896年，广学会最知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改革派的学院邀请去开讲座。湖南还在戊戌变法中起到了带头作用。1898年变法失败后，一

名湖南籍变法官员身首异处，其余四个维新派领袖也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光绪皇帝的。因为这次过错，湖南巡抚被革职终身。另一位受到惩处的改革者是湖南学政，他被谪贬，终身不能升迁。对改革者的同情激起了人们对外国人的友好，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开展。1901年，湖南有了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大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一直非常显赫，他们的一些家族成员已经转化为基督徒，并在长沙市的基督教工作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11.1914年的出行

这次长沙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联合福音会的杜卜思博士新开办的教堂道喜。我于1914年6月抵达那里。此时的长沙和湖南其他一些城市正遭受着可怕的洪水，而我登陆地方的受灾之严重程度此生未见。入城街道的水位有三英尺高，男人们涉水推着小船沿着街道行走。商行和商店的底层已浸没于水中，人们只能生活在楼上。妇女和孩子们从那儿向下望去，只见苦力或行人扛着或背着他们的包裹艰难前行。

登陆后行进的第一个五十码，我们乘坐在船里，接下来我们改坐黄包车，而车轮却深陷在水中。更远些时，我又乘坐一顶轿子进入到城里面。当我乘船离开长沙时，洪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经过城门时，人们一抬手便可碰到城门洞的顶子。这的确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个晚上，有几个有趣的人士被邀请来与我会面。其中，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先生的外孙；华伦斯先生则隶属于卫斯理会。聂先生的父亲担任过上海道台，后来又升任浙江巡抚（参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他统治着大约两百万人口。他的哥哥在北京任民国的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会了湖南总督、内务部长和教育厅长以及各种教会的头面人物——比如卫斯理会、耶鲁大学会、中

国内地会、美国圣公会，他们对我都非常的热情。

12.与佛教徒和教育工作者的交往

另一天，长沙最大佛教寺院的住持及一些和尚、俗家弟子前来拜访我。我提醒大家注意过去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基督徒倾向于谴责只虔诚于自己的立场的非基督徒，而非基督徒也易于诋毁基督徒。但对于那些对双方经典都熟悉的人来说，二者的理念有很多共通之处。在我的阐述结束之时，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将两部最重要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英文，从而让大家远离误解。他的口才雄辩滔滔令人信服。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这个寺院的住持邀请我进行一次参观。会面时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也在场，他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并在1895—1898年属于强学会的一员，因此他对我有所了解。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担任过贵州都督。他在佛教经典上的造诣很深厚。在讨论《金刚经》的时候，我请教他们如何理解第六章上面关于预言的段落（参见第十章）。吴先生和其他在座的和尚们都认为我对此作出的阐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力劝住持与和尚们重新探讨这段预言的意义，以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而精诚合作。

6月17日，教育厅长、公立大学和学校的校长以及一些编辑齐聚于教堂。这大约五百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看到他们的面孔我感到异常的高兴。聂先生主持这个会面活动，他张贴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大家祷告。赞美诗和主祷文都是用很大号的字写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唱念。根据赞美诗和主祷文的内容，我拟定下演讲的主题："你的天国正在降临"。

在演讲中，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派所追求的目标，与现在最优秀的人物所秉持的理想是不能相比的，尽管他们在学习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文化方面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识之士追求的不是军备的扩张并与他国开战，而在于促使先进民族的联合

以组建一个世界性的中央政府。我对这五百名教育工作者指出，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在所有国家的学校和大学里对学生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我呼吁他们，如果大家相信这个理想是对于全人类最有益处的一项事业，那么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站出来并努力践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都起身站了起来，以对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政府这个观点表示赞同。两个月之后，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另外有一天，教堂里坐满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在演讲中，我提到了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从事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恶俗中解放出来。我请她们保证制止这种恶俗的反复。我告诉她们有一份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的《妇女杂志》，旨在启蒙中国的妇女。

在另一个场合，我为六百个人作了一次演讲，他们中有牧师、福音传道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和小学校长。我向他们宣扬了完美教育的四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既知西方又知东方的教义；竖向学史，既知过去又知现代；博集广宇，对宇宙万物的常识有所知晓；专门研究，对于某些专科要努力成为专家）。

演讲结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走进了会客室。他是聂先生的表弟、曾国藩的孙子。会客室里大约有五十个人，他与他们交谈起来，详细阐述了我演讲中的观点。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独立教会的领导人。

还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发生在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中有一位很知名的电学权威，他曾经跟随端方的使团周游世界。在招待会上，我谈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中国摆脱混乱的唯一方法。同样，对于这个充满罪恶和战争的世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性的中央政府，才能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在中国开展的工作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此次长沙之行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中国过去两百多年来最声名显赫的家族的两位子孙，在他们的演说中传达了对我的善意。他们指出了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中国从事的所有工作的价值，这让我倍

受鼓舞。湖南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13.我的第二段婚姻

1914年8月，在经历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走进了婚姻。新娘叫埃塞尔·川博，她是一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她来自布里斯托尔一个知名的非国教信仰家庭，曾作为一个自费的医学传教士，为伦敦传道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近二十年。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赴爪哇岛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为了了解传教士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的确切情况。

我发现这片岛屿受到了八种不同文明的影响：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风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保存着，比如猎头风俗和土地公有制。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定居并宣告其归于己有，但离开的时候则要将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性居民。

爪哇岛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南部的殖民者大概有两万人。他们带来了大米种植的技术，也带来了印度教，伴随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崇拜。这些人在他们的殖民中心，即现在靠近日惹的地方建立起了寺庙。后来，信奉佛教的印度殖民者也来到这里。他们不相信种姓制度而信奉人类之间的兄弟之情，并在印度殖民中心婆罗浮屠附近居住。这两派印度人彼此和平共处，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印度人将两部著名史诗《摩诃摩罗多》和《罗摩衍那》翻译成了当地的卡维语。直到今天，这些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他们的历史剧之中。

第二十一章　我与和平运动

1.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多年以来，我对于能够促进和平的林林总总的方案都深感兴趣。甚至早在1879年，我就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关于组建世界性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将这个想法告知给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次与赴日和谈的使者张荫桓的会面中，与会者们向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而我的提议则是，中国应该谋求与其他强国的联合，组成一个全球性的仲裁法庭，或许可以用来终结国际战争和军国主义。在后来的1898年，张荫桓因支持维新派而被革职流放。

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了联系，我写了一本名为《王子们的和平联盟》的小册子。我的观点是，如今的君主们虽然一意孤行地奉行他们的既定政策，但是我希望新的理念能够比较容易地在年轻的王子们心中留下烙印。有朝一日他们继位掌权，也许能够对世界和平事业有所裨益。于是，我将小册子复印多本，寄给了欧洲所有有资格继承大位的储君们。威尔士王子给我回了信，有他的亲笔签名和赞同之语。在威尔士王子继承王位之后，被世人称为“和平使者爱德华”，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啊！

2.“人类的议会”

参加完1900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之后，我便去了波士顿。在那儿，我应邀为一个名为“二十世纪俱乐部”的组织举办一次演讲。随后，我又为经过遴选的一小群人作了主题为“人类的议会”的演讲。我的一个朋友伊利教授，就是和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一同组建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的人，催促我跟他一起去巴黎，并将我所研究的问题介绍给那些已经对“国际性组织”感兴趣的人们。在演讲中，我

提醒大家注意，由于所有国家对政治和工业方面都存有危险动荡的预期，结果导致了军备的不断增长和劳工问题的层出不穷。因此，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人类的议会”，所有国家都派代表参加。这个议会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让各国可以用法律的力量来消弭残暴的武力，能够为自然增长的人口提供供给，并且建立起进步的教育系统。事后，我还将这次的演讲稿分别邮寄给了在华盛顿、纽约以及波士顿的领袖人物们。

3.给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去日本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在与河野公爵的一次会见中，我提出了由十个领先的国家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十个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压迫另外的国家，或者当强国欺凌弱国以自肥的时候，强国的行径将受到联合政府军队的阻止及惩罚。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将削减军备。长此以往，最终将只有联合政府的海陆军被保留下来，用以维系世界的秩序。河野公爵认为，在列强们做好这样的联合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庆亲王

1904年5月，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目的是为了推动清政府的一些既定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想就由十个领先国家建立联合政府的事宜听听中国方面的意见。此时的那桐身兼外务部长和户部尚书两职。5月7日，我就这个问题专门与他会晤。那时日俄战争正酣，而中国存在着一部分国土被侵占的危险。如果中国可以加入由十大强国组成的联合政府，那么它的利益将受到保护。

5月14日，我将同样的方案呈报给外务部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有一打秘书像老鼠一样仔细倾听了我的汇报直到结束。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衷心赞同我的方案，但是他们对于这样宏大的方案由中国提出来深

表担心，他们想知道其他国家对于组建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持什么态度。考虑到重大事项的决断权在庆亲王的手里，他们建议我应该单独和庆亲王见一面。我还将方案呈报给了伍廷芳和孙家鼐，后者认为沙皇曾经也提议削减军备但没有被采纳，除非在我的方案中包含了互惠互利的原则。

5月22日，圣临节那天，我欲前往颐和园拜会庆亲王。1点之后，我小睡了片刻，就思忖着在即将到来的会面中如何洽谈。野外风光无限，路上车水马龙，这一方面是因为此路通向颐和园，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众多善男信女们前往妙峰山烧香拜佛的必经之路。

我问庆亲王，中国为下一次与外国人开战作了哪些准备。他对这个问题立刻有所警觉，并回答说他不希望与外国人开战。我接过话茬说道，良好的愿望并不能规避战争，但实际的行动却可以。于是我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呈报给了他。

庆亲王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后，认为这个方案看起来相当精彩，但他首先希望确认的是，其他国家是否能够欣然接受。他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首先提出这个方案的话会遭到冷遇。他的回答让我觉得这次的来访并非徒劳无功。

第二天，我就给身在海牙的国际法大会主席起草了一封电报，如果中国外务部觉得合适的话，此电报将通过其发出。电报的主题就是召集一次大会，并由有联盟想法及保障世界和平意愿的十个领先国家派遣代表出席。

5.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不久之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侯爵访问上海。他派遣了秘书来探访我，并就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某些政策咨询了我的意见。我借机询问这个秘书，西园寺侯爵对军国主义怎么看，并且我还向他概述了我曾向庆亲王提出过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个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两国开战，日本国民的税负增加了，西园寺侯爵对此深

为关切。他觉得侯爵一定会很乐意接受这个可以早日结束这场可怕战争的方案。但他又补充道，和我袒露心声是完全出自对于我的信任，故而在日俄战争尘埃落定之前，不能让公众得知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回答说，你尽管把心搁肚子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我绝对不会公开你的观点的。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那里得到了认同，于是我决定将其呈报给欧美和平协会，就此我踏上了归途。

我登上了一艘德国的游轮，在上面遇到了一位三十几岁年纪的土耳其王子。这位王子曾经在英国和德国接受过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起我的计划来。当他初次听到我的想法时，他嘲笑我简直是在痴人说梦。“每个国家现在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道，“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好在每一次的国际竞争中胜过其他国家。”

我告诉他，每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获得地球上更多土地的支配权，而通过联合，每一个政府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这种控制权。但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最终他承认，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扩张利益，还是对世界和平所带来的好处而言，我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案都是最好的。但是他又评论道，要想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个方案的益处，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同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美国的战地记者史丹利·沃什伯恩先生，他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的这个方案的要点并表示全力支持。他宣称这个方案将改变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并给全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红利。

6.卢塞恩的和平大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遇见我的朋友艾德文·米德先生。他是波士顿的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并且于1900年为我开具了介绍信，使我能够得以进入华府大门。此时，他正携妻前往在卢塞恩

举办的年度和平大会的途中，并且力邀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可以顺道去热那亚，并赶上德国游轮返回中国，我便欣然接受邀请并出席了和平大会。在会上，我发表了演说。我告诉与会者们，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会见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要，并在不久后还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经在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我则可以自由地公布会谈的内容。我告诉大家，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认为，如果我的方案能够被执行，那么侯爵将十分乐意日本加入这个联盟。

当我在会上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奥德萨市的代表举手示意，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和平大会组织成立以来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与会者们提议并一致通过，呼吁伯尔尼（译者：瑞士首都）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国际法会议召开之前提交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期间，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经验丰富的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创始人——冯·苏特纳男爵夫人。

7.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天，珀西·邦廷爵士带我去见万德尔勋爵，他是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万德尔勋爵提供了联合会的非常有趣的活动记录给我看。之后，珀西爵士大声说道："新闻界对于和平运动的毫不知情真是咄咄怪事！""这毫不奇怪，"万德尔勋爵答道，"因为新闻界对于和平运动的失声是达成共谋的。"

当我告诉万德尔勋爵，中国和日本对于加入联合政府的意愿，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如何在卢塞恩的和平大会上被接受时，他强烈建议我要取道美国返回中国，这样我就可以将这个方案呈递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当时，罗斯福总统因为斡旋日俄两方终使其和解以来，他便获得了世界性的威望。如果能够力劝罗斯福总统在海牙召开另一次和平大会，促使这个方案通过，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将毫无猜忌地全盘接纳。我接受了万德尔勋爵的建议，在返回中国的途中造

访了纽约。

8.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途中，我在船上遇到了巴罗达（译者：印度西部古杰拉特邦的一个城市，瓦多达拉1976年以前的旧称）的一个王公，我同他交谈了几回。他对于一切有利于和平与各国福祉的事情都充满了同情。

在1900年4月份，作为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的巴托尔德先生，曾为我写过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当抵达白宫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接见，而我则被立即带到了总统面前。但对于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他并未表示十分的赞同。当时，在美国的主要城市里面，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张海军的鼓吹宣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启动扩张军备的政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对于我的方案，罗斯福总统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他表示如果中国派遣特使来商讨此事，他将给予认真的考虑。这样的答复与我从英国的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里得到的简直如出一辙。

9.中国的态度变卦了

在1906年夏天一回到中国后，我便去了北京，向中国的外务部报告了英美两国的态度，并力图说服他们立马安排使节出使这两国。但是外务部的头头是个新人，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事情毫无兴趣，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因为过于胆怯，而未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但是在1907年于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上，中国的代表却出了风头。因为他问了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但被宣战国却不打算抵抗，那么结局会怎么样？

10.与伊藤公爵的会面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里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公爵位于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会了面。我告诉他此次来访的目的，是希望领先国家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能够让他产生兴趣。他怀着浓厚的兴致听我从头说到尾，并说这是他从未听到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些这个方案的书面材料，以使他能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他能接受我的这个方案，真是令人感到无比的喜悦。他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只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了点。

伊藤公爵的身材低于日本人的平均身高，但显得很敦实。他说起英语来不太流利，且每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似乎要掂量每一个词语的分量。

在他回国后的早期生涯，他急切地推动各项改革的步伐，其结果是招致了保守派的憎恨而一度被追杀。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在逃亡途中，有一个故事显得极不寻常。一次他躲进一间茶馆避难，并央求一位女店员将他藏起来。她移开了地上的一些木板，下面露出了一个盛放垃圾的洞。“赶快躲进垃圾箱里！”她说道。当他安全的藏在里面时，女店员便将木板复原，并将木炭火盆（一种盒子形状的火炉，上面用来烧开水）移至其上。追杀者们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女店员坐在木炭火盆旁边，就像她平常时一样神情自若。他们问她刚才进来的那个男人躲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他们说欢迎搜查。他们的搜查自然是徒劳的，于是便很快离开去别处搜捕了。为了感谢这位女店员的救命之恩，伊藤公爵娶她为妻，她就是现在的公爵夫人。这是他多么浪漫的婚姻故事啊！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十分友好得带我参观了官邸里的一个大厅。内阁成员定期在那里聚集，设计宪法的框架，对于宗教自由的条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在《大乘佛教》那个章节中介绍过这个故事）。

一些天后，日本和平协会的秘书鲍尔斯先生，带了十余位有名望

的日本人来探望我。其中，有日本驻巴西公使和帝国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我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了自己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11.卡耐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出席了于伦敦召开的和平协会年会并作了发言。恰好在同一天，卡耐基先生在伦敦市政厅里，当着众多的听众，发表了他著名的“和平演讲”。他宣称，塔夫脱总统主张，凡是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的国际争端，都要付诸国际仲裁，而不像迄今为止一直被遵循的风俗那样，国家的荣誉仅仅建立在对内事务的处理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他国家紧随其后，那么我们将在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明显的一大步。

次日，《晨报》就卡耐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并认为我“已经深入触及到了整个和平问题的根基”。

我在和平协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包含在了如下的文字之中：

让全球十个领先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交给由国际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去解决。保留一支海陆军，来确保最高法庭的裁决得到执行，从而保障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不愿意加入联盟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加入联盟的国家则实行自由贸易。

12.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弗先生附议，主张英美两国共同签署一份仲裁协定，用来规避将来二者发生战争。这是我们通向世界和平所迈出的坚实的一步。过去把国家荣誉建立在仅仅处理内部事务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国际仲裁决定未来的时代第一次到来了！

13.欧洲大战

在1907年召开的海牙和平大会上，并没有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那就是“强权是否代表真理”。伴随着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强权的道德性问题依然众说纷纭。

当看见几乎所有国家都深陷战争泥潭，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未来只有国际联盟才能消弭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为未来唯一确定能够避免战争的途径。我将宣传稿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国家的领袖人物们。当我开始写作它的时候，我发现我国的那些有思考力的头脑，比如爱伊特、罗兹·狄更斯、阿克顿勋爵，以及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曾经思考过同样的问题。英美的主要期刊都曾大力倡导过，要建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的不二法门。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是公共权力这个观点成为欧洲的主流政治理念。”而1915年9月，阿斯奎斯先生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在我们的视野可及的范围内最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的话意味着，“取代武力、取代野心角逐导致的冲突、取代狭隘的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政治平衡而确立起来的，是真正的欧洲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并被一种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是仅在欧洲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还远远不够。要想带来世界性的和平，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内。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即上帝是人类事务的最伟大的管理者。

译后记

沟通中外文化的宗教使者

陈义海

本书是晚清时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先生的回忆录，所记所写，是他作为一个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生活的光阴。本人长期从事着比较文学和宗教研究，对这位在晚近时代有功于中华的先生颇为熟悉，能够组织翻译他的作品，甚感愉悦。

读罢了李提摩太先生在中国风雨苍黄却异常丰富的一生，我不仅看到一名优秀传教士努力传教的身影，还能看到他在传教之外，兴办学校、赈灾济困、创办报纸、与佛教道教交往等等。比作为传教士更重要的，实质上他担当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尽管他穿着一件教袍，但却比任何一个嚷嚷着要改良中国的人做得都多。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认识极力回避文化沟通中宗教的作用，或者贬损之，或者丑化之。宗教在中外文学文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果不把宗教的因素考虑进去，跨文化研究便无从谈起。相应地，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到宗教在异质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则不仅能有效地认清人类文化的形成特点，同时更能确切地把握异质文化交流、对话的规律，进而获得文化间交往融合的方法之道。

英国文化哲学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道森（Christohper Dawson，1899—1970）在他的著作《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of Western Culture）中，突出强调了宗教与文化间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与欧洲民族特征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认为：“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

们流过各个时代，流过它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在他看来，宗教对社会的作用，远远甚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为的产物，是有意识的政治意向试图按照它的意图来塑造社会传统的工具”。而宗教信仰则“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更高的、更加广袤的实在境界”，而不是政权和经济所造就的“无常世界”。具体到欧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关系时，道森认为，“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与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以及高层次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会的和平社会”的两相融合，以及基督教的“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精神运动”的传教特点，使得欧洲民族在文化上获得了许多优势。

也就是说，道森把欧洲的民族特点和欧洲的强盛归功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归功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所带来的“具有创造力的新型才智和能力的发展”——这点是否属实？至少在李提摩太先生身上应验无疑。

因此在东西方跨文化的交流中，宗教同样能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使得各种文化由于宗教的活跃因子而产生“化合”反应。宗教，尤其是普世宗教，其特点就是要进行广泛传播（“外方传教”）；然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宗教本身得到了地理意义上的扩展，它在获得地理意义上的扩展的同时必然也带去并带回非常丰富的“副产品”：文化；有时，“副产品”甚至比“正产品”获得更显著的传播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异质文化系统间的非常活跃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历来就以“封闭”而著称，但它还是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撞击：汉末入华的佛教和明清之际传入的基督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会早已“尘埃落定”，并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而告终，以至学者们认为“不懂得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既是“一般过去时”，又是“现在进行时”。说它是“过去时”，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史的多个阶段，从唐代，经元代，到明清，再到鸦片战争之后，都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印痕。说它是“现在进行时”，是因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对话仍在继续，即当下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当今人们关注的“民

主”问题、“人权”问题、地区间冲突问题、东西方的价值观等问题，无不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克顿认为，“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同样，宗教也是跨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钥匙。

李提摩太先生终其一生的故事，正是锻造这把钥匙的质料之一。再度回溯这位先生的一生，让我这样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获益匪浅。当亲手组织翻译出他在光阴之外所记录下的历史风云，我深为这种心怀信仰而造功中华的使者而感动。在本书的最后，我要感谢统稿的陶林，感谢北京大学的杨虹帆、安宁两位博士的协助，感谢许海峰、陈述、张菊红、杨丹、李隽文、孙永林等提供的帮助。他们为使本书资料更翔实、翻译更精准所付出巨大的努力，使我颇能安心地把这部《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捧出，交给读者阅读。

[1]此语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上》15：22。

[2]译者注：差会是教会的一种宣教组织，可以差派宣教士去异地宣教，差会要负责宣教士的生活费用，宣教士要对差会负责，向差会汇报工作情况。

[3]“流奶与蜜”出自《旧约·出埃及记》三章十六节，用以形容神赐给亚伯拉罕后代的应许之地。

[4]“好土地”出自《新约·路加福音》，耶稣以好土地比喻听了福音作出良好回应的人。

[5]出自《新约·马太福音》10：23，此处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

[6]这句话乃是耶稣问其门徒的问题，见《新约·马可福音》8：29。

[7]此处“道”的原文为“the Word”，依照和合本《圣经》译为“道”，参见《约翰福音》1:1。

[8]哥尼流是非常虔诚的该撒利亚人，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非犹太人之一。参见《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

[9]此句出自《新约·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10]耶利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1667），英格兰基督教圣公会教士、著作家。曾在剑桥大学求学。《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1650）和《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1651）是他的两部代表性的作品。

[11]弗朗西斯·德·索尔斯（Francisde Sales，1567—1622），日内瓦大主教，死后被罗马追认为圣徒。他的《虔诚人生引论》（Introduction to Devout Life）是为教外民众或一般信徒所写的著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2]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耶稣派遣他的门徒们赴各地传教，并在他们行前进行了训导。

[13]原注：根据1876年底数据，我们共有62名领圣餐者，其中超过40人是属于烟台教会。（见1877年会议记录。）

[14]《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是1855年创刊于伦敦的一张报纸。

[15]《蓓尔美公报》（Pall Mall Budget）很可能是指1865年在伦敦创刊的报纸Pall Mall Gazette，怀疑李提摩太把Gazette写成了Budget。

[16]“按才受托的比喻”（the Parableof Talents）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14—29节。

[17]基督教来华百年宣教大会：1907年正值基督教首位传教士马礼逊来华100周年，基督教在华各宗派差会于4月25日至5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三届传教士大会——百年大会（前两届分别于1877年及1890年召开）。本次大会目的在于讨论百年来在华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适合中国社会的传教方针。当时在华传教士的总数达3833人，大会的出席者共1179人。会议最受关注的专题是“传教士问题”，这是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对民教纠纷等问题的反思。

[18]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是伦敦中心的历史城区伦敦市的首长——伦敦市市长的官邸，用于伦敦市一些正式仪式。于1739年到1752年间建造，为帕拉第奥式建筑。

[19]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德国传教士，汉学家、植物学家。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著有《儒教汇纂》、《中国宗教导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自西徂东》等书。

[20]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著有《中国论集》等。赫德长期居留北京，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为了纪念赫德，在中国一些地方有以他命名的道路，如北京赫德路（Rue Hart），上海赫德路（Hart Road，今静安区常德路），香港赫德道（Hart Avenue）。

[21]如果使肺处于膨胀的状态，并把嘴巴和鼻子捂住，这时再用力呼吸，心脏可能会一下子停止跳动。做这个实验是有风险的。（见赫胥黎《生理学初阶》第97页。）——原注

[22]译者注：事工是指基督教会的成员执行教会所任命的工作。部分的事工是针对教会内部的会友，其他的事工则是针对大众而预备的。参与事工，以基督徒的生命去帮助别人，是圣经之中所记载的使命之一。

[23]中英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以后。这个地方或者是李提摩太的笔误，或者另有所指。

[24]更确切地说，应是两江总督，当时总督府驻南京。

[25]即李提摩太的妻子，李姓之来源就是提摩太的本性Richard。

[26]即巴夏礼。——译者注。

[27]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译者注。

[28]即卫三畏。——译者注。

[29]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出使英法等国。——译者注。

[30]参见《万民归宗》（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第2卷第28页。

[31]即李提摩太的夫人，他姓理查德，故夫人随他的姓氏。在英语世界，常以姓氏直接称呼的方式表示对妻子的敬重。——译者注。

[32]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基督教文学社（苏格兰同文书会的附属机构）的成员，从一开始就是这项事工最忠实的支持者，每年捐赠达到数百英镑。

[33]更为中国人熟知的是他的中文名字：花之安。

[34]在当时采用的是一个更中国化的译名，《泰西新史概要》。——译者注。

[35]即强学会。——译者注。

[36]译者注：应该是两江总督，驻南京。

畅销近一个世纪的传记经典，史上最具争议的李鸿章传奇。



李鸿章回忆录

[美]曼尼克斯 著

韩利利 陶林 译

親歷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版权信息

李鸿章回忆录

著者：（美）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译者：韩利利　陶林

责任编辑：郝鹏

目录

版权信息
译序 晚清奇局中的李鸿章
原编者前言 关于本书——《李鸿章回忆录》
原序《李鸿章回忆录》的意义
第一章 从文的宏图伟志
第二章 关于基督教文明的观点
第三章 和戈登将军的交往
第四章 与慈禧太后的关系
第五章 在大饥荒时代
第六章 立志献身农业
第七章 反思中日甲午战争
第八章 戊戌变法前后
第九章 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
第十章 德意志纪行
第十一章 出访法国和英国
第十二章 穿越大西洋抵达纽约
第十三章 美利坚见闻
第十四章 手记中的小故事
第十五章 在义和拳危机中的作为
第十六章 辛丑剧变
第十七章 赴朝平叛
第十八章 割让台湾
第十九章 对于政要们的评价
第二十章 鸦片陋习和贸易
译后记
附录
返回总目录

译序　晚清奇局中的李鸿章

陶林

一部晚清史，或许就可以浓缩为一部李鸿章的个人回忆录。李鸿章出生在晚清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他个人的致仕与家族的发家，与晚清时代中国国运的盛衰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知李鸿章，则知晚清。



李鸿章的油画像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晚清其实很近。历史的轮廓与如今相形也并不差很远，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有时候，多多益乱，只因为太近，太多的眼皮子底下权变的干扰，反而让人有太多的误解。

李鸿章，是晚清时代之象征人物。凡是见李鸿章其人，或有文字

书其貌的，无不说其相貌堂堂，目光有神。就我们所见李鸿章遗留的相片，目光之炯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的确，在晚清时代的凋亡朝廷中，就眼力而言，李鸿章在昏鸦一片的官场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早年，他认准要靠读书出人头地，没有像很多平庸不堪的“官家衙内”们那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深得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读书之际，受父亲之命，拜师于曾国藩门下。曾国藩，是晚清时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君子，殊为严厉，对子弟读书做人的要求很高。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要超过他一生中任何一个人。曾国藩的眼量，几乎是整个晚清时代最高的一座峰，李鸿章投于他门下，得以登其峰而望，眼力的提升自然不同凡响。待太平军兴起时，李鸿章果断弃文从军，师法老师曾国藩，操办起淮军，保有绝对实力，也是对时局变迁的远见所系；等到掌握了国政大权，李鸿章清晰地看到自己“居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便全力操办洋务，努力搞“沟通外交”与“和谐外交”，渐渐有了世界文化潮流的眼力，已然是晚清时代一流中国官员的典型象征，也是晚清朝廷文化的亮点之一。

可惜，纵然目光如此炯然的李鸿章，在不断衰败的晚清时局中，终不免沦于老眼昏花，左右不能力支的境地。甚至都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糊裱匠”，仅仅勉强支撑应付罢了。成也有眼，败在无力，这是李鸿章的天命所系，也是他“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原因所系。

李鸿章究竟是何许人也？当年，在曾国藩的老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是一个喜欢赖床睡觉，怕开早会，眼高手低的幕僚；在恩师曾国藩眼中，李鸿章是个可造之才，但是“拼命喜欢做官”；在同阵营的宿敌左宗棠眼中，李鸿章是个聪明取巧，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能无力的十足废物，“十个法国将军，抵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在维新派政敌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自视甚高，但一步雷池不敢越过的老朽；甚至，在顶头上司慈禧眼中，纵然不断夸奖李鸿章有“再造玄黄”之功，但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聊起他时，也忍不住说：“（湘军）剩下的臣子，李鸿章这些也是好的，只是因循得多。”

显然，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以来并不十分待见这位前清的“一

等忠肃伯”。原因无他，此人位高势众，名大权重，但对中国近代史并未作出何等卓越的贡献。

晚清至今，中国的确居大变而不自觉。可很大部分人不过因为私利所驱，依然活在王朝轮回的宿命感观中。晚清，是一个即使没有外国干预，也逐步走向衰亡的时代。老态龙钟的王朝病，极为严重地困扰着那一整个时代。曾国藩的湘军本意欲“另起炉灶、重开世界”，阻止因文化的衰退导致的“文明的自杀”。由李鸿章继承这笔遗产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做到“重开世界”，反而越搞越糟，不堪重任，吐尽气血。

这一点，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看得更仔细。有日本学者指出，李鸿章是一员福将，他的眼力带着他跟随曾国藩走一条革新开化的开放道路。他的好运气、好“福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直伴随着他。李鸿章是旧体制的优等生，出身资源优渥的官僚家庭。早年，他少有挫折，平步青云，是步步受惠于父兄及师长。父亲李文安苦心孤诣，把他托付给身为同榜进士的大儒曾国藩。这一番托付，把李鸿章放到了命运的过山车上，直抵好运气的顶峰。他步步效仿恩师曾国藩，办团练，拉拢、利用外国雇佣军，打太平军，办洋务，像当代诸多“官二代”那样，什么好处都被他不费大力气地占尽了。这位文忠公，聪明异常，是天生做官向上爬、混人情场的高手。同等利益，别人要十分努力取得，他似乎都是得来不费功夫。可以说，“无有曾国藩就无李鸿章”，这是一点不为过的。

中年得志而俯瞰苍穹，李鸿章比同时代人有更好、更开阔的视野。他比许多人更深刻意识到中华的变局，但也比许多人更乐意抱着“宁守旧而死，不开新求活”的态度。所以说，李鸿章并不是历史大变局中的主角，或者用英文单词表达，“HERO”，一时之“英雄”。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者，创造时势也。”什么都准备好了，让你去做，不过一介“归命侯”而已。英雄，你要自己造天地的。所以说，对于历史，李鸿章是一个本不该赖得太久的过客，却伴随着晚清始终，硬生生在曾国藩夭折之后，赖成了舞台主角。

面对变局一定要有大眼量、大心胸和新道德，这些，李鸿章都不具备。他只知其变，不知其所以变，变成何。在历史的皱褶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却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有生之年，他一直力图把老师曾国藩未竟之事业继续下去，却不得不受旧体制的一再掣肘，而终多事无成。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充其量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一个“糊裱匠”而已，在旧体制中，聊以糊裱一些新花样。他的这番立意，显然，与他老师曾国藩所开创和展望的“采西气补充东气”的格局相距实在太远。

当然，比喻永远只是比喻，李鸿章也并非真是一个“糊裱匠”。他是一个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重臣，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能做成旧历史中的“人杰”，具备旧时代成王成侯的一切能耐，也保有充沛生命力和意志力，有一颗走向世俗人眼中“成功”的雄心。但他却无能无德于新的历史时代，无疑是新时代中的“婴儿”、“多余人”。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对之还毫无自觉，总是把自己的局限归罪于运数的不济。

其实，对于晚近中国，文化、文明体制的变异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却也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图伟业。世界近代以来，有两百余个国家地区，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从欧洲到中东，从非洲到东南亚，从美洲到澳洲，并非中华一家门店。在亚洲诸国，也还有印度、土耳其、日本、朝鲜等诸国的种种成败故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在做这些事。有些国家干得漂亮，有些国家干得拖泥带水。而像中国这样，文明与体制紧密关联的“老大帝国”转型殊为不易，需从文化入手，经由器物、人心、风俗等等的多重变易，才能有所斩获。英雄要做的，无非是把这种变易放置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轨道里，而不能让它循环于老死——至今，对于中华而言，这件事依然还在路上。

李鸿章步步紧随恩师曾国藩，谨守臣道，拘泥不化。有历史学家称他是“内侍昏君、外御列强”，话是不错的。李鸿章对内要极力讨好的那位昏君，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的老女人，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若论起“昏君”，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昏君——不过，在王朝体制中，

产生明君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人断乾坤，何其之难。慈禧从宫闱的倾轧之中走出来，浑身上下丝毫没有求新的意图，甚至连一点文化与文明的气息都没有，一切不过是随心所欲的权变。在她手上，所谓“传统”也不过权术耳：汉官可杀，满官可杀，维新派可杀、守旧派也可杀，主和派可杀，主战派也可杀……一言概之，因私害公，瞎指挥，胡折腾。一部晚清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她“老人家”随意折腾的历史。

李鸿章对“老佛爷”倒真是忠心耿耿，却不敢像曾国藩那样坦率认定“两宫太后聪明有余、见地平平”，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心态待之。比起曾国藩那样纯粹的书生，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封建官僚，他把自己的荣衰和大清王朝的末途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可以很好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擅长于坐享旧日之利，而百折不肯图变。这就是任何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说不动他的原因所系。

在《红楼梦》这部预言中国末世文明境况的天才之作中，李鸿章的形象早已被曹雪芹先生深刻地勾画出来——就是那位“端方四正”的贾政老爷。梁启超说李鸿章“待人颇有傲气”，倒很像是总端着个架子的贾政。他终日里要周旋的，不过是要在牌桌、酒席上享清福的贾母——毫无疑问，也像极了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慈禧太后。如贾政一样，李鸿章心力憔悴，自认为还算正直与努力，但已经难以挽大厦之将倾。

所以，李鸿章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他有好心，有眼力，有一定的手腕，但是没有新时代所召唤的大学问、大见识、大心胸与大能耐，诚如史家所评的“志大才疏，亡国之丞，何堪称能，先拒疆防，又断海防”。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给李鸿章做翻案文章，我觉得是不足取的。与他生前所承受的殊荣、福气和权势相比，功德皆空的李鸿章，死后倘给若干差评，并不为过。

韩利利女士和我所翻译的这一部《李鸿章回忆录》，经过仔细研究，已然被认定是一本伪托之作，一部可以归类为“小说”的作品。虽

说李鸿章学曾国藩甚多，但他并没有像老师那样做好“日课”，也没有记录日记的习惯。他好功业，好做官，好发财，贪恋权势，但疏于自修，受不来一个严谨书生那样太多的约束，所以并无资料显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美国记者曼尼克斯号称从翻译成英文的李鸿章日记、资料里整理出来的这部回忆录，显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但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这部书，清晰可见美国人对于李鸿章的亲和感和好评。这种友善态度，其实时而至今，还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情感的主流。

一派纯然天真的美国人，是难以猜度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官场中的那些老江湖的。他们即便英姿勃发，也骨子里老气横秋，人情世故文章做得太深，便人生如戏，也入戏太深。看这部书稿时，我更相信作者是在塑造一位理想中的英雄，一位类似后世的马歇尔或者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英勇、爱国的美国将军，而非一个中国满清朝廷的权臣。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他来了解李鸿章。正如柏拉图在书中所虚构的那个苏格拉底，同样能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一样。在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李鸿章生活的轮廓，看到大洋彼岸另外一群人对他的赞许与肯定。我想，或许李鸿章本人比任何人都喜欢这部恣意虚构的回忆录，并喜欢那里头所写的那个李鸿章，相信那真的就是他自己。

能和我的妻子韩利利女士共同翻译这部奇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作为一名资深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她对英文原著的严谨把握，保证了翻译的“信”与“达”，也带出了我这个学生。当我们一起修订好书稿时，满怀欣喜地期望着为世界送上一份崭新的礼物。

且向冥冥中的传主与作者致敬，只因为文化的传承，我们之间传递着微妙的因缘。更要向读者们致敬，你们的阅读，慰藉着我们一年来的辛劳；你们目光锐利的批评与指正，促进着我们的成长与丰富。

原编者前言　关于本书——《李鸿章回忆录》

与其说《李鸿章回忆录》这部书是笔者在自抒己见，不如说他是在替李鸿章为自己辩护。当然，传主李鸿章本人也很乐于为改善他的国家和民族而进言。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这份译稿的很多内容，是首度公之于众。

李鸿章不是一个心思仔细的人。当他北上天津时，大量手稿被遗留在了汉口。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又将二十四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遗留在了天津。直至李鸿章去世后，他那位在两广地区做官的侄子，才从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陆陆续续收集在一起，并存放于李鸿章在广州的故居里。

大约是在两年前，即1911年左右，经大清国政府准许，并征得李鸿章遗产托管者和继承人的同意，我们才得以着手研究李鸿章的资料和笔记，并委托曾在李鸿章身边做过英文秘书的罗伯斯上校将它翻译出来。协助他完成此项工作的，还有一位曾追随过李鸿章的幕僚——王秀才，还有广州城的一位老员外。

李鸿章的日记有洋洋洒洒一百六十多万字，他所做的笔记也是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只摘选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同时这些日记也是首次与英美读者见面。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有时会在单独的大主题下，设置出不同的小标题。事实上，原稿中的主题纷繁芜杂，而且喜欢做微言大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一行字就概括了一群人，陈述了很多事。而此后，当李鸿章在另一个地区担任不同职务时，他又会把这个主题重新提起，这时他会就此写上三页、五页或者二十页。再后来，时过境迁，他又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同一个主题。

因此，将李鸿章的全部手稿结集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方式，是对他的日记和其他手稿加以筛选，并冠以恰当的标题，同时将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们在将李鸿章的优美文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太多困难。然而，译者们在确定日期这个问题上，却变得手足无措。在早至他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一直采用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甲子周期和帝王年号纪年法，并在手稿上做了大量标记。就连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困惑不解。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删掉很多日期，并一致认为，如果想把写作每个条目的确切日期弄清楚，即便交给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专家，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1870年以后，尽管李鸿章大体上采用了现代的书写方法，但是为某些条目和手稿标注日期时，他还是会走极端，比如他这样写道：

“光绪某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未时。可恶的一年。”

——他会用这种方式记录不太重要的想法，但是完全忘了标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历史资料，可能会激起全世界的兴趣。但凡出现类似情况时，我们尽力都会把日期补上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与李鸿章一生的某个阶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刻意去提高或降低《李鸿章回忆录》的政治、历史或文学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单薄的容量，无法囊括李鸿章所写的，涉及不同主题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但是，编著者如此选择的目的，志在于收录那些他认为最有广泛和持久意义的文字。

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1912年12月1日，上海

原序《李鸿章回忆录》的意义

——美国国务卿眼中的李鸿章

（美）科士达[1]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这在十九世纪末的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不少颇具影响的诗词作品；作为军人，他参与过许多次重要的战役，为他的国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作为政治家，他在地球上这个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连续三十年身居高位；作为外交家，他成绩斐然，有资格跻身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际关系专家之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国诞生了许多学者、若干的将军、若干能力出众功成名就的政治家，以及为数不多的一流外交家。但是，我们挑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像李鸿章这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卓有建树，并拥有极高的造诣。

正因为这样，我们为能整理出这样一本回忆录而感到高兴。它是从李鸿章篇章繁多的日记中精选出来的。这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我们可以通过它更好地了解李鸿章的性格和事业。

想要公允地评价一个人，必须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此，依据欧洲或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判断李鸿章的个性和成就未免有失偏颇。李鸿章接受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教育，自小耳濡目染“四书五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鸿章的生活范围完全限于中国国内，他只能通过鱼龙混杂的通商口岸去了解西方文明。

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不得不面对极端顽固保守的政治环境，并与那些对外国心存偏见或一无所知的同僚共事。他生长在乡下，出

身于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门第算不上高贵。李鸿章的父亲属于乡绅阶层，苦读多年后，考取进士，官位也并不显赫。他未能给自己的儿子提供飞黄腾达的条件，只能让李鸿章寄希望于科举功名。李鸿章科场一路顺利，最终从两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中进士，点翰林，风光无限。

因此，李鸿章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并以智者的身份立足于社会。他被同僚们公认为一流的大学士。他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在大清国广为流传并颇受好评。李鸿章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学造诣，即使到了晚年，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外，他最大的抱负，仍是想获得中国“桂冠诗人”（诗坛领袖）的美誉。

早年，李鸿章一心只想从事文学。但是公务缠身注定让他的期望落空，并将他的生活引入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在李鸿章博取功名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兴起到全国的地步。这次农民起义，在他上学堂时就开始的。几年以来，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动荡的形势反而愈发严峻，甚至引起百姓的恐慌，冲击了清廷固有的秩序。

就在李鸿章从京城回家之时，他与太平军擦身而过。他们已经攻取了南京，正斗志昂扬地向京城进发。当李鸿章发觉危险将要向授予他崇高荣誉的朝廷心脏逼近时，他的忠义之情被激发了出来。他立即响应圣旨，着手筹办团练招募乡兵，攻打并侵扰太平军的后方。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道的：“所有人都知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用老祖宗的话来说，我是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似锦前程……可这是写诗的时候吗？这片土地里满眼都是水深火热、战乱纷纭，谁会在乎写诗呢？”

接下来的四年里，李鸿章积极参战，并初步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所率领的军队，不断给太平军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筹建了“常胜军”的美国人华尔，与他并肩作战。华尔在战场牺牲后，戈登将军继任为这支军队的管带。李鸿章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后者，他不仅非常赏识戈登的才能和战绩，而且对戈登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也了如指掌。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频，那些年，李鸿章一心报效朝廷，一直专心在南方指挥军队作战。后来，天津发生涉外纠纷，法国威胁要与大清国交战。于是，朝廷才把他派到天津应对危机。凭借其超群的军事才华、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李鸿章不仅名闻天下，而且被赐予史无前例的至高荣誉——清政府不仅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还指定他为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并加授一等肃毅伯。这些高级头衔，使李鸿章一跃成为清政府的头等要员，并持续三十年，直至他死亡。

李鸿章大半生在天津履职尽责，有二十四年。其间，他时不时地去北京公干。因为身居高位，且工作的地方是靠近京城的港口，在为与世隔绝的皇帝站岗放哨的同时，李鸿章也有机会接触到和各国政府有联系的各色人物。作为清政府外交部门的实际领导者，李鸿章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与训练有素、精明透顶的欧洲外交官相媲美的。事实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李鸿章总是能在谈判过程中赢得外国公使的信任和尊重。

与李鸿章同属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从外交的对手那里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在与英国人的一次激烈辩论中，他既实现了大清政府的要求，又表现得相当坦率公正。威妥玛爵士曾经说过，只是由于认可李鸿章在交涉问题时所表现的率真，他才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在调停1885年中法冲突时，法国公使在和约中加入了这样一条："法国声明放弃索要赔款，为的是向李鸿章阁下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智慧致敬。"

1895年，日本政府拒绝了大清政府首批议和专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告知清朝政府，如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他们将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他。日方对李鸿章的品格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在准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期间，俄国沙皇亲自电告清朝皇帝，请满清朝廷委派李鸿章为特使前来朝贺。有人便谴责李鸿章受俄国的影响过深，有人甚至断言他收受了俄国人的贿赂，因此才会如此受其重视。而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将让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因为它清晰地表明：李鸿章正确地识破了俄国政府

的阴谋，并清楚地掌控着局面，表现出全面而伟大的爱国情怀。

在一个追名逐利、把做官当成进身台阶的氛围中，一个大部分人都喜欢用公共的职位来获取权力、装饰门面的国家里，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有几个敌人也是很正常的。读了李鸿章的日记，我们就能知道，他对手众多，一些人甚至与他势不两立。然而，大部分人，还是把他看作是最有能力的高官，并且非常地尊重他。这一点，在他庆祝七十大寿时可见一斑。当时，皇帝赐给他丰厚的贺礼，并亲笔题写了赞词。皇太后和亲王们也争着给李鸿章送礼。大小官员和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慷慨地奉上礼物；按照老规矩，寿日那天，他大摆寿筵，贺寿的队伍浩浩荡荡。祝寿活动的高潮，是大清国的高官们在张之洞写的寿序上签名。

张之洞的尊贵地位和影响力，在清朝仅次于李鸿章。虽然，两人也常有政见相悖，但张依然很尊重李。作为中国颂词的范本，现摘录张之洞寿序中的一段，大意如下：

“您的一切令人钦佩：深邃的著作、惊人的战略、敏锐的洞察力，禀赋卓越，不可动摇……在翰林院时，站在您身边，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在处理两湖重大事务时，我与您相比较，深感能力有限。我们全心地信任您，我真心地向您学习。与您相比，我是普通农夫之于最好的神箭手，拙劣的璞玉之如斧钺。您是国家之栋梁，民众之期望，如柱石擎天，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君王所赖，如姜尚子牙，万众敬仰！”

尽管在政治生涯中，李鸿章总是想扮演一个严肃无情的角色，好像那尘世间的生活，他漠不关心。但是，在日记的很多地方，却流露出他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本性。他对母亲的挚爱令人感动、李鸿章母亲生活在一个偏远的省份，身患重病，即将离世。那时，李鸿章正在天津忙于教务。他便向摄政的皇太后请假，希望回到母亲的病榻边，他说：“十三年前，我和母亲道别之后，一直未曾谋面；现在，母亲已八十三岁高龄了。她老人家身体不好，因时常想念不在身边的儿子，病情日益加重。闻听此事，我心急如焚，夜不能寐，食不

甘味，恳请恩准回家探母。”

最终，朝廷只给李鸿放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他在出发前，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于是，李鸿章请求在家丁优三年，但是慈禧太后说，国务繁忙，只能允许他回家一百天。由于没有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李鸿章悲痛不已。他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奏折的大意是这样说的：



“懊悔之情将萦绕我终生，于私，心中的伤口隐隐作痛，一刻都不能得以缓解；于公，这种悲伤令我无法再为国家效力……尽管天人两隔，无颜与母亲再相见，然而我会用三年的时间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哀悼。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我的灵魂从无法尽孝的心酸和无以言表的悔恨中解脱出来……”

多年后，即便李鸿章专心忙于公务，在母亲逝世十四周年忌日那天，李鸿章还是把自己锁在家里，谢绝了所有的访客。他写道：“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烦恼哀伤也好，欢乐荣耀也罢，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不会忘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

此外，李鸿章与皇太后慈禧之间非同寻常的通信，展示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孝敬父母。这种特征已经被神化为宗教性质的崇拜，同时也对人际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就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家长，如果基督教国家的人，也能像中国人实践儒家的核心学说那样，忠实地遵守《摩西十诫》第五条的规定（译者注：《圣经》上，摩西十诫第五条内容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西方的社会秩序将会极大地改良。

在战争期间，我们在李鸿章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人性光辉。这位威严的将领站在行将就木的美国将军华尔的身边，当看到一个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外国战士就要为清朝死去之时，泪水滑过他的脸颊。在他担任总督期间，直隶和周边省份遭遇了可怕的饥荒，他的同情心也在这时显现出来。为了阻止灾难肆虐，他积极参与救灾，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努力、经济实力和慷慨救济灾民的方式显露无遗。他除了向普通百姓和慈善组织捐款，日记中还表明，他每天会向一两千饥饿的灾民提供吃喝，并自掏腰包，解决附近村庄差不多五千人的伙食问题。“母亲每天都在鼓励我这么做。她说，佛祖和穷人不会忘记我曾经布施救济过穷苦人。”

这本回忆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莫过于有关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内容，它展现了李鸿章的思想成长随着阅历日渐丰富，李鸿章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早期，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他在上海和外国人只有过短暂接触，所以李鸿章对他们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那时李鸿章对这群人心怀偏见，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恨所有的洋人。”

然而，十五年后，他对这个国家所罹患的重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在他即将赴天津以终止仇洋暴乱时，他这样写道：“不过，尽管我们都很厌恶此事，但是如果心里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就不要再反对洋人进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注定会来，无论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的大炮上。”同时，他还表达了喜悦之情，因为朝廷委派他去处理天津事件。这时他记录到，他准备给朝廷写一

份奏折，坚持外国人有权在中国居住，他还打算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并分发到各个省份。

到天津后，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居住的外国人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他并没有对外国人的侵犯和傲慢视而不见，同时他也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有用，他们有资格得到保护。义和团运动刚刚爆发时，李鸿章人在广州，他说，南方的总督们接到命令，准备遣返所有洋人。他称这道命令为“卑鄙的命令”，他写道：“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怎么能愚蠢到把这么无耻的东西交给我！”当我们回顾中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时，总体来说，中国对外国人的依附本来不是很强，但后来意识到需要外国的帮助，于是恳求他们这么做，并对此表示适当的欢迎，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至于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李鸿章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即便长大成人之后，他还是对传教士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并满怀憎恨。当时的中国人称外国人为“洋鬼子”，并一贯藐视他们的教义。但是随着李鸿章对传教士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到任天津后不久，他与当时手握实权的政治家曾国藩会面，他说：“和我一样，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恩师的想法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恨基督徒了。十五年后，他甚至将耶稣和孔子放在同一个高度上看待，他认定，如果身处英国或者美国，他也会自称基督徒。他把基督教义视为哲学或者道德规范，却没能理解基督的使命和教义的宗教性质。不过他不再对基督教怀有成见。他说，几百万中国人如果不想费心去追随孔子，也可以在了解耶稣上得到什么。”尽管如此，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李鸿章写到，欧洲各国之间打得不可开交，他们仇恨彼此。

“法国人恨德国人，俄国人杀犹太人，但是来到中国后，他们都变成了基督徒。”他还指出，英国强行向中国人贩卖鸦片，是阻碍基督教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在日记的结尾部分发表了这番评论：“当人们明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自诩为善的基督教国家，将中国摧残到如此地步时，人们会做何感想呢？”

七十五岁那年，李鸿章第一次出国旅行。这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他要去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加冕典礼。这次典礼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许多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圣彼得堡，共商国事。在八月的那次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清朝皇帝——“中国天子”所派来的贺礼代表李鸿章。从任职时间、职位特色和重要性，以及他所带领的人数，从他的学识造旨、与众不同的相貌以及威严的个性上来看，这位中国代表，是沙皇加冕典礼上最显眼的一个人。

除了位高权重，李鸿章担任头等大臣、代表皇帝出使外国的原因是，他有纯粹的汉人血统，能够代表中国。尽管已经七十五岁了，李鸿章依然精力充沛，健康状况良好，面部轮廓鲜明，身材挺拔健硕，眼睛乌黑深邃，神采奕奕。这一形象，表明他性格坚韧，足以吸引任何外国人的目光。当身穿纯色的丝质长袍，头戴三眼花翎的李鸿章出现时，外国人不可能不注意他。

李鸿章从海路，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俄国。在参加完加冕典礼之后，继续在欧美国家展开环球之旅。这期间，他会晤了各国的元首和政要。每到一处，均受到本国官民的热烈欢迎。在诸国，他检阅了海军和陆军，并在西方见识了不可思议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回国后，他越发意识到要借鉴西方发展的经验，让自己的国家也同样地繁荣富强起来。如果他在从政早期就掌握这些知识，这个八面威风的人物，将为他的国家作出更宝贵的贡献。然而，当时，他对中国疆域之外的大千世界其实原本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仍如此出色，实在更值得夸赞。

李鸿章的日记还让我们对他和皇室，特别是他和皇太后两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慈禧太后，这位女士统治了大清国半个世纪。李鸿章，一生中曾有四次被褫去黄马褂，拔去顶戴花翎，剥夺全部的荣誉，并在他的同僚面前遭受这个性情暴躁的女人的羞辱。然而，他依然对朝廷忠心耿耿。他确信，慈禧太后知道他的价值所在，并会再次授予他荣誉和高官。他写道：“只要有麻烦，我总是那个随叫随到的郎中，然而，我非但没有领到酬金，反而因此受罚。”

有那么几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时，尽管可能会惹她不悦，李鸿章还是毫不犹豫地要进谏皇太后。当主战派占了上风，大清国准备向日本宣战时，他极力劝谏她不要走这一步。他写道："太后勃然大怒，她近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下令拔去他的三眼花翎，并把他从宫里撵了出去。

义和团运动即将爆发时，李鸿章正处于休隐状态，身上没有了一切官职。可了解到皇太后已经受到动乱的影响时，他写道："今晚我要动身去北京，我决意面见太后，把当前的局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她眼前。"这次进谏的时间很长，结果太后"怒不可遏，大声呵斥"，并把李鸿章赶出宫去，希望他再也不要出现在她面前。显然，她已经对义和团做出了某种决定，无力避免眼下的灾祸。

尽管回忆录中所描述的皇太后傲慢、残忍、刚愎自用，皇帝软弱无能，但因事关国家兴衰，李鸿章一直对朝廷心怀一片赤诚。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公使馆被围困后，外交和媒体人士建议罢黜现有皇室，找一个新的皇帝取而代之。他当即指出这是无稽之谈，他说服外交使团，并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普通汉族家庭足以尊贵到和平有序地统治这个国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把外交人员和外国难民解救出来之后，中国皇室成员逃出京城。然而，那些被激怒的外国政府命令他们的外交代表惩罚有罪的官员，并对他们遭受的损失索要全额赔偿。尽管李鸿章遭太后斥责后，被赶出宫去，还被外放到遥远的广东做官。但藏在深山里的太后，还是把李鸿章召回北京，希望他能解救正在肢解毁灭的大清王朝。

尽管身患重病，体力每况愈下，李鸿章还是长途跋涉回到京城。回来的路上，他在天津时这样写道："恐怕，目前的任务太重，我的体力无法承受，尽管如此，在叫停可能爆发的战争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件事。我要让洋人们再次相信我们，不要推翻大清国。"

李鸿章之所以能阻止战争爆发，还要感谢外国谈判人员对他的崇敬。他在日记中高度赞扬了美国政府，美国人知道后一定会很满意，他认为是美国帮他避免了清朝解体，并摆脱了一些无法负担的条件。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为清王朝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他是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全世界最卓越的勤务员之一。这个结局，对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而言也许是一种安慰和解脱。

第一章　从文的宏图伟志

“我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高中朝廷的状元，并且能够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2]。”

这些话写于1846年。李鸿章写得极其意味深长。当时，这位勤勉聪慧的青年学子，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着一年后将要进行的科举考试，恰如中国历代那些著名的文士一样。在那次科举中，他果然高中，获得了翰林庶吉士。



李鸿章从同时参考的四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二甲第三名。尽管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和那个时代，天资卓越的李鸿章依然是那一代同受中式教育的年轻人

中最具天分的人之一。

李鸿章的这番抱负说明了他具备崇高的理想。没有人能够否定，正是他的勤奋与努力，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理想，使之成为现实。那些高度关注李鸿章前程并给予其鼓励的人，皆是如此认为。

在其回忆记录中，李鸿章常常不时并无意地、却又匆急地写下自己的深思熟虑，表露满腔的勤勉与苦心。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表明，从求学伊始到终老之日，他最为珍爱的是自己的文学事业，他期望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传颂千古的诗人、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将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1846年，他如是写道。“我不过一位如媒体人一般的文士。”五十年后，他对纽约的一位记者亦如是说道。

“1846年1月——今日，我考完了殿试的最后一科，我知道自己排名靠前，将光耀入仕途！我自知那时下笔如有神助，因四书五经皆熟烂于心。”

“我坚信，即便是礼乐诸学之宗——周文王姬昌来做我的考官，我之应策也会让其满意而归。是的，从大周朝开始，礼乐已然不断发展繁盛，不过我同样也能让他大吃一惊。他教育世人，六艺乃是人生必须之重要技能，可他并没有得以详细解说经典，因为那时经典还未如如今这般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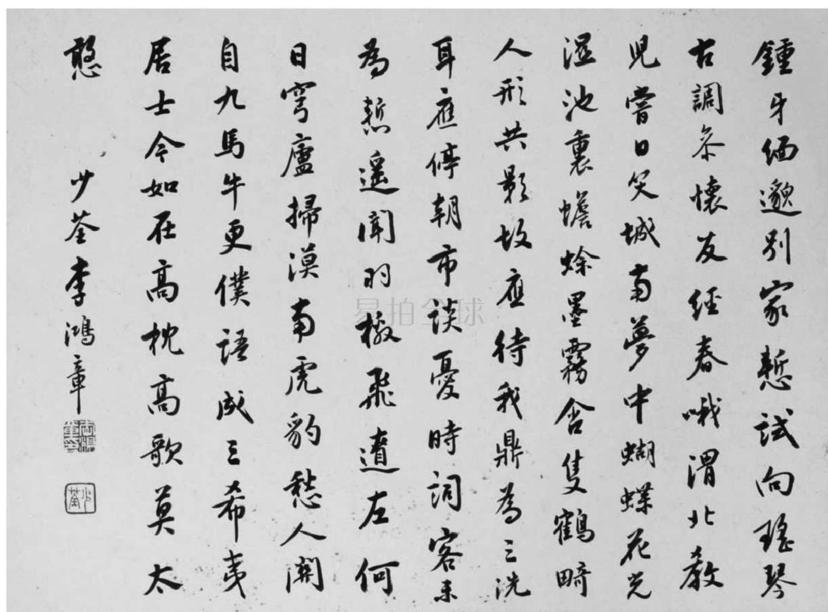
“今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那位伟大君王（周文王）把乐放在首位。这点，我尚有欠缺。如今，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在大街上奏乐、在集市里唱歌的。射，我也不成。不过，只要我稍加练习就能上手。因为我的家族在2800年或者2900年前，诞生过一位伟大的祖先，他因射术超群而闻名遐迩。他曾创造出了亚洲的第一张弓。相传，他从不知名的树中取出树心，浸泡在小母猪的眼泪里数周之久，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结实、最精准的弓。现在，我完全可以勤加练习并成为射箭高手，但我不想成为一个兵丁。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如今的青年士子，依靠打猎、射箭是不可能光宗耀祖

的。”

“有关于御。人们如今不常用到马了。况且，也并非只能用马来拉东西。我也不打算骑着骆驼走南闯北。再说，骑骆驼，也算不得是古书所谓的‘御术’。”

“但是我知道，我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技艺来取悦周文王，这就像我努力让……（这位年轻的学子罗列出了一长串的名单，足有二百七十余人之多）满意一样。我熟读经典，博览群书，擅长书法。我的书法干净雅致，见过它的翰林们皆如是品藻。我还通晓算数，掌握天文地理，熟知社会与宗教的礼仪，诗词歌赋无一不通。若非精通天文地理、民俗人风，何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呢？”

“并不是身为进士就可以写下经典的作品的。一个人在进阶取士，受教于翰林之后，必须对文艺创作抱有极大的热情。而这热情的背后，是不竭的渴望与坚守。如此，他便可以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名满天下。”



李鸿章的手迹

“我如今具备了这些条件。我现在是二十四岁，我的父亲是四十一岁。我们相差十七岁。在这十七年时间的跨度内，只要我没有在半夜里遇到什么样的不测，或者是碰到坏人恶人的暗算。一旦巡抚或者总督大人能够给我足够的机会，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那些关注我的人们，我会努力提升自我，拼命干到底。人们或许会嘲笑我的失败，同窗们甚至会向我扔石头，老师和朋友们，特别是（又是一连串长长的名单）……也许会认为我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诗坛领袖，名垂千古。”

“1846年1月27日——今天我又读完了一部经典之作，《列女传》。这已经是我第九次读它了。我书单上开列的图书不是很多，但每一本我都会认真加以研读利用。每次，我通读一本书，都会在书上注上标志，注明阅读的起止时间。这是一本我从没有打算去背诵的经典，但里面一样有很多优美的段落，记述了一群有趣、可爱而且英烈勇敢的女性。其中花木兰的故事最为吸引人，我正看着她传记的开始章节。”

“1月28日——家人郑重其事地把婚姻大事摆在了我的面前。尤其是我的叔父，他比我的父亲还要热心。他们联手为我安排了一桩婚事，对方是一位同为合肥籍的姑娘。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品德高尚，而且我母亲担保，说她各方面都不错。至于她的容貌，足以打动任何有心思想结婚的年轻人。然而，一句俗话说得好，‘倘若春天花开早，人生之树果实少’。我不是不想要这位大家闺秀，虽然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建立自己家庭的准备。我决定不去理会我叔叔将要说些什么，更不去管将来能通过娶这个女孩子，能得到多少的财产。”

“当然，我并不知道我的人生能活多久。但我坚信我的寿命会很长，长到使我有足够的机会生儿育女，使一生变成荣耀的回忆。一个男人应该生很多的孩子，用以缅怀他，给他安坟上土——我当然不会违背祖训的。”

“我的好友阿峰来拜访我。我俩进行了一次严肃的长谈。他告诉

我，他那严厉的父亲希望他能娶舅妈的女儿为妻。她尚是一个小女孩子。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她，更不想见她。可是，他还是要动身去南方完婚了。”

“阿峰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才俊。他勤奋上进，为人热情正直。阿峰坚信自己同样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当我们共同立志考取功名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事业。今天，他给我带来了几大卷的小说，邀请我品藻。可我不愿意伤害他，坦率地告诉他，虽然他的小说读起来很有意思，但语言太过于平淡，犹如市井之人粗言俗语。不仅如此，我还批评了他的书法。他的字写得很平淡、不够文雅。我给他看了我的作品，几幅行书书写的字。我精心装裱，并在左下角盖上了美丽的印章。我想，他在看过我的作品后，他肯定会有点泄气。”



李鸿章的夫人和儿女们

“我一直认为对待任何艺术或者工作，不可以马虎了事。也许我

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夸耀自己难免显得骄傲自大，但是事实正是如此。成千上万的古人这样记录着自己的生活，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笔写我心是一件好事。但是阿峰对文学太过于随意，并且他学养不够丰厚。这些都让我觉得他想靠笔杆子出人头地是不太可能的。但我没有这样跟他说，因为很多人也曾对我说过这些伤害我很深的话，我实在不想看轻别人的努力，打击别人满腔赤诚的理想。”

“但是，我也希望自己永远别像可怜的兄弟阿峰那样粗枝大叶。如果我像他那般连续三次名落孙山，我会隐居山林或者逐风水而去，不再入世。”

“3月19日，今天我满心欢喜。知府大人给我在府衙里安排了一个实职。我知道，自己从今往后，就踏上了为官从政这条康庄大道。我严厉而高贵的父亲颇感欣慰，我慈爱和蔼的母亲更是高兴得无与伦比。我不知道我的叔叔对之有什么感想。或许，他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了。父亲正备轿，准备亲自去告诉他，并邀请他一道参加明天盛大的筵席。”

“也许，我该结婚了。媒人说，那位姑娘对我很中意，想和我交结秦晋之好。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母亲的。”

“当日，稍晚些时候——我兴奋异常，难以入眠。即使我远住在洪街的叔叔，也在父亲见到他之前，得到了好消息。他拎着两只肥鹅和一条鱼往我们家走来。他俩在路上走岔了。父亲沿着果墙，抄了一条捷径走，叔父则沿着洪街直接去了知府衙门。他要给知府大人送一份答谢礼。”

“叔父说因为他和知府大人私交甚笃，所以我才有如此的好运。多年来，叔父和知府都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收藏古玩。”

“我当然没有反驳叔父，而是跪下来千恩万谢。周围的人都知道，四天前，和蔼、尊敬的王知县来我家做客，对我说了很多的赞美之词。我都听了很多年了——”

“李鸿章，你还记得自己在辉水湖偷走了我的鹅么？”

“我答复他我记得很清楚，尽管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你还记得你甩石子，差点砸死魏家的千金大小姐？”

“我告诉他，对于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也很难过。就像以前所做的那样，我跟他解释说，我当时想和那些地痞无赖打架，根本无意于伤害那个女孩子。”

“王知县继续说，那时我认为你有朝一日一定会被凌迟处死。但看到你因为这些事情受罚而畏缩的样子，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尊父也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很开心，因为他早就说过，他在自己的地界里对你毫无办法。”

“但是，目前据我们所知，你近年来表现也很值得称道。你学业上也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现在，你从《春秋》结尾处起的第六十六段，背诵来给我听听。”

“我很高兴他选择了这部典籍。因为我能把《春秋》从头到尾，用朱砂笔默写下来。我就为他背诵那第六十六段。还没有背完，他就抬起手来示意我停下来。然后，他说他考虑了好一阵子，想给我在他的县衙里安排一个职位。但他也知道，我的父亲想让我从知府的衙门里干起（所以他会在知府面前推荐我）。”

“我衷心感谢他，因为他原谅了我曾经的过失。只因他在知府面前说情，扔石头事件并没有使得我的名誉受损。离开之时，我都有点飘飘然，并自命不凡了。我知道，知县大人是一个坦率正直的人，他不说假话，毫无疑问，过不了多久，知府大人就会派人来邀请我。”



李鸿章手书

“自从我回家以后，家里满府上下都非常欣喜。我自己则兴奋的合不上眼。我担心我满脸的亢奋，看上去像是偷偷吸食了鸦片。但没事，明天就会恢复如初。明天，我将大摆筵席，邀请宾朋。我将给客人们朗诵我所写的诗。我让人捎个口信给阿峰，让他也来赴宴。但是每次他出现在我家，我母亲都会斥责他。他可能会觉得除非自己拎着一袋米来，否则不会受到欢迎。但是对于这个穷小子而言，这样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他家一个月顶多能吃上两顿肉，其余的时间能有米和蔬菜吃，他们全家就认为很是幸运了。”

这位酷爱文学和做官的年轻人是否著文记录那次盛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有位侄子居住在南京，手里保存着不下六百份的李鸿章手稿。其中有一首长诗讲述了某一个类似的场景，告诉了我们将会发生的事情。他把手稿给了我，让我翻译出来。事实上，这首诗的主题和叙述非常确切地和我们谈论的宴席有关。

这首诗过长，不适合在此复述。特别是后面的部分，旁枝斜出地讲述了他对于国家政治的种种看法，以及他对于历朝中国文人的看法，翻译成英文很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些五律诗的部分重现

于此[3]：

AN EARLY REWARD OF GENIUS AND THE

JOYOUS FEAST SENT BY THE GOOD GENII TO

THE YOUTH OF GREAT EXPECTATIONS

No questionings do mock my mind，

That the good genii of the sky

Will favour those who hold quite true

To all the rightful things.

These words I say because in recent day

Sweet tidings, like water of the stream，

Have flowed into my heart to stay

And make a lake of gladness there.

I sought the honours of the school and literati，

I worked at morn, and midday too，

I strove when other students shirked，

Or wasted time at games.

My heart did burst with learning's longing，

Nothing else could give me joy.

I memorised and worked the harder

To realise my fond desire.
The clouds in glory sent their rains
To water seeds of thought in me :
The birds sang ever sweet refrains ,
Inspiring me to con sweet words.
Soon I became a Budding Genius ,
And then another rank I took.
And then the highest flight I gained :
Thus I reached my heart's desire.
But when the hien-kwan of the district
Sent for me to seek his yamen ,
I hastened with my fears excited—
How happily was I mistaken !
O, what blessed words he uttered ! —
He who once had caused me pain—
Of how the whole hien rejoiced ,
And that an office now was mine.
Then came a time of song and feasting—
Happy feasting in my home.

With father proud, and friends about me，

Eating, drinking—rice and tea.

Glad and merry mandarins feasting！

Joy within my heart was swelling，

For the honour that they showed me，

For my parent's pride in me！

诗酬才俊远大坦途书

吾心向无拘，直如魅长空。

所爱真与义，囊括正气中。

近日多佳音，似水绵无穷。

从文待盛荣，未敢付嬉戏。

托志于经册，矢志坚无虞。

负重行路远，多难则神兴。

云雨播厚霖，活水藏慧根。

天鸟相与鸣，引我慷慨歌。

不日登龙庭，恣意展雄才。

行远路自高，得酬吾所愿。

是时众友至，相聚府衙欢。

得令高堂尊，复使同门荣。

长宴达宵旦，醉中咸品官。

家父乐我成，满心向腾达。

这些诗歌剩下来的部分，已经呈现出很深的思想和内容，译者不容易用英语翻译出来。不过依然可见，作为一名热情澎湃的青年诗人，作者已经成功地达到了他的年龄上所不具备的成熟与深度。

第二章　关于基督教文明的观点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李鸿章持续记录着他对不同主题的各种看法。如果将他的文章悉数译出，尽管涉及各不相同的内容，但还是可以按年代顺序关联起来。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主题里，李鸿章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无疑是最有趣的一个。

正如在本书的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译者手中接到了大量的资料，加以精心挑选，再以不同的章节和标题呈现出来。这个方式是非常适用的，这样一来，读者可以通过各个主题，对他做全面的了解。

然而，有一些宏大的论题，篇目冗长，且分别出现在日记的诸多条目中，或者出现在毫不相关的其他卷宗里。光光单个论题，都可以集结出版。例如，据权威估算，关于慈禧太后和宫廷生活的文字，译成英文后要有五十万字之多。有关外国人、传教士和基督教的论题，也在资料中反复出现。李鸿章要么把所有的外国人当成基督徒，要么把所有的基督徒视为外国人。这位总督似乎从不厌倦地写作这些论题，因此，我们精选的内容只占回忆录众多条目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所提出来的内容极为严格谨慎，力图把李鸿章对于外国人和基督教的看法体现清楚。在这个五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他的看法是不断改变并改进的。

1849年，李鸿章在北京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及了基督教：

“我想，如果我能在我的书或者文章里，把洋鬼子们信奉的诸神真相和虚假的上帝告诉国人。这将是一件多么高尚和光荣的事情。同时，也会让我们冥冥中的圣贤们和列祖列宗倍感欣慰。我可以确凿无误地掌握相关信息，向国人揭露这些骗子令人蒙羞的真面目。至少让

南方那些愚昧的底层苦力们明白。他们已经沉沦于这些黑袍人的亵渎言论当中，中蛊太深了。”



中年得志的李鸿章

“这些洋鬼子到我们中国来，并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他们举起双手，高声布道，声称他们是为中国人自身的利益而来。但是我听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为外国那些别有用心的机构所雇佣。他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暗中监视我们的政府。”

“我听说，很多年来，一些黑袍人在我国西部传播他们邪恶的教义，公然挑衅玉皇大帝和众神。这些黑袍人属于洋鬼子的某一个教派。我听说他们分为很多教派，都为同一个被称为‘天父’的神灵而布道。这些教派彼此间相互憎恨。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位天父，他是不会为自己有这样的徒子徒孙而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们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教义说，天父让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了人类犯下的罪恶而赎罪献身——未料世间竟然有如此荒唐的教义！即使他们的教义听起来如此荒唐，我作为有头脑的人，也禁不住对之认真思辨一番：若说天父之子的到来是为善良的人献身，听来也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神是至善的，也希望人们好，难道他会允许自己的家人为了那些罪犯而像一个罪犯那些死去吗？很久以前，一直有人暗示我，大多数的洋鬼子其实是疯子。现在，我开始相信了。奇怪的是他们竟有何种本事，怎能从我们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中带走如此之多的信众？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坚信这种宗教狂热很快会消失殆尽。”

1849年，他又写道：“秦翰林告诉我说，他听说在河南有几个洋鬼子疯狂传道。这些人来自法国，属于天主教派。这些锲而不舍的洋鬼子，到我们国家传教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甚至结成了团伙，成了很大的气候。他们的信众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愚弄我们的人民，还试图愚弄我们的神灵！他们假扮成中国人，同时，又在不停地嘲笑中国人的宗教。”

“这些狂热分子有非常古怪的念头。他们说，越要尊重天父，就越要禁欲，不能娶妻，甚至连一个老婆都不能有。然而，他们又积极劝导人们早婚早育。这是些什么谬论？这些家伙要是死了，没有人去吊唁，没有人为他们守孝，没有人为他们上坟。但我好奇的是，这个教派的人都不结婚，哪里来补充新的传道人？或许，他们指望能从那些愚蠢的皈依者中，挑选出那些不结婚的人来传教。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能够成功，因为当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听信了黑袍人的谰言，他们当然心甘情愿照着他们指示的去做。”

“秦翰林曾写过一篇咨议递交都察院，并上书圣上，肃清这些西方来的黑袍人。但是监察御史回信说，朝廷是不会关注这些外国教派的，以免他们妄自尊大。此外，据说法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在亚洲的另外一端，而这些黑袍人其实全是法国政府官员假扮的。据说，他们并不靠百姓的贡奉为生，也没有自己的衙门和舒适的官邸。他们的寺庙，是一个高大方正的建筑物，外形很丑，但建得很牢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鸿章似乎没有怎么再写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可是，在1854年，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显然，他还是那么憎恨基督教。当时，他正在中国中部的家乡——合肥操办团练。而刚刚兴起的太平军都自称基督教徒。他们正携带枪炮和刀剑，朝着两湖地区进军[4]。不过，太平军上下根本弄不清楚“基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不会去实践哪怕是最为细微的一个小小教义。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敢起身反抗，把这股邪恶的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家？先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可恶的洋鬼子能够控制得了这么多的人。现在看来，在南方，成千上万的愚民甘愿听从洪秀全的驱使。洪秀全大胆地吸取了异域宗教的教义。他们不但在摧毁这个国家，而且把这些邪恶的信仰强加在各地人民的头上。如果传闻属实，还有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正准备从广东及其周围地区北上。”

“据可靠消息。这些长毛乱贼，在南京砍掉了成千人的头颅，割掉了上万人的耳朵。因为这些人没有及时信奉他们邪恶的信仰。这就是那些拜上帝会成员的恶行。他们竟敢擅自称这个国家为‘天国’。”

“我认为朝廷对这些狂徒的惩罚远不够严厉。当他们投降称悔时，把他们纳入大清帝国的军队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是永不会悔改的。这是一群疯狗！他们就像是从广州麻风病传道士们那里跑来的病老鼠那样，窜入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所有洞穴，传播着可恶的病毒。所有赞同外国教义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这些掠食者。即使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行军，也应该被处死。在这个季节里，要不是我风湿的老毛病又犯了，胳膊用不上力，我真愿意亲自去处死这些歹

徒。不过，我为抵抗太平军的爱国仁人志士们筹集财物。当中原的沃土不断被这些掠食者毁灭之后，如何战胜他们，将是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有关于这段光阴，李鸿章用诗歌的形式写道：

It is truly the greatest sacred duty

Of 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all who bow to the mighty Throne，—

The glorious seat of ten thousand years，—

To strike to the black heart

The Long-Haired bandits；

And to let out their vitals upon the earth，

That the swine of our gutters

And the fowls of the barnyards

And the mongrel curs of the alleys

MSy lick up their blood and gnaw their bones.

These fierce Long-Hairs are wild in their heads.

They have crazy notions of Heaven.

They have a new god

And his Elder Brother

Whom they follow to deeds of darkness.

They have forsaken all our sacred gods ,

And spat upon the images ,

And upon the graves of our ancestors.

They are dogs of low order.

Devils of blackest darkness ,

Lepers of the foulest ills ,

Serpents with marks of the pox ,

Fowl that limp with gangrene !

They are not men at all in human shape ,

Nor in their minds—for such are gone ;

Nor in their new speech ,

For they ape the tones of the foreign masters

And talk loud, like barking dogs at night.

Let them be given no quarter !

It is a great work and blessing

To pluck out their lying tongues ,

To burn deep the sockets of their eyes ,

To rip open their vile bellies ,

To rub salt into many cuts ,

To trim close their ears，

To draw forth the nails，

To bury deep whilst yet alive.

To use the pole upon their skulls.

Oh！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Drive these rank fiends

Into the salty sea.

Or make their rotting bones

Manure the land

时艰知巨责，蛮夷引祸多。

家邦虽荣光，基业耀万年。

奈何长毛乱，禽兽乱纲常。

喋血害人伦，犬食陌中骨。

野匪蓬长发，尊天迷邪帝。

天兄作鬼魅，晦暗恒无际。

背弃圣人教，惨绝掘祖坟。

如恶犬横行，魍魉传鬼声。

虫豸布瘟疫，蛇蝎染腐疽。

不复有人形，良知俱成灰。

高亢随夷狄，吠吠不可止。

毒舌播谬种，癫狂乱中华。

余愿兴义兵，斩尽此罗刹。

剥舌坠九重，尸骨扬于野。

只手造玄黄，孝义定中原。

兴起沧海水，涤尽腐与恶。

1865年，在清军收复南京和太平军全线崩溃两年后，李鸿章在苏州城里如是写道：

“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应该持续地严肃思考，深思熟虑，最后做出决定。我探寻太平天国本质时，这一个观点尤为显著。在那个漫长而艰苦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坚信沿海地区的洋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的洋人，对此次长毛叛乱应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当时的想法和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我是通过许多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的。特别是收复南京后，我还记得‘常胜军’参将戈登将军不止一次试图向我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我没有任何耐心去倾听。我对基督教这个名词充满了憎恨。因为，我听到太多让我憎恨它的口舌。”

“戈登当时想让我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同情长毛军的作为。为了证实自己的所说的话，他提供了部分的证据。他坦陈，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却在第一时间内给予大清国政府充分的援助，帮助我们一起镇压叛乱。我清楚地记得戈登的原话——当然是被翻译过来的，因为戈登的中文讲得很不流利。但是事有凑巧，当时，程学启[5]将军正向我控告戈登，说他和太平军的五王有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否该信任他。因为这种情况，我就越来越怀疑他所说的话是否属实。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基督徒

在努力帮助另一批基督徒。后来，我知道自己是完全错了，这么看，对于如此优秀且忠诚的戈登将军是多么地不公平啊！”

“但自从我当上总督以后，和平盛世给予我多年来无法享受的很多东西。我开始趁机仔细研究洪秀全的领兵之道和所谓的‘天启’之道[6]。结果我发现，就像我本人和鞑靼人毫不相干一样，太平军的领导者们与基督教徒相差甚远。洪秀全与他的追随者根本不知道西方真正的教徒们是如何在和平状态之中生活的，如何在战场上战斗的，甚至我还见过最初给洪秀全传福音的洋鬼子教士的弟弟。他告诉我，他的教士兄长并没有鼓励洪秀全和其他追随者研究基督教的典籍。”



李鸿章官服照

“然而，长毛贼的猖狂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邪教四处宣扬，鼓动了四个省份几十万的信徒。每次行军打仗掠夺时，他们都会念着洋鬼子神的名字，希望上帝保佑他们打胜仗，并招募到更多的新兵。在初期，他们很成功。无数人相信洪秀全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连我都误以为真，相信他们如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群真正的基督教徒，所谓的天父和天兄（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在给予他们无限的帮助和鼓励。不过，让我相信神灵遗弃了中原之地，不再保护朝

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随着叛军的节节胜利，我先前坚定的信念一点点地发生了动摇。甚至，暗自责备我们杰出的先祖们，疑惑他们是否还在保佑膜拜他们的人。于是，日复一日，我更加憎恨这个外国宗教。特别是长毛贼横扫环宇，并得以集结出更加庞大的军队时，我这种憎恨之情尤为强烈，觉得基督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灾祸都可恶。我们向上天祈祷，希望太平军能全部被剿灭，还希望那些基督教国家统统都被地震、山崩和可怕的瘟疫给毁灭，最好无一人能得以幸存。”

“但是通过研究学习，我学到很多东西。首先，我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在没有长期勤勉研究之前，不要轻易对任何事情急于定论。遗忘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当一个人对某个问题寻求一个公正明确的见解时，你应该当以前什么都不知道那般，仔细地去审视它。当脑海中同时出现事实与理论时，你最好首先抓住事实，而不是理论，因为理论如日月的变化那样，随着情况而变化。你要像法官审视犯人那样，找出事物的真相和实质，而不受多余芜杂的事物干扰。”

“自从担任高职以来，我和洋人接触的机会要比生平任何时候都多。事实上，我已经不能确定，他们比我们的同胞更会用阴谋诡计来捉弄我。但是，洋人的骄横确实盖过了他们的诚实。据我了解，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臣民在亚洲人面前会表现出优越感。因此，在他们自己出生地没有半点犹豫会奉行的礼节，在自己国家之外的地方，他们会疏于去做。”

“我不能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任何的道德来，相反，他们只是试图给他们眼中的弱国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我听说，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澳门的洋人，肯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要么还不起，要么不愿意还。然而，同样是这群洋人，当他们在亚洲的某个港口安居下来，如果他们的仆人不及时把每个月应得的酬劳领走，他们会非常生气——我不相信他们会真的生气，至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那样毫无道理。干完了活的人，哪个不急于得到报酬？难道洋人为他们保管一两天会有什么损失？假如能保管上两个月或者两年，那么利息岂不是很可观？”

“自从我身居要职以来，到上海来的英国官员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很希望自己能讲他们的语言。有些英国人的汉语说的很流利；还有一两人的秘书，居然会写中文，写得也很不错。他们已经在我国沿海生活好多年了。”

“所有这些洋人都告诉我，太平天国的覆灭，所有的外国基督徒们都很高兴。但是我找了一些英国报刊文章翻译了来看，好像编辑们对长毛贼的最终覆灭的遭遇非常难过，好似他们自己要死去了一样。而且，我发现几乎每一个洋人的聚集地，都因为我在苏州处死太平军的降将而严厉指责我，称我为‘黄种野蛮人’。我不再打算回应这些外人无耻的攻击。我想说明的是，事实上，我并没有下令处决这些降将，不过，即使真是我做的，我也不会痛心与后悔。因为他们死有余辜，消息传到京城，圣上龙颜大悦，太后也大喜。我是精忠报国。如果戈登将军在拜会时，擅自对那些太平军将领许诺过什么，那么他的做法早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1870年6月，北京的清廷让李鸿章起身北上，准备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如是写道：

“对于这次宣召，我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对现在的职位很满意，在此活得很舒心。但是现在的直隶省里，有着大清帝国最棘手的地方事务，还要考虑如何去对付洋人。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朝廷对我的信任。他们相信我有能力摆平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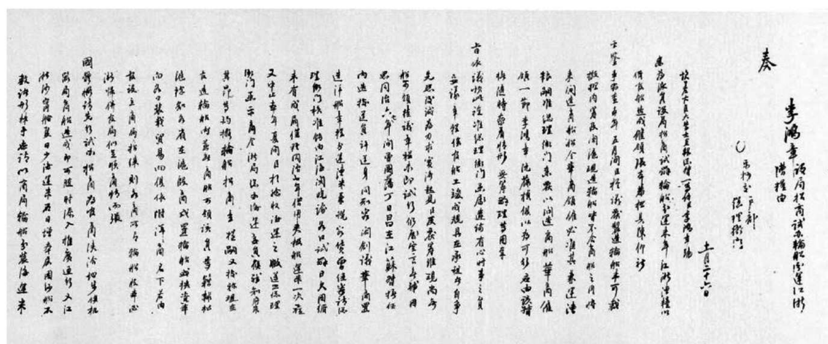
“即使是与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也不会诬陷我是洋人的知心朋友。无论是那些强迫我们与之贸易的洋人，还是那些把他们的宗教硬塞进我们头脑里的洋人，都不会是我的朋友。可是，通过签订和约，我们已经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牧师，试图真诚地告诉我们何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何为最幸福的死亡方式。而我国那些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儒士，一定会非常不快。但是，洋人们却已经凭借武力，把文化的楔子打进了中国。和约已成，现在吵嚷着反对曾经应允的事情，为时已晚。我们一旦打开了大门，羊群们就蜂拥而入。现在的情况是，那些牧人[7]是绝对不会同意收回他的饥饿羊群，

更不会放弃中国这个草肥水美的牧场。尽管我们很厌恶这种情况，但是假如我们真正地把中国的利益放在心里，就不要反对洋人的到来。不管他们是商人、传教士还是其他什么人。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注定是要来的，不管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或者大炮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现实。”

“不久之前，直隶省某些阶层的民众发生了骚乱。他们反对法国的神父和修女。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机构的所有成员。朝廷只是希望这一切能立即中止。我感到非常荣幸，朝廷认为我是解决问题，实现朝廷愿望的最佳人选。我就任后，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骚乱的人的。如果这些人当中也有洋人，无论是神父还是妓女，不管他是传教士还是鸦片贩子，都不会受到我的庇护。我的队伍已磨刀霍霍，将毫不手软。”

“上次见到曾国藩大人时，我们就这个话题深入探讨了足足几个小时——除非找到一种如快刀斩乱麻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否则，它就会像一把匕首那样随时可以刺进我们国家的身体。和我一样，恩师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内，改变了对基督教文化的看法，不再憎恨基督徒了。他告诉我，有些日子，他曾想上奏朝廷，请求颁发一道上谕，充分接受各行各业的洋人。我告诉他，如果他的这一愿望非常强烈，我愿和他联名上奏。”

“6月12日——尽管民众可能无法理解我的行为，我还是要写一篇奏折，为洋人争取到在中国的合法居住权，让他们在不被侮辱和骚扰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事务。我希望尽快完成这篇奏折，并交给曾国藩大人，因为他很快就要面见老佛爷。他也许有机会把这篇文章留在宫中，让太后私下审阅。如果朝廷批准，我会自费印刷几千份，在所有省份去传播。目前，我想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百姓和洋人谋求双赢的最大利益。”



李鸿章手书的奏折

在随后几星期的一篇日记中，李鸿章提及他为洋人请愿的那篇奏折还没有完成：

“我希望尽快面奏太后，征求她的同意，对于把这件大事，我把自己的看法全写下来。”

“6月23日，天津总督衙门，这个城市的暴徒们遵循着自己可恶的理念，又一次在世界面前出丑，使得朝廷蒙羞。这些煽动或参与暴行的无知恶魔，不要以为他们能够逃避惩罚。我会彻查此事，任何与两天前屠杀案相关的人等，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6月24日——今天早些时候，法国领事前来拜会我，并递交给我驻北京的法国公使所写的一张纸条。他询问我，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惩罚那些参与袭击领事、天主教神父、修女和皈依者的暴徒。”

“这就是外国外交官员在中国蛮横行事的风格：一家英国商店的窗户被闹事者砸碎了，领事或公使就会到衙门询问我们该怎么处理；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在市井上与一群无知小民吵架，我们官员甚至还没有听说这事，法国的领事或公使就向总督挥舞着拳头抗议；一个红脸蛋的德国胖子，满肚子烈性啤酒，浑身散发着浓重的奶油味，跌进阴沟里，摔断一条腿。路人走过来，扶他站起来，他却认为人家要抢劫，便掏出了左轮手枪，开枪打伤了一个当地人，伤者的朋友向他扔石块，划破了这个德国胖子的红脸蛋。他的领事和公使就会立即前来，大声叫嚷，敲打衙门的大门，说‘德国的旗帜被玷污’了，要求给

他们‘公道’。”

“——就因为这是在中国！如果同样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遇到了同样的什么麻烦，能有一个警察或者治安官把他的情况记录在案，他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是因为在中国，他们就期望整个政府机器能够使那些‘黄种野蛮人’就范。”

“当然，我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拿它们和眼下这桩可恶的暴行相提并论。在天津和北京的每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包括法国公使和领事都知道，我对于违法的行为向来严惩不贷，特别是针对洋人的恶性暴力事件。可是法国公使和领事还敦促我，问该怎么去办。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

“我对那个法国官员说：‘领事先生，请原谅我的缄默。但是如果阁下能屈尊到监狱去打听的话，你就知道我为这件事做了什么。如果阁下随便找任何一个这城里的人去打听，你就会知道，有三千名士兵正在全城大搜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直到把所有的嫌疑犯都带到官府里来。’”

“尽管我只是向他透露了他已经知道的消息，我的答复却让这位法国领事非常满意。他也只是向我强调自己作为法兰西帝国代表的重要性。而他却忘记了我实际上管理了相当于法国巴黎城市人口二十倍的地区。而领事先生自己站在巴黎街头，估计无人认识他。”

“（没有日期）——处决暴乱元凶的日子定下来了。而法国和俄国的大使都要求延期斩首。他们渴望能到现场看看，确切地说，他们渴望亲眼看到那些罪犯的头被砍下来，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洋人们另一个令人生厌的特性。今天他们写来的这些信，令我非常生气。也许，他们认为我的这些反对暴行的言行，只是为了制造震慑气氛。但是如果他们能体察事实的话，其实应该知道，我比北京或者天津所有的外国政府代表们更急于处理掉这些恶棍。这不只是为了复仇或者为了补偿那些被夺去生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是为了大清帝国的利益考虑，必须对所有的罪犯实施雷厉风行的惩罚。

如果我的儿子或者女儿在欧洲或者美国无辜被杀，我相信外国当局也会查办此事，把凶手或者凶手们绳之以法。只要我担任一天的直隶总督，直隶省都会这样依法办事。”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或许认为，如若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希望跑到国外去，并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她就活该被暴徒杀死，或者，活该有其他什么致命的灾祸降临到她身上。但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杀死那些修女对她们有好处，因为她们既没有丈夫，看起来也吃不了什么东西。总的来说，对世界没坏处——法国领事则说，这些修女在法国基本上都被看成伟大的圣人。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她们只是些平庸、勤劳的女人，照顾着很多的孩子（很可惜的是，这些孩子没有在婴儿的时候就死去）。而一群狂热分子，却把她们看成是圣徒和不朽的祖先。据我对法国人性格的了解，他们会派舰队和陆军来，杀死所有拦路的中国人。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履行他们所宣称的那些个教义的，也不明白他们不惜去维护的道义究竟是什么？凭什么值得为这些修女们大动干戈？”

“6月21日——处决杀害法国领事馆官员和基督徒的罪犯的日期，再一次被推迟。这一次是应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外交部门不断从巴黎和圣彼得堡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对拖延惩罚这些暴徒很不满意了。这是什么意思？俄国和法国是不是想找借口与大清国开战？”

“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提醒我，如果法国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普鲁士的争霸上，很可能会向我们宣战。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我听说，北京的总理衙门也从另外的一个渠道得到了一份报告。如果是这样，那么，错误完全在法国一方。如果没有法国公使的要求，暴乱分子早在几天前就被处决了。这件事非常奇怪，而且根本不应该发生。”



李鸿章与外国公使

“公使亲自向我保证，他对我在整件事上的态度十分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所谓大清政府的漠然态度抱怨了几句。我向他解释，太后、皇上还有衙门与惩治暴徒无关，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如果没有公使馆的干预，我保证用最可靠最迅捷的办法将全部罪犯捉拿归案。我希望公使确定一个明确的处决的日期，但他拒绝了。”

“7月25日——我认为那些谎话连篇、态度轻率的官员是此次排外暴乱事件的主导因素。过去，我一直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的大清官员都是极力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的。但是，通过调查这起可怕的杀害如此之多外国官员和教会工作人员的暴乱案件，再考虑到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暴乱，我确信那些见识浅薄，心慈手软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知道这么做，一定会在全国树敌，少说有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但是下次面见太后时，我依然要力劝她颁布一道上谕（只要我敢于这样坚持下去），命令府县官员负责保护基督徒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损失的，要么偿命，要么还钱。如果这条法令颁布下去，传教团

就会少受到攻击，传教士们就能畅通无阻地追求自己的天职。”

“7月27日——曾国藩大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免除了所有近来引发暴乱的神父和修女的罪责。他严厉地谴责了疯狂的暴乱行为，并宣布圣上代表所有的臣民极力抵制这种行为，并希望对肇事者实施应有的处罚。”

“我很高兴曾国藩大人会有这样的举措，更让我欣喜的是，得知皇上和太后支持我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那些无法无天的反对基督教的暴徒。必要时，我将对其采取更加猛烈的打击。”

“我决心终止直隶省的动荡，如果有必要，凡是我在任的每一个星期，我会亲自去北京、保定府和天津拜访文武官员。如果这些不可饶恕的可恶袭击事件持续发生，整个世界会真的认为我们是一个黄种野蛮人的国家。我肯定会奏请朝廷颁布一道法令。同时，我会让我管辖的直隶省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安心地居住。”

“8月23日——今天闻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8]，心如刀绞。他是一位令我感到自豪的朋友。可恶的暴徒！可惜啊！但愿行刺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仅仅被处死，如果祖先有灵的话，一定要将他们的灵魂撕成碎片。”

“也许我的一些敌人会认为，马总督之死是我的前车之鉴。因为他一直对洋人和他们的宗教表示好感。毫无疑问，就是因为这种感情，他才在权力和事业的巅峰期横遭杀身之祸。光荣啊！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豁达。我想知道，洋人们是否会真的对这种因他们而起的牺牲而心存感激？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的。”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行为，更不要说我的想法和感情会受到两江总督遇刺的影响，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李鸿章！相反，我将比任何时期都更严厉地处置直隶的暴徒。如果朝廷不干预的话，我会把这些闹事者和凶恶的罪犯赶出我的地界。”

“光荣的马新贻总督！他为中国而死！在西方上帝的眼中，他也是中国的殉道者！”

“8月25日——整夜都梦着死去的两江总督，看见他冰冷的尸体在杀手的手里。何时我像今天这样难过过呢？我甚至拒绝接见俄国的公使代表。”

“9月4日——军机处问我待斩的暴徒人数能否适量地减少。这种干涉像公使馆的干涉一样糟糕，甚至更糟。我回答说，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犯人开脱，更何况我还在努力增加人数。军机处和其他高官忙着准备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付给的赔偿金。而我来具体负责这些刁滑、愚顽的无赖，这样最好不过了！”

“9月5日——一共有十九名死刑犯，我赦免了其中一人的死罪。他是一个愚昧低贱的人，对他来说，死去比活着更幸福快乐。但今天上午，我允许他把他自己的故事讲述一遍。他被带到了我的面前。陪同前来的还有一名法国神父。发生天津教案时，他很幸运地在通州。这个犯人解释说，他一直为一个仁慈孤儿院工作，并没有参与最初的暴乱。但是那些暴徒威胁他，如果不参加这场疯狂而残忍的暴乱，他们就杀了他。”

“我问他：‘你杀人放火了吗？’”

“没有，大人，我没有。我很快就逃走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我在老城的老家。”

“我继续问他，是不是改信基督教了。”

“哦，没有，大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听到他这么回答，神父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这个家伙。对他说，他知道他在撒谎，他怎么能够否认自己的信仰呢？他应该愿意为之而死。接着这个低贱的草民自觉羞愧，告诉我，他确实是一个教徒。”

“嗯，你知道承认了就好，我告诉他，因为我不希望被人指责谋

杀了一名基督徒，哪怕你是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坏蛋，所以，我要免去你的杀头之罪，但是你将永远被驱逐出直隶和周边的省份。我希望你去一个基督徒的国家生活，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会马上找出理由杀死你。”

“然后，这个低贱的草民乞求我维持原判，那个神父则说他不在乎怎么判。我把这个懦夫骗子撵走了，下令他不许在沿海地区停留。这种撒谎成性的人当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嗓子眼里都会有一个魔鬼在说谎。如果杀了他，刀锋会钝，那一损失，要比他一条贱命大多了。”

9月1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针对好几个月前发生的天津教案做了最后一次评论。这起事件差点儿引起了中法战争。幸好，处理结果令法国政府满意。年底，法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用法兰西共和国公使的话说，这是一份“圣诞节和平礼物”。



李鸿章与其子李经方、李经述和外国公使在一起

李鸿章总督写道：“信仰基督教的公使、神父、仁慈堂的修女们宣扬和平友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传教工作来证实了其真诚的意

愿，为教徒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够如意，他们从不直接找衙门控诉。如果他们在小村子里遇到麻烦，他们不去找村长，也不去找知县，知府，巡抚或者总督，他们会直接找领事诉苦，领事再找公使。我本人于公于私，对于能当上公使的洋人都很是尊重，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会把麻烦直接汇报给他们的政府，而且常常事先不通知我们。于是，外国媒体登出最新消息说‘中国人向基督徒施暴’。看到消息的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整个中国都在武装起来对抗他们外国人。两三个市井无赖或者几十个自以为爱国的暴徒，就能败坏了整个国家的名声。上到朝廷，下到黎民百姓，都会诅咒他们！”

“我不厌其烦地向教士们建议，当他们遇到各种性质的麻烦时，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报官。其实很简单，他们只需和当地衙门的官员认识，并相信衙门的官员会给予他们全面的保护，免遭暴力。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当地官员、知县或者知府的真诚和可靠，可以直接要求巡抚或总督来保护他们。巡抚和总督也许并不比那些知县和知府更赞赏这些传教士或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害怕丢了官位，而且通常这些人更聪慧，更开明。”

“今天，我目睹了那些杀害法国外交官和仁慈堂修女的人被处决。我很高兴，如此悲惨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外国政府代表们也悉数到场。我相信他们都很满意。十六颗人头落地，其余的三十三人正在被流放途中。”

“我问法国公使是否满意？”

“是的，非常满意。”他反问道，“那么大人您呢？”

“我告诉他，在某种意义上，我相当满意，但是直隶省内，还有许多死硬的人，伸着脖子，他们都需要沉重的剃刀去修理一下。说这句话时，我也想起了马总督。”

1886年2月17日，李鸿章写了这样一篇日记：

“我越来越肯定，基督教本身并不可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憎恨洋鬼子，是因为他们只是外国人。”

“在潜心研究思考西方宗教这么多年之后，我看不到它与我们的哲学有什么冲突。相反，孔子的思想和耶稣的教义都是建立在一个高尚的层面，都是为了对人类加以改良，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我知道：如果我恰好生在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我会自称为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遵守教义的人可以免除生活中的麻烦，且受人尊敬。他们无需考虑孔子，因为他们不需要他和他的学说。同样换做中国，也是如此。我跟随着伟大的圣贤和智者，也不需要基督教，但是，不能只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到基督教的呼唤，就反对它。我相信有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从了解耶稣中获益，特别是当他们遇到麻烦，孔子的思想又不能解决的时候。”

“因此，我要总结一下当今最具才智的官员和文人的感受。从广州到北京，整个东部省份属于这个阶层的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我们不是因为宗教而憎恨洋人，而是另有原因。我们之所以害怕，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或者是他的信徒，而是担心他们可能威胁中国的政治和独立地位。”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暂且不论其他，有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明：在所有的外国人里，日本人是最让国人瞧不起的。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没有基督教国家的优点。正相反，日本人在宗教、哲学和伦理等方面和我们很相近。然而，我们仇恨他们，他们也看不起我们。尽管他们全盘吸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科学，而且他们一直假装比我们好很多。他们非但不感谢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反而会在我们这只鸿雁身上拔毛，从脖子拔到尾巴，假如有机会，他们会把中国当做一整只鸟吞咽下去。”

“了解了这些情况，仔细思考，非常感谢基督教国家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不得不说，我对于西方人很友好，无论他们来经商，还是来传教，或者根本不来。所有的国人都应该意识到，外国人都是一样的人，一些基督徒比某些道貌岸然的道教徒或者佛教徒更招

人喜欢。”

第三章　和戈登将军的交往

那时，曾国藩正是中国中部对抗太平军的团练武装——湘军和部分清军的统帅，如日中天。而李鸿章却籍籍无名，不过他聪颖过人。李父与曾国藩有同年之谊，故而李鸿章得以引起曾国藩的关注，并提携入幕。李鸿章从此踏入了军旅的行列。军人的职务和战争的生涯，最终让李鸿章接触到了查理·戈登将军。双方彼此信任，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在多年的戎马岁月中，李鸿章对此详加记述，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足足可以编成一本书。

1855年，李鸿章三十五岁。尽管如此，他像一个少年一般热情洋溢地赞美着曾国藩：

“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的赞美，也是对我在不同职位上所从事卑微工作的最高褒奖。我听说曾国藩大人已经决定将我招至麾下，帮他一起剿灭长毛逆贼。虽然不知道具体会授予什么样的职务，但不管是干什么，我都会尽力做好。我要战斗。战斗，只有战斗，可以平息我内心对这些粗野叛贼的憎恶。他们是一群强盗，在全国乱窜，竭尽全力去摧毁朝廷。他们会向北京进军，一举推翻神圣的朝廷。我们必须彻底铲除他们，把他们赶到海里，或者用他们的肉体去喂泥堆里的猪。”

“我父亲见过曾大人三次，他说曾大人是最近几个世纪来最伟大的学者。这是多么显赫的名声！曾大人博学多才，精通古典文学。同时，他又是一位明智的管理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这就是曾国藩大人，不愧为一时之豪杰——博学、贤明、严厉和勇敢！他的功绩从遥远的南方传到最北国，从西藏传到东海，令我称羡，一心想襄助曾大人建立功业。”

“我的家庭背景和曾大人的很相似的。但是我更应该在他面前表

现出谦虚，不应该牵强附会。据说，曾国藩大人的家族是安徽和江苏两省最古老的世家之一，还有人说他有满族血统，因此颇受朝廷的厚爱与倚重。但据我后来得知，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一千多年来，曾大人[9]的祖上一直生活在湖南省乡间。”

“1855年——我昨晚和学生时代的三位老朋友一起吃饭。他们来到我的花厅（李鸿章指的是他在合肥担任副通判知幕时的办公室）参观。我很快看出，他们来的目的是拿我开心，妨碍我的工作。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如果自己没正事可干，也不该去打搅别人去完成自己的志向。”

“阿平对我品头论足，说我衣服的质地很好，玉戒很沉。他说父亲这些日子比我读书那会对我宽松多了。我告诉阿平，我并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因为他等于在暗指我不应该拿俸禄，或者直截了当地，我在混日子，拿着我不该拿的钱。”

“我的父亲和叔父对我，确实要比六七年前更慷慨了许多。需要时，我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大笔钱。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花钱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现在知道，借给我的钱，很快就能被还清，而且带着很好的利息，而之前，他们是不敢确定的。”

“我的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念：如果你拥有某个物品一定数量，人们会愿意帮助你好上加好，此所谓锦上添花；而假如你什么都没有，只有圣人才会馈赠你一些东西。这就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学生考试总是不及格，连一个秀才入第都考不中，我想，是不会有一个秀才或者进士，愿意陪他熬夜背书或者给他解释深奥难懂的典籍段落的。但如果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越学越精，越来越好。”

“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是一个沿街乞讨的要饭花子，很可能他一辈子都只能沦落成那个样子。因为除了和他一样的乞丐，他根本不会有其他任何朋友。当他想在寒夜里喝一碗热汤或者在过节时吃一些好吃的，那些乞丐朋友对他来说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个规则甚至

也适用于家庭：假如一个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老婆，那个地方的姑娘就会认为，他要么娶不到一个老婆，要么认为他即使娶到家中也养不起。但是一旦这个男人结婚了，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那个男人有地位的小妾。”

“阿平，阿三和何龄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当我在花厅工作时，我无意再让他们对我的工作说三道四。当他们拜访我的时候，通判知事大人恰好不在。如果他在的话，会立即阻止他们说笑的，命令他们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最终，通判大人还是听说了此事。从知府衙门回来后，他质问了我，问我是否把衙门当成了与朋友聚会的地方了，我惭愧不已，无言以对。顺带一说，这位知事对文学一无所知，但他是一个财政数算专家。在他的驱使下，本府大大小小的税官们忙个不停。他在任职期间，辖区内很少有偷税漏税的情况。除非是那些遭受太平军严重劫掠的地方。总督对那些地区考虑得很周到，很关照他们的疾苦，允许当地百姓免除税捐。”

“朋友们知道我入了行伍，要到军队中去任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嘲笑我之前宏伟的文学抱负。我曾说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写出一部经典史诗般的作品，使自己迈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行列。于是，他们逢人便讲我有怎样的抱负。甚至，曾国藩大人在与父亲的谈话中，也用诙谐的口吻调侃我，并问及，将来是要做一个怀抱词典的文官，还是做一个手持利剑的武将？哪个能干得更好？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我父亲也明白这一点。因为曾大人曾告诉父亲说，他第一次注意到了我的文学才能和造诣，是从那位知县大人的褒奖中听来的。后来，我给曾国藩大人写过一封自荐信，谋求军职。曾大人见信后，高度赞扬了我的书法——说实话，我的确在书法上狠下了一番功夫。见到恩师本人后，他说我的履历和成绩都不赖，他会把我安排在他的身边。如果，我确实笃实能干，他会栽培我，提拔我，委以重任。”

“所有人都知道一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根据老祖宗的训诫，大事从小处做起。我为了一个最低下的差事，放弃了最崇高的职业理想。说白了，假如我在军队里不能当上大将，而最终只落

得为可怜的那一点点军饷而打仗，会被人看不起。但我心意并非如此，我的本心中是不喜欢行伍的，也不想做一介武将。但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更何况军队现在急需人才。在行伍中，我依然可以独善其身，不放弃写诗作赋，坚持自己的文学梦。但如今这世道，哪里是一个写诗的时代？谁又有那份闲心去读我的诗呢？这片土地如今满目疮痍，处处刀光剑影，谁还有那份诗歌的浪漫？”

“因此，说我背弃了文学，改变了志向，这是不对的。曾国藩恩师岂非一代之鸿儒？他同样可以跃上马背，统帅千军万马。”

接下来的那些年头，李鸿章笔下的记录更加谨慎。日记主要记述了他自己如何一步步深得总督曾国藩大人的器重，从一个职位升到另一个职位。他的日记和备忘录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从军细节。所有的记录都表明，李鸿章由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逐步成长为一个笃实能干的官场大吏。从此，他将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无尽的政治事务操劳一辈子。

在放弃了他的财务工作五年后，李鸿章仿佛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因为他在在八月份的一篇长文里这样写道：

“我被推选为很多部队的统领。这种荣耀是不可小视的。我麾下的部队最受曾大人青睐。最终促使他保举我督办江苏的军务。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获得如此的升迁。不过细细想来，也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因为我的军队行事雷厉，总是赶在友军之前，像秋风吹稻草一样，赶走了那些长毛贼寇。”

“起初的那些日子，我觉得自己是绝不会喜欢上打仗的，更不会喜欢上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但是军旅生涯令我的性格和态度渐渐改变了，有时候，我在犹豫自己是否会希望回到宁静而没有厮杀的文官差事上来。”

“只要这些乌合的狂妄之徒还在蹂躏这片土地，我就一定会坚守自己的阵地。他们到处传播邪说，组织拜上帝会，召集了几十万之众的皈依者。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对大清帝国的不忠。他们攻城略

地，屠杀民众，摧毁城市，罪不可恕。但是他们烧杀抢掠，对渴望安居乐业的百姓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还强迫国人，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都要追随他们，一起尊崇天父和天兄（这帮无知的狂妄之徒，居然把耶稣基督称为‘天兄’）。不过，我们已经肃清了来自南方的太平军。令我倍感骄傲的是，只要我一声令下，成百上千颗太平军人头就会落地。”

“我进军浙江时，一些浙江的屠夫告诉我，因为太平军的劫掠，附近已经无肉可卖。现在，他们囤积的肉，还不够大军吃一顿。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杀死狱中的一些太平军囚犯来吃。我告诉他们，我会命令手下的都统督办此事。能补充城市的肉食供应，这不是个不坏的主意。”

“太平军控制下的南京，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此地，摧毁边远的城郊，肆意屠戮百姓。城墙被攻破后，长毛贼如凶猛的魔鬼一般涌入城市，四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些人全都是些流氓地痞，凶神恶煞。他们分布在广州到长江汉口在内的广大地区。好几万人高举着天国的旗帜，所到之处，城毁人亡。”

“尽管他们自封很高的头衔，举行很多煞有其事的敬天仪式，但是依旧改变不了这一群乌合之众的本质。他们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性可言，他们的领袖洪秀全和军师冯云山不光光在邪教信仰上，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毫无理智可言。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南京城内——他们吐着长舌，急切地想喝水。因为缺少食物，他们的胃就像空瘪瘪的猪膀胱一样枯瘦。”

“他们不敢出城，在长江沿岸打仗。不！他们也不愿意投降，接受曾大人的招安。不！他们宁愿一大批人抱团，待在南京城内，直到瘟疫把他们统统消灭，一船一船地运走。而城内，对大清王朝忠诚的臣民每天也会死很多人，很多的尸体被堆在肉摊上叫卖。”

“我手下的官兵不断向我汇报南蛮长毛贼的暴行。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事实。如果我母亲只是间接听人说起，或是在书中读到此事，她是不会相信的。但是，她和父亲也曾亲眼目睹了太平军的烧杀抢

掠。我们家的宅院——那个我出生的地方，以及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夫人生活着的地方，大部分已经像一堆稻草一样，被这些强盗放火焚毁干净了。那个地区，成百上千的房屋遭受到了同样的厄运。老百姓成批被屠杀。所以，我对这些把死人尸体和活人都堆在一起焚烧的疯子，对这些长毛逆贼，下什么样的命令来惩罚都算不上过分。我无法原谅他们的罪孽，无法对他们滔天的罪孽和嗜血杀戮视而不见。我请求列祖列宗让我把他们全部赶走，赶尽杀绝，全部丢到海里去。”

“1859年12月12日——今天，有人向我汇报，说我的同窗阿平在一次口角中，被人杀死在城郊。听闻此事，我非常难过。好像有谁说过，阿平要准备投降太平军。他跟几个士兵开了句玩笑，或者说了点风凉话。士兵就把他和他的兄弟杀死，挂在了大桥上。那些士兵的名字被报到了我手头上。我命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他们。值此战时，我不愿失去任何一个好士兵。但是这两三人，想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多或少，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的。”

“1860年4月16日——夫人又给我生了个男孩，我很高兴。我希望他将来能有所成就，成为一个伟丈夫和封疆大吏。”

“1860年6月16日——太平军的头领们想谋杀我。他们在太仓谋杀了我一位高尚的兄弟。但是，我血管里有足够多的鲜血，大脑有足够的智慧，足以去打败太平军的叛乱和他们的头领。”

同一年的同一个月，李鸿章首次提到了“常胜军”的名字。来自英国军队的查理·戈登后来成为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带领着“常胜军”在浙江和江西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将太平军的力量全部瓦解了。清政府也逐步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与此同时，李鸿章得以擢升，督办大清帝国两省的军务，并代办两江总督。不久，在曾国藩的极力保举下，北京朝廷颁发圣旨，李鸿章正式出任两江总督。

他写道：“我从不以为，鼓励洋人干涉朝廷内政是好事。如果我现在有足够的权力，调动足够多的兵马，能尽快肃清太平军，我也不会奏请朝廷允许英法出兵镇压太平军。但是，恩师曾国藩大人是一个

有大智慧的君子，他是此政策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所以，我不会去批评。他认为最适合的办法，就是全力以赴去肃清长毛，丝毫不要动摇。曾国藩大人说过，洋人的问题是，至少在宗教上，他们要为叛贼负责。所以，用他们的士兵和海军去为平叛作出一些牺牲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给予洋鬼子们经常参与解决类似麻烦的机会，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借口，就像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权来参与中国内政，从而借机为自己的国家谋利呢？”



戈登画像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他们的确帮了大忙。特别是英国人，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派出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来支援我们。这些洋人在没有喝酒的时候，都是非常出色的战士，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喝醉的时候，他们既不喜欢也不尊重我们大清的军队。每攻下一座城池，爱国的将士们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管束他们。他们见什么吃什么，见什么喝什么，但是他们不会虐待妇女，也不会杀死毫无战斗力的

人，除非受了对方很大的挑衅。”

“我交给苏松太道的吴煦[10]一笔钱，让他和美国人华尔平分。华尔正在积极地为我的‘常胜军’招兵买马。我向总督举荐他去做‘常胜军’的统帅。不过，我还没有见过他。我只是听说他的战功，并相信他是一个勤劳肯干，勇猛过人的人。”

“1861年，1月5日——松江被大股的太平军所攻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收复。我命令吴煦和华尔立刻前来与我商议此事。‘常胜军’已经很多天闲着没有打仗了，也许这支部队应该由我来亲自调遣。我本想休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打了这么多的仗，我发觉自己浑身酸痛乏力；可是，‘常胜军’却一直在休整，他们在休息时，吃得比作战时还要多，当他们行军打仗时，他们总是设法去找吃的喝的，不论什么方式，他们总能找到。但是当他们休整下来，士兵们要变得慵懒很多，恨不得希望有人把饭送到他们的嘴边。但是这一点，就需要更多的伙夫服务，而且食物的费用也难以承受。此外，无事可干的时候，他们变得十分过分，无法无天，还总想着拿到更多的饷银。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打仗去比较好。这样，一到晚上，他们就想睡觉，而不是鬼鬼祟祟地四处惹麻烦。”

1862年12月，他写道：“糟糕的是，我听说接替华尔当管带的合适人选，至今还没有着落，试过了好几个军官都不成。华尔真是位精力充沛的统帅，如果他还活着，将对大清国非常有利，也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多的荣耀。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他几乎是每战必胜，他的名字已经开始令太平军闻风丧胆。”

“他战死在慈溪时，我就在他的身边。在他临终之前，我泪水盈眶。令人难过的是，他走的时候，远离家人和朋友，孤苦离世。这种悲伤比死亡本身更伤痛，尽管他的士兵领到了全部的军饷。但作为常胜军的管带，他被拖欠了一大笔的饷银。他对此事只字未提。我要用这笔钱，在圣祠里祭奠他。”

同一天，他写道：“无论是白齐文（一个接替华尔统领‘常胜军’的美国人）还是霍兰德（一个英国前军官）都无法胜任重新组织常胜军

的工作。依我看来，他们只是装作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愿意让一个拥有优秀履历的库克少校来统领，看看他的表现究竟如何。我的两只脚很不舒服，因为去年不慎摔过了一次。后背也很僵痛，否则，我一定会亲自上阵指挥。”

“1863年2月18日，我收到来自布鲁斯爵士和斯特维利将军的来信，说英国最好的军官之一，查理·戈登会被派到我的军中，接管常胜军。而且他们说，这位优秀的军官，在其服役期间不需要任何的酬劳。大英帝国政府真是非常地慷慨。我听到此事，非常高兴，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太平军叛乱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耗尽了私人的资金。可是，雇用戈登的钱，大清国还是出得起的。难道是因为这个人其实对他们的政府而言没有用处？如今并不怕他要价高，更担心的，反而是他不要报酬。他是否可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指挥好这支军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863年2月28日——我又收到英国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戈登少校亲笔所写的。这封用英文写的信很简短，信中陈明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他必须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否则将不接手这一事务。”

“为了得到朝廷的答复，还需要花上好多天甚至很多星期。为我们做事的洋人，全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即使是他们在为自己的出路而求职。当然，我不能这么简单地说这位英国军官，因为并不是他自己申请做统帅的，而是大英帝国的要求，况且，他也没有要求薪水。他自己没有提，可是，他的上司替他说了。数目不惊人，对我而言，完全付得起。如果他很能干，能率领常胜军无往不利，斩断十万太平军的头颅。不管他的大英帝国政府向我伸手要什么，我都会用荣誉和金钱回报他们。”

“没有日期——我可能不会跟这位新任的指挥官英国少校相处得愉快的。这个想法令我很担忧。在信中，他宣称只有掌握最高指挥权的前提下，才同意与太平军作战。这令我更不安。华尔说过同样的话，无用的白齐文和霍兰德也说过同样的话。至于库克，他会是一名出色的将领，统帅一群无业游民拉着骆驼去饱饮水的好将军。”

“我痛恨所有的这些洋人，不过，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就太不明智了。我不讨厌某个洋人本身，而是讨厌他们自恃高人一等，装腔作势的样子。每一个人都会用同一副腔调说，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我会把太平军全部都赶走或者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杀掉。我要让你的军队比任何时候都荣耀，但是你必须让我用自己的方式作战，不能横加干涉。”

“这就是洋人做事的整体风格。在这场战争中，我真领教了不少。因为紧急的情况不断出现，我们不得不赔着笑脸忍受，跟他们说‘是是是’。这让我怒不可遏，最终有一天，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自诩的国家到底有多文明？是否是在我们之前就学会了六艺？你们出生的年代里，是否有比我更加智慧的人？”

最好，在此解释一下时代背景。此时，太平军已经推进到了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四省。他们四处搞破坏，滥施暴行，以反抗清政府的残暴统治。这些人被一个很有蛊惑力的人领导，他自称从“基督徒的上帝和他的兄长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了权力。这源自于一个事实，他们的那个最高领袖洪秀全，曾经从落入他手中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上吸收一些空幻的观念，宣称在他所见的幻象中，“基督徒的上帝”任命他为中国皇帝。

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士，包括曾国藩和恭亲王在内，还有大清帝国政府本身，都曾经相信太平军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根据历史事实，当时去广州传教的国家基督教大主教罗孝全牧师拒绝承认洪秀全的思想，并对洪秀全大病时所见的异象不以为然。洪秀全本人也绝对没有可能得到任何基督教国家或者团体的鼓励。然而，他自称是一个受教者，受天命领导中国人过上“洋鬼子式”的基督教宗教生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把这次起义定性为基督教对清朝的攻击。清廷和中国上下，对太平军发起的这一场可怕战争的仇恨，统统转嫁于外国教会。

到目前为止，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情为零。可能，他的思想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开明的时期，所以，他写下了我们所见到的上面那

些文字不足为奇。毫无疑问，他心中对外国人怀有更多的恨意，只是不适于付诸笔端，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值得称颂的是，随着他的日渐成熟，对“西方教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后，他成为教会最热心的朋友之一，就如我们可以在他的回忆录的其他部分中所读到的那样。

“3月17日——我相信英国人戈登的到来是上天的恩赐。我已经任命他为‘常胜军’管带。他以前好像在火烧圆明园的那支英法联军里效过力，还在天津待过好一段日子。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我对他很满意。”

“他的言行举止都要优于任何我见过的洋人。在我看来，他没有明显显露出那种跟大多数洋人一样令人厌恶的自负。此外，他很有军人风度，说话办事直截了当，秉公行事。他在到来后的两个小时内视察了部队，下达了命令，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士兵们都乐于服从他的命令。”

“看来，英国政府只是把戈登先生借给我们使用，朝廷根本不用给他发薪水。我突然担心起来，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件好事。因为一个愿意提供无偿援助的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比那些拿着哪怕是一点饷银的人更容易撂挑子不干，说走就走。我必须活动一下，让戈登将军接受我们的饷银。”

“4月7日——戈登将军带领着两千名‘常胜军’将士以及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名清军和地方武装，在福山向太平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前天，我给他们一些赏金，并让他们知道，如果能拿下福山，还有一大笔丰厚的奖金。后来，我们再次拿下了苏州，我告诉他们，戈登统帅下的每名官兵，除了得到全额的军饷，还有额外的赏金。”

“5月2日——一位太仓府的前任知县前来向我诉苦说，戈登手下的人在攻占太仓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把太仓剥夺得像一副干巴巴的鱼骨架。他们还杀了好几百个太平军。他情绪激动，问我能否命令戈登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

“这个厚颜无耻的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度暗中勾结

太平军。我早就听说这个叛贼有叛变的倾向。他比比画画地控诉着‘常胜军’的不是，当时我就想着要叫侍卫来，在院子里结束他无边的烦恼。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让我的英文秘书赫尔，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戈登，让他带着这封信去求见戈登，然后让戈登见信后砍掉他的头。这个家伙兴高采烈、满意地走了。”

“（没有日期，可能是在五月中旬）——见到这么一位优秀的英国人领军打仗，我疲倦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沉重的心灵，就像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我和他共处了九天九夜，刚刚从前线回来。如果有什么品质，能让我像对恩师曾国藩大人一样崇拜的话，那就是这个军官雷厉的军人作风。战斗——部署——再战斗——再部署；晚上计划，白天执行——白天计划，晚上执行！他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军人。”

“昨天，当我准备离开暂时休整的时候，我告诉戈登，他是我的兄弟。我心目中拿他当我那个已经死去的兄弟。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位英国人的脸上先是洋溢着喜悦，后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伤心沮丧的事情。当他向我表示谢意的时候，笑容已从嘴角消失，泪水盈眶。难道在他生命中，曾经有一些伤痛，是他挥之不去，所以他期望不顾一切地打仗，想遗忘干净。或是，死亡对他来说，并非一件可怕的事，而是一种解脱？”

“（没有日期）——我很可惜的是，程学启和戈登的关系不是很和睦。他们打起关于对方的小报告来，源源不断，都表示难以相处好。”

“6月12日——许多被戈登将军革职的军官，联名请求我为他们恢复职务。但是我一概加以拒绝。我认为，他们早就应该被赶出军队了。他们没有丝毫的爱国心，满脑子只想着发战利品的财和纳美女为妾。”

“同一天晚些时候——程将军威胁说，如果再不约束戈登将军，他就辞职。也许我告诉戈登，让他直接听命于我，是个错误。虽然学启统领队伍，但无法干涉‘常胜军’的军务。学启并不是一位多么了不

起的军人，他同戈登的脾气一样糟糕。他们两人都像我，性急争执起来，口不择言。”

“7月19日——即使戈登很有才华，他也必须要管好自己的那张嘴。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公然指责我暗中偏袒学启，并试图让他完全指挥包括‘常胜军’在内全部的清军。此外，他还公然指责我克扣军饷，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戈登将军要求职位比他低的人敬畏他，而且他认为，只有采取极其强硬的手段，才可以维持军纪。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这位负责本地区军务和政务的长官一点面子，一点尊敬呢？”

“6月28日——今天程学启又来说戈登的不是了。我将他斥退，命他回部队安分去做他的指挥。这些琐事搅得我日夜不得安静，该集中精力处理军务的时候，却总昏昏沉沉欲睡。”

“（没有日期）——这些日子，戈登不想别的，满脑子全是钱。他向我要钱，好像我是财神爷。他说如果我不给钱，官兵们就无法打仗。我说如果能攻入苏州，就会有钱付清所有人的欠饷，同时，还会有一笔丰厚的赏银。这些话，我是从总督那里听来的，而总督又是亲口允诺的。”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李鸿章只字未提那段时间困扰他的无数难题和变化。但其实，最困扰他的，是戈登将军将要辞职去上海，希望他的英国上司——布鲁斯爵士和斯特维利将军批准他离开。但是到了上海，他陡然发现，那个在华尔阵亡之后继任“常胜军”管带的白齐文召集了百余名上海滩浪迹的洋人，已经投奔了太平军。那时候，白齐文正在苏州的太平军大本营中。很久以来，这位英国军官戈登一直在准备攻打这座城市。而事实上，他已经围困并占领了吴江、青浦和周边的几个重要的要塞。要不是李总督麾下的程学启和他之间互存猜忌与口角，他完全具备了攻打苏州的绝佳条件。他仍然很焦躁，因为那些借他助剿的人很霸道，不顾他的尊严。但白齐文的口是心非和临阵投敌，显然更致命，让这位英勇的战士打消掉了辞职的念头。我们发现，几星期后，他又返回了驻地。

“9月——戈登将军有很多的缺点。他傲慢，脾气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没完没了地要钱，但他依然是一个军事天才。不管我对他说了什么，或者对别人说过他什么，我对他依然非常青睐，时常高看一眼。如果他不介意与程学启共事，并能暂时搁下那些可恶的欠饷的话，我们会更好地协作。真可恶！没有军饷，那些洋兵们什么都不愿意干，就知道吃喝拉撒睡，并且骚扰平民百姓。”

“9月——我着令程学启暂时待在我的身边，不要去管戈登将军的事。”

“9月——今天我给戈登手下的七千人马发了一个月的军饷。还给了他一千块的英洋。他都拿走了，他说要把这些钱给自己手下的军官们发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非常难相处。”

“11月28日——昨晚攻打苏州城时，‘常胜军’第一次严重受挫。三百多名官兵阵亡，戈登将军死里逃生。但是，他还准备向苏州城发起最后的攻击。他让我阻止程学启干涉他的计划。这事我会照办的。”

“11月29日——程学启明白，虽然他协助督办江苏的军务，但是他是决不能阻挠戈登攻打苏州的计划的。”

“12月2日下午，今天太平军的慕王谭绍光（苏州太平军的主帅）在苏州城内被刺杀。这真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这表明太平军的这几个头目之间很不和。我们的诱降献城谈判，很快就可以启动了。今天，苏州送来了三千名饥肠辘辘的百姓到我们的军中吃饭。但是程学启凭着铁石心肠，把他们统统撵走了回去。得让太平军来背这个包袱。”

“12月6日——献城谈判成功了。我下令，赦免太平军几个头目和他们大部分的手下。投降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据报，戈登曾亲自去城里拜会他们。我看不太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交易，是什么促使他单方面派人去谈判。程学启宣布了时间，他说戈登私下里和太平军头目达成了秘密协议，甚至还一直和卑鄙的白齐文保持着联系。他绕过统帅这样行事是不对的。但不管怎样，我是不会怀疑他的。因为，

他劝说了白齐文再次叛变，主动回来投诚。”

在所存的李鸿章这个时期的文章里，他前后三次提到了戈登将军。一次是对杀掉苏州降将的简短记述；另一次写于12月29日，他说他代表了朝廷给戈登“一块头等忠勇奖牌”并赏银“一万两英洋”，“但是好像太平军将士的死，令他很受伤害，他傲慢地拒绝了所有的赏赐。”

李鸿章在1896年做著名的环球旅行时期，就太平军投降将领的死写了一篇文章，并把它交给了英国的媒体，目的是澄清自己当年和戈登不和的原因[11]。这篇文章写于1863年12月8日，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清晨，原文于来自当天的日记。对比起来看，着实很有趣，因为在其回忆录的其他部分，也曾出现过那篇文章的引文。其日记的原文如下：

“苏州，旧的江苏巡抚衙门——今天，这座城市充满了血腥味。许久以来，这里一直是叛乱、饥饿的龌龊巢穴。但我此刻身在其中，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我们为朝廷打了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胜仗。只需要再有一系列类似的大胜仗，就可以把这场叛乱彻底的镇压了。把那颗腐败、嗜血的头颅，从它邪恶的身体上砍下来。朝廷会对这次大胜仗予以高度的嘉奖，恭亲王接到了消息，一定会欢呼雀跃。我已经差人去报捷了。戈登，学启以及所有的官兵都值得褒奖。但这也是让戈登离职的良机，他越来越固执了。当他说起那八个被我处死的太平军头目时，好似在说他不幸的兄弟一般。”

“昨晚，为了表示对太平军这几个头目的投降表示肯定，我召开了议和会议，并设宴款待了他们。我们放弃旧仇宿怨，握手言和的方式很有意思。为了准备这些菜肴，我花了不少银两。这是一场盛宴。席间笑语连连，觥筹交错，一片祥和。尽管他们曾经都是长毛贼人，我依然很高兴结识他们，但我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派人把守东门。我的大战船停泊在那里。宴会结束之前，一大群亡命之徒，一些是绿营兵，但大部分是太平军将领们的部下，喝醉了酒，从东门涌了进来。他们造成了混乱，混乱带来了冲突和杀戮。我最先听到了吵

闹声，起初以为是有人蓄意来谋杀我。因为我曾在很多营房里都遭受过刺客的威胁。我慌忙乘坐小船逃进了城。学启也成功地从闹事者手中逃脱了出来，跟着我上了岸。我立刻向遇到的军官下令，尽快调集部队，逮捕所有的闹事者。但是命令没有到位，我在船上看到的是我军失控的大屠杀场景。我将此事奏报北京朝廷，但是太后和皇上是无法体会到我们对于这次误会的悲痛。”

“同一天晚间——戈登将军前来指责我，说我蓄意谋杀了那些太平军将领。我反诘他，既然我们胜利了，为什么要密谋，为什么要费力兜圈子，只要下一道命令，用毛笔画上几笔，我就能办到同样的事。他没有回答我。但他侮辱了我，说会把他认为的我的背信弃义行为报给上海和英国的上司，公诸于世界。随他去吧，他这么闹又不能换回那些疯癫的太平军降将的命。他们的死，我并不感到难过，只不过为他们这么草率的死法感到惋惜。好歹，他们也都是些人才。”

“午夜——明天，一千二百名叛贼就要被处决。他们很多人是这三千造反者中最为邪恶的人。据最可靠的消息，他们中有很多人参与谋杀那些太平军的降将，而且他们也在找我报仇。”

“（没有日期）——我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恭亲王说，择日我将被擢升。他向戈登和程学启表达了最诚挚的祝贺。我代表朝廷向戈登颁发了头等忠勇功牌，并犒赏他一万两洋银。”

“（没有日期）——戈登将军怒气冲冲地来找我。他又重复了先前关于太平军将领们的那套话。我不想和他争论，甚至也不想跟他解释当天的情境。因为该说的我都说了。他拒绝接受我给他准备好的一万两赏银，还发誓拒绝接受朝廷赏赐的功德牌。这是对朝廷的最大不敬，我要奏请朝廷，让他卷铺盖走人，另谋高就。”

第四章　与慈禧太后的关系

“1873年2月24日，北京——昨夜，同治皇帝的十七岁亲政仪式搞得隆重又喜庆（关于同治皇帝的亲政，李鸿章在他日记的其他部分，多有描述，且极富文采）。太后特差人命我进宫。她很激动地问我，遇到这么大的喜事，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向太庙和天坛的献祭？”

“尽管我的官职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但是，我的头比任何人都低。”



慈禧太后71岁画像

“我说：‘是，皇太后圣明。我在很多地方都呈上献祭，而且永远放在了臣的心里。因为太后您最清楚，自从臣到皇上身边，就非常乐

意处理皇上交办的事情。’”

“她听到后回答道：‘是啊，李中堂，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也难为你，那么仔细。但是我现在要安排你办一件大事儿，一件我从不曾叫任何人办的大事儿。’”

“我将腰弯得很低，等候着她的交办。我不必下跪，因为特赐可站立听话（跪拜，指要把脸贴近地上的地毯）。我想弄清楚，太后是否是念在我的勇气和忠心的份上，让我去办一件秘密的事情。然而，也就是在同治皇帝亲政仪式的那个晚上，太后终于向我示意她有一个心愿，命我代她去圆了这个心愿。”

“我并没有问她，这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知肚明。我热情洋溢且信誓旦旦地回答她说，我的命都是太后给的。我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再所不辞。当时，她高兴地说：‘李中堂，我相信你会的’。”

“太后的肯定，令我心中大喜。因为她是个好猜忌的人，这段时间里她对自己最为敬重的满洲大臣也不会有如此态度。”

“等了许久，太后才问我：‘你了解嫘祖[12]么？’”

“太后这么问我，显然是多余的。她了解我的学识，所以，不等我回答，她又继续说：‘从这个时辰起，并且不得迟于两天后的此时此刻，你要为我在嫘祖庙前奉上一篇举世无双的祭文。李中堂，你面对最复杂的情势，依然气定神闲、口若悬河。所以，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用我跟你多说什么，你现在可以退下了，不过临走之前，赐你好好地看看哀家一眼。’”

“我抬起头，心中甚是欢喜。我真的为能看到太后的尊容而高兴。她已经从御座上起身。我知道，今天，她精心打扮过，穿上了精美的黄丝绸和黄金装饰的衣服，显得高贵而骄傲。”

“我看着她微笑的脸，说：‘圣明的皇太后，臣可以恳请说句话么？’”

“她应准了。”

“见到太后穿着嫘祖娘娘所发明的衣冠，臣将写出最圣洁、最典雅的祭文献给嫘祖。”

“我相信，我的话，一定让太后龙颜大悦。接着，我就退下了。”

“所以，今夜，我去了嫘祖庙，把祭文献给我们女性先祖的杰出代表。她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抽丝剥茧之术，泽被后世这块土地上所有的贵妇人，并养活了千百万相关的从业人员。”

“我坐着轿子来到嫘祖庙，随同前往的只有家府中的一位师爷。到了那儿，我下令所有的香客必须马上离开，一个半时辰之后方准入内。许多香客已经在庙里待了好几天，因为他们在等待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

“师爷把我的命令转告给服侍住持的一个小沙弥。不一会儿工夫，寺庙的住持来到门外要求见我，他对这个命令既局促不安又很惊讶。”

“老衲不敢相信，竟是中堂大人屈尊亲自来拜谒嫘祖娘娘。师爷方才传的话，我还以为是听错了。如果大人想肃清寺院，我立刻去办，但是，大人能否向老衲告知一下出此命令的原因？”

“不能！我回答，你领命就行了。”

“听到这话，他立刻退下，口中含糊地连连道歉。但我知道，他心中定有不悦。而且，我敢肯定，他一定被我的命令给惹怒了，愤愤不平。我听说，这些天，天天会有很多的人来嫘祖庙祭拜，撒了不少的香火钱。而就在这个时候，有小沙弥告诉我，住持正在寺院内的某处款待他的亲朋。”

“不管他怎么想，显然命令很快就生效了。朝拜的人们迅速从寺庙里走了出来，各自回家，或者站到外边张望。期间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足以考验一个人的耐心。但是，假如对于一个把宝贵时间浪费

在无所事事上的人来说是非常快的。之后，住持回到寺庙大门外的入口处，向我通报，寺内已经空无一人。”

“我向寺庙门口走去，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于是，我走进去，关上身后的大门，来到神圣的嫘祖娘娘塑像前。”

“我在塑像前待了不到一个时辰，独自一人，没有干扰，带着太后的懿旨，祭祀着这位美丽的养蚕治丝产业的鼻祖，黄帝的妻子。在半个时辰里，我代表太后致谢、祷告和赞美，其余的时间我以我李鸿章自己的名义拜祭，我把自己说过的所有话都牢记在心，因为我说的绝不是泛泛之语，而是肺腑之言。普天之下，许多热爱她的养蚕治丝技艺的人们，因为她的发明而变得美丽富足，他们都是嫘祖的子民。”

“我从嫘祖庙再次返回皇宫，时间已晚，只能到紫禁城外。然后，从那里直接回到自己的府邸。”



李鸿章府邸的正厅

我们发现李鸿章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些话：

“我被嫘祖庙住持的行为给激怒了。这个爱管闲事的小人，据说已经把准备布施的礼物和钱财都据为己有。这是对我的大不敬，我不打算放过他。住持的多嘴多舌和不恭的态度，并没有干扰到我昨晚的拜祭。因为我代表的是皇太后，而他冒犯的是我本人，不是太后。但是今天，当我准备向太后呈现祭文，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小人，影响了我的心情，妨碍了我的发挥。我表达的内容对自己来说，太过于平淡，即使本来有好的想法，都无法轻易地在纸上写下来。”

“2月26日，未时——成功地完成一件事，总让人产生心满意足的感觉。不久前，住持来拜见我，请我不要革除他的职务。我告诉他，他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可不想被这种小人的琐事所羁绊。他走的时候，声音里带着哭腔，说他不会回来了。他来之前，应该了解清楚。因为我向朝廷奏请弹劾他之后，他就应该从此改头换面，以便能由我来保举他的职务。”

“2月27日，今天，我面见了皇上和皇太后。年轻的皇上，如今已经成年，我希望他能有所成就。而当他回想起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能倍感欣慰。我相信所有的帝王和其他人一样，时常假装蔑视一切世人，都希望世人认为他们已经长大，并足够地权威。”

“太后驾到了。她还穿着三天前交给我不寻常任务时所穿的那件漂亮的衣裳。她解释说，这是对我代她拜祭嫘祖表示感谢。几个时辰以前，一份主要由我所撰写的祭文被送到了太后那里御览。祭文写在很久以前，由师爷装裱的帛书上面。”

“太后高兴地说：‘中堂大人，这是你亲手所写的么？你是怎么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的？’”

“皇上笑了笑，但没有说什么话。”

“我是这样回答太后的：我不敢说这篇祭文全是我写的。因为实话实说，我是代太后祭拜的，所以我告诉她，祭文是属于太后老佛爷

您的。我是受了太后的启发，把太后心底的东西表达出来而已。它体现了太后个人的思想。”

“‘太后圣明，’我说，‘最卑微的下臣，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献上自己的祭文的。如果太后恩准，臣想恳请太后赐予臣这份荣幸，将我这篇微不足道的祭文呈献给太后。太后老佛爷献给嫘祖的语言，文彩锦绣，口若吐兰，相比之下，为臣的文笔不过是私塾学生一份拙劣的尝试罢了。’”

“中堂大人，你的一片忠心，天地可鉴。太后说，把你自己拜祭嫘祖的那一份，也呈上来吧。我倒要看看是否和我心意一样有趣。”

“我随身携带了一份，不过书法平常，誊写在宣纸上。我一边道歉，一边呈现给她。”

“但是她只是扫了一眼，就交还给我了。”

“中堂过谦了，她说，你还是用皇家御用的丝帛书写，再呈给哀家。”

下面这段文字，完全没有日期，但显然是几个星期后，李鸿章在他天津衙门里写的。这篇文章被密封在一个铁盒子里，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章，所有的都是关于皇帝成年后与太后执政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这篇文章写在很沉的银纸上，因为反复折叠，破损得很厉害。因为经常翻看，脱落了很多处，有几行甚至缺失了。很显然，这就是李鸿章呈送给慈禧太后的那一份[13]。她将其归还，意在说明，李鸿章是十分谦虚的，他写得很好。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这份银纸手稿的文章，在本质上是纯文学和宗教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凭借作者个人的兴趣所作。在当时或者接下来的几年内，手稿上经常有触摸的痕迹，说明作者很喜欢这篇文字。而相比之下，很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都是干干净净，没有弄脏，说明对那些官样文字，李鸿章根本不屑于一看。

A HUMBLE MAN'S VOICE

To Thee, O Ancestor of the Silken World，
a humble man, with face to earth，
which thou didst bless and make glad，
asks of thee in all the humility of
his soul to hear his prayer of praise
and petition.
To Thee, O Ancestor of a Noble Work，
it is not given that thou shouldst
hearken unto my words, for in the
celestial world of the Seven Springs
a million millions of them that drew
from thee on earth the breath of their
souls and the food of their bodies are
now thy meekest servants and subjects；
and the voices of their praise must
ring so loud and sweet to thine ears
that these rough words of mine are
but as jarring sounds of discord.

To Thee, O Gladsome Queen of a Gladsome Art , it cannot be known that one so poor and miserable as I doth even in thy loved land exist, much less that thy most degraded petitioner did in all his days honour and praise thy name, sing thy glories , pray for them that prayed to thee, thought by day and dreamed by night of all the vast goodness thou didst bestow upon this Flowery Land.

But, O Transcendent Lady of the Ancient Sin , I, thy miserable petitioner, did, when a boy, labour among the trees of the mulberry, feed with tender care the creatures thou didst teach to spin , threaded from their shells the divine gleams which thou taughtest to produce , wove with mine own hands the silken strands of thy invention, and made into

great widths and breadths the shimmering

fabric which is the glory of the world.

Yet, O Yuen Fi, Goddess of the Golden Weave ,

all, all the words of this most humble

man are true ; as true as ever lowly one

did vouch to speak to one exalted high.

And now, Yuen Fi, Lady of the Blessed Silk ,

I crave that thou wilt think of me in

thy celestial sphere ; that to the holy

ones forgathered there, thou wilt but

speak a kindly word and say that here

upon the sordid earth, which thou alone

didst beautify, there lives a humble man of

poor renown, who, in all the hours of all

his days did strive and toil by sweat of face

and tire of brain to do thy bidding in the

silken fields ; who , ..

[Lines obliterated]

My prayer, O Heavenly One, O Goddess Rare ,

though I would speak to th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in pain I do make brief ; for well I know that in that High Beyond this voice of mine can hold no charm. But now again of thee I fain would ask that in this hour of darkest night a newer blessing thou wilt give to all that work in arts of thine ; bless them that harvest in the fields, bless thou the silkworms'rounded home, bless them that toil at factory loom, bless them that mart thy precious weave, bless them that sail the far salt seas and take thy goods to foreign shore ; bless them that on their bodies fair—inIndies and the far beyond , the lands of Europe and the West, in every isle, in every clime, in cold and heat, in shine and rain, in mountain home and valley mild, in palace rich and humble cot , —

where'er, O Mighty Sun-Loved Queen, thy

name is thought or heard or sung, send

down thy blessings like the dew

译文：

伟大先人——嫘祖颂

煌煌嫘祖　辅我玄黄

胄衍祀绵　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　光被遐荒

诚福尚德　高颂无疆

懿维我祖　命世之英

兹从天佑　代代永享

昭告圣命　拜服祈祥

九州七泉　万年流长

仁爱乐土　母仪我邦

於维圣神　挺生邃古

劳彼桑林　慧而结丝

哺育生灵　如孕神物

手致以巧　乃有绸出

继天立极　开物成务

功化之隆　惠利万世

抚育黔黎　彝伦修叙

生多福恩　不忘而报

机杼相承　转贸遐迩

五洲四海　巨川静谷

印度欧美　殿廷寒牖

普天之下　皆被贵泽

井井绳绳　至今承之

今多患难　再求永佑

保我生民　再沐辉润

惟祖英灵　似水绵长

惟神昭鉴　佑我邦家

永祚如阳　来歆尚飨！

而根据宫廷史料所记载，《嫘祖颂》[14]系太后本人所撰。此外，由于慈禧太后非常重视自己的文学能力，朝野上下也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没有人会怀疑慈禧是《嫘祖颂》的作者。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李鸿章生前费尽心力地下令印制和传播《嫘祖颂》，但是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过他才是其真正作者。在他下达的命令文告中，这样写道：“（这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女性写给先祖中最荣耀圣洁女性的不朽致言。”

尽管我们做了严谨细致的研究，并仔细翻译了李总督的全部日记，查考了包括大量现已出版的文件、信函和其他资料。除了先前提

到的、为慈禧太后代笔的那篇之外，并没有发现李鸿章有其他关于嫘祖的“祭文”或“颂歌”。

显然，毋庸置疑，李鸿章是《嫘祖颂》的真正作者，所以在这里把这篇文章呈现出来，是相当适宜的。此外，研究者和译者没有在李总督的文字中找到《嫘祖颂》的复制品，这是一个孤本。通过进一步研读，我们认为，把《嫘祖颂》译成英文可能要占到十至十二页的篇幅，所以将其缩略。这是个不算严重的瑕疵，在中国，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

然而，对于中国包括欧美的严肃学者们来说，特别是在东方学者宣布《嫘祖颂》具有很高价值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据此文，对我们的传主做出更新的评判：即作者李鸿章不仅是以为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中国的文学家。他的不懈努力和极高文学造诣，也注定让他位列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家之列。

第五章　在大饥荒时代

“1877年11月30日。没有人打心底希望今年的饥荒会再闹一次，即使他恨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如果我能再活上几十年，我会努力将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饥荒和绝望，从我面前一扫而空。有多少人正在横遭饥馑？朝廷至今还不能掌握灾情的详细情况，但是据我初步的了解，我估计在这次大灾难中至少有七百万人因缺少粮食而活活的饿死了。”

“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人们翘首以盼，期待着朝廷官员前来救灾，或者希望拥有巨额财富的地方士绅，能够为许多行将饿死的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即使每隔两三天吃上一顿小米或者青菜，人们也能因此得救，活下来。如果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更多救援的人一定会赶到。”

“在这种艰难的年岁里，只要我还能承受，我将尽可能地敞开我的钱库去购买赈灾粮食。但即使如此，我能买来的食物数量也非常有限，就像用一小把谷子去喂养一大群的飞鸟。不过，不久前传来一个好消息，让我稍稍得以宽慰：在这几个月里，有几千个灾民因为我的慷慨救济而勉强能吃饱肚皮，活了下来。我手下有人向我报告，天津卫有一两千人靠我所赈济的玉米和青菜活了下来。同时，我的人还在努力救助附近村庄里的人们，近五千的人口。我母亲是一位名门闺秀。她从一个从不知匮乏为何物的家庭里走出来，并未遭受过饥荒灾苦，却积极鼓励我积德行善。她说佛祖和穷苦人是不会忘记我这份积善行德的义举的。”

李鸿章自己用诗歌记录下了那段灾情：

THE SAD SIGHT OF THE HUNGRY

T WOULD please me, gods, if you would spare

Mine eyes from all this hungry stare
That fills the face and eyes of men
Who search for food o'er hill and glen.
Their eyes are orbs of dullest fire ,
As if the flame would mount up higher ;
But in the darkness of their glow
We know the fuel's burning low.
Such looks, O gods, are not from thee !
No, they're the stares of misery !
They speak of hunger's frightful hold
On lips a-dry and stomachs cold.
“Bread, bread ! ”they cry, these weary men ,
With wives and children from the glen !
O, they would toil the live-long day
But for a meal, their lives to stay.
But where is it in all the land?
Unless the gods with gen'rous hand
Send sweetsome rice and strength'ning corn
To these vast crowds to hunger born !

For months the awful famine beast
Has roamed the lands both North and East，
And smiled as he on landscape read
The gruesome figures of the dead.
His black claws clutched the stalwart man，
The very headmen of each clan，
The elder sons and younger ones，
Nor e'en the baby's cradle shuns.
In all the fields along the road.
In each and every mean abode，
He stops to grin in hellish way
At famished forms turned quick to clay.
The greater are the awful pains，
And if the tears do fall as rains，
This monster demon smiles the more
While passing by each hungry door.
He crosses now the bone-dry streams，
And listens to the frantic screams
Of those who on the mountain high

Are doomed this awful death to die.

In valley and on sandy plain

The beast appears, again, again！

In city and in village street，

Where'er you go, the beast you meet！

A million now have bowed to him，

This famine monster, black and grim！

O, gods, we ask, remove the brand

Of this vile demon's bony hand！

译文：

惊见饥馑哀鸿而歌

天不见，人被饥馑哀如鸿。

天不见，众瞳黯然为食伤。

荒村犹听妇孺哭，

未得米粟救饥肠。

初闻落尽男儿泪，

再闻恨断病沧桑。

魃兽猖狂行北疆，

又复去往东南方。

龇牙嗜血吞所见，

无分婴弱与野氓。

苍天不忍秋泪雨，

接踵顿仆向九泉。

鬼风卷地触皆死，

市集乡街一扫空。

伏尸百万犹嫌少，

诸魔黑魅残无声。

我呼上宰怜悯开，

斩其爪牙泯其灾。

第六章　立志献身农业

在厚厚的日记中，李鸿章有四十几处提及了农业。他说，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中国必然要十分重视农业和农耕技术。尽管他总是强调，文学是至高无上的事业，但是他还不吝用大量的笔墨和言辞来称颂自己在农业经营的成果，而不是在文学上的成就。1879年，李鸿章尚在天津时，总结了自己的在这方面全面的看法，他写道：

“朝廷里的一位同仁在阅读过我写给神农氏的献词后说，我骨子里是一个村野农夫，而不是一介文士，他告诉我，因为在读这篇赋词之前，他从未见过谁对伟大的神农氏有如此高的评价（他说话的口气很认真，不像是在刻意恭维我）。但是他继续说，如果我一心一意想要为写文章而写，是根本写不出这么优美的颂文的。他想知道，我为何要把孔孟抛在一边，却去关心农家事，为神农作文章。”

“听了他这番话，我其实很开心的。我继续跟他解释说，真正的文学家并不需要关注文学本身，因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以大脑和笔墨纸砚做工具，歌颂那些自身无能或者无闲开口的农耕生活和人类艺术。”

“我们就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问题，我跟他解释说，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精心呵护他们不朽的著作。如果我只是跟风，试图抬高他们的声望，不仅重复劳动，浪费时间，还会惹恼这些人和他们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入流的文人。但是说到伟大的神农氏，却一直为文人们所忽略，大家怎么能听不到有人大声赞美他，怎能无视神农氏那随处可见的美好恩惠呢？”

“他点头满意而归，我却心生点遗憾：因为他带着愉悦的心情读完了这篇赋词，却忘记了评论这篇手稿的装裱。它是用卷轴装裱的，并且精心绘以色彩（足有八种色泽之多，乃是直隶省最好的画师们装

帧而成），我把它们一幅幅都挂在墙上鉴赏。”

“我把这篇文稿抄写了好几份，而且今日晚上，我要把这篇我引以为豪的作品读给我的家人听，这会让我倍感快乐！”



李鸿章全家福

在现有手头的资料中，这篇被称作《神农颂》的赋词并不见原稿[15]。我们只是在天津和广州发现了它的几种不同的抄本，每本上都标注着日期，却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一个用行书所抄写的版本是在广州被发现的，所署日期为1869年10月12日，比他前面那个长篇大论的诗歌的日期，要早了近十年。这个版本的诗歌内容如下：

MY SHEN NUNC TRIBUTE

（Written by me from my Proud Heart）

When I sit down and reflect，

And let my mind and my soul tell me of things so true，
I know that thou，
Most glorious and sublime Shen Nung，
Art the great helper of our people；
The wonderful provider of the world；
The hope of them that have not mines，
Nor great stores, nor forests of hardwood.
But all our wealth comes from thee：
All the funds of our banks.
All the strength of the Government，
All the force of our national progress，
All the muscle of our people，
The beauty of our women.
The hard sinews of the workers.
The strong brain of the banker，
The level head of the statesman，
The shrewdness of the diplomat.
The right arm of the Throne.
（There must always be good blood there.）

We work in the fields：

In the rice，

In the millet.

In the corn，

In the poppy. (The poppy is wrong.)

We work in the vegetables，

In the grain.

And all that is good for man.

But't is not for their sake alone，

'T is that by bringing them to fruition we raise

A Nation，

A People，

The Middle Kingdom！

And when we do this

We are pleasing the Ancestors.

Shen Nung，

You did not teach us mean arts.

You did not show us the way to cheat our friends，

Our brothers，

Our townsmen，

Our officials，

Even our enemies.

You did not tell us that we should live by sloth，

Nor smart games.

Nor subterfuge.

Therefore，

This day, when I am called to go to the North，

When vast affairs of state speak to me.

When some might think I should be preparing for my journey，

I am here saying these things

To Shen Nung.

Even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When my father laboured.

When my mother scolded.

When there were mean times in the village.

And I was almost tired of living；

I thought of thee, Shen Nung—

And the green grain thou gavest ,

The yellow corn so rich in bread ,

The nodding wheat that gives colour to the blood ,

The vegetables that give strength to the bone.

You taught us all these things ,

You made them ours ,

You made them beautiful, and gave them to us.

You bade our land be fertile, the soil in which they grow.

Because you smiled, the winds blew fair ,

The sweet rains came like drops of glory ,

The sunshine did not hurt ,

The moon told the crops to keep growing ,

The stars blessed each head of grain.

The dews dropped their blessings

On the corn and the vegetables.

And made them glad ,

For the people's sake.

You taught the golden sun to shine ,

The night to be cool and refreshing ,

The air to be sweet and to soothe，

The trees to hold back the storm，

The grain to bow its heads to meet the blast.

I see in your art，

Shen Nung，

The message of ages，

And ages of sweet thinking.

I see your blessings conceived.

Increased, and multiplied.

I feel the countless hours of thought you have given

To make something

So grand and glorious for the world.

You did not sleep.

You did not rest.

You did not tire，

You did not stop，

Until all this

Was ready to be placed upon the head of man

For his everlasting blessing.

As though you had spun

The finest silk

And hung it there—

A rainbow！

译文：

神农赋

（余诚惶诚恐而献作）

大哉兮我神农，皇哉兮伟功绩。

吾拜服而称颂，知物兮有民粮。

伏羲，伏羲，创农始而解饥馁，

垦洪荒兮百草尝。

营地利兮，耕土而为田，

固长源兮，凿地而为井，

居有恒兮，台榭而为房。

播五谷兮以足食，

织麻衣兮以蔽体，

筑牖户兮以安居，

省猎生兮而畜养。

兴百工兮，折木以为耒耜，

磨石以为斤斧，利器以为拓荒。

遵天时兮，

昼审寒温序季分月，

夜观星宿定旬立节，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创百艺兮以悦民生

作琴乐兮，和五音以调人畅。

造土鼓兮，截竹苇之豳龠，

始磬鼓以重器，建五音而吟唱。

设腊祭兮，颂扶持之昊乐，

通神明之玄德，慰天地以和祥。

观今兮财资，

罔不肇事于煌祖。

仕女、百工、缙绅、巨富

罔不怀恩以农皇。

兴货殖，贸物资，

于彼五谷兮丰昌。

米、粟、麦、黍、稷、菽

百蔬备，万益开。

市集兴兮，正农咸安其道，

务本货通食足，通变财生货繁。

国朝固本，兹有神农。

神农炎皇，上德唯汝。

开衣食之源，肇文明之张，

功垂千秋青史，德昭万世文章。

吾当承前而后作，

延祚兮懿扬。

吾当戴德以自强，

续世泽兮行刚。

念余兮彼幼岁，

多承难兮踌躇，

每每念余神农祖兮，

振余兮筋骨以涉长。

使日月兮有光，使中华兮无量，

天河熠熠兮，星辰梭转，

华夏浩浩兮，人籁光昌。

持艺于手兮，导尔志教化民，

赈贫穷惠孤寡，优羸弱立贤良。

百世而后，神农之灵

永无休憩，永无长眠，

永无嬉恬，永无止息，

正仁德而通神明，

惠生民而避灾疡。

如锦绣贯穿空兮，若长虹垂天。

进入北京之前，李鸿章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了先农坛（地坛）。他曾经去过先农坛祭祀，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描述：

“过几天，我又要北上，商谈外交事宜。今天，我忍不住要向伟大的神农献祭。”

“昨天，我召集了将要带去祭拜的人。今天，我们要在先农坛里亲自耕种。朝廷上下以为我接到圣旨后会立刻动身，但先农神并不只是属于圣上。他惠泽天下百姓，恩及四海，我必须为天下百姓祈福，祈求风调雨顺。”

“去年的这个季节里，我为宫里太后和圣上献上了一篇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意，同时我还写了一篇赋词，我希望它可与孟子的文章一样，能够流芳百世；这两篇文字都是献给先农神的。我希望有一天，四面八方的学子都可以读到我这篇词赋（这很可能指的正是《神农颂》）。”

“有些人可能要说，是因为我的身份，今天才能从东门[16]进入先农坛的。是的，我承认也许是这样，不过作为朝廷一品大臣，我有责任做出表率。”

“一个男人没有婚书却强抢他人的女儿是错误的，作为朝廷大臣，如果做出此类事情，更是错上加错。因为其他的官员都在看着他，百姓也关注着他。他的行为很容易被其他人效仿，乃至于破坏法

纪纲常。”

“此外，普通老百姓经常会为此议论纷纷：难道当官的犯的错不比我们这些小百姓更大吗？难道官员不比窃贼盗取的更多吗？我们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紫禁城里的丑闻，而很少听到市井里的丑闻吗？”

“我们知道，所有出身卑微、一穷二白的人，会以谈论那些地位高贵的人为乐。我看来，即便我们没有亲耳听到，也同样清楚，事实就是这样。老百姓向总督、钦差大臣或层层级级的官吏叩头，或许，只是因为别人在他们耳边说了一句这是‘中堂’、‘大人’甚至提及‘皇上圣明’，他们就感恩戴德。但灾民把‘皇上圣明’说给一个办事的小官吏去听，却会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不过，这些灾民还真是会这么做，只要办理赈灾事务的官员，往路上丢下哪怕一枚铜钱，那些灾民就会边说‘皇上圣明’边伸出脏手去抓。”

“因此在我看来，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如果文武百官（官职越大，品行越好）在列祖列宗面前、在公共场合表明他们的爱国精神时，或者振振有词地宣讲大道理的同时，得对外表现得非常谦恭（如果内心是真诚的），并踏踏实实是为老百姓们做出一些实绩来，这才是最精明之举。”

“如果一个贩夫走卒公然谴责祖先留下来的神圣思想，他只是会挨板子，或者，最多把他那颗可怜的头颅砍下来，钉在木桩上以儆效尤。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也无关紧要，因为路过的人是不会去打听这个家伙的姓名的。”

“可是你们瞧！一个地方的巡抚、一个大省的总督，也胆敢亵渎传统！他一定不会遭到任何皮肉之苦，并且常常能保住官位，因为他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强，权势很高。可是，他亵渎的言语正像是平地一声雷，整个城市，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说的话，每家每户都在问：这是为什么呢？很快，人们就心知肚明，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正在公开反抗曾经被公认的权威。于是很多无知的人，甚至那些更聪明的人，也会迅速接受这位大人的言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哈！我也一直这么想，现在巡抚大人也这么说了，我就知道我是对的，因为他见多

识广、位高权重。’”

“这些事，我认真考虑了很多年。随着我的官职越做越高，我知道至少有必要非常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不能给流言蜚语制造者们提供机会，同时还要认真地奉公守法，入乡随俗（并不是我的特别身份要求的）。这些都是我的职责所系，我要让人们了解那些事情和规则，并更加尊重历史和传统。”

“是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去先农坛，并不只是表面奉行。我认为我的内在感受——对神农本身的热爱，加之身居高位的责任感，促使我有了更强烈的动机，一定要即做好祭祀。”

下面这行话，显然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写的。不是在重读整篇日记之后，也是在重读了上面那一段文字之后，由李鸿章自己添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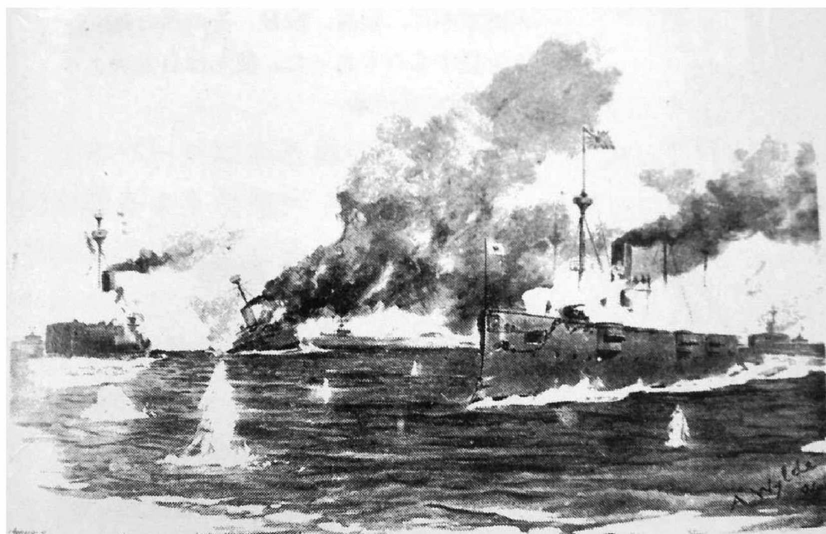
“如果能把我自己所有的官方和私人行为，都记述下来该有多幸福啊！”

第七章　反思中日甲午战争

作为此次事件[17]的头等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在赴日本议和期间，写下了许多篇日记。在中弹负伤后，他甚至躺在病床上，向随行人员口述谈判的进展，以及种种利害关系。带着伤病议和，在病房内，继续与日本人争执得不可开交。然而，回国后的几个星期，他却没怎么提笔记述议和的事。

这位在世界政治界被公认为最精明、最成功的外交家之一的李鸿章，回到国内后，便遭受了朝廷的冷遇。尽管他努力为大清朝挽回了颜面，却被几百万无知的同胞所痛恨和唾骂。他们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说他卖国求荣、辱没国体等等。

回顾往事时，李鸿章在位于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里这样写道：“人入晚景，行之不久了，却还要为种种烦恼和卑劣的流言所困，着实是可怜。如果大街上的流言蜚语，可以像草纸那样拢成一堆，化为灰烬，我也就根本不用担心肉体和内心的伤痛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丝毫的后悔。甚至，我有权利对自己为朝廷为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昨天，从京城回来后，我极度痛苦。因为太后面见我时，处处表明了她那极度无礼的个人好恶。看到了条约的细款，太后、皇上，还有那些该死奴才们，个个却像是自己蒙受了巨大的委屈。既然如此，朝廷为什么要派我去做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个已经被人打倒在地、一败涂地的男人，就算他的肩膀再宽厚、身体再强壮，他也无法命令对手就范！我们大清国就是这样的男人，它需要达成怎样的屈辱的条款，才能有机会站起身来，以图后报？”

“如果动动嘴和挥挥手，就可以打赢战争，那么，朝廷和总理衙门也就不需要大炮和士兵了。也许，我不该对朝廷和监察御史过分苛责。不过，确实是我的极力去争取，才让朝廷在马关谈判中不至于丢尽老祖宗们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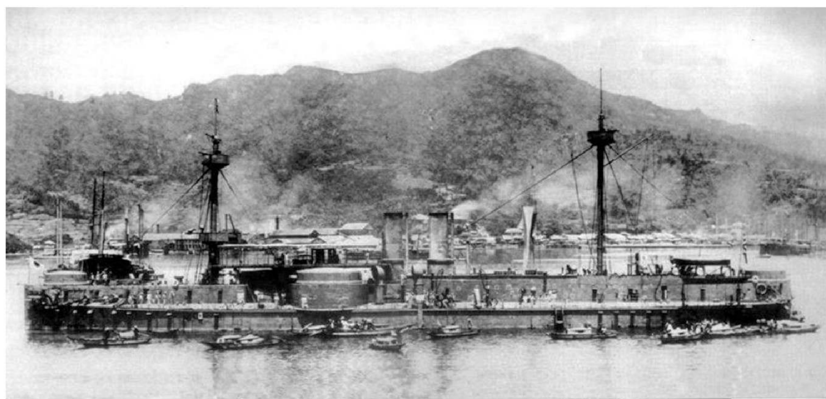
“但是当那个吵吵嚷嚷的无耻之徒，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安维峻[18]向朝廷控诉我时，我实在怒不可遏。这个人对太后来说，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他只会清议，既不会带兵打仗，也不能做议和大臣。他这辈子就知道收受贿赂。如果我再年轻几岁，精力再充足一点，我会严厉斥责他：安维峻，你这个无知的竖子，卑鄙小人！”

“我想，其实太后心里很清楚，我在所有这些不幸的对日事务中，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立场。我相信，太后会把我放在她内心深处一个正确的位置。有些人不在乎后人怎么评价他们，但我在乎。为了帮助国家，我付出了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可不希望去忍受子孙万代的责难。我只希望他们能认识事实，把我当成一个为国担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忠臣义士。一国战事的成败，乃举国之责，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

“我从天津的英国朋友那里获悉，西方国家里，几乎所有的洋人，都责怪我与日本人交战。日本人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我并不是很感兴趣。在最近的十年来，朝廷和欧洲之间来来回回的消息传得太多了，那些记者们写下了很多的消息，都是捕风捉影，并非事实。大洋彼岸的编辑和报馆照单全收，除了记者胡造瞎编之外，得不到更多的新闻。因为他们自己的公使馆不会发出正确的稿件，而导致了全世界对大清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有人说，这次战争的罪过主要在我。正是我积极倡议发展现代陆军和海军，中国才会被卷入到这场战乱之中。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可恶、卑劣，无耻之极！”

“我在北京的政敌，从国外敌人的间谍那里得到一些内幕消息，于是就宣称是因为我鼓动朝廷备战，才招致了洋人，特别是日本人的敌意。这简直最卑劣的逻辑！如果给钱庄安上铁门，或者在当铺的窗户装上一个栏杆，我们谁能说这是在引诱强盗和窃贼们闯进门来抢劫吗？我们难道会责怪一个家里满是贵重玉器、古董瓷器的人，为房子砌上高高的院墙，闩上厚门，以图晚上能睡上个安稳觉吗？一个男人看见一队陌生人推着车经过，便站在稻田边上看，手里紧握着棍棒，我们能断言他就是在防备这些人进来搞破坏吗？或者不如说，我们是否还会赞扬这个为了防止田地遭破坏，而奋起保卫自己的人的态度呢？然而，我早已习惯了官场上的那套玩法，时时刻刻都要防备着用各种理由栽赃嫁祸的危险。”



甲午战争清廷大败，图为被日本人俘获的镇远号

“事实上，我对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对伊藤伯爵、庆亲王，甚至太后和朝廷，都已经明确表明了（对战争的）态度。更不用说对那个卑鄙无耻、贪赃枉法的安维峻。本来，我再也不会跟这个轻浮浅薄的监察御史说什么了，以免玷污了我的口舌。二十二年来，我一直反对与我们的邻邦岛国交战，极力避免任何军事冲突。去年的二月初二、初七和初九这三天，我还在极力劝阻朝廷下令与日本仓促开战。最后的那一次，我的劝谕，惹得皇太后勃然大怒。而大发脾气的太后只不过想让我知道，在朝廷的对外关系方面，是我重要，还是皇上重要。”

“我当然没敢认为是我重要。这个问题现在毫无意义可言。在那种危急的条件下，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以及作出的大部分声明，都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战事压倒一切。太后只不过担心我会拥兵自重罢了。再说，我已经带了这么多年的兵，要么下达命令，要么服从命令。怎么会不知道兵权这东西为何物呢？”

“我在江苏时，在曾大人手下供职不到两年的时候，曾大人就开始对我大加褒奖。博闻广识且善于带兵的曾大人评价说，我这个人非常机敏，不仅知道服从命令，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上，可以完完全全地按接受到的命令行事，根本从来没有拥兵自重的情况。”

“今天，我头痛得很。是因为我写得太多了，也为那个老而不

死、老而愚蠢、十分可恶的监察御史多虑了。我希望列祖列宗不要放过这个毁我清名的罪人，我做鬼也饶不了他。”

“我还担心最后这杯茶不太好，口味不适。但管家坚持说，这是最好的雨前茶。如果是这样，我想，我最好还是喝原来最爱喝的小种红茶吧。”

“一个美国人来府上，给我捎来了一封美国公使科士达先生的信。”

“申时（下午三点）。——我以为这个美国人拿的是介绍信，他是要来这里采访我的。我相信他是一名记者。然而，他此行的目的令我有点意外的开心，因为他捎来了科士达先生的亲笔书信。而且他说，从有识之士那里得到的意见、总集和报告表明，我们的条约（产生的国际反响），要比预想的要好很多[19]。”

“这个消息，着实让我这一把老朽之身喜不自禁！我应该把这个好消息迅速散播到举国各地，特别是京师的圣上。我相信，南方人随后就会知道。他们总是很快就知道一切[20]。”

科士达国务卿先生的信函，经过清廷的印刷，很可能被李鸿章有选择性地发放到一些地方。其中一些复件，可以在他的其他公文资料中找到。严格地讲，这并不是总督回忆录的一部分。从实质上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机密，更不是什么官方文件，仅仅是选编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让读者了解到历史实情。

亲爱的朋友和尊敬的总督先生：

您的来信已经跟随我走了两个星期，星期一晚上才交到我手里。我正在等待着华盛顿的函件，以及针对有关事项的进一步指示。

我欣喜地得知，您的头痛已经大为减轻。我诚挚地希望，在您收这封信时，您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您是否记得您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既然日本疯子的子弹不能拿您怎么样，您也不应该允许烦恼将您击溃。但是恐怕您并没有说到做到，因为如果您遵从医嘱，安心地

待在府中养病，到此时，您的身体一定痊愈了。

我亲爱的总督，您听凭京城的敌人用他们的观点和愤怒来搅扰您，这将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如果您能成功地吞并了日本，他们也会说您心怀鬼胎，要和朝廷分庭抗礼。

您务必要记住，毫无疑问，您一定清楚，据我所知，有史以来，从没有人能签署过任何一份让双方满意的条约，甚至都没有让其中任何一方完全满意过。一方或者另一方（经常是两方），总是确信对方占到了更大的便宜。全权议和的使命，其实是最不讨好的，即使是当您代表着获胜方谈判。如果您是代表着弱国，失败那一方，那就更别提了。

我公然站出来说这些话，可能不太礼貌。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知全世界，除了您自己的国家之外，也包括日本人在内，都认为您在谈判中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我从美国所收到的电报，有少部分是官方的，其大部分是私人的电报，都指出，由于您出色的外交能力，日本天皇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在这次谈判中，日方所损失的信誉与道义，要比它的军队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还要多。而且，我们双方都清楚。您并没有打算在回去的时候，像您幽默地表述的那样——“嘴里还留有一颗牙齿，头上还剩一根头发。[21]”

因此，就让这些恼人的、愚蠢的批评过去吧。这些对您来说毫无害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听说您已经，或者将要失去重要的职位或者勋章。但是它们总有一天会回来，您将受到更多的奖赏。不管事实是否如我预料，您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您已经为您的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了。

请相信我，阁下的朋友和祝福者

科士达

自美国公使馆，东京

1895年6月7日

“六月初四（6月30日）。——我已看到并听到了诸多有关我在议和谈判期间的讲话和立场的虚假新闻。今天，我要振作起来，把最后签署协议之前的实情全部写下来，这里面将包括双方赞成和反对的情况。我要将这份声明上交朝廷，并要求将其纳入到我大清国的史稿之中。我相信，这个要求一定会被应准。我还要将这份声明的复抄件，转寄给伊藤伯爵。如果与史实有出入的话，我还要让这个君子仔细地审读它，并指出其中的错误。”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是出于对朝廷和黎民的一片赤诚，才冒险去了日本。此前，我从未在外国上过岸。我一直希望自己活在中国，也死在中国，不用在此高龄遭受踏上异邦土地的责备，也不要去承担车马的疲苦。”

“同时，我反对先前派出的那一个代表团。我先是极力反对委派德琳去议和，接着我又反对派张荫桓[22]去日本。因为我无法想象，包括日本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政府，会在这么严峻的情势下，与这个级别和资历的人进行谈判。”

“当总理衙门通知我，朝廷已经决定派张荫桓去日本谈判时，我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我知道，如果使团由他率领，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随后，他们不痛不痒地问我，是否随时准备着由李中堂自己去担当这项使命？”

“为什么应该是我？我的言论一直都是反战的。现在，如果我表现得急于结束战争，当然会被指责是为了保全我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全局考虑。我只是希望让日本人停止进攻。现在，我也把自己这个信念写下来：在这次战争中，大清国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损失或花费，可以与我李某人相提并论。户部已经计算好几个星期了，至今他们还在忙着计算，竟然没有人肯站出来说一声，李鸿章在这场不幸的冲突中投入了多少。”

“在军需品和民用品（我自己经营的货物）方面，我已为淮军花费了大约两百六十五万两。整个北京、天津以及两湖和两广地区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冲上前去，毛遂自荐，想要当这个全权大

使，人们一定会窃窃私语，接着高声叫喊，最后像老虎一般怒吼咆哮，说我李鸿章为了挽救个人财产，情愿做丧权辱国的事，为大清国抹黑。”

“是的，我非常渴望和平。若说，不比直接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更急切，也和他们差不多，但是我还没有急迫到为了和平而玷污自己的名声，令自己遗臭万年。”

“我曾经和伊藤伯爵交涉过有关朝鲜的问题。我从潜伏在日本的谍报人员那里获悉，日本政府一直想和我商谈，寻求有关暂时终止敌对状态，或者获得永久的和平。广州、香港，还有北京，都知道这件事。军机处总理衙门也知道。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寻求和平。只是在别人恳求我，并最终接到朝廷的绝对指令时，我才会去的。”

“我并不懊悔去了日本，但是想到必须由我去，我就很心痛。”

“是太后本人命令我去的。与太后相识这么久，这是我头一次有一种对她产生怜悯之情的理由。我内心一直很敬畏她，至少也是快乐、忠实地服从她。但是现在，我这年迈的中堂大人，好像是她唯一的希望。我动身去日本之时，耳边却不时回荡着这句残忍的话：‘是你发动的战争，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有能耐结束这场战争，而且还不要在倭奴面前给国家民族丢脸。’”

“这句话，是庆亲王[23]说的。”



与庆亲王坐在一起的李鸿章

“在去日本的一路上，这句话一直在我疲倦的耳边回响。见到日本天皇的使节时，我还把这句话说给他们听。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比行刺者那颗肮脏的子弹，对我的伤害得还要深。”

“我非常想知道，如果我真的死了在外国，不幸为国殉职，我的敌人们将会是大笑、辱骂，还是为我落泪呢？”

“我抵达日本的时候，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谦恭有礼。伊藤伯爵亲自来驿馆拜会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根本不像两个渴望吸干对方鲜血的敌对邻国的议和大使。毫无疑问，京城和两湖地区的人们，以及所有的日本人都极度兴奋。他们还希望继续交战。有时，老百姓会把自己变成一群乌合的傻子，特别是他们对什么是危机四伏还一无所知的时候。”

“伊藤伯爵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派‘高升号’[24]去朝鲜？”

“我？我说道，我不是大清政府。”

“那一天，我刚刚抵达日本，我们的谈判就开始了。事实上，我首要面对的大问题，是我个人要为战争负责的断言——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要不是我，朝廷绝不会向日本人采取寻衅的行动。”

“我是这样回答日本天皇的全权办理大臣：‘伊藤伯爵，你和我商讨过朝鲜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彼此，因为我们开诚布公。我希望这次谈判，你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我先把真正可以归咎于我的事情讲出来。我确实建议向朝鲜派兵，而且派出的很多部队，是我的亲兵——淮军。’”

“但是北京方面向我承诺，在运兵船出发之前，他们就会派信使去东京，照会日本政府，让天皇详细了解中国的意图。但是我在这方面被愚弄了，我所都统的直隶省上下和我的军队也被愚弄了。国家被迫卷入了一场决裂的战争中。”

“‘我相信中堂说的每一个字。’伯爵说。‘无可非议，总督说的是事实，都是事实。’科士达先生说。伊藤伯爵拜会我的时候，他也在场。”

“美国外交官说完这番话后，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其间，我注意到，科士达和日本大使互相友好且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至于‘高升号’，伊藤伯爵，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这只是你我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不属于谈判范畴。我认为你们无端向中国运兵船只开炮，是可耻的、野蛮的行为。”

“伊藤的面部抽搐了一下，未作任何评论。我相信他内心很挣扎，忍着没把那个‘是’字说出口。”

“过了一会儿，他便起身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上午，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两人没有再见面。科士达先生几乎陪了我一整天，直到深夜才离去。在这个地方，适合表明我的态度，中国应该永远记住科士达这个伟大的朋友，就像我个人会永远会把他当成良师益友来珍惜一样。我确实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要是没有科士达先生斡旋，整个情

形可能对我们更加的不利。尽管他的观点并不全面，在争论某些问题时，他实际上站在了日本人一方。”

“在春帆楼，我向议和会议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宣布立即停火。我的主张是，既然大家都是各自国家派来的全权代表，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和平协议。如果委派我们执行和平使命的政府，却无时无刻不在向各自的陆军和海军上将下达交战的命令，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我就这个问题说了一会儿，这是我就此类事情做出的发言时间最长的一次。我讲完后，会场沉寂了几分钟。接着，伊藤伯爵退席，带着他的助手，到房间的一角去商量。后来他们返回到座位，伊藤伯爵说：‘作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全权代表，我们很乐意接受李中堂的提议。不过，为了保障和平，我不得已提出以下要求：至少在停战期间，中国政府要将大沽、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全盘要塞防务，以及一切军需用品，统统移交给大日本帝国军方管理；将天津一线的铁路和全线主要车辆，也交由日方管理，大清政府不得有任何介入；最后，还包括整个天津城周边的要塞和军需用品，都要统统移交给日方。’”

“听了他的这个提议，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如果我不事先知晓这次会议的严肃性，不了解日本代表团成员的个性，我会责怪伊藤伯爵有点过于狂妄和异想天开了。坦率地说，在停火之前，提出这样的条件真是令人震惊，我一时间甚至都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惊讶。事实上，当时我能做的就是恳请伯爵先生把他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他真的要我们把北京城大门以外所有的要塞和军需品，都移交给他们，那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

“伊藤伯爵逐字重复了刚才说的话。”

“他所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好像在我心中燃腾起一团新的怒火。我费了很大劲，才耐着性子，隐忍不发，听他把话说完了。”

“我看了一眼科士达先生，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一个旁观者。我发现，他也面色苍白。”

“这是你们最好也是唯一的条件吗？我尽量保持好镇静，向这位日本天皇的全权办理大臣问道。”

“‘这是唯一的停战条件。’他回答道。‘很好，那我们就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打仗吧。’我回答他——首次谈判，就此戛然而止，既然对方毫无诚意，也就注定毫无成果。”

“再次回到驿馆后，我独自一人，一步步地逐阶段仔细研究我们的谈判记录。通过研究，我非常不情愿地得出了以下结论：日本政府有意把最苛刻的停战条件强加给我们。日本人非常了解当下中国的局势。据我所知，多年来，他们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密使和情报人员，进驻到中国各地。北京、天津和南京都活跃着日本的文官武将。有些人受雇于饭店，有些人从事房屋买卖，很多人生活在外国租界里。据我所知，还有几个人，甚至从我本人这里领取薪俸——当然，我了解情况后，立即将他们驱逐到我能管辖的范围之外。”

“但是，中国对之一直毫无准备，没想到有朝一日会与日本发生冲突。不是我自夸，满朝文武，并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这个可怕的事实。我一直主张，维持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正因为它是一个和满洲相比邻的孤狭的半岛，日本人才会认为自己应该在朝鲜享有比在中国山东或者如我的家乡——安徽省更多的权利。”

“但是为了与这个日渐强大的邻国和平相处，1884年，朝廷在天津和日本签订过一个协议。当时，代表日本的也是伊藤伯爵。协议规定，双方同意从朝鲜撤兵，由朝鲜国王负责处理内乱。同时，双方进一步约定，‘朝鲜本国如有乱党闹事，该国王可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清国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声称，中国政府近来违反了这一严肃的条款。如果是这样，是我本人受骗了，因为我已告知伊藤伯爵，就像我已经写过的那样，北京方面给我的消息是，‘已告知日本外交部，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恩，故遣兵代平其内乱。’朝鲜国王自认无力镇压东学党起义[25]。于是，朝鲜政府请兵援助。朝鲜的做法，无可非议。毕竟，几

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向来如此，逢事必向中国求援。”

“两大帝国的高级谈判人员在场时，我曾经宣布过此事。科士达先生也是见证人。但是，在这里，我希望把它作为我的历史观点，永久性地记录下来。”

“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或早或晚要将朝鲜据为己有，它就不会刚接到大清朝廷的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兵援助的消息，就立刻发兵赴朝——是立刻，我再强调一遍。中国没有侵略朝鲜，也没有以此为时机和借口吞并之。相反，清政府非常乐于，并十分急于见到朝鲜能够自行处置内部的政事。所谓的隐士王国[26]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世代最友好和谐的盟约。中国即使在政治上全面接管朝鲜，甚至把它纳为一个省份，并在汉城设立总督衙门，或者由北京派大臣直接管辖，其实，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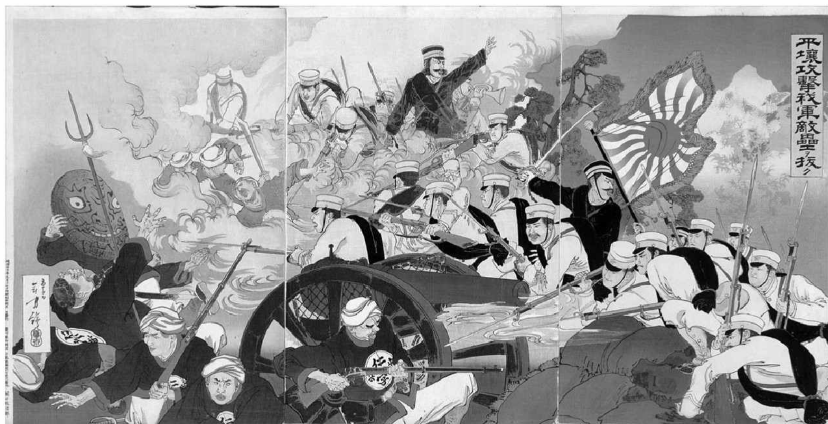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日本急于向中国挑衅，朝鲜政府之前或过后都不会与之交战。‘高升’号被击沉，几百名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勇士无辜丧生。他们只是在遵守朝廷帮助朝鲜维持和平的命令，并没有向日本发动进攻。”

“我指责日本天皇政府蓄意挑衅中日战争，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吞并所谓的朝鲜国。我指责日本人采取的方式是卑劣无礼的，我指责击沉‘高升号’是有预谋的屠杀。日本一直在把自己佯装成东方思想和知识的领袖，并以吸收西方理念和原则的名义作恶。”

“这些纯粹是我个人的感受和声明，但是它们很容易接受历史的检验。这场战争的具体事实记录，将在东京和北京陆续被后人发现。也许有些人会说，考虑到我为自己的性命和清誉的动机，在收集这些证据并把它们交给世界，评判我是否尽忠职守。也有人会说，这是我对大清国应尽的义务，应该由我自己负责。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会有人谴责我。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被指责中伤。”

“但是此时，我有充分有力的理由保持沉默。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最近，我刚开完一个议和会议。和解达成，万事终有定论。战争结束后，追求和平再次为人们所关注。我的名字签在一个重要的文件上，双方同意，我们的纠纷已成过去。每个国家都渴望友好正确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我本人也因之蒙羞。”



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李鸿章晚年政治命运的转折点。图为日本人所绘甲午战争宣传画

“认真回顾并思考这些事情，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我蓄意揭开旧伤疤，让大家重新卷入罪恶的冲突，有谁会原谅我呢？我相信，如果我对全中国、全世界毫无保留地坦诚，就像我在马关，面对伊藤伯爵时所说的那样：和平，这就是最终的结果，这才是大家所要的。写下这些话时，我并没有想过，在这种可悲的气氛中，在非理性的冲突导致的敌意尚浓厚之时，将若干真相公布出去。我只希望中国和平，日本和平。”

一个星期后在北京，李鸿章这样写道：“今天我仔细阅读了从圣彼得堡寄来的信函翻译件，其中一部分，是一位朋友卡西尼伯爵写的。这像是给了我这个老朽一颗生命的新灵丹妙药！虽然此番少了很多的荣誉，但至少，我还可以怀着更好的心情，安定地南下。”

“现在，我感觉皇上对我友好了一些。不过，太后显然待我很冷漠。然而，圣明的太后也承认，去年在战乱迫在眉睫时，正是我挺身而出，向俄国政府控诉，晓以利害，并从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承

诺。”

“太后是个奇怪的女人。她很矛盾。有时，她就像一个魔鬼那样刚愎自用。但是如果她感觉自己犯了大错，只要不危及个人的尊严，她都诚意去改正。”

“昨天，她希望我代表自己说点什么。接到圣彼得堡的好消息一个时辰之内，她就了解了信函的主旨。于是，她传旨召见我。”

“我们俩简单地讨论了俄国的来信。我向她告知，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俄国都不会允许日本占领我国满洲和内陆的任何一部分后，太后心中大悦。”

“为什么在我去日本之前得不到这样的承诺呢？”

“如果我早知道沙皇政府对日本侵略朝鲜和满洲的看法，我会在日本提出停战条件后，用这个方式回答他们，我会对伊藤说：‘继续打仗吧！’”

“然而，我常常怀疑这些欧洲人的真实目的。而且，我发现一些最能干、最尊贵的外交官，说起谎话来，就像是南京市井里的那些卖鸟人一样容易。他们会像一个想借钱却没能力还钱的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许诺。特别是英国人，他们总发誓要做一件事，但是事先他们一定是盘算好了怎么去做另外一件事。”

“如今俄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最需要提防的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大不列颠和法国也摆出一副仗义的朋友样子，似乎希望成为我们更好的朋友。然而，俄国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因为俄国人所谓的命运，迫使他们这么做。俄罗斯统治着整个北亚，并希望有朝一日加深对中国的影响。”

“——他们会帮我们赶走日本人，因为他们（俄国人）自己想进来。”

“——7月28日。即便是在情况最为糟糕的今天，我也并不认为所

有人都是坏人。就是在半个时辰之前，我经历了一件事，它让我相信，职责和交易，财富和荣誉，都并非那么绝对的。还有一些小事，不断触动着我的内心，让我觉得人性不完全是冷酷、利益和虚假的。”

“今天，这个衙门，我掌管了二十四年的衙门，来了一个高尚的基督教徒。这个院子里好像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人。我几乎是流着泪接待了他们。”

“这两个基督徒给我带来了治疗的药物。他们是从那个让我沉痛的日本城市[27]赶来的。他们来看看我，经历枪击后，是不是好些了！我想知道，是不是基督教会让他们来这里看我。我想一定是，因为面对于肉体上疼痛时，日本民族总是表现很坚强，并不以为然。而且，日本人憎恨外来者，特别是中国人。因此，一定是什么别的思想进入了他们的头脑，才促使他们前来看望我这个遭受伤痛的中国人。”

“我亲眼看见他们走上衙门的台阶。一开始，我摆出主人的架子，命令管家把他们撵走。但很快，我发现他们是日本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跑到我这里，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也许，他们想见的人并不是我。最终，我让管家把他们请进来。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弄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因为那个男人说的日语，可能是日本国某处的一种方言，非常难懂，我只能猜出零星的几个词。”

“我便差人去叫我的翻译来。通过翻译，我才惊奇地得知，他们的确是来看望我的，而且我们还见过面。我在日本时，一个疯子将子弹射进了我的颅骨。好在，我侥幸得以死里逃生，正在医院里养伤。当地有许多教民曾经去病房探望我，这个陌生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看了看他，发现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我认出他来了。他说，他叫佐藤，陪他一起来的男孩是他十三岁的儿子。”

“佐藤说，他们属于马关附近的一个小传教团。当年，这个团里的基督徒们派出代表，带着鲜花去病房探望我。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谈论我，还向上帝祷告，希望我能尽快恢复健康。他说他的

教友们不相信战争和杀戮，他们最为清楚，我到日本去和谈，是为了制止战争的。”

“我们说得不对吗，中堂大人？他问道。”

“佐藤先生，你们说得很对。我去，的确是为了试图阻止战争。经过那次谈判，中日就没有战争了，不是吗？”

“他同意我的说法，还说我是一个大好人。”

“接着他解释说，他的朋友们都很想了解我的近况。他说，在日本，他们听说我痊愈了，有时又有传闻，说我死了。他们无法忍受不确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凑了一笔钱，派佐藤把草药送给我，并表达他们对我的善意。”

“我收下了那些草药，并为我的访客们准备了美味的炖鸡、饭菜、糕点和香茶。我想留他们多住几日，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好好款待他们。但是佐藤先生说，这一路走来很辛苦。有那么一两次，他在半途上都想回去了，特别是看到他的儿子跟随他漂流在外，是那么孤独。另外，他还说，他找我都快疯了，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哪儿，在北京还是在广州？”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准备了一大包礼物送给他们家里的朋友们。二百两银子给他们的教会，还有同样数量的钱——二百两银子，给他们做路上的盘缠。他不想接受盘缠，他说他的钱够回家用了。他担心，如果收了我的礼物，把他送来的朋友们会不高兴。但最终，我还是说服他收下了这笔钱。”

“我想，基督教使贫穷卑微的人变得勇敢无畏，因为佐藤先生和他的儿子离开前，他们想知道是否能为我祈祷一番。我说可以，我以为，他们的意思是回到家后再为我做祈祷。但没有想到，当即他对他的小儿子说了些什么，立即跪在了我的门口，开始祷告。当我看到他和他惊恐的小儿子向上帝祷告时，我的心忍不住狂跳不止。他们向那个他们认为能眷顾我、保佑我的上帝祷告，祝愿我早日康复，投入到

和平的事业中去。”

“看着他们离去，我心里很难过。”

“这个老衙门，是我掌管了三十多年的衙门。在这里，上演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大戏，也召开过各种各样的会议。甚至影响全世界政治格局的午夜会议[28]也在这里举行过。我接待过皇公、爵爷、大使、公使、凶手、强盗和乞丐。有人在这里被判处死刑，也有人在这里高高兴兴地获得租地权、铁路合同或者官爵什么。但是无论是发生了什么事，不管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所房子的‘主人’。直到几个时辰以前，他们对我表示关切时，我才第一次感受到，我不过是寓居于此的过客之一，终行将归于死亡。”

李鸿章在写这些话时，自己觉得已经不是衙门的“主人”，他只是把这里当成他在天津的临时的寓所。

“可怜善良的佐藤先生，从日本一路赶来，就是为了给我这个身为‘异教徒’的老总督诵念基督教的祷词！我不知道除了家人，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人愿意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不喜欢任何日本人，但是，也许只有基督教会帮助他们认清自己。”

第八章　戊戌变法前后

李鸿章在他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及戊戌变法[29]，他预感到“维新派”和“乱党们”正用阴谋诡计把中国带入到麻烦之中。虽然这段文字既没有注明时间，也没有注明地点。但很有可能写于南京，时间大约是1898年5月初，因为他在文字的一开始提到了恭亲王之死。他是在那年的5月3日去世的。这段文字如下：

“好几个月来我都没听过这么令人伤心欲绝的事。昨天，我得到了从京城传来的确切的消息。这一消息，令我整夜不能入睡，恳求列祖列宗，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老天爷还是叫走了恭亲王。他是我最尊敬的老朋友。他在政治和其他领域奋斗了将近四十年。他发挥自己无与伦比影响力的这段时间，对朝廷那些目无王法的人，起到了巨大警示作用。”

“恭亲王是个难得的忠君之臣，他这一去，天下的百姓会非常地想念他。如果他死在十年前，即使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麻烦刚刚解除时去世，他的离去，也不会对朝野上下造成如今这样如此剧烈的冲击。但是现在他魂归故土了，大清国正在各种冲突之间寻求平衡。朝廷内部的各种势力，如地狱的群魔般骚动，许多头脑疯狂、思想激进的小人受到朝廷重用，京城多么需要恭亲王这样意志坚定、无所畏惧的声音。”

“有些人好像不走极端，就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他们要么是说一些令人作呕的奉承话，要么就是千方百计谋杀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他们总喜欢站在寺院的宝塔顶上，用自己最大的嗓门喊叫，或者是在深井的底部说一些鬼魅般的悄悄话。他们也总喜欢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要么根本不洗澡，要么使劲搓背，直到一点皮毛也不剩，体无完肤。他们要么胡吃海喝，要么拒绝进食，对一粒米、一块馒头都不屑一顾。”

“许多无知的官员都是如此。他们像天桥上唱戏、耍猴的人一样，从这端跳到那端，为的是让别人看见他也能做到。”

“但是恭亲王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过世令我伤心难过而惋惜。我想说的是，他被老天爷从他尽职尽力的位置上带走了，而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他。虽然恭亲王本人并没有帮我赚过一两银子，相反有那么两三次还挡住了我的财路，但如果我能把他带回来，我愿意向朝廷献出一半财产。”

“说到底，钱财是什么？我严厉而慈祥的父亲拥有巨额的财富，但是我不敢肯定财富能让他幸福。他永远是一个不幸福的人！”

“他娶了第一个妻子的时候，他想，有第二个就幸福了。但是第二个也有了，他又想如果有三个好像更幸福。于是，他脑中幸福的概念，又召唤他再娶一个。我很高兴这下子他做到了，因为他的第三个妻子是我善良温柔的母亲。母亲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责骂我，她为我的父亲生养了一个儿子，并在父亲的努力下，把我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同时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也只有这件事，让他略感欣慰。[30]”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在庐州，钱财和官爵似乎是上天赐给的礼物。但是我发现巨额的钱财和朝廷的顶戴花翎，或者把两者加在一起，都无法保证一个人能克服内心不断膨胀的欲望。得到朝廷赏赐的花翎，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然而掉脑袋，却比这个容易得多！”



李鸿章及其兄的家族合影

“因此，如果能让恭亲王再为大清国做一两年事，我会捐出所有的银两。我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做事经常力不从心。如果没有人能施加有力的援手，恐怕我无法再长时间与那些无故喧闹、目光短浅的人战斗，只怕是凶多吉少。”

“遥想1881年，恭亲王和我肩并肩站在一起，相互声援，共担国纲。从那天到现在，我们为了大清国的安全而共同努力，极力避免她被瓜分的命运。可是现在他就这样走了，我将独木难支，回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心。”

“维新派！维新派！——无知的乱臣贼子，撒谎家，朝廷的敌人，我是这样藐称他们的。”

“他们打着改革的幌子，由一个亲近皇上的人率领，想在一两个月之内颠倒乾坤、重建国家。康有为本身是个好人，我非常欣赏他的文笔和演说才能，他也不愧是个南方的大儒。但是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即便怀着最好的动机，而不考虑现实的情况，草率去进行全面的

改革，永远都不能成功。他只是落入了另外一种改良派的窠臼，疯狂、目光短浅的野蛮人，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反对洋人。康有为以为用他的那点小学识、小聪明，就可以将皇上置于掌心之中。他不知道，一旦激起其他维新党人的狂热，做出有失国体、损害洋人利益的事情，西方列强又将栽赃嫁祸到我们头上。”

“1898年5月30日——我已经病得很重，无法去京城。我本想通过此行，施加一些压力，从而抵消康有为对朝廷的影响。我这一大把年纪，已经不能参加恭亲王的葬礼了，深表遗憾。”

“6月6日，我的身体好些了，但是我感觉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

“6月7日，今天，尽管内心悲戚，我还是写了很多信。其中一封就是给康有为的。在给康有为写的信中，我警告他不要领着皇上做违背祖训、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的信一定会惹恼这群‘康党’之流。康有为，这位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也会不遗余力地反驳我。但是，只要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对国家不利，我就会每天写一封信，哪怕只是徒劳，也在所不辞。”

“6月8日——皇上误信了一些初级的改革理念，就想立刻把生米煮成熟饭。康有为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在我看来，他思路混乱。当然，皇上也正在和他一起失衡。维新党人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天真地想要颠倒世界的做法，恰好是煽动仇洋的自杀性宣传的遮羞布。今天信差给我送来一个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些话，或者为什么偏偏要送到我这里。它只是一个朱红色的布告，上面这样写道：‘朝廷正着手进行全面变法。所有的爱国者联合起来，把洋鬼子们统统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这样大清臣民就可以享皇上推行的圣明利国的维新主义。’”

“我听说礼部有大臣草率上奏朝廷，反对礼部的某些人和一两位监察御史。简直是蠢货！他以为朝廷照他说的做了，就能博得了皇上的信任。”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决定变法。此乃“百日维新”的开始

“6月17日——今夜，我要动身去北京，我决心觐见太后，把我所见的局势如实地汇报给她。”

“天津（没有日期）。自从我到这儿，就有人告诉我，朝廷不会

在乎一个老家伙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所有的‘爱国者’都把我当成保守派靶子来攻击，而先前，我却是以改革派的身份出现的。”

“我想，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二十五年来，我才是朝廷上下真正改革的捍卫者。我想，如果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拥有一座山墙，或者打通一扇窗户，或者开一道门，他可以直接努力，去做些改动。但是我不认同，为了得到一面山墙，就推倒整座房子，或者去建一个拥有山墙的新房子。而如果一人坚持想改一下门庭，却把整个院子都拆了。那他一定是疯了。为什么看见有一只瘸了腿的羊，就要把整个羊群都杀掉呢？”

“康有为提议使用一剂改革猛药方，来治愈所有的国家疾病。他要让皇上自己生火，皇后、妃子们自己洗衣服。他认为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全国的矿山和铁路的问题，消除一个国家两千年以来的偏见。他相信，任何有委屈的人都有权利奏请朝廷，把他的难处说给耳朵里塞满了这些事的皇上听。”

“康有为，你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你的文笔很优美，国内外都听不到比你做得更好的演讲，但是你在让年轻的皇上出尽洋相。太后默不出声，其实是让你在出更大的洋相。可是，她最终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一定会收拾你的！但是一想到国家，我会为你感到遗憾，为国家凶险的命运感到悲哀。再过几个时辰，我要把这些话当面说给你听——”

“你是一个糊涂蛋，本想摆脱混乱，却把事情搞得更加混乱的维新派。我不会跟皇上说这些话，他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不可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他因为太缺乏经验了，即便知道了，也不会相信。我也不会向太后说你的坏话。但如果我还有足够权力在身，我会把你遣送回去，回去做你的私塾先生，或者，让你人头落地。”

“尊敬的康有为，皇帝陛下的导师，你要记住，我在赞扬你仁心的同时，还要告诉你，你的脑子是一个名为‘改革’的泥潭。比你更年长、更强大的人，在你的泥潭里看不见一条像样的鱼。你爱你的国家，但是你欺骗了她。就像害了相思病的乡巴佬对他的暗恋者那样喋

喋不休，不顾一切地在市集上拥抱她，这让她永远感到羞耻。”

“现在，我被召进宫中议事，我要尽职尽责，努力阻止某些所谓的‘改革’。”

“一场意味着倒退的改革，不是可悲的就是可笑的。”

“一场不试图建立新体制，只想摧毁一切的改革，是一阵飓风，是国家的灾难。”

“一场设想全世界在一个星期内变坏，再用一天的时间把它变好的改革是十分愚蠢的。”

“我像憎恨唠叨的妇人一样，憎恨职业改革者。他们都认为别人都没有脑子，更不用说智力了。”

“但是，我真的认为，皇上疯狂的新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反洋情绪。1870年后，我毫不留情地镇压了直隶发生的暴动，终止了杀戮和错误。我将再次遵照朝廷旨意尽力维持国内秩序，让国内的骚乱不至于再次将其他国家的政府引狼入室。”

“7月9日，戌时，在已故恭亲王的王府——自从上次去了京城，我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步。说实话，我这辈子的任何一个时期，在相同的时辰内，如果忙碌成这样，一定大有收获。然而，这一次恐怕收效甚微。很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如果我有一头骆驼，我会不停歇地在路上骑着它，决不让它在窝里睡到天亮。年轻时代的抱负和四十年来不懈的努力，却换来了一个动荡巨变的晚年，到现在也停不下来。我不会推卸责任，即使我肝脑涂地。”

“7月，家中。午夜过后，我在皇宫里待了两个多时辰。一半的时间，我是在和太后老佛爷密谈。她常说，给内阁、外务部下旨答疑，只需一刻多钟就够用了。”

“太后手中捏着刚毅[31]的奏折，这不是个好兆头。而且谭嗣同前天已经奏请太后三次了。他也自称是‘改革派’，但他想改革的纲目是

财政、皇上的权力和基督徒。他联合了刚毅，更确切地说，鼓动了刚毅，和他一起向太后施加影响。这的确是可悲可叹的。同样糟糕的是，尽管方向不同、目的有别，皇上已经被康有为等人所掌控。如此环环相扣，康有为已经变成不经世事的皇上的导师。该死的康有为，他该去教他有能力教的东西，而不是胡说八道。越发疯狂的是太后本人，她竟然与刚毅和端郡王为伍。如果她听从明智的庆亲王和荣禄的劝告，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将会有所缓和，而且她的晚年也能过得更安逸舒适，这本来就是太后老佛爷她应得的。”

“我相信，随着时光飞逝，她的野心也在增长，而且她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但是她不明白，连续争吵、深夜会谈和激烈争辩会让她的生活如黄连汤一样苦不堪言。”

“太后直截了当地问我，万一变法发生了大麻烦，你李鸿章是个什么立场？”

“像往常—样，圣明的皇太后。我回答道。”

“到底是什么立场？她进一步质问。”

“——请太后见谅，但是太后真的需要老臣的答案么？”

“她显然对我闪烁其辞的回答很不耐烦了，但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只要受到了一点点的冒犯，就对我怒目而视。”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并授以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是的，我想知道！她很有耐心地命令道。”

“我只好告诉她，我会永远和太后，还有和大清朝廷站在一起，

就像老臣我一直做的那样。”

“太后，我的时日不多了，我说，但是只要我活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太后都可以指望老臣。我见过她这样的女人，她似乎一切都不动声色，但内心对什么却都一清二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吗？她继续追问。”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回答。”

“然后，她示意让我退下。于是，我立即退下了。我已在宫里待到了凌晨两点了，身心疲倦。她说明天可能还要召见我，但是我希望她明白，已经没这个必要了。可我并没有急于立刻退下，而是恳请太后说出她心里对变法的想法。她是否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她是否还信任我，她心中是否有什么更周密的计划，等等。因为这正是我这趟来所希望知道的，我试探看看她是否能告诉我，让我更安心？”

“和往常比起来，今天晚上，她一直表现得很热忱、很和蔼。我以为进一步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会冒犯她。但听了我的问题后，霎时间，她变得暴跳如雷、大声呵斥我，于是我立即下跪告辞。”

“8月（没有日期）——我对所有人的劝告，都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没见它们产生什么样的成效。我发现所谓保守派和维新派，两个派系的意愿和政策，我都反对，他们将给社会带来大动荡。这还是往好了说，严重了，将是国家的灭顶之灾。”

“皇上——这个轻率的君主，还不如我小儿子适合当一个帝王。他对我非敌非友，然而，我开始感觉到他的末日临近了。我真的不该同情他。而事实上，我确实也没有同情过他。实际上，他已经被周围那些满脑子只想变革的人控制了。他拒绝听进任何人的话，甚至连我的谆谆忠告，都不听去。”

“那个一门心思维新的康有为逃走了。他和他的学生，下半辈子就别想回国来和家人团聚了！”



李鸿章一直极力抨击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

“（没有日期）——我是这么看待康有为的：他所拥有的理性和判断力，不足以让他觉察到他本人的维新飓风将引起一场政治雪崩。他离开了北京，我相信过去几年的努力，证实了他自己的能力。我本人对他没有任何敌意，但是希望他尝试其他领域。那样，他对康党和

自己周围的人会有一点实际的用途。我希望他死后能留下好的名声。一旦得到他死亡的消息，也许，我会立刻去拜祭他。”

“（没有日期）——之前，忠诚地跟随我的文官们，已经很久不和我在一起了。身边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只好亲自给外国使团的朋友写简短的密函，告诉他们朝廷上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如果那些总喜欢找我这个老头子麻烦的人知道这些事，他们准会公开宣称，是我又把国家机密泄露给了洋鬼子。”

“我深切知道，事态又要变糟，也许又是一场巨大的杀戮。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已经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办法，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并且我还努力通过这些朋友的影响力，希望能在朝廷有个听证的机会，但是这只是一种徒劳。”

“今天，荣禄[32]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他没有说得太多，但从他那封言辞激扬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他肯定太后正在酝酿一场声势浩大的剪除乱党的运动。荣禄是太后亲信，深深知道这一点。”

“他让我跟外国使馆的洋人们说一声，如果在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内发生什么变故，一定不要担惊受怕。我恰恰已经这么做了。我们不希望列强们认为，只要遇到任何情况，我们政府都只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或者，为防范接下来会发生的大规模暴动，把教民和传教士当成牺牲品。我们诚然担心外国军队会贸然介入中国的内政。这些外国军队的到来，只会使我国的动乱局势更加紧张，甚至还会酿成战争。”

“太后渴望亲自执政，她并不满足于曾经和现有的权威，垂帘听政。近来，她的脑子已经完全中了毒，她恨洋人以及洋人带来的一切。我们这些对朝廷忠心的臣子，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尽量维持和平，不过分强烈地反对宫中那些激进鲁莽的当权派，刺激他们；虽然，我对她所发动的政变持反对态度，但是，我相信太后也绝不允许他们对我有任何身体上的伤害，哪怕只是伤害到手脚。不过现在，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必须对政变公开表示赞同。一个人在飓风当中吹口哨，有谁能听得到他的声音？用一壶水去浇入大风潮中，对时局

又有何裨益？”

“显而易见，有生以来，特别是从政以来，我头一次被所有的人都忽略并遗忘了。我希望可以找回自己往昔的荣耀和影响力。”

9月24日，李鸿章只写了一行字：“她又一次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实际上，她一直是最高的统治者。”9月20日，戊戌政变，守旧派胜利，此后，慈禧太后复出训政。

大清政府在它的官方报纸——《京报》上，刊发了一则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官方公告，简短地向天下通告了这一次的巨变。我稍稍浓缩了一下这方上谕，其主要内容如下[33]：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朕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子之大幸。

由今日始，在偏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

一切应行礼仪。

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上谕。

今颁。

“（没有日期）。——我心中惶恐，浑身发抖，不知京城和整个华北将会发生什么。老派的‘改革派’走了，新式的‘改革派’还在。”

“政府各部门窃窃私语，传播反基督徒的威胁言论。我听说保定府周边地区已经发生骚乱。如果太后身边的乱臣贼子默许此举，而不出面制止，紫禁城将为疯狂的政治局面所左右，我看国家的安宁，只

能维持短短几个月了。”

“我给各国大使馆发出消息，告知他们务必做好准备。其中有五个国家的朋友——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已经寄来感谢信。康格尔公使亲自来访，他让我放心，据他所知，这个可靠的消息已经转告给所有人了。”

“10月9日，天津——今天早上。从京城来了一个信差，给我带来了很多信函。其中，有一封来自荣禄。他在信中描述了宫中发生的情况。可怜的光绪皇帝被迫跪下，太后老佛爷逼他承认自己一无是处。荣禄说，太后在典礼中，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母老虎，她对待年轻的皇上比对待一个不听话的小太监还要狠。”

“他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他在信中写道，太后威胁光绪，如果他不跟皇后（慈禧的侄女兼眼线）一起生活，就有生命危险。光绪答应和她一起生活，保证爱她。真是令人气愤，我知道，皇上其实连见她一眼都讨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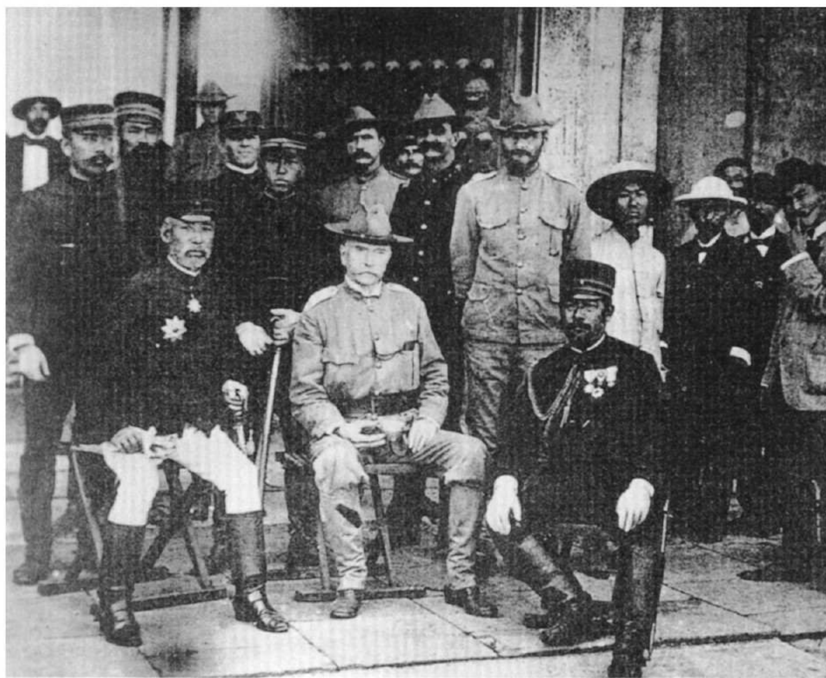
一度，维新运动取得轰轰烈烈的反响，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图为光绪帝与谭嗣同合影

“——后来，当可怜的皇上爱着的珍妃替皇上向太后求情时，太后命人把她撵了出去，投入了冷宫。我认为太后做得有点过分了。还

嫌皇上在卑下的太监和奴婢面前没有被羞辱够吗？太后怎能把他唯一的家庭安慰也夺走呢？当然，荣禄并不同情已经被废掉的皇帝。袁世凯也是一样。不过，我想让他们帮我一个大忙，劝说太后把珍妃和光绪一起关在瀛台。”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李鸿章曾经写信给荣禄或袁世凯，请求他们帮助珍妃说情。这个光绪皇帝的宠妃之所以被称作珍妃，据说是因为她曼妙的容颜，还有珍珠般光洁的肤色。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子在冷宫中，被关押了两年时光，除非是太后在场，她再也没有与光绪皇帝单独见面。最终慈禧下令，将其推入到紫禁城的一口井里。

那是1900年，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皇室成员慌忙出逃。



第九章　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

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回国后，他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朝廷派他到圣彼得堡去。在同年早些时候，他曾提到过一句，说朝廷已选定他人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如下：“朝廷决定派王之春[34]为代表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

虽然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从北京到圣彼得堡一路上大量见闻，直到他再次回到中国的土地上之前，他对选派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做出任何的评价。

“我回来了，心情很愉快。对于一个老人而言，还是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与族人在一起比较踏实。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老年人不醉心于异域奇景。到了这个年纪，正准备着九泉之下的美景。常常听人谈起九泉之下，但他们也只是说得很多，并不能描绘得很详细。”

“我纳闷，为什么俄国指定朝廷，要求派我前去？这当然是最大的褒奖。我有资格感到受宠若惊，但是王之春也配得上这份荣耀。他还告诉过我，他是多么合适的人选。而就在那时，俄国人发话说，如果我去，他们会更高兴。这对王之春来说，显然是一个打击。太后听了，也不是很高兴。但是有人告诉我，一开始，朝廷选定的人就是我。”

“长期以来，俄国人一直想给我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也许他们是真心这样想的，不过极有可能另有自己的打算。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们。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我在一些问题上支持俄国，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大清国会是最终的受益者。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俄国明白，朝鲜不能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但是最近，俄国的立场变了，沙皇不要以为给了我这些荣誉、偏爱和恭维，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加冕典礼确实很壮观。即使有人告诉我，我是典礼上的中心人物之一，我也会这样说的。沙皇甚至告诉我，我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他本人。但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恭维话，难道我看不出美丽的皇后才是典礼上的焦点吗？”

“当她与我亲切交谈，向我举杯微笑时，我相信这是值得记忆的赞美。当我回国后，向太后和她身边的奴婢描述沙皇皇后的美貌时，她们都说，她本人肯定和相片上一样可爱。我从俄国给她们带来一些沙皇和皇后的相片，给她们欣赏。她们见后，大为惊奇。”

“太后问了我许多有关于俄国朝廷的难题。我尽力机敏地做出回答。她想知道沙皇皇后是否是一个强权的人物，她身边是否有很多的太监。但是我回答说，沙皇皇后亲自持家，甚至亲自给孩子喂奶。而且，并没有听说和见过俄国有太监。”

“她说她希望我知道，俄国沙皇的皇后是如何保持生育能力的。但是我告诉她，俄国皇后一点也不老，年龄只有我的一半，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的女人。”

“我完全没有冒犯太后的意思，但是她不耐烦地告诉我她以后再问我有关于俄国的事情。她现在要和奴婢们聊天，太后意在告诉我这次召见结束了。”

“腊月二十一日——我接到通知，说我因违反宫廷的礼仪，被罚俸禄一年。被罚俸禄是小事，但是我很想弄明白，自己是如何惹恼太后的。”

“腊月二十一日，晚些时候——朝廷的信使到了，带来了圣旨的复件。朝廷将‘御赐双龙宝星勋章’[35]赏赐给我。复件上说，圣旨的原件是太后亲笔写的。我不禁去想，内心里，太后其实也没有觉得我违反了什么宫廷礼仪。但出于官方的威严，她还是罚了我三万七千两的银子！”

“御赐双龙宝星勋章，我真是无比欣喜，早在长途跋涉去俄国首

都莫斯科之前，我就期待着得到它。”

“如果我不是身为汉人，而是一个八旗子弟，或许我能更容易获得它。因为朝廷只把它赏赐给满洲皇室血统的人，极其特殊的情况才例外开恩。也许太后把它赏赐给我，是不想看见我再当面冒犯她，因为佩戴它的同时，我也就拥有了一份特权，觐见时下跪与否全随我愿。涉及宫廷礼仪诸事，面对那些权威高于我的人时，我必须小心应对，因为我也期望那些无法和我平起平坐的人，能以起码的尊重待我。”



佩戴双龙宝星勋章的李鸿章

几天之后，李鸿章如是写道："我相信，无论对于哪一个阶层的人，说谎者是最坏的人。当朋友们为我获勋欢喜庆贺，纷纷给我寄来

长长的贺信和许多的贺礼之时，我的政敌们却说太后赏赐给我‘御赐双龙宝星勋章’，是为了讨好俄国人。而我被罚一年俸禄的事情，说明我在遵守宫廷礼节方面是个无知之人，屡屡冒犯朝廷的天威。我的秘书告诉我，有很多人找到他打探我的小道消息，问我是不是告诉太后，如果皇室妃子和公主们效仿沙皇皇后，就可以让她们生出更多更好的孩子。谎言！恶毒无稽的谎言！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知道，即使我有胆量，我也绝对不会对太后讲如此的话。更不会对皇室血统的任何一个人说这些事情，我对宫廷内务根本不感兴趣，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家事管好就成了。”

“有人散布有关我的谎言，或者恶意篡改我说过的话，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四十年来，这样的情况，我遭遇得太多。但问题是，那些品质低贱、无知无识的人，听到这些话，再加上我被扣薪一年，他们会真相信我说了这些丑陋的言辞。然后，就会产生更多传言和闲话。天知地知，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让宫中女人蒙羞的话。我确实称赞过俄国沙皇的皇后，但并未用嘲讽、贬损过任何其他人。”

以“头等钦差大臣”身份出使俄国时，李鸿章在圣彼得的日记中谈到其他事情：

“朝廷嘱咐我，回国时取道君士坦丁堡和苏伊士运河，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想顺道去一趟德国和法国。然后去英国和美国。我想去看看这些大国，而且顺道处理两国之间的若干公务。这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高傲的英国人是不会盛情招待我的，但他们也不会伤害我就是了。我也不会给英国人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害。如果他们给我冷脸，客房冷清、桌上空空，我就不做停留。因为路途遥远，俗话说得好——盘缠充足的旅人，是不在乎沿途官员的脸色的。我也不在乎那种瞧不起人的势利国家。”

“今晚我要出席沙皇举办的第一个宴会。希望时间不要像昨天那样那么漫长。事实上，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食物。但是还是做得无法和家里相比，也没有我自己带来的厨师做得饭菜好。不过，我自备有上好的茶叶，是送给沙皇和皇后的礼物。厨师会教他们怎样喝那些中

国的极品好茶。”

离开俄国动身前去德国首都之前不久，钦差出使大臣李鸿章写道：

“——星期一，我们离开俄国，动身去德国人的土地。他们告诉我，从这里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要走上好几个小时。如果我们向南走，还要远上三倍。向北走，沙皇统治的疆土延伸至大陆的最北端，终年冰封山湖。”

“我经常研究世界各国的地图。我当然很早就知道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但是只有置身其中进行旅行，才真正知道它有多么辽阔……我不禁想到，它要比大英帝国强大和物产丰富得多得多。如此多的领地、岛屿和属地分散开来，如同庞大谷场上散走的家禽一样。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相似的。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学会如何团结一致，抵抗外敌入侵。这就是中国和俄国的差异所系。很多国家胆敢骚扰中国，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打搅俄国。如果俄国不总是想着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有可能会是非常强大的同盟。”

“星期日晚——今天下午，所有人都去教堂做礼拜。礼拜的时间很长。当我终于可以和沙皇会面时，已经很疲倦了。莫尼夫医生是俄国政府为我们安排的家庭医生。他给我打了一针，还送给我一大瓶的白葡萄酒。所以，当我到达城堡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小伙子。我告诉沙皇陛下，长时间的礼拜，再加上缭绕的焚香，我都快病了。听我说到这里，他开心大笑起来，露出洁白漂亮的牙齿。他说我几乎是所有宾客中，看上去最为健康的一位。”

“陛下何时访问中国？我问他。”

“他又笑了，然后说他也许会在合适的机会安排他的妻子去远东会见皇太后和中国宫廷中的女士。”

“我觉得，沙皇尼古拉[36]的身体不太好，待在室内的时间太长，

或者担心健康问题，这让他看起来太过于倦怠。他是一个统治着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小个子。虽然有人告诉我，拿破仑的个子更小。俄国首都有很多的大个子，沙皇被他们围绕着。他的士兵，特别是他皇家卫队的士兵，都很有气势。我相信，日本人看见这些俄国士兵，撒腿就跑。”

“我得到消息，明天一大早动身。这个安排不合我意。我情愿现在就出发，在火车上睡觉。这么早起床，似乎是西方人愚蠢的惯例。尤其是对于政治家而言，这样做更愚蠢。等到晚上，一切都要静下来，头脑最为敏捷的时候，处理各种事情，岂不是更好吗？”

“但是我听说这些政治家和立法者，喜欢晚上出去寻欢作乐。他们出席宴会，光顾戏院，参加奢华的派对，而且经常玩到晨星破晓的光芒再次出现。所有宫廷所熟知的阴谋诡计，应该都是在那些地方策划出来的。女人们不能进入议事厅，也不能在国会上发言。不过，她们可以在派对上，或者剧院里耍些花招，干扰政务。”

“星期一，火车上。——这辆火车比先前所有的火车开得都慢。我去询问原因，被乘务告知说，因为车上有很多的外国高官，俄国政府不希望发生任何不测，产生任何风险。”

“沿途到处都是士兵，每次火车靠站，都不许老百姓靠近。”

“在中国做官已经够糟了，需要忍受谎言、谩骂和谣传。但是这是在俄国，他们只要有机会，那些乱党们就会刺杀政府的高级官员。有个人告诉我，俄国有一个很大的秘密组织，它的成员遍布沙俄全境。他们主要的工作和娱乐活动，就是杀死俄国或者其他国家身居高位的官员们。”

“即使可以拥有美丽的沙皇皇后做妻子，喝到最珍贵的茶，我也不愿意跟沙皇交换位置。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一点也不担心被人夺走性命，除非是特别狂热的疯子，就像是在马关遇到的开枪射中我眼眶的日本浪人。最初，我在汉口做湖广总督时，有卑贱的人到处扬言要除掉我。还有一次在天津，当时我担任着直隶总督。一个恶徒走进

了我的院子，对着当班的侍卫长说，他要杀了我。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绳子，说是要把我吊死在自家的门柱上。在他闭嘴之前，我必须差人砍了他的头。”

“靠近德国，未时——刚刚刮过头，感觉很好。我想，某些俄国人那样顶着一脑袋的头发，简直是疯了。许多国人爱拿我的长而蓬松的胡子开玩笑，但是我希望他们能见到圣彼得堡宫廷里那些毛茸茸的脸。与我相比，他们的确是一群红毛鬼子。”

“母亲说，我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就有将来一定是虬髯客的迹象。她曾断言说我将来一定会长成为国家栋梁。当我做出很多的成绩以后，她很多次问我：我的预言是不是很准确？每次我都被迫回答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她认为我是个大人物，那我就是。”

“拿破仑在严冬从法国出发，走了这么远的路！他要么是个勇敢而意志坚定地人，要么是个傻瓜。因为即使是在现在，火车上提供了最好的食宿，还有士兵保卫着而不是攻打我们，这依然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旅程。有些乡村的景色很美，但有绵延好几百英里的荒原。那里只适合绵羊、山羊甚至是野狼生存。有羊的地方总会有狼，人类的生活，国家的命运均是如此。”

“我不愿被我的同胞当成一头狼。”

“但是我曾经被用更为恶劣的名字称呼过，甚至那些被国人憎恶、而我极力保护的‘洋鬼子’们也曾经诟病过我。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戈登曾说，他知道我的野心是推翻大清朝，自己做皇帝。当我身处拿破仑走过的道路，回忆他统治这个国家的野心时，便会想起他这个说法。在患难之时，戈登是位很好的朋友。时而至今，回想起他来，我依然把他当成生命中的至交。当然，要不是我的金钱和影响力，他也不可能把‘常胜军’团结在一起。不过，我从未有跑到中国京师去做皇帝的野心。”

“火车上现在满是兴奋和欢悦的气氛，因为我们已经抵达了边界。有很多士兵护卫着，远处的人们在注视着火车。我估计很快就要

见到德国人了，因为我听到礼炮齐鸣，军乐声声了。”

“我希望军乐声停下来，不要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刺痛我的耳朵。我想知道是否能见到克虏伯先生。”

几天后，已经身为德国政府的客人李鸿章又在日记中用很长的篇幅说起中国的戈登将军，那个“常胜军”的英国统帅。1863年，李鸿章曾经雇用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起义[37]。

“英国人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和戈登将军的不和。我曾经被多次指责过，传闻说我嫉妒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根本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嫉妒他？他直接受我的管理，没有比看到他指挥的‘常胜军’打胜仗，把太平军的将领们赶出苏州城里更让我高兴的事了。戈登不急于剿灭太平军。我知道他曾经密奏朝廷，请求朝廷任命他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其他总督统领的军队也交由他统帅。他不知道，没有人能有权授予他如此无限制的权力。外国人的骄傲让他们以为他的权力在我之上。他犯了错误，而且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一直忽略不计，只考虑他为大清国所作出的贡献。”

“然而，他犯下的决定性错误，我不能熟视无睹。因此，我上书朝廷，解雇了他。他永远不能再为朝廷效力。”

“他的错误，令人痛心。他指责我背信弃义，在自己的船上杀死了太平军的所有降将。在此，我要把事件的真相重申一遍。此前，在1866年，我曾向北京总理衙门汇报过。那时，我亲自奔赴山东，镇压那里的暴乱。”

“慕王告诉苏州城的将领，他绝不向清军投降。他会继续打十年。这种言论招致了杀身之祸，纳王向我表达了投降之意。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程学启将军。”

“与此同时，戈登将军认为他从太平军将领的投降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耀。于是，把‘常胜军’全部转移到了过去的昆山总部。这一做法违反了我的命令，也违背了程将军的劝告。但是戈登宣称，我

们欠了他很多的军饷。这属于实情。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诺他什么。在太平军投降之前，他也不要期待有任何的赏银，这也是事实。他感觉自己被我们怠慢了。于是，贸然上书朝廷，并等待朝廷回复他的请求。据我所知，他启奏太后的那份奏折，还说了很多坏话诋毁我。”

“当酒宴摆好，我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有人向我汇报说，两条大船已经起锚，并朝着我们这条船冲了过来。我去近旁的船舷观察。正值晚间酉时（晚上七点左右），我看不清楚情况。但我察看到，似乎戈登本人正率领着其中的一条船。我回到宴席间，告诉太平军的降将们，戈登来了。程将军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他靠近我耳边说，他觉得情况很不对，感到非常担心。他究竟担心什么，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告诉我。就在我、程将军和太平军纳王到船边上岸前，大英帝国的官兵已经从两侧爬上了船，见人就砍。他们杀死了我身边的纳王，另一个家伙则捅了程将军一刀，但好似并不严重。一个军官举刀向我砍来，但当我举起手准备反击的时候，他跪了下来。”

“我和程将军几人成功地逃逸，登上了一条兵船小舢板。船夫把我们送上了岸，我立即命令集结城里所有的军队，抓捕发动袭击的人。但是大家反击太平军的情绪太强烈了，我想，他们没有执行我的命令，而是对所有太平军投降者大开杀戒。那天晚上，我得知，留在船上的所有人都被砍头了，尸体被抛在了河里。其中，有一个我非常敬爱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我的亲外甥。”

“我要让英文秘书把我写的东西翻译出来，并抄写很多份。如果有英国人士调查戈登之死，问及此事，这份材料就是我的口述声明。”

显然，英国记者并没有问到苏州杀降的事件，因为李鸿章乘着亚特兰大号客轮横渡大西洋两周后，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在英国时，只有首相格莱斯特顿先生提到了戈登——我想，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他了。”

第十章　德意志纪行

在德国停留的前五天，李鸿章连一行日记也都没有写。尽管他屡次提及“再次把钢笔握在手中”，但是他还是在过了许久之后，才记录下了当时的全部经历。与其说是用“钢笔”，不如说是鹅毛笔，因为他很擅长使用鹅毛笔，只有在书写正式的或更重要的文书时，他才使用他在中国寻常所用的毛笔。

在埃森时，他写道：“在成为德国政府客人的同时，我也收到了克虏伯[38]先生的请柬。很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见到他。我不知道盼望见到俾斯麦首相多些，还是克虏伯先生多些。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人我都见到了。我能自由地与他们交谈，我感觉在德国，没有其他诱惑或利益等着我。而与他们沟通，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非常会工作：克虏伯安安静静地制造他的大炮，俾斯麦则想方设法将大炮使用出去。德意志皇帝是德国的元首，然而俾斯麦才是德国上下遇到大麻烦时，最坚实可靠的磐石。”

“前天，我与俾斯麦首相进行了友好的会晤。他让我喝了些啤酒，我一点都喝不下去这种口味奇怪的饮料。但是他说，如果我想在德国多待些时间，就一定得适应这种奇特的国民饮品。我告诉他，我没有盼望再活多少年，也不太可能适应这种国民饮料。”

“我们一起抽了中国的烟丝，这次会面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打搅我们交流的，只有翻译和送烟袋、茶水的仆人。大部分时间，我们讨论的都是国际政策。最后，我们还谈到了德国可能给远东地区造成的影响。”



李鸿章与俾斯麦

“‘您可能在中国很少见到德国人，’他说，‘因为总的来说，德国还是一个新生国家。但是，德意志帝国统治欧洲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咋咋呼呼的英国，有一百个弱点。而且它知道，如果和一个实力新兴的强国发生冲突，就意味着毁灭。我讨厌英国人自吹自擂，尽管英国王室也有着德国血统。’”

“在我们的会谈接近尾声时，实际上，是在我们即将分别时，我告诉俾斯麦，西方人恭维我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的表情很严肃，好像一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在仔细琢磨。接着，他浓密的眉毛向上翘了一下，微笑着对鲁夫巴赫上尉（在德国人里，他的汉语说得最好）耳语道：‘告诉中堂，法国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赞美说出来！’我们握了握手，表示英雄惺惺相惜，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人根本一点都不喜欢俾斯麦。”

“我发现，俾斯麦和所有西方人一样，恭维话脱口而出。因为我们刚握上手，他就说：他们管中堂先生叫‘东方俾斯麦’是吗？我想告诉您，我俾斯麦也盼望得到‘欧洲的李鸿章’的称号。”

“从柏林来到埃森时，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克虏伯先生。俾斯麦说，克虏伯是个随心所欲的皇帝，乃是‘埃森的皇帝’。德国不赞成打仗，他说，但是强大的武器装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犹如警察手中的棍子。警察不会向无辜者头上挥舞棍棒，但是他会让更多可能做坏事的人清楚地看到他手中的棍子，这样他们就会知道，这位警察正时刻准备应对麻烦。如果一个警察四处巡逻，手里只拿着一根羽毛或者是一小捆干草，恶徒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弱点，而后猛扑向他，夺走他身上仅有的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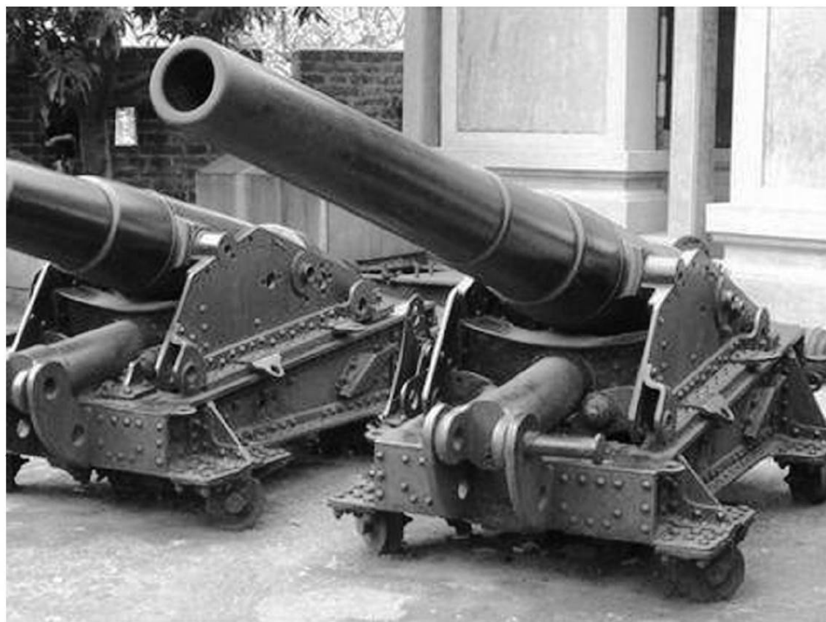
“埃森也是如此。克虏伯先生在那里建了一座大型工厂，为几千人提供了谋生之路。即便他生产的大炮没有一门开火，他仍然是德国的恩人。但是如果所有大炮都不开火，德国却能保持安宁的话，德国人会认为他更伟大。他为祖国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公众对此一无所知。今天的埃森，到处传唱着和平之名。明天，敌人将从一千名埃森人口中听到团结的德国之声。没有比这更令人信心百倍的了。”

“应着俾斯麦的要求，鲁夫巴赫上尉陪我来到埃森。我很高兴他这么安排。因为他好像什么都了解，也能把他知道的讲出来。上尉在北京和广州的领事馆供事多年，汉字写得也很好。我想，我应该请求德皇，让他同我一起回去。”

“那一天，克虏伯先生给我看了一幅他本人的画像，画像外镶着铁框。我请求他，把这幅画像送给我，因为我非常钦佩他。他说这是穆勒为他妻子而画的。但是克虏伯夫人很高兴我能拥有它。克虏伯先生还送给我一座微缩的炮台，炮台的大小正适合孩子玩耍。实际上，他让六名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把它们拉进我的房间。每台小炮上都系着一根黄丝带。我想，其中一个小女孩以为这是真的在打仗，她很害怕，过了一小会就哭了起来。而且她是带头进来的，很可能是小小的炮兵团长。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这不禁让我回忆起往昔，还曾记得，有一次我们与敌人交战，军官们都是懦夫，士兵们却个个骁勇异常。”

“馈赠和接受礼物时，克虏伯先生及夫人、冯茨伯格将军、格雷

格伯爵夫人都在场。克虏伯先生作出简短的致辞，我随后也发言作答。鲁夫巴赫上尉翻译得很精彩，但是他漏掉了最后一句。我提醒他注意，他满脸通红，很显然，有些尴尬。但是我只是重复了先前说的话，他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了在座的各位。可怜的家伙，他以为这次会冒犯我们。”



李鸿章赴德国采购的克虏伯大炮

“鲁夫巴赫的话刚出口，所有的人都大笑了起来。克虏伯先生还拍了拍我的肩头，做得像是一个开心的兄弟那样。”

“是的，您应该有一套，一套真的长枪！他说了两三遍。我告诉他非常感激对我的高度赞美，他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与此同时，我相信如果能赠一套长枪，他的兵工厂的名声或许在东亚会更大。”

“于是，今天上午，我去了克虏伯兵工厂。六杆锃亮的长枪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是克虏伯先生送给大清国政府的礼物。这份礼物的价值超过十万八千两银子。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慷慨大度会让他损失

什么。因为我已经让随行吩咐这里的两位德国工程师挑选三组野战炮和四杆十英寸的枪，近期就把它们运送到中国。我们还要从他这里购买德国的火药和炮弹。”

“第二天，天黑时——今天，我拒绝所有的访客，因为我要缅怀已经升天的母亲。她在十四年前的今天去世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她盼着在九泉和平的阳光下与我相见。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烦琐也好，哀伤也好，欢乐也好，荣耀也好，无论遇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已经升天的母亲。我都不会忘记她一直以来对我的谆谆教诲。”

“父亲比母亲过世早很多年。他的墓地恢弘肃穆，母亲曾多次请求神的保佑，快点让两人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相会。我母亲从没有想过自己结束生命，很多愚昧的中国女人认为，早日结束生命，与死去的夫君团聚是伟大而光荣的。这就是所谓的烈女殉节。甚至很多有知识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父亲挚爱的伴侣，我的母亲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她认为即使这么做，也不会让早逝者欢欣。”

“早年间，我曾有过许多念头。现在想来，都是愚蠢而邪恶的，那些想法与常识以及理学相悖。其中之一，就是有关于自杀。另一个就是杀掉婴儿。如果一个男人或者女人颜面尽失，而且绝无挽回的可能，他或者她最好被深埋于九泉之下，而不是或者看见自己每一天都生活在羞辱中。当然，如果她生性又太懒，自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一个朝廷的命官，得到过很多的荣誉，却因为贪污挪用了公款而被抓，而且即使拿出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也无法全部偿还他贪污的钱，他最好是服毒自杀。因为他死了，家人、朋友和朝廷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坚持活下去，即使律法不能惩治他，他的每一天都将比前一天更可耻。而且对于他的家庭而言，每过一个时辰，他的罪孽就会加重一分。”

“如果一个高级官员，发现他的国家因为自己受辱，即使他本人没有过错，为了表示爱国，他也要痛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名字，将永远和失败与屈辱联系在一起。那

么，他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我要赞美我悲壮的水师提督丁汝昌。我要在杰出的张文宣将军（译者注：张文宣，字德三，安徽合肥人，张家与李氏家族互通姻娅，关系极为密切。李鸿章兄弟读书、婚宦都受到张家资助，因此李鸿章对张氏一族特别关照。1871年张文宣中武进士，后进入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失利后，以死殉国。）的墓前鞠躬！我要为英勇无畏的刘步蟾[39]总兵官焚香祭魂！即使战败了，他们同样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他们的魂魄将与我们高贵的祖先同在，他们的灵魂也在九天之上得以宽慰。就连日本人在海上和陆地上打完他们的胜仗之后，也忍不住向这些英勇光荣的海陆军将领致敬。”

“我一直不太喜欢日本人。但就朝鲜问题，我国被迫与他们发生战争时，我从心底里憎恨他们。因为两千年来，朝鲜一直是我中华的藩属国。但是我个人还是崇敬伊藤博文力排众议，号召议和的高尚行为，我才准备与他议和。”

“如果一个人遇到这等家国大事，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杀殉国。但是，很多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就随随便便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自杀的理由，甚至还够不上判一个无赖乞丐入狱待两天的。他们做事的动机是非常可笑、自私与愚昧的。他们内心太骄傲、太把自己当回事，非常想让别人都称道他们是勇敢无畏的。很多寡妇割喉、投河上吊或者吞下大量的砒霜，以示对亡夫的深情。这是多么愚昧的行为！如果她们这么想，并真的这么去做，那一定是愚蠢到家了。事实上，寡妇很懒惰。她害怕没有其他男人提供其生活来源。如果是这样，她既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成千上万来开心观看她自杀的人们。寡妇再嫁，并鼓起勇气生活，才是对逝去的人最大的致敬。当然，如果她太懒惰，自杀是个不错的选择。”

“小时候，我生活在安徽老家。有一次，我犯了错，一些朋友告诉我，只有投井，才能挽回我自己和家人的面子。我犯下的错误是：我捉住了池塘里的两只鸭子，杀掉煮了吃了。我父母和鸭子的主人没有严厉地惩罚我，但是我仍然心存愧疚。虽然我让家人和自己丢了

脸，但我并不准备去死。我跑去问我母亲，我是否应该跳井自杀。她说绝对不可以，那样做绝对不成。对我而言，更好的方式是在明年收获的季节去挣更多的钱，除了赔给人家两只鸭子，还要给人家送一只鸭子和七枚鸭蛋。我听从了母亲的建议。除了赔了人家鸭子，还给县官送去了一只肥兔子。从此以后，他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我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母亲的死。我本想守孝三年，但是朝廷正和俄国人谈判朝鲜问题。我被迫与总理衙门的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刚才，秘书给我递送了一份来自冯·毛奇[40]先生的信。我要留到明天再看。今晚，我必须诵经纪念母亲，以及为她写祭文直至深夜。”

“我把那组小炮的炮口一致指向东北方向。好像在说，如果再与日本交战，我们将会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一定要击败倭寇。那套玩具满足了我争战的天性，像孩子般对战斗充满向往。但是，现在要是能送给我一批真正的枪炮，我想我会更开心！”

“现在（晚上八点），我要研读两个时辰的《孟子》。”

“早上——冯·毛奇的来信只是表述了，他希望我在到达波茨坦之后，能够与我见上一面。他自己要去席凡宁根（我不太写得溜这个古怪的名字）。”

“我永远不会忘记S城（他在日记中代称波茨坦）当地人民为我燃放了烟花表演。中国的烟花种类繁多，燃放的时候精彩纷呈。但是，我在S城所见到的烟花表演，就像是把空中所有的精灵都聚集了起来，为我在欧洲唱出了一次家中的堂会。焰火的图案有男人在打仗，也有船只横行。我在中国也曾经见到过这些，同时还有非常漂亮的金龙，以及太后老佛爷和皇上的照片。最后，礼炮阵阵，军乐齐鸣，李鸿章中堂穿着黄马褂的照片出现在天际！尽管他们已经事先通知了我，这场焰火晚会是为了向我致敬。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场表演。那天晚上，我穿的正是皇上御赐的黄马褂。由冯盖

特纳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和由桑德斯市长领导的城市委员会来访时，我也整齐地穿着它。”

一段时间以后，李鸿章在旁注中解释说，一个随从打断了他的盛宴。他给李鸿章带来了很多重要的电报，其中一封来自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他以美国人民的名义邀请李鸿章到美国去访问。这封电报还代表了美国国务院询问李鸿章到达美国的大致时间。



身披黄马褂的李鸿章

“不莱梅港（离开波茨坦三四天后）——据我一路所见所闻，我越来越相信，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首相俾斯麦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断言，德意志帝国注定要成为欧洲的主宰者。这个国家整齐划一的管理和行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陆军公事公办，海军公事公办，整个国家机器极为高速地运转了起来，比我们广州城中最好

的大钟还要精准。”

“今天早上，我们一行人在一群高官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我们还将在这里会见其他人。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我真不敢相信，我只是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外国人，而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君王。”

“我听说，今天这里来了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大部分人都介绍我认识了，有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据说美国人非常富有，他们可以买下停泊在这座良港的海岸边整个伟岸的舰队。”

“亲自上阵杀敌，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太老了，不可能再亲赴沙场，杀敌建功了。尽管如此，我的眼睛还是不知疲倦地看着士兵军团和大型军舰通过。”

“从他们的回答中，我大致了解了大部分德国船只的造价。这里有个很大的船坞，德国人打算在国内自己组建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军。我多么希望中国也能组建属于自己的舰队，由真正的炎黄子孙——我们自己的海军官兵驻守海防。但是我们没有海员，只有河里的水兵，他们不知道如何操纵机器。但我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学会的。回国后，我将发展西方工业文明作为己任。我们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有金钱与枪炮。”

“今天，想起来很难过。我看见那么多装备精良的军舰闲置在港口，并没有对海军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如果这些舰艇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定能打败万恶的日本人。”

“一些官员不断给我暗示，请我在不莱梅订购一两艘船。我对站在身边的一位海军司令官说，如果你能把那条船以二百三十万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我，我就乘着它去法国、英国和美国。他夸赞我好眼力，有足够丰富的海军知识。我选中的那艘船，正是德国海军中最为坚固的铁甲旗舰。”

“两天后——我们已经到达了法国。不知为何，我在这里感觉更加舒服，似乎到了家一般。只是胃不太舒服，因为这两天禁不住诱

惑，吃了太多的德国食物。也许是葡萄酒作怪，我喝了太多了。我很喜欢白葡萄酒，哈慈菲尔德伯爵说，他会运送很多桶葡萄酒到天津馈赠给我。”

“我们穿越边境进入法国时，七万五千名法国人正向德国人投降。[41]”

第十一章　出访法国和英国

“LA BELLE FRANCE，他们是这样称呼这个国家的。”在巴黎的第二个晚上，李鸿章总督是这样写道的，“他们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美丽的法兰西’。我的感受的确如此。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许多的形容词，称之为美丽、优雅、快乐的法兰西。的确，这是一块令人欣喜的土地。—路走来，我的心情如此舒畅，从来没有一块土地令我如此欢喜。”



法国人画的李鸿章漫画

“也许，这种想法之中还夹杂着一点爱国情怀，因为我发现，梅斯和巴黎之间的一大片的土地，与广东和江苏之间的十分相似。当然，房屋和篱笆有很大的差异，人与人也截然不同，但是，从火车车窗往外望出去。绵延数英里的风光与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一般可爱。树木、植物和草地，呈现着同样的绿色，偶尔还有其他颜色。如果把房子的风格变一下，或者把它们隐藏来，再有几个同胞站在铁路

沿线，我会很容易相信，这只是距离广州两三百里远的地方，而不是巴黎周边地区。”

“强大的德国军队攻占的就是这个国家。德国军队由普鲁士国王领导。率领作战的是我的朋友——战略大师冯·毛奇和俾斯麦。他们指挥行动起来，有如无声之雷，似可怕的闪电。俾斯麦慷慨大度地请我喝了那么多宫廷啤酒，就是因为他征服并羞辱了拿破仑引以为傲的国家。想起这些事，真是非常地有趣，但是我想，法国人民宁愿忘记它。”

“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早就忘却了，因为他们被我们中国人称作微笑的民族。法国的老百姓与俄国人、德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老百姓好像没有什么热情，他们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晦暗的尊敬与畏惧，以及一种不敢表现出来的无助。德国人有热情，但是那是一种坚硬、实际的热情，或许，他们遵循的是一种讲究实效、科学严谨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会大笑、歌唱、高声讲话，但是不管怎样，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三点都源于啤酒和葡萄酒的刺激，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法国人，就像我说过的那样，非常不同。老百姓的脸上，哪怕是小男孩和小姑娘的脸上，都仿佛洋溢着一种诚挚的喜悦，好像他们早就知道生活里有许多美好的乐趣，他们愿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找出来。”

“今天上午，我短暂参观了法兰西银行。财政部的勒鲁先生把我介绍给法兰西银行的各位董事会成员。我对这个了不起的机构很感兴趣，他们告诉我，欧洲一半的国王和王子都持有这里的股份。我想知道，我是否也能在此贷款上几百万法郎？当时我们都在董事的办公室，出于幽默，我让随行问问他。”

“董事长立刻回答道：‘好啊，中堂，五千万，按您出的条件！’”

“我不禁有点结舌。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他回答说，如果什么时候大清国真的打算贷款，法兰西银行随时恭候。”

“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询问有关法国现有金融体系的问题。我相信它是全世界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完美的金融体系。勒鲁告诉我，如果为了政府用途，必须从金库里取出每一个铜板，那么四十八小时之内，法国所有的分行接到通知，都能按要求准备好所有的银两。”

“听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我感到好奇，这可能是真的吗？”

“我了解到，法国人几乎不知当铺为何物，向他们打听有关当铺的事，把回答问题的人都给逗乐了。因为巴黎的报纸（我猜想，英美的媒体也是一样）广泛地报道了此事，说我本人的大部分财产，都投在中国的当铺生意上。其中一家法国画报，自以为幽默，昨天还给我画了一张漫画。画面中，我长了一只犹太人式的长鼻子，一只手托着西方借贷的标志物。法国的秘密警察部队的警察长沙特弗先生，专门负责我在巴黎的安全。他问我是否诉诸法律，控告这个出版商。我告诉他说不用，因为我也跟所有人一样，都被这张漫画给逗乐了。”

“在西方人的世界里，好像大家都会鄙视小债主或者更确切地说，借出小额钱财的借贷人。因此，当铺老板这种身份在社区中是不受人欢迎的。这种人会遭一般百姓的鄙视，因为他们压榨借款人。”

“他们认为大清国的大部分当铺都归我所有，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了。但是，我确实对在一些省份中设立当铺感兴趣。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恰恰相反，我非常乐于帮助穷苦的百姓，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小额贷款。哪怕他们抵押的是货物、苦力或者仅仅只有一份如期还款的诺言。我知道，表述自己的美德不合礼仪，但是任何一个遭受攻击的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的名声和人品辩护。因此，我要说尽管我从典当生意中获得了相当大的财富，但我并没有收取过多的利息。如果我冷酷无情地对待那些从我的当铺里借钱，却无力偿还的人，今天，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我从未有把自己苦心经营得来的财富用于不良的目的。我既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买官进爵。我宁可用刀子割破自己的脸，也不愿接受买来的官爵和荣誉。”

“我确实把很大款项借给了一些省份，甚至是朝廷。但是当政府债台高筑，欠我很多钱的时候，我的很多荣誉就被剥夺了。多年来，我向遭受水旱灾地区的百姓捐赠了很多钱，这一切都记录并保存在朝廷的功劳簿里。上次，全国发生大饥荒时，我连续四个多月向天津的一千个家庭、直隶其他部分的四千个家庭，以及山东的五百个家庭提供了粮食……”

“他们告诉我，法国几乎不存在贫穷，即便是最穷的人，日复一日，也能攒下一些钱。”

“星期二晚——今晚，共和国总统福尔先生和夫人在总统府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接见了我，大厅里挤满了来自法国和欧洲的各界知名人士。美国公使也在场，他代表克利夫兰总统亲自向我递交了邀请函。依我所见据我所知，我知道我将在美国受到盛情的款待。我焦急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我尤其希望访问纽约和华盛顿，并拜会克利夫兰总统。”

“法国总统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做事细心、为人谨慎。不知道是从哪儿又是怎么学会了一两句中国话，初次见面时，他把那些话重复了至少七八次。福尔夫人相貌普通，不过我听说，她为人很和善。招待会上，很多非常美丽的女士围绕在她身边。她们是公爵夫人、公主、伯爵夫人，以及普通政客和商人的女儿。她们都是那么迷人，很多人都配得上皇后的封号。”

“总有奇怪的事情发生！远处站着一位先生，看起来很面熟。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要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正当我让随从去查清那个人是谁时，那位先生主动走上前来以欧洲的礼仪向我伸出手，要与我相握。‘中堂大人还记得我吗？’——他是用中文问的。他一开口，我就立刻想起来了，他是福禄诺舰长，现在是一位高官。在当年签订《天津条约》时，他是法国的代表。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他，因为他真的很优秀，颇有骑士风度，他是法国的骄傲！我要送他一箱茶叶。”

“午夜，动身去加莱前。——刚才，随行给我读了德皇威廉的来

信。这封信，是通过这里的德国使馆转交的。信中通知我，关于委派一百名军事专家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事宜，已经获得帝国议会的批准。柏林的帝国国防部正在从军队中物色合适的人选。中国将付给他们在国内时领取的等额薪水，并负责他们的一切日常的开销。我希望朝廷不要认为我太浪费。不管怎样，最终还是我的直隶省供给他们薪酬。现在，我们必须拥有先进的军队！”

第二天，穿越英吉利海峡时，李鸿章写道：“我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法国。现在正在前往英国途中，心中有些疑虑。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即将上船时，我读了一份法国报纸，他们说我访问德国时，受到了英国人的嘲弄。那么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是轻率地嘲弄了我一个人，而是嘲弄了一个大国的特使。”

“如果他们对我不好，我将在那里作短暂停留。我不会赖在任何不欢迎我的国家里。”



李鸿章访英

“同一天上午的十点钟左右——刚才的天气很糟糕，我的一些随从病倒了。不过，我仍旧留在甲板上，这样就可以同时看到英国和法国两岸的风景。”

“我刚刚听到一则不可思议的消息。一些富有的法国人，一些杰出的工程师，在政府的支持下，提议在我正在穿越的这片水域的下

方，修建一条隧道。但是我还听说，骄傲自大的英国人不相信这只是一个梦想，他们是不会允许法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挖洞的。啊，这些英国人！他们畏惧所有的人，畏惧所有的事。他们可能仍然想小视我。”

“海面风大浪急，我甚至能听见多佛城堡的礼炮声。我还是要回船舱里，在床上休息几分钟。”

头等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有点晕船。他在乘船去纽约之前，在英国写下最后这段文字，显然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晕船。

“接下来的七八天，我又将过上平静的日子，这个消息令我欣喜万分。然而，我和纽约之间隔着三千英里的海洋。他们说在所有的大洋中，大西洋的脾气最坏。尽管穿越英吉利海峡，航行所需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除我之外，所有人都晕了船（李鸿章把英吉利海峡称作‘英国人的窄海’）。航程近半时，我的胃开始不舒服，但那是德国菜肴和波茨坦啤酒在捣乱，不是轮船晃动的结果。随行的一些人因为晕船而骂起了脏话。但是如果他们像我一样，多次穿行于大清国的海域中，并在海面上下晃动，他们就不会被这个讨厌的英国人的窄海，赶到头等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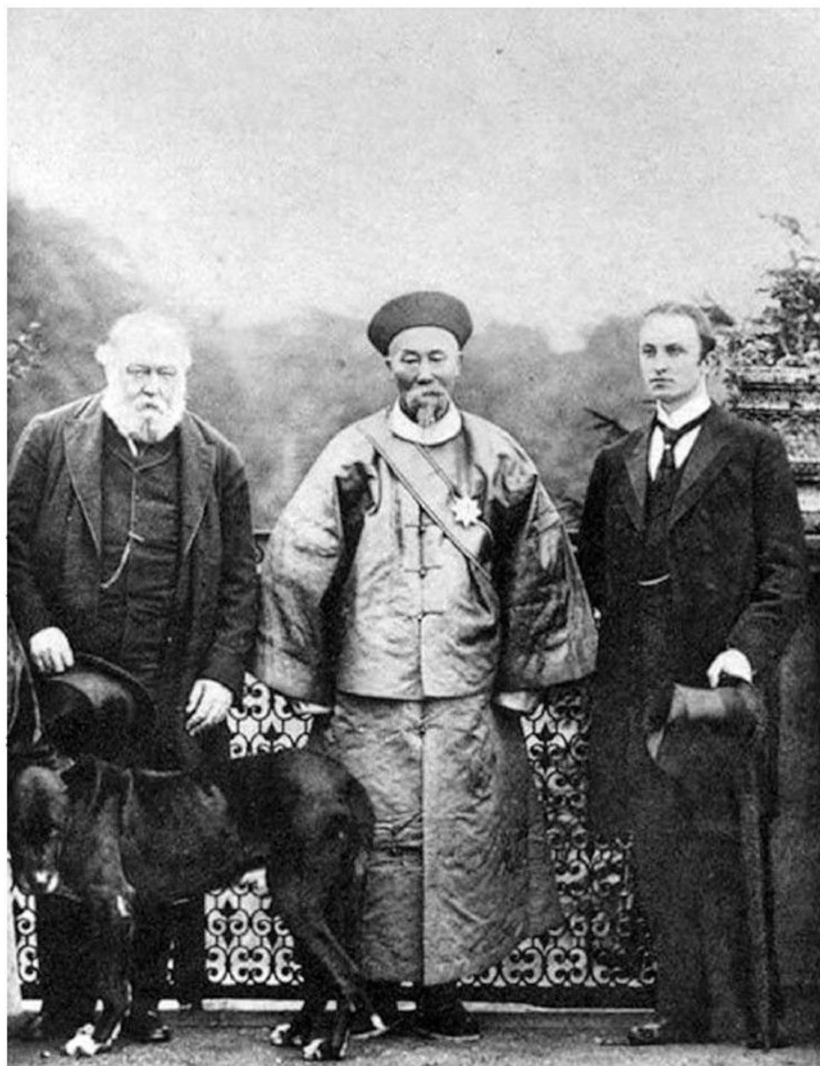
在英国的前四天，李鸿章的行程排得很满，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是如此之忙，忙着应付大事、小事、平民、达官贵人和名人，以至于都没有时间写日记了。”

“哈瓦登，玉皇大帝忌日的第十一天——只有在这里，在活着的最伟大的英国人的家乡，我才可以在多佛下船后，真正地休息一下。自从离开中国后，我从来没有这么美滋滋地休息过一天。因为见到并结识这位‘元老’，就是最好的休息。很高兴能了解他的想法，并能以他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能够在退休之后像他这样，回归家庭生活是对公职人员最高的奖赏。况且全世界都尊重他，英国人民也很爱戴他。如果我不是李鸿章，我可以选择做任何人的话，我想成为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这位大英帝国的‘元老’。此外，所有女人中，我最喜欢的是福禄诺几个女儿中的一个，现在，我喜欢她超过喜欢俄国的皇

后。”

“格莱斯顿先生在宏伟壮丽、绿意盎然的哈瓦登火车站迎接我。我从火车上下来时，一大群英国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高举着帽子、挥舞着手绢迎接我们。随后我们握手时，人群长时间热烈鼓掌，我们两个都光着头。在公共场合出现，头上却没戴任何东西，我记不清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格莱斯顿先生，之所以称他为‘先生’，是因为他拒绝了英国女王授予的最高头衔和爵位。他的样子比我想象的强壮很多。不过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我发觉他已经是一位非常老的老人，脸庞看起来比我老多了。虽然我认为，我们两人只相差八九岁的年龄。”



李鸿章在英国

“他一见面，就立刻向我道歉，说他没能去伦敦与我见面。但是他又说，如他真的做这次旅行，他很可能会病上一两个星期。两天前，我还在温莎城堡时，他给我发过一封电报，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于是我决定去哈瓦登拜会他，尽管为此，我冒犯了很多接待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几位再三邀请我去家里做客的上议院议员。”

李鸿章在第二天就列了一份名单，名单中注明了可能被他冒犯的人。因为他不顾很多要人的盛情邀请，“由着自己的意愿”去哈瓦登看望格莱斯顿。

“那些人能给我什么呢？”他问道，“面包、葡萄酒和音乐会？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一个都没听说过。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呢？英国让我感兴趣的是，统治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还有英国王子、格莱斯顿先生、莫莱先生、丁尼森爵士，当然还有国会大厦和轮船。”

他在哈瓦登的讲述仍在继续，他写道：“我和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庄园里长时间地散步，陪同我们的，只有我的随行翻译和布鲁斯（格莱斯顿的翻译和秘书）。我们没有特别地谈论国事，而是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我很惊讶，他竟然如此了解我的生活。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时，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谈了女王、印度事务，以及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我确信，他希望在死之前，能看到那个不幸的国家被管理得更好。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英格兰，他说，英国却把最坏的东西回报给他们。”

“他把一些树桩指给我看，说八年以来，他就是通过练习伐木来维持健康的体魄和发达的肌肉的。听他这么说，我非常开心。我告诉他，我想看他展示一下。于是他拾起伐木工具，在一棵树上留下了几个大伤痕。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李中堂，您砍倒过树吗？”

“我告诉他，小时候砍过很多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放弃了很多儿时的习惯，包括砍树。但是他想让我试试，我照办了。然而，令人尴尬的是，那个工具的手柄挂住了袖口，我差一点砍伤了自己。”

“火车上，酉时——我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庄园睡了两个时辰，期间，他也睡觉了。”

“再次见面时，桌上已经摆好了简单可口的午餐。上好的乌龙茶，一些中国点心和凉拌鸡肉。这次只有我和格莱斯顿先生用餐。饭

后，在告别之前，我们坐在了一起，还拍了照片。尽管我愿意用任何价格购买那些照片，但是我没有得到一张作为留念。不过，我听说，第二天早上伦敦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张照片。”

接下来的两天里，日记只作了简短的评论。伦敦市长为李鸿章举行了晚宴，他参观了伦敦塔和国会大厦，最后还坐着马车转了一圈伦敦的贫民区。有关于最后一天，他还提及了这件事：

“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向我们展示了帝国最美丽繁华的一面。我见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财富、教堂、公园和漂亮的大街。我也见过柏林的宏伟和壮大，德国人在埃森、不莱梅、慕尼黑和其他城市举办过精彩的活动。尽管如此，每到一处，我始终关注平民的真实处境。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眼前所见的一切不都是阳光和美好。”

“英国也是如此，我受邀到女王陛下的城堡用餐。政要们带着我参观了国会大厦、防御要塞和兵工厂。我看到伦敦漂亮的公园和壮观的大道。然而，我也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穷人。即便这次旅行的时间很短暂，我还是学会了如何通过穿着来区分社会等级。”

“恐怕，接待我的人不是很高兴，因为我渴望，并要求他们带我去看最贫穷的街道。‘我们中国有穷人，几百万的穷人，衣衫褴褛的场面，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是我见到了这么多壮丽的景象，如果你们不满足我的愿望，恐怕以我现在的心境，无法真正了解英国的生活。’我是这么对他们讲的。最后，他们选了几个相对贫穷的角落，带我匆匆地看了一眼。”

李鸿章给英法使臣郭嵩焘的信

“现在，我不能讲出所有见到的，也无法说出全部的印象，但是我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陆军和舰队，但在它雄伟壮观的外表下，隐藏了太多苦难。不只是中国拥有衣衫褴褛和饥饿，英国也如是。如果一个中国人肚子饿了、嗓子干了，他大声嚷嚷。但是在外国，这些饥饿的人会偷窃他们的邻居，或闯入别人家里打劫。在这短短的、但大开眼界的几个星期里，我已经明白，他们准备着，用炸弹或者刀子与政府进行无声的对抗。他们把自己的无助处境责怪政府。我越是看到并了解欧洲的穷苦人，就越对处境悲惨的中国穷人心生怜悯。因为相比之下，中国的穷苦百姓没有什么可怕，他们很善良，很少怨言。我要给全体中国人鞠上一躬。上至太后老佛爷，下至广东海边的普通渔夫。”

“船上，准备起航去纽约——再见吧，沙皇和皇后，再见，俄罗斯；再见，德意志皇帝、俾斯麦以及我的朋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再见，快乐优雅美丽的法兰西；再见，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的元老格莱斯顿先生！”

“我要去格兰特的老家了。”

第十二章　穿越大西洋抵达纽约

出使俄皇加冕典礼的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又一次地被“肠胃紊乱”所困扰，就如他在跨越英吉利海峡时所说的，也许是吃了太多的德国菜肴，也许是因为喝了俾斯麦的宫廷啤酒。从他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此症状以来，一直到他在利物浦登上冠达邮轮后，都是这一套说辞。

“在疯狂海上航行的第三天，吃晚饭后，我想，如果再去德国，我再也不会和德皇、俾斯麦或者任何的显贵吃饭了。除非他们同意我自己准备菜肴，因为我发现很多年以来，我的胃从没有出现这样的不舒服症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病得这么厉害。船上的医生格雷先生说我晕船了，我毫不犹豫地立即跟他说，这个诊断简直是荒唐透顶，一点也不科学。我随行的医生也不同意格雷医生的说法，我更相信我们的中医了。”



欧美报纸关于李鸿章的报道

“船长很照顾我，经常过来嘘寒问暖。其实，我不希望他这么做。因为如果有人体会了我这三天来的感受，他肯定最大的愿望是想

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

“随行医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的易怒。我手艺超群的厨师说，他也没有遇过做出来的食物没法取悦我的情况。可怜的家伙，他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似的，在船上晃来晃去。我知道，他并不比我舒服多少。他这是在晕船，因为他可以吃下所有的食物，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吃完后没有任何反应。他不像我，胃犯病。”

“今天的阳光温暖明亮，我开始享受海上湿润的空气。他们告诉我，过了今晚，我们距离美国还只有一半的路程。他们还告诉我，靠近美国的那一半航程，这个发狂的海洋会平静一些。”

“出海的第三天——如果船上的这些人能够代表美国大众，那么我相信，美利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这些人像法国人一样懂得礼貌，而不像伦敦人那样盯着人看。我不喜欢英国首都的民众，他们外表粗俗，行为鲁莽，有些底层社会的人甚至像辱骂我。幸好有警察时刻警惕着，有好几次不惜动用警棍教训那些恶徒，把秩序维持得很是井然有序。”

“除了三等舱的乘客和船员，我觉得这条船上的所有人，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被带到了我的面前，并被介绍给了我。据说，船上有几位优雅的老先生非常有钱。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介绍给我其中的一位，说他拥有很多条铁路。我跟他聊得很愉快。后来他把妻子和女儿也叫过来了。他们的女儿是船上的美人，配得上宫里的王子。我让翻译把这句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世间最甜美的回答：如果我是国王，她很愿意这么做。”

“我想，这是我所听过的最高赞美。我要送给马文小姐一辈子享用不完的绫罗绸缎。她则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扇子。她说这是在意大利买的。这个礼物很贵重，我告诉她我不能接受。但是她坚持让我收下，我亲吻了她的手。之前，我从未吻过任何陌生外国女士的手。但是，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加冕典礼结束后，俄国皇后立即向我伸出手，她是在期待我吻她的手。但是由于无知和兴奋，那时，我没有那么做，而是把珍贵的玉戒指放

在她的手上，那是太后送给她的礼物。”

“我永远不会忘记沙皇和皇后脸上的尴尬神情，不过皇后那张苍白的脸上随即露出欣喜的神色。她定睛瞧了一眼那枚珍贵的戒指，而后欢喜地再次伸出手，戒指已经戴在她的手上了。我有些激动，双手捧住那只手，跪在地毯上。我想，一个人只要睁着眼睛，每天都会学到点什么东西。孔子也说过，学了一千年，只是为了储备知识，能立身于先贤之中。”

“基督教的节日（礼拜日）——今天牙痛，痛的不是那些假牙。下次再去上海时，我一定要把最后那几颗病牙拔掉。明天我们就到纽约了，我感觉自己比格莱斯顿年轻三十岁。”

“夜间，酉正——我要早点休息，明天黎明我们就到纽约港了。我要在美国生活两三个星期，对此我充满担忧。我希望尽量缩短停留的时间。我只想拜会克利夫兰总统，并为格兰特将军扫墓。”

依据日记，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李鸿章才提笔记述旅行见闻。这是他在费城的贝尔维尤饭店写下的：

“我怎样才能把过去六天发生的事情全部记录下来呢？自从下了邮轮，在纽约上岸，感觉好像过去了一年或者更多。我的疲倦之情几乎难以言表。”

“美利坚民族给予我的款待令我骄傲，我知道这在大清国，也是无与伦比的礼遇了。”

“这个难道不奇怪吗？许多年来，中国人被这个富庶的国家一直拒之门外。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也不是因为得了麻风病，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中国。同样的人，如果出生在日本、朝鲜、印度或者英国，就会得到美国的移民允许。然而，我同样出生在中国，这些美国人把我当帝王一样尊重厚待。我倒要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导致中美关系的变化。”

“我已经见了不少美国的新闻记者。他们很优秀，而且是无处不

在。我和他们聊得很开心，我猜，他们也喜欢和我聊天。我希望他们也有同感。因为他们告诉我的趣事，要比我之前听到的都要多。他们是一群快活的人，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我想，即使是最强大的敌人，也会开怀大笑，令他们丧失戒备之心，也不愿意开枪攻击这些机灵的小伙子。”



“当邮轮驶入纽约湾时——（之前，我们才真正将疯狂的大西洋抛在身后）——有很多的船只迎接我们。烟囱里冒着浓烟，我们看到白色的蒸汽，听到汽笛的长鸣。最前面的是两三艘漂亮的汽艇。它们朝我们邮轮开过来，要撞翻我们的架势。我想，这是一首官船。于是，我走到船舷边，张望迎面而来的汽船。”

美国漫画中的李鸿章

“这些先到的船上没有女士，我想当然地以为船上坐的一定是重要的官员。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这是美国媒体的船。在美国，媒体无所不能。我们的大船慢下来。许多人登上船，这是一群穿着整洁，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就像在外务部工作的年轻外交官的秘书。”

“起初，我对他们的随意感到困惑。他们既没有鞠躬，也没有畏手畏脚，而是径直向我走来，大胆地开始自我介绍，和我们握手。尽管如此，我不可能轻率回答，只是如我刚才所说的，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很快，我就适应了这些可爱的小伙子，带着他们走向甲板的最前端。”

“走到那里后，我说：‘先生们，我是来访问美国，不是来发布消息的。我想了解这里的人和事。因此，随着我们进入港口，请告诉我的秘书，哪些地方值得一看。’他们照办了。见到任何东西，我都会发问。在我们登陆纽约之前，我对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纽约湾的不同水域、岛屿、堡垒。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旅行过的人才能获取的重要信息。”

“从那个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醒着，报界的朋友无时无刻不陪在我身边。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官员们在一起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招待会和会晤现场。哪怕我想就寝了，他们也在饭店等我。吃晚饭之前，他们还在找我。他们非常优秀，且不知疲倦，他们应该能赚很多的钱。我看见他们与总统和州长们亲切交谈，好像这些高官只是一个体面的二等税务员。然而这一切也在告诉我，这个国家的确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记者的行为给我上了一课，我会祝福他

们！”

“我本人也可以称作是记者。很多人会因此怀疑或者奚落我。但是不管怎样，这是真的。尽管我从未出版过报刊，也没当过编辑，但是写作这个职业非常高贵，我很荣幸自己是个文人。年轻时思考未来，我说过，有朝一日，我将成为中国的文坛领袖，高中状元。于是经年累月苦心研读。我的学业优于许多人，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一路走来，一帆风顺。”

“当我告诉一个年轻记者我也是他的同行时，他笑了很长时间。他肯定没有期待我把收集来的所有信息提供给他。他像速射枪一般发问，我看出来了，他是个新手，并为他惋惜。”

“‘李鸿章先生，您说您是记者？’当我表情严肃下来时，他也认真地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我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过很多文章，而且那些文章，所有的编辑都绝对不敢拒绝。’”

“是什么样的文章？他追问。都是写公文，传达朝廷的旨意。我告诉他。”

“显然，这已经够他交差了，因为他在递给我一支雪茄后马上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在一份纽约报纸上读道：‘李鸿章是这样一个作家，如果有谁胆敢动他的文章，他的斧子就会向那个人的身上砍去。’”

“我不会忘记纽约记者对待我的方式。他们不像是德国人那样严肃地对待我的来访，也不像是伦敦和利物浦的报界那样屈尊俯就似的。他们试图弄清楚中国和远东事务的真相，主笔又有点嘲笑我们。但是同时，主编们却把我的来访当成契机，发表了大量有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时评。这些评论的篇幅很长，说得合乎事实与情理。我为此要感谢他们。过去，美国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尽管它极度排斥中国移民，来日我们需要时，它必将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朋友。”

“世界上所有的城市，我认为纽约是最糟糕的。所谓的最糟糕，是因为我李鸿章最不适合待在这里。当然，他们兴建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我的入住。”

“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地方，万一发生地震了，成千上万吨的石头和钢铁会砸到我的头上。现在，我抬头向上看时，头颈和脖子就酸得要命。当我举目向上看，也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向下看我。那些人就像是生活在悬崖峭壁的缝隙里。这些建筑物都比我们最高的宝塔还要高上四倍，如果他们是敌人，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十个人，向我们扔出石块，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们是朋友，千千万万的朋友，他们是朝廷头等钦差大臣及随从的朋友，他们是中国同胞的朋友。我知道是这样的。因为到处都挥舞着旗子，上面绣着龙。美丽的女人和女孩子挥着她们精致的手，为中国欢呼。我和身边的人都很快乐满足。我知道，这些消息将在大清国广泛地传播。”

“同一天，晚些时候——今天晚上，美国政府特别信使将克利夫兰总统的请柬交送到我手上。在纽约时，总统承诺我的克利夫兰夫人的照片也一同送给了我。她还亲笔写上一段祝福：与总统一起将照片送到中国最优秀最尊贵的政治家手里，非常荣幸，同时，恳请阁下务必向太后陛下转达最高的敬意。写得虽然很简单，但是令人非常愉悦。”

“据说，在华盛顿做过第一夫人的淑女里面，克利夫兰夫人是最可爱的一位。我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如此令人赏心悦目的面容和身形。我要称她为仁爱的姐妹，优雅之母。作为美利坚的第一夫人，她为女性增添了无穷的光彩。她是全世界女性的骄傲，我希望圣明的皇太后可以认识克利夫兰夫人和沙皇皇后。”



李鸿章访美

“面见总统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向我和我方代表团成员表达了最诚挚的敬意，即使是皇室驾临，也不过如此。美国总统竟然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来迎接我，这种非同寻常的礼遇着实令我感动。于是我命人花一千五百两银，向朝廷拍发了一条电报。他还能给我们更高的荣耀吗？不能，除非他授予我国务卿一职。我不能感到有比这个更加光荣的事。”

“除了俾斯麦，我无法将克利夫兰与我认识的任何人作比较。看上去，他和铁血宰相一样身强力壮、意志坚定。但是，他一定没有俾斯麦的暴脾气。有一次，一条狗挡住了俾斯麦的去路，他不仅踢了那条狗一脚，还赏了办事不力的听差一个巴掌。我无法想象克利夫兰总统会做那样的事情，他也不会像俾斯麦那样气得满脸通红。不过，人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我曾经有一个小妾，在娶她进家门之前，她是温顺可爱的化身。我一度甚至以为，她的性情太过温柔，简直世间难寻。可是过了六个星期，她开始叫我受苦，好像我不是主人，而是家里的仆从。我给了她二十个银元宝，把她休掉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纽约记者提的问题。他想知道我有多少个妻子。当我告诉他，我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时，他无礼地问我需要多少。这个问题令我很不快，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因为那样正好合了他的心意。他早知道我不想给出答案。于是，我问他：‘你有多少个妻？’他很快答道：‘零。’好，我说，看来，你也只能应付那个数字的妻子。”

“我和克利夫兰总统谈论过美国和中国的妻子和女人，我发现她们很不同。总统想从中获得启发，我也是。我告诉他，如果他是中国总统，除了可以拥有一个合法的妻子，毫无疑问，在每个省份还可以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妾。听到这里，他开怀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不，不，您想想看，’他继续说，‘一个男人得用管理十六到十八个中国女人的力气，才可以控制一个美国女孩。’”

“我把在纽约参加的所有活动记录下来——晚宴、招待会和演讲。市长把这座城市的钥匙赠送给我。这个仪式，意味着我想去哪里都可以，吃什么买什么随我的便，即便购买绫罗绸锻，也全由这代为付账。但事实上，我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且一个铜板也不能花。我参观了中央公园、法院和监狱。大河流经纽约的周边地区，其中一条河上有一座岛，岛上有一座监狱。”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条河从纽约城中穿过，因为最早的城市只在纽约岛上，而后它的地盘扩展到两三个省或州的面积。”

“这里有一条大河，河面像汉口的江面那么宽，它是这座城市的分界线。船顺流而下，我前去祭拜尊敬的格兰特将军之墓。我剿灭了太平军的长期作乱，而他平定了南方同盟军的反叛。而且，奇怪的是，1863年我和程将军、戈登并肩作战抗击太平军时，格兰特将军正在围攻南方叛军的首都。”

“我纳闷南方同盟军是否真的想打赢，他们如此缺乏判断力，竟将首都设在离旧都很近的地方。那个距离不比上海到南京远。如果军队在首都附近打败仗，他们的政府就必须逃亡，或者落入敌手。而一旦一个政府如兔子般逃跑，或者像豚鼠一样被诱捕，那么，它怎么能

够令追随者肃然起敬。我看过南方同盟军的地图，换成是我，会在德克萨斯某地建都，以后可以迁都。”

“我可不是个动不动就哭的人，可是站在逝去的、崇敬的格兰特将军墓前，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的悲伤和甜蜜的回忆。我很欣慰能站在他神圣的墓地前，告慰他的亡灵。只有在墓前对亡灵说的话，才最算数。当愁肠满腹的朋友来诉说衷肠，灵魂徘徊在那里倾听，并且把他的话带给亡灵。祝愿他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我告诉亡灵以及我杰出的朋友，我从遥远的中国赶来为他扫墓。很多年前，我就见过他的长相。当我为朝廷处理公务，向沙皇、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表示友好时，我心怀敬意和渴望，我想向这个著名的美国指挥官的亡灵诉说衷肠。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如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我不会心满意足地回到中国。我向亡灵焚香献花。我将一本祈祷书放在他的坟头，请求他的亡灵时常想念我，欢迎我来到这片‘洒满阳光和金色时光’的土地。把这些事做完后，我的内心洋溢着无限的祥和与喜悦。正如我为圣洁贤惠的母亲扫墓时，我内心也同样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芳香。”

“我经常想到格兰特将军，身后带着全世界给他的美誉和掌声。如果他来中国，我们会把所有的荣誉和掌声都献给他，我们会向他致以更高的敬意。在他之前或之后，都不会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受到如此的礼遇。”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马关的那个日本无赖企图夺去我的性命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格兰特将军。当时，我正和伊藤博文代表各自的国家商讨和平协议。”

“是的，当我再度感觉那个疯子的子弹燃烧时，我甚至远远地朝格兰特将军和夫人的那两棵树望去，我还对他说了话。”

李鸿章把那两棵树当做人所共知之事：格兰特将军和夫人访问期

间，日本人采用多种方式对他们表示敬意，其中之一就是在马关对面的一个小岛上，栽种了两棵品质优良的树木，并把那片土地辟为圣地。一棵树上挂着将军的铜制画像和简介，另一棵树上则挂着镶有格兰特夫人相片的牌子。据当地文献记载，格兰特将军去世后，那棵献给他的树枯萎了，另一棵则郁郁葱葱。格兰特夫人去世后，那棵树也跟着死了。

第十三章　美利坚见闻

“费城又名‘友爱之城’，同时它也是美国自由文化的摇篮。现在，我想把为数不多的印象记录下来，因为再过几天，我将横穿美国，向太平洋和我深爱的祖国方向，重新踏上旅程。我总是对朝廷心怀崇敬和喜悦，尽管最近我向朝廷发了几封加急电报，我还是很思念中国。我对朝廷一片忠心，急于把环球考察的胜利消息告诉太后和其他人。这就像我夫人总喜欢谈论她头胎孩子的古怪可笑举动一模一样。”

“如果说纽约港是我见过的最嘈杂喧闹、最令人闹心、最摩肩接踵的城市，华盛顿就是最漂亮开明的城市（我毫不怀疑，法国友人肯定不会喜欢我这种说法）；而费城，则是最笑意盎然的城市。”

“当然我说的是人们，因为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可以与纽约的上城区相比。说到建筑和街道的庄严宏伟，它不及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半。”

“费城的人口密度没有纽约大，人们的穿着也没有华盛顿人或者巴黎人讲究。但是，我见过这么多地方的人，费城人的性格最好。人干干净净，长得也很好看。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不是欢呼‘你好’，就是把友好的问候表达出来。”

“这个地方真不愧是友爱之城。但是我想给它一个新的称号‘百万微笑之地’。我把它告诉了市长，他说要把它写下来。我称其为‘百万微笑之地’，是因为这个称号有点诗意，不过很恰当。我已经为自由钟写了两行诗，回国后我再修改一下。”



李鸿章访美时掠影

李鸿章是否修改了他在费城期间为自由钟所作的那几行诗，至今已经无从知晓。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几次提到了自由钟和自己访问费城的经历，可是，在仔细查找他多得数不清的手稿和日记后，我们并有发现任何对最初的那几行诗进行改进和校订的痕迹。

他所指的那首诗，非常符合中国诗歌讲究的韵律美，译成英文的难度极大，我们只能试着跟随作者复杂晦涩的思绪，简单地做一点翻译：

To my eyes they did point out the symbol of Liberty，

And to my ears they did direct the sound.

It was only a sound of dong-dong.

And it came from an instrument of brass made by man.

The bell did not ring to my ears；

I could not hear the voice in my ears；

But in my heart its tones took hold，

And I learned that its brazen tongue

Even in silence told of struggles against wrong.

These good sons of America

Call the Liberty Bell ancient；

But I who come from the oldest of the lands，

A stud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ages，

Know that what this bell speaks

Is of Heaven's wisdom，

Millions of centuries before the earth was born.

It repeats the heart words of the gods；

It repeats, only repeats：

But let it do so to the end.

译文：

题自由钟（其一）

新陆奇钟云自由，入耳天籁荡洪流。

岂知两鬓皆不聪，但把贯顶传胸穹。

曾见天佑美利坚，吾知法道承万年。

大好男儿行义勇，诸神不言九重天。

在有关自由钟的优美散文中，李鸿章再次谈到了它的年龄，但是他的行文风格要轻松许多：

“他们向我展示了那口形状优美的老钟，它被放置在独立厅里，名唤‘自由钟’。这口钟的意义在于，只要钟声敲响，所有听到钟声的人就明白他们获得自由了。但是他们再也不去敲它，因为它裂了缝。自由也裂缝了吗？”

“他们告诉我这是一口老钟，于是也叫它‘老自由钟’。于是，我问它有多大年纪，几个官员面面相觑，州长也不知道它的年纪，但是，最后一个目光敏锐的人，看见了一个日期。是在钟的里面，还是在外面看到的，我不太清楚。他说这口钟有一两百岁。”

“啊！才一百多岁或者两百多岁（我忘了到底是哪一个）！在中国，如果有人称一个两百岁的东西为老，我们中国人会笑话他的。它只是个婴儿，还在吃奶呢。我大笑起来，并把这个想法告诉州长。他眨了一下眼，说道：‘是啊，总督，与你们那片值得尊敬的土地相比，所有的国家都是吃奶的婴儿。’听他这么说，我向他鞠了一躬，并表示感谢。我喜欢他的说话方式。”

“费城为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举行，就是保存自由钟的那个建筑物——独立厅。这是一栋小小的建筑，还没有广州的孔庙的一半大，甚至比不上紫禁城的宣仁庙。美国

各州的代表们就是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向英国宣战，并摆脱了英国征收的重税。除了空气和水，英国人几乎向美国人使用的一切征税。所有税种中最可恶的一项，是向中国种植的茶叶所征的税。美国人非常喜欢喝茶，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英国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决定征收茶叶税。后来，美国人把茶叶和税票统统倒入大海[42]。很长时间，他们只喝牛奶、白水和威士忌。战争结束、英国战败之前，美国人有八年时间没有喝茶。如果有人把小种红茶从我手里夺走，我一定会嫉恨他。（小种红茶是一种非常稀罕的茶叶，李鸿章总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沙皇和皇后。只要能弄到这种茶叶，他会始终不变地享用它。）”

“有几次演讲会，是在独立厅举行的，也有人发表了有关独立厅的演讲，我自己也作了简短发言。为我做翻译的人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是中国驻华盛顿使团的一个秘书。我的发言只有几句话，表达了中国对美国的美好祝愿。我还说了几句英文：“I am proud to be welcomed in the land of Washington.（我很荣幸受邀来到华盛顿的国家。）”



李鸿章在美访问

“我至今忘不了费城市长——尊敬的沃里克先生。他是一个快活的人，头戴一顶丝帽，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的微笑与这座城市很匹配。尊敬的市长先生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是我此行听到的最长的演讲之一，他把我弄晕了。他滔滔不绝地演说时，我打起盹儿来。一阵爆笑把我惊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我睁开眼睛，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大笑鼓掌。起初，我以为是讲话人发表了什么幽默机智的言论，所以大家才如此开怀。接着，我发现所有人都在看我，包括尊敬的市长在内。他和所有人一起大笑！我有点尴尬，主讲人一半对着我，一半对着在场的听众说：‘显然，中堂大人不喜欢长篇大论，所以我要长话短说。’翻译把这句话说给我听后，我叫他对尊敬的市长说，我非常喜欢长篇大论，因为我可以趁着他说话多睡一会儿。尊敬的市长把我的话重复给听众，他们大笑欢呼了几分钟。不管怎样，市长很快结束了演讲：乐队开始演奏，宾夕法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开始齐步走。我们上了马车，驶向宽街。”

"'宽街'真是名副其实啊。街道很宽，且长约数英里，是全世界最长的直街。我从市政厅向街道两边望去，这条街仿佛没有尽头。有人告诉我这条街有三十英里长。如果这是真的，这个长度几乎是北京外城墙一倍半。纽约的主要街道是百老汇街[43]。和这个国家其他大街相比，它不仅不宽，反而很窄。我想它和北京的哈德门路差不多宽，但是配上这些建筑，就令我想起了河道深深，堤岸高耸的广东西江。百老汇街是商业文化中心，'商业'被西方人认为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基石。尤其是在美国，什么东西都是'商业'，文学艺术也不例外。在美国，没有人会因为纯粹喜欢写作而写作的。不朽的诗篇、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和英雄故事，如果不事先付钱，作者绝不会让原稿脱手。按照他们的做法，如果一页纸可以付给我一两银子，我写了那么多页，差不多是个百万富翁了。"

正好在这里说明一下，以免读者忘掉前言中的解释。如果可以对李鸿章使用的纸张加以评判的话，李鸿章最喜欢的书写纸非常厚重，且被裁成明信片般大小。但是形状并不完全相同。他把字写得很大，大约是打字体的36号字。他想强调或抒发感慨时，字常常会写得更大，再加上每页纸经常写不过三行字。这两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刚才他说的那番话，没有看起来那么夸张。

"我发现地域荣誉感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尽管伦敦这个城市雾大潮湿，伦敦人还是会告诉你，这是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纽约人会说，纽约以外没什么可看的，这种城市荣誉感引导他们嘲笑费城。当然，聪明的人知道这只是废话，但是愚昧的人信以为真，并传播流言蜚语，仿佛这是神圣的真理。"

"这让我想起在纽约动身前，一个记者对我们说过的话。你们到了费城，不是死掉，就是睡着。我当时没有作答，但是从那以后一直认为纽约比费城更危险。因为在纽约这个地方，忙碌和嘈杂无处不在。"

"这一路上，无论多么疲惫困倦，我从未在公开场合睡着过。这不是很滑稽吗？当费城市长和其他官员在汇合处（在德国城？）迎接

我们时，我很想把纽约记者的话告诉他，但是我又担心冒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脾气到底有多好。后来，他本人告诉我，全美国人都说费城是一个节奏缓慢、昏昏欲睡的地方。于是我明白，那些话根本无法伤害到他的感情。”

“同一天深夜——今晚，我参观了联邦同盟，并在那里享用了一顿中国美食。晚餐里有酒，还有运自广州的茶。这是我自离家后吃到的最香最美的一餐。”

“当时，有许多杰出人物在场。我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我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我现在想提几个人：尊敬的州长，内战时他也是一位将军；沃纳梅克先生，美国的商业巨子；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编辑和作家，包括史密斯先生。”

“第二天上午——今天上午，这个州的州长黑斯廷斯将军来拜访我，与我作别，他还向我介绍了几位年轻的女士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我热情邀请州长访问中国，告诉他，如果他能来中国，可以在我北京的家里安静地住上半年。我保证会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根本不会想回到喧嚣的费城。他对我表示由衷地感谢，说他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的。陪同州长前来的斯图尔特将军问我，是否能让他统领我的省属军队。他说他喜欢打仗。‘如果是这样，将军，’我对他说，‘那么我们可不能要您，寻衅滋事的军队总是会打比他们应该打的更多的仗，会有更大的伤亡。”

“我认为，黑斯廷斯将军是我在所有西方国家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他应该拥有一个王位，至少也是个有领地的公爵。可惜他没有穿军装，因为他天生就是有一个总司令的模样，威严勇武、气度不凡。这位州长站在我身边时，我就没有从前那么高大了，因为我不得不抬着头看他的眼睛。我问他有多高，体重多少，他告诉了我，但是我把这两个数字忘了。不管怎样，我们在联邦同盟时，背靠背站在一起，他比我高好几寸。我们是这个俱乐部里最魁梧的两个人。”

“我喝了几杯可口的美国饮料，它被称作‘鸡尾酒’。我命人查了一下这种饮料是怎么调制的。它的里面放了很多香料和甜味剂，非常符

合我的口味。我想如果不频繁饮用，它应该不会伤害身体。”

“我感觉，今夜可以安稳地入睡了。”

此后的一个星期或者十天的时间，李鸿章又什么也没写。他很少用西方的方法标注日期或地点，而使用中国的方法，又像是在用不同时代的数字记录时间。我们很难确定他接下来的这些文字是在哪儿写的。但是，根据文字的基调推测，应该是在洛矶山山脉西侧：

“坐了三天火车后。——我又回想起俄国的广阔平原和直插云霄的山峰。但是在这里，我不能将二者做类比。因为俄国的荒原和新地在大东部，而美国的西部则伸展着壮阔的荒野和新开发的土地。我一定要表达清楚，不能留下错误的记录，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很多记忆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美利坚合众国的西部地区和大西洋沿岸一样，充满了进取心和商业精神，一切都在迈向现代化。自从离开美国的第一大河——密西西比以后，我们的火车已经行驶了几百英里，据说在五十年前，这个地区还没有一个定居点。”

“这是真的吗？难道自从我当了翰林，就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说，不可能整个国家撒谎。”

“旅行了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我只看见大牧场上有牛群散步，没有一男人、女人或家禽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接着是一个小镇，又一个小镇，再一个小镇，直到火车从一座大城市的郊外急速穿过，开进一个站台。一个让人再次联想起纽约、芝加哥或伦敦的火车站。遍地是高楼，而且是如此之高，如果站在房顶上，成年男子看起来也像个小孩。地震发生的时候，希望上天拯救这个国家。”

“尽管有人向我解释过，我还是不明白，盖这样的房子，似乎高得能挡住云朵的去处。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理解纽约的做法，因为纽约建在一座岛上，商货托运人什么的不想渡河过湾做生意。城市就变得拥挤，土地也很值钱，所以拥有土地的人就把建筑盖到空

中，能盖多高就盖多高，因为天空可以免费使用的。是的，我可以理解纽约那些‘阻挡云彩的大家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西部城市也要这么做。廉价的土地向四方伸展几百英里，为什么非要看看一个地方到底能挤下多少大楼呢？而且，我认为，如果我就此写一本书，并把它赠送给这些城市里的商人，他们不会感谢我多管闲事的。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况且我也不想再见到这些地方了。”

“我不会单纯喜欢一个地方，除非它有什么发自心灵的魅力将我吸引。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因为它本身令我产生感情。如果我想回忆它、梦见它或者写下它，这个地方一定要与某个人或者某个祖先联系在一起。”

“莫斯科作为莫斯科，对我而言毫无意义，但是我在那里目睹了盛大壮观的典礼，见到了俄国皇后，并把圣明的皇太后的礼物——那枚神圣的戒指送给了她，于是这个地方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

“埃森也是如此，我讨厌它的烟雾和高温，但是因为克虏伯先生，我爱埃森；因为大炮，我欣赏埃森。”

“哈瓦登也是—样的，因为格莱斯顿先生。”

“此外还有费城、华盛顿和弗农山。”

“当然还有我的故乡——那里有我们爱的人！有一个美国人写过一首关于赞美甜蜜的家的伟大歌曲。我熟悉那个旋律，因为年轻的时候，听军舰上的乐队演奏过，但是我不知道歌词是什么。然而，歌词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像费城的老自由钟发出的咚咚声，在每个美国国民的心里一样，只要那些人的心不被骄傲、自私或者对利益和权力的贪婪引向别处。”



李鸿章奏请送到美国学习的幼童

在美国的土地上，李鸿章又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点文字。他写这些话是为了忠告他在美国的同胞，要他们切实遵守法律，与周围人和睦共处，积攒钱财，最终回到祖国。

在启航前往中国的前一天，他在旧金山写下了如下几段话：

“今天，我的朋友们带我参观金门湾，这是我第一次从世界的这一边看到辽阔的太平洋。真难以相信它如此辽阔万里。当我登上旧金山海湾入口处的高高悬崖，举目眺望，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神圣的祖国。那些有关我的非议和责难，我一概不予理睬——我的心是中国心。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皇上，我屈膝向他下跪；我也仿佛看到了天津、广东和汉口，这些我曾经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地方。我回到住处后，良久无言，这几个月来我走遍了世界，现在唯一期盼的，就是能亲吻到祖国的土地！”

“回到住地后，我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这几个月来，我见识了世界。现在我想体会亲吻祖国土地的狂喜。”

第十四章　手记中的小故事

“1899年7月10日。——太后召见，幽默地说团练这件事已经如骑虎难下，因为它已经为小刀会所控制。也许太后尚需明白，拳匪类似禽兽和骑师，如若稍加鼓励，它们不仅会吞噬敌人，还会把他们的朋友一并吃光。”

“1869年，南京。——所有的洋人都把中国当成自掘坟墓的黄色尸体。除非吃了洋鬼子的汤药，否则永远不会醒来。这些洋人看待中国时，戴的是同一副有色眼镜。然而，他们相互之间却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比仇恨中国还要仇恨彼此。法国人恨德国人，俄国人残杀犹太人，但是来到中国后，他们都变成了基督徒。”

“1900年，北京。——我们听到的传闻都是无稽之谈：推翻满清朝廷，让一个汉人家庭取代满人执政！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一个普通汉人家庭尊贵到足以和平有序地统治这个国家。”

“（没有日期）。康有为有时是一个爱国的官员，有时只是个爱管闲事的笨蛋，更多时候，他是一个没头脑的蠢驴。”

“1864年8月，苏州。——如果在狂热盲信的同时，太平军还有一些统帅有那么一点统帅军队的才能，他们将直抵北方，攻占北京城。一段时间以来，那个自称天王的人（洪秀全）好像真的打算建立王朝，统一整个中国。但是他在宗教方面只是个冒名顶替者，他是个骗子，绝不是军事指挥家。他确实封了许多骁勇善战的人为王，但是这些人中了他的魔咒，他们筹划行动时，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他的掣肘。”

“1898年12月。——只要有麻烦，就派我出诊，不管是病人死了，还是病入膏肓了。如果那个病人突然痊愈，却没有人表扬我。我得到的永远是责备。无论德国人强占胶州，还是英国人垂涎威海卫，

或者黄河决口，我总是那个随叫随到的郎中。但是我非但没有领到酬金，还会因此被罚款。”

“现在山东这档子事，都归咎我和张汝梅（时任山东巡抚），我们遭到各方的谴责。当然借口是治理黄河时经费处置不当，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和张汝梅极力反对小刀会的活动。我们一致认为，放任小刀会，有百弊无一利。然而，朝廷不赞成抑制。因参与镇压小刀会，张汝梅被革职。他的职位由鲁莽的湖南布政使毓贤和南京的蒙古将军继任。如今，这项任命表明，朝廷同情这些有组织的无赖。他们自称是爱国者和国家的捍卫者。毓贤[44]是所有官员中最愚顽的一个，过去，他曾经纵容屠杀传教士和教民，尤其不会放过罗马天主教会。也许我们的政府乐于看到外国抢占更多大清国的土地。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颇高

1886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及袁世凯：“袁世凯非常勇敢，是一名

出色的战士。1884年，他不惧怕与驻朝的日本人作战。只可惜，没有大批兵力归他指挥。如果他有两个陆军团，我相信那场战争结果将会截然不同。他欣赏德国人，特别是他们的军制。这也很自然，因为他的很多部队是德国人训练出来的。擢升山东巡抚后，他也没有忘记求助他们。”

“1900年10月20日，北京。——今天我和窦纳乐爵士进行了一番长谈。他是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最聪明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我和窦纳乐爵士关系密切，私交甚好。尽管有时，我们在外交事务方面并不是那么彼此欣赏。这些话也同样可以用于欧格讷爵士身上。作为一名外交官，他比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公使都有能力为英国交上更多的朋友。”

“（没有日期）——围攻使馆时，庆亲王命他的满洲军队按兵不动，这对国家来说确实是件好事。今天我见到了他，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他告诉我，七月间，端郡王曾唆使他发动进攻，还丧心病狂地告诉他，一旦把公使和他们的朋友杀得一个也不剩，列强就不敢再向中国派代表了。这是多么愚蠢卑劣的念头！庆亲王知道，就像他说的那么去做，那么列强一定不会放过中国，他们必定会派入一百万的军队进入中国，谋求更大的索赔。庆亲王同时声明，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稳住他的部队。义和团的凶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全都渴望吸食洋人和当地教民的血液。”

“和庆亲王交谈过后，我去了美国公使馆，成功拜会了我的老朋友康格少校。我告诉他我从庆亲王那里得到的消息，但没提到端郡王的阴暗面。他说他知道多亏了庆亲王，那些外国人才可能熬过了八个星期可怕的围攻，也才能活着等来联军的救兵。”

“在文明国家看来，大清国丢了脸，整个国家也遭受耻辱。但是如果庆亲王再软弱一些，向太后、端郡王的命令让步，一方的妥协将成为大清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上被抹去的致命一步。我恨过庆亲王，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他说过那些难听的话，但是我已经真心地原谅了他。他是大清国的救星，我愿意向他鞠上一躬。”

“（没有日期）——我曾经写过，我和洋人按照商业规则多年交道，我已经十分熟悉他们的性情。我发现，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行为都值得尊敬。他们不欺诈，也不说谎。”

“1898年4月。——我不在乎敌人控诉我什么。这辈子我一直站在律法和秩序这边，我从来没有查问过那些机构是白色的还是金黄色的。正派是金，这个道理放之四海皆准。”

“1887年，六月初二。——英国宣称，在处理所有的外交事务时，我常把俄国的利益放在心上。英国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之前它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次犯错。如果看来我是在为俄国的利益工作，那是因为我相信这么做，能为大清国谋得最大利益。正是因为英国外交部，才导致我在与沙皇政府签订《中俄满洲条约》的问题上被朝廷上下痛斥。但是，在我们与日本发生冲突期间及之后，英国拒绝给予我们哪怕是最小的帮助。然而俄国至少在战争结束时，他们让日本明白，中国不是孤立的。”

“（没有日期）——樊国梁[45]主教，如果我是一国之君，我会让你做军队的最高统帅！你是一名高贵的士兵，你拯救了那一队人的性命。我希望你的教派领袖（教皇）能任命你为教会的首脑。”

——李鸿章暗指樊国梁主教和一些法国人、比利时人、德国水兵，以及三千名教民一起并肩作战，英勇保卫了新法国大教堂。尽管当时的教堂日夜遭到袭击，主教还是带领一干人等守住了，并使围困教堂的义和团损失巨大。

“1900年，三月初，广州。——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南方的总督们已经接到命令，准备遣返所有洋人。谁为这道卑鄙的命令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怎么愚蠢到这样的地步！”

“（没有日期）——外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租借我们的土地，我们知道，这些土地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没有日期）——有时，我气恼这些西方‘有识之士’的自命不

凡；有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现在，我经常坐下来放声大笑，直至笑翻饭桌。今天我和一个‘教授’谈话，他从马萨诸塞州大老远地赶来，在新式的大学堂里教课。他告诉我，如果他的书还没运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在工作中会用到十八大卷，’他说，‘这些书涉及科学、艺术、伦理和词典学。’”

“十八卷？我问，‘这些你都需要吗？’”

“哦，是的，它们涵盖了我工作的所有范畴。”

“我不喜欢当着他的面笑，但是我没忍住，笑了出来。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开心。”

“‘我只是想，西方的智慧一定比我们的透彻。’我便直接回答。接着我告诉他，1711年，康熙皇帝亲自编撰了《佩文韵府》，它共有一百五十卷！”

“（没有日期）——如果我们的古代箴言‘惜墨如金’可以挂在各国外交部的墙上，并且挂在显眼的位置上，该有多好啊！”

第十五章　在义和拳危机中的作为

根据李鸿章的日记所记录，当他还是两广总督的时候，已经预见到1900年初，大清国将很快卷入与外国的冲突。他认为在北方活动愈发猖獗的义和团和大刀会，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索。那年二月，他写了这样一则日记：



“这是我第三次奏请朝廷查禁义和团，但是由于朝廷没有针对先前的奏报采取任何行动，去终止暴民集结，我盼望，这次他们能稍稍留意一下我的请愿。我一再努力，尝试了无数次，只是希望朝廷明白：反对所谓的洋鬼子有百害无一利；把他们完全赶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万一洋人撤出，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大清国将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穷弱。”

“在京城的最后几天，我竭尽全力让朝廷了解这些观点的真实性。显然太后心怀同情，荣禄（他是太后身边最有权势、最受器重的心腹）确实是基督徒坚定不移的朋友。但是据我所知，端郡王[46]秘密扶助义和团，而且不择手地劝说太后。如果不加干涉，义和团可能会杀死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端郡王有一群强大的追随者。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太后会相信他所说的话，从而在背地里维护大刀会。”

1900年4月，李鸿章发表了此番言论：“我接到朝廷颁发的上谕，我当然不希望这只是对外做做样子：

‘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若此等人只管己事，不必加以干涉。只怕良莠不分，并以此为托词向当地教民寻衅滋事。切记君王仁心平等，不分地域，因此民众需遵循这种精神，戒除发泄私愤，以致引发衅端，遭受惩罚。特告中堂，嘱咐有关督抚严格管理地方官，必须之时，直言公告，号召所有人莫管闲事，与他人和平相处，切莫置苦心之劝谕于不顾。’”

李鸿章评论道：“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说得完全荒谬。我知道国家会因这些暴民而走向困境。但是，我管辖的省份没有那么多义和团，即使有，他们也不敢露头。”

他写道（据推测，时间是1900年5月）：“朝廷给我发来急电，敦促我剿办我辖地上的不法分子。这下子我被激怒了，这只是在找托词瞎说。这里没有匪乱！将来也没有！”

“最近我和荣禄天天通信，力劝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太后争取到开化者的一边。她现在举棋不定，因为两个心腹的话，她都想相信，糟糕的是，这两个人（荣禄和端郡王）却针锋相对。”

“我为大清国难过。如果骚扰了使团，洋人会持枪提剑杀入中国；甚至，在此之前还算得上是朋友的美国人，也会派陆军和舰队攻打我们。”

“后来（没有日期）。——义和团发出了致命的一击。他们在街头杀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47]。我认识克林德，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德国。现在，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反正苍天有眼，我一次又一次敦促朝廷严惩义和团，直至筋疲力尽！端郡王向来仇视基督徒，这些年积怨更深。他很可能已经说服了朝廷，如果不干涉义和团，他们能剪除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洋人。多么可恶的行为，大清国将为他的愚昧无知付出惨重的代价。”

显然，北方的暴乱让李鸿章坐立不安，但他仍旧心态平静，在广州主持了一场祭拜大典，因为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我行了开耕典礼。我和属下的所有官员，身穿朝服，坐着轿子来到东门边的先农坛，履行了职责。四千七百年前，伟大杰出的神农氏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是他发明了农业，全世界都应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后来，他接着写道：“正如我所料，北方燃起了战火，奸诈的端郡王怂恿朝廷让清军和义和团联手起来铲除洋人。我很心痛，这件事我不想管了。”

接下来，他回到天津，时间大约是八月底：“我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这个我住了很久的老宅，我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当然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既让我公务缠身，又令我忧虑烦恼。尽管难题堆积如山，但是伴随而来的也有不少好处。总而言之，我还是快乐满足的。”

“现在，我的重任，也许是为官生涯中的最后一项重任，就是拯救大清国。皇室暂时逃亡在外，洋人控制了京城。我很高兴许多让这个国家陷入可怕困境的恶徒已经被监禁起来，很快就会受到惩罚。人死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但我很高兴看到某些脑袋被砍下，尤其是那个人的（毫无疑问，李鸿章指的是端郡王）。如果有人做过这等事，他就应该被凌迟处死。我希望这是对他的可恶和多管闲事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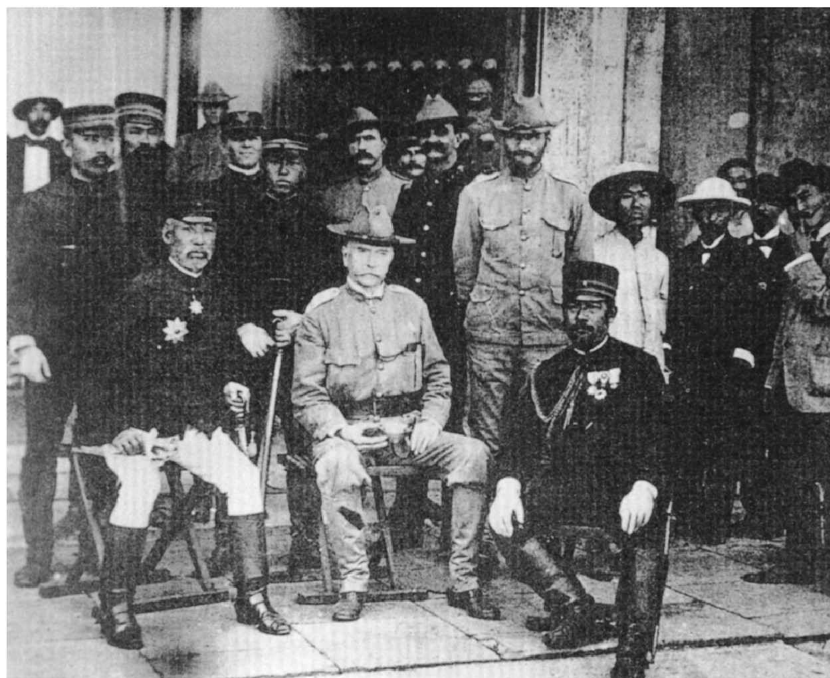
“看起来所有的国家都与我们为敌。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也许会证明，我们可以免于被瓜分的命运。美国人，它也和法国、俄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起行动，但与此同时，美军指挥官和华盛顿政府向我保证，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在道德和实际行动上反对分割中国。”

“我最担心的是德国人和俄国人。德国人，因为他们的公使被杀，每天都向中国派遣部队，并将委派骁勇善战的几位统帅来指挥军队。如果他们在京城集结大规模的陆军，像他们对法国所做的那样索要巨额的赔偿金，不拿到钱就继续待下去，我担心他们将永远都不会再离开我们的国家。俄国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驻扎了精锐部队。如果他们达成协议，那么即便其他列强加在一起，也不一定能让他发慈悲。不过，我的希望，集中在美国的态度上。”

“同一天，晚些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发来的急电让我安下心来。美国政府将知会其他列强，并建议联合索赔，它相信我一定会代表大清国赞同这种做法。外国代表们将把这个建议提交到各自的外交部审批。这正是我想要的。”

“10月12日，北京。有消息来报，毋庸置疑，列强在占领北京后立即决定对中国领土进行分割。但他们如同争抢动物尸体的一群狗，无法在各自应得的份额上达成一致。本来他们决定欧洲国家和日本共同行动，不理睬美国。然而，他们发现这个做法不可行，首先是英国，接着是日本，都变得优柔寡断起来。麻烦在于，日本想要的那部分势力范围，俄国却声称归自己所有。也许趁着恶狼争吵，绵羊可以

溜走。”



占领北京的外国公使

“10月16日，北京。今天，我去了一趟俄国公使馆，与外国公使们会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保存中国领土的完整。美国已经说服其他列强，赞同它的态度。感谢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大清国免于被瓜分。不过，我们要支付巨额赔款，还好，他们把国家留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赔付。日本，作为一个宿敌，表现得相对公正。我相信，东京和华盛顿达成了共识。”

“10月19日，北京，美国公使馆内。今天，我接见了一名美国记者，他采访了我很长时间。我本不该接受他的采访，不过因为两点：他所供职的报纸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在此期间，他们一直支持大清国。其次，他告诉我，他本想在费城的德国城采访我，但是没有成功，这也算是对他的补偿。我请他将大清国和我本人的谢意转达给那些公正的人，那些林肯、格兰特和麦金莱的同胞。”

这一段回忆里所提及的美国记者，正是这本书的编著者——曼尼克思。

第十六章　辛丑剧变

李鸿章的亲洋倾向，为众人所共知。这种倾向，也使他成为顽固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几乎毫无异议的是，北京政府一直是由顽固派所把持，是他们策划了1898年的戊戌政变。皇太后通过这一场政变重掌朝政，将年轻的光绪皇帝囚禁宫中。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希望劝诱李鸿章离开京城。1899年末，慈禧也因此召见李鸿章，并让他自己决定，挑选一个最喜欢的外地，去做个什么官。

12月12日，凌晨两点，李鸿章写道：“秘密觐见太后老佛爷后，返回家中。我内心非常局促不安，因为太后打算让我去遥远的南方，示意那里有事情需要我去处理。我不敢坦率地告诉她，这无非是托词。因为我可以历数北京这些‘老朋友’的罪状，就是这些人，满心想法，巴不得我越早离开越好，妨碍严重的骚乱发生。严重的骚乱！的确，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这回算是顺了他们的意，大家都明白，这种状况，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现在上了年纪，快七十七岁了。或许他们认为我老眼昏花，看不清真正的局势。朝廷知道，总理衙门知道，所有了解我生活的人都知道，此时的我并没有嗜权恋位。没有人比太后更清楚，然而她假装去相信这点，把我派到南方，是对我更大的恩典。”

“不过，我不会再对这个恶毒的决策表示抗议。如果寻求此事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结局只有一个：即便大清王朝不被完全推翻，也会遭到灾难性的破坏，令朝廷蒙羞。我应该最后呼吁一下权臣荣禄、袁世凯，甚至那个鲁莽冲动、惹是生非的端郡王。如果仍没有人听从我的善言，我将再次跪倒在太后面前，恳求她为了她自己，为了她的臣民，而把支持义和团的势力从宫中赶走。不过，我担心端郡王已经说服她了。她确信，所有的洋人都将被强大的义和团赶回到海里。如果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人，能见识一下我所见过那些陆军和海军，欧

洲和美国的强大经济、军事力量，他们就不会再像天真的孩子那样做大梦了！”

在自己的日记中，李鸿章没有透露他是否真的向这些紫禁城里的强权人物发出过最后的呼吁，从而避免他所预见的复杂局面。官方史料中也没有记载他曾经就此事上奏朝廷。然而，他的日记中，多次简短地提及即将动身去南方的事。最后一次，他这样写道：

“即将调离大祸临头的京城，我和许多朋友告别。冥冥之中，仿佛有人告诉我，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既然将选择权交在我手上，我宁愿选择去做两广总督。”

“1900年3月2日，广东，在我的老宅——故友伍廷芳[48]写来一封信，感情之真挚，我多年未曾见过。他的信中，充满了智慧和高度的爱国精神。我要把它抄写几份，尽快寄给北方的督抚们，希望他们能够领会伍博士洞察明理的话语。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公使，对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以及美国主张的总体趋势了如指掌。顽固的端郡王他们最好听从他的劝告。”

“3月17日。——樊国梁主教写信说，京城里所有开明的朋友，都认为我的离开是一个错误。我同意他的看法。但这只是我一生中在别人挟持下犯的许多错误中的一个。”

“3月26日。——我很懊悔，在1895年和日本签订和平协议时，没有同意割让山东省和其他租借地。因为如果这样，中国就除掉了一个祸患。这个地方狂热的义和团，就像谷物船上的老鼠一般猖狂肆虐。毓贤，作为一个满人，朝廷所谓的朋友，却将刀剑交予义和团，助长他们内心的残暴。要是让我说，就凭这个巡抚到目前为止扮演的卑鄙角色，就该被革职查办，现在荣禄也会这么认为。我很清楚毓贤的愚昧无知和咄咄逼人，他连给我抬轿子都不配。”

“3月27日。——从北方地区发来的报告，义和团四处滋事，烧杀抢掠。保定府、天津和许多小县城均遭到威胁，京城也在担惊受怕。我无能为力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尽量少写多睡。自从来到这儿，我已

经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我已老迈，现在离我安息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3月29日。——荣禄来电说，老佛爷对义和团网开一面，但是她不会把政府的军队交给他们。我只相信前半部分的内容。”

“4月5日。——袁世凯这样的人，也听凭义和团为非作歹。这实在令人遗憾。据我所知，他就是这么做的。他经验丰富，在朝鲜时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而且他一直以一个爱国者自居。”

“但是，时事的喧哗似乎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应该知道，洋人，哪怕只是德国人，只要他们突发奇想并下定决心，也能毁灭整个大清国。他没有给我回信，所以我也不必白费力气再和他讲话了。荣禄则不同，他总是回信答复我，尽管他常常词不达意。我想他意识到，端郡王已经完全操控了太后。他只是在担心，长此下去，自己会失宠。”

“4月5日。——现在，当局应该未雨绸缪，别再火上浇油了。”

“4月7日。——我给康格少校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最好告知美国政府，中国即将要发生的暴乱，然后携带家眷赶快离开北京。我非常敬佩这名优秀的外交官，他是一位最可敬的民族最可敬的代表。”

“4月16日。——毕竟，除了家人和故友之外，太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么说，是因为接到各方的报告。所谓的义和团肆行无忌，屠杀洋人和教民，抢夺他们的财物，背后都有太后暗中支持。如果我在北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一声不吭。这也意味着，端郡王将会千方百计地要除掉我。少活一两年并无大碍，但不论结果如何，我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证明自己是忠心爱国的。就像三十四年前那样，与企图推翻大清王朝的太平军展开艰苦、漫长的斗争，我要平息义和拳的叛乱。我也深知，国家更大的敌人，并不是太平军，而是那些阿谀奉承、身披华服的权贵们。此刻，他们身处宫殿，沉浸在太后老佛爷的笑容和信任里。”

“在京城时，我没有用这种方式写，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向有权利听到这些想法的人清楚地讲过：如果忘记我的忠告（现如今它们已经被弃如敝履），那么，过不了几个月，它就会再次被人想起。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心中将不可避免地充满苦涩和懊悔。”

“然而，我必须停下来，我的手在颤抖，像一个发烧的病人；我的眼睛如同一具干尸的眼睛，仿佛涂了一层浊漆的玻璃，因为我每天睡不上两个时辰。家里人都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同时扮演暴君和蠢蛋。是啊，我二者皆是。但是将来，我会努力全面改善自己。但是我希望和祈求，将义和团打入十八层地狱！”

“6月10日。——我最担忧的消息从北方传来了。我收到电报，电报中说，进入北京城的义和团，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毁坏外国人的房产。估计，我租给外国商社的那几间房子也很难幸免。反正我不在乎。只可惜，城里有很多英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买卖场所，都要被毁了。”

“6月14日。——野蛮的义和团杀死了日本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即将要和日本人开战。派别人去当议和大臣吧，我已经受够了赔礼道歉，干站在那里任人谴责辱骂。”

“6月15日。——端郡王肯定掌管了京城的事务，引领朝廷走向必然的毁灭。他应该羞愧地藏起自己的头。他的脑袋里塞满了仇恨的污泥，没有一点真正的理性。如果在北京，我一定会谴责他，他是大清国历史上的头号敌人。我这么说，可能会被斩首，但是对着这个傲慢、愚蠢、无知的端郡王讲出真心话，会给我带来满足感，掉脑袋也值得。”

“午夜。——我的夫人说，民族的忧患快把我折磨疯了。可是她说错了，她这人，经常说错话。如果国家没什么事麻烦我，我才会发疯。半个世纪以来，我正常的精神状态就是一直这样焦虑不安。也许为义和团操心劳碌，是件好事，这样我的精神在正常状态。”

“6月22日。——我接到一封电报，说他们竟然无耻地杀害了德国公使。这些国家的异端分子，以地狱和炼狱的名义，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称呼自己的首领为玉皇大帝，向他献祭，但是我希望玉皇大帝能猛击而扭曲他们的头颅。”

“现在，不止和日本，还要和德意志帝国开战。义和团的行为太过分了，他们已经把朝廷卷了进来，朝廷要在这件事上对列强们负责。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将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并把手伸向大清朝的脖子，这就像农夫抓住围栏中鹅的脖子一样。”

“所有的警告都是徒劳的。我说什么都没用，大清朝难逃此劫。我看清了事件的走势，但在最无助的时刻，我无法预见公使馆里的各国外交官们是否安全。端郡王也许会说，这些暴行非清军所为。据我得到的消息，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在外国人眼中，这绝不可能为朝廷开脱罪责。日本人一定会心中窃喜，因为他们死了公使馆里的一等秘书。为了这个借口，他们等了很久。自从不该得的战争果实被大清国拿走后，他们的胸中就一直燃烧着懊丧和失望。杀了德国的公使，只认个错是不行的！如果两个传教士丧命，就可以让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胶州，那么克林德男爵死了，他们又会要求什么呢？疯狂的一切，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不认识那个日本官员，但是克林德男爵是在北京最后与我道别的人之一。那时，他愉快地和我谈起四年前我们在德国的会面。当时，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客人。而现在，我的同胞在京城的大街上杀死了他！现在德国人会怎么评价大清国——这个我曾经那么骄傲地谈论、那么郑重其事地尽力代表过的国家？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会认为中国人是一群野蛮人。既然我们不遵守最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也就不配得到最基本的国际礼遇。”

“我病了。”

“6月23曰。——尽管身体不适，我还是向端郡王、荣禄和袁世凯发去急电，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让大清国免于被洋人瓜分的境地，就必须动用全部兵力对抗义和团。我还给庆亲王发了一封长电。虽然

自从甲午战争后，他并不是很欣赏我，但他是一个坚韧、理性的爱国者。而且他也看到大清国很可能跌入可怕的深渊。”

“6月24日。——我病了，身体很虚弱。从京城捎来的信中，有一封发给媒体的电报，上面说，义和团已经完全控制了京城，但庆亲王拒绝加入他们的队伍。如果他愿意让他的满人军队抗击义和团，他将挽救时局。”

“6月25日。——有一个来自京城的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总理衙门已经向各国发出照会，自大沽口炮台开火起，双方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政府已经毫无疑问地走向了毁灭。朝廷在政治上疯狂愚蠢到如此地步，简直难以置信。”

“6月29日。——今天，我收到一份以皇上的名义颁布的通电全国的诏书。我知道这份诏书是太后授意而写的：‘我朝开国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闱，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此为日军所绘制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宣传画

“7月12日。——我在床上躺了九天，很少能入睡，也没怎么吃东西。惊闻坊间的传闻，我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有几个原因。不管怎样，也不管是否在衙门里办公，我应该留在原地不动。十五年前的那番话似乎又在耳边响起（李鸿章指的是他作为特使动身去和日本议和之前，庆亲王发表的评论）：‘是他惹的麻烦，现在该让他终止这次祸端了。’”

“7月13日。——一个广东当地的媒体发表文章，证实了我重新调任直隶总督的传闻。可由于身体不适，无法去北方赴任。就这么决定了。”

“7月14日。——全家人哭哭啼啼，因为今天的报纸已经确认了任命的传闻。”

“7月17口。——今早接到太后的电报，这个事实令人哑然无语。她命我立即北上，说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急需我出面。是啊，永远都是急需！几个月前，我在北京时，他们不急需我。如果当时他们能

问问我有什么忠告，我会积极地献言献策。但是他们不让我说，既然违背圣旨，最好保持缄默。我决定不去，即使因此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刚给太后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承蒙太后老人家的信任，不胜感激之至。鸿章唯念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在直隶总督任上，成功地建立起一套新型的管理机制，如今却毁于一旦。以臣现在的身心状况，恐怕不足以担此重任。如今情势危急，尚需比臣更得力的人选。”

“后来。——我又通过袁世凯给太后老佛爷发去另一封电报，问是否有可能把外国公使们从北京安全地护送到天津。我还对他说，他可以告知太后，一旦健康状况允许，我就立刻北上。”

“7月22日，上海。——看来，我只能服从朝廷的指令，为了一个我根本不同情的一帮人的杀戮行为，而向洋人们鞠躬作揖、赔礼道歉。我想我已厌倦这一切，但是事实好像是我必须要面对这些从来没遇到过的难题和复杂局面。一想到所有这些凭空而来的麻烦，以及他们曾对我真诚无私的劝告那么不屑一顾，我就提不起什么精神处理这个困境。”

“7月23日，上海。——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太后老佛爷的电报：‘李鸿章必须服从先前的谕令，不许有任何疑义，迅速北上，不容多虑。形势危急，不得借故推脱。’”

“7月23曰，午夜。——刚刚写完给朝廷的奏折，明天一大早就得发加急信件给袁世凯。尽管篇幅很长，我还是抄写了一份，如果不能载入档案，至少我的子孙可以知晓我的想法。”

“应需牢记，中国与外来的夷狄之人，自远古时起，就频繁交战。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在弄清敌我力量对比之后再做决定。自道光中期起，洋人逐步向我国边境施压，如今我们确实被逼到了绝境。1860年，他们入侵京城，焚毁了清漪园。皇上被迫出逃，并因此而病故。皇上的后裔自然渴望复仇，臣民们也应该继续抱

着不变的复仇渴望。自那时起，法国陆续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安南，整个藩属国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日本与我们对抗，将我们赶出朝鲜。更大的灾难和领土损失接连发生：德国占领了胶州；接着，俄国吞并了旅顺港和大连湾；英国索要威海卫和九龙，同时要求在上海扩大租界范围，在内陆开放新的通商口岸；法国也针对广州湾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面对反复的侵略行为，我们痛心不已，怎么能保持沉默呢？不试图巩固、改进国防的人，是怯懦的，不盼望着清算仇恨那一天的人，是无耻的。我本人享受朝廷的恩宠，国家对我抱有很大期望。如果大清国开始打光荣的胜仗，我自然满怀欣喜。如果亲见这些野蛮的国家最终被我们降伏、唯命是从地纷纷向朝廷致敬，也是我有生之年的乐事。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意识到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大清国无法与任何一个列强匹敌，我们的国力暗弱，无法承担此巨任。鉴于影响到国土完整的问题，谁又会愚蠢到向价值连城的瓷器旁的老鼠开枪呢？不用求神打卦，我们也能明白，鸡蛋比石头易碎。让我们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件，来佐证这个结论：最近以来，数以万计的义和团和绿营兵联合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然而，抵抗他们的仅仅只有两三千洋人士兵。经过十天交战，只有一两百名士兵负伤。同样，北京的使馆里即使没有真正的防御用武器，董福祥[49]部的士兵为了拿下公使馆，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月，却白白损失了几千人。”

“列强联军的舰队，正抓紧向前线大量运兵。最重的大炮，现在也被火速运到了我们的海岸。大清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他们抗衡吗？是否有一个将领有能力抵抗这种入侵呢？如果外国列强派来十万士兵，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北京，到那时，皇上想逃也不可能了。无疑，你们会再次逃往热河，但是这次没有圣宝指挥，谁来阻截追兵？或许，你们会像1895年在马关那样，再召集一次议和议会？但是今天的情形与那次截然不同。当时，伊藤博文愿意与我这个全权大臣会面。遭到义和团背叛，被所有人抛弃的皇上和太后老佛爷，上哪儿去找一个亲王、顾问或者官员向你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呢？你们的财富将毁于一旦。夜里，每每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常常不寒而栗。任何一个有见识的君主，只要看到这些荒唐的、自称有超能力的义和团，肯定早就把他们处死了。汉朝灭亡是因为相信术士和他们所谓预

见未知的能力，史书上不是这样记载的吗？宋朝的毁灭，也不是因为相信披着神奇铠甲的将士有超能力这些荒谬的故事吗？”

“我已经快八十岁了，死亡离我不远了。承蒙皇上恩宠，臣是四朝元老。如果我犹豫不决，不说出内心的想法，怎有脸在阎王殿里面对列祖列宗？因此，我不得不郑重地祈求，并恳求两宫立刻放弃那些可耻的江湖术士，立即将他们处以死刑。”

“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任命一位高官，命他肃清这些可憎的群匪，负责把外国公使们安全护送到联军的总部。天气炎热，我仍然抓紧北上，从广州去到上海，并在那里准时接到了催促进京的谕令。我的身体很虚弱，但不管病得多重，都不能阻止我听从召唤，赴京平难。仔细读过上谕，我的结论是，两宫至今依然还没有采纳理智的政策。你们的头脑仍旧在义和团的掌握之中，把这些义和团当成恭顺的臣民，结果导致骚乱蔓延，全民恐慌。此外，我孤身一人在上海，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即便继续北上，竭尽全力来到宫门前，一路上也将遭遇无数危险。结果很可能只是为乱臣贼子们送去了一具尸体，让他们把我剁成肉酱。所以，我要继续留在这里，想一想有什么办法和途径可以招募部属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我还找机会弄清敌人的计划，并向他们提出有用的外交建议。计划一旦完成，我将尽快北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李鸿章几乎没写什么日记，因为身体的病痛困扰着他。与此同时，他也不愿意继续北上，除非朝廷能保证京城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立即惩办祸首。

“8月2日。——我很担心我的好名声会和那些煽动暴行的人联系在一起。只有太后和她身边的人答应我的要求，我才会北上。”

“8月8日。——一个病人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列强商讨和平协议。我四肢虚弱，几乎无法支撑身体，怎么能抬起头来考虑这等事情？”

李鸿章日记中有关义和团的最后几行话是8月18日在天津写

的："休息了几天，我要继续去北京，想办法让列强们住手。如果我的手不这么乏力，我的事业不比我的手更脆弱该有多好。朝廷躲起来了，人们惊慌失措。我担心眼前的任务太重，体力无法承受。不过，在叫停可能爆发的战争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件事。我要让洋人们再次相信我们，不要推翻大清朝。我要把老佛爷请回宫中，问她是否接受了教训。"



議定條款

大德欽差駐紥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大奧斯馬加欽差駐紥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大比欽差駐紥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大日欽差駐紥中華全權大臣

大美國欽差特辦議和事宜全權大臣

大法欽差駐紥中國京都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大英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大義欽差駐紥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世襲侯爵 薩爾瓦葛

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 小村壽太郎

大和欽差駐紥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克羅伯

大俄欽差全權大臣內廷大夫 格爾思

大清欽命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

會同聲明核定

今日

Protocole final.

Les Plénipotentiaires

d'Allemagne,
Son Excellence M. A.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d'Autriche-Hongrie,
Son Excellence le Baron M. Czikann von Wahlborn;
de Belgique,
Son Excellence M. Joostens;
d'Espagne,
Son Excellence M. B. J. de Cologan;
des États Unis d'Amérique,
Son Excellence M. W. W. Rockhill;
de France,
Son Excellence M. Paul Beau;
de Grande Bretagne,
Son Excellence Sir Ernest Satow;
d'Italie,
Son Excellence le Marquis Salvago Raggi;
du Japon,
Son Excellence M. Jutaro Komura;
des Pays Bas,
Son Excellence M. F. M. Knobel;
de Russie,
Son Excellence M. de Giers;
et de Chine,
Son Altesse Yi Kouang, Prince du premier rang King, Président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Son Excellence Li Hong tchang,

Se sont réunis pour constater
la Chine s'est conformée à

1901年，清政府由李鸿章出面斡旋，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平息事态

这位"大清国元老"确实让中国重获了主权，他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十国代表进行了长期谈判。各方均承认，在七十九岁时，这个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中国诗坛领袖的李鸿章，至少做到了有史以来所有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官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获得了让人景仰的月桂花环。

然而，年迈病重的议和全权大臣没有实现最后的愿望，他没能在宫中再次见到慈禧。尽管她自称"接受了教训"，但是李鸿章已经没有那份荣幸，当面问问她这个问题了。因为太后老佛爷从北京城里仓促出逃十个月后，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此时，李鸿章已病入膏肓，并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北京的寓所——贤良寺。



Un exemplaire sera remis à chacun des Plénipotentiaires étrangers et un exemplaire sera remis aux Plénipotentiaires chinois.

Pékin, le 7 Septembre, 1901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定立

此为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的签字，签字后不久后他就死去

而慈禧返回到京城里，则是在第二年的1月6日。此距李鸿章的离世，整整过去了六十天。

第十七章　赴朝平叛

“1882年3月。——朝廷好像要把朝鲜问题的全副重担放在我肩上，我想我们只能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阻止日本人的企图。[50]我的奏折昭如日月，日本人希望搅乱汉城事务，引发一场危机，此时的朝廷，要么旗帜鲜明地主动维护自身的宗主国地位，要么自此与朝鲜一刀两断，永远不再管理那片土地。”

“1882年，3月17日。——朝廷没有颁发诏书，只是命令我全权负责处理这个隐士王国的事宜。现在，我要为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准备。这个被侵扰的国家总是麻烦不断。几百年来，朝鲜几乎没怎么进过贡，它一直是独立自主的，甚至非常憎恨我们的影响力和既得利益。然而，一旦隐约感觉到危险迫近，不管危险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它就来求我们帮忙。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它，因为我们把朝鲜人当自己人。一直以来，他们和我们一样讨厌日本国。因为日本国总是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无知且自以为是。最初我们教给日本人的东西，他们很快就忘掉了，还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把朝鲜人当劣等人，朝鲜离日本很近，所以他们想当然地把朝鲜看作藩属国。”

“我得知是大院君[51]挑起了内乱，他本该大力支持自己的儿子，以便更有效地避免日本天皇的情报人员策动的阴谋。我必须处理此事，并立即致信大院君李是应[52]，别让他在短时间内，把本来就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驻朝鲜汉城的袁世凯派出特别信使请求我的指示：万一再次发生反日兵变，应当如何处理？然而，上次兵变的具体情况，他还没有汇报给我，我对事件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如果局势变得很危急，我会响应请求，秘密派出一千人增援袁世凯。”

“袁世凯写信说，日本驻朝公使竹添正在积极密谋让人假意攻打

自己的公使馆，另一次骚乱随时可能爆发。袁世凯断言，很多朝鲜国民拿了日本天皇的钱，为日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时刻准备着，只要接到主人的命令，就在日本公使馆闹事，这样就给竹添提供了一个向日本政府投诉的借口。”

“我已经从保定府调派一百二十名亲信，直接归袁世凯调遣，意在搜出那些恶棍。我期望他们能圆满完成任务，尽快凯旋。袁世凯也会因为搜集了全面的信息而得到褒奖。”

“1882年，8月2曰。——汉城传来的消息很令我满意，至少有件很重要的事——不管是死是活，那个我渴望见到的老家伙很快就要成为我的座上宾了。袁世凯派人报，他终于成功摆脱了李昰应这个惹事的包袱，他们正把他押送过来。”

“同一天，晚些时候。——袁世凯的第二封电报到了。他走在大院君一行人之前，比他们先行了至少三十里路。老家伙已经在山海关登陆，正沿着煤渣路疾行。”

“如果这个人不是天生憎恨日本或与日本人有关的一切，我会用他的脑袋装饰衙门口的墙壁。到现在为止，朝廷还不知道捉拿李昰应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但如果知道他不在汉城，肯定都会很高兴。”

“我的卧室（没有日期，但很可能是在几天后写的）。因为压力重重、身陷冲突，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也只好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如果抽不出几个时辰，能抽出一时半会儿也好。那时，他会安静下来，冷静地思考命运对他做了什么，以及将要对他做些什么。通常，在没有公务家事或商务牵绊的短短的几个时辰，我觉得思考是最佳的消遣方式：我会穿越光阴，回到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或者展望未来，在冥冥中搜寻那些命中注定的信息。”

“昨日，从京城返回之后，我身心疲惫，很早就休息了。尽管城里有很多外国人要求拜见我，其中包括美国的海军指挥官怀斯舰长，还有我的商业代理人穆麟德男爵递过话来，说他有急事找我商量——但我已经下达命令，无论如何，谁也不能打扰我。就像我说的那样，

我睡了又睡。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年轻了六七岁。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带着一个好心情接见所有的来访者。”

“在天津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管我的早餐叫‘午餐’。尽管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对此有其他的称呼，比‘迟早餐’或者‘早中饭’之类。反正从早餐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的朋友李昰应，如今，他正被软禁在保定府的监狱里。”

“的确，我不得不嘲笑这个老家伙。过去的这些年，他在汉城搞了不少鬼把戏。他怎么那么铁石心肠，竟然催促我们和日本交战。他不再是大院君，而是一个顺服卑微的囚徒。大部分时间里，他想的是脑袋何时搬家？我不希望这位老人遭受精神折磨，他刚走进衙门时，我就乘机告诉他，不会有什么麻烦降临在他头上，除非他傻到企图回汉城。”

“‘但是我属于汉城，属于朝鲜。’他大声质问我，‘为什么要把我弄到大清国来？’”

“我简要地告诉他，他严重破坏了汉城的稳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认为最好把他带走，送到一个他不能为非作歹的地方。”

“‘但我有皇族血统，’刚把气喘匀，他就高声喊道，‘不管是中堂大人您，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权利绑架我！’”

“一方面很严肃，另一方面又很可笑。我忍不住对曾经的大院君说，历史上这种例子多的是，如果皇室成员不小心谨慎，就很容易误入歧途。听了这句话，老家伙好像平静了很多。如果没有打消他的恐惧，至少也立刻让他安静一些，他轻声问，朝廷想怎么处置他。”

“我安排这个前摄政王在保定府的大狱里待上一段时间。考虑到他先前和现在的处境，我也给予其相应的待遇，避免他再捣乱，因为这家伙的确是个惹麻烦的人。目前我们在朝鲜还有很多矛盾要处理。必须时刻提防敌人，说不定他的朋友们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好朋友李昰应的。但是，他现在要比在朝鲜安全得多。”

“1882年，12月19日。——香港报纸刊登了一则美国的电讯，说美国一些报刊的编辑们认为，我把大院君从汉城带到中国，是骇人听闻的暴行。那些美国报纸把大院君看作美国的伟大朋友，说整个朝鲜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得很开明，因为他在1867年接待了美国的远征军。”

“这显然是谬误，因为朝鲜根本没有接待1867年的美国远征军。要不是我，今天的美国和朝鲜十有八九不会签订协议。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个率领远征军无功而返的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来到天津。我们探讨并分析了向朝鲜新派使团的问题。我们草签了一个协议，后来在汉城大院君和薛斐尔准将才最终达成协议。”

“此外，为了历史的真实记录着想，我要在此强调一下，是我的手下陪同并护送美国海军军官到了济物浦，所有人乘坐的也是我的船，我还写了一封信，强力推荐薛斐尔，并让他把那封信带在身边。那封信是写给李昰应的，我在信中敦促他，如果他在乎和直隶总督的友谊，就让他的政府签署美国海军军官携带的那份文件。那么朝美条约就是这样签订的。现在美国人，因为他是美国的‘朋友’，就把我‘邀请’大院君到中国做客，说成是暴行。”

李鸿章在手稿中还提到了另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以他和薛斐尔准将的协议为蓝本，大院君和他的大臣们，以及代表大不列颠的……（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已经破损，其人的名字也抹去了）在上面签了字。

“1883年，保定府。——今天，我邀请老朋友李昰应吃了两顿饭。因为人身自由轻微受限，他显得有些焦躁。他说如果能活更长时间，一定要允许他回朝鲜，他说这只是为了和家人团聚。我告诉他，朝廷已经决定，他必须留在中国，至少再待上几个月。听了我说的话，他先是很激动，后来又变得很忧伤，最后他宣称，如果处境不改变，他将自杀。我问他是否想多要几个仆人，还是少要几个。他激动地回答：‘少要！少要！把那群该死的人都带走我才高兴呢。’”

“所以说，世上有这样一些人，你提供给他全部的物质需要，他

也不能满足。”

后来，李鸿章在他的日记里写了一句简短的话，而且没有注明日期，他只是评论道：“但愿李是应阁下现在满意了。”

这句话不禁让学者们疑窦丛生，这时，这位前任老国王是曾经向李鸿章威胁的那样自我了断了呢，还是已经获准返回他渴盼已久的汉城了呢？除此之外，李鸿章没有进一步提到强迫朝鲜大院君与自己会面的情形。

“（没有日期）——朝鲜问题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充分强调我们的宗主国地位。我已经把一份涉及朝鲜政治地位的声明寄给袁世凯，让他送交日本公使，再通过他转交给日本政府。我已经将此事原原本本地电奏北京，朝廷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

“日本既没有继承，也没有获取对朝宗主权。我们否认天皇的代表或代表们拥有干涉藩属国内部事务的权利。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不得干预该国的内政和外交。毫无疑问，中国拥有绝对的宗主国地位，日本现在必须清楚中国对此事的坚定立场。”

“我代表朝廷将此份声明交给朝鲜国王，这份声明将张贴在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城墙上，以及纳贡国的各个港口。”

“这是在向自以为是的日本国发起挑战，但是包括俄、英、美在内的许多外国政府驻汉城的代表，都要求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

“从过去五六年的通信，尤其是过去一年来我与列强的公使以及特别代表会面来看，日本人在朝鲜的横行霸道令全世界不悦。我相信，中国拥有对朝鲜的宗主权一事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大国们的道义支持。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们现在要求的部分主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从道义上支持层出不穷地提各种要求的日本。”

“1883年5月。——户部和总理衙门完全同意，我本人也相信面对朝鲜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我任命了穆麟德

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将再次赴朝。他不止一次访问过这个国家，他懂得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人民，最重要的是他在财务方面能力超群，是担当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我在各方寻求更好的结果，相信朝鲜王国的财务状况将在短期内达到至少可信的程度。”

“穆麟德同时担任朝鲜国王的外交顾问，这样可以阻止国王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动。”

长期以来，穆麟德男爵深受李鸿章信任，在被任命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之前，他是李鸿章的幕僚。从李鸿章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钦佩这位德国人的商业才能和正直诚恳，所以才允许他详细了解自己的实业和政治事务。正如上面所说，总督对男爵抱了很大希望，期待他在汉城有所作为，但是在接下来的日记里，也就是在1884年和1885年，李鸿章适度表达了他对穆麟德的失望。这与他在朝鲜首都时个人与官方的行为有关，在此期间，穆麟德秘密与其他政府来往通信，商谈有关隐士王国的事宜，泄了很多的密。当李鸿章最终发现时，他在日记中透露了想要报复的念头。穆麟德好像害怕他的欺诈行为暴露，实际并没有，于是他很快离开了朝鲜，并带走了一笔数额不明的公款。

1885年，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改由赫德爵士[53]兼任。此后多年，这位勤勉能干的赫德爵士一直操控着中国的海关和邮政。

第十八章　割让台湾

李鸿章一度曾认真论及了割让台湾岛给日本的问题，这是他撰写的最长的独立政治手稿中的一篇。这篇手稿的篇幅如此之长，可以印成一本相当厚的宣传册。他用这座岛屿的古代名字“台湾”称呼它。但是在很多地方，他却用诸如“海匪之地”、“蛮荒之岛”来称呼它。[54]

这篇专著很可能写于1897年，因为文中提到了“向朝廷致歉书（主题相同）”。他在这篇专著中引用了刚才说到的内容，指出这是1896年阴历九月送交的。现节录部分内容如下：

“从最初了解国事时起，我就坚定地认为，台湾岛是一个蛮荒之地。此岛上基本没有人肯安顿下来、用心去过农耕生活，即使他害着最严重的麻风病。父亲有一次去海上旅行，回来后他对我说，他看见许多棕色皮肤的海盗被带到岸边，切成碎块。他说，人们把这些碎块抛撒在各处，是为了不让这些凶悍的家伙活过来，再长成一个人。”

“类似的故事给年轻的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当我可以通过事实、报道和常识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做出判断。我知道这个岛如澎湖列岛一样给朝廷献贡，很规律，每七个月献一次，这只是给人们眼里撒沙子，迷惑人们，那些人就可以更好地抢劫掠夺。这就像我的一个仆人给我带来一只鸭子作为礼物，让我觉得他很好，而他的目的却是夺走我漂亮的家禽池塘。”

“此后的几年间，我深入研究了大清朝的这片领土。这片由郑成功收复的领土，一直以来都向朝廷纳贡，朝廷上下笑着受贡，心里很开心。曾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岛上只有个别的海盗出没，不仅骚扰广州的船夫，就连从澳门到上海的船只也不得安宁。时而至今，他们发展到能够大肆劫掠外国船只，将地方总督甚至朝廷一道卷入财务困境和战争边缘。”

“可是，这些问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早在1873年，当英国商人来天津向我诉苦时，我就恳请朝廷要好好管理台湾岛，或者，干脆让英国人来管理这个恶劣的岛屿。”

“这是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向朝廷奏本。这次的启奏，让我差点丢了官位，失了性命。此番被召进京，总理衙门质问我鼓吹送出部分帝国领土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若是送出的土地对整个国家来说是阻碍而不是什么好处，我觉得很好。如果台湾岛不能被卖，我建议作为礼物送给英国。我对总理衙门说，因为英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夺取香港，我们可以对等地把台湾作为礼物送给它。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那番话，实质上打击了朝廷的大国气势。我回到天津，决定不再为分外之事操心费力。我相信，上面的申斥是造成我不能再多管闲事的原因，那些年我兜中无钱、仓里无米，无兵无势。”

“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穷人总是处于劣势。当一个穷人起身讲话时，人们会问：这个家伙是谁，他有什么资格提意见？当得知他身无分文时，人们甚至还能当着他的面朝手心里吐唾沫，并把他的建议投入火中。但是，如果有钱人讲话、写信或者控告，即便他的智商等同于一岁小孩儿，或者他的脊骨弯曲不体面，整个城市的人也会听他讲话，并夸他明智。”

“——一个没有足够兵力或财富武装自己的官员也是如此。他可以通过学识和能力得到这个官位，但是要听还是从官衔更高的人摆布。”

“我们都渴望获得某种官职，哪怕只是村长或者衙门官差，但是官职低的人总是处处受困。所以我们都必须从低处做起，并通过能力和学识获取更高的官职。但是当小官的那些年，尽管我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很多财产，但我心中并不是很快乐。我一度非常憎恨官场，也非常厌倦。可如果没有恩师曾大人的提携，以及在行伍中提升的机会，我可能会转向农业和园艺。”

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是他给了李鸿章第一次成为军事统帅的机会。李鸿章在日记的其他部分也详细地描述过此人。

“我从日本议和回来时，朝廷把先前的奏折摔在我脸上，对此我有点庆幸，因为它完全驳斥了苛评者的言论：他们坚持认为，一方面，我收受了敌人的贿赂，才将台湾岛转交给他们；另一方面，我遭到日本人的威逼恫吓，于是变得胆怯软弱。”

“去年九月，在向两宫写致歉书时，我曾提到割让台湾岛的问题如下：‘二十三年前，我曾向朝廷奏本，或者至少尝试过这么做。奏本中说明了，台湾不过是这块美丽神圣土地上的一块黑斑。不管它被任何人以任何一种方式拿去，都会让国家收益。如果这份本应被重视的重要文件已经被保存起来了，那么，现在完全可以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查到。不能说当时我已经和日本人结成了任何形式的同盟。因为任何时候，我的心中都对日本人充满仇恨。所以，任何人指责我喜欢日本都是无稽之谈。1873年，我因为建议朝廷交割这块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的管辖权而差点丢了官。现在，他们却因为我在马关同意把对朝廷没有价值的台湾岛割让给日本人，而认为我软弱！”

“是啊，伊藤博文在起草条约时，割让台湾岛是主要条款之一。我当即表示，除了这一点，我几乎可以答应任何条件。但是，当我独自一人在另外的屋子里沉思时，尽管身体因为遇刺而虚弱，我几乎还是要手舞足蹈起来。我暗自得意，但是我还是极力请求日方的全权大臣，千万不要让天皇坚持得到那座大岛。伊藤博文同意，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会晤时讨论。休会期间，我很担心他改变主意。不过，谈判双方再次聚首时，日方成员坚持要把台湾岛割让给天皇，我勉强同意了。我方所有的人员完全赞同我，认为让出台湾岛并不吃亏。我也期望朝廷和大臣们能够和我们保持一致意见。”

“我发现，即便用尽全力，也不要渴望总是得到他人的认可。过去的两年，朝野内外都说是我丢掉了中国一个最宝贵的领土。然而，我忍不住要告诉我的所有国人，让他们现在了解，将来回忆，在那次议和会议上，我几乎会愿意把台湾加在天皇的任何要求上。当然，那些要求我们要同意，甚至从我们手中拿走台湾岛，我愿意赔付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朝廷还要这个黑色疮疤干什么？首先，如果台湾真在我们手里有那么大的价值，英法列强早在多年之前，就可以向我们要求得到它了。就如我们失去了很多临海领土一样，我们会在一次一次的武力争端中，早早就失去台湾。但是，西方人或许比朝廷更清楚台湾岛的价值几何，或者说，他们知其毫无价值，所以一直把它留在我们朝廷手中，耗费我们的钱粮和人力去管理它，而所获甚少。许多年前，我就极力主张发展海军，我宁愿自己花上几百万两银子建立一支中国海军，增强我们的海上实力。如果我们是一个海军强国，台湾岛就可以成为一个优良的海军基地。但是作为一块化外之地、一份疆域财产或者一个新的省份，台湾从第一天宣布效忠朝廷开始，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台湾人不是真正的蒙—汉族裔人群，他们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也不同我们站在一起，为此，我们感谢列祖列宗。我相信，在亚洲，在整个世界没有一个种族比台湾人更低级更污秽。在大陆，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罪犯和低等人要处置？”

“这些人不是农夫，不是山里人，也不是猎人。猎人猎杀的动物毛皮可以换来钱财，也可以在寒冬中给人们保暖。他们甚至不适合去做战士，因为他们目无法纪，且不能学会。虽然很多沿海草民会成为很厉害的海盗，但是他们不能在正常的船上当优秀的水手。沿海地区和后面丛林中的人都是割喉人，从嘉庆年间到现在一直如是。”

“他们甚至没有刚才所说的阶层高级，因为鸦片吸食者、捕杀头颅者和污秽的麻风病人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从官方和商业途径（我当北洋通商大臣时）得知，他们很多人都吸食最低等的鸦片，其余不吸食的，只是因为无力承担或者没有途径得到那些最肮脏最邪恶的鸦片，而不得不戒食。英国人已经把鸦片施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五十年了。如果周围沿海港口没有鸦片，如果我们的商船没有被迫押运这些邪恶的东西，台湾岛的居民就不会吸食鸦片，也就不会让自己在社会道德等级中变得如此低级。”



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

“我很清楚，朝廷的一些官员对台湾岛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些人把在台湾修筑铁路，看作是真正的工业和金融进步的开端。但是我本人和刘铭传[55]就兴建铁路和其他工业项目讨论过几次。刘铭传曾经非常热衷此事，但他后来改变了初衷，他曾经找过我，说他已经对在台湾投资失去了信心，希望我为内陆的矿产开采提供资金。这与他之前对台湾十分中意的言论相差甚远。事实上，我个人已经在打狗（高雄）和台南进行过小规模投资，但我不期待着它们会比对日本的政治投资有更大的收益。”

“如果中国西部没有几亿英亩的土地，没有在蒙古几百万土地，江苏和山西几百万，甚至在远西和西藏地区没有未透露过的几百万英亩土地，了无人烟，我们或许会被这座大岛吸引，试着重建它。但是有那么广阔的土地无人居住，无人耕种，我们要一片野林的台湾干什么？那里满是个人头者和吸大烟的人！”

“自大明朝的嘉靖皇帝以来，台湾岛就问题层出不穷。为打击周边海盗，国家支出了巨额经费。大明朝的国姓爷郑成功，是一个曾经

为中国带来荣耀和财富的台湾人。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国姓爷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把荷兰人赶出了台湾岛！”

“我的敌人会说，我写这篇文章无非是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的名声辩解。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是这样，但在更大的意义上并非如此，因为这篇文字主要是为了向我的同胞们做个说明：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人并没有损失太大。相反，却由此可以受益。当我们的每一寸领土都值得我们守护的时候，面对西方人，我们从来没有全力以赴自己的财产。后来，面对着日本人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得了日本人，我们只能作出计算，用最少的损失来保障自己的国际关系。英国人永久地获得了香港，但他们却不谋求地盘更大的台湾，因为他们深知，即使得到台湾，也不会变得更强大。为了朝廷的东方水域里列强们能够势均力敌，我更乐意让日本人窃据台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受台湾所牵制，或者倾力经营台湾，否则，他们将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泛滥成灾、无孔不入。但是，我相信多年之后，我们有能力从日人手中收复台湾时，日本人绝对不会像国内那些清议家那样，说我是一个高尚、慷慨的赠送者。”

第十九章　对于政要们的评价

李鸿章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的权枢者，掌握着重多的实权，因其面向世界形势的心态，在大清帝国官僚当中是最为开放的，故而颇受西方列强政治家们的青睐。他也得以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政要，本章收集了他日记中对于一些政客的品藻。

俄国沙皇

“（1897年写于北京）今天，邮差们给我送来了一张全新的英俊画像，当今的俄国沙皇和皇后。画像被美丽的画框装饰着，上面还有沙皇的亲笔签名。现在，我已经把它挂在了我的卧室中，跟我访问莫斯科时，沙皇陛下送给我的其他礼物陈列在一起。”

“我是不会忘记与沙皇接洽的愉快，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俄罗斯经历的一幕幕。我在莫斯科时，急于了解他对于中国事务的兴趣、想法和意图；而他或许很想了解我对于许多重要远东事务的观点和看法。但是除了简单的政治考虑，还有个人情愫在其中。沙皇陛下邀请我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参加他的加冕典礼，把我当成一个君主而非特使。他的皇后同样是个好女人和好皇后，非常注重照顾到我这样一位一把年纪的老人家。”

“我并不能确定在访问期间，觐见过沙皇几面了。我所说的觐见，并不是简单的朝拜那样子。只有一两次算是正实觐见，其余的则是很随意的面对面交流。喝茶，聊天，听音乐，我想他们欧洲称之为‘音乐茶会’。当然，沙皇能邀请我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参加他的加冕典礼，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此前，我还在一直犹豫不决，也不确定我们神圣的太后是否确定让我来参加这一典礼。最后，尼古拉殿下亲自拍发电报，邀请我参加他的加冕仪式，只有我去他才满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此离开中国，作为纯粹的观光者赴欧洲。特别是最近中

俄两国政府在不断地交恶。沙皇的邀请，给了我一个走向世界、接触西方列国的好机会，包括俄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

“在我两次拜访沙皇时，他表现出非常关心俄国在远东边缘省份的利益。沙皇甚至学会不少的中国话，有些还是很长很复杂的对话。他邀请我参加晚间的国际招待宴。他谈笑风生，好似我是他生活世界中的一个熟知的国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沙皇谈及他做皇太子时到远东的旅行。他说我的一个同胞曾经试图谋杀他。他又说，自从做上了沙皇，已经习惯于面对暗杀了。当时，房间里有不少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只有维特伯爵还有我没有笑。因为我不觉得暗杀政要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在我个人拜访沙皇陛下的经历中，发觉他是一个有亲和力，非常开明民主的人。我知道，可以像我这样如此接近他的人很少。他的待人方式是自由和无拘束的。但通常，他本人都是非常地安静，非常开明，且低调。一开始，我在他的面前非常不自在。但当他无意中为我递送一支雪茄，端上一杯酒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与一名标准的俄罗斯绅士相处，而非是统领拥有世界上最广大领土的帝国的君王。”

“离开圣彼得堡之前，沙皇陛下赠送给了我很多的个人礼物——一部分由我代送给皇上和太后，紫禁城内的妃子们，我本人和我太太。送给我的礼物太过于丰厚，是一件内衬绸缎的貂皮大衣，据说至少值一万五千两纹银。它真太贵重了，我大概只能在最冷的天气里，在最珍贵的场合穿着。”

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先生

“（没有日期）——整个海关财政的大权都被放到了一位外国人，罗伯特·赫德先生手中。不过，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可能不再缺钱花了。尽管，我坚信我们中国也有不错的本地银行家（在此枚举了很多中国的名字）……他们其实都能管理海关。罗伯特爵士是英国政府高度赞赏的一个人，他被推举前来是非常自然的，大不列颠政府非常害怕他们的东方投资失去哪怕几英镑的损失。”

“1883年。——有人建议我把朝鲜的财政也交由赫德爵士管理，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个人而言，我在那里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因为朝鲜局势，我的钱有收不回来的危险。在把所有事务委托给这位管理者之前，我希望收回那部分的投资，因为我有时会怀疑他处理事务的方式。”

“1890年12月。——或许，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所有洋人都不如赫德爵士那样正直清廉。昨天他来我家里做客，我们共进了晚餐。在我们相识并共事的最初几年，差不多是二十五年前，我对他一直不太信任，不过，我现如今已经加深了对他的理解。在我相识任何的陌生人之前，我都会对这个人心存怀疑。然而，我已经充分对赫德爵士能力有所了解，并分析了他每年的成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国人是我们大清国最真诚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同时，作为一名账房总管，他诚实肯干、头脑敏锐，非常令人满意。”

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

“就像我在环球旅行时写到的那样，如果我不是李鸿章，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这样的人。当然，我可不是想患有他身上的慢性病。我猜，他也不愿意患上我身上的风湿病和心脏病。但是，在格莱斯顿家所逗留的那几个时辰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这位格莱斯顿先生不仅智力超群，还拥有出色的意志力。他敢于实践自己的任何一种信念。他的样子比我在全欧洲看到的任何人都诚实。我相信，如果交由这样的人士管理着英国的事务，英国政府绝不会犯下什么大的错误。”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黑斯廷斯

“他们告诉我，拿破仑个子很小，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皇帝。当我在费城见到黑斯廷斯将军时，我想起了拿破仑，以及他率领千军万马，开疆拓土的雄姿。他应该就是这个仪表堂堂的美国人的样子？”

“后来，我听说他去世了，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因为我打算回国后写封信给他，而且我很想给他寄送点中国的好茶去，够他喝上一辈

子。”

“他看上去是一个开国帝王或者常胜将军应有的模样，英姿飒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黑斯廷斯将军也的确是一个热心肠、好交朋友的豪爽人士。他相貌堂堂，而且很有幽默感。我们在费城的一个半官方酒店聊了好几个时辰，可惜我们不能说同一种语言，交谈时必须借助翻译。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那些翻译很讨厌。他们往往词不达意，糟蹋了我们所讲的内容。而且，还经常搞不懂要点所在。在政治和商务方面，还可以容忍他们，聊到私人问题，就非常不好了。不过，有时作为历史见证者，他们还是很有用。”

美国总统克利夫兰

“克利夫兰总统不能像他杰出的前任格兰特将军那样，向我承诺一定来远东访问。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十七年前，格兰特将军镇压美国南方的叛乱时，我正在中国剿杀太平军。如果克利夫兰总统答应访问中国，这对我是极大的荣幸。我会精心安排他的行程，并以从来没有过的最高礼仪，盛情款待这位大人物。但是这个美国总统没给我一点希望，他宣称，任职结束后，他希望去安静的乡下生活，不再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事务。”

“将来一定会有更年轻、更出色、更有能力的人为这个国家谋求福祉。他这么说。”

“我还是很难理解这种态度，因为他领导这个民族这么多年，威望很高，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能放弃这些权力，而自愿隐退到私人生活里。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做。他们视天下公权为自己私有。”

“我问总统有多大年纪了。他告诉了我，可现在我忘了。他肯定比我小十四五岁。他说，就目前来看，他的身体还不错，而且他喜欢树林和田野，喜欢划船、打猎和钓鱼（如果中国人看见皇上在钓鱼，哪怕是我本人，都会惊奇地瞪大眼睛！）。在我看来，克利夫兰先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活动。他的魁梧强壮让我想起了俾斯麦，不过他的面庞没有他那么红润，嗓门也没那么大。”

英国公使欧格纳爵士

“我和这位英国公使打过很多次交道，我发现他无可挑剔。”

“我对他在朝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听说他要调入北京，我很高兴。他来到北京后，我们能够成为知心朋友。但是，这种友谊从来没有影响过中英之间连续交战。”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和这个人讨价还价总是很困难。不过，他的乖僻倔强并不是个人行为。他只是那个国家的杰出代表。他内心仁慈，本质上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他背后的京都府总是鞭策他，让他看上去苛刻无情。他为这个国家尽职尽责，而那个国家哪里值得他这么做？”

美国公使康格

“美国公使馆里，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康格阁下。康格夫人和拙内相处得也很熟。康格上校昨天来过我在京城的寓所，我们一起回顾了不久前所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我们没有像任何对立情绪的外交官那样尽职，竭尽全力打听彼此的秘密，却是像一对朋友一样，看到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排外事件。看着它就这样最终平息下去。在那段时间里，代表着美国支持的力量的康格公使，是我们大清国最强有力的朋友。要不是美国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真不知道大清国的命运将会是如何。[56]”

第二十章　鸦片陋习和贸易

如果可以得到公开发表，李总督关于毒害中国的鸦片陋习和贸易的记录，完全可以作为方家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这种致命的麻醉剂，从年轻到老年，他都怀有一种持久不变的憎恨。但他终生又与鸦片保持着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他曾跟亲家坦言，自己也被卷入鸦片文化当中了，“不过只是为了药用，作为制造药物的原料。”他坦言，曾把部分湖北的田产用于“鸦片文化”中（指租赁给人种植鸦片）。这是他日记里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因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严厉地禁止吸食鸦片和打击鸦片贸易。

他日记里有关鸦片的内容最早写于1845年，他还是一个在合肥的贡生。那时，也确实是所谓的“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份。在日记里，他如是写道：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劝诫我的好友何启戒掉吸食鸦片这等陋习，因其已荼毒千家万户，危害甚重。无可奈何，何启已经全然失掉了志向，沉沦其中不能自拔，恐怕我苦口婆心去劝诫也没有任何作用。我非常痛恨他这种状况，但追究其最主要的责任，都在他的父亲。这位老翁将鸦片恶习带入其家中，让他的几个儿子一起吸食这种丧门的膏药。”

“今天，我又赴何启家里去找他，但他的母亲说他已经很少归家了。他的大部分光阴皆抛掷在郊野围屋，浑浑噩噩，不知所终。他的父亲也似如此，诸多兄弟皆是如此模样。这样的灾祸，若降临家中一个成员的头上，则其他人都难以幸免。鸦片荼毒，其子辈所受之苦，将远甚于其父辈。我不禁庆幸我家未曾蒙被这种大难，都是因为家父谆谆教诲我等务必远离毒物而洁身自好。像何启父亲这样本来很有德名的人，何以非将这样的灾祸带入家中，难道他没有任何远见，这种陋习会导致他举家衰败直至完全败落？”

“近日以来，我父亲严厉警告我不得再与何启为伍。我念在两人的旧情分，最终还是多次到烟馆里找他。想要见他，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他如今的大部分光阴皆浪耗于这个人所共知的邪恶之地。本地有二百多人终日麇聚吸食洋烟土。我恰好在烟馆外遇到了他，正好他吸完烟准备回家。我上前指责他的言行，将我满心的不快之意倾泻一空。何启也对我大发雷霆。我们两家其实是世交，何启的姨母正是我家的姨娘（李鸿章父亲的妾）。她是一位端庄可敬的妇人。暂因何启姐妹、母亲与士绅之家的交谊，我隐忍不发，没有和他多计较。不过，眼见这位故交与同窗把我的良言当做粪土，自己高呼爱烟土胜过好读“四书五经”，我很悲哀。何启虽非天资卓越之人，但毕竟也曾是一个大好儿郎。他何以自将头颅断送入鸦片之虎口，却置性命于不顾？”

“后来（李鸿章没有署日期）——何启的父亲死了，毙命于烟土之中。完全是这种洋人的药物杀死了他。有人能够证明，他是因吸食了太多而死。他的那些同僚们不再以他为然，他的家资皆败落于高利贷人之手。而何启本人，也就不能再在他家的故宅住了，沿街乞讨，以乞丐的身份沦落风尘。何启双目尽盲，虽然比我还要小几岁，但已经是老态龙钟，殊为可怖。昨天，我在街上走着，经过了他的身畔，他已经完全不知我是谁了。悲哀啊，用不了多久，我坚信他必将跟随着他的父亲一样死去。”

许多年后，当李鸿章在南京指挥“常胜军”时，他如是写道：

“我见到这样伟大悠久的城市里，到处可以见到鸦片壅塞。百千之人一连多少天缺乏粮食断炊，食不可果腹。但鸦片的供应一日没有中断。因此，即便有战乱频仍，城中人仍可醉生梦死，而浑不知其所终。所以，我断令程将军，不论何种口实，所有人倘做与鸦片相关的事宜，凡是持有、吸食、购买、贩卖鸦片或牟利其中的，若查属实，当即斩首，格杀勿论！”

“我刚刚授命他，草莽的程将军便与戈登将军起争执。我经常禁止程将军招惹这位英国人，所以痛斥了程将军。他怀着满心不快，灰

头土脸而去，落实我所交办的各项事务。今天早上，他来报告说，已经处死吸食者及贩毒者一千二百余人。干得好，它提升了程将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我决定力行此事而不懈怠，而绝不顾及英国绅士们的想法。我曾经说过，鸦片输入中国主要应该归罪于英国人。我对此坚认不疑。在山东时，我适时下令将一名英国海军少校处死。因为他在我眼皮底下，把鸦片卖给我们的军官，而他自己本人却并不吸食它。”

“戈登将军暴跳如雷，根本不等我写信给他解释。我告诉他，如果发现个别下等的英国人乐于参与鸦片交易不用大惊小怪。但是他反驳道，当鸦片被送到上百万的中国人面前，没有一个不肯接受。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并坦率地告诉了他。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一再提及这个争执，因为他和我一样憎恨鸦片。正因了解到这一点，我警告程将军不要去招惹他，免得伤害他那敏感的民族自豪心。”

“曾国藩总督在年轻时曾经抽过大烟，仅仅很浅的尝试。他的意志坚定得完美，很快戒断了自己的烟瘾。我很难相信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会和其他人一样成为这种陋习的牺牲品。如果我所记录无误的话，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的学者生涯中吸食过鸦片。他觉得这个异国可咒的毒物吸起来感觉很好，但是他对理学的热爱将他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是的，我相信那是曾国藩老师亲口告诉我的，而且我一听就记住了。当他发觉自己正慢慢丧失解决天文和理学问题的能力，他决定永远再不沾染这种毒品。”

“1893年，天津总督衙门——一家伦敦的报纸发表了一份声明，翻译件中写道，我在其中回答了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勋爵的一些问题，说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认为大英帝国不必为鸦片流入中国而负责。”

“首先，我从未发表过如此的谰言和断论。其次，我坚信寇松先生也绝没有说过我讲过类似的话。第三点，我坚信无论是东方还是英国的明智之士，都会一目了然，要不是大英帝国，就不会存在这样可耻的事实，促使鸦片大量地输入到中国，今天也不会有用于非法目的

的鸦片在中国出售。我重申，非法目的是指合法医用之外的用途。”

“也许，我的措辞听起来过于强硬。但英国的这种行为必将受到最强烈的谴责和非议。不管如何，整个东方贸易史都将证实我所说的一切。”

“我有很多优秀的英国朋友。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中还有很多人是我的密友：公使、领事、文官、武将、工程师和好几百位的商人。这些人知道我非常尊重他们和他们的民族。同时，还有他们尊贵的女王陛下。但他们的政府不仅是邪恶的鸦片贸易的代理者，也是维护者。我对之深恶痛绝。”

“我知道正因为万恶的金钱和中英贸易中存在着的强买强卖，几百万不幸的中国人变得更为不幸。强壮的男人和女人沦变得更加贫穷，流浪和最低级的罪犯。数十万体弱的中国人，几乎全是羸弱的妇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所有这一切或许能够导致印度更加繁荣！”

“所有这一切行为，能保证英国在中国港口的贸易更加繁荣！”

“这些都是因为，在英国政府的眼睛里，黄金和领土比任何一个贫弱人民的权力和身体更为重要。”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中国人走在英国的大街上，到处被人嘲笑。他们说我们是‘猪尾巴的东方鸦片鬼’。年复一年，就是这些伦敦人的政府夺去了中国各地几百万人的生命。”

“一个英国海军司令官曾经问过我，中国有多少人吸食鸦片。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他英国有多少人口。他告诉我说大概两千七百万人。我说这几乎就是全中国瘾君子的数量。”

“他说他没有弄懂我的意思。”

“我随之告诉他，他的国家若允许这种罪恶的贸易一天，每一个

英国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代表着一个可怜中国人的冤魂。”

“写这个故事时，我经常停下笔来计算我们伟大的帝国在鸦片贸易中遭受的不幸。每次我所计算得出的数据都在准确无误地告诉我大约十分之一的大清子民正遭受着不幸。这在全世界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多么希望这个统计数据能够缩小一点。但事实上，在鸦片灾害泛滥的云南和四川，我的估算实在是太低了，而非太高了。”

“不要妄断我对鸦片的历史一无所知，才宣称是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应该对输入中国这种可咒的毒品负责。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它就已经被从爪哇输入中国了。它逐渐在台湾海峡沿岸扎下了根，种满了鸦片。康熙皇帝曾经派出一名官员去台湾岛负责调查这种灾难。结果那位官员死在了那里。后来也有其他人去过，也随之沉迷于毒瘾，最终死在了那里。不久前，一些商人和旅行者，穿越印度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把它引进了中国的西部省份。最后，这种毒品被当做向王公贵族进贡的礼物献给了高层。”

“我充分见证了这种陋习是如何在中国蔓延开来的。因为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士子的时候，我就见证了它的暴虐。我很困惑，它们何以这样无所不至，无所不往。我记得自己有位很知心的同窗好友（他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成为了一个瘾君子，并离家出走，最后被官方下令用乱石砸死。因为他的烟瘾发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和体统。”

“是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在学校，在军队，在经商和政坛中，在战乱和饥荒的年月里，通过不懈的研究，我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这种罪恶的深重，并坚持不懈地打击它。我相信，你对它了解越多，越觉得英格兰罪孽深重。骄傲强大富足的英国，拥有庞大陆军、海军和伟人的英格兰，应该为它在印度种植的罂粟所犯下的罪恶感到耻辱，而被谴责！”

“一些人在不同的场合，很多次当着我的面提起过。他们说我尽管在表面上反对这种贸易，但我个人却亲自或者通过代理者也参与到了毒品经营。我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在租给别人的湖北和直隶的土地

上耕种鸦片。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事实的论断。在此，我必须承认，上述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打算写一份文章给在北京的《泰晤士报》的记者，并抄写一份，寄给尊敬的寇松先生。”

“但是为了保全我的荣誉，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声明，我从鸦片生意中赚取的每一分利润都没有用于吸食目的。而极少量不慎流失，吸食的鸦片不能作为我处理这些事情的依据。我将让我的秘书准备一份名单，如果有必要，我将列出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合法贸易的药物公司和商务代表的名单。显而易见，他们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都有着良好的医药声誉，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而且毫无例外，他们都和我本人一样，强烈反对吸食和贩卖鸦片。我敢肯定，就我经营的商品的价格和等级来看，只有极少数可以制成毒品。至于我出租的农田，我坦诚地说，租约上并不好注明同意或者反对种植罂粟。但是只要是发现我的土地上种上了这种植物，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我总是尽力收购原产品。”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很多场合，中国政府会直截了当地被一些外国政府诘问：‘既然你们认为向中国输入鸦片并泛滥成灾是如此重要，为什么你们不颁布法律，禁止在你们的领土上种植罂粟呢？’朝廷总是这样回答：‘既然我们仍然被迫向来自印度的毒品开放港口，这么做又有什么用呢？’”

“有哪一个国家政府向另一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比之更为荒唐可笑，又有哪一个国家政府的答复更能切中肯綮呢？”

“我知道，二十多年来，保守党政府曾经多次敦促我们颁布最严厉的法令，禁止在大清国范围内种植罂粟。对于我们，他们不是反对吸食鸦片，而是反对栽种可以从中提取药物的植物！”

“此外，我还知道，因为腐败的存在，大量的钱流入到政府高官的口袋里。促动他们去敦促政府颁布此项法令。”

“这种做法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人千万不能揣着明白当糊涂。这样，他的智商还比不上一只失明的癞蛤蟆！”

“在富有的印度人的支持下，强盛的大英帝国正凭借外交和军事的优势，从数百万计的中国人身上吸取膏血。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逐步地退化，却依然在耗尽我们国家的最后一滴精血。最后留下那些无助的愚民，被印度种植罂粟的农夫继续愚弄。”

“我和那些公开或秘密反对西方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国人不同。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欢迎西方来的传教士、商人或者工程师。我希望能始终保持我的这一态度。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只要不用牺牲它崇高的美德和高贵的品质，不用忽视自己辉煌的哲学和优美的文学，不轻视圣人和使人们一代又一代赠予她的无价礼物。中国越早被西方唤醒它庞大的身躯越好。及早地为中国注入力量，进入到时代的潮流当中，老百姓的生活上升到一个新的品质上。”

“但是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们必须要了解，由于鸦片的流毒，中国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经济停滞不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速度明显减缓了。我们的人民，官员和差役，富人和穷人，学者和白丁，任何人都清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基督教文明的侵略者们正在把最黑暗最致命的病毒注入中国的肌体。他们会作何感想？饱读诗书和有权力的人们都不会去皈依西方的教会。他们也不会因为鸦片变得贫穷或者锒铛入狱。但是他们周围充斥着这样可怜的人们：被鸦片毒害的人变得奴颜婢膝，政府把这些瘾君子投入监狱，执行死刑。那些可怜的罪犯，让妻子孤苦伶仃，饥寒交迫，最终倒毙在荒野郊外。当他们渐渐知道，这就是一个基督教大国所给予大清帝国的所有灾难与困苦，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从李鸿章有关鸦片的诗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种悲愤交加的心情。以下附录是他的诗作：

ODE TO THE POPPY

(Date of writing unknown)

Who would think to look upon you，

Nodding sweetly in the fields，

That the scented heart within you

Our soul's vilest passion yields?

Who would think to see your verdure，

In the Springtime lovely green，

That the garment nature gives you

Clothes such wickedness and spleen?

Who would think to note your sprouting

As a nurtured, tender child，

That the blood that ran within you

Carried visions fiendish wild?

Who would think to see your bowing

To the soothing winds of Spring，

That you sheltered in your bosom

Every bitterness and sting?

Who would think to see you pluming，

Like the peacock vain and proud，

That beneath your gorgeous feathers

Is a note discordant, loud?

Who would think that in the June-time ,

When in myriads o'er the plain.

You do look your brightest, sweetest ,

That your smile was hidden pain?

Who would think that we who plant you ,

And who love to watch you grow ,

Hate you, curse you, trample on you ,

When you bring us heart-deep woe?

Who would think that tender flower ,

Watched by children of the land.

Should return the fond love given

By a stroke of foulest hand?

Who would think that in our garden ,

Where our eyes may ever see ,

In disguise would grow a hell-weed ,

Deadly in its misery?

Who would think that in our day-dreams

Of a home all undefiled

We should rear—O heaven spare us！—

Such, in truth, a demon child?

译文：

鸦片咒

奇香荡于野，碧绿行满春。

天工赐美服，谁赠邪不分？

参差徒高原，忽如稚子生。

娇藏熙风怀，孔雀振羽声。

六月遍盈地，结果甘如饴。

谈笑匿奇毒，杀人遁无迹。

天下九咒草，人间阿鼻花，

孰知断白梦，遂令家国殇。

THE SHAME OF GREAT ENGLAND

（Wriilen in 1881）

Great England says she rules the widest sea

In might and right and white man's liberty.

Her armoured ships and regiments of war

Span seas and lands'neath many skies afar.

She sends her learned sons（in Western ways well-taught）.

Where'er her flag has been, her sons have fought ;

And vast the good these Church and school men do—

If all Great England claims for them is true.

But has Great England in her lordly boast

Surveyed her pirate traders on our coast?

Or has she, while aloft her pride has tossed.

Vouchsafed one thought to what her fame has cost?

Her traders, sailing here from India's strand

In quest of gold and measures great of land ,

Have brought within their greedy hands no good , —

But vessels large for China's ebbing blood !

Shame ! shame ! upon Great England of the West ,

Upon her bristhng guns and all the rest ,

For know we not that in this grand array

Is sceptre grim to lure our souls away?

Not as a friend comes England to our shore ,

But with a cry for blood and gold, and more :

The lives of countless thousands, steeped deep

In her vile drug, in shameful homage creep.

译文：

英伦耻

赫赫英伦廓无疆，兵甲陈临威四方。

旌旗猎猎教化兴，礼仪上国应堂堂。

何人敢询海多匪，翻行远东如虬龙。

先盗印度后华夏，吞金吸血不肯松。

我云英伦耻辱深，只把刀枪作荣光。

输鸩运毒焚人膏，断尽金血向衰亡。

TO ALL WHO WILL LISTEN

（An early composition）

To all who will listen I would warning give

Against the vile poppy juice.

But if you will not heed

Upon your own heads will fall calamity；

For in all the Middle Kingdom，

Even from the Yellow on the North

To the Pearl on the South，

An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

Back to the granite mountains of the West，

There is no evil such as this.

In the fields we see the poppy growing，

And the great fields are sights of gladness，

For the eye is pleased with the flowers，

And the scent is sweet to the nostrils，

And the birds are happy in their homes.

And the ground mice sport and play.

All is so innocent and good.

That we think of the rice and the maize，

And the orchard and the grasslands，

And they do not surpass the poppy.

Yes, and it would be so

If only we might let the flowers

Bloom and die to grow another year.

But men will not let it be so.

For from the flower the poison is drawn

And given to men to take away their minds.

O my brothers and all my friends，

If you would hearken to good advice，

Avoid the poppy juice forever and aye.
For it is a plague most noxious and vile !
It will eat out your minds ,
It will rot away your vitals ,
It will shrivel up your bowels ,
It will make you walk as a leper.
It will cast you into prison ,
It will send you to your death !
But not only you, my friend, will be cast down !
No, look about you with clear eyes to-day :
See the misery and ruin it has wrought ;
See the human wrecks on every side ,
Lower than the swine of the far fields ;
See the women bereft of home and all ,
Now toiling in the hot sun of the day ,
Each day of the long, long year.
That they may buy rice for their babies ,
And give food to their own bodies !
Think of the graves of every village.

The graves you cannot see for want of care！

Do some care lightly for the palsied.

Or those whose veins do hold the plague?

Yes, in all hearts there is pity

For all that suffer other ills.

But for the user of the vilesome juice，

The smoker of the demon's pipe.

There is no pity in any heart.

No welcome in e'en the lowest home；

There is no shame too great for him，

No suffering he must not bear alone，

No depths too deep for him to sink into.

He thinks he lives in some sweet heaven，

Yet wakes to find that fearsome hell

Has been his own abode

And e'er will be.

译文：

苦心者说

世之欲听吾言者，罂粟之毒如天坠火。

世之欲信吾言者，荼毒华夏如河决堤。

地无南北皆被邪，隳突东西无幸免。

潜行蛇鼠俱不留，稻米果草咸断根。

更有筋骨断煎熬，何来膏腴能见存？

海内兄弟须谛听，罂粟强梁过瘟疫。

腐汝胸臆蚀汝命，寸寸肝肠为齑粉。

乱汝性灵驱汝死，败家毁屋乱人伦。

君不见，万户惶惶如犬豚。

君不见，百村萧萧添新坟。

妇人流离失其所，孺子孤寡皆不养。

此毒不绝永无宁，何报仁者感疾苦！

（全书完）

译后记

一部奇书的是是非非

韩利利

刚刚接手翻译这部著作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部由美国人所写的《李鸿章回忆录》有什么奇异的地方。可能是我先前对晚清历史与人物了解甚少的缘故。只是暗自猜测，这个美国记者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斯真的很厉害，居然能透过号称世界第一难语言——中文（且还是文言文）的藩篱，整理出这么有意思的一部《李鸿章回忆录》。

待我查看了若干的资料之后，我的看法改变了，大为惊讶，这部看似很平常的英文著作里，居然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奇闻：

原书的作者曼尼克斯，是一位资深的美国新闻记者，像任何一位热情好动的美国公民一样。他有写作的才华，也不甘于平庸，早年曾经参军，当过战地记者，参加过古巴战争。因为在战地表现得勇敢、卓越，在美国，他甚至还一度和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地记者——海明威齐名。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记者，浑身上下充满了不安分的气息。1900年，他作为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名普通士兵，随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在中国只待了短短的几个月。1901年4月，退了伍的曼尼克思回到了美国。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发生过任何亲密接触。

然而，曼尼克思非常短暂的中国之行，没有触动他研究中国的兴趣，更与李鸿章似乎搭不上边。退了伍之后，他暂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在西海岸旧金山等城市四处漂泊。直到1911年11月，他跑到了夏威夷的檀香山，在本地的一家《广告者报》里担任新闻记者，才算

稳定了下来。

在檀香山的生活压力要比在北美大陆轻松很多，曼尼克斯租了一座小别墅，过起了安静舒适的生活。但不久，生性好动、桀骜不驯的曼尼克思和报社老板关系搞僵了，一怒之下辞职了事，并开始了酗酒。愤愤不平的曼尼克斯在困顿中，冒用老板的名义给自己开了小额的支票。被查出真相之后，银行报了警。曼尼克思锒铛入狱，被判了一年监禁。

监狱好歹也能解决后顾之忧，曼尼克斯就利用蹲监狱的一年光阴，开始写作这部《李鸿章回忆录》。那时候，由于殖民扩张，欧美主要国家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东方热潮，市面上最畅销的书，不是西方的经典，而是介绍东方的各种书籍。看准时机的曼尼克斯，就请朋友们给他从狱外借来大量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书籍，准备大干一场。

由于曼尼克斯毕竟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监狱方也很关照他，专门给他配了一张书桌，夏威夷的总督给他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曼尼克斯就在牢房里，号称掌握着独一无二的资料，创作了这部《李鸿章回忆录》。

他一边写作，一边投稿，很多报刊杂志都刊登了他“整理”的这份回忆录。纽约、伦敦两地的报纸争相刊登和转载，给予了作者高额的稿费。曼尼克斯也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一个在押犯人有他这般风光的。这部“回忆录”的推出，也激起了美国的新一轮的“李鸿章热”。人们争相通过这部书，议论这位已经死去足足有十多年的中国晚清大臣。

曼尼克斯本人也深受其益，除了挣到一些稿费之外，还因此被减了几个月的刑期。出狱后，他在夏威夷风景秀丽的谷地买了一栋房子，乐滋滋地安享自己奋斗的成果。这部书的书稿，在纽约和伦敦报纸上刊载，也引起了出版界的注意。很快就有一家以严谨著称的出版社找到了曼尼克斯本人，要求出版这部著作。曼尼克斯便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各篇文字，并编写了这部书前面的那段原作者前言。

他言之凿凿地宣称，这部书是通过李鸿章的子侄们获得了他遗留的日记和文稿，并邀请到李鸿章的英文秘书，以及他的幕僚和仆人协助，才得以翻译成英文并编纂问世的。出于学术的谨慎起见，出版社还特意将书稿送给这部回忆录所提及的当事人，曾任李鸿章谈判顾问的前国务卿科士达审阅。科士达认真地审阅了书稿，最终确定作者所撰的文稿毫无问题。为此，他还欣然为本书提笔作序，对李鸿章大加赞美。

1913年，这部由科士达作序的《李鸿章回忆录》成书出版后，其热销程度更如火上浇油。美国上下纷纷传阅，讨论李鸿章和中国文化，很快，这部书就达到了第八次印刷。曼尼克斯本人也大赚一笔，并用挣来的钱，成立了一家“太平洋联合通讯社”，向美国各大报刊推销自己的新闻服务。为了节约成本，曼尼克斯煞有其事地为通讯社虚构了社长、理事、特派记者、财务总监等人。不过，由于曼尼克斯经营得太随意，他的生意毫无进展。最终，他不得不关闭通讯社。

然而，这部书巨大的影响力还是引来了专业学者们的注意，其中包括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使领馆人员。他们通过公开的资料发现，这个“回忆录”里李鸿章自叙的很多细节，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为此，出版社不得不致信曼尼克斯本人求解。心虚的曼尼克斯为了逃避追问，又虚构出一个自己的经纪人“莱昂纳多”出来回复争论。这位经纪人“莱昂纳多”称曼尼克斯先生正埋头整理回忆录的第二卷，无暇与学界争辩。

在出版社不断催促之下，这位“莱昂纳多”又宣称，曼尼克斯手中持有李鸿章家族的证明，中国政府允许他查阅文件和档案的批文以及中国文化主管的嘉奖信。这位吹牛大王更大言不惭地宣称，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非常喜欢这本书，百读不厌，要给曼尼克斯授勋。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曼尼克斯甚至愿意拿出五千美元，跟质疑者打赌。

由于曼尼克斯太过于花样百出，加之之前他那些不良的信用记录，出版社更加怀疑他。他们开始多方打探曼尼克斯所撰写的这部书

的真伪。为之，他们甚至通过线人，打探到了李鸿章之子——李经迈。这位线人，正是李经迈的英文老师。在回复老师的信中，李经迈说他父亲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身边也没有诸如英文秘书罗伯特、幕僚王秀才这些人，他本人既没接待过曼尼克斯，也没有听说中国政府何时批准过这位曼尼克斯大人查阅档案资料。他毫不怀疑，这一整本书都是伪造的。

出版社的质疑，令曼尼克斯招架不住。他又通过自己监狱中的狱友宣称，是自己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哥哥“约瑟夫”给自己提供了资料。这位约瑟夫甚至还发表一系列有关李鸿章的论文。出版社急忙查阅最近多年的人文类期刊杂志，发现并没有一位叫“约瑟夫”的发表过一篇有关于李鸿章论文。显然，这位“约瑟夫哥哥”也是曼尼克斯杜撰出来的。

于是，质疑的呼声更高了。学界联想到李鸿章曾有一位英文秘书，是美国人威廉·毕德格（William.Pethick）。这位毕德格跟随了李鸿章二十多年，保存了李鸿章大量的官方和私人文件。据说，装了整整一大箱。1902年，他因病去世后，这些文件在战乱的中国神秘失踪了。这些文件，会不会被曼尼克斯盗取了呢？大家查到曼尼克斯在军队服役的记录，发现他1901年4月退伍后就回到了美国。而毕德格在中国，两人生活也并无交集。显然，曼尼克斯的资料来源并不在他宣称的那些“秘密手稿”当中。

曼尼克斯在书中号称他在华期间见过李鸿章的面，采访过李本人。然而，作为八国联军的海军陆战队员，在中国期间，他的部队正与清军交战，能采访到李鸿章殊为不易。出版社查考到他的行军档案，也未曾发现任何他能与李鸿章见上一面的记录，没有查到他在那段时间所写的采访李鸿章的报道。

最终，出版社查到了曼尼克斯在监狱中向各大图书馆所借阅的图书。他们发现，他所有的资料都取自这些图书（甚至连错误都一致的）。他所做的，不过是模拟了李鸿章的口吻，把这些资料陈述出来，形成回忆录风格的著作。为此，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该书，并加上

了长达几十页的考证记录，让曼尼克斯的名声扫地。

曼尼克斯因为他的造假行为而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位曾经一度和海明威齐名，颇有才华和巨大潜力的作家，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尽皆知的骗子，声名狼藉。报社、出版社都不敢再用他的稿子。他在美国西海岸默默无闻且郁郁寡欢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光阴。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陶林和我对书中所涉的历史事实进行严格比照，很容易就发现曼尼克斯在虚构与编造：书中，“李鸿章”的叙述热情洋溢，完全没有一个中国科举士子和权臣的中庸平和之感觉。所涉的历史事实，在大方向上没有错误，而在细节上，反而有欲盖弥彰之感。

可作者的失败，并不影响这部极富传奇色彩的伪书进一步畅销不衰。时至今日，它依然带着这段貌似匪夷所思的传奇，流传在历史传记类图书的畅销书架上，不能不说是一段趣闻。尽管近年来，不断有专家“揭批”这部虚构之作，很多粗心的历史学者，甚至依然把它作为信史采用。

这恐怕更因为它毕竟差不离地描绘了李鸿章的一生，向美国读者展示出了一个乐观、自信和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外交家的正面形象，传播了“正能量”。另外一点，恐怕还在于曼尼克斯自己的小聪明，他不吝借“李鸿章”之口，对美国与美国国民的友善、真诚与热情大加褒奖。这自然让美国读者心花怒发，喜闻乐见。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乐于将这部书翻译给中国的读者阅读，或许，更能加强中美两国公民之间心灵的沟通，让大家领会到这种大洋彼岸流传的热情与善意。

这部书的翻译，我们采用的是美国佛吉尼亚大学馆藏的豪斯顿·密夫林出版社1913年第一次出版的原版书。我们严格遵照原文进行翻译，尽最大的可能接近原书的原貌。为了帮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李鸿章，我们特意在附录中选编了李鸿章的年谱、史传、评价与诗歌作品。由于译者学识有限，疏漏难免，期待着您的批评与指正。

附录

李鸿章年谱

【仿宋】1801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1834年，李文安乡试中举。1838年考中进士，使李氏家族在合肥成为望族。榜名李文玕。历任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并令其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

【仿宋】1821年，大哥李瀚章出生。李瀚章后入幕湘军，办理军饷后勤事务颇有建树，深得曾国藩的认可。后，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

【仿宋】1823年，李鸿章出生。其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典出《周易·渐卦》“鸿渐于陆”，号少荃（泉），后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李傅相，亦称李合肥，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

【仿宋】1825年，三弟李蕴章出生，一生追随李瀚章，办理军饷，税务厘金，以后身残废，居家不出。

【仿宋】1829年，四弟李鹤章出生，同治三年，捐赠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子李经义：官至云贵总督。子李经馥：娶曾氏系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之女。其子李国芝娶清末政治家、二品工部左侍郎、企业家盛宣怀孙女盛毓菊。

【仿宋】1833年，五弟李凤章出生，其为李家首富，经营矿务、轮船、纺织等多种产业。

【仿宋】1835年，六弟李昭庆出生。李昭庆入仕后，累擢至记名盐运使。长子：李经榘，候选知州，候补知府，赏戴花翎，赏给一品

封典，1895年诰授光禄大夫，娶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之女。次子：李经叙，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1897年随驻美大臣至美，以二等参赞驻秘鲁，代办出使大臣事务。其子李国源娶皖系军阀、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长女段式萱。

【仿宋】1828年，李鸿章进入李文安所办的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仿宋】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

【仿宋】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仿宋】其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成为一时之名句。

【仿宋】1844年，李鸿章乡试，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仿宋】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仿宋】1853年，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互有胜负；李鹤章随兄从军。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乡募勇防剿太平军。

【仿宋】1855年，李文安卒于合肥军中，年五十五岁。李昭庆的长子李经方生，后过继给李鸿章做嗣子。

【仿宋】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焚毁了李鸿章祖宅。是

年冬，李鸿章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僚，襄办军务。

【仿宋】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是年，他受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仿宋】1861年，李鸿章奉命开始组建淮军。

【仿宋】1862年，李鸿章得以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

【仿宋】1863年，李鸿章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六千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仿宋】1863年和1864年，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淮军攻克苏州后，李鸿章设计杀掉了八名降王以及大量降兵，被授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仿宋】1864年，曾国藩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是年，李经述生。

【仿宋】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此为清朝最大的军工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仿宋】1866年，因剿捻“师老无功”，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担任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仿宋】1867年，朝廷调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仍在军中办理剿捻。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

【仿宋】1868年，捻军完全被镇压。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太保，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不久，奉命入川调查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

【仿宋】1870年，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宿怨很深的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

【仿宋】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遂一举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自此，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入。

【仿宋】1871年，受容闳的建议，李鸿章、曾国藩联名致函朝廷，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仿宋】1872年，李鸿章创办近代最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是年，其六弟李昭庆卒于天津。

【仿宋】1874年，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通过轮船招商局的成功，大力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京师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

【仿宋】他办洋务首办军工企业，造出大量的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国防军。

【仿宋】1875年，李鸿章负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自此，李鸿章

苦心孤诣，渐渐为中国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世界第六强的海军舰队，海军公所选址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

【仿宋】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抵天津，特意访晤李鸿章。

【仿宋】1880年，四弟李鹤章卒于合肥。

【仿宋】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以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要求弹劾李鸿章，朝廷认为其莠言乱政，将其革职。

【仿宋】1885年，因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这个条约，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仿宋】是年，中法战争结束，与法使签订《中法新约》。通过此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仿宋】1886年，三弟李蕴章卒于合肥。

【仿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形成拱卫京城海上门户。

【仿宋】1890年，五弟李凤章卒于芜湖。

【仿宋】1892年，李鸿章七十寿辰，慈禧、光绪赐以厚礼。

【仿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海军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大败于大东沟。是年，孙中山从北美回到广东省香山家中潜居。他在自家书房里起草书稿，与友人陆皓东研讨，一连写作了十多天，完成

《上李鸿章书》，书中除变法改良外，有力劝李拥兵自立之意。后孙中山经过一番思考，到上海，请当时格致书院院长王韬润色。最终，经由郑观应等人的介绍，孙中山和陆皓东由上海到天津，于6月中，将上书递交到了当时李鸿章的得意幕僚盛宣怀手中。李鸿章见书与否，不得而知。由于未得李之回复，失望的孙中山离开中国到美国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

【仿宋】1895年，李鸿章率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本春帆楼议和，与日方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谈判。在交涉期间，他遇日本浪人所刺，面颊负伤。最后，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因此也替清政府背负上了卖国的骂名。

【仿宋】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仿宋】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国，子李经方、李经述以及罗丰禄等人随行。

【仿宋】此行，是他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李鸿章"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

【仿宋】李鸿章此番出访欧美，造成了西方的一阵"李鸿章旋风"。欧洲的报纸把李鸿章与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并称"当今天下三大佬"。在美国纽约，更是出现了万人空巷的迎接场面。李鸿章塑造了当时中国开明的、上升、强悍的国际形象。

【仿宋】1897年，李鸿章因国际声誉太隆，又因甲午战败的指

责，而被猜忌心重的慈禧太后剥夺爵位，赋闲京师，在总署行走，居贤良寺。期间，维新派声势日益增大，李鸿章对之多有关注。

【仿宋】1898年，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工程。时值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举棋不定，不敢公开支持维新派。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鼐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

【仿宋】1899年，大哥李瀚章卒于合肥。年底，一直赋闲无事的李鸿章，被调任两广总督。

【仿宋】1900年，北京庚子事变爆发。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贸然向八国宣战，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仿宋】年初，李鸿章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就在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江山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据传，东南总督密约，一旦“两宫遇难”，即推举李鸿章为“联省合众国”的大总统。

【仿宋】6月，北京局面逐渐失控，清廷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局面；7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0月，仓促抵京，与庆亲王一起，与列强谈判，并于次年初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四起，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仿宋】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即每个中国人一两。在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仿宋】1901年11月7日，吐血不止，致气尽，生命垂危。待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对之哭诉："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还想说些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七十八岁。

【仿宋】死后慈禧感念其尽忠，称有"再造玄黄"之功，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的省份建立祠堂十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有清一朝，汉族官员在京师建祠，仅他一人。

【仿宋】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于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1892年病故。另有侧室莫氏，侍妾冬梅。

【仿宋】有子三人：嗣子李经方（是李昭庆长子）；嫡子李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李经迈（莫氏所生）。生女三人：分别嫁给郭恩垕、任德和及张佩纶。

国内外对李鸿章的评价

【仿宋】——英国及美国新闻界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

"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LI HUNG CHANG VISITS HOGAN'S ALLEY.

李鸿章访问国外漫画

【仿宋】——日本政治学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实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分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形之间。”

“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李鸿章在中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仪式上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

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

“彼一生之历史，实中华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仿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的评价：

“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分怜俐有奇指，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技之所以为大也。”

【仿宋】——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对李鸿章的评价是：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

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外景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

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苛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二三月、庚子（1900）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仿宋】——张之洞评价李鸿章：

“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诸事，稍知之者，唯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仿宋】——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评述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

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仿宋】——著名的美籍华裔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在《晚清三十年》等著作中评价李鸿章：

“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乃是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仿宋】——李鸿章对自己作出以下的总结：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部分诗作[57]欣赏

《入都》十首

其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吴钩”：钩，是兵器之形似剑而曲者。春秋时，吴国人善铸钩，故名剑皆冠“吴”。

“百尺楼”：此用三国陈登的典故。许汜尝拜见陈登求田，陈登不

与说话语，“自上百尺楼大床卧”，让许汜“卧下床”。刘备点评道：“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陈登字）所讳也”。李鸿章引此典故，意思说自己入都求仕，不为一己。

“闲情逐野鸥”：此用《列子·黄帝》典故，写海上之人与鸥鸟相游乐事。

“到瀛洲”：典出《新唐书·褚亮传》，唐太宗为网罗人才，设置文学馆，命房玄龄等十八名文官为该馆学士。每暇日，帝入馆访以政事，研讨典籍。时人盛慕之，谓入文学馆为“登瀛洲”。

这首诗是李鸿章的名篇，写出了他的自信与豪迈，在当时广为流传。曾国藩见后十分欣赏，并心中暗记下这位少年书生的气概。

其二：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

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这首诗叙入都之目的为“出群”，为图新，为了结交海内知名志士。其三：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亦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衫沦落十年人。穷通有命何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这首诗追悔往事，虽多不达之慨，然自信自己必定能成就功名。其四云：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华年逐水源。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遇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虱处裈”：典出阮籍《大人先生传》语：“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

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意思一个不要此诗所追逐功名的甘苦，说明入都的目的乃欲过乡试，达龙门耳。

其五云：

桑干河上白云横，惟祝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待春明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白云”：用狄仁杰典故。《旧唐书·狄仁杰传》记录，狄仁杰登太行山，“南望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瞻望伫立久之，云移乃行。”

此诗颂扬父母教养恩德，自信将不负所望。

其六云：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鼇顶，何日身才入凤池？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趁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分宜。

此诗言志，自信冥冥有助，仕途腾达，扶摇青云也。

其七云：

一入都门已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附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槐厅”：典故出沈括《梦溪笔谈》“学士院第三厅……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閤者，多至入相。”表明作者想入相拜侯的野心。

“笼纱”：用唐代王播的典故。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寺院，随僧食餐。僧人厌之，常于饭后击钟。王播闻钟而往，则饭毕矣。后

来，王播以重位出镇扬州，见旧时于寺院壁所题之作，尽为碧纱所笼。

这首诗发誓自己要面对“人情冷暖”，博取功名，令人侧目。

其八云：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瞰中州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半为好山川。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辙来游壮志坚。多谢呼唔穷巷士，残年兀坐守遗篇。

“呼唔”：读书之声。这首诗由入都之途可饱览山河秀色、广开眼界说起，而接以陆机、苏辙自励，自信入都将鲲化而鹏运也。

其九云：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吟囊”：用唐李贺典故，李贺外出都要背负一个诗囊，有好句子随手写下，投入囊中。

“纯仁麦”：用宋范纯仁典故。范受父亲范仲淹之命，自苏州以舟运麦入丹阳，遇故人石曼卿缝亲之丧，扶柩返乡，途无资财，遂全船送之。

“陆贾装”：用汉代陆贾典故。陆贾病免家居，卖出使越所得橐中装的千金以分给儿子们，以为子孙生计。

此诗言打点行装，亲朋相送，自言惭愧入都的生计都需父母扶持。

其十云：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

撤金莲。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揽鬓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骊歌”：告别之歌。《诗经》有逸诗《骊驹》篇，为告别所赋，因以为典。

“磨铁砚”：用五代桑维翰的典故。考官厌恶“桑”、“丧”同音，劝桑不予进士。桑乃以所铸铁砚示人，谓“砚弊则改而它仕”。卒以进士及第。

“撤金莲”：用唐代令狐绹、宋苏轼的典故。据记载绹、轼都曾夜对宫中，两朝的皇帝，都曾将御前的金莲烛送其各自归家。

这首诗重申了组诗的主题，自信将以文章报国。

二十自述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这首诗是李鸿章二十岁时，为了鼓励自己的意志而写。他提醒自己要事业当时，努力进取，闻鸡起舞，一生不要碌碌无为。

明光村镇旅店题壁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这首诗，是李鸿章四十岁时所写的。当时，李鸿章受皇帝之命，回老家合肥，与同乡高官吕贤基一起办团练，抵御太平军。然而团练事务颇不顺利，吕贤基战败投水自杀，李鸿章取得小胜后，为太平军所忌恨。不久，他老家为太平军攻破，他们烧毁了他的老屋。李鸿章无家可归，只得带着家小逃亡，经过明光村旅店题诗哀叹。诗写完

后，他就投奔到老师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新局面。

绝笔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是李鸿章的最为著名的绝笔诗。诗中，他哀叹一生劳碌都作乌有，鼓励后来人努力进取。

其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两宫西逃至西安。李鸿章拖着老病的身躯，从两广总督的任上急促回京，与十一国代表谈判赔款事宜，最终他签订了人生最后一个耻辱的条约《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两白银，即中国人人均一两。李鸿章接受了这个耻辱，但又气又恼，导致胃出血，吐血不止。他自感来日无多，便在病榻上吟出了这首诗，命人记下。几天后，李鸿章带着无尽遗憾，撒手而去。

[1]译者注：科士达，曾任美国哈里逊总统时的国务卿，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北军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曾担任美国驻墨西哥、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公使。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科士达与李鸿章有深厚的友谊。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期间，他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一直在清廷和日本两国之间进行斡旋。

[2]译者注：原文为“桂冠诗人”，是英美对国内顶级优秀诗人的称呼。中国并无此说法，故译为“诗坛领袖”。

[3]译者按：这些诗篇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译者也很难在李鸿章现有的诗篇中查考出确凿对应的篇章。仅能根据诗篇内容，试着翻译成古体诗歌格式，尽可能仿照李鸿章诗歌的风格，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4]译者注：这里指自1851年起，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

[5]译者注：程学启，1830—1864，清末淮军将领。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初为太平军将领，后投降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安排程学启转入李鸿章淮军。他作战骁勇，为李鸿章屡建奇功。后战死，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6]译者注：据史记载，洪秀全常自称受天父下凡附身，传达天谕，以之控制太平军上下。

[7]译者注：这里指外国殖民者们。

[8]译者注：这里指的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此案发生，震惊朝野，其中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

[9]译者注：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是个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的农家子弟。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他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李鸿章师从曾国藩，一生功绩，都自曾国藩提携始。

[10]译者注：吴煦1809—1872，字晓帆，号春池，晚号荔影，浙江钱塘人。晚清官僚，藏书家，曾襄助李鸿章与太平军作战，后因贪墨营私等官场劣迹为清廷革职查办，致使晚景潦倒，郁郁而终。

[11]译者注：有关这件事的始末如下，1863年12月，戈登率领洋枪队配合淮军转战江浙，围剿那一带威胁上海外国侨民的太平军。在苏州城久攻不下后，以指天为誓保证对方性命的方式招降，使守城军内讧，兵不血刃攻占了这座太平天国重镇。事后不久，他的上级、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却借口诱杀了所有献城的八名太平军降将和无辜士卒几千人，将之前的招降协议弃之如敝履。戈登为此大为歉疚，提枪要与李鸿章

决斗。本书所陈之前因后果，有为李鸿章开脱的倾向。

[12]译者注：这里指的是每年春天由皇后主祭的“亲蚕仪式”。农耕与蚕桑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古人把传说中发明养蚕缫丝的嫘祖尊称为“先蚕”。按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原则，自周朝始，在国家祀典中，就已确立了“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的祭祀格局。祭祀先蚕神嫘祖，由皇后主祭，是“亲蚕”，也称为“亲桑”。慈禧为太后，有心祭祀嫘祖，但又不能逾越规矩，故请李鸿章代之。

[13]译者注：文中提及两份祭文，一份是指李鸿章为慈禧代笔的，一份是李鸿章以自己身份拜祭嫘祖的那份。这里指李鸿章以代慈禧所写的那份祭文。

[14]编者按：李鸿章在他日记的显著位置，曾经三次提起他亲自下令大量印制并广泛传播慈禧太后老佛爷优美高雅的《嫘祖颂》，目的是想让大清国每一个子民不仅知道嫘祖，还要知道关于嫘祖的故事。她创造了养蚕业，并为人们所钟爱，发展了丝织产业，鼓励养蚕织布，并用以富国安民。这三篇文字是李鸿章荣升到了清帝国最高的文官官职——即四大学士之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之后，几年时间内写的。

[15]译者注：神农氏为我国上古神话时代的最后一位神祇，他教会人们认识百草五谷、豢养家畜、种地稼穑等等。因此，古代王朝历朝历代一直都有拜祭神农的传统。

[16]译者注：按照清廷规矩，只有皇族才能从宫城的东门进入。

[17]译者注：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之一，赴日本与其首相伊藤博文讲和，并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除了更多开放口岸之外，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的赔款之外，还割台湾澎湖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李鸿章虽然在谈判中力争，但无奈满清暗弱，只得以屈辱告终。期间，他遭遇日本一位企图阻止停战谈判的浪人青年行刺，脸颊遭到枪击，却侥幸免于难。《马关条约》是继《北京条约》以来，侵略者强加给中国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满足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

[18]译者注：安维峻，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甲午战争期间，他曾上书《请诛李鸿章书》，抨击李鸿章在战争中的失职，要求朝廷斩杀他以谢天下，此文震惊朝野。

[19]译者注：指各国普遍同情中国，而觉得日本的勒索太过分。随后便有英俄出面“调停”。

[20]译者注：因为香港、澳门有西方人所开办的报馆，所以消息传播得快。

[21]译者注：意即和谈不成，并不打算活着回去的意思。

[22]译者注：张荫桓（1837—1900），清末大臣，广东南海人。曾任职总理衙门，旋升任户部左侍郎。1885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被害各案交

涉事宜。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但被日本政府以“不够资格”为由驱逐。1898年3月，受贿50万两白银，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时，倾向变法，戊戌政变后遭弹劾充军新疆，1900年被杀。

[23]译者注：这里指庆亲王奕劻（1838—1917），晚清重臣、宗室，满洲镶蓝旗，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辅国公绵性长子。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十七年迁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二十九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三十四年晋封世袭罔替庆亲王。宣统三年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清帝逊位后，避居天津。1917年1月28日病死。

[24]译者注：清廷派往朝鲜的一艘运兵船，甲午战争前，被日军蓄意击沉。

[25]译者注：东学党起义，又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是1894年在朝鲜发生的一次反对两班贵族和日本等外国势力的平民武装起义运动，领导者为全奉准。这次起义，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线。

[26]译者注：隐士王国，这里是朝鲜的代称。相传朝鲜国为归隐的商代贵族箕子所建，另因该国总处于大国光环下，隐而不显，故称隐士王国。

[27]译者注：是指李鸿章签订条约的马关。

[28]译者注：指签订《天津条约》的会议。

[29]译者注：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李鸿章虽亲近过维新党人，但在变法中站在了保守的立场上。

[30]译者注：显然作者不知道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李蕴章、李凤章等五人都很有出息。

[31]译者注：刚毅，清末大臣，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累升刑部郎中、按察使、布政使。甲午战争中，主张议和。维新变法中，极力反对维新，力主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至京郊时，刚毅力主招抚。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他随同慈禧太后西逃，病死于山西侯马。

[32]译者注：荣禄（1836—1903），清末大臣。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后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维新变法中，主持镇压与屠杀维新党人。

[33]译者注：这份上谕内容，是历史真实的文本，跟本书作者所提供的文本有所不同。

[34]译者注：王之春，晚清官僚，为湘军旧属，曾与彭玉麟等一起提倡创办船山书院，后回国任四川布政使、镇压余栋臣起义，后调任山西、安徽、广西巡抚。曾主张出卖广西矿产权益，借助法国势力镇压人民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遭到革命党人刺杀未遂。次年，被解职。

[35]译者注：晚清时代，中外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许多国家为了联络情谊，对外国重要来宾如使节、要员等，往往赠以本国勋章。然而，清政府按传统却是赠赐马褂、花翎、顶戴等物，与国际惯例很不相宜。于是，清政府于1891年十二月，按照总理衙门建议设置了“双龙宝星”勋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勋章——御赐双龙宝星勋章。

[36]译者注：这里是指沙皇尼古拉二世，俄罗斯末代皇帝，在位时间1894年—1917年。他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却一事无成。1905年旅顺被日本攻克之后，首都发生流血星期事件，引发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后，他被革命党人秘密处决。

[37]译者注：以下段落，读者可以和前文第三章记述戈登之事参照阅读。

[38]译者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德国军工实业家，军火大王，克虏伯家族的奠基者。

[39]译者注：刘步蟾，字子香，汉族，福建侯官人。清末海军将领。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回国后由李鸿章推荐，协助制定海军军制、营规。1895年赴德国购领船舰，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1894年中日战起，黄海战役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次年，为威海卫海战中英勇抗敌，以身殉国。

[40]译者注：这里是指小毛奇（1848—1916），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出身，性格软弱，却深受德皇宠信，超越许多比他更能干的人出任德军总参谋长。曾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的死去。

[41]译者注：指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战败。

[42]译者注：这里是指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在1773年12月16日的政治示威。英国在取得对法国的“七年战争”胜利后，对殖民地加强了控制与压榨，北美被殖民者不满英国，因而当地居民塞缪尔·亚当斯率领60名自由之子化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商船，把船上价值约1.5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来对抗英国国会，最终引起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

[43]译者注，百老汇音译为Broadway，意为宽街。

[44]译者注：毓贤（1842—1901），字佐臣，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内务府汉军正黄旗，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他是满清官吏中“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污严重”的代表者，李鸿章临终前还大骂他误国误民。

[45]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年9月22日——1905年4月4日，法国人，庚子拳乱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

[46]译者注：这里是指爱新觉罗·载漪（1856—1922），清末宗室，大臣。爱新觉罗氏，隶满洲镶白旗，嘉庆皇三子惇亲王绵恺孙，道光皇五子惇亲王奕誴次子，后过继瑞敏郡王爱新觉罗·奕志为嗣，袭贝勒，三十八岁袭封端郡王。义和团事变祸首之一。

[47]译者注：克林德事件，据载，1900年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20日，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派醇亲王赴德赔礼道歉，并在东单牌楼建克林德牌坊。1918年1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北京人将牌坊拆除，迁至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牌坊。

[48]译者注：伍廷芳是清末外交家，时任清廷驻美国华盛顿公使。

[49]译者注：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甘肃提督。同治三年组织汉民民团反清，后降刘松山部，参加左宗棠剿灭西北反清逐回和收复新疆失地战争，后率部进京拱卫京畿并与八国联军作战，失败后扈卫西太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他以“首凶”被革职。

[50]译者注：清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新旧党之争。朝鲜自江华岛事件后，国内维新派组开化党，是为新党；旧党则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因王妃闵氏一族与李昰应不睦，李昰应遂唆使兵变，焚日本使馆，杀日本中尉堀本礼造。日本因而出兵朝鲜，清廷亦派兵朝鲜。敉平叛乱后，清朝与日本皆驻军汉城。清朝将李昰应逮捕，囚禁于中国保定，1885年获释。

[51]译者注：所谓大院君，是朝鲜王朝时代对那些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并非帝王的人的封号。这里的大院君是指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52]译者注：李昰应（1820—1898），字对伯，号石坡。朝鲜大韩帝国的高宗李熙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摄政，号兴宣大院君。1898年2月死，终年七十九岁。葬坡州云川面旧长陵大德园。1907年8月24日，尊号为“大院王”。

[53]译者注：赫德，英国人，二十八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四十五年。1854年，十九岁的赫德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仍挂总税务司的头衔。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其活动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

[54]译者注：本章中关于李鸿章对台湾的态度，纯粹是作者臆想的，不能作为历史事实来看待。据史载，李鸿章在与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在第三次会谈中声明“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第四次会谈中，警告日本“拟请

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在之后的另一次会议中，李鸿章总结道：“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足见当时李鸿章是极力争取保留台湾的，只是最后由于清朝的电报密码被破译，因此日方获知中国底线为尽快促成议和案，导致日方强硬坚持割取台湾。

[55]译者注：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汉族，庐州府合肥县人，李鸿章旧部。淮军将领，洋务派骨干，台湾第一任巡抚，不但打退了法国舰队的进犯，而且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为台湾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56]译者注：这里指美国力陈，列强不能瓜分掉中国。

[57]译者按：因原书中所译的李鸿章诗作，很多难以查考其来源，估计很多只是曼尼克斯的“创作”。译者依意翻译成古体，仅供读者做参考，并不能被视作李鸿章的诗歌作品。故在附录中，选取李鸿章几首真正的代表作，以供读者欣赏。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中国人的性格

[美] 明恩溥 著

陶林 韩利利 译

親歷中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中国人的性格

著者：（美）明恩溥

译者：陶林 韩利利

责任编辑：郝 鹏

目录

版权信息
译者序 一部影响着中国命运的书
原书序 我所见之中国人
第一章 “面子”问题
第二章 节俭问题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节
第五章 疏于时间
第六章 疏于精确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 油滑的才能
第九章 灵活的顽固
第十章 理性混沌
第十一章 神经麻木
第十二章 鄙夷外人
第十三章 公共匮乏
第十四章 保守自大
第十五章 疏于舒适与便捷
第十六章 生命力顽强
第十七章 忍耐有韧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道当先
第二十章 仁义为纲
第二十一章 同情匮乏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飓风
第二十三章 负责与遵法
第二十四章 猜忌成风
第二十五章 诚信匮乏

第二十六章 宗教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译后记 “国民性”问题的新思考
返回总目录

译者序　一部影响着中国命运的书

陶林

一本书，通常由几百页纸和一些油墨构成，小小的一个册子，不声不响，不动声色。把这些书甩出去，它发出的力道不会超过自身的重量。书有什么用？尤其是对于民族、历史这些庞大的词汇和物象来说，一本小书，如同是湍流中的飞絮那样，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这种境遇，有类于历史中的个人，在浩浩荡荡的潮流面前，永远有无能为力之感。

然而，决定历史的终究是人。人的行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决定人们行为的，又是人们的头脑。人们头脑虽说瞬息万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上天入地无所不包无所不想，如同一个纷繁的小宇宙。但这个小宇宙向外输出的成果，其实也仅仅是其中碎裂出来的几个片段。我们把这些片段称为观念。

不错，观念左右着人，进而左右着历史和世界。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功伟绩、帝国与王朝、辉煌的文明与灿烂的文化，说到底，都是人的各种观念投影。一本小小的书里所蕴藏的观念，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但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们都如猛兽一样，潜伏在书页当中，等待着天时、地利，等待着那些合适的人。书本中所提供的观念，威猛跃出，散发无尽的力量，让世界彻底变样。所以说，懂得敬畏书本，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开始。

有关于本书，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就是那种相当值得我们敬畏的书。从历史实际的意义来说，它通过对中国人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曾深深地影响过中国的命运。有幸能在诸多前贤的基础上，重译这部鲜为人知却魅力无限的著作，与明恩溥博士隔着时空对话，令我获益匪浅。

恰如我们知晓的，明恩溥先生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位基督教公理会来华的传教士。这个身份在晚清来看，实在太普通不过了。清末，因为各种条约的签订，最高峰时大约有四五千人规模的西方传教者在华传教。

明恩溥1845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渥农小镇上。1872年，这位二十七岁的美国青年获得了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学位，随即携带着新婚妻子简·迪肯森小姐来华，来到了大清王朝统治下的积贫积弱的中国。起初在天津学习中文，1877年到了山东西北部的一个小乡村——庞庄进行赈灾传教。不想，这一待就是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几座小学、中学和医院。他还兼任一家老牌在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和专栏作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若干著述的写作，诸如《中国文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这些著作中，最富盛名、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这部《中国人的性格》。这部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知之甚少的书，当年在西方是最为畅销的中国入门必读。

从个人意义上来讲，明恩溥是一个太过于令人吃惊的人。这位牧师之子，刚刚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上退役下来，就疯狂地要到内乱频仍的中国来传教。这与其说是信仰召唤，不如说更像是美国年轻人固有的冒险冲动。然而，他前后待在中国，待在中国最低层的乡村和城镇，长达四十年——这个光阴要长过他待在美国的岁月。

毫无疑问，如此漫长的光阴沉淀之中，他身为中国人的资格，要大于美国人的资格。因此，他活着时，被称为“在美国的中国代言人”。各国总统和外交官争相阅读他的书籍，寻找有关中国事务的信息，把他的判断当成自己的判断。也因此，明恩溥不仅只是一位中国观察家和评论者，更是一个中国事务的参与者。这就不难想象，在那历史关键点上，他为中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抉择……

1900年前后，满清政府统治下，义和团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毫无章法的社会暴乱。为了拯救暴乱中的本国侨民，也为了惩罚中国，八国

组成联军攻陷了北京。如果我们以严格的因果观来看待这件事，无疑会发现这是一件维和事务与侵略实质交织的历史悲剧。

悲剧尘埃落定。列强让不负责任的满清政府签下了一笔赔款单——《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作为对满清政府的一种惩罚，当时的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这种侮辱性的惩罚，本已贫穷不堪的中国人必须要认了，且必须要打落牙、和血吞。这一国际赔款史上最大罚单，几乎一夜之间把贫穷的中国人打入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渊。为此，西方主要国家的有识之士对之深怀忧虑。很多深谋远虑的人担心，以普法战争的直观经验担心，中国有朝一日繁荣富强了，会怀着深深的仇恨报复西方。子子孙孙恩仇无尽，这并不是东西方文明必须要面对的结果。

成船成船的白银，从一无所有的中国运出，赔付给各国，以弥补诸国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的损失，同时也带给了中国人民无尽的屈辱与愤恨。

1906年，受下属的推荐，仔细阅读完了《中国人的性格》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人所皆知的老罗斯福，面对着成吨白银的赔款，心有所感，特意邀请明恩溥到白宫做客，倾听这位中国代言人的意见。

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老罗斯福总统读出了怜悯。这位非常容易被文学作品感染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总统。他深受美国人崇敬，成功化解了国内的劳资危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挑战了黑幕重重的金融体制，支持“扒粪者”揭露黑幕，调停了日俄战争，倡导环境保护，并获得了1906年度的诺贝尔奖和平奖。而明恩溥则在义和团运动中九死一生、侥幸逃脱。他曾经不断地给外界以警告，提请中国和世界都注意中国人的处境，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然而，他一直被忽略了。

1906年初，老罗斯福亲笔写信给明恩溥这位最受美国人尊敬的中国专家，谈论《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并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我感到我已经超出了我所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真实信息，比任何书都多，

这是我读过的有关中国问题最好的著作……我深深同情于中国人民的处境。”

1906年3月6日，明恩溥从中国乡村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白宫，会见自己的这位超级读者。那时，明恩溥已经60岁了。他须发皆白，因为在中国这片保守苦难的土地上待得太久而身形消瘦，眉宇间有一种美国人所难见到的饱经风霜的气质，同时又充满智慧与儒雅。他向后梳理着头发，胡须打理得井井有条，目光炯炯，神情坚定，气质高雅。

大权在握的罗斯福总统见多识广，与无数的国家元首、世界各界杰出人士会过面、打过交道。但一见明恩溥，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位从中国乡村来的神父让他联想起慈祥的父亲，不得不尊重与信任，从没有一个君王、皇帝会让他产生过这种感觉。

总统开门见山地询问明恩溥，他应该如何处置同中国人的关系。明恩溥说一切都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写着，他说中国刚刚经历过内乱，中国人很苦，生活很艰难，一个良善的国家不应趁火打劫，而应充分巩固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罗斯福总统被他这个简单明了的原则给击中了，他从办公桌后面一跃而起，开始在办公室内逡巡。

罗斯福问，难不成扣除掉我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偿之外，把多余的赔款全部退给满清政府，一退了之？

明恩溥摇了摇头，他比任何中国人更了解他们头顶上那个所谓的朝廷与政府。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他详细地分析过中国的贵族、士人、官僚与差役们，他知道他们的见识，他们的眼量乃至他们的腐朽。这一笔收刮自民众的赔款，简简单单地被退还到官僚们手中，无异于羊入狼口。

有关如何发展中国，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时反反复复地思考过，他有着最坚定的要求、最大的信心和最周全的思考。这次上天给予他这个机会，虽已年过六旬，他立刻被点燃了，以他固有的“灵活

机动的演说”，细致地描述了他的计划：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铁路网、电报邮传网、金融，但中国人没有变，中国人的性格没有变。因此，得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让中国民众受益，为中国建大学、建医院、建立医学院，建设公益事业，为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打开长期而稳固的非官方通道，给中国人学习文明的机会，培育他们巩固自身文明的能力——这是一揽子的“振兴中华”的计划。明恩溥这个美国牧师之子，比当时任何号称爱中国的满清贵族、维新党人乃至革命党人都要仔细。他说，这代表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意见。

老罗斯福总统的热情也被明恩溥点燃了，他一边兴奋地来回走着，一边不断地嘟哝着：“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现在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

明恩溥从容而周详地说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奠定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其结果，至今还发挥着重要影响。

就在明恩溥的建议之下，美国政府开始退还一半的“庚子赔款”，在当时折合一千一百万美元。这些钱被用于建立留美预备学堂，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用于资助那些有志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青年学子赴美学习，等等。其中留美预备学堂就是至今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几代的中国精英，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去的，他们已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就是一本书和一个国家命运之间的故事。一切，都从这本小小的书——《中国人的性格》开始……

原书序　我所见之中国人[1]

明恩溥

在法庭上，人们总是要求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只是真话。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当中，大概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让他们讲出全面的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书必须面对来自三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关于中华民族，我曾写过中国人不少优秀的品质，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那些具体的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连续烧掉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些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流。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足够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冠冕堂皇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

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佬的特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佬。”[2]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的民族。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人似乎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3]

还有一些人提出了第三种反对意见，即本书所阐发的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道德特征的观点，对中国人产生了误解和不公正，可能误导人们的看法。

然而，大家必须要记住，印象随笔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它冲出的照片，没有哪两张是完全相同的。但每一张底片，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出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镜头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各有差异。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然而，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与笔者是完全一致的。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在某些部位润色一下、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

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时间十分仓促，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特性的文字有三分之一被删减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增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美好德操，我们理所当然要大加由衷的赞美。同时，我们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束缚，过于抬高他们实际上所不具有的道德品行——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了小说家萨克雷。曾经有人询问他，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怎么会有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是机智过人。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并没有做出深入的思考。有一幅表现橡树姿态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来。他正抱着臂，低下头，站在圣赫勒拿岛。起先，长时间地盯着画面看，往往一无所获。如此这般，欣赏者未免要指责作者牵强附会。可是，一旦经由他人稍稍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能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常常会看到，但却并没有被深深地注意到，而一旦被指出来引起注意，就会令人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中的文章，并不是立意于对整个中华帝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大杂烩。这点，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本人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仅仅只能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条这样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光柱。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这里所涉及的诸多细节不仅仅是笔者的体验，也是其他各种人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只不过，在这里，它们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我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密迪乐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一位。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的性格有了许多

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相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要详尽记录着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对外国人来说非同寻常的事件，并附有该国人士对该事件的说明。

正是通过大量的此类事件，才能推出一个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遭到质疑或者完全被否定，但所列举的那些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丢在一边。未来任何有关中国人性格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最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显然，许多被视为属于中国人“性格”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通过阅读本书，你将会看到这一点。至于到底准确与否，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加以判断。

据说，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现如今，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和研读他们的戏剧。这些研究途径无疑有其自身价值的，但似乎这其中还会有第四条途径。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是这一途径并不能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那就是研究那些居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深入其家庭生活中去。正如身在农村比在城市里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风貌，在农村里，也更易掌握一种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他所能获取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他在中国农村住上十二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

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看做是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因此，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观点，它们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自己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没有太多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性格的问题，也不贸然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性格中的确表现出了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在此基础上，这些

缺陷如何去纠正，才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谈论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去改善他们，都将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能不感兴趣的一个专题。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使以往它们都被忽略，这些结论依然将会得到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获得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多年以前，额尔金勋爵士与上海的商界有过一次问答。时至今日，他的话依然是非常正确的和中允的。他说：“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衰退与残缺，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令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行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要想走上战胜这个猜疑重重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的道路，必须要使人们明白，抵达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生活原则，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本书作者明恩溥

第一章　“面子”问题

第一眼看去，把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脸面”，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可能让人觉得十分荒谬。但是在中国，他们所讲的“面子”，可不仅仅指的是脑袋上朝前面的那一部分。它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内涵之丰富，比我们目前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大致理解“面子”的意思，哪怕是作一个不全面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是一个普遍具有爱演戏本事的民族。戏剧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热衷于看戏剧演出，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略辨析，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各种戏剧化的姿势，诸如鞠躬行礼、下跪叩拜、伏地不起、以头抢地。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些姿态如果说看起来不是荒唐可笑的话，至少也是纯粹多余的。而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方式进行日常思维。当一个人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个人的讲话，就好像是面对着千万个人。他大声地说道：“我可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的麻烦去尽、心满意足，他会说自己是体面地“下了台”；如果没有摆平，心情糟糕，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面“下台去”。显然，所有这些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关键不在于事实究竟如何，而完全是个形式的问题。只要把一切看做一场戏，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偷偷进入每一个幕后查看真相，因为那将会糟蹋世界上的所有好戏。

在中国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做出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如果明知对方在表演，不理会他们，小看他

们，阻挠对方的展示，他们就会很“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一词中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正是打开中国人最重要性格密码箱的钥匙。



中国人的面孔

应该一提的是，中国人如何做到向对方给足“面子”，其技巧和造诣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理解力。与中国人相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径直进入与之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太平洋诸岛的图腾禁忌，是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问题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不可简化为具体的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大家一致的感受而废止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彼此存在着巨大差异，因为他们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

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见的那些纷争之时，“和事佬们”必须认真斟酌、推敲各方面的“面子”的平衡，这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贯彻客观公正的原则，而是按照适当

的比例，对所有有关人等的“面子”进行分配。绝对的客观公正，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他们能从道理上认同这点，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认为不可能实现。同样，即使在法律的诉讼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法律裁决，在所谓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纯粹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千万不能照单全收，统统拒绝自然是很少见或者根本不可能的。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犯了错误被揭发出来是“大失面子”的事情，所以，无论你掌握多么确凿的证据，也要为对方保住“面子”，委婉加以处置。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明证当前，他也会不客气地断然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宣称找到了球（而球其实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小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宣称是她找到的。如是这般，他们的“面子”就被保住了。

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会向主人提出辞职，并且傲气凌人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就不要了。”这样，他占得了上风，自己的“面子”便得以保全了。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了，于是他便找到欠债人，当众发狠，威胁对方，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对付你。虽然，他最终还是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将来不会有人再赖他的账了。一位仆人疏忽大意，或拒绝做某些分内之事，在他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之前，他会故意再度犯错，并自己提出辞呈，以保住他的“面子”。

就算是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但我们听说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的地方官，在犯罪被朝廷斩首之前，可以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就是准许穿戴官袍用刑。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保住他的那个“面子”！

第二章　节俭问题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保持家庭的收支平衡。遵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至少包括三个不同方面的含义：一是节制花销，二是制止浪费，三是尽可能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平衡。无论这三个方面的哪一方面，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高手。

很多到过中国旅行的人，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当地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如此之多的人口，几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物、蔬菜和鱼。以上诸种，再加上一点其他的食物，就是这亿万人主要的食品。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遇到特别的事情，才能增加一点点肉。

如今在西方各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有人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最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美分，就完全能够得到足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年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半美分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做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饪大师。

在美食方面，温格罗夫·库克认为，中国人应该列于法国人之下，但在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的烹调水准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的水准一定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显然是无可置疑的。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里，我已经说过，即使以一个生理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对主要食材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物原料简单，烹饪出来的菜肴却是花样繁多，其烹饪技术之完美，这点，即使是对中国烹饪

技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耳闻。

一直以来，还有一件事情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思，它很容易被你去证实：中国人在做饭菜时很少浪费，所有的食材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寻常的中国人家，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非常少，食物的价值很少被浪费。即使有剩下的，都留待下次再用。想要佐证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养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这些家养动物，靠着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命”，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新兴的列强之国中，人们习惯于铺张浪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毫不怀疑，诸如美国这样生活优裕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食物，有可能足够亚洲六千万人过上相对宽松一点的生活。我们确实期待着能看到这些剩余的食物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酒足饭饱”之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让仆人和孩子享用。甚至在喝完茶后，他们把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下次热过后再喝！

还有一个无论在何时何处都会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中国人对食材并不挑剔，而且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分地讲究。天地万物什么东西都迟早能成为他们的网罗中的“鱼”，不能入口的东西寥寥无几。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人们普遍驱使马、牛、骡子和驴子干活。在很大一片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下面所列举出的事实，抖落出来会让我们一些读者看来，中国人显然是太过于节俭了：通常，所有的这些牲口只要一死，无论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之死，都会被很快地吃掉。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牲口死了，就得把它吃掉，此举乃是天经地义，并不会引起非议。若是这些牲畜偶尔死于像胸膜炎肺炎一类恶性的传染病，大家也依然是这样做。自然，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并不如自然死亡的牲畜的肉，因此其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可最终，这些肉还都被卖光了，也都被人吃尽了。人们也都明白，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好影响，但还是乐意少花钱冒险去吃这种肉。无非是贪图便宜罢了。

当然，应该说，真正吃出问题来的倒是不常见的。何止死马、死

骡、死驴，连死狗、死猫也一样被吃了，并消化掉。我曾不止一次地亲身经历过，因为不堪其扰，村民们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杀，然后煮了吃掉。其中有几个小心谨慎的人，提议去问问洋大夫吃了这种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坏处。但狗“已经下锅了”，这几个人都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他们这次也不可能眼睁睁放弃这顿到嘴的美餐。结果，在此次大快朵颐之后，他们居然仍是平安无恙！

另一个与做饭有关的事例，也很能证明中国人的勤俭节约，这就是，他们在烹饪时充分考虑到高效利用柴火。在中国，燃料是非常缺乏而非常宝贵的，一般而言，燃料有树叶和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的燃烧速度飞快，一把火就烧没了。为了让食物能熟得快，所有的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使用起来更要特别小心。在此，顺便说一下收集这些燃料的过程，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表现出中国人的节俭已经到达了极点。在中国的每个小孩，即使他无力干其他的重活，但至少还能去拾柴火。到了秋冬时节，漫山遍野是拾柴火的大军，蔚为壮观。只见他们手持竹耙扫荡田野，连一根干草也不会留下。孩子们都被派到树林里去，把枝头尚未凋零的秋叶打落下来，就仿佛他们收成熟的栗子一样。至于田野中的稻草，甚至秋风还没有将它们吹起，就早已被那些勤劳的人们“抓捕”起来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们都擅长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利用起来虽然说不上美观，但真的是实用。这是议会中所有“家政研究”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布料，在另一处肯定能用上。即使是那些零碎的布头，还可以用来纳成鞋底。一个伦敦和纽约的慈善家，会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他内心真切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为靠救济过活，而感到耻辱，否则，他们只会受到伤害。但是，不管是谁把同样的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服饰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但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些衣服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会被浪费，甚至能与其他布料巧妙地配合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会给朋友送一些题词的条幅。题完词的纸被简单地缝在一块绢帛上。用线缝而不用糨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好另有用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很方便地用来更换绢帛上的字。这样一来，他就会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绢帛！

中国人的节俭也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再小的细节，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比如说，一个杂货铺的商人能准确地报出各种火柴盒中火柴的根数。他也精确地知道每盒火柴能赚到多少利润。

中国人的旧账簿用完后，每一张纸都能派上用场，或者是糊窗子，或者用来糊灯笼。

中国人的节俭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就连确实必要的食品也尽量节俭。他们会为了省钱而忍饥挨饿，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B.亨利博士[4]在他的《十字架和龙》一书中记录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二十三英里的路送他到目的地。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施舍的免费的早餐。在吃早餐之前，他们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担轿子负重而行的，只是为了节省五美分！

还有另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然后撑着船回去。自早上六点钟起，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吃过，却舍不得花上三美分买两大碗米饭吃。后来，那只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两点才到达广州。而这些人已经是二十七小时粒米未进了，还抬着一个人走了三十五英里的路。这时，他们竟然还提出抬着亨利博士前去广州，继续走十五英里，还要带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如此节俭的活法，确实很难令他们赞同。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表示赞赏。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一年的好几个月里，特别是北方地区（说起来很怪），男孩和女孩就像是穿着“伊甸园的服饰”，完全光着身子到处乱跑。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样不穿衣服让孩子们更舒服一些，但其实，目的还是为了节俭衣服。中国人所使用的独轮车，有相当大部分推动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只要加上几滴油，车子的响声就

会消失殆尽。这种响声从来不会停止，因为对那些“浑浑噩噩”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几滴油更便宜。

如果是一位日本侨民在租屋子，他会在合同里特别要求每天必须得有几加仑的热水，以方便他按照老习惯洗澡。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洗过。甚至，很多人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扫帚拍去她孩子身上的灰尘，就好奇地问她：“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天天洗澡？”这位中国母亲不甚愉快地回答道，“打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澡。”肥皂的零售商们喜欢把“像泥土一样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即使如此，也不会吸引一般中国人的兴趣。

中国人一定把外国人都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这正如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评价一样。在中国，人们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所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相比，显然还有一定距离。我们不能把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完全归于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但依然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虽身处贫寒，但还整洁得值得我们去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使然，在中国，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一些部分的“半成品”，然后自己动手加工组装。一般而言，自己动手总比买加工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结果完全的成品当然也就不出售了。

我们曾经谈论过许多中国人在物质上节俭的方式，比方说，在普通人家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会开一个洞。在洞中摆上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最具有典型性的节俭典范，可以在中国的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看到。在我们看来，这类作坊与其说表现出高明的手艺，不如说是表现中国人在节俭方面的某些才能。

就这些工作而言，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工艺方式，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没有人去改善一丁点。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方法，但却提供不了任何一种如中国人这般用料少、成效高的办法。他们似乎

能够胜任任何一种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性质。比如，他们的炼铁炉就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却能长期地用下去，很好使，成本几乎为零。

在中国，即使在完成重大事务工作上，也会以节俭优先。表现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贡粮进京的管理。这个过程井井有条，也可以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贡粮被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南方运抵天津，再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堆积如山的稻谷要卸货、称量和运输，需要各种器械。然而，让西方国家的那些“谷物交易商们”注定大吃一惊的是，在这里，完成这些工作的，只是靠一大帮的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那壮观的谷物交易所，最终所剩下的仅仅只是光秃秃的泥岸！



码头上背货的苦力

在美洲的烟草种植园里，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农村，种植烟草的人这桩花费根本不贵。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又是很好的燃料。烟叶被摘下时，粗硬的叶柄依然留着，再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在夜里再把它们挂起来，就像衣服晾晒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简直太容易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在中国居住过的人都能够通过细心观察，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这个故事更为典型的事例了：这个故事是说一位中国老妇人，人们见她步履蹒跚地挪着步子，痛苦万分状，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更近些，这样一来，就能节省一点抬棺材的费用了！

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指的是努力不懈、勤勉地去做任何工作——即对事务坚持不变的关注。在当今的世界上，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三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强度；换句话说，它可以分解为两个表示规模一个表示力度的性质。所谓长度，是指保持勤劳的时间范畴；所谓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数量；所谓强度，是指“投身于勤奋”和“专心致志”的精力。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才会有所成就。

通常看来，偶尔到中国游玩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此处的侨民，两者对于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认真履行着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似乎每个人都在忙什么。中国社会自然也会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他们也可以不用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像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有钱人仍然像他在白手起家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他们工作起来很努力，不会有丝毫的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让我们分别看一看不同的阶层所体现的勤劳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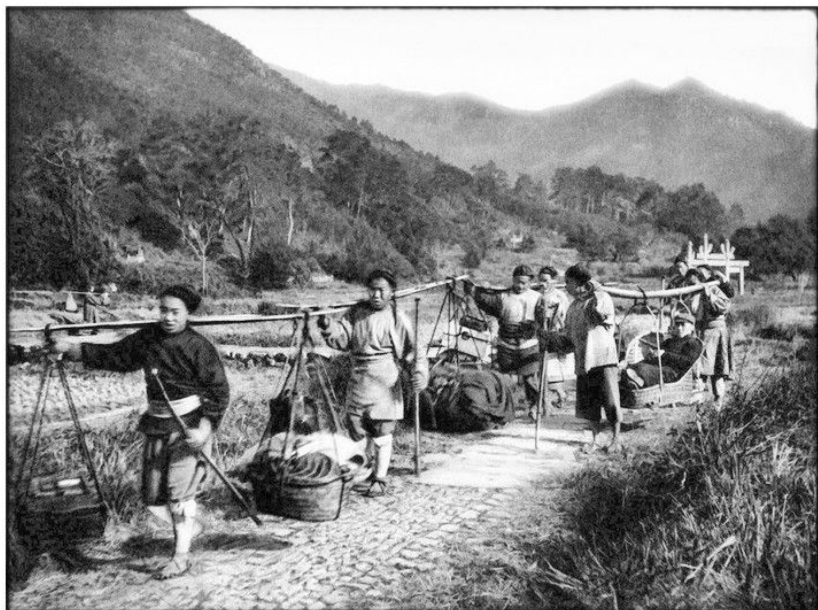
西方人很难认同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这种体制的整体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在这种学习体制中能很好锻炼“只为勤奋、不求回报”的精神。对于那些有钱人购买学位和官衔，这种后门永远敞开。这点，似乎会挫伤一些读书人的热情。但买卖官职的不公正行为并不影响大局。每一个省份都在抱

怨，从最低级别的考场，到最高级别的考场，每一个职位上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的考场都是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

只要我们去估算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鲜明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在《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勤奋的典型，或者如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把书本绑在耕牛角上一边犁田一边温习，时至今日依然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所效仿。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人能获得诸如“秀才”这样的初步学衔就开始放弃走读书这条路了。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士”。而把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学业有成的人。除了在中国，我们又能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做官参加同样的科举考试竞争，经过漫长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直到八十岁时才能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北京的《邸报》上刊登了一些资料，其中有关于各省科举中老年考生的事。在福建巡抚的报告中说，福州秋季乡试的考场，有九位考生超过八十岁，有两位考生超过了九十岁。他们都通过了规定的考试，他们提交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有力、准确。他还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时已年过六十，在此期间已参加了三次乡试，如果这第四次再不通过，当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河南巡抚也以同样报告说，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的考生，一位超过九十岁的考生。他们全部“经历为期九日之科察，其文笔精练，行文甚佳，并无垂暮之气也”。这个报告已经很惊人，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三十五位考生超过八十高龄，十九位考生超过九十岁！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能见到这样的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勤奋不止，那么，农民的勤奋则丝毫不亚于他们。中国农民的劳作如一位庄园大管家所操的心那样，没完没了。在北方各省里，除了冬至前后有一小段的空闲时间之外，一年到头，农民们根本没有闲的时候，总有大量的活要干。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都是很忙碌的，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乡间的农民

农民阶级是这样，那些长期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的劳工同样也是如此。一个农民要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小心地清除掉叶子上各种害虫。同样，一名劳工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这样才能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也填饱他一家人的肚子。那些偶尔经由乡间行走的人，往往过了半夜就要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一种风俗。无论你何时走在乡间的路上，都可看见手拿粪耙，肩背背篓的农民矮小的身影，在弯腰拾粪。当没有其他的活计可干的时候，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人们还经常为了养家糊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这种情景在中国也是比比皆是。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橇，搞搬运，赚点小钱。这种冰橇可以提供价格极低的运输。同样，某些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会充分利用农闲时间编制帽子，编织穗带，如今这种帽子已经作为大宗出口产品外销。中国妇女总是不停歇地手纳鞋底，即使是在村口闲聊时，她们也不会停下手中的活计；除此之外，她们还在纺棉线，以备纺成纱织成布。总之，她们从来不会

闲着无事。

上面所提及的那两个阶层的勤勉，在商人及其雇员身上也得以充分体现。即使是在西方，身为商店职员的生活也不是清闲的。但相比较起来，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活计很是繁重，只是在相对不忙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总是开市很早，打烊很晚。那种记账制度采用传统的复式簿记法，非常复杂，使得账房先生为了获得收支和平衡的账目，常常要忙到深夜。实在无事可做，店员们就坐下来，挑拣收进来的铜钱，寻找那些能卖出大价钱的上古时代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劳动强度最大的阶层，乃是最让人羡慕，每一个有志的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层各级官员，都需要亲自埋头于各种公务，且都必须对每桩事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败负责到底。而此类公务数量之巨、事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如今，正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我们的工会组织，看到下面的这张日程安排，会做何感想呢？

这份日程表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一位政治要员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每天究竟有多少的要务需要处理。因为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太过于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门，因为三点至六点他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大臣，六点至九点他要在朝中内阁议事。他是兵部大臣，九点至十一点要在兵部办公。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十一点至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室。他还是总理衙门的资深大臣之一，每天下午两点至五六点要在总理衙门办公。这些还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要参加其他一些特别或者临时的会议，他得见缝插针地为这些临时事务和其他的部门工作。因此，他很少在傍晚七八点钟之前到家。”

据说，在与这位外国翻译官做了此次访谈的六个月之后，那位官员就因劳累过度而感到心力交瘁，不久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发生此类的

事件并非不可能。显然，若他们能坚持下去，自然对政府而言是很有益的事情。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长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的勤劳在这两个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日，开始于天色未明之时，甚至常常是后半夜时分。正当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墨菲斯的怀抱里，中国的皇帝已经开始准备一天的早朝。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天子的一言一行不同程度地被各地臣民效仿，如风靡草，举国上下，皆是如此。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匠、上海的磨坊伙计，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匠和筛面公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亮之前很久，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伫立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天一亮，他们就可以出售自己的蔬菜了！

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早已经结束。在某个夏季清晨的五点半过后，如果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走走，就更能充分感受到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差了。那些在黄浦江边的高楼洋房里办公、做生意的慵懒欧洲人，此刻还毫无动静，而亚洲人却挤满了街道，并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再过上几小时之后，当西方人开始挤上人行道，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去上班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他们半天的活计。



外国明信片上的上海风貌

约翰·戴维斯爵士关于中国人“热爱劳动”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永远愉快地进行着自己的劳动，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方面是相当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素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性格之一，但要正确地理解它，则需要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和细致的推敲。

接下来，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值得再说上几句。中国人是典型的亚洲人。他们的工作模式也是典型的亚细亚式的。试图以我们的模式对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进行改造，那将只是一种徒劳。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尽管有悠久的宗教和哲学交替影响，中国人却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就像是荷马史诗里的诸神一样，他们从来都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想到，有朝一日，当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哪一方将会败下阵来？

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这正是所罗门王所叙之经济格言。假如这

一格言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理所应当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用以克服品德素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他们缺乏诸多如信仰之类“恒久美德”的基本素养。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毫无疑问指日可待的了。无论如何，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求真和诚信这样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圆满的回报。

第四章　讲究礼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乃至所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角度与我们大为不同——其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总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许多优秀的品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坚忍不拔，温文尔雅则并不重要。因此，当我们到了东方之后，会发现有广阔的亚洲大陆上的居民在处理纠纷、调节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灵活得多的技巧。我们内心不由得充满艳羡。这是疏于实干者对于能说会道者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彼此间的礼节提升到一个完美的境地中。这一境地，是西方人所未知的。且只有亲身体验，必然出乎西方人的意料，并几乎是他们无可想象的。

我们知悉，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还想生存下去，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的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先贤们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国家，这一切只使用在宫廷和外交往来的过程中。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我们是说，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到了特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什么时候是需要这样做的恰当时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如何才能举止得体，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九九得几那样，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人的礼节不是很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怀有一种理念："礼貌是某种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真诚的意愿。"在西方文明中，这一定义的基础是把理论上的"个人的幸福"看做是"全体人的幸

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则是完全与之相反。礼节就像某种技艺的表演一样，这些专业的表演是全部生活技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人表示礼节可以不完全是整个内心或者头脑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生活整体中几个组成部分的需要。

有关礼节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目前既有的社会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他们头昏脑涨。可是，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用语的使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有前因就有后果，有后果也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场合，那么该前的就得前，该后的就得后，各得其所，万事畅通。就像互相在博弈，下一盘棋，先走的一方必须说：“鄙人的王翼兵先向前走两格。”随后，对手则会说：“鄙人的王翼兵也走两格。”接下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人王的马要吃阁下王翼的卒，请赶快把阁下的象向王位动三格”。[5]如此你来我往，直到整盘棋下完。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这些客套的形容词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设想好下一步的出棋，若稀里糊涂地下棋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说不出这些客套的形容词就等于是无知。

与此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在中心城市里，中国人的礼仪是最严格、最正统的。与这些中心城市的距离，会影响到人们恪守礼节的程度。如果是一个庄稼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有极少数的中国人是不怎么懂在恰当的场合遵守礼节的。即使如此，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就像是一个尚未离开襁褓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这个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经验，又比较小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

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中规中矩。很显然，西方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连中国礼节最浅显的门道也难以摸清，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行为也会表现出那样的迟钝与不自然。这点，他们自己也承认不讳。也正因为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节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士人们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并自然而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夷蛮之人”。



作揖的官员

礼节，就像是一个气垫子。其实，它的里面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却能够很好地起到缓冲颠簸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得公正地补

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节（完全如同与自己的同胞相处时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急欲显示自己深谙如何待人接物之道，而不是考虑到客人本身是否感到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却偏偏执意如此；结果四处弥散的烟火，熏得你泪流满面。你喝下的那杯茶就好像是一杯苦药，但是，主人仍然相信自己的这些做法至少表明了他善于待客，倘若客人自己不甚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

与之相似的，倘若你在乡下租了一间较差的房子过宿，房子的主人会觉得他理所当然地要为你把房间打扫一下，并（象征性地）布置一下。这一举止会一直持续到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对你制止打扫的愿望置之一旁，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或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屋必扫”吧。主人就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

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正是遵循这一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前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她特意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了个礼，结果弄得女主人感到惊讶和气恼。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帝所在的方向，所以她必须朝北叩拜，而不用在意女主人正坐在房子的南边。既然这位外国夫人自己不清楚应当坐在屋子的什么方位时，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坐在哪儿，会怎么想；至少，她表明自己是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头的！

中国人的礼节常常表现在送礼这件事上。正如前文所述，送礼是给受礼人“面子”。送礼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

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外用红纸包得清清楚楚、内装油腻糕点的礼品盒。这些点心他根本不会吃。但是，即使受礼者反复表示不能接受，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表示不愿意接受，送礼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他最后只得把这些东西全部转送给其他中国人。

中国人的礼节是决不允许人们对礼物“讲究不尽”。送礼的人经常会被问到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在与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这一句公式般的话：“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又让你们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一次中国婚礼。婚宴上陈列出各式各样的糕点。婚宴进行到高潮时，端上一盘子糕点，仅有两三块，热气腾腾而受到夸耀（也许大家都喜欢热的）。由于那位外国人是贵客，所以这个糕点盘子最先端给了他，而他却婉言谢绝了。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这件事给正在进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子糕点后来没传给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

原来，按照本地的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送上一份礼钱帮衬主人家。按惯例，当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直接收钱。但在中国人看来，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于是，就以向客人送热糕点为托辞。每个在场的中国人都知道送这盘热糕点的用意，唯独这位外国人蒙在鼓里，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在当时拿出自己的红包。后来，这位外国人又应邀参加这一家举行的另一次婚宴，这次，这个老外饶有趣味地听到婚礼司仪这一回比西方人还直截了当地对来宾们宣布：“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大家把红包放这儿来吧！”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人礼节中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置之不理，因为那些礼节的核心无非各种规矩。但是，我们依然要在社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如果西方人坚定的独立自主精神，加入一定量的东方人的儒雅，那一切自然将再好不过。

然而，许多西方人似乎永远不会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以至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都市里的举止习惯。当他后来回伦敦居住的时候，他依然按照老习惯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时，这位朋友极度无情地嘲笑他说："看清楚了，老朋友，这里可不是你们法国猴子耍把戏的地方！"谁若能够集东西方之精华于一体，谁能够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他就将是幸福的。

第五章　疏于时间

当今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流行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一个商务工作者能在特定的商务时间里应付好各种事务，这在上一个世纪[6]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基于其自身的素质为这场革命做了预先的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也曾经碌碌无为，只知道吃喝和打斗，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还是能看到，我们民族是具有冲劲的民族，这种冲劲驱使每个人无休止地去做一桩又一桩事情。

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鲜明差异。中国人遇到他的同仁时说："吃饭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在这种情况下问："你好吗？"[7]我们看来，做事，是一个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饭问题一样。由此可见，对我们而言，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的东方人一样，则显得悠然自在。

中国人的一天仅有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十二个部分。他们所说的"午时"是指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之间这整个时间段里任何一个钟点。我们曾经听到一位中国人在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月亮几时上中天？"如果用更为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时几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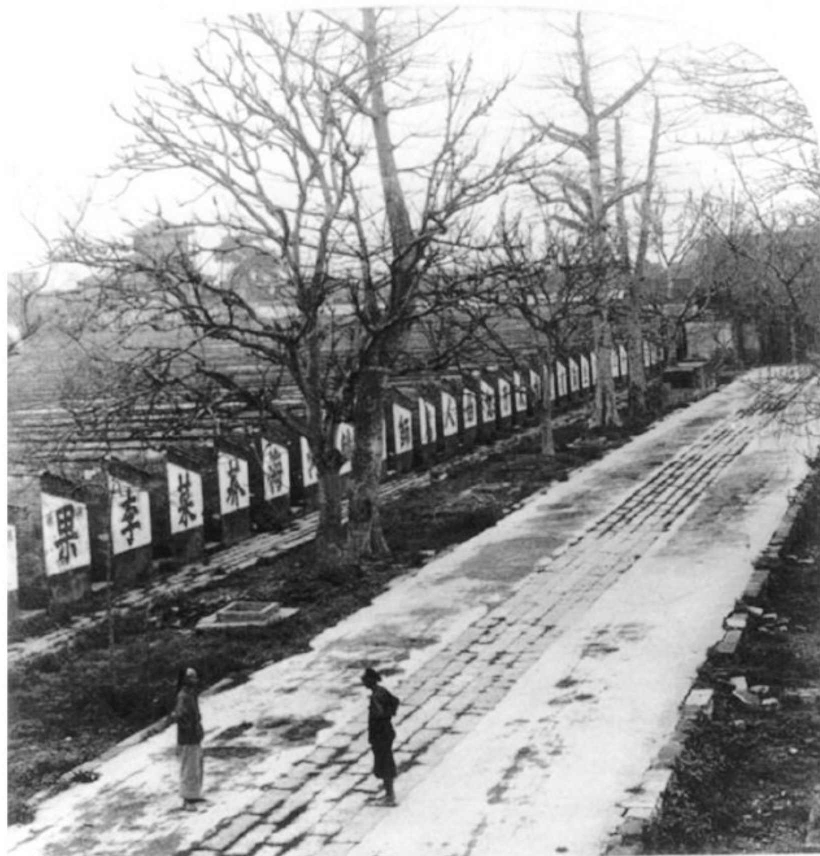
在日常生活的时间用语中，几乎都带有类似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可能是最精确的时间概念了，尽管他们置身于很大经纬度的跨度中。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同样模糊不清。只有最后一更除外，它通常与天慢慢放亮联系在一起，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市里，"更"所指的时间段也或多或少有些不确定。

对于我们所称之为可随身携带的计时的钟表，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之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擦洗一下，以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会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普通的人，则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推测时间的，把太阳高度说成是“一竿”、“两竿”或“几竿”高。如果遇到阴天，就通过猫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获知大致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样的时间概念已经是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不精确测算有很大的关联。根据西尼·史密斯[8]的划分，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之后的人发现，一个人的寿命已经无法达到几百岁那么长，更不可能长达近千岁。所以，他们就得学会抓紧时间，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之相反，大洪水前的人则没有意识到长寿的玛士撒拉[9]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仍然在依照家族的陈规按部就班地安排。

中国人应该可以算成是“大洪水之前的人”。一个出色的中国说书人，比如被茶馆老板雇来吸引和留住顾客的那些说书人，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10]某部“滔滔不绝”的诗篇。茶客们可以来了又走，但他却是“没完没了”不停地说。演戏也是一样，有时，一场戏要连续演上好几天。虽然与泰国的戏相比，中国的戏剧还不能算太长——我们看过泰国戏的人说，有的戏接连演了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戏法表演，是极其的智慧和高超，且风趣有味，但这些戏法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总要向观众说一大堆啰里啰嗦的开场白。这段话如此之冗长，以至于外国观众还没看戏，就已经后悔自己不应该到场了。

最为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筵席上的菜肴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而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几乎是没完没了。尽管中国人自己乐此不疲，直到散席时还意犹未尽，但所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对于落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夷蛮之人”[11]却感到，这一句原本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总是迟迟才得以兑现。



晚清科举贡院外景

中国人自打呱呱坠地之始，就完全习惯于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规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待在学堂里读书，从日出到日落，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稍稍停歇一下。除此之外，无论是学生还是先生，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的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绝顶的考试中体验到了诸多的不便，但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怀疑，这种考试对于检验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有着一种天然的缺陷的。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精神成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要掌握这种语言，需要玛士撒

拉那样漫长的一生时间。这就好比是与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如果强迫他们全身心投入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就将永远不会说出或者写出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以追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尔后，则是一条混浊、舒缓、漫长的历史长河。在它的两岸，既有既往时代的高大乔木，也有无数枯朽的树木、枯枝和枯草。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民族，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这么大的“肚量”能装下它们。

中国人对时间的疏忽，还表现在他们勤劳的力度上。正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在勤勉的强度上，中国人完全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的那样。

有幸在中国搞过建筑的，并与中国的包工头和工匠们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和他们合作盖房呢？那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他们常常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起茶来。他们用一个小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几夸脱[12]的灰浆；如果改用独轮车来推的话，工作效率能够提高三倍。可是谁也不愿意这样干。只要是碰上一点的小雨，整个工程都要停下来。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因此，雇主往往很难看出这些人每天到底干了多少活。我们听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嫌他雇佣的木匠们钉板条的速度太缓慢，于是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结果在木匠们吃饭的工夫，他一个人完成了四个木匠半天的活计。

对中国的工匠们来说，就连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桩很花时间、劳精费神的事情。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工具会莫名其妙地就坏了，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承认曾经动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们所有人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了脚手架。整个施工期间，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以前所积累的有关安全施工的经验全被置之不理。沙子、石灰和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没有一样是合格材料。外国人是如此的孤立无援，就像《格利佛游记》[13]中格列佛在小人国遭遇的一样，他被无数的细绳拉倒在地，这些线结合在

一起，千头万绪，多得令他疲于应付。

我们会一直记住一位广东的包工头，他对施工的承诺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因为他是个鸦片鬼。最后，雇主们忍无可忍，便把这位包工头犯下的实在过分的错误摆到了他的面前。“已经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过三个窗子好几遍。可是你，每一个窗户统统都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扇也关不拢，门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太短了，数量也不够，还都是节疤孔，而且没有彻底铺好。”听着雇主这一番严词指责，这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乎有些忧伤，然后便以一种文雅的抗议语调说道：“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君子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急急躁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没理由的。很显然，中国人不高兴我们的性格中缺乏耐心的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学会重视迅速和敏捷的重要性，那依然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说过，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大包在相距十二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只是因为邮差的那匹驴子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递系统的管理也极为混乱，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

然而，最令外国人讨厌的是，还有中国人在登门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满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类似的访问是有特定的时间限度的，他们一般不会超过时间的。但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时间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让客人留下来过宿，这位客人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即使主人精疲力尽了，客人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和你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谈了不少话，不知在说些什么，或者无话可说，也不提出告辞。

一位杰出的牧师曾说过这样的箴言：“想见我的人就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无论时间有多长，他一定会对他的箴言进行改正。在接待过几次中国人的来访后，他肯定会效仿另一位繁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醒目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神保

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常常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口说话了，便把谚语所言之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上山打虎易，求人开口难！”

如果所有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锡医生那样感觉会好多了。他发觉他的中国朋友不断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工作。于是，他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一样；我还有急事，敬请原谅。”外国人能够像一位天真的中国学生说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感觉就更好了。那位中国学生刚学会一些英文短语，就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结果，说得老师晕头转向。他是在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

第六章　疏于精确

外国人初到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眼印象就是千人一面。他们的面孔似乎都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所有人身上总是穿着蓝布衣服，每一双眼里的“焦点”都好似一成不变，好像发直了一样。两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就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中国人，只要略加体验，即使是一个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也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任意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隔越远，差异就越大，日积月累，以至于形成不同的“方言”。

常常会有人郑重地提醒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被告之，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来讲，那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最普遍的是，计量标准上的不一致。而在西方国家，统一、恒定的度量衡是保证生活舒适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些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常常是令人苦恼不已的，而对中国人，却能从中获得乐趣。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值得去抱怨什么。向一位卖猪肉水饺的人询问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水饺，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么多面粉能做成多少水饺，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

同样，有人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给出的重量似乎太轻了，与实值相差太大。最后，他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一位仆人被问及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的数没有把肩膀以上的部位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里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为他

要担运物资。既然一个中国士兵的脑袋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所以他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与这种算法相反，一位乡下人硬说他的家“离城九十里”，但经过盘问，他才承认消减一点。他承认那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满清新军的军官与士兵

在中国，有关计量最不一致的突出事例，就是计量铜钱——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的办法。这个国家所有地方都采用十进制，这的确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但是，在中国没有人敢打包票说“一贯钱”理所当然就是一百个铜钱，除非他亲自数好串好。走遍了十八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我们就会发现一贯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贯”就是“一百个”铜钱，但事实上从一百个至九十九个、九十八个、九十六个、八十三个（如山西太原），直到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个，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

白银交易中的称重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除非是巧合，任意两个地区的“两”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这种情况把外国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与白银有关的商人，

其他人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诚信守实的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动机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这一现象存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度量标准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在征粮中总是采用这种混乱的“斗”，如果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就很容易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全世界都一样。”这句话在中国却是不适用的，一“斗”不是一“斗”，一磅也不是一磅。每一种随意所造成的混乱，在中国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这种武断的标准随处还加以应用（例如在盐业专卖中），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买家付的是十六两一斤的钱，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但这样的交易居然是公开进行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做。据说，这不算做事欺诈，人们知道了这一点，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陋规”而已。

在土地面积的丈量方面，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有些地方，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套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应对不同的田亩制度。

想要知道一斤粮食或者一斤棉花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是非常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每亩的粮食产量计算上，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的距离测算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中国大地旅行时，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指“大里”还是“小里”！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走下宽阔的官道，“里”就变得更“长”了。如果在官道上每天能走一百二十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一百里，若到了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八十里了。

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甚至不以中国人意识中距离长短为基础，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如此一说，若是说到山顶有“九十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但中国人还咬定不放松，理由是要走完这段路程，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还有一件与测算直线距离有关的颇为奇特的事实，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在中国，欧氏几何所设定的“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基本原则已不起作用了。这个定理要想实现，则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官道，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一百八十三里，而从南到北却是一百九十里。这也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来回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与此类现象异曲同工的是，“整体等于部分相加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在河道航行尤其如此。经过询问，你得知前方的某一地点有“四十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四十里”原来是两个“十八里”相加得来的。你还会被这种振振有词的说法弄得哑口无言：“四个九相加是四十，不对吗？”根据这种说法，“三个十八相加”就是“六十”。我们还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信使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六十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理由很充分，地方官员便下令重新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八十三里”，从那以后，那个新里程就被沿用了下来。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一里到六里各不相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一段据估算只有一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边都盖满了房子，就会被说成是五里长。而且每个村民都会信誓旦旦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度量标准时，你也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雇主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小点点（这些点点被称为“星”）。每个买卖人至少备有两杆秤，一杆是用于买东西，另一杆是用于卖东西。一个

现成的秤是没有人愿意要的，除非它是一杆旧秤，因为所有的刻度都可以改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计算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特别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得知一个人确切的年龄并不难，可中国人却普遍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来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说一位老人已经有“七八十岁”了，其实你确切地知道，他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刚过七十岁，也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得出准确年岁，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

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出他的准确年龄，他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以“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年龄总是含混不清。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地说出年龄是非常罕见的事。这种模糊，甚至还延伸至“好几百”，“好几千”和“好几万”。这样的表述中，“数以万计”是中国人计数方面的极限。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计数法，中国人并不怎么感兴趣。

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两百贯钱”看一场戏，过一会又改口说道：“是一百七十三贯，不过，这与二百贯也差不离，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写着祝福的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福七十载”，而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华诞”。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小心翼翼询问，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对方给予一个典型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写“七十岁”，那会显得题写者太没有想象力了！

在我们要求精准的地方，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是一个致命的干扰。一位希望获得法律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

在某一个村子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得知，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一番追根查问，他承认他如今不是住在那个村里；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的家族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我就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坦然地回答道：“没有，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子里！”

另外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傲地指给我看，说：“那座庙是我建的！”对于他语气中那个“我”进一步调查，我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学习中文的学生，最初遇到的一个障碍是如何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建立在我们不习惯的某种假设之上，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甚至认为是病态的。一个中国人并不确切地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而且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人类的任何一员都有弄清楚这一数字的意愿，但对他来说，则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他们只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者“没多少人家”，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疏于精确，不仅表现在对数字的运用上，同样也反映在文字书写，甚至表现在他们的印刷上。在中国的廉价出版物中，想要弄到一本没有大量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的时候，那些错别字频繁出现，严重地干扰了读者对意思的理解。如此看来，之所以出现错别字，显然不是为了图省事，而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重视精确性。在一般的书信往来中，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派更加突出了。文字的书写不准确，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教育的缺乏，但同样也因为马马虎虎的态度。

疏于精确这种态度，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一般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启”，“慈母大人启”，“叔祖大人启”，“贤弟大人启”，等等，却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

名。

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实际的民族，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这令人非常惊讶。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询问一下，这种情况经常可以见到。但，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字”、“号”，说来奇怪，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学名。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往往会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的两个或三个人。他们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全然不同的名字，并且这些名字也都同样的“正确”。如果一个名字是另一个名字的误用，他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样公文上用正确的名字，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另一个名字。更有甚者，也可以把那个误用的名字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复合地名。

中国人很不幸地缺乏类似于研习化学分子式那样，需要绝对精确意识的教育。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几十个格令”的什么东西与有“好几十个格令”的另一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其结果会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把握得非常精确——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天生就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不得不说，就现在的社会状况而言，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的素养，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如果这一判断是成立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我们在查考中国历史档案记录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疏于精确这一特性。如果我们轻易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则肯定会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想不到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人口调查”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结果，必须持有保留态度。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可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与之相反。我们在审查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非常有可能说：“这是案子的最后一个谜！”这句话，是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在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说的，他坚信“美国的法律有高贵的不确定性”。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一个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天赋。这位外国人会倍感惊讶和痛苦的是，你所说的汉语，别人听不懂。于是，他就回头更加勤奋重新学习。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自信地与公众或者任何一个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了。但是，如果与他交谈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尤其是与一个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那么，他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依然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显然是什么都听不懂，而且他显然也是不想去听懂。他很明显就没在意你在说些什么，也不试图理清跟你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

他面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看着一个聋哑人费尽努力想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你说的话谁能听懂呢？你天生就没有一个能讲中国话的舌头，这是你的不幸，却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无能为力。别用这种事情来为难我们了，因为你所说的，我们听不懂啊。"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你无法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态度，很自然地，你要冲着你的对手发怒发火，说："这一刻，我所说的话，你应该懂了吧？""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的误解才能还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每一个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还是不能弄懂你所表达的意思，至少说没有全部地搞懂。比如，"一个远东的外国人"这个短语，需要放在大量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条件是"、"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堆短语之后。的确，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也觉得没什么机会用这些短语，这与一个外国人大相径庭。同样情况也存在于时态的使用上，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关注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在与人交往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需用品”。“你在干完活之后，你就将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也没有说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地表达：“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是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

因此，当一个中国人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大家的是，在中国做生意，特别要避免在金钱上造成误会。谁收的钱，什么时候该收，收多少，收的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其成色如何，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贯”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周详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主签订一个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预先就必须做大量精准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害己又累人”，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发当事人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干活，但他却时常突然拒绝履行合约。在这种场合里，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14]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了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事后不悔。”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然而有些

时候，在人们绞尽脑汁，即使费尽心思达成了协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会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对待各种协议，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问题。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天生地拥有在误解中占得便宜的天赋。他们善于发现这些误解，并立即加以利用。他们就像元月的北风能够发现门上的一道缝，也像河水能够发现船上的一个窟窿那样，迅速且不费劲。

某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这正如古波斯人大多具有擅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可信、做事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提图斯时的罗马人[15]发现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罗马人发现，犹太人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六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做礼拜，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的这一习惯击败了他们，中国人同样也会善于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

1860年之前，外国人与中国人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外交。这一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接下的年头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但无论情况怎样，外国人总是遵守诺言的，这在中国人心中深深扎根，尽管也有少数的例外。他们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可以给出恰恰相反的例子）。但是，正是基于这个固定的看法，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明明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去理解你的意思的，请原谅我们的愚蠢，不过你还是得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最终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三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三次中有两次会获得成功。

有过丰富经历的读者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足以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苦力清除掉院子里的杂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漫不经心的野牛却拿着锄头，把所有的绿草都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你支使厨子到很远的那个唯一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回来了，却没买鱼回来，手里提着三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你派送信人在收发室下班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这份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这时，收发室下班的时间也到了，误了信件。他不“理解”你的意思。



穿中装的外国传教士

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作很好的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产生误解，多么容易被人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的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这位银行家表示庆贺。对此，这位银行家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合适吧！"

过了很久，这个外国人才发现，他之所以冒犯了朋友，在于他的话里包含这样的暗示：大火如果再近一点，就可能把他的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包含这样的暗示，也属不吉利的。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支骆驼队，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那位长年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的时候，告诉我的孩子，让他出来看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骆驼，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掂量着最终审判，经过了深思熟虑，车夫很贴心地说："就算你要买下那只骆驼，可也不能这么抬举它——那样它很快会死掉！"

有一次，笔者曾参加过一个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牧师正在布道，讲的是有关先知以利撒治愈乃曼[16]的故事。牧师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亚兰大将军来到以利撒门前，其随从人员争相叫门。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戏般，模仿亚兰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亚兰大将军来了！"令牧师大为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见了，好似被枪给打倒了一样。事后才搞清楚，这人完全是误解的受害者。他是教堂的门卫，由于没有注意到前面所讲的故事，当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让乃曼进来。

还有个例子是另外一些听众给某省的牧师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位传教士为了让他的听众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放大显示一只普通的寄生虫。这只虫子显现在屏幕上，其庞大的身躯完全就像是一条埃及的鳄鱼。这时，人们听见一位观众以一种敬畏的口气，小声地道出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看啊，外国的虱子真大！"

第八章　油滑的才能

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是喜欢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出于社交礼节和外交的需要，我们在一定场合下并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然而，尽管要在不同场合修正自己的表达，直来直去的天性实质上仍支配着我们。然而，经过与亚洲各民族不太长的接触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根本不一致——事实上，这两者是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

在这里，我们并不看重所有的亚洲各国语言中都包含着非常繁复的敬语的累赘。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的语言明显要比中文更加复杂麻烦。我们也并不在意强调各种委婉的说法，不善于使用别的称呼，不知道一些本可以简单表达出来却不能简单地说出来的话。比如，中文中关于一个人的死亡会有很多种说法，却没有一种说法会直接提及这个不恭而残忍的“死”字。不论死者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底层的劳工，都必须使用各种委婉的说法，只不过在这两种不同的境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字眼。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并非是那些稳定性的语言，除非就其通用的说法来看。当每个人都乐意使用那些具有“匹克威克[17]含义”的词汇，当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人这样表达出的含义，这个问题结果也就不再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方法问题。

用不着跟中国人交往太深，一个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意图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即使这个外国人精通中文口语——他或许能听得懂每一句话，甚至还能写下他所听到的那句话中每一个汉字。即便如此，他依然有可能无法准确地掌握说话者的所思所想。究其原因，这当然是因为说话者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所思所想。但是，他终究还是说出了一些或多或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理解，或者是大致地理解其意。

对于任何一个想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掌握中文之外，掌握一种强大的推理能力也非常重要。可是，无论他具有多么强的推理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会不知所云，因为他的推理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实际的需要。

为了说明这个在中国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情况，请允许我暂举我的仆人中经常出现的事件为例子。对于我来说，这些仆人是整个中国人最早出现的代表，其重要意义或许并非那么低。一天早晨，家里的“书童”像平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你眼前，说他的一位“姨娘”生病了，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探望她。在这里，你并不能凭借这样的请求就断定他没有什么姨娘，或者那位姨娘并没有得什么病，他也并没有打算去看她的念头。而应该心平气和地想到，这位书童其实是与厨师产生了一些冲突，只不过后者势力很大，暗中在不择手段排挤他。书童对之也心有所感，为了躲避自己对头的打压，便找了托词辞职离开。

一个人帮了你一个忙，你又不能马上付钱给他，他就会彬彬有礼却十分坚决地谢绝你该付给他的钱，他会说，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收取任何酬劳，这是有违“纲常”的，你这是小瞧了他，你如果执意让他收下，就是驳了他的“面子”。这番说辞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对你的回赠抱有厚望，可惜，你的出手太小气，令他大失所望，就像奥利弗·退斯特那样，他“想要得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或许是暗示你，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你有能力给予他更有利可图的东西，如果现在收下了，以后就不方便再开口了。因此，他更愿意让你欠着他的情，直到他提出更大的要求来。

既然中国人在谈及自身利益时都是如此的谨慎，那么处于怕得罪人的普遍心理，在可能带来麻烦的情况下，他们在谈论别人利益时就会更加小心。中国人虽然喜欢聚在一起闲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们都能够凭借直觉判断出来，在这种场合，什么样的事情不能随便乱说，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很多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偶然获知的事情守口如瓶。有过很多的例子，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会不动声色地给我们若干的“指点”。在得到了指点之后，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就

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过，除非中国人能够清楚怎样做才对他们有利、怎样做才会不冒太大的风险，否则，他们会继续保持沉默寡言的本能。我们中国朋友一直会保持着他们深不可测的沉默。

最为有趣的是中国人下决心把不好的消息传给他人时的举止，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暗示。即使是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公开直截了当地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的方式说一件不能说，万万不该说的事。他会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耳语，含糊地暗示那个他没有点明的人。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作为手势，不明不白地暗示那个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地说了一番，暗示事态的严重性，可正当说到关键之处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不进一步说出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就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不是吗？"

在这个全过程中，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只知道没有什么值得去弄明白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你的这位通信人（似乎这么称呼并不恰当）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一无所知，他把你扔到半道上，会明确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中国人所要求的"好方式"是某种程度过高的欺骗，这无疑会让我们惊讶并感到毫无必要。我们曾听说，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两位朋友在窃窃私语。这两位朋友是特地赶来向老奶奶报告她那在外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小声地商量应当怎么转告。可是，当遇到老奶奶后，他们却只是反复说明他们正在闲聊。尽管后来不到半个小时，消息就已经传开了。

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便从这个劝告中得出正确的推断，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果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受托将一个中国人的

一封家书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当他出门在外之时，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左邻右舍见他家没人看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样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该留给他这个孤独一身的人的。然而，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用大字写着不太符合实情的话："平安家信！"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时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地方偏偏不用数字。这样一来，一部分为五卷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标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因为这是"五德"所固定确立的顺序。四十多卷本的《康熙字典》，各册往往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用数字来区分，而是分别用"十二支"来编排。在科举考场上，每个学生的隔间是分别按照《千字文》中没有重复的字目次序进行标识的。

这方面的另一个事例，就是家里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这种妇女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而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字姓氏来称呼。平时，她也许会被叫着"某某他娘"。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小二黑他妈"病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说过他家有一个"小二黑"，但他认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没孩子，那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这位妇女被称为"小二黑他婶"，或者其他拐来拐去的称呼。已婚多年的妇女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外头的"，意思为丈夫是忙家务事之外的事。结婚不久还没孩子的年轻媳妇在说到自己丈夫时常常由于没有合适的词就不知说什么为好了。有时候，她会称她的丈夫为"先生"。有一次，这样的妇女被逼得没办法，干脆用丈夫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油坊里的那位是这么说的！"



传统打扮端庄的女子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赶往战场的途中，经过一片沼泽地时，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这些小动物的勇敢是值得赞美的。普通的西方人当然知道，这位将军对其部下的要求，就像是他们得有“强大的推断力”。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需要比之更强大的推断力。

中国春节的来临，是一年一度偿清债务的时候。一位熟人前来见笔者，他做着某种手势，似乎包含着什么深奥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对方，最后指了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最终，我们惭愧地说自己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结果还是没法获得他的原谅，他以为通过自己的手势，能够很容易地让我们知晓，他希望借些钱用用，而且希望我们保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贪吃）、喝（酗酒）、嫖、赌”指的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鸦片。有时，人们张开五指，说，“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这五种不良的恶习。

中国人的油滑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法去给予别人侮辱。比如，折叠信纸的某种方式就可以表现出一种故意的蔑视。在写到某个人名字时，故意不把他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首字母。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辱，就像是迎来送往过程中不知道接客待客的程序一样。规矩如此之多，众多礼节中缺乏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这些，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无数次地成为牺牲品，还以为是受到了至高的特殊礼遇！

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体地使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一粒糖衣里所包裹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才能吃出里面的味道。比如，“tung—hsi”这个词语，字面上的意思是“东西”，指的是东西两个方向，但它也代表是一样物品，而称某人是“一个东西”，就是骂人，“不是东西”，也是骂人。同样，即使拐弯抹角地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也就是骂他是“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会大为吃惊的是，即使是最没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

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有人去追究他们，谁也不会把这些借口当真，或者说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住“面子”而采取的一些恰当的策略而已。一个具有过多批评精神的外国人，常期待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求真能力，无论天上、水中还是地下，对真理的持久追求已经成为固定的习惯。而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在陷入困境时，也会有信心构筑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以保证他不丢脸。他可以躲进他的无知当中，以保证他可以逃脱。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就像是上帝的宽恕一样，掩盖了各种各样的罪恶。

从每日发行的北京《邸报》上，很容易为我们的话题找到一些好例证。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像《邸报》那样，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然而，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也已经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这是一面棱镜，这个半透明的棱镜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本质，其效用超过了其他窗口的综合。

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之时，都似乎喜欢绕圈子，而不愿谈及真正的理由。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那么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如果这个说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场的生活中去找。在中国的官场，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中国的“官方报纸”的“头条新闻”，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他们大声诉苦，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恩准他们告老还乡，这里头究竟有哪些个含意呢？如果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时，这又意味着什么？那些像煞有介事的冗长奏折作为事实材料被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就像每份奏折所宣称的，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小过失时，这就意味着，起诉的人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或者是被指控的官员是否的确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呢？

我们坚定地相信，通过细读北京《邸报》并同时研读过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领悟其中真正的含意，并由此获得关于这

个国家的知识，超过阅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著作。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来的夷蛮人还得主要依靠各种暗示在理解中国。如果打交道的对方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还得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弄清他话中的意思。即使如此，我们还会漏掉他很多话。对此，便是我们倍感担忧的原因所系。

第九章　灵活的顽固

我们关于中国人的最初知识是来自我们的仆人。尽管他们浑然不觉，他们是我们了解中国人性格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对他们也总是不满意，然而，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却令我们难以忘怀。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广泛与深入，我们发现，尽管仆人们是中国人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与仆人圈子相处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的判断结论，明显地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本章用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标题来表述我们所探讨的中国人的性格，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个题目看起来却是最为合适，只要略加描述，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

一个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家庭可能会雇佣很多用人。在所雇的仆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厨师那样完全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女主人雇佣一个新厨子时会对他说，事情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时，这位新厨子就像是服从的化身。对这家人家里已有的规矩，他都真诚地表示赞同，其诚恳即使还没有赢得信任，也能给人以好感。女主人特意举例告诫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不能容忍的习惯，面包坯还没有完全发好，就放进烤箱。就因为女主人感到需要坚持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还有其他很多事都不能与女主人所想的一致，于是两人吵翻。

对于这一点，候选的厨师的反应令人愉快，他表示，他或许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什么缺点，但这些缺点中不可能有固执。女主人还告诉他，在厨房里，狗、二流子和抽烟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不是二流子。在提了这么多要求之后，他开始履行职责。

但没过上几天，就发现这个厨师在烤面包方面是前任厨师的“亲兄弟”，也是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而且还有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永远弥漫着一种沉重的香烟

味，如同永久不变的宝物。厨师自己坦然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由于揉得不够。在揉面方面，他是很讲究的。在厨房里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儿”，但他们都不曾养过狗，而且他们现在肯定都走了，不再来了——尽管第二天，这些人又在厨房出现了。没有一个仆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隔壁传过来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烟鬼。这个厨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既然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正在休息的苦力

同样一个情况，还发生在一个苦力的身上。他被派去割草，给他一把雪亮、锋利的外国镰刀，他满脸微笑地接过镰刀表示欣赏。但后来到了干活的那天，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镰刀，由大约四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似乎在说：“还是旧的更好用一些。”你给

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起衣服来既节省时间，又省肥皂，省力气，最为主要的是洗得还特别干净，还给他加上一台他专享的甩干机，使用起来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到最后，洗衣机和甩干机都被丢在一边，成了“有用的废品”，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绞拧衣服，衣物都弄出破洞来，弄成了碎片。要想去改变这种情况，就只得以不间断的告诫为代价。

一个园丁被派去用手头的砖坯修理一下破损的围墙。可是，他认为在墙头上插上一尺深的树枝会更好一些，并且他就这样做了。如果你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会说出这样做的优越性。雇佣一个邮差把一包重要的邮件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光在路上就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头天傍晚，把邮包交给他，本来，次日一大清早就可以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还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里晃悠。派人把他叫了回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休息一天，以来清洗他的袜子！你按天雇佣的一个车夫也是这样的感受。告诉他走某条路，照理其他人也会这么走，他也答应了。然而，他却带你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因为他曾听一个陌生的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只相信他们自己。

在一处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都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现象，以佐证我的这个话题。医生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开了药。为了避免出错，病人拿到药后，医生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反复加以确认。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他认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医生反复告诫患者不要动外敷的药膏，可这些告诫一点都不管用，还是不能阻止他随时揭掉膏药。因为病人不希望变成一只“乌龟”，让一层硬壳长在皮肤上。

这个现象不会让人感到舒服，但根据观察，这一现象却是被证明充分存在的：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拥有各种医学头衔，且经验非常丰富，而助手却是一字不识，也不知药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对于一般病人来说，一个无知的助手的看法（并当然地）似乎与主治医生的看法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

一句话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顾医生的嘱咐，而去采纳某种肯定是愚蠢的、且完全可能致命的做法。

至此，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人灵活的顽固的例子，都是与外国人有关的。因为这些事能够最快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影响到我们的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到反映中国人真实气质的人际关系中，就越会看到“口是心非”的状况到处都是一样的，并非一个特例。中国的仆人对待中国的主人，与对待外国的雇主是一样的，谦虚、顺从，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仆人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同样，他们的主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要求仆人唯命是从。一个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切实地按照吩咐地那样去做，如果仆人不这样做，雇主就会在他们之间渐渐地产生敌意。

笔者的一位朋友有一大帮仆人，就属于这个数目庞大的仆从阶级，他们将极端忠诚与极端的固执融为一体，这使他们成为既难得又讨厌的人物。我的这位朋友每每谈起这些怪“家伙”，就表现出这类仆人的主人所常有的两难；他经常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不知该杀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仆人，还是给他们加薪！中国的雇主完全清楚，他的指令会被撂在一边，但他事先会有所准备，就像预留一笔钱以防备坏账，或者像在机械设计中所说的，留些空隙以减少摩擦。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状，也不同程度体现在中国的各级官员中直至到最高层。导致违反上级命令的动机会有许多种，比如个人的惰性和为了朋友情面，最重要的动机还是金钱的魔力。有一位地方官，由于其居住地的水质过硬，有咸味，就命令他的仆人用水车到几里以外的河里去运水。仆人并不是照章办理，而只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去取水。他知道水应该是甜的，所取来的水与官员要求的一样多，而且又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让各方皆大欢喜。即使这位官员确切知道他的仆人没有依照他的命令去做，那么只要有好水喝，他也许就不会过问这件事了。

在中国，“不论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成功就是一切，一事成功，事事成功。中国人天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乱子，不愿

惹祸上身。因此，出现了违反命令的不端行为，就算有五百个人知道实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典型的例子，有一个中国仆人，主人要求他把蓄水池里的水用容器装起来，以备后用。结果却发现，他把水统统倒进了井里。就这样，他表面上一副顺从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雷尼[18]博士说到一件事：厦门的一位官员把一份皇上的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半部分放到前面，前后倒置，为的就是让别人难以读懂。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中，这种花招是很常见的，中国的官员们很少愿意让外国人称心满意的。



典型的传统县衙审问犯人场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即使在执法过程中也有违法行为，而与司法仲裁的规范相冲突。一个地方官判处一名罪犯戴两个月的沉重木枷，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卸下来。但是，只要在“最关键的地方”打点上几个小钱，使些银子，那么命令也就可以大打折扣，改头换面执行了。那位犯人只需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戴上木枷，装装样子，而在其余的时间内，犯人尽可以把可恶的重负丢在一边。这位地方官是否从不怀

疑，贿赂会战胜他的判决。他会不会偷偷从后面溜出去，当场抓住违背命令的证据？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个地方官自己也是中国人，他知道，判决书一下达，它就不被当做一回事了。考虑到这一点，他在量刑时就已经把服刑期延长一倍。

这只是各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实例。外国人长期不间断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上一级官员命令下一级官员，应当去核实某一步骤的执行情况。下级毕恭毕敬地报告说，这件事已经做了，事实上，这期间根本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如果某一个部门不断给予施加压力，而且命令非常急迫，下一级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并把上一级的指责也转嫁到他们头上，直到这种压力的“风头”消失殆尽。然后，一切又照常如初。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图新”。这种“改革图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罂粟的种植，忽冷忽热，其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

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对于这些人来说，我们用“灵活”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中国人“顽固”的特性，似乎显得异常的不恰当。尽管如此，我们必须重申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人远非是一个最固执的民族。他们远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得固执。我们说他们“顽固”，这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顽固”中，也含有一种服从的特质，而这往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缺乏的。

有一个说明中国人这种“灵活”天赋的最好例子是，中国人能够不失风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责。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这是一门被遗忘的艺术，甚至可以说，这种艺术连见也没见过。但是，中国人却能够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地听你指出他的缺点，并乐于接受，还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会因为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感谢你，并保证，他会将你所指出的缺点立刻彻底地改正，并永不再犯。你也很清楚，这些信誓旦旦的承诺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但是，就算他们的天性是不着边际的，这些话还是很受听的，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结束。而且，你如果对此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他们希望得到的目的也就是这样子。

有人把中国人比做竹子，很少有比这个更为精确的比拟了。竹子很高雅，用途很广泛。它很柔韧，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风的时候，它一点也不弯，挺直躯干。竹子的幼苗是一种草本植物。然而，草易于打结，而幼竹尽管柔顺，但很难打结。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头发更柔软的东西了，它可以被拉得很长很长，但是，拉力一旦没了，它就立刻缩回去。凭借自身的重量，头发可以倒向任何的方向。许多人脑袋的头发长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般是不能改变它的方向。俗话说，有一种头发是“牛舔过的”，也就是说，由于一绺翘着不易梳理的头发，而其他头发，不管有多少，都必须顺着这一方向梳理。如果把我们居住的星球看成是一个头，各个民族看做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一绺被牛舔过的头发。它可以被梳理，可以被修剪，也可以被剃去，但是重新长出来的头发，一定依然与以前一样，其生长的总方向也是难以改变的。

第十章　理性混沌

我们把“理性混沌”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加以讨论，可我们并不希望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即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当然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在中国，教育并不普及，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它导致了典型的理性混沌，可能会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犯下罪行。

正如今天不少人已经知道的那样，汉语的名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它们既完全没有“数”，也完全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在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为每一种词类（或者说是非词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中国语言很难或不能把人类的各种思想都表达清楚（尽管有时候的确如此），而只是认为，有这样一种结构的语言，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人昏昏欲睡一样，容易招致“智力含混”。

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见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弄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好像全都是谓语，这些谓语以一种复杂方式组合在一起，整个就像是穆罕默德的天棺，悬在半空之中，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人卡在那里，省却主语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是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决不会想到，听众根本无法根据直觉去理解他所说的这一大堆内容。主语，这个传达信息的主要部分，究竟是什么。显然，他们已经被培养成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多数中国人讲的话，自己能补上所缺少的主语或谓语，

就能领悟其核心的意思了。常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丢失了，也找不到任何能引申出这个词的头绪。

在日常的对话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说话人的方式，说话人的声调，以及谈话的环境都发生改变了。话题的主语悄悄发生改变时，说话人往往没有在态度、音调以及相关的细节上予以暗示，因此，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技艺的表演。对中国人来说这没有任何可以诧异的：没有预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在看窗上的小虫，与此同时，还不断转移视线，能够看到同一视线上远处山冈上的牛群一样。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也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并无助于把一个人的理性梳理得清晰，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若能有兴趣并希望能追得上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想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提出一系列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子在无路的森林中砍出“记号”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后，还可以接着问，“你说的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带着一种困惑、或许是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你，似乎在怀疑你的五官感觉是不是分崩离析了。但是，沿着这样的线索坚持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那个引导人们从无望迷宫里走出的阿里阿德涅线团。[19]

对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一个想法都会令他惊讶，因为他对任何一个想法都肯定没有心理准备。他之所以搞不懂，因为他也从不想着去搞懂。他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来启动一下思维能力，因为他还完全处于惯常的状态中。中国人的头脑就像一门旧滑膛炮，炮身已锈迹斑斑，架在一个不堪重负的腐朽炮架上。在瞄准一个目标之前，需要先调整方向好半天，而最后肯定还是打不响。因此，

当你向一个人问他一个简单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十分茫然地盯着问话人，并反问道："您是在问我吗？"你回答："是的，是问你。"这时，他振作起精神，又问："是问我多大岁数吗？""是，是问多大岁数。"他再一次调整他的注意点，问道："是问我多大岁数了吗？""是的。"你说道，"是问你多大岁数了。""五十八岁了啊。"他回答说，这回，他的脑袋才运转正常，炮口对准了目标。



一个老妇人的侧面像

理性混沌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的原因。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们做馒头时为什么不在里面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就是都不在馒头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冰，为什么不在冬天储存一些起来呢？""是的，我们这个城市不在冬天储存冰块。"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万事之

因的人是快乐的。”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万事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理性混沌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普通人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原原本本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做法。要么因为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要么是信息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C完全不知所云了。要想让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三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而不有所增减，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像折断了一般。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随时随地会碰到这样一些奇特的例证。你会针对一些人的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是的。”你所得到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作为附属物。既有表示疑问的“几个”，又有表示肯定的“好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

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但是，这单音节词的“ta”无所不能，更经常被看做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中国人描述一场斗殴，就像英国法庭上的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道：“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你质问一个玩忽职守的仆人：“叫你，为什么不来？”他坦率地回答道：“不为什么。”这种理性混沌的状态，会导致各种往往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的举动，使得讲究条理的外国人总要为此而恼怒。厨师例行其事，用完了他手头的某些作料，做下一顿饭时，就把他通常必要放

的东西省略掉了。你问他这是怎么搞的？他坦率地回答，“作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弄一些呢？”“我没再要一些。”这就是他的最好解释。你要付一笔钱给某人结账，于是，就很费劲地打开了保险箱，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老半天”，海阔天空的什么都能聊，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提及：“除了这笔账，我还有一笔账在你这里。”“那刚才我开保险箱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岂不是可以一次统统付清。”“噢，我只是觉得那笔账与这笔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已经随意地耗费掉了医生的大量时间，然后走出了诊室。门还没有关上，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过了，他则爽快而简要地说：“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其他的病要看呢！”

在我们看来最愚蠢的例证，就是普通中国人习惯于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也许是因为当时太忙，或者是因为治病要花钱。他们往往认为，忍受一阵阵的间歇性发热的反复攻击和折磨，要比花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更便宜。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事例，许多病人仅仅因为想省一点钱，使得一些完全可以治好的病恶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他们原本是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

有一个人住在离外国人的医院不足半英里路远的地方。他外出时染上了眼病，但回家后，竟然在痛苦中拖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在这段时间内，他每天都希望疼痛能够停止，但事与愿违，最终，他的一只眼睛因角膜发炎而完全地失明了。

还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上的深度溃疡而每天都要来接受治疗。当治疗到十八天时，他说他的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处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治好了之后，他才想起来说他的腿！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使我们想起查尔斯·里德[20]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不是缺乏理智，但是他们的理智有缺点——他们头脑都混沌不清！”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能够获得这样的能力，即在理解和实践的意义上掌握一个客体。西方各国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某些布道者可以确切地证实，即使他们的经书上存在着天花病毒，他们的布道也不会染上。而在中国人当中，居然也能看到这类声誉不佳的独特现象。中国的狗追捕狼的时候会显得很仁慈，一般它们自己不会去追捕狼。当看到一只狗在狼的后面，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与此相类似，中国人在谈论某一话题时，总是离话题越来越远，就像这种躲躲闪闪的追捕。他往往嗅到了该话题的气息，时而像是要作彻底的探讨，但最后还是退却了，显得非常疲倦，在说话的过程中还是始终没有接近这个话题。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富贵者与贫穷者、受高度教育者与愚昧无知者，都比邻地生活在一起。成千上万贫困而又愚昧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理性混沌。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有不少这样的人连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除了他们终日所处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们身上，甚至连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经灭迹了。即使他们知道，离他们家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从来不打听一下他从何处来，他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斗争，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是否像今天有些人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人身上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他们认为，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相信来世的生活，相信来世时，坏人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淳朴地相信，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至于灵魂——如果有的话——会飘向天空。

在西方，所有那些造就了“实利者”的力量，同样也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也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见过或听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连串事实，而且绝大多数是不称心的事实。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

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尔给他一无所知的偶像施舍一些意想不到的敬奉，或者对他不知道是谁的对象施舍一点食物，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性。但是，这种本能是否能获得这种方式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周围人的风俗习惯。

在中国人看来，人的肉体只是独自地生长发育，而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要把这些人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输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创始人所讲述的崇高真理的全部含义："人是有精神的，上帝的感召，就在于赋于人们理解这种精神的能力。"

第十一章　神经麻木

从“nervous”（神经质的）这个词的不同用法中，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面。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这个词的引申意思之一，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碰到的，是“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软弱的”。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种专业医学术语，今天在我们听起来，完全像是日常用语那样熟悉。现代的文明无疑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各种各样的神经疾病也相应地比前一个世纪[21]更为常见。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涉及那些真正患有神经疾病的人，我们要说的是为数众多的西方人。这些人并非有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相反，他们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经常以各种方式被提醒到，神经系统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简而言之，我们说的是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心目中在这里也包括所有我们的读者。至少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那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现代快节奏的人们，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不同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为代表的缓慢节奏时代的人们。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急匆匆的时代。甚至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后果完全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商人都有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态（至少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一封影响其命运的电报——他们事实上也的确经常是在等着电报。我们会在许多举动中无意识地暴露这种精神状态。我们无法静静地等待，常常坐立不安，心情烦躁。我们在一边谈话时，一边还要拨弄着手中的铅笔，似乎此刻我们必须立即写些什么，否则就来不及记录了一样。我们搓着双手，好像准备干一桩需要耗费全部精力的严峻任务。我们拨弄着大拇指，像野生动物那样迅速转过头去，似乎总是担心背后有某

些被忽略的危险事物。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去做，刻不容缓，即使我们已经尽力完成了手头上其他几件更为紧迫的要事，又立刻投身于那件事中去。我们的神经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诸如“提琴手痉挛”、“电报员痉挛”、“书写者痉挛”之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民众整体普遍的紧张气氛。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明显如此。树上的小鸟一声鸣叫、射进我们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一点响声或者是一个人轻微的说话声，诸如此类，都会令人讨厌地打断了我们的睡眠。稍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醒来，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紧贴着我们自己，其结果是我们便失去了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去睡觉才能成功。这就不难理解了，在股东们收获自己的利益之时，银行家却大叹倒霉。

这样，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让一个西方人以之为对比，去了解以前所看到的、感觉到的每一个熟悉的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中国人去世后，很少有人用尸体进行解剖研究的。当然，毫无疑问肯定也曾做过。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神经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形”。但是有一点确凿无疑，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神经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种姿态上无论保持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敲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劳作，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这种单调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们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活动，功课是一成不变的。若在西方，这种功课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的。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顽皮得就

像是一只猴子，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往往能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租界里的小孩子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筋骨、锻炼自己，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模拟打猎”的游戏那样分别扮演“兔子和猎犬”，你追我跑地去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他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要是有人说这样做有

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在睡觉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中国人似乎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那些会让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的小干扰，对他们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有一块方砖当做枕头，有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他们就可以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们睡觉时，不需要房间里的光线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保持安静。“半夜里啼哭的婴儿”，你喜欢哭就哭吧，因为这根本不会吵醒他们。在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的（像越冬的熊）躺下来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他身在何处。在这个季节的正午后两小时的时间内，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对于干粗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手推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招募到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事实是：这就是在中国，人们对舒畅地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了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戴上一副易于激动的神经装备，那么，他们的悲哀就一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

中国人对于肉体痛苦的忍耐力，也同样是他们能够摆脱神经的统治而获得自由的一个例证。对中国医院的手术场面略略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毫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子都感到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22]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她显然是被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因而说道，“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如果她说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至少

已经做出了他们的感召与选择。

勃朗宁夫人[23]曾说过：“不抱着同情心去观察，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如此。但是，中国人也许喜欢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中国那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我们的一到来，就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前来围观。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之感。

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着我们，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似乎完全无可理喻。中国人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出极度强烈的反感，那么，他自然地会怀疑那个人是否有毛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在平时他从未有过对安静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了。朋友、护士、医生都会齐心协力，确保为患者提供环境所允许的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这一条件。如果病人所得的病已是无力回天，那么，病人更得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

中国人与西方人风俗的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就是一个行动信号，来自四面八方的探视，都会强加于病人身上。探视者的人数是与病情严重程度成正比，病情越重，探视者也就会越多。此时，谁也不会想到，病人自己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似乎谁都不需要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面对这样一种环境，还不如死了更好。当一位尊贵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的人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一定对之抱有深深的同情之心。而在中国，决不会有人道出这样的恳求的。即使有，也不会被人接受。

还必须指出，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动荡世界里，令人们感到担忧和焦虑的事情无所不在。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

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当事人是完全无辜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而且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许多这些灾难不仅看得见，而且可以感到它正在不断地悄然降临，如一件渐渐收紧的铁制的裹尸布。

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猛然领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不可抵御却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头脑清晰地去忍受它”。这正构成了这个民族最为显著的性格之一。只有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千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考察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或多或少依然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神经麻木”的，否则我们便无法了解他们。我们不敢冒昧地做出猜测，这一意味深长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碰撞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强烈。至少就整体而言，我们是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的规律的。在二十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的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无孔不入、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鄙夷外人

一位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商人会很难认同这一事实，即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三百六十年的频繁交往。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各个民族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成就。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把他们看做是“夷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夷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某个条约[24]中列出了一个特别的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夷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说到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时刻清晰地认识到，多年以来，中国人的邻国一直是一些非常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因而他们一直被危险地奉承着。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但却是最为有效的。他们发现，他们对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交替使用哄骗和威胁，就可以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理论去处事。他们的这种姿态，一直到北京被占领[25]，才被迫发生了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是刚刚过去了一代人，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说，中国人如今终于充分地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来。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都还并非是一种尊敬。即使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总是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不经意之间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状。

中国人在打量外国人时，首先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尽管我

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个人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与任何东方人的服饰观完全不同。当我们考察到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却不会露出丝毫的赞赏，他们发出的更多的是批评，以及不用说的嘲笑。



汉装女子，此为溥仪的妻子婉容

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一位体面的中国绅士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的。而在中国任何一个外国租界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的短上衣随处招摇过市。外国人所穿的那种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上面所有的扣子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像畸形儿一样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大衣后面的尾部肯定钉着两粒纽扣，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扣子放在那里既不美观，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不伦不类、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外国女士的服饰在许多方面都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考虑到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两性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的道德标准和礼仪，中国人自然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文，也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国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识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这位外国人与这种环境抗争，想在其中待下去，并努力地去掌握中国人的语言，那么，他一定会不断地遭受到蔑视，就连自己的仆人也会在一旁说悄悄话：“哦，他听不懂的！”其实听不懂的唯一障碍在于中国人自己说得不清楚。但中国人并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也不会降低他的天生的优越感。这种情况，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经常而且永远会碰到。因为，无论他的中文水平有多么高，都总还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陆。这个看起来是一种普遍性的体验，尽管有时的感觉并不一致。

外国人在中国积累了一定的经历后，就不会因为他偶尔才知道某

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会因为他对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国人在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进行评价时，往往可以借用约翰逊[26]博士对女人唠唠叨叨的布道所说的一句话来形容。约翰逊博士在谈到妇女布道时说过女人的布道，就像一条狗直起身体用两条后腿走路——那是无法做好的，但人们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一无所知，也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任何人都有可能对他人熟悉的东西有所不知，但中国人几乎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一个外国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在遭受着中国人的故意冷落。这就导致中国人愈加故意地轻视我们这些被蒙在鼓里做牺牲的外国人。“土著人”认为我们带有轻蔑地在冷落他们，结果我们会因为这种种的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许多中国人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逗趣的方式对待外国人，这种好奇心还伴随着一些贬意，这就像利特默先生对待大卫·科波菲尔[27]时似乎心里总不停地在嘀咕：“这么小，先生，这么小！”当然，并非说每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都会遭受这种情况。那些在中国的机敏的外国人们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迟早会成为明察秋毫的观察者。而那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总还有他没听说过的或者第一次听到的事。因此，总有许多细节是他所不知道的。

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国人却不会做，这就导致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下他们所吃的东西，我们经不起太阳的曝晒，我们无法在嘈杂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没有新鲜的空气。我们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也不会喊“吁！吁”让骡子听从我们的使唤——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事情，1860年，英军的炮兵部队在去北京的路上，雇来的当地车夫在河西附近开了小差，使得英军无人驾驶的马车队搞得束手无策，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中国的牲口往前再挪动一步[28]！

在各种仪式中，我们无法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和礼仪，以及其他更

重要的规矩。这也是中国人毫不掩饰地轻视我们的理由，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在他们看来没有“礼貌”或不懂“礼貌”的民族。其实，不是外国人不会鞠躬，而是他们大多数人总觉得用中国人的方式鞠一个中国式的躬很难，不仅难在生理上的，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外国人不把礼仪规范当一回事，常常举止随意，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也常常缺乏耐心。即使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面对一场繁琐的礼仪的大战，其结局事先已经确定，并为双方所知晓，就算只有二十分钟，他也会不耐烦的。外国人不愿意花上“老半天”的时间去闲聊。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中国人来说，事实与之截然相反。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知道，他所浪费的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时间。



绅士打扮的满清贵族

外国人由于倾向于避免大量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而把时间用于其他方向。这样一来，与过分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显得非常单薄，甚至连外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与中国官员富丽堂皇的长袍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外国来访者只会笨拙地行一个屈膝礼。面对这种鲜明的对比，即使最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关的必须要指出，对付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最有

效方法是，对东方人所看重的官员身份不屑一顾。如果中国人见到的是“大美利坚皇帝”，比如说格兰特[29]将军，并曾见过他穿着市民的服装，叼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么中国人的心里又会怎么想呢？一个外国领事，其级别相当于一个中国的道台。假如这位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家间的纠纷，前往某省会与其巡抚会晤。那么，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上街头，想亲眼目睹这位外国大官的浩荡车队。结果，他们看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的跟班，还有厨师等几人。东方人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会从诧异变为冷淡，再变成轻视，这并不奇怪。

我们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肯定比中国人优越，但这些优越之处，并不能如我们所想象和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发明方面占优势。即使许多发明领先于他们，但是这些技术却被轻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没有实际用途的戏法，是某种超自然力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孔夫子是闭而不谈奇迹的[30]。很多到过中国的承包商人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应用的奇迹是那么的不放在眼里，因而感到失望。除了很少的几个例外，中国人是反对一切都模仿外国人的（尽管有时也不得不采用）。他们不关心环境卫生和居室通风设备，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喜欢接受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采纳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们采纳西方人的方法，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中国渴望成为，也能够立刻成为一个“强国”，但目前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其他的一切只能有待于将来。

任何改良，如果缺乏一种“时代精神”，中国人真实的优越就会相差很远，它在各方面的改进都有可能被抛在一边。某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劣势，但他们又认为，西方各个民族所采用的知识，只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的知识。古代的中国人在高度发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积累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当代的中国子孙却不幸让这些关于自然的秘密被西方人盗走了。

中国人显然对单个的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实干能力不很感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人”，正像卡莱尔指出的，这样的人喜欢别人都称他为“王”。大家也崇拜这样的人，并将他推上王位。对中国人来

说，外国人的某些技艺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吃惊，而且以后若用得着，他们不会忘记和拒绝使用。但是，如果进一步把这位外国人作为模仿对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中也许不会有一个人有这样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理想学者就是书呆子，文字化石。这种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拥有多个学衔，学习刻苦，废寝忘食。他努力读书以免挨饿，手指上的指甲有几寸长，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除了教书）。正是这样，才保持了内心与肉体的统一，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因为“君子不器”[31]。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并没有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事实上落后于西方各国。前任中国驻大不列颠大使郭大人的所言，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有人问他，里格博士认为英国人的道德状况比中国的要好，他对此有何看法。这位大人并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种肤浅的比较是得不出任何结论来的，尤其是从外交的观点看，是不成功的。要做出正确的比较，要涉及到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现状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在此无意于进行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如今可以清晰感觉得到，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文人学士是最主要对手。那些外国人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机械技术，但仍被中国的文人学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欣赏中国伦理道德之伟大。在那些“头长在宋代，脚站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能充分体会这种轻视所包含的敌意。就是这个阶层的人，在近年以来，不断撰写并散发了大量极力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形成的浪潮铺天盖地，把整个中国都淹没了。

曾经人们会认为，中国可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占据。刀叉、长筒袜、钢琴会从英国漂洋过海运到中国。这会使得人们产生这样印象，在这种作用下，中国将会被“欧洲化”。如果说有一天中国会被这种方式所占据，那么这只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目前，决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一天。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人攻占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被人奴役的民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去攻打它。

要想让中国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人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向他们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是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无端的轻视和俯就的态度。这也并非没有理由的。

第十三章　公共匮乏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周朝兴盛时期以及更悠远的年代，或许确实有这样的立场，但是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我们常常被告之，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其臣民像子女一般服从于统治。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可他并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

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他认为，“我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如果他真的能想到政府，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政府已经足够悠久，又强大无比，没有我的帮助，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去操心。”

另一方面，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作为全家的家长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危急存亡，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清楚地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灾害中损失，目的只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老百姓自己努力预防这类的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百姓们深信，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给自己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状况很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不重视以及百姓公共精神的匮乏。在这个帝国，许多地方都曾有过以前帝国修筑的公路。这种公路不仅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就像湖南、四川这些边远的省份也同样可以看到。但这些道路，现在大多都已经损坏了。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则相对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

略了维护保养，以至于让这类的大公路发生了损坏，现在已经严重妨碍了交通。最有甚者，整条路都报废了。有人估算，这些交通要道的毁坏，发生在明末清初的那个动荡年代。那么，考虑到政治动荡的那几年，至今少说也有二百五十年了，这么一段漫长的时光足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这种修复工作从未有过，甚至也没人提出过，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状况。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是相互影响的，如出一辙。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到底会怎样。事实上，中国人就从没想过，一条路或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共拥有的”。“江山”（也就是整个帝国）被认为是当朝皇帝世袭的财产，他在位多久就拥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复什么的，就让皇帝老爷自己去干好了。

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属于皇帝的。如果不提农民的农田也属于皇帝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农田若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那则属于他自己的，农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田中那些不属于皇帝的路，给那些愿意走的人去走，也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然而，尽管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归农民所有，但是，通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因此，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农夫们要尽可能地挤占道路，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若是夏季暴雨冲毁农田，道路和农田混在一起，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农田。这样，再加上自然的狂风暴雨，原来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条水沟。对于我们所说的“路权”的概念，中国人是毫无想象的。

在京津之间的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面上有小旗。经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是用来指示，凡是立旗的下面均有水雷，过往船只必须绕开而行！我们还听说过，一支参加军事演习的中国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把他们的大

炮横在一条干道上打炮，其引发的结果是，交通中断，牲口受惊，很快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事故。

一个马车夫想卸货，会在马路中间直接装卸货物，而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一个农夫突然想砍倒一棵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停下脚步，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城市里对街道的侵占，其杂乱程度丝毫不比乡村里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差。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偶尔打这条街道经过，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小商贩们立刻又都回到原处，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排着各式手工作坊。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大显身手。更有甚者，还会有女人们把家中被褥拿出来，摊开在大街上晾晒。因为她们的小院子远不如街道来得宽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剃头的师傅

阻塞街道交通的不仅仅是这些小商贩。木匠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沿街晒起面条。因为，在他们看来摊前的空地不是属于任何“公共”的，而是属于摊主的。但是既然道路被他们所占据，就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的责任。可是现阶段，中国人根本没想过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也没时间和所需的一切。而许多人合在一起修整道路，那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而得到的好处却更少。其实，对于每个地方官员，如果他们去要求沿路的村庄能各自养护一段，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四季通行，这一切都不是很难办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官员能不能想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一切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这些财产还成了偷盗的目标。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搬回家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有一座外国人的墓地。当人们发现那块墓地是无人看守时，它的围墙就被弄得一块砖也不剩下。就在几年之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生过一起惊天的案子。人们发现，某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被盗，这在皇宫里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轰动。中国人普遍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在十八个省份中，遭到盗窃最多的人，就是贵有天下的皇帝本人。

中国人是否有爱国主义态度？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士阶层，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们对外国人普遍抱有敌对情绪，并认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他们的这种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民族感情。

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试图引起一场大混乱，把洋鬼子赶出天朝。在中国人看来，写出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一样。这样的攻击举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除了为国效劳的需要之外，还为之获取了可观的名利报酬。而究竟是名利所致，还是爱国情绪的驱动，两种愿望孰轻孰重，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而不能仅凭某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的印象而下定论。

当前，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者可以不必非常关心鞑靼王朝[32]的命运，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华民族的整体感情是与今天一样的——就是极度的漠不关心。对此，孔夫子曾含蓄地在《论语》中对关于人们面对公共事务时说了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半是结果，另一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导致他们在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上都不感兴趣。

对此，哈克·古柏查[33]先生记录下了一个很好的事例："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当时，我们正离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喝茶，和几个中国人坐在了一起。我们便和他们悄悄地攀谈起政治，谈到了皇帝在近日驾崩，这本是一桩肯定会引起每个人兴趣的重要事件。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由于皇位的继承者还没有公布于世，政事充满了变数，于是就说道：'你们中间谁能知道皇帝的三个皇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沿袭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太小，据说朝廷中分为两大派系，他会倾向哪一派呢？'我们简要地提出各种猜测，目的在于激发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摇头，只顾着各自抽烟、喝茶。他们的无动于衷的确激起了我们的不满。这时，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中有一个从凳子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完全是以一种长辈的架势拍拍我们的肩膀，更像是带着嘲笑的面容在说：'我的朋友，听我说，你何必要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操心劳神呢？自有那些当官的去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拿的是朝廷的俸禄，吃这碗饭。就让他们去挣他们的钱好了，我们别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烦恼，我们一个铜板都得不到，还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不是傻瓜么！'其他人也随声附和道，'就是这么个理。'于是，他们又示意我们，我们面前的茶已经凉了，烟斗里的烟也抽完了，该走人了。"

人们还曾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的时候，用来拉物资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维护各自地方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应允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军需物资。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绝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这类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掉辫子又送还给英军——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的确存在着爱国主义精神，真有公共精神，那么这些词的含义，也应该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平素所使用该词时所理解的那个涵义。

当人们被迫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成为带头人。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在他们的领导下，抗议运动会搞得轰轰烈烈。此时，政府万般无奈，还是会做出妥协。但一旦事情过后，无论广大的“愚民”们被如何处置，政府总会报仇，那些带头人总难免为了正义而一死。为了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这才算得上是公共精神的最高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怀有赤子之心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这些人不仅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的行为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能够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激发出极大的英勇气概，做出慷慨的壮举。

第十四章　保守自大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相比，中国人都更确实地意识到，已经过去的远古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的先贤，总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口吻，谈论着更古的“古人”。孔夫子曾表示，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使命就是把那些曾经的知识，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学问，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非凡的才能使他成为他这个民族受人尊崇的圣人。正因为孔子面对过去的态度以及他的学说品质，使得他一直被尊崇为圣贤之首。

按照儒家的道德学说，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人们自然会相信，只有明君统治的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有时候也会对我们讲起在“尧舜”的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守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失主总能看到他的物品完好无损的搁在那儿。我们常常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在颠倒黑白方面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各地都同样有。只是，在中国这个天子之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人们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文学作品便被当做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古典作品大致上相当于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他们认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的精华、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真理。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子弟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子弟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去谋求

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一些《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一样，儒家学者也有这样的能力，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一切现行政策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源头。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府体制。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每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那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这样一种常见的统治方式就像是那些古代经典一样，也令人肃然起敬。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成功地对中国的政体为何形成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或许将是一桩惊人的发现。如果这一过程可以得到揭示，我们想，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清晰的答案，即中国为何很少爆发那种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席卷全国的政体革命。

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了一堵石墙，墙有六英尺厚，却只有四英尺高。别人很奇怪他为何要把墙建成这样，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府根本不可能被风吹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无论从什么高度落下，都会四脚着地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这一切的人具有无比的智慧，是一个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头脑里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意识到，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有道理的。中国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在内涵上也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

地说，从细枝末节起完全去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它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种本能不只是中国人才有，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那种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也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也并不以这种教义来规范、约束他们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和发展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然而在中国，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风俗习惯，也就是俗话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如此，有些地区的人也会讲着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凝固石膏，你可以打碎它，但无法改变它。理论上来讲，肯定是这样。但实际上，理论也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以适应现实变化。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真的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变化总会悄悄发生的。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建政之初，曾在中国汉人中推行削发蓄辫的发型。显然，改换发型就意味着俯首称臣。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坚持推行削发令，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事实证明，中国人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当年，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痕迹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所用的头巾上了——当年人们用戴头巾来遮盖民族的耻辱。

佛教进入中国也经历过一番斗争。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拥有了不可取代的位置。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就像是一种专制制度。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们的职责只是臣服，并且他们也臣服了。在中国的不同地区，

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也迥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他们所参加的某一宗教仪式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第一，是认为与神灵沟通的各种方式都是从古人那里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第二，是认为既然“每个人”都这么尊崇，那么我也应该这么遵从。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如果这种情况始终出现在每一个地方，那么，就可以说人们对于宗教习俗的遵从，不过是一种最为表面化、形式化的举动。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拥有鼻烟的人，就都会和他的朋友分享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给对方吸烟。如果某个先生自己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还是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则假装着从中捏起一小撮，然后把盒子再送还给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假装在享用鼻烟，则会保全烟盒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下，中国人也同样如此。珊瑚虫早已没有了生命，可珊瑚礁却留了下来，为了避免沉船，行船时就必须小心翼翼地按照既定的航线航行。

用固定不变的方式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他们在建筑铁路时运土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承包商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也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用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用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而这样的僵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第一个鸡蛋，就把它扔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然后扔掉。事实上，那次第一个鸡蛋不过发现是一个坏鸡蛋而已。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给中国的裁缝照样子去做一件新衣服。结果，得到的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是，它们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能对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公式有根本性理解。在南北大约绵延二十五个纬度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人们只按照同一个历法，在冬天穿上皮衣，夏天戴上草帽。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的祖先是神灵，能预知一切，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在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要依靠烧炕来取暖。是否烧炕，要在历法的某一天之后。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常常会发现，它们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上炕，因为按照历法，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是就保守程度而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这位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他和他的人被一座砖窑雇佣来烧砖，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特殊方砖，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烧这样的砖，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可是结果是，需要用砖的时候，这样的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质问他的失职，他却表示难以采用任何这样的创新，还给出了一个底气十足的理由是：天底下就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未来是否有兴趣，每一个把宝押在中国的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似乎注定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关键的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用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由于中国人天生的保守，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接受新酒。但即使有人能接受很少的那么点新酒，还需要用旧瓶来装。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一切新事务保持着小小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歪歪扭扭、粗粗糙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本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那些泥柱子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时常耳闻的这句话倒是很

有道理的。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可能会长时间受到阻挡，但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总督曾上书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新奇事物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至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迫在眉睫时[34]，不仅架设电线的性质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省政府迅速建起了许多电报站。当局还发现，这些电报站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

数年之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在中国修建铁路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最早的铁路只是很短小的一截，只是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作为运煤通道而建的。由于铁路修筑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为了给铁路让路，坟墓需要搬迁，这就像在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让人们相信，这是一场“风水”与蒸汽机的狭路相逢。然而，风水根本不是蒸汽机的对手。这条铁路的延伸后来被推迟了，但历史经验表明，这首先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耽搁了，“风水”迷信对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的有限的。

在中国人处理重要的事务中，可以发现他们天生的顽固守旧的一面，又会发现他们打破惯例的另一方面。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规矩，就是守孝道。一个大臣的父母去世了，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坚决“夺情”，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伦理是父为子纲，儿子必须永远遵从父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权力的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仍健在。这样一来，小皇帝的父亲要么自杀，要么退休，永不参与政事。因此，光绪继承皇位之日，其父亲醇亲王[35]就得辞官。醇亲王得病，其儿子，就是光绪皇帝，只能以探望下臣的名义多次探望其父亲。当时，采取了某种权宜之计，因为这位父亲一直到去世之日，都是儿子手下重要的官员。



幼年骑马的光绪皇帝

如前所述，顽固保守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分地强调先生的重要性。但是正确地理解并谨慎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为外国人的重要自保法门，从而使他们能够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又如此守旧的民族打交道。外国人所要做的，只需模仿中国人的方式，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装着好像那些没有明令禁止的权利是存在的，在当这些权利受到攻击时，全力为其辩护，并且想方设法坚持它。因此，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的居住权问题，只要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地采取一种墨守成规的处理方式，就不会有什么事，聪明的保守主义就是最安全的防护。险恶的暗礁对于航船，似乎是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可一旦穿越它，便可进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静的环礁湖，再也不用担心风暴和海浪了。

第十五章　疏于舒适与便捷

在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时，我们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人疏于生活的舒适与便捷，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便捷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让我们留心看看中国人的服饰。在前面章节里谈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鄙夷时，我们已经偶尔指出，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其实西方人也难以接受中国人的服饰。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编着一个辫子，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额头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采用这样一种非自然的装扮，肯定会感到意外。不过，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他们压根就并没有想过要恢复明朝以前的发型方式。

对这种舒适的疏忽，还表现在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上，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都有不戴帽子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季里，整个民族都无遮拦地走来走去，顶多举着扇子遮挡太阳，用三角形的东西遮挡一部分的阳光。偶尔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男人常常戴着各式各样古怪的帽子，样子很讨人厌。而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若用西方人不带同情心的眼光来看，这头巾的装饰其实根本不算成功。在中国人看来，能维系生活舒适度的物品并不多，而扇子是其中之一。当然，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扇子才可以作为舒适的物品来使用。在夏日炎炎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几乎完全是赤身裸体，拼命地拉着沉重的运盐船逆水而上，不时地使劲扇着扇子。甚至就连乞丐，经常也是拿着把破扇子。



一群扇扇子的妇女

中华文明有许多让人不可理解的现象之一，就是这个民族是最早起源于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天然资源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明的技巧。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学会使用羊毛来进行纺织的技术。我们是就整体而言来谈论的，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是例外。在那里，毛纺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考虑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区，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但这种技术却并没有得到普及，的确是一个令人很费解的问题。

人们相信，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然而无论过去情况是如何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在这个帝国中那些冬季特别寒冷的地区，人们要穿好多件那种填充着棉花的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其体积大概是身体的两倍。一个裹着这么多衣服的小孩，如果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来，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桶里。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中国人抱怨穿这么多衣服不舒服。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难受。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束缚，他们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既然提及了厚重的冬衣，那么就必须相应地提及，与之形成对照

的是中国人不穿任何的内衣。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穿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羊毛内衣，简直就活不下去。中国人却完全没考虑过这种需要。他们用那鼓鼓囊囊的衣服裹住身体，像套着许多层的袋子，但留下了许多缝隙，可以让寒风透过刺入肉体，然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尽管也承认这种衣服不够理想。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说他已经被冻得麻木了，有人就送给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免得受寒。一两天之后，我们却发现他居然把它给脱了，因为他觉得快被“烤死了”。

中国人所穿的鞋也是用布料做的，经常会渗水，稍一沾水，里面就潮湿。无论天气是否寒冷，脚上穿着这样的鞋子，总会觉得脚底冷冰冰的。中国人的确还有一种油靴子，可以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很多给人带来便利的物品一样，它虽好，却很贵，使用的人也只限于少数。用来抵挡风雨的雨伞也是如此，它们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中国人常常不得不在任何天气的情况下出门，即使被雨淋湿，他们并不认为应当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觉得让身体来焐干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手套，但自己就没想过也戴上一副，即使是那种厚实的连指手套，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寒冷的北方地区，也难得一见有人戴它。

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去看，中国服装最令人烦恼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口袋。一个普通的西方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大量的口袋满足他日常工作需要。他需要在上衣胸前有一个放置记事簿的口袋，里面有放置手绢的口袋，衬衣上有放置铅笔、牙签、怀表之类的口袋。马甲上要有放小刀、钥匙和皮夹子的口袋。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着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再加上一支钢笔，这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东西是他经常所要用的，一个都不能少。而中国人却相反，他们几乎没有用到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置这些东西。一个中国人有一块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怀里。他若是带着孩子，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要带一份重要文件，他会认真地扎紧绑腿，把文件塞在里面，然后上路。有时，他干脆把文件往裤腰一别。在这些情况下，若是带子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是经

常会发生的事情。身上还能放置此类东西的地方还有，长衣袖卷起的袖口，卷帽的帽檐上，或者帽子和脑袋的空隙之中。

中国人很难在身上找个放小东西的地方，很多人为了方便，可以把钱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且只是在钱不多的时候采用。像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的小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如果这根带子松开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几枚古钱币之类，都系在外衣的纽扣上，脱衣服时都必须小心谨慎，以防这些东西丢失。



一个晚清家庭的全家福

如果对我们来说，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衣是令我们感到不舒服的。那么，他们在晚上的穿衣方面至少可以避免我们的评头论足，因为他们都是脱光衣服睡觉的，钻进被窝倒头就睡。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他们都没有睡衣。古书上确有记载，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体长一半的睡衣[36]。但有人推测，他所要求穿的“寝衣”并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斋戒期间所穿的长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代

中国人并没有人有兴趣仿效孔夫子穿的这种睡袍，只要有可能，也没有人会去斋戒。尽管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变化异常敏感，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点，中国的母亲也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随意掀开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仅凭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很多中国婴儿着凉，并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未足满月就会死于惊风。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当孩子稍大一些时，中国人并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种沙土袋来充当尿布。对于西方国家心疼孩子的母亲来说，单是这种想法，就足以令她们恐怖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就像一只肚子上“背”个铅弹的青蛙，无法动弹。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大家谈到某个人比较孤陋寡闻时，就会被说成他还没脱掉“土裤子”呢。

中国人对我们所说的疏于舒适，不仅表现在服装上，而且也充分地表现在住房上。为了说明这一命题，我们首先得要把那些没有自己房子的穷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只能过那种他们力所能及的生活。我们这里要谈论的是这样一些人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居住状况。

中国人并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种树遮荫，而宁可搭个凉棚。即使没有那个条件栽上很多的树，普通人家也可以在院子里种一棵遮凉的树木，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但他们不是种这种树木，而是种一些石榴之类的观赏性的灌木。当酷暑降临，院子里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他们干脆离开家，坐到街上去。如果外面又热得实在不行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很少有几户人家能开上一个与南门相对的北门，因此无法形成空气对流。若是能开个北门，南北相对可以带来很多穿堂风，多少可以减少夏季的炎热。若是问起中国人，这等简易的方便之事为何没人去做，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这样：“我们从来就不开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中国人一般用炕来睡觉的。这是一种用黏土砖坯垒起来的，靠做饭的余火在中间加热。若是火没有烧得足，冰冷、坚硬的炕会令外国人冷得无法忍受。若是火烧得太旺，那么，在后半夜，他会由于身上太热而醒过来，会觉得身上被烤得太厉

害。不管怎样，炕的热度总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适宜。而中国的一家人就都睡在这样的炕上。此外，这种炕由于其材料的原因，还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虫子，即使每年都更换一次砖坯，也无法保证能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各种档次住房的墙壁，都被它们占据着。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害虫会传播疾病，但是，即使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寄生虫的危害，也并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用来阻挡那些可恶飞虫的蚊帐，就是在城里也很少有人用。据我所知，中国的其他地方更为少见了。苍蝇和蚊子的确是很令人感到不胜讨厌，偶尔烧一些有芳香气味的草驱赶它们能产生不太明显的功效。但这种害虫并不会惹中国人生气，只及我们厌恶感的千分之一。

睡觉的枕头应该是什么样的才算舒适，这也反映出东西方舒适标准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松软地支撑起整个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承颈部的。它可以是一张小竹凳，也可以是一截木头，更多的可能是一块砖头。以中国人的方式，枕中国人的枕头，没有一个西方人不感到饱受折磨。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来放脑袋的那种袋子上睡上十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样一个奇特的事实，即中国人没有成规模的毛纺技术。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用羽毛来填充被褥十分的简易可行，羽毛的价格低廉，甚至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尽管中国人非常节俭，但他们并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绒制成被子，而使之白白流失。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松散地扎在一根棍子上，做成鸡毛掸子。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家禽的羽毛有时被厚厚地散布在地里，以免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被出来觅食的动物啃食掉。

对一位西方人来说，一张理想的床是有弹性且坚固的。近几年来，最好、最流行的床大概要数钢丝床了，它是一种西方床的典型代表。最近，一家最好的中国医院添置了这种高档用床，然而，那些安置下这些床铺的好心医生却失望地发现，居然有病人不躺这种弹簧床，只要他们一背过身躯，但凡有力气动弹的病人都宁可躺在地板

上。因为他们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躺在家里一样。

中国人的房屋到了晚上几乎总是光线很昏暗。当地产的菜油灯发出难闻的怪味，而且灯光仅够用来勉强照见东西的大致轮廓。当地的人们也知道用煤油点灯的好处，但尽管煤油灯传入已经很久了，但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纯粹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满足于仅仅能看见东西就成，与几乎看不见东西的状况相比，能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舒适，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家具既笨重又很难看。中国人所坐的长凳不像我们祖辈所坐的那种、有靠背的宽大的长椅，而是一种没靠背又很窄的长板凳。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人坐，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肯定就会翘起来。在亚洲人中间，中国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点，中国人的椅子是很不舒适的。其中有一些椅子的式样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样式制造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更常见的几种椅子都非常宽大，似乎为那些体重有两百五十磅的人设计的，样子看上去很大，但受力点不够均匀，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

西方人对中国人住所最不满意的无疑就是潮湿和寒冷。由于建筑物结构上一个根本错误，房子的地基选择得不好，房子就会注定导致一个难以消除的后遗症——经常会潮湿。对大多数的外国人来说，房间用泥土铺地面，或用没烧制好的砖铺就的地面，都是非常不舒适的，而且也有害于健康。还有，安放在两个轴上的不严实的房门，松松垮垮得实在是令人讨厌。这种门有两扇，根本关不密，四周透风。就算只有一扇门，而且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也还是不能很好地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要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出了一条告示：“请随手关门。”这样的告示在中国纯属一句不折不扣的废话，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人会随手关门。无论是房子或是院子，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进门都要低头，否则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是用纸来糊窗子的。这种窗子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百叶窗不常见，即使装上了，通常也只是一个摆设。

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只有一口烧饭的锅，这是一口容量很大的铁锅。有几加仑的容量。但是，这口锅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这种炉灶以柴草为燃料，必须还要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几乎每次煮饭都是这样。水蒸汽和更多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足以让一个外国人呛得睁不开眼，或者窒息，但是中国人却似乎很漠视这种危害，尽管他们也明明知道这种环境会导致眼病，但似乎还是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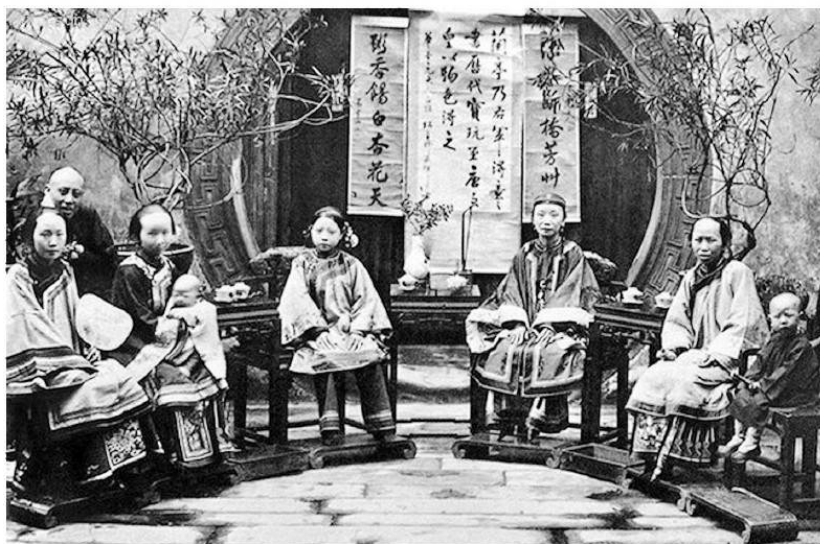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住所最不舒适的是冬天没取暖设备。即使是在冬天最为寒冷的地区，大部分的中国人的取暖只是靠煮饭的锅灶余热传导到炕上来。中国人非常看重“炕”的舒适度，女人们有时称之为“我的亲娘”，尽管这种设备的舒适度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炕实在是不舒适，因为西方人要求热源发出的热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国人的炕根本不如西方人的“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在一些产煤地区，煤的确已被作为燃料，但就与整个国家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范围还非常的小。而且烧煤时，煤烟总是会窜到屋子里出不去，房间逐渐为碳酸气体所充斥。即使在那些家境好的人家，木炭也要非常节省地用，就像烧煤一样，若是使用不慎，危险还很大。这样的屋子待在其中令人很不舒服，天气冷了，屋子里冷得令人难受，待在家里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这样一来，外出时，就没有衣服可增加了。我问他们：“你冷吗？”“当然冷。”他们总是这样回答。

在一些西方人的印象里，他们似乎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使自己暖和过。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表层结了冰，只有在冰下面水才能缓慢地流动。考虑过中国人住房的如此特点，就不会对这样一位中国的道台的话感到奇怪了。这位中国道台在美国待过，他说，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舒适。我们如果知道中国人的住所是

那种样子，就不会对这位道台的话感到惊奇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并不在乎。天气一冷，中国人肯定为了取暖而挤在一起。甚至在极度炎热的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仅有几间的船舱里挤满了人，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而中国人似乎并不以为然。西方人喜欢住在离群索居的独门独院的房子里，既通风又不受打扰。中国人对互相交往，是否通风和不受干扰并不在乎。即使他们有这样的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许多小村庄毫无计划地散建在中国城市的周围，似乎地皮很不值钱。而另一方面，大家的房子都拥挤地建在一起，又好像是由于地价太昂贵。而即便如此，也恰恰是由于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正如像在城里一样。因此，狭小的院子、过于拥挤的房子，统统都挤在一起，无益健康，人满为患，活动空间非常有限。



极富晚清色彩的院落

一位住在中国小旅店的中国旅客，在吃完晚饭躺下睡觉后，可以安心享受着大队车马带来的喧闹声。可是，他那位来自西方的旅伴，则无法入眠，躺在那里辗转反侧直到半夜，头脑清醒地聆听着一大群骡子在那里嚼草、踢腿和长嚎的杂音。这些响声中，还不时地交替伴

有木头撞击的嘎嘎声和狗叫声。

在一个小旅店的牲口棚里，看见有五十头驴，那是常有的事，整个晚上会有想象不到的热闹。正如哈克先生所说，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块砖，牲口的叫声就会停止的，但即使是再三盘问，也没人会去这样做。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对五十头驴子的叫声并不关心。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却不愿意留下这种含含糊糊的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种情绪不仅仅限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中国人普遍的天性。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里养了大约一百多只猫，这个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有无人看管的狗到处侵扰，然而中国人却懒得去灭狗。他们对此熟视无睹，与信仰佛教，倡导不杀生灵有关。然而，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比起东方其他国家来，并不算很显著。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布朗[37]先生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各式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有精瘦的狗，还有癞皮狗，题为“君士坦丁堡面面观”。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速写插画。中国人对此却无知无觉，毫不顾忌疯狗在那里乱叫的烦乱，也不用担心会被疯狗咬伤而造成危害，尽管这种事情经常会碰到。就算被疯狗咬伤，他们使用的治疗方法也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有奇妙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医治”。据观察，消灭流浪犬这事，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以上说的这么多的实例，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疏于对生活舒适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事例，来说明中国人对便捷生活缺乏关注。下面只是略举几个例子，中国人骄傲地自称是有文化的民族，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世界上一个颇有文化的民族。笔、墨、纸、砚被称为“四宝”，是“文房”中的必需品。但是，这四件必不可少的文具，没有一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每当要用的时候，根本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全聚在手边。即便是这四件文具齐备了，缺了第五样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那第五样东西便是水，需要用水来研墨。毛笔使用前必须细心地泡软了，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把笔毛弄软，毛笔还是

不能用，还很可能把笔弄坏，反而浪费时间。

中国人没有像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可以替代毛笔。即使有了铅笔这种替代物品，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们没有削铅笔的小刀，身上也没有衣袋装铅笔。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的勤俭节约时，我们曾经努力证明他们的高超技艺，能够用不起眼的东西做出很好的东西来。但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经常采用的那种节约劳力的发明创造，却不为中国人所知。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高级现代化宾馆中，宾客只需要拉一下铃，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供热和其他服务。而中国十八个行省中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像西方下等的大车旅店，口头上说得很好，但客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服务。客人若有什么额外的需求，只好到房门外，扯开嗓门大声叫喊，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呼声。否则，就别指望能有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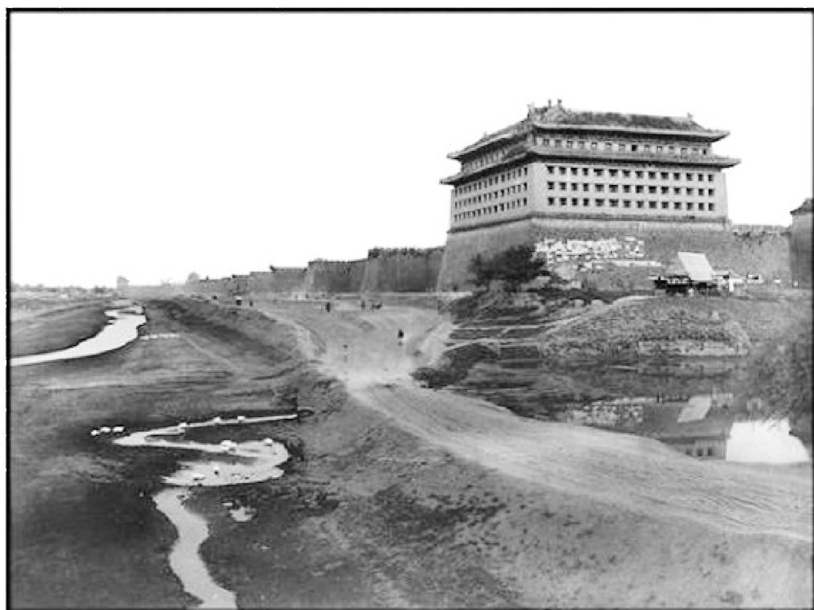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买得到的，要等卖货的小贩时不时地上门兜售才能买到。在其他的时间里，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人们会感到自己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的腹地。在城市里，每个人夜间行路都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灯笼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想要购买灯笼的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里去买，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

城市人口占整体国民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在这里，交通限制了商品流通的方便，且毫无例外。比如有的地方，习惯于只在二月份才卖建房用的木料。同一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它们全部被卖掉为止。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去。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突发奇想，硬是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那么，他会发现根本就买不到，他也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到中国人的节俭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再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与我们关于便捷的理念非常矛盾。

有一次，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但市场上买不

到现成的斧头。他买回的是十四块进口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上一个柄子，整把斧头所花的钱，远远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贵得多！



老北京前门

在这个天子之国中存在着种种的不方便，其中最不方便的事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最直接、最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北京，无论谁如果要去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其结果会比他们要治理的问题更多更糟。

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这样一个既令他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侨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他确信宁波更糟糕一点；但是到了天津，他加倍

认定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回顾了他对北京的看法，他会放弃原先的判断，那也并不奇怪。

详细回顾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在中国当然有私人经营的邮递业务，它们也把信件和包裹从一处传递到另外一处，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也微不足道得可怜。

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文我们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之时，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山东省有一条几十英里长的穿山路，路面十分狭窄，容不得两辆马车同时通过。如此，路的两端分别有人专门把守，上午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的车马通过，下午让朝另一个方向行驶的车马通过！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的原因，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也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泥泞不堪，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用什么办法出门的人叫做笨蛋，而在中国，只有那些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普遍的一个特征是表示命令之必然的句子也会加以转折，最常用的句子是“遇雨即止”。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职守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这个观念像是被钻孔一样钻入了中国人的脑袋，就算是最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们听说，在中国有一个无疑是非常坚固的要塞，地处要冲，配备有精良的克虏伯大炮，里面全是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可是只要一逢到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要塞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这是典型的“遇雨即止”！1870年的天津惨案时，本来遇害的人可能会多上四倍，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外国租界行凶的暴徒们。

在那些敌视外国人的地区，外国的旅行者最好的防身武器莫过于带上一把喷水枪。我们可以确信，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

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五分钟内就能驱散最凶狠的中国暴徒。散弹枪的子弹也许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每个中国人都抱以反感，就像猫怕水那样。无论是从表现还是从内心的感受方面来讲，他们都认为泼冷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东西[38]。

要把中国人所使用的钱讲清楚，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最好是一本书。中国的货币极度混乱，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整整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谈及中国人疏于精确的那一章节里，我们已经说过几个突出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恼人的事。一百钱并不是一百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一千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固定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二十个可抵四十个，也就是当钱数超过二十文时就会这样计算。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五百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二百五十个，甚至更少。还得减去当地的折扣，当然，在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在钱币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各行各业的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通货膨胀而感到头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号称要严厉打击掺假行为。希望这种状况得到遏制，却又使得衙门里的差役有机可乘，他们变本加厉地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

现金的短缺会导致物价上涨。一旦市面上真的钱全部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次等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伪币取代了真钱，从而应验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客观规律，货币市场越来越糟糕。以至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真假参半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购买有些商品只是付给假币。而至于在交易中另有规定的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就要付上两倍的价钱。



晚清通用的铜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摸了这样的钱币无疑是污染。五百文钱或一千文钱（名义上的）穿成一贯，绳子很容易断，而把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会不轻于八磅。人们系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很麻烦了。

如果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都容易上当。他们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其难处也并不减少多少，因为一个地区银庄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要么完全不能通用，要么就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

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那些贪婪的家伙，就他们所兑付的银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便捷的条件下，中国人居然还能完全顺利地做成各种生意。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只有外国人会为之叫苦连天。

一个外国旅行者在经过许多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被拴在一根柱子上，一条结实的缰绳则绑着它的脖子，四蹄伸直地躺在地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四十五度，脖子也这样拧着，好像就要脱臼了似的。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挣扎而弄破脖子，这种姿势能给它什么乐趣可言。没有一头外国驴子会这样。

在看到了我们所举出的这些补充事例之后，我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意识到，中国人虽然生活在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状态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我们也就是从这一点才开始讨论的。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了。当遇到困难时，他们深知自己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堪称典范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断言，中国人是不文明的。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不能理性地看到文明与舒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要考虑到中国现在的状况与西方三个世纪前状况的区别，这样才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弥尔顿[39]、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期英国的生活状况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在此文里探讨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是累赘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足够令人感叹。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时代那种粗糙的生活方式，也

许就会让我们质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时代在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发生改变，人也不会发生改变。关于舒适与便捷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一直没有变化。但如果出现了新的社会条件，这些标准也必将要改变。他们总会有一天，也将采用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相同标准。然而在目前，这一点，他们不仅仅没有预料到，也暂时并不怎么向往。

第十六章　生命力顽强

中国人极富生命力，这是中国人其他性格的一个重要背景，而这点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康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明信片上的晚清街景

一位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生活状况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它看上去是这样，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人口众多，用不着一双很有眼光的头脑就能看出来，但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国的人口密度大。

就人口的相对密度与绝对密度而言，比起其他国家来，中国更类似于印度。不过，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而中国，除了

那些影响不大的民族之外，几乎就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在这个辽阔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一般也能轻易地找到印证这一判断的证明。最近若干年，先是爆发了令人恐怖万分的太平天国暴动，随后是规模较小的回民暴动，1877-1878年，爆发了遍及五省的空前饥荒，使中国的人口总数大概减少了好几百万。我们看到，在中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能得到很快修复。这是因为，中国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不愿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难发现，无论破坏力有多大，都不及修复力来得强大。我们坚信，只需维持几十年的和平安定和农业丰收，中国的每一块地区就都会从本世纪那一连串灾难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种恢复的前提已经充分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否愿意正视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在中国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成群的孩子，他们就像查尔斯·兰姆在给过于骄傲的母亲泼冷水时所说的，“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中国社会有条最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么多的孩子靠什么生存下来。必须记住的是，他们其中的许多孩子其实并没有基本的“衣食”保障的。换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极度的贫穷显然不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的明显减少。

想要控制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鸦片，这对中国人来说，就像是诸如战争、饥饿、瘟疫之类的危险的敌人。完全不用去证明这点，中国人的繁衍能力之强，现有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按照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现有的人口总数也已达到约两亿五千万。这个数字足以证明中国人生育能力强这个观点。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率。在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情况下，我们只能靠笼统估算的方法来得出结论，不过幸运的是，这种结论几乎不会出错。中国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要结婚，除开对金钱的迷恋，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强烈观念。

中国人口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迅速增长，与之相比，法国的人

口状况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最近的报告显示，其居民的绝对数呈下降趋势。这个事实引起了人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严重担忧。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则相反，他们并没有体现出任何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更为明显的衰退迹象。上帝给予人类的有据可查的指令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教导人类“在尘世间生养众多，昌盛繁茂”。正如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经所评论的，这道命令“已经为人类所遵从，并且这也是唯一得到人们遵从的上帝的指令”。而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这在中国更加正确。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幅员辽阔，几乎拥有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无论是亚热带地区还是靠近北极圈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之间任何的地方，中国人都能很好的生存下来。我们所能察觉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本身的特征和该地区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各地区人民适应环境的能力有任何内在的差异。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侨民，他们会移居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太平洋群岛、西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一直听说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并融入各种环境的事。

与此相反的事情我们绝少听说，我们能听到的都是他们适应得又快又好，并且比当地人更刻苦、更节俭，加之他们非常团结并很有凝聚力，以至于其他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纷纷喊出“中国人滚出去”这样的口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整体而言不再大规模地整体移居海外了。这对于其他民族内心的安宁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幸运。如果今天这片满是欲望的人的东亚大陆，要将他们的能量投向这个行星的其他地区，就像中世纪时代的中亚人所做的[40]，那么未来将难以预料，或者我们坚信的“适者生存”的信念将变成何种结果。

由于缺乏任何一种统计资料，我们只能非常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所有的观察者或许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长寿老人。老寿星们总是很受尊敬，长寿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被中国人列为“五福”之首。他们非常注意记录下自己出生的日期，甚至还精确到时辰，小心谨慎地记录下来，以备需要时能随时报

出来。尽管他们通常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并不严格，不准确，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喜欢增加自己的实际年龄。坟墓的墓碑上会突出显示死者的长寿。但是除了盛产石碑的附近地区以外，中国人只有很少坟墓有墓碑，因此，想从其他方面的资料入手来准确推断死者的寿命，仅仅依靠墓碑的记录实际上是不够精准的。



一群老人

中国人能活到百岁以上的并不多见，但百岁以下的高寿老者到处都能找到。可见，若有充足的营养，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还会有不少。事实上，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穷人，他们极度营养不良。若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内，那么，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人活到如此长的岁数，这足以令人惊讶万分了。众所周知，本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提高。这要归功于人们越来越注意保健的意识、不断提高疾病预防的能力以及不断改进医疗手段。需要看清的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相比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社会与医药科学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像过去的五

十年里在英国发挥的那样，那么，中国长寿老人的数目肯定还会有非常大的增加。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共同性格：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懂得卫生规则，即使了解这些法则，他们也公然予以漠视。这一直是外国观察者想弄清的问题：那么，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违背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能使得中国人灭绝呢？在中国，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那些原本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但事实上，这样的人数并不是剧烈增长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人有一种神奇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中国人稍微面临一点小事刺激就要拼命，同时，又顽强地保存生命，这两者都是中国人重要的性格。

我们已是多次不无遗憾地说道，由于缺乏至关重要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观察者所记录的观察结果。随着外国人所开办的诊所和医院不断增长，这些记录一年比一年更多，且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

为了举例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哪怕只是一年度的医学报告分析和整理，都是非常有用的工作，其结果肯定既新颖又有说服力。然而，我们只能简简单单地陈述几个事实来略加说明。其中有两件为笔者亲历的，而第三个例子则取自天津一家大医院所发表的医学报告。这些事例的说服力就在于它们是这样毫无疑问的事实，并非孤立而是互相联系，但又能与我们大多数读者所观察的事实相印证。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人家庭同住一栋房子里。某日下午，我忽然听到窗下传来叫声。那窗子是用砖坯砌成，底下有个洞，洞中有一个大蜂窝。一个才十四个月大的小孩正在那里玩耍，看见窗子下的这个洞，以为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就鲁莽地爬了进去。这个孩子剃了个小光头，头皮通红。蜂群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侵扰所激怒了，或许是把小光头误认为一朵大牡丹花，它们迅速地停在光脑袋上叮蜇，孩子被抱出来时，已被蜂群蜇了三十多下了。这个孩子哭了一会儿，就被放在炕上，不一会就睡着了。大人的手头上没有任何药品，他皮肤上的患处也没有敷任何东西。一整个晚上，这个孩子也没有吵闹。

到了第二天，他头上的肿包全都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痕迹。



玩耍的孩子们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人所雇佣的马车夫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这种病。马车夫患病，到了第十三天，他的病情已经相当危重。这个病人突然变得很暴躁，一个人力气大得能抵几个人。三个负责照看他的人被弄得精疲力尽。就在那天晚上，这个病人被捆在床上，以防他逃走。可当看守者熟睡时，他却设法解开绳子，完全光着身子逃了出去。大约凌晨三点，看守者才发现人不见了，于是整栋房子都搜了个遍。他们四处寻找，连水井也找过了，生怕他投井。

最终，大家在一堵约九十英尺高的院墙处发现了他的踪迹。他先是爬上一棵树，然后跃到高墙上，不知是跳下墙头还是掉下，总之他落到了墙外的地上，并马上沿着将汉人与满清皇宫隔开的城墙护城河跑去。两小时后，大家找到了他，只见他把头伸进宫墙下涵洞的铁栅栏内。显然，他是头热得不行，赶快想跑到这里降下体温的。显然，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在带他回去的路上，发现他的热病居然

完全退去了，尽管腿上还有落下的一点风湿痛，但他肯定慢慢会好起来。

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天津人，以在中国军队的演习场去捡废炮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一枚废炮弹，就在他试图把它拆开来时，炮弹爆炸了，并炸废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医院，实施手术，膝盖以下的部分被截去。这个人本该放弃这种危险的营生，可他一旦病愈又立刻回去捡弹壳了。

大约六个月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炮弹爆炸了，他的整个左手掌被炸掉了，留下一个破烂的伤口。右臂上部被火药严重灼伤，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右边脸颊、右眼的上眼皮，额骨的旁边和右手腕被炮弹片划伤，右小腿也被炸开很深的裂口，露出了骨头。受了重伤的这个人倒在地上，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躺在地上达四个小时听凭太阳暴晒。正好，一位大官看见了他，便命令一些苦力把他抬到医院，他本人也护送着走了两里路。抬的人显然是非常疲惫，等到那位大官一离开，就把这个可怜的伤员扔进了一道小沟里，让他在那里等死。

尽管因流血过多而精疲力尽，那位伤员还是从沟里爬了出来，单足跳了五百码，来到一家粮店，讨到一些吃的，并找到一个大粮筐，用他那一只没受伤的手推倒粮筐，钻了进去。店主为了赶他走，只好用筐子把他抬到医院门口，让他在外面自生自灭。尽管由于失血过多几近脱虚，脉搏也极其微弱，然而他神志清楚，还能清醒地说话。以前，他吸食鸦片成瘾，到了无法戒除的地步，这对康复非常不利。然而，对于如此的重伤和感染，除入院第五、第六天有腹泻和轻微的疟疾外，这位病人完全没有其他任何严重的症状。在四个星期之后，他拄着拐杖、带着一条假腿被获准出院了。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国人这样的身体素质，能够摆脱战争、饥饿、瘟疫和鸦片的影响，而生存下来，如果他们能对生理和卫生法则稍加留意，再依靠适宜的食物，保证均衡的营养，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民族将有自己足够的能力来占据世界的主要一大片地

区，甚至还会更多。

第十七章　忍耐有韧性

“忍耐”这个词，包括着三层迥乎其异的含义。首先，它表示一种能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行为或者品质；其次，它表示一种平静地承担任何苦难、坦然自若的耐力或行为；最后，它还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所涉及的诸种品质，作为中国人的性格而言，对他们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对待中国人某一种特殊性格做出考察，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看待，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在对忍耐有韧性做出考察时，尤其是这样。

中国人的这两种性格，与他们“神经麻木”、“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与最能直接体现中国人忍与韧的“勤劳刻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有关章节中所说的内容本来已足以表明忍与韧是中国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于只是附带提到，难免不连贯，而应当以更为全面的叙述加以增补。

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实的“活着”。为了活着，就必须有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这些生活资料。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赤贫和为活着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本身并不会使任何人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被赋予了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为活着而努力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为高效的发展。同样，也会让中国人充分发挥“节俭”这一重要的性格，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一样。



一群拉着碾子碾米的人

这样的条件，同时还会发展出人们忍耐与坚韧的品格。猎人和渔夫都懂得，他们的生计就取决于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只要他们是猎人与渔夫，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民族，他们总是行动隐秘，小心谨慎而富有耐心。中国人世代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他们能把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劳与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很少的报酬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报酬再微薄总比没有要好。祖祖辈辈的经验告诉他们，欲使得勤劳刻苦成为更多的机会的阶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我们西方人则以为，机会是勤劳刻苦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而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具备相应的

条件后，结果随之就会出现。不用观察便可以断言，在每平方英里五百人的人口密度下生存，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合于证实所谓“勤劳与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为了微薄的薪酬而干活，而这种满足正体现出他们忍耐的美德。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说，当他完成了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诸多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一件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所看到的事情中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挤走了一个犹太人。这一场景真的意义重大。犹太民族的品质至今已广为人熟知，他们的品质已经促成他们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很少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就不同了，他们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些被中国人挤走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相比，肯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相比肯定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即使换上另外一个竞争者，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的忍耐素质是世界一流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促动着一位中国学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九十岁才如愿中举，否则他死不瞑目。这种非同寻常的坚韧既不能说单纯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也无法用可以获得其他什么东西来解释，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超凡的韧性。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禀赋，类似于鹿的敏捷奔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就算是在商店门口最不起眼的一个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拉伯人，他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发现服装中这一重要东西丢失了，没有立即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别的人对他这种奇怪的行为感到纳闷，因而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给了一个镇定的、且极具东方特色的回答：“他最终肯定会来这里的！”人们有时会联想到，这种将消极等待予以夸张的故事所反映的情况，不仅只存在于中国人的个人

行为里，而且还存在于政府行为里。康熙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直至延续到了1723年[41]，这段时间之长、成就之辉煌的统治期，使他成为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

然而，正是在这个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在位时期，一个被称为“国姓爷”的前明将领，在明朝灭亡之后做起了海盗，竟敢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反攻，居然连政府的战船也根本对付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命令沿海所有军民朝内地后退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一来坚壁清野，那位旧王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进犯了。这个颇为古怪的圣旨下达后，大体上得到了执行，并居然大获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的反清复明计划严重受挫，转而进攻台湾，把荷兰人赶了出去，他最后被满清政府追封为“海澄公”[42]。这也意味着，他在得到招安的同时也被消灭了。每个读到这段难得史料的外国人都会赞同《中国总论》作者[43]的这个评述：即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如此之多的沿海军民撤离他们的城市与农村，不惜一切代价地退到内地，那么，它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装备一支舰队，去终结那些针对留下的家园进行肆意侵扰的敌人。

在我们看来，有关中国政府能忍耐的另一个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至今仍记忆犹新。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受政府之命，从巴里坤和哈密出兵，去平息回民起义[44]。这次风波刚开始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却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很快遍及了整个中国的西部，还波及到了中亚。左宗棠兵临新疆，他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得几乎无法克服。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刊纷纷刊发文章，既嘲笑左宗棠的贸然用兵，也嘲笑清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昏庸无能，居然通过贷款筹集资金支付大量军费。然而，在抵达叛乱地区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左宗棠前往平息暴乱的军队，就已进军到天山两侧，并给拦在他们前面的叛乱分子以沉重打击。他们每到一地，若遇粮草供应不足，大军就会转而屯田、开垦土地，自己种粮，以备他们将来需要用的粮食。正是这样，一边进军一边种地，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任务，其功绩被看做是“现代国家中最卓著的”战役之一。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坚忍不拔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表现为，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据说，检验一个人真实的品性，正确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流露出这样一种说法：遇到一个被剥夺了晚餐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失去幼崽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大不列颠岛的居民，对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适用的。要想说明其中的原因并不难。可见，我们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自始至终还处在我们肚子的奴役中。

然而，笔者有一次曾经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去参加一次宴会，其中大多数人是从几英里外赶来的，结果到场之后却碰到了一桩倒霉事。宴会原定于十点钟开始入席就餐，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此连早饭都没有吃，但是情况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变化，宴会并未能按时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站在一边，为后来的人充当侍者角色。后来者津津有味地吃着，那种从从容容的样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比起我们来要高明得多。先来的人没吃东西耐心地等待着，等了很久，终于快要吃上饭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又像先前一样，出乎意料地来了好一些人，情况更令人恼火，看来又得等。

那么，这一百五十位如同遭受虐待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是不列颠群岛的居民，甚至是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公民，那么，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都会带着不满的脸色，直到下午三点钟终于可以坐下吃饭，并且还大声咒骂他所在的整个环境，说自己倒霉运了。他们还肯定会采取严厉抗议办法，要“写一封带有五个‘先生们’联合签名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这一百五十位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仅没脾气，而且一整天都笑眯眯的，非常诚恳、彬彬有礼地服从于主人，似乎无论让他们等待多久都不介意，早吃晚吃确实都是一样的！有哪位读者可曾知道，是否有一种西方文明能经得起如此意外而又沉重的考验呢？

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的大相径庭，但这不能证明，已经表明“神

经麻木的图兰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斯多葛学派[45]的人。中国人能忍受痛苦，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还有耐心，而后者往往更难以做到。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这件事而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样的话，我也就可以心安了。”他的这一态度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我们应该承受之痛苦”的品格。

我们已经意识到，焦虑是现代生活的祸根，它就像是刀刃上的锈迹，侵蚀刀刃于无形。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中国人很少有几个足以引起深刻焦虑的现实缘由，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



挑担子的中国人

我们曾多次问一个中国人，如果他被夺走了土地和房产，妻子也离之远走，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那就再也没有太平日子可以过了！"其他的种种回答还有："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中国人那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给外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的从容。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灾难，发生在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难的，水灾、旱灾和饥荒随之而来。1877至1878年间的那次波及多省大饥荒[46]，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布满恐怖景象的往事令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象的灾难。几个省份最为富饶的地区都遭受到了破坏，肥

沃的土壤被厚达一英尺的沙粒所掩埋，变成了一片黄沙地。数以千计的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大批的民众突然由于天灾人祸而家破人亡，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因此，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的确，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的地方，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同样的事实是，此类的救济相当有限，持续的时间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对于遭受大灾的那些灾民往后的生活，政府能考虑的事务非常有限。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的生活条件的重新开始，政府则一概不管。人民的全部希望只要求政府能减免赋税，还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

在西方国家，“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人所共知的。但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里四处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某种方式的援助。当然，有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灾民们的要求，但他在压力之下总能为民众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他不能“安抚”民众，他就应该下台，让其他有能力的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曾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样子的：“不敢。”我们对这种说法花费口舌劝告，硬要说，一个人与其白白等着饿死，还不如聚集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好得多，那么，我们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敢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一个最讲实际的民族，依靠某种本能，感觉到这样的计划是徒劳的，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实施那种进一步必不可少的联合。然而，我们必须相信，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耐下去。正

是因为忍耐，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令人心痛的情景：充足的粮食近在咫尺，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无声无息地在饥饿中倒下。中国人对这种奇怪的事情已是习以为常，这使得他们对生命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

那些遭受这些苦难的人们终生无法逃脱其阴影，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因为它就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条件允许，遭灾的人宁可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无法再留在一起，他们只有走散了事，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若能渡过难关，就等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近处得不到救济，灾民们便会在隆冬时节，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几千英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某一个省份，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便返回到自己的家乡，被水淹过的泥土还非常松软，承受不了一个耕畜的重量，于是，他们只能在泥土中挖开一道道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撒下一些麦种，然后再度踏上曲折的道路，以乞讨为生，直到他们种下的庄稼获得小小的收获，能够收割时才回来。如果老天垂怜他们，他就可以在当地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从来未曾远去。

人们总是认为，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优秀的力量，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是确凿的，那么，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肯定将用以担当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中常见的苦难和饥饿的折磨，这样的推断应该更符合天意吧？如果“适者生存”就是历史所给出的断论，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天生具有忍耐这种天赋的民族，同时又保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必定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在忍受任何痛苦方面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力对我们而言或许可称为一种无法理解的心理矛盾：明明是身陷毫无希望的境地，他们也似乎没有表现出一种失望。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在做毫无胜算的抗争，并且常常是和唯一的一线希望作斗争。而据我们所观察，在中国民族中间，我们并没有看到十九世纪末叶其他大多数民族都有的一种烦躁焦虑的特性。他们似乎并不期待去计划什么最终能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他们甚至从不认为会有这样的时代出现。

但是，“忍耐”和“坚韧”这两个概念，根本无法涵盖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全部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往往能在逆境中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把这种持续性的好心情称之为“常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呼吁人们对这种美德加以注意，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顺便提一提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帮助大家对这种美德的理解。

我们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只是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以至于他们对改善自己的状况到了毫不感兴趣的地步。正如我们在谈论中国人的保守时已经讨论过他们的知足，在对他们的政治体制进行考察时，这点最能表现出来。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改变那种政体。这就是大多中国人的心态，对此，我们毫无疑问。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被称为“保守”的这一概念，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所有的民族都有这种现象，不过中国人比我们所知的民族更为典型。

显而易见，中国人的保守观念充满着整个社会，世代流传，有力地压制了人们对于命运的既定安排表示不满的行为。他们自然会感受到各种不幸，但他们却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固守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既定的秩序。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太过于沉重了。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知识界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但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极力说服中国人去坚信这点：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现存的体制是最好的体制。中国最漫长的历史所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经验，可供他们旁征博引，一堂又一堂生动、直观的教学课程来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尝试进行任何的改良都是徒劳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生长出顽固的保守主义。

人们还没有完全能够意识到这点，中国人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天命”的说法。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表达方式与我们时常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这两者在基本思想上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对我们而言，“上帝”就是意味着一个观念中完全拥有并创造万物、能给我们带来关照和预见的造物主；而对中国人而言，“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概念，却又非常模糊，不指向任何人格化的事物，而且还是完全说不清的东西。但对他们而言，无论“上天”实际指对什么，其实就是命运。对中国人来说，所谓的“好命”、“歹命”，其意思类似于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与“坏神”。依据这些神秘的魔力，什么事情就可能做不成功，或者就能一举成功。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有着一整套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依据各种力量的显现和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数量惊人的中国人，正是依据这种普遍实用理论来谋生，总数超出任何一种大胆的估算。尽管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地区，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实际程度上有很大的相同，但在每一个地方，它们却总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

中国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总爱说：“这就是我的命。”这种话再常见不过了。尤其是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更是这样。这样一种相信命运的信念，必然地导致人们走向失望，乃至绝望。而人们，尤其是中国人，也同时被赋予了某种获救的希望，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命运的再度垂青。也许，中国人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是坚定的宿命论者。或许，中国人的所谓的“命”不同于土耳其人

的“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坚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宿命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在面对他们认为不可改变的那些事物时，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希腊人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发现，历史就是一种以事实教人的哲学。正如我们刚刚所论及的，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一直是他们自己的老师。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无数的教训，就形成他们这样一种保守的性格。但是，没有一个民族能仅靠着自己的历史分析来获得全面的教育，就像一个人仅仅知道他自己的事情，完全不能说他什么都懂。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现有知识有着致命的缺陷。对于世界现代历史中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发现”、“现代科学”等这样一些伟大事件，他们一概不知。这些事件使得各民族间的联系比任何之前的时代都要紧密，人权的观念也在慢慢得到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却完全不受影响。

对于那些依然顽固地全身心生活在既往灭亡王朝时代的人们而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伟大法则的运用，给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带来好处。可这对于那些守旧的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在十字军时代的祖先更多。即便是他们能有所了解，也不会在意。

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动力是来自于知晓别的国家更优越。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却对外面世界中更好的生活条件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是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他们当中那些对其他国家略有所知的，甚至可以知道的更多的人，却为保守所束缚。除非能够大规模组织改良变法，否则没有什么能够真正造福民众。可是在中国，那些能够推广大规模改良的人士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这类的事情。这显然无法令民众感到满意，可惜这种不满意还没有能够得以表露，就被压制了下去。这样一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与进步相对立，会阻碍进步。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事实，即中国人的经验使得他们反对对现有

的生活进行任何的改良。对于一位在其他国家生活过的外国人来说，为了减少中国人所遭受的诸多苦难，一个简单又绝对必要的办法是移居国外。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这个办法是中国人最容易采纳的，而且成功的把握性也最大。但是中国人永远不会采纳这个办法，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老屋，离开埋葬祖先的坟地。根据儒家学说，他们理应坚守故土的。总的来说，除非被逼无奈，中国人是不愿背井离乡，去异乡谋生的。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扎根于故土，叶落而归根。

总得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离家之后不准备回去的。他们所希望的永远是衣锦还乡，叶落而归根，最终葬入祖坟。“渴望在后代脚下的土中化为尘埃。”只要这种命中注定的渴望一直在继续，中国人是不会改变其原则性的情感。那么，他们永远就不会采取这种能有效减缓他们痛苦程度的方式——移民。我们相信，目前，中国大众生活条件想要真正改善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做任何的族群迁徙，除非要让他们相信那是“命之所使”。纵然有许多能引起愤懑的原因，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却一直在阻止这种愤懑的发泄。

但是，由于我们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国人这种容易满足的才能，所以我们对中国人的论述因此一直还没有切入肯綮。看来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养成知足常乐的性格，就好比鱼儿长出鳍来以适应在水中游动，鸟儿长出翅膀来是为了在天空中飞翔。中国人勤劳、低调，遵守社会规则，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禀赋”。他们还有着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可比拟的承受痛苦的毅力，因为他们坚信那些痛苦是他们无能为力的。

中国人是常乐的，因为他们神经系统不用说，消化能力赶得上鸵鸟。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林林总总我们不能说清楚的原因，中国人是不会白费力气拿脑袋撞石头墙的。他们知道那些石头墙是难以撼动的，他们对大多数自认为无能为力的事情表示遵从，也没有任何动怒的怨怼。他们按照一句老话来活着：“治不了病，由它去吧。”简而言之，中国人懂得如何拥有，如何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拥有与否，他们更懂得知足常乐。

对于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精神上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能令他们喜出望外，但是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过分讲究的毛病在普通的中国人身上很少见。他们大多数是模范的宾客。不管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吃饭或是吃其他什么，他们都觉得够满意的了。甚至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也能用一种令我们吃惊的方式，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悠然自得。

中国人的常乐，表现在对社交的热衷，这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忧郁孤傲地独处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似乎就是与人聊天，无论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毫无疑问，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痛苦，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而大为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的中国人喜欢在他们简陋的环境中种树养花加以点缀，此举并能成为一种非常开心的爱好。有这样一句含义很难以表达清楚的说法：“我们的东西并不多，但尽可能地做到了物尽其用。”

关于我们的中国仆人，虽然我们已经公允地做出了许多批评，但平心而论，他们经常克服种种不便，任劳任怨，花上了很多时间为许多人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什么怨言，而且经常意识不到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这的确又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中国的仆人，若是习惯于叫命苦，就会常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一个笑柄和话题中人。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纺到半夜，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可在他们嘴里却听不到任何诉苦的话。他们起早贪黑，并视之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的劳动最为辛苦，然而，他们从不抱怨这个世界分配不公平，而且他们还常常放弃休息的机会依然精神抖擞地干活，一顿粗茶淡饭也能使他们感到心满意足。那些有眼力的旅行者，经常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劳工的这种非常突出的特点。

谢立山[47]先生在《华西三年纪实》中谈及扬子江上游所看到的情景说道："纤夫也值得关注。除了一位乐师和一位潜水工之外，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心灵手巧的小伙子；他们总是随时随地愿意在岸上奔忙，他们吃饭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刻钟，并且从来不闹脾气。"里德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中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我们的五名纤夫手脚并用，紧紧攥住纤绳，踏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流而上。我不能不高度赞美这些贫苦劳动者的顽强和耐力，他们拉上两个月才能挣得两美元，每天三餐只是粗糙的米饭，配上一点炒白菜。他们就是靠这些食物支撑着，每天从早到晚，使尽力气干苦活。"



推车的人

笔者认识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是推着沉重的独轮车，路程长达数月之久。在这些个旅程中，不论季节，不论天气，每

一天，他都必须很早起身，走到很晚，推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他要赤脚渡过冰冷的河水，每到一处旅馆，还要负责为雇主准备好食宿。干了所有这些艰苦的活，也只能换来一份并不丰厚的报酬，而他却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他的主人后来证明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看了这些文章陈述的每位读者，是不是都可以在对细节推敲之后得出同样真实的判断呢？

也许在生病的时候，中国人最能表现出他们乐观的天性。通常来说，他们都带有最为乐观的态度对待一切，无论别人生病还是自己生病，他们都希望人人对境况保持乐观。即使对于身体虚弱、极度的病痛，他们也常常没有放弃那种充满希望的乐观。我们知道，许多中国病人的故事，他们身患严重疾病，往往又极度贫穷，也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身在他乡，甚至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抛弃，他们的未来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镇定的态度。而在相似的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人性格中一定会表现出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相信，具有这种快乐性格的中国人决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稍有见识的外国人，都会遇见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再一次重申的是，如果历史所告诉的“适者生存”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中国民族就必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第十九章　孝道当先

要想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便不能不谈谈他们所说的孝顺。但是，中国人的孝顺可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解释清楚的话题。“孝顺”这两个字就像与我们不得不采用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在中国人的理解和我们通常赋予它们的含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在汉语中，还有不少的概念都面临着含糊的难题，其中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是“礼仪”中的“礼”字。

为了说明这一点，并为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我们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国总论》）：“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最集中体现；在我看来，《礼记》是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确切、最完美的专著。中国人的感情，都可以靠礼来表达。中国人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中国人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也依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教所控制的民族，家庭生活中有道德的人就是有礼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政治责任感的人都是有礼的人，在宗教生活中表现得虔诚的人就是有礼的人。”对这段话，每个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的评价。他说：“将中国人理念的‘礼’翻译成为‘ceremony’很不够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规范的礼仪和礼貌的基本原则。”

确定中国人孝顺观点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翻阅“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从中找到有关的论述。尤其是《孝经》中的陈述，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性格中最独一无二的特性的。必须要切记的是，中国人的孝顺是多方面体现的，在不同场合能看到不同的表现。不过，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传教士的会议上，晏玛太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撰写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这篇宏篇大作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顺’这一词语的前部分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入歧途。”

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最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学家理雅各博士，则断然否定晏玛太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中国人给他留下的印象与晏玛太博士的观点截然相反，就像不同的温度计会测出不同的温度一样。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点，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新的整体，综合加以考虑。

中国的孩子们没有严格的纪律，他们没有得到过如何正确听从父母意见的训练。他们一般也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正确服从的观念，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而且也为丰富的经验所验证。我们把立即服从父母当成一条人生规则，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可是那些缺乏教养的孩子长大之后，情形就不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了，这似乎也是一个实情。

中国人认为，“树大自然直”，这个比喻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尽管这句话可能讲的是其他意思，但它确实为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似乎就是由人们关于孝顺的信条、培养孝顺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典型共同促成的。《孝经》中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8]还有一种最普通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49]中国人还特别被灌输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任何一种道德的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的缺失。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对君王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恪尽职守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50]。

可见，孝道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仅包括单纯的行为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在我们普遍的理解中，孝顺实际上是出于感激。《孝经》中的“圣治”一章对此作出了强调。据孔子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51]。因此，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子女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众所周知，羊羔很能体现中国人的这种孝道，就是小羊羔吃奶时，还知道要跪着呢（羔羊，兽也，跪哺乳）！孝道还要求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否则我们就是辜负了父母的仁慈，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道要求我们当父母健在时，要尽心服侍好。在父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

孝道还要求儿子要能够继承父道。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52]然而，父母明显有了错误，做子女的也可以努力劝说，以促使他们纠正。卫三畏博士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父母有过，下气怡然。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53]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做父母的在这些方面对子女教谕往往起不了任何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则很少能听到这样类似的事情。

在《论语》的第二章[54]，我们发现了孔子对孝的实质作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依照不同的提问者而各相异。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解释也各不同。第一次解释是在鲁国一位名叫孟懿子的官员请教时，他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55]这个答案如同一粒种子，久久地埋在了提问者的脑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而慢慢萌发。不过，这个词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要违背意愿”。那位向孔子提问的官员孟懿子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其实也像他的后代一样，具有“拐弯抹角的才能”。他并不亲自对孟懿子解释自己的本意，而是直到后来，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而然地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提问，给予了孔子一个能进一步阐释自己本意的机会，他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毫无疑问，孔子之所以和樊迟进行这番对话，就是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子，这样一来，孟懿子就会正确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还有一次在对“什么是孝”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时，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56]。

这里引用上面那几句话，就是想表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是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他们的种种需求。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观念，孔子曾明确表示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也意味着，他感到当时与古代已大不相同了，而他所向往的是恢复更为古典的孝道。孔夫子所讲出的这些话，已过去好多个世纪了。他的学说赢得了很多中国人，并已深深地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如果今天孔子仍然活着的话，我们更有足够的理由去深信，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坚定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人们已经注意到，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职责间的关系，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理解孝顺。随便挑十个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回答：“不让父母生气。”父母生气是因为子女没有好好地服侍。说得简单些，还是应该“无违”，这是孔子的话，尽管他这样说时，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如果我们中的某一位读者想知道这一理论所导致的有关实例，那么，就请看一看《二十四孝》[57]的故事。它所讲述的故事收录在一本小书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东汉的一位少年，六岁时随父亲去拜访一位朋友。人家拿出橘子来招待他。他发现那人家的橘子特别好吃，于是，这个早熟的小朋友就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偷偷地塞了两个橘子在袖筒里。但在他告辞鞠躬时，橘子却从袖口掉了下来，这使得这个男孩陷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可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面不改色。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两句令其名声流传千古的话：“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高官，在一个西方批评家看来，这孩子不可能没其他机会为他的母亲弄到橘子。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却成了

一个尽孝的典范，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够为母亲着想，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反应敏捷，能很快就想出借口吧[58]。

晋代也有一位八岁的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蚊帐，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权宜之计，就是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连扇子也不摇一下，为的是让家里的蚊子都来叮自己，好使父母能睡个安稳觉[59]！与他同一个朝代的还有另一个少年，在家里，和很不喜欢他的继母一起生活。可他的继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吃鲤鱼，但在冬天又弄不到鱼。于是，这少年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主意，不假思索地脱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情形，大受感动，就从冰下钻了一个窟窿，跳了上来，以供他那暴戾的继母把自己当成一顿美餐[60]。



摆出姿态来照相的一家四口

在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中，“私妻儿”（即只管妻子和儿子）被视为

一种不孝之举。在刚刚提到过的《孝经》的《圣治》一章中，这种行为的恶性曾被与赌博并列，都同样遭受人们的抵制。在刚才所提到的《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关于此类坚持行孝的典型事例。有一位汉朝的人，家中很穷，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同时养活老母和一个年仅三岁的儿子。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太穷，实在没有办法了，甚至连母亲都养不起。但孩子会争母亲的口粮。为什么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再有了。"[61]他的妻子不敢反对，于是，他就亲自动手挖了个两英尺多深的坑准备活埋掉儿子。可在坑底，他们却挖出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表明这些金子是上天赐给这位孝子的嘉奖。但假如没有挖到金子，那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而按照一般人对孝道的理解，这人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做法也无可厚非。"私妻儿"的感情不能阻止人们为了增加父母的寿辰而活埋儿子。

中国人还相信，如果父母患上了痼疾，只要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吃一块子女身上割下来的肉，就有可能治愈。这些肉做好吃下后，即使不敢肯定会治愈，但中国人认为总能表达一份孝心。北京《邸报》上时常刊登这类的事例。笔者自己也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为了给他的母亲治病，就曾经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对那一块伤疤，他就像一个在战场负伤的老兵那样一直十分自豪地展示出来。毫无疑问，这类事情也许并不十分普遍，不过也并不罕见。

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因为需要有人继承香火，不断地祭拜祖先。这已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头等大事。同样因为这一点，每一个做儿子的都必须尽早成婚。三十六岁就做祖父的，在中国司空见惯。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弥留之际，还曾深深地责备自己有两件不孝的行为：一是行将撒手人寰，不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来得及安排好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种关于孝顺的想法，无疑会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

没有生下一个男孩，位列中国人休妻七种理由的首位。对男孩非同寻常的渴求，这样就会导致一夫多妻制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不幸。有这样的风俗，中国人每生男孩时就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一旦生下

了女孩，就神情沮丧、意气消沉。这种中国传统观念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广泛存在着溺婴事件。这种罪行，在南方比北方要多。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在北方想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人们对此讳莫如深。中国的私生子的数目也不少。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男孩女孩，都不希望把他们留在世上。尽管在每一个地区能够得到直接证明各地溺杀女婴的事件的证据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可以默许活埋三岁小孩以便养活其祖母行为的民族，轻易地剥夺那些不受欢迎的女孩子的生命，或许算不上太深的罪孽。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国人对去世父母守孝的观念，原来要求服丧期应满三年，可在实际上往往被宽容地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十七章中我们读到，孔夫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守孝三年，坚持认为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对此，孔夫子最后回答，在父母去世后三年的守孝期间，君子是不能行乐的，但如果这位弟子坚持要把守孝期缩短为一年，在这一年内只要他行乐时能够心安理得，他就去行乐好了。但是，孔子明确地指责他为“不仁”。

如果这个儿子在政府中任职，那么他要奉行守孝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虽然这会消耗掉他们大量的时间。在一些极端的守孝行为中，也有一些特别的孝子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草棚，在整个服丧期内整天住在那儿。不过，更为普遍的做法是仅仅在坟边过夜，而白天照常生活。

然而，也有一些做儿子的在尽了人情礼仪之后才安心，于是整个服丧期间干脆自我沉哀，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也不做。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父母极尽孝道，在父母坟前守孝守了很长的时间，这种行为最终导致心绪不宁、精神紊乱，给全家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负累。在中国人眼中，对此等行为表示出了高度的赞赏，至于其实行的后果如何，则根本不用去考虑。在他们看来，履行礼仪是绝对重要的，而其他任何事情与代价都显得无关紧要。

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一场隆重、体面的葬礼，不惜卖掉了自己的最后一块田，甚至拆掉了房子，拿木

料换钱。这种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很少有中国人明白这个观点，更没有哪个中国人能意识到这种错误。这种做法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他们的礼仪，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件毫无疑问要去做的事情。

库伯查神父依照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来看待中国人所看重的孝道和礼仪。他刚来到中国尚不足一年的某段时间，神父生活在南方某一个地方。他雇佣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师，教师家中有一位老母亲，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那个母亲也不知道儿子的下落。有一次，神父要派一个信差到北京去，那位教师恐怕也非常乐意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给他的老母捎上一封信。听说送信的人马上就要出发，这位教师就对刚在隔壁教室上完课的一个学生说："过来，把这张纸拿过去，替我给我母亲写封信，别耽误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

库伯查先生见状大为惊讶，就问那个写信的孩子是不是认识老师的母亲，结果是，那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教师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你什么都没有告诉过他，他知道写些什么呢？"库伯查神父就问那位教师，那个老师则不以为然地说："他怎么会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学写文章已有一年多了，已经掌握了不少文雅的套话。难道你觉得他不清楚一个儿子该怎样给母亲写信吗？"果然，那孩子很快就回来了，他已经把信写好了，而且还封了口，那位老师只是在信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可以送给这个帝国内任何一位母亲，然而每一位母亲收到这样的信时，也都会同样满心欢喜。

由于不同的孩子受孝道伦理的影响并不相同，就导致了两种极端情况。当然，两种极端的例子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都能找到。在中国，子女杀死父母的现象很少见，犯这种罪行的人一般都是疯子，但对他的处罚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普遍民众的生活始终在非常贫困的境地中挣扎，父母有时对子女管束得过分严厉，所以导致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儿子们愿意主动代替犯了罪的父母，去接受死刑的现象发生，它深刻地印证了孩子对父母的一片孝心的真诚力量，尽管很可能那犯罪的父母的确罪该万死。

在典型的西方基督教国家里，维系家庭生活关系的纽带十分松弛并不罕见，对刚从这种社会背景里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道理论的确有些吸引力。尊敬长者的古老风俗是最有益处的，这一品质可以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里得到普遍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一个儿子长大成人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中国人眼里，这种风俗就有点像长大了的牛犊或驴驹对母牛和母驴的所作所为，因为对于动物才适合，它们不用受“礼”的约束。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在许多社会行为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像还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必须小心谨慎一些，不能莽撞地乱扔石子。不过，另一方面，若不着重指出中国人的“孝道”中的几个致命缺陷，一切讨论都将徒劳无功。

依据中国人的孝义观念，将人的五种严重过失视为不孝，前两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62]，还有三个方面有积极意义，却并未加以讨论。在中国谈论儿女义务的书有成千上万卷，却很少能够提及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在中国，提出这类建议并不是多余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这样的建议是一点不可或缺的。神启的智慧，让使徒保罗以他精炼的语言道出了思想深邃的话，向歌罗西的教众宣讲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我们的主。”“你们做女儿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为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63]

在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么能与这些影响深远的准则相提并论呢？如果所有传统的教义都不为女儿们说一句话，而全都为了维护儿子的利益，在看待这方面问题时，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眼睛如果没有昏花的话，怎么会没法发现，这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严重摧残呢。决定性别的偶然因素使得生为男婴，就被家里奉为至宝。同样偶然的因素，却使一个女婴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赘，就算不一定被溺死在襁褓里，也一定会终生饱受歧视。



满人贵族家庭的结婚照

中国人的孝道认为，妻子是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孔子从来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丈夫应该怎样尽到对妻子的责任。而儒教学说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并同时也强迫他的妻子这样做。如果在丈夫与其父母关系和妻子与丈夫关系间产生矛盾时，那么因为夫妻关系是次要的、卑贱的，那么，后一种关系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是按照传统家长制的结构构建着的，其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了人们内心某些自然本能，而又将另一些天性驯化到了极端。其结果，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只要长者还活着，青年一代就备受压抑，也就完全处在从属地位。这些承受钢铁般强硬的压力的人，头脑完全被禁锢了，阻碍了社会朝着

有利的变革方向发展。

施行孝道的方法之一就是要不断传宗接代。中国人的这一信念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的产生，它迫使人们大量的生儿育女，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这也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备受贫困煎熬的境地。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习俗形成的主要原因，并注定永远是一个祸根。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孝道信仰的集中体现，祖先崇拜才是中国民族的真正宗教。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理解这个民族的祖先崇拜体系，知其真味，就会明白，这种体系使得一个民族被迫套上最沉重的苦轭。正如晏玛太博士在上面的那篇已经为我们所引用过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令人备感痛苦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个死人的压抑，“当今活着的一代被无数代人束缚着生活。”对于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种保守主义，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在十九世纪这最后二十五年间，中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致命一击，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华民族继续将已死去的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恪守孝道的深层原因，一半是由于恐惧，另一半由于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支配人类灵魂的两种最有力的因素。鬼神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很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如果忽略了祭祀鬼神，它们就会发怒。如果鬼神发怒，他们接着就要报复。这句话就是中国人崇拜各种形式的死人的理论核心，崇拜它们就是一种为了保险的做法。如此一来，在活人之间，这样的推理也同样简单。

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对自己尽孝。并且，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在这点上，人们有一个非常普遍且通行的想法：“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很清楚这一点。“床上无尿孩湿炕，坟前无儿烧纸忙。”每一代人都要偿还上一代人的养育债，反过来也要求下一代人能尽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道的

品行，就这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递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道，有人怀有一种深忧远虑的观点，认为中国人的孝道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让人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完美的，最终极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与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一致的。它企图使死人变成神，所有的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中国人只对尘世的父母奉献出爱、感恩和敬畏。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即使是知道了，也没有人感兴趣。如果祖先崇拜不被放弃，基督教就无法被中国所接受，这两者不能共存。在这两者的生死斗争中，只有适者才能存留。

第二十章　仁义为纲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人们推断出这样的道理来，“仁”产生于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对文字结构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留心的观察者应该了解的是那些充满了各种事实的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也远非是实情。孟子提醒我们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人们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罢了。儒家学说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仁慈的交易，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一种处处注重实际的本能，一旦他们注意到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体现仁义的机会，并超出其范围做出大量的“善事”来。

在各种各样的善举中，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风病院、敬老院和兴义学等。中国没有进行过一次最有实际意义的户口统计，因此，我们可能还无法确知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李善修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的慈善机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汉口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相对而言还是太少了。因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特别是这些人口在巨大的蜂房般的城市密集居住，他们对慈善机构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

一遇上中国发洪水或发生饥荒时，无处不在的施粥棚成为到处可见的风景，也为缺少衣服穿的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承担，民众自己也以值得赞扬的方式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有见识地捐出巨大钱财的事情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的涌进整个国家的城市里，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可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涌进来，在各个地方都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让步

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我们没有把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考虑在内，它们也属于慈善机构。这些社会团体主要帮助那些背井离乡的人，穷困潦倒到没有帮助就不能回家的人，或者客死他乡的人、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或许中国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专门劝人行“善”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即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做过的恶事负责，引以为耻，并要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之间的平衡，会在阎王殿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一个寿数的结果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那种注重实际的性格，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体现了他们这样一个执着的、难以压制的信念，认为来世（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都是带有期望获得回报的动机。

有时，公开宣布一桩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吏想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对于这座古都的民众来说，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64]。为此官吏贴出告示，竭尽全力劝谕民众：“倘若慷慨解囊，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却一致抵制，他们与茶馆联合起来，不去茶馆喝茶，也就无税可抽，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这种逼迫人们进行的“善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

那些个能不断积累好处的善举包括有：为死去的穷人提供免费的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以适当的方式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来活鱼、活鸟，然后放生；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各种“美德书”，甚至免费赠送阅读，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可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对于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面临的困难做出

具体帮助，被放在其次，这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这些善行也因此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不会惹上麻烦，也犯不着动脑筋，考虑诸多细节。和发现别人的实际困难、并及时给予有效的帮助相比，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然后把他捞上的鱼全部买下，再放回到水里，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于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那就是鱼一到水里，鸟一飞出笼子，它们就靠自己生存，自谋生路去吧。他们的善行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继续照看它们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那个行善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让善举记录在案，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他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知道并不会出现什么影响他的后果。

然而，在中国，“善门难开”，想要关上门，则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完全失明的贫穷乞童，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使得那个瞎子丧失了失明乞讨这一唯一的活路，因为，他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理由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当看门人！

有时，一个活动范围很有限的慈善老太太，不时地款待其他的一些本应该幸福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不久，这些人就赖上那个慈善的老太太，她却成为了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可这样的事情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罕见。但是，打了这么多的折扣后，我们不能不承认，依靠发自内心的仁慈来行善举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

每当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比如说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

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灾害，使得人们意识到，应该采取一些长期性的、大范围的预防措施。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所有的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发生了。而且，对于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在这个时候，灾民们已经非常虚弱，最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可是这时，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金，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自己去尽最大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一是政府的救济款已经全部用完了；二是田里还需要人干活，以便将来农民有粮食可吃。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对于官员来说，个人零星小灾难总比大规模人群死亡损失要小一些。

在同样这一种精神指导下，轰轰烈烈的“腊八舍粥”也如此。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每年中国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都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每一个平时有善心却没机会行善的人，都在这一天准备好要慷慨施舍那种最廉价、最稀薄的粥。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从日出到日落持续十二个小时。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也被人们视为一种积德之举。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生活在乡村里的人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能煮出类似甚至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促进他们换上更好的食物。相反，施粥的人依然展示着他们的善意，其兴致如果不是说更大的话，至少还和往年一样。一天过去了，尽管已经预备了一大缸的稀粥，没有一个人来讨上哪怕一碗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一口喂猪的破缸中。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心满意足地回屋睡觉去了，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这里享受盛宴，但今年的义务他已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情形相反，遇上了一个歉收的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这样成群

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在城里，众所周知，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的势力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乞丐从来不怕失去什么，也就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一个小店主可能拒绝了一个难缠的乞丐的长时间乞讨，即便这个乞丐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锲而不舍。但是，这个店主就会因此遇到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的麻烦。他们都赖着不走，这样的状况，即使是一个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是个沉重的负担。那些乞丐们不断索要，且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价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此，这类性质的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同样的原则经过置换后，也同样适用于人们对待川流不息的难民的救济办法，为数很少，但一定要有。通过这些事例，你将认识到这样一种看法，即这样行善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就像骰子游戏中的“四点”一样，每一个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中能“更进一步”。

在谈及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的缺点时，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多么紧急，多么有益，几乎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中税捐体制的层层压榨。这个体制的压榨和政府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也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想弄清楚任何一个常设的中国慈善机构，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场特大灾难爆发的特殊时期，我们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无耻的官吏侵吞那些由他们手中发放的赈济款。这些丑闻发生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因此不难推测，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接触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那一部分。当他们对西方文明有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世界遍布具有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肯定是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其他国

家无可比拟的。在这之后，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汉语中大部分表示情感的字旁边都带着一个“心”，作为偏旁部首。可是表示“仁”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它没有以“心”字作偏旁。这说明，它所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其导致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做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是否能知晓有无明确的需要，都要找机会去做慈善与公益，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当中是完全缺乏的。这的确不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如果中国人想培养出上述所云的那种真正的慈善之心，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所经历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把仁慈变成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章　同情匮乏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及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所谓居于五常之首的“仁”。仁义是一种善良的祝愿，同情则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在姑且认为中国人的确做了一定数量的善举的基础上，我们下面所要阐明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

我们必须要时刻牢记，中国人口是非常稠密的。在这个国家的各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发大水或闹饥荒。在很多其他国家的事实都表明，这些社会灾祸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这点似乎不怎么灵验。中国人独具传宗接代的首要愿望压倒了一切天灾人祸。即使是最穷的人家，也要在他们孩子很小时就让他们结婚。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大家庭，就好像他们能够养活这些家庭一样。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活只能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全部人生几乎就像一个干一天活拿一天钱的底层打工者的普遍状况，这种状况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一个随时随地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用不了相处多久就会意识到，几乎很少的几个中国人囊中不羞涩。如果他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长期与中国人相处。无论干完什么活，第一件事，他们就是要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拿到了钱，做事的人才有饭吃。即使是一个小康人家，在急需用一笔不大不小的钱的时候，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一个人需要筹一笔钱去办事，比如办丧事、打官司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说上一句意味深长的俗话来形容被迫借钱的窘状：“闹粮荒。”这就是说好像一个饥饿得要死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除了那些少数境况较好的人家外，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能独自办成这些事情。

在中华帝国，最突出的现实就是成千上万人生活在令人绝望的贫

穷之中。即使最粗心的观察家也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因为贫穷，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在生活贫乏的巨大压力下，人们生活全然降低到了纯粹物质的基础上。人们已形成一些固定的旧习，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他们依然如此。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圆，只存在着金钱和粮食这两个圆心，只有它们是焦点，人们整个的社会生活都围绕着这两个点而旋转。

中华帝国的广大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基本生活必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使他们在各种难以想象的条件下，承受令人难以想象、高度同情的苦难，都是举世皆知的。一个中国人，他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在现实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稍稍解脱出来，哪怕是千分之一那么一点点。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要是遇到灾荒年头，还要成倍的增长。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应该意识到，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还是靠政府的干预，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这就像慈善机构发小冰块给那些伤寒病人一样——每一个病人都能分发到几盎司的冰块，却没有医院，没有饮食，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没有能在实际中表达更多的善心，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然缺乏制度、统筹和管控的情况下，慈善行为还能一直保持下去，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都知道，即使一个再有教养的人，长期面对着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结果。我们对这一状况并不陌生，现代的战争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明证。第一次看见献血，很多人会导致上腹部精神紧张，产生难以消除的印象，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了，人们也将变得相对麻木起来。即使流血的是当事人自己，他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他也将会为自己的麻木而惊讶。在中国，一场社会战争是永不停息的，人们对这场战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只会给它很短暂的关注。

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证明之一就是他们对各种残疾人的态度；中国人普遍认为，跛子、瞎子（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睛的人）、聋子、秃子、斜视，所有的这些残障者都应该避而远之。人们似乎都相信这点，如果一个人生理上有缺陷，那么他的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人们一般不会对这些人表现得那么直接地冷酷无情，但他们总是很少能够得到同情。而在西方国家里，这些人是能够得到普遍的、自然而然的同情的。在中国，大家心中普遍暗自相信，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这样的报应。这种观点，倒是与古代犹太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残疾的人，无论是生来就有残疾还是后天引起残疾的，总是会不断被人提起他们的缺陷，他们只得忍受并习以为常。经常被采用的，最温和的方式，就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可能会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子老兄，你是哪个村来的？"常常也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斜眼人会听到人们大声说"眼斜心歪"这样草率的判断。或者，是一个没有头发的人，他会听到人们不断说："十个秃子有九个诈，最后一个如不是哑巴，也一样。"像白癜风这样的疾患，也会成为人们在无聊时的谈资和笑料。这种玩笑且永远开不够。这些不幸的男男女女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想要快乐地生活，只有当他们听到长年不断、没完没了的嘲弄而不再发怒的时候，才能够做到。

对待那些精神有缺陷的人，中国人的态度也同样坦率得过分。一个旁观者会轻易而草率地说："这孩子是个傻瓜！"可实际上，那个孩子也许一点也不傻。但是，一个人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就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去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是一种很普遍的状态。或许，恰恰正是这种方式导致了许多人产生了精神病症，并使之更加地严重。病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致命的原因成了无一不可公开的谈资，甚至都可以当着病人的面一一谈论。而病人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人们称为"疯子"、"蠢货"、"笨蛋"等等。

在一个把生男孩看得至关重要的民族中，生不出男孩子而遭到谴

责与辱骂，这个情况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的古代，先知撒母耳[65]的母亲，“她的对头，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如果一个母亲出于某种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子，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因为那一定是个女孩。

中国人缺乏同情的最为典型例证之一，就是新娘在婚礼中所受到的人们的对待。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轻，她们也很害羞胆怯，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难免感到恐惧。尽管各地风俗差异很大，但有一点都是共通的，就是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没有人能关心她们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有的地方，允许人们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还有的地方，尚未出嫁的少女们会拿新娘当成取乐的对象。她们站在新娘必经的道旁，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大把大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以此取乐。那些碎屑会久久地黏在新娘的头发上。她们的头发都是费了好长时间，抹了厚厚的油的。当新娘下了轿子，走进公公婆婆家门时，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此时此刻，新娘的内心感受当然是不难想象的。



汉族平民的结婚照

中国人一方面号称十分注重一丝不苟的礼节，可与此同时，他们却很少能意识到自己言行有时非常令人不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就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很多老师在教室和其他人谈论起学生来，都会毫无顾忌地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中

举，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我所见过的学生中最为愚蠢的。”而这种评价会对学生有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自然状态下来考察，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过得非常幸福，因为家庭成员彼此缺少感情上的交流，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恰恰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就像一个协会，他们持久稳定地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他们兴趣各不相同，彼此也相差很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在中国，女儿从出生到长大，都多多少少不受欢迎。她们一生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可以证明中国人缺乏同情之心。

在中国，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难免会发生争吵。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她们便往往会自由自在地互相辱骂。不过，中国俗话说得好：“再骂总是亲闺女。”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特定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这是一种通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儿一旦结婚，除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是别人的媳妇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这也是一种地方风俗。

某些地方，女儿经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但不管这些地方的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人们总是普遍认为，媳妇是婆家人，是婆家的一部分。女儿回娘家，严格说来，基本都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她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而娘家的人必须帮她做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简直是一种

严重的盘剥。因此，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母亲却暗中支持。但根据当地风俗，如正月里的某些日子，尤其还有节日，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

女儿回婆家时，就像谚语中所讲的贼，从未空手而归。她应给婆婆带回一些礼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没能办到，婆婆就会演戏似的发一通脾气，女儿嫁到穷人家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她将会发现，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是一种“禁忌”。娘家的媳妇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就像腓力士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把对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妇在家里足够强大，她们就会像腓力士人那样，对不能统统消失或者立刻驱逐出境的敌人课以重税。

媳妇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严格地说，更像是一个奴仆。如果要找一个仆人的话，当然要找健壮的，发育良好的，而且还要懂得烹调、缝纫等生活技艺。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勤劳能干的媳妇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二十岁的姑娘做媳妇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自己的小丈夫。

将中国媳妇所遭受的苦难写下来，一段简单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起码要写成整整一章。所有的中国女孩一般都很早要嫁人的，她们一生中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是得受婆婆的绝对控制的。说到这些，人们大概可以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媳妇在备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对于出了嫁的女儿遭受虐待时，做父母的，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丈夫严重地打伤甚至杀死了妻子，只要能证明她对自己的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年纪轻轻的媳妇自杀，在中国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还有什么话能比这句话更令人心酸呢！



一家女子的集体照

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发表过河南巡抚偶然披露的一份奏折，其中顺便提到，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且做婆婆的杀死媳妇，犯罪凶手只需交一笔高额的罚金就行了。在这位巡抚所披露的案子里，有一位妇女用点燃的香烧她的童养媳，又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活活给烫死了。这位巡抚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但其可靠性是毋容置疑的。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常见，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的现象却是常见的，仅仅能引起极小的波澜。与笔者相熟识的不少家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做妾，她们的命运更是无比心酸。她们所生活的那些个纳妾的家庭（总数并不多），极少是幸福的，总是不断发生争吵和公开的打斗。一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外国人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长官，不仅十分富有，而且还是个大学者，举人，也很有才干，通晓经典中的各种教义；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罪恶的欲念，他任意欺骗、诅咒、搜刮和体罚百姓。他的一个小妾逃跑了，被抓到后带了回来，又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严刑拷打。"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穷人是没有资格生病的。家中的女人、孩子病了，男人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往往任其发展，到最后常常都

是病入膏肓，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有时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我们前面讨论孝道观念时，年幼者的价值只是根据他的未来，而不是现在决定，所以年轻人受较少的关注。因此，在中国，西方的许多国家的做法常常是被反其道而行之。三个旅行者当中，谁都知道，最为年轻的那一个要在任何困难当中挺身而出。最年轻的仆人也最辛苦，一律要做其他仆人不做的苦活。

无数百姓的生活都穷困难熬，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孩子们经常会因难以忍受家中苛刻的压制而离家出走。在外头，下决心逃走的孩子一般都能发现生存的希望，可以与别人合伙谋生。他们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据观察，最普遍的还是因为在家中无法忍受他人的虐待。我知道一个男孩，最近斑疹伤寒初愈，很想吃东西——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这样，病好后胃口奇佳。他也不例外，他觉得家里的粗糙的黑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二十美分的点心吃了，但因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责骂，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去了（整个东北三省都是逃跑男孩的福地），从此，杳无消息。

乔治·D.普林蒂斯[66]说，男人是支配者，女人只不过是“附属物”。这句话赤裸裸地展示了一个妻子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对于娘家来说，婚姻对女方家庭就是免除了抚养她的负担。而对男方家庭来说，娶妻则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果不去深究潜在的动机，人们对此都是闭口不谈。但是在中国，没有谁对此心里不清楚。

对于那些较为贫穷的普通人家来说，婚姻的这一目的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一个寡妇再嫁，人们普遍的看法就是：“现在她不会饿死了。”有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话说：“再嫁再娶，为了吃饱；没吃没喝，散伙拉倒。”遇到灾荒年头救济饥民时，经常会看到丈夫抛弃妻儿，任其沦为乞丐，或者饿死。还有这样的例子，很多家庭把儿媳妇赶回娘家，交给娘家人去赡养，或者无人接收，最终饿死。他们说：“她是你们家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的赈济粮会被男人们抢去吃掉，尽管这种

事可能并不多，可总在发生。

仅仅通过大灾荒年头的现象去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失公允。然而，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甚至与和平时期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但是灾荒之年更普遍罢了，使得这种买卖人口的行为变得无足轻重。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骡子一样被公开，仅有的实质性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被牵到集市上去。

1878年的那场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华北三个省份，然后迅速向南蔓延。在大灾荒期间，大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所装的皆是用以买卖的妇女，并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因为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致使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他们要把年轻的妇女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这种奇特景象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我们说过，在一个家庭里，中国人之所以对病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疾病天花，中国人对它一点儿也不重视。因为它是如此频繁地侵袭中国，很多人染病，中国人便抱定几乎无人能逃的想法。但是，这种病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也只因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因害这种病而双目失明的人随处可见。把身体发肤看得很重要的中国人却以一种令西方人难以想象方式，忽视婴儿的生命价值。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夭折的婴儿经常的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之后，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扔掉拉倒吧”！或者，只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着一种恐怖的习俗，就是把婴儿的尸体胡乱塞进乱坟冈的死人堆里，为的是防止他身上的“讨债鬼”回家骚扰。

我们感到天花可怕，中国人却不在乎，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恐

怖。但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的恐惧，却如同我们见了猩红热一般。如果一个人离家在外，得了上述其中任一种病，都难以得到妥善的护理，甚至一点护理都没有。对于向其他人请求一切的帮助，得到的回答肯定是：“这病是会传染人的。”

许多热病的确有些传染，可在云南的一些山沟里发现的一种疾病，可能是最令人害怕的灾难。贝德禄先生如是描述这种病状：“患者不久就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每一个地方都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的十个患者中，有九个人会性命不保。”他还转述了当地人的说法：“病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它们在桌子和床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让那些不信鬼存在的人也听到。不管怎样，很少有人愿意走进病人的房间。当代的传教士向我证实，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害怕传染，人们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上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每天两次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里看，用棍子去捅一捅病人，看他是否还具有生命迹象。”

中国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的每个家庭中，必定存在着暂时不为我们发现的友爱行为。疾病与灾难最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的西方医院里，我们也亲眼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也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一位中国母亲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使那个孩子不至于被饿死。

除非有某种特殊的原因，人们一般不轻易愿意帮助别人，这一特点在中国社会关系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人劝说一个聪慧却没有机会上学的男孩去读书，这也非常合乎情理。可他有自己充足的推诿的理由，因为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而嘲讽他的人，正是那些曾经年累月混迹在学堂里的人，他们似乎认为：“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在几个月之内就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自己

去请个老师吧。”一个人依靠从零开始完全自学能获得充足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基本文化常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的确非常罕见。

人们看见人掉落水中，只是袖手旁观，这样的事情会让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对此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岸上挤满了观望的中国人，但没人挺身而出，去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最后，那些拼命游上岸的人，很多都被劫掠一空，许多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了，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不久前，在英国，针对沉船进行打劫还是一项职业，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比较来看。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1892年秋天，英国一艘庞大的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不管如何，中国人对灾难冷漠、麻木不仁是个普遍的事实，这样的灾难几乎随处可见，尤其离家在外，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中国旅行，人们能最为显著地感觉到沿途的人对陌生人缺乏友善与帮助。在夏天，雨水使得所有的陆路旅行变得难以维系。一个急需要前进的人会发现，这时天空、大地和人们在串通一气，合伙捉弄他。即使你走的这条路通向沼泽，也没人会提醒你。你步入沼泽，这也与附近修路的人无关。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道路是无人去过问的。在某些特定的季节里，所有的路在任何时候都布满了泥泞的深坑。旅行者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这时，周围立刻会聚满看热闹的人，就像一句中国成语所说：“袖手旁观。”无论这些旁观者数目多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施以援手，哪怕只是举手之劳。直到答应给钱，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站出来，帮你一把。不仅如此，常常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地的居民还经常故意在难走的地方挖一个深坑。这样一来，陷进去的旅客不得不花钱请他帮忙把自己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算不了解道路情况，也最好不要听当地人的劝告，只管照直往前走，只要不是一条绝路就成，这要比接受他们的“帮助”好得多，你根本弄不清他们指引你的目的是帮助还是拦路。

可是，我们还听说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

一个城市。他们受到了人们的热诚欢迎，邻居甚至主动借家具给他们，直到他们把家具备齐。毫无疑问，还存在着类似的事情。不过，大家都清楚，这只是例外。显然，除非对新搬来的人稍稍感到好奇外，人们更多的则是表示彻头彻尾的冷漠，只想看看初来乍到的客人什么样子。或者怀有贪婪和阴郁的敌意之心，盘算着把对方当成肥鹅，最终被拔光羽毛。在那些遭遇到天灾人祸的外国人中间，还没听说过外国人遇到天灾人祸，中国人自愿帮忙的先例。尽管这样的事情不会完全没有。我们只听说过这样的例子，曾有一些海员尝试从天津到烟台或从广州到汕头作陆上旅游。在整个旅途中，没有人给过他们一碗饭，或留住一宿的援助。

在中国，将那些客死他乡的人运送回家，很难在途中的旅店落脚。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办成的事情。我们曾听过这样的事情，一位死者的兄弟，因店主不让住店，不得不在街头站着守了整整一夜。如果要带着尸体过河，就要面对摆渡人的百般刁难，也会被狠狠地敲一笔。我们听说过好几个事例，有些人为避免引起怀疑和麻烦，就把尸体捆成一团，再用芦席把它包装起来，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另据一个报道说，前几年的一个寒冬，寒冷席卷整个胶东半岛，山东潍县县城的一家客栈的老板不让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进门，怕他们冻死在店里，从而导致这几位旅客全都冻死在街头了。

在中国，一个人作恶犯罪，通常不会被告发到公堂之上，部分原因是因为给人定罪要花钱，另一部分的案子因为面子问题，羞于公之于众。许多的通奸案一般都选择私下里了结。那个“第三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所依照的就是中国人坚信的“人多势众”的原则。有时，这个人的腿会被打折，有时是两个胳膊被打断，最常见的情况是被用生石灰弄瞎双眼。笔者知道几个这方面的例子，这类事情一点儿也不罕见。有一位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并不陌生的聪明的中国人，当他听到外国人责备这种做法极为残酷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他说，对待罪犯的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已是“非常宽容”的了，仅仅残废而已，他应该被杀头的。



正施以杖刑的人

“你为什么老赖在我家吃饭？”一个做嫂子的会对小叔子这样说。她丈夫的这个兄弟已离家多年，在外头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两只眼睛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我们这儿没有你住的地方。你要是想硬的，这里有刀；你要是要软的，这里有绳。你只配要这些，自己选一条路吧！”这段话，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偶然告诉我的，如果有希望，他还想获得一点点的光明。若是实在无法重见光明，他暗示说，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帮助他解除痛苦。即使这些暴行的受害者有机会向官府申冤，我们还很少听说过他们能够成功过。关于他们的不利的证据已经压倒了一切，而且官员中十之八九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加重惩罚。即便这个人勉强打赢了官司，他的现实处境也不会有所改善，只会变得更糟。他的邻居会更加愤怒，那时，他性命也很难保了。

在中国，一边号称人命关天，但生活的另一面，很少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命一文不值。在中国，最让人们感到愤怒的罪行之一就是偷盗。因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所以偷

盗就被视为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其危害仅次于谋杀。在一次赈济饥荒的过程中，一位赈济的官员发现一位妇女像疯狗一样被锁在石磨上。她是个盗窃狂，早已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小偷，或是其他某种原因而被公众厌恶。那么，他就有可能在简单讯问后被公众处死，这和加利福尼亚州早些年治安维持会的做法如出一辙。

至于处死人的办法，有时用刀子刺死，更多是活埋。有人形象地称某人为“吞金自尽”，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而非常残酷的事实，即此人其实是被活埋掉了。笔者就曾经认识过四个人，曾差点就被这样处死。有两例是已被捆上，有一例甚至是掩埋的坑已挖好，后来由于族人中一些长者出面的干预，留他们一条活路，才没有被活埋。另有一例，发生在笔者相当熟悉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爱偷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但人人也都知道他神经不正常。一群村民，以及他亲戚，和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商议结果是，人们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个冰窟窿，把这个半疯半傻的青年捆紧了，扔了进去。

在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广大地区的那段日子，全国各地都很紧张。那时候，一个陌生人，只要让人感到嫌疑，就会被抓起来，遭到严厉的盘查。如果他的辩白无法交代清楚，使抓他的人满意，马上就会遭殃。二十年前，在距离笔者写这本书之外两百码的地方，就发生过两件这样的惨事。当时，官吏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无力去执法，就发布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告示，让百姓捉拿所有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们发现，有一个人骑着马向村子里走来，看样子像是外省客。盘问中，那人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来历，接着又发现他的包裹中有很多金银珠宝，这显然是从什么地方抢来的。于是，村民们就把他捆起来，挖坑活埋了。就在这时，又看见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中跑过，有人猜测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同谋。于是，这第二个牺牲品便遭遇了与前一个人一样的命运。

有的时候，陌生人还被迫自己挖坑，用以活埋自己。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多得让人记

不过来。1877年，爆发了一场神秘的剪辫运动，当时，一种极度的恐慌笼罩着这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活埋了。当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时期，我们也并不能认定只有中国会出现这种状况。

在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众多表现之中，最令人惊骇的表现是他们的残酷无情。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所表现的冷漠，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以孩子为例来说，在家里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然而只要从开始接受教育的那一刻开始，那种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

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丢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实行杖刑的数目问题，常常施刑者会以高出法规定数的十倍用刑，有时甚至多达百倍。这里，限于篇幅问题，我们没机会一一列举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这些刑罚都借用公正的名义进行的。在像《中国总论》或者《库伯查游记》这类有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库伯查游记》的作者提到过，他曾亲眼看见一批囚犯的双手都被钉在囚车上，押往衙门，因为解差忘了带脚镣。只因为囚犯没有钱来打通关节，所以平时就会受到衙役蓄意的残酷折磨和例行公事般的虐待。这个证据非常有力地说

明，中国人虽有“心肠”，却肯定没有“善良”。几年前，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案子。这个地方的官员对两名老囚犯追加处罚，因为他们向一个新囚犯索取“孝敬费”。结果地方官员判他们重打两三千大板，又用铁锤敲碎他们的脚踝骨。难怪中国有谚语云：死不进地狱，活不进衙门。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吧。

以上的段落写好后，其中的一些论述又得到了一些出其不意的例证，而这个证据的来源非常可靠。下面我们将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邸报》译文中的一段：

据云贵总督报告，该省的一些农村，流行一种可怕的陋习：一旦抓到偷粮食或者果实的人，就要被活活烧死。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迫此人的家眷立下字据，表示同意这种做法，并逼迫其亲人们亲自点火，以免日后他们告官。有时，之所以采取这种可怕的刑罚，只不过对方折断了庄稼的一个枝茎。甚至有人仅仅因为怨恨，仅凭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别人于死地。这种残酷的做法，听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自从云南的叛乱之后，一直屡禁不止，延续至今。当地政府一直努力铲除这一陋习，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未根除此种现象。

本地的中文报纸，几年前曾做过一个详细的报道，说福州附近的某一个地区，还有强迫寡妇自杀殉夫的恶习。人们强迫寡妇自缢，然后将其尸体焚烧，并为她立起一个贞节牌坊加以表彰！当地政府官员不断努力，企图阻止这一残酷的做法，除了个别地方一时能起效之外，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无法完全制止。



牌坊林立的乡村道路

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是当务之急，而对中国怀有良好愿望的外国人则认为，显然她最需要货币、铁路和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若进一步分析这个帝国的境况之后，我们难道不能发现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未意识到，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逐步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看的同情，她需要懂得仁慈之心是有如天国的甘霖般美好的品质，既祝福于行善者，也降临于接受者——塞涅卡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心智的缺陷”。它是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这一美德的人最接近于上帝。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已经充分培育了这朵仁慈之花，它将充分开放，开满整个世界。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飓风

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异常稠密的国家里，好几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的人口，这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问你的邻居：“你们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来口人吧。”你继续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通常的回答是：“是的。”就这样，十五到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必须同堂生活。大家全都依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这唯一的收入必须养活一家人，所有家庭成员所有的各种消费与需求也得由这份公共财产来满足。每个兄弟都得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构成因素的妯娌们，却很难让她们和谐生活。她们当中，年长的媳妇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媳妇则憎恨年长的。她们每一个人都竭力想让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这个财产共同体里是最为吃亏的。



小脚女子

年轻一代人是导致家庭不睦的重要原因。有哪种社会能承受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必然出现的压力呢？即使是在西方那些秩序良好的家庭里，这种重重的矛盾也并不罕见，在中国家庭这种嘈杂拥挤的环境中，还能有怎样的例外呢？造成不和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人们的动机与兴趣各不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一只鸡，一条狗，每一件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线团的第一个死结。

汉语中有个最难以理解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wrathmatter），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气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人开始愤怒的时候，“气”就在他体内产生了。中国人相信，在这时所爆发出来的“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强烈的愤怒会

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

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即使见多识广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中国人的“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一位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里的男人结婚娶妻，生下了几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还非常年幼。1889年10月，他的妻子不幸去世了。这让丈夫感到非常地愤怒。别人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赖老婆，而是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照管孩子。愤怒之下，他抓起一把中国的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狠地戳出了三个大口子。他的几个朋友赶忙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天之后，这个人的“气”又再次发作起来，又把他的伤口给撕开了。每一次发作，他都无法记清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不过，他挺过了那些对自己的戕害，并且那些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英里，到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去接受治疗。而他腹部的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瘘管。但是，他的肠道的功能已经紊乱。对于前文我们所论及的中国人富有生命力的话题，这似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者发表评论，他们的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而且似乎难以改变。对一个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停顿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这几乎是一个在心理上不可能接受的方式。他非得喊叫，非得武断地打断别人的话，毫不客气，如同一条受了刺激的狗，非得要狂叫不可。

中国人已经把辱骂别人的艺术发展到东方世界里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一个由污言秽语所组成的洪流便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没有这么多词汇能与之相提并论，其刻毒与持久，令伦敦比林斯门大街的卖鱼妇都望尘莫及。哪怕最简单的接触，也时常会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就像偶尔的一碰马上就会产生剧烈火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哪一社会阶层的人士，似乎骂人是一种谁都可以信手拈来的行为。

常常听到人们这样的抱怨，说女人骂人的话比男人更恶毒，持续得也更久，就像一句俗话所说的：“女人裹小脚，舌长利如刀。”孩子们常常还在牙牙学语阶段，就从父母那里学会用土话骂人，那骂人的话，反过来被孩子骂在他们自己身上，却被当成一种莫大的乐趣。对这种语言的使用，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广泛地流传于社会各阶层中。文人学士、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甚至身居高位的内部大员一旦被激怒时，都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地骂人。普通民众在街上相遇时，甚至把骂人的话当做一种寒暄，这可以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

西方人的咒骂，往往声音不是很高，但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意思。中国人的咒骂除了声音高亢之外就没有别的意义了。英语中的诅咒是一颗长有翅膀的子弹，而中国人的诅咒则是一团肮脏的圆球。他们骂人的话，许多被视为一种诅咒。一个男人发现自家田里的谷穗被人掐了，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经常有怀疑对象）。人们对这一行为认为有两种作用：第一，可以向众人宣布他丢了东西，他因此十分恼怒。骂人能让他发泄一下心头之恨。其次，这还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防止再次被偷。偷东西的人就在暗处（理论上），他正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关注着这些辱骂。虽然，偷窃者的罪行一般不会被发觉，可他不能就断定那个被偷的人不清楚是谁干的。或许，被偷者更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谩骂，以作为对偷东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如果被偷的人实在被惹火了，这也是在声明：他会采取真正的报复行为的。这就是中国的骂街理论。不过，他们坦率承认，这么做无力防盗，也无力防止再次被盗。因为，在为数庞大的人口基数上，一个小偷或者其他的同谋并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

女人比男人更喜欢这种“骂街”，她们经常爬到房子的平顶之上，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骂，甚至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直到嗓子完全哑了。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倘能制止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一旦一个妇女被激怒，是很难被约束的。总的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骂街行为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根本就没人理睬。有时我们会不经意在街口遇见一个男人，

或在屋顶上发现一个女人，他（或者她）已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天气较热，他（她）拼命叫骂到底，然后挥着扇子休息一下，提了提神，再继续愤怒地叫骂下去。

中国人吵架如果吵得足够激烈，最终就难免导致不同程度的人格侮辱。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拉丁民族非常惊讶不列颠居民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平着击出的习惯[67]。中国人也跟意大利人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最大的力气去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或只是双方参加，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的情况下，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纯粹变成了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

中国人的争斗，说到底也不过是对骂比赛。粗俗的语言和高亢的词句形成鲜明的衬托，但是，在骂战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真的失去别人的尊重，除了嗓子喊破之外，对自己也没什么严重伤害。但如果说在中国，有人在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教唆他们动手打架，这倒令我们感到很惊奇。我们所常看到的，在双方“战斗”发生时，很快就会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能有两三个人。每位和事佬，都会抓住一个叫骂不止的人，将他拉开，对他好言相劝。但交战中的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他会故意让自己失去控制一般，直到真的有人强力控制住他，他便借机把心头之恨全部发泄出来。但与此同时，他的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偃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一味纠缠下去，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即使在最愤怒时，中国人仍然非常“理智”的，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都会很看重理智。打架者冲向敌人时就会被和事佬抱住，有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这就是一场争执中至关紧要的一节。中国人在最愤怒时，仍意识到和平的可能性——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可能，他只不过认为在自己具体的这件事情上，和平比较难实现罢了。和事佬对他们的评判不一，但他们几乎都能准确地拉走那位好斗的一方。而那位叫骂者则边撤边骂，一边还要回身向他的对手表示恶毒的挑衅。

中国人普遍使用的骂人方法有一个奇怪特征，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热衷于攻击对手实际的过错，而更愿意去污辱他的祖先不是，追溯那个人最卑贱的出身。采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别人，被骂的人肯定就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不过，其原因不在于是对方当着别人的面使用这样的语言，甚至也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即使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过分了，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很不对，并非有失身份，而也只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说对方。

让大家感到庆幸的是，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一把左轮手枪，或像是日本史上的武士阶层那样佩着刀，那么真不知他们每次释放情绪，会酿成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委屈，那么，地球上将无人有力阻止他们“气”的爆发。他们将突然释放出无量之“气”，无可遏制。我们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个男人请求一位年长的、有经验的传教士为他施洗，结果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拔出一把刀子来，逼迫老传教士为他进行洗礼，试图用这场残酷的搏斗来证明自己的虔诚。

幸运的是，这种凭借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并不为大多数信徒所接受。但是，这种行为却是中国普遍的社会生活法则中最基本的一条。一位乞求经济援助的老太婆如果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她就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压着了，这对她来说是件天大的乐事，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所居住的那个村子里就有这么一个老泼妇，经常以自杀威胁别人。邻居们乐于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于他们所给予的。有一次，她跳进了村口一个池塘里，打算把自己淹死，可她却恼怒地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不会随机应变，不知道可以把头浸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对着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如果有什么事情出现错误导致冤情，中国人也不选择走法律途径

解决问题。比如，嫁出门的女儿受到婆婆的虐待超出了习俗容忍的程度，法律上管不着，受到伤害的儿媳妇的娘家人就会去讨公道。这时，如果遭到抗拒，两家人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有遭遇抵抗，但施虐者逃走了，进攻的娘家人就会把这户人家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瓷器、镜子、水罐之类的，以此来平息“气”。等出完“气”之后，他们就扬长而去。假如娘家人来闹事先走漏了风声，婆家人就会先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搬到邻居家里避难。

一份中国的报纸报道了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个男人准备迎娶一个据说很漂亮的姑娘，结婚时，却看到娶来的是个又秃顶又丑陋、且年纪也老大不小的姑娘。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殴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送亲的是骗子，还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所处的环境允许的话，都会这样做[68]。“怒气”爆发出来之后，总有机会平息下来，这项工作正是由“和事佬”们来完成。他们的角色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时候，这些极为重要的人物会给人们留下一种非常热衷于和平的印象，他们心甘情愿为双方斡旋，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一会给这方说好，一会给另一方劝和，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双方的利益达成一致。



租界里新式的法庭庭审

然而，当这种社会飓风无法用通常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大量的“气”太盛，不借助爆炸就无法消散的时候，这就需要打官司了。在中国，诉讼可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争吵中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会使得他在争执不休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为的是“让他官司缠身”。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行为总体来说有失理智。而在中国，此举则完全是一种发大疯。

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宁死脱层皮，不入衙门打官司。”我们笑话过一位中国移民的愤怒，他的狗被别人用枪打死了，这是小事一桩。这位中国移民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多少钱？”这位中国移民却操着生硬的英语说：“这条狗是不值什么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既然下手杀了它，就要给我足够的赔偿。”在一个西方国家的法庭，这桩官司会被认定为无意义的，通常以拒绝受理告终。可在中国，这种事情则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代仇怨。但大体而言，中国人的每一件纠纷通常都会找到一些调和的说情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为双方服务，他们的参与使得成千上万即将要打的官司在接近审判前就了结了。我听说，有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家庭，整整一代人已经几十年没打过一场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担任要职的人物一直在发挥着威慑性的影响。

一台复杂如中国这样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很多东西有时会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是，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充满润滑液的小囊，在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它往往会及时分泌出一滴来，加以润滑。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品质，使得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价值的社会体系。中国人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法律不值得遵守时仍坚守不改。所有亚洲各民族中，或许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不有悖于他们的传统习惯。毫无疑问的是，其他一些文明形态，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但是，少有一种文明形态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了许多个世纪的巨大压力。在这其中，最好把所有的祝福都献给那些和事佬们。

第二十三章　负责与遵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性，可以用“负责”一词来加以概括。这个词语内涵之丰富，地位之重要，对于西方国家的公民很少能够理解的。在西方国家里，我们知道，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国家是许多个体的巨大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单位却是由一个家庭，一个村落或一个宗族等构成，这些概念通常又是可以互换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拥有共同的姓氏，源于同一个祖宗。他们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世代相传，而之所以在现在居住的地方，不曾中断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大动荡，比如明朝灭亡，或者是明朝建立。在这样的村子里，堂、表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长辈比自己高的男性，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爷爷”辈的什么人。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的人。他们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寿数越高，辈分越高。

中国人普遍早婚，以后又多次娶妾，甚至到晚年还纳妾，一辈子不断地生孩子，其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人名字中那个特别表明辈分的字（同一辈分的人所有人名字中都带着同一个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要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为“爷爷”。同一辈分之间所有堂兄弟，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一个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问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亲兄弟”，他们通常会回答得很有意味：他们是“嫡亲叔伯兄弟”。笔者也曾经这样问过问题，我问到的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也可以叫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在社会中团结一致的表现。这种团结一致，塑造了中国富有责任感赖以存在的基础。父亲要对儿子负责，这种负责要贯穿终身，不是单将儿子“拉扯成人”就完事的，而且要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他有责任偿还父亲的债务。兄长对弟弟也负有

明确的责任，而“家长”——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至于要承担怎样一种责任，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相差甚远，“个人差别”也是一个重要定因。不过，这一点，理论上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在一个颇为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者是名列科班，但“族长”却可能是一个头脑糊涂的老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者一家之中任何一个年长者对一个年幼者的影响，是最为直接，也最为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个性独立自由完全不相容。弟弟在家中就像奴仆，整天盼望提升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便不让他花这笔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刚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珍贵的古币，有一个外国人很想把这些古币买下来。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常常压在手里不出卖，情况常常如此。因此，打探到消息的中间人担心古币的主人不卖，就建议外国人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意儿给钱主的叔叔，通过这种间接的关系给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笑话，说的是一位从西方某国家来的旅行者，在路上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很老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这个情景太令旅行者感到意外了，就不由得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就在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骑马，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果然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个人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道，“是的。”“你用鞭子抽打他了？”“没错，我打了他。”“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胆敢顶撞爷爷，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汇总，那可就不是一个滑稽的笑话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的，仅次于这种责任的，便是邻里之间的

关系。不管这些邻居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他们要承担的相互责任都是不例外的。他们之所以有责任，就是因为住处相邻。这种理论的根据在于，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的母亲三次搬迁，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理想的邻居。对于一个刚刚接受了支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熏陶的西方人，对于与什么样的人做邻居是毫不在乎的，或者说认为完全没有意义。如果他在城里，在某个房子里住了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但是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他的邻居也逃不脱干系，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既然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

对弑父弑母这类案子的处理，则是中国人负责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孝道为先”一章里，我们讨论中国人的孝道时已经提过，通常情况下，这类的罪犯一般被认为是疯子。他们也的确是疯子，如果不自杀，就等于自己心甘情愿地去接受极端痛苦的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的《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巡抚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将凶手左邻右舍的房子推倒。因为这些邻居没有尽到责任，没有能用美德去感化罪犯，以令其改邪归正。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这种处理方式是合情合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些地方有人犯了这样的罪，除了对凶手本人进行惩罚之外，还要再推倒一段城墙，或者重修一下城墙的样式，比如，将圆角拐角改成方形，或者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如果某一个地方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犯罪，据说这个整个城市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但是，这类确切的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除了邻居之外，保甲长也承担着责任。在村子里，他们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有时管着一个村子或好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无论管的是大还是小，总的来说，他们充当着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保甲经常会陷入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及时汇报而被打得血肉模糊，可是那些乡里的事情，他不可能知道。

职务上比保甲再高的是县官。就与民众的关系而言，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面对他们脚下的民众，他们就是老虎；面对他们的上级，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地方县令要做的事情，在西方至少要六个人来对付。一个人管辖着一个区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地方，在这里，他同时担任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官员、保安官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长官。如果一个人要同时处理这么多事务，他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体力上还是心理上说，这些都是要超负荷运转的。即使这样，所有的事情也都不能处理得妥当。况且，许多的县令对自己所从事的公务一点兴趣都没有，只一门心思想着自己如何从中捞取油水。他们的职责非常繁琐，量也很大，衙役们又不能协调工作。因此，他们主要依靠师爷或其他的下属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即使县令，自身也难免犯下无数的错误，然而，一些事情的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

与所有中国的官员一样，县令总被想象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并且神通广大，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了方便县令和保甲掌握情况，每个城市或乡村都划分出一定的组合单元。每个单元由十户人家组成，被划为一甲。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籍制度，与古时候的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度很相像。它使得地方上有效地设立出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无论谁第一个发现，就必须迅速报告甲长。甲长立刻报告保甲长，保甲长再行禀告县令。县令则果断采取措施，“严密侦缉，严厉惩处”，如果面对的不是“可疑之人”，而是正常居民，借用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当地所有的犯罪，很多还未露头就已被发觉了。如此一来，这一套制度还使得百姓当中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

显然，这一系列的措施，只有在人们习惯于定居的社会体制中才能奏效。同样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中国这样几乎没有什么人口迁徙的国家里，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意义上的假定。有的时候，在一个城市里，人们压根就没有见过什么门牌。可是，突然之间，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现在每家每户的门上都挂上了。这只能说明此地来了一位新的县令，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想加强这方面的

管理。在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门牌。因为在冬季坏人最多，也最危险。不过，据我们的实际观察得知，保甲制度如今只是一种没落的体制，即使它还在发挥作用，现在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门牌并不常见，至少在不少省份，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一个人在这些省内连续旅行几个月，走上几千里路，在他所经过的城市和村庄里，沿途挂门牌的住居，尚不足百分之一。

可以顺便就此说一下，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普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每家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并且能随时更正这个数字；如果每个保甲长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如果每一个县令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那么，这整个帝国人口的统计，就会非常容易，也非常精准，只要将这一连串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空头支票的“假如”。事实上，上述三个条件中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某个地方官偶尔被人问及他的辖区内的人口总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人数众多的保甲长，都没有太多的热情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项工作不但很困难，而且从事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油水”可捞。因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对中国人口进行准确统计，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想象之中。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会把人口普查与人头税联系起来看，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产生十分强烈的疑心。如果各地没有将保甲制度深入地执行，就绝对不可能获得精确的人口统计。

对于一个行为不太廉洁的地方小官来说，他也许会平安无事，也许可能会遇到大麻烦。如果真有麻烦缠身，他只要找一些有势力的朋友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风平浪静了。不过，他也会因为他的辖区内所发生的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而丢官。在中国，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整个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没有必要在此详细分析。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的报道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工匠。而这位工匠则认为那些子

弹是部队用不着的、多余的物资。案发后，那个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而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被认为是出于不知情而免责，免于处罚，不过按惯例，还是挨了四十小板。带兵的哨长也被撤职了，因为以“纵容”下属偷窃的名义犯罪，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悄悄地溜走了。接到奏折的刑部，还核准了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威武将军的处罚，他对此案也负有责任。这么一来，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一环套着一环，从上而下，谁都不能以对犯罪行为不知情或难以防范为借口，逃避责任。

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某些河流决堤泛滥的奏折，它们都是可以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德的好例子。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就像推动水磨的湍流一样奔涌不息。官员们迅速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与洪水搏斗，奋力抢救。可惜，这是一项人所不能胜任的工作。他们不过像大夏天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束手无策，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李鸿章惩罚他们，他不为之所动，仍坚决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官降一品（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喜欢用的一种手段）。而直隶总督在禀报灾情的奏折最后，也照例一再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后来，同样的河水泛滥还发生过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以候处置”。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有关中国人的责任伦理会一直延伸至天子本人那里。皇帝经常会发布“罪己诏”，向上天坦承自己犯下的错误，把暴发洪水、流行饥荒以及农民造反等等灾祸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正如他的臣子要对他负责一样。如果皇帝失去了皇位，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天意”，是“天命”要将皇位交付另外一个能够治理帝国、应该登基的人。

有关中国人责任的观念中，与西方思维观念最相抵触的是一人犯法、诛灭九族、满门抄斩这样的东方做法。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关的报

道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最近，突厥斯坦领导的穆斯林叛乱的首领阿古柏[69]一家也是被满门抄斩。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镇压公然的叛乱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掘开皇陵，盗取了棺椁外的陪葬的金银珠宝。结果，罪犯的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女婴，全部被处死。在这个案子中，十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犯罪而失去了生命，而且除罪犯一人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余十一人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

中国人关于责任观，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各级官员和平民也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例子一样。这种做法，就不得不导致各种公正原则被破坏殆尽。它还能直接导致从高级到初级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果一个官员必须对一些自己无法负得了责的犯罪负责，或者，他一直没有对这些情况投入足够重视，那么，他如实汇报情况的话，还是要受到严厉、不公的惩处。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这一原则被滥用，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关注。

每个著书介绍中国、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的津贴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即使如此也很少能全领。最后，连衙门中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因各种小错，而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因此，那些当官的不得不压榨百姓，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门路可走，只好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中国人的责任理论显然公然违背了公正原则，这点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也令我们时刻难忘。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对这一理论的优点忽略不计。

在西方国家里，一个人，除非他能被证明有罪，否则他就是清白无辜的。你也很难将责任追究强加到某人头上。一座桥梁，被一列满载旅客的沉重火车压垮，压死了很多的人，调查结果却显示没有人在其中有过。一座高楼倒塌了，也死了很多的人，尽管建筑师会受到指责，可他还能表示自己当时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没听说过他将因此受到处罚。如果一艘铁船翻倒，或者一场战役因为准备不充分或者时间选择错误而遭到挫败，人们也只是滔滔不绝地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做出处罚。中国人在社会公正的理念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明智地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他们的这一经验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的安全，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

中国人的责任理论，对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童仆”掌管物品，他能随时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而负责家务的管家，除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掌握着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和劳工中的每一个人负责——我们身边就生活着这样的一些人，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与这类人相处。在中国客店的老板，很少能从他们身上看出直接的美德的，尤其是他们打外国旅客主意方面。可是，我们听说，有一个老板，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一个外国旅客，竟跟在他后面追了半英里。他以为那是那个外国旅客的什么重要东西。他知道自己应该那样去做，可不像美国的旅店老板，总是冷冰冰地提醒他的客人们：“本旅馆对丢在大厅里等人来擦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要是自己推荐了某个人，就要对引荐人的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这是中国人普遍承认的一种社会义务。这一点，应该得到那些想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的重视。一个中国工头，无论他处在哪一位置，都会对每一次录用或解雇下属的每一次疏忽或者失误负责。这种情况会对事情的各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历史中，外国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有这样的一则传闻，说从前有一个银行里的买办前几天被经理叫去训了一顿，因为他所推荐的“男童”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如果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肯定认为不适

宜由他来负这个责任，那么，他发现这一点后，用不了多久，就会为所欲为起来。

中国人有着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就是他们天生的遵纪守法。我们不知道，是他们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这种品质造就了他们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却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讨论这一民族的“忍耐”的美德那一章节时，这一点已有所提及。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素质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告之，要对他人负责，任何人应该能够目睹这一重要事实。虽然一个人可以“远走高飞”，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这点他也很清楚。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至于变得穷凶极恶。

还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中国人守法的相关事实。这就是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尤其是那些读书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见到官员时往往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除非迫不得已，不会开口说话。即使事情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会如此。我们就知道一个读书人，听说自己要被请去出庭作证，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严正神色审问犯人的官吏

与中国人固有的对法律的尊重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共和政体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是我们祖先引导我们接受共和，追求共和政体过程中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和各州的法律。如今，这些全都遭到默默地抵制，仿佛追求个人自由不是当代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人们已经完全正确地意识到，个人或社会完全应该把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当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并将这一点视为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之方式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可是，在那些基督教国家里，无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文雅的文明人，还是粗野无礼的平民，大家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可以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似乎不需要用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大家都坚信，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值得炫耀吗？我们法典中为数众多的条目，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被很严格地实

施。法律这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状态，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众的蔑视，我们对此又该如何解释或者辩白呢？

还有，在过去三十年，西方国家的犯罪率发生了惊人的迅猛增长。我们对此又能作何解释？人本来生而神圣，这是很多西方国家普遍的信条。可在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被公然漠视，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某些事情，其实连统计学都无能为力，要对其做出武断的评价，更是徒劳无益。

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们在中国的城市生活要比在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在北京就比在纽约更安全。我们也相信，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游，比在美国内地旅游更安全。我们更应该记住，就整体而言，中国人和美国移民一样无知，并且心怀偏见。正如我们一向所知的，他们是天生的暴民，容易聚众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暴乱并不经常发生，也很少危及外国人的生命安全。

中国人坚信这一点，上天会受到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我们在谈论中国人的孝道那一章里，所提及的为了给父母治病而割下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我们当然不准备认同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某一些支持这一理论的事实很有趣。中国十八个行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美国气候反复无常，就像小玛乔里·弗莱明对乘法口诀表所说的那样："超出了人类天性能忍受的极限。"而霍桑[70]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模型"。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如同一些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是一个"严寒与酷暑肆虐之地"。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年温差上下可以达到100华氏度，这是一个为生物提供多样性的必然气候温度。

可是在中国，冷热的交替变化，并没有导致像伟大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生活，总是变化无常、难以预测，而是宁静、平稳、循序渐进的，与她那古老、稳定的宗法社会体制十分匹配。钦定的帝国历书——皇历，就是对存在于中国的那种天、地、人三者和谐理论的良

好阐释。我们不清楚，这本皇历是否在帝国辽阔疆域内适用于所有地区，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样信服它。

不过，在我们所熟悉的地区，这种皇历的确能给我们提供正确的气候信号服务。在被标注为“立春”的那天，春天会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几年中，我们都发现，“立秋”一过，皮肤会明显感觉到气候的变化，多了许多的凉爽，再也没有了夏天的燥热。一年中十二个月，不期而至的霜降会给人们带来破坏性的袭击，而在西方民主国家里这是常见现象，并且听之任之。然而，为避免这一点，中国历书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定为“霜降”。某一年，霜降的日期为公历的10月23日。在这一天之前，哪怕最为零星的霜花都看不见，而在这一天的早晨，地上就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白霜，以后的每天早晨也都会有霜。这一现象，我们观察有好几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迟三天的。

在中国，不仅无生命的东西遵循着因果与自然的法则，就连有生命的生物出没也是如此。有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棂上会点缀着几只苍蝇，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那儿看到苍蝇了。每逢这时，只要打开帝国的历书，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天果然就是“惊蛰”。

有人说过，讲英语的民族，人们的血管中流淌的是某种不守法则的血液。这种血液使我们蔑视法律，一遇到约束就躁动不安。布莱克斯顿说：“我们英国人强健的祖先认为，只在一个给定的精准的时间里做规定好的事情，这个不符合我们自由民众的身份。”不过，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这一特点，个人自由观念和天赋人权的学说没有经历了很长时间等待就得到确立了。

但是，既然现在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清醒一点，多多少少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呢？在这方面，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人学习吗？

第二十四章　猜忌成风

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互相信赖，人类就不能共存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结构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在人们都必须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也仍需要对一些现象予以更多地注意。无论这些现象与我们的观念多不相容，可它们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忌的性格，并不限于这个民族仅有。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更像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的特性。当然，这一特征在中国体制中表现，无疑经由中国的精英们大大的改变。这里整个话题与前面所讨论过的关于“负责”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可能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因为这些事情，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极大猜疑。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在中国存在着一股经久不衰的互相猜忌之风。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在汉语中，“城”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具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的四周都必须建起特定高度的围墙。不过，与许多其他法令相同，这一条文并没有得到坚决的落实，因为有很多城市的城墙都因年久失修，没有得到任何的保护。我们听说，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县城曾被起义者包围，并最终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这个县城的城墙并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建起来。还有许多城市的城墙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挡不住，它们都可以任意在城墙头上爬进爬出。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的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无论何时，一旦有危险的警报出现，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修复城墙。这一工程又提供了一种便利的途径，让负责修城的官吏或暴发户有一次掠夺财富的好机会。

在中国，之所以这么多的城市有那么多城墙，其实质是因为政府对民众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号称是子民们的父亲，他的臣下也被民众称为“父母官”。但上上下下各方面、各阶层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那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术语而已，就像说“加法”或“减法”一样。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倒是孩子与继父之间的关系。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充满各种各样的起义、暴动和叛乱，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这些事态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想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力所不能及的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有时候，民众正在悄悄地准备着反抗，正如政府早早就预料到的那样，可官员们只是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把一场动乱留给军队慢慢去解决。

在中国的城镇中，就像东方其他的城镇一样，所有中国居民房子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个证据。如果说，外国人向一个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想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那么，同样困难的就是，该如何向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说明，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中国人马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的想象其实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聚居在村庄里，村庄就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城镇，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之间相互猜疑。这些村长所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之间的提防。对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群居方式而言，只有一些山区例外。那里的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小偷来偷袭。在四川省，贝德禄先生描绘了如下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可以说没有多大差别地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如果说，这个例外仅仅是因为在四川这个偏远的省份，正如巴伦·梵·里希特霍芬男爵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比其他地区更期望和平。那么，它也就恰恰证实了贝德禄先生的观点，即“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动乱的那段日子，简直不堪回首，尽管在此之前省内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



新派的女子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为显著的例证。这样的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即使用一整章的篇幅，也讨论不清其中的

一个分支。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即变得像“私盐”一样的危险品。一旦她们被订了婚之后，就要过上更为小心封闭的生活。一件极细小、微不足道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也是一条公认的社会真理。尽管中国妇女比起她们的印度、土耳其的姐妹来，或许享有更大的自由[71]。

但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妇女的尊重程度仍不能获得较高的评价。妇女普遍缺乏知识和地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现象也一直存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状况，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乃是西方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此，我们可以枚举一些中国的日常用语，来表达对妇女看法的总结。这些话信手拈来，随处都可以听到。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低人一等，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人。女人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女人好妒。”这里的“妒”容易让人产生的联想，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这一种理念，很好地体现在中国人的一首古诗中：

青蛇口中舌，

赤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

最毒妇人心。

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中国语言文字的每一种结构中。这些观点常常毫不掩饰地赤裸裸表现出来，将那种潜意识展露无遗。为了回答笔者关于这方面的询问，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仅有十四个是褒义词，如“好”、“娴”、“妙”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姦”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

据说，人们之所以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彼此

不了解；二是因为彼此了解。中国人认为，这两种不信任人的理由，他们都有。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这种本领容易令人联想起化学原子的化合。然而，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小心试探，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也时常陷入到互相猜忌中。这种猜忌多是由嫁入家庭中的媳妇们煽起的。妯娌们勾心斗角，为了瓜分家庭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丈夫与大家庭之间煽动矛盾。

本文并不打算在此详细讨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的篇幅。现在让我们跳过这个问题，来看看另一种普遍的情况，没有复杂家庭的人的情况。如果家里的仆人们，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那么，他们只要相处起来，就一定是类似于那种保持武装中立的状态。如果假如他们当中有一位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来，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道自己有错，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报复他。我们听说，一位中国妇女，只要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因为她认为，既然有人在争吵，人们就是在议论她。可事实上，外面只是在谈论一桩买卖，有人想买一堆稻草当柴火烧，嫌卖主要价太高了而已。

如果某一个仆人出乎意料地被辞退，他肯定会猜忌别人，继而满腔仇恨。他会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断定有人说了他坏话。即使他知道，主人能列举十条理由，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但他仍会坚持说，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这样被辞退，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保住自己的“面子”，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人的家庭里，也会发生在雇佣中国仆人的外国家庭里。但是程度会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外国人还一直雇用着那么多早该辞退的仆人。是主人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等于捅了马蜂窝。这件事的中心，就是那些受过指责、“毫无颜面”的仆人们，身为外国人的雇主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不能赶走他们，留下来继续工作后，把

情况弄得更糟。

有这样一个故事，中世纪的奥地利，有一座城市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奥地利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军人们已经快爬到城墙垛子上了。奥地利人把群蜂倾倒了出去，顿时群蜂飞舞，敌人便潮水般的退却了，那座城市也就被挽救了。中国人常常采用的策略，和这个奥地利姑娘计谋一样。中国人的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信号，使得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猜忌。一位拉丁教授在谈论人们面对风暴的态度时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猜忌所产生的纷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虽然中国人常爱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办法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这可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处理。

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到了足够独立闯荡世界的年龄，我们发现，很有必要教育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迷惑，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告诫大家，庙里的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窥井，是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一个人身上有另一个人渴望得到的东西，那么，另一个人也许会趁机把这个同伴推到井里去。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则发生于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拘束，而在中国情形却恰恰相反，明显缺乏自由。对我们来说，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到各种完全不同的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构成中国人思考的无非两种事物——金钱和粮食。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如果一笔钱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再分配给他们，中国人很难相信，此人能够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分配。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那种合理、公平分配的经验，依照他们的经验，只是

坚定地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

出于同样的道理，去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粮食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但如果真的去仔细询问那些受分配的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会公开表示自己对分粮食的人的猜忌，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他们心中的猜疑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正儿八经地询问，中国人则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雁过拔毛，人心隔肚皮。

中国旅馆里的侍者有一个习惯，在旅客即将离开旅店之时，他们会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故意夸耀客人的阔气。它有一个更实际的作用，就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吞小费，或者用中国人的说法是“茶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内心个个盼望能够得到这些钱。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商和调整，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里，只要往有关人士家中去一封信，这样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这要是在中国，绝对行不通。在中国，当事人必须亲自去拜访对方。如果对方恰好不在，得一趟一趟地拜访，直到见到要见到的人为止。因为他们不信任中间者，向中间人交办事宜一定会被扭曲。

人们经常提及中国人的社会团结。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整个家族似乎全部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但是，一个明智的异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最好连一根手指都不要伸入这些事情中去，以免惹火烧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姓不同，不相谋。”“我们家的事情，要这家伙搀和干什么？他一定别有用心！”对相处了一辈子的老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那么，更何况那些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更要小心提防。

“外”这个词在中国具有特殊含义，含有远近之分的意味。外国人之所以受到排斥，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外”国；外乡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如果一个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而来，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定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

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外人，猜忌心重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

如果一个旅行者碰巧迷了路，在天黑之后来到了一个村庄。尤其是在时辰很晚时，他就会经常发现，没有一个人肯走出房子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想花钱雇一个向导，求了很多中国人，却没有一个愿意，他们甚至都不肯说上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私塾里所有的学生上课时，一律被要求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老传统"，但如果有人想刨根究底，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传统，人们就会告诉你，听不到这种读书声，老师就会怀疑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他拿在手上的书本。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形态都强调要热情款待陌生人。在与东方人有了实际的接触之后，所罗门[72]的那些要求人们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具有了很多崭新的含义。但是，中国人的谨慎小心，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教师，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那个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不敢露面。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就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们把他怎么了？"这样，麻烦就来了，非得一块安全地把走失的人找到才成。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最为安全的回答是：不知道！

根据我们的经验得知，在中国，当一个陌生人试图去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件事发生过，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问路，去某个村子，寻找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最后他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词，都断然否定认识村里

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们还都信誓旦旦地表示，甚至连他的名字，听说都没听说过。然而，他们的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一致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既没有串通的时间，也没这个机会。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种对策，是出于一种本能，就像北美大草原上的一种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个人只要随便打一声招呼，他口音中的细微差别就会把他来自哪儿暴露无遗。一个乡下人遇到另外一个乡下人，经常会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另外一些地有多远等等。他们似乎要凭此来做判断，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如此，学生们并不满足一个自称有秀才头衔的人是如何“入闱”时，还可能要盘问他入闱当年所写的考题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采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的确经常被揭破。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指望冒充某一个地方的人，因为他的口音很快会露出马脚。

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很难获得某人的线索，而且他这样打听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这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他会受整个村子的猜疑。笔者有次派出几个中国人，让他们去寻找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的另几个中国人。结果，他们能找到的人非常少。又有一次，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他坚决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号”。他的姓还是一个大姓，同姓的人毕竟很多。另外一次，送信者苦苦寻找一个村民，这个人按说非常容易找到，却会莫名其妙地不管怎么样也找不到，像鬼火一样在他们眼前后退，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就在前文刚刚说过的那个例子中，其实那个陌生人要找的那个知名人士，就生活在方圆一两里之内——事实上，知名人士的住处实际上距他立足的地方仅仅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有一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他们两人从前，都曾参加过某一个遍及中国全境的秘密的教派。可当人们向老人询问起他富有邻居的情况时，结果却发现，这两个老人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他却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年纪很大了，也不怎么出门。”“那么，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

谈过去的时光呢？是不是你们的关系很不好呢？”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摇摇头，然后说道：“不，我们关系很好。但是，他很富有，而我很贫穷，如果我要是去他那里，就会惹人们说闲话：他到这个有钱人家想去干什么？”

中国人本能地存在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从内心里不愿一个人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一定会觉得十分地不自在，最终一定会溜出房间，或许赶紧溜到走廊里去。这个举动似乎在表明这样的意思：“不要怀疑我，你也可以看到，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若一个非常自重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时，有时也会看到与之类似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的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的。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出了阁的女儿的死亡。尽管如前所述，女儿活着的时候，父母无力保护她。可是她死后，只要她死得有一点可疑之处，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得了主动权。女儿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得父母不再像过去那样人所共知地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和这个女子的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这个女孩娘家人的“面子”。

中国有一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充满智慧的箴言警句，表达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也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猜忌。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因此，双方都认为，只有把交易交给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只有拿到了现金，交易才算完全做成。如果这件事的情况更为复杂时，有些东西就必须记录下来，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据”。

中国的白银市场极为的混乱，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钱庄根本不信任他们的顾客，而顾客不信任钱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对方。南方的每一块被切去一角的银元，中国各地每一个地方被切去一角的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生性好猜忌的明证。他们在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是非常精明的；而他们不愿做生意时，则表现得更为精明。每一个顾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希望天黑以后再把银子花出去。这一点中外皆然，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一个商店都建议大家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再花银子。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钱庄的汇票了。但是，这些汇票使用得并不普遍，其流动性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两个相距仅十英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拒收对方的票据。

中国金融的利率很高，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资金成本本身的利润，而是借贷人冒了巨大风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各种投资方式，中国人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的各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正是由于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许多事情会长期不可“立”。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这个民族巨大的利益。

几年前，一份报纸对纽约华人社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一段报道，提供了一个荒谬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和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也是大同小异。在纽约，他们有自己的自治组织，有十二个头面人物担任其领导者。这些人把钱和市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很大的铁质的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没有采用美国银行通用的那种复杂、外观漂亮的号码锁，而是使用了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这十二位华侨组织的人物，每人只掌管一把钥匙。如果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这些杰出的管理者们其中的一位突然因病去世了，

整个华侨组织的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先生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去代他开锁。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迷信担心，害怕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这个华侨组织才取出钱，支付他的丧葬费。这件小事，的确是一扇窗口，愿意透过它一看的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以及互相猜忌，无限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不乏相互猜忌的例子。宦官其实是亚洲特有的一个典型现象。据说，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宦官了。但在目前的这个王朝，满族人一直采用一种卓有成效的办法对付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使这批人物像过去那样来危害民众的权力。

当诸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不和谐的人，必然要在高层进行合作时，就可能导致互相猜忌。满人和汉人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奇异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满人在中国是征服者，汉人是被征服者，双方在政府中难免相互猜疑，产生冲突。比如“六部”中某一部担任正职的汉人，可能在另一部担任副职，而这些职务由哪族人来担任必须妥善安排，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机构庞大、地位重要的都察院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深深猜忌的明证。

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运行情况的人，能够提出很充分的看法，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情况绝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实际上乃是中国人的本性使然：上级官员时时刻刻都提防着比他们职位低的人，他们害怕下级与他们竞争，替换掉自己的位子；下级官僚对他们的上级官员也充满了戒备之心，因为他们随时随地会被上级免职。但无论上级官员、还是下级官僚，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抱有猜忌，他们还普遍对普通民众存有戒备之意。中国有许多的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已使整个帝国变得像一团马蜂窝。一个县官会通过地方政府禁止节欲者团体集会，比如有名的在理教会。可这个教会只不过想禁止享用鸦片、烟草和酒。县官们会把民众当做一种盛宴，给衙门里

贪婪的“虎狼”去吃，由此导致了民众的反抗。所有的这些教众并不企图谋反，可官府一直这么猜忌他们，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官逼民反，他们也就只能如此。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这样的猜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处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端，政府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把他们的首领抓住，或流放，或直接除掉他们。这样一来，官府的恐慌就可缓解一阵子了。

显而易见，我们此处所谈论的中国人的这个性格，即这种相互的猜忌习性如此强大，使中国人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变得十分保守，任何新鲜事物都无法得到接受。他们不了解人口调查的意义，政府偶尔需要，也会因民众对于增加收税的猜疑而不能实行。他们甚至连名号都不愿搞清楚，人们总是立刻怀疑调查是别有用心。笔者邻村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到了何种的程度。有兄弟两人，听说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便断定这就意味着要强制移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他采取自杀的方式逃避了长途跋涉的折磨，也以此挫败了政府的计划。

猜忌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青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同样是这种致命的组合，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对政府的种种猜忌，也长期阻碍着中国所需要的改革的进行。三十多年前，有人向北京城里一位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提出建议，强调铸造小银币之重要性的意见。他听后，非常坦率地说：最好永远不要改革这个帝国的货币，如果试图那样去做，百姓立即会认为政府想从中渔利，这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矿产的开发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中国大地下所蕴藏的矿产可以得到成功开采的话，它会使中国理应变成一个十分富庶的国家。地下的“龙脉”，地上的猜忌和侵吞公款的行为层出不穷，使得整个重要领域中任何第一步都难以迈出。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些好处有多明显，当人人都对此引发猜疑的时候，就别想引进。已故的倪伟思博士在中国烟台培育高级外国水果，为了将

外国优良品种的水果引进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会给中国果农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他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同猜忌作斗争。若是换成一个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的人，早就可能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一旦他开始取得明显的效益，所有的这些猜忌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了。

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和种茶这类产业进行调查时，这种猜忌却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坦诚，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掌握生产状况，从而促进这项劳动的收益。可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能违背过去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不是为了征税呢？有谁听说过这种事情？有谁即使听说这些事情之后，又会表示相信呢？中国人对这些新兴的政府作为的心态，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去，却彬彬有礼地说：'你们各位早晨好。'"



与美国人交涉

下面我们将继续谈一谈这个问题，与外国人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之所以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还因为他们经常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外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他们看来最为难办的事。假如一

个外国人去了在某个中国人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人们就会认为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凝视一条河看，那么，大家就断定，他一定是在测定其中是否有贵重金属。大家普遍认为外国人有特异功能，能够看穿地表，发现地底下有无值得掠走的东西。如果他参与了赈济灾荒，人们不用多想，就会断定他最终是想掠走大批当地人，到外国去做苦力。正是由于这些“风水”上的考虑，外国人攀登中国城墙的行为经常被禁止，外国人在中国所建筑房子的高度也必须严格控制，这就像某个帝国的边界线一样明确。

中国人缺乏哲学中的理性思辨能力。贝德禄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句谚语，“山外长罂粟，山内藏着煤。”就是说能种植罂粟的地方，地表下必然有煤炭。这并不仅仅是无知者的观念，因为彭北莱[73]教授曾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实情的情况下，把这句话当做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而据说，已故的政治家文祥，曾读过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一书，有人问起他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准备部分接受该书中的科学陈述，但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属于宗教部分，则会令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样的一个实情，完全超出了他们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承受能力。梵·里希特霍芬男爵骑着马在乡间游历。当地的四川人看到他悠然自得、毫无目的地游走观察，因此把他想象成一个在某场战斗中逃逸出来的士兵。尽管很多中国人后来逐渐发现野蛮的外国人其实也挺不错，但他们第一次碰到外国人，特别是高大威猛的外国人，都会很快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惧感。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告诫，她们一旦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外国人就会催动致命的咒语，使她们中邪。即使经不住盛情邀请，她们最终被引诱进去，也不会踩门槛，把镜子给她们照也会遭到拒绝。因为在她们看来，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很不安全。

几年以前，一个从内地某省来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该省对外国人其实一无所知——经过笔者的努力，费了很大的周折来到了笔者的居所，答应帮一位新来中国的外国人学汉语。他在那人家里待了几星期后，突然想起他的母亲需要他回去照顾尽孝，就回家去了。临

行前，他答应笔者，某一日赶回来。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回来。在他住在我那位外国人朋友家的整个时间里，这个聪明的儒家弟子从未喝过一仆人按时给他送去的茶，也没有当面吃过一样东西，唯恐被人下了迷魂药。有一次，他写好了一信给他的母亲，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很好。另一个老师就好心送给他一个涂上明胶的外国信封，并且还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封口就可以封口。他一时显得六神无主，随后却急中生智，客气地邀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因为他对此不在行。

这种巨大猜忌的心理定势也导致了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国人印刷的汉语书。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书是有毒的，书中被外国人放了如同他们的小说里提及的那种“迷魂药”，油墨味就是它发出来的。这些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有人时常听说这样的话，就是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的传闻。我们听说有个小伙子对此不太相信，他在稍稍读了一本小册子的开头，马上就恐惧地把书扔掉了，立刻跑回家告诉他的朋友，假如谁读了那个书后却谎言说不曾读，他将来就会下地狱！有时候，负责分发这些宣传小册子的小贩子也经常发现，这些书送都送不出去，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书中不为人知的内容受到敌视。书中内容没有任何值得顾虑的东西。真正的原因在于，是因为人们担心这份免费的礼物会成为陷阱，送书者会以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方式在中国相当普遍，中国人再熟悉不过。

如果外国人不慎重地，仅仅是试图记下一些孩子的名字，也会引起一片恐慌，而且这种漫无边际的猜忌，足以导致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解散。用罗马字母拼音中国汉字的方法一开始引入，在其最初阶段就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与排斥。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的朋友读不懂的文字？世界上任何的解释都不能消除满腹疑惑的中国老一辈人。他们认为，汉字一代一代相传下来，从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很完美，对下一代来说足够好了。在他们看来，一个外国人甚至连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是谁，和他们的那些小发明相比，中国人的汉字不知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所提出的一切建议，都会遭受到普遍的排斥。其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建议是外国人所提出的。这种“灵活的顽固”的性格，会使你的中国朋友，最擅长以温和而

又最明确无误的方式让你确信，你的建议非常令人赞赏，但也是非常荒谬的。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可它完全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国人对待中国人，决不能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并没有他自己希望得那么多，于是，他对仆人的失职和过错就深恶痛绝，就用英语骂这个仆人是“骗子”。这个仆人经常被这么说，就迫不及待找到一位汉语很好的外国女士请教，想知道主人为何总这样说他。当他得知这个用来说他的词的意思时，说他“如同一枚飞镖刺入身体一般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那些查禁罗伯聃[74]先生所翻译的《伊索寓言》的清朝高级官员，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仆人一模一样。他们无法理解其中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背后令他们联想翩翩的隐晦的含义。为防患于未然，斩草除根，他们便查禁了所有的版本。

关于中国人对外国人最顽固的不信任的例子，可以与如今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外国人的医院和诊所联系在一起。在人数众多的患者中，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表现出毫无保留的信赖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另外也还有不少人，仍在相信最为荒谬的谎言，比如说外国人挖出人的眼睛和心脏做药，哪位外科医生有把他的病人切成碎肉的嗜好，据说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除非能够小心探问这些人对此的真实想法，我们一般了解得很少。不过，一二年之后，这些医疗机构的治病救人的广泛成功，可以像大风吹散尘土一样，驱散所有的这些荒谈谬论。不过，尽管有数万成功的例子，这些谣言还是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地蔓延，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在土地上滋生一样。

在中外关系史上，外国一方面存在着许多的严重失误，但整个历史是中国人怀疑与推诿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想起来会心生厌倦的回忆，而那些肩负着沟通责任去进行无谓谈判的人，却无法在其中获得深刻的教训。但在中国，很多并无资质的个人常常被迫去充当外交家，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怎样做，却故意耍人。

我们可以举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外国人提出要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当地官员则提出种种理由加以拒绝。在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还带着各种纸和书写用具。到了见面地点，寒暄了几句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慢地取出文具，摆好纸张，拧开钢笔，检查一下钢笔筒里有没有墨水，一副全神贯注的严肃神情。中国官员怀着强烈的兴趣，仔仔细细地看他完成了这一套的表演，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为的是——"整理整理，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把你所说的答复记下来。"这位官员急忙向外国客人保证，他的住所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可这个官员怎么能断定，下次他再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他不知道内容的神秘记录时，怎么能保证承认，其中的内容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它们经常使人心中充满恐惧。过去的几年间，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一种传闻，使得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很危险，在那里会突然神秘地被人砍掉脑袋。这个帝国可能永远也不能从这样一些传言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对于那些与之有关的人来说，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一样真切。

无限度的轻信和相互猜疑是恐怖的谣言滋生和生长的土壤。当这些谣言涉及到外国人时，长期而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可掉以轻心，而要在它们刚刚产生时就应该加以澄清。只要当地的那些官员真心地却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进行制止，任其蔓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75]。整个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制止这些谣言，抓紧时间非常必要，就应像确定地质的时代一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避免谣言的产生，最好的办法，是以无可挑剔的直观教学的实例，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的真诚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将会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

第二十五章　诚信匮乏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语中，这个会意字是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不过，在中国人值得称道的“五种品质”[76]中，它排在了最后。在许多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来，“诚信”这种品质，在这个天子的帝国每时每地，的确被当成最不重要的一种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77]教授的这一看法，他在谈论了中国人有关于“诚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但是，如果在民族性格中确定一种美德，而不仅不在行动中加以实践，却处处蔑视这种原则。并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错误，这一性格，非‘诚信’莫属了。中国人在公开的和私下场合里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背道而驰。就连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而嘲笑他们，虚伪、矫饰、狡诈、不真诚和奴颜婢膝，正是这个民族的非常显著的一些性格。”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至于多大，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可以探求出一个答案。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相信，作出一定研究的权威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毫无疑问，在诚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与西方各民族之间的现有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在细读中国的古代经典时，能在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却能压缩出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而无礼则绞。”在孔子的《论语》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孺悲与孔子有关的故事，这件事，对西方人来说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个中滋味。下面一段选自理雅各先生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78]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一件麻烦事，他不想直接说出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因而，他便采用了中国的做法来解决。

孔子的这个做法，后来也为孟子所仿效了。孟子曾在某诸侯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孟子希望诸侯先来给他以荣耀的拜见，因此一直托病不出。第二天，为了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他就在别处拜见了其他的客人。陪伴孟子过夜的官员，与孟子就孔圣人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他们的讨论只局限在礼节习惯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是否道德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这件事相关的其他人思考过这一问题。而现代的儒家子弟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解释。

毫无疑问，在保存历史典籍的方面，古代中国人要远比其他许多国家的当代人更高超。他们的历史虽然冗长，但无疑却包罗万象。很多的西方学者似乎对中国的历史推崇有加，对书中种种记录也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8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译文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

新近一位对中国做出深入、广泛考察的学者——李希特霍芬在谈及中国民族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就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对比，他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以及他们面对什么细节都追求探索真理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在中国，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欺骗和作假无处不在，而在一般的外事交往、谈判中也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我们必须牢记，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现方式：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例叙述事件；二、通过对性质和动机的分析来阐释事件。那些广泛地研读了中国史书的人们会说，就一般写法而言，这些历史著作的写作年代无疑是大大超越同时代世界记录；从另一种写法来看，它们却未必能体现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

对不够充分了解的事物，我们不便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史无前例、十分独特的现象：一个民族上上下下都沉溺于谎言，与此同时，又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尊重真理的史官。历史学家的强烈的爱憎感情会扭曲历史，那些可以在其他国家扭曲历史的感情，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难道，同样的因素，在世界其他地区发

挥作用，在中国就会失效吗？

记住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即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在尊重历史方面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圣人先师本人的实际做法也不严格尊重史实。理雅各博士并不是只紧盯着圣人无瑕的品质不放，却着重研究孔子编纂《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史书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孔子在逝世前两年编纂而成。下面一段引自理雅各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收录在其多卷本《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春秋》的作者本人也说过相似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怪罪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春秋》而怪罪他时，不知他心中是否充满不安呢？

事实上，这部编年史书不仅极为简略，而且含糊其辞，容易使人误解。在《春秋》问世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便对之做出了校勘和增补，他曾说《春秋》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我那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了我们英语中三种含义——忽视、掩饰和篡改。对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常常想通过果断的否认来快刀斩乱麻，完全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以解决我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把孔子的手、笔牢牢地拴在了他试图曲解他所生活年代的历史的证据上。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这种十分粗鄙的曲解的办法，使他能通过打量、深深了解这位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同情他，也不会理解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把“实事求是”作为他们的指导原则，但所谓《春秋》笔法却引导了他们的同胞怎样去隐匿真相。而那些真相，则有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

我们刚才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人也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我们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只要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注意力转移到审视自己的诚信问题时，他们自己也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像南太平洋海岛上部落的首领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要一开

口，谎言就出来了。”可是，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

贝德禄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达。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对外国人说，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惊讶，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忽悠我”一样，是不会伤害人的。库克先生是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他在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撒谎者这个问题时，说道：“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话说一个中国佬，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全力否认这个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这人撒谎成性，眼下就在胡扯’，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好几句糟糕的俏皮话’一样。”

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诚信匮乏，虽未达到句句成谎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无法呈现全部真相。在中国确实如此，真相是最难获得的。一个人永远无法断定自己可以获得某件事的全部真相。甚至当一个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求你帮助他打官司。他希望把他的案子交给你全权代理，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事后仍会发现，几件至关重要的事实他向你隐瞒了。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那种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事后才会显露出来。一个较为了解中国的人士是不会因为听了一方的陈述，就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而是把听到的内容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中国人，对这些所陈述的可疑事实再调查、推敲一番，以甄别这其中哪些东西可能是真的。

诚信的匮乏，再加上深深的猜忌，就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会交谈了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外国人在中国人那边看出很多的不可理喻的事情，主要来自于他们的不诚实。我们无法弄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总觉得他们的一言一行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

前，贴在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无法确认这位先生说的是事实，还是在把那人往陷阱里推。从来就不会有人担保，中国人所做的最后决断，就真的是最终的决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说清楚的问题，对于商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依旧搞得不清不白，就埋下了很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任何一件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很难预料。即便你能知晓一个中国人给出的原因，也不能确保那就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否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到追赶时能喷出大量的墨汁，掩护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被人拦截，他们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以便他们去往一片新世界。你准备掏钱捐献，而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慷慨，而是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微笑”提示你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他还向你解释，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你向那些穷人捐款的乐趣被剥夺，而陷入对这是否为诈捐的怀疑当中。我们也很少发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像外国人要求他的那样，明白地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等他们一进去再跑出来。因为如果他们贸然进门，会遭遇门里面的一条凶狠的大狗阻拦。

在遵约守时这一点上，中国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寥寥无几。这一性格，是与他们曲解的天赋，漠视时间的观念息息相关。不管其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将会很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搪塞。一般而言，中国人被指责没有守信的时候，他会答复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下一次更为重要的约定，他一定会守约的。如果你谴责他的某一个过失，那么保证改正的话就会像汩汩清泉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对错误的认识将是很彻底的——实际上是太彻底了，你除了祈求他按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做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教师曾被人雇佣来抄写、注释一些中国的格言。他把一些古老的警句写下来之后，做出了这样的一条解释，即人们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也要表面上答

应。“让他明天再来，接着，再一个明天。”他在注释中如是写道，“这样一来，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据我们所知，这是一个得到公认的原则，欠债的中国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没有人会指望一次就可以把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又是一个下一次。

中国人最缺乏诚实天性的一个表现，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诚实待人，尽管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孩子本人，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懵懵懂懂能知晓大人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某个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仅凭这个事实就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孩子经常对我们说尽坏话了。这些孩子们很小受到恐吓，说外国人有多坏，使得他们保持着强烈的恐惧感。可等他们长大到一定年龄后，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妖魔鬼怪，只是长得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冲我们哄笑呢？

有一位车夫，拉着一个外国人在大街上走。他们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在嘲笑外国人。他被激怒了，就冲着他们吼道，他要一定捉拿几个，然后绑在车后面拖死。遇到这种情况，车夫们也会吓唬道，用开水浇他们。那些有经验的孩子都知道，“我要揍死你”、“我砍死你”这类话，仅仅只是在警告他们“别那样做”的另一种说法。

对于一个想成为“知书达理”的中国人来说，他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这些话，只要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和听话者的高贵。“达理”的人在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妻子时，常常称呼说是“贱内”，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却也能抓住“礼”的本质，称和自己相濡以沫的伴侣为“臭婆娘”。

中国人自己有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性。这个故事如下：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前来做客。他端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为了安全起见，油罐被主人放到了房梁上。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油罐正好重重地砸在

了客人的身上。他华丽的外衣立刻满是油污。可正当客人因为这场不幸而气得脸色发青时，正好主人进来了。在非常得体的一阵相互寒暄之后，客人慢条斯理地如是解释了他的处境：“鄙人幸得入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窜，翻落贵油罐。贵油罐落于鄙人寒衣之上，恰逢贵主人入贵堂，在下狼狈之像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几个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适应，主人走向宴席时，对一群中国客人热情地鞠躬，温和地向他们打招呼：“诸位请入席，请用餐。”或者，把一个茶杯举到唇边，用杯盖转个半圆，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在心理上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大声说“叩首”、“叩首”，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向您拜安”。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在某方面的礼数还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有人骑着马，中途遇到一个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您来骑吧。”也不用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而且，就连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邀请，迫使像我们所提及的那样，连最冷漠的西方人无意识中也对此赞叹不已，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对这样热情待人的人表示敬佩。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如果一个车夫停下来问路，忘了把盘在头上的辫子解下来，别人很可能就会故意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在背后骂他。

如何确定给东方人送什么礼物最合适，这也是一门学问。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接受。而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以为是，自作决断，就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对别人送来的礼物，要谨慎审视一番，尤其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中收到的礼物，就属于这些特别要小心的，“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文章，正如中国的一句朴实的谚语所述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要求

的回报远远超出他的付出。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经亲身体验这种馈赠的虚伪性。我们曾有机会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一个小村庄里的中国人，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特意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这种邀请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外国人必须用几桌像样的宴席来表示答谢。可是，他们的宴请全部被村民们拒绝了，但他们却请求外国人能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村庄的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村子，他们就如是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连续来邀请，说是被这些外国人救济灾荒和捐赠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也派出代表正式地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的人都清楚，这些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在听到他们的好意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伤心的神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然后又全部自然而然转向请求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建筑。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遭受困扰的不单单是外国人，富有的中国人如果不幸要操办喜事时，邻居就会前来拜访，他们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设宴是一种永远不会落伍的方式。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下，哪怕是一个最不了解中国人的人，也会赞叹这么一句中国格言的准确：“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尽管心中非常不痛快，为了不丢“面子”，却不能表露出来，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而“面子”，可比被人吃掉食物更贵重。

这就向人们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表达方式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只要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来。据说，一位中国教师在雇佣他的外国主人的家里，向来被奉为彬彬有礼的典型。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了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不共戴天”一般。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

要依靠外国来的野人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人人皆知，但至少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中，是不能承认的。这样的情况极为常见，如果屋子里有一个外国人在，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会逐一给屋子里的中国人行礼，却完全无视那一个外国人的存在。一个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敏锐，发音完美，说这个学生在接受语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取笑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雇来教汉语的老师，被视为最需要对学生的口语水平负责的人。

中国人表面客套、虚伪礼节的重要表现，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证明，那就是口头上应承，自告奋勇去做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不做。假如一个中国人满口答应你做什么，却最终没有下文，我们不应感到失望。因为，你必须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是，满口答应你的那位先生，却为他自己和你都保住了“面子”。与之相似的情形是，假如在一个旅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定差额的部分由他来垫付，但他却将自己的手伸进你的钱袋。或者，就算是他掏自己的钱，但回头他还是会拿着账单找你付账。你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回答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装进棺材，埋到墓地里去吗？”

虽然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但也存在着大量与之相反的情况。但毋庸置疑，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说这完全是不应说出口的。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接表达时，最好就别执意说下去。但却有很多自视甚高的人非要去争执，固执己见。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就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可以与虚假的谦逊相提并论的是虚伪的同情。它们都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去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那种兴高采烈中对死者假装的幸灾乐祸的同情。贝德禄先生提到他所遇到的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

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教师在听到一个自己的最要好的朋友死得很有趣后，竟也捧腹大笑起来。一些父母，因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自己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中悲伤是人的自然情感，而对这一自然情感的粗鄙嘲笑显得与人类的本性如此格格不入。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在这些交往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为了不使结论显得太过于泛泛而谈，可靠地说，我们还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我们可以应用香港和上海的汇丰银行经理嘉默伦爵士一段话作为范例，这是他告别上海时所说的：“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比我们落后。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分量非常重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里，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一个违背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或许就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蒙受巨大损失，银行的利润每年至少损失一百万元。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批发与零售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面提到的大部分的结果，是否完全归功于我们所讨论过的中国人的责任感在起作用——那种值得西方人好好效仿的东方式的责任体系[79]。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通过一大批的证人长期广泛的观察仍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略知道内情的人写过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认为两个中国人做一桩的普通生意，其过程只是一方成功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格和拉班之间的关系[80]，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是铁刷遇铜盆。在中国，有这样一句

老话，人所共知："送一个孩子去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很难杜绝。甚至一些很大的商号，都会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可是，实际上，这些号称绝非名副其实。

我们无意于论证中国不诚实这一命题。而只是想说明，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而言，在任何地方很难确保能找到真诚。和一个对真实如此不尊重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结果吗？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一个外国人，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会毫不迟疑地拿着书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仅仅是为了不用付钱，虽然那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反倒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成功地把那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个外国人太不精明了，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常常到最后少付一个铜钱。他总是宣称，不好意思，身上没钱了。当你向他指出，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拿下来交给你，那情形就跟受了欺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泡了"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到了最后，他却会取出一千文的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不情愿地给你他应付的钱。但是，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刚刚斩杀了一条大毒蛇一样。

中国社会之团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有时会说一声，有时却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许多这样"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即送进了当铺。如果主人想要回来时，必须自己拿钱去赎。有一个中国男孩子进入教会学校就读，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子的钱时，被发现了。面对着不容置辩的证据，他一边哭泣一边解释道，他在家的时候就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在诱惑之下，他不由得想偷一偷老师的钱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中存在着这些非常明显的问题，而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其中有一个区别，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这一点虽不能随时就可以碰到，但还是随地就能找到。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其中的一些不少例子我们已经做出列举了。若干还要做一些详细的论述，再多的篇幅都不够用。

中国人善于敲诈勒索。我们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上一套非常有趣的书，这有待于对这方面知识最为充沛的人去写——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莫不如此。中国人具有引起人瞩目的一种智慧，是一种高度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使得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体系，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这个体系是如此地恶毒，堕落，很难想象出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来解决它，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的重组，才能将其铲除。

这一状况，以及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中国人的性格，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并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如果他有幸能获得这一名誉的话。在中国，有一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俗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也就是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中介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似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人们都知道，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一场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那个天赋。然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社会环境则正是通过这种社会飓风，才能使社会最终恢复到平衡。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而且没有被任何中国人欺骗或者愚弄。能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这样的完美的中庸之道是很难以奉行的。如果我们有人碰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人，他善于并敏于判断人的性格，像机敏的法官那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到我们的不满情绪，那么，他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中人”那一类。而如果我们保持着类似佛的涅槃境界，保持着那种随时引而不发的气度，我们又立刻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

象。有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典型的中国人，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做工精致、形象得体的泥捏的外国小人。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得意洋洋地对小贩说：“嗨，你这人，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都是些真家伙。”

毋需赘言，只要略略提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获知得更多，中国政府似乎正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性的一个重要例证。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史上，随处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不断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数量极大，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无所不包，似乎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境界。但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辞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在这一点上从不会让人发生误解。一个中国政客的生活和他所处的官家文件，就像卢梭在写作《忏悔录》所表现的那样，同时容纳着最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筑堤坝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了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订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个欺骗人的权宜之计。

毋庸置疑，中国也有清正廉洁的好官员，不过他们为数甚少。而且，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实现心中美好的理想，而只是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把熟读中国经典并身体力行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他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在你所认识的中国人当中，有多少是值得你信任的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给出千差万别的回答。大多数外国人或许会回答说“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都有可能。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们深信，那些有理性又有眼光的观察家，肯定极少做出这种回答。

去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永远都需要小心谨慎。在前文中探讨中国人相互猜忌的特性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最理所当然的事情，个中的缘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整体的统治阶层，并不是这个民族最为精英的那部分人。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最无耻的阶层。一位聪明的道台，曾经对外国人非常肯定地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也没什么用，我们的继任者们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蛇走蛇道、马走马路。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并不为他们的第一级阶层，即商人阶层所信任。中国的商人们都知道，所谓的"改良"，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很快就会剥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潦潦草草地盖起了烟囱与屋顶，花了很长的时间抹平其外表。可他自己心里却很清楚，只要每一次生火，那个烟囱就会四处冒烟。而只要每一次下雨，那个屋顶就会漏水。在中国，很多事情都与此同理。

中国财富丰沛，也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如果没有那种诚信，羞怯的资本就不会从隐蔽的藏身之处走出来。在中国，有满足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且都十分丰富。中国也不缺乏搞开发的各类人才。但是，若这一切没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依旧缺乏彼此间的相互信任，这一切都无助于这个古老的帝国走向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这些井是按照中国人通常的打井方式去开挖的，一般是井底开始从上至下都用砖头一层一层地砌上。但是，在当地，由于土质不好，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使得井口与井壁也随之坍塌，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小洞。这样，井也渐渐地干枯了。为中国长期难以忍受、却正在忍受的病痛开出诊方，恰如与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化的，最后，整个帝国只能像一辆辆满载精美物品的大车，慢慢陷入绝望的泥潭而被埋没。

第二十六章　宗教信仰

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慧成就之一，而儒家经典对于一位西方的读者来说，难免会感到十分枯燥而空洞。然而，我们若想要了解这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意义，还要考虑到它们在历史中发挥的那些影响。中华民族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赶走过。”它如今现存的一切，都像远古的时代那样古老。对于这一绝无仅有的事实，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历史的黎明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这是一个普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所有对此作过最透彻地考察的学者一致认为，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事实是，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精神力量。任何一位学习历史的人，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他们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从古至今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卫三畏博士说：“孔子作为一个理想高尚的学者，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他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理雅各博士说：“儒学关于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的确，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81]，其中后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重要特点经常为人指出，它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点，也是中国古典经籍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密迪乐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拥有如此圣洁的文献，其中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没有一句粗俗的话。四书五经的每本书，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批注，都可以在英国任何一个家庭中大声朗诵。需要重申一点，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都是与活人的献祭和罪恶的化身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狂欢放荡的仪式。可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都找不到半点踪影。”

皇帝就自己的统治好坏，直接向上天负责；而民心的向背，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为重要；统治者应该德才兼备，他的施政行为也应该以德治为基础；人与人之间有着五种关系复杂的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的这些观念，就像是山峰一样，高耸在中国人思想的一般水平之上，也吸引了所有观察家的注意。我们着重强调一下儒家思想体系的优点，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优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华民族。在我们即将结束关于中国人的讨论时，我们要谈谈中国人所具备的一种服从道德的卓绝能力。在延续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所有考生都要根据这些道德经典作文，因此，这种做法使得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个考生都把政府的稳定当成自己个人成功的重要前提，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是否知道一个确切的上帝存在，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些带着最为苛刻的眼光，考察过中国典籍的人向我们保证，学者们的天平倾向于肯定的回答。而另一些自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则持否定态度。即使中国人的确曾认识到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上帝，那到如今他们的这些观念也完全被遗忘了。就像是一枚古币上的铭文，上面的文字如今已被积存千年的斑斑锈迹遮盖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提问者，可能非常重要，但针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完全可以不考虑。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和他们的神灵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某些事例，我们不难追溯那些古代的英雄豪杰，从被人尊敬到被纪念、再到被崇拜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所有的神灵几乎都是死去的人，根据祖先崇拜的习俗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灵。一座座生祠，甚至可以在皇帝的恩准下，不断为生前就非常杰出的人物而建。随着光阴的流逝，说不定其中就会有谁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神。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是典型的多神论者。

众所周知，人们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人们对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有一种神秘的畏惧感，因而便把它们拟人化，并加以崇拜。这些举动的心理基础是，人们认为自然是有感觉的。正因为如此，到处建立着风神庙、雷神庙等等。北极星也一直是人们长期崇拜的一个对象。在北京还建设有日月坛，这与皇权崇拜有关。有些地方，对太阳崇拜的仪式，也成了广大民众一种定期的民俗活动。这个活动在二月的某一天进行，这一天被定为太阳的“生日”。这天一大早，村民们就起身东行，去迎接太阳；傍晚时分，再转身向西，护送太阳踏上归程。一年里对太阳的膜拜这时就算结束了。

这种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就是崇拜大树。在某些省份（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经常可以见到大小几百棵树，都挂着小旗子，标明此树为某个神灵的居所。有时即使没有这种外在的标志，人们对之同样坚信不移。如果在一间破旧不堪的草屋前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简直可以肯定，树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为中间住着神灵。

皇帝经常被认为是这个帝国中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祭祀大典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由皇帝一人亲自主持，并独自在大坛上举行，独一无二。但对于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他们自己若无法祭祀一下天地神灵，这也将是一个新闻。每家每户朝南的正墙上都设有一个小小的神龛，在某些地方把这种神龛称为天地牌位。大多数的中国人可以证实，他们唯一举行的祭拜活动（祖先崇拜除外），就是向天地祭拜上供。这一活动只在初一或十五举行，有时是在每一个农历新年的伊始。祭祀时，不需要祷告，甚至只过须臾，所有的供品就被撤下，像其他祭祀一样，被人们全部吃掉。

在这样一个仪式中，人们祭祀的又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们断定自己的祭祀对象是“乾坤”。有的时候，他们又说是“天”，或称他们所说的“老天爷”。后一种称呼经常使人们留下一个印象，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一个人格化了的神的存在。可是当你明白，这个假想中的“人物”，经常与另一个被称为“土地婆”的神灵相提并论时，这一推论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些地方，是在农历的六月十九这一天祭祀“老天爷”，有这样的风俗，是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但是向那些为老天指定生日的人追问，提出诸如“老天爷”的父亲是谁，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等等。这些问题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很难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确信，知道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他们只是接受传统，就算是做梦也不想提这样或者那样混乱的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一个中国人能够知道“老天爷”有什么经历或者品性，哪怕最粗浅的说法，都不会有。他们除了知道“老天爷”掌管着气候、能决定收成的好坏之外，一无所知。“老天爷”这个词在中国广泛流传，似乎暗示着真有这么一个主宰存在，但是，就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竖立雕像，更没有一种有别祭祀“乾坤”的祭祀方式，这些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释。

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字，用来寄托人的观念和意志。天是一种愿望所系，但并没有人格化。当我们读到“天即道”这样的注解时，便感到其意义已含糊到了极点。这个字在古典作品中词义是模糊不清的，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若是询问一个向天祭祀的人，强烈地要求他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的回答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无论他崇拜的是独个抽象化的自然力还是崇拜具体的自然力表现。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即“他与摇曳的苜蓿与淅淅沥沥的雨水同在”。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含义的人格化的客体，正是中国“天”崇拜中的一个致命的缺陷。

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是纯粹的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那些对此问题颇有研究的人

提供的证据中，通过无数现象和对各种可能性的推敲，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的总结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的团体，像儒家弟子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82]“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中国知识界人尽皆知的最大影响。一位中国经典的权威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他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这一影响甚至超出了经典原著的影响力。

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崇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几百英里，注入了大海。多少年来，它数次改道，跨越了六至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一直流至渤海。但无论它流经哪里，哪里就一片萧瑟，只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理学家们所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根本再也无力支撑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了。道教已经蜕化成一种降妖捉怪的法术。道教曾经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而佛教的引入，是用以弥补儒教的先天不足。儒家无法满足人的本质需求，即对神的渴望。它们的传教方式彼此影响，因为这些影响而改变很大。

对于那种愿意行小善而积德的人，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他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对于他们而言，这条路比任何的路都要好。任何一个神灵，只要他似乎对人有利，都会受到中国人的垂青。就像一个偶尔需要伞的人，会走进任何一个碰巧在出售雨伞的商店那样。中国人对自己所崇拜的神灵是不问其来源，这就如一个英国人使用雨伞之时，是绝不会去问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一样。



晚清道观里的道士

时常能听到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演讲，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有多少人吃菜豆一样。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及时搞到，他们就回去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得起，他们就直接去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最有名的“教义”与这个情形是相似的。任何一个中国人，若他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他就会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为“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太过于冲突的感觉。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吞并了佛教与道教，因此，结果导致了“三教合一”。

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实际关系，可以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他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会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对词语的选择，丝毫不会因为我们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而改变。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的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诺曼底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最为朴素的撒克逊语。但二者都是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

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家信徒，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在这个基础上，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同一个仪式中把“三教”融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比我们在同一个句子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的情况还要多。

想让中国人理解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上的相互矛盾，也很少关心这一点。他们本能地学会了把两种不同命题调和在一起的技能，强行认同两者中的每一方，而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根本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种“理性的融合力”推到了逻辑上断绝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以使他们理解。

两种不同信仰的机械融合会产生两个非常显著的后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中国人喜欢秩序，这一点他们非常出众。从他们官僚阶层的官阶的精心划分就可以鲜明地看出来。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各有各的严格身份标志，各有各的特殊权限。肯定有人想在中国的神灵世界找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但一无所有。若问一个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谁权力大，那简直就是枉费心机。即使是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

中国人的神灵世界里，诸神的权威地位也不固定，这是一种十足的混乱状态，如果这一状况出现在人世间，那一定是长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这样的场景，在供奉孔子、老子和佛祖的“三教堂”里表现的非常明显，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最受尊崇的人应该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属于孔子，或者，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那就应该是老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过去曾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争论的例子中总是推崇佛祖，尽管他是一个外国人！

中国所有的信仰结合起来，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到了最低的层次。有一条社会定律与之相呼应，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儒学所推崇的那些高尚的道德箴言，一点也不能使儒家子弟消除对于那些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常有人这样说，当今世界的文明民族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个看法是一点不错的。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都不羞于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供在牌位上，被人称为“大仙”，据说它们可以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在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高官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洪水之神的大蛇面前。他们都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的一位著名的官员，他曾奇迹般的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中国，只要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也成为了一种惯例。在离河流较远的地方，人们会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并对它的灵验确信无疑。如果洪水退去，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剧性的行为来，以此来感谢这位神灵的恩赐，也就是那条蛇。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宇里或其他的公共场所供人膜拜。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到庙里对这个神灵烧香、磕头。

在离河道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雨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羽则更多地被当成雨神祭拜。有的时候，无论河道远近，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代替。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不符合理性的，因为他的头脑中从不考虑自然统一性的逻

辑，即使荒谬就在眼前，并向他们指出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

有关于求雨，还有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小说《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一只最初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孙悟空，他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一个人。在有些地方，人们将这个想象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而既没有把他当成河神，也没有当成战神。中国人从来就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具说服力？对于一个西方人而言，原因与结果是相互关联的。而一个中国人既然能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头脑中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观念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中国人的神灵有如此之多，去弄清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非常有必要。对于这一个问题，有两种答案：一个是他们崇拜这些神灵，二是他们忽视这些神灵。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要去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这样的估算，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为基础乘以人口比例，从而推算在帝国的其他地区的数字。然而，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靠不住的了，就好像有人要去统计一大片蚊子，“他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做判断时，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中国人到寺庙里去拜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一位从广州登陆的旅行者，看到那里的庙中香客如云，烟雾缭绕，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但是，让他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他游览了帝国的另一端再说。他就会发现，在那里，许多的庙宇早已无人问津了，大部分时间，除了初一、十五，根本没人去进香。甚至在许多地方，连初一、十五都没人去，即使是在上香最盛行的时间——春节，而新年是中国人崇拜本能最为强烈的时刻。于是，那位旅行者会发现成千上万座不知是哪朝哪代修筑起来的古庙，尽管它们偶尔也会被人做些修复，但已无人关心它们修于何时，为何而修了。他会发现，有人口居住的方圆几百英里的地方，甚至找不到一个出家人，无论是道士，还是和尚。在这些地方，在那些庙里，他一般

看不到妇女。孩子们也是放任自由，从小到大，没有人教导他们敬畏神灵的必要性。而在帝国的另外一些地方，情况则截然相反，那些具体的偶像崇拜仪式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中国社会的宗教势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群岛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大多数岛屿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只有通过茂密的植被下面坑坑洼洼的火山坑，才能判断过火山曾经爆发过的痕迹。但在东南部的岛屿上，火山依然很活跃，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烧，不时爆发，强烈的地震波从岛中心传播出来。在中国某些最为古老的地区，对寺庙的崇拜极为冷淡，而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夷蛮之地的省份，偶像崇拜却极为盛行。不过，人们很容易被这些表面现象而误导，人们容易高估它们，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之前，是无法得出有根有据的结论出来的。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他的重要建议。于是，毫不奇怪，他的现代弟子们也因此认为，对中国万神之殿上的众多互不相干的神，敬而远之是最明智的。与蒙古人或者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没有宗教偏见。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庙宇的门楣上看到那句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中国人以一种普遍的本能捕捉到了"如"这个字来传达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下面这一流行的说法，则表现得更具体：

敬神如神来，

若不敬，可不来。

敬神如神在，

若不敬，神不怪。

比对敬神而远之更进一步的是仪式崇拜。按照一定的程式和方法去做，搞出特定的仪式，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想获得外在的利益。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神圣感只是外国人的事情，与己毫不相干。然而，不得不谈论一下敬畏与崇拜，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

对所有中国神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就干脆是交易——能供给神多少，就必须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当“老天爷”被设想成一个人的时候，这种千篇一律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本质。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定期祭拜并给“老天爷”烧香祭拜，他会告诉你：“因为老天爷恩赐了我们吃的和穿的。”即使中国人对“老天爷”是否真的存在茫然无知，也不会妨碍他们仍会按仪式照行不误。祖先们这样，他也会像祖先那样去做，至于到底有什么作用，“谁知道呢？”

中国人这种只习惯于从形式上对待宗教仪式的态度是浅薄的。在一些被人遗忘的庙宇的门柱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对联，较能说明这一点：

古庙无僧风扫地

寺中少灯月照明

中国人崇拜神，就仿佛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保险机制，因为这是一种最妥当的态度。一般人常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它们不存在，相信了也没害处。假如确实存在，却又被人忽略了，那么它们一定会发怒，并施以神力进行报复。人们认为，那些驱动人的动机，也同样支配着神灵。有句俗语说，奉上羊头（献给神庙作供品），百事不愁。人们还说，像“三皇”那样，没有特殊恩泽可以赐给人的神灵总是很贫穷，而观世音菩萨和战神关羽则既尊贵又富有。

中国人不仅仅是把对神的崇拜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即这么做“没有什么害处，却有可能有某些好处”，而且，他们更上一层楼，走到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经常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也似乎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如此。这种表述方式（很难称之为思维方式）就如同一个中国人说：“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如果做这样的类比，中国人也完全乐于接受，但他们无法能以任何合乎逻辑的推论让自己认识到问题所在。

在中国，可以看到许多朝圣者每走一步就磕一个头。他们要在这

种沉闷而单调的朝拜历程中浪费掉很多的时间。若是问起他们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无谓的苦难，他们则会说，对神灵虚伪的信仰太多太多了，信仰者有必要以这种苦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种特别虔诚的例外，我们在谈论中国人相互关系时已经充分提及那种缺乏信义的特性，在他们的信仰方面表现得更突出。我看过一张以北京附近一座庙里一群和尚为主角摄影的作品，简直是一幅展示蛇一样阴险狡诈性格的完美之作。一个人脸上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质，就与他们内心的性格相对应。

的确，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样，把自己的神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模样。这也不无道理，因为有不少神灵就是他们的同胞。笔者曾经看到过一张以菩萨名义向世人发布的晓谕，说有人将人类逐渐变得邪恶的消息上报天庭，作为众神首领的“玉皇大帝”获悉后，大为震怒，高声怒斥了他手下的神臣，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引领人们从善。中国人认为，人类其实为周围的一群神灵精怪所包围，但一样可以贿赂、奉承，且容易欺骗。

中国人在做买卖时拼命喜欢讨价还价，很想占对方的便宜，如果他能讨得便宜的话，是一分都不会让的。他们面对神灵也视为一场买卖，即使向神灵祈祷，如果可能，他同样想占便宜。他或许可以通过捐钱修庙换取好运，但他可能只捐上二百五十个铜钱，却可能在功德簿上记一千个！簿子上记下多少，神灵可能就认为他捐了多少。在维修寺庙时，每位神灵的眼睛都会用红纸遮住。这样，神灵就不能看到周围混乱的场面，他也不会认为是对自己不敬了。如果一座庙位于村外，又常常容易成为盗贼分赃的窝点，因此，人们就会把庙门用砖头给封死。于是，就让神灵独自待在里面，去和宇宙尽情地交流吧。

年根岁底，每家每户的灶王爷要回到天上，汇报他所在家庭的一年的行为，但他的嘴唇会被抹上黏糖，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去汇报这家人的劣迹了。这个风俗，人们都很熟悉，它是中国人智胜天界神仙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有时候，中国人会把一个男孩子取上女孩的名字，好让那些愚蠢的妖怪认为他真是女孩，从而使得他之后能活在平安之中。

贝德禄先生谈到过，在四川，人们杀死了女婴之后，总是大烧纸钱，供她的鬼魂使用，并通过这么做来贿赂、安抚她们。送子观音的庙和其他多数的庙非常不同，经常去那里朝拜的一般都是妇女。很多的送子观音庙会为她们提供泥做的小男孩，她们有时由观音娘娘抱着，有时像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妇女烧香拜佛时，会把标志泥人性别的那些小器官掰下来，吃下去，以确保自己生一个男孩，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做法。庙里一般有大量这样的小泥人，都是特地为去庙里进香的妇女准备的。不过，她们只能悄悄地偷走，不能公开带走。假如真如愿以偿地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位妇女就到庙里还愿，要在上次偷走泥人的地方再放上两个，以示感谢。中国的水手们认为，中国某些海域里可怕的风暴是恶毒的妖怪所制造的。恶魔们躺在水底，静静地等待，一旦有船只经过就俘获他们。在风暴猛烈到极致的时候，据说水手会做一个和他们船一模一样的纸船。等到最危急的关头，放入海里以欺骗狂怒的水怪们，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那艘船，这样一来，真船便有机会脱身了。

在中国很多地方，每当霍乱之类致命的瘟疫发生并迅速蔓延时，人们常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欺骗瘟神，让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算错了这一年的时间，于是就离去了。这做法也可以使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秋二月”实际是“永远不”的另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欺骗神灵的做法，就是让一个人爬到供桌底下，将头从一个专门挖出来的圆孔中伸出来。神灵会以为真有一颗人头献给了自己，于是便恩赐以相应的好运出来。可献祭结束，那人会将头缩回去，然后就回家享受他应得到的好运去了。

我们偶然得知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村庄想把一座庙里的神像挪走，将它改建成学校。那些村民们满怀期望，想从佛像的肚子里掏出些“银子”来，以弥补改建的开支。但是，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神灵的待遇，也不了解塑像者对待中国神灵的态度。结果，他们搜寻神像那最宝贵的心脏，最终发现那里只是一团锡块[83]。毫无疑问，确有些僧人曾把财宝藏在他们的佛像当中，也因为此，很多庙宇遭受了抢劫之后，那些佛像要么被搬走，要么被当场打碎以期获取财宝。那些这么做的人，很多都是号称崇拜神灵的人，但

他们对待神灵采取这么粗暴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们还曾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个县官在审理一桩与僧人有关的案子时，甚至还牵涉到了庙里的佛祖。于是，这位县官便将神像传唤到了公堂之上，责令其跪下，可他似乎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愤怒的县官便命令衙役重打神像五百大板，结果把他从神灵打成了一堆渣土，于是以缺席判，责其败诉。

每一年，每逢大旱降临之时，人们便向雨神求雨，希望他能大显神威，让这片干旱的土地得救。这片土地干涸已久，无法耕种了。在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仍不见结果之后，村民通常会做一点点的调整，把雨神像从庙里抬出来，抬到最热的地方，让它亲自去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是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而不是只守在庙里道听途说。人们也经常不掩饰对神灵表示不满的习惯，在这样的一句流行的俗语中表现最为明显：“三月四月不修屋，六月七月骂龙王。”

我们听说一个例子，中国一个大城市的居民，一直遭受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的侵袭。他们就断定，这是当地的一个神灵施法作祟。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把神灵当成一个现实的恶霸来对待，揪出神像，痛打一顿，最终把它打成了一堆碎土。我们没有证据保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这个故事流传开足够说明问题了，因为这整个的过程都很符合中国人的关于神和神灵的观念。

我们提请读者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实，可能很容易让一个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自然而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其实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宗教。也的确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断言。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信仰》一书中批判了古伯查先生某些过于笼统的概括，并加以指责，断言那是“对人类很大一部分人的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他一向坦然地承认，中国人既不关心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纯粹的神学争论，也不关心把这些争论的结果当成其信念的民族的行为。但是，密迪乐先生断然否认这样的结论，即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和伟大事物的无限崇敬，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孜孜以求，向往神圣崇高事物的内心”。

另一方面，托马斯·威妥玛爵士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有过长期了解，被认为是对中国有无宗教这一问题做出最权威回答的唯一人选。最近，他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宗教是超越于道德之外的东西，那么，我拒绝承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偶像崇拜，或更确切地说，是多种偶像混合的崇拜活动，但没有信仰。他们随时都可能嘲笑本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崇拜，但他们却不敢漠然置之。”



孔子像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探讨这个非常有趣但很难回答的问题。要想对之展开一种详细的讨论并不困难，可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么做能把事情弄得清楚。我们以为，现在有一种比抽象的争论不休，更有效的、更现实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道教和佛教已经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中国人依然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们是孔夫子的信徒，无论给他们的信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他们仍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努力探寻儒教到底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必需的宗教。为此，我们打算引用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他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

恩斯特·费伯博士在他的《儒学类编》一书的最后专门指出了“儒教的不足与失误”。但与此还加以肯定，儒教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其中许多观点，几乎都能与基督教的《启示录》得到共鸣。下面，我们引用了其中的二十四条观点，并加上了几句有限的评论。

一、“儒教自认它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

二、“儒学没有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做出区分，无论就人本身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明确的概念。”

关于“对缺乏人的灵魂认识”的这一个概念，这很令学习儒家学说的外国学生感到十分迷惑。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儒家教诲的最终结果是使他们除了在肉体的生命力方面之外，对人的灵魂一无所知，除非这是一种动物般的生命体。一个人死后，传统经典中权威的说法是他的“灵魂”升天，他的“肉体”化为泥土。但是，还时常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生命的气息消融在空气中，而肉体则化为尘埃，这一观念不断得到了强调与发展，与后来一个真正的儒家子弟所持有的唯物主义以及不可知论完全一致。往往很难让一个中国人明白，他到底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灵魂，甚至是没有灵魂？他对于这个问题几乎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拿这样的问题来问他，就如同问他吃饭的时候到底是人体的哪几块肌肉带动了咀嚼

一样。只要咀嚼的过程让他感到舒服，他就没有一点兴趣关心帮助自己消化的肌肉在生理学家那里是怎么定义的。同样，只要一个中国人还对他有好胃口感兴趣，还对那些他所养活的人的消化器官感兴趣，他就很可能既不关心自己的什么“灵魂”，也不关心那些靠他养活的人的灵魂，除非这件事情与粮食的价格有什么关联。

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圣人，而另外的一些人却是普通人。”

四、“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能和才能有关，而却缺乏解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依据。”

五、“虽然儒家对罪恶的态度，在口气上不够坚定和决绝，但除了社会生活里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到任何对罪恶的惩罚措施。”

六、“儒学总体而言，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洞察。”

七、“因此，儒学发现它无法去解释死亡。”

八、“儒学无法找到一个中介，使人的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九、“祈祷及其道德力量在儒学体系中没有任何位置。”

十、“尽管不断地强调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只是停留在期望或者口头中，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更确切地说，事实恰恰相反。”

十一、“允许容忍一夫多妻制。”

十二、“认同多神论。”

十三、“相信算命、看风水、预兆、托梦和其他的幻像（例如凤凰等）。”

十四、“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

形式。”

十五、“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

十六、“认定某些美妙的音乐旋律会对道德产生不良影响的断言是不合理的。”[84]

十七、“过于夸大某些榜样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如果真的像儒教所宣称的那样，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那么这似乎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伟人没有对那些研究他生平的人们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以改变他们的性格。如果真如儒学家们所说的那样，那些楷模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影响却那么微乎其微呢？我们将在第二十条中提及对圣人的神话，正反映了第八条所言的那种中介力量的缺失。无论“圣人”是多么的贤明，他也只能提出些好的建议来。一旦人们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他非但无可奈何，反而不再提出任何建议了。

我们觉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85]他的这句话给圣贤们所提的建议，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但却不是预防针。如果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只能算是一剂补药。一个旅行者，落到了强盗的手中，只能眼睁睁地受盗贼抢劫并被打伤。若是他大谈加入互助旅行团的好处，说他之所以头破血流，就是因为没有加入该团。而受伤者对此全都知晓，可他现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晕过去。他最需要的不是违背常规的反思演讲，而是油、酒和可以一个供他尽快康复的避难所。而且首先的，就是一个聪明、能拉他一把的朋友。对于肉体有残疾的人，儒学或许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面的，儒学则没有，也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情。

十八、“儒家的教义中，社会生活体系就是一种专制体制；女人就是奴隶；孩子在父母面前没有自己任何的权利，在与长辈的关系中只处于臣属的地位。”

十九、“孝顺父母被夸大到了奉若神灵的地步。”

二十、“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是精英崇拜，即崇拜圣人，也就是把人加以神化。”

二十一、“除了那种没有任何真实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一个关于不朽的明确观念。”

二十二、“所有的愿望都必须在现世中得到实现，利己主义无形中得到了鼓励，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

二十三、“整个儒学体系没有给任何普通人以安慰，无论是他们生前，还是在他们死后。”

二十四、“中国的历史表明，儒学不能使普通人获得新生，让他们努力去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做更高贵的事情。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儒教已经和道教、佛教的观念及做法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有关中国各种不同形式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我们在前文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中国人自己也早已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给人们以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做更高贵的事情”。有一篇中国寓言故事，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传说的作者不详。

这个故事是，据说有一天，孔子、老子、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永恒的神仙之国相遇了。他们哀叹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年头里，人心不古，他们的教义在天朝上邦无人听取。经过长时间的一致讨论，共同认为，他们的教义本身虽然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没有一个永恒的楷模引导人性朝好的方向发展。于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下凡到人间，去物色一位合适担任此重任的人选。说完，这个计划就立即被付诸实施了，他们就分头到人间去了。在人间寻找了良久，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一看上去就显得德高望重。见到孔大圣人走来了，老人却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与他高谈阔论起古圣人的

训诫和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和不施行。

在交谈中，老人显示出了他对古代圣言的渊博与熟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开阔、敏锐的判断力，令孔子大为惊叹。长谈过后，孔子就起身告辞，老人依然纹丝不动，并不起身相送。孔子遇到了终日搜寻却一无所获的老子和如来佛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老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样熟悉这两位先哲的思想。老子就先去了，他非常兴奋地看到，老人对道教教义非常熟悉，就仿佛他也是道教的创始人，其口才和热情也堪为模范。和孔子一样，老子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这个老人保持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但他也一如既往地没有起身送客。到了如来佛祖去拜访老人了，他也获得了惊奇而可喜的成功。但佛祖发现，虽然他表现出对佛家理论深刻的洞察，那位老人对他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样都没起身相送。

这三位宗教的创始人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一致地认为，这位举止罕见的、令人赞赏的老人，正是他们的理想中人，他不仅可以介绍“三教”的教义，而且还能论证“三教的确归一”。于是，他们三人结伴，一起又来到了老人的面前。他们向他解释了上一次拜访他的目的，他们说老人的智慧让他们心悦诚服，希望老人能出山，重振三教，最终将之付诸实践。

这位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恭敬而专注地听他们讲完，然后回答道：“尊敬的圣人们，你们的善行像天一样高、海一样深，如日月齐光。你们的计划充满智慧，重比泰山，令人赞叹地深邃。可不幸的是，你们选错了那个去为你们执行计划的代理人。诚然，我曾拜读过诸如《道德经》《论语》和佛经，对它们的崇高与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是，你们或许并没注意到，我的腰部以上才是人体，腰部以下却都是石头。我擅长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人类的责任，却由于我身体结构是如此严重的不幸，使我永远不能将它们任何一项付诸实践。”孔子、老子和佛祖三位圣人听了，长叹一声，就从人间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企图努力寻找那个能在生活之中展示出三大宗教教义的凡人了。

我们常常听人将目前中国与公元一世纪时代的罗马相比。可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要远远高于罗马帝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国，恰如在那时的罗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即对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真实的；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虚妄的；而对于官僚们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有用的。中国皇帝也和古罗马皇帝一样，都同时可以说是“一个高级教士，又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造成中华帝国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学。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即对无神论是否正确的这一问题的漠然置之，要比纯粹的无神论还要糟糕。在中国，存在着多神论与无神论两种迥然不同的信仰，如同一个骰子上对立的两个面，可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到二者没什么矛盾之处。而对人之本性上最深奥的精神真理的绝对冷漠，是中国人性格中最为可悲的一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内心的精神，接受一个混沌不堪的宇宙，接受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儒家经典就像中国统治者的航海图，驾驭着中国这艘航船，儒家经典就是驾驶这艘航船的航海图。它是人类绘制的最完美的一幅航海图，或者如已故的卫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这些说法并不过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经典的作者出于神启。中国人在驾驶着自己的航船时，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他们此刻又正朝哪个方向前进——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也似乎要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一、工业发展水平；二、社会风俗习惯；三、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四、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五、公共教育的状况；六、宗教信仰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作用。”

我们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上述各项指标中每一项都附带作了说明。尽管还不够全面，也未曾充分考虑论述这些问题应该把握的比例。中国人的性格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有时许多话题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略去不谈。我们能够挑选出的性格问题也仅仅是一点点，通过这些小点的联系，我们只能选择性地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现中国人的性格风貌，其实还应该有许多其他考虑在内的“特性”。

我们在举例子说明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具有说服力，因为经过慎重的选择，列举的这些性格似乎更为典型。它们就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头，每一块都应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只有当骨头完全放好了，才能看清楚整体骨架的结构。每一块骨头都不能被忽视，除非有人提出反对，指出某些骨头放错了位置，并导致骨头整体结构形态

也没形成恰当的样子。或者干脆，不是骨头，而只是石膏模型而已。这种批评极为公正。对此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特别说明，在本书中选择的种种“性格”，并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可能让人形成对他的准确印象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判断并非匆忙断论的。实际上，它们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基础上，而我们观察的事实远远多于本书所提到的。

当然，即使如此，这些观点或许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但更多的却被事实证实了。这些事实如同以下的例子，一个人经历了中国北方起大风时的沙尘暴，沙土灌满了他的眼、耳、鼻、头发，衣服上也落满了灰尘。由于沙尘经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需要点灯。针对这种现象，人们也许会搞错起因，但不管如何，对它的描述总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观察自然现象与观察道德现象是有着重大的差异的：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那些有良好机遇并且善于观察的人才能察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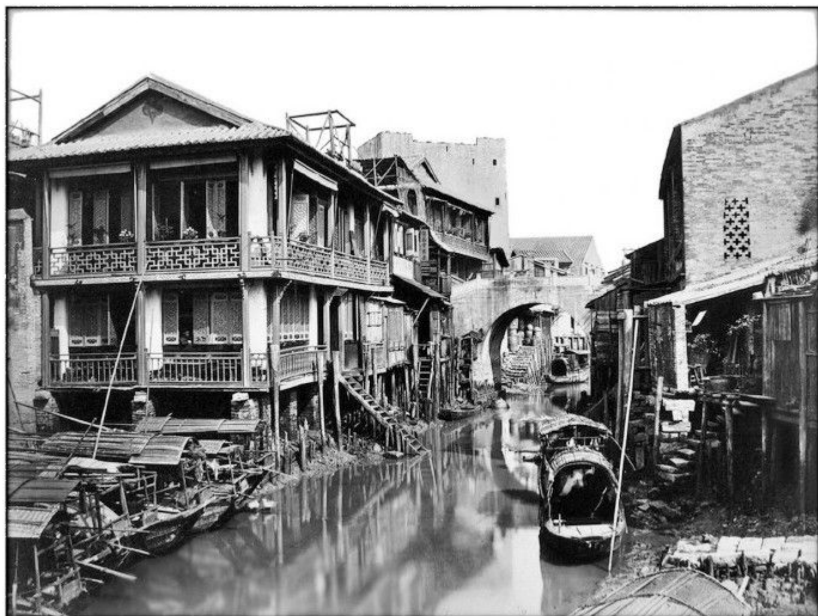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的现象。无论是谁，如果他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忽视了另一面，就一定会作出一种错误的判断，而且还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得出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将两个明显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常常又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国更需要这样做的了。在这里，完全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已是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同时要兼顾两个方面。

我们已经讨论过，儒学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我们乐于相信，它能够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它一个如此杰出的道德体系的厚望，愿见它的良好结果。但是，它如何能使一定数量的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并且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道德状态呢？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都可以通过对待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而被揭示：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的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通过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其人的性格就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呈现。读过前面各章的读者已经知道了，我们用这些测试题来获知当下的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他们对自己，他们对别人，都是

非常缺乏诚信的；他们与别人的关系中，缺少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的。

中国人所缺乏的并不是智慧，也不缺乏耐心、实践能力和乐观的精神，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品质都是很杰出的。他们所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经受不住贿赂的诱惑，就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过，有多少中国人能抵制得了压力，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去担任公职呢？请想象一下抵制掉这种压力在家族中带来的后果吧，中国人害怕面对这一后果，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然而，对于把理论上的道德积极引入这样的领域的中国人，你又能作何感想呢？当你看到，在中国的官场、军队机构、商界中充满了依附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对中国的门卫和差役的不忠于职守感到奇怪吗？

一个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道德情况的人，可以通过中国朋友的帮助去进行。尽管他们竭力掩盖自己及朋友的缺点，却经常对民族性格的弱点直言不讳。一个中国人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腓特烈大帝的一生》一书中明显以愉悦的笔调所描写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手下有一位督学，他很喜欢这位学校的监督员，总爱跟他谈点什么。一天，君王问道：“苏尔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不错啊，陛下，特别是最近几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答道。“为什么非要说最近几年？”“是这样的，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生来就是邪恶，因而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意识到了人天生向善而不是恶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了摇他那颗苍老的头颅，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尔泽，我看你是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拥挤的江南市镇一角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名胜。稍稍离开一点的距离去看它们，显得美丽迷人，极具有诱人的魅力。可是，再近点，总会发现很多破烂不堪、令人讨厌的东西，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非常客观地反映中国的风景名胜，虽然摄影被人们描述成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有关中国的照片却不是这样，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被忽略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有着如此之多象征幸福的表征。可是，经过一段并不太久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那些都名不副实。中国人的幸福的确全只是徒具其表。我们相信这个真实的评价大体而言是公正的，就像说连整个亚洲都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样。

在对中国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我们总是想起那些跨越在大路和河流的石碑。它们被竖立在那儿，用以“纪念”建造和维修桥梁的人们。有的时候，这块碑旁会有五六块同样的石碑，它们都已经有着不同程度破损。我们对这些逝去的光阴和过去王朝所留下的纪念物保持着浓厚兴趣，当我们问起这

些石碑所对应的桥梁时，人们回答说：“啊，那个桥嘛，”我们被告知，“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谁知道什么是时候就没了的！”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旅行时，因为刮起了逆风，航船被迫停下。我们就到岸上漫步，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野里耕作。那时正值五月份，乡间田野里的景色美极了，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那时候，任何一个游客都会由衷地赞美，对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表示感叹，因为他们的勤劳，才能把这么大片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但是，和这些耕作的农民稍稍交谈，就能发现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刚刚熬过一个极为艰苦的冬季。上一年，洪水和干旱毁掉了庄稼，使他们颗粒未收，周围的村庄都有人饿死——也就是说，目前，他们正在忍饥挨饿当中。官家所下发的一点点救济只能是杯水车薪，零星的一点点，还成了无耻盘剥的对象。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一点儿也不能保护自己，这种情况一如既往。可是从表面上，这一切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痕迹。

那一年，其他的地方都是丰年，粮食高产，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报》和在中国出版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任何有关消息。但是由于其他的情况而忽视这一现实，并不能改变那已发生的现实。无论其他人是否知道这件事，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仍在忍饥挨饿。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经验地认为中国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而通过仔细观察，认定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耕作的农人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许多弊病，在西方“徒有其名的基督教国家”里也同样存在着。或许读者们会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对之做出系统性的比较。我们确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除了自己的祖国之外，笔者对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也让我没法做好这项工作。那就请每一位有心的读者自己去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永远都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暂时认为中国人是正面的。在进行过这样的比较后，我们至少可以指望确定这样的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却时时处处要面对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如果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想请读者好好面对这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并深入地思考：而它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它需要的只有人格和良心。更为准确地说，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一个东西，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有人这样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所造出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又高贵”。在中国，有谁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有一本关于几年前去世的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在结尾处，他的妻子写下这段文字，评述她故去的丈夫：“外界会称他为一名作家，一位牧师，一名社会成员；但是，只有那些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能说出，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怎样去生活的。在他人眼里，他那浪漫的一生，他那私人信件里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段落，必定为一层面纱所笼罩。但是，即使不揭开这层薄薄的面纱，我也可以说，假如在人世间最高尚、最亲密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一份持续了六十三年，依然纯洁、热烈的感情，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份爱情从未从一个纯洁的高度降低一点点，也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动。如果这份高尚的爱情可以证明那个骑士时代并没有永远地逝去的话，那么，查尔斯·金斯利就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对于一位今生和来世都有福永远享受这份爱情的女人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86]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成果，就在于它能创造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一种人生并不少见。当下这一代人中就有数百个记录，更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生没有付诸公开的记录。每一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有些读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体验范围内还亲自遇到过更多这类例子。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不愿意过分地怀疑，但是，对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使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这在道德方面，将是一个更为伟大的奇迹，将远远胜过道家经典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

没有一种人类的行为可以逃脱无情的规律，《圣经》上说道：“凭着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的样子。”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

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早已做完了他能够做的，它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果子。它已经完成了人类的能力所能做的一切工作，而且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在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一位态度最为友善的批评家在耐心地考察了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中国现状自身就是儒学所做的全部回答。”

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存在三种互相对立的态度：第一，它没必要改革。毫无疑问，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但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某些隔着一定距离看待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的；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的。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尚未开始，就必定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许多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给埃及的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毫无希望。不过，如果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一切显然使得这一观点，看起来论据不足，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为之补救。还有第三种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仅仅只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几种不协调的观点，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首先，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革新？那些认识到改革之路必须践行的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能够实施这样内部发起的革新。北京《邸报》最近刊登的一份奏折中就是这样一个革新设想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一个省的百姓不断地发生暴动，并说他已派出一批富有才干的人员奔赴该省的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广训》。显然是希冀以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感化当地的百姓，移风易俗。尽管一无所获，但向民众宣讲道德箴言（这是对早期基督教传道的模仿），在改良当时人们的道德风尚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然而用这个办法教谕大众失败后，也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过去一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长期的经验表明，这一做法必然失败，它只能使用一次，如果一再尝试，那么全部努力都会化为泡影。在前文那个能说会道却长着一双石腿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的劝诫没有什么效果，人们就寄希望于楷模发挥榜样的作用。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讨论，我们在这里旧话重提，只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榜样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在于他们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生命中最初的推动力。且以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为例，据报告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他的下属中有多少人能够诚心实意地贯彻他的指示，与他通力配合呢？缺少这样的配合，又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所依赖的中国中间人是贫乏无力的，那么不得不说，他在中国问题上是绝对无能为力的。那么同理，对于一个中国人，无论他官居何等要职，难道不同样会感到束手无策？至多是这样的，这位清廉的官员，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就会着手处理眼前的一切问题（只是表面上的），仿佛一只猫待在阁楼上，就要清除上面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任，甚至几乎就在他开始走之前，老鼠们又已经跑回来干它们自己的活动了，一切又立刻恢复了原样。

一个中国政治家个人怀有改革祖国的抱负，这不仅可信，也再自然不过了，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如果他了解到“东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观的惯性——席勒说，那种即使上帝也无计可施的愚蠢”并且知道长期“改革”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那么，他可能早就把结果准确地预测到了。贝德禄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在这些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的人口必须得到补充，必须平等对待彝族土著，必须修筑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总之，一句话，中国必须开放。要想完成这一切的工程，除非有外来的动力支援，否则，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不“借助某些外力”而想要改变中国，就如同像在海面之下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化为乌有。有这样的一个机械学的定律，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这部机器运转的。[87]

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北运河上，有一个河湾，在那儿，旅行者会看到岸边有一个倾圮了一半的庙，另一半被大水冲走了。靠水的一边，下面有一道精心修筑的用来挡水的栅栏，由拴在桩上的一捆捆芦苇组成。神像们裸露在室外，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

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堤坝。这是一幅象征这个国家现状的帝国残景。中国有这样一句的经典格言：“朽木不可雕也。”只有将朽木全部砍掉，老树的根上才能发新芽。中国永远别想关起门来搞改革，那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不久前，西方国家广泛地采取了一个观点，就是让中国通过加入“新型的国家联盟关系”而获得复兴。不过，中国加入这种“新型的国家联盟关系”过程正发生着，但促进它发生改变却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根据。如今，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他们到底为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多少有益的影响？最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间的国家关系恰恰是各方面的利益均衡，谁都别想占上风，并不对中国格外有利。中国人是敏锐的观察家，他们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那边看到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他们相信，那些国家发展自己国家的动机能比帮助中国人改革富强的动机更强烈？如今，既然中国自己都在被视为一个大国，她正忙得不可开交，试图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从中取利，却没想到从那些“掠夺”她而不是对她进行道德教化的国家那里学来一点什么。因此，如果中国想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

也有一些人坚信，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以及人们彼此情同手足般的友谊。只有商业主义的福音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她需要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需要取消各种过境税。或许，这样的话比之二三十年前，我们听得更少了一点。在这段光阴里，中国人已经充分地渗透进入澳大利亚和北美，其结果是，他们如今行为并没有有利于“自由交流”和“情同手足般的友谊”。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符合要求吗？这样的抱怨早已有之？这样的问题不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从西方进口的劣质货物相提并论吗？

商业的价值，作为一种文明的辅助之物，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之间能够知道去交换骨头。即使假设狗们知道这样去做，而且在一个大城市里，群狗们建立

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那么，这又会对狗的性格带来什么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而是最糟糕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完全不同，这并不能归因于贸易，而完全是由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商业如同基督教，其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的彩虹，总是在金色的那一边拐弯。

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看看猖獗的朗姆酒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成了。这些交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而两种都是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还不能说明商业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说的“物质文明”。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已进入文明社会几个世纪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调过。这种文明的骨子里没有任何改革的欲望。它的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一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文明，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那些总是发出嘲笑和鄙夷的人，不适当加以控制，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

中国人无疑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用以开发这个强大帝国中那些潜在的资源。他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有利于施加对帝国有利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开展呢？就与现代社会密切联系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超过化学。难道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复兴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入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如果中国人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制品不加以限制，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炸药制品，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

发展“物质文明”指的是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中国的全部需要的一切。将每一个城市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陆河上的汽船、完备的邮电系统、一家家国家银行、统一的货币，作为通信中枢的电话与电报——这些都是美好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

这也许就是张之洞在其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那份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杜绝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诸如水手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端吗？铁路能保证其雇员，甚至是其经理人的诚实吗？我们不是读过《伊利城之章》吗？该书写到，州与州之间的整段的铁路干道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而且“无人声称对此负责”。物质文明只是一个基础因素，是自发而起的，还是由一连串复杂的因素经过长期的综合作用共同造就的结果？把选举箱引进中国，就能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建立共和制度吗？如果中国不探求造就西方物质基础的条件，中国也就不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实现在西方的那种结果。创造这些条件的要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



上海外滩一景

目睹了香港、上海的现状，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习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经验，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的城市呢？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变革，如果强行设立了，他们会难以忍受。目睹了帝国海关在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卓有成效的管理，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海关的经验引入到政府上上下下的管理中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中国人采用这种课税的方法，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大不列颠公民的人格与良心经历了一千多年才发展到目前相当的水平，中国人不可能立即接受，并实行这一切，不可能像从埃森运来的克虏伯大炮一样，一架起来就可以随时开火发射。

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就像袭力斯·恺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征服者威廉入侵的历史一样确凿无疑。它诞生于基督

教，又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普通民众心中扎下根，它们也变得枝叶繁茂了。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是如何说的吧："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就如同犹太人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当今的世界，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高举这两面大旗是他们的主要义务，品行反倒成了一件普通的家庭小事。辉煌的希腊因不注重品行而在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类需要品行、沉静、人格的向往……不仅如此，在当今，即使是当今，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任何一门知识都受到高度尊重，且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的卓越地位，而是犹太人非凡正义的卓越地位。"

为了改革中国，就必须理清中国人的性格之本源，并努力使之净化。就必须在实际上推崇人的良心，而不能像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天皇那样，整天把自己蔽塞在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主要的代表说得好："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样低劣的本能炼出黄金般高尚的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中国人必须了解上帝，必须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并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总之，中国人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他们持久地、彻底地接受基督教文明，才能获得。

（全书完）

译后记　“国民性”问题的新思考

陶林

读完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余，一定要比译者本人有更多的感触和话要说。

姑且不论我们怎么看待明恩溥先生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如何，本书能够引起我们多大程度的共鸣，或者多大程度的不以为然。但我们能确定的是，他的很多话题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一定会引起我们种种的联想、思索与辩驳。

是的，明恩溥先生所涉及的领域，正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中国“国民性”问题。有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争论中最为风潮的主题之一。因为这个主题，造就了“五四”前后许多位文化大师：鲁迅、胡适、林语堂、梁实秋……他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立场各异，角度不一，但多是贬多于褒。对所谓的“国民性”，或者说“传统的、陈腐的、保守的、没落的”国民性，基本上都持有否定的态度。

恰如明恩溥先生所论及的，中国人疏于逻辑，总容易把因果颠倒。这一点，许多文化大师们毫不例外地把中国的制度环境问题与环境造就的人性问题颠倒因果，没理由的完全认定后者——即人性，以及围绕人性所衍生的社会文化，看成决定“制度”的完全条件。把中国的专制、落后，归罪于中国人的奴性上来。所有立志于改造中国和中国社会的文化大师，对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都持有一种“有罪推定”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一定是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的野蛮与狡诈等等。

我认为，这是对国人最大的不公平。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绝对有苛责国人之嫌。国家制度与国民性格关系问题，我以为乃是

前者决定着后者。道理很直观，国民性为水，国家制度为器。水随器而赋形，器能容水，水也能覆器。若器形太糟糕，把责任都推在水的身上，显然有失公允。梁启超先生曾撰文指出过，在多内乱之国，国民必定有种种劣性。无他，日子过得太艰苦，人性必多诈多恶，世界皆如此。

我曾一直强调一个理念，就是中国王朝时代的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军政府的统治形式。官有头有脸，有吏有兵，民则无权无利。官和民完全对立，官视民为畜类，民视官为仇寇，彼此间没有任何善意存在，顶多只有伪善。官方有所获，总是必须以民之有所失为前提。双方没有缓冲可言，任何的博弈，都只能以暴力为语言进行传达。

在这种设计得非常不聪明甚至算不上积极向善的制度环境中，永远上演着帝、官与民的三方角力。帝王依赖官僚享用民众，民众受官僚序列里最末、也是最集权的县官统治。国家制度永远在“君主政治”和“官主政治”之间滑动，不是君主独裁，就是官僚专制，总之，一直是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再不然，就是群雄逐鹿的混乱，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喟叹。民众弱而无助，只有在被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谓“欲做奴隶而不得”）的状况下，奋起反抗。

这种生存状态，在历朝历代的政治—权力—暴力高压下，进入了一个宿命轮回般的死循环。王朝时代的暗无天日与辉煌灿烂，中国人曾有的品性与精神风貌，都与之相关。

终身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鲁迅先生一辈子都很爱读《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即使在临终前不久，他还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如今这部书被翻译并推广，正是我们盘点鲁迅先生这份遗嘱的好机会。与鲁迅这样凭借直观追讨“国民劣根性”的中国大师们相比，作为基督教经院哲学所培养出的博士，明恩溥更严格遵守归纳法。从诸多直观的事例开始，与整体的理性判断结合，有章有法地来看待国人

的种种状况。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带着“殖民者”的眼光来打量中国的人与事。特别有所谓的“殖民理论”来支撑，这么一看似乎更像那么回事。但仔细推敲，依然会发觉它是有失偏颇的。

我之所见的明恩溥，似乎更像中国人的朋友。明恩溥先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和学者，无论放置于西方还是东方，他都是一个非常博学、极富有智慧的人，其学识水平，并不亚于我们中国现当代的若干文化大师。由于长年身居中国乡村，他与满清治下的中国的普通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他们的了解有如自己的老熟人。所以，他的行文没有救国心切的中国文化人那种夸张的批判、急切的呼喊、焦灼的忧思，没有为“搬一张桌子而要掀掉屋顶”的过激。相反，读者可见全书的理性、从容、尽最大努力的客观、不偏不倚，有时，作者的写作态度似乎太过于轻松，有不少地方，文笔之中还有一丝的调侃与戏谑——不过，对于“好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般写来，似乎有“戳人蹩脚”的嫌疑，自然会被敏感的国人不断拍砖。

综合来看，明恩溥所写的有类于观察报告，客观性强；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师们涉及国民性问题的作品则更多地像愿景书、或者发展观规划，主观性强。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因时代的境遇不同，观察的心态也不同，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接受的信息观念也大不一样。

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来看这部《中国人的性格》，更多地有用旧镜照新颜的感觉。我们更多信服于作者文笔的精准与到位，时有切中肯綮之感，往往有会心一笑，乃至拍桌感叹。对于有失偏颇的地方，也会报以宽容的一笑。至于这些描摹是否关系到“亡国亡种”，显然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我看来，除了好面子、油滑、孝道、仁义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之外，诸如忽视舒适、顽固、生命力顽强、缺乏公共精神等等大部分问题，其实更当属于人类的共性问题——或者，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人性”这股大水，在满清王朝末代的制度环境这个“器”中的形状问题。

毕竟，我们身处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境遇与一百多年前已经大

不相同了。这一切都归功于明恩溥先生所归纳出来的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勤劳、刻苦、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它们使我们能踏上现代之路。而一个民族，连同它的文化与文明能够经历五千年而大样不变的，固有其根据。这点包括明恩溥在内的西方研究者感兴趣，我们至今也感兴趣。

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为坚韧的一个民族，在做人态度上，中国人是典型的“植物哲学”，低调生长、野蛮生长、茁壮成长怎么都成，也可攀附高枝，也可百年树人，不管如何，都要传根保种、力争硕果累累，最终还要叶落归根。这是老祖宗们道法自然的结果，也是贫乏和农耕的产物。

中国人从很小开始就一直被“克己”着，家庭、社会、责任、人情、长辈、老师、长官……这一切都是大的，唯独自己是小的。中国人生为无数的秩序而生，自然的序齿要遵守，家庭的辈分要遵守，社会的角色高下要遵守，组织之中的权力高下要遵守。遵守到极致，就是“无我无人”，像田中一棵农作物那样安静。品读明恩溥笔下那么多活生生的中国人，我不禁猜测，不知他们是不是农耕王朝时代最后一批“传统作物”？当今，全球化浪潮之中，吾民与吾国的品种与品质改变了的，又有多少？

统观全书，唯一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明恩溥有三点是毫不掩饰的：身为外国人，他毫不掩饰对中国人排外的反感，希望中国能够更加开放；身为基督徒，他毫不掩饰想让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的野心；身为白人，他毫不掩饰地远虑到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竞争的问题，不断提请西方国家需要学习中国人的优点。我们不能把作者这些毫不掩饰的地方，作为侵略者的阴谋诡计来看。以平常心看平常态，那是他身为一个西方基督教学者到中国来做乡土研究的本职所系。

明恩溥先生是一个有大功于中国，却被中国人刻意淡忘的学者。我们中国人对之的态度，仿佛他是这样一个好好先生，见证了邻人最为拮据、困顿的过往。在那时，他热情地指出邻人的问题和缺陷所

在，热心肠地给予邻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与之共渡难关。虽然他给出了很多药方，因为文化差异性太大，当时看来几如天书，但他也做了许许多多务实的事业，帮助邻人治病，提高内在素养，等等。然而，有朝一日，这邻人挣扎着走出了困境，明恩溥先生，和他所标示的那个苦楚的过去，一并成了我们不堪、也不愿回忆的疤痕。

纵然如此，授人之利不宜记，受人之惠不能忘。作为跨越光阴的馈赠，明恩溥先生，连同他的这部智慧且有趣的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必为每一位中国读者所珍忆。有幸能够翻译这部作品，是一段非常美妙的体验与增益。由于我的英文能力所限，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针对其中不少问题请教过很多朋友，特别获得了韩利利女士很多指导与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1]译者注：此文为原书的原序，题目为译者所加。

[2]原注："中国佬"Chinamen这个含有贬义的词，似乎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英国人的语言之中。而"中国人"Chinese，这一恰当的单词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桩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在中国的外国期刊中，是否有一家不用"中国佬"这个词称呼中国人，在这个帝国中是否还有一位作家坚持不用这个词，我们就不得而知。

[3]原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这个版本在中国和东方广泛流传。

[4]译者注：本雅明·亨利（1850-1901），一位美国传教士，1873年来中国传教。

[5]译者注：这里作者是拿通行西方的国际象棋举例的。

[6]译者注：本文写于十九世纪，故这里是指十八世纪。

[7]译者注：这是英语经典的问候"howdoyoudo！"

[8]译者注：西尼·史密斯（1771-1845），英国牧师。

[9]译者注：玛士撒拉，《圣经》传说中的长寿者，享年969岁。

[10]译者注：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

[11]译者注：这里作者指外国客人。

[12]译者注：夸脱，英美液量单位。

[13]译者注：《格列佛游记》，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讽刺游记体小说经典。

[14]译注：德·昆西（1785-1859），英国著名随笔散文作家，代表作有《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等。

[15]译注：提图斯，公元39-81年，罗马帝国皇帝，曾率军镇压犹太人的起义。

[16]译者注：乃曼，《圣经·旧约·列王纪》里的人物，跟从先知以利撒的圣者，原为亚兰王麾下的将军，患了麻风病，求诊于以利撒。以利撒让其在约旦河水中沐浴了七日才得以痊愈。

[17]译注：匹克威克，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翁，他好讲多重意义的词汇。

[18]译注：雷尼，是当时英国驻华的使馆医生。

[19]译者注：这是希腊神话的一个典故，雅典王子特修斯自愿进入克里特迷宫杀死半

人半牛的怪物。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爱上了这个勇士，送给他一个线团，嘱咐他进入迷宫后放出线团，以便退出去。

[20]译者注：查尔斯·里德（1814-1884），英国小说家。

[21]译者注：这里指的是十八世纪。

[22]译者注：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著名小说家，与狄更斯、萨克雷齐名，著有小说《佛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23]译者注：芭蕾特·勃朗宁（1806-1861），英国诗人。

[24]译者注：这里指中英、中法签订的《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在涉及英法两国事务时，决不许用“夷蛮”这些字样。

[25]译者注：这里指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当年占领北京，咸丰皇帝仓促逃往承德。

[26]译者注：约翰逊（1709-1764），英国文学家，文艺批评家。

[27]译者注：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孤儿院里成长的孤儿。

[28]译者注：指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向北京进攻的事。

[29]译者注：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的司令，曾任美国总统，并曾在1879年访问中国。

[30]译者注：《论语》上讲，孔子不乱语鬼神力怪。

[31]译者注：语出《论语》一书。

[32]译者注：这里的鞑靼王朝，指的正是大清王朝。

[33]译者注：哈克·古柏查（1813-1860），法国传教士，曾游历过中国大部分的地区。

[34]译者注：指的是1883年—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起因为越南主权之争。

[35]译者注：醇亲王，即爱新觉罗·奕譞（1840-1891），是第一代醇亲王，道光帝旻宁第七子。

[36]译者注：语出《论语》：“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37]译者注：劳罗斯·布朗（1821-1875），曾任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

[38]译者注：这一段，作者用调侃的笔法来谈论中国人，写得不够严肃。

[39]译者注：弥尔顿（1604-1674），英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是《失乐园》。

[40]译者注：这里作者指匈奴和蒙古向西扩张导致的“黄祸”。

[41]译者注：原文有误，康熙皇帝于1722年驾崩。

[42]译者注：这里是指十七世纪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郑成功。

[43]译者注：此处《中国总论》的作者，即卫三畏。

[44]译者注：指左宗棠平息1867年新疆的阿古柏叛乱。

[45]译者注：斯多葛学派，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创始人为哲学家芝诺，主张宿命与禁欲。

[46]译者注：这里指的是清末的“丁戊奇荒”，从1876年至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二百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震撼整个世界。

[47]译者注：谢立山（1853-1925），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重庆、成都、台湾、天津等地的领事。著有关于中国的著作多部。

[48]译者注：语自《孝经·五刑》。

[49]译者注：语出《礼记》。

[50]译者注：语见《礼记》：“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51]译者注：语出《论语·阳货》。

[52]译者注：语出《论语·学而》。

[53]译者注：语出《礼记·内则》，意思是，无论父母做什么，都要顺从。

[54]译者注：即《论语》的《为政》篇。

[55]译者注：原文如下——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56]译者注：原文如下：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57]译者注：《二十四孝》相传为元郭居敬所编，收录了中国历史上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与传说。

[58]译者注：这里讲的是东汉陆绩怀橘敬母的故事。

[59]译者注：这里讲的是《二十四孝》中晋代吴猛的故事。

[60]译者注：这里写的是晋代王祥卧冰求鱼的故事。

[61]译者注：这是后汉时代郭巨埋儿的典故。

[62]译者注：指不养老与无后。

[63]译者注：语出《圣经·以弗所书》。

[64]译者注：这里指1773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与法国战争筹款，在北美波士顿抽茶税，直接导致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之一。

[65]译者注：撒母耳，《圣经》中希伯来的士师与先知。撒母耳的父亲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嘲笑另一个不生孩子。结果，后一个生下了撒母耳。

[66]译者注：乔治·D.普林蒂斯（1802-1870），美国诗人。

[67]译者注：这里所说的，就是英式的拳击。

[68]原注：据来自北京的报告，当今的皇帝就很不喜欢慈禧太后为他选择的妻子。他的意见总是与太后相悖的。太后作出的选择永远都不会合他的意，这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廷中的婚礼情况与他的那个臣民在婚礼方面的反应是相似的，就是“上行下效”。

[69]译者注：穆罕默德·雅霍甫（1820-1877），汉名阿古柏，被中国人称为“中亚屠夫”，为中亚浩罕汗国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以及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于1865年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后被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击败。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史称“阿古柏之乱”。

[70]译者注：霍桑（1804-1864），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红字》，深刻地描写了殖民地新英格兰的风貌。

[71]原注：但是，判断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决定。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中国山西省首府太原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不过，事实与正文所陈述的现象并不矛盾。

[72]译者注：所罗门，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王之子。出生于公元前1000年，于公元前930年去世。

[73]译者注：彭北莱（1837-1923），美国地质学家，1865年来华考察各地的煤矿储藏。

[74]译者注：罗伯聃（1807-1846），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曾把《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

[75]译者注：这里指天津教案。

[76]译者注：这里指的是“礼、义、仁、智、信”。

[77]译者注：基德教授（1799-1843），英国传教士。

[78]译者注：此处取自《论语》，原文是：“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79]译者注：此处是指“负责与遵法”一章中，作者论及的中国人承担责任的诸种问题。

[80]译者注：雅格和拉班都是《圣经》中人物，雅格是拉班的外甥，为了娶拉班的女儿拉结为妻，雅格为拉班牧羊。拉班百般刁难雅格。最终，雅格还是带走了妻子和羊群，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

[81]译者注：见《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82]原注：密迪乐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不少儒家弟子认为自己不信神，但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无神论者。

[83]译者注：古代通行惯例，在神像的心脏位置放置一块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金属，以让该神有灵。

[84]译者注：此意大概是指儒家对所谓“靡靡之音”的批评态度。

[85]译者注：语见《论语·述而》。

[86]译者注：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作品《希帕提亚》《酵母》等。

[87]原注：已故的贝德禄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最近为1890年8月北京《邸报》上刊登的一篇奏折证实了。写这份奏折的是督办云南矿务的巡抚唐炯，他在报告中提及了矿务工作与运输的条件，他说：“人们大量进行非法开采，官员们害怕独揽开采权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低价购进非法开采的铜矿石，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额外劳动，这一方法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我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采矿正常进行，也不会给外来侵入者提供借口。”不过，皇帝只命令税务署将这份奏章“记录备案”。奏折附文中，巡抚报告说，每月可以从非法采矿者手中买进一万斤铜矿石，但“不付钱，只供给他们油和大米”。他还说：“矿区的整体情况非常令人满意。”皇帝并不是

每天都能收到巡抚一级官员的汇报。许多人故意违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动他们，不过，油和大米可以使他们满足，一点点钱就足以使他们交出偷采的矿。正是由于藐视皇帝及其他官员，帝国的采矿业才“非常令人满意”。无怪乎要让税务署“记录在案”！